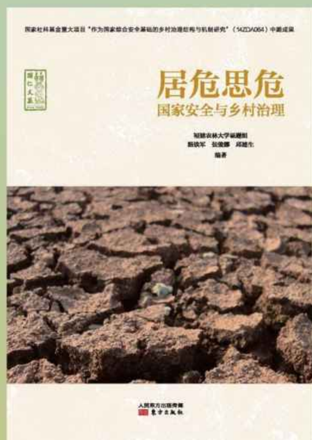
温铁军套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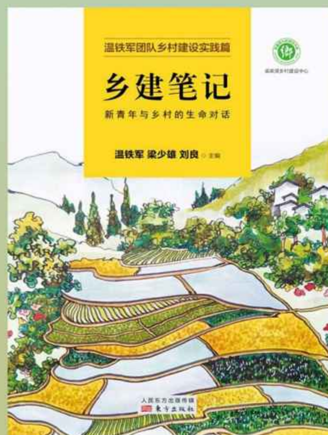
（共五册）


温铁军 · 著
告别
百年激进
温铁军演讲录
上卷
（2004-2014）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解构
现代化
温铁军演讲录
DECONSTRUCTION
OF MODERNIZATION
THE SPEECH OF WEN TIEJUN
温铁军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居危思危
国家安全与乡村治理
编著


CHINA
TURKEY
INDIA
INDONESIA
BRAZIL
VENEZUELA
SOUTH AFRICA
全球化与国家竞争
新兴七国比较研究
温铁军等 /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温铁军团队乡村建设实践篇
乡建笔记
新青年与乡村的生命对话
温铁军 梁少雄 刘良 主编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VIS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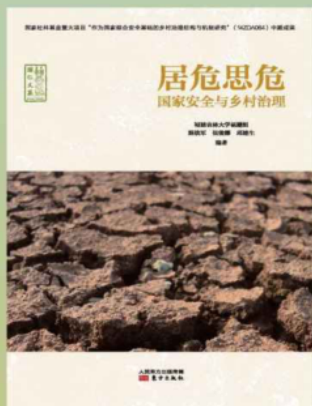
LANZAROTE Caliente.COM

温铁军套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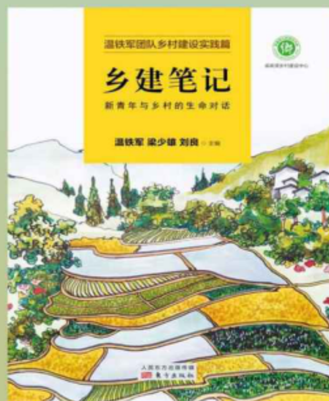
（共五册）


告别百年激进
温铁军演讲录
（2004－2014）
温铁军·著


解构现代化
DECONSTRUCTION OF MODERNIZATION
THE SPEECH OF WEN TIEJUN
温铁军演讲录
温铁军 著


居危思危
国家安全与乡村治理


CHINA
TURKEY
INDIA
INDONESIA
BRAZIL
VENEZUELA
SOUTH AFRICA
全球化与国家竞争
新兴七国比较研究
温铁军等／著


温铁军团队乡村建设实践篇
乡建笔记
新青年与乡村的生命对话
温铁军 梁少雄 刘良

目录

告别百年激进
解构现代化：温铁军演讲录
居危思危：国家安全与乡村治理
全球化与国家竞争：新兴七国比较研究
乡建笔记：新青年与乡村的生命对话

告别

告别百年激进

温铁军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告别百年激进／温铁军 著. —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060-8852-7

I.①告…　II.①温…　III.①改革开放 - 经验 - 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92708号

告别百年激进

（GAOBIE BAINIAN JIJIN）

作　　者：温铁军

责任编辑：郭　国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113号

邮政编码：100007

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版　　次：2016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6 000册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30

字　　数：370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8852-7

定　　价：52.00元

发行电话：（010）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85924602　85924603

We cannot solve problems by using the same kind of thinking we used when we created them.

——Albert Einstein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这句名言可直译为："我们不能用导致问题的同一思维去解决问题。"对应中国的老话，当为孔子所言君子"不贰过"。

——作者注

一部中国近百年史，从头到尾就是一部乡村破坏史。

乡村建设运动，实乃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这最末一层，乃乡村建设真意义所在。作乡村运动而不着眼整个中国问题，那便是于乡村问题也没有看清楚，那种乡村工作亦不会有多大效用。所以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

——梁漱溟

自序 金融全球化成本转嫁与中国生态文明战略

十年前的2004年，我出过两本书，都与十年后再出此书有关。

其中一本是演讲录，书名是《解构现代化》。当年即把同名的演讲整理出来在《管理世界》上发表；接着，美国有一位学者把我在中文期刊发表的文章译成英文在美国发表。于是，就有些学者由此而认为我是学术界中敢于“反思现代性”的人。对这个说法，我一直含糊着未予澄清。直到十年后的今天，当我把《告别百年激进》这本与全球化、战略调整、历史变迁等宏大叙事相关的、新的十年演讲结集出版的时候，才觉得可以认同了。因为，此书所做的教训分析指向明确，就是历代主流都要追求现代化的百年激进。

另外一本就是宏观问题的文章汇编《我们到底要什么》。这个书名，借用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进步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本名著的书名，但却没有借用他的副标题“新人的故事”，因为我们还没有善于在行动中反思的那些新人。如今我那本书已经很难买到了，但十几年之后则不必为人才不济而担忧。因为在中国继往开来的、去激进化的、具有改良性质的乡村建设体系中，在大众参与的、在解构现代化中不断建构和谐社会的创新中，却已经新人辈出了。

十年前那两本书很快售罄。几年之后，有思想界的朋友读过认为“增益”，便摘了其中一些文章，又搜集了几篇过去没收进去的，在日本和韩国分别出了日文版和韩文版的文集，一度引起了日韩思想界的反响，甚至在大陆和港台已经有读书会在精读和讨论我的著述。于是就有人劝我，应该再拿些所思所言出来发表，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吧。

现在这个集子收进来的是我在2004—2014年这10年间的宏观问题演讲。时过境迁，倏忽之间，我们在全球巨变中磕磕绊绊地走过了10年。出版这本与这种10年跌宕起伏的磕绊前行直接相关的宏观问题演讲录，也算是接续了上一部的分析。何况，一般的演讲录主要面向大众，基本要求是通俗易懂，既不必很“学术”，也不必把观点和数据资料都修

改得准确无误。但这十年我主要是在高校做理论联系实际的“比较研究”，自忖思想性和学术性也应该有所增强，这个新的十年演讲录也确实多了些学术性。

东方出版社把我的演讲录纳入出版计划已经很久了注，我也在早几年就签署了把所有文字都交给他们的战略合作协议。然而，在这十年间体现和传承近代改良思想的中国乡村建设事业不胫而走，遍及全国，乃至于在世界上也形成影响。需要我协调处理的事情太多，写作方面的进度也随之放慢。直到2013年我向学校请辞院长职务得到批准、也向长期参与“乡村建设”已经成熟起来的骨干们宣布今后不再介入具体工作，才有时间伏案。注

但当年5月我丢了电脑，几乎接近完成的几部书稿都没了！何况那年的新变化实在太多，我在被西南大学2011年“人才引进”之后，2013年再被福建省“百人计划”作为特殊人才引进，应邀在福建农林大学参与了第三个设在高校的乡村建设研究机构——“海峡乡村建设学院”的创办工作。注于是，这个书稿只好拖到2014年从头再来一遍。

此书既然是10年间的演讲辑录，那么，如果我还演讲，并且还在世的话，下一部演讲录应该在2025年出版。那时候，我应该是古稀有四了。按理，则已经是在“随心所欲不逾矩”的仙界了。

以上简述，是与这本书有关的说明。虽然可以用于自序，但实在太单薄了！如果序言应该偏重于作者对本书主要观点的介绍，那我可以用下面的文字来表述。

下面的文字，原是我最近一次于2015年11月做的演讲，刚刚完成文字整理，内容广博、图文并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近年来的主要观点差不多都在里面了。何况我讲的时候多次被听众掌声打断，讲完了很多人还觉得意犹未尽，可见接受程度较高。读者看完下文即可大致了解本书作者的主要观点。由此而放在序言的位置上，有质有量，不算太弱。注

……我们越来越有全球视野，应该把所遭遇到的国内问题，做一点与金融资本全球化有关的规律性分析。这样做分析，某种程度上是在提示民众：全球化的大趋势不可能被某个国家的单一政策，或者某一部分学者的单一批判所能够根本扭转。注因此在当代，我们需要增加对所处的全球化的宏观环境的认识，增加对人类各个族群、对社会事业的各个方面都具有挑战性的大环境的认识。所以，我要从全球化说起。

只要人在冬天的北京，无论红墙之内还是市井胡同，只要不来西伯利亚寒流，就得共享整个冬天的雾霾。注今天大家所感受到的一切，也都算是气候暖化的客观结果。包括官方说的粮食产量十几连增，很多人不信，问是怎么增上去的。按官方说法当然是政策好、投入高。但，这种问答都是过去的老说法了。不妨自觉更新知识，一旦和气候变化结合就知道：中国的所谓“粮食带”随着气候暖化已经向北推了一个多纬度，等于增加了一百多公里的空间，原来这些地方属于半干旱的荒漠草原，不适合种粮食，现在造成东亚地区农牧业分界的400毫米等降水线向西北推过去了，大宗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自然会增加。所以，用哪一个原因单独解释粮食增产都不大合适。

人们当然也知道，气候越是暖化，西北风来得就越少，风沙天气和沙尘暴也就减少了，但是雾霾就更多了。只要增加常识，就也别说是因为谁，或者什么政策，风沙就减少了。需知：气候暖化是人类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对大自然高度掠夺造成的全球趋势，谁也抗御不了。只要这个社会还在仰慕善于强取豪夺的土豪大咖，那谁都在静悄悄地做“贡献”。

北京除了雾霾举世瞩目，另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周围已经全部是垃圾填埋场，你还想有干净的水吗？不大可能了。垃圾填埋在地下，随着气候暖化，降雨增多，周围整个水资源环境已经是垃圾化了。当然它释放出的各种气味，伴随着雾霾扣在北京上空，整个大京津冀地区在地理区位的条件下搞一体化，谁想过整个从江淮一带建设起来的工业区和城市群的大规模污染，因没有横向山脉的阻隔而随着气候暖化一路上推到太行山和燕山山脉L型包围着的华北大平原？！那么，这个一体化也包含着长江领域及其以北的大面积污染的一体化。

何谓激进现代化的代价？

不论过去叫五年计划还是现在叫五年规划，不都是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吗？不都是把产业集群叠加在城市带上的吗？何况，越多的城市化，意味着越多的抢夺土地。

为什么我总讲百年激进？就在于这种激进起步且滥觞华夏不过百年！

目前的发展状况问题很多，其实应该说整个世界都紧跟着西方人引领的全球化的步伐走，但是，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却没法再有西方人那样的殖民化的历史条件。在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民国也追求现

代工业化和城市化，但遭遇了西方大危机演化成的世界大战，造成长期通货膨胀，遂亡于现代金融危机连带财政垮台和军事失败。现在我们追求现代化，还是因为无法向外实现殖民化，而势必遭遇到现代化的代价在内部爆发的情况，还是与民国几乎同样的麻烦。

诚然，很多人谈的是如何实现现代化，但是从来没有谁谈到现代化的代价。城市化有巨大成本，麻烦往往集中在我们这里，因为我们谈论的现代化是有制度成本的。并且要进一步指出：现代化的收益是少数人占有，现代化的成本却转移给大多数，这就更麻烦了。

现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历史教训的重复出现，当代中国人也遭遇到全球化过程中类似民国时的问题。全球本来就是资本过剩的，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现在加入其中，恶化了全球过剩。

当三大资本都过剩的时候，就会出现成本的社会转嫁。

现在的一些官方文件已经开始谈过剩了，但官方讲的只是产能过剩，经济处于下行期。如果我们往下看，就知道与民国当年的大危机有一定的相似性。今天全球最主要的问题是金融资本的虚拟化扩张。

1929年西方生产过剩危机爆发之前，民国原来使用白银币制，在西方生产过剩大危机持续深化的过程中，白银相对价格先是因为英、日、美先后放弃金本位制而上涨，到1934年又遭遇了美国出台《白银收购法案》这个突发事件打击而骤然大幅上涨，中国当时就遭遇白银大量外流，正在高增长中的民国经济——当年的中华民国经历高增长黄金十年，年均增长率8.4%，并不比我们现在低多少——受到了西方经济危机的直接打击。

那么，接着怎么办？放弃白银币制改行纸币制。

下图看到，法币最初发行的时候还有20块钱的小额票面值，还算是稳定的。接着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就变百万元大票了，到解放战争后期，个别地方的货币已经到了六十亿一张的票面值，为什么？因为严重的多少万倍的通货膨胀。于是民国政府二次金融改革，从美国借了5000万美金用于新货币的储备——1944年美国建立布雷顿体系保证美元与黄金的兑换率，其他国家的货币放弃跟黄金挂钩。由此，民国政府借着的美金可以当储备，于是要求全国放弃旧币改行金圆券，这张60亿的地方纸币下面的小字写着“折合金圆券壹万圆”。但是，只搞了三个多月就失败了，民国现代化的金融体系垮掉了，连带没有财政。当时80%以上财政

用于军事开支，民国现代化军队没军饷就完了，因此，很快就垮了。

民国现代化努力及其现代化军队为何失败

当年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怎样化解得了民国长期通胀大危机呢？就靠土地革命。是啊，今天仍然很多人批评，但在当年却有效地使近90%的农民人口“去现代化”，回归传统小农经济。既然民国危机可以叫做现代化危机，那么“去现代化”就是农民回家，政府就不用再管当时大约5亿的中国农民人口，只管占总人口10%的城里人。于是，农民回家自己种地，有吃有喝，还推着小车给城市和军队送农产品，所以，民国长期通胀大危机，靠着新中国的一个土改化解了。

据此我们说：中国农民革命带来的最大制度收益，在于用回归乡土传统化解了现代化危机。30年后，中国在1980年遭遇产业资本阶段的大危机，仍然是再次靠让农民回归传统加以化解，这次做法也被称为“二次土改”。

那么，乡土社会化解危机是不是中国经验？客观上看当然是。但是，所有照搬来的西方教科书，包括早期苏联和后期美国，都不了解中国经验。不仅是高校知识，从中学、小学看，哪个课本知识讲过现代化危机？讲现代化危机怎么化解的官方资料也没有。各种教科书只讲了农民革命的政治正确性，没有讲革命后回归了乡土社会传统。传统化解了现代化危机，这难道不是辩证法吗？

现在，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于2009年转化为全球危机以后，中国出现了经济下滑，这是GDP增长速度的下滑，这是二产制造业的下滑。2009年大危机以后，私人负债大规模上升。可见，全球危机导致中国发生“去工业化”。

现代化靠两大支柱：工业化和城市化。工业化是产业资本为主，城市化是房地产资本为主。既然2009年工业下降了，到2011年大量资金析出进入房地产，房地产从高涨到泡沫崩溃大约3年一个周期，于是2013—2014年房地产也下跌了。资金再次析出进入股市，就有了大批股民追涨“疯牛”……这些情况本来都属于常识，不重复了。

现在怎么办呢？形势比人强。总之，近年来的私人负债大幅度上升是很危险的，客观上带来银行坏账大幅度增加。风险还是主要在城市的现代资本部门累积！

刚才各位说农村劳动力老弱化，但是，一场大危机下来会有多少外出的人失业回家？不管愿意不愿意。过去，大家都说“一江春水向东流”。当危机到来的时候，哪儿是承载危机的载体呢？就是农村。就像1950年一个土改，缓解了民国危机，1980年难道不是“二次土改”吗？难道只有民国现代化造成危机，新中国搞现代化就不造成危机了吗？同样。

不管何党何派，何人领袖，收益与成本对等的规律不会跟着人改，规律就是规律。所以，我和科研团队的合作者按着这个周期性危机的规律写了一本书，叫《八次危机》，国内第一年就6次印刷，成为畅销书。海外已经出了繁体字版，明年1月出韩文版，年底出英文版。此书强调收益与成本对等，成本累积就表现为经济危机爆发。这对工业化是一个很好的规律性解释。其实周期性危机的理论，马克思以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都讲过。我的理论还没有回到马克思，回到的是马克思之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今天的思想混乱，只不过是愿意不愿意认识到、愿意不愿意承认规律而已。

在这种规律作用下，世界各国都搞现代化，会出现同样的三大过剩危机。其中，金融资本过剩是当代的主要矛盾。例如，现在很多银行存款增加了贷不出去，资金开始大规模闲置。此外，官方只承认产能过剩是有道理的，因为生产过剩被叫做“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金融过剩本源于工业过剩，同期还有商业也过剩。看看那些大商厦，售货员比顾客多。所以，当代中国出现金融资本、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等三大资本都过剩。这个情况跟全球三大过剩是一样的。可见，官方说改革产生的问题要靠深化改革，也很有道理。因为我们面临三大资本都过剩的复杂困境，的确是配合资本扩张的这种改革造成的。

我在演讲开始提到严重的污染。很多人也指出，农业产业化、大量使用工业品，是造成面源污染的主要原因。只要工业资本在继续扩张，生产出这些工业品让谁用？难道主管部门不知道这些工业品会造成环境污染吗？知道，但是能挡住自己工业扩张的步伐吗？主要是利益集团的影响，那协调利益集团是谁的事？

刚才说到了工业化时代的收益曲线，现在则是金融化时代右偏态的U型曲线，我们可以叫做歪嘴微笑曲线，这样对知识界大多数右倾才能得利的本源好理解一点。

所谓右偏态，是指右端的金融资本收益过高，导致中间产业资本收

益下降。因此在金融资本阶段，中国在制造业大国中占比最大，但它的困境也是最深刻的。左端的是收回了资源主权的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他们曾经借着金融资本增加流动性得到“搭便车”的机会，可以向国民支付社会福利开支，就一度得到拥护，但现在美国又把他们打回原形了。

全球金融化时代的“歪嘴微笑曲线”

在这张“国家竞争的微笑曲线”图上，伊拉克和利比亚都被灭国了，这些被灭国的资源经济国家回到出发点，变成了收益分配的45度线的最低端。还没有被灭国的，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这些国家，凡是掌握着资源主权的国家都被西方批判。

我们中国处在微笑曲线的最低端。于是，美国说：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其实是因为中国在这里（微笑曲线的底端），向人家的金融资本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向另一边资源主权国家也做了贡献，所以战略关系跟两边都好，也就是双重贡献，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地位。

因为中国有城乡二元结构，农村是劳动力蓄水池。城市产业资本一旦遭遇危机，大量的劳动力解雇就回流农村，这就是汪晖讲的“机会不公平”，不仅是二次分配不公平，能力建设不公平。因为二元结构体制条件下，80%的人属于非合同雇佣，处在“灰色地带”。城市还能够对乡村随意转嫁成本，《劳动法》为什么成了一纸空文，因为只有这种方式才能转化危机。

任何国家，大学生就业都希望去银行。金融资本集团为什么能够收益高，为什么能够转嫁代价，因为有“新三性”，这是金融资本的基本特质。“新三性”就是追求“流动性”获利所决定的“短期性”和“集中性”，它也决定着产业资本经济和其他资源性经济国家承接的“负外部性”。亦即，核心国家金融资本占有了收益，这个收益对应的成本则转嫁到外面的发展中国家。同理，国内金融资本的代价也转嫁到社会上，就变成社会必须承载的“负外部性”，被实体经济和资源经济——也就是被社会大多数人生活所依存的部分——承担。

今天我们所遭遇到的各种困境，就是现在的制度体系中鼓吹比较制度优势的那部分少数集团获利，这个所谓制度优势，在于能够甩掉巨大成本，如果只能对内转嫁成本就导致食品严重不安全，而上策当然得使

金融资本回归到获取社会平均收益率的资金要素的属性上。但是，能做到吗？我看不论换谁都做不到，因为金融作为一种资本力量，已经异化了。

因此，今天这个世界，只要是被异化于实体经济的金融利益集团所主导着的，请问我们大多数人难道不就得长期承受转嫁过来的巨大代价吗？也因此，如果不把问题认识到这个层次上，在任何局部、个别领域中所做的工作，都恐怕是事倍功半。

为什么是这样？实际上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到当代，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随着人口的过快增长，人均真实GDP每十年下一个台阶。那，什么经济在上涨呢？虚拟资本上涨快，以美国为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转型，形成比较制度优势，带动全球化出现的是金融资本的过快增长。

金融虚拟化由此发生，从1990年到2010年20年的变化，世界资本市场总值1990年是GDP的6倍，现在是15倍。

金融资本的新三性决定它一定是全球扩张的，客观来看，世界1944年放弃金本位制的时候保留了美元兑付黄金制度，1971年美元也放弃兑付黄金以来，货币信用的唯一来源就是政治军事强权。20世纪80年代随金融资本扩张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问世以来，美国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世界最大的金融资本集团，接着是欧盟衍生出的欧元资本集团，然后是日元集团和英镑集团，这些是主宰着世界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几个大的集团。

希望各位，特别是从事社会工作的朋友们，经常关注一下宏观形势，可能会了解世界为什么是这样。

现在比较新的全球挑战性的项目就是TPP，其最主要的本质是核心国家在新殖民主义时期构建的“治外法权”，要求跨国公司在国外投资，不能按接受国的法律处事，而是按照符合跨国公司掌握制度变迁内在利益要求的所谓国际裁判。发展中国家保护自己本土资源和经济主权的法律、政策都得放弃。当年通过民族革命建立的国家，一般都把跨国资本集团的财产收为国有，以此建立了支撑民族国家上层建筑的国有企业。但今天在TPP面前都要重新跪拜，据说为了公平竞争，必须取消任何政策优惠。货币权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经济主权，但金融资本流动要求无国界限制，TPP要所有接受外资的国家放弃核心经济主权，那就得是“金融无边疆”。

总之，TPP内在体现了属于新殖民主义的三大“治外法权”：一是金融资本自由流动；二是跨国公司不受接受外资国家的法律约束，投资所在国法律对它没有用；三是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不得优惠。这三个是今天TPP的要害。可见，TPP根本不是什么一般商品自由贸易，那是早期的二战之前老的帝国主义列强所争论的问题。

今天中国没有加入TPP，应该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据有关测算，中国不被纳入TPP，美国得到的利益每年不过区区几百亿美元；而一旦中国按照TPP的条件被纳入之后，则美国的获益会陡然上升到几千亿美元……

下图说明，其实全球化危机最大的影响是社会危机爆发。

经济危机期间无论何种体制,社会矛盾都会全面爆发

社会冲突在西方爆发，在美国也爆发，直接影响是美国现在不得温饱的人口从9%增加到19%了，因此既有《华尔街之狼》（电影）表现华尔街金融资本的贪婪，又有《侵袭华尔街》讲述被解雇的老实人最后杀了华尔街的老板。美国各种电影片子表达的是华尔街与大众的冲突。实际上，美国最主要的社会矛盾是占领华尔街的人们所提出的理由。尽管在发达国家社会矛盾同样在爆发，但是若是同样社会矛盾爆发在发展中国家，就被叫做“颜色革命”了。

对亚洲来说，这个世界上最稳定的地区就是完成了土地革命的地区。

整个东亚都属于平均分配土地的国家，不管叫什么主义，什么体制，谁当领袖，什么政府，都是一样的。平均分配土地之后就是一个稳态结构，不分配土地的就是菱形结构，菱形结构不稳定，容易在社会主义危机条件下转化为“颜色革命”。

印度土改是合法的，进展有限，于是有部分农民走向暴力革命，建立了革命武装，就是毛派游击队，农村地区白天是政府的，晚上是他们的。下图是我在印度游击区考察的照片，白天和平共处，晚上警察所长关门，游击队长管事。

印度合法土改转化为农民武装斗争

大量无地农民流入印度贫民窟，当官方要在印度推行工业化的时

候，大量的平民起来反抗，因为城市化和贫民窟导致了灰色就业占比90%以上。只是因为没有推进土地革命，所以印度的困难比我们大的多。

再看巴西，现在我们要实现70%的城市化率，巴西已经是82%，但是巴西的城市化率是一半以上人口在贫民窟。现在我们想做的巴西已经做到了。我过去一直说中国最大的制度优势就是没有贫民窟，现在不敢说了，因为我们现在大量的城中村人群就相当于贫民窟，他们提供了大量的服务性劳动，但是对不起，这些人却是属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注

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其实是城市贫民参与的归农运动，参加的人大部分不是农民，而是城市贫民。

巴西民众抗议公共福利政策

如果我们加快城市化过于激进，就相当于“空间平移集中贫困”——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大部分是靠贫民窟实现的。中国人需要理解发展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其结果可能比它们还差！因为巴西才1亿多人口，但是国土面积跟中国差不多。据此看，我们应该对城市化教训加以注意。

去城市化：城市贫民为主体的无地农民运动

因为拉美曾被彻底殖民化，失去民族国家的话语自主能力，知识分子大部分是西方化的，所以委内瑞拉的媒体、高校和知识界是反查韦斯运动的主力。下图中，左上是查韦斯与世界社会论坛的代表对话；左下是我们在委内瑞拉农村调查研究；右上的两个柱图分别是查韦斯时代的政策有利于社会公正：委内瑞拉的贫困人口减少48%，分配不平等减少67%；右下图则是学生为主的街头政治与警察对抗。

发展中国家知识界基本上是西方软实力控制。拉美国家的高校也难以发挥本国经济振兴的作用。于是，查韦斯就与古巴建立合同，古巴得到廉价石油，把过剩的知识分子廉价输送给委内瑞拉。因为古巴是全民免费教育，年轻人都可以上大学，但因美国封锁而没有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所以古巴知识分子过剩。查韦斯请他们到委内瑞拉，工资大幅度高于古巴，让这些仍然有革命思想的古巴知识分子加入两万个玻利瓦尔小组，下乡或者去帮助贫民窟的老百姓搞本地化的中小企业。于是，拥

护查韦斯的主要是底层社会的贫民和农民。

委内瑞拉查韦斯时代的反贫困政绩与学生反政府示威

过去的拉美殖民化的后果之一是农业领域的单一经济，外国资本控制大农场的产出，主要用于国际市场获利，却不为本国民众的需求服务。这就像我们现在放开农产品市场、让跨国企业进入农业占有农地，势必恶化本国食物安全的情况是一样的，只不过拉美被西方占领了很多年，是最早的殖民化大陆，现在想收回经济主权确实很难，只好组织过去在殖民地单一作物农场打工的小农们恢复多样化的农村经济。

拉美要学中国复兴乡村才能缓解贫民窟的大面积贫困问题。而拉美想达到的恰是我们现有的优势。相反，我们现在有些人想做的，就是再走他们殖民化的老路。双方都看着对方好，我们现在的麻烦是主流的学者们跟委内瑞拉的知识分子其实差不多，主流的观点跟他们原来的观点也差不多。

现在全球石油价格断崖式下滑，委内瑞拉财政收入随之大幅度下降，难以支付查韦斯发起的玻利瓦尔运动的扶贫开支，所发生的街头动乱恶化，过去主要是西方软实力掌控高校教师发动青年学生参加的，最近也有收入下降的城市贫民参加进来。这是在拉美有代表性的情况。

全球危机导致石油和原材料需求下降作为大背景，使非洲与拉美的遭遇类似。南非是矿产品积压、关闭矿场引发的大规模工人运动。二者只是参与主体不同。

如果我们中国没有现在这样多样化的乡土社会的支撑，现在很多资源枯竭型矿区——比如像山西、内蒙古等——大量裁人，没出现南非这种情况就烧高香吧。

只要经济下行，就会有大规模失业，就会转化成社会运动，在发展中国家被叫做“颜色革命”，在发达国家被叫做“街头政治”，叫法不一样，现象是一样的。

全球化代价转移的具体过程不多说了。

下面这个图，是金融资本核心国家怎样向发展中国家做代价转移的：左下是美国的开支扩张与税收能力之间的差距显著拉大，势必靠信用扩张应对财政赤字；右上是埃及解放广场运动中与警察对峙的示威群众。

看我们自己遭遇危机之后的发展经验，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大规模投资，结果是用长期过剩掩盖了短期过剩。

当然这个话说的不全对，我们还是有很大成绩的。

主要看中国应对全球化挑战的过程。此前，1997年遭遇到了第一次打击，就是东亚金融风暴。前不久我跟韩国朋友在一起交流谈到，他们是单一民族国家，国家就是民族，民族复兴就是国家崛起。所以国家领导人能够动员老百姓把自己的金银首饰、珠宝捐出来重建国家储备。同理，东亚社会的另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就是日本，单一大和民族，也能对抗危机。所以日本1990年陷入泡沫经济崩溃之后的长期衰退，但社会稳定，至少不出大事。

我们这种多民族国家如何缓解现代化巨大代价造成的这些社会矛盾？虽经百年探索，仍然悬而未决。近代以来不论清末还是民末，每次大规模发生革命，都有几乎被列强操纵民族分裂、国家解体的风险。很多笃信西方列强制造的冷战意识形态的所谓学者专家，绝对不会讨论那两次代价！

新世纪以来，承载并且化解输入型的全球风险很大程度上要靠中央政府勉力“做多”——大规模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因为我们是超大型大陆国家。这一点，北京大学的林毅夫20世纪90年代末期到现在，一直比较客观地作出过分析。

每次参与我们这个大国的宏观问题讨论时的这个感觉，都有点像穿越，2500～3000年前气候变冷的时候六国都得修长城，无论怎样努力最后还是秦实现了统一，这就建立了一个庞大国家的战略纵深，同时，秦还统一了北方各国长城，那才能挡得住游牧民族在气候变冷生存危机压力下的全面南下掠食。

这与罗马这个环地中海大国灭亡之后，欧洲三次遭遇维京人因气候变冷而全体南下掠食的情况类似，那是千年黑暗的欧洲封建制的外因。但，欧亚不同的历史变迁内在的道理，几乎是一样的。自秦以来“去封建化”，老祖宗给中国留下的是能够有地理纵深而抗御北方民族南下掠食的大一统国家，不是欧洲社会那种数千小国林立的漫长封建历史，那才是千年的封建主义黑暗时期，而我们从2500年前秦变法求统一，就开始“告别封建”了！

据此，千万别随便就说中国至今都是由于几千年封建历史遗留的问题。

秦统一形成的就是大一统体制，是集中制而非封建制国家。当气候变冷的时候，北方游牧群体全线南下，农业国家遭到北方游牧部落全部南下掠食怎么办？长城是挡不住的，长城是当年的信息系统，得有战略纵深才能准备力量御敌。所以中国这个超大型大陆国家的国家形态变化，主要是气候冷暖沿着400毫米等降水线来回变化的客观结果。别再跟着外国人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说中国是两千年封建制，那是无知。

以上故事，是要重新认识我们这个国家应对危机的道理。

今天我们能够抗御全球危机，是因为有一个庞大的、有战略纵深的大陆。也因此在列强瓜分世界的时候才有人说中国太大，得分割成七块，目的就是要打掉中国的战略纵深！这个企图至今仍然以多种软实力表达，绝对不会是好意。为什么现在韩国急于跟中国整合，因为半岛离不开大陆，日本为什么急于修复关系？那只是一个岛，没有办法形成战略纵深，没有办法解决生产过剩，只有到大陆这里来，才能活下去。

道理就是这样，现在我们还能维持增长，主要原因是1998年以来连续的大规模投资。下图是中国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投资拉动增长。

中国新世纪发展经验

从1998年遭遇生产过剩危机以来，我们一直是靠投资拉动的，已经17年了，当然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破坏，大量的土地被征占，农民都想留住自己那小块地。在座如果有谁家还是农村的，请千万告诉家乡父老，无论谁来要你家那块地，别给！拥有土地产权的农民，原则是“许租不许卖”。中国一定是资源短缺的，只要家是农村的，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地，HOLD住，别卖，无论谁来要，只租给他们，不能卖给他们。

当中国不断地向内陆纵深做大规模投资的时候，产生的客观结果是弱化改革30年来拉大的三大差别。

一是区域差别再平衡。注意，世界上谁能这么干？唯中国能干。二是城乡差别再平衡，也是中国人才能干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保住了国家的货币主权，没有像我们那些激进朋友们所说的，中国的问题只是放开不够，必须全放开才行。而我们说，幸亏把握住了，当年WTO谈判的

时候因为朱总理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出身，把其他的产业保护全放开了，唯有金融三大领域不放，亦即银行、股市、保险不放。等到与美国签WTO的时候又被压得放了保险，最后坚持住没让的，就是金融的银行和股市不放，股市只放开一小点叫QFII，表现好就给一点，只有几百亿美元额度的外资可以进入中国股市。于是就有很多跨国公司招募高干子女做高管，开展对中国高层的“公关”。

现在，需要新一代领导人采取措施加以缓解的，主要是愈益拉大的贫富差别。

但是，现在金融也接近要全面放开了。

前些年没有放，中国才能凭着自己增发货币，增发国债，投入基本建设缓解生产过剩，带动劳动力就业，度过了全球危机，这是典型的输入型危机条件下国内的逆周期调节，就是政府直接“做多”；投机资本操控的“多空大战”无论多么眼花缭乱，最后都是要“做空”的。

只有“做空”，金融大鳄才能抄底、洗劫……

今天有些激进的朋友，归纳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只是因为深化金融改革不够，市场自由度不够，资本全球化不够……等等，这一票人马客观上是利于投机资本“做空”中国的。另外一批人马无论如何还是“做多”的。诚然，最可怕的就是在危机条件下跟着投机资本“做空”中国，不论这个主张多么美好，都是顺周期的。

何况，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把握住经济主权，大都进入“颜色革命”了，中国现在不发生，不是维稳投入多高，而是因为中央政府现在还有在国内继续“做多”的条件。因此，我们说中国的可持续，最核心的是经济主权如何把握，切忌激进的毛病。

问题是：中国人百年认同的激进现代化可以质疑吗？

当经历了这些全球化的经验教训之后，再来看一些我们自主创新的概念。

1. 现代化（不论是否工业化）＝ 人类近代历史中的一个资本和风险同步向城市集中并周期性爆发危机的阶段性过程。

2. 资本（不论国有私有）＝ 人类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制造的、反过来控制住极少数人群使其反自然的一种异化物，主要作用在于促使多数人及他们生存依赖的资源等客体化成为“被资本化”产生利润的要素。

3. 政府（不论何种制度）＝ 人类制造的由极少数人控制的异化物，因其反过来强制性统治多数人而无论如何改造也难以达到其应该达到的公平公正。

4. 制度变迁（不论何种主义）＝ 原来占有收益的集团为了占有更多，并把形成的风险及其代价向外部转嫁的一种文化现象；不能顺畅转嫁代价则变成强制性变迁。

5. 法律（不论何种意识形态）＝ 政府执行统治的一种规范工具，是主要用于保护和规范收益及分配等相关社会经济活动、体现最低道德约束的一种制度文化。

现在我们的理论研究应该跟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的解构有关。前辈学者中，萨米尔·阿明是非常著名的第三世界的理论家，另一位是美国比较早提出生态文明理论的约翰·柯布先生。跟他们的交流，使我们形成很多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辩证应用。

我为什么在研究上要强调“去西方中心主义”？

当我们看到万年气候变化周期图的时候，正好跟人类的社会变迁紧密结合。由此可以参考下面这张图。

地球气候万年变化图及其对人类社会变迁可能的影响

注：图中横轴是年数，竖轴是温度，虚线是20世纪初温度。IPCC报告中原文：“The dotted line nominally represents conditions near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资料来源：WRO, UNEP, IPCC：Climate Change: The IPCC Scientific Assessment (199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文字为作者在广泛交流和考察各国、各地博物馆后归纳整理而成。

在欧亚大陆上所形成的人类社会变迁和早期的农业模式有关。

我们东亚这里长江黄河的“两河流域”原生农业叫一次农业，北方是狩猎畜牧为主，东北亚和东南亚这边都叫做二次农业。

同期，欧亚大陆西亚那段的两河流域也是原生农业，两条河在那里间距比较窄，因此是单一作物小麦，派生出的思想、文化、哲学等体系有一元论的特点，因此刚才有人批判西方中心主义，这是从西亚开始的单一作物的人类生存方式演变出来的。

相对而言，我们则由于两河之间的距离太长，北方和南方的作物类型完全不同，因此他们之间的交流碰撞使亚洲思想文化一开始就是多元

作物所派生的多元农业文明。东西方这两大文明体系本来在根上就不同，演化出来的历史过程也不同。

所以，当我们讲生态文明是以多样性为基本内涵的时候，它主要应该发生在东亚。而西亚以西是两河农业派生出的二次农业覆盖欧洲，再进一步派生过去到英伦三岛，那是后来的“日不落帝国”，通过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所谓大规模单一化、集约化等。这些都是西亚狭窄两河的单一作物所派生出来的后续演化方式。

既然东亚多样化为内涵的生态文明也延续至今，那只要我们不那么激进，就还能转向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把刚才的气候变化周期和在东亚地区所形成的多样化生态文明做一个结合，就应该明白万年乡土的中国其实本来就是可持续的。

11月19号我们要开一个世界有机农业大会，海内外有机农业的代表都会来参加，这似乎巧合地呼应了百年前的故事。清末，有一个美国土壤局的局长富兰克林·金博士来东亚考察，认为现在东亚社会的小农经济比美国的单一作物大规模集约农业更具有可持续性，写下了《四千年农夫》一书。百年之后我的博士生不仅翻译成中文发表，而且译者就是这次世界有机农业大会的主要发起者。我们今天应该借此告诉大家这个一百年的回归。

为什么六国长城当年都是沿着四百毫米等降水线修的？如果我们重新用万年气候变化图，来解读那时的中国历史，会给出一个不同于以往的那套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解读，希望大家愿意把这些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我们来看最后的摘要，根据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提出的主要观点如下：

1.危机论——引发世界大战的西方产业资本过剩（生产过剩）导致战后产业对外转移，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与超级大国冷战下的产业资本阶段性对外转移直接相关。随之：

一方面是主权外部性风险——接受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接受了内生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导致的社会冲突增加。执政者无论主观认可的意识形态如何不同，在承接外部产业资本的同时，都会因其自身客观上处在资本极度稀缺压力下而普遍采取“亲外资”的政策，而一般性地顺应投资国涉及主权的制度变迁的要求。凡属坚持维护国家主权独立的

国家，就会由于对已经进入的外资发生艰难“去依附”，而导致国内的复杂剧烈矛盾爆发……

另一方面是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环境危机——进入工业化就都会随承接外资增加内生性的“资本增密机制”和本国民族资本原始积累而导致资本风险不断积聚。值得比较的真实经验，应该是不同执政者应对危机的不同宏观政策调整，成为其制度变迁或体制改革的内因，以及产业资本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对环境的严重破坏导致资源环境危机。

2.成本转嫁论——当代全球化的实质是经济结构高度化国家的巨额制度成本向外转嫁。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和体制不同，面对全球化挑战的差别显著。

经济主权残缺国家一般会被迫趋向于再次“被殖民化”；而主权相对完整的国家虽然应对巨额成本转嫁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大都趋向于加强本国政府对国内核心经济主权的国家控制。

凡属能够把握资源主权的国家，就能够有客观条件通过自主货币化占有部分资源资本化收益，也就可能实现国家竞争的微笑曲线理论模型提出的倒U曲线上推，应对单极世界币缘战略所内涵的正U曲线向下转嫁成本的压力。

全球化内涵的制度成本层级向下转嫁的趋势，最终会使承载成本过多的弱势群体向不能发声的资源环境转嫁1%的少数人过分贪婪和无耻的代价，反过来造成毁灭99%人类社会可持续的环境灾难……

其实现在我们面临的主要是周期性危机及其成本问题，危机爆发之后一定是有成本转嫁的。

我们的研究表明，改革之前就有三次周期性危机。只不过每次危机爆发都搞上山下乡，也就是把城市过剩劳动力转移到农村，由社队集体化承载了危机代价。所以计划经济时代的各种现象，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主要归罪于所谓人治。

何况，改革之后也是有周期性危机的，并且也和领导班子换届的政治周期高度吻合。

虽然，根据这些周期性波动形成的理论分析，到目前为止恐怕还不能被主流所接受。但据此，我们也进一步认为生态文明的提出，是在三大资本全面过剩的危机条件下，国家做出的战略调整。

最后，这个图片表明，中国仍然是稳态金字塔结构。

中国的金字塔形双稳态经济/社会结构

经济稳态的原因是，17年来大规模基础建设投资使得实质性资产的价值总量大幅度增加，因此我们的基座是稳增的实体资产，中部是对应实体经济投资而大幅度增加的金融资产，最上部是政府逆周期调节形成的债务资产，两部分加总的总量仍然小于实体资产。这个把实体资产作为分母来对应金融和债务资产的客观比重，国家可以通过对实体资产的持续投入来相对减少，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经济稳态金字塔结构的成因。

中国特色的社会稳态金字塔结构，主要是农民两次平均分了地以后，客观上都变成小有产者或称“小资”，中国之所以不爆发“颜色革命”的主要原因，就是“小资”这个汪洋大海不属于走向革命的自觉阶级。中国社会的底座是小农经济，虽然现金收入能力低，但不属于赤贫，所以底座稳。现在社会上的毛病出在“中资”，作为新生资产阶级，容易受西方影响，声音比较杂乱。但中国真正的大麻烦却在于政治化的“大资”，因为国家发展方向很大程度上把握在“大资”那里。如果“大资”懂得只有乡土社会稳定他才稳定，那么，“大资”掌控的国家政治化只要方向转过来，就能够有效推动中国转向生态文明。

但愿，我们的未来不是“梦工厂”制造出来的。

东方出版社准备出版的演讲录是上下两册。这个上册是我已经完成清理的宏观问题的演讲。我没有完成清理的是下册，有关“三农”问题的演讲。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改原农业经济系为“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之初，于2004年7月53岁“高龄”被学校请回来担任该院的首任院长，连续两个任期之后，按照规定应该在2012年辞职。但几次打报告都未获批准，直到2013年才终于辞职。此外，我本来给自己设计的是60岁退休之后用10年时间写作，但到我60岁的2011年，乡村建设事业方兴未艾，我虽然先后三次向大家宣布退出实际工作，至今仍然没有完全退出来。

我参与创办的第一所完全民办的乡村建设学院，是2003年7月与河北省定州市东亭镇翟城村的村两委合作，联合了国内外进步学者和组织创办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我被推举为理事长兼院长。但，该院于2007年4月12日被取缔了。当代乡村建设的培训和指导工作主要由2005年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承担。不过，这也是近代史上第一个设在中国公立高校的乡村建设机构。到2011年，我应邀参与筹办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学院于2012年正式揭牌，2013年成为该校的计划单列科研机构，总算是当代乡建知识分子继承前辈遗志，恢复起20世纪40年代由晏阳初和卢作孚联手成立的乡建学院。2013年，我通过福建省人事厅的“百人计划”被福建农林大学聘为讲座教授，参与创办了“海峡乡村建设学院”，这是第三个设立在高校的乡村建设机构。

本文原稿，是温铁军2015年11月14日在中国农业大学西校区参加“可持续发展论坛暨滋根基金会20周年纪念大会”的发言记录，已经本人审阅修改。

这个对全球化的认识，也是我们长期坚持乡村建设改良运动的原因之一。

北京2015年11月入冬之初气候异常，先遭遇到严重雾霾，接着是雨雪交加。

俄国19世纪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目　录

自序　金融全球化成本转嫁与中国生态文明战略

第一部分　资本全球化的宏大叙事

第一节　人类创造的两个异化物注1

第二节　全球资本化与制度性致贫

第三节　国家竞争的“微笑曲线”注4

第四节　欧债危机实属政治危机

第五节　日本研究中的另类思考注6

第六节　从北非“街头政治”看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注10

第二部分　现代化困境

第一节　现代化高成本的预言：奥巴马-金正恩难题注1

第二节　解构中国现代化注2

第三节　人民币的故事注3

第四节　我的三个困惑注4

第五节　中产阶级的“去城市化”注5

第六节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注6

第三部分　新世纪的真问题

第一节　中国进入21世纪之初的宏观调控注1

第二节　政府公司主义体制的发展及其改革的路径依赖注2

第三节　我们是怎样失去并又重新得到迁徙自由的注3

第四节　资本下乡的交易成本与乡村建设中的社会企业注6

第四部分　大国忧思

第一节　用脚做学问：我的两次狂野游历注1

第二节　执政党面临的两种挑战注2

第三节　中国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吗注3
第四节　毒奶粉背后的经济学思考注5
第五节　中国工会与西方工运注6
第六节　金融异化与学术异化注7
第七节　中国林改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意义注8

第五部分　区域发展比较研究
第一节　社会变迁与政府治理的中西差异注1
第二节　解读“珠三角”的发展规律注2
第三节　全球危机与苏南经验注3

第六部分　生态文明与新型城镇化
第一节　全球危机与生态文明注1
第二节　生态文明与中产阶级下乡注2
第三节　城乡一体化与新型城镇化注7
第四节　新型城镇化与平民教育的创新注8

后记

第一部分　资本全球化的宏大叙事

第一节　人类创造的两个异化物注

既往的发展经验不外乎证明了一个古典的政治经济学道理，马克思主义早就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然，某种条件下，上层建筑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这种反作用往往意味着巨大的代价。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上层建筑都超前于本国的经济基础，因为那是宗主国留下的。

很多国家形成的政治主权，是通过交易方式获得的，因此，他们在经济上就根本不可能建设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因为国家经济资源已经被交易掉了。这些经济资源被谁资本化、货币化了呢？被原来宗主国拥有的跨国公司。因此，这些国家就只有在宗主国恩赐、资助的时候，才能维持这种西化上层建筑，如果宗主国不给钱，西化上层建筑就会立刻垮掉，国家随即陷入动乱。

这就叫上层建筑根本不适应经济基础，并且由于成本过高而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所以，发展中国家到目前为止的发展困境，我们称之为“南方陷阱”，究其原因其实很简单：越维持西化上层建筑，就越无法发展本国经济基础。

只有个别的案例算是例外。比如委内瑞拉，是通过查韦斯革命才把经济资源主权收归了国有，由此就成为了一个特例，但也因此,它成为了西方的主要敌人。

中国为什么老挨骂？因为中国也是特例，不仅是通过土地革命战争的暴力革命建立政权，没收全部外国公司在华财产权益和前政府的官僚资本权益，一开始就没有与宗主国交易所造成的主权负外部性，而且还是一个因“去依附”而终于进入工业化的主权国家。这一点，在萨米尔·阿

明的理论中已经讲得很清楚。注

马克思和韦伯分别指出，人类在资本主义文明这个历史阶段创造了两个异化物，一个异化物就是资本——马克思讲得很清楚，资本是被人类创造的。人类创造资本，这个异化物反过来把人类异化为可供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劳动力要素，这就是马克思关于资本问世的基本判断。马克思没说而韦伯意识到的是什么？政府也是人类创造的异化物。我们把这两个理论结合之后接着指出，政府这个异化物被人类创造出来，反过来把人异化为什么呢？异化为政府治理之下的“公民”，当然配套的还有一系列的法制体系和公民社会等。

在我的理论框架中：政府和资本之间一般是内在结合的。

不论何种意识形态、何种主义、何种制度，政府都会服务于资本，这是政府的正常职能。为什么呢？因为要现代化。而现代化意味着资本的不断集中，资本在哪集中呢？在政府所在的城市集中。这道理越讲就越清楚了。

因政府的主导而使资本集中，而资本集中必然会同步发生等量的风险集中，同步等量的风险集中一定会导致危机爆发。于是乎，政府一定会帮助资本把危机代价转嫁出去，这也是政府的主要职能。当然也不那么绝对地一面倒，比如，最近十年来中国政府是讲究民生、追求科学发展、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的。

把经验形态的东西上升到一般规律是做理论研究的一个责任。我们只是客观地说，人类在资本主义文明这个历史阶段创造了两个异化物——马克思和韦伯各说了一个，我再加上对二者相结合的认识：麻烦在于这两者是内在结合的。于是，今天的各种各样的现象就都得到了解释。

经济学先后提出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关于市场失灵，其实就是资本失灵；所谓政府失灵，也就是政府异化为资本的同类。总之，道理是一样的。

只要把这些理论稍微结合，就是理论创新！

当资本和政府这两个人类异化的东西结合起来的时候，资本主义就会把全球国家分类，穷的都是农业国家；富的都是城市化国家；不穷不富的，是正在过渡时期的叫作新兴国家（emerging country），这类国家正在搞工业化、城市化。

这样，就为发展主义理论的庸俗化传播打下了知识基础。

但是，真实情况是这样吗？不是。

人类历史上至少有5000年农业文明史，而资本主义文明，连同血腥地反人类犯罪的殖民化时期都算上，也只不过500年，进入产业资本以来不足200年，是前者的1/10或者1/20。人类5000年历史上，农业都是养人的，人类发展的最主要部分应该说都是农业贡献的。

我们看农业社会，其实村落制和部落制本身并不一定是落后或者进步，因为村落制是符合农业要求的——农业内生性地需要人们群体化地聚落而居。因为，农业很难让个体来操作，动物和植物的自然生长过程太复杂了。村落也好，部落也好，都是群体化的农业社会。在农业社会中，由于人们以群落聚居方式存在，因此，在农业社会时期，群体文化居于主要地位，而不是个体文化。

而这种群体文化，已经在人类社会中传承了几千年，切不可因为500年资本主义文明史，就用个体文化去取代群体文化。

个体在某些领域中确实有构建理性逻辑的条件，但并不意味着在所有领域中都可以。

因此，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比较强调“东方理性”，其中最主要强调的是村社理性，这是一种群体理性。村社理性的基础，则是农户理性。应该重点研究中国特色的农户理性和村社理性，要把农户和村社共同作为农村的行为主体。有主体，才有机制。

这个世界所遭遇到的所谓常态危机，无外乎是随人口的增长引发的产业资本的对外转移，这并不意味着世界的真实GDP有所增长，它是随着人口增长而下降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体系，把经济中的泡沫过滤掉，结果是：从20世纪60年代西方完成战后的二次工业化恢复、开始产业转移以来，世界的人均真实GDP随人口每隔十年增长一个台阶而下降。因此，这是常态化的危机。

对于产业资本时代，这本身应该是正常的现象，人们看到有收益，无非是成本转嫁出去了；成本转嫁到一定程度，表现为代价爆发，演变成一般的危机。

那么非常态的危机，就是某些具有主导地位的国家可以超强地转嫁其制度成本。

也就是说，现代化政治其实意味着政府债务的增加。只有在拥有世界最大的军事政治强权的时候，才能够创造世界最大规模的货币信用。战后，货币信用不再产生于黄金储备——1944年西方世界就放弃金本位制了；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就解体了；此后的货币信用既不产生于商品交换，也不产生于拥有多大的实体资产。那货币信用本源于什么？本源于国家强权。

现在，世界上仍然以美元货币为主，美元货币占世界货币总量的接近70%，美元储备占世界各国政府货币储备的60%以上。为什么？当然，一般的政治家、经济家都会告诉你，因为大家对美元有信心。是吗？如果是，为什么？因为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家都相信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所以不能垮。由此，美国的货币无论怎么滥发到泡沫化的地步，也能维持。

不妨拿欧美做个对比。

现在很多人说欧元要解体，为什么？是因为欧元区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众所周知，北约（NATO）是美国控制的。欧洲人曾经想搞欧洲军团，遭到美国人反对，就没搞起来。所以这个世界真要出问题，得看那个拥有最庞大的军事力量的国家在做什么——他们在过量制造货币、过量增加债务信用，这就意味着他们当然有能力向全球转嫁危机！

——美国人赢了，全球都输惨了。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全球危机和贫富两极分化的关系，无外乎就是：起着主导地位的金融资本利益集团因可以凭借庞大的军事实力而造成发展中国家、弱势国家承担过多的代价，最后使这些地方危机爆发、日益贫乏。

当然，再这样下去，这个世界持续不了多久。当我们把全球危机的本源追溯为现在的制度的时候，可以参阅我在2001年的一篇对话体文章《全球化与世界法西斯》。

今天的全球币缘战略和军事霸权支撑的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客观地看，就是金融资本的法西斯化淫威滥施于世界！因为金融资本同时具有寄生性和排斥性这种内在矛盾，由此不仅与产业资本一样具有排斥劳动和社会、排斥环境和自然的特性，而且还因其异化于实体经济而排斥产业资本！同理，这也是当代金融资本不断走向自身反面——金融危机与战争动乱频发的根本原因。注

第二节　全球资本化与制度性致贫

世纪之交已过10年，除了中国之外的世界各国都没有如期完成联合国制定的、各国领导人郑重签署的“新千年计划”。更吊诡的是：完成了新千年计划的中国却越来越成为西方带领的、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主流话语批评的“靶子”！甚至国内外谁都可以凭借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内含的“政治正确”随意敲打中国，而邯郸学步般地跟从西方话语的主流中国人也恨不得自断股肱……

由此，怎么看待全球二八开——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规律，就成了中国人能否有效地把中国经验从特殊论提升到“一般论”的理性高度的重大话语权问题。

于是，今天的题目是全球资本化与制度性致贫。

（一）理论创新：成本转嫁论——全球金融化是如何加剧制度性贫困的

首先，我们提出了不同于主流的问题意识：随着战后西方产业资本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发生的全球化及其派生的制度性贫困问题，已经在世纪之交出现了重要的、但却被学术界视而不见的结构变化。

一是从政治上看，越是政治现代化国家其制度成本越高，越难以化解债务危机。因为，虽然世界上的政府负债已经从发展中国家负债为主，转变为发达国家政府负债占比高达70%以上，但那些因长期忝踞发达国家地位而构建了制度权和话语权的“新债务国”们，却根本就不会认同他们自己确立的债务国必须接受债权国制度要求的原则。结果是：新债务国显然都趾高气扬地赖账，理直气壮地索要债权国“救助”，一度最亮丽的世界主流秩序势必被其构建者“始乱终弃”……

二是从经济上看，越是结构高度化的超现代经济体，基尼系数越高。其中，最发达的现代化美国GDP的85%以上来源于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其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超过0.5，大约1/5的人口不得温饱，属于高度现代化条件下拉大贫富差别的典型。在中国最现代化的香港特区GDP的80%以上来源于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并且也是基尼系数高于大陆大部分省市的地区。在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占比最高的是印度，其贫困率也高达1/3以上（民间组织认为1/2），属于贫富差别拉大、贫困问题严重难以缓解的典型国家。同理，如果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或现代化大

城市愿意把外来打工者纳入本地贫富差别统计，也会出现基尼系数显著提高的现象。

归纳已发生的经验过程可知，体现“西方特色”的政治和经济越是高度现代化，反而产生的贫富差距更大。高度现代化与贫富差别拉大这二者之间，客观上存在因果关系，只不过构成这种因果逻辑的变量及其结构尚待验证。

其次，自从华盛顿共识问世，人们就自觉不自觉的接受其规定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内涵：世界只有20%的国家和地区的人口（白人及其后裔为主），已经进入现代化，另80%的人口（有色人种为主），很难再进入现代化。另外的派生内涵是，因为20%的人口享受现代化就已经造成了环境的不可持续，再让另80%的人进入现代化，地球环境就无法承载了。基于这种占据主流地位的共识，无论中国怎么说和平发展，人们都不信。因为如果占世界人口20%的中国人进入现代化，就改变了华盛顿共识，世界就不再是二八开这个被称为自然界“黄金分割定律”在人类社会的约束，就被中国人突破变成了四六开。由此可见，无论中国人是“乖”还是“张”，西方主流的制度文化都会自发抗拒中国进入现代化。

再次，当人们讨论全球化的时候，需知占据主流地位的是全球金融化。金融化进程中，人们都看到的资本化是一个方面，但资本化的前一个方面是货币化，没有相当强势的政府印刷出纸币并“赋权”于货币信用的货币化加速度过程创造大规模货币增量，金融资产总量不会如此短期就大规模提升，这种依托政治强权的金融资本所主导全球的资源资本化，也就不会有强势地占有资源转化收益的工具。

因此，人们需要分析，当代全球化的实质内容不是教科书上讨论的商品生产和自由贸易。今天占据主流的西方世界更主要依靠的是两个增长：政治强权的增强及其派生的货币化增长和货币大规模增发派生的作为资本化主力的衍生品交易量的增长。

而制度性贫困，则是与这种全球化伴生的成本转嫁与生俱来的。

总结我在最近十几年开展国际比较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只有五个字：成本转嫁论。亦即，制度性贫困是承载了不断累积的全球化代价的客观结果。

这是个以政治经济学为框架、以制度经济学为方法的理论创新。

从这个客观研究反过去找理论资料的时候，就找到了美国学者沃勒

斯坦的“世界系统论”，这属于一个讨论资本主义体系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他提出了“核心—半边缘—边缘”的世界体系，这个基本框架可以做我们分析全球化的一个理论工具。此外，则也承袭了萨米尔·阿明的第三世界“依附理论”。与相对于西方经济学而言已经属于最具革命性的新制度经济学相比，这些理论更具批判性和现实性。

制度经济学之于新古典经济学而具有革命性的原因，是将微观分析为主的西方经济学过去不纳入的制度甚至文化等基础性因素吸收到经济学框架中了，虽然其目的是据以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轨，但毕竟有从“经济脱嵌于社会”内生的幼稚向“经济回嵌社会”的成熟有所回归。

诚然，制度经济学研究中，被认为比较具有积极意义的、并且易于被新古典理论体系接受的，是认为制度变迁产生增量收益。在中国较早用制度学派理论研究改革、并为西方人提出“北京共识”奠定理论基础的，是林毅夫教授。20世纪80年代，林毅夫从海外归来与国内学者合作主持研究项目，证明了因农村制度变迁创造的农业增产占的比重约为46%，此后，这种“制度收益论”成为中国政治家及经济家都乐于接受的主流观点。

但，虽然“有多少收益就必有相对应的成本”只是个基本常识，却很少有政治家和经济家愿意讨论制度成本。

由于，我的实证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90年代的农村试验区，按照试验法的原则只能“不断证伪才能接近客观真理”，在这种不断证伪的试验过程最初我只归纳为“制度成本论”。后来更多做国际比较研究时才进一步意识到，发现制度成本并不应该算是我的理论创新；而发现占有制度变迁收益的利益群体把制度成本不断对下做层级转嫁，而且由于村社理性具有内部化机制遂使其承载的成本也不是不变的，这才应该是我的理论创新。因此修改为“成本转嫁论”。

理论家大都认同贫困是有制度性原因的，这个所谓制度性贫困，其实就是成本不断对弱势群体的转嫁造成的——任何制度变迁都是原有框架内占有收益的利益集团进一步获取增量收益并向弱势群体层级转嫁制度成本的过程。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在资源环境破坏愈演愈烈。那是因为：弱势群体至少还可以发声，但是环境却不能发声，当弱势群体不断承受累加的制度成本到不能再增加的时候，成本就更多地转嫁给了环境。

当我们把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创新引用到分析发展中国家制度变迁的时候，就有了一个有意思的说法。我强调指出：制度本身是派生的——这和很多学者的制度决定论有本质差别 。他们说到各种不良现象的时候，似乎愿意说“都是制度惹的祸”。当然，这使得面对各种劣迹的理论家很容易给社会大众找出解释。但如果愿意深入想，就应该会问：制度是从哪来的？特别是那些所谓现代制度是怎么产生的？

中国是向西方现代化努力学习的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制度从何而来，很大程度上也是历史哲学问题。

我们认为，自从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文明这个相对于人类5000年文明史而言虽然很短、却破坏很大的历史阶段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了三次矛盾转移，这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接轨”高度相关。

第一次始于资本主义早期欧洲工业化导致的殖民地扩张——发达国家对资源和市场的占有、贫困人口的移出，占领了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南北美洲、非洲和澳洲，及其引发的17—19世纪的大量战争，最终导致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同期，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纷纷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被拖入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争夺的殖民化地缘战略。

第二次始于资本主义中期产业资本的扩张——基于20世纪50年代战后的二次工业化兴起的一般制造业转移，消解第三次大战压力。发达国家内部二战之后工人运动促进了社会福利与劳动力成本、环境保护压力上升。同期老殖民主义时代形成的世界秩序解体，全球反殖民化运动中形成大批新兴民族国家，成为接受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载体。

第三次始于资本主义晚期的金融资本扩张——20世纪90年代至今正在演进的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竞争。全球货币化和资本化进程加快，导致后殖民化时期地缘战略：美元集团与欧元集团对抗性冲突。

可见，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是问题，但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制度问题。

而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的所谓现代制度，主要源于国家进入工业化初期的原始积累。据此，我们只不过强调了任何发展中国家现代制度的派生特性。因为，世界100多个国家都是战后形成的发展中国家。正是由于在二战后才成之为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就因为战争的惨痛教训，而大都在追求国家富强。然而，他们的榜样只能是前宗主国。于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制度就都不可避免有宗主国痕迹，体现在议会、法

院、军队、警察、教育、媒体制度等方面，且建于城市文化载体之上。

然而，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在早期工业化发展的时候遭遇的第一件事，就是“资本极度短缺”。因为工业化本身就是个内生性地不断追加资本的过程，亦即：资本增密是工业化的内在机制。于是，凡是想加快工业化的国家就都会构建追求资本的制度，政府也势所必然地都有“亲资本”的政策倾向。对此我们一再指出：在一般发展中国家，只要追求工业化就势必面临资本极度稀缺的实质性挑战。于是，不论声称何种主义，不论坚持何种体制，内涵使然地都具有亲资本的派生制度特性。

并不是意识形态不重要，我们只不过是重申了意识形态不得不受制于经济基础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据此可以归纳出的经验教训很直白地无可奈何：如果追求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的上层建筑及其制度体系不仅超前于、而且不利于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就会因这种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而跌入发展陷阱、很难爬出来。

由此可知，政府内在地亲资本，乃是二战之后发展中国家因资本短缺又要工业化势必采取的政策倾向。然而，二战过去很久了，能靠着照搬西方制度及其文化体系来完成本国工业化的发展中大国很少。

西方人于是提出“金砖四国”，但这个说法似是而非。

因为，其中的俄国本是参加一战这个典型的帝国主义战争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本来不应该列入二战之后的新兴国家。何况，若以是否完成工业化为标准，那在亚洲只有中国，在拉美只有原住民占比不足3%的巴西。

更值得中国人做比较研究的，是世界第二大的原住民国家印度。其工业产值只占GDP的30%左右，和城市人口占比差不多，即使已经进入新世纪，还不能算完成了工业化。很多中国学者都说印度的信息服务业占比很高，提前实现了经济结构高度化。确实，印度三产比重高于50%，因此有人就说印度比中国先进。但，很少有人看印度的三产是什么：服务海外为主。

这与其历史高度相关——英国为了减少对华贸易逆差，于1840年发动鸦片战争，以国家犯罪手段强迫中国开放毒品的“自由贸易”，随之就因追求“规模效益”而需要大量开辟鸦片种植园。于是，1852年英国进一步扩大国家犯罪来占有毒品收益——派出皇家军队在南亚次大陆东征西

讨、配合其政府垄断的当年最大“国企”东印度公司统一了印度。在鸦片战争之前的印度，还是个次大陆地理概念——500多个小邦、几千种语言，被迫统一之后只能全国推行英文。

印度70%以上的人口在乡下的传统村社，其中超过1/3人口是无地农民，还有大量流入城市的穷人生存在大型贫民窟，这种城乡贫困使得民间认可的贫困率占比高达50%以上。印度自称“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却同时也是最大贫困国家，其一国的贫困人口超过了非洲和拉美的贫困人口总和。这也导致印度知识分子无法为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无地农民和贫民窟人群提供服务，贫民窟的灰色经济也不产生可分配收益和工业化必需的原始积累。如果第二产业不发达，就更用不了这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技术人员。如果愿意这样客观地看，印度产业结构高度化内生的问题就解释了。

当代印度国情是：由于国内产业不发达，受了英语为载体的高等教育、符合西方人力资本要求的印度人可以低偿地为西方提供软件、电脑维修、信息咨询等IT业服务，以及医疗、金融投资等方面的服务。当然，这些服务大都难以对内。

诚然，印度这个通过“外向型服务业”形成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的事实，对于比较发展研究非常重要——发展中国家的当代高等教育大都参照结构高度化的西方教育体制来搞，也就大都会内在地具有迫使知识分子服务于西方、倾向于西方的特点。

（二）经验分析：中国在世纪之交的战略调整

那么，什么时候政府能够改出亲资本的模式呢？如果按照以上分析给出的逻辑，只有当资本过剩的时候。我们中国是在什么时候调整了亲资本的政策体系呢？1999年。因为“生产过剩”。

同样是在1999年，中国的执政党中央有了重要的新提法：以人为本。

早在1998年东亚金融风暴发生造成中国出口下降的时候，中国老一辈的经济学家马洪发现我们已经进入了产业过剩的历史阶段。1999年，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也指出我们面临的其实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劳动力过剩与生产过剩，二者互为因果、高度相关，劳动力过剩价格下跌，就会内需不足，恶化产业过剩。这样，双重过剩，恶性循环，

本是引入市场机制的市场失灵，靠市场自身没有好的化解方法。那一年他就提出政府应该启动国债投入新农村建设，内需不足和生产过剩恶性循环才能解决。

大家不要为社会上的各种说法左右，要看到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质性的变化：周期性的生产过剩是一般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当西方体系遭遇这个矛盾的时候，发生的是世界大战——用战争来摧毁过剩的生产能力。为什么说资本主义有寄生性、腐朽性？因为不可能解决这种一般矛盾。其实，中国人遭遇到这些矛盾的时候，试图寻找西方哪个解决了的案例。其中，北大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当时针对过剩研究了罗斯福新政的实际作用，当时他们就指出，罗斯福新政并没有根本上缓解危机，最后还是欧洲爆发了世界大战创造的战争需求，化解美国的危机。

1999年中国的生产过剩怎么化解？客观地看，作为一个超大国家，过剩的规模和性质，绝不亚于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欧美的生产过剩。认真看数据会发现，90年代后期，中国制造业产量已经达到全球第一，过剩是显然的，我们的大宗商品都是过剩的。我们有的只是一般性的矛盾。那么，中国使用了西方化解矛盾的办法了吗？为什么没有呢？

当时的政策部门工作，并不受制于海外政客和媒体高度关注的意识形态。去意识形态化的政策结果是：1999年以来的10年间，中央政府用超过10万亿的国债投资带动就业，基本上化解了双重过剩危机，当然也派生了很多问题。

其一，1999年启动西部开发、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高速公路三纵两横，这些总计2万多亿国债，五年投下去，带动基础建设投资3万亿，使得中国政府换届时，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大国。不过，西部开发虽然有效，但这个过程难免产生大量坏账。

其二，2001年提出振兴东北工业基地，国债投资1万多亿，缓解了东北的资源枯竭城市和设备换代城市的转型困境。

国务院成立了东北办。与西部办作为设立在发改委的两个副部级单位直接操作大规模国债投资，在1998年之后的这一任政府领导下，投了3～4万亿基本建设。前可继承罗斯福（西部投资、市场停摆、国家发券），后可连接奥巴马。

其三，2003年，温家宝总理上任伊始，实际上干的是中部崛起增加两万亿国债。

其四，2005年提出的新农村建设，5年来投入了约3万亿。

其五，2008大地震灾后重建投入了约2万亿。

这样，温总理第一个任期国债投入共约7万亿，几乎两倍于上一任。如果把2009年提出4万亿救市再加上，总共有10万多亿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

诚然，这种短期的大规模国债投资，也势必派生很多问题。

一是导致中国出现了特别值得圈点的长期的“投资拉动”增长：从1998年一直到现在，带动的增长至少占GDP的3个点，某些年份会高于3个点。一般人都知道应该是“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为什么我们总说不平衡？因为，驾辕的本来应该是内需，但内需是长期上不去，驾辕的只能算是瘦驴。可是，拉套的却是骏马。诚然，这只是一个方面。任何一项经济政策解决问题的时候会创造新的问题，经济不平衡是肯定的。

二是，国债投资是未来的税收被当期的政府预支了，性质上应该主要是公共投资。那，就应该是公共部门操作，不可以交给私人部门。于是，代表私有经济的批评就多起来了：为什么公共部门得到加强，为什么大型国企、垄断部门占比上升?私有部门及为其掌控媒体的意见很大，同期出现了中产阶级知本家精英群体代言这种不满，社会上痛批铁道、电力等垄断部门，一浪高过一浪。

民营经济相对于国家资本有所弱化，这是中央政府国债投资应对危机的客观结果。然而，既然这十几年用十几万亿元的国债拉动增长，那就要问，这种主要投资于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的投资结构能不能改？能不能说从1998年增发国债就搞错了（2008年奥巴马也靠增发国债缓解美国危机）？今天欧洲债务危机为什么这么囧，因为欧盟不能发行欧洲债：各国加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实现统一货币，但是却不可能统一控制各国政府发出的国债，于是各国的债务危机蔓延开来，欧元区各国政府的债务普遍超过占GDP的60%以下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变成了垃圾债，只能求助于欧洲央行和IMF，而此前IMF被发展中国家批，是其资金的70%早就已经都投到欧盟国家了。

美国人是国债和货币两手增发，使用增发的货币购买增发的国债，客观上构成了向全球转嫁通胀的特殊政治优势。而欧盟做不到，因为欧洲央行只能增发欧元货币而不能发欧盟的统一国债，对外转嫁债务危机制造通胀的能力就差很多。

中国和西方比较，2009年全球危机是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性考验——只有中国经济下滑了仅一季度，第二季度就开始反弹，因此现在很难做是非对错的价值判断。各位不要用一般的西方价值判断看全球形势，应该把思路打开，把价值观先放一放。我在很多国际场合演讲都强调这一点，要站得比意识形态更高，超越价值观；这才有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条件。

（三）历史经验比较：西方不同于中国的历史演进轨迹

对于发展理论，还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比如，我曾经在联合国与杰弗里·萨克斯和斯蒂格利茨同台介绍中国经验，他们对中国的分析虽然粗糙，但其中有的观点让我很吃惊。众所周知，萨克斯是以在前苏联推广私有化改制著称的。但萨克斯在解释中国经验的时候，认为人们应该从集体化时期的经验入手。而斯蒂格利茨就更有意思了，他认为“恐怕得从中国土改说起”。假如说，斯蒂格利茨的说法还可以理解，因为他上街公开支持群众占领华尔街运动，算是左翼学者，可萨克斯为什么也说得从集体化时期入手才能理解中国经验？我问他，你的观点似乎与过去有不同。他回答说：作为学者首先不是强调自己观点正确，而是对客观现实是否尊重。希望各位多少借鉴一点萨克斯的自我反思精神。

当讨论全球资本化与制度致贫的时候，有些属于对历史经验的不同归纳。

我们都知道，在西方资本主义崛起时，起到构建制度文化基础作用的文艺复兴功不可没，可有谁想过要质疑，复兴的是什么文明？

早年我也是个文学青年，看了大量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人大复校以后我们读书的时候，也有老师介绍了大批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以至于后来我成了个博物馆迷，非常推崇那些伟大的艺术作品。但当我开始做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的时候，越多接触原住民文化，就越有了另外的批判性认识，在此提出来和大家共享——其实与文艺复兴同步的是殖民主义，文艺复兴中的很多艺术、文学或隐或现的包含着对西方几千年奴隶制的复兴……

众所周知，古希腊的城邦制度和古罗马的市民的民主制度的基础，都是奴隶制，享受着民主的市民，只占总人口的不足10%，与现在的黄金分割二八开相比都差远了，而那超过90%以上的人口是奴隶。

古希腊奴隶劳动创造的文明很伟大，但在那些巨石雕塑前被震撼的时候，应该看到其中几乎没有大量投入的劳动者——奴隶们的身影；应该想到这是古代希腊人在上攻到波罗的海一带使其奴隶贸易扩大了十几倍之后才有的奴隶劳动成果。对有口皆碑的古希腊历史来说，最大的伟绩是马其顿城邦首领亚历山大的伟大东征，在于他打败波斯之后把边界向东扩张到印度边沿，由此成为跨欧亚非三个洲的大国，这也进一步扩展了古代希腊奴隶制，于是有了辉煌的文明时代。

古罗马一样是在奴隶制基础上形成的城邦文化，而且他的城邦文明是希腊的血脉传承。因为，罗马是早期希腊海盗占领的据点演变成了的城邦。海盗据点主要贮藏财富、烈酒和妓女。于是，有了今天人们到意大利国家博物馆还可以到处看到的关于"吃狼奶长大的双胞胎"的多种艺术表达（据说已经被意大利最新考古发掘证实了）——他们本来就是妓女生的孩子，一般都扔到河里死了就算了，但这对双胞胎却没被淹死，他们被失去狼崽的母狼养活大。

在罗马的国家博物馆随处可见的还有一个用陶器、壁画和挂毯表现的画面，吃狼奶长大的男婴成为罗马居民的时候，这个城市只有男人，其实这是海盗文化的传承——早年的海盗只有男人。那么，怎么解决男人问题呢？就到另外的部落抢女人做"媳妇"，于是就终于有了罗马城。

这个古罗马成为城邦文明的过程，造成了多少其他部落的"杯具"……

类似的例子：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曾经代表政府多次向原住民道歉，原因也是早年来到澳洲的白人大部分是属于罪犯流放——几乎没有女人。政府就下令当地所有土著家庭贡献一个13岁以上的闺女，交给政府培训之后分配给上岛的白人。于是，也就有了澳大利亚成之为国家的人口基础。

早期的西方文明，确实和后来的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文明有很大的继承性。后来的文艺复兴在对中世纪农奴制表达批判意义的同时，内涵性地是对欧洲早期奴隶制的复兴——殖民化时期是欧洲的国家犯罪造成的对人类的屠杀、迫害和对资源的掠夺、控制。

本质上，西方推进的殖民化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奴隶制，造就了西方资本原始积累进程的内含成本对外转嫁的外部性制度构建。而今天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则是所谓后殖民主义继承原来殖民主义制度的路径依赖的延续，也是原有利益集团转嫁制度成本的结果。

据此，不妨再看看到底什么是制度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各位可以讨论一下。也许可以检验新制度经济学是否经得起不同的经验过程的实践检验。如果任何一种理论的逻辑起点不能和其表现的历史起点相一致，这个理论就不成立。不过，我们今天教科书中的大多数理论逻辑，都找不到与其逻辑起点相一致的历史经验的起点。

如果愿意进一步讨论东西方文明的演变，就会去价值化地看人类历史这个东西，我们不能全怪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在殖民化中复兴奴隶制。因为，西方文明之所以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取决于人类在不同生产关系下受到的环境约束——文明的形成及其延续与自然地理高度相关。大约在中国从黄帝到夏商两朝赶上气候变暖时期，东西方人类社会发育都明显加快。但最早的气候变冷（小冰河期）大约是在2500多年前的战国到秦汉之际，演化为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地域冲突——在新石器时代后期气候变暖期间，亚洲大陆400毫米等降水线北移，华夏农耕文明已经扩展到了北方；气候转冷等降水线南移，干旱草原游牧民族的所有部落都生存困难，不得不联合南侵。华夏农耕文明就和北部游牧文明的各种民族之间出现了频繁的战争。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的战争很大程度受到自然因素影响资源环境变化的影响。由于气候变冷和北方干旱引起的频繁战争，导致汉代重新完成中国大一统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击匈奴于大漠以北”。这也许客观上成了罗马几百年后衰败灭亡的原因之一。被汉武帝打败的匈奴残部西进到欧洲，那时候欧洲北部的原住民大多处于采集和渔猎状态，抗自然风险能力极低，匈奴铁骑逐步压迫那些处于半原始状态的部族只能拉锯型地后撤，渐渐向西、向南迁移，其中有些部族南向进入亚平宁半岛，那就是欧洲历史记载的所谓“北方日耳曼蛮族”的南侵，这些是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败和灭亡的因素之一。只不过，这是个至少百年以上的漫长传导的过程。

但，汉朝征伐匈奴只是中华汉唐盛世影响西方文明的第一段。唐朝是第二段。唐朝先后击败东西突厥，残余突厥人沿着中亚进入小亚细亚，部分定居于安纳托利亚半岛，成为土耳其；其一小部分继续西进，曾经打败了东罗马的衣钵传承拜占庭帝国——也是导致拜占庭帝国解体的历史原因之一。

据此，虽说我们的中原农耕文化“安土重迁”，从来就没有威胁过西方；但被中国汉唐盛世两次打败的游牧民族渐次西迁，确曾对西方有过些负面影响。

到了中古时期，欧洲不再有完整意义的大国，由此进入千年黑暗中世纪，欧洲半岛主体部分那些高度分散的蕞尔小国，连维京海盗都应付不了，至今找不到多少历史文物或者文字清晰地表达这个时期的真实历史。

而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的宋代——政府治理和文官制度最完善的时代——形成了三权分立的中央集权和科考取士的文官制度。

宋代科技文化和工商业繁荣，是当时世界最发达国家。其对外贸易盈余显著增加——主要靠海运瓷器出口，运到阿拉伯世界，不仅靠转运中国货带火了阿拉伯，也搞穷了中世纪的欧洲那些小贵族们建立的小王国。

我曾经在欧洲到处走，看到很多的中世纪小城堡遗址，那些小土豪手下管着几百人就算是个诸侯了。那时候的宋代则是大船出海，回来“十船九空，唯一船实之白银也”。欧洲白银外流普遍危机，长期战乱频仍。欧陆边缘的战败国都要用白银赔偿，而战胜者则更要买中国的东西，于是战败者去了盛产白银的南美。

宋明之际，中国的白银储备占世界的60%。这个基本上不产银子的国家，凭什么用白银作为货币？因为大规模贸易形成的长期盈余。

过去是“弱国无理论”——因为我们被西方列强打败了，就被别人编造说：中国之所以战败，主要是中国人素质低，加上自己的制度不好——封建主义“闭关锁国、落后挨打”。

真是这样吗？从秦汉构建大一统的制度努力直到宋代，中国人用了差不多上千年，才完成了对诸侯分封和节度使割据等封建制度的改造，形成维护中央政府法统治理的国家政治——这就已经不再是西方历史指称自身遭遇“千年黑暗”的封建主义制度了……

1840—1870年，鸦片战争之后大约30年帝国主义多次侵略，中国就把财政赔得差不多了，同期官员和军队都抽鸦片了，上层建筑“被鸦片化”，中国就成了弱国了。而且，1870年之后，由于国家财政失效了，中央政府不能给地方正式税银支持的开支了——就像20世纪90年代中央财政严重亏损不足养官而导致地方乱收税费的状态，清朝就允许地方征收“厘金”。交不起的老百姓就造反了，于是到处是农民起义。

总之，西方通过殖民化实现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之前的序曲，确实与中国有关——是其对华贸易的长期贸易逆差导致的白银外流、通货紧

缩、财政危机，引发长期白银战争，才有对美洲白银产地的殖民掠夺，和进一步对非洲的奴隶制掠夺造成的三角贸易……就是这种掠夺全球，造就了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四）战后双寡头地缘控制下的雁阵式产业转移及西方主导的全球化

……如果说，二战之前是西方产业资本过剩大危机压力之下列强不断瓜分殖民地和市场的纷争构成的多边地缘格局，那么，战后则演变成了双寡头为实现地缘控制战略而推进的产业转移。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把借二战机会大幅度扩张起来的过剩制造业向欧洲和日本转移，这就有了美国的雁阵式产业转移。同期，俄国也向东欧和亚洲的中朝印等国家做类似的雁阵式产业转移。

战后产业转移进程中，欧洲得到设备生产恢复，产品给美国，美元回流给欧洲，到了60年代就有了与滞留在欧洲内部流通的美元相类似的大量的海外美元，比如有石油美元、毒品美元等。海外美元的大量沉淀导致美国人不再允许那些拥有美元的外国投资人随时来换黄金，于是就有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战后的这个体系本来使得美国已经成了西方各国的中央银行。但美国单方面撕毁协议、该体系解体之后就一定会导致了无储备约束的各国货币滥发。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也势必走向金融资本主义道路。

客观地说，只要金融资本脱嵌于产业资本追求独立利益，其导向就是加强金融资本主义内在必然的寄生性：内生地具有强烈投机特性的金融资本越是追求超越产业的自身利益最大化，就越是具有其腐朽性和投机赌博势必导致的垂死性。一旦资本投资人可以靠玩票子挣钱，谁还愿意来千辛万苦地做产业？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搞产业的人一定会吃亏。金融市场的愈益混乱也是一定的，因为金融资本不再具有产业时代资金要素的性质，不再满足追求产业的平均收益率，而是由于追求流动性创造的超额收益率，而势必去制造越来越多的衍生品。

（五）当代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结构性变化

中国从财政税收结构看，根本不可能存在中央集权制，实际上更多时候在经济和政治上搞的都是“地方化”。但地方政府实际上不承担金融风险和投资损失，那么，风险责任只能最终由中央来承担。

政治上的地方化第一个派生的社会现象，是地方追求工业化收益而同样不承担制度成本。当西方把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其内含的劳动与资本的对立矛盾也就转移过来了，于是转移了产业的西方国家，出现中产阶级兴起和民主政治扩大，而传统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就被放弃了。接着，发展中国家资本和劳动的对抗性矛盾就成了主导矛盾，中央政府仍然使用传统意识形态无法解释干群对抗，遂使财政用于“维稳的成本”大幅度上升。前不久我给广东人讲课时候说，2008年南海区连续发生成规模的打工者有组织的罢工并取得成功，是中国在21世纪进入了经典理论描述的对立矛盾引领社会结构变化的里程碑。

第二层的派生结果是西方转移产业使得地方政府促进形成了更多亲外部资本的上层建筑的制度形式。因为，西方是把旧设备高价淘汰给中国。于是发展中国家更多形成外债，欠债国家在西方压力下的国内上层建筑因此产生了转轨、改革，从原来的亲内资变成了亲外资。于是，地方政府推动国家创造了良好的经商环境，这在发展中国家成了普遍现象，不管何种意识形态。

各位注意，本国在最近两年才多少改变了亲外资的政策。此前，国资收税超过50%，民资33%，外资仅14%，何谈市场经济平等竞争？现在虽然统一所得税率25%，但是地方化体制下的政府仍主动减免。从1999年以来国债投资大规模增加的结果，是国有垄断资本的加强，对于民资确实是不平衡。但同期大规模引进外资则意味着地方政府更多亲外资。外资要是没有相当高的回报率是不会来的。例如，20世纪90年代美资在中国的回报约为20%，中国在美国的国债市场投资是不足6%；现在是美国高达33%，中国下降到不足4%。客观结果是，听任外国拿走中国的钱，反过来再投资到中国占有战略产业并且占有高回报，这也是多年亲外资政策所派生的结果。

随着西方产业大转移，就出现了这些派生现象。西方把产业资本过剩造成世界大战的主要矛盾转移了。如今，中国在生产过剩压力下的主要矛盾也会在国内表现为爆发趋势。

当代发生的是人类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第三次危机——金融全球化危机。

如果只认识到这是个资本主义历史的阶段性危机，那并不具有创新性；认识到这种危机代价向弱势群体转嫁以及怎样转嫁，才是我们的理论创新。

大家都知道，因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世界各国政府，都在竞争增发货币，而势必导致金融资本泡沫化！但美国面对危机仍然得靠更多增发货币，由此发生了连续的金融危机。

但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时我正住在华尔街附近，高档餐厅照样顾客盈门，接触的那些投资家趾高气扬，一点危机的感觉都没有。2009年希腊发生危机的时候我也去了，感觉也是这样的。2010年西班牙危机、2011年爱尔兰危机……除葡萄牙之外的“笨猪国家”我都去了，感觉也是这样。虽然偶尔也看到有些群众上街游行，但总之，我在那些危机国家中直观的感觉不像是身处危机之中。尤其是完全不像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苏东解体，更不像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三大赤字引发的大危机。我记得当时美国人对中国非常不屑。当时我们在国外遭到的挑战，几乎都是中国崩溃论。

1991年我到苏东国家考察感到的危机后果是相当严重的，政治改革造成政权解体的同时是货币体系坍塌，使我理解了金融体系之信用的依靠，本质是政治强权。货币是什么？是一张纸，那么货币之有信用在于是政治强权向其信用体系的赋权。政治强权塌了，货币体系也会随即坍塌。由此可见，金融危机一定会依靠政治强权导致危机代价的转移。比如现在的“量化宽松政策”，事实上已经把制造出来的60%过剩货币通过冲击粮食、能源和原材料市场转嫁给国外。因为民间和官方的债务超过40万亿，政府和民间都根本不打算偿付巨额债务。

发达国家债务占比高，因为他们产业大部分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了。1980年，我到美国看到里根政府大做利率调整，一方面吸引外资流入，另一方面不断推出更多衍生品。可见，金融化的过程应该是货币化先于资本化，资本化扩张则更多靠增加金融衍生品吸纳过剩金融的规模交易。何况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苏东解体到现在已经完成了单极化的政治强权，无论怎么向世界转嫁成本都没有“合格反对者”。

早期西方大规模转移人口和占有资源是构成世界二八开的前提。当代形成政治强权支撑金融霸权是维护世界二八开的前提。

（六）生态文明：中国的激进现代化困境和调整方向

中国现在外汇储备很多，要到全球去买资源和原材料，就会被西方为首的话语体系批为新殖民主义！其实我们像“土大款”穷得只有钱了，资源是买不到的。

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了“生态文明”，这与以往提法有继承性。1980年邓小平提了两个文明，1997年十五大承认“资本”之后江泽民提出“政治文明”，今天提了生态文明，演进为四个文明。不过，合并同类项我们发现政治文明可以放在精神文明中，生态文明放在物质文明中也可以。那就是“生态化的物质文明和政治化的精神文明”。

当年“一切向钱看”的时候，中国经历了“去政治化”和“去生态化”。现在当人们发现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去政治化挡不住自发政治化。精神文明也不是墙上挂了文明标语就文明了。何况，今天中产阶级崛起和社会结构的多样化已经开始成为主流了。

毛主席强调过：“我们不可能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建立社会主义”，土改的结果造成人人是小土地所有者，不过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农民几千年诉求的“耕者有其田”，但我们将其解释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包括农民在内小资产阶级占中国人的大约90%，就是全球最大的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发生的经济政治领域矛盾，不过是小资人口过多和小资激进特征的表现，无论说是什么主义，都只是对国外话语的一种借用。

如果说土改派生的经济效果，是把90%的农民从民国危机的长期通胀中解脱了出来，相对于城市资本而言，可以叫做“去依附”（萨米尔·阿明，世界依附论）——中国的土地革命战争使得90%的农村人口与城市几乎没有关系了，而城市孤岛当年主要是高风险的资本主义经济。

回顾民国史可知，20世纪20—30年代是民国追求现代化的“黄金十年”，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加快，但为什么短短十年就完了？因为在经济高增长的时候遭遇了1929—1933年西方大危机，之后美国无视西方八个承担稳定白银价格责任的国家的白银协定，单方面提高白银收购价格，导致中国的白银外流，通货紧缩，就像中国在中世纪曾经导致欧洲白银外来通货短缺一样。于是民国工业化中断，政府不得不在1936年放弃银本位，改为发行法币。接着，第二年日本侵华，迅速造成通胀，政府需要支付硬通货买军火，到了1948年，法币崩溃，贬值了几百万倍，这时民国经济接近崩溃，最后一次挽救是借来了美元发行金圆券，4个月就垮掉了，维持国家的现代的财政和金融没了，于是乎庞大的国军没军饷了。民国先灭亡与现代化的财政金融体制失败，后灭亡于军队崩溃。

新中国成立初期土改就让大多数人和这套现代化体制脱钩了。那么，到底什么要素让中国改出危机进入高涨？

大家认同的现代化，本质上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我把现在西方发生的危机称为“西方特色的现代化的综合成本过大”。由于把产业转移了，那么看英国第一大产业是金融，第二是旅游，都属于第三产业，制造业和农业几乎没有地位，只靠金融、旅游怎么过日子？如果我是英国领导人，一定坚定地站在美国大哥一边。才能保证英镑币值长期高于美元，对其他国家占有汇差，以便靠进口过日子。

事实上，在经济危机打击下改变西方人消费主义生活习惯和压缩福利主义的社会开支几乎是不可能的。政客只能承诺增加既定的福利开支，不能妄想在社会成本不断增加条件下恢复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当年奥巴马把“改变”当成口号，但是几年没成功，因为他们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就是那样的，只剩下了制造货币增发国债。再比如，希腊的造船产业和航运业都转移出去了，中产阶级都要高福利又不事生产，还不能像英国那样靠玩金融，于是只能做旅游，靠的还是奴隶文明打造的神庙。

所以，如同小资产阶级一样，中产阶级是个不清晰的概念，既不可能是自觉的阶级，也没有统一的政治诉求，利益结构还高度复杂，其实只是西方产业转移后留下来靠海外汇回资本收益维持生存的人。现行西方现代化的政治体制下的中产阶级福利要求的泛政治化表达，哪一个政客不能满足就当不了政客。谁都不会冒着政治不正确的风险把自身问题说清楚，那些越来越没底的国际会议只好把我这样的外来和尚找过去揭老底。

西方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文明走到今天，引发全球化成本转嫁不出去的现代化危机，沿着老路是走不下去的。过去累计的成本向发展中国家和环境转嫁，终于反过来惩罚西方自身，就变成了现在的矛盾。连同地中海对岸北非发生的事情，也都是这个道理。现在应该是人类愿意建立进一步反思能力的时候了。

人类从“以资为本”的资本文明转型的方向，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内涵是多样化的人类客体的共存，无所谓好坏，也没有谁一定得“化”掉谁的道理。

（七）自我反思：认同生态文明的学习过程

最近10年老是有人问我，为什么你不强调城市化了？因为城市中国是个资本池，风险收益与成本都大于乡土中国；农村则是“人口池”或“劳动力池”，风险低，收益也低。城市乡村的存在各自都有其合理性，不一

定非得要谁化掉谁。

现在说的城乡统筹，应该注重的方向是公平地给城乡共同分享的财政支持：养老、福利、教育、医疗……干嘛都得像城市那样搞现代化？有人如果愿意“传统化”一点不行吗？

我现在到了甲子年，学什么都有道理，谁批评我都笑眯眯地接受。

今天人们为什么对问题认识不清楚？在于意识形态局限。媒体很难超越意识形态。主流的西方理论都有找不到历史起点的悲哀。西方政治经济社会等主流学科构建基本逻辑的历史起点是找不到的。

苏东战后靠实体经济起步，靠非货币交换的经互会记账流通体系，由于交换不使用货币，因此前苏联的卢布币值高是因为没有推进经济货币化，苏东国家的货币连一般商品等价物的功能都没有实现。在1992年之前，中国也是一样。又因为前苏联作为主导国家在换货贸易中可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不必推动货币化就可以实现苏联产业资本的利润最大化，因此占有这种制度收益的集团就不会推进经济货币化，于是，苏东国家就停留在产业资本阶段。

同期的西方则大规模推进产业转移，主要靠货币增量和经济资本化维持增长，遂导致到20世纪80年代连一贯强调物质生产的苏东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都符合西方需要增加了非物质服务的内容，这样西方的非实体化的经济在MPS和SNA两套核算体系中都有了表达。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只按物质产出核算的时候，大家都得承认苏联创造的实物量和工农业产值更高，但是修改以后就使得数据上西方经济增长明显地快于苏联东欧。这样到了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国际主流舆论：苏东落后了，而西方世界被认为是制度先进赢了。其实，是停留在产业阶段的苏东国家的产业资本被处于金融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的西方击垮了。苏东国家金融体系坍塌又给了西方直接覆盖苏东推进西方货币化、扩张金融资本的历史机遇；欧元也随之应运而生了。

不过，这乃是双寡头地缘战略冲突之下不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矛盾的结果，与社会主义无关。因为，前苏东经济体是比较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

我分析周期性经济危机最早是在1988年经济学周报发表的、被《新华文摘》转载的《危机论》。1991年在美国写的文章也比较早地开始讨论国家资本主义。1992年改出了中文版的《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

再积累》，但在国内没哪个刊物敢发，到了1993年一个朋友的刊物斗胆刊登之后即被《新华文摘》转载。此后，到了1997年的十五大我们才公开承认资本这个概念，1997年之前国家级报刊是不讲资本的。

后来我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开展调查研究逐步认识到，即使用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分析，无论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不符合西方理论的内涵。如果上层建筑长期超前于意识形态，后果是什么？我们有很多上层文件不是大家不执行，是他本身超越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各国都有上层建筑成本高的问题。

西方在转嫁成本，我们也在转嫁，主要因为中国是大国，才有足够的危机承载能力。什么大国？农村大国、农民大国。于是，历次城市产业资本出现经济危机都是向农村转嫁的。当代史上，凡属于能向“三农”转嫁的危机就在城里软着陆，凡是不能转嫁的就硬着陆。城市是资本池，有风险收益；农村是劳动力池，土地是零风险资源性资产，而小农是风险厌恶的，小农村社共同体具有群体理性，能够把外部性内部化处理。可见，为什么乡土社会能够承载城市的资本危机的爆发，就是因为其内部化机制。

我们对西方个体理性有了认识，对中国的群体理性缺乏认识。因此，这种内部化机制正在被各种维护城市资本利益的激进改革破坏掉。

当前农村实际上已经大部分是非规范制度的“三宗”治理——宗族、宗派、宗教。很多农民上访的背后也有复杂的三宗背景。如今的农民已经不是当年集体化时期的农民了。现在做点什么事儿都得找三宗这种非规范组织沟通，否则寸步难行。村镇党委和村级支部这些正规组织由于成本过高而没有大用。在长期刻意在农村执行去组织化和去政治化政策的条件下，任何构建现代上层建筑的努力都遭遇制度成本高而难以落地。

中国的工业化原始积累充满城乡关系的复杂矛盾。

城市产业资本要求以乡为单位实行规模经营，便于提取“三农”剩余。在1953年工业化加速的时候搞了统购统销，几十万个合作社，完成的是从“满头乱发”到“编成辫子”、节约交易费用的制度建设。1957年以后的高度集体化可以形成准军事组织，成规模集中劳动力，以替代稀缺资本。这个替代机制很重要——“L替代K”。因为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遭遇了资本极度稀缺的挑战。中国在1957年几乎是零资本——苏联撤资后，工业化难以为继，于是有了国内力量启动二次工业化。主要是用人力代

替资本。1958年中央没钱投资了，随之发动地方搞的工业化就是后人批判的“大跃进”。接着，不仅中央没有钱，地方工业化折腾了两年，两级政府的财政就全面赤字，累积达到1960年当年财政的大约28%，到了下一年，中国变成了几乎是零投资国家。于是，整个20世纪60年代中国都非常贫困。1958年人民公社的重要作用是吸纳城市的工业品以拯救陷入困境的城市经济，公社自己还得搞五小工业，建立拖拉机站，集体还得组织劳动力去国家的工地替代资本。以上是中国进入工业化的方式。后来工业化原始积累完成了，集体化就转轨了，分散了土地和劳动力。

我们发现的另外一个基本道理是中国政府的公司化和资本化。今天也是这样。地方融资平台负债，越是下级政府负债率越高，最多高达400%，这部分债务最终责任都是中央政府承担还的。现在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实际负债规模占GDP的50%以上。政府的融资客观上反映了资本内化于政府。于是，在中国，政府就是直接的运动员而不是单纯的裁判。这和我说的最近十年的政府直接投资拉动增长是一致的，虽然也招致了西方和国内民资的批评。

从1957年的数据看，中国几乎不可能“中央化”。从财税关系这个政府体制中的核心内容来看，早就已经是“地方化”了。现在的重庆经验也是那样，属于“中央缺位下的地方创新”。中国1988—1994年的大危机，类似1929—1933西方大危机。

1980年危机爆发导致约40%的城市失业率，当时主要靠“单位制”解决——政府要求五个人的工作十个人干，从此出现了单位制的无效率，因为政策要的就不是效率。同期是干部子女在父母所在的政府部门“办三产”：官方恩准干部子女办公司倒买倒卖，使得80年代中期物价飞涨，市场秩序严重混乱。当时为了缓解通胀做了个全面改革的大计划，还好没有实行，虽然并不是不想用市场手段。最后邓小平决定价格闯关可以试。还没来得及闯，就出了大抢购和恶性通胀。

1991苏东解体，苏联人比我们的全面改革计划先走了一步。这样，我们就接受了他们的教训——没有及时推行货币化！于是，中国在1992年进入了货币化——取消一切票证，货币发行量陡增，信贷翻倍。为了吸纳超发货币，又在1992—1993年开放了三大高风险市场：股票、期货、房地产。中国从1992年终于有了真正的货币，但那恰恰是在赤字危机条件下政府实在无力负担票证分配的财政补贴。在1993年三大市场同步放开带动高增长，进一步出现了财政赤字增加。银行资本金为负（银行财政不分家），财政还多吃掉了80多亿存款，以及外汇储备不抵债务

偿还需求等，“三大赤字”爆发，于是政府转嫁危机，要求“下岗分流减员增效”。

但是，客观结果却导致内需大幅度下降。随之遭遇东亚金融风暴带来的外需陡然下降，突然降到不足一个百分点。从这时候起，中国遭遇输入性危机为主的阶段——1998年到2008年，我们已经遭遇了两次输入型危机……

总之，任何一个意识形态条件下的经济体，都有形成自身经验归纳的客观规律的可能。我表述的是我们归纳经验之规律，乃是我的一家之言。

第三节　国家竞争的“微笑曲线”注

近来，听到有些关于全球化和中国内部问题的相关说法，感到思想领域很多人其实是在把不同客观事物拼接起来形成逻辑解释，以支撑某种主流话语权。我多年来不参与类似争论，这里所提供的只算是一种经验层次的逻辑解释，供不同利益背景的群体自主选择。

（一）新币缘战略的“三角结构”是造成全球通胀的根本原因

先对于美国现在是否会打伊朗提出点个人看法。

我们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上刊发的文章，主要讲当代金融资本阶段币权为核心的币缘战略与中国的因应和调整。其中，重点分析了“三角结构的美元霸权”——当人们把美元霸权地位放在币缘战略之核心的时候，就会看到之所以美国能够通过N个量化宽松QE政策不断创造增量货币来缓解自身债务危机，在于同时得有像垃圾消纳场那样的吸收过量增发美元的经济领域，才能够随时消化量化宽松政策过量发行的美元，这个领域就是能源和食品，简单说就是石油和粮食。客观上看，石油战略和粮食战略是密切配合美元霸权的币缘战略形成的“三角结构”——这三者紧密结合，才构成当代金融资本阶段的美国单极世界霸权延续条件——凭借一定的军事优势构造一个政治强权，而以政治强权来形成对美元货币体系的赋权，才有可能使金融全球化或者金融深化被粮食和能源这两个战略物资市场不断地把过度增发的美元增量部分消纳掉。

美元霸权的币缘战略通过这个三角结构，消纳了过量增发美元，所造成的巨大代价当然必须转嫁出去，这就是全球通货膨胀的本源。

同时，世界上那些大量购进粮食、大量购进能源和原材料的国家在“进口通胀”。因此，一旦美国把能源、原材料和粮食价格打上去了，由于通胀并不发生在美国，这些实体经济国家也就等于替美国承担了美元大量增发的制度成本。

也就是说，包括中国这样的以制造业为主的所谓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以自己国内的高通胀对冲了大量增发美元货币带来的全球通胀！美国可以在这个三角关系上不断增发货币，同时靠对外通胀转嫁来消纳过量增发的货币。

这是个金融全球化内在的经济逻辑。

只要人们愿意“去意识形态化”地看全球化，就会发现内涵性地体现着金融资本阶段币权主导的制度演变。

如果根据这个逻辑来看关于美国对伊朗打还是不打的分析，一般的说法还是传统的老地缘战略思路，那得出的逻辑结论当然就是美国不会打伊朗。而如果愿意用新的币缘战略思路分析，那就是巧实力运作——美国已经采取了能够把石油价格搞上去的最低成本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打法，据此看，石油价格实际上已经被打起来了。

如果从华尔街金融海啸发生以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新的币缘战略之下的巧实力战术，对于转嫁发达国家债务危机的作用，是高度有效的。

上一轮2009—2010年转嫁危机，是一次成功的币缘战略实践，造成了北非、中东街头动乱和政权危机。具体看：在2008年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年里，随着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制造通胀，造成了2009—2010年粮食价格大幅度提升，特别是北非地区紧缺的小麦、面粉，价格上涨超过100%，玉米价格上涨超过70%。

与此同时，亚洲地区相对而言最为稳定，因为这个区域老百姓超过半数还是半自足的农民生产者，还能使外部风险内部化。其主食稻米的国际市场价格，也只涨了34%。

国际组织2008年曾经确定38个国家会发生粮荒。实际结果是：除了中国因战略性地保持着粮食进口依存度不到10%才未受严重影响之外，其他37个国家都变成了饥饿国家——这是上一轮2008—2009年西方金

融危机的代价转移造成的，也是由于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客观上发生的三角关系的显著作用，使得粮食和石油价格受美元量化宽松的影响而大幅度上涨。

这个新的币缘战略，确实造成有利于美国只需采取巧实力就足以制胜全球的新格局。

如果看到以上这些现象，那就应该认识到，如果依据王湘穗提出的币权核心理论，则是美国人不必采用传统地缘战略时代的方式，去打那么一场地面占领形式的战争。既不必用老的方式打伊朗，也不必用老的方式打叙利亚。那么，只不过是所谓以币权为核心的巧实力运用，即只要使用各种手段把油价、粮价折腾上去，就能够靠制造进一步的全球通胀来消纳美国政府连续过量增发的美元，这就是新币缘战略最低成本的胜利。

（二）美国巧实力对中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用

中国入世以来逐步表现出宏观调控中的政府失灵，往往引起各界非议。但作为研究者不能跟着产业化的媒体走，主要原因不是新班子当家人没有过去那种所谓“铁腕”，而是没有面对输入型通货膨胀的经验。因为上一届政府留下的，只是1998年以后处置四年输入型通缩的经验。

近20年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确实越来越密切，但不同之处在于，人们逐渐理解了以G2（与所谓的“中美国ChiAmerica”类似，都指美国与中国构建战略合作关系）为名的中美之间实际的战略合作关系并非G1＋G1＝G2。因为两者的战略关系有一个要点，就是两国互相对应的“一高一低”，亦即，美国“低利率＋高汇率”，直接对应中国“高利率＋低汇率”。或者说是美国资本与制度对中国做双重输出，对应中国对美国商品和资本做双重输出。

一方面是中国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都在竞争着长期向美国输入低价商品，客观上保证美国享受了长期低通胀，而低通胀就能使美国在大量增发货币的同时维持资金低利率。于是，则由极低的资金价格而促进美国过剩资本投到那些因输入了高通胀势必造成高利率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不仅使得跨国公司低价资金只要进中国来投资就立即赚取了利差，而且随之变成了对发展中国家战略性的经济领域的极低成本实现控制的优势资本力量！这也是中国相对附加值较高的产品出口中内资占比极低的根源。

而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长期遵循“特里芬悖论”不得不维持美元汇价稳定，使得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收益就是低风险而有保障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老有人说美国是“高增长低就业”——道琼斯500种工业公司指数是很好，原因之一是美国公司在国外的投资回报率很高，但这不可能同时带来国内就业增加。在中国，从上一个十年，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在华公司的投资回报率不足20%，到21世纪这个十年，已经超过30%，平均大约23%。这个很高的投资收益当然会推高美国资本市场股票价值，吸纳更多投资进去。

总之，发展中国家只要资本极度稀缺，就会竞争着吸引FDI（外商直接投资），那就得按照外国投资需求来改变本国制度。而美国对海外输出的投资几乎是占比最高的，注同期，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输出也是最多的，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回报率也在同步提高。

由此，我们大都可以理解为什么国内很多部门和大资本也都在说应该投资美元、投资美国国债、投资美国股市。确实，中国官方财经官员和垄断资本这样做，很符合G2所内含的美国币权主导的币缘战略体系要求。

中国近20年相继进入市场经济和资本全球化，得到最大的制度回报是人们欢呼外资大举进入，促推中国改制——“倒逼改革”！很多高官和高知都在为此弹冠相庆。

但是，高知们欢呼的这些东西其实恰恰没算那个“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账。

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是“双重输出”——大量向美国输出商品帮美国人降低通胀，使得跨国公司有条件以极低价格的资金回过来投资中国的经济命脉领域，控制战略产业；另一方面，以此再取得极高的资金回报率，回流到美国资本市场，再大量吸纳中国贸易盈余作为FDI投入美国资本市场。

中国近年来被动承载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后果是典型的输入型通胀。一方面大量购进高价格原材料和石油造成国内PPI过高，传导推动CPI上涨。银行在CPI压力下不能负利率，只要国家推行宏观调控，那就会控制信贷、提高利率，导致国内资金市场价格过高。同期，中国金融业出现了政策性息差增加导致利润率虚高的现象。但是，银行利润越高，各地产业收益率过低的实体经济就越没法生存。这就是近年来中国加入全球化以来的规律性过程，而恰恰是输入型高通胀带动高资金价

格，也就是银行的高利率，又使得能够吸纳就业的中小企业无法生存。

2011年南方出现的“老板跑路”，很多学者归结到中国政治体制上，却很少人深究：原来在中小企业里面很活跃的民间资金，为什么这几年迅速质变为高息集资，或者是投机性炒作中的高利贷运作，甚至更多地出现金融大案？例如吴英案。

要我看，其实是有复杂的经济背景的。

美国不断量化宽松向全球转嫁危机制造出来的高通胀，使得任何单一国家的一般意义的国内宏观调控政策不得不失效。现在的中国也因无力抗拒输入型通胀而出现政府失灵，这根本就不是社会上说的政府是否有宏观调控意愿或者是否宏观调控措施过量，而是完全没有国际话语权、更没有建制权的政府，单靠国内调控不可能缓解长期以来外部输入型通胀，因此，是政府无力加入全球治理而国内调控成本过大。

目前工业化国家，在亚洲地区的中国、韩国、日本这三国中，中国资金利息最高。这是一条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承接巨大外部性来倒逼金融资本化改革的道路。

这个问题只是借此提示各位，要看到美国量化宽松制造出来过量货币往哪去了。其中值得注意的点位是：对于大多数进口原材料和食品的制造业国家来说，大都已经被以美元币权为核心的新币缘战略使用软实力套住了，当我们国内的宏观调控仍然习惯沿用传统的产业资本阶段的老货币政策时，恰好就是因为输入高通胀而被动高利率，同时还试图维持低汇率来刺激出口。这样，就成了被金融资本剥下两张皮的牛。因此，中国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一高一低”一样，除了逐步小幅调高人民币汇率之外，长期的高利率＋低汇率恰好和美国低利率＋高汇率构成一个完美的对接。这是发展中国家全额承担美元币权主导的金融资本泡沫化增发的制度代价！

因此，也可以认为发展中国家上层建筑的最大体制弊病就是：金融和外汇当局都客观上在帮助美国的金融资本集团对外转嫁代价。由此看，中美双方在汇率问题上的交锋，不过是表象的、有作秀成分的伪博弈。

因此，在中国今天讨论入世十周年的时候，人们应该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当前处在所谓传统的产业资本阶段，美国处在当代金融资本阶段。这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之间，是有着巨大差别

的。

之所以现在无力应对这种输入性通胀，是因为输入性通胀背后是双方正好对接的“一高一低”，这一对接，就导致我们成为金融资本危机代价的承载者。

（三）中国处在国家竞争微笑曲线的底部

金融资本全球化阶段的竞争是国家间竞争，而非微观的企业间竞争。

因此，只有维护经济主权的全球战略，才有国家参与全球化竞争的胜算。

这里借用微笑曲线，做个中美俄三国态势分析。诚然，俄罗斯属于资源型经济，中国属于产业型经济，美国属于金融型经济。如果把GDP数据做一条斜线，则看上去中国高于俄罗斯，低于美国。

但在金融资本全球化阶段，俄罗斯和美国都处在微笑曲线左右两个上端，中国处在底部。

当人们追随西方意识形态宣传，说到俄罗斯、伊朗、利比亚和委内瑞拉等处于资源经济阶段的所谓非民主化的强权国家的时候，要明白他们虽然都属于比中国这种产业资本更低的资源型经济阶段，但是沿用这个观点，那意味着我们还停留在从传统工业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阶段来分析21世纪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竞争。

如果我们认识到世界已经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则分析思路就应该完全不同。

因为，虽然所处阶段不同，但资源经济主权一旦在国家手里或者以革命的名义重新收归国有，那么通过国家垄断，就不仅可以直接获得资源资本化收益，并且还在客观上可以间接地与美国币缘战略结合来“搭便车”地获取国家收益最大化。

这也是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和前卡扎菲执政的利比亚等靠所谓强人政治来维持资源主权的国家都遭到美国极端仇视的内因之一。

当然，在一般意义上都应该支持争取自由和民主的群众斗争，但那些意识形态应该与战略研究区别开来。因为，全球危机打击下的街头政治，往往成为新币缘战略和当代巧实力战术运作的主要领域。

与一般批判俄罗斯或委内瑞拉政治集权的主流思想不同，我认为俄罗斯和委内瑞拉选择石油资源国有化战略是符合最大多数国民利益的。何况，这两国都有一个把石油已经私有化或者被跨国公司掌控、又再收归国家的过程，例如，查韦斯掌权之前委内瑞拉石油3/4是跨国公司掌握，在掌权之后才强行把石油资源收归国有；俄罗斯也是普京上台后才想方设法拿回资源主权。

能够做这个收归国有的实质性变革的领导者，一定是强有力的政治家，并且都得到多数民众支持。如果这个支持至今仍然占多数，那说明该国人民已经从中世纪单一神教所派生的一元论的普世主义的西方意识形态迷信中或多或少地清醒过来了！

其实，对于资源经济国家来讲，维护资源经济的国家控制是第一要务，否则根本不可能占有微笑曲线左边这一端资源价格上升的收益。因为，微笑曲线右边的另一端，与资源开发出口相关的现货期货金融结算及其衍生品交易等，已经转化成西方资本市场收益，被跨国公司和垄断金融资本等西方利益集团占有了。

所以，当1989—1991年俄罗斯被打回到资源经济的时候，不仅前苏联、东欧的产业经济几乎都被打掉了，而且实体经济的货币化和资本化这种制度收益也被西方占有了。如此经济跌落造成的巨大反差，俄罗斯人潜于内心的一定是希望夺回在地化的资源主权，这是大多数俄罗斯人拥护普京的根源。且不管大选党派如何斗争，普京以国家名义采取特殊手段从大亨手里拿回资源控制权的做法，是受老百姓拥护的，因为这样就可以将国家政治强权和资源经济之间直接结合形成最大化的利益。

这个依靠强势政治家以民族国家或人民利益的名义夺回左边那半条微笑曲线的过程，在国家竞争战略的逻辑上很清楚。

因此，俄委两国因都处于西方主导的金融资本阶段，虽然本身仍然属于资源经济，但却直接采取国有化战略，遂造成在西方推进金融深化中“搭便车”而由国家占有机会收益！

其实，最值得调整战略思维的还是我们。

中国人应该明确知道，处在“强权化的资源经济”和“强权化的金融经济”这两者之间的中国，就好比处于微笑曲线的下巴颏，对两头都是吃亏的。

而在微笑曲线左右两头，无论左右之间的意识形态如何对立，二者

利益内生性结合，却是相辅相成的——只要互相“搭便车”，就能双赢——美国币缘战略炒起了俄罗斯资源价格，对于金融资本国家来说是成功对外转嫁了过量增发货币的代价；而对资源国有化国家也肯定是跟着获益，而且左右还能联手把代价转移给制造业国家。

诚然，他们之间即使不主观共谋也是双赢，代价转移到中国这里，我们就输惨了。因为，我们处在微笑曲线底端的下巴颏位置，就是承载双方转嫁危机之所在。所以，只要西方继续过量制造通胀，美俄无大碍，中国就有很大的变数。

（四）美国大选年增加对中国影响的变数

在全球化挑战下的中国对外政治经济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到底是哪个利益集团？

如果能够“去价值观”地看中国这种社会结构，其实最具“阶级自觉性”的，就是国有垄断资本。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政方针，也长期是这个唯一的“自觉阶级”在主导。

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其他阶层都不具有“阶级自觉性”，都还是所谓“自在的阶级”。在中国工人阶级于20世纪之初终于正式走上历史舞台之前，无论是农民小资产阶级，还是城市刚刚崛起的中产阶级，都处于分散状态。近年来瓦釜雷鸣的中资，不过是从一盘散沙升格为一盘碎石。总之，虽然社会冲突乱象频仍，但混迹其中的小资和中资都不是“自觉阶级”。于是，整个20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群体复杂变化的历史中形成的唯一具有自觉性的阶级，就是遭人诟病的国家垄断资本。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条件进入工业化，更没有形成这种国家资本，一般也就无法理解国家资本作为经济基础对官僚政治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这也是一般国家大抵无法学习或理解所谓中国特色的原因。

我们既然进入产业资本阶段，就得遭遇比一般发展中国家更多的麻烦，但100年来连普通中国人都已经习惯于使用西方中心话语体系来理解东方的事情。诚然，由于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无能和无德，搞得现在各种各样的社会讨论基本上还得用这套西方话语体系来做解释。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既然中国社会各阶层都不具有自觉性，如果遭遇巧实力不断渗透或直接介入所催化的政治变局，怎么应对？

以前中美之间战略接近，如果按照宏观经济和战略研究学者王建的

说法，是个渐行渐近的过程。

那接着请问，美国什么集团主导这种中美接近呢？

过去的20世纪美国主流很大程度倾向于右翼，在冷战时期的20世纪50—9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是共和党代表的垄断资本主导，这跟我们国内最具有自觉性的国家垄断资本之间，似乎是某种较低摩擦的结合。毛泽东对尼克松说，他喜欢跟右派打交道……虽然有点过于直白，似乎对当年的中国意识形态宣传做了一个相反的解构，但这是大实话。因为在客观背景上，中美构建战略关系确实是在美国的共和党右派执政时期。那时的中美战略接近，当然符合美国传统地缘战略的利益，特别是符合美国冷战时期的地缘战略利益最大化。中国亦然，恰恰也是在被冷战舆论误以为是左派的前苏联处于产业资本主义鼎盛时期威胁对华核打击的紧迫时候，促成美国总统访华的。

任何研究者如果只能按照冷战遗留的意识形态化理论来讨论问题，就把自己低俗化了，思想库做战略研究的参与者当然会认同，苏东发生那些变局根本就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如果对比当前，恰是被传统意识形态误以为是美国左翼的民主党执政时期，尤其当美国国内矛盾在大选年恶化起来、有更多人认为“我们是99%”被1%的垄断金融资本剥夺的时候，依据民主党相对而言的政治传统，有些情况下总统也会站在弱势群体一边，当前也试图以此为争取选票的政治性表述。因此，民主党强调变革，把增加就业当竞选武器，为此，批判中国的声音就会很大。

相对而言，民主党为了短期政治利益而完全不按照当年共和党与中国共产党形成战略同盟关系的需求出牌，这是完全可能的。近期看，除了振兴美国产业需要迫使中国提高制造业成本的经济策略之外，还在政治上提出“区别中国与中共”的策略，以及遏阻中国出现强势政治家而策动舆论战等，这些都可归于巧实力的战役动作。

因此，唯中国在国际环境上充满变数。

俄罗斯人要维护资源主权，就需要强势政治家维护国家强权。美国大选年，民主党要想靠大危机压力下的选票保持连任，就会有更为激进一点的动作，或者采取西方意识形态意义上属于更左翼一点的政策。总之，更偏向于出台不利于原来中美“结盟”时期的政策。

这一点，恰是我们在思想库讨论中分析不足，中国执政者应对准备

也不足的。

我上一次座谈会给你们交的发言修改稿指出，日本因为放弃基本的国家主权而获得了在战后的美国地缘战略中“搭便车”的机会，所以日本可以极低成本地推进所谓“外向型经济”。因为所有的市场和通道都是美国人花钱、美国人派兵控制和保护的，日本不用花一兵一卒的军费开支就可以方便地占有能源原材料市场份额，并且不用投入国防力量就得到海上通道运输的便利。这个“搭便车”的制度收益，对于日本战后再工业化和日本政治崛起，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使日本从来就强调与美国紧密战略同盟关系成为一个前提。

美国人现在对中国人提出的要求，其实是不许“搭便车”。

表面上看有道理。因为，日本“搭便车”的前提条件在于朝鲜战争陡然爆发，这就造成本来被美军占领没有军队、连警察都只有棍子的日本，突然变成是美国战略前沿的一个不沉的航空母舰。再后来，则是美国跟苏联、俄罗斯之间进行战略对抗的主要军事基地。另外，日本也几乎不提所谓国家主权问题，日本政客知道在美国军事占领条件下提出完整国家主权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现在美国人一方面强烈要求中国人不“搭便车”，但另一方面却又绝对不许中国自己构建海外通道和资源产地的安全体系！这对于中美两国战略对话来说应该是个重大议题，中国方面完全可以把这个问题直接提出来讨论。

如果中国人在中美战略对话中进一步地解释到位，说明中国处在产业资本阶段和美国在金融资本阶段币缘战略之间，确实有非常巨大的落差。由于我们的产业经济扩张实际上向美国做了双重输出——既维护了美国低通胀、承载美国向外转嫁的通胀代价，又遵循“特里芬悖论”维护了美国的金融全球化，那中国就的确不是“搭便车”，而是金融全球化之中处于微笑曲线底端的代价承载者。美国如果坚持不许中国“搭便车”，那就意味着要打掉中国这个最大的承载美国金融资本化代价的主体。美国可以再找个承载者，但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种体制承载代价的能力这么大。

以上说法，只是沿用从西方引进的百年话语逻辑对现实问题做分析，不是我的本意。

（五）地中海经济区的一体化整合

21世纪的今天看地缘战略重组，无外乎三种组合模式——中美、中欧、欧美。

出于对这些年的话语逻辑已经形成的理解，应该是没有更多疑点的，但我总觉得这里面还是有问题。在哪儿呢？不妨从刚才说的道理来看。

第一，在这个全球危机爆发以来的地缘政治变动中，地中海沿岸国家已经构成资源、能源、粮食、制造业和金融经济等多元互动的结构性板块，逐渐构成了原来欧盟成之为欧盟的条件。欧盟成之为欧盟的一个条件，是因为区内贸易大于区外贸易，这就是欧盟发起的重要前提。

如果我们看地中海沿岸60个国家市场总量、经济总量、能源和原材料供应能力、货币量和经济量相关性等，都相对是一个良性结构关系。地中海一体化板块自身就是一个已经初步形成内部区域整合条件的地区。

历史上，无论是古罗马、古埃及、拜占庭还是奥斯曼，只要在欧亚非结合部形成一个大帝国，几乎都是控制地中海这一带，形成环地中海的地域概念。历史上就是这样，当代还是这样。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另类的可能呢？

当我们都认为这次债务危机不仅没有打垮欧盟和欧元区，反而使它更趋向统一的时候，我以为大家都看到了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原来像利比亚这样的石油大国，过去由于石油资源主权国有，而在北非属于高福利国家，因为被欧盟军事运作打垮了，所以它的资源主权全数交给打它的国家，这是后殖民主义地缘战略下的石油资源的再殖民化，利比亚算是最典型的。如果伊朗、叙利亚这些产油国的资源控制权，也以政治借口进一步被西方改变了，那就是说在资源经济阶段的资源主权重归了币权主导国家，这对于西方来说是利益最大化的。

地中海区域整合的可能，在于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美国人在阿拉伯地区驻军只有10000人的时候，它的三艘航母只是保持区域稳定，那这个区域的经济整合机会，就留给了更具有区域主导权的欧盟。

我原来认为欧盟不具有区域整合条件，因为只有纵向的整合才是成功的，那时我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例说，美国占有资本、技术和贸易高端，对下整合加拿大的自然资源和墨西哥的劳动力。而欧盟各国之间如果产业结构是平的，那平面就不可能整合。可现在北非和阿拉伯的资源

都被欧盟利用政治机会强行包纳进来了，欧盟对地中海地区就具有了纵向整合的条件。

所以，全球危机下的区域变化中，还可能有很多另类的区域战略或亚区域战略选择。

我们最近召开首届南南论坛发表的声明，第一条强调的就是资源主权，第二条强调的是社会合作，第三条强调的是可持续的安全。所针对的，一定程度上是近期开始的区域重组。

第四节　欧债危机实属政治危机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欧洲持续发生着政府债务危机，这类政府危机考验的不仅是欧洲政治家的眼光，也是政治制度。

因为，欧元区的政治国家有一个基本的制度缺陷，就是当1999年欧盟国家开始发行欧元的时候，意味着加入欧元区的政治主权国家丧失了其经济主权的核心部门——货币主权。

欧元区的各国政治家要向市民承诺他们的社会福利会不断上升，同时还可以少干活，接着，在当选之后就得兑现。因为他们没有中国这样的完整经济主权——政府可以渐进地制造通货膨胀，迫使百姓承受政府债务转嫁而来的通胀压力，所以加入欧元区之后的欧洲各国政府不能不断地、逐渐地制造通货膨胀向社会转嫁压力，于是就不断地累积政府债务——每一轮竞选产生的政治家轮替，都得许下更多承诺，一旦承诺之后就加重政府债务，不能增发货币就得靠增发债券。当然国债评级就会下降，债务则无从化解。

美国和中国的国债评级都不差，这是因为两国政府债务的比重可以靠不断发行货币来减少——货币的分母会不断增加，债务作为分子就会下降。

所以，希腊、西班牙、爱尔兰这些国家的债务问题，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制造业下降，虚拟资本经济又玩不起来。欧洲那些制造业较强的国家，如德国、法国、意大利，相对来讲还撑得住。其他边缘国家却在不可能维持货币主权的情况下不断累积债务。最后，只能等着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救助，决不可能靠自己国家的力量。

但是欧盟很多政治家认为不该给钱救希腊债务危机，他们的道理是直白的：没救。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负债都比较高，能不能有效地把负债转嫁成社会的代价，这算是任何类别的国家政治体制内在的一种任务，如果不带有任何主观的价值判断，则应该知道：这种向社会转嫁代价是任何主义的现代政府都一定要做的。

当加入欧盟的所有主权国家仍然维持着所谓政治主权，而执政者维护其政治主权却是要靠向普通选民买好来获取选票，那这种维护就是要付出巨大代价——越是自由主义的、多党制民主的政治和治理，就越是会导致政府债务的刚性增加，这就是规律。

诚然，自由民主的制度值得向往，但其成本是相当高的。在这个政治制度下，要么政府有条件将债务向外转嫁，像美国强迫中国和日本这样的贸易顺差国家购买其国债。如果没这本事，像英国这样则只能傍美国大哥，大哥才允许英镑汇率长期高于美元50%以上，有时候甚至高80%，以使英镑在国际外汇市场上，或者说英国国债在国际市场上有相对比较高的信誉。这样的特殊条件，是大哥给的！

美国人作为大哥，有两个地处大陆之外的岛屿小弟在战略关系上最好，一个英国，一个日本。因为，这样可以用欧陆之外的岛国英国控制欧洲，用亚洲大陆之外的岛国日本控制亚洲，所以英国和日本是世界上永远会跟美国保持紧密战略同盟关系的国家。对美国的关系是最重要的战略关系——英国和日本是永远这样公开表态的。

在亚洲外汇市场上，日元和美元是互补的，每当美元要下跌的时候，一定要日本政府大量增发日元买美元，这就把美元汇率撑起来了。因此，相对于美元化的地区，日本是美国在整个亚洲地区最好的宏观政策工具。

欧洲人比亚洲人聪明一点，欧洲人发行了欧元。但与美元有紧密同盟关系的英镑决不加入欧元区，因为一旦加入欧元区，英镑将大幅贬值40%以上。完全从客观角度看，这符合英国经济结构的要求。英国第一大产业就是金融，为了保持自己的币值稳定，只能取得美国特许，因为这个特许英国才有在国际金融竞争中的地位，并不是比谁资本市场管理运作技术高。可如果从实物产业来说，德国不知要比英国大多少，因为英国的实物产业已经完全退出了。英国第一大产业是金融，第二大产业是旅游，如果从产业角度来说，英国并没有国际竞争力，但美国赋予他

仅次于美国的国际金融资本地位，这就导致了德国现在很难处理这个关系。

法国是整个欧洲大陆拥有最长时期国家政治史的国家，据说有1500年的政治国家的历史，在拿破仑时期曾经统一过大部分欧洲。其他国家基本上属于年轻国家，比如德国1832年立国，意大利1847年立国。所以，欧洲的整合一定程度上是在法国人的推动下进行的。

从这个角度看，有助于我们了解欧盟危机。不妨认定为：这是“一批维护政治主权的国家放弃了货币主权导致的客观结果”，这样看，就比较清楚了。

若愿意深入思考，则从中可以知道，既然欧洲危机的本质是政府危机，那么这个危机是否会爆发，就取决于美国是否认为它不再需要这个在金融资本竞争中处于对立矛盾、政治上却是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战略关系的伙伴。

现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手来救希腊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欧洲这些问题国家都属于美国的战略同盟，大哥说一声给我去打阿富汗，谁不去？都得跟着去。大哥说大家去打伊拉克，谁不去？大家都去。美国不可能一国单干，那叫侵略！当年打朝鲜就是联合国军，有16个国家参战。当我们认定欧洲所谓的政府债务危机时，就不得不看政治背景。实际上，国际政治中美国仍然需要这帮小弟一块去打这个打那个，才能证明它不是侵略。也因此，美国控制着的世界银行、IMF就得出手去救欧洲。

可见，欧盟国家只要在政治上仍跟美国保持紧密的战略同盟关系，那欧洲的危机就不可能全面爆发，欧元也就还能维持，中国就不必急于调整外汇储备结构。

按常理，我们该建议中央考虑调整外汇储备结构，抓紧卖出欧元，因为欧元区的危机显然属于放弃货币主权才导致的主权债务危机，假如IMF和欧洲中央银行不出手相救，那就意味着欧元体系的瓦解——无外乎两种意见，要么欧元区开除希腊、爱尔兰等，进一步再开除西班牙，但只要一开除，欧元区就随即瓦解了，所以不可能开除。但如果要维持，欧洲这种纵欲贪婪的政治文化其实不足以靠国内经济来维持，因此这种维持决不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维持，也是美国地缘战略需要的维持。

综上所述，欧洲危机本质是政治危机，但解决政治危机不可能只是靠传统政治经济学讨论的经济复苏，而是靠欧盟继续绑在美国战车上。

第五节 日本研究中的另类思考注

人们看到日本的政治、经济体制有严重问题，却很少有人注意日本属于长期稳态社会。从1991年日本进入衰退的20年（也有说是“失去的20年”），却一直是日本最稳定的时期，既没有高失业，也没有社会动乱，哪怕10年9换相，不论自民党党内派系斗争复杂还是执政党轮替，其政治和社会也还算是稳定的。

现在很多人想当然提出的问题，并不是日本自身的问题，而是从西方的所谓先进制度出发，来反观落后的亚洲，但这只是意识形态而非科学研究。

其实，我只是希望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把日本这幅图画尽可能画完整。还请各位注意，我讲的主要是这些年多次去日本，到处调查研究和与人交流形成的粗浅看法。

（一）从日本的视角看东亚地缘战略格局中的日本与中国

我认为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分析视角，因为中国很少有人从日本自身的角度看日本，特别是从日本自身的发展历程看日本在东亚乃至国际社会中的关系演变。

大家应该看清楚的是，在西方人长期推进殖民化以来，在包括东亚的这个西太平洋扮演主要角色、纵横捭阖的，从来都不是中日两国。

日本跟俄罗斯之间的历史关系大家也都知道。

其实，日本与中国的军事冲突，乃至于二战期间和二战前后的很多涉及中日关系的地缘政治问题，背后都是一方是英美势力，一方是俄德势力。

由于一战德国战败之后不能搞军重工业，遂转移产业投资到俄罗斯。因此二战前的德俄在客观上具有某种产业联盟关系，都不可能就范于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只是由于二战之初德国打下的整个西欧都属于

产业同构、缺乏能源和矿产，才不得不向东进攻俄罗斯。殖民主义列强纷争的产业资本阶段内涵性决定冲突性质的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日本，而日德两国二战的境遇相似。日本20世纪30年代本来受到美国军火支持，先向北去打苏联，却败于诺门坎战役，这才回头向南。也是打下中国东部沿海没有得到能源和原材料，但却已经得罪了欧美，遂不得不与欧美为敌进攻东南亚占据能源通道。

从19世纪中叶东亚遭遇殖民主义侵略和瓜分至今，传统的产业资本阶段的地缘战略仍然有很大作用或者影响。所以，在这块版图上先列强、后大国上演的一幕幕，都不是用中日两国关系变化就可以简单概述的。

因为，东亚近代历史本来就是一个西方大国博弈的历史，无论是从列强纷争，还是到双寡头控制，再到美国单边主义霸权与俄罗斯再度崛起在东亚的互动。

此外，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东亚原住民国家，是单一民族而不是一个移民国家，文化上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但是，别忘了日本人在尚武文化中有一个非常坚硬的内核：日本人自以为是西方推进殖民主义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有色人种打败了白种人的国家！第一个打败的是俄罗斯（当然是在中国战场上）；第二个打败的是欧美，二战初期日本人打败了整个西方在东南亚的势力，一直把他们打到印度边境去。日本人认为，在整个殖民主义历史上有色人种都是被白人欺压的，能够打败白种人的只有日本。所以，日本对战争认罪的人远不如内心深处保留民族骄傲的人多。

在美国使用核武器才造成日本承认军事失败之后的全球经济大战中，日本作为一个几乎没有资源和没有殖民地的外向型工业化国家，长期位居世界经济第二。虽说GDP赶不上美国，但日本1990年制造业主要产品总量曾是世界第一，泡沫化程度远比美国小得多。从这一点看，日本人也有理由自傲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没有“愤青”情怀，客观分析日本政治上的自傲内涵和社会上的超稳结构，才觉得那都是一般中国人不可想象的。

据此，我认为，对于日本在政治经济社会多个方面的情况，中国都还没来得及认真研究。

我在很多内部讨论中都讲，日本是世界唯一的20年零增长但却不发

生任何形式的社会动乱的国家，唯一出过的一件算比较大的事儿就是那个制造了地铁毒气事件的麻原彰晃。注

如果按照中国思想界沿着“左派幼稚病”的犯病传统下激进地纳入资本原教旨主义发展路径的不可逆趋势，来预言如果中国人在遭遇20年零增长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那将是一个非常不堪的状况！

我们研究日本，无权从中国高增长现状或者欧美的制度出发，片面地评价甚至指责日本的政治经济如何糟糕，应该承认它有很多的仍然保留下来的东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而不是现在像这种站在欧美的立场上的学者们大部分是以西方的价值观来衡量日本。

以上分析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一方面。

但是，日本还有另一方面，中国人即使研究了也很难借鉴——主权缺失条件下的实用主义对外战略——日本、韩国这种地缘政治冲突客观造成的主权不完整国家，却得到了美国与俄罗斯对抗的地缘政治中“搭便车”转嫁外向型经济巨大代价的历史机遇。

这也是我现在正在做的危机比较研究的一个内容，即：希望了解日本自工业化以来有过多少次经济危机？什么表现？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代价是怎样转移的？

大家知道，所有的后发工业化国家只要没条件对外殖民，在其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化过程中，不仅都有经济危机，而且只有能把危机代价转移出去的国家才能幸免于难，否则就跌入了所谓的现代化陷阱！

很可惜的是，几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跌入了现代化陷阱，没爬出来。

日本19世纪末期明治维新时代师从西方，日本使团虽然遍访西方，但发现西方模式不可照搬，遂做了“师从德国”的选择。并且，主要是靠集权政治＋军国主义打败了中国、霸占朝鲜半岛及台湾岛之后，再进兵满蒙，靠军国主义和殖民扩张，这才完成工业化的。

因此，它在早期的军国主义的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不属于以内向型积累为基本特征的东亚模式。并且，日本搞这种外向型工业化就得路径依赖地“脱亚入欧”介入列强纷争。只是命运多舛，后来被欧美打回原型了，所以它脱亚入欧走殖民主义道路的第一场“日本梦”变成了噩梦！

那怎么办呢？在美军占领条件下顺势而为，变成了“仰赖欧美”，在

积极地配合美国制衡亚洲、抗俄抑中的战略中，极端实用主义地巩固这种从属关系，从中获取巨额战略利益。

于是，无论日本怎样长期排位世界老二，美国也不会打压势同手足的日本。

不妨看它二战以后的发展路径，因为它不可能挣脱开欧美二战之后对它进行政治、军事、经济全方位控制，于是形成了一个以放弃主权完整为代价的“搭便车”过程——紧跟美国，利用美国以日本作为东北亚的最大军事基地来保护整个地缘战略防御圈，不仅节省了日本如果作为主权独立国家几乎所有必须支付的政治、军事开支，而且，还极大节约了日本的外部市场交易成本：不用按照西方的殖民化模式占有世界资源和产品市场，也就不必遭遇殖民地反抗运动，更没有美俄那种意识形态渗透和斗争、颠覆政权、出兵干涉，甚至局部热战等大国崛起势必发生的几乎所有重大外部性问题。

所以日本战后的再工业化，乃至于达到和维持着全球第二位，半个多世纪以来都是相对最低成本的。其国际形象，也比中美俄都好得多。

我之所以强调说中国不能借鉴日本经验，是因为：只要在全球老二的地位上就必须向老大支付巨额赎买成本，甚至支付成本也不得不面对金融资本阶段的新法西斯主义强权诉诸军事冲突的“极端形式”；而当中国不仅成为老二而且主权相对完整，那就势必成为“被敌对”国家！

这个中日两个先后当老二的国家之间的客观异质性，搞得中国人的精英集团很囧。再怎么一厢情愿地去搞适应老大的“顶层设计”，也无法直接改变中国这种客观具有完整主权国家的基本属性。这也是越深改越触及主权问题的内因。

（二）日本的两个真实经验值得做客观研究

接下来，我们再看构建日本稳态社会的基本制度结构，有两大块算是支撑。

既然提出要把日本这幅图画画完，往往是这个图画的角落起到支撑作用的部分，是人们很少关注到的。

第一大块，就是国内稳定上坚持重农主义的基本制度，内生性地形成土地均分制度派生的小农＋村社为基础的内部化机制。

这个世界上真正全面完成了村内土地的均等化分配的，只在东亚的儒家文化圈（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朝鲜、韩国、越南），而且都有暴力背景。也就是说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土地这个基本财产制度上，是彻底实现了平均分配的。世界上其他地区，包括亚洲的其他国家、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地区，一般找不到类似的基本制度。

因此，东亚可以产生一个连带的、但是很少有人分析的组织现象：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有一定的农村高度组织化特征，无论是日韩台的所谓农协、农会模式，还是中国的高级社和人民公社模式，还是越南的所谓村集体模式，乡村的组织内涵和层级大都是一致的。由此，也都是通过“综合农协”（日本称为JA）这样的农村高度组织化来形成村社制度内部的群体理性，而这些群体理性，也都在工业化过程中有效地内部化处置了外部性风险。

基于组织化才得以运作的所谓村社内部化机制，本来属于“东方理性”的基本经验，大多数研究东亚的中国人却很少谈到。

我们最近这几年开始组织中日韩的比较研究，从根本上来看内部化机制主要在工业化过程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我们说相对于国家稳定这个大局而言，土地均分制是基本制度。这在日本至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像中国这么大张旗鼓地鼓励外资内商进入农村占有土地这种事情，是极其愚蠢的，而在日本长期以来都是绝对禁止的。日本连一般的地方自然人都严禁占有农地、若自然人要进入农业，必须经过考试、履行一定手续，因为日本是一个农业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特别是耕地资源短缺，这个资源短缺到已经不是一个可以自由交易的领域。在这一点上，日本人是清楚的，同样韩国人也是清楚的，只有中国的所谓的改革家们和学者们才是糊涂的。

我们只能说：这是东亚稳态社会体系中的一只脚，这个脚跟稳不住就出大乱！中国现在的问题是这只脚在自断其足。

我们刚才说两脚支撑日本，这第一只脚就是平分土地之后的综合农协模式。这种模式就是不搞条块分割，把农业的产加销，金融、保险、房地产、旅游、超市、餐饮甚至医疗卫生全放在一个大系统内。没有中国这种条块分割互相摩擦造成的过大的制度成本，95%以上的农户加入综合农协，政府的支农惠农政策等给农民的好处，通过一个农协系统下达。然后，农协可以广泛地开展多种经营。在农村办超市、办饭店、办旅游、办金融、办保险，一概免税，法律规定50%以上的收益，返回给

小农。这是日本能够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问题的一个重要的群体理性。这在东亚社会本来都是普遍存在的。

而与中国最大不同的，其实是第二块，就是日本的所谓综合商社为名的财阀垄断模式。

如果能够去意识形态化地看东亚财阀模式，或者从国家长期安全看，确实具有一定的整体稳定性。其与中国之不同，主要是其海外投资战略配合日本央行对外转嫁危机成本的一致性。我们中央现在对付西方金融危机成本转嫁的办法主要是以国家信用对冲——国内印票子，通过制造温和通货膨胀来向社会转嫁外部性危机。而中国在经济领域接下来的一种可能趋势，也许是国企集团向东亚财阀模式转型。

这个说法我曾经在上海讲过，马上就被那些唧唧喳喳的人误解为我认同日本财阀模式。

其实，无论我们如何主观评价，日本这第二种制度，也许与体改研究会秘书长S七八年前就曾经寄希望于中国的官产学媒四大强势群体结盟以形成一个精英治理模式可有一拼？在日本的政治领域，直白地说就是官、产和黑社会结盟。如果日本知识界也得遵循“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那么附在这种皮上的知识分子就只能犬儒主义。

把我分析的日本稳态社会的这另外一只脚画上，有什么道理呢？

日本社会20年经济零增长却仍然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其实是经济社会结构中的政商结合＋黑社会“合法化”参与财阀合谋，共同维护着六大财阀控制全国经济。

客观地讲，人们如果愿意去西方话语地看东亚的话，类似日本这种政治经济紧密结合的制度在韩国、在中国某些地区，包括在中国台湾，都能找到类似的形式，虽然内容上未必完全一致。

至于意识形态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与我做的客观经验的归纳研究无关。

人们总得睁开眼睛看看，东亚各国的经济体制类别有很大的相似性。

日本城市中六大财阀和农村经济中的综合农协都具有内部化机制，其存在前提是它们得以分割控制全国经济。那么，就得涉及这种财阀制下的企业微观制度，那就是能够内部化处理市场外部性的所谓“年功

制”注。企业内部当然不是充分竞争的，但这种内部论资排辈起码有稳定企业雇佣关系、长期维护员工忠诚度的作用。

说到此，算是把我认为应该注意的两只脚画上了，请你们批判。

再明确一下我的分析。

日本得以在20年经济危机和萧条打击下长期稳定，靠的是基本制度中的两个结构性支撑：其一是土地均分制＋高度组织化，其二是财阀制度＋企业年功制，二者都带来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风险的机制。

此外，就是东亚地缘战略中的极端实用主义——紧密结盟美国——战略性“搭便车”带来外部性成本极低的巨大利益。

这些，就是资源极度短缺的日本靠外向型经济再工业化迅速崛起、长期维持世界第二大国却没再次在世界树敌的基本经验！

（三）大国战略演变与日本参与东亚一体化的可能性

对中日两个经济体来说，实现区域整合的机会还没到。假如排除东亚地缘战略中的西方强权控制而只讲中日互动关系的话，目前大家都有些思考，已经看到了机会到来的曙光，当然是积极的，但不能以此为判断依据。所以，我认为机会还没来。

先回应一下W说的板块理论。其中，第一部分关于中国到底和欧盟、日本、美国至今的关系有什么摆布，W对欧盟的态度是一贯的，认为是敌人；对美国的态度也是一贯的，是正在朝友好的方向发展。所以，W现在提出这个战略就是南分北和、东连西进，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地缘战略摆布。W在说这个战略之前，谈到日本未来发展态势，其中有两个主要的判断依据，第一个是经济上的，主要讲的是日本的贸易赤字和储蓄率下降，第二个是社会上的，那就是人口老龄化。但有一个数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引，那就是日本是目前发达国家中综合债务对GDP比重最高的国家，并且是长期最高。这三点似乎都是不利因素。

我想稍微补充一点。日本高债务跟其他国家不同，除了主要依靠国内储蓄对日本财政金融支撑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当我们看到战后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的时候，有一点很重要，以前的列强纷争到战后变成双寡头地缘战略，于是在战后同步推进的是双寡头的“双雁阵产业转移”。美国对西欧和对日本做雁阵式的产业布局，那么苏联也是向东欧和中国在做产业输出，双寡头都试图完成地缘战略的控制。也就是

说，假如这个产业资本阶段上还是传统的地缘战略控制的话，那么美苏这两个产业输出，相对而言都是构成冷战对峙格局的战略条件。

接着看，后来的麻烦出在哪儿了呢？

在于美国人完成了雁阵式的产业转移，形成了雁阵式的地缘控制，乃至于后来升级到金融资本阶段，东亚就变成美元湖，而这个美元湖原来最大的短板就是中国大陆。但，因为中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跟苏联交恶，到20世纪60年代开始双方敌对，使苏联没有完成雁阵式的产业转移，只对中国转移一部分就不仅草草结束，双方之间还发生了对抗。其客观演化的结果，最终是中国补了西太平洋美元湖的短板。

再往深了说两句，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进入金融资本主义，美国操作币缘战略于欧亚大陆，用的是两只“把手”：一个是欧洲边缘的岛国英国，另一个就是亚洲边缘的岛国日本。英国在二战以后客观上让出霸权地位，但盎格鲁-美利坚模式本身仍然是一致的，因此构建的是通过英国制约欧盟的“把手”，内涵是传统的盎格鲁-美利坚全球战略体系。而日本则有所不同，主要是二战之后美军掌握日本军事命脉。而美国凭借军事强权扩张同时又赋权于国家信用体系扩张的内在作用，派生出当美国完成军事掌控的时候，其实也就客观构建了日元跟美元之间依靠美国军事强权维护日元信用体系的战略结盟关系。例如，我们都可以看到日本贸易顺差和长期债务率高的时候，其跟美国币缘战略是互动的关系。

刚才为什么说对日本而言机会没有来？

日本作为美元币权经济操控亚洲或者操控所谓西太平洋美元湖的“把手”这种战略作用，依然是非常强大的。我刚才提到的日本靠外向型经济长期以来只能搭美国便车才有巨大收益的分析。我认为，日本会一直抱着这个大腿，直到抱不住才算完！

因此，我说的日本的机会没来，在于这种日美互动关系的收益大于成本，日本才一定要把美国大腿紧紧地抱下去。所以，对它来说自主选择的战略机会就还没有来。

如果还是按照W的说法，那我这个东亚分析，客观上带来了另外一个判断，那就是中国的机会也没来。直白地说，对日本来说还得继续抱下去，对中国来说可能刚遭遇怎么也抱不着的结果。

还有与之相关的另一个不太成熟的判断，就是中美现在由经济而政治的关系变化。

以往的经验是，中国对美的双重输出：通过出口更多造成美国经常账户的逆差，形成中国顺差，再大量投资美国政府债券导致美国的资本账户更多顺差。这两者都有利于美国金融资本全球化，被中美双方的学者和政治家认为是构成G2的战略相关性的基础。

但是，现在看来有变。主要是美国从中国得到的低价格消费品、极大压抑其国内通胀率，使得跨国公司得到长期维持低利率的资金，反过来以极低利率的巨额投资投入中国，不仅直接得到中国高利率、低汇率的制度利益，而且几乎控制了中国外向型战略产业，这使得美国通过债务融资，反过来成为在中国投资的债权。这个债务演化为债权的间接收益是美国在华公司盈利从20世纪90年代的不足20%显著提高到新世纪的超过30%，客观地造成道琼斯指数表现良好和美国经济复苏。

这些中国对美双重输出，虽然有利于代表金融资本的美国共和党，但却当然不利于在大选年试图从99%的反抗华尔街的百姓中争取选票的民主党。当前，奥巴马借贸易保护主义诟病中国和力促国内就业的经济政策，配合不顾一切地向中国转嫁即期政治成本，成为竞选策略！这些，恰配合了整个西方危机期间急着找到成本转嫁对象、在国际国内各种问题领域对中国意识形态化的全面进攻。这些紧迫的情况，已经不是中国多做“双重贡献”、努力维护美国大资本利益就能单方面奏效的。更何况，中国低技术含量出口产品的可替代性确实越来越明显。

总之，中美以往靠大资本构建的战略关系本来还可通过利益集团的对话勉强维系，但近年来因金融资本危机的全球深化而导致核心区越来越不顾长远地对外转嫁危机代价，遂致近期中美关系被偶发性事件生变的可能性增大。注

第六节　从北非“街头政治”看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注

从突尼斯开始逐渐蔓延多个北非国家的、以“街头政治”为表现形式的社会运动，若只是从现象上看，主要是“两高一单”造成的——单一殖民地经济面临“两高”（高物价和高失业）打击诱发的；若从本质上看，则仍然是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延续。

（一）西方政治体制的债务危机转嫁于发展中国家

源于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被金融资本主导国家通过进一步信用扩张对外转嫁危机造成全球通货膨胀。由于这种通货膨胀的全球性，而使经济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承载了发达国家危机代价的转嫁。

这在本质上仍然是全球资本主义体制性的全面危机，也属于“环地中海危机圈”的一个组成部分。具体解释如下。

大家都应该认识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一对具有因果关系的矛盾。目前在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以其薄弱的经济基础来支撑发达国家最高成本的上层建筑；高成本的西方政治体制造成债务危机，并转嫁于发展中国家薄弱的经济基础，这是全球资本主义体制的基本矛盾。

这一点应该说是我们的科研团队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的一种创新。

为什么说发展中国家承载危机代价，客观上在支撑着发达国家的上层建筑呢？

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政治体制目前被全世界主流意识形态认为具有普遍意义，是普世性的，或说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政治体系。据此，谁要想说发达国家所创建的这套上层建筑，包括多党制议会民主、媒体自由、选举自由等这些东西有问题，认为这个体制不对头，谁就是“政治不正确”，那就没有形成话语的可能。

但客观情况却表明：这套东西在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基本的经济基础支撑，即使在发达国家，它也是中产阶级把自己庸俗化的福利需求过分政治化的结果。

我再重复一遍，虽然发达国家现在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正确的话语体系被主流认为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但它其实是中产阶级把自己庸俗化的福利要求，泛政治化提出的一种表达方式，它在本质上不是一个代表广大劳动者群体的正常的所谓关于人权、民主的自由表达，而是中产阶级追求自己福利化的利益的政治化表达，于是形成了现在发达国家的高成本上层建筑，这在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不具有支撑的条件。

所以，一方面，无论对任何人我都应该尊重你有各种各样的理念，包括尊重你接受了发达国家所形成的这种强势话语之后所形成的理念，这如同只要我尊重你的宗教信仰就绝对不会去探讨信仰本身的对错；但另一方面，我无论多么尊重你的理念，仍然得知道大家共同的麻烦客观

上在于无论哪个理念要想变成现实，都需要认真计算制度成本！因为，这种成本必须由大家支付。

这应该是大家愿意参与讨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因为“环地中海危机圈”，包括当今北非政治出现的问题，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基础不具有支撑这种上层建筑的条件。

（二）“两高一单”的经济发展困境

从突尼斯到埃及再到利比亚，这些似乎体现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出现动乱的北非国家具有经济方面的共性，就是这些国家都遭遇到了高通胀＋高失业的“两高”特性。

而这“两高”，实际上并不是这些经济体“内生”的，很大程度上是外部输入的。

2008年至今的全球危机，是一次全面的资本主义危机，不是局部的，不是个别的。这次全球危机本源于信用危机，而制造信用的主体是政府。尤其是自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西方主导国家不再维护纸币发行与贵金属储备之间的关系。自此以后，世界上的货币信用和国债信用这两种信用，主要还是政府凭借政治强权创造的。

事实上，最大霸权国家创造出的这两种信用都属于世界最大规模！

最大霸权国家信用扩张、膨胀导致的结果，是其金融和债务形势都恶化的危机向全球发展中国家的转嫁。这种转嫁的渠道主要是通货膨胀。因为，大规模增发出来的货币大量流向原材料、能源和食品（粮食）市场。这种关乎人民生存和实物生产的价格水平的陡然提高，并不是人们的正常需求导致的价格上涨，而是全球金融主导国家大量增发的货币涌进期货市场必然推动价格的大幅度上涨。

根据2011年年初的世界银行数据，上一年小麦价格上涨了100%，玉米价格上涨73%，大米价格涨幅相对比较低一些，对东亚和南亚的冲击相对小。

由于应对全球危机的政府都在推进信用扩张，不仅导致了能源、资源和粮食价格上涨，而且，能源价格大幅度上涨，还反过来又导致粮食价格上涨——主要由于发达国家推进生物能源计划，将大量的上亿公顷的土地用来生产生物能源，遂导致粮食生产和供给都减少，这势必推高

粮食价格。

按照测算，只要石油价格超过40美元/桶，生物能源就有利润空间；石油价格低于40美元/桶的时候，生物能源还得要补贴。现在石油价格超过100美元/桶。上一轮危机时期，石油价格最高达到147美元/桶。如果石油价格达到150美元/桶，即意味着生物能源有三倍以上的利润空间。从美国、欧洲乃至巴西、中国、印度等国的发展规划来看，都有大量的生物能源种植计划。这也会继续推高粮食价格。

根据2009年国际组织数据，2008年发生在38国的粮食危机主要原因是大量热钱冲击粮食市场和生物能源，占用大量粮食用地。用一国民众粮食短缺程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饥饿指数”，2008—2009年的全球饥饿主要集中在南亚、非洲这一带。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饥饿，并不是说这一带的农业资源有限或粮食的产出低，而是由于大型跨国公司占有了这些地区国家的农业资源，发展大农场，但大农场的产出用于出口获取利润，而并不对这种资本主义农场所在国家的贫民的饥饿承担责任。像南部非洲国家有规模上千公顷的大农场，个别的甚至会到上万公顷，相当于中国一个小县的土地面积。拉美的巴西、委内瑞拉也都是大农场遍地的国家，但仍然有大规模的贫民人口饥饿的问题。这很大程度上与这些国家的殖民地历史有关。

我们的研究团队归纳出来的规律是：越是维持殖民地“单一经济”的国家，食品和一般商品就越要靠进口。由此，越是贫困国家，越是殖民地“单一经济”，其受输入型通胀危机的影响就越大。无论在委内瑞拉，还是在塞内加尔、马里，普通百姓在街上购买到的食品和消费品价格比在欧洲还高，因为主要依靠海外进口。

所谓“单一经济”，是指殖民者虽然表面上离开了，但留下殖民化的经济结构，比如香蕉之国厄瓜多尔，很多老百姓只种香蕉，在香蕉没有成熟的时候就没有现金收入，如果香蕉成熟了没有人买也没有现金收入；平时既不种粮食蔬菜，也不养畜禽，城市里也不生产衣服鞋子；如果没有消费品和食品进口，就没法维持基本生存。当这些普通民众的生存资料都要靠进口的时候，就会直接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攀升的严重影响。

所以，殖民主义造成的穷国一般都是“单一经济”国家，在经济危机打击之下首当其冲地遭受高通胀的恶劣影响，一旦高通胀发生，这些国家经济基础本来薄弱，于是就会连带着出现企业大量倒闭、劳动者大规

模失业的情况。

所谓“两高”，就是“高通胀”加“高失业”，会使得这个社会大部分群体受不了，于是就会出现“街头政治”，不仅北非，此前的希腊、西班牙爆发街头冲突也是同类原因。

所以，是“两高”问题——高通胀和高失业，引发了没有明确组织动员和没有政党纲领的“街头政治”。这并不是19世纪欧洲发生过的阶级斗争政治经验，也不是20世纪民族独立政治，这只是21世纪在“两高”打击之下，因承载了过重的全球经济危机而爆发的、中产阶级广泛参与的“街头政治”。

更为尴尬的悲剧在于：即便换了领导人，无论是军政府，还是新的多党制议会实行民主，也没有解决“两高一单”问题。亦即，是否换成西方化的政治体制，或者无论谁当政，都解决不了输入型通胀和高失业困境，因为，这是霸权国家外部性危机转嫁造成的结果。

（三）埃及和北非地区“街头政治”的特点

埃及人口规模有8000多万，穆斯林占90%，基督徒占9%，年轻人口所占比重非常高，达到60%以上。要注意的是，埃及GDP在2010年增长6.8%，2009年危机年份是4.6%，危机之前的2008年达到7.2%，整体来看，2010年经济增长是较2009年较低水平有所恢复的。而且，埃及是一个人均GDP比中国还高的国家，并不算是贫困国家。

但埃及是一个食品进口国，而且一般消费品也要靠进口，因此，受到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打击比较严重。亦即，“两高”问题严重。对此，数据不统一。官方公布的通胀和失业率分别达到12.8%和9.7%，但据埃及民间人士的观点，埃及食品的价格指数高达30%，年轻人的失业率也高达30%。

在埃及此次运动中，工人、农民作为传统的革命阶级的主要力量，作为19到20世纪阶级斗争的主力，大部分都没有加入到运动之中。高学历失业人群是此次埃及“街头政治”的主体人群，这是非常重要的特点。大学毕业的年轻人遭受失业打击最严重，在埃及此次“街头政治”中，最初上街的主要是这部分人群。其背景则是埃及的中产阶级家庭受到了打击。

高学历人口的失业源于教育体系与经济结构的不匹配，也属于跟从

西方的后果之一。

当发展中国家大都按照发达国家的教育体制来安排本国教育改革的时候，教育脱离本国实践的社会代价就严重了。因为美国GDP的85%以上来源于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因此美国的教育是服务于美国这个经济结构的。而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体制一般会照搬美国，显然不可能适应本国经济结构。

比如，中国46%的GDP仍然来源于制造业，11%来源于农业。也就是说，有60%左右的经济增加值并不是美国那种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当中国学着美国这样为了高端服务业来推进教育体制改革的时候，就非常严重地脱离了本国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也就制造了大量高学历人群失业。目前中国每年高校毕业生六七百万人，“毕业即失业”的青年人大量沉淀下来，目前累计已经超过1400万人。

这样的情况值得重视，造成高学历失业的教育体制也要重视。

根据埃及著名的“第三世界依附理论”发明者萨米尔·阿明教授分析，此次反对埃及穆巴拉克政府的力量有四部分：第一部分是这种高学历失业的青年人，他们没有组织，但是动员能力很强，既没有参与任何政党，也不认同政治纲领，甚至没有参加组织。其实，就是失业造成年轻人实际困难导致的不满发泄。第二部分才是有纲领有组织的左翼政治力量，他们长期在军事政权的独裁之下受压抑，趁机而起与青年人走上街头结合，主要是这两部分人的结合成为埃及这次运动的最先的发起者。第三部分是运动起来之后，紧急从国外赶回来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巴拉迪，他是埃及中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力量的代表，当然，他有一定的国际背景。第四部分是穆斯林兄弟会，在运动已经起来四天以后才犹犹豫豫地加入，刚一加入就试图代表群众运动来跟政府谈判，但并不被多数民众接受。

埃及学者的这种分析告诉我们，这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通过什么广泛的市民运动、通过什么组织发动等，而就是因为遭遇“两高”打击群众无法忍受，就一哄而起地上街了。

鉴于这些上街的人本身没有纲领，也没有指挥，因此我将其称之为“街头政治”，而不叫革命。当然，后来推翻总统的事实，表明这个运动起到了类似革命的作用，但客观上看还是一种比较混乱的“街头政治”。

可以得出以下判断，即埃及，乃至北非地区的动荡，并不是中亚发生过的“颜色革命”，没有必要给这次运动披上任何意识形态化的外衣。目前国内有一些人把它当成“茉莉花革命”，当成Facebook（脸书）或Twitter（推特）革命来借题发挥，某种程度上看那可能是各取所需吧。

当我们把“两高”和“一单”问题作为主要原因，来和南欧国家“街头政治”的爆发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也就认识到这在本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延续，属于“环地中海危机圈”的一个部分。

（四）发达国家高成本政治制度的转嫁

我们将北非“街头政治”归结于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延续，那么接着的问题在于，全球危机是什么性质的危机？

全球危机最基本的表现，在于今天国际政治秩序是严重不合理的秩序。在经济上，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做实物和资本“双输入”。

发达国家大多是依靠资本市场经济，发展中国家大多是推进实物生产经济。

发展中国家把一般商品和原材料向发达国家出口，造成发达国家的经常项目逆差，而越严重的经常项目逆差，却导致发达国家越多的资本项目顺差。这是因为：在全球化推进的转轨之下，发展中国家得到的经常项目顺差要作为外汇再投资，回流到发达国家资本账户中去。这即是今天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关系的核心——产品和资本的“双重输入”。

于是，现在全球经济体里，现代化程度高的发达国家普遍成为世界主要债务国，发达国家负债占到全球政府总负债的70%以上。其中，美国已经成为最大的债务国。美国的政府负债占发达国家政府负债总量的一半以上；美国官方和民间的全部债务汇总，相对于全球GDP的100%。发达国家组成的20国集团里大部分是“发达的高债务国家”，尤其是债务率最高的美国、英国、日本三国形成的“币缘战略”三角同盟，客观上是某种债务国的“抗债同盟”。目前日本的债务率高达GDP的200%以上，美国和英国在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债务率在60%左右，现在也都达到了约100%。

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2008年全球政府总负债是36万亿美元，2009年末达到38万亿美元，2010年末超过了40万亿美元，2011年预计全球政府负债将高达50万亿美元。

过去都是发展中国家欠债，现在则倒了过来，但债权国无权，这在教科书上是没有的。

发达国家为什么会出现集体高负债？这要追溯到发达国家越来越高的政治成本。

人类的现代化理论创造不断演进，现在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其中，大部分认为西方模式的政治现代化是体现政治文明的唯一模式，却很少认识到这是一个极高成本的政治制度。

实际上，发达国家债务占GDP比例的提高，是必然的、不可逆的。因为普遍出现老龄化负担增加，产业移出，几乎不再有结构完整的制造业，中产阶级则要求增加高质量消费和高福利。任何一个政治家在发达国家都需要向中产阶级群体做承诺，可以多享受福利少干活，当选之后，则只有通过政府增加负债来实现对中产阶级的福利承诺，目前还没有别的好办法。

在欧洲首先爆发债务危机的希腊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传统的造船业和航运业等二三产业都移出的时候，希腊与传统经济基础相关的产业都萎缩了。而当希腊加入欧元区的时候，由于利率、汇率等政府宏观调控工具也上交到欧洲央行，这就等于砍掉双腿和双手。不顾产业萎缩、继续其庸俗化的福利要求的中产阶级，依然在按照西方意识形态化的强势话语不断地提出泛政治化的要求，庞大的现代政治体制依然需要巨大投入才能运转，而剩下仅有的支柱产业——依靠祖先在奴隶制时代留下文化遗产的旅游业支撑不住，金融危机导致旅游客源下降就成了压垮政府债务危机的最后一根稻草。

于是，债务危机就在欧洲产业空心化国家连锁发生，随之，普遍诱发“街头政治”。

一般情况下，美国不会发生债务危机，因为美元是全球占据金融资本运作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美联储可以推行“量化宽松”政策 、依靠货币信用扩张作为分母来缩小政府债务分子，但只有拥有国际硬通货币发行地位的经济体才能如此。

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是一种文化现象，也加剧了社会福利开支的大幅增长。

目前发达国家社会福利开支普遍在财政支出的50%以上。进入新世纪以来，大量的发达国家债务率都在不断上升，高收入的国家政府债务

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越是高福利国家，债务率上升越高。现在大家都崇尚北欧福利社会，但越是高福利国家，政府的税收占比越重，应该知道：丹麦、瑞典、挪威北欧三国是福利社会主义，政府的税收占GDP比重在60%以上（北欧三国中最低的58%，最高的62%）。莱茵社会资本主义模式国家，政府税收占GDP比例一般在50%左右，盎格鲁撒克逊野蛮资本主义模式的美国在40%左右。

而在中国，全部税收加总占GDP比例进入21世纪才达到20%。此前的20世纪90年代平均不到15%。任何现代化想象演变为现实，都是得有财力支撑的，否则政治现代化将永远是想象。

作为一个现在十三四亿人口、未来十五六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不能只是沉迷于政治现代化想象，不论谁有啥理念，都得先算算账，看我们有多少财政能力，能否撑得住？此外，如果撑不住进入高负债，能否如美国那样实现对外转嫁制度成本？

（五）发展中国家会怎样

综合来看目前全球的通胀格局，发展中国家通胀水平普遍高于发达国家。而要指望着一国靠内政来化解通胀或者化解失业，在幅员狭窄的小国几乎是做不到的！只有像中国这样的大陆国家，或者其他有较为健全的产业结构的国家，也许还能做到“内部化”来应对外部性问题。

也应该因此看到，幅员较小的单一经济小国，在承载过多全球经济危机转嫁通胀和大规模失业的打击之下，会相继爆发各种各样的社会动乱。

这就是当前的全球政治经济规律，总体上是不可避免的，而不是意识形态化地指称谁比谁更腐败、更独裁、更专制的问题。当然，西方意识形态强调的自由、民主、人权这些具有全球“政治正确”的说法，都有一定意义的解释力，但不能解释根本。

当前全球部分国家出现的社会政治问题，本质上就是发达国家经济危机压力下的信用过度扩张导致通货膨胀向发展中国家转嫁，而经济容量小、幅员小的经济体承载不住，便爆发了社会动乱，这是最基本的因果链条。即使只有工具理性的知识分子，都不会把这种发达国家转嫁危机所形成的发展中国家社会动乱，替始作俑者解释成所谓的“颜色革命”。总之，不能仅凭一知半解就为虎作伥。

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性的危机并没有结束，在这样的危机代价转嫁的链条里，还会陆续有这类国家进入动乱期。

那么，在这样的转嫁链条里，中国会怎样？2010年中国进口粮食首次超过6000万吨，进口依存度约12%，其他几项土地密集型产品进口依存度有的也超过50%，石油等能源资源进口加剧，依存度超过55%。注 中国的输入型通货膨胀也在加剧。

放眼全球，在近几十年的激进现代化的发展主义大潮中，中国还是一个长期保持没有成规模饥饿的记录，也是所有大型发展中国家中还能够长期维持基本稳定的国家。

那，这是因为什么？

我们的研究指出：实际上，中国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和工业化扩张所具有的负外部性也很严重，只是没有像发达国家历史和当今那样对外转移，而是由于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内部转移了。也因此，中国“三农”之所以成为愈益严峻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三农”承接了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制度代价，我们这个现代化的巨大代价转嫁给了“三农”，才造成了农村的衰败、小农的贫困，造成了一系列“三农”问题。注

传统“三农”对于稳定乡土中国，乃至于稳定整个中国，具有不可忽视的正外部性。

2008年第四季度到2009年第一季度，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打击，中国出现了大约6万家企业倒闭，致使2500万工人失业，但并没有出现失业导致的社会动荡，主要是由于这部分人口回流到了农村，由农村承载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震荡。

而之所以农村能够承载，也主要是由于这些年国家对新农村建设有大约累计3万亿元的大规模投入，正是国家对农村基本建设投资的大幅增加，形成了中国的“第二资产池”，同时也巩固了乡村社会的“劳动力池”，形成了吸纳危机代价的能力。注

现在中国一部分激进政治家和企业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打破传统农业、加快城市化，所有这些都客观地具有扩展投资拉动增长的空间、延缓生产过剩危机爆发的作用，也在主观上符合意识形态化的主流社会的科学理性，但都需要考虑它所造成的外部性问题。特别是在全球危机条件下，要想防范日益频繁发生的危机，就不可以简单地和过于激

进地来推进所谓现代化。

本篇文字根据温铁军2010—2011年在香港岭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等单位的几次演讲记录整理而成。

萨米尔·阿明认为，只有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才是彻底“去依附”的典型。

敢于拒绝使用美元的伊拉克、利比亚、伊朗和朝鲜都被美国为首的金融资本帝国主义作为死敌和“恶棍国家”就是例证。发展中国家思想界都知道：伊拉克被美国侵略导致政权颠覆和成千上万无辜平民伤亡，乃至全球媒体转播以极刑处死萨达姆，当然不是因为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个编造的战争借口被戳破之后没有任何发动战争的罪犯被送上西方主导的国际法庭——而主要是因为这个世界第四大石油出口国公开宣布拒绝使用美元作为其石油出口的结算货币。

温铁军于2012年2月16日在中宏网“战略思想库”座谈会上发言的记录，已经本人审阅。

美国海外投资占比在2013年低于日本，主要因长期坚持实用主义哲学的美国出于“重返亚太”的战略需求而允许日本搞“安倍经济学”——照搬美国的QE政策——大规模增加流动性刺激日本企业在海外投资。类似于美国1950年因朝鲜战争而重新武装日本，并且启用了战犯岸信介为首相（安倍的外祖父）。

温铁军2012年在战略思想库关于日本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已经本人审阅。

麻原彰晃，本名松本智津夫，日本奥姆真理教的创始人，因主谋策划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造成12人死亡及5510人以上受伤，麻原彰晃遭到逮捕，缠讼多年后于2004年2月27日被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处死刑，曾试图上诉，但日本最高法院于2006年9月15日判定麻原彰晃维持死刑，全案定谳不得上诉。

薪金年工制，日本的终身雇佣制的基础是薪金年工制。在一个企业中的工龄决定了一个雇员的薪水。一旦员工要更换雇主，他的薪水将从更换后的时间开始计算工龄，在薪水上比原先要打一个很大的折扣。因此，在日本，一般人很少更换雇主。

这个预见，已经被2013—3014年的情况所不幸验证。

这是2012年4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学生党课上的演讲。

本书问世之前的2013年，石油进口已经接近60%。

关于中国的周期性危机和成本转嫁理论，可参阅温铁军科研团队发表的著作《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年1月第一版。

截止到2013年年底，中国各级政府自2005年启动的新农村建设以来的各项投入已经高达约8万亿人民币，“三农”投入已经成为国家财政最大的支出项目。其客观结果是：中国农村已经普遍实现了“五通”（水、电、路、电话、宽带）到村，农民低保做到“应保尽保”，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农民人口纳入新农合参保达到98%以上。

第二部分　现代化困境

第一节　现代化高成本的预言：奥巴马-金正恩难题注

当代人们讨论的贫困，是个相对于发展的概念。那么，什么是发展进程中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呢？在做了多种不同的国家比较和国内的区域比较之后，我的归纳叫作制度成本转嫁论，即“成本转嫁理论”。从理论资源来说，它是从萨米尔·阿明的“第三世界依附理论”和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论”进一步演化而来，认为世界发展不平衡、贫困的原因，是制度成本转嫁造成的。当代加快全球化中的贫富分化本身并不可能靠任何现代化的发展过程来化解，反而会随之加剧。对此，我有几个去意识形态化的经验性归纳。

（一）资本要素稀缺下的亲资本政策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趋势

大多数后发国家因要进入所谓发展主义现代化，而首先遭遇到的最大困境是资本要素的绝对稀缺。西方经济学立论的前提是要素相对稀缺，这个前提下的要素配置方式在理论推导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发地配置要素达至最优。而发展中国家客观上最大的麻烦却在于，不具备这个西方经济学构建理论逻辑的前提，经济学理论和我们要研究的客观现象差距太大。发展中国家不存在要素相对稀缺，而是西方经济学不讨论的要素绝对稀缺。如果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困境是资本要素绝对稀缺，那会怎么样？不论何种体制下，都会亲资本。

我们做的国家比较研究结果发现，不论何种主义、体制、政府，不管谁当领袖，都有一个共性的特点，就是只要资本绝对稀缺，政府就会采行亲资本的政策体系，除非被封锁。

例如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被两个超级大国封锁时期，资本绝对稀缺甚至趋零，因此就出现“去依附”，而转向亲劳动力，亲民众，亲社会。

因此20世纪60年代是中国最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年代，也是最大规模动员劳动力，以劳动力替代资本继续维持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年代。在资本趋零的状态下，中国人只能靠高度集体化，成规模地组织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去替代最稀缺的资本。而当此前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先是可以获得苏东资本、此后在70年代又可以获得西方资本时，中国就先亲苏东资本，后亲西方资本。客观地、纯粹从发展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亲不同资本的政策体系和发展模式没有什么好坏对错之分。

接下来简单讲讲从1929—1933年西方大危机演变为世界大战到战后的新趋势。1929—1933年西方大危机爆发，本为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的全面爆发——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业化扩张势必导致生产过剩。当在像欧洲这样半岛型的狭窄大陆上的全部工业化国家都发生生产过剩的时候，就无法靠一般手段来解决，只能靠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摧毁过剩生产能力。

相对而言，在美洲大陆之所以有罗斯福新政，是因为它是西方新开拓的殖民地，物理空间广大，可以让国内所有一般资本主义经济暂停。罗斯福新政之所以能够救美国，无外乎是政府在生产过剩条件下，直接把过剩劳动力和国家工业化过程所创造的设备生产能力结合起来，去做国家投资的基础建设，开发中西部。这个做法与中国20世纪90年代末期朱镕基铁腕调控、大规模增发国债投资中西部基本建设的做法差不多。

当年美国人在西方1929—1933年大危机中能够幸免于难，但在狭窄的欧洲大陆上，大家都生产过剩，就不能幸免于难，于是欧战爆发，最后蔓延成世界大战。应该提出的问题是：二战之后，人们都担心要打三战，因为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生产过剩——并没有解决，只是被战争摧毁了一遍，然后战后恢复重建。那么，战后发生什么改变使人类免于三战了呢？是矛盾根源的产业资本移出。

二战后全球从原来的帝国主义列强纷争（这在政治经济学上可以引入多次博弈来研究），变成两个超级大国双寡头控制，重新按双寡头控制愿望瓜分世界，于是形成一个新地缘战略的发展趋势。双寡头都在尽可能地更多分割势力范围，导致出现与冷战对抗同步的“双雁阵产业转移”。二战中西方唯一没有被破坏的经济体是美国，它庞大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开始在战后向大西洋的西欧和太平洋的日本，做两条线的产业转移。而这个产业转移，与后来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的第二次“雁阵转移”的不同在于，早期的这种产业转移是战略性的装备输出。与美国同时同理，通过战争形成庞大生产能力之后，前苏联也是陆上两条线的产业

对外输出，一条战线输出东欧，一条输出中国、蒙古等。那个年代只要是宣称社会主义的国家，大都得到了前苏联的产业转移。

事实上，受援国接受产业转移的同时，也都接受了产业资本输出国的政治意识形态。接着，到20世纪70年代多数西方国家复兴的产业资本进一步对发展中国家转移，造成生产过剩的内生性矛盾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生三战的威胁也就淡化了。

（二）关于建国初期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制度安排

1.中国20世纪50年代上层建筑乃至意识形态的“全盘苏化”。

战后发生的这个双寡头两翼输出产业资本的过程本身也是新的地缘格局形成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因为是战略性的，所以输出的是装备制造业，于是有了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在没有来得及搞轻工业的条件下就直接进入重工业的状况。而重工业有一个内生性特点，就是资本增密、技术增密，而且由此势必是排斥劳动的。

对于中国人口这么多的国家，还没有发展轻工业和一般消费品，就先得到发展重工业的机会，那会产生什么情况呢？于是，大家看到，当中国刚完成“一五”计划时，就发生了城乡二元结构。城市不再需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因为它是重工业打头。再加上1957年，中苏两国发生了一些问题，第二个五年计划苏联不再给予援助性的投资了，所以中国重工业为主的经济发展不得不中辍。

据此可知，二战之后两个超级大国的双雁阵转移有一成一败。

美国战后的产业转移和地缘控制战略基本完成，西欧和日本战后复兴，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原来被摧毁的工业基本上恢复了，同时也形成了西方的政治军事同盟。但是，前苏联的转移，对东欧和蒙古相对顺畅，因为二战期间它占领了东欧和蒙古，麻烦在于对中国的转移。二战之后，苏联在中国保留了中长铁路、大连特区和旅顺港的控制权，前苏联的远东舰队（太平洋舰队）驻扎于旅顺口（旅顺口是苏联太平洋舰队在太平洋一线唯一的不冻港入海口）。中国在东北并没有构成完整的国家主权，军队、行政乃至于经济，很大程度上还受苏联控制。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有着漫长国家史的国家，也许是由于历史记忆太沉重，或者是殖民化时期被打了100多年却没有被帝国主义全面占领，中国人格外重视国家主权完整。当苏联在“一五”计划对中国进行战

略性的援助投资时，中国确实要按照苏联的经济管理方式建立政府、学校、科研机构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道理是，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形成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为了适应苏联投资形成的这种工业化经济基础，中国当年的上层建筑乃至意识形态“全盘苏化”。八大工业部、计委、财委、建委、经委、农委，所有这些政府设置都按苏联的模式来建立，苏联从它的政府部门中派官员到中国都被叫作“专家”，每个部门都有，实际上按照苏联的经验指导着中国建立政府和院校机构。

但在1955年，中国人已经开始提出“全盘苏化”对中国维持国家主权的影响。1955年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当时有30多个部委的负责人参加，讨论如何改变“全盘苏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候中苏之间尚在蜜月期，中国人就有了这种讨论。

接着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两党之间开始发生分歧；同年是中国要按照中苏条约规定收回旅顺口、大连特区和中长铁路的控制权，收回过程中也出现很多问题。

此后，与苏联关系的恶化导致中国出现很严重的投资不足和债务危机等。

尽管危机严重，可当中国人1958年试图正式改除“全盘苏化”的时候，仍然是非常困难的！

为什么呢？苏联模式的重工业作为主要的经济基础，甚至成为国家财政主要来源的时候，中国想改变“全盘苏化”的上层建筑，乃至于已经被知识分子们当成看家本事的外来意识形态，能改吗？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人们：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就会反过来制约经济基础。直到全部经济基础发生根本变革，庞大的上层建筑和滞后的意识形态才会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为什么出现很多政治领域的复杂情况？表明这个调整是痛苦的，代价是巨大的。

2.农业集体化的作用主要是向国家工业化贡献剩余。

中国经过三次以土地革命战争为实质的国内战争，土地革命内在地反映了农民几千年来的基本诉求——“耕者有其田”。这不可能符合19世纪欧洲阶级政治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西方的任何理论，不论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左右派对中国都不大适用。土地革命战争的结果是占人口88%的农民平均分配村内土地，成了小土地所有者。这些小土地所有者过度分散，是一盘散沙。此后，中国社会乃至于各级政治的很多复杂情

况，与无产阶级革命或社会主义体制并无关碍，而更应该和我们这个分散的小有产者群体占比过大的基本国情有关。

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国家，从来没有被外来殖民者彻底改造。而美国原住民人口仅为52万，占总人口不到2%。如果单纯从农业角度来说，大农场的产业化农业与福特主义大生产相适应而被西方意识形态当成先进的模式，但没有哪个大农场国家不是靠殖民地形成的资源条件而形成规模经营的。世界上的大农场国家几乎都是把原住民人口减少到10%以下。而整个亚洲基本上都属于原住民国家，由于亚洲原住民人口在西方推进殖民化的几百年中没有美洲和澳洲那样大规模减少，因此，多数亚洲国家的乡土社会是相似的，很少有大农场形成。中国的发展过程根本就不可能和大部分殖民地国家一样。

我为了做国别比较，跑了世界上四五十个国家开展调查和比较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像中国这样的原住民大国，它所充满的内部矛盾，并非当代形成，而是历史延续而成。而当代中国人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在这么多的农村人口都变成小土地所有者的状况下，政府要进行工业化，交易费用畸高。按诺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当交易对象大到一定量的时候，交易就无法进行，因为交易成本过高。同理，政府无法跟大量的分散的小农交易，因此中国为了推进工业化而开始搞农业集体化，用集体化解决政府为了工业化原始积累而需要从农业提取剩余的矛盾。

集体化建设起来以前，因为搞工业化粮食供给跟不上，陈云1953年开始搞“统购统销”。但政府面对那么多农民无法交易，于是毛泽东发起合作化运动高潮，到1955年大部分农民进入初级社。毛泽东称之为从“满头乱发没法抓”到“编成辫子就好抓”。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建立组织，解决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这也就是科斯所说的“组织是反市场的产物”。对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实际经验归纳，也就从诺斯的交易成本理论转成科斯的企业组织理论。

1955年中国已经成规模生产苏式的拖拉机，但只有七八户、十来户农民组建的初级社，根本用不起那些大马力履带式拖拉机，势必造成浪费。于是，各个工业部门纷纷向中央建议，敦促中央提高合作化的层次，搞高级社，只有以乡为单位建设土地规模经济，才能接收大型拖拉机。于是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农业现代化，其真实内涵是集体化＋机械化。如果没有以乡为单位进行规模经营，就没有国家机械工业的出路，这就是中国最早提出农业现代化的背景。所以，农村集体化算是以很和

平的形式，服务于工业化早期的工农两大部类交换的要求。这种生产履带式拖拉机的厂子之所以关不掉，是因为拖拉机厂还得建坦克生产线，国家必须要搞现代化国防。这就似乎是一个两难选择了。周边许多敌对势力，国防需要生产坦克，因此工农产品剪刀差体制下的拖拉机一定是高价，那怎么让农民接受呢？当年矛盾就是这么复杂。

十一届五中全会给历史问题定调以后，薄一波写了两大本《建国以来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回顾》，其中写道，国家要搞工业化，就得积累，这就得让一部分人作出牺牲，中央反复讨论，决定只好让农民作出牺牲，作出贡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当时也都参与了中央这个集体决定。因此，农业集体化并非农业自身的错误。第一，集体化是为了服务工业化建立的；第二，集体化有利于工业化提取积累。因此，农业集体化的微观不经济乃是国家为了工业原始积累大量提取农业剩余造成的。

至于集体化向国家工业化贡献了多少，一直以来都有研究。20世纪80年代的农研中心研究剪刀差大约8000亿元，我们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荣誉教授严瑞珍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研究中提出，通过集体化向国家贡献的剩余大约在7000亿元到8000亿元。与另外一个数据对比，在1978年改革之初，中国全部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只有9600亿元。近年来我们院党委书记孔祥智教授的研究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三农”作出的各种贡献约为17.3万亿元。

我来做一个简单的综述：1949年，在土改期间造就大量分散小农的情况下，毛泽东“代表整个中国人民最大多数根本利益”推行的是发展重工业，接着是为了保证基本的国家主权安全而不能接受“全盘苏化”，则发生中国与苏联之间的政治分歧向国家战略关系破裂的重大变化。并且，仍然还要发展工业化，那就要继续资本原始积累，就要更多提取剩余，当时的政治局决定剩余只能从农业来。到了原始积累完成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产业（资本）扩张阶段，它是一个资本的结构调整和资本的结构性扩张。这个阶段，由于资本扩张，产生资本溢出效益，于是社会收入增加，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普通的经验过程。

（三）揭示现代化高成本的当代新预言：奥巴马-金正恩难题

我近年来有一个说法，叫奥巴马-金正恩难题，是说现代化制度的高成本存在于任何意识形态或政治形态之中，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

义，都毫无例外。

1.无论意识形态或政治上如何对立，它们都遭遇到“上去了就下不来”的困境，这就是现代化的制度代价。

现在，越是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的国家，贫富差别也越严重。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都不解决贫富两极分化。以美国为例，它现在的制造业只有11%左右，农业只有2%左右，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占85%以上。虽然，美国拥有全球最高度现代化的经济结构，可是美国的贫富差别却很大，基尼系数高于我们。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虚拟经济泡沫破裂的时候，美国在最近四年，贫困人口从原来的9%左右，上升到20%，于是有了代表99%“占领华尔街”等运动。这些运动代表的就是大量失业和贫困人群的呼声。因为美国大量增发货币来救市，扩张出来的信用涌进了金融资本领域。因为它的经济结构中85%是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所以创造出的新增信用只能进这个85%的领域。而这个行业吸纳就业极少，大多数人不会在金融领域中去“玩吹泡泡游戏”。尽管奥巴马主观上希望改变，但客观上他却不能把新增的信用，创造出的货币信用、债务信用等，用于发展实体经济，所以美国越是拥有高度现代化的经济结构，就越在客观上不可能更多地吸纳就业，只能在国内造成贫富差距拉大和社会撕裂。

再看朝鲜。早在金日成时代，朝鲜的经济结构、城市化率都比我们的同时期要现代化得多。在1989年我们人均国民收入才800美元的时候，朝鲜就已经实现了人均粮食产量380多公斤，人均国民收入接近900美元，并且实现了70%的城市化率，比我们现在还要高得多。农村中有6万台套拖拉机，完全是现代化农业的集约化规模经济，农业机械化比我们早得多。

我为什么说朝鲜也是“上去了就下不来”呢？1991年苏联解体，1992年经互会不能运作，换货贸易体系垮了。原来朝鲜拿苹果、新鲜蔬菜等换取前苏联的石油，苏联解体之后，石油来源被切断，大量拖拉机不能运作。当年年末就有1/3的拖拉机不能运作，大量的耕地抛荒，造成1993年收成大幅度下降，大量人口陷入饥饿。只要石油没了，石油农业就完了。有人主张朝鲜学中国搞家庭承包，我表示反对。因为我去朝鲜做过农业政策顾问，在调查中发现，这个建议不可取。中国大包干的时候，是80%农民，20%城里人，8个农民养活2个城里人。那个时候我们没机械化，靠手工劳作就养活了。国家只要提高粮价，农民就“少吃一口，多收几斗”。我们大包干的时候粮价提了49%，农民为多赚点钱，宁

可勒着裤腰带少吃两口，就让城里人吃饱了。所以，我们城市化率低，解决问题就很容易，因为我们是8个农民养活2个城里人。如果让朝鲜3个农民养活7个城里人，还得靠手工劳动，客观上的确不大可能。事实上它现在是大规模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劳动。但是“上去了就下不来”，城市化率搞到70%以上之后，还能让城里人下乡去劳动吗？问问我们这些知青，当年好学生下了一回乡，写了多少伤痕文学？正是因为朝鲜超前现代化，一旦支撑现代化的石油没了，现代化就垮了，只好用一系列的强制性的政策维持生存。这就是今天朝鲜的现状。

2.现代化陷阱：城市资本与风险等量集中导致周期性爆发危机，把代价转给乡村。

现代化是高成本的制度演变过程，需要集中资本。但资本集中与风险是同步等量的，几乎没有任何理论关注制度成本。城市化实质上是个集中资本的过程，但也是风险与资本同步集中的过程。在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城市周期性爆发危机，把代价转给乡村。中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乃是成也二元、败也二元，没有绝对的对错好坏。中国今天成了一个工业化大国，凭的是大量向乡土社会转嫁了城市资本集中与生俱来的代价，因此我们有严重的“三农”问题。今天加快城市化、工业化，其结果仍然是土地、劳动力、资金等基本要素大规模净流出，于是农村现在群体性治安事件大量发生，主要原因在于加快资本集中。

当我们把所谓的工业化、城市化作为现代化的主要内涵时，就意味着我们要准备承担代价。这些代价主要有两个：

一是在“三农”领域中三要素的大规模净流出。这导致了“三农”的衰败，弱势群体变成了草根。从社会角度来说，草尖离开了，农村剩下老人、妇女、孩子。劳动力资本存量最高的部分贡献它的劳动剩余给城市资本了。城市人占有了农业和劳动者剩余之后，给草根回报了吗？中国真正的最大的不公平就在这里。

二是只要在城市过度集中资本就会过度集中风险。我们做了一个经验的归纳，发现只要经济危机软着陆成功，那一定是城市资本把代价转移到乡村去了。凡是硬着陆，那一定是这代价转移不出去，于是硬着陆就砸出了改革。无论改革还是调整，都不过是危机硬着陆在城市资本的结果。

资本，不论国有还是私有，都是人类制造又反过来异化人类自身的异化物，政府也是人类制造的另一个异化物。在一般情况下，政府只不

过是服务于资本。但在特殊情况下，会出现政府和资本直接结合——资本内化于政府，于是就政府公司化，虽然节省了政府与资本之间的交易费用，但是，强大了政府权力和资本权力共生的同时，对资源作资本化占有的能力大为增强。而资源在民生之中，只有内化于政府的资本，才能最顺畅地推进资源转化成资本的过程，并甩掉制度成本。

（四）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三次危机转嫁及“三农”问题的缓解

1.中国加入全球化之前的三次危机及成本转嫁。

1960年我们如何转嫁危机？主要是把城市中的过剩劳动力以“上山下乡”的方式转移到农村，城市青年劳动力转移出去1000多万人。同时，20世纪50年代为了支援城市建设，我们动员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城去挖土方、修马路，1960年工业停滞以后，这几千万人也被送回农村。用乡土社会的村社经济，承载城市危机甩出来的不能就业的代价。我们有几次高达数千万人的失业，这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结果。

改革以前的三次“上山下乡”运动，其实是中国三次遭遇到经济危机的客观结果。一遭遇危机，就搞“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送到农村去，城市危机就化解，就软着陆。

1980年再爆发危机的时候，我们面临着4000万待业青年的巨大压力。因为，毛泽东去世，无法下乡了。而且为了休养生息，还得让知识青年回城。4000万待业青年就演化成巨大的社会犯罪，所以就有“两个严打”。其实不怪当年的那些青年，因为不能正常就业，这些人就买两个塑料包南下深圳当“倒爷”，就开始出现“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的局面。因为1980年危机爆发在城里不能向农村转嫁了，这次硬着陆就砸出一个大规模改革。首先是1979年政府提出价格双轨制，同时开始推行允许地方财政外贸自主权等一批放权让利政策，这就是改革的开始。自此崛起了中国四大沿海地区，辽东、胶东、苏南、浙北，这些地方都是原来国家工业化地区形成的工业带。这些工业带借着放权让利，形成地方自主权和价格双轨制的机会，将产业在周边做了重新布局——物理空间的产业结构调整。所以，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产业结构调整，带出了沿海地区的先发展。当时就提出了沿海先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先富带后富这些说法。

中央在财政严重赤字压力下，进一步推进农村家庭承包，这是一种“政府退出”，国家同时把应该支付给农村的基本公共开支（社保、医

疗、教育）转嫁到被农民重新均分的土地上。至于城市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甩包袱，把财政拨款改成企业从银行贷款，自己留下利润给国家交税，这样企业就开始有需求搞厂长经理承包责任制，政府与企业分离。但就在同时，因为国家面临巨大的失业问题，所以要求所有国有企业吸纳就业，“五个人的饭十个人吃”，很多国企安排子女顶替，下岗老职工就变成了乡镇企业的技术力量。同时，还有大批干部子女就业困难，于是机关大门打开，办三产，“官倒”就开始捞第一桶金了。总之，早年国企的低效益问题不是国企自己的问题。政府采取这一系列政策被称为改革。类似的政策20世纪60年代也采取过，只是当时被叫作调整。所以说，危机砸在城里，就会有调整或者改革。

但是当经济主体多元化，各个地方和企业都开始追求自己独立利益的时候，我们发现市场关系高度紧张。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连续通胀，于是就产生了改革界各种方案，导致领导选择价格闯关，陡然就给刚刚问世不久的“官倒”公司创造了历史性的机会。于是，20世纪80年代机关办的三产公司直接囤积居奇，导致物价飞涨，进而导致老百姓抢购。那时候的教训是，用改革解决改革造成的问题使得市场关系更加高度紧张。于是，1988年物价指数攀升到18.5%，导致了1988年银行为了防止挤兑大幅度提高存款利率，8年期的存款保值补贴利率高达24%，几乎超过了任何产业能够产生的利润。银行提高了存款利率却没有同时提高贷款利率，因为那时候财政和银行还不分家，于是1988年造成了将近500亿元的赤字直接进入财政，就造成了1988年年底、1989年年初，财政公布的赤字高达500亿元。

由于财政受不了，政府要求银行大幅提高贷款利率，但接着就是流通企业受不了。于是流通企业的经济行为发生变异，不再贷款进货，而是占压生产企业产品搞代销，却照收三级批发加零售的全部收益。它的收益刚性是不能减的，而三级批发加零售至少是40%的利润率，而代销应该只有3%。再加上它占压了生产企业的产品，生产企业不能回收资金，所以生产企业全部运转不起来了。这就导致上游的原材料企业也无法运转。于是全国陷入三角债，导致了生产全面停滞！这就是发生在1988—1989年的滞涨形态的大危机，随之是任何大危机都会有的风波。

2.“三农”问题如何才能得到缓解？

我们关注的“三农”到底是什么问题？先看国际经验。

世界上农业本来就分三大类，大农场只适合于殖民地，欧盟国家也是以小农场为主，因此农业补贴占财政的40%以上，同时也造成欧盟农业50%甚至60%以上是市民兼业农业。尽管美国、加拿大这种大农场国家也并不能脱离政府补贴，但没有欧盟那么高。

亚洲的小农国家里最为接近西方现代化的是日本和韩国，我们叫日韩模式。日本农民只剩下558万人，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64岁。主要靠JA系统来解决问题，它是一个综合性农业合作社。政府给予最优惠的政策，让农民合作社免税进入金融、保险、房地产、购销、餐饮、加工、旅游等各种非农产业，所有在二三产业中产生的收益必须50%以上返还“三农”。其实日韩和中国台湾都是日本JA模式——让农民保证收入比较高，生活无忧的这种模式就叫作综合农协——收益并不来源于农业，因为小农经济在农业领域中是不可能获得高收益的，而是来源于给综合农协以特殊政策，让它可以从第三产业中占有高收益。所以日韩和中国台湾，都是95%以上农民加入综合农协。

所以我们说，东亚经验表明，不是没有办法化解“三农”困境。

麻烦在于，这个办法要从现在的利益集团中去重新做调整，要把金融、保险、房地产、加工、超市、餐饮、批发、旅游所有这些非农产业还给农民的话，那些利益集团是不会让步的。怎么才能让中国农民得到像日韩农民，包括中国台湾农民那样的优惠待遇呢？只有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只有农民组织起来才能跟其他利益集团谈判，谈判才能获得交易地位。高度分散的小农交易费用过高根本不可能谈判。所以今天农民在一盘散沙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美好未来的。

再进一步说，如果我们国家想要真的建立市场经济，必须构建信用社会的基础，那也是得让分散的农民形成组织，提高谈判地位，才能形成可维护的契约关系。

总之，没有农民组织化的提高，中国就不可能构建以契约信用为基础的市场经济。

第二节　解构中国现代化注

（一）中国现代化改革进程的认真反思

1.关于西班牙大选问题与蒙德拉贡公共小池塘理论的适用性探讨。

西班牙大选换走了左翼领袖，人们欢呼后发现采取的仍然是紧缩政策，“街头政治”不断。请问如何解释这个现象？

换位思考一下，假如你是西班牙首相甚至是国王，或假如你是任何制度下的领导者，你如何面对高达将近100%的债务率？即政府负债对GDP的比重超过100%，如果再加上民间债务，恐怕会超过200%。再加上西班牙几乎是一个没有能力支撑产业经济的国家，到目前为止，西班牙的产业仍然是以旅游、转口贸易、金融业为主——有点像香港，那你怎么办？无论你是左翼右翼，现在你是总统，是总书记，在西班牙。

关于奥斯特罗姆（Ostrom）的公共小池塘理论，可以用于蒙德拉贡的企业组织形式内部。蒙德拉贡是一个特殊的财产关系，它由五个被神父感化的街头男孩（Street boy）创办，大家共享公司的收益，后来成长为很大的联合企业，在西班牙排名第四位，在巴斯克地区排名第一。每个员工加入企业的第一年，要贡献自己的全部工资作为个人股权。所有员工都是公司的股东，这样就构成了全员持股。当遇到经济不景气时，只有蒙德拉贡可以基本不倒闭。咱们一块儿在公司打工，我们又同时是股东。经济危机时，我们不裁员，但是15%得离开工作岗位，等经济复苏再回来。这段时间你们可以去学习、培训。因为蒙德拉贡办有大学，有各种培训中心。大家坐下来投票谁离岗，离岗的人一定是劳动能力最差的，因为大家都明白要让公司保证竞争力的话，留下来的必须是劳动能力强的人。你一定要说它是个私有（private）的话，也没错，因为每个工人都是所有者（owner）。 但又因为大家共同持有股权，它又是公共的（public），用一般理论很难归纳它。很多企业倒闭时，蒙德拉贡可以维持，甚至借着其他企业的倒闭它可以扩张。它也有失业率，但它不是一般资本主义的劳动与资本对立，它是劳动者就是资本所有者，是职工持股的公司。就用这种方式，它在全世界扩张，但当它扩张到其他国家的时候，并不是职工持股，职工就是打工者，该失业就失业。我们在和他们座谈时，就问他们什么时候把职工持股的制度引用到其他国家的公司？他们说有这样计划，但很难；因为海外的公司占有的收益是很高的。

2.现代化的巨大成本及人们基于想象而产生的改革利益和话语。

无论是西班牙或葡萄牙等国家，现代性问题是，如何从以前的赤裸的军事掠夺，改为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工业化、现代化，用政治的

伪民主掩盖军事的特质。这里可以提出，第一，资本主义在17世纪的欧洲发展时，用抽象的“社会”（society）取代了社会组织的最基本的形态——“社群”（community）。现在面对现代化危机时，是不是可以想象复兴“社群”作为超越现代化的可能性？第二，当今天西班牙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处于衰败的时候，对比起来，中国好像还在崛起，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形式好像很少被质疑，但是如果参照欧洲民族国家的历程，又如何在解构现代化的同时设想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形态？

何为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是不是就是民主？经济危机发生连带转化为“街头政治”危机的时候，这个想象就开始暴露其本质。与其说西班牙不如说我们自己。当我们反思香港经济危险不危险，危险在于高度现代化。现代化难道是一个人们都要追求的梦想吗？在香港讲对现代化的批判似乎还比较平和，人们很少站出来反对，因为人们已经在这个环境中，并且感受到很多问题是不能解决的。而在大陆讨论对现代化的批判，学术上还是可以的，但在很多方面是有问题的。因为现代化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话语，它有高度的政治正确，它被写进了所有的文件，在所有领导人的讲话中都是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同时体现了唯一的执政党的政治正确，它已经和现代化高度结合了，很难对现代化作出批判。

在整个资本主义500年的历史进程中，现代化是随着现代现象产生的——人们发达了，可以不用付出多少劳动就可以得到几乎是全方位的福利保障，人们把这当作现代化。但这真实吗？生活在这个图景中的人们没意识到，最终现代化的成本被转嫁给了资源、环境、生态灾难。少数人反思到绿色主义、环保运动，反思到绿色和平这种激进的组织，民间也有素食主义。甲烷气体的排放量是大于二氧化碳的，它来源于大规模养殖，一个万头规模的养殖场，它排放的甲烷气体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汽车尾气排放。于是就有人呼吁大家少吃牛肉，少喝牛奶。如果大家都要现代化，每天喝牛奶切牛排，那么甲烷的排放就足以摧毁大气层。

因此就有西方进一步提出“华盛顿共识”，说20%的人享有现代化，地球就已经受不了了。现在80%的人都想现代化，麻烦就会很大，特别强调的是13亿中国人，如果像美国人一样消费的话，得增加四个地球。于是这个地球就争吵不休，发展中国家就说，我们像你们一样搞，为什么现在就不让？把到目前为止的人类行为做一个经验，根据这些经验归纳出的精神财富、理论、思想，恰恰是助推着人类走向不可持续的、毁

灭的现代化。因为现在“让不让现代化”变成了国家间的竞争，于是乎就很难放弃。比如让发展中国家不要追求现代化，那么我问，假如你是中国国家领导人，你能提出什么发展目标呢？说从现在开始大家不要吃肉了，改吃素？把西方的激进思想搬到中国来能行吗？假如是民主制选举，一定会下台。因为中国大陆中产阶级正在崛起，他们越来越扮演着一个新生的角色，要求跟西方人一样的生活水平，一样的政治自由。尽管他们占的比重只有23%，但是他们的声音非常大。因为大多数的教师、记者，这些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在传播着他们的声音，他们就是占人口23%的中产阶级。所以现在人们听到的声音通过媒体——中产阶级传播着，你们听到的就是中产阶级的声音，这就变成了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运动。是不是它代表着所有人？不是。所谓中产阶级，是否愿意真的让所有人都享受一人一票的权利？大多数人会模棱两可。中产阶级和占5%的大资产阶级，这些精英群体有一个共同的内在要求：就是我们谈判可以，我们素质高，对问题探讨得更深刻，但不能让72%的民众和我们一样。这个世界上，有任何一个现代化政治，是让占人口70%以上的下层阶级占有权力的吗？如果有，就不会出现西班牙28%的失业率，失业的当然是下层群体。

人们往往被想象弄得很痛苦。比如现在想象现代化，那能不能达成呢？不能，因为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已经达到的，已经破坏了人类生存的环境了。那你要求我不要达到，你能退下来吗？不能。这个世界确实是很有威胁的。这个矛盾几乎不可解。我们在十几年前推进中国大陆的乡村建设中，就提出在思想上要有对现代化的解构，我们不是de-structure，而是de-constructure，我们试图中性一点地来看待这一切。从这个角度，我们说精英之间可以谈判，但精英和大众之间就不是双向的了，大众占72%，他们是很难参与现代化分权的，他们贡献了财产、劳动，贡献了几乎一切。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个结构都差不多，大资本包括外国资本占极少数，带来了占百分之二三十的中产阶级，剩下的占百分之五六十的大众。这个还是一个金字塔结构，相对比较稳定。麻烦在于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枣核形结构，比如在印度完全无财产的人占50%。中国的占72%的人目前还是小有产者，这是中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就在于中国还是个金字塔结构，下层还是小资产阶级，比如农民虽然很穷，但他还有地，至少饿不死。中国大陆目前的政治合法性，还取决于60年前开展的土地革命。它是所有土地都平均分配了，所以中国大陆在基本财产关系上每个人都有一份。有和蒙德拉贡类似的现象在中国大陆并且长时间发生过，那就是以村为单位的社区

农业。江苏华西村就是社区工业资本的庞大联合体。所有华西村的村民人人有份，就和蒙德拉贡的职工一样，华西村所有村民都有财产权，这种村在中国大陆是普遍的。广东南海、顺德很多地方，在村一级每家每户都有股权证，一个县或一个区，一年凭股权证能分到几十亿元。这个股权证代表它拥有土地，土地被开发成厂房了，这个厂房收的租金按股权证分配。类似于此的财产所有权关系在珠三角就是一个普遍现象，但在严格意义上不符合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法律，中国进入激进的私有化改革，世界银行共识在中国实行，变成很大的私有化运动。珠三角是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推进私有化改革以前就已经实行了土地开发了，土地权力变成股权证发给每家每户收不回，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被广东省委正式发文件承认了，所以不能收回。这在广东、苏南是存在的，但在很多地方，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今天中国大陆，中产阶级的表达，是把20世纪90年代的私有化改革当成真改革。今天的改革要保护的是20世纪90年代私有化改革的利益。在这其中，相当一部分官员变成腐败官员，因为搞改革的官员中有一部分人就是凭借权力去占有股权的。这个过程我了解，因为我就在推进改革的队伍中。人和人不一样，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没得一分钱的好处。后来当因某种原因不让我工作三年后，人家有个道理说，这个人搞了那么多的股份制改革，没有一分钱的股票。我可以保证我自己没有，但不能保证别人没有。得到利益的这部分人形成了改革利益群体。现在的部分利益集团大到足以影响中央决策。现在有一股反对改革的思潮，然后我们要坚持改革，这个斗争是表面的，内在的是不同利益集团的斗争。相当部分的大众失去了财产，站出来说你的改革不合法，剥夺了我，我的财产是土地革命战争中流血换来的。这部分人反对20世纪90年代剥夺他们财产的改革。相对一部分的工人站出来说，这个国家原来没有资产，我们贡献形成了资产却被你们占有了，你们得还给我们。这些人就被定义为反改革。谁在坚持改革呢？那些在改革中获益的那部分人认为自己是改革派，要保护改革。外面的人稍不注意，就被某个利益集团牵着鼻子走了。

（二）经济基础决定了相应的上层建筑，包括话语权

1．今天中国的现代化想象及其演化出来的一系列结构性变化，掩盖住了很多正常的声音。

大家以为改革就是民主、自由、正义，其实所有这些都是被媒体包

装出来的。如果我们讲现代化是种想象，国家也是种想象，那么现在被包装出来的改革，也演变成了一种想象。真正内含的和我们想象的具有正义、民主、自由的改革是不一样的，它有着非常复杂的形成利益的过程，现在我们要站出来保护我们的利益了。当年我是推进改革的，我并没参与利益的分配。在今天的知识分子中，站出来反思改革的人很少，我站出来反思比较轻松，这是因为我没有利益。要让那些既得利益者站出来反思，比如我们有一批财经高官，他们当年都是和我们一起参与改革的，现在已经有了各种利益关系。让他们站出来反思改革，是100%不可能的，这会使他们边缘化。所以现在反思改革的人很少，大部分在底层民众。而他们又由于信息的严重不完全，没有对整个过程的深入了解，所以现在底层社会的声音很混乱。相当一部分人由于找不到知识分子的引导，转向了“文化革命”，类似于毛泽东时代那样的，因此现在底层毛泽东热。戴一个左的帽子给大众是很容易的，现在很多媒体在搞这个事，上来就说是“文革”余孽，这种帽子比比皆是。但他们是吗？不是。他们找不到其他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知道自己被剥夺，但找不到表达的方式。我们这些承担知识生产任务的学者们，不会去给他们做知识生产，媒体也不会为他们发声，所以他们现在确实处在一个比较窘困的状态，不具备表达的条件。再加上精英结盟不打算向大众分权，这是中国当前社会政治的主要矛盾，但是在所有媒体上都看不到这样的分析。我们即使有这样的分析，也不会被任何媒体表达，因为利益不同。比如数千媒体聚焦两会，大家表达的当然还是精英们的说法。当然有些人会以大众的名义发声，但并不意味着这是真的。今天中国的所谓现代化想象和演化出来的一系列结构性变化，掩盖住了很多正常的声音，比如社区性。中国至今仍有70万个村，有多少亿的人生活在农村，但表达他们对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需求的几乎没有。底层的大众得不到正常表达的机会。

2.格物才能致知，明白经济基础才能明白上层建筑，以美国和香港地区为例。

可以稍微简单一点归纳中国的现代化——任何简单归纳都很粗暴，会失去很多宝贵信息——但仍然还要归纳：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粗暴了，被批判为“经济决定论”，在经济决定论中又可以被批判为“生产力决定论”，那就更麻烦了。但经济学家会辩解，不讨论生产力，还能讨论别的吗？就像我们讨论香港，一来就问，香港经济到底是个什么生产力结构？否则我们说不清香

港是怎么回事。去年我来讲课，我讲了香港经济结构，你们听后明白了香港经济危险，那请问这种危险的香港经济支撑的上层建筑，难道不危险吗？我承认我的话很粗暴，但不做这样的归纳，就没有分析框架，就容易一团浆糊，就不能达到中国古人所提倡的“格物致知”。何为格物？把客观事物归类出范畴。比如最简单的，男人是个范畴，女人是个范畴。把男女范畴放到这个世界去，就形成了对阴阳的认识。阴阳之谓道也，这是老子思想的最朴素的见解，所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世界就成了多样化的，这就是朴素的自然辩证法的表达。当然把东方的这套思想体系和西方一一对应也不合适，我们知道早在两三千年前的中国哲学思想，在讲究对世界客观事物的认识时，要求同样要先做不同范畴的认识，叫格物；把事情归到某个格，才能根据对这些规范的认识形成某种讨论，这叫致知，从而达成对某个知识的认知。

因为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作为知识生产者，大部分不下乡，所以忽略了很多大众的知识。他们不能把大众的知识状态进行格物，所以他们今天所致的知，是一个严重缺失民众经验的知，是没有基础的知。所以今天大家得到的信息是混乱的，对此必须做出解释。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我们最近发表的文章，说当代全球危机不是一般意义的经济危机，而是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成本过大，其成本很难顺畅转嫁。有转嫁条件的国家，开足马力拼命转嫁；没有条件的国家，像西班牙、希腊，就内部爆发。有转嫁条件的国家也不代表它就转嫁得出去。最有条件的国家——美国——正在通过QE1（第一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QE2来大规模增发货币。它的财政货币主权都完整，并且它的货币主权是全球货币，可以把自己一个国家的国家主权转化为全球主权，靠的就是全球84个军事基地。美国在经济危机非常严重的条件下，国家负债历史最高，达40万亿美元，但它依然保持军费开支是全球的一半。所以硬实力（hard power）无人可比，它经常指责他国增加军费，自己从不批评自己，因为它还有另外一个软实力（soft power），是用来建造政治正确性的，说我增加军费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我打你，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全世界的媒体都不敢说你打他不对，而会跟着说，你打他是因为他有问题。比如你打伊拉克是因为它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打了后一查没有，但是有任何一个国际组织，说侵略伊拉克的布什应该上海牙国际法庭吗？没有。尽管在伊拉克，造成了100万的平民伤亡，其中死亡人数是20万左右。美军死亡人数则在4500人左右。没有人把美国告上法庭，因为它已经建立了政治正确的软实力，这个意识

形态再通过硬实力支撑的金融体系的滥发，现在已经滥发到每个月接近1000亿美元的货币量。发出来后，用于买到各种各样的资源，包括全球范围内大型机构投资人对全球资本市场的控制权。

比如香港的经济主要靠金融资本和房地产市场，但很少见到香港的民主派、自由主义运动去反对金融资本和房地产资本，因为这两个东西是维持大家有自由的主要经济来源。香港的经济是不健康的，因为没有生产，具有典型的寄生性。这个寄生性唯一可比的是美国。美国是85%，香港是82%。这就是所谓以金融为中心的第三产业支撑经济，支撑GDP。

很少有人去分析香港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和危险性，因为香港所有的一切都要靠从外边来。原本我和刘老师讨论时，大家会批评我说，你说的一切基于什么？后来他们去种菜，开始做有利于民众生计（livelihood）的实体经济时，就有讨论的余地了。如果只说不做，对我这个从工人、农民底层出身的人来说，就觉得你没有跟我讨论的条件。我做了十几年的工人、农民和士兵，贡献过我的劳动剩余。我所有的劳动剩余都在国家资产里，你占有我的资产就是犯罪。我可以这样说，因为我贡献了。我认同国内的劳工群众的各种诉求，是因为他们和我一样都是贡献者，所以我们应该有我们的声音。再怎么宣传你是自由民主都说服不了我，因为你没有表达占13亿人口大多数的这部分人的意愿。所以我不相信中国大陆的自由派，说你们只不过在向大资本要权，你们在形成精英政治，这不代表大多数民众。因此我不加入，甚至不参与他们的讨论。因此当你们说到你们笃信的自由和民主时，它只是在这样的一个经济结构中的表达，并不代表着一种真实。这个批评就比较重了，你们姑妄听之，我则姑妄言之，在香港这个话语环境中我肯定没有政治正确性，就像在大陆的现代化话语环境中我没有政治正确性一样。但因此恰恰说明了我有一个学者的公正，在任何不同的环境中我都属于少数派，那才要求保护少数人发表意见的权利。我在所有的争论场合都不坚持，假如有谁说温铁军你错了，我会立刻认错。因为只有保持不争论才有说话的可能，如果一定要斗个你死我活，那我连个说话的余地都不会有。所以我会对所有人认错，只要你认为你正确，那你一定有某些构建你的正确的逻辑。我觉得与其去辩论，不如我先把你的逻辑借过来，我们见招拆招，看看你的逻辑有什么问题，才有讨论的余地。否则在现代政治，大家一定要对立斗争，一定要证明你错了我对了就没了讨论的可能。我最怕的就是用对错、好坏来简单地对客观事物做归纳，这种粗暴

比我用言语归纳的粗暴还要差几个级数。我不太认同现代政治家们之间的争论。当有人问我时，我说，the politician in the world anywhere is the same（政客们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

（三）西方模式现代化的危机转嫁机制

回到最开始的话题。因为它是一个西方模式的现代化的综合危机，因经济危机的爆发而导致政治危机；又由于政治经济学早就指出，一个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就会长期存在，不可能随经济基础的改变而同步改变。这是一百多年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只有当全部经济基础发生根本变化，庞大的上层建筑才会跟进发生变化。请问西班牙的经济基础是否发生了根本变化？如果没有，那么西班牙的上层建筑根本不可能发生变化。无论谁上台，都会维持现在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危机会延续下去。

1.美国的危机转嫁靠印钞、军事强权和话语强权。

可以单独解决问题的国家只有一个，就是美国。它靠不断地印钞转嫁成本。增加的货币量上哪儿去了？它们到了原材料、能源和粮食市场上，导致全球粮食价格、原材料价格、石油价格全面上涨。谁最后承载了增发货币的代价呢？大量进口原材料和能源的国家承载了这个代价，因此美国成功地转嫁了成本。于是就出现了像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国家，因为要大量进口原材料，于是PPI价格上涨，然后就是CPI上涨。所以中国现在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进口通胀。于是我们自己作为经济研究的学者进行测算，发现中国现在的CPI指数中，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因素来源于进口。今天世界上很多人在对之讨论，但如果没有对这个基本关系的了解，很难将其认识清楚。

今天美国的主要敌人不是中国，而是拥有石油主权的国家，比如委内瑞拉。原本委内瑞拉的石油由外国公司控制，3/4的石油资源被美国为首的跨国公司控制，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CIA、军事手段干出来的。那时没有民主可言，但到了查韦斯通过军事政变、发动民众，收回了石油资源控制权，这时就出问题了。因为拥有石油主权的国家，拥有了对冲关系。这个对冲关系非常重要。意思是：你增发货币导致石油价格上涨，如果这个石油是你控制的，那就意味着你把增发货币导致的石油收益上涨也拿走了，成了两头挣钱。这是美国对大多数国家占有收益的手段，成就了自己世界一哥的地位。但现在委内瑞拉把这个对冲关

系收到自己手里了，所以就成了美国的敌人。同理，尽管普京是通过选举上台的，依然是美国敌人，因为普京也是用各种手段把石油收回国有。

由于美国失业率依然很高，美国的贫困人口不得温饱，贫困率从9%上升到19%，因此奥巴马现在的政策是有增长、无就业，他并不能解决大众的问题，解决的是少数大资本通过金融控制、能源控制、粮食控制来占有收益的国家想象。这对美国来说没有问题。麻烦在于他同时制造出了自己的劲敌。普京、查韦斯为什么会是美国的敌人？因为他们把原来美国大公司控制的石油收益收回了。因此俄罗斯人可以通过普京政权大幅度提高收益和福利，委内瑞拉连80%的贫困人口都得到了政府因石油收益增加而发展福利、办教育的好处，所以贫民窟的老百姓站出来拥护查韦斯，而知识分子则是反查韦斯。所以委内瑞拉一方面是贫民喜闻乐见的革命：跳着桑巴舞，穿着红衣服，举着红旗去拥护他；另一方面，90%以上的知识分子、大学教师、媒体反查韦斯。你如果去接触大学教师、知识分子，他们会说查韦斯是反民主、独裁者，这套话语谁给他的？美国。美国用它的软实力影响委内瑞拉和俄罗斯。俄罗斯的自由主义政党也是这样的，高呼自由主义口号，但是60%的俄罗斯大众拥护的是把石油主权收归国有、向大众增加福利的普京。

伊拉克的萨达姆为什么要被干掉？因为他拒绝用美元；普京和查韦斯还是用美元结算的，还不是美国最彻底的敌人；最彻底的敌人是萨达姆·侯赛因和金正恩。这两个国家领导人都拒绝用美元做出口结算。现在中国成为美国敌人的条件上升了，因为中国开始越来越多地与周边国家签双边协定，咱们不用美元了，我进口你的，你用我的货币。这个变化很大，在美元虚涨的庞大泡沫上捅了一下。所以，真正成为美国死敌的，是那些拒绝使用美元结算并具有对冲能力的国家。若从这个角度看，利比亚的卡扎菲，伊拉克的萨达姆，这两个人都必须死。美元增发，相当大程度上要靠石油对冲。萨达姆不用美元用欧元来结算石油出口，于是美国人出兵打伊拉克。利比亚的卡扎菲更过分，连欧元都不用，要用黄金，于是欧洲人出兵把他端掉了。你连对冲货币增发都拒绝，就意味着当我作为欧元区国家，增发欧元支撑欧洲共同基金来解救我的财政困难时，你连我的这个能力都要毁掉，你卡扎菲一定是恶魔，于是你就只能死。欧洲人出兵，美国人乐得说这是你们欧洲人的事，我就不出兵，所以干掉卡扎菲的是欧洲人。

国内媒体很少介绍的是，卡扎菲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强力把利比亚

的石油资源都收归国有，用石油收益来支付社会开支，因此国民高福利，全利比亚没有一个街头流浪汉，教育、医疗、养老全部免费，福利程度比欧洲各国还要高。如果拿社会发展指数衡量，它有全世界最高的社会发展指数。干掉卡扎菲有其他借口，但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只要石油收归国有，你就有对冲能力了，国家不再是个想象，因为经济主权中的石油主权在你这儿。伊朗也是其中之一，因为宗教革命使伊朗的世俗政权把石油收归国有。

干掉伊拉克萨达姆的是美国军队，他的石油主权被美国人占有。干掉卡扎菲的是欧洲军队，先开始动手的是法国，所以法国占有利比亚34%的石油主权，剩下的2/3归了其他的战胜国。这就是再殖民化，根本不意味着什么正义，只是重新控制别国的石油资源。所以许多西方人高呼着，这根本就是石油战争，而不是什么人道主义。我不会去争论，只是提供一点信息有助于丰富你的理解，我并不坚持，因为这些信息在媒体上根本看不到。不会有人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发生的经济关系是这种对冲的关系。

2.美元垃圾消纳场与发展中国家的严重问题。

第一超级大国美国滥发货币，是为了控制石油和粮食这两块市场，叫美元垃圾消纳场。滥发货币肯定会通货膨胀，但为什么通胀就不发生在美国？去年课上我告诉大家，将来谁当政府首脑，如果不去增发货币，根本过不了日子。为什么？就因为成本需要转嫁。任何一个美国经济学家都不会解释说是美国市场制度好，这么解释大家都会跟软实力走，会迷失而永不得解脱；其实它只是把它的痛苦转嫁给你了。当货币进入这两块市场，因为是发展中国家要大量进口原材料以及粮食来进行国内实体经济生产，于是这些国家便发生进口通胀，而美国人便不再通胀。中国是受虚拟资本扩张双重攻击的国家，一方面我们要高价进口原材料，进行大量生产，另一方面向美国出口大量廉价商品，因为要跟别的国家竞争，比如印尼、越南、印度也在生产廉价商品，所以大家在进口高价原材料后都争着把生产出来的廉价商品给西方，还有香港。而美国增发货币却不通胀，因为拿到的商品是最低价的。从引发通胀的两大因素看：货币大量增发造成通胀基础，当你的需求引发价格上涨时，通胀才会发生；当市场价格上涨时，人们去抢购食品、日用品，从而带动一连串的价格上涨。在美国超市你会看到，连拿食品券（coupon）的穷人都拿车在往外推廉价的商品。仅中国一个国家，每年向每个美国人提供12件衬衣，7双鞋。因此美国人在广交会上买中国商品不是按件算

的，是按吨算的。

当商品价格不上涨，就意味着资金价格极低。如果我是美国的投资机构（institution investor），我得到的资金就是世界上最低价格的资金。也即假如美国的物价指数在2%，那我的存款利率维持在3%就可以，贷款利率在4%到5%就可以。也就是说，物价在2%之下，让老百姓的存款不至于负利率的话，就把利率定在3%。存款要贷出去才赚钱，银行赚的是存贷之间的利息差，所以贷款利率定在百分之四点几就够了，过高的话是暴利，企业就不干了。我如果是银行的投资基金，得到老百姓的存款给的是百分之三点几的利率，贷出去就可以用百分之四点几的利率。因为我和银行是一体的，可以拿到大量成本极低的资金，用于FDI（外商直接投资），到发展中国家去投资。发展中国家则由于进口石油、粮食、原材料，它的PPI和CPI都很高，一般都在7%、8%甚至15%、16%或20%。中国在1994年的CPI高达24.1%。一个低价的外国资金以百分之四点几的利率进来，我们通胀率是24.1%，那我们的银行贷款就得至少在27%、28%。为什么大家要吸引外资？因为国内资金的利率太高，利率高则是因为CPI高，而CPI高是因为PPI高。所以，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老是这么糟糕，老是出问题，原因不在于发展中国家。它是怎么被人家剥了几张皮的它自己也说不清。因为软实力，包括话语权，它统统都没有。

现在，没有这种货币权的国家，比如西班牙将货币权上交欧盟了，不能增发货币。那能干吗呢？发债，债就成垃圾。美国人发货币，货币成垃圾，被食品、石油市场消纳，但只有美国一家能缓解危机，欧盟不能缓解，最后导致整个环地中海的国家都发生危机。埃及、突尼斯、利比亚、希腊、西班牙、意大利，无论什么主义，什么政府，谁当领袖，都发生危机或“街头政治”。值得考虑的问题是，现代化的综合成本无处转嫁的危机都会爆发。我们有篇文章解释这个问题，是全球西方模式的现代化成本无处转嫁造成的危机。

（四）中国现代化的危机转嫁机制

那中国的现代化能不能转嫁成本呢？中国越激进时，就越不能转嫁成本。因为中国相当于一个超大型大陆，13亿人口相当于欧美人口之和的两倍还多。美国人口有3亿，欧洲人口有3.4亿，加到一块是6.4亿，再加上1亿的日本人口，中国的13.4亿人口差不多是他们的两倍。同时中国面积是欧洲的三倍，因此它具有小经济体不能比拟的优势，叫内部转

嫁。中国不是不转嫁成本：大资本、中产阶级能维持高收益的原因在于它把代价转嫁给了下层群体。中国现在的资源环境问题严重的原因是，下层承受不了，将代价转嫁给了资源环境。农村过去是完全没有污染的，现在成了污染的重灾区。过去为什么农村没有污染呢？因为城里人的排泄物运到农村成了堆肥，那时农村人抢着到城里去拉粪。城里的废品公司送废品到农村去时，所有有机物都变成堆肥，所以是完全有机的，也没有多少农药，因此作物种植是多样性的，才能使病虫害不大面积发生。而且为了提高产量，精作套种，农村消化了大量的城市污染。现在，农民不吸纳了，都用化肥了，于是城里的排泄物只能流进江河湖海，大面积的富营养化，导致水体污染。现在香港用的水是从广东来的，广东是污染的重灾区。我说这些话不是凭想象说的。我是国家环境资源委员会的委员和专家，国家环境资源委员会是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在一起的委员会，我们对环境污染的现状是非常担忧的。这个情况能不能改回来呢？很难。所以现在中国的现代化也有巨大的成本，过去是向农村转嫁的，但激进现代化导致可承载代价的大众越来越没有承担能力，于是向资源环境转嫁的速度越来越快。所以中国的现代化，以目前的高速态势，是不可维持的。

最后，人的贪婪和纵欲被西方的软实力变成了一个普世价值。我并不认为，在这样的体制下，人能自觉地走出危机的局面。只有下一次的危机爆发，才能使连带受了损失的精英群体有所调整。中国以前任何一次的调整，都是危机的产物，没有自觉过。所以这次底层不能承受危机代价而最终爆发的可能性已经存在。我不是悲观，只是指出客观规律，危机一定会爆发。爆发后，人们才愿意思考。指望现在危机不爆发，让人们自觉反思，是不可能的。同样，香港的经济也很危险，因为他们几乎对实体经济持完全排除态度。在所有香港的政策领域中，都找不到让第一产业发展的可能。人口不断增加，社会开支也在不断增加，连本来可以发展起来的渔业也要排除掉。何况香港也几乎没有第二产业，他们正在消灭第一产业。我们不知道一个浮在空中的第三产业能维持香港所谓现在的繁荣多久。这种发展是寄生性的，而且这种寄生性是危险的。要知道美国的发展是依靠占全球军费的47%到49%的硬实力来维持的。这种政策是典型的自杀政策。当然我指的是代表香港大资本的政治家们。这些关于香港的民主自由的报道中见不到反映。这至少说明投身于香港政治的人对于香港经济自身的问题缺乏认识和警觉，吵的问题中不包含这些真正涉及香港长期生存和可持续的问题。

第三节　人民币的故事注

（一）关于人民币故事的两个序曲

你们也许知道，中国人从清末就试图进入所谓现代币制，也曾经试图发行货币。我印象中是在载沣主持清政府财政的时候，他曾经以财政支持发行过货币，但那是在清朝末年，因为清末财政基础很差，关税已经被英国人赫德掌握，而又主要是用那点“值百抽五”——就是外国人控制的、只允许有5%的关税率——去支付清政府应该支付给洋人的战争赔款。

1840年以后多次帝国主义侵略战争造成的连续的大规模的战争赔款，比如甲午战争，中国支付3亿两白银赔款，到庚子事变，中国支付4亿5000万两白银赔款——使清政府的财政完全空虚了，因此以国家财政为依据来发行货币的努力，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所以，清末实行纸币制度的努力是短暂的一瞬，出生之前就预示着它的夭折，没能成功。

此后中国其实一直仍然延续着明朝在16世纪以来推行的以白银作为货币的制度，我们叫它白银币制。那么，到底什么时候中国才真正发生向所谓纸币制的变化呢？

讨论人民币，先得看此前的币制是什么？

1.序曲之一：民国年间的币制改革与高通货膨胀危机。

1935到1936年，国民政府改行纸币制，叫作法币。为什么要改呢？改纸币制的后果又是什么呢？恐怕在你们的纪录片中必须把这个改行纸币的前提搞清楚。

我现在所看到的资料，主要是源于1929—1933年西方发生的资本主义大危机。当时，中国由于自己不产白银，它的白银供给要靠海外，那么中国的白银币制也就得靠海外平价供应白银才能稳定。

当1929—1933年大危机爆发的时候，一定会导致贵金属价格——黄金价格上涨，跟今天的道理一样，那时白银相对于黄金的价格是温和下降的。为了稳定银价，美国、中国、印度等八个产银或用银大国还签订了稳定银价的协议。但是随着英、日、美这些西方国家告别金本位制带来的货币大幅贬值，白银相对其他货币价格上升，已经使中国发生贸

易逆差白银外流；到1934年6月，美国出台《白银收购法案》，就更加剧了这一矛盾，随着国际银价大涨，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于是乎就出现白银供给短缺。

这不是一般意义的短缺，也就是当国际市场白银价格上升的时候，中国国内的白银会外流，而是出现了白银外流造成的严重短缺。这点恰恰和早期西方在中世纪晚期所谓资本主义拉开序幕的时候情况类似，西方首先是出现白银外流，发生白银危机，导致欧洲长期的白银战争，白银战争的战败国，变成了所谓开拓新大陆的掠夺者。那时欧洲白银没有了，流到哪里去了？流到东方来了。

现在是东方发生类似情况。正值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黄金增长”的同一时期，出现白银外流，于是导致通货紧缩，通货紧缩条件下，同样是政府发行货币的一个宿命约束。也就是说从1935年年底民国时期的政府因为白银外流、严重短缺，而不得不改行纸币制的时候，他们首先遭遇到的是通货紧缩的打击。

接着，我们还得讲“人民币序曲”，也就是说，法币制这个纸币发行是人民币的序曲。

因1935年出现日本侵占华北，日本在日占区抬价抢购白银，导致中国进一步出现白银外流，贵金属储备大幅度下降，于是1936—1937年就从原来的通货紧缩转化为通货膨胀。

所以，民国政府放弃银本位、改行法币制这种纸币发行的最开始，就应该叫作“流年不利”，先遭遇到了1929—1933年大危机，被迫改行纸币制；接着又是日本侵占华北，导致白银进一步外流，储备下降。于是乎，政府当然又得准备作战，备战又得使用贵金属才能购得国外的物质装备。而这个时期是英美支持日本，大量的日本战争装备主要是英美供给的。也就是说，日本侵略者射向中国的枪弹、炮弹，40%以上来自美国。当年陶行知先生是留美的，他在离开美国的时候愤怒地指称46%的日本打中国的军事物资是英美供给的。中国要想得到军事物资，也得用贵金属，政府靠法币是买不到任何军火的。

所以这就导致中国在战争压力之下出现贵金属进一步短缺，于是政府发行的货币就注定进入恶性通货膨胀。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打响，中国进入了全面通胀。这个全面通胀一直延续了12年，到1949年，甚至1950年仍然在延续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胀，而这个过程，就是法币史，也就是中国自从实行现代纸币以来的连续13年通胀。

通胀到什么程度？到1948年国民党政府改行金圆券的时候，以新疆地方政府发行的货币来看，最大面额的竟然是60亿元，等值多少金圆券呢？1948年的60亿元等值于1万元金圆券。可想而知，通货膨胀本币滥发到了严重通货膨胀的币值是多么的空虚。

所以我们说，民国1948年改行金圆券并没有解决所谓纸币制的长期危机，国民党政府在大陆上执政时期的最后这场金融灾难表面上是法币转化为金圆券的灾难——借了4800万美元，以美元作为基础来发行金圆券，仅四个月就垮掉了。

垮掉的结果是1948年年末到1949年年初这个阶段，国民党出现严重的全面财政金融崩溃。没法再支付现代化装备的军费，也就不可能再维持国家。于是几百万军队摧枯拉朽一样垮下来！因此，现代财政金融，或者叫现代币制的彻底解体，导致了民国政府先亡于现代货币经济，后亡于现代军事政治。

因此，去意识形态化地看我们早期推进的现代货币制度的代价极大，在中国面对的多种复杂的国内外因素作用之下，是一场长达十几年的灾难。

所以，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说1953年因为中国进入了计划经济而使现代化金融经济中断。这个说法缺乏历史感，如果一刀砍在1953年，把以前整个民国时期推进现代化的惨痛教训全部都忽略不计，这只能是我们自己脑子里思维出现短路，那就无法解释后来所发生的一切。

先得告诉大家，1949年到1950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其所谓的纸币制打算建立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先天性的不足，这个不足大家从报纸上都已经看到，各种各样的资料也揭露过。大陆的黄金储备几乎全部被拿到台湾去了，形成了台湾建立稳定的纸币制度的贵金属储备基础。因而，大陆要进入所谓纸币制度，亦即一个政权要发行主权货币，那这个主权货币从一开始就是没有任何贵金属储备的货币体系，因此，它不仅延续着接受了民国13年纸币制以来的通货膨胀危机的恶果，而且是从一开始就是没有黄金储备的货币。

这时候你无论叫计划经济还是叫市场经济，都没有实质性的历史意义，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开始遭遇到的通货膨胀，当然不是计划还是市场的问题，而是没有货币发行依据——贵金属储备。

我们都知道，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当代主导国家货币的发行大

都不再以贵金属储备作为依据，其主要的信用来源，源于政治强权，而不是源于其他——比如有多少商品生产，有多少贵金属。这是当代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信用体系的另一个基本特征。

但是，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中国政权还不稳定，货币信用还是要源于有多少贵金属储备作为基础的。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从20世纪20—30年代讲起，这是从头讲起，是因为20世纪30年代在贵金属储备不足的情况下出现白银外流，政府就根本不可能维持货币的稳定，只不过是迫不得已进入所谓货币经济，代价就是大规模通货膨胀。这个教训，可以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是摧垮民国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

请问，今天在谈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的时候，有多少人引述过当年法币危机本源是什么呢？当年就是全球化的作用，本源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中国促推而成的币制改革。民国当时是白银币制改为纸币制，是这个西方大危机波及的结果，由于承载了这样一个危机，导致中国十几年的通货膨胀。

2.序曲之二：建国之初的几大重要举措及货币的作用。

据此再说1949—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的所谓新的一轮通胀，本源于什么？源于本币发行没有贵金属储备，源于继承了十几年通货膨胀的恶果。中国大陆当时的通货膨胀按月计算是百分之三十几。这时候，政府发行的每一分钱都是“毛票子”，请问怎么进入现代货币经济？

我得告诉大家，中国是怎么改出1949—1950年的高通胀危机的。

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银行保证老百姓能存“白米、白面、白布”，那时候就叫 “银行存三白”。听说过商业银行干这些事吗？当然，不是老百姓拿着“白米、白面、白布”到银行去存，而是银行向百姓承诺，不管货币毛到什么程度，你今天存的钱能等值买多少“白米、白面、白布”，到取的时候，银行给你等值的能买同样数量的“三白”的货币。

我印象里很早的时候侯宝林说过一个相声，后来他还因此受到批判。就是讲刚解放那会儿的“毛票子”，500块钱买一个窝头。他拿这些事调侃时并不是恶意，但后来批判的时候，就说他是诬蔑新中国。

新中国一开始继承了民国遗留的高通胀危机，这并不是新中国的耻辱，只是一个客观情况。按月通货膨胀率超过30%，比今天要恶性的

多，请问这货币经济到底怎么搞？据此可以说，根本就不是谁想搞计划经济，谁想搞市场经济，今天把这些后人对历史无知造成的牵强附会变成一个具有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灌输，那是非常糟糕的，会使人不能正视历史。

我们得有勇气正面看待历史，就是说：1949—1950年中国出现高通胀的时候，简单化推出货币制度是运作不起来的。所以只能把当年侧面上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的、导致通货膨胀恶性发展的那些投机性市场关闭。

因此，中国大陆新建立的中央政府在所谓计划经济之前，先采取的是抑制通胀、遏阻严重货币危机继续泛滥的那些措施。

首先是银行可以存“三白”建立社会对银行信用的认可，接着大规模地实现农村的耕者有其田，也就是土改。

全国土改在1951年完成的时候，已经使中国人口的88%脱离了现代货币经济——农村没有现代金融、现代财政，客观上导致农民脱离了现代化危机。对此，我们叫作占中国人口88%的农民“去现代化”了，跟城市现代市场经济可以没关系了，因此中国政府不用再担忧88%的人会遭到这种通货膨胀的影响。

顺便提一句：这跟1980年大包干使得农民离开高通胀的城市危机一样，是类似措施。

因此，在大危机打击下，政府只要帮助大多数人回归小农经济，回归传统农业社会，本身就是降低城市经济波动代价影响的一个最重要的措施。

可见，一是城市先恢复银行信用，二是恢复农村小农经济占绝对比重——88%以上的农民变成了传统的自然经济，跟现代城市财政金融没关系了，于是，中国基本上恢复了社会稳定。

这点应该叫作序曲之二吧。

序曲之一是民国年间的高通货膨胀危机，序曲之二是建国之初的几大重要举措。这两个序曲，是理解50年代的人民币制度的重要前提。

如果认真地研究一下从井冈山开始发展到赣南闽西的苏维埃的所谓货币史，或者研究一下井冈山苏区经济史，就会发现，毁掉井冈山经济基础的恰恰也是那批教条主义的白区党中央领导，他们强迫苏区照搬了

所谓苏维埃制度，甚至把苏联的制度照搬到井冈山，才使得以瑞金为中心的整个根据地的经济出现严重的危机。

井冈山本来属于传统农业社会，根本就不能适应所谓现代财政金融制度，如果硬照搬那一套，结果就是小农承受的负担过重，于是苏区经济先垮掉，军事上再搞所谓阵地战反围剿，就导致经济先垮，政治军事后垮，才不得不大规模转移。

这个道理提出本身，就已经去意识形态化了。其实就跟我刚才讲民国政府先亡于现代财政金融的彻底崩溃，后亡于现代军事制度的彻底崩溃，内在道理是一样的。

早期的中国现代化，从清末到民国，都不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进步。我们今天把现代化当成一个颠扑不破的伟大目标，也许是我们自己脑子短路？如果我们把中国人百年追求现代化的历史延续起来看，几次解救中国大危机的，都是去现代化（de-modernization）。

也许我跟许多主张现代化的学者的观点不一样，但是毕竟也是一家之言。如果没有观点的交锋，这片子就是个宣传片。没有矛盾冲突就没有新闻。大家如果一面倒的只说好，那有什么意思呢？

所以客观讲，这个人民币正式成之为人民币之前的序曲很重要。

先得说清楚，民国年间怎么回事，建国之初怎么回事。如果都说清楚了，那就知道，其实土改是一个中国“去依附”——对西方现代化的“去依附”，因为全面恢复小农经济。土改实现的是中国农民几千年的诉求，那叫作耕者有其田，只不过是这个打出来的党，满足了部分参加革命的农民的利益需求，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就是小农经济去现代化、去城市化了，中国大陆也是靠彻底地恢复了小农经济而总算走出了民国追求现代化的大危机。

这么一来，政府不用再管88%的小农怎么回事，只管那12%的城市人口。农民得到土地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产量增加，不仅维持住城市需求，而且农产品供大于求。是农民的力量弱化了高通胀，货币作为城乡之间工农产品交换的中介物也就稳定了。

要知道，中共1947年就主张要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就主张城市发展私营经济，农村发展中农经济、富农经济，促进城乡交换，同时对外开放，原来在1949—1950年想搞的新民主主义，其实就是民族资本主义，并没谁打算封闭。

至于什么叫计划经济？1953年那时候中国人懂吗？几乎没有人懂。只不过因为朝鲜战争打来了苏联重装备生产线，大概有100多个现代工业生产线的大型项目搞起来了，国内配套的是几百个工厂，这才使得中国陡然有了城市工业。

那么，有了城市工业和城市产业资本经济，就有了对城市经济交换中介的润滑剂——货币的需求——货币是促进交换的中介嘛，也就有了人民币不断增发这种需求。开始谁也不懂怎么玩这个现代货币。

计划经济本来是1950年伴随苏联生产线一起开始的。早期谁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只是因为苏联的各种装备生产线进了东北，东北局就配合着苏联工厂的管理需要，建立了东北“小计委”。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但是，早在结束之前，不仅因为苏联送来了就近支持战争的装备生产线，而且因为打仗造成中苏战略性的结盟关系，苏联承诺对中国进行整体的工业建设支持，当然70%以上是军事装备生产和配套工业。因为这个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是从1950年开始的，随之到1952年就变成了整个的对中国多数城市的工业布局的建设安排。这样，就等于有600多个工业项目要上。可见，中国并不是1949年建国就进入计划经济的，而是1952年才开始建立国家计委，也就是把东北“小计委”整个搬到北京，建立了国家计委。

国家计委一建立，因为工业建设在多个城市开展了，需要大量粮食供给、农副产品供给，需要跟农民的大量交易，而这时候农民刚刚在1950—1951年完成土改，正在过自给自足的小日子，凭什么得给城市交易？农民不愿意增加交易数量。农民自己还想多攒两袋麦子，等着将来憋个好价。当时是高度分散的1亿农户、4亿农民，交易费用过大，不愿意跟政府交易。不要以为放开市场，让农民交易，农民就乖乖地进入市场做交易了，那时候的农民不需要城市工业品，至少家有三年粮，才不至于再受穷。对吧，刚刚开始过好日子。

所以1952—1953年城市想跟农民交易的时候，农产品交易量并不上升，看那个年代的曲线，产量的上升是陡然向上曲线，农民一旦恢复小农经济，生产积极性非常高，产量是陡然上涨，但是交易量可不上涨，曲线是平的，两个曲线并不同步，形成一个大喇叭口，这才使得城里很紧张。

如果看看《陈云文选》或者《陈云百年纪念》的那些文章就知道，1953年为什么搞统购统销，是因为城里没粮食了，工业化速度这么快，

城里没粮，跟农民交易不着，农民不买账，怎么办？中央提出了七八种方案，最终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搞统购统销。

搞统购统销一开始就说好，按照市场价格，国家统一收购，这时候农民已经恢复生产三年了。到1953年的时候，农民已经憋了三年的存粮，这时候说敞开收购，农民乐得给你这个大规模收购者，所以1953年很顺利。

这时候货币的作用也是清楚的，因为它是一个交换的中介。1953年的时候并不因为这时候提出统购统销就搞计划经济了，货币就失去作用了，这不是客观历史，而恰恰在这个阶段，人民币有效地促进城乡交换，货币体系的作用发挥得很好。

而且就在这个阶段，你看当时城市经济也开始欣欣向荣，因为还没到你还债的时候。1953年刚刚打完仗，中苏两国正是热恋期，刚刚形成一个所谓“新婚燕尔”，人家也没让你还，这时候觉得大规模投资多好，苏联不断给你送进来设备制造业，“三通一平”大量带动非农就业，所以那时候大规模动员农民进城支援工业建设，2000多万青壮年农民进城。进城当然干活拿钱了，吃得饱还穿得好，还能拿到现金收入，所以这时候城乡之间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政府尽管有统购统销，但是只是把农业增量形成的剩余——农产品生产的增量部分，按照市场价格收购用于搞城市工业建设，同时政府不是大量动员农民进城去干活吗？一个壮劳力进城挖土方、修马路，不需要什么文化知识，懂得铁锹镢头就行。

此时的城乡之间是一个良性互动，因为还没到代价爆发，没到还债的时候。20世纪50年代的高增长、高收入，社会没有问题，是因为现代化成本还没有表现出来呢。

（二）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去货币化”的另类解读

1.重工业优先发展与不得不形成“去货币化”的计划经济。

什么时候出问题的呢？不是1958—1960年，是1955年。

这也不能怪政府，为啥呢？因为你想引进苏联的生产线，中国人懂什么叫重工业吗？工业是个资本增密、技术增密的过程，中国有资本吗？有技术吗？大部分是进城的游击干部带着进城的农民工，政府干部基本上是游击队出身吧。以北京周围的整个华北大区为例，70%以上的干部基本还处于半文盲状态，靠革命队伍弄点识字班、文化补习班，算

是初步扫盲而已，真正说完成扫盲任务，那还确实需要相当的工夫。当时没有多少人懂现代城市经济，没有人懂工业。所以毛泽东才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是因为刘少奇是在城里长期从事城市工作的领导人。大量进城的老八路，大都是游击队出身，怎么懂得城市工业呢？

所以，那时候完全用苏联专家来帮中国建政府、建学校、建机关、建一切企事业单位，工厂里都是苏联厂长、苏联总工程师、苏联技术员和技术工人。中国请一个苏联厂长，得付比国家主席还要高的工资；请一个苏联工程师，得付部长级工资；请一个技术员付局长级工资，请一个技术工人，也得付处长级工资，而且苏联还曾经提出要双份工资。

这时候，开始有制度代价了，中共领导人觉得如果要是全套的政府、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全是苏联化的，那打了这么多年仗形成的国家主权怎么办？所以1955年毛泽东组织新建立的30多个部委主要负责人开会，讨论“全盘苏化”是应该被接受，还是应该反思；或者应该考虑改除苏化，这是发生在1955年年底的事情。

接着，1956年就开始出现中苏两国在重大国际事务上的分歧。

一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苏联对东欧加强控制，中国共产党认为不对，提出苏共不能以老子党自居，这个干法不行，要提出我们的批评意见。但是为了大局，我们仍然可以服从，这就惹恼了苏联领导人。

二是1956年中国完全按照中苏条约收回了旅顺口这个军港和大连特区，收回了中长铁路，把一切前俄罗斯帝国主义或者苏联在华利益收回了，导致双方出现了一系列的争议。

到1957年，中国“一五”完成“二五”时期刚要开始，苏联对中国不计代价的整体性的工业化援助，就陡然停止了。

这才是中国刚刚建立的货币经济出问题的开始，而不是因为1953年进入统购统销，说什么由于计划经济，中国货币开始出问题，不是的。因为在1953年，外国实体性的产业资本是大量进入的，而且这个资本进入当时又是不计代价的。这在同期促进了中国货币增发，用于城乡交换。

苏联对中国的产业资本投入从什么时候计价了呢？从1957年的“二五”才开始。

我为什么说中国“二五”计划其实没执行，是因为根本没有办法制订和执行。“一五”是人家不计代价给你，大量的资本投入进来，到1957年

突然停了，而且人家开始撤了，等到1960年基本撤完，那就对不起了，工业化需要的技术密集不断增加这个条件首先没了。同期，资本密集这个条件也没有后续追加的了，国家“二五”计划再想要维持那种资本密集投入，那就得买。

拿什么买？中国人有什么呢？人家给的是已经过了季的东西。比如汽车，人家给你吉斯150生产线，就是50年版的车型。但到1960年苏联需要中国偿还债务的时候人家已经上了160吧，那中国生产的150就不可能返销苏联。当然，在中苏战略同盟的时候，中国得到的几乎全是苏联新的型号，不像中国20世纪80年代引进的西方旧的型号。比如大众公司的桑塔纳，是人家德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版本的汽车。那个旧车的生产线已经算二次转移设备，先转到巴西，卖不动了才转到中国，到现在为止，桑塔纳在中国还算是相当主流的车系，这是西方的产业转移。

一般而言，发达的制造业国家转移出的是人家落后版的生产线，发展中国家接受过来当成本国看家的工业基础，这种产品能返销吗？比如桑塔纳返销到德国去，那怎么可能呢？好了，西方转移到这儿的生产线，生产的工业品不能卖回给人家，那么，拿什么还给西方呢？主要是农产品，还有稀缺矿产品。

当然，中国是1960年开始还债，一是拿稀缺矿产品抵掉了一大块，二是农产品抵掉了一大块。农产品就要靠统购统销拿走人家要的农产品还债，比如说小麦必须统购，是因为小麦人家要。此外，很多肉类、蛋类、鲜果菜类等这些副食品人家都要。

那时候其他的东西宽松些，比如地瓜人家不要，像高粱、谷子、荞麦、糜子这些东西，苏联也不要，这些农产品占统购份额就很低。所以后来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包括1960年中国经济陡然进入危机状态，那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大量吃进人家的产业资本，当时没付钱，就没表现出大的制度代价。到1957年苏联不再给了，并且要在1960年以后，得全部汇总算账还回去，又不能拿工业品还，只能拿农产品。

这时候，统购统销所起的作用更加突出，货币不可能再发挥作用。宏观背景的阶段性变化是重要原因，如果这时候仍然是货币经济，就会陡然出现因供给短缺，加之没有贵金属储备支撑的货币是毛票情况下，会像民国那样再度导致严重通货膨胀。

所以我才要说，20世纪60年代的货币经济不能发挥主要作用，是福是祸，还另当别论。

假如接受20世纪30至40年代民国政府的经验教训的话，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去货币化”，恰恰是躲过了一场恶性通货膨胀的灾难。

那好，接着我们说货币经济在农村对农民造成的影响。

应该说前期是积极影响。因为，在中国土改，农民恢复了小农经济，有三年的生产恢复之后，累积的农产品的增加量正好等着政府这个大买家来买，于是无论叫统购统销还是不叫统购统销，都问题不大，只要政府给足够的钱（再加上从1950年开始存“三白”，已经稳定了政府的银行信用），货币的币值是稳定的，统购统销给农民支付的是国家的主权货币，农民要的恰恰是资金这种稀缺生产力要素。于是，人民币这时候已经成为一种促进城乡之间交换的国家主权货币体系了。

诚然，在1957年前苏联停止成规模地不计代价地向中国做工业化的整体投资之前，中国的城乡交换是相对比较顺畅的。问题主要出在1957年苏联终止了整体投资，以及之后出现了1958年的公社化。

2.高级社时代的不得不“去货币化”。

原来高度集体化产生于1956年，是高级社制度，为什么提出呢？

从1955年开始，城市工业能逐渐生产大型机械了，这个工业化速度非常快。20世纪50年代还是“一穷二白”，一场朝鲜战争打出来一个工业化，中国城市开始有了工业产品，不是一般的轻纺产品，更为重要的是大型工业品。比如1954年开始生产拖拉机，1956年生产汽车，那这个拖拉机给谁？如果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要“斯大林50号”履带式拖拉机吗？如果不要，拖拉机生产就压库，不就是一堆废铁吗？压个两年，锈成铁疙瘩了。

到1955年工业各部门纷纷要求中央，说农民这种分散状态，城市工业品下不了乡，这时候已经是初级社了，那是毛泽东帮陈云解决统购统销推进的。初级社之前跟4亿农民打交道，交易成本太高。毛泽东就组织合作化高潮，把4亿农民编成了400万个合作社。毛泽东跟陈云说，你是满头乱发没法抓，我们搞出合作社叫编成辫子就好抓。

如果按照西方的制度经济学理论，那叫作降低了交易费用。就是国家的统购统销跟分散农民之间交易成本太高，变成合作社，交易成本降低。所以早期的合作社，是为了贯彻国家的统购统销，占有农产品剩余，那时候还基本上是市场交换形成的。

到1955年工业部门开始提出的要求就是办高级社，以乡为单位办农

业规模经济，不要以为我们中国人没有搞过农业规模经济，当年就是以乡为单位，数万亩的集中土地，便于农业机械下乡，这件事情就是1956年干的。目的是什么？中央政府1956年提出农业现代化，目的是通过集体化来形成农业机械化，对应城市的工业品下乡。

所以这个集体化高潮，在1956年严重侵犯农民利益，把农民好不容易经过土地战争形成的土地权利，上收到了乡一级。

就在这时候，农村金融的基本作用导向被改变了。这对农民有什么影响？这时候金融的作用变成了帮助国家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发挥了从农业占有剩余的作用，通过“剪刀差”占有剩余。那么，什么叫“剪刀差”占有剩余呢？一辆拖拉机多少钱，得换多少吨麦子？如果拖拉机不能下乡，城市工业品就没法完成一个生产循环。

所以建立起高级社以后，同期做到的是什么呢？国家财政和国家的农业金融，就是农业银行，这两个体系同步下到了高级社这一级。乡这一级。同时国家的粮食部门和统购统销的供销部门，也下到了公社这一级，就是乡这一级。同期到1957年苏联停止投资之后，1958年改成人民公社，就变成了公社这一级。乡这一级是一个大的规模经营性单位，同时又是国家财政金融权利和国家粮食物资商业系统，都下到了人民公社这一级，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交换和结算中心。

这是什么道理？国家按计划把拖拉机分到了乡这一级，建立拖拉机站，后来叫农机站。好了，国家说你不能光叫拖拉机站，你还得配套有农机厂，为啥呢？拖拉机老出毛病。你得有农机配套，还得有配套机具，所以农机厂、农具厂等，就要建立五小工业。五小工业建立，国家就同时把生产出的车床、钻床、铣床各种工业设备，下到了乡一级。

这是谁干的呢？是金融干的。就是农业银行给公社指令性的贷款，你拿到这个贷款，定向地去买拖拉机、买车床、买钻床，装备买进来，国家还得给你下达指标，你不能光有了这些工具性的设备，你还得有原材料运输，就钢材配给你，木材配给你，于是工业品就下乡了。

这又是谁干的呢？当然是农业银行给人民公社贷款，人民公社统一接贷了以后，就等于负债了。负债怎么还呢？好了，这时候就发挥作用了。让各个大队，各个生产队向国家交售农产品，什么价格呢？极低的价格。那边下来的价格是国家计划分配的工业品，价格很高。这边收购的农产品价格很低，中间的“剪刀差”农业银行一结算，跟财政一对接，差额国家拿走了。

通过这种方式，在1956年建立集体化，到1978年，在20多年的时间里，国家从农业占有了多少积累呢？占有了7000亿元到8000亿元的“剪刀差”积累。这就是农村人民公社，配合国家工业化完成的从农业提取原始积累的作用。这个对于国家工业化高度有效，但对于农民来说，就意味着一种剥夺。因为“剪刀差”嘛，压低农产品价格，抬高工业品价格，中间这块，静悄悄地就流失掉了。

这时候农民除了集市贸易之外，向国家交售的大宗农产品并不见现钱。为啥呢？为啥货币的功能并不发挥作用呢？因为它走了财政和金融的内部结算。

不一定要大量增发货币，因此农民并不见现金，各级产品交换结算都可以走账，它就仍然是一种非货币化的交换制度。这种制度当然就不导致大规模增发货币，即使在物资严重短缺的条件下也不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了。

注意，当时因为国家占有了大量的农产品剩余，只允许少数农产品在自由市场流通，自由市场流通会导致自由市场价格跟国家的统购价格之间，差别很大，但这并不意味着通货膨胀率上升。什么道理呢？就是因为并没有多少人用货币来进行交易。大量的城市消费分配靠票证来保证。这时候你并不用货币来标志你的全部消费能力。货币就变成了第二票证，第一票证是各地政府下发的那些本啊、票啊之类的。这个第一票证系统决定你该得到的份额，货币只是你得到这个份额的时候的一个中介物，它并不是一般商品等价物，它的基本货币功能并不体现，所以中国这时候仍然叫作“去货币化”的时代。

3.对建国初期“去货币化”的作用解读。

这个“去货币化”我已经讲了，是从1949年开始的，中国不得不“去货币化”，因为民国政府时期的货币化是一场灾难性的现代经济崩溃。因此，整个20世纪中期，中国主要是“去货币化”的时代，这个时代恰恰没有出现民国那个年代的灾难。这个好坏对错我不评价，我只是说它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

大家都说这个时候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不错，但那不是货币造成的，而是这种工农产品“剪刀差”，为了国家工业化提取原始积累，占有农业剩余，是这样的一个体制造成的，它是一个客观的历史经验过程，没有这个过程，就没有中国工业化。

所以它是不是因为缺乏货币，缺乏自由竞争，缺乏市场经济造成的呢？我说那是后人拿着学到的那点知识，生生地套到前人的经验过程中，所得出的判断。与其那样做，还不如老老实实地看看前人到底做了些什么，我把这些经验过程做归纳，这段时间属于“去货币化”的时代。

这个时代延续到什么时候？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的真正货币化什么时候开始的？在1992年，这中间一大段历史我们全都放过去了，因为其实占人口最大多数的中国农民并不以货币来作为自己的财富的标志，货币不是一般商品等价物，也不是商品交换的中介。

所谓计划经济，无外乎就是保证城市工业化原始积累，可以一方面从农村得到剩余来支持工业建设，一方面来稳定城市市民的基本生活。用这种方式，使中国在完成整个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时间上，比西方用几百年才进入工业化要短得多。我们大概只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就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原始积累，中国的工业化的振动幅度也要小得多。

当然这期间有自然灾害，造成了很多人因饥饿而死亡。话又说回来，民国年间在20世纪30年代那场大灾难，因全球经济危机造成民国大规模的饥荒，有约2300万人的死亡，再加上战争3700万人的死亡，合计损失了五六千万人。

依我看，整个20世纪50年代就是一个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十年。

这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十年里的资本集中的代价，非常大。自然界的基本道理，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体现在人类社会中，就是有一份资本就有一份代价。资本的那份收益你占有了，那份代价甩给谁了？甩给农民了。

工业化主要集中在城市，这个工业化原始积累造成的巨大代价甩给农民了，农民就承载这个代价所造成的一系列的问题。

这到底是不是跟所谓货币化、非货币化有关呢？我说，中国由于非货币化而没有在这个阶段中遭遇恶性通胀，没出现民国连续13年的大通胀导致其现代财政金融全部垮掉！不仅没出现这种灾难性后果，而且维持住这个国家工业的基本存在或社会稳定，就已经难能可贵了。

客观地看待历史经验，应该说只要想搞资本原始积累，就要付出巨大代价，只不过要看清楚这个巨大代价甩给谁了。

（三）中国启动货币化的两个前提

1.1992年中国启动货币化的一个前提是助推中国经济增长。

我为什么说是从1992年才开始货币化呢？是因为，1992年财政承受不了巨额的对票证经济的补贴，中国政府才放弃票证制度。并不是谁主观上说因为1992年宣布要进入市场经济，政府就主观上放弃票证体系，而是因为票证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变成了一个从过去“补贴温饱”，也就是过去补贴吃饭不饿死，到后来财政得“补贴吃好”。

要知道20世纪80年代以后整个工业农业的发展速度都非常快了，人们穿衣吃饭不再是问题了，但还是让占人口20%左右的这部分市民，继续享受财政的全额的补贴。到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们当时希望打破城市乡村之间的二元结构壁垒，记得我当时在政策部门曾经参加过一次讨论。当时公安部户政局的同志说，我们不背户口这黑锅，坚决主张放开户口，别再说不放户口是我们公安部的事，我们要求放。几乎所有的其他部委都急了！可不能放，一放我们完了。为啥呢？财政部先说了，那得加多少补贴，城市里每一个市民，比如像北京这种市民，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个市民就是几十万的补贴份额，无论是吃穿用度，还是生老病死，全都在国家财政的全环节补贴之内。如果一个北京市民30到40万，那一般的中等城市市民，怎么也得是20万。到了县级城关镇这一级，大概补贴少一点，也少不了七八万，十万左右。

所以为啥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卖户口，为啥北京户口不能卖，是因为北京的补贴太高。一般城市为什么可以呢？地方财政短缺，卖点户口，你买个本地户口，就可以享受本地城镇居民待遇，其实就是本地政府把你的未来的享受的财政补贴，先吃了，寅吃卯粮，不管后任政府承受多大包袱。

所以，不是谁主观上推进改革，而是因为财政承担的城市居民要吃好穿好的那块福利性的补贴越来越高。20世纪80年代时，城市人口相对算是中产阶级，农民才是中国的弱势群体，甚至是真正无产阶级，没有任何政府补贴。

当这个补贴大到一定程度，再加上1988年、1989年大危机爆发，1988年高额通货膨胀，1989年生产停滞，典型的滞胀危机全面爆发的时候，1990年进入严重萧条。萧条阶段没有收入增量，财政的刚性开支就不得不减，刚性开支中的一大块是城市补贴。于是到1991年财政再进一步遭遇恶性赤字打击的时候，1992年终于忍不住了，只好中央政府放弃所有票证。各地随之不得不在一夜之间放弃所有的票证，除了边远山

区、边疆的个别地区，我印象里那时候只有二十几个县没放，其他市县全部放掉了。所以一夜之间放掉票证的结果就是，这时候人民币真正成之为货币了——国家没有票证这个第一分配系统了，货币就成了交换中介。

所谓1992年是中国的“货币化元年”，使货币成之为货币，恢复货币作为交换中介这个基本功能，是自1992年起。

再说我们如何启动市场化改革的？没有货币这个基本的交换中介，市场交易何在？价格当然在20世纪80年代有很多波动，当然也有很多改革等；但是要我说，对中国而言，真正起到本质性的重大改变作用的，是1992年在财政严重赤字压力下，在政府再无力承担对城市居民的消费补贴的情况下，中国彻底放弃了票证分配系统。1992年就成了中国人民币真正成之为货币的第一年，可见，中国货币化始于1992年。

记住，什么时候中国开始货币化？1992年。

如果把1992年以前的所谓银行的存款和贷款与今天相比，几乎完全不可比，那只不过寥寥一点，连今天的零头都不够。当年每年大致是个几千亿的规模，一年增加个一两千亿、两三千亿的信贷规模，存款相对来讲也是一年千把亿的这么个数。哪像现在，每年动辄几十万亿，金融资产总量高达100多万亿！

我印象里1978年整个中国银行全部社会存款只有200多亿。贷款只有一千多亿，不到两千亿的规模，就这么点金融的运作。

1992年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启动货币化，恰恰和什么结合呢？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于是被货币化所带动的高增长证明了市场化改革的“政治正确”。想想看，大规模货币进入市场，带来大规模的交换——货币化的一个直接功能，是使原来不可用货币来交易的资源通过货币的中介作用变成了可交易的、可变现的资产，于是导致中国按照GDP统计的通过交易创造的增加值陡然大幅度增加。

谁这么干，都会带来高增长，只要进入货币化。当然，这个货币化的前提，是国家得有相当足够的经济总量了。也就是说，我们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进入工业化原始积累，到20世纪70年代末基本完成原始积累、进入所谓改革开放时期的产业资本扩张，形成了庞大的资源性的物质资产，这个物质性资产在20世纪80年代基本形成之后，正好在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经济货币化，那就把这些资源性的物质资产变成可货币交

易的资产。于是就可变现，财富总量就大幅度增加了。

所以，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有人算过账，中国的实质资源性和物质性资产，已经是百万亿以上规模了，这时候政府大规模增发货币，正好对应的分母是所谓物质性财富，分子是大量增发的货币资产，随之中国经济陡然进入高增长。

这就是以人民币这种中国的主权货币，在中国推行经济货币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不能简单化地把高增长归功于人民币为工具的经济货币化，只是说这个货币化进程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性作用。

2.中国启动货币化的另一个前提是要避免苏联解体的教训。

我在1991年苏东解体的时候，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那个年代西方是典型的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不像现在西方舆论的主流是中国威胁论。所谓中国崩溃论，就是认为苏联已经被美国搞垮了，铁幕都垮了，中国只不过是个竹幕，很容易就被搞垮，中国人撑不过三年。苏东怎么解体的？按照美国人的解释当然是因为意识形态，共产主义是恶魔，没有正义性，所以就解体了。

如果这只不过是西方意识形态解释，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看看我们中国今天主流的解释，到底是什么？我不敢相信一般的说法，只能靠自己眼见为实，于是我背着包就去转了七个前苏东国家，给我最强烈的刺激是只要带一张100美元的支票，立刻变成百万富翁，为什么？因为苏东国家的货币体系坍塌了。本币价值一落千丈，兑换率大幅度下降。比如说前苏联，以前一个卢布的币值曾经可以兑换二点几个美元，因为它是非货币经济，一块钱的实际价值远比完全货币化，甚至过分泡沫化的货币值钱得多。

那时候整个苏联的一般消费品还在分币时代，打个电话几分钱，买个面包八分钱，就跟我们中国当年1992年货币化之前差不多，坐个地铁五毛钱，打个电话一毛钱，我们还是毛票时代。苏联则在分币时代，这两个非货币化的经济差别并不大。

苏联因为政治改革优先，而支撑货币体系的是政权，政权先倒了，货币体系随之陡然坍塌。所有老百姓存的钱，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为啥苏联老百姓后来这么恨那个政府，一定要改朝换代，就是因为

他们输得太惨。整个国家的资源经济、产业经济、实体性财富被国外货币的涌入所“货币化”，外国金融资本占有了大量的托宾税，就是被货币化的收益，这个巨大的制度收益被国外金融资本占有，本国在经济上却输得一塌糊涂。这个过程我是亲眼所见，亲身感受，何况我们也是这个体系，这才明白，政治改革优先于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依托国家政治强权的货币体系彻底坍塌，国民财富积累一夜之间清零。

回来以后我写了报告，“苏东私有化的观察与思考”。我先后去了七个苏东国家，国国如此，看来不是单一的教训，而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训。

至少前苏联整个经济不进入货币化阶段的历史教训，我们算是避免了。尽管苏东国家的实体经济产生的制造业产量是全世界第一，按工农业总产值计算，它肯定是第一的，但是对不起，如果按货币量计算交易过程的增加值，就是按GDP法计算，当然就不如西方。于是西方舆论这个软实力就说苏东的体制不行，但其实质性的问题只是没有进入货币化。

中国恰恰是从1992年进入高速度货币化，GDP陡然大幅度增长，西方舆论也突然就从中国崩溃论变成中国威胁论了。

我们得益于什么？恰恰得益于无形之中推进的是货币化加快，恰恰又配合了市场经济改革。如果中国没有规模化的货币投资这个所谓的龙头要素来撬动其他要素进入所谓的市场经济，光靠放开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很难发挥作用。

所以，苏东解体基本教训是没有进入货币经济，这是一个经济发展领域中的基本教训，人们接受不接受，反正是我实地考察的结果，是眼见为实的结果。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最重要的经验是，自主的货币化创造了高增长。

因为货币化如此短期加快，中国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利益结构改变，崛起了与中央政府利益相关的金融资本集团。今天很多人批判国有经济，反垄断，包括批评国有银行，其实无外乎是批评金融垄断资本。

中国跟其他世界上的大国一样，因为人口众多，国家经济总量大，对货币的需求也大，于是产生了几大国有银行占绝对比重的金融资本系统。这个大银行系统占有了全国资金总量或信贷总量的70%，于是它变

成了一个在中国乃至于世界都排在前列的大企业。这是客观上造成的结果，不是主观的，是客观上中国进入了一个高速货币化进程而由原来的国有金融部门来运作大规模增发的货币。

当然，这个运作的过程，开始因为政府短期内就把全国各种各样的资源性的要素和资产性的要素大都货币化了，这些资源和资产在哪儿呢？大多在地方。所以，早期的中国货币化是地方政府主导。如果看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地方政府，那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每个地方政府拼命地在加快本地的GDP增长。

那个年代，我们叫作“中央承担全部金融风险条件下的地方政府公司化竞争”。这个竞争过程中就有一批沿海的先富起来的地区，在此之前并不特别突出，但在这个货币化进程中，沿海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因为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整个国家的工业布局大部分在沿海，就是实质性资产的主要聚集地。

当沿海地方政府把国家工业化形成的这部分实质资产货币化的时候，资本增量显然比内地大得多。于是沿海按GDP统计就发展起来了，内地就跌下去了，出现了非常大的区域差别。同期，农民收入的低下尤为凸显出来，因为农业属于自然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农民货币化低的时候，城乡差别也就拉大了。

那好了，中国正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进入高速度货币化，尽管后来我们遭遇了更为严重的债务危机，为什么过得去？就是因为在高速度货币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巨量的所谓货币化的制度收益。这个制度收益又因为我们的货币市场不开放，使得中国几乎全额地占有了自主货币化的制度收益，这就是我要讲的人民币在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贡献。

（四）中国启动货币化的巨大代价

接下来我们看20世纪90年代这场货币化的代价是什么？

三大差别拉大，这是一个代价，更为重要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当地方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把自己本地的资产和资源都货币化的时候，根本不顾整个金融系统会形成多少不良资产。

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金融系统不良资产一般在20%，个别金融部门高达30%以上，这要在一般的银行市场化的国家，在货币自由兑换融入金融全球化的国家，这种金融部门就会破产，雷曼兄弟公司就是例

子。

雷曼兄弟公司当时不良资产占多少？有我们20世纪90年代末期国家的银行高吗？没有。为什么它破产，我们的银行为什么不会破产？并且不仅不破产，而且在21世纪成了全球排在前几位的大银行，什么道理？就是因为这个时候财政和银行并没有完全分家。中国的财政金融什么时候分家的？算是比较彻底分家，尤其是金融不再被地方政府所绑架，是在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发生后，中央非常艰难地推进了银行商业化改革，把银行独立于地方各级财政，这时候，财政银行才真正分了家。

当然，银行对中央财政并不能彻底分家，因为大量的有毒资产被剥离之后，自有资产趋零，这就得靠中央拿钱，用外汇储备建立中央汇金公司，再把国家外汇储备变成对国有银行的资本金注资，中央财政再拿一部分资本金注入，这样充进了银行的自有资产，银行才能作为商业化的银行去尝试着独立运作。

这个过程从1998年到2003年用了5年的时间，基本上使银行从地方财政剥离，但和中央财政外汇紧密挂钩，变成了中央控制的垄断金融资本。于是我们有了世界上排名在前的大型垄断金融，而这恰恰和世界金融化过程都是大型垄断金融获利的趋势吻合。

（五）中国货币化与金融全球化的关系

1.就人民币整个发展过程来看，货币信用的来源是政治强权。

在金本位时代，储备黄金是货币信用的来源。那“去金本位”以后呢？世界在1944年去金本位了。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不外乎是美国承诺用黄金作为储备，有多少美元可以随时兑换黄金，其他国家就都放弃金本位了。

为什么呢？战争打的。每一个国家都要用自己的贵金属去换军火，那还有贵金属储备吗？都没了怎么办？只有那个大军火生产商，向整个战争提供军事装备才赚得盆满钵满的，全世界70%的黄金储备在美国人手里。因此，美国向西方世界承诺可以兑换。1944年就意味着全世界放弃黄金储备唯美国一家承诺。但是，1971年美国也撕毁布雷顿体系协定，于是，世界彻底告别了金本位时代。

那请问货币的信用来源是什么？政治强权。

美联储大家都知道是个私人银行的联合部门，它并不是政府部门。

而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家确立的发行货币单位，是政府一个部委。不管是什么，总之是背后一定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强权，发行的货币才有信用。

全世界都知道美元币值严重高估，为什么世界60%以上的外汇储备都是美元，因为没人相信美元会垮。为什么？因为美国人的军事开支占全球军事开支的一半左右。谁都相信有这么大军费开支的国家，能垮吗？不能。想打谁就打谁，所以其他都有可能垮，美国不会垮，还是存美元保险。

那为啥现在人民币这么硬？因为大家嚷嚷了半天，无论是中国崩溃论还是中国威胁论，中国仍然屹立不倒，只要中国维持现有的这套集中体制，它的币值就是坚挺的，不断升值。因此中国才能顺畅地跟周边国家，甚至跟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都开始签订货币协定，和中国的贸易用人民币结算，他们当然愿意，因为人民币的币值在上升啊。

因为中国空前稳定，没有按苏东那种方法改。客观来说，现在世界上这套政治强权就是今天各国货币信用的基础，货币信用的大小多少，其背后是其政治强权大小做为基础的。

一旦把这个关系说清楚，我们就知道人民币到底为什么叫人民币。人民币的信用基础乃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强权。不同国家叫什么币，不重要，这个币值的变化，除了经济决定之外，还有很强的政治因素，在于国家的政权是否稳定，国家的政治强权是否足够大。你再去看看其他国家的货币，哪个不是？英国人不是得把女王的头像印上？随便换一首相行吗？因为首相是走马灯一样地换，女王不换，她是一个长期稳定的政权的象征。印度换了多少总理，哪怕不同政党都轮流上来，对不起，还得用甘地的头像来当印度卢比的大头像，印度人都认他是开国元勋。历届政府领导人不断换，但大家都公认只有一个开国元勋，他是政治权威啊。

这样就看明白了，美国每年军费开支占全球差不多一半，美元就值钱，就有全球储备硬通货的信用，谁也不敢说美元明天就垮。所以，过去人民币就是紧盯美元，没有办法，因为美国的政治强权，庞大的军事开支维持什么？不就是维持美元币权吗？

2.金融资本全球化与维护币权主权的重要性。

接着就得说人民币在全球金融化，或者叫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的故事。当中国终于在2003年完成了银行商业化改制的时候，陡然遭遇到什

么？有谁注意到21世纪之初全球正在连续发生金融灾难呢？

从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发生以后，世界上连续发生拉丁美洲金融灾难、俄罗斯金融灾难，一个接一个的，最后终于发生了华尔街金融灾难，发生西班牙、希腊及欧洲各国银行灾难等。这些金融危机爆发的症结在哪儿？在于金融化要求以一国政治强权赋权于金融体系所形成的货币信用，来货币化他国的资源性资产，这叫作金融全球化。

这个世界谁能对抗美元，就意味着谁能对抗美国的军事强权，实际上没人能对抗，只好臣服。仅有少数几个国家顶着，这些国家都是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敌人。

接着说第二个现象，一般人没注意，当进入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时候，币权就成了核心的权力，一切其他权力维护币权，为什么？因为政府能够凭借政治强权来两手扩张信用，一手扩张出来货币信用，大量增发货币，另一手扩张出来债务信用，大量增发国债。谁这么干？美国政府这么干，中国政府也这么干。无论什么意识形态，叫资本主义，叫社会主义，叫其他什么主义，这才是政府要干的最主要的两件事。在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时代，谁扩张出的信用大，谁就是赢家。

但是，这么说有点太简单了，其实这里面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不可能通过电视画面讲清楚，但有一个情况比较直白——大量增发的政府信用，并不只在本国发挥作用。比如美元是世界货币，大家都储备美元，全世界70%外汇储备是美元储备，于是它变成世界范围内的金融扩张了。

美元大量增发流到哪儿去了呢？除了我们增加外汇储备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增发的货币超过绝对比重，至少60%以上流向了世界原材料、能源、食品、粮食市场。于是粮食价格大起大落，原材料价格大起大落，石油价格大起大落，每一个“起”都意味着有大量货币进去，每一个“落”就如同它变成了一个货币垃圾消纳厂。一“落”，消纳掉了几千亿、上万亿美元的货币符号。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实质性财富，只是一个被政府用强权创造出来的信用，只是个符号，这个符号可高可低、可多可少。每一次大规模的下滑，就替政府消纳掉了一部分大规模创造出来的增量的信用。

这个虚拟资本此消彼长的游戏，美国人玩得是非常之精妙，根本不用派兵打你，只要你们大规模进口能源，那我制造一次能源高通胀，你就出现严重的国内高通胀。随之，一般低利润的制造业就垮掉，就大量

失业，就上街，你的政权就不稳定，连带货币体系不稳定，弄不好甚至把你玩完。然后我的货币进来了，把你剩下的资源性资产、生产性资产，一股脑地给货币化了。其中，货币化收益我拿走了，你怎么在灾难之中痛苦挣扎，那是你的事，我反正把你玩了。

在今天这个世界被这样玩掉的国家比比皆是，麻烦在于我们的知识分子看不见。北非就是这么被玩掉的。

什么样的国家敢于站出来说，不行，这个货币游戏我不玩了，得把我自己的资源变成我的货币化来源了。谁？俄罗斯。原来几任领导都信了那套说法，把自己玩进去了——政权解体、货币垮台，大量的财富被别人货币化占有了。好在上来了一个领导人，年轻气盛，他干的最大的事就是把原来的资源，比如它最大的是石油天然气资源，收归国有了。

一旦收归国有，你这儿增发信用制造涨价，我就水涨船高，能源市场价格上涨所产生的溢价收益，被俄罗斯拿走了，拿回来以后给国民发福利，老百姓拥护，这就是俄罗斯游戏。所谓今天的俄罗斯魔方并不复杂，美国人创造垃圾信用导致通货膨胀，俄罗斯占便宜，也叫“搭便车”。这一“搭便车”就把美国搭火了，美俄之间的关系就高度紧张了。

敢说不的国家还有哪儿呢？委内瑞拉。查韦斯现在还要竞选连任，尽管他病得很重。他本来是军事政变上台的军官，上台后干的一件事也是石油资源收归国有，然后也是水涨船高，美国人吹货币泡泡导致石油价格上涨，石油收益就大幅度上升，于是政府就可以把石油收益用于安抚贫困社区的平民百姓，老百姓就拥护。

类似像这种做法还有哪儿？伊朗。此外，还有原来的利比亚。卡扎菲也是军事政变上台，上台以后石油资源收归国有，过了几十年的好日子。当年的利比亚街上没有任何要饭的，所有的老百姓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养老根本不用担心，政府全包了。为什么？就是石油大量的收益被国家占有，用于社会福利开支。而现在一场战争打下来，尽管说给了利比亚人民自由，但其实石油资源被跨国公司全部瓜分了，率先发动战争的法国，拿走了百分之三十几的石油资源。这时候想再支撑原来的社会福利，没钱了，跨国公司把整个石油溢价收益拿走了。

今天看货币是干嘛的？货币已经变成了一个独立于其他的领域的、异化于物质生产和人类民生的力量。这个异化的资本力量，因为和政治强权的直接密切的结合，而成为今天的金融全球化的一个具有内生性的主导力量。就是这个内生主导力量，会导致世界格局发生重大的结构性

变化。而这个结构性改变如果不能被我们正常认识，如果我们还停留在原来产业资本时代，停留在西方19世纪阶级政治经验的话语之中，就将无法认识21世纪金融资本全球化，靠大规模增发货币信用和大规模增发政府债务信用这两手所形成的新的竞争格局。

中国今天之所以还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无外乎就是一直强调货币主权是国家经济主权的核心部分，一直强调本币开放没有时间表，将来会开放，但现在不承诺。由于我们的财政是自主的，金融是自主的，外汇是自主的……这一套在金融资本时代的现代政治经济手段的自主权，仍然紧紧地掌握在中国政府手里。

因此他怎么干，你可以怎么干。他在世界上干，你在中国国内干。假如中国和周边都签订了双边货币协定，那就带着周边国家一起干。基于今天中国在金融资本时代的所谓表现，怎么来看待在这个时代的人民币呢？人民币为什么越来越被大家要求国际化呢？是因为客观上，人们都没有认清楚这个规律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节骨眼上，恰恰是乍暖还寒最难将息，怎么看待人民币在下一步国际化的进程中所应该发挥的实际作用，怎么让它配合整个国家在金融资本全球化中构建主动竞争的地位，这恰恰应该是新的所谓货币全球化战略、金融全球化战略，或者叫作维护国家币权的币缘战略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四节　我的三个困惑注

“我活着，因为我思考”，这是一句电视剧里的台词。

“我思考，因为我困惑”，这是我今天的台词。

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做规范性学术研究的学者。这种规范研究，按照清华大学一位教授的说法，所追求的应该是“一种片面的深刻”。这样研究的学问越精致化，学术水平越高，就可能会离客观现实越远。不过，书斋学者当然可以这样研究下去，因为他们不必根据调查研究来解释现实。

与规范研究学者不同的是，由于我从20世纪80年代起得到了参与农村政策调研的最好的机会，能够把人生中最好的时光，花在“用脚做学

问”上，因此，这种客观经历，使得自己靠长期下基层搞调研积累了一些粗浅的感性认识。也许，这恰恰是我的不足，因为不懂多少理论，所以，十多年调研到现在，也不过只是收获了一堆困惑。因此，回到学校面对老师和同学们的时候，只能向大家汇报一下我的困惑。

（一）第一个困惑：怎么理解中国的农业现代化

1.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困惑。

记得在1998年，江泽民同志在一次讲话中实事求是地把过去文件语言一向强调的农业现代化，改变为“率先在沿海发达地区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这当然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因为中西部农业的生产力水平确实没有、以后也难以得到根本改变。

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进入世界前五位，但是就大多数传统农村而言，小农经济基本特征并没有得到改变。这是由于受到人地关系紧张这个基本国情矛盾的制约，使得我国农村地区在客观上不得不长期维持小农经济，这是农业的生产力水平一直没有条件根本改变的原因。

在最近有关中国加入WTO的讨论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陈淮研究员指出，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按照中国实际已经达到的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当前全国的19.5亿亩土地应该只需要4000万到5000万劳动力。其他讨论虽然没有那么极端，但大多数接触实际的学者也比较一致地承认，我国农业在生产组织形式上基本上仍然属于传统农户的兼业化经营。因此，如果加上农户的养殖和其他经营，实际上只需要1个亿的劳动力。那么，农村中剩余的大约4个亿适龄劳动人口，就需要非农就业。这确实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么巨大的剩余劳动力要安排，客观上也没有安排到哪儿去的可能。因此，农民的非农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

在1995年有关实行紧缩方针的讨论中，我曾经提出应该把促进就业作为基本国策。近年来也多次说过，如果20世纪中国最突出的问题是土地问题，那么21世纪中国最突出的问题是就业问题。

中央主管农村工作的温家宝同志早就指出，要想富裕农民，就得减少农民。不过，咱们政府的相关部门有没有关于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针对性的政策？目前看至少还不完善。将来即使政策完全对路，农村城市化加速，从中长期看，今后20年内，农民人口的比重可能会下

降，但绝对数仍然会在7亿至8亿，“不得不小农经济”的问题也是中长期难以解决的。

那么，在“不得不小农经济”的制约下，如果农户的人均土地面积难以增加，绝对地租也就无法增加，种植业从长期看可能就是低效益，甚至是负效益的，那么，资本、技术这些至少应该得到平均利润率的要素又怎能投入到农业来？如果劳动力难以转移出去，小农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边际效益现在下降到哪怕零以下，仍然不可能被其他要素替代，那么市场经济所依靠的“看不见的手”又怎样发挥作用？

如果上述问题确实无法解决，人们可能会比较容易达成共识：西方那种农业现代化的思路不能用来解读中国农村的现实。

2.对农业经济科学的困惑。

接着产生的，或者派生的困惑，可能显得更有挑战性。如果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们中国客观上没有条件重复西方农业现代化的道路，那么，是不是应该提出农业经济科学是什么科学的问题呢？

一般认为，农业经济学是个部门学科，是属于西方经济学微观领域。它之所以是西方的科学，是因为这种理论主要是从西方的经验过程中提升出来的。但是在中国，并没有与西方相同的那种给定的、使之能够成立的条件。因此，农业经济科学在中国农村，至少现在，恐怕还难以称之为科学。

这就要提到科学方法论。

所谓的科学成果，应该是可以在同样条件下、沿着相同的技术路线被重复的。如果我们通过“在地”试验，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些基本道理就不能被证实，严格说就应该叫证伪。如果某个所谓科学理论不能解读约占世界农民人口30%的中国农民面临的现实问题，那这种科学有没有普世性？如果没有，那么学生在校学的、老师教的、研究人员据以进行论证的都是什么呢？

随之派生的困惑可能不是我一人的，但却更令人不安。因为在大多数场合我只要这样提出讨论，马上就会有人指出，如果不能按照西方的科学理论来解释农村的现实问题，难道要退回到传统的所谓计划经济理论去研究吗？对不起，这样的非此即彼地提出问题本身，就是在西方“一元论”哲学支配下不自觉的反应。对此我只能斗胆反问：所谓计划经济，难道不是另外一种西方的理论吗？

其实，我们最需要的应该是“问题意识”，最忌讳的则是“意识形态化”。

需要说明的是，我本来一向是尊重理论的，但是对那些不符合本土现实、只会盲目照搬的理论，实在容易使我这种搞实地调查出身的人产生困惑。因此我不敢轻易地在学者云集的大学里议论“理论”，尤其对那些所谓集大成的“体系”敬而远之。

将来，你们这些年轻人可能会逐渐根据中国农村发展的经验过程归纳出理性认识，但现在，还是别急于盲从。即使不敢谈对老师“发难”，或者对学科本身提出颠覆性的观点，哪怕能在平时学习的过程中多一点困惑，就如“困惑着我的困惑”，就算不容易了。

当然，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就此停下，不能对国家、民族、历史和现实不负责任。因此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与共和国一起长大的人有责任去解构（de-structure）那些具有高度正确性的话语。通过下基层调查，通过向实际学习，重新认识已经被我们这一代约定俗成的概念和共识。例如今天所提出的，我们是否应解构农业现代化？也许我们这一代没有能力，将来，可能得由下一代来完成重新建构的历史任务。

当然，建构本来就在解构之中，不破不立，大破则大立。

说了这么多，对这部分讨论归纳出的只是一句尽人皆知的老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话是1978年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思想。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那些盲目照搬、照译的书本上的理论有不少是伪科学，甚至是垃圾，根本不能用以指导我们解释中国农村的现实问题。因此，我们才应该体现陈云同志一向强调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而我们的解构，其实就是一种直面各种挑战的尽力回应，也是弘扬中国历届领导人试图形成不同于西方的指导思想的战斗精神。

（二）第二个困惑：怎样理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客观上没条件与美国、西欧、日本相比，只能与拉美、南亚相比，因为中国是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一个多世纪追求工业化的近代史上，我们不断请“洋和尚”来念经，不断接受人家强加给我们的教训，也不过是从“邯郸学步”，进步到“摸着石头过河”而已。现在的问题是再摸下去行不行？令人踌躇的是，西方人放在前面的那块石头我们可能没法再摸。

还是得先提出方法论问题。自然科学的专家一般认为，到目前为止的社会科学理论，还只是些无法验证的说法。社会科学之所以不能成为科学，主要还是方法上的问题。如果不能通过在给定条件下重复试验得出其成果，那是不能被称为科学的。社会科学的大部分理论都不能被试验所证明，还因为这种科学所依存的经验，必然有时空局限，亦即，试验条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法实现的。

我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国家送出去学方法的那批人中的一个，多少了解研究方法对学科建设的基本要求。从方法论本身的发展看，即使是到了后实证主义，也还是认为最科学的仍然是实验法。在社会科学中，如法律学、犯罪学，可在忽视道德的情况下采用单面镜观察法（one mirror reflect）看人在极端的条件下的一些本能的反映。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给了一个搞实验的学者，尽管他在理论上名不见经传，方法上也机械地照搬自然科学。他在一定的可控条件下，把人作为经济动物关在一个封闭的地方进行试验，观察其表现。这反映一种倾向，即试图把实验法引入经济科学。其实，这仍然是庸俗化经济科学的一种表现。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既往的现代化是个什么过程，是否可以被重复？这就要分析欧洲是如何完成工业化的。

欧洲的现代化必然经历产业资本的形成过程，其中包括对外进行了约300年的殖民扩张，这是在罪恶的“三角贸易”进程中开展的。西方工业化的前提是，大量地向殖民地移去贫民、犯人、异教徒（而并非是富人和有道德约束的人）。结果，仅是美国就移进总数达4800万以英国人为主的欧洲人。同期，南美1个亿、北美1个亿的原住民被抢夺和清洗，人口大规模死亡。在美国，印第安人作为一个种族基本消失了，到1992年只剩下82万。过去生活在那里的上亿的印第安人，被作为殖民地对欧美工业化的伟大贡献而基本消灭了。

如果欧洲不进行这样的移民，现在欧洲大陆上估计会有10亿以上的人口，这么多人集中在欧洲大陆上，就与我国现在的人口状况差不多。结合欧洲人的以个体为基因的文明共同作用，世界大战何止两次，三次、四次早都有了。因为，发动世界大战是解决传统产业资本扩张的必然途径和唯一有效办法。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为了瓜分世界资源，但没有瓜分停当，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酝酿了祸根。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过研究证明，美国解决其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并不是罗斯福新政，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挽救了其传统制造业，是战争解决了美

国足够庞大的产业资本的出路问题。

中国曾经采取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一度被批评为“闭关锁国”，其实当时也是受其外部环境限制而“不得不自力更生”。且不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先后卡我国，在与西方16个国家打了朝鲜战争之后，即使我国想“对外开放”，也无法实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产业资本已初步形成，但世界也瓜分完毕，再没地方可以扩张。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和日本都大幅度调整产业结构，传统制造业逐渐让位于以金融为主的服务产业和以军事需求为主导的高技术产业，中国才在当好“下家”的条件下成为制造业产品出口大国。

历史证明，中国这样的后进工业国家根本不能重复西方的现代化路径。问题是，如果重复不了西方通过殖民地扩张和战争方式实现现代化这样的路径，却要学从这样的经验过程中提升出来的所谓科学理论，那些被我们奉为瑰宝的东西是真正的科学吗？现在，学术界只出现一种声音，大家努力做天上的学问，西式学者站在庞大的西方话语体系里，毕其一生精力在片面地深思，他们都没有时间理睬脚下的热土。

（三）第三个困惑：如何在今后20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

当前我国的产业资本扩张面临的国内外制约很严重。首先，本土能提供的基本能源如矿、水等有限；其次，我国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二位的高速公路国家，石油需求日益增大。总之，自然资源短缺是个硬约束，能够被资本化的资源越来越有限。

关于石油进口问题。日本现在每人每年石油消耗量为2吨，自己一滴不产，全靠进口，每天90个油轮对着开。我国去年进口石油3000万吨，进口超过国内总需求的30%。此外，中国加快城市化，为了减少环境污染，城市需用天然气。按照现在的城市化的速度，不用到“十五”末期，就会有大约7亿城市里和沿海的中国人需要消费石油，中国需进口的石油可能要达上亿吨。到2010年至2020年，如果城市人口达到8～9亿，而国内产量仍然维持在1亿5千万吨，那就需要进口更多。波斯湾一半以上的石油不可能都归中国。一旦石油短缺，或者石油价格大幅上涨，就会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严重问题。

现在，中国的周边环境有点险恶。南海到底是谁的？我们敢在那里进行石油开发吗？我们在南海没有巡洋舰，而越南就有，更不用说控制马六甲海峡了。中国想大规模地进口石油，就得对海上石油运输线有控

制权。而海上石油运输线曾经是日本的生命线，为此它曾发动过太平洋战争。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领事馆被炸，后来2001年又在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发生了所谓的撞机事件。现在中亚、西亚又出现了问题，朝鲜又被美国划定为邪恶轴心国。这些客观上对中国形成了环形的包围圈，国际环境异常险恶。在东北亚，日本、韩国和我国的产业结构的同构程度明显，竞争强化到你死我活。无论如何，我们需要和平的发展环境，我们经不起战争。值得庆幸的是，党的三代领导人已经为我们提供了50年的和平发展环境。现在，为了对付将来石油供给的不可测问题，中国正在建设“西气东输”工程。

进行产业的资本化过程中，一个严峻的问题是中国的主要矿产品短缺在50%以上。以水资源为例，整个北方的300多个大中城市全都缺水，五条主要河流全都断流。而城市人口的平均用水是农村人口平均用水的26至27倍，城里人天天洗澡，他们的爱车、宠物都是爱干净的。在这样的制约下，北方的城市如何扩张成了问题。可现实中我们还是要继续“化”下去。然而，当前的现代化是否能继续下去呢。如果我们了解了这样的国情，则无法这样做。这也许是我杞人忧天，因为有人坚信车到山前必有路，如技术发展到可以利用太空中的资源，可以水变油，可以利用风能、潮汐能、太阳能等。等待技术发展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是唯一的办法。

当然或许可以大幅度发展泡沫经济性质的金融产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十几亿人口的出路在哪儿？地球上还有无可以占领的大陆？如果说农业可以超前技术化，那么造林带早都围绕地球一周多了。所以，我们现在对当前现代化的路径进行思考，在思考中困惑，其实就是在质疑、解构现代化。

现在来看产业化中的实际情况。1996年粮食多了，过1万亿斤，卖粮就困难了。当年国家因此统一制定保护价，造成压库5000多亿斤，财政补贴多占几千个亿。这么多粮食要出口，价格还要比别的国家的高，政府只好进行补贴，但是别的国家进行抗议，因为它们认为这违背了WTO的有关条例。再看工业、加工业的产业资本扩张问题。在广交会上，我国制衣品是1美元1斤，以前是连箱子40美元，现在是8美元。这个世界现在这样发展，逃脱不了制造业的一般规律。现在利润低到了5%～15%，而加工贸易的大头利润都大量地流出了。产业资本的形成和扩张是有规律的。任你政府再怎样号召西部大开发，一江春水从来就不大可能“向西流”。试问1999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有多少资本在三年之内

流向了西部？即使几千万的劳动大军流到东部，也都是在东部发达地区，省内都不向西流，何况省际。

现在的论证具有御用性，正反说都会有理：一会说是产业调整，一会说是产业退出，又是什么雁阵式转移，什么利啦、弊啦，这是一种僵化的错误思维方式。学问在以前是老八股，现在是洋八股。这都不能解释我们的问题，又如何解释这样的现象：浙江私有化程度最高，市场机制最完善，为什么大资本却绕它而过？外资也不进去，反而只找北京等国有企业较多、政府似乎比较官僚化的地方。中国对外大量资本输出达千万个亿，而中西部建设却缺乏大量资金。珠江三角洲加工业的80%来自港资，欧美资本都到哪儿去了？只能说这些都是由资本的追逐利益最大化的本性决定，由当地是否有资源可以资本化、是否为当地政府掌控所决定。

第五节　中产阶级的“去城市化”注

随着中国当代中产阶级的财富和文化崛起，乡土感从过去那种小资群体已经被充分表达过的“一缕乡愁”或农民打工者返乡过年的“难舍亲情”，愈益演化成为一种中资主导社会变迁的“去城市化”群体行动。

但如何认识这种趋势，还是应该有国际的、历史的视角。

（一）资本主义三种模式对城市化规模的影响

首先，我们要明白的是人类处在资本主义历史不同阶段的不同趋势。

中国目前还处在产业资本阶段，主流认可的以大城市来聚集人口的城市化，是典型的野蛮资本主义模式的表现，通常叫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后来通过殖民扩张和两次大战出现了英美结盟之后，进一步演变成了盎格鲁-美利坚模式。这种野蛮资本主义模式对世界的滥觞，产生了过多地集中人口的城市化模式，也同步造成我们都能看到的发达国家的城市病，比如毒品泛滥、黑社会分割控制等乱象，以及普通人在大城市生活高度紧张导致的社会性精神病态。

不仅所有被这种模式覆盖的发达国家的大城市都有这种弊病，例如

早期的伦敦和曼彻斯特随殖民化被复制到芝加哥和洛杉矶，而且在全球化进程中，先是在被称为“美国后院”的拉美，出现了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墨西哥城等，接着扩展到亚非，蔓延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的孟买、孟加拉的达卡等，到处都是大型贫民窟。此外，还有埃及的开罗、菲律宾的马尼拉等都出现了这个问题。

这种把本来分散在农村的贫困人口“空间平移”集中到大城市贫民窟的野蛮资本主义模式，给产业资本化解内生性的生产过剩释放了空间。但同时，所造成的制度代价和发生的社会危害却数不胜数。

可见，只要是以盎格鲁-美利坚模式来推进本国经济发展，那么在这种野蛮资本主义模式下就都有类似的情况，哪怕这种模式演进到金融资本主义，在金融资本之都的纽约也还有多个贫民窟。美国这样一个奉行新自由主义的高度现代化国家，也不能根本解决大城市病。

这也是我为什么说首先要有国际视角、要有历史感的原因。因为，如果简单地加快大城市为主的城市化，那只不过是沿用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某个特定模式来主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人口迁移。

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中还有第二个模式，叫莱茵资本主义，主要就是指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这一带，在欧陆中心的这些国家大城市很少，主要是中小城市和城镇化为主的城市化进程。它体现了城乡兼容、城乡统筹、城乡融合的社会文化。此外，它的工业中小企业很多，大多是坐落在乡村的，很多服务业也在乡下，并不是把所有的资源向城市过度集中。例如，在欧盟产业资本最为雄厚的德国找不到几个百万级人口规模的大城市，不像中国不仅到处都是百万级大城市，连千万级的城市也是世界之最，而这种千万人口规模的超大型城市在欧洲基本上找不到。所以，欧洲不像美国或照搬美国模式的发展中国家那样，经常出现枪击案件，也很少见到黑社会分割黄赌毒势力范围和社会性精神病等城市病。

莱茵模式为什么不会造成严重的城市病？

中国人说的思乡情结，那是中小资产阶级身上出现的，那是城市病的一种。它只不过是城市生存压力过大，不愿意在城市残酷压力之下变成精神病，想找回一点自己的自然属性，也就是要找回人成之为人的那点本性，所以思乡了。但如果在欧洲看看，这种乡愁别绪似乎很少。因为，在莱茵模式下这种以中小城市为主的城镇化，在城乡不那么严重分割对立的地方，不会动不动就有枪杀案出现。中国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也不在大城市，恰恰是在中小城市。正因为莱茵模式不过分追求城市

化，所以那里的工厂、学校周围就是农田，很多建筑物根本没有隔离区，也没有高墙和铁线网。政府根本不搞统一的草皮，也不反生态地去确定那些“市花、市树”，从工厂望出去就是绿色的果园、牧场和农田。于是，人们也就不用去找田野乡情，那里的农村经济追求的也不是所谓土地产出率，政府确定的农业政策是生态化的景观农业，要求搞多样化的可持续的循环农业。这样，人和自然就和谐共生，人的心理是相对比较健康的。

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中的第三种模式是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政府经济——资本内化于政府，就成了最大的垄断公司。其实这种模式的特性类似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只不过主要因为这类国家大部分是工业化的后来者，实行这种国家剥夺能够很快完成原始积累，所以这样的政府公司化运作方式之下工业化发展会很快。其中，我们城市民众的一缕乡愁就是在这政府经济制造的水泥森林、柏油沙漠里形成的。

我们国家类似于这两种模式的混合体，挣扎着试图走出盎格鲁-美利坚模式，适当借鉴莱茵模式，可能最终是要形成不同于西方的亚洲模式。因为我们不可能像欧洲一样，把产业大量地转移出去，整个生态得到恢复。我们也进入不了美国模式，因为没有华尔街金融资本主导的高度虚拟化、泡沫化的，金融吃全球那种铁嘴钢牙的条件，没有美国那种同时控制两大洋的海权制胜能力——中国人从来没有在海权竞争中取得过胜利，我们早过了郑和的时代了。

（二）中产阶级崛起对“去城市化”的客观需求

中国在新世纪初完成了国家垄断银行资本的市场化，随即进入了一个金融业和地产资本紧密结合的城市化高速扩张的时期。短短的十年，海内外大地产商把无数的钢筋水泥堆到了各个城市的有限空间里，造就了一大片使所有的人都感觉到压抑的水泥丛林！让人在这种巨大的水泥丛林里产生了一种自我的矮化感。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作为人，人性和人所有的最基本的自然属性被剥夺，这是一种很残酷的人的属性的杀灭——房奴、车奴、蜗居与穷得只剩下钱，这是一类问题。

还有一类问题，为什么人的精神压抑，被伤害的这种感觉会越来越普遍和强烈？因为最基本的衣食住行越来越不方便、不安全，医疗和教育也是如此。其实，这是资本导向的公共资源过度集中造成的结果，使得大家都不方便、不安全。

此外，现在大家关心的食品安全也是这个资本导向造成的。因为，城市扩张挤占了大量的土地，而且是最好的土地。当人们对食品的消费需求越来越多，那就只有不断地使用化肥，到处大棚泛滥，为了让土地有更高的投入产出比，再加上城市的扩张吸引了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农村只剩下老弱病残，政府集中让农民上楼居住，以便更多占有农村建设用地。结果是养猪的都变成吃猪的了，这就更得加大高污染化肥和有害饲料的使用，造成食品的品质越来越低，但包装和广告越来越华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城市人都要在周末去乡下的农家乐的原因：他们觉得农家乐比较环保，相对安全。

人们在这种地产压抑和不安全的挤压下，就得去思乡了。

现在政府和媒体主流的意见是工业化、城市化再加农业现代化，这样的主流思想罔顾三大制度代价的恶果相加必将爆发，也许这种顶层设计的参与者大部分是裸官或者兜里有绿卡。

其实，在我们强调这些之前，世界上已经出现了三四十年的逆城市化潮流。

城市化，特别是大城市化，只能满足过剩的金融资本和地产资本相结合的获利需求。在前面说的这些城市病的挤压下，人都会有那种“去城市化”的愿望，这在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就出现了。所谓思乡，是伴随着中产阶级崛起而必然出现的一种“去城市化”趋势，当然也伴随着中产阶级社会责任感的增强。

美国推动绿色食品消费和绿色经济的是“布波族”，布波族是布尔乔亚（Bourgeois）和波希米亚（Bohemia）的缩写组合单词，来自一本翻译所引进的书《天堂中的布波族》，布尔乔亚阶层和波希米亚文化这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甚至相互冲突的社会因素混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看似自相矛盾的“布波族”。布波族既讲究物质层面的精致化享乐（讲究所谓的“质感”），又标榜生活方式的自由不羁和浪漫主义风度。他们是21世纪的精英一族，追求心灵满足是其工作的动力，并善于把理想转成产品。这群精英族，同时拥有20世纪70年代被视之为波西米亚人的嬉皮及20世纪80年代的被视之为布尔乔亚的雅皮特质。

大家都知道我现在正在搞城乡融合的新乡建运动，推进生态环保的绿色经济。我们2003年在农村推行合作社试验形成的建议被全国人大2007年通过合作社立法之后，这个乡建就转型为城乡融合的“公平贸易”试验。以前搞过的几个项目都失败了，后来在北京苏家坨镇搞的叫小

毛驴市民农园（简称小毛驴），创建于2008年，位于北京西郊自然风景区凤凰岭山脚，是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在其多年积累的生态农业与城乡公益网络基础上，整合推出的创新性探索。借鉴国内外CSA（加拿大标准协会）经验，通过建立一套可持续的农业生产和生活模式，倡导并实践“发展生态农业、支持健康消费、促进城乡互助”的行动理念，推动食品安全、生态文明与城乡良性互动，促进中国城乡统筹和可持续发展，最终将商业模式与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理念融为一体，引导城市健康消费合作社与农村绿色生产合作社对接。通过城乡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直接互助，重建社会的信任与合作机制，实现城乡良性发展。简单说，就是市民从事农业的模式，现在已经在全国各地自发地搞了200多家。

社会维护农业的方式多种多样，如市民农业、校园农业、小区农业，只要农业进城，大家在大城市压抑下的紧张情绪就会得到缓解。

今年乡建志愿者们正在联合搞一个活动，就是“爱故乡”活动，也就是回故乡。

21世纪最大的社会结构变化，就是中产阶级的崛起。这无所谓对错好坏，反正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随之，中产阶级引领的“去城市化”则势必成为一种趋势。

那么，比较客观的问题是乡土社会怎么吸引城里人？城里人怎么回归乡土社会？不可能把城市的楼房和硬化路面照搬到农村去。因此，我们这十几年推进的是“生态农业和环保农村”，试图让农村维持生态文明内涵的多样性，让农业有生态修复和人的自然属性修复的功能。这样，就可以每年组织城市的人到村里来，让他们有一种回归自然的感觉、与城市生活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我们有很多志愿者推进的类似的社会活动，其中一个是让大学生下乡，让他们不要忘记脚下的热土，这已经坚持12年了。

河南省兰考县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有个村子叫南马庄，2009年习近平主席曾经去考察过，也是值得去看的。那个村以村两委主导的农民综合合作社，已经发展很多年了。他们从发育农民资金互助合作开始，在村里发展多样化的生态农副业，以“中原第一生态村”为发展目标。南马庄过去和很多其他村庄一样，遍地垃圾，现在则是在合作社的组织下，做“购猪认养”的城乡互助试验，有农民替城里人养“快乐猪”，放养遍地跑的那种，市民得先交定金，这样的典型很值得关注。

浙江安吉县推进的“美丽乡村建设”吸引了大量上海、南京、杭州的中产阶级市民周末和假期去村里租房、包地种菜；遂昌县人大决议全县禁绝化肥农药，也都是值得关注的典型。

现在很多地方搞的撤乡并镇其实是对乡土文化一种极大的破坏，农民分散式的居住方式是庭院经济得以保证的根本，现在对农民土地的掠夺就破坏了这种传统的庭院经济的发展，这是农业恢复生态的基础条件。

第六节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注

早在20多年前的1985年，农村政策领域的学者大都在研究大包干以后的农业发展、粮食问题和经济作物的结构调整等问题的时候，我就开始把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作为主要研究方向。20多年后，当人们普遍在大声疾呼城乡统筹、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城市化时，我的观点反而显得保守了，一再告诉大家城市化是一种趋势，但并非必然趋势。城市化也并不仅仅意味着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我们切不可眼中有“数”、心中无“人”。

这些年来，也因为这些说法，我在社会上受到了很多误解，今天想利用这个场合，跟大家多说些相关的研究情况。

（一）城乡统筹中的“城”与“乡”

1.城：“城乡”统筹好！但“城市”统筹了吗？

城乡统筹当然好，但是，最容易实现统筹的城市内部统筹了吗？我们讲“城乡统筹”，最该首先统筹的应该是城市内部。

比如，城市中的农民工群体，被所在的城市真正容纳进来了吗？北京有一个打工青年艺术团，创办之初被工地的老板打，被黑社会欺负，现在终于得到了团中央、文化部等的肯定。现在电视上如此火爆的国家大剧院，如果不包括2亿左右的流动打工者，那么它是什么，是国家的吗？是人民的吗？

2.乡：“农业现代化”与“现代农业”之辩。

今天我们强调城乡统筹，集中农民上楼，节约土地用于规模化生产，在发达国家，特别是比较强调多样化、多元化、生态和环保的欧洲，现在的农业是什么样子呢？已经变成景观农业了，强调农业的多样性。当现代农业在中央政策层次上提出来的时候，我们之中的大多数还没有转到这个方向上来，可是海外已经来找我们说，中国终于出现了农业政策指导思想的重大变化。如果可以比较的话，2007年“一号文件”中提出的多功能的现代农业概念，意味着中国开始把农业政策指导思想调到了欧盟20世纪90年代末或日本20世纪80年代末强调的方向和内容上。

我们知道，世界农业开始追求产业化、商品化、区域化、规模化等一系列的“化”，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福特主义大生产成为工业发展的主导趋势，并且由于工业是强势产业而影响到农业，从而把农业的指导思想变成了产业化、商品化、区域化、规模化……其实，就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短短半个世纪里，人们把农业搞成了立体交叉污染最严重的、制造了负外部性最严重的产业。

经济学早就指出农业现代化的这个两面性问题：传统农业，尽管其生产者未必能得到很高的收益，但因为其经济过程和自然过程高度一致，所以是一个正外部性最大的领域。当福特主义大生产从美国席卷全世界的时候，小农经济国家也跟着要搞农业产业化，这种农业尽管短期内能为生产者增加收入，就像我们的官员今天都会讲的“千方百计让农业为农民增收多做贡献”，但结果是什么呢？是由于农业脱离了和自然性状相结合的基本特征而造成了负外部性最大化。今天中国农业污染已经成为占总量1/3乃至一半的污染行业。

不仅如此，这种农业在制造污染的时候还制造了食品不安全，严重威胁着人类自身乃至子孙后代的安全。今天我们大家都更多地看病吃药，因为我们把农业化学化了，农民是“家家都种卫生地”——谁都不愿意使农家肥了，主要使用化学肥料、农药、除草剂；“户户都养化学猪”——使用重金属抗生素，还得加上点“蒙汗药”和激素才能“瞎吃瞎长”。最近一个国际组织发表报告说，大城市周边的大规模养殖场中（如万头牛场、万头猪场等），牛、猪们联合起来打嗝、放屁排出的废气对大气的污染程度，比城市里的汽车尾气污染还严重。很多人以为不可能，其实那个报告是认真的，当然两种废气的化学成分不同。

当我们开始追求这种化学化农业导致的高产的时候，欧盟、日本却因为农业规模相对较小，早就告别了福特主义大生产。日本政界著名

的“阿角”——田中角荣曾提出一个理想，要使日本农民经营规模达到户均2公顷（这和中国人“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梦想是一样的），但是日本直到80年代初都没实现。于是田中角荣提出“国土整治论”，从此日本开始了大规模的新农村建设，谓之“农村综合整治”，于是乎，日本80%以上的农田实现了归集地表水为主的灌溉，也达到了户均2公顷。就在这个阶段上，他提出了农业政策调整转向，即不再以追求农业经济收益为主，不再让农业主要为农民增收做贡献，也不再单纯追求农业作为一个所谓产业的发展，而强调农业是村社为核心的区域发展中的一个部分，同时强调食品安全、区域发展和农业经济。这是日本20世纪80年代农业政策调整后提出的“三农”问题。

中国90年代初期开始强调的“农业问题”改成“三农”问题是个复杂过程，其中，我发表以“三农”为题的文章是在1996年。而日本早在80年代就强调“三农”问题了，只不过内容不同。日本转向后，带动韩国和中国台湾也跟着转向。

继日本之后的是20世纪90年代欧盟政策的调整。欧盟农场规模大于日本五倍以上，大约平均在10公顷以上——欧盟各成员国内部不一样，但平均规模比日本要高很多——因此欧盟转向晚于日本，到1996年污染过重才开始转向。

恰恰是在20世纪80—90年代，东亚小农经济和欧洲小农场国家先后顺应规律地转向农村综合发展之时，我们却逆向了，开始在农业现代化的大目标之下强调农业产业化！诚然，农业要提高效率的主观愿望是无可厚非的，也符合西方农业经济学教科书，但是由于缺乏对世界不同资源条件下农业差别化发展的了解，客观上造成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农业的化学化程度大幅提高，亩均化学化程度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远高于发达国家，当然也就造成严重的食品不安全。这又带动了整个医药产业突飞猛进的发展。虽然都核算进了GDP，可这样高增长的结果不是害大家吗？注

“新农村建设”中的“新农村”是什么？我们那些志愿者搞了一些生态建筑——生态办公室，是半地下的礼堂，能坐300人，外表像大棚一样的，因为是半地下的，可以冬天不用暖气，夏天不用空调；生态农宅，大约180平方米，建筑材料成本只有2万多元。我们没有使用钢筋水泥，所有这些基本上都是木结构、草土墙，全部建材都可以回收，以此形成新农村建设的生态化。

这些在农村基层的事情做了差不多三年之后，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七大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其内涵是人类社会将步入生态社会，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如果转变及时、调整力度大些，大概对以往所犯的错误还能是个挽救。

（二）重新构建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分析框架

依据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这个指导思想，我们应该重新建立分析框架，来看看发展中国家的基本问题是什么？

1.认识论：一元论向多元论的回归。

生态文明的一个内在的重要观点是从一元论回归到多元论，即把世界本来是多元的这样一种客观事实重新加以确认。

生态文明是个内涵性的改变，它首先改变的是认识论。要认识到世界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认识到人类历史进程不是被斯大林主义教条化了的单一的五个阶段论的线性发展，就像我刚才说，城市化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发展过程，但不是必然的、唯一的、一般的发展过程一样。我们多年来被这样一条单线式的思维禁锢着，这使我们很难突破，很难创新。而生态文明的提出，对于所有的学科来说，都需要重新构建其分析框架，这样我们才能回归到社会和物质世界的本质上。

并非今天，其实“五阶段论”与“亚细亚形态论”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曾发生论战，随着强调马克思通过自我反思才提出亚细亚形态的这批知识分子被打成“托派”，中国就被纳入了一元论的、单线式的、五个阶段论的、教条化的意识形态解释系统。

多元论的发展本是世界的常态，只有理解和包容才能真正和谐。

2.重新梳理不同的人类发展路径。

我们从清末开始照搬、延续到今天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一般都会受到背后起决定作用的“科学哲学”的制约，其实大致可以归为“西方中心主义”的一元论的制约（当各位都在自己的学科中勤奋耕耘的时候，千万别耕了人家的“地”，荒了自家的“田”）。甚至可以说是被中世纪宗教神学“一神论”派生的哲学所制约——宗教上只许信一个神，和社会科学只许有一个真理是一样的。

然而几千年来，包括美洲、非洲、亚洲等，都属于非地中海文化派

生的多神宗教、多元社会，存在着与“西方中心主义”一元论历史观解释不同的、异质性很强的人类历史发展路径。只不过，非洲、拉美、南亚，都先后被殖民化了。而非殖民化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很少，但其无论是制度形成，还是制度改进，最终总还是受到自身有社会历史内涵的一定文化因素的制约。中国属于以黄河、长江为主的大河文明，而西方大多数属于以欧洲半岛为中心的海洋文明。以此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共中央过去战争年代难以服从斯大林领导的第三国际、强调独立自主，后来的和平年代也强调自力更生，现在强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包括今天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也和当年日本韩国不一样。

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梳理不同的人类发展路径，形成不同的人文社会科学思考，然后才有条件重构生态文明的新的分析框架。

（1）“西方中心主义”文化。

“西方中心主义”文化内涵的个体性，是以地中海周边特殊的资源地理环境为条件的早期西方文明的产物。它内含着那里的人类告别蒙昧进入文明之初的早期采集和狩猎的生产方式，必然形成以个体为基础的社会文化表现，以及后期的冲突、契约命题。除了西方以地中海沿岸为主形成的早期采集狩猎文明外，所有以早期灌溉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群体性为基础的社会文化的其他各大陆文明都不是这种个体性特征。

中国近年来曾经发生过网上热炒教科书问题，因为有人指出书里有“让孩子‘吃娘奶长大’的内容”。在欧洲，随着文艺复兴制作的话语体系具有了“政治正确”，“吃娘奶长大”的概念其实得到的是一种发扬光大。

据说古罗马就是两个双胞胎男婴靠“吃娘奶长大”然后形成的城邦国家。所谓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被中世纪以后的文艺大师所复兴出来的文明内涵，其中就包括对“吃娘奶长大”的文化的肯定。（当这类文明终于被自己内涵的内部矛盾灭亡的时候，整个古罗马、古希腊就都进入了长达2000年左右的被殖民化的历史进程。直到1847年，当大部分大陆的历史已经进入了近代史的时候，意大利——古罗马早期文明的发祥地——还只是个地理概念而非当代的政治国家概念。）所以，西方对外的杀戮掠夺，乃至于对殖民地的疯狂征占等，都是那种文化中的内涵。

文艺复兴的实物有很多。各位真到欧洲去，要去那些大的博物馆，如卢浮宫、大英博物馆、日耳曼国家博物馆、意大利国家博物馆，在那里好好待上几天，好好看看他们表现的是什么，文艺复兴到底在复兴什么？其实复兴的是个体文化为基因的海盗文明。其中，什么叫谈判，什

么叫契约，什么叫谈判和契约之间的对立统一，乃至于今天的所谓自由契约理论到底来源于何处，在这里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都有很好的形象表现。

灌溉农业文明也有很多文化表现，比如埃及最古老的博物馆所展示的就是大河灌溉文明。

（2）真实的美国发展经验。

什么是真实的美国发展经验？很少有人注意，我这里做了一个简单概括。

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关门和开门：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前，是个典型的殖民地国家，为欧洲提供原料，并且为欧洲提供产品市场。美国完成了南北战争之后，战争英雄格兰特将军1868年当上总统，上任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关门，闭关锁国，不许对欧洲开放，他说“直到我们有足够的实力，我们才能重新开放”。经过不到30年，经历了美西战争以及美国对亚洲的侵略等，直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终于成为一个工业化强国，这时才重新开门。

美国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同样遭遇到贫富差别、城乡差别、区域差别拉大。东西两大海岸和中部地区、南部地区的差别非常大。1929—1933年的大危机，美国同样逃不过去，生产过剩必然造成危机，而危机在欧洲表现为战争，在美国表现为历史机遇，美国抓住了历史机遇，安然度过危机并成为工业化大国。美国不用像中国今天这样费劲，因为欧战帮它解决了问题。

成为金融资本帝国：因为欧战，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中央银行，于是美国大幅度调整产业结构，成为金融资本主导的帝国主义国家。靠金融资本牟利比任何产业都轻松得多，它可以追求通过印票子占有收益。当苏东解体之后，美国就可以对全球印票子，于是全球化顺理成章地被美国倡导了。（那是金融资本的全球化，我们跟着嚷嚷什么呢？）

（3）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制度的后果：制度收益归谁？制度成本归谁？

制度是不同原始积累方式所形成的，是派生物。我们强调制度，不错，我多年来一直强调制度。很多人以为当我说制度是派生的时候就不重视制度，其实我只不过指出了制度从何而来。

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制度，制度收益谁得到了？制度成本谁来承

担？就像今天有许多人在谈论农民问题，其实农民只是没得到制度收益，而承担了制度成本而已。

这种单极霸权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发展极端不均衡，从而引起极端对立，结果一定不会是好的，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拉美国家开始左倾化甚至游击队遍地。我先后到这些游击区去过好多次，目的就是为了考察为什么在美国的家门口，完全照搬美国的制度反而闹得社会不得安宁、游击队很强大？

（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比较

1.城市化的一般比较。

当城市化成为一种必然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比如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是靠贫民窟实现的？

做一点比较就可以知道，当我们讲着一系列“化”的时候，很少去做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殊不知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很少有人去想想，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人口超过1亿的、大型发展中国家在追求城市化加速的过程中都必然出现的大型贫民窟？我们不是没有，在一些老工业城市，过去的工人区已经变成了贫民窟了，但这些产业转型期间形成的贫困，并不像印度、孟加拉、巴西、墨西哥等这些国家的贫民窟，二者差别是很大的，这些贫民窟动辄上百万人。非洲等地一些后起的国家也在追求工业化，比如最近闹事的肯尼亚，为什么肯尼亚闹事能一呼百应，就是因为空间平移了贫困。本来原来还是分散在四里八村的贫困，因为追赶工业化，大量人口向首都聚居，没地方待，就待在河沟、路边等地方，住在板皮子、棚布搭成的大面积移居区中。现在得到外援的总统，尽管掌握着国家机器——军队，而原有的总统却可以在贫民窟一呼百应。当贫民窟人口超过几十万的时候，想要对什么发言，就靠发动这些贫民窟的百姓上街。

中国现在是2亿左右的进城打工人群，如果按人数算，我们进城打工的打工者数量远大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人口，我们为什么还没有出现这些事情？当然个别事件另当别论，在中国还没有演变为大规模冲突，其背后的重要原因在于我们今天都认为是绝对负面的体制——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千万别只讲一面。

我从1985年开始强调打破城乡二元结构，20多年之后我开始保守了，开始希望放慢脚步，不要一味强调城市化，甚至建议是不是有可能以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县域经济的发展带动城镇化？而不要只讲城市化。

我越来越退步，越来越趋向于保守，什么原因呢？就是怕乱。在座的各位恐怕大部分都属于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成熟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后，一个重要的诉求就是稳定，谁都怕乱，乱起来大家谁都受不了。

2.中印发展比较。

印度与中国最具比较分析价值，两国起点相似，相差在哪里？在于基础设施。印度到现在刚刚开始建高速公路，原来我去之前就听人说印度是个“高速公路零公里”的国家，我到了一看，果然。现在各个邦还不行，到各个邦去的时候，别想着遵守时间——都说印度人不遵守时间，是因为没法遵守，路是混行的，公共汽车顶上人都是满满的。路上马车、驴车、牛车、拖拉机混在一起，中间连分道线都不能划，因为没有划的地方。出一个事大家就停在那儿，在路边埋头做饭，一天都走不了——在印度不要讲究效率，那是不可能的。

印度农村的多子女家庭，住的是茅草房，进去后屋里连张床都没有，贫雇农的农业没有任何机械、没有畜力，只能用人力来耕地，非常贫困。回来后我对我的学生们说，谁想了解30年代的中国农村，谁如果觉得过去好，就去印度；谁想了解80年代的中国农村，去越南。

印度与中国发展差异巨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基础设施的不同。印度的交通非常糟糕，任何一个路口就是汽车、摩托车、摩的甚至跟牛挤在一起，交通规则是很难遵守的，大家都是在抢。城市化不过是多出点装饰、多出点广告而已。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交通、没有基础设施、没有三通一平、没有起码的前期投入，不可能有FDI和其他发展类投资。中国为什么能长期靠投资拉动？一个重要条件是基础设施，中国的高速公路里程是世界第二。

印度没有基础设施的原因是土地私有化。农村土地私有化，造成了印度34%的无地农民，就跟新中国成立前造成了37%的贫雇农相似。印度7亿农民人口中的34%，就是2亿多无地农民，他们干什么呢？每当农村里有点灾的时候，他们就拖家带口进城了，进城就是进贫民窟。贫民窟建在哪儿？城里土地也是私有的，你敢在私人土地上私搭乱建吗？不敢。在哪儿呢？所有的贫民窟都搭建在公有土地上，就是铁路边、公路边、河道边、公园边等这些地方。于是，你想搞基础设施建设修条铁路

搞双轨，就得拆棚子，一拆就是上百万人闹事！

可见，“空间平移、集中贫困”，不是等着人家和你打架吗？

想修铁路、修公路，把棚子拆到哪里去？都是老百姓。想把河道裁弯取直让它行洪通畅，别一下雨就是暴雨成灾，淹没半个城市，你敢吗？沿着河（河道都是曲里拐弯的）都是底下用竹竿子撑着，上边用竹篾子搭成板，在这上边搭起来的棚子，成千上万的人就住在河道两边，因为那是公有土地。

请问，我们主张土地私有化的朋友们想过这个场面吗？去实地看看啊！不远，五个多钟头就到了，从成都走更近，大概三个多钟头就到了。也不贵，几千块钱就够了，我有很多考察都是自费去的。

两国经济发展情况的比较。以前中国经济大起大落，那是在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印度经济始终平稳，但它平平稳稳地走到现在，和中国的差距越拉越大。拉开差距的喇叭口，最早是在1969年，那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但不管怎么讲，中国就是在那个时候完成了工业化原始积累，进入工业化快速增长期。于是，中印两国差距越来越大。

经济结构的比较。2005年，印度服务业已经高达53%，而中国的服务业还在40%左右徘徊着。从结构上看，中国大大地落后于印度，但是从制造业来看，从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战后追求工业化的路径来看，中国的制造业比重是46%，印度一直不到30%，也就是说，印度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当然，如果用生态文明的角度来讲，没有完成工业化并不意味着不好，不进入工业化不意味着不好、也许会更好，这话另外再说。

我主要是想告诉大家，不要看什么意识形态，而要看真实的发展情况。今天很多中国企业家都说，中国的制度不好。当他们出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发现他们寸步难行，甚至有很多已经被抓了。我到印度去调查的时候，企业家们说在这里没法干，稍微让工人超过八小时就罢工了，然后就把中国企业家告进法院了。要是稍微拖延给钱，就进监狱了，还得花好多钱保出来。

从20年的减贫绩效比较看，中国的减贫成就全世界有目共睹，不需要多说了。

3.工业化的共同规律。

大多数20世纪以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都以工业化为主要目标。工业化都需要一定的资本原始积累。

任何发展中国家追求工业化、城市化加速的时候，只要不能像西方人那样向外转嫁矛盾，就一定会导致本国农村的衰败。什么道理呢？有一次我跟领导同志讲，请问为什么80年代中国没有“三农”问题，80年代农民收入连续四年增长速度快于城市，城乡差别迅速缩小，并且第一次出现了农村人口（县以下）的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高达64%（没有扣物价指数），即农村人口占多大比重、消费占多大比重，然后中国出现了黄金增长、内需拉动？为什么90年代市场化、法制化都加强了，“三农”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到21世纪，新政充满了政府善意，但“三农”问题愈演愈烈？

就因为其中有一个基本规律，特别请学经济学的朋友们注意：当这个世界进入金融资本主导国际竞争的时候——金融资本的特性是在流动性不断加快的过程中获利，我们就会出现金融资本因追求流动性而异化于产业资本，越是没有流动性的产业越是被异化。而农业正是一个毫无流动性而言的产业——农业必须和自然过程结合，除了那些大棚生产可以有流动性外，正常的农业生产，只要是和自然过程结合，只要是生态的、有机的，就一定没有流动性。因此，金融一旦成为一种独立的资本，其本质决定就是异化于任何产业的资本，必然追求流动性获利，那就会大量投入股市、期市、房市这三大投机市场，并且不断催生金融衍生品交易，此乃金融资本主导竞争的当代经济的基本规律，可逆吗？不可逆。

既是规律，就只能运作下去。接着，就会出现中小企业因流动性差而没有贷款，农业因流动性差没有贷款。金融离农而去、离中小企业而去，乃是市场经济规律之现象，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只要顺应这种市场经济规律，就会导致农业三要素大规模流出。

大家都知道，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资金或曰资本是“父母结合生的儿子”。现在，“不孝子”先离农而去，“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是当今普遍的话。离走后开始休“爹娘”，于是，“爹跑了娘嫁人，儿子各人顾各人（异化了）”——“娘被霸占”是指土地被征占，“爹跑了”是指劳动力外出打工。农村三要素长期流出能不衰败吗？我当时问领导，世界上可曾有过任何经济领域，在三要素净流出而且大规模净流出的情况下，能保持不衰败？那不是奇迹吗？这就是

今天的事实，对不对？三要素净流出并且大规模净流出，想不衰败怎么可能？

因此，“三农”问题严峻，体现的就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规律，不管我们有无善政、有无善意，谁也不可逆规律而动。

4.中国的真实经验是什么？

在这个规律发生作用的同时，加上西方的新“四化”——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会是什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中国大概是唯一的例外。

我在很多国际交流场合上都说，请你们注意，中国是二战后独立的发展中人口大国中，唯一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其他没有一个。比如南部亚洲，印度（12亿）、印度尼西亚（3亿）、巴基斯坦（1.8亿）、孟加拉（1.3亿），完成工业化了吗？拉美国家中人口过亿的有两个——巴西和墨西哥，但这两个国家都不是以原住民为主的，而是外来殖民者和混血人口为主的国家。

总之，请大家注意，发展中国家原住民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中，唯有中国完成了工业化。

是不是好事我不说，因为生态文明理念下我们不能说我们自己有多好，但是，有谁认真总结过我们的发展经验吗？很少。前不久英国国际开发署要撤离中国（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召集一些专家来讨论，他们能把什么样的中国发展经验带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因为他们要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做项目。在座的所有专家都说，千万别带中国经验走，几乎没有一条经验可以带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去。我前阵子去印度，那里很多朋友跟我说，抓紧写篇文章吧，写印度不能向中国学什么。就像我们不能搬西方、搬来就糟糕一样，别的国家也不能搬我们、搬了也糟糕。

（四）城乡统筹的内涵

以上分析的结论是：任何照搬城市上层建筑都会由于治理成本过高而导致与过去剩余过少的小农经济不适应。这个上层建筑如果是在城市，搬吧，我们不管。但如果搬到农村来，麻烦，因为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这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所以，我们需要实事求是讨论真问题。

真问题是什么？中国地理上本身就具有三级台阶分布，因此，区域差别乃是资源、地理、环境造成的，并非人为的制度造成的。中国只有11%~12%的国土面积是平原，只有9.4%~9.8%的面积是水土光热匹配的平原地区，因此农业条件尤其差。

据此看，中国不是一个农业大国，而是农民大国。

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在近百年的制度史上，导致了三次乡土社会的治理危机。

今天当我们讲城乡统筹的时候，城乡统筹的真正内涵是什么？是由政府承担农村的公共开支和基础设施开支。这一点，2002年中共十六大刚一召开，胡锦涛总书记就讲到了，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就在十六大提出“城乡二元结构”的概念并且强调以“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为指导思想的时候，胡锦涛就说：“我看，今后的“三农”政策不能再口惠而实不至。”怎么解决呢？他说了两个方面。一是把财政的新增部分投到县以下，去解决县以下的公共开支问题，就是教育、医疗、治安、管理等，这些要靠国家财政投入来支付，不要再让农民拿钱了，即公共品要公平。这一点2002年就提出来了。第二条，“国家支农资金能不能改一改？以往70%以上都投到大项目上，跟农民没什么关系还要农民付出代价，今后能不能改成国家支农资金重点投到村以下，去解决和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小的项目需求，即农村道路、水利、电力、交通等，小的基本建设需求也要由国家支农资金来解决，也不要让农民再加重负担了”。

这届领导班子的指导思想是清楚的，就是用国家“看得见的手”改善三要素净流出并且大规模净流出这一农村必然衰败的规律性原因的源头，也就是用“看得见的手”让三要素回流“三农”。

什么道理呢？市场一定是把三要素抽走的，靠市场是不能让三要素回流的，这点大家都清楚，也叫作“市场失灵”。当你使用“看得见的手”逆市场而动的时候，由政府把三要素送回来，把率先异化于农民的资本这个“不孝子”用国家的手给送回来。农村小项目大量增加，就是请农民在家门口打工，参加道路、水利、电力等这些建筑工程，挣了现金，有了消费，就能拉动中小企业发展，带动小城镇发展，那就有了公共设施的投资需求，进而会使中国农村城镇化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资产池”。随之，就会像朱镕基总理1998年启动第一大资产池建设带动了大量FDI进入中国使得中国变成投资拉动型增长一样——假如我们的新农村建设

能以城乡统筹为基本内涵，并且像温家宝总理所说，连续投入十几年。注

2002年十六大之前很少出台社会政策，2003年之后表达政府善意的政府善举、善政大量增加，2007年增加得最多。我们看到：最近几年中央出台的这些社会政策的背后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从2003年以后陡然地向上增加，这就是胡锦涛总书记“两个反哺”的贯彻。

城乡统筹其实不是把城市这套强行去“化”农村、把农村化成城市，其实主要是公共品的公平性，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去解决农村的、农民的需求，“三农”问题的相对缓解，本来就是城乡统筹的题中之意。

当大家都做城乡统筹的时候，不要说得太偏了，我们其实应该是追求一个可持续的稳定发展。因此，社会科学界的朋友们，要强调符合生态文明理念的社会科学体系的重新构建。

此文为温铁军于2012年5月25日在对外经贸大学的演讲摘要。

岭南大学座谈会，2012年3月31日。

2012年6月温铁军接受上海电视台“人民币”纪录片栏目组在北京采访时录音的整理稿，已经本人审阅。诚然，那个片子的编辑即使出于端饭碗的原因也很难采用这些不被主流认同的思路。这次全文发出来，算是立此存照。

2002年10月25日，温铁军应邀到中国农业大学新报告厅为“邓小平理论学习”课程演讲。

温铁军于2012年8月25日对湖南卫视“回不去的故乡”纪录片编导组的谈话记录。

2008年1月，温铁军在成都召开的“中国统筹城乡发展论坛”上的发言。

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认真思考，但我做的反思并不是批评。当年研究产业化问题的人中也有我一个。我的那份研究报告，可能是国内以农业产业化为研究课题的第一份报告。当时姜春云同志到中央主政农村工作，我当时在农业部农研中心，搞政策研究要揣摩领导意图、把脉，就分析姜副总理头三脚踢什么？我说第一脚肯定要踢农业产业化，农研中心若要为领导服务，就得先做农业产业化研究。那时的研究人员大都不认同，说什么叫农业产业化？农业本来就是产业，产业还要产业化吗？同义反复，连起码概念都不懂。但在我的坚持下还是批准在内部立了项，我就做了一份农业产业化研究报告，所提出的不同意见只是强调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衡量农业产业化成功与否的根本标志，不看政府是否增加税收、企业是否增加利润，而看农民作为第一生产者是否分享到了社会平均收益，这才是衡量产业化成功与否的基本标准。我当时不仅提出了标准，全国人大转到农业部的人民代表关于大企业进入农业的提案，也是交给我来写成答复的，这些说来话长，按下不表。可是请问：今天有谁在推进产业化的时候拿这个基本标准说话？没有啊。

温家宝总理说：“我看新农村建设不能搞两三年，要搞就要搞上十几年。投资在现有基础上每年要增长，连续投入十几年。”这在最近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经济工作会议、中共十七大都有体现。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讲得很清楚，就是要加强三个投入，“三个只许加强，不许减少”——好政策只许增加、不许减少；支农投资只许增加、不许减

少；财政用于农村公共品开支只许增加、不许减少。

第三部分　新世纪的真问题

第一节　中国进入21世纪之初的宏观调控注

中国进入商品社会以来，人们追捧的是演艺明星、学界大腕、著名企业家，而那些踏踏实实在基层做工作的人们已经被淡忘了，看来这个社会有点失衡。当年毛泽东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名家是最没有学问的，咱们还是应该尽可能把自己的心态放平和些。

自从2003年以来，我觉得自己去农村调查研究少了，出席公共场合各种会议多了，这让我非常不安。到退休我还只剩下七年时间，而我能做的事情本来应该更多的是去把握基层的实际情况，更多地去做发展中国家跟中国的比较研究，给后人留下些做研究可参考的材料。

在我内心深处，怎么说呢，比较真实的想法是我们这代人犯了太多的错误，应该自我反思，应该把自己的问题搞清楚，这样才能老老实实俯下身子当一块铺路石，让后面的人踩着我们走过去的时候能稳一点。这不是自谦，而是在实地调查中不断反思的结果。

今天向大家汇报，最近中央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我们现在宏观调控局面之下的各个方面的问题解决有什么关系，和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其必要性和紧迫性体现在什么地方。主要有这样几个内容：

第一，2004年初，中央提出宏观调控以后的国际外部压力意味着什么？

第二，就中国国内而言，这种不同压力又代表了怎么样的复杂利益关系？

紧接着，我再跟大家汇报一下：宏观调控并非只是企业家关心、政府官员关心，每一个老百姓其实都在实现调控的问题上有非常深刻的感受。

大家应该记得，我们1997年软着陆以后那是什么局面，大家还应该记得1994年曾经出现物价上涨24%的问题。如果再往前一点，上点岁数的人也许记得，1988年物价指数涨到超过18%的时候出现了什么？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搞再就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其实，都与前两次宏观调控有关。

大家知道，自1988年那次通货膨胀之后，政府宏观调控，大幅度调整利率，接着就出现了三角债。然后就是国企的困境，大面积关停并转。1994年发生通货膨胀以后，1997年虽然软着陆成功，接着也是大面积的企业不景气。而且不光是国企问题，民企也开始不稳定。

现在，我们又面临着新一轮的宏观调控，情况会怎样呢？

实事求是地看1988—1989年、1993—1994年和1997—1998年，我们的经济发展表现为一种周期性危机爆发，这个问题首先要解释清楚。

（一）宏观调控面临的国际背景

我们先从第一部分宏观调控的问题分析入手。大家看到最近中央政治局在强调，要各地贯彻中央的宏观调控。很多企业包括各个地方都在担心，宏观调控到底持续多久，国家计划会不会进一步卡紧，人民银行会不会紧缩银根，银行利息会不会进一步提高。如果这些大家担心的现象都出现，肯定会导致各个地方的经济建设放缓，所以人们现在对宏观调控普遍持有一种不那么认同或不那么适应的态度。

在最近一系列会议上，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以宏观调控政策来实现经济减速，也纷纷表示不理解。尤其是那些在中国周边资本市场以中国概念来炒作金融投机的大投资商更是持负面评价，因为中国一提出宏观调控，周边股市的中国概念股就纷纷下滑。而2003年中国经济态势表现非常好的时候，国际上大的机构投资人都在中国概念炒作上挣了大钱。现在，他们说丢钱了。丢钱的当然会有意见，当然会不满。还有人说，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你们这个发动机要减速，整个世界经济的车怎么能走得下去呢？于是，批评声一片。

可见，国际上的批评，其实是有很强的利益相关的。什么利益相关呢？就是国际上金融资本泡沫在放大。那么，为什么东北亚地区反映更强烈呢？原因之一是日本2003年增发了20万亿日元，大家知道，这些增

加的货币资本要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获利。到今年（即2004年）日本计划再增发140万亿日元，当然也大部分要进入国际资本市场。

你们知道，这些所谓世界硬通货国家，货币发行早已经脱离了传统的货币理论。它的发行并不必根据自己国家的生产，也不必根据国际市场交易，总之，可以不根据实质经济需求。那货币发行主要根据什么呢？要我看，一定程度上是资本与政治的联盟的需求。

日本为什么超发日元？是因为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中国的外汇储备成为世界第一，超过了日本。此前日本是世界第一，大概4000多亿美元，2003年中国官方外汇储备就达到大约4000亿，民间外汇存款还有1000多个亿，加在一起总共达5000多亿美元，如果再加上香港的大约1000亿外汇储备，中国就有6000亿左右。于是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而这部分外汇储备过去又有大约70%是美元，美元外汇储备中又有70%～80%是在美国资本市场上。因此，中国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就意味着中国在美国资本市场的份额增加。这就导致了一个大家都能从报纸上看到的说法：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处在历史最好时期，那就意味着中国在美国资本市场的投资是最高的。因为，美国是典型的资本经济，尤其重要的是金融资本经济，那美国自然会明白中国的资本投资在美国资本市场的作用。大家知道，外资进入美国资本市场最高时达到3000多亿，2003年中国在美国资本市场上买美国政府债券、进入美国的资金规模大约是1500多亿。而美国如果有经济危机，那往往是外资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的总量大幅度下降。

记得2000年我在美国杜克大学进修的时候，有些参与资本市场的华人朋友们问我华尔街股票市场会怎么样，我说有个规律，只要把握了，你们就可以挣钱。什么规律呢？就是你们看外资流入美国的速度和规模，如果外资流入美国的速度下降，规模也大幅度减小，那美国资本市场肯定要下滑；反之，则会上升。

2003年中国增加了对美国资本市场的投资，是导致中美关系形成历史上的最好时期的主要原因之一。大家也知道，客观上现在美国是世界上的一超，或者叫独霸天下，日本、韩国这些国家都跟美国有紧密战略关系。而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超发20万亿日元，就导致日本可以增加1800亿美元左右的外汇储备，使日本从原来4000多亿的外汇储备在超发的情况下进一步超过中国，再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以此来跟美国建立更为紧密的资本同盟关系。

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这个道理没有，这个国际战略格局变化不靠老百姓的情绪，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靠大资本之间的战略关系。

2004年发生钓鱼岛事件以后，日本就说，中国如果在钓鱼岛这个问题上与日本发生冲突，美国是不会坐视不管的，是会站在日本一边的，等等。也许这是因为2004年日本新增发的140万亿日元将会进一步提高日本在美国资本市场的份额。

这其实仍然是资本的力量。

大家也明白，很多青年朋友认为，现在政府把台湾问题国际化了，老反复去跟美国讨论台湾问题，这样不对。而其实，这些反对也只是情绪的表现，你不得不看到台湾的战略地位。如果我们把台湾统一了，而且军事上也统一的话，那么中国的战略前沿将从台湾向西太平洋延伸几百海里，整个东北亚地区的战略物资运输，完全在中国的控制之下。因此，日本对台湾问题必然做出最强烈的反应。从国际地缘战略来说，日本为什么自甲午海战之后强迫清政府割让台湾，那是因为要保证海洋运输。日本是几乎没有工业化资源的国家，到目前为止，是世界第一大进口国，而它的石油70%以上来源于中东，是从中东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再从台湾海峡向上抵达日本。

由此可以说，中国的台湾是日本人的生命线。

但对中国来说，我们的主权不可放弃。别看这是个岛，很大程度上会直接影响东南沿海对外开放。而一旦它追求正式独立，就不可能是一个平和的过程。世界范围内的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独立、区域独立，从来就都必然伴随着冲突、战争，很难短时期解决。因此，我国沿海这一带，还有可能在冲突的状态之下有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的条件吗？绝对不可能。

所以台海的战略地位重要，当然是西太平洋地区所有的经济体都要关注的。

客观来说，当一个国家的领土上有外国基地和大量外国驻军时，就意味着其主权不完全独立。以此看日本、韩国，都是美国驻军的国家，因为本土上有大量的美军，在伊拉克问题表态上就紧跟美国，一步不离。

在这样的周边形势下，中国的压力非常之大。原因其实还不仅仅在经济上，很多问题是关联在一起的。日本2003年超发的20万亿日元、

2004年的140万亿日元，极大程度上助长了国际资本市场的泡沫，变成了大量的国际热钱，又要重新去寻找投机获利的机会。我们知道，“金融大鳄”这个提法是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以后逐渐被中国人所熟知的。可大家知不知道，咱们现在还在面对一个更为可怕的金融大鳄，血盆大口已经张开，正等着要吃你。因此，国际的压力不是一般的压力。

我们内部当然有分歧，最为模糊的估计是国际热钱以各种名义进入中国的比例，绝对值已经高达1000亿美元，可能1000亿美元这个数太大，大家对其没有概念。我们简单解释一下，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发生的时候，大约20亿美元热钱进入泰国，摧垮了泰国的金融体系，泰国的货币大幅度贬值。大约40亿美元的热钱进入韩国，就把韩国的金融体系搞垮。最后为了重建货币体系，韩国的老百姓捐献自己的黄金首饰。因为国家需要有足够的黄金储备，其所发行的货币才能保住兑换率。而以往没有出现金融风暴之前，则不必这样。因为全世界已经放弃金本位，就是不再以储备多少黄金从而决定发行多少货币了。但为什么韩国老百姓要捐献自己家里边的这点金首饰帮助政府来发行货币呢？是因为货币体系垮了。同样道理，你们看印尼，看马来西亚，看看周边的那些东亚国家，都是不过几十个亿美元国际热钱——就能叫作金融大鳄，就能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而且根本不会看到鳄鱼会流下眼泪，这不亚于战争造成的破坏。

但是大家也应该记得，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40多亿美元国际热钱流入香港，最后大败而逃。为什么？根本就不是因为香港有最自由的资本市场制度、最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最民主的什么制度，现在香港的一般人所讨论的那些问题，完全是猴吃麻花——蛮拧。实际情况是，中国人讲面子，不可能香港刚一回归，刚宣布是一国两制的典范，就立刻让香港经济垮掉，这是不能允许的。于是政府站出来说我手里有1800亿美元外汇，加上香港外汇储备是2600多亿美元，咱们就对决一次。你不过是40亿美元热钱进入，你要多少我有多少。所以香港根本不是靠自己，而是背靠一个强大的祖国，成功阻击了亚洲金融风暴。因为中国大陆的货币市场不开放，任何热钱进来，国家银行照单全收。正是在这种垄断货币体制下，我们才没事。我们说东亚金融风暴发生，唯一幸免于难的应该是香港。再看今天进入大陆的1000亿美元相当于什么？大家很清楚，50倍于当时搞垮泰国的热钱，25倍于搞垮韩国的热钱，难道不是很大威胁吗？

我们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在2006年放开金融体系，允许外资银行在中

国开办人民币业务。这对于本届政府，对于十六大以后产生的这个新的领导班子是重大考验。这个国际压力一般在地方层面上、企业层面上是感觉不到的。不研究国际战略的人，搞不清楚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紧张。那是因为国际热钱大量进入，更由于我们这种单一货币体制，不论进了多少外汇，不论是美元、日元，全都由国家的银行统一收购。因此，进来的外汇就有很大部分变成本币增发的压力，当然就是通货膨胀的重要基础因素之一。如何防范曾经发生过的金融风险？不能说这个风险没有，客观上它已经有了，因此中国目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这一点，我想大家很难从一般文件、报纸、电视上看到。跟大家把国际上的重大风险和已经在我们国内发生作用的情况，做一个归纳，介绍一下，以免大家不理解。

为什么现在中央出台宏观调控政策？最近我见到香港大学的一个金融专家，他告诉我，进入中国的热钱60%来自于日本，40%来自于美国，也就说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资本泡沫经济——日本和美国，目前等着从中国榨取利润。这点也是我们必须高度关注的。我们必须看到金融资本在泡沫经济的压力下，它的行为当然不可能超脱规律，那就是泡沫化金融资本只能到那些制造业为主的国家榨取投资利润。这就是当前我们说必须引起高度关注的国际方面的问题。它难道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背后充满利益关系的局面？

（二）最难应对的是国内利益关系

那我们反过头来再看国内。

大家也可以再回忆一下，1994年，消费物价指数上涨高过24%的情况是怎么发生的？你们记不记得？1994年中央就决定要加强宏观调控，要适度加强计划调控，一定程度上紧缩银根，控制信贷规模，主要是因为1992、1993、1994连续三年经济快速增长，这个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很多瓶颈制约。当时电力紧张、交通紧张、煤炭紧张、原材料短缺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已经明显表现出来了。于是1994年中央决定要适当紧缩，否则国民经济运行不健康。而结果呢？可能地方的同志不爱听，其结果是各个地方都不执行。跟今天的情况何其相似！1994年中央也想软着陆、缓刹车，别把整个经济的增长一下打下来。但是那时各地正在大干快上，收不住。结果就是一听中央这方面要刹车，要适度从紧，各地就赶快拼着抢着上，要在被卡住之前抓紧跑几步。这一抓紧可了不得，造成了整个宏观环境更紧张，原材料价格更加上涨。这么一涨，就涨出24

点多的物价指数，明显是通货膨胀，恶性循环肯定发生。

其实那个时候你们也看到，与现在一样，也是进口大量增加，银行超发货币，这些事情都与今天非常相似，而那个时候还同样发生了“圈地运动”。从1992年到1994年连续三年，各地政府大规模圈占土地，大办开发区。那几年办了8000多个开发区，我们这次是5307个，那个时候比这次还要多，因为那次村村都办开发区，也是抢占农民土地，然后开发区从银行套钱，然后政府跟企业分肥。

这不过才是十多年前的事情，在座的都应该记得，至少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很清楚。在某种程度上，地方政府如果抓紧再多跑两步，就会出现真正的恶性膨胀。1996年，中央不得不急刹车，中央政治局决定，不能再批一亩土地，即严禁任何新增土地审批，那就是所谓的一刀切了。这是上下摩擦出的结果，因为在此之前各级不可能自觉适应中央宏观调控的结果，造成不得不急刹车。另外，中央政府也禁止任何计划项目的审批，要求各省计委不得向国家计委报项目，报也不批，一下把经济打入低谷。这才有1997年软着陆成功，1998年之后只能靠增发国债拉动经济。

这个教训，难道不够大吗？今天我们国内出现的情况与上述教训很相似。

首先是2001年开始第三轮“圈地运动”，大规模圈占农民土地。这次比上次（1992年）整个房地产投机狂潮更为严重。为什么呢？时间仅是上次的一半。上次用了五年时间才圈占了3000多万公顷的土地，这次在两三年的时间就圈占了5000多万公顷的土地。而根据2003年国土资源部查处结果，在这轮圈占土地狂潮中，总计16.8万个案件是违规违法的。如此严重的问题，怎么处理？它仍然是地方与中央双方不适应，最后导致要急刹车。2003年初温家宝总理发批示指出，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引发了各地农民上访告状，群体治安事件愈演愈烈。然后接着发文件，连发三个文件，我们叫“三道金牌”，说一定要实行最严格的土地审批制，一定要严肃查处各种各样的土地违规案件，一定要严厉惩处在土地征占过程中有贪污腐败行为的干部。文件出台，各地没有动，反而进一步加剧，发文件也不管用。当年6月底开了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中央领导同志跟地方各省书记、省长在电视上会面，各省都表态坚决拥护中央政策，但是会议完了继续圈地。批示没用，发文件没用，开会没用。最后迫使中央不得不组织五部委联合工作组，派出去十个工作组下去查，各地纷纷启动地方保护，提出违规不违法的各种理由。十个工作

组下去查了一圈，最后，只撤销了一个人的职务。这难道就是中央派出十个工作组查处的结果吗？2003年10月15日领导同志听汇报，非常不满，要求进一步调查研究、组织专家座谈，要出台治本之策。当年11月初国土资源部组织专家组开会，四个人参加，我是其中之一。我说：既然是中央要求拿出治本之策，请允许我说句老实话，这是政治问题。中央行政能力弱化，到下面执行不了。不是要跟中央保持高度政治一致吗？不是要维持安定团结大局吗？土地征占引发了大量上访告状恶性事件，这难道不是政治问题吗？政治问题要用政治手段处理。于是就提出，不拿掉一两个高官，这问题解决不了。

治土地违规案不拿下高官就解决不了。上一次是1996年中央严令，哪怕任何一亩地都不许批了；这次呢，说是任何开发区，都不得再批，哪怕承担代价！但是，这钱就砸进去了。上次仅房地产一项，造成3600亿元银行占压资金，造成银行不良贷款大幅度增加。这回得多少？提醒各位，尤其是在座的企业家朋友们，切不可掉以轻心。别以为你可以跟中央权威玩，玩不得的。真逼到那个份上怎么办？只好采取行政手段，拿一把手说事，谁敢不听，就地免职。奉劝各位，不要试图考验中央政府的意志。

很多地方同志说，我们发展经济有什么错啊？你是没有错，但你并不承担中央的责任。中央面对的问题很清楚，那就是我们已经到了一个相对而言比较紧迫的程度。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这和上一次调控一样，电力紧张、煤炭短缺、石油短缺、天然气短缺、大量的原材料紧张，还包括交通运输紧张。现在为什么在严厉整顿交通秩序，查超载？越是“瓶颈”，就越频繁出现违规。所有这些一系列紧张都会导致“瓶颈”制约越来越严重。这个情况其实跟上次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刚才说土地问题，狂征乱占耕地，使2003年一年耕地减少了3000多万亩。咱们号称有19亿多亩耕地，2003年跌到剩下18.51亿亩，直接导致粮食大幅度减产。大家说中央一号文件好，其实中央一号文件每次必提的政策是要老百姓搞粮食，怕出粮食安全问题。

一个大国，难道是我这样坐在书房里的学者读了两本书，就说，放开进口吧，靠国际市场解决问题吧？！意识形态化的学者就是不愿意真去做学问，查查国际粮食市场价格波动跟中国进出口的关系。那两个数据形成的曲线很容易做，20世纪90年代我发表的文章里就写过。中国在1995年净进口2000万吨粮食。后果你们知道吗？世界市场小麦价格上涨几乎达到100%。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不满：你们富了，有钱

了，你们大量进口，国际粮食价格随即上涨，导致我们穷国饿肚子，因为我们买不起。

大家熟知的莱斯特·布朗，1994年写了一本书叫《谁来养活中国》，我不知道在湖北是否有反应，但它在北京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他的话没落地，中国就大规模进口粮食，西方就开始嚷嚷，说“谁来养活中国”正在成为现实。然后接着出现一股唱衰中国的风潮，从美国开始弥漫整个欧美上空。然后就有美籍华人章家敦，号称在中国工作了十年，回去写了一本《中国崩溃论》。他这边话没落地，那边中国又高速增长了。中国经济一增长，马上就出了新的中国威胁论了。

我参加过很多国际会议，不仅是发达国家认为中国严重威胁了整个国际经济秩序，发展中国家也这样认为，墨西哥、印度、巴西，所到之处，发展中国家都在问，中国怎么了？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因此我们的国际环境相对而言就不那么好了。

最近莱斯特·布朗来中国，中央电视台组织我去跟他对话，讨论他的一本新书，我们翻译为《B模式》，副标题是“拯救地球”。这本书出来，变成了中央党校省部级高官科学发展观研讨班的参考书之一。对话时我就问他，10年前你是唱衰中国第一人，说“谁来养活中国”，然后就有人跟着说中国崩溃等。我问你：你1994年出版《谁来养活中国》，接着中国回答你的是1996年我们的粮食达到历史最高产量，我们不仅自己养活自己，还粮食过剩，过剩到我们不得不出口，中国人这不是回答了你的问题吗？他听完了以后，一点笑容也没有，跟我说，你们粮食高产的代价是什么？一方面你们大幅度提高粮食价格，另外一方面你们大规模超采地下水，结果使你们整个大华北平原区，包括河北、山东、辽宁南部一直到河南这一带地下水严重超采，地表河流全部断流，这就是你们的代价。他说：我现在提出了B模式，就认为A模式需要改变，中国仿效的就是那个A模式，正在重蹈发达国家的覆辙。

现在又登珠峰、又乘热气球的那个企业家王石，万科的董事局主席，前不久我们共同参加另外一次国际会议，在所有参加会议讨论问题的中国人之中，他和我同时被国外的朋友们称为是最为另类的。我解释说，因为中国面临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局面，所以必须加强宏观调控，经济减速是为了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当然我做了一大套数据图表来解释。而到会的其他国内的学者，仍然在鼓吹着这种所谓高增长。到会的大多数企业家也对现在的中央调控政策不理解，而唯独王石站出来说：你们错了，算什么企业家，我认为你们现在就是投机心态。

王石说，很多人投资于钢铁，投资于重化，投资于电力，竟然说最多三年就回本。最为极端的是一个企业家说他投资一个钢铁厂一年就可收回投资。王石说，你们是干什么的？有谁愿意回忆，当年你们最初投资搞原始积累的时候多少年回本？没有十年八年的你们能回本吗？那是在轻工、纺织、一般制造业和一般贸易领域，你们尚且需要十年八年才能收回投资，现在怎么可能设想在重化、钢铁领域中，一年到三年也能收回投资？如果有这种想法肯定是投机。而如果投机造成宏观政策调控卡了你，那我认为你吃亏是活该，因为你不过就想投机取巧。他说，我这个企业按说在房地产行业算是好的，一般的房地产业最高利润率5%～8%，我是12%，我投资一项也得八年才能回本。房地产行业的利润还算比较高的，重化工的利润不能算高，随便放眼望去，世界范围内钢铁行业的利润是多少，有超过10%的吗？一般都在5%左右。如果你想一年回本，那你一年是100%的利润，怎么可能呢？只有投机才能这样，对不对？只有牛市你才能挣钱，所以永远爱说是牛市，不愿意说熊市。这点我理解，但是我们看看，宏观形势到底怎么回事？所以会议结束被人们包围的还是王石。

这话如果是我说的话，你们肯定会意见很大，王石毕竟是你们的同行嘛，可能意见小一点。

（三）缓解资本泡沫

接着，再跟大家汇报一下我对中央强调科学发展观的理解。这跟我们上一部分提到的中央现在加强宏观调控，其实是相关的。

大家看到，一方面，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把过去单纯追求GDP增长目标，转变为追求综合发展目标；另一方面，中央同时强调了五项统筹。

很多人对统筹这个概念缺乏正面理解。不仅国内，国际上也无法明白中国提出的统筹是要干什么。进入新世纪以后，世界银行在归纳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时候强调了三个“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主要内容，叫非中央化，或者叫去中央化（decentralization），就是不再讲中央的集中体制，然后是地方化（localization），再就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最近几次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没有公布之前，要征求各国专家的意见，我参加了讨论。我对他们这个概括有些不成熟的不同意见。怎么说呢？现在提出统筹，其实一定意义上意味着中央权威的强

化。这点，我想大多数地方的同志还不理解。而在内部讨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讨论过一些倾向性的问题。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后果之一，是资源紧缺所带来的资源泡沫和国际问题复杂化。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既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相对而言资源又非常紧缺，人均资源的比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得多。经过近几年的过度开发，从1949年中国开始进入经济建设的增长时期到现在50年来，我们的经济总量翻了10倍，但是我们的资源消耗量翻了40倍以上。

一个例子就是石油。过去我们是贫油国，到后来发现大庆油田、胜利油田，使我们成为石油出口国。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乃至90年代初期我们还是石油出口国，从90年代中期进出口平衡，90年代后期开始进口，到现在则是大规模进口，国内油田逐渐枯竭。前不久，美国的那位布朗来到中国的电视台对话的时候，他说不仅中国这样，整个A模式就是西方主导的工业化、现代化模式，已经出现的不仅是金融层面上的资本泡沫，而且出现了资源环境的泡沫。所以他把中国现在的经济纳入国际分析，说全世界都在透支资源环境。他说，如果说1989年前后，就是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耗的关系是100%，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就是120%。经济每增长100%，导致120%的资源消耗，他把这叫作资源环境泡沫经济。

金融资本泡沫是怎样产生的？本来应该是生产产品，需要多少商品交换就对应发行多少货币。但现在就全世界范围看，已经是99%以上的美元货币根本与商品交换无关，主要在资本市场的虚拟的泡沫经济中运转。这是一个不断涨发的泡沫经济，早晚一定要崩掉，这对人类、对现在的市场经济都是一场灾难。

我们且不说那些金融危机，单看中国自己国内的资源储备，根本不能够支撑经济高速增长。而我们一旦扩大进口，客观来说就是求之于人，这样的经济高速增长，已经造成了一种不可持续的国际国内的严重问题。

先讲2003年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大家看得很清楚，2003年中国为了9.1%的GDP，消耗了全世界10%的能源、30%的矿产、40%的水泥。我们人口近年来占世界人口的17%，这当然会引起国际社会相当强烈的反应。

在世纪之交的时候，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机构——美国哈佛大

学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写过一篇文章，其中有一句话我提醒大家记住。他说：20世纪日本和德国崛起，曾经因为改变国际秩序而引发过两次世界大战；而21世纪中国的崛起，也必将因为改变国际秩序，而对人类、对国际社会构成重大挑战。他倒没有说再发生世界大战。

相对地，我们领导人提出和平崛起，但如果大家注意看到我们的刊物，在《改革内参》上，有过两三篇文章在讨论，我们说的和平崛起，国际社会根本就不会相信。

为什么？因为如果沿着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发展，从来就没有和平崛起的先例。而既然是摸着石头过河，摸的就是西方发达国家放在河里的那块石头，是什么？坚船利炮。发达国家在资源短缺、缺乏市场的情况之下，往往靠坚船利炮打出去。300年的殖民地战争，占领了世界上四块大陆，北美、南美、大洋洲、非洲，大量向外转移贫困人口，然后从这四块大陆掠夺资源，支撑发达国家所谓工业经济和自由贸易。这段历史越来越少地被我们国内的知识分子记起，但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却经常被谈及。

我是国内知识分子中去发展中国家比较多的人，最近这几年主要的精力是在搞发展中国家跟中国的比较研究。如果换个角度看欧洲，如果欧洲没有通过300年殖民战争大量移出人口，今天欧洲的人口会是多少？现在欧盟，把整个东欧、西欧人口加在一起共5个多亿。但是把欧洲在海外的人口计算回来，已是10个多亿。如果把在海外的混血人口再计算进来，有多少？恐怕人口总量比中国多。那在这个小小的半岛型大陆上，你能够相信个人利益最大化？相信谁块头大、谁膀大腰圆，就该多吃多拿？

说白了，无论你想还是不想，当然中国想和平，咱不想战争，可客观上没条件了，世界上不会再有四块大陆让你去殖民化。稍微往外走点人，就说你们是“人蛇”。世界各国现在大都采取了严厉的制度审查中国签证，哪怕是过境。你们看凤凰卫视闾丘露薇这次随温总理去欧洲访问的时候，她说现在只要你是中国人，各国差不多都是拿放大镜查你。

目前的这种情况不能简单化地解释。当你大量进口的时候，实际影响了国际价格，也影响了在国际市场的份额，这就叫作改变国际经济秩序。这对周边国家，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难道不是挑战吗？当然是。因此，一方面在国内我们看到原材料短缺，看到“圈地运动”的兴起，看到投机经济的泛滥，这些都是中央不得不下决心调控的内容。

但并不完全是因为国内。原材料不够用要进口，大量进口就会带动国际问题复杂化。

我们不能说布朗先生的分析是错的。在座的各位，要么是年轻人，要么是自己有孩子的人，请想想，再过20年，当中国人口接近16亿的时候，按照现在耕地下降的速度，那时还剩多少？我们现在已经有1/3以上的省份，人均耕地低于一亩；而人均面积高于一亩的省份大部分是干旱地区，有土的地方没水，有水的地方没土。我们的经济地理就是这样一个客观约束。

（四）缩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

我们又都知道，不论是农业经济，还是工业经济，不论农村还是城市，都往往适宜在平原地区发展。而中国的地理状况是特殊的三大梯级分布状，这个结构决定了人口、资本、经济往往都集中分布在东部。因此，大家不要怪一江春水向东流、孔雀东南飞，只要是市场经济，连麻雀都东南飞。这是规律，逆不了。因此区域差别就扩大，中部渐渐地和西部拉平，赶不上东部。对不起，这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地理规律决定的。所以，区域差别扩大是不可逆的。

再进一步看，哪一个发展中国家不是在增长过程中出现贫富区别拉大问题的呢？

中国也出现贫富区别拉大，当然是同城乡差距拉大同步。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分配研究的专家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难堪的结论，中国现在已经非常大的贫富差距不可能缩小，只可能进一步扩大。

请你们翻开《邓小平文选》，他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曾经这样说过，如果我们的改革开放最后造成贫富两极分化，那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今天怎么评价我们取得的一切呢？难道不是贫富两极分化在拉大吗？

也正因为小平同志当年有这个论断，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所长陆学艺拿了社科院重点课题40万元课题费，做了全国的抽样调查分析，结果认为中国出现了十大阶层。中国语言文字比较丰富，但在英文翻译上“阶层”与“阶级”是一样的。他分析的结果，也非常让人不高兴。因为最高阶层是官员，第二阶层当然是企业家，第三阶层是知识分子，……而最后第九、第十阶层是工人和农民。大致如此。

我们不仅不能失败，还要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我说这话的

时候你们笑，我可一点没笑。为什么呢？这恰恰是对执政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最好的解释，不理解十六届三中全会为什么要统筹吗？对不起，按照一般市场规律走下去的结果就是黄金分割，二八开。中国人改得了华盛顿共识吗？改不了。华盛顿共识是什么意思？因为二八分割规律，只有20%的人能够享受现代化，那80%的人就该承受经济危机转嫁的恶果。在我们国内呢？每当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损失代价很大。当然政府埋单，但政府只替国有银行、国有大企业埋单，经济危机产生的巨大代价、损失也是遵循二八分割这样一个定律，向中西部和弱势群体转嫁。

这规律你认也罢，不认也罢，反正它是规律。

在座的各位知识分子，你们可以把文章写出花来，但是基本规律其实是简单的。

我们的责任不是用各种各样的模型把事情说复杂到谁也看不懂，而是要把事情抽象简化为基本规律，甚至简化为基本常识，这样才有助于认识这个世界，大众才能从你的研究中受益。

大众关心什么，还不是我会不会受损？现在小的有产者或小中产阶级们开始着急了，担心的是在银行有100万或者50万存款能否保值。有些人有外币，那到底存美元，还是存日元，还是存欧元呢？有些人开始做外汇交易，投机心态总是有的。有人甚至做外汇期货。现在的中产阶级大概占人口百分之十几吧？已经担心起来了，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

但是作为中央政府关心的是什么？是我们面临的三大差别如何调解。我们说，当中国三大差别拉大并且已经形成了阶层的时候，面对如此普遍的社会问题，你们认为中央政府应该怎么办？难道应该继续鼓励这种分化吗？而要想缩小这种差别，一般的靠市场是解决不了的。

我再讲一个例子。2003年两会召开，温家宝刚就任总理答记者问，大家说他大脑像计算机一样能储存数据，你知道他回答问题说出的第一组数据是什么？是我们中国有7亿多劳动力啊，而发达国家劳动力总和才不过4亿多。后来我发表文章说温总理的数字可以修订，因为农村60岁以上老人不退休，没有谁给发退休金，他还得干活。为什么不能休息呢？是因为税制，农民直到临死都得交税，农业税是按人摊的，初生婴儿要交税，连百岁老人都要交税，世界奇闻。农村十几岁的辍学孩子成千上万，也得下地干活，如果把这些半劳力、失学的和不能退休的都算上，中国劳动力总量是多少？8个亿以上。几乎是发达国家劳动力总和

的两倍。

请问：什么主义、什么政府、什么制度、什么政策，能解决8个多亿劳动力的就业？而一般所说的基本人权——劳动就业权怎样保障？国务院发展中心有一位研究员算了一笔账，说按照中国现代生产力水平，农业需要多少劳动力呢？他说大约需要1个亿劳动力，而我们农村有5个亿劳动力，那就意味着要转移4个亿。请问，往哪转？靠什么转？他进一步分析，如果按照中国要达到的一般中等程度的发达国家的水平，十几亿亩耕地只需要4000万～5000万劳动力。就是说我们大约应该在2020年前奔小康，2030—2050年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是多少人口呢？16亿。大概有8亿人能变成城里人就不错了。因为城市消耗的资源，远比农村消耗的资源多得多。咱们知道城里人生活用水是农村人的27.5倍。生活在现代化城市的人要每天洗澡，甚至很多人洗澡喜欢多享受一会，那就多消费好多水。城里人都讲究穿羊毛衫，多穿一件，那鄂尔多斯高原就多几亩沙化的戈壁滩啊！越城市化，越讲现代消费，结果资源就越遭破坏。你们待在城里，大家知道所有城里的水泥路面、硬化路面，下面都是沙漠，因为不能渗水。这还不包括那些大广场，用大理石铺砌，不渗水，结果就是地下沙化。早晚有一天，你们看的那个美国电影《黑客帝国》暗喻的情况会成为现实。这个电影透露出了深刻的危机感。将来，你只有在虚拟世界中才是风风光光，可以转着弯地跳跃，可以躲避子弹；一旦离开虚拟世界把脑袋后面的那个芯片拿掉，回到现实世界，就是断垣残壁，一片狼藉。好莱坞也有思想者，包括《未来水世界》的暗喻，将来海洋是越来越大，北极南极冰川融化，整个世界多数国家进入水下，剩下有限的几块大陆，只有原来的山区还浮在水面上。思想者告诉我们，大家现在喜欢开汽车消费石油，都是用不可再生的矿物能源，最后的结果就是人类自己把自己毁灭。

我们接着再看国务院发展中心算的账：全球发达国家制造业劳动力总规模9000万人。这意味着把全球发达国家制造业停了，全转到中国，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世界工厂，也不过增加9000万劳动力。所以，从温家宝总理2003年两会说出的第一个数据看，他最担忧的就是中国是一个劳动力过剩的人口大国。在一般市场条件之下，中国的劳动力是一个绝对过剩、无限供给的要素吗？边际效益率不断下降到零以下吗？今天就是这个现象，就是我们打工一族的实际情况。

农民工为什么拿不到工资？为什么超时加班？为什么没有任何节假

日？为什么没有劳动权益？就因为它是绝对过剩要素。在经济学冷酷的轴线上，它只是一个表现为收益不断下降的要素。但是人本身呢？我们说一个最不该引述的情况，为什么中国黄色产业过剩？为什么屡禁不止？为什么抓黄永远也抓不完，甚至变成了某些部门赚钱的手段？就是因为人多。色情服务作为一种古老的产业，在中国的价格之低，甚至低到了几块钱，这就是市场的作用。

在经济学家用模型演绎的市场中，人只是一个变量，这就是它的残酷性。对于包括人在内的所有要素都被去人性化，才能非常标准地转化为数据。

测算我们的劳动力转移的前景问题，尽管温家宝总理提过，但我们的经济学家至今还没有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很好的回答。解决中国目前高达8个亿的就业问题，既不能靠市场，也不能靠计划，两者都不可能。这几年全国范围内的拖欠工资，有人说拖欠1个亿，有人说拖欠更多。不管多少个亿，总之，这是必然现象，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难道不信规律？因此，乃至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竟然迫使总理去给农民讨工资，那也不过才给熊德明那个村20多户农民讨到了工资，整个云阳县的农民仍然拿不到工资。

我老讲那个故事，就是2003年中央电视台年度经济人物颁奖晚会开始之前，我看到熊德明一家瑟瑟缩缩地待在位于王府井的那家豪华饭店里。在王府井那么豪华的地方，她一个养猪的农户，似乎感到自己无地自容。电视台的年轻朋友对农民挺好，说：“温老师，你找她去说说话吧，也可能你们可以聊到一块。”我就过去了，用四川话说：“你不简单喽！”她一看我跟她说家乡话挺高兴。我问她：“要是没有家宝总理去要工资，你怎么办？人家都说你应该去找劳动部门。”她说要不到。我说为什么呢？她说那个不管事。我说那就像报纸上说的去打官司，你可以找法院嘛。她说那个也不管事，打不得。农民对这些问题的判断其实是非常有直感的。我说，那怎么办呢？她说：“哎，多养几头猪嘛。”聊起来以后，我说其实最担心的是这次你有总理帮你要工资，可将来你的老公、你的孩子再出去打工，哪个企业的头都不敢要。既然你有本事要到工资，那我就不要你。为什么？你们看，每一个工地，每一个工厂门口排队的打工者上百个，我要十里挑一。我们现在使用的是打工者最好的年龄段，老板就要最好的年龄段、最好质量的劳动者，占有最多的剩余价值，给你的只是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那点工资。谁敢说不是这样？工伤也好，病了也好，要交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只能交给打工当地

的政府，被那些发达地区的政府扣下了。然后，无论打工者是因伤因病丧失劳动能力，得回到你的不发达地区去，靠你的贫困地区政府来解决。

这公平吗？这难道不是问题吗？

我请问在座的各位研究经济学的朋友，有谁给我一个经济学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们不同意中央加强统筹、加强调控，给我一个办法。

解决三大差别且不说在我们这解决不了，所有比我们更早转向市场经济、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解决了的。

我们去看看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典型者，如墨西哥，据他们的学者说80%的城市化率，比我们至少高40%吧。按照国家计委测算，我们未来要达到城市化目标，到2020年才会实现50%以上的城市化率，墨西哥现在就是80%的城市化率。人家怎么实现的呢？有人去了解吗？那就是靠大型贫民窟去实现，而在大型贫民窟里面的就是这些大量的无地农民。他们的土地被征占了，或者买卖了。私有制条件下，任何大农场主都大规模占地。任何城里有钱人，也都可以在乡下包一块地，至少弄个别墅。我们中国已经有1个亿的中产阶级人口，谁家手里没有几十上百万？而农民动不动就要现金开支。家里有个病人他能不卖地吗？家里有孩子要上学，他能不卖地吗？

也许我说得太极端，我可以做自我批评，希望大家别计较。但幸亏不仅仅是我说的。大家知道在中央电视台的颁奖晚会上，王小丫说："温铁军有一句话，说农民头上三把刀：上学、告状和医疗。"那是2003年非典刚刚起来，中央台叫我去谈农村问题。我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个"城市老爷卫生部"。教育、医疗、卫生、司法，所有应该提供的普遍服务都是高成本。中央台把节目做出来，台里边领导审查，要把这段话删去。我说也是天公作美，刚要砍，因为非典，卫生部长下台了，编辑紧急请示台领导就用上了。后来这句话就变成社会广泛流传的一句话："农民头上三把刀：上学、告状和医疗。"然后，在党中央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你们看看总书记的讲话——他是一个语气平和的大政治家，他说："农民现在有三难：上学难、告状难、医疗难。"我现在真是感谢中央领导。他们这样说了，我的这些刺耳的话就没毛病了，要不还老担这份心。

根据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现象，你一般讲的现代化上层建筑，就无法

和这个产生剩余过少，并且高度分散的小农村社经济结合。

农村玩得起现代化吗？中国玩得起布朗先生说的“A模式”吗？

三大差别客观上拉大，确是必然趋势。经济学家们已经指出，它不仅现在拉大，将来还得进一步拉大。按照一般的市场方式，能够解决三大差别吗？

我问过墨西哥学者，墨西哥难道不比中国更市场化、更自由化吗？不比中国更美国化、更全球化吗？解决问题了吗？他们承认，不仅没解决，反而内部矛盾在激化。

你们上网可以搜到我的一篇在墨西哥的现场考察报告，叫《现场目击墨西哥蒙面军》。从2000年到2004年这四年期间，我先后去了四次墨西哥，为什么？我目的很清楚，当时不能明说，现在做完调查我就可以说了。我去墨西哥的各种考察各样会议，就是为了每次都找一个机会，去深入到墨西哥和危地马拉边界一带印第安土著民族生活的那个拉卡多尼亚原始森林地区，了解为什么这一带发生农民起义？他们的农民战争已经坚持了九年，至今还控制着1000多个印第安社区，而且在1994年起义时就宣布打响了“反全球化”的第一枪，尽管他们和所有农民战争差不多，打开监狱，释放犯人，宣布农民夺取政权等，政府军一镇压，就退入深山。政府军一次屠杀了大概几十个连女孩子都在内的农民老百姓，就发生了墨西哥全国的抗议。政府不得不跟起义者谈判，他们表示愿意和平，只要政府允许土著自治。这一谈判，就从1994年谈到现在。直到现在他们都还是统一戴着滑雪帽，露一双眼睛，统一穿军靴，但服装乱七八糟、非常土的一支军队。即使这样，他们的军队得到了山区大批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老百姓也都像他们一样，军队戴着黑的滑雪帽，老百姓就用围巾把脸蒙住，露一双眼睛，老人妇女儿童都一样。他们对外完全开放，西方地区记者蜂拥而至。可中国大陆人就我一个去了，我见了他们民选代表、四个司令，他们的自治委员会等。考察以后，请他们帮我安排，由向导带着进了他们的游击区，坐独木舟进去，在他们的茅棚里面住了几天。

今天请问在座的学者，有人愿做这种事吗？

几年来我不仅做墨西哥的调查，还跑到印度北方去做农民起义的调查，了解农民为什么要闹事。最后的结论很简单，无地必反。占1/4以上的大量的农村人口没有土地，难道不反？而今天我们的学者大声呼吁土地私有化，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刚才说的三把刀，你非要逼他砍

下来，农民就得卖地，成为无地农民。现在已经有4000万无地农民了，你们想把无地农民增加多少，能不出乱子吗？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回到十六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五项统筹和综合发展观，能不感慨吗？如果不及时做出决策，把这种单纯追求GDP导致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加剧，转变为追求综合发展的新战略，后果将不堪设想。

十六大强调五项社会统筹，其中的城乡统筹是排第一的吧！

我们如果不能实现这种城乡、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人文等方方面面的统筹，难道就为了追求这种GDP，就得造成社会撕裂、国家出乱子吗？我们这代人给后代人，给咱们会场前排座的带红帽子的小孩们，留下什么？难道给他们留下一片混乱？

所以说，城乡统筹可能是某些人的大忌，可能是我们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的大忌。这意味着不能完全用市场方式来整合中国经济，不能完全用市场的方式缩小三大差别。其实，别说中国整合不了，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整合不了。

于是乎就有更为极端些的、急于成为经济学家的人问我说：温铁军，你为什么不同意中国也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让农民放弃土地进城，不就是进入贫民窟吗？既然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是大规模贫民窟，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出现贫民窟呢？我没法回答。但是，那进入贫民窟的是你吗？为什么不问你自己，是不是愿意在贫民窟中生活？这种人已经异化为非人类的思想，甚至有反人类的思想。

可能我这话说得不全面，虽然要政府发挥作用，但政府也有失衡的时候。这个社会要真打算实现综合发展，需要社会各界的综合努力，需要多方面的参与。所以我们今天说的话不是一般性地给政府辩护，而是为新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辩护，我针对的不是别的，朋友们，针对的主要是三大差别。而如果我们面对三大差别再一般地强调市场化，就可能会偏激地走向连市场经济也要追求的帕累托均衡的反面了。

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到现在，出现了三大过剩：劳动力过剩，工业生产能力过剩，金融资本也过剩。中国的M2与GDP之比曾经超过200%，世界最高。而全世界范围内也是资本过剩。在前不久的那次国际论坛上，我就问所有到会的人，如果你们真的相信过剩是全球化的问题，那中国带着自己的三大过剩，加入本来已经过剩的全球化，是会改

善原有的问题呢，还是会恶化原有问题？没有人回答。

我看我们不必等，还是老老实实地眼光向内，走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条路，中国特色不能放弃。

因此，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不仅是综合发展战略，而且进一步把它变成科学发展观，这是有现实意义的重大战略提法。我认为，如果一旦确定下来，我们担忧的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缓解。是否可以解决？我还不那么乐观。所以，说来说去不外乎是希望大家注意，科学发展观不是一个虚的、云里雾里的东西，它既和中国宏观调控的一系列政策相关，也和我们下一步的发展所面临的三大差别拉大、三大过剩加剧，以及如何缓解这些问题高度相关。尽管这是客观问题，但宏观问题与微观领域中的情况是高度相关的。无论是做企业的，还是政府有关部门的官员，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恐怕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就找不到正确的、合理的办法。

其实也跟我刚才分析所说宏观调控一样，假若一个企业家听了刚才那部分，他应该已经在短短时间内迅速形成反应，形成决策，我应该怎么办？或者你是一个手里有点余钱的老百姓，也应该形成反应。所以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不会回答具体应该怎样，希望大家还是讨论刚才讲的这两个专题。

第二节　政府公司主义体制的发展及其改革的路径依赖注

城乡二元结构在中国是一个基本体制矛盾，也是内向型工业化原始积累派生的。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我提出“三农”问题来讨论的时候，就曾经强调，产生中国的“三农”问题的根源是两个基本矛盾：第一个是人口和资源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这叫作基本国情矛盾；第二个矛盾，是在这种基本国情矛盾约束下又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于是就产生了国家工业化从农业提取积累的客观需求，也就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

大家知道，中国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适合工业、农业和城市发展的平原地区只占国土面积的12%左右，水土光热四种资源条件匹配的地区不到10%，又主要是在沿海地区，聚集了十几亿

人口的大多数。“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乃是经济地理条件约束的结果，并非人为产生。

在近代史上的殖民化和解殖斗争中，中国的仁人志士们知道了必须加快工业化才能有真正的国家主权的道理。如同所有后发工业化国家一样，随之出现的问题是，靠谁来加快工业化？当然，在中国主要是靠长期战争打出来的强势政府，于是中国的国家工业化不是从一个分散的私人作坊起步的资本积聚的进程，这也就在根本上不同于至今没有进入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

（一）研究真问题：中国的政府公司主义

1．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与政府公司主义。

大家都知道，原始积累是任何主义和体制条件下进入工业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至于这个阶段是由资本家来完成还是国家来完成，只是派生的问题。

中国的工业化原始积累是由国家来完成的，也就由此形成了中国的政府公司化体制。至于应该叫什么主义，那是搞意识形态的朋友们关心的问题，搞经济研究的人关心的只是说清楚经济主体是谁。由于这个原始积累阶段的经济主体其实就是政府，因此，我们改革开放之前属于政府公司化经济体制，或者叫政府公司主义。

政府公司主义不是仅在最近60年内产生的，而是在19世纪末——当清朝开始推行洋务运动的时候就开始产生了——也就是以湘淮两军借太平天国之战崛起而掌控的地方政府为主体直接从事工业化，当时先叫“官办”，后来“官督商办”，再后来，才是“官民合办”。

2．两个农业剩余对原始积累的贡献。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改革之前，政府公司主义的国家工业化主要是靠强制建立人民公社这种集体化体制从农业提取两大剩余：

第一，集体化能够成规模地集中土地，也随之成规模地集中农业收益，这就大幅度地降低了国家提取工农产品剪刀差的交易费用。

第二，这种体制能够成规模地集中使用劳动力，替代外部封锁条件下的稀缺程度趋零的资本要素。一般市场经济理论讲的是要素相对稀缺，但在中国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宗主国停止投资之后的资本稀缺程

度趋零！即使有形成市场体制的愿望，也没有现实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用高度组织化的农民劳动力，集中地、规模化地投入于基本建设，以此替代稀缺程度趋零的资本。

3．后期改革的“路径依赖”。

早期的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进程之中形成制度，并且对其后的经济改革构成路径依赖。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改革，被路径依赖所制约，从一个中央政府承担经济主体角色的中央政府公司主义，直接转制为数万个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单位——在农业几乎不再有可能产出剩余的条件下，仍然要靠占有农村土地资源、资金和劳动力来继续维持经济增长。

改革前后之最大的不同，在于此前公司化的政府主要为国家工业化提取资本原始积累，此后则是为国际资本提取剩余。此外，改革后政府公司主义的优势在于强力的宏观调控和扩张信用（例如1997年为应对金融风暴，用国债政策大规模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吸引外资）。

而在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则一方是提取农业剩余，另一方是劳动力集中使用替代资本（劳动力分散使用可以形成作坊，劳动力集中使用才可以替代资本）。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了剪刀差的情况，中国90年代以来物价指数的变动过程说明，无论是高物价还是低物价，都和政府如何导向改革，或者说是和制度变迁有直接关系。

大家知道，由于1972年开始大规模引进西方设备和技术改造国家工业，随后在70年代末出现了严重的财政赤字为代表的支付危机，财政危机下的1980年提出的城市改革思想是放权让利，措施上首当其冲就是财政分级承包，结果是一个政府、一本财政的统收统支体系，短期间演变成了当时70000个左右的政府都成为大大小小的经济主体——从一个中央政府公司化，演变成多少万个地方政府公司化。

于是，就形成了地方政府公司化体制下追求地方工业化的高潮，因此，出现了三次“圈地运动”，都和宏观政策有关。

（二）改革以来三次“圈地运动”与宏观制度变化的相关性

改革以来出现过三次“圈地运动”，可归纳为独具中国特色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发展的核心经验，也体现了农地征占与宏观政策的高度相关性。

三次“圈地运动”中的政府公司化与宏观制度相关性分析，也说明了征地问题表现为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城乡不同方式的原始积累及其资源资本化制度收益分配。

第一次是1984年完成农村大包干之后的“以地兴企”，发展乡镇企业。

国家实行财政分级承包制后，在资本高度稀缺条件下,地方政府急于进行工业化原始积累，这种县级以下地方政府工业化平均每年带动上千万亩土地被乡镇企业占用，同时以1：1.2的占地就业比带动了农民非农就业——因此，不是资本而是农民劳动力和农村土地成为乡镇企业高负债条件下地方工业化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

另一方面，也是当时农村工业化之中的乡镇企业制度创新，既没有引发对抗性冲突、也没有出现“三农”问题，出现的是农民收入和消费大量增加所导致的、典型的内需拉动型的黄金增长！稳定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当年村内土地三年一小调，土地对于村民的保障功能因人均占地而得以强化；土地非农化的变现收益主要在乡村内部分配；农村企业收益替代政府财政功能、增加了对村内的支农开支和村民的社会福利开支。

第二次“圈地运动”是“以地生财”。

起因是1992年南巡之后各地大办开发区和1994年推进分税制改革时期的地方困境——大多数地方政府工业化尚未完成原始积累，却已经导致全国的“两个普遍”：金融系统无论是穷富地方都是普遍贷差，同时是地方财政普遍赤字。这种严峻的宏观条件下不可能遏止的投资饥渴，迫使地方政府把农地拿来作为弥补地方财政亏损和继续工业化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于是，1992—1993年开始了第二轮“圈地运动”。接着出台的分税制改革，客观上也促进了圈地运动愈演愈烈，直到1996年宏观紧缩时被中央叫停。

同期，在农村资金非农化速度加快的同时，土地与劳动力两个要素的非农化比例愈益不合理，政府占地与带动就业的比例下降为1:0.8。加之农民在农业上的收入增速下降，税费负担却愈益加重，遂使“三农”问题浮现。农村衰败反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则是内需不足、经济对外依存度大幅度提高。

第三次是在1998—2003年银行市场化改革后出现的“以地套现”。

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金融危机促进银行的市场化改制。银行变成了

商业银行以后就成为有自己独立的利益的金融资本，其异化于一般产业资本的特性决定了金融部门“追大”和“追快”——银行更乐于追大企业和流动性强的股市、房市、期市。那些越是规模小的、没有流动性的，银行就越得离远，就导致银行必然离开农业和中小企业。而在这种金融异化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工业化尚未全面完成，第三次“圈地运动”由此引发——政府只有拿到土地才能以70%的抵押贷款在金融部门套到现金，用于地方的产业投入。

由此，就出现了高增长、高投资、高负债！这时，如果在宏观紧缩之中中央政府把银根、地根抽紧，土地供应中断，客观上已经绷紧的地方债务链条就断了！可见，已经积聚起来的政府负债与土地金融连接的破产风险将有可能爆发。

这就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演变，高增长＝高投资＋高出口（＋高债务）。

（三）城乡二元结构的缓解

在我归纳的上述两个基本矛盾制约下，我们能否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呢？当然不能。因为当前的高速度增长仍然造成了农村资源要素向外流出。

世界上的任何经济领域，只要它的基本三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是净流出状态，这个领域就一定衰败，这不仅是“三农”问题愈演愈烈的原因，而且导致恶性循环，使得我们变成一个对外经济依存度非常高的国家，一旦遇到国际金融危机，我们就会出现相对比较严重的反应。

这些年，当我们强调所谓出口外向型的发展导向的时候，它的问题其实跟我们原始积累阶段的利益流向差不多，也是两条渠道流出。大家可以看到，就像我们当年集中农业剩余一样，大量的一般商品出口，换汇，导致发达国家出现严重的经常项目逆差，拿到外汇以后再投资到发达国家资本市场，造成发达国家资本账户的大规模顺差或者资本过剩。

这是一个相似的获取剩余的经济流程，说明的是二元结构的普遍性——在我们国内是城乡二元结构，在世界上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

并且，这样的二元结构经济流程也就是今天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要刻意维护的。当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占有这种秩序带来的收益的主导

国家是不会愿意改变的，比如美国就说这个制度本身没有问题，有问题的只是监管不力；而欧盟国家则要求改变这个制度以增加其发言权；至于那些长期被边缘化的第三世界和进步学者如斯蒂格利茨，则要求重建国际金融秩序。

我们超额的向外出口，发达地区地方资本拿到的是国内劳动力应该得到却没有支付给他们的那部分社会保障和劳工福利，通过廉价出口也分享给外资，同时还把土地、环境、资源也在出口中作为一种“租”让渡给外资了。

实际上，我们在一般制造业上早已经没有利润可言，出口的是劳工福利和资源环境“租”！

因为把“租”出口了，所以不可能在地方财政拿到合理的利润来源做二次分配。现在的二元结构也深化为体制了，外来劳动力来打工的人得不到国民待遇，根本原因在于这种经济方式本身的利润几乎可以说越来越小，导致政府几乎不可能对外来打工者有二次分配。

于是，这个时期就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环境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在世界上逐渐增加。

（四）中国可持续稳定发展的战略及其经验

接下来我们看怎么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

大家知道1997年那次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中国与其擦肩而过。这次我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每次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中国都能幸免于难？

因为，它是一个超大型的大陆国家，幅员辽阔，因为城乡二元结构使中国的城市可以向农村转嫁危机的代价——当沿海或者城市出现经济危机遭受巨大外部压力的时候，企业出现大面积的破产倒闭，打工者失业了，怎么办？没有人向这些外来打工者支付失业保险、再就业培训，等等。所有政府对于城市国企职工支付的社会代价都不用向2.2亿农民打工者支付，他们承受的这些代价使得中国的经济危机可以软着陆——代价转移到农村去。他们回家了，家里毕竟还剩一小块土地。所以，为什么说一段时间以来，有关要求农村土地个体化私有这个思路越来越不被人们谈到，是因为危机来了。当土地家庭化占有的时候，打工者失业回来了还不至于发生太大的问题。

其实，上一轮1997年之后的危机已经导致了长时期的通货紧缩，在

经济不景气阶段，也是农村承受了危机的代价，这次恐怕还得这样。这个看法没有预设的价值判断，好坏先不说，只是说这个现象正在发生。

近期很多人谈到的中国政府4万亿投资，我在向海外的朋友介绍中国这次应对危机的措施时讲到，我们在危机之前先走了一步，中国从2004年就开始强调、2005年加大了以扩大内需为目标的新农村建设投入，到这次经济危机发生之时再次决定大规模增加政府开支之前，中国政府在2008年第三季度用于新农村建设的投资已经大于城市，超过了政府投资的一半，这个政策的连续执行，使得我们有条件用内地和农村的投入所创造的新增就业机会，来化解沿海中小企业破产所带来的社会危机和社会矛盾。

同理，我们在上一轮经济危机的时候，用3.6万亿左右的基本建设投资，大体上保持了7%～8%的增长率。测算下来如果我们的增长率低于7%，新增就业就会低于800万人。这一轮如果作出测算，如果我们经济增长率低于8%，新增就业就会低于900万人，现在我们每年新增就业人口大约1000万，如果不能就业的人口超过200万，社会矛盾就会尖锐化，各种事件就会大规模发生。

因此，上一轮我们叫“保7争8”，这一轮大约是“保8争9”。上一轮2.4万亿的国债投资带动了其他投资总量达到3.6万亿。这一轮我们从2005年就已经开始，现在提出增加4万亿，各地提出的加总达到18万亿。而目前国内存款大于贷款的总量在13万亿左右，恐怕还得增发两万多亿的国债才有可能保证现在各级政府提出的投资的来源。总之，这一轮中国仍然会以国债投资拉动“保8争9”的方式来维持住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才能维持住社会稳定。

那么，新农村建设投资增加，客观上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起到打造“第二资产池”的作用——假如90年代不断增发国债是打造了“第一资产池”，现在则是打造“第二资产池”。

农村公共设施与城市的反差，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县级以下3万个乡镇和60万个行政村需要基本建设投资。

1.60%以上的县没有标准的污水处理场；

2.50%的村没通自来水，3亿农村人口饮水不安全；

3.7000万户农民住房待改善；

4.1.5亿农户需要解决燃料问题；

5.1.3%的行政村不通电；

6.100个乡镇、4万个村（占6%）没通公路。

持续增长的农村基本建设投资，能够拉动每年4000亿元人民币的农民购买力，这是城乡公共设施的差距。

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前，财政占GDP的比重大约和OECD国家中低水平的差不多，因此，那时基本上还可以实现财政在基本服务方面的公平性。

瑞典、挪威、丹麦属社会福利高水平国家，财政占GDP的比重是58%以上，而中国在激进改革期间大约从35%左右不断下降到90年代的只有11%左右，政府支付不了基本的行政开支，出现很多严重的问题，比如大规模腐败和武装走私。现在开始回升，2003年升到了21%，加大了财政保障公平的条件，于是开始阳光普照，对农村增加了投资。

这几年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也大幅度增加，就有可能打造“第二资产池”。在90年代末期，政府加大对城市的投资，而现在则需要在农村加大投资打造“第二资产池”。

这应该是与未来一个阶段我们防御全球金融危机有关的一个基本国策——加大农村投资，改变城乡二元体制结构下农村屡次成为经济危机代价载体的状态，以使中国逐步实现相对稳定条件下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节　我们是怎样失去并又重新得到迁徙自由的注

（一）背景分析：改革及其前景

1．对改革的规律性认识。

人们大概都知道，在改革前近30年的国家工业化初期阶段，城市人口享受从出生到死亡的各种保障制度，是靠国家财政补贴维护的。但很少有人认识到，这种对城市人群提供全程保障的制度，一方面能够让国家以“许诺未来”而低成本地换取劳动者的几乎全部剩余，政府仅用了不到30年就高速地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另一方面，相对于占人口80%、不能分享工业化收益却只能提供积累的农民而言，又能够在这个特殊的阶段内有效地把以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为主体的城市人口，变成对社会

起稳定作用的“中产阶级”。

客观地说，当年政府提供的尽管是最低水平的保障，但它确实维护了城市社会相对的安定团结。

由于国家在“五五”和“六五”计划期间基本完成了工业化所必需的原始积累，于是就必然会出现改革：

一方面必然进入国际市场实现大规模交换，并且按照市场规律调整经济结构。这就是中国20世纪70年代提出“引进外资”、 80年代提出“市场取向”、90年代提出“市场经济”改革的客观背景。

另一方面，代表产业自身发展要求的部门或集团也必然会对原来制度框架内部不能实现其利益要求的内容进行重构。这就是我们先后出现“财政甩包袱”、“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以及“行业垄断”加强、贫富分化加剧等各种变化的原因。

随之，当然会导致产业结构改变和社会制度的重构。

2．为什么不能对改革寄予太高的希望？

对上述规律的认识所得出的结论很简单：我们对这个改革的阶段及其前景不应该寄希望太高，因为：

其一，以“许诺未来”换取剩余，只可以在特定政治条件下才会有效。今天无论再怎样许诺，我们也根本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建立过高成本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由于原有的由财政负责的城市保障体制已经解体，因此，如果不重新调整实际上已经被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占有的“国有资产”的产权结构，则既不能使财政形势根本改变，也不可能长期维持社保开支。甚至由于垄断利益集团不愿意为实现“保稳定”这个大局作出让步，而社会弱势群体又没有条件形成压力，因此很可能使得决策者即使面临严重经济困境，也难以作出调整“存量”的改革选择。

其二，近期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如果我们也像某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偏重加工贸易型的“出口外向型”经济，允许泡沫化的金融资本“自由流动”，则无异于在国内资本尚且不强大的情况下，就让庞大的国际资本分享本来被国家垄断资本独占的“货币化”利益，这不仅会导致以“资源资本化”为实质的经济增长的收益大量流出，不仅会在劳动力过剩和自由市场的作用下，必然造成劳工价格不断下降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不仅会进一步加剧区域差别，而且，国际大资本左右国内决策这种最让国人难堪的情况也会由暗转明，其社会后果自在不言之中。

3．改革的主要障碍何在？

我们讨论的“迁徙自由”问题，与上述背景分析高度相关。

现在的政策研究人员应该看到，那些能够参与资本收益分享的发达地区，可能成为把“自由迁徙权利”重新写入宪法的主要障碍。其实，现在发达地区的政府制定的社保政策，在国家不承担“全国统筹”义务的条件下，必然是有利于本地利益集团的。

因此，即使把迁徙自由写入宪法，在没有宪法法、尚且没有违宪罪的判例的情况下，已经成形的、不利于外来打工者的地方政策也难以改变。

（二）历史辨析：失去迁徙自由的过程

“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是毛泽东在城市遭遇经济危机不能增加就业、必须动员城里青年人下乡插队的时候说过的话。

对过去的问题，今天的人们很容易用所谓“这是计划经济造成的”一言以蔽之。但如果我们都承认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经济规律是不可以逆转的，那就必须把当年的经济发展及其遇到的问题作为背景。其实，恰恰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经济危机，导致“自由迁徙”从宪法中被取消。

1．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三个原因。

随着1958年人民公社的建立，中国形成了城乡分割二元体制，人口的自由迁徙也就随之从1954年宪法中被取消。人们一般以为这是计划经济使然，但这其实是由当时的经济危机造成的。

在1952—1957年的“一五”计划时期内，大约有2000多万农民工已经自由流动进入城市。但从1959年开始到1960年，大概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又从城里迁出2000万人，其中至少与三个原因高度相关：

第一，1956年“苏共20大”赫鲁晓夫作了彻底否定斯大林主义的“秘密报告”。其实，苏联在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以后形成了社会化大生产，这必然要求纳入国际分工，因此有所谓“苏共20大”及其后的国家战略全面转变。而中国正在“一五计划”代表的国家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实在不可能跟上苏联的发展战略调整。于是中苏交恶，苏联随即停止对中国工业化的后续投资，而此时中国自身的工业刚刚起步，尚不足以形

成自主扩大再生产的能力。

第二，1952年以后，中国转变1949年确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战略，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加快工业化进程，而且当年的财政体制是“统收统支”，全部工业投资出自政府。因此，苏联停止援助后，中国政府财政赤字随即大规模增加，1958年到1960年连续三年财政赤字累积约270亿（当时的财政总规模不到600个亿），高额财政赤字当然就导致政府基本丧失了扩大再生产的能力，第二个五年计划不得不暂时中辍。没有新增扩大再生产就没有新增就业。于是，从财政赤字大规模发生以后，1959年政府就开始把已经进城的人向外迁移。同时期，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政府在公社一级建立财政和农业银行机构以全额提取农业剩余，并且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结构来保证这种内向型的资本积累。

第三，在朝鲜战争及其后的地缘政治环境下，中国“一五”时期所建立的是以军重工业为主的国家工业体系，而重工业有一种内生的“资本排斥劳动”的机制，这也是发展重工业就必然导致就业下降的结果。在没有新增投资的条件下，客观的趋势是城市连自己新增的就业问题都不能解决，不得不向外排斥。

2.经济危机与三次“上山下乡”运动。

从20世纪60年代起，城市人口“上山下乡”就一直在延续。也就是说，每当城市的人口增加到一定的量，而城市经济又进入危机和萧条阶段，在不能吸纳这些新增人口就业的时候，就会有一次城市人口向农村迁移。

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我国的经济确实不可能随着工业发展来带动农民的非农就业，相反，是城市必然要向外排挤过剩人口。“文化大革命”时期，尤其到60年代末期经济完全不能正常发展的时候，政府就不得不发动、动员，甚至强迫城市不能安排就业的人都下乡谋生。

可见，当时知识青年都会背诵的毛主席语录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那确实是大实话。

这个逆向的迁移过程表明，在1958—1960年第一次财政赤字导致国家工业化出现危机以后，每当财政缺乏扩大再生产投资能力的时候，就会有一次“上山下乡”运动。从1958年开始先后进行了三次，都和经济危机本身直接相关。

因此，我们对过去的经验很难一言以蔽之，至少不能简单地把过去的问题归结为都是计划经济造成的。

（三）“离土不离乡”：重新得到迁徙自由的解析

人们大都知道，2000年的重大政策改变之一，是中央政府宣布从当年10月1日起“县以下放开户口限制”。随之，有些沿海省份进一步允许省内人口自由迁徙，有的省如河北，甚至连省会城市都允许农村流动人口按照居住地和职业转变身份进城。亦即，我们已经得到迁徙自由了。

只不过，该项本来应该引起农民欢呼的政策实行以来，很多地方反映，城市户口实际上很少有人问津。为什么？难道进城农民不是都愿意转变身份的吗？

面对这种现实，建议我们的经济理论界进一步思考，在这“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近10年里，有哪些认识误区。如果认真地、客观地看改革开放24年以来的政策演进过程，可能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人口迁移的问题。

首先，是理论界的误区。

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发展的时候，政府的应对政策是强调“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当时，很多人对这样的政策和乡镇企业的分散布局就提出了强烈批评，要求乡镇企业集中。于是各地大搞各种开发区，严重剥夺了本来应归农民所有的土地增值收益。再后来，人们则照搬国外理论规范，强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非把私有化改制生搬硬套到本来就与意识形态和公有制风马牛不相及的乡镇企业上，其实从根本制度上限制了农民作为真实投资主体分享农村工业化资本收益的机会。

搞到今天，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为“三农”问题的真实写照，理论界突然找不到“屁股”来打。不知道他们是否愿意在批判决策失误的时候把自己的错误也捎带上？而之所以出现这些误区，就在于少有人下基层，并实事求是地分析当时的客观情况。

其次，20世纪80年代为什么强调“离土不离乡”？当1984年卖粮难发生以后，1985年农民自发地减少了7000万亩的种粮面积，大规模种上了经济作物。同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导致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此时，农副产品的充足供应，本身就推进了农村经济市场化和农

民进入城市的要求。于是，在1985—1986年的政策讨论中，就已经提出了进一步发展乡镇企业和开通城乡的建议，但最终还是强调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农民"进厂不进城"。

杜老注曾经讲过，当时的中央农研室提出允许农民进城的建议，尽管领导也同意考虑，但几乎受到所有城市部门的反对，最后只在1986年的"一号文件" 写进去一句加了限制条件的话：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

因为，那个时候城里确实是用财政补贴来维持城市人口的全部社会保障，城里人"生老病死有依靠"，这使得城市人群基本构成了能够稳定社会的"中产阶级"。因此，社会上的刑事发案率也非常低，任何人都怕犯"错误"，因为他的全套保障都在"单位"，而当时"单位"的收支又几乎全部由国家财政负责。

客观地说，尽管政府维持的只是低水平的保障，但仍然基本能够保证社会安定。

而乡镇企业在创办期间根本离不开农村，其制度本来就不应该等同于一般城市中小企业。因为，当时的基本原材料和主要工业品完全在国家计划控制下，除了依托农村资源开发之外，乡镇企业只能以土地和劳动力换取那些被纳入计划分配体系的城市企业转移的初加工或粗加工。无论后来怎样发展，其资本积累也只能来源于土地和当地资源的资本化，以及劳动力的剩余价值注。

（四）人口大规模流动：重新得到迁徙自由的历程

1．为什么打工潮起于1992年？

1992年以后中国突然出现前所未有的打工潮，当年就有大约4000多万农民工流入沿海和城市去打工，此后外出打工农民越来越多，1993—1994年增加到6000万，到1995—1996年曾经达到约8000万。这主要是因为，1989—1991年农产品的全面卖难导致了1992年的粮食市场几乎全面放开，于是农民进城既没有必要带"粮票"，也不必再"自理口粮"。因此，只要有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别，当然就有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首先看劳动力的需求变化。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中国经济进入高涨时期，对劳动力的需求特别是对粗工的需求大幅度增加。1992

年经济高涨是以沿海开发区建设为主要动力的，而开发区建设要求“三通一平”、“七通一平”，需求大量粗工去挖土方、盖楼房、修马路，修建电力、电信和排水的各种渠道。这种客观变化形成了对劳动力的市场需求，带动了劳动力大规模的流动，同时也引起了各地政府的政策调整。

此外，这和20世纪90年代初期第二次出现的农产品卖难有很大关系。

全国自上而下贯彻家庭承包制的1984年发生了卖粮难，引起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业结构调整，农产品全面增产，这又导致80年代国民经济出现“黄金增长”。

同期在城市，1988年的“价格闯关”改革，造成在物资相对“短缺”条件下的物价大幅度上涨，政府随即实行“宏观紧缩”政策导致城市需求下降。于是，农、林、牧、副、渔等大宗的农产品在20世纪90年代初普遍卖难。

据当时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的统计，1991年十几种主要农产品需求弹性大于1的只有一两种，其他大部分需求弹性都在1以下。在那种情况下，其实恰恰是农产品的充分供应和食品价格下降，就把城市财政补贴的食品保障的体系打破了。加之1991年苏联作为国家的全面解体，给了中国深刻的教训。于是，到1992年初，全国大概只有二十几个县粮食还没放开，猪肉、粮食、油料、棉花等大宗农产品基本放开，副食品随之也放开了，粮票和各种票证也都逐渐取消了。

没有了粮食和副食品票证供应这个限制条件，1986年“一号文件”提到的“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政策也就没有实际意义了。

可见，一方面是没有口粮限制，没有副食品供应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农民在农产品卖难的情况下不得不追求非农收入，这才有了农民外出打工导致的劳动力大规模流动。

因此，是宏观条件的变化导致了农村劳动力自发地市场化这种制度改变。

2．加速城市化和允许农民自由迁徙的政策为什么提出后又暂停？

1992年农民开始大规模流动的事实，一度推动1993年开始的户口制度思想的重大改变，那时在多部门的政策讨论中，就已经提出不搞身份限制。

在1994年，公安部的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草稿已经写出来了，其基本精神就是改变管理原则，按照职业和居住地来建立户籍管理制度。

但为什么那时没有最终变成政府的文件？是因为1994年以后宏观环境变化。

由于1994—1995年再次发生通胀，到1996年的物价指数高达约24%，并且1995—1997年期间政府再次采用传统手段进行了宏观“治理整顿”，本来已经起草的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被暂时搁置，自由迁徙才重新成为问题。

具体情况是，1994年年底这个文件的草稿出来以后，在征求各部委和各地意见的时候，又出现很多难以协调的现实问题。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大城市显然不能完全实行放开户籍政策。当时有些大都市为了应对这个文件甚至提出每一个户口迁移至少要增加几十万元财政开支，而且近郊、远效、城区的户口分别差多少万元。这个费用大致等于每个市民享受的公共物品和政府补贴的总额（后来，世界银行曾经测算出城乡差别的修正系数为0.7～0.72）。其他不同规模的城市，也有不同的“卖户口”价格，各地政府应对性的地方收费政策已纷纷出台了。对这类差别很大的地方政策是否应该承认，如果承认该怎样规范？

第二，农民进入城市是否必须放弃在农村的土地权益？理论上农民不能在城乡都占有生产资料，事实上却是农民的承包土地只是“最低生活保障”。如果农民进城必须退了土地，是否能够在城市享受政府提供的社保？如果要让社保覆盖所有进城农民，各级财政要增加多少开支？

第三，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加出现了新问题。逐年增加的社会犯罪中，流动人口犯罪的比重相当大，从1994年的统计材料看，70%新增刑事犯罪来源于流动人口犯罪。因此，应该搞“小城镇、大战略”，还是应该向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允许流动人口自由地向大城市集中？

3.从宏观政策上看20世纪90年代的问题和20世纪80年代的问题不一样。

首先是宏观制度出现了重大改变。从1994年开始提出分税制改革以后，各个地方都有自己明确的财政自主权，对不同税种的征收和分成的权利，这和过去1983年提出的财政分级承包有重大差别。1994年人们讨论分税制改革到底意味着什么，在当时就有人指出：既然分税制是联

邦制的财税基础，那接下来就得改变中国的集中制政治体制。东、中、西各个地区的不平衡发展会越来越明显，而且会越来越显化为地方政府的收入差别。

此外，随着农民工大批进城引发了是否开通城乡等讨论，这既遇到了重大挑战，也形成新的机遇。因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出现了大量职工下岗或者失业，这导致一些城市政府出台限制农民进城就业的文件。而在同期，也是因为政府财政在赤字不断增加的条件下无力承受过去那种补贴负担，于是开始进行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等。这一系列相关改革不仅有利于人口自由迁徙，而且反过来也影响着城市化问题的政策讨论。

只是，这时候的讨论不再是理论上的国民待遇或是权利上是否平等的问题，而更主要的是在财税体制已经改变的条件下实际操作层面上的问题。

由于相关问题复杂，所以，1995年国家11个部委联合提出小城镇建设的政策框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福特基金会也投资支持小城镇改革发展的试点项目。

此时，各部委都进行不同内容的改革试点。例如，公安部就提出先选择大概100个城镇搞户籍改革试点。

4．本来就没有人明确反对开通城乡。

上文引述80年代时的政策提法，当时就没有人明确反对开通城乡，也没有谁反对应该让农民自由进城，而是各部门提出的实际问题，中央政府的决策者解决不了。

人们提出的问题是：农村人口进来以后教育经费谁开支，道路、交通这些增加的开支谁负责，如果公共物品都是财政开支，其经营也是政府补贴的，如果城市人的粮棉油肉菜蛋都是补贴的，新增人口需要增加的开支和补贴从何而来？

这些实际问题提出以后，尽管中央农研室提出的建议在80年代还具有显著的“政治正确”，但也解决不了这些现实问题，所以开通城乡这种理念退下来，变成文件中能够对应解决实际问题的一句话。

综上所述，是1989—1991年农产品的卖难，迫使1992年的农产品市场进一步放开，导致了1993年的户口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发生重大改变。后来，随着20世纪90年代宏观条件变化，财政终于保不起城市补贴

了，影响开通城乡的体制问题也越来越少了，才有现在的户籍改革的重大突破。

可见，微观制度上的变化过程和宏观形势的变化过程基本上应该是一致的。

（五）谁可能反对自由迁徙

从逻辑上看，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实行家庭承包制，随着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农产品市场的放开，就应该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允许农村人口有自由迁徙权。但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的问题是当时年代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的问题也是当时年代的问题，进入了21世纪，我们面对的问题和原来也有了很大的不同。

因此，我们应该注意研究不同年代的政策对不同地区的相关影响。

1.劳动力市场化流动的问题。

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分析完全市场条件下要素的流动，为什么1985年提出的“梯度发展理论”和“先富带后富”的政策没有能够成为现实，为什么东部资本过剩却并不西进、仍然是资源和劳动力“一江春水向东流”？

我曾认为，这些年之所以资本不能西进，是因为完全放开劳动力市场以后，劳动力在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形成的劳动力价格极低，那么投资人在东部地区完全可以坐享投资利益。

比如在广东，粤北粤西离珠江三角洲都不远，为什么在同一个省内资本流不到这些贫困地区？就是因为粤北粤西的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到珠江三角洲去。

再如，2000年4月我在江西调查的时候也看到，周围是资本密集区，唯独它是“盆底”，为什么？就是因为劳动力可以从外部流入，沿海和大城市的投资人完全不必支付劳动力流动成本，也不必为打工者支付社保费用，因为外来打工者的社保仍然依托在家乡的土地上。这也是打工者十年工资不变、实际收益下降和劳工待遇难以改善的客观原因之一。

因此，尽管不发达地区提供再好的条件，即使土地不要钱，只要投资者的比较收益仍然高于西部，他就不愿意“资本西进”。

我并不认为因此就应该挡住劳动力的流动，当然应该继续促进劳动力在市场的作用下继续流动。客观上看，这是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使然。其他调查也指出，四川、贵州等土地资源短缺地区，每年有几百个亿的劳动力的打工资金能够流回来稳定农村的户营经济。

2．不同地区搞社保制度的利弊问题。

现在讨论自由迁徙，问题应该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首先还是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地方政府财政收支不平衡还不止于税制带来的。更大的不公平还表现为，不发达地区的农民必须为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贡献自己根本得不到的社会保障开支。因为，打工者的社保个人承担部分在打工地已经支付掉了，发达地区地方政府把那些献出最好青春年华的农村劳动力的那部分社会保障支付占有了，并用于支付本地人的社会保障开支了。当然，发达地区是愿意维持这样的状况以保证自己少支付公共开支的，因此，在发达地区政府建立的社会保障专门账户，基本上是能够做到收支平衡的。

而不发达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社会保障账户，是肯定建立不起来了，因为劳动力最好的年龄所支付的社会保障，其实已经被发达地区所占有。劳动力回乡时不能带走已经交纳的社保基金，尤其是那些已丧失年龄优势的、病残的劳动力，他们回来以后造成的社会负担，必然转化为不发达地区所承受。

3．企业与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

所以我说，自由迁徙重新写入宪法当然会有阻力，阻力在哪儿，就是在发达地区。

因为一旦写入宪法，包括发达地区在内，都应该无条件执行，而且应该根据这个条款来修改中央和各地的相关政策。但如果我们承认企业家是以利益最大化为第一目标的所谓理性经济人，那他更愿意的就是现在的制度。因为这种制度会源源不断地保证最好的劳动力来让他以最低的工资支付，一旦最好的劳动力所支付剩余价值被企业占有以后，就得让他们走人，还会再来一批新的最好劳动力，所以发达地区的企业家恰恰是跟政府的利益高度一致的，他们恰恰不愿意让这些劳工形成利益集团。

也许，发达地区当地的劳动者可能形成某种形式的利益集团，但那个集团是否是主要的利益主体呢？当然不是。因为它并不在政府的利益

分配范围内，有必要推行社会改革时，政府也许拿它抵挡一下。

可见，重要的不是宣布自由迁徙是一种宪法权力，要求任何地区的政府和利益集团必须无条件接受，而是对现实问题背后利益集团的清楚把握和相关制度条件的理性改变。

第四节　资本下乡的交易成本与乡村建设中的社会企业注

我先汇报一下对各地资本下乡经验的一般归纳，再提出对社会企业的分析。

（一）交易成本较低的三种“在地化资本”下乡

这2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能够和产业资本比较平滑的进行交易、低成本结合的乡村发展方式，大体上有三种。

第一种是村社集体形成的在地化产业资本。

主要是原来社区集体经济相对比较发达，最近20多年来发展比较快的这些地方。一是，当社区整体上完成工业化初期的资本原始积累之后，在地化的产业资本就形成了，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企业；二是，那就必然出现一个规律，就是这种社区化的在地产业资本与其他存在形式不同的产业资本一样，也要推进产业扩张。

我们在各地调研所看到现象是什么呢？一般形式的外来产业资本向乡村扩张，必须要和资源所有者进行交易；而当外来企业把分散小农作为对象造成交易对象过多的时候，交易费用上升，交易无法进行。

我们都知道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道理：产生资本收益的内在机制是把资源资本化。我们也知道国内的一个道理，所谓不发达地区之所以不发达，是那里的资源虽然比较丰富，但它的资本化的主动权不在地方手里。

比方说，陕西延安地下有油、有气，那延安的油气资源却不归延安地方政府和社会公众掌握，而是归中石油、中石化掌握。亦即，大多数地方矿产资源的开发一般归国家大公司掌握。20世纪90年代初开发延安

油田的时候，当时的地委书记就说：现在是我们贫困地区在“扶国家的贫”。因为上头把下头的资源占有了，变现了，收益拿走了，可我们还是贫困。

这些年在各地调研和地方领导干部交换意见，我受到很多教育。中国是在政府控制的范围内实现资源向资本转化，这对于我们这种单一制国家而言成本相对比较低，只要上级有命令，下级就要把资源的开发权利交出来。资源开发、资源资本化所产生的产业资本收益，也就由上级的大型国有垄断公司占有。而地方和公众，尽管资源丰富，却仍然贫困。

但是，农村中形成的社会企业，或称“社区化的产业资本”，却根本不同。

比如江苏的华西村，它的产业资本形成之后也需要扩张，也必须要跟别人交易。如果它一点点的扩张，一家一户去跟周围其他社区的农民交易，则交易对象就是千家万户。因为苏南那地方人均不过半亩多地，华西村企业集团要想建厂区，要占别村的地，如果与邻村的一家一户的农民去交易，根本不可能。

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上半期，此类社区产业资本密集的地方都出现了一个现象——整村兼并。山东的集体企业、社区的集体经济也是这样做的，江苏也是这样做的，像华西村前些年就兼并了周围四个村。纳入华西总人口规模就变成了4万。对于华西的好处是什么呢？等于把周围的几千亩地变成它的了。它的企业如果占有这些土地，就用村内方式的交易，不用付征地费，那4千亩地，按照一般工业开发一亩地30万，占有4000亩地是多大的资本？华西支付的什么呢？不外是四个村的所有人享受华西人的村民待遇。给他们盖房子、养老、上保险。这等于做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国家大包干以后农地对农民的双重功能中的福利保障功能给区分开了。注意，在土地相对比较稀缺的地方，土地更是村民们主要的保障。华西村用这种方式低成本占有了其他社区的资源，把他们整合进了华西，华西产业资本就扩张起来了。它用很小的成本，不过是支付了房子的建设投资，何况它自己有建设队建起来。所以说产业资本的低成本扩张，在社区内部的交易成本为零，不用单家独户去交易。注

这是第一种模式，主要是社区内部长大的产业资本，对周边做整村兼并，在村社内部交易费用非常低，借此实现了低成本扩张。

第二种类型是村社出去的能人在外面形成的产业资本。

若看与第一种的区别，那就是社区集体自己没有形成什么产业资本，但它村里有能人，出去以后在外面形成了一块产业资本。回过头来，对本村进行全面改造，以整合本村范围内所有资源。这个类别中的典型案例，就是最近看电视报道那个企业家梁希森，自己在外面开发房地产挣了钱，回头把自己本村改造成黄牛产业基地了。这个本村出去的能人再回来整合当地资源的交易成本也比较低，因为他是先给本村人构建了福利保障体系，也是把土地上承载的农民福利功能剥离开来，才换得了村域范围内的全部资源。

费孝通老先生当年的理论研究指出，社区的血缘环境和地缘环境，使得商品经济的关系在社区内难以发育。但，毕竟社区的血缘环境和地缘环境是一种人文化的广义制度。他可以使得在外部形成产业资本的企业家，回来整合自己本社区的资源，只要承担村里的社会功能，相对的交易成本就会比较低。

第三种是政府推进本地化的经验。在发达地区已经变成有普遍性的政府经验了。

比如江苏浙江都是全省范围内搞“农村现代化试验”。早年江苏提出搞“农业”现代化试验的时候，对于老一代的省领导、省委农工部长的思路，我跟他们交流很多次，说你们改一个字行不行？改成搞“农村”现代化。后来领导班子换了才接受我们意见。核心内容是怎么把江苏这个地方可整合的农村资源整合成村社为载体的、在地化的、较大规模的产业资本。这是一个地方振兴产业经济的内在机制。

我们说改革是什么，改革是转换经济机制。如果改革工作没有把功夫下到转换经济机制的根本上，则事倍功半。

当年江苏要在水网地区搞农业现代化，大上农业机械，搞喷灌和滴灌，大量投资搞规模化大农场，基本建设投资上去了，农业成本过高、没有竞争力的毛病也出来了，投入产出比严重不合理。为什么建议他们改成农村现代化呢？就是因为江苏农村已经有了一批成规模的企业，然而这些企业需要完成社区化改制，否则对外部做产业扩张及其困难，尤其是那些镇级的企业对周边村扩张。因为，如果村这级土地完全由个体承包了，那镇级企业不仅和周围的村没有办法交易，而且直接去和分散农户就更没有办法交易，现在产权确定到个人化了，整合资源的难度极大。

所以，我们当时的建议是扩建中心镇。一个县市的范围内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乡镇，每个乡镇资源量都很小，哪个乡镇也不能按照资源与产业的合理布局去做整合。所以要搞中心镇战略，一个县域里面不要超过10个中心镇，最好是5个以下，其他的乡镇都改变成街道办事处，它还是一个镇级单位，但是变成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中心镇对整个周边多少平方公里的资源都可以整合。中心镇变成副县级，下设各分局有县级的职能。于是整体上来说中心镇的经济水平上去了，包括结构调整成本都会降低。

如果村级社区已经实现了工业化之后，乡镇再要整合镇域资源扩充产业就很难。最难的是如何降低与社区产业的交易成本，这需要形成一个整合机制。同理，县域各级政府的工作是如何在本地资源的整合上降低交易费用，这本来就是一种机制问题。所以，改革如果就是转变机制的话，那发达地区的真实经验是什么？真实的、起作用的经济机制，就是如何以相对比较低的交易成本来形成产业资本并且促进产业资本扩张。

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竞争主要靠的是资本的规模，无论是区域性的资本还是行业性的资本，只要你能够在规模上打赢别人，就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就是世界范围内老是在搞500强。

前三种模式，都是社区内部的力量可以低成本整合资源，这就利于产业资本扩张。

上述三种产业资本下乡的交易成本比较低，主要归因于有在地化整合条件。

（二）交易成本较高的外部资本下乡

那么，最容易引发冲突的是政府招商引资请来的外部资本强行进入农村。

前不久和某个产业集团座谈，感觉这种外部资本下乡的方式引发对抗性冲突的风险，比江苏那种地方政府推进内部整合要大得多。

这个集团最典型的案例是改造济南东郊，那里过去就有好多问题村、上访村，群众一听说要改造东郊，不仅以往累积的矛盾爆发出来，不解决就拒绝拆迁。而且没有矛盾的老百姓都忙着房顶上加层、盖小棚，好等到以后跟企业交易出更好的获利条件。这样双方的利益根本上

是对立的，凭空增大了很多城市化占地的交易费用。

其中也有个比较聪明的做法是利用原来的社区企业，通过合资控股让出企业占有的社区土地，这就使土地资源变成社区资本受益，至少有一部分让渡给社区群众，以减少外部资本直接进入村内对付单家独户的交易成本。否则，哪怕有一个钉子户，你敢去拔吗？过去大家知道很多报道揭露了现象，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城市化扩张自己去动钉子户，几乎没有一个处理好的。

现在，宏观环境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比如，为什么这两年农村中的群体治安刑事案件、社会冲突减少？农民负担过重引发冲突大幅度降低，可以说降低了80%，这主要是因为中央减免农业税，加重农民负担一票否决。所以现在农民负担引发的治安事件大幅度下降。但与之对应的是，土地纠纷引发案件大幅上升，尤其是现在城市拆迁的办法已经是非常铁的情况下，去年文件出台以后征地的补偿标准提高十倍以上。这些宏观条件变化，就导致外部的产业资本要想进入分散农户占有土地产权的社区，其交易费用大幅上升。

现在，只要发生冲突，政府立刻退出，站在农民一边。这是因为中央政府的态度变了。这种宏观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也导致外部企业下乡的投资风险大幅度增加。

而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又是一个资源高度短缺的国家，最短缺的资源不是资本，是土地和石油资源，矿产等资源。现在石油资源、矿产资源基本是被中央政府垄断的。那些还没有被垄断的资源，现在贫困地区的政府搞招商引资，吸引分散的民间资本大幅度“西进”，去跑马圈水、圈煤，其实质是民间资本的原始积累，就造成了类似阜新矿难这样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地方政府传统的执政方式造成的，是没有按照执政党的新的保持先进性教育而改变的那种情况之下形成的问题。这就是今天的政治环境。注意，中央2004年提出“和谐社会”这四个字，非常明显地告诉你这应该叫做人民内部矛盾。但是，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适当把它激化成对抗性冲突是各地普遍发生的问题。

今天的中国，在产业资本形成之后，它面临的必然的趋势就是产业资本要扩张，但能够直接变现的资源被中央垄断了，没有直接变现的资源在农民分户经营手里，现实问题就是怎么跟农民交易，

外部资本想进入乡土社会，凡是成功了的，必然有特殊的办法，而不存在沿用过去的手段就能成功的可能。外部产业资本介入乡村，要想整合地方资源，就得跟农民降低交易成本，没有技术含量是不行的。因为，强行征用是过时的办法。而且当各地“保先教育”逐步完成的时候，无论哪一个地方政府，当发生社会冲突的时候，都不敢再公开地站在企业一边。尽管让地方政府老老实实站在农民一边，牺牲企业家的利益，也不可能。但这时候企业投资风险就大幅度提高了，整体上看中国资本过剩的巨大压力就要出问题了，那就需要搞出另类发展模式来。

（三）乡村建设与社会企业

如果企业能够以乡村建设的方式来化解过高的企业投资风险，来减少政府和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这就是社会企业的创新模式。

这种社会企业模式，清末民初就有。毛泽东肯定的新中国成立前几个“中国人民不能忘记”的企业家，其中有像张謇这样清朝“最后的状元”比较聪明，他最早提出“村落主义”，1895年开始在南通搞了20年的“在地化”的农工商企业，带动了县域经济与社会的综合发展。此外，创办民生公司的卢作孚是1925年起步，到20世纪30年代，以及整个抗战期间，也是体现社会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把重庆北碚变成了镇级综合发展试验区，整体改造这个离重庆四十公里左右的地方，让老百姓——周围各村的农民都能够随着他的企业在地化进程，改善一点自己的境遇。

可见，这种乡村建设方式早年的张謇和卢作孚就干过，这种方式当年是可行的，只不过取决于对在地化企业如何设计，如何选择一种低成本的进入方式与乡土社会有机结合。

民国年代的乡村建设中形成了世界最早的社会企业，应该是我们中国发展经验中的国粹。

众所周知，晏阳初当年下乡到河北定县，提出农民有四大问题：愚、穷、弱、私。所以他到农村去从教农民的孩子起手，从扫盲入手逐步发展，一直到1949年。梁漱溟早年是北大唯一没有学位的教授，中国近代史上之“最后大儒”者，在山东省邹平县做县乡村三级治理试验区。于是，中国历史上就留下了晏阳初的定县试验、梁漱溟的邹平试验。同期，还有黄展云、陶行知、卢作孚等，这叫乡村建设的不同流派。

分析历史上的乡村建设运动，和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当年在农村问题上最大的不同观点，在于农村有没有地主与农民之间对立的阶级矛盾。今天的主流观点与当年乡建派的观点完全一致，认为农村没有阶级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好就能构建和谐社会。所以，领导干部要抓好如何稳定乡村这个历史意义的大事。因为乡村没有阶级矛盾，税费改革之后没有税了，对立矛盾必然缓和，同时也带来了组织空白和制度空白对乡村治理的威胁，我们不能把乡村治理留给黑恶势力、家族势力、非法宗教，留给各类非正规组织，还是要发展良性的正规组织，这就要搞乡村建设。乡土社会中留下老人和妇女，主要是帮助农民搞老人协会，让大家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还得帮助农民搞妇女协会，妇女们谁家有事、大家一呼百应。只有大家安全了，村里有点文化活动了，弱势群体也能够互相帮助了，这就稳定乡村。要不然现在一亿多人口外出打工，很多乡村就空虚化了，留下的属于弱势群体，被各种势力欺侮伤害无力应对。

既然是小农户分散的原子型经济根本抗御不了市场风险，那怎么办？乡建历来强调搞合作社。我们搞合作社其实也很艰难，农民不是不愿意，让他不拿钱入股咱们成立一个协会，那很容易，一忽悠就起来了，但是一下就垮了，大家没有利害关系。我们搞的合作社非常正规，社员每户必须交100元入社费。但是，农民不愿意交钱，不放心。咋办？那我先交一万，而且让我这些年轻朋友告诉农民，这是温老师从个人存款拿出的一万，我入社费一万，比你村里人多100倍，再说让农民交100，他就会愿意交了。对农民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要是纯粹靠晓之以理，他可能不听，那就要动之以情。我告诉他们：我这1万入社费只做股，不计利息，以后合作社有收入了可以用于公益事业，这样说，社员又感动一把。我接着说：你们干好了，你们得好处；万一你们干不好亏损了，就先拿我的钱去抵补，不要用你们的钱。这样，我的入社费起了防范风险的垫付成本。对我个人来说钱不算小数，但对农民来说也不算大数，它有什么作用呢？在于有人带头，用带头人的钱来承担风险，用它的受益来从事公益事业，这样带动，农民就入社了，我们一发动，一般一个村有几十户，上百户就入社了。

这就是乡村建设运动通过有良心的、健康的、正规组织建设，来替代掉一些非正规的、不健康的组织。比如说，咱们村里的妇女协会建立起来了，大家知道云南有些地方毒品、赌博比较严重，妇女协会可以联合妇女帮助劝阻，防止家庭暴力。

现在城乡统一推行现代法制，有些观念在城市是对的，但是对付乡土社会，靠执法机构去对方成千上万的分散小农，同样存在交易成本过高的困难。所以我们的乡村建设其实是利用传统，改造传统。利用旧组织，发育新组织，利用旧制度，发育新制度。好了，我们做的事情先说到这里。

我和这里的企业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来北京找我，跟我说想学卢作孚，想按照历史上卢作孚在北碚搞试验区的办法搞乡村建设，也就是借鉴和利用我现在干的乡村建设这些事情。这些事情我比较熟悉，但企业如何运作，如何投资，如何盈利，这些是他们的事情，我不管。但是，如果两边结合得好，那就是我帮企业降低了投资风险，帮政府弱化了和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那就可以让他们的项目相对比较持续稳定的发展下去。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

如果这个事情可以成，我就想把张謇、卢作孚的那种社会企业方式，和我们搞乡村建设的那种农村复兴的方式结合起来。这等于是把前三种方式在地化的机制借鉴过来。因此，可能要和地方的很多部门打交道。

很多地方投资搞农业产业化，搞得不成功，因为进入农业主要有两方面的风险——宏观和微观的不确定性。微观不确定性主要是外来企业和分散农户打不起交道，农户不可能执行签署的合同，市场价格高不给你了，价格低了追到你门口，不收就闹事。这不能怪农民不好，是因为政府和外来企业没有事先把机制建立起来。

我们乡村建设团队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机制性的建设工作。具体到这个项目怎么做，现在还说不上来，先要让我的助手们下去做调查，把底盘摸清楚了，我才有思路。至于和企业家们怎么结合更是下一步的事情。因此，现在谈的还只是一个思路的问题，我只是提出一个社会企业的概念。

总之，我们是来帮助大家稳定乡村、降低交易成本、构建和谐社会的，谢谢大家。

此文为2004年温铁军在湖北图书馆的讲话。

温铁军2009年关于应对2008—2009年华尔街金融海啸转化为全球经济危机的多次演讲中的一次。

根据温铁军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次讨论迁徙自由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稿整理而成。

杜老即杜润生，20世纪80年代曾经先后担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主持过那个年代的五个“一号文件”起草。

作者曾经在1998年《浙江社会科学》上发过一篇专门分析乡镇企业改制失误的文章《乡镇企业资产的三个来源及其改制的基本原则》，后来收进三联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温铁军文集《三农问题与世纪反思》。

本文是2005年3月在云南省昆明市由企业家邀请政府部门举办的座谈会上的发言，由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易敏根据录音整理。

据我的团队对华西村的调查，吴仁宝领导华西村在新世纪之前走出产业资本低成本扩张的第一步，完成了对周边4个集体经济空白村的兼并。在新世纪第一个10年再走出第二步：又兼并了周边13个村的几万亩土地，形成了约14万人口的城市（包括外来打工者），同时更名为“华西新市村”，在老书记吴仁宝领导下构建了现代社会中有效治理且最低成本的上层建筑——40个人的村党委班子替代了县级市政府上百部门上千官员、几乎无法监督的庞大队伍——全面管理这个庞大的在地化产业集群。对此，我在调查研究之中称之为：地级市的产值、县级市的人口、村级班子的管理……

第四部分　大国忧思

第一节　用脚做学问：我的两次狂野游历注

刚才张蓉老师介绍说我是个“用脚做学问”的人，可是得跟大家很遗憾地说，我现在这脚不太行了，左右两个脚跟上都长了骨刺，走路超过半个小时就快走不动了。

说这话没有别的什么意思，是劝大家趁着年轻、脚上还没长骨刺的时候多走些地方，多去看看，别等到像我现在这个年纪了，50多岁了，快走不动了，再想多走走就顾不上了。我庆幸在年轻的时候，就像“阿庆嫂说她的丈夫”一样，脚比较野，到处走了走。其实这是很好的事情，现在临老了，就容易回首往事，前半生都留下什么东西让我记忆深刻的呢？无外乎就是走得最野的两次。

第一次是我在34岁，1985年，沿着黄河跑了一趟，历时四个月，行程2万多里，当然不是用脚跑，而是骑着摩托车跑。当然一路上风土人情，山河壮美，也确实领略了不少。到现在为止，记忆犹新。我会永远记得那天高云淡，会永远记得那一片蛮荒，会永远记得在那一片大自然的蛮荒之中自己显得是如此的渺小。跑过黄河，觉得自己作为年轻人的那种狂躁基本上被大自然磨平了。那是让人成之为人的，让人的宇宙观、自然观、世界观也多少得到改变的一次非常有意义的行为。虽然当时很多人说你不可能成功，因为我当时手头既没有驾驶证，摩托车也没有上牌子。

今天看来这是违法行为，现在法制健全了，这样的事就干不成了。当年可是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中华民族那种意气风发的精神刚刚被激发出来，不光是我，带着一个小小的队伍在沿着黄河跑，在我们的前后，还有很多人。

你们知道有一个作家叫王立雄的，写过小说《黄祸》、《天堂之门》的这个人，跟我的岁数差不多，他也是有点狂妄劲儿。他自己一个

人买了几个旧的橡皮轮胎（内胎），到了黄河源头，把那几个橡皮轮胎绑到一起就往下漂。还没漂到龙羊峡，就散架了。幸亏人没有沉下去，否则今天就没有这个小说家了。他回来以后就成了作家。当然不是说因为他沿着黄河漂了回来就成了作家，我沿着黄河违法地骑着摩托车跑了一趟回来就成了学者，不是这样的。但是，趁着年轻，同学们，多接触社会，多去实践，你将来会受益匪浅。

第二次难忘的是1991年，那一年刚好40岁，我绕着地球转了一圈。

大家好像觉得很奇怪。我当时是去美国讲学，进修。在哥伦比亚大学待了半年，这半年就处心积虑地攒钱，然后就想尽办法办签证到欧洲去。当时许多在美国的中国人都说要办理欧洲签证几乎不可能，因为当时欧洲国家对中国非常不友好，正处在对中国政府的制裁状态之中，我又拿的是公务护照，工作单位又有点政府背景，估计很难办得成。我必须在银行存够了钱，拿着存款证明，有对方的邀请函等一整套程序。但我终于在要上飞机的那天上午拿到了最后一个签证。要不然，我就差点走不了。

那一趟大概花了不到2000美元。

前段时间看到有一个小伙子到处给人讲他花了3000美元绕地球一圈，我看了以后不太服气。我本科是学新闻的，对什么都有兴趣了解一下。我这个人又天生好动，到处乱跑，至今已跑了三四十个国家，几乎全都是自费。1991年我才花了不到2000美元转了一圈，而你花了3000美元转了一圈，吹什么？当然，现在我这种岁数一般不跟年轻人叫板，显得特没劲（北京话“没起子”），所以，我对此没有说话。再说我那时确实是没钱，所以就花得少。怎么做到的呢？仗着自己英语还行，到处查阅广告，找到了最便宜的机票，我飞越大西洋只用了200多美元，在纽约还买到了一张优惠价的EURO PASS（欧洲火车通票），在欧洲转了七个国家也只用了200多美元的路费，可以晚上睡在火车上，还是头等舱。火车站一般都在市中心，白天到哪儿就在哪儿转。加上从中国飞美国的600美元，俄罗斯飞回中国的400美元，一共花了不到2000美元。

不过，这第二次野游也算是违规的。当时国家有个规定，如果不经单位同意擅自改变出国地点，就是严重地违反了外事纪律。但我那时确实是想搞清苏东剧变的真实原因。大家知道，当时苏联发生“八一九”事变后，美国人奔走相告，弹冠相庆，说这一下铁幕垮了，下一个就是竹幕（美国政治家对中国的称呼）！我在美国的演讲中说了“no way”（没

门），我认为自己还是有气节的。作为一个中国学者，自费去搞清苏东解体的教训，做有利于国家安危的调研，何错之有？于是我们单位的一把手让我写一个报告，证明我确实是去考察了，写出了考察报告，就可以不给处分。当然，写份报告相对于我已经占有的大量调查资料来说是驾轻就熟的事情，于是我写了一个很像样的调查报告，并且在1992年9月30号的《中华工商时报》上发了一个整版。此前是内部刊物发的，题目叫《苏东七国私有化经验教训的分析》。

我认为，那一次的调查方法也是很有效的，你们学社会学的学生不妨做个参考。

到苏东国家，那里的人非常之好，你在一个车站下车，在车站旁的咖啡馆随便买一杯咖啡，就会感到背后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因为在那些地方很少有中国人。

例如，我去南斯拉夫，要路过克罗地亚，那两个国家正打仗呢。而我是从意大利过去的，意大利铁路上的工作人员说，我不能保证把你送到南斯拉夫，如果由于打仗，铁路被炸了，哪儿炸了你就哪儿下来。

当然，现在大家都是独生子女，做这事让家长不放心。但是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工农兵出身，后来20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出来了，在机关也待不住，历来就是胆子比较大，因此对意大利人的说法也就没在乎。我是当过兵的，那怕什么，这辈子当过兵却没打过仗，看看别人怎么打仗吧。

火车到克罗地亚，果然铁路炸了不能再走了，下车到那地方一看，到处都堆着沙袋，玻璃上全都是贴着米字的那种纸条，身边都是当兵的，军人满街。于是，我只能随遇而安，在萨格勒布转了几天。然后，先去匈牙利，再下来到南斯拉夫。

我在这些城市很容易找到朋友。一般是到那不显眼的咖啡馆里，问那些盯着我的人：谁会说英文？肯定就有人想跟你搭话。你就跟他聊，聊聊之后，我就说，我上你们家去吧，这就去了，在他们家住。特别有意思的是，那正好是一个战争难民的家，家里住着从克罗地亚来避难的亲戚，我跟他小儿子住一屋。好在他家两口子都会说英文，我一边和他们聊，一边在老百姓中间做直接观察。

就这样，我这一趟去考察了七个苏东国家，回来后，就发现我调查得到的东西和我们的文件上、报纸上说的似乎不太一样。

如果没有这些直观的东西，如果只能是从书本上看，那不等于别人嚼过的馍吐出来又喂给你了吗，那好吃吗？啊，想想都难受，更何况下咽了！

你们的何慧丽老师说她要搞教改，我想，再忙也得抽个时间来。因为高校教改是个大事，如果我们的年轻朋友们，小弟弟小妹妹们将来都能从学校的教改中获益，咱们不只是培养出一批精英——怎么说呢？当然人往高处走是对的，可也不能只知道赚钱做官，或者做学问家，不应该是仅仅培养出这样一批人——而是培养出一批能下基层，能真的了解社会，真的能够了解实际情况，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和思想的人，那才叫人。

对不起，这又是得罪人的话。但是，现在社会培养出的人确实让我们吃惊，很难看到有谁还能像我们当年那样做事的。当然条件不同了，也不能强求。

最近，连最典型的海龟如汪丁丁，也在反思。他是学数学出身的，在海外拿了博士学位回来，现在在北大当教授。他在反思中写了一篇文章很有意思，批评当今中国照搬美国的汽车社会，说这东西确实给中国带来了GDP，确实使人们享受到了现代美好生活，但这对历史上从来就是人口密集生活在一起，对于没有多少空间的国家和民族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篇文章可以在网上查找得到。

这使我觉得很有意思。由此感觉到：只要是正直的学者，他就必然会反思，因为你不得不立足于脚下这块热土，这块热土的热度让你的心凉不下来。

都说我们国家的农民占世界农民人口的1/3以上，如果说那些所谓理论跟中国农民的实际之间的差距太大，那叫学问吗？

我来到人大后，有人告诉我说学院派要保持一种理论纯洁，这是在扯什么呢？难道教育部不主张我们的教学科研要瞄准国家重大问题，为国家的重大问题提供决策服务、提供研究支持吗？被强调为重中之重的“三农”问题是学院派的纯洁理论能解决的吗？

只要是一个有良知的学者，必会反思。其实，那些坚持不反思者，无外乎利益驱使罢了。这利益又不怪他们，只能怪现行的教育制度。谁让教育部颁发了那么多的考核标准呢？如果你没有在国外的某某刊物上发表什么文章，就不能是学术带头人，这岂不是胡扯吗？这种教育体制

是害人的，这样走下去是要不得的。它逼着教师就范，因为这考核的分的背后都是分房子，提工资，什么博导资格，能否当院长、系主任，都是搞这个。

在没有进入教育界之前，我曾经组织《中国改革》杂志的记者们编写了三次批中国教育的专题文章。到了学校以后，我收敛多了，毕竟是端教育这个碗，不敢再明目张胆地批评教育体制。现在你们好歹有这么一个人想搞教育改革，这能不让我站出来支持一把吗？

我们当然应该尊重海内外其他学者的研究，我自己也经常出国，但不光是去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我还想方设法找机会下基层搞调研。就拿2004年的事情来说，那年有几次跑出去，大都找机会做农村调查。例如一月份去印度，做了印度北方两个邦大概有六个村的调查。不过就是让印度的朋友带着，去村里接触各种各样的人。

没有这种底层的观察，不参与进去，很难说你了解那儿的情况，如果你只看了文章，只看了统计数据，或上网查了资料，然后最后玩一个模型出来当然也好，也有用，那是现代化的社会科学研究，对吧？因为有人说马克思都说过，不能应用数学的科学不是科学，好像挺有道理，所以现在大家就都用。但是得提醒一句，真正学数学出身的人却说：别拿这玩意来蒙事。说得通俗一点，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研究。人家数学出身的人很难承认那种办法弄出来的模型就是科学。看来，大家需要把这种调查作为基本研究方式，好好掌握一下，只有这样调研才能得到真东西。

所以，你们何老师说要搞教学改革，要让大家了解一下实际情况，说让我来讲讲，那好，我就支持。再加上，2003年7月她去兰考挂职以后，一年多的时间在农村搞起了好几个基层的农村合作社、协会、演出队等基层组织。这些年纪轻轻的人这样下去，能发动起基层的农民合作社，难能可贵呀。如果我们的年轻的知识分子们有10%，甚至仅仅5%，主动来做这样的事情，那对中国农民来讲，该是多么大的好事呀。

现在我年过半百了，真正值得回忆的也不过就是国内外的调研，认认真真地用自己的脚走了一趟，用自己的眼看了一趟，用自己的嘴去问了一趟，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了一趟，这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先给大家讲讲故事，说说能够让人回味无穷的社会调查。之所以要讲讲这两件事情，是因为这两件事情都算是“为人所不能为之事”，这非常值得回忆。无论别人说我发了多少文章，有多么大的社会影

响，终究是过眼烟云。而且，我打算到了60岁退休的时候戛然而止，什么也不干了，因为我已经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尽了忠了。剩下的时间该是我自己的了，那时再努力把以往的调研上升到理性高度。

人不可无志，所谓“三军不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尤其是在座的各位小伙子们，别着急在学校里卿卿我我的，一天到晚地着急找对象，得干出点事来，那就“天涯何处无芳草”！别着急高兴，我后面这句话就很难听了——“何处黄土不埋人”。也就是说，你可能会成功，也可能会失败。失败了别黯然神伤，连想都不要去多想，抓紧时间继续干！只要你咬咬牙，一切都会过去的。

做了这么长的一个开场白，是说我确实用脚做过学问，而且说的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这种好的学风，这就是实事求是，受益匪浅。希望你们这些差我几代多的年轻的朋友们，应该继承我们那一代人曾经有过的那种精神，使之后继有人。千万别相信那些所谓的学院派，那可能会害你一事无成。不仅是说你们，我自己曾经信过，后来才改过来。改也是因为被实践教训的，教训之后深刻反思，当然是很痛苦的过程，犹如大病初愈，感到从未有过的酣畅淋漓，所以才有今天的我。

第二节　执政党面临的两种挑战注

在2004年的政策调整中，有些人提出批评，认为新一届政府接任伊始就借着这次宏观调控，中央加强了计划经济、体现了中央集权等。这些批评如果成为下一步深化改革的依据，客观上会造成某种程度的混乱。

我认为，当前这个阶段的复杂矛盾可以归纳为两种挑战。

（一）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利益结构固化

如果从建国算起，从毛泽东时代就有了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当年被毛泽东批评为“条块分割尾大不掉”，现在利益结构固化到了一种难以调整的境地，这是第一种挑战。

此前，在讨论市场化改革20年经验的时候，中国体改研究会的马克说，你们讲了这么多，在我看来这些年的改革从实质上看就是一句话

——放权让利。而我认为，早期的改革主要源于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应对经济危机发生时采取的“中央财政甩包袱”。

那时候搞改革的圈子里就有这个说法。具体过程是： 1981年搞了“关停并转”； 1982年提出的“拨改贷”和“利改税”；1983年厂长经理承包制；然后是1984年通过财税体制分级承包确立的中央地方财政之间“分灶吃饭”；这一系列措施缓解了中央政府的赤字危机。但也有很大代价，到1986年经济过热时期就已经发展到连乡镇级政府都积极建立本级财政，客观上使得过去一个中央政府经济演变成几万个地方政府经济，这也造成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尾大不掉”从财税体制上全面深化。

这次于2004年开始的宏观调控之所以还算有效，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手段类似1996年江泽民禁止地方政府的土地征占。1996年叫停一年，等于刹住了地方政府掀起的那一轮“以地生财”的“圈地运动”，接着就有了1997年软着陆成功。可见，那次就已经不是靠传统计划手段解决问题了，而同期国家在计划上的强力紧缩，反而导致经济衰退。而这次则是中央叫停地方政府掀起的“以地套现”为实质的改革以来的第三次“圈地运动”。先是停止半年的土地征占，半年后又出台了提高征地价格的高门槛政策，这被称为“紧缩地根”，也不是靠传统的计划手段来实现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占有土地资源资本化收益的地方政府反对是必然的，这其实也反映了1984年财税体制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关系调整越来越困难的问题。

正如清华大学一位教授所说，我们所谓的计划经济从来就不是名正言顺的，他说中国过去是“命令经济”。其实，这是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的“中央政府经济”。在这种中央政府经济确立以后实行改革开放，如果说实质就是放权让利，那么随之就出现了“路径依赖”，很多产业资本领域的国内外私有企业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得以发展，虽然被海内外的意识形态认为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但其本质上只是地方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的地方政府经济。

对于这第一种挑战，政府当前应对得体，这次宏观调控期间查处14万件土地违法征占案件，应该说中央政府在法理上胜了，因此其政治意义大于上次。但是，中西部很多仍然处于原始积累阶段的地方经济的增长受阻，进退两难。总体上国民经济依然是粗放的，而这和以往放权让利式的改革，应该说有直接关系。

2004年7月的国务院重大问题座谈会上，温家宝总理很清楚地表

示，很多人对这次宏观调控认识不统一，其实宏观调控是起因于中央对农业、农村形势的担忧，因为2002—2003年土地大幅度被征占，导致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同步下降，同期粮食价格上涨，进而引起CPI指数上涨。同时，对环境、能源等问题的考虑，也是中央决定调控的重要原因。由于土地问题引发的社会不稳、粮食安全系数下降导致的物价上升、能源短缺、环境破坏等一系列问题，都属于中央必须面对的矛盾，必须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所以中央不得不采取宏观调控措施。然而，地方看到的却是紧缩投资，最担心的还是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所以这些国家层次的重大矛盾显然不是地方政府必须面对的。

因此我认为，短期看调控虽然基本上成功，长期看矛盾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这种挑战越严峻，就越迫使中央加强权威。虽然不缺乏手段，但大部分手段本身受制于下面我要讨论的第二种挑战。

（二）后英雄政府时代的合法性问题

这是第二种挑战。

我对与这个观点有关的海外讨论的了解，是在1991年苏东阵营完全解体后，那时我在纽约。美国人对我说，中国要么接着被搞垮，要么自己出戈尔巴乔夫。我说“没门”！为什么？因为，你们在时代上错判了，中国现在刚刚进入后英雄政府时代，是综合竞争实力空前发展的一个时期。

在中国，这个后英雄政府时代可能还有一段时间的延续，面临的问题和苏联当时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国外讨论关于中国政治体制的合法性问题已经很多年了，认为咱们这种单一制国家越来越容易出现问题。看来，这第二种挑战如今也更加严峻。

这些年来，随着经济基础的根本变化，在原始积累阶段曾经有效的传统意识形态，客观上很难再发挥当年那种国民动员作用，连对一般官僚的约束上也难以发挥作用。于是，搞任何形式的思想教育，只能说尚有积极意义，可如果从整体看，对利益结构复杂的不同社会群体的动员作用却不大。

不过，意识形态从来是不可能存在真空的，现在起替代作用的其实是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连各级党校也是以教授西方的理论为主，否则

就没有职称。似乎大多数官员们都愿意简单地相信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等“新四化”。这种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西方话语体系归纳中国的问题“都是（社会主义）制度惹的祸”，不仅是包括官员在内的中产阶级茶余酒后的谈资，已经变成社会上的街谈巷议，而且也已经成为一种强势话语，而这恰恰是第二种合法性挑战的主要内容。

值得进一步分析的是，目前执政党的确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应对办法，因为我们的上层建筑目前难以超过当年原始积累阶段的基本经济基础所制约的范畴。

在原始积累阶段的经济框架下，近年来形成的相对完整的产业资本和其市场经济条件下符合逻辑的对外扩张，包括近年来发展的对周边国家的工业品换资源，虽然形式上是平等的市场交易，本质上体现的也基本上属于西方工业化阶段的意识形态。

那么，在没有一个像传统意识形态那样能够整合民族、国家和官僚体制的上层建筑的条件下，第二种挑战隐含的问题就是更深刻的。

于是，思想理论界出现两个极端对立的东西，而且越走越远。

一方面是所谓的左派，包括西方传入的新左派、传统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等，其他如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也可以部分纳入。如果不是由于社会上三大差别拉大，这些不同思想流派本来是很难糅合在一起的。但是，这些理论体系过去主要来自西方，不像当年“延安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也就没有坚实的国内民众基础。

然而，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与这些西方左翼思想不同的情况：由于缺乏正确思想的引导，大量底层民众正在自发转向“革命”，对于底层民众真正起作用的是社会上保留的传统意识形态的革命记忆，何况现在的社会矛盾远比20世纪80年代之前要大得多。

近年来一位财经高官曾几次说过，20世纪20—30年代的时候农民能够造反，是因为农民手里的武器和政府手里的武器没有本质差异，而现在则有着本质差异。他的分析不错。某种程度上，工具水平的差异，体现了生产力水平的差别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差别。

为了避免民众流血的悲剧，我近年来做了很多“解构革命”的调查，试图找到化解社会对抗性冲突的改良办法。

通过调查发现，尽管是底层民众为主的各国当代革命，也早就已经不依靠20世纪那种一般概念的思想武器了。真正值得中国人暗自庆幸的

是农村改革还不那么激进，给军队提供兵源的农村还没有重建地主制度，至少在我国农村还是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

也同样来自于西方思想体系的是另一方面的右翼。众所周知，高速增长本身就易于带来社会思潮复杂和社会不稳，而当前对国家稳定有更大威胁的，主要是以西方后冷战意识形态和资本集团为背景的各种右翼势力的挑战。

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员的指导思想，主要是西方右翼提出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这新“四化”，已经在传统意识形态坍塌以后成为中国意识形态实际上的主流。这如果都是学术研究，也许无可厚非，但其背后难免有各种正规和非正规的国际组织及国内资本集团的支持，本来就占据了强势地位的主流，受到海外资助的力量影响愈发强大。

例如，我们现在推进的村民直选，由于中国的基层政府拿不出钱，拿钱的主要是欧盟和美国等西方力量，并且，这些给钱的外国人并不隐讳他们彻底改变中国上层建筑的政治目的，其中当然也有反面力量。而国内拿钱的人，也根本不必隐讳对现行政治的不满。于是，这种官方认可内外结合的主流就把农村社区自治的原意，演变为偏重“选举”过程所体现的程序民主。结果，一方面80%的选举难以成功，还积累了农村社区大量矛盾；另一方面，很多研究者认为这种基层民主实际上已经演变为“作秀”。

类似这些以国际合作交流和学术研究为名所建设的、已经形成强势地位的话语权，客观上是需要庞大的经济实力来支撑的。

不仅外部力量，改革以来产生的、本质上是与地方政府结合的民营私人资本也有意地支撑着这套话语。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话语的部分关键内容逐渐成为政府文件语言，这使得执政党在必须做国家政治建设的时候所面对的源于西方的后冷战话语挑战，其实是更内部的、更深刻的、更难应对的。

既然这第二种挑战的经济基础和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已经客观形成，那么，上层建筑必然会出现与之适应的变化。我们其实早已培养了很多基本上是自由化取向的政府官员。

官产学媒四大强势集团，在资本的本质属性上本来就是结盟的。那，唯一剩下给平民和小知识分子的，就是网络这种便宜的媒体平台。

我个人对此很冷静，既无所谓悲观乐观，也无所谓对错好坏的价值判断。

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是不可逆的。其实，这种规律性的现象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人都明确中国的第三条道路并没有矛盾。

宏观经济学会的王建曾经分析了一个根本矛盾：欧元问世后，两大主流的货币体系之间，必然出现生死争夺。这个分析，显然还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依据的。

目前我国还没完全介入全球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金融帝国主义”阶段的搏斗之中。既然金融帝国主义阶段的两大金融巨头之间早晚会出现拼杀，这对较晚进入那个阶段的中国来说，可能就是一块难得的生存空间，也可能是一种历史机遇。

中国有着非常庞大的实体经济，同时又由于上百年战争才夺取到相对完整的主权，使得中国还是“依赖于这种政治强权所派生的金融主权”相对也比较完整的国家。如果还没有彻底丧失强势地位的国家资本对中国内部的资源整合能够自主完成，那就还有很大的货币化推进经济增长的空间。

比如房地产，1998年取消福利分房以后，房地产业开始加快货币化，而货币化分配的结果就是房地产业的资本化。房地产资本空前绝后的陡然问世，也是中国出现了一个国家推动货币不断增发、金融资本高速扩张的时代的原因之一。而类似这样的过去以国家为名形成的庞大可变现资源从分配制转变为货币化、资本化，对于中国这种单一制国家，总体还是有利的。

樊纲在2002年召开的十六大之前就计算过，中国的国家资源有50万亿左右，其中社会资产有30万亿。以北京为例，如果把周边的农村进行改造后成为集中居住地，就能算出7万亿地产。我那时比较强调自我货币化，认为，如果其中有一半可以使用中国自己印刷出来的人民币来完成货币化，中国的现代金融资本经济总量就会大幅度增加，翻两番没问题。

看来，把资源货币化、资本化创造出新的增量后进行再分配，这可能是下一步改革的实质。只要其是以不开放本国的金融和资本市场为前提条件，中国就可以维持新世纪的金融资本经济（或称为虚拟经济）增

长，如果再通过完善税制从富人那拿钱给穷人，逐渐实现城乡之间良性的社会经济互动，就能出现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

2003年问世的新一届政府的决策科学化和学习机制的建立，这些年来也看得比较明显，我不赞同简单化地批评江泽民时代，其实，他在任期内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和深化邓小平的“国家去政治化”，基本是顺应全球化主流给定的经济规律的。我也不同意庸俗化地批判胡锦涛时代改变了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路线。近年来的政策导向变化，其实恰恰表现出执政党在大方向上是一脉相承的。

如果说2002年之前的政策思想都是邓小平确立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这难道就应该是一成不变的吗？

中国社科院的刘国光老先生向执政党建议做方向性调整：当社会确实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三大差别的时候，如果不能提倡“公平优先”，至少应该强调效率与公平并重，这才能让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资本化走得下去。

同理，只有国家资本总量增大了，才能应对金融帝国主义阶段的国际竞争。这个理性的思考，应该算是不愿意中国在全球竞争中垮下去的普通中国人都能接受的逻辑分析。

至于很多讨论中提及的当代史问题，如果我们还认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就应该明白看到，在毛泽东时代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有苏联投资的阶段和1957年后到20世纪70年代没有苏联投资的阶段。据此，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当然就会根本不同。有苏联投资的时候，必然形成庞大的以苏联管理体制为主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而没有苏联投资的时候，则既要转变生产方式，又要和以往形成的苏联式管理体制的上层建筑做斗争，那就是所谓阶级斗争吧。

这些历史问题之所以被反复地、庸俗化地讨论，是因为人们忘记了：历史不存在假设。

第三节　中国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吗注

我想，我们与其讨论中国说了什么，或者世界上对中国的说法是什

么看法，不如看中国做了什么。我认为，中国其实不过是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这种工业化必然要求制度改变，而制度改变又是在中国必须面对的两方面环境下进行的，一是国内环境，二是国际环境。

（一）两个约束条件下的国家工业化资本积累

我们先谈国内环境的约束，这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资源约束。

中国是一个资源和人口比例十分不协调的国家。也就是说，人口和资源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但是可耕种土地只占世界可耕种土地的7%，而且面临着水资源短缺的约束。南方水资源相对丰富，但土地紧缺；北方土地相对丰富，但水资源短缺。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要想进入工业化，其资源约束就是第一个重大困难。

第二个方面是制度约束。

与其他超大型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似乎是唯一在全国范围内以战争形式完成土地革命的国家。在20世纪前50年，人们都知道中国有三次国内战争，但很少有人明确地强调这是三次以农民为主体的土地革命战争。战争胜利的结果是给全国的农民按人口平均分配了土地。这个结果造成1949年建国时，全国1亿农户、4亿多农民在400多万个自然村里完全平均占有土地。这意味着中国工业化面临的是一个平均分配土地的彻底的小农经济，于是它的资本积累的交易成本就非常高。因为我们知道，工业化最早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必须解决工业和农业、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交易。小农经济越是分散，得到农户剩余的制度成本就越高。

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了解决城市工业的资本原始积累问题，政府建立了农村的集体化制度。

尽管人们把这种在农村中建立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叫作社会主义，但它实际上的作用，主要是从农村为工业化早期的资本原始积累提取剩余。

农村集体化具有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主要是国家在财政极端匮乏的条件下，仍然在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方面采取发动群众的办法提供了必要的基本保障。

对于中国农村的这种制度在国外已经有大量研究，但因为20世纪50

年代是冷战时期的开始，他们对中国当年的资料掌握得很少，一般都是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认识中国，简单地把那个阶段叫作中国的社会主义阶段。

在中国用农村集体化的方式完成了国家在城市的工业资本积累之后，必然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被马克思主义认为是工业化大生产的阶段。

（二）社会主义阵营中有两个相似的现象

提醒大家注意两个非常相似的现象：中苏两国在不同时期都曾经被批为修正主义，实际上却都是服从工业化大生产的内在要求。

第一个现象是在苏联主导社会主义阵营的20世纪50—60年代。

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完成第五个五年计划后，随即在苏共二十大提出了“三和一少”路线，对外加入国际分工，对内放弃斯大林路线。在那种情况下，正在经历工业化的资本积累阶段的中国，客观上跟不上苏联的战略转变。不仅中国，其他仍在进行工业资本积累的国家，像越南、朝鲜、罗马尼亚等，也都跟不上苏联的步伐。由于这种客观情况，就发生了社会主义内部的争论，于是，就有了跟不上的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而苏联为首的工业化国家则被批判为修正主义。双方由此在意识形态上的区别，最终演变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解体。

如果从政治经济学理论角度看，这只不过表明，苏联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必然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加入国际分工，实际上这也是不可逆的经济规律，而尚未完成工业资本积累的国家就不可能跟上这种战略转变。

第二个现象发生在中国20世纪70年代以后。

与苏联相差20年，大约在1975年前后中国也进入第五个“五年计划”，由于初步完成了工业化资本积累，形成工业化大生产，当然也就要求对外开放，纳入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而其他没有完成工业化资本积累，比如因为战争或者冷战，没有条件进入工业化的越南、朝鲜、老挝、阿尔巴尼亚等，他们当然跟不上，因此也发生了中国与他们之间的争论。

这次，中国也同1956年二十大之后的苏联一样，被跟不上工业化步伐的后发社会主义国家批判为修正主义。

同样，在国内政策的变化上，中国也是从70年代后期开始，逐步放弃了农业的集体化和阶级斗争路线。

（三）国际环境变化条件下的战略转变

根据历史资料分析得到的初步认识，中国早在1952年中央政治局的讨论中，就明确认识到中国要做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而且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上也是如此开诚布公。当时明确提出的是进入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那个时期原来在新中国建立之初被定义为“新民主主义”，也就是毛泽东解释的“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资本主义”。后来因为朝鲜战争，中国才进入了国家资本主义。

因此，这个重大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

苏联为了支持朝鲜战争，从1950年起进行了军事工业的投资，在东北兴建了军需工厂，使中国东北在很短的时间形成了在一般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形成的重工业。

一般条件下，中国需要经过几十年的农业和轻工业的交换才可能形成重工业的积累，但是因为朝鲜战争，仅仅三年中国就有了军重工业。所以，这就要求国家作出一个选择，那就是：你要这个重工业，还是不要这个重工业。如果要，那就不得不以这个重工业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如果不要，那就得回到原来的新民主主义。

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发生真正的战略变化，应该是在它从战争得到了重工业以后，而不是在此之前。

从这一点，就要涉及国际环境的约束，主要是指二战后形成的两大阵营之间争夺中国这个中间地带的斗争。

当时美国的战略防御不是设定在朝鲜半岛，而是设定在日本列岛。因此，美国把中国留在中间地带，是要争取中国成为一个“中立”的力量。当时中国的态度本身也可以说是中性的，并不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也并不打算加入苏联阵营。

从这种国际局势出发，对中国来说，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1949年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战略本身是符合中国当时的客观条件的。1953年提出的重大战略转变，也符合中国不得不因为朝鲜战争而纳入苏联阵营以后国际环境的改变。

可见，中国在这个特殊阶段发生的战略转变，主要是国家工业化的要求造成的。最初面临的资源约束导致新民主主义，亦即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制度选择。接着，又由于朝鲜战争改变为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因为，朝鲜战争后不可能再进行国际交换，只能在国内进行强迫交换，国家不得不长期从农业提取积累，因此，工农业“剪刀差”出现。

1957年中苏开始论战以后，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工业投资和技术援助，迫使中国暂停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于是，这种靠集体化和“剪刀差”来从农业提取资本积累的过程一直持续了20多年。

以上，就是我们在改革之前的社会主义阶段所做的。

（四）农村改革的动因是政府退出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初步完成了工业资本积累，开始实行对欧美日开放后，农村的这个集体化制度就不能实行了。这个变化，也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1972年尼克松访华，此前美国解除对华封锁，于是中国借机对欧美日开放，得到很多西方投资，其重点是改变中国偏重的工业结构。

这样，当然就增加了很多支农工业品的生产，导致化肥、拖拉机等农用工业品大量进入农业，农业的成本随之大幅度上升。同期，由于“剪刀差”的既定政策，农业产品的价格是锁定的。一方面农业产品的价格不能提高，另一方面农业的投入品价格非常高，于是导致公社、大队、生产队都出现高负债。

到70年代末期，中国农业已经成为投入产出为负值的产业。

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一种制度现象，实际上是政府作为当时最大的经济主体从不经济的农业退出（有人以前认为是农民从集体经济退出），这就是农村改革的基本原因。

因为在过去，政府是中国唯一的经济主体。所以，所谓农村改革，既不是企业，也不是农民，而是政府在农业亏损的情况下从农业退出，同时也就放弃了对农民承担的社会责任，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这些本应政府承担的职能随着家庭承包制，被加之于土地，那就得公平分配。

事实上，农民分户经营意味着农村回到传统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而这种时候，一旦政府不承担农民的基本保障，原来那种让农民感到有依靠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农村就很难再继续表现。

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制度变化，才导致中国从家庭承包制开始真正出现了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从大包干以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越来越明显，以至于刚才杜润生先生和秦晖注先生都说农民没有国民待遇。

（五）三个重大的制度变化

下面我们再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做过什么。

当前的情况其实很清楚。按照世界银行的一种算法，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的第三位。但按照人均量来算，还是在100位以外。人们看到中国发生的非常显著的变化，看的是它的总量在世界上位置的大幅度提高，但按人均量算，中国却并没有很大的提高。

从经济制度研究看中国发生的重大变化，实际上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1．经济利益主体多元化。

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危机压力之下实行了“拨改贷”的投资体制改革，以及“利改税”和“分级承包”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导致本来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家资本逐渐分化为部门垄断资本，国有经济内部产生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及中央地方分权化的趋势。

2．中国的资源资本化。

1978年，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很低，与全国约1万亿的工农业总产值相比，社会存款才226亿。在国家实行“财政一本账，统收统支”完全承担扩大再生产投资职能，并因此造成长期赤字的压力下，银行系统才对国有企业贷款，其规模到1978年也不过1380多亿。而到1998年，GDP　达到约10万亿，广义货币却增长到近12万亿。前者的增长是算术级数的，后者则是几何级数的，最终形成1998年M2（广义货币）与GDP高达135%的比例（美国为67%）。世界银行1995年发展报告就指出中国的M2与GDP之比在转轨国家中最高，达到105%。截至2001年我国的M2与GDP之比竟然全球最高，达到160%。这个比值增加，表明中国已经是一个资本相对过剩的国家。这20年的货币增长速度大大超过

GDP的增长速度。货币化进程加快，实际上指货币经济快于实物经济的增长。

经济货币化只是资源资本化的外在形式，是近20年的经济增长中最不可忽视的因素。

应该进一步指出，经济货币化本身也为政府收益增加提供了一个主要来源。中央政府通过不断增加货币供应来推动经济货币化和资源资本化。同期，还得通过不断推动企业上市，在资本市场的波动之中消纳过剩投资。这样，它既可以通过发行货币直接占有铸币税，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又可以通过通货膨胀稀释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静悄悄地向社会转嫁亏损。这样，中央政府的利益和金融、金融资产，或者直接称为金融资本的利益当然是一致的。诚然，这个金融资本阶段的经济规律在全世界都一样，谁也不可能违背。

3．资本的全球化。

人们只要尊重事实，那么无论站在怎样的立场，都不可能否认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主要是资本自由流动的要求。这在中国，也并不因所谓的意识形态不同而例外。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国资本大举进入中国，国内外理论界都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国外资本和国内资本的特别是金融资本利益上的相关。这就是说，中国的资本当然会按照国际资本通行的运作规律办事。

综上所述，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是国家资本积累阶段；而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则是资本自身的增长和发展阶段。如果这个观点和相关的描述可以成立的话，所有的问题也就可以得到符合经济规律的解释了。

（六）中国有“第三条道路”吗？

我们再看中国今后的发展前景，有没有所谓“第三条道路”可走。

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国按照西方工业化的内在要求所走的道路，其实仍然是那种传统的工业化扩张模式。这让我们不得不担心，今后继续这样搞，很可能走不下去。

根据现在已公布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每一单位能源消耗所创造的GDP总值远低于日本。日本每人每年平均消耗2吨石油。如果将来中国人比较节约的话，人均1吨，假定中国会在十年之内达到50%城市化

率，就意味着中国将有7亿人生活在城市，那么在未来的十年之内，我们就只算城市人口，不算农村，每年至少也需要7亿吨石油。中国国内石油的总产量尽最大努力也只能达到2亿吨，那么，这种情况下中国至少需要进口70%的石油，才能满足它现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方式。这还是按照日本标准的一半计算的结果。中国对石油的大规模进口，必将极大地造成世界石油市场的短缺和石油价格的上涨。

因此，尽管我们希望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但从国内资源紧缺的约束来看，中国走不成传统的西方式的工业化道路。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寄希望于中国加快城市化的话，平均每一个城市人口生活用水的消耗量是每一个农村人口生活用水消耗的20多倍，而中国又是一个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已有100多个严重缺水城市，300多个缺水城市。

从这两方面的资源约束看，中国面临的国内的资源约束和国外竞争的不利环境其实并没有改变。再考虑到即使50%的人口实现城市化，仍然会有7至8亿人口生活在农村，仍然不得不维持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制度约束也没有可能根本改变。所以，中国恐怕必须选择另类道路。可目前看来，又实在没有其他选择，因为欧洲和美国提出的所谓“第三条道路”仍然是西方的概念，而中国人难以跟着走。

第四节　毒奶粉背后的经济学思考注

（一）“市场失灵”及其与生俱来的负外部性问题

上一次在这里开论坛，我跟大家讲过中国奶业遭遇的几次宏观波动，其自身的波动和国家的宏观制度问题高度相关。

当时我告诉大家，当国内的奶业正在为培育基地、更新设备打基础，正在建立健全产业链的高投资的脆弱阶段，却由于2001年入世的时候我国对农业让步相对较大，导致南方沿海一些省区可以用进口的奶粉做还原奶，据说某个省区竟然占了进口奶粉的80%！这个现象的背后是：这些既没有形成生产基地，也没有足够加工能力的地区，以相对比较低的进口价格冲击了良性业态的构建！于是，正在增加投资做整个产业结构建设的中国奶业就突然受到了巨大冲击，造成的亏损成为了好好

做事的地方政府和良性企业的“沉没成本”。

进一步值得追究的是：各级政府的相关部门并没有及时出面解决这个问题，反而出现有些主管部门出台的规则恶化这个问题的情况。随之，就必然出现理论上早就说清楚了的“劣奶驱逐良奶”（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性结果。

可见，新世纪中国奶业的第一次波动，其实并不是奶业自身投资失误或管理不当的危机。

今天的研究者需要正视的这种劣币当道制度的后续恶果是：只是因为它没有被认真处理，就一定会导致这次第二波冲击的出现——上次没有真正投资做好基地建设，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建设的部门和企业，其破坏性投机获利且不受惩罚的规律性结果，再次发生了。

今天我们看到，恰恰是在这几年，大约六七年的时间内，我们的奶业在另外一个源头又出现了问题，那就是饲料问题。为什么饲料出问题？其实也和中国加入WTO把农业作为一个让步领域有关。比如，我们现在进口大豆占2/3以上，主要因为进口大豆大部分是转基因的，出油率高，它产生的增量收益当然归这些年占领了油脂生产领域的外资大豆加工企业。但与此同时，因为这种进口专用大豆出油率高，而大豆的副产品豆粕的蛋白含量就大幅度下降。饲料行业的问题，却出在大规模进口高出油率的大豆上！这个微观收益归榨油企业占有了，而这个宏观制度成本、外部性代价却甩给饲养行业了——同样数量的豆粕作为原料，不再能够生产出具有同样蛋白含量的饲料。

三聚氰胺的发明，难道不是一种科技成果？不是注册专利了吗？当然不是发明人不对，而是过去没有使用。那么，近年来为什么会被使用？因为近年来饲料的蛋白含量不够，因为进口大豆占了2/3，因为榨油企业绝大多数是外资企业，人家追求大豆出油率高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天经地义的事情，中国的有关部门既不能干预，更没有想干预。

似乎没有人愿意注意：每一个单个的经济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都会甩出一部分自己不承担的代价，而这个代价被谁承担了却长期没有被认真研究。直到今天全社会出大问题，尤其是人人关心的婴幼儿出了毛病，这才引发了社会乃至高层的关注。其实，这些问题表现出的核心机制，就是所谓的“负外部性”。

因此，一年后的今天我在第二次奶业论坛上要讲的一个要点，就是

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外部性问题，虽然这是一个经济学的理论问题，但实际上却和每个人都相关。

在座的，特别是企业界朋友们，请你们注意：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政府追求收益最大化，本来无可厚非！但是每一个主体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微观行为，都会导致外部性。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如今到处造成负外部性最大化的趋势现在不仅没有被讨论，也没有在政策修订中有所表现，因此它正在呈现出方方面面的危害！目前，整个食品行业的不同业态普遍地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趋势性问题，不是靠加强监管能够解决的。

昨天有苏丹红和孔雀绿，今天有三聚氰胺，明天还有什么？还没有被查验的各种化学品不是在广泛使用吗？直到它危害了生命，芸芸众生才开始懵懵懂懂地加以关注。对于发生的问题，政府出台文件很重要，把责任加到哪一级当然也很重要，但是有谁从源头上认真找一找病根？

既然不是监管问题，那么，这是什么问题？

理论上可以归结为负外部性正在扩大，正在日益恶化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把每一个单个利益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所造成的代价甩给社会这样的问题，拿来交给社会大众认真讨论，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说政府监管吧，这么大的国家，纷繁复杂的农业领域，要设多少部门才能监管？而且监管的后面还要有监管。

如果我们找根本，那就是每一个单体利益最大化所甩出的代价，这个代价被社会承担叫作负外部性，当量越来越大的时候叫负外部性最大化，且有不可遏制的态势。

再说得深入些，负外部性可不可以让市场自身解决？不可以。市场经济本身只制造负外部性，并不解决负外部性。既然这个规律也是不可逆的，那么我们就既不能把市场经济政治化、神化，也不能把希望寄托于加强政府部门权利，不能认为出现一个方向的问题，使用另外一只手加强就可以解决了。

当然，这些观点都不是我的发明，都是经济学理论上早已说过的问题，只不过我们有些理论家只讲其中的一面。

（二）加强奶农的综合性组织化建设，从基础上构建良性利益关系

怎么办呢？当然，两个极端都不能选择。其一是不可能简单地回归

到传统的农业经济方式——尽管它的生产者或者投资人收益很难做到最大化，但是因为这种农业是和自然过程高度结合的，因此它往往创造了正外部性却没有回报。其二，对于工业化条件下的化学方式、机械方式的规模化农业，则尤其需要加深讨论。因为尽管它可以使投资人、生产者增加收益，但它却一定是对外制造负外部性却不被惩罚的。

传统与现代两种农业的微观收益和宏观外部性问题，早在古典经济学里就已经讲清楚了，问题是我们今天对西方理论“有选择的”使用。这样，就没有可能从根本上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导致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劣企驱逐良企”等规律性现象，就必然会放大负外部性，最终是全社会受伤害。

刚才农业部的同志讲，如果最终生产者的利益得不到基本保证，那么后续环节的合理利益关系也建立不起来。国家质检总局的同志也谈到利益关系的断裂——其实我们都能看到，在这个产业的业态内部，所有的利益关系都是对立的。

看来，我们必须把研究重点放到如何调整、重构，形成良性利益关系上来。

大家都知道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牛贩子把病牛卖给奶农，把黄牛染成黑白花卖给奶农，而有钱人对于奶农买奶牛是放高利贷的——因为金融也追求利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于是农民拿到了高利贷，买了病牛、劣牛，都成为沉没成本了，那小农承受不起，就也得搞短期行为，于是最终生产者也就出现问题了！最后发现：因为没有谁来承担给农民提供必要的、基本的服务的成本，没有谁帮助农民形成能够抗御风险的经济组织。

20世纪80年代我们就认识到，完成大包干让小农散户经营不是我们的目的，农民必有一家一户解决不了、解决不好，或者解决起来不合算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发展合作社。合作社就是一个成功的内部化处理利益关系的企业，因为社员在利益上是互洽的关系。

那怎样能在第一个生产环节那儿形成一个不是对立而相对合理的利益关系？怎么能够先把农村第一线的利益关系理顺呢？如果那儿理不顺，就一定是剥夺与被剥夺关系，就是尖锐对立关系。如果基本的第一线的工作都没有做，业态的良性结构就难以组建。靠所谓加强培训，能解决问题吗？企业加强技术服务，能解决问题吗？政府加强监督管理，能解决问题吗？都比较难！所以最基本的工作一定是农村基层，还是毛

泽东的一句话："做好第一等的工作。"可现在大家都不做第一等工作。

不解决这些问题，其他的拿多少钱都没有用。

不过，如果要让农民只能单一地搞专业的生产合作，那能行吗？我们知道，农业生产领域是最没有利润的，单一的专业生产合作社一定是没有收益的。国际上成功的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合作社全部是综合性的。

总之，在这些基本问题上，如果我们再不抓紧拿出真问题来讨论，再不把第一等工作做到实处，不能让农民利益得到真正的体现，没有相关组织对农民利益的真正保护，最后什么好的措施都很难落到实处。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2.4亿小农户分散生产，要想监督、管理，政府成本多高？所以，咱们还得加强农民的组织化。

现在，终于有了一个能够比较直面真问题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现在有了一个好的开始，希望各位企业界的朋友和地方政府的官员理解，大家能够把工作做到实处，也许能够使整个业态重新回归良性化。

第五节　中国工会与西方工运注

现在，我们全党、全国各个地方都在胡总书记的带领之下，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深刻体会胡总书记今年的"7.1"讲话精神，具体落实到工会工作，就需要对中国以往的历史和新时期的任务有清晰的认识，由此据以指导工会的工作实践，争取有所创新。

（一）不可逆的历史规律

即使这个现在最提倡全球化和国际化的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北方总司令格兰特1868年就任美国总统后的第一次演讲就说：我们现在的政策是关起门来，拒绝欧洲。格兰特此番用意在于，为了美国本土的工业化，不能现在就开放，否则这意味着欧洲那些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对美国的经济侵略。美国只有在本土工业化已经完成，实现了产业门类齐全、工业结构完整之后，才能对外开放。因此，在南北战争结束后，从1868年始，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在大约30年的时间里实行了一段

产业上“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产业资本的北方获得了对南方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整合权。（资本市场上不是闭关锁国的。战后欧洲投资者大量投资美国，以至于1873年美国铁路泡沫人们说是美国人剪欧洲人的羊毛。）30年之后，美国已经形成了本国庞大的工业基础和雄厚的产业资本力量，这时才开始“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美国从此成为超级大国。

美国的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只有建立一个产业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后，才有可能、有条件对外开放，否则就意味着对民族工业的毁灭性打击。这个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而一旦一个国家实现了国内完整的工业产业体系，“走出去”就成为一种客观需要。看看我们25年的改革开放进程和进入21世纪的全球化趋势，这其实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避免的过程。

回首再看1972年之前的中国，封闭、不开放的批评如今值得商榷。因为那个阶段就如同美国1868年的情况一样，也是为了建立本国相对齐全的产业门类体系而自我封闭。大约是在“五五”计划前，中国基本上形成产业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后，为了改善外部环境，1972年中国恢复与欧美日的外交关系，大量吸引欧美日投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对外开放。然后从对外开放逐步推进到邓小平作为总设计师的、中国对外开放造成高外债条件下的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走过的这段历史说明，中国在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之下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形成了庞大的工业基地和完整的产业门类才开始了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对于这样的一个过程，理论界都很清楚：我们是20世纪70年代开放在先，80年代改革在后。

（二）新中国的战略转变

1.以军重工业优先的国企工业发展战略实乃形格势禁。

从微观角度说，国企现在存在着冗员多、效益低、体制不灵活等弊端。但从宏观角度看，从根本上说，中国当年建立工业体系的时候并不是为了市场，而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为了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看到国有企业曾经的历史功劳，也就容易看到其今天的问题所在。

一般的理论分析认为我国的工业化从1952年开始。但是，把这个时

间当作起点是有偏差的。确切地说，我们国家的工业化从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技术装备精良的美军压境鸭绿江迫使苏联把当时的军事工业生产线搬迁到了中国东北，以支持中朝两国参加的这场对抗联合国16个国家的大规模使用现代化装备的局部战争。

派出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不仅给中国带来了本来毫无准备的重工业，也改变了中国1949年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新民主主义发展战略——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战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诉全党，中国不可能在一片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1950年年初，毛泽东就提出要在城市发展私人工业，在农村保护中农和富农，以及地主的那部分工商业经济，以促进城乡交换和对外开放，以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逐步为国家将来的大工业提供原始积累资源。他明确指出，只有将来建立了国家的大工业基地，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中国共产党才能说服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在他们都同意的情况下走向社会主义。

但是，事情并不如人愿，尤其是在当时那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一场抗美援朝战争凭空从天上给中国掉下来个馅饼，换来了苏联出于国际局势需要而转来的军重工业。接收下来还是不要？如果不把苏联转移来的重工业维持下来，中国按照以往设计的新民主主义的战略搞工业化的速度当然会比较慢，而且当时的国际地缘环境也要求中国必须大力优先发展重工业。中央政治局为此酝酿了好长时间，最后决定把战争打来的重工业维持下去。这样，战争结束后的中国就不可能重新再回到以前确定的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为此，中国不得不改变以前确定的新民主主义战略。

当时的中国工业以重工业为主，尤其是军重工业，其比重达70%以上。要实现这些产品的交换在当时一片小农经济的中国来说客观上做不到。当时5亿总人口只有约5000万是城市人口，工业人口只占不到5%。农村吸纳重工业产品的能力特别差，在小农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实现工农两大部类的有效交换。

伴随着工业产品要销售出去的需求，国家随着工业体系的建立就开始改造小农经济。从1953年合作化开始到1956年建立集体经济，再到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主要意见是工业部门的。这样做的结果是实现了重工业产品的下乡，实现了工农两大部类的交换。

毛泽东1953年提出战略转变时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我们国家的经

济快速发展必须有两个翅膀：一个是国家资本主义，苏联投资形成的工业体系；另外一个就是统购统销加合作化，这可以使国家垄断资源，投入到国家的工业化，迅速完成原始积累。

这个工业化资本积累过程在中国是个历史必然，只是和西方国家烧杀抢掠别国的方式不同，我们的原始积累完全是全体中国人民承担代价。

当年的经济战略改变是不得不适应战争形成的军重工业的结果。从历史角度看待这个过程，就会明白我国国有企业走过的历程：当年以军重工业为主的国企是为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建立的。

2.后来发生迫不得已的战略改变也是势所必然。

当中国进入工业体系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时候，苏联已经是“五五”计划前后，基本上完成了自己国家的工业体系建设。按照马克思的基本原理，苏联这时必然要求实现产品的全面交换。于是在斯大林逝世之后，苏联要求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跟着它一起对外开放。跟不上这股开放潮的就是那些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它们的工业产品无法和苏联抗衡，更无法加入国际交换。当时所有没有苏联驻兵的国家都拒绝了苏联的要求，这其中包括中国、南斯拉夫等，因为中国才刚刚进入工业化。结果，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形成了当时的大论战。

论战的结果是，刚刚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国因为苏联几乎彻底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助并于1960年撤走专家而被迫停止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执行。中国从此之后不得不对依靠苏联形成的工业化进行转型。小农生产、地方国营和集体经济遍地开花，因为依照过去成功的基本经验就是发动人民群众。当时全民大炼钢铁，搞发散型的工业化，结果引发了今天所说的很多教训。但中国就是依靠着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和勤奋好学的精神，自力更生地走出了一条自己国家工业化的历史道路。

同时，中国也不得不偿还苏联以往的援助，并对付交恶的苏联在中苏边境上的军事施压。为此，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用苏联要的附加值很低的轻工业品和农产品偿还，并同期大力发展国防力量，发展自己的核武器，避免挨打，维持国家安全。最终，当苏联用核武器威胁到家门口时，中国为了8亿人的生存不得不调整国际战略。

1972年，中国恢复和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引进欧美日的投资，优

化产业结构，最终形成一个产业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得以加入到国际分工。在这个历史转折中，中国国有经济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恢复与西方的关系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要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就要引进欧美日的投资。这一方面改变了过去的工业结构，转而生产化工、石油、纺织、化纤等符合民生需要的东西，另外一方面必须支付大量的品牌、技术和管理费用。结果造成以往的国有军重工业难以转为轻工业，于是这个产业几乎都被非国有企业的外资和合资企业占领。中国也不得不继续用原材料、轻纺工业和农产品的出口换取外汇偿还更大的外债。

20世纪60年代为了偿债苏联，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了偿债欧美，中国都得作出很大调整。引进苏联的设备为了维护国家主权的调整错了吗？转而发展与西方关系保护国家安全的调整也错了吗？恐怕不应该那样批评。那个年代是全民奉献的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那个时代的政府是一个英雄的政府，有功于这个国家流血牺牲才换得的独立。

我们切不可否定以往的成绩，否定维护主权独立的英雄的政府和作出艰苦奉献的伟大的人民。

自力更生没有对错，改革开放也没有对错。因为，规律使然。

中国走到今天，意识形态切不可被全盘西化搞乱，切不可相信“资本主义就是好”，尤其是做工会工作的同志。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尤其珍惜如今的和平环境和稳定。中国低起点工业化的历史和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的现实，使得我们只能是被动应对，由此要作出很多的调整和牺牲。包括我们加入世贸组织，虽然传统行业和农业受到的压力很大，但中国不得不加入，因为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工业化体系。如果中国的转型做得好，就可以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不能平稳过渡则很多问题都会出现。

那么，外在压力和内在扩张下的工会工作能做什么？需要认真分析。

（三）不能照搬以往的工运经验和理论

今天，中国加入全球化的比较优势是什么？是占据高端的设备制造业还是技术、科学？其实，真正让外国投资大量进入中国的只有两个重要体制因素：其一是土地、石油、矿产等生产要素被政府垄断，导致非

市场化交易的价格低。人们知道，大资本之间的交易成本比较低，大资本和分散小资本之间的交易则成本太高。所以，越是民营化程度高的浙江省，外资就几乎不去，越是垄断化高的上海、北京等地区，外资则大幅进入。这是外资进入中国的本质原因。其二就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还比较低廉，这使得国外把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形成“世界工厂”，中国制造的外国产品可以以成本优势行销世界。

从世界产业链的分工看，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中国的优势就在于劳动力成本比较低。因为中国是一个劳动力绝对过剩的国家。有研究认为，中国人口在2030年会达到18亿人。温家宝总理在两会期间答记者问的时候说过几个数字：8亿多劳动力，这是美国人口的近3倍，比欧洲国家人口的总和还多。面对着这样的劳动力大军，市场供需规律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和工资的上扬。

那么，如何办好工会？如何保障工人的权益？如果严格执行有关政策，中国劳动力价格优势还会保持下去吗？现在，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广东和以一般贸易为主的浙江这两个中国经济典型的地区都出现了平均利润大幅度下降的情况，大部分已经下降到5%以下。

另外，中国为了迎接国际竞争的挑战，需要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提升企业设备和技术的更新，于是不断变成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这些产业解决的就业岗位和劳动密集型的相比，当然就更加少。

只有资本不断流入才能不断创造就业，只有经济不断增长才能创造就业，而增长的比较优势又来自于劳动力价格低，这不是个天大的矛盾吗？

当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不得不依靠劳动力无限供给这个比较优势的时候，能实现对劳动力价格低的现状的改变吗？珠江三角洲工人加班加点，工价还是十年不变。在劳动力绝对过剩的情况下，如果完全讲市场决定，劳动者就完全没有谈判地位，就不会开展有组织的工会工作，也不会有工人运动。只有在西方发达国家那种殖民化和工业化并行的阶段，才有可能形成劳动力谈判能力的提高，形成有组织的工人运动。

但是，中国今天不可照搬欧洲18—19世纪工业化高度扩张时期的工人运动式的历史经验，也不能照搬那个时期形成的理论和思想，因为我们是内向性的积累和工业化。中国要学西方式的工会工作经验，必须是已经形成庞大的产业资本并且已经传递到外国去扩张的时候。虽然我们并不主张，也不设想中国的产业资本一定要走上向外扩张之路，但是，

任何一个产业资本形成之后必然会扩张，这个规律在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都如此。

2002年中国钢铁、洗衣机、电视机等产量都是世界第一。当中国工业品的产量已经在全球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的时候，已经形成的产业资本客观上怎么能不向外扩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这个基本规律我们能逆吗？如果不能逆的话，18、19世纪在欧洲本土上形成的、适合欧洲经验的工人运动形式适合我们吗？那么，我们的经验是什么？指导思想是什么？如果没有新的理论和思想进行指导，具体的工会工作怎么能够有创新？

因为我们不可能实现充分就业，现有的工会理论又无法适应这些情况，所以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的时候提供的数据表明他在困惑，我们大家也都在困惑着。

任何一个地方的党委工作在主要追求增长的目标之下都可能有某种偏差，把邓小平同志说的“发展是硬道理”已经变成了发展主义，GDP增长优先。到下面去看几乎都说投资者是我们县的座上宾，但绝对不会说劳动者是座上宾。最近社科院做的一个调查显示，东部沿海地区90%以上的地方官员不打算执行保护劳动力的政策，50%以上的企业则不能执行。因为按照现有的规定，完全执行起来则必然导致企业成本提升，竞争力不足，企业就会垮台。在广东做的调查也表明，劳动者保障的覆盖面极低，有的企业连基本的劳动社会保障都没有。

执行目前这一套工会法、劳动法等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的时候，宏观层面和执行主体都面临着困惑。这需要我们考虑中国特色、面临的国际环境、特殊的工业化道路，并重新反思以往的理论和思路，工会也要开展调查研究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工会工作同样不能再照搬。如果仍然照搬传统苏联意识形态的那一套，或者照搬欧美当时解决问题的思路，工会工作会面临很大的难题。

（四）当前工会工作的当务之急

工会一个重要工作是保护职工的权益。结合以上的问题，建议要根据党章、宪法和现行有关的劳动权益保护的法律，在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中开展维权，而不是拘泥在国有企业上。

首先，要在私营企业、股份制合伙制等私营企业开展工会工作，对

职工权益作出必要的保护，这应该是当前的工作重点。要力争做到实处，开创新局面。因为只要我们的党章和宪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员工应该能够提供的保障目前还是能够提供的。而私营、外资企业则属于另一种关系，就是资本和劳动的对立。

其次，资本和劳动的对立矛盾是国际化的问题。国外的大公司都有公司守则，强调企业必须承担社会责任，承担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而我们的工会干部还不是很把握跨国公司的公司守则，建议培训的时候学习一下。

外资和合资企业其实是和我国的体制做交易。外资企业大规模进入中国并非唯一看重劳动力价格的低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我们的经济仍然是在货币化和资本化的进行中，外国过剩的大资本在寻找资源资本化的收益机会。

现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本都是过剩的，他们的跨国公司只有占有资源或者进入实际生产领域，才能在资本市场上取得很高的收益。而中国的经济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基本上还不是资本经济，1997年十五大才提出资本经济概念。只要中国的资本化还在进行当中，还没有完全实现把我们的资源变成资本，外国大资本就不会停止进军中国的步伐，就不会停止对中国资本化收益的攫取。因此，我并不认为对外资企业强调劳动力的合法保护对他们会有什么损害。

最后，要抓紧对进城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否则很难保住安定团结的大局。传统乡土社会下的农民很讲究相互帮助，农民在社区中比较团结。不过现在，已经有1亿4千万的农民、9800万的农村劳动力进城，他们最没有正规组织保护，连最基本的医疗保护都没有，如果他们受到了压迫也无处申诉。这将严重影响我国的安定团结的稳定大局。

工会工作要承担起这部分责任，因为他们同样是劳动者，是工人，他们同样面对的是劳动和资本的矛盾问题。只有工会组织才能够实现对进城农民工权益的保护，至于怎么组织和帮助则需要工会积极想办法。

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和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精神高度相关，也和安定团结的稳定大局高度相关。他们代表了中国最大多数的人，帮助他们维护权益，也就维护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第六节　金融异化与学术异化注

现在是2010年的第一个早晨，大家新年好。

就要有纪念1911年的那个感觉——还差一年就是辛亥革命的一百周年，也是中国人追求发展主义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一百年。很多思考要跟大家交流。

（一）中国人一百年来经历的两个不同历史阶段

首先说我最近在很多场合讲中国与西方的比较发展研究的两个不同阶段的判断：

一是产业资本阶段。20世纪一百年，无论何种制度演进，都是中国人实现的从产业资本形成到结构调整和扩张，然后再到产业资本过剩的一个客观进程。这是个人类在资本主义阶段的历史进程，西方人用了500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是战争；中国人用了一百年，大约60年是战争。

二是金融资本阶段。进入新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人实现的则主要是金融资本从完成对产业资本的异化到走向金融过剩的一个客观进程。这个进程西方人用了50年，期间区域战争不断；中国人用了不到10年，还基本没打仗。

过去一百年不算短，简单归纳，就是一个追求产业资本从形成到过剩的进程。你们想想是不是这样？提出这个重大判断的不是我，因为早在1999年时，林毅夫教授在内部讨论的一个会议上讲过，我们面临的是“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他当时分析了产业过剩与劳动力过剩导致内需不足的规律性问题，并且建议国家应该及时转向新农村建设战略投资。这是中国经济学者在世纪之交最为清醒的声音。

我们传统的社会是劳动力过剩，当我们追求发展主义的现代化时候，增加了一个产业过剩。中国几千年来，它的循环遵循了人口和资源矛盾，每当人口、劳动力过剩，传统的资源不足以支撑的时候，就进入下一个循环，那就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人口都会大规模减少，然后资源重新恢复到可以支撑人口，就转入到下一个周期。而我们进入新的这一个产业资本历史周期，是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500年已经演变了几次的循环。而在我们这里呢，到1999年，已经有3/4工业产品供大于求，大体上形成了林毅夫指出的双重过剩。

进入新世纪，中国人用了不到十年完成了西方用五十年完成的金融

资本过剩的过程。就是从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自身出现过剩，这个进程中国人用了不到十年，我们大约应该在2001—2002年完成了金融资本的市场化。因为20世纪末已经出现产业资本过剩，必然会规律性地出现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因为产业过剩了嘛，如果你们在座的各位任何一位是银行家，就不愿意往过剩的产业去投钱，投进去就意味着资金占压，甚至意味着坏账，意味着银行的亏损。所以在这个阶段上，当产业资本出现全面过剩的时候，金融资本一定会规律性地异化于产业资本，很快就异化为独立于实质经济的、虚拟化的资本力量。那么，金融资本异化之后的运作规律就会随之改变——从过去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结合，到金融资本追求自身的流动性获利——那就是什么流动性最快，金融就去追什么。当然就出现了追股市、期市、房市。接着，就会发展衍生品交易和推进虚拟资本扩张等等。

产业资本得不到金融资本的支持，就会首先出现农业和中小企业金融环境的恶化。金融资本离开小农乃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发生的现象，不必多说。而中小企业以民营经济为主，必然会出现已经浮现出来的民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体的政治化反映，那么，就会出现如现在所说的国资与民资之间的矛盾。其实，从本质看，这是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之后必然出现的资本主义历史发生阶段性变化期间的本质性矛盾。

金融资本一旦以追求流动性获利为主，就会迅速的自我膨胀、扩张，出现过剩。那么我们也就进入到了一个虚拟化的金融资本引领经济增长的全球资本化时代。

大致看，人类进入到发展主义的高级阶段，会出现全球资本化这样一种发展的趋势，这也是规律。到了这个资本主义高级阶段，就是我们原来讲过的资本排拒愈益深化。资本排拒（exclusive），在发展中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就表现为一种城市排距。各位听好了，我认为资本排拒会表现为城市排拒，客观上与城乡二元结构相辅相成。赵树凯刚才讲的教育方面的教育排拒、市民待遇方面的市民排拒等等，本质意义上，都是资本排拒。产业资本排拒则导致产业过剩，是个资本主义规律。

当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的时候，就到达全球资本化的高级阶段，必将出现金融排拒与金融危机并存，这也是个资本主义规律。

金融资本的流动性获利是内在的，因此追求的是全球资源和资产的

金融化才能增加虚拟资本交易规模，全球的金融化（global financialization），或者叫全球资本化（global capitalization），最终出现虚拟资本上千倍地多于实质经济总量而导致全球性金融过剩。

这是在全球进入金融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后发生的规律性的必然现象。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分析人类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马克思本身也是一个受到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体系影响的全球主义者，马克思身后的第三国际的全球主义者也可以说是一种教条化的发展主义者），本来就说得很明白：人类进入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是由于人类创造了一个自身的异化物，那就是资本。这个异化物创造出来以后，会不断地把人类生存依托的各种要素、各种资源都反过来异化为可以产生各种资本利润的生产要素，乃至于最终把人类自身也异化为劳动力要素。当资本把人类也完全异化为劳动力要素来占有其劳动剩余价值，以形成资本利润的时候，资本主义这个人类的历史阶段也就终结了。我背不出原话，只能一般理解他这个意思。

马克思在他生活的那个历史时期，主要意识到的是产业资本异化，还没有条件意识到金融资本是可以异化于产业资本的这样特殊的一种滥觞全球的资本力量，在发展主义的高级阶段的能够主导全球资本竞争的力量。90年代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已经不再讨论金融不能获得独立利润，产业资本主导阶段金融能获得平均社会利润，90年代开始讨论钱能生钱，就是印老头票能下崽，这个讨论本来是荒谬的，过去没有人会相信印老头票会下出毛票来。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在90年代已经成为钱能生钱的这样一种理论创新的激励，也就是说，金融资本自异化为独立资本力量以来，它是在追求自己独立于实质经济的虚拟利润，需要学术界建立一种理论模型去推导它的合理性，形成了这样一种逻辑。

（二）何以“学高为师，德高为范”

看到你们这个农民之子《十周年征文材料》，里面有两篇文章值得一读。我其实在来的路上还没有想好跟大家说什么，本来想你好我好大家好，因为大家起个大早，无外乎庆祝一下。但是看了里面有篇尧育飞写的文章《农民和农民之子的自救》，觉得有点意思。

原来冥冥之中有这么一种鲁迅“隋洛文”的感觉。试问，鲁迅为什么死得那么早，因为他把他本来在六十岁以后的话先说出来了，他就死得

比较早。很多人问一个预设了回答的假设：鲁迅活在1957年会怎么样，我说你们这个设问是不对的，因为对于一个死去的人，是不能假设他在未来的一个社会是怎么样的。我们只能假设他在自己生活的当时社会的那些言行之间是怎么联系着的。因此，我这个思考不是那种假设，而是与他当时的言行有联系，觉得他是把本来60岁以后说的话都说了，所以就提前逝世了。

你们社团的姓尧这小伙子，当然我不是咒他，他话也说得太早，把我这个年纪应该说的话他都提前说出来了。然后他就遭到了很多网友的批评。就像鲁迅当时横眉冷对有点孤军奋战的感觉，也因为话说太早。但他说得对不对呢，我觉得有点像那个扁鹊见蔡桓公的感觉，也像鲁迅有篇杂文说你们家病人肯定要死，就遭人暴打……，说早了呢，就容易造人批评，但确实是超凡脱俗了。

看了这东西以后，让我想讲点我现在正在思考的很多问题，提醒各位，特别是青年社团不要陷入当前社会上的无谓的炒作，不要去炒这些事，无外乎你们中间有人说得早了点，那说早了总是要挨批的。

所以，我今天先说一下中国人的上个一百年，无外乎完成了一个产业资本过剩的过程，中国人进入新世纪的十年，无外乎完成了金融资本过剩的进程。这些话，以我这种年龄来看也说早了，将会使我自外于西方经济学那些主张钱能生钱的主流的学术界。但对你们年轻人，我想拿这些话为铺垫，来解释一句话，叫“学高为师，德高为范”。

何以为学高？学，理论界几乎人人都说我们在治学。治学直译，to govern study，那就得有the governing system，就是要有治学的体系，然后就得遵循学术界的规矩regulation，刚才赵老师开始讲这个regular、rules，然后就得有who govern whom，谁去治谁？就得有这一套体系性东西提出来。治学者被治，被谁治呢？被形成这套制度的人去治，因为形成这一套制度的内在作用是利益分配。所以，今天这个治学就变成了被研究being studies，因为你被govern了，被治了，所以就进入被研究being studies 这样的一套学术体系。最终你还能学高吗？不能了，因为你已经被govern了，已经进入了被govern以后的being studies。

我把这个道理用于全球二八开的分析，就是我近年来在反复讲的制度致贫规律，至今不能被主流学术刊物所接受的关于贫富差距的规律性论述：制度性致贫the institutional being poor,其实就是解释你怎么被贫

困的，讲这个世界的二八开是怎么形成的。这个关于制度的理论解释，和一般人说的微观精准去扶贫的感觉就不太一样了。其实，也就是说，致贫的最根本问题不在于你，你要被人家扶，可你本来不是贫，甚至你本来很富，你被制度性地致贫了。怎么被制度性地致贫了呢institutional being　poor？当你把这些问题拿出来讨论的时候，你就已经不是主流的学术了，既然这个讨论不是被治理govern条件下的被研究being studies，那你就超过了这个学了，也就学高了，这时候呢，也许就有条件学高为师了，对不对啊？

还不能，因为你还没有制度system，就不能治理govern别人。而没有system的核心原因是你没有形成利益分配的条件。当你超越这个学问体系的时候，你还想有这个体系的利益分配吗？或者，想另外还有个利益分配体系？门都没有。

所以，谁想真做到学高为师，就得不再被利益分配体系所局限。打个比方无论鲁迅还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话说早了，无论对错都有毛病，因为会被各种既得利益集团挑战。

以我自己为例，现在二级教授拿到了，再往上奔不太可能了，现有的利益分配对我就没制约了，也就可以在不根本性地撼动主流的同时，稍微超越现有的治学体系system，可以有条件做些另类的思考，然后把这另类思考表现为一种新学。

所以我说，不应该怪大多数在被govern条件下的、被利益分配条件下的青年人，他们只能去这样“被学”。要大家一定要学高为师，是不太可能的。

同理，德高为范也不太可能。

因为在这个体系条件下的，它要求的是一个刚才赵树凯讲的这个规矩regular，它去规范你们所有的学。是因为，客观的地讲，比如说二十世纪大家都处在产业资本的形成阶段的时候，资本要异化人为生产要素的时候，他就要规范人类的所有的知识系统，才能将人类本来具有的多样性生存资源被其异化为被产业资本所使用并被它占有价值的生产要素，实现这个过程是产业资本赋予教育体系的任务，因此教育的过程也就是所谓的being　studies，也是一个被学习，被教化为性质同一的生产要素的过程，这是产业资本客观的需求！

如此而已，何以德哉。

遂有著名经济学家说，经济学不讲道德。

诚然，无可厚非，不过是个很客观的表达罢了。

而这样来看90年代中国人高速度地追求产业扩张时期的教育产业化演变，也是在这个阶段的必然，教育既属于生产力，则势必产业化。因为它是让人异化、变成劳动力要素的规模经济过程。另一方面，教育又附属于上层建筑，那是因为这个体系它本身蕴含的利益分配制度及对其做科学化理论包装都是支撑着上层建筑的。然而，上层建筑内涵具有规范教化和国民动员功能的意识形态，还得靠教育体制予以合法化解释和普及传承，这就内在地与教育产业化之间构成了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本质矛盾！

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不能够要求教育什么？我们不能要求教育改为有教无类，构建一个多元化的、非常开放的、包容了所有的多种人类生存环境条件下多样化存在的体现生态文明理念的教育，这样体现有教无类的、使人回归于人的生态文明教育，有悖于产业资本需求，难度很大。

当然，我们如果不批判整个教育体系，只不过是要这个教育体系更多些包容，那也许可以做得到，比如说非得有什么人自己愿意去做非常另类的、但体现人类社会多元化生存的这样的学习和研究的时候，那就得耐得寂寞，少得分配，坐得冷板凳，啃得馒头喝得凉水；就不能指望像其他热门专业那样去积极服务于产业资本的崛起的需求就吃香的喝辣的、出去一次演讲给多少万。

那么，就有了在承认教育体系的这种内部的利益结构的差别条件下，仍然可能靠自觉来实现鲁迅戏称“隋洛文”的可能。

这时候，既然知道教育体系内部追求学何以为高的这个可能性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说中国百年教育很难再出大师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教育本身体现了一种作用，在于把人异化为一种生产要素、可被产业资本占有剩余价值，它的作用是服务于这种产业资本的崛起的。

那它的积极意义在哪呢？如果中国人不崛起，没有以产业资本立国，你得挨打。

因此，就不能简单地批判这种教育制度完全是错误的，完全反动的，不能如同当年发动“文革”那样，也不能像现在这个姓尧的小伙子对

教育持完全批判的态度。不过，他有这种稍微超越的思维，大家也不必去批判，他只不过是稍微讲得早了点。我们看到身处其中的这样一个产业资本主导的社会发展历程，谁想提前做些思考，提前有点理论超越，那谁都会被这个产业社会所批判，所不容。

（三）独立思考

要解释以上道理就得跟大家交流我的思考过程。

这么说，就是结合点实际跟大家说，要想真有点能力，真有点思想，要想学高为师，那你一定要有一点比较另类的思考能力。举我自己的例子吧。

我记得是在1979年看一个手抄本文章，当时叫“四签名”，在北京高校很流行，我至今依稀记得四签名写的文章题目叫“社会主义结构性经济危机”。今天我不知道你们谁看过，如果讲读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很有意思。这四个年轻人敢签名，就意味着他们敢独立地承担风险。承担什么风险呢？承担指称社会主义也存在经济危机的理论风险。我们传统的服务于国家产业资本崛起阶段的原始积累阶段的教育，那更是需要统一思想，谁都是向国家资本贡献全部剩余价值的劳动力，谁都在被学习中别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有其他想法一定被批判。那大家只有认同这一套思想，才能够最大化的献出大家的剩余，形成最快的产业资本原始积累。这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比的是快，因为谁慢谁就挨打。所以我们在一元政治环境高度紧张甚至是战争威胁条件下的产业资本原始积累，要求的就是只有一个思想，不能有其他的。而到达产业资原始积累完成，进入产业资本扩张阶段的时候，就出现了挑战单一思想的文章。

现在学者们强调的所谓这个普世价值和原来单一思想没有什么本质差别。当那个阶段单一思想还处于统治地位的时候，出了个“四签名”，四签名这四个人有朱嘉明、黄江南、翁永曦、王岐山。当时对问题认识较深的现在还剩一个在位的王岐山，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其他先生现在有的在海外，有的下海经商，都还算比较成功吧，至少算社会上的成功人士。

你们想，那个年代就有人公开挑战主流理论界，如果我们稍微往前推一点，“文革”期间早期就有很多人在思考，提出很多挑战性问题，只不过后来被淹没了。如果现在有人重新做“文革”史的研究，你会发现那个时代人们思想是活跃的。事实上，1979年及早期思想解放都仍然是个

延续，延续到“四签名”手抄本的文章之后的西单路口大字报墙。

如果回到那个阶段做反思，而那个阶段的思想解放运动，很多讨论其实是完成了产业资本积累到产业资本扩张、再到过剩期间出现的一个结构调整所客观需要的多元格局。因为，过去国家资本是单一重工、单一军工这样一个为了打仗的军重工业体系，相应地也就形成这样一种单一思想体系、教育体系和理论体系。而到20世纪70年代这个阶段开始出现产业资本结构调整追求产业扩张的时候，就有对此前单一结构的反思认识。何况，我们也有单一结构导致的经济危机，也有很多人认为这个经济危机是因为结构偏重的造成的。那时候，各种挑战性思考很厉害，不要小看那时候年轻人的思考，因此，我也说不要小看现在年轻人的思考。尽管思考的内容、提的问题不同，但都值得我们关注，去保护，叫做我尊重你的说话权利，不要来不来就把他扣帽子打压成什么。

那个阶段出现的情况非常重要。我的思想形成也受到那个阶段重大问题讨论的影响，其实，后来我的文章发表也不过是画蛇添足。例如，我在1988发表《危机论》，这个“危机论”讲的可就不是结构性危机了，而是讲周期性危机。就更大胆了，对吧？1988年还是原来的那个主流理论体系掌握这分配体系和学术规则，还是这个体系还没有被彻底改变的时候。那是从斯大林模式继承下来的思想理论体系。就有反对意见说：你怎么胆敢把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规律——周期性经济危机，拿来运用到对社会主义经济历程来进行分析！这是原则错误。

对我1988年5月那篇文章的严厉批评被8月发生的通货膨胀淹没了，后来到年底计算全年的通胀率18.6%，我的文章也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接踵而至的1989年生产停滞进一步教训了那时候的主流理论家。

那时候，我的思考虽然还很幼稚，但是已经把我们追随发展主义的过程，把整个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文明阶段的历史规律现象开始做讨论。也在同年，大家没关注过的我的另一篇讲民间资本原始积累的文章发表了。既然讨论了官方的资本原始积累了，接着就开始进入民间资本的原始积累的讨论了，而民间资本怎么原始积累的，和地方政府的保护行为怎么结合的，本来都是很实际的问题。那文章也是《经济学周报》发的。那个老编辑是何家栋，思想解放些。

总之，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很多讨论，是对中国经济运作基本规律的初步的探讨。

也就是在那年，同时发生的一件事，也就是刚才赵树凯讲的1988年

关于农民协会的讨论，我那时候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农村改革实验区办公室，领导就跟我们说，咱们如果能够在将来把我们这个办公室变成中国农民协会的办公室，咱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80年代的领导很早就有这样的认识，不是只有现在的学者刚讨论。

因此可以说，我认识产业资本运作规律的文章是1988年。我们认为农村改革的目标是办中国农民协会也是1988年。

也就在同年，领导提出了我们这一代中青年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应该在我们退下来之后，和前辈——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即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等等这一波做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的工作做一个对比，看看我们各自是怎么做的，分析两代人做农村改良事业的异同。所以那时候，我们还派人到北京图书馆把早期的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陶行知等人早年所做的事情的历史资料复印，装了满满一柜子，打算等什么时候有空再拿出来做比较分析。因此，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清楚要积累档案资料，积累历史资料。哪怕我们做不了，也可以留给后人做。

可是，我们怎么会在产业资本开始扩张的年代就去关注乡土中国的变化呢？

那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产业资本的基本运作规律，它一定是从三农获取剩余的。直接把三农要素流出转化为产业资本的资本化收益。这个规律早在那个年代就已经认识到了，所以不是今天，而是早在80年代，我们就已经这样看问题了。

请注意，今天人们讨论的改革，很少有人讨论80年代的思想，因为那时思想对于产业资本而言是有超越性的，是有真知灼见的。请各位务必注意，再后来形成的工作，比如我们去帮助志愿者，甚至小的NGO下乡支农等，这些事情其实并不是后来自发形成的。甚至早在80年代中期，记得我们的老师杜润生就说，你们这个农村实验区办公室要是能够动员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志愿者下乡，你们就成功了。

我当年就是联络室的干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有个联络室，责任就是联络各个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动员他们下乡调研，我们每年寒暑假鼓励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下乡，给他们调研回来的报告评奖。也有在报告评奖后又被揭发说是抄袭的，记得1986年我还到一个山东大学生调查所在地去核实是否抄袭，主要看他是否到村入户了，他的报告内容与调查过的村户情况是否吻合。可见那个时候的工作

是非常认真的。

再到后来，比如我分工搞《中国改革》杂志社的时候，也算狗尾续貂地组织大家调查研究，也拿大学生的调查报告来评奖，给大家结集出版，所做的事和80年代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差不多是一样的。那时候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在干这样的事，所以它当然也被认为是客观地代表了农民的利益参与中央决策的部门。中共中央国务院当时是有这样作为“三农”代表的部门在操作着中央政策调研。而对这个能够代表“三农”参与政策的部门的认识一度有偏差，后来也是被重新肯定的。无论哪个领导都认为，80年代农村政策是我党农村政策是最好的时期，这一点，到温家宝1997年要当分管农业的副总理的时候，他就这样表过态。说我们能不能再搞成像80年代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这样的机构，那个年代是农村政策最好时期，因为来自于“三农”，服务于“三农”。

以上说明，20世纪70年代到了产业资本扩张初期阶段时，因有结构性的变动的需求，就出现了关于结构性危机的讨论，后来20世纪80年代又出现了关于周期性危机的讨论等。那时候人们对产业资本的认识，和对产业资本从三农提取资本原始积累的认识，从某种程度上说应该是完全公开的讨论，并没有遮遮掩掩。真问题拿出来讨论的情况下，就有真知灼见。

回到研究上来，那时候就叫做学高为师。

因此，为什么人们都说那时候一批中青年精英集中在这些中央政策部门，而没有集中在高校，是因为高校的整个知识体系，这个教育所体现在上层建筑的基本功能，还是在于试图把人教化为统一的生产力要素、可以被产业资本原始积累来占用的产生剩余的这样一种要素，因此，很早就是统一的教材、统一的理论，而这一套，20世纪70—80年代在高校里还没有改。

你们不知道，当时教育面临改革大潮时，当时的教育部长讲的什么，他提出的口号叫“全面恢复十七年”！而十七年是什么？主要是斯大林模式的，服务于产业资本需求的，把人异化为劳动力要素的这样一种制式教育体系，是把人异化为标准化的生产要素的十七年。因此教育走向了和社会进步不那么同步的所谓改革，我也不敢说相悖。

教育之所以今天被人们广泛诟病，其实是当时教育内在利益结构的要求，在恢复十七年口号之下得以延续。因此我们说，这个教育体系到

90年代当它得以变形的时候，又激进地转变追求美国主导的国际化，国际化无外乎其实就是指美国化，而美国又是一个85%的GDP来自于第三产业的得以剥夺全世界的特殊经济结构，而这个美国经济结构所要求的美国现代教育，恰恰和我们处在产业资本扩张阶段的教育在内涵上本来是不一样的。他们要求的是培养以金融行业为中心、全球外资进入最高的国家金融资本阶段的人才。而我们在90年代改革的时候并没有形成如此庞大的金融资本，我们尚在产业资本扩张阶段，因此我们盲目追求的这个美国结构，造成越是排名靠前的学校，越是变为整班整班的留美预备科，然后他的班会可以在美国开，所以大家就都愿意去美国。结果是全国有限的教育资源是用来为美国输送人才，因为那才有你这种美国模式的国际性教育的客观市场，因此我们的高等教育人才市场演变成了美国导向之下的人才积压。

而大多数得不到教育资源投入的普通中小学、农村教育和职业教育就都衰败。而由于高等教育恰恰不符合产业资本从农村提取劳动力的这种要求。于是乎，也就出现了良莠不齐地各种各样的民办的职业教育——官办的职业教育衰败了，民办的职业教育兴起了等等这些光怪陆离。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大师，越是名教授，越没学问，因为有些名教授只了解美国，不了解中国。

因此，也在这个阶段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在本质上对教育的无法认同。大家趋向于六十分万岁。和80年代进高校的学子不同，那时候大量学生的都是被社会锻炼过的。我进高校的时候是28岁，我们是被工农兵生活锻炼过的，满脑子是问题。进学校是求知的，发现老师发给我们的是“十七年”的发黄的教材，迫使我们到处寻找手抄本文章，参与大量社会讨论……，我们党支部确实在当时起核心作用，带领全体同学对抗这种维护教育体系的既得利益结构的陈旧教育。

举一个例子，我那时候上了一个外经外贸的选修课，拿了一篇结业文章交给老师，他说你这个文章观点不对，要给我不及格。我说观点不同，要看是否言之成理，跟你谈判，算我没选你这科，你也别给我不及格。今天的教育体系再也不可能允许我这种人出现了。还如，上党史课我给老师写了一篇英语的论文，老师到我宿舍找我谈，说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说因为老师你讲得好，你这个课讲了很多史料，我觉得对你讲的史料的分析可以英文发表。所以我上课就用英文记录了，期末就用英文给了老师写了一篇结业论文。老师当时就要我给他口头翻译这篇结

业论文，还得了良好。

还有很多当时师生之间的故事，因为我们是“文革”后恢复高考入校的那批老学生，那时候跟老师年岁差不太多。我是十多年工农兵生活，是实践中出的真知，你书本知识要跟我在实践中获得的真知对话。

当时那个教育体系确有很多人不认可这东西，所以，我们那时候满北京找有思想的老师去听课。哪个老师的课能让我们接受就去听，不能让我们接受的课就逃学。这里再举一个例子，当时有一个老师，讲课把学生都讲跑了，看班上还剩下三五个学生就非常愤怒，说：期末考试我就考笔记，谁不记笔记，谁就不及格。我说你这叫什么考试？我当时是学生党支部书记，就开党员大会，所有党员一致通过在这个老师要考试那天组织所有要入党的学生积极分子上党课，不来本支部就不发展你入党，然后逐级上报给上级党委，最后只能把考试取消。

到90年代，高校学子演变成了各种各样的支农学生社团。因为这种延续下来的教育方式仍然和学生实践中形成的良知不符。因此你们农民之子为什么能坚持十年，虽然每个人观点不一致，甚至是冲突的，是因为每个人内心深处这颗善良的心，最基本的东西是以良知做人。

所以北京师范大学的农民之子作为支农社团，学高为师看来达不到了，德高为范总要追求吧，那么怎么办呢？我们自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当资本排拒表现为城市排拒的时候，试验着做了点不认同这种排拒的事，以我们有限的知识，去做一点有限的事情，表现了一点我们师范大学的一种德，无德何以为师啊？所以那是大家一种良知未泯的一种表现。

我们说什么叫做德？坐而论道，可谓德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述而不作等，这些有任何德的含义吗？难道仅以现在这种学，就可以生成德吗？当我们把这种学和现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密切结合知道不可超越历史的时候，因为他的利益分配整个来源于这个阶段所产生的收益，是二次分配得到的份额。所以说这个阶段所需要的这种学，难道可以产生德吗？如果有，或者定义为德，那绝对不是真的。那会如鲁迅先生那篇杂文《狂人日记》所写的一样，满纸都是……不再往下说了。其实会有人看到这些问题，于是乎他会发出呐喊，在极端痛苦的情况下他会有“狂人日记”，当要做某种精神回归的时候他会“闰土”。

当你们需要有精神家园的时候，这个纪念册里又有一个文章，作者是黄凯平，来了吗？《在这片土地上筑造家园的一群人——我眼中的“农民之子”》写得很好，你至少在想到故园，想到当年鲁迅先生写闰土的那种感觉。谢谢你，坐下吧。

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啊，真不容易，循着自己内心深处未泯的良知，你们走下来了。10年了，你们走到今天，还能让老会员们回来在一块开个座谈会，再跟新会员们在一起交流交流。你们不易。

为什么？是因为你们开始建筑根据自己内心深处未泯之良知而形成的所谓“德”。何以为德？没有在实践中对自己的改造，凭着学了几个什么“拉夫”、什么“斯基”，你就“德”了吗？你肯定有了他在他那个阶段中他对于那个客体的反思所形成的认识而被人所归结为“德”的那部分知识，但那部分知识并不意味着你就有“德”。

作为教师，你们作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应知这个“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校训，当讲“师”和“范”的时候，你们知道为人师表。那德是什么？德何以为高？如今这个德何以高？不经过你们这样的支农实践，去长期地关注弱势群体，连一般知识分子的素质都没有，何以为师？

什么叫“知识分子”？说得很清楚，不管你是不是有高等学历，只看你是否代表着人类良知去做社会批判，并且在这个批判之中去践行你在社会批判中所提出的理念，这就叫“知识分子”。哪怕你们没有上过学也是一样被称为知识分子。

梁漱溟为什么被称之为“大知识分子”，是因为他上过高等学校吗？非也！是因为他一生坚持了那种批判精神，且竭尽全力地身体力行了。

最近有一篇文章在纪念萨缪尔森，萨缪尔森难道是学经济学的吗？他为什么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难道是他读过经济学教科书？错了，是因为他写了经济学教科书，但你们要知道他是一个没有读经济学教科书而写了经济学教科书的人，因此他才被叫做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今天中国教育界可能有这样的大家吗？唯“附庸”耳——附着于某种利益集团而为其张目者，何学之有，何德之有？！

2010年的第一天不应该说太多。说到这，咱们就戛然而止。

谢谢大家！

（四）互动交流

沈湘平（主持人）：温老师用“纵横捭阖，洞若观火”的思想为我们讲了对一百多年历史的判断，还有对我们当前社会问题、教育问题的症结的诊断，还有从他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讲了在我国在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有的“治学”的立场，我们很受启发，很受鼓励，还让我们警醒，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温老师。下面我们来到提问阶段。

SFQ：温老师，我以前读过你的一篇有关“三农”问题分析的文章，今天听您演讲比原来我通过我自己的理解，我感觉自己有更大的提高了。我就觉得，感觉您在中间分析的从产业化然后到金融过剩的过程，好像是历史的结果，个人无法改变的一个决定论的东西。一定程度上说这个历史的进程可能不是由我们个人的或者个别因素的改变甚至个别政策的调动所受到影响的。那么，我们就是这样一个被格局化的人，处于利益的某个纠葛中。我们这些老会员可能感受更深，好多同学毕业了以后就可能是一个老师啊，或者某个公司的职员。就是我们，尤其是农村出来的孩子，碍于面子这些问题，碍于养家糊口、赡养父母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有一种悲剧的色彩或者说是悲剧的命运。

我们知道历史车轮是滚滚向前的，不可阻挡的，甚至是处于某种决定论当中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可做的有多少？或者，我想的另外一个角度，就像温老师您刚刚讲到的德，我觉得有中国历史上有知识分子为民请命或者类似于这样的一种情怀，那么这中间我觉得是矛盾的，也是我自己长期纠葛的比较多的。我不知道温老师有没有类似的纠葛，对我们会有什么启示？

温答：你听我谈过自己的苦恼吗？没有。说得简单一点吧，就是没工夫。假如我要停下来考虑我的困境、我的苦恼、我的羁绊，那就麻烦了。我们这一代人吧，从生下来就比别人忙，所以显得比别人老，一直忙于干活，什么事都比别人晚。我说我上大学28岁吧，我上研究生的时候是我同班研究生的爹的那一辈，就更晚了，我拿高级职称的时候快50了。什么都晚，所以就来不及。你们还有工夫停下来叹口气，我们是没工夫叹息，所以你问我这些事，也许是不适合，我没想过，也来不及去想，我即使想了也不能怎么着，就是得抓紧去干事。

也因此呢，我要感谢你们一句。其实我老想停下来，但就是停不下来，就是被你们这样的年轻人，还有社会各种各样的人推着，生生推

到……我看到这个小伙子写的文章说知识分子懒惰，我其实也并不是不懒，我也挺懒，但就是停不下来。毕生只有一个感觉，就是没工夫！有时候，说句俏皮话就是“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太深。为什么我的脸上长带着微笑，是因为我面对的矛盾和困难太复杂”。所以不得不含泪地微笑，或者另一句话说的，就是因为我面对的批判太……太那个吧，所以就只好笑着面对这一切。你要想稍微拉下脸来，整个人就会太沉重。

我倒想多说一点你刚才说到决定论或者所谓的“宿命论”。

我们首先承认规律，我觉得“宿命论”不是个重要的东西，是因为当前很多被人们说成是规律的东西可能不是规律。我刚才说“何以为学”的时候，我记得是在提出一个东西，我最近在很多讨论中开始这样提问，有时候甚至把那些听报告的人激怒，我是想说，判断真理目前没有别的好办法，现在所谓“创新”和“被创新”太多，所以判断真理只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是看理论的科学性。无论你建构的理论逻辑多么完美，看你这个逻辑的起点是否能够和历史的经验过程吻合。是否“宿命论”我说不好，只要你的理论逻辑和这个历史的经验过程在起点上不是一致的，那这一定是涂抹理论色彩的“包装”，带有某种意识形态目的的“包装”。比如说，我们今天把市场经济作为市场主义提出来讨论的时候，它就已经是一种包装了，因为它没有和历史的经验过程在起点上做到一致。

同理，假如我们一定要把中国1978年进入改革之前的发展过程定义为计划经济的话，那么这个定义以及我们关于计划经济的批判，全部批判逻辑也因为找不到历史起点或者不能和历史经验过程在起点上一致而不可能是真理。

我最近开始写书的时候就跟大家说，中国改革前其实没有来得及搞完整的计划经济，我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不始于1952年，而是在1950年朝鲜战争苏联开始军事投资以后就形成了苏联人指导下的中国的那个特殊的军重工业发展过程，不是按照“一五”计划搞起来的。我们的“二五”计划只有几个控制数，但因为苏联人投资中辍而基本没有能拿得出来。我们的“三五”计划本来是想调整农轻重比例，但由于周边地缘环境趋紧必须加强战备使“三五”没有最后完成文字工作，大计委就被小计委取代了。也就是说“一五”不是我们的，“二五”没出来，“三五”讨论半天，最后负责制订计划的计委失败了。如果说我们改革开放之前是五

个五年计划，那么对不起，“文革”期间“四五”、“五五”还算有计划，但其实“文革”中也根本就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可以按照计划来做。

所以如果把改革之前定义为计划经济，起码应该知道实际上它是怎么制定、怎么执行的，你找不到计划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经验过程相结合的那个起点。

这也包括我们的改革，据说是建设市场经济体制，但你也找不到西方那个可以参照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经验起点。

因此今天高校的教科书解释既不是真科学，也不是真理。

所以我说，你第一个问题源于现实中很多解释让你感觉到的是历史宿命论，但你得到的通俗化的理论解释它既不是真理，也不是科学，因为它找不到它的解释逻辑的那个历史经验过程的起点。

第二条，怎么判断客观结果的科学性。假定我们要认定某个客观结果是科学结果，那一定是要在给定的同样的条件下，沿着同样的技术路线可以重复得出的同样的结果，也就是说结果可被重复。请问当代社会经济领域中哪个被理论界认定的结果可被重复，如果没有同样的条件，只介绍技术路线，任何一个社会经济过程是可被重复的吗？

根据这两条，可以在我们今天的所谓“学”中，何以为学的“学”之中，请大家去做点衡量，做点评价。你们会感觉到，我刚才这句话问得是有道理的。何以为学？因此我说你所说的那个历史宿命论本身不是真实历史过程，人类历史本来并不是这样的，它不是个被人打扮过的戴着小红头绳的姑娘。你的问题内在地表明，在人类的这个阶段，大多数人生是被扭曲的。明明她是个老态龙钟的老妇，给她戴上小红头绳就是小姑娘了吗？尽管历史都是今天被扎个红头绳，明天被扎个绿头绳，这样被扎来扎去的，但它依然扎不出个亮丽来。

CJH：刚刚听完温老师的演讲，我很赞同您说到80年代的真知灼见在如今的学界是很难再有超越的了。然后您也说到“四签名”中的王岐山，最近我找到一套“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第一位编委也是王岐山。本想问您和赵树凯老师同一个问题的，就是刚刚赵老师说到农村从90年代计划生育最难，收税、收费难，是矛盾集中点，那么现在是维稳，可以说现在的“三农”问题从单方面走向了全面性的问题。

从80年代到现在，这么多人，这么多知识分子的努力，三农问题其实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有一个更加严重化的趋势。温老师，您现在是人

大农村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也是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核心，是我们农民之子里面大多人的榜样，就是想进入体制内获得一定的体制内的资源去做推动社会的事情。我们从2005年开始也有一些项目和活动走到体制外去做事情，我们也受到您的很多启发，到农村脚踏实地地去做。实践出真知，这一点我很认同。虽然这几年下来，社团里还保留着这样的两种观念，一方面削尖脑袋往体制里钻，然后想办法做事情；一方面认清楚体制是一个很强势的东西，希望能在体制外做一些事情。我觉得，温老师，这么多年来，体制内的事你也做了，体制外的事你也推动了不少。所以，我想问温老师，您觉得这两种不同的路线可以怎么结合起来？

温答：听起来好像我多么有策划似的，其实都没有。只是，怎么说呢，可能是我们受过一点传统教育吧。修齐治平这点基本的东西是有的，只不过看条件吧，能做的时候多做一点，不能做的时候少做一点，完全不能做的时候呢，那就独善其身吧，读书去，做书斋研究去。

我刚才不愿讲我这个经历呢，是因为太复杂，太多的挫折，包括有相当长的时间什么也不能干，只好去读研究生啊，做其他研究什么的。我没法给你们一个如何结合体制内外资源的启示。很多年轻人都希望得到一点箴言啊什么的，其实人这个动物他真的是千差万别的，我最不会做的就是思想工作，也最不会跟人家讲这些。

对不起啊，我实在回答不了你的问题。独善其身不容易，但无可奈何之际只好独善其身，你还能干吗？

FBX：温老师，我问你一个具体一点的问题。我知道在土地问题上您是坚决反对农村土地所有权私有化的，您的立场也是很清楚的。现在的制度能够保证农民工有耕地这一个最后的保障，保持社会稳定的趋势。

我想问的问题是，在现在这种土地所有制的情况下，在城乡结合部征地的过程中，农民基本上没有发言的权利。您觉得在现在的土地所有制的情况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的途径是什么？

温答：看来你还是没有很认真地看我的文章，问的问题还是ABC的问题。

我得跟你说，我首先讲的是："农地本无事，征地自扰之。"

在农业用地领域中，农地本来就不是公有。自1949年土改以后是私有，只到1956—1958年短短的一段时间，是变成被乡镇、亦即公社一

级所有。到1960年以后，恢复到以队为基础的时候，土地所有权也就是以自然村为基础，而自然村为基础的就相当于私有性质的地权，在几千年来都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说无论是土改还是大包干，都无外乎是恢复了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延续下来的农村财产关系，也就是说大家都在一个村中聚落而居，那村中的公共事务是靠公共财来维持的，在一般农业文明中没有现代资本主义意义的绝对产权。即使是在民国年间，在加快资本主义进程的历史阶段上，也是有许多农村维持着祖宗田、族田、庙田、学田等公田。大范围看，越是南方土地资源短缺的地方，土地对人口保障功能强的地方，在民国年间的公田的比例就越高。比如像福建，闽南这一带，像珠三角这一带，很多村的公田占比都高达80%以上，比现在被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制度还高得多。

后来，“大包干”之后土地只是名义上的集体所有。所以我说，人们现在并没打算讨论真问题，愿意讨论的是伪问题。农村农地的集体所有，事实上只是社区内部成员权的集合，真实权利是成员权。

具有历史意义的矛盾在于，包括过去的旧民主主义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民主主义，中国的领导人想的都是要实现资本主义规模农场，所以我们的政策本质上反对农民根据成员权来分配土地。其实成员权是在农村社区内部最彻底的私有，也就是说我生下来以后就有一块地保证生存，这是数千年农地制度历史变迁内含的一种本质特征。应该理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之所以都要想方设法地把这个本质特征否掉，目的只不过是要推进资本主义农场，以此促进工商业发展。我们先要把人类进入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之后的这一点起码的道理搞清楚。

我们80年代大包干，既是财政危机压力下的让步政策，又是政府退出、三农休养生息。其后多年来都要求土地产权清晰促进流转规模经营，本意也是想推进资本主义农场，不是仅仅为了保护农民权利，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现在发生土地矛盾冲突一般不发生在农地，随农民工外出，农地早几年就大范围出现流转了，书面合同也好、口头协议也好，张三愿意李四帮他种着，然后打工无着了再要回来，那是他的事。至于你是否实现规模经营，和农民一点关系也没有。可我们非得要强行介入，是我们的毛病。当然我们知识分子脑子里想要法制化，要签协议，要签合同，其实那些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对抗性矛盾主要出现在征地上，那征地有什么问题，无非是城市工

商业和城市房地产资本，这两种资本必然和金融资本结合，然后配合上地方政权，制造出有利于资本的制度供给，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本来是常态。在任何发展中国家，在加快产业资本进程中，也都出现这些问题。也没见哪里因为土地公有、私有或者农民所有就解决这些问题的。你们得做点发展中国家的比较啊，所以我说农地没事，别拿农地说事。这是第一。

第二个说法，“农民本无事，中产自扰之”。

谁要农地自由买卖呢？是日益崛起、人数已经是全球之最的城市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正在裂变着半个世纪中国主要以小资为主的国情特征、成为21世纪中国的历史性短视和邯郸学步的内因。其实农民大多数认同村内土地均分制形成的保障性质的成员权，本身并没有提出这啊那的，就像前一段时间我说“农民不抗旱，媒体在抗旱”，其实地方政府也不抗旱，因为地方政府就追求GDP，农民不抗旱是因为农业收益过低，抗旱投入没有可能得到相应的回报。那谁在抗旱呢？只能满大街媒体在抗旱，这是今年中国农业的真实情况。同理，现在究竟谁要把农村土地私有化呢？主要是随过量增发货币而虚拟财产不断增加、不得不寻求避险投资的城市中产阶级，那些已经崭露头角的农村新富精英也有类似要求。无论是这些高校知识分子也好，媒体也好，老板们也好，还是房地产资本，这些大都属于这个新兴中产阶级，因为土地没有彻底地私有化，富裕群体既不能跟农民自由交易，也不能像政府那样垄断性地直接占有农民的地。

别拿农民说事，别拿农地说事。基本常识搞清楚，先把土地性质划分开来，我们才能讨论土地问题。来不来就简单化地说：你到底主张土地私有化，还是主张土地公有制？我从来就没有主张过那种服务于产业资本扩张的所谓土地公有制，也反对这种偷换概念地试图照搬西方意识形态的土地私有化。我一直说，自从三次土地革命战争之后农地本来就是农民作为社区成员共同所有的，这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私权。所谓私有化是满足你们可以凭借过剩资本占有农民生存资源的那个制度，是吗？

说问题得先说清楚ABC，现在讨论问题往往不从基本概念讨论起，而把城里人所提出的利益诉求假托维护农民的利益来表达，这也是长期来农民的利益在客观层面上无从表达造成的。都说自己是代表了农民利益，其实你代表自己。

农民的利益千差万别，在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如果没有农

协帮助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农民的利益表达的机制尚不存在，根本就没有可能被代表。所以别拿农民说事。

土地制度改革与历届领导人百年制度变迁的主导思想高度相关。我从来指称大包干主要是“政府退出”过量提交原始积累因而负债过高的不经济的农业领域的结果，而不认为这是农民的需求。

FXJ：我想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说的要成立农会中首先要讲明农民的概念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咱们现在所讲的农民是不是就是1956年的时候，为了国家的资本积累而形成的一种城乡分据和社会身份的一种行政化划分而形成的一个概念。因为农民在这个现代化中，他作为一个阶层，其本身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那么将来的话，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是不是会消解掉，因为农民是现在我们的概念下的行政化的划分公民，他本身的这种转化的趋势，也需要掩盖掉当时由于城乡身份而划分的趋势。所以说如果将来成立了农会的话，那么它有谁来领导，它的利益诉求由谁来提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温答：很好，这个算是今天提问题中最好的问题，也是最需要花工夫来讨论的问题。

但是，因为时间已经没有了，所以不能跟你讨论太多的“城乡二元结构”，这是否就是一个行政性划分？

如果你真想了解的话，我建议你把我那个去年1月9号再版的那本《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拿来读一读，先来了解一下城乡二元结构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就如我们一般媒体所说的它就是一个二元行政性划分。然后，你再考虑一下城乡二元结构会不会在可预见的将来就转化为单一结构，也就是说乡土社会的崩解，农民身份向市民的转化，在可见的将来就能完成。这个是我先说的你需要做的一个大势上的判断吧。

其次，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我在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中关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和农民进城问题的分析，我在90年代以来的调查和分析，一定程度是促成今天中央强调城镇化的一个原因。人们都知道，目前为止，在发展中国家找不到城市化成功的典范，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无外乎是资本扩张，农民破产，破产农民携家带口进入城市，变成城市贫民窟的非正规生存或非规范生存的人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农民结构发生的分化？这个分化到底有什么趋势？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讨论。

所以说你提了个很大的问题，也是很好的问题，但是我用这么短的时间无法回答，还是请你们去看看什么是我真正的观点，以防止被做媒体的人所误导。

第七节　中国林改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意义注

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来向大家汇报在林业改革调查研究中形成的体会。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两次林改，我都是当时政策调研方面的参与者，本来以为这次新世纪的林改参与不着了，没想到国家林业局的领导又给了我参加这次林改的机会，使我有一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整个的林改全程参与形成的历史感。据此，谈谈体会。

（一）分—卖—分：三次林改背景分析

林改的历史意义主要在与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客观上一致。

纵观过去30年的林改，20世纪80年代是以分为主，20世纪90年代是以卖为主，这次2003年以后又是一次以分为主的林改。

20世纪80年代以分为主的林改确实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在完成家庭承包分户经营时就认识到，大包干不是农村改革的目的。家庭承包所解决的问题远不如它所引发的问题多，所以才要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因为，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上我们农村就是家庭承包，我们搞大包干实现分户经营并没有超过前人，这一点当年就很清楚。因此，后期农村改革中出现的“三农”问题形势严峻，主要是没有按照客观规律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的后果。

同理，今天林改重新实现了以分为主，但如果不能进一步确立、重构农村经济主体，就不符合深化改革体系规律的要求。30年前以分为主的改革完成后，我们就提出农村经济主体包括农户、合作社和企业这三大类，虽然农户是其中一类，一般意义地维护农户分户承包也是正确的。但培育合作社与企业同样重要，不能把分户经营“意识形态化”处理。

20世纪80年代，在林区以分为主的林权改革缺乏后续制度安排，确

实出现了一些破坏性砍伐，在当年的政策部门也得到了高度重视。老一代参加林改的同志都知道，我们在1988年发起林改试验区的时候，在南方集体林区推进的就是今天做的这些内容：在山权、林权清晰化条件下促进市场化转让，同时形成以股权为基础的林业合作组织作为林区的经济主体。实践证明，只有在林区的规范交易经验足以构建制度的条件下，才能进一步引入外来企业投资。

后来之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陡然转变为以卖为主，是因为1993年中国遭遇到了财政、金融、外汇三大赤字同步爆发的政府债务危机。世界银行曾经计算过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综合负债率与GDP的比值超过了146%。今天欧盟国家遭遇到的债务危机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就曾经严重得多地爆发过！在那个仍然维持对中国制裁的年代，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普遍是幸灾乐祸的“中国崩溃论”，没有谁会出手相救。今天欧盟发生债务危机要中国人出手相助，他们忘了当年中国人是怎么渡过金融危机的。其实中国包括国企的许多方面都在“以卖为主”，更何况林区，很多地方财政是高度赤字，银行是严重贷差。在以林木和林地为主要财政资源的地方政府推进以卖为主的改革，主要是他们应对赤字和债务危机的客观结果，并非谁主观上就想这么做。

到1998年因国企改革造成数千万职工下岗、农村改革造成农民负担过重等问题都加剧了内需不足，加之东亚金融危机导致外需下降，中国开始进入了产业过剩和通货紧缩。接着，世纪末的生产过剩又相继引发新世纪的商业过剩和金融过剩，也就是说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这三大资本在新世纪都出现过剩，而这一点恰恰和当今“全球化的内因是全球过剩”在本质上是相似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2003年以后开始的再次以分为主的林业改革就具有了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以分为主的那场林权改革，是在1979年和1980年国家财政严重赤字压力下，被中央地方分灶吃饭的“财政甩包袱”政策给带出来的，那么，派生的一个客观效果却有重大历史意义，当年“一镢头刨出来个大金娃娃”的说法很形象，实质上就是占人口80%的农民和所谓城市资本密集的工业化过程相对而言脱钩了。从经济角度来说，在发展理论上这叫“去依附”，中国80%人口生活的农村地区，可以不再依托现代化城市部门，这是一个被称为二元结构的特殊的体制条件。

而此前之所以林业“危困”，在于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造成林区资源的被资本化——国家直接占有林区资源，以极低的林价来获取剩余。所以说，不仅农业有“剪刀差”，林业也有“剪刀差”，“剪刀差”是导致林区和农村一样的贫困状况的主因。因此，那不是林业穷，如同农村普遍贫困不是农业穷是一个道理。

正因为，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提取了过多的积累，才有20世纪80年代的以分为主使得政府“退出”最不经济的农村，才有包括林区在内的农村和资本化过度集中的城市经济脱钩，那既然实现了“去依附”，就意味着80%的人可以依靠农民家庭与平均占有自然资源的直接结合来维持基本生存，而这种体现农民“耕者有其田”理念的制度安排，历朝历代都做过。

（二）新时期林改的战略意义

这次新世纪的林权改革，与以往的不同在哪？

它的实践意义在于，在分的过程中，实际上拿出了集体林区28亿亩林地资源向山区农民做了一个重新分配，这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那次拿出了20亿亩耕地资源向农业地区的农民做了一次分配，这其实是具有根本变革意义的财产性分配。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政府重新“进入”农村经济领域——这个财产分配恰恰配合了2003年“三农问题重中之重”的民生新政和2005年的新农村建设——政府连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到2009年全球危机爆发之前，中国95%的山区、林区、传统农区实现了五通（公路、水、电、电话、网络）。

大规模的政府基本建设和公共投入，带来了外部投资资本“搭便车”的机会。因此，这次林改有一个与过去不同但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帮助已经过剩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重回山区和其他资源地区，得到占有资本化收益的“搭便车”机会。

在这种三大资本过剩的情况下，对中国林改来说，国家战略层次的现实意义还在于2009年全球危机大爆发的时候，过剩资本可以因避险需求转而投向资源地区。最近这些年，林业地区得到的外部投资大量增加，达到几千亿的规模，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随着资本回流，带动劳动力回流，一方面导致林区农民增收的速度快于平原农区；另一

方面，林区还吸纳了大量的区外农民流动就业。这就是新的财产性分配带动过剩资本追求避险流动所客观发生的结果。

改革史上的这三次林改各有特点，新世纪的这次应该说是条件最具备的，因为我们是在世纪之交三大资本都过剩条件下，通过林区的林权改革促使资金和劳动力要素回流，而且是全球危机打击下国内资本的回流。

我们认为，中国已经开始的金融化发展阶段上的一系列变化，符合资本运动的客观规律，无论不同理论视角的学者怎么归纳总结、评价都不过分。只是我们还没把其与这段林改经验相关的现实意义，进一步提升到国家应对全球危机的战略高度上。

归纳一下新世纪林改的战略意义，大致是两个。

第一，林区改革有力地帮助中国成功地应对这次全球危机。根据这个现实意义可以做一下测算，国内资本有多少回流林区、带动了多少流动就业、林区的林农收入增加多少、财产性收益占多少？为什么现在林区的林农收入高于一般平原地区传统农业的增收速度？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

第二，林业改革有利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了生态文明，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两型农业”。这次林改所客观产生的结果完全符合中央提出的“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的、多功能的农业和林业发展模式。特别是在这次林改中，很多地方把社区林业作为构建林区生态文明的基础，这是符合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矛盾的合理对策。而社区林业与企业化林业之最大不同，就在于把“以人为本”能积极地、互动地维护资源环境安全的指导思想，纳入社区林业的综合发展，并直接与股份合作社建设相结合。这样把微观组织建设与国家战略调整结合的分析，使林改的现实意义能进一步得到升华。

（三）进一步深化林区改革的要点

最后，对于深化与社区林业相关的投资改革，谈一些具体的看法。

当我们谈到这次林区投资改革的时候，首先应该强调社会上钱是过剩的。上周末开会有人汇报，仍有大量的应该在今年完成的小额贷款完成不了。我认为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产权改革需要加强财产收益分配制度建设。

很少有地方像重庆现在这样的做法，结合“地票交易”向偏远山区转移城市地产增值收益，同时借机把山区的土地财产权益及其分配做了比例划分——15%归村集体，85%归农户。这是现在重庆能形成以土地为中心的股份合作制的原因——至少让出15%给村内“精英集团”。

各地一般讲的所谓产权清晰，无论是土地做股还是土地交易，都没有做出这样的制度：按照一定的百分比分配收益。重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因为土地的实际受益者并不仅仅只是农民，还有村内“精英集团”。从我们在各地调研的经验看，他们事实上享有权益一般不低于15%。政府现在征占土地，如果不给村集体留15%的收益，就无法打动村内“精英集团”，一般会出现由村内“精英集团”所主导的反抗。尽管前面冲上去的是妇女、老人、孩子，后面真正主事的还是“精英集团”。土地收益分配如果不保证精英占有15%，而是完全归农户个体占有收益，这个体现私有化的完整物权的制度设计，客观上是做不到的。

第二，吸纳外部资本进入林区需要加强合作社建设来化解制度成本。

要看到，指望任何商业性金融去面对分散的林区农户做小额信贷，都会有相当大的信息搜寻成本，商业银行是克服不了的。因此，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尽可能“搭便车”——利用财政投入构建的公共项目获取的农户信息，在县级银行设立对综合性合作社的窗口批发业务，在促进合作社内部化的金融零售业务发育的同时，降低商业银行信贷投入风险。

比如说通过政府不断追加的财政经费向农户支付的新农合、新农保，以及用财政补贴的方式支持人保系统试点的农民综合性保险。这些公共品项目都高比例地落实到户了，这就意味着，其实农户方面的信息搜寻成本已经被政府大量补贴吸引普遍参与进来的农民支付过了。而农业、供销、技术和金融部门的投入之所以不能低成本地有效进入到农村基层，没有更多形成小农为主体的合作社作为接纳政府各个涉农部门投入的载体，主要是条块分割体制下大家没有条件去分享这一部分政府已经得到、本来应该公开的信息。我们也在试图帮助金融部门与政府有关部门谈判，把政府已经形成的比较完整的农户信息要来，通过分享来克服或降低信息搜寻成本。

有些人认为，由于没把山权、地权、林权都私有化，就没法抵押，也没法变现等。但我们通过调研认为，真实的原因是上面的这两条：一

是没有给村内“精英集团”留下15%的利益；二是没有结合农村综合性合作组织建设，来解决包括政府支农部门和商业金融的外部主体进入小农经济的交易成本。

此文是温铁军于2004年12月31日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概论》结业课上，为在场的100多名师生演讲“乡土社会的重建”时的开场白。

温铁军2005年3月21日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召开的有关会议上的发言。根据记录整理，已经本人审阅。

这是温铁军2003年在杭州的一次由浙江工商大学主办的国际会议上作的发言。

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史研究会理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青基会社区文化委员会委员、研究委员会委员，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方法》、《开放时代》、《中国学术》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学术刊物的编委。

在2010年第二届中国奶业高峰论坛上的即席演讲。

温铁军2003年对全国总工会干部培训的演讲。

温铁军2010年1月1日上午9：00—12：00在北师大B807对农民之子学生社团10周年老会员聚会暨“社团发展与三农问题再思考”研讨会上的讲话。

温铁军于2011年11月28日下午在国家林业局“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专家座谈会”上的发言。

第五部分　区域发展比较研究

第一节　社会变迁与政府治理的中西差异注

昨天晚上刚下飞机，就先去我们在杭州一个打工者集中的地方形成的观察点，叫“草根之家”（公益组织），参加高校学者和志愿者们与各地农村来的打工者的交流。现居住在杭州的外来打工者人口总量约有250万，相当于杭州常住人口的40%左右。这个社会结构的变化对政府治理改革而言，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在杭州谈“我们”和“让我们生活得更好”的时候，希望把这250万外来打工者纳入到杭州人的“我们”之中。

我向大会提交的论文，主要讨论社会经济变迁对政府治理结构调整的影响。应该关注的是，杭州和一般的产业资本集中区在经济结构上存在着基础性不同。

（一）西方对立的主流意识形态对“我们”不适用

当阐述社会矛盾变化和政府治理结构调整的时候，我们一般会受制于两个对立的主流的意识形态，也是两个本源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一个是阶级斗争理论，一个是所谓的市民社会理论。如果把这两个源于西方的理论体系在中国的实践中使用，常常会感到它们都不一定能够适应转型中的中国。

为什么？因为阶级斗争理论其实是在西方19世纪的社会对抗性矛盾的发展中形成的。到20世纪中后期，随着二战之后西方产业大规模转移，到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主流问世，再到以金融为中心的第三产业的推进金融全球化，原来在西方社会处于主流地位的阶级矛盾也随之已经转变成市民社会的矛盾。

大家可以看西方经济社会已经发生的典型的“V”字形转变。

我们如何看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个“V”字形变化呢？其实，这表明在社会成本上推造成的产业危机压力下，西方国家只能不断向外转移具有内生对抗性阶级矛盾的制造业。在这种大规模产业转移的同一时期造成的V型，在于西方国家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海外汇回资本收益来支撑跨国公司在股市上形成题材、拉动经济愈益金融化。我们认为，产业资本及其与生俱来的阶级对抗大都转移出去，才是西方形成市民社会占据主流的基本条件。

据此看，对于我们来说，这两个在西方对立的主流本来就具有一前一后的阶段性，但因为我们现在接受的主要还是西方的产业转移——之所以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社会矛盾有同质性的原因，主要在于都接受西方的产业转移——基本上还是处在“微笑曲线”的底端，在产业收益率极低的条件下恶性竞争。因此，在产业资本集中的地区，往往会发生与西方19世纪阶级斗争过程类似、而在性质上不同于西方当代公民社会的经验。

结合以上分析来看，杭州的不同特点在哪？

如果看杭州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中出现的“两个50%”，这里确有调整政府治理结构的必要。

杭州是一个产业结构趋向于高度化、已经使第三产业占比高达50%以上的地区。在这种调整期间，在向第三产业转型过程中，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基础性变化。随之，它的社会结构已经从一般低层次的产业、低收入市民这样的社会结构，转向中等收入市民占50%，或者说是中产阶级群体占绝对比重这样的社会结构。与这两个50%对应发生的，则是政府构建良性治理结构与时俱进的借机调整。

由此可见，杭州的社会经济基础变迁及顺应其变化的上层建筑调整，就会和仍然处于一般加工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占比较高的地区有所区别。

要理解这样的变化，我们还要进一步和西方现代化的经济社会特点做一个对比。

（二）经济现代化与贫富差别拉大

当中国人想按照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来构建中国的所谓现代化治理的时候，会发现我刚才讲到的两个对立的思想体系——阶级斗争的体系和

市民社会的体系，两者都未必适用。当代西方以金融服务业为主来引领经济，形成服务业占引导地位的高度现代化经济结构，但它的贫富差别也在拉大。并不因为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贫富差别就会缩小，相反，经济结构越高度现代化，贫富差别也越大。

可见，经济高度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公平正义，并不意味自由民主。历史的和国际的经验都不能证明我们所要的这一切可以通过经济结构高度的现代化来实现。世界70亿人口中只有0.001%的富裕人群，而且主要集中在西方。西方产业结构调整本身带来的是贫富差距加剧，而政府在这些问题上却束手无策。

在经济结构最高度现代化的美国，其GDP 85%以上来源于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制造业占比下调到约11%，农业占比下调到低于2%，这个高度现代化的结构似乎是全球的榜样。但，金融中心华尔街仅容纳了30万人就业。当它发生危机的时候，政府的救市投资却无法有效地解决在这种“极化”经济结构约束下的不能就业的弱势群体问题。因此，只有1%的人得到了大量的投资。可见，美国这种危机困境是由经济结构本身决定的，很难靠谁的主观意志改变。因为政府必须得去救占GDP 85%的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而不可能去救仅占11%的制造业和不足2%的农业，客观上就导致了“有复苏无就业”，贫富分化越来越大。

其实不仅在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也一样。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占比最高的是印度，其第三产业占比高达57%，但它的贫困人口数量也是世界最大的。这并不意味着经济高度现代化就解决贫困，而是反映了这个世界的现代化越来越趋向于极化，贫富差别越来越大。

连带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西方这种贫富差别很大程度上要靠政府推高负债来提供社会保障才能维持相对平衡。先看美国，它现在的政府负债占全球的一半。并且，不仅官方负债是一个非常大、还在不断增加的数字，私人负债也在加速增加，总计相当于全球GDP的100%，这几乎是不可逆的趋势。

我们再看其他欧洲国家的政府负债。欧盟从债务底线上看已经属于不合法存在，因为使它得以成立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本身规定了入盟国家政府负债的合法性底线。现在欧洲国家面对的是一个社会严重不平衡的局面，其采取的应对措施只能是政府财政普遍高负债的同时，制造过量流动性来对外转嫁高通胀。这种现代化政治模式在全球危机面前已经暴露出制度成本过高转化为非法负债的一面。

所以，能不能按照一般西方国家的经济结构和政治调整经验来追求高成本的现代化，来构建我们的经济社会的治理结构？这还是值得调研和讨论的。

（三）中国的比较优势和城乡二元结构下的软着陆

中国人并非没有做过努力。我们在100多年的近现代化过程中一直在跟随西方，但时移境迁，发现根本没法走西方的殖民化的道路，大量原住民人口仍留在国内，而且又往往在每一次危机过程中都表现为大量失业，很容易转化为社会性的冲突。因此，中国人百年追求西式现代化，教训多多。

到目前为止，什么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我认为目前还没有公认的确定答案。很多主流学者说中国劳动力便宜。可这早已不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因为印度、印尼、孟加拉等亚洲人口大国的劳动力比中国便宜得多。那为什么外商直接投资FDI不进那些劳动力更为便宜的国家，而纷纷进入中国呢？可见，并不是因为中国劳动力价格便宜。

第一，是中国政府的低负债率。中国有大约200万亿物质财富作为基础，其与政府制造的130万亿金融资产之比，相对于西方的经济泡沫化而言要合理得多。

西方国家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过度负债，而在全世界工业化国家中，目前乃至今后数年内政府负债最低的是中国。这就意味着中国这个超大型的大陆国家，仍然有条件用政府负债投资的方式，对内陆做基本建设投资，以此拉动其他投资。换句话说：只要政府长期投入于基本建设，就会为其他各项私人的或外部的投资创造“搭便车”获取机会收益的投资机会。

这一点比较优势只在中国才有，这就是中国仍然吸引外部投资的原因。这几乎也是当今工业化国家高负债的政治经济结构中，我国唯一还有的比较优势。

第二，是城乡二元结构。如果我们接受上面这个观点，就可以明白中国的城乡结构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般人都会把城乡二元结构当成非常负面的状况，因此大家都批评户口，基本上成为国际词汇。就像20世纪80年代很多老外到中国来，学会的第一句话就是“马马虎虎”。

现在大家都说户口，其实很少有人注意，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恰恰是以庞大的乡土社会所仍然保留的东方理性，承担了整个产业危机或者代价。

我们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八次危机》告诉大家，每当产业资本在城市发生危机的时候都会把代价向乡土社会转嫁。凡能够顺利转嫁的，城市的产业资本就能软着陆，危机也就解决了；凡属于不能转嫁的，就会硬着陆，每一次硬着陆都会砸出调整或者“改革”。

比如20世纪60年代的大调整是城市产业资本危机硬着陆造成的；同理，20世纪80年代的大改革也是城市产业资本危机不能向乡村转嫁造成的。

因此，今天在杭州谈到“我们”这个本次国际会议的主题的时候，需要大家理解：为什么中央政府2002年强调城乡统筹？2012年十八大进一步强调城乡一体化？主要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应该努力维持乡土社会可持续。如果我们不能真正做到城乡一体化，而是把农村摧毁，危机软着陆的载体就不存在了。

我们还得知道，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陷入危机跳不出来，原因就在于没有像中国这样有一个无数次接受危机代价使其在城市得以软着陆的农村。

（四）关于东方理性的讨论

那么，为什么一般国家的农村不能接受危机代价，使城市产业资本危机得以软着陆呢？

主要差别在于，中国的农村之所以能够消解城市危机，就在于它20世纪上半期有三次土地革命战争，借此完成国家政治建设所必需的全面动员，同时产生了一种“土改红利”。

其实，如果认真看东亚社会形态，就会发现：日本、韩国、中国乃至中国台湾，都具有借中国大陆土改红利形成的重建“东方理性”社会的条件。

东方理性的内涵，主要在于“内部化机制”。其运作基础可称为“农户理性”，接着，在农户理性之上是“村社理性”。

根据我们的研究，农户理性存在“具有内部化整合机制、形成家庭组

合投资功能”的家庭单位之中。村社理性则是由于村级占有土地所有权，得以对农户做财产分配和收益整合，而使农户理性在村庄地缘、血缘环境条件的约束下得以放大为村社的内部化机制。

简言之，在土改这种无偿分配土地制度、使土地成为“无风险资产”的情况下，这两种理性都能够使得外部性，特别是负外部性，可以在村社或农户中得到内部化的处理。

在中国的工业化原始积累时期，为什么没有发生西方模式的殖民地原始积累？

中国不仅是在最初的原始积累进程中形成内部化制度（这也是现在面对全球化挑战的最大竞争力），而且在后来的产业扩张阶段同样靠原始积累形成的制度及后期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来完成产业扩张。

这个道理，解释了为什么城乡二元结构中的乡土社会，以及乡土社会内在的东方理性能够使得“内部化机制”有效存在，并且能有效地化解城市产业资本的危机。在今天应对全球化危机带来的变化中，仍然希望这种有效应对的机制能够得以加强。

据此，至少应该认识到这个机制就是稳定我们乡土社会内涵的东方理性，能够以此来使“我们”这个概念变成国际化的语言。

（五）中国社会“金字塔”型的稳态结构

刚才讨论了土改红利，要知道土改最大的结果，就是使占中国人口88%的农民都变成了小有产者。其实按照西方阶级斗争的理论，小农应该被叫作小资产阶级。今天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主要是由过去的小有产者为主体的社会，变成了以中产阶级或者中等收入群体为主导的社会。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的中产阶级虽然占比较高，但仍处在社会结构的夹层位置。

过去农民分了地以后都变成了小土地所有者，今天我们知道中国社会的住房私有化率高达89%，接近90%，远高于不到60%的美国，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农民几乎100%拥有私人房产。同理，中国的农村土地也将近90%是在农民手里，他们即使在企业打工也仍然是小有产者。

此外，城市还有大量没有达到中等收入的小资群体。

总之，中国城乡小有产者群体大约占总人口的60%～70%，另外

20%～30%是中产阶级。再上面有5%～10%富裕群体，大富群体占5%不到，构成金字塔的顶端。中国的中产阶级人口大约5个亿，与发达国家相比，是美国中产阶级的两倍半，是欧洲的两倍。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是没有底下的赤贫群体，所以就不会导致社会严重不稳。赤贫群体越大，社会不稳越严重。中国金字塔底座是小有产者，这个结构是稳定的。这个稳态结构，客观上要求人们理解政府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学会从过去对待小资的方法汲取经验来学会对付中资。

但是，今天中国的中资还不是西方公民社会意义的中资——最大的不同是不纳财产税。

迄今为止，中国间接税占92%多，直接税占7%还差一点，并且直接税中由个人直接去缴纳的占比极低。例如，我们大都属于中资，单位替我们扣税，自己几乎不去纳税。尽管有庞大的占人口20%～30%的中资人群，但这个中资的政治诉求是要求不纳税的权益（vote for no tax），因此，历史地看，这个中资还不是西方的公民社会，而是两个不同的群体。在中国是有分散的中资利益诉求而非西方那种政治化的中产阶级群体，因此中国才有所谓政府协调仍处于高度分散状态的中资利益的可能。

当把这些基本特点搞清楚的时候，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杭州强调“我们”，这是争取为中产阶级提供能够满足其利益诉求多样化的表达方式，由此，可以形成政府和中产阶级诉求的有效结合。

这些政府治理的结构调整实践，大大超过了过去高校接受的阶级理论和市民理论。但只要把这两个理论放一放，来看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所形成的结构变化，就能够更多地增加一些对这个社会的了解。

现在，很多人在讨论什么是未来中国发展的主流，很大程度上是在跟从资本导向的城市化，却很少有人关注过城市化意味着资本和人口在城市的集中，更少有人注意到每一份资本集中都对应着一份风险集中，而风险集中将导致城市危机的爆发。所以，城市资本集中必然导致危机在城市爆发，而如果没条件对乡土社会转嫁，危机就是灾难性的硬着陆。

可见，中国最近十年强调的城乡一体化战略是合理的，不能简单地推进城市化。因为没有办法学习西方向国外转嫁危机代价，中国人必须靠自己的能力走一条和谐社会的道路。

过去说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我们说，西方高度现代化的模式，对我们来说已经不能摸了，这个石头摸不着。因为在我们前面的主流是金融化，能走这条路吗？至少应该持怀疑态度。

最近中国十年的高增长，靠的是中国对内陆和农村的大规模投资，核心是看怎样解决产业过剩问题。西方是发动二次大战，我们是对内转移制造业过剩生产能力，也有说这是用长期过剩掩盖短期过剩。

客观看这些年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已经在经济发展方式上做改出西方道路的努力，但政府如何在社会治理上根据东方理性形成中国特色的结构调整，还是一个比较有新意的研究领域。

中国人的日常用语中习惯强调“我们”，这个“我们”概念本身，一定有内在理性的支撑。这个内在理性的本源，主要是东方理性中的两个重要部分，一个是村社理性，一个是农户理性。若这两个理性能被杭州在确立以“我们”作为改善政府治理的指导思想的时候成功借鉴，用于我们今天正在发生巨大变迁的城市社会之中，那杭州政府的良治，就有可能变为现实。

第二节　解读“珠三角”的发展规律注

既然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那么我们应该讨论的，只能是如何应对。

（一）区域整合规律：纵向整合成功率高，平面整合十分困难

事实上，世界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结果，是全球区域化（globalization）。

中国在加入全球化的同时，越来越多地重视区域经济整合。2006年开始执行的国家“十一五规划”，也明确强调产业的空间布局调整。中国改革开放25年来初步形成的三大经济板块都集中在沿海，分别是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就体现了这个规律。

然而，中国属于超大型的大陆国家，面积和人口都大于二十几个国家的欧洲和十几个国家的东南亚。因此，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指称：不能把中国当作一般意义的国家，而应该看作是一个大陆，甚至由此认

为中国经验不可取。

是的，凡属按照西方殖民地宗主国的制度来构建本国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数都很难借鉴中国经验。非要借鉴，也不可能成功。

在中国的不同区域整合之中，以很大代价真正完成了“一体化”的，只是珠三角——无论名称是“珠三角经济”，还是“华南经济”，以及“粤港澳经济一体化”，其实都是一个区域经济的整合问题。

区域经济一体化整合成功意味着产生收益，因为附加值高的产业对附加值低的产业的纵向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会带来增值收益。珠江三角洲如果能切实有效地破除过去行政化的区域概念，改变垄断部门分别控制资源的割据状况，区域整合是有可能成功的。

当然，任何纵向整合的收益，主要是位居上游的地区，而成本却主要是由被整合的地区承担的。

因此，我据此对珠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分析，身处珠三角的低收益的广东人和高收益的香港人都不愿意接受，因为是大实话。

现在的全球化，被认为是全球的区域化。全球的区域化整合中，迄今为止还算是成功的，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他们成功的一个基本原因，是通过产业纵向整合来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中的上游国家，或称龙头国家，必须具有较高的产业层次，可以实现对下整合。北美自由贸易区的龙头是美国，在欧盟则是德国和法国。

综上所述，就产业资本发展自身的规律而言，纵向整合的成功率比较高，而平面整合则是十分困难的。

北美自由贸易区之所以整合成功，主要是有墨西哥的廉价劳动力、加拿大的资源，使得美国可以凭借技术产业、金融产业的优势对下整合。欧盟在苏联解体之前的区域整合就很困难，主要是因为法、德、意等欧洲主要工业化国家的产业是同构的，只有在苏东解体之后，苏东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才成为原来在平面上难以整合的法德意向东发展的动力，其实质是：东欧国家政治崩溃之后的资源和资产，成为西欧过剩产业资本进行纵向区域整合的原料。同理，东北亚地区也很难进行区域整合，因为中、日、韩的产业也基本上是同构的。

（二）珠三角产业资本积累既得益于也失之于香港制造业转移

到目前为止，珠三角80%的外资来源于香港，相应地，香港制造业的80%转移到了珠三角。香港自从20世纪70年代起接受日本制造业转移以后，在产业资本扩张的过程中，受市场规律的推动，自然会提高地价和劳动力价格，而香港政府本身的政策是严格控制土地批租的数量，从而更加有效抬高了地价。稀缺土地资源被资本化所形成的增值收益随即就近进入了金融资本市场，从而支撑了香港的资本经济。资本经济的发展又导致产业升级，促使香港的一般制造业大部分转移到了珠三角。这实际是就近利用了珠三角廉价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客观上等于给香港创造了一个很大的增量收益来源，有利于降低香港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本。这样一种产业转移，一方面给过去“国家工业化时期”得到很少投资的珠三角平面转移过去了一个制造业，另一方面也给香港创造了类似美国的第三产业占GDP高达80%的新的产业结构。

当然，这种产业转移也给香港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多遗留问题，主要是发展动力不足，没有制造业的支撑，只剩下转口贸易、房地产和金融业。近年来，一方面是上海与香港形成竞争关系，逐渐取代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另一方面，香港这三业又是高度相关的，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缺乏基础产业和制造业的经济本来就极度不稳，因此，香港急需同珠江三角洲经济进行区域整合。

香港人在向珠江三角洲转移制造业时把服务业留在了香港，亦即现在所说的“前店后厂”，这是特殊的制度变化造成的，也是大国政治游戏的结果。

英国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一方面策动大量香港资本出逃，另一方面大幅度提高公务员工资、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政府开支，给香港经济遗留下很多问题。中国是中央集权制，政府能够短期内动员460亿的中资进入香港，这一方面填补了资本流出的空间、支撑了香港经济，但另一方面，中方金融资本短期、大量地进入香港，客观上也推高了香港的房地产价格，这也成为迫使香港的中小企业转移到珠江三角洲的原因之一。如果没有香港80%的制造业转移到珠江三角洲，不可能有珠江三角洲的南中国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可实际上这也是大国游戏的结果，等于凭空给广东掉下一个大馅饼。

20世纪80到90年代，广东乡镇以下的行政村叫管理区，属于政府下伸的派驻机构，有非农土地经营权——有权建设乡镇企业开发小区。但管理区这一级却没有土地，土地的所有权在生产队（改革之后转制为以自然村为产权单位的经济社）手里。于是产生了镇、区和生产队之间在

占用土地搞开发区上的交易，有行政权力的单位只有与农村生产队合作才能降低交易成本，为开发区提供廉价土地，接纳香港转移来的制造业，接天上掉下的大馅饼。由于这二者之间的土地交易，就形成了以“三区规划”的名义大搞村办工业开发区，于是，也就造成了一个分散的工业化布局。资料显示，东莞仅一个市就有500多个开发区。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对珠三角的调查结果表明，佛山、南海、顺德一带，几乎村村都有开发区。而在一些新兴的、集群化程度比较高、资本化层次比较高的地方，如深圳，开发区数量比较少，产业集中程度很高。

珠江三角洲现在要搞的区域整合所面临的第一大问题，就是天上再也不掉大馅饼了。

香港制造业向珠江三角洲转移的过程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就基本完成了，而由于香港把服务业留下了，所以广东仍然维持着“三来一补”、以“加工贸易”为主的陈旧产业结构。

这种加工贸易面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规律性问题：当初期吃光了低价的土地收益，接着榨取廉价的外来打工者的剩余价值之后，它自身的产业利润必然是会不断下降的。

不过，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对珠三角都还算比较有利，主要是因为国际大资本过剩，国内金融资本也相对过剩。

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迅速波及全世界，世界金融资本为了避险，就要找到一个地区进行实业性投资，去资本化当地的资源和实物产业，从而获得增值收益，来弥补自身过度投机的不足。所以，欧美的资本纷纷涌入以制造业为主的中国。于是广东所得到的外部资本来源与过去有所不同了——从过去完全是来自香港的中小产业资本，到新世纪之初逐渐融入了一些国际大资本，珠三角的资本结构开始发生变化。

大资本的进入，客观上主导了产业的区域化布局，这也是经济规律。

中小资本越小就越没有谈判地位，没有谈判地位就无法应付管理部门的吃、拿、卡、要，于是它宁可分散布局——企业分散可以规避政府腐败导致的治理风险。

而大资本就不同。大资本与政府谈判的地位高，应对治理问题的能力强，更容易形成与政府高层的对话条件。海外大资本进来一般都要求按国际惯例办事。所以，国外大资本纷纷集中到那些垄断化程度最高、

国内大资本控制程度最高的地方，比如上海、苏南、浙北、东北、北京、西安、重庆。它当然不会往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方去。例如中国人公认小企业最集中的浙江，尽管市场化程度最高，但国外大资本与分散的中小企业交易费用太高，所以是进不去的。同理，珠三角那些已经被香港来的小资本分散占有，资源已被小资本瓜分的地方，国外大资本也是不会去的。而在资源没有被小企业分散占有的地方，大资本才会去，并在这些地方迅速形成产业相对集中的区域布局。

可见，不同的产业区域布局形成的前提条件是不同的，分散与否和它当初的形成条件高度相关。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片面强调让佛山、南海这类城市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这根本做不到，因为除了传统产业如陶瓷产业之外，佛山的产业是人家香港转移过来的，而转移时就是分散的，现在想调整、提升产业结构，即使可能做到，成本也会很高。但在惠州、东莞就完全能做到，因为在产业转移过来的时候就没有佛山、南海的这些问题。因此，不能把两种不同性质的前提所导致的问题拿到一块来说，也不能机械地用一个发展思路来规划。

如果真想形成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态势，首先得问问自己那个地方有没有提升产业结构的可能?如果只是一般制造业的基地，几乎不可能提升产业结构。

珠三角有些地方还不算是加工贸易，更不是一般贸易，不过是来料加工。因为产业的大部分有收益的链条不在本地，所以这种企业前期吃地产收益，现在吃劳动力剩余价值，而且利润越吃越薄。

以不同的产业资本积累过程为基础，形成的制度也不同。

大多数在广东的产业，无论是过去的电风扇、电冰箱这些传统产业，还是现在新兴的电子产业、IT产业，基本上都是同一个微笑曲线的趋势，也就是利润不断摊薄。

深圳大学的一位教授20世纪80年代末说过一段很好的话：广东经济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三来一补”的经济结构，这只能给当地留下一点“工缴费”，这点工缴费加上地产收益，让广东在20世纪80年代还算留下了百分之二十几的利润，百分之七十几的收益都流到了别人的腰包，为香港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经济高速增长做了贡献。现在，则普遍下降到了15%以下，有些地方只剩5%左右了。

在这种情况下，广东基层财政开始出现公共负债，据了解，乡村两级公共负债就有900亿元。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用什么来提高产业层次、投资R&D，搞技术密集产业?

从现存问题的根上看，珠三角吃的利润主要还是来源于廉价劳动力。

广东许多民间企业家对外来劳动力很残酷，一般只用他们一生劳动效率最高的五年，超过五年就不要了，而且决不给外来打工者提供任何社会保障。在劳工政策上，地方政府坚定地站在资方一边，充当资方的利益保护者和对劳工反抗的镇压者，难道能指望这种主要得益于野蛮原始积累的地方政府提升产业层次?

（三）在二次创业没入正轨的情况下，珠三角的产业提升之路

1.扎进投机经济，二次创业没入正轨。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就认为广东珠三角如果按照这种方式走下去，再不抓产业结构调整，进行二次创业，将来的发展就会成问题。

在产业层次上，一般商品制造业之上是设备制造业，设备制造业之上是金融业，金融业之上是高技术产业。如果广东长期维持这样的“三来一补”，吃的是不断摊薄的利润、得的是工缴费，并由于低价出让土地、倒贴“三通一平”费用，就会造成基层财政的亏损，这时候还不思进取，调整产业结构，整合便只能是一句空话。

调整产业结构，一定要改变“三来一补”，至少应该把“三来一补”转变成一般贸易。哪个产业本身不能提升层次，这个产业就有危机。

广东的珠三角本来应该顺应形势发展金融为主的服务业，把在第一次创业中产生的不良结果，通过向华南地区转移一般制造业的第二次创业来消除。但20世纪90年代上、中期，宏观经济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在1988—1989年第一波滞涨形态的经济危机发生以后，中国经济并未很好地朝着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的周期性方向发展，而是靠与货币增发同步刺激出的房地产、证券、期货这三大投机经济来拉动经济增长。于是，原来凭借价格双轨制搞原始积累、捞了第一桶金的人，又都一股脑儿地钻进了三大投机领域，广东一省当年就有几百亿的投机资金，这使得广东第二次创业有相当大部分没有进入正轨。

到1994年物价指数猛然暴涨到超过24%，也主要归因于地方一股脑

儿地搞投机经济，最后逼迫中央政府1995年开始实行紧缩政策、三年宏观治理整顿。就在中央政府宣布“软着陆”成功的同时，广东却发生了过度投机所产生的房地产危机，连带发生金融危机，使得中央不得不调集98亿多人民银行资金、连带其他的200多亿资金救广东的金融危机。

对于这一教训，广东地方的同志到现在也没有很好地总结。因此，客观上还没有形成有效地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层次的思想理论等政策讨论的环境氛围。

实际上，广东外向型经济这些年当然有很大的进步，主要的还是加工贸易产业不断发展，外来劳动力不断进入。在中国经济高涨的情况下，尤其是中央1998年以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大量的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又为广东的产业发展带来了一个新机会。基础设施投资的大幅增长，改善了广东作为一般制造业出口加工区的基础条件，使得广东按照原有增长模式还可以继续增长下去。

但是，是否可能通过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来维持区域内基础产业的平面扩张，可能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2.产业结构提升之路。

珠三角要搞和长三角相似的产业结构吗？

长三角的产业结构在全国最完整，但人家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形成了。再说，珠三角按上海的路子搞重、化工，必然要假以时日，且有一个高污染的问题。

珠三角提升产业结构的条件：

第一，有大资本进入。

国内这几年存差严重，超过十万亿的大于贷款余额的过剩存款主要集中在国家垄断的大银行，贷不出去还要付存款利息，因而金融改革迫在眉睫。过去强制关闭区域资本市场、“二板市场”、场外交易，这些20世纪90年代曾经造成重大损失的政策都正在金融相对过剩压力下重新调整。合乎逻辑的调整的思路，当然就应该是形成区域性的资本市场和产权交易中心，整合各地分散的分属不同部门的产权交易所。

而珠三角中小企业密集，现在正好有条件发育地方性中小金融，包括间接金融——中小银行和直接金融——场外交易，在此基础上通过股份制合成资本投资集团，形成地方性的金融资本。这样，资本就规模化

地集中了。然后，如果能把香港的创业板与深圳打通，香港汇集全球过剩金融资本的地方就成了广东的融资市场，再以广东的金融创新集中的资本，形成有规模的大金融资本。集聚大金融资本的又一途径是吸引外国机构投资人。珠三角大资本密集了，就会转向追求资本市场的较高收益，自然会逼迫那些效益低、污染严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往珠三角的周边挪，这即是华南经济圈的概念演化为现实的机会。指望分散的中小企业像现在这样一点一点往周边挪，成本太高、时间太长。

第二，土地制度创新。

温家宝总理一再强调，不得以牺牲农民利益追求发展。征地制度应该有大的改革。征地制度改革的政策思路，就是把土地作为一个农村和农民拥有的基本要素。一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可以在合规条件下直接进入市场，所有工商用地一律走市场，其价格也由市场决定；二是国家严格限制公益性的占地，并保证按市场价格对农民进行补偿。广东这次疾足先得，政府已经出台文件，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进入一级市场，同时，允许农村集体土地入股，如果国家投资的农村公益建设中鼓励农村土地入股，那么公益事业大部分是有长期收益的。此外，如自来水、电力，污水处理（可以收取企业排污费），车站和码头也可以是长期收取土地占用费等，这样改革的结果，是让农村群众通过集体租金分配到户来长期分享土地变性带来的增值收益。

征地制度改革势必会抬高珠三角一般企业的土地成本，一些污染重、技术低的中小企业将不得不向周边地区转移，企业分散布局、城镇带动作用不强的局面也将会有所改善。

珠三角如果要按传统的思路提升本地区的产业层次，改善产业结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倒不如走跨越式的路子。有了外部大资本密集进入和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这两个条件，珠三角经济就可能整合到位。

（四）珠三角发展的宏观条件——作为龙头的香港以及亚非陆桥的打通

1.香港是珠三角产业整合的龙头。

要想使成规模的金融资本和适合区域化布局的产业资本在一个地方成为长久的经济支柱，一是看能否有区域化的资本中心，二是看能否形成不受行政区划限制的金融服务业。

香港的服务业发达，过去是亚洲的金融中心，华南地区的资本市场只能在香港，因此，香港依然具有整合大珠三角的比较高的产业层次。

如果广东真从大珠三角的发展考虑，其实应该是广东现在的小珠三角利用CEAP的概念，去积极配合和推进香港带动的大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整合，香港仍有整合珠三角的产业优势。珠三角应该把金融中心的地位留给香港，物流特别是第三方物流也主动地让香港来发展，这样来带动珠三角的产业整合，把“大珠小珠落玉盘”这句诗改写为：大珠（大资本）落在珠三角，小珠（小资本）转移落华南。

香港应该利用粤港一体化的形势，向中央寻求粤港一体化的金融整合权。同理，珠三角可以利用人民币不放开的条件，先让利率与美元同样很低的港币对外成为主要结算货币，这就可以帮助珠三角的企业组成投资集团推动粤港一体化的金融业，用坚挺但低利率的港币资本来整合华南经济。

其实，我们既然了解到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主要是资本全球化，其核心是占主导地位的金融帝国主义用过剩的金融资本整合产业经济和资源经济，来谋取资本化收益，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把握这个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产业同构的平面整合，无论是国家之间还是区域内部基本都不成功的教训。相对地，也就理解了只有纵向整合，才可能成功的内在原因，就在于产业层次不同。

据此可知，一般的所谓区域整合规律无论国内国外都是适用的——占据产业高端的资本力量只有对下做纵向整合，才有可能获取相对高的利润。

2.打通亚非陆桥，拓展南方国家大市场。

近年来，印度提出加入上海的五国合作机制。这使世界上的战略家发起了新的讨论——中国、印度、俄罗斯三国的欧亚大三角区域整合是否可能？这个讨论很诱人，因为，被称为21世纪的金砖四国（BRIC，即：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中，有三个位于这个区域。

历史上在中国、印度、俄罗斯三国的战略关系中，俄罗斯曾试图用产业资本整合中国和印度，唯独中国、印度之间关系复杂，俄罗斯的整合并不成功。

亚洲北部的两条欧亚大陆桥，沿途是大量的无人区，没有人口规模和市场容量。那么，没有消费，也就没有产业，客观上就没有开展区域

整合的前提条件。

最北边的大陆桥当初服务于俄罗斯百年的帝国梦：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因此有西伯利亚大铁路，沿途的地缘战略及其政治操控，长期是俄罗斯人的领域。另一个从荷兰鹿特丹到中国连云港的大陆桥两头繁荣，中间途经大面积的干旱荒漠区。除非中国的过剩人口和产业资本大量转移进入西伯利亚或中亚五国，建立与那里的石油经济结合的产业集群，否则这两条欧亚大陆桥作用不大。比如，我国江苏北部具有欧亚大陆桥东端桥头堡地位的连云港，就不大可能对内进行经济整合。因为连云港自身既不具有完整的产业结构，又不具有金融中心的地位。从那里作为起点的有条大铁路，但这条铁路延伸到兰州以西到处是光秃秃的。

但是，假定上面述及的粤港经济一体化整合成功，成为中国华南资本中心和产业中心，那么从香港作为起点的这一极，就有可能向西南整合，那就需要建立第三条大陆桥——“亚非陆桥”，从香港一直连到北非，抵达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其沿途大部分是资本、人口、资源密集区，不仅会带动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的市场扩大、产业扩张，而且对于这一带比较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历史机遇。

因此，不妨借印度试图加入上海合作机制的时机，共同协商考虑这一大陆桥的建设准备。如能打通中国与印度之间大约300公里的断头路，将对粤港今后10年至20年的发展是一个无价之宝。那时，才真正能促进珠三角提升产业结构，带来华南地区重化工的发展机遇。

现在中国已经发生全国范围的重化工产业全面过剩，没有这样一个大的计划带来的市场前景，我们近期难以形成提升产业层次的条件，将来也很难维持与发达国家竞争的能力。

第三节　全球危机与苏南经验注

在本校做演讲不必讲客气话，我只是把最近一段时间的研究成果做个汇报，希望大家多多批评。

我们最近确实在做“区域比较研究”，这就要注重现实背景。

国内外很多研究一开口就说中国如何，其实这是一个缺乏常识的表

现。因为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大陆，幅员辽阔、区域不平衡就是个基本常识。中国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在做比较研究的时候需要注意区域的时空条件是有限制的。我们做了对岭南、苏南、重庆的研究，现在正在做对杭州的研究。我们在区域比较研究中有基本的思路，就是对比研究工业化过程中的几个基本阶段。

（一）引语：构建工业化原始积累与制度建构的逻辑相关

无论何种体制，只要搞工业化，那第一个阶段都叫资本原始积累。

一般经济学的道理研究的是资本相对稀缺和要素“相对稀缺”，而大多数发展中的经济体则不可能有所谓相对稀缺性这样的好事，在进入工业化的时候所面对的挑战叫做“资本要素绝对稀缺”，当然，工业化时代与资本紧密结合的技术要素也绝对稀缺。

如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看这些资本和技术要素的稀缺程度，则完全不可解，那么，当绝对稀缺的时候，就意味着得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以使这个经济体有可能进入到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于是，这就决定了我们构建的理论逻辑，不得不讨论各自的不同时空条件导致要素禀赋条件的差异，要素禀赋条件就决定了要素结构的变化，也就客观地决定了制度安排。并且，原始积累阶段形成制度的结构，导致了后续演变的路径依赖。

由此可知，它大体上是一个符合逻辑的过程。

但这个客观决定的制度结构形成过程，却难免使人从不同的利益背景出发来做解读，因此就有因利益结构不同而出现的不同说法。但也因此要求我们所做的研究，是要努力争取做去意识形态化、争取去价值化的解读。

（二）宏观背景：全球资本化与及其危机成本

1．全球化是资本危机在国家间成本递次转嫁的过程。

这次演讲我把“苏南经验”和“全球危机”放在一起解读，是因为全球危机暴露了人类在资本主义文明这个历史阶段的大部分弱点。

前不久在一次“战略思想库”的座谈会上，我说现在的竞争叫做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家间竞争，因为是以国家为单位的竞争，因此表现出“国家

间竞争的微笑曲线”。

实体经济为主的国家在全球危机条件下迫不得已承载了西方货币大规模增发和资源价格大幅度上涨所共同带来的代价，我们把这叫做“进口通胀”。在这次两会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做检讨，没有能够维持住原定CPI不超过4%的目标。其实不该他检讨，因为中国是进口通胀。

另外，我们没有在国际上建立话语权，比如我们的理论创新是国家间竞争的微笑曲线，却没有人代表我们这种承载了全球危机代价的国家在世界上讲话。

那么该不该怪本届政府呢？按道理说也不应该。

因为，上一届政府面临的是进口通缩，现在我们面临的是进口通胀。我们知道通货紧缩从1998年一直持续到2002年，2003年以后才转入高涨。上一届政府应对进口通缩采用的方式是什么？是在1998年以后中国大规模启动国债投资。那么，这一次的政府执政以后也继续靠大规模国债投资拉动经济。按照逻辑思路，当一个国家主要靠国债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时候，会伴随着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另外一个派生的结果是垄断得到加强，那就是垄断资本的谈判地位和话语权，以及左右政府的能力，都在得到加强，因此就出现了大资“政策绑架”，也就是国家垄断资本有能力“路径锁定”。我们现在中西部大部分地区没有多少大资，但是大中小资之间的矛盾也是存在的。

我们现在是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进入到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在初期阶段是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援城市；现在进入到工业化中期阶段就该“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了，所以强调新农村建设。中国农村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得到大规模投资是在2005年以后，从2006年“十一五”开始，这短短的五年时间，中国农村“三农”总投入43271亿。为什么叫史无前例？因为原来都是农村支援城市。因此执政党这些年的理论是对的，方针路线是对的，只不过执行起来极其困难。原因是利益集团左右决策。但是，有些话说回来，利益集团，特别是国有大资本，在中国某种程度上还真得执行国家意志。

2．城市化是资本与危机同步集中的过程。

大家知道，危机条件下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国家安全，也就是说危机会使安全问题暴露。

比如加快城市化，今年年初公布城市化率51.4%，人类处在这个资

本主义文明历史阶段中，城市化意味着资本向城市集中的过程，那么资本大规模快速向城市集中，就带来了风险这个与资本与生俱来的另外一面因素也向城市快速集中，这个风险加快集中就形成潜在危机。

但是，城市是没有危机承载能力的，这已经被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无论发生在欧洲的危机还是美洲的危机，还是发生在亚洲的危机，城市都不能承载危机的代价。所以民间有句俗语，叫做“小乱避城，大乱避乡”。另外，比如说今天食品安全是危机，参与式的市民农业就有可能部分地化解食品安全危机。总之，当危机爆发的时候，城里的人们一般找不到问题在哪儿，即便是在美国。我们看一下所谓占领华尔街运动，这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它是一种街头政治，当危机爆发的时候直接转化为政治不安全。

3．金融资本阶段金融资本扩张与国家政治制度的相关性。

当前世界处于金融资本阶段。以金融作为主要收益的发达国家特别是主导国家，在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它一定要找一个出口来转移矛盾化解危机，这个出口在当前看就是重启冷战。

此外美国还有以下的表现：一、军事开支继续保持全球二分之一，然后指责中国军费增加。二、债务占全球债务50%。三、维持金融资本经济，也就是说虚拟的交易占全球50%。维持三个二分之一——军费开支50%，债务50%，虚拟交易占50%——这样的结果只能靠政府强权，因此，我们知道美国政府是与金融资本直接结合的。

政府跟金融资本之间有天生的关系，这也是全球适用的。

在金融资本阶段随着政府直接创造信用和政府以债务来扩张信用，使得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有债务超限。比如欧盟，欧盟在建立马约的时候是给定了一个红线作为合法性的，现在的情况是欧盟国家的欧元已经不是合法货币了，因为基本上都超越了马约的底线，当然它还在继续流通继续使用，因此，现在在欧洲发生的是一场保卫欧元合法性的斗争。这个斗争胜负如何很难说，再加上各个国家的社会成本上升，随着老龄化而导致的社会开支会越来越大，社会开支会直接转化为政府负担，政府负担会转化为政府债务。据此看欧洲与依靠军事政治强权的美国不同，欧洲政治越是现代化，债务危机越是不会短期内解决。

最近我们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这次全球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现代化上层建筑制度成本过高的结果。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上层建筑未必是

一个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或说不是一个我们可以模仿的上层建筑。因为，现代化上层建筑我们未必付得起，代价太高。

（三）苏南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制度经验与后续演变

1．历史教训：民国亡于现代化成本过大。

虽然世界经验上看工业化都要部分或全部依靠从农业提取剩余完成工业化，但殖民地形成大农场的国家和我们这种靠小农经济做贡献来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代价不同。资源要素禀赋不同而导致的制度也完全不同，其后续制度演变的路径依赖也不同，简单的照搬西方是没有出息的。

中国其实在1949年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若发挥一下毛泽东的看法：我们建立的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小资产阶级国家。此外，人们需要知道，1949年中国城市中的工人阶级总人口只占总人口的5%。即使如此，在冷战压力下也要追求现代化。那就先看民国教训。

20世纪20—30年代是民国的黄金增长时期，年平均增长率8.4%，但同时它也是民族资本原始积累，从农民那里大量提取积累造成剥夺，因此社会严重不安定的根源主要是一个没有资本的国家进入资本原始积累所必然爆发的社会代价。

但同期也遭遇了1929—1933年的西方大危机，民国经济因西方危机转嫁而出现通货紧缩，迫使政府不得不放弃白银本位，改行法币制，那就是1935年。同年日本侵占华北，为了搞垮民国的经济，日本人在占领区抬价抢夺白银，进一步加剧经济危机。当时民国政府为了备战开始大规模采购物质，成为拉动通货膨胀的诱因。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之前，中国开始出现了通胀，此后这一次12年长期通胀从1937年一直持续到1949年。

总体来看，民国追求了现代化，但是却带来了国内革命和通货膨胀的问题。到1948年民国的金圆券制度只用了4个多月垮掉的时候，军队等的现代化国家上层建筑就失去了经济基础支撑，因此民国是先亡于现代化经济，后亡于现代化政治军事。

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来看，当发展中国家没有经济基础支撑时，超前构建西方上层建筑的结果，往往是反作用于它的经济基础。

我们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和大家简单提一下，越是现代经济体，基尼系数越高，贫富差别并不因为现代化而缓解，反而会随着现代化程度提高而基尼系数提高，最典型者就是美国和香港。美国是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占比85%的国家，香港是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占比82%的地区，这两个地方都是基尼系数0.5以上，经济高度化与贫富差别同步拉大的地区。

2．苏南工业化的主要经验：“一二三四”。

接下来说一下苏南经验。

先解释一下，苏南经济和中国的对外开放高度相关。

它的工业化起步不同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其他地方工业化起步，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人不再对中国实行贸易封锁，中国开始引进西方资本、调整工业结构。1971年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制定了引进西方资本、改造本国工业结构的“四三方案”，引进43亿美元西方设备和生产线。这个“四三方案”的执行客观上导致了中国对外负债大幅度上升。在这场负债还没有还完的时候，华国锋又提出了“八二方案”，就进一步造成了更高的外债负担，这个国家层次的债务危机，就给当时可以凭借农产品和轻纺产品出口换汇的苏南地区带来了发展机会。

1977—1979年中央向苏南放权，放“结汇权”、外贸权和财政权以及原材料定价权。从那以后，苏南得到了一个不同于其他省份的条件，发展出口经济，这时候苏南经济就起步了。

但这个时候谁才是经济主体有条件推进发展呢？地方政府。

那么，苏南经验就从这儿开始归纳，我们说它叫做“地方政府公司主义”。苏南经验的第一条，就是一个“主义”：“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第二条是两个“理性”：政府有公司理性，政府靠谁来发展呢？它利用了村社理性，出现了政府理性和村社理性的结合，所以苏南发展归结的第一条叫做“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第二条叫“政府理性＋村社理性”，两个“理性”。第三条就是三大要素的转化，因为你发展的是村社经济，村社把土地、劳动力、资金转化为工业使用的时候，产生了增长的地租收益。接下来看第四条，它经历了四个“阶段”：就是积累、调整、改革和扩张。

因此我们把苏南经验归结为四条：一个“主义”、两个“理性”、三个“要素”、四个“阶段”。

3．苏南工业化与中央早期工业化的共同经验是农村动员。

当说到政府公司主义的时候还得多说几句：中央层次的工业化也是政府公司主义，中央政府直接扮演国家资本投资人的角色，因此我们说在中央层次的“政府公司化”阶段，资本内化于政府，政府直接扮演资本的角色。

教科书上的1953年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实质上是改出新民主主义，这就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经济基础上的实质性改变。

1956年苏联完成国家工业化开始转型对外开放，中国当然跟不上，因为尚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没有那么多工业品，没有资本。于是1958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这三面红旗今天我们把它视为极左错误，但客观地看人民公社是什么？意味着以乡为单位，成规模的使用劳动力替代国内稀缺程度几乎为零的资本——劳动力如果分散使用只能干“作坊”，只有集中使用才能替代稀缺程度为零的资本。同期是以人民公社为单位来建拖拉机站，也就使得保留下来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能力有承接的载体。可见，这是以人民公社作为载体，承接工业化遭遇资本稀缺的危机代价。

从此农业为工业提供原始积累，就成为了一个既定的制度。其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发生过三次，分别在1960年、1968年、1974年。每次都是城市经济危机爆发向农村转嫁代价，所以说农村是城市危机代价的载体，农村不仅向城市贡献了剩余，完成了城市工业的原始积累，农村还承载了城市危机代价。

4．苏南工业化核心经验中“村社理性”的机制分析。

农村能够承载国家工业化危机有一个重要的机制，就是苏南经验中的一条——“村社理性”，就像我们说到政府理性一样，政府的第一理性是资本收益最大化，因为资本内生于政府。那么，为什么讲村社理性能够承载危机？就因为客观上村社有把外部性风险内部化处置的机制，这是村社理性的核心。

我们把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工业化叫做“中国的黄金增长时期”，苏南在这个过程中间扮演者重要角色，主要是因为两个理性的有机结合。一个“主义”叫政府公司主义现代化目标之下，两个“理性”有机结合，那就有了苏南工业化。二者结合的条件在于这一带早在晚清洋务运动时期就接受近代工业文明的洗礼，70年代后期这里借助国家投资已经形成了结构完整的工业布局，农村才有承接城市工业向周边地区扩散的条件。这一点恰恰构成了苏南与东部三南的另外两个——浙南、闽南的差别。

有个案例可以说明农村是怎么进行原始积累的。江苏苏州的吴江有一个村，本来没有村办工业，队长就动员全村男女劳动力，每年大家少得500工分的分配，集中起来去城里交换那些工业生产环节的物质资料。第一年这个村每个男女劳动力500工分拿出来不分配，这500工分对应着应该分配的钱、粮、肉、菜、蛋等所有这些东西拿到城里工厂去换一个铸造工序——你把铸造换过来我这村里干，我给你城里企业提供铸件。第二年大家再每个劳动力节约500工分换来了清砂。第三年还得再让出500工分换来成型。这样村里就形成了一个有三种程序的铸件厂，也就是把城里的机械厂的铸件车间搬到了生产队。这就是农村集体化条件下劳动替代资本进行原始积累的典型案例。

资本要素之外需注意第二个要素——劳动力。工农业的差别很大程度上在于工业劳动力的市场价格远高于农业，但是如果在生产队内部办工业，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就由农业社会决定，在货币化程度还高的七八十年代，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是参照农业来定价的，因此单个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远远高于城市工业部门。在集体经济时期，这一块也是全额被村内“社会化”占有了。

第三个更重要的方面叫做风险的收益转移。我们一般高校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都讲企业家承担了风险，所以企业家理所当然占有投资收益。然而，在农村办工业遇到不景气时，风险被谁承载了呢？当时有句话叫“卖不动了就回家种地”，这意味着乡镇企业经营风险被农业、被农民、被村社内部承载，那风险收益应该归谁？当然归村集体。另一方面是因为村办工业占有的本村要素不计算价格，因此属于无风险成本；但如果要在城里办工业，要素要全部计算价格和成本。

这样看，当经济学讨论的“三个要素”——土地、资金、劳动力都由村内占有和配置，就都转化成了乡镇企业的资本，而且村社集体组织占有了大部分工业化收益，于是乡镇企业就异军突起。

因为乡镇企业大部分是办在村里的，而村社理性是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文化，它有天生的外部性内部化处理的机制，所以乡镇企业遭遇了风险也不会破产。

5．危机调控、私有化改制与村社理性被排拒。

就在乡镇企业大发展的阶段，出现了一个特殊现象：麇集于城市的产业资本爆发了1988年的大规模通货膨胀和1989年的生产全面停滞，这对乡镇企业是一次巨大打击，因为它是中小企业。

一般而言，每当经济危机爆发，国家宏观调控都会采取紧缩措施，只要一紧缩中小企业就先倒闭，但这次出了一个大麻烦。

刚才说到苏南经济成也政府、败也政府。在政府公司化的作用下，地方政府帮助农村工业起步了，但也因此它从农村工业起步中直接占有了大量的收益，也就因“预算软约束”导致地方政府的开支刚性不可能随宏观调控减少，遂使很多村办工业借来的现金被敬老院、幼儿园、中小学等政府下放给村社的公共开支占用。这头乡镇企业不景气，那头地方政府开支刚性不减少，矛盾加剧，甚至出现政府让企业将通过高息借贷拿到的生产资金直接转为政府公共消费，乡镇企业就被迫高负债。在账面上看，这一过高负债没有对应的收益就维持不下去，地方政府和管理者就顺势接受主流提出的改制要求乡镇企业转为私有。当年，甚至有理论家提出“一块钱”理论，你只要把全部债务背走，象征性地支付一块钱就可以把企业拿走。这就是我一直想写的书《1993年》想要追忆的一个内容。

总之，苏南乡镇企业的第一批改私是在1988年通胀膨胀、1989年生产停滞、资金价格提高、官方开支刚性不减等矛盾延续了几年之后。这些与那个时候理论界质疑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意识形态说法其实没多大关系，真实原因主要是负债率过高。

还有市场方面的原因。原来苏南乡镇企业是以内需为主的、一般贸易为主；当然它原来起步的时候有开展外贸的优势，但外贸主要是换取外汇和进口设备，其产品生产还是以内需为主，是因为农民收入提升就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低端工业品生产的市场需求空间，而办服装厂等的进入门槛很低。但这些被理论界称之为市场需求的空间条件，在90年代经济下滑的时候也失去了，因为危机调控让普通群众生活下降了，市场空间就减少了。

归纳一下，宏观环境不利、地方政府行为不利、市场空间萎缩，加在一起造成了苏南工业化的困境。因此，我们知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因内需大幅度下降而转向外向型。同时，外资主导力量迅速加大，尤其是1994年中国政府一次性外汇贬值57%，苏南工业1995年起由原来的一般贸易为主转向加工贸易为主。

这些因素和下面要讲的政府政策调整共同导致了村社理性的机制作用弱化。

在改制之前，苏南乡镇工业第一目标根本不是教科书所说的“利润最

大化”。这是个对西方理论的挑战。因为，我们当年做过很多苏南乡镇企业调查——我从80年代开始就在苏南搞农村改革实验，苏南乡镇企业第一目标是本村就业最大化，因为这个企业是办在村里的，是全村老百姓共同努力办起来的。第二目标也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本村社会福利最大化，当时国家之所以对乡镇企业采取的低税制、报税制，也因为它替代国家吸纳农民就业和缓解农村公共开支不足。1994年全国都改成分税制，乡镇企业纳入统一税制管理，不再享受税收优惠。

同期，乡镇企业的土地优惠没有了。大家知道1992年开始实行《土地管理法》，农村企业用地必须国家征占。

土地和税收都没有优惠了，资金又被银行卡住了，于是乡镇企业主要数据指标大幅度下滑，同时改私。

代价很明显，改私之后的私人企业势必排斥劳动，排斥村社福利，不再解决村内就业，等等。

这就是90年代上半期乡镇企业出现高负债危机而改制的第一波私有化风潮。

90年代后半期，大约七成乡镇企业停产或歇业。

在苏南也因为政策环境不好、市场条件的变化而出现的第二次大规模改制改私风潮，它是一个宏观环境变化之下的企业微观制度的演变过程。

（四）全球危机下苏南的机遇与挑战

改制之后的苏南在新世纪出现了值得关注的新变化——苏南趋同于岭南。但是，这两者仍然有一个现象不同，岭南属于弱政府经济，苏南属于强政府经济。弱政府经济进来的外资企业块头不大，80%以上是港台资本。强政府因其控制资源的能力强，而出现了与国外大资本谈判的条件，于是，进入苏南外资企业的规模比较大。比如看苏州工业园区，这个落户中国的第一个新加坡工业园也是强政府对强政府之间的谈判，仍然带有政府公司主义的特色。这是新世纪以来人们讨论较多的“新苏南模式”。

应对全球危机苏南仍然有它的特色。

苏南作为强政府，和中国的中央政府作为强政府之间是紧密相关

的。

在新世纪的全球竞争中，我们的第一个目标仍然是维护主权与币权统一的国家，中国还没有放弃币权，与之相应的是本币对冲扩张，维护这个币权，就在外汇盈余增加的条件下带来本币同步扩张，表明我们客观上还有加入全球金融资本竞争的条件。第二个目标是三大差别的再平衡战略。与西方不同，中国目前以大规模的金融扩张对应的不是虚拟经济，是过去30年愈益拉大的城乡关系和东西关系的再平衡调整。实际上，因为我们大规模向内地投资，向农村投资，这就带来了内需扩大的条件。于是，第三个国内的结构调整目标就是内需扩大。

因此，当前这个参与全球竞争的情况，和90年代苏南改制的条件不一样，中国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还可以维持至少15年。十八大以后，新一代领导班子继续按照扩大投资的政策走下去，以国内吸纳投资的能量来说，还有15年的投资时间，甚至更长。江苏省在全国率先提出要实现全面小康和全面现代化，当与此有内在相关；苏南农村由于过去村社整合力量很强，因此在贯彻国家政策中，比一般地区具有更好的克服与小农交易成本困境的条件。

最后点到为止：中国现在已经发生了中国式“次贷”危机。

什么叫中国式“次贷”？我们有十万亿以上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其中60%左右都是地方政府直接以财政来承担偿还责任的。在中国，地方政府的金融平台负债大部分在银行，这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的次贷是地方政府把盲目扩张所造成的风险大多转变为银行承载的金融风险上交给中央，这就是现在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特点。

在这种条件下，我们遭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外部环境恶化的更严重，同时期内部次贷压力加大。那么，在这种内外困局之下，今天苏南这种强政府经济面临的，某种程度上和整个国家宏观调控面临的挑战差不多。注

此文根据2013年7月12日温铁军在浙江杭州举行的“让我们生活得更好”的国际会议上的发言整理而成，发表时的文稿作者是温铁军、杨帅、邱建生、兰永海。

本文根据温铁军2008年去广东做《解读珠三角》调研的会上做的发言纪录整理而成。

根据2012年3月1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苏州国际学院的演讲录音整理，已经本人审阅修改。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苏南几个经济发达地区的负债情况受到较多关注，正是这一内在矛盾暴露使然。

第六部分　生态文明与新型城镇化

第一节　全球危机与生态文明注

我讲座的主题应该说在结构上比较明了，要把中国如何应对全球危机的挑战这个问题讲清楚。尤其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国际社会从来没有这么关注过中国改革。为什么？

请大家注意，在三中全会还没有开的时候，国际炒家发生了一个重大改变，在去年，大的投行（institutional　investors）都在做空，认为中国难逃一般发展的经验：房地产过度泡沫化的条件下，一定会因为房地产泡沫化的负债而转化为金融危机。在此之前，大家都知道，2007年美国房地产的次贷转化成了2008年的金融海啸，它就是典型的一个因房地产过度投资而最终导致金融坏账爆发的金融危机，这个危机的基本因素中国具备，所以世界上大的投资银行做空中国，同时媒体也唱衰。看来很有客观依据。

去年以来到今年，10个月的时间吧，我有三次在海外的这些大投行所组织的座谈会跟他们对话，对他们来说是我帮他们更新他们的知识，对我来说通过对话至少一定程度上感受海外金融投资的脉搏。去年以来呢，他们是在唱衰，准备做空，到今年上半年是最紧锣密鼓的时候，大家在赌，中国一旦出现房地产泡沫崩溃，金融出现灾难性的结果，那做空的就赚了。

当金融界和事实进行对接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巧妙的过程，就是6月份中国突然出现钱荒。钱荒的原因也很有意思，是因为西方的信息透露出来一个很重要的题材——你们也许会知道，或是经常会看到，投资银行的业务中发生的信息转化这个题材是常事——什么信息呢？美国QE量化宽松政策的终结，美联储认为就业形势有所好转，因此在今年适当时候会终结量化宽松政策，这是个信息。尽管这个信息目前并没有转化为实际政策，也没有得到官方认可，但它却立刻变成资本市

场的题材，然后就导致大量游资流出所谓金砖五国BRICS（大家都知道金砖五国，我不多解释了），导致这些被认为成长性非常好的新兴国家纷纷陷入股市暴跌和本币的币值暴跌。当然中国6月份也出现钱荒，同时出现民间金融的或者是影子银行的利息大幅度上升，高利贷成为一个普遍的发生的情况。

就是这个阶段上，同时出现西方投行给中国当时领导人命名了一个叫什么经济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第一条，就是对市场采取不干预政策。我们也差不多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边，坚持没干预，于是出现了金融秩序的严重混乱。好在中国没有按照什么经济学运作，仅在一两个星期之后，迅速出手。于是乎，金砖五国中的四国全出问题了，就剩下中国没出问题，这才导致西方投行在今年夏天以后转而就做多了。从做空到做多，从唱衰到唱荣，或再次高唱中国威胁论，这其实是很短时间的事。

告诉大家这个故事，权作为一个开场白。

抱歉，我上来连问好都没有，就直接讲故事，什么意思？就是告诉你们，当代金融资本引导的所谓的全球化大潮之中，危机是随时可能爆发的。其背后的因素远远不是我们教科书上所谓理论可以解释的了的，我说幸亏中国的领导人没上当，没把这些所谓对他们看似积极的说法当说法，或者也许决定出手干预的另有其人，但总之中国干预了，相对而言，唱衰的企图在这个关键的点位上就失败了。

也因此，各位，现在中国的进一步深化改革中，西方对中国最大的期望在哪儿？资本流动的自由化，不是别的。你们说资本的自由化是问题吗，理论上不是问题。那中国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在西方来看，主要是资本管控（capital control），西方要求的是什么呢？一般的概念叫做资本流动（capital flow）。这两个概念的争论背后，其实是两套金融资本引领竞争下的不同体制。

（一）生态文明的序曲：全球危机

为什么原来要讲新农村建设？现在当然也还是要讲，可为什么把讲题定义为生态文明？是因为农村、农业、农民，它本身是一个因和自然结合而本质上具有内生多样性的领域。请各位听懂这道理，就是自然界是多样性的，“三农”问题本身是和自然界、自然过程结合的，因此它内生的有多样性。

所以当你讲生态文明的时候，你得明白，什么是生态文明的最本质内涵，也可以叫做唯一内涵？生物的多样性，自然界的多样性，乃是生态文明作为文明的内涵。为什么呢？就是你得承认，自然界的多样性生存的物种，和你一样有生存的权力，这就是一种文明。

它和产业文明最大的不同是，产业文明因产业作为一种资本，它只有把人类资本化为人力资本，或者说资本化为劳动力要素，才能由产业资本来占有人力资本或劳动力要素的剩余价值，这才叫产业资本对社会文明的要求。而生态文明时代和产业文明时代最大的不同就是人不应该再作为产业资本所对应的越来越“去人化”的劳动力，就说你只是劳动力，你应贡献你的劳动力剩余价值，其他你作为人的因素就都被剔除掉了。

在产业资本阶段（或者叫产业文明阶段）的教育，是制式教育。全国齐步走，使用统一的幼儿园教材、小学教材、中学教材，制式教材的体系是统一的，为什么？是让你必须通过制式教育，形成一个可供产业资本役使的劳动力要素，剥离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特性。为什么在现在制式体制之下，素质教育这些起不来，原因是你在产业文明时代，现在的制式教育这个体系是服务于产业资本的。各位，这个道理简单归纳一下，就是这样的。

而到生态文明时代，注意，本党特别强调生态文明，那生态文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教育、文化，应该转向生态文明内涵的多样性。由此呢，我一上来就说我是来开会的。开什么会呢？开社会化农业的会，就是社区支持农业的会，也叫CSA的会。那我们做的是什么呢？其实恰恰是要让农业从一般地经济从社会脱嵌，再回嵌到乡土社会，使农业本身具有的自然多样性的属性，跟农村社会文化的多样性的属性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社会化的农业。社会化农业就是社会广泛参与的农业。这就是不同。

我们对应的是产业化资本化的农业，而产业化资本化，内在道理是一样的，为什么要搞大规模农业呢，还必须标准化，要用同一个品种，去掉了农业本身的物种多样性，要什么样的品种呢，一定是那个产量最高的。那品质呢，各个品种具有不同的品质，不同的自然适应性，所有这些东西，不在它的考虑范围内。产业化农业是单一化的，规模化的，集约化的，去多样性的，本质上不符合生态文明的要求。

同理，各位，我们在产业文明时代下形成的知识体系，有很多被大

家认为颠簸不破的，甚至上升到价值观的那些观点，今天如果在“去产业文明”的时代来考虑，就都有这样那样值得讨论的地方。

1. 中国双重输出及成本转嫁。

接下来得先说在产业文明时代，中国做到了什么。

如果我们按照PPP法统计，而不是我们现在的增加值统计方法，那么我们会得出一个新的结论，中国现在已经是产业文明时代的全球第一工业大国。按十大工业国来比，中国一国的工业GDP，相当于美国的两倍，相当于其他八个工业国家的总和。这个比重就很清楚啦，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主要工业品产量都是世界第一，那就是说，中国在产业文明时代竞争中，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再继续沿着产业文明时代的产业竞争的道路走下去，那就只能是典型的生产过剩。

我们是什么时候出现生产过剩呢？是在20世纪末，1998年、1999年，我们就已经出现生产过剩了。那，也因为生产过剩，我们开始进入大规模投资拉动，靠投资拉动了十五年，现在我们叫做用长期的过剩掩盖了短期的过剩。

诚然，中国已经成了世界工业生产能力最大的国家。

但是问题在哪呢？问题在中国所谓工业文明时代的发展，实际在是在做“双重输出”。大家看这张图，我们下边这个长长的蓝色箭头，表明中国像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向发达国家输出原材料和一般商品，大多数没有进入工业化的国家输出的是原材料，中国输出的是一般商品。那得到的是什么呢，西方帮你做制度转轨（institutional transition）。为了什么呢？为了让你顺畅的把你所得到的贸易盈余，返回到西方国家资本市场去做资本投资，那就意味着你第二次贡献，把你得到的贸易盈余再做资本投资，我们叫做外汇再投资，投到西方国家资本市场上，于是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语法现象，叫做the-more…, the-more…，就是你越多的贸易盈余，就越多向西方资本市场投资，导致西方国家越多的贸易逆差也就越多的资本顺差，于是乎，中国现在跟美国之间有着历史上最为密切的战略关系。表现为什么呢？表现为一手向它送东西，一手向它送投资，这就是最紧密的战略关系了，那就是离不开你。中国变成了美国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资国，美国的FDI从哪儿来？从中国来，同时中国又变成了美国第一大债权国。这两天美国电视上出了一个六岁小孩说我们不还债，我们把他们杀光，引起了在美国华人的抗议，但在中国大陆上几乎没有任何声音，当然也许我们不在乎。但其实，即使不是这

个故事，人家也早就告诉你了，还债是不可能的，中国人绝对不要以为，你向对方做的第二重贡献，向对方市场投入大量资金是可以拿回来的。这点，我想通过这个电视节目事件，使人们多多少少有了点认识。

当然，中国这个资本输出对做金融投资的人来说并不是问题，因为做金融投资的人说得很清楚，国债是市场上可交易的债券啊，为什么要叫人家还呢，人家根本没有必要还你嘛，因为它把债券发出来以后是你自愿去买的，那是个商品。

这个道理大家注意啊，不同的视角下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很多人是说抗议你们根本就想赖账，为了赖债你们就是想杀我们，这是老百姓的感觉。但对金融投资者来说，他的反应是完全正常的，没听说过非得要人家还债的，人家要还债是人家的事。对他来说只是一个买卖。好了，这就是站在不同的角度上就会有不同的认识。就好比说，企业发行股票，你买卖股票，当然有风险了，企业要是倒闭了，你不就是亏了嘛，或者企业股票变成垃圾股了，你不也就亏了嘛，等等。像做金融投资的人，以他的分析这不是问题。

但麻烦在哪？麻烦不在于这个争论，麻烦在于，中国作为一个资源短缺的国家，你要这样做，就意味着，你用国内非常短缺的资源向外面出口，那出口的是什么呢？出口的是资源环境的租，本来应该向你的资源环境去做补偿性投入，却不仅不投入，反而把它剥夺了，把资源环境过度开发了，造成你国内环境严重的污染，然后你去出口，出口换得的是什么呢？换得的是你还得送回去的投资。

对你有什么实际作用吗？没有。其结果呢，是一个负收益，你连环境租都让出去了。

发展中国家要竞争，大家竞争着向西方出口，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仅中国一国向美国出口的衬衣，够每个美国人平均每年穿12件，中国向美国出口的鞋，够每个美国人平均每年穿7双，那你换回来的是绿纸啊。你在国内竞争着向它出口这么多低附加值的产品，还得压低劳动力价格，于是乎在中国现在是什么呢？代工制。各种各样的劳务派遣公司大行其道，现在真正跟企业长期签劳动合同，并且得到社会保障的这种劳工少之又少，那就意味着你欠了一大块社会租，因为劳动力需要你支付一份工资，另外再支付一份社保，干嘛呢？用于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他总要娶妻生子，总要受教育，总要养老，但这套东西基本不支付，于是乎你出口出的是什么？是社会租，或者叫做劳动者租，劳动力

租。

这两个被称为租的东西非常要命，意味着这种外向型经济造成严重的国内负债，负的是环境债和社会债。那就有很多人讨论了中国政府不行，什么不行呢，你们的社会保障是个亏损账户。他们怎么算的呢，说你13.4亿人吧，你将来15.4亿人吧，如果按照现在的国际通行标准，你要给这些人建立完整意义的社会保护伞（social umbrella），你如果是要给他们都要用社会伞都给覆盖了，那对不起，你欠多少？四十万亿。

也就是说中国的潜在负债，他们叫做动态负债，绝对不是现在公布的这个数，大大高于GDP，别说西方负债对GDP的比例超过100%，中国负债也是，甚至200%以上，现在中国动态负债世界最高。西方为什么唱衰中国，就是这个道理，你是高负债，因为你十五点几亿人都没社保！

因此，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任何争论，一转就会转成国际资本市场炒作的题材。到底是做多中国还是做空中国，取决于翻云覆雨之间，也就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翻手为云的时候可以说你看中国不用开支那么多的社会保障，因此它的劳动力价格是低的，它的劳动力价格成为唯一比较优势，因此中国还能增长，这是翻手为云，在做多中国的时候使用；所谓覆手为雨，就说你看，它有这么多的人没上社保，因此它未来的开支一定很大，所以它的负债非常高，它一定衰败。

里外里都是你说，取决于你要干什么，看你是做空的，还是做多的，还得看你屁股底下坐的多大规模的投资能力。能够在资本市场翻云覆雨的，都是坐拥上千亿美元以上的大投资，被称为金融大鳄。

大家注意啊，不是我们自己形成有效调控，而很大程度上，你现有的双重输出结构，对内造成双重负债，社会负债和环境负债，对外，如果你不能做到双重输出，那我现在目前所维持的所谓跟国际社会主导国家的关系也就很难再维持。

可能我说的太重了啊，各位心头不那么轻松了，对于我们形势一片大好，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似乎感觉不那么美了。

我们再往下看。中国现在的出口呢，基本叫做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微笑曲线表明，出口的收益两端在外边，两头在外其实就是高收益都在外边，你只能在下巴颏上，下巴颏往往贴近于零值，也就是你的出口其实是没有收益的。

那你出的是什么呢？对不起，国家拿财政给出口企业的13%的出口退税率，意味着你即使毛利润为零，也能有13%的收益。那外商为了压低你，明明知道你能拿13%，所以跟你分这块补贴，你不仅是零利润出口，你还得亏损，让你亏10%的利润出口，你照样能赢回来3%。所以我们的出口竞争力，取决于国家以全民的当期税收，或者以未来的预期税收来补贴了外国消费者。

这又是一个不那么让人高兴的现实。

好了，这种方式，还带来了另外一个效果，当我们的沿海出口加工企业生产最终产品可以把利润摊薄到零以下，那请问，一个产业的上游呢，它不是跟着也得把利润拉下来了吗？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整个实体产业投资越来越淡，一方面大量的金融是过剩的，另一方面它却不往实体产业里投！那原因是什么？产业利润下降到平均利润以下很多。而金融投资，正常的银行至少是追求社会平均收益率的。当社会有一二三产业，有各种各样收益的时候，金融投资获取的这个收益显然大于实体产业的平均收益，于是金融析出、不向产业投资，这就是微笑曲线长期化的结果。近年来中国出现什么呢？金融过剩。只要产业过剩，金融就也过剩。一旦出现金融过剩，无论何种意识形态，何种体制，都会出现连带的现象。那就是过剩金融资本会亲什么呢？亲地产资本。

世界上任何国家，金融相对过剩的条件下，金融资本和地产资本紧密结合乃是必然结果。

于是乎，遭遇2009年全球危机爆发以来，大量过剩投资不论官方民间都涌向房地产，短时期因大量资金涌入，而导致地产价格不断攀升，所以地王迭出，同时带动房价上升，房价一上升，就使得房价的升值速度远快于任何其他投资，无论投资股票、投资期货，还是投资实体产业，都不如投资买房，房价的上升速度快带动民间投资纷纷涌向买房市场。这就导致真正“刚需”买不到，有余钱的人，少说两三套，多的十套八套，更多的还有。因此什么房叔房婶房姐房弟的大量产生。

我不知道在座的老师们有多少套，以我所知，人民大学比较赚钱的老师至少得三套以上。在北京，现在一套房子，值多少钱，比如说二百平方米，差不多算千万元户，但那是虚的。这个击破房地产泡沫的那个扳机（trigger）在哪？现在大家都知道要破，也都担忧着，但谁都捂着不动，这就是恰恰危机爆发前夜的社会公众心态，一旦爆发，所有人全都大呼：当年房价高的时候我就怎么没出手，来不及了，他会一泻千

里，然后连带发生大量的银行坏账。

你们注意经济有规律，大众并不了解经济规律，少数了解的人乌鸦嘴，像我这种，告诉大家扳机在哪我不知道，但很可能在某个角落里边。所以，当我们把这件事情看清楚的时候，需知它的源头是什么，当你大量靠出口拉动增长的时候，对沿海对出口企业有特殊优惠，这会导致上游企业利润被连带下降，导致金融不能向实体产业投资而从中析出，金融资本过剩，就去追房地产。这难道不是一个很经验的过程？可在那些文件里能看得到这些表达吗？为什么学术界也不表达，因为大量的资本利益集团上下其手获利颇丰，为什么要把事情说破呢？除非是你没获利，才可能会说点实话，如果真是在这里边跟着去翻云覆雨的人，当然他就不愿意把事情点清楚，他就会说那些你们现在很多人跟着心灵鸡汤的话。房地产商在说，房价肯定还会上涨，你们大家赶紧去抢房子吧。没错，那你不等于被忽悠了吗？很多人会说，房地产严重被泡沫化了，早晚会崩。大多数老百姓会说，你们瞎说房价不是还在涨吗？这种心态是一种贪欲，何况他没有其他投资领域，或者他其他投资领域的收益赶不上房地产投资的时候，有点余钱剩米，哪怕他借钱也想投。

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现状，所以我告诉大家危机是可能发生的，并且甚至随时可能发生。

那因此，新农村建设也好，生态文明也好，我们讲的“三农”问题也好，才特别有现实意义。

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分析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1949年到现在，我们已经发生过八次周期性经济危机，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看我现在比较热的一本书叫做《八次危机》，描述了当代史上我们中国所发生过的周期性危机。我的结论是什么？指出中国经济史上周期性经济危机绝对不是我的理论创新，因为马克思早就说过了，马克思之前的经济学家也都说过了；我的理论创新是指出，危机能不能软着陆，是取决于危机的代价能不能从城市产业向“三农”转嫁，成功地把危机代价转嫁到“三农”的，就是软着陆，不能转嫁的，叫硬着陆。砸在城里的，这种硬着陆，就会导致要么叫调整，要么叫改革。

所以我说，无论你把调整还是改革意识形态化到多么高的政治正确的高度上，它都不过是应对危机的政策措施，这才算是我的理论创新，但它却非常冷酷，它把所有我们对意识形态的包装全撕掉了，这就很麻烦。所以我这乌鸦嘴呢，说得太直白了，不好，还是应该加一些包装，

不要太直白。这话听懂了吧？危机是必然的，并且呈周期性爆发。

上过中学都应该知道，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在人类社会中一样，有多大的资本积累，就有多大的风险，风险爆发是有一定周期性的，只要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就表现为危机爆发，它的波动曲线一定这样的。我们只不过是愿意更多的计算我获得了多少资本，不愿意计算和资本几乎等量的那个代价，也不愿意深究这个代价哪去了。大家只会喊，那个什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你不知道他为什么就苦了呢？它几千年来都不是养人的吗？它怎么就在这会儿就又苦又穷又危险了呢？是因为它承载了过量的产业资本的危机代价。我做这个分析，就把三农问题和我们在自然常识所形成的认识统一起来了，有多大的作用力就有多大的反作用力了嘛，有多大的收益就有多大的成本嘛，不就是no pains，no gains，没有痛苦就没有收获嘛。

事情本来并不复杂，学者的责任在于把非常复杂的现象简单化到任何人一听都听得懂，如果要把简单的现象非要复杂成大家都听不懂，那是骗子。所以，我们把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的抽象为八次周期危机爆发的过程，在这个危机的归纳和总结中，我们理论创新指出，危机代价是要转嫁的。

所以我说，我的八次危机的全部理论可以归结为“成本转嫁论”，就五个字。

2. 西方的转折。

我们刚才解释中国经验就到这里，再接着，要解释西方是怎么回事。

你们看图上的这个红线划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在80年代之前是产业资本为主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80年代之后是金融资本为主的新自由主义时代。为什么？是因为产业资本下降，下降的产业向外移出的时候，就由产业的海外收益和国内的资本市场直接结合了，西方这时候发生了历史转折，就是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了，金融资本的新意识形态叫做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我非常感谢很多做文化研究的学者，他们对新自由主义做了很多批判，好像从我做经济研究的人看呢，似乎批不到点上，但做批判也挺可贵的，总得有人先做批判。

但，西方为什么会形成新自由主义，难道它是一个主观过程？

诚然，我们是相信事物的客观规律的。那，我们做的分析就很简单，1929—1933大危机爆发了，爆发了以后怎么着呢？在产业资本经济阶段大凡奉行自由主义的国家都被经济危机打垮了，哪几个国家没垮？罗斯福新政下的美国，把过剩资本转向内陆的基本建设。还有什么呢？希特勒主义的德国。希特勒主义是什么？纳粹。纳粹是什么？国家社会主义。罗斯福是什么？国家资本主义；希特勒是什么？国家社会主义。Anyway，它们在本质上都是国家主义。什么道理呢？政府直接干预，用看得见的手，把那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直接摁到没有投入回报的基本建设里边去，这么干的国家，就是去自由化的国家，都站住了。罗斯福把美国庞大的生产力转向基建，它就保住了工业，希特勒把德国庞大的社会生产能力转向欧洲第一套高速公路体系建设，于是乎，为什么德国一打就是闪电战？是因为它的机械化部队速度快，因全国形成高速公路网，所以可以东西线南北线调兵一天之内完成军事部署。而它周边的所有国家，停留在自由资本主义的这些国家，没有把过剩生产能力转向基本建设，全都得一个礼拜以上才能调兵，因为没有搞国家基本建设。所以德国打得起闪电战，打谁谁亏，你能短时期内集中优势兵力吗？你做不到，只有德国做得到。这就是为什么德国打遍欧洲无敌手，因为它是，对不起，很不好听的东西，它是国家主义。而国家在西方是陌生的吗？当然不是，早期他们对海外掠夺的时候难道不是国家主义吗？“奉王命强掠”，那就是海盗文明，就是殖民化，用殖民化的方式完成原始积累，那时候就是国家主义的重商主义。当完成原始积累形成本国产业的时候，本国的产业资本这个利益集团才以自由主义的旗帜向王权要权力，才有了西方进入自由主义的时代。

在这个自由主义时代，因西方历史是断掉的，所以没办法，只能向上找，跨越一千年不能说得清楚的封建制的黑暗，找到了古代希腊罗马，这个历史说得太粗，我在自己的研究生课堂上需要一个学期才能把整个东西方历史差异梳理清楚，东方不同于西方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现在只是从二战的生产过剩谈起，不能太追溯了。

我只是说，这已经解构了文艺复兴，解构了希腊罗马。做解构研究的条件不在西方人的书上，我是在世界上多个大的博物馆，做了相当长时间的历史文物的对比研究。比如大英博物馆，我去过五次，每次待一天；墨西哥的人类学博物馆，我去过三次，每次待一天；意大利的博物馆，那个遗迹旁边的博物馆，那里馆藏比较丰富，我去过三次。我当然因为出国比较多，到处跑，一年三分之一在国外，机会多，所以看的

多。我不仅是一般大的国家博物馆要看，很多高校的博物馆也看，主要是为什么呢？主要证明历史教科书的错误，特别是中国人这种选择性的借鉴，我们拿过来的恰恰是西方最不值得用的东西。

好了，这一块我们按下不表，二战以前西方这两个国家立于不败之地的，都不是自由主义的，但因此这两个国家打起来了，你们也知道，美军和德军打起来了，德军打遍欧洲已经没有敌手了，最后美国人进入，算是两个国家主义的国家打起来了，最后美国人联合了第三个国家主义的国家——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好了，美苏联手才打败了德国。于是乎，接着形成了美苏战后的双寡头地缘政治。

美国在西方的统治地位源于二战，因为西方所有国家要从美国拿到军火，这时候你们这些国家都被打垮了，你们拿什么要军火呢？黄金。于是乎，战后所有西方国家黄金储备为零，美国储备了世界60%以上的黄金，发行世界70%以上的货币。那时候美元叫美金。有道理，因为它是以黄金作为储备的。因此美国1944年就召集全球44个国家或政府签订了一个布雷顿森林体系，说你们都不用再搞金本位了，我保留一定的黄金储备，发行的是美金，你们各国货币只要按一定汇率换成美金，我承诺美金随时都可以兑成黄金，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涵，它客观上确立了美国在战后西方世界的所谓世界中央银行地位，对西方世界发行美元的条件。客观的，谁让你们当年是自由资本主义的，你们都被打败了，怪不得人家美国。我得客观的替人家说一句话，因为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实是你们没黄金了，这个替代是历史造成的，是因为生产过剩导致了二战，最后形成了美国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美国成了世界的中央银行，美国对西方世界发行货币，那就有铸币税，就有发行货币的收益，于是乎当然美国就有了领导地位。

但资本主义的麻烦在于，西方战后工业化的复兴有了一定的技术条件之后会很迅速，所以战后仅仅十年西方全面复兴，工业品的大量交换，带来了一次新的货币危机。那就是什么呢？各国都直接用美元结算了，境外美元不回流美国市场，于是乎美国就得超量发行货币，当一个国家没有任何其他权力来约束它，自己可以大规模增发货币的时候，何乐而不为啊？别说它们，换了你们在座的各位再有觉悟，换几个共产党员去当美国总统，他要不增发货币才叫见鬼。发了票子就是钱，就能买东西，干嘛不发。于是就必然造成货币超发，很快超发到它没法再拿美元来兑换黄金的时候，那美国就单方面撕毁了布雷顿森林体系，那就是在1971年发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国不承认你手里的美金可以兑

黄金了。因此从美金回归到美元，变成了纸币，本身不再具有黄金的储备功能，但，它客观上已经成为了各国储备货币，当美元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候，70%的世界结算货币还是美元。那怎么办呢？还是基辛格这个犹太裔美国人聪明，把美元和什么挂钩呢？和石油，于是乎第一个对美国最有益的安排就是美元化的石油，这个石油因为各国的工业化都起来，大量需要石油啊，于是乎美元和石油挂钩，尽管不是金本位，但是石油结算在我手里。也就因此带来什么呢？从这开始，你们注意，美国在所有的石油输出国和周边地带，乃至于石油运输通道全都部署了重兵把守的军事基地，可以随时掐断任何人的石油来源，这就是美国的地缘战略的改变。

从此，美元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有石油作为它的后盾，那就大量增发。等到这个时候，当美国的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集团，可以靠资本领域的交易来获利的时候，干嘛还要苦哈哈地去做实业的投资呢。那得从开矿起，然后洗矿、冶炼，再成形，然后再经过到无数道工序，最后才能出产品，然后才能把它卖出去，才能换钱，这事太傻了！要是能够直接印钞挣钱，干嘛不直接印钞呢？

所以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率先出现产业外移，因为资本家受不了，不能干慢少差费的事，得追求效率优先。到80年代，引发了西方产业外移潮，于是乎以美国为首，带动西方，向金融资本阶段转化。所以你们看这张图上，这个“V”很明显，先是产业资本不断下降，接着出现反弹，反弹的是什么呢，当产业资本大量外移的时候，海外有的是要素价格低谷，比如像中国，那个时候一个劳动力多少钱啊？很便宜，我们那时候30块、50块钱的日工资，美国那时候早已三五百的日工资了，所以，西方把产业移到发展中国家，占有那里的劳动力剩余价值，于是海外收益增加，金融资本阶段的上升由此开始。也是在这个阶段，它把过去自由资本主义改变成了其实是具有保守主义内涵的新自由主义，一旦我们把这一套西方意识形态和它的经济转型“V”型曲线做个分析，你会发现闹了半天，新自由主义是这么来的，它有没有客观基础呢？有，是因为它在做产业转型。

3. 南北双输局面。

把这个东西分析完了，我们就看，金融资本阶段，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难道是共赢的吗？难道这个世界是平的吗？你们看大量的西方著作，都在告诉你们沿着这个国际秩序走吧，这个世界是平的！实际上，不可能。

为啥呢，是因为客观上是双输。输在哪儿？我们以最近美国应对华尔街金融海啸，量化宽松政策为例，来看怎么回事。

你们可以看图，左边，当华尔街金融海啸发生的时候，美国出了一个超级量化宽松的救市政策，什么叫超级呢，零利率。听懂了吗？一手大规模增发，一手给定零利率，这意味着它发行出来的货币，形成金融资本，是零成本的，非常低价格的资金，跨国公司近乎零成本。好了，再加上通过银行各种手续费，在西方筹资，顶多支付2%不到的成本就够了，足以拿到一大块低价投资。国内现在为什么都在欢迎外资？是因为外资的成本太低了。你们都知道奥运歌曲，“我家大门常打开，张开怀抱等你来”，其实等的是什么？等的是低价格的外资，外资到这些发展中国它能攻城略地，占有你的战略性产业，因为你国内的投资价格高，他西方的投资价格低，他一打，你就败了，谁都愿意要低价资金啊。我有很多地方政府的官员们老问我：温老师你能帮我出一招吗，我能不能直接进外资啊？是的，那意思就是地方政府怎样绕过国家的外汇管制直接进外资，这恰恰也是人家美国人的要求，我们的地方官员可能百分之九十以上愿意按照美国人的要求办事，为啥呢？低价格的资金呐，这不是好事嘛。如果中国不是capital control，不是一个资本管制的国家，你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你的产业早就全数归了人家，因为你是资本管制，只许它做实业投资，你才稍微有点战略性……但其实已经输了三分之二了，中国二十一大类产业中的三分之二现在已经基本上外资控制了！

那为什么国内资金价格这么高呢？是因为接受了成本转嫁。

超级量化宽松，大量制造出流动性，上哪去了？60%不在美国，在哪儿运作呢，在全球期货市场上，主要是石油期货，粮食期货，而石油和粮食又是当代世界人类必需品，各个实体经济国家都必须吃粮食，必须消费石油，美国制造出的大量的过剩资金流到石油市场和粮食市场上，短期就把这两个价格炒得很高。你们都知道原来危机爆发之前的石油价格40美元左右，西方搞了3次量化宽松到现在2013年是多少？140美元以上，涨了大约100美元，最高的时候能涨到150美元以上，甚至有人预期180美元以上。过剩的资金流进去，当然会把价格炒起来，粮食价格更是如此。数据表明，小麦价格翻了100%，石油价格翻了300%。你不进口石油吗？中国现在消费的石油将近60%靠进口，这意味着比过去3倍以上的支付石油价格，那就等于你的石油成本上升了，不仅造成生活成本上升，也造成企业成本上升，请问，在这种情况下，能不发生通货膨胀吗？所以我们叫做“进口通胀”，或者叫做输入型通胀。通胀了

不得调利率吗？央行要不调利率，老百姓存款低于通胀率，老百姓还存款吗？不存款不等于发生挤兑吗？挤提不是银行发生金融灾难吗？

所以，发展中国家就得上调利率，调得比较高，那你的融资成本就随着利率上调而上去了。诚然，这不是阴谋，是阳谋，是个人就该懂。而且，我觉得所有的财经高官悉数全懂，老百姓可能懂的少些，问问在座的大学生，你们全懂的也不多，但所有的财经高官全都懂。

那也因此，当然导致进口的原材料使企业成本上升，企业成本上升导致利润下降，这时候还得调整资金价格，于是企业的资金成本也上升。这样看，原材料成本上升、资金成本上升，同时生活成本上升导致劳动力价格也上升，我问你，中国产业还有竞争力吗？所以我们出现“下行期”。这是一种输。

然而，难道美国就赢了吗？为什么叫双输？因为越是这样，越制造泡沫，明明知道它的量化宽松是左手增发货币，右手增发国债，增发的货币直接买增发的国债，于是，金融资本泡沫化。难道泡沫化就会赢吗？最终的结果是当我们垮的时候，它也会垮，这就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双输结局。

但是资本主义并不会有这种自觉性，看到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就自觉地不嫁祸于人了吗？不，资本从来是短视的。我的解释框架是政治经济学的，使用了部分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作为方法，因此我也计算制度成本计算制度收益，结果就发现，双方都在一个竞劣机制上，美国建议中国尽早开放资本市场，尽早本币自由兑换，这些建议都其实不是积极的、向好的建议，而是一个使你尽快早输的建议。

其实这个金融资本统治的世界，美国不可能仅靠经济运作转嫁成本，也必须靠意识形态，同时靠军事强权。所以美国人才有12个航母战斗群，我们现在只是从前苏联买了个废铁船，回来装了几架飞机，就算航母了，当然这并不是嘲笑我们，我们造舰能力确实差，现在为止，造的最大吨位的也只是驱逐舰，大家也知道，走向蓝海的舰队，得有旗舰，旗舰是不能由驱逐舰担任的，最差也得是巡洋舰。所以你们看这次叙利亚危机，俄国人穷到这份上，它开到地中海的还是以巡洋舰为旗舰的舰队。我们的麻烦在于，要到西太平洋上人家门口去做点小动作，这么说不好听哦，最大的舰顶多只是驱逐舰，驱逐舰本该是用于远洋舰队旗舰外围的防御，或者用于近海防御的，不是用于远洋作战的，因此我们到现在为止几乎还没有任何应对海权竞争的能力。

提醒各位一句，日本在1942年被美军炸沉的“大和号巡洋舰”已经是6万吨级了，那是人家40年代的水平，我们今天若要跟日本军事对抗，无论有什么情绪，说老实话，能达到它40年代的水平吗？它造的是6万吨级的巡洋舰，中国现在如果能造出一艘巡洋舰，咱们也可以骄傲一把。全世界最大的造船生产能力在中国，但却造不出一艘能带舰队远航的巡洋舰。我们把这个状况叫什么呢？“一个大草包肚子——满口没牙”，这就是我们的现状。中国的民族主义只能是民间愤青喊一喊，真到我们这些能够比较了解经济实际情况的人这里，我只好忍住一份怒气，没有办法。

更何况海权竞争，中国历史上向无胜绩。

在西方靠海权制胜的年代，我们有过打胜的经验吗？你们说有，的确有过一次，毛泽东时代跟南越海军在西沙打过一仗，还是小船打大船，但那是大雾弥漫的时候，船上的士兵扔手榴弹，正好扔到人家弹药舱里把人家炸了，所以当年我们叫做发扬海上拼刺刀的精神，敢打近战夜战，人家大船没以为你真打，没想到靠到跟前你扔手榴弹了，这个哪是海战呀？过去的事我们不多说了，总之我们不想妄自菲薄，但我们得有自知之明，我们没有西方海权竞争制胜的经验，因为我们没打胜过。

但在陆权竞争中，本国至今，除了像历史上清朝末年老打败仗，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我们向无败绩。几场边缘地区的区域战争，基本上都没打败，也不能说全打胜了，但至少是没败。

所以我说，海权竞争向无胜绩，路权竞争向无败绩，乃当代史上基本状况。

如何认识，不是我的事，现在中国外交上有些成功了，西进了，这是走了陆权战略的方向。过去，自李鸿章、左宗棠开始竞争塞防论还是海防论以来，李鸿章早已经败了，而我们试图再走李鸿章的路吗？走不得，还是走陆权竞争，西进吧，那有石油，当然那也有疆独。怎么处理，仍然是个大问题。

4. 社会成本“上得去下不来”。

好了，零碎太多了，偏离主干了。我们先把主要问题说清楚。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不可按照西方指引的方向走，不仅经济上不能，政治上也不能。因为政治上我们都应该知道，还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上层建筑超前于经济基础，结果是什么，反作用！虽然

辩证法认为，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是这个反作用一定有巨大代价。马克思少说了后半句话，前半句话他说了，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后句话他没说，每次反作用必然带来巨大代价，我把它补上了。所以我对马克思主义也在创新。

出于什么道理我要补上后半句呢？你们看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接手的是西方留下的上层建筑，因为超前，因此必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造成它再也无可能形成综合竞争的国力，除非继续卖原材料，这就是最典型的发展陷阱。

那我们看西方现在它的上层建筑，难道不是成本日益推高吗？是的。

我们以德国总理默克尔最近的讲话来作为一个例证，她说我们欧盟怎么竞争，我们欧盟占世界7%的人口，我们提供世界23%的GDP，三倍于人口占比，但是我们却消耗着世界50%以上的社会开支，我们怎么竞争啊！三个不成比例的数据，表达得很清楚吧，假如社会成本过高，是GDP的两倍以上，怎么解决竞争力的问题？注意，社会成本是上得去下不来。

如果你们愿意可以上网搜我有关于上得去下不来的故事。今天要讲谁的故事呢？讲的是奥巴马和金正日，现在叫金正恩了，当年我提出这个故事的时候还是金正日，所以我还是重复原来的故事，叫“奥巴马—金正日难题”，讲的什么呢？他们俩都上去了，都没下来。所以我说，不管意识形态，不管政治体制，两个人都有同样的矛盾——上得去下不来。

奥巴马的故事好解释，我刚才已经讲了因为他之前的里根当总统的时候就把产业资本移出了，进入金融资本阶段，他想做改变，说we can make a change。要改变到哪，改变到产业经济上，或称回退到产业经济上，可能吗？我们国内的很多人都说可能，可我说，对不起，不大可能，“上去了就下不来”。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跟国外很多大的投行在做接触，让其中比较跟我熟的人给我写个东西，就写写你们投行中的从业人员，认为正常的生活、正常的消费是什么，写完了我拿过来一看，就明白了：金融中的从业人员绝对不会像社会一般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比如你不买什么兰博基尼，就不是他们中间的什么，你不用什么就不是什么……总之，这个群体的消费一定是大大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这个群体所追求的也是大大超过社会平均收益的收入。那，这个群体是靠什么呢？当然是靠金

融投机！那么，这和实体产业有关吗？既然无关，能用这种金融资本的运作方式去为实体产业服务吗？没门。所以，美国经济结构自从高度化以来，“上去就下不来”。

为什么金正日也是“上去就下不来”呢？当然现在是金正恩了，因为他们超前实现了现代化。你们听着很痛苦诶。朝鲜超前实现了城市化，70%的人进城了，为什么呢？是因为朝鲜超前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农业都机械化了，不用人了。已经两代人不是农民，就会当拖拉机手了。在前苏联没解体之前，金日成时代朝鲜欢歌笑语，给西伯利亚地区输送点苹果土豆啊，这个那个的农产品，西伯利亚就给他石油和拖拉机，因为西伯利亚不适合农耕，所以两方工农产品一交换，不找账，都过得挺好。得，苏联一解体，私有化＋市场化，没人再给朝鲜石油了，也没人给拖拉机，原来给的拖拉机没油，也趴窝了，地就不能耕了，30%农民没有机械能养活70%城里人吗，不能，怎么办呢，只能动员所有城里人下乡，一人发一把镢头刨地去，没机械了，到秋天的时候，一人一把镰刀割稻去，这就弄得大批逃北者，你们以为进城的人还愿意下乡务农吗？让你们现在这些孩子一人一把镢头刨地去，你们不反才怪！一定会说没自由民主，没有人权！诚然，这就是朝鲜的现状，并不是说谁比谁坏，谁比谁专制，而是因为超前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却没有维持的条件，自己没石油，西方一封锁，麻烦大了。现在应对危机的办法，只好就是所有这些在城里载歌载舞跳惯了的人都给我下乡干活去。大家都批专制，你不专制试试？！

所以，这个“上去就下不来”是一个道理。

前两天电视上播一则欧洲新闻，我一看就笑了，跟我在西班牙旅行看到的情况一模一样，那个店主说我不愿意那么早开门，我就应该11点上班，1点钟就该吃饭，下午那么热不想来，就该5点钟上班，这跟我看到的情况一模一样。你们知道西班牙人习惯了11点钟上班，早晨是不起床的，因为晚上要有夜生活，那就11点钟上班，1点钟下班吃饭休息，下午5点钟上班，9点钟下班，完了去喝啤酒，去酒吧，去夜生活……这是人家的生活习惯，也是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基础，任何一个政客上台，敢说你给我改，得像德国人一样6点钟起床上班吗！诚然，德国人很愤怒啊，我们勤勤苦苦干活，养活你们这帮南方懒汉，但你到这些国家去当一回政治家试试，谁敢说改8点钟上班，他们不把你选下来才算见鬼。

既然没有竞争力，怎么办呢，只好政府负债。我们说美国人可以这

么干，这么高的社会成本，美国人可以对全球发债，所以美国国会批准债务上限不断向上提，是因为它也没有还债的能力，只好不断发债。而到欧洲人这里，欧洲人只能说我敢印钞，因为欧元区有一个中央银行，但欧盟不敢发债，为啥呢？因为各国政府都在发债，已经是二十七个欧盟国，都在发债，凭什么让欧洲央行拿我印出来的货币去买你发债的单。所以欧盟对债务扩张犹犹豫豫，但在美国却顺顺当当，因为美国是一个国家，再加上它可以把自己印出来的货币向全世界转嫁通胀，欧盟向谁转嫁啊？

但你们要看亚洲人的聪明，安倍经济学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安倍短期内能得到日本70%以上国民的拥护，安倍经济学大行其道并且初见成效，什么道理啊？需知，他很聪明，尽管这人不好，但他的办法很聪明。请看，安倍大规模印钞跟美国一样，美欧日都是量化宽松，都是大规模印钞，都不负责任地向全球转嫁通胀。但安倍的转嫁方式更绝，印钞了以后不是买国债，是买日本央行的银行债，这一买，就买出高价格来了，然后拿着日本银行的债券去给日本投资国。例如，日本在越南投资、缅甸投资，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投资，日本就给这些投资国谈判，把日本银行的有价证券做抵押，定向增发货币给日本在这个国家投资的企业。听懂了吗？空手套白狼，日本在某国这投资了一个汽车工厂，要扩产占领市场，哪来钱呢？用你本国货币。那你的本国货币为什么增发呢？我让你增发的。我拿什么让你增发的呢？我把我的银行债给你的央行做抵押了，你增发了定量的货币给了我投资的企业，意味着你的央行帮助我的企业在你的国家攻城略地，占有你的市场。这够聪明吧？于是乎，安倍经济学在短短半年时间内使日本在海外投资变成全球第一。日本人为什么高比例地拥护安倍？他的财经高官要比我们强多了，所以他得到这么大的拥护，于是他抓紧推动军队正常化。虽然他要变成一个真正有完整主权的国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是国家主权中的最为核心的主权是军事主权。现在，在日本地区美国的实力仍然大于日本，在韩国地区美国的实力大于韩国，因此，这两个国家都并不属于主权独立的国家。对此，日本现在抓紧军事正常化，这对日本是历史上难得的机会。

因此，安倍得到日本国民很大的拥护，乃是他抓准了历史机遇，趁着中美之间斗争越来越尖锐，这一把赌，如果赌赢了，日本回归正常国家，赌不赢，日本人继续当没有主权的国家，日本人的命运并不那么好，因为美国大哥即使在韩战和越战期间也没有给日本恢复国家主权，也没有给他恢复国家军队的能力，他现在正在向前试探。

所以，东海冲突对日本意味着有百利而无一害；对我们则意味着害大于利。怎么运作，怎么做好，把握这个很难。

（二）中国特色的中国经验

1. 无限责任政府与均田免赋。

总之，我们得说，到目前为止西方的政治制度，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问题不是它的好和坏，不是我价值观上是不是愿意要它，而是它的巨大成本你是不是打算支付。

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实际差别很大。请注意，原住民为主的东方国家因为经历了漫长的国家史，正如你们知道的，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保留了原住民文明的国家，长达几千年漫长的国家政治文明之中，它形成的政府在内涵上完全不同于“国龄”过短的西方政府。你们知道西方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大部分国龄也就是个一两百年、两三百年。例如，美国现在算三百年历史，立国史三百年，作为完整意义的政治国家不到三百年，德国1832年才结束三百个小邦国林立的封建制、完成统一大业，意大利1847年建国，此前也只是个地理概念。这两个欧洲的主导国家不外乎就是一百多年不到两百年的国家历史。

这些国家都算作有限责任政府，所以美国政府可以停摆，大家不干了，因为它是有限责任，拿到钱我就开门，拿不到钱我就关门。因此，底特律可以连警察都歇了，满大街社会犯罪，它不管了。在中国呢，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有过严重的财政亏损时期，甚至长达十年，经常发不出工资，不还得照样“五加二白加黑”嘛，敢歇吗？财政这里不发工资了，难道学校就不上班了，医生就不上班了，政府干部也不上班了？不行，照样得干。所以，中国的政府叫做无限责任政府，知道吗？如果你们想搞政治改革，先得搞搞清楚中国的政府性质和美国的政府性质，或者中国与西方政府基本性质相比到底差别是什么，它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对应的，经济中的主要主体是有限责任公司，对应的上层建筑叫有限责任政府。

我们现在经济基础领域把大量的公司改成有限责任公司了，但我们对应的上层建筑还是一个无限责任政府。

我们先把双方的政治体制的本质说清楚，第一，对方的政治体制成本过高，我们支付不起，第二，对方的政治体制叫做有限责任政府，我

们很难把中国几千年政治制度史上形成的无限责任改成有限责任，要想改，也可以，大家得慢慢讨论，看看怎么改才好。什么样的政府说我不对全民承担责任了，我就有多少钱干多少活，这样改大家愿意不愿意。如果这样大家都说很好，咱们就改。

由于大多数教科书都不会讲这个道理，所以我今天把概念讲的稍微多了点，希望各位理解。因此今天根本不是中国人如何威胁西方，如果看西方当代的这个后冷战意识形态，它讲的全是你如何威胁，其实中国根本没有威胁西方的能力，所以西方的各种各样的话语，停留在冷战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其所派生的人文社会科学，至今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点是我们这一辈，你们下一辈人，不得不面对的重大的历史任务，当然你也可以跟着走，跟着主流走，吃得香喝得辣，这也不是坏事，得到很多分配，但如果你真想做一个人，做一个思想者，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知识分子，你恐怕就得有点挑战精神，才能够有所建树。对不起噢，说得重了点。

不是我们不想追随西方文明，麻烦在于，我们没有再搞殖民化的可能。

对于东西方两大历史进程中构建的解释逻辑，我试着在做解构，发现至少在五百年前，出现了一个世界大变局，那就是因为中国长期向西方出口导致西方的赤字危机、白银战争，及其对西方走向殖民化的压力。

当然，你们现在通过教科书得到的印象都是因为中国闭关锁国，所以落后挨打。但，这八个字是人家打完了以后给你留下的，人家建立了某所大学，把这八个字留下，变成了你的意识形态。近代几乎所有的研究就都围绕着这八个字，大家都在解释说我为什么挨打呢？是因为闭关锁国了。那不是扯的嘛！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一个贸易盈余的国家，而且是世界最大贸易盈余国。1840年被打之前，中国的GDP占全球28%，比现在高多了，当时的人口是全球的17%～19%，但GDP大大高于人口占比。而当时中国出口得到的白银储备有多少呢？我们当时是把白银作为货币的国家，曾经占有全球60%的白银，就跟二战之后美国占有全球60%的黄金几乎是一样的。别以为GDP上去就站住了，不对，挨打的原因恰恰是因为贸易盈余太大，恰恰是因为出口太多。

为啥出口多了呢？中国自宋代以来，西域陆上贸易中断，海上贸易开通，开始通过阿拉伯世界向西方转运中国烧出来的土，中国把瓷器运

到阿拉伯世界再中转到欧洲，所以西方叫china，中国人拿点煤，拿点柴火，把中国的土烧成各种形状就送出去了，靠海船大规模向外出口，带出了阿拉伯世界对南欧的浸淫。世界地缘格局由此发生了改变，那中国大量回流的主要是白银，导致从明朝开始，中国以“一条鞭法”为标志，形成白银币制。

因为中国长期对西方的贸易顺差太大，而西方那时候也没什么可以贸易的，于是鸦片战争就开始了，打了两次鸦片战争，到了到1870年前后，用鸦片贸易的方式才使中国出现了贸易逆差。

而就在1870年前后，贸易逆差发生的同时，是中国的上层建筑鸦片化，官员、军队、士大夫阶层、知识分子都抽鸦片。当鸦片变成一种时髦的时候，就导致中国的整个上层建筑鸦片化，其中的核心是军队的鸦片化，于是军队几乎没有战斗力了，一次一次的挨打，最后打的结果是全部财政38年都还不完人家一场战争的赔款，那就是1900年的庚子赔款。进入20世纪，下层社会也走向鸦片化。士绅地主、商人交际也抽鸦片，城市帮会和农村土匪也随之被鸦片化了……

简单说，最初就是对西方的贸易顺差过大造成的，而不是什么闭关锁国，落后挨打，人家要的就是改变西方贸易逆差。

在殖民化时期，我们没有打出去，而是被打了，所以到工业化时期，在产业文明时代，你想学习西方按产业文明时代的路走，却走不成，因为中国人太多。举个例子，非得要姚明盖一小孩的婴儿被，那可不是顾头不顾脚嘛！人口太多，不能对外搞殖民化大量输出人口，就学不了西方。

我们一百年来的知识分子都想学西方，全盘西化最好，20世纪50年代的全盘苏化，也是全盘西化，别以为有什么差别，左派右派都一样。所以在2011年，辛亥百年的时候，我在清华大学有个演讲，叫“告别百年激进”，讲的就是知识分子一百年的激进导致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能不能稳一点？

既然走不得西方的路，那我们实际上是在走什么路？

中国恰恰是走不了西方的路，才在近代以来，出现了一次本土化的重大的制度改变，那是历朝历代都有做的事情，叫做“耕者有其田”，被我们叫做“土地革命”。20世纪上半叶打了三次土地革命战争，最终形成了土地平均分配，是几千年以来农民的基本诉求，所以，历朝历代的开

国之君，都得给农民做4个字的事——“均田免赋”，其实分开是两件事，均了田，还得免赋，任何一个均田免赋的朝代都能维持两百年朝代周期，我国1949年给农民均了田，2006年才给农民免了赋，现在尚处在稳定期，虽然免赋晚于均田半个世纪，但毕竟实现了均田免赋，跟历朝历代并无二致。

西方，特别是美国，为了防止在亚洲——受长期中华文明影响的东亚圈——都发生均田免赋的政治革命，于是它率先去把军事占领下的日本重新分了地，美国大兵占领了日本，强迫土地主把地献出来。朝鲜是1945年，二战一结束金日成领导下先把地分了，朝鲜是当时朝鲜半岛上富裕地区，因为工商业集中在朝鲜，地一分，工商业主纷纷以为其财富受到威胁，于是地主和工商业者为主大约27万人逃往韩国，加强了韩国政府反对土地革命的力量。就像50年代中国把藏区周边云南、甘肃、青海全都搞土地改革了，这一带的头人、奴隶主纷纷逃往拉萨，二者道理是一样的。所以韩国坚决反对分地！韩国的农民说，北方的哥们分了地，凭什么我们就不分，于是韩国大量发生了革命，农民革命甚至已经打到了汉城郊区，要求朝鲜救急，朝鲜就这么爆发了战争。但它被西方定义为是朝鲜的侵略，绝口不提韩国的土地革命。

根据冷战意识形态化的解释，台湾被说成是和平土改、科学土改、合法土改，可你们想想，当时台湾人口多少？600万不到。从大陆去了多少？大约150万，相当于增加了四分之一，怎么养活？其中有80万国民党士兵都是外省人，一人手里一把刺刀，台湾有多少土地主？哪个敢对抗！你们今天把它叫做和平土改，没有国民党士兵的80万刺刀，怎么能土改？今天的社会科学界如此的荒唐，基本背景不看，非得说那是在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帮助下实现了一次和平土改，是不错，但没有暴力背景，能和平吗？

横看东亚这片，中国大陆先土地革命，同期引起了重大影响，整个东亚片无论何种主义，何种意识形态，何种制度，都全面实行了均田制，因此进入东亚稳态社会。什么意思呢？诚然，都有下层社会，但下层都有财产。

因此看日本今天，尽管农民人口剩下580万，尽管高度工业化城市化，但日本农村仍然是平均的小农户，户均农地规模现在也不过是两公顷。到现在为止，不论它换什么党执政，都不敢像本国的某些重臣一样，坚定地主张工商业资本进入农业。过去，日本曾经有过这样的主张，但做出这样改变的人都下台了，后来虽然延续了这项政策，但外部

工商业资本进不去，因为农村中几乎全部是综合农协垄断控制，任何工商业资本进来打不动，因此，日本农民通过自己的综合农协得到60%以上二三产业的收入，农民的收入高于城市居民收入。这是日本的政策，长期稳定。

总之，整个东亚社会都是平均分地的，因此，本国也只是平均分地的东亚之一。

2. 双稳态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

当代中国形成的两个稳态结构，是国家稳定的基础。

在经济上，从土改开始，造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小有产者群体，属于下层阶级占人口的60%。中国小有产者群体如果用马克思主义来定义的话，也可以叫做小资产阶级。

最近的几十年从小资基础上，长出来一块叫中产阶级，或者叫中资群体占人口的30%，上边是大资，主要是国资，国有资本总量占比最大，但占有国有资本及其收益的支配权力的人很少，大概是中国人口10%以下的群体在掌控着国资。但，因为国资高度政治化，因此它不属于一般意义的富裕阶级。

我们看中国社会结构，小资、中资、大资，这是个金字塔稳态结构，稳在哪？稳在没有赤贫。不信你到印度去看看，30%的农民无地，无地就是赤贫，再加上种姓制度、部族制度，它当然不稳。因此，印度农村三分之二的邦有农民武装游击队，被叫做毛派，弄得中国好不尴尬，老解释说，这个毛派跟毛泽东没关系。不过，人家印度毛派就说，毛泽东就是搞土地革命的，我们现在也搞土地革命，所以自己叫印度共产党毛派。

同理，尼泊尔也是没搞土改的国家，也是共产党毛派领导农民武装斗争，一度打赢了啊！1996年，尼泊尔共产党毛派就是到农村去发动农民搞武装斗争的，10年之后，出动一个师的部队包围首都，国王下台，让出政权。

我跑了四十多个国家，到处去做农村地区的调查研究，还了解点真相，比如说印度的毛派游击队怎么搞武装斗争，在游击队斗争地区我至少跑了五个村，大量接触了当地老百姓。我对带我去的印度的进步知识分子说，能不能介绍给我印度游击队的头，我跟他们聊聊，可是转了一圈回到新德里，我说唯一的遗憾是这次我要见游击队的头你没让我见，

他说你已经见到了啊，我说是吗？就不再多说了。尼泊尔人民解放军包围首都迫使国王下台形成所谓新的政权，叫做新世纪的“民主贝贝”，它形成的时候我们组织了三次调查。此外，对印度做研究，我们到现在为止组织了十几次调查，我本人去过七次。

我们大量做发展中国家调查，知道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况，远比一般高校教师能给学生的知识要真实得多。

因为中国没有赤贫阶级，其社会才仍然是稳态结构。大量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是有人想剥夺小有产者，那就是说夺农民的地，拆村并镇，抢占农民的土地，逼得农民哇哇叫，于是群体事件就发生了。

3. 承担无限责任的表现：三大差别再平衡。

接下来，我再讲中国出现三大差别的情况下，因为中央政府仍然承担“无限责任”，所以出手做了再平衡的战略调整。

如何看中国的经济结构？因为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造成外需下降，1998年中国发生了生产过剩，因此开始大规模启动国债投资。这有很重要的三大差别再平衡作用。是因为在这个高增长阶段上，按邓小平所讲的，要允许先富，但是发展起来一定要减少贫富差别，否则的话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所以后接班的领导人必须得把三大差别做再平衡。

1998年开始发生的生产过剩，工业生产能力闲置的时候，中央政府立刻出台了区域再平衡的战略，第一个大战略是西部大开发，投资3万6千亿，国债占三分之二；第二个大战略，叫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接近3万亿，70%以上国债；第三大战略，叫中部崛起，又是接近3万亿投资。为了用国债投资来取得区域再平衡的战略的成功，投了多少？9万多亿，相当于1万2千亿美元。中央政府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投资，投在了区域再平衡上。

接着看，当2008—2009年西方危机爆发以后，西部地区GDP增长一片飘红，东部地区则属蓝灯区。这说明区域再平衡的战略基本取得成功。中国三大差别中的第一大差别，区域差别，也就是沿海和内地的差别，经过中央政府十年期间的三大国债投资战略，已经基本完成了。

实现区域再平衡之后，接着是缓解城乡差别。

我们知道，中央在2001年接受三农问题的政策建议，确定为国家战略重中之重，于2002年开始强调，随之在2003年提出要加强三农投入，接着2005年提出新农村建设，到现在8年，2005到2013年，这8年

期间投入7万亿。第一块，基本上使得农村中所有的社会开支得到低水平全覆盖。什么叫低水平呢？农村中的低保开支很低，但是做到全覆盖，叫做“应保尽保”。农村中所有孩子上学免费，也做到了。医疗报销，尽管报得低，但毕竟有地方报医疗费了，所以这个社会保护伞（social umbrella）给农民覆盖上了。第二块，农村“五通建设”，给农村通路、通水、通电、通电话、通宽带。五通是开发区的水平，我们向农村做五通，做到接近99%，现在没有通电的农户占百分之一点几，当然中国农户太多，两亿农户，就算留下百分之一点几，也是相当大的一数，但是在基本建设上，国家7万亿投资下去覆盖了农村基本建设，覆盖了农民社会开支，这就是城乡再平衡。

因此很多农民现在不愿意要城市户口了。

过去，我们老以为户口是个问题，现在“非转农”最困难。你们谁家是农村的？已经上学出来了，再想把户口转回农村，难上加难，农转非容易，非转农难。

为啥呢？农村是只要有一份户口，就可以无偿占有一份资源型资产，占有什么资产呢？宅基地和承包田，这是无偿的，凭的是你的农村户口的身份。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东西值钱了。如果是城里人，弄一个城市身份，还值钱吗？就算在城里买了一处房子，买到的是什么权啊，那是产权吗？很多知识分子跟我争论农村应该土地私有化。我说对不起，你先看在城里交易的是什么，城里人有土地证吗？搞搞清楚，土地使用权证在开发商手里，你买的房屋产权只不过是钢筋水泥的产权证明，有一寸土地吗？城市土地所有权归政府，土地使用权归开发商，你花大钱买的是一堆钢筋水泥！因此，农民的产权才是实打实的。农村人的那块宅基地可是世代继承的，哪怕你进城了，将来拆迁的时候，还能分你一套房子呢！当然也是把你占有的地权换成钢筋水泥产权，一般人都不愿意要，所以现在农民反对拆迁，他要实打实的脚下有块地，不愿意被变成钢筋水泥，这就是现在的政府跟农民的矛盾冲突。

好了这一部分我们得说清楚，国家投入于大规模的农村基本建设，相当于搞了三大差别的两个再平衡，上届政府把区域和城乡两个差别都平衡了。那接着该干嘛了？

本届政府就该平衡贫富差别了，这是历史责任，也是中国这种无限责任政府必须做的事情。平衡三大差别是这种无限责任政府的投资目标。世界上我们才敢承诺。其他国家哪一国做得到？换一个试试。

拿最发达国家举例，难道美国不得温饱人数不是在上升吗？若按占总人口比例，几乎超过20%了。中国占比多少，现在据说重新计算了以后占比是7%。

且不说哪个制度好哪个坏，只说作为一个国家体制，中国政府应该承担无限责任，必须把它原来造成的三大差别再改成平衡，这就使现在中国的投资有地方可去。那，也因为这三大平衡的战略投入，短期看都不挣钱。例如西部开发投基本建设，往农村投修路，短期能收回吗？给农民修路，能同时修一个卡子收钱吗？不让农民一扁担打出去！怎么可能收到钱呢？所以，农村基建这个需求应该谁来投呢？只能国家投。谁来干呢？只能国企干，就算给私人老板，他愿意干吗？再说电力，大家对电力很不满意，很少人说往农村送电，中间的电力损耗多少，那既然是市场经济，那如果加上损耗农民应该交的电费两三倍于市民，因为市民用电多对应的线损很少，农村用电少对应的线损就多。但是，国家强制规定城乡同价，农村不许多收一分钱，电网公司亏着也得往农村送电！

这个做法的好处在哪？各位，在国家利益。

什么叫做国家利益？举个例子，为什么我强调新农村建设是这次执政党的主动调控？因这种主动投资，不仅是农村实现了五通，而且当五通实现的时候，恰恰是国家遭遇到全球经济危机打击的时候，对农村的基本建设投资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抗危机作用。我在国外争论的时候拿出这个故事会让所有人哑口无言：2009年全球大危机爆发，全世界的GDP都下滑，中国走了V型反弹：第一个季度GDP下滑，第二个季度GDP就上去了。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把补贴外国消费者的出口退税13%，转为补贴农民户口的消费者。只要是农民户口，去买那些出口不了的家用电器、汽车等，国家给13%补贴，而且宣布说，这政策只到2010年12月31号。于是，一年之内，农民的百户彩电拥有率达到104台。你们笑啥？其实，中国政府出台的这个危机应对政策高度有效，一下就把出口转成内需了！出口不了，那我们还能干什么？正是因为中国已经从2005年开始向农村投了4年，这4年里头已经投了3万4千亿，基本建设已经进村了，所以农民买彩电能够看得上，因为宽带已经修在村里了。同理，农民买汽车，能开进村去了，因为路也修到村里了。农民买洗衣机有水了，因为自来水修进村去了。所以，国家投资在农村修路、修水、修电，宽带电话全进村去了，出口卖不动的消费品就卖到农村去了。这一下，只在第一个季度因海外订单撕毁GDP就下滑，第二个季度因制定了

对农民的补贴政策，GDP一下就又上去了，中国两个季度之内就走出“V”形反弹！同时期，别的国家尚在危机造成的萧条之中。

而且，2009年第一个季度因出口不畅，6万多家企业倒闭，都发生在沿海，并且2500万打工者失业。中国处于典型的危机爆发状态，按说应该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我拿这个问题问西方人，你们如果遭遇2500万人失业，那会怎么样？西方人回答，那我们国家就没了，没谁受得了2500万人失业。有一次在联合国开会我发言说，我们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失业是1960年，大约7000万人，那是我们上山下乡开始的时代。需知，因7000万人在城里失业，所以向农村转了上千万知识青年，算是到农村去就食吧？所以说，“三农”承载了国家历次经济危机的代价。

到第二次经济危机于1966年爆发时，轮到我们这批知识青年了。我是1968年上山下乡的，不仅我下乡，我们全家六口人全下去了。我父亲是人民大学的，那时候认为人民大学不创造生产力，因为它是文科院校，只有理工科院校才创造生产力，就还得留着，纯文科的院校解散，老师下乡，我父亲下放在江西干校喂牛，我母亲在北京郊区种水稻，我在山西当农民，我一个姐姐也在山西当农民，另外一个姐姐在湖北当农民，弟弟在内蒙古兵团，一家六口人分6个地方，全下乡了。所以我说：大危机条件下，是乡村救了我们，虽说没工资，但是有饭吃。今天有很多人把这些东西写得很“伤痕文学”，然后就说“伤不起”，说我们这代人“很悲催”等。是的，我们这代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当了垫脚石，能够从困境中再爬起来的人很少，如果不艰苦奋斗，或者说不每天奋斗，当然爬不起来，所以我干到60多岁到现在为止，连一个春节都没过，为什么？就是我永远比别人晚，要在比别人晚的情况下干得超过别人，不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上那肯定是不行的。当然我们6口人都回来了，兄弟姐妹也都上了大学，等于又回到了中产阶级队伍之中，但这过程是复杂的。

总之，怪不得国家，是因为任何国家都会遭遇危机。中国遭遇危机的时候，如果不把多余的城市劳动力送到农村去，那城市就发生动乱。不信你们看现在的欧洲，深陷危机也改不了，因为没农村可去了，所以失业人群就在城市聚集街头，挖出石块来砸警察，能解决问题吗？当然，不仅解决不了，还变成极端化的政治势力。例如，有一部分人走向极端右翼，一部分走向极端民族主义，一部分走向社会主义，一部分走向保守主义……

特别是年轻的孩子们，要有超越主流的独立思考能力。我是个过来人，经历了不同的教育体制，我下乡插队之前原来是人大附小、人大附中的学生，因为我家是人民大学的嘛，就有这条件。人大附小、人大附中至今都是全国最好的学校，我们接受的算是精英教育，因为，人大附中的学生当年就是95%以上是干部子女、知识分子子女，现在还是，仍然是精英学校。那不能说原来的那套，前苏联照搬来的教育完全无效，毛泽东时代的教育完全无效，我们经历过两个教育时代的人，原来的教育和现在的教育各有利弊。以前的教育，我父亲当老师的一代人之中，要说俄文，念俄文教科书，能用俄文教课，就是权威！到我这一代，能用英文教课，就是权威。然而，我们进步了吗？我们知识分子难道就这样荒唐下去，难道不得自己反思吗？

我们的社会叫做“双稳态结构”，如果稍微往前多激进半步就可能自毁，所以我严禁我的学生参加派性争论，因为派性争论是最没学问的表现。孬好有点学问，早就跳出去了。要认真做点调查研究，特别是做点国际比较分析，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三）复兴乡村，建设生态文明

1. 城市化带来的污染。

下边这一部分是说，现在的产业资本时代造成了严重的污染。越是城市化，人们对化石能源和矿物能源的消费越增加，尽管我们国家煤炭的占比低于70%了，原来在70%以上，但现在煤炭的总量消费曲线是陡然向上走的，因为中国正在加快城市化，城市化一定是使用大量化石能源的，而煤炭是大量制造二氧化硫、PM2.5的，一定造成严重的大规模污染。

因为气候变暖，那就形成暖湿气流向北推，带着所有沿途的“城市带”形成的产业污染和生活污染，向北推到了淮河以北，就全是大平原了，再加上这一带平原地区的污染，推到京津唐上空的南北走向的太行山山脉和东西走向的燕山山脉，正好呈一个L形挡住了污染再过不去了，就停在京津唐上空，这样，京津唐地区就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污染带。这个污染带只能靠西北风了。但麻烦在于，由于气候变暖，北方的冷气流下不来、或者下来少了、弱了，就导致我们京津唐地区现在污染特别严重。于是，我最近跟外地院校签了几个约，自己叫逃离北京。幸亏我现在知识还值钱，所以抓紧跟外地院校签约，我现在当了三个学院

的院长了。各位，还想去北上广吗？那都是高度污染地区。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给定的标准，全球17个一千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都属于可吸入颗粒物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状况。各位，上海这地方也属于千万以上污染较重的大城市。

2. 投资拉动增长与新型城镇化。

中国在21世纪这个关口上，做了重大战略性的调整：三大差别的再平衡战略调整，而没有按照主流给的方向激进地走向金融化和全球化。当然就导致了中国尽管遭遇生产过剩“危”，却转化成了三大平衡的“机”。因此我们维持了十几年的投资拉动增长。

这就客观上把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划分成三段：80年代叫内需拉动，老一点的人都应该记得，80年代买什么都紧张，物价不断上涨，是因为内需扩张太快，所以，80年代叫内需拉动增长。90年代，中国内需再也上不去了，于是转而依靠外需。但是，外需拉动经济却遭遇到1997东亚危机，中央启动国债政策进入投资拉动。这样，投资拉动成为新世纪经济增长的主因。

所以说80年代内需拉动，90年代外需拉动，新世纪以来投资拉动。

不过，投资拉动是个单行道，上去了就下不来，是否能够延续得了不在于谁的主观因素。那，取决于什么呢？我看，对不起，得感谢一下秦始皇老爷爷。他老人家2200多年前把中国给统一了，虽然秦“二世而亡”，但以后还是“汉承秦制”，中国长期是个超大型大陆国家而有广大纵深。你们也都知道凯恩斯的挖坑填坑理论，中国人不必要搞挖坑填坑，只需利用内陆纵深广大，就可以把过剩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建设，所以现在中国除了完成区域再平衡，城乡再平衡等国家战略之外，还可以再提出一个城镇化，用城镇化战略去给县以下的三万个城镇做基本建设投资。这个时候，正好赶上沿海“去工业化”，产业开始衰败。流动打工的那些农村人长了点见识，挣了点钱，正好变成城镇化战略需要的中小企业的创业主体。也因此，中国下一步能否继续维持投资拉动增长，主要取决于我们是否还有投资空间。所以我才说各位应该感谢一下秦始皇老爷爷，如果没有他老人家帮我们买完成超大型大陆的国家大一统局面，我们没有内陆纵深，投资拉动就会中断，只要一中断，以前所形成的全部债务就会暴露，那就是金融危机。此前，会先导致所有的财富泡沫化，接着是财富泡沫破裂。那，如果放眼全球，这个泡泡破裂的危机就要爆发在中国了！不过，今天这个世界是个竞劣机制，谁先爆发危机，

那别人就来抄谁的底。

总之，并不是谁的制度比谁好，全球金融化就是一个竞劣机制。

现在中国还有投资拉动增长的机会，国家的战略性投资，当前主要是城镇化，从整体上考虑，应该纳入三农投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所强调的社会化的生态文明，就在于动员社会各个阶层广泛参与，而这一点呢，恰恰和你们这个专业，和文化研究高度相关。因为，我把城镇化当做一次去城市化的经验过程。

应该知道基本概念的差别，城镇化并不是城市化。

在西方，城镇化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去城市化”，历经三十年之后，现在西方生态化的主流叫做“转型城镇”，英文叫做transition towns，什么意思呢？社会群体计算food print（食物足迹）以及生态足迹（eco-print），据此形成本地化的食物短链方式。如果一个地方的食物足迹和生态足迹太长，那就不可持续。因此，西方的转型城镇，是发动市民社会参与，把绿化草皮改成菜园，把市树、那种成批种植的行道树，改成多样化的果园，街道和社区的公园就变成了市民可以就近参与式的搞都市农业的场地，那也就是缩短城镇的食物足迹，减少生态足迹。这样，市民越来越强调食物的localization（本地化）。越多采用本地化的食品，应季的食品，你们就越进步，越表明人类有了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进步。

这就是现在的西方城镇化的新的趋势。

与此同时，西方的城镇化还出现了另外的新趋势。那就是西方社会已经中产阶级化了，你们也都知道欧洲人口70%左右是中产阶级人群。随着社会的中产阶级化，要求的主要是安全，包括生态安全。于是乎，西方现在讲求什么呢？注意其中差别，我们还在产业文明时代，讲的就是要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然而，这个追求已经out了。需知，在中产阶级占主体的西方国家越来越强调“三慢”，慢食、慢城、慢生活。吃饭别着急，慢慢聊，慢慢吃，然后，生活节奏大家也要慢一点，意大利有叫慢城运动的国际组织。中国近年来也有慢城了，江苏南京的高淳县有一个乡镇，在意大利申报了中国第一个慢城，以这个慢城概念，变成了一个文化旅游，变成了一个乡土文化的体验，等等。其中就有了相当多的乡土文化复兴的理念，那里也搞了农民生活博物馆、农具博物馆，等等。总之呢，是希望用慢城概念来变成一个农业的体验文化。近年来类似的事情在全国比比皆是，强调生态足迹的城镇化已经开

始形成趋势了。

乡村文明的复兴和生态文明的复兴，会给人们带来新的消费需求，我把它叫做“四洗”消费。农村中，如果你不搞大规模产业化，不搞化肥化，而是坚持去农药，去除草剂，不用化学化的方式搞农业，就等于让农业发生了生态的修复功能，这时候城市里的人们到农村来，吃农家的有机食品，就是“洗胃”；呼吸乡下的新鲜空气，称为“洗肺”；喝当地的清泉水，算是“洗血”；享受乡村文化的氛围，可以“洗心”。这样，乡村就有了“四洗”文化吧。

这“四洗”文化是非常体验的，也是非常休闲的。城里人下乡消费是要有文化感觉的，什么文化的感觉呢？你看古人做的那些景观，哪怕溪流中的一块石头，也会刻上洗心，那个溪畔休闲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难道干活的时候不苦吗？苦的时候毕竟有乐。最后还有一句，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总之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在这种多样性感受之中，人的生态文化就复兴了。最终，当我们讲生态文明的时候，无外乎就是它本来就是自然多样性的农业，城里人的休闲养生与乡土文化结合的时候，会使得人们在参与中有一种农业文明的复兴感觉。

3. 当代乡村建设运动。

我们十多年前就把这些事情明确了以后，就开展了一系列的乡村建设活动，推行生态农业的多样性，推行市民参与式的农业，发展出了社会化生态农业。

我们在各地做的活动，包括在打工者中间搞服务中心，主要是帮助打工者形成自组织，开展交流活动，不至于每天被生产线困扰着失去人的多元化属性。

我们在各地建了很多不同类型的农村试验区，搞了一百多个试点，各村的做法也都是为了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我们2003年在河北搞起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提出的纲领叫做“人民生计为本，互助合作为纲，多元文化为根”，其中，我们说，文化建设是收效最高的，因为它成本最低。

我们在农村也搞生态建筑，建筑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如果我们把生态文明作为一个理念，那建筑本身就是这种生态理念的文化体验，这种生态建筑是草土墙，不是钢筋水泥的，冬暖夏凉，这个生态建筑非常有

讲究，你们可以上网搜，有介绍生态建筑的网页。我们还搞了生态厕所，虽然很简陋，但它是粪尿分离的，不污染环境，所有的排泄物都可以回收变成有机肥，我们在各地搞了不同形式的生态厕所。

我们在城市推进市民参与式农业，市民到农场来租地种菜，形成的是市民和农民共同分担农业风险，并且市民是要先交定金的，交了钱才能开展生产。当然还有很多市民是订菜的户，我们配送，接着还要搞社区中的有机餐饮业。城市郊区发展微生物发酵床养猪法，不脏不臭，能够分解动物的粪便，利于在农村搞体验农业，亲子乐园可以带着孩子们过来接地气。

我们还在农场搞青年培训，大学生们到农场来参加生态农业的劳动，其中有相当多的人已经变成了生态农业的创业者，我们目前在国内有一百多家CSA农场，大部分是我们培养的实习生和志愿者。我们另外做了青年乡村建设网络，下乡支农的学生中有很多是研究生。我自己有一个研究生，本科下乡，硕士下乡，博士还下乡，每次下乡都休学一年，现在已经成了一个非常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

大学生支农和农业生态合作社建设有机结合。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帮那些农民维权组织转化成了乡建组织，变成合作社了。原来大家组织起来为了对抗、维权，但这个社会总会逐渐和谐起来。以前那些事不放下吧，永远是病，如果有条件放下了，就过去了。因为地方政府已经换很多届了，再跟他闹，新领导不对前任负责。所以我们劝说现任的政府领导，要想不闹，就把政府投入给这些合作社，帮助搞基本建设，让他们能够从过去的政治性对抗转变成经济性自主建设。我们已经转化了一批维权组织。当然，可能有人会说这是没有原则，但其实很多基层问题都是90年代因经济危机、财政严重亏损而造成的，也怪不得具体是谁。就像刚才讲二次大战之后美国成了黄金最大储备国，因此发行了全世界最多的货币，也怪不得他，只能怪二战。类似像这些由客观原因所造成的一系列复杂矛盾，再去深究谁对谁错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都已经过去了。

我们现在正在搞的新的一个项目可能跟各位做文化研究的朋友们有关——“爱故乡”——希望动员一批文化人回到乡土家园的情节之中，质朴的文化感才会恢复起来，我们动员了相当多的音乐人、文人去做采风、下乡跟农民多交流，把乡土文明复兴起来。这些事不少啦，希望大家参与进去，能支持就支持。

第二节　生态文明与中产阶级下乡注

（一）新农村建设需要广泛的社会参与和动员

先说三个感谢作为开场白。

首先让我代表会议的主办方，感谢培田村当地的父老乡亲！

无论经历多少风风雨雨，当我们来到这儿的时候，每个人之所以心里头有份感动，是因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在乡土社会中才有如此自觉的保护。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脑子里闪过的那些画面，是我从小看到的北京城墙被拆毁，看到的北京的牌楼、胡同、四合院，过去的这些代表传统城市文明的建筑被拆毁……当脑海中闪过这些发生在城里的画面的时候，在这儿的村子里我感到的是什么呢？是一种由衷地对咱们培田父老乡亲的尊敬和感激。没有农民的淳朴，就没有对乡土中国文化的保护！假如村里也都“拆哪”，将来的后代子孙上哪儿去找祖宗，上哪儿去找我们的历史，上哪儿去记忆我们的文化？到那个时候怎么面对后代子孙告诉他们我们从哪儿来？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从哪儿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向何处去呢？

所以在这儿呢，首先要感谢的是在座的父老乡亲。

在这个会议之前，刚才在公益食堂开张的会议上，我看到一个80多岁的老人致辞，这个致辞讲得非常好。话说我家里也有老父亲88了，他就没有可能像现在这位老先生这样，面对着各界来宾，用自己写好的讲话稿，还能脱稿讲话，还能给大家致个辞。我听老人家的演说呢真是感动。因为心里感动着咱们这儿多少代人的努力，也就在一开始带着大家鞠躬，作为城里已经失去中国文化的人，得对村里那些仍然能够表达乡土文化的人表示感谢。刚才可能有些朋友不太愿意搞这种仪式，我有点强人所难了，但是我想，也许来的人都有这种感动呢，我们大家应该先谢谢父老乡亲啊。

第二呢，要谢谢在座的各位领导。

特别是刚才参加这个培田村社区大学揭牌仪式，省里边教育厅啊、省人大啊、省农办啊等等这些省里领导，还有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领导，都出席了。他们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全国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福建省是第一个搞了终身教育立法的。我说感谢领导，也是因为

咱们福建省的有关部门，走在全国前头，先把这个终身教育条例颁布出来，让我们在村里办社区大学有法可依。

我们所做的各种社区教育，其实都是帮助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农民——得到终身教育服务。要这么看呢，我们当然得感谢党和政府，感谢领导，感谢这些省里面来的同志。诚然，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的很多工作可能会遇到困难。注由此，我才说第二个感谢就应该感谢他们。当然，也应该包括龙岩市、连城县的各有关部门的同志，他们也是在这个领域中有贡献。

希望大家心往一块儿想，劲往一处使，把我们农村的文化复兴，作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复兴的主要部分，变成中华民族文化崛起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中华民族文化崛起不是我说的。同理，生态文明——就是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是中共中央十七大强调的“四个文明一起抓”的重大突破！

大家恐怕得注意，以前小平同志领导我们搞改革开放的时候，提的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当时要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江泽民同志提的是三个文明，加上了政治文明，现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我们向前进，总书记在十七大提出了一个新的理念就是生态文明。

如果没有乡土中国道法自然而天生的多样化，何来生态文明多样化的内涵？所以我说，要道法自然，要敬畏祖宗，这本身就是我们乡土中国多样性文化传承中的精髓。无论刚才在村里搞敬老活动，还是现在我们这个研讨会在讲生态文明，在讲乡土文化多样性，都应该感谢各级政府，从省里到市县镇各级、连同感谢村级的书记和村长。昨天晚上见到村里的书记和咱们大学生村官，见到了村里的干部，等一下要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也就是说，没有各级政府的配合，没有各级部门的资助，我们很多事情就很难做。现在呢因为这件事情大家坐在一块儿，心往一块儿想，劲儿往一处使，就能把这事做好。

第三还得感谢各界的朋友。

培田村的事业是大家做的，不论是教育界、文化界、媒体、企业界，还是其他各界的朋友你们知道，咱们有一句话是毛主席说的，“世界是我们的，做事靠大家来”。如果没有各界的朋友大家来参与，这件事情

恐怕可能有个头，但未必就有尾，做不下去。

在2005年9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国家战略，到2006年出台一号文件的时候，就把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五大政策之一了。因此，今天大家都在推进新农村建设，我们创办的这个培田社区大学，就属于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咱们省里农口同志在座啊，市县各级农口同志都在座，这个对村民开展的本地化教育其实是我们应该做的一项工作，这项工作有大家的参与就能做得更好，就能五彩缤纷，百花齐放。所以我说，动员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就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在推进新农村建设这件事情上所提出的重大政策。所以，我得感谢社会各界朋友。

先表达这三个谢意。然后再说今天的这个话题。

我是不是表示三个感谢就算致辞了？还有要表示的吗？你们看我老是笑眯眯的，其实我是怕忘事、对不住人……

哦，培田村的这个事做到今天，还得特别感谢一个人，就是刚才领着妇女腰鼓队在大夫第门口表演的衡老师。他叫衡生喜，本是个国企职工，中原油田的退休工程师，他不是农民，但是他却走过了十五个省、六十多个村，也是比较早的参与我们乡村建设的一个老志愿者，就是拿着个大茶杯，走到哪儿呢都不收一分钱，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体现了一种红军精神，走到哪儿都是去帮助各地的农村妇女来搞文艺队，搞腰鼓队和盘鼓队。这个帮助妇女通过文化活动组织起来的工作非常重要。

举个例子吧。我最近刚从百色回来——华润是个中国大型企业集团，近年来在百色投资三千万建立了一个希望小镇，请我去做顾问，我就把衡老师请去了，他在那儿也训练了四十多个农村妇女。这些妇女问我说：什么时候衡老师还能再来啊，我们可想他了。为啥？因为他带着我们打腰鼓，把我们变了！是啊，农村妇女的这些话其实说得很朴实，她们想他，那是真想他。为啥说他把她们变了？变成什么了？说过去她们打打麻将，聊聊家常，造点东家长西家短当个长舌妇。现在她们变了，现在她们是晚上九点钟，家务事干完——你们知道两广一带的妇女比男人辛苦得多，九点钟才收拾完家事——干啥呢，集合起来练腰鼓，或是带着咱们盘鼓队打盘鼓，一人一个鼓，前面一个大的，挺重的。像我这个年龄，背一会就背不动了。人家妇女说：不仅我们精神面貌改了，我们身体也好了，过去的毛病没了。还说，不再像过去那样老去打牌说人家闲话了。现在是当地的哪个商店开张啊，有点红白喜事，就把

她们给请去了。不仅是我们自己精神面貌改了，我们身体好了，我们还挣钱了。特别感谢这衡老师！注那，我想今天把这话带给他，看他在没在这儿（现场）。

还有中国农大这个副教授（何慧丽）注，她其实当年是兰考县常委，八年的副县级干部，从当年在北大读博士就下去职挂职当副县长，现在当常委，她在基层已经工作了八年。

我们的很多事情都靠人的自觉——我刚才说感谢各界朋友，有很多人，你们说他是文化人吗，你们说他是教师吗，但他们的那个教书的课堂，不仅仅是在高校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很大程度是行走在阡陌纵横的田野上，是在民间，是在人民之中。这其实才是人民教育。

特别是像他们这种农业大学和我们这种农业农村发展学院的教师，如果我们的教育不是来源于祖国的乡野之中，还算是从事中国的农业农村教育吗？得亏还有何慧丽这样的人，还有衡双喜这样的国企老职工，一个退休职工能纵横十五省，带出来六十个村的妇女文艺队，比我们多少文化局、宣传部要干的事都多——当然，这也不归宣传部管。这个老先生干的事呢，至少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积极的正向的补充。表明中央提出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思路看来是非常有效的，由此，我特别感谢衡老师和何教授。

那在我们培田，能有这么好的文化保存，将来我们工作深入下来，一定会了解很多民间起着重要作用的人。

借此机会，还得表示一下对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感谢，对西部阳光的感谢，对正荣集团的感谢。因为他们都是培田村文化复兴的积极参与者。同样的，在座的还有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也都是积极参与者。例如我事先看到了王丽老师的文章，觉得获益良多。是啊，我们得多有些您这样的知识分子。我时常感觉到“时不我待”，因为我今年60了，眼看着就要退了，老是觉得有一大摊子的事没来得及干，时不我待的感觉就特别强烈。但是每次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又觉得特放心，因为，很多人都是跟我一样的志愿者在做乡村建设这件事，不用太担心。每当在这种场合，和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相当强的场，那是一种人气。在培田村南山书院这种几百年凝聚了人文感的那种地方，如果没有这种人心向善，没有这种崇尚生态文明的理念的这种人文之气，你在这种地方是待不住的，因为这个场和你是互斥的。

中国人开始富裕起来，就越来越多地讲风水，其实风水从科学角度

来说就人和自然如何才能做到和谐相处。在培田村这样的地方，对面是笔架山，门前是一条小溪，身后的自然环境则是层峦叠嶂、灌木丛生。我们在这种地方，用什么样的人文方式生存才能形成一种山水相融的气场，一种人文场能够与自然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就能够使它传承发扬，能够不断走得下去，使中华民族的文化不仅在中华这块土地上得以发扬，可以再怀化八荒走向海外走向世界，我们不仅应该成为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的一支，而且能够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而不是文化虚无主义，不是逐渐把乡土文化泯灭，这些事情要靠大家做。

刚才说到第三条感谢社会各界的朋友的时候，特殊强调了几位我觉得应该算对乡土文化复兴有贡献的朋友，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我来之前在香港，不仅给学校讲课，还在香港的一个基金会给他们工作人员讲了一次，告诉他们说我要到福建闽西山区有一个五百年客家文化、并且是有很多明清建筑和文化遗产的地方去召开一个生态文明的研讨会，并给村里的社区大学揭牌，那个基金会的总裁立刻就问我说：需不需要我们介入啊？我说当然需要啊。他说好那你先去，看看是不是有一个什么项目咱们可以结合起来做。

其实，海外的很多华人，对于我们积极保护文明传承，发扬文化传统的这种工作有极大的热情，这也表明我们不孤立。不是说大家大冷天跑到一个村里来冻一冻，然后就好像有点那种下乡光荣的感觉。我们得靠不断地把人心往中华民族文化崛起上引，才能真正活的像个完整意义的人。

这就要用一句老话，“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以今天的国际通行概念，则是社会上的中产阶级达到一定比重，就会认同生态文明。我这个说法是中性的。诚然，这也跟中央的一个重要判断有关，现在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温饱阶段，开始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什么叫小康？温饱阶段过去了，就意味着衣食足了，仓廪实了。大家也可能知道，当全世界三十多个国家闹粮荒的时候，中国说我们已经存了粮食年平均产量的近百分之四十。这就是仓廪实，中国有历史上最高的粮食库存。衣食足就得知荣辱，仓廪实更得知礼节。以前我们说，很多人手指缝里都还是黑泥儿，甚至是血丝呢，在其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干了很多“低手段获取高收益”的事情，那是以前。哪怕现在只是为了自我漂白，也要知礼节，要知荣辱。

所以，八荣八耻虽然是中央提出的，但你看看咱们培田的这个乡规

民约，也是早就写着八荣八耻。如果大家有功夫，满村转着看看对联，大部分对联都是教人荣辱，教人廉耻，教人礼义的。可见，今天讲八荣八耻是对我们几千年中华文明传统的归纳，如果各位在这儿找，能找到很多。

我想，将来要是有可能的话，我们可以把有关中国经验的国际培训，对中华文明传承的这种培训，搞点游学——应该多找到一些像培田村这种有文明传承的地方，带着国际上的学生学者来看看什么叫中华文明的乡土传承，省的他们不理解，动不动就把我们媒体反映“土豪”的“任性”用西方文明的那些概念去归纳概括，如果老搞文明冲突，就麻烦了。

（二）中国生态文明依存的基础是乡土社会

为了开好这个在村里举办的研讨会，我开始给邱建生他们发邮件的时候就说，不要用后殖民主义时期所形成的人文社会科学的那些狭窄的学科概念来套我们今天开会要讨论的主题。乡土文明复兴，这是个相对于激进发展主义的文化现象，不是一般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所谓人文学科认同的那个书斋概念。

我认为，要从大历史讲起，来看怎么才会形成培田古村落、古民居，和这种古村落古民居所保留的中华民族文明传承。

我昨天晚上一来，吴老先生就跟我讲几百年前怎么回事。那是明末，大家得了解明末怎么回事。要说清楚明末培田村是怎么形成的，得知道当年发生战乱，发生社会大危机时期，中原这个被多种不同力量当擦脚垫一样擦来擦去的地方，世家大族待不住了，尽管中原灌溉农业是村落文明传统的发祥地，但是，当发生社会动乱的时候，中原这个一马平川的地方是待不住的。

有一个例子，就是我刚才讲那个兰考县的何常委，她挂职的那个地方属于开封，如果往开封地下钻探，大概有一两百米都是这个城市的古迹，曾经有人想搞一个地下车，打一个大洞，弄一个伸向地下的电梯，让游客能看得见一层一层的文化沉积。中原这一代，中华文明的这种历史遗产非常丰富，但之所以是遗产，就因为被摧毁的次数太多。那谁家的传承被保留下来了呢？就是那些南迁的家族。培田村这儿就是南迁家族中的一支吴姓，因中原战乱，而南迁到山区，也因山区“十里不同风”，才能够得以传承。进来一趟不容易——不像现在高速公路修通了，铁路啊机场啊都有了，咱们连城县都有机场了，来这儿容易。当年可是

闽道难于蜀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闽道难，更难于蜀道。所以，天然条件的不足，使中原战乱时期迁入的家族得以保存。

既然天然不足，那家族怎么能成为一种传承呢？不仅仅只是说能种点庄稼，养点鸡养点猪，能吃饭就行，一定得是一种文明的传承，一定得是种维系家族的文化的教化。那就有这种山区的村，竟然能“十户一书院”，人文荟萃。亦即，要耕读传家，才能保得住。

1. 新农村建设和乡土社会对危机的化解。

说到这儿跳跃思维蒙太奇一下，你们注意，目前人们都在谈论，2011年的经济是复苏还是进入“二次探底”？需知，全球正在遭遇大危机，中国人这次要说算是幸免于难。2008年时发生在资本主义核心区华尔街，经济危机发生在核心区，因核心区面向全球转嫁而引发全球危机。全球危机之中，中国幸免于难的原因是什么？——我最近马上要完成一个课题报告，就是告诉大家，中国幸免于难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中央在2005年启动了新农村建设，2006年开始大规模向农村投资，当年是3800亿，5年后的现在是10000亿。头三年，2006年到2008年连续三年大约是两万亿投资下了乡。

2009年初，当经济危机打击沿海经济的时候，仅广东一省就上万家企业倒闭，几百万农民工失业。全国是两千五百万人失业。——美国现在是多少人失业呢？四百万人失业，它就受不了了。我上次去墨西哥，赶上墨西哥首都工人在绝食抗议，为啥呢，有两万多人失业。墨西哥那里开会，我是中国方面的代表，我讲的时候就说，你们街上两万多人失业，就交通阻断了，就绝食斗争了。你们知道中国多少人失业？他们猜着说：20万？我说你再猜，他们说200万？我说你还得再猜也猜不着，中国2500万人失业！啊，全都愣住了。然后我问，如果在墨西哥2500万人失业会怎么样？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没了。那你们听没听说中国有2500万人失业——中国就没了？他们说不可能，没听说。我说因为你们接受西方的媒体，却从来不谈我们中国正面的事情，我告诉你们，中国2500万失业的农民回到家乡，百分之七十几能够在家乡就业，这是统计数据。因为已经有两万亿左右的资金投到了“三农”，用于加强农村基本建设，每一万亿农村投资至少带动1500万就业，你们算算账，两万亿投资能带来3000万就业。沿海有2500万失业的，几乎全部被内地的基本建设吸纳。我们最近因为全球经济危机在加强国内投入，现在已经差不多向农村地区投入了三万多亿。光今年就得接近一万亿。连续向农村前所未有地大规模投资，带来了农民就近打工就业的机会。连离乡背井的

痛苦都不用有了。

借此提醒各位，包括媒体的朋友，要看看中国怎么能在全球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前“我自岿然不动”，难道不是因为加强了农村建设吗？由于这样的经验，我才说别“好了伤疤忘了疼”，这次全球危机，中国遭到打击但幸免于难，是因为危机爆发之前已经投了三年，恰是靠农村基本建设吸纳了那些从沿海工业和城市退出来的人。

再举个例子。

1997年发生东亚金融风暴，印度尼西亚因为农村是土地完全私有化的，进城打工的农民就是卖了地进城的。因此，发生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印度尼西亚的金融体系垮台，城市企业大规模倒闭，出现上百万打工者失业，其中百分之二十七失业者不能回乡，因为家里没地了，这些滞留在城市的人都变成了印度尼西亚那场大规模动乱的主力。当然，遭殃的主要是华人，店铺被抢，人被杀。一场大灾难。但是有谁看见我们2500万人失业出现大规模的灾难、社会混乱？

当然现在也出了不少事，我们来的一路上大家都在说最近各地各种各样的不同性质的群体性治安事件此起彼伏。好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摁下葫芦起了瓢，不断出事。处在危机打击之下，让社会完全稳定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人们，包括我们的宣传部门、文化部门等大量占有国家经费的政府部门，你们要善于比较，要把世界各国在经济危机全球经济危机打击之下出了哪些事，做个比较，才能把我们为什么还算是相对稳定的道理，告诉老百姓。人们才能明白基本事实，我们现在遭受的是全球经济危机打击，造成我们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失业，但是，我们目前却仍然是最稳定的地区，也仍然是经济恢复速度最快的地区。如果官方对我们怎么幸免于难的这些话都不讲，那可不就谣言满天飞吗？政府怎么能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呢？不能一天到晚说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是啊，这算是一种正面宣传，但还是要把困难告诉大家，要靠全民族的共同努力，不是几个干部努力就行了。

所以说，今天这种形势——我刚才为什么在说到第三个感谢，感谢社会各界的时候，要加两点，点赞几个人物，什么意思？是在这个危机挑战的时候——中央强调的这个社会参与的广泛度应该是越来越大才好。

这次邱建生张罗会议的时候，我说务必以我是连任两届的福建省政

府经济顾问的名义请几位领导来，咱们在这对对话、交交流，希望政府部门理解，我们是为稳定社会、稳定乡村在做贡献。

这方面我想往下再深说一点，请注意，这里面有很重要的意义：乡土社会，按照现在教育体系中讲的社会科学，它是一个矛盾产物。

我们如果单提溜出经济学来看农村——各位有很多学过经济学的认同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是配置资源并且使它达到最优的手段，那么对不起，市场条件下农村的资源要素就一定是流出的，农村经济的衰败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北京也好、厦门也好，大腕经济学家都会告诉你，农村经济衰败不可避免，不要去救，谁救谁是逆经济学规律。嗯，有谁反对这个经济规律呀？反对不了。

但是，如果农村经济衰败，国家发生大规模经济危机的时候，不就是下一个墨西哥吗？受得了受不了？我拿墨西哥说事，是因为墨西哥过去是“拉美一哥”，拉美经济的老大，在拉美国家中的经济实力最强，工业化程度最高，城市化程度最高，进城人口最多，现在，严重衰败；那为什么过去的一哥会衰败呢？是因为尽管你发达，但总不如美国发达吧，于是墨西哥和美国签订北美经济贸易区。随之，墨西哥的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劳动力，接近百分之四十流到美国去了，到美国打工，即使按美国的最低工价，每小时可是六块多美元呀，可你在墨西哥农村干什么能挣六块多一小时呢？挣不成。于是，墨西哥农村的劳动力投入它所参照的收益是什么呢？是美国每小时六块多钱的工资水平。于是乎墨西哥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在农村也不干活了，出现大面积的弃耕撂荒——大约百分之三十的土地撂荒——使墨西哥这个国家变成一个粮食进口国。过去是粮食出口国呀，是玉米的发祥地呀！结果他连玉米都要从美国进口。

我上次去帮他算了一笔账，我说，打工汇回墨西哥的收益是多少？然后再算他粮食进口数对应的外汇支出——几乎是二者相等，这也就是说，相当于里外白干了，那么多人出去打工，挣了那点钱，正好购买粮食，那还不如好好的把家里那点地种好，省下些买粮食钱。自由市场造成的结果，是墨西哥农业现在变成严重的进口依赖国，这个国家就没有食品安全可言。再加上如果把墨西哥的劳动力价格变成美国这个高价格，就意味着劳动力投入的机会成本大幅度的上升，这就麻烦了，再想搞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还搞得起吗？搞不起了，加工贸易型的制造业要靠劳动力的低价格竞争。

2. 以西方社会科学为主导的教育体系具有内生性矛盾。

我们说高校的社会学科的单一学科拿出来都有道理，理论逻辑成立。但如果放在危机条件下来考量，它本身就是一个造成危机的问题。所以美国现在无论怎么都要change，要改变——奥巴马上台的口号就是we can make change，我们能够改变——美国改变得了吗？改变不了，就是因为这种铁的经济规律，导致他很难再逆转回来。

如果我们把高校现在另外一个重要学科——政治学——也是从美国来的，拿来一用，会发现它和经济学的逻辑是对立的。为啥对立呢？因为当经济学说农村衰败，要素流出是必然规律，不要反对，那么政治学在讲什么呢？“要建立现代政治”。谁都知道现代政治在农村来建立成本极高，且农民支付不起，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我跑了四十几个国家做调查研究，不是像我们一般的高校学者去，打个“波音的”，住个五星级、开个国际会，就回家了，我是走哪都要搞调查研究的——我去四十多个发展中国家搞调查研究，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西方民主政治在农村建立农村治理是成功的。我不敢说失败，因为大家都还在勉力维持，那至少可以说它不成功。为什么呢？成本太高。

为啥政治学与经济学是个对立的逻辑呢？假如农村要素流出导致衰败是个必然的经济规律，那请问，要素流出之后农村还有收益吗？如果没有收益，当你非要建立现代政治的时候，巨大的制度成本难道要让这些没有收益的农村人去支付吗？当然不能，他们支付不起。所以，指望着靠现代政治运作方式——我从那儿征税，建立政府管理，通过财政二次分配来支撑这个现代治理——这套体系不成立。因为资源要素流出，因此农村是一个收益几乎为负的地区，也就支撑不了任何高成本的现代上层建筑。因此，西方经济学和西方政治学在农村发展上其两个逻辑是对立的。

如果我们照搬西方学科指导农村发展——无论是指导农村经济发展还是农村政治建设——客观看都是矛盾的。当我们把干部都送到这种高校去培训，学的是这种道理，能解决你在工作中的矛盾吗？解决不了。

因此你们看农村基层的负债问题极为严重——我不知道连城县乡村两级是什么情况，咱们这有市县级各级领导，你们比我了解情况。我刚刚了解的发达地区的情况可以告诉你们：如果说2006年取消农业税之前，乡镇这级的负债最高规模是四千万，那5年之后现在乡镇级的负债

最高规模是几个亿，十倍于税改之前。一个税改取消了乡镇和村级的收费权，就把农村过去根本无力支付治理成本的问题暴露出来。现在县一级——像何慧丽所在的河南兰考，县本级财政能够支撑县开支的多少？（何慧丽回答：五分之一）另外80%要靠上面各级转移支付和专项补贴。所以要在农村建立现代政治，80%补贴，不可能靠从农村获取的20%，其实从乡级以下获取的工商各税连20%都不到。县里面还有什么糖烟酒公司、百货公司、粮食局，还有点企业，还能收点税，到乡以下，收谁去？

我们如果盲目地、用西方的所谓具有普遍意义的——叫不叫普世价值，反正都可以——用这些东西强行在中国这个有七八亿人口的农村地区，去建立高成本的现代治理，其结果会是什么？会是乡村基层高负债。连发达地区的乡村级负债都高达几个亿，欠发达地区呢？我说不清楚，没有做调查研究，也许没那么严重。

因此，很多自上而下的红头文件，到县一级就下不去了，如果再到乡镇里面找到乡镇长、书记那里，去跟他们谈谈，怎么跟你干活？下乡总的有辆车吧——车没油；就算有油吧——没零部件，车坏了没钱修；到村里面调研——有一次我到贵州山区去下乡调研，这个地方县干部陪我去的时候说别着急，停个车，先买个烟酒，带点吃的，我问说你怎么还买东西下去呢？他说，到了村里不给村干部送两瓶酒，他就不带你——这是真事。当然，在福建肯定是好得多了，沿海发达省比较富。到了基层，乡村基层干部凭什么给你干事啊？问问我们村里面书记、村长，如果上面来人，除非省长来给面子，也许省长能给点钱，可一般的外来户，比如说我们这些老师下乡调研，你不给村干部带点好处，人家凭什么停下手里的活计陪你到户里面去做访问？如果人家不陪你——我们知道村级干部普通话还灵光一点——你进了户，一般都是方言啊，你听不懂啊。

按我们现在这套现代化治理办法来管制这个占人口70%左右的农村地区，未必就那么好。还得用我们自己的老办法。例如，吴氏家族在培田——请问过去难道是官府拿钱搞的这些书院？十户一书院，有这么多的民间教育，靠谁拿钱？靠村里的百姓啊。对呀。村民可以“点教”，如果谷子给少了，可以收了工以后来书院帮忙做工，而且我们这还有妇女教育，还有各种各样本地化多样化的乡土教育，靠谁呢？靠的是开发民力，有了开发民力就有了通过民间教育实现的启迪民智，于是就教学相长，就可持续发展。

为什么培田这个村保留有这么好的人文资源？无外乎是这样一套内生性的体制呀，它不是靠一个外来强加给你的体制，而是靠村社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种民间的文化，把它保留下来。

我再问一句，今天有什么权力把这些东西说成是落后的？

假如我们真的秉持生态文明理念，则这个生态文明本来的内涵就是多样性，乡村多样化的生存方式和多样化的自然界有机结合的人类文明，本来是天然合理的，这才叫生态文明，如果都要如城市那般整齐划一，就不叫生态文明，叫反生态。

打个比方，现在城里面搞小区建设，都是统一的草坪——任何一种大规模的单一植物都会导致反生态的直接影响。

我跟何慧丽说——她现在是我的博士后——交给她一个任务，请她在兰考县调研，当资本进入——资本是一个强势物种，兰考是个传统农业县——当一个强势物种、强势资本进入农业大县后，会对当地的社会、人文、生态造成什么影响？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事情，也是个国际性的研究，我们没有正确错误的价值评价，只是要客观分析一下。

刚才说到现代高校接受的这套西方社会科学，内生性地就具有对抗性矛盾，不是一个利于和谐社会的社会科学，如果把不同学科放一块，学科和学科的逻辑是打架的。麻烦在于我们现在高等教育中、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中，很少有交叉学科的发展余地。

我这个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是我们学校管科研的副校长当院长，我当执行院长，为什么安排我当执行院长呢？那是因为我这人脑子里面没有单一学科的理论逻辑对我的研究具有统治性。为啥呢？就因为我过去不在高校，而在中央机关的政策部门，中央有什么政策需要，我们就去搞什么方面的调研。所以过去我脑子里面没有哪个单一学科逻辑对错的印象。

在座的农口的人大都知道，我从80年代就搞农村政策，当时是在中央书记处，我们这帮中青年满中国的跑调查研究，那时候下乡，如果到这地方来，大概得照着一个礼拜以上，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的条件，那时也没有地方干部陪同，我们到哪去都是买张车票自己去，到了乡里借辆自行车蹬着就上村里了。因为没有现在这些迎来送往的事，所以那个年代的农村政策调研相对灵活，中央得到的情况也比较真实，主要是因为有一批人在干这些事，也因为我们在干这些事的时候，脑袋里没有这

些所谓现代学科理论的限制，所以才能够比较实事求是地体现“活的灵魂”。

因为已经有几十年政策研究的经验之后，我才进入高校参与到学科建设之中。这时候，我才有点反思精神，才发现学科之间的逻辑是矛盾的，因此我们才要搞交叉学科、才要搞乡村建设中心。

2004年，我要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乡村建设中心的时候，各个部处的领导干部都不理解，说温老师你要干嘛？应该叫乡村建设研究中心啊，我回答说干嘛一定要叫研究中心？我就要搞一个动员知识分子下乡跟农民结合起来搞活动的中心，不叫研究中心行不行？他们说这没法纳入“学科序列”——咱们福建省教育厅长在这儿，一听就明白了——你说把这个中心放到哪去呢？我说学校请我来的不是吗?既然把我做人才引进，那我没有个人要求，只有一个要求——建立乡村建设中心。后来，校长答应了，所以各个部处的同事只好给我开绿灯，单独搞一个“特区”。我现在挂名的这个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设立之初也被学校定义为学术“特区”，可以不受学科限制，主要搞交叉学科。

当然，我到高校工作也是受到各个学科带头人的不解——但我理解他们，因为人家是一个俱乐部的首脑——搞一个学科，相当于搞一个俱乐部，有内在的分配制度，乱闯怎么行呢？我说：你们就拿我当野猪，你这个菜园里种萝卜，那个菜园里种白菜，我这野猪闯进来了，那就萝卜白菜都通吃——比如说经济学是白菜，政治学是萝卜，萝卜白菜我都吃了，说难听点，虽然拉出来的都是猪屎，也可以发生沼气，沼液沼渣做有机肥。

按现在学科化的体系来搞教育，是要搞死的。黄宗智在美国是超级教授，我从一开始当院长就把他请来了，他现在七十岁了，还在干呢。他的第一次课就是告诉大家——美国的社会科学，你们现在向它看齐，但它是一个死了的学科。如果我们中国的社会科学按照美国来搞，一定搞死。

我在大学教育中告诉大家，农业经济学要向美国学？可美国的农业经济学是一个衰败的、不断关闭的走向，美国现在还剩几个农经系？哪还像我们现在有几十个农林大学，都没有衰落，可美国大学的农业经济系几乎都关闭了、合并了，为啥呢？对不起，它的农业占GDP比重只有百分之二点几，从业人员占比也很低，把美国全部从事实质经济的——我们叫physical economy——加一块儿，总共才只有17%。从事工农业

生产的只有17%，它的GDP的85%是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从业占比多少呢？83%。

这么算下来，为啥中国高校毕业生找工作这么困难，我们按美国的高校制度来安排中国的高校教育，人家是百分之八十几的服务业，你百分之四十几是制造业，因此我们制造业需要人，高校毕业生不去，服务业占比小，高校毕业了就业很困难。所以，只要是按照和你结构不同的那种美国教育去安排我们的教育，那就麻烦了。

那为啥今天我们走回到乡村？因为看到乡村需要大量、各种各样的人才。

比如村里的老同志今天早上说，咱这个培田村，连广东、广西，甚至连陕西、山西、北京各个高校都往咱们这儿跑，为啥呢？

培田不言，下自成蹊。培田并不用出去自己说话，大家就往这里跑！

如果是搞建筑的，你来看看中国几百年的建筑是怎么回事；如果是搞美术的，你来看看我们这山清水秀，有多少美术题材；如果搞人文的，你来看看什么叫耕读传家的人文传承；搞社会学的你来看看我们这三世祖的家族是怎么结构社会的；还有搞治理的，你来看看我们乡村治理，古代村社制度为什么没有官府一分钱，治理得如此井井有条；搞环保的就来看看我们怎么就利用自然的水系形成的循环性的环保，立体式环保，它怎么回事……

无论搞什么学科的，在这都有你研究的题材，都有滋养你学科的题材。

（三）乡土文化复兴的第一个条件（乡土社会作为承载危机的基础）

在全球经济危机打击下我们是怎么承载危机代价的？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有文化底蕴，有乡土社会作为承载危机的基础。

这样看，中国加强新农村建设就不仅仅是向农民给予补偿。

胡锦涛总书记在2005年提出新农村建设之前，先是在四川视察的时候谈的两个“反哺”，然后就有多个部委，为了贯彻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两个“反哺”开展工作了。这次是由中央政策研究室提出新农村建设，接受林毅夫的意见。在座的很多城里人知道林毅夫在世界银行当高级副行

长，80年代从美国留学回来，跟我们一块搞农村调查，最后成了世界银行副行长——谁说搞农村调查没出息？他算是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传人，但他研究农业合作社经济，回国干了几年农村调查，又到北大当教授。林毅夫在1999年就提出中央应该及时地推进新农村建设，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制造业出现过剩。不光是他这样说；1998年马洪——大家可能知道的少啊，马洪是中央过去老一辈的经济政策智囊、老一辈的经济学家，他当年是国务院发展中心的主任——马洪在1998年就给中央报告，说我们现在出现“生产过剩”了。林毅夫1999年说我们现在不是一般的过剩，是双重过剩。于是建议中央发行国债搞新农村建设。

不过，他们刚提的时候，大家还没什么反应，到2001年12月，林毅夫是当面向总书记提出的，我在场，我是跟总书记讲三农问题，他是跟总书记讲新农村建设。从2002年以后，“三农”问题变成中央重中之重，再过几年，到2005年新农村建设变成国家战略。

我们80年代参与搞农村调查的这批人没有吃干饭，在中国转型的关键时期发挥了一点作用，就有了大规模向农村投入、夯实农村基础、应对全球经济危机这样重大的战略转变。没有这些，当面中国对全球经济危机打击的时候，难道能过幸免于难吗？

所以说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就以为现在只要去加强城市化，按照西方那套工业化＋城市化的模式走，我们就无往而不胜。错了！恰恰是因为先走了一步，先大规模投入搞了新农村建设，我们才能在全球经济危机打击之下迅速复苏，至今仍是世界最稳定、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

当然，现在社会上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现象，大家很担忧，但是，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只要农村仍然是软着陆载体，就能够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农村是稳定的基础。

这是我向各位汇报的第一个要点。

稳定是个大局。但在经济危机打击之下怎么稳定？就要靠加强农村建设。其中最不可忽视的一块，是基础中的基础，就是我们乡土社会的人文传承。乡土文化是我们生态文明多样性的文化基础，依托这个文化基础，能够最低成本地形成乡土社会的良性治理。

（三）培田村的故事

刚才说：培田不言，下自成蹊。接着要说的是我们乡村建设志愿者

与培田村结合的故事。

1. 培田客家社区大学的简要背景。

我们在这里办社区大学，不是一个忽发奇想的事。各位可能不知道，我们2007年在海南办了第一个社区大学，也是办在村里，那个地方叫石屋村。那是邱建生独立操作的第一个项目。接着，邱建生回到福建又在福前茶场——安溪县福前镇，也是出茶叶的地方办起来农民文化中心，搞农民的文化活动；那是在镇上，但那镇的人口也是村的规模。

所以，在福建是先有福前，后有培田。这是一个乡村建设传承的过程。

如果说办在农村的“社区大学”，听刚才教育部门的领导讲，培田村是福建省内的第一家，这件事情是越办越红火。

我刚才跟省人大的领导讲，海南儋州市石屋村办的中国大陆第一家社区大学现在已经是可持续运转了。我们没多少钱，当时给了邱建生两万块钱吧，现在已经实现可持续运转了，当然主要得靠各界的朋友捐助，靠大家投入自己的能力，最后形成了可持续运转，现在那里的地方政府每年把十几期儋州市涉农培训放在石屋村社区大学，因为他已经有了教学设备，有教室、住宿条件，有食堂，政府省了40%培训经费，如果放在城里宾馆搞培训，那得花多少钱？放在村里面，还能结合做点劳动。一般情况下，政府搞的官方培训很多社会人士还未必愿意参加，可是我们到村里搞培训，社会人士就愿意来——宁可不要钱，他也要表示自己与农民主动结合的这种人文精神、公益精神。这就节省很多成本。

总之，我们2007年在海南创办的中国大陆第一个社区大学已经成功了，主要经验就是本地化（localization）。发掘乡土知识、乡土文化，然后结合了中央国家政策，结合了本地政府的农村发展规划要求，就变成一个“三结合的”一种内容的培训——既有农民中的骨干来参加培训，又有进步知识分子，还有社会力量——多方面结合形成了“社会广泛参与”。这恰恰是中央2006年推进新农村建设那个一号文件所强调的内容，通过社区大学把这些政策都落实了。

有些朋友当时可能不太理解，老是觉得有点不安。有人问我，你们组织这么多学生下乡跟农民结合，这是要干嘛？

其实老农口都理解，只要80年代干过农村政策的人也都知道，这批中青年当时搞农村政策的时候，就是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我当时一开始

工作就是在联络室，我的顶头上司王岐山是联络室副主任，他具体分管我们那个处，当时在忙的就是广泛动员各高校的教师学生参与农村调查，我的具体任务就是把各高校农村调查材料汇总，然后形成报告，作为中央政策参考。那时候农口大老板是杜润生，也是杜老让我们动员知识分子下乡跟农民结合，搞农村试验区，他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如果能动员一千个、一万个知识分子下乡，农村改革试验区就算成功啦。杜老当年对我们做的这种教育现在还记得呢。只不过，后来大家都慢慢官化了，或是学究化了，我呢，算是我们这批人中间比较笨的一个，还身体力行地坚持着那时的做法。恐怕要到跑不动为止。

搞农村调研，还是得坚持下乡，还是得坚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农村调研工作，我还得继续执行杜老当年给我们的指示，坚持八十年代改革时期中青年的好传统。

所以，乡村文化的复兴和党中央提出的生态文明其实是高度一致的。

刚才讲的第一部分内容提到，乡村建设真正体现出作用是在什么时候？就是在这次全球大危机体现出来。只有中国，是靠乡村建设作为基础，能够有效的应对最大的全球经济危机打击。

这次危机正在向发达国家扩散。看西班牙，20%的失业率；这次希腊闹事，已经到了本国的催泪弹全打光，要向其他国家去借催泪弹这种地步！为啥呢，就是因为没有基础。没有危机软着陆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危机到来的时候才真的“出水才看两腿泥”！这个国家干的怎么样？不是靠平时怎么吹。今天为啥不行呢？希腊“自毁”了过去的经济基础。人家早就不靠农业了，那过去靠什么呢？造船业和航运业。但，这些年这两大产业全部转移出去了，就剩下一个产业——旅游业。旅游业还特高傲，长期维持西方冷战时期的双重标准，对港台免签，就不对大陆华人开放，都21世纪了，华人想要上希腊旅游一趟，还要查你多少存款，富人才让你去。麻烦大了。我到希腊就跟他们说，只要别这么看不起大陆华人，把签证放开一点，这国家经济就起来了。谁不想去看看古希腊的文明遗产啊，对吗？我们中国人现在有三亿中产阶级，哪怕其中有10%、3000万上这来看看，你就富了。我们中国人怎么救的香港、台湾呢？不就是那里放开大陆客去旅游了嘛？台湾经济、香港经济就起来了。这次李克强总理到西班牙又说，我们有13.4亿中国人，不要多，有个10%上西班牙来旅游，你就富了。欧盟因为它是殖民地宗主国为主形成的，看不起我们这些过去的所谓被殖民地的国家。比如，我是中国被

税务部门监控的高收入户，可我要上欧盟开个会，多要几天签证，我自费去看看，行不行？多一天都不给签。你去开会，邀请函写的哪天开始到哪天结束，他就给你这么短时间。

欧洲经济萧条怪谁呀？是因为你太自大、太缺乏制度创新能力、太那个——咱也不好说他太什么了。所以现在欧洲那儿的危机正在发酵，而在我们这，大家都说我们已经度过了危机。

中国今年仍然会保持比较好的增长。很多人不知道我们怎么度过危机，不知道那是靠加强新农村建设。我现在为什么被很多海外研究机构、高校请去讲学，就是因为我可以讲得清楚。他们却搞不明白：美国超量发行货币却是长期通缩，中国也大量增发货币，怎么控制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幅员辽阔的农村地区，可供投资。投出去形成的都是实质资产。

比如说投到培田了，将来培田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乡村文化旅游村，所有的投入，就会成为实质资产，会长期产生收益。

我对很多企业界的朋友谈这个道理，现在到贫困地区做的很多投入都有长期回报。比如广西巴马，地处十万大山贫困地区，现在进去了多少亿投资？接近50亿。就是因为巴马的长寿牌打出来了。媒体都说巴马有很多长寿老人，于是乎，巴马的空气值钱了，水值钱了，土值钱了，巴马的人文环境也都值钱了。各地的病人大家都一股脑去了巴马。何况现在的人有钱了都想长寿了。于是乎，几十亿民间投资进巴马。干嘛了？据说巴马这个水好，喝巴马这的水就叫洗肠胃，呼吸巴马这的空气叫洗肺。呵，大家都在城里，从卫星拍的航片看，所有的工业化城市地区，全部是严重污染，深褐色的。西南农村地区还是绿色的、浅绿色的，也就是空气好。最好的是云贵高原、青藏高原，然后就是海南岛。淡绿、发黄的那部分是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发着淡黄色，已经较有污染了。整个沿海地区则全部是深褐色的。最不能待的地方是哪？对不起，这五大人口过千万的城市，主要是直辖市——上海第一不能待，天津第二不能待，北京第三，深圳第四，重庆第五；都是重度污染城市。

2. 乡土文化复兴与中产阶级逆城市化。

中国在加快城市化的同时期，出现了第二波“去城市化”现象，注或者叫做新兴中产阶级的逆城市化现象。

为什么这个生态农业、乡土文化这么重要？刚才说到不要用一般西

方学科的视角来看我们的生态文明、乡土文化，不要弄点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来搞生态文明。我们为什么强调乡土文化复兴？在于条件具备。啥条件呢？

第一个条件，工业化已经把人逼的找不着什么水能喝、什么饭能吃。到咱这村里，今天早晨村里人说，我们这都是走地鸡。这走地鸡什么时候成“题材”了？那鸡本来就满地走。为啥现在大家拿它当回事？诚然，我早就很多年不吃鸡了啊。告诉各位，因为搞农业项目研究，我看了各地太多的农业现代化项目，看完一个、不吃一个。比如：那个工厂养鳖，讲究一立方米水体养几十只鳖，那还是鳖吗？养鸡，讲究要四十几天出一批鸡，那还是鸡吗？养鸭子，三十几天出一批鸭子，那还是鸭子吗？这么个干法，那不都是激素催的么？这激素一催，你能不得病吗？你本来就在一个重度污染的空气之中，再加上点重金属、抗生素、激素，都吃到你身体里，就把各种各样的病全催出来了。所以城里人不安全。

尽管大城市高楼大厦，但如果是上海人，看不见天啊，周围全是水泥的森林，所行走的是柏油的沙漠；喝的是不安全的水，吃的是不安全的饭，住的还是一个最不安全的地方——上海是建在滩涂上啊，放了这么多亿吨的钢筋水泥在一个滩涂上，安全吗？重庆是陡坡，这些陡坡放了这么多的水泥，安全吗？稍微来个地震晃一晃呢？

中国已经形成了中产阶级群体。比如，像我这种人就算是高收入户啦，再加上老是外边讲学，就更是“高收入”。另外，原来我太太买了一套房子，学校引进人才又奖了我一套平价的房子，那我家的房子价值就已经是几百万元资产了。算是典型的城市中产阶级。既然我算高收入户，能在高污染的北京待着吗？不能。

中产阶级们的心态是什么呢？第一，要求安全。安全上哪找？城里没有，要到乡村去找安全的地方。

这个安全需求包含有一种长期安全和短期安全。所谓长期安全——我告诉你们中国有句老话，“小乱避城，大乱避乡”。一旦要真碰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碰上“南京大屠杀”、“广岛核爆”怎么办？培田村的吴家，历史上就是因为这种战乱，逃避到咱们培田山里来，建立了这个村落。

我没敢往这方面多说。但是，我们已经在和平环境中生长了半个多世纪，每到逢年过节，每到进庙烧香，我都得先祈福和平。我们这代人

没赶上战争，全靠老天爷保佑！当前，先别内乱。因此，我对很多主张激进变革的朋友老是笑眯眯的告诉他说，你先烧高香吧，这辈子没赶上打仗，先别急着自己搞乱自己。没赶上打仗，十几亿人能进入产业资本扩张阶段，乃是人类在资本主义文明阶段的历史奇迹！应该知道，大国产业资本进入扩张阶段，难道世界不打仗吗？西方人因为进入产业资本扩张，三十年里打了两次大战，加上局部战争无数，死人少说得上亿吧。中国进入产业资本扩张这三十年，不打仗吗？

可以相信我们不打仗，因为我们是亚洲原住民文明，不崇尚战争，那如果是西方人，试试，不打仗见鬼。那在根上就是打仗的民族，我们在根上就是农耕文明，安土重迁。

两种文化根本不同的原因很客观，华夏文明几千年都是灌溉农业，村里集资或村民投劳打了井、修了渠，还往哪跑？跑不了啊。氏族聚居型社区就得子子孙孙愚公移山，又排洪又引水，对不对？所以一旦氏族村社的灌溉渠排洪渠都修好了，可不就安土重迁了吗？这是毛病呢还是优点呢？按西方社会科学来算就是缺点，不自由不开放嘛，据说这是稳态结构，严重障碍中国向资本主义进步。可是按东方文明来说，出去折腾什么呀！学西方那种殖民化？所以到今天我们都讲“不折腾”，这话对。我们现在麻烦就在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是一个西化的折腾教育，就麻烦了。

所以，我一方面希望社会各界都能参与乡土文化复兴。但是另一方面请注意，当中产阶级下乡的时候，当我们地方政府和农民面对这种逆城市化趋势的时候，既要了解城市中产阶级群体的消费特点，又要构建适应这种分散的中小投资者的制度条件。

中产阶级带来了乡土社会经济的繁荣条件——因为大家来不是空手白来的，大都带点资源来，至少兜里都带点钱对吗？而且不在乎花钱，因为城里的东西奇贵还不安全。到乡下来那真是货真价实。就看刚才院子里边走着的这只鸡，那就是货真价实的。到城里边吃的那叫“西装鸡”，饲料催出来的未必敢吃。在这吃菜，就敢生吃。当年我父母问我，你搞农业的，现在什么能吃？我原来还告他们说，那个肥厚的绿叶菜，尽量不吃；吃瓜类和果类菜。为啥呢？瓜果类菜相对来讲，至少可以洗或去皮，农药残留不是那么严重。绿叶类菜呢，富含亚硝酸盐，容易致癌。他们就主要吃瓜果类了。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跟她们说，不行了，瓜果类菜也得少吃了，那吃什么呢？吃根茎类菜吧，因为根茎类菜毕竟埋在土下，对吧？又过了些年，我说，这又不行了，因为土壤已经

毒化了。我们这些人看资料多啊，全国土壤污染图一出来，就发现大城市郊区、沿海地区的土壤大部分属于重度污染地区。越是贫困地区，土壤污染越低。

这次我那个搞有机农场的学生没来——现在全国高校学生中被媒体报道最多的，就是我那个博士生石嫣，已经一百多家媒体报道了。在座的媒体朋友知道，她就是我们在北京郊区搞的这个小毛驴市民农园的总经理，典型的市民下乡搞都市农业。别以为这是稀罕事。我最近准备帮着浙江把这件事推成国际化。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上海市民跑到浙西山区去承包农宅和菜地，然后把自己家的老人送来，平时就住在浙江农村。浙江现在山区富裕程度远快于平原地区，大量市民资金流入山区，基本都是城市中产阶级已经开始的逆城市化取向的表现。虽然，市民们带来的几十亿的资金进浙江山区。可怎么进去的呢？零零散散进来的。根本不是过去各地招商引资的大宗的投资。现在的浙江，农民自己把山区搞得是山清水秀，率先进入生态化嘛，政府把高污染企业迁出，维护农村和山区的景观，于是山也值钱，山区空气也值钱，山间溪水也值钱，农家有机产品也值钱了，农民建的农家屋都值钱了。上海人一包就包个半层楼——农民盖的三层小楼，半层楼被上海人包了，他随时来，平时户主给维护着就行了；然后，你们房前屋后的这个半亩菜园市民也来包了，必须做到绝对不许使化肥农药。楼层要干干净净的，菜园就只用农家肥，所有费用市民来出。这事能干不能干？大多数能干。为啥呢？市民要保家里老人安全、保子女安全。还得保后代生的孩子别畸形、别先天性疾病呀。那怎么才能保得住？得在乡下找一块干净的地儿，好山好水好土，村里人还得厚道，还得有那种耕读传家的人文传承。我刚才出门时把门锁上，这是城里人的习惯；可当地人说，你不用锁门，我们这没人偷东西。农村很多地方，如果民风真的形成了，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所以，我强调生态文明其实是因为这个社会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去年年初，中国社科院不是公布一个报告吗？说中国现在中产阶级已经达到3.1亿了。我们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国家。美国全国人口3亿，中产阶级70%，是2.1亿中产阶级，比中国少1个亿。老欧盟十五国3.4亿人，中产阶级占70%，才2.4亿，也比我们少8000万。所以中国现在拥有世界最大中产阶级人群。

表现在哪里呢？全球奢侈品消费，中国排第一。它的消费特点上来

了。豪华旅游，中国也排第一。这就有点像当年的日本，在80年代致富以后，特别是八五年“广场协议”日元升值了百分之一百以上，日元一值钱，就像现在人民币不断升值一样，日本人就大量出国旅游买东西，满世界都是日本人。现在开始轮到中国人，最近在欧洲去转转，到处都是中国人，哇啦哇啦大嗓门说话。

同理，欧洲国家在中产阶级崛起的时候，出现了逆城市化带动的市民农业趋向。搞农业的同志们注意，这可不再是农民为主体的农业，我们过去的政策就是怎么让农民好好发展农业，可是欧洲农业60%的农场是市民经营，市民拿钱做农业投资。市民在乎农业成本吗？当然也在乎，但是不太像农民那么在乎。为了保证生存安全，就得要百分之百地做有机农业生产。因此，现在欧盟国家的农业产品几乎全面是生态化、有机的，至少是绿色的。为什么？是因为市民农业的目的不是要产量，而是要质量，要安全。所以，60%以上的市民经营农业，就带来了欧盟农业的绿色化，对此我们不理解啊。我们农口的老同志老是在叫板，为啥欧盟不对中国放开农产品市场？为什么不让我们中国的农产品进入？对不起，因为你是不安全食品！我们批评说欧盟设置技术壁垒。对不起，人家其实真实的壁垒是社会壁垒，占比60%的市民农场主不投赞成票，政府就不同意进口中国农业产品，因为市民认为你们大量化肥农药生产的东西是有毒害的，欧盟这儿是市民拿钱搞农业。众所周知，欧洲和日韩的中产阶级可以忍受食品的高成本，只要安全。少数低收入者则靠领取政府补贴的食品券。

所以，当中产阶级成为中国引领消费趋势的主流人群的时候，要求消费的农产品第一条是质量安全性。

总体看，如果我们能够在农民骨干培训中有效地注入绿色安全的概念、生态农业的概念，那将来我们社区大学的本地化知识传承，就不会和城里的制式教育体系一样。我们要结合农村的实际，结合社会结构的新变化。这就要有我们的培训方法。

什么叫社区大学、社区教育？就是内涵性地体现生态文明多样性和包容性的一种终身教育。为此，就要和十里不同风的、各个不同的地方的资源条件结合。就得教育好我们培田农民怎么向外来的人介绍我这的好山好水，参与社区教育的青年人得配合培田村把自己当地的、社区特色文化的、周围自然的各种资源好好地发掘出来，变成乡土教育的教材和内容，培田村的社区教育才有特点，才能向外来人介绍客家村社的优势在哪，而不是用大而化之的那些说法——那是不行的。

社区教育一定是和社区资源、乡土文化的开掘，和本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密切结合的，这才能跟村民的需求对接得上。如果我们讲的都是千篇一律，给城里人讲什么，到乡下还讲什么，那城里人是不愿意来的——他到这来没有意思。城里人要消费的恰是乡村的特殊性，就要看的是十里不同风，不要看整齐划一。

例如，我刚才在路上碰见一个农民，我问：这条路谁修的？他说是政府干的这个事，可干的跟我们培田路根本不一样；我问：培田原来是什么路？他答：我们培田路都是鹅卵石路。看你修成这种水泥石板路，老百姓都不满意——你投了钱，他也不满意。当然政府搞基建项目都得招标，得符合标准和规划要求，那些是绕不开的法律程序。到验收项目的时候都说我这个怎么好，但是老百姓说我本来就这不是这样的。

为啥村里的老鹅卵石路好、为啥老百姓不愿意搞成这样统一的水泥路面？因为它生态化，下雨能够渗水，不至于使路面下的土壤沙化。一旦搞成全水泥的，道路下面就沙化，因为它不渗水。还有，本村工匠对古建筑能够长期进行有效维护，却不符合近年来确立的政府招投标必须符合法律程序的规定。合法的结果是政府只能发包给城里的建筑公司，却不利于培田村古建筑的维护。所以，越是统一照搬符合城里要求的规章制度，越是自毁多样性的乡村文化。我们当地的很多传统经验，类似本地工匠积累的很多有效维护古建筑的经验，没有被发掘出来。所以我们才说，随着中产阶级群体的壮大，对乡土文化的要求是多样化，他下乡的消费需求也是多样化的，并且他是愿意为亲身体验这种乡土社会多样性付钱的——只要乡村能保证差异化的特性。

提请官方注意：越把乡村搞成千篇一律，就越没有被中产阶级消费的可能。而恰恰是当前的这个社会结构的变化，造成是新兴中产阶级引领消费潮流，不是别的阶层。这就是客观事实。

所以，搞乡土文化复兴，社会条件具备。还不仅是食品安全，中产阶级消费需求中含量很大的是文化消费。也因此，假如我们这一代没有这种复兴乡土社区多样性文化的努力，将不可能在新的强调消费拉动经济的一个时期到来的时候，有这种面对新挑战的能力。

（四）乡村建设的两个要点总结：意义与方向

今天抛开高校教科书的那些教条化的内容，讲了我们乡村建设面对的实际需求。归纳起来主要是两个内容。

第一，我们作为亚洲原住民人口最多的国家，与殖民地国家性质不同。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打击的经验表明，还得靠加强农村这个软着陆的基础。

第二，学会应对中产阶级正在成为一个引领消费潮流的阶级的客观需求。这个群体会越来越大——亚洲银行分析中国的中产阶级现在就是八个亿，也有分析认为中国会在2015年以后达到7亿中产阶级人口——当中产阶级成为社会消费的一个主导群体的时候，它的要求一定是多样化的。因为中产阶级是一个群体结构非常复杂、并且变动性极强的新兴阶级。国内提法还不是阶级，可以叫做中产人群，因为西方讲“中产阶级”，国内也把它错译成了“阶级”。其实呢，是中产群体而非具有自觉性的阶级。所以，如果从这个变化来说，我们今天讲生态文明和乡村文化的多样性，恰恰是迎合了中国正在发生的社会结构变化。

第三节　城乡一体化与新型城镇化注

（一）宏观背景：生产过剩与投资拉动

我们先根据一个政治经济学常识来说，中国当前所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遭遇了资本主义的一般内生性矛盾。而当务之急就是如何延缓爆发。

什么叫做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呢？那就是生产过剩。

从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应该知道，西方在1929—1933年爆发了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过剩危机，在这个危机打击之下，大多数坚持自由市场制度的西方工业化国家都垮掉了，在西方工业文明时代，只有能够以国家直接干预的手段来把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基本建设的国家，才维持住了，没有失败。

具体是哪些国家呢？那主要是罗斯福新政条件下的美国，他把美国庞大的过剩生产能力通过政府干预直接转向了内陆基本建设，因此罗斯福带领着美国，尽管也遭受了危机的打击但是也维持住了；另外一个，欧洲的德国，尽管它的逆周期调节经验在战后被成王败寇的意识形态差不多完全掩盖了，但大家应该知道德国在战前，也是将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了内陆的基本建设，建立了当时欧洲第一套全国范围内的高速公路

系统，因此，维持住了自己的工业化生产能力，没有衰败；再有就是苏联，前苏联尚在工业化的发展时期，还未表现为生产过剩。

如果看整个西方（包括苏联在内），主要有三个国家：美国的罗斯福新政、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德国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三个国家有个共同点：即以国家干预为手段来把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本国内陆建设。并且，最后是这三个国家打在一块，两个联手打败了一个，形成了战后双寡头垄断的地缘政治。

诚然，这就是西方当年的实际情况。至于它在战后的冷战时期被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怎样包装，以及如何用所谓服务于冷战的社会科学理论来支撑这些西方意识形态，那只是西方知识分子们的无奈和大众的无聊。

历史上真实的过程其实很简单明了：这三个使用了国家直接干预为主要手段的国家，化解了在资本主义阶段必然发生的一般内生性矛盾——生产过剩这个危机的打击，维持住了工业化时代的生产能力，最后这三个国家打在一块，形成一个国家之间直接用战争手段打出来的结果：双寡头垄断。美苏双寡头各自建立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服务性的社会科学系统，就有了今天在理论界争论不休的、两大对立的理论体系。

如果各位至今仍然沉溺在这两大对立的理论体系中，那恐怕这辈子就算交代了。为什么呢？思想很难再超脱了。我没义务做批评，只是希望年轻人还有思想创新的能力。

长话短说，中国人什么时候遭遇了类似的生产过剩大危机呢？是在90年代。1997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导致中国在1998年出现生产过剩这个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

这个生产过剩危机的发生不是我说的，如果只是我说的，大家可能会更愿意质疑。当年是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家，马洪先生和陆百甫先生，这两位分别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副主任。他们写了一份报告及时提醒中央，我们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导致外需下降的情况下进入了相对生产过剩。

此外，中青年经济学家也有提出，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90年代中国加快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这个喜悦之中，尚不及反思的时候，大“海龟”林毅夫，芝加哥学派在中国的传人，却不受本学派思想的约束，带领当时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正式写了报告，明确要求中央及时借鉴罗

斯福新政——既然遭遇生产过剩，唯一可兹借鉴的只有罗斯福新政，并且也是在这个政策建议中，林毅夫明确指出：西方遭遇生产过剩最终走向二次大战，我们遭遇生产过剩不能这么干，只能把过剩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基本建设。所以林毅夫接着在1999年在国内最早提出，只有以国债投资于新农村建设，我们才能缓解“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这是1999年，比2005年中央政府提出新农村建设的国家战略早了6年。

那时我在政策部门工作，这两个材料我都看到了。但，如果仅是经济学家提出政策建议，那还不足以使中国发生战略决策的转变。中央领导人中还有重量级人物，当时政治局常委、主管外经外贸工作的李岚清副总理，他在1998年1月6号直接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了封信说，我们正在加快全球化，现在是外需拉动GDP为主，1997年中国的进出口占GDP的总值高达70%以上，已经属于世界上“经济对外依存率”最高的国家（各位，别说我们没有玩全球化，那时候已经过度全球化，反过来把我们玩了！什么结果呢？对外依存度最高却陡然遭遇外需大幅度下降），当时1997年外需对GDP贡献超过40%，但1998年随着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可能下降到对GDP增长的贡献连百分20%都不到，所以建议中央紧急采取对策。这才有江泽民直接批复给朱镕基，朱镕基紧急组织一批当时财经部门的司局长、处长们，几十人做方案，紧急启动应对性战略调整，1998年3月从外需拉动直接调整为投资拉动增长。

这就是中国特色，教科书上都没有。因此一般人很难知道，中国真正的战略调整是怎么回事。

中国与西方体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这个国家在发生了生产过剩这种典型的内生性危机的时候，无论按照马克思主义把它叫成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还是其他什么，中国人的做法是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按照林毅夫的观点我们主要借鉴的是罗斯福新政，转向内陆基本建设，所以就有了从1998年开始的针对生产过剩而形成的投资拉动增长。

那，这个战略调整，恰恰使中国经济在改革以来这三十年中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三驾马车分别驾辕：

80年代是典型的内需拉动，那时候买什么都紧张，刚刚出现消费品升级换代，从过去我们的父辈旧“三大件”——那时候如果没有缝纫机手表自行车，就没法结婚——转换为新的“三大件”，没彩电冰箱洗衣机这三新大件也甭想结婚。现在就更麻烦了，没房子、没汽车也不好找媳妇。总之三大件升级了两次，第一次是传统的三大件升向第二个家电为

主的三大件的时候，出现了内需拉动的80年代，也导致物价上涨。

而在90年代，内需大幅度下降，随之转向外需为主。为什么内需会大幅度下降呢？因为，90年代初期出现了财政、金融、外汇三大赤字的危机，危机导致了政策调整，一方面农民负担过重，另一方面城市国企职工开始大规模下岗，因为企业倒闭，抓大放小嘛。这个年代出现4500万国企职工下岗。于是，工人农民都负担过重、下岗待业，导致内需上不去，全面转向外需拉动。

正好80年代是内需、90年代是外需拉动。到外需受阻的时候就是1998年，随之转向投资拉动。所以中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可以说，每一个十年换一匹马，换一个驾辕的。大家都说内需应该驾辕，外需和投资应该是拉套的，但我们现在变成投资驾辕，内外需变成拉套的。

这么看下来，当前为什么要走城镇化道路？就在于在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之下，有个很内在的趋势难以扭转，必须用不断扩大的投资来掩盖住以前形成的矛盾，甚至可以说政策界用不断投资形成的长期过剩掩盖短期过剩，这就导致宏观调控极其困难。

记得我到学校来之前，赶上2003年换届，当时国务院领导人召开座谈会，问计于经济学家，说以前我们是靠国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主要是说前一届政府），可我们不能老是寅吃卯粮啊！由此，能不能从我做起，改除国债依赖！至少，从我做起，减少国债依赖。并明确提出，从他这个任期开始，10年期间将国债逐年改为零。诚然，新领导的设想很好。但，几乎所有人都说不行。因为，国债投资拉动增长的内在机制叫做国债依赖，一旦开始了就是单行道，没有回头的可能。

于是到现在我们依然是靠大规模增发国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内生性矛盾，停不下来，要是停下来，庞大的过剩生产能力就会爆发为危机。

很多人都说西方资本主义好，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人家可是到了关键时刻把各自的生产能力摧毁，然后在战后重建、扩张，再过剩、消化一遍，但不可能根本缓解矛盾。

二战后重建的时候，很多人都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今人不再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什么？（这里先不谈，点到为止，希望搞清楚的可以去看《八次危机》这本书。）

我们只是说，按照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当进入生产过剩的时

候，很难化解矛盾。

我们现在只是相对缓解，相对缓解的方式说直白点就是用远期过剩掩盖当期过剩。矛盾并不是不爆发而是掩盖住了，因此，如果让我把城镇化这件事情说得直白一点，无外乎就是告诉我们还能找得到继续维持投资拉动的空间，这空间就是城镇化。

我们主要讲现在面临的实际矛盾，也早就发生了生产过剩。需知，我们在一个资源高度稀缺的国家20世纪用一百年追求产业资本，最终形成了产业资本的高速度扩张，扩张的后来就是产业过剩。那就得继续维持现在的过剩产业，让他有处可去。产业要打出去，困难重重。对内来说呢，就是要为这过剩产业找到新的投资空间。

这又得说到林毅夫……

林毅夫从世界银行副行长卸任刚回国就说：中国还有20年的高增长空间！那么，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因为内陆纵深广大，投资空间还有，所以还能保持20年的高增长。

其中，城镇化并不是新的提法。是2005年中央接受林毅夫的政策建议，开始强调新农村建设的时候，明确在新农村建设的文件中强调，县域经济发展有两大支柱：一是城镇化、二是中小企业。以发展中小企业进入城镇形成规模就业，因为城镇化的创业门槛低，能更多的吸纳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吸纳就业能够六倍于大企业，解决未来人口增长带来的就业压力。以城镇化和中小企业来支撑县域经济，新农村建设就有了抓手。

那现在呢？新农村建设中已经投资于基本建设了，国家也大致解决了农村的社会开支。那下一步按照城镇化战略还有一个庞大的投资空间，因为全国有3000多个县级单位，有34000个建制镇。相对而言，以前的投资基本都是集中于城市带，现在的投资要向下，去发展县域经济。所以，国家新的投资战略会转向城镇化，主要转向的是“县域经济中的城镇化加中小企业”。

这么解题，就等于把城镇化和当前生产过剩的这个宏观形势结合在一起了。尽管在全球大危机的打击之下，只有中国一家“风景这边独好”，但我们也得说中国的这个风景独好内在地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生产过剩。延缓生产过剩的方法就是要找到投资空间，那我们现在找到一个新的投资空间就叫城镇化。

（二）生态文明战略及其有关概念讨论

把上边的背景解释清楚了，接着就要讲一下生态文明。

我关于生态文明的概念解释是：生态文明是一种超越传统工业文明，以多样性为内涵的、人类自觉回归自然的文明形态。这是在说，人类本身是自然的一部分，因为人类的不自觉、或是说在工业文明时代自觉地认为能超然于自然，而造成大量不可持续的后果。现在呢，要自觉地回归于大自然，就进入生态文明时代。关键是，人类要自觉地认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呢，中国的21世纪，要自觉地贯彻生态文明战略转型。

那么，我们最大的障碍，恰恰是在20世纪工业文明阶段所形成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造成利益结构已经固化。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十七大开始提出现在利益结构已经形成，到十八大，特别是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强调，利益结构固化是我们深化改革的主要障碍。各位，在我们学习三中全会文件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这个说法忘了，同样，它也是中国贯彻21世纪生态文明战略的主要障碍。

这种利益集团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形成的呢？是在激进发展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条件下形成的。因此，在思想界、理论界反思或者批判发展主义就应该是当前的主要任务。很可惜，我们现在的学术界整体的氛围还是在发展主义的大的话语体系内，所有的评价指标，也都是按照发展主义的框架来形成的。因此，想要思想理论界、学术教育界自我反思，恐怕也有很大的困难。

现在说一下几个向生态文明转型有关的概念，这些是完全抽象的，不带有任何立场。

刚才跟几个《中国投资》杂志的朋友谈梁漱溟。需知，梁漱溟是中国思想界最早做现代性批判的学者，他这一生体现了“中国人的脊梁”这种知识分子特点。他所批判的现代性直到现在仍然因被官方文件所充分肯定而具有高度政治正确。因此，任何人敢质疑现代化，都有政治不正确的问题啊。

要有清晰的问题意识很难，（今天是梁漱溟诞辰120周年，还有两位——毛泽东和卢作孚，都是中国近代百年历史上值得大家认真了解的人物）我对百年认同的现代化是持质疑态度的，简单说肯定否定当然不合适，所以，应该清楚界定有关讨论中使用的基本概念。

第一个，我提出讨论的“现代化”概念。是指，无论是否工业化都是人类近代史中的资本和风险同步向城市集中、并周期性爆发危机的阶段性过程。资本集中产生资本收益，风险集中产生周期性危机，因此要注意，周期性危机往往是爆发在城市。

第二个关于“资本”。是指，无论私有还是国有，不论是内资还是外资，只要它是资本，都是人类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制造的、反过来控制住极少数人群，使其反自然的一种异化物。这里，我把马克思关于资本是人类的异化物稍微扩展了一下。它是资本先控制住少数人群，然后使这个资本群、资本家群体反自然成为一种人类的异化物。主要的作用是促进多数人及他们生存所依赖的资源等客体成为被资本化来产生利润的要素。今天西方经济学只研究要素相对稀缺性，研究要素的优化配置，这本身就决定了它是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

第三个，我们看“政府”。它和资本具有可比性，不论何种制度条件下的政府都是人类制造的、由极少数人控制的异化物，因其反过来强制性统治多数人而使其无论如何改造，也难以达到其应该达到的公平公正。要求政府公平公正是一种理想，实际上任何体制条件下的政府都实现不了，所以在现实中大家要有包容性。

第四个，再看“制度变迁”。不论何种主义何种意识形态下的制度变迁，都不过是原来占有收益的利益集团为了更多占有并把形成的风险及其代价向外部转嫁的一种文化现象。不能顺畅转嫁的制度变迁就变成强制性变迁，能够顺畅转嫁代价的制度变迁就叫做诱致性变迁。那“法律”也是不论何种意识形态，它是政府执行统治的规范工具，主要用于保护和规范收益及其分配的相关社会经济活动，体现最低道德约束的一种制度文化。

我们把这些概念重新界定了，也就基本上“去意识形态化”了，不管哪一种制度，哪一种体制，哪一种思想，哪一个意识形态，我们抽象出来拿给人们讨论的，不外乎这几个概念。所谓研究，是要把抽象出完全客观性的概念放到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的客体上作对应，而并不是说某个政府、某个制度，只是说抽象出某个制度、政府、资本和法律等方面的定义。这些都是抽象的结果。

（三）中国三大差别再平衡战略的实际过程

城镇化与战略转变，是从1998年说起的。因为1998年中国出现阶

段性变化，那就是从过去的生产扩张到现在的生产过剩。这些是宏观背景，是客观的过程。而主观上的指导思想也随之形成。从那以后，中央1999年提出以人为本，接着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2004年提出和谐社会，再到2005年提出新农村建设，到2007年生态文明成为十七大的新的理念，再到2012年的十八大生态文明成为发展战略，等等。这个期间内，城镇化多次被作为战略转变的内容提出。

那这个转变期间中国实际发生了什么？如果愿意抛弃意识形态讨论，就能看实际发生的客观过程是——从1998年开始，中国进入三大差别调整阶段。

需知，三大差别并不是完全客观形成的，某种程度上带有主观的态度。因为邓小平作为中共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他推动改革开放的一开始就明确讲：要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再先富带后富。这是明确说的，在《邓选》里边是能明确看到的，但是他这句话也是矛盾的。因为他下边接着说，如果我们最后造成了贫富两极分化，那我们就失败了，改革开放就失败了，我们这个党也就失败了。前边说允许、后边说不行这不就矛盾吗？但这对于后边的领导者来说，已经造成的两极分化三大差别，都要再平衡回来。当1998年生产过剩的时候中国的领导人实际上执行的是再平衡战略。

要注意，中国的三大差别分别叫做：区域差别、城乡差别、贫富差别。

当生产过剩、要用国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就不能简单靠市场。还有，因为市场只会造成差别、市场不会自发的调节差别，这些是常识。只要是客观立场的学者，都会承认市场不会自发地去平衡差别，所以才会有“市场失败”（也叫市场失灵）。

因此，政府用国债做公共品投资的时候，主要应该是用于化解三大差别。

所以，从朱镕基时代开始，中央政府平均两年提出一次大的调整战略，先投入的项目主要是区域差别再平衡，所以就要注意这个提出过程：1998年决定要借鉴罗斯福新政，要动用国债投资；1999年就是西部大开发战略，总投资规模是36000亿，其中三分之二24000多亿是国债投资。两年之后2001年，中央提出的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投了两万多个亿，也是70%以上是国债。并且，为此国家发改委还增加了两个部门：西部办和东北办。接着，就是2003年提出“中部崛起”投资

2万亿，也是区域再平衡战略——随着西部、东北都上去了，显得中部塌陷了，所以在中部增加基本建设投资，又是两三万亿。

我们解决区域差别，用了七八万亿的国家投资，大体缓解了中国东高西低的毛病。现在西部地区的GDP增长速度快于东部，红灯区在西部了、蓝灯区在东部了，区域差别再平衡战略初步奏效，这在世界上没谁能做得到。

第二个是缓解城乡差别。诚然，国家从2005年开始投资于新农村建设。但是，中央2003年就明确“三农”问题是全党全国的重中之重。也听到新接手财政部长的楼继伟说，现在中央财政最大项的开支是“三农”开支，每年一万多亿（他没提的是过去最小的开支是“三农”开支）。从2005年到2013年八年时间投入七万多亿，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确有效化解了“三农”困境，农村实现五通一平。五通：通电、通路、通水、通电话、通宽带；一平：大规模平整土地，搞水利建设。

国家下达这五通一平投资到了村，就给中小企业发展以及回乡农民创业予以搭便车的机会。因此现在农村发展，看这次三中全会，无论是土地制度、合作社制度、新型经营主体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是在国家大规模基本建设导致五通一平之后，现在该老百姓们大显身手了。所以连续八年的新农村建设投资，中国初步实现了城乡差别再平衡。

需知，这在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是做不到的，没有哪里能做到城乡差别再平衡，也没有哪能做到区域差别再平衡。

两大差别我们完成了再平衡战略，投资总规模约为15万亿，相当于两万亿美元。

这就好有一比——美国救市投资是如何投的？主要投向金融部门，于是乎99%的收益由1%的人占有，这就是两国的最大不同。中国为什么现在还能一枝独秀，不就是因为采取了三大差别再平衡的战略吗？不过，是不是领导人都有这么明确的再平衡理念，我不好说。只是说从客观结果看是三大差别已经平衡了两个，那么剩下该由政府干什么呢？那就是贫富差别再平衡。对此，要想做得到，就得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向前走。

2013年的这次三中全会开始强调什么呢？房地产税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并且要立法。这是要干嘛呢？因为我们现在大量的中产阶级跟富人

崛起了，经济下滑阶段所有的其他实体投资领域都不挣钱，只有房地产的价格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在银行存款利息收益增长的速度，这就是房叔房婶大量存在，但与房奴并存，其实就是社会收入差别难以再平衡客观造成的。为什么难以再平衡呢？是因为税收体制是世界上最差的，叫做累退税率。我们92%以上的税收来源于间接税，甚至能对商品征到20%～30%的高税收，之所以叫累退税是因为穷人和富人一样都买商品，反而富人买的少，富人大部分的消费并不表现在市场上。于是中国只有7%的税收来源于直接税，其中大部分属于扣缴，只有1%是个人直接缴纳。此外，我们国家的各项社会开支政策，也有大调整的余地。

但是，贫富差别扩大是世界通病，没有哪个体制能够有效地实现再平衡。这就得看新一届的领导班子是否有决心和执行力，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恰恰是最难调整的这一块。想让国家领导班子通过征收财产税、遗产税、馈赠税、房产税，增收这些对富人征税的法律，把累退税改为累进税，把间接税为主改为直接税为主，确实有点难度。

三大差别再平衡战略，其中的两大差别虽然已经基本平衡，但却主要是靠大规模国债投资来形成，而非靠体制改革实现再平衡，代价也就很大。所以一方面可以说，国家战略正在发生转变，从区域差别再平衡到城乡差别再平衡，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但另一方面，现在能不能做到贫富差别再平衡，能不能让税收改革起到收入差别再平衡的作用，取决于政府的领导能力和魄力，当然也取决于领导集体和现在各种各样利益固化的集团之间的谈判。但愿我们这个社会有自觉性，但愿这些收入比较高的人能够自我约束，对社会承担责任，这就需要完全公开透明的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并且允许能够用我们的收入直接用于我们觉得应该用的社会公益开支上。

（四）地方高负债与中央两难局面

我刚才说到国家大规模投资的时候就想提这个问题，从现象上看我们的确存在着国有资本不断壮大，对私有资本的挤出效应。经济学界都批判这个现象，我也可以跟着批判，因为它是个现实。但我要问的是什么呢？如果从1998以来，中国干的是国债拉动投资，请问这世界上可有任何政府敢于把国债投资，也就是老百姓未来的税收直接交给私人的？美国政府当然可以，因为它是以私人金融资本为主导的国家，它87%左右的GDP来源于以金融资本为中心的服务业，那它当然只能救金融。而中国呢，当我们投向西部大开发的时候，建设了三纵两横的高速公路系

统，当我们投向区域差别再平衡的时候，大规模投的是高铁、能源、公路、机场、码头、车站，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谁能干？把国债投资到基本建设的资金交给那三千万家私营企业干吗？客观上看这15年干的是国债投资，当然会出现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实现的是大量增加的物质资产，这些公共财产客观上能不能短期回收，能不能近期就有经济回报呢？都不能。

我们知道这段时间重庆增长速度非常快，怎么增长的呢？很大程度上是大规模的西部建设投资投到重庆，帮它极大地改善了基础条件，500多平方公里的重庆，它把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扩展到周边，通过大隧道和大桥把五道山梁全打通了，地面从500多平方公里变成了1200多平方公里了，只做地产他也赚了。经验其实很简单，如果把隧道、大桥收回，卖给私营企业，那过隧道和过桥就都得收费，所有的交通都堵在收费站那等着。西部就等着就这个大规模基础建设带来的搭便车的机会，省会城市或大城市的地产随之成倍扩张。

整个西部现在为什么发展这么快？是因为所有这些高速公路、铁路、桥梁等基础建设投下去都不可能短期回收。让谁搭了便车呢？西部的地方经济搭了便车。所以国家资本集团尽管拥有庞大的实体资产，却不可能变现，表现为在150万亿金融资产的账上趴着。同期，迫使中央政府大规模推进增发货币，这些年发了25万亿货币，其中20万亿是对冲增发，也就是外资进来1块美元，央行得发6块多人民币对冲，这就导致本币增发货币增发出来用于投资了，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大量是趴在账上的。确实，这些资产都是国有资产，但不可能短期有收益。国有生产性资产占多少呢？占中国全部生产性资产的70%。那国有银行资产占多少呢？占全部金融资产的70%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客观结构。

要改，怎么改？大量的固定资产占压银行资金；卖掉，没那么容易。除了这些，地方政府也搭便车，都借这个机会为自己建一些楼堂馆所，我们现在有了世界上最为豪华的政府设施，一直到乡镇村这一级。

那就看看对应的负债是多少，大概是八年前，一次在中央汇报的时候，县以下公共负债估算是7000亿到9000亿，现在如果再让我汇报，翻了十倍不止，至少负债得几十万亿。乡镇这一级政府负债，当年说最高负债是4000万左右，现在得到四五十个亿，县这一级的最高负债得上千亿。这些东西都叫做政府的债务资产。为什么称之为债务资产呢？因为它对应着一块资产，就像政府搞得楼堂馆所都是资产，只不过现在不好出售。政府搞的大型广场，铺的那些花岗岩大石板都是银行的钱，政

府搞的景观大道，华灯齐放也都是银行的钱。都是债务压在那了。

现在为什么很多地方政府狂征滥占土地，并且政府帮房地产商维持房价，尤其是三线以下城市，房价早都维持不住了，政府哪怕贷款也要帮房地产商撑房价，就是因为撑了房价就是撑了地价，撑了地价之后，还能再圈一块地去银行套现的时候就可以套到同等的额度，银行套现率70%，那一部分钱过来之前先把银行利息还上，银行帮政府把旧贷转新贷。这就是中国现在“地方债务增加—银行占压调账—土地征占付息”这种三角结构的内涵。得明白我们这么大的经济总量大部分压在那些钢筋水泥上，压在那些桥梁、高铁、机场、涵洞和大隧道等基本设施上，这些都是陈欠贷款。如果想知道今天中国有多大的不良资产、多大债务规模，不到爆发的那一天，谁都说不清楚。

现在爆发的触动点在哪，都不知道，说知道的都是猜，但猜也要猜到点上。

比如，刚才讲两难局面，政府如何继承政治合法性，如何让人民满意，就得除了继续使用投资拉动来解决面临的经济下滑，还得靠深改完成第三大任务：贫富差别再平衡。可是，想征收房产税吗？征，就意味着全国实现财产透明，官员、知识分子都公开房产，缴纳累进制的房产税。真正想实现透明度，就是征财产税。假如房叔有10套房子，共计1亿元，按1%的房产税征收，就要征收100万元房产税，每年100万元交不起。那就抛售房子吧，这样房价就下来了，地价也跟着下来了。然而，这样就平不了账了，地方政府在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就暴露了。所以，征收房产税这事，不仅仅是富人不愿意交，它还牵涉到银行大量的不良资产如何处理。

（五）经济社会结构历史性变化及其利益诉求

大家想搞清楚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两张金字塔图就可以解释清楚了。我们现在的经济矛盾、社会矛盾无外乎就这两个金字塔，但它们属于超稳态。当经济结构矛盾已经深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谁都不敢碰。谁想真去碰一下，就会意味着“债务暴露，无药可救”。对外又不能打仗，那对内也只能继续扩大投资，维持住现在的产业资本过剩的问题不马上爆发。

如何继续扩大投资？现在提出的就是城镇化。

有一系列的问题要考虑，比如说我们如何在城镇化的基础上去构建生态社会，如何在城镇化中形成创新政府治理的条件。例如我们现在正在乡镇做的试验，看所谓政府善意如何与社会结合形成善治，政府通过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建立乡镇良治。通过结构多样性和市民参与治理创新来形成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所以不仅仅把城镇化看做是一个新的投资的空间，同时城镇化还有新的治理结构和制度创新的空间。

城镇化是中小企业和打工者返乡创业的领域，因为发展恰恰是相对远离大资，投资门槛低得多，何况很多打工者本来不愿意长期留在大城市。为什么打工劳动力为什么跳槽这么厉害，其实不外乎就是打工者整体上是小资属性，不想降低身份成为产业工人或者工人阶级，小资外出打工的目标是成为小老板，从小资变中资。

请看现在城市郊区征地，为什么城郊村都巴不得政府来征地，是因为村民可以一步从小资跃升到中资，可以分得几套房子或者得到一大笔钱，这就是郊区农民的“农民之梦”。

现在提出的城镇化建设适逢其时，给那些想当小老板的打工者提供了一个创业的地方。由此，怎样能够形成城镇化治理创新？怎样能够让那些向中资身份跃升的小老板们、打工者们参与进来，变成社会化的治理创新。这些讨论和教科书上写的大不一样。对此，大家可以看我们搞了12年的乡建，历史上的乡建改良思路为什么总能切合中下层社会的实际需求，在于百年乡建接地气比较多一点。

以前工业文明时代，形成工业集中的城市化，已经不适应现在的生态文明新战略。因为我们近代的城市化体制，本源于工业化阶段产业资本的集中所客观需求的标准化、规模化和它所派生的制度。刚才已经讲到，我们从“九五”时期就要把产业集群和城市带叠加在一起。那是符合工业文明要求的。因为工业化内生的需要的就是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搞城市带最适合这套要求。

然而农村文化却“十里不同风”，农业又是个自然过程，因此，农业最不适应工业集中的城市化要求。当然，强行要把农业搞成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时候，农业自身的反抗就是制造了大量的环境污染和食品不安全，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深受其害。例如，现在地沟油已经普遍化，却没有人再出来骂地沟油了，因为政府组织清查了老半天，请专家们来检测，发现地沟油的理化指标和普通油是一样的，既然没查出来，大家就干脆闭上眼算了，上街吃饭的人吃的基本都是地沟油。不过，今天食物

安全领域的社会诚信已经被地沟油彻底毁掉了。

当我们过度把资本向城市集中的时候，一定是同步集中了过量的风险，过量的风险转化成的周期性危机虽然爆发，但往往是向“三农”转嫁危机代价的。在《八次危机》一书中，发现中国存在周期性经济危机并不算理论创新，因为在我之前很多经济学家，尤其是政治经济学里，周期性危机早就是描述清楚的理论。我的理论创新在于，我们的危机发生在什么时候，而城市危机只要能向“三农”做危机转嫁，它就在城里软着陆，如果不能向“三农”转嫁危机代价，它就在城里硬着陆。硬着陆的结果就是调整或是改革。至于叫调整还是改革，那是意识形态的需要。此书的全部理论创新可以归结为几个字：成本转嫁论。它往上接续的是世界系统论、依附理论、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把这些糅杂在一起，博采众家之长，最后就解释了我们的问题。

现在大家所遭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是在这个工业文明历史阶段产业资本过量集中到城市所发生的问题，首先是三大资本过剩——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商业资本——条件下所造成的代价向全社会转嫁。

这里边有个很重要的不同于西方主流的认识。不同在于，中国并不可能有西方所说的集权主义。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发展充分竞争的结果就是比拼招商引资，然后就导致创业资本集中，形成的风险却上交。于是，中央就得增发货币、增发国债。

现在我的团队在国际上做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在国内做不同区域比较研究，这些年先出版了《解读珠三角》、《解读村南》，我们现在还在做《双村记》，解读两个天下第一村：大邱庄和华西村，同时还要做苏州工业园20年，以及广西的欠发达地区、重庆的发展经验、浙南的发展经验等。做一批不同区域的发展经验分析，我们才能知道中国是怎么回事。我原来的题目区域化，本来想抽点时间跟大家介绍下我们做区域比较研究的结果，现在因为三中全会出来有很多误读，特别是对城镇化、对土地问题有很多误读，所以先利用我们的讲台给大家说说城镇化。

关于城镇化，中央在三中全会的文件中强调城乡一体化，强调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其实得呼应生态文明条件下的发展创新，关键在于城镇化所对应的主体是全国3000多万个县市区下辖的30000多个镇。中国县以下一共是40000个乡镇，60万个左右的行政村，300万个左右的自然村，这是中国现在的区划结构。

我们的城市现在看已经算超前发展了，下一步要重点发展县域经济，特别是县级城关镇和县域范围内的中心镇。如果我们三千个县的城关镇都得到了发展，那客观上就会使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在国债投资的带动之下向县域经济转移，否则县域经济很可能就是个口号，很难落实。需知，承载县域经济的载体，主要是县内的城关镇和三个左右的中心镇。这样看呢，全国会有一万多个中心镇得到投资发展的机会。

做法上，首先是基本建设得到改善，然后吸纳打工者回乡创业投资和中小企业的投资。农村60万个行政村已经实现了村村通，下一步如果能配合城镇化进一步能使300万个自然村实现村村通，那周围村里农民就可以骑自行车到镇里去上下班了。

现在农村中很多问题是社会问题，我们有时会认为“三农”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社会政治问题，并不是经济问题。例如，现在农村大量出现“劣绅驱逐良绅”，结果就是“良民变刁民”，基层治理劣绅化就很难让老百姓再相信什么，整个社会的思想体系的垮塌是最可怕的。还有城乡关系恶化。在这种不断地向“三农”转嫁代价的体制的压力之下，农民的基本的行为已经扭曲了。如果能通过社会恢复或者社会重建，真正把国家投资重点转移到城镇化上去，就可以使农民就近得到非农收入，而不至于背井离乡。

所以，生态文明与城镇化战略结合到一起，应该是四个复兴：生态社会、生态自然、生态经济、生态治理。据此，大家不要简单地把城镇化又理解成某个主管部门的思路，它所面临的真正的客体，还是农村、农民。如果“三农”局面能维持住，这个国家尚可维持，全球大危机砸下来的时候，我们仍然有应对危机的社会基础。

当年印度尼西亚在1998年出现大规模失业时的状况，那里28%的进城农民是没有土地的人，在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是转向了暴力，最终也致使大批华人受到迫害，非常惨重的教训。总之不是虚言。中国遭遇华尔街金融海啸，在2009年曾出现过一个季度的经济下滑，沿海有6万家企业倒闭，发生2500万打工者失业，也出现了各种社会不良因素集中爆发。幸亏那个年代，正好是国家在大规模增加新农村建设投资的时期，危机爆发时中国已经增加了上万亿的农村投资，农村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吸引了回乡的打工者，沿海城市社会恢复平静了……为此，请注意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矛盾：每次发生严重的社会矛盾都与大规模的下岗失业有关。例如，1960、1961两年7000多万失业，中国重新强调阶级斗争；20世纪80年代知青回城4000万“待业”，中国提出两个严打；20世

纪90年代4500万国企职工“下岗”，中国强调维稳。

城乡一体化方面，国内外的教训很多。例如，人类发展指数较高的发达国家都超过了生态足迹。又如，全球人口超千万的大城市都是污染非常严重的地方。中国现在的发展状况跟大多是发展中国家是一致的，就是大量进口垃圾、人为制造着污染，用这种发展方式推动GDP，对中国来说实质性增长是负的。发展中国家生态系统下降是非常严重的，而发达国家略有好转。如果我们在社会问题上继续想农村系统转嫁代价，那发生社会对抗性矛盾冲突也就不远了。

还有些应该讲的，下面列出相关要点：一是在以往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交流中，欧洲、亚洲的日本韩国“转型城镇”是值得借鉴的经验。二是我们一直强调农业三产化，强调综合性农民合作社。三是就乡村旅游而言，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乡土文化最适应“个性化定制”，因为千差万别的与自然紧密结合的乡村自然生活，最能吸引中产阶级参与休闲农业和“三慢”生活，让中产阶级体验生态化的“四洗”，这就变成市民下乡新的消费内容。总之，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很多创新机会，取决于你如何去发现题材。

还应该提炼以上讲述中的理论问题：

其一，农村存在的是“三农”问题和“三治”问题，“三农”是经济基础，“三治”是上层建筑。

其二，中国工业化的过程有过四次外资进入，每次外资都造成对外债务演变为国家财政严重赤字，也都带来两个次危机，每次危机都向“三农”转嫁代价，能转嫁成功城里就软着陆，否则就是硬着陆。需要了解硬着陆的例子，如1960年和1980年，没有成功向农村成功转嫁，出现在城里硬着陆。

其三，中国政府是不可能集权的，是因为中央政府长期是没有财政能力的。当出现大危机的时候，只有中央和地方共同受害，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才能够被地方所接收，否则地方是长期抗拒宏观调控的，中央手里没财政是指挥不了地方的。（关于三次“圈地运动”，可查阅文章。）

其四，如果讲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以中国目前的现行体制看，实现的难度非常大；如果我们在城镇化问题上能够率先推进一体化，引导市民下乡、引导农业生态化进程、引导返乡农民去城镇创业、引导

有“余钱剩米”的市民到农村去创业……总之，如果这些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经验都能够做到，那么，也许城乡一体化能够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有所体现。

结论：新型城镇化是生态文明多样性与市民农民相融合的过程。

第四节　新型城镇化与平民教育的创新注

（一）生态文明内涵教育的多样性和在地化

在国家强调生态文明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生态文明本是一种有别于并且超越于近百年来世人追求的传统工业文明的一种文明形态。

工业文明时代的教育，体现了工业资本对人的资本化进程。它其实是要求把各种各样的资源都能够统一被工业化大生产所处置，因此它要求教育所传播的信息必须是标准化的、可集成的。因而，制式教育就是主要服务于工业文明时代的标准化、集成化和大规模传输的教育模式。

生态文明因其根本内涵是多样性的可持续循环系统，因此，当我们从工业文明时代进步到生态文明时代，就要知道生态文明所要求的教育是什么。当然，符合生态文明的教育应该是多样化的、在地化的，亦即，生态文明是体现自然多样性和社会经济可持续的文明形态。那么，从这个角度看，与百年乡村建设密切结合的平民教育在当代的创新，就主要应该是和在地化知识系统的知识生产和在地化的社会参与式教育相结合的。

中国当前已经把国际社会一般强调的“城市化”改为“新型城镇化”，这个新战略，本来应该和在地化的平民教育有一定的相关性。这样说的原因是其宏观背景，对此，参与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的人们务必加强学习：这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东亚金融风暴造成中国生产过剩危机爆发以来，国家战略发生转变所导致的新的时代要求。

新世纪以来国家强调生态文明新战略，意味着对20世纪的工业化战略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恰是因为我们追求工业文明100多年——从洋务运动以来开始学习西洋的工业化，我们差不多走了100多年工业化的道路，直到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1998年中国人意识到遭遇了工业生产过剩的问题，这个时候，国家势必会产生战略方向的转变。

于是，1999年中央领导人开始提出“以人为本”，2003年明确放弃单纯追求GDP的发展观，开始强调综合性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接着，还是因为生产过剩，中国人开始把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内部建设，这是根本上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在这个新时期调整过程中，最大的不同就是国内三大差别“再平衡”战略。而西方的工业文明时期在20世纪30年代遭遇生产过剩，则是工业化国家恶性竞争，转向用战争摧毁竞争对手的工业体系，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

中国1998年遭遇生产过剩之后，首先推动了区域差别的再平衡战略。主要是三个大项目：1999年西部大开发、2001年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2003年中部崛起，通过这三个大项目来实现区域再平衡。过去曾经主张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就是沿海地区先富，到1998年中国人开始强调区域发展再平衡，连续做了五年，投资了大约7万多亿，沿海和中西部的差距缩小了。

接着，国家强调城乡发展再平衡，也就是2002年十六大以来中央多次讲“城乡统筹”国家战略，2005年“十一五”计划又提出新农村建设。大概也经历了这么七八年时间，又有7万多亿投资到农村地区，这样城乡差别也逐渐缩小了。注

第三个战略，那就是贫富差别再平衡。第三个再平衡战略目前是开始了，当然，这需要一段时间。现在强调：应该首先推动城乡财政公平，也就是由财政支付的公共产品的均等化。

总的来看，中国在工业文明高速扩张的90年代，于1998年发生了生产过剩危机以来，先是为了延续工业化，把过剩产能转而投资于三大差别再平衡，但在同时也相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等新的发展理念，现在我们叫作“五个文明”一起抓。

在“五个文明”中，最近提出的就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最大的内涵就是多样性。

因为这些战略性提法的转变，也就有了转向生态文明推进不同于工业文明的教育创新的客观需求。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教育创新，特别要讲平民教育相对于生态文明的适用性创新，因为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国家战略重大转变过程中形成的对教育创新的客观需求。

（二）生态文明阶段需要的平民教育创新

在生态文明的社会，以及新型城镇化推进之中，都离不开改善治理的问题。

十八大用了大量的篇章讲治理创新。须知，中国社会的下层是占人口60%左右的小资，小资主体是农民，政府对占人口最大多数的下层社会要给以必要的扶持。而在下层社会之上形成了一个占人口规模约30%左右的中产阶级，西方称为中等收入群体，我国中产阶级主体是中资、民资。

现在的生态文明阶段需要平民教育创新，要讲在地化教育，要讲社区教育。这是因为：不论是占人口60%的小资，还是占30%的中等收入群体，都是高度分散的个体化存在。只要分散，就是脆弱的。城市人分散在上百万个不同居民社区，农民则分布在300多万个自然村，那就需要从小孩开始构建与参与式社区发展有关的在地化教育。如果我们现在还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简单化地照搬工业化时代的制式教育，把统一的规范的教材用于这个社区教育系统，那不过是内在地延续着把小资群体变成可被工业资本来使用的劳动力。长此以往，生活在数百万个社区的下层群众和生活在城市社区的中产阶级，就都缺乏对本地乡土知识和社区共生文化的起码了解。这样的话，分散个体都缺乏对本地社区的了解，怎么能够对本地问题形成理性认识，并且支撑相对不同社会群体而言的地方良性治理体制呢？

主要归因于产业化教育造成的体制排异，再加上我们人口占比60%的下层社会和占比约为30%的中层社会，目前都不擅长自主的知识生产和在地的知识传播，因此我国也就至今没有形成在地教育，更没有所谓社区化的参与式教育的支持体系。于是，社区内部的事物哪怕是鸡毛蒜皮也不得不用外部的宏大话语来表达。

打个比方，咱社区里有些人私搭乱建，本来是由于社区没有形成业主自律和自我治理，也就是没有形成在地的“社会自组织”，来进行本社区业主的自我教育和业主参与式的社会管理。大家一说私搭乱建，那是因为什么呢？都说是因为国家制度不好！或者是随着西方媒体批判自由民主人权问题。甚至一说社区有人吐痰、有人的狗便便没有及时清理掉被谁不慎踩到了，也都是自由民主人权问题！一般群众使用的话语如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上纲上线一样，往往是那种外面来的很大的政治概念被误用，因此就没有条件对本地的个别问题做本地化的处理。

这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在工业化造成的制式教育体系之下，

已经习惯了在这种制式教科书传输的宏大叙事的话语环境中生活。如果长期在这种制式教育统一传播的话语体系中生活，真讲点不同的，还害怕别人听不懂，那大家讲的就都是书本上的大话。

人们在社区生活中形成自我组织，在自我组织中间，大家参与社区生态化可持续共生的经验得到传播，逐渐形成适用于本地的知识系统。这些本地的知识系统同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有在地化传播的价值。

如果大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本地的知识生产上，放在本地的知识传播上，相对来讲大家更关心的就会是我们生存其中的这个地方的可持续发展。这样的话，社会结构也更有利于朝向多元化趋势演变，大多数人分享民主的参与方式随之自然天成，也就更有利于这个社会去按照生态文明的方式去重新构建。

以上分析，主要是说我们已经习惯了工业文明时代所需要的制式教育，内在地服务于规模化的、集成传播的信息系统，这个信息系统造成了很多外部概念未必都直接适用于本地的社区事务，那就让我们很难形成本地的话语，就造成今天这个知识系统更多地属于意识形态化的知识系统。如果生活在村里的百姓只会讲那些大的话语，其实只是政治宣传员。尽管这也许是必要的，但不能仅仅如此。

假如大家都忽略了知识的在地生产和在地传播，都不重视与本地实际密切结合的社区教育，不重视地方自主性的文化创新，那在这种意识形态话语的控制下，很可能会产生一种越来越紧张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精神状态也会越来越紧张。很多事之所以一触即发，社会上之所以弥漫着一股暴戾之气，很大程度上跟我们的社区教育没有体现生态文明新战略而创新不足有关。

（三）教育产业化不能适应生态文明的要求

为什么说百年工业化时代它所需要的制式教育，以及这种教育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事实上推行的产业化（尽管有人不同意用这个概念），都不能适应近期我们国家向生态文明的战略转变？

教育既然被公开说成是人力资本形成的工具，那就变成了一种手段，成为一种帮助产业资本来占有人力投入形成剩余的工具，那么，制式教育要使本来自然性状的人成为人力资本的宿主，就得把人所具有的

多样化的自然属性尽可能剥离，把人的思考能力规范在一个被称为现代化的科学体系、但实质上高度指标化的学科框架之内。

由于中国出现产业过剩，随之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制式高等教育产品过剩。为什么2012年690多万大学毕业生中至少40%找不到工作，加上之前累积下来的约40%不能就业的人群，现在大学所制造出来的所谓人力资本往往就派不上用场，所学非所用的人更有的是。

事实上，按照制式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如果只是人力资本，那早就过剩了。

这是按照工业文明时代信息标准化大规模传输所要求的制式教育体系在今天所遭遇到的最大困难，某种程度上，就是90年代以来推进教育产业化的危机。这种危机代价极大，是如今国家不得不强力维稳、受人诟病的根源之一。只不过无人问责而已！

如果教育主管部门继续维持着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大学，都是统一的教材，当然不符合千差万别的乡土社会需要。因为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需要平民教育的生态化创新，国家生态文明新战略的多样性可持续的发展，本身就需要多样化教育。

中国至少县一级就是3000多个单位，还有30000多个城镇和300万个自然村，承载着3000万家中小企业，大部分是有在地化知识需求的。

请问：东西南北八面来风都不一样的中国这么一个国家，怎么可能要求都使用一样的制式教育？打个比方，农村经济管理，怎么可能要求只有一本教材，黄土地、黑土地、红土地、沙壤土，自然条件导致的农业经济管理的需求是不可能一样的呀！既然各地的自然条件和管理方式都是千差万别的，那能不能把在地的知识系统作为本地教材，形成在地化的社区教育呢？过去我们有数千家办在县以下的农校、卫校、技校等，那时候连农村的中学都鼓励在本地知识创新，这些都随着90年代的教育产业化大潮被风吹散了……

（四）教育产业化的信息单方垄断及利益机制造成教育不公

相对于生态文明而言，全国统一的制式教育某种程度上是反着来的，和真实的、千差万别的地方发展需求，以及数百万个社区的人民大众需求之间，是不能对应的。

在完全由国家开支的体制下，制式化教育属于公共产品。但，因遭

遇经济危机而推进教育产业化转化和推进把教育科技都作为市场化创收手段的改革方针在贯彻之中，内生性地发生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本身是公共产品的知识信息，却被产业化的教育部门单方垄断，用于获取垄断利益。

这里有个简单道理，就是任何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单方垄断，都必然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正。同期被推进市场的医疗体系更是如此，医院凭借单方垄断病人生死存亡的信息的特殊地位去收费，那就势必造成很多患者因病致贫，甚至家破人亡！每当发生医患纠纷发生恶性事故的时候，医生和患者就都是这种制度的受害者！

既然教育单位垄断了信息，那我当老师你当学生，老师单方面垄断信息甚至决定学生的前途，学校发的文凭就是学生获取这种被垄断的信息并借此进入中产阶级俱乐部的门票，那也是要多少钱就得给多少钱。越是那些排在前多少位的学校，排位的客观结果就越是收费大幅度地高于一般学校！这样再往下排一本、二本、三本，排下来其结果就是多了教育信息垄断的层级。这是教育市场化改革造成的基本体制问题，然后那些掌控垄断地位的既得教育利益集团再把这些被垄断的知识归纳为所谓学科，也就是再把这些被垄断的信息通过所谓学科建设加以固化，就导致形成了一套内部的分配标准，从根本上压抑了思想创新的可能性。于是，中国高校越多高楼越无大师！这个教育产业化就变成一个收钱的垄断工具。学校老师也就成了“老板”，学生自称是打工的。好的老板还给点工钱，差点的工钱都不给……

为什么农村出现教育致贫？过去是农村万元户的家庭现在很多因教育收费而致贫，农民家里有一个孩子上大学就差不多要把积蓄的财富都花光了，如果有两三个孩子上学，那这家一定是从过去富裕户变成绝对贫困户。为什么？还不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信息的垄断！因为是单方垄断，不可以讨价还价，就造成很多人上不起学。

越是好的大学，被有关部门纳入排名前十位的大学，农民的孩子就越来越少！为什么呢？一方面搞了一套反智的、照搬的学科化知识，与下层社会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另一方面农民孩子根本上不起！

这就是制式教育演化为垄断条件下的教育产业化所造成的社会性不公正。

而所谓现代化教育本来应该是公共品，本来应该算是沟通上下层社会的渠道，是让下层社会有上升预期的渠道，这样下层青年才有希望，

社会才稳定。那越搞教育产业化，就会导致社会失衡越严重。教育在我们这直接演变成阻断下层上升通道的制度障碍。记得林毅夫1998年就讲过“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当教育造成人力资本过剩和城市的产业资本过剩同步发展的时候，它就是我国社会危机被人为地政治化加重的一个主要因素了。

为什么百年工业化所形成的制式教育不适应国家战略调整？并不是说在这百年工业化进程中的制式教育完全没有功劳，做这种片面的理解也不对。教育对工业化本身来说是有支持作用的，作了很大的贡献，有很大的成绩，这样两面话都得说，别理解错了。

（五）新型城镇化对应着在地的知识创新

产业资本集群叠加与城市带为主的高度城市化的社会都违反了人类生态文明所给定的那个标准，就是人均的生态足迹注不得多于两公顷。而且，现在大多数所谓现代化国家大城市（世界上17个千万级规模以上的大城市全都不适宜人居），它的可吸入颗粒物（PM10和PM2.5）的统计结果，表明全都是不适人居的，北京、上海无疑也都在其中。

我们都知道，现在高污染的问题大部分都是集中在这些大城市，已经不是未来生态化发展应该走的路了。

那新型城镇化可借鉴的国际经验呢？我们应该看欧洲的转型城镇，它特别强调生态化社会作为共识的“生态足迹”和“食物足迹”的限制。这会带来什么呢？会带来在地化的知识生产和在地化的教育需求。因此，我们现在的平民教育应该和转型城镇或者新型城镇化相结合。欧洲的转型城镇所蕴含的知识也是多样化的。

我们再看城镇化中的农业创新。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欧洲有很多地方是搞市民农业，它也带来了对平民教育新的需求。

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应该是城乡统筹的，类似我们这些年主张的市民下乡、农民进城。市民下乡就会有新的知识需求，而这些需求又全部是在地化的，而不可能是全国统一的。这就不是工业化所要的全都是统一的知识。因为，城市里边所有可以标准化集成传输的知识都有了，市民下乡干吗呢？下乡一定是有个性化的需求。所以，我们越是保留在地化的乡土知识，就越能满足市民下乡的个性化需求。

所谓在地化知识，是乡村生活保留的自然、人文、环境各种条件都

有在地化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如果能够转化成我们在地传播的知识，转化成在地化的社区教育，那这些多样化的知识就活了！比如说山野自然风光，比如说传统的木刻楞的那种房子，比如石头砌的老房子，市民下乡之后在山间建造的有利于城乡结合的民居。

我在欧洲见过一座石头砌筑的老房子，石头砌的拱门，是四星级宾馆。我们老以为在城市里边得是大理石贴面的那些豪华建筑才能得到四星级，但其实只要是有文化，那种在地的知识承载的建筑文化，同样能够变成四星级。我还见过一种木刻楞的房子也是旅馆，在它外边就是美丽的丘陵风光，所有的这些与众不同的东西都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当地知识，形成了当地文化。当然，还有我国西北的窑洞只能与粗犷的黄土高原风光结合，而西南的吊脚楼也与鳞次栉比的山区梯田农业相得益彰，等等。这些多样化的复杂内涵，都不可能被一个世界统一的建筑标准体系来演变成工业化的标准信息。

在工业文明时代，当我们把信息全部变成标准化的时候，这些本土的东西都被排斥了。那今后呢？在生态文明时代，这些都会被开掘出来形成在地教育。这样，身为当地人，就有了学习在地才有的知识的需求，我在当地学习才有当地就业，比如像这样的旅馆、在这样自然风光的乡村旅游之中，谁能讲清楚本地自然气候和传统文化知识呢？这儿为什么是这个月开这个花、那个月开那个花，自然界这些东西可以干什么用？所有这些知识，都是通过在地的社区教育获得的，虽然未必能符合那种变成全世界都能传播的统一信息的标准化制式教育，而是只有到这来才能欣赏、才能学会的知识。于是乎，要形成在地的知识体系，就要有在地的知识创新以及教育创新。

2013年11月2日，温铁军在上海大学乐乎新楼·思源厅做了一个题为“全球危机与生态文明”的讲座，主持人是董丽敏教授。以下是该校2013级文化研究硕士袁剑根据录音整理成的文字稿，小标题为其整理时个人添加。收入演讲录时已经本人审阅修改。

本文系温铁军2011年3月在福建省连城县客家古村培田举办的乡村文明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者从录音（为时一个半小时）直接记录，除省略个别口头表述和语序调整外，未作改动。为便于阅读，增加了分节处理和若干小标题。收入本书时已经本人审阅定稿。

我们在农村办的第一个面向农民的“社区大学”是2003年7月与河北省定县翟城村村委会联合设立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后被有关部门安排当地教育局出面以“非法办学”名义于2007年4月强制取缔。

衡生喜老人在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组织的评选活动中当选为“2013年新农村建设年度人物”。

何慧丽已经在2015年升任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这个长期坚持深入农村基层做实地试验研究的青年教师，并未耽误学业上的进步。

第一波去城市化，史称三次“上山下乡”运动。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主要是城市产业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发生危机条件下，政府通过动员不能就业的青年人和市民安排到农村去，缓解城市危机压力。具体过程可以参阅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年第一版。

温铁军2013年12月1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双周大讲堂上的演讲。

本文根据温铁军教授于2013年11月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第三届平民教育论坛”上的演讲整理而成，已经作者本人审阅。平民教育论坛每年举办一届，本届论坛由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和中国滋根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主办。

以上估算的投资规模依据的是2013年之前的数据。到2015年，农村投资已经成为国家财政最大开支项，每年1万多亿的投资总额。

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 print, EF）就是能够持续地提供资源或消纳废物的、具有生物生产力的地域空间（biologically productive areas），其含义就是要维持一个人、地区、国家的生存所需要的或者指能够容纳人类所排放的废物的、具有生物生产力的地域面积。生态足迹估计要承载一定生活质量的人口，需要多大的可供人类使用的可再生资源或者能够消纳废物的生态系统，又称之为“适当的承载力”（appropriated carrying capacity）。

后记

本书是作者2004年任教中国人民大学之后所做演讲的汇编，前后时间跨度整整十年。有关宏观问题的演讲结集为上卷，有关农村问题的演讲是为下卷。为了每一章节的内容相对充实，也收入了一些2004年以前的演讲。

这十年，正好对应着一轮经济景气周期。当年的高涨动因构成今天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其实，在十年前我们就有足够的警醒；时隔十年回看当时我们在经济甫显过热征兆时的这些判断，感慨着所谓不幸言中！客观规律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着，也许这是“形势比人强”的另一种解释？

这十年，作者因为跻身高校而有了更多的理论升华的条件。收录于本书中的这些演讲内容，也是作者这十年间承担的十个国家级纵向课题中（其中包含三个重大、两个重点、两个应急项目）有关宏观形势的研究成果面向一般听众的“去学术化”表达，也算是这些国家级课题的通俗版报告。一般读者不大会去看那些课题报告，但仍然可以在这些演讲中了解我们的思考。

是故，谨对这些课题所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作为国家综合安全基础的乡村治理结构与机制研究”（14ZDA06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完善社会管理与维护社会稳定机制研究——农村对抗性冲突及其化解机制研究”（07&ZD048）、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建设与机制创新研究”（07JZD000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重点和政策研究”（06AJY003）、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城乡二元结构下改善社会治理研究”（15FXA00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任基金项目“中国农村城镇化进程与对策研究”（7994101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任基金项目“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与管理问题研究——制度创新·组织创新

与农民本位”（7064102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粮食金融化与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研究”（14BGJ048）、教育部人文社科应急项目“通过新农村建设促进国际金融危机条件下中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2009JYJR023）、教育部人文社科普及读物项目“中国工业化历程简明读本”（12JPJ013）。

除了获批如此多的国家级课题之外，我们这个坚持“不唯书不唯上”的科研团队的研究成果，及其由理论联系实际转化出的教学业绩，得到了8项省部级以上的奖励：

2009年和2013年分获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2012年和2014年连续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13年先后获得江苏省首届政府出版奖以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提名奖、“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等国家奖；2015年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相当于国家级奖）。

这十年，为了配合国家2003年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三农问题重中之重”、2004年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以及2005年确立的“新农村建设战略”，我们的乡村建设运动及科研实践团队从酝酿到全面实施的过程中保持着积极的态度。作者在这个战略转型期间不仅多次出席国务院召开的重大问题座谈会，而且直接把中国向生态文明转型的理念率先用于实践：先是依托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几十个乡村建设试验区，对农村的现实情况进行一手的、介入性的试验观察和资料获得，接着又在西南大学和福建农林大学组建了乡村建设学院，很多年轻学者和社会各界志愿者加入其中，共同开展多学科的理论创新。

有鉴于此，本书观点的形成、创新和渐成逻辑体系，既是因应宏观形势演进的理论需求，也是呼应各地实践中的乡村建设工作对既有理论的不断更新需求。这些从乡土社会反馈回来的问题，极大地深化和丰富了我们对于中国社会从宏观格局到微观结构的认知。他们一次次地提醒我们，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但是，由于形势所需，我们在2015年先完成整理出版的是宏观问题演讲，是为这十年演讲录的上卷。2016年下半年准备出版的下卷，主要是关于“三农”问题与乡村治理领域的演讲。

这十年，和我一同开展理论建设和乡村建设工作的整个研究团队付出了太多的艰苦努力。他们中有的在十多年前就一同对现代化、全球化

进行反思，有的现在仍然承担着繁重的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任务。因此，借此演讲录出版之机，不仅是向团队成员表示感谢，而且是要表明这个演讲录凝聚了很多人的成果和心血，是我们这个创新团队的集体思想表达。

这一个十年中，我们纪念了辛亥百年，那是被主流定义为阶级革命的激进斗争历史。这一个十年中，我们也纪念了“百年乡建”，那是非主流的各界广泛参与的社会改良史。改良者自然不会排斥主流，但也不会苟同。作者在演讲中对于主流的激进及其造成的甩给社会承载的代价多有分析，唯望两种历史叙述能互补，则善莫大焉。记得中共开始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要加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都是在本演讲录起始的2004年。尽管对于往事，我们仍然习惯以革命者的身份去讲述和追忆，但执政者当下所面临的考验，又往往不期然而然地重复着从前的轮回。虽然历史总像有着超强的记忆力总是一遍遍地重复某些故事，而我们身为故事中的人，倒往往健忘……

下一个十年，我们将迎来新文化运动和共产党诞生的两个百年纪念，诚愿中国人的思考能如本书名所言——告别百年激进。由此，而可以有更多的思想和理论创新……



解构现代化

温铁军演讲录

DECONSTRUCTION OF MODERNIZATION

THE SPEECH OF WEN TIEJUN

温铁军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東方出版社

版权信息

解构现代化：温铁军演讲录/温铁军著.—北京：东方出版社，2020.8

ISBN 978-7-5207-1548-5

I.①解……II.①温……III.①中国经济-文集IV.①F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93803号

解构现代化：温铁军演讲录

（JIEGOUXIANDAIHUA: WENTIEJUNYANJIANGLU）

作者：温铁军

责任编辑：吴晓月

出版：东方出版社

发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北里51号

邮编：100028

印刷：北京市大兴县新魏印刷厂

版次：2020年8月第1版

印次：2020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660毫米×960毫米　1/16

印张：27.5

字数：300千字

书号：ISBN 978-7-5207-1548-5

定价：65.00元

发行电话：（010）859246638592464485924641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请拨打电话：（010）8592460285924603

目录

版权信息
“国仁文丛”（Green Thesis）总序
再版序言
第一部分 全球化危机与现代化困境
第一章 全球化与世界法西斯主义
一、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矛盾
二、谁反对全球化？
三、全球化与世界法西斯主义的复苏
第二章 重复欧美经验？——无法复制的现代化
一、全世界最好的投资机会在中国
二、不可重复的西方现代化经验
三、中国的出路：加强区域一体化
第三章 不破不立：解构现代化
一、题解：关于感性认识
二、反思：在调研中重新认识世界和中国
三、转变：由“四个现代化”到“科学发展观”
四、溯源：西方现代化的真相
五、强权政治：资本经济时代唯一不能替代货币的信用来源
六、从不怀疑“翻两番”
七、我们到底要什么
第四章 中国的战略转变与工业化、资本化的关系
一、两个约束条件下的国家工业化资本积累
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两个相似现象
三、一场战争引发的战略转变
四、农村改革的动因是政府退出
五、改革开放的成果：三个重大制度的转变
六、中国有第三条道路吗？
附：讨论
第五章 中国能再争取20年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吗？
一、冷战以后美国的战略调整
二、从国际冲突的历史解构西方现代化
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四、守拙：重大国际变局下的唯一选择
附一：中国改革走的是“第三条道路”
一、中国制度与西方式的私有化制度不同的历史根源
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危机的成因
三、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与发展
附二：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
一、国家工业化时期的资本原始积累
二、中国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比较分析
三、国家资本再分配是民间资本再积累的基础
第二部分 “三农”问题：百年回望与新世纪展望
第六章 我的困惑
一、怎么理解中国在遍地小农经济的条件下追求农业现代化？
二、农业经济科学是伪科学？
第七章 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
一、16年的试验证伪
二、为什么叫“三农”问题？
三、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
附：提问
第八章 “入世”与中国“三农”问题
一、题解：“入世”影响的是农业还是“三农”？
二、背景：GATT向WTO转变的深层次原因
三、中国想要加入WTO的原因
四、利弊：WTO与中国“三农”问题的讨论
五、选择：应对“入世”挑战的另一套政策
附：现场问答
第九章 解决“三农”问题的五大政策
一、“今天的你我重复昨天的故事”
二、“五大政策”解决“三农”问题
第三部分 若干重要问题的去意识形态化讨论
第十章 集建入市的交易成本与垫底制度——关于农地制度创新的思考
一、交易成本决定土地制度
二、土地现在是并且将越来越是农民的保障
三、土地基本制度不能轻易言动
第十一章 “非典”引发的危机与改革
一、回顾过去：为了不再意识形态化地讨论“非典”

二、在危机发生时，最有效的应急防范体制
三、“后SARS”的讨论：改革机会与方向
附：问答
第十二章 财政支农的概念和问题
一、澄清概念
二、中国“入世”以后的问题在哪里？
三、“分盘子”体制：导致乡村公共负债问题的罪魁祸首
四、财政支农的台湾经验
第十三章 找不到大学，找不到教授——教育作为“第三产业”的投资、收益与风险
一、为什么教育投资在中国会有比较高的回报？
二、投资教育领域的交易成本和投资风险
三、终极困境
第十四章 浅谈时尚话题：公司治理结构问题
一、从背景提问：美国的金融危机与公司治理结构问题是否有关
二、分析：西方企业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三、中国的金融风险防范与公司治理问题
第十五章 农村财税、金融改革和贫困问题
一、关于中国农村的税费改革问题
二、关于农村的合作金融问题
三、关于西部农村贫困问题
第十六章 面向小农经济的资金、市场与政策问题
一、银行商业化改革与农户资金需求高度分散的相悖
二、农村市场的成功与困境
三、适宜小农经济和中国国情的政策思路
第十七章 西部开发的两个思路
一、西部大开发≠西部大开放
二、西部应该争取的政策
第十八章 毕节扶贫开发
一、扶贫投资与财政体制问题
二、基层组织薄弱与制度空白问题
三、资源短缺与需求约束问题
四、四点建议对症下药
第四部分 乡村建设与乡村试验
第十九章 我们还需要乡村建设

一、无法复制的现代化
二、去伪寻真：中国仍然是小农经济国家
三、工业化与被剥夺的农民
四、不谈主义，只谈问题
五、解构政府“守夜人”
六、重谈乡村建设
七、农民最懂
八、再谈解构现代化
第二十章 改造我们的学习
一、重要：为什么强调“改造我们的学习”？
二、亮剑：全面提高对农村改革试验的认识水平
第二十一章 发达地区农村改革问题
一、农村现代化的实质：农村资源的资本化
二、农村现代化进一步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三、跨越障碍：解决问题的试验设计
四、八个重点：农村现代化纲要和实施方案
第二十二章 芜湖土地流转
一、农村建设用地流转试点的重大意义
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几个问题

“国仁文丛”（Green Thesis）总序

因为有话要说，而且要说在我们团队近期系列出版物的前面，[1]所以写总序。

我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从被动实践中的主动反思到80年代以来主动实践中的主动反思，经两个“11年”在不同试验区的历练，[2]加之后来广泛开展国内外调查和区域比较研究，且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自忖有从经验层次向理性高度升华的条件，便先要求自己努力做到自觉地“告别百年激进”，[3]遂有新世纪以来从发起社会大众参与改良、对“百年乡建”（rural reconstruction）之言行一致地接续，而渐趋达至“国仁”思想境界，亦即一般学人必须“削足”才能跟从制度“适履”、但只要纳入主流就碍难达到的“实践出真知”。

因此，我在2016年暑假从中国人民大学退休之际，要求为今后几年的一系列出版物担纲作序，也主要是想明了指出“国仁文丛”何词何意，亦即：这个丛书是什么思路和内涵。

一、释义之意

“国”者，生民聚落之域也。“上下五千年”是中国人开口就露出来的文化自豪！就在于，人类四大文明古国除了中华文明得以历经无数朝代仍在延续之外，其他都在奴隶制时代以其与西方空间距离由近及远而次序败亡。由此看中国，唯其远在千山万水之隔的亚洲之东，尤与扩张奴隶制而强盛千年的西方相去甚远，且有万代众生勉力维护生于斯而逝于斯之域，“恭维鞠养，岂敢毁伤”，兹有国有民，相得益彰。遂有国民文化悠久于国家存续之理，更有国家历史传承于国民行动之中。

“仁”者“爱人”，本源于“仁者二人也”。先民们既受惠于光风水土滋养哺育的东亚万年农业，又受制于资源环境只能聚落而居，久之则族群杂处，而需邻里守望、礼义相习，遂有乡土中国仁学礼教上下一致维系大一统的家国文化之说，于是天下道德文章唯大同书是尊。历史上每有“礼崩乐坏”，随之社会失序，必有“国之不国，无以为家”。是以，“克己复礼为仁”本为数千年立国之本，何以今人竟至于“纵己毁礼为恶”……

致使梁漱溟痛感“自毁甚于他毁”的现代性为表、横贪纵欲为里之巨大制度成本肆无忌惮地向资源环境转嫁而至人类自身不可持续！

据此可知我们提出“国仁”思想之于文丛的内涵：

中国人历史性地身处三大气候带覆盖、差异显著的复杂资源地理环境下，只有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各类社会群体兼收并蓄、包容共生，才能实现并绵延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性可持续。

这个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其中的、在亚洲原住民大陆的万年农业文明中居于核心地位的“群体文化”内核，也被老子论述为“阴阳之为道也”，进而在漫长的文化演进中逐渐形成了极具包容性的、儒道释合一的体系。[4]

由是，在21世纪初重启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之后，我们团队试图把近代史上逐步从实践中清晰起来的乡建思想，寻源上溯地与先贤往圣之绝学做跨时空结合，归纳为人类在21世纪转向“生态文明”要承前启后的社会改良思想。[5]

是以，“道生万物，大德中庸。上善若水，大润民生。有道而立，大象无形。从之者众，大音希声”。[6]此乃百年改良思想指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之真实写照。

基于这些长期实践中的批判性思考，我们团队认同的“国仁文丛”的图形标志，是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那个可与西方文明对照的、扭合在一起的蛇身双人——创造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的女娲，只有和将阴阳八卦作为思想工具“格物致知”了人类与自然界的伏羲有机地合为一体，才有人类社会自觉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繁衍。蛇身双人的扭结表明，在中国人传统思想中物质与精神的自然融合，得益于多样性内在于群体文化规范，而不必指人欲为“原罪”而出伊甸园[7]；也不必非要构建某一个派别的绝对真理而人为地分裂成唯物与唯心这两个体系，制造出“二元对立结构”的对抗性矛盾。

此乃思想理论意义上的“国仁”之意。

行动纲领意义上的“国仁”，十多年前来源于英文的“greenground”。

我们搞乡村建设的人，是一批“不分左右翼、但分老中青”的海内外

志愿者。[8]大家潜移默化地受到“三生万物”道家哲学思想影响，而或多或少地关注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坚持的“三农问题”——农业社会万年传承之内因，也在于“三位一体”：在于农民的生产与家庭生计合为一体，在于农村的多元化经济与自然界的多样性合为一体，在于农业的经济过程与动植物的自然过程合为一体。

据此，我们长期强调的“三农”的三位一体，在万年农业之乡土社会中，本来一直如是。告别蒙昧进入文明以来的数千年中，乡村建设在这个以农业为基础繁衍生息的大国，历来是不言而喻之立国之本。

据此，我们长期强调的三位一体的“三农”，本是人类社会转向生态文明必须依赖的“正外部性”最大的领域，也是国家综合安全的最后载体。

中国近代史上最不堪的麻烦，就在于激进者们罔顾“三农”的正外部性，把城市资本追求现代化所积累的巨大“负外部性”代价向乡土中国倾倒！于是，我虽然清楚“三农”本属于三位一体，也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和21世纪第一个10年特别强调“‘三农’问题农民为首”，主要是因为那个时期的形势严重地不利于农民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弱势群体。实际上，也就是在做这种特别强调而遭遇各种利益集团排斥的困境中，我才渐行渐知地明白了前辈的牺牲精神。大凡关注底层民生的人，无论何种政治诉求、宗教情怀和文化旨趣，总难免因慈而悲、因悲而悯，在中国百年激进近现代史中，也就难免“悲剧意义”地、历史性地与晏阳初的悲天悯人[9]、梁漱溟的“妇人之仁”等，形成客观的承继关系。据此看，20世纪初期的“乡建派学者”也许应该被归为中国最早的女性主义。[10]我们作为继往开来的当代乡村建设参与者，有条件站在前辈肩上高屋建瓴、推陈出新，不仅要认清20世纪延续而来的中国“三农”困境，而且要了解21世纪被单极金融资本霸权强化了的全球化，及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巨大制度成本的制度体系。这个令人高于前人的全球视野，要求我们建立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世界观和宏大叙事的历史观，否则，难以引领当代乡村建设运动，遑论提升本土问题的分析能力。

从2001年中央主要领导人接受我们提出的“‘三农’问题”这个难以纳入全球化的概念以来，即有一批志愿者着手复兴百年传承的“乡村建设”。部分年轻的乡建志愿者于2003年在距北京大约300公里之遥的河北翟城村创办起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一开始根本就没有外部资金投入和内部管理能力。因为这种民间力量为主的社会运动无权无钱，很大

程度要靠热血青年们艰苦奋斗。那，年轻人激情四射地创了业，也激情四射地生了孩子，老辈们就得跟上支持和维护。十多年来，有一句低层次的话多次被我在低潮的时候重复：存在就是一切。只要我们在主流随处可见的排斥下仍然以另类的方式存活下去，就证明了超越主流的可持续。在最开始跟我们一起出资、出人共同参与村里主办的乡建学院的三个村外单位中，两个是海外的机构。[11]我们在跟海外机构打交道的时候，心里就觉着，应该给这个社会广泛参与的乡建运动将来可能形成的可持续生存系统，提出一个可以做国际交流的概念，一个符合21世纪生态文明需要的、大家可以共享的名号。于是就跟海外志愿者们商量，提出了这个英文概念“greenground”。若直译，就是“绿色大地”；若意译，则是“可持续基础”。如果把音译与意译结合起来考量，那就是“国仁”。有国有仁，方有国人国祚久长不衰。

从十多年来的乡建工作看，这三个意思都对路。

二、文丛之众

俗话说，三人为众。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如此看文丛，乃众人为师是也。何况，我们在推进乡村建设之初就强调“去精英化”的大众民主。[12]

前几年，一直希望整个团队愿意理解我试图“让当代乡建成为历史”的愿望。尤其希望大家能够结合对近代史中任何主流都激进推行现代化的反思，主动地接续前辈学者上一个世纪之交开始的乡村建设改良运动，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梳理经验教训。或可说，我“野心勃勃”地企图把我们在新的世纪之交启动的新乡建运动，纳入百年乡建和社会改良史的脉络。诚然，能够理解这番苦心的人确实不多。[13]

这几年，我也确实算是把自己有限的资源最大化地发挥出来，“处心积虑”地安排乡建志愿者中有理论建设能力的人在获取学位之后分布到设有乡建中心或乡建学院的不同高校，尽可能在多个学科体系中形成跨领域的思想共同体。目前，我们在海内外十几个高校设有机构或合作单位，有数十个乡村基层的试点单位，能够自主地、有组织有配合地开展理论研究和教学培训工作，立足本土乡村建设的“话语体系”构建，已经有了丰硕成果。[14]

总之，我们不仅有条件对新世纪已经坚持了15年的“当代新乡建”做

个总结，而且有能力形成对20世纪前辈乡村建设运动的继承发扬。

我们团队迄今所建构的主要理论创新可以表述为以下五点。

一是人类文明差异派生论。气候周期性变化与随之而来的资源环境条件改变对人类文明差异及演化客观上起决定作用。据此，人类文明在各个大陆演化的客观进程，至少在殖民化滥觞全球之前应是多元化的，不是遵循在产业资本时代西方经典理论家提出的生产方式升级理论而展开的。这个理论有助于我们构建不同于主流的生态化历史观。

二是制度派生及其路径依赖理论。不同地理条件下的资源禀赋和要素条件，决定了近代全球化之前人类文明及制度的内生性与多元性，也决定了近代史上不同现代化的原始积累（东西方差异）途径，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和体系结构，并构成其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这也成为我们开展国别比较和区域比较研究的重要理论工具。

三是成本递次转嫁论。自近代以来，在全球化所形成的世界体系中，核心国家和居于主导地位的群体不断通过向外转嫁制度成本而获取收益，得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实现产业资本扩张和向金融资本跃升，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底层民众则因不断被迫承受成本转嫁而深陷“低水平陷阱”难以自拔。当代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因不同利益取向而相互竞争的金融资本为主导、递次向外转嫁成本以维持金融资本寄生性生存的体系。在人类无节制的贪欲面前，最终承担代价转嫁的是“谈判缺位”的资源和生态环境，致有人类社会的不可持续之虞。

四是发展中国家外部性理论。二战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通过与宗主国谈判形成主权，这可以看作一个“交易”。任何类型的交易都有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因转交交易范围之外的经济和社会承载而为外部性问题，任何信息单方垄断都在占有收益的同时对交易另一方做成本转嫁，由此发展中国家谈判形成主权必有负外部性，导致难以摆脱“依附”地位。但，越是一次性博弈则风险爆发造成谈判双方双输的可能性越大，发达国家在巧取豪夺巨大收益的同时，其风险也在同步深化和加剧。

五是乡土社会应对外部性的内部化理论。中国作为原住民人口大国中唯一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其比较经验恰恰在于有着几千年“内部化处理负外部性”的村社基础，其中的村社理性和政府理性构成中国的两大比较

制度优势。但政府同样是人类制造出来但反过来统治人类自身的成本高昂的异化物。遂有政府与资本相结合激进推进现代化之后严重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环境等负外向性问题，成为中国通往可持续的严重障碍，才有如此广泛的民众愿意参与进来，以期通过乡村建设使“三农”仍然作为中国危机“软着陆”的载体。

以上五点核心思想，主要体现于我们基于“本土化”和“国际化”两翼而展开的以下五个领域的研究工作中。

一是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在资本主义三阶段——原始积累阶段、产业资本扩张阶段和金融资本阶段，核心国家/发达国家总是不断以新的方式向外转嫁制度成本，乃是全球化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给资源环境可持续带来的最大挑战。这个思想，在我们的主要课题研究中，作为全球宏观背景，都有所体现，也发表在我们关于全球资本化与制度致贫等一系列文章中。

二是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团队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构建了“南方国家知识分享网络”，开展了“新兴七国比较研究”和“南方陷阱”等发展中国家的深入研究。目前正在进行比较研究的新兴七国包括中国、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委内瑞拉、南非、土耳其。已经发表了有关文章和演讲，两部专著也在整理和修改之中。

三是国内区域比较研究。中国是个超大型国家，各区域的地理条件和人文环境差异极大，对各区域的发展经验进行研究、总结和归纳，是形成整体性的“中国经验”并建立“中国话语”的基础。团队已经完成了苏南、岭南、重庆、杭州、广西左右江、苏州工业园区等不同地区的发展经验的分析。已经发表了多篇文章，形成的专著也获得多项国家级、省部级出版奖和科研奖。

四是国家安全研究。国家综合安全是当前面临“以国家为基本竞争单位的全球化”的最大挑战。基于国际比较和历史比较，团队研究表明了新中国通过土地革命建立政权与其利用“三农”内部化应对经济危机之间的相关关系——从历史经验看，新中国在其追求“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道路上，已经发生了九次经济危机，凡是能动员广大农村分担危机成本的，就能实现危机“软着陆”，否则就只能在城市“硬着陆”。团队正在开展的研究是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为依托，探讨如何从结构和机制上改善乡村治理以维护国家综合安全。

五是“三农”与“三治”研究。我们自提出“‘三农’问题”并被中央领导人接受之后，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来研究乡村“三治问题”（指县治/乡治/村治）。自20世纪80年代农村去组织化改革以来，作为经济基础的“三农”日益衰败，而作为上层建筑的“三治”成本不断上升，二者之间的错配乃至哲学意义上的冲突日益深化！其结果，不仅是农村大量爆发对抗性冲突，陷入严重的不可持续困境，还在生态环境、食品、文化等方面成为国家综合“不安全”的重要“贡献者”。比形成对问题的完整逻辑解释更难的，是我们如何打破这个“囚徒困境”。也因此，任何层面上的实践探索都难能可贵，即使最终被打上“失败”的标签，也不意味着这个唐·吉诃德式的努力过程并不重要，更不意味着这个过程作为一种社会试验没有记录和研究价值。

综上，“大乡建”体系之中从事研究的团队成员众多，且来去自由，但混沌中自然有序，我认为团队在这五个领域的思想创新，在五个方面所做的去西方中心主义、去意识形态的理论探索，已经形成了“研究上顶天立地，交流上中西贯通”的蔚然大观。仅“国仁文丛”的写作者就有数十人，参与调研和在地实践者更无以计数，收入的文字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创新性，且不拘一格。如果从我20世纪80年代就职于中央农研室做“农村改革试验区”的政策调研和国内外合作的理论研究算起，我们脚踏实地开展理论联系实际的科研实践活动已经数十年了。其间，团队获得了十多项国家级“纵向课题”和数十项“横向课题”，获得了十几项省部级以上国内奖及一项海外奖。在高校这个尚可用为“公器”的平台上，我们团队通过这些体现人民大学“实事求是”校训的研究和高校间的联合课题调研，已经带出来数百名学生，锻炼了一批能够深入基层调研，并且有过硬发表成果能力的人才，也推进了分散在各地城乡的试验区的工作水平。

由此看，当代大乡建由各自独立小单位组成，虽然看上去是各自为政的“四无”体系——“无总部、无领导、无纪律、无固定资金来源”，却能“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做出了一般海外背景或企业出资的非政府组织“做不到、做不好、做起来也不长久”的事业。诚然，这谈不上是赞誉我们团队的治理结构，因为各单位难免时不时发生各种内部乱象。但，乡建参与者无论转型为NGO（非政府组织）还是NPO（非营利组织），都仍愿意留在大乡建之中，否则再怎么干得风生水起也难有靠自己的思想水平形成“带队伍”的能力！若然，则乡建改良事业得以百年传承的核心竞争力，恰在于“有思想创新，才能有人才培养，才有群体的骨

干来带动事业”。君不见：20世纪乡村建设大师辈出、试验点竟以千数，21世纪新乡建则学者咸从、各界群众参与者更有数十万！

这就是大众广泛参与其中的另一种（alternative）社会历史……

由此看到：发展中国家为主的“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提出的口号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而在中国，我们不习惯提口号，而是用乡建人的负重前行，在大地上写下“另一个世界就在这里”（another world is here）。

人们说，20年就是一代人。从2001年算起，我们发扬“启迪民智，开发民力”的前辈精神，在新世纪海内外资本纵情饕餮大快朵颐中勉力传承的“大乡建”，作为大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改良事业已经延续15年了！再坚持5年，就是一代人用热血书写的历史了。

作为长期志愿者大家都辛苦，但也乐在其中！吾辈不求回报，但求国仁永续。唯愿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投身其中的乡建事业，在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中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以此为序，上慰先贤；立此存照，正本清源。

温铁军

丙申年甲午月

公元二〇一六年六月

再版序言

《解构现代化》再版于2020庚子年[15]春夏之交。

值此“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挑战之时，东方出版社和我的科研团队把这本早期演讲录进行修改增删后重新推出，可谓恰逢其时！因为，出于比较研究之目的，此书再版时收入了我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的部分文章和讲座，那时正值以苏联为代表的本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中国也处于内外交困时期——国内1988—1989年滞涨危机正在发生之际，遭到美国带领的西方国家于1989年6月启动的“全面制裁”；随之是工业化加快必然追求“资本增密”的20世纪90年代，多次发生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导致的经济危机，这也引发了大量维稳事件……可见，再版此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更在于帮助那些关注我的后来者，从中看到上一代人遭遇重大变故时的思想演变，而我们的问题意识，也确实是在客观世界的复杂演化之中逐渐清晰起来的。

也许是基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客观性，我们的科研实践团队才有新世纪以来在社会上一以贯之的影响力。在今年5月份对新时代乡建20年经验的总结讨论过程中，我们认识到，前后衔接的两代人的思想理论之所以逐渐结构化，是因为我们身历其境地体验了国内外复杂背景下中华民族的凤凰涅槃全程！我们在2020年这个世界变局中，没有随波逐流地按照西方中心主义传统话语“人云亦云”，而是坚持对本土问题进行“实践出真知”的调查研究，因而有了对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阶段的客观记述和分析。似乎，作为承上启下且身历其境的研究者，我们比正在成为主导力量的学术新生代有更多求真知的条件，能够直接在重大历史演变中形成更清晰的问题意识。

这也是我同意再版这本演讲录的原因。

本书定名为《解构现代化》，所谓“解构”，须让现代化理论回到与其被称为“理论”的那个时空条件相同的环境下，才能了解其被验证的程度；而这个同等条件下的验证程度，体现的才是该理论的科学程度；后来者只有把握了理论的科学程度，才不至于在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陷

入对过去观点差异的无休止争议中。想到此，我还是一如既往地把作序当作发言机会。

一、我们身处其中的时代演变："冷战""后冷战"与"新冷战"

此书再版时，正值美国发起的"新冷战"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中演化为世界乱象之际——体现着人类现代性最高层次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及照搬西方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大都轮番上演着生存还是灭亡的"哈姆雷特之问"，令人目不暇接；与东亚从"封城"到"封国"、秉持生民为本对应的，是"不自由，毋宁死"的欧美自由主义政治文化内含的、被进化论"丛林法则"所认同的弱肉强食。这种弱肉强食表现为放弃对疫情的控制，听任"群体免疫"的发展，不对"老弱病穷"承担救治责任，从而导致富人无虞而大批"低端人口"（lowlife）被疫情消灭……

于是，"新冷战"照搬的旧意识形态倏忽之间坍塌！遂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被迫陷于最高死亡率的"低端人口"，在体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地区符合规律地发生了"颜色革命"！

这个现象似曾相识——我这个年纪的人都记得，在以美苏对抗为主的"冷战"最紧张的20世纪60和70年代，以非裔美国人为主的各类社会群体，举行过以反"种族主义"为名、以反抗压迫为实的大规模抗议。那时，也有很多白人和其他族裔的人民群众参与示威，也有"黑豹党"发起的暴力革命。但和平示威的群众运动领导人，是主张非暴力的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他被暗杀了！

半个多世纪过去，时过境迁，但很多当前的情况，让人觉得并不陌生。原本贫困率及犯罪率双高的底层社会群体，走上街头参加示威活动，打破了此前各类族群分别聚居的"熟人社会"尚有的"非规范约束机制"，愤怒的人群一旦离开本社区，则不可避免地在大城市的商业区上演打砸抢烧的动乱……

若非亲身经历，很难体会我们失去话语权之后的尴尬。即使仍然保留着客观求实的基本常识，我们也会看到，在疫情对任何体制的国家都同样是巨大挑战的条件下，显露出来的东西方矛盾是明显的——西方长期"生产不足"而"话语过剩"，与之对应的则是中国长期"生产过剩"而"话语不足"。原殖民化宗主国各行其是，原殖民地国家则纷争频仍，世界乱

象大致是在西方长期主导的殖民化区域翻云覆雨，不仅加重了资本主义全球化趋于解体的危机，而且在美国大选年催生了“俄狄浦斯”[16]式的悲剧。

被疫情所催化的全球供应链断裂，将会造成全球化解体，这对那些已经在全球一体化之中获益的实体企业来说，确实是灾难；但是，对美国单极霸权的维护者而言，却“机会难得”！一方面，美国金融资本集团借机推行“币缘”战略主导的全球产业“区域一体化”重组，既要实现美元结算体系“去中国化”，又要使全球生产体系的战略性部门和中国“硬脱钩”；同时，又要借助“冷战”意识形态发起软实力进攻，配合巧实力策动各类乱华运动，达到阻遏中国崛起，甚至肢解中国的战略目的。另一方面，由于美国贸易逆差和债务率双高趋势恶化，虽然美联储也像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那样，再次更大规模地增发货币，搞无底线“量化宽松”，但却因全球都遭遇疫情打击，而不可能再顺畅地对外转嫁成本，来化解其内部危机，遂只能在大选年党争白热化压力下，强行复工复产。

“人算不如天算！”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新自由主义推行金融资本全球化，这样搞了30多年，造成内部分化加剧，派生了社会治理失序条件下的疫情防控困境，拒绝担责的政治家们把疫情过分政治化，荒唐对外“甩锅”，造成官方、民间都在“大规模聚集”——官方为了维持低层次民粹主义，而举办大型竞选集会，搞政治动员；民间则因失业人数超过“大萧条”，低阶层族群纷纷加入街头示威。这两类内生于现行制度的“大规模聚集”，客观上都导致了疫情的扩散，使得防疫专家多次警告的疫情恶化成为事实。尽管其人口规模小于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医疗条件好于全球任何其他国家，但疑似、确诊和死亡人数均为世界之最……

这一切，都表明美国这个资本主义核心国家长期累积的制度成本已经“对内转嫁”！萨米尔·阿明的金融资本恶性扩张造成两极分化最终“内爆”的理论，正在成为现实。

这些此前无法预料的情况，不仅多角度地验证着国内“庚子年必有灾变”之定数，而且，鉴于西方资本主义体系达到的最高境地——“全球一体化”，显然已经败于疫情及其导致的大危机。海内外舆论大都认为，2020年是全人类社会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起点。

因此，就要先对“冷战”以来的不同历史阶段做背景分析。

西方文明主导的人类资本主义历史，在“二战”之后的20世纪40年代中期，进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分割世界、全面对峙的“冷战”阶段，把世界变成了以“意识形态”配套地缘政治的两大帝国主义体系。“冷战”产生的因“内在具有政治正确”而被强权推行着的、本无任何理性可言的制度框架，被两个同属于西方的超级大国包装成“自由主义”及“社会主义”两个思想理论、教育文化体系，据以形成浸淫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制度权。

虽然“冷战”因苏联解体而演化为“后冷战”，但“冷战”所娩出的世界单极霸权体系和孪生的、在“后冷战”阶段几乎没有对手的单极霸权思想，几乎全面继承了“冷战”的制度遗产；其彰显霸气、霸道、霸权的意识形态，以及制度权和话语权体系，依然全面而深刻地统治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社会；遂使霸权国家滑入“新冷战”乃是最低制度成本的客观过程。

（一）从“冷战”到“后冷战”

对于以苏联解体为标志的、从“冷战”到“后冷战”的历史阶段性演变，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是从西化意识形态出发的、所谓理论给出的主观原因的归纳；但很少有人分析出这个事变本来就是客观规律使然。这次再版新收入的文章中，就有对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直接调研和不同于主流精英所同样归宗于西方意识形态的分析：自20世纪80年代美国引领西方国家进入“金融资本全球化”，借此加速经济货币化和资本化以来，西方经济仍然停留在产业资本阶段，坚持“换货贸易”，因而属于非货币化经济体系的苏联及东欧国家，在以GDP（国内生产总值）为经济增长标准核算体系的竞争中被动趋弱，随之进入解体过程。

更少被关注的后续演变是：1991年，苏联名号取消之后，西方资本乘势利用新自由主义构建的话语权推进“制度转轨”，把控那些政治上解体国家的庞大的、未经货币化的资源性资产的“市场化”进程，使用西方投资作为主要工具，加速“资源资本化”，从而获取巨额收益。这才是这个世界正式进入单极霸权主导“后冷战”时期的真实内涵……

将这个逻辑在空间上延展到极致的，的确是美国单极霸权所控制着的西方——因力推全球化所必需的制度权和话语权，而对试图纳入全球化、跟从发起“转轨”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势。与之对应的，是大量发展中国家因资本极度稀缺，而在产业

领域和制度体系对西方资本“大门常打开”，遂有在资本的大进大出中“醉生梦死”——醉着生，梦着死！

（二）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

我们未曾例外。“后冷战”之初，西方资本因中国发生的政治风波而加入美国发起的制裁，并大部分撤出中国，遂使20世纪80年代末期本已遭遇滞涨危机、资本极度稀缺的中国，立即在20世纪90年代之初深陷财政赤字与恶性通胀叠加的制度困境，并且，这种困境持续了整个90年代；也是在这种困境中，主流精英加快全盘西化的深改步伐。

实际上，此阶段西方政治家和媒体人，包括国内精英集团，绝大多数笃信“中国崩溃论”。

我们之所以指称中国在这个史无前例的严峻挑战下，经历了一次值得后人正视的凤凰涅槃，原因乃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苏联解体后，中国为应对美国制裁、外资撤离的危机，而在政策上鼓励地方政府吸纳一切可能进入的海外资本，那些劳动力密集型、资源破坏和环境敌对型的以“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为主的低端外向型经济，本来在过去都不可能纳入官方计划，90年代却在“改革计划体制”的过程中，迅疾在沿海各地占据了主导地位。这虽然维持了一定数额的海外资本进入国内，改善了外资“绝对稀缺”的困境，但客观上也挤占了以国有企业为主的上游设备制造业的国内市场空间，遂加剧了本来已经严重不景气的国企的“关停并转”，间接促使数千万职工“下岗分流”。同时期，此类仅靠地租和社会租生存的、以“低端制造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还催生了内地多个欠发达省区的上亿农村劳动力被“市场配置”向沿海地区和城市。这些导致中国“被全球化”的演变，在多个方面都使得中国制造业在“融入全球化”之际，日益失去自主发展的结构支撑，成为给发达国家以技术创新驱动的高端产业做零部件配套生产的“世界车间”，为其主导的“全球资本化”贡献了巨大的资源资本化收益和劳动剩余价值。

由此可见，至少在经济基础领域，“冷战”阶段的“一个世界两个体系”已经演化为“后冷战”阶段的“一个世界一个体系”——客观上看，“新冷战”的“去中国化”会给发动者造成一定程度的经济损失，强行“硬脱钩”的制度成本会恶化金融资本“内爆”代价……

另一方面，中国在“冷战”初期时的1989—1993年，遭遇西方资本撤出。资本绝对稀缺，必然导致以规律性的通货膨胀为标志的经济危机频发，并且必然派生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在这种巨大压力下，“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和政治讨论贯穿于整个90年代，也客观上回应着西方给定的“中国崩溃论”……作为有两千多年大一统制度传承、长期民族独立战争和革命史的政治国家，领导人在官方文件中仍然坚持着与革命历史内生“合法性”密切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客观作用是，经济正常运作条件下，市场发挥顺周期作用，而在大危机派生的多重挑战下，则需对已经成形的多元利益集团的国家进行宏观调控，这就只能靠“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发挥“举国体制”的比较优势。

于是就有了90年代后期，西方从“中国崩溃论”陡然转向“中国威胁论”。

对此我们的理解是：中国在遭遇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的挑战下，本来应该发生和东亚其他国家类似的资产价格暴跌、被西方投机资本涌入“割韭菜”的局面，但中国却凭借国家主权直接干预——由中央财政直接出手“剥离”了国有银行高达1/3的不良资产，再用国家外汇储备向银行注资，很快使银行得以重生。这种被西方称为“资本管制”的体制，虽然达不到“自由主义”的标准，但使所有试图通过投机获利的西方资本，在中国铩羽而归！从此，中国凭借政治主权执行的资本管制，成了阻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金融资本攻城略地的最大障碍，当然也就构成美元滥发而推进全球金融化的“主要威胁”……

此后，西方提出的“中国威胁论”愈演愈烈，也算有更多的客观依据。因为，国有银行重生之后，变成国家采取“逆周期调节”的主要抓手：配合扩大国债投资的战略投资，投放于大型基本建设。同期，为了走出外需下降造成的“生产过剩”困局，中央政府相继推出1999年的“西部大开发”、2001年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2004年的“中部崛起”等缓解区域差别的三大措施，虽然相当于借助中国版的“罗斯福新政”使以投资为主拉动的中国经济增长，演变成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但这不仅没有被西方认可，反而因资本账户管制，而被美国列为“邪恶国家”之一。

与之对应的则是国内思想领域的“自毁”演化出的混乱，这种“自毁”心态，不仅迎合着“后冷战”时期西方控制全球话语权而使国际舆论一面倒环境下的“友邦惊诧”论，甚而也被内部激进改革家自我惶恐于事实上强化了国家资本的基本制度的“妾身未名”！诚然，彼时海内外的思想

理论界及其工具化了的教育界、学术界无不屈从于“楚王好细腰”，这在中国，也或多或少地表达着名不副实的、话语权缺失的尴尬……

回顾20世纪90年代，“后冷战”阶段的中国确实“祸不单行”！

在“中国崩溃论”这个西方给定的政治结局造成的仿佛“墙倒众人推”般的意识形态压力下，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激进增长方式，不仅经历了外资撤离、内需阙如所必然造成的此起彼伏的城市产业经济危机，而且在城乡二元结构基本体制矛盾下，势必延续危机代价向乡土社会转嫁的路径，演化出数亿农民“负担过重”和“三农”问题愈演愈烈等所谓向全盘西化的现代化“转轨”的制度成本……其所派生的社会代价是20世纪末的官场腐败前赴后继、社会矛盾尖锐严峻！更有新世纪初“群体性治安事件”年增过万的现象……

简言之，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构成了中国在“后冷战”阶段无以自语、在“新冷战”之初软实力阙如的困境！

诚然，“后冷战”阶段提出并且笃信“中国崩溃论”的美国及西方其他国家，一度试图让中国“融入”西方制度体系。中国也确从20世纪90年代起，再度兴起“全盘西化”思潮，大批官员公费去西方学习考察，大量部门愿意更多招聘海归，以方便借鉴甚至照搬西方制度。然而，中国却因又“大”又“拙”，而既没“融入”，也没“崩溃”。甚至，就在美国自身发生房地产泡沫化的“次贷危机”、华尔街金融海啸，从而引发全球需求下降的更大危机中，表演了“一枝独秀”[17]的压轴戏！也就势必“树欲静而风不止”地造成西方政治舆论的根本性改变——从“中国崩溃论”改为“中国威胁论”！

（三）迟到但不会缺席的“新冷战”

从上可见，早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威胁论”问世之际，“新冷战”就呼之欲出了……这不仅与此前的“后冷战”形成演化更替关系，也与每个普通中国人的“八国联军进北京”之热战记忆隔着100年而遥遥相望……

只不过，恰在世纪之交，一场全球化大转型毫无预兆地来临了。

于是，中国人既赶上了一次机会收益，也付出了“双重输出”的巨大成本[18]。

2001年，就在美国虽然提出却没有来得及化解“中国威胁论”之际，其自身遭遇了“IT泡沫崩溃”造成的“新经济危机”和“9·11事件”——直击美国金融中心的恐怖主义政治危机。美国遂在经济和政治双重危机挑战下，把战略重点转向西亚、中东、北非。这虽然为美国的军工产业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间，但美国也不得不听任无利可图的一般实体产业，向中国大规模转移。这样做的后果有三点：一是使原本处于1998—2001年的4年通货紧缩危机下的中国，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FDI）直接跃为全球第一；二是跨国公司本来就是全球贸易，因此，刚刚加入WTO的中国当即被拉入全球化进程，并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就成为全球贸易总量和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三是中国迅疾进入连续10年保持两位数以上的经济高增长阶段（曾经在2013年被称为“黄金10年”），使其以经济成就表达政治合法性的话语建构，竟然在实践检验中得到有力支持！何况，因美国领导人的战略重点转向被“宗教极端势力”操纵的中东“恐怖主义”，中国在政治上转而被美国认作配合反恐斗争的盟友。

中国经济高增长方兴未艾，美国又遭遇2007年“次贷危机”和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这就又给以实体经济为主、正在进行货币深化改革的中国留下差不多12年的时间窗口……

延宕至2020年，美国两党政客无论有多少矛盾，在中国问题上却已经有了高度共识——既然美国确立的中国“融入”[19]策略，已经在中国反复重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并“坐大”的过程中失败，那就只能改回到“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以中国为敌”，重建所谓的“一个世界、两个体系”。美国于是要引领西方世界推动“去中国化”的“硬脱钩”，也就是以“美国优先”的“新冷战”政治策略决定其对华经济政策。但是，“新冷战”在中美现状上看都有点尴尬。

美国的尴尬在于：中国自从20世纪90年代全面“美国化”，这30年大量接受西方的投资及其产业转移，国内产业大类2/3是外资控制，跨国公司深度融入中国市场，获取高于其他国家的实际利益，早就与美国构成“一个世界、一个体系”。既然“冷战”的两个体系在经济基础上不成立，那就在客观上制约着政治对立！

而中国的尴尬在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及扶持其在2016年获胜的竞选团队的主要智囊，都是“冷战”的亲历者，享受过整垮苏联及东欧，并将其未被货币化的巨额资源纳入全球资本化所带来的巨大制度收益！因此，这些人根本就不在乎重建冷战政治格局会对美国经济造成短期损

失。而中国占据主流决策地位的精英群体，大部分受教于“灭国先灭史”的西化教育体系，更鲜有亲历“冷战”者，且国内早就在知识传播中，淡化了老一代应对美苏冷战期间先后封锁中国的斗争经验！因此，那种教条化的软实力斗争就会屡战屡败，若不深刻调整，则在“新冷战”话语竞争中几乎没有胜算。

由此，才需要作者毛遂自荐地对此书的思想性及对当下的现实意义做个提示。

自20世纪80年代末内外交困以来，三十余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此刻的中国主流社会，再次虽自身极不情愿，但却显然无可奈何地被西方“硬脱钩”，且更深憾于没有早些解决“妾身未名”的基本制度问题。虽然领导层头脑清醒地指出我们置身于“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上层建筑却因失去话语权久矣，而无法跳脱出西方主导全球化所给定的思维模式。于是人们看到，不仅依据“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所谓“经济理性”派生的思想反应及其演化出来的各种议论，确乎莫衷一是；而且，其多年试图推行的参照西方金融资本运作模式的激进化制度转轨，也因疫情抑制GDP的增长，被领导集体再度借追求增长速度而加快推出。

二、关于本书的一些说明

身处大变局之中，我们团队刻意地要求自己不被外部环境左右，坚持做“客观研究”，而成为一股“清流”。虽然书中收入的我在官方试验区培训讲课中的很多观点和内容，大都顺遂于当年的政策导向，但我们这几十年来的基调仍然是，不敢贸然认同激进地与西化全面接轨。由此，我们到乡村基层操作的试验研究成果，以及建基于试验证伪得出的思考，也无疑地不同于主流精英群体。因此，在此“新冷战”爆发之际，有更多的与基层实践联系紧密的人愿意参考我基于广泛的实地调研和比较研究所形成的看法。

（一）内容来源

初版《解构现代化》是2000—2004年的演讲辑录。后来能够直接与此书对接的是2016年出版的《告别百年激进》，后者辑录的是我去中国人民大学担任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首任院长到2014年辞去院长职务这10年的演讲中的宏观部分。有兴趣的读者如果愿意把前后两个阶段的两本演讲录连起来看，则会对我这几十年的思想脉络有个相对完整的了

解。

诚然，2014年美国结束“量化宽松”以后，原材料和能源出口国家应声落马，世界经济全面萧条，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严重不景气，中国也进入第二轮外需下降引发的“生产过剩”周期。加上美国2016年换届之后，当即针对中国做出根本性战略调整，国内外风云变幻，局势更加复杂严峻；对此，人们也更加需要对官方推出的“工业供给侧改革”，从客观实际出发，做“去意识形态化”的、平和而客观的解读。其间，我应邀去各地和海外做的演讲次数随之大量增加，仅2019年就有60次之多！这也造成各方面人士收集到的录音稿在内容和观点上多有重复。若读者需要，我再把2014年以后的演讲编辑出版，则需删繁就简、认真整理；那就还得等团队中有人腾出手，才能做成书。

（二）观点更新

学无止境，何况我本来就没有立志坐冷板凳去搞“学问”，只不过是在农村试验研究中成了个误打误撞地涉足思想理论领域的莽汉；之所以在思想界众说纷纭之中，还能够对读者，特别是对年轻人有一定的影响，也许恰在于我的思考本来就形成于调研和实践，本来就是接地气且与时俱进的。换句话说，我本来就没有所谓学科理论体系的约束，根本就不会像“规范研究者”那样遵循舶来的学科体系和给定的理论框架，“学术化”地解释客观世界；因此，希望在学科研究中，严谨著述的学问家们原谅我们在理论上的莽撞和在表达上的粗糙。

因为与时俱进，我在《解构现代化》初版问世之后的调查研究中，不断地纠正、修改或充实了过去的很多观点，出书乃为存照，只能做技术性调整；而在序言中则有必要挂一漏万地对读者交代一下这些年的思想更新。

1.关于农业问题

我在世纪之交向领导人提出“三农”问题的时候就强调：“三农”问题必须把农民排在第一位；要是从中国历史上看，农业问题本来是派生的，因为有了农民家庭聚居于农村社区之中，才产生出维持其家庭乃至氏族村社可持续生存的农业问题。在初版的《解构现代化》里，乃至一个时期以来我的大多数著作中，都是这么说的。但我们团队后来对这个观点有了很大调整。此书出版10年后，在关于“生态文明”与“三农深

改”的讨论中，我们提出了“从农业1.0到农业4.0”的分析，形成了更深入一步的认识：诚然，农业问题在乡土社会中一般是被农民和农村问题派生出来的，这与后来形成共识的农村是“三生合一（生态、生活、生产）”的归纳在内涵上一致；但放到人类自觉不自觉地追求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以国际比较的视野来看，则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业被作为“第一产业”，都是工业化派生的；随之，在金融资本主导下，这种“一产化”的农业也是金融化派生的，都是要“资源资本化”。然而，在生态文明战略转型之下，农业作为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传承的载体，当之无愧地成为“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尤其在中国告别资本短缺，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农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有着远比过去丰富得多的开发空间；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确立，以农业为基础的生态化空间资源开发的“六产融合”，也迫切需要有新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显然，我们强调这些“非常名”都不是“农业生产问题”和“第一产业”等“常名”所能涵盖的……

2.关于城乡二元结构

我们过去在政策研究体系中理所当然地接受和使用的观点，在没有被大量的实践去做“证伪”之前，很多是符合或体现所谓现代性的西方主流思想的，而我们当时还没有来得及清理思想意识。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城乡关系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把城乡二元结构作为对立矛盾，来做比较消极意义的分析。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我们也认同“只有减少农民、加快城市化，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政策主张。而对现代性的反思，是在大量开展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之后才逐渐形成的；我们现在对于中国这种发展中原住民大国长期化的城乡二元体制的认识，则有实质性差别。差别如下。

一是逐渐在实践中去激进化，从危机软着陆的分析中认识到，乡土中国客观具有危机软着陆载体的作用。

二是认为其与西方一元论哲学为依据描述的城乡二元结构，具有本质上的不同。西方城乡二元结构理论主要来自大多数殖民地化的非原住民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那里的城乡因被跨国资本占据资源开发权，而具有资本主义主导的殖民地经济的同质性。据此，所谓二元结构是乡村社会被跨国公司摧毁，造成贫困人口“空间平移”，进入城市贫民窟，遂有贫富差别固化，最终，西方与发展中国家构成“中心—边缘关系”的宿命！

三是在比较研究中发现，相对而言，在未被殖民化的、以原住民为主体的、未进入现代化的东亚国家，所谓的城乡二元结构是相对平等且可以互相转换的二元，恰如太极图中的阴阳两极。城乡经济社会文化不同质、治理不同构，按照各自所处条件的需要，有更多的制度选择余地。反观在东亚华人社会里被殖民化得比较彻底的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虽然发达到只有城市而没有乡村，不再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但照样有贫富二元结构。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被打击的主要是其弱势贫困群体：新加坡2020年4月份以来的新冠肺炎确诊数的高速增长，主要暴发在外来打工者以低租金租住的组屋；而中国香港的疫情也是暴发在低收入者居住的出租屋。

但是，中国近年来“资本下乡”势不可当。名为“城乡一体化”，实为自毁长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下到乡村。金融资本支持房地产资本大量进军县域经济，一些地方政府不惜以增加负债、向后任和向中央“甩锅”的方式，来配合投机资本占有乡村资源，以实现“资源资本化”的获利！遂有各地普遍性地“集村并镇”、跨区出让“集体建设用地指标”来牟利；有关部门集中上收本属乡村的教育和医疗资源，迫使农民把户口转到中心城镇才能让孩子上学、老人看病，同时为地产商们消化掉过剩的县域房地产泡沫。这相当于有关权力部门向农民直接转嫁四线以下“加快城市化”的所谓现代化成本……

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已经发生稀缺要素回流“三农”领域的可喜变化，市民下乡与乡贤返乡也已经蔚然成风。近期与之相关的是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受疫情影响而反思，把晴耕雨读解释为“晴则耕于城市赚钱，雨则安于乡野修心”。

确实，只有乡土中国成为“海绵社会”的可持续基础，才能具有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作用。

基于以上观点调整，我们对中国领导人近年来提出的“城市化与逆城市化相辅相成”持积极评价，高度认同官方正在推动的“城乡融合战略”；这些重大的政策思想创新，都应该融入新确立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方针。

3.关于“成本转嫁论”

这个概念是我们团队多年来的研究成果的重要归纳。这些年来，我

们进一步揭示了成本转嫁的一般规律——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缘于其构建了对发展中国家次第转嫁成本的制度体系，以及与之对应的制度建构权，并且掌控着维护和推行这种制度的话语权；越是向西方体系做深度转轨的发展中国家，就越多承载西方转嫁的制度成本。我们还系统总结了全球化500年的三次重要成本转嫁，如果只用人们常说的殖民化、产业化、金融化来归纳，而忽略了这些历史过程中复杂的机制问题，那就未免太简单了！恰恰是这些客观、不可逆的规律，才值得今天的人们格外重视。比如，英国工业化鼎盛时期，因在全球殖民，占有资源和市场双重收益，并随之推高对国内生产制造的需求，而有恩格斯关于“英国的工人阶级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的看法。可见，是海外殖民化收益从经济基础上瓦解了工人运动的发动条件；另一方面，“二战”后发达国家的实体产业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最先移出的恰恰就是劳资矛盾最尖锐、对生态环境破坏最严重的低端制造业部门；而发展中国家承接了这些低端产业，就意味着也将这些产业内生的对抗性矛盾承接了进来，却不再有当年英国靠全球收益来化解这些矛盾冲突的条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但这样的另类归纳却难以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大多数还压在箱底，要整理出书还需时日。不过，也有可喜的进展：我们团队近期完成了关于全球化成本转嫁大趋势下，新兴国家发展经验的比较研究，书稿已经交付给出版社。

4.关于“可复制性”

我们对西方经验的可复制性及其是否具有科学真理意义的深化认识，也需要交代一下。一是西方经验的可复制性，其实内含着“以西方现代化作为样板、追求西方模式”的预设，本来就内在地具有意识形态给定的“政治正确”。在21世纪中国确立生态文明理念及其战略转型的重大调整下，中国已经不再以西方经验可复制性作为目标；由此，也理解和尊重各个国家、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历史地理的独特性，因而人类世界不必要确立统一的目标，也不需要任何单极霸权承担领导世界的责任。二是社会科学即使把可复制性当作是否具有科学性的一个检验标准，也需要知道“任何人都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基本常识，不应在行动上追求简单复制样本，而是对所谓一般性规律的重复发生做“证伪”，才能提示那些自诩“削足适履”的学问家无论怎样拔掉头发也离不开地球给定的“本地化”约束。

（三）补充解释

第一，新世纪宏观形势变化对“三农”问题产生了新的影响机制，超出了本书的分析范围。

本书收入的大多数文字是2000年之后我的演讲整理稿。当年，受美国新经济危机的影响，国际资本开始向中国沿海地区重新布局，直接推动2003年中国成为外商直接投资（FDI）第一的国家；随之，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入城市和工业开发区打工，导致2004年以后农村出现空心村、城市出现劳工荒……这个势头在2001—2003年经济复苏时表现得还不充分，也因此，书里所讨论的劳动力因为绝对供给过剩，而短期内难以通过对等谈判提高工资待遇等判断，在2004年以后再看，就显得和现实脱节。此外，其他对于劳动力构成重大政策性影响的，一是2004年《土地承包法》开始实施；二是2005年中央财政开始承担“三农”开支，同时落实农业税费全免的政策，使得过去按地亩缴纳的“农民负担”几乎归零；三是2007年《劳动法》开始实施，雇主需缴纳不低于工资额40%的社保开支，相当于承担“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真实成本……这些新世纪以来的制度性改进，都促进了乡村劳动者大量向城市转移，派生了劳动力、资金等要素价格被城市再定价造成的农业成本提高等问题，反过来既促进了土地流转集中和农业机械化占比的提高，又使得小农家庭简单再生产从农村转向城市，导致低端服务业发展。但，这些客观变化及理论思考，都是成书时所难以预见的。

同样，外资大量进入也在短时间内改变了中国工业化高增长时期资本严重不足的局面，使得中国迅速从“产业过剩”进入“资本过剩”；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村原本比较困难的资金供给和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局面。

进一步地，这也在新世纪初改变了政府财政和金融体系资金严重不足的老问题，而中国不仅在较短期间就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还在中央层次的政策导向上转向亲民生、亲环境，转向“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等新政，进而在2005年开始实施中央财政为主要投入力量的新农村建设，以及后来在2017年确立的乡村振兴。此类涉及“三农”的重大国家战略转型，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多有积极意义。

以上提及的这些从“资本极度稀缺”向“资本相对过剩”的趋势性变化，需要纳入必要补充，以便读者在阅读本书时有所借鉴，只有结合最近十多年的宏观形势变化，才能比较辩证地看待当年我们的观点演化及其分析。

第二，本书另外两方面的参考价值。

本书还附带记录了我的其他变化。2000年我离开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接手了国务院体改办主管的“自收自支”事业单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身份上算半官半民。离开偏重于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的农口政策部门，不仅讨论的问题变了，也有了一定的自由度，当然，也就有很多被实践不断改变的观点需要说明。

在此之前，我在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任职期间的演讲，主要是在培训地方干部时的讲话，涉及的主要是时事形势、宏观政策分析，以及地方发展的制度设计，等等。进入新世纪、接手新工作之后，我的演讲更多地面对高校，还有各种学生社团，也就更多从学术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农村问题及当时热议的加入WTO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当时正值我接近完成中国农村问题百年历史变迁的系统梳理，有了很多独特的、去意识形态的研究发现，遂在几次演讲中都进行了比较通俗的阐释。这些在我的博士论文及以此为基础出版的《中国农村经济基本制度研究》一书中有比较学术化、规范化的表达，但也难免会有阅读门槛有点高的问题。而本书作为演讲辑录，则尽量做到雅俗兼顾。感兴趣的读者不妨把本书的这一部分作为理解中国百年“三农”问题的入门导读。

此外，在中国如何应对WTO挑战的政策分析中，我在演讲中给出了比较全面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框架，涉及方面比较广泛，也提到了资本市场对于促进城镇化建设，以及促进经济欠发达区域资源资本化的作用，还提到了东亚社会中日本、韩国的“三农”制度体系对于中国的可借鉴意义。直到2004年，我进入高校以后，带领团队开展比较精致化的学术研究，才提出东亚“原住民社会”的农户理性及村社理性，及其对于外部性风险的内部化机制作用的理论分析。进而又在生态化扶贫的广泛调研中提出，因空间生态资源“结构性粘连”内在性质所决定的价值化开发，必须遵循“空间正义”，应重构村社经济组织作为必要载体……相对而言，那些早期演讲中提出的体系设想虽然内容相对粗糙，但今天看来，仍然不失为一个全局性的、整体性的框架，对于致力于实践拓展的读者而言，仍然具有并不过时的参考意义。

三、致谢与说明

首先，和我一道追求“国仁永续”的科研实践团队多年来负重前行，不舍涓滴地进行理论建设和实践推动，作为长期志愿者大家都很辛苦。

其次，跟随我多年的科研团队成员直接参与了再版修订，从贴近读者的角度，重新对本书进行了章节编排。

再次，东方出版社编辑李烨、吴晓月对全书进行了细致的审校，尽可能地使稿件减少错误。

在此一并感谢。

此外，应出版社一再要求，我自己题写了书名。在我的出版物中这还是第一次，值得记上一笔。

最后，第一版序言来自我在中国农业大学的一个演讲的节选，再版序言则是专门成文。

特此说明。

温铁军

（起草于庚子年大寒时节，大疫发作世界之时；修改于芒种时节，中国确立“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方针之际……）

第一部分
全球化危机与现代化困境

第一章　全球化与世界法西斯主义[20]

一、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矛盾

印度喀拉拉邦的可持续发展经验一度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我们在考察中发现，喀拉拉的劳动力价格在当地是低的，但由于有l/3的劳动力就近流动到海湾产油国打工，因此喀拉拉本地的劳动力价格被拉高了。如果进一步做国际比较，印度的劳动力价格不如中国低。有调查证明，中国沿海地区的低层劳动力价格10年没有上涨。这是因为，中国农村的劳动年龄人口有5亿，实际上大多数农业劳动是由半劳力承担的，因此，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这就导致市场条件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劳动者也因此根本没有条件建立能够与雇主进行谈判的地位。

于是，农村流动打工的人基本上没有社会保障，沿海企业也从来不支付中西部劳动力的流动成本。可见，其他国家不可能在劳动力价格上与中国相比。

我们应该进一步看到，在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问题上，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有资本输入、输出的矛盾，发展中国家之间也有矛盾。比如我2000年11月在墨西哥访问时了解到，那里的知识分子就强烈反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因为墨西哥的普通劳动力价格比中国高3倍，在一般商品的生产中它就竞争不过中国。

所以，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互相激烈竞争，另一方面几乎都反对WTO，这是有其客观原因的。在与印度朋友的座谈会上，他们质问我，中国为什么那么强烈地要求加入WTO。他们的问题其实不确切，应该问到底是中国的哪部分人如此强烈地要求加入。

如果真正实现了全球经济市场化和一体化，市场的作用就当然会把最过剩的要素价格降到最低。于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劳工价格与他们的生存条件都会同一化到最低程度。这个规律在中国实际上已经有明显表现。在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结构约束下，绝对过剩的农村劳动力价格不仅是在下降的，而且已经降到最低水平了；不仅如此，人们发现无论东部还是中西部，劳动力的价格之低也是一样的。

在中国，最显著不同的，其实是城乡人口的收入差别。

最近20年，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结构变迁的确已经大规模发生，但是，它并非现在才发生的。从19世纪中叶到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就已经是面向全球的开放经济了。由于工业化加快，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沿海地区的农村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因此，农业商品化过程对农村社会结构的解体造成的压力是长期的、客观存在的。这和现在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至少在现象上是有相似之处的。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资本全球化的同时，资本也把自然资源的价格压低，这样才能在资源资本化的进程中变成资本的增量收益。因为，资源价格压低之后产生的任何利益，亦即资源转化为资本的收益，大部分都是被大资本所占有的。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发生的大城市超前繁荣、传统农区却难免衰败的趋势，就是这个规律的作用使然。

二、谁反对全球化？

我在国外接触的大多数NGO（非政府组织）都认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是全球化的推进者。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是反对全球化的。由于发达国家是在一个与中国不同的语境中讨论问题，因此，这个说法值得分析。

我曾经听过美国政治家直言不讳的演讲，认为中国维持“后集权体制”是最有利于美国利益的。这当然只是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反映，我们姑妄听之。但是，人们如果愿意从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成本上做经济学的分析，就会认识到，其实就是现行制度条件才可以保证大资本之间的交易成本最小，获得利益最大。并且我们看到，这也与中国政府和社会公众都在强调的反垄断相关，因为如果经济资源被部门化的垄断资本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搞改良或者改革，就会越来越困难。在谈到国有垄断资本问题时，黄平对此做了评价，他指出：以国有企业名义、合资名义、外资名义垄断资源的少数新贵，实际上已经站到了跨国资本代理人的位置，已经不止是从前的买办。买办的意思是说把一个民族国家的利益出让/出卖给另一个民族国家，现在他们本身则成了跨国资本的代理人。

至于国内大企业对国外大资本集团的实际代理关系，如果我们完全可以从资本经济关系上考虑，也是能够被赋予另外的解释的。比如说，中国电信成功地招募国际资本，成功地在纽约上市，它的股东有各种资本集团。中国电信在国内实行手机双向收费，当然消费者强烈不满，但

要改为单向收费，却受到外国资本的反对，说本来因为你们许诺垄断利润高，我们才投资你的股票，现在你们要改单向收费，利润要降低，就等于你们没有实现承诺。显然，这关系到国际信誉问题，不是中国电信可以自行决定的。类似的例子不仅中国，其他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多。中国既然接受资本经济，这种事情就只能按照保障资本收益的制度执行。因为全球化当然也是标准的、制度的全球化。1999年4月，克林顿和中国谈判的时候就明确讲，加入WTO意味着按照西方的制度改变中国。[21]

接着的问题是，讨论全球化问题的时候要注意，其中很多新话语构成的语境的变化本身，就是值得讨论的。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大多数NGO强调的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问题。

这里的语境不同，可以举例说明。比如在中国的理论界，WTO问题一度成了难以深入讨论的东西，因为人们想当然地把加入WTO与改革开放等同起来，而改革开放相对于过去那种国家高积累、人们低消费的计划经济，已经是具有绝对“政治正确”的民众共识。作为长期从事改革研究的人，我理所当然认同改革开放。但我除了强调不同语境之外，进一步的问题是，谁反对全球化？在中国，普通国民是要求市场化、全球化的，其实只是少数内外垄断集团在阻碍。

在讨论所谓自由贸易的时候也有语境问题。比如很多人都问这样的问题：经济学不是讨论三要素（资本、土地、劳动力）吗，那么，中国的劳动力要素价格最低，为什么不允许自由贸易到美国去，平衡一下美国劳动力的高价格？中国土地要素稀缺，为什么不允许到美国去种地？西方人在发达国家这个语境中所谈的全球化，实际上仅仅意味着只有一个要素的全球化，就是资本。而单纯强调资本全球化的背后，是反对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的全球化；其唯一目的，就是保证大垄断资本的收益不断增加，它的收益只能从对资源的占有和对劳动力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剥夺上来。有了对语境的识别，才可能把问题讲清楚。

香港岭南大学教授许宝强最近正在做区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研究，他试图找一个不同于主流的角度，来重新阐释市场和资本主义的关系，这是很有创造性和理论价值的。但是，这种努力同时也把市场给意识形态化了。实际上，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在面对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矛盾时，目前无论哪一种解释都可能由于其片面性而显得苍白无力。

三、全球化与世界法西斯主义的复苏

如果允许我把这种“宏大叙事”简单化地描述一下，那么可以说现在的全球化和过去的最大不同在于：过去工业化早期的商品贸易发展阶段，世界上还有大量的资源可供转化为资本，后发国家民族资本崛起之际，还能够分享资本增值收益。可现在呢？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会出现全球瓜分资源的战争，是因为全球都在资源资本化。一旦发展中国家没有新的资源可供资本化了，将会出现真正的重大的全球性危机——不是经济全球化的资本流动危机，而是世界法西斯主义的复苏。

因为，20世纪以来全球都认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换句不那么意识形态的话说，是都认同现代工业化的生产方式，结果必然是加速把所有资源都转化为资本。比如印度经济，很多海外的包括印度的学者为什么觉得没有希望，是因为它已经没有什么资源可供资本化了。于是，金融资本进入缓慢，或者说投资者就不来了，这是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只是中国的1/10的根本原因。

因为没有新的资源就不能有资本收益，所以，印度或者南亚次大陆也就可能出现法西斯主义问题。

贫穷的国家，中美的，南美的，也都有法西斯主义的现象；非洲，在完全没有资源可以吸引资本进入的情况下，则是种族屠杀、种族灭绝。而发达国家如美国，尽管已经最发达了，但在没有新的资源可供资本饕餮把它转化为资本收益的时候，最可能向法西斯化转变，因为它实现这种制度转化的成本最低，条件最好，可能的收益最大。

所以，一般讲全球化不错，是指商品的自由贸易那种全球化，是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期的概念；今天，21世纪的全球化，真正反对市场在诸要素自由流动条件下充当“看不见的手”的，其实不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民众，而是在泡沫经济崩溃过程中，在连带发生的社会危机中，无路可走的大垄断资本[22]。因此，今天全球化的矛盾的深刻性远超过20世纪。

我们需要看到，当前的全球化在发达国家也是不同的。一般的投资者在希望获利这样一种欲望的驱使下，其本身是要求资本流动的。那么，到底谁在反对资本流动？一方面是被压迫、被剥夺的发展中国家的

民众；另一方面，是那些真正占有垄断地位的大资本，特别是美国、英国的大资本。因为，他们最担心资本流出。比如说美国之所以在世界上这么多地方“当裁判”，插手那么多问题，似乎在表明全球只有美国是“鲜花盛开的地方”，那是因为它要推动资本从那些所谓“不安全”的地方、从那些受到“流氓国家”影响的地方流入美国，否则，就保持不了美国资本市场上靠外部资本不断流入进行交易而产生的收益，美国的经济就不能软着陆，而可能出现硬着陆。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最保守的，甚至会走上法西斯道路的，是华尔街的银行家，是波士顿集团，是马萨诸塞军火工业集团。

再如，英国金融是第一大产业，是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外资流入国，英国之所以长期坚持反对欧洲统一货币，也有担心资本流出导致本国货币贬值的问题。所以，今天很多非政府组织上街搞反对全球化的游行示威的时候，可能没搞清楚他们到底反的是什么。

可见，我们面临的是一种极特殊的时代变异。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似乎在全球化过程中集各种内外矛盾于一身？是因为唯有中国，在客观上仍然实行部门垄断的条件下，大部分资源还处于自然状态，有待于进一步资本化，并且当然会形成增量资本收益。在全民的名义下占有资源的那些垄断部门，现在面临的既有国际大资本要求参与并且分享权益的压力，也有国内各种利益主体要求重新界定资源和财产权益的压力。

有鉴于此，我们国内现在的所谓右派、左派，以及所有照搬西方的各种主义的人，对我们当前问题的解释也许都需要再从基本概念的讨论入手。他们可能没弄清他们争取的是什么，保护的是什么。用从西方引用的一些概念，生搬硬套地解释今天中国的状况和趋势，似乎都有“失语”的问题。

第二章　重复欧美经验？——无法复制的现代化[23]

一、全世界最好的投资机会在中国

中国正处在最后一个体制转型期，只有金融资本市场尚未市场化。这是因为，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中国不开放资本市场，不可自由兑换人民币，所以有效地防范了外部金融危机转嫁到国内的风险。就目前看，尽管资本市场没有完全开放，但全世界投资机会最好的，我个人认为仍然是中国。

在人口规模上和中国最可比的是南亚的印度，印度在2001年得到的外国投资不到中国的10%，尽管它早就殖民化、市场化了，但外国资本在那里很难有获利的机会，因为印度的资源已经全部被资本化了。而中国，因为有30年前毛泽东的时代，而20年的改革进程尚未完成，所以中国成为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资源向资本转移收益最高的国家。也就是说，现在的外国投资和本土投资占有的，不是一般的制造业所产生的利润，很大程度上是资源向资本转化过程中增加的那部分收益。

客观地看，全世界还有没有这样的地方？如果说有，比如说以色列、巴基斯坦，如果国家和平，也会产生资本增值收益，那叫和平红利。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的大陆国家，50年没有战争，它可以加快资源资本化的过程。

中国经济最后的竞争，可能是国外资本和国内资本的竞争，当然也会发生在不同的外国资本之间。在今后的5～10年，国内的金融资本在最后的5年不开放期间，会利用它的垄断特权加速资源向资本转化的进程。如果这一过程会加快，则中国的金融资本会壮大，参与国际竞争，否则它的实力是有限的。

美国和欧洲现在仍然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中国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引导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之一，而且，我们应该明白，中国永远只能是中国。

二、不可重复的西方现代化经验

现在的主流经济理论似乎正在试图延续一个不可重复的经验，就是

所谓实现现代化。

我们大家常说的社会科学理论是科学，因为那些理论已经被西方的现代化经验所证明了。但是，什么是科学？科学就是在给定的条件下、按一定的技术路线得出的结论，别人可以重复。现在的情况是，只有美国和欧洲是现代化国家，但它的经验是不可复制的。

比如说，日本脱亚入欧，其实是想重复欧美的现代化经验，但它最后走不下去，人们终于发现欧美的经验是不可在日本复制的，尽管它曾经给日本带来了欧美模式的经济成长。但后来日本人才知道，欧美可以做，别人不可重复。可见，这个经验是假的。因此，那不是科学。

当年日本认为自己的生产能力到一定程度，必须学习欧美搞殖民化。历史上，欧洲在自己的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下，使用了炮舰政策，占领资源性的国家，先占领了美洲大陆、大洋洲，再占领亚洲。但到亚洲他们发现，亚洲的资源被这么多的人口控制着；在美洲，只要把数千万印第安人杀完，就把资源全占了。而且，欧洲在殖民化的过程中移出了1/4的人口，光大英帝国就移出l/3的人口，因此有了新大陆国家。这是殖民主义创造的辉煌的德沃夏克的《致新大陆》交响乐，整个乐章的气势是大气磅礴的，却是以千万印第安人的生命为代价的。

这个殖民化的经验，对解决欧洲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的过剩问题是有效的，但到日本重复的时候却是失败的。日本不过是在重复从殖民化向现代化前进的经验：既然欧洲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把美洲占了，日本为什么不能在工业化过程中把亚洲占了？因此就有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但最后在中国人民的反抗和欧美军事、政治的干预下失败了。亦即，欧洲的殖民主义—现代化的经验不是科学的，因为它不可被重复。先一步对世界资源瓜分的国家不允许后发国家重复这条道路，否则意味着将有场世界大战。

再看德国。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谁对谁错？战胜者对，战败者错。在遇到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时候，德国一国的经验是正确的，因为它把自己过剩的制造业能力转化为军事生产。它对其他国家的非军事投入将产生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军事竞赛的规律就是，增加哪怕l%的投入，都将可能形成100%的优势。但德国的经验不可重复。如果其他国家都这样，就意味着世界大战。

所以世界在有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会轻易有第三次世界大战。

冷战思维所讲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的威胁，实际上是告诉人们一个假的道理。因为这个经验是不可重复的，因为我们看到日本在重复欧洲工业化进程中的失败。

那欧美的现代化中国能不能重复？同样，重复别人的经验，实际上是走不下去的，欧美只允许自己走殖民化—现代化的路，后来的别人是不能走的。

美国成为世界金融资本最大的力量，它怎么来维持金融霸主的地位呢？也有很多经验证明它不可复制。

当1999年欧元问世时，它的币值比美元高13.8%，既然已经没有金本位制度了，那么欧元发行的基础就是欧洲区内贸易的不断扩大。这来源于欧盟东扩，来源于欧洲有条件把苏联及其他东欧国家原来的计划体制下没有资本化的资源（资产）转化为资本。金融的根本功能是中介，一方面是交换的中介，一方面是资源转化的中介，在大多数转轨国家这叫“货币深化”。我们把改革的这些计划经济国家的转型过程叫金融深化，或者叫货币化推进资本化。

但欧元刚刚发行，接着却是巴尔干战争。

当欧元足以威胁美元成为世界第一货币时，意味着什么？战争。

这些经验可重复吗？日本可以因为日元升值，为了维护日元地位在亚洲发动战争吗？尽管就像日本朋友说的，小泉政府要当美国人的后勤基地，要求出兵参加阿富汗战争，表现了它从经济大国、资本大国向政治大国、军事大国转型的一种愿望，但是日本的这种愿望仍然是重复欧美经验，实现不了。

日本的脱亚入欧，既有转型成功的一面，又有它不成功的一面，就是重复不了欧洲的殖民主义。今天日本的政治家们还想重复美国的军事霸权维护金融霸权的这样一种方式，然而此路不通。巴尔干战争可以一时把欧元打压下来，因为所有的欧洲国家参战，都要以财政来支持，欧盟发行欧元必须保证它的财政赤字保持在3%以内。因此战争必然会带来财政赤字增加，也必然会拖累欧元汇率下滑。那么，因为欧洲的不安全

性增加，买美元保值保证安全的避险心理会增加。因此，欧洲的投资人或中东的石油美元都会流向美国的资本市场。因此，在发生了巴尔干战争的情况下，美国的资本经济往上走。这是美国继续维持强势美元地位的手段。

这种经验，日本可重复吗？不可。

今天，日本在货币量上和美元是相似的，但在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上根本不可能和美国相比。你当然可以跟在美国后面，但学得了美国的这种基本经验吗？所以，中国不想重复日本，也不想重复美国的东西。

实际上，美国人有两手。

一方面是尽可能压住欧元不让它起来，美国历届政府都毫不含糊地公开宣布自己的“阳谋”（已经成为唯一霸权国家，根本不必搞阴谋）：一定要保住美元的强势地位。但美元又被严重高估达36%，如果按美国学者拉鲁什和中国学者王建的计算，高估70%不止。如果美国没有世界霸主的地位，没有军事强国的地位，不能把美国变成世界上最安全的投资国度，就不会有大量的外资进入美国。

另一方面，让日本成为美国外资的相当大的供给国，因为日本银行零利率，可以使投资商以极低成本或无成本地从日本拿到钱，投资于美国的资本市场。

由于这两手，美国可以实现80%以上的GDP来源于金融投资为主的服务贸易，它很成功。

你说主流经济学根据美国经验得出的理论，对所有国家是适用的吗？那种理论背后的经验是可重复的吗？那种经验过程中所形成的制度是可采取的吗？绝对不是。

个别的例外也有。还有谁能实现80%以上的GDP来源于金融投资为主的服务贸易？香港。世界上除美国外，只有香港的GDP的增加值中80%来源于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贸易。

三、中国的出路：加强区域一体化

2001年9月，我去日本参加中日经济论坛，论坛的题目是“21世纪：

中国是威胁还是机遇”。我说，这看你们要什么，你们如果要威胁，中国就是威胁；如果要机遇，中国就是机遇。如果你们要威胁，那么就继续跟着主流走——尽管我们认为是不可重复的经验，但你们愿意的话尽可以去尝试重复，虽然实际上肯定重复不下去。以亚洲的金融资本关系为例，人民币即将升值，早晚会成为亚洲的强势货币，这似乎是个趋势，日本难道能发动什么样的战争把人民币打下去？

“后冷战”意味着冷战虽然结束，但仍然有后冷战思维和行为，意味着冷战中的参与国家继续按照冷战思维来考虑国际关系。欧洲人进入冷战后的阶段，他们很清楚地知道，在原来苏联控制的范围内，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有廉价的资源，可以和欧洲过剩的资本、过剩的制造业更好地结合，因此欧洲加速一体化——在1991年“8·19”事件发生以后，欧盟开始东扩，欧洲货币一体化也进入日程。

虽然现在全球资本化是个主流认同的大趋势，但人们真正看到的是全球“区域化”。那么到底相信资本全球化，还是相信已经出现的经济区域化进程？当人们鼓吹全球化时，主流其实就在告诉人们：完全放开你们的资本市场吧，让我这张绿色的纸可以自由地进入，自由地占有你们在资源向市场转化中增值的那部分收益。

当前，人们都说世界经济黯然失色，讨论欧、美、日三大经济体到底出了什么事。根本问题在于，像美国这样，以80%以上的服务业收益来维持GDP增长的经验，确实是不可复制的。对亚洲来说，如果各个国家都明白了不可复制美国经验的道理，那么目前唯一可参照的现实经验，就是区域一体化。

至于中国，我认为中国人应该参与区域化的整合进程，无论是东北亚的区域化，还是东盟与中国的“十加一”，或者是中印俄的整合。因为，还没有谁真正有能力创新出一种与当前的现实经验完全不同的新的经验来。

第三章　不破不立：解构现代化[24]

我不是一个书斋型的学者，而是一个四处游走的调研工作者。我从调研中得到的大体上都是感性认识，感性认识可能确实没有理论深度，也就不能从理论上去给大家解说现在的问题，只能以我最擅长的方式做发言，就是给大家讲故事。曾经有很多年轻朋友问我的学术思想，很惭愧，直到现在我都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我想，我还是就这样做下去吧，等我们这一代人能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将来由后人总结归纳，来看我们这一代人到底做了或者说了些什么，是否有理论价值。

一、题解：关于感性认识

今天的演讲题目叫“解构现代化”，英文叫deconstruction，为什么谈这么个题目呢？并不是说现代化的概念不好，而是当你要使用这样的概念时，先要弄清楚这个概念是怎么形成的，它对我们中国人的历史和现状到底意味着什么。

当年你们上海的曹锦清老师写《黄河边上的中国》那本书的时候，我们曾经在昆明有一个小型的座谈会。会上曹老师很激动地把他到黄河边上走了很多路、看了很多村的感受跟我们说。因为我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搞农村调研，所以虽然他说的话很有感染力，但我呢，那时就没有随着他的话激动起来，显得似乎有些冷淡。他就很奇怪，问我：

“老温，你怎么回事，你搞农村研究的，我说这么多农村的事，你为什么好像无动于衷？”

我说：“你在这短短几个月的考察中看到的东西确实是真实的，可我这十多年已经司空见惯了。我要问的是：你感动完了，书也写了，那以后呢，怎么办呢？”

老曹愣了一下，后来，他就做了很多哲学思考：我们从何处来？身处何处？将向何处去？……再后来，就写在了他书的前面。

作为上海的一位著名教授，他也很难将现实观察中得到的感性认识转化成对策型的思考，所以，他会回归到他的哲学思考。我想，这对他来说已经很难能可贵了。

借用他的故事是打算说明，我们把感性认识转变成政策思考已经不容易了，如果希望上升到理性高度，转变成所谓的理论，那就更困难了，尤其需要很多的调研积累。

但是，我们当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现象层面的一般的感性认识上，我们需要根据大量调研的情况，做更多的反思。因此，我今天晚上跟大家谈的，其实是我在大量调研中形成的反思。

二、反思：在调研中重新认识世界和中国

大家都知道，反思其实是很痛苦的。当你被调研和实践教育得不愿意再把现有的书本概念拿来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大家约定俗成的、普遍接受的概念，必须重新认识。而这个重新认识确实很难，比当初接受它们的时候还要困难得多。

以我自己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我也曾经是个激进的市场改革的推进者。我们那一批人当时就以为，过去的问题主要在于体制不好，只要能够比较快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就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只要产生新的可供分配的增量，我们的问题似乎就能够解决了。后来，到了90年代，这些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正好当我反思过去认识的时候，得到了一些机会，在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NGO）的支持下，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做考察。

这和80年代末90年代初到欧美发达国家考察，感受是不一样的。我发现很多问题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已经经历过、思考过了，而我们正在经历，正在思考。很多问题和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交流，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说法，特别是去南亚、东南亚、南美，就会发现他们思考的问题几乎完全不在我们的视野之内。而我们现在所打算实现的很多预期目标，也许人家已经实现，或者曾经实现过。

比如说，我们要在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是人均GDP在现有水平上翻两番，大家也看到新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布的人均GDP是1000美元，翻两番大概是4000美元；我们现在达到36%左右的城市化率，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预期的，2020年的城市化率大约是55%。人们似乎觉得，当我们实现这样的目标时，“三农”问题可能就解决了。可是，当你走一走发展中国家会发现，这个目标在人家那儿曾经达到过，但是问题解决了吗？

咱们不妨以墨西哥为例，在自由化程度、民主化程度、市场化程度上，墨西哥的这些“化”都比我们走得远得多：人均GDP在金融危机前曾经接近6000美元，现在大约4000多美元；城市化率现在是80%。也就是说，我们预期的目标他们早就已经实现了。但是墨西哥的社会仍然是两极分化的，城乡差别仍然是很大的，农村问题仍然是很复杂的，有时候矛盾甚至是很尖锐的。1994年曾经有过恰帕斯州的农民起义，起义坚持了9年，现在仍然存在。那是一个印第安土著人群在山区发动的武装起义，现在则正在逐步形成山区土著人的地方自治。在墨西哥，农村的凋敝、农民的破产，事实上并没有随着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得到解决，并没有随着GDP增加、城市化目标的实现迎刃而解。

再看巴西，国土面积比我们稍小，人口不过才1亿多，而且没那么多沙漠、山区。坐飞机从巴西上空飞过时，中国人都会非常羡慕，因为那是一片绿色。巴西经济发展水平也很高，人均国民收入达到过7000多美元，城市化率达到82%。但是，那里仍然有全国性的“无地农民运动”，也有各种各样的激烈的社会冲突。

墨西哥城有百万计的人生活在贫民窟，巴西的城市里也有大面积的贫民窟，成批的边缘化的人群生活在贫民窟里，“黄赌毒”在里面泛滥，黑社会控制也是很严重的，正规的政府治理是很难实现的。

我上次到墨西哥山区的时候，真的见到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脸上蒙着红围巾，上千的土著解放军战士都穿着军靴，戴着黑色的滑雪帽子，只露出眼睛。回来以后，我把见闻写成《现场目击墨西哥蒙面军》，发表在《中国改革》杂志2003年第9期上。见到这些现象我们就需要思考，为什么他们在经济数据上比我们追求的目标还要高，却还有这些现象呢？为了搞清楚问题，这几年，我先后到墨西哥去了四次，先是做了外围的考察，后来才有条件在当地向导和翻译的带领下，深入土著人群集中的地方，到山区、原始森林去和那些土著人生活在一起。这就有条件从他们的角度、以他们的眼光和立场去看这个世界，也反思我们中国人面临的问题。就是从这样的角度，我在“首届绿色中国论坛”上做了个发言，题目就是“从四个故事引申出的故事”，也引发了不少争论。后来，这个演讲被人翻译成英文，我去年到哈佛和MIT（麻省理工学院）开会时，国外学者也很关注。

今年1月，我第二次去印度，主要是去北方的地区做农村调研。我就在想，为什么那个地方的贫困问题那么严重呢？是那种看了觉得惨不

忍睹的贫困。你到不同的农村去看，那里有相当多的农民无地，茅草房比比皆是，农民家徒四壁，贫困农民反抗的激烈程度也是不可想象的。印度的情报部门说：从尼泊尔到不丹，到印度西北，再到斯里兰卡，已经形成了一个游击走廊，农民的武装力量控制了相当大的农村地区。我到了几个村，就问当地的人："你们说有严重的武装冲突，那些游击队在哪儿呢？"他们说："游击队是地下的，也许在你所交谈的这些人中，已经遇到过了。"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无论到泰国、菲律宾，还是到孟加拉、印度，只要到发展中国家去看，所到之处几乎都有相对来说比我们高的收入水平，比我们高的城市化率，他们的资源条件也大都比我们要好。我们现在所追求的制度变革的目标，如市场化、自由化、民主化、全球化，这些国家都比中国走得远。那么，为什么在制度变革上走得远，经济上也比我们现在公布的数据好看，而社会的三大差别——收入差别、城乡差别、区域差别，亦即我们现在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却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观，某种程度上甚至社会矛盾更复杂、更尖锐呢？

这些考察、这些了解，才逐渐使我的反思显得更广阔一点。因为以往在没有条件去发展中国家调研的时候，主要是对我们改革以来走过的路做了一些反思；后来，当有机会到发展中国家做一点比较研究、做一点深入考察的时候，才进一步发现，市场经济条件下三大差别扩大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中国一国特有的现象。

由此可见，我现在说解构现代化，是多年自我反思的结果，是在有条件更广泛地去看这个世界，特别是去发展中国家做考察、做比较研究后，才逐渐形成了对我们今天很多问题的重新思考。当然，这还只是片面的、简单的，我调查得还很不够。有生之年我会更多地去做这样的调查，去丰富自己的感性认识。

当然，看了这么多地方的情况，总会有一些深入的思考和讨论。一方面，这些讨论大部分发表在我主编的《中国改革》《改革内参》等杂志上。不仅去年9月的《现场目击墨西哥蒙面军》值得大家看，今年1月从印度回来以后我写的《无地则反》《党争则乱》，也值得看看。《无地则反》发表在《中国改革》2004年第2期，《党争则乱》发在了《改革内参》上。此外，去年我去孟加拉，写了个《孟加拉注释》，也是在试图解释我所看到的这些现象。

三、转变：由“四个现代化”到“科学发展观”

由这些现象的讨论，我们能做出的进一步思考是什么呢？刚才主持人说我们要守秩序，我先做个表率：我今天演讲的所谓解构现代化，就是在按照中共中央十六大、三中全会，以及今年“两会”的精神，对过去的问题做反思。这就不仅仅是一个普通调查研究者的个人感受，也应该和一系列政策讨论相关。

大家知道，我们过去所希望达到的大目标叫“四个现代化”，当然，这个目标不是现在的，而是改革开放一开始提出的。当时提的是要在2000年争取实现四个现代化，可到了2000年时，好像大家也没怎么关注实现没实现，就这么过去了。

但是，如果人们稍微注意一下，就会发现在提法上的变化还是有的。1998—1999年，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已经改变了20年前的提法。至少，“农业现代化”在咱们这儿大概是最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就提出“在沿海发达地区争取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咱们中国的文字很有意思，对这个提法的变化，人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去理解。一是可以理解为将来只有发达地区能够实现，其他地方就暂时放一放；二是可以理解为即使在沿海发达地区，也要通过努力争取才可能实现；三是可以理解为全国都能实现，只是现在是沿海发达地区要争取率先实现。怎么理解都可以。但总之，这个提法是在20世纪末就被中央领导改了。

后来到2002年，在中共中央十六大的政治文件中已经史无前例地写上了咱们国家的基本体制矛盾是“城乡二元结构”。在写上这个提法的同时，提出了将来要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这也可以理解为现在条件不足，还难以实现开通城乡。而且，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针对中国现在不断扩大的三大矛盾，文件强调了我们在2020年要实现的大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就把过去事实上确实没有能够实现的“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做了实事求是的重大修改。

2003年10月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又进一步比较清楚地强调了“综合发展观”，可以理解为今后不再“以GDP论英雄”了。中央还同时特别强调了要实现“五项统筹”，如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经济和资源环境的统筹等。

可见，中央的说法在新世纪开始这几年，正在发生重大改变。其

实，在世纪之交时，中央就已经明确强调“十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是“以人为本”，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又再次进一步强调了这个“以人为本”。到2004年2月，中央还专门举办高级干部学习班，把“综合发展”这个战略思想的转变，强调为“科学发展观”。这时候，“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主要指导思想又得到了强调，还把“可持续”这个理念也引入了新的指导思想。综合起来，也就是要“以人为本”，综合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

2004年3月的这次“两会”，温家宝总理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很完整地阐述了重大战略转变的主要内容。应该说，从2002年中共十六大，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再到2004年“两会”的报告，大体上是把对这个战略转变的认识不断细化、解读，并逐渐演化为政府的政策的过程。

四、溯源：西方现代化的真相

当我和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讨论问题的时候，发现其实这些人并不比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考虑问题的层次低，也不比他们的深度浅。他们在思考：“我们现在的这种落后状况，并不是像一般发达国家的理论和意识形态所解释的那样，是我们的文化不行、制度不行，甚至人种不行。”他们给我讲了一个常识性的道理，是这样开头的：“美国人在1992年就说了，在我们这儿的印第安土著，已经不能再算是一个民族了，因为他们只剩下了42万人。”可在300多年前西方人来的时候，北美大陆有大约1亿印第安人口。

历史早就告诉我们，西方人实现的现代化，其实是一个长期殖民化的结果。

另外一个容易被人忘记的常识是，如果把欧洲搞殖民地转移出来的人口，都计算回欧洲，那欧洲现在应该有多少人？也就是说，如果把16世纪以来的殖民化人口都送回去，现在的欧洲人口会有多少？大概有10亿。亦即，把欧洲大陆向北美、南美、非洲、大洋洲这四个大洲移出的人口及其繁衍的后代计算回欧洲，大约有10亿人口；如果再把殖民过程中欧洲人和当地人混血形成的人口，也算欧洲血统的人口计算回去的话，那恐怕就会超过中国现在的人口。那么，在主张个性充分发展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的欧洲，资源和人口之间的关系就会非常紧张，会导致比那两次世界大战还激烈的冲突，那还会有现代化吗？

第三世界的人们提问题的这个角度，恰恰是我们中国人很少想到的。按照他们算的账，300年的殖民化，欧洲本土总共移出1/4人口，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占的殖民地便宜最大，移出人口也最多，大约1/3，其中最贫穷也最善战的苏格兰转移出去一半。结果就是欧洲人占领了其他的四个大洲，人口和资源的紧张关系由此彻底改善，资源环境空前宽松。

而又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本身必须有原始积累，欧洲的产业形成伴随着“三角贸易”的过程：一方面殖民者占有了北美和南美丰富的资源；另一方面，因为那里的土著居民不适应奴隶劳动——土著部落本质上就是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民族，几千年的理念就是不向自然多索取。因此，这个民族按他们的理念来说，是最可持续的，他们不多猎杀野兽，只要够自己吃就好了。当欧洲人到了新大陆时，发现这边自然条件非常好，生活在这儿的人是不破坏环境的——土著要自由，要可持续生计。他们就是不愿意到殖民者的矿山去劳动，于是土著人口在反抗中就大批死亡。而殖民地新的资源开发又急需劳动力，所以就把占领的非洲大陆的劳动力转移到南北美洲。这个过程中，南美大陆和北美大陆各减少了1亿土著人口，而非洲l亿人口在被抓过程中杀掉了l/3，转运中死掉1/3，到美洲这边大概有几千万吧。

因此，这个殖民化过程伴随着美洲土著和非洲上亿人口的大量死亡，以及资源环境的大规模破坏，这样就形成了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这个事实演进过程，当然就产生一套资本形成、资本扩张的经验，而这个经验，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习惯接受的所谓“现代化”的实质。当然，后来的那些第三世界追赶型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不是这样的。

乃至于，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的欧洲的市场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也与此有关。欧洲有这样四个大陆的殖民地开发，产业资本的扩张带来了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需求，加之人口的大量迁移，劳动力就短缺（尤其在还没有形成现在这样大机器生产的时候），从而就能够形成劳动者的谈判地位，于是就有工人运动，就有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接着就有福利政策的提出，也就有了后来的福利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这对于当时的工人运动历史来说，也是有殖民地这个根可寻的。你们可能会记得当年恩格斯在《英国的工人运动》中说过，英国工人之所以不强烈反抗，在于英国的殖民地能够大量向本土回流资本收益，被国民分享。

假定300年的殖民过程对于西方的现代化是不可避免的，而这客观

上也是形成西方话语环境中的“现代化”的经验过程。那么，我们现在在讨论中国的发展问题时，能不能仅仅把这些话语拿过来用，而不去考虑这一套话语是怎么形成的？

这些问题使人不得不认真去思考，西方话语环境中的“现代化”的经验过程是不是一个科学的东西。

我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比较早地被送出国去学方法，当时美国的教授就有一个关于方法论的解释：为什么社会科学不能被称为科学？主要就是因为社会科学不能试验。为什么只有试验得出的结果才是科学的呢？那就是因为，如果在给定的条件下沿着一条技术路线得到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应该可以被别人重复，这才是科学的。

如果我们把所谓的“现代化”也作为一个科学的理念拿过来，那西方走过的300年殖民化，就应该被看作一个实验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被别的国家重复吗？如果不可重复，对于后发国家、追赶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怎么能够直接把那一套东西搬过来呢？

应该说，我现在只提出问题，还不能解答问题。但至少我觉得，这么一讨论，就需要对过去接受的、约定俗成的东西重新认识，不能搬过来一套话语，就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以往在很多书本上、会议上去讨论那个“现代化”，但人家本来形成这些东西的经验过程，在客观上又实在是不可重复的。

我们就近看，亚洲国家按西方模式推进现代化的，确实有几个先驱者。如日本，是最早提出“脱亚入欧”指导思想的国家，但当它想按照西方搞殖民化扩张的经验再走一遍的时候，却被西方狠狠地教训了。日本可能由此就觉得很委屈，现在还不肯认罪，内心深处是愤愤不平的：“既然你欧洲人可以这样，你们在美洲和非洲干的事要残忍得多，为什么我不可以干？我不外乎就是占了朝鲜，中国的台湾、东北、蒙古[25]的一大部分。日本几乎没有资源，按照西方的经验去占领殖民地有什么错？”日本要脱亚入欧，结果却被老师打回去，狠狠教训了一顿，就是不被允许按西方模式走。至今日本还是被美国驻军的非独立国家。

现在看，要按西方模式，再走一遍扩张的路，第一是没条件，第二是日本曾经走过，没成功。

那我们呢？

中国在进入世纪之交的时候，在主要工业品的产量上都已经达到了世界前列：钢铁第一，彩电第一，煤炭第一，纺织品第一，水泥第一，化肥可能第二……中国很多重要工业品的产量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这是因为：我们市场比较广大，国内正在发展；另一方面，其实中国产业形成、扩张的过程，恰恰是一个需要提问题的过程。

我们无论到亚、非、拉丁美洲国家，还是到发达国家，到处可以听到人们在说“中国威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吃”得太多了。2003年我们经济增长9.1%，但消耗了世界石油市场总量的10%，钢铁消耗量占全世界的24.9%，水泥消耗量大约占全世界的50%。以钢铁为例，中国铁矿石的购买量占澳大利亚铁矿石输出的一半以上，是我们推起了澳大利亚的GDP，推起了澳元汇率。但是，如果照这样下去，不用多久，世界能源和原材料市场中相当大的份额将会是向中国供给。你说世界会答应吗？

我们已经有过教训了。比如说1995年到1996年，我们连续18个月进口了3000万吨小麦，导致国际小麦市场价格上涨大约100%。这引起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不满：“你们中国有钱了，可我们买不起，我们没钱，难道我们就该饿肚子吗？”

我们国内的人，当然不认为这样的指责有道理，但你到世界各地去看看，人家都觉得咱们这样有问题。于是，要么是“中国崩溃论”，要么是“中国威胁论”，崩溃论是认为“你没有足够的资源，也不可能永远这样消耗世界资源”，而威胁论的出发点差不多，就是认为你这样下去会把世界市场抢光。

美国费正清中心有个说法，20世纪德国和日本的崛起，曾经因为试图改变世界经济政治秩序而引发两次世界大战，21世纪中国的崛起，也必然要求改变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这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冲突，对全人类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可我觉得，咱们这种所谓的高速增长，首先对中国自己就是一个挑战。

也因此，我们才高度评价现在党中央提出的可持续的综合发展观，一再强调“以人为本”。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循环经济”，都意味着中央对这种粗放增长的警觉。我们不可以再这样浪费、这样无节制地消费，不可以再放任产业资本盲目扩张。所以政府工作报告把2004年的经济增长指标定在7%。中国在高增长的阶段上为什

么把指标定得这么低呢？国际上有人评价2003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幅度不止9.1%，实际上超过10%，但我们却似乎趋向于保守，同时把2004年的其他经济指标也大幅度压低。例如，我们2003年的进出口增长是37%，而我们把2004年的进出口增长定为8%。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突然降下来？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的中央已经认识到这样的粗放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所以，我们高度评价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我们要的是有效的经济，循环经济，不能盲目地鼓吹消费主义。可是，我们知识分子中只有少数人开始了对现代化问题的反思，其实这也是和中央政府的政策考虑有一定的呼应——当然，并没有直接参与政策的那种联系。

五、强权政治：资本经济时代唯一不能替代货币的信用来源

我们再来看中国曾经位居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我们现在有大约52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官方大约4000亿美元，民间还有1200亿美元。这是什么东西呢？有人说这是真金白银，可我说未必，因为1944年国际上就放弃了金本位制，货币发行就不再以黄金作为储备；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连美元都放弃了与黄金的挂钩。

那外汇储备到底是什么呢？应该说那是一个表明财富的符号，过去的表现形式是一张纸，可现在是所谓的电子货币，是虚拟的，看不见摸不着的电脑里的符号。你说有5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是一个财富，那它可是虚拟的，你要这个能干什么用呢？一般说，有美元当然可以买国际市场的东西，尤其应该能购买美国的东西，可如果你用这个去买美国的高技术产品，它不会卖给你；你买制造业的产品，对不起，在美国的制造业产品几乎全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又主要是来自中国的。

是的，正如布什政府所说，中美之间的关系现在确实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那可能是因为，中国外汇储备中的大部分是在美国，为美国撑着他们的资本市场。美国的GDP可以达到80%以上来自第三产业，其实主要是来自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因此它可以让一般制造业退出。请注意，美国的GDP主要不来源于实质经济的生产，而虚拟经济的增加值却占GDP这么大的比重。

虚拟资本，当然主要是以货币符号来表现，而货币到底是什么？货币信用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最近，搞宏观战略和虚拟资本研究的王建指出，日本的外汇储备再次超过中国，达到大约6800亿美元，那是日本政府大幅度增发日元购买美元的结果。据他说，日本去年用了20万亿日元购买了大约1800亿美元，而到2004年计划再拿出140万亿日元购买美元。这对于日本来说，似乎不必生产出物资去换汇，只不过是政府多画几个零出来。这说明，进入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的发达国家，当然会按照虚拟资本的游戏规则行事，直到这个虚拟资本疯狂膨胀的世界再也玩不下去。

而由于中国所处的阶段不同，我们在十五大才明确提出“资本经济”的概念，因此中国获取的外汇是用大量的产品出口换来的。王建还有一篇文章，题目是“虚拟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战争”，揭示了虚拟经济膨胀必然走向崩溃的运行规律。既然是规律，就是不可逆转的，值得大家看看。过去我们接受过“三性”的道理，亦即，资本主义进入所谓的金融帝国主义阶段，必然是“寄生、腐朽、垂死”的，现在仍然是个规律。而有人说资本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也可能是他们还不了解王建揭示的这些情况吧。

当全世界放弃黄金本位后，货币发行的唯一基础——经济增长当然很重要，但不是绝对的，真正绝对的、可以说是唯一不能替代的货币信用来源，就是政治强权。如果美国没有超过其他国家多少倍的军事力量形成全球霸权，就不可能维持美元的硬通货地位。

2003年10月我在德国的时候，去了柏林的国家经济研究所，跟那里的学者讨论欧盟东扩问题。我说，德国马克是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阵营解体之后，得到了空前绝后的历史机遇，而迅速扩张的。随后欧盟接纳东欧国家，整合东欧的实体经济，因此能够发行欧元，进一步与美元抗衡。

可是，庞大的苏联经济为什么坍塌了？尽管苏联的实质经济总量仍然很大，但是其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恰恰是货币体系的垮台，而货币体系垮台的主要原因是苏联的政治改革先行，它的政权不存在了——没有政权就没有政治强权维持的货币信用，由此导致卢布大幅度贬值，国家和老百姓的财产都随之大幅度缩水。所以我们说，金融的信用，主要来源于强大政府的政治信用。

同样的道理，现在说人民币要升值，一个原因是中国现在进出口总量很大，但更主要的是因为，中国是目前相对来说政权最稳固的国家。无论国家发行多少货币，信用是来源于政府的。为什么现在国有银行据说有多少不良资产率，但老百姓照样存款，没人怀疑存款会贬值？那是因为，国有银行的信用程度并不在于按照“巴塞尔协定”规定的资本充足率是多是少，而在于它背靠着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制政府，亦即所谓中国是“单一制”国家。

六、从不怀疑“翻两番”

那些个翻过来倒过去地不断召开的研讨会，都是言者谆谆，可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目前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人们想来想去似乎还没讨论清楚。有时候，那些普遍存在的疑惑，在我看来，却有一种很意识形态化的感觉。

十六大召开之前，有的老同志问我，你怎么看待“翻两番”？我们是不是真有条件能够实现？我说，应该有足够的信心，翻两番其实不是问题，三番、四番都行，前提是中国不开放货币市场、不开放资本市场。什么道理呢？货币发行的最重要基础是稳固的政权，而中国现在的政权不仅足够强大，而且在不断深化自我改革。如果现在这种政权稳固且不断完善的状况基本能够保证稳定大局，那么，只要我们不急于开放货币市场，政府就可以印发货币，印出来就可以增加投资，进入GDP。因此，问题不再是GDP能否翻番，而在于这是不是我们真正要的东西。

可是，为什么我还提出不要开放资本市场呢？因为，当你开始反思过去的真实经验的时候，就不会再用那些约定俗成的概念去讨论问题，就会根据事物的客观规律来考虑我们国家现实的选择是什么。

我认为，资本市场主要是一个把资源和资产通过“资本化”来产生增值的工具。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解释：过去我们都是分房子，那时的房子是什么呢？是生活消费资源，连资产都不算。后来住房制度改革了，人们去买房子，房子就转变为资产。如果房子的建造和经营企业再进入股票市场，就是把房地产资本化。人们一旦想买房子，就得先得到多少万元的货币，比如10万元的房价，国家就得增加发行10万元货币。于是购买房子的开支就进入GDP了，亦即增发的10万元货币进入了GDP。如果房地产企业再进入股票市场，股民还得获得更多货币来参与交易，如果再创造出“衍生品”，那又得是多少货币被政府增发出来了？因此，在过

去分房子的时代，房子虽然也事实上被人们消费着，却不表现为GDP增量；可是通过改革，从分配变成购买，再变成房地产业的资产进入股票市场，这个GDP增量可不就是翻着番地上去了吗？

这就是我从来不怀疑过去咱们已经实现了翻两番、到2020年也肯定能够再翻两番的道理。

何况，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还有很多草原、森林、水土、矿产，还处于资源形态，只要进入交易市场，再进入股票或者期货，GDP就上去了，别说翻两番，二十番都没问题。

七、我们到底要什么

但是，你要这个GDP到底打算干什么呢？诚然，当你翻两番，或者翻到二十番的时候，你就有几十万亿元的财富总量，就能够以虚拟经济对虚拟经济，就变成中国也参与几个虚拟资本大国之间的新的一轮竞争。难道咱们的确就要这个东西吗？

如果要，咱们就这么走下去！这就是当前的主流！沿着这个主流走得下去吗？当然走得下去。可同时必须附带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科学技术加速发展到能把阳光变成能源，能把海水变成原材料，能把地球的、太空的资源无限开发。亦即，假定西方主导的这个现代化能够实现，那就必须是建立在人类的能力无限扩张，能够无限地占有资源上。

如果大家都觉得这样走得下去，那我想，咱们尽可以就这么继续走。其实我也没意见，我只不过就是提出问题，因为人的想象和目前主流的思路大体还是吻合的。沿着这样的路走下去也未尝不可，就可能变成《黑客帝国》的居民，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当你以人的状态生存的时候，这个世界是很难以忍受的；而在另一个世界，当你以数字化的虚拟状态生存的时候，即人被完全虚拟化的时候，也可以生活在幻化出来的无限空间中。

可如果你觉得这样走不下去，也许你会觉得，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这么好的前景；也许未来会像其他科幻小说、好莱坞电影给我们描绘的，要么全球变暖，变成“未来水世界”，要么变成水泥的森林、柏油的沙漠……直到人类无法居住了，从而走向火星，走向太空，那里就有了新一轮的竞争甚至战争……

如果人们觉得这样的路走不下去，那么，至少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就应该考虑人与资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恐怕就需要有一些反思，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人口不断膨胀、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而且进一步看，即便我们到2020年能够实现人均4000美元的GDP目标，真的能够让55%的人生活在城市中，即使那时候大约有8亿人生活在城市，也还会有7亿多人生活在农村。也就是说，农民的人地关系并不能得到根本改变。按照现在的统计，农业人口是7亿8000万，到那个时候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不过减少几千万而已。而按照现在的城市化速度，平均每年耕地面积减少1000万亩，到时候会减少2亿多亩，那农村的人地关系不可能得到改善，反而会恶化。

如果由这个现实出发，你就会发现，尽管我们希望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但是，我们现在城市里所有的这一套现代制度，包括现代经济，对那个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小农经济高度分散的农村来说，仍然是不适用的。现在的法学家们所设想的现代法制社会，对这样一个小农经济遍地的状况来说，可能也不适用。小农经济高度分散，并且有3/4比例的兼业化经营，这个基本的经济基础恐怕到那时也还是目前这个状况，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也还是难以实现所谓的现代化。

我们把这个还是先放下，总之，20年之后也还会有一个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还会有大量的人生活在农村中，人们现在认同的全部的这套现代化治理的制度，对“三农”社会还是不适用。那时，国家也仍然不能按照所谓的现代法制来形成一个政府治理。只要城乡二元结构还长期存在，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的差别就还是存在，那贫富差别和区域差别呢？恐怕这三大差别都还是会存在的。

如果你按现在提出的大目标去看2020年，我们的人口达到15亿的时候，情况也许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再往远一点看，2030年我们16亿人，或者18亿人。到那个时候怎么办？如果以可持续的观念来看中国，现在的物质资源最多能够维持16亿人的生存，如果那时有18亿人，那么，这超过的两亿，就是打算移民也没有地方，咱们往哪儿移呢？

当这么多方方面面的情况错综复杂交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进一步反思，我们现在普遍认同的这一套现代化的话语指明的方向，真的是我们必须达到的目标吗？

再说了，有机会你去看看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的贫民窟，会发现之所以我们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贫民窟，恰恰就因为咱们是城乡二元结构，恰恰就因为现在的制度是给农民按人平均分地。如果农民真的彻底离开农村，家里那块地就没了。所以尽管开放农民打工已经12年了——1992年取消粮票以后就出现了4000万以上的农民工，从那时起大规模的流动打工就开始了，但是现在12年过去，流动打工仍然是流动打工，定居下来的很少。假定我们想加快提高城市化率，让这些人定居下来，至少应该先去看看墨西哥实现的城市化率有多少是出现在贫民窟的。这种城市化你是要呢，还是不要？如果说要实现良性的社会治理，都给这些人提供社会保障，那咱们有这个财力吗？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提法只要拿到发展中国家一衡量，就会发现都是问题。因此我才觉得，作为和这个国家一起长大的一代人，我们应该趴下做年轻人的垫脚石，让他们走过去。我们能提供垫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反思，是我们的解构，是我们对这一套大家已经约定俗成的话语的认真思考。

大家现在在书本上学的、大学里教的东西，可能连这点起码的反思精神都没有。等你们出来工作了，到我们这个岁数的时候，你们所感受的东西，可能和书本上的东西完全不一样，那时你们也可能会这样痛苦地反思。那还不如我们先把我们已经经历的东西、能反思的东西先做反思，然后告诉大家，让你们现在就开始讨论，不至于到时候麻烦成堆、教训成堆，再想调整已经很难了。

所以，我这些年跑来跑去，凌乱地形成了这么些感性认识，也没能清理出条条来。到哪儿大家让我讲，我都觉得很惭愧，给不了你们理论，现在还只能处在感性认识阶段。但这个感性认识已经让我觉得很多约定俗成的话语值得怀疑了。

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两个极端的东西都不可取，20世纪50年代，我的父辈在大学教书的时候，谁能翻译俄文，照俄文原版教材来教书，谁就是学术权威，就是博士生导师。今天，谁能翻译英文，照英文原版教材来教书，谁就还是学术权威，是博士生导师。我们难道这样就算进步了吗？

我的父亲就是在大学教书的，我就觉得他们那一代人挺可怜的，从来没有跳得出来。今天看看我的同辈，我觉得也挺可怜的，甚至更可

怜，因为他们甚至不想跳出来。为什么呢？利益已经决定了思想，他们只有这样干，才能得到职称，得到房子，得到博士点，才能到处去挣讲课费。那是他们的谋生之道。

我觉得，我说这些既得罪我的父辈，又得罪我的同辈。可是如果不跟大家说，我就觉得没尽到责任。如果确实得罪了谁，只好请原谅。

第四章　中国的战略转变与工业化、资本化的关系[26]

非常感谢下午安排我第一个发言。在座有很多国内学者，例如杜润生先生和朱厚泽先生，还有高文斌先生，都是我的领导；其他有很多都是著名的学者、教授。我在他们面前是个学生辈。所以我诚惶诚恐，不知道我的发言能不能让领导和老师满意。

我想，我们与其讨论中国说什么，或者世界上对中国的说法是什么，不如看中国做了什么。我认为，中国其实不过是搞了一次工业化。这种工业化必然要求制度改变，而制度改变又是在中国必须面对的两方面环境下进行的，一是国内环境，二是国际环境。

一、两个约束条件下的国家工业化资本积累

我们先谈国内环境的约束，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资源约束：中国是一个资源和人口比例十分不协调的国家。也就是说，人口和资源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但是可耕种土地只占世界可耕种土地的7%，而且面临着水资源短缺的约束。南方水资源相对丰富，但土地紧缺；北方土地相对丰富，但水资源短缺。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要想进入工业化，其资源约束就是第一个重大困难。

第二个方面是制度约束：与其他超大型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似乎是唯一在全世界范围内以战争形式完成土地革命的国家。在20世纪前50年，人们都知道中国有三次国内战争，但很少有人明确地强调这是三次以农民为主体的土地革命战争，战争胜利的结果是给全国的农民按人口平均分配了土地。这个结果造成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1亿农户、4亿农民各自在400多万个自然村里完全平均占有土地。这意味着中国工业化面临的是一个平均分配土地的彻底的小农经济，于是资本积累的制度成本就非常高。因为我们知道，工业化最早的资本原始积累必须解决工业和农业、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交易，而小农经济越是分散，得到农产剩余的制度成本就越高。于是，在50年代中期，为了解决城市工业的积累问题，政府建立了农村的集体化制度。

尽管人们把这种在农村中建立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叫作社会主义，

但它实际上的作用，主要是从农村为工业化早期的资本原始积累提取剩余。农村集体化具有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主要是在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方面提供必要的保障。

对于中国农村的这种制度，国外已经有大量研究，但因为20世纪50年代是冷战时期的开始，他们对中国当年的资料掌握得很少，一般都是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认识中国，把那个阶段叫作中国的社会主义阶段。

在中国用集体化的方式完成了国家的工业资本积累之后，当然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被马克思主义认为是工业化大生产的阶段。

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两个相似现象

提醒大家注意两个非常相似的现象：一个现象是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完成第五个“五年计划”后，随即在苏共二十大提出了“三和”路线，对外加入国际分工，对内放弃斯大林路线。在那种情况下，正在经历工业化的资本积累阶段的中国，客观上跟不上苏联的战略转变。不仅中国，其他仍在进行工业资本积累的国家，像越南、朝鲜、罗马尼亚等，都跟不上苏联的步伐。由于这种客观情况，因此发生了社会主义内部的争论，于是就有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区别。

从经济角度看，这只不过表明，苏联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必然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加入国际分工，实际上这是不可逆的经济规律；而尚未完成工业资本积累的国家就不可能跟上这种战略转变。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中国。1975年前后，中国进入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初步完成了工业化资本积累，当然也要求对外开放；而其他没有完成工业化资本积累的国家，比如因为没有战争条件完成工业化的越南、老挝、阿尔巴尼亚等，它们当然跟不上，因此也发生了中国与它们之间的争论。

同样，在国内政策的变化上，中国也是从70年代开始，逐步放弃了农业的集体化。

三、一场战争引发的战略转变

通过我们现在做的历史资料分析，得到初步认识，其实中国早在

1952年中央政治局的讨论中，就明确认识到中国要做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而且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上也是如此。我们中国人当时明确提出的是进入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那个时期原来在新中国建立之初被定义为新民主主义，也就是民族资本主义。后来因为朝鲜战争，我们才进入国家资本主义。这个重大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苏联为了支持朝鲜战争，从1950年起进行了军事工业的投资，在东北兴建了军需工厂，使中国东北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了在一般条件下不可能形成的重工业。

一般条件下，中国需要经过几十年的农业和轻工业的交换才可能形成重工业的积累，但是因为朝鲜战争，仅仅三年中国就有了重工业。所以，这在当时就要求国家做出一个选择，那就是：你要这个重工业，还是不要这个重工业。如果要，那就不得不以这个重工业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如果不要，那就得回到原来的新民主主义。

出于这个原因，中国发生真正的战略变化应该是在它从战争中得到了重工业以后，而不是在此之前。

这一点就涉及国际环境的约束。这主要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两大阵营之间争夺中国这个中间地带的斗争。当时美国的战略防御不是设定在朝鲜半岛，而是设定在日本列岛。因此，美国把中国留在中间地带，是要争取中国成为一个“中立”的力量。当时中国的态度本身也可以说是中性的，并不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也并不打算加入苏联阵营。

如果人们可以得到最近三年的资料的话，就可以看到有关中苏关系的经济背景的研究，这是苏联解体后的档案解密，中国学者把它的一部分买回来做出了最新研究成果。

从这种国际局势出发，对中国来说，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1949年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战略本身是符合中国当时的客观条件的。同理，1953年提出的重大战略转变，也符合中国不得不因为朝鲜战争而纳入苏联阵营以后国际环境的改变。

可见，中国在这个特殊阶段发生的战略转变，主要是国家工业化的要求造成的：最初面临的资源约束导致新民主主义，亦即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制度选择。接着，由于朝鲜战争改变为国家资本主义

工业化，又因为朝鲜战争后中国不可能再进行国际交换，只能在国内进行强迫交换，国家不得不长期从农业中提取积累。因此，工农业剪刀差出现。

1957年中苏开始论战以后，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工业投资和技术援助，迫使中国暂停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后来，这种靠集体化和剪刀差来从农业中提取资本积累的过程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年……

以上，就是我们在改革之前的社会主义阶段所做的事情。

四、农村改革的动因是政府退出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初步完成了工业资本积累，开始实行对欧、美、日开放，之后农村的集体化制度就不能实行了。这个变化，也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国对欧、美、日开放，之后得到很多西方投资，其重点是改变了中国偏重的工业结构。这样当然就增加了很多支农工业品的生产，导致化肥、拖拉机等农用工业品大量进入农业，农业的成本随之大幅度上升。但同期，由于剪刀差的既定政策，农业产品的价格是锁定的。这就导致一方面农业产品的价格不能提高，另一方面农业的投入品价格非常高，于是公社、大队、生产队都出现高负债。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农业已经成为投入产出为负值的产业。

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一种现象，即政府作为当时最大的经济主体从不经济的农业中退出（人们以前认为是农民从集体经济中退出）。这就是农村改革的基本原因。

因为在过去，政府是中国唯一的经济主体，所以不是企业，也不是农民，而是政府，在农业亏损的情况下从农业中退出，同时也放弃了对农民承担的社会责任，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事实上，农民分户经营意味着农村回到传统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这个时候，一旦政府不承担农民的基本保障，原来那种让农民感到有依靠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农村就很难再继续实行。

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制度变化，才导致中国真正出现了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从“大包干”以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越来越明显，以至于杜润生先生和秦晖先生都说农民没有国民待遇。

五、改革开放的成果：三个重大制度的转变

下面我们再看改革开放20年我们做过什么。

当前的情况其实很清楚。按照世界银行的一种算法，2002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三位。但按照人均量来算，还是在100位以外。人们看到中国发生的非常显著的变化，看的是它的总量在世界上位置的大幅度提高，但按人均量算，中国却并没有很大的提高。

从经济制度研究看，中国发生的重大变化实际上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经济利益主体多元化。由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危机之下实行了“拨改贷”的投资体制改革，以及“利改税”和“分级承包”的财政体制改革，国家资本逐渐分化为部门垄断资本，国有经济内部产生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及中央地方分权化的趋势。

第二方面是中国的资源资本化。1978年，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很低，与全国约1万亿元的工农业总产值相比，社会存款才226亿元。在国家实行“财政一本账，统收统支”完全承担扩大再生产投资职能，并因此造成长期赤字的压力下，银行系统才对国有企业贷款，其规模到1978年也不过1380多亿元。而到20年后的1998年，GDP约10万亿元，广义货币却增长到近12万亿元。前者的增长是算术级数的，后者则是几何级数的。世界银行1995年发展报告就指出中国的M2与GDP之比在转轨国家中最高，达到105%；1998年M2与GDP之比高达135%（美国为67%）；截至2001年，我国的M2与GDP之比竟然全球最高，达到160%，表明中国已经是一个资本过剩的国家。这20年的货币增长速度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所谓货币化进程加快，实际上指货币经济快于实物经济的增长。

经济货币化只是资源资本化的外在形式，是最近20年的经济增长中最不可忽视的因素。

应该进一步指出，经济货币化本身也为政府收益的增加提供了一个主要来源。中央政府通过不断增加货币供应来推动经济货币化和资源资本化，既可以通过发行货币直接占有铸币税，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又可以通过通货膨胀稀释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向社会转嫁亏损。这样，政府的利益和金融部门、金融资产，或者直接称为金融资本的利

益当然是一致的。这个经济规律在全世界都一样，谁也不可能违背。

第三方面是资本的全球化。人们只要尊重事实，那么无论站在怎样的立场，都不可能否认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主要是资本自由流动的要求。这在中国，也并不因所谓的意识形态不同而例外。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来，外国资本大举进入中国，国内外理论界都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国外资本和国内资本的特别是金融资本利益上的相关。这就是说，中国的资本当然会按照国际资本通行的运作规律办事。

综上所述，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是国家资本积累阶段；而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则是资本自身的增长和发展阶段。如果这个观点和相关的描述可以成立的话，所有的问题也就可以得到符合经济规律的解释了。

六、中国有第三条道路吗？

我们再看中国今后的发展前景，有没有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可走。

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国按照西方工业化的要求所走的道路，其实仍然是那种传统的工业化模式。我们不得不担心，今后继续这样搞，很可能走不下去。

根据现在已公布的研究成果，中国每一单位能源创造的GDP总值远低于日本。日本现在每人每年平均消耗两吨石油。如果将来中国人比较节约的话，假定人均1吨，再假定中国会在10年之内达到50%的城市化率，就意味着中国将有7亿人生活在城市。那么在未来的10年之内，我们就只算城市人口，不算农村，每年至少也需要7亿吨石油。而中国国内石油的总产量尽最大努力也只能达到2亿吨。那么，这种情况下中国至少需要进口70%的石油，才能满足它现在的工业化方式。也就是说，即使按照日本标准的一半算，中国也得大规模进口石油，这必将极大地造成世界石油市场的短缺和石油价格的上涨。

因此，尽管我们希望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但从国内资源紧缺的约束来说，中国走不成传统的西方式的工业化道路。

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寄希望于中国加快城市化的话，平均每一个城市人口生活用水的消耗量是每一个农村人口生活用水消耗量的20多倍，而中国又是一个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截至2002年，已有100多

个严重缺水城市，300多个缺水城市。

从这两方面的资源约束看，中国面临的国内资源约束和国外竞争的不利环境其实并没有改变。再考虑到即使50%的人口实现城市化，仍然会有7亿至8亿人口生活在农村，仍然不得不维持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制度约束也没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所以，中国恐怕必须选择另类道路。可目前看来，又实在没有其他选择，因为欧洲和美国提出的所谓第三条道路仍然是西方的概念，中国人难以跟着走。

附：讨论

阿明：我想问一些关于剪刀差的问题。我曾经试图考察不同资料提供的到70年代末（毛泽东时代末期）的数据。对于过去的25年，虽然是同一个历史时期，但不同的中国人使用的数据都不一样。我想搞清这个奇怪现象的内在逻辑。我非常感谢您讲到了战略这一重要的而又容易被人们忘记的事情。我想，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是以价值规律观念为基础的，要使农民和城市工人之间的平均收入达到平等。具体说来，是将主要产品的价格与农产品联系起来，工人的月工资保证了平等。在这个原则基础上，我对毛泽东时期的数据又计算了一遍。我发现了一些空白，农民的平均收入和工人不平等。改革之初的第一个阶段取得的成绩，看起来大大减轻了剪刀差，但第二个阶段好像又比毛泽东时代的剪刀差要大，这是否正确？如果不是这样，您能做一个解释吗？

温铁军：我要重复一遍，我们要看做了什么而不是看说了什么。理论上的事，我没有资格和大家讨论，我只是一个做实际调研的人。接下来回答您的问题。无论怎样计算，剪刀差都是存在的，即使在后20年也是这样。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农村全面推行家庭承包制的一段时间内，因为从1979年到1982年，我们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相对来说剪刀差不存在。但是从90年代以后，剪刀差实际上是扩大的。您刚才说的现象在80年代到90年代的变化确实是存在的。

阿明：但是，是否在从1952年到1957年间革命的开始阶段，剪刀差较小呢？

温铁军：实际上从1954年开始，剪刀差比较大。1954年以前，政府还是完全按照市场价格来购买农产品的。从1949年到1953年之间，剪刀差相对比较小，1954年后开始扩大。

阿明：第三个问题，因为我从你的回答中可以得出结论，剪刀差在1980—1984年间和1949—1954年间较小，可以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比较小吗？

温铁军：我记不清了，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参阅我写的相关图书《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其中有50年代剪刀差的数据。

阿明：如果是正确的话，是否意味着剪刀差可以通过诸如革命初期的社会力量的平衡或国家的政策等来得到减少？

温铁军：当然是。1949年到1953年，政府基本是按照市场价格来购买的。1954年遇到灾害，农民惜售，愿意多储存。国家强制实行统购统销，才开始出现剪刀差。同样的道理，1979年到1982年，政府主动提高了农产品价格，因此相对来说，工农业产品价格差缩小。1984年“卖粮难”导致1985年粮食减产，减产以后，国家实行强制合同定购，剪刀差又再次扩大。

阿明：我想问两个简单的事实问题。第一个是税收在农民收入中占多大比例，第二个是农民从中央政府那里得到哪些基本的利益保障。

温铁军：第一个问题我有一个专门的报告，是英文的，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把那个报告给你，因为要说清楚这个问题会非常占时间。第二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农业得到的是负保护。政府尽管有一些投入，但相对于从农业提取的收入来说，政府用于农业的补贴是很少的。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即使政府想给农民提供必要的补贴，但对于2.34亿农户，对于8.17亿分散的农业人口来说，这个交易成本太大了：不知道该给谁，该怎么给。因此，即使是扶贫资金，落实到农户的比例也是比较低的。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过高，是目前一个无法解决的制度问题。

第五章　中国能再争取20年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吗？[27]

与前面做规范研究的专家不同，我对于国际问题的认识不是靠书本，而是“用脚”形成的。主要是得益于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有机会七次去美国做访问学者或者开会，通过“灰狗”、铁路、租车、免费搭车等多种交通方式几乎跑遍了美国，不仅有机会对热点问题进行跟踪、直接观察美国的经济社会变迁，而且有条件与各色人等，特别是非主流做大量交流。90年代初期，还曾经在苏联解体之后，自费考察了七个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此外，对世界其他地方的认识，如欧洲、拉美和南亚，近年来也有机会采取“直接观察”的方式。因此，我对国际问题的看法主要是经验性的，当然也就是感性多于理性的，仅供大家参考。

一、冷战以后美国的战略调整

（一）美国的战略调整

对于美国问题的认识，其实应该是对国际问题认识的前提，因为目前在经济上已经客观形成了以美国主导世界经济、以美国资本为主推进全球化的局面。苏联解体后在政治上也逐渐形成了以美国为主宰的单极体系。唯美国有条件实行“单边主义”，让这个世界的所有国家都感到威胁。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关于权力谁都知道的常识。当权力客观上可以不受制约的时候，在一个国家的内部必致腐败；同理，当美国的世界性权力不受制约时，必然导致国际社会秩序的混乱。这才是对世界真正的威胁。最近英国一个议员对美国打击伊拉克的批评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当狼要吃羊的时候，你还能问狼有什么理由吗？

二是过剩资本推动的资本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利益的冲突，这是有很多争论的问题。客观地看，世界当然是不平衡的，各国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异当然是明显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相应制度当然也是不同的。除了少数资源禀赋特殊的国家（如主要石油生产国）之外，正在推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当然难以按照“自由贸易”的原则构建内部制度。这也是中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认同“多元体系”的原因。

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反殖民地运动中崛起的大批第三世界国家，基本都是以主体民族认同独立这种民族主义为动员、以战争为手段形成的民族国家。独立之后大凡有所发展的，无论宣布什么主义，实际上几乎都得靠某种内部集权制度，才能够有效地集中国家资源，将其投入于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一旦完成原始积累，形成产业，接着就必然进入资本化阶段。而资本的全球化却意味着欧洲、美国、日本的过剩资本自由进入其他民族国家，占有本来属于各国民族资本通过资源资本化获得的资本收益。这就是“资本建制权”的实质。

当然，如果世界不得不接受这种西方过剩资本来“化全球”的过程，客观上就会出现一个资本最过剩的国家建立单极霸权，按照资本的需要和各国资源禀赋对各个民族国家“重新洗牌”，这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调的所谓建立“新秩序”的实质。

这也必然带来各种次级大国资本与单极霸权国家重新争夺资源富集地区的冲突。最具军事强权地位的美国的捷足先登，客观上会威胁欧洲和东亚产业资本的生存，而这两个以制造业为主的地区不得不越来越依赖进口能源和矿产资源才能发展。

《外交事物》今年3月发表塞巴斯蒂安·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的文章《不得不帝国主义》，也试图对美国的全球霸权给出合理性解释。

我们搞经济研究的人一向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动员国民、整合资源的工具。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站在美国人的角度，可能会理解大多数美国人都认同“上帝保佑阿美利加”这样一个观点，是上帝创造的历史赋予美国人这个机会。尤其是当美国被包装成自由、民主、讲人权的国度，并且将反恐、反暴力、解救全世界等这些“新教精神”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大多数民众是愿意认同的。为什么在反恐问题上布什得到如此高比例的社会认可？这和在美国人内心深处的这种意识有关。

有一位智者指出，当冷战时期，也就是存在世界两极的时候，尽管双方的理念不同，手段不同，但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当时，苏联、东欧是一个与西方对立的阵营，它有极大的核武库，核武器的数量是美国的两倍。在这两大势力集团同时存在的情况下，谁都不敢贸然使用手中可以造成人类毁灭的核武器。

在苏联、东欧这个阵营中，苏联作为晚进工业化国家，只能以集中统一的方式来控制以社会主义阵营为名的本系统的全部资源。于是它就要树立起某种理念作为本系统的基本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恰恰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所树立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不同。但苏联在集中统一、有限主权论的理念之下，所采取的行动就是一种对老牌帝国主义行为的复制：以国家的名义直接使用军队，比如苏联对阿富汗的战争，也包括20世纪50年代对匈牙利、60年代对捷克、70年代初对中国的关系的处理。这些军事行动，相对于它秉承的理念是正常的。而中国和其他正在进行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否认同社会主义，都不能接受。因此毛泽东把苏联定义为“社会帝国主义”。

而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因为老殖民主义时代结束，不可能再派军队到发展中国家去直接掠夺，它的意识形态又与苏联阵营对立，强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所以就更不能以国家直接出动军队的形式来对那些不听话的族群或者独立主权国家实行干预，于是就改变干涉方式，动用CIA（中央情报局）去进行贿赂、颠覆、爆炸、暗杀，搞恐怖主义活动。由于这种手段与意识形态冲突，因此CIA在好莱坞影片中几乎成了国家罪恶的代表。

这位智者还指出，在刚刚过去的冷战历史上，两大集团尽管理念和手段不同，但他们之间的对抗客观上形成一种制衡，并且实际上都是在维持本集团体系的控制，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势力。一旦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没有了对手，美国所采取的手段自然会有重大变化，没有必要再靠CIA的恐怖活动，而是直接把当年苏联在有限主权论之下的军事干涉方式接过来。于是，阿富汗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一样，被美国军队从当年美国扶持的武装集团手里又“解放”了一次。

以史为鉴，可知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实际上不过恢复了过去的手段：以国家的名义直接用军队来进行干预。“9·11”之后美国的做法，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正常的，符合美国人的利益要求。例如，2000年4月南海撞机事件发生之后，我上网看美国人的反应。在十几个网民的讨论中，只有一个人提出“为什么中国飞机没有到我们的家门口来巡视？为什么定期巡视是美国到中国的门口去……”

客观来看，没有苏联这个对手之后，采取战争形式来实现国家利益，应该说是“阳谋”。至于是以“反恐”为名，还是以“反邪恶轴心”为名，那都只是一个借口。还在“9·11”之前，美国就以“反流氓国家”“反恶

棍国家”为名进行战争准备，当时开列的几个“恶棍国家”中就有中国——根据美国提出的标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非民主、大规模毒品、大量反人道的行为和黑社会等，这些标准中够一条就算是“流氓国家”，而美国认为中国够好几条。由于把中国作为“恶棍国家”，美国从本土派远程轰炸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也应该被看作“正常”情况。

当前，以军事手段来实现国家利益，对美国来说条件已经完全成熟，“9·11”之后打阿富汗，接着是不是打伊拉克？伊拉克之后打不打朝鲜？如果中国反弹是不是就对中国制裁？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并不是天方夜谭。

（二）如何看待美国近年来的战略调整

为什么美国近年来会有如此重大的战略调整？还得从经济上找原因。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制造业就持续不断地向下走，而同期非实质经济也就是“虚拟经济”大幅度地陡然向上。原因就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没有黄金储备的货币发行必然导致通货膨胀。

原来的金本位制度自动弱化，是“二战”后美国大规模对外援助，造成美元成为主要结算和储备货币所派生的结果。美国向全世界承诺每美元含有多少盎司黄金，这只是一个被世界各国接受的信用承诺，而不是真有那么多黄金储备。

但是近年来为什么各国明明知道美国的经济严重泡沫化，美元严重高估约70%，还要把美元作为主要的储备货币？就是因为美国在世界上拥有唯一的无以匹敌的军事强权。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全世界就应该承认：货币发行只有一个依据，就是政府的权力。既然只有政府能够发行货币，那么政府发行货币客观上就征收了铸币税。按照制度学派的理论，政府本来就是要追求租金最大化的。政府每发出一块钱货币，就必然分享一部分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那么，越是强势政府，其货币就越变成世界硬通货；而弱势政府，比如乌拉圭、越南，它的货币就几乎不堪一击。金融危机扫荡弱国的事实就验证了这样的道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不再实行固定汇率制，而浮动汇率制又不是以美国对美元随时可兑换的承诺为基础的。所以在美元过量发行、被大幅度高估的情况下，如果它不维持政治

强权，就意味着美国虚拟经济泡沫的破灭和美国金融资本的崩溃。

从这一点来说，美国国民即使不懂经济，内心深处也是有感觉的，因为他们半数以上的家庭在股市上炒股，人们几乎不储蓄，大部分是超前消费，凭的就是美国政府可以发行这张绿色的纸。而所有制造业的国家，尤其是后发工业化国家，都不得不以自己最好的资源、最好的劳动力，生产出最廉价的产品，半卖半送给美国人，以获得那张绿色的纸；还得再送回美国，买美国政府债券才能保险。于是，美国反过来又成为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这种金融资本的循环，使得美国能够稳定地占有对全球美元化所产生的资本收益。

这就是世界上已经形成的、有利于美国金融资本的经济秩序。

今天的美元经济已经严重泡沫化，成为美国政治背后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因素。这体现了一种和微观领域研究的经济规律不同的国际宏观经济规律：当世界转变成以政府强权为发行货币的依据的时候，货币早已不是一般等价物或者交易的媒介，而是政治军事强权的外在表现。近期内，无论格林斯潘怎样努力，美国股市也上不去，就是因为“9·11”事件表明美国也不再是全世界最安全的投资场所，因此外部资本流入不断下降，美国股市高峰期外部资本每年大约流入3000多亿美元，而今年已经下降到只有1000多亿美元。虽然近年来有人不断预测美国经济复苏，我仍然同意国家计委（于2003年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王建研究员的观点，只要没有大量外资再次回流到美国股市，美国经济就难以复苏。

当今天人们普遍认为资本能够单独创造收益的时候，几乎已经公认，只有让外部资本不断流入中国，中国才能走上经济发展之路。然而，上面述及的“美国现象”对发展中国家整个是颠倒的：外国资本买美国的国债，过去收益最高不过4%～5%，现在大约2%～3%；而资本进入发展中国家则必须占有超过15%的高收益回报！很多人在强调引进外资的时候恰恰没有注意到，外资主要和中国的垄断资本谈判，目的是要占有中国的资源向资本转化的收益。

1929—1933年的欧美大危机，本质上是全世界范围内制造业过剩的危机。当殖民地都已经被几个工业国家所占领，再没有什么可瓜分时，当产业资本扩张到了已经没有什么人需要这些东西时，就爆发了那次全球传统制造业的大危机。欧洲工业化小国再没有新大陆可去，也已

经把国内的地铁、铁路、公路等基本建设都修好了，因此，德国率先把制造业转向军事。而在军事生产中，正如盛洪博士指出，每比别人多1%的投资，就意味着比别人多100%的比较优势。19世纪末期的日本曾经转向军事工业，于是先后打败了中国和俄国。20世纪中叶的德国率先把投资转向军用，也是既满足了就业，也生产出了战争设备，于是就必然导致战争，并且先走一步的德国在欧洲就战无不胜。

后来，德国人在欧洲的狂轰滥炸打垮了其他国家的制造业，自己的工业生产能力也被欧洲本土之外的美国炸完了。这就给了美国一个空前的机会——欧洲的军事设备只能从美国来。于是美国必然大规模地扩张它的传统制造业，尽管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提升产业结构或是经济结构调整，而是传统经济结构的空前扩张。

历史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内生性危机：一旦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被用来输出设备的时候，资本主义生产就要转向军事工业，输出战争设备。规律性的结果就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战争的形式扩展工业设备生产，不仅向欧洲，而且还向中国输出。

这个对美国空前绝后的发展机会还在于，美国远离欧洲战场，因此它可以在战争中扩张，战后又开展“马歇尔计划”援助西欧和日本，乃至于在整个美国势力范围内进行工业重建和国家重建。这个重建的过程，又是美国设备和产品进一步对外扩张的机会。

同理，为什么中国20世纪50年代会得到苏联援助？因为苏联也在战争中利用它的亚洲部分远离战场的条件，发展了亚洲工业基地，并有条件在它战后的势力范围内进行传统工业扩散，导致美国和苏联成为世界工业化国家的两极。

但美、苏两国也有实质性的不同。苏联是非货币经济的计划交换，比如，它把吉斯150生产线挪到中国长春生产出解放牌CA-10卡车，要求中国用鸡蛋和猪肉等农产品来交换；而美国输出设备之后，是要用美元计算归还的；欧洲人虽然是战略盟友，也同样要还债，就要生产很多美国人要求的工业品。接着，就导致欧洲和日本的生产成本低于美国。后来，20世纪70—80年代，日本和韩国的汽车打败了底特律的汽车生产线，美国全球汽车产业第一大国的地位逐渐衰落。福特不得不在底特律建立一个“复兴中心”来发展第三产业。

欧洲和日本的工业从50年代恢复，60年代崛起，70年代开展大规模出口，这必然导致美国在战争中和战后大发展的传统制造业出现严重问题。这时候美国的跨国公司大规模对外转移，转而依靠货币资本扩张虚拟经济，以金融为主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近年来达到80%～85%，成为国内某些学者提出的“新经济”依据……

从政府操作来看，70年代后期美国进出口逆差问题发生，80年代最典型的调控政策是里根政府大幅度提高利率，促使外国资本大规模地进入美国资本市场；同期大规模发行国债，解救传统制造业。其实，西方国家冶金和机械等战略产业的保留都是依靠政府投资和关税保护。里根执政8年，政府国债投资2.6万亿美元，用以提升产业结构的层次，进入所谓高科技产业引领的知识经济时代。

里根时代的经济发展之所以能让一个演员获得“里根经济学”的美誉，在于美国建立了两个新的结构调整的基础：第一个是资本的基础，外资大举进入；第二个是高技术的基础，得益于政府以国债投资，不计成本地以军事需求来发展所谓的IT（信息技术）产业和BT（生物技术）产业。后来苏联解体，IT产业逐渐转变为民用，例如，到1996年互联网发展起来，就是把军队的指挥网络系统转为民用。

另一方面，这些结构调整也都是经济规律使然。当它的制造业大规模移出的时候，必须有新的产业替代，传统的自由贸易方式当然解决不了它的结构调整问题，政府只能调整金融政策，利率高到一定程度，进入美国的资本当然增加。里根时代创造了美国资本经济的基础和高技术产业的基础，由此孕育了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因此果然真的就有了后来的IT产业和BT产业（当时也是为了战争，为了制造生化武器搞起来的）的发展。另一方面，从80年代开始，美国发展信用卡，社会上也是消费主义盛行。

但是，里根政策也带来了一个恶果，即非政府投资的制造业无法经营下去。记得20世纪80年代，当里根政策使得利率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时候，我正在美国进修，看到的情况是到处拍卖（onsale），因为企业和社会承受不了高利率——社会存款利率都高达5%～7%，贷款利率肯定要上升到10%以上——这就导致一般的制造业根本无法在美国本土立足，当然是产业资本大规模移出。

如果这些算是美国人放在河里的一块块石头，我们却不能摸着它过

河。尽管美国有些做法和我国1989—1991年的情况相似：那时我国政府曾经大幅度调高存款利率，公布的8年期保值补贴利率可以达到约24%！那么，相应的贷款利率就应该算是高利贷！哪个企业能受得了政府制造的高利贷？当然会产生大量三角债，导致以制造业为主的国企资金成本大幅度增加，逐步趋向垮台。可见，中国也本来就是金融问题、宏观政策问题重于企业微观制度问题。这些情况可以与美国的里根时期相比的是，美国的存款利率最高也不过调到了7%左右，它的企业就受不了，大量移出，使美国经济空心化；不可比的是中国的企业移不出去，因为我们是低质企业，顶多剥夺国内市场，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合乎逻辑地出现了一系列经济问题。例如，1992年以后出现三个投机经济的大幅度增长——股市、期货、房地产。成本过高的资金一下大量投入了这三个投机经济，至今仍然是中国解决不了的烂疮。

再回过头来看美国。里根之后的老布什政府当然看到经济空心化问题，便开始降低利率，一降就降到了2%左右，于是又造成资金外逃。没办法，就去打海湾战争。投资者一看外逃不行，石油主要输出地的阿拉伯不安全，世界上其他制造业为主的地区投资净收益也就下降，只有美国仍然是资本收益高且安全的地区，于是国际资本只好又回到美国股市。这些变化完全符合规律，美国为了国家利益，必然用军事手段解决经济问题。也可以说：只要资本出逃，就必然导致美国在外边打仗。“9·11”以后，美国再次出现大规模资本外逃，随即这种军事至上的行为就愈演愈烈，必然发动战争。

二、从国际冲突的历史解构西方现代化

为了进一步了解冷战后的这种重大变化，我们还应该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的现代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社会主义阵营还没有建立，美苏主导的两极秩序还没有形成，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就有条件毫不客气地直接以国家名义进行战争，掠夺和控制殖民地。几百年来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必然伴随产业资本的对外扩张，这是经济规律使然：大工业一旦形成，必然要求大规模商品输出，商品输出必然与别的国家利益发生冲突，发生冲突必然要求代表资本利益的国家采取政治手段和军事手段，而军事手段只不过是政治手段中比较极端的。任何政治问题背后都有其经济原因，因此，在没有形成苏东体系与西方对抗之前，工业化国家使

用军事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当然就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所以才有两次世界大战及其他国际冲突。

大部分拉美和亚非学者对新老殖民主义都抱强烈的批评态度。他们指出，北美大陆在欧洲人进入之前，原来至少有3000万到1亿的印第安土著人口，现在只有80万人。美国建国以后，仅仅在19世纪中叶，就发动了1000多次战争，基本上消灭了印第安人。到20世纪末期，美国的印第安土著人口只剩下80万。如果再加上往北美运输的非洲黑人，到达美国的仅有2000万人，而在掠夺和运送途中，各有同样数量的黑人死掉了。所以仅仅在美国拓展北美大陆的过程中，就有将近1亿的土著和非洲人做了牺牲。今年年初我去巴西，拉美的学者们认为南美大陆的情况几乎相同，他们计算南美有1.1亿的南美土著和非洲黑人死于200年前的殖民地开发过程。这样，南北合计大约2亿人成为美洲殖民开发的牺牲品。

而殖民地的开发和欧洲的工业化扩张及人口的移出，都是高度相关的。

据有关研究，欧洲通过16世纪以后的移民和18—19世纪的“三角贸易”向殖民地转移了1/4的人口，老牌殖民主义的英国转移出1/3的人口，那3个小岛上的人口流出去，占据了北美和大洋洲两个大陆，其他欧洲国家则占领了南美和非洲，就这样，欧洲对4个大陆的殖民地占领，彻底缓解了欧洲本土人口与资源之间过度紧张的关系。

假定西方已经建立的现代化是我们必须追求的一个目标，那么，我们应该具有的基本常识就是：中国根本没有条件，也不可能按照西方的这种对外扩张的模式来发展以工业化为主的现代化。因此，我们只能通过内向型积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西方的现代化只能以西方的经验过程为基础才是科学，在中国则很难说是科学。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我们不能再进行两三百年的殖民扩张，再杀2亿人；第二，我们也不能照搬西方在人口大规模移出以后，以节约劳动力为目的的科学技术路线；第三，人口与资源过度紧张这种基本国情矛盾必然对国内制度构成制约，搞得我们在是否照搬西方的制度这个问题上进退两难了上百年。19世纪中叶的洋务派先驱者们只能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20世纪初的慈禧太后把“引进器物”改变为“引进制度”；也不过让10年后的胡适博士总结出“全

盘西化”的理论，中华民族付出巨大学费，结果只是“邯郸学步”。100多年了，中国人汲取了大量教训，终于进步到“摸着石头过河”的水平。

目前我们国内有一系列困境——内需扩大不了，外需扩大却收益太低。像广东的有些出口加工区，只有5%的收益留在广东人手里，95%都流出去了，但低到这种地步还不得不这么搞，还不就是因为中国不可能重复欧美国家当年殖民地扩张的道路吗？所以，客观来说，中国走到今天还是进退两难。而这一点很多人至今都不能清醒认识，也有些人一门心思地以为能摸到西方人放在河里的石头，就能达到现代化的彼岸。

客观地说，中国处在产业扩张阶段，而且是资本和劳动力“双过剩”，此时我们面对的河里的下一块石头，就是西方人200年前的殖民化，但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西方当年搞殖民地的那个条件了。于是，中国唯一能够发挥的所谓比较优势，就是在劳动力资源严重过剩条件下压低劳动力价格，不承认剩余价值，对外杀价倾销。据说今年的广交会已经到了1公斤衬衫卖1美元的地步，几乎等于白送；原来一个五金工具箱能卖到40美元，现在只卖8美元。这些简单的制造业没有技术门槛，谁的劳动力便宜谁占领市场。而压低劳动力价格又必然导致国内收入差距的拉大，社会矛盾越来越复杂。此外就是压低资源价格，有研究认为应该把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算作负值计入GDP。

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讨论过，那时有个关于“亚细亚形态”的辩论。当时就有人引述马克思晚年的思想：在传统的生产力水平之下，人们无法逾越地理障碍，导致不同的文明发展线索。古代中国对于西方来说，不仅遥远，而且有着无数的地理障碍。南面的喜马拉雅山高不可攀，西面是大漠，北面是冻土带、荒原，东面是大海。所以西方人没有过来，因此中国维持着不同于西方的“亚细亚形态”。后来，为了得到苏联的援助，我们才在理论上照搬了被苏联教条化的“五个历史阶段”，甚至把那些主张中国属于“亚细亚形态”的学者批为“托派”。

近10年来，我有机会两次去马克思当年做研究的大英博物馆，两次去巴黎的卢浮宫和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以及欧美其他汇聚人类文明的大博物馆。在对古代文物的观察中，感觉到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形态”确实有道理。因为我看到人类文明的发展线索的确差异明显。古地中

海和近东的古巴比伦文明，主要是狩猎和采集文明，当地气候温润，物产丰富，使得那里的人可以伸手摘到果子、扔出石头打倒野兽，从那里的3000～5000年前出土的文物中可以看到，文化表达主要突出的是个体的人高马大，而有群体场面的则是战争，因此那里产生的是以个体为基因的文明。这种个体文明的侵略性非常之强——它从来就是要打仗的。欧洲最早的《荷马史诗》几乎就是掠夺和战争的描述。

这与古代东方必须以群体劳作才能实现灌溉和防洪的农业文明根本不同。中国最早的政府“夏禹王朝”之所以与西方不同，恰恰在于它不是产生于战争，而是产生于“大禹治水”过程中以共同防治水患为目标、以“三过家门而不入”为德政，对沿黄河各部落的成功组织。这也是中国必须强调“以德治国”的政治传统的本源。

后来欧洲人先扩张到尼罗河流域，再到中东地区、印度。到印度以后就非常困难了，因为地理障碍补给跟不上，所以中国就变成了一个在西方殖民化进程中没有完全成为殖民地的国家，因此中国属于相对比较独立的类型。这也是中国要走自己道路的历史原因。

四、守拙：重大国际变局下的唯一选择

近代历史上，从1840年到1857年，大英帝国对中国进行了十几年的侵略后得出经验教训，中国这种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超大型的大陆国家是不可能被完整征服的，所以认为中国必须分裂。相应地，所谓“大英帝国远东战略”，就是各国都可以在中国拥有殖民地，但任何“列强不得形成独占利益”。然后，这个既成战略又被后起的美国在19世纪末期变成了“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成为列强们都认同的殖民化中国的政策。也就是说，英美领导下的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战略其实就是“分而治之”，逐步肢解；而且从1857年大英帝国远东战略制定之后就基本确定了，那之后没有大的变化。

当前，在重大国际变局下，中国外交政策就应该相对更为谨慎。客观上我们既不可能重复欧洲人搞“绥靖政策”的做法，也不能像有人要求的那样，一定要站起来代表第三世界大声疾呼。我们不得不继续“守拙”。

（一）谁才是美国真正的对手？

如果从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看，我们首先应该认识到，真正有可能成为美国资本对手的是欧洲。

俄罗斯及其他欧洲国家都非常愿意看到美国在战略上把“两洋”改为“一洋”，把亚洲作为战略重点，把军事力量转移到西太平洋。

毋庸讳言，美国把战略重点转移到西太平洋对欧洲也是一个历史机遇。人们已经看到，同期欧盟乘机抓紧东扩、加快欧盟的一体化进程，抓紧利用美国和中国的紧张关系，创造欧洲第二次崛起的机会，希望成为可以和美国抗衡，进而替代美国霸权的另一极力量。

我于去年和今年两次去欧洲，和那里的学者讨论到这一点的时候，欧洲的有识之士看得很清楚。欧盟国家本身并不想和俄罗斯对抗，但是，北约是美国主导的，欧洲人想从“法德军团”变成“欧洲军团”，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然后以之来代表欧洲利益。这当然遭到在欧洲军事上占绝对优势的美国的强烈反对。美国认为有北约就够了，因为北约的军事主力基本是美国军队，美国战后在欧洲各国的战略要地驻兵，客观上压制着欧洲各国的崛起和对美国的反弹。为什么欧洲各国除了法国之外，大多数政治家对美国的批评非常谨慎小心，因为只有法国领土上没有美军；显然，德国的军队根本对付不了在德国领土上驻扎的美国军队。所以相对来讲，政治独立的、态度比较强硬的，只有领土上没有美国兵的法国。当然，如果这次法国极右翼势力上台，那可能就比较麻烦了；如果一直是中间势力或是中左势力执政，对美国就不利。而法德联合，推进欧洲一体化，对整个世界再次形成两极制衡是有好处的。

因此，我们应该高度评价欧盟崛起，积极发展对欧洲的经济政治合作关系，尤其应该适度支持欧元汇率提升；同时，必须低调宣传中国的发展，公开暴露制约中国发展的“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的国情矛盾。我们隐含的希望——就像毛泽东当年希望的那样——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最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亚洲。遗憾的是，现在对于中国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来说，军事冲突和战争的威胁已经日益迫近到亚洲而不是欧洲。这时的欧洲人急于想实行绥靖政策，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把战争的祸水往东方转移，尽量让美国人到东方来。

（二）中国周边国际形势

现在中国的周边是多事之秋，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日韩两个重大的亚洲经济体跟中国存在结构性的经济冲突。

问题很清楚，东南亚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那些国家的产业结构不完整，没有重型工业，没有原材料工业，没有支撑国家基本建设的大型制造业，只有日本雁阵式战略转移过去的加工业，只可能对我们华南地区一般产品制造业的出口，比如服装、食品等低附加值出口构成竞争。因此中国提出“十加一”，跟东南亚结盟，这就可能重新形成亚洲的地区经济结构整合，有利于中国的产业输出。

不过，我们这样做，客观上必然和日韩冲突。

20世纪过去的两次大战都是在那些产业结构趋同的国家中发生的，日韩和中国一样，都有着完整的重型工业，由重型工业又必然带动大型机械制造，如造船、汽车等战略产业的发展，然后才是次级产业的发展，所以，越是产业结构完整的国家，其稳定性越强。同时，如果不扩张的话，它的内部危机就会越来越严重，包括我们的国企问题，之所以解决不了，也是这个道理。重型工业结构国家的大型制造业必须是生产线输出才能有活路，这一点是所有的老牌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的必经之路，而当代的中国就是走不了这条路。我们现在仍然是一般产品输出，既没有产业输出又很少有设备输出。从发展规律看，我们其实只靠对内剥夺完成了原始积累，离真正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还有一个不可能逾越的对外扩张阶段。

因此，“9·11”之后，美国在中国周边形成的基本战略布局是值得我们谨慎考虑的。比如说美国打阿富汗，军队驻到了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于是，就能够扼制西亚乃至整个中亚。中国苦心经营的上海中亚五国合作机制这样一个想整合中亚、协调中国西边石油生产国关系的设想，很快就被美国人打阿富汗给突破了。这就意味着，美国要在中亚搞面向西欧的石油通道不仅得到军事保证，而且得以进一步控制欧盟的石油命脉。而中国修建的西气东输工程，其隐含的战略意图是进一步向中亚五国的石油资源地发展，乃至将来如果可能，发展中、印、俄三角关系，分享里海的石油资源。这个战略意图看来是难以实现了。

中国要按照目前这个工业化、城市化的速度发展，没有外部稳定的石油补给是很难维持的。越来越多的人要买汽车，城市还要改烧天然气，所有这些消耗大量能源的项目都发展起来的话，其结果必然是中国成为一个石油和能源的高度进口依赖国。

日本现在人均消费两吨石油，1亿多人口每年要进口两亿多吨石油。马六甲海峡每天对开180艘巨型油轮，给日本运送石油。就这一个制约因素，使得日本经济即使全球第二，哪怕成为全球第一，也必须紧跟美国。

从目前我们国内的发展情况看，中国预计10～15年之后会实现7亿城市人口的目标。我们即使没有日本那么大的消耗量，按照他们的一半算，再过10年，估算下来我们的石油也将有70%靠进口。马六甲海峡目前已经非常繁忙了，现在海盗又重点袭击油轮。要想挡住中国的这条几乎是唯一的石油运输线，是非常容易的。当年苏联在越南的金澜湾、美国在菲律宾的苏比克湾，都建设有大型军事基地，两个超级大国都是为了控制亚洲的生命线。我们过去靠自力更生的时候，经济上没有那么大的外需，军事上可以立足于人民战争，可以没有远洋海军和战略空军，更没有海外军事基地。现在，经济对外依存度近年来曾经达到45%以上，就不得不面对这些既没法回避也没法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几乎类似于当年日本在工业化崛起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所遇到的问题。

（三）欧盟和欧元崛起给我们的历史机遇

中国不可能有条件成为美国的敌人，当前完全没有必要造成国际上的“错觉”，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示弱下去，除非关系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否则就不要强出头。中国一旦强出头，那就必然导致日本、韩国更加紧紧地绑在美国的战车上，它们生怕中国崛起，成为世界或者亚洲的强国。历史上，只要中国在亚洲崛起，日本和韩国就没有好日子过。诚如前面所讲，中、日、韩三国都建立了相对完整的产业结构，东南亚小国则谁强跟谁走。

我个人认为：真正有条件成为美国金融资本的敌人的，只能是欧洲。美国真的觉得它的战略平衡失控的时候，一定会把战略重点转向欧洲。

欧元1999年刚刚问世时，在国际汇市上就比美元高十几个百分点。这是因为欧洲经济比美国经济健康得多。美国经济80%靠服务业，欧洲的服务业也就占40%～50%。有人说美元币值高估70%，公认的说法是高估20%。既然欧元比美元币值高，欧洲经济又相对比较健康，必然导

致各国调整外汇储备。比如日本1999年大约有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假定要调换20%的欧元，就意味着要卖出600亿美元的国债（因为大部分外汇储备在美国都是以国债和其他债券形式存在的）。假定外汇持有大国（包括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等）都看好欧元，为了防范汇率风险，就都要买入欧元同时抛售美元，那么结果是大量资金进入欧元市场，欧元一下子就会被托起来，美元就会被打下去。也因此，才发生了巴尔干战争。

欧洲的巴尔干冲突是长期潜伏的，科索沃危机由来已久。为什么会发展成美国主导的大规模军事干涉？那是因为美国想阻止各国把资本投向欧洲，阻止买欧元的潮流，防止美元垮！所以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的巴尔干冲突到1999年才全面爆发。背后导致这场战争的原因就是典型的经济原因。欧洲各国发行欧元的前提是各国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3.4%，巴尔干战争一打，所有欧盟国家赤字都超过4%，欧元立时就掉下来了，汇率跌落20%以上。各国马上停止调整外汇结构，因为，战争使欧元成为不稳定货币。

按照传统理论，货币被当作一般等价物、交换中介。欧洲区内贸易大于区外贸易，一旦欧洲整合成功，形成欧盟统一货币的情况下没有汇率损失，而区内贸易的实际量就会增加，因此它的经济健康程度大于美国。美国现在实际成了全球最大的吸血鬼，它要把所有制造业国家创造的利润吸到自己这里来，把自己发行的美元给他们，再将美元吸引回来投入自己的资本市场。这是一个恶性的经济循环。当它的制造业大规模移出的时候，实际上把经济变成了一个“从纸到纸”的循环。

世界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发生的危机不再是传统的产业资本过剩，而是金融资本过剩导致的危机。欧洲和亚洲的中国、韩国等经济没有严重“泡沫化”的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能够幸免于难，不是因为金融方面的决策或者技术上的操作正确，而恰恰是因为这些国家以制造业为主。中国的产业结构是完整的，资本市场没有对外开放，所以中国在东亚金融危机中没受什么影响。韩国的产业结构相对完整，所以它复苏得最快，只要把泡沫挤出去，产业就会继续运行。同样的道理，从拉美经济三支柱——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的情况看，墨西哥、阿根廷先后都垮了，巴西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垮？也是因为巴西是其中产业结构最完整的国家。

金融危机中垮得最深的，是与国家政治强权结合的金融资本。作为

以实物经济为主的国家，中国并不担心国际上发生大的金融危机，充其量损失外汇储备。如果美元在金融危机中垮掉，那么中国的2500亿美元外汇储备可能大幅度缩水，但在本币坚持不开放的条件下人民币并不会垮。

国内外很多人希望人民币对外开放，但我认为如果现在开放人民币，很有可能重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厄运，这是因为我们的货币总量太小，总规模连美元27万亿至28万亿的零头都不到，而人民币折合美元充其量才1万多亿美元，无法与国际金融资本对抗。除非有特殊条件把我们国家约40万亿元总资产的80%实行社会化分配，并且根据发展到不同层次的资本市场交易的需要增加货币发行，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提升国家金融资产的规模，形成与国际资本抗衡的实力。

冷战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苏联的资源基本上是沉淀性资产而不是流动性资本，由于资源向资本转化、占有资本收益是靠货币化来进行的，因此，解体后的俄罗斯政府承认德国马克在俄罗斯流通，就等于德国政府凭借政治权利在俄罗斯占有铸币税。此时欧洲资本进入苏东，把资产转换为可以增值的资本，就可以取得资本化收入。这给了欧洲金融资本一个空前的扩张机会。俄罗斯在17—18世纪占领了一大片亚洲土地，加上东欧大量的熟练技术工人，对欧洲金融资本来说，这是空前绝后的有利条件。而欧洲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加紧内部整合，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和统一的货币，并没有坐失良机。欧元作为欧洲的统一货币进入苏东国家，能够占有苏东资源向资本转化的几乎全部收益，使之不被美元资本占有。于是，这两大货币代表的两大资本集团的斗争，必然是你死我活的。

我在1999年的文章中分析过，欧盟和欧元的崛起意味着欧美两大金融资本集团斗争的开始。欧盟刚一发行欧元，美国就发动巴尔干战争，打了欧洲的“下腹部”，欧盟各国不得不参战，导致资本大量流出欧洲。后来，2002年1月，欧元正式流通，接着就是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的外资从3000多亿美元迅速滑落到1000多亿美元；在美国的外资流入中，欧洲曾经占四成以上，现在则不到一成；同期，欧元的汇率恢复到超过1：1的水平。

在欧洲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时期，为什么英国无论哪个党派执政都紧紧绑在美国的战车上，干扰欧洲的统一进程，而且至今不加入欧元体系？关键原因是英镑币值高估，汇率长期比美元高约50%，而金融业是

英国的第一大产业，制造业早就从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移出了。如果加入欧元体系，英国的欧洲金融中心地位不保，英镑汇率就会掉下来。因此，英国必须与美国保持紧密的战略同盟关系。

在中国的国际环境变化趋势上之所以注重欧洲问题，就是因为实现了一体化的欧盟，必然形成与美元抗衡的货币体系，而欧元随欧盟东扩一旦真的形成强势，必然置美元于死地。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一旦美国完成控制亚洲的战略部署，在中国周边形成包围，而中国自身经济增长不足以缓解人口膨胀的压力，不仅内部矛盾复杂，而且又处处“服软”，确实没什么可怕之处。那么，美国下一步的重点还应该是在欧洲。

当然，中国也完全有可能长期处于逆境。记得当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我在纽约听一个美国政客说“我们能够打破铁幕，当然就能够打破竹幕”。美国霸权在亚洲推行若没有任何障碍，则有条件联手日本，先把中国肢解了再去整治欧洲。

但这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够正视国际环境和自身问题。如果中国仍然继续保持集中统一的局面，并且得以改变过分依赖外需维持增长的问题，通过类似“西部大开发”这种内部调节战略不断缓解自身的复杂矛盾，也许会使美国意识到它可能和19世纪中叶的大英帝国一样，在中国无法形成独占利益，而日本、韩国参与中国瓜分又可能在若干年后进一步威胁到美国的世界霸权……或者，这个时期欧洲崛起比较快，欧元对美元打击比较大，等等，那么，美国可能先掉头西顾。只有在那种情况下，才可能给中国留下一个相对和平的发展空间。

总之，我们希望看到欧洲统一，欧盟迅速崛起；看到俄罗斯和欧洲区域一体化迅速融合。这样，欧洲的金融资本整合苏东资源就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当欧元进一步稳定并且强大到和美元资本对抗的时候，就会迫使美国重新把战略重点转向欧洲。

当然，我们必须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内抓紧解决我们的问题，不能再延迟。

附一：中国改革走的是“第三条道路”[28]

一、中国制度与西方式的私有化制度不同的历史根源

中国在漫长的农业社区文明中，社区和农户之间自发性合作并经历史沿革而成的“两级产权”，与西方私有制经济制度下的产权关系是不完全相同的。中国不可能第二次再走西方指示给我们的道路。

（一）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的“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公民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分析依据。马克思早就看到，即使是西方的私有制经济，当它在向生产的社会化和股份制发展时，也在扬弃着私有制。他说：“资本主义的股份制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扬弃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8页）此处所说的“后者”就是合作制。他还在1858年4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股份资本，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及其一切矛盾。”中国的城市改革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消极扬弃的”，以为可以通过股份化改造企业产权构成；而农村改革之初的分地和后来“股份合作制”的发展，却在实践着“资产的社会化与生产的社会化相结合”。

在这个历史性的社会经济变迁过程之中，“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却长青”。应该注重的是从实践中去发现问题，提炼出一些带有理性的经验，而不是把传统的或西方的理论结论或理论概念，套用到现在生动活泼的经济现象上来。农村的分田到户，并不意味着私有制的产生，而是集体经济“产权两极构造”的又一种实践形式。

（二）东西方不同社会基因的形成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西方的“个体化”的私有制经济，是建立于西方自己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当中的；而东方这种“群体化”的公有制经济类型，则是建立在自己五千年东方式的“亚细亚形态”文明发展过程中的。

据我所知，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对此有过争论，80年代初，我在大学里也对此有过讨论。带着这些争论中未决的疑点，我曾经有机会在马克思做研究的大英博物馆认真地做过观察分析；后来在法国的卢浮宫、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俄国的冬宫博物馆、德国的日耳曼博物馆……在那些汇聚了人类文化财富的地方，认真地做过一些研究分析。

尽管我并非历史学家，但作为一个有心人，我感到震撼的是，在三千年乃至五千年前的那些古墓葬挖掘出来的文化遗产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悬殊的差异：西方的古代文明发源于地中海沿岸的采集、狩猎文化，那些地方的出土文物所表现的人，是充分“个体化”的人。无论是古希腊的雕塑还是壁画，所表现出来的人物各个不同，但主要表现的是人的体魄的强健。

而东方，包括古埃及、古印度及其他古代小国，所有这些立足于原始灌溉农业的古代东方社会，挖掘出来的墓葬壁画却都千人一面，体现出典型的“群体化”特征。即使是部落酋长，比如说大禹，也不过是个头高点。大家都着一样的衣服，有一样的面孔；甚至那种多年延续的一样的单线平涂式的表现手法，也体现不出东方古代社会人的“个体化”突出特点。

古代东方社会可以总结为浅显的“以群体为基因”的社会形态，西方社会则叫作“以个体为基因”的社会形态。这两种社会形态导致后来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类型。我认为，这种基因是决定东方无论如何都照搬不了西方经验的内在原因。

从经济基础上看，地中海文明首先发源于古希腊、古罗马，这些地方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的优势。即使现在到意大利半岛去看，那里还是气候湿润，物产丰富。原始氏族部落制的时候，西方是狩猎文明或采集文明，体格强壮的人伸出手就能拿到果实，扔出石头就能打到野兽，如果没有自然资源或者资源不足就会发生战争。所以，西方古代社会第一部成文的历史《荷马史诗》反映的是战争史。我们读过著名的“特洛伊木马”的故事，这个故事表面是讲因海伦而发动的战争，实际上是资源配置而导致的一场战争。后来，西方社会在从中世纪向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仍然以战争来控制资源和市场。

而东方古代社会产生于原始农业，比如，中国最开始崇拜的是“神农氏”，因为他“尝百草而事农耕”，所以这位原始农民就成了“三皇五帝”之

首。后来，第一个从部落酋长转化成国家统治者的则是大禹。大禹治水也与西方迥然有异。为什么中国的最初国家权力形成于治水政绩和“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德行，而非西方式地形成于战争或暴力？因为，原始的灌溉农业这种经济类型要求人们必须结成社会群体才能防御水患，才能利用水力，才能引水灌溉。所以，它突出不了个体，一个人开不了一条河，一个人防御不了洪水，依托大江大河的原始灌溉农业，演化孕育出的必然是群体基因的社会形态和德政的政治形态。

（三）中国应该有第三条道路可走

两种不同类型的原始经济基础决定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基因，奠定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底蕴。即使发展到今天的这个世界格局，也仍难脱其窠臼。

到现在为止，我们实际在走着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传统的“第三条道路”，但却还没有产生于自己脚下这块热土的中国人自己的经济学理论。理论界实在是非常苍白的，还没有从我们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脚踏实地调研，一个一个地去界定社会经济范畴，去发现它们之间的本质关联，去挖掘出质的规定性，去总结提炼出我们的基本理论和概念……要么照搬苏联的理论，要么照搬美国的理论，照搬理论是没出息的。我相信“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的古训就是注重调查研究、注重交流，特别是从基层调查研究当中产生感性认识，为深入的理论研究提供实证材料。

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危机的成因

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能改变经济的周期性规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不仅仍然表现为周期性波动，而且周期缩短，原因迥异。

（一）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引发国家资本部门垄断和地方政府原始积累

如上文所述，1982—1984年中国经济开始高涨。其中非常重要的变革就是为减轻财政负担，实行“利改税”、“拨改贷”和“财政分灶吃饭”。从过去的财政“统收统支”体制改造成各部门“留利交税”，财政对企业投资改为银行贷款和中央地方财政“分级承包”。

所谓“统收统支”，就是任何一个单位所创造的每一分利润都要逐级上缴财政，所花的每一分钱都要由财政统一安排下达。这是全民所有制

存在于财政并对全民进行分配的必要条件。财税改革在调动了各部门和地方理财积极性的同时，客观上以“单位所有”取代了全民所有，带来了三个重要的现象。

一是财政改革以后，出现了各个部门根据自己实际占有的国家资产来决定上缴和留利的情况；于是，出现了部门之间的财产分割，也就是“国家资本的部门垄断”。

在财政体制改革之前，中央政府是有绝对权力的。因为，各个部门的资产都是全民积累的，是农民、工人的剩余价值形成的。因此，这个国家从一穷二白、完全的农业国发展到70%以上的产值来自工业，发展到改革开始时国有工业固定资产达1000O亿元，这是全中国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形成的。因此，中央政府代表全民有绝对的财产权力，甚至连各部门的人都认同这是国家的财富。

但财政改革使各部门突然有了收益权；从收益权就开始转成财产占有权，因为收益权来自对财产的实际占有。于是，就开始出现了部门之间的收益差别。其实，权力份额最差且最无资本利润可占的是农口部门[29]，因为农民把财产先分包到户了，人民公社也解体了，农口各部就成了几乎没有资产可供垄断占有的政府部门。

部门之间的收益差别现象导致了后期的部门垄断资本形成。现在所谓的“块块之争、条块之争”皆起源于此。因为每一个条条都有自己的部门利益，所以就有了部门之间出于利益在决策上反映不同意见，进而再让人大通过部门为自己起草立法并予以合法化的情况。这就使部门利益到了尾大不掉的地步。

部门垄断资本形成也是中央调控失灵、“设租寻租”型政治腐败泛滥，陡然加大制度变迁成本的直接原因，只是人们对此无可奈何罢了。

二是“拨改贷”改变了全民所有制国有企业的性质。企业从银行贷款进行扩大再生产投资，还贷后所形成的资产，按理应为该企业全体职工劳动剩余转化而成，视为共同所有。现在则因产权改革滞后而已经演化成为“单位自有资产”。政策理论上不承认“拨改贷”后企业资产性质上的“共有制”变化，片面强调“国有”，实际上是部门垄断资本自我保护的政策表现。

三是“财政分级承包”启动各级地方政府为自己的财政利益而进行地

方政府资本“原始积累”。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只完成了国家一级的工业资本原始积累，这意味着国家所直接控制的大中型城市基本上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地县以下普遍工业基础薄弱。于是，在财政改革后，全国形成了各个层次的明确的收益主体，数千个县、市，乃至数万个乡镇便都突然有了一个要求：完成各级地方政府的资本原始积累。

大家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个现象——“跑步进京”。就是地方政府到北京跑部门，从部门垄断占有的国家资本和收益中挖一块给这个地方，甚至拉高干子女当地方官，于是官场腐败应运而生。随之就出现了80年代中期投资规模的空前膨胀。而又由于整个国有经济的内部分配机制是完全不能制衡的，新增投资约有一半要转化为消费基金，于是，投资的膨胀又导致了消费的膨胀。

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带来上述问题，因此出现了投资、消费双膨胀的局面，形成了改革以来的经济过热问题，进而引发了经济危机。

（二）危机调控政策分析

1985年经济增长出现高潮，也导致财政出现了较高赤字。这时提出的经济调整的口号基本上还是“调整、整顿、充实、提高”，和上一次发生危机的1980年的八字方针差不多。不过，1986年提出的“拍、租、转、股”则因其触及国有企业产权改造，而显然比上一次的“关、停、并、转”有本质上的进步意义；但这个进步由于仍没有进步到承认企业资产中的职工劳动剩余价值的深度，因此得不到广大工人的响应。加之种种体制环境原因，1986年提出的方针终未得到认真贯彻。

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当时的投资膨胀使国有企业资源供给严重不足；于是1986年开始提“乡镇企业大进大出，两头在外”。但实际上因为外贸垄断，只能是“两头在外贸”。

不仅是中央控制的大中城市投资、消费双膨胀，而且由于财政体制改革创造了层层利益主体，大约7万个地方政府也都在尽力争取投资，试图完成地方政府的资本原始积累。这就在全面经济膨胀之中产生了地方差异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级政府不可遏制的“现代化攀比”问题。这是中央1985年即已提出紧缩政策，而到1988年仍未能见效的主要原因（统计上看只在1986年投资略有回落，但并不构成一个周期）。接着，从现象上看，还是由于供给不足和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造成了1988

年夏季的大抢购，并导致当年出现18.6%的物价上涨幅度。

值得进一步分析的是，大抢购只是20世纪80年代的特殊现象，此后则不足为训。

因为我国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政策语言上刚开始讲商品经济，并不承认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上也还是非市场化的。当时老百姓面对的可进入市场只有两个，就像一个跷跷板：一头是高档大件消费品市场；另一头则是生活必需品，即粮、棉、油、肉、菜、蛋市场。那时没有股票、房地产，没有任何资本市场，也没有听说过谁买医疗、养老、财产等社会保险；当时连旅游都不是市场化的，大家都抢出差机会，借机出去旅游。因为这些消费都是非市场化的，是国家包着的，所以对于市民而言，除了基本生活用品和高档大件消费品两个是刚放开的消费品市场之外，没有其他消费品市场来分散资金投向。因此，抢购就集中在这“两极跷跷板”上，任何一极消费压力稍微加大，都会导致物价波动过大。

当抢购高档大件消费品使物品价格上涨时，对应政策是增加高档消费税。这间接大幅度提高了高档大件消费品的价格，又在客观上无异于刺激市民对价格上涨的预期；无处释放的社会消费就只能转向基本生活用品，市民甚至开始抢购布、盐、粮食……

两极化的消费使物价波动显得很大，随即引发了公众挤兑。为了防止银行存款下降，政府又较大幅度提高了存款利息，同时实行保值贴补。高利吸储虽然确实使银行存款随即大增，但在贷款利率未调而且严格规模控制的政策作用下，银行当年即出现数百亿元的亏损，并导致财政赤字相应增大。于是，接着就必须调整贷款利息。这时，地方和企业在紧缩政策于1989年之际突然有政治条件实现的同时，又遇到资金成本突然大幅度上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作用，终于使国民经济在1989年以后进入萧条阶段。

对于后来者，这种宏观调控政策及其作用过程本应引以为训。

（三）萧条和复苏

1990—1991年是很典型的萧条期。企业“三角债”一度高达3000亿元，库存占压达2000亿元。为了安定团结，银行被迫增加贷款，用于收购企业库存，甚至给亏损企业发工资，导致不良贷款大幅度增加。这样

延宕到1991年，中央一方面继续实行紧缩方针，另一方面对国有企业只能实行“点贷解扣”。此时的农村，直接表现是农民收入连续三年下降，负担相应增加，干群矛盾激化。

到1992年，逐步适应了当时政策的各种民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经济开始有所回升。此时邓小平“南方谈话”仿佛一剂猛药，突然使地方经济以大办开发区为特征猛然进入高涨阶段；当时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所反映的效益并未提高，但在股票、期货、房地产三大投机同步作用下，再次出现1993—1994年投资与消费都过度膨胀、财政赤字和物价都过度上涨的局面。

另外，1992—1995年，每年360万亩农民土地的非农占有，约等于每年从农民手中拿走3000亿元的国民收入。

（四）“信用膨胀、生产停滞”型的第四次经济周期

1994—1995年，连年的高物价上涨源于两个与20世纪80年代不同的新因素。

一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过程中，必然伴随产生“经济货币化”（或称“资源资本化”）所推动的货币超发。

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步放开，90年代社会公众所面对的市场显然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两极化跷跷板”了；金融资产的多元化及投资结构的多样化，加快了我国经济的货币化进程。每一份在原来产品经济时代不用货币即可分配的资源，在90年代的市场条件下，则必然要求对应增发一份等值货币，以实现通过货币为中介的交换和资源配置。在节省货币的信用手段和契约化的信用关系都不发达的情况下，这种方式当然会促使货币大量增发。

二是高利率造成“信用过度膨胀、企业生产停滞”的恶性循环。

有经济学家说，1994年全国贷款总规模是34000亿元，当年的官定贷款利率是在年息10%左右。但实际上大部分企业拿到贷款的利率一般都在20%以上。这中间至少有十个百分点的利差，折合人民币3400亿元。若不是银行，那是谁吞掉了这3400亿元？这个问题无法直接解释。

据《金融时报》说，中央财政历年亏损对银行透支已经超过了银行

的自有资本金。财政部1994年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说：今后赤字不再向银行透支，靠发行国债弥补。于是当年国债是1000亿元，1995年增加到1500亿元，1996年当高于上年。大规模增加的国债只能高息发行，这就客观上推高了银行的负债率和资金利率。

而银行在上一轮周期之中被迫放贷，已经有大量的不良贷款收不回来，只有用剩下的可回收贷款去牟取高利，才能偿还存款人本金，以及只有在存、贷款利率倒挂的不利条件下硬挺着支付利息。最为极端的例子是，三年期以上的存款加保值补贴，1996年1月到期时年获利约24%，而贷款按调整后规定的利率年息只有约13%。存贷之间差十个百分点以上，这还不加银行经营费用。

表面上看是存款利率高于贷款利率，但这只是按照国家法定利率计算的。事实上全国大部分银行单位都坐好车，发高额奖金，盖好楼……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了对于银行而言最起码的经济选择：官方银行既然官定不能破产，就只能采取某种追求利润的行为——变相放高利贷。既然规定不能高息，那就只好通过搞财务公司、投资公司的违纪拆借等手段，由这些相关公司去高利放款，这就是企业到银行借不到款，而要拿到贷款就得都是高息的原因。

另外，银行在利率倒挂的条件下，存款增加就要多支付利息，但是还必须大力吸收存款，因为贷出去的款已经收不回来了。如果不增加存款，就没有新增贷款能力，所以一定要增加存款。这就是信用膨胀。

一般而言，在资金利率高于10%的条件下，除非投资于银行或“泡沫经济”，否则在实物经济领域中的任何投资都几乎是无利可图的。这也是近年来“公款私存”和社会存款都大量增加的直接原因。

信用膨胀的直接结果是：企业之间的连锁负债至1995年第三季度已经突破8000亿元；库存占压约5000亿元。二者都是上一次周期的2.5倍。并且，企业在负债率高达80%、资金利润率又只有约3%的情况下，亏损面必然扩大，从而导致生产停滞。

接着是恶性循环：企业不良债务导致银行之间的信用关系恶化，贷款大量转化为坏账、呆账或预期贷款、不良贷款。到现在为止，金融系统承认的不良资金大约占贷款总规模的不到30%，其他部门说法不一。理论界最为极端的说法是高达50%以上。

（五）经济危机中的地方政府

1991年以来，60%以上的县级财政赤字，80%以上的县级工业亏损。在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信用状况都不断恶化的同时，有些地方政府行为也发生了本质性变化。

一是变相吃存款。某些地方政府指使银行给县办工业贷款，在贷款的同时把税扣下，银行则先把利息扣下，以此满足本届政府的眼前需求，包袱甩给后人。

二是配合某些外商掠夺资源。在国内资金利率过高而且受规模控制的约束下，某些地方政府往往不顾环境污染，以有限资源置换引进外资。

三是剥夺农民地权进行原始积累。在缺乏外部资源的地方，某些地方政府伸出手去以地生财，大规模征占农地垄断出售。

（六）有关讨论意见

根据金融资本运行规律，既然银行信用的基础只能是政治强权，那么信用恶性膨胀的下一步将导致政策支持下引入浮动汇率制，或对商业银行注入低息资金，从而通过不断扩张信用，避免金融破产及其连带的政府信用危机。作者认为，对此唯一可做出的早已不是价值判断，而是制度成本分析。

对于这方面的详细分析可参阅我另一篇文章——《建国以来四次周期性经济危机及宏观调控政策分析》，发表在1996年第1期《发现》杂志上，文章分析了信用恶性膨胀的结果，认为按照经济周期规律，近期经济危机的主要特征是信用崩溃，直接表现为孔夫子所担忧的“礼崩乐坏”，即广泛的社会性“赖账”。不仅企业、银行，各部门和地方之间也互相赖账。一旦银行赖账，“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信用危机就到了崩溃的边缘。对于决策者而言，也就是到了不得不做出取舍及抉择的岔路口上了：是要产业资本还是要金融资本？

企业不景气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把现在国有企业没有积极性、经营效果不好归因于高的负债率，那么，农村也有同样的问题。全国乡镇企业统算账，资产负债率67%。其中，大型乡镇企业（经营规模最大的1000家乡镇企业）资产负债率78%，接近国有企业，这反映出企业自

我积累能力过弱，资产负债率过高，是经济危机和萧条阶段的普遍问题。

一般而言，企业的债务率达到50%，效益受到影响（不包括流通企业，我国流通企业相当多是全额负债的），因为利润中有相当一部分要变成银行利润；当企业负债率达到60%时，一般产业几乎无利可图；到60%以上的时候，企业出现负利润；而如果达到80%以上，多数就该破产了。

理论界有人说，银行应把债权转为股权，就是把企业欠的债务转成银行对企业的股权，也就是银行的左口袋拿钱，右口袋装钱。也有人说，过去从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是改革，现在改回去，把企业债务再算成财政拨款。总之，还是在原体制内循环。

还有一种说法，向管理要效益。认为只要加强企业管理，就能增加效益等。十四大政治报告中明确讲，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是产权清晰化，就是要先搞产权制度改革。不能以加强管理来否定产权改革。好在从“十一届五中全会”起又讲明晰产权了。只讲加强管理的说法早在1978年就提过，但就是执行不下去。当不触动产权的城市改革导致企业的亏损面进一步扩大时，1986年才认识到要调整、盘活存量资产。从那时起，因为非经济环境变化又耽误了十年。现在企业负债率进一步提高，坏账率进一步增加，当老路再也走不下去的时候，才终于又走回来。

与产权改革对立的另一种说法是“国有资产流失”。事实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两代劳动者的剩余价值都转化在国有企业资产中间了。如果不承认劳动者在国有企业中的产权，只给他们一个劳动合同，一旦他们遭解雇就失去了生存基础，这当然不是“主人”；也无法阻挡工农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大幅度下降。所以，如果不改革现行产权制度，就不能防止资产流失。

有一种国际知名的理论说，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增量改革”。但是，农村改革一开始就是“突变式存量改革”，就是“大包干”让农民分地。第二步农村改革的突破也是南方率先开始搞的“股份合作制”，就是要把包括土地在内的农村资产进一步以股份形式量化到人。“不动产权的改革不是改革。”建立新的财产关系是其他制度创新的基础。而由于农村人口占中国人口的74%，这也就意味着改革是对大部分中国人不动产权

的存量改革。也许渐进式增量改革只反映城市，但那块只是渐进，却并没有增量；而且存量越来越少，差不多全变成负债了。若再延宕，无异自弃。

三、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与发展

（一）“抓大放小”存量调节

中国的国有工业固定资产统算账将近40000亿元。国有房地产统算账，按重置价格计算也是大约40000亿元。这样，城市固定资产总规模仍然在8000亿元左右。农村所拥有的固定资产包括土地在内统算账，应是80000亿元到90000亿元。现在资产总存量仍在160000亿元到170000亿元。中国的希望在此，发展的基础在此。

流量调节已无出路，存量调节迫在眉睫。如何减少存量调节中的社会震荡，就看如何做出调存量的决策。

1995年中央五中全会提出的“抓大放小”是重大决策，几乎雷同于80年代初农村改革中保留4000家集体工业发达社队不分包到户的安排。现在按40万家企业计算，抓住1000家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尽管政府仍占有国家资产总额和利税的约70%，但是毕竟放开了其他39.9万家国有企业，这就可能较大幅度地开放资本市场。

（二）国有资产社会化

资本市场放开应体现“国有资产社会化”的社会主义原则。形式上并非照搬规范化的股份公司，而是根据国情，至少搞一定比例的“劳动贡献股”，推行体现工人产权，可产生较高积累率的“企业职工股份合作制”，再通过拍卖、租赁、转让、破产等形式来市场化配置资源。

产权改革的实质是：必须重视对劳动者财产权利的承认，还原他们在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时期付出的劳动剩余价值。改革存在于广大劳动群众对自己财产权利的觉悟之中，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乞求贵族再光荣一次”上。

开放资本市场是存量资本调节的最关键环节。这一步迈得大、动得快的地方将占很大“便宜”。因为最稀缺的、流动性强的要素仍是资金，只有资本市场先放开，货币要素才能较便宜地集中流入。工业省大中型

企业较集中，如果能够率先开放资本市场，在存量调整上先走一步，发展速度可能非常快。

（三）中西部加快发展与资源资本化

中西部与东部之间的差距表面是差在收入上，由此对应产生“财政转移支付”的扶贫政策。但收入是一个变动幅度大、变动频率迅速的变量。收入之差这个现象所掩盖的本质实际上是资本量所产生的资本收益之差。西部有自然形态的资源优势，但不是资本优势。深化改革的制度安排有可能创造极大的制度效益。

例如，湖南怀化的山地制度建设试验，只是通过把原来按人均分的山地改变为可流转的“山权长期租佃制”，就使24亿元资金流入这个贫困山区。

又如，地处黄淮海盐碱地区的山东济阳县孙耿镇，“集地滚地”1700亩办工业开发区，三年之内镇财政收入从40万元跃升到8000万元，办法就是每个农民拿出半分地，从远村往近村滚地，最后集中到镇区国道两侧变为工业用地。只要保证农民地权不变，就能实现从传统农业进入现代工业的零制度成本。

如果西部能够加大改革力度，打破部门对资源的分割垄断，有权自主加速资源资本化，加速开放资本市场，西部的资本量就能陡然增长，甚至无须财政转移支付就可赶上东部，因为其人均资本收益会随之大幅度增加。

（四）完善农村财产关系

农村资产90000亿元中的80%是地产，现在农村即使已经建立了合作社或乡镇企业的集团，也没有把这最大的资产计算进去。各个地方乡以下应该抓紧实现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重构和完善农村财产关系。

曾经有过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重构财产关系、创造经济高速发展的经验。从那以后，农村经济已经发展成了工、商、建、运、服、农、林、牧、副、渔十业并举，形成产业门类齐全、专业分工初步社会化的商品经济框架，但财产关系基本还停留在人民公社解体时农民“大包干”分地时的那种状况，因此大有调整余地。

完善财产关系应包括乡一级在内，因为乡一级政府一般不存在国有资产；乡政府现在占有的资产就是原来人民公社三级集体所有、在社一级内部平调或积累的资产，人民公社解体后，转化成了乡镇政府占有的资产，其属性仍是集体所有。所以，农村的产权制度改革要特别强调把乡镇及政府部门占有的、以原人民公社社一级集体积累资产为基础的那块资产的属性明确为乡域内全体成员共有的集体财产，并予以作股到村民组。只有这样，农村产权关系才能清晰。村委会更应该是在村社区范围内推行全员资产股份化，通过配股折股量化到人。

完善农村财产关系应包括乡村全部工商业固定资产和农业固定资产。农业固定资产当然包括土地资产。不抓紧作股量化工作是重大失误。中央文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强调农村要素的市场化流转。不把土地从实物形态向价值形态转化，土地无法流转，也就难以真正实现分工分业、规模经济。要素市场化流转的前提是要全环节地实行农村资产股份化。

（五）以小城镇建设吸纳农村过剩人口

在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发展较快的地方，乡镇企业产值已经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60%～80%（在地方工业产值中占40%左右），约50%以上的劳动力在乡镇企业或其他非农领域就业。发展到这个阶段，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加速城市化、尽快转移农业人口的条件，应及时把乡镇企业和非农就业人口集中到小城镇，把土地所承载的过剩农业人口转出去，缓解基本国情矛盾。只有土地承载的农业人口降下来，才能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才能提高农业的商品率、劳动生产率和积累率，农业才能市场化，也才有可能逐步改变分散的小农供给和城市成规模需求在体制上不对接的状况。

非农转移受财产关系制约。原来“大包干”分地时，大部分社队是按公平原则分的。只有把社区资产包括农民的土地都作了股，社区成员占有股份，才可以在进城进镇后保留家里的那部分股权，产生收益凭股分红，农业剩余人口才能转移出去。如果不把土地从实物形态向价值形态转化，谁离开就意味着谁丢失了已经实际占有多年的利益，那农业中的多余人口是转移不出去的。因为农村资产总量80%以上的地产约值80000亿元，而且越是发达地区地产越值钱，农民为什么要丢？更何况原来“大包干”时土地的第一次分配本来就是按公平原则分配的，而且实际上多数搞了社区股份合作制的地方，第二次再分配股权时，仍体现了

传统社会的公平原则。

这个问题在广东刚兴起开发高潮的时候表现得尤其尖锐，农民开着拖拉机包围政府，在开发区的推土机前静坐。广东46%的上访告状是因为土地纠纷引起的，而原来广东农民并不要地，到处弃耕撂荒。但是，一旦土地当作商品被开发，农民就不干了，那是农村祖祖辈辈留下来的财产，怎能让人白白拿走？地方政府往往3万块钱1亩征，30万块钱l亩卖，中间90%的利润流失。

在土地纠纷非常尖锐的情况下，广东省政府发现一部分地区基层创造了农村股份合作制，经规范化在全省推开后，上访告状没有了。

让农民占有股权收益的办法同样可以有效促进小城镇建设，这个制度安排的效益非常大。因为城建占地要投入，而土地股份化可以不占地，初始投入可以节省下来用于城镇发展；只要政府允许社队和农民土地以股份形式参与商业开发或工业开发，按股享受红息，就可以节约制度成本，这本来就是最节约制度成本的办法。

（六）降低乡镇企业团地化的门槛

乡镇企业集中进入工业小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村以下乡镇企业发展快，主要是劳动力极度过剩条件下社区追求就业最大化和福利最大化的结果。企业办在村，可以得到社区土地资本增值收入转移的好处。

乡镇企业创办之初，没有多少货币投入和设备投入，主要是地便宜，劳动力便宜。企业办在村受自治法保护，“大盖帽”们一般不下乡；可以土地不交钱，劳动力不付钱；不用搞行政后勤系统，也不用建职工宿舍和食堂；一切社会福利保障都不要支付。这就节省了乡镇企业启动资本。如果企业经营不下去，产品卖不出去，老百姓不发工资回家种地去；什么时候卖出去再给钱，这又节省了一部分机会成本。如果连行政干预和市场风险都可以低成本避免，企业当然办在村更好。由此造成的破坏资源、污染环境，是现行的制度成本；只有改革，别无良策。

政策上强调乡镇企业集中进入工业小区，实现规模化、团地化发展，前提是先要降低进入乡镇企业小区的门槛。企业一旦离开本村，地得买，宿舍、食堂也得盖，企业成本就得提高。此外，乡镇企业的进城高门槛，还在于政府垄断征地、开发商再转手倒卖的地价太高。

县以下不实行国家征地，允许乡、村两级土地作股，可能有效地降低门槛，从而降低制度成本。乡镇企业进镇用的也是农村用地，为了农村经济综合发展，企业可以让地权股份化，这样既可以解决乡镇企业进城会增大成本的问题，也可以至少保证无地农民仍有股息收益。

如果在一个县或镇的范围内，能够让四乡八里的乡镇企业向小区集中，还可大量节约土地，节约出的土地既然是股份化的，也就便于流转，便于区域化种植，从而实现农业的规模经济。

（七）重建农村积累制度

积累制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劳动积累，二是资金积累。其中应特别重视的是资金积累。

在生产力要素中，资金要素是起组织作用的龙头要素。所谓重建农村积累制度，就是紧紧抓住资金这个龙头要素，在现在这样对立的城乡二元经济格局下，要保住最为奇缺的资金要素尽可能少地流出农业和农村。

千投入万投入，真正的农业投入主体是农民。中央决定加强在农村投入，但实际不到位，因为不存在投入机制。国家银行不可能对应2.4亿个小农户，现有的金融工具在小农户小规模的农业生产上都无法进行金融运作。信用社最基层在乡一级，不能对村以下农产小额信贷做审查监督；农户贷款成本过高，风险过大。所以，尽管1994年农行统计仅6%的资金投入农业，而农业生产照样增长。实际上，改革以来这些年，维持农业投入的主体是农民。

但是农民这种高度分散的小额投入不利于提高农业积累率。资金这个龙头要素如果形不成规模，就不成其为有组织作用的要素，就没有再扩大生产的能力，也就改变不了农民自给自足、农业商品率低的局面。

积累制度建立仍要把“以土地为中心的股份合作制”作为基础。

第一，明晰集体地权，促进土地从资源形态向价值形态转化。其中，无论是实行“两田制”、“租佃制”还是“股田制”，或是实行“四荒拍卖”，都意味着转换了一个重要机制：从原来按公平原则、完全按人分配所侧重的福利功能转换为侧重生产的功能。除了保证农民基本生存需要的自留地（口粮田）外，体现生产功能必须是土地要竞争才能包得到。

农民要把竞包的承包费先交给集体才能种地。“四荒拍卖”也是竞争拍卖才能种地。一旦实行了这样的制度安排，农民自然会主动交钱给集体。于是，包地交钱这种制度安排连带产生了大于农户投入规模的资金要素。

第二，承包费和拍卖金都要作为农村资金积累制度建立的基础；要及时建立农民合作基金会，把所有农村中产生的资金成规模地集聚到村、乡两级。农村资金积累制度建设是中央早已用政策语言明确规定了的。从调查看，比较好的县一级农民合作基金会，集聚的资金规模大体上能达到三四亿元；比较好的乡一级农民合作基金会规模能达到三千万至五千万元；极端的能达到一亿元。

第三，可以利用农民合作基金会这个载体搞生产要素在流动中的优化组合。比如专业户承包开发，到农民合作基金会融资，应允许以拍卖到的山权、林权、地权做抵押，如果经营不善收不回资金，抵押物和不动产期权可以收回重新发包。因为农民合作基金会是农村社区合作组织内部的信用组织，所以，全世界范围对这种合作信用组织都是给予足够的优惠的，如社区性基金会免交八种税费，不注册，不登记，不纳税，这样资金成本就比银行低，且利率还可以上下浮动。

第四，要严格执行不对外搞存、贷款的政策界限。会员都应是乡、村两级合作组织成员，只进行会员内部的资源融通。由于乡镇企业也是会员，所以，乡镇企业的产权流动也可以通过合作基金会柜台交易。山区开发果园期权转让、山林期权转让，都可以通过合作基金会开个窗口，以便于规范转让，防止纠纷。

第五，再进一步讲，可以在会员、社员之间进行结算。在乡镇企业范围内、在不同专业和环节之间不用走现金，节约了现金的在途，也就节约了资金，无形之中就增加了资金量。

（八）第三产业的规模效益

第三产业的规模效益也要靠发展农村小城镇来实现。

工业的规模经济是能够创造规模效益的，但这并不绝对化。因为工业产品是可运输的，所以工厂即使相对分散，也仍能生产。对于规模经济而言，更为重要的是第三产业，因为第三产业没有规模人口和规模消费就不可能存在。

就在胶东、辽东、苏南、浙北这些集体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由于忽视了产权制度建设，因此尽管小城镇和县级城镇超前现代化，大楼盖得很好，马路修得很平，路灯都很美，但就是没有第三产业。在苏南很多小城镇，一到晚上七八点钟以后，农民下班回到村里去了，镇区里边街道是“这儿的傍晚静悄悄”。第三产业是不能放在轮子上移动的产业。饭店、理发、洗澡、娱乐业等，没有成规模的人口，就没有成规模的消费。所以，农民进不了城，就发展不了小城镇，就没有第三产业的较快发展。

大凡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按照国有工业的模式搞福利，按照城市模式搞农村现代化：村村通柏油路，村村通自来水、通电话；家家盖别墅，户户买轿车。然后搞村级公园，村级敬老院，村级办公大楼。高度分散，高度浪费，这些全部都进入乡镇企业成本，造成乡镇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这不仅是严重的资源浪费，而且在这么大工业比重的情况下，城镇不得不“带状分布”；产业结构得不到合理调整，第三产业得不到发展，农业人口也转移不出来。

所以，小城镇和第三产业发展都必须以产权制度建设为前提，只有在要素从实物形态向价值形态转化之后，才可以加快向城镇流动，农民才可以在占有收益而不直接占有实物资产的条件下“离土离乡”。

（九）农业产业化

推进农业产业化的最大难度就在于城乡对立的二元格局至今没有被打破，农业的投入和产出的两头是在城市被垄断的。部门垄断资本是当前改革的一大难题，导致市场经济条块分割的也是部门垄断。所以，推进产业化首先强调的还是打破加工、流通、金融等部门的垄断。

第二个难题是产业化使保证农业生产者获得平均利润这个目的难以实现，其背后的核心矛盾仍是产权问题。泰国正大集团可以让养鸡农户和加工企业分享利润，因为它在资产权益清楚的条件下倾向于长期收益。所以，有恒产就有恒心，无恒产就无恒心。假如城市的产权没有通过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的改造，城市的企业家和职工都无恒产，那他就没有恒心，就必然是短期行为。当年城市企业搞承包制的时候，就是厂长、经理和职工一块拼光耗尽设备，增大短期收益。如果没有长期目标，不追求中长期收益，就形不成平均利润，产业化也不能发展，因为产业化就是要在生产、加工、销售各个环节上大致都能得到均等收益的

前提下，产业链才能形成。

所以，检验产业化是否成形的根本标准就在于：能否形成产、加、销各个环节的平均利润率。

以上所有农村改革的步骤尽管历年都已被中央文件所明确规定下来，但是，真正地贯彻执行还有待于宏观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当然，在大的环境逐步改善之下，地方才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工作创造出有利于发展的小环境。

附二：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30]

本文可能引起争论的观点如下。

第一，东西方社会的主要差异源于不同的资源环境和不同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过程，这也是形成不同政治体制甚至是意识形态的基础因素。中国是一个典型的进行东方式原始积累的国家，她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对外掠夺扩张，而是主要对内“自我剥夺”：一方面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从农村提取积累；另一方面以票证形式计划、分配，维持城市劳动力再生产的限额消费品，从城市提取积累。

第二，中国历史上，农村社会管理一向是“社区自治”，村民们根据传统道德规范及对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的大小，筛选出“社区精英”，组成“管理集团”，对农村社区进行管理与统治。应该认识到：上下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只有在国家资本原始积累这个特殊历史阶段，政府控制才真正下伸到农村基层，它凭借的是“农产品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这两种相辅相成的制度。这时，政府对全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环节实行集权控制，而极端化意识形态的作用则在于国民动员的有效性。

第三，对财产的控制和对资源的配置是权力的出发点和归宿。集权体制建立在国家对全部资源实行垄断占有的基础上。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过程中，原有的以“按级分配”为标志的全民所有制，已在“利改税”之后渐变为“单位所有制”，国家资本蜕变为部门垄断资本；而又由于后者并不是剩余价值的直接付出者，因而根本无权占有国家资本及收益，其法权占有必致腐败。在中国大城市发生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问题，症结就在于此。

第四，中国当代的改革其实应被看作由亿万劳动者积累的约三万亿元国家资本的一次再分配。国家资本的再分配是“民间资本”再积累的基础，它意味着城乡经济主体有机会根据自己的社会经济条件，在重新获得必要的启动资本的基础上，不计代价地以劳动投入替代资本投入，重建自己的财产权力结构。正是由于这一基础及社区血缘、地缘关系这种传统中国农业文化在国家资本再分配中所起的作用，中国近年来的农村改革和发展才能取得成功。

第五，具有家族（家庭）结构特征的农村社区组织在经济上有两个主要功能：一是区域资源配置，二是收入、福利的整合。在农村组织创新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过程中，这两者都是无成本或低成本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必须重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因为它无论是在民间资本的再积累过程中，还是在减少制度变迁费用方面都具有积极作用。

第六，基于农村改革中农户家庭凭借社区成员身份对地产和农业固定资产进行再分配的成功经验，人们必须在城市找到一种方法，即能像分房“打分”一样，来核算每个劳动者拥有的与其工龄和贡献相应的国有资产份额（包括消费性固定资产），可以让这种“劳动者份额”在政府注册之后继承、抵押或抵顶政府税费，但不许兑现。只有当这种社会化了的国家资产在新的产权关系促进的高积累中增值，才可以进入股票市场兑现。

第七，研究中国体制问题的焦点在于认识城乡差别。中国存在着两种社会、两种体制、两种政府。城市政府相对于农村政府恰像一个“倒置的金字塔”。不同的财政来源导致权力方向上的不同。而这种城乡矛盾的对立统一，又正好是中国社会得以在稳定中渐变的基础。近期的改革选择是：要在城市中对国有企业和政府资产进行界定，重建一种财产关系清晰但产权结构复杂的资本形式，一步一步地打破部门资本的垄断，形成政府与各种经济主体的契约关系。

第八，国有资产社会化再分配问题对于多数东方国家来说是相类似的。如果一味地等着外国投资或本国公众购买国有企业资产（这些企业资产按理本该属于为国家资本原始积累无偿地付出了剩余价值的劳动者），那么这种做法将会使国家资产在产权矛盾造成的经济混乱和社会动荡中日益贬值。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改革，正越来越多地撞击着一个绕不开的难题：对于大多数已经在40年国家资本形成过程中付出了艰苦劳动的人而言，改革的确走到了必须进行选择的岔路口上：要么通过新的产权制度安排还原劳动者在国家资本积累过程中付出的剩余价值，并以此作为民间资本再积累的基础；要么任由已经成形的部门垄断资本分割国家资源，造就出一批既不具有任何现代市场经济特征，又有悖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官僚资本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终于作为一种体制被确认下来之后，那些一向主张市场取向的改革者甚至还来不及感受最初的欣慰，就和社会公众一样，眼睁睁地看着国家资产的瓜分狂潮忽然其名其妙地翻涌起来；尽管

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开始感到“资本主义的丑恶”，然而又大都无可奈何地把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也被视为非法的政治权力控股和垄断剥夺，当成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同胞兄弟。

显然，一向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以能代表中国人民最大多数的根本利益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不会听任一部分已经在事实上垄断性地占有国家资产的既得利益者，无论是以计划体制下的“国有”为名，还是以市场体制下的“股份”为名，攫取本国劳动人民的资产和收益。当十四大政治报告明确地把理顺产权作为深化改革、发育市场经济主体的基本前提时，不期然抛出的这一块“试金石”，便对所有认同或号称改革的人做出了检验。那些大多已经在国家资本利润分配中稳定地占有既得利益份额的人，那些意识到手中含金量很大的权力正在资源重组之中渐趋弱化的人，或是那些曾经有条件借助于权力造成的财产关系混乱以“公有”谋私的人，几乎都乐得接受以往放权让利式的“改革”，但却几乎都不愿看到“产权清晰化”成为现实。于是，恰恰是他们，成了国家资产瓜分潮的始作俑者……

本文的理论发现不仅仅在于对改革之前的30年重要政治事件与国家工业资本原始积累的因果关系做出解释，更为重要的是对15年改革中非官方的民间资本再积累做出分析。民间资本这种前所未有的高度再积累，恰恰是建立在由亿万劳动群众创造的剩余价值所形成的国家资本进行再分配的基础上的。如果说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那么我的全部观点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当前改革的核心问题是通过国家资本社会化来还原劳动者在改革之前的30年原始积累过程中付出的剩余价值。对此，我将以模型和公式来解释劳动者个人或家庭如何计算他们在国家资本再分配中的份额，以及怎样与政府重建相应的经济契约关系。

人们需要一种通俗而又系统的思想来解释发生在他们身上却又困扰了他们40年的重大历史问题。好在我们这两代以自己的剩余价值无偿投入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劳动者还在；好在用我们的血汗积累而成的国有资产，不论在账面数额上还是在可供分配的实际价值上，都还不难计算。

一、国家工业化时期的资本原始积累

（一）历史不存在假设

分析历史的目的也并不仅仅在于批评判断某一事件中的谁是谁非，而在于找出一定历史时期各主要事件合乎逻辑的本质联系。无论如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仅用了28年即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进步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留下了价值两三万亿元人民币的国家资本，包括工农业固定资产和房地产。同时，还留下了一个表现为对立壁垒状态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

（二）政治因素的考虑

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在极短时期内以极高的速度完成的，这就必然带来众多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因此，在做制度成本分析时，绝不应仅仅考虑经济因素，同时还要考虑政治因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是一个典型的落后的农业国，只有15%的城市人口，5%的工业人口，15%的工业产值和50美元的年人均国民收入。没有海外殖民地，没有国际市场，除了苏联之外，没有外部资金投入，而苏联投入伴随着无法接受的条件（当然，在朝鲜战争中苏联曾给予过援助）。中国自1950年以来，地缘政治环境险恶，朝鲜、印度、苏联、越南和柬埔寨等区域战争和边境争端接连不断。战争需要工业，民族独立需要工业。毛泽东作为“英雄政府时代”的代表人物，拒绝以主权为代价换取苏联的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中国人只能靠自我剥夺来完成工业化所需的原始积累，即马克思所揭示的最大限度地把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至于是由资本家还是由国家来实现这种转化，则是原始积累这个任何国家任何不同历史时期都无法跨越的历史阶段所派生的问题。从经济实质来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已有明示：“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是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31]

为了实现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中国政府在接收了仅值一百多亿元的原国民党的官僚资产，使之成为国家工业化启动资本的最初投入之后，不久即进行了私人资本主义的工商业改造，使之不能与稚弱但又是垄断性的国有企业竞争。于是，国家拥有了实现工业化的“启动资本”。然而，处于幼稚期的国家工业要求有稳定的原料和产品市场，可它面对的却是有五千年历史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传统的农村集市交换。中国台湾学者柯志明曾在分析大陆20世纪50年代的原始积累问题时提到：1952年政府还可以购买到70%的贸易粮，但1953—1955年，政府购入

的贸易粮迅速从800万吨下降到200万吨。这是因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使工业劳力和城市人口大幅度增加，粮食的市场需求上涨导致粮价上涨（柯志明·塞尔登，1988年）。而政府恰恰在1953年开始推行统购统销，试图保住国家工业的原料和产品市场。其实质是推行“剪刀差”——高价卖出工业品、低价购进农产品，这样，政府可以在买卖双方中都获利，国家把所获利润通过政府财政二次分配投入工业建设和城市居民生活消费之中。

但是统购统销在推行之初不仅“统不了”，而且适得其反，其问题在于分散的4亿农民，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不可能照搬列宁的方式，让武装的工人以革命的名义强迫农民上交粮食，因此，毛泽东提出合作化，并进一步发展为人民公社制度，即把自治形态的农村社区变为准军事化的人民公社，使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成为公社社员，这就奇迹般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使政府的控制下伸到农村基层。以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为特征的人民公社，代表国家占有了除简单工具和居住用房之外的一切农村财产，执行对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全部经济环节的计划控制。

1958—1978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年的当代史中，只有这20年可以说是集权体制，实践证明这个体制在国民动员上是极其有效的。这是一代人以革命的名义无私奉献，为了国家工业化而自我剥削的20年。从国家固定资产的投资额来看，年积累率最高可达40%，年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由200亿元增加到600亿元以上。就这样，最终给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即对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与再调整留下了一个两三万亿元的基础。

（三）经济危机与体制改革之间的因果关系

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与中国屡次进行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回顾危机周期之前，有两个因素必须首先考虑：一是在集权性的政府经济体系中，财政是最重要的核心部门；二是在1980年之前，除了通过国家财政再分配对全社会固定资产进行投资以外，没有其他资金来源。所以，财政收支变化直接反映经济周期变化。

第一个经济危机周期（1958—1968年）。1958—1960年是危机发生期。政府财政赤字占收入的比例从5.6%增长到14.3%，三年赤字总额达到200亿元。1960年以后，由于财政投资能力下降，就业严重不足，

政府不得不动员大约2000万城市人到农村去生产自救，以解决城市的失业问题。

196l—1962年，经济萧条期。国家财政年收入进一步由572.3亿元下降到313.6亿元。从1982年公开发布的1964年政府统计数据可以看出，1960—1962年这三年的人口增长曲线呈下降趋势，“未增加人口”大约为2000万人，其中大部分人口被认为死于饥饿。人们称此段时期为“三年困难时期”。

1963—1964年，经济复苏期。由于政府在全面危机压迫下放松了经济控制，允许农民（人民公社社员）搞“三自一包”（这种以“放”为特征的经济改革15年后再次进行，只是改名叫“联产承包”了），因此，农业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例由原来的8%上升到22%，财政形势好转。

此时，由于中央领导人之间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和在政治路线上的斗争越来越明显，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无法解决基层阶级斗争问题，因此，“文化大革命”正处在孕育阶段。

1965—1966年，经济高涨期。国家在经济形势初步好转后，增加了对工业的投资，使得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但紧接着财政赤字再次出现。随后，1968年上百万的城市“知识青年”奔赴农村，其真正原因仍在于城市无法解决高失业率问题。

（四）第二个经济危机周期的发生

第二个经济危机周期（1978—1986年）。1978—1979年，危机发生，国家财政赤字每年约为200亿元，占总收入的比例高达20%，比上一次危机爆发时的比例还高5%。其中的原因不仅仅只是“文化大革命”对经济的影响，还有“洋跃进”——大规模举债用于工业投资及中越边境战争造成的非预算性开支。

1980—1981年，经济萧条使得政府再次采取“放”的政策，逐步解除了对农村地区的控制，降低农业税收，提高农产品价格，允许农民分户经营，承包土地，开放集市贸易。这就是农村改革的第一步。这不仅是上一次为缓解危机而采取的“三自一包”政策的翻版，而且很像中国历史上的那些通过战争获取新政权的统治者为了恢复经济而采取的“均田免赋”政策。与上一次经济危机不同的是，这次没有迫使城市人去农村解决就业问题，因此，城市犯罪率增高，监狱暴满。

1982—1983年，经济复苏阶段。由于对农村土地的再分配和农产品自由市场的开放，粮食产量每年增加20%，这三年的总增加量约为75亿吨。中国第一次用自己的力量解决了吃饭问题，同时，农业产值也提高到工农业生产总值的40%。

1981—1986年，经济高涨阶段。工业产值增长幅度加快，同期财政赤字每年大约增加100亿元。其中较重要的原因即是1982年“利改税”之后形成的国有资产“单位所有制”。由于国家垄断金融的低利率政策和政府财政投资的无偿性，因此，相对于较高的物价水平而言，任何单位获得投资本身即意味着吃进利差，这就必然造成投资膨胀；又由于单位内部“利益同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一般有30%～50%的部分会以各种渠道转化为消费基金，自1983年以后，非生产性建设投资大幅度增加。于是，消费膨胀接踵而至。在投资和消费双重膨胀的压力下，供需矛盾和由赤字转化的超发货币量终于引发出全面通货膨胀危机。

正如20世纪70年代末的危机导致了第一步农村改革一样，80年代中期的危机也促进了城市改革。农村改革中，人民公社解体，使农村发育出各种独立的经济主体，并成为商品经济的基础，农村社会恢复了自治形态，使得以人民公社体制做组织保障的统购统销制度难以运作，农业投入品和产出品市场渐次开放，于是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商品经济新体制在农村形成。同理，城市改革从80年代中期开始日益触及产权，城市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和股份化使政府部门垄断和计划控制相对弱化，工业投入品和产出品市场也渐次放开。因此，假如没有新的战争把现在的中国“平民政府”再一次打造成“英雄政府”，则中国的市场取向的改革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五）传统行政手段对资本的调节造成的极端性后果

1988年全国范围内发生的通货膨胀危机，如果可以不考虑意识形态的影响来分析政府决策，则可以看到，在使用传统的行政手段强行压减投资、消费双膨胀未能奏效的情况下，政府于1988年末开始连续大幅度调高利率，存、贷款利率一度升高70%～80%。这种流量资本调节的极端性措施是在不触动存量资本的情况下运作的，因此，必然会由于企业产权虚置而造成极端性后果：银行高利率造成企业资金成本大幅度提高——使用流动资金贷款最多的商业企业被迫减少资金占用，改购进为代销，向生产企业转嫁成本负担——生产企业如法炮制，缓付原材料款，向原材料企业转嫁产品成本占压资金负担——连锁负债迅速波及全社

会。在这样恶劣的经济环境之下，企业管理效益每况愈下，中央财政捉襟见肘。可供中央分配的资源和利益份额减少，调控能力随之下降，各部门与地方之间“条块”矛盾加剧，终于，传统体制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又都走到再也走不下去，非变革不可的地步了。由于过去不动产权的改革已经给政府留下了足够的教训，因此，进一步深化改革必然触及“公有国营”经济单位的产权关系。

二、中国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比较分析

（一）中国与苏东国家经济体制上的相同之处

中国与苏联、东欧诸国在国家经济体制上有许多本质上的相同之处。中国十年改革成功的原因，即在于从国家垄断资本控制最薄弱的环节——农村入手，将国家以人民公社的名义所拥有的土地资本再分配为以农户承包为形式的小额劳动者资本，创造了以大量劳动替代资本投入、进行民间资本再积累的基础。而城市改革把“利改税”入手作为第一步，恰恰让各部门根据实际所占有的资产收益留利交税，这就静悄悄地使国家资本转化为部门资本。

无独有偶的是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当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触及城市工业体制中部门垄断资本的产权问题时，所遇到的麻烦与苏联、东欧诸国绝无二致，随着国家资本演化为部门资本，全民所有制演化为单位所有制，国有企业产权的“灰化”程度越来越大，部分城市的企业职工早已把“爱厂如家”变成“厂里有啥家有啥”，而各类干部则依托自己控制的部门资本份额来进行“资源置换、权钱交易”，社会性的腐败正在蔓延。而从传统意识形态出发，在经济上采取对国有企业“输血”“倾斜”的政策，则不仅造成数千亿无效益投资转化为库存占压资金和消费基金的大量增加，而且还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腐败。

（二）原始积累过后的产权不清问题

苏联的国家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也充满了激烈的政治斗争，甚至是无情的肉体消灭。布哈林在20世纪20年代即揭示出原始积累对于后发达国家的必然性。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仁斯基曾经指出，发达国家与后进国家在原始积累过程上是不同的，前者是一种依靠商业资本的市场渐进过程，而后者则是国有企业对农民进行不等价交换的计划过程。尽管布哈

林和联共（布）党内一些人反对以国家的名义剥夺农民，但世界上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仍然让自己的人民承受了自我剥夺的历史性痛苦。无独有偶，中国人忽视了布哈林主义，但其积累过程却仍被布哈林不幸言中。

既然在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家资本的部门垄断或称部门资本，以及全民所有制演化为产权关系极度模糊的单位所有制，具有苏联、东欧诸国，以及中国城市体制的本质性弊端，那么，解决的办法就是“国家资本社会化”，即通过明晰国有企业产权，还原劳动者付出的剩余价值，据以建立劳动者资产份额，并以此作为劳动者资本再积累基础的经济机制，以此改造国家垄断资本和官僚政体，发展由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当然不是私有化，而是真正按马克思原意走向社会主义的必要的一步。

西方舆论界对东欧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诸多问题有不少分析，较为表面化的有两种：一是分析企业本身的问题，即认为企业设备陈旧、管理水平和职工素质低下，无法运转；二是市场环境问题，认为不仅政治环境不稳定，而且缺乏资本市场必备的资产评估，而要等东欧诸国建立起必要的制度环境和完善的资本市场，他们认为起码还需30年。无论是根据西方经济制度提出的私有化方案，还是套用西方经济理论得出的分析判断，其针对的仍是苏东诸国传统的“全民所有制国有企业”概念，而问题的症结恰恰在于这种“完全公有制”现阶段只是名义上的或理念上的；实际上，无论苏东诸国还是中国，公有制国有营企事业单位早已在开放市场、货币交换的同时，静悄悄地转化为了“单位所有制（企业所有制）”。

大多数“二战”之后形成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家工业体系建设的过程上有相似之处。在工业化初期，国家凭借革命战争形成的权威占有全部生产资料，获取工农业劳动者的全部剩余价值，形成国家资本。而对付出剩余价值的“国家主人”——劳动者，则通过平均分配消费品或票证供应支付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此时，体现在最终消费环节上的平均化，使得“国家主人”并不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在这个意义上，全民所有制在原始积累阶段是存在的，也是可以掩盖产权主体不清的问题的。

但是，一旦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结束，各产业门类之间日趋频繁的交换便产生出日趋明显的不同利益，国家资本的公有制形式和内容即演

变为各个国有单位依据事实上占有的不同国家资本份额享有不同的资本收益，从而造成社会收益分配差别化的部门资本。部门资本的受益主体是政府部门自身，而这些部门并不是付出剩余价值的劳动者，为了维护其所有权的合法性，部门资本所派生的既得利益者阶层一方面必然加强政治强权，形成官僚集权政体；另一方面则必然强调“既得利益者所有制”的合理合法，维持僵化的意识形态控制。如果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应该认识到：这种资本形式包含的产权关系不仅是最模糊的，而且也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东方后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国有企业长期不景气、财政包袱沉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甚至社会动乱等现象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以这种产权关系为内容的所有制和以这种所有制为名的企业资产，在任何主义、任何制度、任何国家中，尚无成功运转的先例。

因此，应该从企业产权清晰入手，还原不合理的部门资本所占有的劳动者份额，再建立独立的产权主体，使之进入有制度约束的市场。这样才有可能打破国家（部门）资本的垄断，铲除官僚集权政体的根基。这个过程中，公众中新的利益分配机制产生，人们才会意识到产生于市场交换中的平等自由是不可侵犯的权利。于是，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便有了社会基础。而这个过程的起码条件是要求有相对稳定而权威的政治控制……如果像苏东各国那样搞私有化，把已经产权关系不清楚的国有企业统统交给一个新组建的、从未在资本形成过程中起过作用的、依靠一种并不稳定的社会政治结构的“私有化部”来售卖，当然解决不了苏东诸国的问题。

（三）中国城市经济问题的关键

如果单纯从城市经济看，中国的问题与苏联、东欧诸国相类似：国有企业效益低下——政府税收困难，财政赤字增加，举借内外债，通货膨胀——政府调控能力下降，社会动乱……造成此类问题的根源也是类似的，即国家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完成之后，社会化大生产促进专业分工——各个产业门类之间交换频繁必然要求符合价值规律的市场体系取代旧的计划分配体系——市场化的商品交换冲击了旧的集权主义政体。

如果以上描述成立，那么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改革与发展趋势也就清楚了。

正如上文提及的，国家资本的本质属性并非“公有制”。中国20世纪

80年代上半期城市经济改革提出“利改税”之后，政府各部门分割占有国家资本并享有资本收益的“部门垄断资本”性质，即随着部门之间日渐明显的既得利益差别而显露出来。中央政府（国务院）决策也渐渐从“统一号令”转化为“平衡协调”。在宏观价格体系尚未理顺、市场环境尚未形成的经济条件下，占有较大份额国家资本或低价资源的政府部门即可获得较大份额的收益，接着发生的就是“权钱交易”“官倒”。从根源上说，这些政府部门并未在原始积累阶段付出自己劳动的剩余价值，因而无权分割并垄断性地占有国家资本及其收益。可以认为，国家资本悄然改变为部门垄断资本，这是认识中国城市经济问题的关键。

进一步对归属于政府主管部门的国有企业做分析则可以发现，企业产权的实际属性也已从国家所有制演化为“单位所有制”了，即企业负责人与职工利益同构，共同占有企业资产并分享资产收益，但无人对资产增值负责。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没有认清上述问题，在未对企业产权做界定之前即推行企业承包，便造成企业负责人与职工共同拼设备以扩大消费份额的短期行为。

既然部门垄断资本和单位所有制是中国乃至苏联、东欧诸国国有经济的通病，那么，解决问题的方法只能是明晰产权，即通过还原企业资产中劳动者剩余价值形成的积累为“劳动者资本份额”，使之成为劳动者大量投入劳动、进行民间资本再原始积累的基础。这是推行股份制的真正合理内涵。

三、国家资本再分配是民间资本再积累的基础

（一）中国内向型积累方式的独特之处

如前文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后的40年中，曾有两次明显的经济危机周期。两次经济危机周期的共同点在于：导致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都是内向型积累的唯一来源——国家财政发生严重赤字；而缓解危机的有效政策都是“三自一包”，只不过第二次是“大包干”，即把国家资本的一半做了一次静悄悄的分配。农村人民公社的地产和农业固定资产根据区域血缘、地缘关系所赋予社区成员的天然权利大多分配到户，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于是，农村户营经济有了再原始积累的基础，从而不期然地创造了80年代上半期农村经济的高速增长。其理论意义，类似20世纪90年代初捷克、罗马尼亚的“国家资本社会化”。

其不同点有两点。一是中国农村是国家垄断资本统治最薄弱的领域。农村的国家资本再分配是国家资本垄断经营获取剩余价值的基础——人民公社制度和统购统销制度同时解体，中国从此有了发育独立经济主体和政治主体所必需的市场化前提。二是这种再分配为“民间资本再原始积累”奠定了产权关系基本清楚的基础。劳动替代资本，即个体经济或户营经济不计报酬地大量劳动投入，创造出成倍于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民间资本再积累率。

于是，中国在国家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中有了新的变化：集中的部门垄断经营的城市资本与分散的民间市场化的农村资本相对立；与之相关联的，则是城市政治和农村政治，因为利益结构不同和权力指向不同而对立。这两种对立是中国得以在苏联及东欧巨变之中幸免并仍可稳定发展的根本原因。

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从事商品生产并演变为纳税人阶层，除缴纳农业类税赋外，还向地方基层政府和社区组织缴纳以提留、统筹为名的“行政税”，以农业主产品合同定购为名的“经济税”。因此，农民与基层政府的关系日渐现代化。农村社区自治组织通过普选实现直接民主；基层政府与村级组织建立经济契约关系，变行政控制为管理服务。而在城市，除个体私营经济的从业者之外，市民仍为非纳税人，并且是享受全面消费补贴的既得利益者阶层；城市政府对于市民仍通过既得利益分配机制来保持集权政体的行政控制关系。

（二）第二次工业化浪潮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农村改革，说到底是允许农民对之前留下的巨额资产的一半，即人民公社的地产和农业固定资产，由农民自发地按照平等原则，做了一次静悄悄的革命——权力财产的再分配。它意味着农户经济在形成之初，即有机会获取最起码的“启动资本”，可以在农户规模内优化要素配置。农户家庭和具有家族（家庭）结构特征的农村社区组织在经济上有两个主要功能：一是区域资源配置功能，二是收入、福利的整合功能。在农村组织创新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过程中，这两者都是无成本或低成本的，因此，效益最优，收益和剩余绝对化。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改革的特殊贡献。“大包干”之后，村、户之间形成两极化的产权构造，利益关系基本清楚。其后的发展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农户经济的发展实质是一次非官方民间资本的再原始积累，表现为农户家庭成员不计成本的活劳动替代物化劳动资本投入后所

创造的高积累；农村户营经济的剩余必然转化为货币，并且投向在“剪刀差”作用下可以产生超额利润的非农产业。然后是城乡壁垒条件下的第二次工业化浪潮。

与第一次工业化（国家工业化）浪潮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农村工业化——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它随着农村中工业对于规模经济的追求和市场条件下不同产业之间平均利润率的形成，乡镇企业团地建设和小城镇建设得到同步发展。此时，农村中以国家资本再分配为基础的第二次工业化浪潮及与其相伴生的大规模市场交换，必然对另一半国家资本，即城市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和政府房地产形成压力，迫使城市国有资产进行社会化再分配，以此为城市非官方民间资本再原始积累奠定基础，形成20世纪末市场趋向的第三次工业化浪潮。[32]

（三）国家资本社会化再分配的经验

城市国有资产民营化已经普遍，国家资本社会化再分配也已经有很多经验可循。从改革试验区的操作经验来看，界定企业产权，划分劳动者资本份额是第一步前提，正如股份只是企业资产的一种形式一样，劳动者资本份额也可以表现为股份。可参照的模型和公式如下。

模型：$\sum_{i=1}^{n}=（C-I-GF）/En$

公式：

LC＝[（C-I-GF）/En×AW-H]×P

LC＝劳动者资本份额（Labor’s Capital）

C＝企业账面资产（Captial）

I＝银行借贷投资（Investment from Bank Loan）

F＝政府财政优惠（Government Financial）

En＝企业职工总数（Employee Number）

AW＝企业年平均利润率与个别职工劳动工龄构成的系数

（Coeffeciancy of Average Interest by Different Working Ages）

H＝企业提供给个别职工的福利或住房（Social Welfare or Worker’s House Distributed by Enterprise）

P＝职务权重（Wighting of Position）

即使参照上述公式划分了股份，也只是一种表面化的“骗局”，因为迫使劳动者资本份额成为民间资本再积累的基础，大幅度促进劳动替代资本投入，以高积累率加快经济发展才是第二步要实现的目标。其中的原则是：不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再积累的人，其份额和股份永不兑现。可参考的做法如下。

第一，由政府财政、税务、工商管理、劳动人事和国有资产管理局等部门合组一个权威性办公室，为国家资本再分配确定劳动者资本份额做登记。

第二，在原企业中工作的职工可依据经过登记的劳动者资本份额作股，并享受股息红利。被原企业解聘或自愿辞职的职工，可凭份额申领私营、个体工商营业执照；上述联合办公室通过减免税的办法逐年冲抵该职工份额，同时将冲抵数转账，使之成为政府股份；政府可通过股票市场出售收回的股票。

第三，被解聘职工若被其他企业雇用，其在原单位资本份额即从账面转入新单位。此时，政府可通过逐年增加原单位税费同时减免新单位税费的办法来转移此类职工的资本份额。

以上公式和操作步骤尚待更多的实证检验。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国有经济“负效益”十分严重，国有企业亏损面从30%扩大为60%；国家财政补贴占全部财政开支的三分之一；企业新增债务和新增库存占压资金加上历年财政赤字形成的超发货币量，几乎等价于国有工业账面固定资产……这种险恶的经济局势比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时的状况更为严重，但中国仍能不垮，其原因全在于占人口80%以上的农村商品生产者所提供的农副产品商品量占市场份额的绝对供给量；全在于被隔绝于城市体制之外的农村有一个发展了十几年的市场化的民间资本再积累，它创造出了数以万元的新财富增量。中国城乡关系好比“四抬大轿”，四个农人抬一个城市人，四平八稳。可以说，中国的发展，原因在于农村生产力解放；中国的政治稳定，原因在于农村自治社会与基层政权的新型政治关系。

第二部分

“三农”问题：百年回望与新世纪展望

第六章　我的困惑[33]

“我活着，因为我思考。”这是一句电视剧里的台词。

“我思考，因为我困惑。”这是我今天的台词。

我多次强调自己只是个“试验员”，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做规范性的学术研究的“学者”。因为这种规范研究，按照清华大学秦晖教授的说法，所追求的本来就应该是“一种片面的深刻”。我觉得这样研究的学问越精致化，就可能离客观现实越远，我们的书斋学者这样研究下去，就可能难以解释现实。

而我，由于得到了参与农村政策试验区调研的最好的机会，能够把人生中最好的时光花在用脚做学问上，因此才靠长期下基层搞调研积累了一些粗浅的感性认识。不过，也许恰恰因为不懂多少理论，这是我的不足，所以，搞了20年的调研，到现在也只不过收获了一堆困惑。因此，说实在话，我只能向大家汇报一下我的困惑。

一、怎么理解中国在遍地小农经济的条件下追求农业现代化？

我的第一个困惑是：怎么理解中国在遍地小农经济的条件下追求农业现代化？

记得是1998年，江泽民总书记在一次讲话中，把过去的文件中一向强调的农业现代化，实事求是地改变为“率先在沿海发达地区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这当然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因为在我国中西部的大多数传统农区，农业的生产力水平确实没有、以后也难以得到根本改变。

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进入世界前5位，但是，就大多数中西部传统农区而言，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改变了吗？由于人地关系的紧张这个基本国情矛盾的制约，我国农村地区客观上不得不长期维持小农经济。这是农业的生产力水平一直没有条件根本改变的原因。

在最近有关中国加入WTO的讨论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陈淮研究员指出，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按照中国实际已经达到的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当前全国的19.5亿亩土地应该只需要4000万至5000

万的劳动力。其他讨论意见虽然没有那么极端，但大多数了解实际情况的学者比较一致地承认，我国农业在生产组织形式上基本上仍然属于传统农户的兼业化经营，因此，如果加上农户的养殖和其他经营，农业实际上只需要1亿的劳动力。那么，农村中剩余的大约4亿的适龄劳动人口，理论上应该处于“潜在失业”状态，当然就需要非农就业。这确实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么巨大的剩余劳动力要安排，客观上也没有安排到哪儿去的可能。因此，在中国，农民的非农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

在1995年有关实行紧缩方针的讨论中我曾经提出，应该把促进就业作为基本国策。近年来的政策讨论环境相对来说更宽松了，我也就有条件更多地强调自己的观点：如果20世纪中国最突出的问题是土地问题，那么21世纪中国最突出的问题则是就业问题。

中央领导早就指出，要想富裕农民，就得减少农民。不过，国内有没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针对性政策？目前来看，至少各有关部门需要进一步贯彻“与时俱进”，因为相关政策还没有出台，或者很不完善。将来即使政策完全对路，农村城市化加速，从中长期看，今后20年内，农民人口的比重也可能会下降，但绝对数仍然会在7亿至8亿。“不得不小农经济”的问题，也是有中国特色的、中长期难以解决的基本制度约束。

在“不得不小农经济”的制约下，如果农户的人均土地面积难以增加，绝对地租也就无法增加，种植业从长期看可能就是低效益甚至负效益的，那么，资本、技术这些至少应该得到平均利润的要素又怎能进到农业来？如果劳动力难以转移出去，小农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边际效益哪怕下降到零以下，仍然不可能被其他要素替代，那么，市场经济所依靠的“看不见的手”又怎样发挥作用？

如果上述制度约束问题无法根本解决，人们可能就会比较容易达成共识：不能用农业现代化的思路来解读中国的现实。

二、农业经济科学是伪科学？

接着产生的或者派生的困惑，可能显得更有挑战性。如果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们中国客观上没有条件重复西方的农业现代化的道路，那么，是不是应该提出农业经济科学是什么科学的问题呢？

一般认为，农业经济学是个部门学科，是属于西方经济学微观领域中的部门学科。它之所以是西方的科学，是因为这种理论主要是从西方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但是，在中国，并没有与西方相同的给定的成立条件。因此，农业经济科学在中国农村，难以称为科学。

这要提到什么是科学，以及相关的方法论问题。

大家都会同意：所谓的科学成果，一般是通过试验获得的。如果我们通过试验，某个科学的一些道理或者假说不能被证实，严格说就叫证伪。如果我们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农业经济学的道理被证伪，或者这门科学几乎不能解读占世界农民人口27%的中国农民面临的现实问题，那么，这种科学有没有普适性？如果没有，那么，学生在校学的、老师教的、研究人员据以进行论证的都是什么呢？

随之派生的困惑可能不是我的，但却更令人不安。因为在大多数场合我只要这样提出讨论，马上就会有人指出，如果不能按照西方的科学理论来解释农村的现实问题，难道要我们退回到传统的所谓计划经济理论中去吗？其实，这样的非此即彼地提出问题，本身就是受西方“一元论”哲学支配的不自觉的反映。对此我往往只能反问：所谓计划经济，难道不是另外一种西方的理论吗？

有鉴于此，我们当前最需要的应该是“问题意识”，最忌讳的则是“意识形态化”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我本来一向是尊重理论的，但是那些不切本土现实只是盲目照搬的理论，实在容易使我这种搞实地调查出身的人产生困惑。因此，我一向不敢轻易地与人议论“理论”，尤其是对那些所谓的“体系”只能敬而远之。

将来，你们这些年轻人可能会逐渐形成根据中国农村发展的经验过程归纳出的理论，那现在，还是别急于盲从。即使不敢对老师“发难”，或者对学科本身提出颠覆性的观点，但能在平时学习的过程中多一点困惑，或能够“困惑着我的困惑”，也就不容易了。

当然，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就此停下，不能对国家、民族、历史和现实不负责任。因此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与共和国一起长大的人有责任去解构（deconstructure），通过下基层调查，通过向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向实际学习，重新认识已经被我们这一代约定俗成的概念和共识。

例如，我今天汇报中所提出的，我们是否应解构“农业现代化”？然后，也许我们这一代没有能力，将来要由下一代再建构（reconstructure）。

当然，建构本来就在解构之中，“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吴敬琏老师几次提出“需要再来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我们实在到了需要“大破大立”的时候了。

说了这么多，最后归纳的仍是一句尽人皆知的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那些盲目照搬、照译的书本上的理论有不少是伪科学，是垃圾，根本不能用以指导我们解释中国农村的现实问题，因此，我们的解构，其实就是一种挑战。

第七章　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34]

主持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世纪大讲堂”欢迎您。

很早以前，有一位杂志的主编跟我说，咱们中国人大多数上溯两代人都是农民，所以关心农民的命运就是关心我们自己。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经济学家温铁军博士，请他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报告，这个报告的名字就叫“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好，有请温教授上场。请坐。我听说您是1951年出生的，但不知道您出生在什么地方？

温铁军：北京。

主持人：就出生在北京。算了一下您的年龄，我觉得您应该是经历过上山下乡的。

温铁军：对，1968年插队。

主持人：也在北京插队吗？

温铁军：不，在山西的汾阳县。

主持人：离北京不算太远。

温铁军：现在属于吕梁地区。

主持人：您是一直研究农业问题、农民问题、农村问题，那当时这段插队的经历，跟现在的这个研究有没有关联呢？

温铁军：当然很重要，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和当年从插队开始那十几年的工农兵经历很有关系，如果没有在基层滚一身泥巴，跟基层这些群众在一起，我们至少没有从基层出发看问题这样一种角度，也可能不会有这种关注农民的感情。所以我觉得，今天搞政策研究的人如果没有当年那段底层生活经历，只从书本出发，恐怕是搞不好政策研究的。

主持人：好，我想听听到底怎么个底层法？您是哪一年从北京出发的？

温铁军：1968年。

主持人：正是“文化大革命”最火的时候。

温铁军：接近于不火了吧。

主持人：那您心里愿意不愿意去啊？

温铁军：当时我们是一颗红心，真是“党让上哪儿就上哪儿”，没有任何思想抵触，真的是满腔热情地去农村跟贫下中农结合，然后尽我所能去做农村的事情。我当时虽然只有十六七岁吧，十七岁，但是我没有任何思想上的抵触情绪。

主持人：给我们简短描述一下当时您看到的那个底层是什么样子。

温铁军：怎么说呢？当时如果从农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大家不明白到底为什么要这么辛苦，要这样做。所以老百姓说我们是“老背兴”。比如说，我们一起去交粮食。交粮食嘛，当时公社就把好粮食收了，把不太好的粮食，质量稍微次一点的退回来。然后呢，我们书记跟我们一块去交粮食，书记说，这个瘪麦子、不好的粮食是咱们“老背兴”吃的，好粮食那是给城里人吃的。当时，我们无论是想干什么都受控制。比如说，尽管今年麦子丰收了，可以多分一点，但是你的分配是上级计划的，从县到公社然后再到大队，你不能因为丰产了就多分一点，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按照从上到下控制的，控制得很严。所以我们这批知青刚下去的时候真是拼命干，自己觉得特别积极，干活干得特别卖力，可是老百姓就觉得你们傻，因为你干了活卖了力，最后分不到那么多粮食，你还等于要亏。后来，我在农村做调查的时候，大量去访问这些农户，当年的收入高低各不同的这些农户，和我早年在农村插队的时候老百姓给我们发牢骚说的话，其实还是一样的。

主持人：几乎没什么变化。

温铁军：没什么变化。

主持人：那好，你说的那个“老背兴”的那个“背”，是您自己的意会还是跟咱们说的“老百姓”不一样？

温铁军：山西人是谐音，我们插队的那地方“老百姓”和“老背兴”是谐音。

主持人：就是你自己想的这个“背”可能是很背运。

温铁军：他说的就是背兴，因为咱们背兴，所以咱们就吃瘪麦子。

主持人：噢，是这个意思。

温铁军：大队书记他就是这么说。

主持人：好。我知道您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新闻的，按说您更应该成为一个记者，怎么成了农业问题的研究专家了呢？

温铁军：当时新闻系明确告诉我们，我们是专业调查研究人员，未必一定要学报纸。我的兴趣更多的还是在政策研究，因为我工农兵都干过了，所以觉得很多问题确实需要不是一般地去报道反映，而是需要你深入研究，这是其一；其二，我本科是新闻，但我博士学位是经济管理——后来还是沾了点经济的边，所以搞了很多经济问题的研究。

主持人：最开始研究“三农”问题是什么时候？

温铁军：说到“三农”问题研究，不应该说我们这一代人，不是我们提出“三农”问题。因为，20世纪两个最伟大的中国人，一个孙中山，一个毛泽东，都明确地讲中国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所以说，讲“三农”问题研究应该是从他们开始的。

主持人：您自己研究“三农”问题是什么时候？

温铁军：我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去搞调研的，当时（所在的）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就是搞农村政策研究的。我的职责就是下去跑农村调研，在调研的过程中间就发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又以农民问题为主，所以我们当时就认识到，恐怕不是简单地讲“农业政策”就能解决复杂的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我们更多地应该关注农民问题，关注农村可持续发展问题。而所谓农业问题，我当时就认为这是派生的。所以我们在制定农村政策的调查中，特别是在80年代那个时候搞的政策调查中，比较强调如何关注农民，关注农村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农业问题。可见，我今天要讲的主题为什么是“三农”问题，就是要说“三农”问题并不等同于一般地讲农业经济问题。

主持人：开始研究“三农”问题是从80年代中期，到现在已经有15年了。

温铁军：16年。

主持人：16年。那接下来就请我们洗耳恭听温铁军博士给我们带来他的报告，他的报告名字叫“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

一、16年的试验证伪

我想，十多年的农村调研，是不可能在半个小时之内把它完全讲清楚的，难免挂一漏万，只可能是蜻蜓点水，好在我已经有了一本书，就是这本书——《中国农村经济基本制度研究》，它之所以会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会卖光，我想大家关注的其实不是我的研究，而是关注中国农民。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尽管我们国家到现在为止，已经被国际组织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列入前十名，世界前十名，甚至有的国际组织从增长潜力上来看，说将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中国会进入世界前三强。但是，因为中国是个二元结构的社会，我们有机会到农村去的人都会看到，农村相对还是比较贫困、比较落后的，当然沿海发达地区情况不同了，但是大多数传统农区应该说还不能跟得上整个国家高速发展的现代化的过程。因此，人们越来越多地把眼光集中到农村问题上，尤其是最近一两年，人们慢慢地开始接受这样一个概念：中国的问题不是农业问题，中国出问题是出在“三农”问题上，也就是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上。

因此，我的研究特点，包括我今天讲的特点，主要是从我十年的试验研究中，是从基层的实证过程中间所产生的一些看法。这当然会和一般地从理论或者从书本出发做规范研究的那些东西有很大不同，所以我请学界的朋友原谅，我说的东西如果和规范研究给你的那套知识谱系不同的话，请你能够考虑一下我是从实际来的。我使用的是试验方法，它本身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就是要求不断证伪的，其实自然科学的试验方法也是要求在不断证伪的过程中间接近真理。那么，政策科学研究使用试验方法，我们怎么证伪？

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说，经过十年的试验研究，被我们证伪的是什么。既然是试验，既然是证伪，那么被证伪的东西是什么？我今天要讲的，就是经过试验证伪的这些提法。

（一）证伪农业经济理论

我们不太认同一般的学界，特别是院校派的研究人员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比如说，一说到中国的“农业”，就要用农业经济科学的一般理论来解释。一段时间以来，无论是报刊宣传还是理论文章，都是在讲中国农业问题如何如何。我们经过十年的试验之后才说，中国其实既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农业经济科学，也没有单纯的农业问题，农业经济科学的一般理论不可能对应地解决中国现在的复杂的“三农”问题，为什么这么说？我想做点解释。

一般我们讲农业经济科学，都是说在市场条件下，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对于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也就是土地、劳动力、资金，产生作用，在每一个要素出现要投入边际效益递减的时候，就会发挥作用。它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来调整要素，假如土地要素的边际效益递减了，那么会有劳动力来替代它；如果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减了，那么会有资金来替代它。所以这个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就叫作“优化要素的配置”，或者叫“优化资源配置”。这是我们所有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基础，而且也几乎是我们颠扑不破的真理，当然农业经济科学也是这样解释农业问题的。

但就中国的农村经济来说，这些东西能起作用吗？

我们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我们的农业劳动力到现在为止（2001年），按照国家统计公布的数据是5亿，即劳动年龄人口是5亿。我们这些插过队、当过队长的人知道，在你这个正式统计公布的劳动力人口基础之上，恐怕还得加个30%。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半劳力呢，你怎么能说60岁以上的人不干活，怎么能说十六七岁以下的这些半壮小子不干活？农村十几岁的孩子干活是正常的事，60岁以上的老人没有“退休”一说，他照样得干活，这是正常事，这么算下来，得加30%。中国的劳动力就农村而言有多少，有6亿多吧。那么我们农业按照现在的生产力条件需要多少劳动力呢？1亿多嘛。往多了算1.5亿吧。那还有多少是属于相对就业不足的呢？在这种情况下，在劳动力绝对过剩、无限供给的条件下，你拿什么来替代它？相对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其他任何要素都是价格昂贵的，因为劳动力可以不算钱，所以才出现劳动生产率长期维持比较低的水平。在现在的家庭经济条件下，我们的农户调查测算已经连续3年劳动力投入产出是负值，就算它的边际效益递减到零以下，它能被替代吗？你把它替代到哪儿去？这个世界上有哪个地方可以让中国农村的劳动力被替代出去吗？这是不可能的。就这一条，我请

问，我们怎么用“看不见的手”来调控农业生产要素，来优化资源配置？不可能。这就是第一大要素——劳动力要素，事实上不能被替代。

第二大要素：土地。我们的土地是不可能增加的，只在不断减少。每年非农占地至少是几百万亩，再加上沙化、盐碱化等自然的减损，每年农业耕地减少大约……咱们也不好说绝对数，反正是比那几百万亩还要多，大家可以查统计资料。总之，土地是不会增加而只在不断减少的，劳动力是没有减少而只在增加的。于是，随着人口的增加，二元结构不能打破，对不对？

第三个要素：资金。农村中一个要素是只能增加不能减少，一个要素是只能减少不能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连社会平均利润都产生不了，因为劳动生产率是下降的，劳动力投入产出是负值，所以就产生不出利润来。那么请问，假设我们认定资金按一般的规律，至少要分享社会平均利润，那么假如农业生产产生不了社会平均利润，资金进得来吗？进不来。请问这三要素怎么在现在这样一个农业经济科学理论框架之内来考虑它的市场配置？所以我说，我们证明了半天证明不了的东西，就只能证伪。那当我们告诉学界这东西被证伪的时候，学界什么态度呢？说你这东西不符合我的理论！那我只好说，请你修改你的理论，你只能从实际出发嘛。所以这种对话是困难的。

可见第一个被我们证伪的，就是说你一般地跟我讲市场条件下要用“看不见的手”去优化资源配置，我告诉你我三个要素不能被你优化配置。因此我们出现什么情况呢？农村资金净流出。很多人建议要加强农业投入，请问加强农业投入的条件是什么呢？是资金作为一种要素投入进来，它能得到大致平等的社会平均利润率，它才有投资回报，对不对？更何况相当多的资金所有者并不只是要求一个社会平均利润，近年来投资者大量进入资本市场，是要拿超额利润的。在这样一种不规范的投资条件之下，你怎么能让农业增加投资，怎么可能增加投资呢？再加上，如果投资增加了，而其他要素不能相应地去优化配置，那么会导致什么呢？成本上升。而且我们看到，这几年农产品价格长期低迷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什么呢？是天花板价格的封顶。什么叫“天花板价格”？就是国际市场价格。我们大家都说现在农民没有种粮积极性，说农民弃耕撂荒，要想办法解决农民弃耕撂荒的问题，怎么想办法？怎么解决？你这个粮食价格让农民种粮食，农民当然不种了，为什么呢？价格上不去，成本在往上涨。20世纪90年代以来，平均农业硬成本上涨10%，涨到什

么程度呢？甚至涨到我们国家的农业按基本产品（就是按主粮产品）算。我们的基本农产品的成本价格甚至在某些时段上高于“天花板价格”，就是“地板价格”高于“天花板价格”。这是非常荒谬的一个现象，怎么能让“地板价格”高于“天花板价格”呢？

（二）中国是农业大国？

接着要问的是，在上面那种情况下，你怎么进行农产品贸易呢？因此，我们挑战的第二个观点就是，中国是不是一个农业大国。很多人说中国地大物博，是农业大国。我说非也，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而非农业大国。

有几点可以来证伪“中国是农业大国”的观点。是什么呢？

第一，人均农产品的产量。无论是粮、棉、油、肉、菜、蛋，中国全都接近于世界平均线，个别产品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也很低，与农业大国不能比。例如美国，它不仅是工业大国、科技大国、资本大国，还是农业大国，因为美国的人均农产品的产量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尽管我们中国农业按照总产量来算，可能是比较高的——所以人们说中国是农业大国，但其实应该说我们不是，因为按人均算它只是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甚至在很多品种上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第二，我们的农业商品率非常低。比如说，我们以农业主产——粮食为例，常年看，平均的农业商品率，就是粮食商品率是多少呢？30%多，不到40%，哪个农业大国的商品率这么低呢？美国农民种粮食，但他吃自己种的粮食吗？他买面包吃。因为他的粮食全部进仓，然后就有做加工的厂商买走了，农民再去商店买面粉回来才能烤面包，对不对啊？他不会自己去磨麦子吧。所以，美国农业的商品率几乎是100%。美国农民也不吃自己养的猪，不吃自己养的牛，他不宰杀嘛，对不对啊？我们呢？70%左右是自给自足。当然统计上问题很多了，咱们不多说，但是就现在公布的统计数据看，我们的商品率按主产品算，也才是30%多，当产品不能大规模商品化的时候，怎么能够叫一个农业大国呢？所以，就从这两个方面看，我们不能说中国是农业大国。

可见我们通过证伪得出的第一个看法，就是中国不能简单照搬农业经济科学的一般原理来解释我们的农村经济现象；第二，我们不是一个农业大国，我们是个农民大国。

二、为什么叫“三农”问题？

我们反过来再说为什么中国的问题叫“三农”问题。有个朋友帮我把它翻译成英文是three dimensional rural issues，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三维的农村问题，是三维的，也就是要求你立体地去看中国的农村问题。如果你只简单地、一维地去看，那你就是投入产出，供给需求，那就是一个纵轴一个横轴就解决了。如果三维地去看，那你就能看到我们刚才所说的农民人口众多的农民国家的问题。

于是，很多人就开始跟我们讨论了：你说农民人口众多，那为什么不加快城市化，为什么不在工业化加快的同时去加快城市化呢？你如果解释不了这个问题，你提出的观点也是站不住的。

（一）中国独特的工业化道路的影响

我可以这样告诉他：中国因为处于别的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之后才开始工业化起步的这样一种地位，所以它一上来上的就是重工业；并且又是在战争环境之中——我们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周边地缘环境非常险恶——所以，一上来就是重工业。重工业一上就是资本增密、技术增密、排斥劳动，这是重工业的特点。因此，中国不可能随着自己的工业化，就是工业产值占的比重的提高，来带动农业就业人口向非农的转移。由于客观上我们没有条件随着工业化带动农村的城市化，没有条件大量转移农业劳动力，因此，直到我们几乎完成工业化，即2000年时，GDP中工业占绝对比重，农业大概仍在16%以下，在这样一种条件之下，农业人口仍然占将近70%。这就是中国的特殊国情。

中国不是一个搞了几百年工业化的国家，从当代史上看应该从1950年或1951年开始。咱们从1952年的“一五”计划算起吧，“一五”之前中国有什么工业呢？比如，北京有什么工业呀？石景山制铁所，是日本留下来的。除此之外，北京有王麻子剪刀、大串糖葫芦，那叫工业吗？就是些作坊嘛。现在你看，这个国家整个工业化水平多高。但因为它是这样一个特殊的过程，这样一种一上来就是以重工业拉动的工业化过程，就根本不可能像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路那样，随着工业化带动农民的就业，带动农村人口的转移，形成农业人口占非常少的比例的高度城市化，比如美国只占不到3%，日本大概不到10%。可见，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有5亿农业劳动力，这完全不可比嘛！所以，这是中国第一个基本国情。

（二）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

那接着会有人说，为什么现在不能通过加快城市化，来转移更多的农村人口呢？我们说，如果从绝对数看，改革开放之前30年城市人口就从4000多万增长到2亿，搞了改革这20年再翻一番到4亿，可见，50年来我们转移农业人口的速度确实不慢。但是由于人口基数的作用，如果从比例上看，尽管我们已经搞了50年的工业化，却仅仅把城市化水平从15%提高到30%。那再往今后数50年，城市化就算加快一倍；或者，我们不往50年算，按2020年、2030年算，因为讲人口学的人都会说，2020—2030年是中国人口最高峰，到那时候中国的人口是16亿多。就算加快城市化，到那时候农业人口转移以后占总数的一半，农村还剩多少呢？8亿多农业人口。现在我们多少呢？8.7亿，到那时候大约还是八亿几千万，绝对数差不了多少，可能才差几千万人口，还是8亿多农民人口嘛。绝对数还是没有减下去，还是人均不过一亩地，户均不过是四五亩、五六亩地，这怎么能够形成现在人们所说的规模农业？那么，在这样一个小农经济基础上，能够把刚才我所说的那些问题解决吗？

经济学讲预测，三年、五年的就算是远景了，要讲30年的发展前景，那几乎不可信。所以，我们只讲大的趋势。30年之后，尽管你可以通过转移人口实现50%的城市化，却仍然会有8亿多人生活在农村，起根本制约作用的人地关系不可能根本改变，因此，农村可能还是这样一个小农经济。

所以刚才主持人阿忆问我说，你当年是个插队的，现在又搞农村政策这么多年，你觉得到底会有什么大的变化？我说这个变化是肯定有的，大家生活好了嘛，对吧？土地产出率提高，是因为投入增加了，这些都是重大变化。但是你说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的制约条件，我觉得很难。也就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基本制约条件很难改变，我们把这个制约叫作“基本国情矛盾”。咱们中国的任何政策研究，假如忘记了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基本国情矛盾，单纯地依据某个科学理论或者某种科学理论来制定政策，就会很麻烦。

把我们刚才讲的做个归纳：因为从一开始就是重工业导向的这样一个高速度的工业化过程，所以没有同时带动城市化；又因为我们再往将来看30年，到那个时候农业人口即使不再占绝对比例，但仍然还会有8亿多农村人口。所以我们才说：从长期看，中国农村的小农经济这样一种基础是不可能发生根本改变的。有鉴于此，我们就不得不客观地承

认，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这个基本的体制矛盾，也将是一个长期的体制矛盾。因此我在基层搞的10年试验把我变成一个注重现实的人。我们最终能够证明的，无外乎一个最简单的常识，这就是中国是个农民大国，它的长期发展受制于两个基本矛盾：第一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我们把它叫作“基本国情矛盾”；第二是基本体制矛盾，就是城乡二元结构。

三、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

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尽可能简单地说点结论性的东西。

我们做了这么多研究，对“三农”问题有什么办法没有？我们说所有的办法大概只能瞄准一个目标，就是如何缓解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样的“基本国情矛盾”。假如我们的政策导向确实能够有效地缓解这个矛盾，那就有可能给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一线希望。如果不能缓解，我们恐怕就很难有可持续的发展条件。例如，中国最基本的国策除了计划生育之外，还应该再加一个，就是“就业最大化”，这应该作为一个标准。无论你发展什么科技、引进什么项目，是否能够带动就业就应该是评价项目的标准之一。这是咱们这个农民国家需要的第一个大政策。

缺，土地的保障功能就越大于生产功能。那么，有没有什么政策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因此，我们能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制度来解决中国农民把他的生存保障依存于土地这样一个问题呢？也不能。即使你把最现代化的美国请来，它也不可能为一个国家70%的人口——9亿人口去解决保障问题。可见，在没有解决土地承载双重功能的问题之前，至少在中国农村照搬西方的制度搞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二个，我们说应该有些政策来为农民安排必要的保障。大家知道，因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那么实际上土地承担了双重功能，它既是生产资料，又同时是农民的生存保障依据，或者说是生存保障基础。所以，很多的政策都强调要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如要发育大户，要搞大农场等。但是，假如你们不能把土地上所承载的对农民的保障功能剥离掉，那么这个土地就永远得按人分配，因为每增加一个农民，他没有其他的生活来源，城市又不可能短期内解决那么多人的就业问题，所以他得依存土地生存。因此土地就变成了什么呢？越是人口增长，越是土地资源短接着，我们再说今天农村所发生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你们看，农

业的产值只占15%左右，但人口却占70%左右，请问哪个国家能够把15%的产值所产生的利润作为基数去提取税收，支付70%人口的公共品需求？这是一个倒置的结构，根本就是不可能做的事情。另一方面，怎么可能要求政府从城市收取的税收，用来支付70%的农村人口公共品开支呢？也不可能。所以这种矛盾同样是尖锐的。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来搞政策，恐怕都要面对如此尖锐的矛盾。你们看南亚次大陆，你们去看中南美，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间，是不为农民人口提供基本保障的，因此出现大量的农民弃耕撂荒，因为农业是负效益嘛。然后农民流入大城市，在大城市周围形成大面积的贫民窟，然后就是黄、赌、毒泛滥，黑社会泛滥，产生大量犯罪，于是乎军事独裁就有了借口；然后，集权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复杂，就开始出现社会动荡、不安定。而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一旦出现社会的动荡不安定，对于每个人都是严重的威胁，所以这个事情与所有的中国人都高度相关。我们强调的绝对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农民保障，实际上强调的是中国的长治久安，强调的是我们这十几亿人的福祉，长远的福祉。

综上所述，就是我们证伪的两个问题，我们提出的今后政策上应该注重的两个方向，当然，这只能是作为一种希望提出的。我想，今天长话短说吧，不过是简单地概括一下我们这些年从试验中得到的感性认识，大概就跟大家说这些。

附：提问

网友“亲爱的葡萄”：我知道您一直在四处呼吁重视“三农”问题，而且强调您说的“三农”不是传统的顺序，农业、农村、农民，而是把过去放在“三农”最后的农民提到最前，把原先放在最前的农业放在最后，即农民、农村、农业。不过，我听说社科院农村所所长张晓山认为，“三农”中的三个问题不可分，根本上是搅在一块的，很难说清谁重谁轻。言外之意是，如果把农民、农村、农业三个因素都放在第一，那才是最好的，而单纯把农民提到最前，当作“三农”之首，不见得科学。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温铁军：首先我是对所有的社科院或者其他院校的老师都一概表示尊重的，因为我是学生出身嘛。但是我刚才一开始已经讲了，把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不是我说的，而是20世纪两位最伟大的中国人，是他们说的，所以让张晓山去跟他们争论，我退出。

主持人：一位是孙中山，一位是毛泽东。

温铁军：对，这是他们说的，他们说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在一次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我曾经说，不仅20世纪的中国问题是农民问题，21世纪的中国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只不过，20世纪农民的问题表现为土地问题，因此我们前50年有三次土地革命战争，后50年有三次以土地为主要内容的改良，也就是土改、“大包干”和江泽民总书记倡导的土地承包30年不变。这三次都是在村社内部按人平均分配土地，以农民人口为分配的基数这样一个分配方式为主。因此20世纪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还是第一要务。21世纪我说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农民的问题，是因为21世纪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农民的就业。我刚才已经讲了，按统计计算，到2001年我们有5亿的农村应就业人口，就是劳动年龄人口。我们说农业只需要1.5亿人，当然有人说乡镇企业解决了1亿多人，但那有相当一部分是“两栖”就业的。村以下的乡镇企业至今仍然占乡镇企业个数总量的90%以上，那些在村以下就业的农民是完全转移了吗？当然不能这么看。所以你说1亿多乡镇企业的就业人口有多少是真正实现了非农转移呢？恐怕很难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然后还有很多人说现在进城打工的农民也有1亿多了，不错，进城农民是有1亿多了，他们放弃土地了吗？因为土地是他们的生存保障呀。所以我们说，假如20世纪的中国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那么21世纪的中国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但这个问题将主要表现为就业问题。

观众：我就想问一下，最快要多长时间才能让咱们农村脱离现在这种情况？谢谢。

温铁军：我们觉得其实中国这50年的经济增长过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村生活的状况，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我们很多人知道，在沿海发达地区，有些农村的生活状况要比城里人好得多。更何况他可以享受比较干净的空气，比较好的水源，比我们城里人的担心还要轻一点。所以我说，5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间，至少部分地区农民生活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改善，现在问题其实集中在那些贫困地区或者是资源相对短缺的地区。针对这种地方的问题，我们恐怕需要采取不同的政策。我个人的看法是，对那些资源已经短缺到不足以维持农民生存的地方，恐怕很难寄希望于在当地推动经济发展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恐怕就需要异地扶贫，或者是国家有目的地实施一些大型的工程项目，来带动这些资源短缺地区的农民就业，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而在中部传统

农业地区，就是以粮食生产、粮棉油生产为主的传统农业地区，恐怕要通过一定程度地改变现在的农村经济的结构来解决问题。

现在国家的农村经济战略结构调整已经逐渐提高到了一个很深的认识层次上，就是说不再把一般的结构调整认定是农业的结构调整。现在已经提出的政策语言叫作“战略结构调整”，也就是说，要通过加快城镇化、加快农村工业化，加强农村基层的农民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等等。国家将用一系列的安排来解决中部传统农区农民收入的问题、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所以我说，笼统地谈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恐怕那是过去的说法。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尽管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农民的问题，但是至少可以说，在部分地区农民的问题已经相对比较轻了。那么在贫困地区，这次不是刚刚开过全国的扶贫工作会嘛，已经定向地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政策来解决那些贫困地区的问题，而比较难解决的实际上是大量的中部传统农业地区的贫困问题，恐怕这个工作量很大，真的需要像当年毛泽东所说的要做“第一等的工作”，真的是要扎扎实实地、一点一滴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做，而不是大轰大鸣地去做。

我还要多说一句话，20世纪80年代能够靠大包干“一镢头刨个大金娃娃”的事不可能再有。当时是胡耀邦说这话的，他说，“没想到大包干一镢头刨个大金娃娃”，那时候是一个政策就能调动全国农民的积极性，然后带动一个时期的高速增长。那种情况，在今天如此错综复杂的矛盾纠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已经不可能产生了。就是说，再不能寄希望于搞一个政策，就能把中国整个农村问题解决，那是不可能的。这恐怕需要分区，根据不同情况来采取对策。

观众：我想向温教授提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入世”在即。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土地非常少的国家，“入世”以后，中国将会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墨西哥这些国家开放粮食市场，将会在粮食方面给中国造成一个很大的冲击。那我想问，刚才教授讲了两个要点——一个是我们中国的土地越来越少，一个是我们的人口越来越多。这样的话，国外的粮食进入中国以后，我们生产粮食的这批农民将会到哪里去？做什么事？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三农”问题中的农民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稳定的大问题，现在国家正在考虑对农民的社会保障，那么对农民的社会保障怎么实施？我想请教温教授，谢谢。

温铁军：你提的这两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们恰恰在上周刚开了一个关于WTO与中国“三农”问题的研讨会，我很高兴有人能关注这个问题。农业问题将面临重大的挑战，这个挑战甚至是很严峻的，这一点我想大家是有共识的。

但是具体到粮食产业，我想这个恐怕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什么呢？你看东亚小农社会，当然没有谁像咱们小农这么多，农民人口这么多。但是在东亚小农社会，不论是日本、韩国，还是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除了中国大陆之外，其他的都是按照“日韩模式”来重新建构对农业生产的一种保护结构，什么结构呢？就是说，政府其实并不把资金直接用于农业生产投入，但是政府在加强什么呢？加强农民的互助合作，加强对农村的社会性投入。同时，必须向农民的生产合作、农民联合起来建立的合作组织，开放所有农业生产之外的涉农经济领域，比如说投资、比如说保险、比如说购销、比如说超市、比如说加工，等等，只要是农民联合起来所形成的合作组织，都可以低税甚至免税地进入。然后政府还要给一定的投资来帮助这些事业——就是涉农的农民合作事业发展起来后，以这方面所产生的收益来反哺到农业生产上。比如说，农民联合起来搞的农民金融，它就规定是60%以上的收益要定向地用于农村各项事业的开支上。也就是说，与现在的做法相比，可能有点不太合适的地方在哪儿呢？我们还让生产最低价值产品的农民承担很多税费，因此他们就亏本，就弃耕撂荒，农业就没有竞争力。如果不让这些人承担税费，同时又让这些人联合起来形成合作，让他们能够进入各种各样产生比较高利润的经营领域，比如把涉农领域干脆让给他们，然后政府再扶助，再以低税的或者甚至免税的待遇鼓励他们进入。政府大量的农业投入进去以后只作股不分红，为了扶持他们发展合作经营，为了让他们产生利润，来抵补亏损的种植业生产。所有东亚国家和地区所采取的措施都是我们可以借鉴的，所以我说不是无路可走。这是第一。

另一项政策对我们来说，普遍还没有采取。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农业收益净流出的现象，很多人测算，平均每年从农村流出的，大体上能算出几千亿元来，所以怎么办呢？不是没有办法，当然我们提出的只是建议，还需要讨论，绝对不是定见。既然我们国家在土地一级市场上维持的是政府垄断，那么政府垄断征占土地，现在又说每年有数以百亿的收益在流失。那如果不想流失，政府就把垄断征占土地所产生的任何收益都用来建立土地基金，每年大概也是几百亿元嘛，那几百亿元的土地基金上市所产生的增值收益，完全可以定向地用于支付农民的保障。必须

先用于无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再逐步地和贫困农民的社会保障挂钩，特别是和中西部、和不发达地区的农民社会保障挂钩。当这些地方的农民还不能从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间去分享收益的时候，那就只能先由政府以垄断征占土地所产生的增值收益去建立保障，特别是对无地农民的保障，这可能是一个权宜之计，但却能够用中国人自己的办法，不是照搬西方的办法，来解决中国人自己的问题。

网友“平地摔跟头”：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采取的是不是“苏联模式”？为什么农民问题的“苏联模式”没使苏联变成咱们今天这个样子？

温铁军：这方面的问题在我这本书里做了回答。

我专门对100多年的农村制度变迁过程做了分析，我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实际上是在详细解释中国农村这个制度变迁过程是怎么回事儿。很多人习惯于把责任归于过去，就是说，这个责任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是上一代人造成的。这样大家就轻松了，可我觉得这样简单地去做判定是不负责任的。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其实早在1947年，你去看看当时的文件、当时的讲话，我想当时的讲话肯定是内部的，就已经认定了中国不可能照搬任何发达国家的模式。而且到1949年的时候，毛泽东还在讲，如果想在这样一个小农经济遍地的条件下去搞社会主义，充其量是民粹主义，或者说是农民的社会主义，那是根本搞不成的。1950年，毛泽东在全国政协讲话的时候，也讲得很清楚，说社会主义还是遥远的将来。

第二，到底什么情况下导致农业开始出现合作化、集体化？人们一般都以为是意识形态造成的。我们特别要提醒大家，那当然不是因为意识形态，造成中国从土改然后互助、合作、集体化，这几个步骤和中国追求工业化这个宏观环境的巨大改变有直接原因。什么原因？比如，为什么陈云同志当年主张搞统购统销？那是因为咱们土改之后，尽管农业生产有了很好的增长，你看那个曲线是这样的，很陡地往上走，表明农业产量在大幅度增加，但是同期供给在下降。这里边有个什么道理呢？你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搞土改之前，地主这个阶级是万恶的，他是剥削阶级，但他客观上起了什么经济作用呢？他收租，收了租他自己吃不了那么多租——地主只占人口的7%～8%，他收的租大体上能占到20%～25%，但只消费7%～8%，那他至少要有15%左右的租子变成市场供给的商品，所以地主客观上自发地起了农产品“规模供给者”这样一个作用。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和平年代，你靠谁来解决与4亿高度分散的小农交易的问题呢？所以当你的交易对象数量大到一个这么大的、数以亿计的时候，交易成本空前推高，因此（粮食）供给上不去，尽管产量上去了。所以，到1952年秋天的时候，陈云同志当时主管财经，他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说是咱们粮食连过冬都难以保证，更别提春荒了，怎么办？当时考虑了八种到十几种的方法，最后选定了统购统销。你搞统购统销的对象还是4亿农民，怎么解决呢？毛泽东就发出号召组织起来，组织成400多万个合作社，这个统购统销就跟合作社交易，交易成本就降低了。所以，最初搞合作化根本不是为了解决中国农业自身的问题，而是解决当时工业化加速的问题。你知道1952年有多少人进城吗？当时是2000多万青壮年农民进城，因为需要大量的挖土方、修马路、盖房子的工人，工业化初期对简单劳动力的需求是非常大的，那时增加了2000万劳动力进城，而当时城市总人口才大约5000万，所以这一进城就突然增加了一大块对粮食的需求，当然就导致得解决（与分散农民）没法交易的问题，对不对呀？所以统购统销加合作化就是这么来的，绝对不可能是因为意识形态造成的。

所以，我们如果看经济问题，只能就经济谈经济，咱们把意识形态的那些解释先放一边儿，看很多当时的会议上领导人的讲话，他们绝不比现在我们提问题的这些人智力水平低。所以我说，要看当时的问题是什么。有的研究人员已经把那个时候的文件全部整理过来，发现我们农业组织化程度提高，逐步提高到人民公社化的过程，其实都和国家的工业化需求高度相关，尤其当国家开始生产出拖拉机的时候，你的拖拉机给谁？连这400多万个合作社都不可能成为接受拖拉机的主体，对不对？我当队长的时候，我们村里面一旦公社派拖拉机来耕地的时候，农民说什么？说咱们又倒霉了，为什么呢？它得要多少麦子。我们其实用自己的牲口完全耕得了那个地，为什么要拖拉机呢？农民当时是不需要的，是国家强迫给农民拖拉机。那国家没拖拉机行吗？没拖拉机就没坦克，拖拉机摘掉上头的驾驶室放上炮塔就是坦克，国家能不生产拖拉机吗？今天的人应该懂这个道理，是我们现在的人没有实事求是地去看当时的情况而已。更何况，1956年开始中苏交恶，中国不会再有苏联的后续投资，你从哪儿弄来工业化投资？重工业追加投资的比重是相当高的，每年没有30%～40%的积累，重工业能上得去吗？“两弹一星”怎么上天？靠重工业基础。中华民族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没有这些玩意儿不行，因为全世界都靠这些玩意儿在那儿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能免得了吗？如果我们农民就使用锄头、镰刀，不使用拖拉机，那么，

就没农民买拖拉机，就没有坦克，国家当时就得用卖拖拉机的钱去顶坦克的成本。所以那个时候，这套体制自上而下地这么贯彻下来，就是让农民做出牺牲。要我们说，那一代人，包括我们这半代人——因为我们至少干了几年活儿，正是我们的牺牲，形成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形成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所以我们觉得不亏，我们为民族做了牺牲是应该的，我们是骄傲的。

主持人：好，最后一个问题，您只能用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是，在世纪之交谈“三农”问题，到底有怎样的重要性？

温铁军：我要说，中国是中国，它不可能重复发达国家的经验，变成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所以我们还得眼光向内；解决农民问题就是解决内需问题，解决内需问题就是解决了中国的发展问题。

主持人：好，谢谢温铁军博士，谢谢现场观众。

第八章 “入世”与中国“三农”问题[35]

一、题解：“入世”影响的是农业还是“三农”？

我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当面批评，有严重错误的地方请大家当场批判。凡属不符合当前意识形态所宣传的内容，请一律以报纸、杂志、文件为准，请务必如此。

人们既然已经比较普遍地接受了“‘三农’问题”的这个提法，就先得弄清楚中国“入世”到底是对农业有影响，还是对“三农”有影响。

在这几年的讨论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无论有没有WTO的挑战，无论入不入“世”，中国已经面临比较严重的农民、农村、农业问题，而且现在人们已经注意到，单纯讲中国农业问题似乎不太合乎时宜。人们已经越来越多地开始把研究中国的所谓农业问题，转变为研究“三农”问题。尽管“‘三农’问题”的提法在中国官方的文件和报纸里排序，还是农业、农村和农民，但是对于做农村政策研究的人而言，我们从一开始就是讲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这个排序的差别是明显的。因为我们首先认为中国是一个农民人口大国，主要面临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尽管在说法上学界还有不同意见。新闻界的朋友问到我的时候，我说“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并不是我提出的，20世纪两个最伟大的中国人——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曾说过，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所以说，是他们把农民放在“三农”问题之首的，我只不过按他们的提法延续下来做点研究而已。

因为农民问题是第一位的，又因为农民居住在农村，而土地这个农村最大的资产，它的产权是以村社为边界的，所以，如果讲农业经济研究，也需要把这种客观现实存在的产权制度作为基础来研究农村的财产关系。如果从理论角度研究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我们也应该首先看到，中国农村实际存在的是“小农村社经济”这样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特殊制度。所以，“三农”问题中，我认为第二位的问题应该是农村问题，也不是农业问题。我在比较不是那么理论化地探讨问题的时候甚至说过，在中国，农业问题是派生的，是因为有了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才派生出农业问题的。

假定中国有9亿农民这样一个世界最庞大的农村人口基数，从中长

期看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就是说农村的人口数量不可能在中长期会大幅度下降，不可能下降到现在一般发达国家的水平（也就是说下降到10%以下）。那么有限的耕地——过去说14.5亿亩，现在说19.5亿亩——不管统计上说多少，相对于9亿农村人口来说，耕地的主要功能就不可能是生产资料了，而是这么多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因此，这也就决定了另外一个制度基础：谁能向农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谁就是这种生活保障资料的所有权主体。比如说，国家向你们在座的这些大学生和学校的老师提供基本的保障，包括医疗、失业、养老保险等，那国家就不仅是这种被称为公共品的社会保障的提供者，而且是税收财政资金的所有者。而在农村，因为我国是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得不到足够的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所以客观上农民的社会保障，也就是它的生存基础，只能是依托于土地的。那么谁来给农民土地呢？是村社，从“土改”以来的50年里，都是村社来给农民分配土地的，因此也就形成了农户有土地的使用权、村社有土地的所有权的双层结构，这就是中国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

所以说，首先得搞清楚，中国的“三农”问题是什么。不是一般的农业问题，而首先是农民问题，然后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村社——可以归结为农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然后才是前二者派生出来的所谓的农业问题。这个观点和教育界、学术界长期教给大家的理论有很大的差别。因为，在我国的经济科学这个领域中，农业经济学作为一个微观经济科学，已经被当作大学教育内容或者理论规范存在了很多年，我们只有农业经济系，没有农村系，也没有农民问题研究所；我们有农业大学，没有农村经济大学。研究土地问题，我们有土地经济系，那也是把土地作为生产资料来研究的。经济学研究土地的要素生产率，研究土地这个要素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当它在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况下就会被其他要素替代，等等。但近年来没有人将农村、农民作为教学科研的重点来研究。所以，我们说“三农”问题是农民为首，农业是农民和农村派生出来的一个问题，这对教育界、学术界恐怕是一个挑战。当然，我所说的这种学问能够成立与否尚待实践检验。

我基本上不认为WTO对农业构成单独的影响，而是对中国“三农”问题构成影响：主要对农民构成影响，其次对农村经济构成影响。这显然与其他人讨论问题的出发点不太一样。我们这些长期做农村调查的人，在讨论问题的时候首先想的是人，心里面装的是农民。因为我是长期搞农村政策的，长期下乡做调研，我认为能不能做正确决策，第一条取决

于你心里面装的是什么。如果你心里面装的是农业，对不起，你错了，你心里面得装农民，否则就没有正确决策产生的可能。

这是进入正题之前说明的一点，我要对演讲题目做不同于既成理论规范的解释。

二、背景：GATT向WTO转变的深层次原因

下面进入今天要讲的第一部分，先介绍一下WTO是怎么回事。

谁都知道，WTO即世界贸易组织，是1994年成立的，但很少有人清楚其中的区别：在它之前的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和WTO这两者通常被认为是连续的，但如果深入分析一下，它们是有本质区别的。一般地说，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入世”之路，报纸上说走了15年，这个说法可能不够确切——1994年以前，我们要求的是加入关贸总协定，原来我们的公开提法叫作“恢复关税贸易总协定缔约国地位”，1994年以后才叫“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中的问题是，很少有人对世界贸易组织和关税贸易总协定的区别做分析。

长期以来，学校的老师在讲授这一内容的时候，约定俗成地会讲到一个原则：世界贸易组织体现的是自由贸易原则。他们会说几百年来这个原则是颠扑不破的，只要你贯彻了就会发展。假如你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挑战之下受到的影响是负面大于正面的，他们就会说：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在加入WTO之后垮台。这是大家经常听到的说法。对此，我认为有必要解释一下WTO和GATT的差别。

有些观点在我发表的相关文章中已经强调过了。GATT形成于194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要推动的确实是商品的自由贸易。而1994年之后的WTO主要推动的已经不是一般商品的自由贸易，而是推动资本的自由流动，其所隐含的原则是资本有建制的权力。所以，在国际上对经济全球化与WTO进行讨论的时候，人们会提到WTO与维护国家主权的矛盾如何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建立制度的权力，本来是一个国家主权的体现，WTO条款包括资本的自由流动，当然就要求资本有建制的权力。你要想接受外部资本，就必须按照外部资本的要求来建制。这和一般商品进入是不同的，因为一般商品进入以后，主要就是消费而已。比如说，人们告诉你加入WTO以后，你会买到更便宜的化妆品，抽到更便宜的香烟，你可能还会买到更便宜的汽车，等等，但那是

指一般商品贸易。

有历史常识的人应该知道，GATT的背景与WTO是不同的。

1947年形成的GATT，是战后经济重建时期的产物，当时条件是特殊的。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是1929—1933年的大危机、全球经济衰退的必然结果，而1929—1933年大危机是传统工业化结构趋同所造成的一个必然结果。问题很清楚，比如法国生产机械，德国生产机械，英国也生产机械，大家都生产机械，于是机械就过剩了。那怎么办呢？没法办。只有你不生产，而我生产，我才能胜。

欧洲的一些早期的工业化国家，麇集在这样一个狭窄的疆域。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把殖民地瓜分完了，那些有殖民地的国家也用商品输出将世界市场覆盖掉了，没有殖民地的国家和战败以后被迫让出殖民地的国家，连这个条件都没有。因此，德国率先将制造业转向军工生产，而军工生产就是这样一种非常直接的比例关系，你投入的是100，他投入的哪怕是90，那他也必败无疑。这个道理是4年前由天则研究所的青年学者盛洪提出来的，我认为很多历史事实都可以证明盛洪的观点。比如我国和日本在甲午海战之前双方军事的能力是相等的，只不过慈禧太后将应该更新炮舰的那些钱拿去盖了颐和园，没来得及更新武器。我们和日本当年是在同步进行军备建设的，日本海军比我们多走了一步，甲午海战就把中国海军主力舰队打沉了，然后中国政府就得赔2.3亿两白银。日本拿到这2.3亿两白银，就投资上了钢铁工业，一步跨过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日本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尽管同样是残酷的，但它当年也只是完成了初步的轻工业或者一般商品制造业的建立，而发展重工业，如大机器制造、钢铁工业，要进入这些资本密集的工业化阶段还没有充分条件。

中国的2.3亿两白银赔款对日本完成工业化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它跨越式地完成原始积累阶段的一个必要条件，日本把其中的1/3用于支持钢铁工业发展，建立了今天的新日铁的前身。1895年《马关条约》得到赔款10年之后，日本就用战争赔款形成的钢铁工业造出大炮和炮弹，打败了俄国，占据了中国旅顺口和辽东半岛，乃至后来占据整个东北。本来一般的通过轻工业和农业这种交换逐步形成初级工业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逐渐为重工业提供积累，但日本是通过战争一步进入重工业，成为一个军事工业大国的。我用这个故事说明，在军事工业方面投资100和90的差异，就是国家之间竞争胜和负的差异。

1929—1933年，传统制造业的结构性经济危机发生后，德国率先转向军事工业，就打败了欧洲所有敌手，谁让你晚投军事工业呢？而美国人长期奉行“孤立主义”，当时认为这是欧洲的事，跟美国没关系。而且唯独美国在1929—1933年整个西方发生大危机的情况下，原来的传统制造业可以基本不调整——尽管大家的制造业都是同样结构、同样过剩的，但因为美国是新大陆国家，有德沃夏克那辉煌的交响乐所表现的新大陆的宽阔国土，就可以通过政府搞积极财政政策来启动国债投资，大规模开发西部，修铁路、修公路、修水利，以它过剩的制造业，能够以政府投资的形式来缓解结构性过剩这样的大危机。所以，唯独美国在1929—1933年大危机发生后幸免于难，但也并没有根本改变它的工业结构，并没有造成产业结构的提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利用自己没有被破坏的工业结构，向欧洲输出军火，战后则以它更趋庞大的传统制造业这样的生产能力，向欧洲、日本和其他的西方国家提供“马歇尔计划”所需要的设备，这时候它恰恰主要是搞商品和设备的输出，因此，当然就要求商品无国界地自由进入，这就是GATT产生的背景。

随着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推行，整个西方世界几乎都变成“美元区”，就好比东方的苏东国家变成“卢布区”一样。从“二战”后到20世纪50年代初，美元在西方货币中的总量一度超过76%，亦即大约有3/4的西方货币是美元。各个国家要想还美国的钱，手里就得有美元——借的是美元，当然还的还是美元了；欠债还钱嘛，天经地义。所以，就形成了“美元区”，这使得美元成为全球第一货币，后来逐渐演变为取代黄金的“美元本位”。于是就造成了这样的经济循环：美国把设备给你，来帮助你经济复苏，你经济复苏以后，生产出美国需要的消费品，卖到美国去以后，美国再给你钱，你才能还美国的债。

不过，随着战后欧洲、日本经济的不断发展，到50年代末期基本完成了再工业化就是重新工业化的过程，60年代制造业开始大规模发展。各国开始立足于本国的生产能力和对外贸易发行的货币，由于基本上与实质经济（实质经济，也有叫实物经济）的需要高度相关，所以，西方各主要工业国所发行的货币相对来讲就开始坚挺，逐步使得美元占世界货币份额的比重开始有所下降。随后，就有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浮动汇率取代固定汇率等，大家在各种教材上也都有所了解，不多说了。

总之，是因为战后“马歇尔计划”所带来的机会，美国得以通过大规

模的商品输出，维系传统的制造业膨胀。但是，由于这客观上导致美元占世界货币总量的绝对份额，进而导致美国战后从20世纪50—60年代制造业膨胀达到顶峰以后，就出现了初步的经济结构调整，我把这种调整称为“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一般来说在GATT这个阶段，实际上并没有形成对欧洲传统制造业的结构调整机会。

后来到70—80年代，欧洲和日本也开始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制造业。同期，在资本输出的带动下，德国马克和日元都出现过升值。这时，美国已基本上演变成了世界的中央银行，亦即美国可以通过发行货币，向世界上所有追求贸易盈余的发展中的工业化国家征收铸币税。这对美国来说是巨大的、空前的历史机遇，这个机会导致了美国的经济结构重大调整，逐渐调整成以金融服务业为主导。它可以逐渐让传统的制造业这种实质经济移出美国，而主要发展资本经济。特别是到了80年代里根政府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随着美国逐渐演变成全球的金融中心，以资本交易、以金融为主的服务业在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的份额也越来越高；到了90年代后期，就已经超过了3/4，近年来甚至达到了85%。

于是，美国的实质经济基本上衰退，大规模移出本土，所形成新的经济循环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组织生产，而利润回流美国，进入资本市场获取增值收益。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我去美国考察的时候，眼见着美国的夕阳产业不断调整，看着像匹兹堡这样的地方从原来的钢铁工业中心，变成以旅游、金融和计算机为主的城市，经济结构调整很快。

正是由于80年代开始的美国大规模的结构调整，资本经济取代实质经济，因此它必然要求资本自由流动。于是，在1986年，里根政府提出关税贸易总协定不应该再满足于一般商品的自由贸易，而强调把资本的自由流动纳入关税贸易总协定中来。但因为各国反对的力量很大，所以才在GATT之外再搞个“乌拉圭回合”，把美国的要求列入谈判。这就是所谓“乌拉圭回合”的由来。同时又因为美国是新大陆国家，农场规模很大，它的主要农产品占世界农产品市场的50%以上，所以，同时列入“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就是这两个主要内容：其一是金融业，即以金融为主的资本自由流动；其二是农业。这两个都是战略性的或者说是基础性的产业。

可见，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确定的GATT的制度框架下，各国本来

只承诺一般商品的自由贸易，但如果金融业和农业也完全开放自由贸易，就能够动摇人家的国本了。

金融是什么？它是一种以货币为表现形式的社会信用。而到现代社会，信用是政府政治强权的产物。客观上说，金融背后起支撑作用的基础，就具有政权这样的政治特性。因此就又产生矛盾了：一方面金融的无国界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必须以所谓的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来保证币值稳定。也就是说，储存外国的硬通货是本国货币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今天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存多少美元是决定本国货币是否稳定的重要因素，这就意味着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只能承认美国客观上承担着世界中央银行的职能，你要储备它的货币才能保证你的货币的币值。

同样的道理，现在国内外很多经济学家在讨论汇率问题，各种说法都有。中国为什么不必调整汇率？其根本的经济原因是什么呢？就在于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是世界第二。2001年底，我们的外汇储备将超过2000亿美元，日本2000年才不过2300多亿美元，内地再加上香港的大约1000亿美元，中国的外汇储备将可能是全球第一。有这么多的外汇储备，币值当然也就非常坚挺。为什么人民币越来越升值呢？就是因为外汇储备越来越多。中国的商业银行去评级，标准不高，也评不出什么好级来，这是因为银行的不良资产的比重相当大，但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太大，所以本币贬不了值。

综上所述，因为全球资本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元独霸天下的条件下，终于进入金融帝国主义阶段，所以西方先后放弃了金本位和固定汇率制度。在美国保证美元对黄金的比值不变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大都以美元为本位。尤其是1991年苏东国家解体以后，再没有另外一个对立的货币集团，于是后发国家大部分以“美元化”为资本自由流动奠定了基础。其间，1994年正式建立世界贸易组织表明了这种趋势：当资本过剩和农业资源充裕的发达国家得以把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纳入WTO的制度框架内，就能够主宰今天的世界经济。

三、中国想要加入WTO的原因

（一）缓解出口大增引起的国际摩擦之需

中国在1992年宣称，中国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

体制。在讲这个问题之前，中国并不存在实质性谈判的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无论关税贸易总协定还是后来的WTO，都认定只有市场经济国家才有资格谈这个问题。而中国在1992年十四大以前，没有承诺过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所以我们跟关税贸易总协定谈判谈的不是具体内容，讨论来讨论去，讨论的是中国是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中国有没有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资格和身份来恢复它的缔约国地位。以前我们恐怕谈不到WTO谈判的内容，因为是原则性的问题，中国要求恢复，台湾要求恢复，到底是谁恢复？中国大陆方面坚持应该是大陆代表中国恢复关税贸易缔约国地位，台湾也有它的一套说法。

总之，在正式建立世界贸易组织之前，以及中国正式承诺我们要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之前，这应该另当别论，它不是一个你如何去谈WTO的问题。即使中国希望以市场经济国家的身份开始谈要加入WTO，那也是1993年以后的事。

在开始阶段，我们并没有很多的或者很迫切的、很强烈的要求去谈判这件事情，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在1994年、1993年、1992年中国经济进入高涨阶段之后，我们的进口大量增加，基本建设增长百分之四五十。而这是要靠进口的，进口消耗了我们大量的外汇存底，这样到1993年底只剩下180亿美元，因此造成1994年因为人民币的大幅度贬值刺激了出口，从而造成了出口的大量增加。1994、1995连续两年，中国因为出口的大量增加而造成了我们经常项目之下的顺差，这个数字大约每年在300亿元到400亿元，这就迅速地把原来的外汇存底局面扭转了。

我们出口的大量增加，引起了进口国的反倾销起诉。比如说纺织品，大家可能记得，美国曾经对我们在美国的公司进行搜查，把所有的资料拿走，对我们国家进行反倾销起诉。同时也引起了和中国有同样经济结构的，比如东南亚很多国家的不满。大家记得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东盟国家曾经和中国有各方面的冲突，各方面的意见。以后是和我们产业趋同的国家或是进口的国家，都因为中国出口的大量增加感到了威胁。因此，以反倾销为武器，以美国所谓“301超级条款”为武器，对中国进行制裁，这些问题才使得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愿望开始迫切起来。这个谈判进入日趋紧张的阶段，应该是在1995年以后的事情。

（二）农业科技竞争力提高之需

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谈判过程中，美国一个非常大的公司叫“孟山

都”，它做了很多公共关系工作，要求进入中国市场，而我们卡着它，不让它进。我们要靠科学技术来提升我们整个农业的质量，提高农业的竞争能力，所以我们把大量的国家投资投下去。但是我们不如“孟山都”一个公司干出的水平，咱们干不过人家。经贸部说别进它的种子，你进了它的种子，我们整个工程就完了。我们曾经希望以种子工程带动中国资源短缺的农业能够有高增长，所以我们用科研经费进行了大量的初试中试推广，所有的东西都投下去了。那是很花本钱的，要是一放开，进口它的种子，而它的种子价格又低，品质又好，我们这么多年的投入就完了。你说这个东西是一个部门利益？说是也不是。这事说起来很怪，客观上部门确实有投入，再进一步看，国家的政策导向是进入高产，所有的科研投入拼的是高产种子。咱们就说玉米种子，怎么能让河北的种子到辽宁种高产，辽宁的种子到吉林种高产，吉林的种子到黑龙江种高产？

人家研究这个种子含多少油，含多少玉米蛋白，都是分品种搞的。人家的新型工程有几十个实验室，每年出好几个成果，我们在这儿折腾了几十年才出几个科研成果，你干不过人家。要不得科教兴国呀！农业要提高它的科技素质，提高它的科技含量，要的是什么？各部门当然很着急，但是他提意见说你不要进，美国可不是咱们这种制度。在美国，我是大公司，这个议员是我帮你竞选上去的，你要不压迫政府给我开辟这个市场，我就不投你的票，你就没有钱竞选。所以竞选者压力非常大，一定要中国进他们的种子，咱们就死顶，你一进科研投入就全完了。最后弄来弄去，找到咱们一个漏洞，就说合资行不行？跟河北一个县搞一个合资企业，上一个品种，比如说棉花品种，合资上一个棉花加工厂行不行？河北批了，投资量很小。一批就进来了。进来以后，抗虫棉好到什么程度呢？咱们是投资多少下去，生产抗虫棉的棉种，但咱们的就是抗不了虫。大量地生产农药、打农药，弄得棉铃虫抗药性极强，打上农药都毒不死棉铃虫。这使得河北地区的农民种棉花的成本极高，所以农民就不种棉花了。治不了虫，所以棉花的成本越来越高。结果中央部门按照政策，把棉花推到西部去，就推到新疆，甚至带动棉纺厂西迁，让西部地区发展棉纺厂的加工。但人家的棉花种子一进来，不用打药，就是基因工程，棉铃虫吃了就不育，没法再繁殖，就不用打药了。这个不用推广，不用打药，种出来的棉花就挺好。棉花从轧花厂出来以后，老百姓买走了。按说是基因工程第二代不起作用，结果不仅第二代起作用，第三代还起作用。用这个棉种繁育种子，生产就恢复过来了，成本低，不用打药。你看竞争多么厉害，没放开就把你竞争得一塌糊

涂。棉花西迁了，东部一开始生产棉花，后来不生产的山东、安徽、河北一带，现在又开始生产了。你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很难解决。

接着就是，你原来的结构调整还得再来过，花了大量的钱投西部种棉花，现在还得迁回来。在谈判过程中，各个部门谈的不同意见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很大程度上牵扯到本部门的产业如何安排的问题。结果这就谈了两年，一直到1997年还谈不下来。各部门都有道理，谁能说道理不对？否则大量的科技投入就白投入了。产业带西移这个结构怎么安排，这些事情考虑不考虑，你说有道理没道理？说有道理也有道理。很多事情也是这样的。相关的产业，如专门生产治棉铃虫农药的厂子没有用了；很多相关的行业，包括基层的种子站、农机站都是靠卖药过日子，60%以上的收入是靠卖药。农机队伍怎么维持？供销社过去靠农药专营赚点钱，这块没有了，因为没有需求了，它怎么过日子？相关产业一连串的问题怎么解决？所以我说这个事情确实需要各部门参与意见，但是各部门的意见又不能全听，还得以人家为主，这一点咱们服从大局。客观地看，不是说各部门的意见不能参与，也不能说参与一定对，也不能说参与就一定起作用。

（三）国内就业问题解决之需

接着到1998年，中国经济如果不高增长，经济增长率低于10%，就业问题就会严重起来。所以现在就不得不开始让各个学校增收学生，缓解就业压力。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你如果没法解决就业问题，就会闹得到处犯罪。我们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货币政策，这有很大作用，但是毕竟没有达到希望它达到的程度，所以经济问题就比较突出。在这种情况下，看来中国及早加入WTO是一个选择。

（四）国内经济发展资金之需

大家也不要把WTO谈判看成是一个整体，各部门的意见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小局服从大局，国内投资上不去，还得靠外资，靠外资就得加入WTO，就得投向市场。说来说去，就这么一个过程，总得有部门让步。

四、利弊：WTO与中国“三农”问题的讨论

刚刚我在开场白解题的时候已经讲了，在中国不能单纯地讨论农业

问题，我认为现在一些说法并不一定确切，需要反思。

按照国内的提法，“1999年4月8日美国单方面公布了中美‘入世’谈判的文本”，之后学术界曾经有过一些讨论。当时发表观点的经济学家基本上是在原则和理念上来讨论问题的，那些书斋学者中的大多数认为中国“入世”“利大于弊”。而当我根据那个文本分品种给大家介绍我国的承诺，不同农产品的什么品种的不同品质价格差别会怎样的时候，有些学者显得很吃惊，甚至说，我们怎么不知道小麦还有硬麦、软麦之分，还有白麦、红麦、花麦之分？那么，是否允许我提个问题：如果不知道这些具体品种、品质和相关价格的差别，学者们怎么能够讨论WTO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呢？可见，单纯从经济学的理念出发，对条款的利弊和约束是解释不清楚的。现在人们已经知道，目前中国小麦的总产量中大约40%可以叫硬麦，相对而言，面筋含量还比较高，但完全能跟国际上高面筋含量小麦相比的只占总产量的不到20%，大约80%在品质上不能与美国小麦竞争，连加拿大、巴西、墨西哥这些国家的我们也都比不上；但是在价格上我们高于国际价格的30%左右。这是在1999年的时候，在基本达成了中国跟美国的“入世”协定的时候。当时，我们的大米价格高于国际价格40%左右，我们的大豆价格高于国际市场50%～70%，而这几种重要农产品的品质，我国都比国际同类农产品的品质低。因此，要按照同类农产品质量算价格差别的话，中国的国内价格还要更高。

所以，在形成中美“入世”协定时，我们根据当时在网上看到的协定的文本认为，从基本农产品贸易的角度说，中国的确没有太多的机遇；至于所谓竞争力，中国的农业资源严重短缺，也几乎没有什么潜力可言。

当时有的同志说，尽管中国做了承诺，按照最低关税配额（TPQ），我们应该进口大约2000多万吨粮食，这也只是不到国内总产量的5%，基本上不构成对国家粮食安全的影响。还有人强调，尽管有按照最低关税配额承诺进口的数量，也并不是一定要进，它只是核定的一个额度。这些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值得进一步讨论。

我们知道，TRQ（关税配额管理）指的是象征性地征收1%～3%的关税。大约150年前，帝国主义列强曾经安排一个叫赫德的英国人主管中国的海关，当时定的是5%的关税率，而现在的TRQ是比这个还要低的关税。关税是一国的主权体现，因此不能不征，只是象征性地征一点儿。TRQ这个配额是各国WTO谈判的技术手段，超过这个配额的部分就

按照正常关税（减让以后）的比例来征。比如中国农产品平均关税从40%多减让到14.5%，亦即多于配额的部分，按照14.5%征收；在配额之内的，只能按照1%～3%征收，大体上就是这个意思。

接下来的问题是，是否配额就必须全部都进？有的同志曾经说：即使有配额，是否进口也取决于我的需求。这话说得非常之理性，它里面隐含着极为正确的经济学道理——什么叫需求。所谓需求有两个方面：第一，当然看你有没有消费了；第二，你的价格是否比人家高，如果比人家高，那么按照市场原则，人家的就自然会进来。我们一开始说我们的农产品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尽管有这个配额，你可进可不进，但如果你的价格比人家高，而客观上你国内又有市场需求，那就必然进口。当前的情况下，我们这两个方面都具备：第一，我们的价格比人家高；第二，我们国内有需求。所以按照配额的进口，毫无疑问得进。此外，还有超配额部分，就是按14.5%平均关税（税率分不同品种计算）的进口，就要看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的程度，比如小麦价格高于国际市场30%，扣除关税14.5%后；高出国际水平15.5%，把对方的运费打进来；如果不到15.5%，那还得进。近年来的事实是：一方面国内农民饱受"卖粮难"的苦；另一方面，沿海和大城市已经大量使用进口粮食了。

在这种压力下，现在农业生产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就现在国内这样的价格水平，农民从事种植业已经是亏本的。特别是农业主产区的主粮产品生产，基本上是不挣钱的，如果算上活劳动投入，那就是负值了。统计数据也证明这一点了。从1997年以后，农户家庭经营条件下的种植业，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入产出均为负值，到现在已经是连续多年的现象了，不仅中西部传统农区如此，东部也是如此。所以，按照现在的国内价格水平，农户已经是亏本了，这就决定了我们国内的所谓农业政策空间有限，因为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靠提高价格来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了。大家知道，本来价格是有个弹性区间的，一般把国际市场价格叫"天花板价格"，国内的生产成本叫"地板价格"，但现在我们这个现象已经是很怪了，我们的"地板"在"天花板"之上，你怎么能谈竞争呢？

我们看近两年发生的事情。尽管中国是到11月10日才签订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的，预期应该出现举国欢腾的场面，但不知为何没有出现。在没有加入的情况之下，去年中国已经进口了1200万吨大豆，我们大豆的价格比国际市场的价格原来高70%，近几年大约高50%，已经进口了120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国内正常年份最高产量是1700万吨，个

别年份达到过2100万吨，去年国内产量大约1500万吨，而进口1200万吨等于全年产量的80%以上。对国内大豆的生产、加工的相关产业的影响已经显现出来了。今年上半年，仅1月到6月又进口1000万吨，全年进口估计会接近总产量。

中国市场容量就是这么大，与国际上的价格差别又很大，从个别产业来说，如大豆，还未“入世”，国内生产所遭受的挑战就几乎是灭顶之灾。为什么？很简单，国内价格高，是因为小农经济条件下生产成本高；品质不如人，则是因为国外生产的是转基因大豆，它能使大豆的出油率比中国最好的大豆高4～5个百分点。按照中国在“入世”协定中所做出的承诺，中国按TRQ的配额应该进口的是豆油，如果按国外大豆20%以上的出油率折成大豆，即把我们按照TRQ需要进口的豆油折成大豆，就会比我们国内全年产量还要高。所以，至少在某些品种上，对我们的负面影响是比较清楚的。

但最后是否会影响到中国农民都不种大豆了？那倒未必。比如说，可以由在座的学生们宣传宣传，告诉老百姓说，他们进口的都是转基因大豆，虽说好，但谁知转基因会有什么毛病呢？还是吃咱们农民种的土种大豆安全点儿，磨出的豆腐才香点儿。可能只有靠这样的宣传，咱们土种的大豆才有市场。大豆这个东西不像一般的粮食，比如说小麦、玉米、水稻，农民自己可以吃一部分——中国粮食的商品率一般只有百分之三十几，农民自己要消费掉百分之六十几。而大豆的商品率却是百分之九十以上，农民自己除了磨点豆腐，总不能自己加工豆油吧？因此，越是完全商品化的品种，面对国际竞争就越是难以抗拒。所以今年夏天的时候，国家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在讲话中明确表示他很担心，咱们还未“入世”，大豆就已经面临这么严峻的挑战了……

此外，我们看到在“入世”谈判中所说的农业保护，跟实际上我们中国农民需要的农业保护两者之间还不是一回事。我们现在谈判中所说的保护，不管是美国所要求的5%，还是我们提出的10%，抑或是最后双方达成妥协的8.5%，其实都与中国9亿农民没有直接关系。我甚至认为，这个补贴在中国并不是对农业的补贴。向对方提出补贴问题，是因为我们这几年粮食的库存积压过于严重，把财政的补亏和银行的贷款占压得太多，所以，这几年不得不以政府财政拿钱来补贴出口，事实上是中粮得到出口补贴，国家是补给外贸进出口部门，进出口部门拿到钱来还在银行占压的粮食贷款。所以客观来说，这个钱仍然是在政府垄断部门系

统内循环，跟农民似乎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样就导致中国农业从原来的补贴为零或负值提高到现在所说的二点几。

经贸部在谈判时当然要保护所属的中粮进出口总公司的利益，将来也还是希望国家财政给中粮进出口总公司出口补贴，因为利益主体明确，所以谈判就显得非常艰苦。我认为，时至今日农业仍然是负补贴，农民并没有得到WTO谈判的任何好处，我们至今仍然是从农业提取积累。从我们现在谈判的条件来看，从承诺的TRQ来看，对于农业主产品的国际贸易是相对不利的。如果以国际价格衡量我们的农业主产品，比如说粮食类产品、棉花、油料等，我们这种小农经济基本上是没有国际竞争力的。

当然，机遇或利益可以是潜在的。也许，将来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我们能够真正参与规则的制定，会制定出有利于中国9亿农民的规则，但这只在将来是可能的。我们，尤其是长期搞农村政策的，特别希望能够给一个解释，比如公布文件的时候，能够逐条说明哪一条是对农民有利的。但到目前为止，一未公布，二未解释，所以，我们只能是从网上看到相关条款，认为对中国农民基本上是不利的。我们得出了一个不叫结论、只能叫印象的东西，就是世贸组织谈判中，农业或农民的利益作为了一种让步。因此，WTO对中国“三农”问题的影响客观上是以负面为主。

有人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土地资源高度稀缺，因此，土地密集型的产品我们没有比较优势，只能依靠进口，这个结论客观上当然是成立的。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就说过，如果我们东部土地面积过少的地方能够进口美国、加拿大的粮食，那就等于进口人家的土地。中国土地密集型的产品相对来讲不具有市场优势，逐步退出农业生产领域是一个符合规律的现象。即使没有WTO，在东部相当多的地区，土地密集型的粮食类产品也正在逐步退出农业生产领域。很多地方在大幅度调整产业结构，政府下命令不准种粮食，只能种经济作物，这是符合规律的。但因此引发的另外一方面的讨论，其实80年代也已经有过，那就是：中国要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国际市场来满足十几亿人口的粮食需求？

有人说，按照我国承诺的TRQ的数量，进口粮食占国内总产量的比重只是4.6%，并没有达到我们国内研究提出的5%的粮食安全线。我对此不敢苟同，在我的文章中，中国和西方国家计算粮食安全所对应的基数不是总产量，而是扣除农民自给自足之后的那35%的商品粮。这是当

时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提出的我们和发达国家计算粮食安全线的重大差别。

发达国家比如美国，他们的农民不叫农民叫农场主，生产小麦并不自己吃，他自己也是到商店买面包；他自己并不磨面粉，可中国农民要自己磨面，套上头驴，或用电磨，磨出粉来一筛，拿到家里包饺子、下面条、蒸馒头。我们的农民是自产自销，自给自足。而在发达国家，全部农产品都是商品化的，美国农业人口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二点几，而中国至今以农业户口计算仍然占73%（统计上说法不一样，户口统计是73%，按照第五次人口普查是64%，按照县改市划入市镇人口的统计，那农村人口只剩下50%多），在全球来说算最高的。因此，我们的粮食自给自足的比例比较高，大约64%粮食产品是农民自给自足的部分，只有35%～36%是商品部分。

因此，中国计算自己的粮食安全线，应该是以什么为基数呢？当然不能以总产量而应以商品量为基数。因为进出口影响的是成为商品的那一部分粮食，而不直接影响总产量。忽视这种国情，又怎能计算出正确的粮食安全线？以为中国是美国啊？“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所以，客观地看，以总产量来对应TRQ的计算法，本身就是值得讨论、值得推敲的，应该计算的是商品量对应的进口量。这是其一。

其二，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进口量也不能按照TRQ来计算。只要国内有需求，只要人家的价格加税率加运费仍然低于国内价格，就会进口，无论是放开还是不放开国有垄断，贸易部门都会进口。

但现在似乎只有我持这种可以讨论的意见。“入世”对“三农”问题的影响怎么解释？看解释权在谁手里，有人就硬那么解释，那不就类似于指鹿为马吗？不顾中国二元结构的城乡差别，指着总产量就说它是基数，那是不对的；更何况，咱们从来就没有搞清楚过总产量是多少。谁知道总产量有多少？我们是长期搞农村调查的，下到农村去问农民今年打多少麦子啊？他回答18个蛇皮袋。一个蛇皮袋是多少？你去称吗？没法称。这不能怪统计局，要说过去，统计人员还可以靠拉对角线；现在农村都承包到户啦，谁让你去人家的麦子地里拉对角线？抓人家的麦穗过来算千粒重，你给多少钱？不给钱你上农民地里蹚麦子，行吗？过去行，现在确实不行了。现在要把握准确的数据，客观地说是做不到了。

到底现在中国有多少年产量，在统计上可能是模糊的。我们所说的

粮食安全线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隐含的东西，也没有人做过测算，我在1997年关于粮食周期问题的分析文章中曾经写过，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网上看：每到中国比较大规模进口的时候，必然造成国际粮食市场价格大幅度抬升。1995年1月至1996年6月，我们曾经在连续18个月的时间内进口过3000万吨粮食，陡然之间就引起了国际市场粮价的变化，甚至引起了各个发展中穷国的抗议。你们中国人富了，你们吃得起，就把国际市场粮价抬起来了，中国大规模进口的结果是无论现货、期货，价格飙升。中国突然就成了全球最大的进口国，对全球粮价的影响非常之大。现在，只要中国一报粮食减产，国际期货价格马上就抬起来了。只要咱们中粮的工作人员一到那个地方，情报人员马上就跟上了，眼看价格马上就起来了。他知道你们是带计划来的，甭管多贵，你得买，得执行上级指示，你又不是真商人，你是真官员、假商人。在这些问题上，对国际粮食市场乃至于中国和周边国家特别是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会相对而言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恐怕也是很重要的问题。

再进一步说，按照中国目前调整产业结构的速度，粮食面积已经大幅度减少，我们从1996年以后连年粮食总产量下降，而人口还是不断增长。如果做长期曲线会发现，中国的粮食产量基本上是一个伴生的变量，如果自变量是人口，因变量是粮食产量，那么人口增加，粮食增加。而目前这种政策调整思路，所谓农业结构的战略调整，是有意识地要在人口增加的时候不让粮食产量增加。而这个决策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呢？是1996年在政府价格提高的刺激之下，粮食总产量突然大幅度抬升，使我们在1996年就提前完成了2000年的粮食产量目标。这就是说，粮食总产量本来应该是缓步增长的，但是因为我们1994—1996年连续给出了一个特别的价格信号刺激，所以到1996这一年产量是超常规增长的；而粮食增长的长期曲线本来应该是与人口同步的，人口到2000年每年平均应该增长1000多万，如果提前4年实现粮食产量目标，就意味着：人还没有增长上去，对粮食的需求还没有上去，突然粮食产量却超常规增长上去了。于是，就必然造成混乱，出现粮食库存积压。市场价格便宜，农民种粮不挣钱，种地不合算，然后就是弃耕撂荒，大规模涌起打工潮，在全国范围内涌动。且不说同期社会犯罪的增加，这还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问题。

尽管这样的分析太让人不高兴，但是客观上人们应该看清楚，任何突然的政策刺激所造成的粮食产量的突然变动，也就是政策造势所造成的突然变动，对这个农民国家而言都可能是灾难，无论这个政策的出发

点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大家是否知道1984年有一次“卖粮难”？现在你们这儿上点岁数的人不多。当时我们叫作生产力的突破性释放。农村大包干，生产力解放了，造成了大丰收。大丰收应该是好事，1982年到1984年连续3年，粮食从原来的6000亿斤左右，一跃而增加到8400亿斤。陡然之间，粮食大幅度增长，长了2400亿斤，短短3年粮食增长了34%左右。当然，就出现了需求对供给的严重抑制，导致了“卖粮难”，粮食部门就压价，结果是1985年农民不愿意种粮食。人们到现在都还说，1984年的政策是好政策，但对于某一个单一的品种，比如粮食这个品种来说，对于某一个单一产业，比如粮食产业来说，它所造成的影响其实是灾难性的。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粮食亏损也出现了，就是那次，造成国家财政给粮食企业补亏。

客观地说，1984年那次，因为农民实行“大包干”，积极性突然上升，一下把粮食生产顶上去了，一顶上去，卖粮难了，因此就造成了粮食这个产业本身的灾难。1996年是第二次粮食突然大规模地增长。从1994年到1996年连续3年，粮食从9500亿斤增加到了1万亿斤以上，这样突然增长的结果就造成了粮食的积压，因此现在是粮食部门压价，农民也不愿意种粮食了。但是历史告诉我们，这从来都不是长期现象。就好比1984年那次“卖粮难”，农民自发地调节种粮面积，1985年减少了7000多万亩的粮田播种，减产了540多亿斤，此后是连续9年的粮食徘徊，相对来讲供需之间的矛盾是有规律的。而这次连续5年的农产品难卖以后，按现在这个结构调整的政策走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呢？不会太久——我估计最近3年之内，中国会出现相对粮食短缺。那么，大规模进口粮食将可能是一个必然趋势。

过去有些事都是怪怪的，要么不进口，要么一进口就是2年到3年连续进口；而再进一步从人口的中长期增长趋势看，中国还是属于粮食供给短缺的国家。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能以某种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保护农民从事基本农产品生产的积极性，也许到不太久的将来，等你们离开学校，走上社会的时候，你们可能会遇上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希望到那时你们仍然记得住那句歌词，“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说过这样的话。那时候你们可能已经记不住了，“恰似一张破碎的脸”。

从长期看，中国的粮食形势其实一直不容乐观，因为我们是土地资源短缺的国家，我们叫作土地要素高度稀缺，客观来看，这是不容乐观

的。我们稍微做一点分析。大家知道，农业的收益基本上叫作地租收益，而地租产生于土地资源的多少。土地资源大，至少绝对地租的量就大，也就是说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农民都拼命节衣缩食想当地主呢？一两代人节衣缩食，起五更睡半夜，背着筐去捡马粪，就是为了置地。而置地就等于扩张了土地资源，就等于扩张了地租的绝对量。新中国成立后咱们农村人口翻了番，土地不得不按人口平均分配，难以再形成规模，因此，中国不可能按照美国的农业模式来运作。

很多人在讲现代化的时候开口闭口谈美国，但是中国农村客观上做不到美国的现代化。为什么呢？美国平均每个劳动力所对应的土地面积是中国的828倍。很多干部到美国去做考察调研，去参观农场，大部分去参观的人都不懂英文，也就是看看人家怎么好啊，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在美国做调研的时候去找那些破产的农场主交谈，或去考察那些濒临破产的农场，去研究美国农场为什么也会破产。我发现，在美国800公顷以下的农场基本上不怎么挣钱，越是对应资本密集型的农业，它越得扩充面积，以面积扩充所产生的绝对地租量的增加，来抵补不断的资本密集投入所带来的成本的增加。这话说起来绕口，只是专业人员讨论起来爱这么说话，实际上就是说，你得拼命地扩张你的农地规模，你上的拖拉机、烘干机等设备的成本才能被充抵进去，就这么个道理。所以我走了几家400公顷左右的农场，都是濒临破产的。小于两三百公顷的就等着被兼并，根本没有利润可言。那么，我们农户的平均农地规模有多少呢？0.4～0.6公顷。我们如果以农产作为一个家庭农场（其实根本不是），它差了几乎上千倍。美国劳动力平均土地规模是我国的828倍，以赢利能力来看的话，恐怕差了上千倍。所以，美国的农场和中国的小农经济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再进一步看，我们不仅是农户的农地规模过小，而且在一个户内还是土地分割细碎。家在农村的同学都知道，村里分地，总得好地、中地、差地都分一点，所以一户少说三五块地，多则十几块地，最多的有二十多块地。我们不是老讲这个故事吗——贵州山区的草帽田故事。说一个农户上山整地，他有26块地，整完25块却找不到最后一块了，拿起草帽一看，哦，在这儿呢，被草帽盖住了。你说这地块儿零碎到什么程度呢？扔一个草帽就能盖住了。

不但土地分割细碎，农户还要兼业化经营。东山上的地种点儿茶，西山上的地种点儿玉米，家门口种点儿菜，院里边养头猪，屋后面还得

拴上头牛。不仅普遍兼业化经营，而且还是我们说的一兼户、二兼户，一兼户指的是种养两业兼营，这是普遍的，谁家种地不养点儿猪啊？我们叫作粮猪型小农，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常识性概念，一点儿都不可笑。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小农天然地形成了户内自我平衡机制，过去我国粮食的价格和生猪的价格正好相差一个生产周期，我们叫“粮价高，猪价低；猪价高，粮价低”。农民又养猪又种粮正好自己平衡价格风险，这就是小农经济条件下必然形成普遍兼业化的道理。可是，你问问我们现在这些搞经济学研究的，有几个知道粮猪型小农经济？有几个知道粮价高，猪价低；猪价高，粮价低？有谁认真研究过小农经济？几乎没有。那你凭什么说加入WTO对中国农业提出了极大的挑战？不做农户调查，就这么关在屋里说，连我都听不明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如果承认小农经济是土地分割细碎而且是高度兼业化经营，那么请问你怎么能够计算它的商品率？哪些部分，比如农民杀了头猪，哪一部分是他自己吃了？多少商品率，多少自给率，能算得出来吗？书斋学者的困难在于，你不能用现在的统计原则来统计农户经济。我们做了十七八年的农村调查，始终就没能够设计好一个全国通行的调查表，我还是20世纪80年代被中国政府派到美国去学方法的人。客观地说，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研究，又是比较早地被中国送出去学方法的，我都觉得底气不足，对付不了小农经济研究。

所以客观地看我们所谓的参与国际竞争，至少得知道美国和中国几乎不可同日而语的资源差别：第一，人家的劳均耕地面积是我们的828倍；第二，人家的农场规模是我们的上千倍；第三，我们不仅农户规模小而且分割细碎，再加上兼业化经营；第四，我们的农业没有规模，连自食部分和商品部分都算不清楚。中国为什么得说是农民问题第一？就是因为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的生产、生活结为一体，无法区别。你说老太太用刷锅水煮点糠喂猪，那是生产，还是刷锅呢？你怎么计算她刷锅加上煮糠和喂猪的劳动呢？怎么计算她的成本呢？她算不算劳动力呢？按照国家的统计，她属于非劳动年龄人口。小孩子放学回家，一路走一路割点儿草，回家塞进猪圈里，算不算劳动呢？

其实我们所谓的畜牧业生产还有竞争力，恰恰就是由于这些半劳动力的投入不算劳动成本，才造成了我们畜牧产品价格低，才造成计算下来我们畜牧产品的肉料比与发达国家相比都要低，哪怕它有转基因。因为老百姓只把精料，即花钱买的饲料才计算成为成本。所有这些活劳动投入“不算”成本，才造成我们现在的畜牧业有竞争力，才能出口点儿猪

牛羊肉。你如果按照美国式的所谓现代农业来搞规模的养殖场，根本是不可行的。你们看看北京郊区，那些上万头牛场、上万头猪场，在国际竞争面前，哪个还活着呢？大部分全死了。

即使现在讲，我们目前有几种产品还有所谓的国际竞争力，但回过头去瞧瞧，国际竞争力是从哪儿来的？根本就不是农业现代化或者叫作规模农业产生出来的。我们客观地看，无论再怎么讲，当这个国际竞争到来的时候会带动结构调整，提升产业层次，技术含量也会提高，规模可能会增加，等等，这些说法大部分似是而非，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学者们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小农经济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们应该客观地看这个WTO影响农民的过程。第一，我们要明白在谈判中农业是做出让步的产业，这从条款上、承诺上都已经很清楚了。第二，从国际对比来看，我们争执的原因在于我们农业人口过多，农村仍然持农业户口的人占73%，这必然造成大家都来分那点儿地，于是乎土地分割细碎。政府号召农民实现专业化、规模化的生产。号召了15年，快20年了吧？可是为什么农民不听你的号召呢？是因为你不了解他们。你按照所谓现代化理论提出来的东西，不符合农民的实际。他们现在唯一能挣点儿钱的畜牧生产，其实是把家里的半劳力不算账，这才使以农户家庭经营为主的畜牧业有所发展。但这并不是在完全市场化条件下得到的真实效益，不是按照现代方式所形成的所谓农业生产的竞争力，而是小农经济条件下以劳动力对饲料的替代而形成的畜牧业、水产业等方面的竞争力。所以我说，看中国加入WTO承诺的条款，农业是让步的；看中国农业的现状，客观上也不具备所谓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力。

五、选择：应对“入世”挑战的另一套政策

我们接着讲第三部分，我们怎么办？

当然，第一还是得依靠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这是十五届三中全会文件指出的，我们认为，中国农村的改革与发展是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我们应该相信群众，这仍然是根本原理。至今我们还真没有别的办法。第二应该相信党，这是说党现在很重视这个问题，朱镕基总理最近不断地讲他睡不着觉，中国加入WTO，很多人高兴，他高兴不起来。党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是重中之重，一定要加强，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相信群众，中国老农民已经

活了5000多年了，从“后稷”教人稼穑开始，农民有4000多年的种地历史了。4000多年都已经活过来了，今后也会继续活下去，这个历史还是要相信的。这是我们要相信的两条原则。

至于具体应该怎么办，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强调的实际措施主要叫作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农业产业化，加强政府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业的科技水平和农民的素质。这些说法从目前看，每个说法都是“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都存在很多问题，落实起来都非常困难。所以从说法上看，今后解决问题的前景也不容乐观。

最近我们一再向上递建议，大体上有这么几条，当然都是个人看法。

第一条，农民纯粹在农业生产领域中，不仅无利可图，而且投入产出为负，这是客观事实。因此这么多的人，这么少的地，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就决定了任何调整都不可能大见成效。除非实现重大战略调整，就是大幅度加快城市化，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允许他们进城，放开城市户口，在就业、劳保、社保等一系列待遇上一视同仁。这应该是第一条。但能不能做到呢？目前看政府逐步在做，比如说现在浙江省已经在全省范围内实现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和城里人共同实现。这也算是一个开始吧。2001年10月1日，中央放开了县以下城镇的户口，个别的省会城市，比如石家庄市，也打开城门，你可以根据你的身份、居住地、工作来登记你的户口。因此应该说，假如中国能够在21世纪以有效的政策来推进城市化、加快城市化，那我们有可能大幅度减少农民的数量，提高平均每个小农的农业规模。

但是，尽管我们有这种梦，也仍然不可以对它抱有太大希望，为什么呢？

我们假定确实加快了城市化，而且这个城市化真的实现了我们的计划目标，那么我们从中长期看，到2020—2030年这段时间，中国人口会发展到16亿至18亿。按照这个人口规模，我们实现了50%～60%的城市化率，我们现在只有34%，能够翻一倍到60%。且不说我们50年来城市化率只增长了15%，我们在今后20年内要比前50年快1倍，还会有多少人生活在农村呢？大约8亿。绝对量减少多少呢？仅仅几千万。我们现在的绝对量应该是8.7亿农村人口，号称9亿，结果是什么呢？还剩8亿多。那么，劳均耕地能提高多少呢？不仅不能提高，还会下降。为什

么？因为每当城市化加速的时候，都必然会带来土地的大规模征占，按照现在的速度，平均每年大约减少1200万亩。按照1993年以后城市化加速的情况看，平均每年会减少2000万亩。我们按少的算，按1200万亩算，20年后减多少？24000万亩。现在8.7亿农村人口对应的19.2亿亩，减掉2亿多亩，还剩多少？16亿多亩。人没减多少，地减少了几亿亩，你想劳均耕地面积、小农产的土地规模会提高吗？

这还是在领导决策正确的假设前提之下。万一要是不正确呢？所以从中长期看，靠大规模地减少农民人口来提高农地规模，以农业规模经济来参与国际竞争这条路，中国根本走不通。现在我们的学术界浮躁得很，一有点儿问题就急着说，为什么你不这样呢？确实有很多学者提出很多聪明的办法，可你算算账就知道了，基本国情矛盾是不可能根本解决的。我们目前农业劳动力绝对过剩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同样不可能根本解决。

我举几个例子，说一点儿数字。按照去年的统计，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也就是应该劳动的这部分人是5亿，那么农业按现在的生产力水平，需要多少劳动力呢？最多需要1.5亿。为此需要转移多少呢？3.5亿。我们现在的乡镇企业号称解决了1.2亿劳动力的就业，但70%的企业处于停产、歇业、倒闭的状况，它不能破产，因为破产法不涵盖乡镇企业，它没有依法破产的资格。乡镇企业没有国民待遇也是个老问题，咱们且不说。就算它仍然在解决1.2亿人口的就业问题，但其中有一半以上也叫作两栖就业。比如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这一带，它没必要完全转移，在村里上班、下班，就那么点儿地，早晨晚上捞两把就可以了，不值得正儿八经地去种，就那么个意思吧。实际上乡镇企业解决的过剩农业劳动力大约也就是6000万～7000万。那么你把那1.5亿加上6000万～7000万，算出2.2亿，就是5亿劳动力解决2.2亿，还有2.8亿。那么这些年进城打工的呢？大约有8000万。那好了，再减8000万。其实这8000万和乡镇企业就业是有重复计算的，外出打工的农民中有相当多的人，据说有57%转移到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乡镇企业就业了。客观地说，不能说减了8000万，顶多算减了4000万，但是咱们仍然按8000万算，为了好算账，所以我们说农村绝对过剩的劳动力大数至少是2亿，2亿就是俄罗斯的总人口或接近美国的总人口。

农村过剩劳动力问题怎么解决？刚才说了，即使城市化加速，从中长期看，算下大账来，也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不仅如此，据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测算，在加入WTO条件之下，会有1200万劳动力需要从农业离开。也就是说原来有1.5亿，实际上可能最后剩下1.3亿。这些因素考虑来考虑去，我觉得目前在这个大的环境、大的政策上还没有给个明显的出路。现在这种调整，无论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农产品品种，还是品质结构等，相对于我们的基本国情约束来说，都还没有针对性地提出措施。

尽管我们第一条讲了要相信群众，第二条要相信党，我们应该相信现在所提出来的一切政策，都将有利于“三农”问题的缓解，但是从中长期看，思路还不是很清楚，问题还是长期客观存在的。现在我们已经有的这些政策提法，都不足以有针对性地、有效地解决问题，因此就必须有综合性、突破性的东西。

依我看，目前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到农村基层和农民头上，能够真正代表大多数农民的利益。中国要真正实现“三个代表”的伟大思想，就应该有针对性地解决或缓解基本国情矛盾，即人口过多，资源有限，劳动力绝对过剩。因此，我们首先应强调中国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都应该认真学习邓小平，毫不避讳地讲清楚这种国情，谁想让我照搬你的制度，请你把我这2亿多过剩农民劳动力拿走。当年邓小平就是这么谈的话。美国派特使斯考克劳·福特来秘密谈判，邓小平就说，你们美国人讲人权好啊，我同意，可我现在没办法，要不这样吧，我给你1亿人，你给他们人权吧。当时杨尚昆插话说，别说给你1亿，给你5000万，你就不是今天这个生活水平了。

所以，我们只要知道国情矛盾，就请在座的各位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不要寄希望于照搬人家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得明白，站在这块土地上，脚下这块热土就决定了你搬不来现代化，你就得认“可持续发展”。无论我们讲科教兴国也好，赶超战略也好，今后假如你们在座的各位有一天当了领导，请你千万记住，“恰似那张破碎的脸”。

因此说，中国的基本国策应该强调一条，叫“就业最大化”。无论谁作为中国的领导者，只要你心里没有那9亿农民，没有那2亿多过剩劳动力，光想着追求什么现代化的东西，解决不了他们的就业，早晚你也待不稳。所以，我多年来一直呼吁就业最大化应成为基本国策。任何高科技，如果是节约劳动，那么对不起，你就不能算适合中国的技术。所谓发展适用技术，就应该适用于我们目前劳动力过剩这种基本国情，亦即要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确立之后，强调以就业最大化为基本国策，否则，

我们必会遇到大麻烦。

竖看中国历史，所谓的天灾人祸、农民起义、改朝换代，无论哪个重大事件发生之前，一般都出现人与资源之间关系的恶性发展。而当资源不足以支撑人口扩张的时候，肯定会出大麻烦。现在看还没到极限，中国的资源可支撑的人口约为16亿，超过16亿这个极限，按现在这个生产力条件，就支撑不住了。这个极限值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测算过，更何况我们现在还是粗放型增长。我们且不说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水荒、油荒，2000年我们进口的7000万吨石油已经超过国内总需求的30%，到2005年，我们的石油进口至少将超过总需求的50%，到2010年中国的石油进口将超过总需求的70%。如果国内70%的石油消费要靠进口，这么发展受得了吗？一天到晚嚷嚷汽车消费，但是客观地说，我们完全按照现在西方国家走出来的现代化道路走，那是走不下去的。我觉得在座的各位同学不妨多学点GRE、GMAT，都考出去，你就可以享受现代化了。可如果你在中国，那还得悠着点儿，也许得把追求四个现代化改成追求可持续发展，把追求高科技产业结构提升改为追求就业最大化，这是战略层面上的问题。这是第一。

第二，中国并非没有扩张土地资源的条件，我们到现在至少有5亿亩干旱荒漠土地沉睡在西部。但是如果按照现在开发西部的方式，对外招标，你哪怕上了一批非常漂亮的高速公路，也会是“这条公路静悄悄”，两边没人。你就算修了复线铁路，那就是四条铁轨在月亮下闪着寒光。就算你修了油气管线，6000公里一直从塔里木盆地到上海，但沿路如果有个把民族分裂分子放个炸药包就完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心里得有人，光是上项目，没有人在西部生活，将来会有很多麻烦。

那我们建议的是什么呢？中国在国家的这个战略层面上，我们叫可持续发展，在具体的开发策略上，我们要考虑尽可能多用人，少用机器。咱们宁可慢一点儿、质量差一点，你用了人就有收入和消费，有消费就有拉动内需的可能。所以，我们主张西部开发“以水为先”。先上西部调水工程，要实行以工代赈，除非一些特殊工程要用大机械，其他能用人的地方尽量用人，而且应该是一个劳动力上工地，给你三口人的以工代赈，鼓励劳动力带着老婆孩子去。干一年白给他3亩地，干3年给他5亩地，白给，叫作“以工授地”。以工代赈可以解决生活问题，以工授地则是让去的人留在那儿。有水就有地，有水就有农业生产，然后沿水建村，沿路建镇，把5亿亩的旱地开发出来，西部就保下来了。大家知

道北方河流的用水有70%是灌溉用水，这是既成事实。自从大禹治水以来，几千年来人们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宏观层面上要考虑国家战略，中观层面上要考虑开发项目的实施策略，我们不能完全按照现成的这些理念来搞。西部开发搞项目也应该想着那2亿过剩劳动力。我觉得这样做的结果其实不仅仅是有利于农民，有利于调整农民和土地资源之间的不平衡关系，也有利于那些目前仍然试图维持自己垄断地位的企业的生存。你想啊，如果2亿过剩农村劳动力就了业，挣了钱，怎么不想给闺女买根红头绳？哪怕他就是杨白劳。2亿人需要2亿根红头绳，那也够生产一阵子吧？所以我想，即使各位将来毕业到了垄断部门，大家心目中都是银行呀，保险公司呀，但不要太短视，要想着真能把这2亿人的就业给解决了，就会有需求，有需求就会带动生产，这样国民经济会进入良性循环。就是说，中观层次上考虑项目的时候也要心里有农民。

我们再进一步说，第二个层次，微观层面上考虑“三农”问题的时候，建议不要光学西方远的经验，我们的近邻日、韩，加上我们的宝岛台湾，乃至于欧洲，任何地方只要小农人口仍占一定规模，它都必然实行合作经济。在东亚小农社会，尽管它的农民人口已经普遍下降到10%以下，日本现在大约有5%的农民人口，韩国也就7%左右，但几乎都是政府以一定的政策优惠，以一定的投资来帮助农民发展合作生产、合作运输、合作销售、合作加工、合作保险、合作金融等。有人鼓吹私有化、反对合作社经济无可厚非，但如果说中国农民没有搞合作的愿望，那就大谬不然了。事实上，让农民只在负效益的农业生产中合作、联合，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组织、任何制度都是有成本的。而当前能够产生效益的涉农领域，比如加工、流通、金融、保险全都是你垄断，农民怎么能合作得起来呢？至今没有哪一个政策试图帮助农民进入这些垄断领域。为什么科学决策行不通，还不都是垄断部门坐在那儿决策吗？一方面自己是政府来制定政策，另一方面自己又是经营部门在捞钱，当然就制定出自己最能捞钱的政策来帮自己捞钱了。

比如说，我们国有商业部门的生猪加工企业，非要告农民宰的肉都是假冒伪劣产品，只有他们那里屠宰的才是放心肉。最后名义上为了让市民吃上放心肉，就规定统一屠宰，实际上就给了上面一个收费的机会。比如北京，大家只认大红门、顺义，似乎只有他们的肉是真的。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为什么农民使刀子捅出来的肉不合格，一定要你宰的

猪才合格？好多事情都没法说道理，其实就是因为它垄断。谁能够逼着所有的猪都必须是定点屠宰？客观上根本做不到，于是各地都报告，实行了上级下达的计划，可弄了半天，却把猪头税变成了人头税。具体做法是：乡里根据上级税收计划计算应该有多少只猪的税，然后各村一平摊，就按人收了。农民就说，政府把猪头税变成了人头税。这种事儿往往开始是某个部门为了自己的垄断利益来建立这么个名目的，接着各个部门都支持，因为都可以搭车收费。

再比如金融垄断，非得说农民自己办的合作金融搞的存贷不合法，只有他搞的合法，现在所有的存款都进他那儿，结果每年至少几千亿的农民资金流出农村，农村就变成了经济上的锅底。农村没钱，接着就必然是高利贷横行。我去年调查了46个村，分布在15个省，95%存在民间借贷，85%存在高利借贷，尤其是农民一遇到教育或者看病收费，非借高利贷不可。在教育和医疗垄断下，据说为了让学校和医院不断地提高收入，上学和看病就越来越贵，农民借高利贷也越来越多。和知识分子相关的这些领域，教育、医疗等，农民都是越来越消费不起的。因此，号召从农村来的这些年轻学生，学成回乡为父老效力，怎么可能呢？请问你们谁还愿意回去？于是，农村人才流失是很正常的，这是按现在政策走的结果。

因此，涉农领域的部门垄断不打破，留给农民的就只能是一个负效益的农业生产。农业属于劳动力密集的生产，劳动生产率低，近年来低到负值、零值以下，劳动生产率长期上不去，这农业还能有救吗？如果把所有能产生利润的领域都垄断着，让农民怎么办？所以我们客观地说，农村真正需要的、所谓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的政策是：请你打破自己的垄断，允许农民合作起来，进入这些领域。

我们现在说加强农业投入，请问到底加强给谁了？当你面对着2.34亿小农户的时候，请问政府即使有投入，给2.34亿小农户怎么分？政府投入怎么能到户？按照交易费用理论，政府怎么可能对付2亿多小农产？交易成本在这儿摆着呢！由于任何政府都根本做不到与分散农产的直接交易，那些支农政策从根本上看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政府加强的投入，其实大都给垄断部门拿走了。这个农业投入当然就基本上是空的了。

你们只要上网去查看就知道，其他东亚小农社会，尽管农民人口比我们少得多，但是政府法定投资每年投多少？政府法定的投入投给谁

呢？投给那些组织起来的农民。日、韩也是小规模农户经济，尽管它们的土地规模比我们大得多，但仍然抵抗不了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米，于是就靠合作经济保护农民收益和农村发展。比如说合作社办了一个肥料厂，政府的投资量为50%，但只投资，只做股，不得计息，政府除了税收之外是不许有其他收益的，因为你拿的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是为了保证国本，保证农业不可动摇，保证本国农业不垮台，所以同意政府投资。那么，政府投到什么上呢？投到农民合作起来办的企业，比如说合作社的一个设施农业，为了生态环境需要生产复合肥，那政府就投资进来。无论是买车还是买设备，总之我保证你不私有化，取得收益得为社会大众服务。

政府投入产生的收益，必须定向地用于农村公共品开支，农民可以合作起来办金融和其他产业，而且享受免税待遇。只要是农村社区成员，包括非农民，都可以实行会员制借贷，但是这个农民办的合作金融所产生的收益60%必须返还到农村公益事业，比如修路、架桥、农民培训等。农民合作组织的大型批发、仓储销售也一概免税，所得收益仍然是50%以上用于农村公益事业。农户几乎都是农协的会员，例如一个种稻谷的农民，向合作社办的批发市场交了稻米，最后产生的利润的60%会被返还回来。否则他如果纯粹就靠在土地上种植稻谷，怎么能不亏损呢？小农经济从事的种植业当然都是亏损的，就得靠涉农领域的合作经营来补贴种植业的亏损。

再看韩国，他们搞的农协公开宣传的口号是“身土不二”。什么意思？就是我身、我土分不开，我生为韩国人，我就脚踏这块热土。所以哪怕美国农产品再便宜，韩国人也不买；韩国的农产品再贵，他都愿意买韩国农产品。农协大力宣传韩国农产品是绝对绿色产品，以韩国农协的名誉保证我们韩国人的健康，不吃那些转基因食品。农协给农民一个绿色食品的标志就够了，他们的宣传没有那么意识形态化，但效果好，消费者就是形成了这个选择。看看我们，有这种宣传吗？报纸上空喊着加强农业，政策呢？措施呢？不仅没有，农民头上还有那么几座大山压着，教育恰恰就是其中之一。不要以为喊加强农村教育就都对了，对于那些没有起码的国民待遇的农村人来说，没有公平，什么提法都可能造成他们的损失。

所以，说来说去，中国在“入世”的挑战面前，恐怕需要另外采取一套政策，完全照搬是搬不来机遇的。

附：现场问答

问：温老师，中国现在就像是一个农业大家庭，比如说老大和老二都在上学，但是家里没有这么多钱供养，只能牺牲老大，供老二读大学。就是说国家让农业做出一定牺牲，保护了其他一些产业。现在按您的观点，就是把老大杀掉，是这个意思吗？谢谢。

答：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说不是问题，你描述了在中国追求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必然有人牺牲，我们确实也是这样做的，50年来我们是让农民做了牺牲。不光我这样说，你看薄一波写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老作为当时参与中央重大决策的领导人之一，他也是明确指出，中央当时经过慎重选择，认真地讨论，觉得要想搞工业化，就得有人做出牺牲。那么看来只能让农民做牺牲了。这一点我觉得你说得对，跟当时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决策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

一个国家要实行现代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总得有人做出牺牲。就现在的情况看，我也觉得有些决策仍然有相当的合理成分。比如说1999年，中国定义自己的21世纪的发展战略是要做最终产品制造业大国，也就是世界其他国家所说的，中国想当世界工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在一般的商品竞争中占有比较大的份额，客观上我们也正在这么做。

前两天听了一个故事：有一个德国人要过生日，让他的几个子女去买礼品，其实他心里想测试一下他的子女买回来的东西有多少是本国货。结果，买回来的礼物全是中国货。就是说我们定义中国为最终产品制造业大国这一点正在实现。而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点，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竞争不过我们，其中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就是我们有2亿绝对过剩劳动力。在劳动力绝对过剩条件下，劳动力价格必然是最低的。请问哪一个农民工有社会保障？有参加工会的权利？有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权利吗？什么都没有。当然，有些地方的讨论和政策安排中这些问题已经开始有所涉及。我今年已经看了几个这种典型，看他们的制度怎么建立的。广东1996年提出全省不分城乡，所有的企业必须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8月份我在广东做调查，他们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0%多的企业落实了社会保障。我就去找企业调查，问一个企业家实行了吗？他说实行了。我问你给几个人上了保险？他说3个。我说3个都是什么人呢？他说："我一个，还有我老婆，我儿子。"我说你雇了几个人？他说十几个人。我说那些人呢？他说："我为什么要给他们买？"这是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今年10月份开了一个研讨会，主办者提交了厚厚的一个调查报告。在他们试点的地方，政府要开始推行统筹社会保障，在所有的企业铺开。于是，首先是外资投资企业联名找当地政府提意见。政府答复说，根据上级给我们布置的试点任务，必须这样做。政府做了无数的工作，最后做通了，企业家们同意了，可工人们却不干了。政府就找了工人座谈，问，为什么你们不干？工人说我们不信这个，我们要现钱。因为这个社会保险制度要企业负担一点，从工人的工资里拿一点。到现在为止，推行这个制度报纸上是有，文件上也有，实际执行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因此，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提得挺有立场。

咱们回到你的问题上。我们要想维持竞争优势，目前唯一的就是靠劳动力价格低廉。我今年去印度，印度搞基层调查的知识分子跟我们座谈，他们就说，你们中国的产品没道理便宜。我们印度的劳动力也过剩，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劳动力价格压到最低了，可我们制造出的产品价格还是比你们高。怎么回事？墨西哥是纺织业大国，也是个最终产品制造业大国，那里的学者也问，为什么你们中国的产品价格比我们低？他们都解释不清楚。我看，只能说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第一，有体制优势；第二，这里劳动力过剩的绝对数远大于那两个国家。所以我们看墨西哥劳动力价格比我们高3倍，印度比我们高大约1/2。

但是请注意，你可以压低劳动力价格，但你同时必须得到低价格的原材料。这就是说，你的制造业在现在的工业结构条件下发展，必须以石油为原料，所以才造成我们近年来大规模石油进口。而按照这种模式发展下去，其实是走不了多远的。尽管我们可以在一般商品的生产上一时覆盖住整个世界市场，但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制约：原材料的制约是一个，市场的制约也是很明显的。去年我到美国做了3个月的访问学者，看到连美国的低收入人口都成批地从超级市场购买中国制造的衣服鞋帽。据美国人统计，平均每个美国人一年消费7双中国鞋。可见在一般商品的制造上中国已经基本覆盖掉了发达国家市场，这样发展下去，尽管我可以同意你的观点，在工业化过程中，总会有人做牺牲，但就按这个方式，我们即使杀了老大，老二似乎也走不下去了。所以如果不改成可持续性发展战略，还是有个是否走得下去的问题。

问：我在《读书》上看到您的一篇文章《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今天听了您的报告，我觉得“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不在它本身。我还想补充一点，新中国成立以后，共产党第一次把权力下放到基层乡镇一

级，这时候就引发了负效益，对农民来说是很严重的，因为牵扯到农业税费的问题。再加上您说的部门垄断利益，从这两点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政府以后应该少干预农民的事呢？

答：先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我完成过三个关于农村税费问题的研究报告。网上都有，你可以上网查，我就不多解释了。关于第一个问题，1993年我就写过一篇文章，在《经济日报》上发表了，题目叫《汝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当时我就提出不可能在农业内部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做宏观政策的全面调整。

第九章　解决“三农”问题的五大政策[36]

一、“今天的你我重复昨天的故事”

当人们开始重视“三农”问题的时候，我反而觉得问题似乎更麻烦了。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看到的有关政策，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已经被当作国民经济的重中之重来考虑，各界也普遍重视农民收入问题，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似乎有这么一个现象，今天的你我还在重复昨天的故事，大家手中用的是旧船票，很难搭上今天的客船。所以我感觉现在出台的有关政策似乎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有可能加重现在的困境。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增加农业投入。这仍然是把当前问题看作农业问题，瞄准的目标不是合适的目标。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业的成本每年上涨10%。在现行体制条件下，加大农业投入意味着加大所有涉农部门的开支。在所有和农业相关的产业领域，凡属盈利的部分均在政府控制之内，凡属收入为负的一部分均在农民手里。加大农业投入意味着政府所控制的涉农部门会得到投资，而当这些投资要求1：1配套的时候，都会转化为农民负担。一般地说，在现行体制下增加农民收入，如果不配套必要的强有力的改革措施，恐怕只能是导致农业成本突然上升，农民负担进一步加重。在加大农业投入问题上，“两会”在讲，政府文件在讲，“十五”计划也在讲，但唯独没讲改革。在不讲改革的情况下，恐怕这个政策的效果很难达到。

第二，提高农业科技含量。从目前情况看，有很多地方，包括农业部科技司都说农业增加值中40%是科技投入的结果。但科技意味着服务，最近几年农民收入下降，一定程度上和服务成本上涨有直接关系，最近3年的服务成本每年上涨9%。小农经济条件下，劳动密集天然排斥资本和技术，因为资本和技术都是要钱的，这样就会导致小农经济条件下的不规模经济，投入成本上升，收益下降。

直接的数据表明，最近3年，无论东部还是西部、中部，所有家庭经济条件下的农业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入产出全部是负值。东部因为是资本密集地区，一部分转移收益相对维持了稳定，而中西部地区没有这种条件，出现大量的农民撂荒，实际上意味着农民破产。所以才有无论是

陆学艺老先生，还是湖北的镇党委书记，都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危险就在于农业投入产出多年为负，所以我说农民到了不可维持的地步。

而我们现在所有的政策似乎都在加剧这种不可维持的问题。从现行政策比较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收入连续出现4年的增长速度下降，所对应的政策恰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农村出现黄金增长，并且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那段政策，其实政策手段是一样的。1979—1982年，国家出台了连续调整农产品价格的政策，农业主产品价格调整幅度上涨了49%，同期大规模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这两项政策在90年代中期重演，1994—1996年，也是连续3年，农业基本产品价格调整，上调105%，比上次增加了1倍；同期，我们大规模落实30年不变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和上次（1982年）“大包干”几乎是同样的。那次价格调整和体制调整双管齐下，造成了农村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这次双管齐下造成的结果如何？总之，同样的政策手段在不同的时代使用差别是比较明显的，我想怎么慎重，也找不到合适的词来描绘这种现象。看来一般使用政策和一般使用体制调整手段，似乎背后隐藏更多需要分析的问题，让我们简单分析一下问题在哪。很清楚，原来我们在实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调整政策的时候，农村人口占大约80%，农业产值占的比重比较高，而我们现在农业产值只占17%。用17%的产值所产生的收益去供养70%的人口，这本身是不可行的。

对这种状况做调整怎么调？王占的发言比较好，提到了城镇化；杨老师的发言提得比较好，强调了城镇化、户口开放、土地流转等。但不客气地说，这些还是老话，80年代反复被强调过，包括有的同志提到过能不能通过建立金融工具促进土地流转。这些方面在1977—1988年都搞过试点，效果并不是很好。

不好的原因不在别的，而在于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二元结构条件下，在农村三要素中，土地不可能增加，只能减少，因为人口在增加；劳动力不可能减少，实际上在增加；资金因为劳动力和资金的投入产出为负是不能进来的，因为资金至少要追求社会平均利润——要是投入产出为负，连平均利润都不可能产生，资金怎么可能进来？因此资本退出农村。这几年，尽管银行商业化、市场化改革很成功，但对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业来说，意味着资金这个农业要素的流出。请问，所谓农村市场条件配置资源怎么实现？其中隐含着很多深层次问题，恐怕不能用强

调农村市场化，强调对农业增加更多的投入等现行的政策来解决。

目前农村存在的复杂问题，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有中国农业特色的“三农”问题，看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需要深入讨论，不能表面化地就事论事，这是其一。

其二，城镇化。这是大家普遍讨论的一个话题，认为城镇化能够解决问题。且不说现在大城市吸纳农民的能力已经下降，从王占所说的长期的分析来看，即使我们加快城市化，到2030年可能实现50%的城市化率（这是在决策选择完全正确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达到50%城市化率；如果决策选择不正确，能不能达到还是个问号），那时我们是16亿至17亿人口，按16.8亿计算，仍然还有8.4亿人生活在农村；而在城市化加速阶段，每年被征占的土地按正常的规模来看，至少减少1200万亩。也就是说30年后，按老口径目前14.5亿亩耕地算，要减少3亿多亩，按新口径19.5亿亩算，人均耕地面积也不会增加，实际上还会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农村这三个基本要素的配置关系能调节得了吗？这是一个大问题。

其三，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最终产品出口大国，靠的就是劳动力成本低廉。比如，去年中国仅出口的鞋就够美国人平均每人7双，且极廉价，连贫困人口都用车拉鞋子、衣服。以我们有限的资源、最便宜的劳动力生产出来的产品，在那里实际被浪费着。尽管有人强调出口品有消费刚性，不可能减少多少，但确实可能减少，因为没有必要每年消费7双鞋。我们维持这样的出口靠什么？就靠低层次劳动力。在劳动力供给绝对过剩的条件下，劳动力价格不可能提升。以去年看，尽管外出打工人口9500万，流出的人口总规模超过了1个亿，农民的总收入还是增长不快。看来靠出口拉动是个说法但似是而非，因为东部地区吸引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打工节省了很多成本，节省的是农民进入打工地区的全部成本。没有任何一个东部企业家为农民打工者支付路费、办证费等，只是开几百元工资就完了，且工资水平10年不变，基本上是恒定的。这样，当出口绝对值增加的时候，虽然带动了就业和打工，但并不意味着收入水平的增加，只是就业人数增加导致绝对值增加。打工人口没有社会保障，最好的劳动价值被榨取完就被淘汰了。我们绝对不可能由国家来提供占70%的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在17%的产值水平之下的社会保障国家是提供不了的。国家向农民让渡的是什么呢？是农民承包的那块土地，让这块土地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作为社会保障资料的土地怎么能进入市场？在国家不能提供社会保障的条件

下，如果随着人口增加土地减少，农民的社会保障就成问题。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自己是长期做农村试验工作的，我所说的一切绝不是推理，不是一般的建议，而是一个试验的结果。我们做了10年的试验，我们发现，在不牵涉所有权的条件下，农村土地流转实际上也会大量发生。比如，农民要出去做买卖或打工，土地总是要转给别人的。如果土地不能给他带来收益，甚至可能带来负收益的话他就撂荒了，那也是一种使用权的暂时放弃。其实，土地所有权的流动牵涉到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在国家垄断一级市场的条件下，农民不能享有农地向非农地转化过程中的收益。按农地计算的土地其实不值多少钱，仅仅是农业内部转移（实际大量发生的是这种转移）产生不了多少收益。

二、“五大政策”解决“三农”问题

因此，我们需要认真清理以往的政策思路——不清理也行，但要有点新思路。我不说具体的分析过程，就说怎么办。

第一，政府放开那些仍然有盈利的涉农领域，比如说生产资料供应、农产品的销售、农产品的加工、农业金融、农业保险，允许农民组织起来的合作组织进入这些可以通过规模经营产生收益的领域。因为纯粹的农业领域已经没有效益可言，调整农业内部结构1985年农民就调了，那是农民自己的事。有些地方政府强令农民种多少万亩草莓什么的，到时都卖不动，都烂在那儿，那是麻烦的事。所以调整农业结构的事不能再那样去折腾了，最好的办法是把那些涉农部门控制的盈利领域让给农民。如果能够做到放开垄断，让农民组织合作社进入，形成一点规模效益，反哺农业，至少目前还破不了产。无论是农业金融、保险还是加工、购销，这几块应该还是有利可图的。

第二，免除一切农业税。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农民生存的保障资料，全世界没有对社会保障征税的。搞税费改革的设想是很有技术性的，但客观上不可行，因为没有任何政府能够面对9亿农民按他们的实际生产经营销售去征税，交易成本太高。我们做过这样的实验，征了4万多块钱的税，花了3.9万多块钱，根本没有效益。不如干脆放掉农业税，不过三四百亿元。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当农村走不下去的时候都是免税的，我们现在的税费改革测算下来，实际上比以往的“什一税”高50%，如果按现金计算超过30%，这么高在中西部怎么能推行得了呢？所以只能免税。比如，为了确保农村稳定，实行3年免税行不行？或者

在中西部实行永久免税。以上两条是东亚小农普遍采取的政策，无论是在日本、韩国，还是在我国台湾。

第三，如果免税，庞大的县乡政府怎么开支？我们说同时要配套基层管理体制改革。把乡政府改成乡公所，乡政府现在不是六套班子“七所八站”吗？按目前的发展趋势，改革似乎是要把他们改成“七局八局”。要让乡公所只是一个上情下达的机构，各村落实自治法，直接对县。各村联合组成合作社理事会，直接行使董事会的职权，控制乡一级信用社、供销社、粮站、农机站等涉农部门，决定其服务和收费。这就把2/3的乡级开支变成了合作社组织开支，它也就没有收费权了，收费取决于人家需不需要服务。镇建自治政府，其自治权和村民自治的权利是相等的，镇不得剥夺有自治权的村的合法权利，否则就打掉了城镇化过程中伸向农民的手。

第四，国家如果维持垄断性的土地征占，土地垄断征占所产生的收益必须定向用于无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不是直接使用，而是把这土地转让的资金用于上市，产生的收益用于支付无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这块是个大头，如果按每年1000万亩的征占幅度算，大体可以支付无地农民或者赤贫人口所需要的社会保障。

这样算下来，每年可以给农民减几百亿元的税，减掉1000万元左右的农民所承担的基层政府人员或基层公职人员的开支，可增加数以亿计的无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基金。如果按这几个大政策走下来，就可能相对缓解现在农村的困境。

第五，国家支农资金不要投到部门，不能作为要有收益的资金，要作为股权投入农民合作起来建立的加工、流通、金融、保险等组织，占有股权但不分享收益，收益反复投进去。按照一定比例，比如国家股权收益的60%用于农村社会事业，如农村妇女、教育、医疗等。要把法律规定国家投入的股权所产生的收益，用于农村社会事业，另外一部分用于这些合作事业的积累。

只有这样走，才有可能解决小农经济条件之下，农业不可持续、农村没法发展、农民过于贫困的问题。五大政策，五管齐下，才有可能综合治理解决现在的农村问题，否则，长治久安维持不了几年了。因为20世纪发生过几次大的高利贷狂潮，一次是在国民党晚期，一次是在90年代。1997年我们曾经建议过，假如按现在银行商业化改制的趋势发展下

去，必然导致商业金融退出农村，必然导致农村高利贷重新占领农村信用市场。结果从1997年开始，确实产生了大量农村高利贷。我在去年调查了15个省40多个村，民间借贷的产生频率是95%，高利息借贷产生的频率是85%。农民高利借贷中，33.8%是生活性借贷，因为他们必须消费；另外29%是垄断性消费，是必须支付的教育、医疗等垄断性消费；只有11%用于生产。所以现在大家的呼吁、各地方的反映不是虚的，真的需要有一个综合治理的政策解决农业问题。

第三部分

若干重要问题的去意识形态化讨论

第十章 集建入市的交易成本与垫底制度——关于农地制度创新的思考[37]

一、交易成本决定土地制度

（一）政府与农民的交易成本

我们讨论土地制度问题，就必然涉及这个制度怎么才能够形成，这个制度形成以后对谁有利。

一方面应该重视制度的合理性。只要在这个制度框架内获得利益的群体是多数，那么这个制度就是稳固的。而如果这个制度还能够协调和平衡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制度就是长期的、有效的、稳固的。

另一方面应该考虑交易费用。因为，土地制度的供给者是政府，所以土地制度无论怎么变，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在一定的利益要求之下，来对这个制度进行完善或修订的。

为什么现在土地制度会有很大的变化呢？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与农民之间在土地问题上的交易成本。当政府要从农民那里拿走土地时，叫垄断征占也好，叫买也好，交易成本太高了。农民虽然没有正常的利益表达渠道，但他可以上访，包围政府。这说明原来制度框架下的交易成本太高，高到了政治化的程度。所以，尽管这个制度曾经给政府带来收益，但如果制度成本增加到影响稳定，当然就必须改变。

（二）制度改变的方式

形成制度改变的条件不同，制度改变的方式就会不同。

比如，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土地一级市场，各地推行这一制度改变当然会有不同的做法。安徽人说，得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的程度；上海人说，由当地一定的客观条件来决定；浙江统一规划，把家庭作坊式的工业都集中到园区，农民要建居民楼；河南安阳采取“倒算账”的办法，把国家在垄断征占集体土地之下所有的收益，全部计算出来，然后倒着测算出一个收益分配比例，让农民执行。

各地经验各不相同，首先决定于各地土地资源的稀缺程度。

资源的稀缺性或叫要素的稀缺性是决定价格的第一个关键条件。土地资源越是稀缺，交易双方在交易过程中间的摩擦就越大。不同的资源条件，对交易双方形成什么样的制度有着重要的影响。

土地资源相对宽松的地方，如河南省，比江南的人均耕地面积要多一些，只是工业不够发达。只要你出的价格比农民原来种地、种经济作物的收成要高，那农民可能就接受这个价格。而到那些土地资源已经严重短缺的地方，你用一般的价格去跟农民交易，或者用比他进行农业生产的收益要高的价格去跟他交易，可能要困难得多。所以，土地的稀缺程度决定交易的困难程度，交易的困难程度又决定了政府用什么样的制度来解决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决定了政府的制度供给。

农村非农就业水平的高低，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土地交易成本的高低。

如果农民非农就业的比重比较大，那么他从非农就业中得到的收益多了，他的收入对土地的依赖性就下降了，这样也会降低交易成本。不同地方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在考虑集体土地制度改变的形式时，就得考虑那个地方非农就业的水平到底高不高。

非农就业水平的高低，又与地方的工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高度相关。

苏南土地高度稀缺，但过去乡镇企业发展得很好，老百姓大部分在乡镇企业就业，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从事农业。所以苏南在发展乡镇企业，政府征占土地用来盖大楼、建广场时，似乎土地非常便宜就能拿得到，这实际上取决于这些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所以，非农就业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交易成本的高低。

后来苏南土地矛盾之所以变得突出，是因为苏南乡镇企业遇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

苏南的乡镇企业基本上是政府经济，地方政府在主导经济。修大楼、广场、马路、敬老院及办学校等，所有这些政府的公益性开支和行政性开支，往往直接来自乡镇企业。当经济出现危机，国家实行宏观紧缩，或在萧条阶段市场销售困难、乡镇企业收益下降的时候，政府的这

些开支就直接从乡镇企业的借债中支出。因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苏南乡镇企业的负债开始大幅提高，而负债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是政府公益开支。我们做过调查，在苏南乡镇企业高达百分之八十几的负债率中，借债用于政府开支的大概占百分之三十几。这意味着，乡镇企业借债给政府消费。政府经济交易成本确实很低，但它导致了高负债的政府消费，于是企业在高负债压力下就等于为银行打工，地方政府和企业家就都无利可图，没法再经营了。接着就在90年代末期引起普遍的企业私有化改制。

企业一私有化，它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不再解决农村就业。企业的行为就是利润最大化，而原来作为政府经济的时候，是就业最大化。改制后企业不解决就业了，原来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就要回家，还得回到土地上去，于是在土地问题上的争议就又增加了。这个时候，更多的集体，实际上是靠地租在维持他们的基本生存。因为集体手里没有别的，就剩下那些原来属于第一产业的土地。在苏南工业化的过程中，部分土地转为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用地，集体凭借自己所有者的身份收取地租，来维持乡、村两级政府或准政府的开支。

再看西南的贵州、重庆一带，农村人口一般都占80%以上，非农就业非常低，农民在土里“刨食”，那些地方普遍推行农地承包30年不变，其实从1981年分了地以后就一直没有变。这一制度安排产生什么样的客观效果呢？计划生育。在贵州，当一个家庭人均占有的耕地低于0.5亩时，这个家庭往往主动节育。为什么？没有地，养不活。就是人均0.5亩耕地，才能勉强维持一家三四口人的生活。如果人均耕地面积降了下来，这时候就得买粮食，买粮食的人家绝对不愿多生孩子，他们得靠男劳力外出打工挣点钱买粮食养活一家人。贵州全省都是山区，人均只有几分耕地，农村调地的难度极大，调地的成本极高，进而决定了农地承包制度30年不变。

所以，制度的安排及其形成，与各地的条件高度相关。这次会议特别有意义，它没有给大家一个统一的模式，而是让各地的土地部门从自身的实际出发进行制度设计，在这里进行经验汇总和交流，回去后调整在农地制度上的安排。

二、土地现在是并且将越来越是农民的保障

历史上凡属于无地农民增加的时期，社会控制、社会安定的成本就

非常之高，因为如果农民能稳定地在原来的社区生活，他基本不犯罪。我们现在的集体土地之所以必须以社区成员权作为基本权利依据，就是要稳定农民。农民一旦离开社区，离开了那个可以获得财产的身份，有什么可以约束他呢？因此，现在城市犯罪70%以上是流动人口犯罪。

（一）不同体制条件下的土地问题

在过去30年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以比较低的成本，建立了工业化。政府几乎能够无摩擦地拿到农民土地，因为政府每拿一份土地，就对应解决所有依赖这份土地生存的人口的就业。那时，农民愿意政府征地，一征地就有多少农民要吃“皇粮”了，生老病死就有依靠了，农民当然愿意。那个时代，土地收益根本就没有市场化，农民拿不到土地收益。

现在为什么摩擦越来越大？因为仅城市就有6000万人下岗，转换身份有什么用呢？农民知道政府既没法给他解决就业，也不可能有社会保障，当然不愿意“农转非”了。当城市户口对农民没有吸引力的时候，农民的生存只能依存于土地，不能再指望政府提供生老病死的依靠。外部制度环境的巨大变化，进一步使土地对农民的保障功能远远大于其生产功能。

（二）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问题

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出现大规模武装斗争？一位英国人的研究很清楚地表明，印尼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企业倒闭，回乡农民中有27%没有土地。没有土地的农民回乡，就成了基层造反、动乱的最主要力量。菲律宾不断爆发武装斗争，因为这个国家50%以上的土地在大土地所有者手中。可见我们现在的土地制度安排非常要紧，要剥夺人家农民安身立命的土地，却不给人家补偿，或补偿不够，或补偿到位却被农民买酒喝了，这些情况都会制造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大包干”是以土地为中心的制度变迁。变的是什么？过去政府控制全部资源，现在把土地让给农民，但同时把对农民的社会保障一并让给农民。也就是说，政府把农民的生老病死全押到土地上了。所以农民在土地里“刨食”，靠土地安身立命。

有人会说，为什么不能在农村建立现代意义的社会保障制度？无论是谁，都解决不了8亿多农民的社会保障。现在为3亿多城市人口建立社

会保障就已经捉襟见肘，因此要靠国有股减持来建立社会保障基金！事实上谁也管不了8亿多农民的社会保障。没有哪一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能够在工业化过程中，为那些处于边缘化的农业群体、农村人口，提供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

有鉴于此，我们切不可忘记，土地还是农民的社会保障，而且将越来越是农民的保障，假如我们的社会制度安排中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将来大家都不安全。

三、土地基本制度不能轻易言动

（一）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不能轻易言动

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和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流转是高度相关的。

著名农村问题专家陈锡文同志提出，切不可因为现在各方面矛盾比较复杂，就要去改变家庭承包这样一个土地制度。这一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强调的是三方面：明确集体所有权，稳定家庭承包使用权，通过搞活经营权来促进土地流转。这三方面内容是高度相关的一个整体。所以，无论讲集体土地国有，还是讲农村土地私有，都意味着要动摇家庭承包这项基本制度的根本。

以最近的贵州调查为例，那里不是以行政村或自然村，而是以作业组为分地单位。为什么呢？山区居住分散，一个山沟里的小小村落，一个作业组，七八户农民，就这么两三个山沟，才能构成一个自然村；七八个山沟才能构成一个行政村。让他以行政村为单位分地，是不可能做到的。那里甚至不可能以自然村为单位分地，事实上只能以作业组为单位分地。北方为什么以行政村为单位分地？在河北，自然村这一级没有土地调整权。北方是大村，不是自然村落，大村里面分成生产队，这条街是一个队，那条街是一个队。就这么分地以后，原来的生产队就没什么作用了，以后再调整土地就是大队的事了。

可见，在大包干过程中，农村土地权属关系这项基本制度，本来已经根据农民和农村的实际情况形成了，而且在过去20多年中无论是不调整还是经过数次调整已经基本稳定了，所以现在不能轻易言动，不能轻易提出私有化或国有化。

我们在农村调查时发现，在大多数地方，娶来的媳妇没有分地。妇

联的同志说这样不对，一定要把土地权利落实到人，这人出嫁了，地也要随人走，这样才能保证妇女到婆家不受欺负。要求是对的，从工作上讲也是合理的，但得问问农民答应不答应。她嫁到外村了，地怎么向外村走啊？所以，集体土地的产权边界叫社区所有。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科斯讲得很清楚，产权重要不重要，取决于交易，当没有交易发生的时候，它就不重要；当有交易发生并有交易费用的时候，这个产权问题才突出，才要求制度安排。

其实，土地现在就能够大量流转，农民出去打工，地包给别人，地租完全由市场决定。如果他去打工，所承包的土地收益为负，那用打工挣的钱来交“三提五统”，地只要不荒就行。在那些地租为正的地方，比如在河北偏远一点的地方，交200公斤玉米作为地租；交通沿线离城市近的地方，交350公斤玉米作为地租。地租已经显化，交易大量发生，只要有人愿意投资农业，愿意成规模地经营土地，他并没有不方便。

（二）先保障再动地

假如能通过国有化或私有化法案，把所有农民的社会保障包下来，农民也会同意改变土地制度。可如果不是这样，农村以土地为核心的基本经济制度切莫轻易言动，既不可国有也不可私有。

如果地方有条件以政府文件或条例的形式来规定集体土地入市的收益分配，那么，入市以后的收益不可用于当年分配，也就是不可用于一般性的分配来补足农民收入。这个收益只能用于农村的社会保障，建立医保、社保基金。

集体土地的保障功能大于生产功能，各项补偿得给农民。除此之外，要做一定的制度安排，专项用于医保、社保开支。这部分收益也不能由政府拿着，因为它是集体的，根本意义上是由成员权决定的。

总之，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流转的时候，政府应适当做一些制度安排，以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土地制度既然是农村的一项基本制度，土地流转特别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又是最能产生收益的一块，那么，在产生的增值收益中，如果政府能定向地安排一块用作农村社会保障基金，将有利于维持国家的长期稳定。

第十一章　“非典”引发的危机与改革[38]

一、回顾过去：为了不再意识形态化地讨论“非典”

要讨论“非典”引发的危机与改革，需要对问题有正确的认识。我最近看到很多这种所谓的讨论，学者似乎急于抓住机会，对任何事情的议论都难免自说自话，在某种意义上这还不如老百姓的调侃，比如北京人的幽默天性就把这次“非典”危机给“解构”了。比如，我们看到的手机信息上说，多年来政府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次让“非典”给解决了：大吃大喝政府治不了，“非典”治了；公款旅游政府治不了，“非典”治了；卖淫嫖娼政府治不了，“非典”治了；商品滞销……

人们几乎不假思索地接受了“非典”是一场公共危机的说法，似乎没有人来得及问一声：说“非典”是公共危机的根据到底是什么？是根据这场疫病的危害，根据意识形态、政治需要，还是根据其他的什么来说的？对此，我们出版的《中国改革》2003年第6期发表的封面专题“SARS搭台谁唱戏”表达了我们的观点，把这次的“非典”与1998年的抗洪做了对比分析，观点可能比较“另类”。

现在人们又开始讨论“后SARS”了。不过，从哪个角度反思？什么叫“后SARS”反思？如果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学术领域，研究政治学的从政治领域反思透明度和公开化，研究经济学的反思SARS多大程度影响经济增长……这种多角度反思可能是有积极意义的，可能是好的，但是也可能是发散的。恐怕还没有人好好去想一想，这个SARS反映出的真正问题是什么。

刚才与我的校友提起，我们至少应该回顾过去30年，每次大的社会变动之后都有大作问世，警醒世人。

20世纪70年代，我们经历过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先后去世，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等重大事件。那时，真正在思想界引起相当反响的，是1979年那篇题为“社会主义结构性经济危机”的文章，史称“四签名”，是指有四个青年人敢于把自己的真实姓名签出来，发表这篇振聋发聩的文章。这篇文章在人们的讨论中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到现在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相当多的问题还在他们当时提出的思想框架中。这篇“四签名”的文章在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中间是有长期影响的，其中一个签名的，

就是在政坛上比较活跃的北京现任代市长王岐山。

80年代，我们的双轨制改革中出现权钱交易，引起新的社会政治矛盾。至今在我们做研究的人中间经常引用的是“胡王报告”，就是胡鞍钢、王绍光所写的署名报告。至今有很多问题的讨论没有超过他们对当时发生大规模群体冲突的分析。

90年代，中国经济从萧条进入高涨，然后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的科索沃冲突、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随之引起广泛重视的，就是当时国务院体改办副主任潘岳主持的三个安全问题报告：关于国家政治安全问题、经济安全问题和社会安全等问题的报告。后来关于突发事件的处理政策，从这三个报告里面多多少少都能找到一些表述。

引述过去，是提醒今天的人们，在讨论SARS危机引起的改革的时候，我们不要再重复过去的老话，这样的老话有价值吗？有意义吗？说来说去还是那些东西。

二、在危机发生时，最有效的应急防范体制

最近报纸上报道，有民工因为交不出治疗SARS的钱只好跑了，这反映了什么问题？就此插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问题：SARS在世界上哪两个国家发生后会立刻得到控制？我认为是朝鲜和古巴，因为只有朝鲜和古巴还保持着全民免费义务教育、全民公费医疗。如果教育和医疗都是100%的公共品，完全公费，在这样的体制下，SARS能不被控制住吗？

我们看现实情况吧，真正让SARS立即就控制住的是什么呢？其实是满街警察发挥了作用。在公共品不足或者无效的情况下，就是中央一声令下，哪个单位的“一把手”敢疏忽，马上撤职，你还敢疏忽吗？不管你是大知识分子还是大官的亲属，不管你有多大的社会影响，有多大的权威，在这个体制内你就是一颗螺丝钉，你就得被死死地钉在你负责的部门上。

所以，在危机发生时起作用的不是别的，正是邓小平讲过、江泽民也讲过的：我们的体制好就好在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只要这个党还存在，这种特殊的优势就可以随时发挥作用。

想想我们真正面临的问题是什么？还是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的城乡二元结构这个根本体制矛盾之下的不断扩大的三大差别。如果大家有共识，承认SARS是一场危机，那它揭露的到底是什么危机？SARS面前政府失灵，市场也失灵，问题在哪里？

从卫生部门的微观角度说，不过是公共卫生防疫制度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那么，是我们的财力不足吗？恐怕比那些小国家足得多吧！为什么我们的公共卫生防疫系统没有随着经济发展同步地好起来？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连农村的公共医疗都可以覆盖到80%~90%？这些问题不应该深入讨论吗？如果不讨论，就是人们的思考仍然受到“意识形态化”的制约。

再看看我们现在的医疗消费，高达7000多亿元；相应的医疗投资小吗？比80年代翻了几十倍。还有这种消费和投资拉动的药品、器械等行业，这不都是GDP？难道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增长吗？现在说预防，那可不创造增长！你到底要什么？

接着，讨论舆论。如果不是我们这种媒体一片正面的报道，如果我们把西方的媒体报道全部照搬来，也去报道SARS没药能治，病人如何危险，刀子下去脓血喷溅……还有多少医生护士敢上一线？台湾百名医护人员大逃亡的情况明显说明了这一点。

最后，回归正题，讨论危机防范。当危机发生的时候，最有效的应对危机的手段，就是要求集中各种资源统一指挥。如果完全放任，我就不相信危机能够被控制住。

请我们的知识界好好反思反思，如果意识形态化地考虑“非典”，根本分析不了真问题。所以，真要想谈“后SARS”问题，就先得把意识形态化的东西去掉。

三、“后SARS”的讨论：改革机会与方向

这次SARS危机确实给了我们一个调整的机会。

温家宝总理在中国农业大学的讲话非常动情，他指出了一个重要的方向性的问题：希望大家更多地关注农村、关注农民。他这种有感情的关注，让我深深体味到一个新总理的遗憾，他实在难以根治因为具有垄断地位而积重难返的卫生体制，于是不得不动员社会有感情地去关注这些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总理面对的公共卫生体系是什么样子。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县以下农村至少有51万的专职医生护士，乡以下有146万赤脚医生，还有62万接生员。诚然，这些人都没有“城市老爷卫生部”颁发的证书，都没有考过外语，都没在国外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文章，更没有今天的医生拿红包的腐败；但他们却保证了我们这个国家80%以上的农民享受到起码的公共医疗服务。现在呢？总理知道农民去不起医院，他曾经问：有多少农民的孩子是在家里出生的？多少病人是在家里死亡的？回答是：80%以上。

那些在农村蔓延的疾病仅仅是SARS吗？到现在全国感染SARS的才几千人，农村只占其中的几百人。我们的舆论关注那些感染人数过百万的疾病吗？性病、艾滋病、肝炎、结核病，都是过百万的……当人们讨论SARS的时候，有谁讨论到这些受害人口更多的疾病了吗？如果不讨论这些问题，难道是在讨论公共卫生防疫体制改革吗？

什么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看看今天乡以下的农村还存在多少卫生院，还有多少乡村医生，还有几个基层的合作医疗？20世纪80年代农村集体化解体的时候合作医疗剩下了5%左右，90年代曾经搞合作医疗体制建设，当年投资后恢复到超过6%，但第二年没有了投资，恢复不下去了。

前不久中央接受了“‘三农’问题”这个概念。领导同志召开座谈会，会上有一位研究人员出身的领导干部，专门就农村医疗卫生情况的现状做了一个报告，比较了城市和农村：90%左右的农民死在家里，接近100%的城市人，除了在路上意外死亡的，基本死在医院里；90%的农民孩子出生在家里，接近100%的城里人出生在医院。这就是目前的医疗卫生现状。温家宝同志接任总理之前很重视这个报道，指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这个数字。

问题是，虽然我们要建立现代医疗卫生体制，建立现代防疫体制，但如果我们到农村去看看就会产生疑问：在农业产值占GDP已经到了15%以下、农村人口仍然占总人口的64%这么一个结构上怎么建？且不说年人均国民收入不到1000美元、农村人均日收入1美元以下至少有1亿人的中国，年人均收入达到8000美元的巴西，建起这个体制来了吗？印度建起来了吗？在我国农村一片组织空白、制度空白的情况下，无论搞什么现代化的体制，都有无源之水的问题。因此，即使有投资，请问怎么建设？

当年毛主席一声令下，赤脚医生在几年时间内就能使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立起来，是因为当时我们的农村有一套完整的组织系统。现在这套系统我们还有吗？它已经被彻底打碎了。当然，原来那套组织系统有严重的弊病，存在大量的问题，我并不是说当时的情况是好的，今天的就不好。关键在于，有些西方有效的经验不可能照搬，制度也不可能拿来就用。

比方说建立现代法制，在农村按照怎样的标准来实现？谁养活这么多法官和警察？警察制度是高消费的机器，制服、警车、警棍，等等，一大笔开支，谁支付得起？如果真按照西方的标准，每万人配一定警察的比例建起来，徒然加重农民的负担，这不是恶性循环吗？这条路在农村完全走不通。我们提倡法治，小知识分子们就号召农民去打官司，但没有人去想，为什么老百姓长期的文化传统是迫不得已才告状。我们好多法学界的年轻人鼓励农民打官司，真以为打官司能解决问题？其实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在农村搞现代法制是昂贵的，根本没有财力能够支持。离开北京30公里以外，看看这些乡村的收入，看看这个收入能不能支付得起我们现在法律制度规章规定的费用——根本支付不起。

十六大指出“三大差别”，提出今后二十年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候，已经英明地告诉我们最主要的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个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至少应该知道，城里搞的这种现代制度不适用于农村。我国就是这样一个二元结构社会，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农村是小农经济，相对它落后生产力的就是传统社会，面对这样的经济基础，知识分子来不得半点浮夸，政府也来不得半点照搬。

我们很担心现代化被照搬到农村，把老百姓逼得造反，所以才强调：中国特色不是儿戏！现在的“特色”已经很清楚，我们仍有9亿人可以被定义为弱势群体，那些千千万万进了城的人也只不过把贫困平移、空间改变。强资本弱劳工的局面已经形成，而且，在权力、资本、知识三者已经结合的条件下，我们到底能够改变什么？现在强调法制社会，所对应的是大量的犯罪，可犯罪的根源是什么？清华大学的调查证明，进城打工的农民连续三个月失业的占30%以上，失业后能干什么？非偷即抢。所以，贫穷是万恶之源。

温家宝总理在中国农业大学讲话的时候特别动情，我体会他的遗憾就遗憾在缺乏手段。如果我们把SARS当成了危机，而不是把它当成机

会，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应该把它当成充分地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的机会，把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问题重视起来，把全民实现小康社会这个大目标重视起来，让我们的公共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向农村倾斜，真正考虑在农村建立一个符合实际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

我们不是最担心SARS向农村扩散吗？SARS之所以被控制，靠的就是党中央要求全党服从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现在，中国就得益于还存在这个能够集中指挥的政治基础。十六大已经指出主要矛盾来了，只不过到现在为止各部门的工作仍没有跟上，只要党中央要求各个部门继续“一把手”负责制，都好好反思，为什么自己这个部门不跟十六大保持一致，为什么不跟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也像这次采取撤换干部的办法，何愁得不到重视？问题何愁得不到解决？

此外，新闻界应该说说这些话，就像1998年的洪水一样，当年曾经发现水利部敢把水利资金拿去搞楼堂馆所，现在我们怎么敢保证卫生部得到防疫资金不被用来搞腐败？

总之，希望各个部门各个地方能够跟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危机转化为动力，认真地讨论中国面临的真正问题，这样，弱势群体的问题就应该进入大家的视野。政策研究界应该逼着各部门抓紧把有限的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如果这样转变，我们就能早一点走向全面小康。

附：问答

许知远：我们本身存在统治过度的问题，再集中到这种地步，我们不能依靠社会中间组织的力量了吗？

温铁军：我刚才说了，既然大家都承认SARS是危机，那么就危机本身谈危机发生时所需要的，而不是谈你这个知识分子心里憧憬的，那就是一个如何防范突发事件的问题。这一条，在当前的经验过程中我们都已经了解，只有集中资源统一指挥才做到了有效控制。

许知远：您刚才谈到现在农村的防疫体系崩溃了，应该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温铁军：这不是纯粹存在于卫生系统里的问题。我们长期以来忽视了最基本的工作——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当然，农村一盘散沙的问题是千年来的问题，我们既不能像过去那样搞人民公社化，又不能像现

在这样自由放任。我们应该仔细思考，把农村的组织制度资源进行更新、利用、再造、变革，想办法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这样，我们的公共卫生系统、法律系统的建设，才能够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许知远：具体怎么来做？

温铁军：我们进行这样的工作已经很多年，你可以上网去查。

许知远：您刚才提到，中国140多万赤脚医生没有了，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基层卫生防疫体系没有了。在之前这些系统为什么存在？

就我自己的观点，这次我们不是用市场的手段来处理危机，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温铁军：这个问题谈起来话很长。但是，如果你听懂了我关于不要再意识形态化的劝告，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简单来说是市场手段本身的问题。

我们以前在城市郊区的农村，也按照所谓现代农业的模式搞所谓的产业化，投资上“规模养殖”，比如万头猪场，现在大多数都已经搞得一败涂地了。首先是造成了大规模污染，很难解决。以前这完全是小农经济可以自行解决的问题，因为农民用的从来就是农家肥，做的从来就是生态农业。自从工业化要求农业提高规模以来，生态农业被破坏，污染问题就解决不了。举个例子，搞农业的人都知道，现在很多蔬菜和食品都不敢吃。

我认为，SARS实际上是工业和人口高度集中的“城市病”，是人的贪欲导致过度的发展造成的。这次发生，下次还会发生。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至今没有明白人类该怎样持续发展，西方已经经历了这么多教训，可我们仍然在走人家的老路。少数人已经对这一点进行反思，但理论界、新闻界还是很少有人谈到。

许知远：南北战争最大的成功是解放了黑奴，当时的林肯找不到军人，就找黑人加入军队。后来宣布解放黑奴，解放黑奴的一个原因是美国西部发展，不把黑奴解放了，奴隶主有可能把黑奴带到西部去。在中国，大家讲农民问题，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工问题，他们的生存状态比当年的黑奴稍微好一点。这次SARS危机，能不能把农民问题、农村问题

及农民工问题解决了？怎么来解决？

温铁军：你提问题的方式就有很值得讨论的问题。你先讲了一大段林肯解放美国黑奴，然后试图将它同中国城市农民或者农村的农民问题建立一个逻辑关系，实际上这个逻辑关系不成立。我们进城的农民工大量增加，恰恰是自由流动的结果，现在没有人限制农民的人身自由。而奴隶制最大的特点是限制人身自由。我们讨论“非典”对农民工的影响，也恰恰是放开了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以后，农民工进城才有的问题。看来，你得放弃你想建立的逻辑关系，我们才能讨论如何解决城市农民工防范“非典”的问题，否则无法讨论。

第十二章　财政支农的概念和问题[39]

一、澄清概念

（一）讨论现实问题不能意识形态化

前不久我刚开个会，也是针对中国一旦加入WTO以后，农业、农村怎么应对，农民问题会怎么样的问题的讨论，那个会是请国家各部门搞政策研究的人参加，几乎未请搞规范研究的人参加。因为，从1999年4月中美关于加入WTO谈判被美国首先公布以来，理论界关于WTO的探讨似乎很难深入下去。人们想当然地将WTO和改革开放画了等号。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被20年的发展过程证明为高度正确的话语，在这种话语之下，谁要是提出不同意见，谁似乎就有反改革开放的嫌疑。于是，关于WTO问题的讨论很难深入下去。人们就这样延宕了两年，似乎都在谈利呀弊呀，到底利大于弊呀，还是弊大于利呀？

其实，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农村、农民在国际化大背景下普遍受到冲击、挑战，农村经济凋敝，小农破产，大量流离失所，是形成城市贫民窟的主要来源，已经被近十多年的国际经验所充分证明。人们之所以不愿意多说，也许就是基于这种话语：加入WTO就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如果认为加入WTO，利大于弊，机遇大于挑战，那就是赞成改革开放；如果认为加入WTO，弊大于利，挑战大于机遇，可能就有政治上不正确的嫌疑。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讨论不可能深入，扯皮的说法太多。

今天，希望讨论财政支农这么具体的话题时，避免一个容易扯皮的倾向：把本来复杂的现实问题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化实际就是简单化、庸俗化，比如一个市场经济到底姓资姓社，或者一个改革开放是姓资姓社……什么东西一旦意识形态化以后，讨论就很难深入。所以我在发表意见以前，先要强调讨论的问题是个现实问题，跟意识形态没有关系，跟“保持一致”没有关系，跟政治问题没有关系，也跟理论研究没有关系，就是实事求是地研究现实问题。

（二）为什么要财政支农？

一般而言，财政是公共品操作的领域，那么财政作为公共品能否对

应农业，就要看农业本身是否具有公共品的性质，道理上这是应该首先搞清楚的。对我国而言，农业是否具有公共品性质呢？根据一般农业经济科学，农业是一个产业，但事实上，中国是个农村人口占70%的国家，小农经济遍地，并且长期以来一直延续着农业为工业、乡村为城市工业化资本积聚提供积累的过程。客观地说，我们应该看到农业本身具有相当大程度公共品的性质。

为什么呢？第一，出于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特别是郊区农业，具有明显的保护城市生态和环境的作用。第二，农村基本的资源就是土地，并不仅仅是一般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资料，而更主要的是农民生存保障的基础，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结构社会这样基本的体制条件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不向农村人口提供社会保障，天然地就把农村、农民的社会保障寄托在土地上。中国出现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并且这种分配，新中国三代领导人都强调是不要变的，比如土改时，曾经强调不变（当然后来变了），大包干说15年不变，现在说30年不变。不管后来怎么说，新中国成立50年中的三次大规模土地分配都是按人为分配依据的，可能当年毛泽东曾经设想过按乡为单位分配土地，实行大拉平，但即使是他那样最有权威的人物也做不到，因为无论哪个村，谁也不愿意别人占有自己的土地，所以基本上是按社区内部人口分配土地的。这样土地天然就具有农民的生存保障功能，因此就具有了社会职能。又由于任何政府，无论是中国政府或美国政府，都不可能对8.8亿这么庞大的人口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因此，中国的农村土地承载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的制度将是长期的普遍现象。我们测算到2030年至少不会变化。因此，从2001年算起，至少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土地承担农民社会保障的这个基本功能不会发生根本变化，政府不可能直接承担8亿多农村人口的基本保障，这也是不可逆的制度条件。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土地定义为生产资料，而要把土地定义为社会保障资料。

由于以上两个原因，其一，农业具有保护环境和资源的功能；其二，农村最基本的资源——土地不能被认为是纯粹的一个产业里的生产资料，土地这个农业中的主要资源天然具有保障功能和社会职能，因此，我国农业具有公共品的性质。

（三）农村的社会开支具有公共职能

毫无例外，在所有发达国家都是由政府和财政保障农村的社会开支的，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政府财政管不了，不得不寄托于农村经济自

身进行内部化的收益分配调节。也就是说，在农村社区中也发生了类似于财政的功能，亦即二次分配。因此，曾有人专门研究村社经济，研究乡镇政府财政以下的非正规财政，即村社财政有无二次分配的功能。比如说修桥补路，照顾鳏、寡、孤、独的人和处理生老病死的事，几千年来都是由社区自主承担的。现代制度下的政府，应该以财政二次分配来承担修桥补路，照顾鳏、寡、孤、独的人。可是，由财政负担、政府来承担这些公共职能，不过是最近几十年的事，也就是现代中国才有的现象。从长期看，哪怕整个20世纪来看，实际上财政上所能承担的农村的社会功能也是极其有限的，而村社这级本身就具有二次分配的公共职能。

请大家明确，如果再有人问：村社经济和村社社会活动本身，是否具有一定意义的公共品性质？答案是：当然有。所以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问题绝对不是简单的微观的农业经济领域的问题，也不是简单的农业微观产业领域的问题，因此才和政府财政有必然关系。

可见，要想说清财政支农，首先要把概念搞清，这里的支“农”，不是指农业，而是指“三农”。朱镕基也多次讲，他最搞不清的问题是“三农”，最对不起的是农民。政府最没有把握的、最没办法的，也是“三农”问题。

为什么？现在再看看，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到底是什么状况？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从全国范围推进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这样一种农村基本制度后，财政基本上不再承担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支撑，所谓历年财政用于农业的开支或支农资金，实际上主要是政府及其部门开支，是计划经济时期留下的涉及农业的各部门如水、电、供销、粮食、农业技术等相关部门的维持费用，是这些职能部门在财政的盘子里分配的所谓支农资金。

由于1985年、1986年前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人们很难在原来的政府计划经济框架内找到它的地位，于是政府就给它赋予了特殊职能，承担以工支农、以工建农、以工补农等职能。国家不再承担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交给乡镇企业了；国家不再承担农村基层村以下行政性开支，也交给乡镇企业了；国家也不再承担农村的社会保障开支，还是交给乡镇企业了。因此，由乡镇企业去补、去建、去支，同时允许税前列支1%，有些地方允许税前还贷。因为，所有支农、建农、补农资金是可以税前列支的，也就是说，当国家给乡镇企业赋予这些职能时，政策上

是以税前收益保证乡镇企业替代国家财政职能，企业是可以得到一定的税收优惠的。但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把这些优惠全抹了。从那以后，乡镇企业开始大规模私有化，全国范围内都如此。当然，改革以来，北京曾经在意识形态上抓得比较紧，理论界也一直以为北京是以集体经济为主，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包括北京地区在内的乡镇企业已掀起私有化浪潮。

假如说政府放弃了农村、农民、农业这些公共品的开支，把它交给谁了呢？80年代交给乡镇企业了，而在90年代中期时，我们盲目地照搬西方制度，认为所有的企业在税收政策上应该在一条起跑线上拉平。那好啊！你可以拉平，但请国家承担9亿农民的社会保障，把原来让乡镇企业替代的政府职能再重新承担起来呀！可是，相应的安排完全没有。于是乎，一方面没有任何优惠情况，另一方面金融系统不再给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不再给乡镇企业提供贷款，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乡镇企业得到的贷款大概下降到不到原来的1/3；因此，它的支农职能垮了，也因此，“三农”问题才越来越严重。

比如说现在的旱灾，已经导致了相当多地区的人民流离失所，怎么看待这个现象？请各位不要忘记，中国农业尽管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被强调，但它的地位还是相当薄弱的。过去，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那时尽管大量从农业提取积累，但国家财政算大账，用于农业的投入是逐年增加的，由于大江大河的治理，国家财政对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增加，农民的无偿劳动增加，北方的基础设施得到了大面积的改善，不再是有灾就减产，因为北方水利设施改善了，灌溉面积增加了，再大的灾荒都不怕了，所以导致从南粮北调改成北粮南运，整个国家的农业生产能力得到稳定的提高。而且，从70年代后期以来，再没有因为自然灾害导致过全国性的粮食供给不足。但是，80年代后连续20年，用于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占比是下降的，有限的投资又被大量挪用，用于楼堂馆所建设，这已是被审计部门查处过了的情况。

昨天，我刚从重庆回来。无论在贵阳、重庆，还是在所有西部省份的省会城市，繁华都不亚于北京，到处高楼林立，大量未完工的房地产项目正在上马，这些大都是西部开发资金。政府国债先上哪儿投资？当然先上城市。可见，政府还是在重演着过去的故事。

因此应该说，这20年的“财政支农”政策可以使人得到以下几个印象。第一，实际上是部门在分配资金，在养人，而没有真正用于支农。

第二，财政税收政策的改变，实际上迫使原来就有提供公共品性质的乡镇企业大规模私有化，也放弃了对“三农”的基本保障作用；财政不保证农村的公共品这块开支，才导致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出现一系列冲突和问题，才出现“三农”问题愈演愈烈。第三，最近的国债政策加大了对城市的投资力度，城乡差别的进一步扩大，是政府转嫁矛盾的结果。

二、中国“入世”以后的问题在哪里？

最近20年积累的问题，在WTO条件下会加剧。那么，中国“入世”以后的财政支农如何搞？

首先，我们当然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搞财政直接支农。如美国是最典型的保护农业的发达国家，以财政补贴直接保护农业，平均每个农民得到1万至2万美元。我们学不了，美国人口太少，农业人口仅2%。亚洲的发达国家如日本我们也学不了，日本农民占总人口的8%。我国的台湾省农民占12%。因此，我们很难说完全按发达国家、地区模式来搞我国的农业保护。

其次，当谈到绿箱政策时，我们发现中国缺乏操作绿箱政策的基础条件。什么是操作绿箱政策的基础条件？我们没有农村的基本生产单位，因为农村人口、劳动力太多，小农经济仍然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因此，我们强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定30年不变，不得不刻意维持这种经济基础。80年代强调15年不变的时候，就放开了城市农产品市场，让农民进城，目的就是要打破城市二元结构。打破要靠先放开城里的农产品市场，因此，1985年就有了“倒蛋”大军，有了“百万雄鸡下江南”等，这些被报纸炒作过的事件，那时出现了很多。但因为城市的农产品供给是和财政补贴高度相关的，比如，从80年代以来，北京大白菜一项每年补贴达3800万元，允许农民放开鲜活农产品进城，意味着财政补贴了差价的农产品没有销路——假如鲜活的猪肉可以进城，谁愿意吃冻猪肉呢？因此，以财政为首的城市各部门反对，城乡二元结构一直没有被打破。农业没有规模经济主体，西方通行的绿箱政策就难以操作。

1985年提出的第二步农村改革，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设计的就是打破城乡二元关系，以城市市场、鲜活农产品市场为突破口，但遇到了极大障碍。记得1986年我在沈阳调查，那里只开放了20多天的农产品市场，沈阳市财政就受不了，因为商业、供销、所有的基层门店一概向上告急，正常的城市经济流程全部被打乱了，所以像沈阳这样的大城市只

放开了20多天。

后来国家体改委（已于1997年9月终止运行）提出，农村第二步改革要从以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入手。但谁拿钱建社会化服务体系？面对千家万户的小农经济，你怎么服务？依靠现有的农机站、种子站、供销社、粮站、信用社、电管所、车管所等政府下设机构搞社会化服务体系？行啊，拿钱！可当时真没钱。1986年正好是通货膨胀上涨，财政赤字增加，财政拿不出钱来的时候。

其三，我们应该认真反思农村改革。当年，第二步改革以市场为突破口，但没有突破，以社会化服务体系为突破口，财政没钱。因此，从那时开始，农村第二步改革就停了，没再走下去。

15年过去了，对我们是很短暂，但对农村来说，累积的矛盾越来越复杂。累积到现在，比如贫困问题，20世纪末完成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但新增了l亿贫困人口——原来扶贫计划内的贫困人口降到3000万以下了，但新增了返贫人口。尤其是1995年以后，每况愈下。1995年，农村人均现金收入在零值以下的，只有1%；到2000年，农民人均现金纯收入在零值到负值的占16%。

这15年的教训告诉我们，农村第二步改革没有财政支持走不下去，而破解不了财政全额补贴城市开支这样的难题，到最后财政自己也走不下去。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不仅是农村不保，城市也不保了，不仅是一般生活消费不保了，连基本的社会保障不是也不保了吗？这种情况下，简单化地要求增加财政支农是不可能实现的。当然我同意农业部同志所说的财政支农一系列的任务，但过去的教训和现在的问题都是清楚的。当年第二步改革没有走下去，就是财政缘故，之后财政连城市都不保了，再让它支农？还是现实一点谈问题吧。也是因此，我才特别强调不要把现实问题意识形态化。

目前我们按发达国家的路子走不了，根据我们自己的现实情况难以真正与国际接轨，可又“入世”了，要遵守承诺，走不了别的路。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亦即宏观方面，看来暂时没有解决问题的条件。

三、“分盘子”体制：导致乡村公共负债问题的罪魁祸首

从微观方面看，农村累积的矛盾，到现在不是爆发的临界点，而是

已经爆发了。爆发以后，也还是找不到办法来解决。比如农业部张洪宇司长刚才讲到的乡村负债问题。这次我去贵州调查，随便走到一个镇，还是中上等水平的镇，镇本级公共负债已经500多万元，预计明年负债600多万元。为什么？因为现在“十五小”[40]还未关完，一旦一两年内“十五小”都关完了，乡镇负债还得往上走。因为，当年都是乡镇政府投资上的小煤窑、小水泥厂、小采石场、小冶金厂，不发达地区都是基层政府搞经济，利用当地资源上了一批小企业，为镇村两级农村经济服务。现在“十五小”要全关闭，原来的投资根本拿不回来，全部转成债务。以前的乡镇企业投资亏损已经转成债务了，以前的农民合作基金会被关闭也已经转成债务了，以前所有加强农村如“双基教育”“普九达标”这些上级财政没有给钱的项目到地方就全部是债务。还有其他所有上级下达的任务，包括纪念建党80周年，农村基层搞党组织纪念活动，谁给钱？只有转变成为公共负债。

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即使财政有钱了，也是“后任不理前任账”，谁让你上任欠账呢？跟我这任政府没关系。结果乡村公共债务越累积越多。

实际上，历年的财政支农资金很大程度上被部门分配占有以后，到基层几乎没有剩下多少，转化为一笔笔投资都要求下面配套，转化为基层负债，再转化为农民负担。比如说修水库，报纸上有个典型的例子，山西有个水利设施，欠了几十万元债务修水库，结果水库未弄好，漏水，成了废库，债务也瞎了；然后政府往各村摊，搞得怨声载道。

政府增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善良愿望，按目前财政投资渠道和投资方式，还能“支”农吗？到底“支”的是哪个“农”？且不说财政“分盘子”这样的做法支不了农，最后只能转化成公共债务负担，再转化为农民负担。即使政府确实有充分的善良愿望，大家都特别廉政，没有谁为自己争一分钱的利益，但这个善良还是无法操作：当你真从财政拿到一笔钱时，是支张三、李四，还是王二麻子？政府面对的是2.4亿农户，那么支谁，不支谁？

根据过去监测的调查，大部分财政资金，包括扶贫资金，结果支的是乡村干部或者干部亲属，一般用的都是各种名义——这个是党的活动积极分子，那个是团员青年带头人，其实可能就是他的老伴和闺女，都支他们家了，他们再雇两个工，就脱贫了，就致富了。然后支的就是各级干部的联系户，他们带你去看，咱农村贫困人口锅里有肉了，都挺好

看的。

这里有个经济学道理，现在讲财政支农时，似乎未注意农户已经分户经营了，集体经济已基本上解体了——北京郊区曾经维持了多少年，最后也没维持住，差不多也就那样了。一旦分户经营成为一种制度、一种现实时，你会发现任何自上而下的交易都几乎无法进行，因为交易对象太多，导致交易成本过高。据此，农村目前一盘散沙，支农？支谁？凭什么支他们？有人能审查这人为什么该支吗？该支王二麻子，他最好，不给张三，这没有道理。财政部门怎么考核？

于是，财政只好继续按照早期计划经济的办法“分盘子”，维持部门体制原状，因此，目前的财政体制——“分盘子”体制，基本上和原来的计划体制一样。也就是说，农村第二步改革未推进得了，因为面对这样庞大的财政做后台的城市经济体系无法推进。而这个体系延续到今天，15年过去了，又成了财政支农话题最大的障碍，怎么支？

四、财政支农的台湾经验

一般而言，要真正做到财政支农，有招没招呢？在概念、判断、分析后，应该说还是有招的。其实过去北京市在这些方面有相当多的成功经验——以我这些年对北京有限的了解，北京市过去在维持社区经济、在形成农村可作投资载体的单位上，本来是有经验的。我们以近邻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为例，很多人都去看过，我也去考查过。政府财政支农资金并不分配到各户，那是做不到的，尽管它人口少——台湾只有40万农村人口，与我国大陆8亿多农村人口不能比，但台湾40万农村人口也不是说每个人都得到财政补贴，这不可能操作。台湾有关部门只是确定下来支农资金是多少，因为法定的这块财政投资不能挪作他用，所以他们着急，每年几百亿台币的支农资金不知道往哪送，台湾岛小小的范围内实在是已经支无可支了，但它还是有些经验可取的。

第一，用于农村金融业务的保险。为什么用于这个保险呢？因为农民的合作金融是建在乡镇一级单位的（和我们1998年下令把所有农民合作金融关闭、掐死的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农民合作金融可以不仅限于吸收农民的存款，和所有银行的营业所一样，也可以吸收社会存款，在整个社区范围内是公平竞争。但是合作金融却没有税，就像我们原来搞的合作基金会不承担8种税费一样，这就当然让你产生利润。不过，利益的60%定向返还给社区范围内的所有农民。返还可通过绿色证书培

训、通过社会事业支出，整修道路、办敬老院、办广播、办各种活动，把60%的收益定向返还到社区，这就基本解决了农村社会开支的问题。经营风险找上级政府要钱给予保障，这是第一种。

第二，用于市场建设。这个市场建设，当然不是哪个大户，不是哪个私营企业家，而是农民合作社的市场。政府只对农民合作免税地放开所有的和农业相关的经营，无论是生产资料供给，还是农产品销售；无论是联购分销、分购联销，还是你用什么方式；无论是批发，还是专业市场。这些市场允许农民合作组织免税进入，而且政府投资定向用在这上面，以保证合作社以最低的经营成本来占领最大的市场份额。

为什么？如果不这样做，这些地方都是小农经济，成本必然高，农产品绝对没有竞争力，日本、韩国的农户能干得过美国大农场主吗？绝对干不过。但他们的农民协会办的超市顾客盈门，人们宁可买他们的高价食品。为什么呢？就因为政府从另外的思想文化领域也支持他们，经过多年的宣传，已经使国民形成一种共识：这是我们本土生产的东西，我们要支持自己的农业。因此，尽管日本的大米价格比美国加利福尼亚大米原来要高20多倍，中国台湾和韩国大米价格都比美国加利福尼亚大米要高多少倍，为什么仍然有市场？主要在于背后有政府，以支农资金撑着他们。合作社办市场免税，而且可以凭获得的收益补充你的亏损。如果纯粹讲市场经济，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地区的农业就不可能保得住。

因此，第二个重要的财政投资领域，实际上是定向投入合作社进入的涉农经济项目，特别是购销、批发、专业市场。让农户联合起来，成立合作社，财政支农资金只对这些农户联合的合作社，不对个人。

第三，对生产性的经济实体投资。但这些生产单位也都不是单户，而是蔬菜生产合作社或蔬菜生产企业等；政府如果找不到合作社性质的生产单位时，可以投入那些股份制生产单位，但政策是有区别的。如果投入的生产企业不是服务于社区的，不带有公共性质，政府投入就是入股，要拿利息；如果投入的生产企业是合作性质的，或者基本具有合作性质，政府投入只计股，不得计利息。政府即使占有50%以上的股也不能收取利息，因为你是公共财政，政府投入作股的目的只是保证投票权，保证企业不变成私有化，不变成私人牟利的东西——一旦改变为私人物品以后，它跟财政就没有关系了。私人物品带有公共性质时，财政才应该投资支持。

综上所述，财政支农一定要有规模经济单位作为载体。这个载体一是为农村社会提供基本支持，如农民合作金融，其保险体系要通过财政资金来建立；二是涉农的经营领域，特别是市场这块；三是直接生产，包括两种投资方式，一种是计股计息，一种是计股不计息。这取决于对方的性质：合作性质的，计股不计息；私人性质、股份制性质的，计股计息。

第十三章　找不到大学，找不到教授——教育作为“第三产业”的投资、收益与风险[41]

尽管我个人并不同意所谓“教育产业化”的提法，但起草本提纲时仍然认为有必要专门讨论现行体制条件下教育作为“第三产业”的投资、收益与风险。

之所以不得不做这样违心的分析，是因为无论官办教育，还是社会上热炒的民办教育、私立学校，实际上都有个如何分享教育部门垄断收益的问题。

一、为什么教育投资在中国会有比较高的回报？

人们不会否认，教育领域的投资机会，很大程度上源于多年来教育部门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形成的对教育资源的垄断。

因为，没有谁会去认真计算被教育部门无偿占用的、名义上仍然是“全民所有制”的资产收益，所以才使得能够通过寻租“进入”教育领域的投资者，多数得到较高回报。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恰恰是在部门垄断资源的条件下推出所谓的“产业化”乃至“市场化”，才导致严重的不公正和收入两极分化。

当然，这其实并非教育领域独有，而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普遍问题。

教育系统的资产来源本来应该是清楚的，有以下三个。

其一，改革前国家全额拨款形成了教育系统资产，“文化大革命”以后又在强调“全面恢复十七年”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在旧体制事实上不断强化的条件下，形成了学校借全民所有制资产获利的基础。

其二，改革开放以来，教育部门进一步以法律形式保障部门垄断利益合法化，以全社会被国家权力强制征得的税收，转化为财政对教育不断追加的无偿投入（包括以办教育为名大规模占有中国最稀缺的土地资源），形成教育资产和资产收益的增加，而这种垄断收益与其他垄断部门一样，主要在利益相关者内部分配。

其三，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公众在劳动力绝对过剩压力下对教育与就业形成很高的相关预期，随之，社会不断增加对教育的支出，使得教育系统凭借垄断的地位可以进一步得到社会公众为了购买其产品标志“文凭”而不得不支付的那部分支出。

我们的教育系统知识分子尽管有公众“话语权”，但也受“屁股指挥大脑”的规律支配，对分享以上三部分收益的事实，基本持默认的态度。

二、投资教育领域的交易成本和投资风险

因为，客观上是教育体制的过度垄断所形成的信息“不对称”，给了投资者以高收益的机会，所以，投资者的当期风险主要源于如何与部门垄断体制交易，远期风险主要来源于这种旧体制的弊病何时、怎样被革除。

从各地调查得到的案例看，投资者的“进入成本”主要产生于以下两个“交易”。

其一，如何以最低的“租金”满足教育部门的寻租要求，并得以分享教育部门所垄断的教育资源，包括“借牌子”、租用场地设备、使用教学与研究人员等。

其二，如何与地方政府谈判以最低价格占有土地，以占有土地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化所形成的超额增值收益。

目前，大多数投资者沉迷于较高回报，还没有“退出”的考虑。但在部分地区已经发生了“生源短缺”和招生大战。近年来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低于20%的现象（若计入研究生和出国留学生则高于80%），预示着教育也有资源不足和产品过剩的问题，当然也应该有投资经营失败或需要转移投向的“退出”问题。

三、终极困境

目前，院校知识分子之外的理论界关于打破教育垄断、促进教育改革的呼吁，与教育投资者基于获利目标而采取的交易行为，以及投资者为了保护既得利益而提出的要求之间，当然有本质差别。

占有话语强势地位的学者与具有资本强势地位的教育投资者之间，

目前还没有公开、认真地对话；一旦双方形成利益相关，教育的体制改革可能会朝更加不公平但却更加有收益的方向走……然后，我们的困境可能是：找不到真正的大学，找不到真正的教授。

第十四章　浅谈时尚话题：公司治理结构问题[42]

一、从背景提问：美国的金融危机与公司治理结构问题是否有关

在讨论公司治理问题的时候，特别值得国内理论界注意的，首先是东亚各国对公司治理原则开展讨论的背景[43]，亦即：这是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才普遍重视、开展研究的一个问题。因此，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公司治理问题本身和防范金融风险直接相关。西方学者近年来之所以强调东亚各国应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也是出于这个背景。

但是，也正因为这种观点事实上已经成为讨论的前提，我才认为有必要提出不同看法：并不是只要我们讨论了公司治理原则，或者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改善了公司治理结构，就能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如人们所说的那种高度相关，至少在目前看，仍然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特别是最近，当人们都看到欧美主导的国际经济在资本市场下滑的影响下，日益表现出的严重危机趋势的时候，难道不应该问：去年以来首先发生于美国的这次金融危机，难道也与发达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有关？

近年来人们现在看得到的文件和材料，大部分针对的主要是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东亚国家如何改善其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其目的都说是为了应付、防范金融风险。我感到，应该怎么认识公司治理与金融风险的相关性，这个问题还没有来得及认真讨论，从现在这些材料中，似乎还不能得出一个清晰的解释。

二、分析：西方企业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首先我们看发达国家的问题。2000年下半年到2001年年初，美国已经在强调“经济软着陆”。最近，针对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问题，我有机会参加了在美国和德国的讨论，今年年初也在香港参加了类似讨论。各国学者在讨论中强调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尽管是在这些发达国家，尽管他们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可能相对解决得比较好，但并不是说

这些公司就没有内部人控制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似乎表现得更趋于复杂。

去年在美国的讨论中就有学者指出，本来是为了防止内部人控制而给经理人以期权，但是结果未必如想象的那么好。由于经理人有了股权，就会更追求公司股票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所以他们的工作就更倾向于做好报表。而且，为了共同追求资本市场的短期收益，就连上级公司对于公司的检查，也越来越偏重于如何让这些报表推动企业股票在股市上走高。这样，反而使有些公司经理人为了追求股市收益而有意识地做信息欺诈。其结果是企业在股市上的反映似乎很好，公司内部大家的期权收益也有所增加，但是对公司的、对股东的长期利益，其实并不能很好保证。这些问题最终会在资本市场发生危机的情况下暴露出来。

也就是说，在近期看，东亚金融危机发生后，亚洲国家重视公司治理结构问题，似乎在仿照OECD（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国家的榜样，强调国内的公司治理原则的改善，而OECD国家自身却遇到了越来越严重的这方面的问题。由此可见，金融风险产生于金融资本这种宏观制度自身的特性，其能否防范，未必取决于公司治理原则这种微观机制是否完善。所以，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其逻辑上的相关性仍然值得进一步讨论。

三、中国的金融风险防范与公司治理问题

人们当然要看中国的情况。最让西方学者不能解释的矛盾是，一方面，很多人认为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防范金融风险的表现上相对比较好，甚至有人说中国是防范金融风险最好的国家；但另一方面，在公司治理结构上，人们的批评却集中在作为中国上市公司的主力的国有企业，其公司治理原则还没有条件执行，有些甚至还没建立起来。

必须首先申明的是，我并不认为以上关于中国防范金融风险最好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如果人们愿意以中国为例做分析，那么，这两个问题的相关性，当然也是值得讨论的。也就是说，我们到底如何看待像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企业改制所面临的问题，如何分析中国从国家资本向部门垄断资本转化之后国有企业产权的实质？其他东亚国家如泰国、韩国、日本，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也曾经受到西方较多的指责，一般认为他们的企业微观制度不好，因此导致金融风险或经济危机的发生。

而中国恰恰是企业微观制度问题比较严重的国家，虽然公司治理原则尚未建立起来，但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对其影响似乎并不像对其他完全市场化的东亚国家那么显著。可见，这二者到底存在什么相关，也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就我们最近一段时间跟国外做企业咨询的工作人员的交流来看，外国公司在中国的企业应被看成管理相对比较好、公司治理结构相对比较完善的典范，但是其内部人控制问题、内部人的行为不规范性问题，以及管理者的在职消费的问题等，也是客观存在的，有些甚至是比较严重的。这也与中国的国有企业有可比性，尽管这种对比的制度背景有鲜明的差别。这是因为，外国在中国的公司远离其股东，母公司的董事会也难以控制分公司业务，这种情况和我们国有公司的很多情况是可比的，只不过国内科研单位有条件做这些外企研究的很少。不仅我有这样的质疑，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新著中，也提出了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国有企业产权不同、问题相似的观点。他的分析之所以深刻，在于他正在接近对传统意识形态约束下的制度经济学的突破。如果人们的研究完全没有偏见，而且能够真正深入外国在华企业的具体微观管理问题，就能够发现其内部问题与中国的国有企业有些相似之处。

我认为需要提出的是，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在西方本来是不同的投资方式所形成的不同资本结构派生的问题，而中国的国有企业在资本结构上具有明显的部门垄断性质，事实上已经在参与国际竞争的进程中，与其他性质的国际资本结合起来。有鉴于此，人们为了防范金融危机而真正应该深入讨论的，似乎还不仅仅是一个公司治理原则不完善的问题；需要作为前提来提出的，应该是更为重要的全球金融资本经济运行的宏观体制问题，这当然包括中国在内。

综上所述，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很多学人表面上是根据经济学理念分析问题，其实是从现成的意识形态出发的；有些东亚国家尽管也是迫于压力才接受西方通行的判断，但接着就把这些原来似是而非的东西变成“共识”。如果我们也不假思索地认为就是企业微观机制的问题，就是治理结构不完善的原因，就会得出发生金融危机是自己的微观企业制度不好的结论。我看，这样的结论下得太早。

第十五章　农村财税、金融改革和贫困问题[44]

上一期我们出版的《中国改革（农村版）》的封面专题就是税费改革，我就先从费改税这个话题说起。

一、关于中国农村的税费改革问题

早在农村落实了家庭承包之后，有一个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现象就又发生了，就像大家唱的一首流行歌曲“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那么，我们重复了一个什么样的昨天的故事呢？

（一）交易费用问题

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新中国政权刚刚建立，党给全国农民搞土改，大家分了地。那个时候说是有4亿多农民，大约15亿亩地。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政府要想进行调控，按正常情况，就得有财政收入来源，就得征税。征税当然是个正常的政府行为。可是，有谁想过，假如政府面对这4亿多农民征税，起码应该知道谁挣了多少，才能决定谁该交多少，可问题在于怎么计算。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要面对4亿多农民去征税。这个情况在制度经济学看来，就是交易费用太高。制度学派立论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交易费用。当交易对象增大到一个特别大的量的时候，就会因交易费用增大而导致交易没法进行。所以，当政府征税面对农民这个交易对象达到4亿的时候，交易费用大到无法进行，就是很明显的常识问题。

有人说美国为什么能征农业税？对不起，美国是农产品大国，美国的农业纳税人叫farmer，那先得有农场farm，然后才能加er，变成农场主farmer。中国呢，没有农场主，中国只有农民，叫peasant。虽然他们有了土地，可中国农村的土地基本上不能叫farm，为什么呢？土地的大部分产出是供这个农家自我生存的。所以，我们把他们叫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交易费用增大只是其中的一个道理。第二个道理是传统的小农经济不可能适用现代税制。例如，有个农民，如果他家里分了8亩地或5亩地，他不会只种一种庄稼，得倒茬、得间作。要想这样，他就得种点稻子，还得种点麦子或蔬菜。如果在南方，一年得两季到三季。并且，家

里还得养些猪、鸡，或者养些牛、羊。因此，对这种小农，我们还不能一般定义为自给自足，还得加上兼业农，农户生产是兼业化的。中国农户大约70%以上至今仍然是兼业农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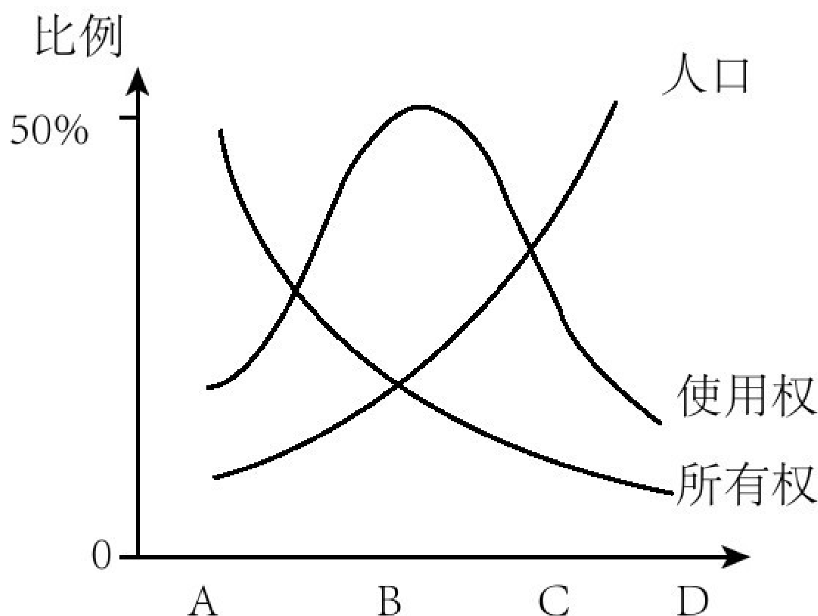
这就与西方完全不一样了。多少了解点西方的人都知道，西方的农民基本上都是专业化商品生产，养牛就养牛，种小麦就种小麦，种小麦的人不吃他们自己种的小麦，他们要买面包，因为他们自己不磨麦子。他们把麦子送到面粉加工厂，然后去买面包吃。养牛的人不杀牛，他们把牛送到屠宰场去。他们不是自给自足的，他们是专业农。西方的这种农业是完全商品化的。而我们这个兼业农，你怎么计算他那两头猪或者再加三个猪崽该交多少税？你怎么计算他那玉米，还没等棒子硬就砍了，然后做猪饲料？你算它是生产环节还是消费环节？养两头猪自己吃了一头，是劳动力补偿自己，还是算商品？怎么算？

因此就农村税制而言，中国与西方应该有很大不同。

中国就有这么大规模的农民人口，而且70%以上是兼业农，政府怎么征税？20世纪50年代这问题没有解决，就要靠合作化、集体化、人民公社化。高级社以后，农业税就不再重要了，而是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来占有农业剩余，这样问题就通过提高组织化解决了。但那是所谓计划经济，实质是严重剥削农民，所以后来被农民自发搞大包干否掉了。于是，今天的你我，就不得不又要重复昨天的故事，而且比昨天更严重，因为现在有9亿农民，大包干时有8亿农民。50年代有4亿，现在8亿至9亿，交易费用问题也更加严重。要这么生硬地把西方的征税制度搬到农村来，请问，能实行得了吗？

有人会说，这个问题现在没有办法解决，那旧社会为什么解决了？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只听说过赋税重，似乎没有人提到交易费用这个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土地的使用权其实是正态分布状态，如下图所示，A是地主，B是富农，C是中农，D是贫农，B、C是自耕农，他们通过租地占有大部分农地的使用权。而地主A占人口的7%～8%，占土地的大约50%。旧中国土地资源也紧缺，越是短缺要素其价格越高，因此中国的地租率高，谁能承受这么高的地租率呢？富农和中农，亦即自耕农，而不是雇农和贫农。



直到我自己插队下乡接触生产实践，才知道真的就是老中农的生产技术高。老中农当队长，这个队的产量就高，分的粮食就多；你要硬选一个贫农或雇农——当然贫雇农是依靠对象，阶级斗争搞得坚决，这都没问题，但是你让大家作为社员来选队长的时候，给候选者背后碗里放豆时，肯定是老中农碗里的豆最多。也许大队书记老百姓不能选，能力怎样也见不着，但因为基层的生产单位是生产小队，所以大家特别重视选小队长。

客观地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农村情况，这部分自耕农集中占有了大量的土地生产资料，因为他们人口相对少，生产的剩余量就大。即使地主，也愿意把地租给那些产出量大的，而不愿意租给产出量相对小的，这就是高地租约束的规律现象。因为土地使用权呈正态分布，土地集中在自耕农那里，所以，旧中国农村是有规模生产主体的。

我们讲农村规模经济，要看规模生产和规模流通两个主体。因为使用权集中导致的规模生产主体主要是富农和中农。那么规模流通主体是谁呢？是地主。他们占有大约50%的土地，一般要获取50%的地租（五五分成），这样大算账，农业产出的至少25%应该是留在地主手里。再加上地主往往会买好地而不买薄地，所以尽管占有50%土地，但那是

50%的好地，因此产出不止50%，应该在60%甚至更多。这样算，地主大体上应该占农业剩余的30%，而地主占人口的7%，他消费多少呢？就算他浪费，大碗地喝香油，大块地吃肥肉，也不过消费10%而已。更何况，旧中国地主大多数是“土地主”，土地主为了简单生产力的外延扩张，要更多地购买土地，所以他得节约，宁可吃点窝头。

旧社会的南方和沿海大部分地主多少在城里有个铺子，不是个什么米铺，就是个面铺之类的。有个铺子，地主就当然地成了流通主体。农民种地交租，假如地主得到了30%，自己消费了10%，就有20%上市，而且这部分以富农和中农为主的自耕农，形成了一条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链条。自耕农为了能稳定地获得土地，肯定是守信誉的，按时交地租，于是地主集中的这部分农产品就进入市场形成规模流通。那么接着的问题是：谁该是纳税人？当然是地主。所以，旧中国对土地所有者征税，而不对租地者征税，当然就不会有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交易费用问题。

在正常情况下，中国历史上长期维持农业轻税、低税制，以此保证稳定。那么，在什么情况下维持不了稳定呢？一是兵荒马乱，兵差大于正税；二是大搞基本建设，徭役负担过重。比如像秦始皇修长城，或是像隋炀帝修大运河、东征高丽，都必致朝代短命。

好了，我们面对的基本问题就是一个简单的制度经济学道理：政府征税，只有纳税者人数少才能征到，而不可能是普遍对所有8亿至9亿的农村人都征税。要想实行现代税制，并且以现代税制为基础，建立所谓的现代管理，我们现在叫local governmence（地方管制），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借鉴现代制度和现代管理，但那确实是建立在庞大的税基之上。

我最近刚下载两篇文章，一篇是介绍美国现代政府的，政府及其所属单位的人占整个就业的比重；另外一篇是介绍意大利的这个比重的，比重似乎都不比中国政府小。庞大的政府，庞大的制度，建起来的全套现代制度靠什么呢？我们说进一步应该讲清楚，你要想执行现代制度就得靠警治，英文叫policesystem（警察制度）。大家看美国电影，随便什么人，哪怕是个老太太，拿起电话叫警察：“你赶快来，我感到有危险，有人在我们家门口转。”或者你看《小鬼当家》，那个小孩拿起电话叫警察来：“我发现××××。”警察都得马上来。为什么？关系很清楚，这个社会的这套制度之所以有效，是靠你随时都可以让警察到门口来。靠这样一套警制来维持，需要多少警车、警棍、警枪、警服等庞大

的开支？别说现在，从中长期看我们都难以支付。

（二）税费基础

以上是第一部分讲的交易费用的道理。第二部分讲税费的基础。

我们现在多少农业产值？前天看了个统计表，今年（2002年）农业占GDP增加值份额预计15.2%，去年15.6%，前年15.9%，大致数字为15%。多少农村人口？第五次人口普查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3.9%，这是按居住地和职业分；如果按户籍算仍然近70%。那么，政府管理按户籍算，还是按居住地算？现行制度当然是按户籍算。15.2%产值，对应70%人口，怎么能对15.2%产值征税来满足70%人口的公共需求？

我以为，你们明白了这两个道理，就能够自己去找关于税费制度问题的答案。

二、关于农村的合作金融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农村信用社的问题。

有人问："农村信用社目前对农村经济有多大作用？存在哪些问题？应如何改革？"这是个好问题。

农村信用社存在的问题，从本质上看，和我刚才讲的交易费用理论其实是一样的。这两年做农村金融问题的研究发现，农户是兼业的、分散的，而商业化改制以后的银行和信用社是要求规模的。这两者之间同样存在交易费用过大的问题。例如，农民要买两袋化肥，需要借200块钱，找信用社，还是找农业银行？谁会愿意借200块钱，现在利息大约5%，200块钱的年利息收益大约11块钱，当然不合算。还有，怎么审查这个贷款？怎么监督？形成的风险如何评估？如何到期回收？而如果是个企业，要多少吨化肥，银行当然就愿意干。所以，银行经过商业化改制，肯定都愿意当主办银行[45]，追着大企业动辄给几百万元、几千万元，或者上亿元贷款，一笔贷款出去，就赚几百万元或上千万元利润，那多好啊！所以，越是银行商业化改制，就越要以规模来提高本企业收益。其次是风险大的问题无法克服。例如，有个农户想借钱买两袋化肥，上集市一看有赌博的，就去赌。赌输了，或是喝酒被人骗了，或者一看猪仔不错，买几头猪仔，没买化肥。回去一看，这猪仔是病的，很快死了……农业生产的自然性决定其风险是无限大的。因此，没有任何

一家保险公司愿意介入农业保险，因为它风险大，农户高度分散而且兼业化。

又由于农户经济有个重要特点，叫生产生活在户内合一。你说老太太在刷锅水里面倒了点糠，搅了点野菜喂猪，这是生产，还是生活？这半大小子拉头牛上山，坐在牛背上，吹个笛去放牛，让牛吃点草回来，这是生产还是生活？老乡上街去连着赶集、逛庙会，再买两袋化肥回来，这是消闲娱乐，还是生产流通？小农户经济条件下的农民行为，让那些学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人根本无法理解。

所以，商业化银行一旦完成了所谓转制，行为目标便随之变化：第一是必须追求收益最大化，第二是必然力图规避风险。因此，农村信贷资金严重短缺，根本就不赖农业银行，也不赖信用社。因为，给它的目标就是商业化转制，要按照商业银行一般规律运作，就必然出现一个现象，那就是离开高度分散的农民。所以，农村金融领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仍然是不可交易的。

无论是哪一种商业化银行，在农村中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水泵”，把农村的资金抽走。最近这一两年，农村信用社有很大改善，发展小额信贷，这是一种以组织化来降低风险的信用方式，就是组织借贷户建立联保制度，通过联保，一户欠款，十户共担。其实这条也不新鲜。我们都知道中国农村历史上的联保、保甲制度早就有。近年来收屠宰税时也有把猪头税变成人头税的。就是因为政府的收税办法必须简单，所以，给某乡下达了1000头猪的屠宰税任务，政府也没法算老张养了1头，老李养了2头，王二麻子养了3头，就干脆按人头来平摊屠宰税，猪头税就变成人头税了。所以，其实小额信贷的作用在于通过把贷款户组织起来，以联保的方式来降低信用风险，这个方式已经相对缓解了一些农村资金短缺的问题，信用社这方面做的改革还是不错的。

有人问：“应该构建怎样的农村金融体系？纯粹的生产合作金融由于内在弱势，在农村很难生存。”

到现在为止，有谁见过真正的合作金融？只有20世纪50年代初有过，最近翻历史资料看，土改以后小农经济全面恢复，随之是高利贷泛滥。因此政府动员农民，要么入10万元的股，再交5000元入社费；要么交100斤小米入股，加5斤小麦入社费。那个时候通货膨胀严重，l万元顶后来的l元。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到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按月通

货膨胀率是30%以上，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当年没有建立货币发行基础。大家知道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这个世界认同一个道理，就是你要想发行货币，就得有黄金储备，所以叫黄金本位。而在苏东计划经济国家叫商品本位，要想发行1元货币，必须生产出12元的商品，因为它把货币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定义为交换的中介，主要用于一般商品交换。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库那点黄金被蒋介石带到台湾，没有黄金储备，所发行的货币就是100%的毛票。那么我们有商品吗？对不起，那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业生产，你们说北京有什么工业呀？化学工业就是王致和臭豆腐，冶金业就是王麻子剪刀，食品加工业就是大串糖葫芦。没有工业就没有商品储备，拿什么作为发行货币的基础？由于这两条都不存在，所以才按月通货膨胀率30%以上。那时候，连国家的银行都要存白面、存白布，那就是“两白”。不是说真的把白面白布放在银行柜台上“你给我存上”，而是银行向储户承诺，如果你今天存的钱顶一袋白面，存上一年，一年之后无论一袋白面值多少钱，肯定给你的钱还够买一袋白面。银行都不得不以白面、白布作为一般等价物。

当然，那个时候农村金融体系确实没建立起来，那怎么能发展生产呢？大家都知道，资金是三要素——土地、资金、劳动力之中的龙头要素。没有资金，无法组织其他两种要素，除非你是自然经济。所以，政府当时就动员老乡入小米，或入票子，建立信用合作社。不过，维持了短短两年时间，最初让老百姓拿票子或拿小米组建的合作金融就归政府了。

所以，至少在这50年当中，真正的合作金融恐怕在中国就没有。

再进一步说，我们几乎无法在农业领域中组织单纯生产方面的合作社。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世界银行派合作专家到中国帮我们搞合作社试验的时候，就曾经很清楚地告诉我：纯生产领域的合作几乎95%都是不可能成功的。那么，什么合作能够成功呢？综合性的合作才有可能成功，因为世界范围内从长期20年的价格看，农产品价格基本上是向下的曲线，因此，单纯在生产领域中合作，其收益必然是低的，只有把流通、加工、金融、保险这四大类合作，与生产合作相结合，才有可能成功。

不过，单纯搞金融合作，我认为倒真的有可能成功，但我不太愿意强调这样的政策，我还是希望把金融领域的合作与生产、加工、购销、保险等领域合作结合在一起，组成综合性的农业合作组织，它才能用赢

利的部分去补不赢利的部分，才能保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稳定。

三、关于西部农村贫困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怎样解决我国农村特别是西部农村的贫困问题？作为反贫困的一大举措，西部大开发到目前为止收效甚微，怎样才能缩小收入差距呢？"

西部大开发问题，借用一位权威人士的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陈锡文研究员——一位在农村政策领域辛勤耕耘了20多年的同志，他说，东西差距本质上仍然是城乡差距。你到西部去看，无论哪个西部的省会城市都很漂亮，贵阳、乌鲁木齐、昆明、兰州……都是高楼大厦，街道宽敞，但是如果你到东部，哪怕从北京往外走不到100公里，就会马上见到贫困。就是广东这样高度发达的省，离开珠江三角洲四五十公里，甚至20公里就是贫困县或者贫困村。据说浙江现在经济最好，到浙西看仍然有贫困县。所以，贫困问题应该说不是西部问题，而是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或者说，主要是农村问题，是农民问题。所以无论东部、西部，最大的差距是城乡差距。

按目前情况看，西部大开发还很难有太多的专门针对农村问题的投资项目，当然这几年，国家启动了国债投资，大量地投入农村道路、水利电力建设中，包括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等，方方面面的投资不少，地方也增加了很多农村的投资项目，这应该说有助于缓解农村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困境。但是，这是否能马上带动解决贫困问题呢？还要有一个过程。

第十六章　面向小农经济的资金、市场与政策问题[46]

解决农村经济问题要有创新，要坚持贯彻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三个创新”的思路，尤其要有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因为即使能够按照原来的成功经验安排政策，也很可能仍然解决不了现在的农村经济问题。

一、银行商业化改革与农户资金需求高度分散的相悖

在坚持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进程中，银行的商业化体制改革要求银行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来判断其经营行为，从金融部门看这当然无可厚非。但从中国农村发展的需求看，则应该另外评价。因为，商业化的正规金融机构是不可能接受高度分散并且兼业经营的农户提出的资金信用需求的，商业银行和小农经济这两方面的对接有问题。我认为，农户经营高度分散是其根本特点，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也确实要求其追逐利润，规避风险，所以，银行和农户任何一方都没有对错之分。

目前的问题是，农村资金的短缺使之成为极度稀缺要素，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问题不是农户资金需求不足，也不是政府不想加大农业资金投入，而是市场化取向的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必然结果是要求退出农业。

农户的资金需求一般具有分散、小额化、周期长、风险高、不易监督的特点，银行如对其贷款，利润比较低。而任何银行所追求的利润只能来源于相对有规模效益的贷款。因此，这就导致了资金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不对称。不对称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银行没有办法了解农户的贷款需求，农产也不可能拿出详尽的贷款报告给银行，不可能走目前的金融程序向银行申请贷款。此外，农户没有资产抵押条件，即使可以用土地抵押，银行也难以收回这种隐含农民社会保障的抵押品。实际上，如果不使用特殊的或暴力的手段，就连高利贷者也难以收回农户借款时的抵押品。

从近几年对农户的整体调查情况来看，农户的存款增长幅度大于其贷款增长幅度，因此有大量资金从农村流出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表面形式就是农业银行及农村信用社吸纳农村的资金有所增加，银行给农户的贷款却是减少的。农民的信用需求能够从银行和信用社得到满足的只

占到24%，连1/4都不到，这就证明了我们刚才的假设：市场化导向的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必然结果是其退出农村信用领域，银行的资金供给与农户高度分散的，自给自足和半自给自足的，生活性需求与生产性需求混合在一起的，小额的，周期长的，风险高的，监督不易的资金需求之间信息不对称、体制不对称，其严重结果是导致农村资金要素的匮乏。

作为龙头要素和最具组织作用的要素——资金，如果退出农业，就会导致任何力图加大农业投入的政策措施都不能落实，增加农民收入的良好愿望只能落空。这就会引出一个问题：在整个国家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的同时，农业经济无法实现市场经济。这怎么来解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它调控的是什么？它是在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作用之下调控那些递减的要素，使那些边际收益可能递增的要素替代那些边际收益递减的要素。

那么，什么要素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呢？很明显，是劳动力要素，而资金要素是过度稀缺的。因此就必然会产生这样一种现象：在农村搞高利贷是最赚钱的。资金要素的边际效益是上涨的，但由于银行资金供给与农户资金需求之间的矛盾，资金没法通过国家金融部门进入农村，因此农村成为资金要素过度稀缺的一个领域。土地要素也不能增加，因为它是人均占有的，而且由于土地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所以土地要素的流转比例低。因此，尽管劳动力要素的边际效益降为零，甚至是负值，它也当然不能被替代。

因此，我们说，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发调控资源，在农业生产领域很难发挥作用，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控农业结构更有可能会出问题。当我们的政策取向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思路上的时候，农业、农村经济所遇到的困难与这种政策取向的善良愿望之间似乎就出现了不一致。

同理，中国的农村经济问题不能靠外资来解决。

20世纪90年代后期，城市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外资不断增加来维持的。

那么，农业经济的发展能不能靠外资呢？我的回答是不可能。因为，外资是不会投向高度分散的、自给自足和半自给自足的、生活性需求与生产性需求混合在一起的、小规模的、周期长的、风险高的农业经

济的。因此，可以说，既不能按照城市经济发展的思路来解决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也不能靠外部市场来解决农业和农村经济问题。

二、农村市场的成功与困境

简单地强调用市场化的路子来调整农业结构可能走不通，因为单纯开展农业的结构调整已经走到头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两次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导致农业主产品的成本在“天花板价格”（国际价格）之上。此后小农经济条件下，唯一能够维持农业简单再生产的内在机制，是农民在家庭经营内部，自己把劳动力的收益降为零，甚至是负值。在这种情况下，对农业的一切政策设计，包括政府对农民直接进行补贴，其效果都不可能明显。

从以往的经验看，一方面我们认识到，市场化的制度最早是在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被借鉴的，那时候的城市仍然在维持计划经济；并且由于政府对农村采取休养生息的让步政策，放开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因此，农村的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被设计好、被推行下去的，实际上是农民作为利益主体的条件下，自发地与农村传统制度结合，才发挥了市场的作用。

另一方面，后来农村发展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则与城市改革从原来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部门垄断体制，以及在国家大规模对外开放进程中部门垄断与国际资本结合有关。这显然已经导致农村经济外部环境发生根本改变。以往的教训表明，再单纯地强调农业的市场化改革，解决不了农村经济的复杂矛盾。如果政府真的想扶持农业，必须从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放开某些垄断领域，让农民合作经济参与进来。

三、适宜小农经济和中国国情的政策思路

第一，中国农村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必须用适宜小农经济的思路来解决农业问题。

首先要看到，我国的小农经济中，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其投入产出比下降为负值其实是个必然的过程。要想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就不能照搬西方，而东亚小农经济社会模式的基本政策安排——日、韩、台模式（即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小农经济发展模

式），是更值得我们借鉴的。“日、韩、台”模式的主要特点就是，对农民合作社采取特殊政策，放开农业外部规模经营。因为纯粹的农业生产没有规模效益，政府对农民进行补贴又由于交易费用太高而不可能补到每个单一的农民头上，因此，只能靠农业外部规模来补充农业内部收益下降的损失，政府只能是放开与农业相关的领域，让农民合作经济进入。与农业相关的这些领域包括：农村信用、保险、生产资料购销、农产品的加工，以及农副产品的批发等。所有这些农业生产外部经营领域都能形成规模、产生利润，而唯独种植业产生不了利润。外部合作经营所产生的收益必须通过合作社内部收益分配补贴到种植业上去，否则东亚小农经济从事的农业就很难持续下去。

其次是政府对农业的投入要针对那些有组织的合作社，而不是直接投给农户。这还是由于政府与单个农户的交易成本过高。近年来提出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税费改革等政策，都是以为政府可以与9亿农民进行直接交易的，其实50年的经验教训证明这是做不到的。政府能做的是，对农村的投入和补贴不是用于部门或者部门下设的企业，而是直接用于农村基层合作经济组织。比如，政府对合作社的农产品加工项目投入，政府投入可以计股（政府股权甚至可以占到50%以上，保证政府投入的资金不被私人占有），但不能拿回收益。政府股权收益只能通过合作社内部分配用于农业生产补贴和农村公益事业开支。

不过，即使我们采纳了“日、韩、台”模式，也仅仅意味着我们其实将小农经济条件下必然不断提高的农业生产成本消化在其他涉农行业领域返还的利润之中，而这并没有解决农业规模不足的根本问题（美国劳均土地面积为800多亩，中国仅为4亩多，相差200倍），中国的农业依然无法与国际上的规模农业去抗争。

第二，现在必须尽快启动城市化，否则就很难解决农村经济结构调整问题，也难以带动国民经济整个一盘棋的发展。

这已经是被政策理论界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谈了15年的老话题。按说已经没有再讨论的必要，当务之急似乎只是如何操作的问题。但是，如果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放眼全球”，如果考虑到21世纪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我所做过的关于加快农村城市化的分析，就变得几乎没有意义。因为进一步的分析是，如果按照199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定义的，将来在21世纪的国际垂直分工体系中，中国所能够扮演的，只能是以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生产最低价格的一般制成品的角色的话，

其结果可能要求我们只能像当年搞工业化的资本积累那样维持城乡二元结构，才能保证劳动力的低成本，否则追求高增长的中国经济就走不下去了。

如果人们能够对复杂经济过程的最后结果进行认真归纳研究，就会发现历次的中国经济危机都能软着陆，其苦果最终是由“第三世界”——中国内部的第三世界——广大农民来承担的。纵观中国5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最后的结论是很清楚的，我们现在的决策思路具有天然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合理性。

看来，如果不认真考虑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仅仅个别地讨论农村经济领域中的问题和对策，很可能事倍功半。

第十七章　西部开发的两个思路[47]

近来有些关于西部开发的文章提出了一个观点：西部大开发＝西部大开放。

尽管这种讨论意见到目前还只是停留在新闻界的炒作阶段，也许无碍大局，但我认为仍然有必要提醒各地和各界，不要让这种观点影响到“十五”规划的开发项目的实际执行。

一、西部大开发≠西部大开放

关于中国发展战略的讨论，一直有两种思路：到底是依靠外需为主，还是通过努力扩大内需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从近二十年的经济增长情况看，尤其从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后的五年看，进出口对经济增长速度当然有明显的拉动或抑制作用。1994—1995年经济增长的对外依存度曾经超过40%。从2000年前三个季度的情况看，经济增长的对外依存度再次提高到超过45%，一度达到约47%。这几乎比美国高一倍。

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密集的大陆国家，尽管不能自诩地大物博，但大国不可能长期走外向型的经济发展道路。

从长期看，中国必须以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为目标，下大力气扩大内需。而西部开发的提出，显然是为了改变最近五年过于依赖外需对中国经济发展形成的制约，本来就是一种有利于开拓内需市场的发展战略。

因此我认为，西部大开发≠西部大开放。

具体理由如下。

其一，江泽民总书记是在1999年6月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他认为我国西部开发将成为21世纪国家经济发展重大战略部署，并且明确地指出西部开发对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是重大历史机遇，因为这将给国有企业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间。其本意是明确的：西部开发是政府行为，如果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带动西

部开发，所形成的市场空间将主要对应解决国内民族工业的制造业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解决国有企业的脱困、生存与进一步发展的问题。

其二，政府财政来源于税收，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意味着用全国老百姓的钱为国家创造财富，为人民谋取利益，当然不是给外商牟利。何况西部开发中的基础设施投资相当部分还是政府举债。把这种资金用于对外采购是不合适的行为。

其三，西部开发如果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那么，国内基建原材料的生产能力和技术，以及工程的施工能力，相比于国外并没有明显差距。实行“政府投资，国内采购”的政策，既有利于促进国内就业，劳动力有收入又会产生“乘数效应”，还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改变市场疲软、内需不足的矛盾。

二、西部应该争取的政策

以上三个方面的道理实在是非常浅显的，能否实现关键看影响各级政府的不同利益主体的政策取向。

有鉴于国内利益主体多元化日益影响重大决策的状况，西部各地政府应该向上级有关部门明确提出政策建议，主要有三条。

其一，要求把国家计划内国债投资定向用于采购西部工业企业的产品，以提高西部企业的开工率和市场占有率。

其二，要求地方政府有当地资源的部分所有权和受益权，或者，如果中央有关部门继续维持对西部地方资源的垄断权利，那么应该给地方政府占有地方资源开发大于50%的股权，以形成地方政府在资源开发中对当地企业的采购。

其三，在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条件下，允许在西部有选择地放开地方金融，组织民间的股份制金融机构，同时允许建立地方的“场外交易市场”。如果全面推进有风险，可以先试点。

第十八章　毕节扶贫开发[48]

近年来，我曾经在贵州省毕节地区试验区3县1市专门做过扶贫体制改革的调查，以后又陪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经贸部等部门和机构的中外官员、专家考察了安顺、黔西南两地州的4个县，进行小额贷款扶贫的评估和项目调查。加上以前总共来过3次，总体上对贵州的扶贫问题有了一定的了解。这次应毕节试验区的要求，综合过去多年调研中的谈话和记录形成此文，目的在于立此存照，供后来者参考。如有错误，言责自负。

一、扶贫投资与财政体制问题

正如贵州有的领导同志所说，近年来贵州的扶贫问题实际上不是投资力度不够大，也不是政府不够重视，而是怎样形成合理的投资机制的问题，是怎样深化扶贫投资体制改革的问题。

我在调查中，对各县统计资料进行了相关数据的对比分析，认为贫困县的投资效率不高与财政转移支付有关。由于贫困县地方政府所得到上级财政转移的支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县级地方国有企业上缴税收的返还，就是把贫困县政府收的中央税返回来作为上级政府对地方的财政定补。这种制度在客观上可能形成压力，使得地方政府只好把地方投资、银行贷款等，更多地投向县属国有企业。因为这些贫困县的民营企业大多数还处在初期原始积累阶段，纳税能力低；而且企业不仅规模小，在布局上又是高度分散的，即使征税，成本也太高，所以只能靠对国有企业增加投资，以保证企业能够运转、上缴税收，再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返还给地方政府。

但是，全国的县级国有企业中的70%是亏损的，贫困县国有企业的亏损面更大。在这样的财政制度压力下，政府与国有企业好比打上了“死结”。对这些地方国有企业投得越多，企业就必然越多地依赖外延扩张，而不是深化企业改革。因为如果企业能继续这样轻易地得到新的资源和投资，就不会重视自身的改革和机制的转换，就会使无效益的投资膨胀、粗放经营的问题加重。这是贫困地区企业改革难以突破的制度因素之一。

实行这样的财政转移支付办法，虽然短期看使贫困县保证了基本开

支，但同时会促进地方政府更多地把资金投向国有企业。而本来有效益的民营企业和其他地方集体企业，以及开发性农业等，则可能得不到或者少得到投资；而且还客观上造成银行资金占压越来越严重，从而形成恶性循环的局面。

从全国情况看，资金占压过于严重、社会有效投资不足的问题非常突出。于是人们提出引进外资，贫困县则都提出要进一步吸引国内外投资。但是从近年来的引进外资情况看，贫困县的成绩并不如意。因为外来投资者必然要进行当地投资环境调查，其中重要的是评价地方项目的投资质量。显然，就贵州目前这种投资与财政体制相互作用所产生的问题来看，吸引外来资金仍存在诸多制度障碍。

二、基层组织薄弱与制度空白问题

如果说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解决不了贫困地区的发展问题，那么，哪怕是能够有助于贫困地区维持现状，也算是达到目的。可实际上，这个最起码的一般要求也不能实现。基层组织薄弱、制度空白，各级政府基本上无钱办事，是目前贵州和其他不发达地区都面临的问题。在农村，基层组织薄弱、制度一片空白的问题不解决，会引发更多更严重的问题，如人口政策落实不了，人地关系越来越紧张，就是因为基层没有一个可落实政策、可办事的执行机制。

这几次到各县调查，所到之处都尽力到村到户做访问。看到有的农民“有孩子没房子”，茅草棚子几乎要倒塌，家里破破烂烂；有的正在远处陡峭的山上烧荒。要找村干部不容易，即使找到了有的也说不清楚本村情况。有些乡镇的主要领导大多数住在城里，一般干部即使想管事，也难得有下去管事、办事的条件。这些现象可能是个别的，但确实发人深省。

尽管基层税费负担轻是好事，但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农村几乎没有保证国家政策落实到位的组织机制。在我们调查的贫困山村里，农民形不成正规组织，农村没有起码的组织和经济功能。村和组干部除了上级发的微薄的工资，没有其他工作经费，仅仅能做一些带路和民族语言翻译工作。其中值得重视的是，即使财政转移支付足额到位，也只保证核定编制内的县、乡政府人员开支。于是，有本事的人为了捧“金饭碗”，就尽可能往乡以上政府和部门里挤，编制外人员就得“想办法”才能吃饭。农村的公共品开支没有来源，公事没有人管，政府有关政策措施还

是落实不下去。

三、资源短缺与需求约束问题

更严重的问题是，人们习惯按照传统方式进行扶贫开发，但可供传统开发的资源不足，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潜力也有限。

比如“四荒”资源，政府统计的“四荒”面积可能与实际有出入，因为农民已经把能开垦的山坡都种了庄稼，大凡有一捧土的石头缝里农民都点上了玉米。如果把这样的“四荒”资源转让给投资者，就可能会引起和农民的冲突。这方面据了解已经有不少案例和反映，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从另一方面看，其实这几年大多数贫困地区都是利用现有的资源进行了结构调整。地方政府能够做的工作差不多都做了，应该说已经很到位，力度也很大，但结果受制于市场需求不足。各地无论让农民上什么项目，都可能出现“卖难”。

这也与全国宏观经济形势有关。1995年以来，中央决策层和有关研究部门也在讨论怎样解决全国性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因为全国产品积压现象相当严重，消费品工业普遍开工率不足。即使在浙江义乌这个全国小商品交易最发达的地方，也出现了“有场无市”的现象，新建成的大面积的市场上只有卖的，没有买的。因此可以说，需求不足对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同样都是严重的障碍。

近几年，由于国家大力发展基础产业，着力解决“瓶颈”制约，无疑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但目前出现的新情况是：不但一般消费品，连过去的瓶颈产品也出现过剩，也受市场需求不足的制约，煤炭、钢材、玻璃、水泥、木材等都积压，电力都卖不出去；过去说交通是“瓶颈”，现在公路、铁路运力也过剩。有人因此说，全国已进入买方市场，或称“市场需求约束阶段”。

联系到东部地区实施部分传统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动态，从一般规律来看其实也可以认为是“甩包袱”！既然在东部地区原本就受市场需求的制约，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照样逃不出市场需求不足这个框框。对贵州这种欠发达地区来说，按照“梯度理论”，确有必要跟着东部地区调整经济结构，但如果接受东部发达地区落后产业转移，接受过来后是否又

会受到生产过剩、市场疲软的影响（包括烤烟）？值得认真讨论。我认为贫困县不能按照“梯度理论”，照搬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模式，要认真调查研究，走出符合西部实际的发展路子来。

四、四点建议对症下药

以上三个情况都属于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省的决策部门和扶贫主管部门做了大量调研，可能已经研究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我认为有必要提出通过“综合改革，统筹开发”来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思路。目前要重视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不发达地区要加强县乡两级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改革力度

不发达地区所有地、县属企业都属于“放”这个范畴，越包起来发展越慢。只能通过产权制度改革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通过改革财政定补方式，切断国有企业和政府联系的“脐带”，彻底改变以往谁当县长都要尽可能地把钱往国有企业拿，越亏损越要拿的局面。这样做实际上是吃社会存款，越吃坏账越多，有效投资也就越来越少。

因此我认为，企业改制的前提是财政体制要改革，要解决政府财政、银行与地方国有企业联手吃社会存款的恶性循环。先抓试点，省级地方财政可以调整转移支付的方式，对贫困县保证财政定补额度不变，但不再只是让地方政府依靠国有企业上缴返还，而要考虑用另外的有利于企业改制的方式。这不是财政部门一家能够解决的，要党委加强领导、政府多部门的配合解决。一方面要有当年毛泽东带领红军从井冈山撤出来“不怕打烂坛坛罐罐”的改革勇气，另一方面也要妥善处理企业改制中的职工问题。

第二，企业改革中发生矛盾，实际上问题在于过去有些改制不符合宪法原则，忽视了劳动者剩余价值在企业资产中的份额，而不在于国有企业工人素质差、要求多。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中小企业要把让职工占有大部分股权作为改制的核心内容，进行以股份合作制改革为主的产权制度建设。

地方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一般搞租赁、转让、股份制都不难，因为至少上级主管部门在改制中有收益；但实践证明这种“资本统治劳

动”式的改革不受工人欢迎。对政府及其部门而言，尤其难接受的是职工股份合作制；因为这样是还权于民，还产于民。折中的思路是，政府主管部门占有一定比例（不超过15%）的企业债务核销之后的净资产，工人按照工龄和贡献来占有企业剩余资产；如果企业有效益或者有潜力，还可以规定让职工按1：1占有股权，即交现金与无偿量化各占一半（职工没有现金可以先挂账，不能强制收取）。这样做既有可能使企业资产规模增加，又不加大地方对县属国有企业的投资额度，有可能减少新的占压，把资金和企业都盘活。

（二）争取地方融资和资源开发权利，加强综合开发

在条块分割的体制条件下，贫困地区除向国家要投资外，党委、政府应该要特殊政策，主要争取两件事。

其一，争取地方融资权，或者能够海外上市吸引外资，就像发达地区在香港上“红筹股”的那种渠道。设计出贫困地区可能有开发潜力的概念、题材，包装到地方综合性的投资开发公司里面去，由国家特别批准海外上市。

前提是企业产权要改造，地方资源的产权也必须清晰。当上文所述国有经济改制和其他经济成分充分发展的改革发动起来时，就可以把各种各样的投资重新组合起来，组建投资公司或投资基金，形成可以在资本市场上进行交易的“产品”。前几年就应该争取贵州的资本经营公司在香港上市，因为一旦上市，就可以争取把地方资源开发的炒作题材上香港发“红筹股”，可以多筹集发展资金用于基本建设。这是直接引入外资，也引入了外资的思路和管理，实际上是引入了一个新机制。

现在按说是不缺资金的，全国社会存款5万多亿元，四大国有银行算账存贷相抵有几千亿元资金没有投放出去，我在“97贵州改革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讲到，贫困地区要优先发展资本市场，因为贫困地区真正缺的是资本市场。各地都搞交易会，可是靠交易会等形式吸引不来成规模的基本建设资金。根本的策略还是要发展资本市场。

其二是争取地方资源开发权利。现在这些权利是以国家为名的公司垄断。例如煤炭的开采，公路、铁路建设等，都集中在垄断部门手里。要争取在国家统一规划的前提下，地方有资源的部分开发权和受益权。

就像毕节地区，资源丰富但无权开发。贫困地区如果不把地方资源

开发权利争取到手，综合考虑开发规划，恐怕单独搞哪一项都难以奏效。毕节土地少，人多石头多；但有100多亿吨优质煤的储备，如果中央给地方以特殊政策，允许地方政府把绝大部分原来分别属于条条系统的扶贫资金重新组合，用来建立地方性投资集团公司，就能够在开采煤炭的同时，通过以工代赈形式组织劳动力挖煤、烧水泥、打石头、修水泥路。同时，在经过改造的公路沿线搞“长防”“坡改梯”，沿路办厂建镇。这样一来，沿路建设中受到工业锻炼的、最有可能组织化的农民就可变为城市人口。一方面农村人口减少，人地关系缓解了；另一方面小城镇发展起来，成规模的消费市场也就随之扩大了。这样不仅会取得预期的扶贫效果，而且会有效地促进贵州全省经济发展。如果不改革，仅仅按常规办事，那么这件事情分头切块到哪个部门去搞，都难以见效。

如果针对前面几个问题的改革能够做到，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争取特殊政策能够搞投资基金，争取到资源开发权，并能够有基金海外上市权，就等于争取到了内地办“特区”权，就可以用本地资源开发权利作为国内外融资的基础。说透了是要打破条条主政垄断经营的局面，这是真正切中要害的问题。

欠发达地区要改变观念，北京各部门或者国际组织的人来了就该吃苦，一定要让他们看最贫困的地方，让他们知道这里百废待兴，知道这些地方为什么要求资源开发权和受益权，理解地方政府的这种要求是完全合理的。

（三）大力发展包括集体经济在内的非国有经济

如果国有企业改革不力，则发展非国有企业也很难，因为绝大部分资金都已经投放在国有企业了。必须改变资金投放形式。不发达地区可以考虑以适当的优惠政策，鼓励外地和本地的非国有经济进入那些政府控制较弱的领域，或者国有企业没有完全覆盖的领域。比如参与地方资源开发、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副产品流通等。这样能够与开发过剩的人力资源相结合，产生可供分配的增量，借此把新经济主体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不发达地区发展经济，要靠政府和银行共同努力。有些坏账的责任应该由政府承担的就该让银行抓紧冲销。例如我们在调查中访问农民，有一户农民欠款3000多元，大部分是上级指令性地让农民调整种植结构时贷的款，结果发生风险出现亏损，要农民承担债务。客观上小农没有

多少剩余，不可能有偿还能力，银行给他旧债转贷，再往下债务越来越大，农民仍然还不了。谁也不敢和负债农户打交道，联合国的扶贫贷款也不敢再放给他。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地方、一个政府也是这样。看来政府是“现任不理前任账”，只能通过增加银行的呆账准备金冲销小农坏账的比例，才能提高政府和银行的信用。

（四）要把农村基层建设作为“第一等”的工作来抓

1984年以来搞财政分级承包，从中央一个财政主体，一下子形成了大约7万至8万个财政主体。原来大多数地方乡镇财政只是“过路财神”，并不是一级完全财政单位，现在财政部要求把乡级搞成完全财政，利弊如何，值得讨论。当然这样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性，但随之各个条条系统就纷纷下设延伸到乡，迅速膨胀起来，乡镇要养一百来个人。贫困地区也“一刀切”，全国农民要养活新增的大约800万伸手吃财政饭的人。如果上级政府补贴不到位或不能满足开支，就会变为乡镇企业和农民的负担。本来县乡两级财力就有限，抓村以下工作就更没有开支能力了。谁想改动，各个条条马上拿出红头文件，或者以撤资金相威胁，最后地方政府给条条“打工”。这种搞法对欠发达地区确实不利。

此处有必要引入贵州省湄潭县1995年起步的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因为这实际上是农村基层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那里的税费制度改革与减轻农民负担和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相结合，按照“人地分账”的原则，把人口增加应该承担的社会开支从过去笼统的催粮逼款中区别开，采取地税折实征粮、人费折钱收款的办法，一定二年不变，现在看效果不错。

比较彻底的解决办法是，要通过基层政治体制改革来减少吃财政饭的人的数量。或者可以考虑在推进税费制度改革的同时，把一部分经济总量小的边远山区或没有财政能力的地方，变乡政府为乡公所。如果在这方面有突破，则可以腾出干部组成工作队，重点抓基层村和村民组的制度建设。不过这个问题各地情况不同，恐怕要区别对待。中部农民负担问题严重的地方可以先搞，贵州农民负担轻，不一定这么做。

基层组织制度建设工作可以和小额贷款扶贫项目相结合。仿照孟加拉乡村合作银行的办法，利用小额贷款作为专业合作的启动资金。动员乡村干部下去把边远山区贫困户五人一组互相联保，得到贷款用于发展养殖业；五个贷款小组组成一个中心组（相当于村民组）；五个中心组

组成一个协会（相当于村委会）。按照这种形式组织起专业合作经济，例如组织养牛、羊，或开发桑蚕，农村就有经济规模，市场就有大宗商品，地方就有专业市场。龙头企业再结合进来，发展就更快。所以，村以下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如果能够和小额扶贫贷款结合，就可以较快地充实基层，强化组织，使之能够和基地、龙头企业有效结合，长期下来就能够保证党的政策落到实处。

上面几条建议的逻辑关系是密切的，希望能理解其中阐明的改革出效益的道理。如果这些建议能够在省、地级形成决策，对贫困县地方政府和干部就能够形成一种压力。总之，促使投资体制、财政体制、国企改革、资本市场发育、基层组织建设等形成一个完整综合的改革方案；再把综合开发本地资源，与通过资本市场建立融资渠道结合起来，即改革与发展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加速不发达地区的经济起飞。

第四部分

乡村建设与乡村试验

第十九章　我们还需要乡村建设[49]

所有不同意见的背后，其实都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化的制约，如果完全超脱意识形态，可能你就不再信那套东西了。我是已经撞得头破血流了，才不得不坐下来慢慢想才想通的，这是教训。

一、无法复制的现代化

中国的乡村建设，如果说我们现在考虑的这些问题算是热点的话，其实它早就热过了。

在巴黎和会之后，当中国第一次试图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瓜分世界的这样一场宴席时，结果是被赶出门外。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帝国主义第一次想把这个世界按照它的秩序瓜分的时候，中国就曾经试图通过工业化，摆脱类似于殖民地的原料、市场这种地位。那时的尴尬境遇是个教训：按照西方人所走的工业化、现代化的路，对它来说没有条件，西方列强已经把门关上了，不可能了。

其实今天也是这样，当中国产业资本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在全球具有第四位的庞大的制造业生产能力的时候，能否走西方工业化伴随着帝国主义化的这条路？如果不能，那么我们首先就得否定一个东西——要“解构现代化”，什么意思呢？

当不能按照给定的条件，沿着西方现代化这个既往技术路线（制度路径）去重复的时候，它就不是科学。这个“不是科学”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已经给了中国人狠狠的一击，让你明白走不了这条路。日本人想“脱亚入欧”，应该是欧美最好的学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人想走这条对外扩张的路，结果也被好好地教训了一顿。也就是说，产业资本必然扩张，这是规律，就带来殖民地的扩张，而殖民地的扩张就带来战争，这是一个规律，而这个规律中国人是不能走的。当你的产业资本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你想到世界上去扩张一下，门都没有。所以我说，现代化对中国人来说，它恐怕不是梦，也不是现实，它是一个伪科学，是西方人放在你面前的海市蜃楼。因此我就非常同意邓小平所说的“不争论”，不要去讨论什么主义。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不也是“不要去讨论主义，多谈谈问题”吗？

二、去伪寻真：中国仍然是小农经济国家

我们找的真问题是什么？第一个先得把伪问题识别掉，西方式的现代化对中国来说是伪问题，因此所有源于西方现代化经验过程的这些所谓的“科学”，对我们来说都需要重新认识。

必须讲清楚的就是，我们今天做的乡村建设运动不是从今天开始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做过，为什么那时候做了，今天还要做？为什么中国人要搞乡村建设运动，而且为什么在大陆搞？

就是因为中国不过是个超大型的农民国家，而不是地大物博。“地大”不假，“物”却不“博”，只有百分之二十几的耕地面积。跟我们国土规模几乎差不多的国家，像美国、巴西，它们的耕地占国土面积的比重非常大，而农民人口占的比重非常小，因此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无论谈美国经验、巴西经验，任何其他国家的经验对中国可能都不适用，因为中国过去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至今仍然是，户籍登记73%的人口是农民，大约有8亿9000多万，但是按照居住地的统计是64%左右，中间有10个百分点的差，拿去跟中国的总人口一比，就比出了1亿3000多万，那就是1亿3000多万人实际上并不居住在农村，已经进了城。这是一个工业化资本在20年中急剧扩张的阶段，其间仅吸纳了1亿多人。这就意味着，你可以很容易地画出一个曲线，工业化的扩张速度和人口城市化的速度之间，仍然是一个喇叭口。

我们当然知道，西方的工业化伴随着殖民扩张，欧洲转移出去1/4的人口，大英帝国（“日不落帝国”）转移出去1/3的人口，而这些转移出去的人口，基本上是过去的农民、贫民、罪犯，是那些在这个国家造成不稳定的因素。我们能这样做吗？大家都知道不可能，那我们怎么做？20世纪20年代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产生了一批改良主义者，像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这些人，他们要去进行乡村建设运动？因为当时的人们就已经看清楚了，你走不下去，你想走人家也不会让你去走，那怎么办呢？必须考虑到可能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部分人口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农业生产领域之中，停留在传统的农村社区之中，仍然是小农经济，不可能随着我们憧憬的那个“墙上的画饼”——现代化，去实现它，不可能把大量的过剩人口转移进城市。中国现在仅仅4亿左右的人在城里生活，就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城市病——大规模的污染。至少在我们这代人可见的将来，大概是在2030年前后，中国人口是增长的，还不会下降。而这个人口的增长就靠城市化来吸纳。到16亿人、18亿人的时候，

就算实现了50%、60%的城市化，还会有7亿到9亿的人生活在农村，仍然是小农经济，只不过土地更少，资源更紧张。

中长期看，假如这个问题不能解决，那么中国的乡村建设问题就始终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所以我说，2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经验今天没有被我们很好地认识。其实当年发生乡村建设运动的宏观前提是：第一，“一战”以后中国不能参与世界势力范围的重新瓜分，内部矛盾开始激化；第二，恰恰是那个十年——民国史叫“黄金经建十年”——工业飞速发展，经济急剧地增长，十年的经济高增长期间，出现了中国大陆自追求现代化以来的第一次乡村建设运动。那一代的知识分子绝对不比我们傻，他们早就发现了，早就投身其中了，而且比我们更有奉献精神。像晏阳初先生，美国博士，回来以后能够举家迁入河北定县，在那里搞平民教育，搞乡村建设，这种精神我们有吗？不光是我们没有，我们担心我们的下一代也没有。

三、工业化与被剥夺的农民

客观地看，那时候大多数人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这么广泛地让人们相信现代化是多么美妙的一张图画，让人们去憧憬，一门心思去往里面钻，哪怕它是墙上的一幅图画，让你撞得头破血流，还要去撞。如果不把现代化解构掉，是不可能让人们明白为什么要搞乡村建设的。为什么工业化会带来乡村建设运动？那是因为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必然是加速内向型积累、内向型剥夺的，就是因为中国人走不出去，没有那个“坚船利炮”，没有那个铁爪子，不能伸手掠夺。拿不到别人的东西，只能拿自己的。拿谁的？拿农民的。历史就是这么写着的，“黄金经建十年”的高增长就是剥夺农民，同样，也伴随着农业的商品化率的大幅度提高，同样伴随着现在我们所强调的农业产业化（区域化种植、专业化生产），这为工商业资本进入农业、金融资本进入农业创造了条件，加剧了对传统小农经济的剥削。它是一种增加的剥夺。历史早已证明，它是造成农村解体、小农破产的一个重要原因。

并且，它也当然带来了和传统小农生产最大的不同，就是一旦专业化、区域化以后，风险大幅度提高；而又没有谁——无论是政府还是公司——来为这种增加的风险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于是这个风险就必然由被摔得头破血流的小农来承担。再于是乎，这些贫苦小农就不得不铤而走险，这个社会就盗匪横行。如果是现在，则可能被称为“恐怖主

义”。

四、不谈主义，只谈问题

我们实际上仅仅是改良主义者，和当年的乡村建设运动的这些先驱者一样，是主张社会改良的。我们不会做任何“斗争”，那些农民革命对我来说，已经是过去的那个世纪的事情了。我们只希望已经形成的大资本，无论是金融资本还是工商业资本，别太不顾13亿人的福祉和生计，恳求他们“拔一毛以利天下”，不要完全不管。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租界就有相当多的这种人。一是清末的失败的洋务运动的遗老遗少，一是北洋政府的那些贪污腐败的官员，他们可以移到租界。这类似我们现在大量的所谓的“资本外逃”。非规范的或者非法的资本外逃，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垄断、通过权钱交换所形成的非法收益。他们到国外那些资源相对宽松的地方，给自己买一个安身立命和后代可以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留下的就是资源的短缺、环境的恶化和国内人们的不可持续，大概是这样一个类似的过程。

因此我说，我们现在的大陆乡村建设的思想和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的思想，其实无所谓异同，可能只是国情矛盾更严峻一些罢了。假如我们放弃任何主义之争，不谈主义，就谈问题，我们就会看到，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这样的。

五、解构政府“守夜人”

武力主张自上而下，求得上面的政府尽可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于建嵘的观点是希望自下而上地发育组织。无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只要有效都可以，但是有一个误区。

我们再解构一下政府“守夜人”。一般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都认为政府应该是一个“守夜人”，是一个调控主体，但是中国自从1840年被打开国门以后，从开始意识到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后来认为不仅要“法器物”，而且要“法制度”，政府的认识比较早，包括慈禧太后本人都认识到，中国是要学习西方制度的。没有学的是哪一块呢？就是把政府完全独立于经济之外，后发国家（包括巴西和拉美的一些国家）其实都是政府主导、在进入工业化的时候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因此使政府成为经济主体。

按今天人们都接受的道理说，“大包干”是农民从政府经济中退出；我不敢苟同！“大包干”是政府从不经济的农业中退出。同样的道理，假定我们认为政府是经济主体，政府就不可能承担调控和守夜人的责任，它首先为自己追求利润最大化来服务的。那么，指望着在什么情况下，它能够变成一个完全独立于市场之外、超然于经济之外的这样一种政府？恐怕仍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六、重谈乡村建设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我们还不能简单化地说它失败了，因为它的条件变化了。在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经济迅速崛起，但亚洲不可双雄并立，日本必然要跟中国发生战争，因为市场和资源是有限的。其实从新文化运动以后，无论是教育救国论、实业救国论还是乡村建设救国论，这些都是改良主义的。只不过，所有的改良主义当中最不被当时的中央政府接受的是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建设运动被谁接受呢？被地方政府接受。为什么呢？因为地方政府有大量的地方基层问题要解决。无论是梁漱溟去说服韩复榘这样一个五大三粗的老军阀，还是晏阳初去改变地方的乡村政府的政治结构，这些做法的前提条件都是很清楚的，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利益的分化了。虽然我们认为是抗日战争导致条件变化，不能说它“失败”，但是应该解释，为什么战后它也不起作用了呢？因为接着是土地革命战争，革命胜利以后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土地平均分配了，政权民主化了。所有这些目标都实现了，为什么还要搞乡村建设运动？没必要了。晏阳初的那个乡村建设学院就挪到菲律宾去了，其他没有搞土地革命的这些国家的人要继续接受晏阳初的思想训练。

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重谈乡村建设？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搞了“大包干”之后，就是恢复了小农经济。我们搞农村试验区是1986年开始的，当时就讨论，我们干试验区，要不要和早年的乡村建设派比较？认定的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情是相似的。所以我们当时就去图书馆把二三十年代的资料复印回来，就想将来我们做了几年以后，可以做比较研究，看看我们干得怎么样，两代乡村建设派干了什么。做到十年之后，我和那些在圈里面的人讨论的时候说，“我是个失败者”。这个时候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了，我开始总结，然后做比较。所以我为什么说，中国内地的乡村建设，不是个新事儿，是个老事儿。20世纪发生过两次，两次都不能说失败，但也都不能

说成功。

七、农民最懂

我们讲发育农民协会，本来就是想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所以一开始谁都明白，农民比你清楚，这个不用教他们，我自己就是插队出身的，在基层成长起来的，这事儿不是问题。我们所说的“自上而下”是指的当资源大量地被抽走的时候，只要政府愿意改良，就可以自上而下地把资源摁下去，这是短期内可以缓解矛盾的一种办法。而目前，至少政府是懂这个道理的，因为在20世纪的100年里面，前50年是农民自己打了三次土地革命战争，所以后50年每一个领导班子上台，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都得给农民重新分一次地，这一条政府是明白的。我近年来搞杂志，为什么要办个农村版，就是要把中央文件、政策、法律摘成一条一条，配上案例发给农民，就是给他一个维护自己权益的武器。这不是要农民搞革命，而是让他们了解一点自己起码的国民待遇。

当权力、资本和知识（具有话语霸权的知识分子）结合的时候，弱势群体，被边缘化的这部分人，连自己的话语都建立不起来，更遑论这个话语成为主流话语、具有政治正确性？所以我们说，现在的中国农民问题是“农民最懂”，是的，他当然最懂，但他实际上并没有话语的建构权，也没有使农民的话语成为主流话语的这种政治能力，因此才有这些知识分子去和他们结合。

八、再谈解构现代化

无论讲咱们的台湾，还是讲韩国、日本经验，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归纳过，叫“日、韩、台模式”，实际上就是综合农协模式。还有另外的经验，比如说以色列的基布兹，都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的，因为政府有需求。最初如果没有日本为了战争的需要稳定农村，那它就不可能建立农协；日本占领韩国和中国台湾后，把综合农协模式推广到了韩国和中国台湾。可见，这些经验都是明显有政府背景的。再看以色列的基布兹这种组织形式，有人说以色列立国之初，基布兹曾经占到百分之七八十的比重，谁干的？也是政府干的。为什么？Forsettlement，为了定居。要占领这个地方，必须用准军事化的基布兹这种具有高度组织化、公社化特征的组织，来完成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扩张、定居、占领，这是自下而上吗？不是，但它有效地形成了以色列的版图。

我提出解构现代化，为什么我一定要先把这个现代化给解构了，是希望大家认真反思。你逐渐会明白：所有这些不同意见的背后，其实都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化的制约，如果完全超脱意识形态，可能你就不再信那套东西了。我是已经撞得头破血流了，才不得不坐下来慢慢想才想通的，这是教训。

我再说一遍，我只不过是失败者，当年那么认真地搞改良，也没成功。

第二十章　改造我们的学习[50]

一、重要：为什么强调“改造我们的学习”？

《改造我们的学习》本来是《毛泽东选集》收入的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一篇文章的题目。现在借用这个题目来谈改革试验区的工作，意在结合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和对试验区工作的要求，强调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以使我们在改革试验区的工作中能够自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指导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科学理论，是伴随着中国知识阶层在“新文化运动”中对“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的追求、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引进而产生的。因此，我们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思想理论体系，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源于西方的科学及其背后的科学哲学，如何与中国的实际和中国的传统理论相结合的问题。

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居于绝对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客观上也有同样的外来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众所周知，这个问题至今并未解决好。因此，无论是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还是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都曾经老实不客气地告诫人们：我党真懂马列主义的不多，所以才容易上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当……既然如此，即使是对于从斯大林那里翻译过来的、以马克思主义为名的、过去被认为是正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同样也有如何清理在假马克思主义骗子或其他不合国情的理论指导下所形成的伪科学的问题。在没有做认真的清理之前，有些理论家认为，强调国有企业占绝对比例就是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因此反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而另外的一些学者则在主张市场经济的同时，“倒出脏水连孩子一起扔掉”，甚至是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公开主张资本统治劳动。这两派主流学者无论怎样争论，无论哪派占上风，都不利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因为中国至今还是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对比例的农民国家，无论什么外来思想理论，都必须合于国情，也就是要能够解释中国的农村问题，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理论界至今对于中国农村问题的认识还不够深刻。由于中国革命实

际上是农民革命，中国的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又被称为三次“土地革命战争”，而土地制度问题正是农村问题研究的基本内容之一。因此，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的科学理论研究，不仅不可能独立存在于社会科学所具有的阶级属性之外，而且其基本内容本身就使农村问题研究的时代特征、政治特征比一般的社会科学领域更为明显。

我们可以从20世纪初以来的农村问题的主要观点讨论的情况，来分析农村发展的基本脉络。

孙中山早在发动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初所提出的纲领中，就以“平均地权”为重要内容之一。但是不久之后他就认识到：中国农村社会的不平等其实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分”，于是，发动不起农民革命的孙中山转向联络“会党”起义，最终还是使旧民主主义革命沦为被军阀利用的割据战争。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同志，在20世纪20年代做农村调查，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充分肯定农村中的“痞子运动”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理论依据。从那时起，他在早期的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革命历程中，尝试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来平均地权，但却“扩红”30万，而“苏维埃”式的革命终于未果。到后来毛泽东历经艰苦长征，几次选择目的地才发现陕北；而其后仅以3万军力在陕北贫瘠的乡村立足，以“延安山沟里也能出马克思主义”的意志力战胜了王明从莫斯科照搬的苏式马克思主义，并终成正果。究其原因（排除抗日战争这个外因），把“分田地”改革为“减租减息”，把“打土豪”改革为承认“李鼎明先生是个开明士绅”，亦即保持农村基层传统的社区精英自治，应是其中的关键。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就是我党同王明的苏式马克思主义斗争的产物。

20世纪30年代，几乎就在中国以农民为主体的共产党从鲜血凝成的教训中，逐步纠正从西方的共产国际批发来的“左”倾错误的同一时期，中国知识界曾经有过一次较深刻的讨论。一批注意研究国情的左派学者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或称“亚细亚形态”的问题，其意在于引证马克思晚年自省对亚洲古代社会认识不足，因而不能以自己源于摩尔根和达尔文的有关论点，来分析中国不同于西方五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特殊性。这本来对于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是一线希望的曙光。因为以原始灌溉农业为生存基础，以“群体（家庭）”为社会基因的东方古国，其社会发展过程的确有别于以原始狩猎、采集和畜牧为生存基础，以“个

体”为社会基因的西方。我之所以持此观念，还因为我曾经带着这个问题，在搜集了收藏有大量人类文化遗产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和巴黎的卢浮宫的历史资料后，认真地做过观察对比。人类从原始氏族共有制社会向古代封建国家制的社会过渡的历程，东西方差别十分明显。因为人类在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不同，形成了不同结构的社会：西方是以个体为基因的社会，东方尤其是中国，则是以群体为基因的社会。中国的第一个国家政治形态“夏朝”，产生于“夏禹”带领农业氏族公社对黄河水害的成功治理，而非阶级压迫和战争掠夺，当然也就不会有类似西方的奴隶制国家。

但30年代那次讨论的结果是，随着这批学者被打成“托派”，学术界有关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如何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深入讨论，也因之中辍；而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由于明确了中国也与西方完全一样，存在包括奴隶制社会在内的五段论进化模式而备受赞赏。同理，后来薛暮桥在经济科学领域的崛起，当与其在农村调查中提出“20%的地主占有70%的土地”这样的重大判断，从而为大规模“土改”提供了理论依据有关。

另一方面，自20世纪20年代起，就像那些力主“科技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学者一样，一代又一代主张农村社会经济制度渐进改良的研究人员，始终在为推动适合中国小农村社实际的农业经济科学的发展而默默无闻地工作着。以梁漱溟、晏阳初为首的中国“乡村建设派”知识分子，在军阀割据、土匪横行的环境中，坚持下基层进行农村“试验区”的实地研究工作；30年代费孝通等人身体力行开展农村调查等。他们当年之所以未成气候，并非学术水平问题，而在于这种研究的确不能服务于革命，不能印证阶级斗争理论，也不能服务于国民党所代表的官僚资本统治。因此，他们在20世纪上半叶始终是“非主流派”。不过，如果今人能够站在前人的肩上思考问题，就应当明白，一个阶级在取得政权前后对革命和改良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说，革命成功之后的统治阶级，更倾向于采取“改良”作为社会整合方式。因此，过去的“非主流派”，应该是现在的“主流派”。

邓小平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曾经在20世纪60年代初和80年代初两次主张恢复农民地权。第一次他失败了，并且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第二次他成功了，并且进一步否定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于是，正如胡耀邦所形容的“一镢头刨了个大金娃娃”，在1982—1984年，农民

以“大包干”为名重新获得地权之后，突然打破粮食产量长期徘徊、农产品供给长期匮乏的局面，国民经济危困局面得以解脱。由此，被称为“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良运动随之全面开展，中国也终于出现了令全世界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

以上分析试图说明：中国历来走着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自从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停止过结合本国的国情对西方经验和理论的探讨。因此，当前或今后一段时间发生一些理论界的争论也是正常的。而且，从我们这些年在实践中产生的感性认识出发，可以认为无论哪一方面的理论都还需要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就我们的农村经济而言，理论界至今还在混沌之中，尚未见成体系的、确有指导作用的理论产生。这和大多数知识分子长期脱离实际，既不下乡调研，又不了解国情有关。基层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大可不必被那些自说自话的人搞乱了方寸。

二、亮剑：全面提高对农村改革试验的认识水平

从1987年农村改革试验区创办起，我们已经在这个有利于直接从事理论见之于实践的实证研究岗位上，坚持了十年。所谓十年磨一剑，今后不能像毛泽东曾经批判过的，仅仅是看着这把剑连说“好剑、好剑”，而是要扩大试验范围，推广成功经验，指导农村改革，促进经济发展。这就要进一步提高对改革试验的认识水平，对此我认为主要是提高四个方面的认识：一是分析基本矛盾，二是把握发展趋势，三是紧密联系实际，四是不断深化改革。

（一）基本矛盾分析

中国农村发展有两个基本命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三四十年间农业经济体制的轮回，或称螺旋式进步，就像是在农村这个广阔而透明的大实验室里做了一次试验，让人清楚地看到了客观经济变化的全过程，有益于我们作为后来者的思考。

1.基本国情矛盾与土地问题

以农民（包括地主、富农）按人口平均占有地权为基本内容的“土改”，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即解放战争）的结果。此后历次关于农业

经济的重大政策调整，几乎也都与地权有关。

互助组维持农民地权不变，以自然村为基础建立的初级农业合作社，也允许农民享有土地入社的股权。而从打破自然村（氏族村社）界限，兴办高级社开始，农民则基本丧失了地权。但是从1957年到1962年，仅仅过了5年，在那次导致全国性饥荒的灾难的压力下，农业政策又调整成“队为基础”，亦即自然村为基础；同时还允许“三自一包”，亦即还给农民部分地权。最后，终于还是以“大包干”的形式把土地的大部分产权还给了农民。现在，许多地方进行的股份合作制，中心内容仍然是以农民土地作股的方式来体现并保护农民对土地的基本权益。而一些地方发生的政府与农民的重大矛盾冲突，也大多发端于或包含有滥占或低价强占土地的问题。

结合上下五千年中国农业文明史，我们不难发现，小农村社经济传统与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基本国情矛盾相辅相成。正是由于这个“农业中国”的国情矛盾制约，历史上大的事变往往是人祸甚于天灾，往往是豪强大族占田导致“不患寡而患不均”，或者政府大兴土木、连年战争，导致徭役赋税过重引发流民四起、社会动乱。这时若遇天灾、外患，必致“改革中兴”或改朝换代。而其后的第一国策，也往往都是“均田免赋”。所谓“汉唐盛世”，无不与当朝“开疆拓土”扩大了农业的生产力外延有关。

满人入关后，以少数民族身份维持了近300年统治，不仅在于其迅速地改“跑马占荒”为全盘承袭“农业中国”的道统，更为重要的是，清初在疆域广大的资源条件下，一方面“移民实边”，另一方面宣布“新增人丁永不加赋”，在全国范围内大幅度地调整了人地关系，从而出现了“康乾盛世”。

晚清以降，先是列强入侵，割地赔款，之后又是军阀混战。随着人口的增加，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率已经大幅下降，贫富分化相对加剧。尽管清初开疆拓土增多的农业资源已无作用，但氏族村社内部均衡分配、稳定小农生存这种内部化制度条件下的农村社会，似乎仍可维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侵略中国和两次国内战争造成数千万人口减少（为总人口的20%～30%）。这些调整性变量都影响着人地关系，并出现了明显的区域差别。其直接表现是尽管南方佃农多，北方自耕农多，但农民生活水平却是南方好于北方，因此农民革命在北方形成决定性力量。

再后来，革命成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以“土改”为名给农民按人口分了地；邓小平以“‘大包干’15年不变”为名又给农民均分土地。中国的第三代领导则是“萧规曹随”，向农民宣布了“土地家庭承包权30年不变”的政治承诺。

由上述分析提出的有别于现在农经理论的假设是：“农业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正是因为资源禀赋制约，中国历来并无类似于西方的纯粹“农业”经济问题。我们历来面对的其实主要是农民问题、农村问题。而且，由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土地作为中国农民最基本的“生存资料”（并非经济理论所讨论的“生产资料”），只好按人口平均分配，亦即只能体现“非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这也就是说：西方式的农业经济科学立论的前提和农经微观研究所追求的目标——“效率原则”，在中国农村还没有条件作为第一原则来体现——除非人地关系这个制约条件彻底改变。

如果此处大胆引入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我们会看到体现中国均平理念的农地初始产权的配置，要么通过战争，要么通过政府“改良”；而且历来并不存在完整的“私有”产权。这也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国家公有制经济和中央集权政治的基础。

2.基本体制矛盾与农产品购销问题

有位经济史专家曾经指出：中国早在一千年前，农地产出的商品率就达到15%。近年来有关农户统计的研究表明：我国仍有50%的小农，其土地产出的商品率为0，还有30%小农的商品率低于30%。因此，国家占有的粮食在一般年景仅占总产量的15%左右。

由于上节所述之国情矛盾制约，暴力的革命和非暴力的改良都不过导致“均平”农地，于是小农村社经济内部化的财产和收益分配制度便成为中国社会的“稳态结构”的内涵，天然排斥西方工业革命及其所带来的资本主义式的社会进步。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西方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完成资源瓜分，中国的确已经没有任何余地了，且周边地缘政治环境险恶。中国必须工业化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工业化必须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而原始积累不可能在商品率过低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完成。新中国成立初期，4亿农民向5000万城市人口提供农产品还没问题。1950年，通胀危

机缓解之后经济复苏，并且在朝鲜战争带动需求的拉动作用下进入高增长，随即出现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开展基本建设。2000万劳动力进城支援工业建设，突然增加40%～50%的城市“商品粮高消费人口”，就突然产生了农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更何况在劳动力过剩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进行积累的方式是“劳动替代资本投入”，这使城市工业品几乎占领不了农村市场。工农两大部类无法实现交换！

于是，中国人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高度中央集权下的自我剥夺：在农村，推行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这两个互为依存的体制；在城市，建立计划调拨和科层体制，通过占有全部工农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的中央财政二次分配，投入以重工业为主的扩大再生产。我们以最短的时间跨越了原始积累阶段，形成了国家独立所必需的工业经济基础。这个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特殊历史阶段，由于人人奉献、天下为公，故被称为“英雄时代”。

这个时代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数以万亿计的、以全民所有为名的资产，供后人以各种名义再分配和重新占有，而且是一个城乡分割、对立矛盾的二元体制。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已汗牛充栋，本文不赘述，谨就这个基本体制矛盾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做以下分析。

农经权威人士杜润生10年前指出，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的局面不改观，中国的农业没出路！套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概念来解释，城市农产品需求是国家保障的、高度集中的，需求弹性很小；而农民的供给则首先是自给自足的、高度分散的，供给弹性相对较大（这一点与西方完全不同）。由于城乡两种体制条件下的“信息不对称”，供给需求不可能稳定。因此，农产品市场的供求和价格波动就是无序的，导致小农倾向于追求保险的“兼业经营”；这又使得数亿小农从事的农业经营规模更进一步“细碎化”；转而，不成规模又更加放大市场波动……20世纪80年代小农经济恢复以来出现的三次农产品供给“相对过剩”并呈周期性表现，即可为例证。

不仅如此，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农地对农民的生存保障功能日益增强，生产功能日益减少。无论是现代科技等新的要素投入，还是政府的价格政策，其效益不仅都融化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而且往往适得其反，因为这种投入中隐含着的是政府补贴。显然任何政府都补不起如此庞大的、处于半失业状态的中国农业人口。

有人极而言之：中国无农场，美国无农民。欧美国家一贯尽力维护本国通过历史上的殖民地战争掠夺的资源，尤其重视保护与生态相关的农业资源，并不允许农场主充分利用，而且都是以财政补贴休耕限产的。近年来的WTO和乌拉圭回合农业谈判，显然操纵在西方手里。如果再考虑到我国小农从事的细小农业面临的国际大农的竞争，20世纪30年代地处“人间天堂”的苏杭小农，在国际农产品冲击之下的大量破产，当属前车之鉴。

本节分析也可以提出一个假设，我们姑且称之为中国农业的“哥德巴赫猜想”：如果1＋1＝2的问题在数学领域中是女王王冠上的钻石，那么，1个小农加1个小农是否等于2个小农（亦即是否就是规模经营）的问题，则至今是阻碍中国农经研究成为科学的最大难题。

过去我们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通过农业集体化方式搞规模经营，结果是1＋1＜2；因为无论是一锄加一镰，还是一个小农加一个小农，都不是生产关系的进步。现在我们也一直没有放弃搞规模经营的努力，但农业人口比过去增加了一倍，就全局的劳动力过剩而言，“劳动替代资本投入”应是最经济的选择；任何局部地区无论多么发达，搞资本密集型的所谓现代化农业，其投入产出比相对于全局性劳动力过剩而言都是不合理的。

我们认为决策者可有两个选择。其一，中国只能以劳动密集就业于国家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此作为第一国策（宁可水平低、速度慢），辅之以全面开通城乡，调整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以此促进农地上承载的过剩人口，实现非农转移。其二，若上一提议难度太大，则只好加强农村社区“非市场”的、内部化的财产和收益均平的制度建设，同时强调打破流通和金融垄断，通过扩大农业的外部规模来维持小农村社经济。舍此，农民没有出路，农村不得发展；农业也难成为独立产业。当然，这并不妨碍少数大城市带着贫民窟超前现代化，也许其结果会使中国陷入“拉美化”沼泽。

（二）中国农村的发展趋势

从中长期看，今后的农村发展主要有两个趋势性内容：一是城镇化，二是国际化。

1.农村城镇化

根据上文述及中国的基本国情矛盾，我们认为：农村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内容并不是怎样搞小城镇建设，而是怎样让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城（进入城镇），同时让土地更少地被占用；是要最多地把农业人口离土离乡转移出村，然后让尽可能少的农民在土地上搞农业，特别是促进种植业的规模经营。这是现在的小城镇建设试点要达到的目标。目前最为有效的改革，是允许农民土地作股，发展小城镇。

例如山东省济阳县孙耿镇，就是农村城镇化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镇政府动员农民把各村承包到户的土地每人交出5厘，集中起来滚到镇中心。全镇54个村都不再分散办企业，而是地滚地、地换地，换到镇中心统一建立工业开发区。工业带动的非农就业增长了20%；镇财政从1992年的40万元增长到1996年的1.5亿元。这是基层干部群众的伟大创造！可惜很多人对此不理解。套用现代经济学的概念来评价，这种政府主导的传统农区城镇化、工业化，其制度变迁成本趋零。因为没有同农民发生任何矛盾，地权还归村，各村把土地作股建立镇级农民集体所有的股份公司，统一经营集中到镇中心的1000多亩地，产生的收益各村按股分红。安徽省涡阳县也是试验区，也有相同的做法，各村集地滚地，人均集出2厘地，不花钱就促进了工业化、城镇化。

之所以能够实现制度成本最低、经济效益最好的制度变迁，就是因为有效地防止了政府部门和各种资本以国家为名剥夺农民的土地权益。

城镇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一定要成规模的人口才能带动成规模的消费，才能发展第三产业。

在第一、二、三产业中，第一产业的农业、第二产业的工业是可以分散的。当然集中起来才有规模效益，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到现在为止，乡镇企业有90%以上分散在乡以下，只有7%在乡以上。因为工业产品是可以运输的，所以人们针对这种情况说“要想富，先修路”。然而第三产业的服务业是不能分散的。剧院、宾馆、饭店，没有人口规模就没有消费规模。我们现在的小城镇人口平均规模约一两千人，显然不行。即使一万人仍然不够规模，仍然没有成规模的消费，仍然上不了第三产业。有些地方乡镇工业高度发达，但是小城镇却高度浪费。搞了现代化的公路、宾馆，现代化的学校、敬老院，就是没人消费，农民还是都分散住在各村。于是就村村通电话，通柏油路；家家盖别墅，买汽车。考虑上文所述基本矛盾，中国能那样做吗？结果，正是因为大量分散安排福利，造成了劳动力成本上升，乡镇企业不得已向资本密集化发展，然

后就负债率过高，一般在7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80%，最后承受不起了，迫使有些地方不得不彻底改制。比如广东省的顺德，只能把大部分原来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搞股份化改造。

搞小城镇建设试验需要在改革区划的前提下加强规划。如果一个县有20个乡镇，都搞小城镇建设，那么即使全县所有的村都取消，农业人口都进城也不够规模。一个县的平均规模按50万人口来算，充其量只能搞3～5个中心镇；每个中心镇聚集的人口规模至少应该在5万以上，否则没有第三产业。不要鼓励镇镇开花，就像我们不鼓励“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乡镇企业一样。

在这方面，山东省的基层干部群众创造的经验非常有价值。淄博市的淄川区和博山区大规模地动迁人口，已经积累了非常重要的操作经验。他们主要是利用政府和乡村组织的政治权威和行政能力，给予输入地的村优惠政策，让那些资源过于短缺的山区人口搬到城镇来。这种跨行政区域、跨社区的优化要素是对小农村社制度的最大突破，有必要认真提炼经验在全国推广。

博山区成10万地调动人口，将其集中到城郊和中心镇，给的优惠政策仍然是土地。就是把宅基地指标集中放到输入地的村，让城郊的农民新村建设按城市的标准建楼房，节约土地，但却没有现在城市房地产开发面临的一系列收费太多和中间盘剥的问题。有关资料显示，城市房地产开发的真实成本，如水泥、沙子、原材物料只占30%，另外30%是征地，再有30%是收费，其实只有1/3是真实成本。而博山区和淄川区这样做既没有大量地收费，也没有征地。还是村里的地，只不过是把宅基地指标集中给了城郊农村，然后本村农民搬进楼房，留下旧的房子不拆，让那些从山区搬来的农民住。我去调查的时候，遇到一户从山区搬迁来的农民，住进了城郊农民留下的老宅子，儿子进企业，老汉卖豆腐，人口增加了，豆腐的需求量就增加了，满够生活的。山区人口搬迁出来也不用再往山里送扶贫物资了；生态恢复，水土保持经费也省了。这就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

这样做对于输入地而言也是利大于弊，第一是成规模地增加了消费人口，有利于发展第三产业；第二是降低了城郊乡镇企业劳动力成本，提高了企业效益；第三是以最低的成本推进了农村城市化，能够节省2/3的费用发展经济。这难道不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的最好的城镇化方式吗？

2.小农经济条件下农业的国际化

1996年的农业生产形势非常好，中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同时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在农工会上的讲话，又明确地提出了丰收之后的问题绝对不可掉以轻心。中国人从来都讲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形势很好，第二句话是问题不少。

粮食大丰收，甚至粮食产量估计1996年已经提前实现了2000年的目标，达到了l万亿斤的水平。经济学家认为：现在的粮食丰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粮食的生产量绝对地大于供给量的延续，长期维持生产量大于供给量就意味着生产的过剩。如果提前在1996年就达到2000年的目标，就意味着进一步的或一定规模的过剩。

中国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业要和市场经济接轨，但市场经济条件下，粮食的大规模增产，已经造成了粮食部门亏损290多亿元，占压资金达到将近1700亿元。西方粮食过剩有过往海里倒的教训，因为往海里倒不占压资金，不占压库存。而我们是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文件要求必须收，实际上无法判断现实情况。中央一再向农民承诺，不许打白条，全额收购，否则影响农民下年生产，但收进来则压库、占压资金。农业生产资金本来就有限，占压数千亿元的资金也必然影响下一年的生产。所以中央领导同志强调丰收之后“不能掉以轻心”。

进一步分析现在粮食供给相对过剩是怎么来的，就会涉及农业的国际化问题。应该看到，在1995—1996年连续两年粮食生产量很高的情况下，特别是1995年、1996年连续两年突破历史最好水平的情况下，有关部门仍然在维持着粮食的大量进口，1995年1月至1996年6月连续18个月进口了600亿斤。一方面是持续高产，一方面是大量进口，结果必然造成供给大于需求。

不能只批评进口，因为我们的价格政策有问题。1993年粮食调价，当时主要粮食品种的价格就已经高于国际市场20%以上了。1994年1月l日外汇并轨，人民币贬值了一半，本币的大幅度贬值，使得国内的粮食价格在短时期内低于国际价格。有关部门有利可图，当然要把国内市场的低价粮食拿来，出口到国际市场赚取利差。所以尽管1994年粮食低产，但还是出口了1000多万吨。外贸部门既然是企业，并没有义务承担对国内市场稳定的任务，而是理所当然地参与国内抢购。又由于1994年国民经济高涨，基础建设大上，农民工大量进城，8000万民工进城，城

市的粮食成规模的需求又增加，所以内贸也抢购。外贸、内贸一起抢购，就造成国内粮食价格猛然上涨，在1994年上半年短短的4个月时间内突破了国际粮食市场价格水平，然后就一路上涨，最高的时候，玉米的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l03%。这时候，由于国际价格很低，就又造成外贸大量进口，造成国内粮食在生产高涨、产量增加的情况下大规模过剩。因此，粮食问题出在流通、金融、财政等垄断体制上。所以这次中央领导同志特别强调一定要抓流通体制改革。

从上述现象来看，农业的国际化对农村发展是有影响的。首先，中国要恢复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地位，那就必须实行农产品关税减让，必须减少对农产品的补贴。假如我们的价格水平大大地高于国际价格（1997年年初，主要粮食品种国内价格还是比国际价格高30%以上），一旦允许进口，国外的大粮商看到有30%利润可图，就会冲进来。小农生产扛不住国际大农竞争！动态地看，美国会削减补贴，为了维持粮食价格，美国是补贴不种地。现在如果不补贴，大农场主增加粮食面积，就意味着粮食的世界供给短期内会大大增加，价格还会下跌。国际市场的价格进一步下跌，而国内市场价格这么高，就意味着国外低价农产品及其制成品更要冲击国内市场。在国家又不能提高关税保护的条件下，中国遍地小农经济，农民扛不住国际大农的竞争。假如沿海省份、大城市都开始吃便宜的美国玉米、泰国大米，国内小农的高价农产品向谁去卖？所以农业的国际化问题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

此外，现在国内大幅度调整产业结构的主要原因，是种粮食的比较收益低。已经高于国际价格的粮食，收益还低，还迫不得已调整产业结构。那么如果国内少种粮食，国外不卖给中国粮食怎么办？既然谁都会说农业是基础产业，粮食是战略物资，就需要拿出稳定农业、稳定粮食的治本之策。对此，试验区提出了以“中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建设，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设想。而中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建设的提法，就源于山东省平度市。

199l—1992年，我们总结山东省平度市农村改革经验时就提出：平度市不仅仅是搞了“两田制”。很多没有深入调查的专家学者断言：平度就是两田制。我说不对，平度实际上搞的是一套相对完整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后来和杜鹰主任及其他参与试验区实践的同志一起讨论，认为提“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概念太宽，还是提“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好些，并向中央搞农村决策研究的同志做了汇报。后来1993年中央农工会的文

件，深化农村改革的第一条就是“建立和完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这个提法是从平度经验总结提炼出来的。所以，山东平度改革试验区为中国农村的宏观改革，乃至为中国农业国际化做出了贡献。

有人在平度搞两田制试验之初就认为，这是“归大堆”，剥夺农民地权！可是资深农村问题专家杜鹰10年前听平度汇报试验方案的时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平度这个办法好，好在它兼顾了公平和效率两个原则，把我们的传统和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

平度的制度安排是相对合理的：给每个农户按人口核定出大致半亩口粮田，这是社会主义公平原则保证农民不挨饿的制度体现；其他的地拿出来按市场的原则承包，招标竞争。这就是说不再按人口分包全部土地，也就是把市场配置资源这种体现效率原则的体制搬到中国农村来了。这种做法在客观上有利于解决基本国情矛盾。平度的土地制度安排名义上叫“两田制”，实际上是在农民占有土地的基本财产关系上部分体现了市场原则。很多其他搞两田制的地方“动账不动地”，既不调整土地，也不搞竞争招标，没有引入市场机制，当然就搞不好。然后就有些同志一叶障目，以此来否定平度经验。平度人的经验根本体现在把公平和效率相结合，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难道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经营制度吗？

在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平度同时搞了“三项制度”建设。把竞争招标的资金成规模收回来，用资金办了农民合作基金会。农村最短缺的是资金要素，平度解决资金问题的经验很实际：先划方招标，农民竞争承包土地；资金上过去叫“上打租”，就是竞争包地的农民抢着把承包费先交给村集体再种地，承包费变成农民合作基金会的垫底资金，这样集体就有了一块按市场经济要求运行的货币要素；村、乡、县三级建立农民合作基金会，农业就有了自我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功能。平度农村80%的农业生产资金靠农民合作基金会供给。此外，集体自有资金可以投入发展第二、三产业，安排包不到地的农民进入第二、三产业扩大非农就业。

此外，通过竞争、付费才成规模地包到土地的农民，还必须签订合同，搞以地定养、种养结合，以此保证培肥地力。合同规定每5亩地对应养1头牛或2头猪，客观上推动农民不仅规模种粮而且规模养猪。并且既然是合同规定，那就不管市场价格怎么变也得养。由于猪、粮价格周期不同步，恰恰形成种养农产在扩大了相对规模的条件下，实现了内部

收益均衡。平度经验如果推广，就能实现猪、粮两业的价格均衡，也就是以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抗衡了市场经济的风险，实现了农业和市场的接轨。

这就是以农地制度安排为基础，包括积累和管理在内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将来中国农业国际化，还要靠平度创造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保证种养业少受国际价格波动的影响。事实上，从1986年平度开始搞农业基本经营制度以来，其农业生产始终是稳定的，始终保持了粮、棉大县的称号。

同样的例子还有莱阳跨区域搞农产联，还有的地方农民专业协会，跨8个省、几十个市县，100多个单位会员。这样的专业合作经验也是有利于小农经济抗衡市场风险的，有利于我国农业经济在国际化竞争中不至于衰败。

（三）密切联系实际

把握住了基本矛盾和基本趋势，也就知道改革试验要搞什么。试验区必须根据地方党委政府的长期发展规划，通过调查研究，来把握制约本地经济发展的主要体制矛盾，确定下一步改革试验的主题。制约各个地方的主要矛盾是千差万别的，因此要通过各地搞试验区来超前探索，分散决策风险。

中央的1号文件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过大作用，大幅度地促进了农业的增长，粮食产量从6000亿斤左右提高到了8000多亿斤。但为什么中央从1987年以后不再发1号文件了呢？就是因为我们从80年代中期开始认识到，中国经济的区域差别是如此之大，各个地方改革的内容、要解决的问题是如此不同；靠一声号令、一个文件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再搞1号文件。尽管老百姓对1号文件有很大的预期，但是实际上，老百姓预期的是要求中央每年通过一个文件，继续保证给农民地权，而不是指导千差万别的各地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

因此，中央1987年5号文件提出办试验区，当时的目的就是分区决策，分散风险，超前突破，促进发展。所谓分区决策，并不是要地方做中央的决策，而要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来做本地区的决策；然后中央的决策部门根据各个地区决策的实践情况，来综合提炼，再演变成中央的决策。所以5号文件提出的决策思想是科学的。政治上要保持一致，

但在经济发展的具体政策上要适应本地实际，这就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的紧密联系实际。

无论是谁，都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除非做了调查研究才能说这个地方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才能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我们审批各地试验区的改革方案，要求报一套材料，包括调研报告，就是要根据对地方的经济情况的描述，分析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体制障碍，考虑是不是对应性地提出了改革试验方案。因此，各地方试验区办公室的责任在于要紧密结合当地政府的中长期发展规划，通过调查研究，来发现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然后有针对性地提出改革试验方案。不要怕试验内容重复，而怕没找准主要矛盾，因为解决同一个矛盾可能会提炼出不同的经验和不同的操作办法。例如，淄博搞小城镇靠行政力量大规模搬迁人口；济阳孙耿镇就搞土地股份制，靠的是把农村行之有效的“股田”引用到城镇开发上来，搞集体土地入股。

再者，试验区的工作如果不能配合地方党委政府解决当前存在的主要矛盾，工作就没有位置。山东省试验办承担了很多山东省农村经济决策的调研工作和文件起草工作，试验区办公室的工作就有位置。我们必须结合现在的热点问题，从改革试验区中去提炼出有利于本省、本地决策的意见，因为试验区有超前的经验。

尽管我们名义上是农业部的试验区办公室，但在中央农村决策研究工作上能有一定的地位，因为我们所提出的经验和意见能够参与到中央决策工作中去，试验区办公室杜鹰主任的大量时间是给中央写材料，写领导讲话，参加中央的决策会议，向中央报告现在试验区什么经验可以用于决策。我的工作就是长期跑面，回来把地方怎么做的报告给主任，主任给反映到中央决策层。无论谁来主持农业农村工作，都会重视试验区提炼的改革经验。

（四）不断深化改革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更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会不断产生。要用传统的方式去解决几乎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

有人觉得当前农村改革位次不够，这个认识是有偏差的。并不是不够，而是一段时间内城市所表现的体制问题更为尖锐，矛盾更为激烈，中央不得不把大量的决策精力用于解决城市问题。因此，决策的重点在

城市，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农业没有位置。农业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这是历代领导人都强调的。

我国最基本的矛盾一是人地矛盾，二是体制上的二元结构。这两个基本矛盾解决不了，中国不可能发展。有几个国外学者跟我座谈时说，中国肯定会在21世纪末成为世界头号强国，我说，你的评价太高了。我认为下世纪初的世界经济大国仍然是美国和俄罗斯。因为我有个基本判断，就是谁占有资源量最大，谁就是将来的胜者。而正是美国人和俄罗斯人占有世界上资源量最大的份额。我们资源量少，人力又大量闲置，现在至少有3亿多人不能充分就业。假如我们能够通过深化改革，把人的因素调动起来，与其他要素优化组合，就能保证中国经济维持稳定，维持发展。解决人的问题只能靠改革，这3亿多不能充分就业的人主要是农业人口，因此，改革的重点是实现农村的要素优化组合。

要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第一要稳定人心，坚持中央的30年不变，保证农民已经到手的基本财产权利关系不变，这也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深化改革的有机统一。现在有人不理解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的关系，我们在实践中的确感到有必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因为我们在试验区搞的股份合作制，给职工和农民分配“职工基本股”“劳动贡献股”的股权，就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体现，而“只允许卖”的提法正是资本统治劳动的体现。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讲的四句话中，第一条是产权明晰。而我们要求改制中劳动者占有自己的剩余价值形成资产的那个产权必须明确。现在各地农村大量发展的股份合作制，之所以不合学者们的意见但非常有效，就是因为广大劳动者对自己的产权予以明晰之后有了积极性。所以，深化改革调动人的积极性，要靠产权制度建设。

中央在l997年新年伊始就开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农村工作会之后就是全国乡镇企业会，几乎所有领导同志都讲话，表示中央对农村、农业和乡镇企业工作的重视。重视的原因在于：一是乡镇企业解决了1.3亿的农村人口就业，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有重大的社会效益；二是乡镇企业产权相对明确，能够影响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所以股份合作制要正式立法。

股份合作制的发祥地，就在山东周村试验区。周村的股份合作制并不像西方那种私有制，而是集体经济的不同实现形式，农民作为成员对集体经济的财产收益权，是通过股份合作制来实现的。根据马克思主义

关于股份制的论述，首先要承认农民的产权，才能够形成集体的产权。周村股份制改革是“先有长行村，后有王村镇”。就是集体经济的所有权维持不变，把价值形态的财产做股量化到每个农民头上。长行村是1984年大包干的时候，就把当时集体积累的几百万元固定资产做股量化到每个农民头上；王村镇1992年把镇办企业资产按各村村民代表大会代行股东代表大会的形式，让村集体按股占有乡镇级企业的资产，这就解决了镇级企业产权不清的问题。所以，周村人的创造有全国意义，甚至有世界意义，解决了中国式的坚持公有制集体经济同时又兼顾个人财产权利的难题，这是西方人做不到的。

周村能够在淄博市发育出一个淄博乡镇企业基金和全国唯一的一家淄博证券自动报价系统，是因为当年周村搞试验方案设计的时候，加上了谁也没有注意的“第六条设计”，提出要搞规范的股权流转、上市交易。1988年，国务院批准了周村试验方案，后来经过努力，就在深圳、上海两个股票市场之外搞了一个规范的场外交易。中国证券管理监督委员会不干预淄博的场外交易的原因是有国务院批准的试验方案。所以搞试验方案的同志注意，既要有比较明确的内容，又要用比较抽象的语言，不要去触“高压线”。比如，河南有个试验区搞供销社体制改革做得很好，总结经验时明确揭示了“租壳子、卖瓤子”的清晰集体和职工产权的做法，但是有些人否定说，这是把供销社的集体资产流失了。如果当时在材料上写“全员全额承包”，改革内容还是一样，经验就有可能得到肯定。

第二，产业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贸工农一体化，也不是一般意义上讲公司加农户、企业下乡。姜春云副总理到中央工作以后，重视山东的产业化经验，就因为农业和农村长期以来处在两头被垄断控制的局面之中。农业投入，无论是资金还是生产资料都是垄断控制；农业产出也是长期被垄断控制的。改革以来，农产品市场放开了一部分，比如水产品、蔬菜、果品等放开了，但大宗农产品仍然维持垄断而且越统越死，比如棉花大幅度下跌，就是垄断控制“三不放开”的结果。粮食、外贸的高度垄断，再加上在产量连续提高的情况下还大量进口，内贸和外贸抬价抢购，造成物价上涨，也造成了市场的大起大落。所以农业发展并不是仅仅维持千家万户的小生产发展，产业化真实的含义在于打破投入产出的两头垄断。山东的同志在产业化上做了很多工作，无论是让供销社牵头，还是让市场牵头，又或是让企业下乡牵头，要想和生产者结合，就要和生产者建立大致平等的利益关系。诸城养鸡成功，在于它保证每

只鸡1.5元的利益，意味着无论企业当期赚不赚钱，都必须让农民生产者得到大致合理的、稳定的利润。

1995年我们做产业化研究的时候就已经提出：平均利润是检验农业产业化的根本原则。假如哪个地方的产业化不能让生产者分享到平均利润，就不是产业化；假如哪个产业化是有利于原来垄断局面的，就不是产业化。我们希望不要“产业化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但一夜之间，全国到处都是产业化。

试验区尤其要看生产者是否拿到大致均等的收益，平均利润这个原则是否实现。这就要通过改革试验做很多工作，就有很多体制弊端要克服。有的省出现了农民闹事，就是没有照顾到农民作为生产者的利益，只照顾了公司的利益。很多企业家说愿意投资搞农业，可是跟农民打不起交道。其实根本问题是企业想要追求短期利润。那企业可以去股票市场搞投机，不要到农业中来；农业投资只能追求中长期收益。所以，搞产业化必须严格约束企业，告诉企业家必须建立和农民的稳定的利益关系。

山东经验中值得推崇的是莱阳的农民把土地入股建立公司，产加销之间不是买卖关系，而是最后按股分红；三九集团在临沂搞的农业公司，农民土地股占30%，也是一个好例子。我们主张紧密型的利益关系和股份型的合作关系，不主张公司与政府合作，农民处于无权的地位。如果与农民纯属买卖关系，发生农民撕毁合同的情况就很难处理。地方政府也不能解决小农不守信用的问题，不能保护只和农民建立买卖关系的企业。政府的保护和政策优惠，应只给和农民建立财产关系的企业，因为他必须实现按股分红的平均利润，而且有明显的社会效益。

第三，搞好集体经济和规模经营。如果能按照股份合作制的原则来搞，就能够实现规模经营。如果强行推，那就必然失败。平度实现了规模经营，一个万亩千斤方，牵扯到8个村，不外乎大家产权清楚，可以实现“六统一”。

不要以为把地集中了才叫规模经营。所有统一的、能够产生规模效益的服务都叫规模经营，所以“六统一”就是规模经营。美国式的大农场规模经营在中国是实现不了的，我国曾经有意识地进口大型机械在黑龙江搞大农场，即使成功也没有推广价值。

“六统一”服务就是集体经济。没有经济实力做到“一统一”也行，哪怕统一规划也是规模经营。有一个地方搞的30万亩蔬菜基地就是统一规划的结果。这绝对不是一定要让农民把地交出来，而是在稳定农民财产权利的基础上，通过统一规划实现规模经营。如果能够像平度那样，集体把招标拿来的承包费变成农民合作基金的生产费，就是在资金供给环节上实现了规模经营。假如生产资料能够统一供应，农产品统一销售（有个材料介绍组织实现了30多亿元的销售额），也是规模经营。

综上所述，新形势下的农村发展，需要改造我们的学习，重新认识我们面临的环境，重新认识改革。

第二十一章　发达地区农村改革问题[51]

一、农村现代化的实质：农村资源的资本化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在发达地区推进的农业现代化试验已经开展了10年，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发达地区采取“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的形式，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业机械化、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从乡镇企业转移到农业的较高水平的投入，反过来支撑了乡镇企业发展对农产品供给的基本需求。就农村社区的整体利益而言，两者互相促进、协调发展；形成了一种我国农村特有的、内部化的制度类型。其结果是一个集体化的社区经济算总账是合理的：工农业总产出的综合收益大于总投入的综合成本。

但是，作为改革者的价值观应该是不断进取的。我们常说：改革所解决的问题，远不如它所引发出来的更多，所以才要不断地深化改革。随着发达地区农村工业化完成第一阶段的原始积累，初步形成产业门类齐全、专业分工细致的社会化大生产，就必然要求市场交换。有些在过去是成功的改革经验，现在也就有必要深入探讨。因此，有些发达地区进一步提出农村现代化是有战略意义的。

通俗地说，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搞的是产品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我们搞的是商品经济，而进入市场经济就要求我们搞资本经济。所谓农村现代化，首先是要在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框架下，推进农村经济发展，也就是要求以资本市场的交易来配置农村资源，要求农村资源必须实现资本化；在文件语言中或者可以说“促进农村生产力诸要素从资源形态向价值形态转化”。

因为，80年代以来，发达地区各地政府主要是通过农村集体的内部化制度，来统一控制农村资源，用以完成地方工业化的资本积累。而原始积累完成之后，则要顺应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规律，开放资本市场，促进要素流转以形成规模经济，这也就是各地政府提出的“进行二次创业”。而以往农村实物形态的资源要素是不可能进入资本市场交易的。有鉴于此，既然发达地区提出农村现代化这个新的发展战略，就要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对农村经济与市场接轨起主要制约作用的体制障碍，加大改革力度来解决这些问题。

二、农村现代化进一步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1.乡镇企业高负债中的非生产性占用

各地对发达地区农村现代化建设所反映的比较突出的矛盾，一是资金紧张，二是乡镇企业布局分散、结构雷同，三是户籍制度改革滞后和城市化水平较低。这些问题实际上还是经济和社会结构不合理，都是普遍性的问题，所以各地都提出调整经济结构。但是发达地区为什么出现这些问题，要认真进行分析。

目前从宏观上看，资金并不是太紧张，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革以后，已经出现银行追着好企业主动上门给贷款的现象。一向经济发展势头很好的发达地区，似乎更应该是资金流入地区。现在提出资金短缺，虽与国家宏观政策的“一刀切”有关，但近年来大量资金流入非生产领域，有些乡镇和有些企业非生产性占用资金在20%以上；再加上投资主体不明、投向分散，导致发达地区乡镇企业的负债率过高，普遍达到60%以上。这些也是银行头寸减少、贷款困难的重要原因。

2.乡镇企业产权与积累问题

乡镇企业在发达地区三分天下有其二，对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其收益大量向地方政府和社区转移，确实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也的确是当务之急。

乡镇企业创办之初的资产形成主要有三个来源。第一部分是企业占用土地的增值收益，亦即农村土地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所形成的级差地租。第二部分是农村在潜在失业的压力下，到企业就业的社区内部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因为农民追求就业，并不计较工资、福利，企业也省去了至少30%的职工福利性开支。第三部分是高通货膨胀下，企业得到银行贷款的同时，从“深度负利率”转化的利润。因此，尽管乡镇企业现在形成的固定资产规模很大，初始投入主要是这三部分。由于这些收益转移都只能依靠乡镇和村的社区环境，所以乡镇企业就只能“社区化”，随之产生了两个弊病：一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高度分散、不规模；二是乡镇企业完成原始积累，利润有所增加时，也不得不向社区转移。一部分投入公共品开支，就是修桥补路、养老办学，以及行政性补贴；另一部分投入社区消费，就是户户通电话、盖新房等。

于是，企业负担渐渐增大，负债率推高，这又使得企业有限的效益

也得交给银行。此外，20世纪80年代全国性的商品短缺给乡镇企业留下的历史性机会也不复存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80年代末期全面的卖方市场已不存在，现在连资本品都已经相继出现过剩。可见近年来发达地区有人说“找不到感觉”并不为过。因为发达地区多数资源已经完成资本化，过去依靠资源转化使经济增长快的优势已日趋衰弱，这就意味着要获取以前的高速度增长已难度很大；何况乡镇企业负债偏高、布局分散和结构类同等矛盾也会影响经济增长。

3.小城镇问题

小城镇建设也是农村现代化的一个主要内容。目前，发达地区大部分小城镇的硬件建设已经很上档次，可以算得上超前现代化了。但我们都看到，小城镇白天挺热闹，晚上就是“这儿的傍晚静悄悄”。因为上述乡镇企业收益向社区转移的问题，农村非农就业人口大都滞留在乡下，仍然不是市场经济要求的商品消费人口，而是自给自足的农业人口。由于城镇的人口规模和消费规模偏小，所以经济聚集程度过低；而没有一定的规模消费，也就不可能有发达的第三产业；没有第三产业的支撑，再现代化的城镇也将是一座“空城”。这可能是目前发达地区小城镇建设的共性矛盾。伴随而来的问题就是投资越来越大，占地越来越多，包袱越背越重，很多地方出现“有城无市”，小城镇发展将难以为继。

中央早在1984年的1号文件中就明确了允许农民携带要素进城的政策。十几年了，农村人口为什么难以向小城镇聚集？一方面可能是农村的分工分业受到人地关系紧张的制约，农民的收入水平还没有达到城镇消费水平，或者是传统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小城镇的制度“门槛”太高，阻碍了农民和乡镇企业进入城镇。这后一条是发达地区的主要问题。降低小城镇的制度“门槛”、推动农民进城的问题不解决，成规模消费上不去，地方乃至全国的经济结构就无法进一步调整。

4.农业现代化试验遗留的问题

发达地区农村在上一轮农业现代化试验中，通过转移乡镇企业收益“以工补农”，形成了农业的高投入。这个做法实现了社区综合收益最大化。但在乡镇企业完成原始积累进入社会化大生产以后，农业是否能够自我积累成为独立产业的问题至今还未解决好。理论界对发达地区长期回避讨论的问题其实是十分明白的，这就是搞高投入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经济上不合算，如果计算折旧和资金利率的话成本太高，无法参

与市场竞争。

形成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是：宏观上国家的粮食市场体制和经营机制改革不到位，微观上小农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天然反动”，农业经济领域缺少明确的市场主体。随着有关粮食贸易国际谈判的进展和世界粮食市场的波动变化，这一问题将会表现得更加突出。

大城市郊区一度搞区域割据和高投入的“菜篮子工程”，过去虽然起过保障供给的作用，现在看来也有同样的问题。比较一下大城市农副产品本地购销量的差别就可以发现，政府的农业补贴，正在通过郊区蔬菜和食品批发市场的交易大量流出去。城市的“高价农业”客观上已经变成财政的包袱。

三、跨越障碍：解决问题的试验设计

“农村现代化”这个主题比单纯提“农业现代化”好，但许多问题在现行体制下操作的难度的确很大。发达地区在做好新一轮改革纲要和实施方案的设计时，应该把各项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一点。一是要对十多年来各地搞农业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进行认真总结；二是要正确地分析和判断目前阻碍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突出问题，适度借鉴外地的成功经验。山东、浙江等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搞了股份田、股份水、股份城，效果很好，各地可以借鉴。要试验一种政策，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在不改变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属性的前提下，真正获取社会的平均利润，切实解决农民进入城镇“门槛”过高的问题。还要采取“推一把，拉一把”的办法，把农民吸引到小城镇聚居。比如对那些不进城的非农就业人口，既然坚持农民身份，就必须按照农业法规定出满“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不许交代金。同时规定农民宅基地和农村非农用地不再给村以下，而是捆起来统一用到小城镇。

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中人口聚集的要求，与农民进城“门槛”太高的矛盾，是当前起主要制约作用的体制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使集体经济得到壮大，农民利益得到保护，资源配置得到优化组合，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在改革体制和机制的过程中，积极培育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的组合由实物形态向价值形态转变。即：只有通过实现要素的价值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权主体不清的矛盾，推进剩余资源的资本化，进而遵循市场法则构筑起符合资本经营的市场交易制度。通过这种深化改革，会逐步解决发达地区的社区封闭问题、产业

布局分散问题、集体企业负债和负担偏高问题。

如何将实物形态的资产转化为价值形态的资本？从目前国内的各种试验效果来看，较好的一种方式是股份合作制，当然也可能有其他方式。总之，要在农村合作经济内部尽快建立一种要素价值化的资本经营运作体系，这既是资源优化组合的载体，也是保障农民利益不受侵害和集体经济组织在“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制度下正确处理内部成员利益关系的最好实现形式。

四、八个重点：农村现代化纲要和实施方案

农村现代化建设是有超前意义的改革与发展相结合的事业。为此，发达地区要继续保持“超前、示范”的特性。1987年全国刚成立试验区时，我们就提出了“以市场为导向，建立商品经济新体制框架”，这在当时来说是超前的（一般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目标，农村改革试验区的指导思想也就更加体现出来了。

党的十五大将会在总体指导思想上进一步确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方针。因此，改革试验区必须围绕党的十五大精神，按照“发展出题目，改革求答案”的试验意义选准新的、具体的试验主题，继续保持超前性，否则也就没有建立试验区的必要。

一是在指导思想上要坚持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以及党的十四大决定精神，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的改革中，通过职工持股来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而不是以资本家控股来体现资本统治劳动的资本主义原则。

二是要把产业结构调整放到突出的位置。目前，发达地区虽已实现大量劳力非农就业，但还没有成规模地形成城镇集中消费人口。因此，要以城镇人口的集中作为调整产业结构的前提。

三是市场经济的根本内容是实行资本经营。目前，一方面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另一方面基本要素如土地、资金还不能进入市场，乡镇企业资产也没有进入要素市场，农民不能携带股份化的土地和资产等要素离村进城进镇。因此，要进一步优化资本结构，就要把土地价值化，把乡镇企业的资产价值化，通过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农村生产力要素从

实物形态向价值形态转化。

四是产权制度改革要强调土地所有制不变，集体财产关系的所有权属性不能改。如土地产权，生产队以户为单位核定面积，应按中央规定30年不变的原则，测算出30年土地产权的价值量是多少。农副业用地按产出平均收益计算，这样就可确定一亩土地价值的年货币量。实现土地资产货币化，就可形成生产队的货币化资产规模，然后还可以村或生产队为基础计算投资股本，设置基本股、劳动贡献股、管理股、技术股等。按资产总规模得出股份价值量后，由股东会推选董事会、监事会，建立健全价值化以后的资本经营制度。乡村两级实现价值化的土地可以作股参与城镇开发，促使价值化的财产向城镇流动。实现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户资产合理配置、流转的有效办法是：以村为单位建立股份经济合作公司，然后村入股到镇级公司，作为镇股份公司的股东；镇村两级公司作为合作制企业统一纳税。实力雄厚的镇还可以把农民股权集中管理，建立投资基金，这样就全盘活了。

五是要强调对农业的保护。各地的发展规划应在不减少基本农田和农业资源的前提下，确保农田面积的动态平衡。要允许价值化的由各村持股的宅基地和工业开发用地集中到镇上来，这样既可保证农村集体土地权属和财产关系不变，又可实行集中土地规模经营开发。

六是城镇化要严格规划。这个规划不是分散的，而应在政府一元化领导下实行集中统一规划，并具有法律效力。深化改革试验中，要重点发展试点镇，逐步形成中心镇和中心村发展的格局。非试点镇、村则要控制其发展。

七是要制订好小城镇试点政策。试点镇要参照执行国家11部委关于小城镇建设的政策，并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有所突破，按市场经济的要求搞建设。

（1）允许农村集体土地作股参与小城镇开发。以县为单位，规定非农用地指标和农户建房的宅基地指标向参与试验的团地开发区集中使用，这一政策只适用于试点镇村，非试点镇村则要严格控制。

（2）按照“谁投资，谁得益”的原则，筹集现代化建设资金。这笔基金只能用作股投资的办法，不能平调农民的资金，让投资者拥有所有权和受益权，调动广大农民积极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热情。要试验出一种

农民可以带宅基地使用指标进镇的办法，以减少进入城镇的征地费用。

（3）户籍制度改革，要按照公安部关于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精神，实行按居住地和就业原则确定身份的户籍登记制度。应让进城镇入户的农民享有所有权和受益权，并以参股的形式缴纳一定费用。

八是要规范和完善各种合作经济组织。农村的合作基金会、“合作社股权转让咨询中心”等，是一种合作经济组织内部的信用合作，在合作经济组织内部融资是合法的。今后，要通过建立股份化的资产交易信息的内部网络，使集体经济的作股基金通过联网进行融资交易，形成要素价值化以后的资本经营机制，让农民和集体经济的资产在市场竞争中获取社会平均利润。

同时发达地区应继续推进农业的产业化建设、规模经营，解决农业的经营和投入主体不统一的问题。总之，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换，努力降低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经营的成本，提高竞争能力，自觉形成农业的市场机制，使农业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

第二十二章　芜湖土地流转[52]

对于国土资源部最近几年在农村土地进入一级市场这个领域进行的改革试点，我一向持积极态度。自从1995年合作开展小城镇试点以来，我们之间尽管有过很多不同意见，而且有时候我的意见十分尖锐，但相比较而言，可以说国土资源部基本上是“从谏如流”，接受了我的大多数建议。因此，在去年4月河南安阳的会议之后，我主编的《中国改革》曾经发表过文章强调，“国土资源部是真改革”。

一、农村建设用地流转试点的重大意义

我认为国土资源部和安徽省芜湖市及各试点镇现在所进行的试点意义非常重大。

其一，有利于缓解城乡差别扩大的趋势。

这个试点对于中央十六大所强调的要在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于中央现在所提出的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对于“两会”期间国务院把“三农”工作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都有积极意义。温家宝同志最近特别强调，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们还剩下18年时间，实现十六大提出的这个大目标的难点、重点都在农村。十六大之所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就是因为三大差别越来越大。其中，第一大差别就是城乡差别。十六大接受了“城乡二元结构”这个概念，这是前所未有的；写入党代表大会的文件，在历来党中央的文件中是第一次。说明中央对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是高度重视的，中央对于这个战略目标面对的主要矛盾定性是清楚的，在今后的发展中，城乡差别必须有所缓解。因此，国土资源部、安徽省芜湖市的试点，首先是和十六大以来中央一系列有战略高度的提法吻合的，是想中央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确实是有重大意义的；而且又是几年前开始做的，也就是说试点不仅是有重大战略意义，而且是超前的，确实体现了和中央保持政治上的高度一致，这是值得高度肯定的。

其二，有利于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

刚才刘守英提到了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发展的经验教训，我们在总结改革开放25年的历程时，公认80年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

而且是普遍获利的增长。其中的经验，对于农村来说就是放手发展多种经营，同时放手发展乡镇企业。1986年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发展所对200家乡镇企业做了一个调查，总结出的经验表明，之所以能够形成规模的乡镇企业，能够推动农村工业化，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企业用地不要钱。80年代刚刚搞乡镇企业的时候，本村的人用本村的地发展本村的工业，解决本村农民的就业和收入，这个是内部的资源向资本转化。那个时候土地管理法还没有出台，因此土地从原来农业的资源状态向第二、三产业的资本状态转化，其中所产生的全部资本收益被截留在农村社区了。尽管那时候乡镇企业都是高负债，负债率可能高达70%～80%，因为谁也没有所谓的创办投资，只能拿本村内的资源转化成资本，其实就跟现在由镇政府把本镇内的资源转化成资本的做法一样。

其三，有可能促进产业资本向中西部转移。

今天我们汲取80年代农村工业化的经验，能够通过农村、通过乡镇的发展，把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盘活，还可能带来另外一个效果，就是使得东部的产业资本向中西部流动。为什么有这个好处呢？这是因为假定下一步能够按照现在的修订土地管理法的意见，强调非公益性建设用地，就是工商企业用地，应该完全市场化，那么，我们现在安徽省的试点镇流转使用的每亩土地是2.8万至2.9万元，而东部可能是30万元，甚至更高，比我们中西部高10倍。如果企业的用地成本比我们高10倍，那些东部企业能不过来吗？

大家昨天去的大桥镇精铜加工厂，我特别注意了解了一下这个行业的平均利润是多少。经理说，这个行业的平均利润在5%以下。上个月我在浙江调查，问当地一般产业平均利润多少，他们说6%～7%。也就是说，在充分竞争领域中的工商企业大体上已出现了社会平均利润下降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东部完全市场化的一般制造业企业还能不能支付如此高的地价、地租？正因为一般都支付不了，所以才出现东部的地方政府很多都在违规占地，不顾老百姓反对，与企业家共同分享土地增值收益；闹得发达地区农民的集体上访难以平息。这也是新时期中央与地方矛盾的一个重要表现。如果真的能够按照中央意图实现市场化的地价，下一步就会促使东部过密的产业资本向中西部流动。中西部不发达的问题，难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问题，可能会被从东部流入的外来资本解决。

考虑到以上三个方面国家宏观政策的需要，芜湖试点的积极意义应

该充分肯定。

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几个问题

有关专家们对试点提出很多理论问题，我只能从实际出发提点讨论意见。

第一个值得讨论的就是，村集体是农村建设用地流转的主体，这和现在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强化农民土地物权化的法律内涵怎么衔接？我一向认为，不要轻易改动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关系。这也并不影响流转。因为农民土地承包法指的是耕地承包，而芜湖这块搞的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对象。希望我们的专家在讨论实际问题的时候，放弃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方式，放下架子，充分尊重广大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

第二是现在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是一级市场流转，二级市场还是个新的事物。

根据经验材料，其实各个试点乡镇和村里与企业之间建立的是一级市场关系，等于允许试点乡镇替代国家来征占土地。而进一步的改革思路则是，政府只应该为纯粹公益性的用地来履行征用手续，其他非公益性的就是按市场价格来交易。这一块将来的前景应该是很清楚的，政府不应该再扮演跟工商企业联手以征地的方式剥夺农民的角色，反而应该站在弱势群体这一边，如何跟工商企业讨价还价来保护弱势群体，以表现政府的善意，这本来就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政府继续跟工商企业联手来征用农民土地，这不叫善意政府，而叫恶意政府，或者至少叫非善意政府，肯定会被社会各界批评。因此，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一级市场本身是善意政府的表现，是一个当代所谓平民政府必须实行的做法。

但二级市场转让怎么做，试点经验总结的材料上还看不出来，二级市场的增值收益应该如何分配？现在定的是县、镇、村三级，集体所有者和镇开发者之间共享大致均等的收益，我看目前的收益基本上是倾斜分配给了镇和村两级，比例关系大体上还是合适的。如果有时间我想多了解一下二级市场，当然存在二级市场转让收益分配是否合理的问题，以及这个收入分配形成一块规模资金以后如何使用的问题。形成规模的资金恰恰是生产力三要素中的龙头要素，是最具有组织作用的要素，怎

么使用它才能形成地方金融、促进当地经济的良性发展，这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第三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政府作用。

从试点单位的经验看，无论是政府还是集体都不再办企业。但是，根据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黄金增长的经验，地方尤其是乡镇如何盘活土地资产，如何利用土地资产增值收益来发展地方经济，是非常重要的。这次国务院在向“两会”提交的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县域经济发展，强调乡镇企业的发展，这说明以往的经验教训已经被汲取。

解决“三农”问题，或者缓解“三农”困境，很重要的是要靠农村工业化，靠县以下的乡镇工业化来进行。如何把土地增值收益变成建设资金或者地方工业化的启动资金，如何跨越县域经济的原始积累阶段，这还是个绕不开的基本问题。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政府实际上承担了经济主体的角色，还不可能照搬西方的理论把政府完全变成一个“裁判员”或者“守夜人”。尤其是在农村土地资源向资本转化过程中，只有政府权力能够低成本地介入转化过程中，形成增量资本收益，这样才能由政府确定分配比例，使得不同主体合理地占有土地资本化收益，才能使地方低成本地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进入工业化，县域经济才能发展起来。不过，这样做的前提是政府不腐败，是公正的。

第四个要讨论的问题是，必须强调国土资源部现在已做的试点中的那些土地股份制的安排。

我多年来坚持主张：公益事业建设占地、集体土地应该入股，以得到长期稳定的收益；而工商企业用地、农村集体土地应该采用租赁的办法，以规避企业经营风险。这里的试点单位也有入股，好像是转出土地的农户全部入股，但似乎村级对自己有多少股权并不清楚。有机会我想再了解一下。

[1]这几年我们会有十几本书分别以不同作者、不同课题成果的名义问世。这些出版物都被要求做单独的“成果标识”。但我们实际上要做的仍然是这几十年的经验归纳总结和理论提升，“实事求是”地形成“去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体系。由此，就需要为这个分别标识的系列出版物做个总序。——作者自注

[2]参见即将出版的《温铁军自述——难得5个11年》（暂定名），其中对20世纪80—90年代在官方政策部门开展农村改革试验区及新世纪启动民间为主的新乡村建设试验区，两个11年的经历分别予以归纳。——作者自注

[3]参见温铁军：《告别百年激进》，东方出版社，2016年4月。这是我2004—2014年这10年演讲录的上卷，主要是与全球化有关的宏大叙事和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甫一出版即被书评人排在当月优选10本财经类著作的第一位。但在此书出版之前，我还没有来得及设计“国仁文丛”，也就不能把这个序言加上去。——作者自注

[4]最近10年一直有海内外学者在研究乡建。国外有学者试图把中国乡建学者的思想上溯归源到孔子或老子，国内也有人问我到底偏重晏阳初还是梁漱溟，还有很多人不理解梁漱溟晚年由儒家而佛家的思想演变。其实，我们从来就是兼收并蓄。在儒道释合一的顶天立地和五洲四海的融会贯通之中形成乡建思想。因此，这些海外研究者的关注点对我们来说本来不是问题。——作者自注

[5]本文丛并非团队的全部思想成果，但在“国仁文丛”设计之前的成果没法再纳入进来，只好如此。——作者自注

[6]这些年，我一直试图对承上启下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形成的国仁思想做归纳，遂借作序之机凝练成这段文言，意味着国仁追求的是一种“大道、大润、大象、大音”的思想境界。——作者自注

[7]在东方，人们认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也”，是自然的表达形式，并且表达形式是多样的，是群体内部文化的一部分，也受群体文化的约束。而在西方，男女之情则属于人的原罪，认为人生来就背负着罪过。——作者自注

[8]中国乡建运动之所以能够延续百年而生生不息，乃在于参与者大抵做到了思想和行动上都“去激进”，不照搬西方的左右翼搞的党同伐异。——作者自注

[9]参阅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第二版），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记得一位学者型领导曾经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农民在现代化的大潮中挣扎着下沉，就剩下两只手在水面乱抓。你的思想无所谓对错，只不过是被溺水者最后抓住的那根稻草，再怎么努力，也不过是落得跟着沉下去的结局……——作者自注

[10]乡建前辈学者梁漱溟因在1953年与毛泽东激辩合作化问题而被后者批为“妇人之仁”。据此，梁漱溟可以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早期女性主义者。尽管在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前，打上何种类别的标签并不重要，但如果这是当代学者们的本能偏好，也只好任由其是。——作者自注

[11]我们2003年创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时候，主办单位是我担任法人代表的“中国

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和翟城村米金水老书记代表的村委会。三家联合创办单位最初全部投入约为20万元，一直都没有回报。我后来陆续投入各项工作（包括赞助3年以上乡建骨干获取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的资金不低于百万，转化为当今所有以乡建为名的志愿者无偿使用的无形资产。我们至今仍是参与乡建的志愿者。——作者自注

[12]关于精英专政与大众民主的分析，请参阅《人间思想第四辑：亚洲思想运动报告》第2—19页，台北：人间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作者自注

[13]近年来，我不断在乡建团队中强调对乡建经验的归纳总结要尽可能提升到理性认识高度，并且要努力接续百年乡建历史，并带领团队申报了一批科研项目。那么，要完成科研任务，就要花费很多精力。对此，就有一些长期从事乡村基层工作，必须拿到项目经费才能维持单位生存，为此来不及形成理论偏好的同人难以接受，甚至有些意见相左之人表达了误解、批评。这本来不足为怪，对批评意见也不必辩解。总体上看，大乡建网络的各个单位还是积极配合的。但，考虑到这些批评说法将来可能会被人拿去当某些标题党的报道和粗俗研究者的资料，因此，我才不得不以总序的方式让相对客观些的解释在各个著述上都有起码的文字依据——尽管这些话只是简单地写在脚注中。——作者自注

[14]中国有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国家行政学院、清华大学、重庆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上海大学、西南大学、福建农林大学、香港岭南大学。海外有英国舒马赫学院、美国康奈尔大学，近期正在形成合作的还有国际慢食协会的美食科技大学（意大利）等。——作者自注

[15]此说是指自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的帝国主义侵略，迫使中国纳入西方“现代化进程”以来，每遇庚子年必有大变：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中国被迫支付巨额赔款；1960年苏联专家撤出中国，全面中断对中国工业化的援助，导致中国被迫艰难地“去依附”。——作者自注

[16]俄狄浦斯悲剧的意义在于，美国政客在经济理性上自愿“致盲”。一是搞“贸易战”提高外国廉价商品关税率，这意味着美国的一般消费品价格上涨会提高其通胀率，直接伤害的是美国消费者；二是强迫美国获益企业离开中国，则会造成回流美国的资本减少，直接伤害美国金融市场。这些都属于经济上的“自毁”决策。——作者自注

[17]中国金融危机的化解具体过程可参阅《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年第一版。

[18]参见课题组《中国对美国的双重输出》（《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5）和《居危思危》（东方出版社，2016）等相关研究成果。

[19]国防大学、总政治部保卫部、总参谋部三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关系研究所联合推出的纪录片《无声的较量》里边提了一个美国人的观点：苏联解体不是“冷战”的结束，而是美国结束“冷战”政策的产物。也就是说，美国在80年代开始改变“冷战”策略，强调让社会主义国家融入西方制度及文化，才有了“冷战”终结这个客观结果。美国在“后冷战”阶段也确立了中国融入策略。——作者自注

[20]2001年之初，来自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菲律宾，印度的一行十数人组成的考察团造访了印度的喀拉拉邦。考察团中有经济学、社会学、比较文化研究的学者和作家。数月之后，曾经同行喀拉拉的部分中国学者，在交流彼此的思考时，谈及本章的主要议题“全球化与世界法西斯主义”。当时参与讨论发言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黄平研究员、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戴锦华教授、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刘健芝助理教授等。讨论记录整修后的原文，发表在《天涯》《读书》等刊物上。本文根据发言整理而成。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标题为收入本书时所加，再版时略有调整。

[21]有学者曾经提醒说别陷入“阴谋论”，但这当然是路人皆知的“阳谋”。——作者自注

[22]黄平当时的插话很有见地：今天反对全球化的不仅是全球化过程中的弱者，还包括国家层面的东西，它也可能是一种保守力量，贸易保护主义、排外主义、新法西斯主义，这在发达国家很明显。人们都知道，是那些最保守的力量起来抵制贸易、资本、金融的全球化，还有一个是信息和文化的蔓延和影响，也冲击到发达国家的原有文化，如法国的文化。当然，发达国家几乎都在抵制人口和劳动力（高科技人员除外）的跨国和跨地域流动。——作者自注

[23]此文是作者2002年1月在“中日知识共同体会议”上的发言。

[24]此文是作者2004年2月21日在上海闸北区“热爱家园”青年社区志愿者协会举办的会议上的演讲。标题为收入本书时所加，再版时略有调整。

[25]1946年以前，蒙古分属黑龙江、吉林、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几个省份。1946年1月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日本侵华时期，自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相继侵占了内蒙古多地，1937年内蒙古西部地区主要城镇和主要交通线平绥铁路相继沦陷。

[26]2002年7月，我应旅美华人学者曹天宇等人的邀请，参加杭州的“中国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杜润生、于光远、朱厚泽等老前辈和秦晖、汪晖等中青年学者均出席会议，各种不同意见争论激烈。本文为我在会议上的发言。因为不是理论家，所以我的发言比较侧重对现实问题的解释。鉴于会上争论难以充分发表意见，会议期间，我特意邀请秦晖和汪晖在我的房间进行了一次坦诚的交流，谈话持续至深夜。后整理发表，即为此篇。——作者自注

[27]此文是2002年作者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部内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28]编者按：本书第一部分虽然讨论了中国的战略对策，但是在会议发言和演讲中，不可能谈得足够深入和系统。16年前，本书的第一版是与作者的另一本学术论文集《我们到底要什么》同年发行的，两本书可以互补着看。现在，《我们到底要什么》中相当多的内容已经扩充为其他学术作品，不宜再版，是以选择其中的两篇作为本部分附录，以期帮助读者把握作者思路的整体框架。本文是根据作者1996年在对地方试验区干部培训时的讲课录音整理而成的，收入本书时有删节，题目也是修改时加上的。

[29]农口部门，指与农业结合得较为紧密的部门，如林业、牧业、水利、气象、扶贫等部门。

[30]本文最初是作者于1991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演讲时的提纲，回国后整理成文，征求有关杂志意见后获得积极评价，但却由于当时某些方面的困难，没有任何刊物的负责人敢于公开发表，只好在我工作的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内部刊物《改革与试验》1993年2月10日第2期上首发。那期刊物发出后所留下的上百份存底很快就被人要光了。随后，本文在《发现》杂志1993年秋季号上公开刊登，《新华文摘》1993年第12期随即转载（删去了第二部分）。此后，《战略与管理》主编坚持要求再发，于是本文在该刊1994年第6期第三次发表。此次收入本书时，同样删去了第二部分，略去了图表和注释。——作者自注

[31]马克思：《资本论》，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6年6月第l版，第783页。

[32]本文公开发表之时的1993年，中国确实发生了第三次工业化浪潮，民间资本也确实有大的发展，但是并没有出现“社会化分配”。我们显然低估了部门垄断资本捍卫权益和左右决策的能力。——作者自注

[33]中国改革杂志社组织的大学生支农调查评比出了获奖报告，要结集出个册子，编辑让我写个序言，正好2002年10月25日我在中国农业大学新报告厅做了个演讲，所谈的无外乎近期的所思所想。与当时在场的老师、学生交流，气氛很好。有同志帮我记录，形成了摘要，权且摘录其中的第一部分作为序言。本篇即为此序言。——作者自注

[34]本文根据2001年5月作者应香港凤凰卫视邀请在清华大学“世纪大讲堂”进行演讲的记录稿整理。

[35]本文根据作者2001年11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整理而成。

[36]本文为2001年5月作者应学生社团邀请在北京大学的演讲记录稿。

[37]2002年5月，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李元在河南省安阳主持召开了农村集体土地进入一级市场的经验交流会。本文是作者在会议上的发言。

[38]此文根据2003年5月30日作者在《经济观察报》“观察家论坛”以“‘非典’危机与社会改革”的发言整理而成。

[39]本文根据2001年7月作者在北京市“财政支农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40]“十五小”企业分别是：年产5000吨以下的造纸厂，年产折合牛皮3万张以下的制革厂，年产500吨以下的染料厂，采用“坑式”和“萍乡式”、“天地罐”和“敞开式”等落后方式炼焦、炼硫的企业，土法炼砷、炼汞、炼铅锌、炼油、选金和农药、漂染、电镀，以及生产石棉制品、放射性制品的企业。

[41]此文是作者2002年5月在海南博鳌“民办教育论坛”上的发言提纲。

[42]此文是作者于2001年5月在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一次研讨会上的发言。这个讨论会是为2001年上海APEC会议准备有关“公司治理结构”的文件而召开的。

[43]“公司治理结构”，或者被称为“公司治理原则”问题，属于近年来比较时尚的“科学”。其之所以时尚，在于理论界针对中国上市公司，特别是国有企业表现出的各种弊端难以从深化产权改革角度发难，于是转向强调“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或者建立“公司治理原则”。我之所以提出不同意见，其实也在于强调另外一种更客观的角度：本来不必区分国内外，而应该直接讨论反映大资本本质的行为特征问题。——作者自注

[44]本文为2002年10月lO日作者在中央财经大学回答学生提问的录音整理稿，由《中国改革》杂志社支农调研志愿队办公室陈守合、黄学谦整理。

[45]主办银行：指主银行制度，是公司以一家银行作为自己的主要贷款行，并接受其金融信托及财务监控的一种银企结合制度。

[46]本文为2000年12月作者在中宏网与《中华工商时报》联合召开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世纪论坛》的发言。

[47]此文是2001年6月作者在贵州省贵阳市参加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召开的“西部大开发”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48]本文为1998年10月作者到贵州毕节地区考察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时应邀做的报告。

[49]本文为作者2004年4月7日在中央财经大学做的报告。

[50]本文根据1997年1月18日，时任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副主任的作者，在山东省农村改革试验区第七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整理而成。发表前已由作者修改过。

[51]此文是1997年5月作者担任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副主任时在苏南试验区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记录。

[52]本文为2003年4月16日作者参加国土资源部在安徽芜湖召开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试点经验交流会上的发言。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作为国家综合安全基础的乡村治理结构与机制研究”（14ZDA064）中期成果



居危思危

国家安全与乡村治理

福建农林大学课题组
温铁军　张俊娜　邱建生
编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東方出版社

版权信息

居危思危：国家安全与乡村治理/福建农林大学课题组等编著.—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3

ISBN 978-7-5060-8982-1

I.①居…　II.①福…　III.①国家安全—研究—中国②农村—群众自治—研究—中国　IV.①D631②D6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58503号

居危思危：国家安全与乡村治理

（JUWEISIWEI：GUOJIA ANQUAN YU XIANGCUN ZHILI）

编著：福建农林大学课题组　温铁军　张俊娜　邱建生

责任编辑：李烨　吴晓月

出版：东方出版社

发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北里51号

邮编：100028

印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版次：2016年7月第1版

印次：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22.75

字数：334千字

书号：ISBN 978-7-5060-8982-1

定价：45.00元

发行电话：（010）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请拨打电话：（010）85924602　85924603

目录

版权信息
《国仁文丛》（Green Thesis）总序
前言
国家安全以乡村善治为基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期报告
第一篇 局势：发展中国家内外风险叠加
第一章 中国对美“双重输出”格局及其新变化
第二章 关于一带一路和当前国际局势的一些思考
第三章 金融资本“无祖国”与做空分析
第四章 谨防当前国际外部性风险叠加国内社会动荡
第五章 中央风险与地方竞争
第二篇 乡土：国家稳定的基石
第六章 莫让私有化摧毁乡土社会
第七章 中国地方政府的三次“圈地运动”
第八章 百年乡建一波三折
第九章 乡村治理与国家安全的相关问题研究——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视角的结构分析[185]
第十章 乡村公共财的作用与生成逻辑
第十一章 政府理性与村社理性：中国的两大“比较优势”
第十二章 重构宏观经济危机“软着陆”的乡土基础
第三篇 农业：现代化何以为继？
第十三章 农业现代化的误区
第十四章 中国当前农业农村政策的基本问题
第十五章 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路径与方向问题
第十六章 农业“三产化”阶段的制度创新
第四篇 粮食：金融化趋势下如何保障安全？
第十七章 粮食金融化与粮食安全
第十八章 粮食金融化挑战
第十九章 日本高米价背后的农协垄断及其政党联系
第五篇 生态文明：发展中国家的希望
第二十章 理性看待全球危机，自觉转向生态文明
第二十一章 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高等教育理念转型及其试验
第六篇 探索：本土经验与地方创新

第二十二章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苏州工业园区结构升级案例研究
第二十三章 逆周期调节与“政府信用替代资本信用”——苏州工业园区三次遭遇危机条件下的政府行为案例分析
第二十四章 通过国家赋权与地方创新破解“三元悖论”——重庆发展经验解析
附录 课题组已发表英文文章摘要
I人—机—环境系统工程在金融创新及中央银行转型中的应用研究
II粮食金融化与中非农业合作
后记

《国仁文丛》（*Green Thesis*）总序

因为有话要说，而且要说在我们团队近期系列出版物的前面，[1]所以写总序。

我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从被动实践中的主动反思，到80年代以来主动实践中的主动反思，经两个“11年”在不同试验区的历练，[2]加之后来广泛开展的国内外调查和区域比较研究时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自忖有从经验层次向理性高度升华的条件，便先要求自己努力做到自觉地“告别百年激进”，[3]遂有新世纪以来从发起社会大众参与改良、对“百年乡建”（rural re-construction）之言行一致地接续，而渐趋达至“国仁”思想境界，亦即一般学人必须“削足”才能跟从制度“适履”、但只要纳入主流就碍难达到的“实践出真知”。

因此，我在2016年暑假从中国人民大学退休之际，要求为今后几年的一系列出版物担纲作序，也主要是想明了指出“国仁文丛”是何词何意，亦即：这个丛书是个什么思路和内涵。

一、释义之意

“国”者，生民聚落之域也。“上下五千年”是中国人开口就露出来的文化自豪！就在于，人类四大文明古国除了中华文明得以历经无数朝代仍在延续之外，其他都在奴隶制时代以其与西方空间距离远近而次第败亡。由此看中国，唯其远在千山万水之隔的亚洲之东，尤与扩张奴隶制而强盛千年的西方相去甚远，且有万代众生勉力维护生于斯而逝于斯之域，“恭惟鞠养，岂敢毁伤”，兹有国有民，相得益彰。遂有国民文化悠久于国家存续之理，更有国家历史传承于国民行动之中。

“仁”者“爱人”，本源于“仁者二人也”。先民们既受惠于光风水土滋养哺育的东亚万年农业，又受制于资源环境只能聚落而居，久之则族群杂处，而需邻里守望、礼义相习，遂有乡土中国仁学礼教上下一致维系大一统的家国文化之说，于是天下道德文章唯大同书是尊。历史上每有“礼崩乐坏”，随之社会失序，必有“国之不国，无以为家”。是以，“克己复礼为仁”本为数千年立国之本，何以今人竟至于“纵己毁礼为恶”……

致使梁漱溟痛感“自毁甚于他毁”的现代性为表、横贪纵欲为里之巨大制度成本肆无忌惮地向资源环境转嫁而至人类自身不可持续！

据此可知我们提出“国仁”思想之于文丛的内涵：

中国人历史性地身在三大气候带覆盖、差异显著的复杂资源地理环境下，只有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各类社会群体兼收并蓄、包容共生，才能实现并绵延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性可持续。

这个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其中的、在亚洲原住民大陆的万年农业文明中居于核心地位的“群体文化”内核，也被老子论述为“阴阳之为道也”，进而在漫长的文化演进中逐渐形成了极具包容性的、儒道释合一的体系。[4]

由是，在21世纪初重启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之后，我们团队试图把近代史上逐步从实践中清晰起来的乡建思想，寻源上溯地与先贤往圣之绝学做跨时空结合，归纳为人类在21世纪转向“生态文明”要承前启后的社会改良思想。[5]

是以，“道生万物，大德中庸。上善若水，大润民生。有道而立，大象无形。从之者众，大音希声”。[6]此乃百年改良思想指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之真实写照。

基于这些长期实践中的批判性思考，我们团队认同的《国仁文丛》的图形标志，是出土汉代画像砖上那个可与西方文明对照的、扭合在一起的蛇身双人——创造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的女娲，只有和用阴阳八卦作为思想工具“格物致知”了人类与自然界的伏羲有机地合为一体，才有人类社会自觉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繁衍。蛇身双人的扭结表明在中国人传统思想中物质与精神的自然融合，既得益于多样性内在于群体文化规范而不必指人欲为“原罪”而出伊甸园；也不必非要构建某一个派别的绝对真理而人为地分裂成唯物与唯心这两个体系，制造出“二元对立结构”的对抗性矛盾。

此乃思想理论意义上的“国仁”之意。

行动纲领意义上的“国仁”，十多年前来源于英文的“green ground”。

我们搞乡村建设的人，是一批“不分左右翼、但分老中青”的海内外志愿者。[7]大家潜移默化地受到“三生万物”道家哲学思想影响，而或多或少地关注我自90年代以来坚持的“三农问题”——农业社会万年传承之内因，也在于“三位一体”：在于农民的生产与家庭生计合为一体，在于农村的多元化经济与自然界的多样性合为一体，在于农业的经济过程与动植物的自然过程合为一体。

据此，我们长期强调的“三农”的三位一体，在万年农业之乡土社会中，本来一直如是。告别蒙昧进入文明以来的数千年中，乡村建设在这个以农业为基础繁衍生息的大国，历来是不言而喻之立国之本。

据此，我们长期强调的三位一体的“三农”，本是人类社会转向生态文明必须依赖的“正外部性”最大的领域，也是国家综合安全的最后载体。

中国近代史上最不堪的麻烦，就在于激进者们罔顾“三农”的正外部性，把城市资本追求现代化所积累的巨大“负外部性”代价向乡土中国倾倒！于是，我虽然清楚“三农”本属于三位一体，也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和新世纪第一个10年特殊强调“三农问题农民为首”，主要是因为那个时期的形势严重地不利于农民这个世界最大的弱势群体。实际上，也就是在做这种特殊强调而遭遇各种利益集团排斥的困境中，我才渐行渐知地明白了前辈的牺牲精神，大凡关注底层民生的人，无论何种政治诉求、宗教情怀和文化旨趣，总难免因慈而悲、因悲而悯，在中国百年激进近现代史中，也就难免“悲剧意义”地、历史性地与晏阳初的悲天悯人[8]、梁漱溟的“妇人之仁”等，形成客观的承继关系。据此看，20世纪初期的“乡建派学者”也许应该被归为中国最早的女性主义。[9]我们作为继往开来的当代乡村建设参与者，有条件站在前辈肩上高屋建瓴、推陈出新，不仅要认清20世纪延续而来的中国“三农”困境，而且要了解21世纪被单极金融资本霸权强化了的全球化，及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巨大制度成本的制度体系。这个令人高于前人的全球视野，要求我们建立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世界观和宏大叙事的历史观，否则，难以引领当代乡村建设运动，遑论提升本土问题的分析能力。

从2001年中央主要领导人接受我们提出的“三农问题”这个难以纳入全球化的概念以来，即有一批志愿者着手复兴百年传承的“乡村建设”。部分年轻的乡建志愿者于2003年在距北京大约300公里之遥的河北翟城村开始了新时期乡建，一开始却根本就没有外部资金投入和内部管理能

力。因为这种民间力量为主的社会运动无权无钱，很大程度要靠热血青年们艰苦奋斗。那，年轻人激情四射地创了业，也激情四射地生了孩子，老辈们就得跟上支持和维护。十多年来，有一句低层次的话多次被我在低潮的时候重复：存在就是一切。只要我们在主流随处可见的排斥下仍然以另类的方式存活下去，就证明了超越主流的可持续。在最开始心里就觉着，应该给这个社会广泛参与的乡建运动将来可能形成的可持续生存系统，提出一个可以做国际交流的概念，一个符合21世纪生态文明需要的、大家可以共享的名号。于是就跟海外志愿者们商量，提出了这个英文概念“green ground”。若直译，就是“绿色大地”；若意译，则是“可持续基础”。如果把音译与意译结合起来考量，那就是“国仁”。有国有仁，方有国人国祚久长不衰。

从十多年来的乡建工作看，这三个意思都对路。

二、文丛之众

俗话说，三人为众。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如此看文丛，乃众人为师是也。何况，我们在推进乡村建设之初就强调“去精英化”的大众民主。[10]

前几年，一直希望整个团队愿意理解我试图“让当代乡建成为历史”的愿望，尤其希望大家能够结合对近代史中任何主流都激进推行现代化的反思，主动地接续前辈学者上一个世纪之交开始的乡村建设改良运动，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梳理经验教训。或可说，我“野心勃勃”地企图把我们在新的世纪之交启动的新乡建运动，纳入百年乡建和社会改良史的脉络。诚然，能够理解这番苦心的人确实不多。[11]

这几年，我也确实算是把自己有限的资源最大化地发挥出来，“处心积虑”地安排乡建志愿者中有理论建设能力的人在获取学位之后分布到设有乡建中心或乡建学院的不同高校，尽可能在多个学科体系中形成跨领域的思想共同体。目前，我们在海内外十几个高校设有机构或合作单位，有数十个乡村基层的试点单位，能够自主地、有组织有配合地开展理论研究和教学培训工作，立足本土乡村建设的“话语体系”构建，已经有了丰硕成果。[12]

总之，我们不仅有条件对新世纪已经坚持了15年的“当代新乡建”做个总结，而且有能力形成对20世纪前辈乡村建设运动的继承发扬。

我们团队迄今所建构的主要理论创新可以表述为以下五点：

一是人类文明差异派生论：气候周期性变化与随之而来的资源环境条件改变对人类文明差异及演化客观上起决定作用。据此，人类文明在各个大陆演化的客观进程，至少在殖民化滥觞全球之前应是多元化的，不是遵循在产业资本时代西方经典理论家提出的生产方式升级理论而展开的。这个理论有助于我们构建不同于主流的生态化历史观。

二是制度派生及其路径依赖理论：不同地理条件下的资源禀赋和要素条件，决定了近代全球化之前人类文明及制度的内生性与多元性，也决定了近代史上不同现代化的原始积累（东西方差异）途径，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和体系结构，并构成其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这也成为我们开展国别比较和区域比较研究的重要理论工具。

三是成本递次转嫁论：自近代以来，在全球化所形成的世界体系中，核心国家和居于主导地位的群体不断通过向外转嫁制度成本而获取收益，得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实现产业资本扩张和向金融资本跃升，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底层民众则因不断被迫承受成本转嫁而深陷“低水平陷阱”难以自拔。当代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因不同利益取向而相互竞争的金融资本为主导、递次向外转嫁成本以维持金融资本寄生性生存的体系。在人类无节制的贪欲面前，最终承担代价转嫁的是“谈判缺位”的资源和生态环境，致有人类社会的不可持续之虞迫在眉睫。

四是发展中国家外部性理论：二战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通过与宗主国谈判形成主权，这可以看作一个“交易”。任何类型的交易都有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因转交交易范围之外的经济和社会承载而为外部性问题，任何信息单方垄断都在占有收益的同时对交易另一方做成本转嫁，由此发展中国家谈判形成主权必有负外部性，导致难以摆脱“依附”地位。但，越是一次性博弈则风险爆发造成谈判双方双输的可能性越大，发达国家在巧取豪夺巨大收益的同时，其风险也在同步深化和加剧。

五是乡土社会应对外部性的内部化理论：中国作为原住民人口大国中唯一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其比较经验恰恰在于有着几千年“内部化处理负外部性”的村社基础，其中的村社理性和政府理性构成中国的两大比较制度优势。但政府同样是人类制造出来但反过来统治人类自身的成本高昂的异化物！遂有政府与资本相结合激进推进现代化之后严重的经济、

社会、文化、资源、环境等负外向性问题，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才有如此广泛的民众愿意参与进来，以期通过乡村建设使“三农”仍然作为中国危机“软着陆”的载体。

以上五点核心思想，主要体现于我们基于“本土化”和“国际化”两翼而展开的以下五个领域的研究工作中：

一是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在资本主义三阶段——原始积累阶段、产业资本扩张阶段和金融资本阶段，核心国家/发达国家总是不断以新的方式向外转嫁制度成本，乃是全球化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给资源环境可持续带来的最大挑战。这个思想，在我们的主要课题研究中，作为全球宏观背景，都有所体现，也发表在我们关于全球资本化与制度致贫等一系列文章中。

二是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团队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构建了“南方国家知识分享网络”，开展了“新兴七国比较研究”和“南方陷阱”等发展中国家的深入研究。目前正在进行比较研究的新兴七国包括中国、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委内瑞拉、南非、土耳其。已经发表了有关文章和演讲，两部专著也在起草和修改之中。

三是国内区域比较研究。中国是个超大型国家，各区域的地理条件和人文环境差异极大，对各区域的发展经验进行研究、总结和归纳，是形成整体性的“中国经验”并建立“中国话语”的基础。团队已经完成了苏南、岭南、重庆、杭州、广西左右江、苏州工业园区等不同地区的发展经验的分析。已经发表了多篇文章，形成的专著也获得多项国家级、省部级出版奖和科研奖。

四是国家安全研究。国家综合安全是当前面临“以国家为基本竞争单位的全球化”的最大挑战。基于国际比较和历史比较，团队研究表明了新中国通过土地革命建立政权与其利用“三农”内部化应对经济危机之间的相关关系——从历史经验看，新中国在其追求“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道路上，已经发生了九次经济危机，凡是能动员广大农村分担危机成本的，就能实现危机“软着陆”，否则就只能在城市“硬着陆”。团队正在开展的研究是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为依托，探讨如何从结构和机制上改善乡村治理以维护国家综合安全。

五是“三农”与“三治（县乡村三级治理结构）”研究。我们自提出“三

农问题”并被中央领导人接受之后，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来研究乡村“三治问题”（指县治/乡治/村治）。自20世纪80年代农村去组织化改革以来，作为经济基础的“三农”日益衰败，而作为上层建筑的“三治”成本不断上推，二者之间的错配乃至哲学意义上的冲突愈益深化！其结果，不仅是农村大量爆发对抗性冲突，陷入严重的不可持续困境，还为生态环境、食品、文化等方面“贡献”了诸多问题。比形成对问题的完整逻辑解释更难的，是我们如何打破这个“囚徒困境”。也因此，任何层面上的实践探索都难能可贵，即使最终被打上“失败”的标签，也不意味着这个堂吉诃德式的努力过程并不重要，更不意味着这个过程作为一种社会试验没有记录和研究价值。

综上，“大乡建”体系之中从事研究的团队成员众多，且来去自由，但混沌中自然有序，我认为团队在这五个领域的思想创新，在五个方面所做的去西方中心主义、去意识形态的理论探索，已经形成了“研究上顶天立地，交流上中西贯通”的蔚然大观。仅这个《国仁文丛》的写作者就有数十人，参与调研和在地实践者更无以计数，收入的文字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创新性，但也都不拘一格。如果从我20世纪80年代就职于中央农研室做“农村改革试验区”的政策调研和国内外合作的理论研究算起，我们脚踏实地开展理论联系实际的科研实践活动已经数十年了。其间，团队获得了十多项国家级“纵向课题”和数十项“横向课题”，获得了十几项省部级以上国内奖以及一项海外奖。在高校这个尚可用为“公器”的平台上，我们团队通过这些体现人民大学“实事求是”校训的研究和高校间的联合课题调研，已经带出来数百名学生，锻炼了一批能够深入基层调研，并且能够有过硬发表的人才，也推进了分散在各地城乡的试验区的工作水平。

由此看，当代大乡建由各自独立小单位组成，虽然看上去是各自为政的“四无”体系——“无总部、无领导、无纪律，无固定资金来源”，却能“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作出了一般海外背景或企业出资的非政府组织“做不到、做不好、做起来也不长久”的事业。诚然，这谈不上是赞誉我们团队的治理结构，因为各单位难免时不时发生各种内部乱象。但，乡建参与者无论转型为NGO（非政府组织）还是NPO（非营利组织），都仍愿意留在大乡建之中，否则再怎么干得风生水起也难有靠自己的思想水平形成“带队伍”的能力！若然，则乡建改良事业得以百年传承的核心竞争力，恰在于“有思想创新，才能有人才培养，才有群体的骨干来带动事业”。君不见：20世纪乡村建设大师辈出、试验点竟以千

数，21世纪新乡建则学者咸从、各界群众参与者何止数十万计！

这就是大众广泛参与其中的另一种社会历史……

由此看到：发展中国家为主的“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打出的口号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而在中国，我们不习惯提口号，而是用乡建人的负重潜行在大地上写下“另一个世界就在这里”（another world is here）。

人们说，20年就是一代人。从2001年算起，我们发扬“启迪民智，开发民力”的前辈精神，在新世纪海内外资本纵情饕餮大快朵颐中勉力传承的“大乡建”，作为大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改良事业已经延续15年了！再坚持5年，就是一代人用热血书写的历史了。

作为长期志愿者大家都辛苦，也乐在其中！吾辈不求回报，但求国仁永续。唯愿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投身其中的乡建事业，在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中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以此为序，上慰先贤；立此存照，正本清源。

温铁军

丙申年甲午月

公元二〇一六年六月

前言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作为国家综合安全基础的乡村治理结构与机制研究（14ZDA064）”的中期成果。主要内容是中期报告正文及课题发表文章的汇编。课题组设计这个科研项目的提纲时，便受惠于本项目首席专家集数十年交叉学科研究之大成，他提出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系统性思路得到团队专家的一致认同。因此，我们期望该项目成果报告能够体现“集成创新”——从全球化挑战、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应对输入型危机，遂有成本转嫁，而承载危机代价的乡村唯有加强善治才能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这个高度概括的逻辑关系，凝结着我们科研团队多年来从事国际比较和国内实践的综合性思考。2015年课题正式展开以来，中国恰好遭遇“经济下行期”，连带发生成千上万打工者失业，而乡村破坏、治理残缺难再发挥“劳动力蓄水池”作用等情况表明，课题组多年来强调的上述逻辑解释堪称“不幸而言中”……

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这个课题思想不仅由来已久、与时俱进，而且事关重大、殊为不易。

回顾1988—1994年的经济周期，当时以深化改革为名义，采取了应对危机的一系列政策，曾经引发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诸多社会连锁反应。对此，我们在90年代中期就针对性地提出要用“三农问题”取代农业问题的政策建议，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农民利益受损，导致农村中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愈发严重，到90年代后期农村群体性事件无论是数量还是烈度，都已经超过城市产业资本危机大规模下岗引发的事件。领导人常常半夜接到重大群体性事件的报告，以至难以睡个安稳觉！据悉，在中央正式接受“三农问题”取代农业问题这个政策建议之前，形势一度严重到中央平均每天接到27起群体性事件的报告。可见，农村中的基层治理问题，20年前就已经形成令人担忧的混乱现象。

新世纪之初的2001年12月，本课题首席专家在国家领导人面前直陈“三农”时弊，明确指称90年代全面市场化改革以来党在“三农”工作上存在的倾向性问题。紧接着，2002—2003年，“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和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被党中央和国务院相继提出。

自2003年我们以民间力量为主在村里筹办“乡村建设学院”以来，就一直试图把本来应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却被危机应对政策激化的群体性事件转化成“非对抗性”。我们2004年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申报成功的国家985“中国农村发展试验创新（I类）项目”、2006年申报获批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也都关乎于此。那个时候，在学术界内还未提出过发生在农村的社会冲突“本质上是对抗性”的相关理论，尽管理论家们对把招商引资作为第一要务的地方政府亲资本政策也多有批评。因此，我们从立项汇报到开题研讨，都需要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向大家解释何为“本质上具有对抗性”的矛盾，以及在当代社会已经大量发生的对抗性冲突中怎么做才能把已经激化的矛盾从对抗性转为非对抗性。此后，我们申请的国家985二期项目继续深化了这项研究的指导思想。同期，课题首席专家多次出席国务院重大问题座谈会和有关部委的政策咨询会议，我们课题组有关国内外比较研究和基层试验成果，都成为国家政策的参考或依据。

在农村基层开展具有近现代历史意义的“乡村建设”（rural reconstruction）试验研究十多年之后，2014年我们第二次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虽然研究的主题还是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但2007年次贷危机、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2009年全球危机，演化为中国2011年以来的经济下行和投机盛行，最终造成2014—2015年的房市、股市泡沫崩溃，反过来恶化实体经济等一系列事件，这不仅使我们的视野更加国际化了，也使得未曾谋面的国家社科基金评委对本课题思路更加认同——金融资本的全球危机及其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成本转嫁，都与承载“输入型危机”巨大代价的乡村治理有关。

我们注意到：在全球经济危机打击之下，沿地中海国家形成了一个危机圈，圈内国家无论何种制度、何种宗教，几乎全部爆发了严重的社会冲突。由此可知：全球化的成本转嫁所形成的巨大危机，对于大多数存在内生矛盾且情况比较复杂的国家而言都是挑战。我们据此形成了一个相对简单的经验性的判断：全球化条件下金融资本核心区的经济危机的代价转嫁到发展中国家，几乎全都表现为剧烈的社会冲突。总之，那些被称为“颜色革命”，或者是表现为其他部族、族群、宗教等一系列的暴力冲突，很大程度上和全球化的成本转嫁，或者和全球金融资本危机的代价转移有直接关系。课题组从国际经验比较研究的角度，认为中国尤其要关注全球化挑战下的国家安全。既然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是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决策的，那么，决定课题是否可以立项的应该是问题意识

是否足够清晰。

1.国家综合性安全与全球化挑战的相关性

课题组对发展中国家的综合性安全，构建了具有一般性的分析框架：全球化挑战——核心国家危机代价向发展中国家转嫁；承载输入型危机的乡村只有通过完善治理，才能维护国家稳定……

（1）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虚拟经济与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的关系

我们在以前的研究中做过这样的归纳，进入金融资本阶段的发达国家现在是虚拟化的符号经济主导，而发展中国家现在是实体经济主导，二者之间的关联是发展中国家把一般的商品和原材料向发达国家出口，形成发达国家经常项目的逆差，这个逆差怎么处理？发达国家借助“资本市场”这个概念，诱导发展中国家用出口一般商品形成的外汇到其资本市场进行再投资，于是发达国家形成资本项目的顺差，在整个体系里面出现两套话语，前者叫“自由贸易”（free trade），后者叫“金融流动”（capital flow）。发达国家以这两套话语去要求发展中国家“转轨”。结果就是发展中国家在实体产业和金融层面都无利可图，一方面得压低本国社会福利来维持劳动力价格长期比较低，一旦出口市场有所波动，就陷入失业和动乱；另一方面随之而来的是自然资源与环境的不可持续。

（2）双输：发达国家金融扩张导致发展中国家宏观调控两难

2008年的时候，我们在调研写作《解读苏南》这本书中就提出过世界在后冷战时期划分为北方和南方两大阵营，分别处于资本主义的不同历史阶段。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北方发达国家表现的是金融竞争，南方发展中国家表现为产业竞争。

美国在出台量化宽松政策之后，大量释放的货币并不直接进入世界实体经济，而是通过机构投资者进入资本市场，早已经虚拟化的资本市场有两个线索，第一个是进入能源、原材料和粮食的期货市场，每一次能源、原材料、粮食期货市场的大幅度波动，体现的都是一个大规模增发出来的“垃圾级”货币的消纳场作用，金融资本的这一部分投资通过制造期货市场波动产生高收益，但这直接压抑实体经济的复苏，发展中国家在实体经济层面的消费需求也就难以拉动。而价格不断升高的能源、原材料和粮食是通过国际贸易让发展中国家进口，客观上推高了基础商

品的价格。对中国这样的实体经济大国来说，当基础商品价格推动CPI高于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时，资金析出流向泡沫化的房地产，政府需要实行紧缩的金融政策，提高资金价格。一边资金价格提高但另一边实际的消费需求并没有提高的时候，实体经济就更是低收益的。这时候，大量的金融资本加快从实体经济析出，更多进入投机市场。房地产投机市场又和中国政府的几万亿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联结在一起，于是就加重了政府的国债和地方债来替代内需，尽管它在充实中国实体经济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使发展中国家进口通货膨胀的机制不断地恶性循环着。投机品市场的高利贷需要中央政府来调控，但另一方面，因为它和整个宏观经济的增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政府又投鼠忌器地很难对它进行有效的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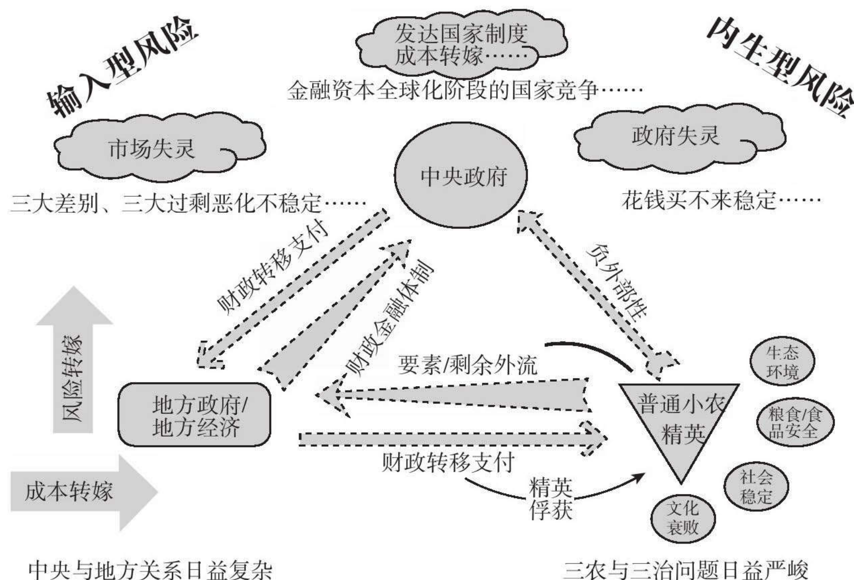
所以，发展中国家都会陷入一个宏观调控的两难困境，也就是说：单靠任何一个实体经济国家，要逆转以美国为首的其他西方金融资本国家共同向发展中国家进行制度成本转嫁的趋势是很难的。同理，既然西方金融资本国家能够顺畅转嫁制度成本，也就乐得分享金融资本收益，碍难向实体经济回调，也就难以扩大就业，财政长期赤字和社会对抗性冲突就都不可避免。这就是双输格局。

西方热衷资本市场的另一个趋势是，在利于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的国际秩序之下，美欧日相继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发行大量的低息资金，通过对海外投资——经资本市场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实体经济做战略投资或者战略收购以产生高收益。其他国家购买美国的国债资产，形成美国资本项目顺差带来的资金收入，美国把它所获得的资金用于购买其他国家的实体商品和战略性资产。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向美国出口实体商品，另一方面把换来的外汇在美国资本市场上购买债券；同时自己的实体产业被美国资本收购。对美国来讲，它的低利率资金的海外投资是高收益的，而国内居民生活是低通胀的；但是在中国，实体经济的低收益和投机品市场造成的高利贷并存，于是越来越多的资金被吸引到投机品市场中。所以，世界的实体经济是被资本市场和海外投资所引导，并非和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自身资金要素相关联。于是金融脱嵌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脱嵌于社会。

2.中央、地方、小农之间的“不可能三角”

我们在申请课题的时候做了一个总体的框架图，里面含一个“不可能三角”图。在面临国际输入型风险时，有三个承受主体：中央政府、地方

政府和小农。



图前言-1 “不可能三角”

伴随着30余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经济基础层面陷入了一个地方产业竞争与中央金融垄断相互强化的循环之中：地方政府主导产业资本竞争，但历史上却几乎从来就不承担产业资本恶性竞争造成的代价——赤字依赖和坏账上交，并导致中央政府只能强化财政和金融的权力垄断。实际上，这个制度演变在90年代末基本形成，但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地方招商引资的竞争……在这一循环往复中，中国经济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了日益固化的层次划分：地方政府的经济基础仍然是产业资本主导的实体经济，而中央政府依靠的经济基础则演变成金融资本主导的金融经济。

在客观发生经济分层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遵循着不同的“政府理性”和相应的行为逻辑，两者之间的利益结构格局失衡也就在所难免。并且，经济分层日益固化，而使得中央的调控即使在经济正常运行条件下也难以贯彻，所以，课题组认为中央—地方利益失衡格局可能将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不大可能被一般强调的市场改革或法律约束等现代化制度化解。

经验表明，在经济正常运行状况下，连有限责任都不承担的公司化地方政府永远是追求高增长的，中央的宏观调控也就不可能被地方政府

自觉落实；何况有些“见了红灯绕着走”的发达地区干部，因粗放GDP考核被越级提拔，这就使得地方对抗中央具有利益机制决定的内生积极性。而只有在风险累积至危机爆发的时候，因上下各种利益集团都发生利益受损，中央的宏观调控才有条件地被地方政府接受。

中央政府在财政金融领域获得巨大收益，从而实现对地方和农村的强力反哺。从中央下拨的经费结构上看，第一是养人大于养事，第二是专项经费大于一般转移支付，而且经费随着行政层级呈不断衰减态势，即省部级获得的最多，地市级其次，等到最基层的乡镇时成了杯水车薪。并且在项目下达的过程中，出现了普遍的“精英俘获”现象，即地方政府和农村中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结合，把专项转移的项目往往做成套取财政补贴的项目。这样不仅导致惠农项目很难体现中央财政的普惠功能，也使得农村社会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普通小农在资源要素和经济剩余长期外流的情况下，为了获得收益或者说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就不断地向生态环境、食品安全、社会稳定、文化等这些弱势领域转嫁负外部性。中央政府每年不得不开支大量的经费在维稳上，但仍捉襟见肘！

显然，在基层治理领域面临着因南辕北辙而越来越严重的“政府失灵”。

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错综复杂的国家安全矛盾。我们叫它“不可能三角”，换句话说就是，三者之间难以形成利益一致。我们从图示中看到，这三者中两两之间矛盾对立。

3.国家战略安全“锚”定何处

在目前国家安全复杂的局面中，国家安全战略的这个锚应该定在什么地方？一种说法是发展的问题要用发展来解决。相应的观点即，出现问题是因为我们发展得还不够，需要进一步引进外资，并配合外资做国内的制度优化。但在上述西方主导全球化的双输格局下，如果我们用发展的思路来解决发展的问题，最终是堕入发展陷阱。另一种说法是内部矛盾要在内部来解决，也即我们说的利用乡土社会化解外部风险的能力，内部化地处理国家安全所面临的风险。

（1）20世纪50—80年代的危机及化解方式

我们在另一个获奖研究成果《八次危机》中，系统总结了1949年以

来中国的历次经济危机，指出危机的化解每次都依赖于乡土社会，凡是能够顺利由乡土社会承担成本的，整个危机就能相对比较平和地过去，基本体制也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如果危机只能是在城市进行硬着陆，那就是巨大的制度变迁，或称改革。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共有两次引进外资，每次外资转化为中央赤字，对应发生两次危机，共发生了四次危机。每到上山下乡时，也正是危机发生时。大量城市失业青年转移到农村去，使得失业危机不爆发在城市里。另外，通过动员农村劳动力，实现了农村基本水利设施的建设，使得国家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依赖的“规模劳动替代稀缺资本”的机制能够发挥。

和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9—1981年。1978年的改革开放背景其实是一个严峻的经济危机，我们认为是整个70年代领导集体第二次引进西方外资导致的严重赤字引发的这次危机。但，因农村已经进行了去组织化的改革，不能再吸纳失业人口“插队”务农——不可能插户，大量失业人口滞留在城市里面，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于是出现了80年代以来经济危机向社会领域、向政治领域的转嫁、传导。

（2）农村劳动力蓄水池机制的发挥

与此对应的经验值得借鉴。2008年遭遇金融危机之后，广东省倒闭了约15000家外向型企业，主要分布在低端的劳动力密集型加工制造业。2009年沿海总共有2500万的失业人口。中国有效的经验是通过内部的基础设施建设，吸纳沿海不能就业人员回乡，因此出现了劳动力的回流，这与1978年之前的情况有异曲同工之妙。1978年之前每次危机都伴随着知青上山下乡，实质是城市失业劳动力向农村转移。而1981年到2008年，这个机制基本上是失灵的，劳动力单向地从农村向城市流出。但在2009年，在2005年提出新农村建设战略和2008年4万亿国债的刺激下，农村基本建设高潮再一次发挥了吸纳沿海失业劳动力的作用。

所以，城市和农村相比，农村更易于稳定。农村吸纳失业劳动力的机制，一方面是小农有地，是兼业化的小有产者经济，另一方面农村本来就可以经营多种工副业，还可以参与国家投资的三农基本建设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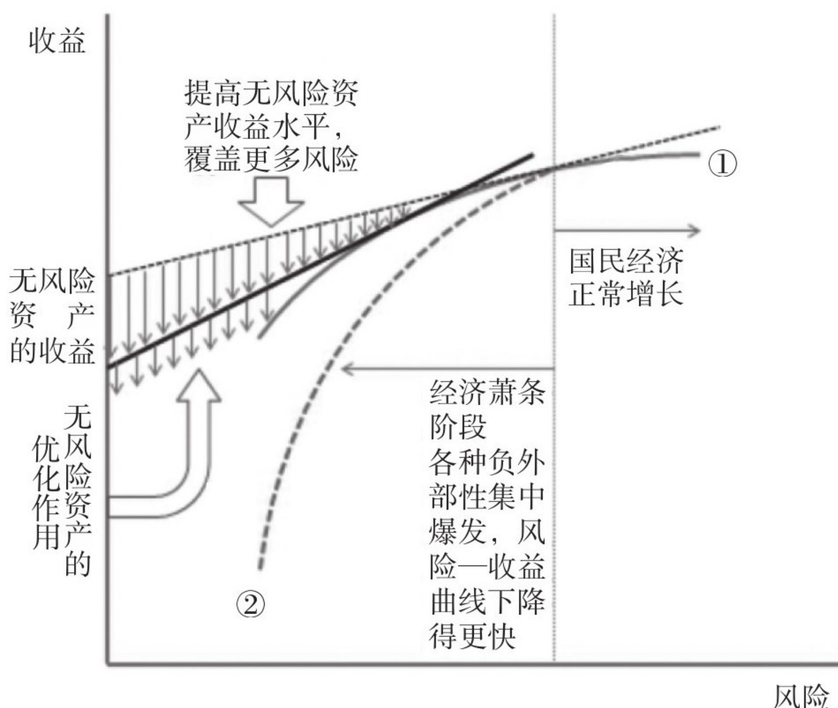
4.新农村建设对国家安全的积极意义

国家进行新农村建设纯粹是因为乡村能够吸纳失业人口吗？

（1）乡土中国的经济基础对国家稳定的作用

我们在以往的研究发表中指出，乡土中国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城市，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经济增长所依托的“无风险资产”，这对于重新认识农村在工业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许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下图显示了在宏观经济的风险—收益层面，无风险资产对于优化国民经济增长路径的作用。正常情况下经济增长的风险—收益情况如曲线①所示；然而，当经济增长率低于一定水平时，各种社会风险集中爆发的可能性骤然增加，有可能会使宏观经济陷入停滞，经济增长的风险—收益水平曲线切换为曲线②所示情景。如果能通过提高无风险资产的收益水平，使国民经济免于迅速掉进“下降通道”，那么无风险资产也就具有了“软着陆”载体的作用。



图前言-2　国民经济中的“无风险资产”对于优化宏观经济增长路径的作用

从经验过程看，在农业集体化时期，依托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三级组织化载体，农村吸纳了三次城市宏观经济萧条时产生的共计4000万失业人口，农村成为城市危机软着陆的载体。

农村改革以后，农村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无风险资产，效果最为显著的是80—90年代农村维持的土地平均分配、且大约5年就再分一次的土地制度，是为农户家庭综合经营派生的外出打工者安排了一份无风险资产。但近年来由于土地制度的激进变迁、工农收益差别的拉大，以及城市文明向农村的扩散，新生代农民工离土离乡离农的倾向日渐显著，作为个体的经济理性选择这本来无可厚非，但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国将面临一个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三农"这个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稳定器"，何去何从？

（2）"三农"对于国家安全的两种可能

缓解"三农问题"的政策及其执行，对国家安全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假如乡村治理劣化，安全基础薄弱，在面临国际风险向国内输入时，"三农"表现出风险外溢，也就是说它对这个风险是正反馈加强的系统。这将会导致国家整体安全风险增加。另一种可能是"三农"可以发挥风险吸纳的作用，这是对危机进行负反馈、消化的系统。它的基础在于改善乡村治理，构筑国家安全的微观基础，才能从总体上保证国家安全。

总体来看，我们的观点可以归纳成三点。

第一，发展中国家尤其像中国，其所面临的安全风险，在全球化时代主要是发达国家成本转嫁对发展中国家形成一个输入型的风险。西方货币紧缩的时候有一个传导机制。同理，在大量的货币增发输出通胀的时候也有一个传导机制。无论西方输出通缩还是输出通胀，都会导致发展中国家面临输入型的安全风险。

第二，从国家综合性安全角度看，乡村实际上的治理失序已经制造了内生性风险，乡村内部的各种问题演化成国家面临的一个总体风险，在这个乡土社会内生性风险不断累积，并且经常性爆发的过程中，乡村治理问题及其相关国内外比较研究，已经构成国家总体安全的一个重要部分。

第三，只有改出"百年激进"对乡土中国的破坏、重视"启迪民智，开发民力"的乡村建设，只有提高农民组织化形成其主体地位来改善乡村治理的依存基础，只有维护并加强能够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的村社理性，才可以在最低制度成本条件下保障国家综合性安全。

国家安全以乡村善治为基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期报告[13]

概述

本课题组在关于国家综合安全与乡村治理的相关性研究中，形成了如下三个方面的认识。

首先应该强调两个问题意识。

一是我们通过国际比较研究认为：对于中国的“国家综合安全”的研究必须走出西方发达国家给定的安全观视角，重新确立了全球化挑战下发展中国家自主的“安全观”，那就要看到发展中国家安全风险的复合性和复杂性，亦即来自国际的外部性风险叠加国内的内生性风险[14]。

二是我们对中国近代历史经验的归纳表明：乡村因其多样性、多元性而使得低成本的内在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成为可能。据此，乡村在现代化制度成本不断“积累—爆发”的历程中[15]，客观上成为历次经济危机“软着陆”[16]的载体。由此可知：各地为短期政绩推行激进现代化而破坏乡土社会，实际上是起到了自毁国家安全软着陆的基础的作用。对此，承担国家安全最终责任的中央政府必须加以约束。

其次，我们需要认识到当前乡村治理劣化存在风险累积的趋势。

一是从现实上看，如果以上两个问题意识属于人们应该了解的老常态，那么，当然需要看到“新常态”——乡村治理领域中的“市场失灵＋政府失灵”正在被造成这种困境的政策思路所不断深化，并且会按照“路径依赖”规律加强自身南辕北辙的趋势——乡村基层正在成为两极分化加剧、精英治理劣化、安全风险不断累积的领域。

二是从理论上看，课题组在申报书中提出，中国乡村治理正面临难解之“不可能三角”，国内外尚没有与之对应的理论创新。因此，若要客观研究现实问题，务必屏蔽西方后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才能重新求解：中国在现行体制上根本不可能形成“集中制”或“集权制”——中央政

府与地方政府的经济结构存在质的差异性。相应地，势必造成政令不畅——中央反复强调的善治改良之所以不可能与地方政策对接，在于当前体制内在地发生中央—地方—乡村“三元悖论”。[17]

最后是我们需要给出缓解这种复杂问题的、不同于主流思路的政策建议。

有鉴于上述“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长期趋势与乡村治理劣化的严峻性直接相关，课题组的政策建议重在加强基层社会的可治理性：一是农村“深改”应该重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客观地显现出来的两大“比较优势”——政府理性和村社理性；[18]二是通过鼓励“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来确立对农村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政策支持；三是从经济、社会、政治三结合的基础建设入手带动治理结构调整，透过文化嵌入、社会关联、伦理性整合等多种社会文化领域的机制创新，“自下而上”地提高农民和农村的组织化程度，才能对接得上官方强调的“自上而下”的政府善治。

本报告讨论的问题兼具长期性和基础性，是建基于此前11年间获批的社科基金多个重大重点项目研究成果上的进一步综合创新，是长期坚持实事求是的客观研究发现。课题组2004年获批国家“985农村发展试验研究基地（I类）”以来，一直从事乡村治理研究，在11年研究间先后获得两个国家级重大项目和一个重点项目及北京市社科基金农村发展交叉学科重点项目等支持，形成深厚的研究积累，才在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重要指示之后进行立项申请，并于2014年7月和2015年4月先后再次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为了体现这个重大项目在研究上的最新成果，本文扼要蒐集了课题组从立项申请以来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

一、树立发展中国家为本位的“安全观”研究意识

本课题认为，只有超越一般意识形态化地解读中国发展经验的羁绊[19]，才能确立更为清晰的国家安全研究的问题意识。我们必须认识到，不同的时空条件和考察视角，会赋予国家安全不同的结构内涵。

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安全包括十个方面：国民安全、领土安全、主权

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这些领域的相关研究被“学科化”地分门别类，虽然成果很多，但大多难以解释中国面临的综合安全方面的复杂挑战。

诚然，课题组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基本规律的现实意义：在整个经济基础巨大变化的作用下，上层建筑会逐渐发生跟进变革；但包括思想理论及其相关学术界的意识形态，还是属于最缓慢地发生改进的领域；并且由此而具有保守特性，严重地制约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

因为理解上述意识形态化的研究对解读国家安全问题有局限性，那就更要积极借鉴可以利用的理论资源。本课题在对发展中国家长期开展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讨论发展中国家的综合性安全问题，尤其需要借鉴萨米尔·阿明的第三世界“依附理论”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论”。

萨米尔·阿明近年来多次强调金融资本阶段的全球化危机。他认为，金融投资的爆炸性增长需要各种形式的债务作为“燃料”，尤其是主权债务。金融化垄断集团吸纳垄断的剩余利润的策略要求，就是债务增长。过去意义的主权国家对金融体系的控制手段如汇率、利息等，都已经因为强大的垄断金融资本的肆虐而失去其效用。

萨米尔·阿明曾预言全球化垄断资本主义不可持续，将会出现内爆（内爆的例证之一就是作为全球金融体系一部分的欧元体系和欧洲体系在走向崩溃）[20]。因全球化垄断资本体系强势制定了游戏规则并使体系内成员国接受，内生性地加强了金融集权对弱势群体转嫁代价。经济主权不再自主，国家缺乏能力去保障其民众的生存权，继而民众大规模的赤贫化、暴力化。[21]

专栏一：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危机

发达国家之所以积累了这么高的债务并且难以化解，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政治现代化的内生性危机。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是“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等已经具有高度“政治正确”的源于西方的概念，如果作为理念和信仰，则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应该得到秉持其他理念的群体予以同等的尊重；但如果某个具体的国家试图贯彻落实为有既定形式的某种政治制度，则至少需要对这种形式的制度产生的过高制度成本有所了解，对累积政府债务如何化解（或降

低）等方面的经验教训有所研究；唯能以此为据，才有符合国家治理常识的讨论。因为，在发达国家现行政治体制下这些被大力宣传的理念是一回事；其得以借助某种被称为现代化的政治形式来具体运作过程，则是另一回事。客观上看，这些政治现代化运作都在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也转化为政府赤字和国家债务——政治家为赢得选举而支付的全部成本、连同其政党给民众做出的福利承诺，在政府财政来源不足时都会直接形成高额的政府债务。

一些发达国家社会福利在财政总支出中所占比重甚至超过50%，这种财政结构支撑的社会政策体系，远非发展中国家因资本高度稀缺而普遍实行“亲资本”导向的政策可以相比。

——摘自课题组2010年的报告《通过新农村建设促进“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和谐、可持续发展——中国的真实经验：60年8次危机及其软着陆》（教育部2009年应急课题研究报告2009JYJR023）。

沃勒斯坦早已指出，全球资本化的巨大成本是从核心国家递次向边缘国家转嫁的，这是核心国家占有全球化制度收益的另一面。世界上关于沃勒斯坦的思想的讨论汗牛充栋，本文无须赘述。在理解他们的分析的同时，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些向外转嫁制度成本的核心国家，已经成为国家安全问题的最主导的研究者和研究对象。

专栏二：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及全球转嫁

为什么美国负债最大，可政府债务危机却首先从欧洲国家爆发呢？

从危机发生之后政府可采取的应对手段来看，当前债务危机最严重的是欧盟国家中那些已经没有实质产业支撑却加入了欧元区的国家，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因其放弃了货币主权，而不能再用政府不断增发货币制造通货膨胀的手段来向社会转嫁危机。

亦即欧元区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这意味着这些仍然具有政治主权的欧元区国家把最为重要的经济主权——对内的货币主权和外汇主权都交给了欧洲中央银行，不仅失去了靠制造通货膨胀向社会转嫁危机来缓解债务压力的手段，而且不再有条件采取即时的利率和汇率政策这两个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也就失去了政府即时宏观调控的两只手。

何况，这类国家大多数同时完成了制造业对外转移，那就好比完成了经济上的自断骨肱——失去了货币体系和产业体系这两条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腿。

欧元区国家虽然有条件发行欧元扩充欧洲金融资本参与全球金融竞争的“数量”，却没有条件提升欧元的“质量”——像美国那样靠军事霸权来维护其作为全球主流储备货币地位；遂决定了其不可能像美元资本那样直接向世界转嫁美国政府债券增发隐含的本国债务增量。

只有美国仍然可以靠既增发货币（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又增发国债，以客观上促推全球通货膨胀的方式而向世界上其他仍然主要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业化国家转嫁危机代价。

——摘自课题组2010年的报告《通过新农村建设促进“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和谐、可持续发展——中国的真实经验：60年8次危机及其软着陆》（教育部2009年应急课题研究报告2009JYJR023）。

这是因为，从现实主义角度看，全球竞技场（global arena）上不可能自觉形成公平合理的体制和原则，对行为体进行公正的利益分配。核心国家的国际地位和权力关系的形成，受位置、空间、资源等地理因素限制，因此，追求大陆、海洋、天空等空间主导权，石油、矿产、粮食等资源支配权和战略要地、海洋通道等基地控制权成为西方近世文明的主题。这种格局下核心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不安全关系甚至军事冲突关系，现实主义的安全观势必成为这些国家的“自觉选择”，并且势必导致国家之间互相猜忌、敌视与对抗而，陷入“囚徒困境”，遂使处于强势地位的核心国家的安全问题成为研究的主流。

专栏三：希腊债务危机

希腊深陷债务危机，无法自拔。一旦希腊完全脱离欧元区，则当即要恢复的是本国的主权货币。而除了美国这样的霸权国家及坚决绑在美国地缘战略上“搭便车”的紧密盟友之外，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主权货币是否有信用，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本国拥有自主产权的资产总量有多大；二是本国的内外贸易总量有多大。这两个额度如果说都很小，则本币没有信用基础。由于这两个都是弱项，因此，一旦它改回到使用本国货币，就会出现大规模的主权货币贬值，国内则会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甚至会导致一旦发行本国货币就会发生“厄瓜多尔现象”（老百姓去

银行换外汇，本币信用崩溃，全国改用美元）。

亦即，如果希腊继续坚信所谓的自由主义经济的话，则它一旦退欧，国家金融体系就会崩溃，老百姓就会把手头的本国货币都换成外币（美元或者欧元），政府就又得去求助于IMF、世界银行、欧洲稳定基金，它就还得回来接受债权人更为苛刻的条件。这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再也不可解了。

但是如果回归到主流的西方金融经济去，对希腊来说是恶性循环。既回不去，也跳不出。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归纳全球危机体现的内在规律，可知：西方体制的本质，是“有限责任公司”的经济基础支撑“有限责任政府”的上层建筑。因此，这个体制下的公司破产，其超过注册资本额度的代价转嫁给社会；若政府破产，则超过财政支付能力的代价也同样只能转嫁给社会或国外。对此，可借用“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或可称为“有比较制度优势的不负责任”。

——摘自2015年7月6日温铁军教授在香港岭南大学《当前热点问题——希腊公投及中国股灾》讨论会上的发言。

有鉴于此，本课题研究确定的第一个问题意识是：要从发展中国家在应对全球化挑战中如何维护自身权益的自主性视角出发，研究我国的国家综合安全问题。如果这个视角得以确立，那就要求我们尽可能地改变，至少在立场上有别于占据主流地位的符合西方社会科学的价值观及理论工具的安全研究。

此外还要认识到，当前国内蜂拥而起的“智库”大部分不具基本条件。所谓全球领先地位的“智库”研究及其制度话语内含的逻辑建构，虽然一般都被主流认为具有普遍意义，甚至被照搬到国内，使人不自觉地臣服于“软实力”的浸淫，但在实质上，它只是以发达国家需求，特别是核心国家的全球安全战略及其内在利益需求为主导的研究框架。不幸之中的大幸是，多年以前我们确立此类客观的问题意识的时候，往往不被主流意识形态认可，但近年来却正在随着人们对全球危机代价转移的切身体验而逐渐被社会大众所接受。

二、发展中国家承受的风险特征：国际的外部性风

险叠加国内的内生性风险

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不再是西方工业化时期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产业资本占据矛盾主要方面），而是西方“去工业化”后主要金融资本集团之间恶性竞争的内生性矛盾：总体性金融过剩及其不可回避的金融资本垄断集团争夺全球货币霸权（垄断地位）的对抗性矛盾。在全球生产过剩长期化的制约下，由于金融资本具有流动性、短期性和集中性，在垄断集团的控制下，大部分的剩余价值不再被用来投资于没有流动性的实体经济扩张及深化生产系统，资本持续累积的唯一选择是把这些剩余用作金融投资，产生不断增长的剩余，而且以此自肥[22]。这必然要借助全球化扩张泡沫经济来获取收益并向外递次转嫁成本。

例如，美国遭遇金融海啸之际，连续实施巨大规模的“量化宽松”，但本应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却并没有发生，而是发生了“通货紧缩”。主要原因是大量货币流动性进入全球期货市场，导致石油、原材料和粮食价格上涨。一方面，跨国公司借此获取投机收益而更多主宰全球期货贸易的同时，造成不得不进口粮食和能源的发展中国家被迫“进口”通货膨胀。另一方面，这类“输入型通胀”抬升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利率，构成全球投资市场竞争中发达国家的低利率优势，使其能够更低成本地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战略产业。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大安全风险来源。[23]

在战后全球秩序主导国家从产业资本阶段进入金融资本阶段的过程中，所淘汰的实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随之，实体产业内生的劳资对抗性矛盾、环境问题亦随之转移，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内部安全的另一个主要矛盾。

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和政策调整，通过全球资本和商品市场传导给发展中国家，加剧了一般发展中国家内部本就紧张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并越来越多地从根本上危及国家政治安全。“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就是金融危机，顶多恶化成经济危机。[24]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不仅每次就是经济危机，而且经常递进成社会动乱、政权颠覆、国家分裂。”

美国曾经通过量化宽松政策缓解自身债务危机，并且最大化地获取金融全球化的制度收益，但其造成的巨大制度成本却借助粮食、石油、原材料的价格上涨，转嫁给大量进口基础物品的国家。美国救市政策加剧流动性过剩，造成2009—2010年全球粮食价格大幅度提升，特别是北非地区紧缺品种小麦、面粉的价格上涨超过100%，玉米价格上涨超

过70%，由此引发北非、中东地区的通胀危机、街头动乱和政权危机，使其成为制度成本的承担者。国际组织2008年确定38国发生粮荒，也是西方金融危机的代价转移造成全球通胀的结果。[25]

显而易见，发展中国家的安全风险受制于国内外两个方面的复杂因素，且越来越多地在经济、文化、科技、环境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体现。

在国际竞争性市场上，发展中国家依然是配角，并且既向发达国家做原材料和低价商品输出——这相当于对发达国家构建输入型通货紧缩，助其以零利率推进对外投资，做出巨大贡献；同时又承受着发达国家转嫁的危机代价。新兴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格局失衡、社会性投资与生产性投资失衡、金融创新与投机失衡、政府管控能力和市场需求失衡，[26]被动地陷入资本外流、货币贬值、债务上升、通胀高企、楼市高仰、股市架空等经济困境，以及工厂倒闭、就业不足、追求福利、贪污腐败、弱势政府等社会困境；同时还因本国资源环境严重破坏、社会关系过度紧张，而被发达国家凭借软实力深度蹂躏。

这些影响深远的外部因素，的确不可能靠国内单纯加强传统的部门“维稳”来解决，甚至发生政策体系的冲突：只要在外部环境上加快融入全球化，那么内部传统部门越加强维稳就越适得其反。

三、中国的安全问题研究需同时关注多个维度

中国在新世纪全面纳入全球化，客观上是个充满张力的过程。其伴生的综合性安全问题研究也需同时关注国际和国内、中央和地方、城市和农村、农村集体和农户个人等多个维度，具有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复杂性。

1.美国“双重搭便车”与中国“双重输出”。

课题组在全球化研究中，依据前述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归纳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三个阶段，并发文分析了中美分别是两个不同阶段第一大国的观点。[27]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最高阶段，是金融资本阶段；下一个阶段是产业资本阶段；再下一个阶段则是资源经济阶段。在金融资本阶段，美国是第一大国，其金融衍生品的交易规模占全球份额近40%[28]。在产业资本阶段，中国是第一大国，装备制造业

占全球比重超过1/3[29]。世界由此形成美国占据金融资本高级阶段，中国处于产业资本次级阶段，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资源经济低级阶段的世界经济新格局。

中国长期维持的低价出口和贸易盈余及其回流美国的国债再投资，不仅同时补贴了美国的消费者和金融资本、造成美国在“生产不足”条件下的长期通货紧缩，还支撑了美国产业资本的全球扩张。美国从资本市场回流的充裕美元，使其企业界具有低息融资的条件，而发展中国家恰因资本和收益外流而形成国内资本高息；更由于这两种资本体系之间的巨大利差形成美国实体产业占有的金融竞争优势，并据此低成本地控制接受国的战略产业。而跨国投资的收益向美国资本市场回流，进而又成为美国资本市场的支撑[30]。

北京大学的陈平教授将这一流程概括为：发展中国家用出口换汇再投资于发达国家金融衍生品市场，而发达国家的投资银行则用这些收入反过来收购发展中国家的战略产业；美国不仅“借贷消费”，还大量“借贷收购”，从而形成在全球的战略控制。

本质是，美国作为金融资本阶段第一大国，是典型的寄生性攫取型经济，长期搭着中国物质产品出口和贸易盈余再投资的“双重便车”，在坐享低通胀条件下实现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

新世纪之初，中国完成银行商业化改制并且使其全部上市，同时央行大规模对冲增发货币及中央政府推出中国版量化宽松。2009年全球危机之后，沿海发生“去工业化”，中国经济只能向金融资本升级。这与2010年开始的美国向实体经济回调正好迎面相撞，造成中美关系从互补转向互斥。这对中国如何应对外部压力和风险提出了新的挑战。

中国如今更多地面临金融相对过剩的压力，于2010年左右加强推进金融投资和实体产业“走出去”战略，并从2013年以来，通过全面实施“一带一路”等对外投资项目来带动人民币国际化。一方面，美国不遗余力地利用“后冷战”软实力的多种方式构建阻遏中国金融资本“走出去”的战略布局，包括利用各种“民间基金会”的大量资金投入发展中国家，资助对中国做“新殖民主义”的批判研究和与中国海外投资项目对立的NGO运动[31]。另一方面，美国变成一个相对具有吸引力的制造国，正在积极吸纳中国有潜质的高新产业去美国投资设厂。2014年，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额达到120亿美元，越来越多的企业在美国设厂，贴

上"美国制造"的标签。[32]

这种金融资本阶段的大国对抗趋势是显然的，因为大国急速扩张金融资本信用，只能派生于国家政治军事强权。该国货币作为国际硬通货的"硬度"，主要来源于该国的军事政治实力的硬度。但更显然的是，中国目前确实不具备直接对抗的条件。由此看，中国被动地接受更多美国金融扩张和产业回调转嫁来的代价，使得中国的国家安全风险具有显著的国际国内联动性。[33]

2.中央—地方—乡村社会之间"三元悖论"及民间调和。

近代以来，中国为追求民族独立而派生了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进程，在这种以内向剥夺为主的资本积累的工业化进程中，代表国家资本的中央政府，比其他政府和社会主体，更直接地承受了国际压力和挑战。中央应对国家层面的重大挑战的方式只能是"政权内卷化"，借助地方和基层力量来应对时势演变对于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无论哪个时代，"三农"都是最大的剩余输出者，而乡村治理结构的数轮重大调整，核心指向都是对中央、地方与基层社会之间不断进行"三农"社会剩余分配进行调整。尽管这种调整对于"三农"剩余的动员成本具有显著的影响，但利益矛盾本质上就具有哲学意义上的对抗性，遂使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乡村社会基于利益关系的一致性建构，自清末以来一直难以达成。我们认为，这种利益结构上的"三元悖论"，恐怕是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

近代以来，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中心的整体性变革，既产生出再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百年轮回"经验过程，又派生了由"三农"承载代价的实际后果。[34]整体性的"西化/现代化"进程都共存着"都市本位、工业优先、从'三农'提取剩余、巨大成本向乡土转嫁"等特点，上层和精英的"自强"不期然地导致下层和乡土的"自毁"。正如梁漱溟先生所指："外力之破坏乡村尚属有限，我们感受外面刺激而起反应，自动的破坏乡村，殆十倍之不止……一部中国近百年史，从头到尾就是一部乡村破坏史。"[35]

其具体表现为：乡村经济中的"生产力三要素"多形式外流、乡土社会低成本稳态治理秩序随之解体、"乡/土"成之为问题与必须克服的目标对象；外加资本主义全球化与制度代价向发展中国家弱势群体和资源环境次递转嫁这一宏观国际背景，共同产生着"乡土社会整体性衰败"的普

遍效果。乡村衰败之现象及民众对现代的向往进一步形成乡村“自毁”之社会基础。

而正是因为看到了农村所承受的国家现代化的代价及其严峻后果，百年来，知识分子纷纷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挽救衰败的乡村，历史上不同阶段的乡村建设实践即是例证。但同时他们强调“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36]。

第一波中国乡村建设高潮，表现为20世纪初，当地乡绅米春明父子自发创造的“翟城试验”及20世纪20年代由晏阳初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所主持的“定县试验”；同期还有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先生在其家乡南通开展的县级治理实验；社会企业家卢作孚的北碚实验；这一时期投身于乡村以实现“救民”愿望的还有在战乱频仍、土匪乱世与地方割据环境下推行农民组织化的早期乡村建设领导人、河南村治学院与宛西自治开创者彭禹廷先生；辛亥革命先驱、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旨在分期实现“三民主义”，以革除差役整顿警政、设立民团肃清土劣、清理丁粮改革赋税、破除迷信倡导文明等系列建设实践的福建营前模范村（1928—1933）创办人黄展云先生。

第二波乡村建设运动表现为：1949年土地革命对底层社会全面动员，并以此为基础，对乡村社会进行全面整体的组织化改造。这虽然让“乡建派”知识分子们的乡村建设行为萎缩，却由于新国家社会广泛参与基础的形成，乡村建设的理念和工作在国家建设背景下，以新的形式被高效、全面地替代与覆盖。比如全民扫盲、技术推广、赤脚医生、乡村民兵，社队企业、大众文艺、水利建设、互助合作，以及对农民主体地位、妇女解放、尊严劳动等的强调。

第三波乡村建设着力点在于，如何让纷纷外流的“三要素（资金、劳动力、土地）”及有利于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各种资源逆向回流。为此，21世纪的乡村建设以试验、培训、研究、推广为方式，不断往返于“现代—传统”“城—乡”“政府—民间”“知识分子—民众”“理论—实践”之间的广泛地带。以“人民生计为本、互助合作为纲、多元文化为根”为基本原则；以城乡一体为新的分析单位与建设对象；以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为基本方针；以城乡互助与包容为生态文明背景下的基本方向；以“学生下乡教育支农”“农民合作改善治理”“农业生态城乡融合”“工友互助尊严劳动”“社会参与文化复兴”等五大工作为基本形式。民间团体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创新性探索。

由上，如何将持续百年的努力延续下去，构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乡土社会这三者之间激励相容的制度框架，使得从中央到农村基层的各层级政府治理主体和各种城乡市场主体之间，形成一种新的有机组合，在行动过程中通过相互关联和补充来增进结构凝聚及功能融合，促进乡村治理各主体彼此依赖、共存互生的整体性，使乡村的安全性、公共性、市场性与社会性等不同机制有机地综合为一体，将是乡村治理和国家安全治理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3.派生于工业过剩的“农业产业化”战略陷入困境。

农业产业化战略是1998年中国工业化遭遇生产过剩危机压力下，应工商业资本的要求而提出的，迄今已经进行了17年。虽然农业产量确实增长了，但也造成了“双重负外部性”：食品质量问题严峻及资源环境遭到破坏。其原因有三。

一是根据“要素再定价”规律可知：由于符合农村外部资本要求的土地规范流转的占比很低，因此能够用于支付农业资本化的成本所必需的“绝对地租”总量并没有明显增加。就在同期，加快城市化造成农业生产力诸要素更多被城市市场重新定价，在这种“外部定价”作用下的农业“二产化”所能增加的收益有限，根本不可能支付已经过高且仍在城市三产带动下攀高的要素价格。于是，农村的资金和劳动力等基本要素必然大幅度地净流出。劳动力老龄化更表明，通过工业化来改造农业的主要方式：“一产规模化”＋“二产车间化”的竞争力已经丧失殆尽。这说明，中国并不例外于东亚各国农业现代化都遭遇到的普遍困境。

二是根据“资本深化”规律可知：农业产业化内涵性地体现着“资本增密排斥劳动”，即同步带动农业物化成本的不断增加。引入外部资本来改造传统农业带来的相应后果，则是在过去兼业化综合性村社合作社经济通过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条件下，大部分的经济作物、畜禽养殖还能产生附加值，可是，一旦交给产业资本开展大规模“二产化”的专业生产，就纷纷遭遇生产过剩；因此，单一品类生产规模越大，市场风险越高。如今，一方面是倒掉牛奶、蔬菜大量烂在地里、水果留在树上的情况比比皆是；另一方面，则是在城市食品过分浪费的消费主义盛行情况下，大部分规模化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仍然几无盈利，中小型企业甚至债台高筑，大都转化成地方财政负债和银行坏账。

三是根据“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双重失灵规律可知：追求资本

收益最大化的农业经营都会造成严重的“双重负外部性”——不仅带来水土资源污染和环境破坏，在最难治理的面源污染中，农业的贡献早已超过工业和城市，成为第一大污染源，而且使食品质量安全进一步恶化。正由于“双重失灵”，愈益显著的“双重负外部性”不断演化为严峻的社会安全成本爆发的风险[37]。

4.粮食安全危机。

本课题组提出的国际粮食市场的供求关系，并不是构成粮价剧烈波动的最主要因素。同时，我们发现国际粮食价格的剧烈波动与美国数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存在紧密联系，从而引出我们对于“粮食金融化”的概念和内涵做出相关分析。

粮食的金融化，在国际社会上主要是指粮食的美元化，它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各国彼此联系越来越紧密的粮食产业被金融化的体现。美元的大量增发，造成越来越多的过剩流动性冲击粮食市场，导致粮食价格出现剧烈波动；粮食市场同时成为过剩金融流动性的垃圾消纳场，粮价的一次大起大落就能替西方主导国家制造的过剩流动性做“消化”。这两方面都显示出粮食市场的运行脱离实体层面，而粮食则被人为创造出“金融属性”。[38]

大多数殖民主义时期留下的“单一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因粮食的对外依存度高，而在核心国家扩张信用推动全球通胀、转嫁危机的时候，此类对外依存度高的发展中国家，势必首当其冲地承担制度代价。

我国粮食价格因“地板”高于“天花板”，[39]粮食种植实际上早就是亏本的，于是传统农区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种粮，进城打工谋生。2014年，如果算上大豆，和直接的肉、奶进口折算，则我国粮食的总进口量已经突破1亿吨，占全国总消费量的比重接近20%！[40]也就是说，即使在中国的粮食生产量“10年连增”的大好形势下，进口占比5%的安全线也早已失守；遑论遭遇粮食减产之因应。

须知全球化本质上是国家之间的资本竞争。金融资本主导全球化已经造成的“粮食金融化”，对中国为适应过剩产业资本向农业扩张而建立的粮食安全战略，及因此而缺乏“责任主体”的粮食安全保障方式，敲响了警钟。但近期中国有关粮食安全的政策讨论，对此尚缺相应关注。

人们还应该理性看待中国粮食安全“缺乏责任主体”的有关背景：

在整个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粮食安全很大程度依赖占比约1/3的农户存粮，国家每年收购和储存占比1/8，即可实现市场调节和产销安全。但1997年遭遇亚洲金融风暴，1998年以后顺应金融商业化改革必须压减坏账而要求粮食配套改革，主要实行了“统一收购、顺价销售、资金封闭运行”。加之全面推进农业市场化，而使得农户粮食生产和消费的商品化率大幅度提高，农户存粮占比随即大幅度下降到几乎可忽略不计。由此所形成的集中依赖国家储备体制维持安全之最大弊病，就在于：本来与粮食安全有实质性相关的农民生产者和种养殖企业、市民消费者和地方政府等四类主体几乎完全不承担粮食安全责任；偌大一个13.6亿人口的中国，实际上只有中央政府这一个主体承担着对保障全民粮食安全的无限责任！这个责任主体1:4的客观情况，造成中国粮食安全形势不仅严峻，且随着消费主义左右社会舆论而更加难以改观。

专栏四：粮食金融化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的挑战

包括：粮食价格脱离供求基本面，定价权旁落；粮食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引起连锁反应；生产、储备、进出口及相关部门分属不同系统，条块分割易于引发粮食金融危机。粮食波动的客观结果成为加剧贫富差距的因素。在粮价高企导致低收入阶层生存条件恶化的同时，市民作为消费主体缺乏社会组织创新条件，粮食文化方面被“消费主义”全面掌控、节约传统被抛弃；致使食物浪费恶性循环地刺激政府补贴化肥农药和机械等投入，不仅加剧资源环境破坏，而且造成把中国粮食安全更多依赖外部市场的政策诉求和心理预期。

——摘自2014年课题组报告《粮食金融化与中国粮食安全战略研究》（国家粮食局委托课题）。

5.“中央下乡”和“地方下乡”。

客观看改革以来的经验过程，由于公司化的地方政府追求激进发展主义造成的巨大制度成本，最终还是要由客观上属于“无限责任政府”的中央来政治埋单，因此，随着中国进入资本过剩阶段，中央和地方关系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零和博弈。[41]

新世纪之交，中国在进入产业资本整体过剩、造成银行坏账全面爆发的同时，经由中央财政对国有银行有条件注资而短期完成了银行商业化改制；也恰因二者同步而引致了中央和地方经济利益结构的新变化：

中央政府逐渐升级到以金融资本及垄断行业为主要收益来源，地方政府则一方面谋求升级产业资本来继续与其他地区的“府际竞争”，另一方面则唯有借地产开发才能与中央管控的金融资本博弈。由是，课题组认为：地方政府追求“以地套现”正好迎合了金融资本异化于实体经济的趋势[42]，遂使土地征占成为新世纪以来引致农村冲突的最主要原因。

总体来看，当前乡村所面临的一个大格局是“以国家综合安全为目标的中央政府要稳定，以产业综合收益为目标的地方政府要发展”；二者客观上已经属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却在空间上并发于当下之乡村。遂使乡村基层中方兴未艾的“政权下乡”，亦可分为“中央下乡”和“地方下乡”。[43]

所谓中央下乡，本质上是因乡村“三治”乃国家综合安全之基础，因而需要承担安全责任的中央政府采用国家信用配合政策手段下乡。亦即，以集中制国家的强大主权信用所派生的国家财政和金融作为乡村基本建设和社会政策的主要资金来源，目的在于构建“民生新政”之下的和谐社会。

所谓地方下乡，实际是大多数不可能升级到金融资本阶段，而只能“以地套现”的地方政府，现在“以地托债”的地方政府[44]，与被亲资本的优惠政策吸引来的外部投资结合在一起搞“资本下乡”，实质上还是以资源和土地的资本化开发来实现产业化经营。尽管这客观上推进了国民经济过度依赖房地产投资造成的快速增长，但经济下行期政府债务负担严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却很难有条件构建能够弱化矛盾的话语体系和缓冲机制，因此社会矛盾明显激化。[45]

鉴于任何外部主体都面临着与分散小农的交易成本问题[46]，中央下乡只能经由地方下乡实施，由此势必遭遇重重尴尬。

6.内生性的不可持续风险攀升。

由于中国是一个超大的大陆型国家，长期存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进一步加剧了国家安全局面的复杂性。在中央政府已经跃升到国家信用派生的财政、金融收益为主要收益来源的条件下，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公司化竞争，不仅导致了在市场的“过度竞争”下，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等国家广义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内生性的不可持续风险不断攀升；也使得国际和国内、中央和地方、城市和农村、农村集体和农户个人之间的利益格局日益复杂，使中国的国家综

合安全问题空前复杂和棘手，经济发展、地方财政和基层治理的不可持续风险不断增长，从微观基础来看，中国经济很有可能出现“断崖式崩塌”。[47]

课题组在2010年完成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的结题报告中已经指出：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历史地看，今天地方政府仍未能从近代史中汲取足够的教训，基本还在延续着已经被过去一百多年的经验一再证明为社会成本过高的做法。

近代一百多年以来，乡村长期面临着两个基本矛盾：一是在国家追求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和产业扩张的制度导向下，农村剩余被城市过量提取，导致乡城差距加大，“三农”问题日益严峻；二是政府为了从分散小农为主体的农村提取剩余而在基层形成了“对上代理型”治理结构，与乡村“自我稳定机制”所需要的治理方式刚好相反，村社的自我治理和风险内部化功能受到极大削弱。

在这两个长期制约乡村治理的基本矛盾下，由于乡村资源收益往往只够满足少数精英群体的需求，任何普惠制的或体现“群众路线”性质的制度变迁都难以在乡土社会内部发育和维持；因此，在不断加大的社会冲突压力面前，通过乡村精英群体的灰色治理来勉为其难地维持村庄基本秩序，就成了大多数时期、大多数地方政府的工具性选择。诚然，这是长期放弃价值理性的必然结果。而且，反过来会进一步强化乡村中经济剩余单向集聚于精英和社会治理单向主导的非稳态结构。由此看，“精英俘获”为内在机制的、灰色治理为工具的村庄，已经不再有能力内部化地消纳外部性风险，反而成为多种潜在冲突不断复合和累积的矛盾体。

由此，需要有组织地开展国内“去学科化”的深化国家综合安全战略研究。须以全球化挑战下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国家综合安全为目标，全面进行内部战略调整，提高乡土社会资源资本化所急需的农村组织化程度，建设“政策金融—六次产业—乡土资源”三者之间的稳定合作关系，则不仅有可能延续以往危机“软着陆”的经验，而且利于构建最低成本的国家综合安全基础。

四、乡村仍有成为国家安全危机软着陆载体的可能

课题组在以往的研究中自主创新地指出：在当代工业化进程中，相对于风险过度集中于城市“资本池”而言，生态化的乡村社会客观上发挥

了“劳动力蓄水池”作用，遂使国家得以借助“三农”为载体多次实现经济危机“软着陆”。由此，也使得乡土中国支撑的国家现代化进程几乎不间断地延续了60多年。

然而，也需要看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乡村“生产力三要素”长期大幅度净流出，这造成“三农”问题日趋恶化，乡村正在成为大量制造安全风险并将风险不断外溢，从而对国家综合安全产生严重负外部性的区域。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在乡村“去组织化”改革30多年之后，乡村几乎全面地进入了“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的状态。[48]

1.国家综合安全的主要矛盾发生在乡村。

除军事安全和核安全外，国家综合安全的诸多领域大都与乡土社会直接或间接相关。本报告大致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1）乡村社会冲突不可能靠照搬城市的现代化政治手段（法制、官制、党制）予以化解。选举、打官司和上访等过去曾经被认为普遍有效的现代政治手段，已经成为影响当前农村社会稳定的最严峻问题之一。

（2）农村文化建设落后，在官方意识形态缺乏组织载体而流于形式的同时，宗族、宗教、宗派等非规范组织派生的亚文化已经占据主流。国家文化安全在农村基层缺乏有效维护和保障。

（3）国家粮食安全在内外矛盾叠加造成的巨大压力下，仍然缺乏有力的微观基础。面对愈益严峻的粮食安全问题，最大的安全隐患是指望部门利益集团代行国家安全职责造成的新世纪“假大空”（数据假、成本大、仓储空）。究其根源，仍然是农村去组织化改革以来长期存在制度性的不负责：无论生产者还是消费者，无论企业还是地方政府，在全面转向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形成对此负责的经济主体。

（4）乡村面源污染愈演愈烈，直接与地方政府亲资本政策取向被意识形态化及其导致的国家环境安全责任缺失相关。那些被当作深化改革典型的地方政府公开亲资本、暗中反生态的长期政策取向，已经事实上成为国家生态安全及食品安全的重要威胁。一方面各级政府GDP竞争盲目招商引资是主要内因，另一方面国家对县以下治污投入和防控力量严重不足。

（5）乡村经济可持续对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长远影响。在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资本挤压乡镇企业发展空间，乡镇企业70%以上倒闭（从无破产保护），而大量土地被征占。进城打工农民面临着“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这样的尴尬境地。2014年以来三、四线城镇房地产泡沫崩溃，不仅造成地方债务过重，也使农民原有的生计基础被摧毁，这是因农村不能再成为“软着陆”基础，而使得当期危机只能“硬着陆”的最为突出的经济安全风险来源。

2.乡村既可成为风险膨胀的气球，亦可成为吸纳风险的海绵。

从我国的实际经验出发，一方面，历史中呈现出来的规律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相似性，即每当乡村社会的内部治理机制受破坏到一定程度，从而导致小农大量破产、乡村普遍衰败，就会爆发严重的社会冲突乃至农民革命；另一方面，新中国也表现出显著的特殊性——因土地革命建立政权，从而巩固了农村以“小农村社制”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的内在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

据此看，凡是能够有效利用乡土社会的内部化机制处理乡村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就能维护乡村内部的稳定机构。

从历史经验来看，城乡二元结构赋予中国的，除了发展主义和现代性话语下广受批判的城乡差距之外，还有生态文明视角下农村的独特比较优势——因其多样性、多元性而使得乡村低成本的内在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成为可能。由于这是西方学者因缺乏实际经验而难以纳入分析范畴的，遂使欣然于邯郸学步的中国学者和官员对于自己的独特制度优势熟视无睹，缺乏立足本土经验开展理论创新的信心与勇气，反倒是一边倒地诉诸内在具有高成本、高风险属性的现代化治理体系来维护国家综合安全，这无异于缘木求鱼！

但要让乡村继续发挥承载城市资本危机“软着陆”的安全功能，必须以国家总体安全作为治理的“矢量性”[49]目标，进行乡村治理的结构调整和机制创新，才能强化乡村“外部风险内部化”的功能，使国家安全宏观战略和国家综合安全体系具有有效落实的微观基础。这方面的探索，既是对当前的乡村治理研究的拓展，又是对治理理论的重大创新。

3.20世纪80年代苏南乡村发展及稳定经验值得汲取。

课题组关注了苏南农村平和地实现工业化的进程，苏南避开了发达

国家原始积累期间不可避免地发生对抗性矛盾的历史轨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实践改写。村社理性是苏南农村工业化得以实现的根源，它因有效地内部化了工业原始积累的负外部性问题，而可被称为中国发展经验的一个内在机制。苏南农村工业化是以社区内部资本积累为主起步的，资本原始积累非常薄弱。在资本极度稀缺甚至为负资本的情况下，以劳动替代稀缺资本，使劳动力剩余价值实现了社区内部转化。农村社区通过将资源形态的农业用地低成本转变为资产形态的产业用地，使土地资源资本化的增值收益实现了内部转化。

由于社区企业是以社区成员土地共有为基础成立的，企业的经营风险也有社区共同承担，这成为企业独特的比较优势。而村社内部通过公平分配工业就业机会、平衡社区内部的工农从业收益和提供社区福利保障构建了收益公平分配的内部化机制。通过打造“绿色车间”，有效避免了农业衰败。最终，在实现了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同时，避免了西方工业化进程中“资本增密排斥劳动”这个内在机制所导致的对抗性矛盾的发生。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苏南的高速发展之中，几乎没有发生一起破坏稳定的群体性事件，连上访告状的现象都很少见。整个经验，相对于90年代以后的教训，值得认真总结。[50]

五、国家总体安全视角下的乡村治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案例

我们的“子课题一”着眼于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该研究来源于我们课题组已经开展了3年的新兴七国（E7）国别比较研究。[51]

环顾发展中国家，近两年因遭受国际金融资本国家调整策略而导致国内社会动荡频生，时刻威胁着执政党的统治权威，例如：委内瑞拉后查韦斯时代反政府示威浪潮；巴西民众街头抗议政府公共福利政策；印度乡村反政府的武装毛派势力扩张、农民自杀率攀升、性暴力罪案剧增；南非矿工罢工浪潮席卷全国；印度尼西亚民众抗议燃油上涨及政府补贴不足；土耳其反政府抗议运动等。

课题组以国家总体安全为矢量来看乡村治理，对比研究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案例，如：“缺乏乡土社会作为危机软着陆基础”[52]的巴西教训、“重建地方治理”的印度经验和“植根大众民主”[53]的委内瑞拉等。

巴西是金融资本全球化进程中的“深化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搭上跨国金融资本投机粮食及能源市场的便车，GDP快速增长，2010年巴西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超过英国跃居世界第六大经济体。[54]2002—2008年，巴西政府各种针对贫困人口的直接补贴总额占GDP的比重从6.9%上升到8.6%。贫富差距缩小，2002年卢拉上台时，基尼系数为0.553，到2011年罗塞夫继任时，已经降至0.500，达到半个世纪以来最低；同期，失业率则从9.1%降至6.8%。短短10年里，有3500万人口（约占贫困人口总数的一半）脱离绝对贫困。但是在高增长的GDP、外汇储备外表之下，巴西实质上是为跨国资本打工的净负债国。

近年来，随着几大经济体发展减速，受制于外国资本及市场的急剧波动、需求下降，巴西也陷入经济持续低迷的泥沼。[55]2014年，累计逆差额达39.2亿美元。2015年，巴西经济萎缩3.8%，通胀率高达10.67%，政府支出减少1%，财政赤字占GDP比重飙涨至10.3%，创下历史最高水平。穆迪、惠誉、标普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均已将巴西主权债务评级降至垃圾级。[56][57]随之而来的是城市居民上街抗议政府福利政策，农民抗争、占领土地、示威的数量开始上升。

印度多个邦有不同的民众科学运动，独立运作，组成联网，名叫“全印度民众科学联网”（AIPSN）。发展得最好的是卡拉拉邦。“卡拉拉民众科学运动”（Kerala Sastra Sahitya Parishad），简称KSSP。KSSP的思想来源之一乃甘地乡治思想。甘地认为，印度的未来不在城市，而是村落。印度政治应是由民众直接参与的制度。这种民主政治不在国会，而在村会，就是乡村的代表会，即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甘地指出地方自治的条件之一，需要发展本地经济系统，本地生产与消费。1987年，KSSP成立民用科技研究中心（IRTC），目的是培养农民学习真正实用的技术。IRTC研发太阳能、沼气、小型水力发电、省柴灶、保暖盒、省电启动器、蓄水池、水流域管理、综合农畜模式、猪种改良、草药等。[58]1994年，喀邦根据国家宪法修订乡镇议会法，及举行乡镇议会代表民主普选。发起“人民计划运动”，下放权力，不仅在机构和体制上把权力交到乡镇，而且培养村民的自治能力。人民计划运动在1997—1999年兴建10万间房屋、24万个厕所、5万口井、1.7万个公众水龙头、8000公里道路，清洗1.6万个池塘，把30万英亩土地改为耕地。[59]KSSP与“人民计划运动”的重大意义，在于立足于日常生活的知识与技术，缓解民众生活资源极端短缺的问题，推动民众参与，尝试解决代议制民主或集权体制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即民众如何决定自己的需求。

这对于全球化过程中越来越边缘化的群体是很重要的。

查韦斯上台后，推行“玻利瓦尔任务”（Misiones Bolivarianas），以消除贫穷、提高社会福利、扫除文盲等旨在重新分配财富、实现社会正义。包括开办扫盲班、夜校；开办售卖经过国家补贴的便宜食物的国营商店，保障委内瑞拉的粮食主权；在贫民小区设立诊疗所，提供免费医疗；为穷人建设新的房屋单位；培训人民成立合作社，以生产社会所需物品，让委内瑞拉经济摆脱对石油工业的依赖。新成立的合作社，获得政府提供设备援助及低息贷款。超过30万人在该计划下获得培训；制定全面的土地征用及重新分配方案，让贫穷人民拥有土地。荒置的大庄园和工厂也被征用，归合作社管理；为贫困母亲提供财务援助，协助她们养育孩子。这一切都是通过组织创新而产生的社区议会、合作社、社区媒体去低成本完成的。委内瑞拉的国债，从1998年占国内生产总值45%，下降到2011年的20%。委内瑞拉还因提早还清拖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所有债务，而退出这两个国际金融组织。委内瑞拉的失业率，从1998年的15.2%，下降到2012年的6.4%。政府提供了逾4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

但是，2013年美欧日为主的国家全面推进量化宽松的金融政策以后，大量过剩流动性进入国际原油期货市场造成其价格连续大起大落，先是随着美国2008年的QE政策蹿升到140美元以上的最高点，拉动产油国争相扩大出口、进口国被迫“输入通胀”；造成全球危机而实体经济衰落，投机资本则回流资本市场。同期，石油进口大国——美国的能源自给率迅速上升、进口大幅度减少，又迫使油价下跌到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之前的低价位，导致与美国势成对立的俄国和委内瑞拉等产油大国的出口收入大幅度减少。此时的委内瑞拉内外交困，查韦斯已经去世，新政府面临过高负债，再也无力支付反贫困等领域的社会性开支；内外反对派借机发起大规模对抗政府的街头冲突。

通过以上案例可以看到，不论克拉拉邦的民众科学运动还是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革命，他们都在积极地推动大众民主，下放权利给穷人，让穷人掌握重新分配财富的政治权利。唯有让底层人民自主参与政治决策的民主赋权过程，才能打破国内寡头精英和跨国公司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格局。在中国也有类似的历史经验，只要保留着传统的乡土社会仍然在发挥着政府主导和人民参与作用的内部化机制，就能构建和巩固国家综合安全体系。

六、国家安全战略对乡村治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提出新的要求

课题组在关乎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研究中，只能勉力去除意识形态束缚，尽可能立足于现实，构建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海外与国内相比较的研究框架，对“不可能三角”“中央下乡与地方下乡”“中央风险与地方竞争”“逆周期调节与资本替代”等现象做了理论归纳。

专栏五：逆周期调节

纵观历史，经济危机之下，大多数国家都会采取政府干预行动，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方式：其一是通过国家制造货币信用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稳定市场信心；其二是通过政府财政信用对私人企业实施国有化，避免企业倒闭的连锁反应；其三是通过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准政府信用”，发挥逆周期的调节作用。

在危机条件下企业的顺周期行为是常见的；而逆周期调节则需要政府信用对私人资本信用的有效替代，不仅能够熨平经济波动，并且当复苏和高涨接踵而至之际还会产生制度收益。市场化改革使承担无限责任的中央和承担有限责任的地方之间发生政府信用分化。因此，一般地方政府并不具备内在对接中央政府信用以替代外部资本信用的客观条件。

而我们通过区域比较研究，发现苏州工业园区能够在20年间多次“化危为机”——在1988—1994年滞胀型周期性危机之中逆势而起，在1998—2001年通货紧缩期间获得国家战略投资，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际推进结构调整，主要是因其承接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而特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体制”特征。亦即，园区“政企合一”的地方政府信用很大程度上带有无限责任的特点，才能够平滑对接。

——摘自董筱丹：《再读苏南——苏州工业园区二十年发展述要》，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4月。

1.走出乡村微观叙事，超越“国家—社会”二元对立，构建“全球—国家—乡村”的研究框架。

第一步，将“中国在全球挑战下作为后发国家追求工业化进程”作为大背景，认识到近代以来的乡村治理格局改变乃是工业化需要内向型的从农村地区提取剩余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所致，必然将国家发展阶段的演

变纳入“国家—社会”的关系研究。

第二步，须注意的是，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中，对于“国家—社会”问题有着明显不同的思考和回答；从西方经验衍生出来的这一范式潜在地预设了国家和社会的对立关系，这种对立性，既不符合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与当前中国参与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全球化竞争之历史使命也不相符。

第三步，认识到以往农村研究的局限性。一般从中国农村基层实际情况出发的学者，对于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宏观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及作用于乡村治理的内在机制往往缺乏把握，其研究或是以某一片段的经验事实代替一个更长时期的历史演变，或是缺少对农村土地与国家财税等重大制度变迁背景的观照，或是缺少全球化的视角，从而影响了乡村治理研究的深度。

2.从特殊中归纳一般经验，摒弃各种“主义”的束缚，提出中国本土的理论创新。

我们注意到，即使在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的条件下，构建善治也是可能的，并且在国内一些地方和乡村也存在着很多治理创新的实践经验。这些实践经验对国内其他地区，乃至对制度资源贫弱的后发国家，都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但一直以来受重视程度不够。对这些经验的归纳，需要摆脱先入为主的假设和学术框架，以参与式方法融入这些经验和实践当中，对其进行机制性、规律性的归纳研究，形成有借鉴价值的理论升华和政策建议。

专栏六：地方政府公司化与资本替代

中央和地方政府信用的分化始于1984年以“财政分级承包”为核心的财税体制改革及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这两次改革中，地方政府获得相对独立的财政利益和土地等资源配置主导权，也就有了更鲜明的垄断经营性特征。而且，地方政府因占有以财政权和土地产权为主的公共产权而派生出地方政府信用，主要包括财政信用和可变现资产信用。其中，财政信用是由税收、预算等法律规定所产生的信用关系，来源于地方经济发展和税收增加，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水平相关联；可变现资产信用直接依托于地方政府拥有的土地、自然资源以及固定资产等可变现资产的存量。无限责任的中央政府信用，共同完成对外部资本信用的替

代。

——摘自董筱丹：《再读苏南——苏州工业园区二十年发展述要》，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4月。

国内学者如能着力结合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中国经验研究，将乡村治理问题置于全球化与国家安全的框架之中，将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传导机制与微观主体的行为研究相结合，尝试回答如何在全球化的挑战中构建服务于中国国家总体安全的乡村治理体系，将具有显著的学术创新意义和政策应用价值。

3.发掘农村低成本治理经验，构建农村低成本的风险弱化和安全保障机制，作为国家总体安全的微观基础。

林毅夫在1999年提出国家应该以国债为主投资于“新农村建设”。当时针对的就是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引发的中国输入型通货紧缩与生产过剩同步的危机，以及危机期间发生的社会不稳。温铁军等则于2001年开始把稳定与治理结合起来开展基层试验研究。据此指出，新农村建设是关涉中国宏观经济调整和社会稳定全局的国家战略，政府公共投资在改善乡村经济社会基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必须以乡村治理的结构调整和机制创新为前提，才能克服政府与分散小农之间交易成本过高从而导致政府治理成本过高而收效较低的难题。

同理，在落实国家安全战略中，如果因循既往那种造成过高制度成本的维稳道路，同样会是收效甚微的。

七、构建乡村综合治理体系以破解中央—地方—乡村的“三元悖论”[60]

“三农”经济基础决定“三治”上层建筑，要将“三农”政策的重心转变到“三农”与“三治”有机结合，下决心从改革以来较多强调提高经济收益，调整到强调有利于稳定乡村社会、改善地方和国家治理上，构建县乡村各有侧重的综合治理—发展体系。

县政改革建议：第一，改变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创造县域综合体制改革条件；第二，重点改革条块分割的涉农体制，设立体现普惠原则的“农村综合发展基金”，将各部门分散把持的国家粮食与食品安全、

生态与环境安全、社会与文化安全以及美丽乡村建设等专项资金统合起来，作为县级资本金对乡、村农民综合性合作组织持股；第三，将县级政府各单位涉农（金融、保险、物流、仓储、科技、房地产、旅游、餐饮、加工、流通等领域）的项目经费参股纳入综合性合作组织，使产生的经营收益反哺“三农”。

乡（镇）政改革建议：通过打造结构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条，产生稳定的制度收益，同时保持内部的低成本治理。民国时期的著名乡村建设实践，如20世纪20年代的卢作孚在重庆北碚、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基本上都是以一个镇作为试验的范围[61]；农业集体化时期，也是以乡镇同级的人民公社作为一级核算单位，来进行农田综合整治和使用大型农业机械；当代中国的“超级村庄”，如江苏的华西村、永联村、长江村等，从地域范围来说，都差不多是以一个镇的土地面积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资本价值链。

当前，自然村和行政村的社会和资源整合仍然受到或隐或显的派性力量的制约，而乡镇则为各种农村公共活动和社会组织的发育提供了空间。客观地比较东亚乡村，只有中国大陆在乡镇一级没有组建综合性合作社，农民组织化程度最低。另有一些案例表明，在农村中各种民间社会和文化力量日益活跃的局面下，乡镇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实现治理创新，低成本地撬动各种民间资源，推进农村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

村治改革建议：第一，成立以体现成员嵌入关系、集发展与治理于一体的农村综合性合作组织（而不是“大农吃小农”的专业合作组织），或者扩大农村集体经济的资产量；第二，村两委与综合性合作社有机整合，降低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政府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交易成本”；第三，中央部门应以政府公共财政为杠杆，向农民综合合作组织注资入股，再通过股权分配自下而上地形成农村综合合作体系，使农村资源收益水平提高与农村公共资源总量扩大同步推进，通过增量分配将村庄积累的历史矛盾化解在村庄内部，变“行政吸纳社会”为“合作吸纳冲突”。

综上所述，地方“三农与三治”的综合体系如下：村民小组作为“一个社会—地理实体”的成员关系和土地财产关系的存在，使得建立在利益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地缘共同体上的合作成为可能。行政村统摄村民小组，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内部交易成本，活化乡村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在村合作的基础上，乡镇是实现规模收益的主要层级和上下联动的重要衔接，一方面为乡村内的各种社会能量提供场域，另一方面应该组

建综合性合作社来承接自上而下的中央资源和国家战略任务。而县级发展—治理则需要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和涉农收益整合，使地方政府从积累矛盾的经济发展竞争转向能够弱化矛盾、缓解冲突的发展—治理综合体。

第一篇　局势：发展中国家内外风险叠加

第一章　中国对美“双重输出”格局及其新变化[62]

本文对中美关系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从互补转向互斥”的演化做了客观分析。认为在全球危机成本转嫁的压力下，中国内部一方面发生资金从实体经济析出向虚拟经济转化的顺向运动；另一方面城市经济不可能承载输入型危机，只能“路径依赖”地内向对乡土社会转嫁。由此，只有稳住乡土社会，才能有危机“软着陆”的载体。

一、问题与背景：美国搭“双重便车”与中美之间的“双输”格局

客观来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本来是两个分处不同阶段的第一大国之间具有经济互补性的利益关系；而且，在这一关系中，中国处于矛盾的非主要方面，美国作为金融资本第一大国占据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典型的寄生性攫取型经济，长期搭着中国产业资本第一大国的物质产品廉价输美和贸易盈余低价返美的“双重便车”，坐享低通胀条件下实现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

（一）中美是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第一大国”

历史地看，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业化时期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产业资本占据矛盾主要方面），而是金融资本异化于实体经济的内生性矛盾。具体如下。

一方面金融资本占据主导地位；而在金融资本内部则是美元与欧元两个主流金融资本集团之间的对抗性矛盾。由于金融资本具有流动性、短期性和集中性这“新三性”[63]，所以必然扩张泡沫经济并借助全球化递次转嫁金融危机代价。这个异化过程从美国1971年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推出衍生品交易，再到20世纪90年代推进金融全球化，一直持续到进入新世纪强行转嫁虚拟资本危机，其间伴随着大规模扩张军事强权。

另一方面，在这个金融资本异化于实体经济的过程中，西方随金融资本主导国家从产业资本阶段进入金融资本这个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随之发生其淘汰的实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因资源、劳力价格低廉和“举国体制”的比较优势，而进入产业资本快速扩张的战略机遇期。从1995年起主要工业品产量逐渐超过西方国家，1998年遭遇生产过剩，政府直接采取国债投资拉动增长，到2005年即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品生产第一大国；又在2008年遭遇第二次因外需下降造成的生产过剩，政府再度增加直接投资维持高增长，到2013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若按购买力平价法（PPP）计算，已经占全球41%，约为美国的两倍（美国占23%），超过其他7个工业国家的总和（日9%，德7%，俄7%，巴4%，加、英、法均为3%）。[64]

1950年，美国制造业的规模占GDP的29.3%，金融服务业只占10.9%，然而到金融海啸的2008年制造业只占到GDP的11.5%，农业不到2%；而金融为核心的第三产业的比例提高到了近87%。[65]随着1999年《金融服务业现代化法案》的通过，风险巨大的“影子银行系统”[66]陡增。从次贷危机爆发的2007年全球广义流动性的估算看，美国“影子银行系统”创造的金融衍生产品占流动性的78%，相当于世界GDP的964%；创造的证券化债务占流动性的11%，相当于世界GDP的138%。随着金融衍生产品和证券化债务的推出和流行，欧亚的实体产品出口国和中东等地的石油输出国的资金以史无前例的规模流入美国，2007年美国吸收了全球近一半的资本流入。[67]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美国和欧盟饮鸩止渴大规模创造流动性进入资本市场，到第二次量化宽松的2010年全球资本市场扩张到955万亿美元，而世界GDP仅为63万亿美元。[68][69]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中国是产业资本阶段第一大国，创造全球工业GDP的四成多。美国是金融资本阶段第一大国，创造全球金融衍生品的一半。世界由此形成美国为首的西方占据金融资本高级阶段，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处于产业资本次级阶段，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资源经济低级阶段的世界经济格局。

（二）美国搭中国实体经济的“双重便车”支撑美元扩张

中美分别作为不同发展阶段的第一大国，一般认为两国之新型大国战略关系取决于是互补还是互斥。中美曾经有过被美国认为是战略关系最好时期，那主要是基于“中国生产过剩，美国生产短缺”。[70]所谓互补

关系，实际上是中国客观起到了维护美国金融资本全球扩张做出的“双重输出”。

一是中国输出廉价制成品，既帮助美国维持较低CPI[71]，又利于美元增发支付其不断增加的对华贸易逆差，实质性地维护着美元作为世界结算和储备货币的绝对地位。

二是中国所获贸易盈余还得输出到美国最低利息率的国债市场，成为对美FDI第一国家。

借此，美国利用“特里芬悖论”[72][73]吸纳全球美元资本回流到美国的资本市场，并以低息借债方式进行全球再投资，即通过国内低通胀条件下的低息美元资本与接受国的高息资本之间的市场利差构成的金融竞争优势，低成本地控制其战略产业，获取跨国集团的回流资本收益支撑美国资本市场。[74]

研究表明，中国向美国出口商品获得大量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是排名第二的日本外汇储备的近3倍。在这3.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约70%是美国国债和美元资产。[75][76]由此，中国低价出口创造的收益大量回流美国。此外，通过货币与资本价格的传导和重置，美元资本可以向全球转嫁国内金融与经济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出台QE（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美元持续贬值，成功地向美国国债、美元资本持有国（以中国为首）转嫁国内危机。

由此可知，作为金融资本阶段第一大国的美国，事实上长期搭乘中国实体生产和贸易盈余的“双重便车”，才得以实现美国虚拟化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

（三）中美看似“互补”的经济关系实际上也是竞劣，造成“双输”

之所以是“双输”，在于美国搭“双重便车”和中国“双重输出”的后果都是走向反面。

美国越多贸易逆差，对外输出最有竞争力的低息美元就越多，世界第一储备货币的地位也就越稳，保护美元坚挺的“特里芬悖论”的机制性作用也会越显著！但，由此产生的负面作用是客观促使美国金融资本越来越虚拟化。在实体产业大量移出的背景下，美国得不到原来由企业支付的相当于工资总额50%的社会性开支，转而只能更多地依靠借债来支

付社会性开支，其结果是政府赤字不断增加，不得不把“债务泡沫化”变成国家强权政治的内涵。另一方面，则是企业流向海外导致国内资本市场异化于实体经济而随流动性扩张趋向于“金融泡沫化”，而且不得不更多倚重军事霸权来维护金融资本全球扩张。这是所谓左翼的美国民主党政府同样大规模投资扩张军备的根源。于是，一个“债务泡沫”，一个“金融泡沫”，都成为美国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发生经济危机的主要来源。

处于产业资本阶段的中国，在“双重输出”的格局之下，其不断增加的实体资产，事实上被来自金融资本大国的虚拟金融资本“再定价”（例如大批中国实体企业低价海外上市），从而使中国以劳动为核心要素的产业收益，被以资本为核心要素的美国通过推行“资本化”来长期占有；不仅导致产业平均收益下降、资金大量析出冲入房地产等投机领域构成危机，也派生出劳工待遇低下、环境和社会成本愈益恶化等一系列“负租效应”[77]。[78]

二、中国宏观调控困境——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例

自从20世纪80年代美国主导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升级”进入金融资本阶段以来，在短短的20年间，美国资本市场竟然“创新”出两千多种衍生品，极大地促进了“低成本”的金融经济的全球扩张；同期，与之相应的巨大制度成本，也势必因金融资本大量进入虚拟经济而累积着，并且不断表现为从边缘逐渐走向核心的金融危机爆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先多次发生在边缘国家，如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再渐次向金融资本的核心区演进；终于在全球金融投机最集中的华尔街爆发为“金融海啸”……

在资本主义高级阶段占据统治地位的金融资本，更因被占据单极化全球霸权地位的国家掌控而具有对下转嫁制度成本的条件和能力；尽管这只是美国从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做阶段性改变的客观演变过程，但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逃开其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因泡沫化扩张造成的全球危机，以及应对危机所内生性地对外或对内转嫁成本。

不过，诚如很多政策研究者指出，全球危机下中国经济的一枝独秀是表象。随着国内经济因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拉动投资实现从恢复性增长迅速进入井喷式增长，宏观经济在2010—2012年一度出现过热，

但“生产过剩”的长期化这种实质性矛盾并不可能随着经济过热而根本解决；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并非缓解，反而在某些方面加剧了产业资本的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之后，国家救市投资表现出很强的“服务业主导制造业”的特征。实体产业中除了与基本建设相关的领域和一些资源型产业[79]以外，大部分行业发生了因行业平均利润率下降而被金融资本排斥、异化的现象。金融资本全球化在各国的实践经验早已证明：不论在何种体制下，一旦金融资本异化为独立利益集团的趋势不得克制，则其追求流动性获利的寄生性本质必然反作用于实体经济，使之衰败！这一经验性规律，概莫能外。当下，几乎所有实体经济为主的沿海工业开发区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美国QE政策及金融资本主导的制度调整

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补充资本市场上的流动性，2008年11月25日美联储宣布启动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仅购买政府支持企业房利美、房地美、联邦住房贷款银行与房地产有关的直接债务，还将购买由“两房”、联邦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所担保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到2010年6月底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结束时，在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间里，美国的基础货币从9364.85亿美元上升到20151.99亿美元，增长了151.19%，增量为10787.14亿美元，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同一时间长度（2006年1月—2007年8月）基础货币增量379.57亿美元的28.4倍。[80]

接下来，则是金融资本主导国家路径依赖地启动了第二轮、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以及制造局部战争迫使海外资本回流美国资本市场的币缘战略“巧实力”（smart power）频繁运作。[81]

直到2013年10月31日，美国与其他5个西方主要金融资本经济体达成多边货币互换协议，能够熨平任一经济体的任何短期流动性不足，使得核心区不再有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才明确了逐渐退出QE的政策考虑。而且，在这个金融稳定机制运行一年之后，于2014年10月30日才正式结束了总量高达3.8万亿美元的QE政策。

华尔街金融海啸发生以来的6年里，东西方几乎所有金融资本经济体普遍发生了贫富两极分化更趋严重而造成的社会乱象，遂有一系列或多或少地指向金融资本寡头政治的“代表99%”的占领运动。

这个金融资本危机在核心区爆发、最终通过核心区倡导的制度创新予以化解的全过程，再一次验证了我们提出的“成本转嫁理论”[82][83]所揭示的、内含于金融资本阶段的制度运作机制——核心国家能够顺畅地对外转嫁成本，而边缘国家只能承载核心或半核心国家递次对外转嫁的成本。

（二）国际市场上基础商品价格大幅上涨[84]

在QE政策释放的巨大流动性冲击下，主要初级产品价格脱离一般的供给和需求的决定作用，形成“被金融化”——由金融投机制造价格涨落。由于这种通过向大型机构投资者回购中长期债券所增加的基础货币供给大规模流向了能源、粮食、原材料等期货市场，致使国际市场上原材料价格一路上涨，到2011年中期已经达到了570多点，比金融危机爆发前高出了100点左右。2011年中期到2012年虽然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但最低指数水平仍然远高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最高水平。

从美国发生次贷危机的2007年，到爆发华尔街金融海啸的2008年，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的CRB指数[85]发生了一轮大幅波动，首先是从2007年年初的不到350点上升到2008年年初的将近500点，并持续数月；然后则发生自由落体式下滑，在半年的时间内回落到300点。[86]

因国际市场受到QE政策的显著影响，中国这样的实体经济国家遭遇到“输入型”通货膨胀。这在对原材料供给的海外依存度较高的国内制造业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事实上，制造业企业的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发生了一轮基本同步的波动：在华尔街金融海啸席卷全球的2008年下半年，该指数从2008年中期的75.7点一路下降至11月的26.6点，达到近年来最低水平；而在美国QE政策出台后，该指数旋即发生了从2008年11月到2009年8月的长达10个月的连续上涨，累计上涨指数达到36点，到2010年4月已经接近2008年危机爆发前的最高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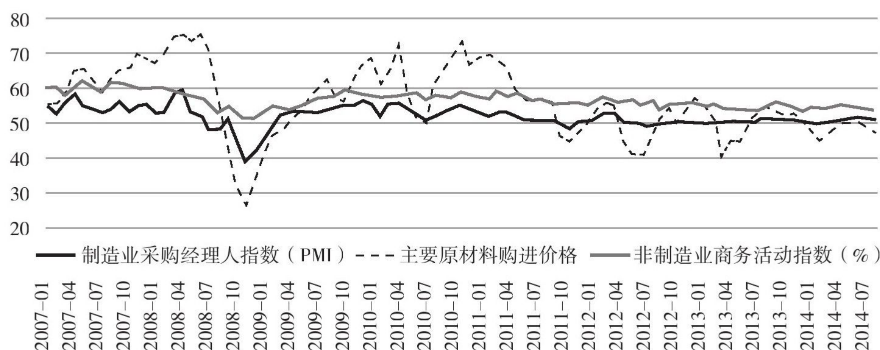


图1-1　2007—2014年7月中国主要经济景气指数

来源：根据Wind资讯提供的数据整理而成。若无特别说明，以下数据均来源于Wind资讯。

图1-1中的曲线很清晰地表明中国的实体经济价格波动受到金融危机影响。除了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一个明显的V形变化之外，2009年、2010年和2012年的三次QE政策也都带来相应的价格起落。同期，代表非实体经济的曲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波动幅度很小，基本保持平稳。

（三）国际产品市场需求持续低迷

和基础商品不同，国际制成品市场总体表现萧条，价格水平相对低迷。根据笔者的一项计算，从2009—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进口价格上涨了64%，出口价格仅上涨了19%。

从经济景气指数来看，反映制造业景气情况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虽然在2009年上半年也有了显著的回升，且一直位于50以上，从指标含义来说，整体上位于扩张区间，但更多时段是贴着经济景气的临界线运行。[87]

从图1-2也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大幅提高的最近20多年，大部分时间中出口商品价格指数都低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发生后，全球商品价格出现了两个变化趋向，原材料价格在美国增发货币的影响下大起大落，制造业产品价格则整体下降；出口价格指数则在整体上呈现下降态势。二者共同作用，使得国内经济比重最大的实体产业的利润空间被迫压缩。

此外，从经济运行的稳态来讲，全球市场无疑为中国的制造业提供了巨大的产能扩张空间，但从图1-2可以看出，全球市场的波动性与中国宏观经济的波动性总体上是同期同向的：在经济萧条时期，出口商品的价格指数下降，构成整体经济萧条的一个部分；而在经济景气时期，出口商品价格的上涨同样加剧了国内原材物料的供应紧张。这种顺周期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强化了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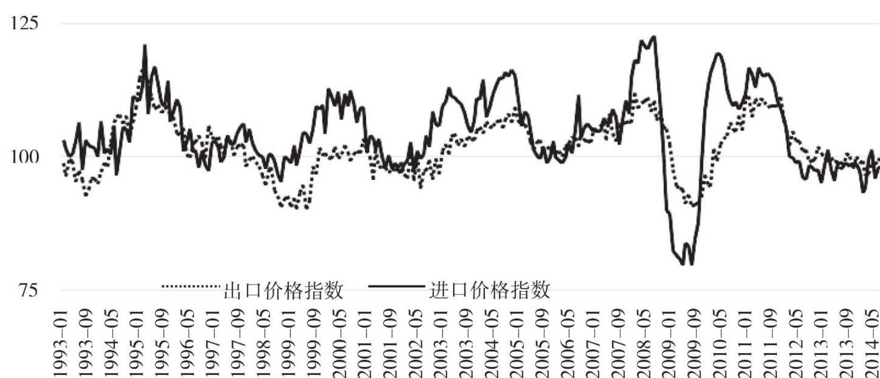


图1-2　1993—2014年中国进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上年同月＝100）

图1-2表明，中国沿海加工贸易型的实体经济的利润空间被挤压，连带其相关制造业的整体利润已经摊薄到寥寥无几。几年下来，已经造成大批企业倒闭破产，很多港台投资迁往东南亚国家，南方沿海的加工贸易型经济事实上已经进入“去工业化”时期。

与制造业相比，非制造业的景气度一直处于高位运行区间，二者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从创造增加值的情况看，非制造业中的交通运输服务业、仓储批发和零售业等三产部门与第二产业的增加值情况大体相当，而金融业的扩张和盈利情况则显著好于第二产业。

面对此类输入型危机造成的三次产业差别，因遭遇市场失灵叠加政府失灵的双重困境，单一国别的宏观调控根本无力化解矛盾，只好顺势强调提升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其结果是资金纷纷从实体经济析出，涌向房地产和金融投机，连锁性地造成影子银行及其他形式的高利息借贷泛滥，反过来进一步压榨实体经济。

（四）中国救市投资与实体产业内部的挤出效应

2008年年末以来，在国债拉动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大量投资进入土地基本开发建设，固然提高了土地的总生产能力，使得土地的绝对地

租和级差地租得以提高，但也使得国内骤然出现了一轮开发热。在前几年固定资产投资未有明显下降的情况下，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速高达30.5%，达到新世纪以来的最高点（见图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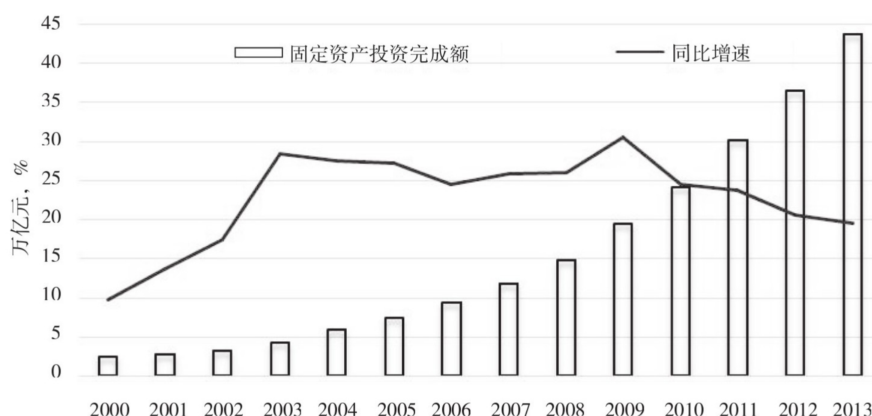


图1-3　2000—2013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及增长速度

基本建设占地导致城市征用土地面积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持续在高位增长，在2012年甚至超过了2000平方公里；2013年略有回落，但仍然在1800平方公里的高水平上。

几十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毫无疑问在相当大程度上加剧了国内能源和原材料的供给紧张，提高了国内对于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并不利于改变一般产品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被动地位。

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价格被持续拉高，以至于沿海过去依靠加工出口的中小企业数万家亏损倒闭的同时，各地频现“民工荒”，从2009年6月到2014年9月长达5年多的时间里，人工费的年同比价格指数持续大于105（见图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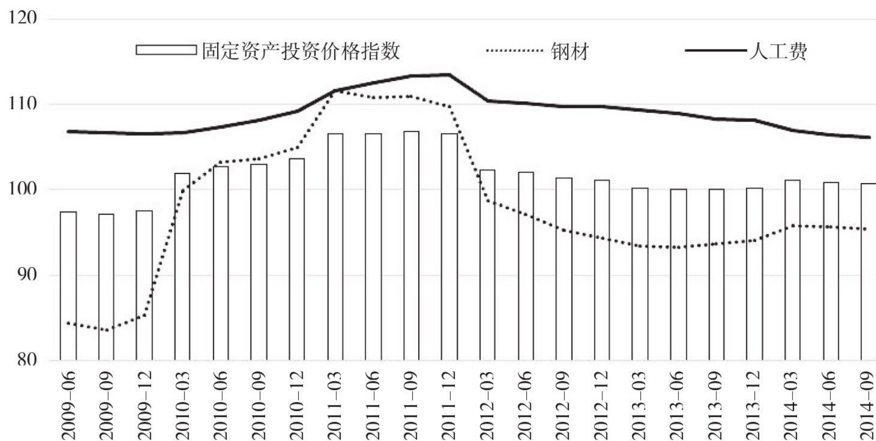


图1-4　2009年以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上年同期＝100）

固定资产投资集中上马，拉高原材料价格和人工费用，对一般制造业的生产运行客观上产生了挤出效应，使得制造业的盈利空间受到挤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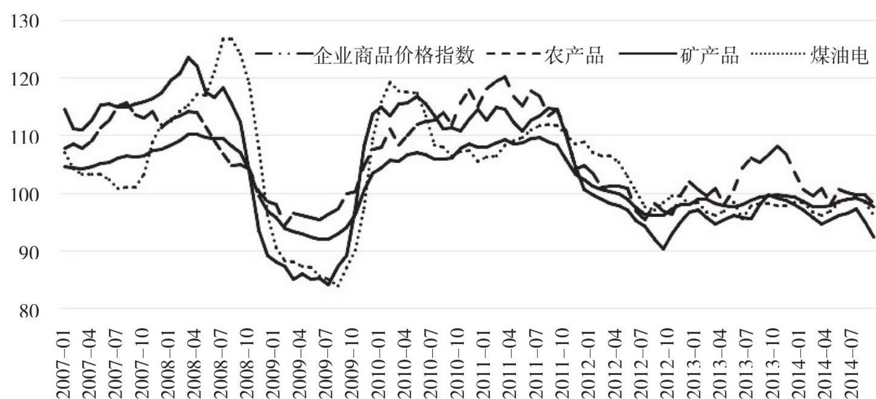


图1-5　2007—2014年中国企业商品价格指数（上年同期＝100）

从图1-5中的企业商品价格指数走势图中，可以看出第二产业内部的收益分化情况。2009年以后，政策性的农产品和垄断性的能源产品价格指数显著高于一般商品价格指数，而资源型的矿产品价格指数在2011年之前走势强劲，2011年之后开始降至最低。

（五）资金从实体产业加速抽离

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制度成本转嫁的规律仍在持续，具有征收土地和改变农业用地用途权力并以此获取土地资本化收益的地方政府，

以土地为抵押向银行借贷，“以地套现”。[88]征地高潮随着2003年以来国内经济进入新一轮经济景气周期而来临，却并未随着2009年输入型危机的发生而减退，原因如下。

一方面国家紧急启动四万亿元国债资金进行救市，其中有相当大规模国债资金投资于基本建设，对于社会资金的投入具有强大的导向作用，承载住了外需下降对于国内就业市场的压力；但另一方面，由于国债项目通常要求地方政府进行专项配套，或者要求企事业单位达到一定条件，客观上加大了国内的整体投资热度，加剧了国内资金的紧张，正规银行和影子银行贷款应势而起，而其所接受的抵押品几乎都只有一样——“以地套现”——完成征收手续和一次开发从而进入资本化开发通道的土地，专业名称叫“建设用地”。有的地区连市政广场都已经拿去做了抵押。

如图1-6所示，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到位资金2013年年末已经达到48万亿元，这一指标2006年才首次突破10万亿元。2008—2012年，每年以5万亿元以上的规模逐年递增；2013年一年的增长量则超过8万亿元。

在全部资金来源中，企事业单位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长年占比高达一半以上，其中，企事业单位自有资金占比1996年为20.86%，在2004—2006年上升到25%以上，但2009年以后开始下降，2013年仅为15.76%；自筹资金占比1996年为33.23%，2007年上升到40%，2012年超过50%，2013年为52.03%，从占全部到位资金的1/3上升到了一半以上；而量比齐增的自筹资金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企业利润或自有资金积累，相当大部分为股市融资、债券融资或非常规渠道融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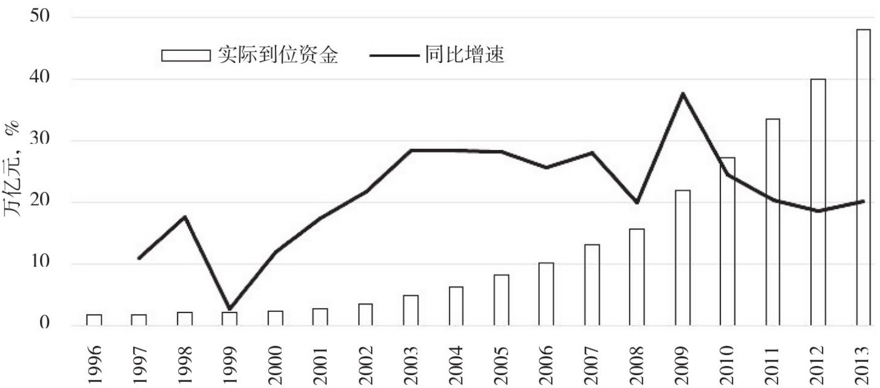


图1-6　1996—2013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及增长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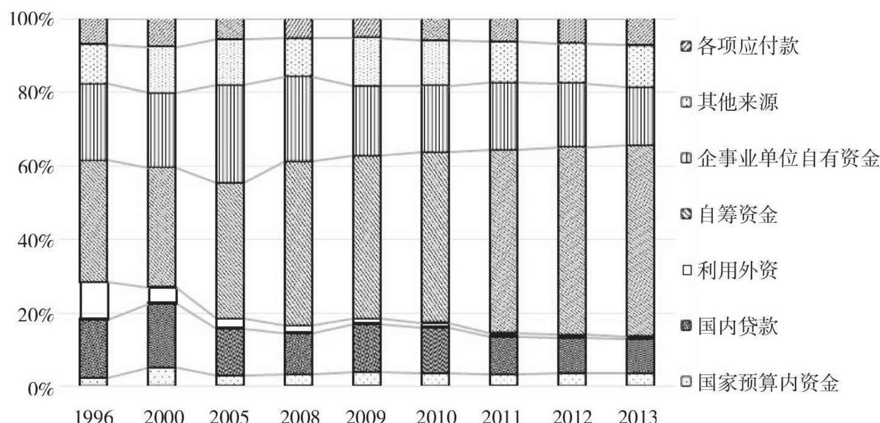


图1-7　1996—2013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构成

事实上，自筹资金和企事业单位自有资金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是土地，可以说，“以地套现”对各地都普遍适用。

2009年之后，地方政府为争取国债配套资金和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专项资金，而在产业开发、招商引资等领域展开了大规模的无序竞争，引发了比2008年华尔街海啸之前更严重的“圈地运动”。

2011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达到3.1万亿元，2012年降至2.7万亿元，2013年再猛增1.2万亿元，达到3.9万亿元。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统计，2013年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入（41266亿元）占地方财政收入比例达35%，若算上当年与土地及房产相关的5种税收，这一比例将达46%。与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入激增相应，支出也在增加。2013年土地出让支出与收入基本持平，约3.9万亿元，远超预算。其中，以对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土地开发支出、补助征地农民支出等方面支出最大，如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约2.1万亿元，为预算数的161%，比上年增长51%。[89]

为了保证土地出让金的收入水平，就势必要求房价不能降，因此，地方政府成为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的主要推手。这也吸引了更多的社会资金，在制造业整体收益预期严重下降的情况下，从利润率低的实体产业部门大量抽离，流向房地产等投机领域，推升投机领域的泡沫经济。

于是，国内发生了制造业和投机领域的“冰火两重天”：一方面，实

体产业因难以维持正常运营而发生“老板跑路”；另一方面，房价迅猛上涨，进一步吸引了大量社会游资，各地普遍出现了高利贷性质的民间集资。

由于四万亿救市国债投资引致的货币扩张中，很多是通过地方政府运作的“城投债”等渠道进行的，而地方政府的债务链条又由土地价值最高的房地产开发来维系，这使中央政府对房市泡沫的宏观调控左右两难：如果不加管制地放任下去，则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利益分配矛盾将愈演愈烈，房地产泡沫累积的风险会越堆越高，而制造业所累积的矛盾也将越来越危险；如果出台有效措施调控房价，则依靠高地价、高房价来维持的地方政府资金链条将会断裂，而地方政府的综合债务危机的爆发将使尚未走出金融危机阴影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

总之，在国际出口产品市场、国内外原材料市场、国内房地产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多方面形成的持续压力下，中国的加工制造产业陷入了深重的危机。

三、美国再工业化经济调整引致中美关系从互补向互斥演化

2008—2009年危机之前，中美两国因分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顶端构成了两国“互补”的经济关系。然而，美国在应对危机的重大调整中构建了金融制度创新、“巧实力”（smart power）运作和新能源开发等三重优势，形成了再工业化趋势，使中国正在从“双重输出”演化成沿海的“去工业化”。

三重优势中最主要的是所谓金融制度创新，主要是指美国与其他5个西方主要金融经济体（加拿大、英国、日本、欧盟和瑞士）达成通过多边货币互换协议来熨平短期流动性不足的协议，使得金融资本核心区不再有资金短缺诱发危机的可能性，才明确了退出QE。其次是以“巧实力”来配合币缘战略的频繁运作，例如制造区域冲突、局部战争以迫使海外资本回流美国资本市场。[90]最后，则是开发页岩气资源等新能源来压低能源价格，造成产油国中的“另类”国家财政透支（如委内瑞拉和俄罗斯）及石油投资回流美国。

2008年金融海啸的确促进了美国经济向产业资本回调。自2009年以来，美国制造业产出增速快于其他发达国家；到2013年工业生产指数

增加到104%，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约90%的水平；而且，这种相对优势还在扩大。[91]

2010年后，更多证据表明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复苏：产出增加、投资加速、产能利用率上升、制造业就业人口回升等。由于政府复兴制造业措施和能源独立带来的成本下降、生产效率的提高、劳动力成本的相对下降等多方面的原因，2010—2012年美国经济复苏的三年中，制造业增长速度均高出GDP增速约2个百分点。2011年制造业私人设备及软件投资达110%，远高于投资住宅的40%（以2005年为基期），而在危机之前十几年里，设备和软件投资一直低于总体固定资产投资指数。美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自2010年以来也一路走高，至2013年第一季度已经达到95%。[92]

（一）美国制造业竞争优势在于能源和投资的低价格

随着美国加强应对危机的调控措施，中美制造业总体成本差距进一步缩小。考虑到新世纪产业竞争越来越从劳动密集向资本、技术密集转化，则美国具有的资本、技术、能源三类现代要素价格大大低于中国，导致美国的综合成本优势明显。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米建伟、陈强的计算，中国制造相对于美国制造的成本优势将从2000年的25%下降到2015年的11%。[93]

从能源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能源要素价格大幅下降，2013年美国天然气价格是亚洲的1/4，是欧洲的1/3。美国能源价格优势带来的影响是其制造业能源成本总体下降，如美国的工业销售电价仅为中国的70%。尤其是2010年页岩气革命，使美国产生了全球“能源比较优势”。2012年美国页岩气产量占比超过40%，致密油产量占比35%。EIA在2014年度能源展望中认为，到2040年，非常规油气或将占到美国油气总产量的半壁江山。2012年美国页岩气探明储量3.7万亿立方米，技术可采储量13.7万亿立方米，占美国天然气总探明储量的40%。[94]

从劳动力成本来看，中美的劳动力成本目前依然差距较大，但这一差距却在不断缩小。随着中国劳动力价格的提升，美国制造业平均薪酬/中国制造业平均薪酬，已经从2001年的26倍下降到2012年的6倍。但是，考虑到双方的劳动生产率差距，2010年美国制造业工人劳动生产率大约是中国的3.7倍，中美的劳动成本差距并没有那么巨大。[95]

2010年以来，美国再工业化与经济复苏事实上产生了新的关键词：产能与供给复苏、进口替代。数据显示，美国的进口金额同比增速自2010年高峰不断下降，在GDP相对强劲的情况下，从2012年10月到2013年4月的6个月中，有4个月是同比负增长的。[96]美国制造每增加一分都对原有外部需求产生“进口替代”效应。美国消费更多由国内生产所满足，消费提高进一步拉动国内生产、产能、投资、供给端的复苏，这就在投资、消费两端加速了美国经济增长。这种美国经济增长对外部经济的拉动力在减弱，导致对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出口提升作用有限。

（二）中美关系悄然向互斥竞争演变

新世纪之前，中国特色的、中央承担无限责任条件下才有的、“政府信用替代资本信用”的体制优势，使得中国在资金要素极度短缺的瓶颈制约下维持高增长。而政府信用体制内生地要求“财政金融不分家”，遂使中国半个世纪都没有条件形成西方意义的、异化于实体经济并且极具扩张性的金融资本。这才使进入工业化但资金极度短缺的中国客观上与金融过剩的美国构成互补关系。

然而，世界的主要矛盾正在发生历史性重大变化。新世纪之初，中国完成银行商业化改制并且使其全部上市的同期，推进国内经济的货币化和资本化。加之央行大规模对冲增发货币及中央政府推出中国版量化宽松，多次出现M2/GDP超过180%的年份，中国也随即发生金融相对过剩，2014年底已有上万亿元存款过剩。

对此，中国政府近年来加大推进金融投资和实体产业“走出去”战略，以及“一带一路”等倡议，带动人民币国际化。于是，新世纪中国经济“路径依赖”地跟着西方发生从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阶段的升级，正好与华尔街金融海啸以来美国向实体经济回调迎面相撞，而引起两方面质变：一是原来金融资本阶段内生的美元与欧元两大集团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转变为非对抗；二是近年来美国向实体产业回调，构成对中国产业资本的互竞关系和中国大规模向海外投资减少输送给美国的巨大利益，致使中美战略利益关系如双方曾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冷战期间的地缘政治合作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承接西方实体产业转移形成的经济互补关系都发生逆转。

事实上，美国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经济复苏，正在逻辑性地改变着中

美之间的经济关系，总体上表现为“中美脱钩”，其战略利益则从互补转为互斥。进入新世纪第二个10年，美国金融经济复苏和实体产业回调，将越来越表现为中国的外部风险，而不再是外部机遇，对中国“走出去”战略已经形成巨大压力。

四、政策建议：应对中美战略互斥与加强乡土社会的内部化机制

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的世界格局变化之中，中国客观上演化成为主要矛盾的非主要方面，虽然与矛盾的主要方面美国具有哲学意义的对抗性，但目前确实不具有直接对抗的条件。由此派生的战略意义的新挑战，是美国因处于最高级的金融资本阶段而有把这种互斥矛盾及其内生性危机代价转移海外的条件，而中国就不得不接受更多美国金融扩张和产业回调转嫁来的危机代价。

为此，中国不仅必须改变对美战略误判，而且要深谙处于对立矛盾的被动一方难以正面对抗的道理。鉴于中国客观上只能对内转嫁“输入型危机”所恶化的激进改制成本，近期更需以国家综合安全为目标、借生态文明和城乡统筹转向内部全面战略调整，如果能够有效提高乡土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利用其“内部化处置外部性”的内在机制，则不仅有可能延续以往危机“软着陆”的经验，而且有利于构建最低成本的国家综合安全基础。因此，当前可能的应对战略，主要还是练好内功。

一是继续依靠超大型大陆国家幅员辽阔维持投资拉动增长，通过扩张实体财产规模来加快本国金融信用对本国经济的货币化进程；同时借实体资产和金融资产同步增值，来大幅度降低相对政府债务及银行不良资产比率；为此，尤其要延缓本币自由兑换和银行业及资本市场对外资开放。

二是借助完善城乡统筹战略，继续发挥举国体制的比较优势，以国家主要投资于综合性合作社的导向作用，来大力推进农村基层以农民为主体的组织创新，以此为基础促进多样化的生态文明复兴和治理创新。若然，则可维持乡土社会承载危机的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的机制。

三是有组织地开展国内非“学科化”研究，开展利于中国“走出去”的话语体系建设，全面反思以往单纯强调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走出去造成的巨大代价；由此，不仅能够深化国家综合安全战略研究，而且同时能

够把构建中国话语的多种努力和民间的社会组织走出去有机结合。

第二章　关于一带一路和当前国际局势的一些思考[97]

过去一年来，世界局势变化之快、规模之广泛、影响之深远，是20世纪90年代苏东集团瓦解以来之最大变局。对于当前的大变局，先写下一些思考供大家讨论。

“一带一路”是中国内部的剩余工业产能及新崛起的金融资本利益需要向外寻找开拓空间的战略。尽管中国高度重视20世纪30年代西方生产过剩大危机引发世界大战的教训，明确提出和平发展的思想；但它的出现也仍然使区内浮现了19世纪末至二战前欧洲列强争霸的类似局面。以下是一些重要观察。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是陆权和次海权的结合，必然触动当前海洋霸权的神经。众所周知，历史上，中国对西方的贸易，为伊斯兰世界在西亚和中亚大陆兴起提供了沿着商道扩张势力范围的利益驱动，迫使长期处于贸易逆差、造成白银危机压力下的欧洲，为开拓绕过伊斯兰世界的东方贸易路线而最终变成海洋强权。西班牙、荷兰、英国交替成为海权大国，最后是美国。

如果只是提出一路，它还是传统的陆权战略。但一带一路是依托广阔大陆纵深而在大陆和海洋交接的边缘开拓次海权的策略。看历史，这也不是新鲜的事。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后起的帝国主义强权德国（普鲁士）基本上是陆权国家，正因为面对英法等海洋大国，恰恰成为海权论的诞生地。这跟陆上强权俄国的彼得大帝向西迁都，在滨海的一片沼泽地上建立圣彼得堡，梦想建立强大海权，道理一样。

彼得大帝这个人胸怀雄图伟略，没有奢华之气。他在圣彼得堡夏宫修了一处住宅，叫“我的乐趣”（mon　plaisir）。那是一座面对波罗的海的房子，装潢简朴，规模比今天很多土豪的别墅还要小。他的乐趣就是坐在这座房子前对着波罗的海，梦想结合陆权和海权，把俄国打造成一流的欧洲强国。可是俄国海军就只打了一次重大胜仗，百多年后的1905年旅顺口战役，还败给日本这个后起的海洋强权，输掉了出太平洋的通道。

德国也想走相同的战略路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原因是德国修建柏林—巴格达铁路。只要拿地图一看，就明白。如果铁路修成运作了，德国可以连接西亚的贸易通道，上面接入广阔的中亚大陆，下面接通波斯湾，避开了英法控制的苏伊士运河，打开通往亚洲的海路。

虽然19世纪英国的麦金德提出欧亚非大陆岛的概念，认为区内如果出现一个能整合欧亚非运输通道和经贸的强权，便足以称霸世界。但实际操作上，还是要配合大陆岛沿岸的海运。

所以说，陆权只是相对海权的纯理念，实际上，要挑战海权，必然是依托陆权的海运条带与大陆纵深相结合。英国两手准备，一面和德国签好关于柏林—巴格达铁路的合作协议，但转眼，便爆发了一战。一战本来不是德国挑起的。教科书上，一战爆发的导火线是奥国大公遇弑，开始打起来是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德国有自己的利益盘算而参战，因为当时中东地区是奥斯曼帝国的势力范围，而奥斯曼帝国当时又是奥匈帝国的盟友。柏林—巴格达铁路，就是穿越这两个没落帝国的势力圈。但不久，英法的主要针对面转向德国。理由很明显，德国是后起之秀，在世界版图上抢殖民地，处处受制于英法。

本来中东没有什么利益，但发现了石油后，就不同了。20世纪初开始，石油成为世界工业和军事的核心动力。当时主要产油国是美国，所以美国一跃成为第一大工业产能国，其次波斯在英国势力范围内，如果德国接通了巴格达，获得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便肯定成为下一个欧洲强权。英国一边打德国，另一边策动阿拉伯人反抗奥斯曼帝国，塑造了阿拉伯的罗伦斯这个传奇历史人物。

一战和二战使德国和日本的帝国梦想破灭，但却成就了两个附庸于美国海权的工业强国。英国后来扶植了截断伊拉克入海口的科威特。20世纪初欧洲强权争霸遗留下的问题，一直影响了20世纪末的地缘政治。

所以中国的陆权策略，要一带一路一起提。

现在世界上能称为大陆型大国的，只有三个：美国、俄罗斯和中国。

中国不能只搞内陆的丝路，因为这无可避免地要通过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但俄罗斯一直有欧洲情结，东方一直只在它的战略上占次要位置。所以早几年油价大升、形势大好时，对中国的丝路倡议态度若即若

离。它的战略重心一直倾向欧洲。早一阵子提出欧亚贸易区，等于是由它来整合贯通中亚的前苏联成员国和欧洲。说白了，就是中国等在门外好了，中亚这里轮不到你来整合。但乌克兰危机美国插手后被迫与欧洲交恶，同期美国主导推倒油价，决心打下普京，俄罗斯才不得不转向东方，要认真对待中国的倡议。财困之下，甚至提议和中国一起研发新一代武器，变成貌似真正的战略伙伴。但只要和欧洲关系改善，它的心还是会转向欧洲。

不管眼前和俄罗斯利益多密切，中国也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美国在亚投行上陷入被动，有人归咎于奥巴马不擅长于外交。但美国的外交体系运作非常成熟，跟总统的个人能耐没有多大关系。这一次是美国点起太多火场，战线过长，在太平洋和欧洲两边分别围堵中国和俄罗斯，结果分身不暇。乌克兰问题上美国玩得过大，以为支持"法西斯"右翼势力搞个政变，便能使乌克兰纳入北约，完成对俄罗斯的最后围堵。结果迫虎跳墙，俄罗斯借机发难收回克里米亚，并支持乌东分离。这一年来，美国集中精力对付俄罗斯已然捉襟见肘，还要处理伊斯兰国（ISIS）和基地组织，对华政策明显少了攻势和力度，给了中国一个喘息的机会。为了拉倒普京而推低油价，也减少了中国的通胀压力。可见美国难以两边兼顾，只能在一边速战速决，再集中力量对付剩下的一个。

但中国不能掉以轻心，美国会不会因此调整策略，转而加强对中国施压呢？譬如说，在明的一面，挑起东亚的地区冲突；更重要的是在暗的一面，加强和中国内部的资本利益集团（包括执政集团内外）结盟，夺取未来中国发展政策的主导权。

美国也肯定会根据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而调整其外交策略。例如伊朗，就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上的重要环节。美国与伊朗达成核问题协议，有可能是考虑平衡中国在区内影响力的因素而做出政策调整。毕竟，对于美国，地缘政治利益才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民主自由、制度文明这类旗帜，有用便拿来摇晃呐喊一下，在亲美的保守高压政权前，它会识趣地收起来。美国的外交之路，百多年来都是这样走过来的。美国国民自己相信这一套让人无话可说，连不少国家的百姓、教授、公知、媒体、网民们也对人家的意识形态话语工具崇拜不已，是好莱坞美式教科书的软实力渗透厉害，还是人们对美好价值的理念落得如此贫

乏？

一、中国开拓新的海运命脉线与东盟的复杂性

刚过世的李光耀的历史角色很有趣。这么小的地方能出一个在国际上有如此分量的政治家，不管李光耀被捧成多么有政治智慧，主要还是因为新加坡的特殊地缘战略位置。新加坡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建立的，英国人选的地方，肯定是具地理战略价值的关键之地。新加坡扼住马六甲海峡之咽喉，是控制欧非亚大陆海运通道的战略重地，也握住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产业资本的能源生命线。

新加坡很清楚自己的生存之道，就是要在西方和中国之间玩平衡。西方人推崇李光耀，因为他是最坚定的冷战斗士，力阻共产主义在区内散播。因此，不管中国自邓小平以来数代领导人都和李光耀颇有交情，也不管李光耀提倡的亚洲价值（即威权政治＋高效能政府＋政府公司主义）如何和中国的意识形态兼容，新加坡始终不会成为盟友。相反，李光耀在奥巴马甫上任即力劝美国重返亚太搞再平衡。而且不光是嘴巴上说，还开放军事港口给美国，协助美国在东盟区内的军事部署。

既然这是新加坡的生存之道，那就不由中国抱任何幻想。

因此，中国渴望打开另一条从中国西南接通印度洋的货运通道，无须经过马六甲海峡。无论是试图与泰国大米换高铁，还是在缅甸做基础设施投资，都正在和美国角力，但形势不明朗。另一条南下的路线选择是经巴基斯坦或孟加拉下印度洋。不管是哪一条，接着都希望接上斯里兰卡，替斯里兰卡修建世界级的港口，绕过印度。

东盟是中国倡议的海上丝路的前线起点，但也是形势最复杂的区域，也是除了日本外，美国影响力最根深蒂固的地区。

二、后布雷顿美元体系格局

中国的金砖银行＋金砖国应急基金、亚投行＋丝路基金与接下来上海合作组织银行，客观上是另起炉灶，与在二战后建立美国主导的布雷顿美元体系分庭抗礼。中国也是继大英帝国特惠贸易体系和美国布雷顿体系以来，第三个主导全球性金融贸易体系的国家。当然，在可见的将来，它们的协作也不可能取代布雷顿美元体系，最多只能分庭抗礼。美

国自19世纪末成为第一大工业产能国后，也是经历了两场大战，50年后，才成为金融主导国。所以中国一直强调，亚投行等只是世银和亚银的互补，不排除合作关系。

未来10年内，只要中国内部不出现大动荡，人民币成为其中一种重要的国际货币，基本不是问题。但除非有新的重大因素出现，还看不出人民币哪怕是在20年后能挑战美元的地位。（20年之内会不会爆发毁灭性的全球战争，主要资源会不会枯竭，又是另一回事。）在产业资本主义阶段，一种货币的力量，建基于一国之政府及民间组织社会生产和创造的能力。但在金融资本阶段，作为信用货币的信用之来源，主要是国家政治强权。据此看美元作为世界信用货币的强势，当然首先取决于其庞大的军事力量。美国的军事开支占了全球军费的四成多，比接下来的十个国家加起来还要多；它可以在两大洋上同时打两场战争（虽然最近开始调整这个军事原则）。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像以前的罗马帝国，靠强大的军事力量长达几百年地榨取周边地区的资源和奴隶劳动的超额剩余。罗马的核心基本上只消费而不事生产，输出的只有斗兽场、竞技场和大浴场等奢华腐败文化，却大量输入各种奢侈消费品。美国也是一样，靠印刷最低成本的美钞换取世界各地的资源，支持其国民的高消费，撑起被世界当作自由民主样板的现代化高生活水平。但美国比罗马更全面更优胜。

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资本高附加值的创新源头。并且是官方统筹推进的、高度组织化的军工科技引领，由化工、半导体、电影、电视、航空、电脑、金融、商贸模式、生物科技、互联网到智能手机，绝大部分促进产业扩张的资本高附加值创新都是源于美国。美元价值的最根本基础除了独占鳌头的军事政治强权之外，就是美国的垄断性提升资本附加值的创新能力。

现在中国上上下下盛行空想资本主义，以为只要搞所谓的国退民进，依赖神奇的市场力量，就可以像人家一样变出高附加值创新力。缺乏庞大的高新科技体系性研发投资和基于组织化的有效的协调统筹，敢问中国分散的民间资本在未来20年能发展出这种高附加值创新能力吗？在中国成为全球资本高附加值的创新源头之前，中国的货币还不大可能挑战美元，甚至欧元的地位。

按照矛盾论原理，将来能压垮美元的，估计只有愈益虚拟化的美国金融体系本身。随之而来的问题还不是我们是否心甘情愿长期替它埋

单，而是如何才能及时地先从内部改变跪着埋单、自取其辱的“犬儒主义”文化对思想和教育的浸淫。

中国十多年来输出资本，欠缺整盘计划，在不少地方焦头烂额（例如利比亚和苏丹），也碰上不少壁（例如墨西哥高铁和斯里兰卡港口项目），正是因为缺乏亚投行这种政治性金融组织的支持与协作。说得通俗直白一点，就是即使只在美欧霸权的地盘外围到处插旗，也会被这些大佬恶霸出手修理。

中国虽然成为重要的资本输出国，却不仅没有一个政治同盟，也没有金融同盟在背后支撑。尽管谁都知道只有二者相辅相成，大规模对外投资才能相对安全。对于前者，中国碍于“后冷战”地缘政治而一直刻意地回避；而对后者的改变，则主要在金砖银行和亚投行。由此看，这正是中国配合资本输出的跨国制度建设。

美国几年前为了防止有利于中日韩合作共赢的亚洲货币同盟的出现，高调重返亚太搞所谓的再平衡，不惜扶植日本右翼势力重新执政，形成围堵中国的太平洋同盟圈。为了排斥中国，美国倡议TPP，但几年来一直进展缓慢。中国作为应对提出亚投行，虽然美国极力劝阻欧洲和亚洲的盟友参加，亚投行却在短短一年之间，阵容浩大。美国的尴尬是本来为了排斥中国而搞TPP，却反过来第一次把自己排斥在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之外。当英德法意瑞等欧洲盟友宣布参加亚投行后，奥巴马召开了紧急国家安全会议，可见美国视亚投行的成立为威胁国家安全的大事。实质上，它挑战了美国战后主宰全球的金融霸权。

当然，盟友们不是放弃布雷顿美元体系这条船，而是在单极霸权疲态毕露后，为了保险，而多买一张船票。更何况，一带一路覆盖的，本来就是英法意老牌帝国的传统势力范围。中国强调亚投行大家都能分到利益，是拉拢利益同盟。

其实欧洲首先决定参加的是瑞士，但和中国秘密谈判，并要求押后公布，才使英国成为第一个抢先宣布加入亚投行的欧洲国家。但瑞士和卢森堡这两个传统上很少参加国际组织的金融国也参加亚投行，表明了布雷顿同盟内部确实出现了问题。我们不妨称之为布雷顿体系的特里芬难题：就是美国已经开始和它所领导的同盟组织出现利益矛盾。

布雷顿体系建立是为了配合美国输出过剩的工业产能和资本，当时

欧美双方利益是一致的；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大规模输出流动性，也是和欧洲的金融集团利益一致。但近年美国的金融利益导致欧债危机，双方的根本利益已经开始出现矛盾。这几年IMF和世银的改革停滞不前，也因为美国不愿放弃其否决权。美国领导的国际金融组织无作为，跟不上全球新形势新需求，客观上迫使全球出现另一个全球性金融合作组织。中国领头的亚投行，恰好顺势而上。各国反应之热烈，恐怕中美都始料不及。

早前美国与2013年10月构建的六方央行流动性互换同盟，预料可以有效防止欧美再出现大规模流动性危机。但这只是预防性，现在全球新局势需要积极主动的倡议。被美国资本利益主导的IMF和世银（及其分支亚银），明显变得僵化，跟不上全球格局重整的新形势。

中国能否趁此时机，领导建立新的全球性金融联盟？对于一个刚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处于转型期面对内部多种问题的产业大国，无疑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三、西方同盟阵营关系重新调整？

这次亚投行创立，美国最尴尬的是二战后建立的同盟阵线首次出现众叛亲离的局面。美国严词批评英欧盟友，英国也高调回应。韩国和澳大利亚被压住不许加入，但最后一刻还是跳上了尾班车。结果只剩下很急于借此历史机遇恢复军事地位的日本和本来就不着紧的加拿大跟在后面。美国领导的同盟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出现根本分歧。

正如上述，美国领导的国际金融组织开始出现特里芬矛盾。那么美国领导的西方政治同盟，是否也出现矛盾呢？有这个可能性。

首先在俄罗斯问题上，美国的态度非常强硬。乌克兰签订停火协议后，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一些国家进行漫长的军事演习，并且在演习后留下武器，意思是随时做好开战准备。而且美国坚持把俄罗斯交回克里米亚作为和解的先决条件，等于说是没有谈判的余地。欧洲盟友，尤其是德国，是否支持美国这种强硬的态度呢？德国的利益，本来和俄罗斯分不开。当然，美国并不真的想和俄罗斯开战。美国在各地缘板块搞的，都是分而治之，在区内挑起主要力量之间的矛盾，然后就可以从中获利。所以美国不愿意欧洲和俄罗斯走得太近。如果欧洲和俄罗斯结盟，整合成一个强大的欧俄（中亚），那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美国

要借乌克兰危机挑起事端，而且态度强硬。就是要把俄罗斯推向欧洲的敌对面。换言之，美国的欧洲政策，很难说再与欧洲的利益完全一致了。欧洲各国在亚投行上公开与美国决裂，可能也反映了盟国对美国的欧洲政策有一定的不满。

北约，正如其名，是美国海权战略的附属旁支。北约的利益与欧盟的利益，是否再能保持完全一致？

亚洲也一样。韩国和澳大利亚本来是美国围堵中国及TPP的重要成员，但它们最后还是加入了亚投行，等于对美国投下不信任票。只有日本得到加强军事扩张的机会而顺势表示："说明我们是美国的最忠实盟友。"

韩国一直的竞争对象是日本。只要朝鲜半岛统一，韩国无论在人口、军事和工业产能上都将足以挑战日本。为此，中国是韩国的重要贸易伙伴。所以中韩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甚至将来在统一的问题上，韩国最终需要中国的支持。而美国实际上不想朝鲜半岛统一，以免亚洲演变成稳态的三足鼎立，日韩成为直接的竞争对手。更何况朝鲜半岛一旦统一，韩国愿意放弃核武吗？那么韩国将最终在军事上寻求独立于美国。所以美国的亚太政策，与韩国的利益，很难说一致。

日本也一样。日本同样面临资本过剩问题，同样渴求输出基建产业。国内的资本集团渴望日本加入亚投行。事实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倡议成立亚洲稳定基金，让日本成为领导亚洲的金融力量，结果被美国否决了。日本主导亚银，最后还是要仰美国的鼻息，区内每年8000亿美元的基建需求，亚银只批出135亿美元。表面是环保、人权等高标准，实质是要配合美国的政策。右翼集团表面上为了意识形态而实际上为了重建军事大国而坚持站在美国背后，但长期看也难说美国海权战略会与日本的军事扩张利益一致。

世界的利益集团变得多样化。美国领导的同盟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加深。中国怎样在其中找到自己发展的位置，需要很大的智慧和谋略。中国过去20年的外交，说得好听是韬光养晦，但实际上是条件未成熟，形势比人强，只能龟缩，缺乏连贯统一的章法。但接下来的10年，中国外交需要积极主动的思考和策略。

四、输出发展的意识形态不够，急需社会公义的理

念

美国在20世纪50—70年代，输出的是配合冷战地缘控制的发展意识形态。世银主导的发展主义遭遇发展中国家普遍高债务危机而破产后，美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外交话语，改为民主自由制度变迁。尤其是波斯湾战争后，拿着大棒子送上美式自由民主，成为美国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主调。但过去10年出兵伊拉克和阿富汗，结果引爆了永无止境的地区冲突，不仅造成数十万人死亡和数百万人的难民的代价；还亲手栽培了基地组织阿尔盖达、伊斯兰国（ISIS）这些反过来咬住美国殃及西方的政治产物。大棒子＋民主自由的话语，已经没有多少说服力。这几年，美国的外交意识形态悄悄地转为大棒子＋安全。即是说，面对日益严重的地区冲突（虽然它不说这些冲突的大部分根源都是美国），需要美国的强大军事力量介入。

而一带一路的倡议，是和平发展。即是说搞好基础建设，促进经济发展，自然会减少冲突，变得和平。无疑，和平发展，要比美式的大棒子＋安全更靠谱。贫穷和不公义，是极端主义的温床。但输出基建的发展主义，也有可能导致区内各种社会问题爆发。“和平发展”这套话语的盲点，也是中国内部矛盾的折射。如何避免亚投行重蹈世银那种破坏环境和原住民稳态生计系统的错误？如何令基建带动在地化的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换言之，怎样避免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变成另一对与IMF和世银同类的魔鬼？虽然中国这几年输出基建援助强调必须有利于当地的实质生计，但“基建发展”作为一套话语，还显得比较苍白，不足以在道义上挑战美国的所谓“民主自由”。

既然一带一路是一种制度权竞争，那么决定其成败的关键，是核心价值的话语竞争力。中国必须形成一套内生性的社会公义论述，来应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在世界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民主自由话语及其外推的制度变迁软实力。

当然，如果中国内部正在以城市化吸纳过剩产能而不顾乡土文化及资源环境；官方面临30年发展主义所带来的贫富分殊、环境恶化、腐败不义、道德伦理崩坏的严重社会矛盾而束手无策，我们怎样有信心这套“基建发展主义”的话语在海外会有说服力呢？发展生态文明，只能建基于多元化社会的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之中；而构建和谐社会，也只能建立在符合公义的社会财富分配之上。

可见，如果中国缺乏一套内生性社会公义的论述，输出基建发展主义，不足以挑战西方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话语。

我们团队的各研究课题，例如乡村建设、社会冲突缓和机制等，也必须有这个高度的思想意识，必须把我们的知识生产提升为一套可以输出的中国（或乡土社会）式社会公义论述，才可以使“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范围拥有话语权。

换言之，“一带一路”本身是没有灵魂的，它需要更深厚的社会公义思想和文化内涵。否则，它面对亚非欧大陆上的多样民族、多元化文明，在遭遇地区冲突时，将苍白无力，缺乏文化对话的能力。

只有过剩的产业和金融财力，而缺乏深厚的社会公义理念和丰富的文化多样性视野，在本国连生态文明战略都难以落实，连真正的内生性和谐社会也建设不了，还能侈言什么东方复兴、和平崛起，更遑论可以输出足以改变世界的实践。

综上，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成败在于话语权，当前急需内外兼修，自省谋变。

第三章　金融资本“无祖国”与做空分析[98]

新世纪以来，“产能过剩”（一般称为生产过剩）这个在20世纪的中国很少见到的概念，在官方文件上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同期，则是伴随实体产业下滑同步发生的金融资本扩张。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20世纪末期已经发生核心国家从产业资本阶段向金融资本阶段的跃升。任何体制下的金融资本扩张都具有本质上的共性，那就是追求流动性获利而推进经济虚拟化。于是，这些特征得以借助互联网创造的虚拟空间和电子结算瞬间获取巨大利益而被冠以“现代金融”，愈益取代传统银行体系以“存贷汇兑”为主要业务、服务实体经济的性质。也因此，金融全球化是世界上所有可称之为金融资本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基本要求。遂有伴随着全球化而出现的金融资本“无祖国”的投机做空趋势蔓延全球。

中国的银行业在2001年中国加入西方主导话语权的WTO之际，大体完成了市场化取向的改制。接着是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之前完

成四大国有银行的股改上市，基本具备了参与金融资本全球化竞争的制度条件。2009年全球危机爆发以后，国内金融资本逐渐异化于实体产业；从2011年国内房地产业下滑开始大规模转向西方模式的金融资本经济。近几年来，加快异化转型的金融资本集团与代表其利益的监管当局大力推出“融资融券”、金融期货、场外融资等一系列利于衍生品发展的交易工具，这为海内外金融资本联手做空中国经济，制造了难得的历史性的机会。

客观来讲，中国的这次“股灾”是一场正在演化之中的、具有金融资本阶段特性的多空大战。尽管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中国官方资本做多与私人资本做空之间的一场对决。

一、谁制造了做空中国的机会？

此前，西方金融资本一直在试图寻找做空中国资本市场的机会，已经做了至少5年准备。这从来就是公开的秘密。但做空多年却并不成功，这是因为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的金融资本交易还没有对外开放。此前，中国只是象征性地给了外资QFII政策，由于审批额度很小，投机资本不足以兴风作浪，金融大鳄只能把巨额资金囤积在香港，把港股指数炒到全球最高的25000点以上，反过来又造成香港经济饮鸩止渴地更多依赖资本市场，不断推升其寄生性；而这种寄生性金融资本经济如同美国一样不可能创造就业，遂派生出香港一般年轻人没有前途！于是，各种势力借此社会衰落之机而兴风作浪也就难以避免。本源上不是自由选举或法制问题。

现在看，金融资本集团终于找到了这些年梦寐以求的做空中国、借机抄底的历史性机会。那么，机会是从哪里来的呢？

自从2008年美国政府救市，不断推出超级量化宽松以来，金融流动性长期以零利率对外攻城略地，大规模扩张。其中，注入期货市场的过量资金推高原材料、能源和粮食价格，意味着向进口国转嫁了通货膨胀。这时候，对中国这样的全球最大原材料和能源进口国就造成国内难以抑制的通货膨胀，间接造成国内资金利率上涨，压迫实体经济的利润空间致使其衰落。这反过来又使得国内各地官方和民间全都渴求“廉价外资”。于是，对外开放资本市场成为国内新兴资产阶级墙倒众人推一般的改革呼声！演变出类似路易十六改革一样的沪港通、深港通，以及“上海自由贸易区”率先开放海外金融资本等举措。随之，沿海甚至内地中心城

市也紧跟上海步伐，跃跃欲试。而多空大战的机会，正是由这些资本项目开放带来的。其实，这些所谓的资本项目对外开放，都与沿海地区强烈要求在体制上实现“去中央化”（de-centrali-zation），以便由地方政府直接对接外资有关。可见，这一次中国全面转向西方金融资本的深改和促进互联网＋金融的“新政”，确实给海内外金融资本做空中国制造了一个现实版的“特洛伊木马”。

二、近20年不同的做多政策比较

回想2008年，那届中国政府采取四万亿救市措施“做多”还能奏效，原因在于那个时期还没有放开国内金融控制。再回溯到之前10年，1998年，政府总理启动国债投资加强中央调控也是在“做多”，也还有效。同理，也是因为那个时期中央依然严格掌控金融资本。

对中国这种制度，国际上叫作资本管制（capital control），而整个外部的金融资本体制叫作资本流动（capital flow），所以，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和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之后，海外讨论中的一种意见就是资本管制有效，还是资本流动有效。讨论结果认为，中国当时严格掌控资本市场——capital con-trol，有效防范了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来则有效防范了2008年金融海啸，并且曾经在过去的两个10年中，有效地防止住了国际金融资本做空中国这个公开宣布的企图。

直到2013年，西方用放弃QE这个似是而非的题材，兴起投机资本炒作，导致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纷纷陷入股灾及本币大幅度贬值。幸运的是，2013年的中国虽然有了说法但还没来得及去做资本项目的深改，所以又幸免于难。

不过，2013年年底召开了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大规模转向西方模式的金融资本经济。在这个阶段上当局大力推出“融资融券”、金融期货、场外融资等利于衍生品发展的交易工具，同期发生房地产危机造成的资金析出地产投机，转而大量进入股市等客观情况；这才符合规律地制造了国内外金融资本联手做空中国经济的历史性的机会。

可以对比的是2007年股灾，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华尔街金融海啸之前，中国先发生股灾，蒸发了超过7000亿元人民币；而8年之后的这一次股灾，我们蒸发了超过7万亿元人民币……

三、为什么金融资本无国界？

为什么说金融全球化的制度要求是“无边疆”，金融资本流动性需要的是“无国界”呢？无论是内资外资，只要是做金融资本的，都会体现“金融无祖国”这一特点，因为金融资本是靠流动性获利，是最不讲究国界阻碍的。于是，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就一定是金融全球化占据政策和理论的主流。近年来深改的顶层设计所提倡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思路，内在地体现为货币霸权国家的金融殖民主义，也就一定是最反对民族主义、民粹主义……

流动性获利是金融资本的第一大特点。我们多年来希望大家认识所谓金融资本新三性：流动性、短期性、集中性。第一条就是流动性，其他两个特性是派生的。因为追求流动性获利，就必然有短期性的、集中性的进入和退出。过去在产业资本阶段，20世纪帝国主义之所以是老三性，因为它是寄生性的，所以是腐朽的和垂死的。而今天的金融资本追求的是新三性，只有追求流动性才能实现资本获利，所以它希望全球都没有国界，同样，金融家也是无祖国的。

以前，老马克思主义者讲过“工人阶级无祖国”，但实际上，帝国主义国家一打仗，工人阶级就都有祖国了，都从国际主义改回到民族主义，这是历史的教训。之所以工人阶级不可能无祖国，是因为产业资本是“在地化”的，产业资本的资本收益对本国社会作分配是工人阶级有祖国的重要前提。也就是说通过国家做“二次分配”的制度，使得工人阶级有祖国。我们看今天的金融资本的无祖国，可以说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国际主义，谁做到的呢？是被金融资本做到了，金融资本是洗劫全世界的。因此金融资本可以注册在开曼群岛、巴哈马群岛，可以注册在任何一个低税制的小国，只要能够使利润最大化，他们根本不在乎祖国在哪。

所以尽管今天实现不了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工人阶级无祖国，但在金融资本阶段实现的却是金融资本家阶级无祖国，他只要能够靠多空大战来套利，会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搅得周天寒彻。从这个角度看，这次中国的股灾的实质就不那么难理解了。

四、金融资本的黑洞会否崩溃？

很多今天秉持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人，看到中国爆发的股灾幸灾乐

祸，其实这个现象跟自由主义无关，跟极权主义也无关，只是金融资本阶段，由海内外金融资本家操纵的多空战役的一个历史现象。据此看，那些私人资本参与做空，和那些违背中央做多意图的国企高管们，在本质上并无差别。只不过遵循的是他们作为投资人在资本市场上都会“顺周期”的规律而已。对此，同样应该客观理性地看待国家有关部门直接出手做多，那也只是政府尽了其应尽的逆周期调节责任。只有这样“去意识形态化”地做分析，人们才能客观看待多空大战。不要因海外自由主义思潮或国内的国家主义舆论环境，而忘记我们结合自身国情的思想理论创新的责任。

今天更为客观来看，中国当前发生的股灾是2013年以来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的结果，这种符合全球化的主流政策选择本身，也使得国际金融资本集团终于得到了历史性的做空中国的机会。不过，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如果这一次中国的证券金融监管部门不紧急采取措施，那就意味着当股灾全面爆发的时候，就给了国际金融资本集团和国内的金融资本集团一次极佳的通过做空来抄底的机会，那将会更加惨烈。这些年压低劳工福利破坏资源环境所积累的实体经济的财富，将会先被人家打压得一钱不值，然后人家再一拥而入抄底。这就像俄罗斯1991年“500天私有化计划”的深化改革新政策造成的客观结果，那也是一次政治做空之后的经济洗劫。

面对此次“股灾”，谁会感到高兴呢？当然是国际上的金融资本集团，以及被金融资本集团用多年的迷魂药迷昏的所谓学者。社会在分食腐尸之后剩下的将是一片狼藉，连那些赚了昧心钱的新土豪也会因任性而尸骨无存。如此，金融资本会得到好处吗？短期来看或许会有好处，但是从长期看，则未必。因为它是腐朽的、垂死的，本质是寄生性。

这个金融资本通吃的世界越来越走向全球竞劣。最终，当金融资本把所有的实体经济洗劫完毕，没有东西供它洗劫的时候，它终将会导致自身的崩溃。这就如同宇宙黑洞，金融资本就是一个黑洞，最终将因为多空大战不能做了而导致崩溃。

第四章　谨防当前国际外部性风险叠加国内社会动荡[99]

一、引言

发展中国家首要的安全问题是面临着全球化挑战下的严峻的国际外部性风险叠加国内内生性风险的复杂挑战。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和政策调整，通过全球资本和商品市场传导给发展中国家，加剧了一般发展中国家内部本就紧张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并越来越多地从根本上危及国家政治安全[100]。

根据外部性风险内部化理论，从历史经验看，乡土社会因客观上具有“风险对冲机制”和“稳定器”功能，因而仍然是当前应对全球化风险叠加的挑战下发挥“政府主导”和“人民主体”作用的最佳领域；当前急需在构建乡村良性治理结构和创新乡村治理机制的基础上，强化乡村“外部风险内部化”功能，据以构建国家综合安全体系，使国家安全宏观战略具有有效落实的微观基础。新中国的真实经验证明了这一假说[101]。

发展中国家的内生性风险是由殖民历史包袱与现代工业化政策所产生的。

根据市场失灵理论，很多发展中国家至今无法改变殖民时代资源输出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国家财政收入长期依赖出口初级原材料，由此承受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此外，由于仿效西方工业化，引进外资，加之农地私有化制度条件下被福特主义大农业及其配合的资本深化造成大量农民失地，涌入大城市贫民窟导致一方面城市化率过高，集结贫穷与动乱；另一方面城市完全无产的绝对贫困人口因生存开支伴随物价上涨而不得不要求提高贫困标准（近年来4美元/日人均收入），这也造成劳动力价格上升，使本地劳动力资源难以形成比较优势。[102]

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基础薄弱、收益低下，无力支撑高成本的现代化上层建筑，外部主体进入乡土社会遭遇组织涣散产生的交易费用难题，官方法制需要的正规治理缺乏组织载体，一般都导致治理主体缺失。

根据政府失灵理论，越是现代化政府越是债务缠身，越是依然受制于本国乃至跨国资本的操纵，故城乡社会共同抵抗外部风险的基础均十分薄弱。[103]

二、当前国际外部性风险引发国内社会动乱

王小强曾经指出，发展中国家摆脱不了现代化“三部曲”的宿命：一

为改革开放带来物质生产高速增长，二为金融自由化带来货币经济繁荣昌盛，三为外资抛空带来金融危机。其实，不只金融危机，更威胁其执政权威。“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就是金融危机，顶多恶化成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不仅每次就是经济危机，而且经常递进成社会动乱、政权颠覆、国家分裂。”[104]

环顾发展中国家，近两年遭受国际金融资本国家调整策略而引发国内频频发生社会动荡，时刻威胁着执政党的统治权威，例如：委内瑞拉后查韦斯时代反政府示威浪潮；巴西民众街头抗议政府公共福利政策；印度反政府的武装毛派势力扩张，农民自杀率攀升，性暴力罪案剧增；南非矿工罢工浪潮席卷全国；印度尼西亚民众抗议燃油上涨及政府补贴不足；土耳其反政府占领广场运动等。

（一）金融全球化与当前外部性风险增加趋势

1.发达国家缔结货币同盟以自救。

世界体系理论代表人物之一萨米尔·阿明分析，20世纪80—90年代，资本愈益集中于美国、中西欧与日本三巨头里，这种普遍化的垄断系统正是资本集中新阶段的产品。踏入21世纪，普遍化的垄断正在主宰全球经济，控制全球资本主义边缘地区的生产系统，所谓“全球化”，等同于帝国主义的新阶段。但当代的帝国主义自我“调节”去适应新时代，并且加紧对五大方面的控制：技术、挪用地球资源、全球货币与金融体系的整合、通信及信息系统与大毁灭性武器。[105]

徐以升对全球货币与金融体系的整合的分析，与世界体系理论不谋而合。他认为当今世界从全球化变为全球大分化，世界格局被划分为“中心—次中心—外围”，在“中心—次中心—外围”国际体系与国际货币体系里，是中心向上（美元和美国经济体系）、次中心趋稳（欧元和欧元区经济体系，英、日、加、瑞士等个别发达国家货币和经济体系）、外围向下（绝大部分新兴国家货币和经济体系）的大分化格局。[106]

据徐以升分析，2013年10月31日，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加拿大央行和瑞士央行，全球六家主要央行把现有的临时双边流动性互换协议，转换成长期货币协议。根据美联储公告，这些互换协议在六国央行间建立起了“双边货币互换网络”（a network of bilateral swap lines），一旦签订双边互换协议的两家央行认为当前市

场状况可以保证互换发生，那么有流动性需求的央行就可以按照协议规定获得来自其他五家央行的五种货币流动性。美联储为美国构建了具有制度意义的“货币同盟”，并将国际货币体系从“牙买加体系”（1972—2012）推进到“大西洋体系”（2013—）新阶段，美联储扮演了全球最后贷款人乃至全球中央银行的角色。加入该互换俱乐部大西洋体系的国家，将得到美联储的流动性支持，而不能加入该体系的国家，在美联储政策从宽松到紧缩的大周期里，将得不到确定性保护。这种货币体系的差异，将产生并加剧全球货币金融经济体系的大分化。[107]

在该互换体系内部的发达的国家货币与资产，都将在未来享受到国际资本对其的“垄断溢价”；而不在该垄断体系的主要是新兴国家的货币与资产，未来将比牙买加体系时代更加无序，更加没有底线，更加动荡，更加具有体系性风险。[108]

徐以升进一步分析，自20世纪70年代进入浮动汇率时代之后，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拉美金融危机、1992年英镑危机、1994年墨西哥债务危机、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债务危机、2001年阿根廷债务危机等，不是危机国破产违约，就是IMF在苛刻条件下救助，唯一例外的是1994年美国财政部为墨西哥提供担保。美联储一直没有出手，承担起国际中心货币所应该有的最终贷款人职能。因为美联储不承担这一角色，而IMF救助的能力有限以及苛刻，各国最终走上积累美元外汇储备的道路。但2008年的危机则不同，美联储通过所构建起来的国际货币互换体系，直接向互换国央行、间接向全球金融体系注入美元。美联储绕开了IMF，直接承担起国际货币最终贷款人的终极角色。在2008年国际货币体系就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只是在2013年这一以美联储为中心的临时货币互换网络正式长期化，标志着国际货币体系真正格局性变革的到来。[109]

2.美联储启动紧缩性货币政策。

2013年12月18日，美联储开始改变量化宽松政策，启动紧缩性货币政策，推动全球美元回流。2014年10月底，在上述新大西洋体系运作满一年、已经取得调控经验之后，美联储宣布结束资产购买计划，全面退出了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徐以升指出，在未来美元流动性收缩基本格局之下，上述六家主要央行的垄断体系，将主导全球货币金融经济体系的大分化。进入该体系的货币、金融市场将受到流动性支持，以及国际资本评估的“危机底线溢价”；而无缘该互换网络的全球其他所有经济

体，货币汇率、金融市场都将受到冲击。[110]

徐以升进一步分析，2010年以来的美国大转向概括为七个方面：第一，美联储从10年宽松政策周期转向未来5年左右的紧缩周期。第二，美国财政从绝对扩张到相对收缩的转向。第三，美国加大“能源独立”战略的实施力度，美国能源结构从依赖进口转向本土和西半球自给。第四，美国重新恢复实体经济制造业增长。第五，美国外交和军事战略调整，从打赢两场战争转变为打赢一场战争的美国“新军事战略”。第六，美国全球地区战略调整，从中东相对撤出，战略重心东移，“重返亚太”，并确保西非和拉美的“环大西洋能源供应圈”。第七，美国贸易与投资战略调整，从全球的、普适的自由贸易，转向有选择的、高门槛的“规则贸易”。[111]

3.美日同盟牵制亚投行。

2013年，发达国家缔结货币同盟以自救，以及美联储启动紧缩性货币政策；同年，中国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简称“一带一路”，One Belt And One Road），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AIIB），旨在促进亚洲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截至2015年4月15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确定为57个，其中域内国家37个、域外国家20个。

“一带一路”可以使中国内部的剩余工业产能及新崛起的金融资本利益向外寻找开拓空间。但尽管中国高度重视20世纪30年代西方生产过剩大危机引发世界大战的教训，明确提出和平发展的思想；但它的出现也仍然使区内浮现了19世纪末至二战前欧洲列强争霸的类似局面。[112]

三大巨头的其中两头美国与日本拒绝参加亚投行，而日本更利用亚洲开发银行拉拢亚洲国家。2015年5月21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今后5年将投资1100亿美元支持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日本将把源自公共资金的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约三成，包括通过亚洲开发银行发放的贷款在内，总投资额将达到1100亿美元。其中约530亿美元是亚开行的贷款额度，其余部分通过“日本国际协力机构”这一政府开发援助机构执行。日本是亚洲开发银行的最大出资国，此举明显与力争创建亚投行的中国抗衡。[113]

（二）当前发展中国家的困境

1.任由摆布的外围配角。

近几年，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纷纷陷入困境，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张敬伟描绘：“这就导致了一种诡异的现象，美国抗危机，美元量化宽松，新兴市场跟着倒霉；美国去量化宽松，加息正常化，新兴市场又一片紊乱。由是可见，新兴市场依然是全球经济的配角，而且经不起发达经济体的沉浮。”[114]

马光远分析，新兴国家正在面临美国“后QE时代”的重大挑战：“在美国启动印钞机应对危机的时候，中国等新兴市场成为发达国家流动性泛滥的蓄水池，廉价的资本从发达经济体肆无忌惮地流向新兴市场，在带来了不可持续的增长的同时，也吹高了资产价格泡沫。……美联储一旦退出量化宽松，美元走强，新兴市场将立即从资本流入地区变为流出地区，多年以来靠潜伏的国际资本支撑的高房价也将迎来真正的重击。”[115]

徐以升甚至批评，新兴国家过去10年徒具繁荣的躯壳，表面上，贸易顺差，但实际上，被金融资本帝国洗劫。1996—2010年，金砖四国和东亚主要新兴国家累计经常账户顺差2.85万亿美元，但在金融市场效应之后，新兴国家累计的对外净资产规模反而下降3370亿美元。新兴国家在实体经济层面的贸易顺差优势，并没有转化为对外债权净资产的胜势。反过来，对于美国来说，1996—2010年累计产生6.98万亿美元经常账户逆差，占全球逆差的60%，但其间其对外净债务却只增长了2.3万亿美元，所以这期间美国通过金融效应获得的收益高达4.68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为2001—2007年间获得，共计3.86万亿美元。[116]

2.国家粮食安全受到严重冲击。

美国曾经通过量化宽松政策缓解自身债务危机，并且最大化地获取金融全球化的制度收益，但其造成的巨大制度成本却借助粮食、石油、原材料的价格上涨转嫁给大量进口基础物品的国家。美国救市政策加剧流动性过剩，造成2009—2010年全球粮食价格大幅度提升，特别是北非地区紧缺品种小麦、面粉的价格上涨超过100%，玉米价格上涨超过70%，由此引发北非、中东地区的通胀危机，诱发街头动乱和政权危机，成为制度成本的承担者。国际组织2008年确定38国发生粮荒，也是

西方金融危机的代价转移造成全球通胀的结果。[117]

3.当下的具体困境。

（1）资本外流。

据世界银行业组织国际金融研究所（IIF）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10月份投资者从非洲、拉美、东欧、亚洲股市合计撤出90亿美元。2014年以来，巴西的资本外流规模已超过500亿美元。

（2）货币贬值。

自2014年6月份以来，国际石油价格结束了自2009年以来持续上涨、高位震荡的行情，连续下跌，创下了近5年来的新低。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跌是部分新兴产油国货币贬值的主要推力。油价下降导致石油出口国的财政收入锐减，一些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严重依赖石油的国家如伊朗、委内瑞拉、利比亚和俄罗斯等国陷入困境。[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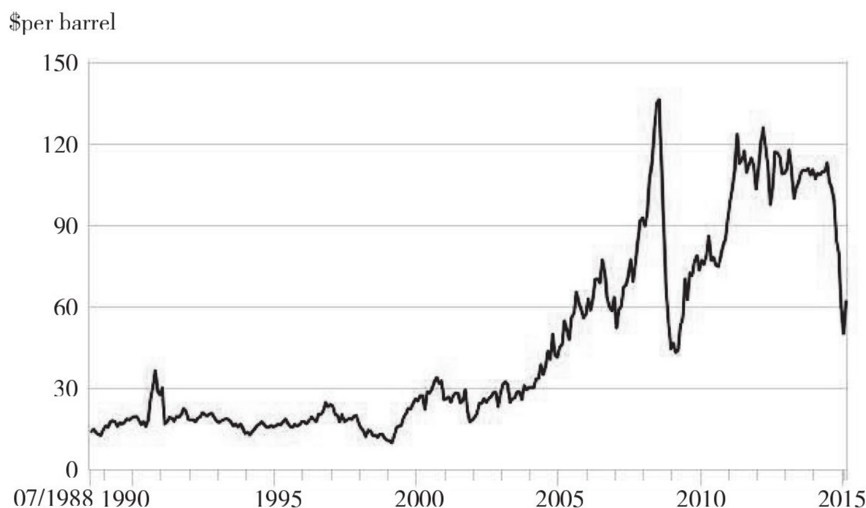


图4-1　国际原油价格急转直下

来源：彭博社。

2010年以来，多个新兴国家货币像印度卢比、印度尼西亚盾、巴西雷亚尔等大幅贬值。[119]自2011年8月1日至12月15日，印度卢比对美元贬值约18%，巴西雷亚尔对美元贬值约17%；俄罗斯卢布对美元贬值约13%；南非兰特对美元贬值约21%。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最高贬值

幅度也仅约25%。

（3）债务上升。

“脆弱五国”中的巴西、南非、印度、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经常账户在危机后加速恶化，土耳其的经常账户赤字2011年高达10%。印度尼西亚目前外债高达2300亿美元，但外汇储备已降至1050亿美元。印度尼西亚央行加息，意在缓解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局势，通过加息来挽留国际资本是新兴国家典型的困境。

（4）通胀高企。

新兴国家货币贬值导致多国进口产品和使用进口原材料加工的本国产品价格上涨，从而推升通胀水平。新兴国家中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南非，通胀率基本都在6%以上。

巴西在截至2014年10月的一年通胀率已达6.59%，突破了政府管理目标的上限。委内瑞拉的年通胀率则高达64%以上。[120]巴西央行2014年12月3日晚宣布，将银行基础利率提高0.5个百分点，由11.25%升至11.75%。这是自2013年4月以来巴西央行连续第11次加息。巴西央行货币委员会称，提高利率旨在抑制当前通胀上扬的趋势。印度尼西亚央行11月18日召开临时会议，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7.75%，以应对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预期。

三、巴西教训——缺乏乡土社会作为危机软着陆基础[121]

（一）背景：殖民历史及其遗留的土地制度问题

在殖民时代，巴西经济结构由殖民地宗主国的欧洲商业资本所控制，其有两大特征：（1）广阔土地被殖民者掠夺形成高度集中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大庄园和奴隶制）；（2）这种掠夺性的殖民地经济为资本集中的城市提供极为专门化的物产（经济单一化和过度城市化）。

巴西有358年漫长的奴隶制剥夺史，从1530—1540年第一批黑人奴隶被运往巴西，到1888年才宣布废除奴隶制。巴西经济乃依靠奴隶生产初级产品像甘蔗、棉花、烟草、咖啡等，最初输往欧洲市场，后来是美

国。即使在独立之后，巴西仍继续维持了66年的奴隶制，仍然以出口初级商品的殖民地经济为主；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在西方大危机的打击下推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

几个世纪以来，巴西的制度基础乃是奴隶制遗留下来的大种植园的土地财产制度。大多数人很难获得土地，中产阶级乃至农村无产阶级都无法进入土地市场，由此造成社会严重不平等。1850年奴隶制晚期颁布的土地法乃土地私有法，此法目的在于阻挠已获得自由的奴隶获得土地，并不威胁大庄园主的精英阶层的利益。法律规定土地凡是无人占领，即属当局政府，导致伪造土地契约档增多。到现在，土地垄断依然存在，这是巴西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背景。

（二）金融资本全球化进程中深化资源型经济

1.搭上跨国金融资本投机粮食及能源市场的便车。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徐世澄分析：“巴西前总统卢拉执政的8年（2003—2011年），正好遇上世界经济发展较好的时期，巴西的矿产品、农产品在国际市场都有不错的价格。而到罗塞夫当选时（2012—），世界经济形势已经有所变化。”“拉美经济增长并非来自内部，而是主要依赖原材料价格及出口，依赖中国、美国和欧洲的需求。”[122]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副研究员周志伟也指出，巴西经济很多投资非常依靠外部市场的流动性补充，最近几年的经济形势，由于欧美国家的货币政策调整使市场的流动性进一步短缺，也体现了对巴西经济的制约作用。[123]

受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所造就的“世界工厂”的带动，巴西的资源及大宗商品出口价格和总量一路攀升，获得丰厚的外汇收入。截至2012年年底，巴西的外汇储备已经接近4000亿美元。巴西还成为IMF的前十大出资国之一，参与救助欧元区国家，这在拉美历史上，确实没有先例。[124]

2010年巴西实现GPD增速7.5%，创造了1986年以来的最快纪录，同时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高增长率。这一年，巴西的GDP第一次超过2万亿美元，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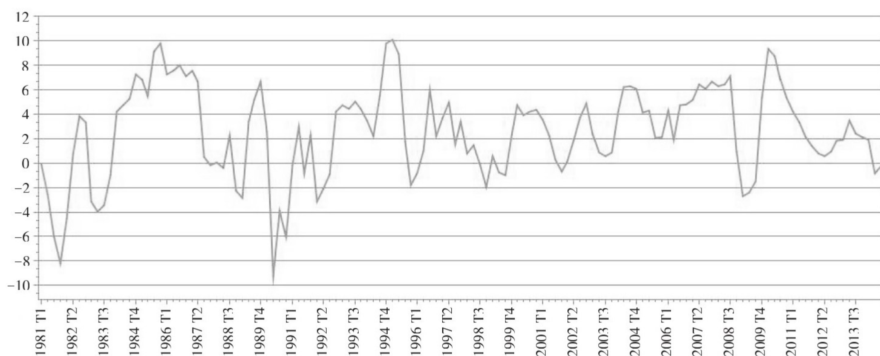


图4-2　巴西GDP

来源：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

因此，卢拉总统拥有足够的财力改善民生，特别是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同时构建完善的失业保险和最低工资等社会保障体系。据估算，2002—2008年，巴西政府各种针对贫困人口的直接补贴总额占GDP的比重从6.9%上升到8.6%。贫富差距缩小，2002年卢拉上台时，基尼系数为0.553，到2011年罗塞夫继任时，已经降至0.500，达到半个世纪以来最低；同期，失业率则从9.1%降至6.8%。短短10年里，有3500万人口（约占贫困人口总数的一半）脱离绝对贫困。[126]

2.受制于外国资本及市场的急剧波动。

巴西依靠大宗商品出口拉动经济的腾飞，但也让巴西的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资源出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阿莉西亚·巴尔塞纳指出，拉美国家经济依然很脆弱。随着几大经济体发展减速，需求下降，巴西也陷入经济持续低迷的泥沼。[127]

2014年，巴西贸易14年来首次出现贸易逆差。2014年前11个月，累计逆差额达42亿美元。巴西外贸研究基金会的负责人桑托斯表示，由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铁矿石需求减少，致使巴西的出口量明显减少，2014年1月至11月，其出口量仅占全国出口总量的11.5%。2014年铁矿石的收官均价为每吨75美元，比2013年每吨减少23美元。巴西的能源出口遭遇相同困境，全球原油价格已经下跌约37%。随着美国页岩油的开采，巴西能源的市场竞争力更被削弱。

自世界杯之后，巴西雷亚尔贬值趋势加速。雷亚尔兑美元汇率从

2014年9月—11月下跌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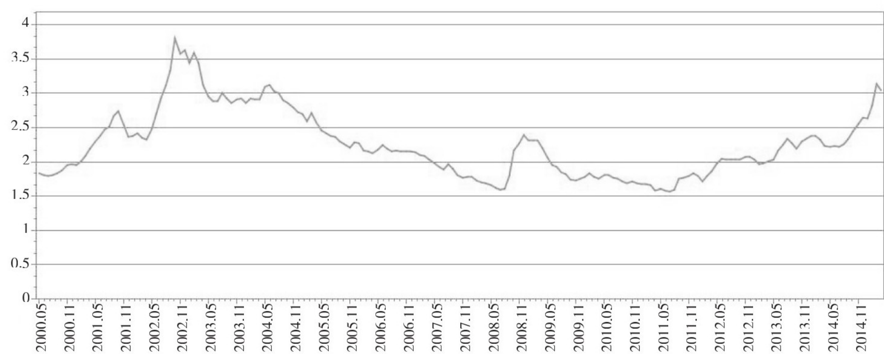


图4-3　美元/雷亚尔兑换率

来源：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

国际资本大进大出，使得巴西雷亚尔大幅波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对美元也贬值约25%。金融危机前后，巴西资本金融账户波动更为剧烈，从盈余300亿美元以上下滑至赤字200亿美元以上，随后又跳升至盈余300亿美元。

巴西新任财政部长莱维信奉自由主义经济[128]，指出为了减少财政赤字，政府必须削减预算开支。在2015年，用于偿还公债利息的“初级财政盈余”，必须达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而在随后的两年，还要升至2%。2014年10月，政府本年度财政赤字已达115亿雷亚尔（约合46亿美元）。[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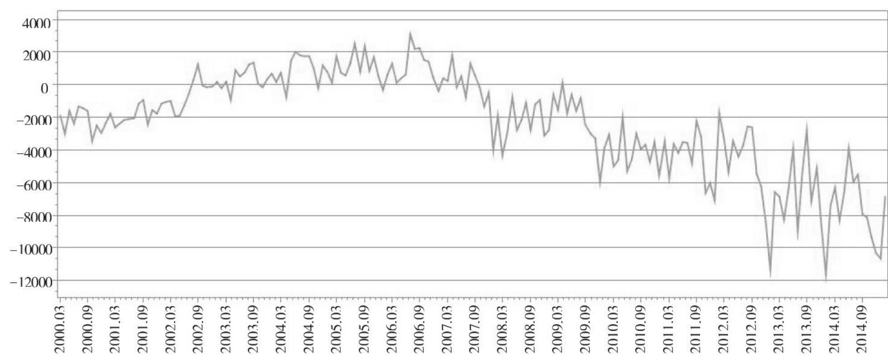


图4-4　经常账户（Current Accounts）大幅下降

来源：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

巴西2011年至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仅增长2.7%、0.9%和2.3%，2014年的世界杯足球赛没能提振经济，其经济在第一、二季度先后萎缩0.2%、0.6%后已陷入衰退。2013年全年巴西股市下跌了16%，跌幅居当年全球主要股指之首。

从2013年4月起，巴西央行连续9次加息至11%。由于不断加息以期控制过高的通货膨胀，巴西也因此成为史上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周期最长的国家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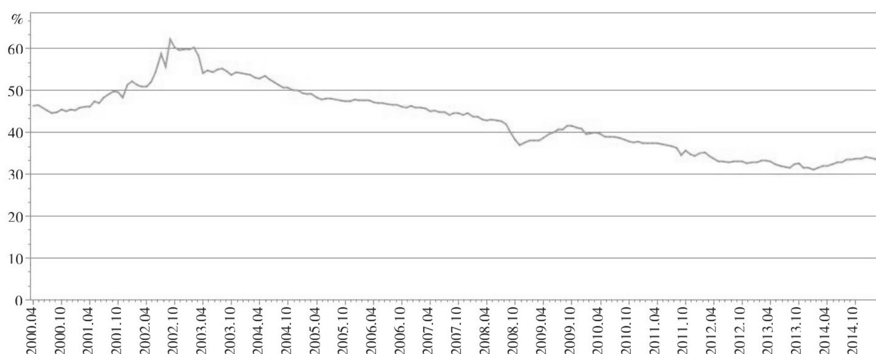


图4-5　公共债务总额（Total Public Debt）占GDP百分比

来源：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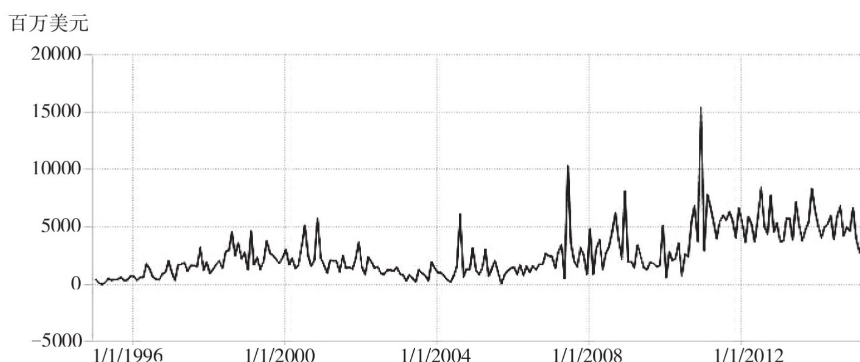


图4-6　巴西外国直接投资（FDI）

来源：Tradingeconomics.com与巴西中央银行。

国际资金——其中包括大量“热钱”——蜂拥而入，由此推高了本币的币值。雷亚尔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在过去10年里升值超过100%，成为

经济学家眼里全球被高估最多的货币。2012年以后，巴西的通胀率连续突破央行设定的4.5%上下浮动2个百分点的目标区间（也就是6.5%），基准利率一度升至12.5%的惊人数字，同期发达国家的利率很少有超过1%的。但更高的利率反过来吸引更多热钱流入，形成了恶性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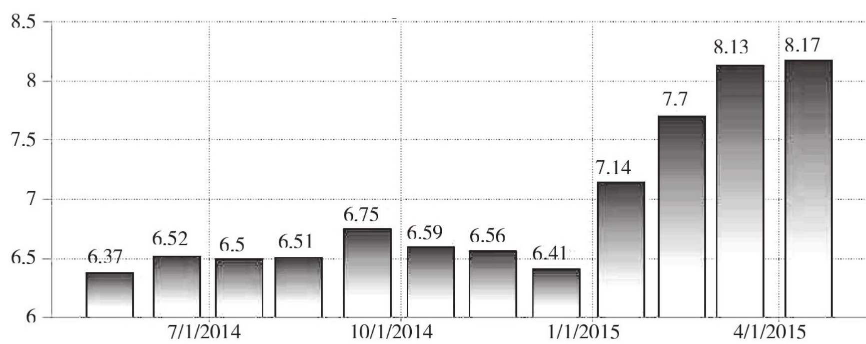


图4-7　通胀高企

来源：Tradingeconomics.com与巴西国家地理与统计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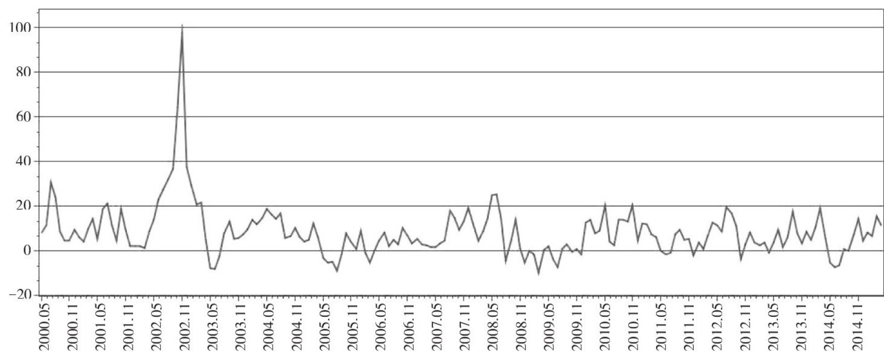


图4-8　物价指数[General Price Index（domestic supply）]

来源：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

3.工业部门萎缩，产业结构无法改出单一经济制度。

2004年巴西制造业占GDP的份额曾达到顶峰16.5%，2010年已降至13.5%。巴西国家地理与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10月份巴西工业生产总值环比零增长，同比则下降3.6%。2014年前10个月，工业生产总值累计同比下降3%。2014年1月至11月，汽车生产量累计294万辆，同比减少15.5%。

目前居民消费占巴西GDP的60%，投资的比重仅有18%，而中国的投资占GDP比重约为40%。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占GDP比重约为16%，而巴西的这一比重仅为2%左右。



图4-9　工业生产率下降

来源：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

4.为跨国资本打工沦为依附型经济。

2011年，巴西GDP规模首次超过英国，排在美国、中国、日本、德国、法国之后，成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2011年巴西贸易顺差298亿美元，2010年为202亿美元，在2006年最高时曾达到465亿美元顺差。截至2011年年底，巴西外汇储备余额攀升到3520亿美元。但是，风光背后，巴西却是净债务国，而且债务规模还在持续放大。根据徐以升等的研究，在2010年第二季度，巴西国际净债务头寸高达9757亿美元，接近净债务1万亿美元。

2000—2011年，巴西投资收益项逆差总量高达3387亿美元，巴西的海外投资收益为774亿美元，而国际资本在巴西的投资收益则高达4161亿美元，这就是巴西12年来总共需要向国际资本支付的投资收益，其规模是巴西储备资产（3171亿美元）的1.3倍，占GDP（2.1万亿美元）的20%。而巴西同期的贸易收支盈余（包括商品和服务）总规模为1395亿美元，商品贸易长期盈余，同期总规模为3478亿美元。

换言之，巴西12年的贸易盈余，仍远不足以支付国际资本在巴西的投资收益；即便除去服务项目，巴西12年的全部商品盈余仍不足以支付国际资本在巴西的投资收益；而若将巴西12年全部商品盈余和海外投资

收益加在一起（4252亿美元），才刚好足够支付4161亿美元的国际资本投资收益。徐以升因此总结：在高增长的GDP、外汇储备外表之下，巴西成为为国际资本打工的净负债国。[130]



图4-10　资本流动（capital flows）大起大落

来源：Tradingeconomics.com与巴西国家地理与统计局。



图4-11　外债总额（Total External Debt）节节上升US $（billions）

来源：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

（三）国内社会动荡

1.城市居民上街抗议政府福利政策。

2013年6月6日民众开始上街抗议示威，导火线是圣保罗市公共汽车票价小幅上调0.2雷亚尔。后来抗议浪潮席卷全国，超过100万巴西人走上城市街头，其诉求日益广泛和多元：要求政府抑制通货膨胀，惩治贪污腐败，改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抗议者批评政府在世界杯上花费137亿美元，整体投资已经超过165亿美元，占年度财政收入的9%，仅

比年度教育预算的190亿美元少一点点。这是有史以来“最昂贵的”世界杯，投资额是上一届南非世界杯的3倍，绝大部分项目超出预算，场馆投资的总成本中有超过85%来自公共资金。[131]

早在2011年马拉卡纳体育场改建时，2300名建筑工人便罢工抗议。此后，巴西国内对世界杯的抗议之声此起彼伏，罢工不下百次。2013年联合会杯赛期间，数十万巴西人走上街头并与警察发生冲突。一幅标语上写道：“第一世界的足球场，第三世界的学校和医院！”

罗塞夫的支持率一度跌落至30%以下，竞选连任时，也仅以51.6%的支持率险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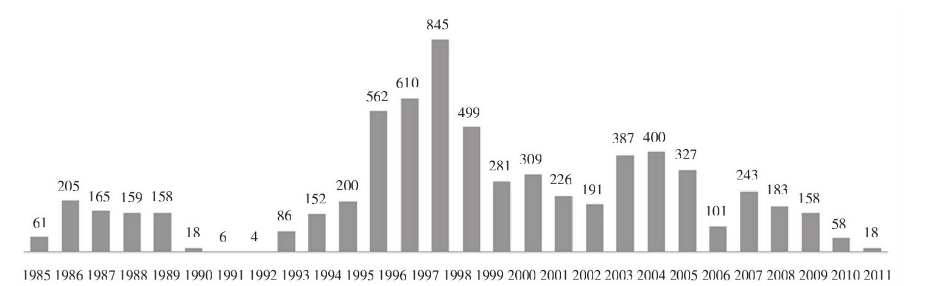


图4-12　联邦政府充公大庄园土地的数目

来源：Miguel Carter教授。

2.农村土地占领运动。

巴西国土面积为8.5公顷，其中3.5亿公顷为耕地。根据联合国2006年农业统计，巴西土地集中的基尼系数高达0.57。全国1%的人口控制46%的国土面积；跨国公司控制1.7亿公顷土地。从卢拉第二任期（2007—2010）开始，政府将农村闲置的大庄园充公的数目减少，以致获土地分配的受惠农户跟随减少。从2010年开始，农民抗争、占领土地、示威的数目开始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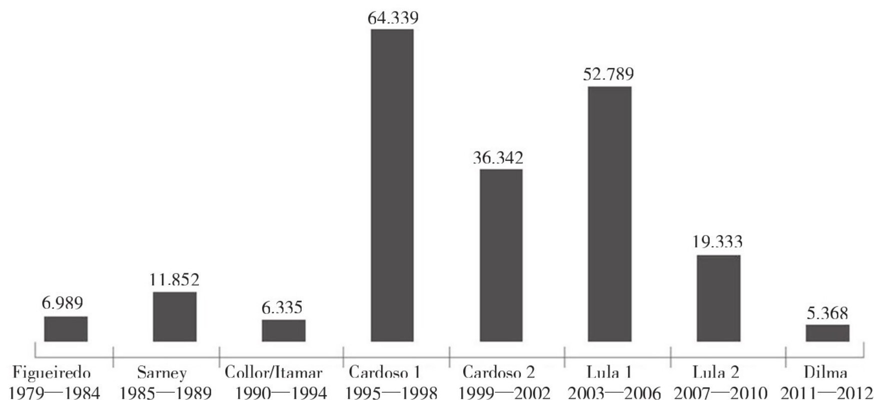


图4-13　总统任期内获土地分配的受惠农户（1979—2012）

来源：Miguel Carter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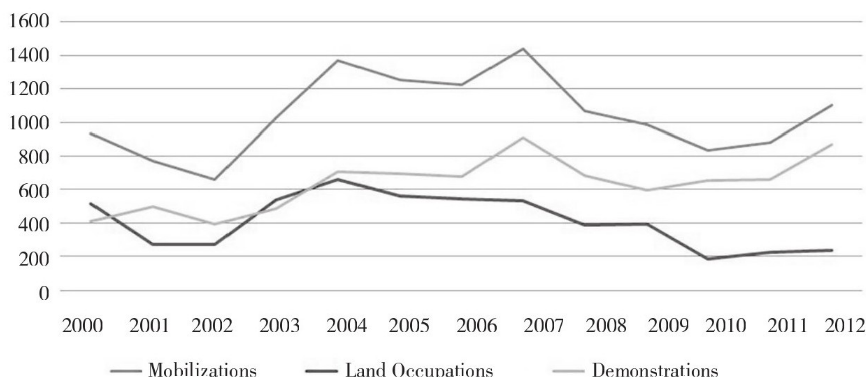


图4-14　农民组织抗争、占领土地、示威的数目（2000—2012）

来源：Miguel Carter教授。

（四）小结

巴西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贫穷问题却严重，究其原因是殖民体制贻害至今。自沦为葡萄牙的殖民地开始，白人殖民者大肆掠夺资源，建立大庄园体制，土著与黑人被劳役，以喂养欧洲资本主义成长。到了20世纪，为了推动工业化，向外举债，导致外资大进大出，本国则负债累累，通胀疯涨，民生凋敝。为了摆脱困境，唯靠出口大量初级商品，经济结构仍属依附欧美市场的制度。

2002年劳工党政府执政以来一方面出台亲民生政策，颇得民心；但

同时延续亲跨国资本的经济体制，土地和资源性财产为跨国资本服务。“后殖民主义”的出口再初级产业化与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现象同时出现。

近两年遭遇原材料价格大跌，引致本币贬值、资本外流、通胀高企、债务累加，社会动荡不安，城市居民上街抗议；另一边，无地农民占领土地数目又上升。劳工党的执政权威受到重大的考验。

第五章　中央风险与地方竞争[132]

国内经济告别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而面临下行压力，使得社会各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不断显化成为一种常态。对此，虽然深化体制改革被普遍认为是应对矛盾的良方，然而这需要首先明确改革的对象到底是什么体制。很多人说，中国过去是计划经济体制，现在则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针对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说法，本文提出了对体制问题的不同看法。

一、中央调控与地方行为的分歧

中央与地方关系往往被认为是理解国家体制的一个基本问题，在一国的经济与政治关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已经将其列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正确处理的关系之一。

如果从国家权力运转的角度去窥探中央与地方关系，可以发现中央调控和地方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国家权力机关，各级人代会投票选举产生本级政府领导及其各部门领导，各级政府服从本级人代会所形成的决议。以经济增长目标的确定为例，各级地方的经济增长目标由本级人代会通过，而由于各级人代会召开的时间顺序是县级人代会最早，其次是地市级人代会，再次是省级人代会，最后是全国人代会，于是，当上下级人代会确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一致的时候，上级人代会客观上无法调整下级人代会的决议，也难以对下级地方政府形成真正合法的约束。现实中，地区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一般都高于全国，而且越往下一级地方政府确定的增长速度就越高。以“十一五”规划制定的GDP年均增长速度为例，全国预期GDP增长率为7.5%；31个省区市平均预期GDP增长率在10%以上，高于全国2.5个百分点；

地级市对GDP增长率的预期大多高于所在省区市1～3个百分点；而县（市）制定的GDP增长率平均高出所在的地级市1个百分点，这就至少达到了12%以上。

这就意味着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一种被社会上称为“政令不出红墙”而学者们却视而不见的矛盾：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几乎没有可能执行中央的宏观调控，或者说，没有一个上级政府制定的指标被认真执行过[133]。正如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房维中对政府计划的经验分析，体制上“中央的宏观调控权和地方的计划自主权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各地区执行的是地区的计划而不是全国的计划，因此全国计划往往被架空；中央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由于与地方利益相冲突难以做到令行禁止”。而且近年来，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冲突和政策博弈已经不断显化，而且愈演愈烈，甚至在保护耕地、调整房市、规范招商引资等一系列事关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上，因地方政府的抵触，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陷入“失灵”的尴尬境地。这种“中央失灵”不仅使得作为单一制国家的中国的中央权威受到损害，而且，因在实施过程中与部门[134]，更主要地和精英结合[135]，而使得中央政策偏离普惠性原则，难以真正服务于弱势群体，最终导致中央的“善意”难以变成“善举”。

二、地方政府公司化竞争与有限责任化

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制度性根源，大部分研究将其归结为中央向地方的历次分权[136]和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评体系，由此也派生出地方政府公司化的行为逻辑。然而，很少有研究将这一体制层面的变化纳入到周期性经济波动中进行考虑，而对地方政府属性变化的研究则更是寥寥。

如果回顾中央向地方分权的实践历程，不难发现，每次分权都与中国遭遇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宏观背景高度相关。第一次分权发生于1958—1960年期间，因苏联援华投资中辍，财政资金陡然下降，财政赤字持续增加[137]，1959年与1960年的赤字规模达到财政收入的10%以上，紧接着造成国民经济大幅回落——GDP在1960年出现下滑，在1961年下滑幅度达到27.3%！[138]第二次分权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正值中国周边地缘政治趋紧，“三线建设”[139]投资需求巨大，直接导致内生性财政赤字，1967年财政赤字规模20.48亿元，加之财政收入大幅下降，导致又一次的经济衰退[140]。从1980年到1993年又经历了三次以

财政体制改革[141]为名的放权让利，其特征都是“分灶吃饭”和“财政包干”。其中，1980年的改革也同样是因工业化建设的投资加大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开支增加而爆发的财政赤字危机：1979年财政赤字135.41亿元，占财政收入的11.8%。而1988年的改革则是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滞胀形态的危机[142]，同期按全口径核算的财政赤字也非常严重，1988年的赤字相当于财政收入的14.8%，1989年这一比例达到25.1%。

从以上的梳理似乎可以得到一个经验性认识：20世纪50—90年代期间，每当遭遇经济危机时，中央政府应对危机的办法是向地方放权以刺激地方发展，从而渡过危机。

然而，这一做法从20世纪90年代——1994年中央政府应对危机而采取的带有集权性质的分税制改革起——被彻底扭转了，个中缘由十分耐人寻味。

一方面，众所周知，支撑政府运转的核心动力是财政收入，从1958年中央第一次向地方分权起，中央财政收入比重从1958年的80.4%骤然降至1959年的24.4%，并在到1994年之前的长时间内，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平均26.2%，最低时仅为11.8%）[143]，直接导致中央财政年年赤字，连维持基本开支都很困难，更遑论调控地方行为。海外有人把中国的这个时期称为中央集权体制，恐怕是缺乏当代经济史资料而笃信了冷战意识形态。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依靠中央政府所赋予的财权和自主权，地方政府发生性质变化，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并采取公司化的运作方式——通过汲取本地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实现“营业额”（GDP）和“利润”（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地方政府领导则扮演着董事长、总经理的角色——在这一过程中，地方与地方之间还面临着横向的竞争，即经济上对稀缺资本的竞争，以及政治上对“晋升锦标”的竞争。举例而言，20世纪80年代，通过各级财政的分级承包和“分灶吃饭”，当时创收能力和出口创汇能力越强的南方沿海的地方政府，发展得就越快，这就促使各地争着上特区、开发区，以分享中央政府下放的外资外贸外汇权力。

诚然，地方政府的这种公司化竞争体制，的确对过去三十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这也带来了一系

列的严重后果：一方面体现为因过度干预经济而导致的诸如产能过剩与宏观经济波动加剧、地方保护和诸侯经济的形成、权力寻租行为滋生等问题；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公司化还体现为因在民生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能缺位而导致的诸如社会冲突难以调和、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不足、资源浪费与环境破坏等问题。

除了上述列举的一系列严重后果，我们认为，中央碍难调控的地方政府公司化竞争体制，更为深刻的影响在于地方政府基本性质的改变：从过去名义上承担无限责任的“人民政府”演化为实质性地承担有限责任，甚至连有限责任都未必承担的强权性“权力公司”。加之，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日益激烈的公司化竞争，地方政府已经呈现出有限责任化的倾向，但却未见相应的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的制度规范。这使得有限责任化的地方政府往往不承担风险，最终风险都上交给中央。要知道，对于一般参与市场竞争的有限责任公司而言，出了风险还是需要承担有限责任的，超过其资产的损失才甩给社会。

于是，地方政府公司化占有经济增长收益，却不承担竞争风险的体制弊病，以及派生的泛滥于官场的以权谋私很快就暴露出来了。这本来应该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深化改革的对象，但当年却以市场经济之名绕开了。

地方政府有限责任化的这种质变，在苏南乡镇企业改制过程中体现得极为明显。

20世纪80年代在乡镇企业创办和运行阶段，苏南地方政府积极为乡镇企业提供体制资源，包括吸引资金、技术和开拓市场渠道等，当然这是以乡镇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并形成预算软约束为前提的。这种合作或交易在当时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本属于地方政府职责的社会性职能的实现，在地方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体现了其无限责任的基本性质。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恶化的条件下，尽管乡镇企业仍然承担刚性的社区福利开支，甚至还要为地方政府的消费开支埋单，地方政府却因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后资金来源多元化而急于从乡镇企业退出，这种“从不经济的领域退出”体现出公司化地方政府对本应承担的无限责任的放弃[144]。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使得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从22%陡然升至55.7%，地方财政收入占比则相应地从78%滑落至

44.3%[145]，并且在之后的财税改革中，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分成基本维持在一半对一半。显然，分税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财权上收。而且，之后的金融系统改革、建设用地指标管控和政府机构改革等举措，都带有中央收权的色彩。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公司化的无序竞争。然而，迄今为止，这些改革并未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地方政府独立的利益主体地位，事实上还是在相对分权的格局内对中央与地方利益分配的调整。换句话说，“条块分割，尾大不掉”的体制弊端仍未改除。而且，在中央与地方的政策博弈过程中，地方政府能以地方治权被上收为由拒不服从中央调控，从而可能导致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更为激烈，并强化地方政府有限责任化的倾向。

三、中央政府承担无限责任：制度优势与现实挑战

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人们就已经发现，公司化地方政府追求GDP高速增长的行为，伴随着发生大量风险。事实上，随着城市经济改革的全面展开，地方政府依靠财政力量发展本地经济的积极性显著提高，使得地方财政在1958年之后首次遭遇赤字问题，1986—1992年的7年时间累积赤字达421.7亿元[146]。而由于中国当年“财政银行不分家”，银行各级机构都是作为同级政府职能部门存在，而且各级银行分支机构的领导还是地方党委任命，银行实际上扮演着财政出纳的职能，“信贷资金的财政化”倾向使得国家专业银行在各地的分支机构经济效益明显下降[147]。同期，在南方谈话促进中央更多放权于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实施背景下，沿海各地争相引入外资，并无视国家计划从国际市场大量进口原材料和生产线，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立足国内原材料和国内市场的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

这些问题大都是在1992年南方谈话之后因地方追求短期高增长[148]而集中爆发，并且最终都上解到中央，遂集中表现为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宣布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际的中央政府实际上却不得不面对财政、金融、外汇“三大赤字”同步爆发的严重危机：一是中央财政赤字超常增加，赤字规模扩大了85.7%[149]；二是因财政向银行透支造成国家金融系统中的不良资产和坏账大量增加，演化成严重的金融赤字，国家金融部门全部自有资本金甚至降到零以下[150]；三是进口的大量增加所造成的贸易逆差，直接导致外汇储备吃紧，甚至在扣除贸易逆差后不足以偿付次年外债的还本付息[151]，导致不得不借新债还旧债[152]，甚至发生国际债务违约，我们称其为“外汇赤字”。

正是这种公司化地方政府完全不承担其追求外向型经济增长所造成的巨大风险，而是全部上解到中央的严峻局面，才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一手增发货币，一手增发政府债券[153]的手段；在采取这两个客观上制造通货膨胀的国家信用扩张手段的同时，推出人民币主动大幅度贬值为实质内容的“外汇并轨、一步到位”和“中央—地方分税制”等被称为“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应对措施。

中央政府于1993—1994年竭力化解连有限责任都不承担的公司化地方政府所上交的最终风险的这个过程，至今仍然被海内外理论界意识形态化地归纳为“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尽管如此，这些改革都实质性地表现出所谓中央政府的“政府理性”[154]之内涵——根本不同于私人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理性——中央政府必须对国家经济安全承担无限责任。

而之所以中国的中央政府的无限责任属性能够成立，有其必要条件：只有在中央政府直接掌控国债发行和国家金融权力并且坚持不对外开放资本市场的条件下，才能采用国家主权直接派生的“政府信用”扩张——包括赤字财政和制造通胀[155]等手段——来承担当期政府对国家安全的无限责任。

可见，凭借国家政治强权维护核心经济主权所派生的财政和金融这两个方面的国家信用扩张，才是中国特色的化“危”为“机”的制度基础。或者说，这是中国无限责任政府能够特立独行于西方有限责任政府体制的内因……

如果回顾中国近代史就不难理解，因中共政权形成于百余年的民族民主革命之中，并且是通过广泛动员各阶层人民参战打出来的，其中央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对国家安全和全民福利承诺了无限责任的全能型政府，也因此获得法理意义上政权的合法性。

在改革前的30年间，这种通过革命建立的上层建筑，所能够依赖的经济基础恰是全民所有制的无限责任公司[156]。这个体现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结构，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一般政治经济学原理，也恰恰造成了与西方在政治经济基本体制上的根本性不同，而且也是中国与尚未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质性不同。

简言之，西方的基本体制实乃“承担有限责任的公司作为经济基础，及相应地建于其上的承担有限责任的政府作为上层建筑”，这种体制直接

决定了西方“财无付钱可不为”的所谓“现代政府”的政府理性及其派生的作为政治常态的“政府失灵”。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关于美国的一系列报道都体现了这个特点：加州政府遭遇破产危机，雇员停薪休假；美国联邦政府非关键部门停摆；底特律因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导致警力大幅削减，暴力犯罪活动猖獗[157]……

其实，追根溯源，美国实际上是一个欧洲殖民者占领殖民地大陆而形成的占领者国家，其原始积累是通过16—17世纪长期强制性剥夺原住民财产权利甚至生存权利并使用奴隶劳动来完成的。因此，美国作为白人殖民者利益集团所控制的政治国家，从本源上就不可能对其全民承担无限责任，相反，在体现着“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国家政体长期运作过程中所彰显的是高度排他性。例如：1920年才承认妇女的政治权利[158]；1965年才在法律层面废除种族歧视和隔离制度[159]；2012年才对130年前的《排华法案》做出正式检讨[160]。

同理，很多通过解殖斗争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其国界线划分方法往往是沿用西方殖民者粗暴分割族群所采用的经纬线法，导致无法构建拥有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民族国家”，从而难以形成对全民承担无限负责的政府体系，而只能路径依赖[161]地照搬原殖民地时期高成本的上层建筑，也就不可能形成有效的、本土化的社会治理经验。这是所谓第三世界的解殖运动既难以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可能照搬毛泽东思想来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内因！

反观中国，数千年的国家政治史中唯有励精图治而鲜见政府停摆的记载。即使当代中国多次遭遇财政赤字危机，人们也不会听到中国哪个政府停止运转或宣布破产，原因就在于上层建筑的无限责任属性。即使地方政府在改革以后存在有限责任化的倾向，但在某些方面仍然保留着无限责任的传统和印记。比如，20世纪90年代出现严重财政赤字的时候，很多不发达地区的公务员、教师、医生，甚至连离退休的老同志都发不出工资，但政府机关仍然能够做到“5＋2”[162]“白＋黑”[163]地上班；事业单位的教师、医生照常工作，甚至连拿补贴的民办教师都坚持上课。这种无限责任的政治体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就体现为同期很多全民所有制企业即使发不出工资，甚至连基本生活费都发不全，但是企业职工照样每天来点名报到，哪怕是工厂对外关门，职工也会在车间里集中学习。

中国上层建筑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无限责任属性，还体现为20世纪90

年代末以来中央政府大规模下达专项资金用于“三大差别”[164]再平衡战略，棚户区和老工业区改造，农民粮食、社保、医疗的补贴等诸多普惠全民的政策安排。这也是中国的下层社会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大大高于中产阶级的解释之一。

中央政府承担无限责任的体制，恰是维持国家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优势。然而，这种体制在现实中遭遇到重大挑战。一方面，构建无限责任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应该是全民所有制的无限责任企业，具体形态主要表现为国有企业[165]。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的产权性质，决定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收益理应全民共享，而由于实践中全体人民不可能直接参与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因此由全国人民代表组成的全国人大委托给中央政府全权负责管理，中央政府则作为总代理人负责将国有企业利润向全民（包括国有企业）分配。照此逻辑，国有企业的利润理应全部或至少大部分上缴中央。

然而，从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历史演变来看，如果说1978年以前还能够明显体现出价值理性、保持国有企业全民所有的基本性质[166]，那么此后则主要体现了工具理性。在1978—1993年的改革初期阶段，出于赤字压力而搞活国有企业、激发其创收能力的需要，对企业利润分配的三次调整，都无一例外地以“市场化改革”为名而行“去全民所有制”之实：1980年国务院下发的《国营工业企业利润留成试行办法》将国有企业利润留成比例一步上调为40%，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两步“利改税”制度最终确定将企业税后利润全部留存，80年代后期的企业利税的承包责任制规定“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歉收不补”的基本原则。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逐步确立了以“税利分流”[167]的原则来理顺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关系的改革思路，这固然对重塑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制度发挥了积极意义，算是对之前改革的一种纠偏和调整，但对国有企业回归于全民所有制而言仍不彻底，国有企业的大部分利润还是留归企业内部分配和使用，实际上是将全民所有的国有资产收益让渡给了企业或部门，这构成了当前中央政府无限责任体制的最大挑战。

事实上，现行的国有资本收益的收取对象仅为中央管理的一级企业，而其中仅中央企业拥有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的国有独资企业才上缴利润，并且除军工企业和转制科研院所企业外，上缴利润比例仅为5%～10%，远远低于国外国企35%的利润上缴。这种制度安排，使得业已形成的企业或部门利益分化格局更为固化，这从薪酬水平就可见一斑。根

据《中国薪酬发展报告（2011年）》对2032家上市公司进行的职工薪酬水平研究结果，2010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职工等平均薪酬8.55万元，高管等人均收入52.92万元，分别是当年全国人均收入的4倍和25倍。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并且提出两个“有利于”[168]和三个“允许”[169]，被社会舆论普遍理解为是当前深化国企改革以混合所有制为基本方向的依据。若舆论属实，则因天然具有排他性和经济效率导向性的非公有资本的客观存在，如何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发挥国有资本的全民所有的基本性质成为又一法理难题。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中央应对风险承担无限责任的最直接措施是政府信用扩张，增加发行国债和货币，这就对冲了滚滚涌入的外国纸信用和国内财富群体积聚起来的纸信用，从而引发海内外财富群体的严重不满。问题在于一大批代表这一群体利益的财经官僚和学者，恰好是承担国家体制改革顶层设计的主体，或有意或无意地遗忘了传统中国几千年国家政治史中适用于本土的低成本治理经验，而选择以西方有限责任的政治体制为深化改革目标。须知，如果真要按照西方制度取向深化政治改革，其向有限责任政府转化的制度成本将会是倍加的、爆发性的，并且可能酿成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发生的而被西方称为“颜色革命”的社会动乱；更何况，大多数当代西方政体的维持依赖于（也服务于）金融资本尤其是美元信用的强势扩张，而二者又都依赖于美国的军事霸权——即使金融海啸之后削减军费预算，美国的军费开支也只是从占全球约二分之一下降到超过全球的三分之一[170]——作为美国非军事盟友的中国，在激进地照搬西方政体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本国金融信用的内生性扩张，与美元霸权发生正面较量，这在现阶段正在成为中美矛盾深化的主要原因。

四、经济分层条件下中央—地方利益失衡格局长期化

如果以工业化的一般经验过程划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阶段，那么，1980年以前主要是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阶段；1980年之后是工业化所形成的产业资本结构调整与扩张阶段；世纪之交中国进入产业

资本过剩阶段。

正如前文的分析，在进入工业化第二个阶段后，地方政府在实体经济层面公司化竞争开始显化，因有限责任化倾向遂将风险上推给中央，承担最终风险的中央政府不得不依靠增发货币和国债的方式应对危机。而随着地方政府风险的累积，中央只能路径依赖地在20世纪90年代以一系列财税和金融改革来不断强化自身的财政、金融权力，再加上外汇管制以应对外债偿付，终于在新世纪之初进入以经营垄断性金融收益为主的阶段。恰在同期，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中央政府所掌控的金融部门——作为中国抵御输入性风险[171]和参与全球竞争的工具——得到了持续的扩张。

中央政府对货币、国债和外汇等金融经济领域的垄断过程，而将除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行业之外的大量实体经济交给公司化的地方政府经营管理，客观上加剧了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竞争。同时，中央垄断控制的金融部门在利益导向的市场化改革中越来越异化于作为地方收益来源的产业经济，使得本来可以凭借制度性信用支持以实现结构性提升和调整的地方产业经济，因资本短缺而陷入日趋激烈的低水平竞争，导致中国在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的短短20年之后便遭遇产能过剩危机。并且，也同样因地方产业经济缺乏国内资本支持，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向演化成：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因外资的低利率而更主动地“亲外资”，客观构成对国内金融资本的竞争、短期风险更多上交中央；而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则只能以资源环境为代价才能承接沿海发达地区的落后产业转移，长期风险也上交中央。[172]

简单归纳可以看出，伴随着三十余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经济基础层面陷入了一个地方产业竞争与中央金融垄断相互强化的循环之中：地方政府主导产业资本竞争，导致中央政府强化金融权力垄断，这又进一步加剧地方产业资本竞争……在这一循环往复中，中国经济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了日益固化的层次划分：地方政府的经济基础仍然是产业资本主导的实体经济，而中央政府的经济基础则演变成金融资本主导的金融经济。

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经济分层也就从侧面印证了如前文分析的地方政府承担有限责任、中央政府承担无限责任的结论：产业资本作为生产要素追求的是生产性投资报酬最大化，这就决定了产业资本在组织其他要素投入生产的过程中，尤其在资本稀缺的条件下，因其掌

握要素的定价权而势必最大限度地压低其他要素价格而抬高资本要素价格，这一过程本身就内含对劳动者、土地所有者乃至生态环境的不负责任，因此，处于产业资本阶段的地方政府只承担有限责任也就不难理解了！而对处于金融资本阶段的中央政府而言，尽管金融资本追求投资报酬的资本属性没变，但一国金融资本的扩张或金融信用的增加——尤其在全球化竞争条件下——依赖的是国家经济主权和政治强权，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央政府承担无限责任与金融资本所内含的强化国家主义要求本来是相适应的，但却被西化意识形态左右的财经界所诟病。

在经济分层条件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遵循着不同的“政府理性”和相应的行为逻辑，两者之间的利益结构格局失衡也就势所必然。并且，因经济分层日益固化，而中央的调控在经济正常运行条件下难以贯彻，中央—地方利益失衡格局可能将维持很长一段时间。

事实上，经验表明，在经济正常运行状况下，有限责任的公司化地方政府永远是追求高增长的，中央的宏观调控也就不可能被地方政府自觉落实；而只有在风险累积直至危机爆发的时候，因各种利益集团都利益受损，中央的宏观调控才有条件地被地方政府接受。

不妨还是以波澜起伏的20世纪90年代为例：1992年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际，地方大办开发区招商引资，宏观经济直接跨过复苏阶段而迅速高涨，接着就因经济过热而导致1993年“三大赤字”同步爆发。其实在这之前，中央已经意识到宏观形势的严峻性，并采取或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调控措施[173]，但在与地方的拉锯式谈判中，就眼见着财政、金融、外汇等三个领域的问题集中爆发，遂有了之后俗称“铁腕调控”的改革。之所以如此说，无外乎是因为经济过热造成危机即将爆发的压力下，中央领导人做了调控决策，但仍然很难被地方执行。直到1997年下半年突如其来的东亚金融风暴造成出口增速与GDP增速双双下滑[174]，连带银行坏账等各种国内问题彻底暴露出来，地方才不得不信“狼来了”，中央才在1998年真正有机会整顿金融秩序，全面开启国有金融市场化改革。但时过境迁，在亡羊补牢之前已经造成的损失十分惨重。

五、缓解中央—地方利益矛盾的出路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矛盾，是中国当代追求现代化过程中内生的问题，当前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由于条块分

割、尾大不掉的历史积弊，至今都很难在表述上理顺，也就更难化解。

可以说，中央—地方矛盾已然成为“历史遗留问题”，剪不断理还乱。因此，所谓的深化改革，如果无法做到根除这一核心体制弊病，倒不如以“缓解”的思路做一些制度创新。

首先，在中央层面，中央政府承担无限责任作为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其经济基础理应得到夯实。因此，需要强化国有资本，并且明确收益向全民分配的改革方针。中国在21世纪之初融入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竞争，这一竞争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盖因任何国家的金融资本所内含的政府信用，都是以该国的经济主权、政治强权乃至军事实力为后盾，因此，为了能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幸免于难，中国不得不做大做强国有资本，用以保障全民财产安全，这也是中央政府“安全理性”之体现。与此同时，国有资本的经营收益还应向全民分配，具体的操作方案如成立公共信托基金、以中国公民资格入股平均分红等，其实，只要能够体现公平性和普惠性的具体方案都可试点。这样才更能体现全民所有制的经济基础属性，亦可巩固和加强中央政府承担无限责任的职能。

其次，在地方层面，公司化的地方政府作为风险的主要制造者，可以说是中央—地方矛盾中的主要方面，如何降低风险、在地化化解风险、分担风险责任就成为改造地方政府行为的基本思路。

一是以生态文明理念和三产化思路开发利用本地资源，降低地方政府竞争风险。

地方政府之所以竞争激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各自控制的实体经济层次较低、同质性严重。而事实上，对于纵深广阔的中国而言，各地方在自然景观、民俗风情和传统文化上千差万别，恰恰符合生态文明所内含的多样性，因此，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即使地方政府仍然公司化竞争，那也至少是差异化竞争。而且，考虑到现阶段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绿色、生态、差异化的消费特征，在开发利用本地资源时应以题材和创意为手段走三产化发展道路，这样有助于缓解因长期二产化发展而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

二是鼓励多方主体共同参与政府治理，在地化化解风险。如前文所述，地方政府公司化竞争会因在民生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能缺位而带来

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可以构建由包括政府、企业、基层群众组织、知识界、媒体界等不同身份的人员共同参与的多层架构、网状连接的组织平台，以网络化结构内部化处理其中的一些社会问题，发挥政府单一科层治理体系所不具备的优势，从而实现在地化化解风险而不必将风险集中于中央。

三是对直接关乎国家安全的地区[175]财政支持从专项转移支付为主改为一般转移支付为主，促使地方政府分担风险责任。目前，中央政府对直接关乎国家安全的地区的财政支持，很多是依靠专项资金项目来进行专项转移支付。但由于部门利益和“精英俘获”问题的存在，中央政府保障国家安全的“善意”难以公平传递成为“善举”。因此，对这些地区财政支持从专项转移支付为主改为一般转移支付为主，使这类地区基层政府的人均公共开支至少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中央才有可能与之谈判事权，将保障国家安全的责任合理地与地方政府分担，从而改善“有组织地不负责任”[176]的现状。

再次，在国际层面，以国有金融为主的金融资本与以地方企业为主的产业资本联合“走出去”，能够实现“双赢”，有助于缓和中央—地方矛盾。一方面，随着国内要素价格的攀升，国内制造业企业有向海外寻求要素低谷的需要。国有金融能够为此提供资金和信用支撑，不仅可促进产能出口，化解国内产能过剩问题；还能够促使企业将流回国内的利润投入到产品和技术创新上，从而有助于地方产业的层次提升：这两方面共同作用，对缓解地方竞争压力、降低风险大有裨益。另一方面，通过30余年的贸易积累，中央掌控的外汇储备已从1980年年底的负值飙升至2014年年底的3.84万亿美元[177]，给外汇经营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也使当前国内承受着巨大的通胀压力。产业资本“走出去”所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生产性项目建设，给外汇储备投资提供了标的，能够有效降低中央所承担的通胀风险；而且，客观上也为国有金融的全球扩张和布局提供了支点。

第二篇　乡土：国家稳定的基石

第六章　莫让私有化摧毁乡土社会[178]

关于土地私有化的问题，目前经济理论界呼声比较高。显然，这个提法的依据是西方经济学的逻辑，本身有其符合经济理性的一面，因为私有产权确实最能够平滑地在市场上交易；所以私有化是市场化的前提。随之而来的，市场化会形成由“看不见的手”来促进土地的规模化，这就可能形成农业的规模效益，进而促使农业产生更高的收益，也就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经济的竞争力。

需要注意的是，不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是否合理，那些盲目照搬西方经济制度，践行“私有化＋市场化”教条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深陷于“发展陷阱”无法自拔，目前尚找不到能够单纯依靠土地规模经济推进农业现代化，来成功解决本土贫困加剧和粮食危机问题的成功范例。

一、东亚土改的成功经验

我们只要把整个亚洲大陆作为原住民人口大陆观察就会发现，亚洲各国到现在为止无论自称实行何种制度基本上还是小农经济，土地规模化的程度都非常低，以美国那种大农场模式运作的亚洲国家只有千岛之国菲律宾，那还是殖民地时代的遗留产物，并且由于本地原住民的土地权力不被外来殖民者承认，因此即便在全国形成了二三十个大的家族性农场，土地所有权也并不为本国原住民所有。

我们最近在做联合国支持的一个项目，专门研究为什么多数发展中国家始终走不出发展陷阱。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拉丁美洲的农业资源非常丰富，但主要是由跨国公司控制的，不会给当地贫民提供粮食的安全保障，更多的是考虑在国际食物市场营利，因此尽管大宗作物是在拉美当地种植，但收益却在华尔街。

例如，厄瓜多尔是世界著名的香蕉之国，但香蕉贸易、物流和结算都不在国内，农产品作为原材料都被跨国公司拿走了，也就没有当地加工业的发展条件，国内食品价格就高于国际市场；相关的另外一个后果

是，跨国资本的收益在国外，厄瓜多尔老百姓几乎没有条件形成有规模的存款，当然也就没有金融投资能力；最终是国家金融破产，全国改用美元作为流通货币。那也就没有政府做宏观调控的基本条件了。可见，如果资源主权不在本国手里，根本谈不上在地化发展，这就是拉美的发展陷阱。

土地私有化不可能是一个解决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思路。

实际上，整个世界范围内，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土地改革是最为成功的。

东亚社会无论何种意识形态、何种政治体制，在土地改革问题上都做了一件类似的事，就是给农村家庭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这成为战后东亚社会能够相对稳定发展工业化的最基本的前提。二战之后，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成功实现了以小农村社为制度基础的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除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因冷战地缘政治而得到美国的扶持之外，东亚在制度上都没有简单化地照搬“私有化＋市场化”的西方教条，所谓“日韩台模式”，主要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综合性合作社体系，这样才能以合作社在所有涉农领域的其他收益来弥补弱势小农在农业生产领域的收益不足。

以日本为例，土地改革与建立综合性的合作社几乎同步，包括金融保险、房地产在内的农村经济领域所有的资本化利益都集中在这个垄断性的合作社里面，政府的优惠条件也全部给到合作社而不给私人企业。同时，政府还严禁任何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进入农村社会经济领域。所有在农村领域产生的经济收益都通过综合性的农民合作社高比例地返还给农民。这样就稳住了农村，也稳住了农民。

在日本，城市经济基本上被六大财阀垄断，农村经济则主要由综合性农业合作社全面控制，无论是金融保险还是房地产、旅游、饭店、超市、批发等所有一切，都在综合性合作社体制内严格控制收益和分配，任何外部资本无论怎么抗议都没有用。虽然2001年官方开放自然人、2011年允许企业法人进入农业，但到现在为止，日本企业能够下乡介入竞争的仍然非常少，也几乎没有敢于挑战垄断性综合农协的企业家。

二、不能轻易改变目前的土地制度

我国农村目前的土地制度，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总体上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因此尽管“三农”问题饱受诟病，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是比较轻的。我认为，倘若目前没有条件在农业外部的宏观环境上作出重大政策调整，就应该继续坚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不要轻易改变。

我们目前的土地制度实际上可以称作“农民兼业经济的无风险制度”。为什么说是无风险呢？因为土地并非通过市场交易而是通过分配得来的。得到土地的农民之所以不愿意拿到市场上交易，是因为这块土地是“一家两制”经济的基础，也就是说，保留这片地至少可以让一家人吃上饭，家庭成员可以留在农村也可以出去打工，都是有风险趋零而使收益最大化的选择。所以我们会看到现实当中，即便是已经在城市当了老板的人，只要听说村子里重新分地，也要坐飞机回来。谁也不愿意扔掉家乡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这可以被媒体说成是中国农民的土地情结，但也是乡土社会风险内部化机制特殊的运作特点。

现在我们很多地方政府都在想方设法打碎原有的土地格局，利用撤村并镇，试图把原来村社内部对财产和收益分配制度有约束作用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关系打碎，打破农村的“熟人社会”格局，似乎这样才能降低地方政府征用土地的成本。据观察，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政策一直鼓励土地流转，但实际上农民使用权的自发流转每日每时都在大量发生，而真正自愿进行所有权放弃的彻底流转现象，却几乎没有发生。恰恰是农村目前的土地制度，让农民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有权无偿获取一份土地财产，并以此作为无风险资产来追求其他高风险收益，才可以使其风险收益最大化。

中国现在有两亿六千多万农民工。十年前的一次会议上，我遇到了曾经请温家宝帮助讨薪的农民工熊德明，我当时问她，如果工资最终也拿不到怎么办？她的回答很有意思，说“拿不到就回家了，多养几头猪嘛”。这也表明，农民是靠兼业化小农家庭经济的内部性来化解外部风险的。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有两个经验非常难得和宝贵。第一是中国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时期始终没有伴随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化趋势，在全球发展中人口大国仅此一例；第二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按户占有产权的农村土地制度，在给农民提供维持生存的基本保障的同时，也在客观上成为中国历次经济危机“软着陆”的基础。而这两项经验获取的前提是，保障农民既可以自由地进城务工经商，也能够自由地返乡务农谋

生。实际上，对大部分农民而言，也只有这样“进退自由”，才能够维持一个相对不错的收入。

一旦允许政府服务于资本下乡而形成制度性土地私有化和市场自由买卖，短期当然会有“资源资本化”的制度收益，然而其带来的制度成本则势必由全社会承担：一方面，在地方权力与资本结盟的强势介入下，经营农业本来就无利可图的小农会大批失去土地，尽管表面是自愿交易，实质还是被强势利益集团所胁迫；另一方面，丧失了在农村生存的根基之后，大多数农民无法在城市立足，很可能造成贫民窟化与农村社会冲突的同步加剧，大规模社会动荡将不可避免，而且激烈程度将远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严重。

当激进发展主义者们把乡土社会毁掉的时候，中国将不会再有危机“软着陆”的基础条件。

既然发展中国家大多数都有“三农”问题，也没有见到采用短期、激进手段解决“三农”问题的先例，那么要缓解中国的“三农”问题，最好也能立足现行基本制度，走长期的、改良的、新农村建设的道路。

农村社会太过复杂，农民群体也过于庞大，涉及这个领域的一举一动都应该谨慎。

第七章　中国地方政府的三次“圈地运动”[179]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地方政府对农用地的征占仍在继续。

2012年岁末，土地市场变得格外热闹。当年11月27日，京沪两地同现地王，28日，深圳新总价地王诞生，30日，全国总价地王在南京横空出世。同时，13个重点城市11月推地环比暴增219%。一时间，土地问题以及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又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那么中国到底已经经历过多少次“圈地运动”？未来还要经历几次“圈地运动”？笔者于2013年1月1日出版的《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中剖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对农用地的三次“圈地运动”。

诚然，第一轮“圈地运动”中农村耕地主要被乡镇企业乱占滥用，干

扰了国家建设的总体思路。1986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中明确指出：乡镇企业和农村建房乱占耕地、滥用土地的现象极为突出，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将会给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严重恶果，贻害子孙后代。但同时需要注意的另一方面是，这种农村土地内部化“农转非”的增值收益主要归乡村集体，政府几乎不能分享，却必须承担“粮食安全”责任。于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央开始要求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逐步将耕地转为工商业用地的权力收归国家所有。1986年又以出台《土地管理法》的形式将国家对土地农转非的权力加以确定，并在1988年设立国家土地管理局，由其行使对土地非农用途的全权。

然而，就在农村集体对土地的非农使用权力被上收到公司主义的政府手中的同时，土地的商品属性也逐渐确立。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正式开启了我国的土地有偿使用制度。1990年5月19日，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对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出租、抵押等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使土地实际上已经具有商品的属性。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土地资源资本化的性质和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基层农村自主发展乡村企业的生产性的“以地兴企”，到90年代地方政府满足刚性开支的消费性的“以地生财”，土地变现遂成为地方政府最快捷的生财门路。

第二轮由地方政府发起的“圈地运动”，因主导力量发生改变而与第一轮大不相同，并且持续时间更长。这与上一次在20世纪80年代大规模征地催生宏观经济高速增长有些许类似，但资本化的具体机制和途径却远不相同——80年代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而占有土地，还需要与企业的其他实物资产相结合，作为工商产业中的一种物化“资产”，并通过产业经营实现土地的增值收益。而到90年代初，土地本身就成了被经营的对象，通过单纯的土地开发或者流转，就可以获得远高于80年代“以地兴企”阶段的增值收益。比如，苏州市斜塘镇因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就呈现出明显的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土地财政特征。

这还意味着：政府公司主义的内在利益结构发生变化——异化于在地产业资本，各地政府越来越少地依赖本土产业资本的增值分享，越来越多地青睐没有社区负担的外资。由于土地资本化的机制及主导土地资本化的主体均发生了改变，“农地转非”的增值收益分配也相应发生了改

变。中国在资本短缺条件下的招商引资，与国际产业资本过剩条件下追求向要素价格低谷转移而出现的资本供给，恰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投资拉动型增长道路的形成与1993—1994年财政危机中中央政府上收财政权力有关，也与1997—1998年危机中中央政府上收金融权力有关。

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及1998年金融系统全面改革以后，地方政府的财政金融权力都被极大地削弱，加之劳动力自由流动（即使不流动，也不再具有成规模劳动替代资本服务于产业升级的主、客观条件）。此时，地方政府唯剩有土地资源可以用国家之名来支配。当新一轮宏观环境利好来临时，地方政府便以土地的资本化助推所辖地域内的招商引资、外向型经济高速发展。即使没有招商引资也要靠滥占土地、大兴土木建设地方政府的楼堂馆所来创造银行资本进入当地的政绩。

只是，这些非生产性投资都造成地方政府不承担风险和责任的大规模负债！鉴于中央也不能承担这种地方累积的债务，遂使货币大规模不断增发成为唯一手段。

地方政府的具体操作过程是：由于制度规定和与小农之间交易成本的限制，土地使用方乃至开发商并不直接和土地的实际使用者小农打交道。一方面，地方政府利用其垄断性权力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征收土地，然后再通过土地储备中心、各种城投公司及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等融资主体，以土地作抵押套取银行贷款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到2006年，在东南沿海的县市，高达数百亿元的基础设施投资中，约60%靠土地融资；而在西部，银行贷款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份额更高达70%～80%。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加快推动城市扩张，以增加各种地方税种规模及土地出让收益。到2002年地方营业税比重迅速上升，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一大税种。2006年时营业税在地方税收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43.3%，而营业税主要是对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征收的税种，这就使得加快城市扩张以扩大建筑业、房地产业营业税的规模成为地方增收的当务之急。世界银行的研究指出：在增加财政收入动机的驱动下，地方政府2002年以后对于土地开发、基础设施投资和扩大地方建设规模的热情空前高涨。

我们在同期发表的研究报告中，称之为地方政府与银行之间的“以地

套现”，认为这符合金融资本异化于一般产业之后与地产结合的需求，客观地推动了城市扩张。首先带动的就是房地产业的暴利，使其“成为政府偿还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巨额贷款和实现土地出让收入的通道”，成为过剩资本争先恐后涌入的领域。继而，在基本建设和房地产业的带动下，相关的产业投资也如火如荼，蒸蒸日上。自2002年以来投资在新增需求中始终占60%的份额。

这样，以地方政府“以地套现”的第三轮圈地运动为肇端，便逐渐形成了新世纪以来基于“高圈地”的“高负债＋高投资＝高增长”的发展模式。加之，中央层面的过剩金融资本在投机市场上的积极推动，便带来了新世纪中国经济的迅速高涨。

第八章　百年乡建一波三折[180]

温铁军先生在2001年《读书》第3期的《百年中国一波四折》这一研究提纲中，通过以百年中国历史上四次工业化的内在动力与联系效果为主线，从“收益—成本”角度指出其对“小农”及中国发展道路的深远影响，努力摆脱意识形态化下“左—右”二分逻辑的可能限定，为重新理解近现代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框架。

如果继续这样的整体性视野，并以“三农”为基本立场与分析角度，通过回到具体历史脉络并对国情限制保持充分自觉，是否可能将百年历史上不同阶段的乡村建设实践及宏观历史背景融合起来并建立起内在逻辑相关？如何打破历史与当代实践在时空与叙述上的割裂，通过“跳出乡建看乡建”，重新理解百年近现代历史间隙中那些形式不同但实质呼应，某种意义上“没有乡建派的乡村建设”？

中国作为以农业为传统文明类型及以农民为主的超大规模原住民人口国家，近代以来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中心的整体性变革，既产生出再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百年轮回”经验过程，又派生了由“三农”承载代价的实际后果，同时也孕育着“乡村建设”这一延续百余年的社会大众改良实践。但正如梁漱溟先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所强调：“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其自然不限于技术层面的革新或单一问题的回应，也不只是一村一镇的个案实践与微观做法，而是对数千年中华文明之社会参与的历史传承与创新发扬。

如果说鸦片战争后洋务派所推动的“自强运动”，体现着被压迫民族

的自尊与憧憬，同时也作为封建统治者及上层精英们的“自救”，那么随着甲午以来“体用说”及其指导下洋务实践的破产，则产生着更为整体性的“西化/现代化”动力——全面激进变革在屈辱与受挫中逐渐成为时代强音。虽然主张各异，却共存着“都市本位、工业优先、从三农提取剩余、巨大成本向乡土转嫁”等特点，上层和精英的“自强”不期然地导致下层和乡土的“自毁”。正如梁漱溟先生所指：“外力之破坏乡村尚属有限，我们感受外面刺激而起反应，自动地破坏乡村，殆十倍之不止……一部中国近百年史，从头到尾就是一部乡村破坏史。”

其具体表现为：乡村经济中的“生产力三要素”多形式外流、乡土社会低成本稳态治理秩序随之解体、“乡/土”成之为问题与必须克服的目标对象；外加资本主义全球化与制度代价向发展中国家弱势群体和资源环境递次转嫁这一宏观国际背景，共同产生着“乡土社会整体性衰败”的普遍效果。从而促使乡村“自毁”之社会基础的进一步形成，遂使得乡村建设内在于因中西碰撞而剧烈变动之近现代进程。

1904年，河北定县翟城村乡绅米春明被聘为定县劝学所学董，开始以翟城村为示范，实施一系列改造地方的举措。米春明和他的儿子米迪刚等人一起，积极兴办新式教育、制定村规民约、成立自治组织和发展乡村经济。正是这些本地乡绅自发创造的“翟城试验”，直接孕育了随后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由晏阳初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所主持的“定县试验”。如果说这个起于传统良绅结合“海归”子弟的地方自治与乡村“自救”实践是在村一级开始萌芽的，那么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先生在其家乡南通则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县一级探索，正是这些20世纪初叶不同范围内自发的建设性实践，构成了百年乡村建设的萌芽与先声。同时也让我们看到：近现代乡村社会“劣绅化”进程中，“良绅”以建设性实践进行反抗与博弈的事实存在，而其所遭遇的困境张力及随后的整体式微也反证着传统乡土社会结构的进一步改变。

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除乡土社会稳态基础进一步被破坏，还伴随着“五四”之后“多元救国论”的兴起与落地。“一战”爆发所出现西化思潮反思的现实基础，“到民间去”“实验主义”等则纷纷成为时代趋势与社会氛围。

在此脉络背景下，一批名家使乡村建设进入公众视野。其中既包括常被作为乡村建设代表人物而提及的平民教育教育家晏阳初先生、“生活教育”的创立和践行者陶行知先生以及同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西方

现代性进行反思与另类探寻的“最后儒家”梁漱溟先生，还包括近年来日益被重视的更多乡村建设实践者，比如：通过地方割据条件下的“和平红利”以完成建设，同时创造出中国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社会企业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开拓者卢作孚先生；在战乱频仍、土匪乱世与地方割据环境下推行农民组织化的早期乡村建设领导人、河南村治学院与宛西自治开创者彭禹廷先生；于1925年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主张与一切教育界、职业界联络，由此进一步面向社会并推进农村改进的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开创者黄炎培先生；1920年毁家兴学，1928年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院长的民众教育家高践四先生；辛亥革命先驱、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旨在分期实现“三民主义”，以革除差役整顿警政、设立民团肃清土劣、清理丁粮改革赋税、破除迷信倡导文明等系列建设实践的福建营前模范村（1928—1933）创办人黄展云先生。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1927年6月所起草的《全国农协对于农运之新规划》第四节中还专门提出“开始乡村建设事业”。[181]

此外，教育家黄质夫、王拱璧、周方分别在贵州、河南、湖南等地开展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实践；除农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知识分子外，诸如作家孙伏园、戏剧家熊佛西、医学家陈志潜、美学家张竞生等专业人士及来自乡村底层的民间思想家王凤仪（1864—1937）等人都以不同形式参与着广义的乡村建设。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调查，当时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试验区达1000多处，实际呈现着“群体性”与“多样化”的特点。虽然出发点、学科、经历、政治立场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但他们都以“救民”为目标而扎根大地，尽管负重潜行却润物无声且生生不息。

而当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西方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转嫁和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导致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的外部环境发生着剧烈变化，而内部环境则随着白银危机的爆发和保甲制的强制推行而导致乡村社会中劣绅当道、兵匪横行，农民负担进一步加重、维持乡村良性治理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基础同时受到摧毁性破坏。此时的乡村，剩下更多的只是“干柴烈火”，社会改良空间进一步萎缩。

然而，广义的乡村建设却从未停止或消失，只是在不同阶段以不同形式曲折展开。此时的乡村建设，在目标、内容、方式和重点上发生着一定变化。一方面，面对救亡压力，多数乡建实践从“救民”向“救国”转型，并以宣传动员、政治调停、人才培养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抗战

救国。另一方面，抗战大后方的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学者们，开始探索“国统区”的减租减息和合作社建设[182]，中国共产党则在延安和各解放区更为成功地开展包括合作社、经济建设、农业改良、民众文艺、乡村调解等内容的乡村建设[183]。在回归乡土脉络的过程中，乡村革命与乡村建设实际上相互融合与彼此影响。

相对于民国时期第一波乡村建设来说，1949年土地革命对底层社会全面动员，并以此为基础对乡村社会进行全面整体的组织化改造。这虽然让“乡建派”知识分子们的乡村建设行为萎缩，却由于新国家社会广泛参与基础的形成，而使得乡村建设的理念和工作在国家建设背景下，以新的形式被高效、全面地替代与覆盖。比如：全民扫盲、技术推广、赤脚医生、乡村民兵，社队企业、大众文艺、水利建设、互助合作，以及对农民主体地位、妇女解放、尊严劳动等的强调。

到了集体化阶段，由于随之伴生的国家力量全面进入“三农”以获取剩余投入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虽然乡村工作再度因城市工业化的优先需求而与乡建初衷背离，即便如此，乡村建设也无声地存在于因千差万别而难以充分集权的广大乡土社会，草根民众为稳定乡村、维护传统仍然做出了艰辛努力。

进入20世纪80年代，由于产业资本扩张与全球化进程加快，仅靠推行“大包干”并不能根本解决“三农”发展与基层治理问题。于是在追求工业化和摸着西方石头过现代化大河的过程中，中央政府于1987—1997年自上而下推动了“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的建设[184]。从内容上看，其与20世纪50年代土地入股的初级社和20世纪60年代恢复小队核算的“三自一包”等两次“体制内改良”几乎雷同；从过程上看，知识分子下乡与地方政府结合的方式，及其在广大农村开展的制度建设与组织建设也一脉相承。其间的复杂关系，正如沟口雄三有别于主流叙述对梁漱溟、毛泽东差异之过度强调，而指出他们“虽然在中国是否存在阶级这一革命的根本问题上是相互对立的，但在建立新中国的局面下，却显现出犹如两根稻草被捻成了一根绳子般的协调”。

如前所述，乡村建设贯穿于百年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既可能因危机缓解或激进程度突破所能够承受的临界点而转为“隐性”，也可能因现实需求的再度严峻而集中“显化”。当历史进入新的千年，当中国以举世瞩目的“和平发展”而重新成为世界焦点，虽然这与民国时期岌岌可危的没落形象完全相反，但第三波乡村建设改良运动却在世纪之交再

次兴起于民间社会，并刻意实践着前辈“启迪民智、开发民力”原则而持续至今。它起于三大资本全面过剩和“三农”问题进入中央决策，兴于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转型于城市化加快与全球金融危机代价转移而对乡土社会造成大规模破坏。对比起来，由于中国已更为彻底地进入全球化体系，导致更多成本向乡土社会与资源环境转嫁。因此，上层精英、中产群体与下层大众共同面临的挑战也更为严峻和复杂。

如果说“三农”问题之关键在于“三要素（资金、劳动力、土地）”大规模净流出农村，那么尝试面对且缓解此困境的乡村建设，虽然内容、形式多样，但如何让纷纷外流的“三要素”及有利于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各种资源逆向回流则为实质。为此，乡村建设以试验、培训、研究、推广为方式，不断往返于“现代—传统”“城—乡”“政府—民间”“知识分子—民众”“理论—实践”之间的广泛地带。在实践中不断进行自我反思与重新认识，进而发掘且创造出更为丰富多样的可能性。

具体说来，当下正在持续进行的第三波乡村建设以“人民生计为本、互助合作为纲、多元文化为根”为基本原则；以城乡一体为新的分析单位与建设对象；以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为基本方针；以城乡互助与包容为生态文明背景下的基本方向；以“学生下乡教育支农”“农民合作改善治理”“农业生态城乡融合”“工友互助尊严劳动”“社会参与文化复兴”等五大工作为基本形式；以促使长期外流的“三要素”及其他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各种资源回流乡土中国，促使资源环境可持续条件下的民生安全为最终目标。

如果我们继续以这样的整体性视野做观察，是否乡村建设只是发生在中国的个别与例外？乡村建设与全球范围内多样化的另类实践（Alternative）彼此呼应，不管是尝试摆脱殖民主义多重压迫与话语束缚的广大第三世界民众，还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对不可持续发展模式提出质疑和挑战的实践者，实际上都在各自条件与现实空间中，进行着丰富多彩的创新性探索；都是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展的霸权格局下，在限制中寻找并创造“新可能性”的努力。由此共同构成了乡村建设的世界性光谱与全球性视野。虽然其对地方化与本土性的强调使其经常湮没于国家与全球脉络主导下的大叙述中，但其对草根弱势群体、生态环境、多元文化和第三世界来说，却具有独特的启示意义。

中国乡村建设贯穿于现代化进程之始终，其根植乡土大地，却不拘泥于现实田园；始发于乡愁乡恋，却在贴地潜行中不断提高改变自我的

自觉性。一方面，在危机状况下积极回应着城乡二元结构这一基本体制矛盾下不同形式的“三农”问题；另一方面，这种建设性改良延续着大众广泛参与的民间社会史，同时基于对“老中国”的再认识，对平民、知识分子及中国在现代世界体系处境进行着动态的发现与自觉。

若摈弃“好人好事”与“成王败寇”的简单化评价，则可认识到：所谓百年乡建，乃是这个原住民人口大国的“三农”因外部环境的变化和“激进”现代化追求而被迫承接多重代价，勇于担当的知识分子、农民和各种社会积极力量结合起来，尝试在外部环境与资源约束下，寻找非西方中心主义掌控之主流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持续努力，以及由此而与各种困难和限制互动的过程。

第九章　乡村治理与国家安全的相关问题研究——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视角的结构分析[185]

中央2002年开始强调“三农问题重中之重”和2005年提出新农村建设以来，国家为缓解“三农”困境和改善基层治理而大规模增加的基本建设及社会事业投资已有10万亿元之巨，政府的“善意”和“善举”都得到几乎史无前例的表达；[186]但是，“人民内部矛盾要用人民币解决”的政策效果似乎不尽如人意。农村基层还是乱象频仍，国家综合安全最缺乏的仍然是基层载体！如是，根源何在？

一、背景介绍：中央下乡与地方下乡的零和博弈

我们此前的区域比较研究曾经指出：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与国家安全有内在相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和地方之间实际发生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中央承担风险条件下的地方政府公司化竞争”，其制度收益是地方政府在发展主义导向下的“府际竞争”中推动了以地方资源资本化为实质的经济快速增长，而其制度成本则是积累了大量社会和经济矛盾，近期表现为地方政府债务率过高造成银行坏账风险和农村对抗性冲突频繁发生，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受到严重挑战。

客观看改革以来的经验过程，由于地方追求激进发展主义造成的巨大制度成本，最终还是要由客观上属于“无限责任政府”的中央来政治埋单，因此，随着中国进入到资本过剩阶段，中央和地方关系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零和博弈。[187]

新世纪之交，中国在进入产业资本整体过剩的同时经由中央财政对国有银行有条件注资而短期完成了银行商业化改制；恰因二者同步引致中央和地方经济利益结构的新变化：中央政府逐渐升级到以金融资本及垄断行业为主要收益来源，地方政府一方面谋求升级产业资本来继续与其他地区的“府际竞争”，另一方面则唯有借地产开发才能与中央管控的金融资本博弈，是为“以地套现”，[188]遂使土地征占成为引致农村冲突的最主要原因。

总体来看，当前乡村所面临的一个大格局是“以国家综合安全为目标的中央政府要稳定，以产业综合收益为目标的地方政府要发展”；二者客观上已经属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却在空间上并发于当下之乡村。遂使乡村中方兴未艾的“政权下乡”，亦分为“中央下乡”和“地方下乡”。

所谓中央下乡，本质上是因乡村“三治”乃国家综合安全之基础，因而需要承担安全责任的中央政府采用国家信用配合政策手段下乡。亦即，以集中制国家的强大主权信用所派生的国家财政和金融作为乡村基本建设和社会政策的主要资金来源，目的在于构建“民生新政”之下的和谐社会。中国这个做法，本来与西方国家进入到金融资本阶段后实施福利化政策、构建“后现代性”话语的制度经验可以做类比研究；没有对此做“比较制度研究”的困窘，仅在于当前学术界给定的评价标准还缺乏对构建中国话语形成激励。

所谓地方下乡，实际是大多数不可能升级到金融资本阶段而只能“以地套现”的地方政府，与被优惠政策吸引来的外部投资结合在一起搞“资本下乡”，实质上还是以资源和土地的资本化开发来实现产业化经营；尽管客观上推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根据“路径依赖”理论，其所沿袭的只能是中央过去处于产业资本阶段及“税费时代”的做法，即物质形态的改变发生在乡村，但“以地套现”所得的资金并不留在乡村而是主要地流入当地的城市化，因而利益矛盾仍然是对抗性的，地方政府却很难有条件构建能够弱化矛盾的话语体系和缓冲机制。

鉴于中央下乡只能经由地方下乡实施，由此势必遭遇重重尴尬。

第一，短期来看，中央与地方两种下乡之间社会差异显著：由于地方政府服务于资本下乡，并不是公共服务下乡，在中央政策的映衬下，地方政府在乡村的权威和合法性受到质疑，一些农民在“中央的好经被地方念歪了”的判断之下越级上访，给刚性的维稳体制带来极大压力。

第二，长期来看，中国自1998年以来就处于全面生产过剩压力之下[189]，各种名目的国家投资被学者认为是“以长期生产过剩来掩盖短期生产过剩”[190]，地方引来的资也并不能形成稳定收益，乡土社会分享到的资本溢出收益有限。特别是2008年美国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中央—地方—基层的这一矛盾愈加凸显，产能过剩导致收益预期下降，进而导致前期被掩盖的各种制度成本未来被某个偶然因素引爆的风险越来越大。最终，将如前文所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将陷入囚徒困境。

这种国内体制下的制度收益与成本不对称，与全球化条件下的制度成本对内转嫁[191]，共同构成新世纪中国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主要挑战。特别是在2008年爆发华尔街金融海啸带动2009年全球危机的教训讨论中，国内思想界愈加深刻地了解到内外矛盾叠加造成的影响。[192]

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历史地看，近代一百多年以来，乡村长期面临着两个基本矛盾，一是在国家追求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和产业扩张的制度导向下，农村剩余被城市过量提取，导致乡城差距加大，“三农”问题日益严峻；二是政府为了从分散小农为主体的农村提取剩余而在基层形成了“对上代理型”治理结构，与乡村“自我稳定机制”所需要的治理方式刚好相反，村社的自我治理和风险内部化功能受到极大削弱。这两个基本矛盾下，由于乡村资源收益往往只够满足少数精英群体的需求，导致任何普惠制的或体现“群众路线”性质的制度变迁都难以在乡土社会内部发育和维持；因此，在不断加大的社会冲突压力面前，通过乡村精英群体的灰色治理来勉为其难地维持村庄基本秩序，就成了大多数时期、大多数地方政府的选择。诚然，这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乡村中经济剩余单向集聚于精英和社会治理单向主导的非稳态结构。由此，村庄成为多种潜在冲突不断复合和累积的矛盾体。

过去的经验表明，一旦各种矛盾累积到积重难返，则任何被中央政府赋予厚望的“三农”政策，在实际执行中都往往因被基层精英所把控造成“精英俘获”，进而使农村社会分化加剧。在宏观经济上升期，这一矛盾尚可被大多数兼业农户“劳动替代资本”的风险内部化机制——通过密集投入劳动来获取商品化生产或外出务工的收益所掩盖；然而，一旦城市中的资本危机爆发，村庄中累积的社会矛盾将加速、加剧、加倍地激化和爆发。

二、问题分析：制度成本最低的国家安全基础在于稳定“三农”

借用政治经济学理论，我们从“三农经济基础决定三治上层建筑”的基本理论对上述问题的形成进行了有力的解释。但在如何解决问题上，任何外部主体都面临着与分散小农的交易成本问题[193]而使得政府对于“三农”发展与“三治”稳态常常顾此失彼。片面追求前者，将愈加失于后者；单纯强调后者，则只能是无本之木，遑论为国家安全发挥战略性的风险吸纳功能？！

按照35年前确立市场化改革目标时所设定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政策界对于农村经济层面的关注远高于治理问题。这些偏经济效率的政策对促进增长具有积极作用，但其中有些内在体现“市场失灵”的措施，客观上也侵蚀、削弱了农村治理的基础，部分乡村治理非正规化（被有些学者指为黑社会化），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而对于任何体制下的政府而言，在当代全球化转嫁的虚拟资本经济危机代价不可逆的压力下，国家综合安全无疑都是第一要务！那就要以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国家安全理性”为前提；据此，无疑应该将是否有利于改善乡村治理、增进全局稳定作为衡量农村政策是否有“效率”的第一标准。

本文指出：在西方虚拟资本危机本质不可能改变、仍将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嫁代价的情况下，形成统筹国家安全与乡村治理问题的一体性框架，通过改革地方治理结构，稳定和发展牵涉8亿生众（含2亿多进城的流动打工者）的“三农”领域，不仅操作上最可行，而且效果最好。

为此，就要将三农政策的重心转变到“三农”与“三治”有机结合，要下决心从改革以来较多强调提高经济收益，调整到强调有利于稳定乡村社会、改善地方和国家治理上。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促进乡村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互补共赢。

下面用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对这一判断提供理论支持。

新经济社会学属于新兴交叉学科。该理论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微观分析框架提出的创新，主要在于纠正了对理性经济人“低度社会化”（undersocialized）或“过度社会化”（oversocialized）的假设，将

经济主体的社会行为与经济绩效的互相影响纳入研究，从而丰富了对研究客体的认识。[194]已有研究指出：当代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产业集群，本身是一个具有强烈的社会、地理和经济联系的企业集合，作为一个社会—地理实体，其典型特征是“在一个自然或历史形成的有限范围内拥有活跃的人们和企业”[195]；产业集群生命力的关键是：成员在集群中具有高度嵌入性，通过经常性的非正式接触建立较强的信任关系、促进信息的有效流动及对风险的共同分担[196]。

中国的乡村社会，既因历史上形成的稳定地缘边界和血缘关系，而具有显著的“社会—地理集聚特征”，也因费孝通指称的“熟识人社会”特征，而具有较高的社区成员嵌入性，具备将新经济社会学引入乡村研究的逻辑前提。本文强调其在以下三方面对国家安全战略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经济结构多元化的乡村因具有发育产业集群的社会关系优势，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经济波动风险，因而能够持续作为国家安全的“软着陆载体”；这应该作为国家总体安全战略的基本判断。

第二，根据经济—社会的互嵌、互动性规律，构建乡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统筹兼顾的一体性框架，更有利于改善村社经济并使之具有持久活力和抗风险能力；这应该成为制定和调整涉农政策的主要思路。

第三，“当和地理敏感性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嵌入性成为一个有力的概念”[197]；正是由于农村土地以社区为边界而使其财产关系具有高度的地理敏感性，因此，无论是发展乡村经济还是建设乡村人文环境，都要充分保证成员的社会嵌入性；这应该作为构建地方“三农—三治”综合发展和治理体系的核心思想。据此看，如国家的政策和投入主要从活跃社会关系、促进农民组织化入手，则不仅能有效提高农户在村社中的成员感和嵌入性，而且对弱化利益矛盾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

三、“三农—三治”结构改革：构建县乡村各有侧重的综合治理—发展体系

乡土中国的地方治理—发展体系，可以分为县、乡（镇）、村这三个最重要的层级，各层级在功能、机制方面各有侧重又互相支撑。以下分而述之。

首先看难度最大的县政改革。

县级政权是地方政府发展竞争的主要财税经济单位，同时又是国家科层体系中下伸到农业地区完整地行使国家权力的最末层级，因此，县治对于乡、村两级治理和农村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产业资本阶段的地方政府公司化竞争框架中，县级政府既承担着竞争和考核压力，又缺乏内源性资本原始积累的条件。这种困境，使县级政权运行普遍性地呈现出既要远离农村又得就近剥夺农村——在行政和服务上远离农村，在财政收入上又高度依赖预算外的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遂使土地征占成为当前引发农村冲突的最重要原因。

因此，县政改革难度最大，但综合效应也最大。要使县政从远离农村变为服务农村，从剥夺“三农”改为落实中央“反哺”政策，并以县政调整带动乡村问题改善，那就要从“国家安全理性”出发，加强顶层设计。第一，改变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创造县域综合体制改革条件；第二，重点改革条块分割的涉农体制，设立体现普惠原则的“农村综合发展基金”，将各部门分散把持的国家粮食与食品安全、生态与环境安全、社会与文化安全以及美丽乡村建设等专项资金统合起来，作为县级资本金对乡、村农民综合性合作组织持股；第三，将县级政府各单位涉农的金融、保险、物流、仓储、科技、房地产、旅游、餐饮、加工、流通等领域参股纳入综合性合作组织，使产生的经营收益反哺三农。

其次看制度成本相对较低的乡（镇）改革。

在现行的科层体系下，大多数乡政要么被扭曲，要么被消解，对下难以构建稳定的合作博弈，对上则难以代理国家安全战略。主要原因是：对上，由于县政要追求产业资本阶段的经济增长，其任务量化分解到下属科层后，乡镇的首要职能不可能是提供涉农公共服务和落实国家战略，而是要贯彻招商引资。对下，农业税被取消后，农业乡镇基本没有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政能力，而国家对农业的反哺资金通过直补或专项资金下达，前者直接打到农民账户中，后者通过部门垂直下来的县级职能单位执行，乡政处于被动、难以有所作为的“悬浮”状态[198]；与此同时，医疗、教育、交通、金融等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还随着撤乡并镇而有所收缩。

以中国一般乡镇的规模和体量，通过结构相对完整的价值链条从而产生稳定的制度收益，同时保持内部的低成本治理是可能的。民国时期

的著名乡村建设实践，如20世纪20年代的卢作孚在重庆北碚、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基本上都是以一个镇作为试验的范围[199]；农业集体化时期，也是以乡镇同级的人民公社作为一级核算单位来进行农田综合整治和使用大型农业机械；当代中国的“超级村庄”，如江苏的华西村、永联村、长江村等，从地域范围来说，都差不多是以一个镇的土地面积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资本价值链。

当前，自然村和行政村的社会和资源整合仍然受到或隐或显的派性力量的制约，而乡镇则为各种农村公共活动和社会组织的发育提供了空间。客观地比较东亚乡村，只有中国大陆在乡镇一级没有组建综合性合作社，农民组织化程度最低。另有一些案例表明，在农村中各种经济和文化力量日益活跃的局面下，乡镇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实现治理创新，低成本地撬动各种民间资源，推进农村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

再次，制度成本最低、收益最明显的是村治改革。

中国1949年全面土改以来，土地产权就以自然村为边界。这是因为农村中最基本的地缘关系和财产关系都在自然村，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活动都在村庄范围内展开。若以新经济社会学观点看，自然村也是自然和历史形成的、最基本的信息流动汇集的“一个社会—地理实体”，是农村中最基本的农户组织单元。

当前，“政权和资本下乡”将村庄社会置于矛盾对立的最前沿。由于村内剩余有限又缺乏组织载体，村两委或者转变为上级政权或下乡资本在农村的代理人，成为“赢利型经纪人”；或者直接由村中的经济精英担任，虽不增加村内成本，但小农在村庄生产和政治中处于更加边缘化的地位。而相当一部分自然村中未被吸纳到资源增量分配的“体制外精英”，则成为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意见领袖”和“行动领袖”。[200]

众所周知，如果没有农民自下而上、平等广泛参与的基层组织创新，则乡村治理难以摆脱经济领域的“精英俘获”和治理领域的“囚徒困境”。[201]这个自农村去组织化改革以来派生的规律性后果，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严重负面作用，被那时候的调研报告说成是“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问题延宕至今几十年了，仍只求追加资本而不重视农民组织创新，乃成为导致国家普惠“三农”之政策及配套大规模投入只能适得其反的内生性矛盾。

因此，组织化程度最低的村庄既然是农村维稳第一线，那么，贯彻国家综合安全战略，就不能以个体化、原子化的村民为抓手，而必须以体现成员嵌入关系、集发展与治理于一体的农村综合性合作组织（而不是“大农吃小农”的专业合作组织）作为工作对象；并且，村两委与综合性合作社有机整合，才可能有效地降低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政府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交易成本”。可见，提高农民组织化能够收到“四两拨千斤”之改革成效。

土地革命为农村形成平等的土地财产关系奠定了基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为农村组织创新提供了制度保障，加之中国整体告别资本稀缺进入资本过剩为乡村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为此，资金富余的中央部门应以政府公共财政为杠杆，向农民综合合作组织注资入股，再通过股权分配自下而上地形成农村综合合作体系，使农村资源收益水平提高与农村公共资源总量扩大同步推进，通过增量分配将村庄积累的历史矛盾化解在村庄内部，变“行政吸纳社会”为“合作吸纳冲突”。

农村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不是单纯的“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的关系。依据上述新经济社会学观点可知，由于农村仍然是生产、生活不可截然分开的社会化的多元综合体，人们在物质再生产中进行着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因此，在基层发育乡村综合合作的空间和渠道也应该是多元的、广泛的。这是地方政府与社会合作的主要空间。唯有将乡村兼业化经济的多元化、包容性和可持续运行与地方良性治理结合起来，互相强化嵌入、互相提供“正能量”，农村综合合作组织才能低成本地发育和维持，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载体。

综上所述，地方“三农与三治”的综合体系如下：因为村社作为“一个社会—地理实体”的成员关系和土地财产关系都在村，所以村级农民综合合作能够最大程度地活化乡村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构建基本的合作单元。在村合作的基础上，乡镇是实现规模收益的主要层级和上下联动的重要衔接，一方面为乡村内的各种社会能量提供场域，另一方面应该组建综合性合作社来承接自上而下的中央资源和国家战略任务。而县级发展—治理则需要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和涉农收益整合，使地方政府从积累矛盾的经济发展竞争转向能够弱化矛盾、缓解冲突的发展—治理综合体。

四、结语：在深化改革中重构承载危机“软着

陆”的“三农—三治”体系

总之，要实现上述结构调整就要深化改革，必须将顶层制度供给和基层组织创新结合起来，首尾呼应；如此重构“三农—三治”体系，方能使得农村继续其宏观经济危机“软着陆”的载体功能，在中央落实国家安全战略的同时，为地方构筑持久的收益源泉。一个有效的国家总体安全保障体系也就呼之欲出了。

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也表明，只有在全局性资本收益预期因危机爆发而衰落时，中央才能利用危机压力对地方落实调控和干预，借以体现国家长远利益。当前，在地方仍然被危机爆发前的机会主义、发展主义主导的局面下，“三农”与“三治”领域是地方经济中资本最薄弱的地带，也是亡羊补牢地为地方经济社会积累的系统性风险打造软着陆载体的最合适领域。另一方面，当前社会过剩资本表现出踊跃下乡的态势；如果“三农”这一资本力量相对薄弱的制度空间也被各路资本填满，那么，未来中央政府在落实国家安全战略时将减少一个重要抓手，而会增加一个恶化零和博弈代价的既得利益主体。有鉴于此，中央应该在“机会窗口”关闭之前有所作为。

第十章　乡村公共财的作用与生成逻辑[202]

乡村治理秩序或者乡村系统的相对稳定，以村庄治理秩序为载体，需要相应的经济资源集聚机制作为基础。当现代市场社会的核心发展越来越取决于产业化利益的时候，以广大小农为对象的村庄治理，必然会与公共资本——“公共财”密切相关。那么，村庄要想达到善治状态，即“通过治理以实现农村社区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动态管理过程”[203]，这块公共财应该是多少？从何而来？用向何处？在缺乏公共财的传统农区村庄，是否有可能重新生成公共财？地方上有无这样的经验性探索？这正是此文需探讨的。

一、公共财是村庄善治可持续的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乡村经历了一个对于小农村社制度的去组织化过程，其既有自治平衡结构支离破碎，大多数村两委缺乏集体收入；另一方面国家面临经济危机，财政紧缩，对乡土社会治理欠缺充足的投资。于是，乡村劣治便出现了。

在缺乏集体公共财的情况下，以前是以三提五统的方式，通过向农民摊派治理成本，来维持对乡土社会的治理。由于快速工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县政乡派”“县经乡派”现象，来自于上面（县乡层级）的各种加在农民身上的税费负担越来越重，村干部被倒逼成利益经营者，成为赢利型经济人；农民用脚投票，或者外出打工或者成为干部群众隔膜对立的一方，于是所谓的乡村治理越来越演化为一种对立关系，乡村治理遂成为问题。

自2005年起全面免去农业税之后，却又出现另一种形式的治理问题，即自上而下地给钱，才能形成对上负责的乡村治理。由税费负担过重之上的干群关系紧张难以维持下去，导致政府放弃对农民征税，于是税费制度取消，变成了由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省两级承担对农村公共开支责任，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其结果是：谁给钱我对谁负责，上面给钱，村两委就变成了只向上负责，但是上面的指导并不必然与村庄内在的具体需要合拍，甚至未必从村两委干部的实际需求和愿望出发……发展下去，基层治理不但要以钱为手段，而且成本不断增加，也难以做到有效和实事求是。比如：你让我给你写党的组织建设报告，很好，我会按你的意图来写一份；你要求我建立党员活动室，哪怕每一天都锁着门我也建了；你要求建立电脑室，我也建了；还得有一台电脑，我再给你增加一份申请报告；此外，还得有人管电脑，再增加一份钱。按照现有的这套自上而下的体系，任何一项所谓的治理都必须拿钱。这个钱并不意味着增加成本同时其功能也增加。这是今日乡村治理所出现的机制性问题。

无论是农业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问题，还是免去税费之后的新问题，其实质在于：乡村治理需要公共财。在基层，有财才有政；有私财则有私政；有公财则有公政，才会增强基层治理活力，形成相对持久的公共治理，强化以广大小农为基本立场的村庄善治。公共财正是公共空间存在的必要条件。我们曾经对村级收入与村级有效治理的相关性有个经验性判断，以浙江湖州为例，一些村两委由于土地出租金以及门面房等第三产业收入，使得村级收入能占到全村经济总收入的5%以上，这样的村庄能够维持良好的村级治理。[204]无论村两委是谁当政，也无需考虑村干部的能耐、水平如何，也不必看它有多少老党员、好干部，只要有充足的村级收入，便能形成有效的治理。因为就算从村民那儿拿不出多少钱，开办村里活动还有收入可以维持。完全空心、空壳的村庄，彻底将集体财产分干净、没有任何收益的村庄，在广大村民生老病死等各

种杂事问题的处理上，谈不上构成起码的村级治理，不管上级是否给足了村两委启动资金。基层治理主体弱化的问题，本质上是基层公财缺失的问题。农村基层党建有的能维持，有的瘫痪，区别主要在于有钱与否：没钱便管不了事，发挥不了作用；村里有地租或者经济林收入，便有实力来应付各种复杂治理问题。

在传统农区，在利润从农业不断流入第二、第三产业的经济宏观大势下，如何形成基层公共财增量？这块公共财，其主要的逻辑关系，只能是内生型的，即生于基层用于基层。假如其主要逻辑已经变成了外生型的，即取之于上级，村两委便只想着对上负责；那么便难以杜绝应付、投机等对待小农的现象。但薄弱的基层总还要有辅助的、引导性的条件或者环境支持，为了区别于“等靠要”的外生型逻辑，可称之为外发型逻辑。

下面就分两部分来谈“内生型”逻辑和“外发型”逻辑具体关系的展开。

二、公共财的“内生型”逻辑，源于村两委主导的社区综合合作社

10多年来，我们参与的当代乡村建设，其主要目的之一是以村两委主导的农民合作为纲，形成区别于分散小农的组织化主体，以有组织的农民经济活动、社会活动乃至文化活动，形成乡村治理的良性结构，为乡村善治形成点有价值的机制性探索。其中，关键在于，形成村两委主导的综合性农民经济合作社，以其经济活动的内部化良性循环机制，主要是以第三产业内部服务于第一、第二实体产业的形式，生成一块用于良性治理的村庄公共财。以这块公共财，服务于村庄社会、文化、教育、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事务，乡村善治方得以真正形成、持续发生作用。

为什么说需要村两委主导的社区综合合作社呢？首先，在农村基层，要把农民组织起来，行政村是最适合的基础性单元。因为村民自治委员会本是建立在村庄集体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农民自组织，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开展村庄各种服务工作，本就是村党支部、村委会分内的工作职责。其次，虽然合作社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但是大多数不是村两委主导下的合作社组织，因缺乏体制内的资源和条件借用，能

实质运行的并不多，服务能力强、信誉好的生产型合作社就更少，群众信任度不高。形成小农立场的乡村治理，这样的组织系统管理，本质上是在一定的经济财产占有、生产、分配、服务基础上的社会管理。要强化小农立场的乡村治理，以村两委主导的农民综合合作社为组织载体，提振农民组织，形成农民群体的主体性人格，通过重建乡村系统，形成农村地域范围的主体性实体，可能实现这一点。

如何在第一、第二产业无利、微利的传统农区，形成一块旨在促进乡村良性治理的公共财？

分散小农只能产生处于生计线上的家户财，并不能产生公共财。单纯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只能产生合作社成员财，何况假如不借用村两委的体制内资源条件，其变异的可能性极大，存在着不可持续的生存风险。村两委具有体制内动员力；农民经济合作尤其是金融合作或其他服务业合作，相对具有一定的利润空间。李昌平认为发育村社“内置金融”合作，是村民主体性发育的根基。村社有了“内置金融”，农户土地承包权就可以抵押贷款了，村两委和村民综合性合作组织就有了心脏和血液，内生之动力就会自发生成。杨团认为：以村庄为基础单元的综合农协——合作社要办信用部，在合作购销功能上增加合作金融功能，是“三农”改革的突破口。综合农协的农技推广、村容和环境治理、老年人照护与儿童教育等社区服务和文化开支，都是农民合作组织通过规模化、社会化的经济服务获得的收入。杨团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不仅是生产力问题，而且是与物质利益相关联的农民为本的社会治理问题。符合农村规律、能满足农民经济、社会、文化多元诉求的综合农协类组织具有自我完善功能和自主成长的动力”。[205]

以兰考县南马庄村两委主导的农民生态合作联社发展为例。从2004年起成立至今有11年了，合作社的小杂粮、大米产业的推广发展，村留守妇女、返乡青年创业，均可以成员身份从合作社的资金互助部进行12‰的借贷。资金互助部服务于小农生产发展，加工实体也返利于成员，给大家带来利益。迄今，南马庄的资金互助达1000万元，每年产生的利润，为社员承担其生活用电费；也为老年人协会进行捐赠支持公益事业；还为6个月至15岁的合作社成员家小孩买保险……以金融合作为核心把小农组织起来，合作社资金互助部资金的绝大部分，从农民的农业收入、打工收入中来，其利润又回馈于农民，为农民的文化福利、社会福利埋单。在这种村社内部良性循环的模式中，会培养一批公心的组

织带头人，形成信息业、金融业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好方式。

再以胡寨村村两委主导的农牧业专业合作社的综合发展为例。发展了10年的胡寨村综合合作社以紧抓各种服务来聚人气。在农业经济上，合作社做种植、养殖、加工等的产前、产中、产后的技术、种子、农资、销售等服务；还直接搞资金互助，现有100多万元，资金互助直接服务于社员的资金需求，还以其自身利润用来支撑村庄幼儿园的发展，以及村庄老年协会、腰鼓队、广场舞的社会文化需求。正是因为村庄综合合作社的发展，在村两委班子选举时，合作社出面组织人参与选举相当顺利。对于村民而言，离开了村两委主导的合作社，产品没办法加工；农产品不知道卖给谁；蔬菜怎么种，技术上没办法掌握解决；农田没办法进行水利灌溉；小孩没办法上学……离开了政社合一的农民组织，他没办法更好地生产、生活，于是大家的心就凝聚在一起了。

总之，兰考以南马庄、胡寨为代表的合作社发展都是村干部领办的综合型合作社，属于社政合一，体现了村社血地缘关系与党政体制内资源有机结合的合作社成长规律。其共性在于：采取的是村两委主导的“合作金融＋实体产业＋公益服务”的程式：首先指的是一种“内部化”的经济机制，即以村社为边界的农业、加工业和农村金融业三业并进，能够内部化收益互补并降低外部风险的经济；其次，在村社文化共同体层面上，即以“内部化”经济收益为保障的维系村社文化共同体的公益服务。正是这种方式，小宵村社成为再造农民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基本场域。[206]

三、公共财的“外发型”逻辑，源于政府涉农部门及涉农企业为主的社会参与力量

多年来的一个共识是：任何外部参与力量进入乡土社会面对分散小农的时候，会有不可克服的高成本交易。这里所说的社会参与力量，包括各级政府部门、各类涉农企业、不同社会公益机构、任何个体行动者力量等。只有克服了与分散小农之间高成本代价的社会参与才是有效参与，只有克服了与分散小农之间交易成本过大的治理才叫有效治理。也即，尽管小农村社内生力已损其根，外发力量再猛烈、再强大，也只能属于外发的、辅助性的力量，也得在发育和弘扬内生力并尊重其为主体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外在环境条件的作用。

显然，小农社会在目前强势的城市市场力量面前，并不能自行组织起来，仅以残存的村社资源力量，也很难形成像样的农民组织。李昌平老师所说的“内置金融”，杨团老师所说的“综合农协”，均要发育农民内生的主体性组织力量，采取“外发促内生”的方式是改善外部政策、经济、社会条件或者外部力量适当介入，以促使合作力量组织起来的内力发展的办法。这里，强调乡村治理所凭借的经济增量的增加；以及内在的综合性合作组织的创建。早在基层做乡建试验的时候，我就提出“外发促内生”[207]的动员模式。今天再来提“外发促内生”，是想更为强调产生“公共财”的动员机制。“外发促内生”的外发力，主要来自于不失灵的政府涉农部门，以及有效的新型企业。在中国国内经济面临结构性矛盾——劳动力、产能和金融“三大过剩”压力的宏观背景下，在广大村庄内部化降低外部风险的机制普遍削弱的情况下，会有不失灵的政府部门参与经验，以及有效的新型企业出现吗？

今谈两例正处在成长发展中的经验性探索，一是小额信贷公司经验；一是政府涉农部门——县级农委会的经验。

例一：北京宜农贷小额信贷公司的“爱心金融＋协会或合作社＋农民”模式，作为“无形之手”，为有利于乡村善治的农民组织提供了经济动力。

宜农贷作为北京宜信公司于2009年推出的公益理财助农平台，致力于社会上有爱心的出借人，通过宜农贷的高科技网络平台，直接将富余资金出借给那些远在中西部地区需要资金支持的农村借款人。借款人及宜信均不以盈利为目的，每年象征性收取1%的宜农贷管理费和2%的借款人爱心回报费，使受益方承担起创造价值的责任。宜农贷以网络平台的技术优势以及宜信公司的理财业等的内部收益互补机制，在青海、宁夏、陕西、内蒙古、福建、河南等多省份自治区的近20个贫困农村地区，进行公益性和商业性有机结合的探索。其中一个有价值的经验是：宜农贷会给合作的协会或者合作社注入几十万、上百万元的社会爱心资金，以参与资金互助所得来的大部分利润（合作社向借款社员收1分2，给宜农贷和借款人3厘，剩下9厘成为合作社的利润）留在持小农立场的合作社内部，助其成长壮大。2015年4月20日，宜农贷在国家级贫困县——河南省兰考县，推出“宜信—谷雨”战略，决定在兰考已注册的700余家合作社中推广“爱心金融＋协会或合作社＋农民”模式。在资本化时代金融产业异化于实体产业的大背景下，以合作社为平台扶持农民组织

化发展的经济试验，作为一种“可持续扶贫”的创新公益模式，是在尝试解决普惠制金融与小农社会治理关系的大难题。

例二：江苏射阳农委会发起的“联耕联种”体制创新，作为“有形之手”，指导服务到位，为乡村善治提供了政府部门不失灵的好经验。

2013年起，江苏射阳县农业委员会在全县发起了联耕联种的农村经营体制创新。即在平原地区在不改变农民土地承包权、经营权的前提下，通过村两委引领和农业部门服务，带动专业合作建设，把农户组织起来，使农民破除田埂、进行有组织的家庭合作，有联耕联种、联种联管、联种联收三种基本形式。三年内，联耕联种带来了节本增效、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带动了大农机和新机具的推广应用；还促进了集成技术的运用，破解了适期播种难题，带来了粮食稳产增产；实现了秸秆全量还田，有利于化肥农药减少使用，改善了农业生态环境。中央农办调研认为，联耕联种有利于稳定和完善农村家庭经营制度，是土地不流转也可实现规模经营的新路子，适合约占全国耕地近1/3的6.2亿亩平原宜耕耕地的传统农区。[208]

联耕联种的诸多调研材料大都强调其经济体制创新作用。实际上，其实施和推广，至少属于县级涉农部门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灵验的典型；同时，它又成为改善乡村治理的一个良好契机，为小农立场的乡村善治形成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在与小农打交道过程中普遍失灵的背景下，射阳县农委会为什么不失灵？原因在于他们对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道理有一定认识。他们认为，中国有2亿多农户，小规模经营自家承包耕地的普通农民仍占大多数并将长期存在，分散的农户完全可以通过联合，依托社会化服务组织，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所以，不需要走以土地流转让大户发财而促发土地流转纠纷问题祸乱乡村的路子。在射阳县农委办的县级顶层设计下，全县村组干部以行政组织为强有力的抓手，把分散农地集中起来，进行组织、协调和安排，将各种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注入家庭经营。其次，村组干部在组织协调过程中，通过引导甚至主导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将村里农机手、农资大户等组织起来，利用联耕联种之机，可以大力发育集机耕、机收、育秧、条播、植保、开墒、烘干等业务的综合合作社组织，构建农民组织与市场相配合的多元社会化服务结构。这里面，有商机，有利润，有增量的公共财。

第十一章　政府理性与村社理性：中国的两大“比较优

势”[209]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发达国家主导全球化发展的社会变迁现象，体现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在全世界扩张的历史过程，其以军事和金融霸权内在结合而在全球获利的经验是不可复制的；但西方现代化却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参照的目标——在工业化发展中试图走西方模式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数千年未曾中辍过传统文明的古老民族国家，若从其实体经济总量看，业已发展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中国之不同于西方的经验到底是什么？假如我们承认现代化实际上是以国家总体上实现工业化为主的一系列制度配套过程，那么，我们就可以去掉意识形态化的种种说辞，仅从“理性”这一角度来看中国所构建制度的所谓“比较优势”，这有可能对现代化制度变迁及其路径选择的研究具有启发价值。本文对已经引起关注的两大比较优势——政府理性和村社理性的对立统一关系，及其在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及产业扩张中的相辅相成作深入分析。前者是从中国工业化的组织保障特点上而谈的，后者是从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单元特点上而谈的。兹分而述之。

一、中国现代化的“比较优势”之一：关于政府理性的分析

关于政府理性，大多侧重于从政治学视角进行研究，比如“政府理性是指政府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机制与能力”，认为“权力型”的政府理性应向“权利型”的公共理性转变[210]；“所谓政府理性……对后发展国家而言，它包括三个主要内容，即政府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明确目标性，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政府政策的连贯性”[211]；也有认为政府理性是指其“权力型”，这个“权力型”的政府理性应向“权利型”的公共理性转变。而本文所指的政府理性，主要是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追赶现代化进程中政府直接参与配置资源的经验来做归纳演绎。

市场与政府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相对于自由市场理论所强调的市场均衡发轫于个体化的理性经济人的概念而言，中国人所经历的是经济领域中的政府理性生发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是工业化原始积累的主导力量[212]；政府是国民经济体系的内在的参与者，而不是外在协调者，因政府行为以“出于利益

考量在经济领域直接行使‘进入权和退出权'为特征”[213]，是谓“政府理性”。

中国的现代化成绩之所以令人瞩目，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实质是中国政府在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及产业资本发展阶段，借其组织动员能力及财政能力而达成的中央工业化和地方工业化的过程。政府不是“裁判员”，而是直接国际竞技场中与本国“运动员”整体利益一致的“教练员”。

（一）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集体化和单位制[214]的时代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维持苏联战略援助形成的以重工业为主导因而内生性具有“资本增密排斥劳动”机制的国家工业化体系，以对付周遭险恶的政治环境，政府只能通过农村集体化才能从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中过量提取剩余，以此形成国家工业化的内向型“资本原始积累”。履行这样的经济行为，在政府只能与高度分散且剩余太少的亿万小农进行交易的宏观环境制约下，必然造成交易费用畸高的现象。[215]于是，政府只能以解决这个问题为目标，进行相应有效的制度安排，即“利用长期战争对执政党和人民的教训以及战争形成的军事化集权体制，建立了必不可少的国家工业化的动员机制和组织”[216]。

相关的制度安排及其各自功能如下表所示：

此表所归纳的具有相辅相成作用的诸项功能主要发挥的作用是：以集体化制度强行控制、保证农村社会稳定，从而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准备了必要而又庞大的支撑体系以及强大的舆论支持”[217]；而城市单位制则提供一系列城市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以保证城市社会稳定，它“体现了全能主义的政府以政治动员的形式调配社会资源的过程……是计划经济时代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基石”[218]。在此前提下，再以户口管理制度为强行分离城乡居民的闸门，从而保证国家以对资源的垄断权力进行统购统销的不平等交换，最大可能地从农业中提取进行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使工业化优先得到发展。

表11-1　中国城乡二元经济制度安排简表

制度类别	功　　能
农村集体制	以官定低价农产品的规模上缴和指令性承接城市工业的高价产品来贯彻剪刀差，辅以成规模军事化地集中劳动力投入于国家基本建设，并以维持农村的基本稳定为条件来承载城市危机软着陆的代价。
城市单位制	以生老病死的综合性保障维持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相对封闭的、低水平的基本生存，借此配合国家资本通过占有剩余最大化和支付福利最小化来短期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正是借助农村集体化制度和城市单位制为基础的、体现国家对资源高度集中垄断的二元制度安排，“保证了中央政府在不到30年的工业化进程中，多数年份都能形成高达30%的积累率，使中国从50年代初期一个工业产值和城市人口均占仅15%的典型小农经济条件下的传统农民国家，在既缺乏外部市场又几乎无外来投资的恶劣的国际环境中，发展成为工业产值达70%以上、产业门类齐全、专业分工细致的初步工业化国家”。[219]

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关制度安排的阐述表明：国家工业化初期政府作出的制度供给，主要是为了在外部封锁的国际环境制约下，依靠高度组织化有效地解决与分散小农经济之间交易费用过高的难题。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政府对城乡人民进行总动员，其实质是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性任务。其间，政府一方面是以集体和单位为形式的组织化的发动者，另一方面也是经济活动的组织者、投资者及利益分配者。因此，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资本的形成和扩张阶段，都是以政府为主体进行的。

可见，在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组建起来的、在此后的工业化进程中不断调整和完善着的各级政府，事实上是具有理性经济人特征的经济主体。

（二）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公司主义”[220]的表现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完成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已经形成“社会化大生产”体系的新阶段，产业资本内生性扩张的要求，主要通过兼有“理性经济人”和制度供给者双重职能的政府做出有利于市场交换的制度安排来达到。在政策语言中，这个制度安排被称为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市场经济新体制。

在改革起始阶段，财政赤字负担过重的中央政府理性地“退出”了不

经济的农业，形成了与农民进行交易的一种制度变迁——大包干，即“政府在‘退出'相对于城市工业而言日益显得‘不经济'的农业的同时，向村社集体和农民在土地和其他农业生产资料所有权上做出让步，换得的是农村集体自我管理和农民自我保障”。[221]

接下来，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财政分级承包制的改革相配套，地方政府内生性地发生了公司化演变，以适应产业资本结构调整和产业扩张需求的市场化改制条件。“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是指地方政权为了谋求经济发展，强力推进地方工业化战略的实现，以类似于公司化运作的形式进行地方党政能力和经济资源的大动员、大整合，从而以经济发展增加本地收益分配的重要制度特征之一。政府各部门参与地方产业资本发展、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取向，表明其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属性与历史上以政治理性为主的政府不同。

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1.与地方工业化相伴随，基层政府大办乡镇企业。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财政分级承包制改革，确立了各级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作为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相对比较明确的收益分配关系，使地方政府得到了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自主权，开始了地方上的农村工业化进程。在县、乡、村三级的经济发展中，从决策责任承担和收益占有分配来看，地方政府和乡村组织是实际上的经济主体，有扩张产业借此获取财产收益的明确动机和行为，在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各关键环节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成为投资决策者、资本控制者和受益者。有学者将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发达地区乡镇企业的成功归之于“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认为中国的地方政府相对其行政范围内的企业实为大董事会的角色，因而对企业运作是不可缺少的因素；[222]或者认为企业相对于政府只不过类似于执行总裁或工厂内的车间主任的角色；也有学者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基层政权成为公共资源的垄断集团，成为从事经营的“经济行动者”。[223]

有数据表明，“1984—1988年，全国乡镇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43%，3倍于以往增速，农村工业占全国工业的产值比重达到24.3%。沿海的地方工业化在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中初步完成了原始积累”。[224]这往往被认为是地方政府作为投资主体主导“以地兴企”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成绩。

2.大办开发区，获取土地资本增值收益，通过招商引资实现产业资本扩张。

随着工业化的大力推进，各地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开发区”，实质上是城市资本通过与地方政府分享收益的去实现农村资源的资本化。从事工商产业的利益集团需要土地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地方政府则寄望于把“以地生财”作为获取收益的手段。其间，一方面这两个利益主体结合媒体产业集团，强烈地把以私有化为基础的土地交易包装成市场化改革的经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利用《土地管理法》为依据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征用农村土地，反过来突出了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关系不明晰的弱点。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方面，拥有一个共同的实质，就是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强力配合资本占有社区资源实现资本化，大量获取土地资本增值收益，用于地方政府分享资本收益分配。

与此同时，“随着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对利用外资政策的逐渐放宽，由于与外商合作办企业可以在短期内见效，不但可以直接解决资金、技术、市场问题，还能同时增加税收、出口创汇和创造有利于政府政绩攀比的地方经济总量”，因此，区域之间竞相开出优惠政策，进行“亲资本”的激烈的“府际竞争”。[225]政府均自觉地承担起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为目标、以“招商引资”等为举措的强制性任务达成干部资源大动员；同时精心打造地方工业园区，作为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绩工程；各级组织部门也会把GDP作为官员的政绩考核……严重损害了社会大众的权益和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激进发展主义导向下的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已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负外部性”，诸如社会矛盾、生态危机、产能过剩等；对勉为其难地加入到招商引资竞争大军的传统农业地区而言问题更甚。这说明一般事务都具有两面性。在产业资本形成之后，以推进产业扩张获取资本收益为主的政府理性，与占有资源收益通过维护村社生存发展的村社理性之间，哲学意义上的对立统一关系在现实中更多转向对立。

之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外向型经济高增长以来社会上的对抗性冲突不断发生，在于其实质是“资本异化于其原始积累来源”的私有化改制造成的代价向弱势群体转嫁。一是在城市形成了资本利益集团，及其派生的结构复杂的、高度依附型的社会。二是由于将为现代化建设付出的主体力量排除在了现代化收益的分配体系之外，随之造成城乡和贫富差距的固化、拉大。对立矛盾的对抗性表现，致使国家不仅得支付被上述异

化过程甩掉的沉重的社会开支，而且还得增加支付被“三大差别”派生的巨大的维稳开支……

但就国民经济总体而言，中国凭借超大型大陆国家幅员辽阔和广大人民吃苦耐劳，还是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不仅创造了持续30多年平均近两位数高速增长的奇迹，而且既没有对外扩张掠夺，内部也相对保持了稳定，颇有“中国复兴”之迹象。[226]若能够有效缓解越来越严重的“三大差别”，则符合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在人类现代发展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精彩一幕。

二、中国现代化的“比较优势”之二：村社理性

本文关于村社理性的讨论，是从其作为工业化进程中周期性发生危机、其代价向乡土社会转嫁以村社内部化机制为基础实现软着陆的视角来做分析的。与上文讨论的政府理性，是相辅相成的两个不同层次。相对于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假设前提的西方经济学所讨论的“个体理性”而言[227]，村社理性是从中国发展经验中归纳出的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创新。

村社理性针对的首先是市场“外部性”造成的“市场失灵”这个经济学的一般问题[228]而提出的。我们认为：在小农村社制度不被以“亲资本”为内涵的激进政策破坏的条件下，村社理性体现的是一种能够“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的经济机制，即以乡土社会中的村社地缘关系为产权边界，存在着农户成员权在村社共同体的集合代理，据此而形成的是户村两级地权结构，这是“一种内部非排他性的、体现‘社区成员权'的农村产权”[229]。这种统分结合的、以成员均分共有、两权（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为产权关系所派生的财产分配和收益整合等相关制度，能够通过内部化的收益互补来降低市场化的外部风险。

任何制度都是一种文化。那么，村社理性还指的是村社文化共同体层面上的，即建立在村社集体所有权和农户使用权两权分离的经济制度基础上的、以农村一定范围内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维系村社内部社会秩序的群体理性。就是说，“中国人数千年聚居于村落，祖祖辈辈共享村落边界内的以土地、水和山场为主的资源，形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小农村社因而成为再造农民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基本场域”[230]，成为中国农民甚至中国人的实体性信仰，这个层面是对其经济学意义上的延伸。

小农村社作为农村社会的基础性单元，是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基础性载体，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有三：

（一）农村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中的“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风险”[231]机制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间，从宏观层面来看，得益于以“里仁为美”[232]的传统自然村落为基础建立的初级社和生产队，之所以能完成人民公社集体化服务于国家工业化的提取剩余功能，也在于内部收益分配相对均衡这种村社理性的机制性作用。改革开放以后30年，在一些农村工业化相对发达的地区，村社理性的作用则在于通过如下两个“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的机制助推农村工业化进程。

首先是“自我资本化”，快速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从而跨入产业结构调整历史阶段。

以苏南农村工业化的一个个案为例。“苏南吴江有一个生产队，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自主创办社队企业时资本投入为零，即使全靠劳动力，也至少还是需要得到政府严格控制的工业原材料。于是，队干部召集全村社员协商一致，每个劳动力每年让出500工分不参与分配，由集体拿这些从全村农民社员嘴里节省出来的农产品与城市国企交换本村企业需要的原材料。就这样，连续3年，每个社员让出了1500工分，终于在农村集体化时期的人民公社体制条件下完成了村办企业的原始积累！”[233]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认为，单家独户以其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存量，不具有进入现代工业化的条件。然而，这个案例的启示在于，开始于20世纪70—80年代的苏南农村早期的工业化，在集体经济为名的“村社理性”内部化机制作用下，通过村社内部成员劳动力规模投入来替代“极度稀缺”的资本要素的“自我资本化”能够快速完成原始积累。社区劳动力剩余价值的内部化积累和转化，可以助长“负资本”起步的社队企业起步和发展。其实，村社理性在助长社队工业化方面还体现在社区土地和自然资源使用的零成本、土地自我资本化、社队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风险“成员共担”等诸多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方面。

其次是“内部化”消纳资本原始积累中的诸多负外部性问题。

主要是克服工业化进程中村民、农户之间收入分化和工农业发展的结构性不均衡问题。在基于乡土社会道德文化的社区精英领导下，以村为单位整体进入工业化的一些农村社区，企业并不只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单一目标，还要为本社区居民提供福利，构建收益公平分配的内部

化机制，公平分配工业就业机会；此外，还采取了注重工农从业收益的社区内部平衡，打造“绿色车间”，有效避免农业衰败等措施。改制以后的一些苏南乡镇企业为了实现产业升级以利于参与国际竞争，虽然其归属和经营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更多的集体经济组织在改制中保留了不可变现的工商业地产租金占有或分享权，一些实力强的集体由经营企业转变为经营资产和吃租收益（土地租、厂房租和设备租）。其间，有两个特点是“对‘老苏南模式'内含的村社理性——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问题的特殊机制的延续”[234]：一个是有效降低了外部投资主体进入乡土社会的交易成本，一个是在实现了相对于原始积累阶段的土地要素资本化而言的再次资本化，保证了苏南的稳定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进行原始积累阶段的“自我资本化”，还是“内部化”消纳资本原始积累中的诸多负外部问题，都不只是归因于中国式小农经济所“具有工具理性特性的‘队生产'形态”，还应归因于“以血缘认同和村落共同体认同为基础的具有价值理性性质的家庭内代际分工和外部协作行为”。换言之，在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以劳动和管理协调替代资本投入的内在机制”，正是村社理性所内含的温情脉脉的社队内部自我剥夺和家庭内部代际分工与协作的代际剥削，也是“中国农民勤劳革命的内在逻辑与具体实质”。[235]

（二）劳动力大幅流出的传统农区的土地流转，血地缘关系起主导作用

就普通的中西部的传统农业地区而言，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基础上的传统小农村社经济，由于其地理区位和资源条件的局限不利于农村工业化的发展进程，在发达地区工业要素市场价格对农村青年劳动力的强大拉力下，成为以老人、妇女为主的留守经济，或者成为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虽然如此，也因其基本制度及村社价值系统尚未根本改变，村社理性依然在因农村劳动力流出而导致的土地流转现象中发挥有效作用。

例如，许嘉鸿、贾林州通过对豫南某镇乡村4个村民小组土地流转情况的调研发现，在114户农民中有高达76户有流入或者流出土地的行为，但是其中有正式合约的只有47户，其具体情况如表11-2、表11-3所示：[236]

表11-2　土地流转合约双方关系情况

合约双方关系	户数	百分比（%）
兄弟	20	42. 55
父子	8	17. 02
五代亲	12	25. 53
邻居	10	21. 28
同组非血缘	4	8. 51
外组	11	23. 40
合计	47+28（即重复关系为28）	138. 29

表11-3　土地流转租金支付方式情况

租金方式	户数	百分比（%）
无租金	18	38. 30
实物	20	42. 55
换工	5	10. 64
货币	6	12. 77
合计	47+2（即重复方式有2）	104. 26

由表11-2可看出，在这些村庄的土地流转合约双方关系情况中，兄弟间土地流转的有20户，比例最高，占42.55%；而兄弟、父子、五代血缘亲属之内这三者之总和为40户，占85.1%；邻居、同组的地缘关系、外组之总和为25户，占53.19%。至于这外组的11份，也大部分是由于亲戚（比如岳父母与女婿关系）。由表11-3可看出，村庄土地流转租金支付方式的四种状况按从多到少的户数和相应百分比顺序排序为实物（20户，42.55%）、无租金（18户，38.30%）、货币（6户，12.77%）和换工（5户，10.64%）。之所以货币化地租很少，是因为村庄中土地流转的交易现实“仍非市场原则主导，而是由血缘与地缘关系主导，其实质仍是互助合作型的交换行为”。

上述土地流转合约的双方关系与租金支付方式表明：传统村庄农户间流转土地的经济现象，仍是血地缘关系主导的内部化的村社理性机制在发挥作用，它是一种“包括血缘和作为血缘映射之地缘的村落的价值认同与共同规范……建立在以血缘认同为核心的村社意义世界的基础之上”的价值理性。[237]

（三）在工业化产业扩张阶段，村社理性对现代经济危机的“软着陆”作用

传统小农村社还能成为一旦发生全球输入型经济危机时各种问题得以“软着陆”的地方，尤其是成为进城失业农民仍然可以返回农村就业与生存的弹性空间。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为中国高速现代化提供了稳定的基石，“正是农民可以在进城务工经商失败后返回家乡熟人社会生产生活，城市没有形成大规模贫民窟，从而使农村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使中国现代化的重心稳定，城乡社会有序，使中国可以经受得住几乎任何经济、金融、社会危机的冲击”。[238]

整体上看，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乡土社会承载城市资本的危机代价，客观上成为中国工业化完成原始积累进入产业扩张的主要“比较优势”；“三农”中国对城市中国的产业资本危机的“化危为机”，起了重要的载体作用。以2008—2009年中国正式进入全球化产业扩张之时的第一次危机发生时为例：之所以东南沿海企业倒闭时2100万农民工失业而几乎没有发生严重问题，很大原因在于理性的政府以财政手段进行深度干涉，在大幅投资农村建设以解决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时，广大农村地区还能够成为“软着陆”的“蓄水池”，其池底——农村土地财产关系中的成员权“共有制”还没有被完全打破，“2.4亿户农民家庭大多数还有‘一亩三分地'作为无风险资产，而且300多万个村社也还有机动地、村办企业、多种经营等能够内部化处理严重负外部性成本的回旋余地”。[239]

而在当今资本过剩状态下，以“村社理性”为实践原则的发展模式，还可以使村社共同体成为应对“资本下乡”的保护机制，从而最大化地保持村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240]诚然，若从历史意义的、更宏观的多元角度来看，中国的小农村社优势还在：“中国现在仍然存在着世界上最众多的村庄和农民，大多数农民在村子里仍然从事着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而这些小型的、多样化的家庭农场是最能解决未来人类食品安全问题和避免工业化农业的耗能困境的，同时也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稳定的根基之所在。”[241]

三、进一步的问题探讨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之不同于西方现代化进程的主要“比较优势”，到目前来看，主要是在人多地少紧张关系及城乡二元结构制约张力下、在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客观形成的政府理性和村社理性。

政府理性体现在政府直接作为经济主体推进资源资本化并且占有收

益——无论是集体化时代由中央政府主导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还是改革开放后以地方政府公司化的方式大办乡镇企业和大办开发区获取土地资本增值收益、进行招商引资。村社理性主要表现在：社队企业原始积累阶段中的"内部化"机制；在农村劳动力流出阶段的土地流转中发挥有效作用；对现代经济危机的"软着陆"作用；等等。

今后很长时间内，中国参与全球经济体系日益深化——在实体经济层面，"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动力由国内产能过剩的推力为主变成了外部需求的拉力为主"；在金融体系上，"中国主动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由核心国家的金融资本主导的国际经济新循环"，对外形成"金融依赖"；[242]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经济面临结构性矛盾——劳动力、产能和金融"三大过剩"压力，以及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之间的关系加剧失衡问题。[243]

而农村内部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村社理性正日趋遭受瓦解：新增人口不再分地的法规颁布，农村青年劳动力大规模流出农村，农业人口的老龄化和女性化，这都极大地削弱了农村社区长期存在的能够靠内部化来降低外部风险的机制，以及"三农"对工业化危机的承接能力和社会调节机制。

中国是否还能维护政府理性与村社理性这两个比较优势，已经成为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由于继续加强其理性经济人特征的公司化地方政府推进激进发展主义，农村生产力三要素均因被"农业外部定价"导致大幅度净流出，一方面是史无前例地出现城市化"大跃进"，另一方面是农村经济基础衰败、"劣绅驱逐良绅"，遂使很多地方已经出现村社理性无效。由此，"三农"问题及乡村治理困境成为"国家综合性安全"不得不面对的多种挑战之中的"重中之重"。

中国在迈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之后的战略转变之中，将其强政府的经济理性通过深层次改革的整体推进，转变为以加强宏观经济调控、建设生态文明、提供社会公共品为主的"善治"理性；并且在实施新农村建设战略中，采取"针对村社多边合作的资源注入和有效制度供给"[244]，以此修复、发展村社理性，这是21世纪生态文明时代的要求。多年来从事当代新乡村建设的一批知识分子，以村庄为基本单元在全国范围内一些有条件的农村从事经济、文化、社会的综合性的合作试验[245]，一方面顺应了中国工业化中期之后"以工补农，以城返乡"的政府理性转变的需要，一方面也是冀望于通过干预性试验研究形成对小农村社理性的科学

认识。

第十二章　重构宏观经济危机“软着陆”的乡土基础[246]

一、问题与背景：去工业化趋势明显致使劳资矛盾进入阶级对抗性质的冲突多发期

自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先后进行4轮量化宽松向全球市场释放巨大流动性，导致国际市场上基础商品价格大幅波动，类似中国的制造业国家纷纷遭遇“输入型危机”，而国际制成品市场总体表现萧条，价格水平相对低迷。据笔者计算，2009—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进口价格上涨了64%，出口价格仅上涨了19%。使得国内经济比重最大的实体产业的利润空间被迫压缩，大批企业倒闭破产，很多港台投资迁往东南亚国家，南方沿海的“加工贸易型”经济事实上已经进入“去工业化”。[247]同期，由于乡村社会碍难再如以往承载城市危机代价，此次危机势必在城市硬着陆，直接影响社会稳定。

楼继伟对当前中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概括为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他的基本判断是中国在未来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248]

1.去工业化与全社会杠杆率[249]迅速上升成为当期危机的动因。

诚然，国家采取的逆周期调节[250]，总体上是有效的。如在2008年紧急启动4万亿元国债资金进行救市，有相当规模资金投资于基本建设，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一度高达50%以上，相对成功地承载住了2009—2011年外需下降对于国内就业市场的压力。但另一方面，输入型通胀与国内基本建设投资也进一步造成实体产业内部的挤出效应，客观结果是国家救市投资所释放的过剩流动性自2011年起纷纷从实体经济析出，先是涌向房地产，形成大致表现为3年周期的泡沫，到2014年房地产泡沫从私有制为主的三线以下城镇递次挤出[251]，大量资金再次析出只能流向股市等高风险领域，带动股市泡沫半年周期崩盘，连锁性地造成全社会各个部门的债务剧增，催生影子银行及其他小贷形式的高利息借贷泛滥（如图12-1）！

自2008年全球危机以来，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国内生产总值GDP

及分行业累计同比（如图12-1）等宏观经济指标的下滑趋势，表明了中国的去工业化趋势。随之，则是全社会杠杆率的显著增长。数据显示，全社会的杠杆率从2008年的184.6%上升到2014年的278.9%，6年时间里上升了94.3个百分点，其中：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在过去几年经历了相对快速的上升过程，从18.2%提高到36%，上升了17.8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包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在金融危机之前一直保持在100%的水平以下，2008—2014年期间则从98%提高到149.1%，猛增51%以上；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在2001年以来一直保持在35%～40%的水平，2008年之后快速上升，从40%提高到57.8%，上升了17.8个百分点；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剔除通货和存款）从13.3%左右提高到18.4%，上升了5.1个百分点。[2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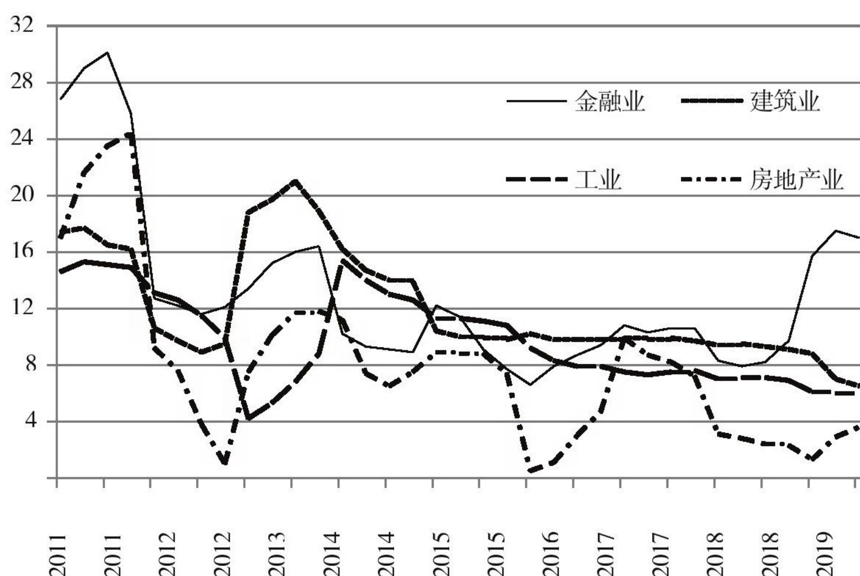


图12-1　全球危机与中国经济的行业分化（单位：%）

来源：Wind资讯。

更为尴尬的是：在全球危机代价转移及其相关软实力构成综合性外部压力下，国内自主创新阙如，客观上造成金融生态劣化，反过来进一步压榨市场化条件下一般都会顺周期的实体经济。

2.危机爆发压力下劳资对立演化为阶级斗争的动因。

目前来看，率先发生在沿海地区的去工业化已经从南到北逐步蔓延

开来！而大部分“公司化地方政府”[253]尚无预案，并且在劳资阶级矛盾尖锐对立之中被亲资本制度“路径锁定”；企业家则先“骗贷”后“跑路”，甩下巨大社会代价造成政府直接面对工资拖欠以及失业现象大量增加，致使劳资斗争越来越呈现群体化、政治化的演进趋势，也成为海内外广泛批评中国的依据。

有案可查的是：2013年前三季度，全国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办理拖欠工资等待遇案件17.4万件，为343万劳动者追发工资等188亿多元，案件数量和涉及的金额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了24.7%和54.6%。[254]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我国劳动争议案件数量一直处于高位运行态势，其中民营企业劳动争议高发。从2010年到2013年，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当期立案受理私营企业案件比重不断上升，占劳动争议案件的比重分别为49.8%、58.8%、63%、65.8%。[255]在企业劳动争议案件高发的同时，集体劳动争议案件占全部集体劳动争议案件的比重从2010年的52.6%上升到2013年的73.1%。[256]

当期的宏观经济危机爆发导致大规模失业的压力，正是工业化带动农民发生性质演变的充分必要条件——从2.6亿农村“小有产者”派生的流动打工者群体演化为工人阶级，有组织斗争的自觉性明显提高。

究其原因，一是劳动力成本、社会成本不断上升条件下出现的资本增密和技术增密，并且同步排斥劳动，也就是说制造业已经开始机器人化替代劳动。但这也是产业资本主导工业化时期的一般内生性矛盾的基本规律：“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工业化内在机制必然转化为资本与劳动之间对抗性阶级冲突。二是劳工群体在中国地方政府亲外资制度下在厂区高度集中食宿，也在组织上奠定了工人必须组织化才能演变为先进阶级的基本条件。三是各级制式教科书对阶级斗争确立的“政治正确”，[257]不仅给广大劳动者提供了指导思想，也节约了任何意识形态的革命者发动工人斗争的动员成本。客观来看，这次经济危机中的工人反抗不同于以往，会直接以经典阶级斗争的形式反映出来，催生国内与官方意识形态对立的政治变革。

二、乡村内部化机制被破坏碍难实现危机“软着陆”

从中国应对历次宏观经济危机的实际经验来看，1950年的毛泽东和1980年的邓小平都是以全面推行小农均田为基础建构国家治理体系，也因使最大多数人群成为“小有产者”而延续了具有内在稳定性和历史延续

性的中国特色的“小农村社制”[258]，而使得乡村成为国家稳定的载体。

在6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中，相对于风险集中于城市“资本池”而言，资源性资产共有均分的基本制度，一方面体现着村社成员的生存权，弱化了传统乡村向阶级社会转化的动能；另一方面，外出打工仍保留小有产者财产因此还回得来的乡土社会，客观上发挥了“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国家得以借助“三农”载体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而多次成功实现经济危机“软着陆”。据此可知，这是危机重重的中国特色现代化进程几乎不间断地延续了60多年的主要“比较优势”。[259]

1.乡土社会能够“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在于村社理性。[260]

传统农业社会的“小农村社制”之内涵性地存在村社理性得以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风险，在于土地产权的社区边界（农村社区血缘和地缘关系的边界长期是在自然村），客观地导致土地要素的地租或地价都主要是依据农业产出形成的“内部定价”。这是20世纪90年代之前“三农”形势相对较好的内在机制。[261]而在加快工业化和城市产业资本扩张阶段，古典经济学的三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和其他生产力要素都被“外部定价”，就导致农业产出不可能在预先支付地租的条件下实现净收益。市场经济的“外部性”造成的农业困境，不可能被因“在地化”造成资本沉淀而没有流动性可言的农业产业化自身的制度改进和政策调整所改变。“地板顶破天花板”——国内农业成本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就是农业资本化导致制度创新能力低的客观结果。[262]推行产业化农业18年来，现代化程度越高就越体现资本深化，所造成的银行负债和财政补贴也就越沉重。

传统乡土社会中，学田、河田、庙田、族田等在性质上属于不同类型的村社“公地”，主要用其对社区内部成员出租的收益来维持农村内部的基本公共品供给，因而并不存在根据西方个体理性为依据来批判的所谓“公地悲剧”。若从财政社会学的视角看，这类以社区为产权边界的共有土地内在地发挥着“社区财政”的载体作用。可见，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村社公地”，是将成员个体财产的一部分被村社组织集中占有收益用于公共品供给的一种制度化安排。

这种维持内部公共品的制度安排，是东亚地区“日韩综合农协”[263]模式长期存在的依据之一。但在当代中国，则主要是仍然维持乡村集体经济占有部分土地用于出租的村社存在。其制度收益最大化的作用表

现，就是外部性风险的内部化处置，[264]这个非常重要的、支撑村社理性的“内部化机制”，不仅使得村社共同体能够实现个体农户无法达到的风险弱化，而且也是中国城市资本池风险累积演化成危机、代价因向乡村转嫁而多次实现“软着陆”的制度基础！然而，这个制度基础近年来被摧毁，中国当期爆发城市资本危机就势必“硬着陆”。

2.危机“软着陆”的乡村基础被摧毁的客观过程。

农村组织化程度最高的是农业集体化时期，其与“日韩综合农协”模式相似，在于土地的社区财政功能发挥到最大，也使得国家的支农建设投资能够效用最大化，中国以占总财政支出10%左右的水平，建立了财政公平性国际排名第一的、多维度、广覆盖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和维护体系，兴建了一大批至今仍发挥体现“正外部性”积极作用的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

之所以集体化时期农民收益低，主要问题不在农业组织，而是剩余长期流出、被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占有——集体化作为国家推进资本积累的手段，一是通过以乡为单位的数万亩规模农业，直接占有工农产品不等价交换中内含的剪刀差，借此获得大量剩余；二是国家在大型基本建设中成规模占有农村劳动力来替代极度稀缺的资本；三是把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发生的巨大制度成本（如数千万失业人口）从城市转嫁到农村。[265]

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完成，政府财政主要源于城市工业以后（1978年85%以上财政收入源于城市工业），在累积赤字危机爆发的压力下客观地发生了放弃集体化——农民去组织化的大包干。[266]

首先是社队集体作为经济主体长期缺位、完全没有话语权的条件下，只被允许“合法”地留下5%的机动地。在很多地方“分光吃净”的情况下农村基层公共开支普遍高负债，使得局限为农业用途的农村土地不再具有社区财政的功能。

土地增值收益最大的部分本来是农村建设用地，凡具有集体化制度“路径依赖”特征的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大都具有三大目标：第一是社区成员就业最大化，第二是社区公共开支和福利最大化，第三才是追求企业利润，这说明了乡镇企业的社区财政取向[267]，而乡镇企业收益的三个主要来源之一就是土地农转非的资本化增值收益，土地涨价

归公（社区集体）的理想（国家政治化的基础）在维持集体化的农村社区是普遍实现了的。

但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村社土地的农转非权限被以国家名义强行上收至各级地方政府，城市土地则实质性地改变全民所有制属性归于各个城市政府及其利益部门。因而，1994年分税制改革引发的新一轮“圈地运动”，标志着土地的功能由支持“社区财政”转向了地方政府财政（新世纪以来则进一步转向地方金融），意味着农村土地收益权由基层社区上提至地方政府，从而不再具备反哺社区的功能，村社集体的交易地位当然也随之下降。

其次，由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城市倾向，大约70%乡镇企业在私有化改制中破产或倒闭，随着能够提供农村公共品的集体经济坍塌，农村缺乏吸纳劳动力的经济场域，加上国家在1998年生产过剩大危机压力下连续实行多个大规模基本建设计划，使劳动力市场在2003年以后出现10年需求旺盛，从而非农就业市场的劳动力价格飙升。于是，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打工，一方面抽空了农民合作的另一个收益来源——劳动力租，另一方面，造成农业劳动力也被“外部定价”。结果，农业因不可能支付城市工业的劳动力市场化价格而出现越是产业化越是难以维持的“农业产业化困局”。

大约延续了10年的所谓“人口红利”，其实是农村劳动力随宏观经济波动被间歇性的从农业部门抽调到城市部门[268]，因“劳动力再生产”成本长期留在农村内部而使得外部的城市工业劳动力低工资得以长期维持。亦即：劳动力外部定价使农村的劳动剩余被城市资本部门占有，也就导致农业自身不能形成资本积累。而且，农村居民的劳动投入也开始参照城市预期打工收入，农民为了追求收入和闲暇的效用最大化而选择“被动闲暇”，导致粮食种植面积减少和农业劳动生产率降低，这种符合市场经济的“理性小农”特征逐渐强于“生存小农”，成为导致我国农业主产品价格“地板高于天花板”的一个重要因素。[269]

更为深远的影响还在于，这种情况下的“半农半X”，因为有对外出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完全定价，外出劳动力回到本村，一般不再秉持基本的农户理性，也不再是一个对村社理性起积极作用的因素，反而会不断加速“小农村社制”的解体。这意味着两个机制性改变：其一，以外部市场作为诱因所产生的破坏性因素，既可以被内部化机制处置，也可以是负外部性因素进入，破坏原来的内部化机制；其二，外出务工的劳动力

因被外部市场条件完全定价，即使回到乡土社会，也不会选择继续下地干活，处理粮田，也就不能为家庭综合安全打造一个粮食安全基础。本文据此指出：在外部市场作为诱因、外出劳动力作为中介的条件下，市场竞争逻辑被大多数在地化农户接受，也被村社成员在处理内部关系时所接受时，小农机会主义势必由此发生。于是，就有了当前农村中出现的各种乱象。因此，在乡村“去组织化”改革30多年之后，乡村几乎全面地进入了“有组织地不负责任”[270]的状态。

此外，农业生产及农村基本公共品供给中不断演进的“资本深化”及其配套的制度安排，使得过去依靠大量劳动力投入才能开展的一些关键环节，如水利设施建设与维护、农村道路工程等，普遍承包给专业工程队；加之化肥、农药、薄膜、机井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使用，也降低了个体农户对于集体协作的依赖。只有在那些自然条件恶劣、现代化设施及招投标制度还没有配套使用条件的地区，一些关键的生产环节还保留着邻里互助的做法。

综上所述，乡土社会在外部压力下的机制性改变，使得“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的村社理性在大部分农村地区已经被破坏。由此，中国乡村碍难如以往60年那样，再次作为城市危机代价转移的载体。所以，此次危机在城市“硬着陆”随之引发社会冲突，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

三、城镇化中的“无风险资产”[271]是重构宏观经济“软着陆”的基础

1.近期加快城市化与地方“以地套现”债务链危机。

客观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激进发展主义政策导向，促进了资本与风险同步集中的城市化过程，已经逐步演化成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或土地金融为杠杆撬动的房地产泡沫化，及其与金融扩张同步的发展路径。某些政府负债程度较高地区，采取“农民集中上楼”等更为激进的、消灭农村的方式，来获取“增减挂钩占补平衡”指标在土地市场上交易得来的政策差价，就是因为地方政府以土地抵押从银行套现的空间不够了，只能以差价抵付利息来阻止“以地套现”累积的债务链条立即断裂。

这种饮鸩止渴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地方政府债务陷入越来越严重的

恶性循环。

与此同时，由于资本这个龙头要素过度集中于大城市，而势必带动其他要素也流向大城市，遂致东部地区发生“产业集群叠加于城市带之上”造成的污染恶化，同时中西部县以下的“三农”衰变，弱化了中国经济抗御外部性风险的乡土基础。也就是说，原有能够实现宏观经济危机“软着陆”的微观机制性基础，已经随着外部制度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改变，在当前宏观经济下行趋势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大量失业劳动力很可能无法再如从前那样顺利回流，由此导致经济危机“硬着陆”在城市并引发冲突的风险与日俱增。这与很多发展中国家堕入“城市化陷阱”难以自拔的教训基本雷同。

2.城镇化与城市化的战略差异。

然而，随着2005年中国针对“三农”问题严峻而在“十一五规划”中确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以及提出“县域经济以城镇化和中小企业发展为主要依托”的指导方针，局面本来可能根本改观。因为这本身就内含着一系列的政策反思和战略调整，既不同于一般西方话语中的城市化概念，也不同于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超前发展大城市和产业集群的投资导向。

我们从1995年就把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战略与从殖民地国家照搬来的城市化道路相比，10年间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认为，中国在2005年自主提出的“城镇化”[272]战略更多呼应了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这一国情矛盾，既能为延缓生产过剩危机爆发而构建县域经济这个“第二资本池”，也能在巩固农村“劳动力蓄水池”的同时分散和弱化城市内生风险。

为了防止中国作为产业资本第一大国遭遇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本来应该主动采取逆周期调节，而且本来也还有自主创新的时间和空间条件。

但，由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的外部压力，中国实际上仍然沿着激进殖民地国家的城市化道路演进。到2013年经济下行明显急于寻找投资空间之际，据估计，一个农民转为市民至少需要国家综合性投入20万。于是，官方认同了2亿农村人口进城带动40万亿投资需求的说法，这就意味着又从“城镇化＋中小企业＝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思路，退回到了在发展中国家教训惨重的“城市化”……

3.城镇化战略及成员权联合的合作经济能够缓解城市阶级矛盾。

需知，“城镇化＋中小企业＝县域经济”，既是中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双过剩背景下，把本来的被动选择转化为主动做逆周期调节的比较制度优势，也是在宏观经济下行趋势加剧导致劳资之间阶级矛盾日益紧张背景下的政治上的主动而为。与西方市场资本主义体制下势必出现的阶级斗争相比，中国在竞争中应该延续的比较制度优势，本来是国家以政治强权向中央掌控的金融和财政这两大体系做信用赋权，直接推动财政的债务扩张和金融的货币信用扩张，以此来垫付县域经济或中心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本。

国家的这些城镇化投资，虽然也属于不可回收的“沉没成本”，但却可能成为城镇化发展的无风险资产，有效降低中小企业落户城镇的机会成本，形成县域经济的中小企业进入城镇、带动非农就业的集聚发展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在沿海去工业化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强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能够在县以下城镇创办中小企业的潜在主体，恰恰是那些常年在外务工并且积累一定现金的返乡务工人员。由于常年在外务工，其劳动力价格已经被外部工业市场定价，即使返乡，也不愿意从事收益率过低的农业。

由此，有必要加强对打工者返乡创业和创新的激励政策。而以国家信用投资作为杠杆撬动城镇化发展的制度安排，在经济下行的趋势下不仅可以缓解产能的长期过剩压力，也可间接实现返乡务工人员由小土地所有者向小业主所有者的身份转换，客观上也符合返乡务工人员的主观愿望，进而有利于弱化日渐对立的劳资之间的阶级矛盾。

为此，作为配套的制度安排，还应由中央和省两级财政主导增加县域经济和中小企业专项投资；同时通过税收、金融、技术、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既鼓励农民提高组织化程度发展合作社经济，以此为基础来构建小城镇必需的、只有低成本才能运作的“良治体系”；也为那些能够与城镇化相结合的外出农民“返乡创业”和本地中小企业降低进入门槛和经营成本，保护中小企业在县内城镇的生存环境；同时创造对等的自主谈判条件推动中西部城镇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可资借鉴的改革促发展经验是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崛起，同步带

动农村建制镇的增长：1978年建制镇只有1800多个，到1995年建制镇增加了10倍多，达到2万多个。同时，1995年县以下工业增加值占全国54%，被誉为半壁江山。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改革促进的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完全同步的，不仅没有后来发生的维稳和剥夺，甚至没有当今随处可见的上访告状，而且有效化解了1979—1980年的城市经济危机。[273]

4.在地化的资源资本化是从投资拉动型向内需拉动型转变的关键。

单纯依靠国家信用扩张派生的县域城镇化投资打造“第二资本池”，虽然能够有效缓解当前宏观经济下行背景下的产能过剩压力，但如果无法借此激活广大农村地区在地化的资源性要素，使之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则县域经济与城镇化发展战略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国家的信用投资也就成为真正的“沉没成本”，而无法发挥无风险资产的杠杆效应。

尤其是在中共十七大以来反复强调的生态文明的战略导向下，农村地区所有在地化的生态资源环境、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等，客观上都属于“重新定价”的范畴，潜在的增值空间巨大，而且绝大部分的增值收益有可能通过“资源自主”的产业纵向整合被在地化的“小农村社制”成员所共同分享，形成乡村公共财[274]，从而复兴村社理性之“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风险”的机制性基础，同时，这也是真正扩大中国内需消费能力的有效路径。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最新研究成果，在不包括国有农场、国有林场等全民所有制单位占有和使用的资产前提下，2012年中国农村总净资产大约为127万亿元。其基本特点为：第一，集体净资产占农村总净资产近70%；第二，土地净资产占农村总净资产的近70%；第三，集体净资产中归个人经营和使用的部分占到80%以上；第四，全部净资产中归个人经营和使用的部分占到80%以上。[275]这仅仅是一个近似估值，中国面广量大的农村地区的资源性资产存量远多于此。

但是，客观困难在于农村地区处于分散状态的资源性资产很难变现，也就无法实现要素资源的定价收益。目前来看，即使变现，溢价收益也主要是被下乡的工商业资本和本地精英所俘获。

已经被无数经验事实反复验证的一个理论判断是：在小农已经成为

分散的、细碎的小规模经济主体的条件下，任何外部主体进入乡土社会都必有交易费用过高的难题。一般情况下，外部主体进入乡土社会通常会选择与村内精英合作来化解交易费用难题，由此，势必导致“精英俘获”，形成外部主体和村内精英之间稳定的合谋关系，亦即：通过“精英结盟”，构建“精英俘获”的制度体系。[276]这也就意味着，要想实现在地化资源资本化收益的公平分配，继而形成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内生性增长动力，其首要前提是先形成在地化组织，才能构建与外部市场主体平等的谈判地位，才能建立相互信任的可维护契约，这才是以合理的契约关系为信用基础的市场经济。据此，保证最大化地留住在地化资源的资本化收益，并以村社成员权为基础进行收益分配，是在农村和城镇构建市场经济及其信用体制的前提。

四、有关政策建议要点及操作方式

上述政策考虑，在操作上应该遵循以下渐进的步骤。

首先，所有在地化的生态资源要素应主要以自然村社为单位（已经以行政村为单位的可不做更改）、以界定成员权为基础完成确权登记，这本来也是最小阻力、最低成本地贯彻中央一号文件、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等一系列中央政策文件的基本要求。生态多样化、文化多样化的资源越多地得到村社为载体的保留，其价值化的预期收益就越大，这个价值化的收益不能都让渡给外部资本投资主体。近年来，之所以没能在地化操作生态化转型的原因，恰恰在于确权登记政策没落实，在地资源的所有权人没到位。为此，应该督促各地政府在加快向村集体签发村社范围内的所有地权（含水面权、滩涂权、草权、林权、山权和建设用地权）和地面物权（包括设施和建筑物等）的所有权证，同时在合法及有监督的情况下，由所有权主体向农户签发与上述所有权相对应的使用权证的工作。

其次，在地化资源资本化的形式一般是成员权的股份化。这是综合性合作社内部以村社成员权为基础的主要财产关系，也是最主要的组织基础。

诚然，由于外部资本除了短期资本收益，还可以享受生态环境的长期溢价收益。这也是生态化三产经济能够吸引外部资本主体的条件。进一步，通过确权之后形成的综合性合作社就可以把价值化的资源做股，形成县级联合社一致对外，通过与外部资本主体平等谈判合组区域开发

集团公司。当以生态资源要素形成股权投资的合作社对外谈判时，就有了合法体现在地化收益的条件，比如某县合作联合社在地化的生态资源经过确权评估的价值化资产为100亿元，若设外部资本主体投资达到上限100亿元，则当地政府只要投资1元，即在亲环境和亲民生的政府法理上可使在地化资本形成控股权。

再次，由于合作社对接政府的财政项目资金及使用经营性资产，乃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新政策，这就使地方政府面对联合社可以相对集中使用财政资金中占比最大的支农开支，直接用于县域经济区域开发集团公司，作为农村合作社资源开发的投入。据此，国家应该通过大部制涉农改革，重点改革条块分割的涉农体制，设立体现普惠原则的“农村综合发展基金”，将各部门分散把持的国家粮食与食品安全、生态与环境安全、社会与文化安全以及美丽乡村与资源可持续建设等专项资金统合起来，作为县级资本金对乡、村农民综合性合作组织持股，一般只是作为资本金，不享受股本分红。同时，将县级政府各单位涉农的金融、保险、物流、仓储、科技、房地产、旅游、餐饮、加工、流通等领域参股纳入综合性合作组织，使产生的经营收益反哺“三农”。[277]其现实目的之一，也在于帮助垫付合作社的前期组织成本，以此作为杠杆来撬动农村地区资源的资本化过程。

最后，全面发展综合性乡村合作社，才能维护危机“软着陆”的劳动力池。一方面自上而下地促进农村金融、农产品流通、社会化服务和教育文化等领域的机构与农村综合性合作组织的有机结合；另一方面，尽可能帮助有社会和文化基础的农民合作社拓展生产、加工、金融、流通、服务等多领域综合性经营。这二者结合，一方面能够充分活跃农民为主体的乡村经济；另一方面，可以借此形成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消费能力，最终实现县域城镇化战略由投资拉动型向内需拉动型的阶段性转变。

第三篇　农业：现代化何以为继？

第十三章　农业现代化的误区[278]

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口号是1956年提出的，1956年提出能源现代化的同时，中国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把原来的初级社升级为高级社，所谓的高级社就是以乡为单位形成数万亩土地的规模经济，我们今天所要达到的目标，在1956年的时候曾经达到过，也就是说当我们以土地规模经营为现在的农业改革和农村制度建设的目标的时候，别忘了我们曾经有过26年的集体化历史，那个时候是以乡为单位集中土地的。所以1956年在农业现代化提出的当年，中国实现了以乡为单位数万亩土地规模经营的这种经营形式，同期提出农业现代化的时候，其实是斯大林主义模式的重工业化的工业，在中国开始生产50马力的拖拉机，我们知道中国成批量地使用拖拉机是1955年。由于工业各个部门生产出的拖拉机不能被农民所接受，因此当时工业各部普遍要求中央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让工业品能下乡，所以这是为了国家工业化从农业顺畅地提取原始积累，而提出了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也就是说当年农业的规模经营和机械化这两者是紧密结合的。

这个话题我就不多说了，今天我们官员、学者几乎不假思索地把农业现代化作为一个发展目标，搬到我们所有的政策报告和学术文章中的时候，大概少做了一件工作，没有去索引这个东西怎么来的。我想每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人应该自己去考虑它到底怎么回事儿。

当前，其实当人们谈农业的时候，已经很难再单独谈农业了，特别是以中国为例，我们从2010年国务院公布的面源污染普查报告来看，农业已经超越了工业和城市生活的污染，成为中国面源污染第一大贡献，也就是说农业造成的污染远大于工业、远大于城市。今天，人们讨论农业现代化的时候，也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农业是我国第一大面源污染。无论是国内国外的研讨会，也没有见到谁把这两者做结合分析的。殊不知，其实在三四年之前，中国农业还是一个正外部性的行业，也就是说农业是因和自然性状直接结合，是有利于资源环境的保护的，因此叫正外部性。尽管农业自身没有收益，但是它却有利于资源环境的保护。同时此前我们说农业的第二重正外部性是它创造食品安全，那时候

几乎听不到有今天这样的食品不安全事件或者说叫食品质量事件。

尽管农业过去可能有所谓“不现代化”的问题，但它和资源环境之间的结合是正向的，也就是说它不创造负外部性。现在当然我们把它叫作创造双重负外部性，一重是严重地造成了资源环境的破坏，特别是污染，江河湖海水资源的污染、土壤的重金属污染以及大气的污染，应该说面源污染贡献最大的是农业，这是第一重负外部性。第二重是严重的食品不安全。

除了利益使然之外，大多数人都不会觉得自己是安全的，这一点我也不多强调，只是告诉大家农业从原来创造双重正外部性，现在变成了创造双重负外部性。为什么农业的污染，就是农业作为源污染超过城市和工业生活，成为最大的污染源。原因在哪儿呢？

首先在于全球三大资本都过剩。第一大资本过剩毫无疑问是金融资本过剩。现在各地政府都是张开双臂欢迎招商引资，高喊着一个口号——投资者是本地的主人，资本毫无疑问是要追逐利润的，那么在资本过剩的条件下呢？人们很少做这样的讨论，特别是我们农业界的人士，包括农业院校的教授，我看了大量的论文，几乎没有哪一位讨论：在资本过剩条件下，农业与资本之间的关系。

举一个例子就明白了，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的奶产业遭受了摧毁性的打击，也知道连带发生了政府的信用危机，现在无论政府怎么出面说“我的奶业没问题了”，老百姓就是不信。这样严重的问题，谁也想不到本源于什么？本源于一笔不到5000万美元的热钱，拿到这笔热钱的那位著名企业家，当然今天他已经不做奶产业了，去改做公益了，于是乎，坊间有一个段子：你不做奶产业就是最大的公益。

大家知道热钱现在横行于世，热钱横行于世为什么会影响农业呢？当然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在欢呼着某个玩儿热钱的大型投行，要玩儿中国的猪，要在中国建猪厂了等等，所有媒体都几乎在那儿欢呼。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曾经有一笔不到5000万美元的热钱是如何摧毁中国奶产业的。那就是拿到一笔钱根本不用，因为热钱要求短期回报，是不可能先去做草场和基地建设、养殖户的培养、奶站的建设、加工企业以及宣传推广等整套产业的投资，是需要多少年不断地投入才能形成的。但是热钱会怎么样呢？掐终端。

建一个现代化的奶业加工车间，请领导人来看这叫农业现代化，但是有谁算过这一个加工车间的产量和这个企业总销量之间的关系？大概连它的总销量的十分之一都不到，那90%哪儿来的呢？抢奶站的奶源，只要抬价就行了，因为反正有一笔热钱，这样一抢购奶源，就把整个奶业市场搞乱了，那些辛辛苦苦培育草场，帮助农户上奶牛，甚至帮他贷款、帮他担保来养奶牛的那些企业全完了，于是乎大家一起跟着三聚氰胺造假，奶产业毁了。这个人赚得盆满钵满，被我们媒体一捧捧成了企业家明星，现在转行做慈善了。

这个故事我想没有任何政府部门、研究机构愿意好好地把它研究清楚，作为一个个案提交给你们，有没有研究呢？有，只不过我们现在的高校和政府部门总是有选择地使用研究材料，因此这个问题至今不能解决，出了多少文件解决不了。类似的情况难道不是比比皆是吗？

第二，当我们说到产业资本过剩的时候，应该知道那比金融过剩还要早，中国什么时候发生产业过剩的呢？是1998年，当时是由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家给中央写报告，说中国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的情况下，已经表现出生产过剩的问题。什么是生产过剩？只要上过高中就应该懂，高中政治课本都写着的：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我不用重复课本了，只是告诉大家生产过剩发生会怎么样。当然也就在1998年，在生产过剩发生的当年，中国推出了农业产业化，为已经在过剩阶段的工业资本、工业产业找到进入农业拉长产业链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在1998年之前，大家很少听到有成规模的食品不安全事件，1998年以后短短十几年过去，大概也就是15年的时间，我们几乎每年都会有成规模的食品不安全事件，以黄浦江漂猪为例，我们看到多少了，为什么？因为如果在它的上游浙江某个地方，那儿据说是700万头生猪的年产量，那正常死亡率在规模养殖条件下是多少？最低是3%，700万头、3%是什么概念？一年有21万头猪死掉，农业部的官员一拍脑袋发展工业养殖，卫生部官员另外一拍脑袋要搞焚烧和填埋处理。

如果按照8%的正常死亡率，56万头，那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请问卫生部的官员，你让他上哪儿填、上哪儿烧？烧一头猪比烧一个人贵得多，一年烧56万头猪吗？所以政府官员脑袋拍扁了能解决问题吗？没有人从根本上找原因。在政策理论界，至少在工业领域中我们已经找到了原因，今天中国之所以出现严重的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乃至于1998

年、1999年发生了生产过剩，为了防止生产过剩引发危机，我们这十几年是以远期过剩来掩盖当期过剩，那就是要继续扩大投资，所以我们现在变成典型的投资拉动增长，连续增长十几年。

当然我们可以说现在仍然是风景这边独好，经济一枝独秀，我们继续保持着投资拉动型的高增长，笔者可以微笑着说这些话，但是内心深处能笑得出来吗？当这种产业过剩直接进入农业的时候，会造成什么？难道不会造成类似的问题吗？十年之后当我们看到一份联合国组织54个国家的专家做的粮农组织报告的时候，我们又是有选择地借鉴，我们让这样的声音完全不在中国有动静。全世界如果按人均健康所需要的卡路里来计算，农业的产出量，农业产出过剩三分之一，之所以还有饥饿国家、饥饿人群，那是制度不合理，有谁说过农业过剩吗？

那好，我给大家说一个数字，世界上80%的大棚设施农业集中在中国，中国种植出多少蔬菜呢？全球67%的蔬菜是中国人种植，人口却只有世界的19%，那你消费世界上多少蔬菜呢？至少是平均规模的3.5倍以上，真的能消费那么多吗？不，浪费一半。有必要吗？

再说生猪，中国养殖了世界上一半的猪，19%的人口、50%以上的猪，有必要吗？还有果品，大概苹果的50%、柑橘的40%。我们各地的干部还嫌调结构不够，直到菜贱伤农，我们还认为那只是个别现象，有谁讲过中国也出现农业过剩？所以说，假如政策理论界在1998年、1999年就已经发现了工业领域中的生产过剩，当然这后续的一系列政策安排，都未必那么让人满意，某种程度上是尴尬的。

那请允许我冒昧地说一句：在我们发生工业领域的生产过剩十年之后，其实有人早已经指出农业也存在生产过剩，只不过我们不接受。对中国来说，农业难道不同样存在生产过剩吗？

金融资本过剩，产业资本过剩，商业资本也过剩，因此我们现在农村中的商业环境，因商业资本过剩，而不可能构建一个所谓契约关系，只要是有理性思考的人，就会明白，在三大资本都过剩的条件下，会出现什么？当然是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于是乎，我们所谓的污染问题，当然就得靠国家战略调整。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就已经强调，我们要发展的是多功能农业。2007年我们提出了生态文明的理念。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

提出了两型农业，叫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农业。这几年，慢慢开始强调农业转型，其实转型也要看天时、地利、人和。

其实如果我们把大农业口径做一个区别，你会发现最早实现转型的是大农业中的山区林业，尤其是南方山区林业。从1999年国家把过剩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建设，提出西部大开发的同时，强调了退耕还林、造林种草，1999年到现在，整个山区的植被恢复，森林覆盖率大幅度提升，同时山区的森林经济乃至于制度创新，除了经济创新之外，组织制度创新也在大量发生。所以我们现在看如果和资源环境相对而言比较亲和的，大致有条件朝向可持续方向，向生态化方向走的是山区林业。第二大块儿就是平原农业，但目前来看，恐怕越这样投麻烦越大。

以北京地区为例，我曾经在北京的领导面前提过，如果在北京郊区这种地下水严重超采的地方，也就是说现在的华北，华北几乎大面积都变成大棚，假如说把设施农业放在华北大平原上，其结果就是更进一步严重超采地下水，然后地表沙化和盐碱化，这是严重地破坏资源环境的做法，很可惜在农业领域中，仍然不顾资源环境条件的约束继续这么干，包括大城市郊区，这是严重不可持续的。

所以说农业因为原来的思路没改，不像1999年那次西部大开发，就严格地要求所有15度以上全部退掉，然后国家拿补贴，这样才促使整个山区林业发生了相对而言比较正向的变化，也就是说它开始出现正外部性了，而农业还没有。所以说农业现在和资源环境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这个破坏性就不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而是资源浪费型和环境破坏型，这种状况愈演愈烈。再这样下去，大多数中产阶级移民的倾向可能会越来越强，因为担心子孙后代没有安全感。

再看干旱草原牧业，本来就是每况愈下，照搬了农区的家庭承包制，而把本来很大程度上具有公共性的干旱草原牧区，变成了牧业产业，也要追求干旱草原地区的牧业产业化，这个口号后患无穷，再不调整会越来越严重。如果抓紧调，就像林区那种调整，战略方向性调整，还来得及，否则污染的问题、资源环境的破坏问题将会越来越难以缓解，这是笔者要特别强调的。

接着还得提醒做农商的，想在农业领域中打造自己的产业的朋友，世界农业本来就是三分天下，你们所追求的一般大规模产业只在殖民地条件下才有。比如荷兰的人均耕地面积跟中国差不多，所以荷兰也不能

搞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那种大农场农业。欧洲其实基本上算是小农场农业，所以我们说第一类大农场的规模化大农场农业，只规模存在于殖民地条件下，所以看，北美洲是两个白人国家有大农业，一个是加拿大、一个是美国，原住民哪儿去了呢？加拿大和美国的原住民下降到不到2%，因此有外来人把土地资源占领，真就有了大农业。麻烦就是我们的官员和企业家们，跑到美国、加拿大一看，说那里的大农场真棒、真漂亮，表面看是不错，但你有本事把中国的原住民送进太平洋你才搞得起，否则没有大农业。南美洲也有两个国家有大农业：巴西和阿根廷，这两个也是原住民人口下降到了5%以下，在这种条件下，你有可能实现大农场农业，否则老老实实发展。欧洲是小农场，因为没法跟大农场竞争，所以欧盟财政的40%是补贴给农业的。想像欧盟这样干吗？拿高补贴吧。平均每个欧盟农场一年要得到1.8万到2万美元的补贴，这就是客观事实。并且还得有一系列的壁垒，除了一般的贸易壁垒之外，还得有各种各样的技术壁垒，甚至社会壁垒。比如说讲牛权、猪权、鸡权，如果你的国家不给牛以牛权、猪以猪权、鸡以鸡权，你不符合我的社会标准，你不能出口。就是我不进口你的东西，类似的各种各样的壁垒，欧盟国家因农业规模小，且没有国际竞争力，所以用大量的各种壁垒来保护自己本国农业，这是普遍现象，这是常识，谁都知道。

亚洲小农经济不管你叫什么主义，印度叫资本主义、日本叫资本主义，叫什么主义并不重要，但是亚洲小农长期就是小农，改得了吗？你让印度人、日本人改改，日本现在农业人口剩5%，你们有人说把中国人70%变成市民，农业就变成规模农业了？这是中国梦还是美国梦？听不懂。因为说老实话，你再梦也顶多梦到日本，但是日本只剩下500多万农民人口，那还不照样是户均2公顷左右的小农吗？改了吗？

且不说改不了，看看整个亚洲地区，就是因为亚洲是典型的原住民大陆，外来的殖民者没把亚洲这么大规模的人口减少，反而增加了，那结果就是亚洲农业就是小农农业，小农农业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把各种各样的和农村经济相关的产业，都包装进综合性农协，农民才能在其他的产业领域中获取收益，达到社会平均收入，否则当我们大家都说到粮食安全的时候怎么办？我跟媒体的朋友开过一个玩笑：我说现在只有总理抗旱，农民不抗旱，农民巴不得你旱得再重点儿，然后我坐着没吃的你给我送，反正你得保我，地方政府也不抗旱、企业也不抗旱，真到抗旱的时候就是媒体跟着总理报道一下中国大旱了，他没有道理帮你抗旱。有机制吗？请问地方政府有没有激励机制抗旱，农民有没有激励机

制抗旱？

所以我说现在就是媒体抗旱、总理抗旱，为什么？现在农民的收入靠农业是不可能的，无论把农业怎么绣出花来，让农民的收入增加，靠农业来增收，这一条已经被事实证明，已经在10年以上的时间反复证明过多少次，我们有的官员就是不接受。所以现在实际上不要再想让农民靠农业增收，农民很大程度上靠的是非农领域增收，因此农业主要干什么？既然农民作为生产主体，不能再以农业作为自己收入增加的一个领域，那农业是什么？是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安全领域，所以我们现在讲新“三农”的时候，第一条叫合作农业，农民不合作，搞不得经营主体。第二条是农村，农村是什么呢？叫作稳定农村，或者说可持续农村。第三条是农业，农业叫安全农业。

“三农”不再是过去的农民增收、农业增产和农村发展，那是过去的发展追求GDP的老“三农”概念。

其实只要我们注重东亚小农社会的理性，我们的发展仍然还是有条件的，这点笔者不多说，大家可以查笔者的文章，这都是理论。

我们现在做的实践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在鼓励市民下乡、农业进城，而这其实应该说在日韩、包括中国台湾，乃至在欧洲的一个很普遍的社会趋势，大家都应该知道中国是世界上中产阶级人群最多的国家，现在社科院公布的数字是3.4亿，亚行的数字比这个更高，折中大约有5亿多的中产阶级，一旦中产阶级成为社会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就会导致逆城市化或者说叫去城市化。

所以说在这种条件下，更应关注这个趋势，因为这个趋势带来大量的经济机会，比如说中小资本的中小企业，中小资本的中产阶级，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政策建议，希望开放非转农，我们的政策主流是促进农转非，让城市放开户口，我们说有没有可能让农村放开户口，促进市民下乡，非转农，这样的话城乡之间的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的流动，将会带来农村新的发展机会。

以北京为例，北京周边所有的沟全都被有钱的人包光了，现在到北京找一条沟很难，十年前还有，这十年期间，北京的富人大量增加，他们的钱投向哪儿？房地产，很多人都已经买了很多套了。投哪儿的房地产了呢？往山沟里投了，只要这个沟系有水，这个沟口一卡，整个沟系

生态化。就是在整个生态化的农村改造中，有着巨大的机会，我们以1999年林区的改造为例，不知几千亿元资本流向林区，为什么呢？很多人说投资往哪儿投？北方林区每年林木的增值率至少在6%，南方的林区林木的增值率至少8%，比一般制造业要强得多，南方投快林子，那投资就保险了，别老觉得买股票不行、买房不行、买金子也不行，农业领域中确实有很多很好的机会。

所以说去城市化这个趋势，适应中国中产阶级崛起，它本身对于山区林业、牧区、草原，乃至于一般有点儿资源环境条件的那些地方，都有很大的机会。

第十四章　中国当前农业农村政策的基本问题[279]

我们在承担多个国家重大和重点项目的研究中开展了国内外的调查研究，对造成中国农业困境的内外因提出客观分析，从产业化负外部性角度讨论农业政策的研究导向，并研究了乡村治理劣化的主要问题。兹报告如下。

一、农业全球化困境："地板高于天花板"[280]

中国农业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即从此前的注重生产关系变为注重生产力，此后的农业综合成本平均每年增长约10%，已经出现了粮食的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的"地板高于天花板"现象；进入新世纪则变为以加强投入和调整结构为主，随即出现中国大宗农产品几乎都"地板高于天花板"，在总体上已经没有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由此，客观上难以继续靠传统部门政策来化解农业的复杂困境。

另据陈锡文的研究，"谷物国内价格比国际价格高10%～15%，每吨比国际市场高600～800元，肉类价格更是国际价格的两倍。即使我们使用关税保护，国际市场的价格依然会低于国内的价格"。他也提到收益下降成本上推："去年我们每亩土地的净收益是682元，这里面包括农民自身劳动力的报酬，这个收益水平比前年下降2.4%，而各项农业服务的价格却提高了8%～10%。"[281]

如果从外因看，中国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在总体上倾向于自由市场经济的客观背景，与20世纪西方产业资本战后恢复即遭遇过剩压力急需

对外强化自由贸易制度相似。由于我国农业领域服从产业资本扩张需要而在WTO谈判中被作为让步筹码，政府增加对农业补贴在加入WTO之后已属“红箱”……

从当前形势看，近期多个自贸区协定生效造成低价粮食、油料和畜牧产品进口增加，就可能连带发生国内涉农企业资金链断裂，演化为银行坏账和地方财政赤字增加。对此讨论不足，遑论预做准备。由此，以往“三农”政策的很多争论变得没有意义，无论传统小农经济还是现代产业化经济，都势必遭遇农业全球化的巨大挑战。需要对中国遭遇国际价格“天花板封顶”困境及成因做深入研究。

二、农业困境的内因分析：生产要素被外部定价

人们如今不难看到国内农业成本作为“地板价”已经长期高于国际价格的“天花板”的现象，进一步要了解其内因。起决定作用的内因是中国农业基本要素劳动力、土地和资金都被“外部市场定价”。具体情况简述如下：

劳动力——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大面积关停以来农村已经有两代人外出打工，造成农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占比下降到25%，使农业领域的劳动力要素主要被城市劳务市场定价（普工的日工资150元以上、农业用工最多承受50元）；于是劳动者即使返乡也不做农活。对此，我们在6年前发表的研究成果称之为“被动闲暇”。

土地——各地基层政府和企业由于征地指标有限而一般都大面积租用农村土地搞建设、办开发区，这也造成土地要素已经被外部工商业用地市场定价（县级亩均年租金在1500元以上，而农业用地最多承受500元）。于是土地资源高度稀缺的发达地区出现弃耕撂荒。

资金——银行资金经过影子银行及其他费用添加造成外部市场确定资金价格（中小企业平均利率实际上超过10%，而农业收益远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于是导致农村资金长期净流出。

这种“被外部定价”造成三要素长期净流出而使得农业堕入困境——农业的低收益决定三要素的回报率低于工商业，任何在“一产化农业”领域投资的经营主体都不可能支付被外部二三产业市场决定的要素价格。而任何经济领域只要发生三要素长期净流出就都会导致衰败——这既是

作为经济基础的中国“三农”问题长期化的根源，也是学科化农业教育所缺乏的内容。

据此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部门强调“要素市场化”改革提高农业效益的政策思路，客观上体现了“市场失灵”规律。如果只在农业领域中做微观主体及其运行机制的改革安排，其效果是有限的。近两年不仅农户在农业上的收益连续下降，各类较大规模的农牧企业效益也普遍不好；所派生的趋势只能如工业企业遭遇过剩一样进入恶性循环：一方面更多占有乡村资源获取“资源资本化”的制度收益，另一方面更多套取政府支农资金。

把生产过剩压力下的短期应对政策作为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内涵并且进一步使之意识形态化，意味着中央政府随意性地赋予有关部门利用国家权利为利益集团服务，使得上述恶性循环反过来恶化地方政府“亲资本”政策与底层社会的利益冲突，最终以破坏国家综合安全的基础作为此类政策的代价。

因此，中央政策急需另辟蹊径，如果有条件再次注重宏观政策和农村生产关系领域相结合的改革思路，强调从生态化战略及“多功能农业的三产化”所需要的组织制度创新角度来深化“三农”领域的综合改革，则尚有可能通过相对缓解农业困境来维护基层稳定。

三、农业产业化：背景、实质、成果及其“三重负外部性”

自从1997年遭遇东亚金融风暴使中国遇到“工业过剩”危机以来，如同西方1929—1933年遭遇生产过剩、转而在农业领域全面推进大生产、旋即造成农业过剩的情况类似——中国也主要是商品化率高的大宗农产品生产领域全面推进了工商业资本进入农业的产业化进程，并在1998年成为国家支农政策的主要导向至今已经15年，客观上也发生了农业过剩和农产品大量浪费。

据研究，“农业产业化”在现象上看是农业的二产化——增加设施投入实现车间化生产，而实质则是政府为过剩工业产能开放农业领域，让外部投资主体获得农业资源“资本化”的制度收益。在这个实质的决定作用下，几乎所有外部投资主体都与地方部门交易来更大规模占有农业资源。

农业产业化15年来的经验和教训两方面都值得关注。

积极的结果，一是在化解工业过剩压力的同时加速推进了农业现代化，设施农业为主的农业现代化憧憬初步得到体现。二是形成了一批有规模的涉农企业。三是体现了农业市场化改革的效率，凡商品化程度比较高的农产品产量都大幅度提高。

消极的后果是产业化农业的三重负外部性愈益明显。具体如下：

其一是农业过剩：中国人口占比约19%，相对而言中国农产品占世界产量的比重数倍于人口比重，其中蔬菜67%、猪肉51%、淡水养殖70%、大宗果品40%等。事实上，中国鲜活农产品大部分过剩，社会上发生大规模浪费型消费，增加了物流、垃圾等环境成本和诸多社会问题。近年来，中国产业化龙头企业大部分已经没有盈利可能，其行为与近年来工业过剩压力下的一般企业没有利润、却不得不勉强挣扎恶性竞争的情况几乎一样。

其二是污染严重：种植业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和养殖业的添加剂、重金属等，都造成农业污染愈演愈烈。陈锡文指出，2013年我国的化肥使用量已达5900万吨，农药使用量达到180万吨。遭受中重度重金属污染的土地，已经达到了5000万亩。此外，北方广泛使用的塑料地膜每年回收的不到40%，剩下有100万吨的地膜碎片留在了地里；大量抽取地下水造成地下漏斗的有22万平方公里，主要在华北。[282]这种农业生产模式造成的污染大大超过城市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农业源污染在我国面源污染主要指标中占比在一半以上。并且成为碍难化解的环保瓶颈。

其三是安全恶化：大量食品安全事件演化成为社会冲突。毋庸赘述。

发现农业产业化造成三重负外部性并不是理论创新。根据负外部性理论发现涉农企业及农业部门实际上都不承担责任，因此存在“市场失灵＋政府失灵”，进而导致双失灵条件下的国家治理困境，才是研究中提出的理论创新……

据此可知15年农业产业化期间形成的利益集团对政府部门决策多方面的潜在影响；可知中央政府及时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及转向“两型农业”的重大调整难以在部门政策调整中得到落实的原因。

此外，面对更多新挑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有关政策被意识形态化地讨论着，而至少应该有的政策研究明显阙如。为此，近期需要加强关于产业化农业派生的生产过剩及污染恶化的相关性研究，需要有关于全球化挑战下的负外部性研究。相应地，急需建立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积极配合开展生态化农村经济及两型农业的优惠政策及投入导向。

四、治理困境：交易费用导致“精英俘获”直接影响国家安全

农民全面恢复传统小农经济为实质的家庭承包制，派生了农村去组织化改革。客观形成2亿兼业细碎农户生存于300万千差万别自然村的过度分散状态。虽然本是无可厚非的历史过程；但对于包括政府和企业在内的任何外部主体而言，都有交易费用过高的难题。

21世纪的新矛盾是：政府善意和善举前所未有——2002年强调“三农问题重中之重”以来连续出台惠农政策已经投入约10万亿元用于基本建设及社会福利，但农村群体性治安事件仍然居高不下严重影响国家综合安全。

据多个重大项目研究成果，主要问题是政府多部门分配的公共投入深陷“条块分割，尾大不掉”的体制困境，政府项目下达到基层的本意是普惠农民，但项目资金却有很大部分被精英俘获并与该部门分享“寻租”收益。于是，越多此类增加寻租收益的项目投入，群众对“精英俘获＋部门寻租”的不满就会越多转化成群体事件。

据此看，花钱买不来稳定。需要做相应的综合性政策调整：

一是减小交易成本，弱化精英俘获。政府财政金融的支农投入作为普惠制的公共品只能用于村社成员股份合作制的综合性合作社，所有村域内的资源和政府项目投入皆做集体股，其收益用于增加公积金以促进扩大再生产。由此，能够借综合性合作社建设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形成对外谈判的对等地位。

二是政府支持基层综合性合作社抓好农村经济三产化开发，把外部定价改为内部定价。各级政府应以免税、贴息和财政专项免配套等优惠政策帮助基层合作社抓好乡村经济和社会各类资源的综合性开发和资本化利用，重点促进合作社在多功能的“两型农业”及农村二三产业的发

展，形成收益反哺一产，利润返还农民股东。

三是在复兴乡土社会文化基础上改善乡村治理。不再强推劳民伤财制造冲突的“村民直选”。除了城市郊区和工业化地区之外不在村级建设过高成本的公检法体系。也不再形式化地强调乡村基层实行党政经分设。应该了解和理解乡土社会千差万别的文化资源和传统社会协调机制，以中央财政专项开支用于各地改善村治试验，重点探索以综合性合作社为经济基础的“乡绅（乡贤）＋村规民约”的低成本自治；同时鼓励党政机关、社会组织、学校和市民群团等多元化外部主体开展经常性下乡，奖励那些有利于城乡融合的支农活动。适时地建立全国农会，公开地与其他利益集团谈判，合法地维护农民阶级的权益。

第十五章　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路径与方向问题[283]

一、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来龙去脉

当中国在21世纪延续性地把农业现代化写进国家战略的时候，很少有人注意农业现代化自1956年以来几次提出的背景以及演变过程。起草文件的同志没时间关注历史，可我们作为从事学术研究、强调客观立场的学者，有责任搞清楚来龙去脉。

以往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主要是来自于西方发展经验：殖民化带来的规模化和工业化带来的产业化。

需知，以“土地规模经营”为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是伴随着西方殖民化产生的。

从16世纪开始西方国家向美洲拓展移民，被宗主国王权授命的外来殖民者政权不承认当地原住民的土地和其他财产权利，甚至不承认当地的人是人。按照西方的教义，不信上帝者没有灵魂，那就不是人，所以殖民者可以大量杀戮当地原住民而不必做有罪忏悔。在占领美洲、澳洲和非洲的殖民者对原住民的权利完全不承认，甚至对基本人权也不承认的情况下，外来殖民者按照在欧洲的传统封建庄园的模式占领美洲的土地，这就有了大规模的农场。在这个殖民化时代的原住民作为劳动者是被束缚于土地的奴隶。因此，当前理论上认定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来兼并土地，形成土地规模经营的农业现代化思路，在历史上并不具有真实经验的依据。

在世界史上，北美和澳洲都是通过殖民化形成土地规模经营的典型——外来殖民者不承认原住民的权利，几乎把原住民赶尽杀绝，据有关资料，殖民化之前美国的原住民8000万人，现在仅剩50多万被圈入保留地。如以世界上最大规模农场为例，主要出现在欧洲殖民者占领形成的大陆国家，北美有两个，加拿大和美国。但是，农场主都不是原住民，而是外来白人殖民者。南美也有两个大农场国家，即阿根廷和巴西，白人占比都很高，白人及其后裔占比达60%以上，白人与当地人的混血人口占30%以上，剩下的原住民不到5%。这两个国家的大农场主也一样不是原住民。再看澳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农场主也不是原住民。

总之，美洲和澳洲的大农场农业的土地规模经营，主要靠殖民化实现。

亚洲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大陆。大部分是小农经济为主。不过，在整个亚洲也有一个国家是大农场为主，即被殖民化了400年的菲律宾；也同样是外来殖民者拥有土地权利，不承认当地人的财产权利，才有所谓大农场。原住民只是农场的包身工。

所以，谁想在亚洲大陆上搞土地规模经营，谁就要先解决原住民的问题。

可见，按照有意不谈殖民化罪恶的西方理论来把中国这种原住民农业作为纯粹经济问题脱嵌于社会，再简单化地作为“第一产业”，试图以推进“土地规模经营”加入全球农业竞争这套思路，虽然主流理论认可，但在原住民大陆确实还找不到符合客观性原则的经验依据。

以中国为例，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即使在市场条件下也并不成集中的趋势，而是人口越多的地方土地越呈村社“共有制”趋势。当1947年解放战争向南方推进到淮河以南要求发动土改配合战争的时候，中央领导中有“农民问题专家”之称的邓子恢就已经发现很多村子无地主，甚至找不到富农。于是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土改暂停两年。据此可见，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前，尽管土地私有，自由买卖，淮河以南的土地集中度并不高。另据笔者在珠三角这一带的调查，1949年之前农村共有制土地以所谓的“公田”“祖宗田”“族田”这些形式存在，很多地方超过80%以上，村社土地共有制的财产关系是以血地缘关系为产权边界的。

当代政府强力推进市场经济30年，在农民大量外出打工的条件之

下，农村土地转让占比也不到30%，相比新中国成立前的地主拥有土地占比还略差些。

倘若超越西方农业经济理论来看规模化农场，还多少可以得到解释：在近现代产业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的制度条件下，工业改造农业的最初内容是农业机械化，那就必然会要求土地规模化，因为规模化才能产生绝对地租总量增加，才能支持机械化的高成本。因此，尽管美苏意识形态是对立的，却几乎在同期——生产过剩大危机的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美国福特主义的大农场和苏联斯大林主义的集体农庄。美苏两国都属于殖民化占有资源、开疆拓地形成的世界最大疆域的国家，它们有条件实现绝对地租增加，以土地规模经济支持机械化，也就有了工业化时期的机械化作为农业现代化内涵的经验。

那么，这种农业现代化在中国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1956年，苏联战略性援助形成的重工业，特别是军重工业为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在中国实施的时候，就应运而生了。但是，苏联模式的工厂生产出来的大型拖拉机没法在农村使用——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主要是1954—1955年在“一五”时期能够生产大型农业机械的条件下，农村还只有20、30户的初级社，接受不了大马力的拖拉机，于是政府工业各部要求中央在农村推进农业现代化，以乡为单位建立高级社。只有靠以乡镇为单位集中土地的集体化才能保障拖拉机站的效益。于是，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作为组织载体，维持了几十年的集体化土地规模经济，使得中国发展出2000多家拖拉机厂。这主要是国家工业化要求搞农村集体化才能让农业机械下乡。同理，大包干平均分地之后形成的分散农民家庭经济不接受机械化，于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数千家农机厂和农技校随即倒闭。

因此，服务于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才是把农业单纯作为第一产业、推行土地规模经济和农业集体化的根本原因。

由此看，1956年工业部门要求的“农业现代化”，不仅比1963年才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早了7年，而且当年的农业部门基本上是持反对意见的。以邓子恢和杜润生为代表的领导人向中央提出的建议恰恰是“放慢推进合作化的速度，不要过量侵害小农利益”。他们被毛泽东批评为“小脚女人”。在此之前，梁漱溟向毛泽东提出批评，被客气地称为“妇人之仁”。但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必须反帝反殖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就需要服务于军事装备需求的重工业。那么谁要为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作出牺牲呢？中央多次讨论的结果是只能农民让步。没有

这种高度集中的组织体制，工业化不可能完成原始积累。

于是，1956年全国农业实现了全面的土地规模经营——以乡为单位集中土地，一个乡设立一个拖拉机站，当时建立了9万多个高级社，每个高级社能够集中几万亩土地。例如河北晋州市周家庄乡，是第一个接收大型拖拉机的以乡为单位的高级社，也是大包干以后全国唯一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乡镇。

需知：1956年贯彻的农业现代化对接城市国家工业化，实际上有三大内涵：一是以乡为单位的集体化形成土地规模经济；二是以乡为单位建立拖拉机站，接受城市大型工业品下乡；三是贯彻城乡产品不等价交换、获取剪刀差，用于城市产业资本原始积累。

中国实行以乡为单位的大规模经营，从1956年开始维持到1961年，这5年确实实现了第一产业的农业规模经济。所以，今天的学者们再无知也不要讲中国人没搞过大规模农业，不要讲没搞过土地规模经营。

但是，5年后改成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把原来以乡为单位形成的土地规模经营再退回到以自然村的地缘关系作为土地产权边界，重新界定土地财产关系；同时允许农户留下大约15%的土地搞“三自一包”，允许农民搞庭院经济、自留地，还可以搞拾边地、小块地、小片荒。国家政策上推出生产队集体与农户个体的这种“双层经营”，使得农民的小生产可以占有大约15%的农业用地维持家庭生活。

可见，“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早在1961年的那次调整中就已经做到了。

1961年的政策调整的原因，是那5年“土地规模经营配套机械化”为主的第一次农业现代化造成的过高成本，压得农业承受不起。也还因为我国人口太多，不可能像西方殖民化那样把原住民基本赶尽杀绝才有殖民者大农场。相反的却是和平年代中国人口增加，农业的人力成本不可能减小，还另外追加了高价格的拖拉机成本，就导致第一产业的农业现代化的制度成本太高，集体经济承受不起。

若深入分析可知：农业集体化效益低并不是因为农业自身，更主要的是因为农业承受了工业化的巨大制度代价，导致了农村的相对贫困和农民收入过低，遂有以乡为单位的高度集体化调回到以自然村为单位的

双层经营。

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中国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全面封锁条件下进行独立自主的工业化——没有外资，必须靠自力更生。于是，各个公社不仅维持拖拉机站，还要配套建立“五小工业”，把城市产业资本生产的工业品用人民公社体制下乡，然后公社再通过国家金融与统购统销相结合的体制强制从各个大队抽取农业剩余。这样，城乡之间出现了一个城市长期提取农村剩余的二元对立体制，这才是导致“三农”困境的根本原因。

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下设的农村发展所曾做过一个测算，称20多年的集体化期间，城市和工业通过剪刀差的方式从农业提取了大约8000亿元的剩余，而到改革开放之前，国有工业的固定资产总量只有9600亿元，那就意味着80%是从农业提取的。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的严瑞珍教授测算，大约也是在7000亿～8000亿元。孔祥智教授通过测算，认为新中国60年期间国家从“三农”占有的剩余总量是17.3万亿元。并且，到现在仍然没有完全改变从农业占有剩余的发展模式。

当我们说新世纪农业现代化遭遇的种种困境的时候，人们很少去注意背景，就是当年工业化原始积累所形成的向“三农”转嫁代价这套制度至今仍然在延续。新农村建设以来，国家已经向农村投了约8万亿元，但仍然不能抵偿已经从农村拿走的17.3万亿元，何况每年征占土地和劳动力也有上万亿价值净流出。

也就是说：以农业现代化为名，“三农”向国家现代化、工业化做了巨大的贡献。农业现代化是一个长期从“三农”占有剩余（或者说是提取剩余）的过程。

这样解释并不是批判农业现代化，只是说由于中国不能像西方人那样通过对外掠夺来形成自己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那么在这个约束条件下以农业现代化为名采取了对内的内向型积累来实现工业化。

二、第二次农业现代化的高潮发端于产业资本遭遇“生产过剩”

第二次农业现代化的高潮是从1998年开始的。其背景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工业对外的出口订单大幅下降，出现产业过剩危

机。如同1956年的第一次农业现代化是工业部门的要求一样，这时候，产业领域中收益下降的企业家们就要求产业资本进入农业。当年开“两会”的时候，有30多个代表联名写提案要求大型工商企业进入农业，理由仍是“促进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的技术含量”“延伸产业链”，以使得农业产业综合收益增加等等。于是，政府赋予优惠政策使他们得到农业产业化的资本收益。

第二次农业现代化之所以被官方称为农业产业化，因为其主要是城市资本下乡以产业方式对农业做车间化的改造。由此看，已经不再是第一次农业现代化时的形式：当年主要是工业产品下农村，搞拖拉机站及其配套的五小工业；现在则是各地推进设施农业和产加销一体化，使工商资本占有全产业链收益。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第二次农业现代化高潮，试图把土地兼并变成企业资产，同步把农民变成农业工人占有其剩余价值。诚然，这也是各级政府招商引资要做的事情。其实质是使农业去资源化而实现资本化。因此，这是原住民农业遭遇本土资本进入带动的资本深化过程。

第一次和第二次农业现代化过程，本来也无所谓对错好坏，只是国家产业资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改造农业的两次客观经验。如果说第一次农业作为第一产业的土地规模化经营，确实有利于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那么第二次工商业资本下乡促进农业产业化，则确实有效地提升了农业的装备系数和技术贡献度，使得全世界大约80%的大棚建在中国了。

若从这次大力推进农业二产化高潮看，中国农业现代化几乎是世界之最。我们的农业产量在这次产业化改造之后，很多农产品产量达到了世界第一。

比如，中国是世界第一大淡水养殖生产国，占全世界70%的淡水产品；世界第一大蔬菜生产国，占全世界67%的蔬菜产品；还有全世界51%的生猪、40%的柑橘和苹果等，但中国人口只占世界的19%。也就是说大宗鲜活农产品的人均占有量中国都是世界2倍以上。

这就造成了农业过剩、效益下滑。按现在测算，中国人口增长最多是15.6亿，就是说现在13.4亿，未来最多再增加2亿人口。中国现在浪费的粮食够养活2.4亿人，那也就意味着不用再追求粮食增产，只要别浪费就足够养活中国人了！这也就是说：粮食其实是已经过剩了。另据有

关部门测算，蔬菜浪费在一半以上。中国以这么有限的资源生产出世界最大规模的农产品，却浪费掉很大一部分。现在每年浪费掉的农产品价值几千亿元，大大超过国家财政的种粮补贴。

还有生态破坏的问题，甚至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农业资源破坏最严重的时期，无论对水资源、土壤，还是对大气，这三大农业基本资源的大规模破坏主要发生在这个阶段。到现在为止，越是农业现代化程度高的东部发达地区，污染越严重。土壤的污染高达40%以上，大城市郊区44%，水污染也在40%以上。因为越是发达地区政府赋予更多优惠推进所谓二产化的农业现代化，就越是发生资本替代劳动而大规模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因为发达地区劳动力价格早就提高了。

结果，就是农业的双重负外部性。第一重，资源环境严重破坏；第二重，食品质量严重的不安全。各地政府都愿意让大家看好的项目，比如说当地是百万头猪的农业大县。可是百万头猪每年正常死亡率是5%～8%，百万规模养殖的一个结果就是一年要死5万～8万头猪，大部分都是死猪产业链处理掉的。这样不可能有食品安全、环境安全。

2011年国务院公布全国面源污染源普查，农业成为面源污染贡献度最高的行业，远高于工业，远大于城市。农业在总磷的贡献上高达67%，总氮的贡献接近60%，这些污染确实是农业产业化派生出来的。山东诸城作为最典型的农业产业化县级市，农村几乎被大棚全部覆盖条件下的土壤已经完全丧失有机质，甚至毒化了。

这不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这种农业现代化生产方式也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第一次农业现代化被我们叫作一产化的农业，走了5年就基本上走不下去了。第二次农业现代化被叫作二产化的农业，1998年提出到现在也走了15年；再继续沿着二产化道路还走得下去吗？我看这两次都会走到头的。诚然，这两次农业现代化的经验很丰富，但也有很多教训。不仅是中国这样，欧美在20世纪30年代先工业过剩后农业过剩的规律现象也类似。我们只不过对产业过剩认识不足，更不要提对农业过剩的认识难以被接受了。

三、第三次农业现代化主要是“三产化”的农业现代化

第三次农业现代化，应该是一二三次产业相融合的、三产化为主的农业现代化。而不是过去曾经有教训的那种单打一的追求一产的规模化、二产的车间化。

那么三产化农业是什么呢？务必实质性地体现“三农”问题重中之重的指导思想，大方向是生态化。这不仅符合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两型农业，即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也符合十八大确定的生态文明发展战略。而且，中央强调其他几个战略都要和生态文明发展战略有机地结合，应该以生态文明发展战略为主导来统筹其他发展战略。我们感到，这是新一代领导集体对世界文明作出的重要贡献。

需知，传统农业本来就是生态化的，我们只不过是经历了两次比较单一的、经济“脱嵌”于社会文化的农业现代化。

中央政府在2006年的一号文件中提出了农业是多功能性的，2007年的十七大提出了生态文明，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文件中就强调了2020年的农业大目标是实现“两型农业”，即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农业。

国际经验表明，两型农业必有一个重大变化：农业从单纯强调农业经济资本化而脱嵌于社会，转变为“回嵌”社会，只有农业社会化才能生态化。

因此，第三次农业现代化的主要特点，应该是生态文明理念之下的“三产化＋社会化”。

如果1998年是二产化农业的开端，那么2008年应是三产化的第三次农业现代化的开端。

但是，中央提出的方针并没有在有关部门得到贯彻落实。由于大量利益群体浸淫其中的坚持，实际上不可能做投入政策及相关优惠政策的调整，也就难以服务于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文明战略，也没有贯彻2008年就确定的两型农业的发展目标。

终于，到2015年1月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相对地涉及了三产化农业的指导思想……

为什么应该叫三产化农业呢？就是因为每一个产业层次会带来对要

素的“重新定价”，亦即所谓产业升级的内生增长机制。三产化农业对要素重新定价所产生的增量收益，大大高于二产化农业对要素定价增加的收益。

早期的中国政府在经济欠发达条件下把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来发展，就要靠多投入土地来匹配拖拉机的应用，才能多生产粮食，这是一产化农业生产力外延扩张，追求规模经济收益。而在工业化后期的二产化农业，则主要是把农业装备系数提高，这就要按工业要素来定价农业要素；但农业产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按工业的产品定价，于是要素价格上升就导致农业成本上升，大量农业用地被二产化后盖上了大棚，还得把农民当成雇佣工人来支付全额工资加社保，这样的农业产业化企业现在纷纷找政府要补贴，否则还不了贷款。因为大规模生产出来的产品多了，价格只可能下降，但要素价格却都得按二产定价，企业就亏了。

比如，现在到农村去办产业化企业的时候再对农民说“每亩地500斤玉米把地租给我，一租15年”，农民还会干吗？早就不干了。农民会参照工业用地的地价地租向投资者要钱，一般城市郊区每亩地每年租金要超过1500元，甚至2000元。过去说500斤稻谷或是500斤玉米就能解决了，现在得要1000斤，否则农民就不愿意把地租给企业。这是因为土地要素价格被二产定价，大量出现工商业和房地产占地而导致土地要素价格显化；于是，很多当年大规模租地的企业都亏了，因为农民重新要价。企业说已经签了合同，应该按500斤玉米支付地租，但农民人多不遵守合同，企业也没办法。

其中的道理，制度经济学讲得很清楚：当你面对的交易对象大到一定量的时候，就会由于“交易成本”过高而使交易无法进行。一个企业面对着成千上万农民（农村人均1亩多地，企业占去了1000亩地，就要对付1000个农民，要占10000亩地，就要对付上万农民），怎么付得起“交易成本”？

为什么现在大量二产化农业项目出现纠纷，主要是因为产业资本进入农业必然造成资源要素被重新定价。

那么，能够以三产的要素价格对农业资源要素重新定价的三产化的农业现代化，就应运而生了。这是因为中国有个基本变化：崛起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中等收入群体）。企业家群体和政府中层以上干部都

属于中产阶级，其消费特点要追个性化。比如现在网络这么乱，想用传统意识形态来控制网络做不到，因为中产阶级靠网络来表达个性化的言论。同理，中产阶级在农业产品的消费上也是个性化。如果研究市场消费，一定要知道什么类型的农产品所对应的消费主体是什么。

那么，中产阶级在中国有多少呢？中国已经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约为5亿。如果按照亚洲开发银行的数字，中国有8.17亿中等收入群体，而中国社科院陆学艺先生曾做的经济分析研究是有3亿多中产阶级。亚行和陆学艺先生的两个数取其中就是5亿。是美国中产阶级的2.5倍，欧洲中产阶级的2倍。这是非常巨大的消费需求。现在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已经占比很低了。中产阶级不愿吃大路货，但其食品消费也是理性选择，首先是要安全。不会接受地沟油、转基因，以及那些产业化条件下的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的农产品。这个群体到处找安全食品，愿意出高价。

客观上看，安全是全世界中产阶级消费的共性要求。为什么欧洲绿色主义兴起，是因为欧洲是中产阶级个性化最强，安全需求也是最强的，那就带来了第一需求——安全农产品的需求。而我们这种大规模的产业化农业能有安全产品吗？谁都知道不可能，就像刚才讲到百万头猪的农业大县，能安全吗？

因此，21世纪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如果再用工业文明时代的观点、思路、政策来推进“三农”发展已经过时了。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郊区有了一些市民农园。市民农园主要起什么作用？就是保障食品安全。虽然那里的农产品价格贵了点！2008年，我们认为第三轮农业现代化是“三产化＋社会化”，于是就开始了市民农园的试验。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我们就跟北京市海淀区政府签订合同，搞社会参与式的三产化市民农园。

在第三次农业现代化阶段，三产化农业会把一、二、三产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用三产对农业要素和产品同步实现重新定价，使农产品价格能够达到三产水平，而且我们主张“农业进城、市民下乡”，使城乡对立转化为城乡融合，形成农业一、二、三产有机结合的社会基础，通过社会化才能形成最低成本的安全保障。这才可能是一个相对投入产出合理的农业现代化。

之所以提出社会化，也是由于中国21世纪大量崛起的中产阶级对农业消费的要求除了安全，还有乡土文化的复兴。中产阶级的乡村旅游也比较具有个性化特点，不会愿意跟着产业资本时代风行的那种把旅游资源作产品的旅游团，而是更喜欢个性化的农家乐，消费讲究“四洗三慢”，即新鲜空气洗肺、山溪清泉洗血、有机食物洗胃、乡土文化洗心，以及慢食、慢城、慢生活。现代都市人向往的乡村农业生活，导致阳光、空气、石头等千差万别的乡村资源环境都成为生态文明时代可被三产重新定价的要素。

总之，21世纪生态文明新时代与中国的中产阶级崛起，意味着有山水风光和有机农业资源潜力的地区都将成为中产阶级下乡和中小资本投资的重要领域。各地政府要抓紧对农村集体土地和农民宅基地的确权，推进资源性资产的股权化和产权的本地化，进一步形成农民股权联合的综合性合作组织；这样可为吸引市民下乡打好财产关系和组织制度基础；同时抓好信息化时代连接个性化需求的网络化的城乡互动，为城乡融合的农业三产化发展创造条件。

第十六章　农业“三产化”阶段的制度创新[284]

2015年1月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了我国农业现代化面临的重大挑战，同时强调要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道路，由生产导向转为消费导向。这对于以往更多注重“二产化”的农业产业化而言，是更为丰富的“三产化”发展的创新思维。

一、农业现代化的阶段性政策演化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我国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政策演变先后经历了“一产化”“二产化”两个阶段，现在进入消费主导的“三产化”新阶段。

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战略方针是1956年正式提出的，主要是在国家工业化背景下推进农业作为第一产业的基础性发展，目的是通过扩大土地规模化种植实现农业机械化，促进工农两大部类交换，巩固工农联盟，完成从农业农村提取城市产业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性任务。为此组建了高级社，以乡为单位集中土地以承载拖拉机下乡。这可称为服务于城市工业化的农业“一产化”阶段。1958年，农村集体经济在发展和更

名为“人民公社”的同时，国家把涉农的中小企业权利下放到乡镇级，大办“五小工业”，以承载更多城市工业品下乡，有效地提升了农业的装备系数和技术贡献。20世纪90年代的“农业产业化”，最早形成于山东潍坊等地商品化农业发展经验，主要是借鉴泰国正大模式的“公司＋农户”推行“产加销一条龙”。

但1997年确立农业产业化之后的改革安排，包括全面上收涉农的第三产业。金融业方面的主要措施有：1998年农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的法人地位被提为国家一级，信用社法人地位被提到县市级。与官方金融保险等高端三产退出农村几乎同步的是高利贷崛起，农业承受双重风险的情况更加严峻。这导致了“二产化”困境。

二、农业产业化面临重大挑战

一是根据“要素再定价”规律可知：由于符合农村外部资本要求的土地规范流转的占比很低，导致能够用于支付农业资本化的成本所必需的绝对地租总量并没有明显增加。就在同期，加快城市化造成农业生产力诸要素更多被城市市场重新定价，在这种“外部定价”作用下的农业“二产化”所能增加的收益有限，根本不可能支付已经过高且仍在城市三产带动下攀高的要素价格。于是，农村的资金和劳动力等基本要素必然大幅度地净流出。劳动力老龄化更表明，农业竞争力丧失殆尽。这说明，中国并不例外于东亚各国农业现代化都遭遇到的普遍困境。

二是根据“资本深化”规律可知：农业产业化内涵性地体现着“资本增密排斥劳动”，即同步带动农业物化成本的不断增加。改造传统农业带来的相应后果，则是在过去兼业化综合性村社合作社经济通过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条件下，大部分的经济作物、畜禽养殖还能产生附加值，可是，一旦交给产业资本开展大规模“二产化”的专业生产，就纷纷遭遇生产过剩；单一品类生产规模越大，市场风险越高。如今，一方面是倒掉牛奶、蔬菜烂在地里、水果留在树上的情况比比皆是；另一方面则是在城市食品过分浪费的消费主义盛行情况下，大部分规模化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仍然几无盈利，中小型企业甚至债台高筑，转化成银行坏账。

三是根据“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规律可知：追求资本收益的农业经营都会造成“双重负外部性”——不仅带来水土资源污染和环境破坏，在最难治理的面源污染中，农业的贡献早已超过工业和城市，成为第一大污染源，而且使食品质量安全进一步恶化。正由于“双重失灵”，

愈益显著的“双重负外部性”不断演化为严峻的社会安全成本风险。

这些对中国农业做产业化改制陡然引起的变局，值得在国民经济从高涨期进入新常态之际认真总结。例如，现行体制下国家维护粮食安全的保护价和物流库存补贴等政策，客观上提升了库存占消费的比重，加剧了国内粮食综合成本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矛盾。由此看，需要结合三农综合发展推出制度创新。

三、缓解农业产业化困境的制度创新

农业“一产化”和“二产化”这两个产业化不同阶段的政策，集中体现的主要是20世纪工业文明的发展主义思想。21世纪的中国，在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不断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农业产业化正进入一个消费导向的、附加值更高的阶段，那就是农业“三产化”。

之所以叫“三产化”农业，是因为每一个产业层次都会带来要素的重新定价，体现所谓产业升级的内生增长机制。借用级差地租理论来分析，农业“一产化”只能增加绝对地租，“二产化”增加的是产业级差地租，而“三产化”因极大地拓展了被重新定价的要素范围，带来的级差地租增加将会数倍于“二产化”农业。

具体而言，“一产化”农业强调多种地、多投入劳动，获取的只是农业规模收益。“二产化”农业强调通过投资提高农业装备系数，根据工业要素的市场价格来确定农业领域的要素价格，但是农产品的价格却不可能参照工业产品来定价。这意味着，掌握农业投入要素购销渠道的外部资本，往往具有更大的农业剩余索取权，实际占有了“二产化”农业要素定价过程中所产生的大部分增值收益。而“三产化”农业强调农业的多功能性，在外部金融出现整体性、长期性过剩的条件下，所有在地化的生态资源环境、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等客观上都属于重新定价的范畴，潜在的增值空间巨大；而且绝大部分的增值收益有可能通过产业纵向整合，被在地化的小农村社制成员共同分享，成为农民增收的来源。

当前，中国制造业产能和粮食库存都是世界最高的，有条件进入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的生态文明阶段。乡土社会是生态文明的主要载体，其内生性具有的生态、环境多元化特色，与山水景致、风土人情相结合，农村中安全的水源、没被污染的土地、中老年劳动力等资源要素，就有被“三产化”重新定价的机会。

国家维护粮食安全尤其需要“三产化”的制度创新。从以往以实物形态生产和交易为主，改为与国家金融部门密切配合、尽可能介入价值形态的交易，要鼓励龙头企业在农业金融化竞争中重点突破，占有全球物流、批发、期货等三产市场的定价权，以及通过信息、创意和品牌等在高端市场占有收益，改变过去“二产化”农业内在的双重负外部性。

农业的一、二、三产业融合，需要转为消费导向、依据消费群体结构变化来制定的“三产化”农业政策。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分析，中国的中产阶层总数占总人口的23%，并将在2015年后达到约50%。他们对于农产品消费的第一要求是质量安全，“三产化”内涵性地发展生态化农业和原产地农业等非规模化和非车间化的农业，市场潜力巨大。中产阶层在乡村旅游中，也趋向于通过网络实现具有个性化定制的自由行。新世纪中国大量崛起的中产阶层，为农业“三产化”发展提供了现实消费市场，成为中小资本分散化投资的重要领域。国家政策应该鼓励“农业进城、市民下乡”，使一、二、三产业有机结合，经三产对要素和产品实现重新定价，构建一个投入产出相对合理的多功能现代农业。

第四篇　粮食：金融化趋势下如何保障安全？

第十七章　粮食金融化与粮食安全[285]

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多年来，除个别年份之外，中国基本实现了粮食的自给，粮食安全形势总体稳定。按照农业部门公布的数据，2013年之前的10年里，中国粮食生产甚至超越历史上公认的“两丰一歉”粮食周期（也有“两平两丰一歉”5年一个周期之说）实现总产“十连增”。但是，也就在同期，中国粮食进口却在大幅度增加，粮食自给率却早已跌破官方确定的95%安全线。有研究表明已经低于88%。中央农村政策有关负责人指出，进口农业产品折抵耕地已经接近6亿亩，是国家设定18亿亩红线的1/3。若此说成立，则中国农业进口约占国内消费的1/4。

可见，粮食安全问题在新时期始终必须高度关注，在资源环境愈益紧张的压力下如何解决未来15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仍然是一个重大挑战。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的相互影响日益加深，继续在封闭状态下寻求国家发展与粮食安全越来越困难。

传统的对于粮食安全的研究多集中于供求形势的分析判断上，供给需求形势的变化和相互作用，决定了粮食市场的价格及其走向。但近年来，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粮食市场与货币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衍生品市场的联动不断加深，流动性过剩带来的投机行为加速了粮食金融化进程，助长了粮价的剧烈波动。

在对国际粮食市场形势的基本判断基础上，本文以国际金融资本全球化为研究视角来看待21世纪的粮食安全问题。

一、国际粮食市场形势

（一）国际粮食市场供需形势的总体判断

为了直观地描述世界粮食供需状况，用各年度小麦、玉米、稻谷、大豆等四大粮食的产量与消费量的差值占产量的比重来揭示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四大粮食的生产、消费的不对称状况，如图17-1所示。从图中不难看出，近年来存在产需缺口的主要是大豆，而其他三大主粮则产高于需；而且21世纪以来，总体上四大粮食的供需不平衡形势从历史角度来看并不明显。2001—2009年，小麦的产需差值占产量的比例在-6.56%到6.71%的范围内波动；玉米的产需差值占产量的比例在-5.40%到4.56%的范围内波动；稻谷的产需差值占产量的比例在-4.82%到2.80%的范围内波动；大豆的产需差值占产量的比例在-5.10%到2.64%的范围内波动。而且，最近几年，各大品种的粮食供需形势还愈加趋于平衡：2005—2009年，小麦、玉米、稻谷和大豆的产需差值占产量的比例浮动范围分别为-2.35%～6.71%、-1.04%～2.17%、1.32%～2.80%和-5.10%～2.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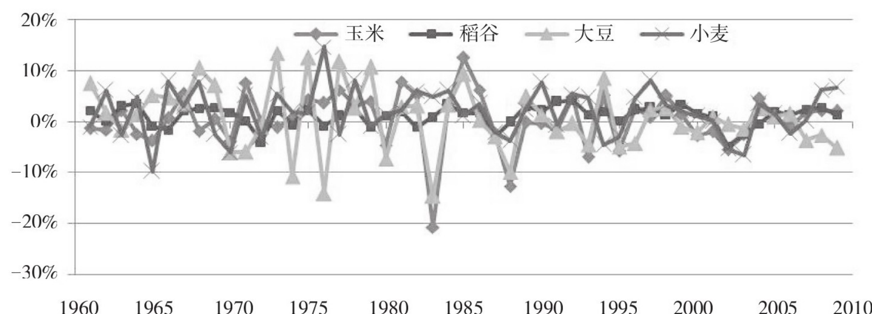


图17-1　1961—2009年世界四大粮食产需差值占产量的比例

数据来源：由联合国粮农组织网站数据计算整理得到。

而且，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公布，2011年世界小麦、玉米和稻谷等三种主粮的总产量比2010年增长3.6%，达到23.37亿吨，接近历史上最高水平，这还不包括薯类作物和豆类作物以及其他饲料类作物。

因此可以认为，目前全球粮食供求处于基本平衡状态，没有明显的供需缺口。

（二）国际粮食市场价格波动分析

回顾20世纪后半叶的国际粮价波动历史，可以发现国际粮价出现过四次大的涨跌，这四次粮价高峰分别出现在1973—1974年、1980—1981年、1989—1990年和1995—1996年。纵观进入21世纪之前的这四

次粮价的大起伏，不难发现国际粮价七八年发生一次大的变动，并带有周期性变化的性质。20世纪粮食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也很“传统”：几乎每次主要粮食生产国粮食减产，都会导致本国粮食对世界粮食市场需求增加，从而使粮价猛涨。

然而，当人类进入21世纪，国际粮食市场的价格走势却出现新的阶段性变化，与20世纪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价格波动与基本供求面的联系日趋模糊。近年来，小麦、玉米、大米和大豆等粮食国际现货价格（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价格）如图17-2所示，可以发现近年来国际主要粮食价格波动剧烈，大起大落的情况时有发生。

如果考察近年来四种主要粮食的国际价格走势与全球宏观经济背景的关联，不难发现国际粮价的潮起潮落与2008年金融海啸及美国连续三次推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存在紧密联系。

2008年9月雷曼兄弟银行破产标志着金融海啸爆发。美国政府紧急救市，推出了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即QE1。QE1政策随即造成粮价上涨。以小麦价格为例，由于市场间的传导存在滞后，小麦价格在2008年年底开始上涨，并在不断波动调整中攀升至2009年6月2日的6.28美元/蒲式耳，回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之后伴随着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和各国相继推出经济刺激计划，小麦价格在2009年下半年出现二次探底和相继的反弹。

美联储以提振本国经济、避免通货紧缩和降低失业率为名，于2010年11月开始推出6000亿美元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即QE2。大量制造流动性的QE2政策，对国际粮食市场的效应几乎是立竿见影的，小麦、玉米、大米和大豆价格纷纷止跌上扬。例如，国际小麦价格上涨至2011年2月10日的9.76美元/蒲式耳，接近近年小麦价格的最高点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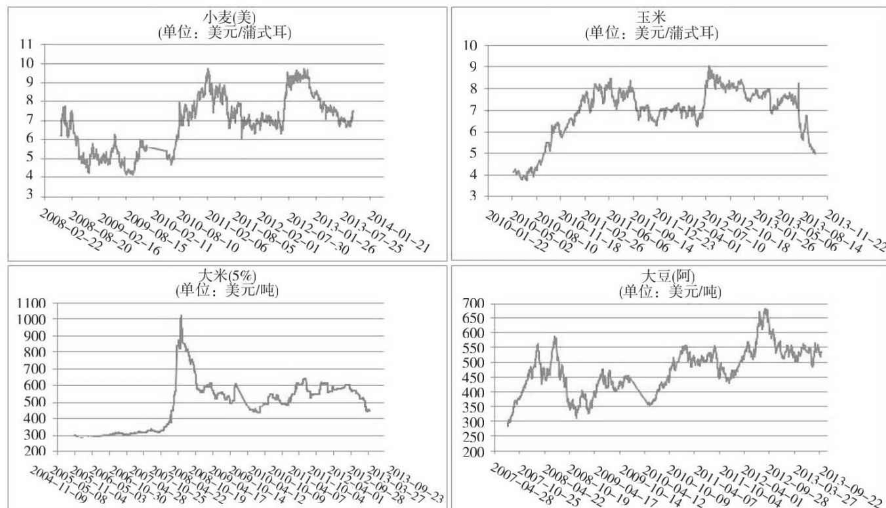


图17-2　近年来世界四大粮食国际现货日价格波动图

数据来源：Wind资讯。

尽管美联储是在2012年9月宣布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即QE3，名义上是防止欧洲债务违约将美国经济拖入衰退的可能性和进一步刺激经济复苏和就业增长，但事实上，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当年的3月份就已经表示失业率进一步明显好转可能需要更迅速地扩大生产和消费者与企业的需求，持续的宽松政策可以支持这一过程。由于，市场上已经对美国推出QE3产生了预期，所以国际粮食市场也在市场预期的作用下应声而动。尤其是小麦、玉米、大豆的价格均攀升至近年来的最高峰。其中，小麦价格从2012年6月6日的6.34美元/蒲式耳开始上涨，很快在9月17日达到9.69美元/蒲式耳；在QE3政策正式出台之后，又于11月9日蹿至9.78美元/蒲式耳的近年小麦价格的最高点位。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发现金融危机以来的流动性扩张对粮食市场影响的一个递增作用：QE1政策对国际粮食市场价格还存在滞后影响，那么QE2政策对国际粮食市场价格则发挥了即期作用，进而市场对QE3政策的预期或者说是美联储对外发布的信息就能够对国际粮食市场产生效应。

可见，在2008年以来的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粮食市场对美联储政策调控的反应日益灵敏，其中的作用机制，正是与供需关系无关的“粮食美元化”或者说是“粮食的金融化”。

二、粮食金融化与国际粮食安全

（一）粮食金融化的内涵

实体经济的“金融化”现象，本质上是社会经济体系中实际发行和流通的货币及其衍生品的总量显著超过实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流动性的正常数量，因此使得本来取决于产品供需基本面情况的价格体系中的关键价格环节，受到货币及其衍生品也就是金融产品的供需情况变化的直接影响，并且这种影响甚至超过了产品供需基本面情况对产品价格变化的作用；而价格是市场经济体系下实体经济的核心环节，于是最终出现了金融产品市场形成的虚拟经济（virtual economy）掌握了生产产品与服务的实体经济的定价权的现象。需要指出的是，“金融化”表面上看是超发货币及其衍生品导致的经济现象，但它绝不属于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通货膨胀的概念范畴。

粮食金融化，是全球化或者说金融资本全球化框架下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体经济高度金融化所衍生出的一个剖面，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各国彼此联系越来越紧密的粮食产业被“金融化”的体现。粮食金融化，主要是指粮食的美元化，由于美元的大量增发，造成越来越多的过剩流动性冲击粮食市场，导致粮食价格出现剧烈波动；粮食市场同时成为过剩金融流动性的垃圾消纳场，粮价的一次大起大落就能替西方主导国家制造的过剩流动性做“消化”：这两方面都显示出粮食市场的运行脱离实体层面，而粮食被人为创造出“金融属性”。

（二）国际粮食市场金融化趋势及机理分析

1.美国政府持续超发美元的量化宽松政策不断增强世界经济体系的流动性，世界经济的“金融化”将不断深化

粮食金融化的趋势与世界经济的金融化趋势是紧密相连的。中国香港金融管理局前总裁任志刚指出，金融资本应当落实在产业资本实体经济上，但现实非如此，是不正常的。

正如前文分析，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推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与国际粮食价格走势存在密切联系。美联储实行的注水政策，从长期和历史经验来看必然导致美元走低，从而推高包括粮食在内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民进天津市经济委员会和民进安徽省委会曾指出，金融危机以

来，美国通过美元持续贬值成为最大的受益国。由于世界各国的粮食贸易主要使用美元结算，石油贸易和国际黄金市场的标价货币也主要是美元，美元的贬值直接导致石油价格和黄金价格上升，进而引发农资价格和国际粮食贸易运输成本上升，所有这些上涨因素都会最终被转嫁到粮食价格上，大量出口粮食的美国是粮食涨价中最大的受益国，而非洲一些欠发达国家则成为最大的受害国，粮食的金融属性越来越显化。

2.国际粮食市场“金融化”向整个粮食产业体系延伸

据媒体报道，粮食生产的投入品市场也出现了金融化的趋势。化肥业界普遍认同，在2010年必和必拓对全球最大的钾盐生产商加拿大的Potash.Corp发动收购以后，表现出金融资本触手伸向钾盐行业的态势，以此为标志，钾盐业也出现了金融化趋势。即钾盐业除了已有供应集中垄断态势以外，金融化也开始显现。

3.种类更多和风险更大的新型金融衍生品将越来越多地进入国际粮食市场

近年来，随着国际农产品期货市场价格不断走高，越来越多的新型金融衍生品如农产品指数期货和对冲基金等进入国际粮食市场，大大增加了国际粮食市场价格的波动性和风险性。

投机者不仅可以通过商品交易所，还可以通过场外衍生品市场（OTC）实现期货、掉期以及期权掉换等交易，通过各种手段去规避投机衍生工具之间的投机风险，而原来的对冲者也开始利用现有信息去投机。同时大量投机者买进商品去对冲他们的衍生合同，甚至企图控制即期市场价格。由于套期保值变得更加复杂，期货市场交易者更倾向于降低套期保值与套利的业务活动，或者套期保值期限日益短期化。指数基金成为投资于农产品的主要工具，指数基金是一种以拟合目标指数、跟踪目标指数变化为原则，实现与市场同步成长的基金品。当市场指数价格上升时，购买或持有指数基金将会获得收益，这意味着该种投资在期货市场上只做多头。与套期保值者和传统投机者不同，指数基金投资者对价格不敏感，是纯投机行为，或者说是一种被动式投资，常常集中交易。

近年来指数基金相对发展迅猛，在个别市场上头寸最高时可占据60%以上。

2002年指数基金额仅500亿美元，2006年增至1000亿美元，2008年高达3000亿美元，占到农产品市场份额的40%。商品指数基金数量庞大，如指数基金对于小麦的持有量几乎可以满足美国对小麦两年的需求量。自2004年至2008年，农产品指数基金合约交易量在主要农产品中几乎都呈现明显增长趋势，泰森食品数据则显示玉米、大豆和小麦商品指数基金长期合约达到了33%～65%。

4.美国发展以玉米和大豆等粮食作物为主要投入物的生物燃料产业政策保持不变，将继续增加国际粮食市场供给的紧张程度和不确定性

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13年3月16日的电视讲话中提出，要建立能源安全信托基金，推动继续发展生物燃料产业，直至生物燃料等新型能源全部替代石油能源，同时新能源产业将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据统计，美国生物柴油行业几乎在每个州都有工厂，全国的就业超过64000个岗位，与美国生物乙醇产业直接和间接相关的就业人员达40.16万人。因此，美国推动以玉米和大豆为主要投入物的生物燃料产业发展政策是坚定不移的。

将主粮大规模地用作生物燃料产业的工业原料，一方面会对国际粮食市场供给造成持续压力，使供应长期偏紧；另一方面，也使美国作为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在掌控影响粮食产量预测的天气信息以外，增加了对国际粮食市场粮食供应数量的控制力，从而在更大程度上控制了国际粮食市场对价格波动的预期走向，从而使得国际粮食市场价格波动的不确定性增加。

（三）国际粮食市场金融化的主导力量分析

1.“币缘”战略条件下美国过量增发美元是国际粮食市场“金融化”的根源

当代金融资本运作和竞争所奉行的已不再是传统的地缘战略，而是以货币权为核心的“币缘”战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资本愈益成为世界分工和分配的核心，遂使货币权力超越地缘实力，成为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国家间关系的新枢纽。苏联解体后，美国“单极”霸权赋权于美元，使其无约束地增发并顺势主导了金融资本全球化，这决定了美元霸权成为币缘政治时代国际关系的实质，并衍生出强化美国的全球币缘战略体系，即以美元资本、能源（石油）、食物（粮食）三大霸权为核心

的新霸权体系。

在此背景下“币权”的时代特征，则演化为以地缘关系为保障、以决定产业链安全的资源定价权为基础、以当代国家政治主权派生的信用体系以及自主的财政货币政策为核心，美元可以在全球经济金融化竞争的资本扩张中获取利益并转嫁成本。

华尔街风暴以来，美国通过量化宽松政策缓解自身债务危机，其发行的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与石油战略、粮食战略密切配合，造成美元币权对下形成“三角结构”，后两者像垃圾消纳场一样吸收美元的过量增发，并没有导致美国本土通货膨胀。这正是当前美国延续“单极”世界霸权的机制，即凭借军事优势构造政治强权，政治强权赋权于美元货币体系成为全球货币，三角“币缘”战略使全球成为美元过度增发的消纳场，并承担金融全球化下美国所转嫁的制度代价。

2.农产品期货市场成为大型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实施粮食“金融化”以牟取暴利的主战场

美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对世界粮食市场价格走向有决定性的影响，期货市场上交易规模、资金规模及结构能够反映大型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在其中的介入程度和影响力。近年来国际粮食市场价格飙升主要是大规模投机资本在国际粮食市场上进行投机炒作的结果。

国际投资基金大量转向粮食产品期货市场，基金公司已经成为粮食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和定价者。据美国农业部分析，在2007年下半年至2008年国际粮价大幅飙升中，来源于对冲基金等国际资本大肆炒作的因素占70%。据资料显示，2002年全球商品指数基金的规模不到5亿美元，到2012年2月总规模已经达到约2400亿美元。许多投资大宗商品的对冲基金增加了对粮食产品期货的持仓，有的甚至达到投资组合的60%～70%。据报道，2012年粮价飙升，全球最大投行高盛投资于小麦、玉米、糖和咖啡等大宗商品，从中获利4亿美元。另据报道，至2012年8月，美国对冲基金对于大宗商品的多头仓位增幅创下两年以来新高。巴克莱银行用于农产品期货投资的金额就已经达到了5亿英镑，远远高于2011年全年的3.4亿英镑和2010年的1.89亿英镑。而巴克莱在农产品上的投入与其华尔街同行们相比并不显眼，高盛和花旗在这方面的投入甚至翻番。

3.美国农业部的“权威”信息发布是形成“金融化”的粮食市场预期的重要因素

在金融产品市场上投资，是着眼于对未来收益可能性和可能水平进行预测的基础上进行决策。因此，预期是金融市场上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影响最重要的因素，而有影响力的投资者的预期判断，会在市场上带动中小投资者跟进投资，短时间内推高某种金融产品价格。反之，有影响力的投资者放弃或者减持某种金融产品投资规模，也会带动中小投资者跟进后在短时期内使某种金融产品价格迅速下降。理性的预期是基于市场供需基本面变化趋势的判断进而得出对未来收益的理性判断，而在金融投机过程中，非理性预期是定价的主导性因素。这是因为投机者需要按照自己的获利意图操纵价格走势，这就要建立在夸大有利于自己希望的价格走势的趋势性因素，制造恐慌心理，通过短时间内制造暴涨暴跌而产生巨额差价，并借此低买高卖以牟取暴利。

在农业行业，几乎每个环节都形成了了解分析美国农业部报告的习惯。美国农业部在市场中获得了绝对的话语权和决定权，毫无疑问，获得了间接的定价权或者关键性的主要的定价影响力。但美国农业部发布各项数据的主要目的是需要达到顺利以及高价销售国内农产品的目的。例如，中国国内期货从业者已经普遍达成共识，从美国大豆上市的季节性周期表现来看，美国新豆上市之后，价格冲高已经成为规律。按照惯例，美国农业部等相关报告都会在北美大豆上市期间利多大豆价格。而期货市场上的投机者则把美国提供的信息作为炒作题材，因为对于投机资金来讲希望市场出现起伏是其实现获利的先决条件。

而且，美国农业部的农产品供求报告一般要比FAO和其他国际机构提前发布一个月，这大大加强了其报告对世界市场的影响力。美国农业部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的信息主导权。美国农业部每年调研费用高达200亿美元，其中单是农业数据方面就花费15亿美元，而ABCD四大粮商每年搜集整理农业数据的支出也在30亿～50亿美元之间。有报道称，美国农业部发布的天气、产量和单产信息等一般都是由美国ADM、嘉吉和邦基等巨型跨国农业企业提供，因此在影响国际粮食市场价格预期的源头信息上，就已经表现出了利益倾向。

（四）国际粮食市场金融化对国际社会造成的直接影响

1.粮食金融化直接助推国际粮食价格剧烈波动和高价运行

近年来，国际粮食价格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粮价波动剧烈，起伏不定，虽然偶尔也伴随着短暂的下降，也有平稳运行状态，但是这些价格再也跌不破2004年的价格水平。

从长期来看，国际粮价总体呈上升趋势，低粮价时代极有可能一去不复返了。

正如前文的分析，国际粮价的剧烈波动和高价运行很大程度上是粮食金融化的直接后果，国际资本的炒作以及投机商人的囤积居奇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有报道称，截至2011年6月，联合国数据表明全球粮食价格此前10个月中有9个月上涨，并于当年2月创下纪录。同期CFTC数据显示，截至5月24日，美国商品期货期权净多持仓增至7.6%至117万手，而前3周则下降了27%。其中，对冲基金大举增持了小麦期货和期权净多头寸，增幅高达155%。

一般来说，市场投机行为对粮价波动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世界粮食供应量每出现3%～5%的波动，国际市场上的投机活动就可能把粮食价格波动放大3倍，即粮价可能达到10%～15%的波动幅度。

2.粮食金融化使“单一经济”国家陷入饥荒

“单一经济”是指那些曾经的殖民地国家，殖民者虽然表面上离开了，但留下的经济结构是单一的且高度货币化的，并不是出于本国国民基本生存的需要。比如“香蕉之国”厄瓜多尔，大部分地区只种香蕉，香蕉没成熟或者香蕉成熟了但没人买，人们就没有现金收入，也就没有基本生存条件，因为平时他们既不种粮食、蔬菜，也不养鸡、养猪，国家不进口食品就没法维持基本生存！

所以，在粮食金融化背景下，大多数殖民主义时期留下的“单一经济”结构的前殖民地国家，遭遇核心国家扩张信用推动全球通胀、转嫁危机的时候，将首当其冲承担制度代价。

国际组织2008年确定38国发生粮荒，主要原因是过剩金融资本冲击粮食市场，导致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0年到2011年这短短一个年度内，大多数按照西方生活方式获取食品的，比如以面包为主食，遭遇的最大的问题是小麦、玉米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因此直接影响6800万日均收入在贫困线附近的贫困人口，其中4400多万贫困人口将降到赤贫水平。世界银行特别指出，东亚社会因以稻米为

主，这次受粮食价格上涨的打击不如其他地区严重。事实上，当粮食的金融属性大于商品属性，其结果不是没有粮食，而是买不起粮食。据统计，在近两年来粮食产量水平并未下降的情况下，全球仍然有4000多万人处于饥饿状态。自然灾害的减产不具有持续性，但发达国家主导的农产品金融交易却会成为其转嫁金融风险的利器。

3.粮食金融化引发北非、中东街头动乱和政权危机

在2008年美国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之后的一年时间里，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造成2009—2010年全球粮食价格大幅度提升，特别是北非地区紧缺品种的小麦、面粉，价格上涨超过100%，玉米价格上涨超过70%，由此引发北非、中东街头动乱和政权危机。

北非和中东地区国家粮食自给率普遍很低，食品进口依存度过高。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2010—2011年粮食价格陡涨期间，小麦进口超过50%的埃及等北非国家，相继遭遇城市贫民不能承受粮食价格越涨越高的危机走上街头导致突发性政治运动。尽管埃及这样的北非国家在非洲饥饿状况并非特别糟糕，但城市贫民饥饿叠加、青年学生超过50%的高失业率，是街头运动长期化的基本条件，虽然埃及在西方意识形态的政治化作用下演变为政权更迭，但这确实没有对解决既往难题造成积极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埃及曾经是一个经济指标比中国还要好的国家，人均GDP早已超过5000美元，经济增长率也比一般发达国家要高得多，只不过在经济危机打击之下有所下降，但仍然有上升的空间；从国民经济结构看，服务业占比50%，农业占比13%～14%，已经是一个典型的“倒金字塔”的现代化经济结构，一般要求的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实现；而且埃及还是美国中东战略的长期盟友，在国际政治、经济上长期受到美国庇护。由此可见，粮食金融化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发展中国家所承担的危机代价是深层次的，甚至是灾难性的。

三、粮食金融化背景下保障中国粮食安全

（一）坚持深化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相关的经济体制改革

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将粮食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高度，均指出“必须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

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并强调“做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在具体操作上，要通过深化农村改革来为“国家粮食安全”打基础。

第一步，在宏观政策上，要在专项转移支付向一般性转移支付调整的财政体制改革中，让粮食主产区的县市得到人均公共财政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倾斜政策，这样才能使国家立足于自给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方针，有条件落实到产区地方政府。

第二步，在微观制度上，只有坚定不移地加强农村综合性社区合作社建设，才能把集体所有和农户承包的基本经济制度落到实处；只有在合作社综合经营所有涉农经济领域获取足额剩余，并且主要用于内部分配的条件下，才能有效地复兴乡土社会的内部化机制；借此系统化的优惠政策，国家得以向合作社下达粮食全产业链经营责任，把粮食优惠政策及其相应的责任义务落实到双层经营的两级经济主体。这样做，就足以促其分担国家粮食安全责任。

总之，在国家重新恢复以人为本和群众路线的思想前提下，在村集体和农民都得到充分发动的条件下，才可能改革农业经营体制，推行以综合性合作社为主导的适度规模化生产经营；才可能适时地全面改造中低产田，也才保得住18亿亩耕地红线。

（二）以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和城乡互助的参与式农业分散粮食金融化风险

粮食的问题往往与宏观经济形势高度相关。在国际金融资本低成本扩张的局面下，中国粮食安全面临双重“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困境，单一领域或单一手段的调控，往往会使自己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因此，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如果仅局限在农业生产销售或者粮食仓储物流等领域的讨论，将会陷入无解的境地；而唯有通过“大农业”和“大粮食”概念下的改革创新，方能实现国家粮食安全。

当前，顺势而为的做法即通过培育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将一般的农业生产经营领域的合作扩展到二三产业，尤其是构建食品安全必需的农业的“三产化＋信息化”，只有让更多非一产领域的大农业收益反哺一产农业，才可能实现农业发展的“永续”。

同时，发展城乡互助的参与式农业也能够有效分散粮食金融化所造成的市场风险。因为，城乡互助的参与式农业还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一方面可以发挥农业的生态、休闲、文化、教育等多功能性；另一方面能够通过多方参与式认证体系的建立起到发动中产阶级利益群体的作用，低成本地形成保障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的开放式社会基础，这意味着粮食系统也可以充分利用这个社会基础。

（三）以农业生产和食物消费的多样化构建粮食金融化防御体系

中国正处于产业资本阶段，而西方主导国家已经步入金融资本阶段，对我国而言，金融资本的运作是我国的比较劣势，这也决定了在国际间金融资本竞争中我国只能采取守势，因此应对粮食领域的金融化我国主要战略不是要去争粮食霸权，而是构建好立足本土优势的粮食金融化防御体系。

事实上，以美元为工具进行金融化操作的产品，都是大宗化、同质化产品。粮食金融化也同样是针对大宗农产品进行操作的。而中国传统农业的生产和饮食消费文化本是以多样化为特征，而多样化又恰是生态文明内涵的要求。因此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一方面我国应大力发展多样化农业生产，实现农产品的去大宗化和去同质化，进而规避粮食金融化的风险，走出一条立足本土优势的、有别于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国特色生态农业道路。

第十八章　粮食金融化挑战[286]

金融资本主导全球化已经造成的“粮食金融化”，是导致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后全球粮食安全形势严峻、粮食进口依存度高的低收入国家发生动乱的最重要因素。这个在金融资本全球化历史阶段所内生的灾难性后果，作为不断发生的教训，已经引发国际社会的警觉；同时，也对中国在20世纪适应产业资本向农业扩张阶段而建立的粮食安全战略及其相应的保障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粮食金融化成为国际粮价剧烈波动的主要原因

粮食金融化，是全球化或者说金融资本全球化框架下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体经济高度金融化所衍生出的一个剖面。

所谓实体经济的“金融化”现象，本质上是社会经济体系中实际发行和流通的货币及其衍生品的总量显著超过实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流动性的正常数量，因此使得本来取决于产品供需基本面情况的价格体系中的关键价格环节，受到货币及其衍生品也就是金融产品的供需情况变化的直接影响，并且这种影响甚至超过了产品供需基本面情况对产品价格变化的作用；而价格是市场经济体系下实体经济的核心环节，于是最终出现了金融产品市场形成的虚拟经济掌握了生产产品与服务的实体经济的定价权的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金融化”表面上看是超发货币及其衍生品导致的经济现象，但它绝不属于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通货膨胀的概念范畴。通货膨胀实质上还是虚拟经济（金融经济）因为实体经济形势变化而被动地超发货币。“金融化”之最为本质性的不同，则是虚拟经济利用超发货币及其衍生品导致流动性过高而掌握实体经济定价权以控制实体经济，达到通过操纵价格短期变化而实现财富集聚为目的的有主动意识的经济行为。因此，“金融化”对产业发展和社会生产力进步具有严重的破坏作用。

实体经济金融化，是在近年来国际经济体系中流动性不断增强到严重泛滥的情况下普遍发生的新经济现象，这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发展深化的必然产物，即金融经济对国民经济投资和国际经济体系的主导作用超过实体经济，金融资本家对经济的控制力量超过产业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国民经济体系的各个产业都会发生金融资本控制产业经济发展的产业金融化现象，表现出产品价格越来越多地决定于相关金融产品市场定价，产品供需基本面情况对产品定价的影响越来越小。

粮食的金融化，在国际社会主要是指粮食的美元化，它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各国彼此联系越来越紧密的粮食产业被金融化的体现。由于美元的大量增发，造成越来越多的过剩流动性冲击粮食市场，导致粮食价格出现剧烈波动；粮食市场同时成为过剩金融流动性的垃圾消纳场，粮价的一次大起大落就能替西方主导国家制造的过剩流动性做“消化”：这两方面都显示出粮食市场的运行脱离实体层面，而粮食则被人为创造出“金融属性”。国际市场粮食现货价格越来越多地决定于农产品期货市场以及流动性本身的影响，而国际市场粮食供需基本面情况对其影响作用相对下降。

事实上，根据测算，21世纪以来，小麦、玉米、稻谷和大豆等四大

粮食作物的供需不平衡形势从历史角度来看并不明显，产需差值占产量的比例浮动范围分别为-6.56%～6.71%、-5.40%～4.56%、-4.82%～2.80%和-5.10%～2.64%，而且最近五年，各大品种的粮食供需形势还愈加趋于平衡。而正是在全球粮食供求处于基本平衡、没有明显的供需缺口的情况下，国际粮价出现剧烈波动。据世界银行统计，自2010年10月至2011年1月，国际粮价上涨15%，与前一年相比飙升29%，接近2008年的粮食危机时创下的历史最高水平；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2010年部分粮食的价格已经破纪录，玉米的价格暴涨了52%，小麦上涨了49%，大豆上涨了28%。可见，全球粮食供需基本面情况，不再是构成粮价剧烈波动的最主要原因。

而另一方面，如果考察近年来四种主要粮食的国际价格走势与全球宏观经济背景的关联，不难发现国际粮价的潮起潮落与2008年金融海啸及美国连续三次推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存在紧密联系，而且金融危机以来的流动性扩张对粮食市场的影响存在一个递增作用：QE1政策对国际粮食市场价格还存在滞后影响，QE2政策对国际粮食市场价格则发挥了即期作用，而市场对QE3政策的预期或者说是美联储对外发布的信息就能够对国际粮食市场产生效应。因此，可以认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粮食市场的剧烈波动和近年来世界粮食安全面临的新挑战，根源都在于粮食金融化。

二、“币缘”战略条件下美国过量增发美元是国际粮食市场金融化的根源

长期以来，国际市场上小麦、玉米和大豆等主要粮食产品的价格与原油价格变化趋势相同，呈现相当直观的正相关关系；而与美元价格变化趋势相反，呈现明显直观的负相关关系。原油价格与主要粮食产品价格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说明导致其变化的因素有共同性，其共性因素就是美元价格。即：美元价格越贬值，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流动性越强，则粮食价格和能源价格就会持续上涨。

美国长期超量发行美元以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客观上造成美元长期贬值预期，制造了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性泛滥。流动性泛滥已经成为一个长周期、全球性的经济现象。无处不在且不断增加的流动性，势必向世界经济体系的深度渗透和向广度扩张，如果不能采取制约和减少流动性的有效措施，国际粮食市场金融化趋势还将不断加强。正如美国《商业

内幕》网站所言，粮食危机实际上是美元危机。

事实上，美元的过量增发是美国为占有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制度收益并向全球转嫁制度成本的重要手段，这是当代金融资本运作和竞争所奉行的以货币权为核心的“币缘”战略的体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资本愈益成为世界分工和分配的核心，遂使货币权力超越地缘实力，成为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国家间关系的新枢纽。苏联解体后，美国“单极”霸权赋权于美元，使其无约束地增发并顺势主导了金融资本全球化，这决定了美元霸权成为币缘政治时代国际关系的实质，并衍生出强化美国主导地位的全球币缘战略体系，即以美元资本、能源（石油）、食物（粮食）三大霸权为核心的新霸权体系。

华尔街风暴以来，美国通过量化宽松政策缓解自身债务危机，其发行的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与石油战略、粮食战略密切配合，造成美元币权对下形成“三角结构”，后两者像垃圾消纳场一样吸收过量增发的美元，并没有导致美国本土通货膨胀。这正是当前美国延续单极世界霸权的机制，即凭借军事优势构造政治强权，政治强权赋权于美元货币体系使其成为全球货币，三角币缘战略使全球成为美元过度增发的消纳场，并承担金融全球化下美国所转嫁的制度代价。

三、粮食金融化引起发展中国家陷入社会危机

正如前文的分析，国际粮价的剧烈波动和高价运行很大程度上是粮食金融化的直接后果。在粮食金融化背景下，大多数殖民主义时期留下的“单一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因粮食的对外依存度高，而在核心国家扩张信用推动全球通胀、转嫁危机的时候，首当其冲地承担制度代价。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0年到2011年这短短一个年度内，大多数按照西方生活方式获取食品的发展中国家，遭遇的最大的问题是小麦、玉米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因此直接导致6800万日均收入在贫困线附近的贫困人口中的4400多万降到赤贫水平。

很多粮食自给率低的国家在粮食金融化背景下都遭遇到一定程度的饥饿和营养不良。例如，非洲国家中粮食能够基本自给的凤毛麟角，绝大多数粮食都依赖进口，自给率低，甚至一些国家自给率不足50%，这导致国际粮价高位运行时期非洲大多数国家都面临重度饥饿或相对严重

饥饿，同时非洲也成为世界上营养不足最严重的地区。

更为严重者，在2008年美国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之后的一年时间里，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造成2009—2010年全球粮食价格大幅度提升，特别是北非地区紧缺品种的小麦、面粉，价格上涨超过100%，玉米价格上涨超过70%，由此引发小麦进口超过50%的埃及等北非国家，相继遭遇城市贫民因不能承受粮食价格越涨越高的危机而走上街头形成突发性政治运动。尽管埃及这样的北非国家在非洲饥饿状况并非特别糟糕，但城市贫民饥饿叠加青年学生超过50%的高失业率，是街头运动长期化的基本条件，虽然埃及在西方意识形态的政治化作用下演变为政权更迭，但并没有对解决既往难题造成积极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埃及曾经是一个经济指标比中国还要好的国家，人均GDP早已超过5000美元，经济增长率也比一般发达国家要高得多，只不过在经济危机打击之下有所下降，但仍然有上升的空间；从国民经济结构看，服务业占比50%，农业占比13%~14%，已经是一个典型的“倒金字塔”的现代化经济结构，一般要求的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实现；而且埃及还是美国中东战略的长期盟友，在国际政治、经济上长期受到美国庇护。由此可见，粮食金融化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发展中国家所承担的危机代价是深层次的，甚至是灾难性的。

四、中国急需调整粮食安全保障政策

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造成外需大幅度下降的背景下，我国在遭遇生产过剩的压力之下推出支持产业资本下乡为主的农业产业化战略。1998年全面推行银行商业化改革以后，为顺应金融压减坏账而要求粮食改革实行“统一收购、顺价销售、资金封闭运行”。进入新世纪之后，这个在分散农户生产基础上的改革难以全面贯彻，但所遗留下来的、更为集中地依赖于国家储备体制之最大弊病就在于：与粮食安全实质性相关的农民生产者和种养殖企业、市民消费者和地方政府几乎完全不承担责任；偌大一个13.6亿人口的中国，实际上只有中央政府这一个主体承担着对保障粮食安全的无限责任！

因此，维护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恰在于事实上已经承担了无限责任的中央政府需要认识“全球化是国家之间的资本竞争”的实质，不能再简单化地跟从已经愈益被投机资本深度操控的国际市场做顺向调节；而必须从安全理性出发，加强有利于国家调控粮食安全的综合性改革，以

此弱化跨国金融资本的粮食投机对国内安全的负面作用。

首先，在宏观政策上，要在专项转移支付向一般性转移支付调整的财政体制改革中，让粮食主产区的县市得到人均公共财政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倾斜政策，这样才能使国家立足于自给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方针，有条件落实到产区地方政府。

其次，在微观制度上，只有坚定不移地加强农村综合性社区合作社建设，才能把集体所有和农户承包的基本经济制度落到实处；只有在合作社综合经营所有涉农领域获取足额剩余，并且主要用于内部分配的条件下，才能有效地复兴乡土社会的内部化机制；借此系统化的优惠政策，国家得以向合作社下达粮食全产业链经营责任，把粮食优惠政策及其相应的责任义务落实到双层经营的两级经济主体，方有可能促其分担国家粮食安全责任。

总之，在国家积极倡导以人为本和群众路线的思想前提下，在村集体和农民都得到充分发动的条件下，才可能改革农业经营体制，推行以综合性合作社为主导的适度规模化生产经营；才可能适时地全面改造中低产田，也才保得住18亿亩耕地红线。

第十九章　日本高米价背后的农协垄断及其政党联系[287]

一、引言：日本农协的垄断性与国家安全

在美国重返亚太和日本借此提升国际地位的软实力战略影响下，人们一般会认为日本是东亚经济体中的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典范。但若去除“冷战意识形态”的色彩做分析，则可理解本文通过对日本高米价政策及其政党政治背景研究而提出的观点：日本的城市经济主要是六大综合性财阀垄断控制，[288]而日本的农村经济更是由唯一的、具有全面垄断地位的综合农协控制。亦即：日本城乡经济体制客观上都具有垄断性，并且因其与国家政治稳定直接相关而得以长期维持。[289]

在美国主导的TPP谈判中，因美国要求把大米配额纳入谈判框架而使垄断控制日本农村经济的综合农协（JA系统）的多种问题陡然暴露出来，相应地促使所谓“安倍经济学”不得不把日本综合农协改革纳入“顶层设计”……但，实际上却仍因农协之垄断地位与国家安全高度相关而步履

维艰。

在梳理农协历史中我们认识到，其演变为唯一垄断组织与国家安全战略高度相关。无论是明治时期明治政府为了顺利发展资本主义稳定社会建立产业组合，还是战争时期为了对外扩张将产业组合与农会合并成立农业会，以及战后为了解决粮食危机和恢复经济发展成立综合农协，不同时期的农协组织演变都是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的。相对于战后的综合农协，产业组合和农业会在配合国家政策，维护国家安全上起到的作用更大，任务更为艰巨。而现今的综合农协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执政党（自民党）通过综合农协得到的农民选票维持了自身的执政基础，保持了政治上的相对稳定性。日本国内对战前合作组织研究的两位重要学者是近藤康男和井上晴丸。[290]他们作为日本合作社研究的开创人，认为产业组合是明治政府为了防止因发展资本主义产生的经济波动对农民造成冲击，通过小生产者之间的互助合作以维持社会稳定的组织。特别是近藤康男的研究，是在明确垄断资本与合作组织关系的基础上开展的。战后的山田定市[291]则分析了不同时期的合作组织在配合国家政策的同时是如何发展壮大的。近藤康男在另一篇著作《从贫穷中解放》[292]中做出论断，认为农协是服务于垄断资本的国家机构。此外，从政治学角度研究的学者有西山久德的《日本农协的逻辑、课题和展望》，[293]考察了不同农业政策时期日本政府与农协的关系。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高米价难以见容于TPP的矛盾为切入点，作如下分析。

二、问题：日美TPP谈判进程中围绕大米进口的斗争

日本和美国关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Agreement，简称TPP）[294]的谈判焦点，在于美国要求日本在现有已经进口国外大米10万吨的基础上再增加17.5万吨，而日本的主张是增加的进口额度只能限制在5万吨。在美国的强烈要求下，最终日本同意对10万吨的进口额度进行商讨。

日本政府于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后的1995年开始，根据关贸总协定的要求开始进口国内大米消费量4%的最小进入配额（进口大米被称为“Minimum Access Rice”，简称“MA大米”）。[295]由于这些“MA大

米”是无关税大米，日本政府以进口大米可能对国产大米造成极大负面冲击为理由，规定这些大米进口不允许民营企业参与，而采取了100%的国家贸易方式，在价格上以政府补贴的方式提高“MA大米”的价格，以达到缩小与国内市场大米价格差距、削弱“MA大米”魅力的目的；[296]在销售渠道上日本将“MA大米”主要用于加工食品、对外援助和家畜的饲料等用途上，减少对主食大米的影响，并且日本通过加强卫生检疫的方式打击向日本出口大米积极性高的国家。但由于对大米销售差价进行长期补贴以及大米的长期储备产生的财政负担，日本从1995年至2013年19年间已经累计损失2723亿日元的财政支出。[297]

三、政策：日本的大米保护方式与政策回顾

（一）日本保护大米的方式

日本一直对本国农业实行各方面的政策保护。日本对大米的保护主要采取两种方式：

1.通过国境保护中间接保护方式对进口大米征收关税。比如大米的关税高达490%，使得日本国内进口大米销售价格比进口平均价格高4.9倍，若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关税计算方法，日本的大米关税高于700%。

2.大米价格补贴制度。日本政府对大米实行价格倒挂，亦即高价收购、低价销售的“双重价格”制度。[298]

对此，一般西方人都习惯把日本抵制进口大米的高关税政策和对大米的价格高补贴的“双高制度”视为一种与自由市场经济相对立的保守和固执；还有学者指出，这不仅使得日本大米远远失去了国际竞争力，而且造成所谓“合作社陷阱”制约农业发展。然而，这些批评大致是出于西方经验和根据西方理论的误判。本文认为：即使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日本也要勉为其难地坚持高米价的动因，是日本农业保护政策的双重作用。

须知，以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东亚农业制度体系在西方没有参照系。如果完全剥离意识形态，则日本以“综合农协JA”作为组织基础的农业垄断经营体系，从来就是国家历经战乱和危机而保持基本稳定的基础，因而具有维护综合安全的战略意义：其一，日本作为岛

屿国家农业资源高度稀缺，必须立足于基本国情矛盾及其对制度的客观约束，来维持大米作为传统主食的基本粮食安全，为此就需要借助“大和民族”历史悠久的稻米文化构建多元化“六次产业”[299]（包括历史、文化、教育、神道文明等能够提高基层民众凝聚力的社会建设），来维护本国不可或缺的农业基础。其二，日本政府无论怎样换届，都集中优惠政策全部用于发展比城市财阀制度还要全面垄断、并且是农村唯一垄断组织的综合农协，以此才能把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期间不断涌来的外部性成本予以内部化消纳。若没有农民和农村的高度组织化，历经多次危机并且深陷于20年衰退的日本根本不可能维护国内政治长期稳定。

（二）日本国内大米政策的相关回顾

基于日本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日本政府通过各种农业保护政策保证本国主粮的自给，即使巨大的补贴造成财政预算大量支出日本也一直不断加强农业保护。近年来日本在美国推进TPP派生的改制压力下提出农协改革措施。对此，应该联系日本大米政策调整的历史进程来深入理解（参照表19-1）。

表19-1　与大米相关的政策回顾

时期	政策内容
1961 年	以规模化为目标的《农业基本法》的实施。
1970 年	引入减反政策（休耕政策）。
1978 年（3）	引入转耕补助金（饲料用米、米粉用米补助 8 万日元；麦和大豆补助 3.5 万日元）。
1995 年	废止《粮食管理法》,《粮食法》施行。
2004 年（1）	修改《粮食法》。国家每年制定生产目标，向各都道府县进行分配。
2010 年（2）（民主党执政期间）	务农者户别收入补偿制度。
2013 年（自民党执政期间）	提出 2018 年废除“减反政策”。
2014 年	（1）的制度持续到 2017 年截止；（2）的制度截止到 2017 年减半；（3）的制度改为饲料用米和米粉用米最大补助 10.5 万日元。

来源：柿沼茂喜、福永宏：《減反廃止は名ばかり、迷走を続けるコメ農政——転作補助金を残したまま強いコメ農業は作れない》《周刊东洋经济》12月29日号（2013）。

日本现行米价机制的形成要追溯到1942年。当时正处于战争年代，为了保障战争的顺利进行，制定了由政府统一管理粮食生产、流通、消费的《粮食管理法》。战争结束后，因粮食严重短缺，黑市猖獗，政府为了稳定大米价格继续沿用了该法来掌控大米市场，这一法案一直到1996年才被正式废除。在政府直接管理大米的制度框架下，生产者必须以政府规定的价格将大米全部出售给政府，政府根据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工资和平均利润率核算大米的收购价格。因此，工业部门的快速发展，使得大米收购价格急剧升高，大米的种植面积和产量也逐年增加。[300]

日本政府虽然于1961年制定《农业基本法》，希望通过农业的规模化达到降低生产成本的目的，增加农业收入，缩短农业与工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但是与农业基本法相反，实际上的农业政策是通过上文提到的《粮食管理法》中“双重价格”政策以提高大米价格的方式来提高农户收入的，加上日本国内大米的生产成本很高（参照表19-2），使得日本大米价格形成了高关税、高成本、高价格的“三高”状态，确实没有国际竞争力，给国民带来了更大的食品消费支出。

表19-2　日本、美国的大米生产成本比较估算（单位：日元/公顷）

项目	日本（2006 年）	美国加利福尼亚（2004 年）	
	水稻耕作面积 5.8 公顷	水稻经营面积 283 公顷	与日本的比较（%）
合计	579380	180816	31
种苗费	22280	7778	35
肥料费	72880	21899	30
农业药剂费	66520	28122	42
燃料费	38320	14958	39
土地改良和水利费	65500	16035	24
生产管理费	3190	8496	266
其他材料费	18350	1316	7
借贷费	69810	39251	56
税金	18270	6941	38
建筑物费	27790	1556	6
汽车、农机具费	176470	34464	20

注：日美两国所取的水稻耕种面积为两国各自的平均值。

来源：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生产局：《米の生産コストの現状》《米の直接技術等の現状（2008）》数据整理得出。

但是随着经济增长带来的生产收入增加和饮食文化的变化，日本的大米消费量在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期后逐渐减少，但是日本的大米生产量却因为政府的价格补贴而不断增加。其结果是大米生产量远远超过了消费量（参照图19-1），而政府为了保证农民的收入和贮存大米则付出了大量的财政补贴，日本的粮食管理制度很难继续维持。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开始对大米进行调整，主要通过补助金的诱导让农户从种植大米转向种植其他农作物。

1970年“减反政策”（休耕政策）的实施成为了政府减少财政收入、保障农民收入，同时维持高米价的主要政策，并且于1978年引入“转耕补助金政策”来“吸引”农户减少耕种大米的面积，减少大米的生产量，以通过供给的减少来维持大米的高价格。民主党执政期间加入的“务农者户别收入补偿制度”[301]进一步促进了小规模兼业农户继续进行高成本的大米及相关农产品的种植。



图19-1　大米的生产量与消费量推移（单位：万吨）

来源：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食料需給表》（平成25年、平成26年）整理。

日本政府通过各种政策来维持大米价格，主要是为了国家粮食的自给、国家粮食的安全保障以及农户收入的不减少。但是在具有生产能力

的情况下进行采取“休耕政策”“转耕政策”以及“务农者户别收入补偿”来维持高价格的做法是否真的正确，为什么日本的农业规模化不能实现？

按照市场经济的原理，在具有生产能力的情况下，通过贮存等手段完全可以用降低价格促进内需或进军国际市场。可是，日本政府的做法却相反，为了能在维持高米价的前提下削减政府储备米，实施了以上政策。人们一般都认同大米产销涉及农业、经济领域以及国家粮食安全的问题，而很少理解这在日本历来是一个极其敏感的政治问题。因为大米价格与自民党的选票密切相关。游国龙、尚会鹏（2004）的研究中将日本稻米生产地分为三个不同的区域，通过自民党得票的大量统计资料，得出自民党在稻米产量高的地区得票率也较高的结论。[302]2009年举行的众院大选中在野党民主党击败自民党而成为执政党，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原本被称为“城市党”的民主党也认识到了农村的重要性，在竞选纲领中承诺直接将补偿金发放到每个农户手中，因而成功地拉到了大批的农村票。[303]

四、分析：日本政党政治中综合农协的地位

日本近乎固执地维持“高米价”的目的，在于维持大量的小规模的兼业农户继续停留在大米以及非主食用大米的耕作上。而大量农户作为日本农村最具影响力的组织——综合农协的组合员，对综合农协的发展以及对执政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日本的选举制度

分析综合农协和政党的关系，首先需要从日本的选举制度开始。日本的选举制度在1994年选举制度改革以前采用的是介于大选区和小选区之间的中选区制。[304]随着日本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使得日本人口分布呈现大城市高度集中的特点，在中选区制下，城市与农村的选民人数相差很大，同样一张选票在不同选区所代表的价值也就不同，这就是所谓的“一票的格差”。简单说就是农村的选票能够选出较多的代表，农村的选票价值高于城市选票，在1994年选举法改革之前，农村的1张选票平均相当于城市的5张左右，农民选票的价值在选举中占据重要位置。为了解决“一票的格差”的问题，1994年日本进行了选举制度的改革，从原来的中选区制改为小选区和比例代表制相结合的混合选举制。[305]但即使改革后的农民比例缩小，城市选票和农村选票的价值差仍然很明显，平均一张农村选票也仍然相当于城市的3

张左右。选举制度仍然有利于农村选区。

因此，正是因为有利于农村选区的选举制度，使得无论哪个执政党都会把重心放在农村，而作为战后一党独大的自民党更加与农村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二）综合农协的组织结构

综合农协的组织结构最大的特点在于其“金字塔式的三段制结构”。从图19-2可以看出综合农协三段制的系统组织纵向涵盖了几乎所有的农户，横向涵盖了农村生产生活的几乎各个方面。综合农协经营的事业范围极为广泛，“JA全中”是综合农协贯彻国家农业方针实施的决策机构，同时也是向国家表达农民诉求的机构。“JA全农”“农林中金”“JA共济连”“JA全厚连”等部门分别承担着经济业务、金融业务、保险业务以及卫生业务，使农民得以享受和城市居民同样的保障和福利。“JA全中”是日本综合农协当中的决策机构，农民利益诉求也是通过“JA全中”进行表达的，可以说“JA全中”可以代表整个农村。加上基层农协自下而上服从组织的指导和监督的原则，组织结构的完整性构成了日本农村高度的同一性。

由于日本综合农协长期以来客观上形成了对农村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全面垄断控制，因此，一方面海内外至今没有任何私人企业能够进入农村开展任何领域的竞争，日本至今维持稻米这个主粮的产销自给率超过100%；另一方面日本农村长期稳定，无论国内外发生什么剧变，农村都波澜不惊，无任何“群体性治安事件”，更无强力维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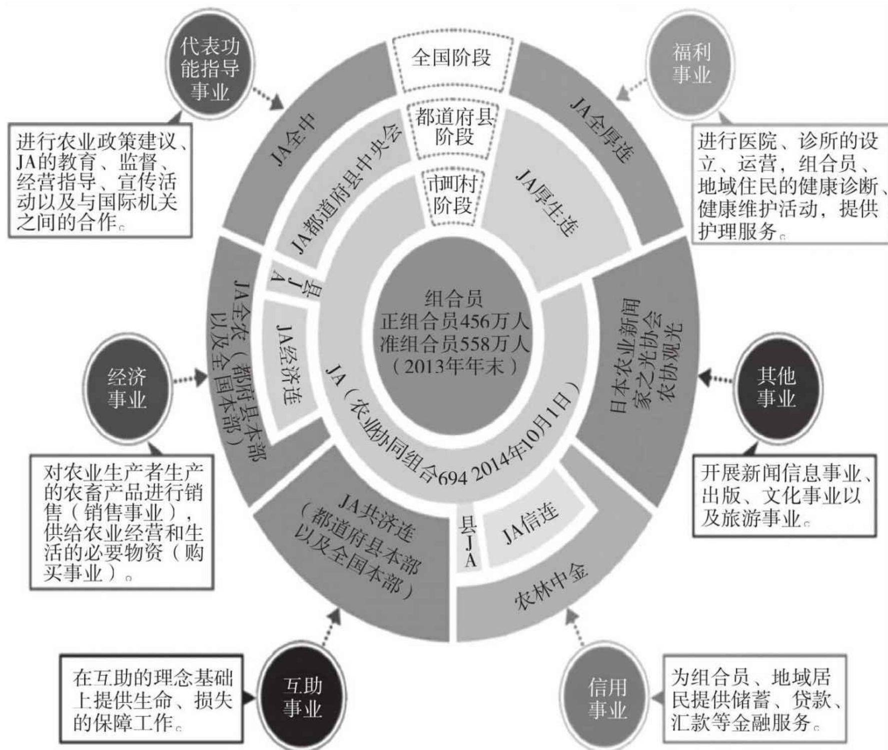


图19-2　日本综合农协的组织结构

来源：JA全中http：//www.zenchu-ja.or.jp/profile/x，2015-05-06引用修改。

（三）“一票的格差”与综合农协的“金字塔结构”——执政党的“集票机构”

城市选民身份各不相同，在一般情况下并没有共同的利益诉求，他们在选举时只是按本人意愿各自投票，甚至还有很多人放弃投票。相对于城市人口多元化的利益取向，农村人口是一个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保守群体”，越是规模细碎的小农，越是需要国家集中权力予以保护。[306]并且，由于地缘、血缘的关系，农村人口在社区范围内具有紧密的联系，农村人口的利益取向相对单一。

日本综合农协作为涉及农村各个领域的组织，具有高度集中的全面的组织性，因而农村人口几乎百分之百是综合农协的组合员，综合农协通过其“金字塔式的三段式结构”自上而下对下层农协进行指导和监督。也可以说，农村人口是一个综合农协通过其高度的组织结构而被组织起

来的一个群体。而一个被组织起来的群体对政党来说意味着较低的政治交易成本。因此，作为战后“一党独大”的自民党，与在农村形成垄断地位的综合农协的密切关系，是其一直能够执政的很重要的基础，而作为回报，自民党则实施各种国家支付成本的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政策作为“交易的手段”。[307]

综合农协通过其在农村成为唯一垄断组织的高度的“统治性”，得以打着维护农民利益的“旗帜”获取政策优惠，使组合员普遍认为综合农协是在维护成员自身的权益，从而形成巨大的凝聚力，使得无论哪个政党要想在选举中获得胜利都必须在自己的政党宣言中将惠及农协的农业政策放在很高的位置，并且在执政的过程中制定和实施有利于农村的政策，以此来保证自身的选票数量和执政地位。而自民党长期的执政地位使得自民党与综合农协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综合农协与职业官僚及农林族议员三者在紧密联系的同时，也逐步形成了共同利益，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铁三角结构”。综合农协也借此转化为日本利益集团中保守性和垄断性最强的团体之一，并频频以“代表农民利益的强大利益集团”的面貌示人。[308]

（四）政府维持高米价与保持综合农协组合员数量的紧密关联

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帮助”下通过对农地的改革，消灭了支配农村的地主阶层，综合农协在成立之初，形成了以生产米麦为中心，以自耕农层为核心的组织基础。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高度发展，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使得农业劳动力逐渐外流，依靠非农收入的兼业农户比例开始增加，综合农协的正组合员开始分化为专业农户、持有土地的工薪阶层农户（第二种兼业农户）、处在前两者之间的兼业农户（第一种兼业农户）。从图19-3可以看出与蔬菜、水果、奶酪畜产业等农户类型相比，种植大米的专业农户只占到38%，62%的农户多是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兼业农户，并且这些农户的种植面积分散、规模较小。

正常情况下，生产成本的增加必然会使兼业农户放弃大米种植，但是高价格的大米使得兼业农户即使在高生产成本的情况下仍然继续种植大米，一方面用于自家消费，另一方面国家财政还有补贴。于是分散的兼业农户进行分散的种植导致了农地无法向少数专业农户集中，无法规模化地进行生产种植，因此也无法降低生产成本。而这种经济上丧失竞争力的现状的形成，不得不说是综合农协所“期待”的。因为一方面如果

土地规模化向少数农户集中则会造成综合农协收入的降低，也会形成随着专业农户的成长，专业农户脱离综合农协自主经营的情况出现（通过图19-3可以看出在蔬菜、水果以及奶酪畜牧业等领域的农户多为专业农户），这样一来会降低农户在综合农协的利用率，另一方面随着农户的减少，综合农协其他方面的事业项目收益同时会受到损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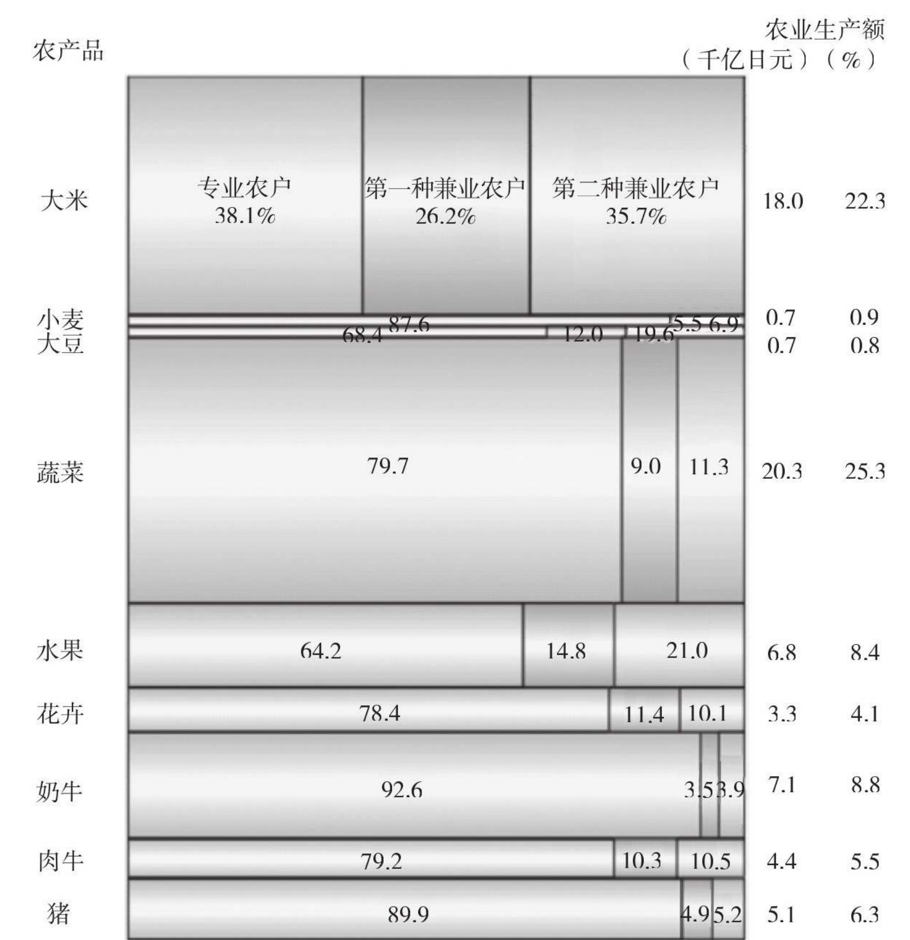


图19-3　2011年主要农产品的农户类型占比

来源：农林水产省：《平成22年度食料·農業·農村白書》（2011）。

图19-4显示了生产不同农产品农户的收入来源构成，相比其他农产品，生产大米的农户的收入主要来源于非农收入和养老金收入。也就是综合农协的组合员当中，以非农收入和养老金收入为主的生产大米的小

规模兼业农户数量占据了主要地位。

由于政治上综合农协的优势地位，日本政府一直以来重视农业政策，采用高关税和不惜支出大量的财政对农业进行补贴。对于政党来说，无疑是想在选举中能够更多地得到农村的选票，而如果想得到农村的选票就必须使得综合农协具备更多的组合员数量。而对于综合农协来说，组合员数量越多则越有利于自身获取更多的收益和巩固自身的垄断地位。因此保证组合员数量的不减少是综合农协和政党共同的需求。而通过各种政策维持高米价则成为了稳定组合员数量不减少，特别是维持种植大米的小规模兼业农户数量不减少的重要手段。

上文已经提到，从图19-4中已经看出种植大米的农户更多的是以非农收入和养老金收入为主的兼业农户，这些农户的特点大多是平日正常上班、周末进行务农的工薪阶层以及年龄在60岁以上的靠领取养老金生活的人。而大米种植相对于其他农产品种植来说比较简单，适合于平日忙于工作的工薪阶层以及年龄较大的人。同时，高米价的政策对于购买大米来说自己种植更划算，加上各种政策补贴“吸引着”大量的小规模兼业农户停留在大米种植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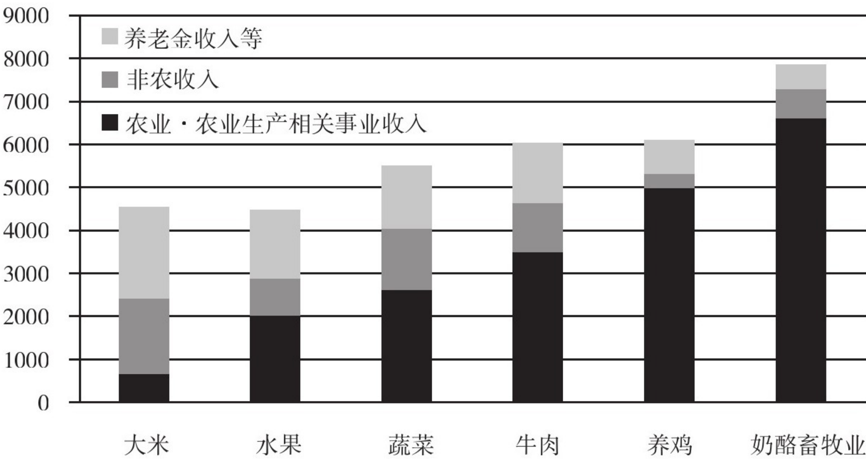


图19-4　2012年生产不同农产品农户的收入来源构成（单位：千日元）

来源：农林水产省：《農業経営統計調査——営農類型別経営統計（個別経営）総合編》（2012）。

为了维持小规模兼业农户数量的不减少以达到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也正是由于面对分散的兼业农户而造成了综合农协在农业方面收支

上的亏损，但因综合农协的综合事业兼营，使其能够通过金融和保险事业进行获利，又可以保证在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即使是需要极少的生产资料的农户或者是其他服务项目综合农协也必须进行服务，综合农协的“综合性”在这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内部的循环机制维持着综合农协的经营。

本文在此以农林水产省2013年的统计为中心，对综合农协各事业部门进行一个概括性的分析。从表19-3可以看出在各项事业收支中，除了信用和保险事业（5）外，涉及农业生产和生活的事业利益均为赤字，总计达到了165414581000日元，[309]而信用和保险两项的收益为370846267000日元，于是，信用和保险的收益填补了其他各项事业的亏损，使得综合农协整体处于获利状态，2013年的事业利益达到了205431482000日元。

表19-3　2013年度综合农协各事业部门损益收支表（单位：千日元）

项目	合计	信用事业	保险事业	农业相关事业	营农指导事业	生活以及其他事业
事业收益（1）	5648515901	974292081	511847363	2721739758	29182918	1411454989
事业费用（2）	3772490092	192600968	39694647	2294158620	45372420	1200664587
事业总利益（3）（1）－（2）	1876025612	781690874	472152443	427580975	－16189372	210790202
事业管理费（4）	1670593878	542579051	340417740	451551207	96483913	239561264
事业利益（5）（3）－（4）	205431482	239111684	131734583	－23970163	－112673435	－28770983

来源：农林水产省：《総合農協統計表——部門損益計算書（総括版）》（2013）。

五、改革：TPP谈判引发的日本农协改革及日本农业政策

（一）TPP与综合农协

文章一开始已经讲述了TPP中日本和美国之间关于大米的谈判，知道维持国内高米价是日本政府抵制增加进口额度的重要原因，其背后涉及政府的执政地位以及综合农协的利益。据日本《朝日新闻》2015年4

月17日的报道，在2009—2013年的5年间，政府的储备米每向市场销售1万吨的大米就会损失接近25亿日元，假设日本同意接受增加10万吨的进口大米，也就意味着日本将损失250亿日元的财政支出（参见表19-4）。

表**19-4**　日本政府储备米销售收支表

年度	储备米销售量	储备米销售收支
2009	4 万吨	▼224 亿日元
2010	19 万吨	▼614 亿日元
2011	9 万吨	▼327 亿日元
2012	12 万吨	▼124 亿日元
2013	18 万吨	▼232 亿日元
5 年累计	62 万吨	▼1521 亿日元

注：▼为损失。

来源：《朝日新闻》：米価維持へ年100億円超の国民負担も対米輸入枠（2015-04-17）http：//www.asahi.com/articles/ASH4J4G73H4JULZU004.html？iref＝reca，2015-05-01引用。

而上表数据还不包括政府储备大米所产生的管理费用，这无疑给政府财政以及日本国民造成了严重的税费负担。但是，综合农协与日本政府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使得日本政府在面对TPP谈判时显得极为矛盾。为了在美国服务于金融全球化的自由贸易战略推进中继续占有“搭便车”的国家利益，日本大米市场一般会有两种选择：要么大幅度消减关税，要么扩大“MA大米”的进口数量。诚然，前者需要从根本上改革日本的农业政策导致执政党失去老“票仓”，后者则意味着国家财政要拿出更多的补贴。[310]与大多数西方国家对外政策往往被内因决定一样，日本在财政赤字与政权稳定两者之间，当然会倾向于后者。

（二）“安倍经济学”中的农协改革

据2014年5月22日，日本在“规制改革会议”[311]中做出的关于对农协的改革意见中可以看出，安倍政权做出了削弱农协势力的改革方案，对于农协的改革主要有4方面比较关键的内容：

1.中央会制度的废止。所谓中央会制度其实就是废除“JA全中”对下

层农协的指导、监督权力，以达到各基层农协能够结合地域优势形成具有独立性的组织，能够自主地发展地域农业。这意味着安倍政权有意地在对综合农协进行“去中央化”，从而加强地方农协的独立性。

2.“全农”的股份公司化。“JA全农”作为农村领域涉及农业生产的全国组织，对农产品的销售以及对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购买具有垄断性的地位，在面对今后更加开放的国际市场，试图通过对“JA全农”的股份公司化改革加大其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

3.基层农协的专门化。当提及日本农协时，更多的是说综合农协，而日本综合农协与专业农协最直接的区别就在于综合农协可以经营信用事业，专业农协禁止经营信用事业。而这次的改革意见中，建议将基层农协的信用事业全部移交到“农林中金”，基层农协只作为“农林中金”的代理窗口存在。同样，保险事业也提出了和信用事业一样的改革意见。

4.准组合员业务。如果从日本综合农协作为农业合作组织的角度出发，组合员当中非农住民的准组合员数量远超农民的组合员数量这一现象显得很异常，但是大量的准组合员的存在是综合农协金融与保险事业得以更加壮大的基础。因此，改革意见中指出建议准组合员的事业利用不允许超过正组合员的1/2。

以上改革意见的关键是在政府惠农政策力度不减、基本上维护JA垄断地位的条件下，做了组织关系的结构性调整。形式上与1993—2003年中国的供销社组织结构调整类似。从中还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其实无法摆脱东方原住民农业的约束条件而进退维谷。一方面在面对美国规模化的殖民地农业配合其全球战略的压力下必须做出让步；另一方面，亚洲原住民被资源约束而长期形成的兼业化小农经济无论怎样调整，也不可能全面纳入美国实际掌控的国际农产品贸易市场。

总之，日本如果不对农协的垄断控制进行改革，会影响整个国家搭上TPP便车的好处，但如果真要放弃农协对农村经济的垄断控制，则会威胁自民党的执政地位。

本文认为：从以上4项涉及“关键部位”的改革意见可以看出，日本的农业以及农协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在面对美国、澳大利亚等殖民地才有的规模化大农业国家的竞争下，日本在TPP进程中提出的“安倍经济学”指导下的农业改革是否能打破长期以来的农业界“铁三角

结构”，将是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六、结语：农协垄断与国家综合安全直接相关

本文通过高米价对日本综合农协的分析，提出日本的综合农协是农村中具有经济、社会和政治多重功能的垄断性组织的观点。若超脱国内那些把日本农协仅作为合作社来研究的理论局限来进一步分析，则可知：这种综合性全方位的垄断组织不仅在其他国家很难看到，而且也比日本城市经济和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六大财阀具有更高的、唯一性的垄断地位。客观地看，其针对农业这个弱势产业和针对农村弱势群体的普惠作用，与维护国家安全及自民党长期执政的基础性作用，确实是相辅相成的。

这种相辅相成，表现在维护国家综合安全方面，已经达到唇齿相依的地步：一方面综合农协通过高米价维持组合员数量的不减少，使得综合农协具有了很强的“集票能力”，由此影响着执政党的选票，进而使政府通过高关税以及各种农业政策维持着高米价，以达到小规模兼业农户作为综合农协的组合员停留在种植大米以及相关具有“吸引力”的农业生产上，另一方面，因种植大米的农户多为工薪阶级的兼业农户与领取养老金的高龄者，这些人群因不具有专业农户那样的购买和销售渠道，所以只有依存于综合农协，失去综合农协的“服务”农业将无法进行，这反过来又使农协在维护国家农业安全和基层政治稳定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

综上所述，被称为“安倍经济学”重要内容的日本农协改革，因涉及执政党自身的政治利益，只能舍本逐末。没有这种组织结构和制度基础的国内政策界，需要对此做认真观察。

第五篇　生态文明：发展中国家的希望

第二十章　理性看待全球危机，自觉转向生态文明[312]

被西方意识形态化地命名的所谓“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几大经济体，并未能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全身而退，几乎都出现工业化衰落的困境（除了没有被承认为“完全市场经济”的中国），甚至退回到以资源出口为主的“前现代化”阶段。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追求西方式的现代化，并接受了西方制度形式推进“发展主义”，却普遍陷入发展陷阱无法自拔。原因即在于发展中国家无法复制西方发展所内在地延续着的本质特征——殖民化——既是前提条件又是“路径依赖”（起点决定路径）。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原住民人口聚居地和“超大型大陆经济体”，根本无条件照搬殖民化，由此却走出了与西方工业化不同的路径。虽然客观上靠从“三农”提取剩余这种特殊的“比较优势”内向型地完成了工业化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313]和后续的外向型的结构性产业扩张，但若要在金融资本主导全球“竞劣机制”、向全球转嫁代价的格局下维持发展，则更需要转向生态文明导向下的“包容性增长”[314]。

一、西方现代化的不可复制和不可持续

二战以后，落后国家纷纷将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西方式的现代化成为绝大多数后发国家竞相追求的目标。由此，发展主义成为战后的世界主流。我们通过梳理发现，西方发展路径因其特殊性和劣根性，不可能为其他“后发”国家所复制，并且这种现代化自身也因无法负载内在的高制度成本而越来越捉襟见肘。

因此，非西方的民众如果愿意把西方宣传的普世价值作为一种信仰，则无可厚非，因为相信各种美好说法中的一种或者几种，乃是个人的精神偏好。但切不可把那些宣传当作科学真理去忘我追求，甚至迫使他人牺牲一切为之奋斗。因为，唯一应该作为常识记住的检验科学与否的标准，是可以“在同样的条件下重复得出的结果”。当代实践中，还未

能找到如同西方那样对外殖民化扩张的条件。若没有如西方数百年对美洲、澳洲、非洲的原住民采用“血与火”去杀戮掳掠的条件，也就更没有可能形成西方制度路径可被重复验证的典型。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始于以国家推进反人类犯罪形式向海外进行的大规模殖民扩张。与希腊罗马奴隶制文明在全球复兴同时发生的是，亚洲、美洲和非洲原住人口的大量死亡，以及资源环境的掠夺性破坏。正是依靠大量掳掠来的海外财富，以及欧洲“贫弱”和犯罪人口大量向殖民地移出，西方才得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也只有在以此类殖民化增量收益的经济基础之上构建上层建筑，那些为后人乐道的技术革新和“政治文明”——资产阶级新贵与原封建贵族在海外增量收益条件下达成政治妥协——才成为可能。

西方进入工业化中期，必然地发生了产业资本结构性扩张需求，从而开始了占领世界市场的步伐。这期间，欧洲各中心国之间不断爆发争夺海上霸权、贸易权利、殖民地的战争。这些矛盾延宕到20世纪初叶，麇集在那个狭窄半岛型次大陆的欧洲列强，也在产业同构和几乎同步扩张背景下形成生产过剩和竞争恶化。

也是在这个时期，因宗主国的产业资本向原殖民地国家大规模扩张引起要素配置发生结构性社会变化——产业工人相对于产业资本成为愈益稀缺要素，才使劳工逐步具有了起码的谈判地位——而使得所谓阶级对立矛盾及其政治制度在近代西方有了落地的基本条件。

但无论海外殖民地争夺是否继续，也无论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否兴起，都并没有解决欧洲在产业资本扩张阶段的内在矛盾造成的生产过剩大危机。最终的结局，仍然是诉诸战争，并因所属殖民地的被迫卷入而演变为以法西斯为形式的、反人类的两次世界大战。

当然，西方在这一产业资本阶段经济社会结构内含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因素并没有随战争结束而马上消除。20世纪50—70年代，劳工运动、学生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和反战运动等，此起彼伏，大规模发生。直到20世纪70年代冷战竞争处于胶着状态，西方遂全面实行福利制度与收入分配倾向于中下层的分配模式，虽然缩小了贫富差距，但社会成本迅速上升，西方才不得不从80年代开始对外产业转移，其经济结构才升级为以金融资本主导。

西方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同时，内生性的劳资矛盾、外生性的环境问题等本来只属于西方世界的问题，也随之不可避免地移出到发展中国家，西方遂转型为以在金融、法律、医疗、教育、影视、出版印刷、旅游和技术领域等三产就业的白领为主，从而在20世纪80—90年代逐渐形成了橄榄形的、中产阶级引领的公民社会，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所谓政治现代化。可见，西方产业结构演化状况，对于扩大中产阶层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不可忽视的是，实体产业移出西方的同期是金融资本扩张，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两个十年里美国在资本市场上创造出了数千种金融衍生品，促推其加快经济泡沫化进程。由此造成的这种以寄生性的金融服务业作为支撑的上层建筑演变进程，发育出的是内在本质上具有寄生性的政治现代化，主要依靠产业资本在海外的汇回收益维持。20世纪90年代以来，任何一次从海外回流资本带动的华尔街股市冲高，都造成资金流出地的金融危机；并且，逐渐从外围向中心蔓延，金融危机最终符合规律地在中心引爆。

人们都应该知道：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海外资金回流美国IT产业造成的。但2001年IT产业代表的新经济泡沫崩溃，资金又避险逃离IT转投房地产，于是又形成房地产过度投资引发的2007年次贷危机。最后，随着华尔街金融海啸2008年爆发、演变为2009年全球危机，接着就暴露出2010年以来的西方国家全局性的债务危机，越来越显示出这种高成本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不可持续。

政党意识形态界分性渐趋模糊，竞选时无不在提高福利上夸大其口以吸引中产阶级选民，并陷入不断推高福利成本的政治现代化“棘轮”中。任何政治家都只能继续深化这种金融资本的寄生性，即政府直接出手，通过货币扩张和债务扩张来满足西方社会的大多数中产阶级群体的福利主义需求。

显而易见的常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根本不具备向外转移制度成本来化解国内矛盾的条件，那也就既不可能建立西方式现代化的经济基础，更不可能支付建基于其上的现代上层建筑的巨大成本。

据此可知，任何发展中国家追求“全盘西化”的激进努力无论多么呕心沥血、艰苦卓绝，都无异于“拔着头发离开地球”。而无论是在拉美的墨西哥城，巴西的里约、圣保罗，还是在亚洲的孟买、德里等大城市，

大型发展中国家都有占人口半数以上贫民居住的大面积的贫民窟。私有化的制度使得农村无地者涌入贫民窟成为城市赤贫者，城市化不过是“空间平移、集中贫困”。黄赌毒泛滥成灾，黑社会控制严重，正规的政府治理则很难实现。于是，巴西要举办世界杯足球赛，政府不得不违反宪法地动用国防军上街“打黑除恶”；而没有世界杯为借口、不能动用军队、只能“合法打黑”的墨西哥，就打不掉黑社会和毒品泛滥……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就大多数激进主流所追求的西方制度——市场化、自由化、民主化、全球化而言，其他大型发展中国家都比中国走得远。但却没有哪个能够相对地解决收入、城乡、区域等三大差别，少数主流利益集团进入西方式的现代化以大多数人的贫困和痛苦为代价，社会矛盾由此更加尖锐。

二、中国后发内向型工业化积累的制度经验

在不可能有西方通过海外殖民掠夺财富、转嫁矛盾的条件下，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大陆国家的工业化，主要靠内向型原始积累：（1）通过高度组织化（农村集体化和城市单位化）来占有全体劳动者的劳动剩余价值，同时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提取农业剩余；（2）通过劳动力资源资本化来大规模地集中使用劳动力投入国家基本建设，以此替代稀缺程度趋零的资本。正是通过这种对社会经济全面覆盖的“举国体制”，才创造了对产业资本的国家需求，也才在维护了独立国家主权的条件下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这个“惊险”的跨越。只是，这种“非典型”发展主义增长中的巨大制度成本，主要由举国民众承担[315]。

中国工业化原始积累过程中形成的这种中国特色的“政府公司主义”经济基础，也构成了后来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于是，在改革之中就派生出以“政府公司化”为特色的政府市场经济——无论社会如何批判这种国有部门占较大份额造成的垄断和集中体制，人们都得正视这个基本事实：“中国经验”的本质是在“政府公司化”条件下维持了产业结构的相对完整[316]。

如果进一步从制度文化层次看，中国在近现代国家政治建设（state build-ing）中，得以在维护自身几千年传统灌溉农业形成的群体文明的同时，形成了东方特色的集中体制内部两个能够整合社会资源的有效机

制：（1）借助漫长历史遗产中的核心——群体文化，来“内部化处理市场经济严重的外部性问题”；（2）借助几千年农户经济内在具有的“不计代价的劳动力组合投入”的机制来缓解资本极度稀缺问题[317]。在这两个机制的作用下，中国就有了比“完全实现了西方人殖民化占领的、即使获得独立也仍然传承了西方人构建的上层建筑的一般第三世界国家”更易于、也更快地进入工业化的条件。

三、生态文明理念与可持续的包容性增长

乡土社会作为中国历次经济危机软着陆的载体，其内部社会经济结构和外部宏观环境都发生着根本变化：

在农村内部，青壮年劳动力向非农领域大规模、长期净流出，致使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女性化的趋势严重，而农村劳动力的资本化收益，却大都被内、外资本和发达地区占有。这不仅使得产生“群体文化”的乡土社会基础正面临瓦解的危险，也使得维持农户理性——依靠家庭人力与资源的自我资本化收益以维持“风险内部化”机制——的主要条件正在衰减趋零。

在外部宏观环境上，一方面，中央层面在“资本过剩”条件下有条件向“亲民生”的政策作积极转变：2003年提出“民生新政”思想，2005年推行“新农村建设”国家战略，2007年强调生态文明，2008年明确提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两型农业”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并在2005年确立新农村建设战略以来连续近十年的时间里对农村投资总规模接近8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2万亿美元）（本文选取国家财政的农林水事务支出作为衡量国家财政对“三农”投入的指标，数据来源为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在广大农村地区大规模投入基本建设的这个不可能计较投入产出效率的政策安排，在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经济领域属于绝无仅有的举措。其宏观效果非常显著：由于大部分县市的农村实现了道路、供水、电力、通信、宽带等“五通”进村，使得农村中小企业创办成本大幅度减低，遂有农村多元化非农经济自主发展的局面，甚至带动了外出劳动力的回流，加剧了沿海的“用工难”……

但另一方面，延续着“政府公司主义”路径依赖的地方政府却由于仍然面临资本短缺压力，而不得不在“发展主义”导向下延续着“高投资＝高

负债＝高增长”发展模式，并面临着资源流出严重、生态环境难以持续的困境。

因此，若问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无非是在这种中央与地方复杂关系的背景下能否形成贯彻中央做出的战略调整的体制条件；舍此，不可能维系中国所谓的“比较优势”。

四、结语

长期来看：（1）必须贯彻“生态文明”理念，摈弃GDP至上的发展观，使经济回嵌社会，缓解环境和社会“双透支”遗留的种种矛盾。（2）要强化“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路线，政府的国债投入和国家金融部门的投资都需要体现普惠制原则。（3）要依托传统村社内部化节约交易成本的机制，弱化增加基本建设投资带来的农村社会的资源和生态环境冲突。

而近期的政策重点：（1）以中央政府掌握的垄断金融为基础，自上而下地组建能够统筹县以下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的基本建设投资机制，赋予其承担维护乡村稳定、更多地创造就业机会和拉动内需的政策职能；（2）进一步深化以“组织创新、制度创新”为内涵的农村综合体制改革。

唯其如此，中国才能在全球竞劣造成的危机之中达到“危中有机”，实现适合中国自身特点的可持续的包容性发展。

第二十一章　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高等教育理念转型及其试验[318]

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是应对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上层建筑范畴。高等教育形态，是具有一定历史使命的教育方式，体现了一个文明时代作为主要矛盾的经济基础和政治需求。

本文在阐述中国以工业文明为导向的高等教育形态的历史使命及其弊病基础上，认为时代到了新的关口——由工业资本文明转型到生态文明；而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需要高等教育形态的转型，以与之相匹配，并成为它的助产婆。文章列举了当前与生态文明相呼应的几种新型教育形态的雏形，并呼唤完善对这种新型教育形态的制度设置，从而在培养

生态型人才的使命中发扬光大。

一、生态文明为主导的教育形态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近现代出现的大学教育，作为国家工业化宏观战略的产物，在对我们这个传统农业文明历史悠久的发展中的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的国家百年的工业化而言，确实履行了其历史使命。由于近代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生存环境和救亡图存的现实压力，从政府到社会对刚刚起步的大学教育均抱有一种强烈的国家功利主义态度。“政治事业之推动与支持，则首赖于人才。人才之培养，系唯大学教育之责。”[319]天津大学的前身——中日甲午海战后1895年成立的天津北洋西学学堂，作为近现代以来我国的第一所现代大学，其创办宗旨为“兴学救国”，重点培养理工科人才，为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任务服务。伴随着中国20世纪百年来的四波工业化浪潮，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经历了师从欧美，到照搬苏联，再到师从欧美的历程，虽然每个时期的政治形态不同，但都显示出了教育本质是因应着中华民族百年来共同的政治战略目标——为救亡图存、改革开放的产业化发展目标培养主体力量——人才的。因为高等教育要面向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需求，其任务和内容则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科知识为重点，其典型特征是作为大型集中化综合性学校，教育过程为适应工业社会的需要而设计，致力于培养有一技之长的专门化人才。因此，专业教育、知识技能教育，其教学内容趋向于实用主义的专业化，教学组织趋向于形式主义的程式化，教学方法趋向于教条主义的传授式，这些现代化教育的变迁特点，为国家战略的指挥棒所指引，是工业文明在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使然。

时代到了21世纪初期，百年来中华民族的赶超战略终于使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到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事易时移，变化易矣。以工业文明为导向的高等教育形态，也逐渐表现出了其弊病的一面。其重视知识技能型、分科之学的专业化，以及产业化发展到了极致，形成了大学生人文素质缺失，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失衡等严重事实。专业化的人才（包括专家教授等知识分子）形成了对现实世界的分裂或者抽离式的认知图式和生活样式，在对世界的真实认知上，“我们的专家们好似成千上万个盲人。他们用拐杖在大象的各部位乱捅乱戳。大象是什么，各人自有主张”[320]，而综合人才或者全人教育却丢失了。如此，学生素质无法全面发展；学生自由研究空间大大缩小；学生创新思维难以养成。而且，产

业化的教育发展，是适应非再生能源基础的需要而出现的，其世界观和方法论均是基于培根、笛卡尔和牛顿等知识大家所奠定的机械论世界观。众所周知，工业化国家的经济都依赖于非再生能源基础，“当非再生能源贮存告罄，以其为基础的全部经济上层结构便将开始分崩瓦解。上层结构的各处正在出现裂痕。但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所剩的非再生能源仍然难以胜任修补工作”[321]。高等教育今日之问题正是“上层结构的各处正在出现裂痕”的表现。

执政党因应社会发展机遇和困境，于2007年提出了生态文明战略，于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精神，认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总之，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战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这是工业资本文明发展到后期的危机以及转机使然。“生态文明的发展有赖于两大因素的实现：第一，生态环境的支撑作用，即地球上的生态环境状况从最终意义上决定了社会文明的发展存亡；第二，生态文明时代的经济社会活动、人的文化心理变迁，需要以遵循自然规律、以‘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为基础性目标，以敬畏天地和自然为终极目标。它要求生态文明理念与道德准则在经济、社会、人文、民生和资源、环境等各个领域发挥导向、驱动作用”[322]，从而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与身体、各文明之间等都逐渐“生态化”“和合化”，以此体现新的文明时代特点。可见，所谓“环保”，已不只是一个技术方面的问题，而是全面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动指南的综合性理念层次的问题了。

既然教育形态随着文明时代的不同而不同、变迁而变迁，那么既有的教育形态如何适应执政党倡导的新文明形态而发生改变，并顺之者昌，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改革使命。新的生态文明的时代秩序应是以教育为开端的，至少当前及今后的大学教育，其方式、内容、方法论和宗旨，均是要围绕着这一战略性目标来的。社会政治战略目标的转型从根本上必然决定了高等教育的转型方向，而高等教育的形态转变，因为培养、造就了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历史主体力量——人才，也反作用于社会政治经济的转型。新的人类文明到来急需大量的基于生态文明教育原则而培养出来的“生态型”人才。它需要汲取古典的自由教育、自然教育及现代生命教育、非理性主义教育思潮的合理成分，服务于生态文

明战略践行的现实和长远需要，并在现实可能性的探索中得到经验性的建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高等教育形态的变革，不仅是生态文明到来的重要体现，而且推动着生态文明的转型，是其发生、发展的基础工程。那么，什么样的教育形态和教育目标符合生态文明的需求呢？以下谨从三个与生态文明相符的教育目标和原则上进行阐述，分别称为转型之一、之二、之三。

二、转型之一：应培养具有整体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人才

这条教育原则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而言的。

这一理念，汲取了古典自由教育的合理内涵，即推崇通识教育，主张个体身体、道德和智慧的和谐发展，其中包含了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性把握，理论认识和实践能力的统一性把握，等等。而以前为适应工业社会需要和非再生能源基础的需要设计的专业型分科教育过程将越来越过时。对生态型人才的教育过程，将围绕着对待知识的整体论方法而展开。如教育将强调过程而不是测量法；人们将找寻彼此联系的现象流动，而不是收集彼此隔离的事实贮存；考试将更着眼于非系统化的经验主义能力，而不只是自觉的有方向性的理性能力；论文、口头表述和实践经验很重要；学习不再意味着灌输性的知识积累和进步，而是脑力和体力的结合，体验性知识将成为必需，等等。

当前高校体制内通识教育的改革，正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层次培养具有综合性、整体性视野的探索和尝试。国内通识教育基本上是在1999年教育部建立一些素质教育基地后得到发展，近些年来较有影响的还有北京大学的“元培计划”、复旦大学的“核心课程”、浙江大学的“大类招生”，等等。通识教育是针对教育现代性的问题——大众化、技术专业化的缺陷而来的，它不只是一般教育的课程或知识，而是一种顺应未来社会变迁需求、培养中华文明传人的教育形态。它借鉴了古典自由教育的原理性思想，但有时代、民族和国情的新的内涵。通识教育的宗旨和目标，可以哈佛大学为借鉴：“为学生将来参与公共事务做好准备；教育学生能够理解自身既是艺术、理念与价值传统的产物，又是这些传统的参与者；使学生能够对社会变化做出批判性和建设性的回应；使学生更好

地理解自己言行的道德伦理意义。”[323]具体来说，通识教育核心内容为提供完整的教育，致力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从而奠定其广博的知识结构基础，训练和影响学生的心灵。其设置课程的特点和教学方式注重全面性、互补性、实践性和博雅性，可以“从教学内容体现融合性、教学过程增强互动性、考核方式注重实践性这三个方面进行教学改革”[324]。值得强调的是，博雅教育是通识教育实践发展到新阶段的一种教育形态，“它突出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发展，培养具有广博知识和优雅气质的人，注重提升人的生命价值和生活品质。它不仅鼓励开展多学科多领域的探索，更强调跨学科的整合，并能引导学生学会生活、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发展”[325]。

以中山大学通识教育试验为例。2009年，中山大学率先在全国成立首个博雅学院，首任院长甘阳认为博雅学院只是整个通识教改试验的一个环节，其目的是给通识教育的模式提供一个理想化的试验环境。博雅学院作为中山大学专门设置的学院，每年从各录取院系和专业的入校新生中精选30名学生集中住宿和学习。其教育方案是本科学制四年不分专业，贯彻跨学科跨领域的教学方式，目标是培养今后有能力从事高深学术研究的大思想家和大学问家。课程设置贯彻“少而精”原则，学生四年本科期间将广泛深入地研修中西方文明传统及其经典著作，包括中国文明史、中国人文经典、西方文明史、西方人文经典，等等，每门核心骨干课将有大量阅读、讨论与合作任务。教学方式还采用了研究生助教制度、小班讨论制度等。经过几年不易之实践，甘阳认为当前要推进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就要对现在的各种极端不利的条件（不利的社会氛围和大学内各种不利因素等）有充分的认识，目标一定要非常实际，要量力而行和逐渐积累。

由于通识教育试验有助于培养个体自身全面发展的素质与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其内含了生态文明时代所要求的对学生人生观、世界观和方法论等的整体性、综合性的培养价值取向。可谓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高等教育理念转变的重大探索。

三、转型之二：对大自然物质和生命运动的认知与敬畏

对大自然物质运动和生命运动的体验和认知，是大学生把握的一大类系统知识。从对大自然物质运动的认知上而言，敬畏生命是一条根本

原则。

具有对生命和灵魂的敬畏之心，是生态型人才核心宗旨之一。生命是物质运动的最高形式。敬畏生命是人类文化的开端，也是文明和文化的伦理内核，在开启人类文明之初，敬畏生命就包含了对各种生命——人类、动物和植物等生命的敬畏。“敬畏生命是一条上抵天、下抵地、中涉人的绝对性、普遍性和深刻性的伦理原则，它直接针对当今无法无天的人类，要求唤醒他们的生命意识和伦理良知”[326]，让每个人都在用信念和行动回应它，承担起敬畏生命的神圣职责，包括热爱生命、尊重生命和保护生命的职责。量子物理学证明，粒子能记忆身边环境的变化，会记忆外界的想法、语言、音乐和图像，并通过自身变化反映出来。敬畏生命，赞美生命，对大自然物质运动的生命形态持积极认知和友善态度，才能走上一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共生共荣之路。

自从20世纪末、21世纪初，地方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剧而导致中国“三农”问题严重化、出现生态环境危机以来，在以温铁军为首的知识分子倡导下，全国高校大学生“三农”社团蓬勃兴起，有持续作为的约有100多家，遍布全国各大专院校。大学生“三农”社团作为以关注农民、农业和农村为出发点，对包括农业在内的乡村生命和乡土建设进行参与性认知的自发组织，是对产业化、学科化发展的大学教育进行补位的产物，它不同于高校体制内的院、系、班的规范化组织设置，具有志愿性、开放性和创造性等特点。“三农”社团以“关注‘三农'、成长自我”为使命，或利用校园条件进行相关理论学习和行为体验来了解“三农”，或利用节假日奔赴乡村进行乡村建设的参与式体验。以北京林业大学翱翔支农与实践社等高校社团为主的“校园农耕”试验，以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等高校社团为主的“乡村情景朝话”行动，均是以敬畏生命为核心的、对大自然物质运动认识的行之有效的经验性探索。

关于“校园农耕”试验，北京林业大学翱翔支农与实践社是一支以践行“环保、爱心、支农”为特色的志愿服务类学生社团，从2005年成立起至今，已有会员累积近千人。翱翔社于2008年始连续5年来在全国首创“校园农耕”行动，开展景观农业、生态农业的试验，在社会上引起一定反响。社团“校园农耕”的试验过程，不但是一种全人教育方式的体验式教育过程，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得到了整体性认知和运用，更重要的是，学生们从中受到了敬畏生命和灵魂的体验性教育。农耕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活，整个过程中有堆肥、选种、育苗、耕作、除虫等多

种农业技术的运用。在农耕初期的育苗大赛环节，学生们感受到了是生命就需要一定的温度、湿度、阳光等条件限定；在接触、感受、呵护生命的过程中，他们体验到了生命的脆弱、神奇、条件、生长、成熟，等等。这是一门关于尊重生命的体验性的综合性学科，而非知识灌输型的专业化学科。此外，在农耕过程中学生们培养了一定的情与志——即灵魂的塑造。当该社团在农耕中把握了一些规律之后，便激发起了大家追求生态、健康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热情、志向和理想。他们主动地以校园农耕推广交流会的方式，进行示范、推广、宣传，并以极大的热情带动了北京农学院、天津科技大学、井冈山大学、河南农业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重庆大学等“三农”社团的校园农耕实践。

关于“乡村情景朝话”的体验。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是一支成立于2003年的社团组织，在当代知识分子参与的新乡村建设运动中，它一直以结合农村社会和大学生自身发展状况探索有效的乡建方法而凸显于高校社团之林。自从2011年至今，该社团就提出“向社会学知识，到田野做学问”的目标[327]，以“乡村情景朝话”的方式去发现乡土性，去体验那以土为本的百谷草木与人类生命之间的生生不息关系，其中包括自己和别人之间的友善关系。培养发现乡土性的能力和功夫，其方法就是悟道与尚清。所谓悟道，即经历“接触事物→找出规律→反复验证→完善浓缩、穷究其理→旁及其他、一通百通”这样一个过程[328]；所谓尚清，即敏其感清其心，就是在解放身心开发五官潜能，对真善美、知情意的呼唤中，恢复相对于人为雕琢而言的“天然”和“自然”，触及自然社会和历史传统的根本。该社团试图通过悟道与尚清的方法，对自身本能的直觉力尽情释放，也即“率性至道”，从而学会接近他人、他物和大自然生命的本然机理，真正地分享感动、收获，使自己成长，大家共享成长，这种对另外一种可能性——不同于资本化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和情景场域——多元生命共生的乡土性之寻找和体悟，就是乡村情景分享行动的主要功能。两年来，该社团在河南省兰考县的坝头村、贺村、南马庄村，杞县的于村，祥符区的杨庄村、段木周村，通许县的岳寨村，灵宝市的罗家村等诸多村子，进行支农支教活动时，均于清晨时分，到村庄的田野里、树林里、高岗上、草丛中、祖茔旁、古树下，进行情景分享式的朝话活动，曾写出了《良辰美景润心田》《祖坟与古树》《老院落，新院落》《新乡村建设之黄河坝头篇》等文章。把“感觉、理解和欣赏乡土性”作为一大任务的下乡行动，这是一个新方向，意味着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外发力量“走进乡村”理念的开拓，这种做法和理念曾影响到很多其他“三农”社团的下乡活动取向，即从以前以热情协助和推动农民合

作的方式“求诸人”，到以感受天地生命和推己及人的方式而“求诸己”。2013年4月，当代知识分子指导参与的河南省灵宝市弘农书院成立了，它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为宗旨，两年来开展的关于下乡大学生实践教学任务之一，就是“乡村情景朝话”。

四、转型之三：把握人类社会运动的自主合作之道

从对社会关系运动的认知上而言，把握自主性和合作之道是另一条根本原则。

自觉把握和处理社会关系中的自主性和合作之道，学会理解和尊重“差分”和合作之道，是生态型人才的社会关系处理时表现出来的特点。所谓差分，是指“性质各异、品位有差、充分分化的”多样化的存在，也是指各种物质元素、要素的“差异与分殊”的“连续不断”“不断生生”的过程[329]。所谓自主性，是在对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的价值予以理解和尊重的前提下，在多样化的存相之中培养自己的差分并自觉对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进行认知。所谓合作素质的培养，是指在人与人之间的各种“融突”和合的动态过程中，把握住如何达到共生、共处、共立、共达及共爱的大道。所谓“共生、共处、共立、共达、共爱”等五大中心价值，是21世纪人类处理各种自然、社会、文化问题的基本原理之一。

如下谨以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所进行的乡村实践教学探索——“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为例。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作为一家民办社会性组织，成立于2004年，是以新乡村建设为核心目标，以推动农民合作与城乡和谐发展，进行大学生行动教育与新文化研究及推广工作为主要任务的民间组织。该中心曾与国家扶贫办、中国扶贫基金会、香港社区伙伴等组织合作，自2005年开始启动“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迄今已有10届，培养人数已达几百名。

“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面向高校和社会，选择那些关心农村发展、对农民有感情、有服务农村热情、有奉献品格的大学生为培养对象；要求培养对象有意愿长期蹲在农村，全职一年进行相关的理论学习和实践工作；原则上要求培养对象为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的社会青年（有丰富农村工作经验的人员可适当放宽）；必要时也可以持有所在高校书面推荐或同意的在校休学证明而休学一年。学员实践领域多种多样，主要是关于合作互助的农村社区发展尝试，关于绿色联盟的农村可持续发展尝试，关于生态农业种植的联合尝试；关于

新青年绿色公社的尝试，即青年人自身的可持续生活的探索，等等。

把青年学生迈向具有生态文明导向性的实践作为一种重要教育手段，权且称之为生态文明的实践教育模式。这个实践教育模式，具有教育学层次上的方式之综合性和目标之彻底性。相对于“理论已死？理论何为？”的高校教育之反思，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直接践行了“实践即教育”的命题。在具有生成性、综合性和多样化的乡村社会生态实践之中，年轻人通过参与农民合作的方式学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合作之道；在自觉把握和处理各种乡村社会关系之中，体验到了农民合作事业和生态文明事业的需求而滋生的知识分子自主性价值，在接近自然的有机耕作体验中，在对乡村四时风物的感受中，年轻人真正理解和明白了尊重天地万物生命间“差分”的多样性共生价值。通过“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项目的推动，一批优秀的青年人脱颖而出。他们不仅摆脱了旧有的教育和思想羁绊，推动了以乡村实践教育为模式的变革和教育理想的实现，而且也开始通过自身行动的合作式参与，推动了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这就将个人的成长和中国农村社会的变革结合起来。

乡村实践教育，作为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多年来在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其开创性经验已经为相关组织所重视和采用。到目前为止，约有十家机构采用类似的方式培养青年人才。如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组织的“青年人才培养计划”，友成基金会组织的“小鹰计划”，等等。

综上所述，从工业文明主导的教育形态向以生态文明为主导的教育形态转型，作为一个时代性的宏大战略课题，本身充满了错综复杂的此消彼长，它是在高校体制内、外或者两者之间的条件允许下，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高等教育理念转变及其试验为体现方式的，一点一滴的量变积累过程。值此新文明与旧文明交替之际，唯愿适应生态文明需求的新型教育形态，能够从先行者们在一定条件下自觉试验的萌芽、开创阶段，发展到引起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进行相关制度化的保障阶段，以及在高校和全社会的成熟推广阶段。

第六篇　探索：本土经验与地方创新

第二十二章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苏州工业园区结构升级案例研究[330]

政府作为制度创新中的重要主体，在市场化的改革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相对于诸多发展中国家无法摆脱“低水平陷阱”的教训，中国的苏南经验，特别是苏州工业园区（以下简称园区）发展经验值得借鉴。本文通过对园区的深入调研，系统分析了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机理，并且提出了政府创新与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相关性理论思考[331]。

一、制度创新：“低制度”向“高制度”转换的动力

所谓的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美国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332][333]认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作为最主要制度供给主体的政府，因同时承担着提供公共物品的职责，而相对于其他行为主体（个人和组织）在制度变迁中更体现公平性。所谓制度创新，可理解为制度的诱致性变迁过程，应该是制度创新主体为获得潜在收益而配合政府进行的有正外部性[334]的制度安排。

根据演化博弈论的一般原理，由于社会的和历史的初期条件局限，经济社会的制度进化往往表现出极强的路径依赖性。因此，一般的社会经济演化过程不一定带来最佳制度，可称之为“低制度”，并派生出许多与“低制度”概念有关的现象。例如，国际社会关于“拉美化”[335]的讨论，关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陷阱”的讨论以及“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336]等现象。

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337]认为：“发展就是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变。”动态地看，只有实现经济结构“一次又一次”的成功转变，才叫发展。据此，通过高技术或高投资而实现了经济升级到“高结构”的发展经验，也具有相应形成“高制度”的条件。

相对而言，当西方主导国家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转变，进入金融资本全球扩张的时期，一般发展中经济体如果只看国内条件的话，往往因没有信用基础而无法获得金融授信，遂只能从低端产业起步进行“内向型积累”，形成低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基础和与之配合的符合“低制度”内涵的上层建筑。二者的内在利益分配及其结构性组合，对后续的产业结构向高端升级形成难以突破的“路径依赖”约束，使得经济体的产业层次只能在“低水平”上徘徊。

并且，更为深刻的问题是：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不具备复制发达国家通过向外转嫁制度成本而成功转变经济结构的客观条件，有些甚至都没完成过一次像样的民族民主革命。由此而一般都处于低经济结构羁绊之中的“低制度”，于是，遭遇到各种“发展陷阱”也就成为一种老常态。

这种低水平陷阱之普遍意义，一方面是与要素重新定价后自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遇到瓶颈有关，更重要的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惯性已经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性较强的“低制度”。在这种普遍性的局限下，当下的中国经济发展也正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的困局，甚至出现去工业化的趋势：2009年全球危机爆发以来外需下降，作为世界工厂的外向型经济过去依赖“环境租”和外来劳动力“福利租”[338]，长期处于收益率过低的“微笑曲线”底端[339]，没有形成产业升级必需的资本积累[340]，表现出相关数据连年下降而负债率不断上升的趋势。且这种“吃租经济”强化了外来资本和外来劳动力在本地的固化，形成了“吃租”的路径依赖。

有鉴于此，如何才能在困境中突破“低制度”，形成向“高制度”转换的动能，完成技术增密和资本增密的过程，从而解决产业转型升级带动产业利润率上移？对园区产业升级成功经验的研究尤为重要。

我们在园区[341]起步的筹融资过程研究中认识到，西方“制裁”下的中国全面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之初即于1993年遭遇财政、外汇、金融三大赤字同步爆发，致使园区起步时的中方投资为0！正是因依托中国以“举国体制”构建的“政府信用替代资本信用”，加之搭上了新加坡这种“强政府”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优良信用的便车，才得以超越了一般发展经验的“低水平均衡陷阱”，构成了制度起点较高的“高制度”[342]。

我们此前对苏南发展实践[343]的研究证明，早期的资本原始积累决定了其以后发展靠自身的制度结构和路径依赖。而近年来对园区的研究则进一步表明：从正式进入制度化的建设运营阶段开始前的资本原始积

累过程中，经济基础层面进行区域综合开发的本地“强资本”与寻求产业全球扩张的跨国公司“强资本”的所谓“强强联合”建立了产业资本阶段的“高制度”起点，从而凭借国家信用、海外资本和政府公司化运作这“三驾马车”，实现园区发展规模快速扩张。也正是得益于此，园区才能在形成产业结构之后，进一步通过政府公共服务创新和金融创新，将结构调整带来的制度成本内部化，助推区内企业技术创新，实现技术增密与资本增密，上推园区整体产业收益率，带动完成了产业升级转型[344]。

二、地方政府：转型中制度创新的重要主体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央政府财权和事权的下放，地方政府更多演变为具有独立财政及经济利益目标的经济组织，实际上成为地区经济的主导力量。

1983年，美国经济学家劳埃德·雷诺兹[345]分析41个发展中国家100多年的发展历史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的假设是，在经济发展中一个最为重要的解释性变量是政治组织和政府的施政能力。”在中国经济学家中，杨瑞龙根据我国地方政府在改革的一定阶段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事实，提出“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假说，把地方政府作为转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迁主体来研究[346]。李义平认为一直以来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的任命制和以GDP的增长为主要内容的考核标准，导致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要求不一致[347]。周黎安等运用中国改革以来的省级水平数据系统地验证了地方官员晋升与地方经济绩效的显著关联，为地方官员晋升激励的存在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348]。

尤其是自1994年中央政府应对赤字危机而采取的带有加强中央财税集权性质的分税制改革起，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角色发生了巨大变化。众所周知，支撑政府运转的核心动力是财政收入，从1958年中央第一次向地方分权起，中央财政收入比重从1958年的80.4%骤然降至1959年的24.4%，并在到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前的很长时间内保持在较低的水平[349]，直接导致中央财政连维持基本开支都很困难。相对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依靠中央政府所赋予的财权和外贸外资等自主权，地方政府发生性质变化，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并采取公司化的运作方式——通过汲取本地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实现“营业额”（GDP）和“利润”（财政收入）的增长。

人们都应该知道收益与风险对等的道理。由此说，地方政府的这种

公司化“府际竞争”体制，既对过去三十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推进作用，又造成巨大风险表现为银行坏账和财政赤字，则只能由中央承担。由此，凭借国家政治强权维护核心经济主权所派生的财政和金融这两个方面的国家信用扩张，是中央政府承担地方竞争风险的主要手段，也由此形成对中央严格掌控信用扩张的内因——这是中国区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基础。

同理，若某个地方政府得到中央的信用赋权，则该地方需要承担中央的战略责任，例如主动调整产业结构。我们对园区20年发展经验中有效利用国家信用的调研中重点讨论的问题之一，就是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如何降低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制度成本，实现“外部性成本的内部化”[350]，并推动产研融结合带来产业结构升级和利润率上移，从而有效地解决了“低制度”陷阱下无法自主迁移到“高制度”的路径依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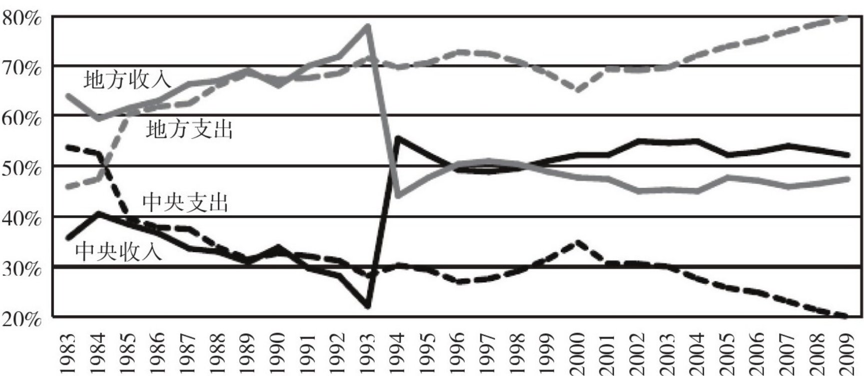


图22-1　1983—2009年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占比[351]

三、案例研究：园区发展中的地方政府创新

（一）危机下的原始资本积累

1988年中国爆发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通货膨胀＋生产停滞”这种典型的滞涨危机，从宏观经济指标来看，1988年通货膨胀率高达18.5%，随即，1989年经济增长速度陡然下降到4.1%，1990年则进一步下降到3.8%[352]，沉入典型的萧条阶段，直到1992年相当于“逆周期”作用的邓小平南方谈话，才出现复苏和1993年高涨及其伴生的1994年CPI超过24%的高通胀再次爆发。据此看，1988—1994年的周期性波动，就是苏州工业园区创建时的宏观背景。与1988—1989年经济危机同时爆发的是政治危机，则与冷战中的大多数不同于西方制度的国家的

遭遇几乎相同。但随之而来的西方制裁恶化了萧条，也让中国经历了改革以来最艰难的时期。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1990年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对于正处于西方制裁困境中的中国来说，是一件重要的大事。而新加坡出于本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地理空间布局优化而与中国进行深入经济合作的客观需求，与中国打破封锁的努力一拍即合[3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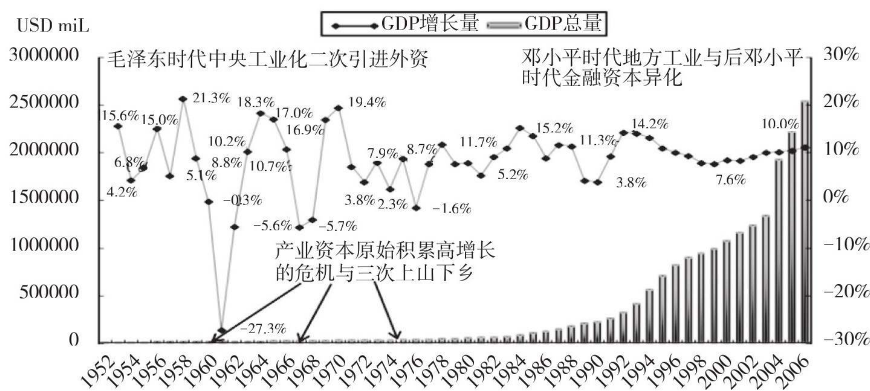


图22-2　1952—2006年中国宏观经济增长与波动[354]

于是，苏州作为一个区域经济体，客观上就具有了“双重角色”，第一重角色是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开启“地方工业化”[355]的进程中，地方政府普遍具有的以地方利益为本位的“地方政府公司化”；第二重角色是苏州市因承接国家重大战略性任务而特有的“地方政府代行国家体制”，并由此得到中央政府资源的在地化配给，以及国家信用的背书。这“双重角色”强调了垄断性地“代行国家战略”，从而进一步上升为“代行国家体制”，客观上极大地提升了所在地政府的竞争力。

历史上任何国家，无论何种体制、何种意识形态，其工业化都不可逾越资本原始积累这一阶段，且资本积累过程决定了制度结构及后续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356]。亦即，所谓的制度，并非主要取决于具有特殊性的条件下的主观人为因素，而是派生于工业化原始积累初期的一定资源禀赋约束条件下的不同要素根据稀缺程度的客观结构变化[357]。得到中央政府赋权并承担中央的战略责任的园区，受命于危难之际，因此也被赋予了非比寻常的资本积累方式，并深深地影响了其后的制度变迁。

1994年，中国和新加坡成立了“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首期开发70平方公里土地。但是，这一年国内财政、外汇、金融三大赤

字同步爆发，通货膨胀率高达24.1%[358]，处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中央政府将本币的币值一次性下降50%以上，大力推进外汇改革[359]和财税改革[360]。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园区起步自然绕不开原始积累，而当时的中国政府投资能力捉襟见肘，园区手中唯一的筹码就是政府的“强信用”背书。

而此时的新加坡，因推行出口导向战略，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快速腾飞，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被称为“东亚模式”[361]的典范。由此，按照事前约定协商，5000万美元注册资本的原始资本积累由新加坡政府先行承担65%[362]，这种初始资本的投入方式所形成的制度路径，由是而不同于珠三角发展模式[363]。

同时，中方非比寻常的政府信用替代资本方式集中体现在了园区最有竞争力的软件环境上，即“九号文件”[364]。不仅给予了园区参照享受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各项政策[365]，还给予了园区上不封顶的自行审批特权、财税优惠政策以及灵活方便的外事管理权，充分体现了国家权力在地方层面的延伸和直接行使，并由此形成了中央向一个地方“强政府”赋权替代资本的案例，为举国体制下海内外两个强政府的紧密结合打下了制度基础。

（二）“强政府”与“强资本”结合下的“高制度”起点

很多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均指出，强有力而高效的政府是后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此，“强政府”与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必然联系[366]。新加坡就是典型的“强政府”国家。“强政府”特征作为稀缺资源，助力其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而新加坡“区域工业计划”之所以选择苏州，恰是苏州这种苏南“强政府”模式能够成功地嫁接其优良商业信用的隐含逻辑。

作为承接国家间合作使命的园区，既有举国体制下的制度优势，又有新加坡依托“强政府”信用背书提供的外资，使园区脱离了地方资本原始积累内在形成制度的路径依赖，在“高制度”起点上客观形成了“强政府”和“强资本”合作的发展路径，较快地直接进入法制化、有序健全的市场经济高级阶段。使园区产业的发展跨越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低级阶段，一开始就进入以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为主的阶段，从而避免出现珠三角发展面临的“腾笼换鸟”[367]制度性困境[368]。从累计总投资看，在起步阶段的1994—2000年期间，园区就吸引了大量来自欧美国家和新

加坡的产业资本，累计总投资合计占比达到60%。到2014年，累计进驻企业已经超过5000家[369]，发展的产业也从电子信息产业和精密器械，开始向软件、动漫游戏、纳米光电新能源、生物医药、生态环保、融合通信等新兴产业迅速扩充，客观上实现了技术增密，形成了产业高地，实现了内生性的产业转型升级。

因此，我们或可形成如下比较有一般意义的经验归纳：世界上任何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资本要素极度稀缺（而非一般经济学作为立论前提的要素相对稀缺性）条件下，都是“亲资本”的。区别仅在于各国政府由于自己的基础和能力不同，能与之结合的资本类型也不同，遂使各国的工业化道路形成了不同的路径和结果。

园区经验表明：得到中央信用赋权的本土“强政府”和外来“强资本”的两强结合，客观上形成了一种产业筛选机制，易于吸引处于行业中较优秀、附加值较高位置的企业入驻落户，最终聚集较高产业利润率的企业形成产业高地，从而带动产业链扩张，实现产业利润率的上移。

（三）制度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再平衡

1998年，东亚经济体遭遇了金融风暴，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中国很快就遭遇外需持续下滑的局面，对外依存度过高、缺乏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等结构性问题不断凸显，这次“输入型危机”让中央政府深刻地意识到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意义。

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来的历史经验，一再表明如下基本事实：居于任何类型的政府治理下，只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都会有结构调整带来的制度成本。为了将制度成本最小化，政府可以通过制度创新来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进而降低交易成本，而制度创新则与政府市场经济[370]派生而来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府际竞争”体制有较大关系。

代行国家体制、承担中央调整产业结构战略责任的园区，则依托“强政府”信用背书，通过产业公共服务创新引领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其核心经验则是：生产性服务业呈现出典型的资本和规模报酬递增优势，对于产业转型升级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但是需要较高的财政投资能力，因此，政府需充分发挥在资源配置上的引导作用，以金融平台和生产性服务业[371]作为政策传导中介，有效引导了园区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进而促进产业转型发展。

于是乎，政府一方面投资于产业公共服务，建设产业共性技术平台，帮助中小企业降低技术创新外部成本。同时，还建立了综合服务平台，对接有需求的中小型科技企业，提供认定咨询、财税服务、投融资服务、上市服务、培训服务等专业公共服务，降低初创型企业经营成本，帮助企业专注于核心技术创新。另一方面，政府通过金融创新，解决了初创型中小企业缺乏抵押担保等信用供给不足问题，促进金融资本回流实体经济，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而以上这些也只有与“强政府”下的“强资本”结合才具备财政投资能力，且技术创新本身的“准公共物品”特性和外部性使得政府介入尤为必要。

其中，就金融创新来说，由于不同于传统产业的信贷支持模式，高附加值类科技型中小企业处于微笑曲线的两端，具有轻资产性，因抵押担保不足往往面临期初融资困境，虽然技术创新本身具有正外部性，但也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容易导致技术创新投资不足[372]。因此，作为技术创新重要支撑的投融资机制创新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一般的风险投资[373]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客观条件，基于这种风险投资理念，园区成立了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依托公共服务平台创新使得外部成本内部化，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倾斜来培育和引导重点行业发展，形成相关创新企业聚集的条件，通过制度创新和金融创新来夯实技术创新基础。

这个过程可理解为政府信用赋权给引导行业的新兴中小企业信用，依靠政府背书减少信息不对称下的交易成本过高问题，从而“筑巢引凤”，吸引后续社会基金跟投，对接创新型中小企业，并逐步形成股权融资、债权融资等全方位金融服务平台[374]。2010年，第一支“国创母基金”[375]落户苏州，作为投资基金中的基金，其不直接参与项目投资，而是筛选合适的创业投资基金来投资，发挥杠杆撬动作用，实现资本增密。通过母基金引导投资，园区在推动股权投资行业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带动了园区创新型企业的集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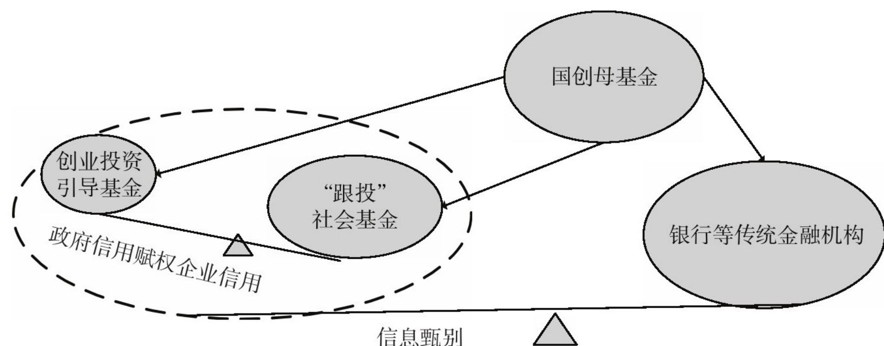


图22-3　投融资机制创新模式[376]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如下：在引导新兴产业集聚形成产业高地的过程中，由于期初的研发、融资成本过高，导致完全市场化竞争条件下很难自发形成产业转型和升级。因此，依托中央政府的赋权和“强政府”政府特征，先行投资建设综合的产业共性技术服务平台体系，可以克服各种交易费用过高并将一些外部性问题内部化，易于解决市场失灵和组织失灵问题，降低技术创新的制度成本，有助于带动和哺育新兴产业发展。在平台服务创新的基础上推进企业投融资模式创新，不仅有助于解决高附加值型技术创新企业的期初融资瓶颈和技术创新投资不足的问题，还有利于弥补交易成本过高和企业债信不足的短板，更易于实现新兴产业集聚，破解“低水平陷阱”，形成服务创新、技术创新与投融资机制创新的相互促进与良性循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再平衡实现。

四、结语

通过园区产业升级的发展经验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不能指望资本自发推动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在外向型经济路径依赖较强的前提下，尤其需要政府通过制度创新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性结构升级。

二是政府的制度创新也很难自发形成，与地方政府的公司化竞争能力和发展自主权有较大关系。制度的创新应该是综合性的，不仅包括金融服务创新，还包括公共服务创新、技术服务平台创新。

三是园区创造的辉煌不仅与坐拥区位优势的苏南地区、借势国家对外开放战略之天时地利有关，最重要的是与资本原始积累方式和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的本土制度创新紧密相关。

园区经验通俗地概括起来就是1232："一大优势、两强结合、三驾马车、两大创新"。

"一"大优势：依靠中国的"举国体制"与国外投资方谈判，得以"零成本"逆势起步。

"两"强结合：园区的地方政府"强信用"与发达国家的"强资本"相结合，为园区打下高起点基础。

"三"驾马车：凭借国家信用、海外资本和政府公司化这"三驾马车"，实现园区发展规模快速扩张。

"两"大创新：通过金融服务创新和政府公共服务创新，助推区内企业技术创新，上推园区整体产业收益率，带动产业升级转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加快了融入全球化的步伐，外向型经济的程度日益加深。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以及相关的政策导向，西方大都将本国过剩的生产能力转移到市场需求旺盛的新兴国家，以服从这些跨国企业控制和扩大市场份额的全球战略。中国沿海地区率先成为外资青睐的投资标的。

但是，长期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客观上形成沿海地方政府对"三来一补"型外资的依赖，甚至在遭遇全球危机导致外需下降、很多企业破产之际仍呈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因此，实现内源性经济的转变首先要求地方政府发展理念上的转变，通过制度创新，从热衷于融入全球价值链转变为立足本国市场需求培育本土企业引领技术研发创新的成长环境。尤其是在当前经济高速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和产业结构转型路径依赖较强的背景下，唯有在政府主导下，利用各种资源和主体的复合制度创新才有可能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性结构升级，从而向价值链两端延伸，实现产业利润率上移，摆脱低水平陷阱。随着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放权及赋权力度的持续加大，经济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迎来了新的机遇期，地方政府应充分发挥公司化"府际竞争"优势，积极转变发展理念与导向，做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这篇大文章，尤其是要发挥好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创新、技术服务平台创新、金融服务创新方面的高效动员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和平台再组织建设，打造好制度建设高地，为实现资本增密创造基础条件，并促进其与技术增密的相互补充，最终助力产业结构转型突破"路径依赖"约束，实现产业结构及产业利润率上移的再平衡，彻底

摆脱产业转型的“低水平”陷阱。

第二十三章　逆周期调节与“政府信用替代资本信用”——苏州工业园区三次遭遇危机条件下的政府行为案例分析[377]

一、引言

逆周期调节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旨在熨平经济运行中的周期性波动，并降低由此积累的系统性风险。2008年美国爆发华尔街金融海啸旋即演化成全球经济危机，不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多采取了类似的政府干预行动，主要有两种观点和做法：其一是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依据、以政府主管部门为调控主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国家增发货币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和政府财政增发国债拉动投资，以及资本监管、产业政策等其他工具的综合协调运用；[378]其二是以国内陈元为代表的观点为经验依据、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按照政府宏观调控的需要，选择政府急需支持的企业和领域予以信贷支持，缓解企业的市场融资约束。[379]

上述两者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逆周期的宏观调节作用，而且各有侧重。但也有各自的局限性：前者的政府宏观调控覆盖面广，却因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后者的开发性金融的市场化运作具有直接、针对性强的特点，也因此缺乏综合性。本文从政府信用的角度对这两种看似不同、实则相同的逆周期调节逻辑予以抽象归纳，认为：在危机条件下，各国政府所普遍采行的逆周期干预措施，不管是财政、金融、货币等宏观调控政策，还是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市场化运作，其实质都是政府信用的具体表达，基本方式都是政府信用对资本信用的替代。

从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过程分析，当宏观经济处于上行区间时，私人资本在自由逐利的市场上乘势而上，容易形成经济泡沫；当宏观经济处于下行区间时，个人信用、企业信用等资本信用加速避险下行，起到恶化经济环境的作用，最终造成系统性的全局风险。[380]因此，在全球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出现系统性风险之后，政府信用替代资本信用的逆周期调节，对于市场恢复稳定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

我们对苏州工业园区（以下简称“园区”）20年发展经验的研究表明，不仅在国内外的宏观经济层面，存在危机条件下政府信用替代资本信用的客观经验，而且在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中观层面，政府信用和资本信用在不同条件下也可以相互转化和替代。其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主要是指中央政府信用或国家信用；后者既包括中央政府信用，又包括地方政府信用。对此，本文将在第二部分中阐明有关政府信用的基本观点；第三部分以政府信用替代资本信用的基本框架对园区三次遭遇危机条件下的政府行为进行案例分析；第四部分归纳总结逆周期调节中中央和地方政府信用的转化及其替代逻辑。

二、观点提出：改革以来形成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信用的内在差别

迄今为止，关于政府信用，大多侧重于从政治学视角进行研究，比如强调政府作为信用主体履行职责和承诺的意愿及能力的能动观、从公众和社会组织等客体出发界定政府信用的认知观以及两者兼顾的能动-认知综合观等。[381]这些研究思路遵循一般的两分法给定政府和社会对立的关系，认为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是社会成员让渡的个人权利，目的在于维护社会成员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一旦政府不能履行承诺，人们有权废除并建立新的政府。从这个指导思想方法出发，政府信用是政府维护公共权力合法性的派生价值，强调的是政府信任和承诺的抽象内涵。[382]这一判断也许适用于西方国家，但并不适用于中国。

本文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工业化国家，在资源环境禀赋极差的条件下，客观上只能由政府主导来推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先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工业化，其后是改革30多年地方政府主导的地方工业化。[383]也就是说，政府作为事实上的经济主体参与了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全过程。同期，政府发展成为垄断国家财政金融权力、控制大量国有资产[384]以及拥有土地等关键要素资源的所有权主体，本质上不同于“物业公司”性质的西方国家政府。[385]因此，若从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政府自身的特性出发，则政府信用是政府权力直接派生的国家信用工具，在资本稀缺条件下政府信用直接对私人资本起到信用替代作用，主要服务于国家的整体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这导致中国人民银行管控国家赋权形成的主权货币信用与美国金融资本之间的性质不同，也在于美元是由美联储这个私人银行组成的机构发行和掌控、主要服务于私人资本运作需要的信用工具。

新中国成立初期，与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相配套，财政管理制度总体呈现“全国财政一本账、统收统支”的状态。在财政和金融的关系上是“财政金融不分家”，中央政府控制社会经济活动，高度垄断财政金融权利；地方政府则在中央政府计划下行事，自主活动空间相对狭小。[386]因而，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只有国家信用和以工分为形式的农村集体信用，中央与地方政府在信用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不存在私人信用和企业信用等商业信用。[387]在这种非货币化时期，政府及其部门信用可以直接用“白条”表达。

中央和地方的政府信用分化始于1984年的“财政分级承包”，以及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这两次财税体制改革中，地方政府获得相对独立的财政利益和土地等资源配置主导权，也就有了更鲜明的垄断经营性特征，由此派生出地方政府公司化的行为路径。[388]而且，公司化的地方政府因占有以财政权和土地产权为主的公共产权而派生出地方政府信用，主要包括财政信用和可变现资产信用。其中，财政信用是由税收、预算等法律规定所产生的信用关系，来源于地方经济发展和税收增加，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水平相关联；[389]可变现资产信用直接依托于地方政府拥有的土地、自然资源以及固定资产等可变现资产的存量。一般而言，地方政府信用的强弱取决于其社会动员能力、经济实力、财政实力以及金融实力等经济社会条件。[390]

中央政府信用直接与国家信用或主权信用相关联，主要包括国家货币信用和国债等政府性债务信用。其中，政府性债务信用是中央政府以国家财政做担保发行国债，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通过向全社会筹集资金所产生信用关系。由此体现的国债信用是一种主权信用或国家信用。国家货币信用是由国家发行法定货币所产生的信用关系，中央政府直接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掌握货币发行权，也属于典型的国家信用。此外，国家法定的金融机构属于中央政府信用派生的国有金融工具，享有“准主权级”的政府信用。[391]据此看，不论是国债信用、货币信用还是国家法定的金融机构信用，客观上都是承担国家政治经济综合安全责任的中央政府在维护国家整体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过程中扩张市场信用的基本手段，其实质都是中央政府因垄断国家层面的宏观金融和财政权力而派生的信用工具。

因此，一方面，中央政府信用和地方政府信用具有体制上的同构关系——只能由政府权力所派生；但另一方面，两种信用之间的内在差别

也是客观存在的。

尤其是2002年国有银行商业化改制完成以后，中央政府在新世纪进入了以获取垄断性金融收益为主的“白领政府”阶段；仍然停留在产业资本“蓝领”阶段的地方政府，则由于金融部门在利益导向的市场化改革中异化于产业经济的普遍规律，而陷入资本短缺。[392]

因此，以金融资本为主的中央白领政府和以产业资本为主的地方蓝领政府各自遵循着不同的行为取向，彼此呈现出一种很强的竞合关系。

中央政府因掌握财税、金融、土地指标等关键宏观制度权力，尤其是掌握国家政治信用赋权的货币信用，而对全民承担无限责任，需要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因此才有中央在宏观领域的区域差别、城乡差别、贫富差别再平衡以及“亲民生”的“中央下乡”。亦即，承担国家综合安全责任的中央政府采用国家信用配合政策手段下乡，以集中制国家的强大主权信用所派生的国家财政和金融作为乡村基本建设和社会政策的主要资金来源，目的在于构建“民生新政”之下的和谐社会。

然而，大多数不可能升级到金融资本阶段而只能“以地套现”的地方政府[393]，只能与被优惠政策吸引来的外部投资结合在一起搞“地方下乡”：处于资本短缺条件下的地方政府将中央各部委带有“普惠”性质的财政转移支付项目整合打包，集中投资地方规划中的园区基础建设，目的在于吸引外部资本的大型项目投入。在这个意义上，财政转移支付项目被用来作为招商引资的资本项目的通道和平台，而资本项目的引入才是拉动地方经济的关键。[394]其实质还是以资源和土地的资本化开发来实现产业化经营。

此外，杨斌认为中国政府是一个全体人民共有的特大型无限责任“资产公司”，拥有大量的土地资产、金融资产以及企业资产。由于大多数的生产资料全民共有，政府需要对全体人民承担无限责任，因此不存在破产问题。而且，政府公司下属两类子公司，包括省、市、县等各级政府体系和国有资产体系。虽然这些分公司都是独立法人，但实际上责任是连带的，下级公司若出现资不抵债即由它们依附的上级政府或部门解决，或者由上级单位动员兄弟地区或部门援助解决，或最终由中央政府买单。[395]

本文指出：实际上，只有中央政府承担最终的无限责任，公司化的

地方政府因风险上解而只承担有限责任[396]，由此导致中央政府信用和地方政府信用的内在差别。

不过，本文分析的园区经验是一个特例——园区能够在一片经济危机之中逆势而起，并且多次对接国家战略投资，是因其承接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而特有的“地方政府代行国家体制”形成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特征，园区“政企合一”的地方政府信用很大程度上带有无限责任的特点，与无限责任的中央政府信用具有同构性。

三、案例介绍：园区20年中政府信用三次替代资本信用的经验过程

本文以园区20年发展经验为案例论述“信用替代”。先看园区的“高调”起步。[397]

（一）1988—1994年宏观滞涨型经济危机之中逆势而起

中国1988—1989年滞涨形态的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是1990—1991年的萧条阶段，接着在1992年“南方谈话”作用下出现全国大办开发区招商引资，进一步演化为1993—1994年的经济过热造成的“三大赤字”[398]危机，1994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4.1%，是为改革以来最高，迫使中央政府强力推出宏观调控（后来被媒体称为“三年软着陆成功”），提高利率、紧缩信贷，控制基本建设。[399]同时期，1989年后西方对中国封锁，以美国为首的20多个发达国家联合对中国实施制裁，世界银行与其他受美国影响的国际组织都停止了对中国任何用于发展和建设的贷款。[400]因此，中国当时不得不面对资本极度短缺的国际压力。

正是在这样不利的形势下，园区起步才是“高调”的。园区问世之初，因其有着突破西方封锁的任务而带有政治性，中央政府赋予它“举国体制”——在突破现行制度环境约束下更多的行动选择空间，包括打破部门条块分割的“中国新加坡双边协调理事会”制度设计、超过一般经济开发区数倍面积的国务院权限的土地开发规划、不设上限的国家计委权限的项目审批权、长达10年的财税政策优惠、独立海关等本来属于中央政府权利的特殊政策。[401]

据此可知，园区正是凭借中央赋予它的“举国体制”形成了可供地方政府运用的国家权力转化而成的信用资源，才得以逆势而上——作为典

型的投资型经济开发区，园区却是近乎“零成本”起步。

1994年中国和新加坡共同成立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简称中新合资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美元，中方占比35%，新方占比65%。根据1994年对外经济合作部下发的《关于设立中外合资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的批复》，双方均以现汇出资，第一期至少为各自认缴出资额的30%，须在合资公司营业执照签发3个月内出足；1个月内缴清出资额的10%，其余1年内出足。合资公司可在园区内进行成片土地开发与经营，合营期限为30年。

而那时的中国政府对外负债远比2010年爆发的“欧债危机”严重得多，若按照西方财务标准则属于已经“破产”：1994年中央加地方的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约12%，而当年外债余额占GDP的比重达到14%。[402]可用之财捉襟见肘，在中央财政这一层表现得尤其明显。而且，当时全国范围内的资本极度稀缺，无法通过正规的金融渠道筹集中新合资公司中方占股35%所需的资本金。

对此，园区代表中方采取的解决办法就是“政府信用替代资本信用”：在银行设立了一个临时账户，让新方财团把注册资金打过来，再作为土地补偿款转到中方账户；由于20世纪80—90年代苏南在农村集体经济条件下的工业化高速发展进程中，地方政府在土地开发方面有相对较高的政府信用足以替代资本信用，因而并不需要立即向动迁农民发放补偿款和安置费等费用。于是，园区就利用这个政府对资本信用的替代作用打了时间差，把新方这笔钱作为中方财团的出资又打回临时账户，这样中方财团的出资也到位了。由此，现象上看解决了园区的第一笔出资问题，实质却是仅凭政府信用就完成了园区的零资本启动。

1995年，随着园区开发进程加快，中新合资公司的投资总额由1亿美元增加到3亿美元，注册资本相应地从5000万美元增加到1亿美元。而园区后续的资本金以及相应的投资责任并非源于地方政府，是由国家出面安排了11个国家级单位参股来筹措完成的[403]。

客观来看，园区这个“化危为机”的具体过程里面，固然包含着新方基于国家合作而形成的“国家信用”提前给中方打入开工款，而且，园区在需要增资之际得到的投入也绝大部分来源于中央政府的外汇资产，遂使园区脱离了地方资本原始积累内在形成的制度路径依赖。但除此之外，还有一层信用关系也需要析分出来，苏南地方政府因其对辖域内各

种资源的较强动员能力，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被称为“强政府”，其不同于“弱政府”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强政府大都能够派生出对基层社会的“强信用”。

总之，在起步阶段，园区第一次依靠中央政府赋予的“举国体制”和地方政府强信用完成对一般金融信用的替代。[404]

也就是说，与新加坡合作的园区能够在一片经济危机的逆境之中突起，必有前提，亦即：因承接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而特有的“地方政府代行国家体制”。在代行国家战略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可以得到中央政府资源的在地化配给，以及国家信用的背书，因此，垄断性地“代行国家战略”从而“代行国家体制”，客观上能极大提升该地方政府相对于其他地方政府的竞争力。这也是园区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能够多次对接“无限责任”的中央政府所派生的国家金融信用的内在原因。

（二）1998—2001年宏观经济紧缩期间获得国家战略投资

园区第二次面对危机发生政府信用替代作用，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受其影响，新加坡国内的经济遭受严重打击，出现经济不景气、前景不明朗、房地产市场低迷、价格疲软以及利率趋升等一系列问题。加之，园区周边地方政府公司化竞争致使其竞争力不断下降。因而，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新加坡决定从园区撤资。中新双方在1999年达成股本转让协议并于2001年正式实施，中方占股从35%增加至65%，新方相应地减少30%的持股比例。同时，根据资本结构改变治理结构，中方承担起公司的主要管理职能和全部的投资责任，将全面负责园区的环境改造、基础设施建设、地面设施建设、招商引资等职责，新方则转向提供人员培训等辅助职能。

据此来看园区的2001年，当新加坡方面随着股权结构的调整，撤出了对园区高标准基本建设的投资责任之际，中方除了增资扩股所带来的资金压力外，更大的资金需求则是后续的园区基础设施投资。

然而，此时的中国，一方面正处于1998—2001年宏观经济下行期间的通货紧缩时期，金融资本严重短缺；另一方面国有银行因不良率过高正在进行商业化改制，银行风险意识加强，惜贷现象严重。因此，当新加坡停止投资时，园区遭遇到了第二次经济危机带给它的又一次劫波，用媒体的话说是遇到了“资金瓶颈”，其实是遇到了资本断流的严

冬。

对任何主体来说，无论宏观还是微观层面，资本断流都必是一场危机。

在这个阶段上，承担无限责任的中央政府所派生的主权信用发挥了逆周期调节作用，通过国开行这种国家信用工具直接介入园区开发，先是投资园区环金鸡湖的环境治理工程，然后贷款园区做二三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配套功能建设。2000—2006年，国开行先后向园区承诺了四期贷款，累计承诺额194.11亿元，累计发放额134.5亿元，占此期间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累计投资的1/3。[405]

国家信用替代私人资本的逆周期作用在园区表现为引入国开行投入于基本建设，极大增加了以土地为中心的政府总资产规模。至2005年年底，园区国有资产总规模506.08亿元，净资产170.46亿元；固定资产总额115.08亿元，占全社会固定投资比重32.27%（最高时占比将近一半）；产业分布于基础设施开发、房地产、公用事业、投资管理、电子与信息、风险投资、教育文化科研、仓储物流、商业旅游、人力资源管理等行业。[406]

其实，国开行代表的国家信用和园区的结合有着很强的必然性：园区项目启动时，就是依托“举国体制”进行股份筹资；当后续基础建设融资的重任再次落到中方肩上时，由国开行这样为国家战略性投资提供融资支持的政策性银行给园区以信贷支持，也是势所必然。亦即，面对宏观经济进入通货紧缩时期和东亚金融危机新加坡撤资的双重压力，也只有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以长周期的大额贷款投入于园区的基本建设来体现对国家信用对市场信用的替代作用，才能帮助园区熨平经济波动，维持园区初创时期以“举国体制”形成的“高制度”路径。[407]

国资确实起到了以国家信用维持投资拉动增长的逆周期作用。随之，是自2002年达到高位之后伴随经济复苏和2003年重新进入高涨阶段而连续下降——国资投入的逆周期调节作用是清楚的，至少在园区是这样表现的。随着宏观经济形势转好，园区的地价、房价等土地增值收益日益显现，国开行也从园区的开发建设过程中分享了园区地价上涨所带来的总地租[408]收益。

这就是园区第二次依靠中央政府所派生的国家金融信用对商业金融

信用的替代。本文据此认为，危机时期应该强调政府信用替代资本有逆周期调节的宏观作用。

（三）2008年全球经济下行之际推进结构调整

园区第三次发生政府信用替代是由于2008—2009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旋即演化为全球经济危机。受其影响，园区2009年的经济形势出现了新世纪以来的最严峻局面，多项重要经济指标——包括工业总产值、利税、利润、主营业务收入和成本等，都出现了程度较重的大幅下滑，亏损面比上年提高，出口则出现降幅为20%多的深度跌落。最终，园区却能够相对平稳地渡过此次危机。

其原因在于：从2005年开始，园区就以电子信息和机械制造为基础，着手向云计算、生物医药、纳米技术等新兴产业转型，并且日益呈现出以产业服务创新带动产业技术创新的发展态势。其中，核心经验是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上的引导作用，以金融平台和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政策传导中介，有效服务并引领了园区面向未来产业发展的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

与此同时，国开行在对园区的信贷业务也在“与时俱进”地不断创新。一方面，随着经济过热、商业金融投资增长速度加快，国开行逐步降低在园区总融资存量中的占比，但仍然占有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以设立“国创母基金”[409]的方式对研发创新提供金融支持。

政府利用经济下行推进结构调整乃是更为积极的逆周期调节。其中，园区金融创新的关键是政府信用主导让金融信用“回嵌”[410]实体产业。这与同期一般金融资本追求流动性获利而加快脱离实体经济的趋势完全不同。

2010年国开行与园区的中新创投合作运作中国第一支国家级股权投资复合基金——国创母基金。该基金的总规模为600亿元，分为PE（私募股权投资）母基金和VC（风险投资）母基金两个板块。苏州创投集团（由原先的中新创投转变而来）主要负责运作VC板块，主要投资于早期和成长期投资的创业投资基金。

截至2010年年末，入驻园区的股权投资机构将近100家，累计的注册资本规模超过180亿元，在苏州市备案的创业投资机构数量在全国地级市中排名第一，其中近一半是在园区办理备案登记手续。园区已经成

为江苏省内创业投资资本集聚度最高的区域。股权投资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园区创新型经济发展，仅2010年就有40多家创新型企业获得总额超过3亿元的创业投资。[411]

2011年，国创母基金首期运作顺利，新增股权投资机构150个，资金规模超过430亿。

至2013年年初，园区已拥有297家股权投资机构、14家融资租赁公司、5家小贷公司、3家科技支行、1家科技金融超市，并设有统贷平台、引导基金等政策性融资服务平台，先后推出科技型中小企业集合信托、集合式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股权质押贷款、投贷通等10多项金融创新产品。

总之，国创母基金的成功落户，对于园区目前组建具有引领和整合功能的区域金融综合体，进而扶持中小创新型企业的发展意义重大。这是园区第三次依靠无限责任的中央政府所派生的国家金融信用形成了对一般金融信用的替代。

四、经验归纳：无限责任的中央政府信用嫁接“公司化的地方政府”信用

一般来说，无限责任的中央政府所派生的国家金融信用和公司化的地方政府信用能够交易的前提在于金融短缺。当经济危机来临时，一般都会出现金融机构惜贷以及短期的流动性短缺无法补救，只要熬过这个阶段的流动性短缺，长期增长内生的风险收益就是倍加的。而在危机发生时，只有在中央政府独立地通过国家政治强权创造国家资本信用的体制条件下，政府信用对一般金融信用的替代才是存在的，同时也是有效的。

第一种比较常见的方式是中央政府一手创造国家货币信用，一手发行国债等政府性债务信用，然后国家用增量货币直接购买增发国债，意味着用同属于国家创造的这两种信用做交易来演化为规模化的市场信用扩张。此时，对国家政治经济综合安全承担无限责任的中央政府信用派生的国家金融信用替代的是一般金融信用。

这在中国的特色实践中，体现为被大规模扩张出来的资本信用转化为面广量大的国债带动国有金融的基本建设投资，用于缓解区域、城乡

和贫富这三大差别。

首先是缓解区域差别。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当年，中国政府果断借鉴西方1929—1933年大危机中相对成功的美国“罗斯福新政”经验，在1998—2002年以国债投资手段将过剩产能转向国内基本建设，先后实施了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1999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到2013年年底总投资规模超过4万亿，其中的2.万多亿是国债投资；2001年开始“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投资规模为2万多亿，70%以上属于国债投资；2003年提出“中部崛起”，投资规模又是3万亿左右。总的来说，中央政府用了大约8万亿元的投资来解决改革开放“一部分地区先富”带来的区域不平衡发展，基本上缓解了中国经济增长“东高西低”的区域差别。全球大危机以来西部地区的GDP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东部，区域差别平衡战略初步奏效，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紧接着是缓解城乡差别。中国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把城乡统筹列为新世纪的五大统筹之首，2005年又把新农村建设作为八大国家战略之首，持续到现在，“三农”投入成为中央财政最大项的开支，2013年为1.3万多亿，8年的总投资规模7万多亿。这个史无前例的、基本建设和社会建设双管齐下的大规模农村投资，客观上起到了缩小城乡差别的作用。

十八大以后需要通过“深改”予以缓解的，是这个大规模投资期间反而拉大的贫富差别。

第二种是公司化的地方政府可以在政府角色和企业角色之间相互转换，地方政府信用可以替代资本信用。

按照西方的二元对立思想，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企业是对立关系。但对园区来说，中方主导时期与新方主导时期相比的一个重要转变，是随着园区治理结构改变为“政府公司化（政企合一）”而来的：收益来源由单一的土地营利性出让转变为“土地出让金＋园区财政税收”的总地租内涵——即使土地出让的价格低，但企业入驻后上缴的税收是增加的，这可以弥补土地的收支缺口。因此，园区管委会既是开发区的政府管理主体，也是开发公司，可以随时在政府信用和公司信用之间相互转换。

而且，这个转换是相对平滑的，因交易费用内部化而使制度成本近乎为零：既可以以公司形式要求国开行给它发放贷款，又可以以政府的

身份，以本地掌控的可开发资源土地作为抵押来获得外部投资。最终，当公司型政府可以随时转换政府角色和公司角色时，所产生的制度收益也是倍加的。

第三种是不同的政府信用之间也可以相互交易，尤其是中央政府信用和地方政府信用，两者平滑交易的前提取决于是否具有同构性。

中央政府因承担国家的无限责任而以无限责任的方式创造承担无限责任的国家金融信用。据此看，国开行就是最直接体现无限责任的国家信用工具。而且，只有中央政府能够用国家强权来创造货币信用。所以，现实生活中普遍发生的是，处于资本短缺的公司化地方政府将政府信用转化为公司信用，去对接中央政府赋予无限责任的国家金融信用。

此外，还需强调的是，国家金融信用所替代的不是一般性金融信用，而是长期的基础性投资。基于风险控制的需要，一般性金融的主要业务大多是短期贷款和设备贷款，固定资产贷款相对很少，即使有也是需要抵押品的。而区域性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样的投资大、回报周期长的项目，属于商业金融难以涉足的长期投资领域。比如，国开行在园区的贷款就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既然很大程度上能够提升园区的地产价值，那就会因符合周期性规律而在经济高涨期产生倍加收益，包括园区一期投资中的环金鸡湖治理等公益环保项目。因此，一般认为，金融信用用于环保方面的投资是没有回报的，国开行作为无限责任的中央政府所派生的国家信用工具，并不是单纯地介入环保投资，而是参与对园区的整套组合打包贷款——包括有升值潜力的基本建设在内。最后，作为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园区政府则是用整个土地升值后的预期倍加收益来统一偿还。这就是两者成功合作的内在运作机制。

同时，这也解释了为何国开行自成立以来，一直支持并不能获得产业短期收益回报的国家“两基一支”工程（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支柱产业），而仍能维持95%以上的贷款回收率。因为：国开行选择与地方政府或者大型国有企业合作，而这两类机构，都是能够将投资收益所产生的总地租增量，再通过政府的强制性措施，如税收、财政预算外收入或者其他方式，相对集中地以现金方式收回，从而履行对国开行的还本付息责任。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公司化地方政府信用都可以直接与中央政府信用平滑结合。园区能够对接国开行投资，客观上是因为园区管委会虽然

作为地方政府却有着代行国家体制的条件——因其承接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而特有的“举国体制”特征，而且其身份可以在政府角色和公司角色之间相互转换。也就是说，园区政府很大程度上具有无限责任特征，与无限责任的中央政府具有同构性。

综上所述，园区先后历经三次宏观经济大危机都可以“化危为机”，其得以逆周期发展的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可以占有实体资源成为土地资产和其他实体资产所有权主体，中央政府又可以占有信用资源创造债务信用和金融信用。客观上，处于产业资本阶段的园区政府主导着本地资源的资本化过程，保证长期并且可持续的资本化产生的所有权主体收益。新世纪初的国有银行商业化改制完成之后，金融权力上收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则顺势进入金融资本阶段。本文案例中，中央政府所创造的国家金融信用通过国开行这个工具去直接跟“政企合一”的园区结合。这表明，恰恰只有中国这样的无限责任政府，才有如此操作的条件和空间。

如果是西方模式的有限责任政府，那只能让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自由市场去干，而后者因为投资人承担责任有限，不可能包下全部风险，而一定要求有向社会转嫁代价的制度，所以西方制度具有风险与收益不对等、势必对外转嫁成本的内在机制。

因此，中国得以“化危为机”的逆周期调节中的重要经验，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信用的两种转化及其所派生的两种替代：中央政府的国家政治强权转化成国家货币信用，国家层面的金融信用所支撑的长期投资替代的是一般意义上较为注重短期流动性贷款的金融信用；地方政府的政府信用转化成公司信用，政府信用和公司信用之间可以相互替代。同理，中央政府信用和地方政府信用之间也可以进行交易，主要取决于两者是否具有同构性。

第二十四章　通过国家赋权与地方创新破解“三元悖论”——重庆发展经验解析[412]

从国家综合性安全角度看，重庆是长江上干流最西部的重要战略城市之一、“长江国防体系的三大支点”之一，重庆所在的西南地区也是明清以来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重庆模式”这一概念最早是在2010年由七大部委联合推出，当时认为其优势在于通过系统工程解决重庆房地产问

题，同时在促进社会公平、改善民生等方面取得良好效果，随即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对于重庆的发展经验，我们可以从更长的时间维度以及宏观层面进行剖析。本文认为，中国自清末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一直没有破解的中央—地方—基层“三元悖论”，在重庆得到了相对有效缓解，是以其区域创新值得持续关注。

近代以来，如果以19世纪末为起点，则可大致将重庆的发展分为前工业化、工业化、金融化三个阶段。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势力愈益侵入中国，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重庆于1891年开埠，由此拉开了这个内陆城市与全球政治经济接轨的序幕。

开埠以后，近代工业和外国资金以及西方宗教开始涌入，重庆的政治、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各种利益集团的矛盾冲突加剧，20年后辛亥革命的导火索也开始在这里埋下伏笔。从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重庆的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主要是面向本地区民生消费的轻工业，兼有采矿等资源型产业和航运、金融等服务业。但是受资金和地域限制，这渐进而缓慢的资本主义发展期间的企业普通规模小、资金力量弱，重庆并没有能力自主地形成完整的产业结构。这是重庆的前工业化阶段。

后来，重庆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特点明显，可称为“三次飞来的工业化”。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始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带来的“突变”。1937年冬，日本军队占领南京，民国中央政府被迫西迁至重庆。1940年宜昌失守前，堆积在宜昌的申钢厂、渝钢厂、航空兵站，以及广东、陕西、南京、巩县等兵工厂的器材抢运入川，重庆一举成为各种工业和党政机关、大学等集中的地区，直接带起了重庆的第一次近代工业化和现代社会发展。由于“内迁各厂中，迁往重庆的占了半数，且这半数之厂均为兵工署所辖重点厂家，应该说是我国兵器工业的精华”，这为重庆的工业化打下了深刻的兵工特征的烙印。

第二次工业化同样出于战争威胁下地缘战略的考虑。1964年，三面受敌、处于“新月形包围圈”下的中国启动“三线建设”，将沿海沿边工业

基础迁往中西部的三线地区，重庆有了依托举国之力进入第二次工业化的机遇。到20世纪70年代新中国领导人对美欧开放之前，西部都是国家工业投资的重点；重庆兵工工业得到强化，成为重庆第一大支柱产业；重庆成为整个西南地区的军重工业高地。

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政府在宏观经济危机压力下提出的应对性改革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中央决定大裁军的同时期，大幅度减少军工投入；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财政分级承包制下有了财政的自主性和积极性，部分兵工工业转向民用产业，重庆可以利用自己的发动机和钢铁产业基础生产摩托车等适合山地消费的产品，乡镇企业也乘势而上，成为支持农村公共事业、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但大部分过去由政府供养的兵工工业部门转到面向市场求生存以后，因本不具备面向市场的条件而遭遇重重尴尬乃是势所必然，就像苏联解体后集成了大量高科技的航母也只能切割了当废钢板来卖。

80年代后期，中国在外汇短缺的背景下实施政策优惠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的“对外开放”战略，沿海地区直接进口生产设备从事“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内陆地区的第一部类的生产部门（生产工业设备的部门）不能与下游的生产终端消费品的第二部类生产部门形成产品交换和价值循环，发展空间被进一步挤占和压缩。重庆资金、技术、人才都“一江春水向东流”，麻雀、孔雀都往东南飞，在国企衰败、职工下岗这样的恶劣环境之内，依靠暴力抢地盘、抢生意成为最低成本的资本扩张手段，由于在山区维持正规治理的成本显著高于平原地区，重庆的经济和社会治理都如其“雾都”的天气一样呈现灰蒙蒙的色调。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

正如重庆国资委主任崔坚所说：“重庆的基础非常薄弱，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和西部困难的双重叠加，而当年国企全面脱困目标，重庆差一点就拖了全国的后腿，实际上全国的国企全面扭亏为盈时，重庆还有70%的大面积亏损。”

到了2004年，重庆的国有企业“小、碎、散”，历史包袱依然沉重，结构性矛盾突出，亏损面仍占70%以上，超过270亿元不良债务难以处置。

重庆第三次“飞来工业化”，既是在上一轮工业化衰败的重要背景

下，也是在中国在缩小区域差别的同时面临新的世纪挑战的重要背景下发生的。

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和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国家地缘安全的问题再度受到重视。同期，中央政府以国债投资为主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至今已经实施了15年，极大地改善了西部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环境。

2002年，随着国有银行进入商业化改制的攻坚之年，金融资本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而将授信对象的范围缩小，只有财务报表优良的国有企业，或是有土地作为抵押品的企业，才能容易地获得贷款，前者是有国家信用支撑，后者则是因土地广受投机资本青睐而比一般实体产业更具有升值潜力。在大多数地区，后者更具有普遍性。因此，金融资本因追求自身独立利益而转向与投机领域相结合这个趋势性转变，使得沉淀成本高的实体产业得难依靠自身的实体资本在市场化条件下生存。

金融资本异化与产业资本叠加国际资本大量涌入国内所带来的挑战是全国性的、结构性的。对此，可以用“三条微笑曲线”来概括这一演变态势。

第一条是指一般意义的微笑曲线，主要是金融对产业的异化导致了产业链的分化而形成的。过剩资本首先对国内各种资源和要素进行再定价，导致资本过剩的发达国家将实体产业的生产制造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因此在产业链分工上，形成了发达国家占研发和营销两头高附加值，发展中国家只占据底端低附加值环节的格局。第二条微笑曲线是指，自美元与黄金脱钩而与石油、粮食等结合，国家收益分化形成了资源型国家、加工制造型国家和金融型国家这三大类群，拥有资源主权的资源型国家因可以搭金融资本国家货币增发的便车而收益大增，加工制造型国家则因为资源与资金成本提升而收益下降，这个“两头高、中间低”的收益格局课题组归纳为“国家竞争的微笑曲线”。第三条微笑曲线指的是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的投机金融资本涌入，另一方面由于在上两条微笑曲线的作用下国内实体产业收益低，资金剩余不再向实体产业回流，从而形成与第二条微笑曲线类型的垄断性资源领域和金融资本两头收益高、中间产业资本收益低的局面。

以上三条微笑曲线叠加之下，发展中国家普遍呈现经济泡沫化和产业低度化。

今天中国疲缓的经济形势以及居高不下的房价，某个角度上都是这一矛盾持续深化、积重难返的产物。迄今能够成功应对这一挑战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屈指可数。

因此，最近十多年来重庆高潮迭起，并在中国经济整体进入增速放缓的“新常态”的情况下拔得经济增长头筹（2015年重庆经济增长速度在全国各省份中名列第一），既离不开中国宏观经济背景的重大转变，也离不开重庆适应金融资本规律的系统性的发展创新。重庆的第三次工业化和金融化并驾齐驱，成为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这个普遍规律下为数不多的一个发展特例，个中经验值得认真研究。

以下为课题组提炼出来的几条关键经验。

第一，以土地作为杠杆，去撬动庞大的存量资产。

2002年年末，重庆组建城投公司、地产集团、高发司、建投公司、开投公司、交旅集团、水投集团、水务集团等八大政府性投资集团。这“八大投”初期主要依靠土地储备为杠杆，用土地作为抵押来获得银行贷款和发行企业债券，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413]由于土地价值正处于上升期，以建设—移交（BT）模式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相当于资金套期，则既解决了项目启动时的资金稀缺难题，又使土地的增值收益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

第二，地方政府利用隐性资源建立“价值化债务转换机制”，构成企业债务与固定资产和银行金融资产对接起来的通道。

这是通过著名的渝富公司完成的。渝富公司先以省级政府的经济辖权为支撑，获得国家开发银行17亿元贷款；其后以打包打折的方式以21.5亿收购重庆工行157亿（本息）不良贷款，再对这些不良资产进行解包出售。各债务企业可以用现金和土地抵押对资产同样打折赎回，如果没钱就实行债转股。渝富公司用所得收入来归还国开行贷款，并对持有股权的企业资产进行跨公司重组，将土地或现金资源注入公司，使其能符合银行的信贷条件而获得贷款。这样就把僵尸资产变成了正常资产乃至优质资产。由此，重庆不仅借国家金融力量消解了部分上一轮东部沿海开放导致西部被边缘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债务负担，还形成了在新一轮宏观经济景气周期中借势而起的基础。

重庆位于西南山区，其土地资源开发本不具有区位优势，也因企业

大面积亏损而不易受到资金眷顾，但在21世纪初全球产业向中国转移推动一个资产价格上涨的长波、城镇化进程在各地方兴未艾之际，用在地化的土地资源去与最具有流动性的资金要素结合，获得了重庆开展第三次工业化的第一桶金。有了对土地和资金这两大要素的配置主导权，如下创新便可以乘势推进。

第三，打造综合性的地方金融体系，和地方以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结构提升为主要内容的实体产业发展互为表里。

在金融放贷权上归中央的条件下，地方金融的作为空间被压缩。重庆统筹地方经济发展的核心经验有三条：一是打造地方综合金融体系，综合利用企业债、城投债、证券、信托、股票、银行贷款等多种金融工具，消解实体资产投资沉淀性的不利影响，实体资产信用化，信用收益内部化，包括机构投资者在内的大量民间资本源源不断流向重庆，补充重庆大规模开发的资本需求。二是在综合金融平台的基础上，用“全资产”作为金融信用来源，来代替传统的“现金流”金融（以收益率等流量型指标作为贷款依据），满足基本建设和产业结构提升中资金沉淀量大、回收期长的需求，推进实体资产与金融资产协调发展，互相借力，防止金融领域泡沫化。三是实体产业综合扩展，既加强道路、桥梁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引进惠普等高端外资制造业促进本地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同时繁荣本地中小企业。通过全面涵盖各种投资层次和就业渠道，既巩固了地方金融生态环境的经济基础，也实现了发展收益面向全社会的分配，提高了发展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

第四，畅通上述综合收益（课题组称为“总租”）的分配渠道。

与一般地区土地—资金的二元结构不同，重庆构建了土地—金融—实体产业的三角形资产结构，重庆在土地、劳动力和产业发展上的全面动员，客观上要求形成全民都有获得感的分配机制，才能维持这种动员机制的持续运作。

由此形成课题组对重庆“五大战略”之“民生重庆”和“平安重庆”的政治经济学解读：只有通过国家暴力机器的介入洗出灰色资本，才能重构如上综合收益对国资、外资、民资的顺畅的分配渠道。

第五，是地方政府代行国家体制产生了超额制度收益。

重庆市长黄奇帆认为，一般地方只有一个税收财政，而重庆还有第

二财政和第三财政。第二财政是基金财政，即国家基于专项目标而转移支付的各项基金，包括西部大开发等多项国家战略的生态补偿、移民安置、经济发展、交通运输等多个方面。[414]

除此之外，中央政府对重庆还有多项制度赋权，比如在金融结算和海关通关上，使重庆拥有了获取超出一般地方的制度收益的机会，也可以一定程度上作为“区域次中心”对周边五省进行跨区域整合，重庆当然也会由此占有一份超额的制度收益。

综上，重庆地处内陆山区，能够形成资本积累的资源禀赋极差，因此“三次工业化”都是依靠国家投资而形成的，这种国家赋权服从的是国家整体安全。重庆当前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工业化也是如此，虽然主观战略设计上似乎不那么清晰，但从国家经济布局的客观调整来看，国家财政资源、制度资源下沉西部，对于纠正中国长期偏重于东部沿海地区而使整体经济安全受到挑战具有重要的正外部性，因此，国家赋权与地方发展创新在重庆形成了双赢格局，对于破解20世纪80年代地方工业化以来形成的中央承担最终风险条件下的地方政府公司化竞争，从而导致中央风险与地方竞争双输困境，具有重要意义。

附录　课题组已发表英文文章摘要

I人—机—环境系统工程在金融创新及中央银行转型中的应用研究

黄胤英　胡志浩

本文运用人—机—环境系统工程研究框架解析金融创新及中央银行转型。主要研究目标和结论是：中央银行（“人”）需要顺应金融市场化（“环境”）的长远发展趋势，改变原有的临时、被动应对危机的事后机制，应持续、主动进行货币政策工具（“机”）创新，疏通政策传导机制（“机—环境关系”），积极打破传统职能范围，创建新型“人—机—环境系统”关系，才能达到有效控制金融风险，实现“安全、高效、经济”的目标。

人—机—环境系统工程是运用系统科学理论和系统工程方法，正确处理人、机、环境三大要素的关系，深入研究人—机—环境系统最优组合的一门科学。通常，人—机—环境系统可分为三大类：简单人—机—环境系统、复杂人—机—环境系统和广义人—机—环境系统。人—机—环境系统工程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有广泛应用，在社会科学领域亦有很强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本文将货币市场定义为一个广义的人—机—环境系统，并试图以人—机—环境系统工程的研究方法对现代金融创新及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体系转型进行论述，探讨人—机—环境系统工程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研究中的应用。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创建的各类新型操作工具，已经远远超越了中央银行只能向商业银行提供资金支持的传统职能。美联储开始通过创建定期存款便利（TDF）等新工具（新“机”）来弥补联邦基金利率等传统政策工具（旧“机”）的失效，向金融市场直接注入流动性。在其货币政策报告中也已多次重申“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传统公开市场操作手段调节准备金规模来控制联邦基金利率的宏观调控手段已逐渐失效，联邦基金利率对准备金调节的敏感度已经降至历史最低”。由此，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基础（“环境”）变化引发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机”）、传统机制（“机—环境”关系）的变化，反映出美联储当前主

要调控机制已经转变为直接调控市场流动性的新范式（新“人—机—环境系统”）。

本研究结合“人—机—环境系统工程”理论，论证了：在金融体系市场化进程中，在宏观调控的“环境”（即金融市场）将不断变化的背景下，中央银行需要顺应市场化的长远发展趋势，改变原有的临时、被动应对危机的事后机制，应力求持续、主动进行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即“机”的创新），疏通政策传导机制（即转变“机—环境关系”），并敢于积极主动打破传统职能范围，才能达到有效调控市场的预期，并有效地控制金融风险，防范金融危机，即达到人—机—环境系统中的“安全、高效、经济”的最终目标。

Application of Man-Machine-Environment Systems Engineering in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the Transition of Central Banks

Yinying Huang and Zhihao Hu

To analyze the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the transition of central bank,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man-machine-environment system engineering (MMESE) on this field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 central banks (“man”) needs to comply with the long-term trend of marketization of financial market (“environment”) , to change its temporary and passive crisis aid system af-terwards into active continuous innovation of monetary policy tools (“machine”) and policy transmission mechanism (“machine-environment relationship”) .With breakthrough in its traditional function, the central bank can create a new“man-machine-environment system”to control financial risk and ultimately achieve its“safety, efficiency and economy”objectives.

Man-Machine-Environment System Engineering is a science employing system-atic scientific theory and engineering approaches,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ree factors, namely man, machine and environment and doing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optimal combination of man-machine-environment system. In general, man-machine-environmen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 simple man-ma-chine-environment system, complicated man-machine-

environment system and generalized man-machine-environment system.Man-Machine-Environment System Engineering can be widely used not only in the field of natural science, but also has a stro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in the field of social science.This article defines financial system as a generalized man-machine-environment sys-tem and attempts to state modern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transition of monetary policy system of central banks by the research method of Man-Machine-Environment System Engineering and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MME in research of monetary policy of Central Bank.

Sinc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 various kinds of operation tools created by the Federal Reserve has gone far beyond the traditional functions that central banks can only provided financial support to commercial banks. The Federal Reserve has begun to compensate for the limitation of effect of traditional policy tools including federal funds rate (traditional“machine”) by creating new tools such as term de-posit facility to fill in the liquidity directly to financial market.Its monetary policy re-ports have also restated for several times , “Sinc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mac-ro-control means by adjusting scale of reserve funds to control interest rate of federal rate through traditional open market operation has failed gradually and degrees of sensitivity from federal funds rate on adjustment of reserve funds has fallen to the lowest level in history.”Thus, change of monetary policy tools (“machine”) and that of traditional mechanism (“machine-environment”relationship) provoked by ; change of base of central banks'macro-control reflects that the current regulatory mechanism of the Federal Reserve has been transmitted to the new paradigm of regu-lating market liquidity directly (new“machine-environment”relationship) .

With the Man-Machine-Environment theory, the conclusion of this analysis could be as follows : In the marketization process of financial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ntinuous change of macro-control“environment” (as financial mar-ket) , central banks are required to comply with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trend of

marketization, to change its temporary and passive crisis aid system afterwards into active continuous innovation of monetary policy tools (“machine”) and policy transmission mechanism (“machine-environment relationship”). With proactive breakthrough in its traditional functions, expected efficient control of financial risks can be reached.Central banks are also required to control financial risks efficiently and keep the financial crisis away, which means to achieve the final objectives of“Safety, efficiency and economy”in man-machine-environment system.

II粮食金融化与中非农业合作

薛翠　等

金融资本主导全球化已经造成的“粮食金融化”（亦称“粮食美元化”），是导致全球粮食安全形势严峻、造成粮食进口依存度高的低收入国家发生动乱的最重要因素。本研究以国际金融资本全球化为研究视角，分析21世纪的粮食安全问题，尤其关注中国与非洲在粮食金融化下共同合作，应付粮食与金融两重风险。

目前，全球小麦、玉米、稻谷和大豆市场的供求处于基本平衡状态，没有明显的供需缺口；而在价格方面，国际粮价近年来却剧烈波动，明显脱离了供求基本面。这表明，国际粮食市场的供求关系并不是构成粮价剧烈波动的最主要因素。同时，国际粮食价格的剧烈波动与美国数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存在紧密联系。

在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美国政府采取“超级量化宽松”政策向世界转嫁通货膨胀以来，美元的大量增发，造成越来越多的过剩流动性冲击粮食市场，导致粮食市场价格出现剧烈波动；粮食市场同时成为过剩金融流动性的“垃圾消纳场”，粮价的一次大起大落就能替西方主导国家制造的过剩流动性做消化：这两方面都显示出粮食市场的运行脱离物理层面，而被人为创造出“粮食的金融属性”。

在美元过量增发条件下，大量过剩流动性源源不断地强化着直接冲击粮食期货市场的投机性金融资本，造成粮食的金融属性与传统意义的产销供求等价格生成条件的脱节愈益凸显，进而形成金融投机资本是为粮食期货市场价格异常变化的主要因素，也为导致世界范围的粮食危机

的主要因素。国际市场粮食金融化对国际社会造成严重影响，包括国际粮食价格剧烈波动和高价运行，“单一经济”国家陷入饥荒以及北非、中东街头动乱和政权危机。

本研究旨在面对这种新的形势，即全球化竞争下的粮食金融化是导致全球粮食安全的最重要因素，在粮食金融化的框架下探讨如何更好地保障中国与非洲的粮食安全。

GrainFinancialization and China-Africa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SIT Tsui et al.

The globalization led by financial capital has already resulted in“grainfinancial-ization”（or grain Dollarization），which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giving rise to the grave situation in global food security, as well as turmoil in low-income countries that rely heavily on grain imports. This research studies and analyzes food security issues in the 21st century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globaliza-tion.In particular, it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grain financialization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dual risks existing in grain and financial markets.

At present, the global supply and demand of wheat, maize, rice and soybeans are essentially in a state of equilibrium, without obvious gap between two sides. It indicates that the supply-demand relationship in international grain market is not the main factor that causes severe fluctuations in grain prices.Rather, there is a clos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evere fluctuations in international grain price and the several rounds of quantitative eas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monetary strategy.

Ever since the financial crisis erupted in the Wall Street in 2007，the US gov-ernment adopted a“super quantitative easing”strategy to transfer the costs of the ；crisis and triggered inflation globally. The enormous amount of US dollars thus issued has produced increasing surplus liquidity which then gushed in the grain market, leading to wild fluctuations in grain market prices.The grain market

has become the“garbage dump”of excessive financial liquidity.Every major rise and fall functions to digest the surplus liquidity that has been produced by the dominant nations in the West.Both these two aspects show that operation of the grain market has gone beyond the normal realm and the“financial properties of grain”has been artificially create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over-supply of US currency, the large quantity of surplus liquidity continues to strengthen speculative financial capital, which is im-pacting on the grain futures market, creating an increasingly obvious mismatch be-tween the financial properties of grain and the pricing conditions (production-sale, supply-demand etc.)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Financial speculative capital has therefore become the main factor of the abnormal price fluctuations in grain futures market, and also the main reason in causing the food crisis around the world.Grain-financialization has serious impacts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cluding fluctuations in grain market and persistent high price level.As a result , “mono-e-conomy”countries have fallen to starvation.We witness street riot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various other crises of sovereignty.

This research aims to confront the new situation —“grainfinancialization”under globalized competition becoming the main factor that threatens global food se-curity—to investigate how to better protect food security in Africa and China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grain financialization.

后记

本书是课题组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作为国家综合安全基础的乡村治理结构与机制研究”（14ZDA06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汇总（中期报告）。

国家安全问题既有很强的现实性，也是一个历史范畴。从近代史起点的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如何维护完整独立的国家主权、实现长远国家安全，一直就是最为紧迫的命题，中国人前赴后继奋斗了百余年，今天仍然在延续着这一未有穷期的历史脉络；在这个被认为是“撞击—反射”的所谓文明冲突过程中，致力于“启迪民智、开发民力”的乡村建设运动也薪火相传了百余年。

但“乡村建设不只是建设乡村”，其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早就有文字阐述。20世纪的乡建大家、文化上由儒而释的梁漱溟先生就强调过：“我所主张之乡村建设，乃是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非是仅止于乡村问题而已。建设什么？乃是中国社会之心的组织构造（政治经济与其他一切均包括在内）……”这段话跨越茫茫时空，与马克思之语——“哲学家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如何改变世界”，不期然而然地呼应着。

另一重跨越历史的遥相呼应是行动上的。21世纪初，课题主持人温铁军教授与海内外几家积极改良的社会力量合作，共同发起了民间为主的乡村建设运动。初创之艰辛朴陋自不必提，中途之波折多舛亦不足言，可堪慰藉的是，时隔百年，当代学者这一自觉承续前贤的努力已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值此，课题团队的另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当代人既在实践行动上与前贤相应相和，在理论建构上也自当勉力为之！以此，系统阐释乡村建设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就不仅是本课题要完成的一个科研任务，更是一项对历史延续的归纳。据此，这份中期报告，也是课题团队告慰先人、立此存照，以启后人的一个工作成果。

这个中期报告，是课题组成员十余载甚至几十载持之以恒努力的结

晶。如果没有课题主持人及志同道合者几十年海内外调查和区域比较研究中形成的宏观和历史的多学科综合研究积累，没有分布在全球各地（高校、试验区、社会组织等）的乡建行动研究者们十多年来的思考交流、实践积累及与主流理论的碰撞，没有在大量调查研究中已经锻炼得十分过硬的科研团队，课题组确实不可能在短期内拿出一个内容丰富、视角广阔的项目设计，以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个中期成果。

诚然，之所以说这个中期报告只是这个涉猎广泛的课题组团队作战的成果之一，也是希望读者能够借此窥一斑而知全豹地了解我们团队的视野和积累。除本课题以外，近年来我们还开展了全球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既包括新兴国家研究，也包括深陷于发展陷阱不能自拔的南方国家研究；中国区域发展比较研究，目前已经形成了对苏南、岭南、重庆、杭州、广西左右江、苏州工业园区等的系列研究成果；粮食金融化问题研究；农村金融问题研究；乡村冲突原因及转化机制研究；农村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研究等国内经验为主的研究领域，提出了“农户理性与村社理性”“外部性风险的内部化机制”“从农业1.0到农业4.0”“三农与三治”等概念和成本转嫁理论。同期，还在国际比较研究中创新性地提出了全球化研究中“国家竞争的微笑曲线”、发展中国家研究中的“主权外部性”、“南方陷阱”等思考。简列如下（纵向课题10项，其中社科基金课题5项、教育部课题3项、自科基金课题2项）：

1.城乡二元结构下改善社会治理研究（15FXA003），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

2.作为国家综合安全基础的乡村治理结构与机制研究（14ZDA064），国家社科重大项目

3.粮食金融化与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研究（14BGJ048），国家社科一般项目

4.中国工业化历程简明读本（12JPJ013），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5.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建设与机制创新研究（07JZD0009），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

6.通过新农村建设促进国际金融危机条件下中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2009JYJR023），教育部人文社科应急项目

7.完善社会管理与维护社会稳定机制研究——农村对抗性冲突的原因及其化解机制研究（07&ZD048），国家社科重大项目

8.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与管理问题研究：制度创新、组织创新与农民本位（7064102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9.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重点和政策研究（06AJY003），国家社科重点项目

10.中国农村城镇化进程与对策研究（7994101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1.建立农村投资长效机制课题研究，横向，国家发改委

12.全球粮食发展趋势与我国的粮食安全，横向，国家粮食局战略性课题

13.新兴国家包容性增长网络项目，横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

14.南南合作知识分享，横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

15.广西左右江革命老区规划，横向，广西发改委

16.传统乡村治理模式对构建城市社会复合主体治理的借鉴，横向，中共杭州市委

17.社会复合主体治理模式研究成果推广，横向，中共杭州市委

18.“基于我们”的社会主体结构和治理方式创新，横向，中共杭州市委

19.网络状、生态型社会结构与和谐创新的经济运行，横向，中共杭州市委

20.苏州工业园区二十周年总结，横向

这些已经被社会认可的理论思考和经年累月的调查研究，是本课题中期报告能够顺利完成的基础。

国家安全问题是一个宏大、综合而且现实形势不断变化的范畴，本课题在立项设计时就着力于多学科领域协作的交叉学科创新，因而尤其强调跨学科、跨校的团队合作。本课题由中国人民大学团队与两个子课题的执行单位——福建农林大学、西南大学团队，会同重庆大学、中国农业大学、香港岭南大学、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国仁城乡科技发展中心（小毛驴市民农园）、江苏省常州市姬山书院、各地爱故乡协会（促进会）等多个参与单位共同形成理论框架、研究方案和调研计划，协同开展工作。大家在思想上多元共生，行动上参商各异，本是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知识群体＋小资社会”之常态，遂有综合各种意见最后由课题主持人在理论框架和实地调研方面进行最后的统一协调。

本课题除了调研执行当中出现很多需要统筹协调的情况之外，也遇到了一些其他实际困难，如课题组有的老师身患重病不得不退出，有的老师因家人重病难以亲自深入基层调查，有的子课题需要根据变化情况更换主持人；另外，一般深入农村调查就难以得到正规发票，这恰与上级按照政府财务模式加强对项目经费的审计不期而遇……凡此种种，都给课题执行和调整有关的主管部门造成很多麻烦。课题组对此深表歉意，也感谢主管部门的大度和宽容。

课题组于2014年9月、12月先后在子课题的执行单位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海峡乡村建设学院）、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举办了子课题的开题研讨会；2015年5月在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支持下于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办了总课题的开题会；2015年9月在北京北坞村举行了课题中期报告及理论务虚会。

课题组于2014年12月派团队成员赴台湾地区调研一个月；2015年7月、8月间组织了7支，共50余人参加的调研团队，分赴黑龙江、陕西、山西、甘肃、宁夏、内蒙古、河北、河南、江西、福建、浙江、广西等地，对将近50个村庄开展调研；2015年11月组织了3支调研队伍，分赴江苏、安徽的三个村庄开展调研；2016年1月组织了河北调研；2016年4月组织了湖南调研。

课题获批之后开展的境外调研有：刘健芝、薛翠分别在2014年7—8月赴英国、法国、墨西哥、秘鲁调研，2014年8月赴越南调研，2014年10月赴马来西亚调研，2015年3月赴泰国、突尼斯调研，2015年7—8月赴巴西调研，2015年10月赴印度尼西亚调研，2016年3月赴波兰、日本

调研。

团队指导海外学生开展的国内调研有：Christof Lammer（谢帅东）于2014年9月—2015年9月在四川资阳市简阳市做深度调研；Ibrahima Niang（梁汉礼）于2015年在北京、广州、义乌开展调研；Tung-yi Kho（许统一）在深圳开展了总计超过30个月的调研；James Peter Francis Oswald（区吉民）于2014年两赴浙江浦江县调研，2015年在山东章丘市、平邑县，河南的弘农书院调研。

科研团队中参与本课题调研、写作、协调等任务的人员如下：

董筱丹担当项目综合协调，牵头起草了课题申请书，统筹和带领课题调研，参与历次讨论；黑龙江省政协热心组织大学生下乡的领导同志对问卷资料和调查研究提供了帮助；著名学者张晓山、沈原、刘伟平等多次与首席专家交流意见；计晗和高俊参与了课题申请书写作，带队进行多次实地调研，并负责编制课题的财务预算和处理财务工作；李行、兰永海、薛翠、张兰英、潘家恩、杜洁、杨帅、张晓蕾、刘雨晴、余甜等参与了课题申请书起草；何慧丽、张兰英、谷莘、潘家恩、邱建生、杜洁、刘传磊、石嫣、黄志友、白亚丽、何志雄、刘良、张斌、孙远东、杨云标、王茜、黄圣仙、刘伟国、程金台、邓清波等协调推荐调研点，帮助招募、组织学生；刘健芝、薛翠、黄德兴、严晓辉等承担了与国外合作机构的协调工作，在海外发表了多篇相关文章；刘伟平、潘家恩进行了大量的历史文献搜集和研究工作；杨帅、邱建生、王海侠、兰永海、侯宏伟、张俊娜、何志雄、罗士轩等人带队下乡调研，潘家恩、杜洁、刘传磊、黄胤英、兰永海、吕程平、倪坤晓、余翔、王淑羽、褚贤祥、张津、侯婷艳、刘亚慧、唐溧、韩山、刘岚、蔡哲毅、王翼、罗荣弟、刘鹏举、柳芳叶、潘婷、余鹏、林民悦、龙辣等五十余人参加了调研和写作；杜洁、张俊娜承担了两个子课题的综合联络工作。

历次会议上参与观点讨论的专家有（以姓氏拼音为序）：艾恺、陈传波、陈国樑、陈卫平、陈熙、丁建庆、丁宁宁、范焕谦、范水生、房宁、甘满堂、高梁、郭琼虎、郭为桂、黄跃东、黄志友、江涌、蒋年荣、康晓光、兰思仁、冷尚书、李莹星、连文、梁钦宁、梁钦元、廖晓义、刘飞翔、刘金龙、刘庆亮、刘欣华、卢国、罗加玲、毛飞、Marissa B.Espineli、庞晓鹏、仇焕广、生吉萍、石嫣、孙恒、孙永生、谭淑豪、唐宦存、陶育民、仝志辉、汪三贵、王姮、王佳、王松良、王西琴、王湘穗、王志刚、辛毅、徐家祥、徐以升、晏鸿国、尤婧、苑鹏、张木

生、张孝德、赵法生、赵义熙、郑风田、周常勇、周立、朱启臻、朱乾宇、庄佩芬等。

课题组战略合作单位东方出版社有关领导参加了课题研讨会，郭国编辑在书稿整理和出版中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中国人民大学、福建农林大学、西南大学的有关部门和领导对课题申请、执行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各调研地点对本课题的实地调研工作给予了充分保障。

应该说，迄今课题组完成的所有工作都是多方密切合作进行的集体劳动的成果。只是，当前高校考核制度很难适用于跨校的科研团队建设。本书综述由张俊娜起草，其他内容由本课题开展以来陆续发表的论文集结而成，以福建农林大学团队名义发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福建农林大学团队成功申请到福建省人文社科基地——乡村建设与社区营造研究中心，我们的研究又多了一个良好的资源平台。

“山雨欲来风满楼”，与课题立项时的2014年比，中国在2016年面临的外部风险输入的压力更大，形势更加严峻。我们多年来强调利用乡土社会来吸纳风险从而帮助危机软着陆，一方面仍然是中国历史上屡次行之有效的经验；另一方面，其在危机严峻的压力下又往往更多地被短视者轻易破坏。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希望本书的提示在当下能够受到更多人的重视，引发更多的“居危思危”的思考。

课题组全体成员

2016年5月30日

[1]这几年我们会有十几本书分别以不同作者、不同课题成果的名义问世。这些出版物都被要求做单独的“成果标识”。但我们实际上要做的仍然是这几十年的经验归纳总结和理论提升，“实事求是”地形成“去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体系。由此，就需要为这个分别标识的系列出版物做个总序。

[2]参见即将出版的《温铁军自述——难得5个11年》（暂定名），其中对20世纪80—90年代在官方政策部门开展农村改革试验区及新世纪启动民间为主的新乡村建设试验区，分别作为两个11年的经历予以归纳。

[3]参见温铁军：《告别百年激进》，东方出版社，2016年。这是我2004—2014年这10年演讲录的上卷，主要是与全球化有关的宏大叙事和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甫一出版即被书评人排在当月优选10本财经类著作的第一位。

[4]最近10年一直有海内外学者在研究乡建。国外有学者试图把中国乡建学者的思想上溯归元到孔子或老子，国内也有人问我到底偏重晏阳初还是梁漱溟，还有很多人不理解梁漱溟晚年由儒家而佛家的思想演变。其实，我们从来就是兼收并蓄。在儒道释合一的顶天立地和五洲四海的融会贯通之中形成乡建思想。因此，这些海外研究者的关注点对我们本来不是问题。

[5]本文丛并非团队的全部思想成果，但在“国仁文丛”设计之前的成果没法再纳入进来，只好如此。

[6]这些年，我一直试图对承上启下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形成的国仁思想做归纳，遂借作序之机凝练成这段文言，意味着国仁追求的是一种“大道、大润、大象、大音”的思想境界。

[7]中国乡建运动之所以能够延续百年而生生不息，乃在于参与者大抵做到了思想和行动上都“去激进”，不认同照搬西方的左右翼搞的党同伐异。

[8]参阅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记得一位学者型领导曾经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农民在现代化的大潮中挣扎着下沉，就剩下两只手在水面乱抓。你的思想无所谓对错，只不过是被溺水者最后抓住的那根稻草，再怎么努力，也不过是落得跟着沉下去的结局……

[9]乡建前辈学者梁漱溟因在1953年与毛泽东激辩合作化问题而被后者批为“妇人之仁”。据此，梁漱溟可以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早期女性主义者。尽管在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前，打上何种类别的标签并不重要，但如果这是当代学者们的本能偏好，也只好任由其是。

[10]关于精英专政与大众民主的分析，请参阅《人间思想第四辑：亚洲思想运动报告》第2～19页，台北：人间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

[11]近年来，我不断在乡建团队中强调对乡建经验的归纳总结要尽可能提升到理性认识高度，并且要努力接续百年乡建历史，并带领团队申报了一批科研项目。那么，要完成科研任务，就要花费很多精力。对此，一些长期从事乡村基层工作，必须拿到项

目经费才能维持单位生存，也就来不及形成理论偏好的同人难以接受，甚至有些意见相左之人表达了误解、批评。这本来不足为怪，对批评意见也不必辩解。总体上看，大乡建网络的各个单位还是积极配合的。但，考虑到这些批评说法将来可能会被人拿去当某些标题党的报道和粗俗研究者的资料，因此，我才不得不以总序的方式让相对客观些的解释在各个著述上都有起码的文字依据——尽管这些话只是简单地写在脚注中。

[12]国内有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国家行政学院、清华大学、重庆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上海大学、西南大学、福建农林大学、香港岭南大学，海外有英国舒马赫学院、美国康奈尔大学，近期正在形成合作的还有国际慢食协会的美食科技大学（意大利）等。

[13]本报告部分内容源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作为国家综合安全基础的乡村治理结构与机制研究”（批准号14ZDA064）的申请书，由课题组成员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张俊娜（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综合课题组既往发表和近期集体讨论意见成文，课题组首席专家温铁军修改定稿。感谢程漱兰教授提供修改建议。

[14]薛翠等：《谨防当前国际外部性风险叠加国内社会动荡》，内部报告，2015年。

[15]董筱丹、温铁军等：《乡村治理与国家安全的相关问题研究——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视角的结构分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16]杨帅、董筱丹、温铁军：《中国市场化进程的独特比较优势》，《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17]温铁军、计晗、张俊娜：《中央风险与地方竞争》，《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7期。

[18]主流理论界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保守着传统的、苏联主导的社会科学体系，此后则改为保守美国为主导的西方社会科学体系；而全然不在乎这两者都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实际需求的客观局限性。本报告指出，我们课题组提出的关于中国经验中存在政府理性与村社理性的比较制度优势，属于实事求是原则之下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但因不符合西方意识形态而被忽略。

[19]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年。

[20][埃及]萨米尔·阿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爆》，http：//news.takungpao.com/mainland/focus/2013-06/1687335.html。

[21][埃及]萨米尔·阿明：《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http：//news.takungpao.com/mainland/q/2013/0621/1706652 4.html。

[22][埃及]萨米尔·阿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爆》，http：//news.takungpao.com/mainland/focus/2013-06/1687335.html。

[23]温铁军、高俊、张俊娜：《中国对美“双重输出”格局及新变化》，《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5年第7期。

[24]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后，发达国家演化出了政府的主权债务危机，以往历次危机虽然也表现出巨大的财政压力，但与此次有着本质不同。

[25]薛翠：《粮食金融化及中非农业合作》，内部报告，2015年。

[26]纪明葵：《2015年中美关系及大国走向》，http：//views.ce.cn/view/ent/201501/12/t20150112 4314106.shtml。

[27]温铁军、高俊、张俊娜：《中国对美“双重输出”格局及其新变化》，《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5年第7期。

[28]张建刚：《美国衍生品市场发展启示及我们的建议》，http：//futures.hexun.com/2012-10-24/147161164.html。

[29]庞革平、王云娜：《我装备制造业产值居世界首位占全球比重超过1/3》，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4/0404/c1004-24820516.html。

[30]兰永海、贾林州、温铁军：《美元“币权”战略与中国之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3期。

[31]黄培昭等：《美国1.5万NGO撒在全世界成为“推动民主”工具》，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2-02/2476159.html。

[32]《中国厂商在美设厂“中国制造”成“美国制造”》，http：//finance.huanqiu.com/view/2015-02/5631300.html。

[33]温铁军、高俊、张俊娜：《中国对美“双重输出”格局及其新变化》，《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5年第7期。

[34]潘家恩：《百年乡建一波三折》，《读书》，2015年第4期。

[35]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36]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37]温铁军、高俊：《农业“三产化”阶段的制度创新》，《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8日，第A07版。

[38]计晗、张兰英、温铁军：《粮食金融化挑战》，《中国投资》，2015年第2期。

[39]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粮食生产成本被称为地板价，国际价格则是天花板价。但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国内粮食生产成本不断上涨，很多年份高于国际价格。这被称为“地板”高于“天花板”。

[40]胡靖：《“地板”、“天花板”与中国粮食安全困境》，http：//

news.sohu.com/20150822/n419500606.shtml。

[41]温铁军等：《解读苏南》，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

[42]杨帅、温铁军：《经济波动、财税体制变迁与土地资源资本化——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圈地”相关问题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10年第4期。

[43]董筱丹、温铁军等：《乡村治理与国家安全的相关问题研究——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视角的结构分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44]课题组发表过改革以来三次土地征占的分析文章，指出20世纪80年代是以地兴企，90年代是以地生财，新世纪初是以地套现，现在则是地方政府在征地成本高于土地出让收益的情况下仍然强行占地，实际上是“以地托债”——在债务压力过大的条件下以有限的土地出让金抵付银行利息，才能托起债务链条。

[45]温铁军等：《中国新农村建设报告》，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

[46]同上。

[47]张木生：《谨防经济断崖式崩塌》，http：//www.wyzxwk.com/Article/shidai/2015/01/336998.html。

[48]温铁军、计晗、张俊娜：《中央风险与地方竞争》，《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7期。

[49]董筱丹、温铁军等：《乡村治理与国家安全的相关问题研究——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视角的结构分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50]温铁军、刘传磊、张俊娜：《村社理性：苏南农村工业原始积累的内在成因》，待刊稿。

[51]E7比较研究得到联合国开发署UNDP中国代表处的资助，是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话语提出的“金砖五国”的一个国际合作项目。

[52]摘自E7课题组工作报告之巴西报告。

[53]许国平：《查韦斯遗产为何永存？》，http：//twnchinese.net/？p＝4609；安那琪：《查韦斯的遗产》，http：//utopia.e-channel.info/read.php？1699；SMFF（social movement film festi-val）：《委内瑞拉的自主社区议会》，《委内瑞拉的草根社区媒体》，《委内瑞拉的合作社》，https：//smff2013.wordpress.com/tag/%E5%A7%94%E5%85%A7%E7%91%9E%E6%8B%89。

[54]同上。

[55]严瑜：《巴西：金砖能否重新被拭亮？》，《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10-30。

[56]莫成雄：《“金砖巴西”2015年经济萎缩3.8%风光不再》，http：//

world.huanqiu.com/hot/2016-03/8648250.html。

[57]徐以升：《巴西真相——为国际资本打工的净债务国》，《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报告》经济金融系列第28期，总53期，2012年5月14日。

[58]刘健芝：《印度的民众科学运动——社区建设的树人工程》，《中国改革（农村版）》，2003年第3期。

[59]刘健芝：《民众做主人官员为公仆》，《中国改革（农村版）》，2003年第7期。

[60]董筱丹、梁汉民、区吉民、温铁军：《乡村治理与国家安全的相关问题研究——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视角的结构分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61]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62]作者为温铁军、高俊、张俊娜，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作为国家综合安全基础的乡村治理结构与机制研究”（批准号14ZDA064）、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粮食金融化与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研究”（批准号14BGJ048）以及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城乡二元结构下改善社会治理研究”（批准号15FXA003）的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本文原载于《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5年第7期。

[63]中国战略思想库：《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的国家安全》，http：//www.macrochina.com.cn/sixiangku/2014/201416.shtml，2015-06-04。

[64]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The World Fact book*），天马图书出版社和波托马克出版社，2013年。

[65]李小晓：《对决华尔街》，《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第41期。

[66]影子银行系统（The Shadow Banking System）的概念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执行董事麦卡利首次提出并被广泛采用，又称为平行银行系统（The Parallel Banking System），它包括投资银行、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债券、保险公司、结构性投资工具（SIV）等非银行金融机构。

[67]李志能：《虚拟资本主义的财富霸权——从对美国经济数据的质疑看世界金融危机》，《人民论坛》，2009年第7期。

[68]引自论文集*Global governance*：*Crossed perceptions*中Rasigan Maharajh所著论文*Betwixt now and then*：*travailsin the interregnum*的图6“Market sizes（2010）”，转引自*Han-delsblatt*：*Spiegel, LWF, BIZ and WFE*。

[69]Sérgio Eduardo Moreira Lima：Global governance：*Crossed perceptions*，Brasília：Alex-andre de Gusmão Foundation（Funag），2015.

[70]王建：《中国如何避免生产过剩危机》，《上海证券报》，2014-03-19。

[71]李建宗：《外媒称中国廉价商品助美缓通胀15年CPI均速2.1%》，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2/02-21/3685038.shtml，2015-06-04。

[72]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在其《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一书中提出，“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虽然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

[73]罗伯特·特里芬著，陈尚霖、雷达译：《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商务印书馆，1997年。

[74]兰永海、贾林州、温铁军：《美元“币权”战略与中国之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3期。

[75]田俊荣：《中国外储3.5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是排名第二日本近3倍》，http：//finance.ifeng.com/a/20130714/10161313 0.shtml，2015-06-04。

[76]朱舜：《日媒：中国外汇储备约一半投资美国国债》，http：//finance.cankaoxiaoxi.com/2014/0417/376832.shtml，2015-06-04。

[77]张五常认为，“土地、矿物、树木、人力等资源，由上苍赐予，这些资源不通过人的脑子发展起来不值钱，而资源的升值就是租值”。也就是说，劳动、土地等要素资源在资本化过程中的升值体现为租值增加。然而如今，在资本愈益深化的规律作用下，过度追求发展所造成的资源环境问题和社会性冲突日益显现，不仅不能产生资源升值，反而还需不断增加投入用于生态环境修复和社会维稳。

[78]张五常：《经济解释卷4：制度的选择》，中信出版社，2014年。

[79]因国际金融资本主导基础商品价格大幅波动，资源型产业可以通过“搭便车”实现超额收益。

[80]鑫干线点金：《美国量化宽松的历史与展望》，http：//www.cnforex.com/comment/ht-ml/2014/10/21/86db9b8128858fa254a76f43887060e7.html，2015-06-04。

[81]兰永海、贾林州、温铁军：《美元“币权”战略与中国之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3期。

[82]在借鉴美国学者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论”和埃及学者阿明的“依附理论”的基础上，温铁军提出“成本转嫁论”作为解构当代中国经济史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史的理论工具。具体而言，西方特色的资本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造成的危机代价，主要是向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转嫁。这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贫困的主要原因。这一由西方列强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般矛盾所形成的理论，可以归纳为“成本转嫁论”。

[83]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年。

[84]2011年以来，包括主要能源和有色金属等在内的国际主要大宗商品价格总体上呈现出趋势性震荡下跌走势，尤其是2014年下半年以来，价格加速下跌趋势更加明显。这标志着美国通过粮食—石油—美元的币缘三角结构消纳垃圾金融衍生品的措施告一段落。

[85]CRB指数（或写作CRBI）是国际市场上Commodity Research Bureau Index的简写，涵盖的19种期货合约，其中，农产品：大豆、小麦、玉米、棉花、糖、冰冻浓缩橙汁、可可、咖啡、活牛、瘦肉猪；能源类：原油、取暖油、汽油、天然气；金属类：黄金、白银、铜、铝、镍。

[86]网易财经："聚焦美联储第三次量化宽松"专题，http：//money.163.com/special/fedqe3，2015-06-18。

[87]指标解释：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是根据企业完成的业务活动总量（如客户数、销售量、工程量等实物量）月度环比变化情况编制的扩散指数，由于没有合成的非制造业综合PMI指数，目前国际上通常用商务活动指数反映非制造业经济发展的总体变化情况，以50%作为经济强弱的分界点，高于50%时，反映非制造业经济扩张；低于50%，则反映非制造业经济收缩。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是通过对企业采购经理的月度调查结果统计汇总、编制而成的指数，是国际上通用的监测宏观经济走势的先行性指数之一，具有较强的预测、预警作用。PMI是一个综合指数，由5个扩散指数（分类指数）加权计算而成。5个分类指数及其权数是依据其对经济的先行影响程度确定的。具体包括：新订单指数，权数为30%；生产指数，权数为25%；从业人员指数，权数为20%；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权数为15%；原材料库存指数，权数为10%。其中，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逆指数，在合成PMI综合指数时进行反向运算。PMI通常以50%作为经济强弱的分界点，PMI高于50%时，反映制造业经济扩张；低于50%，则反映制造业经济收缩。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是根据企业主要原材料价格的简单平均水平月度环比变化情况编制的扩散指数。

[88]杨帅、温铁军：《经济波动、财税体制变迁与土地资源资本化——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圈地"相关问题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10年第4期。

[89]陈益刊、徐燕燕：《去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再创历史之最》，《第一财经日报》，2014-07-14。

[90]兰永海、贾林州、温铁军：《美元"币权"战略与中国之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3期。

[91]徐以升、许元荣：《大分化：全球经济金融新格局》，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

[92]徐以升、许元荣：《大分化：全球经济金融新格局》，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

[93]米建伟、陈强：《美国制造业“回巢”的原因及其影响》，《发展研究》，2012年第12期。

[94]范必、徐以升、张萌、李东超：《世界能源新格局：美国“能源独立”的冲击及中国应对》，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

[95]陈晓晨、徐以升：《美国大转向：美国如何迈向下一个十年》，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

[96]徐以升、许元荣：《大分化：全球经济金融新格局》，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

[97]本文源自温铁军科研团队集体讨论，由香港岭南大学群芳文化研究及发展部研究员、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特邀研究员黄德兴执笔，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作为国家综合安全基础的乡村治理结构与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4ZDA064）》的子课题《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安全：国际比较》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原载于《世界》，第870号，2015年6月。日本：岩波书店。

[98]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作为国家综合安全基础的乡村治理结构与机制研究”（批准号为14ZDA064）、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粮食金融化与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研究”（批准号14BGJ048）以及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城乡二元结构下改善社会治理研究”（批准号15FXA003）阶段性成果。原文来源于“全球大学网站”，第一作者是温铁军；第二、第三作者薛翠和杜洁，分别是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副教授和助理研究员。本文是根据2015年7月6日温铁军教授视频参加香港的一个形势研讨会的发言整理而成的，已经本人审阅。本文原载于《中国投资》，2015年09期。

[99]本文作者为薛翠等。

[100]参阅董筱丹、薛翠、温铁军：《发达国家的双重危机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转嫁》，《红旗文稿》，2011年第21期，第4～9页。

[101]参阅温铁军：《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年。

[102]参阅温铁军：《“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双重困境下的三农问题》，《读书》，2001年第10期，第22～29页。

[103]董筱丹、薛翠、兰永海、温铁军：《发达国家全球金融资本与现代化政体的双重危机》，《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第15卷第6期，2011年，第82～85页。

[104]王小强：《投机赌博新经济》，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年。

[105][埃及]萨米尔·阿明：《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内爆》，《政治经济学评论》，第4卷第3期，2013年7月，第201～224页。

[106]徐以升：《从全球化到全球大分化》，《第一财经日报》，2014-01-27，A13。

[107]徐以升：《从“牙买加体系”进入“大西洋体系”》，《第一财经日报》，2013-12-02，A08。

[108]同上。

[109]同上。

[110]徐以升、章怀远：《金砖国家怎么了？新兴经济体或面临更严重危机》，《第一财经日报》，2011-12-26。

[111]徐以升：《从全球化到全球大分化》，《第一财经日报》，2014-01-27，A13。

[112]参阅《关于一带一路和当前国际局势的一些思考》（温铁军科研团队集体讨论，黄德兴博士执笔）将发表于日本著名学术期刊《世界》（岩波书店出版社）。

[113]《日掷千亿与亚投行“抢生意”安倍计划对抗色彩浓厚》，《环球时报》，2015-05-22。

[114]张敬伟：《新兴市场依然是全球经济配角》，《每日经济新闻》，2014-10-10。

[115]马光远：《中国等新兴市场面临“后QE时代”大考》，《南方都市报（全国版）》，2014-10-31。

[116]徐以升、章怀远：《金砖国家怎么了？新兴经济体或面临更严重危机》，《第一财经日报》，2011-12-26。

[117]参看子课题（1）阶段性成果《粮食金融化及中非农业合作》报告。

[118]彭元正：《国际油价下跌与石油企业的应对思路》，《中国经济时报》，2015-01-01。

[119]廖冰清：《全球新兴市场再遇货币贬值风暴》，《经济参考报》，2014-12-12。

[120]张枕河：《巴西经济陷“低增长高通胀”困境》，《中国证券报》，2014-10-28。

[121]摘自E7课题组工作报告之巴西报告。

[122]严瑜：《巴西：金砖能否重新被拭亮？》，《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10-30。

[123]包蕴涵：《巴西经济增长遇阻》，《中国经济时报》，2014-08-29。

[124]陈季冰：《巴西：“未来之国”成长中的烦恼（上）》，《经济观察报》，2014-07-14；《巴西：“未来之国”成长中的烦恼（下）》，《经济观察报》，2014-07-21。

[125]陈季冰：《巴西：“未来之国”成长中的烦恼（上）》，《经济观察报》，2014-07-14；《巴西：“未来之国”成长中的烦恼（下）》，《经济观察报》，

2014-07-21。

[126]同上。

[127]严瑜：《巴西：金砖能否重新被拭亮？》，《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10-30。

[128]若阿金·莱维（Joaquim Levy），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供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巴西最大的私人银行巴西贴现银行，并在卡多佐政府和卢拉政府担任过财政部司长。

[129]刘彤、杨江玲：《财经观察：巴西经济新政关注财政与通胀》，新华网，2014-12-

[130]徐以升：《巴西真相——为国际资本打工的净债务国》，《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报告》，经济金融系列第28期，总第53期，2012年5月14日。

[131]陈季冰：《巴西："未来之国"成长中的烦恼（上）》，《经济观察报》，2014-07-14；《巴西："未来之国"成长中的烦恼（下）》，《经济观察报》，2014-07-21。

[132]本文作者为温铁军、计晗、张俊娜。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作为国家综合安全基础的乡村治理结构与机制研究"（14ZDA064）、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粮食金融化与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研究"（14BGJ048）和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城乡二元结构下改善社会治理研究"（15FXA003）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文原载于《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133]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彩电和冰箱作为紧俏商品，中央曾经确定过应该引进多少彩电生产线和冰箱生产线，实际上在短时间内都被大大突破了。

[134]中央政策在下达过程中，需要经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部门，一方面，因部门利益的存在，强化自身部门的利益自然成为各个部门的行为偏好，从而瓜分中央政策所内含的资源并排斥相关的责任成为"理性"选择；另一方面，这些部门客观上构成政策实施的交易主体，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交易费用甚至寻租空间，这进一步降低了政策实施的效果。

[135]当中央政策下达到基层，出于节省交易费用的需要，会选择规模主体进行交易，而在原子化社会中，精英通常成为对接政策资源的代理人，从而能够占有大部分资源和收益。这被称为"精英俘获"机制。

[136]中央向地方下放的权力，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主要表现为计划、财政、企业、事业、物资和人事的管理权；在改革开放之后主要表现为计划、基建、财政、物资、外贸等方面的权限。

[137]1958年财政赤字20.74亿元，1959年财政赤字56.05亿元，1960年财政赤字71.39亿元。若无特别说明，本文所列举的财政赤字数据均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

2013》。

[138]1961年是迄今为止经济衰退最严重的一年。若无特别说明，本文所列举的GDP增长率数据均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1999）》。

[139]为应对可能的战争，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决定将中国工业建设的布局重点放在西部地区的三线上。

[140]1967年财政收入减少24.9%，GDP下降5.7%；1968年财政收入减少13.9%，GDP下降4.1%。

[141]1980年推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1985年调整为“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198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地方实行财政包干办法的决定》推行财政大包干制度。

[142]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从1987年的11.6%持续下降到1990年的3.8%；另一方面，1988—1989年爆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全年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环比涨幅都高达18%。

[143]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1995》。

[144]客观来说，地方政府从不经济领域的退出，与中央政府在赤字危机条件下的放权让利，都带有“甩包袱”的性质。区别在于中央政府为由此行为所带来的风险负最终责任；而且，为维持政权稳定和国家安全，这种负责是无限的，或者说，愿意付出的代价是无限的。

[145]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1995》。

[146]可见，分税制改革之前，地方财政已经赤字。地方财政盈余的1993年作为历史上的奇异点，原因在于：1993年年底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规定，1994年1月1日起实施分税制；同时规定，以后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数额以1993年中央从地方净上划的收入数额（即消费税＋75%的增值税-中央下划收入）为基数，并逐年以一定比例递增。这促使地方政府在1993年年底紧急加大征税力度，并从严追缴以往的偷漏税。

[147]详见1989—1995年各年度《中国金融年鉴》“调查报告与专题资料”部分。

[148]1993年地方财政建设性支出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48.4%。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1996》。

[149]由《中国财政年鉴2013》计算得到。

[150]连续多年的财政赤字向国家金融体系透支，不仅吃空了银行全部资本金，还吃进了一部分银行存款。

[151]1993年，中国外汇储备211.99亿美元，扣除当年贸易逆差122.2亿美元后，仅剩89.79亿美元，低于当年的短期外债余额135.46亿美元。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

1996》。

[152]1993年，国家财政债务收入中国外借款收入折合人民币357.9亿元，比上年增加71.3%。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1994》。

[153]这种以扩张国家信用来应对危机的措施具有一般性：中国应对1997年和2008年两次输入型危机的办法，美国奥巴马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之后的救市计划，以及2010年后欧盟、日本相继采取的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都属同类。

[154]政府理性，多出现于政治学研究，指的是政府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机制与能力。本文中多次出现的“政府理性”，并非是一个内涵确定的科学概念，而仅仅是一个用来指代政府行为的原则和动机的工具名词，也因此对于不同政府，其政府理性会有所不同。

[155]1994年三大改革使得CPI环比增长达到21.7%，是为例证之一。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1995》。

[156]在城市表现为全体公民公平持股的企业，在农村表现为村社全体成员共有的、以血地缘关系界定基本财产关系的企业。

[157]从2000年算起到2013年底破产，底特律因政府财政问题，警力被削减了1/3，导致底特律事实上成为“犯罪天堂”：每年每10万人中便会发生1052起暴力犯罪事件；警局出警平均响应时间为58分钟，远远落后于全美11分钟的平均出警速度。

[158]美国国会于1920年通过宪法第19条修订案，承认女性也有投票权。

[159]美国国会于1964年通过《公民权利法案》，1965年通过《选举权利法》，才正式以立法形式结束美国黑人受到的在选举权方面的限制和各种公共设施方面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

[160]2012年6月18日，美国众议院全票表决通过，美国正式以立法形式就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道歉。

[161]以诺斯为代表的制度学派认为，制度变迁存在着自增强或正反馈机制，当它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其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从而形成对制度变迁轨迹的依赖。

[162]形容一周七天天天上班。

[163]形容一天24小时轮流值班。

[164]“三大差别”，指的是区域差别、城乡差别和贫富差别。

[16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的第七条明确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三条也指出：“国有资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166]1978年以前，尽管在不同阶段对国有企业的利润留成做了不同调整，但企业留成比例在最高时的1958年也就只有13.2%。

[167]企业向国家缴纳完所得税之后，税后利润再在国家和企业之间进行适当分配。

[168]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169]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170]2014年美国军费开支为610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总开支的34%。转引自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15年4月13日发布的《2014年全球军费开支趋势》。

[171]中国加入WTO后，外资大规模进入中国，直接导致中央政府所承担的外债最终偿还责任愈益沉重，同时不得不对冲增发本国货币；随之势必出现国内金融资本过剩压力下的虚拟经济扩张和实体经济下滑。

[172]概不论具体行为如何不同，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都实质地体现出"亲资本"的取向。而只要政府亲资本就势必排斥劳动，也就势必会表现为底层百姓参与的群体性社会治安事件大量发生。

[173]从1991年开始，中央就陆续展开了诸如清理"三角债"工作、清理金融领域的体制外活动和提出中央与地方分税的想法。

[174]1998年，出口增长率陡然从1997年的20.5%降到0.4%；GDP增长率也从1997年的9.3%下滑到7.8%。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4》。

[175]如关乎粮食安全的产粮大县，又如关乎生态安全的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等等。

[176]风险社会理论认为，在风险社会中，社会制度与经济利益之间具有共谋关系，为了维护某些阶层的利益，风险可以转移、遮蔽和弱化风险及其危害，造成"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使得风险及其危害"合法化"，从而顺势被全社会尤其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承担。

[177]数据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http：//www.safe.gov.cn/）。

[178]本文作者为温铁军，原载于《中国房地产业》，2014年第7期。

[179]本文作者为温铁军，原载于《财经界》，2014年第10期。

[180]本文作者为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硕士生导师，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特邀研究员潘家恩，原文刊于《读书》，2015年第4期。本文是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作为国家综合安全基础的乡村治理结构与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4ZDA064）和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中国乡村建设史述要"系列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特别感谢温铁军、何慧丽、董筱丹、黄志友、杜洁等师友的修改建议。

[18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173页。

[182]2012年11月由重庆市璧山区档案馆意外发现的近400卷晏阳初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所领导的乡村建设华西实验区（1946—1950）完整档案，其中包括乡建知识分子所领导的“国统区”土地改革与减租减息实践，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该批档案影印版将由西南师范大学2016年正式出版。

[183]孙晓忠、高明编：《延安乡村建设资料》四卷本，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年。

[184]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编：《中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十年历程》，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

[185]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作为国家综合安全基础的乡村治理结构与机制研究（14ZDA06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第一作者董筱丹是该课题协调人和本文起草者；第二作者梁汉礼（Ibrahima Niang），塞内加尔国立达喀尔大学研究人员；第三作者区吉民（James P.F.Oswald），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博士生；后两人都是温铁军教授指导的新汉学计划博士交换生，该课题科研团队海外成员。本文原载于《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186]政府善意及其相应的政府善举，英文为government good will, government philanthro-py。近年来国内研究政府治理和相关政策的学术文章多有使用。

[187]温铁军等：《解读苏南》，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

[188]杨帅、温铁军：《经济波动、财税体制变迁与土地资源资本化——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圈地”相关问题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10年第4期。

[189]马洪、陆百甫：《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报告：1999》，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此外，1999年林毅夫在一个内部论坛中指出，中国进入“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其中“双重过剩”指的就是产能过剩和劳动力过剩。

[190]郎咸平：《用明天的产能过剩消化今天的过剩》，http：//www.ca800.com/news/d 1nrusj6oapd3u.html，2010-05-20。

[191]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三次危机四个阶段——苏州工业园区20年发展经验述要》（课题报告），2014年。

[192]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年。

[193]温铁军等：《中国新农村建设报告》，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

[194]M.Granovetter：*Economic Institutions as Social Construction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Acta Sociologica*，Vol.35，pp.3-11.

[195]G.Becattini：*The Marshallian Industrial District as a Socio-Economic Notion*.In

F.Pyke, G.Becattini，& W.Sengenberger（Eds.）：*Industrial Districts and Interfirm Cooperation in Italy*，pp.37-51.Geneva：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Labor Studies，1990.

[196]S.Kukalis：*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Firm Performance*：*the Case of Industry Clus-ters, Journal of Management*，2010，36（2）：453-481.

[197]Tallman S, Jenkins M, Henry N, et al：*Knowledge, Clusters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4，29（2）：258—271.

[198]何慧丽、赵晓峰、魏程林：《后税费时代的县乡关系与乡村治理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夏季卷），邓正来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199]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00]温铁军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完善社会管理与维护社会稳定机制研究——农村对抗性冲突及其化解机制研究”（07＆ZD048）结项报告。

[201]同上。

[202]本文作者为何慧丽，社会学博士，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此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作为国家综合安全基础的乡村治理结构与机制研究”（批准号为14ZDA06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本文原载于《人民论坛》，2015年第14期。

[203]张金明：《地权变动下的乡村善治理念与机制创新》，《农业工程》，2013年第1期，第64页。

[204]此处经验性判断，引自2011年笔者在中国人民大学做博士后时参与温铁军教授的学生例会上的讨论。

[205]张伟宾：《协会加政府，共建乡村善治》，《农民日报》，2014年5月1日，第1版。

[206]何慧丽、程晓蕊、宗世法：《当代新乡村建设的实践总结及其反思——以开封10年为例》，《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第161～162页。

[207]何慧丽：《新乡村建设试验在兰考》，《开放时代》，2005年第6期，第19页。

[208]戴亚生：《联耕联种——家庭分散经营增粮富民的现实选择》，未刊稿。

[209]本文是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作为国家综合安全基础的乡村治理结构与机制研究”（批准号为14ZDA06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第一作者为何慧丽；第二作者为邱建生，第三作者为高俊，第二、第三作者均为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管理博士研究生；通讯作者温铁军。本文初稿是前三位作者在2014年暑假期间研读《八次危机》和《解读苏南》时形成的读书笔记的基础上，由第一作者起草成文，后由通讯作者温铁军修改并定稿。本文原载于《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210]史云贵：《从政府理性到公共理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性路径分析》，《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6期，第65～70页。

[211]李晓：《经济发展与政府质量》，《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1期，第43～44页。

[212]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年。

[213]温铁军等：《解读苏南》，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

[214]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面临着从晚清到民国社会政治解体与社会解体相结合的“总体性危机”，国家为了集中动员稀缺、分散的社会资源以投入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性领域，落实赶超战略，实现计划经济，在工业化过程中，主要是城镇地区各实体部门，实行了单位制。单位制自20世纪50年代初兴起，在计划经济时代成为国家管理和控制城市社会的主要组织形式。纪乃旺认为单位制特征有三：经济资源和制度性资源的垄断性；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结构的稳定性（参见纪乃旺：《当代中国单位制的形成及其特征》，《经济导刊》，2011年第30期，第13～15页）。田舒则认为单位制的特征有二：一是个人依附于单位，个人的一切权利来源于单位；二是单位是国家对社会进行直接行政管理的组织手段和基本环节（参见田舒：《从全能主义到后全能主义：政治动员模式的变迁》，《理论界》，2013年第4期，第21～24页）。张荣则认为单位制体现了全能主义的政府以政治动员的形式调配社会资源的过程，是计划经济时代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基石（参见张荣：《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与单位制基础的消解》，《学习与探索》，2007第2期，第53～56页）。

[215]薄一波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若干重大决策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比较明确地解释了中央50年代初做出让大多数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做出牺牲的决策讨论过程。

[216]温铁军：《百年中国，一波四折》，《读书》，2001年第3期，第4页。

[217]何艳：《现代化视野下人民公社制度的缘起》，《浙江档案》，2014年第4期，第44页。

[218]张荣：《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与单位制基础的消解》，《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2期，第53页。

[219]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第142页。

[220]“地方政府公司主义”，也叫“地方政府法团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最早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戴慕珍（Jean Qi）在20世纪90年代考察了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与地方政府关系之后提出的概念；温铁军等在《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2001年）、《解读苏南》（2011年）等著作中做了深入阐发。此处以之为基础再行阐发。

[221]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第284页。

[222]Jean Qi：Local State Corporatism：The Organization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Chinese Rural Industry Takes Off：Incentives for Growth, Univ.of California Press，1995.

[223]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1页。

[224]杨帅、温铁军：《经济波动、财税体制变迁与土地资源资本化——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圈地”相关问题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10年第4期，第35页。

[225]温铁军等：《解读苏南》，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1～132页。

[226]玛雅：《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中信出版社，2013年。

[227]现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前提是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理论和西尼尔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理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了“经济人”假设的三个要求：即个人理性、自利心和市场自由（看不见的手）；认为在自利的、理性的经济人的行为下，“看不见的手”（市场）会使整个经济在人们追求私利的同时达到最优。威廉·西尼尔作为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观点，认为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去获得更多的财富（收入效用最大化原理）。作为理性的一个层面，个体理性是指个体人和其他类型的个体行为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参见刘红军：《亚当·斯密的理性和西尼尔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管理创新》，2014年第20期，第248页。

[228]西方经济学认为，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机制，一般只能保证资源配置的边际私人收益和边际私人成本相等，而无法保证边际社会收益和边际社会成本相等；当边际社会收益和边际社会成本不相等时，对整个社会而言，资源的配置就没有达到最有效率的状态，这就是“市场失灵”。“外部性”就是指“外部影响”，它是造成市场机制低效率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从社会的角度看，在存在“好”的外部影响时私人活动的水平往往太低，而在存在“坏”的外部影响时又往往过高，也就是说市场机制往往存在坏的“外部影响”或“外部性”。参见高鸿业：《西方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11页。

[229]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第297页。

[230]何慧丽、程晓蕊、宗世法：《当代新乡村建设的实践及其反思——以开封10年为例》，《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第161～162页。

[231]根据科斯以及德姆塞茨的研究，经济学所面对的一些经济现象必然导致的社会成本问题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不能简单地用经济学的办法来解决，也难以“费用高低”的标准来衡量，假如经济问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内部化解决，这是一个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路。而这个“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风险”的经济社会学命题，在中国农村工业化的一些地方经验中出现了。

[232]出自《论语·里仁》篇，意思是：居住在有仁德的地方才是好的。

[233]温铁军等：《解读苏南》，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页。

[234]同上，第138页。

[235]徐嘉鸿、贾林州：《从“村社理性”到“村社制度”：理解村庄治理逻辑变迁的一个分析框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92～100页。

[236]表11-2、表11-3均来源于对《从“村社理性”到“村社制度”：理解村庄治理逻辑变迁的一个分析框架》一文中“表1山头、周畈和小洋村4村民组114户土地出租情况”的数据整理改编而成；参见同上书，第94页。

[237]徐嘉鸿、贾林州：《从“村社理性”到“村社制度”：理解村庄治理逻辑变迁的一个分析框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92～100页。

[238]贺雪峰：《城市化的中国道路》，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12页。

[239]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年，第28页。

[240]陈靖：《村社理性：资本下乡与村庄发展——基于皖北T镇两个村庄的对比》，《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37～39页。

[241]何慧丽、小约翰·柯布：《解构资本全球化霸权，建设后现代生态文明——关于小约翰·柯布（John B.Cobb, Jr.）的访谈录》，《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27页。

[242]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年，第199页。

[243]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年，第199～200页。

[244]温铁军、董筱丹：《破解“三农”与“三治”困境，一个新视角》，《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年第4期，第23页。

[245]何慧丽、温铁军：《亟待从村庄层面突破小农困境》，《人民论坛》，2014年第7期，第66～67页。

[246]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作为国家综合安全基础的乡村治理结构与机制研究”（14ZDA06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作者为温铁军、高俊。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4期。

[247]温铁军、高俊、张俊娜：《中国对美“双重输出”格局及其新变化》，《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5年第7期。

[248]楼继伟：《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清华大学新闻网。

[249]就全社会而言，GDP构成收入主体，而债务对GDP的比率（或债务/GDP），便是全社会的杠杆率。

[250]温铁军、高俊、董筱丹：《逆周期调节与“政府信用替代资本信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6年第1期。

[251]房地产投资增长加快下行是2014年经济下行影响最大的因素。从投资增速看，投资增长率从2013年的19.8%下降到2014年的10.5%，2015年1—8月进一步下滑至3.5%；从新开工面积看，增长率从2013年的13.5%下降到2014年负增长10.7%，2015年1—8月进一步下滑至负增长16.8%；从土地购置指标看，购置面积从2013年增长8.8%下降至2014年负增长14.0%，2015年1—8月进一步下滑至负增长32.1%。而且，2014年以来，房地产开发企业实际到位资金的增长率从2013年近30%的高增长，急剧下滑至接近零增长或负增长，特别是银行贷款和自筹资金增速下滑更快。数据来源：刘晓光、刘元春：《房地产市场复苏不容乐观》，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问题与思路》（内部资料），2015年第29期。

[252]李扬、张晓晶、常欣等著：《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杠杆调整与风险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2～40页。

[253]参见“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研究：Jean C.Oi：*The Role of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The China Quarterly*，1995，144，1132-1149；陈家建：《法团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宫希魁：《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及其治理》，《财经问题研究》，2011年第4期；赵树凯：《地方政府公司化：体制优势还是劣势？》，《文化纵横》，2012年第2期；折晓叶：《县域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变化》，《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254]据中国企联2014年发布的《中国企业劳动关系状况报告》。

[255]据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13年《中国民营企业劳动关系报告》。

[256]刘凌林：《经济下行压力下劳动关系现状调查报告》，和讯网。

[257]事实上，1949年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来，马克思主义就被确定为中等以上学校思想政治课的核心，而鲜明的阶级性和实践性恰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性。同时，历史课程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指导，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逻辑环节，被广泛应用到历史问题的分析中。

[258]无论从现实还是从法律角度出发，“小农村社制”经济都是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基本类型，其基础是村社成员共同拥有土地的村社共有制产权，由于这本身是一种对内不排他而对外排他的产权关系，所以本质上仍然属于私权，但并不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意义上的完全公有制或私有制。农村土地客观上是以血缘、地缘关系维系的村社边界作为其产权边界，村社为产权边界的集体共有制是村社内部一组成员权的集合。参见：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第8～9页。

[259]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年，第10～19页。

[260]也可称之为社区理性、群体理性，与之相关的概念还有集体理性、合作理性、社会理性等。

[261]温铁军：《解读苏南》，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37页。

[262]陈锡文：《国内农产品价格逼近天花板》，新浪财经。

[263]申龙均、韩忠富：《韩国综合农协对我国发展农民综合合作社的启示》，《经济纵横》，2014年第5期；秋芳：《战后日本农协发展史研究》，南京农业大学，2009年。

[264]董筱丹、杨帅、李行、曾天云、温铁军：《村社理性：基于苏南工业化经验的比较制度经济学分析》，《制度经济学研究》，2012年第1期。

[265]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年，第10～19页。

[266]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第284～300页。

[267]温铁军：《解读苏南》，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37页。笔者比较重庆调查，认为这相当于黄奇帆在重庆以"八大投"为名的大型国企收益作为第二财政。

[268]丁守海：《劳动剩余条件下的供给不足与工资上涨——基于家庭分工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269]刘怀宇、李晨婕、温铁军：《"被动闲暇"中的劳动力机会成本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270]陈道银：《风险社会的公共安全治理》，《学术论坛》，2007年第4期。

[271]董筱丹、李行、温铁军：《宏观经济波动视角下的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探索》，2013年第2期。

[272]温铁军、温厉：《中国的"城镇化"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教训》，《中国软科学》，2007年第7期。

[273]温铁军、温厉：《中国的"城镇化"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教训》，《中国软科学》，2007年第7期。

[274]何慧丽：《乡村公共财的作用与生成逻辑》，《人民论坛》，2015年第14期。

[27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内首份农村净资产评估：2012年净资产127万亿元》，中国乡村发现网。

[276]温铁军：《中国新农村建设报告》，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8～48页。

[277]董筱丹、梁汉民、区吉民、温铁军：《乡村治理与国家安全的相关问题研究——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视角的结构分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278]本文作者为温铁军，原载于《财经界》，2014年第11期。

[279]本文调研和写作受到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粮食金融化与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研究”（批准号14BGJ048）、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作为国家综合安全基础的乡村治理结构与机制研究”（批准号14ZDA064）的资助。本文作者为董筱丹、计晗、邱建生、温铁军等，原文刊于《战略与管理》，2015年第1期。

[280]对这个“地板高于天花板”的现象分析，见温铁军1999年发表的《中国入世对三农问题的挑战》一文，后来收入温铁军文集：《三农问题与世纪反思》，三联书店，2005年7月，第1版，第222页。

[281]摘自陈锡文2014年11月2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60年院庆暨国家粮食安全研讨会开幕式演讲。

[282]摘自陈锡文2014年11月2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60年院庆暨国家粮食安全研讨会开幕式演讲。

[283]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作为国家综合安全基础的乡村治理结构与机制研究”（批准号14ZDA064）、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粮食金融化与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研究”（批准号14BGJ048），以及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城乡二元结构下改善社会治理研究”（批准号15FXA003）的阶段性成果。本文作者为温铁军、张俊娜、杜洁，根据2014年4月温铁军在国家行政学院的演讲整理而成，已经本人修改审定。本文原载于《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28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粮食金融化与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研究”（批准号14BGJ048）、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作为国家综合安全基础的乡村治理结构与机制研究”（批准号14ZDA064）等项目阶段性成果。作者为温铁军、高俊，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第48期。

[285]本文作者为温铁军、计晗、高俊。本文原载于《理论探讨》，2014年第5期。

[286]本文作者为计晗、张兰英、温铁军，原文载于《中国投资》，2015年第2期。

[287]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作为国家综合安全基础的乡村治理结构与机制研究”（批准号为14ZDA064）、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粮食金融化与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研究”（批准号14BGJ048）以及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城乡二元结构下改善社会治理研究”（批准号15FXA003）阶段性成果，作者为温铁军、侯宏伟、计晗。本文原载于《农业经济问题》，2016年第2期。

[288]此处指三菱财阀、三井财阀、住友财阀、富士财阀、三和财阀、劝银财阀等六个综合商社。

[289]关于日本现阶段形成的六大财阀的演变历史及所涉及的文献，可以参阅日本国内学者奥村宏：《日本の六大企業集団》（朝日新闻出版社，1993），菊地浩之：《日本の15大財閥》（平凡社出版社，2009）等文献。关于农协垄断，可以参阅山田定市：《独占禁止法の適用除外と農協の協同性·公同性》《開発論集》第80号（2007），山下仁一：《農協の陰謀》（宝岛社出版社，2011）。

[290]这种观点在近藤康男：《協同組合原論》（高阳书院，1935）与井上晴丸：《日本産業組合論》（日本产业新报社，1937）的两本著作中涉及。

[291]参见山田定市："国家独占資本主義と農業協同組合"《北海道大学農経論叢》第27号（1970）。

[292]近藤康男：《貧しさからの解放》（中央公论社，1954）。

[293]西山久德：《日本農協の論理と課題と展望》（文化书房博文社，1996）。

[294]日本雅虎新闻网：コメ·自動車、解決目指す＝甘利担当相"最大のヤマ場"日米閣僚協議2日目（2015-04-20）http：//news.yahoo.co.jp/pickup/6157193，2015-05-01引用。

[295]张云：《日本的农业保护与东亚地区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132页。

[296]因"MA大米"进入日本的价格低廉，日本政府规定在出售前必须进行价格调整，最大可以进行高达每公斤292日元的价格上调，然后才允许在国内市场流通，这种价格上调在日本被称为"买卖差益"（Make up），虽然大多数"MA大米"经过价格上调后销售价格仍然低于国产大米，但是与国产大米的价格差距已经被大大缩小。

[297]日本经济新闻（电子版）：ミニマム·アクセス米、国の損失2723億円19年間累積（2015-02-20）http：//www.nikkei.com/article/DGXLASFS20H41 Q5A220C1EE8000/，2015-05-01引用。

[298]张云：《日本的农业保护与东亚地区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页；日本财务省：《貿易統計-実行関税率表》（2015年4月版）。

[299]六次产业是日本学者今村奈良臣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创建"农民塾""造村塾"的活动中提出的，即"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六次产业"。但是在三年半后通过加深对理论和实践的考察，今村奈良臣又将这一概念改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六次产业"，其原因是为了突出农业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如果农业衰亡了，六次产业的构想也就消失了。今村奈良臣认为随着经济、产业的发展，第一产业不断向第二、第三产业过渡的过程中，农业在不断地衰亡。因此第一产业不能仅仅停留于农畜产品的生产，应该跨入第二产业（加工、食品制造等）和第三产业（流通、销售等），创造新的附加价值，盘活地域经济，他认为农村充满了智慧，六次产业的原点源于地域先祖如何生活的历史当中。

[300]高强、刘同山、孔祥智：《日本大生产的发展历程及大米政策改革探析》，《现

代日本经济》，2014年第4期。

[301]“务农者户别收入补偿制度”主要是对生产费用和销售价格的差额通过补助金对农户收入进行补贴的方式。

[302]游国龙、尚会鹏：《自民党得票率与日本的米价——对自民党统治与其农业政策关系的数量分析》，《日本学刊》，2004年第3期。

[303]徐家驹：《日本农业政策困境解读——从“第三次开国”说起》，《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304]张云：《日本的农业保护与东亚地区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7页。

[305]张云：《日本的农业保护与东亚地区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0页。

[306]参见韪驰：《论小农经济与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云南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郑琼现：《马克思小农特点的宪政分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武建国：《小农与专政集权政府的作用力方向及其影响——兼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云南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

[307]可参见蔡亮：《试析农业利益集团对日本政治的影响——兼论“农协”在反对TPP活动中的政治影响力》，《日本学刊》，2012年第5期；李勤昌、石雪：《日本强化农业保护的经济与政治原因》，《现代日本经济》，2014年第2期；游国龙、尚会鹏：《自民党得票率与日本的米价——对自民党统治与其农业政策关系的数量分析》，《日本学刊》，2004年第3期；张建：《日本农业结构改革中的农协问题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张云：《日本的农业保护与东亚地区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9～62页；于秋芳：《现代日本农协的发展变迁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142页。

[308]蔡亮：《试析农业利益集团对日本政治的影响——兼论“农协”在反TPP活动中的政治影响力》，《日本学刊》，2012年第5期。

[309]按照中国银行外汇比率折算：100日元＝5.2元人民币（2015年5月14日）。

[310]张云：《日本的农业保护与东亚地区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134页。

[311]内阁府：規制改革会議議事次第（2014年5月22日）http：//www8.cao.go.jp/kisei-kaikaku/kaigi/meeting/2013/committee2/140522/agenda.html，2015-05-15引用。

[312]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批准号14ZDA064）、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批准号14BGJ048）、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批准号15FXA003）成果。本文作者为温铁军、邱建生、张俊娜。本文原载于《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5年第4期。

[313]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11页。

[314]杨帅、温铁军：《什么才是体现中国“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7-26，第480期，A07。

[315]温铁军：《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年，第214页。

[316]温铁军：《解读苏南》，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页。

[317]温铁军：《中国农村发展的另类解读——“中国经验”、“比较优势”与乡建试验》，《理论前沿》，2008年第13期，第13～16页。

[318]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批准号14ZDA064）成果，作者为何慧丽、胡方萌、符彬、潘国亮。本文原载于《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319]钱穆：《文化与教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5页。

[320][美]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吕明、袁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321][美]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吕明、袁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322]何慧丽、吕迅、王瀛昊：《作为生态文明形态的有机农业之道——以北京市天福园有机农庄的经验为例》，《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116～123页。

[323]王蕙：《哈佛大学通识教育对中国高校的借鉴意义》，《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第83～87页。

[324]杨展怡：《通识教育理念下非社会学专业社会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以F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为例》，《科教导刊（下旬）》，2015年第4期，第137～138页。

[325]冯向阳：《我国通识教育的发展应当更加重视博雅性》，《高教研究》，2010年第7期，第105～108页。

[326]王俊：《作为生态文明形态的敬畏生命伦理》，《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5期，第25～28页。

[327]何慧丽等：《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总结及反思——以开封10年经验为例》，《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第149～167页。

[328]刘益明：《中国式的“悟道”对大学通识教育的启示》，《教育与教学研究》，

2015年第5期，第91～95页。

[329]张立文：《和合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7页。

[330]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作为国家综合安全基础的乡村治理结构与机制研究”（批准号14ZDA064）、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粮食金融化与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研究”（批准号14BGJ048）和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城乡二元结构下改善社会治理研究”（批准号15FXA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为温铁军、谢欣、高俊、董筱丹。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6年第2期。

[331]本文主要观点和资料来自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解读苏南》（先后获得2013年北京哲学社科二等奖、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科二等奖）和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再读苏南：苏州工业园区20年发展述要》。

[332][美]道格拉斯·C.诺斯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25～226页。

[333][美]道格拉斯·C.诺斯著，杭行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三联书店，2008年，第29～67页。

[334]正外部性是指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导致其他经济主体获得额外的经济利益，而受益者无须付出相关代价。

[335]“拉美化”是指这些国家在进行经济改革以确保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形势不断恶化，最终导致改革与预期相去甚远的矛盾现象。拉美化陷阱是在各国讨论和评价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成效时提出来的。

[336]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337][美]霍利斯·B.钱纳里著，吴奇译：《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60页。

[338]此概念由盛洪等在工作论文《论产品内国际分工下的中国贸易》中提出沿海加工贸易的主要收益来源于环境租和劳动力租。

[339]“微笑曲线”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初有台湾“IT教父”之称的宏碁（ACER）总裁施正荣先生，根据波特理论和他多年从事IT产业的丰富经验提出的。他用一个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来描述个人电脑制造流程中各个环节的附加值，由于曲线类似微笑的嘴型，所以被形象地称为“微笑曲线”，后来加以修整成为“产业微笑曲线”。一般来说，资金和技术密集度越高的产业，其曲线的位置越高、曲线的弯曲度也越大。“微笑曲线”以附加价值的高低，来看待地区、企业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地区、产业和企业，只有不断往“微笑曲线”的高附加值区块移动和定位，才能赢得良好的经营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

[340]温铁军等主编：《解读珠三角：广东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调整战略研究》，中国

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第148～152页。

[341]据2015年8月28日凤凰卫视的报道，苏州工业园区在台商评价中位列第一。

[342]董筱丹著：《再读苏南：苏州工业园区20年发展述要》，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27页、第50～52页、第260～272页。

[343]温铁军等著：《解读苏南》，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0～37页。

[344]董筱丹著：《再读苏南：苏州工业园区20年发展述要》，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27页、第50～52页、第260～272页。

[345][美]劳埃德·G.雷诺兹著，马宾译：《微观经济学——分析和政策》，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36～245页。

[346]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

[347]李义平：《地方政府行为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348]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长期存在的原因》，《经济研究》，2004年第6期。

[349]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1995》。

[350]是指将经济行为带来的外部成本变为内部成本的过程，从而消除外部成本，使得经济运行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一般来说，外部经济会引起私人成本高于社会成本，外部经济会引起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

[351]图表转自温铁军：《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年。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352]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9》《中国统计年鉴1990》和《中国统计年鉴1991》。

[353]就具体地缘政治来讲，在整个东盟中间，新加坡和中国关系比较稳定，渊源较深，和这样一个属于西方阵营的华人国家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既是为了突破西方封锁的政治任务，亦可借机向国际社会展示与中国的合作空间和前景，增加中国作为合作者和投资东道国的吸引力。

[354]本图来自温铁军著：《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年。该书是多个国家级课题的研究成果，第一版一年之内6次印刷，联合国系统驻华协调员及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罗黛琳不仅为本书作序，还资助本书翻译和用于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经验的培训和交流。本书被《经济参考报》评为“流过我的思想的你的智慧——2012年最值得阅读的10本财经图书”、被经济参考网评为“2012最有影响力的10本书”，被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评为“2012—2013年度全行业优秀畅销

书”，2014年5月，在中国最大财经门户网站和讯网主办的“和讯华文财经图书大奖”活动中网络投票评选为2013“年度十大财经图书”。本书繁体版已经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韩文版也已经出版，英文版即将问世，以此书为题的英文讲座录像已列入英国普利茅斯大学舒马赫学院研究生课程。

[355]温铁军把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百年工业化历史划分为四个进程。其中第三个是改革之前中央政府为主导的“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第四个则是为以改革开放为名的“产业资本扩张”，且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由此可以称之为“地方工业化”。参见温铁军：《百年中国，一波四折》，《读书》，2001年第3期；收入作者文集：《我们到底要什么》，华夏出版社，2004年。

[356]温铁军等著：《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年。

[357]温铁军著：《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第二版。

[358]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5》。

[359]1994年开始，国家对外汇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取消外汇留成制度，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并一次性实现汇率并轨。

[360]1994年开始，中央开始实行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税体制改革，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涉及范围最大、调整力度最强的一次财税改革。在这之前，实行的是“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由于管得太死，抑制了经济发展活力。

[361]是指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或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面对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及地区在战后取得的巨大成功，人们将东亚现代化进程总结为“东亚模式”。

[362]注册资金是困扰园区开发初期的一个大问题。在商务谈判时，我方表态，双方投资将同时到位，第一期双方共注册资金5000万美元。按中方35%计算，中方应投入1750万美元。根据1994年对外经济合作部下发的《关于设立中外合资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的批复》，双方均以现汇出资，第一期至少为各自认缴出资额的30%，须在合资公司营业执照签发3个月内出足；1个月内缴清出资额的10%，其余1年内出足。合资公司可在园区内进行成片土地开发与经营，合营期限为30年。

[363]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利用良好的区位条件和政策优势，承接了当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低端制造产业转移，初步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并形成了外源型经济模式，强化了“境外前店＋境内后厂”的加工型贸易产业结构在本地的低端配置。

[364]1994年2月11日，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有关问题的批复》，俗称“九号文件”。

[365]它所得到的政策优惠高于一般的省一级的政策优惠，这是苏州工业园区第一步发展的特殊条件。它可以自由地使用资本，地权审批权力、项目审批权力和税收权力大大超过省级。

[366]温铁军等著：《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年。

[367]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战略举措，就是把传统制造业从目前的产业基地“转移出去”，再把“先进生产力”转移出来，以达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广东地区的腾笼换鸟可称为“双转移”政策，即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具体是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翼、粤北山区转移，而东西两翼、粤北山区的劳动力一方面向当地二、三产转移，另一方面向珠三角发达地区转移。

[368]温铁军等主编：《解读珠三角：广东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调整战略研究》，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第148～152页。

[369]数据来源于苏州市工业园区“一站式”服务中心。

[370]中国政府在完成了内向型的国家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之后，符合产业资本扩张规律地推行了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由于后任政府继承的是直接获取农村剩余的政治经济制度，必然出现内含于后来制度改革之中的“路径依赖”，于是派生出以政府公司化为特色的政府市场经济。

[371]生产性服务业具有资本和规模报酬递增的优势，因轻资产性为破解制造业陷入“低水平陷阱”提供了新的方向。

[372]高俊：《政府的平台创新对新兴产业发展的诱导机制研究——基于协同理论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373]其宗旨就是通过不断筛选优质投资项目来增加投资项目的成功率，从而获取必要的风险收益。

[374]高俊：《政府的平台创新对新兴产业发展的诱导机制研究——基于协同理论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375]该母基金由国家开发银行的全资子公司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和苏州创业投资集团共同发起设立，总规模600亿元，首期资金规模150亿元，分为PE（私募股权投资）母基金和VC（风险投资）母基金两个板块。其中，PE板块主要投资于专注产业整合、并购重组的股权投资基金；VC板块主要投资于专注早期和成长期投资的创投基金。

[376]本图来自高俊：《政府的平台创新对新兴产业发展的诱导机制研究——基于协同理论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第37页。

[377]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作为国家综合安全基础的乡村治理结构与机制研究”（14ZDA064）、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粮食金融化与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研究”（14BGJ048）、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城乡二元结构下改善社会治理研究”（15FXA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作者为温铁军、高俊、董筱丹。本文原载于《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6年第1期。

[378]杨春学、谢志刚：《国际金融危机与凯恩斯主义》，《经济研究》，2009年第

11期；乔海曙：《为什么要逆周期调节？》，《求是》，2014年第6期。

[379]陈元：《开发性金融与逆经济周期调节》，《财贸经济》，2010年第12期。

[380]陈元：《开发性金融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经济科学》，2009年第4期。

[381]范柏乃、张鸣：《国内外政府信用研究述评与展望》，《软科学》，2011年第3期。

[382]孙亚忠、葛笑如：《政府信用的渊源和理论分析》，《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

[383]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年。

[384]以金融资产为例，根据中央汇金公司公布的信息，当前国有金融资本为4万亿~5万亿元，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等机构，占全部金融资本的比重为60%~70%，如果包括非金融国有企业入股国有金融企业的国有股本，金融行业国有资本占比则在80%左右。周星旺：《国有金融资本经营面临结构调整》，《中国金融》，2013年第14期。

[385]杨斌：《论中国政府特性和非对称型分税制加分益制财政体制》，《税务研究》，2014年第1期。

[386]胡书东：《经济发展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国财政制度变迁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387]陈珠明：《从政府信用到企业信用——粤海债务重组案例解读》，《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2008（00）。

[388]Jean C.Oi：*The Role of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The China Quarterly*，Vol.144，（1995）（pp.1132-1149）；Andrew G.Walder：*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1，（1995）（pp.263-301）；陈家建：《法团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宫希魁：《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及其治理》，《财经问题研究》，2011年第4期；赵树凯：《地方政府公司化：体制优势还是劣势？》，《文化纵横》，2012年第2期；折晓叶：《县域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变化》，《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389]陈元：《开发性金融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经济科学》，2009年第4期。

[390]饶云清、张海波：《地方政府信用风险管理与外部监督》，《银行家》，2014年第8期。

[391]比如，国家拨付3000亿元作为国家开发银行的资本金，并赋予其在市场上发行金融债券的特许权，债券信用享有“准主权级”的政府信用。陈元：《开发性金融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经济科学》，2009年第4期。

[392]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年。

[393]杨帅、温铁军：《经济波动、财税体制变迁与土地资源资本化——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圈地”相关问题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10年第4期。

[394]折晓叶、陈婴婴：《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对“项目进村”案例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395]杨斌：《论中国政府特性和非对称型分税制加分益制财政体制》，《税务研究》，2014年第1期。

[396]比如，当中央政府1997年在金融危机的巨大风险面前启动强制性制度变迁——银行商业化改制的时候，国家因承担的安全责任而必须化解巨额不良贷款，实际上是通过国有银行系统替公司化地方政府承担工业化的制度成本。

[397]本节引用的案例资料，主要来源于董筱丹：《再读苏南——苏州工业园区二十年发展述要》，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

[398]所谓“三大赤字”，除外汇赤字外，还包括1993年中央政府直接承担责任的“财政赤字”和金融严重贷差压力下，国有金融部门全部资本金为负值的“银行赤字”。

[399]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年。

[400]中国在世界市场上获得中长期贷款的渠道被关闭，来华外国投资减少75%。对外经济贸易部1989年10月公布的数据显示，自经济制裁以来，约有100亿美元的贷款被搁置。资金的不足，导致相关建设项目进展受阻。阮建平：《战后美国对外经济制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

[401]来源：国函（1994）9号《国务院关于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有关问题的批复》。

[402]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年。

[403]1996年1月21—22日，苏州工业园区投资实业有限公司先后与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等9家央企签署《关于共同组建中国苏州工业园区股份有限公司的原则协议书》。至此，中方财团正式成立，更名为“中国·苏州工业园区股份有限公司”，共计7200万股，每股面值1美元，总股本规模为7200万美元。其中，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2672万股，占37.11%；江苏省投资公司1000万股，占13.89%；其余9家央企共计3528万股，占49%。

[404]园区刚成立时，在从事基本建设开发的中新集团（CSSD）里中方占35%股份，那也是中央直接安排11个国家级单位参股才出齐了资本金，全部资本金（连新方的资本金算在一起）占CSSD前后投资总额的1/3左右。若然，则中方的资本金占CSSD投资

总额的比重只有1/10左右。

[405]国家开发银行：《苏州工业园区融资建设模式案例——评二局案例[2007]016号》，内部报告。

[406]李巨川：《苏州工业园区志1994—2005》，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

[407]董筱丹：《再读苏南——苏州工业园区二十年发展述要》，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

[408]“总地租”概念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中就已经被详细讨论，将总地租与政府的公共政策相结合的思想火花，最早可见美国学者亨利·乔治的“单一地价税”主张，并由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讨论城市公共品供给的文章中予以证明。在中国，总地租的政治经济思想在100多年的时间跨度里两度被热议：一是孙中山据此提出“土地涨价归公”作为其“民生主义”的重要支柱；二是2010年前后国内学者崔之元拿它来讨论重庆开发中的土地问题。

[409]“母基金”是指专门投资私募股权基金或者创业投资基金的基金，又被称为“基金中的基金”。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美国，是以股权投资基金作为投资对象的特殊基金。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股权投资基金早已超越股票二级市场成为与银行、保险并列的三大金融业支柱之一，而股权投资基金的资金20%以上来自“母基金”。

[410]“嵌入”和“脱嵌”概念首先是由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变》中提出来的。他认为随着劳动、土地和货币作为虚拟商品纳入市场体系，后者成为独立于社会其他部分的自主系统，人们的经济活动不再是嵌入于社会之中，而是脱嵌于社会之外。如今，在产业资本后期，金融资本日渐“脱嵌”于实体经济，成为独立的资本力量乃是一种常态。而在园区的经验中，金融资本与创新型产业发展呈现出一种紧密结合的状态，是为“回嵌”。

[411]尤志卉：《首支国家级母基金落户园区》，《苏州日报》，2010-12-29，（A01）。

[412]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组对区域中观治理创新的研究成果之一，主要观点系温铁军主持科研团队集体调研、讨论后形成，由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硕士生胡骏根据董筱丹副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2015—2016学年春季学期“区域经济学”课上讲授的内容整理，课题组首席专家温铁军与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副院长张兰英共同审阅定稿。

[413]后来出台的地票制度设计，其主要功能并不是通过交易市场来发现土地的市场价值，而是在国家土地增减挂钩、占补平衡的政策要求下，通过农村社区建设用地整理源源不断地释放出建设用地指标。由于地票市场可以将土地指标攒零为整，因此避免了很多地区整村拆迁导致的矛盾激化等问题。

[414]第三财政是重庆国资企业资产增值所产生的收益。

全球化与国家竞争

新兴七国比较研究

CHINA
TURKEY
INDIA
INDONESIA
BRAZIL
VENEZUELA
SOUTH AFRICA

温铁军等／著
（温铁军 刘健芝 黄钰书 薛翠）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東方出版社

版权信息

全球化与国家竞争：新兴七国比较研究/温铁军等著.—北京：东方出版社，2021.2

ISBN 978-7-5207-1749-6

I.①全…　II.①温…　III.①国际竞争力—研究　IV.①F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22161号

全球化与国家竞争：新兴七国比较研究

（QUANQIUHUA YU GUOJIA JINGZHENG：XINXING QIGUO BIJIAO YANJIU）

作者：温铁军等

责任编辑：李烨　袁园

出版：东方出版社

发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6号

邮编：100120

印刷：北京市大兴县新魏印刷厂

版次：2021年2月第1版

印次：2021年4月第5次印刷

开本：660毫米×960毫米　1/16

印张：27.75

字数：348千字

书号：ISBN 978-7-5207-1749-6

定价：78.00元

发行电话：（010）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请拨打电话：（010）85924602 85924603

目录

版权信息
“国仁文丛”（Green Thesis）总序
序言 E7研究与南南论坛：探求南方的出路
概述
绪论
第一部分 中国、土耳其、印度、印度尼西亚：全球格局重构下调整战略
导言
第一章 中国：产能过剩下发展模式的转型与金融化的矛盾
第二章 土耳其：地缘格局重构中的“土耳其症候”
第三章 印度崛起之路：从超前金融化转向发展制造产业
第四章 印度尼西亚：在新地缘格局下的区域性海洋大国
第二部分 巴西、委内瑞拉、南非：资源国的困局
导言
第五章 巴西：替国际资本打工的债务国
第六章 委内瑞拉：资源主权国的困局
第七章 南非：深度割裂的两极化社会
结语 新兴国家未“新”何“兴”？
附录 E7研究的宏观背景
按语
专题1 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的阶段性战略调整
专题2 新核心同盟之一：核心区构建六方货币同盟
专题3 新核心同盟之二：TPP——殖民主义的“去国家化”
专题4 货币霸权战略冲突下欧元的困局
专题5 美欧中战略关系分析（2015）
专题6 中国2015年股灾背景及过程
专题7 中国债务的四个层次
专题8 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两个取向与两难困境
专题9 “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的布局和挑战[267]
专题10 巴西近年政局动荡述要（2013—2016年）[268]



温铁军（后排左三），黄平（后排右二），刘健芝（前排左二），戴锦华（前排右一），薛翠（前排右三）

图1　2001年，印度喀拉拉邦农村调研



图2　2001年，印度喀拉拉邦，温铁军（左）与MP帕拉梅斯瓦兰（M P Parameswaran）交流



温铁军（后排右三），刘健芝（后排左三），汪晖（后排左一），戴锦华（后排左六）

图3　2008年，委内瑞拉农村调研



图4　2008年，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温铁军（左）与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交流



左起：汪晖，文诺·瑞纳（Vinod Raina），刘健芝，温铁军，陈昕

图5　2011年，参加塞内加尔世界社会论坛



温铁军（右三），黄钰书（右五）

图6　2011年7月8日，“全球化的成本与危机转嫁——发展中‘新兴七国’客观经验比较研究”研讨会



刘健芝（前排右二），薛翠（前排右一），黄钰书（后排右三）

图7　2011年7月12日—15日，实地调研霍家沟村



温铁军（前排左三），汪晖（前排右二）

图8　2011年12月10日，新兴七国比较研究项目报告会



刘健芝（前排左七），温铁军（前排右三），戴锦华（前排右二）

图9　2011年12月12日—14日，第一届可持续实践南南论坛



刘健芝（后排左一）

图10　2011年，第一届南南论坛实地调研，华北路线：河南—河北



黄钰书（右二）

图11　2011年，第一届南南论坛实地调研，华东路线：上海—浙江



董筱丹（前排右三），薛翠（前排右二）

图12　2011年，第一届南南论坛实地调研，西南路线：重庆—成都一团



刘健芝（左二），薛翠（左一）

图13　2011年，第一届南南论坛实地调研，西南路线：重庆—成都二团



萨米尔·阿明（后排左一），刘健芝（前排左二），薛翠（第二排右三）

图14　2012年，第二届南南论坛实地调研，西安—襄樊—宜昌—重庆三峡



温铁军（前排左五），刘健芝（第二排右七），萨米尔·阿明（前排右四）

图15　2012年12月8日—10日，可持续实践与乡村建设国际研讨会暨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成立



左起：刘健芝，萨米尔·阿明，黄钰书

图16　2012年12月8日—10日，可持续实践与乡村建设国际研讨会



左起：温铁军，弗朗索瓦·浩达（Francois Houtart），萨米尔·阿明，刘健芝，戴锦华，陈昕

图17　2013年，在突尼斯世界社会论坛，举办中国专题论坛



弗朗索瓦·浩达（右二），刘健芝（右四），薛翠（左一）

图18　2015年，在突尼斯世界社会论坛，宣告全球大学成立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右）与刘健芝

图19　2016年8月蒙特利尔世界社会论坛开幕游行



刘健芝（右二），戴锦华（右三），沃勒斯坦（左三），

沃勒斯坦妻子碧翠丝·沃勒斯坦（Beatrice Wallerstein）（左二）

图20　2016年8月，蒙特利尔世界社会论坛开幕游行



薛翠（左一）

图21　2019年，探访巴西圣灵州农民合作社



委内瑞拉人民政权外交部长豪尔赫·阿雷亚萨（Jorge Arreaza），刘健芝（右）

图22　2020年1月8日，委内瑞拉加拉加斯蜂巢公社2021



刘健芝（右二），薛翠（右三），严晓辉（左三），何志雄（左二）

图23　2020年，探访委内瑞拉农户



刘健芝（前排右四），薛翠（前排左三）

图24　2020年7月8日—17日，第七届南南论坛

“国仁文丛”（Green Thesis）总序

因为有话要说，而且要说在我们团队近期系列出版物的前面，[1]所以写总序。

我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从被动实践中的主动反思到80年代以来主动实践中的主动反思，经两个11年在不同试验区的历练，[2]加之后来广泛开展国内外调查和区域比较研究，且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自忖有从经验层次向理性高度升华的条件，便先要求自己努力做到自觉地“告别百年激进”，[3]遂有21世纪以来从发起社会大众参与改良、对“百年乡建”（Rural Reconstruction）之言行一致地接续，而渐趋达至“国仁”思想境界，亦即一般学人必须“削足”才能跟从制度“适履”，但只要纳入主流就碍难达到的“实践出真知”。

因此，我在2016年暑假从中国人民大学退休之际，要求为今后几年的一系列出版物担纲作序，也主要是想明了指出“国仁文丛”何词何意，亦即：这个丛书是什么思路和内涵。

一、释义之意

“国”者，生民聚落之域也。“上下五千年”是中国人开口就露出来的文化自豪！就在于，人类四大文明古国除了中华文明得以历经无数朝代仍在延续之外，其他都在奴隶制时代以其与西方空间距离远近而次第败亡。由此看中国，唯其远在千山万水之隔的亚洲之东，尤与扩张奴隶制而强盛千年的西方相去甚远，且有万代众生勉力维护生于斯而逝于斯之域，“恭惟鞠养，岂敢毁伤”，兹有国有民，相得益彰。遂有国民文化悠久于国家存续之理，更有国家历史传承于国民行动之中。

“仁”者“爱人”，本源于“仁者二人也”。先民们既受惠于光风水土滋养哺育的东亚万年农业，又受制于资源环境只能聚落而居，久之则族群杂处，而需邻里守望、礼义相习，遂有乡土中国仁学礼教上下一致维系大一统的家国文化之说，于是天下道德文章唯大同书是尊。历史上每有“礼崩乐坏”，随之社会失序，必有“国之不国，无以为家”。是以，“克己复礼为仁”本为数千年立国之本，何以今人竟至于“纵己毁礼为恶”……

致使梁漱溟痛感“自毁甚于他毁”的现代性为表、横贪纵欲为里之巨大制度成本肆无忌惮地向资源环境转嫁而至人类自身不可持续！

据此可知我们提出“国仁”思想之于文丛的内涵：

中国人历史性地身处三大气候带覆盖、差异显著的复杂资源地理环境下，只有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各类社会群体兼收并蓄、包容共生，才能实现并绵延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性可持续。

这个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其中的、在亚洲原住民大陆的万年农业文明中居于核心地位的“群体文化”内核，也被老子论述为“阴阳之为道也”，进而在漫长的文化演进中逐渐形成了极具包容性的、儒释道合一的体系。[4]

由是，在21世纪初重启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之后，我们团队试图把近代史上逐步从实践中清晰起来的乡建思想，寻源上溯地与先贤往圣之绝学做跨时空结合，归纳为人类在21世纪转向“生态文明”要承前启后的社会改良思想。[5]

是以，“道生万物，大德中庸。上善若水，大润民生。有道而立，大象无形。从之者众，大音希声”。[6]此乃百年改良思想指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之真实写照。

基于这些长期实践中的批判性思考，我们团队认同的“国仁文丛”的图形标志，是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那个可与西方文明对照的、扭合在一起的蛇身双人——创造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的女娲，只有和用阴阳八卦作为思想工具“格物致知”了人类与自然界的伏羲有机地合为一体，才有人类社会自觉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繁衍。蛇身双人的扭结表明在中国人传统思想中物质与精神的自然融合，既得益于多样性内在于群体文化规范而不必指人欲为“原罪”而出伊甸园；也不必非要构建某一个派别的绝对真理而人为地分裂成唯物与唯心这两个体系，制造出“二元对立结构”的对抗性矛盾。

此乃思想理论意义上的“国仁”之意。

行动纲领意义上的“国仁”，十多年前来源于英文的“Green Ground”。

我们搞乡村建设的人，是一批“不分左右翼、但分老中青”的海内外志愿者。[7]大家潜移默化地受到“三生万物”道家哲学思想影响，而或多或少地关注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坚持的“三农”问题——农业社会万年传承之内因，也在于“三位一体”：在于农民的生产与家庭生计合为一体，在于农村的多元化经济与自然界的多样性合为一体，在于农业的经济过程与动植物的自然过程合为一体。

据此，我们长期强调的“三农”的三位一体，在万年农业之乡土社会中，本来一直如是。告别蒙昧进入文明以来的数千年中，乡村建设在这个以农业为基础繁衍生息的大国，历来是不言而喻之立国之本。

据此，我们长期强调的三位一体的“三农”，本是人类社会转向生态文明必须依赖的“正外部性”最大的领域，也是国家综合安全的最后载体。

中国近代史上最不堪的麻烦，就在于激进者们罔顾“三农”的正外部性，把城市资本追求现代化所积累的巨大“负外部性”代价向乡土中国倾倒！于是，我虽然清楚“三农”本属于三位一体，也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和21世纪第一个10年特别强调“三农问题农民为首”，主要是因为那个时期的形势严重地不利于农民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弱势群体。实际上，也就是在做这种特别强调而遭遇各种利益集团排斥的困境中，我才渐行渐知地明白了前辈的牺牲精神。大凡关注底层民生的人，无论何种政治诉求、宗教情怀和文化旨趣，总难免因慈而悲、因悲而悯，在中国百年激进近现代史中，也就难免“悲剧意义”地、历史性地与晏阳初的悲天悯人[8]、梁漱溟的“妇人之仁”等，形成客观的承继关系。据此看，20世纪初期的“乡建派学者”也许应该被归为中国最早的女性主义。[9]我们作为继往开来的当代乡村建设参与者，有条件站在前辈肩上高屋建瓴、推陈出新，不仅要认清20世纪延续而来的中国“三农”困境，而且要了解21世纪被单极金融资本霸权强化了的全球化，及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巨大制度成本的制度体系。这个今人高于前人的全球视野，要求我们建立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世界观和宏大叙事的历史观，否则，难以引领当代乡村建设运动，遑论提升本土问题的分析能力。

从2001年中央主要领导人接受我们提出的“三农”问题这个难以纳入全球化的概念以来，即有一批志愿者着手复兴百年传承的“乡村建设”。部分年轻的乡建志愿者于2003年在距北京大约300公里之遥的河北翟城村开始了新时期乡建，一开始根本就没有外部资金投入和内部管理能

力。因为这种以民间力量为主的社会运动无权无钱，很大程度要靠热血青年们艰苦奋斗。那，年轻人激情四射地创了业，也激情四射地生了孩子，老辈们就得跟上支持和维护。十多年来，有一句低层次的话多次被我在低潮的时候重复：存在就是一切。只要我们在随处可见的排斥下仍然以另类的方式存活下去，就证明了方式的可持续。我们在最开始心里就觉着，应该给这个社会广泛参与的乡建运动将来可能形成的可持续生存系统，提出一个可以做国际交流的概念，一个符合21世纪生态文明需要的、大家可以共享的名号。于是就跟海外志愿者们商量，提出了这个英文概念“Green Ground”。若直译，就是“绿色大地”；若意译，则是“可持续基础”。如果把音译与意译结合起来考量，那就是“国仁”。有国有仁，方有国人国祚久长不衰。

从十多年来的乡建工作看，这三个意思都对路。

二、文丛之众

俗话说，三人为众。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如此看文丛，乃众人为师是也。何况，我们在推进乡村建设之初就强调“去精英化”的大众民主。[10]

前几年，一直希望整个团队愿意理解我试图“让当代乡建成为历史”的愿望。尤其希望大家能够结合对近代史中任何主流都激进推行现代化的反思，主动地接续前辈学者上一个世纪之交开始的乡村建设改良运动，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梳理经验教训。或可说，我“野心勃勃”地企图把我们在新的世纪之交启动的新乡建运动，纳入百年乡建和社会改良史的脉络。诚然，能够理解这番苦心的人确实不多。[11]

这几年，我也确实算是把自己有限的资源最大化地发挥出来，“处心积虑”地安排乡建志愿者中有理论建设能力的人在获取学位之后分布到设有乡建中心或乡建学院的不同高校，尽可能在多个学科体系中形成跨领域的思想共同体。目前，我们在海内外十几个高校设有机构或合作单位，有数十个乡村基层的试点单位，能够自主地、有组织有配合地开展理论研究和教学培训工作，立足本土乡村建设的“话语体系”构建，已经有了丰硕成果。[12]

总之，我们不仅有条件对新世纪已经坚持了15年的“当代新乡建”做个总结，而且有能力形成对20世纪前辈乡村建设运动的继承发扬。

我们团队迄今所建构的主要理论创新可以表述为以下五点。

一是人类文明差异派生论：气候周期性变化与随之而来的资源环境条件改变对人类文明差异及演化客观上起决定作用。据此，人类文明在各个大陆演化的客观进程，至少在殖民化滥觞全球之前应是多元化的，不是遵循在产业资本时代西方经典理论家提出的生产方式升级理论而展开的。这个理论有助于我们构建不同于主流的生态化历史观。

二是制度派生及其路径依赖理论：不同地理条件下的资源禀赋和要素条件，决定了近代全球化之前人类文明及制度的内生性与多元性，也决定了近代史上不同现代化的原始积累（东西方差异）途径，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和体系结构，并构成其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这也成为我们开展国别比较和区域比较研究的重要理论工具。

三是成本递次转嫁论：自近代以来，在全球化所形成的世界体系中，核心国家和居于主导地位的群体不断通过向外转嫁制度成本而获取收益，得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实现产业资本扩张和向金融资本跃升，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底层民众则因不断被迫承受成本转嫁而深陷“低水平陷阱”难以自拔。当代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因不同利益取向而相互竞争的金融资本为主导、递次向外转嫁成本以维持金融资本寄生性生存的体系。在人类无节制的贪欲面前，最终承担代价转嫁的是“谈判缺位”的资源和生态环境，致有人类社会的不可持续之虞。

四是发展中国家外部性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通过与宗主国谈判形成主权，这可以看作一个“交易”。任何类型的交易都有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因转交交易范围之外的经济和社会承载而为外部性问题，任何信息单方垄断都在占有收益的同时对交易另一方做成本转嫁，由此发展中国家谈判形成主权必有负外部性，导致难以摆脱“依附”地位。但，越是一次性博弈则风险爆发造成谈判双方双输的可能性越大，发达国家在巧取豪夺巨大收益的同时，其风险也在同步深化和加剧。

五是乡土社会应对外部性的内部化理论：中国作为原住民人口大国中唯一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其比较经验恰恰在于有着几千年“内部化处理负外部性”的村社基础，其中的村社理性和政府理性构成中国的两大比较制度优势。但政府同样是人类制造出来但反过来统治人类自身的成本高昂的产物。遂有政府与资本相结合激进推进现代化之后的经济、社会、

文化、资源、环境等负外向性问题，成为中国通往可持续的障碍，才有如此广泛的民众愿意参与进来，以期通过乡村建设使“三农”仍然作为中国危机“软着陆”的载体。

以上五点核心思想，主要体现于我们基于“本土化”和“国际化”两翼而展开的以下五个领域的研究工作中。

一是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在资本主义三阶段——原始积累阶段、产业资本扩张阶段和金融资本阶段，核心国家/发达国家总是不断以新的方式向外转嫁制度成本，乃是全球化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给资源环境可持续带来的最大挑战。这个思想，在我们的主要课题研究中，作为全球宏观背景，都有所体现，也发表在我们关于全球资本化与制度致贫等一系列文章中。

二是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团队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构建了“南方国家知识分享网络”，开展了“新兴七国比较研究”和“南方陷阱”等发展中国家的深入研究。目前正在进行比较研究的新兴七国包括中国、土耳其、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委内瑞拉、南非。已经发表了有关文章和演讲，两部专著也在起草和修改之中。

三是国内区域比较研究。中国是个超大型国家，各区域的地理条件和人文环境差异极大，对各区域的发展经验进行研究、总结和归纳，是形成整体性的“中国经验”并建立“中国话语”的基础。团队已经完成了苏南、岭南、重庆、杭州、广西左右江、苏州工业园区等不同地区的发展经验的分析。已经发表了多篇文章，形成的专著也获得多项国家级、省部级出版奖和科研奖。

四是国家安全研究。国家综合安全是当前面临“以国家为基本竞争单位的全球化”的最大挑战。基于国际比较和历史比较，团队研究表明了新中国通过土地革命建立政权与其利用“三农”内部化应对经济危机之间的相关关系——从历史经验看，新中国在其追求“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道路上，已经发生了九次经济危机，凡是能动员广大农村分担危机成本的，就能实现危机“软着陆”，否则就只能在城市“硬着陆”。团队正在开展的研究是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为依托，探讨如何从结构和机制上改善乡村治理以维护国家综合安全。

五是“三农”与“三治”研究。我们自提出“三农”问题并被中央领导人

接受之后，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来研究乡村“三治”问题（指县治/乡治/村治）。自20世纪80年代农村去组织化改革以来，作为经济基础的“三农”日益衰败，而作为上层建筑的“三治”成本不断上升，二者之间的错配乃至哲学意义上的冲突日益深化！其结果，不仅是农村爆发对抗性冲突，陷入严重的不可持续困境，还在生态环境、食品、文化等方面成为国家综合“不安全”的重要“贡献者”。比形成对问题的完整逻辑解释更难的，是我们如何打破这个“囚徒困境”。也因此，任何层面上的实践探索都难能可贵，即使最终被打上“失败”的标签，也不意味着这个堂吉诃德式的努力过程并不重要，更不意味着这个过程作为一种社会试验没有记录和研究价值。

综上，“大乡建”体系之中从事研究的团队成员众多，且来去自由，但混沌中自然有序，我认为团队在这五个领域的思想创新，在五个方面所做的去西方中心主义、去意识形态的理论探索，已经形成了“研究上顶天立地，交流上中西贯通”的蔚然大观。仅“国仁文丛”的写作者就有数十人，参与调研和在地实践者更无以计数，收入的文字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创新性，且不拘一格。如果从我20世纪80年代就职于中央农研室做“农村改革试验区”的政策调研和国内外合作的理论研究算起，我们脚踏实地开展理论联系实际的科研实践活动已经数十年了。其间，团队获得了十多项国家级“纵向课题”和数十项“横向课题”，获得了十几项省部级以上国内奖及一项海外奖。在高校这个尚可用为“公器”的平台上，我们团队通过这些体现中国人民大学“实事求是”校训的研究和高校间的联合课题调研，已经带出来数百名学生，锻炼了一批能够深入基层调研，并且有过硬发表成果能力的人才，也推进了分散在各地城乡的试验区的工作水平。

由此看，当代大乡建由各自独立小单位组成，虽然看上去是各自为政的“四无”体系——“无总部、无领导、无纪律、无固定资金来源”，却能“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做出了一般海外背景或企业出资的非政府组织“做不到、做不好、做起来也不长久”的事业。诚然，这谈不上是赞誉我们团队的治理结构，因为各单位难免时不时发生各种内部乱象。但，乡建参与者无论转型为NGO（非政府组织）还是NPO（非营利组织），都仍愿意留在大乡建之中，否则再怎么干得风生水起也难有靠自己的思想水平形成“带队伍”的能力！若然，则乡建改良事业得以百年传承的核心竞争力，恰在于“有思想创新，才能有人才培养，才有群体的骨干来带动事业”。君不见：20世纪乡村建设大师辈出、试验点竟以千

数，21世纪新乡建则学者咸从、各界群众参与者更有数十万！

这就是大众广泛参与其中的另一种（alternative）社会历史……由此看到：发展中国家为主的“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打出的口号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而在中国，我们不习惯提口号，而是用乡建人的负重前行，在大地上写下“另一个世界就在这里”（another world is here）。

人们说，20年就是一代人。从2001年算起，我们发扬“启迪民智，开发民力”的前辈精神，在新世纪海内外资本纵情饕餮大快朵颐中勉力传承的“大乡建”，作为大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改良事业已经延续15年了！再坚持5年，就是一代人用热血书写的历史了。

作为长期志愿者，大家都辛苦，但也乐在其中！吾辈不求回报，但求国仁永续。唯愿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投身其中的乡建事业，在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中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以此为序，上慰先贤；立此存照，正本清源。

温铁军

丙申年甲午月

公元二〇一六年六月

序言　E7研究与南南论坛：探求南方的出路

刘健芝

一、缘起

1999年，我在香港岭南大学教书，并担任亚洲学者交流中心（Asian Regional Exchange for New Alternatives, ARENA）主席，因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引发的世界变局，举办了一系列国际研讨会，探讨金融资本、经济危机、民众生计等。当时，我和岭南大学的同事，与时任《读书》编辑的汪晖、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等学者一起策划和翻译《另类视野：文化/社会研究译丛》，经由他们推荐，邀请时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处长温铁军参会，谈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三农”的影响。从此展开了一系列的合作。

2000年开始，我参与了温铁军发起的新世纪乡村建设运动，最早在北京小汤山及草场地举办乡村建设培训班，接着在河北翟城村乡建，后来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成立，举办农民生态农业与合作社培训班，协助大学生支农、学农，助推打工之家歌颂劳动文艺价值，后来，小毛驴市民农园动员市民下乡，培育返乡青年，推动城乡融合，全国爱故乡运动掀起了新乡土文化潮流等。与此同时，我们组织调研团队，到世界各地，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做田野调查，与当地专家学者交流访谈。自2001年开始，我们带领乡建骨干参加多届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与全球学术机构、民间组织、社会建设力量探讨世界局势与另类实践。我们也邀请国际专家学者与基层社区建设骨干到中国实地调研，加深了解中国乡土社会现状与发展。

2011年春节，我与温铁军构思，团结发展中国家知识分子，在理论思考与实践经验层面深度合作，彰显南方国家人民的视角与立场。目标确立后，分头众筹，资金部分来自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岭南大学群芳文化研究及发展部、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等，部分来自我们自己和朋友的个人捐赠。当时构思两个项目：一个是新兴七国

（中国、土耳其、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委内瑞拉、南非）的国际比较研究（以下简称E7研究）；另一个是举办南南论坛。2011年12月，七国的国别研究报告完成，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了报告会。

2015年，我们在突尼斯世界社会论坛，正式宣布成立全球大学，200多位创始成员来自世界各地，主要为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的进步知识分子与社会活动家，立足本土，放眼国际，推动南南合作。对“新兴七国”的关注，同时也是对亚非拉国家发展道路的审视。2020年，E7研究课题因应时局变化多番修改，最终完成书稿，南南论坛亦于同年7月举办了第七届。

即便2011年呈交了报告，但接下来的9年，研究团队依然参照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论（World-System Theory）与反体系运动（Anti-Systemic Movement），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去依附”（De-linking）理论等，通过中外实地调查研究，持续观察、分析、比较新兴七国的发展，深入探讨全球南方遭遇西方危机打压的经验教训，并总结追求现代化的所谓“后发”国家的两难。

E7写作背景，正值代表民意的政党上台执政，拉丁美洲有左翼“粉红浪潮”，非洲数国也一样努力把土地矿产资源收归国有，尝试缩小社会财富的悬殊，改善百姓民生，也即阿明一直强调的南方本国人民掌握国家自然资源主权。阿明给出“新兴国家”的定义：

“一国唯有其目标是向内建构一个国内市场（而非目光朝外），并确立国家经济主权，才称得上是兴起中国家。要实现这个庞大复杂的目标，需要确立涉及经济生活所有面向的主权，尤其是需要保护粮食安全及主权的政策，以及本国自然资源主权，乃至有获取领土外的自然资源的能力。”[13]

我们研究的资源国巴西、委内瑞拉和南非，外贸出口依赖原材料输出，并从国际市场获得溢价，让政府有财政收入，实行各种社会福利政策。可惜，一时繁荣局面难以长久维持。一方面，原来侵占资源的核心国及跨国企业不甘罢手，阴谋、阳谋兼用，大举反扑，在巴西搞议会政变，扶持右翼上台；全面制裁委内瑞拉，策动傀儡夺权；在南非压制土改政策与践踏《劳工法》；另一方面，左翼执政者被溢价所诱惑，没有完成20世纪左翼政党未竟的土地革命，乃至发展本土民族工业的使命，因此，殖民时代遗留的单一经济制度依然没被动摇。

印度及印度尼西亚乃亚洲人口大国，农民占多数，在政治上取得独立后，大力发展工业化，至今正规经济与非正规经济并驾，产业经济难以形成积累。而且，其在全球产业链扮演代工角色，以出口工业为导向，服务海外市场，承接了核心国转移的产业资本所带来的两大问题：环境破坏与劳资冲突。民众面对困境，被迫起来斗争。1995—2015年，印度有31万农民自杀，而从2020年11月26日开始，30万农民组织起来，开着农用车与拖拉机挺进首都新德里，抗议政府通过三项庇护大企业的《农业法》。巴西亚马逊森林被跨国企业砍伐后用来养牛与种大豆，当地原住民组成联盟进行收复失地的抗争；印度尼西亚森林一样被跨国企业大幅砍伐后种棕榈树，2020年10月，印度尼西亚劳工上街游行，抗议政府漠视民意，草率且强行通过维护资本压榨劳动者权益的法律。

土耳其和中国经历了现代化建设时期，现在处于产业资本阶段，当下越发走向新自由主义金融化。土耳其纵容里外吃租经济野蛮生长，既让房地产霸占公共空间牟利，也让跨国金融资本击垮本币，使其汇价一路狂泻，致外资有机可乘，抄底本国资源。在中国滋生的靠吃租寄生的利益集团，也协助营造泡沫经济，埋下金融炸弹，甩给国家和民众的风险越来越大。2015—2016年的股灾，乃深刻教训，全民辛苦劳作积攒的外汇储备，顷刻损失了1/4。两年来中美贸易争端，乃至“新冷战”，无不说明西方金融集体帝国主义嗅到哪里有暴利，就集结高歌涌进，终极目标是洗劫人民财富。

回顾E7十年发展，因承受发达国家转嫁危机而跌宕起伏，但在重重困境下，E7的底层民众并不缴械投降，也未屈从1%的跨国金融资本所缔造的世界而放弃尊严。我们看到民众自发组织，重建社区，从下而上推动确立人民对土地、工业、金融的主权，分享土地、工业、金融的三重收益。

二、南南共识

E7研究与南南论坛，一是研究报告，一是论坛平台，两者相辅相成，建构南南精神，推动南南共识。

从第一届南南论坛开始，开宗明义，阐释南南精神，以可持续实践与多样化的生态文明为理念，立足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与现实，促进世界另类实践广泛开展对话与交流，形成南南多元化合作方式，寻求全球化

挑战下包容性可持续实践的新途径。

南方国家在摆脱殖民主义束缚和争取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方面，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我们需要收集、诠释与比较这些多样化的国别经验，不是为了证明以西方现代化为目标的发展主义理论体系的普遍意义，而是找出主流话语不能解释的、大量出现的困境与灾难；并且在开展南南国家合作的对话、交流中，努力探寻化解危机的途径，共同建设合理正义的新世界。

全球危机频频发生，生态灾难接踵而至，社会经济停滞不前，越来越多的人被推至悬崖边缘。上至国际机构出现巨大变动，下至普通民众缺乏赖以生存的洁净空气、水源与土地。当今全球危机环环相扣，盘根错节，威胁着人类可持续生存与地球可持续生态。有鉴于此，南方国家的思想家与行动者，尤其需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摸索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解决良方，推动地域乃至全球范围的互相协作。首要下功夫的，是透过重读历史的真实经验，孕育创新力、构建新话语与新行动，突出行之有效的集体智慧。

南南论坛作为南南合作交流的平台，致力于推动生态与社会经济正义，发扬民间智慧。首先，记录平民社会形成民生基础的努力，重视能够维护公共财富、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风险的互助社区，特别注重发掘与理解南方国家的本土经验，形成互相依存的关系网络。再者，促进寻求另类实践的不同组织与网络的互相交流，跨越国界，形成新世纪的历史主体，促进文化与社会变革，构建可持续世界。

第一届南南论坛的中外参会者宣告，共同推动《南南共识》（*South-South Consensus*）（2011），成为以后各届南南论坛的指导纲要：

“我们，首届南南论坛的各国代表，用简洁的话语，表达我们对于全球生态危机影响人类安全的深刻关注。首先，我们要申明南方国家关于生态文明‘3个S’的基本主张：只有维护资源环境主权（Sovereignty）、加强南方国家的社会团结（Solidarity），才能促使世界回归以最基本的‘可持续人类安全（Security）’为前提的生态文明。”

其次，我们要确立南方国家构建不同于金融资本全球化的话语权和制度文化的基本要求，批判不利于加强“3个S”的政治主张并揭露其背后

的跨国资本利益集团。

再次，南方国家应该与北方国家中认同生态文明的社会群体结成广泛的联盟，共同反对威胁生态文明与人类安全的恶劣制度。

我们支持代表99%的民众“占领华尔街运动”及欧洲各国爆发的反对金融资本全球化的群众斗争！自觉与包括北方在内的、代表99%的最广大民众站在一起。

我们呼吁：南方国家联合起来，以“3个S”为基本原则，构建不同于金融资本帝国主义的“另一个世界”——人类与生态和谐共存的、更多包容性的、以多样化为内涵的生态文明。

表1 E7会议时间表

日期	研讨会	地点	会场
2011年7月8日	全球化的成本与危机转嫁——发展中“新兴七国”客观经验比较研究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2011年7月9日至11日	可持续发展比较研究国际研讨会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2011年7月12日至15日	实地调研：山西平遥古城、永济农民协会、霍家沟村等		
2011年12月10日	新兴七国比较研究项目报告会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表2 七届南南论坛时间表

日期	论坛主题	地点	会场
2011年12月12日至4日	第一届可持续实践南南论坛 * 会前中国三线实地考察（12月5日至11日） • 华北：河南—河北 • 华东：上海—浙江 • 西南：重庆—成都一团 * 会后中国西南实地考察（12月16日至21日） • 西南：重庆—成都二团	香港	岭南大学
2012年12月8日至10日	第二届可持续实践与乡村建设国际研讨会暨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成立 * 会前中国实地考察（11月29日至12月7日） • 西安—襄樊—宜昌—重庆三峡	重庆	西南大学
2016年7月23日至29日	第三届南南论坛： 亚非拉的区域整合、“三农”问题与生态正义	香港	岭南大学
2017年7月4日至6日	第四届南南论坛： 21世纪亚洲民众运动：挑战与突围	香港	岭南大学
2018年6月13日至18日	第五届南南论坛： 大同之道：理论与实践	香港	岭南大学
2019年6月24日至7月3日	第六届南南论坛： 生态生计与社区建设	香港	岭南大学
2020年7月8日至17日	第七届南南论坛： 气候变迁、全球危机与社区重建	香港	岭南大学 （线上/线下）

自2011年12月主办第一届南南论坛起，我们已经成功举办了七届论坛，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社会实践者等近千人汇聚一堂，就

人类文明、另类实践、生计民生、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等议题进行深入的对话交流。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第七届南南论坛采取线上线下并行方式，共设置了30个场次，50个国家150位讲者、850位参会者进行深入的思想理论交流。过往七届南南论坛的视频录像，可在岭南大学和全球大学网站上观看：

https：//our-global-u.org/oguorg/en/the-first-south-south-forum-on-sustainability/

https：//our-global-u.org/oguorg/en/the-second-south-south-forum-on-sustainability/

https：//our-global-u.org/oguorg/en/the-third-south-south-forum-on-sustainability-july-2016/

https：//our-global-u.org/oguorg/en/the-fourth-south-south-forum-on-sustainability-4-6-july-2017-2/

https：//our-global-u.org/oguorg/en/the-fifth-south-south-forum-on-sustainability-june-2018/

https：//our-global-u.org/oguorg/en/sixth-south-south-forum-on-sustainability-ssfs6/

https：//our-global-u.org/oguorg/en/seventh-south-south-forum-on-sustainability-ssfs7/

本书乃研究团队长期调研与讨论的成果，团队分工如下：

温铁军、刘健芝立论与审定；黄钰书、薛翠执笔起草；董筱丹、逯浩、何志雄修改文字；谷莘、欧阳丽嫦处理行政事务；陈燕文、黄小媚、许统一、高俊、计晗、严晓辉、靳培云、温博、刘健青、张怡松、潘婷婷、李翘志等参与观点讨论、资料收集及案例整理等工作。

衷心感谢中外各国的学者、专家，为寻求南方的出路而尽力。

E7国别研究团队成员：

中国：温铁军（组长，中国人民大学）、周立、陈传波、董筱丹

（中国人民大学）、黄钰书（岭南大学）

土耳其：加里普·亚尔曼（组长，中东科技大学）、阿伊林·托帕尔·伊玛兹（中东科技大学）、赛尔敏·萨里卡（伊斯坦布尔大学）

印度：文诺·瑞纳（组长，全印度人民科学网）、阿米特·巴索莱（发展研究中心），T.甘加达兰（全印度人民科学网）、艾林丹·班納吉（安贝德卡尔大学）

印度尼西亚：梅林·奥伊·加迪纳（印度尼西亚大学）、尤利安·朱奈迪（斯里维查亚大学）、印拉·卢比斯（农民之路）、薛翠（西南大学）

巴西：保罗·中谷（组长，圣埃斯皮里图联邦大学）、罗热里奥·纳克·法莱罗斯（圣埃斯皮里图联邦大学）、内德·塞萨尔·瓦尔加斯（圣埃斯皮里图联邦大学）、保娜·纳布科（圣埃斯皮里图联邦大学）

委内瑞拉：何塞·菲利克斯·里瓦斯（组长，委内瑞拉前中央银行行长）、埃内斯托·雷韦罗（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

南非：帕特里克·邦德（组长，南非西开普大学）、卡蒂嘉·谢尔菲（民间社会研究中心）、萨曼莎·哈格里夫斯（民间社会研究中心）

概述

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竞争的参与者不是个体，而是国家。

不同国家在参与全球化竞争中客观地分处三类地位——核心、半边缘（半核心）、边缘，从而形成了“核心—半边缘—边缘”的依附结构，通过不平等交换和制度剥削，半边缘和边缘区域的利益不均等地向核心国家输送，在这一过程中，核心国家地位不断强化，边缘国家地位不断弱化。[14]

在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全球化竞争中，分处不同地位的三类国家盈亏不同：第一类是占据金融资本阶段主导地位的核心国，其之所以能够赢家“通吃”，乃在于占有收益却不支付成本；第二类是从属于核心国的制度体系、能够以战略伙伴名义“搭便车”的半核心国，在与核心国的战略利益基本一致的时候，其得以分享核心国的收益；第三类是以资源经济和实体经济为主的边缘国家，由于承载了转移过来的制度成本，其经常处于被“洗劫”状态，但不自知。于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纳入这种全球化进程中，因盲从核心国“软实力”而导致内乱，有些成为所谓的“失败国家”。

本书简介了新兴七国（以中国、印度、巴西、南非4个长期研究对象为主，外加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委内瑞拉3个短期研究对象，简称E7）的经验教训，将上述国家既往的经验教训进行理论归纳，将其表述为从核心向边缘的“双重成本转嫁”过程。

把握这个规律，就会理解核心国金融霸权趋向于法西斯化是当代人类社会最大的威胁：金融资本虚拟化扩张的核心国越是过度负债，越要借助“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推动成本对外转嫁；为此不惜制造冲突，甚至发动战争。[15]

在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新阶段，核心国家因客观上占据着“经常账户逆差＋资本账户顺差＝资本输出获利”[16]的全球食物链最顶端，而得以在增发货币的同时增发债务，并且势必以增发的货币购买增发的债务。也因此，才成为双向度地推进虚拟资本过度扩张的最大金融经济体。与

此同时，那些违背基本的市场价值观的所谓“负信用”“负利率”等概念由此也成为金融霸权国家主流社会的当代流行语……

占有此类巨额收益的金融资本核心国，势必为了维持这种获取制度利益的地位而积极调整其币缘-地缘战略，推行全球体系制度重构，以便更顺利地向半边缘及边缘国家进行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双重成本转嫁，更大程度攫取全球经济成果。否则，核心国就无法维持过度泡沫化的虚拟资本主导的经济基础，以及其建之于过度负债基础之上的政治体制。

这是人类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宿命。对于核心国而言，这属于“生存还是死亡”的“哈姆雷特之问”。但对于边缘国家而言，则无疑只有衰败和死亡。

经济成本转嫁是指，通过国际货币及金融制度权，核心国家破除发展中的主权国家对金融资本流动的限制，把金融全球化的风险成本主要转移给非核心国家来承担，以此最大化自身的收益。由此，势必导致金融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爆发而使全球经济进入下行周期，加上资本主义的结构性财富收入分配不平等，中下层群众日益不满，族群、宗教、区域冲突加剧，使社会动荡。全球不论何种体制下的何种政府，几乎都无可避免地面对经济、社会及政治的多重不稳定。而这些非核心国家的不稳定又恰好给了核心国难得的低成本介入机会——凭借意识形态化的教育文化、科研学术、法律服务、标准设立等多种软实力，以及伺机策动政治、宗教、民族、地缘等冲突的巧实力，来诱使边缘国家群众接受核心国的政治和文化，把斗争矛头转向本国制度，从而又增加了核心国家介入操控的条件……

诚然，核心国家高昂的政治及社会制度成本，使它更需要大量攫取全球的经济收益来维持本身的体系稳定性。但是，“二战”之后被核心国控制所形成的国际秩序及其为维护此国际秩序而建立的组织，不可能有应对单极霸权国家按照本国利益一意孤行的合法手段，也根本没有条件形成全球治理的有效经验。由此，核心国可以同时进行“政治的成本转嫁”，主要内容是利用币缘-地缘军事战略部署，加上各种巧实力、软实力的操作，颠覆被核心国视为妨碍自身战略利益的国家政权，或者使其“去国家化”。

此类“政治成本转嫁”的制度收益分外显著——竞争对手及非核心国家的政治及经济不稳定，一方面有利于核心国资本趁危机之际收购有价

资产，另一方面更有利于吸引国际资本回流本国。而对非核心国家的去国家化之所以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即在于以“自由民主”的名义，实质性地解除竞争国家调控经济及管制资本破坏性流动的能力；或在其国家资本还未具备竞争力时，打压其相对具有竞争力的国家资本，扼杀其长远国际竞争力。

据此，全球竞争之中广大民众遭遇的最惨痛教训，就是所谓的国家失败。而失败国家最尴尬的悲剧，就是其精英群体盲目“自毁”地推崇敌人，不仅自取其辱，也使芸芸众生苦不堪言……

发展中国家思想理论界越多接受核心国的“先进”制度文化及其意识形态化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就越失去自主的“话语”能力。这也是美国政治家强烈反对美国高校的科学技术专业接受中国留学生，只允许他们进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习美国制度和文化的原因。

由此可见，以往立足于“个体理性”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既不适用于当代发展中国家解释本国参与全球化竞争中的利弊得失，也不适用于理解西化精英操控造成“国家失败”的教训，更无助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形成重新构建制度权和话语权的竞争力。

本书主要研究分析核心国家美国近年的战略性调整，以及其对新兴国家的影响。

研究团队选取了七个具有代表性的新兴国家，在研究国别报告时归类为三组：

第一组是曾经有过“去依附”努力、相对来说自主性较强的，处于现代化建设时期的产业资本阶段、越发走向金融全球化的中国和土耳其；

第二组是存在于农村地区的、数量庞大且分布广泛的、组织化程度低的微观经济主体（非正规部门），且与高组织化程度的城市“正规经济”并驾为二元结构，致使产业经济难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形成规模竞争力的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第三组是始终受制于殖民地时代“经济单一化”的历史因素，经济未能完成工业化、过分依赖原材料输出，面临国际经济下行周期严重冲击的后殖民化国家巴西、委内瑞拉和南非。

通过分析当前这七国各自的困难，可以粗略地反映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困境。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全球危机的积极应对之中，演化成为工业制成品总量最大的工业化国家。随之，即主动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新时代做战略转型；并且，据此推出“区域整合”“乡村振兴”“扶贫攻坚”等一系列主要由国有企业操作的国家投资战略。诚然，中国若能切实贯彻体现人类自觉的生态化转型，则有可能走出一般发展中国家被动“依附”的困境。但中国这种靠“举国体制”才能奏效的转型努力，却被核心国当作试图挑战其全球霸权控制而遭遇到越来越复杂的国际国内制约，甚至不可避免地招致核心国家发起以“新冷战”为内涵的全面“围堵”……

人们在经验教训的总结中逐渐意识到，任何发展中国家要挣脱对核心国的依附，走出被动接受成本转嫁的发展陷阱，都必须加强多边关系及区域合作的共生协调；与此同时，力争形成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构建权与维护自身利益的话语权，共同努力建设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包容、平等、互利发展的国际制度。

绪论

一、“成本转嫁论”

21世纪以来的20年里，新兴国家经历了像“过山车”一样的大起大落！

对此种现象，形成于300年前的资本主义的陈旧知识体系及被其勾兑的舆论体系均无力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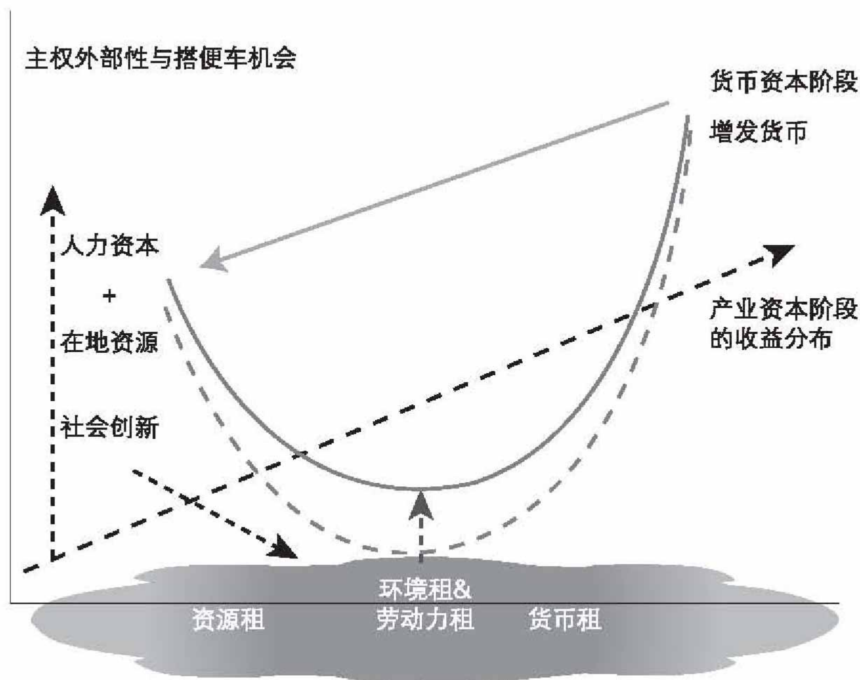
我们不妨先看看21世纪的主要事件演化。

先是因2001年美国爆发“双重危机”——以“IT泡沫崩溃”为代表的新经济危机和以“911事件”为标志的政治危机——加强了这个核心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双重流出，遂使有条件容纳“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国家出现经济一度勃兴的局面，也就有了被西方跨国公司粗略归纳出来的概念——“新兴经济体”。

但好景不长，这些新兴经济体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以来，又随2008年核心国家爆发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下滑而相继再度陷入停滞，甚至落入发展陷阱。

究其原因，发现其经验过程基本符合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17]给定的规律：核心国家的所谓的“比较制度优势”的实质内涵，就是核心国家顺畅地实现了在全球体系中向半边缘及边缘国家进行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成本转嫁。

为此，我们尝试着把“微笑曲线”（图1）作为分析全球化成本转嫁的模型图，提出了“国家竞争的微笑曲线”，也可称为“国际分工产业链微笑曲线”[18]；用不同于西方理论的自主创新知识体系，来说明核心国金融资本主导竞争的全球化体系内制造产业国和资源出口国分别占据国际产业分工链上的不同位置，以及其承载核心国金融资本对外做双重成本转嫁的实际流程。[19]



注：全球化危机在中国的软着陆，依赖于生态化整合，意味着资源环境和劳动力等“租金”在地化形成社会资本。

图1　金融资本阶段国家竞争的微笑曲线

图1表明全球化竞争中三种不同类型的国家收益。

一是右侧占据金融资本高端的核心国家，凭借虚拟资本扩张获取制度收益。

二是左侧占有资源主权的国家，得以借助资源价格短期抬升而获得“搭便车”收益；但资源被外部跨国公司掌控的国家，则只能承载主权“负外部性”的代价（资源市场的溢价收益被外部占有）。

三是处于底端的制造业实体经济国家承载了最大化的制度成本。由此，只能靠社会创新提升劳动力租、靠掌握资源主权获取环境租，同时把控国家货币主权获取货币租。这些租资源在图中之所以用暗色表示，在于这些潜在能力必须靠积极的制度安排才可以提升制造业国家在微笑曲线中的位势。

不过，在核心国家软实力的影响下，这些国家的学术研究者及媒体

从业者往往缺乏独立的认知，经常将问题简单地归咎于自身国家的制度落后，比不上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遂有“裴多菲悖论（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的当代验证——种种以自由之名推动的配合核心国的地缘政治战略而开展的“颜色”革命、“花卉”运动，致使不少国家甚至出现长期政治混乱，无法建立稳定的社会治理环境，甚至发生血腥内战及国家瓦解，爆发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

（一）全球危机与核心国家的双重成本转嫁

21世纪以来，全球危机不断在核心国家内部爆发，被萨米尔·阿明称为“内爆”[20]。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其金融化之经济成本对发展中国家转嫁的具体做法：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演化为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核心国相继陷入金融或债务危机，美国、日本，以及欧盟等先后启动多轮量化宽松政策（QE），大量制造过剩流动性，一方面推高全球能源、原材料和粮食价格，“成功”地在贫困国家制造了通货膨胀诱发的“颜色革命”，同步向实体经济国家转嫁了经济危机的代价；另一方面，也确实在不断向外输出通货膨胀的同时，有效地实现了自身的低利率和低通胀。

当前，核心国家的政府和私人负债总量，已经超过全球GDP总量的两倍，西方国家金融机构的虚拟资本坏账，到2016年7月已经高达550万亿美元。西方分析家认为，德银、JP摩根、花旗、高盛等金融机构可能引发金融“核爆炸”。[21]这些西方投资公司的表述，从侧面印证了阿明提出的“内爆”论。

更为严重的是债务国与债权国地位的颠倒！

20世纪核心国家对外输出产业资本，成为债权国的时候，都会要求接受西方产业转移的债务国做符合西方要求的“制度转轨”；但当核心国家成为最大债务国之后，即把危机期间大规模增加对外负债的做法“常态化”，却绝对不会按照债权国的要求进行改制，甚至会反过来凭借其占据全球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地位把债务演变为资产交易，借此扩张资本市场而不再承担还债义务。

这两个21世纪的逆“普世规律”的矛盾现象，警示着所有在西方软实力控制下痴迷于“看不见的手”的发展中国家利益群体：唯独占据国际制度权及金融-货币权优势高地的霸权国家，才能够创造人类经济史上前所

未有的“奇迹”！

核心国家债务越高越扩张信用的做法，与其在20世纪后期强迫发展中国家作为债务国，必须服从债权国要求实行的放弃经济主权的“深化体制改革”、而且必须低价出售资源性资产来连本带息地用美元还债的做法完全相反。由此表明，“二战”以后被标榜的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经被金融资本阶段的所谓“新自由主义”彻底颠覆！

核心国家之所以要利用金融全球化来大规模扩张债务，就在于其在“后冷战”时期形成的单极霸权，要依赖“三种借债”才能勉强维持：一是借债消费（借边缘国家的钱维持核心国的无度消费），二是借债投资（借边缘国家的钱来占有边缘国的资源和并购边缘国的产业），三是借债打仗（借边缘国家的钱增加核心国家的军备，挑起区域冲突）。

诚然，个别事先就收回了资源主权、得以借助资源价格上涨的“新兴国家”，一度得到“搭便车”的短期收益，也一度改善了本国福利；其他超大型实体经济国家也各自以其方式应对全球危机的冲击，暂时稳住了步伐。但这些新兴国家须臾不可忘记的是：国际制度权还是主要掌握在核心国手上。核心国家为了应对金融资本主义本质性矛盾所造成的全球危机，采取了与足球场上的“上帝之手”[22]等做法类似的多种措施。

这些手段并非针对解决金融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而是继续利用国际制度的不对称性，延续其优势，一方面从全球系统的半边缘及边缘地区更大规模地榨取庞大利润，另一方面则把维持制度的成本转嫁给非核心国。

尽管人们对其经济成本转嫁已经或多或少地有所认识，在其政治成本转嫁方面，依然有太多的含糊不清。

需要强调的是：当代全球化是以国家作为竞争单位的。据此可知，政治成本转嫁主要表现为核心国家在边缘及半边缘地区以软实力和巧实力支持种种颜色革命为名义的战略性“去国家化”运动。其结果往往是，核心国家得以以低成本维护其币缘-地缘战略利益，而在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控制下的被边缘化的国家参与全球化竞争，则纷纷遭遇“国家失败”，这些被边缘化的国家中只有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根据其对核心国家的贡献度分享了有限的利益，广大民众却承受着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甚至大量无辜平民付出了人身伤亡的巨大代价……

中国资深学者王小强曾经深刻地指出，发展中国家摆脱不了现代化三部曲的宿命：首先，改革开放带来物质生产高速增长，其后，因金融自由化带来货币经济繁荣昌盛，最后，承担外资抛空带来的金融危机。其实，外资抛空不只导致金融危机，更威胁国家政权和执政党的权威及执政地位。“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就是金融危机，顶多恶化成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不仅仅是经济危机，而且经常递进成社会动乱、政权颠覆、国家分裂。”[23]

当然，我们也要重视核心国家内部日益严重的阶级矛盾。

欧美乃至日韩等富裕社会内部财富分配日益两极化。西方社会科学曾经因为中产阶级的一度壮大，而质疑经典政治经济学中“阶级”（Class）的概念。但到现在，核心、半核心国家富裕社会却普遍出现了“去中产化”的情况，人口占少数的最富裕阶层不成比例地占有了本国大部分财富。我们称之为金融资本主义的制度不对称性（Institutional Asymmetry）。[24]

诚然，核心国的阶级矛盾虽然深化，却不一定以阶级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

一方面，国际制度的不对称性使核心国家从非核心国榨取巨额收益，这些收益回流核心国社会，无论其分配是多么不平均，中低层民众还是能分享一小部分。因此，大部分国民作为全球体系收益的分享者，还是支持参与国际竞争的金融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机器（包括媒体、文化产业、学术界）极力掩盖阶级矛盾的结构性根源，纾缓阶级对立情绪，以致中下层民众对生活的不满情绪往往以种种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25]的方式爆发出来，例如宗教或族群冲突、仇外等。右翼取向的民粹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在欧美日社会普遍有复兴之势，以致非建设性的激进政治在各地冒起……

凡此种种，金融资本主义制度是其深层根源。

新兴国家和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处境不一样。虽然这些国家也有身份政治，但同样面对源于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带来的失序时，社会矛盾往往直接表现为针对政府。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不能像核心国家那样一面赚取全球性制度收益，一面把危机向外转嫁。因此，它们在国际竞争中享受的收益和承担的风险高度不对称，直接表现为内部社会矛盾。

延伸阅读1

核心朝边缘成本转嫁表征：非洲近年的社会冲突[26]

近年非洲的群体事件急升，自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后趋势更明显，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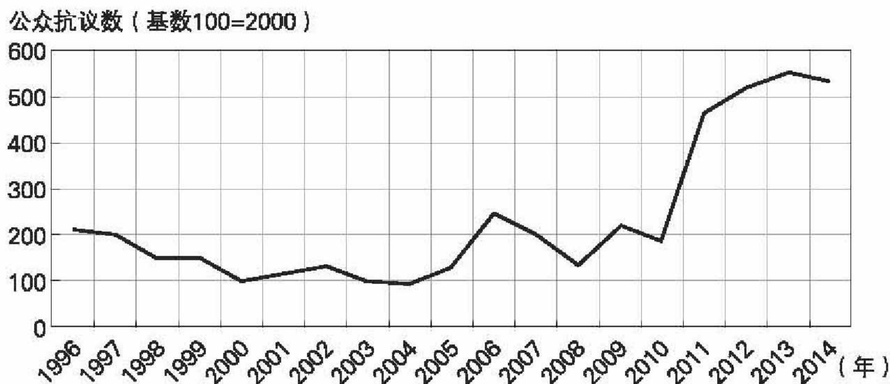


图2　非洲近年的群体事件

图3表明，群体事件的主要原因还是以经济性质为主，例如要求加薪、失业、工作条件、追讨工资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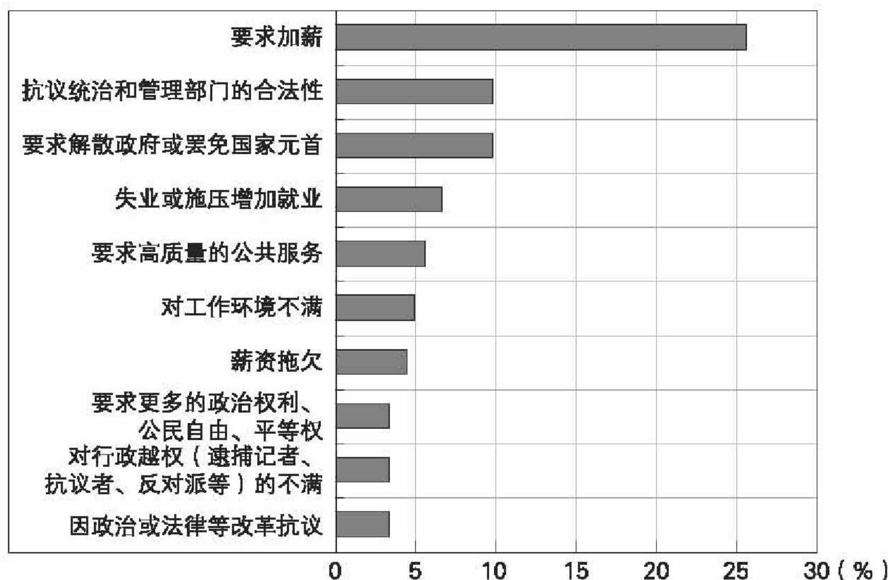


图3　2013年排名前十位的抗议动机

在核心国家意识形态软实力的影响下，边缘国家承担知识再生产责

任的思想理论界及舆论领域中的信息生产者一般都缺乏认知深度，把问题简单归咎于本国的制度落后，遂有种种以自由之名推动的“颜色革命”“花卉运动”，把经济及社会矛盾转化为政治矛盾。

延伸阅读2

政治成本转嫁——美国低成本退出中东，祸延欧洲

2001年后，美国推行全球反恐战，直接出兵中东及中亚。近年美国国内推动了页岩气革命及建设北美天然气管道，基本实现本国能源供应独立（参阅附录《专题1　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的阶段性战略调整》），中东地区对美国的地缘政治重要性下降，加上美国21世纪的地缘战略重心移往东亚，促使美国战略性撤出中东。但美国多年的单边主义令中东区域内分崩离析，当地极端恐怖主义横行，政局动荡，宗教派系对立，社会一片混乱。如果美国承担维持中东秩序的责任，则必然要负担庞大的军事及政治成本。然而，美国这次撤出中东，采取的不仅是低成本撤离，而且是焦土政策，包括策动圣战武装部队及伊斯兰国推翻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及引爆叙利亚内战[27]。这不仅不用承担撤出的政治成本，反过来还祸及欧洲，防止中东成为欧洲的势力范围，尤其是避免欧洲整合俄罗斯及中东，建立石油欧元（Petro　Euro），使中东、北非及中亚成为泛地中海欧元区。与此同时，增加依赖中东能源的中国之成本，一石二鸟，同时打压欧元及人民币，维护美元的全球霸权（参阅附录《专题4货币霸权战略冲突下欧元的困局》《专题5美欧中战略关系分析（2015）》《专题8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两个取向与两难困境》）。这也是核心国政治成本转嫁的经典例子。

由此可见，政治成本转嫁不仅是核心朝向边缘，更会发生在核心内部的核心与次核心之间。

回顾历史，当前金融资本全球化蛊乱世界的局势，与“一战”“二战”间法西斯主义兴起的背景高度相近，都是在高度金融化的资本主义体系爆发严重经济危机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分歧和矛盾加剧，民众面对生存的焦虑凸显。在社会经济资源分配高度不平均的情况下，个别机会主义政客和背景复杂的组织别有用心地转移视线，挑起族群或宗教等矛盾，把下层社会的愤怒引向排外的血腥冲突。

20世纪法西斯主义兴起后的惨痛历史人们还记忆犹新，可是对于当

前全球因金融化而会再次导致“泛法西斯化”的严峻势头，大部分人却仍然缺少警觉性，更遑论直指其根源。

面对上述严峻形势，新兴国家社会各界尤其需要提高对核心国家主导的“金融全球化”的认知能力。因为在可预期的未来，仍然要不断承受全球无序的各种冲击，在艰难中摸索前进。

为此，本研究选取其中七个较具代表性的新兴国家：印度、巴西、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南非、委内瑞拉及中国（以下简称E7）。它们的发展途径和模式，乃至于当前的处境，对于我们理解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命运，具有深刻的参考意义。

（二）全球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分析

要深刻理解新兴国家，乃至全球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当前的处境，必须把它们近百年来，为了摆脱贫穷奴役而追寻发展的路径，放回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历史大背景中进行研究。若抽离全球历史背景去研究国家的制度选择，甚至比较制度之间的优劣，不仅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弊，甚至容易落入高度意识形态化话语的窠臼。

全球资本主义发展至今共经历了三个主要历史阶段。

早在前资本主义的殖民化时期，西方列强通过大规模实施反人类的国家犯罪，在欧洲之外到处复制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奴隶制。一方面奠定了西方进入工业文明的条件，另一方面也把人类社会改变成“三个世界”，随之派生了三类资本主义模式：一是殖民地宗主国的老欧洲演化成的“莱茵模式”；二是被殖民化的新大陆（南北美洲、大洋洲）演化成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三是没有完成殖民化的亚洲原住民大陆演化成的“东亚模式”。[28]

在人类的资本主义历史上，这三个世界在资源环境和制度文化上都有显著区别，我们对不同经验都应该增加了解，但不可简单照搬。

1.第一阶段：16世纪末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

处于亚欧大陆边缘的欧洲通过向全球殖民扩张，既向外输出贫困人口，又占有资源产品借以完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进而，殖民地瓜分演化为主要发生在欧洲的帝国主义战争，由此，欧洲成为世界中心。

殖民化之前的欧洲，负债累累、战乱频仍，为了应付内部危机，积极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贸易路线及开拓殖民地。欧洲人在新大陆的掠夺和开垦，以及开展更为血腥和残暴的奴隶制“三角贸易”，为欧洲本土诸国产业资本的急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欧洲社会虽然取得较大的进步，但这如同恩格斯指出的：连工人阶级都因分享了殖民地收益而淡化了阶级意识。于是，欧洲人虽然在其本土发展了少数人享有的平等、自由、民主等理念，却同时在其他大陆复兴了古希腊、古罗马所谓“弗里敦邦”时期的残酷奴隶制，对其他民族和国家进行无情的侵略和剥削，甚至大规模杀戮；即使在国内，也是奉行双重标准——“人生而平等”的前提是：白人基督徒，而且在很长时间里必须是男人才能享有权利。欧洲内部诸国之间的激烈竞争在欧洲大陆甚至世界各地引发了无数战争。20世纪初，德国、日本等后起的帝国主义新秀积极扩张，英、法等老牌帝国为确保利益及延续本身的优势不断打压后起之秀，最终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

2.第二阶段：**20**世纪“一战”及“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反殖民主义与产业跨国转移

世界各地几百年来饱受殖民主义侵略压迫的民族，纷纷争取民族自主独立。资本主义核心国发现，在国外直接殖民的成本日益高昂；随着制造业的利润率下降，先发国也在寻求产业升级。而且为了降低劳工成本、纾缓阶级冲突、降低国内环境保护的压力，先发国乐于向在解殖运动（独立运动中的反殖民主义，以下简称解殖运动）中诞生的民族国家转移低端制造业。只要先发国能继续掌握核心技术，并确保国际货币金融及贸易制度有利于资本输出国（例如资本自由流动），就可以利用其优势，以低成本获得发展中国家的低廉劳动力及自然资源，并且把劳资冲突造成的社会不安，以及环境破坏等成本转嫁给发展中国家来承担。对此，我们归纳为“成本转嫁”理论[29]。

3.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全球化阶段，核心先发国加速金融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一方面，在政治上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中国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制裁压力下奉行亲资本的制度转型；另一方面，在经济上，核心国家资本跨越了地缘及意识形态壁垒，在发展中国家赚取了巨额利润。

然而，这些利润回流，客观地促使资本主义核心地区加速金融深化，并多次催生形形色色的资产泡沫，不断引发金融危机。危机爆发后，核心国家利用其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借由巨量货币增发来缓和流动性危机，而发展中国家则承受金融无序及资本大规模流出的风险。从昔日的赤裸殖民掠夺发展至今日的复杂金融化，成本转嫁的机制更上一层楼，核心国确保了其在国际货币—金融—贸易制度中的寻租地位。

本书提出的“国家竞争的微笑曲线”模型，可以用来说明这个历史过程。

以上是E7比较研究的宏观历史背景，属于大时段的历史划分。

本章集中讨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又可以细分为三个时期。

20世纪90年代至2007年：“二战”之后，1944—1971年的国际货币体制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1971—2013年可称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其中，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阵营解体后的单极币缘-地缘政治格局为核心国家的急速金融化提供了便利。过去20年中，个别发展中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被称为新兴国家；与此同时，核心国家凭借产业转移进行产业升级，朝向金融深化发展，最终引爆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

2007—2013年：核心国家经历金融及债务危机，一面做出制度调整，一面通过QE纾缓流动性危机，把金融化的风险成本转嫁给发展中国家。2013年10月，核心国六方（1＋5）货币协议的签订，标志着应对金融危机的制度调整初步完成。（参阅附录《专题2新核心同盟之一：核心区构建六方货币同盟》）

2014年至今年：由于核心国家内部出现问题及面临新兴国家的挑战，20世纪90年代初，“后冷战”以来的单极币缘-地缘政治体系难以为继。核心同盟完成制度调整、初步稳住阵脚后，便积极调整其全球地缘战略。2014年以后，币缘-地缘政治格局出现法西斯化的变动，各地缘政治板块进行大规模重构，血腥的地区冲突和排外的民粹主义成为新常态。同时，新兴国家过去近20年的旧发展模式走到极限，E7之中，凡是紧跟西方新自由主义制度的“路径依赖”都显得难以为继，各自陷入调整的阵痛之中。

在这个金融资本为核心构建起来的新世界体系中，被边缘化的国家中只有中国可能成为唯一例外。作为实体经济规模世界第一的、具有完整产业结构的超大型大陆国家，其实体经济总量至少两倍于国内金融资本总量，并且主权货币不能自由兑换。加之东方国家有别于西方的举国体制，使中国相对而言既顶住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输入型通缩，又缓解了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带来的输入型通胀。

由此来看，这个核心国主导的西方金融资本新体系要完成对世界的统治，就只有软硬兼施，对中国等新兴国家推行“去国家化”。这是21世纪西方金融危机连续发生之后中美战略利益冲突的一个具有本质性的内因。

以上是从历史时序切入所做的归纳。

二、新兴国家当前面临的全球大势分析

当前的世界局势，在三股巨大力量的碰撞中被重塑。

首先是两股互为表里关系的宏观政治经济力量。其内在深层动力为金融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趋势自身，服从于金融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是为“里”；相应地，币缘战略及“后冷战”意识形态所派生的各种话语载体为其“表”，服务于边缘国家接受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成本转嫁。

美欧核心国经济结构日趋高度金融化，连带半边缘乃至新兴国家“被金融化”，人类资本主义历史由此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这期间的虚拟化金融扩张造成金融资本全球过剩危机，进而引发币缘战略冲突[30]。这与产业资本阶段的资本增密造成工业化大生产的生产过剩危机进而引发地缘战略冲突，虽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金融资本阶段所导致的全球经济风险增加、经济涨落周期缩短、金融危机频繁加剧、社会及地域贫富悬殊分化等内生性制度成本和代价，却比产业资本阶段要沉重得多。

在进行金融深化（虚拟化）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进程中，面对全球新形势，核心国为了巩固自身的利益而调整其币缘-地缘政治策略。此中的转变乃是西方主导的“后冷战”时期——1989—1991年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之最大的重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只能被动应对，饱受经济、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冲击；个别新兴国家尝试主动回应挑战，开拓新的国际区域性合作关系，寻求发展空间。

接下来十数年的全球币缘-地缘格局，将在核心国与新兴国家的博弈碰撞中被重塑，但核心国在此场博弈中始终占据着硬件和软件方面的优势（包括军事力量、制度安排及意识形态软实力）。也因此，核心国家在这种“后冷战”时期，尤其需要借助意识形态软实力压制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制度权，并且在挑起区域冲突之际，借用巧实力促进分化，甚至直接制造新兴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动乱。

“后冷战意识形态”作为软实力，[31]主要通过科学技术援助和制度转轨（改制）服务的输出，以及所谓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现代教育”和“精英文化”等领域中似乎充满善意的合作交流，就足以诲淫诲盗地、威逼利诱地把握住新兴国家的知识集团，掌握以个体或小团体获利为内在目标而推进制度变革的思想理论体系。诚然，只有这些手段软硬配合，才能顺利转嫁金融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巨大制度成本。

上述两股力量互为表里关系。金融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为其本，“后冷战”意识形态包装的全球币缘-地缘战略格局的重构为其表。[32]

第三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自然力量。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各地持续出现极端天气，自然灾害频繁。再加上本来已日趋严重的全球资源制约，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以原住民为主体的乡土社会将受到更严峻的冲击。

综观人类历史，气候变化一直是塑造文明的重要因素。只有到了西方殖民化大陆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为主导的现代化时期，人类才有了不可一世的想法，以为自己已经可以突破气候和自然的制约，无限度地扩张下去。事实上，气候变化及资源枯竭，将会成为全球最严峻的宏观刚性制约。这个因素的影响和冲击，势必愈益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各个层面上猛烈呈现出来。

本书集中探讨前两股力量的互动。[33]

不可否认，资本主义通过顺利转嫁制度成本的金融资本阶段表现出其仍然具有巨大的自我调节及创造力。核心国家一直在进行内部制度创新及政策调整，来应对后进国特别是新兴国的挑战。可见，人类接下来要面对的，恐怕不是国际主流传统左翼思想所热衷想象的资本主义危机（crisis of capitalism），而是新阶段的危机资本主义（**crisis capitalism**），即核心国家将持续不断借着危机向发展中国家转嫁金融

深化的成本。随着全球金融深化，种种危机（金融、债务、地区军事冲突、社会动荡、自然灾害等）势必成为新常态。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当前的“全球化危机”不是国际社会的左翼力量发起的“反全球化运动”造成的；全球化解体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核心国强力推进的，是其自身内在矛盾演化而导致的。

（一）世界格局重构，新兴国家面临巨大挑战

近年来，世界局势变化之快，规模之广泛，影响之深远，是自20世纪90年代苏东集团瓦解以来之最大变局。新兴国家面临巨大挑战，唯有把握当前金融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矛盾，方能正确理解过去40多年以来的全球发展史，包括新兴国家当下的困局。

2007—2008年华尔街爆发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国家以各自体制派生的应对方式承受着国际金融市场震荡的负外部性，反过来也检验了各自体制的有效性。因为，所有非核心国家面对的外部挑战具有同质性——新兴国家当前的困境源于金融资本阶段的“新核心”在地缘战略及制度两方面的演变。

1.地缘战略重构

美国靠2008—2013年连续5年的多次QE制造金融资产再膨胀，向全世界乃至“99%”[34]的美国公民转嫁成本后，暂时性地纾解了美国国内金融部门的结构性危机，稳定了国内经济，并趁此时机在国内外进行了战略性调整。

美国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内战略性调整的核心从过去近20年的急速财政膨胀转向相对策略性收缩（参阅附录《专题1　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的阶段性战略调整》）。

延伸阅读**3**

美国的战略收缩

有研究者指出，美国正由之前的扩张周期进入收缩周期。陈晓晨和徐以升认为，美国的收缩表现为全面的战略大转向，包括：

（1）不再像小布什时期那样不断增加军备，转而开始收缩；

（2）不再全面出击，而是进行军事战略调整，除亚太以外整体战线收缩；

（3）不再对盟国提供全方位的安全承诺，转而鼓励盟国自行承担义务；

（4）不再奉行贸易领域的全球主义，转而推进区域化的贸易投资协议；

（5）不再依赖进口能源，转向通过“页岩气革命”等，逐步实现西半球能源自给，进而向“能源独立”目标迈进；

（6）不再扩张赤字，转而推行财政相对收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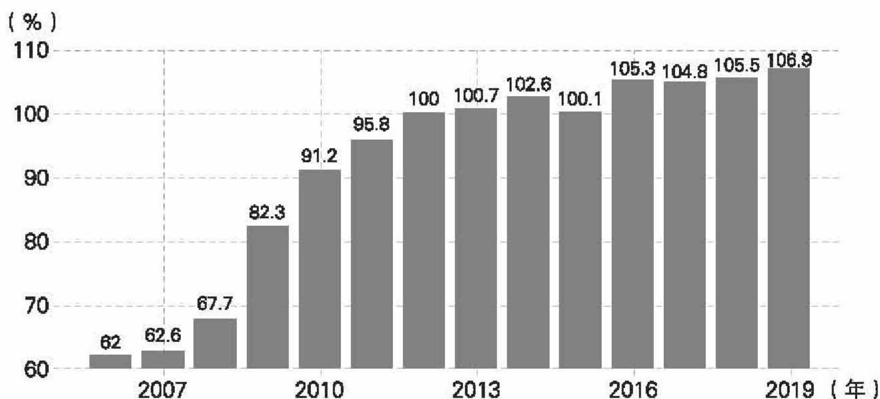
（7）不再通过货币政策为全球“输出增长”，转而实施强势美元政策，全球资金将回流美国。

参考资料：

陈晓晨、徐以升著：《美国大转向：美国如何迈向下一个十年》，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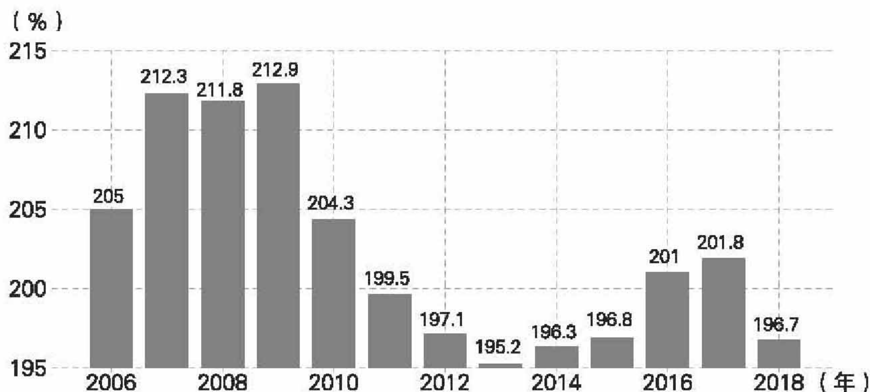
陈晓晨：《美国大转向、全球大失序与中东大乱局》，本文刊于2015年11月27日“秦朔朋友圈”微信公众号。

但是，我们在基本接受上述分析的大部分判断的同时，也认为不宜过度解读美国的战略性收缩。因为，美国的整体债务始终维持高水平。美国私人债务从2009年的高峰下降，至今仍维持在高水平，而与此同时，美国公债却高速增长。两者加起来，达到美国GDP的300%（见图4、图5）。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美国公共债务局。

图4　美国公债占GDP比重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图5　美国私债占GDP比重

美国始终站在金融资本主义的顶峰，并且始终是全球金融深化的先锋，直至金融资本虚拟化扩张到最终发生“内爆”。由于美国的债务不断攀升而必须增发货币、购买债券，因此，金融资本总有急速扩张的内在冲动。当然，这也是由金融追求流动性获利的本质所决定的。无论是美国的“再工业化”，还是暂时性的战略收缩，都只会为下一阶段的金融扩张铺路。美国要勉力维持住作为全球贸易结算和储备货币的国家政策及其巨大的金融利益，这决定了美国金融资本始终会是扩张性的，由此而势必派生出政治军事的扩张性——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而美国接下来数十年利益的关键，就是怎样对主要新兴经济体进行“美元化”。

据此来看，核心国金融资本法西斯化乃是美元资本全球化的内在特征使然。

美国没有打算降低其在全球的影响力。它目前进行的策略性调整，一方面是为了配合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以更低成本发挥其全球影响力（包括善用巧/软实力及金融制裁等国际制度性优势），另一方面是为了针对更大的长远利益目标——中国，而把主要海外军事力量集中部署在东亚。要掌握美国的新地缘战略，必须理解其金融资本主义新阶段的币缘战略。

近年美国在多条战线上展开重大的地缘策略调整部署：一方面，在亚洲延续2012年以来在区内拉拢形成“太平洋同盟圈”的策略，企图对至今仍然维持住了货币主权的中国进行孤立和围堵；另一方面，在欧洲则支持乌克兰的极右翼力量，引爆地区性严重军事冲突，把俄罗斯推向欧洲的对立面，破坏欧洲和俄罗斯建立战略性同盟的任何可能性，以确保美国对欧洲的主导权；再利用“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制造乱局，祸延欧洲，以此拖累欧洲的经济复苏，打压欧元。[35]

简言之，一面是通过打击俄罗斯来巩固其对旧大西洋同盟的领导权，并防止欧洲强大到足以挣脱美国的影响；另一面是打造新的太平洋同盟圈以孤立中国。

美国“二战”后的军事原则，就是确保其军力能同时在大西洋及太平洋两边打赢两场战争。据此，美国当前欧亚两边同时开展的“新冷战”模式，正是此军事原则在地缘政治上的反映。

恰恰因为在大西洋及太平洋两边同时打开战线，促使美国战略性退出因页岩气革命（参阅附录《专题1　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的阶段性战略调整》）及能源独立政策而变得价值下降的中东地区，留下一个烂摊子，让依赖区内石油的欧洲及中国来面对。（从区内涌出逃避战火的难民，已经对欧洲造成沉重的负担，影响欧洲社会的稳定，甚至促使欧盟解体。2016年6月英国公投脱欧，其中脱欧阵营鼓动群众的主要煽动点之一即是欧洲的难民政策。）

2011年以前，全球地缘战略演变格局明显趋向三分之势：中、日、韩通过货币同盟整合亚洲；而欧洲则和俄罗斯联结；21世纪的地缘格局一旦朝此方向发展，美国就只能依托“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亚三足鼎

立。这虽然利于世界平衡，却不利于其单极霸权地位。所以，无论重回亚太推行“再平衡”战略，还是扰乱欧洲，美国的战略目标很清楚：防止全球地缘格局形成天下三分之稳态。为此必须压制打击中国，削弱欧洲。

欧洲是欧元面世后美国过去十多年进行币缘战略打击的主要对象（参阅附录《专题4货币霸权战略冲突下欧元的困局》）。而当人民币影响力开始上升，并意图成为地区性乃至全球性结算及储备货币时，美国当前打击的对象，则将无可避免地从欧元转向人民币（参阅附录《专题5美欧中战略关系分析（2015）》）。

自然，美国更需防止欧洲和中国市场融合，例如批评欧洲各国加入中国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AIIB），又越俎代庖警告欧盟不要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Market Economy Status）[36]。美国强烈反对的理由很简单，一旦全球第一和第三大经济体（也是第一和第二大国际贸易体）基于利益而结合，甚至可能建立某种货币同盟关系，则美国将更难打击欧元及崛起的人民币，美元的全球霸权或将不保。美国多年来的全球策略一直是“分而治之，逐个打击”。当对手有联合之势时，美国更需加强分别打击。

进入2017年，全球地缘局势又出现新转变。

特朗普靠高举民粹主义大旗当选美国总统，就任后立刻宣布退出之前美日金融资本集团积极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37]。再加上随着中国深水海军力量的发展，美国多年经营旨在围堵中国的岛链开始崩解。此时，美国借着朝鲜核危机而制造北亚紧张局势。在亚洲的另一边，随着俄罗斯高调直接军事介入，美国推翻叙利亚政权的地缘策略功败垂成，因此转而挑起中东地区主要盟友与伊朗之间的直接对抗，以什叶派及逊尼派之争为下一轮中东冲突的爆发主轴，并且把中东区内持续的军事和宗教冲突引向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沿路的中东及中亚地区。

全球局势千头万绪，但只要抓住最主要矛盾，问题的核心便水落石出：欧亚大陆乃至中东、非洲的和平大整合，是最根本动摇美元全球霸权而美国最不乐见之事。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朝欧亚非大陆和平大整合的方向前进，恰恰是美元霸权的最大绊脚石。

明白这些背景，我们才能理解美国为什么冒着影响国内经济复苏势头之风险，也要部署退出QE，美联储资产缩表，并重新进入加息周期，引导三轮QE洪泄出去的资金，挟带实体经济的价值回流美国市场。

据此来看，新兴国家将面临进入21世纪近20年来最大的挑战。

2.国际制度转变

在资本主义的金融资本主义新阶段中，发达国家中的“核心国家”主导金融竞争的实质，是金融资本及其投机获利能力都向在全球具有垄断地位的“核心国家”的跨国公司集中，其金融利益集团组成的监管机构，通过大量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将资本以零利率投给机构投资人，使其以最低资金成本进入资本市场，占据能源、原材料和粮食期货及衍生品市场多空交易主导权，获得高收益。

核心国的跨国公司通过零利率美元的海外投资，确实已经占有了世界实体经济的高收益，例如投资或战略收购中国这样的实体经济国家的关键产业（中国现在21大类产业的2/3由外资控制）。其中的内在逻辑可以解释为，一方面，国内接受了通过国际贸易推高的基础商品价格，必然是高通胀的，导致企业成本上升；另一方面，应对输入型通胀导致国内资金价格也相应上升，进而竞争不过投资市场中的国外低价资金。[38]

反之，由主要金融集团组成的美联储如果部署退出QE并重启加息周期，亦同样会引发全球金融震荡，受其影响的首先是实体经济效益有所增长的新兴国家；2013年年中，美联储放出QE结束风声，随后资本回流美国而在新兴市场国家出现金融市场动荡，国内中小投资者在股市中被外资操控的多空大战打败。这就是新兴国家演变为衰败国家的外因之一。

在金融危机频发、威胁性日增之际，核心国家向外转嫁成本必然提出相应的制度安排。金融海啸派生的美联储QE政策（以及欧盟和日本相继推出QE）最为实质性的后果，就是核心国家虚拟资本更大规模的扩张，于是全球的制度安排将向更利于全球化金融（尤其是高度虚拟化金融产物）的方向扩张及流动，加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控制。

例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破坏了供应链，连带造成全球化危机，美联储再度无限量QE，资产负债表增加到7万亿美元[39]，大部分用

于美联储直接购入美国各类负债；而获得资金的企业反身杀入股市，使得连续4次遭遇“熔断机制”的美国股市基本上“收复了失地”。

以下从核心内部地区，以及核心与半边缘的关系两方面来分析。

首先，在金融资本利益与地缘军事战略操作协同的大趋势下，美、日以及欧盟等为了推动其严重的金融危机向全球转嫁，进行了稳定核心国家金融市场的制度变革。2013年10月31日，以美联储为核心的美国、欧盟、瑞士、英国、加拿大和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央行，宣布达成长期、无限、多边货币互换协议，构建核心国之间的流动性互换协作网络，这标志着金融资本阶段“新核心”的形成，也是全球化金融资本“作而不死”得以自我修复的一次重大制度调整。（参阅附录《专题2 新核心同盟之一：核心区构建六方货币同盟》）

其次，金融资本核心国积极推动吸纳服从其地缘战略的“卫星国”及其他半边缘国，形成具有鲜明地缘政治背景的新贸易同盟。以WTO为代表的那种基于多边平等（起码原则上）的全球性贸易协议组织的发展，基本上已走到尽头。以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为代表的新贸易同盟兴起，其核心机制是解除非核心国家的金融与货币主权，甚至“去国家化”，以方便核心国家的金融资本在境内外自由流动获取利益，并控制非核心国的实体资产。

“去国家化”是指核心国家利用国际制度安排、地缘战略和各种巧实力，削弱处于较弱势的主权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各种主权，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调控国内经济及监管外国资本的能力（经济主权）；二是通过国家信用赋权而获得铸币权收益及调控本国货币的能力（货币主权）；三是维持国内社会稳定的管治能力（政治主权）。

本书讨论的“去国家化”，主要指后殖民现象中的蚕食发展中国家主权。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防止威胁国家主权完整和政治安全的新帝国主义策略。

（二）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并重启加息周期，引发环球金融震荡

延伸阅读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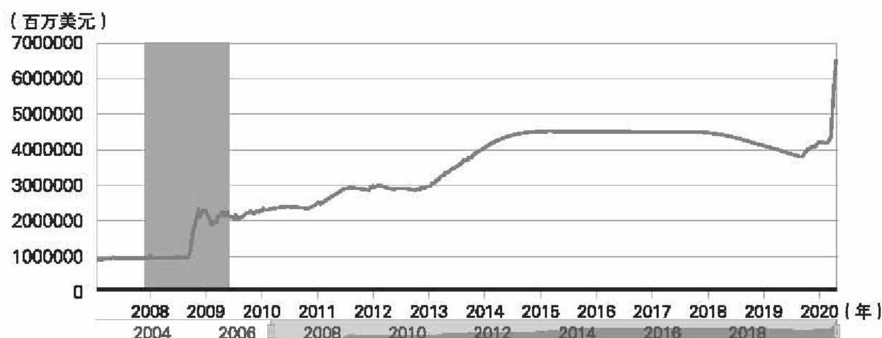
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预期，引发新兴国家货币汇率急挫

美联储是美国的金融资本家集团组建的服务于金融资本获利体系的私人机构，但是，这个代表金融资本利益集团的私人机构做出的决策，却由世界最强大的美国政府来贯彻执行，并依靠美国政府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迫使全球政府跟随。

华尔街金融海啸之后美联储决策的变化，直接影响全球经济乃至政治形势。

第一阶段：2013年年中，美联储放出QE结束风声，新兴市场出现动荡。

第二阶段：2014年10月美联储正式宣布结束QE。在此之前，日本央行及欧洲央行已相继推出QE。此时，美国已经向全球倾泻了超过3.8万亿美元的资金（见图6）。



来源：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注：阴影区表示美国经济衰退。可以看到，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从2008年9月时的9000亿美元膨胀到了2014年10月的4.5万亿美元。

图6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

此后，海外资金回流美国，美股大幅度上扬，直接带动美国2014年第四季度GDP增长幅度达到5%的历史性高度。

第三阶段：2015年12月开始，美国重回加息周期，资金持续回流美国，新兴市场面临巨大冲击。

自2013年5月以来，市场对美联储退市的预期加剧。2013年6月，美联储对外释放结束量化宽松的信号引发全球货币及金融震荡——国际

资本大幅撤离新兴市场，美元再次走强，进入上升周期，引发了新兴市场动荡，包括货币贬值、资产价格下挫、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出现停滞和衰退等，进一步暴露了各国本身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社会矛盾被激化，有的国家和地区甚至出现持续的社会及政治动荡，如图7所示。其中，没有外汇管制或资本流动限制的国家受到的影响最为直接。据统计，美联储宣布结束量化宽松以来，全球有50多个国家出现不同程度的货币震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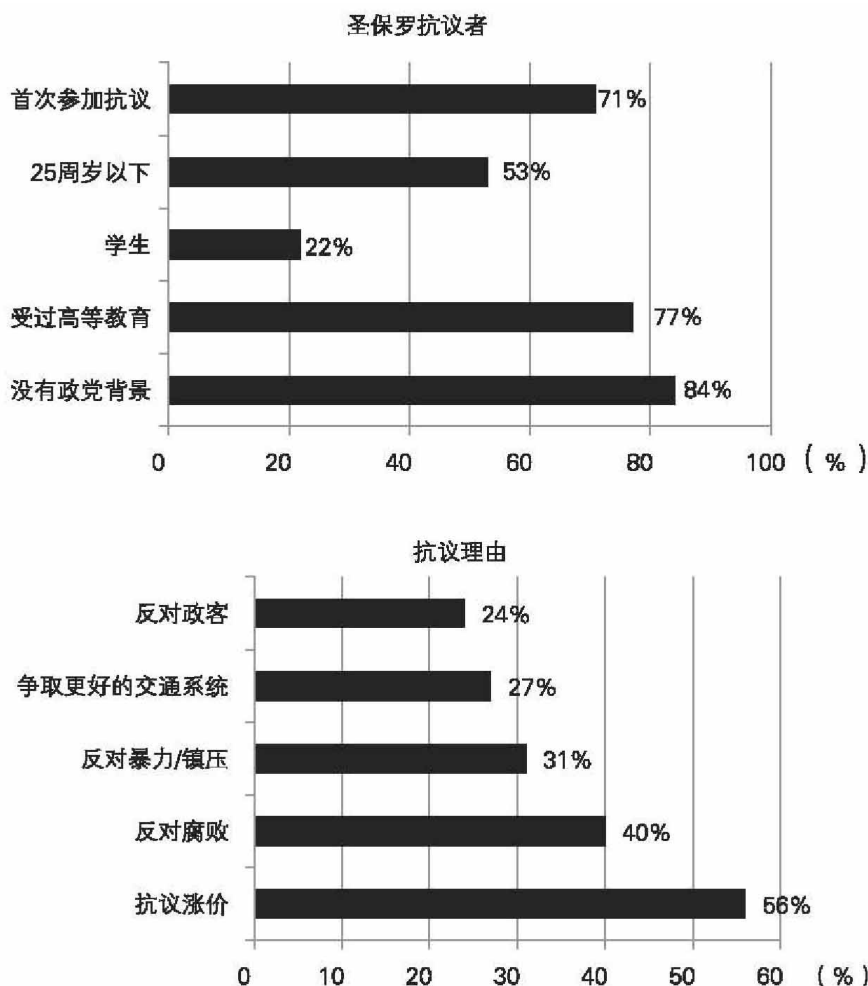


图7　2013年6月巴西各地超过100万群众上街示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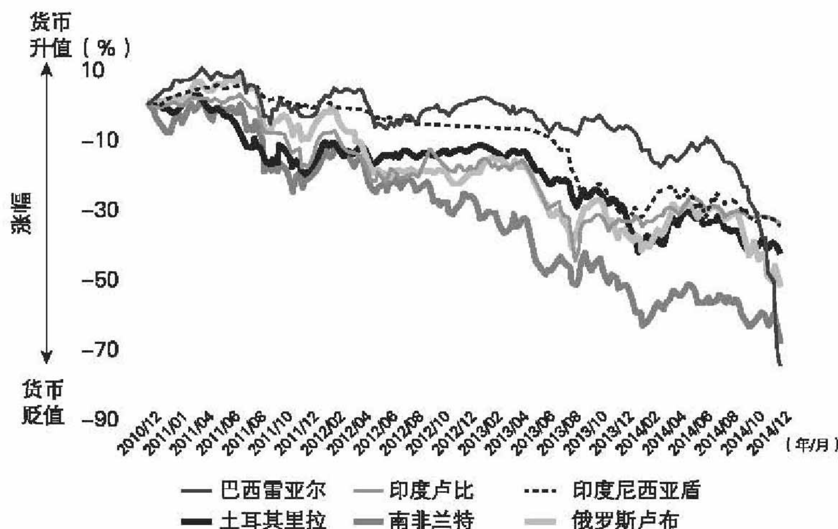
图8　自2013年5月，资金开始流出新兴市场

注：2016年的低位较2009年低25%。



图9　JP摩根新兴市场货币指数

图10显示了2013年6月因QE结束预期而引发的金融震荡，这使本来便呈现疲态的新兴国家货币出现崩盘式下跌。2013年6月至2015年9月初，新兴七国货币兑美元的汇率都出现大幅下跌，巴西雷亚尔下跌约73%，土耳其里拉约55%、印度尼西亚盾约45%、南非兰特约34%、印度卢比约17%、中国人民币约5%；至于委内瑞拉，其官方牌价不反映实际情况，2013年6月的牌价约1美元兑6.3玻利瓦尔，其后，2014年3月设立的SICADII市场牌价为1:55，但实际黑市价可能超过1:6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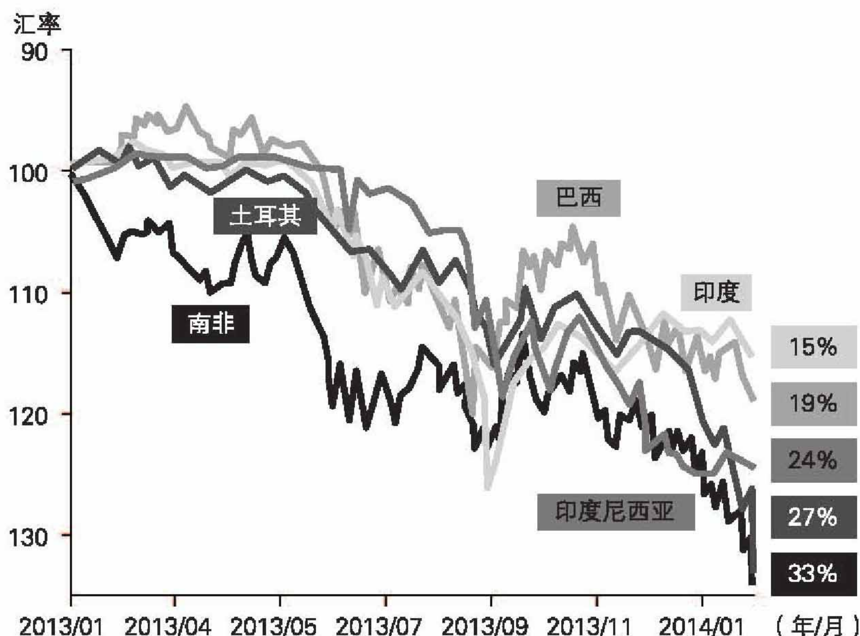


来源：http：//blog.frontierstrategygroup.com/2014/12/fsgs-events-watch-extreme-currency-volatility-2015/。

图10　2013年以来多数新兴国家货币大幅贬值（2010年10月—2014年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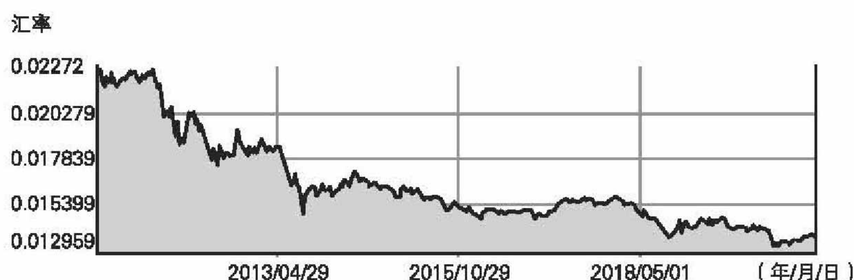
我们在对七个新兴国家的国别比较研究中看到，除了中国恰在2013年完成政府换届，随即开始反腐败，因此相对缓解了金融资本利益集团带来的压力，得以保住金融主权，而其他六个国家都在全球金融战争中遭遇洗劫。巴西、印度、土耳其、南非和印度尼西亚这些一度被跨国金融资本追捧的新兴之星，现在已经被国际金融集团的分析者改称为“脆弱五国”（Fragile Five），如图11所示。

新兴国家除中国外，只有印度卢比对美元的跌幅相对温和，但这也是临时加强管制的客观结果。其实，2013年6月的环球新兴市场危机中，印度的金融秩序还是面临很大的冲击。2013年5月下旬至8月底，印度卢比兑美元已下挫超过24%。因印度不仅高度依赖外资，而且存在巨额贸易赤字，很容易被国际资本做空，所以造成由币值急速贬值及资金外逃引发的国际收支危机。2013年5月至9月间就有约120亿美元资金撤出印度股票和债券市场。只不过，面对危机迅速恶化的巨大风险，印度官方当即采取了资本管制等一系列措施[40]，包括上调贵金属及部分商品的进口税率、禁止金币进口等[41]，这才避免了更大规模的金融震荡。



注：脆弱五国的本币汇率自2013年5月后大幅下跌。

图11　脆弱五国货币兑换美元走势（2013—2014年）



来源：https：//www.chartoasis.com/inr-usd-forex-chart-10-years-cop0/。

图12　印度卢比兑换美元汇率

这个情况表明，尽管印度近年官方的政策主调是解除金融管制的新自由主义，但在紧急关头，还是政府出手沿用资本管制措施，才稳住了局面。

E7中，只有中国的人民币在**2015**年**8**月“汇改”前保持了币值稳定。

究其原因，这仍然是中国坚持国家经济主权、坚持政府对金融资本跨境流动管控的结果。其中，人民币非自由兑换是政府得以直接干预汇率和利率的制度前提，它既是中国有效实行宏观调控的制度条件，也是长期遭到西方国家强烈批判的所谓“中央集权”。最令西方金融资本集团愤怒的是中国限制国际资本流通的管控制度。与此类似，西方“人权”话语的背后，更多的实质性含义是去国家化的“资本权”。

然而，中国金融高层及相关主管部门似乎没有看到2013年新兴国家遭遇金融危机的教训，在同一年推出资本市场对外资开放的所谓“深改”政策；随后，2015年中国发生股市大幅度波动，约20万亿元资金蒸发；随之而来的是2016年资本大规模流出。这些相继发生的危机现象已经引起领导人的重视。

2013年12月18日，美联储决定缩小QE规模，每月削减购债100亿美元，使购债规模降至每月750亿美元。之后，美联储明确提出将退出QE，这掀起了国际资本撤离新兴市场、回流美国的新周期。某些主流经济学家试图淡化美联储政策对新兴市场资本流出的影响。例如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克里斯汀·福布斯（Kristin Forbes）认为，全球GDP增长及其不确定性是比美国利率及流动性影响更大的因素。[42]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循环论证，因为外资进出新兴市场，本身就是近年来影响全球GDP增长及其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

过去数十年，国际宏观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基础是蒙代尔三元悖论，即在资本自由流动、独立货币政策与固定汇率中，只能选择维持两项的三难困境（Trilemma）。但海伦妮·雷（Hélène Rey）的最新研究却指出，全球化金融周期实际上令三难选项压缩为两难：只有在资本账户受一定管制的条件下，一个国家才有可能维持独立的货币政策。[43]当前，国际资本流动、资产价格及信贷增长存在一个全球性金融涨落周期。此周期与量度市场的不稳性及风险指数VIX[44]同步。有更大规模信贷流入的国家，其资本市场对全球周期更敏感。全球化金融周期并不与个别经济体的特殊宏观经济条件一致。雷教授的分析显示：决定全球金融周期的最主要因素是核心国家的货币政策。这决定了国际金融体系中银行杠杆水平、资本流动及信贷增长等重要事项。只要资本可以自由跨境流动，不管该国是采用哪一种汇率制度，都不可能维持独立的货币政策。

雷教授的实证研究结论，验证了我们多年以来在《八次危机》[45]

及多份关于新兴国家的研究中的观察与分析，也说明了在核心国主导的全球化金融涨落动荡中新兴国家所面临的困境。

（三）新兴国家被动跟进的经济金融化与资金回流美国的挑战

值得关注的是，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全球危机之后，美、日以及欧盟等相继采取QE政策，促进金融资本的空前扩张，一方面构成了对新兴经济体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普遍遭到国际金融资本绑架；另一方面也促使新兴经济体大多应对性地出现自身金融化进程的加快（或者说“被金融化”）现象，而严重侵蚀实体经济。

中国面临的严峻考验，不只是要应对国际资本借此做空，还要减少外贸盈余和过剩外资进入带动的国内货币超过实体经济需求量的“对冲增发”。这部分对冲的货币增量在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之后，短期内即超过20万亿元人民币，占增发总量之比超过80%，是国内金融过剩的重要原因。亦即，当对冲外汇的货币发行超过绝对比重的时候，表明国家主权货币的性质在客观上已经实现了重大改变。人们无法获知，在这种重大变化中的获利集团到底怎样发挥对宏观决策的内在作用，但至少应该看到，伴随金融市场化改革已经发生的“洗钱”风潮和大量资本外逃。对此应该警醒，若这时中国在核心国家压力下开放人民币自由汇兑，则势必发生对“做空中国”蓄谋已久的外资短期逐利性撤离和国内资本恐慌性抽逃，导致人民币灾难性贬值或国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

既往的教训是清晰的：资金撤出新兴市场的趋势自美联储部署结束QE两年以来没有改变。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2015年8月之前的13个月中，已有1万亿美元的资本流出新兴市场，差不多两倍于金融危机期间的资本流出。有投行的分析指出，截至2015年7月底的前13个月里，19个最大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本净流出总量达到9402亿美元，近乎两倍于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三个季度共计4800亿美元的净流出量，而从2009年7月到2014年6月底，上述19个新兴市场的资本净流入总量达到2万亿美元。

简而言之，这个华尔街金融海啸之后的资本流向变化表明，E7国家的双重困境的本源只有一个，那就是金融资本核心国借助推行金融自由化带动的危机成本转嫁：美国推出QE释放流动性，新兴国家随即发生海外资本大规模流入造成的通胀；美国结束QE提高利率，新兴国家随即发生资本大规模流出引发的本币贬值和资本市场被做空造成的财富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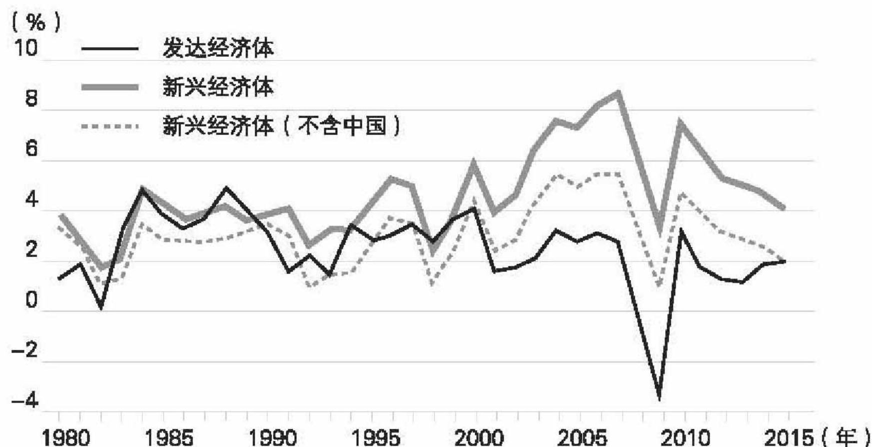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5年6月底公布，新兴国家的外汇储备在该年首季急跌2220亿美元，至7.5万亿美元，跌幅达3%，为2009年首季以来最大跌幅。据推算，新兴国央行在2015年首季消耗约26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以抵抗外资的流出，外储之流失速度是华尔街金融海啸以来最快的。据估计，新兴国家在2014年第三季度至2015年首季共损失5750亿美元外储，连跌四季，为20年首见。国际投机资本也纷纷放出消息，认为新兴市场货币面临史上最糟糕的风暴。根据上面报道的数字计算，当时滞留在新兴经济体的资金仍超过1万亿美元，还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做空操作，故而其后在2015年8月21日的黑色星期五及接下来的黑色星期一，全球股市以预期美联储将重新启动加息周期作为触发点，出现大幅下挫，新兴市场所受的震荡更剧烈。

正当新兴市场为资金撤出而苦恼时，一直处于历史高位的美国股市，却因为资金回流预期而急速高涨，2013年以来美汇亦同步上升。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美股已经延续9年牛市，成为历史第一。

2015年，全球约有5000亿美元资金从新兴国家流向美国。

2015年12月16日，美联储宣布基准利率调升0.25%，结束7年的零利率时代。全球新兴国家货币随即受到冲击。例如，多年受金融危机困扰的阿根廷比索一夜之间暴跌了41%。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援引IMF数据称："不计中国在内，2015年新兴市场整体GDP增速仅有1.92%，低于发达国家1.98%的整体增速，这是1999年以来首次增速低于发达国家。考虑到新兴市场国家的人口增长更快，若以人均GDP计，两大阵营经济体的差距更大。数据反映出，新兴经济体国家不再逐渐趋近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而是越来越落后，2000—2014年新兴市场的强劲增长可能只是异常表现，这期间，中国超快速的工业化所激发的大宗商品'超级周期'惠及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但可能是一次性的变化，新兴市场将回归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增速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常态。"[46]如图13所示。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英国《金融时报》。

图13　新兴经济体（不含中国）经济增速首次低于发达国家

换言之，处于边缘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追赶，曾以为可以缩短与先进核心国的差距，结果在核心国家为了应对自身危机而进行的一系列地缘-币权策略操作下，还是被打回了原形，不仅在经济上依然深陷于依附性结构，还要应付由此引发的种种政治及社会矛盾动荡。

其中，新兴七国大部分都被全球危机“打回原形”，不仅没有体现所谓西方提出的“新兴市场经济”概念，反而几乎都倒退回传统的“殖民地经济模式”——主要靠出卖资源维持生存——贸易赤字和债务增加转化为国内暴力冲突的趋势愈演愈烈。

究其原因，依然是国际货币金融权及制度话语权掌握在核心国家手里。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只是表征，其实质仍然是国际制度权不对称下的“依附性陷阱”（dependence trap）。

回溯以美国为首的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进行双重转嫁的历史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规律，虽然部分结论还只是在经验层面上的归纳，但通过对新兴七国被双重转嫁并被动应对措施的回顾与分析，也足以说明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复杂困局。

三、新兴七国各自所受的冲击

新兴七国在以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金融化进程中，客观地分处于“核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的特定位置。为了更清楚地揭示新兴七国各自面对冲击的特殊性及其与各自所处产业发展阶段、经济社会结构和地缘关系的关联，本书同时采用了另一种分类方式，即根据各国之特殊性及条件将新兴七国分为以下三组。

第一组：中国及土耳其

将这两个国家归入一组的主要原因，是考虑到两国都曾经有过国家资本主义[47]工业化的崛起时期。两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生周期性波动的情况也较为相似，也都在80年代开始接受新自由主义，推进制度转轨，此后外资大量流入，这些与金融危机的发生都有一定的相关性；近年也在遭遇全球大危机之后各自提出地缘战略，却都深深受控于西方几百年来驾轻就熟的地缘战略变化。

第二组：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将这两个国家归入一组，是基于两国都属于人口大国，但也都具有灰色就业占比很高、外债和贸易赤字严重的共性特征，并且，这两个国家内部都存在不同名义的武装冲突、恐怖主义袭击等威胁国家安全的不稳定因素——根据经济及和平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Peace）编制的恐怖主义指数（Terrorism Index），印度所受的恐袭风险在E7中最高。印度尼西亚也曾经面临高风险，但近年已下降至中等水平。

第三组：巴西、委内瑞拉、南非

这三个国家都是因“后殖民主义”历史条件而造成严重“主权负外部性”的国家。巴西和委内瑞拉都属于陷入典型的拉美型“城市化陷阱”的国家——大城市贫民窟化＋大宗农产品金融化（“贫困化＋金融化”），这使得两国贫富分化更加恶化——食品和一般消费品都依靠进口，国内民众的生活必需品价格过高，下层社会劳动力的实际成本接近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更大大高于中国、越南、泰国等依靠自给自足的小农村社经济实现危机软着陆的国家。从根源上看，巴西和南非的国民经济都始终残留和延续着昔日的依附型殖民地经济模式，由于土地及主要经济资源高度集中于占人口少数的前殖民者后裔及跨国资本手上，财富分配高度不公，社会矛盾势同干柴烈火，民间却缺乏有理论创新基础的自主话语解

读。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E7中的巴西和印度尼西亚都兼具丰富的劳动力及自然资源等“比较优势”。巴西曾经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出口替代”，到80年代已建立了较完整的工业产业链；可是后来的自由化政策导致出现经济再回归第一产业的现象。印度尼西亚也曾经蕴藏丰富的石油及天然气，但目前石油产量已不及国内消耗量，目前主要依赖出口棕榈油，其热带雨林也是受到资本垂涎的珍贵资源，同时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制造业也是印度尼西亚产业结构的重要部分。

E7之中，巴西、委内瑞拉、南非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过去十多年搭乘了全球贸易扩张、全球市场对原材料需求旺盛的便车，一度获得了可观的资源出口收益，因2008年以来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推升了国际原材料价格，也推高了出口资源的收益率，可谓资源输出型国家的黄金十年。但随着华尔街金融海啸，全球经济于2009年以后增长下滑，国际贸易额大幅度缩水，制造业出口国对原材料需求降低。而原材料价格下滑，造成从2011年起资源输出型国家的出口收益下降，国内消费需求也随之下降，这更加恶化了全球需求下降的局势，加剧了制造业国家的生产过剩危机。在这种恶性循环形成之际，2013年后美国收缩货币政策，外资撤出新兴市场，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曾经风光一时的以资源输出为命脉的国家，遂以各自不同的形式陷入危机中无法自拔。

第一部分　中国、土耳其、印度、印度尼西亚：全球格局重构下调整战略

导言

随着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日渐动摇，全球格局正面临解体与重组的冲击，E7也在世界新的大变局中或被动或主动地调整各自的角色定位乃至战略方向，其国内的经济结构与社会关系也随之改变，从而面临着重大转型压力。我们将E7分为三组：第一组是中国与土耳其，俱在产业资本走向金融全球化的阶段中调整方向；第二组是印度与印度尼西亚，俱受制于正规与非正规经济部门并驾的二元结构，其产业经济难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第三组是巴西、委内瑞拉与南非，均始终陷入“单一”殖民地经济体系而无法自拔。

第一部分分析第一组——中国与土耳其，第二组——印度及印度尼西亚。

从1998年开始，中国已经出现类似于西方1929—1933年发生的产能过剩的潜在危机。中国的解决方法，也如同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利用政府国债投资，引导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建设，这个措施维持了中国15年的高增长。可是，仅仅用对内投资来缓解外向型经济的产能过剩，实际上是用长期产能过剩掩盖短期产能过剩，20年至今，长期过剩问题已经达到极限。并且，过去将大规模过剩产能转向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征用资源，特别是征地，导致农村出现群体性事件，山区的基本建设还连带发生环境灾害。鉴于环境破坏日益严重，生产过剩愈加凸显，以后很难再沿用国债投资来转移生产过剩的发展模式。

与此同时，金融利益集团推动金融深化，更驱使资本析出异化于实体经济、进入投机部门。金融脱实向虚，对于并不具备全球货币金融霸权的中国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终究会带来系统性风险。因为人民币不是全球结算和储备货币，中国无法持续的吸引全球资本和利润回流，一旦资产泡沫膨胀越过明斯基时刻，必然发生金融内爆。

因此，中国正遭遇到旧路径产能过剩和往前发展金融化风险的两难困境，不得不探寻第三条道路。中国领导人明确宣告，中国未来将推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尤其乡村振兴作为国内大循环之压舱石，此乃非常重要的战略选择。

土耳其与中国一样，都曾经有过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崛起时期。

两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生周期性波动的情况也较为相似，也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接受新自由主义推进制度转轨，此后外资大量流入与金融危机的发生都有一定的相关性。随着2014年美国退出QE和美联储加息、新兴市场国家整体陷于经济下滑，资本持续外逃，土耳其负债累累，货币贬值严重。只有把土耳其在东西方之间占有的特殊地缘政治位置纳入分析之中，方能全面理解土耳其的特殊状况。土耳其尽管加入了北约，但始终游离于西方核心圈。土耳其所处的中东这个“四战之地”，地缘环境错综复杂，局势瞬息万变。近年来，随着美国的衰弱和对中东地区掌控力度的弱化，土耳其面临内外重重危机，开始铤而走险，主动出击。

印度与印度尼西亚的农村微观经济主体（非正规部门）与城市“正规经济”并驾为二元结构，产业经济难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形成规模竞争力，工业化的发展难以突破限制。也就是说，在原有的美元金融霸权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中，两国难以再有本质性的飞跃发展。

印度在没有完成工业化的情况下，却在新世纪出现对外服务业的超前发展。这个历史性机遇至少部分地源于美国IT泡沫崩溃危机，也由此使印度在新世纪与美国资本经济构成紧密的关系。大量外资的进入使印度金融市场在众新兴经济体中一枝独秀，与美国同步上扬。但以IT服务业为代表的印度正规经济部门只占国民经济的小部分，也只吸纳了小部分人口就业。严重依赖外部资本流入的印度，试图转向发展制造业缓解内部矛盾，但在选择和美国合作还是中国上表现出犹豫不决的态度。当下，究竟是加入中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还是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前者意味着未来有希望也有困难，后者代表对过去的依赖，仍然有利益集团的惯性使然，所以印度徘徊不定。

作为同属西太平洋生产中心的另一个新兴国家印度尼西亚，一方面西方意识形态及制度体系不可能适用于这一由在数千个岛屿上高度分散的原住民组成的海洋国家，其地理条件和族群文化的多元化，客观上确实难以被西方模式的现代政治手段整合为“民族国家”，致使建国初期没有利用本土相对丰富的资源优势的客观条件“在地化”地完成国家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另一方面，跟从核心国地缘战略、照搬西方意识形态导致外国资本大进大出，显然利于外资通过“资源资本化”来占有本地资源经济的收益，却并不构成在本地发展产业必需的资本积累。延宕到当代，也就势必在全球资本化的竞争中被边缘化。因而，在金融资本全球

化以来爆发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中，印尼经济都受到了严重打击。但，新近印尼所在东盟与中、日、韩等达成RECP，中国和东盟彼此都是对方最大的贸易伙伴，关系越来越紧密，且看印尼在当前区域整合的机遇下能否形成工业积累。

总而言之，在全球格局面临大重组的情况下，E7各国都遭遇了原有发展路径的瓶颈，而各自调整战略方向。

第一章　中国：产能过剩下发展模式的转型与金融化的矛盾

要明白当前中国的处境，首先得看清楚中国与美国两国的战略关系正处于重大转变期。

一、全球币缘-地缘格局重构背景：美中解除耦合（US-China Decoupling）

2014年开始，全球出现地缘及币缘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动，这是自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以来的最大变局。唯有明白核心国家的竞争战略，我们才能够理解当前世界错综复杂的局势，在纷乱无序中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

这个变动的核心环节之一就是中美正在解除过去20年的耦合关系。中国正在被美国推向战略对立面，并且被当作排名第一的战略竞争对手（如果还称不上敌人的话）强制性纳入“新冷战”，采取各种手段实行“去中国化”。

（一）全球结构性失衡与中美的耦合关系

过去20年被认为是全球化的黄金时期，是新兴国家经济急速增长的阶段。但这种繁荣的背后却是全球性的失衡。

首先是世纪之交国际贸易中美国与中国两大主要经济体经常账户的结构性失衡。[48]通俗地说，**20**世纪末期，美国“产能不足”，长期靠中国的过剩产能填补；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金融资本流动性过剩长期填补中国投资中的资本投入不足。由此，一方面美国加快了金融化进程：越多贸易逆差，就带来越多资本顺差。另一方面，中国加快了全球化进程：越多贸易顺差，就带来越多对冲外汇增发的国内货币，甚至超过货币增量的2/3——从主权货币向外储货币的实质性转化，因而被动纳入对美国金融化构成的“再依附”。由此带来恶性循环——只有不顾资源环境及社会代价而增加出口，才能维持外汇储备增加，维持基础的汇率（币值）稳定。

但中美共治这个被称为“G2”的所谓的经济互补关系，也由此埋下了因这种实质性的“双输”，而导致双方关系符合规律地走向对抗性矛盾的

内因。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货币宽松政策，带来以金融虚拟深化扩张为本质的财富效应，带动全球进入总需求旺盛的一个阶段。也就是在美国经济转型为金融资本主导的同期，一方面，“去工业化”客观上造成美国国内总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在高度“亲资本”的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美国一般家庭的收入增长相对停滞，国内储蓄率极低，但低利率和金融衍生品的创新极大地刺激了居民的借贷消费。这种金融化派生的结果是美国消费品大量依赖进口，尤其是从中国进口，造成其经常项目连续出现巨额赤字，而且规模不断扩大，在2007年次贷危机前达到高峰。

相应地，与美国的经常项目失衡对应的，则是中国等新兴国家进出口在只能使用美元结算约束条件下积累了大量的贸易盈余。由此，造成中国国内的其他结构性失衡：内部需求不足、国内总供给过剩、居民高储蓄率与政府高负债并行……除了资源环境与人文社会加剧恶化之外，其他失衡均与美国的失衡存在着一一对应的互补关系，如图1-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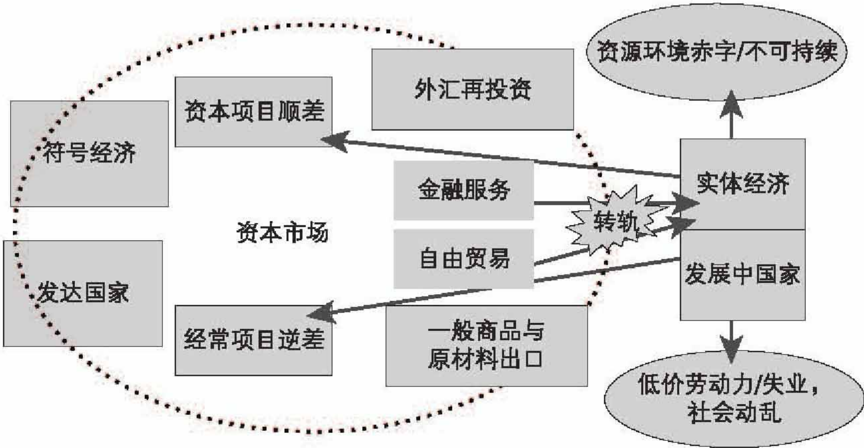


图1-1　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实体经济国家的关系

中美的耦合关系由一组双货币同步扩张的资本循环连接起来。

其一，美国对中国的庞大贸易赤字使美元大量以外汇净收入的形式流入中国，而中国央行只能被动地接受商业银行的大量结汇，并相应投放大量基础货币支付外汇占款，遂使中国的基础货币供应被动地膨胀。造成的后果是，一方面，在加快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进程的同时，造成通货膨胀压力；另一方面，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大幅扩张，埋下量化宽松

政策连带投资扩张的隐忧。

其二，与此同时，中国所累积的美元外汇储备又在美国限制技术贸易的约束下大量回流，投入美国金融市场（债券市场），于是形成一个美元循环。中国美元储备回流使美国的市场流动性充裕，因而使得美国长期国债利率保持稳定。因此，尽管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美联储连续17次提高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但直至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经济总需求下滑幅度仍然有限。[49]

其三，中国对美长期维持低价商品出口，既在需求方面抑制了美国本应发生的通货膨胀，又为大量美元储备回流、为美国的金融深化提供了基础条件。这些客观作用，成为21世纪中美战略接近的经济动因。

于是，2015年，中国首次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占全球**1/3**、人口占世界**1/4**、贸易总量占全球**1/5**，两者无疑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关系。

另一组方向相反的对应关系也许更值得关注：美国加速金融化，虚拟金融投资规模在股市、债市、期货市场等领域急速膨胀；而同一时期，中国却在实体资产和基本建设投资方面都形成了高增长态势。并且，这种官方推动内外投资增长拉动经济的做法，正在随着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向周边国家和地区，乃至向非洲和拉丁美洲延展。

上述情况表明，在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之前，尤其是**2002—2007**年全球化贸易的这段黄金时期，中美两大经济体在各自不同的结构性失衡条件下，客观上派生出了互补性耦合关系。

（二）中美解除耦合与中国金融化的矛盾

过去全球化贸易体系中的最重要的一个关系是以各自结构性失衡为基础的中美互补关系，不管中美怎样同床异梦，过去20年两国的双边关系实际上是一种耦合关系，以至西方媒体和学术界数年前炒作诸如中美共治、中美国（Chimerica）等掩盖实质关系的概念。中国国内也有官员和知识分子曾经对这种所谓的"中美大国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抱有幻想，极力主张要在美国的羽翼下继续发展利伯维尔场经济和公民社会，但转眼间便成了泡影。

由于美国近年推动内部再平衡及战略性调整，中美之间的互补性逐渐减弱，美国市场复苏对中国制造业的溢出效应也已经大幅下降，留下中国的内部结构性失衡愈加严重。[50]

当前美国的战略性调整对全球格局最大的一项影响，就是美国强制把中国纳入“新冷战”，强行“硬脱钩”，结束过去十多年奇特的共生关系。中国虽然完全没有做好进入“新冷战”的准备，但仅从维护国家主权和稳定大局的角度出发，两国势必愈益疏离而分处于战略性对立面。

我们需要恶补的常识是：“冷战”本质上是战争，是以不造成全面热战为底线，但最终必须“决出胜负”的战争，因而也就没有经济理性可言。这也是美国一方面通过支持各种涉及主权的“独”势力惑乱中国，另一方面则大规模调整军事部署并向中国周边增加战争压力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中美处在不同的发展层次，各自应对不同的危机，因而导致双方规律性地演化为对抗性矛盾。所谓规律，在于中国2005年碳排放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资源环境与食品安全等问题恶化，遂在2007年确立“生态文明”发展理念，试图在发展战略上做重大转型和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领域做出调整。而在同期的2007—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和接踵而至的金融海啸，誓言“改变”的美国领导人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改变自己——放弃发展实体经济的初衷，转而把量化宽松政策造成的新增流动性再度连续地投向虚拟资本利益集团。

当然，中美解除耦合、转向“新冷战”，体现出对抗性矛盾的本质，对中国反思此前的发展模式确有警示作用。不论“去中国化”的措施如何演化，也不意味着美国会停止对中国像过去10年那样的双重成本转嫁，也不意味着中国不再对美国有利用价值。相反，美国越深化金融资本主义，金融虚拟化危机就越恶化，就越需要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榨取实体经济价值。简单而言，美国需要以其过剩金融资本全面进入中国实体经济，直接占有“资本化”的增量价值，就需要打击中国政府向本国金融资本的赋权机制，及时做空中国货币，或者强迫中国实现金融自由化以方便海外资本进出获利。

换言之，在此前的中美耦合阶段，美国的利益在于跨国企业在华投资赚取的庞大利润，并确保中国的外汇储备回流美债市场。当时跨国金融资本在中国“屯兵”，一方面赚取高额的利息差，另一方面希望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来赚取汇率差价获利撤出。但中国内地一直坚持货币是国

家经济主权的核心，以及坚持不完全开放资本账户，令跨国资本的美梦落空，只能麇集于香港地区兴风作浪。与此同时，中国不仅在加速自主金融化，人民币也在通过不断地签订双边互换协定迈向区域性国际化。由此可见，中美在金融资本阶段的币缘战略上的确出现了重大对抗性矛盾。

在中美解除耦合的现阶段，美国的核心利益仍然是保证强势美元地位，力阻人民币发展成为与其占国际贸易份额相符的区域性国际结算及储备货币，防止某些区域加速“去美元化”。为此，美国一方面需要从货币及军事两面巩固自身的战略同盟，另一方面阻止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同盟关系。

与此同时，美国要防止中国内部乃至在国际形成以人民币定价的优质资产池，并不乐见人民币资产发展成为能与美元资产竞争的避险性资产。

由此来看，跨国金融投机资本的策略在此阶段也发生了改变，就是利用中国加速金融化过程中潜在的系统性风险，狙击人民币汇率，推波助澜，企图制造中国金融危机，希望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式的危机以更大规模在中国爆发，这样不仅可以劫掠中国的外汇储备，还可以趁资产价格大幅下降，收购中国的优质资产。亦即，就是希望俄罗斯卢布危机在中国重现。此策略一旦成功，将会是近50年来对中国人民财富的最大劫掠。

所以，美国符合官方与私人投机性资本的共同利益的策略，主要是敦促中国尽快开放资本账户及金融市场，解除对资本流动的控制；同时，在政治上让中国“去国家化”、政府失去调控经济的能力，最终使中国本来完全用人民币来推行本国实体产业和资源经济的自主“货币化”的经济过程，被美元或其他西方货币替代，不断地占有本来归属中国的“货币租”。

也就是说，核心国只有先借助硬实力与软实力相结合的手段，对边缘国家实现“去国家化”，才能把这种“国家主权向本国货币赋权”形成的信用体系摧毁，才能彻底实现全球美元化与再殖民化。

明白这个大格局，就能更清楚地理解中国当前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十次危机

（第三次输入型危机）

当前中国正处于自1993年开始的大危机压力下加速全球化以来最关键的转折期，经济、社会、政治形势异常复杂。2015年夏天，在国内外金融利益集团夹攻下，国内发生多次股灾；人民币汇率内外两个市场逆向波动，造成外汇储备锐减；实体经济持续下滑的同时，资本出逃、就业下降……我们归纳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输入型危机，并越来越多地表现出“金融资本无分内外”的全球化特征。

中国这种实体经济国家的当期危机并非某个国内因素孤立造成的，不是内生性的，仍然很清晰地具有输入型危机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发生核心国家从产业资本阶段向金融资本阶段跃升，近年来在世界虚拟资本极度膨胀压力下，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愈益虚拟化，愈益体现出币缘战略军事化的趋势——军事强权与币缘战略结合，炮舰与货币双管齐下，不断地制造对实体经济和资源经济的具有明确指向性的多空投机，强制性地“剪羊毛”洗劫公共财富。

延伸阅读5

剪羊毛

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利用美元的全球主要结算及储备货币地位，通过美元供应的膨胀收缩周期，从其他地区的经济体获取巨额利润，俗称“剪羊毛”。

具体机制为：

（1）美联储采取货币宽松政策，向美国金融市场，乃至全球提供流动性；

（2）新兴资产市场进入牛市，资产价格上升，出现资产泡沫；

（3）美联储结束货币宽松，并重新步入加息周期，吸引资金回流美国；

（4）资金撤出，新兴市场出现金融及经济危机，资产泡沫被挤破，资产价格大幅下挫，相对处于货币宽松的核心地区企业，利用较低

的融资成本，在低位收购危机中的新兴市场优质资产。

美联储等于是世界的中央银行，向全球直接或间接提供流动性。但是，这种国际“公共品”不是廉价的。得益于美元流动性的国家堪称在经济上“吸毒成瘾”，总有一天要削肉断骨连本带利归还。

自20世纪70年代美元摆脱金本位以来，美国利用美元供应周期在其他地区制造危机并从中获利，主要制造了五次：

（1）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强化冷战意识形态的同时，直接使用CIA（美国中央情报局）插手拉丁美洲国家政变，使其形成军事独裁，通过把控此类集权政府实现经济再殖民化，拉丁美洲国家依赖跨国公司大量借入以美元为主的外债。结果：1979年后美联储大幅提高利率，拉丁美洲国家相继爆发债务危机，一方面集权政府先后垮台，另一方面，接任的民选政府大都堕入债务陷阱。因此，无论拉丁美洲国家哪一党派执政，都不得不屈从债权国的要求，虽然资源丰富却被跨国公司掌控，长期受困于殖民地留下的单一经济结构。

（2）美国20世纪70年代大量吸纳日本出口，同时从日本回流巨额美元，再通过1985年广场协议迫使日元一次性成倍升值。其后5年，日本虽然增加了海外投资，但国内也出现资产泡沫化。结果：1990年日本泡沫崩溃，“金融战败，GDP几乎零增长，由此进入失落的20年”，一定程度要靠海外投资汇回收益维持国内开支需要。

（3）美国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以国家资本私有化为主的休克疗法，促进俄罗斯经济实现市场化和自由化。结果：俄罗斯消费品短缺引发恶性通货膨胀，造成卢布百倍以上贬值，工业解体；从第二超级大国地位退回到一般发展中国家水平，以出售资源和军火为主。

日本及俄罗斯的两次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在美国的主导下，两国推动经济急速金融化，催生了资产泡沫，其货币供应膨胀有一定的内生性。美国在日俄的资产泡沫膨胀到一定程度时顺势挤破。

（4）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东剧变之后，开放军事技术于民用，计算机为主的信息产业陡然兴起，拉动海外资金大量回到美国，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资产泡沫随之破灭。结果：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美国公司再乘机回到亚洲新兴国家抄底。[51]

（5）21世纪初，美国IT泡沫崩溃，连带形成房地产坏账和2007年次贷危机，接着在金融资本核心地区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2008年以后美国连续实行三轮量化宽松后，中国等大量出口并由此输入美元流动性的新兴国家的经济迅速泡沫化。2013年美国的量化宽松结束，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经济应声下滑，本币下跌，面临资产贬值冲击。2014年中国房地产大跌，2015年股市泡沫破裂，本币加快国际化的同时明显贬值。

美元通过利率调整在过去四十多年时间里，大致出现一个“十年走弱，六年走强”的周期（见图1-2），是为养肥羊继而剪羊毛的周期。但美联储的加息周期因为2007年的次贷危机而被迫延迟了，并且终于在2015年年底重新启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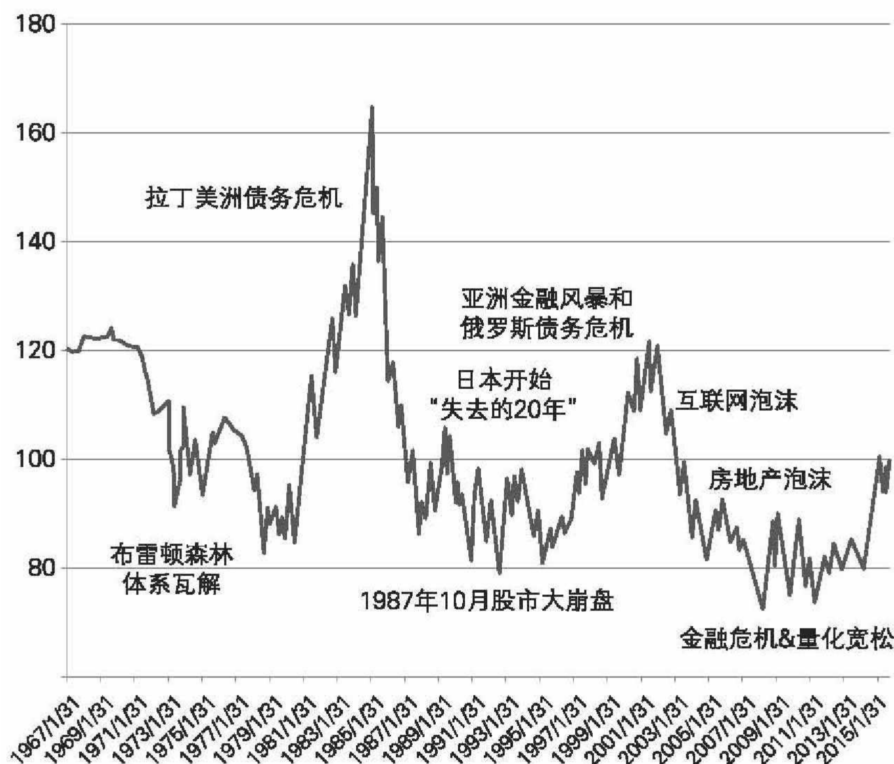


图1-2　美元指数（1967—2015年）

以上资料分析表明：核心国家金融资本集团法西斯化及其币缘战略军事化，已经有祸延全球之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经发生了十次经济危机。如果做去意

识形态化的分析，则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所有领导人任期内都曾遭遇危机，也都发生过数千万工业劳动力失业的情况。海外媒体对中国经济社会大量的负面报道，大都与危机代价有关，从具体现象上看，也同各国遭遇危机发生的社会矛盾冲突情况类似。

简而言之，20世纪50年代初期遭遇的第一次危机，是双重因素造成的：一是从民国延续而来的长期通胀；二是新政权按照“新民主主义”发展战略鼓励私人资本的内生性代价。而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发生的六次危机，属于国内产业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国家资本经济的内生性结构性失衡；最终表现为1993—1994年中国面临财政赤字、外汇赤字、银行系统资本金赤字三重危机。

其后是以“软着陆”为名、顺周期紧缩为实的宏观调控，中国在城市失业增加、农民负担加重导致内需无力的压力下，全面朝向出口导向的“加工贸易型”经济发展策略，遂有这种过度依赖外需拉动的增长方式必然纳入全球化过程之中而遭遇到的三次危机，它们均可被归结为输入型危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加快融入全球化，随之遭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大量外资进入，使中国更深地融入国际分工及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国融入全球化体系之后，1997—1998年、2008—2009年、2015年至今的三次危机，也都属于输入型危机。[52]

面对输入型危机，中国转而采取“逆周期做多”的宏观调控策略，更多地依靠增发国债，启动多轮基础投资拉动经济，以弥补出口下滑的影响，包括1999年的3.6万亿元的西部开发、2001年的2万亿—3万亿元重振东北老工业基地、2003年2万亿—3万亿元的中部崛起、2006年以来不断追加至今已超10万亿元的新农村建设，都属于国家投资战略；此外，还有2008年2万亿元地震灾后重建资金、2009年的4万亿元救市资金，以及2015年的扶贫攻坚和2017年的乡村振兴战略。

在出口及投资拉动下，美国IT泡沫崩溃的2002年到次贷危机的2007年，被普遍认为是中国高速发展且与美国战略接近的黄金时代。但这急速增长的背后，却是国际和国内的结构性失衡。

尤其是2009年全球危机爆发，美、日及欧洲相继推出量化宽松救市的时期，一方面是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外资继续大规模流入，但外需却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中国自2011年开始明显地出现了“去工业化”趋

势，到2014年西方相继结束量化宽松政策之际，中国依赖外需的实体经济全面不景气；于是，以私人资本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发生资金大量析出流入股市的情况，紧接着是2015年连续发生的股灾蒸发掉20多万亿元投资人的金融资产，遂有官方承认进入“经济下行期”，亦即本书指称的“第十次危机”发生。

这次危机在性质上类似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造成外需下降引发的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因此，可被称为**“**第二次生产过剩危机**”**，同年则针对性地提出“工业供给侧改革”，要求“三去一降一补”；直到2015年股灾之后，才非正式地改称为“L形经济下滑”。

在中国经济增长于2015年进入L形的“萧条阶段”后，官方此前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带有顺周期的作用，恰与18年前第一次生产过剩时强力推出的逆周期调控政策相对立。[53]延宕一年多之后，当国家经济工作再以“新型城镇化”这种传统战略，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名义试图改回到投资拉动时，却坠入2017—2018年以来“中央增加投资＋地方土地融资与企业联手推高房地产泡沫＝社会过度负债”的债务金融陷阱之中。这种宏观调控的导向错误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其付出的代价巨大。若比照西方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引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二战”后的60年代第二次生产过剩危机同期的社会动乱，则中国第二次生产过剩危机代价“可期”；且2018年美国利用掌控制度权和话语权发起“新冷战”、强行推进“去中国化”，使局势更加不容乐观。

中国参与全球化带动增长是一方面，但被忽略的是另外一方面。

从1998年开始的长达20多年的投资拉动增长的过程中，中国的国债投资和国有大型企业相配合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优化了一般制造业的竞争力，而且改变了20世纪90年代国家基础工业和装备工业下游市场发展“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阶段几乎被外资控制的局面。基本建设带动自主工业化的崛起，使中国成为综合产能世界最强的制造业大国，虽然在高端领域还未能赶上美德日等先发国家，但在某些领域已达领先水平，更重要的是成为世界上少数能建立一个供应链完整而有效率的工业体系的国家，这是中国国力的核心支柱，而中国的整体经济效益及全要素生产率也有显著提升。例如，2014年中国GDP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成为继美国后第二个GDP总量达10万亿美元的国家（不计欧盟），2015年以PPP（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中国工业实际GDP已经是美国的两倍。

但若从成本看，中国过去数十年经济发展的沉重代价是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劳工福利缺失，所以有人说，中国沿海开发区这些年来的发展其实是靠吃“环境资源租”及“劳工福利租”得来的。其结果表现为“两大矛盾（严峻的生态环境矛盾及社会矛盾）”爆发，以及“四大失衡”——地域发展失衡、城乡差距、贫富分化及经济部门之间的失衡。

总之，中国2015年以来进入因外需全面下降引发的第二次生产过剩危机以来，遭遇产能与流动性双重过剩矛盾的冲击，并深陷于实体经济通缩及债务膨胀的流动性空转陷阱。

三、双重过剩条件下的发展极限

首先是产能过剩。从1998年开始，中国已经出现类似于西方1929—1933年发生的产能过剩的潜在危机。中国的解决方法也如同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利用政府国债投资，引导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基本建设。这项措施维持了中国15年的高增长。在此期间，尽管西方连续发生多次经济危机，比如2001年美国的IT泡沫破灭，同期发生的阿根廷经济危机，乃至美国后来2007年的次贷危机引发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又进而导致2009年全球大危机，以及2010年开始的欧债危机等。其间，中国之所以还能维持高增长，主要归因于不仅使用了“国家干预”这种“看得见的手”，而且还“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优势搞应对危机的“举国体制”，这在西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属于严重的“政治不正确”。

诚然，仅仅用对内投资来缓解外向型经济的产能过剩，实际上是用长期产能过剩掩盖短期产能过剩；如今，长期过剩问题已经达到极限。并且，过去将大规模过剩产能转向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征用资源，特别是征地，这导致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群体性事件，山区的基本建设还连带发生了环境污染和自然灾害。

鉴于资源枯竭、环境破坏日益严重，生产过剩与债务负担问题愈加凸显，很多中国学者认为，以后很难再沿用国债投资来转移生产过剩的发展模式。经过20多年的全方位出口导向（所谓的全球化），中国当前的处境是：无论就外部环境还是内部条件而言，走了几十年的旧发展主义路径正面临极限。

仅就美国带领西方发起“去中国化”的外部环境而言，中国就不能像

过去20多年那样依赖向美、欧、日输出商品来维持增长。

首先，美欧等经济体依然沿袭以信贷膨胀来达成制度寻租的路径依赖。

但是，一方面，日益虚拟化及具排斥性的经济模式难以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来吸纳新就业人口及提供社会层级向上流动的机会，其表现为年轻人失业率高企，缺乏发展机会，以及社会两极化（去中产化、“下流化”，或称M形社会结构），结果贫富分化日益严重。这又造成恶性循环——中下层群众愈加依赖借贷维持生活，缺乏增加税收的条件下公债又日益膨胀，国家总体负债率持续上升，社会文化日渐激进，右翼政治得以利用民粹主义情绪高涨乃至推行法西斯化，最终甚至有可能又再一次诉诸大规模战争来消耗过剩产能，同时替西方国家债务“撇账”。

另一个现实是，以WTO为代表的那种多边全球化贸易已进入尾声，当前全球贸易增长率已显著下滑，靠出口拉动增长已无以为继。接下来登台的，应该是以“区域一体化”为主导的全球产业链重构。例如，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形成的自由贸易区；再如，美国原来积极推动、后来由日本接手的以TPP为代表的排他性区域贸易壁垒。

其次，全球生态环境亦达到资源再生可承载的极限。

人们难以继续像过去数十年那样，通过生产海量的消费品试图把全人类卷进全球化体系中。面对自然资源约束及制度扩张的极限，全球经济将进入低增长周期。与此同时，在产业链的低附加值端，中国面临越南等具有更低工资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的追赶；而在高附加值端，除了个别少数领域外，还未能赶上美、德、日、韩等先发国。正是在这种恶化的外部条件下，中国迫切要进行内部结构调整，以形成“国内循环”。

2015年，中国的顶层设计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新说法[54]，其实质内涵（如提升供给侧的创新和效率及降低制度性成本等）与一直以来强调的各项改革目标其实没有多大差异。现在从西方经济学借来一个词，实际上是指出1998年以来沿用的以增量为主的“需求侧”刺激经济措施的边际效用正在下降。[55]据估计，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前，1元人民币新增债务便能增加1元GDP，而目前需要4元新增债务才可推动1元的GDP增长；传统的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均再难以扩张。扩大货币供应及以国债拉动投资已无以为继，出口增长率呈

下降之势，消费也受收入分配结构性的约束，现在只能走优化结构的路子。

中国需要依据2017年确立的“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的主要矛盾，从产业升级、产能整合等方面来优化经济结构，推进质量效益型的国内循环。对此，一方面应该投资于生态化乡村空间资源开发，以及AI、5G和大数据等新经济领域；另一方面加大投资于医疗教育、环境保护、可再生洁净能源、高新科技研发等公共物品领域，改善国民整体生活质量（不仅是货币收入增加）及促进社会福利，作为下一阶段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

转型时期的问题错综复杂：如何扶植中小型企业的健康发展，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活力？如何防范金融化过程中资产泡沫的无序爆破？如何通过改革税制来改善社会财富分配？如何在保障粮食主权及安全的大战略前提下改善农民的生活？如何使作为核心发展策略的城镇化切实成为以人为中心的有机城乡整合，而不是简单地维持投资拉动经济的路径依赖？如何防止农村土地的商品化及金融化动摇农村土地作为中国社会稳定调节器的功能？如何避免地方政府债务过度膨胀？等等，不一而足。

不难理解，这条结构调整之路障碍重重，牵涉多方利益。

简言之，中国现阶段一方面需要加大力度保护环境，另一方面需要进行产业整合，压缩过剩产能。但那可能意味着失业率上升、地方税收下降，本来希望接收低端产业赶上国家发展步伐的贫困地区，最易受影响。

在这种内部两难的困境下，中国对于美联储缩表及重返加息周期更显敏感。

2013年6月市场上释放出美国量化宽松退出信号，银行体系顿时出现钱荒。政府本来清晰地表达了坚持利伯维尔场的政策取向——拒绝干预，但被现实压力所迫，结果还是依靠中国人民银行紧急干预向资本市场注入流动性来缓解；12月，美联储正式落实退出量化宽松，导致市场量化宽松削减恐慌（taper tantrum），触发资金撤离，致使钱荒升级，银行间流动性短缺愈趋紧张。随之中国的经济增长整体开始放缓，东北和西部部分区域甚至出现塌方式下滑，名义GDP增速和财政增速都出现

了负增长。2016年，中国的经济增速滑落至自1990年以来的新低，官方称之为“新常态”，之后改为承认其为“L形下滑”，并进一步在2017年1月明确了不再用GDP增长率考核各级干部的新政策。

当然，调整过往片面追求GDP增长的模式本身不是坏事。2014年，中国平均劳动生产率比上年提高了7%，单位GDP能耗下降了4.8%，高新技术产业有较快速发展，这表明经济结构局部走向优化。但疲弱的经济使中国的内部结构性失衡日趋严重，生产领域的萧条与金融资产市场的泡沫化、传统制造业的困境与新型产业的崛起并存，东部地区基本保持繁荣，但部分缺乏转型条件的滞后地区，则陷入衰退的边缘。[56]

人口红利、制度红利、环境红利等，所有短期获益而未支付长期代价形成的红利都基本耗尽了。于是有人寄希望于再来一次全面土改。要知道，1950年的毛泽东和1980年的邓小平无论怎样评价，其共同点都是在遭遇到严重的经济危机时，给农民“平均分地”，主要靠“革命红利”和“土改红利”支撑中央宏观调控，才缓解了那个时代的大危机……于是，2019年著名的中央“一号文件”确立了以“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东）”为手段来“重构新型集体经济”的政策，并且明确乡村振兴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

中国作为超大型“大陆国家”，在此期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有两个可以预期的前景：其一，向沿“一带一路”的地区提供中国过剩但沿路国家缺少的产能；其二，推动人民币的区域性国际化，即期望有秩序释放人民币流动性，并打造优质的人民币资产。（参阅附录《专题5美欧中战略关系分析（2015）》和《专题9“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的布局与挑战》）

除了已经延续近20年的产能过剩之外，中国还面临流动性过剩而引致债务膨胀、资产泡沫化、金融市场不稳等随着金融深化而出现的新时期问题。在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的同时，股票市场在政策带动下快速上扬，股票泡沫开始替换此前出现的房地产泡沫；另外，生产领域收益与金融收益背离，导致生产领域的萧条与股市泡沫并存。2013年6月，量化宽松退出的消息引发经济危机，由于中国具备较佳的基础条件及仍实施一定的资本项目管制，因此当时所受的冲击较其他新兴国家更温和，但真正的金融危机延后了两年，到2015年6月终于爆发。（参阅附录《专题6中国2015年股灾背景及过程》）

四、去主权化的“对冲增发”造成金融膨胀及“被金融化”

在资本主义跃升至金融资本阶段之后，任何边缘国家，只要纳入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就难免被卷入核心国的金融扩张进程。

中国不仅属于边缘国家中尚处于产业资本阶段的实体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而且是在纳入金融全球化之中勉力维护本国货币主权的最大国家。于是，中国有两个加快“金融化”的机制：一方面是“主动地”推进本国经济的货币化，以本国主权向货币赋权，形成国内信用，来加快本国的经济资源和实体资产的货币深化，同时构建国内资本市场来吸纳不断增加的流动性；另一方面，在外资大量流入的同时，也只能“被动地”按照即期汇率对冲增发本币，导致“被金融化”内在地改变了主权货币性质，造成通货膨胀压力。

中国21世纪之初表现出的流动性过剩矛盾，主要源于过去长时间的外汇占款主导了基础货币供给机制。

延伸阅读6

中国外汇占款机制

任何追求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资本稀缺都是长期矛盾。

外汇对于中国曾经是宝贵的金融资源，直到21世纪第二个10年。1994年以前，整个外汇管理体系和汇率形成机制都比较紊乱——计划内价格与调剂市场、黑市价格的差价，特别是外汇调剂市场，是在一个特殊环境下，国内企业与金融机构进行交易的场外交易市场，不仅不联网，而且有价差。自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中国开始实行强制性的银行结售汇制度：企业及单位的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收入，必须及时调回，并卖给国家外汇指定银行，建立全国统一的外汇市场体系。2012年4月16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文终结强制结售汇制度，并称强制结售汇制度作为外汇短缺时代的管理安排，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3年中国面临三重危机（乃至之前数次的危机），以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亚洲国家的困境，都巩固了积累外汇储备以防范风险的基本政策取向。1994年实行汇率并轨，人民币汇率一次性下调超过50%，促进了出口增长，加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外资大量涌入，外汇的供

给开始大于需求。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了规避外汇风险、维持金融体系稳定，货币当局实际上将人民币钉住美元，实行钉住汇率制。1994年以来，中国国际收支维持双顺差，本币产生升值趋势。为了维持人民币钉住美元的汇率，央行必须在外汇市场上购入外汇。购入外汇而释放的本币就是外汇占款。外汇储备的增加直接导致了外汇占款的增加。

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供应的重要渠道。央行在外汇市场上处于被动的地位，不得不购入多余的外汇，外汇占款问题随之产生。具体机制为：国际收支顺差—国外净资产增加—外汇储备增加—外汇占款增加—基础货币增加—货币供应量增加。这个过程中货币供应的增加是被动的。

中国的外汇占款主导基础货币供给的时序简述如下。

2000年及以前，基础货币供应主要通过内生渠道。

2001—2008年，经常账户中贸易盈余的外汇占款高速增长，基础货币发行机制转为相对“外生”。

2009—2011年，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大规模增加流动性，造成全球流动性宽松，热钱流入各新兴国家，中国资本项目下也有大量热钱流入。2009年央行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的比值达到121.6%的历史高点。

2012年后，美联储结束量化宽松带来的流动性边际宽松减弱，[57]新增外汇占款急速滑落。随之，2013年美联储明确其量化宽松政策结束后，中国以外汇占款为主的货币投放机制再也无法满足经济对流动性的需求，成为实体经济通缩压力的一个来源。

中国人民银行“被动”地加快基础货币供给，已经造成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和M2货币供应规模（2016年3月末144.6万亿元人民币）均名列世界首位。在这种货币机制下，本应承担国家宏观调控职责的中国人民银行，其利率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被汇率政策“绑架”，陷入两难的被动局面。面对涌入中国套息及等待人民币升值套利的热钱，如果中国人民银行降低利率，则可能加剧通胀压力；但如果经济过热，央行加息降温，则短期海外资本就会加速流入追求无风险套利。[58]

纳入金融全球化的中国之所以在21世纪遭遇宏观调控两难困局，主

要是因为，中央政府本身的货币政策已经遭到庞大的外汇储备及囤积的热钱绑架。某时段内，跨国金融资本热钱大量屯积，一方面乘人民币升值的浪潮图利，另一方面赚取息差，低风险双重套利。不管是外汇储备增加还是热钱涌入，中国人民银行都需要相应增发本币，造成基础货币供给扩张。人民银行只好通过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行票据等手段回笼商业银行流动性，结果市场可贷资金短缺，利率攀升，造成企业融资困难。[59]

由此发生过剩与短缺并存的尴尬：中国银行体系出现自身货币宽松，而一般非金融类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面临的却是信贷紧缩。

而这一切，恰恰又是因为中国向美国双重输出廉价商品及廉价资金，才促成以最低制度成本获取最高制度收益的美元资本大举进军中国。这样被称颂的“新型大国战略合作关系”，确实是有利于美国金融资本的。其实际作用，使得本来应该供应中国企业的建设资金和流动资金，被大量转移到美国金融资本集团手里；反过来，再用中国送去的资金来收购中国的战略性资产，或者直接用于占领中国的市场。

金融资本全球化阶段西方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制度安排，被有些研究者称为“金融世界大战”。

中国在一段时期内“被动”增加基础货币供应量，客观上派生了以下效果。

1.资产泡沫化

大幅推高银行体系可用资金规模，中国的流动性出现“系统性过剩”，创造了适宜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融资条件。宽松廉价的融资条件不仅为资金密集型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提供了资金支持，也通过资产价格升值预期、降低实际融资成本等机制拉动了固定资产的投资需求。[60]

诚然，宽松而低廉的融资条件也曾经起到推动制造业投资及发展的积极作用，但随着产能过剩的恶化及国际竞争的加剧，制造业的边际利润率下降，在某些领域甚至趋向于零，而且因为银行对实体资产抵押的偏好，制造业融资需求的优先性渐渐被替代，结果大量增发的货币供应集中流入房地产市场及股市等投机性部门，造成资产泡沫化。在2015年6月的峰值上，沪市和深市的规模达到10万亿美元（约为GDP的

100%），综合市值让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股市。

另一边则是在土地财政背景下出现的房地产泡沫。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造成“强中央、弱地方”的财政状况。从那时起，地方政府一般税收难以维持正常运作，于是地方政府从土地财政的膨胀，发展到土地债务平台的普遍化。其实质是，地方政府一次性出让70年土地使用权，从银行获得70%土地抵押贷款用于本地公共建设，而本届政府不对其债务承担责任。可见，房地产泡沫的背后是各利益集团分享超级地租而不顾后果。[61]

流动性过剩的同时伴随着流动性短缺，因投资拉动增长内生的不平衡，使某些较多承担国家宏观调控任务的部门（基础建设投资、房地产、国有企业等）享受信贷宽松，而消费乏力也使一般产能过剩的制造业面对信贷紧缩的情况。

2.债务膨胀

2001年以来，因为基础货币供给高速增长，银行体系信贷也随之扩张，即使是资金大量被长期建设项目占用也在所不惜。2000年年底，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余额为9.9万亿元，至2014年7月已达78.02万亿元，累计增长688%，而同期名义GDP增长仅为473%。[62]信贷膨胀率明显高于实体经济增长率。（参阅附录《专题7中国债务的四个层次》）

据估计，中国2016年总负债率为342.7%，除去金融的实体总负债率刚刚超过250%，10年前的数字为150%。与此同时，欧元区约为270%，美国为248%。

诚然，中国当前确实存在债务泡沫风险，降低杠杆率、防止企业债务问题易演变成大规模危机，是当局需要审慎处理的问题，但中国相对很多出现债务问题的先发国家及新兴国家，还是有较高应对冲击的基础的。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不可比的因素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形成庞大的资源性资产未进入市场交易而留下巨大的货币化空间。据此来看，只要保持信用主权、依靠投资拉动增长，就会造成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双增加，则债务作为分子就可能会缩小。

尽管如此，西方媒体以至投机者近来大肆渲染中国的债务问题，似乎为多年常唱不衰的“中国崩溃论”找到了一个新版本。IMF等国际组织多次警告中国要处理企业债务问题，否则中国经济有可能爆发系统性风

险。

须知，美、欧、日应对次贷危机及欧债危机导致全球经济下滑的一个重大措施，就是政府直接出手救市，推出量化宽松，也就是美、欧、日的政府相继扩张货币信用。而照搬西方做法的发展中国家的教训是：国家调控经济和金融的能力缺失。国家信用做逆周期投资恰恰是处理经济危机的最关键因素。可是，当西方以强化国家调控经济功能来应对危机风险时，一方面呼吁中国处理债务风险，另一方面否定甚至提倡解除中国政府进行逆周期调控经济的主权能力——西方在这方面显然持有双重标准。

3.金融深化改革

中国进行金融深化改革的动力，既有内源性的，也有外源性的。

中国在21世纪之初完成国家工业化，一方面出现产能过剩、工业的边际利润率下降的不利条件；另一方面，资本内在具有扩张及逐利的冲动，社会上累积的流动性不断增加，但缺乏导入投资产业的渠道。于是，便出现了金融部门追逐回报的强大动机下的“脱实向虚”。

因此，如果单从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一般规律看，中国自然具有从工业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发展的内源性动力。

但也不可忽视外源性的推动。实际上，2001年以来，国际直接投资（FDI）及热钱涌入造成大量的贸易盈余，迫使中央银行以外汇占款形式注入的基础货币供给高速增长，超越实体经济增长的速率。尤其是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派生量化宽松政策增加约4万亿美元、大量追逐短期回报的热钱涌入，再加上金融全球化的巨大压力及复杂国际形势，在某种意义上，中国过去十多年是处于迅速“被金融化”的状态中。

另外，中国内部的金融改革也在客观上催生了一个庞大的金融利益集团。

1998—2000年，中国财政向不良资产占比在30%以上、濒临技术性破产的国有银行体系重新注资，同时剥离了全部坏账，交给国有资产公司处置。此后，经过十多年的金融改革，中国的金融业（银行、保险等）无论在资本规模还是盈利等方面均已名列世界前茅。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以来，金融部门实质上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它们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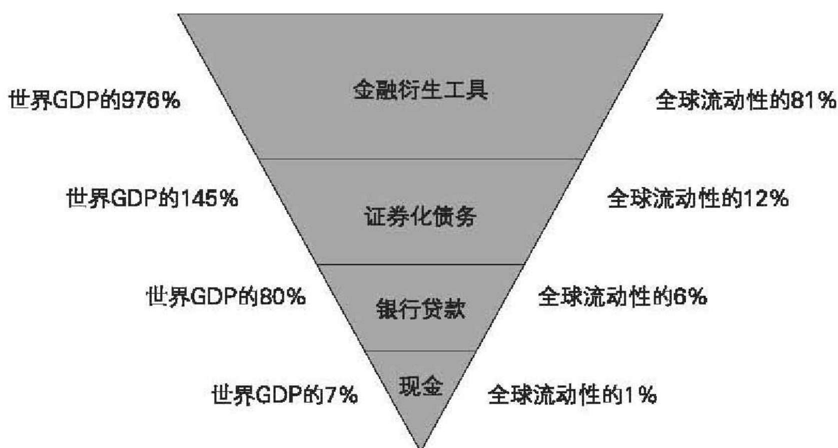
于自身利益的诉求，要求中国加速金融深化改革，为此而大量借鉴美联储私人银行家机构的制度和政策。与之相对应的是，服务于国际金融资本利益、盛行于中国知识界和政策界的新自由主义精英集团同时推波助澜，倡议金融自由化，解除金融管制，大力推动金融深化改革。此外，为了推动剩余产能向外输出、人民币国际化等战略目标，相关经济部门也需要推动金融深化改革。

正如中国过去加入全球化，是以农业和其他弱势产业利益一度被边缘化为代价，由此，以吃租为实质的加工贸易全面地取代了多少还有自主性的一般贸易。中国名义上是全球制造业大国，实际上只是代工厂而已；一旦无租可吃，那些投机性的无根外资就迅疾流出，甩下污染、失业等包袱给地方政府。

同理，当前中国推动金融深化的利益集团因得天独厚而从之者众，正在重演上一轮产业资本加快全球化的戏码：资金从实体经济析出，进入投机市场，致使中国从东南沿海开始出现了“去工业化”的趋势。[63]

五、中国金字塔双稳态结构的变化趋势

西方资本主义在进入金融资本阶段之后，已经形成了倒金字塔结构，如图1-3所示。



来源：新纪元投资（Epoch Investment Partners），http：//www.eipny.com/assets/graphs/liquidity-pyramid-global.gif。

图1-3 全球不稳之源：世界流动性倒金字塔

图1-3数据表明：全球流动性呈现倒金字塔形结构。现金等只占全球总流动性的1%，相当于世界GDP的7%；各种银行贷款占全球总流动性的6%，相当于世界GDP的80%；证券化债务占全球总流动性的12%，相当于世界GDP的145%；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工具，占全球总流动性的81%，包括期货、期权、掉期交易等，相当于全球GDP的976%。

这种西方金融资本阶段客观形成的“头重脚轻”的倒金字塔结构，正是流动性泛滥下全球金融体系不稳定的根源，也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99%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起源。

相比之下，中国的社会及经济两个领域呈现双金字塔形的稳态结构。

在社会结构方面，1949年中国农村全面推行了土地改革。全国大部分小农户都被平均分配到了一小块土地，实际上使得农民的社会属性成为小资产所有者，经济上则因地制宜地小规模分散且兼业化，成为中国保持生态文明的基础，同时也成为社会稳定秩序的基础。我们在《八次危机》中已经详细分析过中国成为产业资本第一大国也可归因于此：20世纪90年代初，农户的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寻求现金收入。小资产阶级家庭派生的农民工仍然具有与土地不可分割的财产关系属性，这使他们成为世界工业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勤奋、低对抗性、高纪律性的制造业劳动力，为资本主义全球化贡献了最大化的制度红利。

同理，这是中国得以以低劳工成本参加全球化竞争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社会面对现代化、城市化及全球化的负外部性危机时，可以通过内部化化解危机的基本条件。而即使在城市，也有很大比例的居民拥有自己的物业。这些占中国城乡总人口60%的小资产所有者，与一般发展中国家下层主要由赤贫群体组成不同，他们构成了中国社会稳态的长期基础。

在小资产所有者的下层社会之上是中等资产者，即相对散乱、缺乏自觉性的城市中产阶级，约占人口的30%；而顶层是政治化的大型资本（主要成分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国家资本）控制，这个群体估计占不到10%的人口。

与这个金字塔形社会结构对应的是金字塔形的经济结构，其特征是：中国首先是实体资产占到社会财富最大部分的制造业大国；政府长

期增加基本建设投资，实质性地力推实体资产增值，形成的作为社会财富底座的实体资产总值大约为500万亿元人民币；在此之上中央政府得以不断增发货币，形成的金融资产总值约200万亿元；以这700万亿元资产为基础，最上层的政府债务资产总量约60万亿元。据此来看，金融资产与债务合计占全部社会实体财富的比重约为50%。这样看，中国已经构成一个具有相对稳态基础的经济金字塔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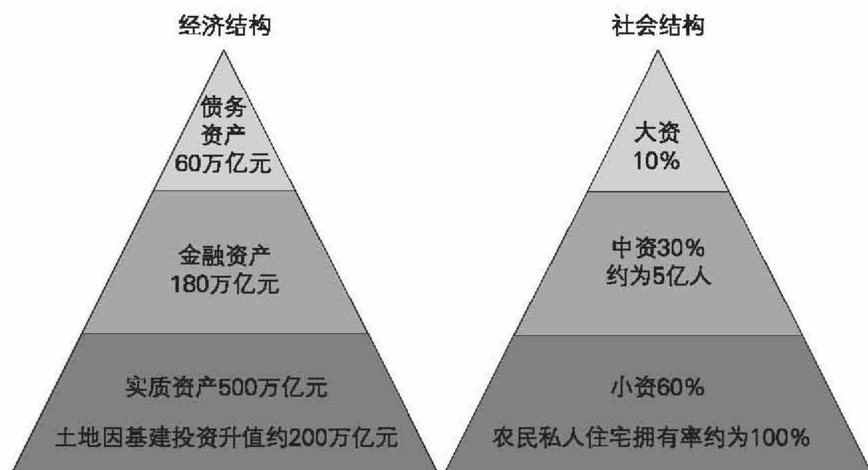


图1-4　中国的金字塔形双稳态经济/社会结构

从这样的社会经济双金字塔稳态结构看，海外竞争对手如果不靠软实力或其他巧实力策略从内部瓦解，纯粹靠外部力量做空中国，很难得逞。

中国属于东亚稳态社会的一种类型。整个东亚不论何种意识形态全都完成了平均分地，即使遭遇严重危机也不会演化为社会动乱。例如，日本1990年以后虽然经历了25年的经济衰退，但仍保持了长期的社会稳定。这表明，东亚稳态结构和西方社会经济制度不一样。

金融（信贷）本来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产业资本在一般市场条件下的形成离不开金融。当金融资产和债务跟实体资产还是呈金字塔式的比例结构时，工业资本主义还可以保持在一定程度的稳态中运行。但随着金融深化加速，一旦金融资产和债务过度膨胀，经济愈益虚拟化，最后变成倒金字塔形结构，金融危机爆发就是规律决定的必然结果。而一旦危机爆发，处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核心的金融发达国家可以利用全球化的种种金融制度安排，向核心国的中下层民众及半边缘、边

缘国家转嫁成本。如果最终不能顺畅转嫁，则会诉诸战争，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源于无法解决第一次大战遗留的战争债务问题。

诚然，中国的产业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本来无可避免地需要发展金融市场引导剩余的流动性，促进产业的优化。但随着中国的金融利益集团不断壮大，庞大的金融利益集团推动金融改革加速深化，拓展衍生工具市场，热衷于从各种核心国家照搬的“金融创新”，极力挣脱较合理的金字塔形比例约束，最终可能如同核心国家一样，金融异化于实体经济，甚至反过来绑架实体经济。这是从内部瓦解中国双稳态结构的潜在力量。

一般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金融深化，是一种极少数人的现代化进程，需要压制**“99%”**（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提出的口号）来维护其利益的现代化上层建筑，制度成本必然大增。综观西方金融发展的历史，金融化的过程总是与公共债务的急剧膨胀并行。如果以政府债务为表征的上层建筑制度成本过度膨胀，变成倒金字塔结构，经济基础最终将无法承受，从而爆发危机。

金融深化也必然触动财产关系。以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为例，中国农村传统的村社土地共享制度，一直是中国社会保持稳态的基础。当前有关土地流转的讨论，我们要保持清醒，在种种意识形态及经济理论包装之下，符合外部金融资本核心利益的政策就是推进农村土地的货币化、商品化及金融化。一旦财产关系改变，社会关系也会发生改变。如果改变这种农户与村社为两级产权主体的土地制度，农村势必失去过往数十年作为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换句话说：只要允许目前金融深化改革的趋势向农村蔓延，中国的社会及经济双金字塔稳态结构，将不复存在。

六、中国当前的输入型危机分析

进入21世纪之后的中国金融资本甫一形成，就经历着重大的历史性演变。金融资本追求流动性获利的共性特征，是中国当前连续发生输入型危机的制度基础；但同时，其作为主权国家，凭借政治强权向信用体系赋权形成的资本力量，也是国家逆周期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

这看似对立的性质，反映出中国金融资本的内生性矛盾。

上一轮发生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引发中央政府针对国有银行强

制推行的市场化改制，是中国金融资本成为独立的资本力量的催生剂。中国改革界的主流一直以美为师，由此在银行商业化改制之初就推行美国当代“混业经营”模式。中央政府从1998年开始着手银行与财政脱钩的商业化改制，2008年完成四大国有银行上市融资的股份化改制，这10年间的两大改制措施，恰恰都有外部金融危机作为背景。虽然中国基本具备了参与金融全球化竞争的制度条件，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对于向来以美国新自由主义金融体制为榜样的精英群体而言，不啻“浪遏飞舟”——西方连续发生金融危机的事实客观上阻遏了被精英群体主导的激进改制。

无论主观意愿如何，“形势比人强”。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造成2009年全球危机爆发以后，在外需陡然大幅度下降直接导致外向型实体产业凋敝的影响下，中国金融资本也不可避免地逐渐产生异化于实体产业的趋势。尽管中央政府仍然强调“银行服务于实体经济”，但在4万亿救市资金大规模投放的背景下，货币信贷增速远高于GDP增速，工业增加值与M2及社会融资总量增长出现背离。究其原因，尽管增加的信贷资金大部分进入国有企业承担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由此使中国成为全球危机中维持世界增长的“发动机”；但也有批评指出，救市投资没有带动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扩张，大量获得融资的非金融企业放弃收益低的基础产业，通过开展信贷、理财等业务进入金融行业。[64]

进而，从2011年国内房地产企业利润下滑，开始大规模转向西方模式的金融资本经济，房地产基金纷纷转战保险业、互联网金融等虚拟经济领域；同期，国内影子银行盛行，投机性金融市场快速扩展。近几年来，加快异化转型的金融资本集团与代表其利益的有关部门大力推出“融资融券”、金融期货、场外融资等一系列利于衍生品发展的交易工具。配合这个金融异化实体趋势的官方部门，也于2015年4月新推出几项股指和做空机制，这为海内外金融资本联手做空中国经济，制造了难得的历史性的机会。[65]在内外配合下，中国股市在2015年6—8月开始大跌。（参阅《专题6中国2015年股灾背景及过程》）

客观来讲，中国2015年多次发生的股灾和汇率波动，是中国金融资本纳入全球化进程中的第一场正在演化之中的、具有金融资本阶段特性的多空大战。尽管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中国官方资本做多与私人资本做空之间发生的一场对决。

（一）资本项目局部开放

近年，中国的资本市场已经敞开半边，这恰巧给予了海内外金融资本集团这些年梦寐以求的做空中国、借机抄底的历史性机会。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化国家，势必是原材料和能源最大进口国，也就在客观上造成国内难以抑制的通货膨胀，间接造成国内利率上涨、融资成本上升，[66]内在地压迫实体经济的利润空间，促使制造业衰落。如果这个外向型经济结构被其内在的客观规律约束，则反过来又使得国内各地方政府和民间资本大都渴求派生于核心国家量化宽松和零利率政策大量制造出来的“廉价外资”，也由此势必派生出大批对新自由主义金融制度几乎如痴如醉的拥趸。

于是，从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导致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本来需要勉力维护的主权币制实质性地被外储币制渐进抵消，对外开放资本市场成为国内新兴资产阶级众口一词的改革呼声。回顾历史，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曾向呼吁宪政改革的资产阶级妥协而推行了“路易十六改革”[67]。人们不该轻易忘记2015年股市下跌前那些金融全球化加速的一系列举措：为了方便外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演变出的沪港通和深港通、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和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大扩容、A股纳入国际指数、上海自由贸易区率先向海外金融资本全方位开放等。

随之，沿海甚至内地中心城市也紧跟上海步伐，跃跃欲试。而多空大战的机会和条件，正是由这些资本项目开放带来的。其实，这些所谓的资本项目对外开放，都与沿海地区强烈要求在体制上实现“去中央化”（de-centralization）有关，即要求中央让渡对外资进出管制的权力，以便由地方政府直接对接廉价外资。但是，中国的体制特色是对国家安全承担无限责任的只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不承担最终还债的责任，等于是在迎接外国资本的过程中享受机会利益，却把风险向上传递给中央政府。[68]

据此来看，2015年6月开始的股市连续暴跌及其后人民币离岸汇率波动只是“扳机”，那不过是蝴蝶扇动翅膀——只要有人启动了某一个做空操作，便足以引起风暴。

为了防止股灾失控，中央政府动用大量国家财政资金，直接注资国有企业入市“做多”，抗衡内外投机资本“做空”力量。据估计，中国政府共动用近1400亿美元以避免股市出现崩盘式下挫。而有业内人士估计，

包括社保、证金公司和其他入市机构投资者在内，救市资金达到2万亿—3万亿元人民币的水平。

但稳住阵脚后，中国的各类金融精英们还是没能反思，仍然顺从金融资本规律推动进一步金融深化。

股市大跌发生之时，2015年8月31日，四大财金部门（证监会、财政部、国资委、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鼓励上市公司兼并重组、现金分红及回购股份的通知》，主要内容是通过各种方式进一步深化改革、简政放权，大力推进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积极鼓励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创新支付工具和融资方式；通过并购贷款、境内外银团贷款等方式支持上市公司实行跨国并购。市场人士对此普遍欢迎，认为可以提升资本市场效率和活力。

这份通知的基调是在危机中进一步推动金融深化。会议强调国企改革需“做强做优做大”“优化企业管理”，强调防止国资流失。从某一角度来看，它符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早前在2015年6月5日通过的两个国企改革先导性文件的精神。央企的兼并重组可能朝着两个维度来进行：第一是针对外向型央企，通过兼并重组提升国际竞争力；第二是针对内向型央企，兼并重组将有助于这些央企压缩过剩的产能，应对过度竞争的恶性环境，从而集中做大。这本身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在危机时刻，这无疑是拿出央企最优质的资产向私人资本群体让利，并明确鼓励现金分红以增加股票市场的回报率。这也可以被看成是金融利益集团利用这次危机倒逼加速金融深化改革的一次胜利。

诚然，生产过剩压力下把社会累积的剩余流动性有序引入股票证券市场，以改善企业的融资条件，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这个策略从应对危机本身而言是必需的，否则无处可去的资金便会有冲动涌入房地产市场，造成物业资产泡沫，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中关键是如何防范金融利益集团绑架策略。

而在股票市场稍为喘定之际，中国在2015年8月11日进行了震动全球市场的汇率改革。

延伸阅读7

人民币“811汇改”

2013年6月美联储退市预期曾触发新兴国家货币大跌。日本安倍经济学的弱日元政策，加上日本央行及欧洲央行接力美国竞相推行量化宽松，实际上全球已进入货币战争的年代。两年以来，亚洲货币除钉住美元的港元以外，在过去一年都表现疲弱。人民币兑日元在2015年8月前一年已累计升值逾80%。而过去一年，人民币兑一篮子全球货币经通货膨胀因素调整后升值近15%。人民币汇率实质上在某种程度上已偏离中国经济的基本面。

2015年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调整人民币中间价形成机制，将中间价下调1.9%，并且承诺采用更加市场化的汇率定价机制，使人币汇率更能反映实际经济基本面，引导人民币有秩序贬值。其后，人民币汇价便出现10年以来最大、最急的贬值潮，触动全球市场。自811汇改后，人民币贬值压力大增，此后多番出现离岸人民币汇率大幅下跌后又反弹的情况（见图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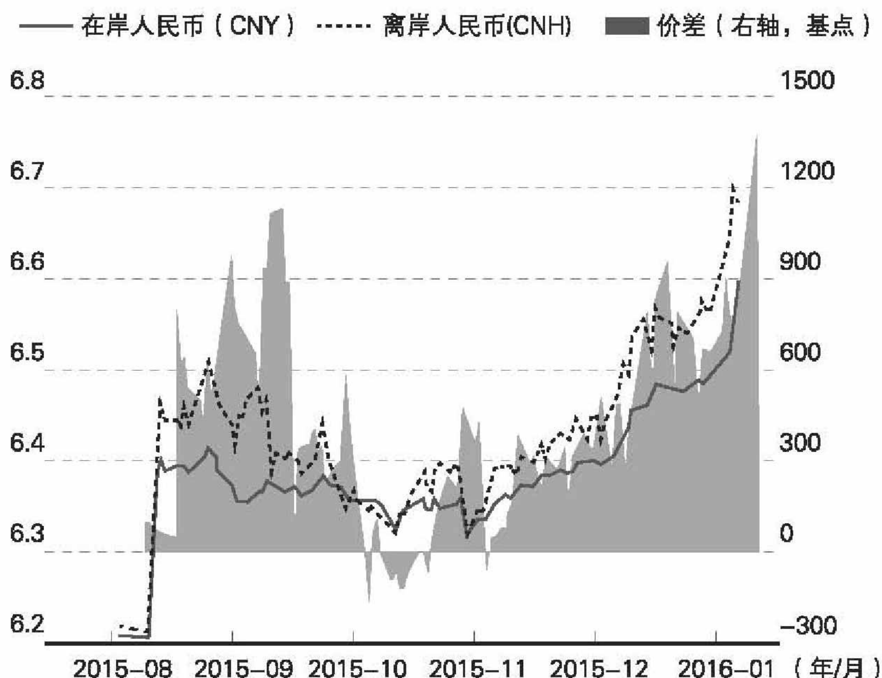


图1-5　境内外人民币汇率价差破纪录

市场普遍认为是中国的货币当局多番利用不同的市场操作，防止人民币汇率急速下滑。这种不寻常波动也反映了国际对冲基金有做空人民币谋利的企图及部署。直至2015年年底，离岸人民币全年累计下跌

5.3%，在岸人民币全年则累计下跌4.5%，为1994年以来最大跌幅。811汇改后一年间，人民币由高位已下跌8%。

自2015年8月11日人民币汇改以来，央行通过多种市场操作以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仅2015年8月中国的外汇储备就下降了939亿美元。[69]

据估计，由2015年8月启动汇改至2016年3月底，为了支持人民币汇率，中国共出售逾4800亿美元的外汇资产。外汇储备从2014年6月接近4万亿美元的峰值大幅下降至2016年4月底的3.22万亿美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明指出，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最近3个月内，每个月的外汇储备缩水规模接近1000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被用于干预外汇市场。[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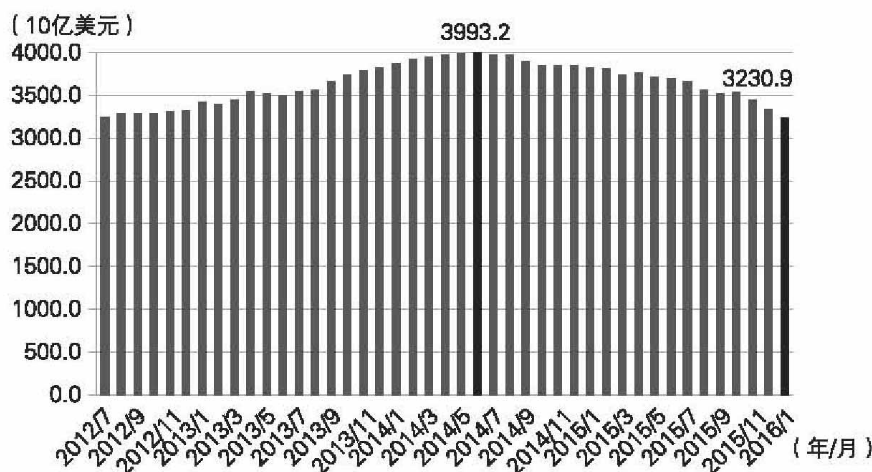


图1-6　汇率维稳的代价

人民币贬值加速了本来的资金外流趋势。另一个隐忧是国内的富裕阶层开始抛售人民币买入美元等外币，或者在海外购置产业，把资产美元化或外币化。调整人民币中间价形成机制后，中国国内汇市每天都有300亿到400亿美元的外汇交易。其后外电引述消息指出，中国政府大举抛售美债，金额估计1060亿美元，以缓和人民币过度贬值的压力，也可能是为了应付汇市大量的人民币兑换美元需求。资金以正规及非正规方式流出的情况趋于严重。某些报道甚至指2016年1月至9月间，大陆地区的资金非正常流失高达21400亿元人民币。虽然此数字准确性目前缺乏实证，但资金以非正规方式大量流失的情况令人关注。这方面俄罗斯的

教训可为佐证：俄罗斯危机恶化的其中一个原因，正是国内资产权贵阶层大量向国外转移资产。

E7比较研究表明，越是借助国家赋权于信用体系形成高度“去在地化”的金融资产阶层，越是异化于本国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会自发地对本土社会、国家和民族怀抱忠诚，除非受制于严格和有效的制度约束。历史已经一次又一次印证，金融化财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流动性获利”特质，决定了金融化资产拥有者内生性地跟从金融全球化的意识形态，这是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规律。任何新兴国家的政治家若是以为不断向“先富”起来的金融资产阶层让利，就可以吸引他们留下来同舟共济，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个历史教训值得人们深切反思。

究其原因，在于金融资本的特性之一即依靠流动性获利。故而，作为最具有“非在地化”的资本形式，在资本运动中必然体现出“金融资本无国界”的特征，这也是全球金融资本共同的制度要求。因此，金融资本，不管是国内资本还是国外资本，对于在地化的民族国家都没有“忠诚”可言，其“亲和感”的对象只能是金融资本主义核心地位的国家或地区，即全球化金融资本流动的核心，例如美国或美国操控的伦敦、东京。

在一定程度上，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就是新自由主义[71]。近年来中国的顶层设计所提倡的深化金融改革，在政策解读过程中常被某些部门和部分学者曲解为新自由主义政策思路，试图背离国家核心经济主权性质而跟从货币霸权国家的金融帝国主义，甚至反对“在地化”情感认同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相对于19世纪到20世纪旧的产业资本阶段的帝国主义“老三性”（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72]，当代的金融资本更具有“新三性”：流动性、短期性、集中性。其中，流动性获利是金融资本的第一大特点，其他两个特性是派生的。因为追求流动性获利，就必然有短期性的、集中性的进入和退出。只有追求流动性才能实现资本获利，所以它希望全球都没有国界；同样，除了认同以军事力量维持货币及金融霸权的核心国，金融资本家也是无祖国的。据此，当代的新金融帝国主义也是“非在地化的”，它并不需要占领其他国家的国土，而是货币霸权国通过各种地缘政治操作及巧实力，弱化目标国的主权，以极大化核心国的币缘-地缘利益。

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定义为唯一的自觉阶级，在于他提出的“无产

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这就是所谓的“工人阶级无祖国”。但工人阶级没有实现“工人阶级无祖国”的国际主义理想[73]，因为产业资本和工人群体大部分是“在地化的”，产业资本的收益需要通过国家进行二次分配。因此，世界大战爆发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并且以摧毁他国产业资本与工人群体最集中的工业城市为战争内容。20世纪60年代以来，有100多个殖民地附属国取得了独立，其中绝大部分由民族解放运动组织成立了国家。而且新生的发展中国家以承接产业转移的国家工业化为奋斗目标，自然更强化了各种形式的民族资本主义。

20世纪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向世界蔓延的历史。其客观经验表明：只要是产业资本在地化发展，就不再有工人阶级单独追求国际主义的条件，尽管左翼运动和进步知识分子仍然把《国际歌》作为某种倾向表达……

相反，在21世纪的金融资本主导全球金融化的历史阶段，投机资本可以注册在开曼群岛[74]、巴哈马群岛，可以注册在任何一个低税制的小国，资本家并不在乎祖国在哪儿。或许可以借马克思的话改成我们的说法：金融资本集团只有完成对全世界的掠夺，才能最终消灭金融家自己！据此，似乎只有金融资本真正在追求以金融自由化为目标的“世界主义”，[75]它们的意识形态正是以“去国家化”为主要内涵的新自由主义。

（二）金融资本主义的最终内爆崩溃[76]

尽管秉持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对中国2015年以来股市连续下跌幸灾乐祸，但其实，“金融资本因异化于实体经济而无祖国”这个现象跟自由主义抑或极权主义也无关，只是金融资本阶段由不分国籍的海内外金融资本家操纵的多空战役的一个历史片段。

中国有些私人资本参与做空，和个别违背中央政府做多意图的国企管理层沆瀣一气，其实都是资本集团的利益代表或参与者，在本质上与海外投机资本并无差别，都不过是根据金融资本主义的逻辑，在资本市场上做“顺周期”操作而无任何良心之不安。

对此，人们应该客观理性地看待国家资本及其有关部门直接出手做多。无论成败，那也只是中国这个历史上通过“剥夺剥夺者”的暴力革命形成的，因而应该对全民承担无限责任的政府尽了其本应尽到的“逆周期调节”责任。

今天更为客观地看，中国2015年发生的股市暴跌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不断深化所带来的结果。既然这种主流政策选择符合金融全球化，也理所当然地使得国际金融资本集团终于得到了历史性的做空中国的机会。显然，中国怨天尤人的股民们还要在嗟叹之余努力提高分析能力，才能理解出卖耶稣的犹大就在身边——“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外部的索罗斯们的作用，远不如中国内部的“邯郸学步”大赛的组织者们。

不过，中国单一执政党制的上层建筑确实能在关键时刻直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2013年新一届领导班子成立之际，中国共产党开始强力反贪，屡破贪腐大案，震撼全国。可见国家审计、监察和金融资本管理部门对占据70%金融资产的国有资本尚能加强约束。由此可知，这个过去每次遇到危机都强制推行国家逆周期调控、致使某些利益集团受损的、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体制，既是中国应对核心国金融资本虚拟化扩张的“比较制度优势”，也是西方软实力及其长期操控的中国学术界攻击的最重要的目标。

如果2015年这一次中国的证券金融监管部门不紧急采取措施，那意味着当股灾全面爆发的时候，就给了国际金融资本集团和国内金融资本集团一次极佳的通过做空来抄底的机会，那将会让中国的实体经济部门输得更加惨烈。这些年通过压低劳工福利、破坏资源环境所积累的实体经济的那点财富，将会先被打压得一钱不值，然后外部资本再一拥而入抄底优质资产。这就像俄罗斯1991年施行的在西方思想指导下的“500天私有化计划”的深化改革新政策，造成本币坍塌、产业崩溃。

延伸阅读8

苏联改革中的“500天计划”

1990年，由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组织撰写的《向市场经济过渡——构想与纲领》一书出版后，被报纸《民主俄罗斯》摘录为《国家向市场关系过渡的500天纲领》一文，也简称“500天计划”。计划指出：迄今人类尚未找到任何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的经济形式，要在从1990年10月1日起始的500天之内，通过各种“非常”政策措施，彻底改变苏联国民经济的基础和结构，转向市场经济，实质是转向资本主义经济，计划以自

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为主要内容。这种方式，后被称为“休克疗法”式激进转轨方式。

激进改革的结果是接连不断的金融经济危机，20世纪90年代卢布大幅贬值。国家资产被外国资本及本土新兴资产阶层廉价收购，积累多年的国家财富被洗劫一空。这个曾经拥有世上最强大重工业产能的国家，其后产业崩溃，出现去工业化情况。国民福利乃至人均寿命及人口大幅下滑。据笔者当年对苏东国家政治改革连带金融解体的实地调查，那是一次政治金融双重做空之后的经济洗劫。

对此，俄罗斯精英事后做了现象的归纳。时任俄罗斯财政部第一副部长的乌留卡耶夫根据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时十分严峻的社会经济情况，得出的结论是：“俄罗斯的经济改革政策不是由改革家的理论思维确定的，而是由通货膨胀危机、支付危机和体制危机并发决定的，这些危机在外部表现为生产的急剧衰退。”

参考资料：[俄]Л.Я.科萨尔斯等著：《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经济与社会》，石天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7页。

整理：逯浩

金融资本如此反复洗劫实体经济，对于金融资本短期来看或许会有好处，但是从长期看，当金融资本把所有的实体经济都金融化的时候，最终将因为多空大战不能继续做下去而导致自身的崩溃，那它自身也就走向了灭亡。因此，马克思主义在提出基本规律的时候早就预见到，当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的时候，就会因金融资本自身的寄生性，而使得它必然是腐朽的、垂死的。[77]

在2016年之后的美国，地产商出身的“非典型”政治家以或明或暗地代表“铁锈带”和“99%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形左实右”诉求参选获胜，成为具有哲学上“否定之否定”意义的标志性事件，随之发生的是这个核心国的战略陡然朝着恢复实体经济转向。在没有新的意识形态解释之前，人们似乎只能理解为从符合金融资本利益的新自由主义转向符合产业资本复兴需要的“新民粹主义”！不管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对此是否有理论解释，这种急转弯却是在被全世界最强大的政治军事机器推进着！于是，无论原来跟从新自由主义的盟友还是来自外部阵营暗通款曲的“战略竞争对手”，都不可能在思想和行动上适应急转弯。

若据此看新兴国家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遭遇的困境，则会发现与本研究做的三组分类有明显的相关性。须知，这个金融资本通吃的世界已经越来越走向“全球竞劣”。最终出现的，是不能遏制贪欲的人类的“多输”结局。

1.币缘战略博弈下金融战争的风险

综合前述两大分析：全球币缘战略及中国内部金融深化所引发的潜在系统性风险上升，中国即将面对一次外部地缘战略强力打压及内部经济危机同步发生的高概率风险。不仅本书做此分析，在当前的全球币缘战略博弈的大棋盘上，不少分析者也指出中国面临金融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金融战争是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发展至一定阶段的特殊国家冲突形式。

控制国际金融及货币制度权的核心国家，需要占有在实体经济中积累利润的“边缘国家”的收益，才能维持金融资本集团的全球统治地位；这种榨取外部收益的特性，导致其势必利用软实力瓦解他国维护金融主权的制度体系，以及采取各种金融手段打击实体经济为主的目标国。例如，利用各种金融衍生工具，集中攻击目标国的金融市场和货币汇率，使其陷入金融及经济危机；或者挑起地区军事冲突，令资金大量撤出；甚至可以以各种理由直接进行金融制裁。其目的是攻击目标国的经济及金融体系，最终削弱其整体国力，达致不战而胜的效果。

此外，金融战争的背后，也必然需要硬实力——军事战略的配合。

假设这个前提：美国的核心利益是美元霸权，为了维护美元霸权，美国必然对任何有潜力挑战美元的货币进行“币缘-地缘”战略打击，不管是20多年前的日元、马克，还是十多年以来的欧元乃至接下来的人民币。那么，E7各国唯有中国在2015年之前一直在软实力屡战屡败之困境中仍然勉强地坚持货币主权！

由此，在2015年金融体系深化改革前，美国还不大可能像对付日本那般，只用一道《广场协议》便能使中国乖乖地自行金融切腹。据此来看，中国的阿喀琉斯之踵，就是随着内部金融深化及人民币国际化而加速推进的资本项目开放。[78]

但美国的软实力进攻，一向是被硬实力所派生的……

美国军事上与政治上“重返亚太战略”，军事干预南海岛礁纷争，多种手段扶持“台独”“港独”，以及西部民族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等，都对中国造成巨大压力。采用硬实力贯彻国家战略的收获之一，就是2015年第7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达成70多项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

①推进自由浮动汇率，加快推进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

②资本项目开放，中方承诺增进外国金融服务公司和投资者对其资本市场的参与，特别是开放债券市场；

③降低美资对华投资收购的限制；

④允许外资评级机构发布对地方政府债券的评级。

众所周知，全球金融评级服务由几家西方公司垄断，并且它们在美国次贷危机中表现出了为了利益纷争不断不专业和不诚信嘴脸，其本身就已经是信用破产的状态，甚至理应被追究法律责任。可是今天它们还控制全球的金融评级，赚取庞大利润。中国容许外资评级机构发布对地方政府债券的评级，等于让外国人操控本国的融资成本。当条件配合时，只要这些评级机构下调对中国的评级，国内的地方融资成本就会大幅增加，甚至直接引发债务危机象征的国家信用危机。

在美国把主要军力投向中国周边、造成战云密布的环境下，2016年6月的第8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国首次决定给予美国2500亿元人民币的RQFII额度，该额度仅次于此前中国香港的2700亿元。目前，中国总共提供RQFII额度1.21万亿元，遍及16个国家及地区。据报道，中国人民银行更计划下一步在美国设立人民币清算行。虽然RQFII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制度进程，但一次性给予美国额度之大，明显期望以给予利益的方式来拉拢战略伙伴关系。

但这也是双刃剑，实际上给予了国际资本协同做空中国金融市场的条件。

也许中国的经济决策者有必要更多了解本书对新兴七国（E7）国家纳入全球化的教训的研究。如果不清醒认清中美正在解除耦合关系的重大币缘-地缘变动现实，还在一厢情愿地憧憬所谓的中美大国新型战略合

作关系，以为单方面向美国为首的国际资本开放让利，便可以成为平等的合作伙伴，那无异于给对方送上武器，再引颈待戮。

在E7比较研究中，我们吸取2015年中国股市的教训，认为金融管理部门应该加强防范金融风险。而对资本流动的适度管制是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假设国际金融资本成功多方配合做空中国的金融市场，引发股市、银行和信托等领域的全面信用危机，中国央行在救市的过程中大量消耗外汇储备，外资撤出及国内富裕阶层把资产美元化并且转移到国外，便会同步爆发国际兑付危机。那么，接下来中国别无选择。国际资本一方面可以趁低廉价格吸纳中国有价值的资产，另一方面美国可以根据《中美投资协定》要求中国变卖最有价值的国有资产进行偿付，并且进一步瓦解中国的经济主权。[79]如果中国因内部发生重大变革而拒绝履约，作为全球金融制度安排制定者的美国，便可以启动它近年操作完备化的最低成本、最大杀伤力武器——金融制裁，[80]更不用说能源及粮食禁运等其他贸易制裁武器。

一旦中国经济元气大伤，若不选择屈服，就只能面对最后的战争。如此来看，中国人似乎亟须同仇敌忾地唱响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2.国家金融安全机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逐利本性驱动的金融深化，必然引发潜在的系统性风险上升。自2007—2008年经济大危机后，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内生系统风险一直维持在高水平。

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发展借助IT业的技术创新，到21世纪之初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居高不下！因此，如何防范内外金融风险伤害国民经济，对每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巨大挑战，尤其是对在国际金融制度权下处于相对较不利位置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其中，以E7为代表的不甘沦为附庸的新兴国家，不得不面对外部地缘战略的强力打压，以及内部经济危机同步发生的高概率风险。

经历了早前盲目急促的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恶果，中国的政策顶层近年似乎开始痛定思痛，几次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有关部门遂展开大规模反腐斗争，清理财经部门。2017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把金融安全上升至国家安全的最高层面。7月14日中国

设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领导金融安全工作。监管当局也要严防国内资本外流到美国的泡沫资产市场接盘。2019年明确提出“金融供给侧改革”之后，又在2020年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名义，在对“违纪”的银行高管通报处理的官方文件中，首次把“不执行中央关于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作为处罚的依据。

国家综合管理金融风险的能力，将会是影响这一轮新冠肺炎疫情破坏全球供应链，造成产业大转移中的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3.金融化加速与去工业化的综合性危机

20世纪后期，除了东亚的日、韩和新加坡等尚能维持部分关键设备制造业之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资本相继大规模转移到包括E7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欧洲的金融资本，主导国家危机爆发的主要表现是股灾、本币大幅度贬值或债务违约……中国这种产业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爆发危机，主要表现是企业倒闭、工人失业[81]；但中国近期在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升级阶段，则有综合性危机的多种表现。

我们在2013年出版的《八次危机》里已详细分析过，1997年和2008年中国经历了两次严重的输入型危机，都是因为中央政府仍然维持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加之“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农村还能发挥作为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再配合其他应对措施，产业资本集中的城市因此没有爆发大规模危机。

但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再次遭遇输入型经济危机之际，虽然中国于2017年启动了“乡村振兴战略”来应对，却发现过去实现软着陆的经验未必还能奏效。因为，经历30多年的城市化进程，通过“撤村并镇”占用大量农村建设用地，特别是2013年开始的急速城市化，以及2014年确定全面深改促进农村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要素的日趋商品化，农村作为综合性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已大为削弱。2015年的这一次对外开放资本市场为诱因的输入型危机直接造成2016年经济增速下滑，而如果“去工业化”造成的大批失业人员再也不可能回流已经被城市化破坏的乡村，那就意味着有可能发生内生叠加外生因素的综合性危机的硬着陆，恶化本已严重混乱的社会局面。如何化解新中国成立以来第十次综合性危机，是当前最严峻的考验。

4.农业对国家应对危机的基础性作用

任何一个民族，必须有自足的或至少能维持基本粮食安全的农业生产力和完整工业体系，才算是真正独立自主的民族。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向金融资本阶段升级，改为按照市场交换计算增加值的GDP统计体系之后，那些维持传统农业并且有功于全球资源环境可持续的国家，才因农业很少直接入市交换，而无一例外地在GDP竞争中落败，被认定为“贫困国家”。

但若从既往教训看，若忽略了农业对国家安全的基础作用，无论一时的GDP增长多么耀眼，也可能只是南柯一梦，最终都只会落得依附他国任人宰割的下场。

综观历史，任何一个曾经主导国际秩序的大国，都必须兼备强大农业生产力、先进工业能力及货币权，缺一不可。无论是荷兰、英国，还是当前的美国，都不例外。这本来是稍为研读历史便明白的常识，如果读了一些根据金融意识形态而编修的“先进”教科书，以为经济是线性发展过程，发展工业就要牺牲农业，然后发展金融服务业便可以放弃工业，却无视美、欧、日这些最先进、高度金融化的国家，不惜花费大量的财政补贴保护本土农业的简单事实，那就只能是脱离实际的空想主义。

那么，谁最乐意推进这些“先进”教育在世界上的广泛传播呢？正是在“后冷战”阶段就已经把握住单极霸权的核心国家——不仅始终坚持直接补贴来保护本国的强大农业生产力和高科技工业体系，而且可以利用增发货币及其背后的金融霸权去操纵大宗农产品期货投机，以资本优势及价格竞争来瓦解他国的农业和农产品加工工业，最终得以使用粮食武器威胁他国主权。

中国用了几代人的血和汗，总算解决了温饱问题，不仅农村接近于实现小康社会，而且是世界上少数拥有完整产业体系的国家。据此来看，目前中国综合国力的根本支柱，不是那数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也不是一下子可以吹胀，然后一下子又可以被戳破的金融资产，而恰恰是基本农产品能够相对自给的农业和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

七、中国面临重大战略选择

“危机”，中文字义本来就是危中自有机。而英语的crisis，其希腊语

字源为κρίσις，意谓“分歧点”“选择”。我们多年来提出危机论，并非为了吸引目光而危言耸听，而是坚持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揭示经济现象的周期性，更重要的是提醒世人，每次一个国家面临危机时，其实都是面临发展路径策略的抉择。

中国古代哲人老子强调“反者道之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家。进入21世纪的中国正在自觉推进向生态文明的战略转型：在成为国际直接投资最高，并由此进入高增长的2003年，提出了“放弃单纯追求GDP”，确立了“科学发展观”；在仍然维持着高速增长的2007年提出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并且在2006年确立了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两型经济”发展目标：2012年换届之后新一届政府进一步确立生态文明发展战略；2015年明确强调深化生态文明改革的政策；2017年确立了有助于生态文明转型的“乡村振兴战略”……这些步骤表明中国已经确立了21世纪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发展目标。

但在上百年的产业资本阶段已经形成了老的利益集团，在21世纪金融资本异化于实体经济的过程中也正在形成新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不仅同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发展有机结合思想的执政当局，而且与社会公众之间都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也各自有利用新媒体及理论界的利益表达方式，因此，当前中国仍然面临两种发展策略或称经济领域的“两条路线”的选择。

第一条路线是深入贯彻两届政府明确提出的真正意义的生态文明发展战略。

中国如果对生态文明发展战略做出统筹协调，则需要针对复杂的利益集团形成各个不同层次的有效利益协调机制。产业资本内生性地要求标准化的规模经济，其与生态文明的矛盾在于后者的核心是人类与自然的多样性可持续。后者在发展战略上的内涵，首先是全面发展多功能的生态农业，在维护生态资源可持续的条件下改善小农生产和生活，维持中国社会的土地制度稳定基础，保障粮食主权，保证国民能享用安全的农作物；其次则是保护完整的工业体系，并按照生态文明思想下的产业政策加以优化升级。

承接这套生态文明战略的载体，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乡整合；而非有关部门几十年坚持的把“产业集群”叠加在城市带上的反生态方式。

中国虽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无疑付出了极大的生态环境及国民福利代价。这套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究竟是为了把污染留在国内，然后把商品输送到外国供人消费，还是服务于整体国民福祉？

中国必须大力保育生态环境，优化产能及产业结构，提升国民的整体生活水平（不仅是增加现金收入，还包括环境、医疗、教育、文化等），共享发展成果。而从生产环节征税向财产税为主的税制改革，无疑是其中的关键环节。虽然应该扭转过往在“亲资本”年代制定、倾向资本利益、由雇员劳动者主要承担税负的财税体制及名目繁多的行政收费制度，但这显然会遇到新资产阶级的强烈反抗。另一方面，则应该创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及保护生态资源的税收环境，并大幅增加资产持有、转移的税负，使资产性收益不过分高于产业平均收益率，以免资本过度集中，流向寻租性及投机性的金融化项目。

至于金融，它的功能本来是为了创造流动性及调动剩余流动性以服务于实体产业的发展、促进技术的研发，以及保持商品和服务从生产至消费过程的资本循环的畅通。它应该是吸引价值投资者（value investors）的低调、沉闷的功能化金融，永远不能喧宾夺主，成为只吸引非短期投机者（short-term speculators）的泡沫化的、以流动性获利为目的的虚拟化金融。然而，对这种传统功能的制度维护，显然与正在要求扩大金融开放的利益集团构成了冲突。

于是，第二条路线恐怕是推行占据主流话语权地位的既得利益群体所要求的全面金融化。

2003年国际直接投资带动中国外向型经济高增长，外汇同步增加促进人民币对冲增发，这使得中国金融资本在最近10年间高速扩张，在总量上可与美元和欧元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这时候，若中国也按照核心国家向金融资本阶段跃升的“现代化”经验来走，则进一步的发展策略就是加速金融衍生品的发展，靠资源资本化和价值虚拟化使金融资产价值急速膨胀。诚然，从核心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往往都会吸引一般中小投资者在高位时进场，变成实质上形同赌场的不平等零和金融博弈。并且，金融资本寄生于城市化核心地带的“中央商务区（CBD）”，资本高度集中，时刻伺机以短期炒作实现流动性获利，使得大城市产生的GDP增量最多。这也是很多城市政府热衷发展“总部经济”的内因。

有些金融机构增加朝向农村的流动性释放——推动“资本下乡”，其

中不少资本是投机性的。其不是为了发展稳态、多功能的生态农业和新乡村建设，而是把农村土地货币化、金融化，并据此占有空间生态资源的资本化收益。

本来，资本主义从产业资本主义朝向金融资本主义发展，源于资本逐利的强大冲动，这是资本运动的规律。中国国内的金融资本利益，期望打造优质的金融资产池，并开放金融市场吸引国际资金流入，其中具有庞大的潜在利益期待。但在中国的金融资产真正发展成为优质的国际避险资产之前，如何防范因为激进的金融化及资本市场过度自由开放而爆发内生及输入型的系统金融风险，最终祸及整体国民经济？如何避免未见金融资本所渴望之利而反见一般百姓所受之害？这是金融精英必须向国民郑重说明的关键问题。

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促使全球化处于解体的十字路口上，中国的高层决策者需要顶住国内外金融利益集团的强大压力，按照既定战略选择，真正走向生态文明为内涵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经过2012—2013年全球危机深化，新兴七国大部分堕入“发展陷阱”，导致全球需求显著下降之后，中国领导人于2013年把生态文明确立为国家重大战略，2017年提出把生态文明转型与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起来，这是近百年来追求中国模式的现代化的又一重大历史抉择。

本研究的理论创新，就在于强调核心国金融资本恶性扩张的“双重成本转嫁”主导了E7各国危机的演化。其中较特殊的现象是：全球危机之下E7各国相继堕入“发展陷阱”之际，唯有中国仍然保持贸易盈余和外资进入“双重增加”，同期造成国内货币大规模“对冲增发”，而迅速向金融资本经济跃升！由此可能演化为以下两种情形。一方面，中国作为人口众多的超大型国家，因坚持金融主权而得以在自己国家范围容许金融资本异化于实体经济，这是与没有条件实现资本市场和外汇兑换管制的其他六国的体制最大的不同，但也构成了通胀基础。所以，在美国2018年发起贸易战、2019年公开把中国作为排名第一的对手而发起“新冷战”、2020年借助疫情推行“去中国化”的打击下，一旦外资逆转为净流出，就必然引发中国金融危机。另一方面，更为吊诡的是，本来就只“善谋内事”而不善于金融资本国际竞争的财经高官们，在内心对美国主导金融秩序认同的情况下，却反过来被这种制度牵着鼻子走向中美金融资本对撞！

好在，中国早在2013年就确立了朝向生态文明的重大转型，2017

年确立了支撑生态文明转型的乡村振兴，2019年推出金融供给侧改革，2020年遭遇“去中国化”，则提出“国内经济循环”的对策。这些堪称未雨绸缪的大政方针，都有助于中国应对全球化解体这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第二章　土耳其：地缘格局重构中的“土耳其症候”

当美国借助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破坏全球供应链的历史时机发起“新冷战”，老调重弹地提出冷战时期的“一个世界两个体系”之际，大多数非核心国家不得不选边站。由此，我们在本章中提出“土耳其症候群”（Turkey Syndrome）[82]的尴尬，对于任何试图被接纳为“半核心”或“半边缘”国家而言，都如同人们本来就知道“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那样值得反思……

西方媒体将土耳其长期面临的经济状况归纳为“土耳其症候群”，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该国在全球化经济分工中由特定角色所决定的经济现象。但我们认为，只有把土耳其在东西方之间占有的特殊地缘政治位置分析纳入“症候群”之中，方能全面理解土耳其的特殊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土耳其的经验教训更多归因于地缘政治。“得也地缘，失也地缘”，这就是“土耳其症候群”原因的概括性表述。图2-1则形象地、直接地说明了土耳其所遭遇的尴尬。

土耳其地跨欧亚大陆、扼守北方国家南下地中海的战略要冲。作为综合国力曾经很强的伊斯兰国家之一，土耳其原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世纪20年代以来就开始推进西方化……按理说，历经近百年从精神到物质的全面西化改革，核心国主导的西方早就应该认可其梦寐以求的半核心国地位，但实际上，土耳其却被核心国及其战略性从属的半核心地区的西方国家一致“排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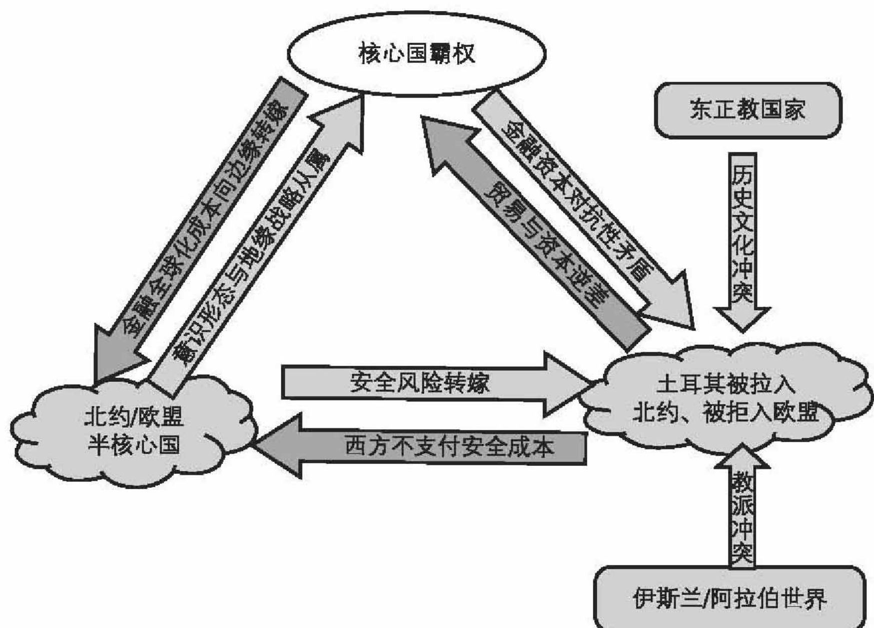


图2-1　地缘政治、宗教文化与土耳其发展的多元悖论

于是，土耳其虽然拼尽身家，但至今在“核心—半边缘—边缘”的依附性结构中，也只是“半北约＋0欧盟”的次级半边缘地位。

这个次级半边缘的尴尬国家，与20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解体之后的那些国家类似，只不过被“后冷战”意识形态包装成甘饴美味，使那里的主流们自欺欺人地强调为“享受”新制度。唯有曾经同处于核心地位的俄罗斯人不甘食其残羹冷炙，遂于21世纪做再度奋起之“悲剧性”的努力……

实际上，土耳其之所以被西方当作地缘战略要冲和前沿，根本原因是大力推进西方化改革使其“四面受敌”：其与欧洲之间还隔着被西方势力人为地边缘化了的斯拉夫东正教地区；其与美国构建的亲美伊斯兰国家之间，也隔着被西方势力先培植后抛弃的边缘化的宗教极端主义和不同教派冲突地区。

这一带的复杂宗教族群文化被冷战意识形态长期浸淫，再叠加大国分割控制的地缘政治环境，导致土耳其的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目前正面临“东西”两难、回归伊斯兰世界更难的“多元悖论”。其在产业资本阶段或多或少地还算能够占据的地缘优势，反而在金融资本阶段造成土耳其的发展停滞。

“二战”后，土耳其以其地处欧亚大陆之间、扼守苏联南下通道这种独特的地缘位置，成为西方世界不可或缺的战略盟友。一方面，其因为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被纳入北约，长期得到美欧的军事援助，国内也按照西方模式推行多党制议会民主；但另一方面，却遭遇欧洲对土耳其进入“半核心国家”的双重标准：军事利用，经济排斥——无论怎样认同或照搬西方体制，仍因国家政治中的宗教内涵和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而不被认为是欧洲国家，也不被允许加入欧盟。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土耳其也与中国一样，与经过初步工业化势必融入国际贸易、接受西方产业资本转移的“转轨国家”类似，改变以往发展国有企业的方针，在推行私有化改制的同时朝外向型经济转变；并且，在经历21世纪初的严重金融危机后，2002年上台的正义与发展党（AKP）加快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其主要内容仍然为将国有资产私有化，这使土耳其赢得国际投资者的青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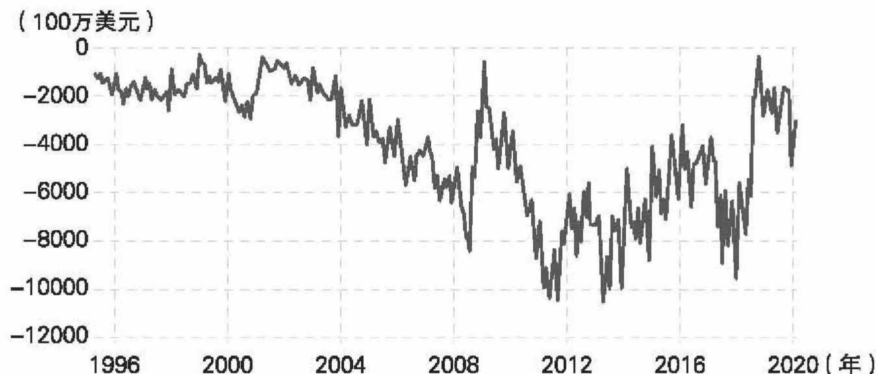
但这比其他国家外资流入造成短期资产价格提升效应的情况更差，因为土耳其是遭遇金融危机、资产价格下跌的时候推进私有化，只能短期得到外资流入带来的资本账户盈余，却并未带来所期望的经济活力提升，反而加剧了国民收入分配失衡[83]，经济发展动力始终摆脱不了金融泡沫化，发展的基础难以稳固。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以来，海外需求持续下降，幅员相对狭小的土耳其难以转为内需拉动，于是经济增速放缓，增长陷入停滞。

以下各方面可以说明土耳其当前经济的脆弱性。

一、国际收支经常账户及贸易持续赤字

土耳其数十年来一直录得贸易赤字，如图2-1所示，在2000年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后更加恶化，这说明其私有化引进外资的经济改革并没有加强本国产业的生产力。尤其是中东国家在美国实行量化宽松政策时期，连续向历史期货市场注入过大流动性，造成价格暴涨，并且因食品短缺而导致“颜色革命”和内部战乱以来，大量难民涌入，不仅恶化了财政及贸易赤字，而且使其长期化。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土耳其统计局。

图2-2　土耳其贸易差额（1995—20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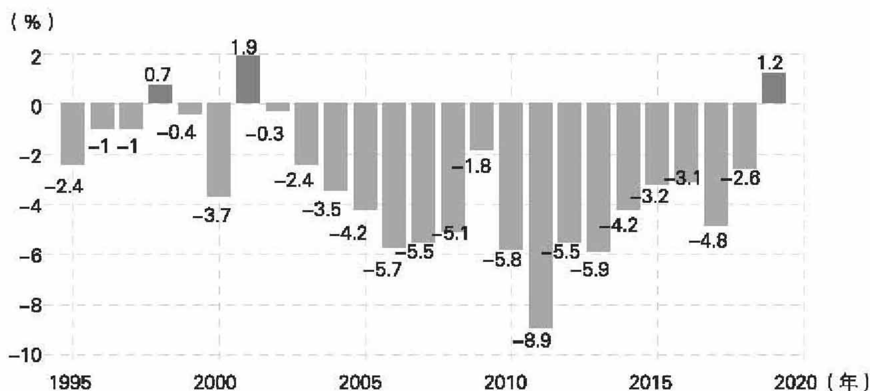
图2-2表明，土耳其的国际收支经常账户在2001年美国IT泡沫崩溃危机之后的2002年开始形成逆差，2004年以后逐渐恶化，2009年全球危机导致欧洲债务危机，2011年土耳其国际收支经常账户逆差触底。换言之，即便私有化改革当期吸引了国际资金流入，其主要目的是“抄底”获利，但总体而言土耳其十多年来是持续处于资金流失状态的。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土耳其中央银行。

图2-3　土耳其经常账户（1995—20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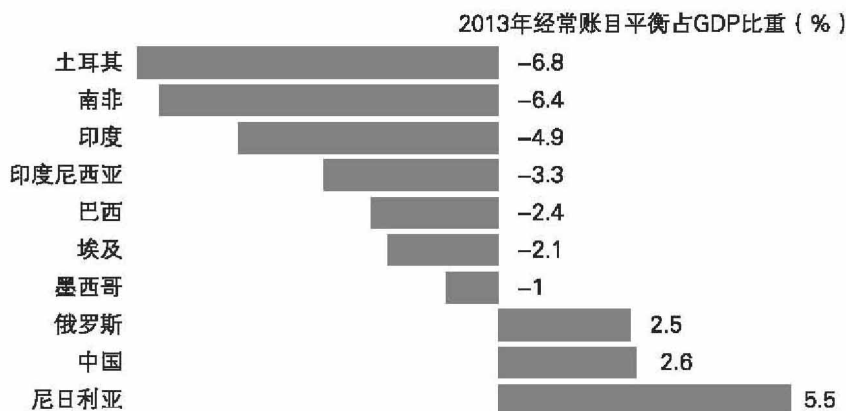
图2-4中数据表明，土耳其的经常账户逆差在2011年曾经达到GDP的8.9%的规模。贸易差额及经常账户都常年处于赤字的外向型经济对本国的经济必然存在长期的负面影响。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土耳其中央银行。

图2-4　土耳其经常账户占GDP比例

图2-5中，2013年土耳其的经常项目赤字与GDP的比值为6.8%，几乎3倍于巴西、2倍于印度尼西亚，为新兴七国之冠，紧随其后的是南非、印度。



来源：Quartz | qz.com；IMF估算。

图2-5　新兴国家2013年经常账户平衡与GDP比

事实上，近年新兴七国中只有中国和拥有丰富石油及农业资源的委内瑞拉及印度尼西亚录得较长期的持续外贸盈余。

通过新兴七国的比较研究，我们认识到以下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竞争的规律：

只要存在长期贸易逆差，就会形成巨大外债。并且，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官方的外债，都势必转化为国家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对本国主权货币及与核心国家过剩资金交易的汇率构成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该国接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金融全球化的制度要求，放弃对资本流动的管制，就必然遭遇热钱投机做空的金融危机。

土耳其的经验教训，恰好验证了我们在新兴七国研究中总结出的这个规律。

二、外债持续攀升

理解土耳其长期录得贸易及资本账户双赤字的成因，就不难明白该国近年的困境其实与很多陷入发展陷阱的边缘国家相似。具体来说，就是高度依赖外债——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外国投资，以致累积的外债数额持续攀升。换言之，内生资本缺乏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能力。

在对外贸易长期赤字的情况下，偿还外债资金筹措困难，偿付外债本息压力将不断增大，如图2-6所示。除了用本国的资源和资产抵债之外，只有请求债权国减免债务或债务展期；为此，债务国就得按照债权国的要求做出诸多让步。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土耳其财政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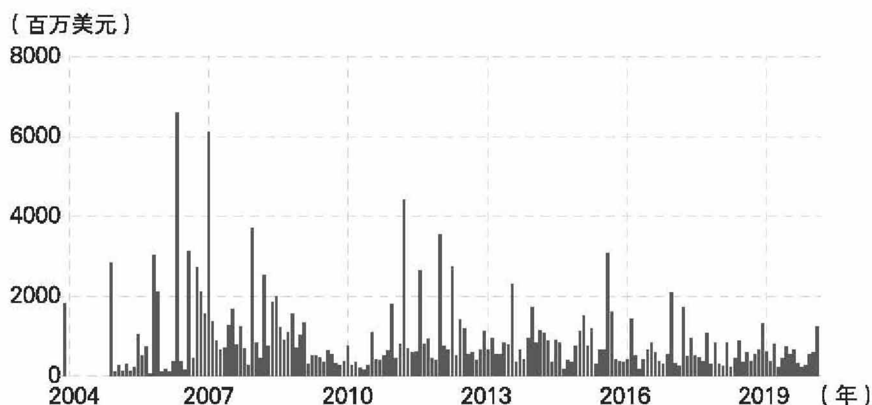
图2-6　土耳其外债（1995—2020年）

但这只是一般情况。截然相反的是，美国作为最大政治强权维护的核心国，其对外的国际债务往往是依靠全球霸权的军事实力和操控金融规则而得到无限展期，或者通过汇率操控而达到实质性的免除。这也是

美国之外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照搬美国“先进”制度的内在原因。

三、外国直接投资与土耳其的外资依赖

经历2001—2002年的多重经济危机后，土耳其以外国直接投资形式注入的流动性在华尔街金融海啸前达到历史高峰，如图2-7所示，主要是跨国公司借助土耳其推进私有化开展并购投资。2008年欧美核心国出现金融及债务危机后，外国直接投资总量曾经急降，其后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令国际游资充斥，加上海湾资金补充，流入土耳其的外资问题再次增加。但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土耳其中央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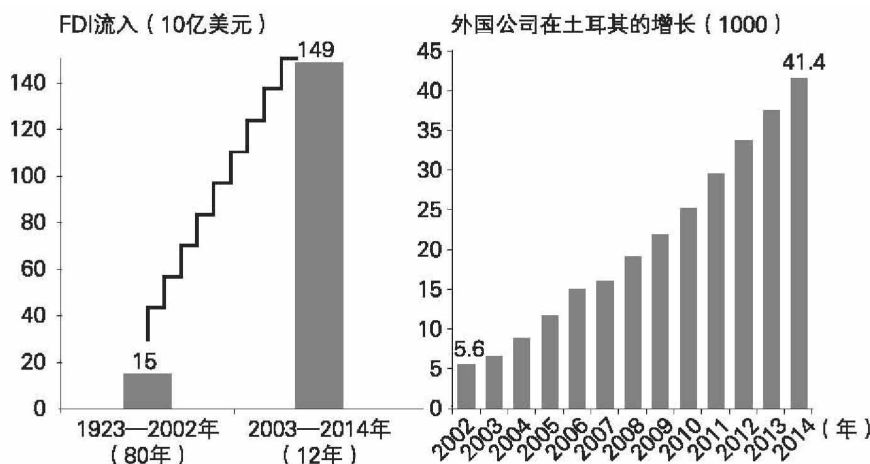
图2-7　土耳其国际直接投资

从外国直接投资对象更替的路径上看，前期靠私有化拉动外资带动经济增长的动能耗尽后，随着外商直接投资下降，主要投入的板块从之前的制造业转向基础建设及房地产，而近年土耳其的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后者。

如图2-8所示，2003—2014年的12年间，外资公司数量增长7倍多；进入土耳其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已经是过去80年总和的近10倍。

21世纪之初外资大规模进入土耳其的客观背景与中国一样，主要是2001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生以IT泡沫崩溃为标志的新经济危机之后，大量产业资本寻求避险流出西方国家，转而投入适合外资，并且基础设施条件好的发展中国家。土耳其得益于其地处欧亚交界之地缘优势和要素价格大幅度低于欧洲工业化地区的比较制度优势，因而有大量外资进

入的现象。



注：土耳其改善投资环境使其成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磁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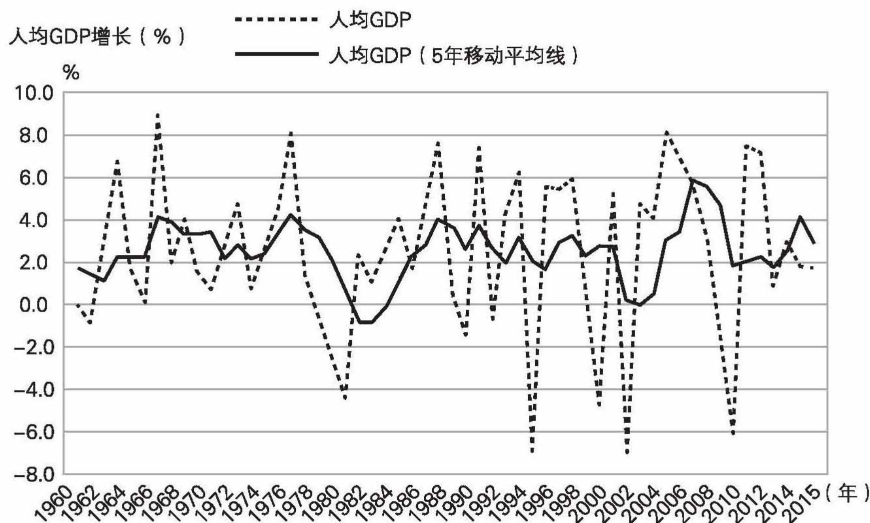
图2-8　土耳其引进的国际直接投资

不过，西方产业资本转移到投资条件适宜的发展中国家，一般都会使接受国的产业经济有短期增长，促使其精英集团把外资流入造成的增长当作政绩。于是，在这种粗俗政治倾向及为其服务的庸俗化意识形态的共同作用下，社会主流几乎一面倒地亲外资。

四、“热钱流入—基础建设拉动”的增长模式成强弩之末

这种外国投资加速发展中国家纳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也必然使之随经济危机周期的全球化而出现大起大落：受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的影响，2009年全球需求明显下降，直接影响接受西方资本形成本国产业的国家——土耳其跟中国的情况相似，都出现了因外需下降造成的经济增长乏力，随之在土耳其国内演变成经济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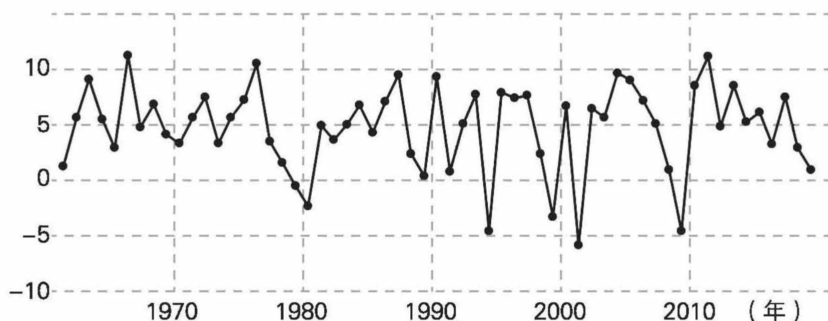
据此来看，土耳其的经济发展之路一直跌宕起伏，如坐过山车般大起大落，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涌入，并未使土耳其形成稳健的增长模式，如图2-9所示。



来源：土耳其统计局/土耳其发展部。

图2-9　土耳其的人均GDP增长率

图2-10中曲线表明，土耳其高度依赖外资及外债的外向型经济缺乏内生发展动力，人均GDP增长率跌破0值的年份分别是1994（-4.67%）、1999（-3.39%）、2001（-5.96%）、2008—2009（-4.70%），与欧美核心国爆发的危机有很强的关联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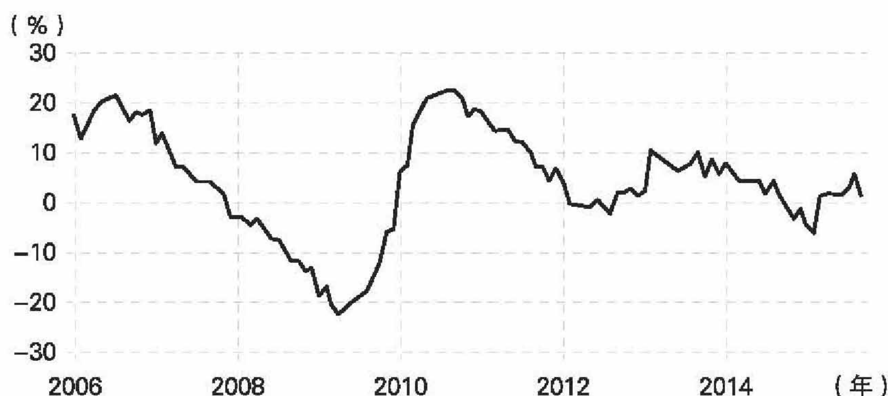


来源：https：//www.macrotrends.net/countries/TUR/turkey/gdp-growth-rate。

图2-10　土耳其GDP年增长率（1961—20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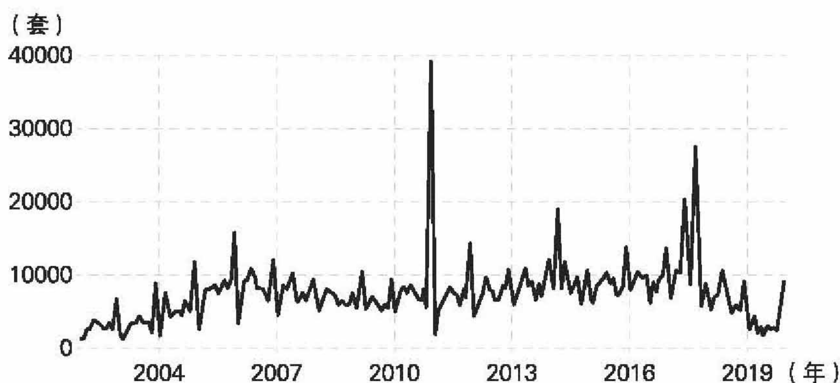
土耳其的经济高度依赖外部资本流入，推动经济增长的基础不稳固。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相继爆发，因外部资本流入减少，土耳其国

内经济出现大幅收缩。其后虽然依靠波斯湾地区资金补充、私人消费（基于信贷膨胀），以及政府在基础建设和房地产领域的公共开支的拉动，经济增长曾经大幅反弹，但当前已缺乏新动力，只能主要依靠发展动力亦趋于耗尽的固定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见图2-11和图2-12）。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欧盟统计局。

图2-11　土耳其建筑部门产出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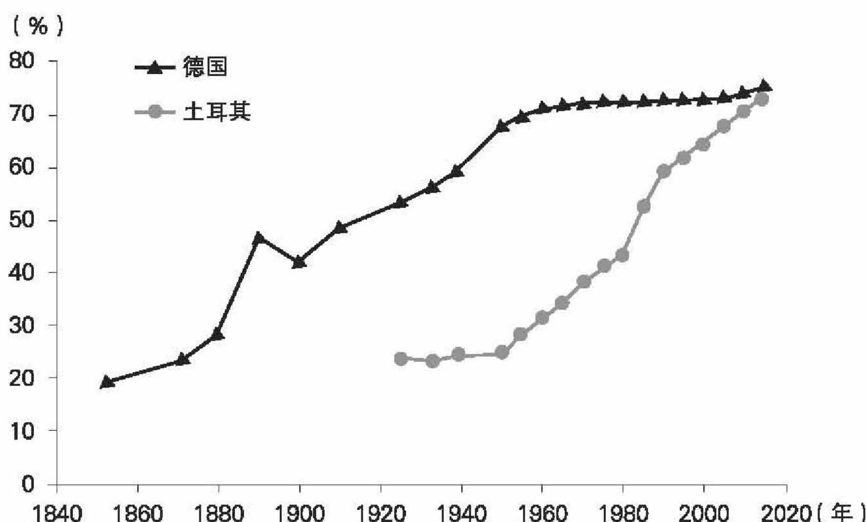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土耳其中央银行。

图2-12　土耳其房屋开工率

如图2-13所示，“二战”后土耳其急速城市化。目前土耳其的城市化率已达欧洲先进国家的水平（2014年土耳其城市化率为72%，德国为75%）。事实上，国土面积狭小的国家投资空间有限，很难长期靠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维持增长。这也是土耳其在达到72%的城市化率

后，经济发展的内部动力“换挡”并后劲不足、日渐衰微的原因之一。



来源：《赫里耶特日报》(*Hürriyet Daily News*)官网。

图2-13　土耳其与德国城市化率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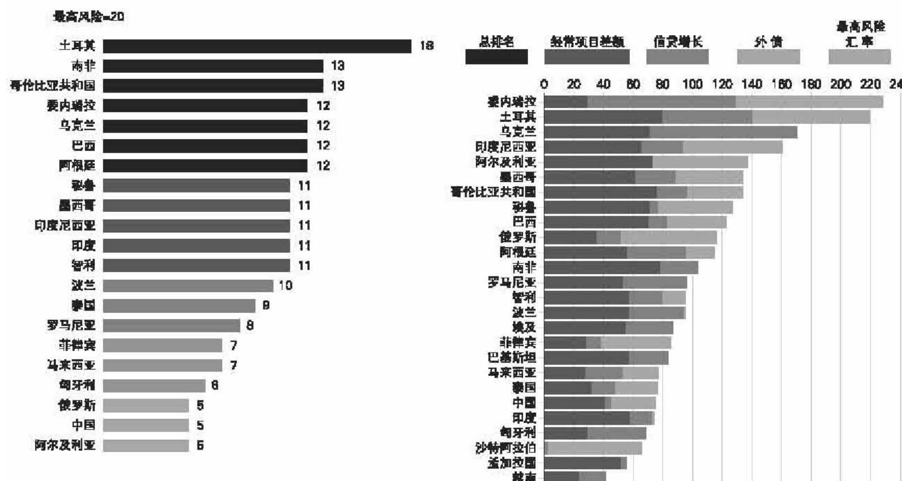
五、“土耳其症候”

土耳其的发展不仅过度依赖外来投资，而且未在外资流入、收益有所增加的高增长时期有意识地形成良性产业结构，也没有像中国那样借助国家干预培养出有效的内部发展动力。因此，土耳其的外资撤出风险是新兴七国中最高的。持续多年的贸易逆差及经常项目赤字、外债不断攀升、经济泡沫化，形成“土耳其症候”。

土耳其“二战”之后开始的多年的工业化努力，曾经建立了较好的工业基础，但近年土耳其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不是强化及提升其工业产能，而是倾向于金融化主导的资本累积（这一点也与中国类似），导致土耳其经济具有泡沫化的性质。

《经济学人》制定的新兴市场资本冻结指数包括经常账户、外债、信贷增长、Chinn-Ito金融开放度等因素，反映了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出风险。

图2-14揭示了E7各国的风险变化。



来源：英国《经济学人》官网。

注：左图12以上属高风险、7—11属中等风险、6以下属低风险。右图2014年更改了指数算法，300为最高风险值。

图2-14　新兴市场资本冻结指数（2012年、2014年）

根据这一指数，在2012年和2013年，土耳其面对资本突然撤出的风险乃新兴市场之最（2014年才被处于严重政治经济危机的委内瑞拉超越），新兴七国中的其余六国，南非、巴西、委内瑞拉处于危险区，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均属中等风险，唯有中国为低风险。直到2014年，印度才降至低风险（注意：此指数并没有把社会矛盾冲突的因素纳入考虑）。

六、排斥性发展导致社会矛盾

2013年5月美联储试探性地释放结束量化宽松的信号，引发全球新兴国家经济的剧烈震荡，也激发各国积累已久的社会矛盾。2013年6月，土耳其出现剧烈的社会冲突，伊斯坦布尔政府计划发展塔克西姆广场及盖兹公园、兴建购物中心成为此次事件的导火索。[84]

塔克西姆广场的所在地又称独立大道，是土耳其独立运动的象征性地标，因近年土耳其靠扩张基础建设及地产项目来维持经济增长，故而伊斯坦布尔市区多处进行拆迁重建，遂引发了千名抗议群众的游行示威，并演变为与镇暴警察的对峙和冲突。这场社会运动也是群众对政府

多年来一直推动新自由主义而刻意对民族国家去政治化的反弹，但当即遭到当局铁腕镇压，造成多人死亡，并且在驱散群众时使用越南战争时用的橙烟，致使多人单目永久失明。为此，同年12月，全国多个城市又爆发针对政府贪腐丑闻的示威，致使政局持续动荡。

社会矛盾爆发的背后原因是土耳其的发展困局。

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市场化改革带来多次输入型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情况相类似，土耳其1989年以来的自由化改革，导致其20世纪90年代经济急剧波动。经历1994年、1998年两次危机后，在2000年1月—2001年2月爆发双重危机——国际收支平衡危机及银行体系危机。严重经济危机导致政治动荡，土耳其遂被迫接受IMF和世界银行主导的结构性改革。

自1999年和2001年的严重经济危机以来，土耳其靠私有化及金融自由化吸引热钱流入，推动并非就业导向的经济增长（就业率仅占劳动力的44%左右，官方失业率在9%—10%，青年失业率约17%），并推行公共财富私有化的结构改革，以此催生投资甚至投机机会以吸引国际资本持续流入，但同时造成国民收入分配不平衡的问题。

田文林指出："在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第一阶段的13年里（1984—1997年），土耳其GDP增长125.8%，人均收入增长60.6%。但接下来的12年中，国民收入增长38.3%，人均收入只增长9.6%，年均增长不足1%。换言之，近30年来，土耳其经济是'有增长无发展'，经济数量看似增加，实际人均收入却在急剧下降。"[85]而这一点，对于采取私有化导向的经济制度转轨的国家而言，是共性特征。

人均收入增长乏力的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平衡问题，两极分化明显。根据瑞士信贷《2014年全球财富报告》，土耳其最富有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0%，所占全国财富比例竟高达77.7%，财富分配不均程度全球仅次于俄罗斯（见表2-1）。

表2-1　2000—2014年各国最富有的10%人口占全国财富比例及变化幅度

国家/地区	最富有的10%人口占全国财富比例	2000年至2014年间变化幅度	国家/地区	最富有的10%人口占全国财富比例	2000年至2014年间变化幅度
俄罗斯	84.80%	7.70%	墨西哥	64.40%	-4.50%
土耳其	77.70%	11%	中国大陆	64.00%	15.40%
中国香港	77.50%	11.90%	奥地利	63.80%	0.80%
印度尼西亚	77.20%	6%	波兰	62.80%	-7.10%
菲律宾	76.00%	-3.00%	韩国	62.80%	9.60%

（续表）

国家/地区	最富有的10%人口占全国财富比例	2000年至2014年间变化幅度	国家/地区	最富有的10%人口占全国财富比例	2000年至2014年间变化幅度
泰国	75.00%	0.60%	中国台湾	62.00%	7.70%
美国	74.60%	0.00%	德国	61.70%	−2.20%
印度	74.00%	8.10%	阿联酋	60.40%	1.30%
秘鲁	73.30%	0.00%	新加坡	59.60%	−6.40%
巴西	73.30%	3.90%	爱尔兰	58.50%	0.30%
埃及	73.30%	12.30%	葡萄牙	58.30%	0.50%
瑞士	71.90%	−1.50%	新西兰	57.00%	−5.30%
马来西亚	71.80%	−5.20%	加拿大	57.00%	−4.50%
阿根廷	71.80%	8.70%	希腊	56.10%	1.30%
南非	71.70%	−0.50%	西班牙	55.60%	1.50%
智利	68.90%	1.30%	荷兰	54.80%	−0.40%
瑞典	68.60%	−1.10%	芬兰	54.50%	−0.50%
丹麦	67.50%	−1.40%	英国	54.10%	2.60%
捷克	67.30%	4.60%	法国	53.10%	−3.30%
以色列	67.30%	4.90%	意大利	51.50%	−1.10%
沙特阿拉伯	66.40%	−6.90%	澳大利亚	51.10%	0.00%
挪威	65.80%	−1.20%	日本	48.50%	−2.50%
哥伦比亚	65.20%	−4.20%	比利时	47.20%	−0.30%

来源：瑞士信贷2014年全球财富报告，观察者网。

表2-1的数据显示的新兴七国的排序为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印度、巴西、南非、中国（缺少委内瑞拉数据）。任何国家可以有不同制度和维护那些制度的不同意识形态，但只要社会财富分配失衡严重，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就势必成为社会动荡之源。

七、从凯末尔主义到新奥斯曼主义

2002年上台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一方面因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

而获得西方的称许及外国投资者的青睐，但另一方面，带有保守主义民粹色彩的新政府调整了土耳其过往亲欧美的外交政策，转向奉行多边主义，加强与伊斯兰世界乃至俄罗斯的关系，因而引起传统西方盟友的不满。

“脱亚入欧，加入欧盟，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欧洲国家”，这曾经是土耳其凯末尔主义者的目标。但欧盟对这个伊斯兰邻居始终抱持文化排异的态度，在欧盟成员身份上设置障碍。虽然土耳其人不满，但不可能改变在同一地区诞生的两种单一神祇的宗教政治对立。随着欧盟发展停滞及陷入债务危机，土耳其近年不再热衷于加入欧元区。

正义与发展党（AKP）倡议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尝试使土耳其从多年追求“现代化/欧洲化”的凯末尔主义转向拥抱昔日作为一个幅员广阔的伊斯兰东方帝国文化价值的新奥斯曼主义，期待挣脱长年作为北约和欧洲的地缘战略前线的角色，成为自主的区内主导性势力。[86]

土耳其这个无奈之中的战略转向，对欧亚非三大洲交界处本来就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造成巨大不确定性和大国介入的机会。

延伸阅读9

奥斯曼帝国与现代欧洲

第一次世界大战瓦解了两个历史悠久而组成复杂的帝国——奥匈帝国及奥斯曼帝国，改写了东欧及西亚广大地区的政治版图，其余波一直影响整个20世纪的地缘政治。

延续了600多年的奥斯曼帝国，在全盛时期是一个覆盖西亚、欧洲东部、阿拉伯半岛、北非乃至延伸到中亚的庞大帝国。在欧洲陷于黑暗中世纪的时期，奥斯曼帝国曾经因垄断了西欧及亚洲之间的贸易而致富，由此带来商业的繁荣，高度发达的科学和文明曾经领先欧洲。虽然伊斯兰的奥斯曼与基督教欧洲长时间处于对立或竞争状态，奥斯曼帝国被视为欧洲势力的边缘，但奥斯曼帝国也是欧洲各国没有全面开拓海上通道之前因国际贸易而不得不接纳的重要政权；在某些时期，因欧洲内部复杂的政治及军事斗争，而与不同欧洲国家建立同盟关系。实际上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各国共同塑造了近代欧洲历史。

17世纪，欧洲借助航海大发现推行殖民化、占有海外巨大收益时，

奥斯曼帝国的发展却开始停滞，并因无力与新崛起的欧洲争夺势力范围而走向衰落。1839年的坦齐马特（改革）法令开启了帝国的漫长现代化进程，但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也推动了奥斯曼帝国的解体。20世纪初，帝国逐步失去巴尔干地区的领地，可以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奏。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正式解体，在昔日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的土地上建立的国家多达40个。欧洲列强瓜分奥斯曼帝国剩余部分的企图，引发了土耳其独立战争（1919—1923年）。苏丹被废除并驱逐，土耳其成为一个世俗化民主政体国家，继续推动现代化，并试图融入欧洲。

整理：黄钰书

八、土耳其近年试图扩张地缘影响力

由于美国近年的地缘战略调整造成近年区内政治形势急剧转变，再加上持续的严重军事冲突，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变得模糊，引起西方阵营“是否正在失去土耳其”的质疑。

在此之前，土耳其在区内的地缘定位是很清晰的，就是作为美欧与伊斯兰世界的中间人，居中发挥影响力，而不是明显地倒向一边。土耳其前外相达乌特奥卢曾经为土耳其的外交策略制定了五项原则：

①强调民主制度与国家安全是相互促进的，民主制是土耳其拥有的软实力；

②与邻国的“零问题政策”（zero problem policy）；

③不仅与临近地区发展关系，还要与更远的地区发展关系；

④坚持多维度的外交政策，强调互补性而非竞争；

⑤实践有节奏的外交（rhythmic diplomacy），即强调对重要国际组织及其活动的参与，并在其中建立和强化土耳其的影响力。[87]

任何党派的土耳其政治家都明白，土耳其的影响力始终在于其扼守俄罗斯南下地中海的通道，而这与霸权国家的战略利益密切相关。这种对西方世界的特殊地缘战略价值，使土耳其不可能只看本国实际利益而

不顾西方的好恶。例如，土耳其一度有意采购中国的导弹防卫系统，最终因为美国的压力而取消了。

但这几年随着区内地缘格局遽变，区内的地缘政治形势变得更加复杂险峻。土耳其对于众多国际问题的立场都引起不少争议，以致有评论称土耳其外交已从“零问题”变成“零朋友”。也许是因为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国内贫富悬殊、社会撕裂，政局日渐不安，需要点燃民族主义情绪转移国内视线，所以土耳其执政党放弃立国以来的凯末尔主义，转而提出新奥斯曼主义，大有复兴昔日奥斯曼帝国在广泛西亚地区具有影响力的宏图，成为地区霸权。粉碎2016年政变企图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国内进行政治大清洗[88]，与西方的关系更为紧张，也因此只能转而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

延伸阅读**10**

土耳其近年积极介入地区冲突

美国耗费5万亿美元，仍然无法在军事上稳住中东，最终只能撤出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出前后，美国改变策略，在中东实行焦土政策。凡是无法在军事及政治上控制的国家，都必须颠覆其政权，引爆地区战争。于是美国、以色列扶植“ISIS”等伊斯兰激进恐怖主义军事组织或反政府力量，接连引发了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的人道主义灾难，难民危机波及欧洲，也间接削弱了欧盟及欧元的力量。

美国的焦土政策虽然取得成效，令欧洲陷入分裂危机，但在对付什叶派国家上，却功败垂成。美国给予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力量武器及金钱的支持[89]，包括“ISIS”等（美国表面上空袭“ISIS”，实际上是为反叙利亚政府武装力量提供空中掩护）。可是叙利亚是俄罗斯在中东的盟友，也是俄罗斯海军可以利用地中海军事基地的重要地缘战略据点。俄罗斯决定强势军事介入，并随后稳住了局势，令叙利亚反政府武装节节败退。美国新总统特朗普最后只得决定取消已投入近10亿美元的中央情报局颠覆叙利亚政府计划[90]。

土耳其对叙利亚问题的立场也出现重大转变。在叙利亚内战初期，土耳其以其一贯北约成员的身份，忠诚地作为美国区内军事行动的后勤，甚至不惧击落俄罗斯战机。但随着受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力量在伊拉克内战及叙利亚内战中不断成长壮大，库尔德建国运动的呼声也日

益高涨，这直接损害了土耳其及伊拉克等国家的领土完整，触动了其核心利益。

当年大英帝国撤出中东时，划定各方势力使他们互相制衡，以便有机会介入继续发挥影响力。在英国的地缘谋划中，库尔德人成为牺牲者，他们不仅无法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其传统民族活动领地甚至被数国瓜分。美国入侵造成伊拉克分裂的结果是，伊拉克北部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被库尔德人控制石油且高度自治的地区。库尔德问题一直是土耳其内政中最紧张的部分。土耳其在叙利亚内战初期，趁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之声势，对境内的库德尔人进行打击。[91]与美国关系变得紧张后，土耳其转而与叙利亚和俄罗斯联手，加上伊拉克，合作打击区内库尔德独立运动武装力量。

美国在叙利亚功败垂成，转而挑拨逊尼派与什叶派国家之间的矛盾。美国总统特朗普2017年5月访问中东期间，沙特阿拉伯承诺向美国采购1000亿美元军备。接下来便发生了海湾国家与卡塔尔断交风波。卡塔尔是一个国土面积很小的国家，除了容许美国建立军事基地之外，一直与中东的各种力量皆保持良好关系，面面俱到，谁都不得罪。尽管如此，以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为首的逊尼派国家也无法容忍，以支持恐怖主义组织及与伊朗关系等罪名，和卡塔尔断绝外交关系，逼迫卡塔尔必须选择站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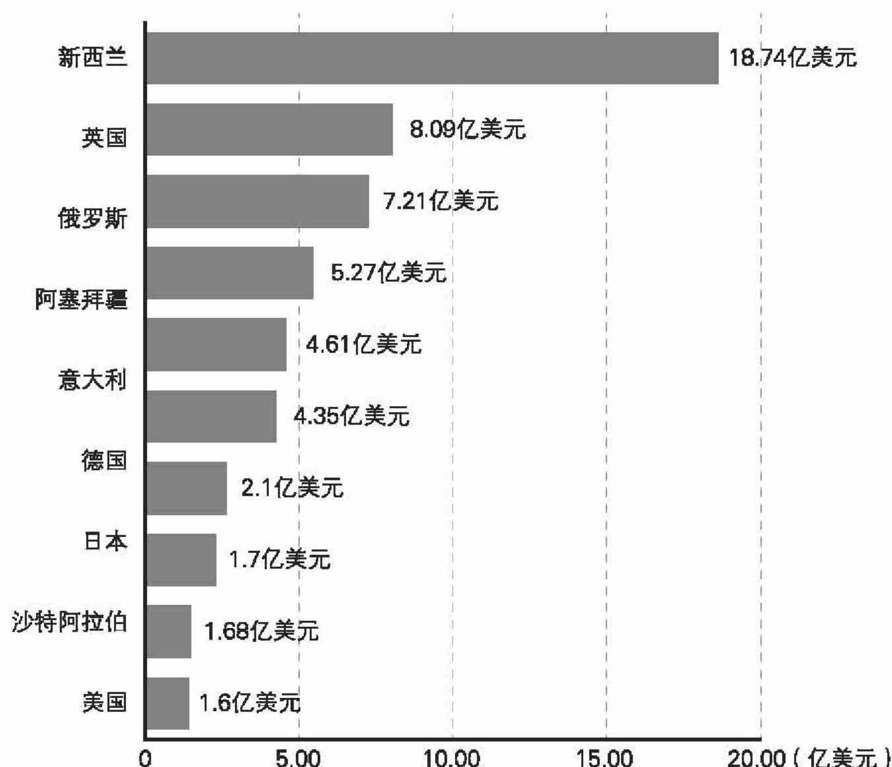
如此一来，美国和以色列背后支持的逊尼派国家与以伊朗为首背后有俄罗斯支持的什叶派国家，剑拔弩张，有可能成为中东爆发地区大战的引火线。

在凯末尔主义影响下，土耳其立国以来一直是最西化、世俗化及多元化的伊斯兰国家之一，无须在逊尼及什叶两派之间选边站。在这次海湾国家风波中，土耳其高调支持卡塔尔，并声称一旦卡塔尔受威胁，愿意提供军事援助。有评论指出，土耳其高调介入中东冲突的原因是需要卡塔尔加强投资。

整理：黄钰书

其实，土耳其的外交取向出现“向东转”也早有先兆，并且有现实的考虑。2008年经济危机后，高度依赖外资的土耳其需要来自波斯湾乃至俄罗斯等“东方”国家的资金来补充减少的欧美资金。

如图2-15所示，2014年1—9月，俄罗斯投资位列土耳其外资的第三，沙特阿拉伯也超越美国，波斯湾地区的投资基金加重在土耳其的投资。



来源：土耳其中央银行。

注：仅为主权资本流入。

图2-15　土耳其十大投资国（2014年1—9月）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土耳其有动机要摆脱北约，以及作为美国地缘战略前哨的定位，转而积极介入中东地区，试图发挥其地区霸权影响力。

不过，新奥斯曼主义虽然有复兴昔日奥斯曼帝国在西亚广泛地区具有影响力的宏图，但土耳其本身的国力无法支撑其成为这样一个“准超级大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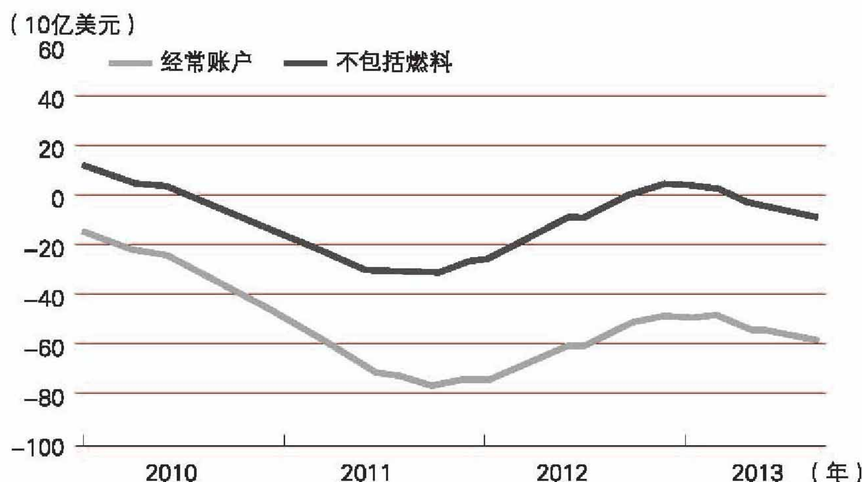
建立一个政教分离、现代化的民主政体是凯末尔主义的重要目标。

但正义与发展党趋向民粹主义的新奥斯曼主义，在区内混乱的局势中愈益卷入民族主义及以宗教教派为名的军事冲突，使土耳其当前陷于非常复杂的地缘冲突局面，甚至土耳其有可能成为区内的火药库，国内的政治及社会冲突也愈益紧张。

九、锐意成为区内能源枢纽

近年作为一个高度依赖石油进口的国家，土耳其积极图谋，发展成区内的能源枢纽，利用北约东扩与俄罗斯的矛盾，以及区域冲突对北线油气管道的负面影响，力争成为欧洲能源供应通道上的重要枢纽。

如图2-16所示，土耳其高度依赖进口能源，并成为贸易赤字的重要部分，尤其是2008—2014年，美联储量化宽松导致国际石油价格猛涨，让依赖能源进口的土耳其经常项目赤字雪上加霜。



来源：哈佛和IMF。

图2-16　土耳其日益严重的经常项目赤字

近年来，土耳其一直争取成为欧洲两大能源管道的连接枢纽。数年前，俄罗斯曾经计划打造一条跨巴尔干管道（Trans-Balkan Pipeline, TBP），把俄罗斯的天然气经巴尔干半岛输往南欧。但随着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此计划进度目前不明朗。相反，欧洲的石油巨擘正积极打造一条接通欧洲及阿塞拜疆里海天然气田的南方天然气走廊（The Southern Gas Corridor, SGC）。这不仅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天然气管道——延绵

3500公里、横跨多国、牵涉以英国石油公司为首的多个投资方共计450亿美元的总投资额，而且也是在地缘政治关系上最复杂的建设项目，因涉及里海“突厥走廊”多个国家，而成为以所谓“大突厥主义”作为民族主义内涵的土耳其借机整合周边伊斯兰教地区的历史性机遇。

构想中，连接欧洲的管道网分别为经巴尔干半岛直达德国的纳布科管道，以及经希腊和阿尔巴尼亚连接意大利的跨亚得里亚海管道（Trans-Adriatic Pipeline，TAP）[92]。计划中，这两条管道都经过土耳其的跨安纳托利亚管道（Trans Anatolian Pipeline，TANAP）。目前，以英国石油（BP）为首的多家欧洲石油公司已组成集团，推动TAP计划。

这两个计划的地缘政治意义很清晰，就是要摆脱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

计划中的南方天然气走廊（见图2-17）由连串庞大的基础建设工程组成，把里海的天然气，还可能包括哈萨克斯坦的石油，通过复杂的管道网络最终输送至欧洲。这项庞大计划的第一部分是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南高加索管道（South Caucasus Pipeline），然后经过土耳其的跨安纳托利亚管道，再连接上分别送往南欧及东欧的管道网。



来源：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italy-greece-welcome-selection-of-tap-gas-%20route.aspx？

pageID＝238&nID＝49620&NewsCatID＝348。

图2-17　计划中的南方天然气走廊

无论是石油、天然气管道，还是铁路、高速公路，任何跨国乃至跨大陆的人员及物流运输通道，都涉及庞大的地缘政治风险，也必然导致复杂的强权博弈。对此，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深层原因的柏林—巴格达铁路计划，是很好的可借鉴的历史案例。

延伸阅读11

铁路与海权、陆权的斗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后起的帝国主义强权德国（普鲁士）基本上是陆权国家。正因为面对英法等海洋大国，德意志统一成一个帝国的首项重要举措正是建立皇家海军。这跟陆上强权沙皇俄国的彼得大帝向西迁都，在滨海的一片沼泽地上建立圣彼得堡，梦想建立强大海权，道理一样。

塔勒布（Nassim N.Taleb）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意料之外的“黑天鹅”事件，但只要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不难理解“一战”是必然发生的事情。

“一战”爆发的深层原因是德国计划修建柏林—巴格达铁路。如果铁路修成开始运作，德国就可以连接西亚的贸易通道，接入广阔的中亚大陆，下面再接通波斯湾，避开英法控制的苏伊士运河，连接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并打开通往亚洲的海路。换言之，英法对地中海的控制权形同虚设。理论上，德国可以因此比英国更快速地动员大量兵力至远东，这将改变当时全球的帝国强权势力格局。当时一位评论家说：“据说拿破仑指出：‘安特普在一个大陆强权手上，英国会感到有如一支手枪指向英伦海岸。’那么，如果巴格达和波斯湾在德国（或其他强权）手上，英国将感到有如一支42厘米口径的火炮指向印度。”[93]

19世纪英国的麦金德提出欧亚非大陆岛的概念，认为区内如果出现一个能整合欧亚非运输通道和经贸的强权，便足以称霸世界。但在实际操作上，还是要配合大陆岛沿岸的海运。

陆权只是相对海权的纯理念，实际上，要挑战海权，必然是依托陆

权的海运条带与大陆纵深相结合。

英国两手准备，一边和德国签好关于柏林—巴格达铁路的协议，迫使德国承认南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的中部及南部是英国-波斯公司的专属利益范围[94]，但转眼便爆发了“一战”。



来源：http：//www.archaeoplan.com/Div01.htm。

图2-18　德国“一战”前构想的柏林—巴格达铁路

“一战”本来不是德国挑起的。教科书上，“一战”爆发的导火索是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被塞尔维亚青年加夫里若·普林西普枪杀，最初打起来的是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德国因自己的利益盘算而参战，奥匈帝国是其盟友，而当时中东地区是奥斯曼帝国的势力范围。柏林—巴格达铁路正好穿越这两个没落帝国的势力圈。

英法参战主要针对德国，理由很清楚。德国是后起之秀，在世界版图上抢殖民地，处处受制于英法，但当时大英帝国实力已经走下坡路，法国也在1871年战败于普鲁士。这两个老牌帝国明白，必须在德国变得过于强大之前扼杀它。1903年，英法签订谅解协议，中止双方在摩洛哥、埃及和苏丹等地的利益冲突，大有同仇敌忾、剑指德国之势。后来新晋帝国俄国也加入英法阵营。

本来中东没有什么利益，但发现石油后就不同了。从20世纪初开始，石油成为世界工业和军事的核心动力。当时的主要产油国是美国，所以美国可以一跃成为第一大工业产能国。波斯在英国势力内，如果德国接通了巴格达，获得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便肯定能成为足以超越英法的欧洲强权。

英国一边打压德国，另一边策动阿拉伯人反抗奥斯曼帝国，时势造就了阿拉伯的罗伦斯这个传奇历史人物。英国还扶植了扼伊拉克入波斯湾咽喉的科威特。19世纪末欧洲强权争霸遗留下的问题，一直影响到20世纪末的地缘政治。

1919年签订的《凡尔赛和约》剥夺了德国对柏林—巴格达铁路的所有产权。[95]

整理：黄钰书

远隔重洋的美国，在土耳其的战略调整中举足轻重。美国自“二战”以来长期称霸地中海沿岸，多年来单边主义的中东政策造成区内一片混乱，引爆永无休止的军事冲突。但近年美国国内的页岩油革命降低了其对中东地区的石油依赖（参阅《专题1　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的阶段性战略调整》），促使美国做出退出中东、重返亚太的地缘战略重大调整。

美国对于中东地区的考虑，是如何在撤出后防止它被收纳成欧洲后院，防止美国在区内影响力下降后导致区内石油结算与美元“脱钩”，出现石油欧元甚至石油人民币。可以说，美国日后的中东政策愈来愈趋向破坏性。换句话说，美国越是低成本退出中近东，遗留的麻烦就越大，或称“成本转移”就越大。

在资本主义进入21世纪初期的金融资本阶段，泡沫化虚拟金融资本的恶性竞争中的主要矛盾仍然发生在美元和欧元两大集团之间。[96]

不可能参与金融资本全球竞争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只能承载金融资本恶性竞争造成的危机代价转嫁，也就必然处于边缘化状态。只有像土耳其这样少数处于大国地缘战略关键点、占据绝对重要的位置的，才有可能成为所谓的“半边缘”国家。历经近百年的努力才达到半边缘地位的土耳其，为了升级到半核心，而可能变成美国在区内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棋子。

不管怎样，“绝对重要”的土耳其长期是个地缘政治中难以稳定的变量。

土耳其一方面仍然是西方世界面对俄罗斯和伊朗的重要地缘政治部署，另一方面也在寄希望于“陆权战略”走出去的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上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理位置[97]，再加上它锐意成为区内的能源枢纽，土耳其未来的发展仍如“二战”后70年来一样，与其特殊地缘战略位置密不可分。

如同奥斯曼帝国因扼守欧亚贸易通道而崛起一样，土耳其未来的发展仍取决于其能否强化对于欧亚非的地缘战略价值。

诚然，上述欧亚大陆上多个21世纪重大战略调整的项目被提出，意味着土耳其可以稳定地通吃各方的地缘收益：从过去扼守黑海到地中海的通道，相当于卡住俄罗斯的脖子；到今后扼守陆上能源通道和“一带一路”客货运输通道，相当于卡住欧洲能源及对东亚贸易的脖子，土耳其的地缘战略地位肯定明显增强。任何世界性大国的崛起，都不可以忽视这个既有历史上的突厥之梦，又有当代伊斯兰复兴之梦的富有挑战性的国家。

但是，一方面土耳其本身的经济结构缺乏国际竞争力，在21世纪的金融资本全球竞争形势下，不可能是一个被核心国认可的稳定的参与

者。但另一方面，土耳其又有位居欧亚通道咽喉的战略地位，在面对错综复杂、日益险峻的地缘政治形势之际，有得天独厚、左右逢源的优势，进而难免抱有锐意成为地区强权的宏图。何况，21世纪以来，大国战略重组内生地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土耳其将要在不可能与任何一方结盟的多面需求中寻找微妙的平衡。

十、中土两国比较

中国和土耳其这两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都曾经在西方列强逼迫下衰落，从而焦急追求现代化及工业化之路，也曾经有过基于民族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崛起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来也发生过类似的周期性波动，而且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接受新自由主义，推进制度转轨。此后，外资大量流入转为外债，接上国际金融资本流动的洪流，并与金融危机的发生有相关性。

中土两国为了吸引外资，都在21世纪推动了改革。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是产业资本大国，虽然有20世纪90年代的“抓大放小”、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股改和第二个10年的混改，国有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仍然占绝对比重。

近年，在遭遇全球大危机之后，不论是中国“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还是土耳其的欧亚能源管道，都深深受控于西方把控的地缘战略。

全球化大趋势之下，中土两国最大不同有以下两点：

一是陆权竞争的态势不同。中国是主权相对完整的原住民大陆和最大原住民人口国家，历史上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客观条件是幅员辽阔、战略纵深广大；土耳其则可被戏称为欧亚之间的“擦脚垫”，历史上就战乱频仍、冲突不断；在奥斯曼帝国解体之后就是主权半依附、半边缘的地位，且因半岛形地理位置而客观上派生出的、没有可能构建战略纵深的次区域国家。

二是中国对国有经济的集中管理被称为“举国体制”，可在遭遇危机时抑制住微观企业利益做逆周期的宏观调控。恰是在这一点上，任何放任外资自由流动的“金融无边疆”的E7都不可比。[98]

进一步比较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和土耳其的能源通道战略，则不难发现：土耳其锐意成为欧洲绕开俄罗斯的新的能源通道；中国则

为了突破美国精心建立的太平洋战略包围圈，以及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印度洋、马六甲海峡这条掌握在他人手上的能源海运生命线，而锐意打造向欧洲和非洲联通的大陆桥战略。这两个国家的“锐意”进取，具有内在的相似性……

如果，位于亚洲大陆东西两端的这两个国家的战略意图能够实现，则似乎应验100年前英国人麦金德提出的世界岛及欧亚心脏地带的理论。虽然亚欧大陆借此能在21世纪重新成为世界中心，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试图通过修建欧亚铁路来改变英法地缘控制，而成为列强战争导火索的教训，仍要注意。

第三章　印度崛起之路：从超前金融化转向发展制造产业

高度外向的印度金融体系曾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受到重创，但其特殊的二元体制中存在庞大的非正规经济，因此，尽管正规部门受影响，但主要由非正规经济支撑的大部分人还是照常生活，没有受到冲击。也因此，当美国量化宽松释放出来的游资寻找高回报率的投资机会时，印度金融市场迅速复苏。尤其是当中国的经济增速放缓时，印度被国际媒体看作将从中国手中接棒的高速增长发动机。大量外资进入使印度金融市场在众新兴经济体中一枝独秀，与美国同步上扬。但以IT服务业为代表的印度正规经济部门只占国民经济的小部分，也只吸纳小部分人口就业。

印度要打造长远稳健的发展基础，必须发展制造业，为大部分人口提供发展机会。可是印度的各种制度，包括成本高昂的政治体制、低效贪腐的官僚体系、土地制度、种姓制度等，均成为发展的绊脚石。印度当然需要改革，但过于急功近利的改革步伐又会引起社会的不稳，以及传统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弹。超前金融化形势岌岌可危。民粹主义政党面对国内矛盾，会有动机煽动民族主义，并推动扩张性的地缘战略，期望在区域的地缘政治中取得好处。如此一来，便如火中取栗，稍有不慎，就会引爆区域性地缘冲突。

一、印度体制的基本特性

印度在意识形态上号称“世界第一民主大国”，在官方政治体制上与西方世界一致——发达国家上层建筑的机构和制度，印度几乎都有。但同时，客观上印度也是世界“第一贫困大国”和即将超过中国的第一人口大国。

这两方面的特征，内含两个相关性很高、难以用西方理论解释却与中国相似的基本矛盾。[99]

（一）两个基本矛盾

其一是“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领域的收益太低，不可能支付发达国家模式的高成本上层建筑。并且，越是少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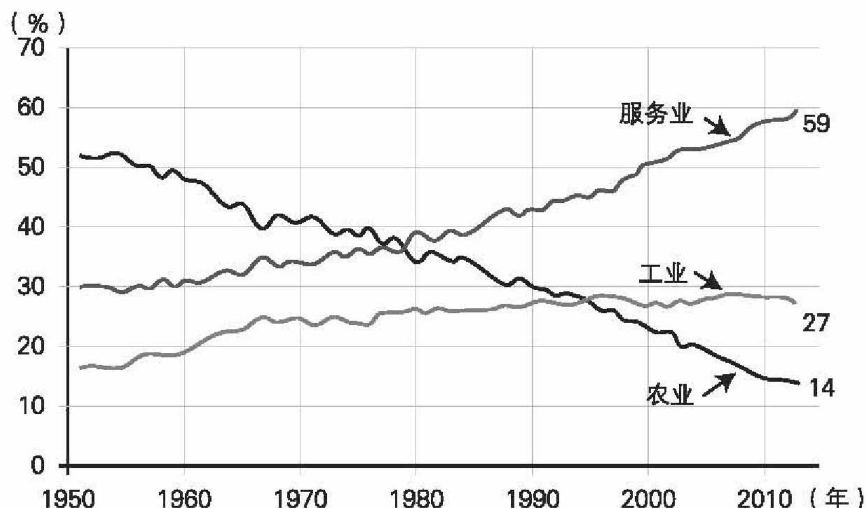
精英群体在与西方制度接轨中获取利益，越是构成与生存在民间社会中大多数人难以弥合的内部张力。由此导致少数人接受的官方正规制度与大多数人生存其中的民间非规范制度的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

其二是“人口资源关系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在国内资源不足以支撑快速增长的人口需求不可逆的压力下，只有依赖外部资源和产品输入，由此造成长期贸易逆差、长期内外负债、长期财政赤字等三个长期赤字为特征的宏观约束趋紧。诚然，这都是基本国情矛盾造成的，但也都极大阻碍着国家追求工业化的战略目标。

在西方凭借船坚炮利海权竞争推进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印度得益于南亚次大陆直插印度洋而具有扼守欧亚大通道的地缘优势，具有不容任何国家忽视的特殊战略地位。无论在早期西方殖民化时代、西方发起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双寡头分割世界的冷战时代，还是当代核心国金融资本霸权掌控世界的“新冷战”时代……这种特殊地位都有利于本属于“半边缘”的印度，因被核心国家竭力纳入结盟关系，而使其精英群体的文化认同升级到“半核心”。

但国内资源有限、环境承载力低、制度效率更低，这些因素对工业化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内外部约束明显，因此，印度很难自主地通过中国式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完成自我原始积累而成为工业化国家，那么，它客观上只能依靠外资。

根据官方发布的GDP结构，印度GDP中工业仅占27%，服务业占59%，农业占14%。劳动人口分布中：20%是工业，31%是服务业，49%是农业。总体上来说，印度自2000年以来，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呈较快上升趋势，近几年来逐渐放缓；农业和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则呈缓慢下降趋势。



来源：印度经济百科。

图3-1　1950—2012年印度各部门占GDP之比

这种GDP结构与劳动人口分布高度脱节的情况，说明了占近一半人口的农民从事着仅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更进一步分析，则服务业人口中，亦仅有小部分受雇于现代正规部门。如果仅看服务业占GDP比重，则印度容易被同样以服务业为主的西方先进国家视为同类。

印度这种服务业超过绝对比重的产业结构在E7中绝无仅有，由此被西方认为是有望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明日之星”。英国《金融时报》旗下数据服务机构FDI　Markets的研究显示，2015年上半年，印度共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约310亿美元，领先于中国的280亿美元和美国的270亿美元。按资本性支出数额估算，印度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绿地投资目的地。[100]

（二）印度的两次战略机遇

印度得到第一次战略性发展机遇是因为冷战时期美苏对立。

“二战”后，圣雄甘地领导下的印度经过长期反抗殖民统治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1947年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随即，印度公开确立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由此得到苏联在工业化建设方面的战略性援助，除了设立资本密集的工厂企业之外，印度的科学技术和军队装备也得益于苏联援助。

但苏联“南下暖水”的百年战略目标，却在20世纪80年代深陷于阿富汗战争泥淖之中，没有与对印度的援助同步实现……此后，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不能再继续投资，其援助印度工业化形成的企业大部分陷入困境。印度遂全面实施了自由化改革，20世纪后半叶苏联援助时期形成的国有经济被全面改制。[101]

1.非正规经济成为印度经济支柱

这次改革以后的一个时期里，自由化的制度成本显化，大量进口能源和原材料，但出口不足的印度发生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逆差”，从而导致政府财政严重匮乏，既没有能力像诺贝尔奖得主印度裔美国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所呼吁的那样，通过投资医疗、减贫等措施来推动发展，也没有能力像中国那样大规模增发国债投资用于交通、电力、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尽管拥有庞大低技术劳动人口，但没有条件通过发展一般正规制造业来创造就业机会以吸纳劳动力；相反，印度主要依赖非正规经济部门吸纳非正规就业。

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在2013年7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102]指出，印度84%的非农业工人属于非正规的“灰色就业”。对此，有印度学者指出：在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力为8%—10%，主要集中在沿海大城市的产业园区；另外，90%以上的印度人则属于“灰色就业”，其中包括15%的黑色就业。印度的GDP有一半是由非正规部门贡献的（仅次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55%）。

这些非正规就业劳动力缺乏基本劳动保障，雇主也不可能向政府缴纳社会保障资金来构建国家社保体制。报告还指出，尽管近年印度企业的数量快速增长，但企业所雇用的正规就业劳动力数量有下降之势。

符合西方要求的现代制度体系在印度只创造了大约覆盖10%人口的劳动力就业，这是值得反思的。

表**3-1**　印度非正规与正规就业人数

（单位：百万）[103]

部门	非正规部门		正规部门	
	1990—2000年	2004—2005年	1990—2000年	2004—2005年
农村	277.13	315.08	23.63	27.99
城市	65.51	79.82	30.50	34.58
总计	342.64	394.90	54.13	62.57

由于这个近13亿人口的国家的大多数人处于“灰色地带”，而且并不进入西方模式的市场经济，遂有印度分散小经济为主体的民族资本主义内生性的“现代化悖论”。据此可理解，为何已经在发展中国家畅行无阻的好莱坞文化、可口可乐、沃尔玛，在印度都步履维艰。

2.印度的第二次战略发展机遇

这个历史性机遇是在21世纪出现对外服务业超前发展，这至少部分地源于美国IT泡沫崩溃危机，也由此使印度在21世纪与美国经济构成紧密联系。

苏联于1991年解体。3年之后，美国支付大量军费形成的高技术研发成果度过保密期，开始转向民用开发，随即1994年大量IT企业诞生，并且吸引海外资金回流。这一方面造成1997年以东亚加工贸易为主的国家遭遇由资本流出演化而成的金融风暴；另一方面，这些追逐搭便车收益的回流资本催生了美国本土IT业的巨大泡沫，且于2000—2001年发生“新经济”崩溃。接着，这场爆发在美国的危机迫使IT业及其相关产业投资外溢，这样才能匹配得到廉价的人力资本。也就是借助泡沫崩溃前已经投下的转化为沉淀成本的基础设施建设（如跨洋电缆），寻找海外“要素价格低谷”，才能维持IT业在危机打击下的生存。这时候，在中学阶段就普遍使用英语教育的印度成为西方IT产业外包发展的首选地，于是，印度过去十多年的发展主要靠向海外提供廉价IT、医药、财务、咨询行业劳动力等，以及与海外需求相关的服务性行业。

客观地说，第三产业超前并不是印度对发展战略做出主动选择的结果。

3.西方资本流入会是印度的第三次战略机遇吗？

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相继在金融危机之

中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向全球输出巨额流动性。这个时期，外国低息资金大量涌入包括印度在内的任何有成长性的新兴国家，一方面确实令印度金融体系流动性增加，近年来印度国内经济出现“回暖”征兆；但另一方面，这种经济的“回暖”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信贷膨胀，包括房贷、私人消费借贷及基础建设投资，而并没有改变印度的传统部门占比过高的基本结构。

一般而言，这种增长应基于对前景发展充满信心，但印度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本身表明其并不具备稳健发展的基础，其金融市场伴随西方货币政策的变化，会出现短期资本增减变化，既可以大量流入，也可以大量流出。例如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时，孟买股市敏感指数在10个月内下跌了70%。2013年美国媒体做了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分析，立刻引发印度外资流出连带本币贬值。

E7比较研究发现，在西方金融危机及其救市政策造成的波动中，除了中国因未完全开放资本市场而幸免于难，巴西、委内瑞拉、印度尼西亚、南非等国，都在外资自由进出本国资本市场的制度条件下遭遇金融危机的严重打击。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印度作为金融对外开放的国家，虽然也遭遇外资流出造成的资本市场波动，但至今仍然维持相对稳定。对此，需要进一步探究。我们推测可能与印度的传统部门及占人数总数50%以上的贫困人口不在资本流动造成的资产价格与汇率波动影响范围之内有关，毕竟对于以小农经济或非正规就业贫困人口占社会主体的国家而言，资本短期跨境流动对他们的生活不会造成更差的结果。

同时也应该看到，为占**90%**的人口提供就业的非正规部门，恰恰为印度的经济提供了基于二元结构的危机缓冲条件。这类似于中国农村的农户和村社经济成为危机软着陆的载体。

囿于新自由主义话语体系，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印度尽管出现资本经济的较高增长，但很难惠及“灰色地带”的乡村和贫困人口。印度贫困率的官方数据约为27%，民间则认为在50%以上；若取中间值则约为1/3。于是有人说，印度一个国家的贫困人口就比整个非洲多……

从图3-2可见，首先，印度2000年以来的10年间净附加值组成中利润急速增长，其次是非薪金性的酬金大幅增长，工资增长相对缓慢。这

进一步说明了印度增长模式的缺陷。过去十多年企业利用廉价的外国资金，靠垄断土地及矿产等稀缺资源来推高公司股价，私营企业共欠外债近2000亿美元；卢比币值下跌更加重了企业偿债的利息负担。2013年5月至8月期间，卢比币值下挫近25%，2013年9月跌至1美元兑68.27卢比的历史低位，至2015年中还在1美元兑65卢比的水平徘徊。

印度的经济增长速率在2010年达到峰值后便明显下降。2013年6月美联储表达收紧量化宽松政策的信息，引发市场对美联储缩减货币刺激规模的恐慌（Taper Tantrum），外国投资者急忙从印度的债券和股票市场上撤出资金，引发卢比大幅度贬值等危机，从而引发海外对印度经济增长的脆弱性的普遍担忧。同期，社会两极分化加剧也致使族群和宗教冲突、暴力犯罪和贪腐等各种问题纷至沓来。[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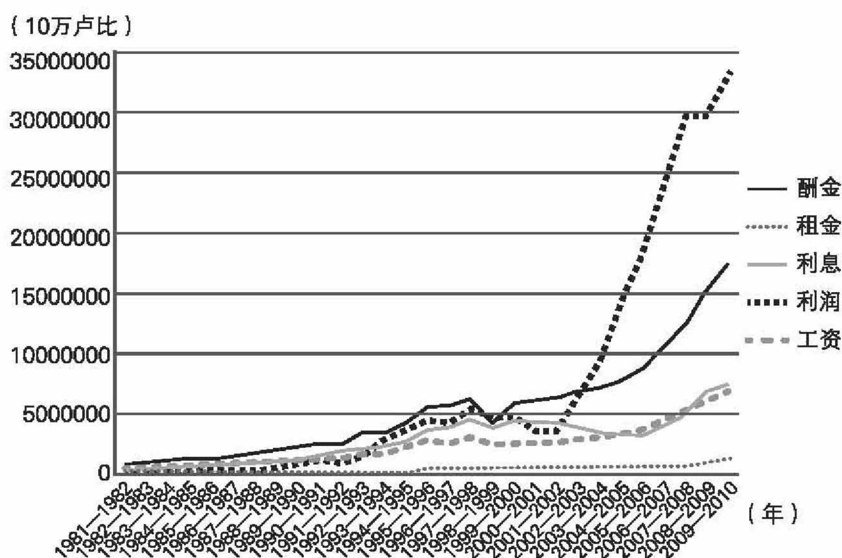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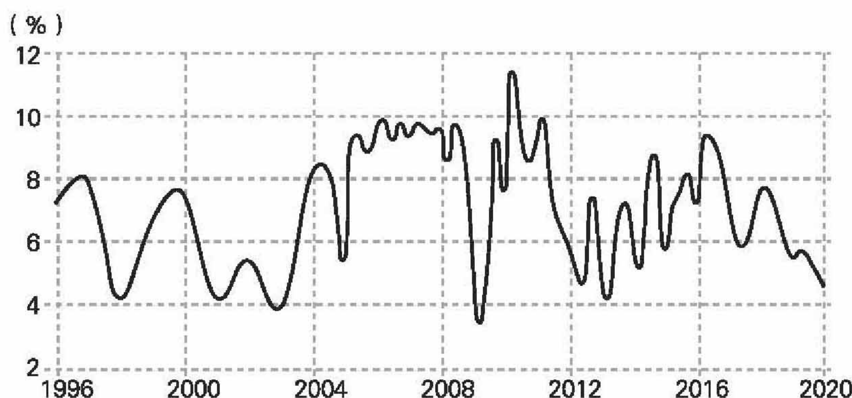


图3-2　净增加值构成[105]

与此同时，印度的GDP增长在2016年之后放缓，并且，在华尔街金融海啸后呈现大幅涨落，如图3-3所示。

根据印度中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受益于算法调整，2014年四季度印度GDP跟2013年同期相比增长了8.4%，成为仅次于中国的推动增长国家。2016年前3个月，印度的GDP按年平均增长7.9%，不仅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而且显著超过中国约6%的增长率，一跃成为世界第一的高增长国家。

2016年年末，当《福布斯》杂志发布的报告显示印度的GDP总量已经超过英国时，印度媒体用骄傲的语气宣布："这是150年来首次印度经济超越了殖民时期的英国宗主国。"[106]据《印度时报》2016年12月20日报道，印度内政部国务部长基伦·里吉朱（Kiren Rijiju）当天在个人推特（Twitter）上发表推文称，印度已经超越英国，成为继美国、中国、日本和德国之后，GDP全球排名第5位的国家。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印度统计和计划执行部（MOSPI）。

图3-3　印度GDP年增长率

印度的GDP增长在2013年后突然大幅反弹，乃得益于新的算法调整，主要是估算制造业的增长。[107]。新的统计算法在印度学术界引起了很大争议，很多学者指出数值因此被严重高估了。

尽管如此，最大问题其实并不在这里，而是正规的GDP统计本来就很难准确反映印度的真实情况。此前，课题组在农村地区调查时发现，乡村基层的主管干部报不出本村的主要数据，甚至连最起码的本村人口和土地有多少都说不清楚；入户调查时，即便户主本人也说不清楚自己及家庭的实际收入。这也许因为，支撑印度接近13亿人口规模经济结构的，是民间社会存在一个巨大的、维持百姓民生的非正规部门。

二、二元结构：非正规灰色经济的双刃剑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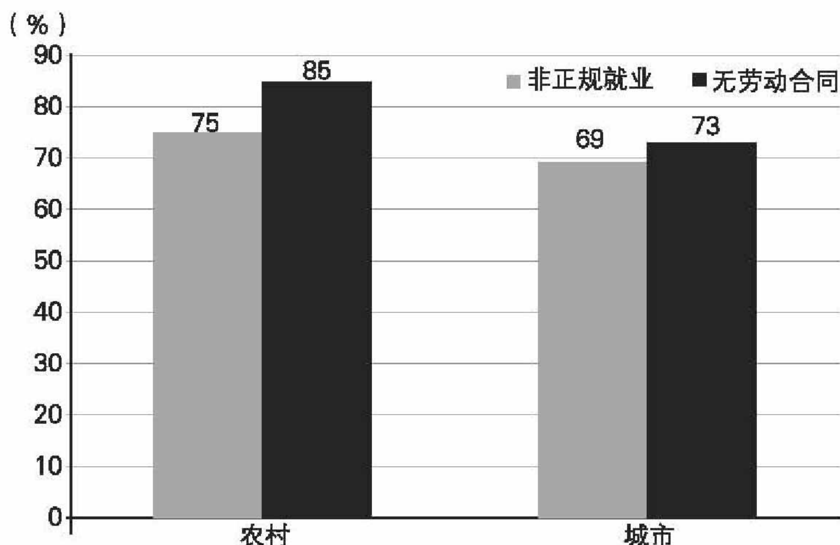
印度经济的二元结构中，非正规部门（灰色经济）难以纳入GDP统计，估计占印度经济总量的50%，而其就业占不同行业劳动力总数的比重见表3-2。

表3-2　印度非正规就业劳动力在不同行业所占百分比（%）

行业＼时间	1990—2000年	2004—2005年
农业	97.70	97.65
采矿	40.55	33.74
制造业	70.19	71.20
电力	8.35	6.59
建筑	73.66	75.58
贸易	93.64	95.54
酒店	88.30	86.72
运输	71.42	75.93
金融	21.91	25.70
房地产	75.66	70.74
管理	7.66	0.90
教育	27.04	26.88
医疗卫生	42.85	44.18
社区工作	86.82	88.20
家务等	81.58	98.72
总计	86.36	86.32

来源：奈克《印度的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工人》(*Informal Sector and Informal Workers in India*)，www.iariw.org。

如表3-2所示，印度的正规就业只集中在国有部门、资本密集产业或特殊专业。另有近90%人口非正规就业。



来源：http：//www.thehindu.com/opinion/columns/Chandrasekhar/indias-informal-e-conomy/article6375902.ece。

图3-4　印度劳动力（作物种植以外）中“弹性”雇佣所占比例（2011—2012年）

此种情况，在客观上根源于印度官方承接的西方高成本上层建筑和跟从西方意识形态造成的恶性循环：西方模式的正规制度越是规范，其相对于民间的分散小经济而言制度成本就越高，就越促使大量劳动人口进入非正规经济；反过来，也就越不可能实现官方正规制度的有效治理。

此外，这种非正规部门比重过大的情况，客观上决定了任何类型的外国产业资本仅靠官方的规范法律进入印度市场是行不通的。[108]因为，任何外资企业都需要按照印度政府颁布的、符合西方要求的法制体系规范运作，但那都难以跟印度无处不在的、高度分散的、与政府统计体系几乎无关的小经济做制度成本竞争。

非正规经济除了造成巨大的制度成本壁垒外，还对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具有难以替代的保护作用，这与亚洲这个原住民大陆上的其他国家类似——无论宣称何种政治体制，奉行何种宗教文化，遭遇经济危机之际，都是依靠治理成本最低的传统乡土社会来承载现代化危机的代价，实现城市产业资本的“软着陆”。

据此，印度灰色经济的实际作用是，绝大部分城镇劳动力人口生活

在贫民窟，那里的非正规就业劳动力只能维持低消费，也就客观上降低了少数正规部门就业人口的生活成本，反过来就淡化了正规部门经济波动对民生经济和民间社会的实际影响。

综上，印度经济21世纪之初得以在美国IT泡沫崩溃之际逆势接盘，发展服务西方的现代第三产业，现在也没有随西方金融资本造成的全球危机而发生严重衰退，主要因为印度经济和政治相对稳定的基础，在于民间庞大的灰色经济吸纳就业，以及在于民族产业资本占据主导地位。

基于上述原因，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包括阿玛蒂亚·森在内的西方理论家的政策建议在印度不可能贯彻。大部分海外研究者若只根据官方发布的正规经济部门的数据和媒体的事件炒作来做分析，并以此为依据对印度进行解读，则大多不足为凭。

（一）印度特色的民族资本主义

在1852年被英国占领之前，印度是一个高度分散的、有几百种语言、几百个小邦国麇集的地理概念，民族主义是在本地资产阶级的去殖民化斗争中作为意识形态工具使用的。1947年，印度通过甘地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实现国家独立，其绵延至今的制度遗产，是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本地化”的社会主体长期占据国家经济的主导地位。

印度独立后，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导思想是苏联模式。

按照苏联官方社会主义思想，在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应先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才具有在工业化大生产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可是，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一般资本短缺，在这些国家实现工业化，急速进行“资本主义补课”，那逻辑上和实践上就需要具有天然规模优势的国家作为资本累积的主体。

虽然印度明确以西方议会民主制度作为政治制度模式，但在农业人口占压倒性优势的条件下，欲急速推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自然倾向苏联的经济模式。这也与苏联欲南下印度洋的地缘战略一拍即合，因此两国展开了悠久的工业转移合作关系。

延伸阅读12

印度早期的“超赶战略”

远在印度独立之前，独立运动领袖尼赫鲁就声明：“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推动大型工业的发展，不过，我们应仔细选择有限发展工业类型。这些工业应该是重工业和基础工业，它们可以奠定国家经济力量的基础，在它们的基础之上可以逐步建立其他工业。”[109]

印度在1948年独立以后，通过了一项“工业政策决议”，提出了印度经济的出路是大工业，其中重点发展机械制造业和基本化工工业。尼赫鲁提出，“只有发展重工业才算工业化”，“如果要搞工业化，最重要的是要有制造机器的重工业”。[110]

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印度政府把工业分为三类。

第一类：基础工业、战略工业，包括钢铁、煤炭、化肥、石油、电力、铁路、航空、通信、军工、重型机械等17项，称为17个“制高点”。

第二类：其他重工业，例如机床、化工等12项。

第三类：消费品。

印度政府规定：第一类工业只能由国家专营；第二类工业主要由国家经营，私人企业只能起辅助作用；民间企业只能经营第三类产业。

1950年成立了以尼赫鲁为主席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并实施五年计划。从1950年到1973年，印度中央政府对重工业和基础工业的投资占总投资额的**98.8%**，对消费品和农业的投资只占1.2%。投资总额的78%集中在钢铁、机械、化工、石油等六个重工业部门。印度政府得到的外援中的大部分也是用在重工业的投资上。

印度政府在1951年通过工业许可证法，几乎对所有的企业都实行计划管理。无论是开业、搬迁、扩建、生产定额、新产品开发等都要向政府申请许可证，特别是外贸和外汇控制得格外严格。在重工业和基础工业部门中建立了一批大型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拥有全部工业生产能力的**60%**，特别是在基础产业国有企业的比重非常高。在煤炭工业中，国有企业的比重是**96%**，在钢铁工业中为**85%**，铜冶炼工业为**98%**。在印度最大的20家企业中，国有企业占了18家。国有企业的人事、生产计划、经费、供销、投资建设等全部控制在政府手里。企业如有利润必须上交

国库，如有亏损则由政府给予补贴。

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印度的重工业确实取得了较快的发展速度。和1950年相比，印度在1971年的机床产量增加了196.7倍，年平均增长率为28.6%；电动机产量增加了22.4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6.1%；钢增加了3.2倍，年平均增长率为5.7%；发电量增加了9.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1.3%。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印度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其中冶金、机械、电机、化工等部门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111]

资料来源：

徐滇庆、柯睿思、李昕：《终结贫穷之路》，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

其实，中印两国早期的发展策略因同样受苏联影响而类同。两国在差不多的时期完成民族解放运动，印度的经济基础在当时甚至比中国稍胜一筹，而且一直是地缘政治的宠儿，左右逢源，同时接受西方和苏联的援助。[112]

但今天，曾经先后于1950年被美国封锁、1960年被苏联封锁、1989年和2019年两次被美国制裁的中国，在长期面对恶劣地缘政治处境下，已跻身全球工业强国之列，并且在弱化区域差别和消除贫困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相对而言，印度只有少数企业具有国际竞争力，尽管作为民族国家已经独立70多年，但至今还是世界上贫穷人口最多的国家。

关于中印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比较研究已经较为充分，在我们的研究中，更注重对经济基础的根本差异的探讨。

我们认为以下的结论是清楚的。

中国方面：20世纪先后在中国执政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把平均地权作为基本纲领。国民党百万大军退守到台湾才实现这个纲领，而共产党则通过在大陆对农民这个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国民群体动员完成了土地革命。

两岸华人社会都有的共同点是，下层社会在普遍参与革命的进程中，成为自给自足的小有产者，从此海峡两岸的中国都不再有绝对贫

困。

接着“土改”的是，中国台湾延续并改造了日据时代的高度垄断性质的“农会”制度，形成农民组织化程度最高的体制优势，使城市产业资本得以顺畅提取农村剩余，较快地进入工业化。而中国大陆也同样依靠在农村推行高度组织化的集体经济，一方面吸纳工业化阶段产业资本内生性危机造成的巨大代价；另一方面集中劳动力，将之投入国家基本建设，替代因外部投资突然中断造成的极度稀缺资本，并为其后不同阶段的工业化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印度方面：土地制度改革上，虽然从甘地时期就有追求“耕者有其田”的官方意愿，却始终没有实际发生过重大变革，难以为大部分的乡村人口打下良好的发展基础，不管是以前的计划经济模式，还是当前的新自由主义政策。[113]

近10年来，印度新自由主义政策取向基本是放宽或解除管制，但在官方意义上，它与之前的计划经济模式一样，都是从顶层开始，只惠及人口的一部分，例如金融业自由化、发展IT服务业、发展资本密集产业先于制造业等。这可以理解为某种后殖民情状。

有别于中国通过暴力革命推翻以前的精英阶层，印度的独立运动是殖民模式所孕育出来的本土精英集团所推动和领导的，独立后的印度社会的财产关系没有根本的变化。因此，印度两个阶段的发展策略一直有浓厚的精英主义色彩，这也造成印度政府很难具备对下层社会的动员能力，从而导致下层社会一直缺乏发展条件。

（二）二元体制下的灰色经济

在这种“印度特色”的二元体制条件下，长期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结果，就是衍生出以非正规部门为主的、本地化的灰色经济，而精英主导的民族资本（正规经济）与本土非正规经济形成一种特殊的共生关系。这是受政府西方化的上层建筑和制度规范约束的外国企业所缺乏的某种本土优势。

表现民族主义复杂性的一个鲜明的例子是：占印度人口大多数的贫穷民众无法负担昂贵的专利药物，因此，印度本土发展出蓬勃的仿制药物产业，直接“侵犯”外国企业的专利权。印度政府为了照顾贫穷人口的需要，也不愿意签订有关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协议。外国制药企业因此

很难在印度本土具有竞争力。

正如前面所讲的，印度民间政治与社会经济按照潜规则运作的基本特点，使得任何按照印度政府发布的正规制度运作的外国产业资本都会遭遇两难，只要不理解或不顺从非正规部门的潜规则，就都难以在印度市场具有竞争力。[114]

1.印度“经济结构高度二元化”所内生的基本特点

在印度，能够承担正规制度的过高成本的所谓正规经济，恰恰是必须用代表殖民文化的英语来服务西方国家消费者的**IT**及相关服务产业，例如医疗和教育服务、金融相关咨询和会计服务等现代第三产业。这是印度服务业GDP占比高达57%但在高端服务业就业的劳动力却只有约5%的主要原因。

客观上，这些面向西方社会需求的现代服务业必须与西方制度全面接轨，也只有“全盘西化”，才能对西方需求“寄生性”存活！其中受益部门的精英群体，更是只能由“海归”主导。这种正规的外向型经济虽然与印度非正规部门格格不入，却是支撑国家正规制度和科技教育等部门的主要力量。西方社会了解和认可的那个印度，也主要是这些在外向型的现代第三产业领域就业的、全盘西化的印度精英。同理，也因为被这类西化教育培养的学生很难在本国得到就业机会，遂有大量进入国际组织就业的现象。

这种少数人参与的正规部门也理所当然地难以带动国内产业，难以形成对交通、能源、水利等基本建设的投资拉动作用，也难以吸纳这个12.8亿的人口大国大量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劳动力，并且势必长期延续与非正规部门构成明显对立的经济社会二元结构。

印度的政府制度是联邦制，各地政府由不同党派执政，不仅财政税收相对独立，而且拥有地方立法权。此外，地方政府直接面对的是那些能够解决就业的本地化的非正规企业，对这些企业的不规范甚至不合法，也只能容忍和让步，其中权钱交易也在所难免。这也是印度政府官员腐败普遍化的原因之一。

外资企业进入印度市场，虽然需要学习印度的市场潜规则，但如果按照印度本土企业熟悉的“游戏规则”进行竞争，关系网络、风俗习惯等方面均比不上本地企业，势必处于弱势。[115]尤其在面对某些腐败政府

官员时，可能会遭受比较大的挫折。因此，总体而言，印度的营商便利排名在全球130位，正常条件下难以吸引外资进入一般产业。

之所以印度普通百姓的民生依存于灰色经济，一是城市和沿海地区的私营和个体的中小企业经济如鱼得水、非常活跃，恰在于民间能够主要依靠潜规则来低成本地处理大多数负外部性问题；二是因国内资源极度稀缺，所以造成资源要素价格相对过高，占有资源性资产的小私有经济和高度分散的弱势群体，因此不得不在应对外部资本的立场上达成一致——越是分散的小私有经济占比高的地区，对外部资本排斥越强烈。

2.印度联邦制政治的基本特点

印度是西方主流政治体系长期认可的“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此外，印度精英群体不仅能够取悦于西方的意识形态，而且能够大量向服务于西方软实力的国际组织输送英语流利的雇员。因此，西方主流舆论很少意识形态化地抹黑印度；即使有些恶劣的事件报道，也不会构成西方媒体众口一词的舆论趋势。

但是西方制度体系在印度国内却造成两种“恶性循环”。

（1）恶性循环之一

一般而言，各邦上台执政的政党必须在政治上推行本地化，由于在性质和政见上与中央政府并不完全一致，中央也就难免在转移支付和财政投资等发展政策上对本党执政地区厚此薄彼。于是，很多贫困地区就因穷困而造成民众倾向于左翼政党，那些地方的NGO（非营利组织）也有左翼政治倾向；而更贫困的地区则大都存在以土地革命为指导思想的农民游击队。

近年来，全球化的巨大代价向弱势国家转嫁，造成城乡差别严重，农民生存条件恶化，印度发生农民游击革命的邦接近2/3，逐步形成从北部和东北部沿着印孟边境部族地区向下延伸的T形游击走廊。农村和山区发生暴力革命，阻滞了民间产业资本和政府投资项目的进入，反过来更加促进左翼政党发动群众，从而致使右翼政党掌控的中央政府减少了对左翼政党执政的贫困地区的国家财政投入。

这也是制度性致贫的内因——贫困人群和贫困区域的情况难以靠国家政策来缓解从而趋于恶化。

（2）恶性循环之二

由于政府面对的主要是孤独分散的农民和私人个体经济，因此其实现规范治理的执行成本过大。于是，一方面，沿袭西方制度体系造成的“政府失灵”趋势在基层治理领域非常明显；而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却能够“适应”内部化处理外部性交易成本的灰色经济运行机制，来服务于本国及本地私人资本利益群体占主导地位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需求。

据此，这种政府“适应”势必造成无处不在的灰色政治运作和跑冒滴漏型的小规模贪污腐败普遍化。这就构成身处城市的知识分子群体越是强调西方模式的规范法律制度，社会反而越是演变为全面腐败的恶性循环。

与此同时，在这种高成本上层建筑的作用下，完成了原始积累的、有一定规模的某些印度国内产业资本已经被动地转向全球化，也就更强烈要求政府加强符合西方秩序的法制建设。

由此可知：非规范经济不仅与制度性腐败相辅相成，而且与要求西方法制体系的规范企业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制度演化悖论。

3.超前于经济基础的成本高昂的政治制度

印度的二元性也反映在其高昂的政治制度上。正如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是由上层精英领导和推动的。这些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精英作为主导阶级，在独立运动成功组建政府时，不仅尽可能地保留了宗主国建立的殖民模式经济基础，一般地简单移植西方政治模式来建立本国的政体，而且维持了宗主国留下的西化意识形态，以及派生于并且支撑着此类上层建筑的科技教育体系。

这种脱离本国的地方经济、社会及文化基础的中央层次的现代化上层建筑，不仅制度成本高昂，而且与本土的滞后经济基础相互矛盾和制约，结果无法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所以，尽管印度移植西方政治体制，建立了一个全球最庞大的“形式民主”的政体，赢得西方的一致称誉，但不等于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全面的管理体系。

而这高昂制度底下的矛盾颇明显。据路透社报道，2014年印度选举的耗费估计达50亿美元，是2009年大选的3倍，在当年成为仅次于2012

年美国总统大选（耗费70亿美元）的人类历史上第二昂贵的选举。对于一个还存在庞大的贫穷和饥饿人口的国家而言，究竟是每隔几年花数十亿美元来进行选举游戏还是用来改善贫穷对国家的长远发展更有利？这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课题。

与之对应的事实却是印度的高昂现代化政治制度并没有带来良好有效的管理，反而成为贪腐的根源。有分析指出，印度政客为了赢得选举不惜耗费大量财力，而政客靠贿选上台后，也千方百计捞回其金钱投入，这又使得贪腐问题愈加严重。[116]

这种成本极高的西方上层建筑及其制度体系，难以适应殖民地模式的薄弱经济基础，更难以对构建进行有效治理，反而必然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于是构成恶性循环。

印度的这种基本体制矛盾具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普遍意义：这种殖民者留下的西化上层建筑与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不能对应的根本矛盾，也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深陷发展陷阱的真实原因。

21世纪之初，华尔街金融海啸暴露出发达国家普遍遭遇的问题：政府债务过高从而引发危机。在西方宗主国的正规部门都会因制度成本过高，造成恶性债务负担，任何发展中国家接受这种上层建筑，其传统经济更是注定不堪重负。由此，大多数国家形成二元结构。一方面难以发生较快经济增长且势必债台高筑，不得不仰赖原宗主国的援助，国家正规经济部门也难以吸纳更多就业；另一方面，非正规部门维持大多数人口的基本生存，却几乎难以建立政府征税体系和实现政府法制化管理，遂演化为灰色治理——私人经济与管理部门之间普遍通过做“交易”来获得发展空间。几乎没有“油水”的农村和偏远地区则无人顾及，长期停滞在自然经济和传统社会状态，致使部族和种姓等传统制度成为基层替代昂贵政府的低成本社会治理的主要制度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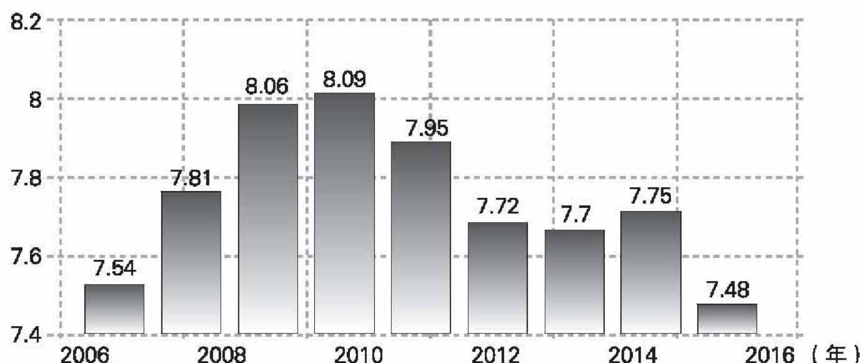
综上所述，印度只是在表面形式上成为承袭着西方制度的民主法治国家。西方人对印度的判断主要来自占就业人口5%的现代第三产业精英群体，而这一局部的、片面的、一叶障目式的判断，对于深入理解和解释印度纷繁的经济社会现象来说，显然是不充分的，至少是有失偏颇的。

4.二元体制下的两个印度

由于二元体制这个基本矛盾的制约作用，人们仿佛看到两个印度，一面是西方眼中那个充满希望的闪亮印度——新兴市场的未来之星、蓬勃发展的IT服务业及金融市场、耀眼的宝莱坞电影、亿万富豪的创造机器；但另一面却是一个绝望的国度——数以十万计的农民因不堪负债而自杀，小农不甘被剥夺压迫而投身毛派游击队奋起暴力抗争，全球最大规模的饥饿人口，长期极度贫困，大型城市贫民窟，深入骨髓的贪腐，让人发指的宗教仇恨、性别暴力，愚昧的村落风俗、种姓制度……

而这两个印度，长期处于“低烈度内战”之中。[117]印度的恐怖袭击主要源于内部，尤其是印共（毛）武装与政府军的冲突。

图3-5中的恐怖主义袭击指数[118]显示，印度近十年来一直处于受恐怖主义袭击的高风险国家之列。印度恐怖袭击指数在2007年是7.54，2008年上升至7.81，并受核心国家华尔街金融海啸导致的2009年全球危机影响，于当年达到8.06的历史高点，而在美欧大规模增加流动性对外转嫁成本的2010年，印度的恐怖袭击指数上升到高达8.09的历史最高水平。尽管目前稍微回落，但仍然维持在高风险水平。印度某些官员近年声称印度有能力同时打赢“2.5”场战争。除了印度眼中的地缘威胁之外，那“0.5场战争”，指的正是“低烈度内战”。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经济与和平研究所。

图3-5　印度恐怖主义袭击指数

如前所述，印度在经济上存在正规与非正规部门的二元结构，但正因为存在庞大的非正规部门，当印度承接全球化服务业而面对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带来的不稳定性（负外部性）时，可以通过维持人民生计的民间非正规部门做内部化处理，使社会及生计经济保持基本的稳定及韧

性。

（三）印度特色二元结构下的超前金融业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遭遇第二次生产过剩危机，在核心国家引领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生经济结构的阶段性调整，到21世纪初已经完成了从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主导的历史性演变。与这个客观过程相伴生的，就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后冷战”时期形成的“币缘-地缘”新战略。

其间，大凡更多保留实体产业资本的国家，在核心国的引领下改为以GDP统计体系为标志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这样的全球竞争中就都显得等而下之了。而更多转向金融经济的、认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则势必发生更多因跟从核心国金融化虚拟资本扩张、外资“大进大出”而引发的经济波动。对资本主义的这个从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升级的阶段性变化的复杂制度成本，后人也许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如上文所述，印度的第二产业以民族资本的“非规范经济”为主，主要解决了国内就业和一般民生问题。由此，相对政府管理的外资企业而言，本地企业具有明显的在地化“比较优势”，一般不受联邦政府规范法律和制度的限制。由此，如果外资进入印度只能按照法律规范走“正道”，与本地民间资本开展竞争，那就很难在“印度特色民族资本主义”为主的社会立足。总之，外资企业遭受到各种不同形式的“非经济因素”的干扰和阻挠，较难进入第二产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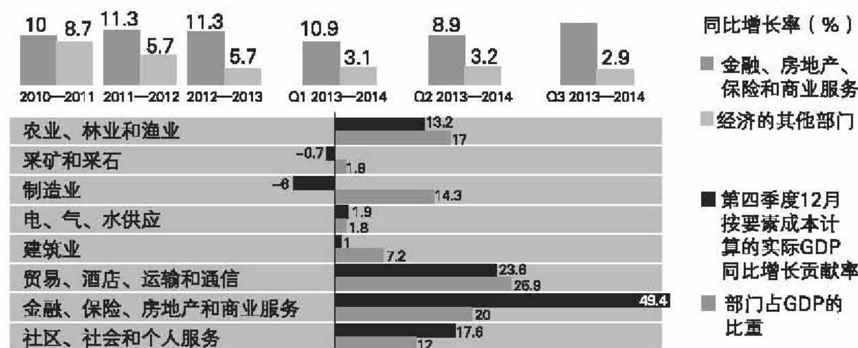
印度政府也在政策上长期保护民族资本，在制造业（2013—2014年仅占GDP的13%）和零售业等领域（2013—2014年占GDP的8%）设限较多；于是，外国投资者更多的是进入以印度股票和债券等金融市场为中心的服务业。这也是印度金融服务业超前于实体产业得到发展的客观原因。

1.印度金融业一枝独秀

印度金融服务业领域之所以能高度开放，与外国金融资本接轨，固然有英国殖民统治留下的金融机制及服务业老底，但归根究底还是上述的二元化社会经济结构——以IT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业为代表的那5%高度西化的精英，可以与西方资本无缝接合，没有任何制度成本或文化上的障碍。

所以，尽管在新兴七国中，近年印度的基本经济层面表现得并没有特别出众，但金融市场的表现一枝独秀，如图3-6和图3-7所示。

2008年受华尔街金融海啸的打击，印度依赖金融自由化推动增长的方式与其本身经济基础不稳固的矛盾浮现，内部则储蓄和资本形成等宏观经济基础领域表现孱弱，对外则仍然持续面临经常账户赤字。经济增长放缓，金融市场不稳，加之印度进入新一阶段的经济改革，进一步加速自由化，放宽各种投资限制，外资“大进大出”也导致金融市场波动更为剧烈。



来源：印度中央统计局（Central Statistics Office, India）。

注：金融、保险、房地产及商业服务占GDP的比重约为20%，对经济同比年增长的贡献率达49.4%，制造业的贡献率则显示下降。

图3-6　印度各经济部门对增长的贡献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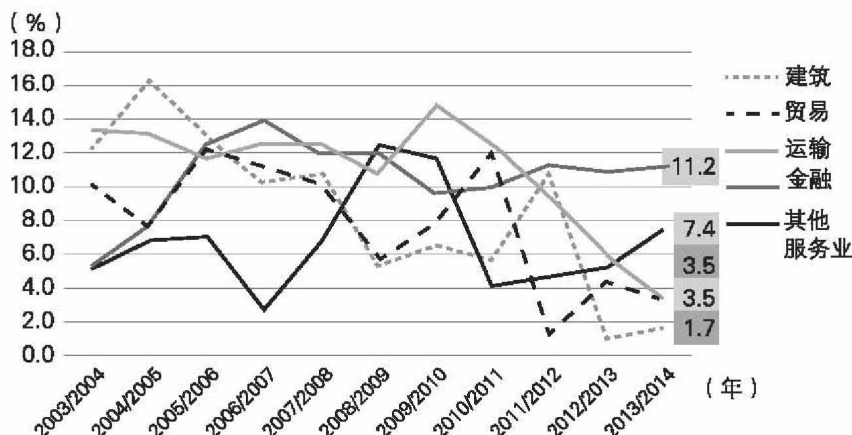


图3-7 印度各产业部门的GDP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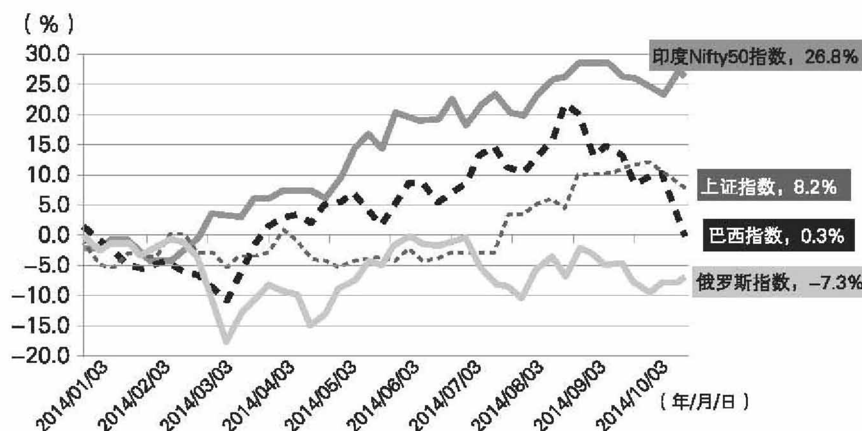


图3-8 金砖四国比较（2014年1—10月）

除了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经济危机后因为全球流动性萎缩，印度股票市场曾经一度大幅下挫外，其后全球流动性随着美国量化宽松回升，印度再次吸引大量外资进入国内股票市场。近年印度股市一直呈上扬趋势，屡创新高，基本上与美国股市呈同步之势。甚至在2013年6月预期量化宽松结束的新兴市场震荡中，印度股市只是稍微回落，不久便重新上扬。2015年这一波的新兴市场撤资潮中，印度甚至承接从金砖国家市场撤离的资金。2015年仅1—7月净流入印度股市基金的累积金额就达70.42亿美元，而同期总体新兴市场股票基金所录得的净流出是224亿美元。外资大规模流入印度股市和债市逐利，使印度股市在高位徘徊，如图3-9所示。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孟买股票交易所。

图3-9　印度股市指数

2.高速金融化下潜藏的债务危机

印度过去十多年推动依靠金融及信贷膨胀来拉动经济增长的策略，究竟有多大程度上是在推动实体经济部门的长远稳健增长？2010年10月爆发的微型贷款（microlending）危机（实质是民间高利贷），戳破了西方对印度这种所谓“非集权化、高效率、低不良信贷率”的神话。西方乃至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吹捧这种自由信贷神话，其意识形态目的往往是针对中国的集中型金融体制及其对资本流动的管制。

印度金融系统的潜在不稳定性在数个方面反映出来，例如高速金融化下，银行未偿还信贷占GDP比值大幅攀升，2007年超越50%，2011年已经达到56%，如图3-10所示。

图3-10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商业银行的未偿还贷款占GDP之比成倍攀升。结合图3-11显示的信贷结构，我们能看到主要问题在于贷款中占比最高、增长最快的是基本建设贷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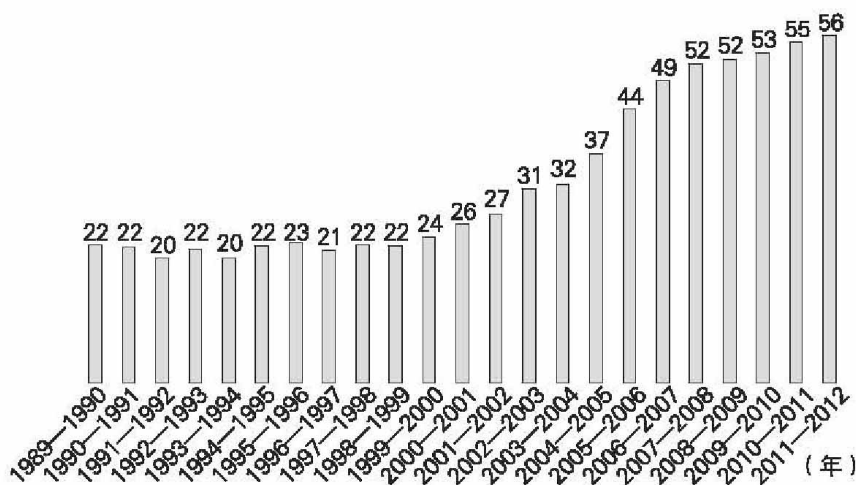


图3-10　未偿还银行信贷占GDP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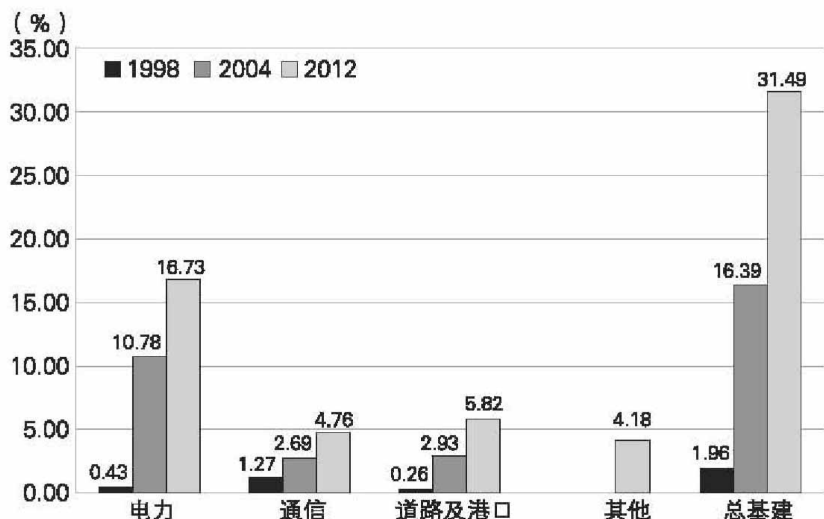


图3-11　基础建设投资借贷占商业银行对工业借款的比例

图3-11表明，基本建设借贷占比2012年是31.49%，约为2004年16.39%的两倍。其中，增长相对平稳的是通信，最显著的是电力，其次是交通领域。尽管这些投资增加符合印度发展的客观需求，但此类基本建设投资回收期太长，若通过商业银行贷给私人部门，则难免影响商业银行当期的盈利状况。此外，政府若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推动银行系统及私人部门参与基础建设投资，就会引致银行系统承受过大压力而不稳定，银行要通过资产债务重组以改善账目。

中国在同一领域中的做法值得注意：21世纪以来，中国一直维持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有些年份投资对GDP的贡献超过50%。但基本建设投资的主体是国有金融机构和国有大型企业；占有的土地和自然资源也收归国家所有，同时也承担大幅度增加投资形成的债务和收益。据此，中国也有基本建设投资效益低、回收期长的问题，但可以在国有经济内部调整，甚至可以在国家直接核销银行坏账的同时向银行注资。

3.潜藏的银行债务危机

印度储备银行（Reserve Bank of India）2017年6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印度的银行贷款呆坏账比例升至15年来新高。2017年3月坏账比例达9.6%，估计在2018年3月达10.2%。各种不良贷款总计达1910亿美元。国有银行的呆坏账从2014年的388亿美元急增至2016年的916亿美元。

近年因为房贷活跃，印度的私人贷款与GDP的比例一直处于上升态势，2015年已达52.23%，如图3-12所示。一旦全球重入加息周期，因偿还贷款所产生的消费压力必然加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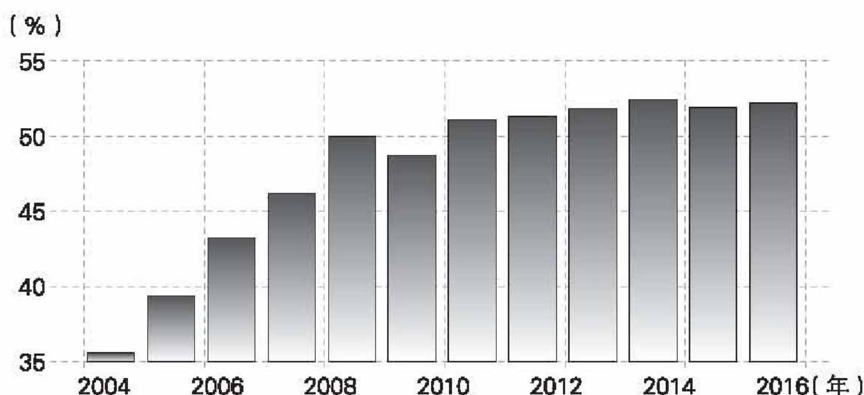


图3-12　私人贷款与GDP的比率

印度银行业正面临严重的债务问题，据2017年10月CNBC[119]报道，印度银行和印度工业发展银行均出售资产，以应付高企的债务和严重的不良贷款。其他银行各自寻求筹资方案以应对困难。

4.超前金融化的隐忧

超前金融化的印度有蓬勃的债市，这可能会带来对债务膨胀的偏好，造成超过实体经济收益的快速债务膨胀，再加上印度的党派选举制度及地方利益输送，一旦碰上政府的扩张性基础建设政策，便容易积累更多的问题。

例如自2009年以来，有8个共耗费超过5000万美元建造的机场落成，竟然荒废至今，连一个航班也不曾升降，但当局坚称这是发展所必需的。而2015年正值地方选举年，印度总理又承诺在贫穷的比哈尔投资4.13亿美元再建造4个新机场，为其所属政党拉票。凡此种种，都令人担忧扩张性的财政及基础建设政策，究竟能多大程度有效拉动实体经济增长。

印度超前的金融化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正吹起的资产泡沫呢？

以新德里的奥朗则布大道（Aurangzeb Road）为例，这是印度最昂贵的富豪住宅区，2012年平均每平方英尺地价高达1.7万英镑[120]，相

当于英国最贵区域肯辛顿（Kensington）的14倍，而2011年英国、印度的人均GDP分别为38974美元和1440美元。[121]

这种超前金融投资拉动资产价格膨胀的模式，恐怕难以支撑印度下一阶段的发展，更何况印度外向经济的部分基本层面并不稳健。

前述印度卢比的币值贬值只是表征之一，类似的观察还可以深入到以下方面。

（1）长期贸易赤字

印度人口快速增加，但可开发的自然资源愈益短缺，这是具有长期制约性的基本矛盾。

自独立以来，印度国内资源和制造业生产都不能满足国内需求[122]，而大量进口使得经常账户大部时间均录得赤字。历史上，只有1972—1973年及1976—1977年两个时期曾录得贸易盈余。自1980年加快经济发展的30多年以来，印度一直录得贸易逆差，而且规模不断扩大。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印度失去其长期战略性援助出现国际收支平衡危机而推行自由化政策，出口额增加，贸易赤字略有改善，2000—2001年度出口对进口的比例曾经达88.2%，但其后还是持续下降，如表3-3所示。

表**3-3**　印度历年出口与进口金额与比例

（百万美元）

年度	出口	进口	出口/进口
1997—1998	35006	41484	84.4%
1998—1999	33218	42389	78.4%
1999—2000	36920	50011	73.8%
2000—2001	44560	50536	88.2%
2001—2002	42358	52940	80.0%
2002—2003	52719	61412	85.8%
2003—2004	59361	72431	82.0%
2004—2005	83536	111518	74.9%
2005—2006	10510	15710	66.9%
2006—2007	128900	190700	67.6%
2007—2008	166200	257600	64.5%
2008—2009	189000	307600	61.4%
2009—2010	182200	300600	60.6%
2010—2011	256200	383500	66.8%
2011—2012	309800	499500	62.0%
2012—2013	305600	502200	60.8%

来源：印度中央银行（RBI）及其他。

表3-3数据清楚地反映出印度贸易逆差在21世纪以来不断恶化的趋势。只要发生长期逆差，就会不断累积债务，连带压迫本币贬值，影响国内金融市场稳定。

图3-13中的贸易逆差恶化趋势有所改善，原因并非政策措施的作用。印度的庞大能源进口需求，是其经常账户逆差的主要原因。在2008—2009年度，经常账户逆差达160亿美元，是GDP的11.11%，只是由于2014年中国际油价开始大幅下挫，才有效地改善其经常账户赤字情况。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印度工商部。

图3-13　印度持续多年贸易赤字，规模呈扩大趋势

（2）外债沉重

印度企业依赖向外借贷投资，致使印度的总外债规模急速上升，在2016年年底达4843亿美元的历史高位。2017年第一季度为4718.52亿美元，而同期印度的外汇储备规模仅有4007亿美元。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3年印度偿还利息占财政收入的25.69%，债务负担沉重（一般国际标准危机线为3%）。

印度评级和研究机构2017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印度500家上市的非金融企业中有1/3不能偿还足够的债务利息，陷入债务危机。随着全球进入加息周期，美联储缩表，美元流动性回流，印度企业的债务负担将会加重，面对经济增长放缓，可谓雪上加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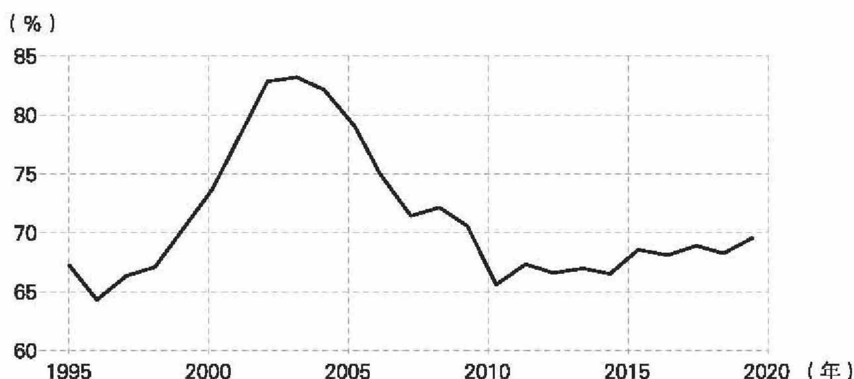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印度财政部。

图3-14　印度总外债持续上升

（3）政府高负债率

另一方面，虽然印度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03年84.2%的历史高位有所下降，2016年为69.5%，相较于日、美、欧等高度金融化的发达地区，虽然相对温和，但仍然是E7中比重最高的国家（巴西58.91%，委内瑞拉49.8%，中国41.06%，南非39%，土耳其33%，印度尼西亚25.02%）；政府以债务的手段拉动经济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难免造成隐忧。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印度储备银行。

图3-15　印度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

（4）货币贬值

自2008年以来，印度卢比进入漫长的下跌周期。2009—2011年资金流入使得印度与其他新兴国家相比货币保持了相对的抗跌性。但卢比稍后还是急速下挫，2016年2月触及68.80的历史低点，如图3-16所示。



图3-16　印度卢比汇率

币值下跌有利于出口，但印度的出口，并没有因此而大幅改善，还是长期处于贸易赤字状态。而且印度企业大量向外举债，这些债务一般以美元结算。本币币值下跌，利息及还款成本无可避免地上升，增加了企业偿还债务的压力。

三、印度在21世纪的发展战略

目前，印度政府向人民乃至世界描述的愿景是，尝试在制造产业上打造另一个闪亮的印度。

（一）“印度制造”（Made in India）

印度发展战略最重要的依托是人口红利。目前印度拥有人口近13亿，其中一半年龄都在25岁以下，是世界上人口结构最年轻的国家之一。目前有60%的人口处于适龄就业阶段，预计今后10年还会有超过2.2亿人加入劳动力大军。据此，享受人口红利已成为印度政府重要的政策依托，如果这些年轻人能够获得就业机会，无疑会成为印度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

但反过来，如果不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就业增速没有赶上人口增长，则对这个每年新增适龄工作人数达到1000万人的国家来说，将出现重大社会问题。2017年官方最新失业率为4.9%。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一份报告却指出，印度15—29岁的人口中30%并不是处于受雇、教育或培训的状态之中。换言之，印度的失业或就业不足压力

巨大。

一般情况下，越是产业结构高度化，吸纳就业的能力就越差。印度是发展中国家结构最高的国家，目前依赖IT服务、金融等高端服务业占就业人口不足5%，难以提供足够就业机会消化大量的适龄劳动人口。沿着西方道路追求现代化的印度，只能寄望于发展制造业来大规模创造就业机会，期望能继中国后成为另一个制造业大国。印度政府期望把制造业占GDP的份额从16%（2016年）提升至25%（2022年），新增1亿个就业岗位。

但印度要发展成制造业大国，将面临一连串难题。

1.基础建设瓶颈

印度制造业一直无法国际化的一个原因，是其薄弱的基础建设水平。印度政府计划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以推动经济加速增长。根据2015年印度政府财政预算，政府将向基础建设领域增加7000亿卢比（约合113亿美元）的拨款，包括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基金拨款2500亿卢比，以及增加对公路和铁路建设的支持和港口及卫生的投入。同时，将为铁路和公路引入免税的基础建设债券，设立国家投资和基础设施基金。[123]

印度透露未来5年将在铁路网投资1370亿美元的计划。

同样，2016年的印度政府财政预算（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再次强调，要重点扶持中低收入人口和农村人口，同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对农村的投入，包括就业、基础设施、教育、农业技术和农产品市场开发等，争取5年内让农民收入翻一番。[124]

2016年，印度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正式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成为继中国后的第二大股权成员国，共出资83.67亿美元，占总股比8%以上。[125]同时，印度还推出了本身规模较小的区内版“一带一路”专项基金，用于投资南亚及非洲的公路、桥梁和发电厂等基础建设项目。[126]

但印度如何突破基础建设瓶颈，将是一大难关。正如梅新育总结：

印度政府不是不重视改善基础设施……问题是，要改善基础设施，

与中国相比，印度和其他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困难：基础设施发展计划本身就不现实，有竞选宣传价值，却难以落实；财政能力不足，资本短缺瓶颈制约，也没有能力如同中国毛泽东时代那样充分动员其充裕的人力资源以化解资本短缺约束；无休止的政治斗争、媒体口水大战，都阻滞了印度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土地私有制更令印度基础设施建设陷入比中国数量多得多、程度严重得多的拆迁纠纷之中；印度各级政府普遍存在“腐败＋不作为”的问题，不仅大大提高了印度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而且令基础设施建设进展迟缓，被拖延烂尾的风险大大提高；等等。[127]

印度根据生产率调整后的劳动力成本在过去10年几乎没有增长，这使印度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中具有竞争力。但，印度需要克服上述困难才能把低成本优势转化为制造业投资和产业出口的增长。

2.教育问题

印度是精英平民严重两极化的社会，教育也出现两极化情况。印度固然具有不少优良的大学，为全球IT业及科研部门供应大量优秀人才，大量能说流利英语的人口也是其优势，可是印度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文盲人口群体，其中女性接近一半是文盲。

印度社会文化中的种姓制度、性别歧视、赤贫等现象妨碍社会流动性，如果不能打破这些陋俗，则印度恐怕无法有效释放其“人口红利”。

3.非正规部门的两难

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锐意发展制造业的印度政府将面临两难。

一方面，为了打造一个能吸引外资进入制造业的环境，印度政府必须规范非正规部门，创造一个外资能与民族资本竞争的环境，但这样将不可避免地大幅度增加制度成本。[128]印度西化上层建筑（政治制度、法制等）的成本已经过于高昂且缺乏效率，如果连经济领域的制度成本也上升的话，其经济基础将更无法支撑。印度也许会堕入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低水平发展陷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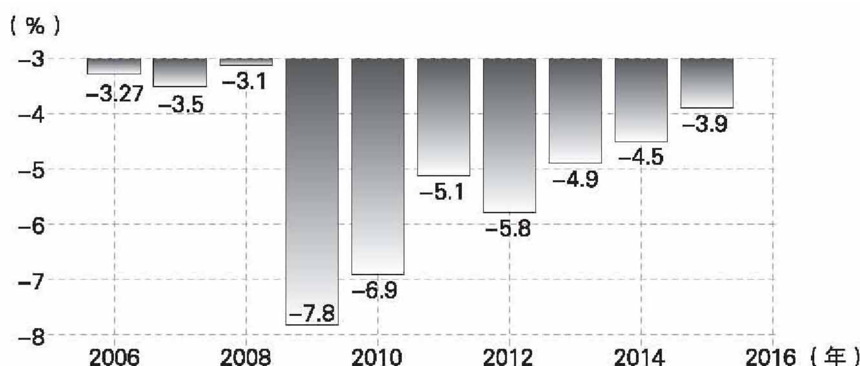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如果灰色经济真的被规范化，民间低成本的生计经济失去韧性，印度社会通过非正规部门内部化处理负外部性的能力下降，则印度面对全球化冲击时，由贫富差距过大演化而来的区域、族群、宗教

等冲突可能会全面爆发，维持社会稳定的正规成本将上升。

而且，前面已分析过的土地制度障碍、占有资源性资产的小私有资本和高度分散的弱势群体对外部资本强烈排斥，都是妨碍印度发展制造产业的正规及非正规制度性障碍。此外，还有技术工人缺乏、文化障碍、法律程序冗长、完整的工业体系还未建立等一连串问题。印度要实现制造业大国的梦想，即使有领导人政策上的决定，实践上也还是前路漫漫。

4.扩张性财政的隐忧

基础建设发展难免需要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来配合。但是，印度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预算赤字在2009年创下GDP7.8%的历史纪录，如图3-17所示。近年虽然已有下降，但在E7中仍然仅次于有庞大石油收益的委内瑞拉（委内瑞拉11.5%、南非3.8%、印度尼西亚2.25%、中国2.1%、土耳其1.3、巴西0.6%）。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印度财政部。

图3-17　印度财政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

印度政府已经把2015—2016年的财政赤字控制在GDP的3.9%以内，但为了削减开支，政府将大幅削减粮食、化肥、石油的补贴，比例高达10%；而且在增加军费的同时却削减教育支出，比例高达17%。这种财政分配的调整，可能影响大量贫困人口的生活，并削弱印度的长远竞争力。

此外，为了吸引外资，政府同时削减税收。新预算案将公司税由

30%降至25%，并对部分原材料关税降低10%，以促进制造业发展。印度政府如何保持稳健的财政，避免堕入债务陷阱，仍将是一大考验。

5.发展模式失去动力，制造业青黄不接

印度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让印度企业大量向外借债。充裕的流动性进入金融、房地产、保险、建筑[129]等带有泡沫色彩的领域，加上IT服务业及采矿业的发展，共同推动了近十多年来印度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率。“数字印度”（Digital India）也是政府响亮的口号之一。印孚瑟斯有限公司是世界知名企业，欧美的顶级IT企业也出现不少印裔首席执行官。与IT相关的行业雇员人数约1000万，但对于数以亿计的劳动人口来说，这只是九牛一毛。有学者估计近年来印度的高速增长只让10%—15%的上层人口受惠。诚然，这些部门对整体经济也有一定的溢出效应，可是，印度的IT服务业及房地产等部门的发展近5年来已有放缓的趋势。随着国际企业迁离印度或缩减规模，IT业已出现解雇潮，估计短期内将有10万人失去工作。

印度从2016年年初开始连续6个季度经济下滑，随后短暂回升，接着从2018年年初开始又连续8个季度下滑，多种经济数据创下美国次贷危机以来的最差水平。印度亟须发展制造业来创造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但随着外资流入减缓甚至逆转流出，本国工业基础仍然薄弱，长远来看即便“印度制造”真能成功，但也是远水不能救近火。更何况，对比区内其他制造业发展迅猛的国家，印度实际上正被抛离。2017年5月，印度工业产出仅增长1.7%[130]；而越南在2017年1月的增幅达7.1%，孟加拉国在2016年12月的增幅也高达7.4%。这些国家没有什么响亮的口号，但其制造业在稳步发展，有望在这一轮的全球工业转移中接棒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制造业中心。

6.踉跄前行的激进改革

印度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必须多方面进行改革，但印度既得利益集团非常顽固，历来改革皆困难重重。2014年重新执政的人民党比起国大党，与精英利益集团较少有千头万绪、纠缠不清的利益关系，而且其领导人莫迪颇有雄心壮志，以改革者自居。这对身患沉疴的印度体制本应是一剂良药。可是，人民党有浓厚的印度教民粹主义色彩，其领导者颇有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性格。例如，莫迪在演讲中曾经提出要把印度的GDP规模扩大至20万亿美元，即近10倍于目前的2.264万亿美元。

虽然莫迪没有指明期限，但这种言辞难免使人怀疑政策制定者是否有点信口开河、脱离现实。

这种好大喜功的性格可以从印度首个高铁项目反映出来。孟买至艾哈迈达巴的高铁于2017年正式动工，预计于2023年竣工。可是据印度媒体报道，目前孟买至艾哈迈达巴的铁路持续出现亏损，空座率达40%。这不禁令人忧虑该高铁项目未来的营运状况。究竟决策者是真正考虑经济效益，还是只是为了面子？在另一个闪亮口号“印度速度”的背后，是不是反映了印度经常出现的二元超前特性？罔顾本身的经济基础，而好骛前宗主国或先进国家的制度及生活方式，也许是后殖民性（Post-colonial）的一种症状。

可是在经济民生最急需的基础建设上，印度政府却仍未达标。例如莫迪上台以来，分别提出“印度所有家庭通电计划”和解决厕所问题的计划。可是至今印度仍然有约3.04亿人（占人口的23%）未接通电力，数量为世界之最；截至2016年12月，51.6%的印度家庭没有厕所。联合国一项调查发现，印度仍然有6亿人口在户外便溺；每年近20万儿童因为水源污染感染腹泻死亡；2017年印度的全球饥饿指数在119个国家中排名100，属于严重级别。

事实上，印度执政党急于求成的特性反映在其猛烈推行而不顾社会可承受能力的多项激进改革之上。

7.震荡式货币改革

莫迪第一项重大改革尝试是为了便利推动基础建设发展的征地法案，可是在2015年因各方利益反对无疾而终。其后莫迪政府推行震荡式货币改革。2016年11月8日，莫迪忽然在电视上宣布4小时后废除旧大额钞票。民众必须在限期前将持有的500及1000面额钞票存入银行账户。只要提供身份证明文件，民众也可以限额换取少量新钞。可是印度有一半人口没有银行账户，而且估计3亿人口没有任何身份证明文件。

可以对比数年前朝鲜推行的一次换钞。朝鲜那次换钞设定了兑换上限，实际上就是以国家手段推行强制性财富再分配。朝鲜的体制可以这样做，但尊重西方私人产权观的印度当然不能公然侵犯私人财富，所以换钞不设上限。那么这次废钞并非货币或财富再分配改革，而更多的是一次税务措施。正如上文所述，印度存在极庞大的非正规部门。从事“地

下经济”的人们手上囤积大量现金，所有交易以现金进行，没有账面记录，政府无法从这些经济活动中抽税。据估计，印度的经济活动近90%以现金进行。把现金赶进银行体系，并推广电子支付，减少经济对现金的依赖，扫除灰色及黑色经济，政府便可以监察经济活动，从中征税。

政府也期望这次行动可达到一定财富再分配的作用。政府的构想是，很多为了避税的富人和贪污的官员宁愿让手上的旧钞废掉，也不愿意全数存进银行。如此一来，社会的总货币量将减少，无异于局部财富再分配。民众觉得这项举措可以惩罚那些避税的富人和贪官，也愿意忍受种种不便。

但结果民众饱受折腾后，99%的旧钞都回到银行体系中。估计是手上持有大量旧钞的富人利用各种途径借用贫穷民众的银行账户来存款。所以有批评者说这次劳师动众的举措，只是让黑钱洗白了（此外，所谓的消灭伪钞作用也微不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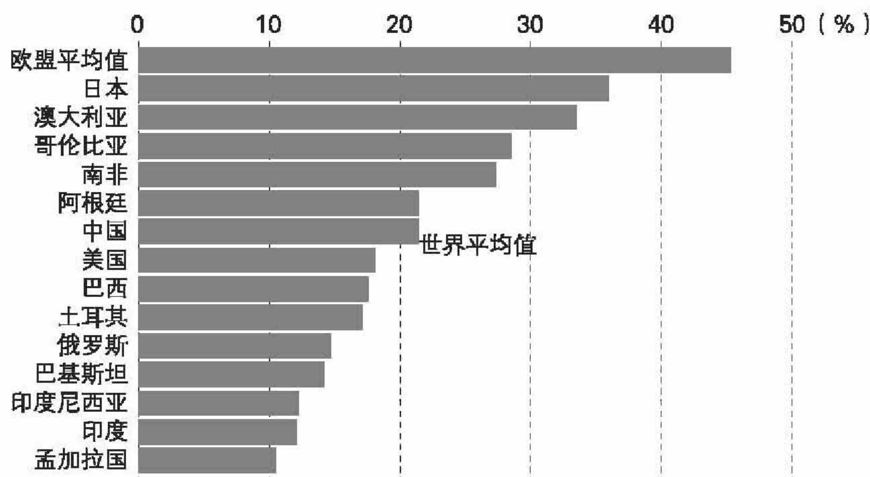
政府不承认这次换钞行动失败。毕竟钱回到银行账户，当局便可以对可疑的账户进行税务调查。财政部声称正在调查180万个这类账户，其成效有待观察，但底层群众的生计率先受影响。

由于市面现金短缺，很多小经营者因周转不灵而无法维持。人民党的官员也承认约有25万非正规部门的经营单位因此歇业。房地产部门严重受影响，大批雇员失业。高度依赖现金的农民也饱受打击。

印度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得益于非正规经济。所以不管印度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如何外向激进，外部性成本及风险也可以被非正规部门消化，印度社会得以保持稳定。然而，一旦激进改革伤及非正规经济的筋骨，印度社会的不稳定性风险必然大增。这是印度改革的两难。

8.税制改革

由于存在庞大的非正规部门、各种灰色经济、黑色经济（避税贪腐等），印度的税收/GDP比位列全球最低水平[131]。世界银行一份报告指出：印度的税收占**GDP**比重只有**16.6%**（对比欧盟达**45%**），纳税人口只有不到**3%**。此外印度实行联邦制，各邦有较大财政自主权，再加上政府体制叠床架屋，让印度全国税制非常复杂。政府税收不足，无法有效推动各种基础建设促进经济发展，以及投资改善人民基本生活水平。



来源：《经济时报》。

图3-18　各主要经济体税收占GDP之比

莫迪政府在废钞政策余波未平之际，又出台另一项重大改革措施，它被认为是自印度建国以来最大的税制改革。2017年7月，印度开始实施一般销售税（General Sales Tax, GST），其内涵是在全国推行单一税制。印度全国实际上并非单一市场，各邦之间货物往来会征收关税，除了中央销售税外，还有各自的附加税。一件商品在供应链的不同环节上往往出现重复征税的情况。在新的全国统一销售税制下，除了66项外，所有商品及服务将分六级征税。政府希望统一的简单税制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

可是分析者指出，一般销售税实质上是一种累退税，即底层群众受的影响大于高收入人士。而且经过多轮讨价还价，避税最严重的土地买卖及房地产最终会豁免征税，政府最终的税收将大打折扣。而中央政府承诺向各邦补偿税收减少，则可能加重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再者，印度各邦的经济条件差别甚大，统一税制忽略了各邦的特殊条件，情况就像欧盟统一货币及市场，结果造成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矛盾。

一般销售税的执行并非完全简单，管辖的部门也不统一。企业需要每月填写三份报税表，再加上每年一份总报税表。而且在任何一个有业务的邦都得重复填报。有分析担心有关的会计及税务开支将加重中小企业的负担。

在野国大党副主席拉胡尔·甘地认为这次税制改革将以失败告终。

最新报道指出这次税制改革目前做成供给链和分销链出现紊乱，商业情况恶化，达到2008年危机以来最差水平。据报道，印度信贷增长跌至25年低点。2017年第二季度印度放贷规模环比下滑达52%，说明印度工商业进入收缩期，只靠金融、房地产等泡沫部门撑门面。

在连番改革引起社会动荡的背景下，印度士兵非法进入中国的领土洞朗地区。[132]有分析认为，这是莫迪政府为了转移国内的不满而挑起民族主义情绪。日本顺势倡议与印度联手在区内打造具有冷战色彩的所谓“自由走廊”。这对莫迪政府的地缘战略影响，恐怕是方向性的。

2017年8月22日，印度银行业职员发起全国大罢工，抗议废钞造成银行系统的压力，并反对有关银行改革的方案。与此同时，各种社会冲突不断。如何平息印度政治家口中这“0.5场战争”，确实是一大挑战。

小结

印度无疑充满发展的潜力，不能简单地认为其二元化的体制结构阻碍改革，而要认识到，其在印度全球化的过程中起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但同时也是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一大障碍。何况在人口资源过度紧张的压力下，印度只能靠尽可能降低社会成本，自主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民生经济来满足本地需求，才能缓解长期贸易赤字和政府债务压力。若想达到这种效果，就需要政府权衡利弊，至少先完成民主革命阶段的土地改革。

如果在基本经济制度没有变革的条件下，单纯去调整只有少数人就业、使海外资本更多获益的服务业出口占比过高的经济结构，印度的外汇收入就会大幅度减少，不利于缓解长期贸易和财政双逆差的局面。这个道理，印度精英群体完全了解。然而，之所以如此强势的莫迪政府在土地制度改革上也无法执行其调整意图，是因为他们很多人与土地改革被调整的利益主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第四章　印度尼西亚：在新地缘格局下的区域性海洋大国

印度尼西亚地跨亚洲、大洋洲两个大洲，有约2.4亿人生活在1.7万个岛屿上，17世纪初以来被荷兰人以“东印度公司”的名义殖民统治了350年。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在海外知识分子中确立以“印度尼西亚”作为国家名称，可见其命途多舛，晚近成国。

我们对其复杂国情很难做归纳，若跟着一般性资料描述，则只能简单地认为：这是一个在地理气候、族群文化、自然资源等方面都具有多样性的“世界第一大岛屿国家”。

立国晚、岛屿多，而且族群矛盾、宗教冲突与军人干政此起彼伏，因此，在客观上印度尼西亚难以完成所谓西方确立的现代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概念上的国家化建设（State Building）；但也许是印度尼西亚的精英群体缺乏自主话语体系建设的努力，因此该国在殖民化制度遗产的约束下罔顾国情，继续跟从西方：先是20世纪60年代跟随美国主导的冷战意识形态，纳入军事化围堵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后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接轨于核心国“后冷战”阶段要求的新自由主义制度体系。由此，其在参与全球化的同时，势必发生“去中央化”，致使国家调控难以实行，经济发展多灾多难。

本书超越一般资料的描述指出：印度尼西亚发展困境是内因和外因共同造成的。一方面，西方意识形态及制度体系不可能适用于这个由住在数千个岛屿上高度分散的原住民组成的海洋国家，其地理条件和族群文化的多元化，客观上确实难以被西方模式的现代政治手段整合为“民族国家”，这也导致其建国初期没有利用本土的资源优势“在地化”地完成国家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另一方面，印度尼西亚跟从核心国地缘战略、照搬西方意识形态，导致外国资本大进大出，显然利于外资通过“资源资本化”来占有本地资源经济的收益，却并不构成在本地发展产业所必需的资本积累。延宕到当代，也就势必在全球资本化的竞争中被边缘化。因而，在金融资本全球化以来爆发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中，印度尼西亚的经济都受到了严重打击。

印度尼西亚在21世纪遭遇经济危机以来的复杂困境，只是资源出口国在金融资本全球化恶性竞争中势必“被边缘化”的必然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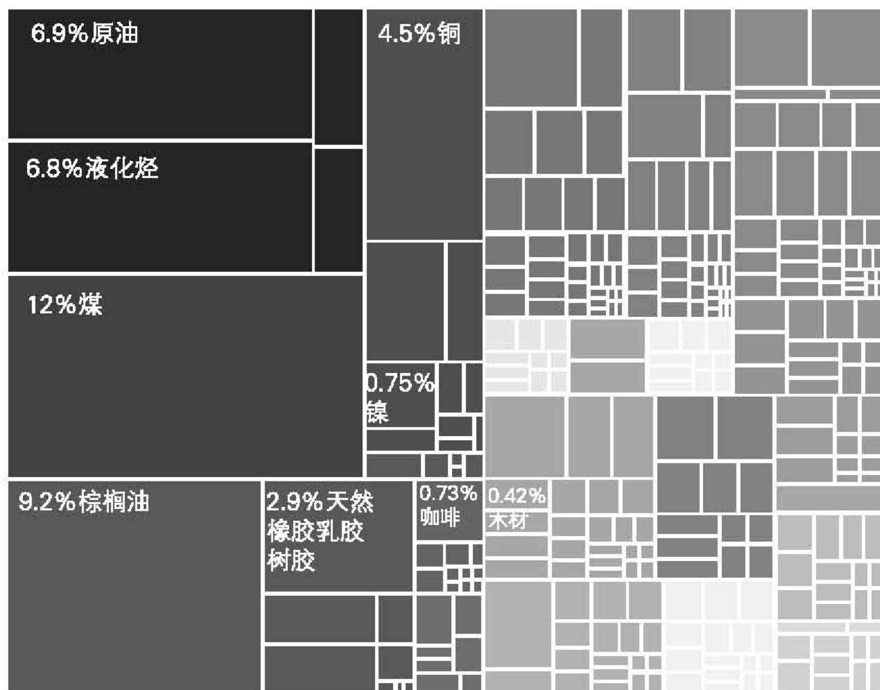
不过，我们在把印度尼西亚纳入E7比较研究的时候，只能以印度尼西亚官方公布的有关数据和公开发表的资料做分析，引述的文字也基本上属于西方主流话语。[133]由此，对此类数据资料不可能涵盖的多元结构问题也就有待做进一步调查。

有鉴于此，以下分析只是初步的、粗浅的。

一、资源经济国家在全球危机下的困境

21世纪初影响世界经济走向的一件大事，是2001年美国IT泡沫崩溃爆发危机，由此促使其资本大量流出；随之，2003—2007年全球经济处于繁荣期，由此，全球对能源和原材料的外部需求增加。借助于此，作为资源出口国的印度尼西亚也乘着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升浪，经济重新进入增长期。

接着是2007年次贷危机引发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其间，全球经济随核心国家资本大进大出的周期性波动而变化。美国应对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做出的量化宽松政策虽然推动原材料价格短期飙升，但随之便在2009年全球危机、2010年西方债务危机的压力下，因需求锐减而在2012年以后陡然下降。此后，印度尼西亚的出口结构依赖天然资源（见图4-1），因此一旦遭遇全球经济下行、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减少，以及投机资本流出原材料期货市场，出口品价格低迷就会使贸易盈余显著下降，印度尼西亚的资源出口经济也就无可避免地受到恶性冲击。



注：天然资源出口占最大份额，超过50%。

来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Indonesia Product Export Treemap.jpg。

图4-1　2012年印度尼西亚外贸图

1.大宗商品原材料市场价格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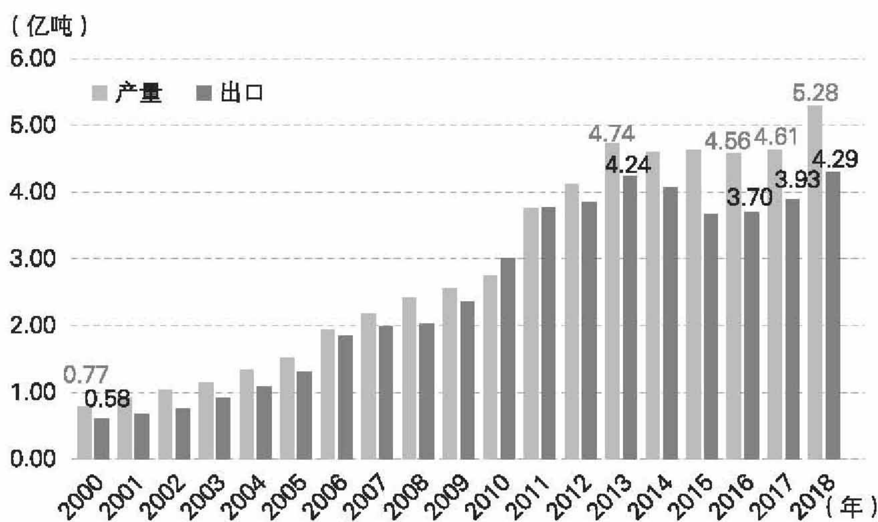
印度尼西亚作为资源经济国家，其出口物资中的煤炭、石油、棕榈油、天然橡胶等能源和资源产品，占主要出口份额。这些出口品的价格波动，在21世纪的金融资本时代并非由供求决定，而是由核心国家不断扩张的金融流动性进入期货市场的规模和进出频率决定。美国2013年停止量化宽松政策之后，进入期货市场的资金减少，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随之下跌，直接打击了像印度尼西亚这类资源出口国的经济。

2.煤炭价格下滑

2000—2013年，印度尼西亚的煤炭产量和出口量逐步提升，连续14年保持同比高增长。从2014年开始，随着全球经济下行，印度尼西亚的煤炭产量和出口量同时逐步下降，直到2018年才开始明显回升。

印度尼西亚的煤炭占出口产业比重高达10.3%。据《印度尼西亚商报》2014年12月18日报道，2015年印度尼西亚政府的煤炭产量目标为4.6亿吨，其中出口3.5亿吨。2014年，印度尼西亚煤炭国内需求目标定为9500万吨，预计只能完成7000万吨。随着国际能源需求的疲软，煤炭价格下滑较快，已从2015年1月初的每吨约80美元下滑至12月的每吨64美元左右。[134]

据彭博社（Bloomberg）消息，2019年印度尼西亚煤炭产量达6.1亿吨，连续第二年大幅度增长，不断创出历史最高水平。预计已超过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成为仅次于中国、印度和美国之后的位列全球第四的大煤炭生产国。印度尼西亚中央统计局（BPS-Statistics Indonesia）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印度尼西亚共出口煤炭4.56亿吨，同比增长6.43%，创至少2015年以来新高；出口额为214.5亿美元，同比下降10.44%，如图4-2所示。[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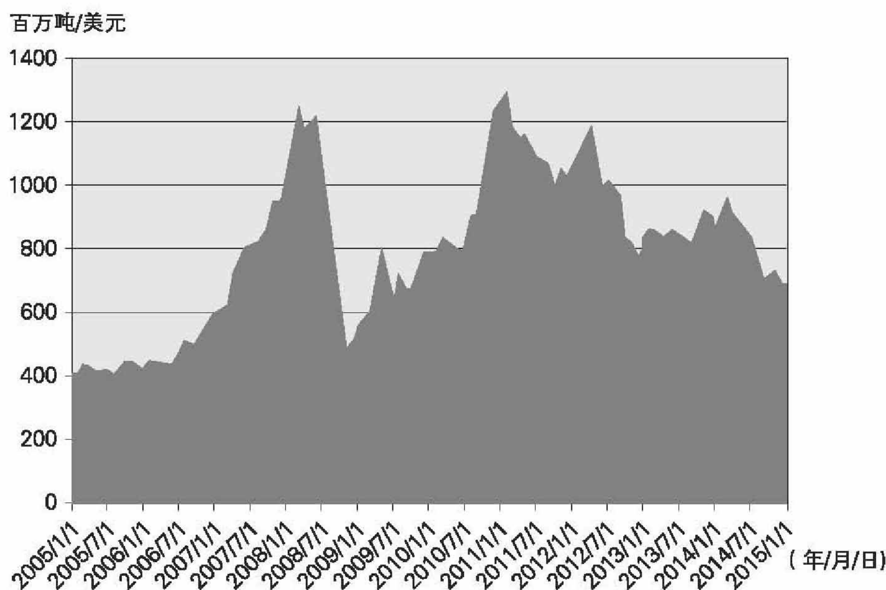
来源：中国煤炭经济研究网/金瑞期货。

图4-2　印度尼西亚煤炭产量及出口变化

3.棕榈油价格下跌

近年来，印度尼西亚棕榈油出口量持续增长，成为世界第一大棕榈油出口国，排第二的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同时也是全球第一大棕榈油生产国，其总产量占到全球的60%左右，出口量则占到全球总出口的

55%左右。印度尼西亚2008—2013年棕榈油出口量从1507万吨增至2122万吨，2014年大幅增加到超过2500万吨，此后增长放缓。出口市场主要为美国、印度、中国、欧盟、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但2011年以来，国际棕榈油价格下跌、国际需求疲软等因素，对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印度尼西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如图4-3所示。



注：2011年开始国际棕榈油价格整体下跌。

来源：https：//news.mongabay.com/2015/03/declining-palm-oil-prices-good-news-and-bad-news-for-smallholders/

图4-3　2005—2015年国际棕榈油价格（百万吨/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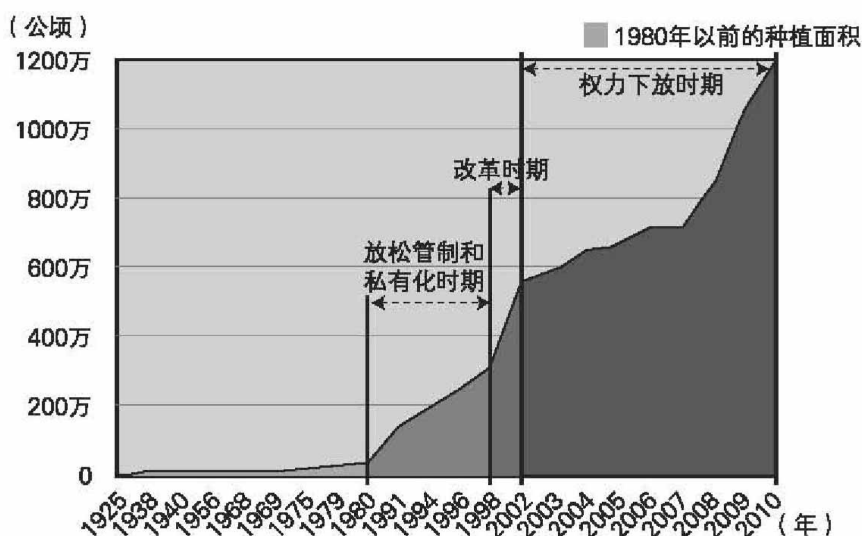
全球大豆供给充足、石油价格大跌、印度尼西亚生物柴油行业的棕榈油消费量不尽如人意等因素，导致棕榈油在生物柴油行业中的吸引力降低，国际需求下滑。2014年9月，马来西亚棕榈油价格跌至每吨1914马来西亚林吉特（约合567美元）的5年低点后，2014年以来国际棕榈油价跌幅已达19%。[136]

延伸阅读13

印度尼西亚砍伐大片森林造就棕榈油产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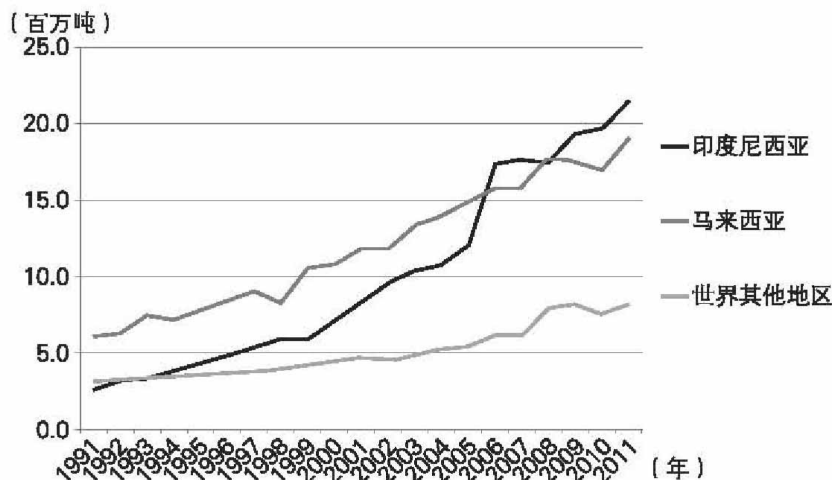
目前世界上有约20个国家在生产棕榈油，主要生产国只有三个，分别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尼日利亚，这三个国家的总产量占世界棕榈油总产量的88%，自1980年以来，印度尼西亚各届政府均竭力种植棕榈，2010年，全国共有约1200万公顷土地种植棕榈树，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6.3%（见图4-4）。自2005年起，印度尼西亚逐步取代马来西亚，成为世界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见图4-5和图4-6）。

棕榈油生产加工业是印度尼西亚经济发展的支柱行业之一。根据统计，印度尼西亚棕榈油产业占出口产业的7.3%。



来源：https：//fatwaramdani.wordpress.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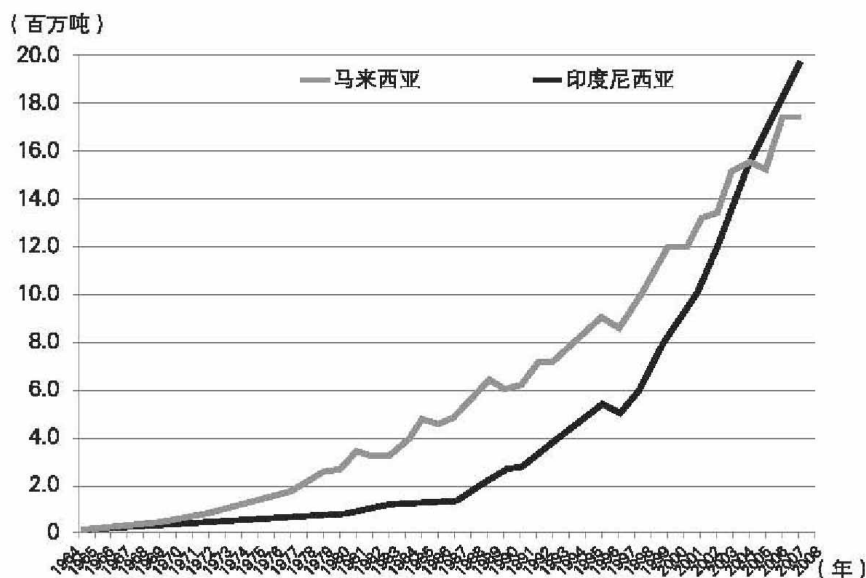
图4-4　印度尼西亚政权迭起与棕榈树种植面积变化



注：不含棕榈仁油。

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图4-5　全球棕榈油生产量（1991—2011年）



来源：mongabay.com。

图4-6　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棕榈油生产量（1964—2008年）

根据印度尼西亚中央统计局资料，目前棕榈树种植已占到农业产值的11.87%，2003—2006年，棕榈树种植业的产值平均增长率为17.8%，远高于整个农业部门8%的比例，同期棕榈油产量以每年约15.3%的速度增长，其中个体小农种植园增长最快，为20.7%，私营部门为15.9%。

印度尼西亚国内棕榈油消费增长缓慢，产品消费以食用为主。2006年棕榈油及衍生产品产量达1610万吨，其中国内消费420万吨，出口1190万吨，国内和国际消费市场份额比例约为3:7。为促进棕榈油出口，印度尼西亚曾将棕榈油出口税率从1999年的超过60%下调至现在的零关税，但政府仍保留了10%的初级产品增值税。

整理：薛翠

参考资料：

《2015年印度尼西亚棕榈油出口前景》，驻印度尼西亚使馆经商参处，2014-12-12。

《印度尼西亚棕榈油产业概况》，驻印度尼西亚使馆经商参处，2011-09-08。

《印度尼西亚棕榈油产业状况》，驻印度尼西亚使馆经商参处，2007-04-04。

二、过剩外资兴起“新圈地运动”

西方经济进入金融化阶段的重要特征，是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发生金融虚拟化扩张。自从美国2008年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大规模向全球输出流动性来缓解本国金融危机以来，欧盟、日本相继推出不同版本的量化宽松政策，但实质性的后果只有一个——在全球形成金融产能过剩！随之，大规模增发的西方货币被跨国公司占有，但并不用于本国的实体经济投资，而是直接用于在产业经济国家做战略产业并购，以及在资源经济国家兴起“新圈地运动”。

我们在E7比较研究中认识到：若土地或其他自然资源被大规模圈占，其资源出口过程中的物流、结算等属于较高附加值的第三产业各个环节就都被跨国公司在海外完成，造成资源产品出口国留在本地的只有

第一产业劳动者养家糊口的收益，客观上就没有在本地形成本国金融吸收存款的可能性。这样，国内很难拥有自我积累能力。

这个简单而深刻的教训，值得那些开放外资进入本国资源经济领域的边缘国家认真对待。印度尼西亚就是资源经济国家被海外资本推行圈地的典型案例。

延伸阅读14

印度尼西亚棕榈油产地的外资圈地

印度尼西亚棕榈油的主要产区在苏门答腊岛，苏门答腊岛的棕榈树种植面积和棕榈油产量占印度尼西亚总面积和产量的80%。

根据公共数据库Land Matrix，在被跨国资本垄断大规模国土面积的国家排行榜上，印度尼西亚排名第二，一共被征地3636437公顷，占全国面积的近1.6%，主要种植棕榈（见表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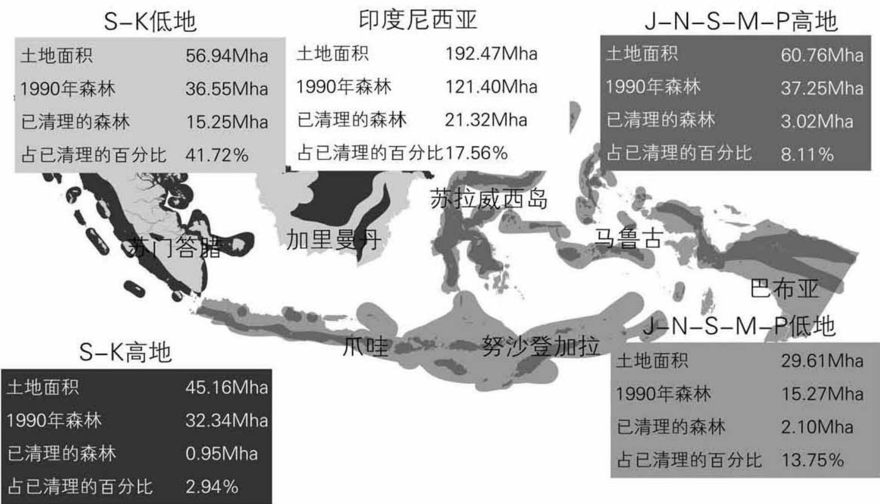
表4-1　十大被跨国资本大规模占用国土面积的国家

1	巴布亚新几内亚	3799169 公顷
2	印度尼西亚	3636437 公顷
3	南苏丹	3491453 公顷
4	刚果民主共和国	2765158 公顷
5	莫桑比克	2203767 公顷
6	刚果	2132000 公顷
7	俄罗斯	1731948 公顷
8	乌克兰	1600179 公顷
9	利比里亚	1340777 公顷
10	苏丹	1269013 公顷

来源：http：//landmatrix.org/en/get-the-idea/web-transnational-deal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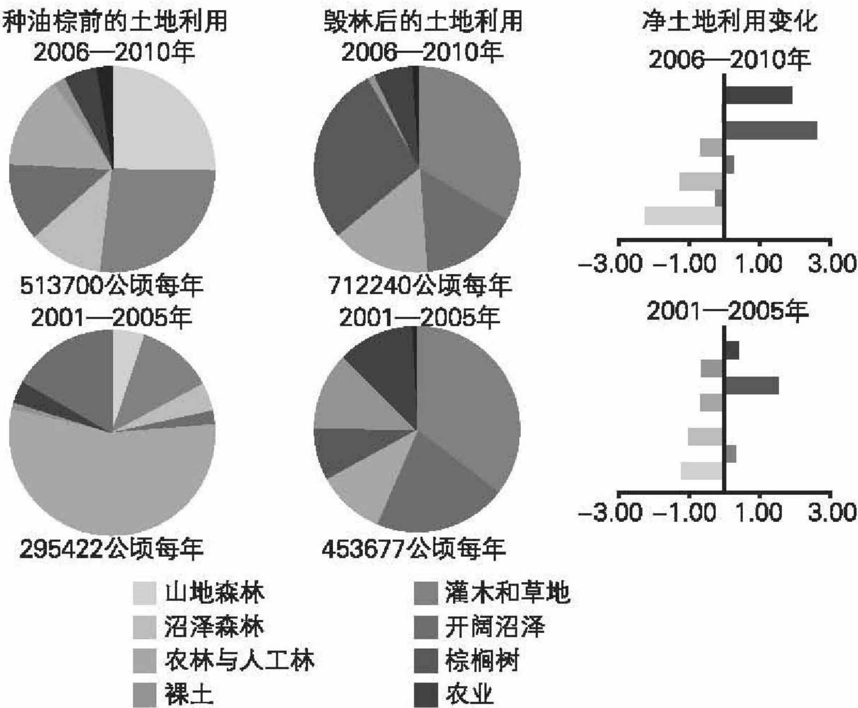
印度尼西亚国土面积19247万公顷，1990年，森林覆盖面积12140万公顷。过去30年，森林已经被砍伐2132万公顷，占全国面积的

17.56%（见图4-7）。其中苏门答腊、加里曼丹与巴布亚三大地区土地，在2001—2010年主要用于种植棕榈树（见图4-8）。



来源：mongabay.com。

图4-7 印度尼西亚森林全图



来源：mongabay.com。

图4-8　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加里曼丹与巴布亚地区土地使用变迁

（2001—2010年）

整理：薛翠

参考资料：

《2015年印度尼西亚棕榈油出口前景》，驻印度尼西亚使馆经商参处，2014-12-12。

《印度尼西亚棕榈油产业概况》，驻印度尼西亚使馆经商参处，2011-09-08。

《印度尼西亚棕榈油产业状况》，驻印度尼西亚使馆经商参处，2007-04-04。

以上专栏案例显示：依赖第一产业的大宗商品出口的印度尼西亚，确实出现了国土资源被跨国资本圈占的情况。同样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巴西，也出现类似情况。

下面的统计数据出自另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印度尼西亚及巴西是E7各国中国土被圈占面积及占国土面积比例最大的国家。

表4-2　2012年被外资收购土地最多的国家

国家	圈占土地（10万公顷）	占全球圈占土地比例（%）	占该国耕地比例（%）	占该国面积比例（%）
乌拉圭	3.46	0.74	18.08	19.61
菲律宾	51.71	11.02	49.48	17.24
塞拉利昂	4.94	1.05	40.62	6.88
利比里亚	6.5	1.38	106.52	5.83
印度尼西亚	71.39	15.21	16.76	3.75
刚果民主共和国	80.50	17.15	1.08	3.43
巴西	22.55	4.80	3.29	0.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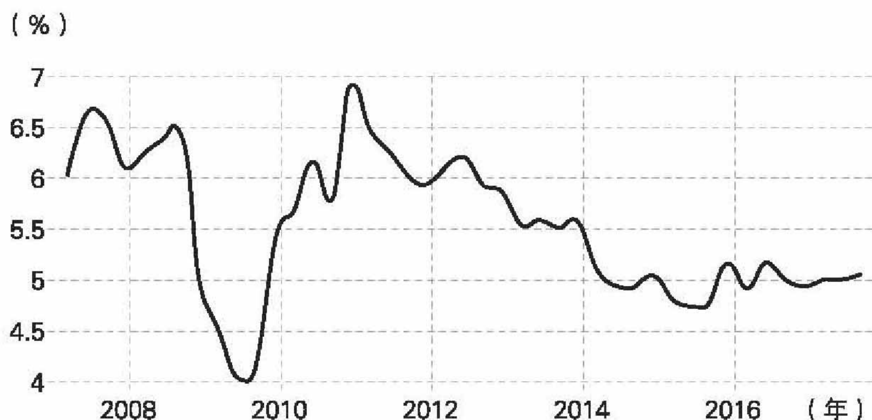
来源：[美]鲁里·萨维奥里，P.奥托里科：《全球土地和水源争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110，No.3，第892—897页。

发展中的边缘国家在资本极度稀缺的条件下，大都制定了亲资本的政策。美国提出的“超级量化宽松”政策的要点是“0利率”，欧盟国家甚至提出“负利率”，于是，外资成本明显低于国内，这就造成发展中国家普遍制定特别优惠于外资的政策。国土资源被外资进入大规模圈占，也可以理解为发展中国家的主流配合着核心国主导的金融资本扩张的客观需求。同理，接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边缘国家势必承载金融扩张的代价，而在资源主权上发生“负外部性”的一种表现形式。据此可知，这种亲外资政策的后果，是错综复杂的。

1.外贸及出口下降

虽然近几年全球经济衰退打击了印度尼西亚的出口，但因为旺盛的内需，印度尼西亚同期还录得比较可观的增长率。其GDP在2009—2012年增长了20.2%，可是同期信贷/GDP比值亦上升了7.2%，潜藏着依靠信贷膨胀拉动经济的泡沫化危机。

2012年以后，美国不仅结束量化宽松政策，而且进入加息周期；随之发生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外资收缩甚至回流，原材料和大宗商品需求显著下降，印度尼西亚依赖外资流入和本国资源出口的经济终于不可避免地减速，GDP增长持续下降。到2015年第二季度下降至4.66%，为近5年来季度新低，2016年第一季度为4.92%。同期固定投资增长速度降至2008年以来最低点，外贸及出口同比双双下降，如图4-9所示。[137]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印度尼西亚统计局。

图4-9　印度尼西亚GDP增长率

图4-9中曲线表明，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增长水平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中下滑，其后一度反弹，但2011年开始持续下降。这种下降与其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高度相关。

图4-10表明，印度尼西亚出口下降与GDP增长率下降都始于2011年；出口额到2016年已经跌回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时的水平。任何缺乏基本必需品生产能力的国家都不可能减少进口，这就势必导致国际收支恶化。印度尼西亚也属于此类国家。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印度尼西亚统计局。

图4-10　印度尼西亚按月出口值

2.资金持续流出

E7各国之中，印度、巴西、土耳其、南非长期录得贸易赤字。只有中国、委内瑞拉及印度尼西亚较长期录得顺差。但近年来印度尼西亚顺差额下跌，如图4-11所示。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印度尼西亚统计局。

图4-11　印度尼西亚贸易差额

可是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的国际收支赤字恶化，资金持续流出，如图4-12和图4-13所示。

柱图清晰表明，印度尼西亚的经常项目在2011年以后成为净逆差，持续录得国际收支赤字，表示资金持续净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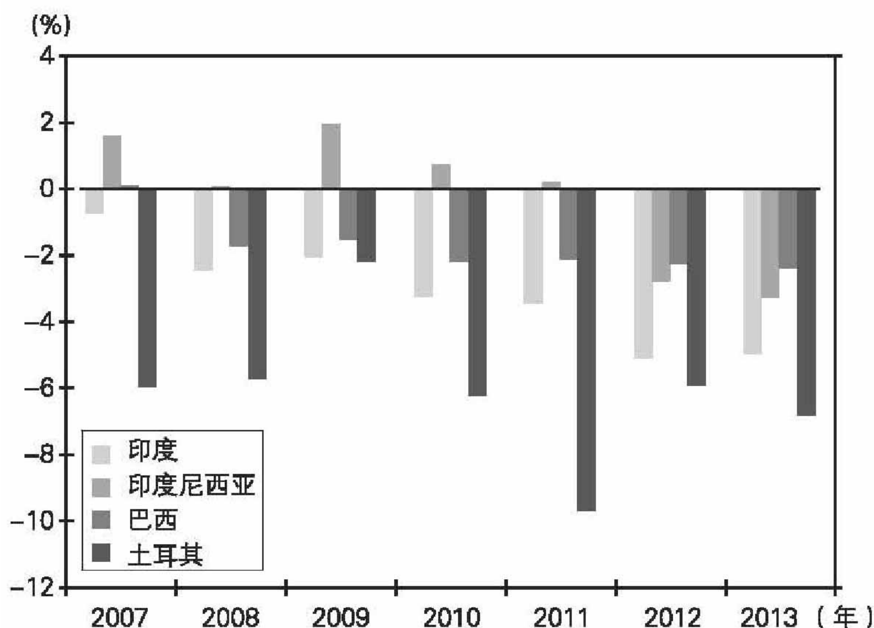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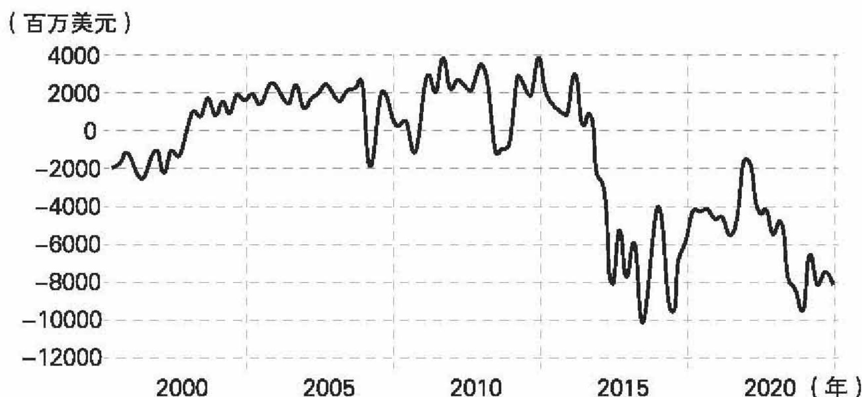


图4-12　近年新兴国家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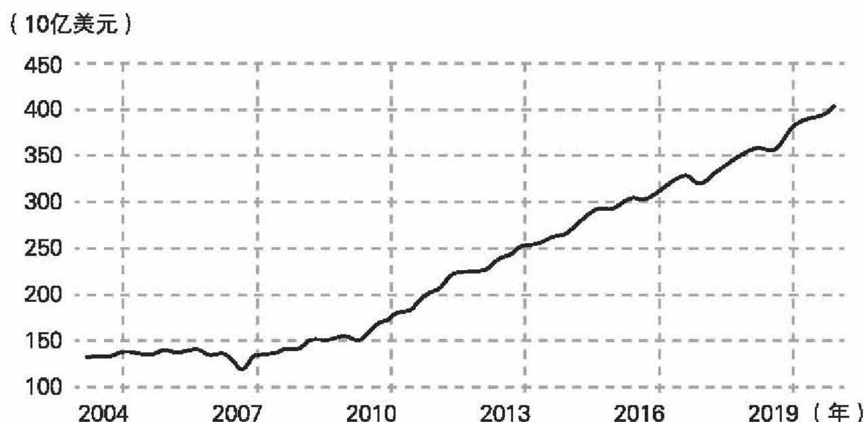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

图4-13　印度尼西亚经常账户近年连续录得赤字

3.外债上升

印度尼西亚的外债曾在2006年回落到1326亿美元，可以说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之前都长期处于稳定的阶段，规模变化不大。但在2009年之后则连续10年快速增长，大量的外资以借外债的形式流入印度尼西亚国内。现在印度尼西亚的外债规模超过4000亿美元（2019年12月数字），如图4-14所示，但近年来外汇储备最高峰时也只有不到1320亿美元水平（2017年12月），另有不到80吨的黄金储备。

印度尼西亚高度依赖外资流入为国际收支融资。其国债债券的海外持有率达33%。这种依赖外债的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融资的方式，使印度尼西亚的货币在面对国际金融震荡冲击时相当脆弱。[138]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

图4-14　印度尼西亚外债规模持续上升

4.币值急挫

印度尼西亚面对输入型金融危机最典型的症候是币值急挫。



来源：https：//m.sohu.com/a/252816563 483467。

图4-15　印尼汇率与印尼外汇储备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印度尼西亚盾跌至1美元兑16650的历史低位，其后逐步回升，曾在2010年11月上升至8881的水平。但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的打击下，印度尼西亚盾汇率又再次断崖式下挫。其后逐步恢复，但2013年6月美联储量化宽松结束预期使新兴国家普遍面临金融及币值震荡的形势，印度尼西亚盾再次开始下滑。2013年6月13日，印度尼西亚央行企图通过加息手段来缓解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的趋势，这也是所有新兴国家面临本币下跌时采取的典型市场化手段，但也大都难以走出困境。此后印度尼西亚盾跌势不止，2015年9月一度跌至超过14700，接近历史最低水平。2017年还是在13150—13600低位徘徊。

亚洲金融危机20年后，印度尼西亚始终遭受输入型金融危机的困扰。这也是很多无法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的发展中国家的困局。

三、印度尼西亚石油从出口转为进口引发的矛盾

印度尼西亚曾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但由于油田老化、储量衰竭，石油产量和储量不断下降，已经从出口国转为进口国。由此而引发的矛盾非常复杂甚至很尖锐。其经验教训对资源经济国家具有典型意义。

1.印度尼西亚国内石油产量下降

近年来，印度尼西亚探明石油储量基本稳定在6亿吨左右，但占世界石油总探明储量的比重从2006年的0.4%降低到目前的0.2%。如未增加新探明储量，再有11年的时间，印度尼西亚的石油将被开发殆尽。

2006年以来，印度尼西亚的石油年产量降到5000万吨；2012年已降至4460万吨。与此同时，国内石油消费量却逐年攀升，由2006年不足6000万吨上升到2012年的7160万吨，增长约19%。从2006年起，印度尼西亚就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并于2008年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到2012年，印度尼西亚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高达37.7%。[139]

2.能源对外依存度攀升

2014年印度尼西亚政府预算案中原油产量设定为81.8万桶/天，实际产量不足80万桶/天，2015年政府预算案设定目标为90万桶/天，预计实际产量只能达到85万桶/天。如图4-16所示，印度尼西亚的原油生产量呈持续下降趋势。另据印度尼西亚石油协会预计，2019年印度尼西亚将成为能源净进口国，届时印度尼西亚能源需求为每日**610**万桶石油当量，其中石油、天然气、煤炭仅能满足每日**604**万桶石油当量的需求。预计2025年印度尼西亚能源需求缺口将扩大至每日240万桶石油当量。[140]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美国能源信息部。

图4-16　印度尼西亚的原油生产量持续下降

3.日益不满的工人

印度尼西亚近年依赖资源产品出口和外资的经济增长并不对本国制造业形成拉动作用，也由此缺乏相对应的就业增长。2007年2月官方公布的失业率达9.75%。政府希望发展制造业以吸纳就业。近年，通过刺激内需，失业呈下降趋势。虽然印度尼西亚有严格的劳动法，可是**69.8%**的就业劳动力都是缺乏福利保障的非正规雇佣。2012年10月及2013年10月，连续两年印度尼西亚爆发大罢工，数以十万计工人上街示威要求增加最低工资及改善待遇。

图4-17表明，印度尼西亚的非正规就业占比从1990年的约77%下降到1996年的约64%；而在21世纪则回升到约70%。非正规就业劳动力占比过高，在大多数加入全球化但被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属于普遍现象。虽然过去10年印度尼西亚录得可观的经济增长，但贫富分化却日益严重。政府发展制造业以增加就业，但在全球生产过剩的恶性竞争压力下，雇主往往利用外包和临时合约来绕过严格的劳工法。其结果是近年出现日益频繁的大规模罢工。



资料来源：research.stlouisfed.com。

图4-17　印度尼西亚的就业情况（1990—2006年）

譬如2012年10月3日，据称达200万工人在印度尼西亚20多座城市进行大罢工。这次全国工人举行的大罢工造成雅加达、勿加西、丹格朗、德博、茂物、巴淡、万隆、三宝龙等地的至少12个工业区陷入瘫痪。印度尼西亚工会联盟估计这次全国大罢工的参加人数至少有300万。在雅加达，示威工人挤满总统府、印度尼西亚大酒店环形公路、国会大厦及劳工与移民部前，要求取消外包制度，在勿加西，大约75万工人在7个工业区举行罢工。工人在示威中提出3个要求，即要求取消外包制度，要求提高最低工资修正有关基本生活费的条例，要求实行全国人民健康保险。

2014年1月12日开始，印度尼西亚禁止出口未经处理的矿物，目的是希望令矿物留在国内加工后再出口，增加附加值，以及创造更多职位。这项措施间接反映出资源出口国的困局——出口资源的收益只占整体产业链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附加值都在提炼加工及金融结算等领域，而这些收益往往被跨国企业占有。

4.通胀压力民怨日深

印度尼西亚一直有通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其通胀率曾飙升至82.4%。

随着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及核心国对外转嫁危机，通过量化宽松政策造成的国际粮食、能源等期货市场价格蹿升，引发进口国通胀及燃油价格高涨，使得能源和粮食进口依存度高的边缘国家民众生活压力日益沉重，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满情绪。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后，印度尼西亚通胀率又升至12%的水平，其后有所回落，到2013年通胀水平仍然高达9%，如图4-18所示。同年6月政府减少燃油补贴，致使石油价格提升44%，柴油提升22%。2013年10月31日，再次有数十万群众响应工会的呼吁在全国各地罢工示威，要求提高法定最低工资，这迫使雅加达的最低工资提升了44%，至每月约200美元。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印度尼西亚统计局。

图4-18　印度尼西亚的食品通胀率

5.印度尼西亚国内石油消费补贴及其调整困境

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乃至全球零售油价最低的国家之一，政府每年拨付大量预算资金用于燃油补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时任总统苏哈托试图减少燃油补贴，随即导致油价暴涨并引发骚乱，这成为执政30多年的苏哈托在动乱中下台的导火索之一。

燃油补贴政策是指政府补贴国内外石油产品差价，保证国内消费者享用低价燃油。这项政策始于苏哈托掌权初期。在执行初期，燃油补贴政策受到了民众欢迎，中下层民众也因此能平等地享用国家丰富的石油资源。但由于贫富差距逐渐扩大，人民群众对石油产品的消费不平衡。据统计，贫困阶层燃油消费支出约为其月收入的0.2%，而富裕阶层的支出则是其月收入的7%—8%。据测算，约71%的燃油补贴被拥有汽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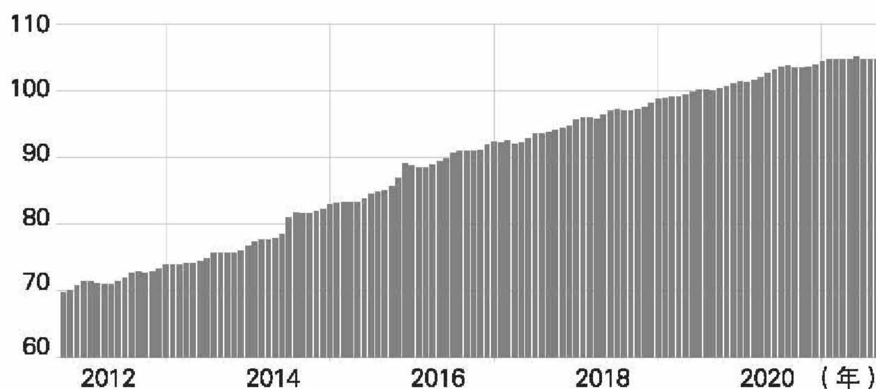
摩托车等的中产阶层以上人口享用。

印度尼西亚油品的持续低价位刺激了国内油品消费，加上工业化发展的用油需求猛增，侵蚀了石油出口创汇能力，同时还需要进口大量石油，加重了印度尼西亚的财政负担。据不完全统计，仅在苏希洛总统执政的10年间，印度尼西亚政府花在燃油补贴上的财政支出就高达1370万亿印度尼西亚盾（约合1141亿美元），**2015**年印度尼西亚燃油补贴开支将达**227**亿美元，占财政支出的**15%**，成为政府的沉重包袱。

燃油补贴使印度尼西亚国内的汽油和柴油价格远远低于国际市场水平，导致燃油走私猖獗，使国家资源大量流失。据不完全统计，印度尼西亚每年因燃油走私蒙受的损失高达8.8万亿印度尼西亚盾（约7.3亿美元）。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预测，上调油价将每年为印度尼西亚政府节约120万亿印度尼西亚盾（约合100亿美元）的财政预算，并减少印度尼西亚经常账户赤字至少20亿美元，缓解财政支出紧张的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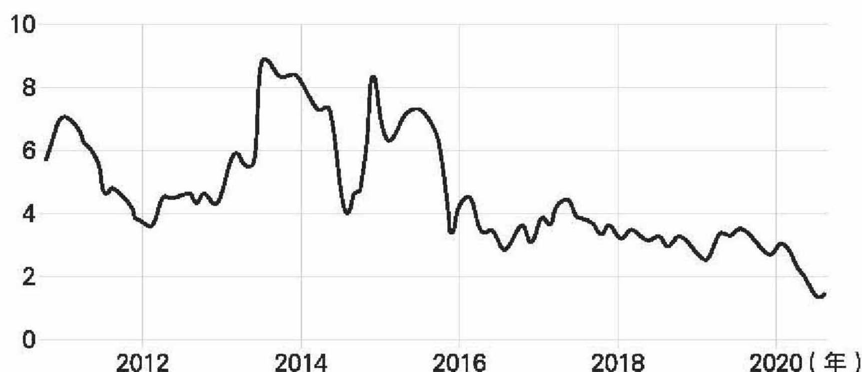
但上调油价导致国内通货膨胀风险上升。2013年6月印度尼西亚政府调高油价后，年通胀率即上升到8.4%。（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后，印度尼西亚通胀率曾急升至12%，这表明发展中国家面对输入性通胀的困局。）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印度尼西亚统计局；https：//tradingeconomics.com/in-donesia/consumer-price-index-cpi

图4-19　印度尼西亚消费者物价指数（2011—2019年）

油价上涨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导致企业物流、工资和生产等成本随之上升，特别是对能源依赖度较大的交通运输、渔业捕捞等行业，经营成本也将大幅增加。印度尼西亚运输业协会副主席布迪表示，此次上调油价将使运输成本提高约10%。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印度尼西亚统计局；https：//tradingeconomics.com/in-donesia/inflation-cpi。

图4-20　印度尼西亚通胀率（2011—2019年）

由于经营成本上升，一些企业不得不裁员或者倒闭，导致失业率上升。对于印度尼西亚的普通民众而言，油价上涨意味着生活成本的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据世界银行统计，目前共有约2900万印度尼西亚人生活在贫困线下，油价每提高1500印度尼西亚盾（约合0.13美元），贫困率即上升约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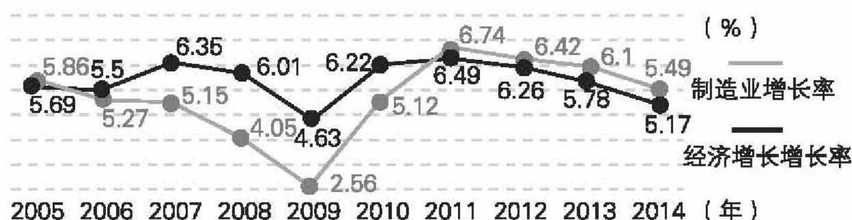
四、印度尼西亚经济发展的其他制约因素

印度尼西亚近年寄希望于利用其劳动力成本优势发展成制造业大国，但困难重重。如前所述，印度尼西亚的国情和历史等基本因素存在对所谓“发展”的根本性制约，并不完全适用于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也不能完全符合西方中心主义的国家政治建设等制度要求。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发展，受制于多种复杂的内外部因素。

若按照一般产业资本发展的条件来看，虽然印度尼西亚在全球前**25**位出口国中直接生产成本最低，但在物流效率方面排名第**59**位，廉洁指数排第**114**位，经商指数排**120**位。[141]这些都对在地化产业发展构成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也没有建立完整的工业结构，缺乏完整

的本地供应链，在材料、零件和机器仪器等方面均依赖进口，即使形成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也只能是位于低附加值端的出口加工业。总之，印度尼西亚发展制造业之路还是困难重重，如图4-21所示。

图4-22中的就业比例说明：在印度尼西亚就业人口中，居于前三位的分别是农业（占35%）、贸易（占21%）、社区社会及个人服务等（占16%），排在第四位的制造业只占13%。接下来是不足10%的就业领域：建筑业占6%，运输、仓储和物流占5%，金融占3%，采矿、水利等占1%。



来源：http：//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4/10/15/sby-seeing-red-manufacturing-report-card.html。

图4-21　印度尼西亚制造业增长率及经济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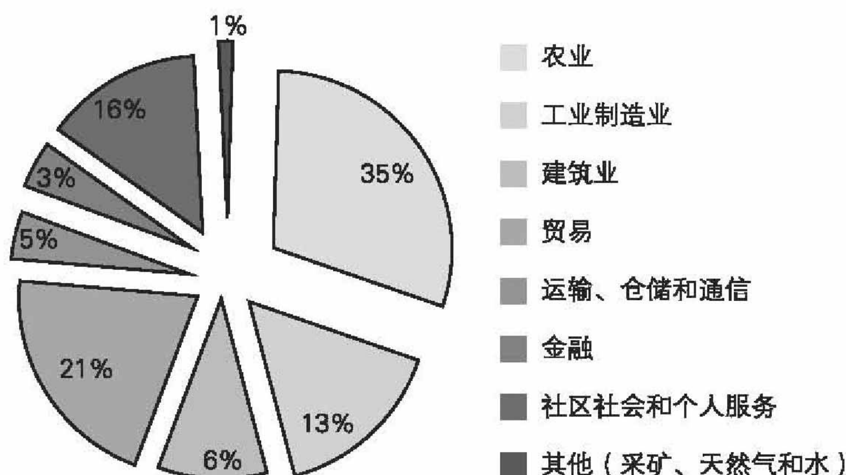


图4-22　15岁或以上劳动力从事产业分布（2013年）

综合多种因素分析，由于经常账户较长期录得逆差、高度依赖大宗商品贸易、债券收益率与美国金融资本过度关联，印度尼西亚可谓亚洲

主要经济体中最脆弱者。[142]

据《经济学人》制定的新兴市场资本冻结指数（2012年），印度尼西亚面对资本突然流出的风险属于危险水平，在新兴七国中仅次于土耳其。国际资本市场的波动令外资流出、股市及债市震荡，融资成本升高，导致投资减少，经济增速减缓，民众愈发不满。

五、21世纪新地缘格局中印度尼西亚的海洋力量展望

在新一轮全球产业大转移中，全球最重要的地缘战略核心带将不在太平洋，而是在印度洋。

不少人说21世纪是太平洋世纪，那只是美日本位的想象而已。从地缘战略角度来看，实际上21世纪是印度洋—中国南海的世纪，或者印度洋—中国南海—西太平洋世纪。这些海域布满全球最繁忙的海洋航运线，而且在接下来的数十年，对于全球经济来说只会愈来愈重要。

印度尼西亚位处南印度洋及太平洋的重要战略位置。印度尼西亚是唯一同时毗连中国南海、印度洋及西太平洋的国家。换言之，印度尼西亚位于21世纪地缘战略的地理中心点。

1.锐意发展造船业

作为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海岸线总长达95000公里，具有发展造船业的潜能。

印度尼西亚总统乔科维（Jokowi）锐意发展造船及航运业，把印度尼西亚打造为世界级的航运强国。他提出："所有国有的船只必须本地制造。"2005年印度尼西亚航运部门共拥有6041艘船只，到2016年已增加至25352只，增幅达310%，其中超过90%为印度尼西亚制造。作为拥有丰富海产资源的国家，印度尼西亚计划耗费4.6万亿印度尼西亚盾建造5000艘捕鱼船。此外，印度尼西亚也致力于发展成地区性海洋强国，正筹备建造一艘价值6000亿印度尼西亚盾、长120米的航空母舰。

2.印度洋航运线转移与新地缘格局

其实印度尼西亚的海运潜能不仅仅在于造船业，海运是全球贸易的血脉，海上集装箱航运仍然是最便宜的远程货物运输方式。近5年来，集装箱船的平均运载容量已经增加了30%。目前，最大的船只最高可负

载19224个集装箱。而世界各地大型的船厂正积极建造能负载达20000 TEU[143]的货船。技术评估组织DNV GL甚至认为负载量高达24000 TEU的货船，在技术上也并非不可能实现。[144]

更大型集装货船涉及的不仅仅是技术和成本问题，还有主要航运线的转移。海洋货运是全球资本主义商品流通的命脉。可以说，全球资本主义从诞生那天开始，便与海运密不可分。航运线是海洋军事力量覆盖的重要内涵。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波斯湾、印度洋、马六甲海峡，乃至中国南海等，在不同历史时期成为重要的地缘战略区域。更大型的集装货船将不利于通过某些较狭窄及水深较浅的传统航线（如马六甲海峡）。开拓新的深水航运线也意味着海洋地缘力量线将发生转移，全球集装箱货运船只愈趋庞大，马六甲海峡等水浅狭长的传统航运线将不再适合巨型船只通过。印度尼西亚极有潜力发展新的深水航运线。目前，整个东亚依赖的印度洋穿越马六甲海峡航运线，将会转向从南印度洋穿越印度尼西亚进入中国南海。届时，区内地缘战略布局将出现重大改变。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印度尼西亚将成为区内具有重要地缘战略价值的国家。一个兼具丰富天然资源、人力资源及地缘战略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其未来发展路径值得研究者密切关注。尤其是核心国在全球危机深化之际高调提出重返亚太、把军力的60%部署到中国周边，来体现其“亚太再平衡”战略；接任的政治家又发起“贸易战”“科技战”等“去中国化”的策略。在迫使中国“硬脱钩”的“新冷战”地缘政治格局变迁之中，目前，如印度洋、马六甲海峡、中国南海这些海上地缘战略热点周边的国家，是世界上最重要也是最针锋相对的，它们都会主动或被动地“选边站”。这无疑将深刻影响亚洲和太平洋的地缘战略布局。

小结

虽然印度尼西亚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二战”后也曾经挣扎着改变殖民地政治经济制度，并且通过主办不结盟运动的1955年“万隆会议”，力图挣脱帝国主义控制第三世界之格局，然而，岛屿地理和多元文化等国情矛盾制约着西方模式的现代国家制度的构建，加之受冷战时期双寡头地缘战略的裹挟，印度尼西亚的土地改革与社会改革相继中断，至今仍沿袭殖民化时代留下的大种植园经济模式，大量出口农作物和资源产品，长期处于国际产业分工低端。

20世纪90年代西方推进全球化以来，印度尼西亚也曾经靠提供廉价资源和劳动力承接发达国家的加工业，但未能改变资源出口国的境遇。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尼西亚受西方金融危机影响，经济波动和社会冲突明显恶化；在因美国结束量化宽松政策而造成一般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和原材料出口价格大幅度下降的打击下，印度尼西亚也陷入国际贸易赤字与债务大幅度增加、国内通胀和财政赤字恶化的困境，这不仅直接遏制了其国内基本建设的努力，也压抑了追求全球化的传统外向型经济路径；何况这种牺牲本国自然环境以换取经济增长的发展主义道路，不可能有惠及全民的包容性经济发展。若在“新冷战”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之中做了服从于核心国的“选边站”，印度尼西亚会更多承受危机重重的核心国的成本转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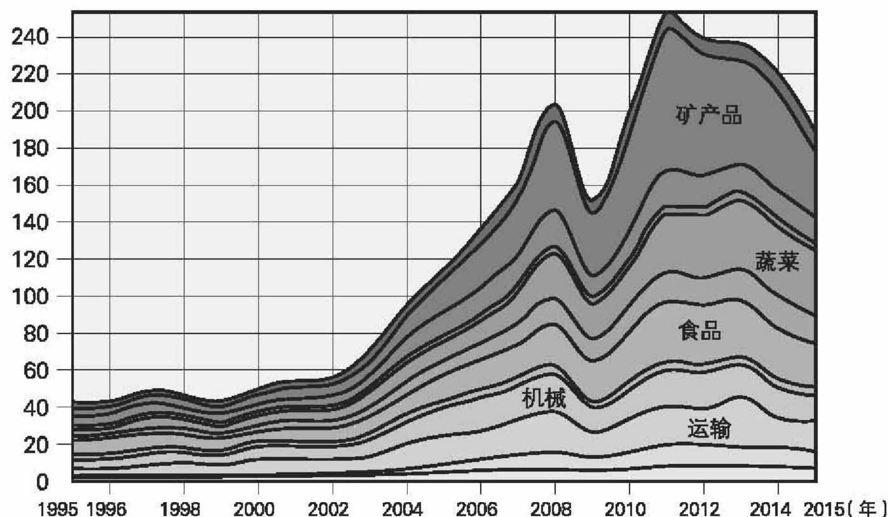
综上所述，在印度尼西亚的发展路径上埋伏着发展主义陷阱的典型症状：纳入全球化派生的贸易与资本账户双赤字，及其造成的国内高通胀、汇率急剧波动、财政赤字恶化，乃至继之而来的社会及政治动荡。

第二部分　巴西、委内瑞拉、南非：资源国的困局

导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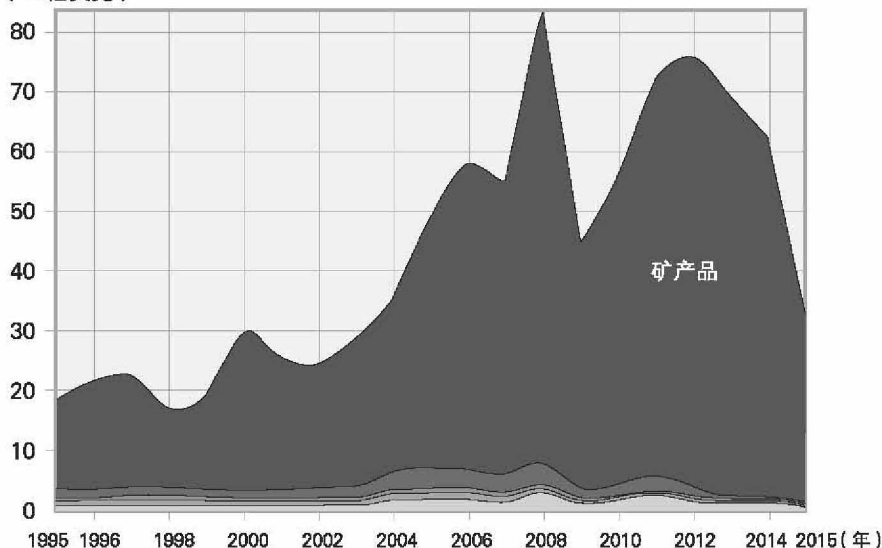
E7研究中，地处殖民化大陆（此处指美洲、大洋洲、非洲三个大陆）以资源出口为主的国家在全球危机压力下表现出很明显的“主权负外部性”——面对核心国家和半核心（半边缘）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相继采取的以量化宽松为名、“成本转嫁”为实的手段，造成资源价格大起大落，资源出口国按照西方理论所做的宏观调控，几乎都反过来加深了国内危机的恶化。因此，我们把巴西、委内瑞拉、南非这三个经济上难以摆脱殖民化的国家作为一组，但仍然分国别来做分析。

其中，南美洲的巴西和委内瑞拉有三个相同特征：一是同属于殖民化国家，外来殖民人口及混血人口占国内人口超过50%，并且外来人口在客观上也是此类国家的解殖运动的主导力量，独立后仍然是延续西方制度的社会主流；二是同样都落入“城市化陷阱”，城市人口占比高达80%以上，都因城市化超前、贫困人口集中于大城市，而不再有进入工业化的所谓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也不再有政府通过社会改革形成良性治理的可能；三是同属于“殖民化单一经济模式”，资源出口占GDP之比过大，跨国公司把控本国资源市场形成“外部定价权”[145]，因而这三国无法自主地把握本国经济主权；任何党派的政治家上台，只要试图收回资源主权，则势必被西方软实力“妖魔化”，并面临西方势力各种颠覆政权的台前幕后操作。图II-1和图II-2为巴西和委内瑞拉的外贸结构示意图。



来源：http：//atlas.cid.harvard.edu/explore/stacked/export/bra/all/show/1995.2015.2/。

图II-1　巴西外贸（1995—2015年）



来源：http：//atlas.cid.harvard.edu/explore/stacked/export/ven/all/show/1995.20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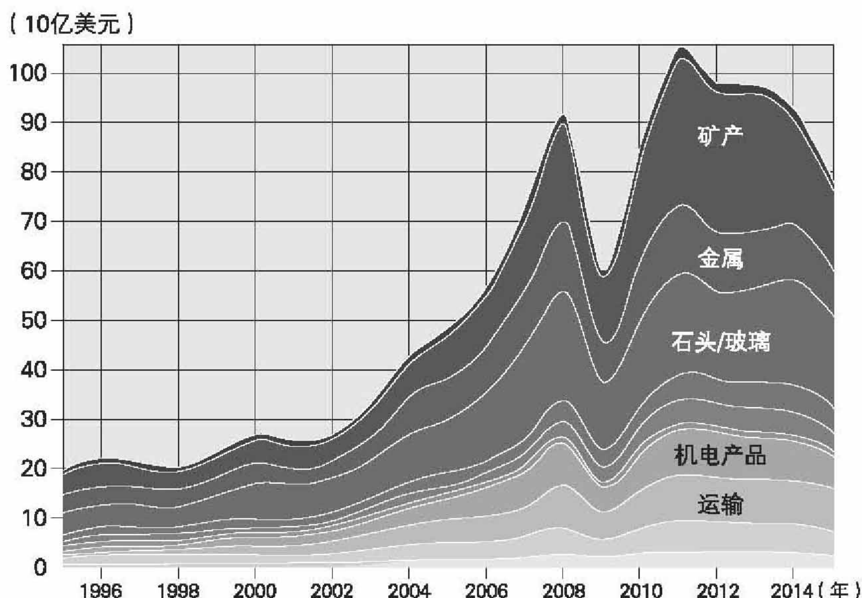
图II-2　委内瑞拉外贸（1995—2015年）

图II-1表明：巴西外贸结构中，矿产品占比最高，其次是蔬菜和食品；资源产品与农产品合计占据出口的2/3。

图II-2表明：委内瑞拉出口结构中，矿产品占据90%以上，过多依靠石油，相比于巴西，更凸显其殖民化单一经济的特点。

这个特点也是委内瑞拉在核心国量化宽松政策出台之后，借助石油价格暴涨而短期暴富，随核心国中止量化宽松政策导致油价暴跌而迅速贫困化，并随即陷入社会动乱的内因。

与巴西和委内瑞拉这两个南美国家长期维持殖民化的单一资源出口型经济相似的是南非。请看图II-3。



来源：http：//atlas.cid.harvard.edu/explore/stacked/export/zaf/all/show/1995.2015.2/。

图II-3　南非外贸（1995—2015年）

图II-3表明：南非外贸结构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矿产品、金属、石头/玻璃。三者合计占据南非出口额的2/3。这表明南非经济类似于巴西和委内瑞拉，也是典型的资源经济出口国（如表II-1所示）。

表II-1　巴西、委内瑞拉、南非三国发展情况

国家	原住民人口（%）	城市化率①（%）	贫困率（%）
巴西	0.40	86（2016年）	15.4（2016年）
委内瑞拉	1.67	89（2016年）	32.1（2013年）
南非	80.2（黑人）	65（2016年）	26.2（2011年）

①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详见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URB.TOTL.IN.Z.

南非虽然在前两个占比上有所不同，但面临近似的困境。

这三国都是十多年连续执政的政府，都在21世纪初搭乘了全球金融化流动性过剩、大量资金注入原材料和能源等期货市场所带来初级大宗商品“牛市”的便车，也由此产生了表面为正、实质为负的结果：表面看是得到“搭便车”机会，利用核心国金融扩张获得本国资源出口的溢价收益，能够改善国民福利，赢得底层民众支持；但从实质看，却因资源溢价收益大大超过制造业的正常利润，而在利伯维尔场制度[146]作用下，私人部门的资金从本国工业流出，进入机会收益高的领域，随之是实体经济衰败，社会失业增加。简单来说，这就是经济学上所谓的“荷兰病”：因为初级商品繁荣而扭曲了经济结构，导致工业部门衰落。

随着核心国家2013年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资源出口价格急速下滑，这三国很快就陷入了资源出口国承载全球金融危机代价的困境。

更为深刻的困境，是这些边缘国家不仅没有本国资源的定价权，更没有制度建设的话语权。由此致使核心国借危机爆发“以恶传恶”，发挥其“后冷战”话语的软实力作用，把过多承载全球危机代价、造成国家失败的责任，归罪于这些边缘国家的政府，甚或直接归罪于那些敢于批判核心国的政治家……

例如，受核心国家软实力攻击最严重的是委内瑞拉。其特殊之处并不在于查韦斯和马杜罗政权的社会主义政治宣传，更不在于他们用石油溢价收益组建的拉美左翼政府反美阵营，而在于他们试图跳出造成上述“负外部性”的殖民化经济地位，更因为他们获取石油溢价收益的前提是，主要依靠底层群众的支持，以革命的名义从国际资本手上收回大部

分资源主权！所以，他们才深受跨国资本及其母国政府的敌视。

何况委内瑞拉试图通过改造被西方软实力控制的国内传媒和教育来夺回话语权，因而更加遭到西方主流传媒不遗余力的妖魔化，各种方式的颠覆策略内外夹击，而且从未间断。

巴西劳工党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也认同社会主义思想，但卢拉获得执政地位之后的国内外政策相对较温和；不过，本国对石油收益按比例分配，仍然是跨国企业的心腹大患。

尽管资源领域的主权外部性程度有别，两国的左翼政府同样受国内中产阶级及富裕阶级的敌视，不断受右翼政治运动冲击。

南非黑人政权之所以得以建立，是因为以继续维护跨国公司的资源开发权为谈判条件，"主权负外部性"相对更大；也因为政府与跨国资本分享资源收益的份额较前两国更少，所以其政权没有受到严峻的外部挑战，其领导人也得到最多西方世界的赞赏。但黑人政府却因分享收益过少，而无法兑现其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及上台时许下普遍提升底层民众福利的承诺，虽然"非国大"执政的政府仍然有其群众认受性的优势，但社会的不稳定性还是以暴力排外的形式爆发出来。

由此可见，南非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典型意义——越是在解殖运动中以放弃暴力革命的方式取得原宗主国的认可，越是更多保留殖民者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则其承载海外资本转嫁的制度成本的基础就越差；随之必然对其他弱势群体转移自身不能承载的成本压力，由此造成的社会代价，一般都会反过来被西方话语利用，来抹黑边缘国家的政府。

综上所述，巴西、委内瑞拉和南非三国的历史经验是，本国如果没有长远发展战略及有执行力的政府，就不可能以国家资本的力量搞出结构完整、具有活力的工业体系，也就不可能形成比较优势，不管资源多丰富，始终无法长远地、根本性地改善整体国民福利。而且，越是依赖殖民者留下的单一经济或单一类别的商品，在国际市场涨落的周期下，本国经济受到的冲击就越大。

产业结构正如投资组合（Portfolio）一样，也需要一定的多元化以分散风险。工业体系的完整性和产业结构的多元性，应该是发展中国家追求的长远可持续发展策略。

第五章　巴西：替国际资本打工的债务国

巴西近年来再次陷入昔日高通胀、低增长的发展困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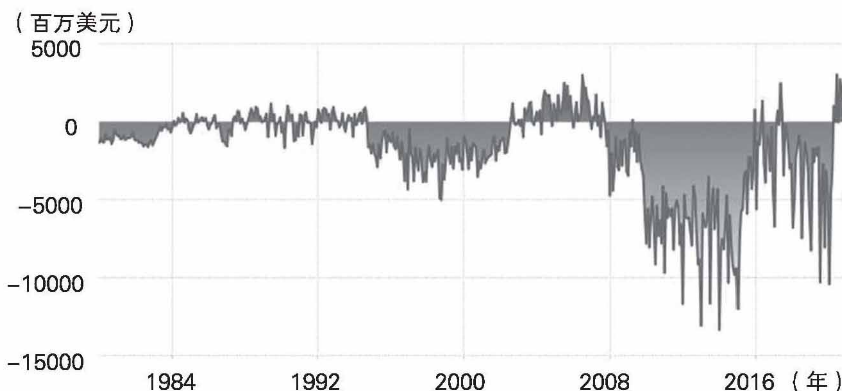
虽然巴西曾经成为令人瞩目的新兴国家，但经济上依附于国际资本的地位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

2011年，巴西的GDP总量超越英国，排在美、中、日、德、法之后，跃升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而且自2001年以来，账面上持续的贸易顺差积累了高额外汇储备。但实际上，巴西却是净负债国。

因为，20世纪90年代，巴西推行金融市场私有化及自由化，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进入。国际资本在巴西获得巨额投资收益的同时，巴西实际上维持着庞大的资本项目逆差。搭乘上全球贸易扩张的便车，尽管巴西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曾经连续多年维持着贸易项目顺差，但随着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全球经济下滑，巴西也跟其他资源出口国一样，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重新出现大规模的经常项目赤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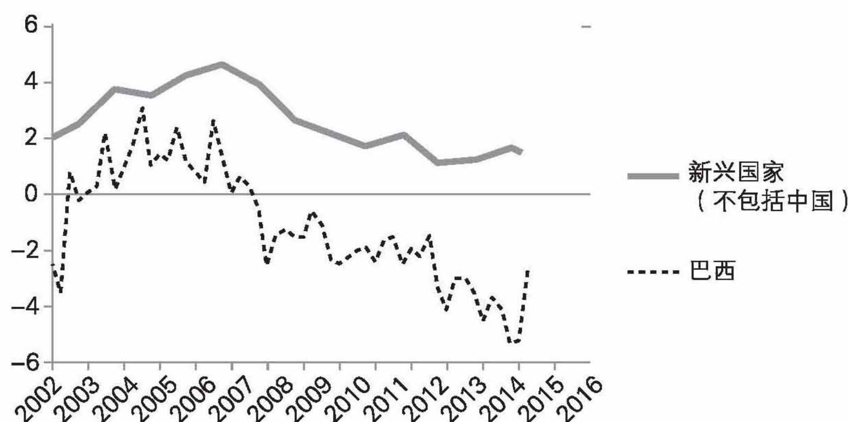
随着国际经济增长减速，原材料出口需求下降，巴西近年的经常项目再次连续录得赤字，如图5-1所示。

巴西2011—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仅增长2.7%、0.9%和2.3%，2013年全年巴西股市下跌了16%，跌幅居当年全球主要股指之首。2014年的世界杯足球赛没能提振经济，其经济在第一、第二季度先后萎缩0.2%和0.6%后，已陷入衰退。



来源：https：//tradingeconomics.com/brazil/current-account。

图5-1　巴西经常项目（1980—2020年8月）



来源：http：//bruegel.org/2015/11/brazil-playing-with-fire/。

图5-2　巴西的经常账户与名义GDP之比

徐以升将该过程深刻地总结为：“自巴西20世纪末选择对外开放以来，国际资本大规模涌入，推动巴西成为金砖大国，也使这个金砖大国饱受资本之苦。12年来，国际资本涌入使巴西沦为庞大的净负债国，且因向国际资本支付高额投资收益，巴西沦为给国际资本打工的国家。国际资本在攫取巨额投资收益的同时，其大进大出的特性又使巴西资本市场反复经历剧烈波动。由此观之，巴西更像是一个由国际资本催生的牟利机器，是一个被反复吹起、刺破、再吹起的泡沫机器，在一次又一次的循环中，国际资本牢牢控制了巴西这个市场、获得了丰厚的回报。”[147]

2000—2012年，巴西全部的贸易盈余仍远不足以支付国际资本同期获得的投资收益；即便除去服务项目，巴西12年的全部商品盈余仍不足以支付国际资本在巴西的投资收益；若将巴西12年全部的商品盈余和海外投资收益加在一起（4252亿美元），才刚够支付4161亿美元的国际资本投资收益。对此，徐以升的总结是“在高GDP增长、高外汇储备的新兴国华丽外衣下，巴西实际上沦为长期为国际资本打工的净负债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巴西研究中

心执行主任周志伟也指出，巴西的产业结构“去工业化”且高度依赖对外贸易。产业结构方面，最近10年的初级产品繁荣加剧了巴西的“去工业化”，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足，而2013年以后初级产品价格的下降使得经济增长失去了足够的支撑，经济的衰退直接造成财政收入锐减及失业率的上升。[148]此为其当前危机的根源。

一、拉丁美洲的工业发展策略教训

进一步看，巴西作为拉丁美洲最大的经济体，也是区内工业化最成功的国家之一，本来已经建立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却始终无法走上工业大国之路，其经验教训值得深入探讨。

可以认为，包括巴西在内的拉丁美洲各国今日的困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殖民化时期遗留的单一经济结构这种内因没有改变的条件下，却遭遇外因改变——西方核心国升级到金融资本阶段的恶性扩张带来了巨大成本转嫁。

以往的很多研究也都试图给出解释。一般认为，在内外因素不利的影响下，拉丁美洲国家不仅普遍缺乏应对能力，而且奉行了有偏差的发展策略。

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不少拉丁美洲国家曾经奉行所谓的“进口替代”及贸易壁垒政策，试图以此化解资本稀缺的约束，建立本国工业体系。这本身不一定有问题，毕竟贸易保护曾经是很多工业强国在发展初期采用的策略。但外资本来就是双刃剑，吸收西方资金，特别是吸纳核心国掌控的国际机构的外资，往往带有涉及主权的苛刻条件。可谓“成也外资，败也外资”！正如李晓鹏分析[149]：拉丁美洲各国发展策略的偏差不仅在于错误运用关税保护“幼苗产业”，更在于对外资的进出和利用缺乏战略性认知。

当时拉丁美洲国家一方面树立贸易壁垒，另一方面吸引外资，希望首先建立内销主导的产业，然后待产业成熟壮大后再向外竞争。但实际情况却是，因为市场保护、缺乏有效竞争，这些国内企业往往不思进取，外来投资者也没有带来先进技术或管理模式，而是单纯利用本地的廉价生产要素，以致国内产品质量长期无法提升至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水平，但本国消费者却要付出昂贵价格，经济缺乏活力（中国的汽车市场也出现类似的情况）。

本书对E7的更深入研究则超越了以上基于发展经济学的一般认识，指出：由于核心国的制度改革要求是符合金融资本自由进出的“去国家化”，因此拉美各国对资本缺乏适当管制，外资一方面倾向制造资产泡沫以从中牟利，另一方面则偏好寻租性质的天然资源或公共服务部门。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借此强迫施行的激进私有化、取消资本管制的所谓结构性改革，更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扭曲的模式，拉丁美洲国家也因此堕入“发展陷阱”，经历了失落的数十年。

换言之，较合理的发展策略应该是一方面利用政策把外资引导至讲求技术创新、具充分竞争的实体产业部门，以促进本国产业的健康发展，并最终具备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则应该限制外资进入投机性及寻租性部门，尤其是天然资源、公共服务等领域。本身具有垄断性的行业，引入外资或竞争并不会特别提升效率。当然，对投机性资本实行合理的管制也是无可厚非的。

1.工业部门萎缩、依赖资源输出埋下祸根

我们通过E7比较研究认识到：产业结构单一的经济模式是殖民地化的南方国家的通病之一。

巴西曾经在20世纪采取进口替代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国民经济已经有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巴西是拉丁美洲国家中少数有较强工业产能的国家，其中某些领域甚至已跻身国际先进之列，尤其是生物燃料的研发。但其后政治动荡、国际经济周期涨落、国内债务危机等各种因素，皆使巴西没有完成工业化，成为工业强国。近年依赖国际大宗商品需求强劲、借助初级产品贸易而跻身经济大国之列。但连续十多年初级商品市场的蓬勃兴起却造成了“挤出效应”，更进一步加深了巴西“去工业化”的情况。巴西“黄金十年”期间工业增长只及GDP增长率的一半。如果扣除与石油采矿有关的产业，那么制造业增长率更呈下降之势。

2004年巴西制造业占GDP的份额曾达到顶峰16.5%，2012年已降至12%；相反，服务业占比持续上升，从2004年的65%，上升至2014年的71%（图5-4）。巴西地理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10月巴西工业生产总值环比零增长，同比则下降3.6%。2014年前10个月，工业生产总值累计同比下降3%，如图5-3所示。2014年1月至11月，汽车生产量累计294万辆，同比减少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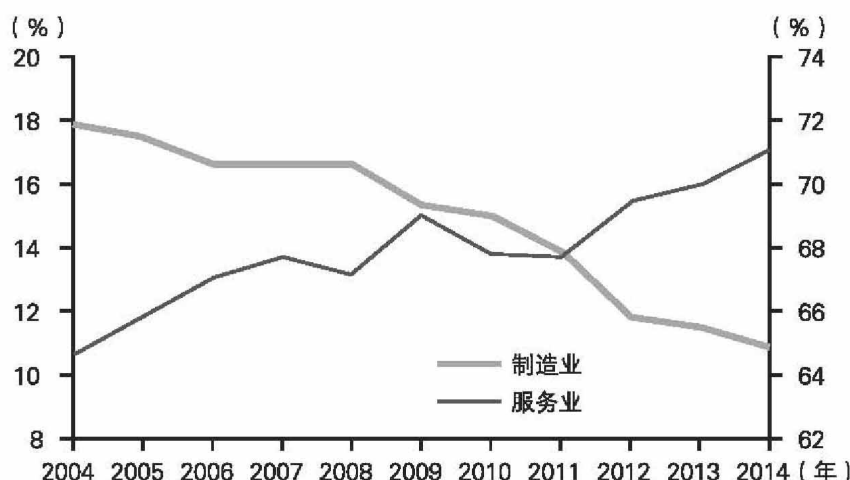
来源：http：//www.ipeadata.gov.br/Default.aspx。

图5-3　巴西工业生产增长率（2003年3月—2017年6月）

目前居民消费占巴西GDP的60%，投资的比重仅有18%，而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约为40%。此外，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占GDP的比重约为16%，而巴西的这一比重仅为2%左右。

巴西发生“去工业化”的原因之一是制造业成本急速上升：2004年巴西的平均成本低于美国约3%，到2014年约高于美国23%（游资流入造成本国币值被高估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总劳动生产率仅提高了1%。某研究报告把巴西与意大利、比利时并列为“最不具制造业成本竞争力经济体”第四位。[150]

巴西经济的衰退已经影响到了各行各业，据报道，“在整个亚马逊州玛瑙斯自由区里的500强知名品牌企业，其工厂规模和产量都急剧萎缩，比如可口可乐、飞利浦、三星、雅马哈、本田。传统的奢侈品、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企业，都在大面积关停”。[151]



来源：http：//bruegel.org/2015/11/brazil-playing-with-fire/。

图5-4　巴西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左轴），服务业占比（右轴）持续上升

巴西过分依赖出口大量资源性产品而造成产业结构性失衡。有分析指出，由于大量商品出口带来的货币升值压力，从2010年到2012年，雷亚尔的升值幅度接近40%；从2003年到2011年，巴西的进口渗透率（国内消费品中进口产品占比）从大约10%提高到了20%。

同时，21世纪的前10年繁荣的经济形势也消磨了巴西进行结构性投资和改革的动力，包括对基础设施、研发、教育的增加投资，以及税收和养老金系统的改革。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4年，巴西全国硬化的路面比例仅有13%。对于大约60%的货运和45%的客运都需要通过国家高速公路网络进行运输的巴西而言，交通拥堵时有发生，不仅严重阻碍了该国的物流效率，商品的交货时间乃至交货质量往往也难以得到保障。

2.搭便车：跨国金融资本投资粮食及能源市场造成的溢价收入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徐世澄分析："巴西前总统卢拉执政的8年（2003—2011年），正好遇上世界经济发展较好的时期，巴西的矿产品、农产品在国际市场都有不错的价格。而到罗塞夫当选总统时（2012），世界经济形势已经有所变化……拉美经济增长并非来自内部，而是主要依赖原材料价格及出口，依赖中国、美国和欧洲的需求。"[152]

美国遭遇2001年新经济崩溃危机和“9·11”政治危机之际，恰逢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美国产业资本大量流入中国所造就的“世界工厂”，大量进口原材料和能源。受这个特殊变化的带动，巴西的资源及大宗商品出口价格和总量一路攀升，巴西获得丰厚的外汇收入。截至2012年年底，巴西的外汇储备已经接近4000亿美元。巴西还成为IMF的前十大出资国之一，参与救助欧元区国家，这在拉美历史上，确实史无前例。

2010年，巴西实现GDP增速7.5%，创造1986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同时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高增长率。这一年，巴西的GDP第一次超过2万亿美元，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超过英国跃居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如图5-5所示。[153]

因此，卢拉总统拥有足够的财力改善民生，特别是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同时构建完善的失业保险和最低工资等社会保障体系。据估算，2002—2008年，巴西政府各种针对贫困人口的直接补贴总额占GDP的比重从6.9%上升到8.6%，贫富差距缩小。2002年卢拉上台时，基尼系数为0.553，到2011年罗塞夫继任时，已经降至0.500，达到本国半个世纪以来最低值；同期，失业率则从9.1%降至6.8%。短短10年里，有3500万人口（约占贫困人口总数的一半）脱离绝对贫困。[154]



来源：https：//zh.tradingeconomics.com/brazil/gdp-growth-annual。

图5-5　巴西GDP年增长率（1995—2020年）

但我们在E7比较研究中提出：巴西的困局是在没有进入工业化的时候就超前实现了人口的城市化，并且大部分人口集中在大城市的贫民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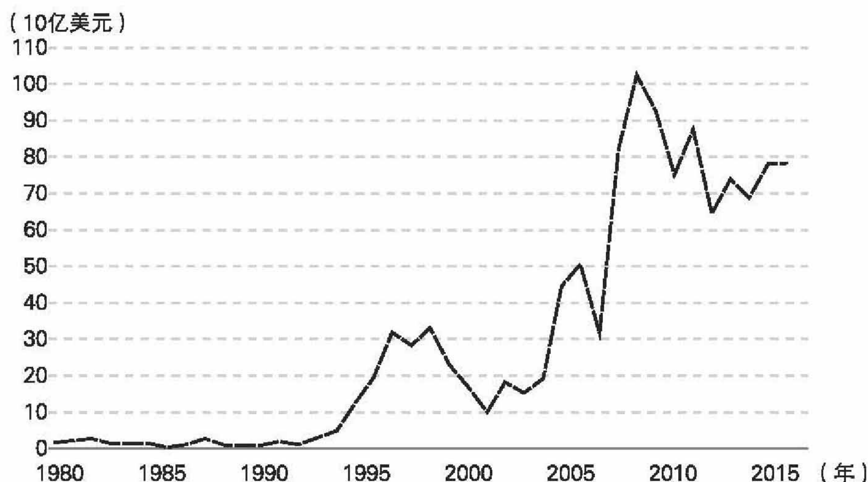
中。由此，任何遵守正规法律的企业雇用城市劳动力，就都得支付其生存、教育、医疗等“劳动力再生产”的全部成本，这几乎是在劳动力市场定价之外再增加至少50%的成本。如果这个国家是食品和一般消费品进口国，那么劳动力成本会随着进口品的价格上涨而更进一步提升。于是，此类国家便没有可能再发展自主性的产业经济，也就难以摆脱对资源、能源和大宗农产品出口的依赖。一旦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走弱，巴西的经济便立即受到严重打击。

2012年3月1日，巴西总统罗塞夫出席《完善建筑业劳动条件协议》签字仪式并发表讲话：“面对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发达国家不是通过提高投资能力来摆脱危机的，而是采取货币扩张政策，把自己的问题转嫁给世界其他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造成经济困难。”罗塞夫指出，“过去数年里，发达国家共释放4.7万亿美元的货币，如同制造了一场巨大的‘货币海啸’……国际热钱涌入，不断推高巴西货币汇率，大大削弱了巴西工业的竞争力”。她更反驳说，“不是巴西工业缺乏效率，也不是巴西人不愿工作，而是这场‘汇率战争’令巴西处于不平等的生产条件之下”。[155]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副研究员周志伟也指出，巴西经济中很多投资非常依靠外部市场的流动性补充，最近几年，欧美国家的货币政策调整使市场的流动性进一步短缺，为也体现了外部市场对巴西经济的制约作用。[156]

当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时，国际资金——包括大量投机性“热钱”——蜂拥而入，由此推高了巴西本币的币值。雷亚尔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在过去10年里升值超过100%，成为经济学家眼里全球被高估最多的货币。但随着美元流动性持续增加，且在巴西国内逐利性地无障碍进出，巴西经济的景气程度、国际大宗货物价格与投机性“热钱”演变为复杂的相互孽生关系，汇率暴涨暴跌，国内宏观调控几乎完全失效。

2012年以后，巴西的通胀率连续突破巴西央行设定的4.5%上下浮动2个百分点的目标区间（也就是6.5%）。政府为了应对高通胀率，不得不使得基准利率一度升至12.5%的惊人数字，同期发达国家的利率很少有超过1%的。但在金融自由化体制下，更高的利率反过来吸引更多热钱短期流入，由此形成了恶性循环，如图5-6所示。



来源：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BX.KLT.DINV.CD.WD？end＝2019&locations＝BR&start＝1980&view＝chart。

图5-6　巴西以外国家直接投资净流入（1980—2019年）

从2013年4月起，巴西央行连续9次加息至11%。由于不断加息以期控制过高的通货膨胀，巴西也因此成为史上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周期最长的国家之一。政府从2014年12月起就开始采取财政货币双紧缩政策，巴西央行一年内连续6次加息，将基准利率调升至14.25%，但这也未能阻止汇率急泻和通胀水平上升，如图5-7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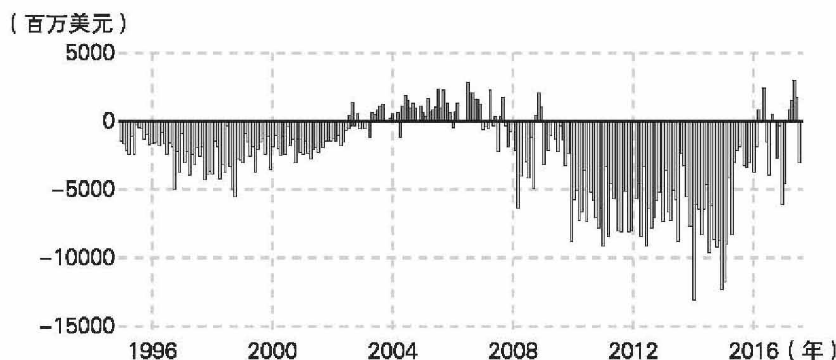
如图5-8所示，巴西的海外资本大进大出，一直发生大起大落，2010年后更是主要净流出。

国际资本大进大出增加了巴西经济的不稳定性。当2013年6月美联储宣布可能退出量化宽松时，带动资本回流美国，致使巴西的金融及货币秩序立即遭受重大打击。



来源：世界银行。

图5-7　2008年以后巴西剧烈波动的短期外债



来源：https：//tradingeconomics.com/brazil/capital-flows。

图5-8　巴西净资本流动（1995—2017年7月）

3.为跨国资本打工的依附型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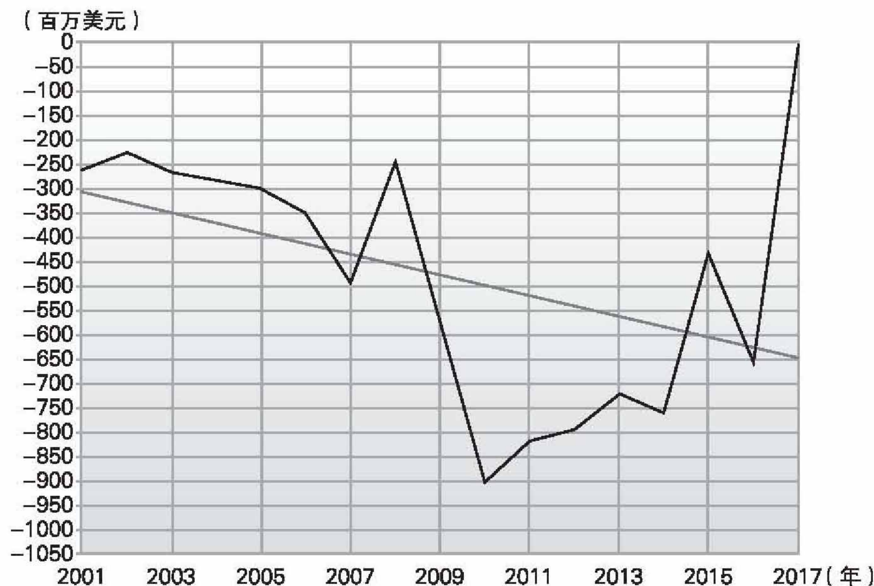
2017年1月2日，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MDIC）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57]，2016年巴西外贸实现顺差476.92亿美元，大大高于2015年的196.85亿美元，创下1989年公布外贸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158]。据统计，2011年巴西贸易顺差298亿美元，2010年为202亿美元，在2006年最高时曾达到465亿美元顺差。截至2011年年底，巴西外汇储备余额攀

升到3520亿美元。但风光背后，却是巴西成为净债务国，而且债务规模还在持续扩大。根据徐以升等的研究，在2010年第二季度，巴西国际净债务头寸高达9757亿美元，接近净债务1万亿美元大关。

2000—2011年，巴西投资收益项逆差总量高达3387亿美元，巴西的海外投资收益为774亿美元，而国际资本在巴西的投资收益则高达4161亿美元，这就是巴西12年来总共需要向国际资本支付的投资收益，其规模是巴西储备资产（3171亿美元）的1.3倍，占GDP（2.1万亿美元）的20%。而巴西同期的贸易收支盈余（包括商品和服务）总规模为1395亿美元，商品贸易长期盈余，同期总规模为3478亿美元。

2010年，巴西的国际投资净头寸高峰值达-9061亿美元，接近国民生产总值（GNP）的50%，超过储备资产3倍以上，如图5-9所示。第一财经研究院经计算发现：2000—2011年，国际资本在巴西的投资收益高达4160.58亿美元，而同期的全部商品贸易（资源出口）盈余，再加上海外投资收益，仅为4252亿美元。换言之，巴西12年间参加国际贸易，出口了不少珍贵资源，实际上是为外国资本服务。可以说，整个国民经济近一半是掌握在国际资本手上。

正因为这种格局，巴西经济对国际资本进出非常敏感。例如，2008年5月巴西股市指数达73516点的高峰，华尔街金融海啸的爆发导致国际资本撤出，巴西股市在随后的5个月暴跌60%；2008年8月至12月，巴西雷亚尔贬值38%。为了刺激经济，巴西央行自2011年8月连续10次降息，将银行基准利率由12.5%下调到7.25%的历史低位，2012年经济增长率下降至0.9%。2013年3月，巴西的通胀率更升至官方设立的6.5%通胀上限。4月，巴西央行在“环球降息潮”中逆流加息，并结束了维持约一年半的降息周期。巴西陷入高通胀和低增长率的滞胀格局。



来源：巴西中央银行。

图5-9　巴西的国际投资净头寸（2001—2017年）

一方面，随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低，依赖资源出口贸易的巴西2012年贸易顺差仅为194.4亿美元，较2011年减少35%，创10年新低。2013年美国结束量化宽松政策，致使国际商品价格持续走低，巴西的出口贸易顺差减少状况更难得到缓解。另一方面，巴西的经济结构不均衡，近年增长主要依靠私人消费来带动。2012年，消费占GDP的比重超过60%，投资占GDP的比重仅为18%。消费越是低迷，经济就越难有起色。

国际投机资本是典型的“风险厌恶型”资本，巴西等新兴市场的货币和金融资产属于“风险资产”，而美国的美元和金融资产都可以起到“避险资产”的作用。国际资本虽然在新兴市场取得高收益回报率，但是一旦国际市场出现波动，国际资本就选择抛售，撤回美国市场避险。美元一旦进入升值加息周期，对资本流动不加控制的巴西就要面对资本外流的风险。

美联储酝酿退市，自然使得巴西受到的冲击进一步加深。2013年6月4日，为遏制巴西雷亚尔兑美元快速下跌，巴西政府取消了针对国内固定收益投资的金融交易税；6月12日，巴西政府又取消了国内外汇市

场方面的1%金融交易税。此前2011年，巴西政府为抑制大量短期投机资金流入巴西市场，曾对来自国外的短期资金采取了征收6%金融交易税的措施，该措施在逼退短期热钱的同时，也抑制了其他短期投资入境。[1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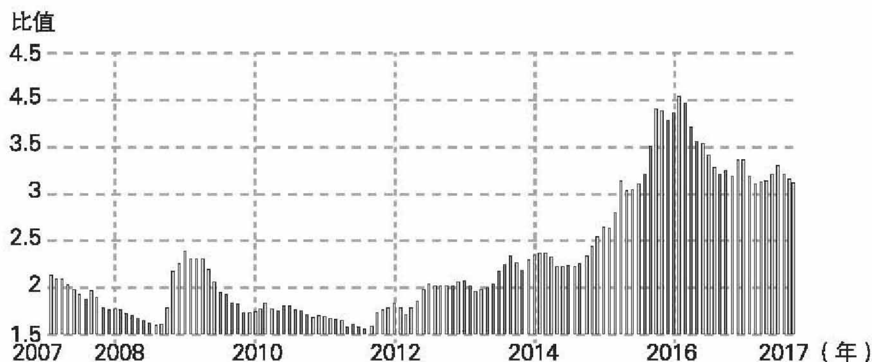
更为严重的是，在经济收缩、金融波动的情况下，积累的社会矛盾也借机爆发。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以来，巴西政府利用降息及减税的所谓“供给侧改革”来刺激经济，试图以借贷膨胀来拉动消费，令私人债务不断膨胀。据调查，巴西每个家庭平均收入的20%需要用来偿还债务。2013年6月，圣保罗市公交车票加价20%，触发全国百万计的民众上街示威，要求政府加大对教育、医疗等公共品的投资力度，抑制通货膨胀，惩治贪污腐败。目前巴西的GDP中投资只占19%，其中仅有2%用于基础建设，而民众平均受教育年期仅为7年。

4.受制于外国资本及国际市场的急剧波动

巴西依靠大宗商品出口拉动经济腾飞，但同时也让巴西的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资源出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阿莉西亚·巴尔塞纳指出，拉丁美洲国家经济依然很脆弱。随着欧洲、中国等大经济体发展减速，需求下降，巴西也陷入经济持续低迷的泥沼。[160]

2014年，巴西进入21世纪14年来，首次出现贸易逆差。2014年前11个月，累计逆差额达42亿美元。巴西外贸研究基金会的负责人桑托斯表示，由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铁矿石需求减少，巴西的出口量明显减少，2014年1月至11月，其出口量仅占全国总出口量的11.5%。2014年，铁矿石的收官均价为每吨75美元，比2013年每吨减少23美元。巴西的能源出口遭遇相同困境，全球原油价格已经下跌约37%。随着美国页岩油的开采，巴西能源的市场竞争力更被削弱了。[161]

世界杯结束之后，巴西雷亚尔贬值趋势加速。雷亚尔兑美元汇率从2014年9月至11月下跌17%。12月9日，跌至2.6174雷亚尔兑1美元，2016年年初更破至4雷亚尔兑1美元的水平，超过2003年货币危机3.95雷亚尔兑1美元的历史水平，如图5-10所示。



来源：https：//tradingeconomics.com/brazil/currenc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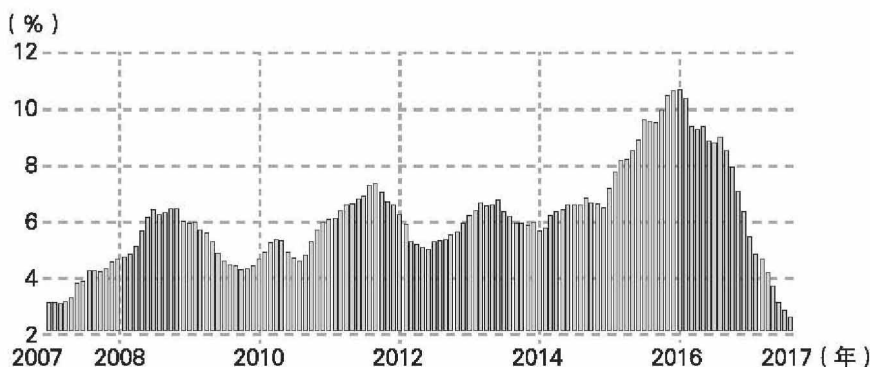
图5-10　美元与雷亚尔兑换率（2007—2017年9月）

国际资本大进大出，使得巴西雷亚尔大幅波动，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期间雷亚尔对美元贬值约25%。

5.通胀高企

巴西过去曾经饱受超级通胀之苦，近年更是陷入经济增长放缓、通胀率恶化的滞涨困局。

巴西地理统计局（IBGE）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11月的年度通胀率高达10.48%，创12年来最高纪录。其后，受国际大宗货物和汇率变动影响，虽通胀率略有下降，但2016年全年的通胀率仍然高达6.29%，于8月统计的过去12个月的年化通货膨胀率仍达8.97%，如图5-11所示。



来源：https：//tradingeconomics.com/brazil/inflation-cpi。

图5-11　巴西通胀率（2007—2017年8月）

究其原因，与昔日军政府时代的超级通胀处境类似。

当时巴西奉行“进口替代战略”，一方面设置高关税限制进口，另一方面给予外资优惠，促其在本地投资，期望以此发展本国的工业。缺乏国际竞争力的本国产品大部分只能通过国内消费来消化，可是巴西的遗留殖民地土地制度令财富分配高度不平等，本国大部分人口缺乏消费力。于是，当时政府采取放宽货币供应及补贴中产阶级消费的方式来促进经济。1968—1973年，巴西平均增长率达11.2%，1973年更达14%，当时被国际称誉为“巴西奇迹”。[162]尽管这种方式在某段时期的确奏效，但这种繁荣的幻象只是筑在流沙上的城堡，它极度依赖外国资本流入。当时欧美在“二战”后经济复苏及繁荣期所累积的资本，需要在国际寻找投资机会，巴西吸引外资的政策正好受惠于此。当国际经济形势发生转变时，这繁荣的幻象就破灭了，因石油危机而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粉碎了当时的“巴西奇迹”。其后，巴西陷入超级通胀、低增长率及高外债的困局。

那么再看巴西进入21世纪以来近十多年的情况，虽然经济策略不同，其实与昔日颇类似。只是这一次全球化下对大宗初级商品需求的急升及美元货币供应的膨胀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巴西便搭上了此班快车。因外贸盈余及大量外资流入，巴西再一次迎来了久违的繁荣。

卢拉政府也是通过放宽信贷和补贴来促进消费的。这一次不同的是，左翼政府利用石油及原材料外贸的收益来补贴低下层民众消费。双管齐下的结果，一方面是中产阶级数量与其消费力同时增加，另一方面是低下层民众也具有了消费能力。但制造业没有相应发展，反而受资源出口扩张而出现收缩，结果巴西近年GDP大部分是由国内消费来支撑的。当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也像美国那样寄希望于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时候，恰恰忽略了美国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是向制造业国家输出作为全球结算货币也是储备货币的美元……

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再一次扭转了巴西的繁荣局面。铁矿石等巴西主要出口商品的价格在2011年开始滑落。国际原油价格也在2014年开始急速下降，巴西再次陷入高通胀、低增长率及外债增加的困局之中。

6.外债总额节节上升

在上述种种因素叠加下，巴西的外债再度急升。如图5-12所示。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巴西中央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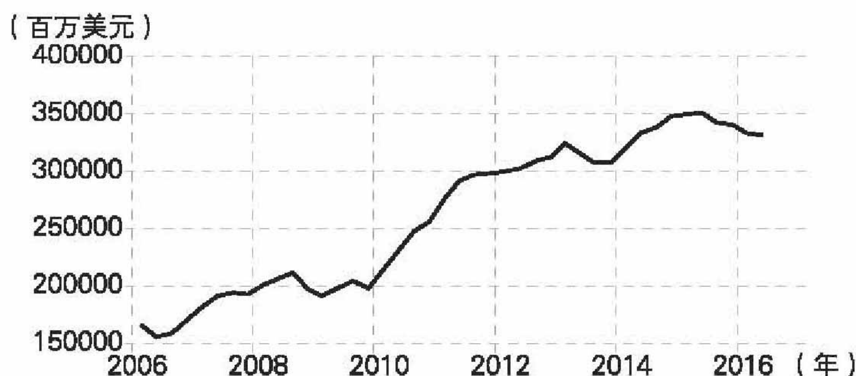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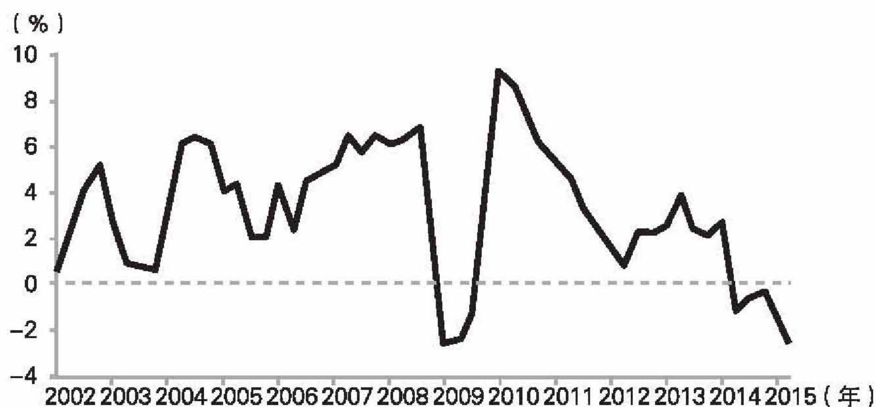


图5-12　巴西总外债

2015年巴西二季度GDP环比萎缩1.9%，创下逾6年来最严重下滑。如图5-13所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1月16日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巴西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此前预测的-3.3%进一步下调到-3.5%；2017年GDP增长预期被调整至0.2%，较此前预测值下调了0.3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预计巴西2018年经济将增长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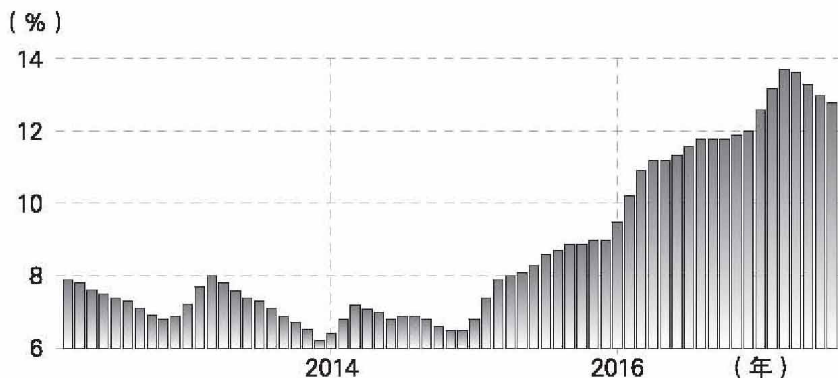
近年发达金融资本国家的经济周期波动和策略调整，通过全球资本和商品市场传导给发展中国家，加剧了一般发展中国家内部本就紧张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并越来越多地从根本上危及国家政治安全，如图5-14所示，巴西失业率在这几年居高不下。[163]

巴西近年的繁荣依赖国际大宗初级商品市场蓬勃。制造业占经济比重下降，GDP主要靠国内消费来支撑，而且国内的消费力也是靠信贷膨胀，如图5-15所示。一旦大宗初级商品价格滑落，加上政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提升利率，信贷收紧，在连锁效应下，巴西经济便快速陷入衰退。



来源：http：//bruegel.org/2015/11/brazil-playing-with-fire/。

图5-13　巴西实际GDP增长率从2010年高位开始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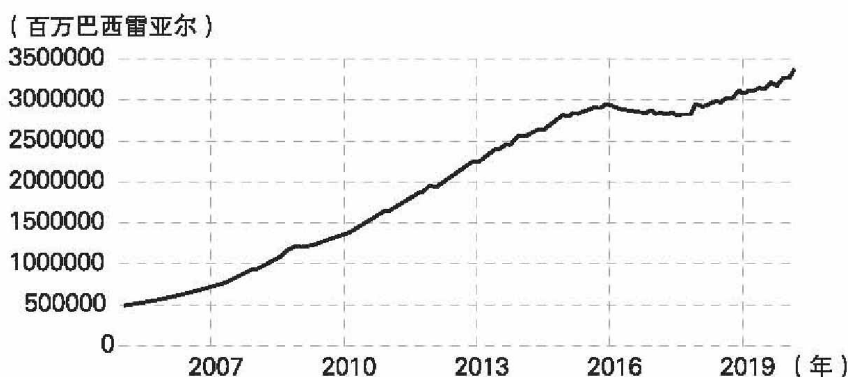


来源：https：//tradingeconomics.com/brazil/unemployment-rate。

图5-14　巴西失业率（2012—2017年7月）

面对经济下滑困局，巴西的社会及政治又再次趋向不稳。街头政治已从2013年民众抗议政府公共福利政策，变为2015年右翼政党借机动员民众上街，高呼执政党劳工党下台。罗塞夫遭受卢拉执政时代从未出现的政治动荡之主因，乃卢拉搭上跨国金融资本投机粮食及能源市场的便车，以财政收入实施亲民生政策，缓和了20世纪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所造成的社会矛盾。但到罗塞夫当选时（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已经有所变化。2016年8月31日，巴西国会参议院举行全会表决，通过了对总统罗塞夫的弹劾案。外国有评论分析称此为议会发动之政变。（参

阅《专题10巴西近年政局动荡述要（2013—2016年）》）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巴西中央银行。

图5-15　巴西私人部门信贷快速膨胀（2005—2019年）

巴西再次陷入动荡，其中一个重要的外在原因，不能不被认为是殖民主义遗留之祸根，尤其是美国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164]之延续，下面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方面综述。

延伸阅读**15**

巴西动荡新常态：桑巴之怒

2013年6月，席卷巴西全国的示威浪潮骤然升级，100多万人涌上街头抗议，向世界展示了罕见的“桑巴之怒”。“巴西需要改变”“示威在整个巴西”，随着类似的口号传遍100多个城市，巴西的抗议风暴在6月20日晚达到高潮，100万人参与了示威。

2017年当地时间2月4日至6日，巴西圣埃斯皮里图州（Espírito Santo）首府维多利亚（Vitoria）等多个城市因警察罢工、治安混乱，发生大规模骚乱。截至7日中午，骚乱已造成75人死亡。巴西政府已派出1000名军警和200名部队士兵前往事发地平乱，维持治安。

自2014年巴西经济开始进入停滞状态后，2015年巴西经济在经历“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高增长后首次陷于负增长，全年萎缩3.8%，通胀率高达10.7%。与此同时，巴西政局开始动荡，反腐和政坛斗争错综复杂、日趋激烈。社会上各种罢工层出不穷，由此引发的大规模骚乱严重

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稳定，形成恶性循环，时局每况愈下。

根据巴西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研究所（Dieese）发布的数据，自2012年起，巴西罢工次数开始增加。2012年，有记录的罢工行动达879起，而2011年为555起。2013年，罢工行动激增至2057起，同年6月爆发多起抗议活动。2016年，罢工次数达到峰值，记录到的罢工行动有2157起。自2017年起，罢工次数有所下降，但仍高于历史平均水平。

2019年巴西共发生罢工1118次，相较于2018年的1461次下降23%。尽管次数的降幅明显，但与2018年同期相比，2019年上半年罢工次数下降36%，而下半年仅下降3%，降幅有所变小。[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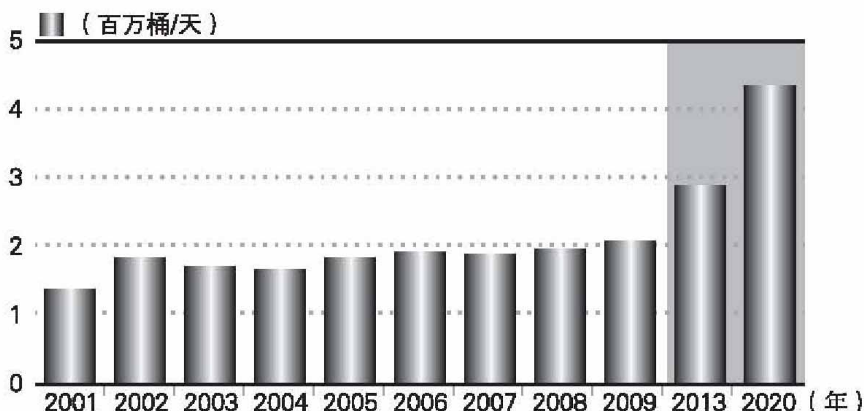
除此之外，近几年来巴西频繁发生监狱暴动事件，其恐怖血腥程度震惊世界。《华尔街日报》引用巴西的官方数据称，在拥有2亿人的巴西，目前约有81万人被关在巴西各处早已拥挤不堪、负载达到172%的监狱系统里。但这仍然阻止不了每年有6.4万人遇害这一严重的暴力问题。经济下滑，失业率激增，社会动荡，犯罪率高企，是导致监狱暴动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

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皇冠上最耀眼的珍珠

针对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腐败案的调查始于2014年3月。最初只是怀疑该公司高管监守自盗，在外包工程时与承包商勾结，抬高工程报价以牟取巨额贿赂；随后发现许多政治家向巴西国家石油公司推荐承包商并收取好处费；直至进一步被曝出，竟然有执政联盟内的大党参与其中，以收受贿赂的方式为本党秘密筹措政治资金。

正当各界紧盯着官员腐败、弹劾总统、投票结果等时，却忽略了究竟是谁，一直在对皇冠上最耀眼的珍珠——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虎视眈眈。

《石油信息周刊》将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评为世界第七大石油公司。该公司生产能力强，每日生产130万桶油，足以提供国内消费的75%，目前钻探技术先进，能深入海底1850米。预计2020年产量将翻1倍，如图5-16所示。



来源：https：//www.oilandgas360.com/petrobras-crossroads-production-rising-will-brazils-election-slam-brakes/#。

图5-16　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生产量（2001—2020年）

这颗珍珠原来是国家的掌上明珠。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自从1953年成立之后，便享有本国开采石油的垄断权。1953年10月，巴西政府宣布石油工业国有化，规定石油资源为国家所有，并于1954年5月成立了政企合一的国有企业——巴西石油公司，该公司不仅参与石油政策的制定、执行，还统管巴西石油的勘探、开发、生产、运输及企业的经营管理。

1997年，巴西政府宣布法令，石油业实行政企分开，设立国家石油管理局（ANP），负责巴西石油政策的制定和行业监督管理。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则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实行企业自主经营。巴西联邦政府有关部门与机构共持有巴西国家石油公司51%以上的股权。法令的颁布，意味着巴西石油公司的子公司可以与本国或外国企业合资，外国大型石油公司，如荷兰皇家壳牌集团（Royal Dutch Shell），陆续进入巴西。

2007—2008年，巴西发现了巨大盐下油藏，全球大型石油公司，如雪佛龙、壳牌、埃克森美孚等，虎视眈眈，意图牟取暴利。

2007年，总统卢拉恢复了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对本国石油的部分专利，时任政府幕僚长罗塞夫制定法律，给予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营运的专利权，其所有收益均拨给政府教育与医疗的社会计划。2010年，法律规定巴西国家石油公司乃唯一开采巴西石油的合法机构，有权征收所有石油业务活动30%的利益。

同时，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开始与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国有石油公司合作。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同意将在巴西所有业务30%的收入全部缴纳巴西国家石油公司。

根据2010年的维基解密，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征收30%利益这一举动引起了美国政府的疑虑，美国国务院与能源信息署（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开始代表美国石油公司游说巴西政府官员，企图改变其法律政策。当时正值卢拉第二期总统任期届满，劳工党推选罗塞夫竞逐总统。最大反对党巴西社会民主党（The Brazilian Social Democracy Party, BSDP）主张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私有化，他们推选圣保罗市长何塞·塞拉（José Serra）参选总统。维基解密文件揭露美国资助何塞·塞拉，借以保障美国利益。何塞·塞拉扬言扭转政策，重返旧模式。但罗塞夫获选总统。

巴西外交部一匿名官员指出："美国政府与石油公司拿不到合约，便攻击我们，巴西成了恶魔，就像委内瑞拉那样，他们的媒体也如此报道。""但我们政府也犯了错，对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和石油期望过多，忘记了石油是商品，其价格也会下降。"

何塞·塞拉虽然竞选总统失败，但他以国会参议员的身份，继续利用法律机制，图谋将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私有化。2016年2月24日，何塞·塞拉提出取消"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必须是所有盐下油田的唯一作业者并持有至少30%的参与权益的法定要求"，提案以40票赞成对26票反对的投票结果获得通过。2016年11月9日，巴西众议院投票通过石油法修正案。但新法案仅规定，在开发油田新区块时，巴西国家石油公司仍具有优先权。另外，保留了开发联合体需要向巴西上缴石油的比例，即原油产量的40%。属劳工党的国会议员瓦尔米瓦·普拉西代利（Valmir Prascidelli）批评，"这等于将盐下油田拱手让给跨国公司"。

总统罗塞夫被弹劾后，特梅尔正式就任巴西总统，其新任内阁名单清一色白人男性。特梅尔将巴西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尔迪米尔·本丁（Aldemir Bendine）撤换，佩德罗·帕伦特（Pedro Parente）接任。派伦特乃美国金融精英中意人物，曾任美国巨大农商企业邦吉（Bunge）巴西子公司高级行政人员，现任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主席。

2016年9月13日，巴西新政府推出庞大私有化计划——"成长计划"（Project Growth），拍卖油气、电力和基础设施项目的运营许可，

包括出售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萨尔瓦多（Salvador）、弗洛里亚诺波利斯（Florianópolis）、福塔莱萨（Fortaleza）几座城市的机场运营许可，并计划在2017年拍卖油田及水电站坝的权利，以及出售中西部和南部地区的联邦公路经营权。总统特梅尔扬言计划目的乃“去国家化”：“我们需要对民间部门开放，因为国家不能什么都做。”

2017年8月23日，巴西联邦政府公布了57个特许项目私有化的计划，包括飞机场、港口、石油勘探领域、巴西中央电力公司（Eletrobrás）及国家印钞造币公司。

整理：薛翠

7.沿袭殖民单一经济制度

著名英国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伦敦书评》撰文《巴西的危机》，从经济结构分析劳工党陷入执政危机的原因，他认为卢拉和罗塞夫没有采取措施调整单一的经济结构，即过度依赖出口初级商品，而忽略了扩大制造业的比例。[166]

8.复制成本高昂的西方政治与福利制度

另外，安德森从政治体制分析巴西危机，巴西采用美国式的总统制，但议会选举方式，则采用欧陆议会制的比例代表制，导致议会中政党林立，不同的政党操纵立法和行政，互相对立，这容易造成宪政僵局，通常协商方法乃执政党以金钱收买或者以内阁要职拉拢。[167]民主运动党不仅是巴西第一大政党，更是参议院第一大党和众议院第二大党，还占据着参、众议长两个重要职位。目前，在巴西获得法律承认的政党有29个，其中25个在国会内拥有席位，数量居世界之首。

1988年的巴西联邦宪法规定：“追求福利的权利应该得到保护。”这为公共开支奠定了强有力的“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基础，即易增难减。自从这部宪法颁布以来，巴西联邦开支近乎翻倍，达到了GDP的18%，全部公共开支超过了40%。大约90%的联邦预算受到了宪法或法律的专门保护（包括养老金）。按照巴西央行发布的数据，2015年其不含利息支付的基础预算赤字（Primary Budget Defi-cit）为1112.5亿雷亚尔（约272.9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88%，较2014年增长了两倍以上。[168]

9.偏向白人种族主义

《美洲季刊》(*The Americas Quarterly*)总编辑布莱恩·温特（Brian Winter）分析："贫富悬殊仍然是巴西人民生活中重要的事实——这些抗议也没有不同。"他引用民意调查结果，指出所谓百万群众上街游行的"群众"明显比较有钱，肤色比较白，学历比较高。

根据《圣保罗页报》调查机构在新近圣保罗的两次抗议（一次亲政府，一次反政府）中的调查，反政府的示威者年收入高于27600美元的可能性比亲政府的示威者的年收入能达到这个水平的可能性高13%。同时，反政府示威者不太可能是公务员，而更可能有自己的生意。但在那两次集会中，近80%的示威者都是大学毕业生（在一个只有20%人口完成大学学业的城市里），一半以上的示威者年收入超过15600美元（圣保罗只有23%的人能赚那么多钱）。总而言之，这表明，大多数上街的人是更富裕的白人上层中产阶级。[169]

10.美国延续门罗主义

近代以来，拉美多场军事政变往往由美国背后策划支持，目的乃扶植亲美国的政权。

根据南方电视台（Telesurtv）报道，从2000年开始，美国已经发动6次拉美政变：2002年发动军事政变企图推翻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2004年发动政变推翻海地总统阿里斯蒂德，2008年发动"市民政变"推翻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2009年发动军事政变铲除洪都拉斯总统塞拉亚，2010年发动警察政变反对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2012年发动议会政变推翻巴拉圭总统卢戈。[170]第七次便是罗塞夫总统因议会政变被罢黜。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阿道夫·佩雷斯·埃斯基维尔（Adolfo Pérez Esquivel）认为美国总统奥马巴不应该在（2016年）3月24日访问阿根廷。1976年3月24日，阿根廷发生军事政变，人权组织估计军事政变之后的几年，大约3万人被杀或者人间消失。埃斯基维尔说："那是死亡、虐待、囚禁、流亡的时代，我是那个时代的幸存者。如果你深入分析现实，就发现美国要对拉丁美洲的军事政变负责。"

英国《卫报》(*The Guardian*)评论《2014真相委员会报告》："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巴西和拉丁美洲其他地方一样，精英和中产阶级

与军队合谋，铲除被他们视为共产主义的威胁力量。”

当卢拉被警方扣押时，资深的巴西外交官萨穆埃尔·吉马良斯（Samuel Guimaraes）指出政变正在进行中，“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就是国内与国际合谋摧毁劳工党，目的就是在巴西推行在阿根廷当下实行的新自由主义模式”。

社会学教授博阿文图拉（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直斥美国插手巴西内政：“美帝国主义已经回到拉丁美洲。50年前，帝国主义只知道使用军事独裁，迫使拉丁美洲国家迎合美国利益。今天，帝国主义者已经使出其他手段为所欲为，那就是资助非政府组织经营本地发展项目，表面上捍卫民主，实际上只是作为前线，以掩护针对进步政府的秘密攻击，甚至公开挑衅的举动。”

法学社会学教授桑托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更揭露右派的金主是谁：“巴西当前所有的巨额资助活动来自各式各样的基金（更具有渗透性的帝国主义的全新特质），从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相关的组织到科氏兄弟（Koch Brothers），他们资助美国最保守的政策，他们的钱主要来自石油收益，乃至北美的福音派组织。”[171]

巴西主流媒体将成千上万涌上街头的民众描写成英雄，反抗腐败的左翼残暴政权。获得被喻为新闻界诺贝尔奖的普利策新闻奖（The Pulitzer Prize）的著名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却认为：“这种街头运动由富裕阶层策动，企图推翻巴西民主成果，他们长期憎恨民主选举产生的结果，现在借着反腐败的幌子欺上瞒下地前进，与1964年军事政变颇为相似。”在外界的大量资助下，新自由主义政党、财团控制的媒体、保守的司法制度、石油游说集团、白人精英与右翼集团集结在一起推翻现任政府，却被主流媒体描绘成人民起义反抗腐败政权。[172]

1964年的悲剧仿佛正在重演。历史学者阿尔维斯·德利马（Paulo Alves de Lima）感叹：“我们正在面对一场推翻民选总统的政变。我们临近新阶段，反革命浪潮回击了，在民主制度中设置了更多限制，孕育了令人难以承受的傲慢与建制暴力。”1964年，军队领头推翻政府，而当下的“反革命”群体则是由新自由主义政党组织勾结了商界、右翼团体、财团控制的媒体，以及高度政治化的司法机关。环球集团（The Global Group）势力庞大，旗下经营数十种报纸、杂志、电视频道、网

站等，并且拥有新闻、娱乐、足球、嘉年华等专利。环球集团当年积极支持1964年政变，在军方当政21年期间牟取暴利。

另类左翼网站O Cafezinho的编辑罗萨里奥分析："与1964年相似，当前的政变图谋是由巴西最大的媒体集团——环球集团大力支持的。但与1964年不同之处在于，当前的政变图谋乃意识形态驱动的司法制度的结果，目的有三：第一，推翻民选总统；第二，阻止卢拉竞逐2018年总统选举；第三，最终将劳工党打成非法组织。"

二、历史宿命？

在20世纪，巴西至少有三位总统因为推行惠民政策而触犯了本国精英与美国的利益，最后下场十分悲惨。第一位热图利奥·巴尔加斯（Getúlio Vargas），他创立了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而且给予穷人社会权益。巴尔加斯被本国精英控制的媒体污蔑贪污腐败，1954年，他自杀身亡。

第二位雅尼奥·夸德罗斯（Jânio Quadros），他于1961年上台，便邀请革命英雄格瓦拉访问巴西，并且赞誉其为"南十字之秩序"（The Order of the Southern Cross）。接着，他将一家大型采矿公司收归国有。不到一年，他便被国会剥夺权力。之后辞职，原因至今未明。

第三位若昂·古拉特（João Goulart），他推行工人高薪政策、土地改革，给予所有巴西人投票权等。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John F.Kennedy）面对古巴猪湾的军事失误，开始策划推翻古拉特。根据美国国家安全档案，1963年3月，肯尼迪对助手说："我们务必对巴西下手。"不久，巴西媒体抨击古拉特是共产主义者，并且批评其造成通胀高企。1964年，受美国指示，巴西军方推翻古拉特，宣称从共产主义浪潮中"拯救国家"。

这难道是巴西乃至拉美的历史宿命？

小结

2003—2011年，卢拉政府搭上跨国金融资本投机粮食及能源市场的便车，由此有本钱出台亲民生政策，颇得民心；但同时延续亲跨国资本的经济体制，土地和资源性财产为跨国资本服务。"后殖民主义"的出口"再初级产业化"（Re-primarization）与"去工业化"（De-

industrialization）现象同时出现。

2013—2015年，巴西遭受国际金融资本大国调整策略，核心国家结束量化宽松之后，原材料市场价格大跌，导致几乎所有新兴国家出现本币贬值、资本外流、通胀高企、债务累加。巴西并不例外，政府应对危机改行紧缩政策，削减公共开支，增加税收，上调多种商品价格与费用。群众街头政治此起彼伏，社会动荡不安。2013年街头政治的焦点已从民生政策转移为政治问题：2015—2016年巴西右翼力量借由经济困境及石油公司丑闻，推翻总统罗塞夫。

跨国资本利益与大国地缘-币缘战略，始终左右着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性。E7比较研究证明：包括巴西在内的拉美、非洲等前殖民地的国家，大凡跟从核心国实行了金融资本自由进出的都深陷危机。只有未被西方殖民化的中国维护了国家核心经济主权，没有实行金融自由化，只允许外资进入实体产业，并以本币增发对冲外资来推进本国信用快速扩张。由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唯一既完成了工业化，又由国家掌控足够庞大金融资本的经济体，尽管中国自主工业化和自主金融化过程中也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

第六章　委内瑞拉：资源主权国的困局

我们在比较研究中认识到：拉丁美洲国家殖民化程度的深浅，可以通过其经济结构单一化程度来考虑。单一化程度越高，贫民窟密布的城市化率就越高，也就越难以推进劳动密集型的一般商品生产，国内市场就会被外部定价从而受输入型危机影响。这是委内瑞拉堕入拉美陷阱无法自拔的内因。

任何维持着殖民化时代留下的单一经济的国家，只要没有改变这种殖民化结构，就没有加强国家经济主权的基础条件，那就会决定性地影响着该国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不管该国在政治上选择何种制度，在意识形态上宣称何种主义，都不过是跟从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一个流派。

据此来看，在核心国家制造全球危机、对外做成本转嫁的过程中，认同社会主义的委内瑞拉恰是由于无力改变单一经济结构并走出了其派生的危机困境而遭受重创，从21世纪的新兴国家演化成为最新的失败国家。然而，也正是由于委内瑞拉摆脱殖民化经济的努力因西方打压而"失败"，并被西方意识形态全面抹黑，其经验教训才尤其值得我们认真、客观地总结。

无论政府还是百姓，委内瑞拉作为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国家，在核心国实行量化宽松的政策，释放巨大流动性给金融资本，来操控国际石油价格，从而造成石油价格史无前例的大起大落的过程中，无疑会被摔得头破血流！不过，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教训，最为惨痛的是落入陷阱后还不明就里地鼓与呼——中间群众被核心国家经济软实力包装的各种说法推动着参与大规模街头政治，却不知道他们所拥护的是鼓吹加强外资控制本国资源的政治派别。可见，不论最终改换何种党派执政，都不能扭转这个国家惨遭核心国蹂躏的结局。

21世纪初，查韦斯政府以和平赎买方式坚定不移地收回了石油主权。在查韦斯执政最初几年，因为政治和经济的动荡（包括2002年的军事政变及2002—2003年的以石油公司PDVSA为首的大罢工），经济发展举步维艰。直至2003年政局稳定后，才开启了委内瑞拉经济高速增长的新阶段。当然，这要得益于当时新一轮的全球化经济高增长的带动，特别是以中国为首的制造大国对原材料和能源的巨大需求。

委内瑞拉产业以石油生产为主，石油产量在拉丁美洲国家中位居第一，在石油出口国组织（OPEC）中位居第三。石油行业是该国经济最重要的支柱产业。2006年日产石油320万桶，占全球石油总产量的4%，石油年收入约1000亿美元。2006年，石油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5%，石油出口占出口总额的80%。

其后不久，却碰上了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石油价格短时间内急剧下跌，委内瑞拉经济受到严重冲击。随后，美国政府为救市而直接干预市场，开启量化宽松政策。核心国家制造的大量过剩资金，直接进入石油期货市场，实现了向外转嫁通货膨胀代价的目的，又迅疾创造了石油价格短时间内跃升超过3倍的奇迹，不久前才占有了资源主权的委内瑞拉，也趁此有了继续搭乘高油价便车而崛起的历史机遇，如图6-1所示。

然而，这个油价高企的奇迹只延续了4年，核心国家于2013年渐次退出量化宽松，以及中国产能过剩，导致全球能源需求降低，全球能源和原材料市场的价格迅即下跌回原点。2014年以来，因石油收入显著减少而使财政赤字恶化的委内瑞拉面临严峻的局面，甚至被认为已经到了国家灾难的地步。



来源：https：//zh.tradingeconomics.com/commodity/crude-oil。

图6-1　WTI原油价格（1995—2020年）

由于委内瑞拉在左翼政治的拉丁美洲国家中居于核心地位，因此遭

到美国不同党派当权者的一致反对。就在因美国结束量化宽松而使世界石油市场价格急剧下跌之际，美国抓住委内瑞拉石油收益大幅度下降的机会推出制裁措施。2015年3月9日，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签署一份行政指令，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指称“委内瑞拉的状况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及外交政策构成非比寻常的莫大威胁”。一年后，他再次宣布延长该指令一年，指令赋予美国政府有权制裁委内瑞拉，一旦发生武装冲突，可以没收委内瑞拉的资产，而委内瑞拉在美国的最重要资产是价值数十亿美元的CITGO石油公司。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委内瑞拉局势并不是其外交政策优先考虑的议题。特朗普政府认为，委内瑞拉现任总统马杜罗推动成立的制宪大会非法，美国财政部宣布对包括马杜罗在内的多名委内瑞拉官员实施制裁。2017年8月11日，特朗普宣称不排除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世界第一绝对军事强权指称一个蕞尔小国对自身构成“非比寻常的莫大威胁”，本来是缺乏说服力的，但在新门罗主义的地缘策略调整下，美国已部署打下这只“牛虻”的战役。美国总统行政指令，为没收委内瑞拉资产提供了合法性。这一切都表明，核心国家多年来颠覆这个左翼民选政府的策略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委内瑞拉作为主权国家参与当前全球化竞争所遭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核心国正进行的币缘-地缘战略重大调整。

众所周知，美国出于本身的利益及战略需求，曾经推动宽松货币政策，结果令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急升，石油一度冲上近150美元一桶的历史高位。通过政府更迭回收并且掌握了资源主权的国家，例如委内瑞拉、伊朗及俄罗斯，也就顺势搭了一个便车，国家获得庞大的石油收益，用于改善国内一般民众的生活。这些收回资源主权及收益的国家，自然遭受核心国跨国公司的敌视，于是核心国家的主流媒体及学术界，不遗余力地长期妖魔化这些从跨国公司手中夺回资源主权的国家。尽管委内瑞拉、伊朗及俄罗斯的政府都是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合法政权，但核心国仍指责它们不民主，不符合西方的普世价值。

但不管委内瑞拉和美国怎样在意识形态上对立，两国在经济上一直以来是密切的共生关系。美国长期以来都是委内瑞拉的最大贸易伙伴，委内瑞拉出口的40%石油输送给美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占总贸易额的26%（中国是第二大贸易伙伴，这两个数据分别为11%和15%）。双方的利益冲突在于，委内瑞拉搭了美元流动性膨胀造成国际大宗商品价格

上升的便车，之前委内瑞拉大量进口商品，使跨国公司获取了巨额收益，石油价格上升又使该国从出口中得到了大量以美元结算的收益，影响美元指数回调；委内瑞拉把赚来的美元一方面用来搞民生经济，在贫民窟中建立能够吸纳就业的中小企业，聘请在古巴相对过剩的医生、教师和技术员，来改善本国下层民众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在赢得广大民众的高度信任的同时，又积极改革被西方控制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体制弊病，大力发展社区媒体和大众教育，在美国的后院搞左翼国家同盟，试图抗衡美国在区内的传统影响力。

因此，美国一直公开而且明确地支持委内瑞拉国内认同西方思潮的舆论界和教育界，以及服务于跨国公司的买办利益集团，努力培育体制内的反对力量，试图用各种方式颠覆玻利瓦尔主义民选政权[173]。《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主流美国媒体长年不遗余力地做出妖魔化玻利瓦尔政府的各种夸张扭曲报道。[174]这些软实力的作用，在发展中国家也形成了紧跟美国确立的政治正确来妖魔化委内瑞拉的趋势。

面对核心国公开推行的颠覆和国内经济危机带来的巨大压力[175]，委内瑞拉只能使用国家权力全力应对。2016年1月，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宣布国家进入经济紧急状态，5月13日再延长经济紧急状态60天，并且进一步扩大经济紧急状态的适用范围，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2017年5月1日，马杜罗宣布启动制宪大会进程，重新制定国家宪法，以维护国家和平、促进国内对话、解决当前政治危机。而这些措施当然遭到反对党联盟的竭力反对，在选举前一周内连续举行抗议活动。7月30日，委内瑞拉国家选举委员会表示，41.5%的选民（800万人以上）参加了该国制宪大会选举，选出545名制宪大会成员中的537名，另外8名原住民成员于8月1日经选举产生。[176]这种坚持国家掌握主权、资源收益用于改善民生的执政党，以群众动员的方式进行政治斗争，本来没有偏离“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民有、民享、民治）[177]的西方经典民主理念，但在资源主权斗争的大背景下，则被妖魔化为民主与独裁的斗争。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政府的经验再次证明我们在E7研究中提出的观点：没有经历暴力革命，而是通过与原宗主国谈判，延续原宗主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方式而获得执政权力的政府，在推动社会改革时，往往遭遇原有体制内的依附跨国公司的利益集团、旧官僚、境内外跨国资本等势力的激烈反扑，从而使得新政权改革往往难以深入，要保存有利民众的

改革成果亦非易事。

马杜罗在2017年10月4日倡议创立一个原油及精炼原油产品交易的货币篮子，希望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并推广至所有产油国。然而，之前曾提出类似倡议的石油产出国领袖萨达姆及卡扎菲被核心国通过战争杀害的下场还历历在目。对于金融利益仍然建立在石油美元之上的美国来说，间接策动推翻委内瑞拉现政权的政变或直接军事干预，都会被列入考虑的选项。

特朗普政府上台伊始就确立了对马杜罗政权极限施压的基调。在他看来，所谓极限施压，就是综合应用经济、外交与军事等各种资源，以严厉的制裁与军事威胁相结合来迫使对手改变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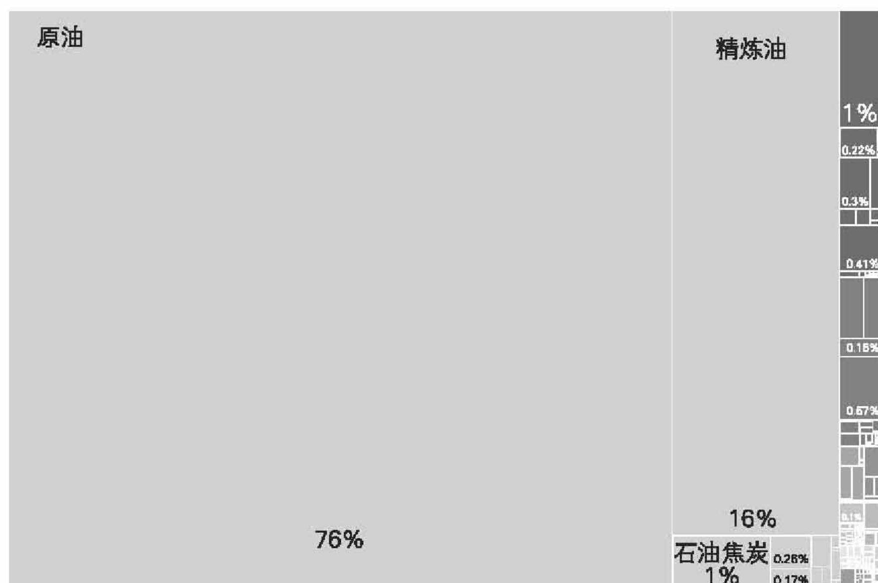
2017年，当时委内瑞拉举行了制宪大会选举，尼古拉斯·马杜罗顺利当选了第二个6年任期的总统。美国方面认为制宪大会投票破坏了民主，而马杜罗则是一名独裁者，并为此对委内瑞拉启动了大规模的经济制裁，尤其是对委内瑞拉的石油部门进行了史上最为严格的制裁，禁止该国以美元来进行石油贸易结算，以此来掐断委内瑞拉的经济命脉。

在经济上，2017年8月25日，特朗普签署法令，禁止委内瑞拉政府在美国发行债券，禁止其国有企业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在美国金融市场融资，也禁止美国银行给二者提供超过一定期限的新贷款。在马杜罗政府计划发行数字石油货币后，2018年3月19日，白宫签署行政令，禁止美国个人在境内供应、购买和交易该货币。5月初，在美副总统彭斯敦促委内瑞拉暂停新一轮总统大选之际，美国对委内瑞拉的20家企业进行制裁。5月21日，在马杜罗赢得总统大选后，美国禁止公司或者个人交易与委内瑞拉政府和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相关的债务或者应收账款。11月1日，特朗普政府宣布禁止美国公民同与委内瑞拉黄金出口等行业有关的个人和实体进行交易，以降低后者在黄金方面的收入。2019年1月28日，美国正式对委内瑞拉石油部门进行大规模制裁。财政部将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在美国价值约70亿美元的资产冻结，随后将其转交给瓜伊多，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甚至预测，这个行动还能够让马杜罗失去来年110亿美元的石油销售收入。8月5日，委内瑞拉政府在美国的全部资产又被宣布冻结。

一、单一产业结构的困局

新兴七国中，南非、巴西、印度尼西亚和委内瑞拉都有国民经济过于依赖大宗初级商品出口的问题，这是南方世界殖民地经济模式遗留下来的主要困局，而其中委内瑞拉的问题最严重，几乎是完全依赖单一石油产业和石油贸易。

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原油储藏（已探明储量为2984亿桶，超越沙特阿拉伯）[178]，石油与天然气之总产值高达GDP的25%，石油收入占该国总出口收益的95%。政府近年40%—50%的税收预算来自石油企业出口收入，石油收益为社会发展领域的投资提供了80%以上的资金来源。有分析指出："委内瑞拉经济长期高度依赖石油产业，其他产业发展非常缓慢，经济结构单一，技术相对落后，国际竞争力较弱。委内瑞拉政府从查韦斯时代就迫切希望发展本国民族产业，但众多经济发展领域都需要国外的资金和技术。"



来源：http：//atlas.cid.harvard.edu/explore/tree map/export/ven/all/show/2015/。

图6-2　委内瑞拉2015年出口产业收益比例

据委内瑞拉央行2017年1月披露的初步数据，2016年委内瑞拉CPI暴涨了800%，为史上最严重，与此同时经济却收缩了18.6%，录得13年来最大衰退幅度；委内瑞拉2016年通胀飙升800%，经济萎缩；委内瑞拉央行的一份内部文件显示，2016年几乎提供了委内瑞拉所有硬通货

的石油部门萎缩了12.7%，非石油部门萎缩了19.5%[179]。

而这一趋势并非一夜之间发生的，委内瑞拉政府经济顾问、委内瑞拉规划与发展部前部长费利佩·佩雷斯早在2014年的发言中就指出了单一经济结构对国家经济的伤害，他讲道："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不理想的状况。比如，2014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明，年平均通货膨胀率达60%，食品价格上涨80%，物资匮乏指数达30%，玉米粉、牛奶等日常生活必需品依然匮乏。又如，国家对石油的依赖性过大，非石油工业及农产品的产值正在不断下降，非石油物品的出口仅占出口总量的3%。"[180]

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特别要求经济结构的均衡发展，改变单一的石油出口经济。"但不可否认，查韦斯的改革未能解决委内瑞拉经济结构单一化的根本问题，致使国家创汇只能依靠石油出口，查韦斯也未能大力发展本国工业，基础民生商品仍几乎完全依靠进口，导致国内消费品价格长期高于发达国家。国际油价一有风吹草动，直接影响政府财政收入。"[181]只要政府财政补贴下降，低收入人群就会陷入生存危机。

殖民化单一经济不仅阻碍国家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改革努力，而且，其连带发生的对制度的黏滞效应也是明显的：只要资源出口收入成为政治家对底层社会承诺的福利来源，就会造成对福利分配的政治依赖；由此，一般加工贸易的轻型产业就会因劳动者收益低于"被动福利＋被动闲暇"[182]而难以发展，贫民窟大量失业人口也难以得到参与所谓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机会。亦即，能够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并且获利的，主要是核心国为主的跨国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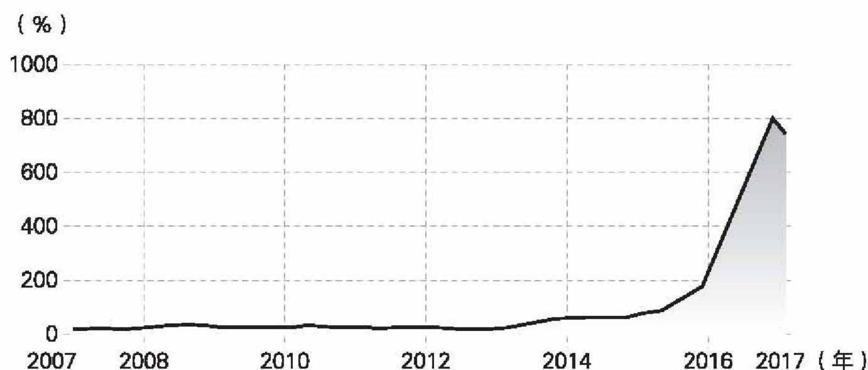
我们在E7比较研究中提出的理论归纳是：拉美和非洲在其贫民窟人口的福利被动地由政府通过占有出口收入从外部赋予，在这种条件下，政府不会自愿地将福利投入低端就业市场，而宁愿使贫民窟人口在依然贫困的情况下安于闲暇。这对大多数拉美和非洲国家奉为圭臬的发展主义是个挑战。无论建立何种现代化政治制度，或无论信奉何种西方意识形态，有一个结果是共同的：在有大量过剩劳动力资源且收入低下的条件下，不可能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二、币值急挫

委内瑞拉经济危机的主要表现是恶性通胀压力下的本国币值急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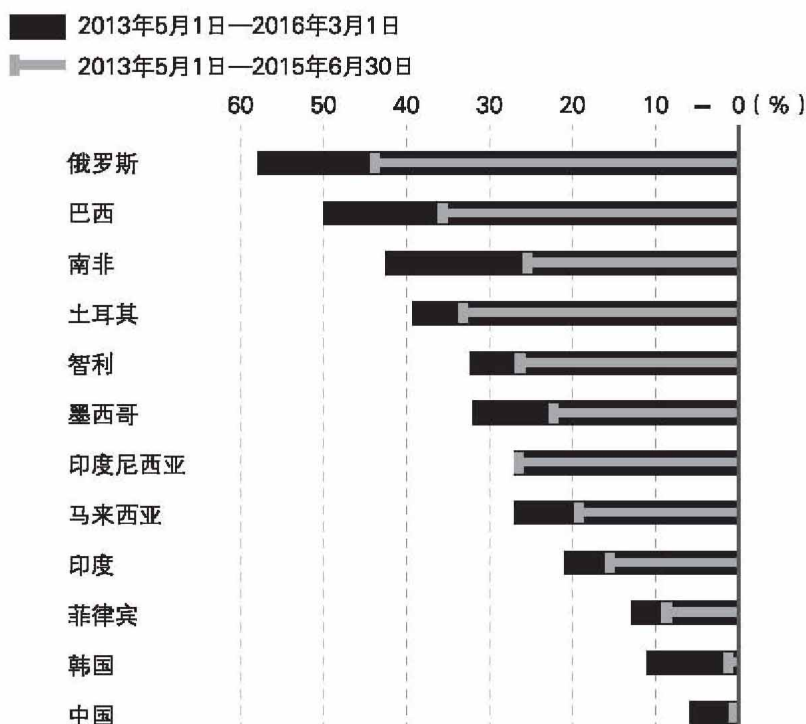
在美国即将结束量化宽松的2013年2月，委内瑞拉货币就开始贬值，官方汇率从1美元兑换4.3玻利瓦尔调整至6.3玻利瓦尔，货币贬值将近32%。量化宽松结束之后，2014年1月23日，委内瑞拉政府再次将旅居海外的国民的官方汇率调整为1美元兑换11.36玻利瓦尔，一次性贬值45%。[183]

据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数据，委内瑞拉石油收入占出口总收入的95%以上，政府收入的一半来源于石油，石油价格自2014年6月约115美元/桶暴跌至2016年11月的50美元以下，给委内瑞拉经济带来严重打击，食物、药品等严重短缺，也使2016年12月的通胀率高达800%，成为全球通胀最高的国家。截至2017年2月，通胀率为741%，如图6-3和图6-4所示。通胀的高企使货币大幅贬值。



来源：https：//tradingeconomics.com/venezuela/inflation-cpi。

图6-3　委内瑞拉通胀率（2007—2017年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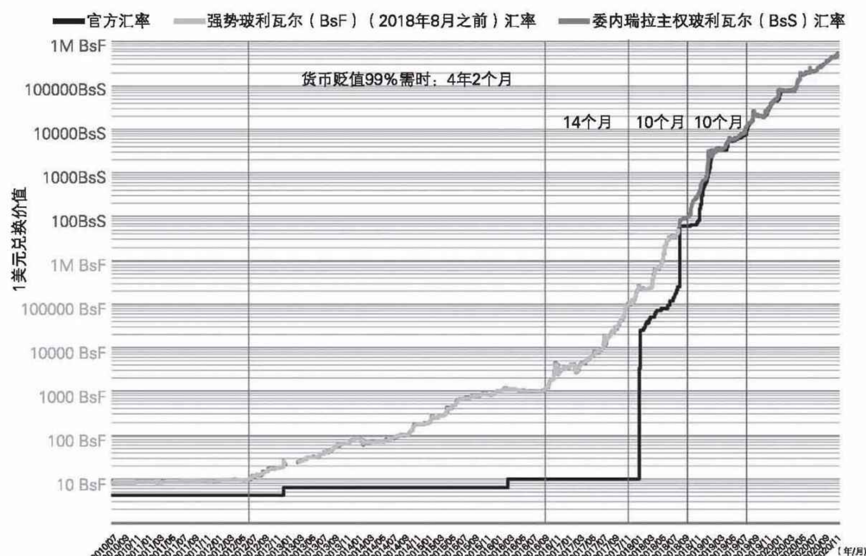
来源：https：//www.economist.com/news/finance-and-economics/21693961-why-bor-rowing-dollars-central-business-cycle-developing。

图6-4　新兴国家货币大幅贬值（2013年5月—2016年3月）

图6-4中的数据表明的是核心国把控金融资本阶段的规律性现象，这值得边缘国重视。

但由于委内瑞拉政府在金融危机压力下实行了外币管制，官方的兑换价未必反映市场实际情况。该国黑市外汇交易猖獗，为了遏制黑市交易，委内瑞拉在2014年3月，启动了新外汇交易市场（SI-CADII），当时定价为1美元兑55玻利瓦尔，相当于官方汇率6.3的8倍多；另一个专门为企业购汇的SICADI外汇市场中，当时汇率为1美元兑换10.8玻利瓦尔（来源同上）。但据估算，2014年实际的兑美元汇价，达1美元兑超过600玻利瓦尔。而2016年，外币管控在创历史纪录的通货膨胀面前已完全失去作用，追踪黑市汇率的网站dolartoday.com数据显示，2016年

12月29日玻利瓦尔兑美元汇率为3107.3:1，较12月13日的3980.51:1略有回升，但100玻利瓦尔面值货币早已丧失大量价值，相当于约3美分。



来源：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5/5d/Venezuela inflation on the black market %28DolarToday%29 on a logarithmic scale.png。

图6-5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兑美元的实际汇价与官方汇率（2010—2017年）

图6-5中的数据表明，委内瑞拉自2013年美联储确定结束量化宽松政策开始进入贬值期，到2015年美国提出加息政策之后，则陡然发生本币恶性贬值。由于官方和市场化的两种汇率差距过大，以货币持有量作为身份标记的中产阶级在经济危机压力下纷纷对家庭资产做组合理财，遂在黑市汇率引导下加速推动民间外汇流出，并且还存在担心私人财产在国内恶性通胀中受损而势必在政治上与官方尖锐对立的因素。这也是委内瑞拉社会右倾化的内因之一！

三、外债规模扩大，外汇储备收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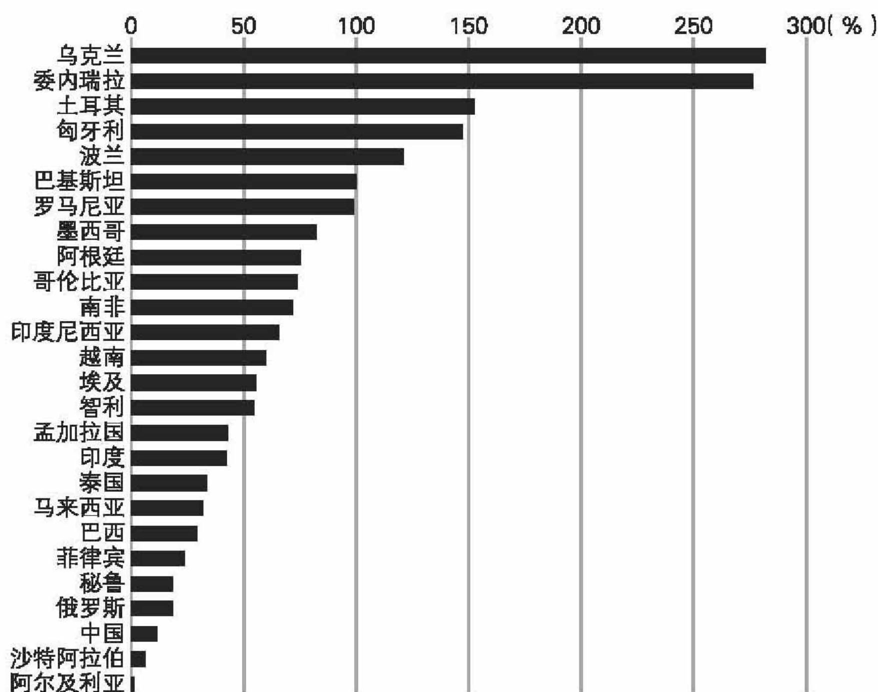
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是资源出口国家的黄金时期。由于石油收益丰厚，委内瑞拉的外汇储备在2009年录得422.99亿美元的历史高位。受惠于石油价格高企及连续录得贸易盈余，2007—2011年，委内瑞拉的外债居然降至接近零水平。

图6-6中的数据表明：2012年委内瑞拉短期净外债规模占外汇储备及主权资产值的270%。由此可见，虽然委内瑞拉有较大借债规模，但只要政府保持较高石油收益，其外债偿还能力仍然稳健。

其后，随着石油价格波动，自2014年委内瑞拉的未偿还公共外债规模曾四次剧烈波动，接近21.89亿美元，而每次外债规模的陡升都意味着在国际石油市场中被美元流动性洗劫和绞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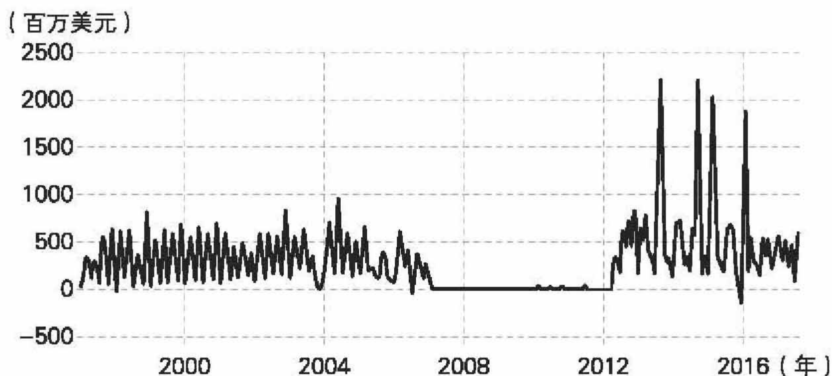
图6-7显示，委内瑞拉政府仍然有较佳的偿还公共债务的能力，目前未偿还公共债务只有5.89亿美元（2017年8月）。

但巨额的债务必然造成外汇储备的流失。据《金融时报》报道，自2014年国际油价下跌以来，债券持有人、商业债权人及中国方面预计已持有超过1200亿美元的委内瑞拉债券。[1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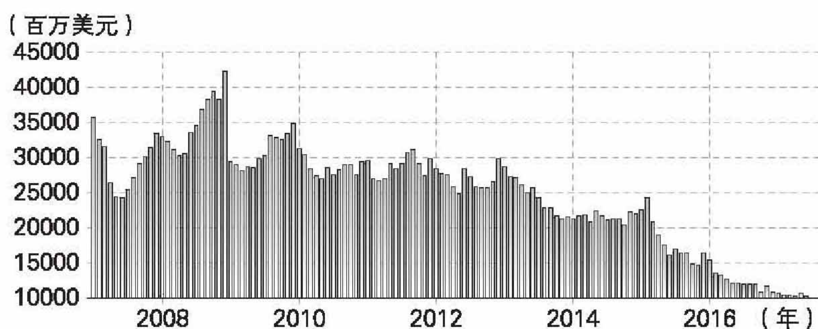
来源：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85039/mobile-frameless。

图6-6　2012年短期净外债加外债偿还（占外汇储备及主权基金资产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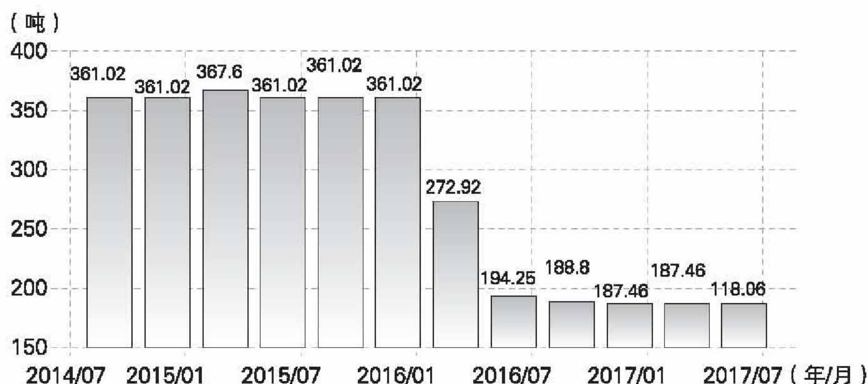
来源：https：//tradingeconomics.com/venezuela/external-debt。

图6-7　委内瑞拉公共外债（1996—2017年4月）



来源：https：//tradingeconomics.com/venezuela/foreign-exchange-reserves。

图6-8　委内瑞拉的外汇储备（2007—2017年6月）



来源：https：//tradingeconomics.com/venezuela/gold-reserves。

图6-9　委内瑞拉黄金储备（2014年7月—2017年7月）

此外，委内瑞拉最高峰时期还有372.93吨黄金储备，2016年快速下降到不到200吨。2018年11月，为防止受美元金融限制的拖累，委内瑞拉决定运回此前寄存在英格兰银行（英国央行）的约14吨黄金，这将是继2011年委内瑞拉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地下金库等海外金库中运回国约160吨黄金后的再次遣返本国黄金的决定。在英格兰银行拒绝了委内瑞拉提出的多笔遣返黄金的要求之后，委内瑞拉的很大一部分黄金（32吨，价值约16亿美元）仍留在伦敦。尽管英格兰银行是独立的，但英国当局以“意图不明”为由拒绝了，并表示委内瑞拉当局不应获得海外资产。[185]

很明显，对方此举显然是在配合美国对委方的制裁。要知道，这批黄金虽然存放在英国的仓库里，但使用权依然在委内瑞拉手中。所以，不管对方是出于何种原因，都不应该拒绝该国运回黄金的请求。之后，美国专家给出了所谓的建议，使得该国只能通过交易黄金的形式出售。值得注意的是，该国存放在仓库中的黄金不止14吨。据悉，委内瑞拉目前还有近80吨黄金被对方“冻结”，依然无法顺利运回。[186]

延伸阅读16

中国是委内瑞拉最大的债权国

2007年以来，中国国有机构已向委内瑞拉发放逾500亿美元的贷款，据悉约200亿美元尚未偿还。这些贷款很大一部分是以石油输出的方式进行偿还的。[187]另外，中国也是委内瑞拉第二大石油进口国。

“受制于投资环境，委内瑞拉吸收外资规模较小，是拉美地区吸收外资最少的国家之一。联合国贸发会议2014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3年委内瑞拉吸收外资流量70.4亿美元，截至同年年底，外资存量为557.7亿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3年中国对委内瑞拉直接投资流量为4.26亿美元，同年年底投资存量为23.63亿美元。中国投资主要集中在石油开发和组装加工领域。

2013年6月3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签署了总额40.15亿美元的融资协议，计划提升中委合资的石油公司SINOVENSA在委内瑞拉石油产量。附属签署的还有支持该笔融资的石油买卖协议及项目执行保障协议。

仅在2013年马杜罗访华期间，委内瑞拉就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国开行）达成了用于住房建设、农业、工业、道路建设、电力、交通、矿业、医疗、科技等领域项目的贷款协议，用于国家的发展。

同期，委内瑞拉还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订了3.91亿美元的贷款协议，用于Pequiven公司的莫龙码头建设项目，此码头用于出口尿素和氨。

当时，中国石油化工集团（以下简称中石化）与委内瑞拉达成了注资14亿美元，以开发奥里诺科胡宁一区块，每天生产20万桶原油的合作协议。

委内瑞拉是国开行在拉美放贷最多的国家之一，涉及矿业、农业及航天电力。国开行还于2015年7月19日习近平访问拉美前夕，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开设了办事处，是首家在委内瑞拉设立办事处的中国金融机构。有媒体报道称，据彭博数据，2007—2012年，国开行向委内瑞拉累计发放贷款425亿美元，占其同期对外贷款发放量的近1/4。据2015年1月8日凌晨消息，马杜罗宣布与中国达成新的双边合作协议，带来200亿美元委内瑞拉急需的资金。他是在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会谈后对外宣布的消息，双边合作协议以能源、工业和房地产行业为中心。[188]

2016年11月17日，中国最大的国有能源企业——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以下简称中石油）与委内瑞拉国有石油公司达成价值22亿美元的协议，提高其合资公司的产量。中石油持有此合资公司的少数股权。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与中国石油集团相关人员在加拉加斯会面后发表电视讲话称，将部分动用中国提供的最多90亿美元的信贷额度，将该国原油产量最多提高约27.7万桶/日[189]。

随着低油价重创委内瑞拉经济，中国进行海外放贷更加注重财政稳定和政治风险等因素。审查加强，可能令中国履行有关承诺变得复杂。中国承诺未来3年（2017—2019年）向整个非洲地区提供60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面向重度依赖大宗商品出口国家的优惠贷款和政府支

持投资。[190]

委内瑞拉和中国之间的“石油换贷款”协议，预计2017年委内瑞拉对中国的原油出口量将达到55万桶/日，较2016年增长55%。而委内瑞拉对印度的石油出口量预计将下降15.5%至36万桶/日，由于印度主要以现金支付石油费用，委内瑞拉对印度出口的减少将使该国的金融状况更加恶化。[191]

四、从贸易顺差至逆差

过去十多年，在E7中只有中国和委内瑞拉长期保持经常账户顺差。得益于石油出口收益，委内瑞拉曾经在2008年第三季度录得历史最高的177.32亿美元贸易顺差。虽然曾经因为国际油价波动而出现短暂的季度贸易逆差，但一般能很快再度回复顺差。但持续的低油价及国内的经济动荡，终于使依赖单一石油经济的委内瑞拉开始出现较持久的逆差情况。从2014年年底开始，经常账户一直录得逆差。在风雨飘摇中失去财政作为后盾，政府的执政前景堪虞。



来源：https：//zh.tradingeconomics.com/venezuela/current-account。

图6-10　委内瑞拉按季度经常账户差额（2003—2019年）

五、物资短缺造成社会动荡

委内瑞拉土地资源丰富，很多大型农场被跨国公司占有，农作物产量虽然丰富，但近年市场上的粮食及日用品非常短缺，形势严峻。对此，政府甚至派出军队暂时接管厕纸工厂及电器连锁店，以确保生产及

销售的正常运行。当前问题有其历史根源，委内瑞拉的产业结构源于西方殖民化在拉美形成的单一经济，以出口资源满足西方市场为主，由此往往对本国其他产业产生排斥作用。

以农业为例，在20世纪30年代，农业曾经占委内瑞拉22%的GDP及60%的劳动力，但随着石油业的发展，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农业人口下降至不到10%。根据1997年的一项调查，340万公顷适合耕作的土地中，只有70万公顷生产谷物；另外1710万公顷适宜畜牧的土地也出现同样情况，农牧业土地资源使用率明显不足。

此外，农业也沿袭殖民化的大种植园经济，由海外跨国公司把控着收益较高的农产品出口、物流、结算等环节，跨国公司要在国际市场获利，根本不为本国需求服务，导致本国食物及一般消费品价格高于发达国家。这种大农场制度排斥农民，造成农村人口贫困化并流入城市，形成超前城市化（2015年城市人口占89%，是拉丁美洲之最）和大城市贫民窟化，一般商品生产能力落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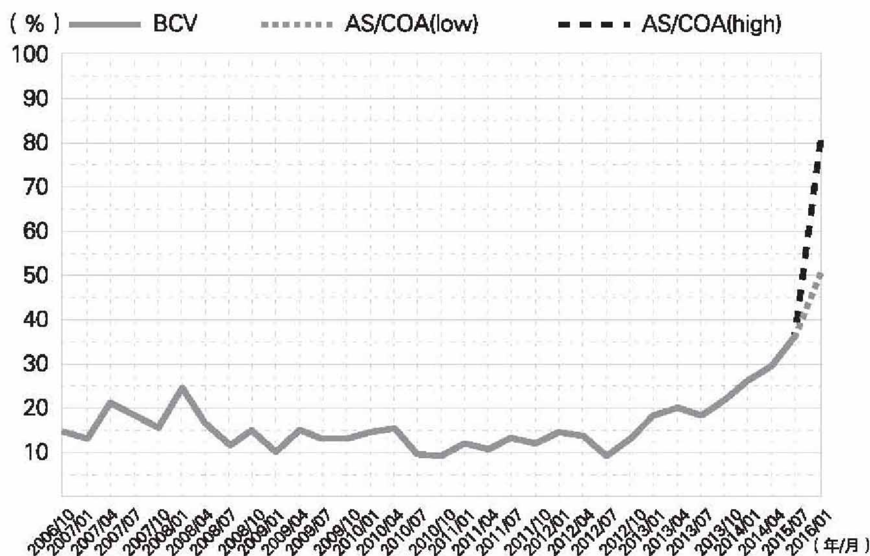
委内瑞拉土地上生产的粮食被跨国公司把控，不为满足本国民众需求和平抑食品价格做贡献，反而借食品价格抬升获利。例如，该国最大的私人食品生产企业Polar在市面严重粮食短缺的情况下，却把玉米面粉的产量削减一半。政府指责这些私人企业通过制造粮食短缺来参与动摇政权的经济战争。该国中央银行公布的食物短缺指数从2012年开始攀升，至2014年指数接近28%，如图6-11所示。此后，委内瑞拉央行停止公布数字。

自2013年以来，食品价格持续上升。2015年12月的食品通胀率为300%多（见图6-12）。

委内瑞拉在2008年也经历过严重的食物短缺。当时人们认为这是商店主故意囤积食物，意在抵抗政府的物价管制政策。

美国支持的委内瑞拉反对派、大资本及其控制的媒体，利用委内瑞拉出现的经济困难猛烈攻击查韦斯的经济政策，指责查韦斯建设委内瑞拉特色社会主义政策遭到失败，政府的资本账户管制引起了国际投资者的不满和撤离。为此，应该取消汇率与利率的管制、减少资本收益税来吸引国际资本，对因油价下跌陷入困难的国有石油公司实行私有化，限制国有银行、增设私人银行，扩大对中小私营企业贷款，重新进入查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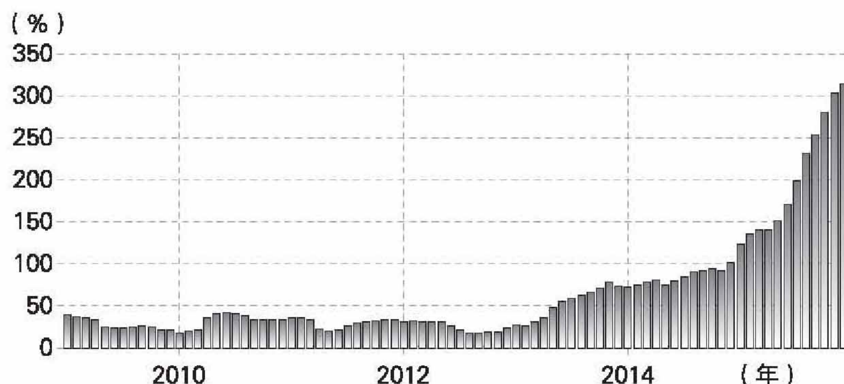
斯退出的美国倡导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向跨国公司、跨国银行开放贸易金融领域以促进经济增长。



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shortages in Venezuela。

注：委内瑞拉中央银行（BCV），美洲协会（AS），美洲理事会（COA）。

图6-11　委内瑞拉食品短缺率



来源：https：//tradingeconomics.com/venezuela/food-inflation。

图6-12　委内瑞拉食品通胀率（2008—2016年）

商界及反对派则指责是政府的价格控制及外汇管制导致了经济危机。

对于**2013**年以来的这一波物资短缺危机，有分析认为：原因是一年前委内瑞拉的外汇市场中的美元供应开始减少。**2013**年**2**月，市场上几乎无法买到美元，进口商为了取得美元，需要从黑市中购入远高于官方牌价的美元，造成进口物价急升，推高通胀水平。

另一方面，政府的粮食补贴造成国内粮食被黑市偷运至邻国哥伦比亚转卖图利。政府声称，近40%政府补贴的基本生活必需品被走私出国转卖，但也有观点认为该数字实际只有10%。

此外，在汇率和成本的影响下，委内瑞拉进口农产品价格长期低于国内农产品价格，导致国内粮食等农产品的供给结构发生严重扭曲。总之，导致委内瑞拉成为拉美地区唯一依赖粮食进口国家的原因有多个方面。当然，这个教训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粮食自给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不可一厢情愿地认为，存在经济大幅波动可能的情况下，主权国家永远可以靠外部的比较优势和国际贸易解决本国粮食问题。

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政府也尝试提高本国粮食自给率，过去十多年开展粮食主权运动。虽然委内瑞拉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经有过土地改革，20万农户获得分配土地，但委内瑞拉仍然具有拉丁美洲典型的土地产权高度集中的特征，其中**70%**的耕地集中在**3%**的农地拥有者手上。2001年通过的《土地与农业改革法》规定，被确认非法占领及不生产的土地应该重新分配给无地农民。2005年又提出回归农村计划，鼓励城市失业居民自愿返回农村从事耕作。2004—2010年，政府征收了高达300万公顷的土地用于分配给农民。从1999年到2011年，委内瑞拉的农业生产增加了3倍，基本粮食（大米、玉米、豆类和高粱）和种子的自给率达到50%。先前，委内瑞拉的种子100%靠进口。据委内瑞拉中央银行统计，12年来委内瑞拉农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31%，而在此之前的40年间只增加7%。[192]

由于农业生产自身的规律限制和供给结构调整的长期性特征，尽管粮食主权运动取得一定的成就，但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对外部粮食供给的严重依赖，甚至还不能满足发展中的委内瑞拉的口粮需求，因为生活水平提升，委内瑞拉的粮食消耗量增加（2003—2012年的粮食消耗增长了94.8%），粮食进口需求量大幅上升，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2014年开始，政府对多种基本生活必需品实行配给制，加强边境巡逻，防止粮食走私出口。2016年，随着粮食供应问题恶化，总统马杜罗出动军队监察食品加工厂，并协调物资的生产与分配。

雪上加霜的是，提供全国70%的电力的El Guiri水电站，也因为严重干旱而产电能力大降，供电量不足导致全国各地要每天轮流断电4小时，公务员也不能每天上班。

低效率的官僚体系只是问题之一，委内瑞拉的最大问题仍然是殖民主义经济留下的恶果：长期过度依赖石油出口的单一经济结构及少数人占有大量优质耕地且不用于生产粮食。由此，造成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及日用品工业发展停滞，其结果是粮食及日常生活所需品都需要大量进口。

尽管问题严重，但我们在研究中也注意到，政府近年在减少饥饿人口问题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自查韦斯执政以来，委内瑞拉的饥饿或营养不良人口从超过全国一半降至5%，儿童营养不良率下降了40%。贫穷率从1999年的50.4%下降至26.5%，其减贫的成就在世界上数一数二。这主要归功于查韦斯的玻利瓦尔革命，其主要内容是夺回国家的资源主权，把石油收益用于改善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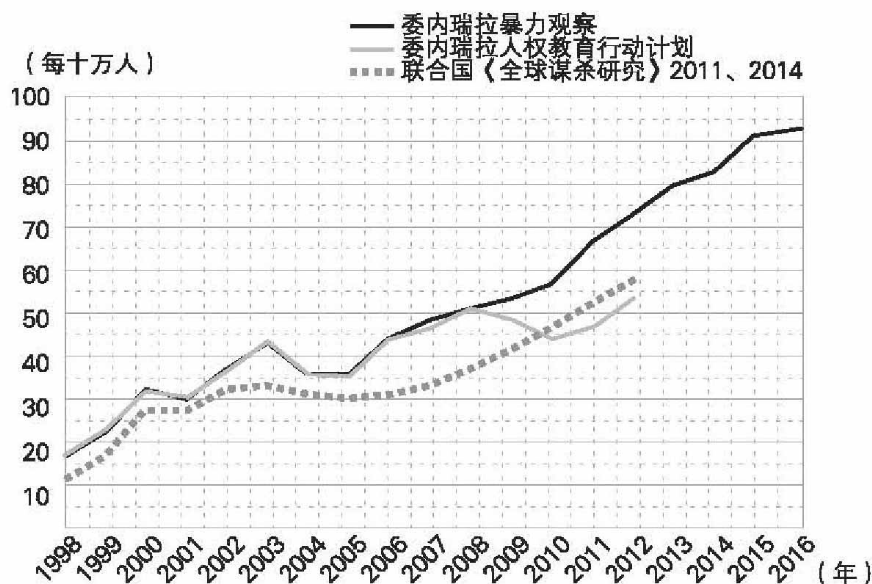
六、激进城市化制造贫民窟

委内瑞拉人口城市化率高达89%，是拉丁美洲之最，由此难免出现治安恶化及暴力犯罪急升的情况，面对当前的危机，城市爆发各种盗窃抢劫及暴力罪案，而且还出现群众抢掠超市及粮食运送车辆等事件。[193]

激进超前的城市化与伴随的大城市贫民窟化是拉丁美洲以至不少南方国家的通病。当大量农村人口出于各种原因放弃农村地区，涌向城市谋生时，无论是由于城市缺乏安置居所的配套能力，还是这些贫穷人口只能投身低收入的非正式部门，结果都是城市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这些贫民窟往往成为都市治安的隐患，一旦经济出现问题，社会不稳定性往往首先表现为暴力犯罪率急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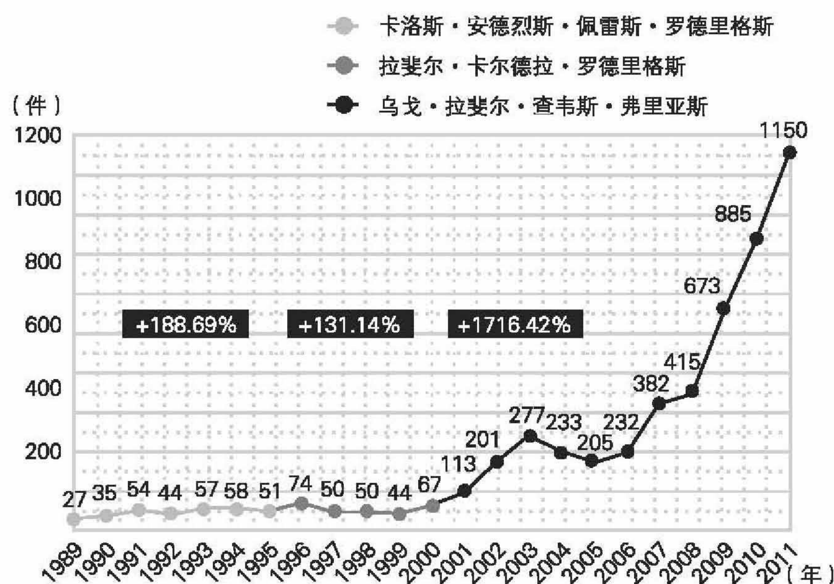
图6-13和图6-14显示委内瑞拉近年谋杀率上升，绑架事件更是急速攀升。这是典型的拉美城市化病。当大量人口集中在城市时，如果正规经济部门不能吸纳这些涌入城市谋机会的人口，他们便只能流入非正规

部门，或者灰色经济及黑色经济（例如有组织犯罪）。而一旦经济衰退，他们也没有退路，不能返乡，城市犯罪率也必然急升。



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Crime in Venezuela。

图6-13　委内瑞拉谋杀率（1998—2016年）



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Crime in Venezuela。

图6-14　委内瑞拉绑架事件数量（1989—2011年）

据报道，2015年上半年已发生2800多起抗议事件，其中不乏由外国势力支持的右翼政治运动，尤其是互联网社交媒体上充斥大量虚假的信息及照片（很多是从不同年代全球各地的示威活动照片胡乱移植的），散播政府武力镇压示威群众的信息，试图抹黑委内瑞拉政府，以至煽动群众。这也是当代地缘战略巧实力的操作方式之一。

如果不将委内瑞拉的种种经济社会乱象纳入全球经济政治的背景下考虑，那么，以上这些事实可能都会被归结为内生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而掩盖了更深层的原因——委内瑞拉收回经济主权的斗争很不彻底，尤其在收回石油主权的同时，没有及时掌控跨国金融资本流动。遂在核心国家转移自身危机的过程中，承担了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成本和代价，造成了输入型危机。而国内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也是这个转嫁过程中的产物和必然结果。委内瑞拉没有针对金融资本阶段的西方制度做出国家对资本流动加强控制的应对措施（哪怕是像印度那样短期性地大幅度提高外汇流出的税率），在其油价下跌与外汇流出、粮食安全等问题同步发生之时被核心国全面制裁，只能被动接受灭顶之灾的命运。

同时，我们再次着重强调：过度依赖单一经济结构以提升国民福利，最终是不可持续的。盲目仿照西方追赶成本高昂的上层建筑，也是让不少发展中国家堕入发展陷阱的原因之一。但发展中国家利用本国的资源收益来提升国民福利，这本身在道德上及经济上都无可厚非。

委内瑞拉国民经济有三个缺乏：一是缺乏完整的工业产业链；二是缺乏对跨国公司占有本国土地生产的粮食的调控能力；三是缺乏满足国内消费的自主及多元化的国民经济基础。再加上没有内生性的可持续社会福利发展策略。若在这些属于积重难返的长期问题没有缓解的约束条件下，迅速提升国民福利，无论当时显得多么成绩辉煌，都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七、地缘政治大战略下资源主权国的困局

2013年12月，自查韦斯逝世以来第一次举行的全国性选举，在国际石油价格仍然还能维持较高水平的条件下，执政党赢得80%的地区，包括大部分主要城市，这主要归功于查韦斯的玻利瓦尔革命夺回了国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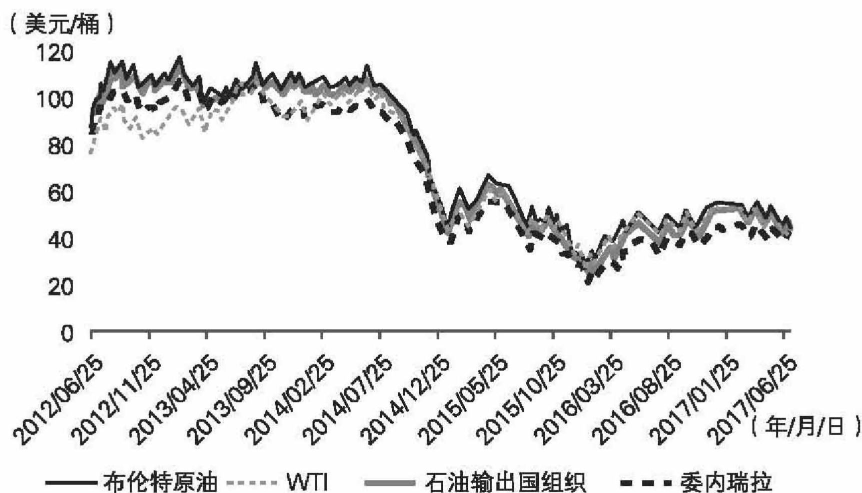
资源主权，把石油市场涨价的超额收益主要用于改善本国民生，因此深得民心。所以，尽管面对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下层社会的大部分群众还是继续支持现任政府。

这也说明，要让群众失去对玻利瓦尔革命的信任，必须从根本上打击委内瑞拉政府的财政能力。只要油价大幅度下滑，政府的财政收入大降，难以再继续推行各种改善民生的计划，这时候，只要再配合市场物资短缺的状况采取软实力进攻，那么，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度也将很快下降。

2014年，美国结束量化宽松之后，进入石油市场的流动性减少，随后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下挫，从110美元/桶下跌至40美元/桶。[194]较长时期的低油价，客观效果就是依赖以石油出口为财政支柱的国家受到严重冲击。而原油出口收入占委内瑞拉出口收入的**96%**，油价每下跌1美元/桶，政府收入就减少7亿美元。与之可比的是另一个石油输出大国俄罗斯也面临相同困境。[195]

如图6-15所示，委内瑞拉的国家财政能力取决于石油收益，随着WTI（西得州中间基原油）及布兰特原油价格在2014年从当年高位急速下滑，政府的借贷信用下降，债券也同步下挫。

委内瑞拉左翼政府作为美国这只巨牛上的一只牛虻，一直是美国拉丁美洲政策的眼中钉。根据前文分析，美国过去几年最重要的地缘战略之一是建立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同盟，那么玻利瓦尔主义难免成为美国利用TPP整合拉丁美洲的绊脚石。美国势难容忍拉丁美洲的各左倾政府的存在。由此看来，拉丁美洲的多个左翼政府相继陷入政治危机，甚至右翼势力卷土重来，虽说各有其内部原因，但时机配合之妙，很难说是纯粹的巧合。再看正当在大西洋的另一边，俄罗斯的普京政府被迫成为美欧的战略对立面之际，此时推倒油价，不啻是一石二鸟的策略。



来源：http：//oilprice.com/Energy/Crude-Oil/Venezuelas-National-Oil-Company-On-Its-Last-Legs.html。

图6-15　原油价格（WTI、布伦特原油、石油输出国组织、委内瑞拉）的变动情况



来源：https：//seekingalpha.com/article/4079170-goldman-sachs-investing-venezuelan-sovereign-bonds。

图6-16　委内瑞拉主权债券指数（2010—2017年）

当然，石油作为大宗原材料，影响其价格的波动因素很多，我们的研究中也注意到新能源及页岩油对石油市场供给结构变化的影响，但在能源供求没有根本性地调整之前，这些因素不足以解释原油价格从150美元/桶左右的高位断崖式下跌到36美元/桶。除了上述地缘政治对做空石油价格的客观需要外，美元流动性增强也是原因之一，在全球货币整

体贬值、避险预期增加时，美元指数一路上涨，客观上也造成以美元标示的石油价格的大幅下跌，这也是美国“竞劣思维”主导下对全球双重转嫁自身危机成本的方式。

八、美国能源独立策略与货币地缘战略调整

美国能推行低油价政策以打击对立的资源主权国，条件是前面分析过的战略性货币收缩及能源独立策略。此前美国炼油厂依赖从委内瑞拉进口的原油，包括产自奥星诺科（Orinoco）的油砂。油价暴增给美国页岩气革命创造了巨大利润空间，也使美国进口石油的需求下降。2007—2014年，美国进口委内瑞拉的原油量下降了一半。连接加拿大的基石（Keystone）输油管计划同期施行，也使美国最终不再依赖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

九、新门罗主义

2013年是《门罗宣言》发表190周年。美国国务卿克里2013年11月18日在华盛顿表示，门罗主义的时代已经终结，今天美洲国家间的关系建立在平等伙伴关系和共同责任基础上，美国不再致力于干预其他美洲国家事务。

众所周知，门罗主义是指美国以自由、民主等意识形态之名，把拉丁美洲视为自己的后院，主张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有权在拉丁美洲进行政治及军事干预。在美国进行战略性调整的时刻，美国高调发表纪念门罗主义讲话，变相承认一直以来美国与美洲国家之间的非平等关系，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长期干预其他美洲国家的事务。此时指称门罗主义时代终结，可以反过来解读为美国新门罗主义的开始。[196]

新门罗主义的不同，在于减少赤裸裸的直接军事介入，而更多运用软实力（Soft Power）颠覆，利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民主、自由、人权旗帜，利用网络新媒体，动员中产阶级，尤其是受美式教育体系灌输思想、消费美式文化长大、无条件认同美国价值观的年轻人参与政治运动，推翻不亲美的政权。它的执行媒体，包括各种非政府组织、智库及基金会[197]。对此，正如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创立人艾伦·温斯坦（Allen Weinstein）所说：我们今天做的很多事情，正是25年前美国中央情报局所做的。

在美国一度热衷推动的TPP中，拉丁美洲是重要部分，美国时任国

务卿克里提出所谓的“平等伙伴关系”，实际上是把拉丁美洲纳入以美国为核心的泛太平洋同盟伙伴。我们必须在美国的新地缘部署中理解新门罗主义。

在美国的战略分析上，现在有两个拉丁美洲：一边以古巴、委内瑞拉、玻利维亚为代表，强调国家控制资源及掌握国民经济；另一边以墨西哥、秘鲁、智利、哥伦比亚为代表，信奉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198]，也就是一边强调资源主权，一边保护跨国企业及本国庄园式大资本的利益。（在美国的二分战略分析里，巴西属于前一阵营。但实际上，巴西更多是中间立场。卢拉政府不过是利用资源收益改善民生，但一直与美国保持较良好的政治及贸易关系，本国市场也一直对跨国资本开放，对委内瑞拉和古巴推动的玻利瓦尔美洲联盟不算抱有太大热情。）

对于分属于两个阵营的拉丁美洲，美国的战略很清楚：把目前亲资本/亲美的阵营顺势纳入TPP，并且尽力推倒坚持经济主权的政府，最终把整个拉丁美洲纳入TPP，确保未来整个太平洋地区及大西洋沿岸成为庞大的“美元湖”。这是关乎美国接下来50年乃至100年国运的大战略，也是新门罗主义的核心利益。

理解这一点，我们才可能明白美国与古巴外交破冰的战略用意。

封锁古巴半个世纪后，美国早已明白缺乏资源的古巴只能起到意识形态表率的作用，实际不能给美国带来多少威胁。真正的威胁来自蕴藏丰富石油资源、以石油收益支持古巴，进而组建拉美玻利瓦尔联盟的委内瑞拉。美国一边改善和古巴的关系，一边积极支持以各种手段颠覆委内瑞拉政府，最终达到完全瓦解任何独立于美国之外的拉丁美洲同盟的可能性。委内瑞拉的波利瓦尔主义政府及其发起的拉丁美洲左翼政治联盟，面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挑战，恐怕前路将会很艰难。假如右翼重新上台执政，情况大概也如巴西一样，将会再走上出卖国家资源资产、让渡资源主权、大幅削减国民福利的旧路。

历史循环，拉丁美洲也许始终摆脱不了依附性的枷锁。

我们的研究总结了一条规律：任何具有一定地缘政治分量的国家只要收回或坚守本国的资源或货币主权，就难免触动跨国资本之利益，也势必受到跨国资本母国及本国利益集团的敌视。由此，后者就会以政治

正确的意识形态之名，通过“亲核心国”及“亲资本”的主流媒体、学术及知识界，煽动群众（尤其是接受核心国知识生产所教育出来的年轻人）反对政府，并在适当时机配合核心国的经济及金融攻击，以图推翻坚持主权独立的政府，继而树立愿意让渡经济或资源主权来换得过剩资本流入的新政权。他们高举的旗帜是种种政治正确的“普世价值”（例如自由、民主等，即便其本身是在针对一个通过民主选举出来的民选政府），“人权高于主权”的普世价值表面好听，但其掩盖的实质性问题却是：关乎国家核心经济主权所代表的收益，应该是由本国人民分享，还是由跨国资本及本国代理集团瓜分？

正值委内瑞拉亟须借助玻利瓦尔革命的民众动员能力推进“本地化”之际，陡然遇到华尔街金融海啸之后美国采取量化宽松政策救市、大量过剩流动性推高能源价格的历史性机遇，遂有查韦斯得以坚持把政府财政投入下伸到贫民社区，扶持中小企业，逐步调整经济结构，增强国内农业及制造业生产能力，逐步减少对石油出口的依赖。只有这样，在面对国际经济波动及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时，方能有更稳健的基础。但随着美国2014年结束量化宽松政策和国内的能源战略调整，继承查韦斯政策的马杜罗总统无论主观上怎样努力，都难以克服客观上遭遇石油价格暴跌导致财政能力陡降、外债随之大幅度增加的困局，遂使国内的玻利瓦尔运动难以为继，拉丁美洲左翼联盟也没有财力维持。

据此可知，核心国成本转嫁导致的输入型危机演变为国内政治转折，是委内瑞拉及其他任何单一经济国家都应该汲取的沉痛教训。

须知，世界放弃黄金本位之后，任何不可能取得国际结算货币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发行的主权货币就都只是“软通货”，遂使得各国都得主要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并以此作为本国货币被市场接受的依据。但随着美元增发，并且向世界输出过剩流动性、转嫁虚拟资本泡沫化的代价，国际期货市场大起大落的影响，反而是那些非结算货币的发展中国家因“输入型通货膨胀”而致本币大幅度贬值。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越是纷纷兑换美元，其国内金融资产贬值就越恶化！这已经不是左翼右翼的概念了！

这次的悲剧发生在委内瑞拉，下次可能发生在任何国家。

委内瑞拉的沉痛教训，尤其值得按照全面市场经济体制的理念推出“811汇改”之后随即遭遇汇率大战的中国汲取。

第七章　南非：深度割裂的两极化社会

南非是典型的由白人殖民者建立的国家，被殖民者奴役的族群长期开展反抗压迫剥削的斗争，最终通过政治谈判（非暴力革命）取得了以非洲族群为主的政治主权。

但由于在国家独立过程中向原宗主国让渡了部分核心权益（主要是经济权益），因此在解除殖民统治后建立的是只有形式上独立的民主政权，实质上因缺乏完整的经济主权，资源开发收益仍然被宗主国的跨国公司占有。这导致了南非政府长期缺少财政来源，无法改善民众的生活。

对此，借助我们提出的“主权外部性”理论，可以深刻解读南非现象。

种族隔离结束后，新上台执政的非洲人国民大会（ANC）政府本应大量创造就业来改善底层有色人种的生活，但是，新政府20年来倾向新自由主义，其政策的设计既不是为了扩大就业率，也并非旨在促进偏向下层的收入分配，反而是导致财富被向上虹吸。究其原因，具有主权外部性特征的国家本来承袭的就是配合发达国家朝向金融资本主义阶段深化发展的意识形态，以及确保资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亦即，西方成熟资本主义制度只是“西方的制度”；若被移植到大部分人口仍处于低收入水平的“前资本主义”国家，自然出现“制度错配”。

曼德拉的妻子格拉萨·马谢尔（Graca　Machel）指出：“南非现在是一个充满愤怒的国家，危险的事态正濒临爆发边缘。”南非最底层40%的人口至今仍然只能分享经济总量的6%，种族隔离结束20年后，非洲人国民大会承诺的推动土地再分配至今进展缓慢，人们开始对他们自己选举出来的政府失去耐心。

2013年年底，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曼德拉逝世，他获得了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高度评价。这种包括前宗主国的众口一词的肯定，也许表明了另一种对西方更为有利的意义——他带领国家沿着西方给定的道路在形式上结束了种族隔离，体现了西方给定的“普世价值”，但让渡了国家本应从殖民者及其跨国公司那里夺回的经济主权。因此，跨国公司掌控资源资本化收益所内在的经济不平等仍然深刻地割裂南非社会，占人口

大多数的有色人种表面上获得了被作秀拉票游戏表达的政治自由，实际上能够改善社会生活的经济自由仍遥不可及。

此外，资源丰富的南非的第一产业收益转化为金融投机的来源，还催生了巨大的金融及房地产泡沫，使南非经济对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格外敏感，南非的经济以至社会正面临一连串问题的冲击。

一、货币汇率不稳

对于外向型经济，本国货币汇率的波动往往反映该国经济的稳定性。事实上，南非货币兰特自2010年以来呈持续贬值的势头，其贬值幅度在新兴国中较为显著。2013年5月，美联储确立结束量化宽松政策后，随着全球货币的币值震荡，南非兰特更是出现大幅度下挫。南非币值的贬值幅度在E7中仅次于委内瑞拉，乃主要新兴市场中最严重者之一。

二、经济增长呈下滑趋势

南非的经济增长持续下降，如图7-2所示。主要原因是近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滑，这也说明南非还未发展出内生的经济增长动力。



来源：currencyconverter.io。

图7-1　南非兰特兑美元汇价

南非蕴含丰富的铂、黄金、钻石等矿产资源。当这些资源的国际价格上涨时，南非依赖这些资源创收形成结构化的利益分配，势必排斥制造业的发展（由于缺乏投资及因商品出口蓬勃而币值过高影响竞争

力）。目前，制造业人口比例只占15.5%，采矿业也只占3%，就业机会严重不足，失业率高企。只要国际经济收缩，大宗商品价格下滑，南非经济便面临严重打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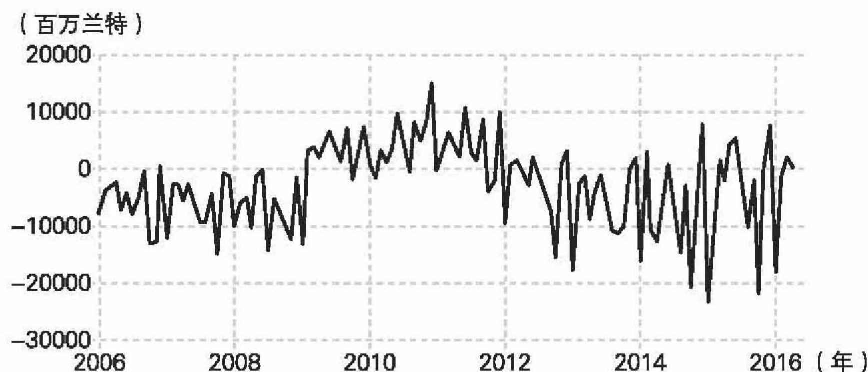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南非统计局。

图7-2　南非GDP年增长率（2003—2019年）

数据表明，南非经济曾受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重创，其后稍微恢复，但近年GDP增长率在低位徘徊，是E7中表现最差者。

（一）经常账户和贸易差额长期赤字

南非长期录得贸易赤字，成为经济的一大隐忧，如图7-3所示。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南非国税局。

图7-3　南非贸易差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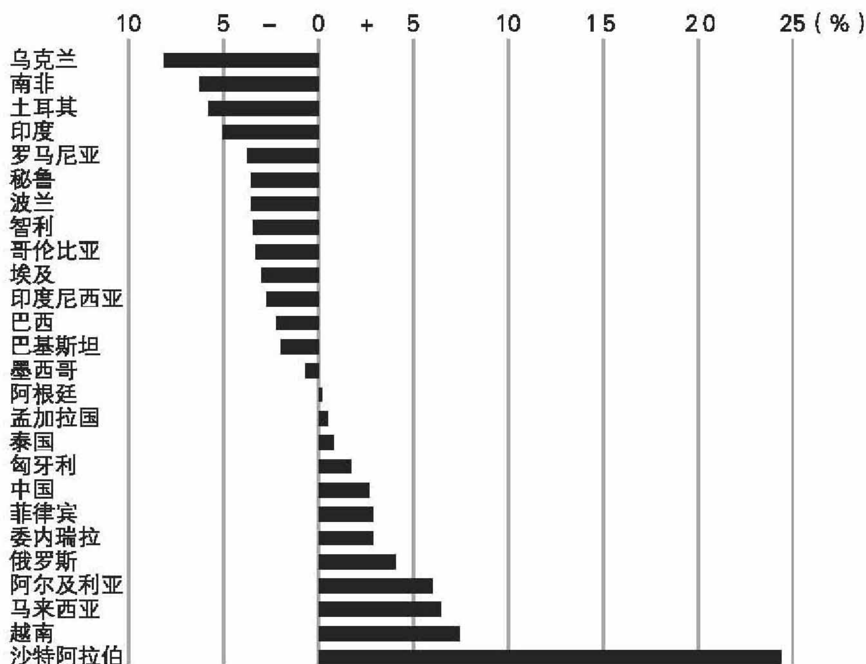
如图7-4所示，南非自2003年以来，经常账户一直是赤字状态，并且经济增长率越高，经常账户赤字越大。这充分说明了南非的经济增长一方面几乎完全依靠外资，另一方面本国经济占主体部分的资源和原材料出口几乎都被跨国资本所掌控，因此与中国这种经济增长率越高贸易盈余越高的国家完全不一样。

图7-5显示南非2012年的经常账户赤字占GDP比重在主要新兴经济体中高居第二，仅次于随后便爆发政治和军事危机的乌克兰。E7中的土耳其、印度位列第三和第四。事实上，E7中，除中国和委内瑞拉较长期录得贸易盈余外，其他五国都是长期赤字（印度尼西亚在某段时期曾较长时间录得盈余）。而近期，几乎只有中国继续保持盈余。而E7中，南非和土耳其更是持续多年录得财政与贸易双赤字的国家，经济基础最脆弱。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南非储备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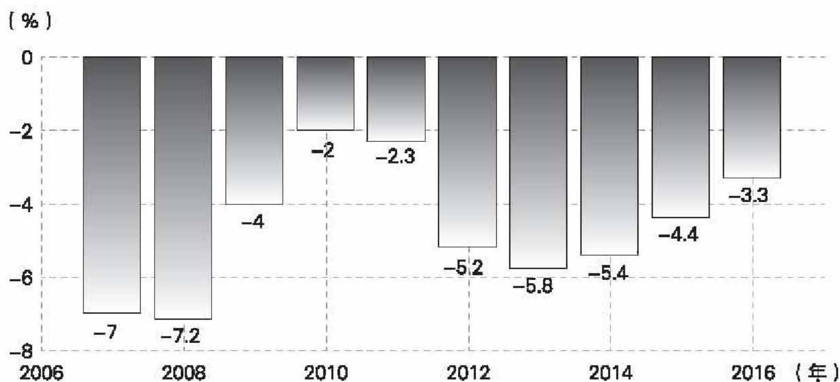
图7-4　南非经常账户（2003—2019年）



来源：《经济学人》。

图7-5　经常账户赤字（2012年占GDP比例）

图7-6清楚显示南非的经常账户长年赤字。在2006—2015年的10年中，有6年经常项目逆差对GDP的比值高于5%；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的2008年最高，达到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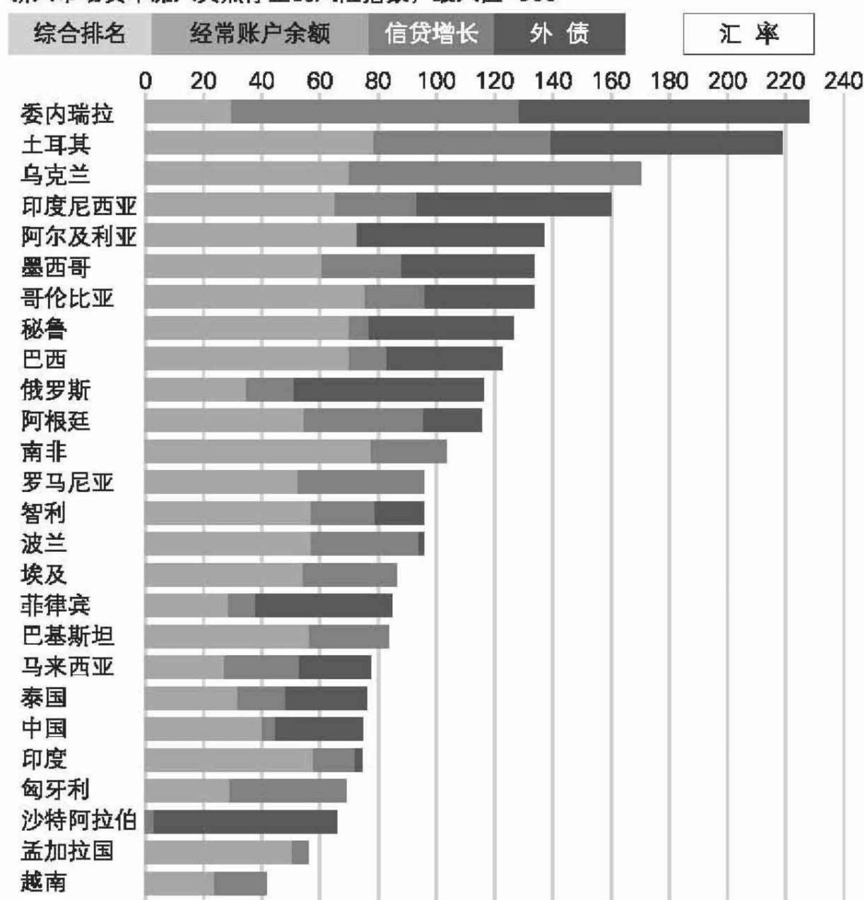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南非储备银行。

图7-6　南非经常账户赤字与GDP比值

（二）资金外流风险

图7-7是《经济学人》编制的新兴市场资本冻结指数，此指数主要是量度资本停止流入某新兴市场的风险，分别以经常账户、信贷增长及外债三方面评定某新兴市场的风险。最高风险指数为20，12以上是高风险，7—12是中等风险，0—6是低风险。2013年的评测中，新兴七国中土耳其、南非、委内瑞拉和巴西都为高风险，印度尼西亚及印度为中等风险，只有中国是低风险。2014年指数改变了量度值，300是最高风险值。陷入严重危机的委内瑞拉超越土耳其成为全球最高风险新兴市场，土耳其仍然属高风险，印度尼西亚风险大增，南非相对下降，印度的风险值则首次低于中国。

南非依赖外国投资，但不稳定的经济及社会又令外国投资者担心。南非一直存在资本外流风险。主要为国际金融资本服务的评级机构也趁机落井下石，2014年11月，穆迪将南非评等降至Baa2，较垃圾评等仅高一个级距；而惠誉给予南非的评级为BBB，展望为负面。



注：短期外债总额加上外债支付额占外汇储备和主权财富基金资产的百分比

来源：经济学家情报股，哈佛分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权财富基金研究所，世界银行，《经济学人》。

图7-7《经济学人》的新兴市场资本冻结指数（2012、2014年）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金融机构评级的变化似乎总与南非国内政治的变化纠葛不断，风险评级被工具化和政治化，操控评级也演变为政治或经济打击的具体手段。例如，在2016年11月28日南非兰特兑美元周一升至近三周高位，此前评级机构惠誉和穆迪确认了该国投资级别的信贷评级，而评级机构的利多消息马上就与“南非总统祖马正面临执政党执行

委员会的不信任投票”这一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评级变化的原因是，即便祖马如预期赢得投票，但挑战会令祖马权力削弱，而这会提振金融市场人气，因为金融市场将南非总统祖马的存在视为不利因素。[199]

像信用评级这类制度，本来是由核心国主导的国际金融制度的软实力之一。

（三）外债持续上升

长期贸易赤字通常都会造成对外负债增加，如图7-8所示，南非外债自21世纪以来一直上升，从2000年的320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771亿美元，这可以说是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但随着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美国开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后，南非的外债随即进入一个急速增长的阶段，从2009年到2013年，短短4年外债总额几乎翻倍。接着，在美国退出量化宽松之后，南非外债在三四年中基本上保持不变，随着外资撤离甚至有所下降。但2016年之后又进入一个急速增长的阶段。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南非储备银行。

图7-8　南非累积外债

南非黑人在争取政治主权的谈判中，其中一项重要条件是黑人新政府承担在长年种族隔离下南非所借下的外债。

据国际法惯例，当某国人民没有从政府所借的外债中实质获益时，这些债务便可视为恶债（**Odious Debt**），旧政权下台后的新政府本来没有义务要偿还旧债，但非洲人国民大会政府为了维持外资的信心，承诺继续还债。在旧债未清却长期录得贸易赤字又高度依赖外资发展经济

的情况下，南非的外债持续上升，埋下了债务危机的巨大隐患。

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教训：通过谈判而非暴力革命建立的政权，往往要承接前政权的债务，并因此堕入“发展陷阱”，久久不能自拔。

三、失业及贫富悬殊持续

南非的最大问题是始终无法扭转国内贫富悬殊的顽疾，而且财富分配不均主要表现在种族的分野上。2013年南非实质经济增长只有1.9%，但官方公布的失业率达25%，其中黑人人口失业率高达30%。在某些地区，失业率更高达60%，全国青年失业率接近50%，农业部门的失业率也达50%。

如图7-9所示，南非不仅是全球财富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而且失业率长期偏高。正是社会财富分配的高度不平均和普通民众缺乏发展机会、长期陷于贫困，导致南非难以形成稳定的社会基础，长期暴露在经济和社会动荡的风险中，并不断地累积着风险因素。

南非官方公布失业率曾经在2003年达到历史高位后一直下降，但2008年核心国爆发金融危机后，南非经济条件恶化，失业率再度攀升，2017年接近历史峰值，而实际失业情况可能比官方披露的更为严峻，如图7-10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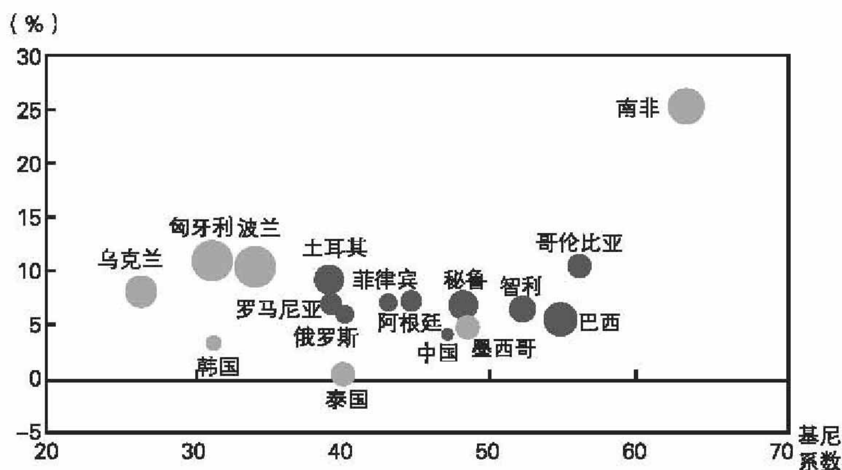


图7-9　南非的高失业率和收入分配不平等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南非统计局。

图7-10　南非失业人数占劳动力之比

四、社会不安，种族阶级冲突，仇外排外情绪高涨

内部财富分配高度不平等，社会关系愈趋紧张，基层民众看不到生活改善的前景，其对社会的不满借由某些事件为导火线，经个别政客煽动，便以排外、仇外的暴力形式爆发出来。

事实上，南非排外的群众事件自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全球危机以来一直不断出现。南非警方2014年9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2014年财政年度，南非共有17000多人被谋杀，平均每天有47人被谋杀。由于绝大多数的谋杀案件发生在晚上，所有城镇的店铺一到下午四五点钟就关门闭户，商业中心空无一人，如同鬼城，就连旅游胜地开普敦也不例外。[200]

2015年1月24日，南非警察总署发言人马克加里称："连日来在约翰内斯堡索韦托地区发生的针对外国人的暴力抢劫事件已经渐渐平息。不过，截至23日，已经有超过80家外国人开的商铺遭劫，至少有3人在暴力事件中死亡，另有162人被捕。"[201]

2015年3月底以来，德班、约堡等地陆续出现大规模以排外为名的暴力及抢劫事件，造成多人死亡。南非约800万祖鲁人的传统领袖兹维利迪尼和总统祖马之子爱德华相继发表排外言论，南非全国上下掀起"摧毁殖民者雕像"的风潮。

2016年5月24日和25日，自由州省的两个地区先后发生骚乱，一些

黑人区的居民因对当地政府官员选举不满，用石块堵塞道路，并袭击、哄抢、洗劫了一些外籍商人经营的商店，还打伤部分外籍人士。受此波及，十余家华人店铺遭哄抢、洗劫、打砸。中国驻南非使领馆更是在6月1日发布安全提示，称南非多地发生暴力骚乱，提醒在南非的中国公民注意当地安全局势。[202]

南非出现去殖浪潮，说明黑人群众意识到，尽管建立了一个形式上的黑人民主政权，但实质上南非的去殖化过程并没有完成。

在南非贫民区再次出现类似昔日反种族隔离斗争的示威，说明黑人群众深刻感受到经过20年，即便是在黑人政府的统治下，经济层面的“种族隔离”也始终没有结束。

诚然，任何初步的政治觉醒虽然难能可贵，但其“政治化”过程很复杂，也很容易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作用下被跨国公司支持的强势集团利用。事实上，南非近年出现的仇外情绪及排外暴力示威活动，并非南非的独有现象。我们不难发现类似的排外、仇外在世界各地，甚至在富裕的国家及城市中也会出现。这正是我们一直警惕世人要担心的全球法西斯化现象。

五、日益严重的劳资冲突

近年南非开始持续出现严重的矿产业劳资冲突，比如2012年Marikana矿场罢工导致43人死亡，政府更扬言考虑派遣武装“维和部队”进驻矿场。矿产业虽然只占南非经济产出的6%，却占出口总值的60%，也是全国最大的私营部门雇主，雇用超过50万名员工。矿场的数目从2004年的993座上升至2011年的1600座，总产值从2004年的980亿兰特升至2012年的3700亿兰特。但近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进一步打击了南非的矿产业。

2014年7月1日，南非金属工人全国工会（NUMSA）约22万名成员在约翰内斯堡、开普敦和德班，高举着要求涨薪的标语游行。当月14日，在持续两周的罢工后，南非金属工人全国工会和钢铁与工程行业联合会（SEIFSA）进行谈判。在此前的罢工行动中，南非金属工人全国工会曾提出涨薪15%的要求。而此次罢工初始，其将条件降低至12%，随后又降至10%，附加每人1000兰特的住房补贴，以及废除劳动中介的要求。

工人要求加薪12%，而企业开出的条件是加薪7%—8%。工人们表示，若其要求得不到满足，将开始全面罢工，甚至“让国家陷入黑暗”。在罢工游行的工人中，有悬挂标语牌写着：“Eskom（南非国家电力公司），我们希望得到应有的工资。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家徒四壁，而资本家们却享受着我们数百万人的劳动成果。”[203]

南非劳工部数据显示，2014年南非共计发生88起罢工，造成61亿兰特经济损失，平均罢工时长为20天，占全部工作日损失的98.4%。罢工最多的行业是社区、社会和个人服务业，其次是制造业，最少的是金融业和电力行业。[204]。

2015年4月13日下午，在约堡东部的杰米斯顿，南非运输联合工会豪登省秘书恩考斯被人枪杀。在此之前，他已经收到过无数死亡威胁。事件显示南非的劳资冲突日趋严重。

2016年7月10日，据南非《每日商报》网站报道，南非第一国民银行高级行业经济师Muscat表示，南非罢工活动势头再起，矿工和建筑工人联盟协会（AMCU）再次提出铂业工人应保证有1.25万兰特基本月薪的要求，而南非金属工人联盟宣布和汽车零售组织（RMI）存在纠纷。[205]

六、ANC内部分裂，青年政治家激进化

由于ANC执政以来背离作为建党纲领的《自由宪章》，长年推行亲资本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黑人民众对其支持率下降，并引起党内年青一代成员的不满。

青年联盟前任主席马勒马（Julius Malema）因为激进的政治言论于2012年被ANC开除党籍。其后他创立经济自由斗士党（Eco-nomic Freedom Fighters, EFF），吸纳了ANC的一批年轻及较激进的成员，包括现任国会议员。他们主张不谈判、直接剥夺白人土地和矿业国有化，征用这些资产的时候也不需要拿出赔偿；他们同时强烈反对外国人拥有南非土地的所有权。马勒马在一次集会活动时演说：“我们会接管政府。一旦我们接管了政府，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谈判，而是夺回土地，因为那些土地本来就是我们的。”马勒马还提醒南非人，随着他们的“革命运动”，不可避免地会有牺牲：“或许有天早晨醒来，你会发现自己的炉子上没有面包了，那时我们就要学会自己做面包。”[2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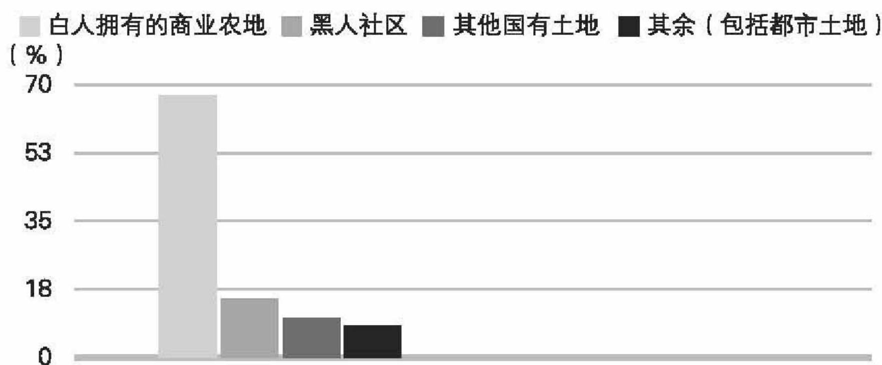
七、土地改革步履蹒跚

南非政府无法创造大量就业改善底层民众的生活，土地改革便成为敏感而迫切的政治议题。

2013年是《土著土地法》(*Native Lands Act*)颁布100周年纪念，该法案标志南非种族隔离的开端，法案明文禁止黑人在所谓的保留区以外建立新的农场。[207]在该法案的基础上，再加上日后一系列附加修订，南非白人政权奠定其种族隔离政策。不平等的法案，使占南非人口近70%的黑人只能拥有全国7%的耕地，而且一般是较贫瘠、耕作条件差的土地。黑人的传统农场被摧毁，黑人被迫迁移至拥挤的隔离区，只能成为矿场及白人农场的劳工。1960—1980年，被迫迁徙的人口达350万。

1994年，刚接管政权的**ANC**答允会把白人所拥有的**30%**耕地转移给黑人农民。但种族隔离结束20年以来，土地改革步伐缓慢。全国最肥沃的土地仍然主要集中在以白人为主的少数人手上。种族隔离政策结束后两年，即1996年的统计显示：6万个白人农场主拥有全国近70%的农地，并租用另外的19%。[208]

图7-11清晰表明，南非的土地大部分集中在白人农场主手上，与前面讨论的巴西一样，属于前殖民地立国的典型土地经济结构。



来源：http：//qz.com/358625/south-africas-proposals-on-land-reform-suggest-a-push-to-sow-votes/。

图7-11　南非土地分布

至2013年，政府从白人手上收购了412万公顷的土地（耗资129亿兰特，即14亿美元），并分配给230886名黑人农夫，但黑人获得的往

往并非优质土地，而且缺乏政策配套支持。2010年，政府的调查指出，90%的分配土地已不再具有生产力。

201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45%的被访黑人希望获得土地，其中33%期望获得土地以种植粮食。[209]土地改革成为左右南非社会稳定性及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自1991年以来，有1500多白人农场主被杀。在一些地方，由于土地问题引发的冲突已经演变为低烈度游击战。农场主们雇用安全人员，在农场周围挖壕沟，以抵挡农民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区的农场主纷纷前往非洲其他国家进行耕种。”[210]

面对党内外加速土地改革的强大呼声，执政党提出更积极的土地再分配政策计划。

2015年2月14日，总统祖马在国会上表达了期望土地改革的意愿，表示会限制农场主占有土地的面积，并限制外国人拥有土地。他说：“土地成为纠正昔日种种不公正的其中一项最关键因素。”

2015年5月8日，南非土改部长恩昆迪在国会发表预算报告时，公布了南非关于土地改革政策的一些详细信息。他表示，小型农场主允许占有1000公顷土地，中型农场主2500公顷，大型农场主最多也只能占有5000公顷。12000公顷的土地占用量上限仅仅适用于“特殊类别”，包括林业、狩猎农场、可再生能源农场等。恩昆迪表示，多余的土地将会被政府按照“宪法规定的公正价格”征用并再分配。

然而，代表大农场主利益的自由前线政党表示，南非土改部长的“工作目标”，已经远远超出了之前南非政府计划的、征用30%农业土地的目标。仅仅是12000公顷的上限，已经足以吓跑很多投资者；现在更加苛刻的政策，其效果更有可能是毁灭性的。

南非政府能否顶住农场主利益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大反动压力，加速推动真正惠及基层民众的土地改革，为撕裂的南非社会打造稳态社会结构的基础条件，将决定南非社会是否会因为基层黑人民众日益不满而日趋动荡。

南非的案例显示发展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历史现象：在缺少“革命红利”的土地分配条件下，依靠政治谈判让渡了经济及资源主权而被承认的国家，很难建立稳态的社会基础。

南非的经验显示：第一次非暴力革命无法建立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又或者第一次革命的成果被利益集团侵蚀后，基层民众终于忍无可忍之时，便会奋起走上第二次革命之路。

南非的演变，对于片面亲资本、破坏稳态社会基础的各发展中民族国家政府，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

结语　新兴国家未“新”何“兴”？

上述新兴七国（E7）比较研究中的理论创新主要是两个论点：第一是“成本转嫁论”，第二是“二元结构承载危机软着陆”的作用。后者接续并对应前者：能够让转嫁而来的输入型危机得以软着陆的载体，并非麇集于城市的现代化的正规经济部门，而是二元结构体制条件下的非正规部门。

一、成本转嫁三阶段

总结过去500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其成本转嫁机制一直在演变，可大致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战”前400多年列强通过侵略、殖民等方式直接对外掠夺；第二阶段是“二战”后先发国通过产业转移获得发展中国家的低廉劳动力及资源，并转嫁成本（生态环境破坏、社会矛盾等）；第三阶段是1971年后核心国向金融资本主义进一步深化发展，借由大量增加货币供应向全球输出流动性，从中获取巨利，却同时散播危机。

现在作为深化成本转嫁的第三阶段的资本主义最新调整，是在金融资本核心区形成货币联盟，通过打造排他性的“新冷战”背景的贸易同盟，延续其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结构性优势，而被排拒在外的边缘化国家则预期将要继续进一步承受成本转嫁造成的社会混乱和输入型危机对资源环境的破坏。

二、核心国霸权加剧成本转嫁

1991年“旧冷战”结束，诞生了单极化霸权，20多年后的2015年形成了两个体现霸权的国际体系：一是“六方货币同盟”这种币缘战略产物（参阅附录《专题2新核心同盟之一：核心区构建六方货币同盟》），二是保障“治外法权”的后殖民化体系。从其内生性的排他性及延续“二战”后地缘政治同盟关系来看，二者都属于资本主义升级为金融资本阶段借尸还魂的“新冷战”制度体系；并且与被核心国称为软实力的“新冷战”意识形态紧密配合，更多通过教育、科研、文化、艺术等被认为西方优越的“巧实力”进入发展中国家，以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利

益。

总之，“二战”之后形成双寡头分割世界的对抗性地缘政治及其冷战意识形态不仅没有随着“旧冷战”结束而死亡，反而在核心国家“单极化”霸权的主导下，旋即进入“新冷战”时代。金融资本主义虽然遭遇全球危机，但凭借霸权加剧向贫困人群和资源环境转嫁成本！在这种金融资本推进全球化的条件下，西方中心主义得到了自我复兴的机会。

新兴国家艰苦奋斗多少年，争取凭自身的努力走出危机，业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满以为累积了足够的筹码，可以在不试图改变全球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游戏规则的条件下，逐渐增加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制度谈判权和话语构建权。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如今看来，E7中的大部分国家已经遭遇失败，剩下勉力支撑的是合计占全球人口总数约40%的中国和印度。

作为最大经济体的中国，尽管之前曾经一再公开地表示：承认美国引领世界的地位，不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但无论怎样“示好”，也如同“待宰肥羊”遭遇磨刀霍霍，不得不被动应对西方金融资本集团单方面改变秩序和强化其金融霸权制度的动作。

眼前的现实，是先进金融资本主义核心国主导的美元集团，单方面建构新币缘战略及意识形态体系的全球“新冷战”格局。E7大部分已经被打回原形，发展中国家将来的道路，只能荆棘满途。2017年1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执政，其颠覆式的政策之一就是退出前任总统勉力推行的TPP。这一决定在已经纳入TPP创始意向成员的国家中引起更多不确定性。作为美国地缘战略布局中的关键一招，TPP的存在意义不言自明，但从特朗普新政的颠覆意义看，美国似乎已不能从中获得更多。因此，实质性地表达“反全球化”意图的“美国优先”战略的调整，势必有新的转嫁自身危机和代价的做法。2018年，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科技战，以及一系列强化制裁措施，给实体经济和资源主权国家带来的伤害更大。对此，我们已经开展了20多年的国际比较研究仍会持续跟进。

三、二元结构的辩证关系

E7国别研究表明，边缘国家越是高度城市化，危机烈度越强，后果

越严重！反之，包括乡土社会在内的非正规部门占比越高，这种输入型危机软着陆的可能性越大。

这个结论的经验依据，来自此前对中国周期性危机的经验教训分析，[211]也来自我们这次对E7比较研究中对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别比较。例如：中国和印度都属于亚洲原住民大陆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乡村社会非正规就业占比较高，在应对成本转嫁带来的输入型危机中相对稳定；而巴西和委内瑞拉都属于拉丁美洲殖民化条件下实现了高度城市化的一元体制（委内瑞拉更是单一经济叠加高度城市化），也都在成本转嫁的规律作用下出现经济衰变、政治颠覆。

尤为可贵的是，中国在产业资本经济高速增长的2005年推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国家投资计划，随即在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的时候提出“生态文明指导思想”。在2013年核心国推出量化宽松组建六国货币同盟的同一年，中国进一步推出“生态文明”战略转型；然后是2017年当新兴国家相继进入严重危机和经济衰退之际，中国确立了“乡村振兴”的战略投资方向，并且在2019年遭遇特朗普政权“去中国化”的压力下，明确指出“乡村振兴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从2005年提出“新农村建设”战略算起，中国已经向广大农村地区投入大约2万亿美元，主要用于乡村基本建设和农民的社会福利，以及教育、医疗、扶贫等减少两极分化的公共开支。

显然，这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主流所强调的加快城市化，同时消灭传统部门的激进战略思想确实不一致，但是对拉丁美洲高度城市化无力承载危机代价而发生“国家失败”教训的反思之后的方向性调整。

四、新兴国家的新出路

新兴国家尚未“新”，何以“兴”？！

与其尝试在核心国主宰的霸权体系内进行小修小补，期待游戏规则会因此对新兴及发展中国家变得更公平，还不如更清醒地做出新的选择！也许是到了该真正对核心国“去依附”，即摆脱附庸关系的关键时刻了！

所谓“新”，就要在核心国霸权的压迫之下，靠制度创新来实现对“新币缘战略同盟”的去依附，这就要求区域合作板块中的国家捐弃前嫌、求同存异，缔结不同规模的地区性货币及贸易联盟，努力打造能够有效弱

化输入型危机的地缘战略纵深。

自1955年万隆会议倡议不结盟运动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局势中一直处于守势，只能在先发国家所塑造的秩序与失序中被动应对，甚至挣扎求存。这个情况直至近年新兴国家推出金砖银行、亚投行（AIIB）等倡议才出现局势转变的可能（参阅附录《专题9“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的布局与挑战》）。这些倡议的历史意义在于，新兴国家尝试走出美欧所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霸权体系，另立更有利于后发国家可持续发展、平等互惠的全球金融贸易新格局。

再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应该主动与土耳其的能源通道战略有机整合，两国地处亚洲大陆东西两端，发展的历程有相似性，亟须开展战略对话；并且要尤其警惕核心国的软实力攻讦和巧实力运作。

可借鉴的教训是E7中的拉丁美洲案例。本来，委内瑞拉与巴西在外贸形势良好之时，早就应该联合构建南美各国以资源主权为信用之锚的区域货币体系，只可惜兄弟阋墙，功败垂成……

我们期望达到的“新兴”，是形成一个真正体现发展中国家多元化特征、较平等的全球体系。

诚然，任何新兴国家若敢于单独这样做，那就意味着改变而不是顺从西方竭尽全力强化了的、以军事霸权支撑其制度权和话语权的国际秩序，就都必然地会引发更为严峻的外部打压，如地缘战略上的围堵和遏制。同时，国内外也必然会出现各种以冠冕堂皇的普世价值为名的软实力进攻，各种花色革命的巧实力的运作……

但是，更为值得关注的是2018年以来，核心国为实现所谓的美国优先而公然强化其单极霸权地位，不仅主动发起去全球化，而且借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世界性暴发破坏了全球供应链之机，强行推进以“新冷战”地缘政治画线的产业重构。这个前所未有的剧变使所谓的“新兴国家”概念随之解构：中国在西方体制外一直被作为边缘国家，进而被美国列为头号敌人，不得不应对以“贸易战”为名的“硬脱钩”；巴西作为与美国战略性结盟的南美第一大国，被纳入金融资本阶段半核心圈，加入了美国在2020年3月主导建立的1＋9货币互换机制；[212]土耳其、南非、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因在地缘战略重构中都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而将处于半边缘地位。历史巨变之中的新兴国家若在被迫选边站之际，不

能深刻理解自身所处的“资本主义不同历史阶段”的定位，不清醒掌握自身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位置，便将难以避免被宰制之恶果。

此刻，哈姆雷特的名言在耳边响起：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

附录　E7研究的宏观背景

按语

我们对新兴七国（E7）的国别比较研究起始于2011年。

这一年，全球危机正在深化，西方出现深陷债务危机的“欧猪五国”；接着，发展中的实体经济国家与资源经济国家均开始遭遇经济下滑、资本外流。中国也在“第二次生产过剩”引起的实体经济向金融化经济的转型和配套制度的演变过程中，发生了非同寻常的体制变革……数年间，国际风云复杂变幻。在E7中，最极端的情况是“国家失败”——美联储加息带动油价暴跌，使不能摆脱殖民化单一经济的出口依赖型国家的财政和金融这两个最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崩溃，从而使社会陷入混乱无序状态。

为了更清楚地揭示背景，搞清楚国际形势变化及各国应对过程背后隐含的核心国家向次边缘/边缘地区或国家进行“双重转嫁”的单极霸权战略实质，我们将正文中因篇幅所限未及展开的重要问题汇集成10个专题，作为深入了解本研究视角的补充。这些专题分析主要写于2011—2017年。近年来，全球局势风起云涌、瞬息万变，以下某些内容可能失去了时效性，但其分析框架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不予删改，立此存照。

专题1　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的阶段性战略调整

自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以后，美国为了纾解国内的结构性危机，实行了三轮量化宽松措施，制造了大量流动性进入投机市场，引发了国际主要商品（石油、粮食、有色金属及煤铁等）价格大幅上涨。其客观结果是，把源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通过国际金融货币制度体系转嫁给发展中国家。

具体来说，量化宽松的主要效用是解决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处置与降低资本成本，缓解流通中的资金紧张，避免更深层次的金融系统性危机爆发。但美联储增加的巨额流动性并未形成大量有效信贷进入实体经济，对实体经济作用有限。[213]实际上，增发的美元更多进入粮食、能源和原材料市场，造成价格陡然上升，一方面向“大进大出”的实体经济国家，尤其是向未能改出单一经济的殖民化国家转嫁通货膨胀；另一方面，美国2008年以来推高能源价格，使价格上涨了3倍以上，恰好给美国页岩气留下了利润空间。而页岩气的大规模开发在2015年达到了自给自足，为替代进口的海外能源创造了条件，降低了美国的工业成本，促进了美国实体经济的复苏。

进而，美国又在2014年退出量化宽松政策、能源价格大幅度下降之际，重创了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等地缘战略对手；更为美元与石油“脱锚”、把中东乱局甩给思想陈旧的老欧洲、一劳永逸地打败欧元奠定了基本条件。

这种借用自身流动性过剩导致油价大起大落实现“一石三鸟”的重大战略调整，表明美国确实是金融资本阶段不容挑战的主导国家，其在金融资本与政治强权紧密结合的体制下的制度与话语创新能力，以及战略调整的自主条件，是维护其全球单极霸权地位的内生力量。

反观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连产业资本阶段都还没有条件进入，却在美国的软实力控制下，急于加入跨国资本集团要求以“去国家化”为核心内容的TPP。正如中国民间一句俗话所说：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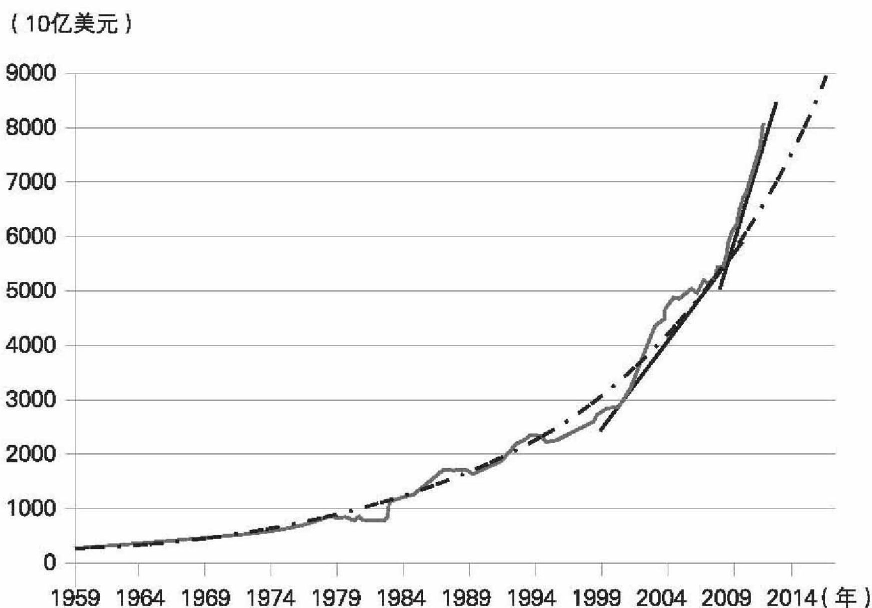
要在上述风云变幻中准确把脉当前世界的发展局势，首先需要做些正本清源的工作，理解当代全球化的实质乃是“二战”后西方霸权国家美国向金融资本阶段跃升并获取收益，带动全球跟从发生变迁的过程。

一、当代全球化是全球被动卷入美国向金融资本跃升的阶段性过程

核心国家的金融深化，是当前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而金融深化又是货币供应膨胀的必然结果。自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全球迈入美元流动性急剧增长的时代。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运用各种地缘影响力，使石油输出国组织规定石油贸易以美元交易结算，美元变相从金本位转为准石油本位，接着便发生中东战争和石油危机，原油价格急升。任何国家需要石油，便需要美元。而本身蕴藏丰富石油资源的美国，也同时限制国内石油开采及石油出口，继而主要从中东地区大量进口石油。

今天回看，很难判断这一连串事件究竟是偶然，还是美国精心计划的紧凑地缘战略部署。但客观上，环环相扣的一连串事件效果是，美元供应急速膨胀，向全球大量输出流动性。

如图1.1所示，自美元脱离金本位后，美元供应一直呈指数式膨胀，而且增长的指数级不断加快。



来源：http：//www.todaysbetterman.com。

图1.1　美元历年真实货币供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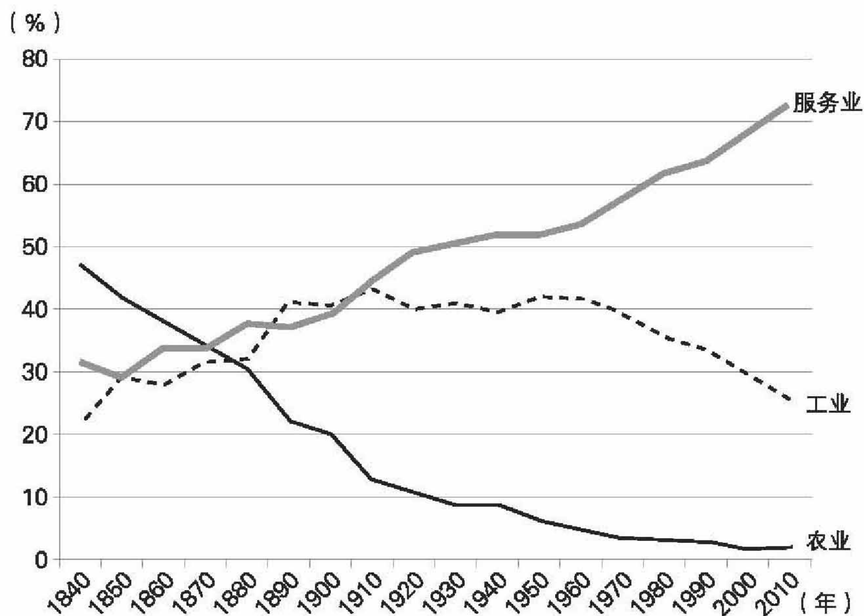
美元流动性泛滥全球，使世界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再次进入迄

今长达40余年的金融不稳定年代。经济及金融基础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外汇储备作为本国货币秩序的最后保障，而世界的主要储备货币自然是美元——这不仅仅是因为美国一直占全球贸易总量的大份额，且美国是政治稳定的发达国家令各国对美元有信心（在非金本位下，货币的价值基础主要依靠主权国国力背书），最重要的是因为美国是全球第一大军事强权，也是唯一有能力控制全球贸易主要航运通道的海权大国，是过去数十年全球贸易秩序的主要维系者；因此，全球进入货币自由浮动年代后，各国对外汇储备的需求并未如当时某些主流经济学理论家所预测的那样下降，反而急速增加。

当然，自布雷顿体系建立以来，作为全球资本主义核心国中核心之美国一直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才维持全球贸易秩序，并且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而不断塑造和改变这个体系。核心和边缘，当然是不平等的关系，不仅是起跑点不一样，即使表面话语上是“平等竞争”，但两边的游戏规则和条件也存在巨大差异。

比如，按照一般经济自由主义的话语来表述，人们最普遍接受的一个观点就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全球化进程开始加剧，尤其是中国这个劳动力大国全面出口导向日益融入全球化，其显著特征是美国（尤其是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急速上升，美国出现局部的“去第二产业化”的情况，第二产业在总产出中的占比加速下降。这个判断“有图有真相”（图1.2和图1.3），故被视为一个客观的经验归纳，被中美两国的学者广泛使用。两国在同一现象的解释上各取所需：中国学者用来力证“加入全球化”的好处，美国也有一些政客以此大做文章，称美国是全球化自由贸易的受害者。

但这其实不过是美国内部进行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转型、加速金融深化的过程的产物。美国实际的情况是：1996—2010年美国累计产生6.98万亿美元经常账户逆差，占全球逆差的60%，但同期其对外净债务却只增长了2.3万亿美元，亦即在表面严重失衡的贸易赤字下，美国通过金融效应获得的收益高达4.68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为2001—2007年获得，为3.86万亿美元，占同期美国GDP总额的4%。这被国际学界称为“暗物质”的国家间财富关系，其实在本质意义上表征了在当今国际经济金融体系里不同国家的不对称地位。这是新兴市场十年繁荣、表面贸易失衡背后的真正失衡。[214]



来源：https：//www.minnpost.com/macro-micro-minnesota/2012/02/history-lessons-understanding-decline-manufacturing。

图1.2　美国历年不同部门产出值占总比



来源：美联储经济数据。

图1.3　美国商品及服务净出口额

可以说，这4.68万亿美元差额的收益，就是美国1996—2010年对全球征收的铸币税（seignorage）。更何况，美国对于那2.3万亿美元债务的履行义务有多少约束性，以什么方式来履行，都还是未知的问题。退一步讲，也不过是印更多的美钞来支付利息而已。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要求美国让渡重要资产权益来偿还债务，不像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所强调债权国对债务国的绝对主宰权那样。

如果考虑美国是地球上唯一可以靠印钞票进行国际贸易的国家，那么可以断言，1996—2010年累计6.98万亿美元的经常账户逆差，全是美国对全球征收的实际铸币税。

因为，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实质上是金融资本主导下的成本转嫁与成本承担二者互相紧扣的双重过程。一边是发达国家的核心国及其跟从国朝金融深化发展，向全球输出流动性。这些发达国家之间又有优劣之别：日本曾经一度有挑战美国霸权的鸿鹄之志，但金融泡沫爆破后在漫长停滞中挣扎，已经全面附庸于美国的太平洋战略；欧洲曾被美国战略性打压，正在艰难处理内部矛盾，面临各种危机；而作为核心国的美国，凭借其军事强权支撑货币霸权之优势，始终是最近四十多年来金融资本主义发展的先锋。另一边，在全球流动性膨胀的条件下，某些后发国家借着生产要素低廉或资源丰富的便利，在付出了重大的社会及生态代价的条件下，参与全球化贸易，经济规模得以发展起来，被泛称为“新兴国家”。

在这样的全球格局中，美国之所以能够依赖债务（维持高杠杆比）来扩充其经济及政治军事强权，其基本条件仍然是以E7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纳入全球化体系，积累巨额美元储备向美国贡献铸币税，以及贸易盈余回流美国，并且只能用于购买回报率较低的美债。而为了维持实体经济国家贸易盈余、资本持续流入美国资本市场，美国必须维护美元作为世界主要结算和储备货币的地位。（见图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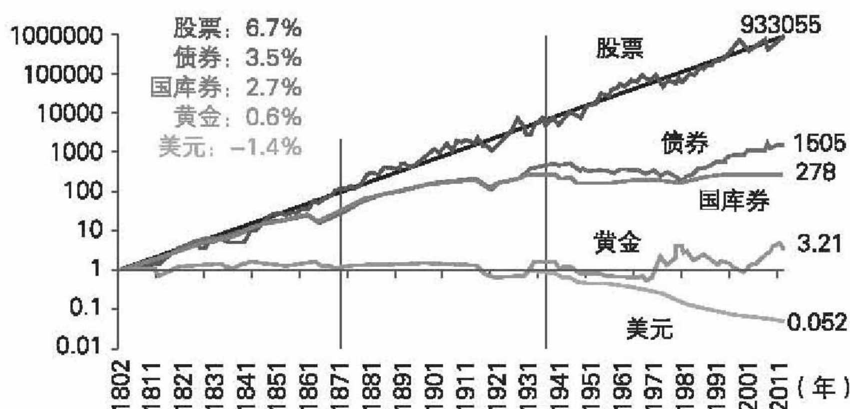


来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Reserve currency。

图1.4　世界储备货币占比及其变化

须知，同样1美元，发展中国家和美国投资人能获得的收益差异巨大。从图1.5的数据看，如果在19世纪初持有1美元，200多年之后会丢掉95%的价值。即使持有美债，200年后的收益也只有1500多美元。亦即，任何国家大量持有美元、美债都没有获得利润的可能。而美国投资人主要是在股票市场获得巨大收益的。19世纪初的1美元股票，除掉通货膨胀因素之后在200年里升值近100万倍，今天的价值是93万多美元。表面看，这是通货膨胀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作用，实际上这与美联储的制度建构权直接相关。[215]

由此可知，以实体经济为主的国家与美国所谓“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实质，一方面等于向美国“进贡”廉价资金，使美国长期成为外部资金流入最高的国家；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国家却要为此承担极高的国内融资成本，造成国内的中小型企业的发展严重受阻。例如，直到2015年1月，中国一直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但就在向美国大量输出资本仅仅获得极低的回报率的同一时期，中国国内却出现因融资难及贷款利率高而使中小型制造业企业大批倒闭的现象。



来源：http：//www.aaii.com/files/images/articles/9298-figure-1.jpg。

图1.5　1802—2013年美国大类资产的回报表现

而即便在美国内部，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也主要是为金融资本服务，一般美国中下层群众只搭了个没有未来的便车。高度金融化及低利率的环境，让经济增长的收益分配严重不均，普通人和政府都依赖借贷度日。有研究显示，美国的工资中位数经通胀率调整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便再无显著增长。美联储的一项调查显示，40%的美国家庭表示他们仅仅是“刚刚温饱”，60%的家庭甚至没有足够的储蓄来支付3个月的生活费用。美联社和NORC公共事务研究中心的一份调查则显示，有2/3的美国家庭表示难以拿出1000美元应付意外支出。事实上，美联储20年来的政策鼓励投机活动令金融和经济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美国发展成一个金融业“赢家通吃”的经济体。[216]

因此，当代全球化的本质乃是占据全球体系核心位置的欧美先进经济体仍然借着无限度的信贷膨胀，在全球金融化体系里进行制度寻租：一方面把成本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则榨取全球自然资源及实体经济国家/部门的人民之劳动成果。这就是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进入高级阶段的历史过程。

二、美国金融化长期走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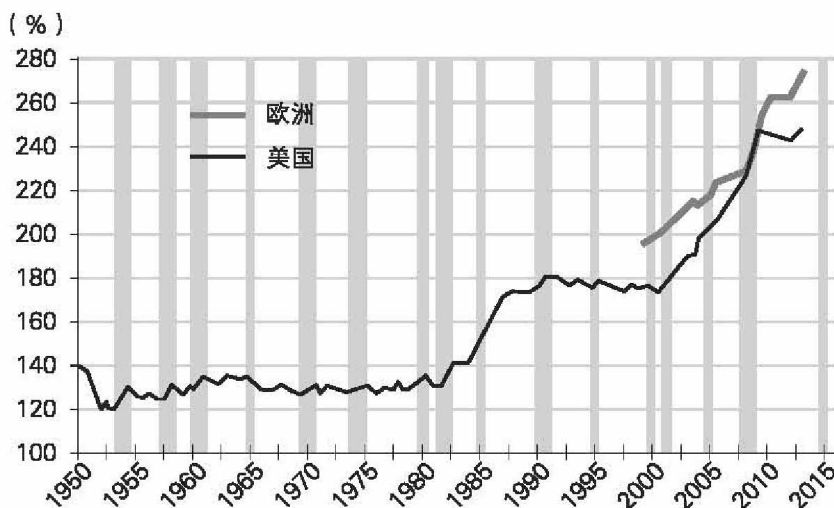
金融危机之下，美国采取所谓零利率的超级量化宽松政策，是以零成本的流动性直接注入金融市场，防止资产价格崩盘，并把不良资产转

移给公众来承担，使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避免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Balance-sheet insolvency）。某种意义上，这是政府公开支持代表私人金融家的美联储以量化宽松政策来转移银行家因贪婪而制造的坏账泡沫，即把之前创造出来的虚拟价值泡沫转移到大幅膨胀的央行资产负债表里。

事实上，期望已进入金融资本高度发展阶段的欧美经济大幅去杠杆化，只是人们的一厢情愿。除了作为金融海啸罪魁祸首的金融与地产的投机资本之外，欧美的总体负债比率一直处于历史最高水平（见图1.6和图1.7），这才是西方连续出现金融危机的主要内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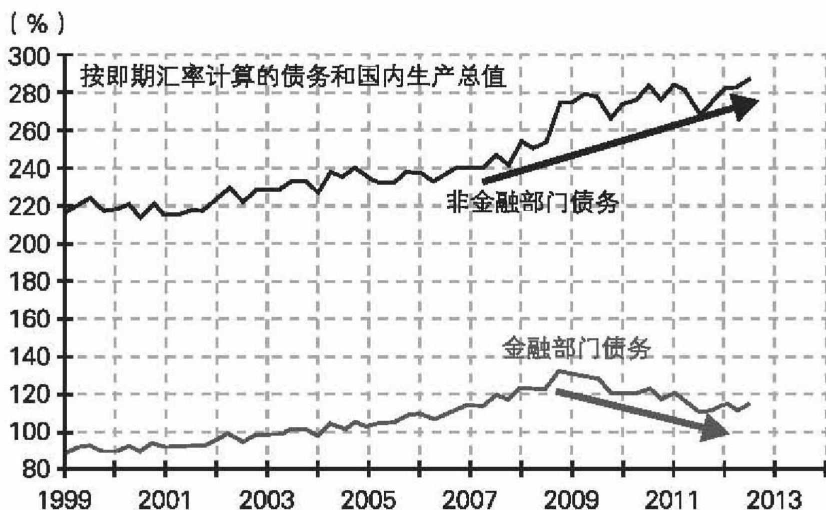
以美国为例，其高杠杆率可以从经济的三个主要部分反映出来。

第一，美国的家庭负债率虽然从次贷危机前的高位回落，但仍然超过100%。如图1.8所示，次贷危机后，世界上大部分先进经济体，除了少数如德国、法国和日本[217]以外，平均家庭负债率都超过100%。这说明发达国家的不少家庭继续以举债来维持其高消费、高耗能的生活水平。



来源：http：//www.allianzgi.com/en/Market-Insights/Pages/CIO-Perspective-Oct-2013-%28by-N——Dwane，-CIO-Equity-Europe%29.asp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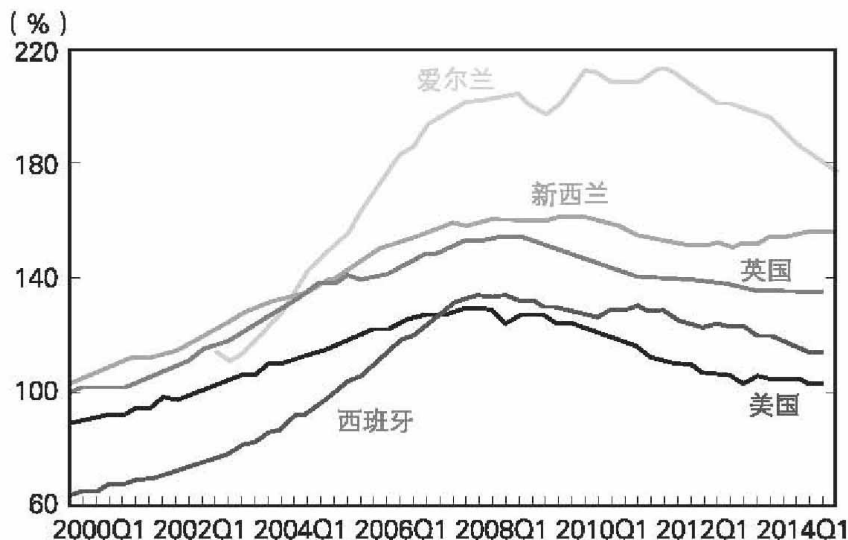
图1.6　欧美非金融负债与GDP比（1950—2013年）



来源：http：//www.gordontlong.com/2013/Tipping Points-2013-03-17.htm。

注：金融部门债务与GDP的比率在2009年以后稍微下降，非金融部门持续加杠杆。

图1.7　美国、欧洲、日本的债务占GDP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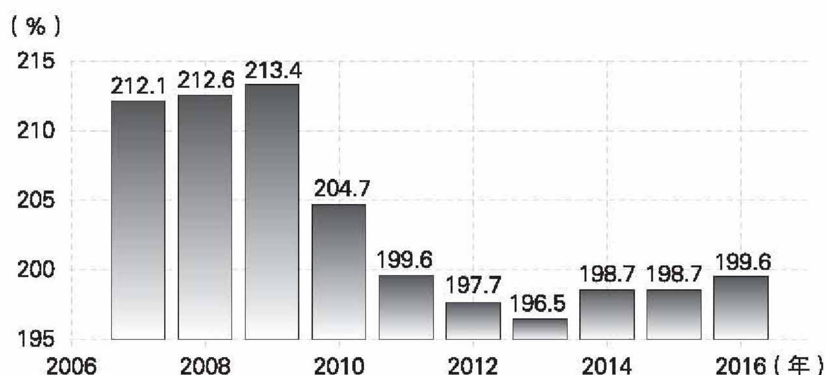
来源：http：//trueeconomics.blogspot.hk/2015　　03　　01 archive.html。

图1.8　爱尔兰、新西兰、英国、西班牙和美国家庭负债与可支配收入比

第二，美国企业的债务增长率自2010年以来一直呈上升势头。华尔街金融海啸后，美国企业的负债率在短期大幅回落之后，于2010年再度高升，而且创下了历史新高。这要拜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下的低融资成本所赐。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的资本市场在企业大量负债的条件下能维持如此低利率，形成对美国企业低成本的资金供给，一个重要的基础条件恰恰是发展中国家中以中国为首的贸易顺差国大量向美国廉价出口制造业产品，客观上帮助美国维持了极低的通胀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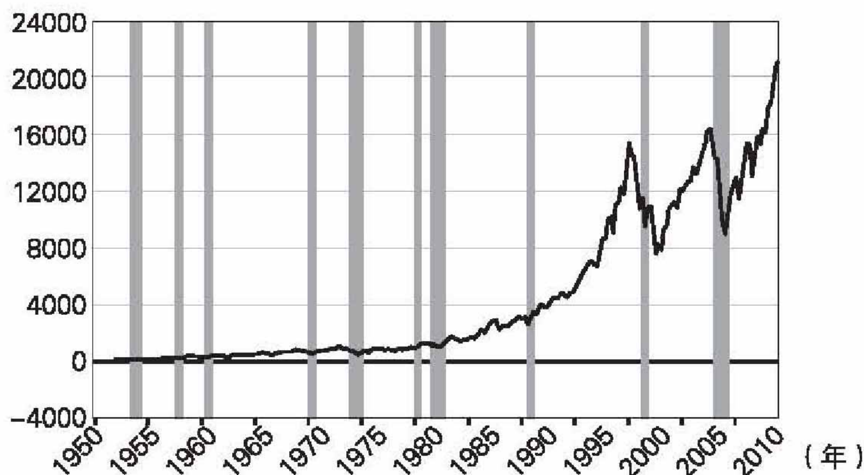
美国整体私人债务虽然自2009年的峰值稍微下降，但仍然维持在高水平（见图1.9）。但与此同时，美国公债却大幅增长，2016年两者加起来达美国GDP的300%多。

第三，美国政府债务大幅上涨。金融危机前，美国非金融债务约占GDP的227%，2016年已达到了创纪录的250%。2007年次贷危机后，美国的政府公债急速上升，目前已达GDP的106.1%，如图1-11所示。2008年金融海啸后，美国的非金融债务整体增加了约9万亿美元。扣除美国社保信托基金（Social Security Trust Fund）所持有的债务，美国联邦债务在金融海啸后6年间上升了大约7.3万亿美元，增长了140%。[218]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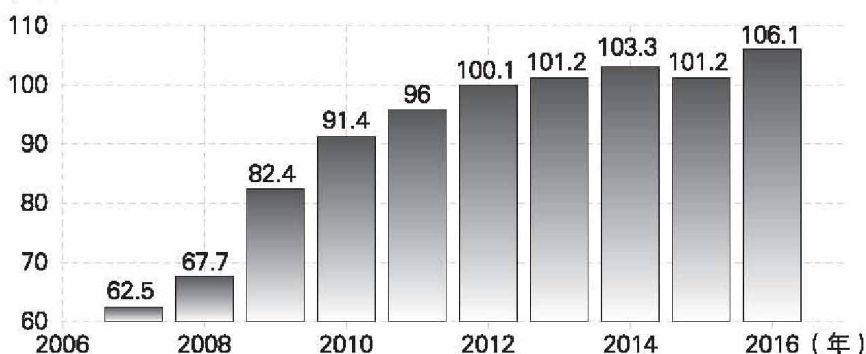
图1.9　美国私债与GDP比



来源：美联储。

图1.10　美国非金融企业负债创历史新高

量化宽松需要一个阶段性结束，以便美国开展下一轮的战略部署。虽然，量化宽松创造出来的流动性拯救了美国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它使得债项从私人金融部门转移到央行的资产负债表里。但这个庞氏骗局的游戏不能一直玩下去，否则总会迎来资产负债表爆破的那一刻（明斯基时刻[219]），而且已经创造出来还未爆破的虚拟金融价值需要像吸血鬼一样从外部榨取实体价值来支撑。实施的关键环节一是有秩序结束量化宽松，二是重返加息周期，引导资金回流美国市场。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美国公共债务局。

图1.11　美国公债与GDP之比

美联储掌控的利率周期，一直是笼罩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阴霾。而这一片阴霾恰是西方金融资本的主力——那些大型投资银行竭力做空新兴国家的机会。一旦有机会，金融大鳄就会扑进来洗劫这些国家几十年发展实体经济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而且，我们还看到：配合着投机资本做空的经济手段，在新兴国家内部及其周边连续发生了以各种冠冕堂皇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借口制造出来的不利政治环境。

三、当前美国的战略性调整：从急速膨胀到策略性相对收缩

长期来看，美国的金融深化趋势不可逆，但也必须理解美国金融运作的规律。无论是启动量化宽松还是结束，都只是核心国家环环相扣的宏观币缘-地缘战略中的一环。

1.货币及财政急速膨胀

踏入21世纪，尤其是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以后数年中，美国进入货币及财政急速膨胀的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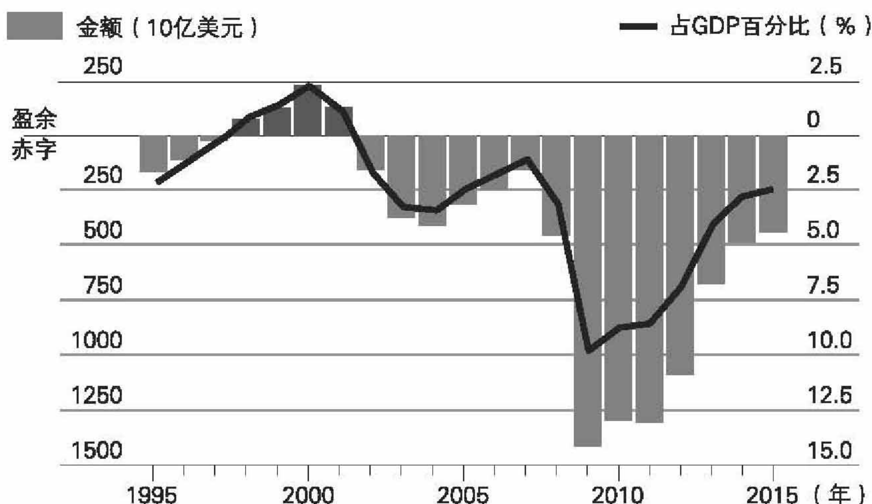
第一，贸易赤字持续扩大。经过2000年IT泡沫崩溃及2001年“9·11”引发的短暂衰退后，美国经济其后全面复苏，在美联储主导的低利率环境下，金融愈加深化，房贷等债务膨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与此同步的是贸易赤字急速上升至历史高峰。

第二，财政赤字迅速膨胀。与美国货币供应急升同步的是美国经济加深金融化及联邦赤字膨胀，如图1.12所示。尤其是次贷危机后，量化宽松的一个操作环节是联邦赤字相应急遽膨胀，在2009年达到1.4万亿美元的历史高峰值（约占GDP的14%）。

第三，军事支出急增。美国的全球实力主要靠强大的军力维持，其军事开支自然是美国政府的主要支出。如图1.13和图1.14所示，“二战”后，美国的联邦政府债务与国防开支是同步增长的。

从其阶段性波动来看，自冷战结束后，美国军费曾持续下降近10年。1999年欧元通行，美国为打击欧元的主权基础稳定性而介入科索沃战争，军费开始回升。自“9·11”事件后美国发动反恐战争以来，军费急速膨胀，达“二战”后最高水平。为了使美元继续在全球称霸通用，美国

历届政府必然全力打击任何可能威胁到美元霸权之货币，近期例子为欧元与人民币，既不容许任何国家挑战美元独大的局面，也严禁任何国家试图改变以美元为首的国际货币与贸易政策。这就是美国所谓的维护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实质，也是其必须维持强大军事力量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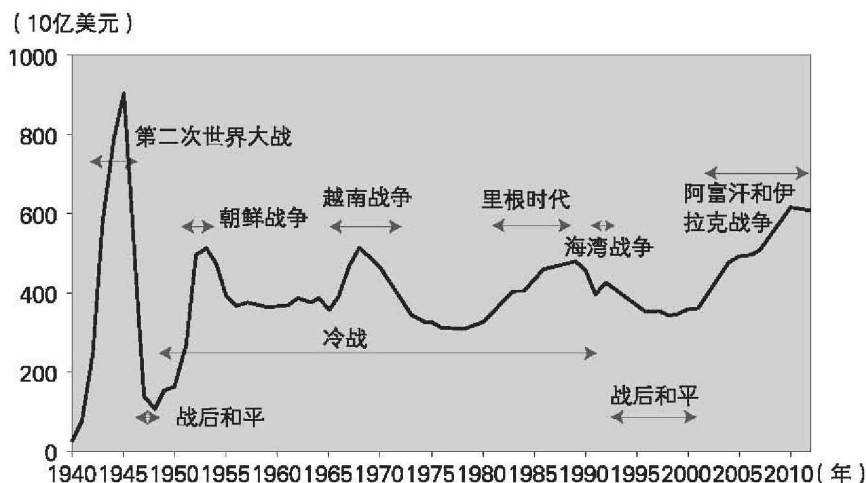
来源：The Wall Street Journal 10/15/2015。

图1.12　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1995—2015年）



来源：http：//www.nwtrcc.org/mtap13/mtap0213.ph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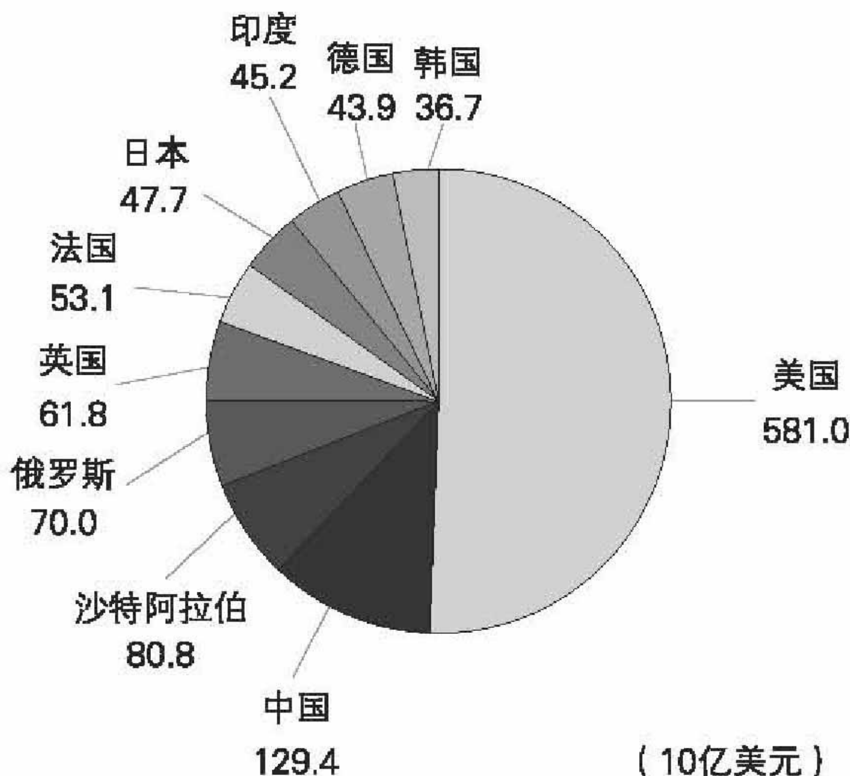
图1.13　美国联邦债务与国防开支（1950—2011年）



来源：https：//www.sdvfp.org/us-military-spending/？doing wp cron＝1439541912.5893280506134033203125。

图1.14　经通胀调整后的美国军费开支（以2005年美元为基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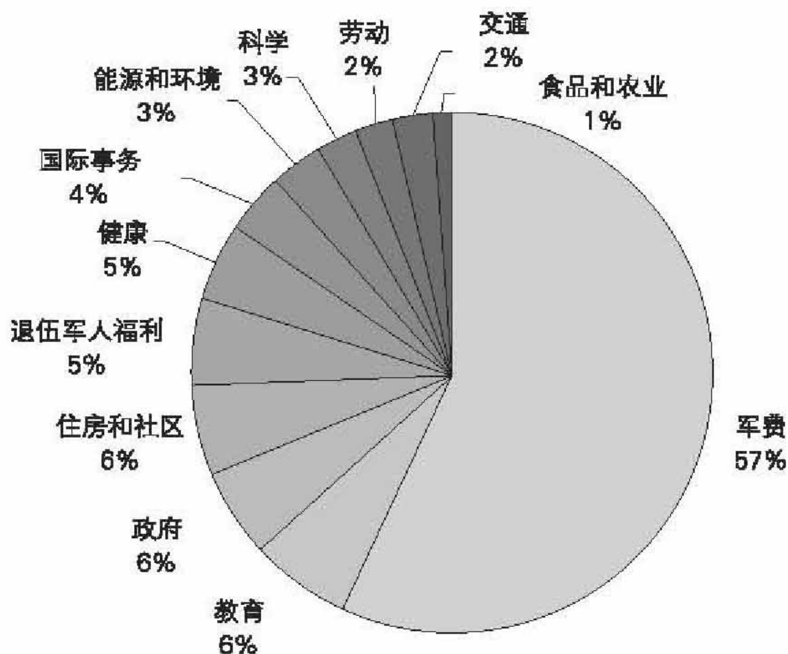
如图1.15所示，2014年美国军费支出超过全球的一半，位列第一，较紧跟其后的10个国家的总和还要高，拥有压倒性的全球军事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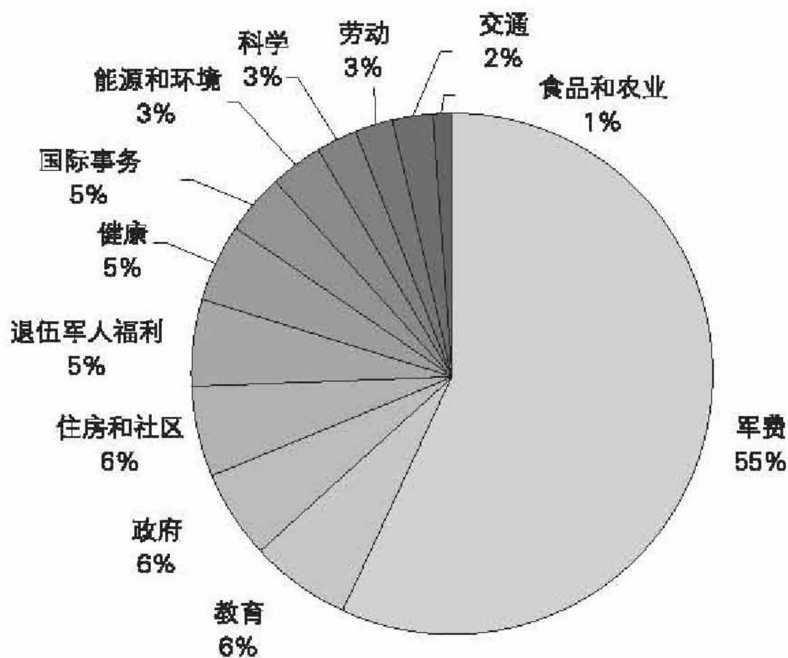


来源：国际战略研究所。

图1.15　2014年全球军费支出

美国军费支出在美国财政中的比重也证明了，美国是一个以军事强权来维持货币霸权的国家。以2013年为例，仅以实际开支而言，美国的财政支出第一位是社会福利（约34%），第二位是医疗保健（约24%），第三位是军费（约18%）。但前两项为刚性开支，并且有独立的税项及财政账目，并不属于联邦税收支出。扣除这两项后，实际军费是联邦政府的最主要支出（2013年约占57%），如图1.16所示。





来源：https：//www.sdvfp.org/us-military-spending/？doing wp cron＝1439541912.5893280506134033203125。

图1.16　2013年及2015年美国联邦政府可支配预算支出

把上述美国的财政及军费支出和过去20年的全球化贸易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画面：美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撑其全球货币霸权及话语权，塑造一个有利于其自身的全球贸易秩序；美国输出美元流动性，换取其所需的全球资源及劳动力成果；以贸易赤字形式流出的美元，又以国债的形式大量回流美国，维持国内低廉资金成本，支持美国企业获得廉价资金在全球进行竞争，并收购新兴经济体有价值的资产，并加速其金融化；而国债又支持政府的财政支出，继续维持其绝对的军事优势。

2.从大幅扩张到货币及财政的相对性收缩

本书认为，美国正在从过去十多年的绝对扩张转向相对收缩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联邦预算赤字在2009年触及1.4万亿美元的历史高位后开始财政收缩，至2014年大幅缩减至4833.5亿美元。

第二，美联储在2013年年底开始减少量化宽松规模，收缩货币供应，2014年10月正式结束量化宽松，并在2015年12月正式重新启动加息周期。

第三，2016年12月15日，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准利率提高至0.5%—0.75%，并预计2017年加息三次。值得指出的是，本次利率决议获得一致通过。利率决议公布之后，美元指数扭转跌势开始上扬，非美货币与现货黄金则纷纷回落。2017年加息步伐预期将更快，特朗普承诺将通过减税、增加开支和减少监控来促进经济增长。[2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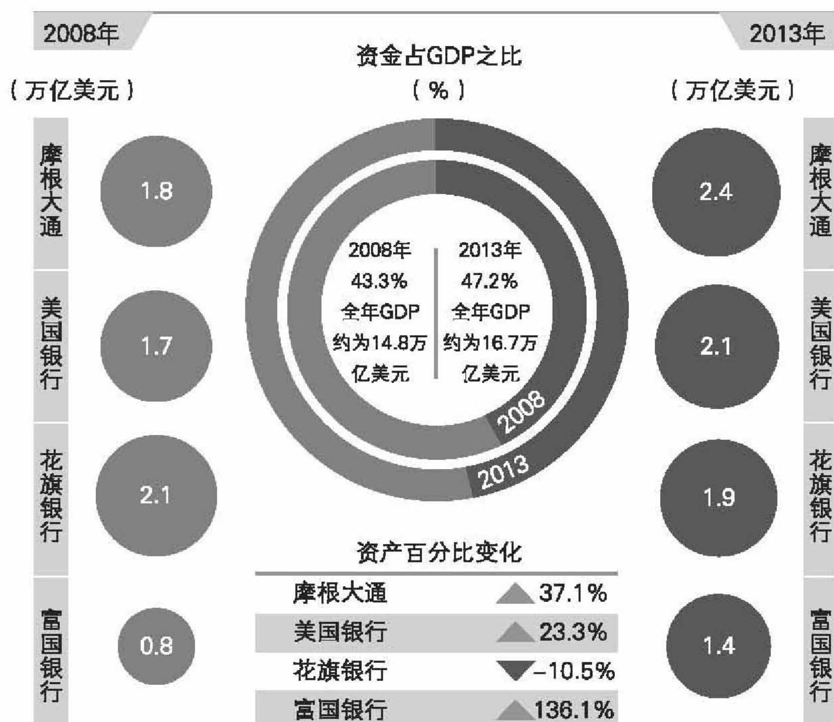
但本书同时强调，这些调整不应被解读为美国的战略性收缩。具备庞大粮食生产力和丰富自然及能源资源的美国，本来是最具备自给自足条件的富裕国家，但无论当前美国如何进行战略性调整收缩，它也不会退回为一个以正常方式参与世界贸易的国家，更永远不可能走回昔日孤立主义的路线。美国的问题并非在于它在可见的未来仍然是世界第一大强权，而是其霸权地位不容挑战的特殊性。奥巴马多次提醒世人美国的“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即意味着它不受一般的国际规范约束。[221]美国所谓的特殊性，直接来说，就是其作为全球的单极军事强权及金融霸主，是唯一有能力利用货币及金融在全球进行制度寻租的国

家。

所以，即便某些学者很敏锐地注意到美国近年的相对收缩态势，并归纳为美国的战略性调整和转向，但本书认为，分析美国当前的调整时，不能忽略其强大的金融利益集团。美国的金融部门这几年有一定的去杠杆化，但也只是为下一阶段的再扩张做准备的策略性调整。次贷危机后，美联储为救市所做的努力，实际上使得美国的金融部门比危机前更强大。

因此，我们认为不宜过分评价美国再工业化的努力，更不能忽略美国始终站在金融资本主义的顶峰，并且始终是全球金融深化的先锋。在金融资本虚拟化扩张到最终发生“内爆”之前，金融资本总有急速扩张的冲动，这是金融的本质。无论是美国的“再工业化”，还是当前的相对收缩，都只会为下一阶段的美国金融再扩张铺路。美国的货币及金融利益，决定美国始终会是扩张性的，而美国接下来数十年利益的关键，就是怎样对主要新兴经济体进行“美元化”。

四、美国页岩气能源革命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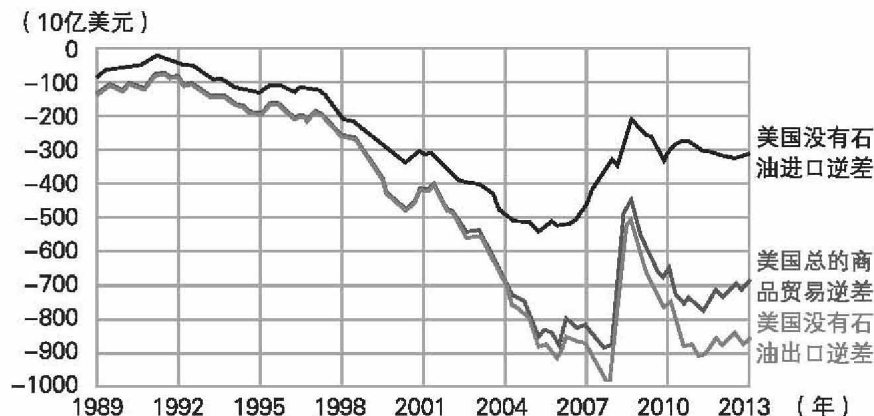
注：美国主要金融集团（如摩根大通、美国银行）2013年的资产问题大都比2008年显著增加；同期，美国金融资产无论从绝对资产值还是占GDP的份额来看，实际上都比2008年危机前更庞大。

图1.17　美国主要金融部门的资产总量

这几年影响全球地缘及贸易格局的一项因素，是美国本土的页岩气能源革命。美国蕴藏丰富的石油资源，但迫于环境保护的压力，或是为了本土石油储备，又或者是为了扩张货币供应向全球输出流动性，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限制国内石油的开采及出口。近年美国的能源政策全面扭转，从依赖进口转为能源独立。美国对本土、离岸及北极圈地区的石油钻探限制渐渐放宽。美国及加拿大推动Keystone管道计划，把加拿大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美国并加以提炼。尽管这些沥青砂（tar sand）的提炼比一般原油会多释放17%的温室气体，可谓污染性的燃料，在美国国内也有反对声音，但美国的战略需要势将压倒一切。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的《2012年能源展望》，美国2010年的能源自给率已达78%。[222]《BP2035世界能源展望》的数据显示，2015年北美从能源净进口区域转为净出口区域，美国将在2021年实现能源自给自足。[223]美国将实现“能源独立”，因此比欧洲、日本、中国等其他主要经济体享有更大的能源安全优势。

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将在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主要分为全球经济及地缘政治两大层面。

第一，改善美国贸易赤字。如图1.18所示，能源进口是美国贸易赤字的重要部分。美国未来不仅可以大幅减少能源进口，甚至将成为主要的天然气输出国。这将大大改善其庞大的贸易赤字。



来源：http：//www.eia.gov/todayinenergy/detail.cfm？id＝17191。

图1.18　石油进出口对美国商品贸易赤字的影响（1989—2013年）

第二，创造就业及带动本土制造业复兴。自2005年以来，由于大规模开采页岩天然气，美国的天然气成本下降了50%。目前，中国、法国和德国的天然气成本超过美国的3倍，日本更是达到美国的4倍。这使得美国的电价成本低于其他主要出口国，使其能源密集产业成本产生优势。据估计，美国的综合制造业成本已低于巴西，并与俄罗斯、东欧基本持平，而中国相对美国的制造业成本优势已经下降到5%以下。[224]

据估计，2012—2015年，页岩气将为美国经济创造1180亿美元的收益，并提供87万个工作岗位。[225]美国未来的能源价格优势将助力本土的制造业复兴。一方面减少了美国的进口依赖，另一方面，美国有望重新成为制造业大国，甚至增加出口。两者结合将改善美国的贸易赤字。

第三，从中东战略性撤离。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从世界各地主要是中近东地区大量输入石油，构建了全球83个军事基地大部分位于石油主产区和运输通道的地缘战略，由此，石油贸易结算主要使用美元，形成美元锚定石油贸易的金融资本扩张战略。这个战略延续到新世纪美国高调重返亚太的新战略之际，发生了美元对石油的“脱锚”。

因为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从中国等新兴国家输入大量商品，目的是向全球输出更大量的美元流动性。整个东亚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共同构成“西太平洋美元湖”，并将美元作为贸易盈余再回流美国的国债市场，因此成为美国前几大债权国。这才是美国必须保证对亚太战略控制的根源。

如今美国已经实现能源独立，摆脱了中东地区的石油依赖。于是，中东对于美国的战略重要性显著下降。这个阶段中，美国一方面把主要军事力量向亚太转移；另一方面以反恐之名强行推进军事单边主义，造成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等国分崩离析，连带发生沙特与伊朗的对立冲突……把中东地区推进永无止境的军事冲突的深渊。[226]只要能够以硝烟弥漫的中东沼泽地拖住思想陈旧、缺乏统合意志的老欧洲，也就压住了欧元崛起的势头。

第四，巩固战略性同盟。美国因为页岩气革命带来的石油资源出口能力，将有助于巩固其与日本及欧洲等盟友的战略性同盟关系。日本和欧洲期待从美国得到稳定的能源供应，这将把美日欧绑定在稳固的战略性同盟关系之中。美国近年所巩固的战略性同盟主要有两种：一是在货币秩序层面的六方央行货币同盟；二是贸易同盟。

美国从中东战略性军事撤离（但政治上却不断挑起冲突制造混乱），并且减少从中东输入石油，逐步实现能源自给；将来有可能影响其对沙特阿拉伯、尼日利亚等石油输出国的影响力，美元有可能主动改变20世纪70年代确立的锚定石油的战略，导致该地区石油贸易的“去美元化”。

美国要维持美元霸权，就必须确保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货币及金融秩序。为此，美国需要一方面汲取2007年的教训，防患于未然，预防美元系统出现流动性危机，其相应制度安排是六方央行货币同盟；另一方面，美国必须强化太平洋及大西洋两大区域的“美元湖”，其相应制度安排本应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及《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之类的贸易协议。

然而特朗普在2017年当选美国总统，并于上任后宣布美国退出TPP，阻断了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化进程。靠打着民粹主义旗号上台的特朗普是美国政治精英集团的圈外人。所以，原有的精英阶层对特朗普口诛笔伐，并试图弹劾推翻他。而商人出身的特朗普试图以重商主义来维护美国的利益，这未必符合美国金融资本集团的利益。特朗普和传统精英集团经过一番磨合后达成某种共识，还是最后屈服，有待日后局势

发展来看。

专题2　新核心同盟之一：核心区构建六方货币同盟

如果说量化宽松是核心国家转嫁危机成本的一种手段，那么，美联储退市、再度进入加息周期，对于非核心国家而言将造成外资回流美国，引发本币贬值、恶性通胀乃至资本市场崩盘等后果。

此外，由于与霸权国家结盟的半核心地区——欧盟及日本，随后也被允许采用量化宽松政策来缓解金融危机，因此，西方世界短期流动性过剩将会因美联储政策的转变而转化为流动性短缺。于是，在经历了金融海啸导致全球危机的教训之后，西方主要金融资本国家形成了新的币缘战略同盟。

众所周知，“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内容是美元以黄金为基础，形成固定汇率，其他货币之间不存在竞争，以避免重演“二战”前各国货币贬值的恶性竞争。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重构之后，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混乱时代，主要特征是美元与黄金“脱钩”、浮动汇率、美元以外货币之间的无序竞争、缺乏协调性的全球金融调节机制。在后布雷顿时代，美联储大量增加美元供应，美国开始全面朝向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跃升。与此同时，1972—2012年，世界各国大量爆发货币和金融危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经历了无序的40年。从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来看，这是核心国向金融资本主义进阶的一个过程。

经过40年的磨合，当全球化进程引爆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又蔓延至欧美核心地区时，迫使既是盟友又是竞争对手的核心国进行制度调整。2013年10月31日，以美联储为核心的全球主要六家中央银行达成长期货币互换协议，构建核心国之间的流动性互换协作网络。

将此事件与前后关联事件联系起来：2013年6月，美国传出即将退出量化宽松的报道，随即引发新兴国家的金融危机，大量外国资本流出，导致新兴国家本币币值和国内股市迅速下跌，同时，其国内融资成本随通胀率提高而上涨。这个向新兴国家转嫁金融资本扩张危机的成功试验，促使2013年10月30日这一具有排他性的货币联盟正式形成；并且在其运行一年之后，美联储于2014年10月31日宣布量化宽松政策正式停止。

这是金融资本主义的一次重大制度调整，也标志着全球化金融资本

主义又进入一个新阶段。

国际金融战略研究专家徐以升等指出：过往某国爆发危机，要么像俄罗斯和阿根廷那样违约，要么被迫接受苛刻的条件以获得IMF的救助，只有极少数像墨西哥那样和美国关系密切的国家，才可以得到美国的直接救助。但2008—2011年的美欧危机，美联储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央行进行货币互换，避免了西方金融体系的崩溃，这种货币互换操作在过去牵涉核心国的利益时也曾发生，但现在的规模更庞大，而且2013年10月达成的协议，使这种货币互换长期化，并且不设上限。

延伸阅读17

六方央行货币互换操作

这一新体系的主要内容是：以美联储为首，美国与欧盟、英国、加拿大、日本和瑞士的央行进行货币互换，形成一个无上限的流动性互换协作网络。具体操作机制如下。

·当某国需要美元流动性时，该国央行与美联储互换货币，由该央行把互换额度下的美元借给其管辖范围内的金融机构。

·美联储并不是贷款的对手方，外国央行承担其发放给管辖范围内机构贷款的信用风险。

·该货币互换交易是结构化的，美联储不承担任何汇率风险。

·美联储不必为换入的资金支付利息，但承诺将这些外币资金存放在外国央行，而不是用于放贷或者进行投资。该央行根据协议日后归还美元。

·在交易的结算日，外国央行向美联储支付利息，这笔利息等于央行将美元借给本国金融机构的利息。

实际上，与美联储签订货币互换，如果规模提高，甚至到无上限，那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实际上并不需要积存巨额外汇储备；即便保有外汇储备，在出现危机时，也没有必要出卖资产变现，来应付国内市场的美元需求。

参考资料：

徐以升、郭荣、单景辉：《透视美联储与各国央行之流动性互换》，第一财经研究院（内部报告）2013年。

徐以升：《从“牙买加体系”进入“大西洋体系”》，《第一财经日报》2013-12-03。

徐以升：《新兴市场应测试美联储货币互换》，《第一财经日报》2013-07-08。

这种机制的好处是该国可以用低成本、低风险获得美元流动性，以注入本国金融体系，同时维持本国货币汇率的稳定。货币互换意味着货币互换联网内的货币流动性可以随时相互调动，并且以其国内的资金价格结算，不受国际价格的影响，同时以那些不发生流动性短缺的国家的资金价格决定流动性调度的价格。更关键的是，当一方发生金融危机，出现临时流动性短缺时，不必让任何一方资金离开，就可以在货币互换网络内当即化解——当然，这些只限于在金融资本的核心区。

如此一来，全球货币体系便形成类似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所揭示的中心—边缘关系。可以发现，一个新的“核心—半边缘—边缘”格局正在形成：美元依然处于最中心位置，是核心中的核心，与围绕它的欧元、英镑、日元、加元、瑞士法郎组成核心货币体系；其余意识形态兼容的经济体因可以和这六方央行进行较大规模的货币互换，具有次中心属性；而其他依附于核心国、可以和核心央行进行有限度货币互换的国家，例如墨西哥、巴西（依附于美国）和东盟（依附于日本）等，成为半边缘；至于被排斥在外，未能和核心货币央行进行互换操作的其他经济体，则处于边缘地位。[227]

这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按意识形态来划分的全球货币层级，意识形态化“等级”越低的央行，未来应付危机的能力就越低，或者说抵御风险的成本就愈高。这也是大多数国家的金融当局往往比其他部门更亲美、更认同美联储为“全球央行”而主动跟从的客观原因。由此可知，西方模式的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势必具有更多排他性，因为其所形成的游戏规则本身就具有“竞劣机制”特征。

IMF近期的一篇研究统计了自1980年以来近150个国家的资本流动情况，得出一个结论：资本流动不管在先进经济体还是发展中国家，抑或在任何时期，都同样是反复无常的。[228]作者的弦外之音是：世界就

是如此，大家只能接受。但研究同时也有另一个发现：尽管先进经济体资本流动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波动性同样大，但由于先进经济体具有更多的资本流入，可以局部抵销资本流出，降低净资金流入的波动性。IMF的作者将此归因于先进经济体的金融灵活性及创新能力。但我们不能忽略：核心区金融创新的灵活性，往往是以外围地区的被动性为代价的。

过去20多年，发展中国家为了防御可能的金融危机，努力累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但它们辛辛苦苦并且以极高成本（压抑国民福利、损耗环境资源等）所构建的外汇储备防御体系，其对危机的防御效力，实际上不如五家央行与美联储签订的长期货币互换协议。处于外围的被动角色的新兴国家，日后将继续承受国际金融无序波动的压力。

延伸阅读18

全球流动性缺乏监控管理

六国央行货币互换凸显了当前全球体系的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国际货币体系的严重不对称；第二，全球流动性缺乏良好的监控和管理。

一旦爆发金融危机，各国都需要美元流动性。因此，布雷顿森林体系所确立的美元超级地位至今仍不受挑战。而且，美国国内经济情况和宏观经济政策不仅主导了美元海外流动性的供给，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他国家货币的流动性，有很强的“溢出效应”。

虽然美联储成为事实上的“全球中央银行”，美国享受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好处，包括部分美元滞留在国外形成的铸币税，但美国却并不承担“全球中央银行”的责任和义务。其他国家，虽然各自对本国流动性环境可以监测，但是全球范围内缺乏协调监测。过去的经验说明，各国央行（特别是美联储）各自为政，很可能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或者紧缩。

参考资料：

徐以升、郭荣、单景辉：《透视美联储与各国央行之流动性互换》，第一财经研究院（内部报告）2013年。

上述货币同盟与全球流动性问题的讨论，本来应该形成的结论是有必要加强国际合作，形成调控全球流动性的“总阀门”。可是，核心国六

方货币联盟明显不是着眼于稳定全球流动性的大局，而是服务于集团利益，否则，很难想象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新兴国家的中国，以及全球第五大经济体、第二大人口国家印度，竟然都被排斥在外，而且这种排他性的西方金融资本联盟已经深刻影响到了地区稳定。

支持这个判断的材料有很多。

例如，中日韩在2008年年底签署扩大货币互换协议，其后，2012年5月，东盟与中日韩（10＋3）协商，把《清迈协议》的区内货币互换基金规模增至2400亿美元，建立预防性紧急贷款制度。本来，按这个方向发展下去，完善10＋3的多边货币互换机制，对于稳定区内经济秩序具有莫大好处，也符合日本利益。但随后便先有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太，要在区内推行“再平衡战略”，并明确表明美国要做主导太平洋地区的力量。紧接着，日本提出“国有化”钓鱼岛，右翼政治势力抬头。此后，日本全面调整其亚太外交策略，以至于中日关系跌落低谷。

同期发生的是，日韩也因为独岛问题关系日趋恶化。日本政府以中断货币互换协议作为报复手段。何况，两国部分货币互换协议在2012年9月到期后自动解除，700亿美元互换额度缩减到2008年危机前的130亿美元。2013年7月，日韩双方30亿美元互换协议终止，至此双边互换规模清零，仅剩在东亚外汇储备库合作机制中的100亿美元。[229]

也就是说，东亚现在的形势转变为中日韩各自在区内进行双边货币互换的竞争。如果日本的右翼势力不是恃着有美国为首的六方货币联盟作为后盾，恐怕东亚区内的局势不会演变成当前的僵局。

如今，全球金融核心区形成具有排他性的货币联盟，再一次重蹈与冷战同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覆辙。本来是为了避免恶性无序竞争导致悲剧性恶果而共同形成的国际货币稳定机制，现在却变成某些金融资本强国为了巩固自身利益而以邻为壑，这当然会加重核心区对边缘国家的成本转嫁，恶化全球的不平衡。

专题3　新核心同盟之二：TPP——殖民主义的“去国家化”

美国确立“亚太再平衡”战略后，借助制度建构权的软实力和话语权的巧实力在以实体经济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推行“去国家化”，试图以最低成本实现金融资本霸权的全球战略目标。2016年2月签订的TPP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虽然其后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就职不久即宣布退出TPP，但这并不影响本文所做的分析，也不意味着美国在侵犯其他国家主权上将有所收敛。我们保留有关TPP分析的原文，日后类似的制度安排以其他方式再次出现时，本文的分析可以作为参考。

从其针对中国“挑战”的战略及其预期的利益来分析，TPP乃21世纪制度建构权与话语权之争，是霸权国家占据高制度设计、软实力的意识形态制高点的产物。TPP埋下了主权外部性的祸根：半殖民化的治外法权。

相对于1944年为战后美国工业化大生产占领世界市场而确立的GATT（关贸总协定），以及1994年为了产业资本全球化而确立的WTO而言，当前TPP的实质在于金融资本阶段要求世界各国实现“去国家化”，[230]接受霸权国家控制的跨国公司的资本权力大于本国的国家主权，类似于重建殖民化时代靠着“炮舰政策”推行的“治外法权”，以此来推进泡沫化金融虚拟经济向全球扩张，并且同步转嫁危机，维护单极霸权地位。

根据有关披露，发展中国家纳入TPP有三个“去国家化”承诺需要特别关注。

一是对主权国家赋权货币产生的金融信用做“去国家化”承诺，以实现跨国资本“无边疆”地自由进出任何国家。

二是对主权国家法律体系的“去国家化”承诺，以保障跨国公司不受投资所在国的法律制约，相当于重申老殖民主义时期的“治外法权”。

三是对主权国家安全基础的“去国家化”承诺，切断政府与国有资本的关系，取消政策优惠就意味着国有企业在危机爆发时不承担国家逆周期的调控任务。

WTO所代表的多边全球化，实际上已经步入难以继续发展的极限。接下来，全球格局将转变为核心国掌控的排他性贸易区域化。美国积极推进TPP、TTIP，加上原有的FTA，致力于建立太平洋及大西洋的排他性贸易及政治战略同盟，实质上将取代目前谈判陷入胶着的WTO。正如陈晓晨和徐以升的分析：

美国本来的算盘是通过自由贸易主导全球经济，并且推广美国的价值观。然而，十几年来的实践并没有让美国达成全部设想。中国受惠于全球自由贸易，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尽管此间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是美国全球化、自由贸易战略的赢家。[231]世界经济重心越来越转移到亚太地区。欧元区则在这十几年间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并挺过了欧债危机。与此同时，美国却经历了产业空心化，并受到金融危机的打击……正因如此，为了在后危机时代重塑美国对国际经济的“领导地位”，美国正在经历一个巨大的转向：从推动自由贸易转向推动规则贸易，用以美国标准设计出来的规则来达到扩大贸易、推动其影响力、推进其价值观的战略目标。为此，美国希望将其自身的规则作为新的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

对上文，我们认为很难简单说中国是单方面的赢家，尽管中国付出了环境急速恶化和国民福利发展被压抑的沉重代价，成为第一工业产能国，以其经济总量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新兴国家。诚然，美国本以为可以借自由贸易完全打开中国资本市场的大门，并发挥本身的金融优势，全面支配中国经济，但中国政府一直坚持不全面开放资本市场，不肯让渡经济主权，结果成就了中国加工贸易型的制造业。

但正如前面的分析，我们必须结合美国金融资本主义全面升级的视角，才能理解美国在第一阶段全球化通过贸易逆差洪泄巨量美元进入全球实体经济，其目的是让实体经济国家的经济产出不同程度地“美元化”。虽然中国的发展也许出乎美国的意料，但是，从美国的战略分析，无论如何，目前是调整其贸易政策以更好服务于美国的币缘战略及维护其金融霸权的新阶段，其核心目标正是产业经济和资源经济国家的经济主权。因此TPP的要求比WTO更直白、更赤裸裸，就是要求加入者向以美国为首的跨国金融资本让渡更大的经济主权，乃至于管治权，实质无异于“去国家化”。

一、针对中国“挑战”的**TPP**战略及其预期利益

TPP源于新西兰、新加坡、智利、文莱四国倡议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美国接过来做了符合美国霸权需求的战略提升，定位其为与区内军事部署并驾齐驱的经济战略。换言之，美国一边在亚太区公开拉拢军事小北约，一边打造美国主导的亚太区经济北约。[232]

1.“新冷战”思维下战争话语与**TPP**的相关性

美国重返亚太与TPP在战略方向上是一致的。因此，不难理解美国政府在推动和宣传TPP时爱用一种冷战甚至是热战式的战争话语。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部长卡特2015年4月6日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演讲中说，就最广义的再平衡战略而言，TPP与再造一艘航母一样重要。其后，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资深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在7月21日也说，TPP相当于10艘航空母舰，如果美国能成功建立TPP，美国将大大提升应对中国挑战的能力。而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则形容贸易是现代战争的一种。

只有回归冷战思维，才能理解美国这套关于航空母舰与TPP相关性的战争话语，其中所针对的敌人非常清晰——中国。[233]

明白背后的“新冷战”思维，就明白以战争话语来表述一份所谓的贸易协议，在一个霸权国家声称维护和平的时代并不显得奇怪。

TPP的真正悖论是其措辞及实质内涵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从表面的战争话语上看，TPP是不欢迎中国的高级俱乐部，中国被设定为敌对方；另一方面，美国官员却多番暗示不排除中国最终有可能加入TPP。

2.中国纳入**TPP**的利益测算

只要我们理解，如果将中国排除在外，TPP对于促进贸易的中短期实质利益并不如美国宣扬的那么大，那么就不难明白，美国的目的是希望用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把中国乃至其他新兴国家最终纳入其主宰的贸易秩序之内。

彭支伟和张伯伟在论文《TPP和亚太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及中国的对策》中估算了不同的自由贸易方案对亚太各国的实际GDP及福利的影响，如表3.1所示。

表**3.1**　不同**FTA**方案对主要**APEC**[234]成员**GDP**和福利的影响

国家	实际 GDP（%）			福利（亿美元）		
	TPP12	TPP13	FTAAP	TPP12	TPP13	FTAAP
中国	−0.14	1.21	1.86	−40.58	194.45	252.11
美国	0.37	0.5	0.46	452.41	608.38	540.75
日本	0.4	0.9	0.95	185.46	455.02	473.01
韩国	−0.27	−0.74	4.75	−25.74	−70.74	318.55
新加坡	0.8	1.29	1.34	15.98	26.70	28.17
马来西亚	3.45	4.91	5.93	35.95	56.46	63.31

（续表）

国家	实际 GDP（%）			福利（亿美元）		
	TPP12	TPP13	FTAAP	TPP12	TPP13	FTAAP
印度尼西亚	−0.17	−0.36	1.11	−6.35	−13.39	35.88
越南	5.93	8.93	13.51	28.66	41.39	57.39
菲律宾	−0.09	−0.26	1.8	−1.70	−4.66	1715
泰国	−0.34	−0.75	4.77	−10.93	−24.86	112.46
澳大利亚	0.61	0.85	0.91	46.87	65.53	74.12
新西兰	1.14	1.27	1.5	14.89	16.39	20.30
加拿大	2.19	2.28	2.19	236.96	244.46	235.06
墨西哥	2.87	2.93	2.87	217.39	217.07	209.46
智利	0.76	1.1	1.23	9.86	14.06	16.07

注：TPP12——目前成员，TPP13——中国纳入TPP，FTAAP——亚太自由贸易区。

来源：彭支伟、张伯伟：《TPP和亚太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及中国的对策》，《国际贸易问题》2013（4），第83—95页。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估算显示：如果把中国纳入TPP，美国所获得

的实质利益将是非常巨大的（TPP12：452.41亿美元；TPP13：608.38亿美元）。所以，美国实际上是口硬心痒，表面上是要抗拒中国，但实质上是希望最终把中国及其他新兴国家以符合本身利益的游戏规则纳入TPP。

换言之，这本质上是一场企图先发制人、关于未来制度建构权的软实力之争。所谓21世纪最先进的贸易协议，实际上是企图在高制度、软实力的外衣下再现殖民化时代的“治外法权”。

二、新世纪的制度建构权与话语权之争

在理解TPP的战略目标的同时，也需要分析其作为制度建构基础的话语权。

1.自由贸易的话语意义及其实际作用

TPP制定者自诩TPP比WTO更接近理想中的自由贸易原则，因为WTO是降低关税，TPP却是取消所有关税。但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指出的：协议要取消数以千万计商品的关税，但就算只是部分取消也要花几十年。成员之中，最大的阻力可能来自美国，其政府要取消1.8万项商品的关税。例如，日本的进口小汽车关税将在15年内从2.5%降至2.25%，降至为零需要几十年，进口卡车关税要再过30年才能彻底取消。按这样的蜗牛速度，TPP实质上不比现在实施的双边或多边区域贸易协议有更多优势。

再举例来说，越南的纺织品出口美国，关税为18%—36%。TPP的零关税承诺对越南具有很大的优惠，但根据TPP的要求，产品由原材料到加工都必须在TPP成员内完成，才能享受零关税。但越南的纺织品原材料大部分来自中国，越南很难在目前的TPP范围中找到可以替代的供应链。[235]那么所谓零关税优惠，对于以制造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实际上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

请看彭支伟估算不同的自由贸易方案对亚太各国进出口的影响，如表3.2所示。

表**3.2**　不同**FTA**方案对主要**APEC**成员进出口的影响

国家	出口（%）			进口（%）		
	TPP12	TPP13	FTAAP	TPP12	TPP13	FTAAP
中国	−0. 32	6. 68	10. 78	−0. 53	8. 69	14. 91
美国	3. 7	4. 88	6. 27	2. 66	3. 46	3. 54
日本	2. 16	4. 76	6. 71	2. 04	5. 78	6. 34
韩国	−0. 13	−1. 32	9. 31	−0. 56	−2. 09	14. 41

（续表）

国家	出口（%）			进口（%）		
	TPP12	TPP13	FTAAP	TPP12	TPP13	FTAAP
新加坡	2. 17	4. 07	4. 49	2. 13	4. 1	4. 4
马来西亚	4. 7	7. 08	8. 54	8. 13	11. 36	13. 98
印度尼西亚	−0. 33	−0. 99	7. 34	−0. 77	−1. 66	10. 44
越南	6. 58	9. 26	15. 11	15. 09	21. 26	32. 74
澳大利亚	3. 18	4. 54	6. 48	3. 37	4. 64	5. 62
新西兰	4. 59	5. 2	6. 9	5. 91	6. 55	7. 69
加拿大	5. 26	5. 47	5. 6	6. 79	7. 02	6. 76
墨西哥	0. 92	1. 29	1. 89	11. 25	11. 19	10. 89
智利	2. 39	3. 09	3. 69	3. 54	4. 43	4. 89

来源：同表3.1。

当然，在目前的阶段估算，任何一份自由贸易协议所带来的经济效益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从上面的初步估算可见：TPP对于区内主要经济体进出口的影响，可能实际上并没有宣传的那么大；甚至可以说，这份具有一定排他性的协议对成员的利益，比不上其他更具包容性的协议，例如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

2.新世纪制度建构权与话语权是要害

高调的话语措辞和真实的收益之间可能存在的落差说明，对于美国而言，TPP的战略意义并不如宣传的那样，是因为自由贸易而带来收益，实际上，这是关于21世纪国际制度权的斗争。

奥巴马在一份声明中说：“当我们逾95%的潜在客户都住在美国以外时，我们就不能任由中国这样的国家为全球经济订立规则。这些规则应该由我们自己来制定，为美国产品开拓新市场，并设定标准去保障工人和保护我们的环境。”

奥巴马的指向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新兴国家。显然，说中国有能力单方面制定全球的贸易和经济规范是夸大其词。一直以来，中国参与国际组织更多是要遵守及内化并非由中国单方面制定的国际规范，所以奥巴马的话我们更应该逆向来理解。

奥巴马的真正意思其实是不容许新兴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改变一直以来由核心国家、近年来更是由霸权国家主导游戏规则的状况。换言之，问题的关键是究竟21世纪的全球制度权，应该像19世纪及20世纪那样继续掌握在核心国手上，还是新兴乃至发展中国家也有权参与，共同制订更平等互利，而且能兼顾各国实际情况的国际制度。

读者若明白了这是游戏规则的延续而不是创新，便好理解TPP谈判过程中措辞与现实的矛盾。

而事实上，TPP涉及的不仅仅是国际贸易制度，而是更广泛的金融资本主义高级阶段下整个经济制度及相关的社会制度。在TPP协议的30章里，除了第1章的《初始条款及一般定义》外，其余29章中只有5章直接和传统的贸易范围有关，其他的章节涉及金融、信息、知识产权、企业、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公共品及公共福利等多方面。简言之，TPP是为了适应金融资本主义高级阶段而推行的新制度安排，其辐射的影响力，可以说非常广泛和深远。

3.透明度问题的背后

TPP谈判缺乏透明度这一点一直被参与谈判的成员猛烈批评。有关谈判超过5年，其间条款内容极度保密，公众、媒体和民选议员对协议内容一无所知，只有少数政府高层官员和跨国大企业以作为市场利害关系人（stakeholders）的理由获准阅览协议文本，并能够讨价还价，对细节施加影响力。奥巴马共有28个贸易顾问委员会，覆盖航空航天、农

业、化工、制药、服务、金融、科技、工业标准、电信及电子商贸等领域，均由大企业和贸易组织主导。

如果这真的是一份高规格、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协议，那么为什么谈判过程中的协议细节会如此不透明？归根究底，TPP协议的谈判，还是以核心国的跨国企业利益为主导。[236]在整个谈判的过程中，被蒙在鼓里的美国国会议员只能对整个一揽子立法投赞成或反对票，不得提出任何修订案。难道这算是民主的体现吗？

日本早前批评亚投行缺乏透明度，所以拒绝参与谈判。但是日本参与TPP便无异于自己打脸。而长期研究全球贸易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批评TPP协议与自由贸易无关，而是贸易管控，代表了每个国家最强大的商业集团的利益，由它们来管理各成员国间的贸易投资关系。他甚至认为一些条款会限制公开竞争，阻碍自由贸易。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更直指：说TPP是一份自由贸易协议简直是个笑话；它实际上是具有极端保护主义倾向、限制贸易自由的措施，其核心与贸易无关，而是投资者的权益。[237]

三、主权外部性：半殖民化的“治外法权”

在核心国和后进国的全球产业链竞争本来就不平等的现实条件下，以平等竞争之名，解除后进国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等于以隐蔽的方式设置了某种形式的主权外部性。

1.去国家化的ISDS

TPP协议中一项最富争议的条款是“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即外国投资者如果认为东道国政府的某些措施影响其当前或潜在的未来利益，可以绕过东道国的法律框架，对该国政府提出法律诉讼，索取赔偿。换言之，投资者在某国投资，不受该国法律所规范。一旦出现争端，不在当地根据该国的法律体制来寻找仲裁解决。

这意味着外国投资者实质上获得某种“治外法权”，这无疑是对一国主权的侵蚀。亦即，TPP协议设置了某种主权外部性。

目前WTO或各种双边、多边贸易协议下的贸易纠纷仲裁，还是以主

权国家为主体。而TPP容许企业作为经济主体僭越国家主权，企业可以不受当地法律规范而起诉该国政府。这基本上是在全球化趋势下，遵从了跨国公司以各种形式摆脱东道国的行政和法律规定的意愿。如今通过TPP把这种趋势制度化，这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

这份号称21世纪最高标准的贸易协议，在ISDS方面实则也并无新意。如果我们不善忘历史，就会记得中国在半殖民时代，也曾经出现租界这种外国人享有“治外法权”的制度。TPP无异于在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东道国里设置了一个经济租界。

虽然有分析认为，TPP条款设有严格的规定来限制仲裁委员的行为准则，要求ISDS受理案的所有流程公开，而且有些规定限制了外国投资者“起诉”政府监管法规的条件，所以预计实施起来难度大。诚然，ISDS将来的实际运作究竟如何，现在只能推测，毕竟，国际上的仲裁最后还是看控辩双方背后的国家实力。但是，就制度设计的本意而言，无疑是要设置某种形式“治外法权”的主权外部性。

甚至日本人也能感受到这种主权外部性。有日本学者指出，TPP是美国继1853年派“黑舰”强迫日本开放并签订《日米修好通商条约》（1856年）、1945年美国军事接管日本及1951年《旧金山条约》以后，再一次对日本主权的侵蚀。[238]

事实上，跨国企业利用美国的贸易及投资协议，至今已索取了超过30亿美元的赔偿，主要是涉及环境、能源和公众健康。而目前还有140亿美元的索偿要求正在处理中。知识产权法也成为美国企业防止对手占领市场的强盾。最突出的例子是三星被裁决需赔偿苹果公司9.3亿美元（仍在上诉）；苹果公司同时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申请禁止三星产品进口美国。

2.金融无边疆：解除国家信用货币化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ISDS是配合金融全球化的重要机制。

ISDS的“涵盖投资”（covered investments）项目超越了传统上的实体投资。根据美国的双边投资及贸易（BIT）概念，投资更多是指金融投资，这符合美国作为发达金融资本国家的利益。包括知识产权的无形资产权益则是在新经济下的延伸概念，而TPP的投资更包括了投机性金融资本。传统的投资者一般在实体资产受到当地政府影响时寻求补偿，

例如，该国政府的“国有化”政策导致不动产（土地与厂房等）损失等。传统上的实体投资起码从长远而言对东道国经济会有所贡献，因此其合法权益应该获得当地法律的保障，而TPP框架下的投资则不考虑它对东道国的经济是否会造成伤害。

金融投机性资本自由进出，在多空操作之中利用各种危机获利，转移利润，却不顾及对当地的冲击和影响，这就是当前金融全球化的现实图像。任何坚持经济主权、维护宏观调控能力、维持有效管治的主权国家，在某些环节上都有可能对这种“自由”构成限制。

虽然TPP许可国家在经济危机时采取适当的救市措施，但是被ISDS机制引入了灰色地带。为什么这么说？比如中国香港在1997年或内地在2015年6月份采取的救市措施，导致外国投机性金融资本因为部署做空而失利，跨国公司可以通过ISDS申请赔偿。

事实上类似情况已经发生了，却没有引起注意：中国采取救市措施之后，立刻被欧美金融界指责为央行政策“不透明”。西方当然知道，中国央行是中央政府的金融政策部门，不是美国那种私人银行家组成的美联储。难道一个国家根据其经济主权采取宏观调控措施之前都要预先向在市场上兴风作浪的金融大鳄们广而告之不成？再考虑协议强调的“反汇率操控”“金融自由化”等理念，TPP实际上是要求解除那些仍然有能力维护经济主权的国家防御全球过剩流动性冲击的逆周期调控能力。

简言之，资本就是资本，它的存在就是为了最大化地获利。这是投资者的特权（investor’s privilege）。所谓TPP代表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先进性”，在于它的核心已不是一般商品的自由贸易，而是核心国利用其货币霸权地位大量制造全球金融流动性泛滥，趁机牟取巨额利润。

3.扫清发展中国家尚有竞争力的国有资本

如果仔细研究TPP条款，不难发现其内含的贸易管控关系是不对称的。这是一份为保护核心国的产业优势而量身定制的FTA，即其条款更有利于核心国的优势产业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并且阻止对方政府采取适当措施来保护及扶育本土的产业来和核心国优势产业竞争，从而避免未来出现潜在竞争对手。而纵观近代产业发展的历史，很少有国家的优势产业开始发展的时候不是得益于政府的政策性扶助或保护。

换言之，这种金融资本阶段的新的制度安排，是把核心国优势产业当前的“比较优势”，制度化为长期的“绝对优势”。

例如，TPP协议在平等竞争的名义下专门限制国有企业，取消对国有企业的政策支持、财政补贴和其他优待。一方面可能阻断政府依靠国有企业承担国家经济安全责任，弱化国有企业配合政府在遭遇经济危机时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服务公众长远利益的能力；另一方面，核心国优势产业因此而扫清了所有竞争对手。

众所周知，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在殖民时期惨遭剥夺，只在少数有条件通过革命剥夺宗主国跨国资本的国家，建立了由政府部门掌控的国家资本，只有以国家之力或特殊的保护措施，方能打造一批较具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而这些企业不仅在内成为政府推进逆周期调节和实现宏观调控的主要载体，在外也足以和核心国的大型跨国企业在国际上形成竞争。而如果加入TPP，则意味着预先阻断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政策保护，这难道不就是相当于为核心国的优势产业扫除对手吗？

退一步说，次贷危机后美国政府的救市本身就属于国家补贴的一种形式。假如美国的战略性部门及其企业在资本市场遭遇失败，美国会允许外国金融集团趁着市场价格的“自然”低谷来收购国内的重要企业吗？美国深知其中的利害，对于经济主权，可谓寸步不让，但对于要纳入TPP的发展中国家则恰是反其道而要求之。

四、高制度设计、软实力的意识形态制高点

TPP是WTO协议、新西兰—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ANZSCEP）等FTA的进一步升级和扩充，而且制定了更高的标准。其“门槛”之高超越当前其他普通投资贸易协定。其中除了贸易自由化之外，TPP还涉及经济立法、金融改革、环境保护、劳工权益、知识产权和竞争中立等多方面，每一方面都是高标准。

有评论认为，TPP的标准之高，甚至连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存在是否可以达标的问题。[239]当然，为了达成协议，还是少不了妥协。

那么，这是否真是一份名副其实的体现高标准的先进制度贸易协议呢？

起码在生态保护方面，环保人士不会认同。在两千页的条文中，尤

其是第二十章《环境》中，居然没有提及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及改善当前效率低下的环境监督机制，而是仅仅表示“成员承认转变为低碳经济需要集体行动”。据《金融时报》报道，美国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的执行董事迈克尔·布鲁恩（Michael Brune）就认为，TPP协定全文对“气候变化”只字不提，不配称其为21世纪的贸易协议。其《环境》章节的许多规定软弱无力，没能为协定的支持者提供任何保护。学者指出，《环境》章节成了环保主义者的噩梦。[240]关注互联网信息自由的人士也担心TPP将会是对国际互联网自由的最大威胁。例如，假设有人通过互联网来揭露某些企业的不当行为，有可能被检控。

正如上文的分析，我们如果从TPP的当前政治意义高于中短期经济意义来理解，就会明白TPP在措辞高度和实质内涵之间的落差。事实上，TPP只有最终把新兴国家纳入核心国家主导的贸易系统，才能完全实现它对核心国家的长远的潜在的经济利益。

全球霸权国家公开指出：TPP的当前核心战略意义涉及更多制度权之争。这是一份为保护核心国的产业优势，尤其是金融资本优势而量身定制的高制度设计，它的战略意义在于为核心国取得意识形态制高点，进一步利用教育、媒体和人文社会研究等方式丰富其话语软实力，以便能倒逼新兴国家向符合核心国利益的方向进行体制转换。而事实上，不少事事以核心国的软实力宣扬为“政治正确”的新兴国家知识分子及其舆论工具，迫不及待地歌颂TPP的先进性及高标准，纷纷呼吁要趁此良机倒逼新兴国家进行内部改革，想尽办法也要进入这个高级俱乐部。

总而言之，新兴国家不应该被TPP的高调话语所迷惑，而要继续走自己的路，以自主创新的方式保持本身已有的制度优势，以适当的速度、为了本国的长远利益而进行良性改革，并且以平等、互利、照顾各国特殊情况的原则来组成各种区域性贸易协议。如是，方为上策。

小结：币缘战略下新世界体系的“后冷战”意识形态

通过2、3两个专题分析可知，冷战结束20多年后形成的“六方货币同盟”这种币缘战略产物，以及TPP这种保障“治外法权”的后殖民化体系，从其排他性及延续“二战”后的地缘政治同盟关系来看，仍属于资本主义升级进入金融资本阶段之际需要构建的“后冷战”制度体系；并且与被核心国称为软实力的“后冷战”意识形态紧密结合。这些体系并非无源之水，而是冷战时期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在新世纪的翻版。

也就是说，冷战意识形态不仅没有随着冷战结束而消亡，反而在金融资本主义遭遇全球危机、加剧向贫困人群和资源环境转嫁成本的条件下得到了自我复兴的机会。

人们对这种冷战体系在新世纪的“复兴”不应该感到陌生。因为我们可以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的历史经验中找到类似阴魂不散、借尸还魂的教训。

最鲜明的例子，莫过于“一战”中形成的法西斯主义并没有在“一战”后随民主制度普及民族国家的兴起或社会主义国家诞生而消亡，反而变本加厉，结果只隔了短短的20年便带来了更惨烈的数亿人伤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理，虽然西方同盟自诩为民主自由斗士，但有识之士都明白，冷战及其意识形态实际上服务于“二战”客观形成的双寡头瓜分世界的传统地缘政治，是在核威慑竞争中多次把人类推向毁灭边缘的愚蠢斗争，且不计朝鲜战争及越战中死亡的平民人数，仅看冷战中败北的苏联，10年间人口减少了600多万，可见这场斗争的惨烈程度，不亚于任何“热战”。

尽管教训如此惨痛，但仍阻挡不住西方中心主义政治家继承罗马奴隶制的殖民化遗产，继续推行愚昧的冷战意识形态的政治教化。于是，“后冷战”体系还是在金融资本主义的危机中借由这次重大的损人利己的“制度创新”而复活。

当人类已经有足够生产力去解决全世界贫穷问题的今天，当富裕社会只要拿出他们过度丰裕的物质享受的一小部分，就足以大大改善全世界大部分贫穷人口的生活之时，发达国家政治家却把创造力放在建立和延续一个确保能延续其因殖民化而形成国家竞争优势的制度之上。

当联合国的千禧目标已铁定失败之际，当全球每日因为战争和饥饿而死亡的人数绝不少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今天，我们却只能战战兢兢地目睹一个纳入“旧冷战”意识形态的新币缘战略同盟形成。

综观历史，金融与军事暴力总是如影随形。[241]

回顾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源，金融资本不受抑制地膨胀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今天，金融资本主义发达国形成了币缘战略同盟。为稳定全球风险性日增的金融体系，货币与流动性互换协议应由全球主要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共同参与。但核心国在掌控旧的国际金融

工具——世界银行和IMF之外，另外形成西方的六方货币同盟，明显地带有强烈的排他性。它表面是货币金融同盟，但实际上是具有排他性的政治同盟。

再看，核心国稳定了内部金融货币秩序，同时积极在全球展开新的地缘军事战略部署，而且处处以冷战思维设定敌人、打击对手。今天我们看六方货币同盟，有如目睹“六方轴心国”形成。与此同时，全球地区性冲突硝烟不断，有识之士不能不忧虑核心国之金融与军事战略结合的“金融军国主义”，大有祸延全球之势……

专题4　货币霸权战略冲突下欧元的困局

欧债危机、中东战乱和新兴市场金融危机（例如中国2015年股灾）并不是孤立发生的个别事件。它们其实都是全球货币战略冲突的症候。唯有在深层的币缘政治层面着手分析，方能看出当前全球纷乱局势背后的一连串线索。

美国经历“9·11”后十年的反恐战争，当前做出重大的地缘战略调整，自有其深层原因：美国和欧洲这个战略盟友，乃至和中国这个曾经一度被绑在耦合关系中同床异梦的贸易伙伴，在新时期的币缘战略上出现了利益冲突。美国无论何种政党执政，都要维护美国的核心利益，那就是以国家强权保障私人银行家获利而必需的强势美元地位。因此，美国的政治及军事核心战略也必然是极力维持美元的全球霸权。这是当前金融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矛盾。

所以，美国的核心战略是要打压所有能挑战美元霸权的新兴货币，包括自己的盟友。20世纪80年代用广场协议打垮了日元，当时的打击目标还有德国马克。“二战”后西德和日本是战败国，没有完整的主权，之后搭美国的军事战略便车再度变成工业强国。日元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有能力挑战美元，美国便要日本金融“切腹”，日元便被轻易击败。而德国幸免于难，乃因两德统一的历史机遇，西德增发的货币用来对应地货币化东德乃至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庞大实体经济。诚然，吸纳东德的工业产能及居民消费，延迟了德国的金融化，才没有走上日本的金融泡沫化之路。而在德国完成统一消化了东德的工业产能后，法、意等西欧国家也乘苏东货币体系解体之势，加入了以西方货币来货币化苏联、东欧庞大实体经济的获利大潮——相当于美国支付成本获得的西方阵营的冷战胜利，留下的和平红利被欧洲获取。

于是，1994年，欧盟在成熟的条件下成立，1999年欧元区正式成立。

但是，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顶层设计比美国更理解货币的本质和机制。美国看准欧元有先天缺陷，那就是缺乏作为主权货币所必需的内部政治统一性。于是，美国积极介入南斯拉夫科索沃战争，就是冲着欧元去的。在1999年欧元诞生之际，美国在欧洲的火药库巴尔干半岛煽风点火，无异于放大欧洲的政治不稳定性，尤其是挑起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

矛盾。因此，美国似乎是通过科索沃战争来凸显欧元的先天缺陷的：信贷基础主权的不确定性、矛盾性及不稳定性。

欧元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希腊或“欧猪五国”（PIIGS），那只是表征。

众所周知，欧盟的制度矛盾是有统一的货币政策（如利率），却没有协调的财政政策，难以在区内针对不同经济体的实际情况进行微调，结果造成强者愈强的局面。像美国和中国这种有强大中央政府的政体，一旦某地区或部门出现问题，联邦或中央政府可以超越局部利益进行调节平衡（尽管还是有一定的利益倾斜）。这次希腊危机凸显的却是：一旦欧盟内部出现矛盾，主导的还是强国的利益。这方面已经有过不少分析了，但大部分研究者都忽略了美国对欧元的战略性打压相对地加剧或放大了欧元区的内部矛盾。

欧元的真正问题是它承载了两种矛盾的功能与期望（或者说利益）。

金融资本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不同金融利益集团的竞争。欧元甫一问世，立即形成了欧洲的金融利益集团与美元集团的对抗。这中间牵涉到庞大的利益调整。但欧元的先天缺陷和美国的打压，令欧元始终无法享受美元的信用优势，不像美元般可坐享全球铸币税，在全球贸易中进行制度寻租。于是欧元资本只能靠内部收益来维持欧元资产的收益率。像欧洲债权人对政府财政收入欠佳的“欧猪国家”提供主权信贷这种掠食性借贷（predatory lending），跟美国房贷公司针对缺乏储蓄能力甚至稳定收入的NINJA（no income, no job and asset，无收入、工作和资产者），连哄带骗说服他们签下根本没有能力偿还的房贷，两者本质一样，都是金融资本为了增加自己的收益，不惜埋下债务危机的定时炸弹。但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可以靠量化宽松向全球输出流动性来化解内部危机，欧洲的量化宽松却主要由内部来消化。

先撇开内部缺陷不说，欧元能否成为重要的储备货币，有两个决定性因素。首先是它能不能成为全球主要商品的贸易结算货币。欧洲实际上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其覆盖的经济总量超过18万亿美元。而且，欧盟也占了全球贸易的最大份额，其后才是中国和美国。可是欧元流通15年，到2014年仍然只占世界货币储备的22.2%（在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后短暂达到最高的27.6%），美元至今还是占压倒性地位的国际储备货

币，至今还超过60%；全球资金结算中，欧元只占28.3%，美元则以44.64%的份额仍然高居第一位，[242]美元还是世界主要大宗商品的结算货币，尤其是占第一位的石油。

欧元当然渴望成为主要商品的结算货币。第一次海湾战争，欧洲盟友普遍支持美国，因为当时美国并没有拿下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并接管伊拉克。后来萨达姆扬言要推动以欧元来结算伊拉克的石油贸易，这就等于挑战美元的石油本位，真正触动了美国的神经，因而被美国支持的伊拉克政权处以绞刑。在第二次海湾战争时，德、法等欧元区主要国家并不支持美国动武。这也不是出于什么道义，而是萨达姆推动欧元结算石油贸易的倡议恰恰符合欧元想成为世界主要结算及储备货币的鸿图。同样试图将结算货币从美元改变为欧元的还有伊朗、朝鲜和俄罗斯，所以美国视伊朗和朝鲜为“邪恶国家”。这其实跟宗教、文明、意识形态也没多大关系。不少人已经指出：美国在中东最亲密的盟友沙特阿拉伯比起伊朗，在宗教上更保守、在政治上更专制、在社会上更压抑女性及外来劳工的人权，而且是极端保守伊斯兰主义Wahhabbism的输出者，[243]但只要符合美国利益，这一切都无碍它成为美国的亲密盟友。

十年之后，利比亚的卡扎菲更“大逆不道”。他不仅提倡石油去美元化，甚至要甩开欧元，倡议以黄金为基础、以本国丰富的石油储备为后盾成立非洲货币同盟。这等于同时触动美元和欧元两大货币霸权的利益，所以这一次，法国等欧洲国家便积极参与军事行动，推翻这位梦想打倒巨人的堂吉诃德了。

说到底，在金融资本阶段的国际币缘-地缘政治里，鲜见正义之师，有的只是各自的利益盘算。

俄罗斯近年倡议建立欧亚贸易区，整合贯通欧洲和中亚的苏联成员国。换言之，整个亚非欧大陆的核心区将变相成为“欧元湖”（Euro lake），其连锁效应可以很大。如果以欧、俄、中亚为核心，再联结上中国、中东及非洲，美元在整个亚非欧大陆的影响力将大幅下降，只剩下“泛太平洋美元湖”（Pacific Dollar lake）。这才是影响美国接下来20年、50年乃至100年国运的重大地缘格局重组。

因此，欧洲和俄罗斯走得太近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必然不惜一切离间欧俄。唯有明白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乌克兰事件的意义。美国已经不是第一次为了自己的一时利益而培植及利用极端分子，昔日较

突出的例子是阿富汗的塔利班、基地组织拉登，最近的例子是“伊斯兰国（ISIS）”。这一次美国支持乌克兰的法西斯极端组织搞了次实质上的政变，把一个合法的民选政府拉下台，[244]引爆乌克兰内战，把俄罗斯推向欧洲的对立面，切断了欧俄货币同盟的可能性。虽然客观上有把俄罗斯推向中国的作用，但人民币羽翼未丰，还不是自由兑换货币，在国际上只是新起之秀，较容易对付。[245]

所以，欧盟的困局是欧洲精英缺乏政治勇气造成的。因为只有在外交上与美国保持适当的距离，在军事上摆脱北约、成立欧洲联军，才能在货币上有明确的策略，推动欧元成为与其实力相符的国际结算及储备货币。这也难怪，欧洲从来就不是统一的政治体，由28个国家组成（欧元区19个成员），有24种官方语言，根本没有可能形成强大一致的意志来自立于美国之外。

于是，欧元只能是被美国打压和规定界限的区域货币。

欧元无法成为主要国际商品的结算货币之一，则没有可能挑战美国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也无法在全球进行制度寻租，享受全球铸币税的庞大利益，那就只能在内部榨取弱国来维持金融收益率。这正是欧元的困局。

希腊这些基础较弱的国家，不惜靠高盛弄虚作假也要跻身欧元区，结果却因为缺乏竞争力，资金流向法兰克福，堕入了传统产业萎缩、信贷却不断膨胀的陷阱中，在低成本借贷条件下，靠借钱维持虚假的经济增长。在一个赢家通吃的森林法则主宰的金融世界里，希腊成为金融化洪流的输家。欧盟为了确保欧洲金融资产的价值，坚持以紧缩政策迫使希腊放血还债，令其陷入紧缩衰退（austerity depression）的恶性循环。

欧元本意是要成为可以与美元并立的世界性储备货币。但欧元甫一创立，美国便暗中打压。欧元区诸国踉跄走来，终于继美国房贷危机爆发后陷入主权债务危机，欧元同盟甚至有瓦解之可能；而且，即使目前勉强维持，也要付出巨大成本，恐怕在长久的将来也不能挑战美元的地位。不难理解，对于美国来说，只要有任何威胁美元价值的因素出现，必定坚决打击。

专题5　美欧中战略关系分析（2015）

当前世界的复杂性在于：美国继续深化金融资本主义，不惜用各种手段来维护其货币及金融市场霸权，欧洲正在急速转向金融化，愈发与美国发生利益冲突；而具有世界上最大工业产能的中国，也因为核心国大量输出流动性及应对输入性危机而“被金融化”，在工业产能及国内流动性过剩的状况下，若要按照西方模式推动本国货币的国际化，就难免成为美元霸权的另一潜在对手……总而言之，要掌握当前乃至未来的全球局势，需要从金融霸权竞争，以及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来入手分析。

一、三大货币各自的利益目标与币缘关系

1.三大货币各自的利益目标

美元：极力维持美元的全球霸权，为此要阻止任何强势货币崛起成为足以挑战美元的全球性货币，甚至不惜利用军事及政治等各种手段打压。对此目标有利的战略：巩固“美元湖”——美洲自由贸易区、TPP，乃至大西洋自由贸易区。最理想的目标是打垮欧元，并把各大新兴经济体美元化。

欧元：企图成为足以挑战美元的全球性货币。为此要巩固欧盟，在欧元区内打造优质的金融资产池，成为避险资产，吸引全球资金流入。对此目标有利的战略：与俄罗斯结盟，利用俄罗斯把中亚整合成欧元区的附属经济区域；趁美国撤出中东，建立石油欧元，收纳中东成为欧洲的后院，再加上北非，使整个环地中海区域成为庞大的“欧元湖”。

人民币：面对产能及流动性的双重过剩（工业、商业、金融三大资本过剩），亟须输出工业产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便向金融为主的第三产业升级。对此目标有利的战略：中韩、中澳、亚洲自由贸易区、“一带一路”（制造业向中亚、南亚、中东、非洲推进）。

未来10年的全球政治经济演变，简单来说，主要就在美元、欧元、人民币这三大货币湖的币缘-地缘战略博弈碰撞中开展。

2.三大货币之间的关系

美元霸权过去10年以及当前的主要对手是欧元。欧洲作为全球第二大金融资本集团是美国当前的主要打击对象。

人民币是美元潜在的长远的对手。中国是美国的中、长期打击对象；但美国仍然需要中国的廉价商品来维持美国的低通胀，因此，近期美国对中国主要是软实力控制和巧实力挑起局部冲突。

目前的形势是美国主动两面打击，欧洲处于守势，中国在夹缝中求进。

二、当前的全球币缘-地缘局面

1.美、欧、中、俄主要战略关系

表**5.1**　全球主要战略关系比较

	美欧	欧俄	中美	中欧	中俄
货币霸权	竞争	暂不存在竞争	中期及长远将出现竞争	中长期将出现良性互补竞争	暂不存在竞争

（续表）

	美欧	欧俄	中美	中欧	中俄
产业结构	竞争	互补互利	短、中期产业结构互补	短期互补，但中长期将渐渐出现竞争	互补
政治制度、意识形态	相容	不完全兼容，但可以联盟	难相容，竞争	不兼容，但不至于对立，可以合作	相容，但俄罗斯的欧洲身份情结与东方取向矛盾
地缘及币缘利益	欧洲愈来愈感受到美国的战略打压，日趋对立	共同面对美国日益明显及尖锐的离间及打压，合作对双方有利	冲突	美国划定了美洲及太平洋的势力范围，剩下的中亚、中东及非洲将成为中国和欧洲的竞争场所，包括货币及资源上的竞争	面对共同对手美国，利益一致；但长远而言谁主导中亚将成为中俄的矛盾
军事关系	目前是军事同盟，但长远而言北约将矛盾深化。欧洲将寻求军事自主独立	乌克兰问题紧张局面暂时纾缓，在打击“ISIS”问题上军事合作，在中东问题上趋向合作	紧张	不对立	可以合作

2.当前币缘-地缘热点

（1）美国利用“ISIS”等在中东制造乱局来扰乱欧洲，继续利用乌克兰离间欧俄，对欧债危机煽风点火。

战略目标如下。

短期：防止欧俄结盟。压制欧元，打压欧洲经济发展，防止欧元区内形成优质金融资产池，全力阻止欧元成为可以与美元分庭抗礼的全球主要储备及贸易结算货币。

中期：利用TTIP把欧洲纳入美国主导的体系，使欧元成为美元的附庸。

最理想结果：欧元解体，欧洲再次成为美元势力范围。

（2）美国利用日本及南海诸国来牵制中国。

战略目标如下。

利用TPP阻止亚洲贸易一体化及货币同盟出现。打压人民币，使其不能上升为区域性强势货币。推动中国完全开放资本账户，美国金融资本自由进出牟利。

最理想结果：使中国经济殖民化、美元化；中国失去有效管治，缺乏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国家资本推动足以抗衡美国利益的政策。

三、美欧中各自的战略优点及弱点

1.美国

优点：拥有美元霸权，军事强势，拥有雄厚的软实力和巧实力；仍然是全球资本高附加值的主要创新源头；政府有清晰明确的战略思维，国家政策与资本利益高度一致，群众支持国家，精英对国家忠诚，政治稳定；资源丰富，本来是最有条件自给自足的丰裕国家。

弱点：愈趋向金融化，隐含系统风险愈大；体制成本高昂，需要庞大的全球资本流动维持；同时开展大西洋、太平洋两个金融战场，容易犯战线过长的战略错误。

2.欧洲

优点：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经济结构较完整及多元化。

弱点：欧元的主权信用基础不稳定；欧盟欠缺政治统合性，国家之间有利益矛盾，宏观战略不清晰；政治家、精英和群众对美国战略打压缺乏清醒认知；能源供给更多依赖教派对立、政局混乱的中东地区和“后冷战”意识形态对立的俄罗斯。

欧洲政治精英过去十多年的表现缺乏连贯长远的战略思维，总是处处被美国牵着走，陷于守势。甚至对美国打击欧洲的战略仿佛懵然不知。例如，美国军事打压利比亚、叙利亚，“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欧洲竟然凑热闹，以为可以取代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结果捅到了马蜂窝。“ISIS”正如以前的拉登，愈来愈多的证据显示其是美国制造出来的工具，欧洲情报机关（也许除了MI6）[246]以至政治精英可能至今还是懵然，起码是束手无策。

当然，欧洲强国也有本身的帝国主义行为，例如法国出兵并分割马里。

3.中国

优点：政府有较清晰明确的战略，具有世界最大的工业产能、完整的工业结构，具有广阔的大陆战略纵深。

弱点：经济上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金融上对美元依赖度过高，这种双重逆向选择正在重归“依附性”。主流深受美国软实力熏陶，看不清自己的处境；内部结构性矛盾严重；所依赖资源及市场均在美国的战略覆盖下。

美国现在虽然是大西洋、太平洋两条战线同时开展，但对中国的战略性打击力度，绝不会弱于过去十多年对欧洲的打击，而且因坚持冷战意识形态而手段可能更赤裸裸。

应该避免像某些分析家那样过于强调美欧的对立，一厢情愿以为中国可以作壁上观。两边逢迎，趁鹬蚌相争，渔人得利，是不切实际的实用主义想法。如果欧元解体了，欧洲人的日子也不会过得很差。可是一旦人民币解体或中国经济彻底美元化，中国民众将会很惨。当然，指的是只能留在中国的国民，而不是那些到时早已席卷资产、携眷移居美欧的精英们。

中国的困窘处境，也是新兴国家的处境。或者反过来说，那些无法维护货币及经济主权的新兴国家当前的困局可谓前车之鉴，一旦中国无法维护其货币主权，也将无可避免地面对拖垮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陷阱。

专题6　中国2015年股灾背景及过程

外资乃至本土的投机性资本企图做空新兴市场股市牟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从2009年7月到2014年6月底，19个最大新兴市场的资本净流入总量达到2万亿美元。其中有大量重兵屯聚在最大的新兴市场——中国。估计在2015年股灾前进入中国的热钱达1万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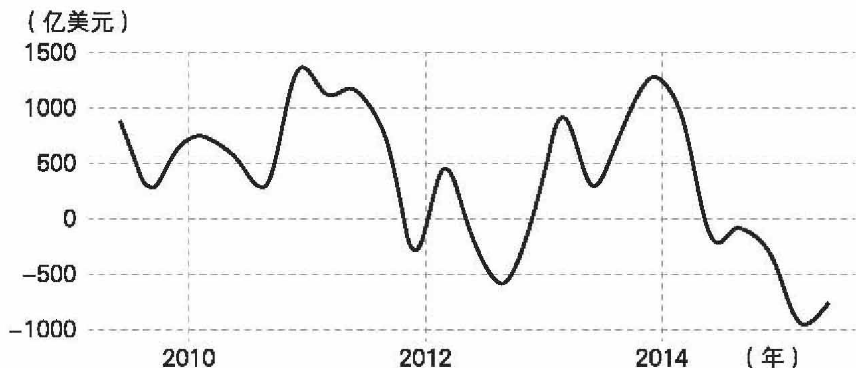


图6.1　中国季度资本流动情况

2013年6月美国量化宽松预期结束引发新兴市场金融动荡。中国因为具有良好的基础条件及资本项目管制，无论是金融市场还是币值，都能保持相对稳定，所以没有受到冲击。

但2013年以后的几年间，中国内部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经济愈趋金融化（乃至去工业化），另一方面，国内的金融市场变成半开放状态，更容易受国际金融市场涨落的冲击。2015年夏季爆发了股灾，蒸发掉20多万亿元人民币。个中原委，我们归纳为：资本账户半边敞开，国内市场与国际金融涨落渐趋接合……

一、中国的金融化之路

21世纪第二个10年开始以来，“产能过剩”（而不是经典马克思理论中的一般性生产过剩）这个在20世纪的中国很少落地的概念，在官方文件上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同期，则是伴随实体产业下滑同步发生的金融“加杠杆”促推资本市场扩张。

中国于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改革目标。此

前，全国先后开放粮食等其他产品价格，1992年一次性地放弃全部票证制度，启动经济货币化市场改革。1993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随后，证券、期货、房地产三大资本市场全部开设，但不对外。

1998年东亚金融风暴以来，中央政府直接出手，以国债投资于基本建设为内容，形成21世纪初各地方借全球产业重新布局大潮竞相低成本吸引外资的基础，并由此出现连续17年的投资拉动型高增长，使中国一跃成为制造业大国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中央政府采取以国企承载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地方政府作为招商主体大力吸引外资的形式，虽然极大地节约了政府与资本之间的交易成本，但也种下了矛盾，不仅造成日益严重的生产过剩和生态环境恶化，而且因对私人部门构成“挤出效应”而被指责为“国进民退”，由此而有对市场和民资、外资让步的一系列改革。

比如，中国政府为应对东亚金融风暴这一输入性危机，持续采用扩张性财政手段向四大银行发行特别国债，大规模投资内陆基本建设。但由于中国尚未开放外资进入国内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这种面对输入性危机强化国家银行资本的措施属于官方逆周期干预、直接出手做多，使得中国在东亚金融风暴中幸免于难。[247]然而，中国利用国家金融资本进行逆周期调控的做法，被西方国家称为与“Capital Flow”（资本自由流动）相对立的“Contrl Control（资本控制）”；由此，西方从一般意义上要求中国开放市场，转变为更多强调中国金融开放。

到2001年加入西方主导制度话语权的WTO之际，中国已经大体完成了全面市场化取向的改制，最核心的经济部门国有商业银行从1998年开始进行商业银行改制，[248]至此也已经形成商业银行的基本架构。在接下来的2003—2007年美元扩张带来中国经济高增长阶段，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有三家相继完成股改上市，余下的中国农业银行也在2010年完成“A＋H”两地上市。四大行的资产与中国的经济体量同步快速增长。

2002年，中国经济结束通货紧缩进入高速增长，又因外汇增加而对冲增发本币，带动国内资金大规模增加，就这样拖着中国进入金融资本过剩初期阶段，恰与已经进入金融资本高级阶段、亟须面向全球寻求超额收益的金融资本核心国的全球化扩张需求对接。[249]中国外汇大量增加，只能回流美国的国债市场而形成对美国债务经济的直接互动，反过

来加速了中国的金融深化过程，最终造成了中美双输博弈——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并引发全球经济危机，那边美国用量化宽松化解了危机，这边剩下中国面对自身的资产泡沫危机。

回望这个历史演变过程可知，中国全面产能过剩的挑战，既因中国加入全球化而延宕了爆发，从而拖延了中国经济虚拟化、金融化的步伐；又因中国加入全球化而加重了复杂性，越来越表现出“输入性”特征和内外呼应“去实向虚”的倾向。

这个中国百年工业化进程中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不仅是我们理解中国2012年至今的去工业化趋势所应具有的背景知识，也是客观分析2015年股灾的一个立足点。

二、**2015**年股灾的宏观背景

随着金融深化，政府本希望国内股市能发展成一个有秩序的融资市场，并且打造优质的人民币定价金融资产池，配合同期大力推行的金融资本国际化，但事与愿违。从2003年开始算起，中国政府在10年中创造了3倍于前一届政府的投资规模，拉动GDP实现了连续10年的“黄金增长”的同期，资金却逐渐从实体经济析出，大量进入房地产，使地产和房市严重泡沫化。2012年开始的新一轮实体经济下滑周期中，大量资金涌入投机领域，导致资产泡沫急剧膨胀，也属势所必然。2014年以前的房市，2014—2015年的股市和债市，2015年股灾之后的房市，都是资产泡沫膨胀的重灾区。

1.2012年以来实体经济持续疲软

曾经高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的中国经济从2012年开始持续疲软，出口[250]及消费均陷入低迷。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已经连续3年下降，虽然其中一个原因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但也反映出中国的结构性产能过剩及工业领域疲软等问题。2015年8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初值为47.1，连续第六个月低于50.00的临界值，创上一次危机2009年3月以来最低，显示制造业正在加速下滑，经营形势不断恶化。此前公布的各种数据及经济指数也呈现出下降趋势，经济出现疲态。此外，代表投资的信贷数据恶化，社会融资规模放缓，企业中长期贷款创18个月新低，企业需求相当疲软。

“趋势性力量与周期性力量叠加，使中国宏观经济面临失速的风险，

部分区域和部分行业超预期的塌陷导致中国经济的脆弱性步入新阶段，未来有效需求不足和局部问题的恶化随时可能触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底线。”[251]

2.2014年开始，金融资产泡沫加速堆积

从2014年年底开始，中国股市高歌猛进。2014年年初IPO审批解冻至2015年上半年，中国已有345家公司上市，并且有超过1000家公司在排队候审。[252]上证指数在半年内翻了一倍，如图6.2所示。在2015年6月的峰值上，沪市和深市的规模达到10万亿美元（约为GDP的100%），综合市值让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股市。

大量民众被吸引投入股市交易，2015年共有2亿人开通股票账户，加入这场史无前例的金融狂欢。据世界交易所联盟（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数据，2015年6月前的几个月内，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成交额与总市值之比超过5倍；6月初中国股市的融资（投资者借入资金购买股票）规模达到人民币2万亿元左右，较一年前增加了近4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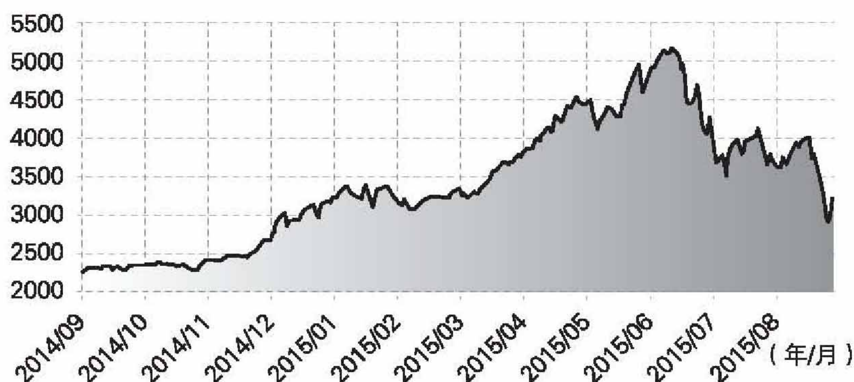


图6.2　2014年9月—2015年8月上证指数

2015年，中国债券市场也成长为全球最大市场之一，达到6万余亿美元。[253]

金融资产泡沫越堆越高，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3.2015年货币供给双重紧缩

从背景上看，2015年年初，当股市在一边高歌猛进，中国国内货币供给同时发生了内生性与输入性紧缩。

（1）“去杠杆化”调控政策导致金融及货币内生性收缩。

2015年上半年，一方面是股市的货币政策相对宽松，继续助推牛市，另一方面是实体经济面临着实际的货币紧缩。随着连续十多年依靠投资拉动增长，以及近年金融化加速，中国经济已经出现过度杠杆化的情况。鉴于中国需要进行平稳有序的去杠杆化，作为政府重要调控手段的金融机构开始进行表外业务清理。在银行借贷紧缩及整体性去杠杆的冲击下，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供应增速回落，金融处于内生性收缩。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刘元春和阎衍有精准的描述：

2015年1—5月全社会融资总额累计同比增速为-19.7%，比去年和前年同比分别下滑13.6个百分点和50.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货币供应出现明显回缓，2015年1—5月M2增速仅为10.8%，是近5年来新低……同时信贷市场和资金市场循环的各类参数也出现回落，表明金融内生性紧缩现象普遍存在：一是货币流通速度的线性趋势回落明显，2015年较2010年累计回落14%；二是与货币流通速度相对应的工业企业资金周转率也出现趋势性回落……

过快的债务增长及企业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过高的问题在2015年开始与生产领域的通货紧缩相叠加，导致“通缩与高债务效应”出现，局部风险恶化和蔓延的程度随时可以加剧，对宏观经济带来的内生性紧缩效应也将更严重。按照我们的估算，中国总体债务与GDP之比到2014年和2015年将分别达到242%和252%。其中企业债务率到2014年和2015年将分别达到169%和179%。这种高债务率与通货紧缩相叠加，直接导致债务风险大幅度上扬，甚至局势恶化。2015年以来激增的各种信用违约事件证实了这种可能。据不完全统计，从2014年4月到现在，共有575只债券被降级。其中“ST湘鄂债”成为国内首只在公募债券市场上的本金违约债券，“天威债”成为首只国有企业在公募债券市场上的违约债券。这标志着中国风险全面向纵深发展。

实体经济的贷款需求及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导致当前定位的稳健货币政策不稳健，货币条件指数紧缩，金融对于实体经济的渗透性大幅度下降，货币政策明显偏紧……

2013年“城投债”违约，2014年“超日债”违约，到2015年“天威债”违约，标志着中国债务风险开始全面蔓延，传统的“借新还旧模式”处于崩溃边缘，宏观“去杠杆”与微观企业减负成为左右中国未来调整与重

整的关键。地方债务的置换、资产证券化的全面启动，以及利用股市启动的宏观“债转股”，成为中国金融结构性转换的关键，并左右着近期中国宏观经济的景气和风险。股市在短期的快速回落所带来的宏观冲击将大大超越以往水平。如何驾驭目前中国这个脆弱的宏观去杠杆支点，如何在完成股票市场战略性融资和制度完善的同时，保持股票市场相对平稳运转，已经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核心任务之一。事实上，下半年，宏观经济的触底反弹、宏观政策的再次微调、IPO规模的全面放量、房地产市场的超预期回升都会触动中国股票市场脆弱的神经。

（2）大规模资金外流导致输入性通货紧缩。

正如前述，2001—2011年，中国外汇占款的高速增长令基础货币供应脱离实际经济需求而急速膨胀。其后，随着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间断及后来的正式退出，中国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供应的比例下降，中国实际上发生输入性通货紧缩的情况。这个问题在2014年后，尤其是2015年年中变得格外严峻。

据估算，截至2015年7月底的前13个月里，19个最大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本净流出总量达到9402亿美元。根据资金流向监测机构EPFR的统计，仅2015年6月10日前的一周之内，新兴市场基金资金流出总量达93亿美元，创下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单周流出规模，其中71亿美元从中国股票基金流出，是新兴市场基金遭遇的7年来最大的一次资金外流。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外汇储备日均下降达580亿美元。[254]有研究估计，直至2015年5月，中国已累计沽出价值18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同期日本只沽出94亿美元。减持美债可以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随着资金大规模外撤，央行需要沽售美元资产买入人民币。其后，中国股市指数出现大幅度走弱。2015年11月底，人民银行外汇占款减少3158亿元人民币，是有记录以来单月第二大跌幅。据国际金融协会（IIF）当时的报告，中国第三季度资本外流为创纪录的2250亿美元，第四季度估计为1500亿美元，全年资本外流规模估计将达到创纪录的逾5000亿美元。

以上几方面表明，股市的虚火越来越缺乏足够的支撑条件。

三、2015年股灾进程

2015年6—8月，中国股市先后发生了两次暴跌。

1.股市第一波下挫

中国证监会于2015年4月新推出几项股指和全面做空机制。有分析认为：

“当前我国股市最大风险在于，有了股指期货以后，通过金融衍生品做空大盘的利益极为巨大，这已经不是对个股的做庄，而是对大盘的做庄。6月29日，沪深300的期指总成交是39753亿元，而相关股票成交是7040亿元，股指期货成交量已远远超过股市股票成交量。这背后的盈亏是按照成交量乘以涨跌点数计算的，股指期货的盈亏超过股票很多倍，股票可以成为操纵股指的工具，对其中的联合做空必须有所重视。这些联合做空的手段就是场外融券和掉期。一些机构和私募通过融券和掉期，可以得到额外的利益。这对大盘多方而言，构成了巨大的不对等威胁：场外的掉期和融券，由于资金不离开操作人的账户，其保证金和利息都比场外融资要容易得多，成本低得多，空方和多方严重不对等；而且在信息层面，融资的信息容易被挖掘，场外的掉期和融券则秘密得多，信息上也严重不对等。因此，如果没有严格的限制，空方总能突袭多方获取暴利，尤其是对知识水平不足而导致使用金融工具保护自己利益的散户来说更是如此……”[255]

机制具备了，另一方面需要弹药。据场外配资公司人士估计，场外配资规模为1.7万亿—2万亿人民币，远高于证监会的估算。[256]2015年6月18日，彭博新闻社的数据显示：美国最大的跟踪人民币计价股票的ETF的做空意愿已经升至流通股数的16%，创下历史纪录，做空赌注较上月翻番。[257]至此，市场做空的机制和弹药皆已具备，就差有人扣动扳机了。

2015年6月12日中国股市达到最高点5178，仅仅经过11个交易日，便一路暴跌1331点到6月30日的3847点。众多网民大呼股灾，此后又跌到7月9日近3300点的水平，不到一个月，市值蒸发掉约18万亿人民币，如图6.3所示。7月6日沪港通双向为净卖出，沪股通卖出133.85亿元，港股通净卖出14.57亿元。国外资金纷纷逃出中国股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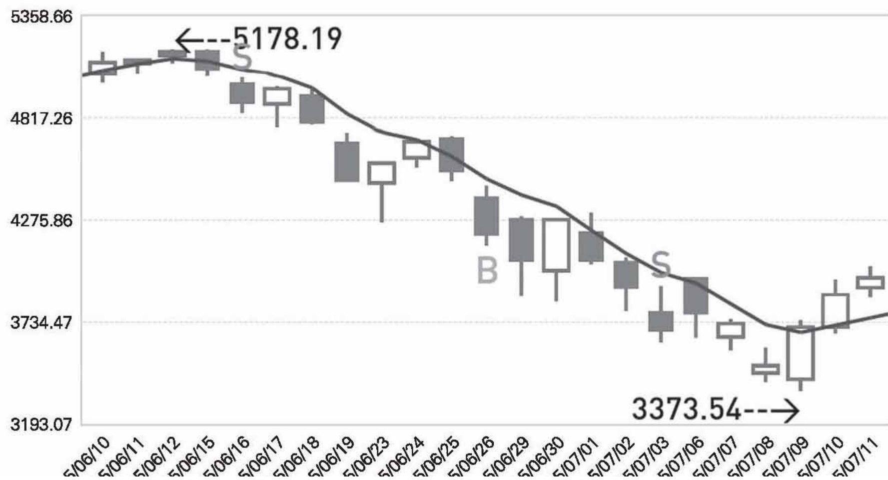


图6.3　2015年上证综合指数

这还发生在中国政府一系列的救市政策之下。

6月27日，央行宣布降息0.25个百分点，同时下调部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这是一记罕见的组合拳，上一次出现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达到最高潮时，可见政府已经认定这次股灾的严重性。

其后《财经》报道，7月4日下午，国务院召集会议商讨应对之策，消息指政府斥资1.7万亿元人民币救市。

高盛估计中国政府动用了近1400亿美元，以避免股市出现崩盘式下挫。而有业内人士估计，包括社保、证金公司和其他入市机构投资者在内，救市资金达到2万亿元人民币到3万亿元人民币的水平。

2.股市第二轮下挫

2015年8月21日，美股跌幅达5.8%，是2011年9月以来最大跌幅。全球股市应声暴跌。随着国际石油及大宗商品价格暴跌，新兴市场的股市、债市及汇市均遭到抛售，大有回到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的前兆。

接下来的星期一（8月24日）开市，中国股市在众新兴市场中所受冲击最大，上证指数重挫8.49%，创2007年2月来最大单日跌幅，是1997年以来A股历史上的第三大跌幅，蒸发掉2015年年初以来的涨幅。

8月25日中国央行宣布，从8月26日起，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4.6%；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

1.75%。9月6日起，将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政府连续两个月在股市大幅下跌后推出双降，可见形势之险峻。

在2015年的两次股市下挫中，中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避免了股市崩盘。

四、谁制造了做空中国的机会？[258]

谁制造了做空中国的机会，这个问题似乎前文已经给出了答案。但那只是个别机制上的，有必要用更长远的眼光来观察此问题。

客观地讲，西方金融资本一直在试图寻找做空中国资本市场的机会，已经做了至少5年准备。这本来就是公开的秘密。[259]但做空力量的多年努力并不成功，主要是因为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的金融资本交易还没有对外开放。此前，中国只有外资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政策，由于审批额度很小，投机资本不足以兴风作浪，金融大鳄只能把巨额资金囤积在香港，把港股指数炒到全球最高的25000点以上，反过来又造成香港经济只能饮鸩止渴地更多依赖资本市场，不断推升其对内地经济的寄生性；而香港越来越严重的寄生性金融资本经济如同美国一样，不可能创造就业，遂派生出香港普通年轻人机会很少的问题。于是，各种势力借香港社会衰落之机兴风作浪也就难以避免。这不是那些街头政治家及其背后巧实力玩家所热衷的自由选举或法制问题，问题根源在于香港金融资本膨胀，实体经济中空，社会财富分配日趋贫富悬殊。

自从2008年美国政府为救市不断推出超级量化宽松以来，金融流动性长期以零利率对外攻城略地大规模扩张。其中，注入期货市场的过量资金推高原材料、能源和粮食价格，意味着向这些基础商品的进口国转嫁了通货膨胀。

这时，中国这样的全球最大原材料和能源进口国就发生了难以抑制的通货膨胀，间接造成国内资金利率上涨，压迫实体经济的利润空间并促其衰落。这反过来又使得国内各地官方和民间全都渴求“廉价外资”，派生出大批新自由主义制度的拥趸。于是，对外开放资本市场成为国内新兴资产阶级的改革呼声。为此中央政府推出沪港通、深港通，以及施行了上海自由贸易区率先开放海外金融资本等举措。沪港通之后，深港通、QFII和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大扩容及A股纳入国际指数

等系列开放举措，都被提上日程。

其中，上海自由贸易区是中国2013年9月设立在上海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园区，于2015年4月正式启动本外币一体化的自由贸易账户金融服务。随之，沿海甚至内地中心城市也紧跟上海步伐，跃跃欲试。

而多空大战的机会和条件，至少相当一部分可以归因于这些资本项目开放。其实，这些所谓的资本项目对外开放，都与沿海地区强烈要求实现“去中央化”（De-Centralization），以便由那些从来就不承担还债责任的公司化地方政府直接对接廉价外资有关。

回顾2008年，那届中国政府采取4万亿救市措施的做多还能奏效，原因在于那个时期还没有放开国内金融管制。再回溯到之前10年的1998年，当时的政府启动国债投资加强中央调控也是在做多，也还有效。同理，也是因为那个时期中央管理体制上财政金融还不分家，中央政府依然严格掌控金融资本。两届政府先是有效防范了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来则有效防范了2008年金融海啸，并且曾经在过去的两个10年中，有效地防止了国际金融资本做空中国这个公开的企图。

2013年，西方用退出量化宽松这个似是而非的题材点燃投机资本炒作，导致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纷纷陷入股灾及本币大幅度贬值。幸运的是，此时的中国虽然有了进一步开放外资的说法，但还没来得及去做资本项目的深改，所以又幸免于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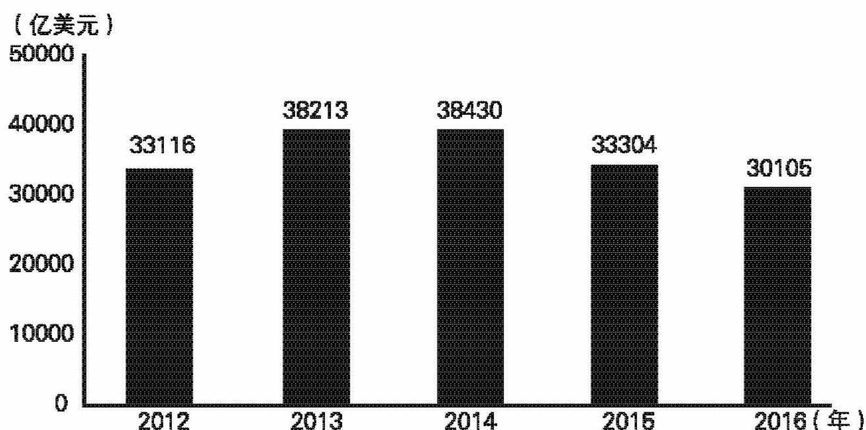
不过，2013年年底以后，一方面在实体经济下滑的压力下，民间资金自发地析出制造业涌向投机领域；另一方面，中国官方政策也开始大规模转向西方模式的金融资本经济。就在这个阶段上，当局大力推出融资融券、金融期货、场外融资等利于衍生品发展的交易工具。同期，又发生了房地产危机造成的资金析出地产投机、转而大量进入股市等客观情况，这给了国内外金融资本联手做空中国经济的历史性的机会。

可以对比的是中国2007年发生的股灾。

那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华尔街金融海啸之前，中国先发生了恶性股灾，从2007年10月的6124点，跌至2008年10月的最低点1664点，下跌幅度超过72%，市值蒸发了22万亿元，股民人均亏损达13万元。[260]当时股市熊气弥漫，套住了所有进入中国的热钱不能回流到美国。由此，中国股灾成为次贷危机的流动性短缺连带引爆华尔街金融海啸的诱

因之一。

而到了8年之后的2015年，这一次6月股灾，中国股市蒸发了超过7万亿元的财富，又套住了大笔海外热钱，但仅仅诱发了8月份的美国股市短暂暴跌。根据沪深两大交易所的官方统计数据，从2015年6月12日至2016年6月7日，A股总市值蒸发超过25万亿元，人均24万元，上证综指跌幅超过4成。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GDP约67.67万亿元，沪深两市一年蒸发的市值相当于2015年GDP的1/3还多。[261]根据国家统计数据，2014年年末国家外汇储备38430亿美元，2016年年末国家外汇储备30105亿美元，两年损失了8325亿美元，约1/4（见图6.4）。之所以与8年前迥异，究其制度原因，在于美国与其他金融资本核心国家2014年10月形成新的货币协定足以熨平波动。



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2/t20170228 1467424.html。

图6.4　2012—2016年年末中国外汇储备

因此，中国2015年的股灾到底是谁干的？这无疑需要外资和中国的内资互相密切结合才能实现。但这并不是说内外资本在某个投资家的主持下开个会、要求大家在主观上密切配合那么简单，而是符合客观趋势的结果：中国的金融资本只需强调市场原则，明确拒绝或暗中扭曲中央政府逆周期调节的决策，并且按照金融集团的利益要求政府去搞全面“深改”。于是，在推出能够大量吸纳过剩货币的衍生品交易之后，终于必然地发生了符合金融资本市场及虚拟资本运作规律的内外配合。

“金融资本无祖国。”因为异化于实体经济的金融资本，是非在地的洗劫全世界的资本力量。因此，只要能够虚拟化扩张，使利润最大化，只要能够靠多空大战来套利，金融资本就会把世界上任何地方搅得周天寒彻。

从这个角度看，2015年中国股灾的实质就不那么难理解了。

所以，2015年中国股灾究竟是不是外资“空军”在操盘，根本不重要。在股灾爆发前山雨欲来，中国股票基金出现大规模“走资潮”（资本出走），究竟只是外资看淡中国和平撤退，还是外资的战略安排，抑或是向国内的金融大鳄发出信息，这些都不重要。反正金融资本无边疆国界，金融精英也无国籍，最终是不会对任何社会或国家怀有忠诚的。

有趣的是，这次大股灾堪称一面照妖镜，各路专家各执一词。某些经济学家和金融权威说“市场神圣不可侵犯”，政府为防止资产价格过度贬值干预救市就是“暴力”。意思是说：利用金融手段把你剥夺得一无所有，是温柔文明的屠宰，即使你被宰光了，也应该感到这是神圣市场秩序所恩赐的灾难，而阻止其发生，就是对神圣市场的暴力……高盛方面的专家说：最有效的是让市场自然大跌，释放流动性，然后才会再有购买力进场。

但资本市场遭血洗后，谁手上还有资金趁低捞货呢？还是让我们来温习一段尚未远去的历史吧。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的历程可以简单归纳为：①被金融化；②金融货币大危机；③实体资产被超低定价；④资产被贱价收购。对照可知，策动金融灾难，把几十年积累的美元储备赚走，还只是第一步；货币本身不是财富，只有把实体资产贱价收购了，那才叫真赢了。

这次股灾，只是一个开始。

专题7　中国债务的四个层次

中国当前的债务问题可以从四个财政主体层次来分析：地方政府、企业、个人（家庭）和主权国家。

一、地方政府债务

中国制度的特点是中央承担最终风险条件下的地方政府公司化竞争。

中央与地方之间长期存在税权矛盾。所谓改革，实质上是中央对地方“放权让利”，越是发达的地方，其政府公司化程度越高，其投资和债务风险越是上交中央。可见，中国的体制下，任何地方的债务和金融坏账无论有多严重，地方政府都不会破产；其风险上交、集中到中央，则促进了国家主权信用扩张——对应赤字增发国债和外汇占款增发货币。地方政府及其经营的企业因此享有无形的中央政府信用保证，所以地方有强烈的债务扩张冲动，致使资产负债表迅速膨胀，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负债规模、资产负债率和债务杠杆率均大幅提升。2011年后，大量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出现恶化情况。[262]

2014年9月21日，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规定地方政府截至2014年年底的存量债务余额应在2015年1月5日前上报中央，将存量债务分类纳入预算管理；统筹财政资金，优先偿还到期债务。这实际上就是中央政府承诺替地方偿还部分债务。

有分析估计，地方政府上报的18万亿元人民币地方债务，其实只及实际债务的30%—40%。其后有报道称，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地方政府总体债务规模达到24万亿元人民币，其中15.4万亿元人民币属于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较2013年激增4.5万亿元人民币（41%）。

来源：http：//finance.chinaso.com/detail/20150831/10002000327252614409759074117528471.html。

注：政府或有债务含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政府承担救助责任的债务；2013年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为2013年6月底数据。

图7.1　2010年、2013年、2014年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变化

为了防止地方债务危机演变为系统性风险，财政部在2015年3月批复地方3.2万亿元的置换债券额度，用新债置换旧债的方式，允许地方把一部分到期的高成本债务转换成较长期的低成本地方政府债券，为地方减少利息负担超千亿元。这次置换债务的操作实际上是中央银行间接向地方投放基础货币，等于中国政府用一次类似量化宽松的方式，纾缓了一场迫近眉睫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但以长债换短债只是争取时间的权宜之计，金融创造出来的价值，最终还是得靠实体价值来支撑，否则危机始终会爆发。

2015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议案》。新华社披露，根据该议案，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锁定16万亿元，预计债务率为86%，明确将债务率不超过100%作为地方政府债务的整体风险警戒线。

二、企业债务

根据标准普尔的估算，中国的企业债务融资市场（包括企业信贷、企业类债券和企业非标融资市场等）的存量规模在2014年已经超越美国

成为全球第一。[263]2015年7月底，国有企业总体债务规模达71.3万亿元，同比增加11.2%。

《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杠杆调整与风险管理》指出：2008年之前，中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一直稳定在100%以内，全球金融危机后，其加杠杆趋势非常明显。其中，资产负债率从2007年的54%上升到2014年的60%，上升了6个百分点；其次，非金融企业负债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195%上升到2014年的317%，上升了122个百分点；最后，2008—2014年，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反映债务占GDP的比重，与前面负债占GDP的比重略有不同）由98%提升到149.1%，猛增了51%以上。如果不考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杠杆率虽只提高到123.1%，但也上升了25个百分点以上。

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水平在所比较的国家中是最高的，其隐含的风险值得关注。[264]

三、个人债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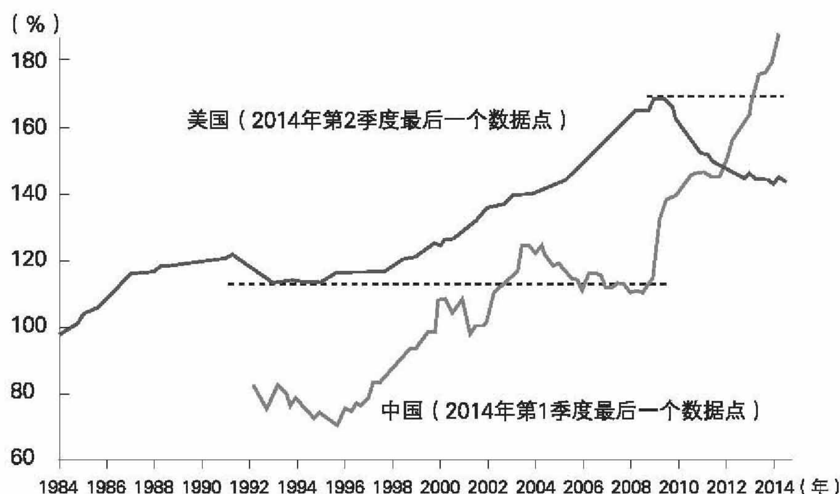


图7.2　中国的私人非金融部门债务与GDP之比

2015年7月，中国的私人部门借贷存量规模已达90万亿元人民币的历史水平。私人非金融债务/GDP的值超越英美等发达金融国家，近200%，如图7.2所示。部分企业已出现债务违约的情况。2016年5月IMF的一份研究警告，中国的银行账面上有1.3万亿美元的企业贷款，如图7.3和图7.4所示。其中背负近1/6总债额的企业的收入连利息都不足以

支付。据报道，中国金融管理当局正防止影子银行将数以万亿计的高风险贷款包装成投资产品。[265]债务置换计划或不良贷款证券化，可能衍生长远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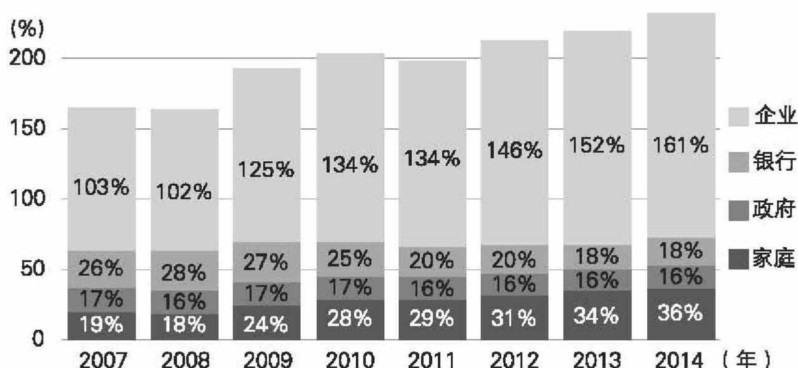


图7.3　中国未偿债务占GDP比例（2007—201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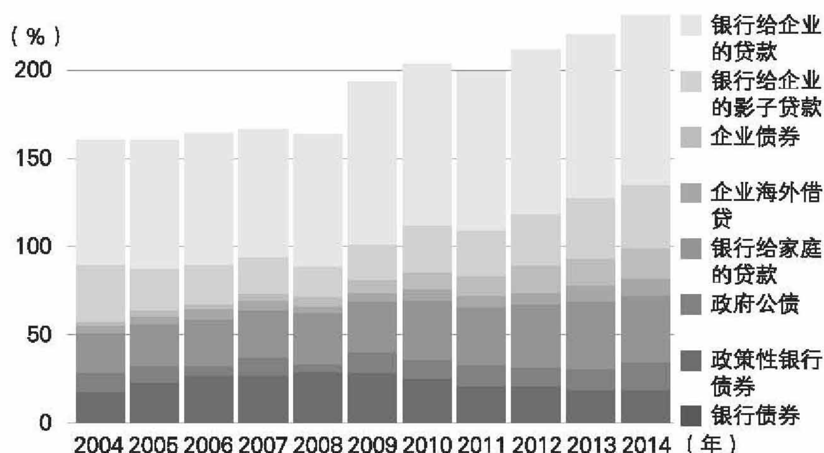


图7.4　中国债务总量与GDP之比（2004—2014年）

四、主权债务

《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指出：按宽口径匡算，2014年中国主权资产总计227.3万亿元，主权负债124.1万亿元，资产净值为103.2万亿元。考虑到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变现能力有限及国土资源性资产使用权无法全部转让，以窄口径来统计，中国的主权资产将由227.3万亿元减少到152.5万亿元。由此，窄口径的主权资产净值为28.4万亿元。整体而言，中国经济整体杠杆率过去6年增加了65.7%。

该份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国家负债率上升与全球危机和国内经济下滑密切相关，一旦经济增长速度长期持续下滑并致使“或有”负债不断“实有”化，中国的主权净资产的增长动态有可能逆转，因而不能掉以轻心。

专题8　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两个取向与两难困境

一、人民币为什么要国际化？

中国的困局在于过去20年的旧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国内一般制造业产业的利润率下降，甚至趋近于零；同时，中国积累了大量的流动性，金融利益集团开始抬头，推动经济金融化及人民币国际化。过去20年中美关系一直处于畸形状态——中国在美赚取大量贸易盈余只能以国债的形式回流美国，为美国金融资本提供低廉资金，再涌入中国投机牟利，实质上使中国加速了“被金融化”。大量的美元涌入中国，以外汇占款形式的货币增加供应，中国的基础货币供应实际上处于被动地位。当产业利润率下降，资本离开制造业，而货币供应却仍然增加时，在没有对应的实体经济增量的情况下，便催生房地产、股市等资产泡沫，包括现在各方热烈讨论的农村土地流转。在很多伪经济理论及意识形态包装下，其利益本质仍然是通过土地私有化、货币化以至于金融化，维持货币供应增加，更重要的是确保人民币定价资产的价值。

因此，金融资本在国内过剩条件下走出国门，亦即人民币国际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规律使然。

本来随着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日益增长，以及亚洲日益成为全球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中日韩与东盟诸国整合为平等互利互补的自由贸易区，并建立亚洲货币联盟，是最符合亚洲长远发展利益的战略，但这意味着美元在亚洲的影响力下降，且直接冲击了美国的核心币缘战略。

为维护美元霸权，美国高调重返亚太搞再平衡，炮制钓鱼岛冲突，暗中支持日本右翼势力再上台，令21世纪初《清迈协议》所展望的3＋10亚洲货币同盟胎死腹中，以此保住了美元在亚洲的地位。此外，美国更积极推动排他性的TPP等，确保美洲、太平洋、大西洋继续成为庞大的“美元湖”，这可是关乎美国未来国运的核心战略。而中国作为回应提出的“一带一路”、亚投行倡议，则是要突破美国太平洋同盟的围堵，依托广阔大陆纵深，在大陆和海洋交接的边缘开拓次海权，尝试在亚欧非大陆打造一个“人民币湖”（RMB　lake）（“一带一路”的相关问题将在下一专题进行分析）。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两个取向

比较来看，人民币崛起和欧元崛起之初遭遇的困境几乎是一样的。

任何一种崛起的区域性货币如果想进一步走出去拓展为世界性货币，都会不自觉地挑战美元的地位。但在这个过程中，新兴货币又不具备美元已经有的从外部捞取利益的优势，就只能加速内部的金融深化，通过内部去维持整个金融化的收益率，确保内部较大的金融收益，维持货币定价资产的价值。中国金融利益愈想国际化，整个国内经济就要更加被金融化。

人民币国际化，同时承担着两个目标、两种不同的利益。

首先是“一带一路”，部分是输出中国的产能——输出基础建设及工业化模式，拓展区域化的平等互惠贸易伙伴关系，它可以促进中国国内制造产业的发展，为此，它需要配套的区域性国际金融及货币制度安排。这就像“二战”后美国为了向全球输出商品，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国发起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银行等，必须配合人民币与区内货币互换协议，打造一个非美元贸易结算的体系——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是区域性国际化而多于全球化。这要靠中国开拓多边的战略性伙伴关系，打造一个区域性的“人民币湖”。

其次，人民币国际化也无可避免同时内涵性地承载着国内金融集团的利益扩张目标。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及国际贸易，本来就需要复杂的信贷、融资、结算等金融服务。人民币国际化所带来的庞大利益也有可能使金融集团过度膨胀，不惜一切加速推动中国的金融深化，试图打造优质的人民币定价金融资产。但如果金融过度膨胀，反制实体经济，则有可能催生美国的次贷泡沫及欧债危机之类的大规模金融危机。

综合来看，既要使用金融工具推进“一带一路”，又要有效控制金融集团的过度扩张，这对于中央政府的深改设计来说，是个难度很大的挑战。

三、人民币纳入**SDR**[266]：挑战或大于收益

震动全球的“811汇改”被认为是朝向更加市场化机制的改革。其后11月IMF宣布人民币将于2016年10月纳入SDR货币篮子，权重在美元（41.73%）及欧元（30.93%）之后第三位（10.92%），但强调中国需

要在三年内实现汇率机制完全市场化。

SDR是IMF的国际货币单位，它源于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所建议的全球货币设计。理想中，它的权重应该反映各国参与国际贸易的实际情况。凯恩斯的构想是建立一种稳定的国际货币，防止某一国货币独大，并预防长期结构性国际贸易失衡的情况。但美国一心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元霸权，自然反对这种构想。“二战”后，美元成为一枝独秀的国际储备及结算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后，美元汇价根据美国的币缘战略及国内经济状况大幅涨落，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混乱期。一篮子SDR本应该取代单一货币发展为稳定的国际货币。理想上，SDR是国际贸易结算的单位，并成为各国央行之间的结算及储备货币，但在美国不愿意放弃美元霸权的现实下，当前SDR并没有很大的实质功用，甚至称不上是货币的一种。虽然IMF曾经数次向会员国分配SDR，但直至2011年1月，SDR仍不足全球储备货币量的4%。所以，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被纳入IMF之SDR，虽然普遍认为这是首次确认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但并不会猛然增加国际对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需求，对中国短期而言，象征意义多于实质利益。

有趣的是，美国近年在多项国际事务上均对中国严厉批评甚至施加压力，唯独在人民币纳入SDR的问题上表态支持。众所周知，中国多年来一直维护货币主权，顶住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避免中国的出口部门受挤压，更是为了防止大量流入中国屯兵的投机性资金借着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套利。但人民币纳入SDR对中国的货币权益来讲则是一把双刃剑。与远期的利益相比，近期如何保住货币主权完整是对中国更大的挑战。因为通过支持人民币纳入SDR，推动中国加速开放资本项目，让美元资本可以自由进出，从中国金融市场波动中获利，同样符合下一阶段美元的战略利益。

又因为开放资本项目同时夹杂了中国国内金融资本扩张的利益冲动，所以，中国将出现一个复杂的多方博弈局面，中国国内的工业、金融部门及国际金融资本三者之间，到底会形成什么样的关系呢？从基本面看，当前全球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比率只有1.1%，需要增加约3300亿美元的人民币资产需求，才能达到与日元相当的水平；但中国外贸直接以人民币结算已达26%，而且，随着全球人民币存款增加，对应的人民币金融产品需求亦会上升。另有分析指出：到2030年，亚太区的GDP将占全球40%，亚太区的中产阶级将占全球2/3，中国的中产收入

群体将由目前的3亿人增至6亿人，中国以至于亚太区将拥有全球最庞大的商品消费市场。到那个时候，人民币能否成为区内的主要贸易及金融产品结算货币呢？如何解决其与美国战略目标的冲突呢？这大概是预测未来十多年亚太乃至全球局势的最关键性因素了。

在危机四伏的狂热金融化之路上，人类要摔倒多少次，才会最终学到教训？中国会有幸成为例外吗？

专题9 “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的布局和挑战[267]

“一带一路”是中国为满足内部的工业产能及新崛起的金融资本外开拓空间之需求而提出的倡议。中国高度重视20世纪30年代西方生产过剩大危机引发世界大战的教训，明确提出和平发展的思想，但“一带一路”的提出也仍然触动一些大国的神经。

一、“一带一路”倡议触动传统大陆帝国和当前海洋霸权国家的神经

中国自汉唐以来对西方的贸易，为伊斯兰世界在西亚和中亚大陆的兴起提供了沿着商道扩张势力范围的利益驱动。长期处于贸易逆差造成的白银危机压力下的欧洲，为开拓绕过伊斯兰世界的东方贸易路线进行航海拓展，最终变成海洋强权，由此开启了世界近代史。西班牙、荷兰、英国交替成为海权大国，最后是美国。

顺着这条历史脉络，中国如果只是提出“一路”，那还只是传统的陆权倡议；但提出“一带一路”，就涉及大陆和海洋交接边缘的次海权的问题。

放眼全球，能称为大陆型大国、拥有足够陆权纵深的国家只有三个：美国、俄罗斯和中国。

以中国来看，不能只搞内陆的丝路，因为这不可避免地要借助俄罗斯的势力范围。曾经作为18—19世纪新兴帝国的俄罗斯，其战略重心一直倾向欧洲，东方在其战略中只占次要位置。所以前几年油价大升、形势大好时，俄罗斯对中国的丝路倡议态度若即若离。而且，俄罗斯也曾经提出成立欧亚贸易区，等于是希望由它来整合贯通中亚的苏联成员国和欧洲。说白了，就是俄罗斯认为轮不到中国来整合中亚。但美国插手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被迫与欧洲交恶，同期美国主导压低油价，俄罗斯才不得不转向东方，认真对待中国的倡议，变成貌似真正的战略伙伴。一旦和欧洲关系改善，俄罗斯还是会转向欧洲。因此，不管眼前中国和俄罗斯的利益关系有多密切，也绝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毫无疑问，陆权海权兼顾必然会触动海洋霸权国家的神经。地缘政治利益向来是美国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因此，美国势必通过各种策略加强对中国的打压。譬如，在明的一面，挑起东亚的地区冲突，以及调整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交策略（如伊朗就是中国“一带一路”上的重要环节，现在，美国与伊朗达成核问题协议，有可能就是美国基于地缘政治利益，考虑平衡中国在区内影响力的因素而做出的政策调整）；更重要的是在暗的一面，加强和中国内部的资本利益集团（包括执政集团内外）结盟，夺取未来中国发展政策的主导权。

二、复杂东盟：中国的海运命脉与海上丝路的起点

东盟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直接关系中国的海运命脉，但地缘关系格局自“二战”后一直为美国所主导。

面积狭小的新加坡出现了一位在国际上有如此分量的政治家，李光耀的历史角色很耐人寻味。但是不管李光耀被吹捧得多么有政治智慧，主要还是源于新加坡的特殊地缘战略位置。近代新加坡的繁盛始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建立商站。英国人选择这里，自然是因其极具地理战略价值。新加坡扼住马六甲海峡之咽喉，是控制欧非亚大陆海运通道的战略重地，也手握着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产业体系的能源生命线。

处于弹丸重地的新加坡很清楚自己的生存之道。西方人推崇李光耀，因为他是最坚定的冷战斗士，自20世纪60年代就高调宣布支持美国介入东南亚。奥巴马甫一上任，李光耀极力劝美国重返亚太，搞战略再平衡。他不光是嘴巴上说，还给予了实际协助，比如给美国提供军事港口，协助美国在东盟区内的军事部署，并获得整个亚太地区最先进的美国军备（某些装备规格甚至超越日韩）。

这应该称为新加坡的现实生存策略，也就不由中国抱任何幻想。中国自邓小平以来数代领导人都和李光耀颇有交情，李光耀还曾提倡亚洲价值（即威权政治＋高效能政府＋政府公司主义），但是新加坡始终不会成为中国的盟友。

因此，中国渴望打开另一条无须经过马六甲海峡、从中国西南部接通印度洋的货运通道，例如，促成泰国百多年来一直想开通的克拉运河，或者帮助缅甸、马来西亚等国建造大型港口，再以铁路连接中国西南，在区内建立港口同盟等。目前，无论是试图高铁换泰国大米，还是在缅甸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实际上都是在和新加坡背后的美国角力，形势都不明朗。此外，中国正式租用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这样就可以绕过地缘形势复杂的印度洋，把中东的原油经巴基斯坦直接输入中国（但

是基础建设成本较高）；另一条路线选择是南下阿拉伯海，借道斯里兰卡，这样就在印度之外多开辟一个印度洋的中转港口。

总之，东盟是中国倡议的海上丝路的前线起点，但也是形势最复杂的区域，是除了日本外，美国影响力最根深蒂固的地区。

三、亚投行与“后布雷顿”美元体系的调整

1.亚投行的战略意义

中国虽然成为重要的资本输出国，却没有一个政治同盟，也没有一个金融同盟在背后支撑。只有这几者相辅相成，大规模对外投资才能相对安全，缺乏政治与金融组织的支持与协作，结果不一定理想。

关于政治同盟，中国碍于“后冷战”地缘政治而一直刻意地回避；而关于金融同盟的新动作，则主要体现在金砖银行和亚投行。由此来看，金砖银行和亚投行是中国配合资本输出而启动的跨国制度建设。

和之前的动作组合起来看，金砖银行＋金砖国应急基金、亚投行＋丝路基金与接下来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银行，客观上是在另起炉灶，与在“二战”后建立的美国主导的布雷顿美元体系分庭抗礼。这也客观上使得中国成为继大英帝国特惠贸易体系和美国布雷顿体系以后，第三个有能力主导全球性金融贸易体系的国家。当然，在可见的将来，这些协作组织还不可能取代布雷顿美元体系，最多只能是某种程度的博弈。

2.亚投行面临的美元挑战

美国几年前为了防止有利于中日韩合作共赢，直接威胁美国货币利益的亚洲货币同盟的出现，高调重返亚太，搞所谓的再平衡，不惜扶植日本右翼势力重新执政，形成围堵中国的太平洋同盟圈，又打造TPP以确保太平洋地区继续成为消纳美国货币增发的“美元湖”。但TPP谈判进展缓慢，而中国应对性地提出亚投行，虽然美国极力劝阻欧洲和亚洲的盟友参加，但在短短一年之内形成了浩大的阵容。

二者进度差异明显的一个原因是，TPP谈判系以美国的利益为核心，而对于谈判国来说，区内降低关税所带来的边际效益，实质上可能比不上输出基础建设及相关的融资和金融服务。

美国本来是为了排斥中国而搞TPP，却因此被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

组织排除在外，这当然会使美国尴尬。当英、德、法、意、瑞等欧洲盟友宣布参加亚投行后，奥巴马召开了紧急国家安全会议，可见美国视亚投行的成立为威胁国家安全的大事，因为它实质上挑战了美国战后主宰全球的金融霸权。所以，亚投行的诞生也促使了美国加速TPP谈判，并且在某些原则和策略方面做出调整，使得TPP最终在2015年10月完成谈判。

根据报道，欧洲国家中首先决定参加亚投行的是瑞士，但瑞士是和中国秘密谈判，并要求延后公布，才使英国成为第一个抢先宣布加入亚投行的欧洲国家。瑞士和卢森堡这两个很少参加国际组织的金融国也参与其中，表明了布雷顿同盟内部确实出现了问题。我们不妨称之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特里芬难题：美国已经开始和其领导的同盟组织出现冲突。

当然，美国的盟友们并不是要放弃布雷顿美元体系这条船，而是在单极霸权疲态毕露后，为了保险，多买一张船票。更何况，“一带一路”覆盖的，本来就是英、法、意等老牌帝国的传统势力范围。

3.亚投行能取代布雷顿森林美元体系吗？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是为了配合美国输出过剩的工业产能和资本，欧洲当时亟待战后重建，因此当时欧美双方利益是一致的；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大规模输出流动性，虽然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实体经济都打击甚大，但是美欧的金融集团利益仍然是一致的。然而，近年双方的根本利益已经开始出现矛盾。美国领导的国际金融组织无作为，跟不上全球的新形势、新需求，客观上需要产生另一个全球性金融合作组织。

2013年10月美国主导构建的六方央行流动性互换同盟，预期可以有效防止欧美再出现大规模流动性危机。但这只是预防性的，现在全球新局势需要主动性的倡议。被美国资本利益主导的IMF和世界银行（及其实质上的分支亚洲开发银行），也因为美国不愿放弃其否决权而停滞不前，明显变得僵化，难以改革，跟不上全球格局重整的新形势。

中国能否趁此时机，领导建立新的全球性金融联盟呢？这无疑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中国牵头组建的亚投行，可谓部分地呼应了全球对金融创新的现实

需求。然而，总体来看，虽然未来10年内，人民币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货币基本不是问题，但除非有新的重大因素出现（比如20年爆发毁灭性的全球战争，主要资源枯竭），否则人民币未必能在20年后挑战美元的地位。

在产业资本主义阶段，一种货币的力量取决于一国之政府与民间组织生产和创造的能力；但在金融资本阶段，信用货币的信用来源主要是国家政治和军事强权。据此来看，美元作为世界信用货币的强势态度，当然首先取决于其庞大的军事力量。美国的军事开支占了全球军费的四成到五成，位列世界第一，比紧跟其后的10个国家加起来还要多，原则上可以在两大洋上同时打两场战争（虽然最近开始调整这个军事原则）。

“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资本高附加值的创新源头，并且由官方统筹推进的、高度组织化的军工科技所引领。从化工、半导体、电影、电视、航空、电脑、金融、商贸模式、生物科技、互联网到智能手机，绝大部分促进产业扩张的资本高附加值创新都源于美国。美元价值的最根本基础除了独占鳌头的军事政治强权之外，就是美国的垄断性提升资本附加值的创新能力。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更像从前的罗马帝国，靠强大的军事力量榨取周边地区的资源和奴隶的超额剩余，只是美国比罗马更全面更优胜。罗马的核心基本上只消费而不事生产，输出的只有斗兽场、竞技场和大浴场等奢华文化，大量输入各种奢侈消费品。美国则靠印刷低成本的美钞换取世界各地的资源，支持其国民的高消费，撑起被世界当作自由民主样板的现代化高生活水平。

在中国成为全球资本高附加值的创新源头之前，中国的货币就不大可能挑战美元，甚至欧元的地位。比较来看，美国自19世纪末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产能国，也是在50年后才成为金融主导国，其间还经历了两场世界大战。

中国一直强调，亚投行等只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补充，不排除合作关系。按照矛盾论原理，将来能压垮美元的，估计只有愈益虚拟化的美国金融体系本身。

四、从亚投行成员国看西方同盟阵营关系重新调整

亚投行创立，美国最尴尬的是“二战”后建立的同盟阵线首次出现众叛亲离的局面。美国严词批评欧洲盟友，英国也高调回应；韩国和澳大利亚被压制无法加入，但最后一刻还是跳上了末班车；结果只剩下急于借此历史机遇恢复军事地位的日本和本来就不着急的加拿大。美国领导的同盟阵线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出现了根本分歧。

如前所述，美国领导的国际金融组织开始出现特里芬矛盾。那么美国领导的西方政治同盟，是否也出现了矛盾呢？

首先在俄罗斯问题上，欧洲盟友，尤其是德国，很难同意美国的强硬态度。德国的利益本来就和俄罗斯分不开，当然，美国并不真的想和俄罗斯开战。美国在各地缘板块的战术都是分而治之，即在区内挑起主要力量之间的矛盾，然后就可以从中渔利。如果欧洲和俄罗斯结盟，整合成一个强大的欧俄和中亚，那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美国不愿意欧洲和俄罗斯走得太近，美国借乌克兰危机挑起事端，而且态度强硬，就是要把俄罗斯推向欧洲的敌对面。换言之，美国的欧洲政策，很难再与欧洲的利益完全一致了。欧洲各国在亚投行上公开与美国决裂，可能也反映出盟国对美国的欧洲政策有一定的不满。

其次，北约问题。北约是美国海权战略的附属旁支。北约的利益与欧盟的利益，是否还能保持完全一致？

最后，亚太地区。韩国和澳大利亚本来是美国围堵中国的重要棋子及TPP的重要成员，但它们最后还是为了自身的长远利益加入了亚投行；只有日本因得到加强军事扩张的机会而表示自己是美国最忠实的盟友。

韩国一直以来的竞争对手都是日本。只要朝鲜半岛统一，韩国无论在人口、军事和工业产能上都将足以挑战日本。为此，中国是韩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和政治支持者。中韩不仅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甚至将来在统一的问题上，韩国最终也需要中国的支持。而美国实际上不想朝鲜半岛统一，以免亚洲演变成稳态的三足鼎立，日韩成为直接的竞争对手。更何况朝鲜半岛一旦统一，愿意放弃核武器吗？恐怕它最终会选择在军事上独立于美国。所以美国的亚太政策与韩国的利益很难说是一致的。

日本也一样。日本是个狭长的岛屿，资源稀缺，想成为强国必须建立海权向外拓展。日本在19世纪末打垮了清帝国的海军，然后战胜了沙

皇俄国，成为一方霸主，下一步想挑战新兴的海洋强权——美国，但战败并被军事接管，从此成为美国海权的附庸。现在，日本同样面临资本过剩问题，同样渴求输出基础建设产业，其国内的资本集团渴望日本加入亚投行。事实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就倡议成立亚洲稳定基金，让日本成为领导亚洲的金融力量，结果被美国否决了。日本主导亚洲开发银行，最后还是要仰美国的鼻息，区内每年8000亿美元的基础建设需求，亚洲开发银行只批出135亿美元，表面说辞是环保、人权等高标准，实质是要配合美国的政策。现在，日本右翼集团表面上是为了意识形态，而实际上为了重建日本军事大国的地位而坚持站在美国背后。短期来看，美国的海权战略与日本的军事扩张利益一致，但长期来看就很难说。

总之，世界的利益集团变得多样化，美国领导的同盟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加深。中国怎样在其中找到发展的机会，需要很大的智慧和谋略。接下来的10年，中国外交需要主动的思考和策略。

五、亚投行的话语建设：急需内生社会公义的理念

美国在20世纪50—70年代，输出的是配合冷战地缘控制的发展意识形态。世界银行主导的发展主义遭遇发展中国家普遍高债务危机而破产后，美国80年代开始将外交话语改为民主自由制度变迁。尤其是海湾战争后，拿着大棒子送上美式自由民主，成为美国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主调。但美国过去10年出兵伊拉克和阿富汗，引爆了永无止境的地区冲突，不仅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和数百万难民的代价，还亲手栽培了基地组织阿尔盖达、“伊斯兰国（ISIS）”这些殃及西方的怪物。“大棒子＋民主自由”的话语，已经没有多少说服力了。这几年，美国的外交意识形态悄悄地转为“大棒子＋安全”，即指面对日益严重的地区冲突（虽然这些冲突的大部分根源都是美国），需要美国的强大军事力量介入。

而“一带一路”的意识形态，是和平发展。即搞好基础建设，促进经济发展，自然会减少冲突，变得和平。无疑，和平发展，要比美式的“大棒子＋安全”更靠谱。毕竟，贫穷和不公义，是极端主义的温床。但输出基础建设的发展主义，也有可能导致区内各种社会问题爆发。如何避免亚投行重蹈世界银行那种破坏环境和原住民稳态生计系统的错误？如何令基础建设带动在地化的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换言之，怎样避免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沦落成另一对IMF和世界银行？虽然中国这几年输出基础建设援助时强调必须有利于当地的实质生计，但不足以在道义上挑战美

国的所谓“民主自由”。

那么决定“一带一路”成败的关键，是核心价值的话语竞争力。中国必须形成一套内生性的社会公义论述，来应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在世界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民主自由话语及其外推的制度变迁软实力。

当然，中国内部正在以城市化吸纳过剩产能，面临30年发展主义所带来的贫富分殊、环境恶化、腐败等社会问题。发展生态文明，只能基于多元化社会的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之中，而构建和谐社会，也只能建立在符合公义的社会财富分配之上。

可见，具备深厚的社会公义理念和丰富的文化多样性视野，不仅可以在本国落实生态文明战略，只有建成内生性和谐社会，才会有国家崛起、民族复兴。否则，并不足以挑战西方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话语和地缘战略。

因此，中国的知识生产者需要把中国经验中的积极因素提升为一套可以输出的东方（或乡土社会）式社会公义论述，才可以把“一带一路”上升为具有全球意义的话语软实力。

换言之，“一带一路”需要更深厚的社会公义思想和文化内涵。否则，它面对亚非欧大陆上的多样民族、多元化文明，在遭遇地区冲突时，将显得苍白无力。

综上，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甚至推动金砖银行的成败在于话语权，当前亟须内外兼修，自省谋变。

专题10　巴西近年政局动荡述要（2013—2016年）[268]

一、2013年6月街头政治

2013年6月，不同政治立场的巴西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社会公共政策，其导火线是公共交通费的上涨。[269]

后来抗议浪潮席卷全国，超过100万的巴西人走上城市街头，参加抗议活动的大多数是中学生和大学生。他们的诉求日益广泛和多元：要求政府抑制通货膨胀，惩治贪污腐败，改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抗议者批评政府在世界杯上花费137亿美元，整体投资已经超过165亿美元，占年度财政收入的9%，仅比教育年度预算的190亿美元少一点。这是有史以来“最昂贵的”世界杯，投资金额是上一届南非世界杯的3倍，绝大部分项目超出预算，场馆投资的总成本中有超过85%来自公共资金。[270]

此后，巴西国内对世界杯的抗议之声此起彼伏，罢工不下百次。2013年联合会杯赛期间，数十万巴西人走上街头并与警察发生冲突。一幅标语上写道：“第一世界的足球场，第三世界的学校和医院！”

罗塞夫的支持率一度跌落至30%以下，竞选连任时，也仅以51.6%的支持率险胜。

二、2015年街头政治浪潮

2015年3月、4月及8月的三次街头政治浪潮，显然不再针对社会民生政策，而改为要撼动刚获连任的罗塞夫政府的权威，甚至推翻劳工党的执政地位。

1.3—4月[271]

据巴西《圣保罗页报》报道，3月15日，巴西全国26个州和联邦区至少152个城市爆发了反对总统罗塞夫及劳工党的示威游行，据估计，有100万—150万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石油公司的腐败丑闻及总统的经济政策。

参与游行的大多数是中产阶层，其中以白人为主。他们指责巴西石

油公司高管长期以来收取回扣、参与洗钱、收受承包商贿赂并用作给执政党的政治献金等问题。在野党派说，这些受贿行为发生于罗塞夫担任巴西石油公司总裁期间，深信总统对受贿行为知情，要求弹劾总统，并且要求总统及其代表的劳工党下台。罗塞夫予以否认，检察总长经调查后也称排除了总统涉案的嫌疑。

自从巴西石油公司贪腐丑闻曝光以来，包括议会议长、议员和前政府高官在内的数十人陆续被曝涉案，涉案金额已超过数十亿美元。徐世澄分析，由于丑闻牵扯数十名政客，该案实际上已不单纯是经济丑闻，而升级为政治问题，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背后带有右翼的政治诉求："巴西的右翼势力在背后支持一些组织，要巴西总统下台。"据巴西《环球报》报道，巴西反对党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内维斯出现在抗议人群中，加强了反对者的力量。

4月12日的游行规模，组织者称仍有150万人上街，警方则称只有69.6万人。

2.8月 [272]

报道称，8月16日民众走上街头，在首都巴西利亚、第二大城市里约热内卢、第一大城市圣保罗以及巴西各地城镇游行抗议，高喊"罗塞夫下台"。据警方估计，至少有41万民众在全国数十个大小城镇示威抗议；主办方则说参与示威活动的人数达66万人。

巴西某调查公司所做民调显示，2/3的巴西人支持弹劾总统。据英国《卫报》报道，少数激进示威者甚至认为如果总统拒绝下台，发动军事政变也在所不惜。此时，距离罗塞夫以微弱优势成功连任还不到一年。

3.2015年12月，巴西国会对总统罗塞夫展开弹劾程序

2015年12月2日，巴西国会众议院议长库尼亚宣布接纳议员呈请，对总统罗塞夫展开弹劾程序。弹劾呈请由一群知名律师起草，转交在野党派议员提交议院。呈请书指责政府应为巴西石油公司腐败丑闻负责，并指责罗塞夫隐瞒政府的实际开支。12月8日，众议院成立弹劾案特别委员会，并以229票赞成和199票反对通过了弹劾报告。该报告认为2012—2014年总统罗塞夫违反财政法，在未获得国会批准情况下，擅自向国营银行贷款，隐藏日益增长的财政赤字，犯有渎职罪。罗塞夫在

总统府发表全国电视讲话称，弹劾呈请“完全缺乏基础”，重申自己并无不当行为，并批评此举是右派试图发动“政变”。

4.2016年8月，总统罗塞夫最终被弹劾

踏入2016年，巴西左派、右派除了涌上街头示威游行分别支持及反对罗塞夫，还在法院和议会对垒，巴西政局几度动荡。

2016年3月4日，前总统卢拉遭到警方强制传讯，配合腐败案调查。2015年3月，巴西联邦警察正式对2014年曝光的巴西石油公司腐败案展开代号为“洗车行动”（Operation Lava Jato）的调查。该案指巴西国家石油公司高层利用外包工程大肆收受贿赂，或将贿款作为政治献金输送政党，涉案金额高达400亿雷亚尔。至少有三个政党与石油公司的贪腐相关：民主运动党（PMDB），进步党（PP）以及执政党劳工党（PT）。民主运动党的几大领袖，如副总统泰梅尔、众议院议长库尼亚和参议院议长雷南，都深陷腐败丑闻。

3月16日，罗塞夫紧急任命前总统卢拉出任内阁部长。3月18日，巴西联邦最高法院一名大法官裁决中止政府对卢拉的任命。

3月29日，巴西第一大政党民主运动党正式宣布该党退出罗塞夫总统领导的政府。在罗塞夫政府31名内阁部长中，民运党占7席，仅次于执政的劳工党。

4月11日，巴西国会众议院弹劾委员会以38:27的投票结果通过了针对总统罗塞夫的弹劾动议。4月17日，众议院以367:137多数票通过对罗塞夫的弹劾议案。

5月5日，最高法院决定剥夺库尼亚的联邦议员和众议院议长职权。据闻，库尼亚至少收受了巴西国家石油公司推荐承包商500万美元的贿赂，而且被查出在瑞士信贷银行拥有多个账户，往来金额巨大，证据确凿。他还被指利用职务之便，使道德委员会对其审理延期六次。2015年12月，库尼亚曾试图和执政劳工党进行交易，以否决反对派弹劾总统的申请为筹码，阻止道德委员会做出对他不利的判决。然而，在遭执政党拒绝后，他便宣布接受反对派弹劾总统的申请。

5月12日，巴西国会参议院以55:22的投票结果通过了针对总统罗塞夫的弹劾案，罗塞夫被强制离职长达180天，副总统特梅尔出任代总

统。

8月31日，巴西国会参议院举行全会表决，81名议员以61票赞成、2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对总统罗塞夫的弹劾案。巴西首位女总统罗塞夫最终被弹劾，代总统特梅尔正式出任巴西新总统。

引用资料：

1.周志伟：《巴西会成为下一张“多米诺骨牌”吗？》，《当代世界》2016-03。

2.张晓添：《从黄金十年到衰退边缘：巴西危机启示录》，巴西财经人文观察2016-03-09。

3.《巴西通过弹劾总统报告经济衰退腐败严重引民众不满》，中国网2016-04-12。

4.冉秉鸾：《巴西左翼政权的终结》，经略2016-04-13。

5.T.伊兹格塞拉：《你理解巴西政治危机的指南》，海螺社区2016-04-18。

6.《兔死狗烹：库尼亚下台》，巴西财经人文观察2016-05-05。

7.《女总统罗塞夫被弹劾特梅尔正式就任巴西总统》，中国新闻网2016-09-01。

[1]这几年我们会有十几本书分别以不同作者、不同课题成果的名义问世。这些出版物都被要求做单独的“成果标识”。但我们实际上要做的仍然是这几十年的经验归纳总结和理论提升，“实事求是”地形成“去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体系。由此，就需要为这个分别标识的系列出版物做个总序。

[2]参见即将出版的《此生无憾：温铁军自述辑录》（暂定名），其中对20世纪80—90年代在官方政策部门开展农村改革试验区及新世纪启动民间为主的新乡村建设试验区，两个11年的经历分别予以归纳。

[3]参见温铁军：《告别百年激进》，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这是我2004—2014年这10年演讲录的上卷，主要是与全球化有关的宏大叙事和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甫一出版即被书评人排在当月优选10本财经类著作的第一位。

[4]最近10年一直有海内外学者在研究乡建。国外有学者试图把中国乡建学者的思想上溯归元到孔子或老子，国内也有人问我到底偏重晏阳初还是梁漱溟，还有很多人不理解梁漱溟晚年由儒家而佛家的思想演变。其实，我们从来就是兼收并蓄。在儒释道合一的顶天立地和五洲四海的融会贯通之中形成乡建思想。因此，这些海外研究者的关注点对我们来说本来不是问题。

[5]本文丛并非团队的全部思想成果，但在“国仁文丛”设计之前的成果没法再纳入进来，只好如此。

[6]这些年，我一直试图对承上启下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形成的国仁思想做归纳，遂借作序之机凝练成这段文言，意味着国仁追求的是一种“大道、大润、大象、大音”的思想境界。

[7]中国乡建运动之所以能够延续百年而生生不息，乃在于参与者大抵做到了思想和行动上都“去激进”，不照搬西方的左右翼搞的党同伐异。

[8]参阅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记得一位学者型领导曾经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农民在现代化的大潮中挣扎着下沉，就剩下两只手在水面乱抓。你的思想无所谓对错，只不过是被溺水者最后抓住的那根稻草，再怎么努力，也不过是落得跟着沉下去的结局……

[9]乡建前辈学者梁漱溟因在1953年与毛泽东激辩合作化问题而被后者批为“妇人之仁”。据此，梁漱溟可以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早期女性主义者。尽管在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前，打上何种类别的标签并不重要，但如果这是当代学者们的本能偏好，也只好任由其是。

[10]关于精英专政与大众民主的分析，请参阅《人间思想第四辑：亚洲思想运动报告》，人间出版社2016年版，第2—19页。

[11]近年来，我不断在乡建团队中强调对乡建经验的归纳总结要尽可能提升到理性认识高度，并且要努力接续百年乡建历史，并带领团队申报了一批科研项目。那么，要完成科研任务，就要花费很多精力。对此，就有一些长期从事乡村基层工作，必须拿

到项目经费才能维持单位生存，为此来不及形成理论偏好的同人难以接受，甚至有些意见相左之人表达了误解、批评。这本来不足为怪，对批评意见也不必辩解。总体上看，大乡建网络的各个单位还是积极配合的。但，考虑到这些批评说法将来可能会被人拿去当某些标题党的报道和粗俗研究者的资料，因此，我才不得不以总序的方式让相对客观些的解释在各个著述上都有起码的文字依据——尽管这些话只是简单地写在脚注中。

[12]中国有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清华大学、重庆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上海大学、西南大学、福建农林大学、香港岭南大学。海外有英国舒马赫学院、美国康奈尔大学，近期正在形成合作的还有国际慢食协会的美食科技大学（意大利）等。

[13][埃及]萨米尔·阿明著：《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内爆》，黄钰书译，《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3）。

[14][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世界体系分析》(*World-Systems Analysis：An introduction*)，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5]21世纪以来，核心国利用其霸权地位静悄悄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基本秩序：此前发展中国家背负债务的时候，债是必须还的，因为债务作为一种维护人类社会契约制度的基本信用关系，乃在于其必须“刚性支付”。但现在演变成发达国家承受更多债务之后，不仅公开发出其从来就不用还债的言论，而且还把债务转化为吸纳其大量增发流动性的可交易资产。

[16]根据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来看，一方面美国有大量的贸易逆差，另一方面在资本流动上是顺差。因为美国有大量资本输出并获得最高的对外投资收益，但同时其他国家有更多的外汇储备和私人投资流入美国购买诸如美债、公司债券和股票等金融资产，这一进一出在资本流动方面美国是顺差的。即使是在直接投资方面，2014年以后流入美国的也比美国输出的多。

[17]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及历史学家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是当代世界体系理论（The Theory of World System）的始创者，他论述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即现代世界体系的起源与发展的历程，分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特征“中心（Core）—半边缘（Semi-periphery）—边缘（Periphery）”：中心地区通过不平等的分工关系垄断有利的贸易通道，攫取最大的利润；边缘地区则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和初级产品；而半边缘地带介于二者之间，既受中心地区控制，同时又可部分地控制边缘地带。参阅沃勒斯坦著：《现代世界体系》（第一、二、三、四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18]本图由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董筱丹副教授制作。

[19]在《国家竞争的微笑曲线》（温铁军等著，尚未出版）一书中的第二部分将对它们在不同阶段的处境做更详细说明。

[20][埃及]萨米尔·阿明著：《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内爆》，黄钰书译，《政治经济学

评论》2013（03）。

[21][美]哈里·登特：《有毒资产引发的金融危机》(*Toxic Assets Made the Financial Crisis*)，《经济与市场》2016-07-01。

[22]1986年6月22日，在墨西哥世界杯1/4决赛阿根廷对阵英格兰的比赛上，马拉多纳用手把球攻入了英格兰的球门，并且裁判判定进球有效，这就是著名的“上帝之手”事件。后来把在足球比赛中用手将球打进，且被裁判误判有效的情况称为“上帝之手”。

[23]王小强著：《投机赌博新经济》，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年版。

[24]对于这种制度不对称性，西方某些进步学者有现象性的描述，但鲜有探讨其深层金融资本主义制度性根源。参阅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莎士奇亚·萨森（Saskia Sassen）教授的《大驱离：揭露21世纪全球经济的残酷真相》(*Expulsions：Brutality and Complexity in the Global Economy*)。

[25]身份政治指围绕某种特殊身份认同而进行的政治斗争，例如宗教信徒、民族、国家等。

[26][英]帕特里克·邦德：《抗议世界经济论坛上难以置信的非洲正在崛起》，帕姆巴祖卡新闻2019-08-09。

[27]中东问题专家、中情局前分析员雷厄姆·富勒（Graham Fuller）认为“美国是‘ISIS’的主要创造者之一”。美国已经不是首次为本身的地缘战略利益而扶植恐怖分子或军事独裁政权了，例如两伊战争期间的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另一例子是20世纪70年代，阿富汗发生了废除高利贷和封建主义、提倡两性平等和妇女政治权利的本土自发革命，CIA支持来自保守部族的圣战者游击队，他们后来发展成为塔利班组织。再如，曾经是美国头号大敌的拉登基地组织，也是美国为了在阿富汗抗衡苏联而支持扶植起来的。拉登在20世纪80年代曾到访白宫并获里根总统接见，当时还被西方媒体称赞为自由战士、和平缔造者。2016年10月维基解密公布一批文件，显示美国为了推翻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及叙利亚的阿萨德政府，向基地组织及“伊斯兰国”提供各种援助，并组织策动恐怖主义集团进行推翻叙利亚政府的军事行动。（来源http：//www.thep-oliticalinsider.com/wikileaks-confirms-hillary-sold-weapons-isis-drops-another-bombshell-breaking-news/）。虽然文件的真伪还具争议性，但美国支持该地区的反政府组织并供应军火千真万确，而这些武装组织又与“伊斯兰国”等极端恐怖主义组织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更有甚者，美国在中东世界最亲密的盟友沙特，多次被指责财务支援“伊斯兰国”，而且“ISIS”的主要财政来源是石油。可是，被国际广泛制裁的组织又是如何出售其控制的石油的呢？据报道，与以色列及美国仍然保持良好关系的土耳其，暗中协助“ISIS”销售石油。（汉娜·奥斯曼2016年12月9日报道）《每日邮件》报道，“维基解密从埃尔多安总统的继子那里收到57000封邮件，证明埃尔多安向“ISIS”走私石油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据《金融时报》报道，“ISIS”也向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叛军控制地区供应石油。再者，仅以实际效果而论，这些极端军事组织鲜有针对美国在区内的盟友，其军事行动客观上往往服务于美国于区内的地缘战略利益。另参阅陈章：《关于“美国扶植‘伊斯兰国’”的证据考证（修订版）》，观察者网

2015-11-21。

[28]此处关于三个资本主义世界划分，可参阅温铁军著：《告别百年激进：温铁军演讲录（2004—2014）》（上卷），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

[29]董筱丹、薛翠、兰永海、温铁军：《发达国家全球金融资本与现代化政体的双重危机》，《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1年第15卷第6期，第82—85页；董筱丹、薛翠、温铁军：《发达国家的双重危机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转嫁》，《红旗文稿》2011（21），第4—9页。

[30]参阅兰永海、贾林州、温铁军：《美元“币权”战略与中国之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03），第121—137页、159—160页。

[31]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后，西方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凭借冷战意识形态取得胜利的有效经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转型为更多依赖“软实力”的“后冷战”意识形态——主要对中国和其他维持非西方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在思想文化艺术教育等领域做殖民化的全面进攻。其主要战绩，即为发展中国家知识界和主流官员对西方制度体系的深度认同。

[32]参阅温铁军、高俊、张俊娜：《中国对美双重输出格局及其新变化》，《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5（07）。

[33]对于第三种力量——气候因素差异化影响，我们将会在下一本《南方陷阱》（暂定名）一书中更深入探讨。

[34]2011年9月17日，近1000名示威者进入纽约金融中心华尔街示威，开启占领华尔街运动（Occupy Wall Street）。示威人士指出，美国金融危机根源于华尔街的贪婪、银行界的腐败和跨国企业干涉政治，现有制度偏袒极少数的权贵和富人，1%的富人占有世界的财富，并且剥削99%的民众。运动声明：“最基本的事实就是我们99%的人不能再继续容忍1%人的贪婪与腐败”，为了“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我们不需要华尔街，我们不需要政治家”。“我们就是那99%的人”（We are the 99%）成为占领华尔街运动最著名的政治口号。

[35]王建教授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的首场世界性战争——第三次欧战猜想》（《战略与管理》2015年7/8月号）一文中探讨了美欧因为货币霸权冲突而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我们认为美欧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机会不大。更大的可能性是目前这样，围绕欧洲利用代理人（例如“ISIS”、东欧的法西斯主义势力等）进行各种军事及政治颠覆活动，令欧洲陷入不稳，欧元受创，甚至欧盟解体。欧洲紧紧被限制在北约之内。

[36]根据《金融时报》2015年12月28日报道，美国官员警告欧盟不要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称此举等于单方面解除欧洲对中国的贸易防御，欧盟可能因此难以抵御中国的低价商品倾销。

[37]商人出身的特朗普试图以重商主义来维护美国的利益，这未必符合美国金融资本集团的利益。美国原有的精英阶层因此对特朗普口诛笔伐，并试图弹劾推倒他。

[38]参阅温铁军、高俊、张俊娜：《中国对美双重输出格局及其新变化》，《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5（07）。

[39]参阅《美联储资产负债表首次突破7万亿！》，2020-03-05，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20-05-23/doc-iirczymk3076770.shtml。

[40]例如居民往海外汇款的限额从每财年20万美元削减至7.5万美元，同时将印度公司海外投资限额从净财富的400%降低至100%。中国金融新闻网2013年8月17日报道。

[41]根据印度央行统计，约有80%的经常账赤字是因黄金进口造成的。《国际金融报》2013年8月14日报道。

[42][美]克里斯汀·福布斯：《新兴市场的动荡：故事中缺少什么？》，2019-07-06，http：//www.voxeu.org/article/understanding-emerging-market-tur-moil。

[43][美]海伦妮·雷：《进退两难：全球金融周期与货币政策独立》，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工作论文，2015年5月，No.21162。

[44]VIX指芝加哥交易所波动率指数（CBOE Volatility Index），量度标准普尔500指数期权的隐含波动性（implied volatility）。一般认为它有助于掌握未来市场波动性（即风险）的预期，因此也被称为恐慌指数。

[45]《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年出版）是我们团队1988年发表《危机论》以来近30年的研究成果，主要归纳了中国宏观经济周期性危机的规律性表现。

[46]参阅王维丹：《16年来首次“落后”：除中国外新兴经济体增速低于发达国家》，华尔街见闻2016-02-26。

[47]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一个文件上批语：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刊印。

[48]参阅赵巍华、徐以升著：《旧格局与新周期：全球金融周期下的中国经济》，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5年版。

[49]参阅赵巍华、徐以升著：《旧格局与新周期：全球金融周期下的中国经济》，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9页。

[50]参阅陈晓晨、徐以升著：《美国大转向：美国如何迈向下一个十年》，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版；[法]热拉尔·迪梅尼尔、多米尼克·莱维著：《大分化》，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51]参阅董筱丹著：《再读苏南》，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52]参阅温铁军等著：《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

[53]供给侧改革在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发生的时候就被提出过，只是当时正在使用增发国债、投资拉动策略，因此中央没有采取这类建议。

[54]2015年11月10日的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上表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55]回顾中国的改革经验，这实际是暗示中国经济将面临硬着陆，由此加速进行新一轮的制度调整。参阅温铁军等著：《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

[56]参阅《2014年中国国民经济主要数据》，《经济日报》2015-01-20；刘元春、阎衍：《经济增速筑底关键期到来，今年面临四大深层次风险》，《中国证券报》2015-06-20。

[57]参阅赵巍华、徐以升著：《旧格局与新周期：全球金融周期下的中国经济》，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三章。

[58]参阅赵巍华、徐以升著：《旧格局与新周期：全球金融周期下的中国经济》，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5年版，78页。

[59]参阅余云辉：《美国汇率武器，是刺刀还是原子弹？》，观察者网2020-01-22。

[60]参阅赵巍华、徐以升著：《旧格局与新周期：全球金融周期下的中国经济》，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84页。

[61]据估算，2015年政府及银行从房地产获得收入47917亿元，约占6.4万亿元收入的75%。

[62]参阅赵巍华、徐以升著：《旧格局与新周期：全球金融周期下的中国经济》，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100页。

[63]金融化的冲动源于资本的规律。马克思指出："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G—G'，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资本论》第3卷第5篇第36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64]参阅陈道富：《我国货币金融与实体经济割裂的现状与原因》，《发展研究》2013（10）。

[65]参阅温铁军、薛翠、杜洁：《金融资本"无祖国"与做空中国图谋》，《中国投资》，2015（9）；另参阅温铁军等著：《居危思危：国家安全与乡村治理》，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第69—74页。

[66]何正全：《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分析》，《财经科学》2012-10。

[67]路易十六（Louis XVI），法国波旁王朝的国王，于1774—1792年在位，法国大革命爆发后，1793年被送上断头台。路易十六开明善治，曾被国民称为“贤王路易”。18世纪80年代，英法自由贸易对法国工商业造成巨大冲击，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坚持“德治”的法国债台高筑，一方面下层社会民不聊生，同时城市工业受到冲击，危机压力下的资产阶级将矛头指向政府，随即自行召开三级会议要求宪政改革。在上层利益僵持的情况下，苦不堪言的下层贫民和失业流民率先发起了暴动。路易十六改革失败的原因，后人认为是其协调贵族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时候过于向资产阶级妥协，没有顾及更广大的贫民。

[68]温铁军、计晗、张俊娜：《中央风险与地方竞争》，《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04）。

[69]央行2015年9月7日公布数据，中国外汇储备8月下降了939亿美元，8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56万亿美元。央行发言人表示外汇储备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为境内其他主体持有外汇资产的增加。参阅《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就远期售汇宏观审慎管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中国人民银行官网2015-09-08。

[70]张明：《近期中国究竟消耗了多少外汇储备？》，2019-05-02，http：//zhangming1977.blog.sohu.com/321294564.html。

[71]所谓新自由主义，本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产业资本外移、金融资本崛起，促使停滞于产业资本阶段的苏联东欧国家解体的冷战意识形态；在“后冷战”时期则已经实质性地演变为推动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新保守主义”。

[72]旧式帝国主义是一个国家夺取其他国家的领土，占有其资源，奴役被占领土国家的人民，建立经济及政治霸权，从而凌驾于别国之上。帝国主义可能衍生出殖民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列宁在1916年发表《帝国主义》，从经济观点较有系统地探讨了帝国主义，他的结论是：帝国主义政策多在资本主义国家被实施，而且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有基础实行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

[73]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写道：“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没有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以及列宁：“革命阶级在反动的战争中不能不希望本国政府失败，不能不看到本国政府在军事上的失败会使它更易于被推翻。”《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3页。

[74]开曼群岛（Cayman Islands）是英国在西加勒比群岛的一块海外属地，面积约264平方公里，是著名的离岸金融中心和“避税天堂”，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百慕大并称为三大离岸注册地。全世界最大的25家银行都在开曼群岛设有子公司或分支机构，每年平均约有4300家公司在此注册成立，全球700多家银行在开曼群岛都有分支机构。据报道：现在香港的上市公司中，有近半均在开曼群岛注册，2013年在香港上市的公

司，有724家于开曼群岛注册，详见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50110/18997932。

[75]对此，马克思早有洞见："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商品所有者也就发展为世界主义者。人们彼此间的世界主义的关系最初不过是他们作为商品所有者的关系。商品就其本身来说是超越一切宗教、政治、民族和语言的限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3卷，第142页。

[76][埃及]萨米尔·阿明：《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内爆》，黄钰书译，《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03）。

[77]参阅[美]沃勒斯坦等著：《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徐曦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一章。

[78]古希腊神话中的阿喀琉斯因幼时被母亲提着脚踵浸入神水而有"金刚不坏之身"，唯其脚踵未被浸水而最终死于脚踵被刺。中国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激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时候，也只是放开一般贸易的自由竞争而坚持资本项下的国家控制。到2013年新一届领导班子上台，才确定了人民币自由兑换和资本市场对外资开放的时间表。

[79]参阅张庭宾、余云辉：《比股灾可怕十倍：中国决不能退让的两大金融底线》，2015-07-06，http：//www.wyzxwk.com/Article/jingji/2015/07/347213.ht-ml。

[80]参阅徐以升、马鑫著：《金融制裁：美国新型全球不对称权力》，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年版。

[81]不少经营困难的企业较早前已开始靠借新债来偿还旧债，现在甚至进入靠借新债来还利息及发工资的阶段。这个趋势持续恶化的话，有可能爆发企业倒闭潮。

[82]"土耳其症候群"是西方媒体对于土耳其长期面临的经济状况的描述：高度依赖外国投资拉动经济，对国际投资环境高度敏感，虽然因特殊地缘战略位置而有外国资本流入，但因长期贸易逆差及经常账户赤字，导致外债攀升，出现资产泡沫，因而造成币值及金融体系不稳定，面临外国投资突然大规模撤出之风险隐患。

[83]参阅田文林著：《困顿与突围：变化世界中的中东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85—197页。

[84][土耳其]加利普·亚尔曼：《从盖兹抵抗到现象：土耳其政治格局的轮廓》(*From Gezi Resistance to the Present*：*The Contours of the Turkish Political Landscape*)，http：//taksimdayanisma.org/？lang＝en。

[85]参阅田文林著：《土耳其经济私有化的后果及教训启示》，观察者网2016-06-03。

[86]参阅盘古智库课题组：《大选之际看土耳其——历史遗产、地缘政治及与中国的相关性》，2015-06-06。

[87]参阅盘古智库课题组，《大选之际看土耳其——历史遗产、地缘政治及与中国的

相关性》，2015-06-06。

[88]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主要城市再次爆发军事政变，政变以失败告终。据估计有270—350名士兵在冲突中丧生，179名平民死亡，2185人受伤。总统埃尔多安指责是流亡美国的教士葛兰（Fethullah Gülen）背后策动政变，并谴责美国提供庇护。但葛兰否认与事件有关。其后有15846名士兵及司法人员被扣押，其中8133人被正式拘捕。另外48222名政府官员及雇员被暂时停职（包括多名官方将领、2700名法官及15000名教师）。3家新闻社、16个电视台、23条电台频道、45份报章、15本杂志及29个出版社被勒令关闭，有评论认为总统借机进行政治清洗。土耳其政府指责美国CIA及退休美国将军背后支持政变，也令两国关系紧张。其后土耳其国内爆发多起恐怖袭击，多名平民伤亡。2016年11月又拘捕12名亲库尔德的国会议员。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16 Turkish coup d%27%C3%A9tat attempt。

[89]美国在南斯拉夫战争和第二次海湾战争中好用的“捏造罪证指控以合理化入侵”策略，在这次叙利亚内战中更上一层楼。叙利亚激进武装组织编导了白头盔（White Helmet）等伪宣传战，伪造叙利亚政府违反人道、使用生物武器的所谓罪证，并且在国际媒体之间博得同情。

[90][美]马克·马泽蒂，亚当·戈德曼，米歇尔·施密特：《10亿美元中央情报局颠覆叙利亚政府秘密计划的突然破产背后》(*Behind the Sudden Death of a $ 1 Billion Secret CIA War in Syria*)，《纽约时报》2017-08-03。

[91]Juan Cole，“Turkey’s New‘War on Terror’Mainly Targeting Kurds”，In-formed Comment，26 July 15.

[92]TAP投资项目的股份组成：英国石油（BP）20%，阿塞拜疆国家石油（SOCAR）20%，挪威国家石油（Statoil）20%，比利时天然气（Fluxys）19%，西班牙天然气（Enagás）16%，瑞士公用事业公司（Axpo）5%。

[93]参阅[美]莫里斯·贾斯特罗著：《战争与巴格达铁路》，第97页。

[94]JeffReed，“Following the Tracks to War—Britain, Germany and the Berlin-Baghdad Railway”，http：//oilpro.com/post/4759/following-the-tracks-to-war-brit-ain-germany——the-berlin-baghdad-railwa.

[95]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打垮了德国和日本的帝国梦想，但造就了20世纪下半叶两个附庸并支撑美国海权战略的工业强国。在21世纪核心国金融霸权控制全球的体制框架内，如果德国这个代表莱茵文化的国家还算半核心的话，日本这个被西方“去主权”的国家无论怎样自我西方化，也仍然只是半边缘地位；当然，日本也得以借辅助美国控制东亚，而得到在美国势力范围内分享能源原材料和产品市场的好处。

[96]目前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随着中国资本的快速崛起及人民币日益国际化，自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以来，美国越来越明确地将中国作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甚至是战略敌人，不惜发动针对中国的“新冷战”。中国已然成为当前全球金融资本阶段主要矛盾的非主要方面。

[97]2015年6月29日签署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机构章程里，不计中国，土耳其的股权排第十位。

[98]中国至今仍然维持中央政府对金融资本相对有效的控制，关键经济部门仍然是国有制。

[99]温铁军在《中国农村经济经济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详细描述了中国的这两个基本矛盾。

[100]2014年，印度政府放宽保险业的直接投资持股上限，从26%升至49%。其后在推动“印度制造”后，再有25个部门进一步放宽吸引外资的条件。但是根据不同机构发布的统计数据来看，此种说法存在较大争议。比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15年度全球投资趋势报告》显示中国（大陆）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了1360亿美元，印度外国直接投资仅为440亿美元；而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2015年上半年的外国直接投资金额为680亿美元，而《金融时报》只以280亿美元来作为计算报告中的数据。

[101]印度同中国相比，都属于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印度在20世纪40年代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时间比中国略早两年，90年代推行改革的时间比中国略晚两年；按理说，其与中国的发展水平应该没有很大差别，但两国经济差距却逐渐变大。做喇叭口状拉开的年份是1969年，那时中国仍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102]Neelkanth Mishra＆Ravi Shankar，“India’s better half：The informal economy”，Credit Suisse，09 July 2013.

[103]奈克：《印度的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工人》(*Informal Sector and Informal Workers in India*)，www.iariw.org。

[104]参阅梅新育：《印度腐败的悲剧与反腐的闹剧》，《大象之殇》第六章，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版。

[105][美]钱德拉塞卡：《脆弱的基础：自由化后的外资和增长》，《社会科学家》2013年1—2月刊。

[106]据《福布斯》杂志报道，2016年英国GDP为1.87万亿英镑，换算成美元（0.81英镑约合1美元）约为2.29万亿美元；2016年印度GDP为153万亿卢比，换算成美元（66.6印度卢比约合1美元）为2.3万亿美元。

[107]在新算法下，2013—2014年的GDP增长从4.7%上调至6.6%。

[108]参阅温铁军等：《印度非正规经济的“潜规则”及外资在印度的六个困难》，课题调研报告2013-09-10，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联合科研团队。

[109]参阅[美]斯里瓦尼桑著：《发展经济学：过去和现在》，《贸易、援助和发展》(*Trade, Aid and Development*)，圣马丁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9页。

[110]参阅孙培均主编：《中印发展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11]Dubey, Vinod.“India：Economic Policies and Performance，”in Enzo R.Grilli and Dominick Salvatore, eds.，Economic Development.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94。

[112]有关印度早期对华经济基础优势分析，参阅梅新育著：《大象之殇》，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版，第316—372页。有关中印两国近年一般人口及经济统计数据比较，参阅沈开艳，许志桦著：《印度经济分析：中印比较的视角》，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

[113]关于印度的土地问题历史背景，参阅王静著：《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第一章，《土地制度的沉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梅新育著：《大象之殇》，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版，第48—77页。

[114]据估计，大约90%的印度公司不合法地付款给政府官员。参阅沈开艳、许志桦著：《印度经济分析：中印比较的视角》，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44页。

[115]有关印度的民族资产阶级如何建立政治经济权势网络及构筑利益聚合体，参阅楼春豪著：《印度财团的政治影响力研究》第四章和第六章，时事出版社2016年版。

[116]有关印度民主政体助长腐败及反腐的困难之分析，参阅梅新育：《大象之殇》第六章，第238—283页。

[117]参阅梅新育：《大象之殇》第一、第二及第五章；王静：《印度版“低烈度战争》，《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第六章。

[118]恐怖主义袭击指数是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制定的一项指数，评估某国家受恐怖主义袭击的风险。0是没有风险，10是最高风险。

[119]CNBC：美国NBC环球集团的全球性财经有线电视卫星新闻台。

[120]1平方米约合10.76平方英尺，则此地价约为1平方米18.3万英镑。

[121]梅新育：《如何评价印度经济与体制表现？》，《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6月下。

[122]可以对比中国1990—2017年平均工业年增长率为12.37%，而印度1994—2017年为6.61%。

[123]《印度政府公布年度预算案》，2019-03-09，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2/28/c 127529747.htm。

[124]《印度政府提交新财年预算》，2019-03-09，http：//intl.ce.cn/sjjj/qy/201602/29/t20160229 9182560.shtml。

[125]《亚投行各国话语权：中国股份超30%一家独大印度俄罗斯前三》，2019-03-09，http：//www.guancha.cn/strategy/2015 06 29 324999.shtml。

[126]《中国推“一带一路”印度推专项基金投资南亚非洲》，2019-03-09，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423/c1002-26892736.html。

[127]梅新育：《如何评价印度经济与体制表现》，《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6月下。

[128]实际的情况是，印度不仅没有在政策上尝试发展制造业，使经济“正规化”，而且反过来想利用非正规部门的成本优势。一个例子是，政府打算修订《劳工法》，把可以豁免正规劳动保障的单位雇佣工人数目提升，即让更多企业可以进行山寨式的非正规营运。

[129]蓬勃的房地产及基础建设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但这些岗位一般为低薪非正规雇佣。农业低收入与多年的农业危机使大量小农涌进城镇寻找生计，使建筑行业一直维持低工资水平。

[130]如果我们把新GDP算法的因素考虑在内，那么印度的工业极有可能处于负增长状态。本来在旧算法里，制造业增长为-0.7%，在新算法下却跃升至5.3%。

[131]另一方面印度财阀利用各种方式避减税务负担。例如，对印度的投资有20%来自避税天堂毛里求斯，可能是某些印度财阀为了避税采取迂回式投资。

[132]详细分析参阅我们的另一篇文章《第五次全球产业大转移与霸权兴衰的冲突》。

[133]最初同意加入本课题的印度尼西亚当地调研团队，在第一年的工作中就因私人理由退出了E7研究计划。在缺乏调研案例资料的条件下，E7课题组只能使用官方公布数据做分析。

[134]《2015年印度尼西亚的煤炭出口目标3.5亿吨》，驻印度尼西亚经商参处，http：//id.mofcom.gov.cn/sys/print.shtml？/ztdy/waimao/201412/20141200839085，2014-12-18。

[135]《金瑞期货：金瑞专题报告/中国进口煤市场形势分析——进口煤市场专题》，2019-08-09，http：//www.cngold.com.cn/dealer/jyshp/20190301f12105n4426555526.html。

[136]《2015年印度尼西亚棕榈油出口前景》，驻印度尼西亚经商参处，2014-12-12，http：//id.mofcom.gov.cn/sys/print.shtml？/ziranziyuan/jjfz/201412/20141200833601。

[137]《外部环境恶化，世行再次调低印度尼西亚经济增长预期》，驻印度尼西亚经商参处，2014-12-09。

[138][法]热拉尔·迪梅尼尔，多米尼克·莱维著：《大分化：正在走向终结的新自由主义》，陈杰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85页。

[139]2015年9月8日，印度尼西亚能源部宣布重新加入石油输出国组织。印度尼西亚的加入将使原油产量增加3%，接近历史最高值。

[140]《国际油价下跌，明年印度尼西亚油气领域投资增长受阻》，驻印度尼西亚经商参处，2014-12-15。

[141]《全球制造业转移的经济学分析》，经济观察研究院2015-11-11。

[142][法]热拉尔·迪梅尼尔，多米尼克·莱维著：《大分化：正在走向终结的新自由主义》，陈杰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84—185页。

[143]TEU：Twenty-feet Equivalent Unit的缩写，以长度为20英尺的集装箱为国际单位，也称国际标准单位。

[144]https：//freighthub.com/en/blog/container-ships-keep-getting-bigger.

[145]外部定价权是全球化条件下边缘化国家遭遇困境的核心机制：本国资源的市场价格由外部的霸权国的跨国公司定价，以使跨国公司能够压低资源出口国收益而在期货及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中获取资本利润，以此保证核心国的金融资本全球通吃。

[146]利伯维尔场制度即遵循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是对个人经济、思想、政治、信仰自由的保护。

[147]参阅徐以升：《巴西真相——为国际资本打工的净债务国》，《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报告》经济金融系列第28期，总第53期2012-05-14。

[148]周志伟：《巴西会成为下一张“多米诺骨牌”吗？》，《当代世界》2016年3月。

[149]李晓鹏著：《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年版。

[150]《全球制造业转移的经济学分析》，经济观察研究院2015-11-11。

[151]阎彦：《巴西深陷衰退泥潭》，《第一财经》2015-08-31。

[152]严瑜：《巴西：金砖能否重新被拭亮？》，《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10-30。

[153]陈季冰：《巴西：“未来之国”成长中的烦恼（上）》，《经济观察报》2014-07-14。陈季冰：《巴西：“未来之国”成长中的烦恼（下）》，《经济观察报》2014-07-21。

[154]陈季冰：《巴西：“未来之国”成长中的烦恼（上）》，《经济观察报》2014-07-14。陈季冰：《巴西：“未来之国”成长中的烦恼（下）》，《经济观察报》2014-07-21。

[155]《巴西总统批评发达国家制造“货币海啸”》，新华网2012-03-02。

[156]包蕴涵：《巴西经济增长遇阻》，《中国经济时报》2014-08-29。

[157]《巴西2016年外贸顺差创历史最高纪录》，http：//news.163.com/17/0103/07/C9RC8J6A00018AOQ.html。

[158]数据显示，2016年，巴西外贸总额为3227.96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1852.44亿美元，进口额为1375.52亿美元。

[159]《抑制本币贬值，巴西取消外汇衍生品金融交易税》，http：//www.cnforex.com/news/html/2013/6/13/cf0ad6e43474e02fe565a8abfa4bd402.htm，2019-09-01。

[160]严瑜：《巴西：金砖能否重新被拭亮？》，《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10-30。

[161]《巴西经济：春天在哪里？》，《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12-09。

[162]迟玉德：《巴西衰退之谜：一个“金砖国家”的突然崩溃》，华商韬略2016-08-17。

[163]参阅董筱丹、薛翠、温铁军：《发达国家的双重危机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转嫁》，《红旗文稿》2011（21），第4-9页。

[164]1823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向国会提出咨文，宣称：“今后欧洲任何列强不得把美洲大陆已经独立自由的国家当作将来殖民的对象。”他又称，美国不干涉欧洲列强的内部事务，也不容许欧洲列强干预美洲的事务。这项咨文就是通常所说的《门罗宣言》。门罗主义彰显美国控制拉美的野心，乃美国扩张主义者的历史理论依据。

[165]《2019年巴西罢工次数下降23%》，2019-09-08，https：//valor.globo.com/brasil/noticia/2020/02/19/numero-de-greves-tem-queda-de-23-em-2019.ghtm。

[166]《巴西通过弹劾总统报告经济衰退腐败严重引民众不满》，中国网2016-04-12。

[167]冉秉鸾：《巴西左翼政权的终结》，经略网2016-04-13。转引自ht-tps：//www.guancha.cn/PeiLi-AnDeSen/2016 04 14 356959 s.shtml。

[168]张晓添：《从黄金十年到衰退边缘：巴西危机启示录》，界面网2016-03-09。

[169]T.伊兹格塞拉：《你理解巴西政治危机的指南》，海螺社区2016-04-18。

[170]《自2000年以来针对拉丁美洲左派的6次政变》，2016-05-11，ht-tp：//www.telesurtv.net/english/news/6-Coups-Against-Latin-Americas-Left-Since-2000-20160511-0021.htm。

[171]保罗·弗莱雷（1921—1997），巴西著名的左翼成人教育学者及教育工作者，著有《受压迫的教育学》。

[172]肖邦·萨克塞纳：《政变浮出水面：使鲁塞夫、卢拉和巴西不安的阴谋》，2016-03-23，http：//thewire.in/2016/03/25/acoupisintheairtheplottounsettlerousseffIulaandbrazil25893。

[173]2015年年初，奥巴马批准国务院一项500万美元的拨款，支持委内瑞拉的反政府组织。国会支持的国家民主基金也拨款120万美元，支持反对派推翻马杜罗政府。此外参阅：[美]卡尔·吉布森，华盛顿如何玩弄委内瑞拉，《读者支持新闻》，2014-02-21。

[174]参阅伊娃·戈林格：《委内瑞拉：实时政变》，《反击》2015-02-02。

[175]在2015年12月6日的委内瑞拉大选中，由20多个政党组成的右翼亲美“民主统合联盟”（MUD）取得16年来的第一次胜利，赢得167席国会代表中的109席，加上可能与其结盟的三个原住民代表，总席次超过2/3，足以挑战与阻止执政的“社会主义统合党”（PSUV）的任何政策，也能召集制宪与修宪大会。在多重危机夹击下，委内瑞拉社会及政局日趋动荡。2016年9月，反对派号召群众前往首都进行示威，要求举行罢免总统马杜罗的公投。政治暴力事件愈益激烈，并日趋武装化，执政党执政之路越发艰难。

[176]《委内瑞拉称41.5%选民参加制宪大会选举投票，马杜罗宣布胜利》，环球网2019-09-29。

[177]这是美国总统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讲中的一句话。

[178]此外，委内瑞拉还蕴藏像重油、油砂油、页岩油等非传统石油储备，如果能用新采油技术开采，储量估计5130亿桶，几乎相当于目前已探明全世界传统石油储备的总量。

[179]《委内瑞拉2016年通胀飙升800%，经济萎缩》，2019-09-29，http：//news.cngold.com.cn/20170122d1702n118110490.htm。

[180]《21世纪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态势及社会主义前景——首届墨西哥普埃布拉大学前沿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7期。

[181]《委内瑞拉隆重纪念查韦斯逝世两周年——前路漫长》，中国新闻网2015-03-07。

[182]温铁军科研团队在分析中国农村外出流动打工劳动力即使失业回到农村也不参加农业劳动的现象时，使用了“被动闲暇”的概念，认为这些劳动力在农业上得不到被外部市场定价的收益。参见《三农与三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83]牛犁、闫敏：《新兴国家货币贬值对能源企业的影响及对策》，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2015-01-23。

[184]《委内瑞拉5年来首发50亿美元国债：救急必需品进口资金短缺》，2019-09-28，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 forward 1593476。

[185]《委内瑞拉遣返存英国的14吨黄金遭拒》，2019-09-29，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6623457960910485&wfr=spider&for=pc。

[186]《80吨黄金被“冻结”？委内瑞拉要求运回黄金被拒，那中国呢？》，2019-09-29，http：//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PI9LCX9。

[187]《委内瑞拉获中国50亿美元新贷款》，《中国产经新闻报》2015-04-29。

[188]王琳：《200亿美元！中委签订双边协定》，《第一财经》2015-01-08。

[189]《委内瑞拉将动用中国22亿美元信贷额用于增产原油》，2019-09-29，http：//futures.hexun.com/2016-11-18/86954079

[190]《中国与委内瑞拉达成增产协议》，2019-09-29，http：//finance.ifeng.com/a/20161124/15031939 0.shtml。

[191]《委内瑞拉2017年产油量要创历史新低》，2019-09-29，http：//www.cs.com.cn/xwzx/hwxx/201701/t20170113 5155133.html。

[192]管彦忠：《委内瑞拉12年农业生产增加三倍粮食50%自给》，人民网2011-02-23。

[193]吉里斯·古普塔、亚历山大·乌纳：《抢劫和骚乱每天都在晃动委内瑞拉》，路透社2016-06-13。

[194]如此低于开采成本的价格，不仅严重影响委内瑞拉、俄罗斯乃至沙特阿拉伯等主要石油输出国的收益，甚至对美国发展作物燃料和页岩气等计划造成压力。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美国的首肯，石油输出国组织怎能维持连本身的利益也受损害的低油价政策。

[195]“俄罗斯的石油产量和出口量位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沙特阿拉伯。2011—2013年，俄罗斯每年石油产量为5.11亿—5.23亿吨。……俄罗斯石油开采和石油加工企业的收入占俄罗斯全国税收和关税总收入的1/4。此外，俄罗斯1/3的外汇收入也来自石油企业。世界石油价格的变化极大地影响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石油价格与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关联性已经得到认真的研究：在2003—2012年的10年间，无论是俄罗斯以美元计算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还是乌拉尔原油价格，都增长了近4倍。2009年，石油平均价格下降30%也导致俄罗斯以美元计算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了25%。总体来说，根据俄罗斯专家的估计，世界石油价格每降低10美元，就会使俄罗斯国家财政赤字增加国内生产总值的1.4%。”资料来源：《论石油资源在俄罗斯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人民网国际频道2014-06-04。

[196]圣地亚哥·索萨：《新门罗主义》，2010-10-27，http：//colombiareports.com/the-new-monroe-doctrine。

[197]例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等，它们通过发展中国家的智库及学术界深刻影响这些国

家的政策制定。

[198]大卫·卢诺：《两个拉丁美洲：支持国家控制的集团和拥抱自由市场的集团之间的大陆鸿沟》，2019-09-10，http：//www.wsj.com/news/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337090457929635295143607。

[199]《新兴货币南非兰特升至三周高位，惠誉和穆迪确认南非评级》，2019-09-29，http：//money.163.com/16/1129/02/C70O5M0O002580S6.html。

[200]《南非华人遭遇劫杀和骚乱不断南非是华人天堂还是地狱》，2019-10-09，http：//gb.cri.cn/42071/2015/02/10/6891s4869908.htm。

[201]《南非骚乱暴露社会问题》，《人民日报》2019-10-09。

[202]《南非多地发生暴力骚乱中国驻南使领馆提醒注意安全》，2019-10-09，http：//finance.ifeng.com/a/20160603/14454776 0.shtml。

[203]《南非超过20万工人罢工称要让国家“陷入黑暗”》，2019-10-09，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703/c1002-25236239.html。

[204]《2014年南非罢工造成61亿兰特经济损失》，2019-10-09，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k/201509/20150901117355.shtml。

[205]《南非罢工活动势头再起》，驻南非使馆经商处，2019-10-09，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shz/rlzykf/201607/20160701357763.shtml。

[206]2013年7月13日该政党在约翰内斯堡南部塞博肯举行集会活动。2015年4月12日EFF开始在Ballito组织土地占据活动，同时搭建建筑。4月13日，他们在该处发放入党申请表格，同时向成员“分配”土地。其后警察驱赶，据报一名女子在逃跑过程中被车撞死，另外两名男子也被撞成重伤。（来源：南非侨网2015-04-14）

[207]克劳斯·戴宁格：《推进谈判的土地改革奏效：哥伦比亚、巴西和南非的初步经验》，《世界发展》，第27卷（1999），第651-672页。

[208]http：//www.africaresearchinstitute.org/publications/briefing-notes/waiting-for-the-green-revolution-land-reform-in-south-africa.

[209]HYPERLINK，“http：//www.new-ag.info/en/news/newsitem.php？a＝2961”http：//www.new-ag.info/en/news/newsitem.php？a＝2961.

[210]常伟：《南非农地制度改革前景展望》，《世界农业》2010年第9期。

[211]参阅温铁军等著：《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

[212]美联储宣布与外国央行设立临时回购协议安排。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早在2013年，美联储、欧盟、日本、英国、瑞士和加拿大六方央行达成了长期性货币互换

协定，形成了核心圈金融联盟。此次唯独将E7中的巴西纳入，达成央行临时货币互换协议，即相当于将巴西纳入半核心圈金融联盟，必要时施以金融援手。

[213]参阅黄胤英、王锦华：《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看美联储量化宽松对美国经济的复苏效应》，《经济学动态》2012（11）。

[214]参阅徐以升、许元荣著：《大分化：全球经济金融新格局》，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215]美联储是金融资本家们掌控全球的寡头组织，通过大量印发美元货币，向全球输出通货膨胀，来为金融资本创造垄断利益。

[216]《美联储令美国经济陷入"赢家通吃"的模式》，2019-11-01，ht-tp：//www.cs.com.cn/hw/03/201408/t20140827 4494379.html。

[217]但日本的政府债务已相当于GDP的220%，需要用41%的税收支付利息。日本央行已推行负利率。

[218]《美国"去杠杆"只是一场谎言？》，2019-11-01，www.wallstreetcn.com/node/103595。

[219]以重新解读凯恩斯而著名的经济学家明斯基指出，当经济周期进入上升期时，投资者借贷投资，首先是审慎具有偿还能力的对冲性融资（hedge fi-nance）。其后经济升温，投资者开始过分乐观，继而进行投机性融资（speculative finance），即借新债还旧债来扩张投资。随着经济过热，投资者进入狂热状态，即靠借新债来还利息的庞氏融资（Ponzi finance），最后游戏无法延续下去。当市场出现大规模的资不抵债的情况时，泡沫最终爆破，即被称为明斯基时刻。经济周期如是周而复始。

[220]《美联储加息之锤终于落地美元"一飞冲天"》，2019-11-09，http：//money.sohu.com/20161215/n475919350.shtml。

[221]《关于美国"例外主义"的分析》，http：//readersupportednews.org/opinion2/277-75/38812-focus-the-bloody-legacy-of-american-exceptionalism。

[222]参阅陈晓晨、徐以升著：《美国大转向：美国如何迈向下一个十年》，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版。

[223]《巴黎枪声书写石油欧元的开始——中国处在十字路口》，北京均衡博弈公共战略研究院2016-03-23。

[224]《全球制造业转移的经济学分析》，经济观察研究院2015-11-11。

[225]王林：《页岩气或为美创造87万就业机会》，《中国能源报》2011-12-15。

[226]"9·11"后的14年，有研究报告指出：美国的单边主义"反恐战争"实际令区内局势更加混乱。对比反恐之前，暴力恐怖袭击增加了6500%，死亡人数增加了4500%。美国军事介入的地区，恐怖主义袭击更为严重。经济及和平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的2014年报告指出，美国的军事介入导致地区的权力真空，结果不同的军事派系抬头，引爆暴力军事冲突。如果人们相信美国发动“反恐战争”的目的是减少恐怖主义的威胁，那么美国的战略可谓彻底失败了。参阅：Paul Gottinger，“Despite 14 Years of the US War on Terror, Terror Attacks Have Skyrocketed Since 9/11”，Reader Supported News，11 September 15。

[227]我们的分类与徐以升等略有不同。他们以美国为核心，欧日等为次中心，其他为外围。

[228]J.蓝多恩、R.达塔古普塔、J.瓜哈多、P.托帕洛娃：《资本流动不定：随时随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报告2013-08。

[229]徐以升：《日本重拾单边战略，中日东亚货币竞争来临》，《第一财经》2013-12-15；徐以升：《东亚一体化已告中断》，《战略观察》总第90期2013-01-07。

[230]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借助第二次世界大战削弱了宗主国的军事控制能力而得到独立主权的。其中，大凡通过与宗主国的谈判交易形成的政权，则其国家化进程尚无自主完成的条件，其本身已经具有内生性“主权残缺”的负外部性问题。此时纳入FTA（自由贸易协定）则意味着弱化甚至让渡国家经济主权，有“去国家化”的作用。

[231]中国理论界的主流认为中国是自由贸易的赢家，这似乎偏向于国内资本角度。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实际上没有赢家，中国对金融霸权国家长期做“双重输出——商品输出和贸易盈余输出”，留下的只是资源环境破坏和劳工福利损失。

[232]TPP的12个始创成员国GDP总量占全球的40%，相互间的贸易额占全球总额的26%。据报道，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接受财新传媒采访时直白地说：“贸易从来不是纯粹贸易。贸易也是‘谁是你的朋友、谁是你的盟友’的一种表达方式。”

[233]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认为美国牵头推动TPP的动机就是对付中国，他称“TPP是一种歧视性的多边贸易安排。目前而言，虽然美国并未在官方层面把TPP这个经贸安排与‘亚太再平衡’这个政治军事安排相提并论，但二者的联系显而易见，TPP就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经济支撑点。与此同时，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亚洲国家加入TPP，也含有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争取让美国继续加强在亚洲存在以制衡中国的意味”。引自《安倍访美谈判的TPP协议究竟是个什么鬼？》，《清华金融评论》2015-05-06。

[234]APEC：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

[235]《TPP达成基本协议，中国怎么破？》，新浪专栏2015-10-08。

[236]美国企业每年在政治游说工作上的开支达到26亿美元。

[237][美]诺姆·乔姆斯基：《TPP是一种新自由主义袭击》，2019-11-10，http：//www.salon.com/2014/01/13/chomsky tpp is a neoliberal assault/。

[238]参阅萨奇·美藏：《TPP及其批评者的介绍和请愿》，《亚太日报》2013（11）。

[239]陈惟杉：《中国对美国推动TPP持开放态度》，《中国经济周刊》2015-10-20。

[240]《TPP协议全文内容细节公布细数条款细节中的“魔鬼”》，观察者网2015-11-06。

[241][美]大卫·格雷伯著：《债：第一个5000年》，孙碳、董子云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242]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2015年1月28日的公告。

[243]查尔斯·皮尔斯：《是时候阻止沙特人了》，《时尚先生》2016-05-24；理查德·福克：《沙特阿拉伯与王室有罪不罚罪》，《中东之眼》2015-10-06。

[244]罗伯特·帕里：《乌克兰的新纳粹党》，《联合会新闻》2014-04-20。

[245]美国地缘战略专家布热津斯基早在1997年出版的《大棋盘》中已指出美国为了本身的战略利益必须对欧亚大陆施行美国霸权，防止俄国、中国或伊斯兰国家等任何欧亚对手崛起。为此必扩张北约，把欧洲紧紧置于北约之下。

[246]MI6：Military Intelligence 6，英国陆军情报六局的简称。

[247]温铁军、计晗、张俊娜：《中央风险与地方竞争》，《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4）。

[248]此前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是国家财政直接管理的专业银行，1992年开放市场经济以后，将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离。这一时期金融秩序混乱，形成大量不良资产，造成银行资本严重不足。1997年年底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成立华融、信达、长城、东方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将对应的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剥离，为其商业化改制铺平道路。

[249]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20世纪后半期已经发生核心国家从产业资本阶段向金融资本阶段的跃升。任何体制下的金融资本扩张都具有本质上的共性，即追求流动性获利而推进经济虚拟化，当前，这些特征得以借助互联网创造的虚拟空间和数字结算瞬间获取巨大利益而被冠以“现代金融”，愈益取代以“存贷汇兑”为主要业务、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标的传统银行体系。因此，金融全球化是世界上所有可称为金融资本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基本要求，美联储代表其利益也属题中之义。遂有伴随着金融全球化而出现的“金融资本无祖国”的投机做空趋势蔓延全球。

[250]2014年消费对中国GDP的增长贡献比例为50.2%，投资为48.6%，出口的贡献最低，只有1.2%。传统的三驾马车中，出口明显失速。

[251]刘元春、阎衍：《经济增速筑底关键期到来今年面临四大深层次风险》，中证网2015-06-20。

[252]王维丹：《今年A股最差IPO表现：国泰君安四天涨77%》，华尔街见闻2015-07-02。

[253]对此有不同估算，一说6.6万亿美元，见http：//news.10jqka.com.cn/20150828/c581335968.shtml；另一说为6.3万亿美元，见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5-07-30/934758.html。

[254]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nd/20150612/155922419742.shtml。

[255]张捷：《应加大对做空市场的监管规范力度》，《中国证券报》2015-07-02。

[256]http：//www.yicai.com/news/4671226.html。

[257]三峰：《A股股灾，金融战中隐现索罗斯魅影》，深察智库2015-07-04。

[258]参阅温铁军等编著：《居危思危：国家安全与乡村治理》，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第69—74页。

[259]《外资五步骤做空中国路线图郎咸平：高盛太可怕》，凤凰网资讯2012-12-02。

[260]《2008年中国股灾十八年不遇股民人均亏损达13万》，《中国证券报》，http：//news.cctv.com/financial/20081224/104792.shtml。

[261]《股灾周年祭：A股市值蒸发25万亿人均24万》，新浪网2016年06月11日，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t/2016-06-11/doc-ifxszfak3535841.shtml。

[262]参阅赵巍华、徐以升著：《旧格局与新周期：全球金融周期下的中国经济》，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5年版。

[263]参阅赵巍华、徐以升著：《旧格局与新周期：全球金融周期下的中国经济》，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16页。

[264]李扬等：《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杠杆调整与风险管理》，国家金融发展实验室2015-07-24。

[265]雷贤达：《中国债务水平难持续》，爱盈利网2016-05-12。

[266]SDR：Special Drawing Rights，特别提款权。

[267]本专题执笔人为黄钰书。

[268]本专题由薛翠整理。

[269]徐世澄：《巴西缘何会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2013-06-19，http：//www.hswh.org.cn/wzzx/xxhq/lm/2013-06-19/21409.html。

[270]陈季冰：《巴西："未来之国"成长中的烦恼（上）》，《经济观察报》2014-07-14；陈季冰：《巴西："未来之国"成长中的烦恼（下）》，《经济观察报》

2014-07-21。

[271]李继东：《经济停滞让巴西乱象不断》，《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03-21；《巴西百万人大游行要求弹劾总统》，BBC新闻2015-03-15；《巴西数十万人再次上街抗议政府腐败》，BBC新闻2015-04-13。

[272]林思含：《抗议示威又来了罗塞夫撑得住吗？》，《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08-20；《巴西数十万人示威抗议总统贪腐要求罗塞夫下台》，中国新闻网2015-08-17。



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

温铁军团队乡村建设实践篇

乡建笔记

新青年与乡村的生命对话

温铁军 梁少雄 刘良 ◎ 主编



版权信息

书　　名　乡建笔记：新青年与乡村的生命对话

主　　编　温铁军　梁少雄　刘良

责任编辑　李烨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社

ISBN　978-7-5207-125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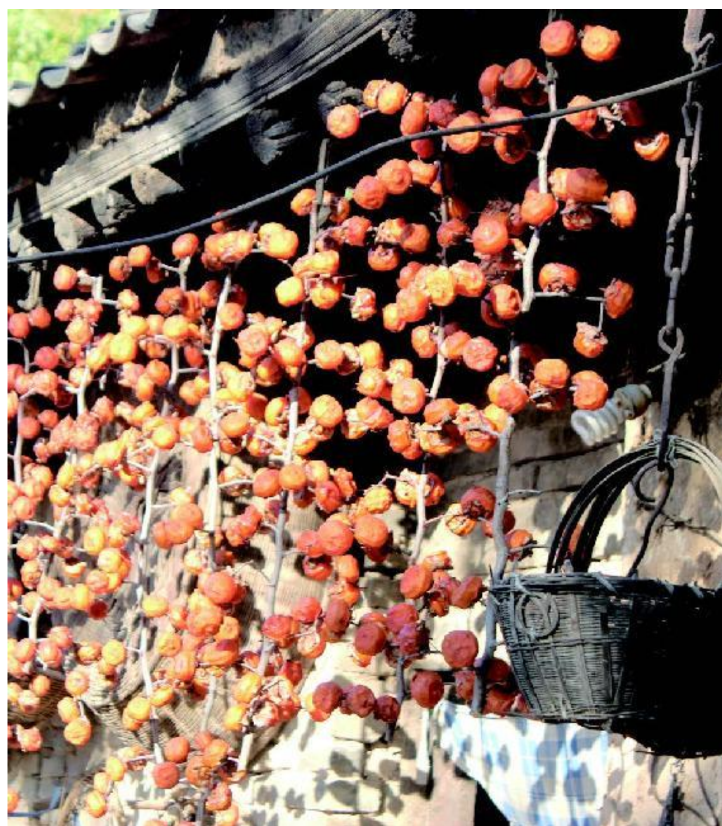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S

"国仁文丛"（**Green Thesis**）总序
前言
　　"一懂两爱"与"去精英化"的教育创新
　　乡村建设是人的建设——从自身经历来看人才培养
　　理想寓于行动中——实践式教育与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农村发展人才计划
　　种子的信仰
第一部分 守望
　　引言 两个历程的相互嵌入
　　1.1 一场悄悄的新时代乡村"乌托邦"实验
　　1.2 一位大学生的十年"下乡记"
　　1.3 问道乡间
　　1.4 乡村衰败下的合作社
　　1.5 从农中追求自主生活方式
　　1.6 "大时代"和"小时代"的缩影
　　1.7 潮流下的返乡青年模式
　　1.8 一个案例：一位农村媳妇的蜕变
　　1.9 一个从"支农"到"滋农"的成长历程
第二部分 求索
　　引言 从全球和历史角度看乡建
　　2.1 我与乡建：生命中的偶然与必然
　　2.2 试解生态农业的商业之困
　　2.3 一个合作社公益信托范本的打造
　　2.4 一位草根农民工的呐喊
　　2.5 我的另类生活体验——忆我的21—28岁
　　2.6 另类视角：一位退休人员的乡建探索
　　2.7 淌过的时光，留住的理想
第三部分 返乡
　　引言 返乡有种
　　3.1 隆化新乡村建设成功十年
　　3.2 少年白飞返乡记
　　3.3 彝族姑娘康丽的四次创业记
　　3.4 扎根家乡的大学生村干部
　　3.5 试着回到家乡
　　3.6 探索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第四部分 扎根
　　引言 "理想乡"蒲韩乡村建设纪实

4.1 向蒲韩“宝库”求索
4.2 在蒲韩打造理想的儿童学堂
4.3 扎根蒲韩：干十年看成效
4.4 一位大男孩的“生态养猪”
4.5“农二代”：从城市回归乡村的艰难心路
4.6 平凡大学生的下乡救赎
第五部分 家人
引言 新的幸福，新的生活
5.1 柿子树下的浪漫，一生一世的情缘——第一届乡建志愿者新幸福主义集体婚礼的幸福故事
5.2 喜事来啦！——第二届乡建志愿者新幸福主义集体婚礼的幸福故事
附录
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简介
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简介
梁中心人才计划及青年人陪伴工作大事记
致谢
后记
注释



人才计划四期结业典礼



晒柿饼的老房子



走访农户



擀面的手



黄河边的娃娃



养蜂人



乡村戏台

献给老石及所有一路同行的朋友！

“国仁文丛”（Green Thesis）总序

因为有话要说，而且要说在我们团队近期系列出版物的前面，[1]所以写总序。我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从被动实践中的主动反思到80年代以来主动实践中的主动反思，经两个“11年”在不同试验区的历练，[2]加之后来广泛开展国内外调查和区域比较研究，且已经过了天命之年……自忖有从经验层次向理性高度升华的条件，便先要求自己努力做到自觉地“告别百年激进”[3]遂有新世纪以来从发起社会大众参与改良、对“百年乡建”（rural reconstruction）之言行一致地接续，而渐趋达至“国仁”思想境界，亦即一般学人必须“削足”才能跟从制度“适履”、但只要纳入主流就碍难达到的“实践出真知”。

因此，我在2016年暑假从中国人民大学退休之际，要求为今后几年的一系列出版物担纲作序，也主要是想明了指出“国仁文丛”何词何意，亦即：这个丛书是什么思路和内涵。

一、释义之意

“国”者，生民聚落之域也。“上下五千年”是中国人开口就露出来的文化自豪！就在于，人类四大文明古国除了中华文明得以历经无数朝代仍在延续之外，其他都在奴隶制时代以其与西方空间距离远近而次序败亡。由此看中国，唯其远在千山万水之隔的亚洲之东，尤与扩张奴隶制而强盛千年的西方相去甚远，且有万代众生勉力维护生于斯而逝于斯之域，“恭维鞠养，岂敢毁伤”兹有国有民，相得益彰。遂有国民文化悠久于国家存续之理，更有国家历史传承于国民行动之中。

“仁”者“爱人”，本源于“仁者二人也”。先民们既受惠于光风水土滋养哺育的东亚万年农业，又受制于资源环境只能聚落而居，久之则族群杂处，而需邻里守望、礼义相习，遂有乡土中国仁学礼教上下一致维系大一统的家国文化之说，于是天下道德文章唯大同书是尊。历史上每有“礼崩乐坏”，随之社会失序，必有“国之不国，无以为家”。是以，“克己复礼为仁”本为数千年立国之本，何以今人竟至于“纵己毁礼为恶”……致使梁漱溟痛感“自毁甚于他毁”的现代性为表、横贪纵欲为里之巨大制度成本肆无忌惮地向资源环境转嫁而至人类自身不可持续！

据此可知我们提出“国仁”思想之于文丛的内涵：

中国人历史性地身处三大气候带覆盖、差异显著的复杂资源地理环境下，只有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各类社会群体兼收并蓄、包容共生，才能实现并绵延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性可持续。

这个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其中的、在亚洲原住民大陆的万年农业文明中居于核心地位的“群体文化”内核，也被老子论述为“阴阳之为道也”进而在漫长的文化演进中逐渐形成了极具包容性的、儒道释合一的体系。[4]

由是，在21世纪初重启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之后，我们团队试图把近代史上逐步从实践中清晰起来的乡建思想，寻源上溯地与先贤往圣之绝学做跨时空结合，归纳为人类在21世纪转向“生态文明”要承前启后的社会改良思想。[5]

是以，“道生万物，大德中庸。上善若水，大润民生。有道而立，大象无形。从之者众，大音希声”。[6]此乃百年改良思想指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之真实写照。

基于这些长期实践中的批判性思考，我们团队认同的“国仁文丛”的图形标志，是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那个可与西方文明对照的、扭合在一起的蛇身双人——创造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的女娲，只有和用阴阳八卦作为思想工具“格物致知”了人类与自然界的伏羲有机地合为一体，才有人类社会自觉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繁衍。蛇身双人的扭结表明在中国人传统思想中物质与精神的自然融合，既得益于多样性内在于群体文化规范而不必指人欲为“原罪”而出伊甸园；也不必非要构建某一个派别的绝对真理而人为地分裂成唯物与唯心这两个体系，制造出“二元对立结构”的对抗性矛盾。

此乃思想理论意义上的“国仁”之意。

行动纲领意义上的“国仁”十多年前来源于英文的“green ground”。

我们搞乡村建设的人，是一批“不分左右翼、但分老中青”的海内外志愿者。[7]大家潜移默化地受到“三生万物”道家哲学思想影响，而或多或少地关注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坚持的“三农问题”——农业社会万年传承之内因，也在于“三位一体”：在于农民的生产与家庭生计合为一体，在于农村的多元化经济与自然界的多样性合为一体，在于农业的经济过程与动植物的自然过程合为一体。

据此，我们长期强调的“三农”的三位一体，在万年农业之乡土社会中，本来一直如是。告别蒙昧进入文明以来的数千年中，乡村建设在这个以农业为基础繁衍生息的大国，历来是不言而喻之立国之本。

据此，我们长期强调的三位一体的“三农”本是人类社会转向生态文明必须依赖的“正外部性”最大的领域，也是国家综合安全的最后载体。

中国近代史上最不堪的麻烦，就在于激进者们罔顾“三农”的正外部性，把城市资本追求现代化所积累的巨大“负外部性”代价向乡土中国倾倒！于是，我虽然清楚“三农”本属于三位一体，也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和21世纪第一个10年特别强调“三农问题农民为首”主要是因为那个

时期的形势严重地不利于农民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弱势群体。实际上，也就是在做这种特别强调而遭遇各种利益集团排斥的困境中，我才渐行渐知地明白了前辈的牺牲精神。大凡关注底层民生的人，无论何种政治诉求、宗教情怀和文化旨趣，总难免因慈而悲、因悲而悯，在中国百年激进近现代史中，也就难免“悲剧意义”地、历史性地与晏阳初的悲天悯人[8]、梁漱溟的“妇人之仁”等，形成客观的承继关系。据此看，20世纪初期的“乡建派学者”也许应该被归为中国最早的女性主义。[9]我们作为继往开来的当代乡村建设参与者，有条件站在前辈肩上高屋建瓴、推陈出新，不仅要认清20世纪延续而来的中国“三农”困境，而且要了解21世纪被单极金融资本霸权强化了的全球化，及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巨大制度成本的制度体系。这个今人高于前人的全球视野，要求我们建立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世界观和宏大叙事的历史观，否则，难以引领当代乡村建设运动，遑论提升本土问题的分析能力。

从2001年中央主要领导人接受我们提出的“三农问题”这个难以纳入全球化的概念以来，即有一批志愿者着手复兴百年传承的“乡村建设”。部分年轻的乡建志愿者于2003年在距北京大约300公里之遥的河北翟城村创办起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一开始根本就没有外部资金投入和内部管理能力。因为这种民间力量为主的社会运动无权无钱，很大程度要靠热血青年们艰苦奋斗。那，年轻人激情四射地创了业，也激情四射地生了孩子，老辈们就得跟上支持和维护。十多年来，有一句低层次的话多次被我在低潮的时候重复：存在就是一切。只要我们在主流随处可见的排斥下仍然以另类的方式存活下去，就证明了超越主流的可持续。在最开始跟我们一起出资、出人共同参与村里主办的乡建学院的三个村外单位中，两个是海外的机构。[10]我们在跟海外机构打交道的时候，心里就觉着，应该给这个社会广泛参与的乡建运动将来可能形成的可持续生存系统，提出一个可以做国际交流的概念，一个符合21世纪生态文明需要的、大家可以共享的名号。于是就跟海外志愿者们商量，提出了这个英文概念“green ground”。若直译，就是“绿色大地”；若意译，则是“可持续基础”。如果把音译与意译结合起来考量，那就是“国仁”。有国有仁，方有国人国祚久长不衰。

从十多年来的乡建工作看，这三个意思都对路。

二、文丛之众

俗话说，三人为众。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如此看文丛，乃众人为师是也。何况，我们在推进乡村建设之初就强调“去精英化”的大众民主。[11]

前几年，一直希望整个团队愿意理解我试图“让当代乡建成为历史”的愿望。尤其希望大家能够结合对近代史中任何主流都激进推行现代化的反思，主动地接续前辈学者上一个世纪之交开始的乡村建设改良运动，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梳理经验教训。或可说，我“野心勃勃”地企图把

我们在新的世纪之交启动的新乡建运动，纳入百年乡建和社会改良史的脉络。诚然，能够理解这番苦心的人确实不多。[12]

这几年，我也确实算是把自己有限的资源最大化地发挥出来，“处心积虑”地安排乡建志愿者中有理论建设能力的人在获取学位之后分布到设有乡建中心或乡建学院的不同高校，尽可能在多个学科体系中形成跨领域的思想共同体。目前，我们在海内外十几个高校设有机构或合作单位，有数十个乡村基层的试点单位，能够自主地、有组织有配合地开展理论研究和教学培训工作，立足本土乡村建设的“话语体系”构建，已经有了丰硕成果。[13]

总之，我们不仅有条件对新世纪已经坚持了15年的“当代新乡建”做个总结，而且有能力形成对20世纪前辈乡村建设运动的继承发扬。

我们团队迄今所建构的主要理论创新可以表述为以下五点。

一是人类文明差异派生论：气候周期性变化与随之而来的资源环境条件改变对人类文明差异及演化客观上起决定作用。据此，人类文明在各个大陆演化的客观进程，至少在殖民化滥觞全球之前应是多元化的，不是遵循在产业资本时代西方经典理论家提出的生产方式升级理论而展开的。这个理论有助于我们构建不同于主流的生态化历史观。

二是制度派生及其路径依赖理论：不同地理条件下的资源禀赋和要素条件，决定了近代全球化之前人类文明及制度的内生性与多元性，也决定了近代史上不同现代化的原始积累（东西方差异）途径，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和体系结构，并构成其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这也成为我们开展国别比较和区域比较研究的重要理论工具。

三是成本递次转嫁论：自近代以来，在全球化所形成的世界体系中，核心国家和居于主导地位的群体不断通过向外转嫁制度成本而获取收益，得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实现产业资本扩张和向金融资本跃升，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底层民众则因不断被迫承受成本转嫁而深陷“低水平陷阱”难以自拔。当代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因不同利益取向而相互竞争的金融资本为主导、递次向外转嫁成本以维持金融资本寄生性生存的体系。在人类无节制的贪欲面前，最终承担代价转嫁的是“谈判缺位”的资源和生态环境，致有人类社会的不可持续之虞。

四是发展中国家外部性理论：二战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通过与宗主国谈判形成主权，这可以看作一个“交易”。任何类型的交易都有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因转交交易范围之外的经济和社会承载而为外部性问题，任何信息单方垄断都在占有收益的同时对交易另一方做成本转嫁，由此发展中国家谈判形成主权必有负外部性，导致难以摆脱“依附”地位。但，越是一次性博弈则风险爆发造成谈判双方双输的可能性越大，发达国家在巧取豪夺巨大收益的同时，其风险也在同步深化和加剧。

五是乡土社会应对外部性的内部化理论：中国作为原住民人口大国中唯一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其比较经验恰恰在于有着几千年“内部化处理负外部性”的村社基础，其中的村社理性和政府理性构成中国的两大比较制度优势。但政府同样是人类制造出来但反过来统治人类自身的成本高昂的异化物。遂有政府与资本相结合激进推进现代化之后严重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环境等负外向性问题，成为中国通往可持续的严重障碍，才有如此广泛的民众愿意参与进来，以期通过乡村建设使“三农”仍然作为中国危机“软着陆”的载体。

以上五点核心思想，主要体现于我们基于“本土化”和“国际化”两翼而展开的以下五个领域的研究工作中。

一是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在资本主义三阶段——原始积累阶段、产业资本扩张阶段和金融资本阶段，核心国家/发达国家总是不断以新的方式向外转嫁制度成本，乃是全球化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给资源环境可持续带来的最大挑战。这个思想，在我们的主要课题研究中，作为全球宏观背景，都有所体现，也发表在我们关于全球资本化与制度致贫等一系列文章中。

二是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团队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构建了“南方国家知识分享网络”开展了“新兴七国比较研究”和“南方陷阱”等发展中国家的深入研究。目前正在进行比较研究的新兴七国包括中国、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委内瑞拉、南非、土耳其。已经发表了有关文章和演讲，两部专著也在起草和修改之中。

三是国内区域比较研究。中国是个超大型国家，各区域的地理条件和人文环境差异极大，对各区域的发展经验进行研究、总结和归纳，是形成整体性的“中国经验”并建立“中国话语”的基础。团队已经完成了苏南、岭南、重庆、杭州、广西左右江、苏州工业园区等不同地区的发展经验的分析。已经发表了多篇文章，形成的专著也获得多项国家级、省部级出版奖和科研奖。

四是国家安全研究。国家综合安全是当前面临“以国家为基本竞争单位的全球化”的最大挑战。基于国际比较和历史比较，团队研究表明了新中国通过土地革命建立政权与其利用“三农”内部化应对经济危机之间的相关关系——从历史经验看，新中国在其追求“工业化 + 城市化 = 现代化”的道路上，已经发生了九次经济危机，凡是能动员广大农村分担危机成本的，就能实现危机“软着陆”否则就只能在城市“硬着陆”。团队正在开展的研究是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为依托，探讨如何从结构和机制上改善乡村治理以维护国家综合安全。

五是“三农”与“三治”研究。我们自提出“三农问题”并被中央领导人接受之后，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来研究乡村“三治问题”（指县治/乡治/村治）。自20世纪80年代农村去组织化改革以来，作为经济基础的“三农”日益衰败，而作为上层建筑的“三治”成本不断上升，二者之间的错配

乃至哲学意义上的冲突日益深化！其结果，不仅是农村大量爆发对抗性冲突，陷入严重的不可持续困境，还在生态环境、食品、文化等方面成为国家综合“不安全”的重要“贡献者”。比形成对问题的完整逻辑解释更难的，是我们如何打破这个“囚徒困境”。也因此，任何层面上的实践探索都难能可贵，即使最终被打上“失败”的标签，也不意味着这个唐·吉诃德式的努力过程并不重要，更不意味着这个过程作为一种社会试验没有记录和研究价值。

综上，“大乡建”体系之中从事研究的团队成员众多，且来去自由，但混沌中自然有序，我认为团队在这五个领域的思想创新，在五个方面所做的去西方中心主义、去意识形态的理论探索，已经形成了“研究上顶天立地，交流上中西贯通”的蔚然大观。仅“国仁文丛”的写作者就有数十人，参与调研和在地实践者更无以计数，收入的文字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创新性，且不拘一格。如果从我20世纪80年代就职于中央农研室做“农村改革试验区”的政策调研和国内外合作的理论研究算起，我们脚踏实地开展理论联系实际的科研实践活动已经数十年了。期间，团队获得了十多项国家级“纵向课题”和数十项“横向课题”获得了十几项省部级以上国内奖及一项海外奖。在高校这个尚可用为“公器”的平台上，我们团队通过这些体现人民大学“实事求是”校训的研究和高校间的联合课题调研，已经带出来数百名学生，锻炼了一批能够深入基层调研，并且有过硬发表成果能力的人才，也推进了分散在各地城乡的试验区的工作水平。

由此看，当代大乡建由各自独立小单位组成，虽然看上去是各自为政的“四无”体系——“无总部、无领导、无纪律，无固定资金来源”却能“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做出了一般海外背景或企业出资的非政府组织“做不到、做不好、做起来也不长久”的事业。诚然，这谈不上是赞誉我们团队的治理结构，因为各单位难免时不时发生各种内部乱象。但，乡建参与者无论转型为NGO（非政府组织）还是NPO（非营利组织），都仍愿意留在大乡建之中，否则再怎么干得风生水起也难有靠自己的思想水平形成“带队伍”的能力！若然，则乡建改良事业得以百年传承的核心竞争力，恰在于“有思想创新，才能有人才培养，才有群体的骨干来带动事业”。君不见：20世纪乡村建设大师辈出、试验点竟以千数，21世纪新乡建则学者咸从、各界群众参与者更有数十万！

这就是大众广泛参与其中的另一种（alternative）社会历史……

由此看到：发展中国家为主的“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打出的口号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而在中国，我们不习惯提口号，而是用乡建人的负重前行，在大地上写下“另一个世界就在这里”（another world is here）。

人们说，20年就是一代人。从2001年算起，我们发扬“启迪民智，开发民力”的前辈精神，在新世纪海内外资本纵情饕餮大快朵颐中勉力传承的“大乡建”作为大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改良事业已经延续15年了！再坚持5年，就是一代人用热血书写的历史了。

作为长期志愿者大家都辛苦，但也乐在其中！吾辈不求回报，但求国仁永续。唯愿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投身其中的乡建事业，在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中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以此为序，上慰先贤；立此存照，正本清源。

温铁军
丙申年甲午月
公元二〇一六年六月

前言



黄河傍晚

“一懂两爱”与“去精英化”的教育创新

温铁军[1]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时，要求培养“一懂两爱”（懂农业、爱农民、爱农村）人才。这很让人感慨！一方面，这项为国家贯彻乡村振兴战略所必需的与农民群众密切结合的人才培养工作我们已经做了十几年！我们这些年培养的深入“三农”工作的优秀人才恰逢其时地应该成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生力军！另一方面，尽管我们认真地培养“一懂两爱”人才，但是难免在颟顸腐朽的旧教育体制中遭遇“合规”困境，也势必受制于愈益西化的学科教条和学阀排异。那些被伪科学甚至真科学（田松：生态文明不光要反伪科学，还要反真科学）的形式主义维持着的制式教育体系，因内含复杂的利益机制而依然冠冕堂皇地横亘着！如此，乡村振兴的前路仍然会荆棘丛生……

青年志愿者支农下乡的时代背景

2001年，新世纪的第一年，我得到直接通知参加了由总书记召开的“三农”问题座谈会，会上我向总书记当面汇报“三农”问题，希望中央把“农业”政策导向改为“三农”政策导向。当时在参加那场中央“三农”工作座谈会的人中，我算是最人微言轻的，也是说话最直白、最没有任何顾忌的。当我把农村形势之所以很严峻，“三农”问题之所以越来越恶化，是涉及方针路线的重大问题的思考和盘托出时，中央领导表态是非常积极的，当时总书记说，我会负责任地把你反映的问题提交到政治局讨论。后来，中央全面接受了我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向强调的“三农问题”的概念，这是“三农问题”作为国家战略“重中之重”的背景。

此前，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有差不多十年的时间，一直是按照西方的农业政策思想去强调“农业”问题的。因此，我们强调“三农”问题，和有关部门强调“农业”问题，显然是不同的方向，或者说是不同的方针。我们对90年代农业政策的批评，主要是“眼中有数，心中无人”。新世纪初，有关部门即使很被动地接受“三农”问题这个说法，但还是坚持把农业排在第一位，农民排在最后。

从道理上，第一位的应该是农民，中国长期以来能够真正体现社会进步的，主要在农民组织化发展上。因为农民是中国的原住民，是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的生产生活和自然生态结合得非常紧密，农民的文化体现的是一种多样性的原则。因此，强调农民在“三农”中是第一位，不仅是因为要“心中有人”，要“以人为本”，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发扬靠农

民传承的这种农业文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和过去只讲农业生产、孤立地讲农业政策，有很大的不同。

第二位才是农村，其实我们是讲农村的可持续，反对那种“消灭农村”的极端化主张。如果没有农村作为载体，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无论是农业经济、农业生产，还是农民作为文化传承的主体，恐怕客观上都不能存在。

所以农民、农村、农业这三者本来是一体的，我们应该知道三点支撑是最稳定的，只有强调“三位一体”的“三农”可持续，才有农业的可持续。从2001年开始，中央接受了“三农”问题，并且在2005年将新农村建设作为中共十六大以后的重要国家战略提出。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转折，我们抓住了这个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就开始恢复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步的乡村建设运动，或者说乡村复兴运动。

最早强调乡村的是“村落主义”，它是1894年甲午国耻之后张謇下乡搞南通试验区的时候提出的，而“乡村建设”的概念，则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延安的革命者和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分别独立提出的。这个概念广泛的国际传播交流中被翻译成Rural Reconstruction，意思就是乡村或农村“重建”。后来国民党退出大陆到了台湾，在台湾用的是“农村复兴”这个概念，并且成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这个官方机构。

我们在2001年重启乡村建设运动的时候，考虑过不叫“乡村重建”“乡村复兴”“乡村建设”这些老的概念，应该叫作“乡村文明的复兴”，但是为了维持百年的传承，我们想还是延续着叫“乡村建设”吧。为了和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有所区别，又叫作“新乡村建设”。

当代的大学生青年志愿者下乡支农之所以兴起于2001年，正是因为当时中央已经接受了“三农问题”这个概念，这虽然一时间反响很大，但各地和各部门仍跟不上。由于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开始引起社会的重视，我们借此发动年轻人到农村去和农民直接结合，来了解“三农”、服务“三农”，这就变成了一个被社会大众广泛认可的趋势。如果只是少数几个知识分子发出批判，得到少数有一定觉悟的青年人响应，那是少数人做的，显然是个小众的事情；一旦和21世纪之初，全国认同“三农”问题这个新形势结合起来，就变成一个比较大的、有持续性的社会运动。

这是乡建运动在21世纪初得以复兴的大的背景。

从2001年重启乡村建设开始，到2019年已经有十八年了，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脉络，或者说一个很主要的内容，就是有很多青年志愿者下乡到农村去，参与农村的支农调研活动，被社会上称为“新上山下乡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出的骨干，还慢慢形成了鼓励年轻人下乡到农村去锻炼成才的“农村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其实就是想把那些不仅有心，而且还想在农村有为的年轻人培养成才。一般按照西方模式做的

那些高校是不可能开展这种人才培养工作的。

青年知识分子下乡的使命

我们的新乡村建设中，与20世纪前辈们类似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发动农民。因为只有让农民组织起来，才能集合谈判，才有谈判地位、有谈判能力，才有形成社会契约的条件。反过来讲，如果农民不能组织起来，那么高度分散的农民就不可能集中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如果农民不能集中地表达自己的利益，那么社会上的任何主体下乡与分散农民所签的合同，几乎不能得到有效执行，这个社会契约关系就建立不起来。人们都说，市场经济是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是信用经济，市场经济下的社会是个信用社会，但所有这些说法，只要农民分散，就都不可能成立。

在这种情况下，新乡村建设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内容，就是去农村基层帮助农民形成组织，当时以合作社作为农民形成组织的主要形式。这个工作大大早于国家的合作社立法，其目的无外乎是给市场经济要求的契约关系建立基本的组织基础。因此，即使从这个主流的角度入手，我们也要去发动农民。

接着，问题就来了，谁去发动？

似乎无人可用。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就一直在组织大学生下乡。

我当时在中央的农村政策部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我所在的联络组的一个重要工作任务，就是发动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到农村去跟农民结合，一方面开展农村调查，了解情况；另一方面把青年人的热心和能力，用于帮助农民，多多少少地促进农村的发展。

其实，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在农村政策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组织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下到农村去支农。当时我的领导后来也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的杜老杜润生，是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也是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主任，作为一位70多岁的老人，一位革命老前辈，他就对我们说："你们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发动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如果这件事情做成了，真的有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下到农村去了，这就是最大的成绩。"在杜老心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他是一直鼓励我们去做这项工作的。所以，80年代的农村政策相对比较有效，"一号文件"显得更受农民欢迎，原因之一，就在于当时组织了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下乡调研，体察民情。

但20世纪90年代就不同了，自按照西方的模式只讲农业问题以来，对农民权益、对农村发展问题似乎都忽略了。由此，鼓励青年学生下乡的中央精神，这个时候似乎也就淡化了。

直到21世纪中央重新强调“三农问题”，我们才再度发起青年学生下乡支农活动；随之也有国务院领导以批示或写信的形式，鼓励青年学生下乡。

这就解决了我们这个时候再想发动农民形成组织来建立合作社、来提高农民谈判地位、来稳定社会契约关系、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经济社会基础等等所派生的谁来帮助农民形成组织的问题。我们当然继续20世纪80年代农村政策部门的优良传统，培训大学生下乡，动员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就变成了解决“三农问题”的题中之义。

可见，要配合着发动农民组织，必然要发动青年学生下乡。

被主流挤压的支农下乡

早些时候，高校内部的两极分化还不是那么严重，确实有相当多的农村来的孩子，知道自己的父老乡亲是弱势群体，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村正在衰败，出于不甘心，就自发组织支农社团。正好也有了中央接受“三农问题”作为重大战略的历史性转变，同时我们的新乡村建设又是以发动农民为主，自然就会产生动员力，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在高校组织支农社团，然后开展下乡支农的活动。

这是新乡村建设的两个重要抓手，一个是农民组织建设，一个是学生社团支农下乡。这两者的紧密结合，就是在时代背景下所形成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新乡村建设的工作。

客观地说，我们的工作与当时主流所推进的市场化改革是相悖的。所谓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本身规律性地造成贫富差别拉大，市场化改革也就带有一种因主张市场经济而必然发生市场失灵的现象。市场经济在什么上失灵呢？在扶助弱势群体上失灵，市场只制造贫富分化，却不可能缓解贫富分化。市场失灵在什么问题上最严重呢？恰恰就是在贫富两极分化上最严重。那么贫富分化在中国客观的改革过程中，主要表现为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贫富分化也就主要是城乡的两极分化。当时我借托尔斯泰的话说，“幸福的城市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农村各有各的不幸”。把托尔斯泰的话搬过来描述城乡二元结构，很恰当。

大量的资本集中在城市，因资本集中在城市产生资本溢出效应，从而使得城市收入相对比较高。而农村是三要素流出，无论是资金、土地还是劳动力，这三个基本要素都长期大规模流出农村，导致农村是一个似乎被历史遗忘的角落。任何领域，只要三要素长期流出，一定是衰败的。所以，忽视三农而只强调农业问题当然会出现农民的贫困化，农村严重衰败，农业也就成为弱势产业了。

因此，按照市场化条件我们几乎没有做事的可能。正好2000年，我从农业部调到国务院体改办，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的社长兼总编，我利用单位法人代表的身份和《中国改革》这个媒体的平台，来复

兴历史上的乡村建设。我们当时关注三农问题，主要是农民组织和青年下乡这两块工作，就在杂志社建立了一个支农调研的小组织，吸引了很多各地有志于乡村建设事业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其中，天津科技大学来了一位教师，叫刘相波，他比较多地在从事大学生支农社团的建设，帮助学生下乡开展支农调研活动；另一个跟他配合比较紧密的叫邱建生，主要是在农村发动农民参加社区大学、组织合作社。他们俩就成了杂志社这两方面的实际负责人。因为要强调对民国年间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等前辈们的继承性，后来刘相波就发展出了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邱建生就发展出了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

我在杂志社大概就做了三年，从2001年到2004年，正是在这段时间，乡建算是初步恢复起来了。此后，我们自己也感觉到作为弱势群体的困难重重。到2004年前后，乡建团队和杂志社追求利润的理念渐行渐远，那就只好离开。

离开以后，各单位就没有依托了。当年毕竟还有这么一个办公场所，还有这个中央单位的名义，还能利用一点媒体资源，而一旦离开之后，就不能再使用官方资源了。怎么办？

幸好在这三年间，我们已经在各地培育出来一大片学生社团，形成了几十个农民合作社，大学生作为青年志愿者下乡去跟农民结合，也已经蔚然成风，还得到了不同来源的项目。所以刘相波的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虽然被甩到了社会上，但无外乎是调整了一种生存方式。2003年我们在河北定县的翟城村成立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后来邱建生的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也扎根在那里了，主要是在村里工作。

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主要的工作是发动大学生参加培训和下乡支农，这块的影响相对就比较大，但由于那个时候没有经费租办公室，有半年到一年时间，连放个办公桌的地方都没有，几经周折，在北京郊区找到了一个可以待下来的地方，可见这件事情能坚持下来实属不易。再后来，有了一些资助单位，得到项目经费，可以支持青年人长期扎到农村实践，也就是现在的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简称“人才计划”。这样，就把动员青年志愿者下乡的工作维持了下来。

这在当时都是难能可贵的。我和刘相波都没想到后来演变成“新时代上山下乡运动”，还有了这么大的社会影响……

对制式教育的颠覆

动员青年知识分子下乡做志愿者，还得考虑这些青年小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本身是否适合去跟农民紧密结合。这不怪青年人，也不怪教师，而是要归因于这100多年来的历史是一个追求工业化的历史，而在工业化的历史之中的教育，就得符合工业化的要求。

工业化的要求是什么呢？我老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大家都看过卓别

林演的《摩登时代》，电影里就把卓别林这个活生生的人，生硬地按照机器流水线的要求，标准化地改变他作为人的动作。这个喜剧批评对人的扭曲，跟工业化时代配套的现代教育的内涵是一样的。

现代教育中有一个重要的理论，说教育是个工具，是把人力资源转变成人力资本的工具。接着人们要问：变成人力资本要干什么？那就是配合产业资本，为产业资本服务。所以，现代教育体系的真实内涵，就是把人的其他属性，如社会属性、自然属性等，尽可能地弱化，只要加强符合产业资本的属性，这个属性就是人力资本属性。

由此形成的教育就是制式教育。

制式化教育的客观结果就使得大学也好、中学也好，从小所学的都是一个标准的制式教材，甚至要全国统一教材。这种现代教育所训练出来的青年学生的知识结构，就根本不适合农村本身的多元化的社会存在，因为农村是“十里不同风”，农业是跟当地的自然、资源、气候、地理等方方面面的条件紧密结合的，所以农业知识也主要是在地化的，这是高山区的，这是黑土地的，这是红土地的，这是黄土地的，这是石灰岩地区的，那是海边的，那是林区的，那是草原的，那是湿地的……千差万别的农业是很难被集中统一形成标准化知识体系的，它需要分散的适合在地化的知识生产。可现在的教育体系当然不可能包括在地化知识。所以，参照美国学科搞农业类的制式化高等教育现在非常困难，青年人很不愿意上农业类学校，学的知识越标准化，就越无法把所学的知识拿到多样化的农村去用。

由此不难理解，当我们把青年知识分子组织起来下乡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自己的知识很难在乡土社会的实践中得到应用。这是一个重大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带着这种制式化教育体系灌输给他的标准化知识体系，能下乡吗？下乡能跟农民结合吗？所以，为什么梁漱溟乡建中心相对稳定了以后，就要搞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就是因为越来越多地感觉到，这些高学历的青年人其实既不适合农民，也不适合农村和农业。也就是说，“三农”的客观需求跟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体系之间，存在严重的矛盾。

这件事搞起来很有意思，很多企业家跟我说：“温老师，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人才，有多少我们要多少。”这些年来，梁漱溟乡建中心培养出来近两百名人才计划的学员，几乎供不应求。为什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它对现在的主流教育是颠覆性的，即我们要求这些人下乡的时候，先把在高等学校所学的知识放一边。我们强调说，乡村这块热土所需要的是对大自然心存谦卑的人，大多数依靠教科书知识的学生并不是这种乡土人才，未必适应“三农”需求。而青年人一旦适应了“三农”需求，今后干什么都行！只要没有任何“身份”“标签”地下乡，在农民群里磨砺着待够一年，今后干什么还干不成呢？

从这个角度看，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这个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实质上针对的是现在这个形式主义的制式教育叠加了教育产业化所形成的反社会的诸多弊病，恰恰是一个突破性的创新；相对现在这套完全西化的，以标准化知识、制式化灌输来服务于人力资本化的教育体制，是一种颠覆性的创新。今天的所谓万众创新，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就是颠覆性的创新。而人才计划这些年培养出来的人才之所以被社会广泛需求，就在于这才是真正的教育创新。

总之，人才计划这种方式，是一种跟实践结合、跟国情结合、跟农民结合的，培养“一懂两爱”人才的教育方式。

去精英化的乡村建设

人在两手空空的时候，出于事业需要往往得四方杂处、八面太极，但我也深知“人怕出名猪怕壮”的道理。我从小是个安安静静的读书人，本来没打算做这么多事情，更不愿意突出个人。如果一个事业的成败只系于某个人，那么这是很危险的趋势，从治理理论的角度说，这个人必须开除，否则这个事业很难可持续。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有非常明确的群体意识，几十年来我们动员这么多青年学生下乡做“三农”工作，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虑：这不是哪个人的事情，而是大众的事情！

最近，我在一次演讲中说过，乡村建设最大的特点就是“去精英化”。我跟身边很多人讲，我们这一辈人经历了很多波折甚至苦难，只有不到5%的人奋斗出来了，有的人考上大学、出国，有的人成为企业家，还有的人成为社会的精英……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了身边95%的人。大多数我同辈的知青，经历过一起上山下乡，一起搞群众运动，后来一起回城成为待业青年，最后一起下岗，现在成为低收入人群，这些人是95%。不能因为我们这代人中有5%奋斗出来了，就把周围的95%忘了！

宽泛地说，95%的人也包括大量没有从农村出来的人。

所以，从我个人来说，要实现一个“去精英化”的社会实践，就是“没工夫叹息”，甚至没工夫琢磨，因为永远觉得跟不上身边的人，永远觉得学习不够，那就永远在奋斗着。

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有这么一种自觉地“去精英化”的思维，就是不能忘记当年我身边95%的人，它使我一直不愿意跟着占5%的精英的主流思想走。因为在精英的主流思想中，很容易产生这样的认同，即这个世界所产生的财富，主要是精英群体带着社会向前奋进所形成的收益，当然应该由精英占有，并且由精英来分配，所以精英认为，一次分配应该体现精英贡献，再通过二次分配来扶助弱势群体，由此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安排。

这个观点在主流中确实很有市场，但我不这么看。虽然我是奋斗出

来了，但难道只有这种方式吗？难道没有其他相对来讲更为公正的方式吗？难道一定要把95%的人应该享受的那部分先由精英来独占，然后再做二次分配吗？我不觉得那是一个必须认同的思路，所以我们主张大众民主，主张多元共生的社会，主张可持续发展，主张人类的生活、生计与生态“三生合一”的生态文明。这样的声音就变成了不同于现在主流的另类主张。

因此，我也把乡村建设认同为一种“去激进化”，其中包括很多对于古老文明的继承，比如我认为必须“三省吾身”，也必须相信“阴阳之为道也”，相信“上善若水”。当人一旦自觉地要“去精英化”的时候，就会把古人的传统智慧继承过来，自然而然地也就变成相对比较认同生态环境可持续包容性发展的思想。

因之，我经常总结说我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信邪！如果信邪，那么善就会大打折扣；不信邪才能做到上善若水，才能做到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些就会在一点一滴中体现。

也因此，对于青年人的下乡，我们向来不主张用精英化的思维来做成王败寇的判断。如果有人当面批评，我也笑眯眯地照单全收，不做任何解释。

至此，如果要用一句话结束，无外乎是当年讲的“世界是我们的，做事靠大家来”。

乡村建设是人的建设
——从自身经历来看人才培养

张兰英[1]

引言

时间荏苒，老刘[2]离开我们已经7年了，也是我到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7年。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农村青年人才培养计划也走过了13年。在这13年中，人才培养计划在实践中不断反思总结，不断完善培养模式，并在社会大背景的变化中勇于创新，不仅逐渐构建起多样形式的在校理论思想培养模式，还进一步地深入社会最基层的乡村的体验、乡村工作的学习和实践模式，同时培养专业技能、改造自我，探索一种扎根乡村、构建可持续生活的创业模式。这种锲而不舍、脚踏实地地对理想的追求，让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这些年轻人的责任担当，也不禁让我回想起自己年轻时所走过的路对个人成长的帮助，从而反观人才培养、能力建设的方式和方法。

在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推进的形势下，我感受到培养当代年轻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经历了过去30年发展的我对于年轻人的成长责无旁贷。因此，我愿意以此文来总结一下我的成长经历，看看过去走过的路与个人成长和人才培养的关系，思考当下的变化和趋势与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的关系，以及未来在乡村振兴中对“一懂两爱”人才的培养重点。

转轨：从个人成长看人才培养

我参加乡村建设的工作比较早，但并不是在国内，而是晏阳初先生在菲律宾创办的国际乡村改造学院[3]。1989年，我从北京大学小语种（印度尼西亚语和菲律宾语）专业毕业，留校开设菲律宾语专业课。为了更好地开展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我被派到菲律宾大学进修一年。在进修期间，偶然的一次翻译机会，改变了我的人生。

那是1990年10月，晏阳初创办的国际乡村改造学院（IIRR）招募中英文翻译，为参加一个月的农村可持续发展培训班的三位中国朋友做同声翻译。一位曾经到过IIRR的泰国同学推荐了我，告诉我那位创办人非常伟大，与世界十大革新家齐名。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晏阳初的名字。虽然那时还不是很自信自己的同声翻译水平，但是出于好奇，我还是报名申请了这个临时翻译的工作。由于我会讲中文又会讲菲律宾语和英语，非常符合他们的要求，经过面试后，我被选中了。正是这次经历，让我走上了乡村建设的道路。

晏阳初先生于20世纪20年代在河北省定县开展了十年的乡村建设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乡村工作经验。在推动乡村建设的经历中，他充分认识到“财与才”的重要性。40年代出国后，他辗转于各国。50年代应邀在菲律宾开展了乡村建设的试验工作。他在1985年和1987年先后两次回访中国，恢复了与国内的联系，和国家教委建立了合作关系，从此开启了乡村建设的回国之路。第一项合作内容就是邀请国内的同行参加国际乡村改造学院组织的为期一个月的农村发展管理培训。

这个培训是为全球从事乡村发展工作的项目管理者准备的为期一个月的培训课程，也是在多年实践、研究的基础上，总结提炼成的精品培训课程。每年只举办两期，每期最多30人。该培训内容，包括从乡村建设理论学习到乡村问题分析，从宏观趋势了解到发展理论方法的学习，从实地参访学习到方法工具的运用，是比较全面的理论到实践的培训课程。1990年10月的这期培训，有3位来自国内的同行，其中一位是曾经与晏阳初先生在定县开展卫生教育工作的陈志潜先生的女儿，还有两位来自南通市环保局。因为他们的参与，才有了我为他们做同声翻译的机会。

在这一个月的翻译过程中，我有机会更多地了解了晏阳初先生所从事的乡村建设的历史，还加深了我对乡村建设的理念、方法和路径的了解。晏阳初说，“我们要建设一个新社会，就必须基于改造一个旧社会。不能抛弃所有的传统”。从20世纪20年代开展平民教育运动到十年河北定县试验，从菲律宾Nueva Ecija五年乡村建设试验到60年代在菲律宾成立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从试验点的实践出发，不断研究总结实践中形成的经验和教训，形成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不断循环螺旋上升的学习模式，并结合当时的国际发展理论和参与式方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乡村建设理论和方法论，并在此基础上，按照成人教育理论，系统地开发了乡村建设理论和方法的培训课程。

这个经典的培训课程培养了众多从事乡村建设的人才。截至1990年1月晏阳初先生去世，他已经通过自己建立的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培训了上万名乡村建设的管理人才和乡村综合发展的协作人才，推动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开展相应的乡村建设工作。作为一个中国人，远在异国他乡，在不同的社会体制下，晏阳初先生仍然能够不忘农民的“苦”与农民的“力”，致力于培养推动乡村生计、教育、健康和自治的综合发展人才。他的一生，不求回报。为了“天下一家”的和平理想，他全身心地奉献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他的经历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看到了这项工作的非凡意义。

这次经历改变了我的人生。当我即将从菲律宾大学菲律宾语言学专业（我是第二个获得菲律宾语言学硕士的外国人）硕士毕业时，国际乡村改造学院的校长找到我说：“能不能来这里工作，负责中国项目？”那时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和国家教委有一个3年的合作项目，正好需要一个懂中文又懂本地语言的人。IIRR的校长已经和国内的合作单位——国家教委“星火燎原”计划的负责同志沟通过，他们一致认为我是最合适的人

选，会中文、英文和菲律宾语。我欣然地答应了，因为我喜欢这样的工作。

这个决定成为我成年以来第一次做出的最重大的选择，而这个选择也就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每个人的人生选择相对比较单一，按照当时的社会状况，一个人会按部就班地从小学读完进中学，高考到大学，大学后分配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是政治生涯和学术研究不断提升和深入的人生轨迹。直到我出国之前，我的人生也是这样四平八稳的。我如愿地考上了北京大学，并在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众人羡慕的大学老师。我的老师希望我像老母鸡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孵化更多的小鸡"的人才培养上。如果按照当下的选择，进入大学可以很安稳地做学术研究，努力尽快地从一名讲师成为令人尊敬的大学教授。但那时，我想的是：要是回北京大学教书，可能只有七八个菲律宾语的学生，而且不是每年招生，虽然还可以做一些菲律宾的国别研究，但领域和视野都聚焦在一个国家（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全球化），而我更喜欢国际乡村改造学院的农村工作，与农民打交道，开展农村教育，推动可持续农业发展、社区健康、乡村自治和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的工作，可以不断地增长学识，开阔视野。因此，面对这样一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机会，尽管我是在异国他乡，尽管面对未来存在的诸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为我还很年轻，一切的一切都无法阻挡我践行自己理想的冲动，实现人生价值的决心。

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是一所以实践经验为基础的培训机构，也是最早基于中国乡村建设经验、结合国际发展理论构建的一所培养乡村发展人才的培训学校。晏阳初认为，做乡村建设工作，人才和资金是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条件。对于人才培养，晏阳初有一句名言："知识是可以传授的，但精神只能是捕获的。"精神的原动力来自你内心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而人生价值的体现则在于你对社会的贡献。

晏阳初乡村改造学院的人才培养，希望每个乡村建设的工作者，都具备基督徒的爱心、科学家的头脑和军人的行动力。在具体的培训课程设计和落实过程中，非常注重从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出发，以成人学习特点为原则、经验交流为基础，来提升心、手、脑的综合能力以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这一套以认知理论为教育法来规范培训课程设计的专业性，包括培训前的需求评估和课程设计、执行培训中的不断反馈和调整，到培训后的总结评估一套完整的流程，让我在后来的乡村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中受益匪浅。

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在1993年与国家教委、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横县人民政府共同建立了综合教育示范区，这是自晏阳初先生1985年回国后开展的首个乡村建设试验点。

20世纪90年代初，应试教育成为教育的核心目标，农村孩子学习的知识大多是以服务城市为目标，他们的祖先世代从事农耕所积累的传统智慧和经验成为落后的标志。对于农村孩子来讲，唯一的目标是好好学

习，脱离农村。但对于农村的孩子，由于教育质量的差异，他们中大多数还是要回到乡村，而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在他们回到农村后全无帮助。发展得红红火火的乡镇企业，以及现代化农业推进而导致大量化肥、农药、除草剂的使用，不仅对土壤、水和大气造成污染，同时还带来众多的职业健康问题。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在国家教委的星火燎原农村教育计划下得以开启这个农村综合教育合作项目。

我有幸全程参与了这个合作项目，包括与各级政府沟通交流达成合作共识的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从调查研究到项目开发，从策划到参与式计划，从执行到监测评估的项目管理，从运用参与式工作坊编写环保教材到开展系列的交流学习和可持续环境教育培训等，从而得到了全方位学习和锻炼的机会。

想起那段经历，经常是没日没夜地工作，也经常碰到困难和阻碍，虽然感觉很艰难但也是成长最快的阶段。由于农村综合教育合作项目将生态学、环境与健康、公共卫生与职业健康等多个领域融合在成人教育的框架下，而环境教育与职业健康，尤其是生态理论，在那时还是比较超前的，我们也需要边做边学习。

我仍然记得编写教材的经历：由于我们运用参与式编写工作坊编写的教材修改变动比较大，不仅要翻阅大量的环保书籍，翻译补充相关文章的内容，同时由于有大量的插图排版不是很规整，就需要每行都有一些变动，而这个工作都是需要一行一行地用刀片切割各行字数，然后逐行粘贴完成的。我做了三次编辑修订和粘贴排版的工作，经常是为了赶时间工作到半夜。但值得欣慰的是，我对整本书的内容也记得滚瓜烂熟，让我对环境保护工作更加关注和投入。

我仍然记得三个月的农民田间学习培训学校辅导员培训班（TOT）的经历：三个月，每周三天的培训，我需要先把课程从英文翻译成中文，自己先学习消化，再通过邮件和远在菲律宾的同事沟通，然后准备三天的培训课程。我们每周下田观察水稻生长情况，观察、认知田中各种昆虫的生活习性和相关数量与水稻的关系，我们开展使用和不使用化肥和农药田地的对比试验，还请当地的技术人员分享水肥管理的经验、交流治理害虫的技术、农户的交叉参观学习等。当我们在收获后，计算颗粒数与重量时[4]，各种益虫一起出现在我工作与居住的房间里，我想这是它们来“道谢”的吧，由于没有使用农药，它们才得以生存。我心中油然感到非常兴奋和充实，那时的情景，今天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我仍然记得在横县面临垃圾无地填埋的困境时，我们迎难而上，在中国还没有在县城成功进行分类先例的条件下，开启了县域垃圾综合治理的试验。在借鉴了少之又少可能经验的基础上，组建了政府指导小组，形成了政府、社会组织和技术部门三方共同参与的执行小组，分别从社区发动、技术策划和政府部门的统筹协调上分工协作配合。在长期环境教育的基础上，实现了家庭干湿分类，收集过程中干垃圾分类回收、湿垃圾堆肥还田，废弃垃圾填埋和有害垃圾贮存的有效分类管理体

系，并建立了分类后垃圾处理系统有效衔接的生活垃圾综合处理系统。

在工作期间，我还获得了亚洲发展银行的奖学金，有幸到亚洲管理学院攻读为期一年的发展管理硕士学位。亚洲管理学院是按照哈佛大学的管理学院系统，针对有一定工作经验但需要提升的社会发展工作者，通过案例教学法，协助学生系统学习战略规划、资金筹措和财务管理、机构发展和人力资源管理、项目管理和推广宣传，以及农业产业链发展、社会性别、小额信贷等专业领域的内容，从而能够将自己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教训进行梳理，进一步充实相关知识和经验，并通过论文做出未来希望开展的工作计划。我当时的设想是进一步深化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和国内扶贫领域的合作，将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扶贫工作与自下而上的社区自主发展动力相结合，更好地推动可持续的乡村建设工作。

从在国际乡村改造学院这样的非营利组织中工作学习的经历来看自我成长，这段经历非同寻常。首先，该学院是最早的一流的从事农村工作培训的机构。该学院提供的培训是基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试验经验和最前沿的发展理论和行动方法，培训既专业系统，又具备思想和可操作性，培训的人员都是具有一定实践经验和研究能力的资深社会发展工作者。所以到这里学习起点高，犹如民国时期的黄埔军校。其次，多元文化的工作环境和国际机构的发展脉络及其变化，增强了个人的社会阅历，拓宽了国际视野，认识到战略定位的重要性与机构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关系。同时，在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多元文化环境中工作，培养了不同语言由于语气和语法的不同而可能造成的理解上的差异的敏感性。再次，社会组织的共同特点是一人承担多个功能，能者多劳，这很锻炼人。社会组织的共同特点是资金有限和不稳定，所以需要每个人可以承担多功能和任务，这就让青年人得到了各种锻炼。我的岗位是中国项目协调员，只要与中国相关的，都需要参与和协助，从翻译到联络，从协作者到培训者，从项目管理到监测评估，从规划到执行，很多时候都是超负荷工作，但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讲，尤其早期成长阶段，能够得到一个全面锻炼能力的机会有助于形成综合性思维和组织协调统筹能力。最后，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又有一个机会去学习，重新补充知识和能量，同时也是一个总结过去、计划未来的过程。

我认为，我的成长正是因为有国际乡村改造学院这样的学习平台，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让我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在这样多元文化的环境里学习乡村建设的理论和方法，全身心地投入这项事业，在乡村建设这项工作中得以成长和成熟。这段经历不仅引导我走上了乡村建设的道路，让我内心一直追求的理想获得了一个可以践行的平台，同时还在各种专业培养和技能提升方面提供了边做边学习的机会，尤其是与世界接轨的项目管理、专业协作等方面，让我成为一名乡村建设的实践者、项目管理者和培训协作者。及时的深造也为未来的发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管理和计划的专业基础。

接轨：从机构需求看人才培养

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急速变化的年代，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各个领域都在积极地与国际接轨，而在吸纳多种思潮的影响下，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多元化景象。我突然发现，在国外开展国内工作无法跟上社会变化的步伐，尤其作为一名乡村建设工作者，无法了解乡村的巨变是致命的。而中国扶贫工作和乡村也在蓬勃发展，中国的扶贫攻坚工作和国际合作项目需要更多的人才来承接，人才培养也非常迫切。于是，自认为在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学到并具备了项目管理和培训开发与管理的能力，希望与国内发展领域的工作更加密切结合，接轨国内发展工作，我便在2001年5月回到了国内。

我先加入在西南成立比较早、在国内做得比较好的民间组织之一——云南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做能力建设的工作。我参与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作为培训协作者，与合作的国际机构中的培训团队一起，在西南三省共同开展妇女领导力的培训。这次培训为后来在行动援助组织开启的青年发展项目奠定了基础，尤其在领导力的培养上。我们认为领导力是内心力量的表现，具体体现在自身追求生命意义过程中建立的自强、自信和自尊，落实在社会上的“有所作为”。虽然每个人都与众不同，但人生来是平等的，生命赋予每个人所具有的潜能是均等的。领导力是人与生俱有的潜能之一，是发自内心地追求人生价值的一种动力，是力量的源泉。这种动力引导每个人在实现自我成长、自我赋权和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中实现最大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影响。知识和技能等只是领导力发挥的辅助工具。

2002年，我应聘担任了以扶贫为核心工作的国际组织——国际行动援助（Action Aid International）的国别主任。作为女性，能够获得在60个国家开展工作的国际机构的首席代表和负责人职位，足以体现这家机构践行本地化和女性平等发展的理念。

也就是在开展行动援助工作的过程中才有了青年发展计划这个项目。

行动援助在中国开展工作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才短缺。虽然行动援助有稳定的筹资渠道和资金捐助，有依据本国实际情况开展扶贫工作的政策环境，也和政府部门签有扶贫发展的合作协议，但是缺乏执行力，缺乏具有领导力、能够扎根乡村的青年人才去落实相关的工作。这样，不仅不能很好地利用这些资源和政策，由于不懂农村，还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行动援助一直强调社区主导的自我发展模式，工作人员必须长期扎根乡村，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工作中了解乡村、向农民学习，发现乡村带头人，并与他们共建社区，这样的工作需要工作人员具备社区工作经验、整合各种资源，发挥政府、乡村和行动援助各自优势的协调组织能力；不仅如此，由于整个世界在进入全球化的发展阶段，我们还要求工作人员要具备国际视野，了解全球化，尤其是WTO对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影响，在这种微观与宏观的互动比较中，注重发现给乡村社会带来的变化和影响，并积极地开展相关的政策研究和实践探索，以期保证农民的利益，保障农民的基本权益。

作为机构的负责人，为了更好地履行机构的使命，解决机构缺乏农村发展工作的人力问题，我在2003年邀请了在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工作的同事Vicky来到中国，一起着手开发青年发展项目。在2004年一年准备的基础上，2005年我们招募了第一批志愿做乡村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将他们派驻到行动援助开展贫困工作的河北省和贵州省，开始了他们为期一年的实习学习，同时协助开展机构的相关工作。这一年，也是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开启农村人才培养计划的第一年。

行动援助的青年发展项目自2005年启动，目的是通过一年的实践，培养一批对人类发展和社区发展具有深刻认识，增强社会责任感，成为具有自我学习能力、反思精神、行动技能和领导力的年轻人。该项目面向来自大学的青年人和农村社区骨干，根据两个群体不同的文化背景、个人需求、未来期许提供针对性的支持和陪伴；鼓励大学生与社区骨干的交流分享，在社区层面协同工作，在个人层面体验个体相互影响的力量。行动援助的青年发展项目通过一年试验、两年成形、五年推广的工作，确立了一年的学习培养框架，按照学习的内容，在不同时间段安排三次培训，以认知—分析—实践相互交织的学习过程，来提升青年人的发展视野和理论思想知识、调查和分析能力、沟通和协作能力、组织和执行能力等。

该培训框架是在一年内围绕四个方面的培训内容来推进的，即自我认知和领导力潜能，全球视野和发展议题，发展工作的基本技能和技巧，参与式工作方法的社区实践。在这四个模块的框架下，第一次培训在7月下旬开始，共计15天，依据成人学习的特点参与培训学习和社区实践。培训结束后实践者奔赴各实践点，开展三个月社区调研分析来识别问题所在，即8—10月的社区融合、社区认知和社区现状的描述和分析，这部分主要通过调研报告体现三个月的学习成果。11月上旬作为中期交流，实践者对过去三个月的实践活动，围绕自我认知、社区现状的认知及现状分析和实践经验进行分享与反思，并确定未来12月到来年2月三个月将想法转化到行动的准备和确定的工作，即通过开发小额项目来锻炼自己各方面的技能和项目开发能力。2—6月集中为小额项目的实施，并通过参与式的项目监测和评估来总结项目开发到解决问题的实际行动的学习过程，同时培养项目管理能力。这个过程奠定了7月中旬总结反思这一年实践给个人、组织和社区带来的变化和影响，由此完成一年的实践学习活动。

自2005—2011年，青年发展项目在总结反思中不断地修改和完善，逐渐形成了一套以成人学习特点为基础，以挖掘培养领导力为核心内容，以集中培训学习、小额项目实践、自行组织学习和实践工作相结合的学习模式，开展为期一年的扎根社区的培养模式。2006年，这种培养模式也从最初满足机构对人才的需要扩延到服务社会发展机构对人才的需求上。行动援助与聚贤社基金会合作，与35家民间组织一起，为有志青年骨干学习农业、教育、环境、生计和艾滋病等领域的知识和开展工作的方法及技能，提供学习、实践和交流的平台。截至2011年7月，青年发展项目共培养了大学青年115名，来自农村社区和流动人口社区

的骨干138名。目前，他们中的80%依然活跃在乡村建设和社区发展的一线工作中。

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以下简称“梁中心”）的农村人才培养计划与青年发展项目犹如姊妹关系，其宗旨是一致的，都是希望培养青年人成为乡村建设的栋梁。这两个青年培养计划在同一年启动，在实践过程中，一直保持着相互间的交流和互动。由于工作人员上的重叠，在培训课程设计上、培养结构上、培训老师选择上都是共享的。两个组织互派青年到各自的实习地点交流学习。温老师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但这两个青年培养计划也存在各自的特点。

第一，人才培养的思想基础各有不同。梁中心的人才培养计划的思想来源以温铁军教授为主，经过他的研究团队近20年的努力，借鉴了上下五千年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环境的思想智慧，结合了具有批判性的国际思想和理论，研发创新逐步形成了乡村建设的系统理论学说；而青年发展项目的理论则更多的是依据国际发展的理论和话语，以批判性的视角来看待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环境危机，以人类共同追求的美好社会——没有贫困和不平等的社会为终极目标，期望通过每个人的努力，实现每个人的权利，尤其是农民的权利，得到保障。每个人都可以获得所需的资源，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接受教育，获取各种信息。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地得到法律的保护并享受到应有的公共服务。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个富有创造力、安定的生活，并得以不断完善。

第二，思想和理论的学习有所不同。由于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上的差异，梁中心的青年人培养在思想教育方面有突出的效果，不仅通过学生社团，动员大学生支农支教来“引入门”，认识三农问题，同时还通过校内人才培养计划，通过一年半的时间在思想理论上将青年人“带入境”，让他们具有一定的、扎根本土社会的理论思想，为他们进行一年“融入乡土”的学习生活打下了坚实的理论思想基础；而青年发展项目更多的是从实际问题出发，以国际发展理论为基础来分析现实存在的不公平和不平等问题。在对现实问题认知的基础上，激发个人“有所作为”的内心动力，积极地参与到解决社会问题的行动中，这些行动多是回应社区的需求。

第三，实践工作中的不同成长。两种模式在自身变化和促进社区改变两个层面上，方式和方法也各有侧重。梁中心遵循乡村建设“生态农业、环保农村、合作农民”的目标，侧重于支农支教、文化建设、农民合作等方面的实践学习，倡导劳动文化，积极推动青年人参与村庄的农事劳动，自食其力；通过新青年绿色公社，探索新的生活方式，推动新的文化生活；同时推动大学生农村创业，探索大学生支农与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凸显梁中心青年人“为农民服务，为理想奋斗”的伟大情怀；而青年发展项目，由于选择的都是有社会组织介入的地点，更多的是通过小额项目来协助村民解决他们眼前的问题。同时，比较注重在工作理念、方法和工具等能力和技能方面的提升，强调通过和乡村带头人一起解决

微观问题，不仅使自己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锻炼，也回应了乡村的现实需求。

第四，在辅导机制上，梁中心采取了老学员帮助新学员的传帮带机制，更好地支持了梁中心对青年人的培养工作，成本低，但效果好，还建立了各界青年人之间的联系。青年发展项目则建立了支持青年在乡村工作和生活的三级辅导机制，即实践的辅导员机制，大部分是乡村中的骨干或者相关机构的在地负责人，这样能够及时地给予日常工作的指导和支持；核心辅导员机制，邀请的多是在食物权益、减灾备灾、社会性别、艾滋病防治等发展领域有一定经验和专业的实践者，负责给予专业发展和事业选择上的辅导和指引；同伴支持模式，促进青年人之间生活上的相互关心和事业选择上的意见交流。总之，两个培养模式在思想理论学习、实践技能提升、生活技能增强等青年的综合能力培养方面，各有所侧重。但对于一个外部呈现独特的整体特征而内部又充满丰富多样性的现代青年人来说，他们最看重的是有这样的平台，且越多越好，因为这样的平台可以让他们的个性化在集体生活环境中得到一种独特的表现，同时也能体验集体意识下的合作与配合，从而使这样的平台，乃至乡村建设的网络平台，都能成为他们发扬团队互助协作精神的舞台，成为“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的那粒火种，那颗闪亮的星星！

回归：乡村建设是人的建设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的乡村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农村空心化，老人、妇女和儿童留守，谁来种地成了问题，而留守老人的医疗保健和养老问题、留守儿童的教育和关爱问题等都成为这个时代快速经济发展的共生现象。农村缺少年轻人，就缺乏活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华五千年可持续发展的根基，乡村振兴急需年轻人的参与，而吸引“90后”和“00后”的年轻人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无疑需要不断地调整思路，来回应新时代的需求。十年风雨征程的农村人才计划，如何在这个不断变化的社会进程中助力新时代的年轻人，为他们提供多样的体验基地和学习平台，扎根乡村，开展新农村建设，成为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面临的挑战。

梁中心一直被视为乡村建设网络中的黄埔军校，培养出了众多在各地生根、开花、结果的乡村创业人、乡村公益人和乡村建设的研究人员。不管在任何地方举办活动，都有梁中心人才计划学员的身影，也能看到十几年来和梁中心一起发展起来的“农民领袖”。但梁中心面临的新时代的调整，告诉我们不能停留在已经取得的成绩上，要总结过去的经验，不能“狗熊掰棒子”；要不断地拓展人才培养的瞄准机制，不能局限在自己熟悉的范围里；要不断地调整机构的发展定位，服务乡村建设对人才的需求。

加入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对我来说是一种回归。回归乡土，从一个多元文化的国际机构，回归到一个真实的、扎根乡土的乡村建设运作

中。参与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工作，也是一种身份的转变，从一个国际发展机构的管理者，转化为一个协作者、辅导员和导师。也许很多人不这么想，但对于我来说，从加入的那一刻起，我就把自己定位在协助这批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人的发展上。

我仍然还清楚地记得在2012年9月，梁中心的志愿者们[5]相聚在凤凰岭下的农家大院，我协助大家一起探讨梁中心存在的问题和面对的挑战。经过一天的回顾总结和沟通交流，大家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只要加强有效沟通，梁中心扎根基层的独特的工作方法和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管理风格，在乡村建设思想和理论的指导下，具有不可比拟的发展优势。但需要做的工作也很多，尤其是将过去十几年积累的工作经验转化成集体记忆和组织经验，并构建合理的管理架构，让经验得以传承和发扬，让年轻人的领导力潜能得到发挥。

针对人才计划，我特别希望梁中心的农村人才培养计划和行动援助的青年发展项目能够取长补短，不仅能够更好地体现中国的“道、理、法、术”四个层面的能力培养，同时能够遵循新农村建设的20字方针来推动基层的参与，青年人的返乡。经过这几年大家的努力，我认为人才计划已经发展出多元、多层次的培养模式。

其一，开启了在地化、集中学习的人才培养模式。青年团队在蒲韩乡村，与村中的合作社联合，通过理论反思、文化建构和技能提升，不仅进行思想建设，同时也强调社区工作能力的提升。既要有理想和情怀，也要有专业性，是理想主义人才与专业人才培养的结合，是工作与生活并重的新生活的探索。其二，启动了培养乡村带头人的“头雁计划”，这个计划拓展了梁中心人才培养的对象，拓展了合作社发展的工作内容，从合作社本身的发展和基层组织建设，从生态农业的推动到三产融合六次产业的创新发展，从文化建设到乡村治理，从污水垃圾的环境治理到美丽乡村建设，2014年与晏阳初乡村建设中心开启的“头雁计划”积极回应了乡村振兴中对“一懂两爱”乡土人才的培养。

其三，启动了人才培养国际化的“鸿鹄计划”，让从事乡村建设的青年人走出去，交流中国的乡村建设经验，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探索了通过国际交流来培养人才的可行路径和方法。

正如人的成长一样，机构的发展对人才培养也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在机构中，承担不同的责任得到的锻炼也是不同的。在过去的几年中，梁中心延续了以往执行委员会的决策机制，同时还尝试采纳了机构负责人的轮流制度，及各个团队之间相对独立运作的平行管理模式，这些努力都是在为青年人的成长创造不同的发展空间，为青年人施展才华搭建更大的舞台。

从事乡村建设工作，得到了在其他许多工作中得不到的学习和锻炼机会，最重要的是培养了每个乡建人胸怀天下、脚踏实地的做人道理和做事能力。乡村建设就是人的建设。加入乡村建设这项事业中的每个

人，都会深深地感激乡村建设这个平台为我们大家创造了学习的机会，创造了践行理想的平台，同时还有思想理论引领的导师，相互支持的同伴，默默支持的大学老师志愿者们。

随着乡村建设事业的不断扩大和发展，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也在不断地拓展其培养青年人的空间和力度。大家分别走出大院，奔赴全国各地，承担起不同的职责，扎根蒲韩乡村，创新人才培养在地化模式，构建昆山基地，开启城乡融合的试验，打造顺义培训基地，拓展乡村带头人的培养工作，开启合作社南北对话，走向国际交流。但不管是纵向深入，扎根社区，还是横向发展，构建不同领域的专业团队，建设不同领域的网络支持系统，大家仍然秉承着那份对理想的信念，那份“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的乡建人的认同！

回想起在梁中心的七年，很多场景历历在目，尤其是大家一起劳动、一起唱歌、一起工作的情景。这些年磕磕碰碰地一路走来，虽然每个人的成长与发展各有不同，草根组织生存压力与发展空间有限，但走在一起，就是为了能够一起成就乡村建设的事业。伴随着过去的青年越来越成熟，我们对乡村建设事业的未来更加有信心。在此，特别感谢大家给我这样一个机会，与大家一起走过这些年。

理想寓于行动中
——实践式教育与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农村发展人才计划[1]

刘老石[2]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方面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环境迅速变迁，综合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全国大部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普遍得到了改善；另一方面，我国的农村、农业、农民却遇到了不小的麻烦，自20世纪末就一直被人们称为“三农问题”。无论是农村的衰败凋敝，农业耕地面积的逐步减少、粮食产量几年来的持续下降，还是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没落、村社组织的松散，都日趋严重。振兴中国乡村，需要一批热情向上扎根基层的乡村建设人才。在过去十年的新乡村建设运动中，一支重要的力量是大学里的青年学生，而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是发动和组织大学生参与乡村建设活动的一个重要组织机构。

从2005年开始，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同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合作，开始了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简称“人才计划”）。梁漱溟乡建中心就设立在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里。为了工作方便，我们以中国人民大学乡建中心的名义招生，具体事务由梁漱溟乡建中心操作。

在人才计划之前，我们做大学生支农近十年，但做的都是短期支农。大学生到村里实习一个星期，做点项目，一个星期之后事就没人做了。为了弥补一星期之后做事不足的问题，我们开始琢磨要做长期人才培训，让人在中心培训一年。项目计划写出来以后，我们就到处去找钱，最后找到社区伙伴（NGO）。他们看完之后跟我聊了很久，我才知道，在我们考虑这个事之前，他们也在考虑做“青年实习生计划”，主要就是绿色农业和环保的。听到我们的计划，他们（社区伙伴）给了我们第一年的经费。我们筛选了36个人，中途流失了2个，共34个。

学员招募程序

学员筛选有一套程序，而且随着时间变化，这套程序越来越严。招人情况各不相同，最开始招人就是把招募公函发到各个学校招生办就业办公室。起初第一期，筛选比较简单，学员愿意做乡村建设就行，但是后来发现光是愿意做还不行，还得强调态度，有理想，就是基本态度合格，然后才可以往下谈。我们叫作“两高两低”原则。“两高”就是要么理论要高，要么实践能力要高；“两低”就是这两个能力不能低于平均水平。后来我们发现这样也有问题，问题是有的人能力也行，理论也行，

但是到了最后这能力都是为他自己，这样的人特别多。后来我们吸取教训，又再往前推一步，让现实去试验他，看他愿不愿意做事。现在选人的时候就非常在意这个人能不能踏踏实实去做，得有理想，而且要为理想踏踏实实去做事才行。

我们的培训和现行大学教育唯一的不同就是培养的场所不同，现在的大学教育培养人是在学校里培养，我们是在农村培养。农村锻炼虽然对增进能力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对于改变学员的态度却不明显。所以从第四期（2008年）开始，学员要通过一个月的试用期。一开始试用的方法是把他放到我们临近的厂里去待一个月，他能坚持下来就等于录用了，坚持不下来我们就不要了，他也就走了。现在，招人这个环节我们已经很成熟了，一般是五步：

第一步是审核报名表。一般在校学生，我们倾向不招，因为在校学生在这里培养完了，回到学校再待一年，我们教的那点东西又被学校给瓦解了，所以现在我们不招在校生，而是选已毕业的。毕业的人中要是有点工作经历和实践经验则最好。

第二步是打电话。中心工作人员先开始打电话，跟申请人聊，一般都是聊几十分钟，聊完之后确定这个人到底行不行，聊的过程中看这个人的基本态度，看这个人的理想，看这个人有没有理论，看这个人的能力。打完电话之后就能筛选出来，70个人能筛选出十多个。

然后我再给筛选出来的人打电话，也是打几十分钟，这是第三步。一般招生是劝人来，而我们是劝他走，打电话一般都是把我们这里的困难讲清楚，告诉我们这里不好的地方。有的人听了以后说，让我想想，明天我再给你答复。明天忽然不答复了，或者答复说“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差距”。这个环节很重要，对最困难的东西他没有思想准备，来了以后一定坚持不下去。

第四步就是面试。面试就跟他们仔细谈，谈了之后再加上之前的感觉就可以进入下一关，就是试用期。

第五步是试用期。一般是跟着大学生一起下乡。下乡以后跟着大学生一起帮着村里做事，既可以看出基本态度，也可以看出团队协作精神，还可以看出个人能力。比如，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的学生，跟着9个学生一起到一个村里做事，到了村里以后，学生说我们需要艰苦的环境，要到小学里去住，大家就往小学里搬，这个人不同意，说村里条件好，为什么要到差的地方，就和其他学生起了冲突，经常是他们队里9个人反对他一个。另外，他到村里以后，见到村里的人就问，你们村里有什么好吃的。后来大家忍受不下去了，就把他开除了。下乡期间他做什么事都要经过人家9双眼睛的考核，回来后我们基本上就有数了。也有新人做得很好的，有一个从云南来的女孩，她也没经过很多培训就投身到下乡的队伍里，到村里以后天气非常热，她很不适应。但是她态度很积极，她没学过的歌就从歌本上抄下来，然后

让大家教歌，而且非常愿意帮助别人，不计较一些琐事；同时也很愿意思考问题，能吃苦。所以她能经过这样的筛选，未来可能都会一直坚持下去。

参加项目的学员大部分来自农村，因为对农村有感情，才能到农村去做事。同时他们也不怕吃苦，城市里的孩子一般都做不到，所以城市里的孩子能到这个队伍里来的都是凤毛麟角。名牌高校出路比较好的也很少到这里来，像北大、清华的，以前也来面试过，但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理论能力都比较强，但实践能力常常很弱，尤其在试用期的艰苦环境里，精英意识比较强的人也待不下去。

培训过程

培训过程大致有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理论培训，将近20天的基本理论培训，主要梳理三农问题。我们请三农研究方向的学者来做讲座，相关方向的代表人物差不多请遍了。培训内容包含三农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主要是一些比较贴近我们操作的基本理论，如从养老问题、社保问题、农村教育问题，然后谈及国际经济、农村经济和合作组织、土地问题、村民自治的相关知识，之后再讲三农问题的历史、三农问题背后的整个发展观和发展体系等，系统性地对三农问题进行梳理和解剖。现在，我们在理论培训之后又加了一个环节，就是一个星期的专业技能培训，包括到农村如何做合作社、如何做绿色农业等内容；除此之外，还有一半培训内容就是生活技能，包括做饭、用常用电器，还有摄影、照相、做视频这些技能，这个对现在我们的学生来说也是欠缺的。

第二个阶段就是派驻村里工作。在村里待三个月，这三个月就完全独立工作，一般是把学员编到一个团队中去，成为团队的一分子，让他配合整个团队的一些工作。这样是锻炼他的团队精神和协作能力。这个团队中有主导的，也有策应的，我们叫作“坦克部队”，学员是其中一分子，一定要保证每个学员在工作期间是可以调动并且配合别人做事的，不能让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工作。刚放到农村的学员没有对于他的特别安排，如果对他有工作安排，一般不会把他放在关键性的岗位上；如果他发生一些工作上的失误，一般从轻处理，或者根本就不会怎么处理，因为他处于学习阶段。第一次驻村工作从9月到12月中旬有3个月时间，这段时间最困难，因为他们没这么长时间在基层待过，在村里待一个月以后就没有新鲜感了，所以非常困难。在工作团队之外，同时我们有专门的人照顾学员方方面面的要求，帮他们处理一些眼前的问题，从吃、住的实际生活问题到一些理论上、思想上的东西，我们都有专门的人为他们服务。我们有三个人负责人才培养的后勤，分别负责日常工作和理论方面，现在还有人负责村里的巡查和指导。

第三个阶段是春节之后回到北京的第二次理论培训，内容涉及一些

文化问题、发展观的问题，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加深。除此之外也可安排一些具体工作内容的培训，一般10—15天。同时，我们会对学员三四个月的工作情况和学习情况做一个内部考评，我们和学员做单独访谈，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中期筛选工作。

第四个阶段是第二次驻村，第二次理论培训结束后，学员回到村里再待大约两个月，工作方式跟以前是一样的。其间我们要安排一次到其他项目点上考察的机会。考察主要是学习别人的经验，与此同时也会有一次区域性的小团队的交流、活动性的交流，这是预定的内容。

第五个阶段是答辩考评，第二次驻村培训结束后，再回到北京就是6、7月份，进行最后总结式的培训和考评了。一般最后考评答辩都是两个星期左右，学员要通过成长答辩，才能结业获得结业证书。答辩是一个综合考评，要求对整个一年的成长经历进行陈述，如学习到什么宝贵的东西，或者有哪些需要反省的地方，等等。我们邀请几位答辩老师，一般是有理论和实践经验的人，对学员的成长经历提问题，其中包括实践的内容，也包括理论的内容，然后进行综合考评。答辩通过以后，学员就可以到各个NGO机构找工作了。

培训成果

学员经过一年的培训后，在理论和实践能力上都会有改变，但最大的改变是价值观上的。我们招募的时候苗子选得好，学员们自己有要求，自己要往前走，我们起着推动和辅助的作用。但他们刚来的时候，价值观没有完全形成，只有一些初步的理念，在有些问题的认识上是很模糊的，来了以后要通过整个培训过程慢慢梳理。我们有几次理论培训，通过疏导的方式，慢慢地让他们把价值观形成系统。培训的目标不仅是改变价值观的问题，更是要求把价值观能落实到行动中去。这当中有人可以不谈理想，可以不要这个东西，但是要踏踏实实地去做事，这才是最好的状态。我写过这样一句话："胜利了不感到高兴，失败了不感到痛苦，就是做理想的机器。"不用太在意成败，用平常的心做平常之事，该干什么干什么，这就是最好的状态。我们有个胖胖的小伙子，第一年培训结束，他第二年就到深圳去了，进入工厂工作。到了工厂以后，他本人很胖，工作环境又非常热，满身都长痱子，大汗淋漓，经常都是这样。原来他也是谈理想的，但是他在工厂里待了几个月之后，后来写文章说，"理想需要实现，要把所有理想放到现实中去操作，变成行动，这个才行"。新的学员谈起理想很激动，而老队员一般不会，因为他们已经把理想放到现实操作当中去了。

我们的理想就是为平民服务。现在谈的不是是否应该为平民服务的问题，而是怎么为他们服务的问题。这是平常大家考虑的问题，它已经不再是是否有理想的问题，而是操作的问题。

现在各个NGO组织都需要人手，而大学并不为它们培养人才。我们

这个项目等于在给各个组织培养人，差不多有一半学员结业后在各种非政府组织里工作。去了以后大家都很喜欢他们，因为这些学员很容易到位，很愿意在最基层工作。相反，正规大学教育出来的社工和农村发展人员，都不往农村去，都往上面跑。而我们培养的人都往下面去，往基层扎，所以很多组织都认同我们的培训。

人才培养计划与大学教育

我们目前使用的培养方式，是一种另类方法，在实践中教育，我们的目标是平民的，但方法却是精英的。我们招募一小拨人来培养一年，平均每位学员一年的培养费用是2.5万元左右，比正规大学教育的成本还高。这个方法的缺点是规模太小，所以，我们现在想方设法把培养的面积扩大，用一种很平民的方式去教育学生。一种现在我们叫作“校内班”的实践，从2009年开始，我们在各地大学招募学生组成校内班，每个城市都有十来人。就在本地学习，在本地有实践机会，不必脱离学校，我们有工作团队在当地给他们做培训。时间同样是一年，最后我们给他们考评、发证。等于他们边上大学，边到农村去做工作。这可能既是对人才计划的一种修正，也是对现行大学的一种修正，一种中间结合方式。

现在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尤其在这一轮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模式受到严重质疑，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我们的理想了。中国国内也在进行对于发展观的讨论。年轻人普遍要求接触新的东西，要求对社会有真实的认识，把社会和自己的发展结合在一起。他们也希望了解真实的社会，但遗憾的是，大的环境没有转化到对年轻人的教育中去。

所以我们梁漱溟乡建中心的骨干人才培训，是在正规教育体制之外的试验，试图通过实践教育的方式，把理论和实践的训练结合在一起，让理想和行动能力的培养同时进行。我们希望能与某所大学进行合作试点，把这种实践形式的教育方式有机地结合到本科教育的课程中，把青年的教育和人生发展同现实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变迁密切地联系起来。

种子的信仰

社区伙伴 薛启婵[1]

又是一年春风起，看到大家纷纷留言怀念老石，我才恍然意识到，老石离开我们已经七年了。七年，有多少树木茁壮成长？又有多少新芽破土而出？

老石和他的伙伴们一手创立的人才计划，很快就将走过十三个春秋，在这十三年里，我们有幸看到一批又一批的青年行经此地，慢慢成长，然后四散各方，相互守望，最重要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还坚守在乡村建设的道路上，砥砺前行，初心不改。读这本文集里记录的故事，脑海里立马浮现出那些年轻鲜活的面庞。这本书里，写满了洋溢着理想与热情的生命实践，记述了饱含痛苦与喜悦的成长。一期又一期学员，透过文字，穿越而来，在这里呈现出群体精神的聚合。当我们把时间拉开，以十年来回望这个计划和参与其中的伙伴时，我们就会发现那种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力量。面对资本主义的滚滚大潮，在这个强调自我、极度物化的社会里，人才计划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们，用真实的生命实践，书写着他们在这个时代安身立命的姿态，路径不同，选择各一，却也自成一幅多彩的画卷。

社区伙伴从2005年至今，一直是梁中心在人才计划上的合作伙伴，这是一段颇为持久的合作关系。最初的一拍即合，是源于彼此对支持青年人在农村实践和成长的认同。人才计划从概念、想法落地到具有可操作性的支持框架，经历了几年“摸着石头过河”的历程，学员有过在扑面而来的各种主义和思辨下无从实践的茫然，有过对放羊式管理的抱怨，也有团队在磨合里的种种张力，然而，这不是一个谁在管理或谁被管理的项目，而是组织者与参与者一起成长的共同体，正是大家不断的参与和反馈，让计划有了调适的机会。第四期时，一个将青年的教育与社会进步的推动相结合的大教育观逐渐清晰，培养模式已具雏形。到2010年，在人才培养之外，也将青年人作为主体的网络构建纳入思考，这是人才计划的一大跨越，也在这之后，慢慢形成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

还记得在老石离去后的那几年，年轻的团队走进了痛苦的纷争过程，人才计划也在这个阶段变得有些消沉，许多工作都随着团队的纠结陷入循环。我想，对那时在梁中心的许多伙伴来说，这都是一段颇为煎熬的时光。于我们而言，虽在局外，也何尝不担忧心焦。但有些坎终归需要自己慢慢去迈。

2015年的春天，我到永济，少雄用电瓶车载我看永济正在发生的种

种变化，讲述自己在这里的各种学习与领会。他那时已举家驻扎永济，团队开始勾画着将学员集中安顿在成熟的合作社，探索扎根乡村社区培养人的新模式。从当年胸怀天下的青年一步步走来，慢慢回归到乡土，俯身于土地，人才计划不只是提供一年期的农村实践，更是教大家开始把自己的生活安放于此，让农村重新成为安身立命的选择。两年多过去，我们已然看到这个探索的成效，一种从土地里长出的生命正在蓬勃生长。

这十余年来，社区伙伴与梁中心不断在差异里磨合，在共识里求进步，时间见证了这份历久弥新的伙伴情谊。七年前，老石在春天里告别；七年后，我们在春天里透过这本文集，看见过去也看见未来，这既是对逝者的告慰，也是对承继者的祝福。而人才计划的故事远远还没完，现在只是逗号，未来还在路上。

最后，以梭罗的话送给大家，愿我们一起静候生命的奇迹。

我不相信

没有种子

植物也能发芽

我心中有对种子的信仰

让我相信你有一颗种子

我等待着奇迹

薛启婵
社区伙伴
2018年3月23日

第一部分
守望



黄河边的青年

引言 两个历程的相互嵌入

人才计划一期 吕程平[1]

所见文集的这一部分，青年们在完整参与了作为乡建体系骨干型项目的“农村发展人才计划”后，继续选择留在乡建实践的各个领域并逐渐成为其骨干。一个项目目标的提出是与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的背景相结合的，也是与项目执行机构的整体目标体系自我定位话语相一致的。这里展现的其实是作为一种教育过程的社会实践与个体生命历程的相互嵌入。而“相互嵌入”的实现，是基于人才计划项目目标体系的两个基本面有机构成的。

第一个层面，推动农村的进步及对更值得期待社会构建的贡献，这包含若干层次：推动农民合作组织的建设，即以普惠性合作为手段对农村发展过程中多方面困境的解决尝试；倡导健康农业，及在此基础上构建城乡间更大范围的合作和互动（早在项目执行的最初一两年，早期项目组就清晰地认识和提出了这层目标）；推动包括合作文化和健康生产文化及对传统优秀文化继承与发扬在内的乡村文化的重建，并与此一道，在对现代发展观及资本统摄性等概念反思的基础上，推动新文化概念及实践体系的建设。对于前者我们尝试借此计划推动包括农村社区学校及综合性合作组织在内的载体建设，并以之动员本土资源和社会资本网络，修复、重建社区自我教育、自我规范、自我动力功能。

第二个层面，在对主流青年教育方式反思的基础上，以特定的价值观为基点，强调在以共同理念为核心的实践集体中的个人与团队和事业的共同成长的教育创新。在这里，我们所珍视的立场是以“人”为最终关怀的，而非以“物”或物的积累为最终体现。进一步说，我们不认为教育是以商品的交换能力和商品化价值程度为衡量标准的。在这样抽象的根本立场上，我们将其具体化为一个价值立场和一个成长观，事实上两者是一体的，并只有在一体中才能相互实现，即我们以最广泛人民的幸福及实现幸福能力的构建过程作为最珍贵的财富，并把在此过程中人的全方面成长作为成长观。

这种价值认定在项目理念的设计中必然表现为对国家、民族的生存和进步及在整个经济进程中处于不利境地的人民利益的关注，即农村人才发展计划的落脚点不仅仅是农村，学员的成长视界也绝不应仅仅拘泥于一村一社的农村发展本身，我们在人才项目内成长的学员，能对何为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上更可持续地发展有更深刻的理解，并能将自身的成长服务于、结合于整个社会的进步，这种社会责任感的赋予和内化的过程，正是整个项目的教育创新所在。

在既往机构资源和项目资源的约束下，人才计划期待学员在对以上价值观（基于一定程度）认同的基础上，在前一个目标体系的行动框架内，实现自身思考力、行动力、团队协作能力等多方面的成长。

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上两个目标是在互动中得以成长和实现。一方面，各种具体事业的实现需要识别能推动处于不利境地群体处境改善的、在社会和生态层面上更可持续（出脱以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商品化为表征）的行动方案；另一方面，这种社会实验的进行又有赖于具有一定实践能力和对农村发展有相当思考与热情的青年的推动。将对理念的热忱和青春的热情转换为行动的能力，把对理想的追求凝聚成行动的步伐，让各样想法和立场的话语接受现实的考验等都有必要最终落实在各项创新性事业的成就中。

人才计划是一个项目，而我们真正想赋予它的当是对项目的超越。我们把人才计划作为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或是一个教育过程——这取决于我们所取的主体。这种成长或教育是在学习和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中实现的。一个项目需要量化各种指标，需要明确的效果评估，而人的成长、价值观的成长、对人的意义及更广大幸福的追求却难以量化。正如我们将在本文集一个个故事中看到的，其影响在个体成长时间维度上必将远远超过项目周期，在价值求索维度上将远远超过项目所赋予的框架，在社会实践的样态上将远远超出项目设计者的想象。这样的超越最有意思的基点是，我们将一粒种子植于那些敏感着和反思着的个体的生命历程中，并施予一定的机会、自主性和资源，这粒种子于是慢慢长大并和生命历程融为一体。

1.1 一场悄悄的新时代乡村“乌托邦”实验[1]

人才计划试验期 白亚丽[2]

世纪之交的大学生“上山下乡”

2000年前后，正是城乡矛盾比较激烈、三农问题凸显的时期。在这个大背景下，许许多多来自乡村的大学生也面临着个人生活的两难选择。一方面，农村大学生到城市学习，也想摆脱“泥腿子”的命运，适应以城市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另一方面，从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高校产业化改革，既加大了农村学生的学费负担，也使得未来的道路更加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这有些残酷的现实面前，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大学生，被迫开始了对自己的生活与未来的反省，与此同时，我们也转变了观察城乡关系的视角，重新思考我们生长于斯的乡村。大学生支农调研运动的兴起，可以说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下展开的。

具体到我们个体，参与其中似乎都有些偶然，甚至可以说有些随意。2000年，刘老石老师来到我所在的天津科技大学（原天津轻工业学院）任教。在这个以工科专业主导的学校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利用他在食工系做辅导员的一年，放松社团审批政策，鼓励学生自发成立各种社团。20多个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我也参与了“新希望农村发展促进会”。

在2000年冬天，关心农村的学生并不是很多。为了组织大学生乡村调研，我们几个“新希望农村发展促进会”的创始人在学校食堂、宿舍到处张贴海报，打着“文化旅游”的口号。或许正是因为“文化旅游”的吸引力，才招来六个同学组成一个小队。当时，对于下乡调研，我们都不确切清楚去哪里、如何去。后来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我们去了山西左权县麻田镇。

就在我们下乡前后，北京师范大学“农民之子”在1999年暑假以“京楚大学生村民自治宣讲队”的旗号，组队去了湖北随州柳林镇——这也是一位队员的家乡。2000年后，北京大学“乡土中国”、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促进会”等社团都相继成立，也开始了组队下乡。2001年5月1日，我们几个学校的“老骨干”碰到一起，决定组成一支跨校联队，随后这支跨校联队就辗转在苏北丰县、沛县等地。

我们最早的下乡点，绝大部分是队伍成员的老家，要不就是其他来自农村的朋友的家乡。而我们下乡的费用，也是自己平常省吃俭用节省出来的。当时我们能做的，无非就是带上文具教教孩子读书，带上衣物看看孤寡老人，等等。再多一点的，也就是带上影碟在老乡家里组织大

家学习科技种田和法律信息。支农调研变得有组织、有目的，是在我们接触了《中国改革》（农村版）杂志社之后。

我们中最早接触到《中国改革》的是刘老石。2000年的一天，他挤在南开大学的走廊里听了时任《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兼总编温铁军的讲座。在听到温铁军说“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它教人吃饭不种粮、穿衣不纺棉。它教大家都拼命挤向金字塔的塔尖，离中国最根本的现实越来越远”后，刘老石决定“投奔”《中国改革》。从那之后，刘老石一方面在天津科技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课程，另一方面把所有业余的精力都用在推动农村发展和青年学生下乡的工作上。那时，温铁军也在用自己的课酬费资助一些学生返乡调查，他说他的想法很简单，一是想延续老一辈农村工作者杜润生老先生“动员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深入农村调查研究”的夙愿，二就是要给予长期脱离乡村、漠视乡土的孩子们再次了解家乡的机会。2001年10月，杂志社来了“我向总理说实话”的李昌平、执着于平民教育事业的邱建生等人。以《中国改革》（农村版）为核心，也凭着“中改”等单位的支持，大学生支农活动得到了5万美元的资助。在刘老石等人的推动下，“中改”专门成立推动大学生下乡的支农队项目组，由京津高校的老支农骨干兼职组成。零散的支农活动在此时变得有组织起来了。

虽然参与支农调研的大多数学生都来自农村，但通过支农调研，农村呈现出打开大门后的另一个世界。2000年正值乡村矛盾的尖锐期，我们组织的很多下乡队伍都遭遇到不同程度的刁难。盘查、扣押证件是经常发生的事，有时候支农队因为没有和地方干部打招呼直接进村，还会被地方干部驱赶出去。北京大学“乡土中国”的一支队伍到内蒙古的赤峰调研，刚进村就被村民团团围住。村民围住他们是希望这支外来的队伍能帮着解决问题，而村干部却一再催赶他们离开。在村民们渴望的眼神中，这支队伍坚持留下来做完调查。在赤峰的七天调查中，这支队伍是由村民轮流彻夜站岗保护的，调研后也是村民们护送到火车站的。中国政法大学的一队学生在江苏调研时，遭遇到冒充派出所人员的地方恶霸盘查。带队人机灵应变，反问对方是否有合法证件，因而才躲过危险。类似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这些刁难与危险，极大地锻炼了这群在学校温室里长大的学生的应变能力和毅力。

调研工作想要真正得到农民的信任，获得第一手材料，和农民打成一片是必然的。支农的学生必须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许接受任何礼品馈赠，不随便接受任何吃饭邀请。北京某大学的一支队伍在河北顺平的一个村因为被村干部接到城里吃饭，结果这里的村民拒绝他们再返回。后来这支队伍所在的社团也被支农队开除三年。为了使得下乡学生更快融入乡村，在下乡之前，每支队伍都会就安全问题应对、调研方法等接受培训，老队员也会传授一些经验，帮助新队员熟悉相关的资料。类似这样一些队伍陆续积累的经验逐渐形成了规定，被奉为所有支农队学生的纪律。

后来，钱理群老师在《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一文中，指

出新时代的大学生支农调研是承接了“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历史精神中“第六次上山下乡运动”。

“知识分子到乡村去”的现实困境
——以文化活动推动农村组织化

在项目组的推动下，仅2003年下半年全国就有80多所高校组建农村社团。支农队项目组指导各社团将下乡的村庄资料汇集在一起，建立了农村信息站。但是，在21世纪初三农问题仍然很严重的时候，在这100多家站点的带头人中有一半以上都是上访者。这种结构给支农调研也带来了很多问题。许多学生社团遭到学校的施压，要求不再组织下乡活动。我们的“新希望农村发展促进会”社团甚至被要求改名，也不让我们再下乡了。在这样的压力下，大部分学生都坚持了下来。一方面，我们相信，我们对农村问题的关注出于对社会良性发展的推动；另一方面，到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随着新政调整了农村政策，农村的基层矛盾与群体性事件大幅度减少，我们也在思考支农调研在新形势下如何发展。扎根在基层的我们很快就发现，在基层矛盾减少的同时，以城市区域发展为核心的发展主义，也通过既有的制度设计源源不断地吸取农村的发展资源。农村的发展危机呈现的是人才、资金、基础设施等资源的多重“瓶颈”和困境。小农的高度原子化状态，造成小农既无力抵抗带有剥夺性质的强势市场，也很难与政府对农村的支持政策对接。如何组织起来，成为新时期农村发展面临的挑战。

在这样的形势下，无论是关注社会民生的青年知识分子，抑或是《中国改革》（农村版）所凝聚的农民精英，都在探索着新的实践方向和内容。新乡村建设运动从历史中吸取经验，选择了以青年学生动员村民重建农村文化为切入口，开始了通过恢复合作文化进而推动农民组织化的探索。

2003年春节，在河北定州历史名村翟城村，邱建生重启了70年前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当邱建生和大学生们在村委会门上贴出对联“平民教育诚可贵，乡村建设慨而慷”后，他也搬到了翟城村破旧的村庄小学。在此后近四年的时间里，他把全部精力投入乡村建设学院和翟城村的建设上。

2003年暑假，因农民维权而寻求外界帮助的安徽阜阳南塘村迎来了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十几所高校的近30名学生。这个村庄也因为这些学生的到来出现了新的变化。开始的时候，这个村子里村民和基层干部的矛盾剑拔弩张，每次乡里干部在村子里出现，都会被一群“讨个说法”的村民团团围住。学生的到来，无疑加剧了这种紧张。地方政府不愿意学生在村里待着，以“安排参观旅游”的名义，要把学生带走。学生们在乡政府和有关人员展开了长达3个小时的谈判，最后双方达成了妥协，学生可以在村里调查，政府则以“保护学生人身安全”为由，安排相关人员陪同学生调查。本来一触即发的官民矛盾没有被激

化。因为在接下来几天的调查中，这支队伍又不得不去思考远比他们想象的更为复杂的现实问题。学生们发现，维权的确让村民热情高涨，但村民的生活并未改善：老人病死家中无人知晓的事情，让人触目惊心；年轻人的不孝顺也完全颠覆了尊老爱幼的传统；村庄的道路损坏无人问津，而村民们却只知成群结队地打麻将；夜晚，宁静的村庄却因为治安问题频发令人非常不安。谁愿意生活在这样的村庄里？

面对这些比维权要复杂得多的现实问题，学生们开始思索如何将矛盾和冲突进行建设性的转化。这么做的前提是需要村民带头人的认同。起初，杨云标等一群维权的“硬骨头”对这种思路是持有怀疑态度的。或许是不愿意浇灭学生们的热情，他们也同意尝试看看。学生们找来了村子里的老文艺骨干，这些老人从床底下搜罗出30年没怎么用过的二胡、边鼓，村庄里的“老瞎子”扯着嘹亮的嗓子吼起了老革命歌曲。住在隔壁邻县20公里远的王殿敏阿姨，本来是个默默无闻的农村妇人，也在学生的带动下扭起了秧歌。这个平凡的农村寡妇，在随后的两年中成功地组织起了村里的老年协会和妇女文艺队，还被大家推选为村委副主任。2005年在由戴锦华等人发起的“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活动中，王殿敏也名列其中。

村庄的不孝顺是个普遍现象。有些老年人求助派出所，但常常会使矛盾更激化。于是，学生们想到了“褒奖好的而使不好的害羞”的操作办法。学生们把老年人组织起来，让他们评出村庄的“十佳儿媳”。然后学生们自己凑了几百元钱，买了大红花和奖状、脸盆，敲锣打鼓地送到好儿媳手里。让学生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妇女都是放着鞭炮迎接奖状的，她们还把这些奖状贴在堂屋正中央。“因为这样的活动，村子里的风气扭转了，以后每年我们都要评选一次。”杨云标说。这位年轻睿智的村庄带头人后来这样总结学生们的行动，称这是“从哭着维权到笑着乡建”。

在这样的带动下，随后的这些年中，南塘村陆续成立了图书室、经济合作社、生态农业实验田和农村互助金融等。至今，这个远近闻名的村庄不仅实现了以组织为依托多位一体的村庄建设，同时带动了周边十几个村庄共同发展合作组织。最重要的是，村庄里村民和政府的关系由原来的恶性对立到如今的良性合作，承接了政府上百万的村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类似的故事也在湖北房县的三岔村、山东微山湖畔的姜庄村、河北顺平地区跨县乡的联合社等地进行着。这些鲜活的村庄故事让我们看到青年学生在协助乡村建设过程中，以本地群众为主体，在基层转化矛盾、建设和谐农村的推动作用。

一本杂志带起一场试验

2003年年底，《中国改革》杂志社乡村建设中心成立，开展了村民骨干能力培训项目，目的是通过对村庄带头人的培训，将力量凝聚起来，通过走合作组织的道路来发展村庄。但2004年年底，随着《中国改

革》杂志社（农村版）停刊，乡建一度陷入了无组织的状态。但很快，以刘老石为核心的支农学生注册成立了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邱建生等人也坚守在翟城，成立了河北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这些组织随后挂靠在温铁军任教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2005年暑假，乡建中心在全国100多所高校选拔了35名学生，他们中有的刚刚毕业，有的是特意休学的，“乡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正式启动。

“人才计划”的培养理念是靠实践和理论两个主题方式为农村培养人，在此过程中，也要完成对年轻人的再教育。“人才计划”包含每年四次的集中培训和学习，其余的时间学员们都驻扎在乡建中心的项目点，协助村庄推动合作组织的发展。多年的乡村调研让我们很清楚，乡村治理并非如其表面所显现的仅仅是技术缺乏、资金匮乏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企业介不介入农业领域的问题，深入的探讨下，乡村发展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能否培养一批能够长期推动中国农村发展的青年人是乡村建设可持续性的关键。“人才培养计划”针对的核心问题是年轻人去农村做什么？初到农村的大学生常会被村民、基层政府期待带来扶持资金、市场渠道、企业项目。事实上，一无资源二无背景三无经验的大学生，在这些方面是难有作为的。他们特定的优势是在农村的客观调研、村庄的组织和动员工作、教育和文化推广等软件能力上。人才计划的学员不是去满足村民短期的致富欲望，不是去处理村中各种日积月累的矛盾，不是去跑市场、跑信息，不是单一地提供科技咨询，不是越俎代庖替村民能做的各项村庄事务——他们在村中能做好的，是以公益文化活动切入，发动村中“能人”，推动乡村的组织创新和制度改变。事实证明，这样的撬点既发挥了个人的价值，同时也推进了农村基层制度的改良。

参加“人才计划”的学员们，整整一年、两年甚至三年的时间，直接住在农户家中。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在这里不带任何笔本纸墨，就在炕头和农民一起生活聊天，农忙的时候也挽起裤管和农民一起播种、收割。他们每个月要向村民缴纳不低于生活成本的费用，他们还会从自己微薄的生活补贴中挤出一些钱去探望鳏寡老弱。村民们很快会认识到他们无法直接依赖穷学生发展村庄，但村民们渐渐地会被他们的行为带动，逐渐认识到自己是家乡建设的根本。

从2005年至今，“人才计划”已培养出了5期共百余名优秀的农村发展人才，他们中的2/3仍在农村建设、社会发展的第一线忙碌着。

黄瓜藤畔谈金融危机

2009年12月5日，乡建迎来了十周年庆典。12月6日，北京西山已是一片萧瑟景象，可山脚下一个大院子从早上开始就很热闹。在菜园的边上，搭起了两口硕大的灶台，许多学生在这里忙碌着，有的添火、有的切菜，还有人在房间里牵起彩纸，在门上都贴上“囍”字……这里，是在布置着一场集体婚礼。

这个院子就是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目前所在地。常来常往的青年学生称它为“家”，农民朋友称其为“大后方”，我们则诗意地称这里为“新青年绿色公社”。说是“公社”，首先是有共同的工作目标，然后就是在生活和成长上互助和协力。在这里，社员自愿“入股”成立了公社互助保险。互助金首要用处是为生活困难或生病的同学提供帮助，互助金的另一个用处是通过“美好生活促进会”组织活动。作为对“美好和幸福”的一次重新定义，同时也是美促会2009年度最出色的工作，就是“新幸福主义集体婚礼”了。

如今，当全国千万“蚁族”大军奔波在蜗居地和工作地之间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在探索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生活方式。每天6点半，学员们准时集合，进行一个小时的晨练；8点半，是“朝话”的环节，组织者站在队伍前面指挥大家喊口号、唱歌，大家一起分享近期自己对某个问题的思考或心得，之后所有人都要陈述当天的工作计划。公社生活简单而有序。尽管不乏生活上的小摩擦和小插曲，但这里整体氛围是积极向上的。在这里，大家亲自参加劳动。院子里有几分菜地，生态农业部门把这一小块地小心翼翼地划分为责任田，每个人认领一块，自己耕种，每个微型菜农也都施展着自己的有机农耕法。在公社的食堂，每月仅缴纳百元就可解决一个月的吃饭问题。工作之余，每周会有定期的学习讨论以及其他以团队建设为核心内容的娱乐活动。很多来授课的老师称这里才是真正的大学。夕阳下看着同学们一边撅着屁股拾掇着黄瓜藤一边谈论着金融危机的影响，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公社的生活，虽非奢华但很安逸，因而，我们也得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让公社成为脱离社会现实的小圈子。公社被定位为青年人长期参与乡建的大后方，而前方则是广阔的农村基层。大家的大部分时间是和农民或者工友在一起，他们在这里只做短暂的休憩和知识的补充，随后就会奔赴全国各地。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这是新时期欧文式的乌托邦，其实，在我们眼里再没有比这里更能反映和接近社会真实的地方了。比起大多数为生活奔波而困于高房价的同龄人，我们在创造着一种把个人成长、社会理想和促进社会发展有机结合的生活方式。

在《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一文中，钱理群老师认为“第六次上山下乡运动”最大的不同是这次行动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青年知识分子的自觉自发行动，并内含对当今教育体系的挑战和创新。当然，这与五四时代欲用“民主与科学”、平民教育等试图改变“愚昧的农民”与“黑暗的乡村”的情形有所不同，这一代人其实是在为自己寻找、建立价值观的过程中，促进着农村的变革。因此，这或者可以称为一场“双向精神扶贫”运动。

对这个论断我们是深有体会的。一方面，我们所来自、面对并进入的农村已经不是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社会”，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在解体中的乡土社会。在通常说的资本、劳动力和土地外流的基础上，在

更深层的意义上，乡土中国的价值体系在解体、崩塌，而现代化的媒介手段无疑加速着这一过程。我们看到，以城市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和生活方式渐渐为人们所接受，这个时代还没来得及对源于17世纪西欧工业化时代兴起的城市文明在今天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检讨，就已经抛弃了东方农业文明中的某些优良品质。在这个意义上，乡村精神再造有着更深远的意涵。

另一方面，精神的危机同时发生在青年学生群体中。在这个开始对人生意义思考的年龄，有多少青年在选择中迷茫？几十年前的民族危亡赋予过去时代的青年深沉的价值坐标，而生于“盛世”的我们，却在意义之网上迷遁。十年前，当“到农村去”的口号将第一批支农队员聚集的时候，谁也不曾预料，这竟是一场以行动来进行的对时代精神和青年价值的探求——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探求才刚刚开始而已。

1.2 一位大学生的十年“下乡记”

人才计划二期 刘良[1]

曾经有个朋友问我：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你坚持做了十年的乡建工作？我当时一愣，以前从没想过，会用十年的时间去做一件事情。当时我略带自黑地回答她：“好像除了做乡建之外，其他的我也不专业呢。”是啊，这也许可以解释成带引号的“专业”。但十年来自己做的事也不太专业，从北方的农村，到南方的农村；从西部大石山区，到苏南鱼米之乡；从做项目，到财务、行政、人事、传播……只要有需要都去，只要有需要都做。

十年，或许因为情怀，或许因为习惯，或许已成为生活方式。以乡村为坐标，是十余年来的守望，为乡村、为农人，也为自己，心安于此，成长于斯。

向左公务员，向右乡村

将时钟拨回到2006年，那时我正好大学毕业，处在一个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既有对未来无限的憧憬，也因前路漫漫而感到迷茫，但更多的是随着大流走一步看一步。那时候考公务员进体制绝对是热门，父母和家人也是这样期望的，于是连续报考了国考、家乡所在的江西省考、学校所在的贵州省考，笔试成绩都还可以，但最后还是没有结果。于是我只得做次优选择，报考了贵州的“特岗教师计划”，需要到农村地区的乡镇中小学做三年的老师，但至少算是一个稳定的，而且是有编制的、体制内的工作。

我的祖父和外公是老师，父母也是老师，就在我感慨要继承“家业”的时候，大学同学推荐我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的“农村人才培养计划”（简称“人才计划”），有去北京学习的机会，需要在农村实习一到两年，还可以见到很多著名的学者，如“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老师，最早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李昌平老师，他们曾经来我们大学做过演讲，那时给我留下了深深的震撼。因为自己学的是农村区域发展专业，总觉得大学四年学得不够，于是报名参加了这个实习生计划，正好可以去学习和进修。最后，在当乡村教师和乡村志愿者之间，我选择了后者，带着些许浪漫的想象，做了一个暂时性的选择。

2007年1月，在我参加人才计划的半年之后，我又选择考江西省公务员，还是希望能如家人所愿，找一个稳定的工作。这次考试笔试成绩还不错，而且招的人多，但要去面试的时候，我正好参与了中心在江西

兴国为期一年半的扶贫项目的前期调研，中心也有意让我接着参与后面的执行，于是，我又一次面临选择。这次选择算是天意吧，我借了同事一个乾隆通宝，以抛硬币的方式决定：汉字朝上就留在中心不去面试；满文朝上就回去面试，可能成为公务员。结果汉字朝上，我留下了，做着乡村建设这份事业，一干就是十年。

这就是我选择的初心：有理想，但不坚定；有学习的愿望，也有些许浮躁；有慕名而去的虚荣，也有脚踏实地的坚持。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天意，也或许是适合自己的道路，所以一直走到今天。

一个贫困乡村的项目分配模板

2006年下半年，也就是实习期的前半年，我被安排在山东微山湖畔一个叫姜庄的村子里，和一起下乡的伙伴支持当地合作社的发展。半年之后，也就是2007年1月，在我参加完一次公务员考试之后，中心的负责人老刘告诉我，我们刚中标了一个NGO组织与政府合作扶贫实施村级规划的项目，在江西兴国，离我家很近。于是，接下来的一年半，我就来到了离我家很近的一个叫“忠田”的小山村，为当地留下了一些痕迹，也在我心中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迹。

这个村级扶贫规划项目在当时来说意义很大，是政府第一次拿出财政的扶贫资金，来采购NGO的服务，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就叫“政府采购社会服务”。在这宏大叙事中，我们团队的作用，可能仅仅是其中一个微小的统计数字；更大意义可能是偶尔会被当作某个里程碑事件中的一分子而被提及。而真正影响我的是，我与村干部和地方精英的两次冲突，以及冲突过后两次心情和境遇不同的哭泣。

也许是因为我顶着中国人民大学的头衔，也许因为项目得到国字号基金会的支持，尽管我的老家离这里只有百里之遥，但因为我被当地人认为是“中央”派来的钦差，以至最初的两三个月里，村里办低保的找我，计划生育的也找我，甚至有一次我打摩的从镇里回到村里的时候，摩的师傅非要多收我1元钱，说我从“中央”来的不差钱，直到我用当地土话反问了他一句：“你见过哪个中央下来的干部还会坐摩的？”摩的师傅才松口，按照原价带我回村里。

因为项目的设计，我所代表的机构对投入这个村子的50万元扶贫资金有一定的决策权，开始时大家对我的工作都很配合，入户调研、选村民代表、按村民小组申报项目计划、管委会代表核实项目等，根据项目手册规定的工作流程按部就班地进行，一切事情进展都很顺利。于是，在我们正式驻村工作两个月后，在村干部的配合、老干部的支持和村民的拥护下，一个完美的村庄扶贫规划即将出炉，似乎只要与村民选出来的代表开会一通过，这个偏远贫困的小山村，即将改天换地。

会议在我22周岁生日的前5天举行，地点在村委会，和往常不一样的是，这次会议所有的9个参会代表到得都很准时，除了3个村干部稍微

年轻一点，其他6个村民代表都是60岁以上的退休老干部、老教师。就在我认为一切都将很顺利的时候，会场开始一点点地失控了，看到这个“完美”规划的项目表的时候，代表们都拿着这张纸重重地翻过来翻过去，相互之间借着老花镜，在看这张纸上有没有自己村民组的项目，有多少项目资金。

他们都有自己的标准：组里的人口多少？组里到公路的距离多远？项目资金该是平均到组还是平均到户？就在这样的你来我往中，争相翻看仅有的两张项目列表；不一会儿开始拍桌子吵架，接着便是一些很难听的话，甚至连四五十年前的事都扯出来了，不一会儿拍桌子又变成了面红耳赤的骂架。

这时我着急了，想制止他们，也开始拍桌子跟他们叫板，试图让他们停下争吵。但没想到适得其反，大家吵得更厉害，有人开始指责我偏心，也有人指责我一个外人在这里大呼小叫的，指责我一个小毛孩凭什么对着一群老人指手画脚。于是，吵着吵着，变成了我一个人和他们之间的骂仗，会也开不下去了，有的代表开始离场。最后，会场里只剩下几个村干部，我一生气也离开了会议室，把自己关在了宿舍里。刚回到房间里，我就觉得委屈，明明是为他们村里做好事，没想到他们还不理解，想着想着眼泪就掉下来了。坐了几分钟之后，觉得这事没完成总不是个事，喝了一口水之后用毛巾把眼泪擦去，打开房门看到几个村干部都还在，于是跟他们说还是把代表们召集回来把会开完。他们看到我一脸委屈的样子，也觉得自己刚才说得有点过头了，只是说刚才我不应该拍桌子跟他们吵，毕竟他们也是老人，等他们吵完之后就好商量了。我点了点头，就和几个村干部分别去找他们。

接着开会时，在会场上我又委屈地抹了一把眼泪，觉得自己主持不下去了，就让村干部来主持，我来记录。可能刚才这一举动影响到大家了，之后大家还是争吵，但是没再拍桌子了，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每个小组都有至少一个基础设施项目，要不就是修条路，或者修个水渠，或者改建学校；项目资金也按照组里的人口相对平均，如果项目资金不够就组里自己筹资。最后，我的“完美计划”被改得面目全非，但是他们得到了一个相对满意的结果。在大家都离开之后，我把自己关在宿舍里，回想刚才发生的事情，越想越觉得委屈，越委屈就越想哭，终于忍不住大哭了一场。这一次，他们原谅了我的毛躁，我接受了他们的“自私”；这一次，我吞下了委屈，他们获得了现实的利益。这是我进入社会后第一次哭、委屈的哭，在很现实的世界里不得不做出妥协和退让的委屈。或许，这也是一次迟到的成人礼，让我明白在现实的利益中，不能再抱有浪漫的幻想。在这之后，因为大部分项目都改成了基础设施建设，修路、修水渠、修水坝等，作为对项目具有一定话语权的我，不得不去学习一些基本的工程知识，向当地的老师傅请教不同土方石方的配比与造价，一年半下来，竟还能对农村的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看出个门道来，也算是没白哭一场。

被利益碾压的理想

如果说第一次哭，还多多少少是因为年轻的毛躁所引起的，那么第二次哭，则真正体会到了理想在利益面前被碾压的绝望和说不出委屈的伤心。

2008年3月，距我第一次哭有9个月的时间，此时项目已经进展得差不多了，该做完的工程也基本完成，没完成的也基本上开不了工，因为在上次开会时争吵的结果，这种撒胡椒面式的项目分配方案，有些人口较少、相对贫困或者组织较弱的村民小组，注定是做不下去了。于是，我又得召集大家重新讨论剩余的项目资金的分配方案。

我照例联系所有的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其中一个村干部因为之前有一个项目没满足他的资金要求，总是推三阻四地爽约，没办法，只好一次次地电话联系。再一次爽约之后，我终于压制不住自己了，因为前一天在县、镇两级政府领导面前答应得很好，说要一起开会讨论工作，可我再打电话给他时他还是说有这事那事，等到天黑都没来，我只好说："如果你来不了的话，那么我就和其他几个代表商量，你到时候就别再有什么意见了。"他说："就你们说了算，你们一直都是老大。"我一听他这么说，更压制不住自己的火气，就说："找你来开会商量你又不来，这次这个老大我还当定了。"于是，我们就这样吵起来了。最后，他说要我小心点，并说看我怎么从这个村滚出去。

晚上，我又哭了，是在兴国的第二次哭，饭也没吃，就喝了一碗米酒，想尽快地睡去，却在不停地抽泣。这次的哭，是委屈，但更多的是绝望，是理想崩塌的绝望，在利益面前，我所追求的理想，我要追求的公平，并不是他们所需要的；我所付出的努力，收到的却是恶语相向，甚至威胁或滚蛋。我在这里所能留下的，无非是他们想要的一座桥、几条路、几个水渠、几间房子，以及我和村干部、村民代表吵架甚至打架的故事。

第二天，他来到我们宿舍，还想动手，幸好当时我们有3个人在场，只是相互拉扯了几下。后来，县扶贫办一副主任到了村里，把我们两个单独地叫去谈话，一场风波算是平息了。最后的项目调整，他没再参与，我和其他村民代表则在磕磕碰碰中完成了新的资金分配方案，为了平息争执，绝大部分剩余的扶贫资金，几乎都用到当地的小学，维修小学校舍、翻建小学厕所，而这本该纳入教育部门计划投入的项目中。

新的资金分配方案确定之后，离项目结束已不足两个月，剩下的事情就是拨钱、花钱，简单、畅快，越快越好。但往往简单的事情最容易出问题，在需要钱的时候钱总是迟迟下不来。项目一开工钱就得到位，钱不到位各个项目的负责人就都来找我，于是我在村里就成了一个欠债的人，不得不时而去另一个村，时而回家，时而装着出差，表现出一副很忙的样子，其实心里比谁都着急向中心申请钱，但钱却总是因为各种原因迟迟下不来。在一次原定时间要拨款，但因为中心的原因钱没到

账，以至我和中心当时的负责人刘老石大吵了一架，他问我："你知不知道中心账上也没钱？你的承诺就那么重要吗？"当时我就反驳："是的，我的承诺就是很重要，当时是你说的能拨钱我才跟村里做的承诺，我也是有尊严的。"说完后我就挂了老刘的电话，挂完电话之后我们又互发短信，他说："不管怎样，你都要把剩下的事做完，这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我一听"道德"两个字就反感，马上就反驳他："我就要讲道德？他们就可以什么都不讲？这些事本来就不是我该承担的事情，到现在却要我背着道德的担子去做！"

后来老刘没再说什么，接下来的事情大多都是由着我自己的性子在做，在我认为做得差不多了该离开的时候，我才知道，资金迟迟拨不下来，是因为被负责这个项目的另一个同事"借用"了。借用？！多轻巧的一个词啊！让我们在村里像杨白劳一样躲债，也让我们努力工作的人在无端地相互指责。于是我下定决心要离开，离开兴国，离开农村，离开这个让我无尽遗憾和伤感的村子，带着满身伤痛和疲惫，也带走了青涩和不懂世故的少年时光。

天等人民不等天

在离开江西兴国之后，自己也一度想离开乡村建设领域的工作，于是我就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但是我去的时候正好遇上2008年的金融危机，像我这样没有任何城市工作经验的人自然不是很好找工作。最后几经辗转，经朋友的推荐，加入了国际扶贫机构行动援助（Action Aid，AA），在广西中越边境的小县城里工作，一待就是三年。

从2008年12月到2010年5月的一年半里，是在一个叫宁明的县城工作，从助理开始做起，行政、财务、筹资、后勤、项目等，几乎什么都做。那时候下乡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白天找村里的孩子画画、写信，然后寄给欧洲的资助者用于筹资；晚上与妇女和村民开会，讨论如何将筹来的资金用于社区的发展。因为AA是个国际机构，工作流程比较规范，工作领域也比较广泛，接触了很多与扶贫相关的新鲜词，诸如妇女权益、人居安全、善治、可持续生计、能力建设、政策倡导、HIV/AIDS等，开阔了自己的视野，也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

2010年6月，因为工作的调动，我到了另一个边境小城天等县，属于桂西南大石山区中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天等"，在壮语中意思是石头立起来的地方，放眼望去天等县到处都是大大小小且荒凉的石头山。这里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上的植被因20世纪六七十年代被破坏以后，形成了石漠化，遇雨则涝，无雨则旱，作物难以生长，连人畜饮水都很困难，所以贫困。但当地人也有一种战天斗地的气概，很喜欢把天等称作"天等人民不等天"，其中有一个叫立屯的村子用三代人打通出山的隧道，就是这种精神的最好体现。

因为经验的增长和资历的积累，到了天等之后我成为当地项目的负责人，带着三四个人的团队，在机构的框架下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在奋斗，得益于当地淳朴的民风和干劲，在天等做出了一些让当地农民、政府各方都满意的事情。同时，自己在生活上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不仅仅把这里当作工作的地方，更多的是和当地人交朋友，周末和他们一起去骑行、爬山、踢球，晚上还会与他们一起烤红薯、搞烧烤，努力融入当地的生活圈，而不仅仅是一个过客。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在天等工作期间，一次志愿者活动上，我遇到了一个美丽的广西姑娘，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相恋，最后走入婚姻殿堂，这个边境小城成为我们爱情开始的地方。

工作上的进展，生活上的圆满，让自己踌躇满志要在这个边境小城做出一些改变。然而事不遂人愿，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因为看到中国国力的上升，国际上对中国的援助日渐减少，通过儿童画向欧洲中产居民筹资的方式也日渐困难；同时当地政府更愿意看到的是修路、修桥等硬件投入，而我们的工作手法主要是通过小项目以及软性项目的投入，重在提升当地农民的组织和能力，思路上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在我到天等的一年之后，机构已经明确转变合作思路，我们在当地的团队年底都将撤出。三年的合同到期后，我离开了天等，也离开了广西，因为和当地人有了关系，也有了连接，总忘不了那里的山山水水和淳朴的农人，对广西的人和事总是多一些关注，也盼着有回来的时候。

公益化vs市场化

离开广西后，计划休息一段时间，骑行到处去看看。在刚刚开始骑行的第一个星期，当时中心的负责人白亚丽就给我打电话，说中心在常州的一个小镇跟当地政府合作，做合作社、社区文化、青年人培养等乡村建设的工作，问我有没有回去工作的意向。当时自己想了想，正好也闲着，先过去看看吧。2010年前后，因为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以小毛驴市民农园为代表的CSA社区支持农业农场开始火遍全国，除了可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之外，更多人把它当成一个商机，当地政府也因此投入巨资，建立了大水牛农场，主要是小毛驴团队执行。同时对试验区的社区工作的投入也很大，每年200万元，主要由中心的团队在执行，加上自认为有先进的工作方法和完美的思路，还有一批志同道合的伙伴，想想都激动！

2012年3月，我到了嘉泽的试验区，可是到了之后，因为前期大家对财务、行政等细节问题的忽视，导致前三个月我几乎都在梳理以前的账目，理顺工作流程。等到整理得差不多的时候，第一笔拨款花完了，又得向政府申请拨款了，这时候我便开始了无奈的催款之路，一次次地把皮鞋擦得锃亮，穿着笔挺的衬衫，在政府各个部门间来回穿梭，只求领导们能高抬贵手，在拨款书上审批签字。当地政府的一个书记似乎看到了我这方面的“才能”，专门找我谈话，让我安安心心地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保证三四十人的吃喝拉撒就是大功劳，其他工作就不用过多地参

与了。于是，我便成了专职的行政人员，在情愿与不情愿的失落中，重复着找领导审批签字拨款，然后报账、写报告、交报告、申请拨款……

在我想离开的时候，当地领导又与我沟通，因为大水牛农场的负责人离开，需要有人去协助，要把我调到农场工作。当时为了想证明自己，我就答应过去工作了，约定的试用期是1个月。到了农场之后，当时的经营压力巨大，更多的是以商业逻辑去运作，而我的思路是社会化的公益运营思路，自然很难合到一块，和农场主要负责人也冲突不断。尽管我当时很努力也很用心，但最后还是以我的退出而告终。在1个月试用期快到的时候，当地领导通过一个同事告诉我，明天不用再去上班了，于是我当天就完成了工作交接，很挫败地离开了大水牛农场，离开了嘉泽，此时距我来时正好一年。

变革者的变革之痛

2013年5月，我回到了中心的北京本部工作，此时的中心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创始人刘老石在2011年3月因车祸去世，中心的几个老骨干因为工作思路上的差异，大致分成了两派，纷争不断，温老师不得不协调前AA的负责人张兰英老师参与中心的工作。因为我有过在规范化管理机构的工作经历，正好也是张老师所在的机构，加之自己在外地工作没被卷入中心原有的派系之中，而且也算是中心早期的参与者之一，从经历和资历上都符合“变革者”的要求，因此被寄予厚望，希望我返回后能通过建立规范化的工作机制和流程，期望以工作的推进来化解矛盾。

回到中心的第一年里，女友也来到了北京，在小毛驴工作。但在刚回到中心的那年里，自己带着改变中心现状的强烈使命，几乎全身心地都投入在工作上，建立工作规范，监督制度遵守，稍有不合规矩，自己都会站出来毫不留情地与人争执一番。那时的自己是线性思维，只要大家都遵守工作制度，工作就能推进；只要工作能够推进，就能化解之前的矛盾。自己就在这“只要……就……”的直线因果关系中，规划着中心一步步的改革方案。

然而依然事与愿违，因为大家思路上差异的形成非一日之寒，在社区伙伴（PCD）[2]对中心一份评估报告中提道：“每个团队都有各自的方向和侧重，团队认为分歧缘于中心宏观视野的缺失造成理念上的不认同。具体体现在同一表述的不同理解上，而团队之间缺乏沟通，不了解相互行动的动因，也是各自为政的原因。”于是，我的努力一次又一次变成徒劳，自己也被卷入这场无休止的派系斗争的旋涡，甚至是旋涡的中心，急躁、抱怨、愤懑、非黑即白……直到现在仍有余波。在这没有尽头的争执中，我慢慢发现自己除了脾气变大之外，其他没有什么长进。在一次又一次的挫败感中，我渐渐收敛了自己的脾气，转而捡起自己曾经做过的或者还算擅长的事情：行政、财务、活动、项目计划、农民培训、返乡青年等。总之，不让自己太闲，不论事情大小，都去做一做，

希望能在平静和细微中，慢慢磨炼自己的心性，毕竟任何宏大理想，都必须建于细小的一砖一瓦之中。

新的征程

2016年5月，我和相恋五年半的女友终于领证了，用我们这几年来的积蓄象征性地交了彩礼，没办婚礼，没办酒席，也没拍婚纱照，然后剩下来的钱就拿来蜜月旅行。还好双方的父母都很理解，让我们这样简简单单地走到了一起，让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规划自己的生活，此时我们已经萌发了回到广西的想法。

而后，我们一个团队搬到了北京顺义东北郊区的一个村子里，而妻子还在北京西北郊区的村子里，每一个来回就要花上一天的时间，就这样度过了半年同城异地的生活。半年后，妻子所在的小毛驴因为业务调整，面临工作上的选择，于是她先离开北京回到了广西，而我在完成一次泰国参访的交流活动后，也离开北京回到了广西，准备开启一段新的征程。

1.3 问道乡间

人才计划五期 车海生[1]

现在是晚上8点多，我坐在窗前的书桌旁边，微风吹进来，凉凉的，很舒服。外边只有不多的几户人家亮着灯。夜很安静，乡村里的人休息得早，不像城市，有的到了午夜还很热闹。这里是福建省永春县岵山镇茂霞村，我们生态文明研究院的宿舍就在这里。

安静的夜里，最适合回忆往事，总结人生。我于2008年下半年参加人才计划学习乡村建设，到现在（2018年）整十年了，先是在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五年，后来在灵宝弘农书院五年，如今到了永春生态文明研究院。这十年基本上是按照自己大学毕业时根据《易经》规划的人生轨迹走过来的——2002—2007年“见道起信”、2008—2013年“悟道解义”、2013—2018年“依道修行”、2019—2024年“印证道果”。

如果把自己为什么参加乡建，以及乡建10年的“求道”过程讲出来，对后来参加乡建的年轻人可能有些借鉴作用。

经典启蒙

我的故事要从小学、中学讲起。小学六年、中学六年，总的来说，我是个听老师和家长话的好学生、好孩子，成绩也很好。但是，心里有一种东西压抑着，就是对课本、学校不大满意。这种不满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到高中后已经很严重了。例如，课本，“语数外物化生政史地”9门，够多吧，可是讲怎么才能让你身体健康、精神通达，怎么处理跟父母、老师的关系这样的课程却很少。而在同学中，恰恰是生病、抑郁，跟老师、父母闹别扭等问题很多。我就经常生病，有一回输完液去厕所时晕倒了，额头磕了老大个包；一个同学经常失眠，半夜坐着；还有一个同学成绩不稳定，害怕父母责备，高考前几个月失踪了。还有排座位，成绩好的靠前，成绩不好的靠后，这些事情总感觉不对、不公道，追求那样的“成功”、高分，有意义吗？有道德吗？

心中有疑惑，课本、老师又不能解惑，于是去书店找课外书来读，寻找答案。慢慢课桌上就有了《论语》《孟子》《尚书》《礼记》《易经》《老子》《毛泽东传》等书，觉得这些书上说的是正理，是公道话。这种书越来越多，课本、习题集越来越少，算是用这些书为自己筑起了一座孤独的精神堡垒，用来抵抗课本、老师等周围环境的压力。你自我边缘了，老师也就把你边缘了，我一度因为成绩下滑，被老师安排在了最后边。可是抵抗终究不能彻底，没办法，高考对每个高中生来说

都是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关乎今后人生的命运，不是闹着玩的。高考前几个月，我把那些书都封起来了，课本、习题集又回到了课桌上。

理科生的大学文化求道之路

到了大学，对学校教育的不满进一步发展。不过，第一年，说实话，对大学充满期待，甚至对老师们很崇拜，那可是教授啊，有学问，以前只有在电视里能看到。我努力做一个好学生，然而，慢慢地，不满意还是冒出来了。课本还是那些内容，比高中深一点而已；老师倒是不逼着你做习题了，可是你要选班委、拿奖学金、入党、保研，就要分散精力；学习压力是小了，可是也疯狂了，玩游戏、谈恋爱、混日子。

这样的大学不是我想要的，大学就应该像我们校训说的，“怀天下、求真知”，老师应该带着学生探讨历史社会问题、研究真学问，可是整天在校训下走来走去，却没见有老师和同学那样做。第二年开始，我就不怎么去上课了，对周围环境有一种很强的抵触——无力改变环境，又不想被环境同化，就这么矛盾着。每天去图书馆，看文学、历史、哲学、时政类图书及报刊。学校图书馆有藏书300万册，这对一个从农村来的、小学中学里看课外书还要挨批评的又对历史社会充满好奇的学生来说，吸引力可想而知。一年的自学，让我改变很大，感觉到自己的兴趣不在物理而在历史。大三一开始，就向学院提出转专业的请求。历史系的分数线比物理系的低，再补考几个科目过关就可以转专业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院里老师说不容易转，但说帮我争取。就这样，一边跟院里沟通，一边自学历史和传统经典，到了大三快结束的时候，院里通知说，学校决定了，不能转专业。

恰好，那几年，学术界有一场关于改革的争论，在《读书》《中国改革》等杂志和乌有之乡网站上，我经常看到一些争论文章，虽然自己的理论素养不高，但直觉上比较赞同温铁军、汪晖、崔之元、甘阳等学者的观点，而且在《大学生》杂志上，我看到了白亚丽休学支农的报道，当时眼睛一亮，觉得这些人、这些事，是冲破世俗遮蔽的契机，感觉支农是追求道德的方式。同时，在对传统经典尤其是《易经》的学习上，我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我理解了《易经》中“时”的含义，把我们国家的历史和自己的人生经历同六十四卦对应了起来，国家的历史和自己的人生，忽然显现出了美妙的秩序，不再是杂乱无章的了。我清晰地认识到，1900年以来我国进入了变革时期，我则在大四面临着从世俗中挣扎出来反身向道的抉择。总之，温老师发起的大学生支农和乡村建设是社会外部条件，自己心智的成长、对《易经》理解的深入是内部条件，两方面条件综合，我决定摆脱世俗，走追求道德的路。

这是大学四年最重要的收获，虽然没有得到学位证（学分没修够），但是对历史和人生有了自己的见解，并下决心走追求道德的路，这是最好的学位证。怎么联系这些老师和同学呢？毕业后，我在学校就

业网站上看到北京一家公司来招聘，查了公司资料，就去应聘，打算到了北京，就能接触到这些老师、同学，与支农结缘。

在乡村中求道

没想到，到了那个公司后，我经常出差，河北、河南、云南都去过，在北京的时间很少，难有机会接触那些老师和支农同学。我就跟在大学里一样，看他们的书，看报刊、网站，关注思想学术界动态。2007年4月，我还写了一篇文章《中国改革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此次“改革争论”的总结和评价》，以“车易”的笔名，发在网上。文中说，“2013年到2041年是中国变革的攻坚阶段，社会矛盾的特点是‘大人虎变，未占有孚’，意思是，国家干部为人民服务意识显著增强，贪污腐败现象迅速减少，虽然仍有些微不足之处，但深受人民爱戴”（果不其然，习近平主席上任后，猛药去疴，铁腕反腐，政治生态迅速好转，人民群众衷心拥护）。

2008年，公司新来了一个叫梁翔宇的同事，聊天中他说，有个叫吴丰恒的，参加了支农，他们在北京温泉村有个机构，叫作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说这话的时候，我还在河南。但我当年年底就辞职到了北京，找到了温泉村的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

在中心，接待我的是何志雄和王盼，他们问了我的情况，我也了解了中心的情况，知道温铁军老师是精神引导者，知道每年都有人才计划，现在是第四期，下一期第五期，我可以参加。过了几天，刘老师又找我谈了话，算是面试吧。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觉得农村好还是城市好？”我说：“各有好处，农村环境好，但是挣钱、上学、看病不方便，城市相反。”他说：“也对也不对。现在是这个样子，那是因为人才都从农村跑到城市去了，如果大学生、青年人才，能回到乡村、建设乡村，农村就没有你说的那些坏处了。”我心里想，这可能就是刘老师做“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项目的原因吧。这一次谈话，我有种“找到了组织”的感觉，从此开始了我的乡建生活。

大四的时候我虽然下决心要走追求道德的路，但是路在哪里、怎么走，我还不知道。具体疑问是：对历史社会内部的力量构成和相互关系，如王道和霸道的关系，道统的传承谱系等，还不明白；更重要的是，对当代社会非常懵懂，我要追求道德，在当今社会谁是老师和朋友我都不知道。我是带着这些疑问加入人才计划的。

在顺平试验区的一年里，李翰昭、刘秋菊、张志伟、葛玉桃和我五个五期学员，跟着德斌、张可两个三期、四期学员，协助四个村子的农民做合作社——柴各庄的于阿姨等人、小水村的葛叔等人、史家沟的杨阿姨等人、康关的赵叔等人。于阿姨、杨阿姨、葛叔他们年纪大了，曾经因看不惯村干部贪污上访过，刘老师劝他们不要上访，转回来建设自己的家乡，我们帮他们搞了农资店、养了一些羊，还有资金互助等，挣

钱不多，他们倒也安心，遗憾的是始终没有做大。康关的赵叔不是上访出身，40多岁，正当壮年，原来做一点小生意，有经济头脑，我们协助他承包了几百亩山地，种了树、养了鸡，一个小农场，现在还在经营，效益还不错。

前半年，我们主要在柴各庄和小水村花了不少精力，但是感觉工作很难推进，上访团队转型成的合作社，没有做经济建设的能力，内部还有一些矛盾，所以，下半年开始我就去康关住了。农忙的时候，我也帮助于阿姨、杨阿姨等收玉米、割谷子，但平时主要协助赵叔做农场，虽然也很难，但一点一点地在前进。为了这个事情，我跟德斌、张可等还有过争论，到底重点放在哪个村？放在什么工作上？当时我就觉得农村有自身的纹理，农村工作有自身的规律，建设一个村庄必须顺应这个纹理和规律，就像“庖丁解牛”，不然劳而无功。这个规律是什么呢？就是依靠冒尖的青壮年发展当地特色经济。同时我也感觉到，农村好复杂呀！农民解决问题的能力很低，他们没有足够的胸怀和智慧去化解矛盾；相反，一件小事都可能闹得很大。我们的工作必须小心谨慎，一不小心就会弄巧成拙甚至引火上身。所以，乡村建设还真不是什么人随随便便就可以做得了的。我也明白了为什么温老师说，“支农活动，主要是为了大学生自身的成长，了解脚下这片热土，并不指望你们真正能为农村做出多少事情来”。

除了合作社的事情，我还是我们五期学员选的学习委员，引导大家的理论学习，主要学习那一本《参考资料》，因为要做表率所以看得很仔细，每篇都写读后感。参考资料里有很多学者的文章，左中右各种观点，如徐友渔、秦晖、黄宗智等，可能刘老师的意思是让我们自己辨别。这些学者不管观点如何，都是学术界头面人物。在刘老师的引导下，不知不觉我对学术界的状况慢慢了解了。

学习《参考资料》之外，还有两次理论培训，请的也是这些老师，徐友渔、卢周来、钱理群、党国英等，当然更有温老师。大部分老师讲的理论知识我记不太清楚了，温老师讲的他的人生故事倒是印在了我的心里。他讲到，“文革”时候怎么坚持读书学习，后来到人民大学读新闻专业怎么恶补英语，在军委总政研究室的时候为了圆毛主席的未了心愿，和几个朋友骑摩托车千辛万苦走黄河……温老师这些在逆境中追求理想的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总之，人才计划一年，我对农民和学者的状态了解了很多，加入人才计划时带着的疑问初步获得了解答，进步很大。在结业论文中我说，“比大学四年进步总和还大”。同时，基于自己的感受，我对人才计划也提出了一个建议，“选一个合适的农村，学员集中驻点，一定五年。因为农村的问题很复杂，学员集中起来容易做事，农村的问题又需要长时间地磨，一年时间根本不够，最好能长期扎根”。（现在看来，这个理想方向对，但是那个时候时机不成熟。“三农”问题不是三农自己的问题，是城乡矛盾、中西矛盾等外部大环境决定的，是宏观政策造成的。2003—2013年，大环境还没有改变，宏观政策没有改变，年轻人在农村很难做出成绩，很难扎根。）

后来，在枣强大营镇芍药村、天津、嘉泽也一直是这样的学习状态：一边参与农民、工友的事情，了解底层社会，一边读书，从温老师、汪晖教授到鲁迅、梁漱溟、费孝通、李泽厚、黄宗智等——就是20世纪以来学术界代表人物的著作，还有《尚书》《易经》等传统经典。这样一直学习，差不多到2013年，加入人才计划的时候带着的疑惑——“历史社会内部的力量构成和相互关系是什么样的；我要追求道德，在当今社会谁是老师和朋友”基本弄明白了。

可以说，人才计划五年的学习给了我答案，为此我写了一篇文章《清末以来百年历史图景重构》，发表在嘉泽姬山书院内部刊物《乡建与自觉》上，编辑了一本文集《百年经世文编》。而且特意请教了温老师、黄宗智老师和汪晖老师。黄宗智老师说，“去其形式，保其深髓”，温老师说，“甚合吾意”。老师们的鼓励给了我信心。以这篇文章为标志，五年前加入人才计划的时候带着的理论疑惑基本上解决了。

这几年里，温老师、汪晖老师等的著作我仔细研读，向他们请教疑难，让我具备了宽阔的历史视野；人才计划的同学，乡建青年人都是益友，还有传统文化圈子里曾维术老师等，亦师亦友。自己的老师就是温老师、汪晖教授等学者，朋友是人才计划的同行，以及其他具有“家国情怀”和“底层关怀”的优秀青年人。

我这五年（2009—2013年）的学习成长，跟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老师们和同学们的引导分不开，尤其是刘老师，他一直为我的理论学习提供帮助，给我介绍文章、介绍书、介绍老师，学术上允许甚至鼓励我跟他辩论，他是一位好老师，现在他不在了，我很怀念他。

在2013年，以理论探索为主的学习阶段基本结束了，今后理论探索会继续，但到了转入实践探索的人生阶段。我要沿着尧、舜、禹、汤、文王、孔子、孟子以及慧能、百丈等古圣先贤走过的路，自觉觉人，响应习主席的号召，跟着温老师等乡建老师和人才计划的朋友们，做农民的组织工作、合作社的工作，化解“三农”问题，助力乡村振兴。

打开新窗口的合作社资金互助模式

农民工作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怎么组织他们成立合作社、发展经济增加收入呢？这是新的疑惑，是未来五年里要探索的。2014年3月，我来到了位于河南灵宝市焦村镇罗家村的弘农书院，跟随何慧丽老师在灵宝做乡村建设探索。

刚到灵宝，第一年，先了解情况，熟悉环境。第二年，2015年，我基本了解了罗家村，罗家村的干部、村民也了解我了，在何老师的指导下，我开始探索建设罗家村。这有三大内容：一是在砥石峪，利用旧山神庙和旧林场场所，改建一个作为生态种养殖技术培训基地和村庄公共文化空间的小秦岭弘农园；二是依靠罗家村干部和优秀青年人，引导罗家村走上“（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生态休闲农业）·青年返乡创业”的路；

三是举办以教育优秀大学生成长为有“道统自觉”的君子为目标的“大学生耕读研修班”。

2015年，通向砥石峪的路开始硬化，通了电、水，简单收拾了原林场旧房屋。在何老师的帮助下，我们联系到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并获得支持，尝试举办了一期“大学生研修班”。2016年，何老师邀请来谢英俊先生，对砥石峪山神庙和旧林场进行了整体设计，弘农堂等建筑开始修建。跟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合作，正式举办“大学生耕读研修班”。我也赢得了村民的认可和信任，被选为合作社副理事长，负责生态农业技术服务这一块工作。2017年，弘农堂、明德楼、院墙等都建起来了，发酵床猪舍、鸡舍、生态厕所也建起来了，给村民做生态农业示范，市民朋友也喜欢带着孩子来这里玩。在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上，一方面通过学习四书五经等传统经典，形成道统自觉；另一方面体验农耕生活，了解农村实际，形成底层关怀。各方面工作都慢慢展开了。这一年，温老师也来弘农书院考察指导，表扬、鼓励了我们的工作。

在弘农书院，何老师指导我们怎么引导罗家村干部群众成立合作社，开展资金互助、统购统销和生态农业试验，虽然步履艰难，但确实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例如，资金互助部，四年里累计借款的社员有400多人，借出资金480多万元，用于香菇种植，猪、羊、鸡养殖，孩子上学等，大大方便了社员的生产、生活；统购统销部为社员统一购买优质小麦，加工成面粉，保证吃得安全；生态种养殖技术服务部在探索新苹果树生态种植和老果树的生态化改造，还引进了东北李云凤老师的发酵床养殖技术。

这个成绩的获得，是罗家村干部、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也应看到，有“三农”外部环境改善的原因。党中央、习主席推进脱贫攻坚、全面小康，“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三农”的发展空间慢慢拓展开来了。例如，允许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开展资金互助业务，这对发展农村经济有大帮助，之前农村的银行、邮政储蓄、信用社都是把资金抽走，农民存款容易贷款难，现在允许农民搞资金互助，贷款不难了，经济就搞活了，还有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政策、资金、项目上为农民探索农业生态化转型提供了很大支持。农民是勤劳、智慧的，只要宏观政策对头、外部环境有利，乡村振兴是可以实现的。

在这个社会背景下，我们的人才计划培养也实现了转型，真的开始集中在一处，尝试长期扎根了。我2014年到的灵宝弘农书院，第二年，少雄就带着人才计划的学员们到了永济蒲韩乡村，灵宝和永济隔着黄河遥遥相望。少雄他们在永济的工作开展得更好，老石农场、电商、儿童私塾等做得有声有色，社区发展了，自己也成长了。四年时间，他们已经站稳了脚跟。灵宝和永济的乡建青年人的做法很有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味道，也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农村有集体经济——以前是人民公社，现在是合作社或者农民协会，否则没有承接知识青年的载体。

到了2018年，去弘农书院的时候带着的疑惑（怎么组织农民成立合

作社、发展经济增加收入）基本获得了解答：农村工作的一般方式是，引导村庄走“（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生态休闲农业）·青年返乡创业”的路；工作节奏是随曲就伸，外部环境和宏观政策允许做多少事就做多少事，允许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同时，因为中美贸易战爆发，我国面对的国际压力增大，而深受西方现代性影响的思想学术界不能有力应对新的国际斗争，形成不了我们的话语权，于是我逐渐有了一种冲动，想在温老师的指导下慢慢参与思想学术界的革新。我就写了一篇文章《传承优秀传统重构历史图景实现民族复兴》请温老师指导，温老师基本肯定。我已经知道温老师、邱建生老师在福建永春建立了生态文明研究院，是一个可以把思想理论研究和乡村建设实践结合起来的很好的平台，就请求到生态文明研究院工作。5月到了研究院，直到现在。

回首走过的路，中小学十二年、大学四年，乡建十年，一步一步走上乡村建设的路。我感觉，梁漱溟、费孝通、温老师的乡村建设是20世纪以来的道统传承，跟历史上尧、舜、禹、汤、文王、老子、孔子、慧能等的道统一脉相承，学乡建就是学道。如果大家读过儒释道经典，就会明白学道要经过四个阶段：见道起信、悟道解义、依道修行、印证道果，学乡建也是：回望乡建、看清乡建、接近乡建、进入乡建。

我大学4年是回望乡建：2002—2006年，正是教育产业化方兴未艾的时候，西方化、城市化、名利化的利害，我想追求道德却没有条件，正在苦闷的时候，看到了《大学生》杂志介绍白亚丽休学支农，看到了《中国改革》，觉得支农是一条道德之路，于是毕业后加入人才计划，学习乡建，学道。后来我慢慢明白，温老师发起的乡建确实有针对教育产业化进行教育改革探索的含义，我就把人民大学乡建中心当作一个书院了，历史上朱熹等很多大儒都曾在教育体制外创办书院授徒讲学，这样的师徒关系才是传道学道的关系，不会是“教师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传统的科举和新世纪初的大学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大学时期算是从世俗中挣扎出来的，回望乡建。梁中心5年是看清乡建：在中心刘老师的指导下，除了传统经典，我读了温老师、汪晖、甘阳、黄平、崔之元、王绍光、韩毓海等老师的书，温老师、汪晖老师的书我读了两遍，还有梁漱溟、费孝通、李泽厚、黄宗智等，同时到乡建试验区驻点和农民生活在一起，慢慢地弄清楚了乡村建设是怎么一回事，实际上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为了应对西方的挑战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过程，主题是回归中国、回归乡村、回归道德，用梁漱溟先生的一句话说，“以乡村为根、以老道理为根，另开创一个新文化”，老道理可以上溯到老子、孔子、慧能大师等。弘农书院5年是接近乡建：在何慧丽老师的指导下，引导村民组建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社，做发酵床养殖和苹果园养鹅等生态农业试验，寒、暑假开办大学生传统经典学习班，同时继续研读中西古今经典，知行合一，加深了对乡建的理解，但还没有通透，“只到门外，未入门内”。

现在到永春生态文明研究院是打算在福建这边5年，跟随邱老师、温老师继续学习，一边在温老师的指导下从事课题研究、写书，慢慢参加思想学术革新工作；一边在邱老师的指导下从事乡村振兴实践，慢慢

地入乡建之门、印证道果。这个入门证道的阶段才刚刚开始，思想学术界对“《易经》视野下的历史图景”的需求还不是太大，自己的学术功底也不到家，未来5年是成器待时，到2024年内外条件才能成熟。所以，我要抓紧学习。

温老师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三农问题太严重了，所以有新乡村建设。他还说，乡村建设“负重潜行”，这和曾子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不是一样的吗？乡村建设就是20世纪的道统传承，学乡建就是学道。乡村的山水田园、耕读一体的生活很有意义，希望越来越多的优秀青年参加到乡村建设、乡村振兴中来。

以一首小诗结束此文：

从前不知道，为道日颠迁，

而今才知道，道在山水间；

田园勤耕作，勤中又有闲，

回看天上月，游在白云边。

1.4 乡村衰败下的合作社

人才计划六期 汪维行[1]

参加乡建的工作已经有七年多的时间了，但在内心深知，参加乡建绝对不仅仅是一份工作，它不仅承载着短短几年中数不清的酸甜苦辣和悲欢离合，而且更是自己内心对乡村生活记忆的延续，让自己在这个乡村快速衰败的时代，还能够感觉到自己是没有离开生我养我的乡村和土地，还在与乡村发生着丝丝缕缕的联系。“乡村建设”有时候会被人表述为一份社会事业，一份对乡村进行重新改造和建设的社会事业；有时候也被表述为一个机构或者一种派系，大意是指他们这一类人都有某种共同的特点，拥有某种特定的观点，并做着这一类的事情。

但是对于这些年一直参与其中的我来说，参与工作的年限越来越长、经历过的人与事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渴望去回顾自己在这样的乡建脉络中发生了哪些事，又是怎样发生的等一系列的问题。但是，探讨的问题似乎更倾向于我在其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自己的成长，那这些与乡建的关系呢？与社会的关系呢？所以我总想把自己参加乡建的前后梳理清楚，尝试将自己的成长、乡建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变化融合在一起，共同来展现一个青年人在当下的成长生活路径。

躁动与启蒙

生命中总有些东西似乎就在前面等着你，就比如乡建，当然她会为你遇见她做一系列的铺垫，只为你遇见她的时候能够百般投入和倾心。

大学时期的我是班上最不“安分守己”的学生之一。在大学的校园里，拥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可就是不知道把这时间花在哪儿；拥有着无限的潜能和活力，可就是找不到该去努力的方向。面对枯燥乏味的专业和课本，听着老师在讲台上“喋喋不休”地讲着陌生的化学公式，还要应对毫无意义的考试，那时候的我开始在想：我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我要去哪里？我觉得非常的迷茫和困惑，但内心总有声音告诉自己：一定有很精彩的世界在等着我。

于是我开始选择逃课，让自己走出课堂、走出校园。我参加各种活动，去寻找自己想做的事情，包括利用假期去食堂、饭店当临时工；在学校广场上大声练英语、练习演讲；学习成功学，梦想自己要成为成功人士；骑自行车横跨太行山，游览黄土高坡的宏伟壮丽景色……尽管这么使劲地折腾，可是内心深处却总觉得没有真正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事，做这些事似乎只是纯粹用来打发校园里大把的时间和用不完的精力，在

闲下来的时候也会问自己：我到底想要什么？我喜欢什么？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意义在哪里？什么才算成功呢？

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位共同疯狂过的伙伴介绍我去参加学校社团组织的支农下乡活动。当然报名参加这类活动的人不是很多，在学校里对农村的一些议题感兴趣的同学本来也不多。当时我是抱着体验的感觉去的，很荣幸被当时的支农队录取了。

接下来我就是开始参与支农队的一系列准备活动：早起拉练学习、朝话、晚上讨论学习，学习什么是三农问题，它是怎么来的。同时还要结合自己家乡的变化来讨论农村和农业；一起学习农村调研、访谈技巧，最为重要的是在这里也讨论人生价值如何实现。紧接着就是组成队伍下乡，按照计划我们要在村里开展文艺、调研和支教三项活动，除了这些工作，七天的下乡活动期间还发生了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团队之间的互帮互助，集体做饭，集体讨论学习，共同分享在活动开展期间所遇到的困难和思考；同时大家开诚布公地做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有表扬与自我表扬；有时候也会吵架，可就是觉得怎么吵都不会影响伙伴之间的感情。村民们也非常热情，总是给我们送一些自家种的蔬菜和面粉，有些人还送来烙饼。在我们的下乡纪律中有一条：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但是有时候因为村民们太热情，有些村民还悄悄地把菜和食物放在我们门口，我们也不好意思拒绝。就因为这个事情，伙伴们还专门开会讨论，互相辩论，到底该不该拿村民送来的东西。最后，我们集体想出办法，村民送东西来的时候，不能拒绝的可以收下，第二天派出两位代表给人家干半天活。什么活都可以，扫地、挑水、锄地、给孩子补课……总之要付出相应的劳动来换取，这叫“劳动换食宿”。

短短七天的下乡活动很快就结束了，在心里埋下了种子或者说是让原本埋的种子开始发芽。首先是在情感和心灵上找到了归属。我们在中学时代就被老师和父母教育，要走出农村，不要务农，所以一直向前走，走得越来越远，到了大学的时候开始追求更广阔的世界。可是却从没有回头再看看生我养我的乡村和土地，那种脱离了土地和乡村的感觉让人有些不知所措。所以当第一天到村子里的时候，自己感觉有一种莫名的轻松和愉快。脚踏着土地那才叫踏实，一眼望去是田间的各种苗木、花卉和蔬菜那才叫醒目，呼吸一口村里的新鲜空气那才叫气爽。所有在孩提时期熟悉的场景一下被我感受到，让我全身都放松下来。我想这也许就是自己参与乡村建设工作至今最为核心的部分，乡村是一个可以净化心灵的地方，让你找到踏实的感觉。

其次这次下乡活动也影响了自己内在的价值和视野，所有的活动时刻都是在强调集体与互帮互助，学习的内容也以关注社会和弱势群体为主。它打破了我原来那种狭隘的关注自我成长的空间，让我通过关注和参与社会议题来提升自己的思考和能力；在人际关系上，我体会到一种人回归集体的温暖；同样在理想上不仅仅肤浅地追求经济上的腰缠万贯与身价百万，而是对于社会美好愿望的一种寄托。

在第一期下乡之后，在往后大学的生活中我便开始更加关注三农与乡建，经常和支农社团的前辈开始在村里“走街串巷”，只要碰到地里干活的农民就去聊天，聊生活、生产、教育……尽管那个时候我对于系统的调研方法以及访谈技巧都很缺乏，也没有做一些详细的记录，但是很享受那个过程，我不仅能够欣赏和感受到农村的田园风光，而且可以和在土地里劳动的人聊天，才是一种真正的学习。

最后，对于大学期间的下乡活动用一位让人尊敬的老师——刘老石的话语来结束：“我决心把青年人更多地带到农村去，让他们在对农村的关注中学习和体会自己的责任，让青年人在对社会的关注中超越狭隘的自我关注，从而把自己的命运和农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以此达到升华。”

失败的联合购销试验

因为参加支农调研结缘乡村建设，或者说大学时代的支农调研本身就是乡建体系的一部分，个人在其中深受影响。毕业之后，参加乡建工作也成为可以选择的一个去向。对于自己一直都参与的下乡工作总是放不下，也总想看看往下走到底会是怎么样？经过矛盾、犹豫和比较之后，我决定还是继续往前走走看看会发生什么。2010年毕业季通过学校支农社团的推荐我参加了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梁中心）的全国大学生培训：这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终于可以到“延安”来学习了（当时梁中心在很多支农同学的心里就是这个分量）。在这里的每一天信息量都非常大，不断有新的知识需要去理解和吸收。和10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同吃、同住、同学习，几乎每时每刻都处于学习和交流之中。当然最兴奋的就是平时在书中看到的老师终于见到真人了：钱理群、温铁军、李昌平、何慧丽等，在大学时代就是看着他们的文字、听着他们的故事成长的，现在能够见到这些真人能不激动嘛！另外梁中心也介绍了在全国各地建立的红红火火的乡村建设试验区，在村里组建的文艺队、老年协会、合作社……这些试验区原先就是由大学生支农作为第一支力量去动员，现在也急需青年人投入，共同参与建设。

在参加该培训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梁中心正在招募农村方面的实习生：农村可持续发展人才计划（简称“人才计划”），到2010年8月已经开展五期了，准备招募第六期的学员。我毅然决定参加第六期人才计划。尽管当时的学员补贴非常低，只提供500元/月的生活补贴。当时我的脑海中就只有一个想法：到这些新农村建设事业红红火火的地方去体验和学习，去看看这些开展乡村建设的地方到底和普通的农村有什么不同。

人才计划的一年是需要全年待在农村试验点的。我被分配到了苏北地区盐城市阜宁县的一个乡镇：硕集镇。接待我的是一个当地的合作社和普法协会的成员。这是一个陌生的地区，好在年轻气盛，也确实想去重新认识乡村，认识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到了之后被当地的合作社安

排住在了一位张姓大叔的家里，在这里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几乎快成为他们家的一员了。那时候在农村的实习没有什么太多繁杂的任务，有大把的空余时间去体验农村各种活动：赶大集、观摩村庄选举、参加婚礼、葬礼、孩子百日等。这些大型的村庄活动让我切身感受到，即使是没落的乡村，依旧是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社会。在大集上你可以看见大叔、大妈们为了我们平时看不起的五毛钱差价而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我想，他们讨价还价的过程应该远比最后的结果“享受”；参加隆重的“封建”葬礼，你可以联想和追溯到千百年农业社会遗留下来的那种对“孝道”的重视。当然和他们一起劳动也是家常便饭了：冒着雨抢收、顶着太阳喷洒农药、早起锄地……只有下地劳动，才能明白以前课本和文章中提到的中国人多地少到底是怎么个人多地少，农业的内卷化到底能够承受多少农业劳动力，更重要的是让我感受到农民身上那种耐劳和韧性。

因为接待的机构是一个信访的协会，这里会涌现出很多上访的农民精英。他们不断地向上级政府反映乡镇上各种“苛捐杂税”，县里不行就去市里，去省政府甚至跑到北京来上访。在和他们接触的日子里，我明白农村的上访维权不仅仅是维护权益这么简单，很有可能会涉及农村的基层选举、村庄灰色势力以及历史遗留问题。

因为矛盾激烈的原因，在人才计划的下半年我就被调离了苏北，来到河北保定市顺平县的一个小山村——柴各庄村。刚去柴各庄村的时候是1月份，天寒地冻，这里靠山，风又特别大。寒冷的天气就给了我们这些没有生活经验的人一个教训，如何度过这个寒冬成了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在村里租了一栋村民不住的房子，位置还不是很好，是西厢房（坐西朝东），晚上能够降到零下15—20摄氏度。这里没有煤气，做饭、烧炕都用烧煤的地灶，关键是烧炕。刚开始的时候，一夜要起来好几次添煤，天太冷也不愿起来，头一天晚上添的煤第二天基本都灭了，又得重新烧，弄得整个房间都是烟。在几次尝试之后终于学会了如何添煤、添多少煤才能够烧一个晚上，第二天刚好早上用；特别是学会了如何封炕，不能封得太严实，要留一个口子可以通气，这绝对是个技术活。有时候想想，如果我们连这些生活的基本技能都丧失了，我们还能做什么？

在顺平柴各庄村的半年有各种的酸甜苦辣，有被人关怀的感动，也有工作的失落和挫败。印象特别深的是送桃子那件事。柴各庄村因为靠近山区，昼夜温差比较大，这里种出来的水果特别甜，尤其是桃子。夏季是桃子成熟的季节，村民们天不亮就到地里去摘桃子了，一直到晚上天黑得看不见了才回来。在这期间，我们就会经常收到惊喜，一筐鲜红的桃子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摆在家门口，关键是桃子还特别大、特别熟。顿时我们心里充满感动，是谁送过来的桃子呢？是昨天遇到的大婶还是前天给帮忙摘桃的贾大哥……在乡村最好的、熟透的桃子反而卖不出去，因为不利于运输，老板都是选用一些有点儿红，但不是全红的那种桃子去卖。所以一般熟透的桃子都是自己吃或者是送给熟人、朋友吃。除了桃子，还有苹果、蔬菜、腊肉等，现在想想其实在乡村工作的人比

一般人更有条件接触到最好的农产品，还有人间那份最真挚的感动。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合作社发起人于大娘和大爷会在寒冬的大早上架上牛车送我们到村里的路口来坐车；康关的赵叔和婶儿会做好一大桌子非常可口的菜为我们改善伙食……至今，我和他们还保持着联系，有时候还能吃上于大娘送来的小米、赵叔和婶儿在山上散养的鸡生的柴鸡蛋。

农民有可爱的一面，也有让人揪心的时候。2009年在顺平建立试验区，联合五家合作社成立联合社，开展一些合作联合的业务，特别是在农资统购上。梁中心作为发起人参与协调甚至投入钱和合作社一起来创办。我们作为实习生也参与了其中的很多工作。第一年尝试的时候都不错，每个合作社都有一些剩余，也能给社员一些分红。第二年就出现状况了：合作社与合作社之间因为农资货物协调的问题（运输的远近、提前付款还是后来付款）开始出现一些矛盾。

事情总有变故，联合起来取得的收益总是抵不住相应的风险，无论是合作社本身还是外界参与的青年志愿者都不愿意看到联合购销解散的局面，但最终还是不得不面临解散的局面。一方面着实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投入资金维持运行。另外，其联合购销产生的收益并不大，但是仍要花费大量的成本、精力来协调各合作社之间经营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还需要面对其他农资经销商的竞争、打压。为数不多的1万元利润因为某个合作社领导家庭变故而挪用了这部分钱。内忧外患，合作社联合社因此开始解散。解散过程是痛苦的，因为涉及挪用的账目。因为自己当时不理解这些复杂的事情，总觉得真理在自己这边，所以理直气壮地去要账，甚至还和他争吵，然而事情并没有顺利地解决，至今也没有很好地解决。

在处理完这件事之后自己特别失望，原本好好的试验区为什么就做不下去了呢？这些合作社都说要联合起来一起发展，但是碰到实际问题的时候却又互相猜疑、斤斤计较。难怪都说农民宜分不宜合，心里也曾怪过他们是一群扶不上墙的烂泥。我心里对农民合作这件事开始打退堂鼓，农民真正的合作社之路在哪里？这些只有小农组织成的合作社真的很难发展起来吗？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对农村合作社感兴趣，农民到底该如何合作起来——农户在面对强大的市场环境时，是迫切需要合作和联合起来发展的，合作的需求也很强烈。但是在现实中，不管是合作社的内部社员发展还是外部市场开拓依旧是困难重重。在面对农民需要合作而又难合作的时候，农民寄希望于通过组建合作社来解决农业、农村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资金、人才的短缺及避免市场的风险，但是农民组建的合作社在发展的过程中同样也面临着资金、人才的短缺及市场的风险。那么组建合作社还有什么意义？需要突破的关键点在于合作社把农民的哪一方面合作和组织起来了，谁有这个能力来协调和做这些事？在这个市场竞争很激烈的社会中，有哪一块利润空间可以放开让农民来做，又有谁

会在这个低收益的农业领域在乎农村的发展？这些很实际的问题都摆在农民合作社的面前。在后来四五年的工作过程中，作为一位协助者，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从这个过程中逐渐找到了自己工作的定位。

当然，发生在这个村庄里的故事非常多，也非常复杂，至今有些还在延续：有合作社骨干与骨干之间的“拉帮结派”和互助合作，有农民和学生志愿者之间的相互支持和各种碰撞，也有年轻志愿者之间的各种恩恩怨怨……在乡村工作，即使很多知识和道理、方法能够通过前辈和老师分享给你，但是在农村生活和工作的那种复杂与巅峰的体验却是无法言说的，甚至有时候只能独自享受。

从合作社培训与分享入手

在人才计划的下半年，梁中心也正在全面推广农民合作社的培训，当时由于我在顺平离北京近的原因，几乎每两个月就会回北京参加一次培训，而且前辈在培训过程中，也有意地培养我在组织培训方面的能力，有意让我来带领参加培训的农民做一些活动及主持等，这些为我在人才计划结业之后从事合作社的推广培训工作提前做了一些准备。同样，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与推进，我们发现农村社会越来越复杂，自己对于乡建工作者自身思考的定位和能力，也需要不断地加深与提升。

做一名合格的培训协作者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更不要说做到优秀和专业了，首先要克服协作现场的紧张感，能够外出来参加培训的农民都是不简单的，我这样一个毛头小伙子怎么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呢？依然还记得有一次是在西安杨凌培训的组织现场，自己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当时真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幸好当时一位老师出来救场，给我们做了很多的解释和介绍，才让这个培训班继续下去。后面靠着前辈和同事们的不断鼓励和支持，每一次培训也算是能依葫芦画瓢地安排下来，但是对于其中很多课程的协调以及参与式的把握还做得很不到位。

随着工作的深入，我慢慢学会一些参与式的方法，也让培训的农民参与其中，在课间安排一些小的互动来增加课堂的活跃性，有很多方法都是在实践过程中摸索的。后来我开始接触参与式的培训，更加系统地了解如何协助，如何开展一次培训。对于我们每一次培训的定位也逐渐有了自己的理解。

在开始的时候，只是认为通过培训能让来参与的农民学到更多的经验和知识，能够对他们在实践过程中解决困难提供一些帮助。所以在培训课程中总会邀请很多著名的老师来分享自己的研究，分享当前的政策趋势，现场农民听得很带劲，可是回去之后呢，如何转化为行动？说实话，很难有哪个方面的政策或是理论能够给农民在实践中提供过多的帮助。很多农民在反馈的时候也提到这些政策或理论只能提供一些发展方向，对于当下的行动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农民的问题还需要他们自己来解决，同伴之间的经验分享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更有效的。所以在往

后的培训中我们更多地加入了实践者或是培训学员的交流与互动，让他们通过培训建立联系，即使培训结束之后还能互相联系和贡献经验。越到后面越发现，培训不仅仅是简单的知识和经验的传递，一个好的培训或是协助者更应该传递一种力量、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要想别人能够获得力量，首先自己得有力量；要想别人从中感受到爱，自己得有爱的源泉，同样新的生活方式也要让人能看见。在乡村实践中，很多问题我们都没有办法给出直接的答案，但是我们通过各种方式将大家会聚在一起，共同学习培训，努力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模式和理念，虽然时间短，仍然希望能够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我们在乡村中所面临的困难，也许出路不止一条。我想，这是自己未来要去寻找的，也是自己作为一位协助者要去做的：让大家能够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扩展更多的可能，出路不只是发展主义或是现代化，其实还有更多的可能。这些可能性其实就隐藏在我们广阔的乡土上，隐藏在勤劳、朴实的农民同伴之间。

1.5 从农中追求自主生活方式

人才计划七期 唐义国[1]

传统农村大学生成长模式的反逆

2008年大学毕业后，因为我学的是物流专业，就在家乡安徽芜湖的一家国有物流集团做物流工作。因为那时候《劳动合同法》出来之后，国内有一些企业为降低用工成本互相派员工，上海的员工比较贵，于是就把我们从安徽的公司调过去，相比上海的人力资本就便宜一点，一个月五六千元。毕竟是国企，待遇各方面还可以，加上加班工资，一年也有十多万元的收入。刚开始做一线，干两年可以升为主管，因此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干劲。那时候觉得自己的人生还有点希望，按照原来讲的成长路径就是这样：一个农村的孩子通过读书，在城市找个工作，买个房子，然后把父母从老家接出来。这个成长路径不仅仅是某个人的成长经验，而是整个社会告诉农村孩子的一个出路。

我上班的厂区很大，面积有几十万平方米，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虽然给算加班工资，但只剩下的8个小时还要吃饭、睡觉，还要从仓库走回自己的住所，压力很大。我们的仓库也很大，占地十万多平方米，很久才能走出来，那就是暗无天日的感觉。后来连续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身体就不行了，整个身体就很虚弱，后来我就休假了。我觉得休假也不行，很焦虑，不工作就没有钱，继续工作自己的身体又吃不消，怎么办呢？

2009年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遇，芜湖当地一个环保机构的朋友找到我说有一个基金会，愿意投一笔钱推动皖南地区的环境保护、生态保护。我大学时做过环保社团，从整个安徽来讲，皖南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皖南山地比较多，有很多小的河流，水环境各个方面都比较好，正好也有这样的机会，就问他能不能让我也参与一些事情。但是因为当时的身体状况不太好，我不能全职工作，所以我就兼职加入这个环保机构做一点事情。

那时候钱不多，做的都是一些小的活动，如骑自行车绿色出行，减少使用塑料袋、倡导使用环保袋，还有"熄灯一小时"活动，等等。那时候联系了当地高校的环保社团，推动环保社团进校园，让大学生到中小学上环保教育课，也做了很多环境教育活动。

一年之后，基金会资助的那笔钱用完了，没有更多的资金支持我去做全职的工作，当时我的开销挺大，自己没多少积蓄，所以得出来找工作。正好有个朋友在长江中间的一个小岛上，有一片1000多亩的荒地，

在这些荒地上他已经种了一些树，他说想发展循环农业，做林下养殖，可以养羊、养鸡，然后再种一点地，就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一块做。我觉得这个事情挺有意思，虽然自己是农村出来的，却没有干过太多农活，但是因为长江的关系，做好了对长江的环境有益处，我当时所在的环保机构很关注这个提议，同时可以满足我对于工作和生活的规划，于是我就答应可以先做一做。

试水从农的失利

从2009年开始，我们在长江中间的这个小岛上养了两年的鸡，当时自己带着保护环境的理念，不能用有添加剂的饲料、不能用激素。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有机农业”的概念，就知道“土”的概念，如土鸡、土鸭、土猪、土鹅，当时认为土的东西就是好东西，所以，那时候我们注册的品牌叫“土鸡蛋”。

因为以前没养过鸡，加上我们这样的养法，所以就碰到了好多问题。比如，不用激素怎么提高鸡的产蛋率？我们养的鸡产蛋率比较低；不喂有添加剂的饲料，用玉米、谷子的成本就比较高。因为不用激素、不用饲料，我们的鸡蛋不像别的养殖场里的那么大，那时候虽然卖得不贵，1.3—1.5元一个，但消费者很难接受。而且鸡的产蛋率比较低，100只鸡每天才产三十几个鸡蛋，一只鸡一般三天左右下一个蛋，产出也不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防疫，因为我们在长江中间的岛上，候鸟很多，不好防疫，候鸟带来的禽流感传染给鸡，有一次死了五六千只鸡，损失惨重。

那时候我们的鸡不好卖，鸡蛋也不好卖，于是想着开一个餐厅，卖不出去的鸡和鸡蛋就可以自产自销。当时开了一个200多平方米的餐厅，我和我的合伙人理念很一致，那时候就不用地沟油，不用味精、鸡精，不用色素，不用食品添加剂，我们还用好的食材，所以餐厅的成本也比较高。那时候“三公”消费还没有现在限制得这么严格，我的合伙人有一些政府资源，一顿饭三五千元还能消费得起，餐厅也红火了一阵子。后来因为政府对“三公”消费的限制，餐厅也日渐萧条下来。

2010年的时候，长江发了一场大水，把我们的整个基地都冲掉了，鸡棚里所有的东西都没了，再加上开餐厅投了很多钱，我们一下子就欠了好多钱。那时候我和合伙人说：“怎么办？我们得赚钱还钱啊！”正好他手头上有一个卖墓地的项目，他就开玩笑说，“这个在家里不用动，别人会找上门的，因为这个是刚需，因为每个城市就那么几家陵园”。于是我们就去卖墓地，利润确实很高，100%—200%的利润，我们要卖多少个鸡蛋才能顶得上这样一块墓地。我们卖了一年的墓地，才把以前欠的钱还清。这是我初次试水从农的经历，做得很累，还亏了钱；做的是生态农业，但那时还没有“生态农业”的概念。

大计划与小事情

在合伙开餐厅的时候，我主要是去村里找好的食材，开着车往村里到处跑。跑了才发现，原来很多村庄都没人，要不就是老年人，要不就是还在家里读书的小孩，村里已经没有什么年轻人了。后来想想，这个问题也发生在自己身上，其实我们也是被裹挟着离开了乡村。那时候我对乡村的感觉，已经不是小时候对传统乡村田园牧歌式的描述了，于是也在思考，为什么乡村是现在这样的?2011年的时候，一个环保圈的朋友说北京有一个做乡村建设的机构，他们有一个一年期的实习生计划，有一年的时间在农村里学习、做一些事情，所以我就报名参加了人才计划。于是我就来到北京，走进了梁中心的大家庭，成为人才计划第七期学员。

我们七期班一共有13个人，8个男生，5个女生。第一次培训结束后，我们就被分配到各个项目点上，我和另外两个七期学员一起被分配到了江苏常州的嘉泽镇。嘉泽是乡建与东部地区政府合作的第一个在地项目，以前乡建的点大部分都在偏远地区或比较穷的地方，但嘉泽不一样，当地主要做苗木产业，老百姓普遍都很有钱，所以与以前乡建的项目点很不一样。

当时在嘉泽分了两个团队，一个是从小毛驴市民农园过去的团队，主要运营大水牛农场；另一个是我们梁中心这边过去的，主要做姬山书院。我们刚过去的时候，三期的张斌、魏丰收他们已经在嘉泽待了一段时间了，那时候他们想得很大，要做合作联社、要做资金互助、要做苗木产权等，但那时团队的执行能力很弱，这些事情很难推动下去，所以一开始特别纠结。后来我驻点到跃进村，我说干脆先做点小事情，给村里做类似于便民服务的工作，帮村民搞晚会、做活动，然后帮村委会做些文字工作。因为即便是在嘉泽这样比较富有的农村地区，也基本上是中老年人在家，他们不会用电脑，所以我们去了正好可以发挥我们的优势。

当时跃进村给我住的房子旁边正好有个小广场，有很多人在跳广场舞，我就天天跟着他们一起跳，后来村里说想搞一个晚会。但村里的思路是请专业演员、专业的团队来做，我就跟村里说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自己来搞，自编自导自演，于是村里就花了几十万元买舞台搭建、买音响灯光这些设备。第一次晚会由我们来组织策划。那场晚会很受欢迎，那时候广场那边全是人，路边停满了三轮车，他们把自己的生活故事编成小品，还有其他一些自编自演的节目，后来有两三个节目到镇里演出还获了奖。

那时候和村里的小孩子互动特别多，我会给村里的小孩子做课外辅导，但做了一年之后，感觉没有成就感，这些都是锦上添花的事情。于是，在嘉泽待了一年，我觉得自己还是想做生态农业，到2012年7月，人才计划结业之后，我就回到芜湖，继续做生态农业。

轻资本农业、再探索的失败

回到芜湖之后，我没有立马投入农业，因为以前的经历告诉我，投入农业需要很多资源，而我在中心做学员的时候，一个月才800元钱，只能保证基本的生活，根本就存不下钱，于是最开始在那里帮我一个朋友做一些咨询、写一写方案，干了有半年多。

到了2013年，有一个地产公司想搞旅游开发，配套地也想搞生态农业、景观农业，那时候和我的想法一致，我就拉几个七期的同伴与地产公司合作一起创业，做生态农业。刚开始我们觉得找到了一个和资本合作的路径，觉得地产公司财大气粗、想法好，但后来合作的过程中慢慢发现他们铺得太大，那时候地产环境比较低迷，对这边农场的事情推动很慢，我在地产公司干了半年没做起来，觉得有点儿不靠谱，就和伙伴们都退出来了。

从芜湖出来后，我们三个人又去了福州，当时正荣基金会在福州闽侯和乡建合作建了一个农场，叫故乡农园，他们说可以给一块地让我们做生态农业。我们在福州待了半年，因为人生地不熟，卖生态农产品很难，没办法做营销活动，待得很是艰难。后来厦门有几个朋友想开生态餐厅，因为我以前开过餐厅，有一点开餐厅的经验，就和他们一起在厦门做了一段时间，也没做起来。

这几个事情做得蛮可惜，在福建晃悠了一年，除了做农场和餐厅之外，还做了一些小尝试，包括卖猪肉等。2014年，我们还花了一年的时间来筹备福州的农夫市集，当时我找了一个小项目，拉着福建的生态农场和当地的乡建机构，终于在年底把福州市集办起来了，而且福州市集一直持续到现在。

现在让我回想在福建的这段经历，是最痛苦的一段，我非要把自己置身在城市的资本洪流中，想走一条轻资本的、半农半X的创业道路，却发现自己走不通。后来想想，我的事业和生活的可持续性在哪里呢？我决定还是老老实实地扎根乡村吧。

阳澄湖畔耕与读

昆山这边是2013年中心和昆山城投[2]签的协议，2014年中心开始派三期的管奇过来负责，并在当地招了几个实习生一起来运作。第一年的时候压力比较大，最重要的是人手不足，当时管奇就找到了我，希望我去昆山。当时我在福建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特别困惑。想想去昆山挺好，因为我的老家在安徽芜湖，从昆山坐高铁3个小时就可以到家；我姐在江苏那边工作，离我姐姐也近一点。那时候父母给的压力很大，觉得我好像没有事业，也没有结婚，要不然就离父母近一点，离家人近一点，能不能赚到钱再说，至少对家人来说能让他们安心一点。所以2014年年底，我就来到了昆山。

“青澄计划”这个名字是管奇起的，意思就是一群有返乡从农意愿的青年在阳澄湖畔耕读，这正好满足了我对事业的向往，以及对生活的想

象。其实最早我们来到昆山，是因为政府为了保护当地饮用水源地阳澄湖和傀儡湖，在两湖中间的地块建了一个悦丰岛农场，采取生态农业的耕作方式，希望不再污染当地的水源。悦丰岛农场做了几年之后，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也积累了一些品牌和渠道资源，但是总公司在评估的时候，觉得投了这么多钱，还是没达到期望的效果：一是从经济方面来看，农场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二是从社会价值方面来看，农场没有影响到当地的村民采取生态农业的耕作方式，改善当地的水质。所以城投公司就跟我们乡建合作，希望我们去影响村民，我们的具体工作主要是和悦丰岛农场对接。

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协助悦丰岛农场，建立与村民沟通和对话的渠道，去影响当地更多的村民做生态农业。对于悦丰岛来讲，他们做农场的目的，其实是让更多的人去做生态农业，因为这里是传统意义上的江南鱼米之乡，我们所在的绰墩山村有5000多年种稻子的历史。说起阳澄湖，大家的第一反应是大闸蟹，再加上昆山是全国的百强县之首，本来就有很多其他赚钱的计划，当地农民开始不太愿意去种水稻，因为利润太低了，所以2014年的时候我们就拿80亩地试种，生产上采取生态农业的耕作方式，销售是由悦丰岛农场负责，第一年下来我们的产量达到900多斤/亩，而且我们还打出了“青澄米”的品牌，一斤能卖到15元，效益还不错，当地农民看到之后，第二年村里才开始跟我们合作种植水稻。

2015年的时候，我们只种了20多亩水稻做老品种的保护实验，大部分的水稻主要由当地的农民在种，我们做的事情就是PGS（参与式保障体系）。一方面帮助村里动员农民，去给农民做一些培训，包括让招来的实习生和农民一起学习，然后帮助农民做田间记录，用农民看得懂的语言推广生态农业技术，我们把这个工作叫作“望田头”；另一方面我们也做消费者活动，我们招募当地的市民来农场做农耕体验活动，每年水稻收获之后还会做“丰收节”，让消费者来参与和感知农耕与食物、农耕与环境的关系，我们把这个活动叫作“青团子”。我们也将农事生产和田间知识转换为消费者能看得懂、能感受到的书本知识，因此我们出版了很多宣传物。

同时，我们做了一个类似于人才计划的实习生计划，每年招募六七个实习生到这边来，和农民一起学习，但时间比较短，只有半年的时间，主要是跟着水稻的生产周期学习。我们还面向公众、面向政府做一些公开的讲座，请温老师、《汉声》杂志的黄永松老师、复旦的王建革老师等，讲乡村建设、讲传统文化、讲转型城镇、讲生态农业等，做公众倡导工作，去影响政策以及让更多的人来关注和支持昆山农业的生态转型。

到2016年第一期项目结束的时候，村里有390多亩水稻是按照我们提倡的生态农业耕作方式种植的，每年给当地农户带来20多万元的收益，未来大家还是比较愿意持续做下去的。这两年周边过来学习交流的人越来越多，其他乡镇都知道这个事情很好，都在开始做农业的生态转

型了。同时我觉得现在政府的思路有一些转变，包括一些在农业口工作的人，他们认为应该重视当地的传统农耕知识，以及对当地老品种的保护，应该做自己的文化。所以这两三年来，从项目层面讲，我觉得还是上升的状态，无论是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从我个人层面来讲，现在很多工作我们都没有再参与了，我们没有参与生产，也没有参与销售，这些都是由绰墩山村的村民和悦丰岛农场在做。我感觉即使我们现在就撤出去，这个事情还能持续做下去，所以对于我们青澄计划项目的执行者来说，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金钱无法带来安全感，但种地可以

近年来，我们一直围着农业转，因为做的事情特别具体，很多事情具体化之后就发现自己大的框架和想法越来越少，其实反过来说，我们做生态农业本身也不完全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我个人的力量，始终不能解决这个社会中所有关于食品安全和农业污染的问题，我们能做的工作，无非是让外界或者社会能够看到，每个个体都有改变的可能，这些事情能否做到，取决于还有多少个个体愿意参与。

人如果离开了土地，就失去了直接养活自己的能力，无论劳力或脑力都只能换成现金。城市里什么都得用买的，很难脱离消费主义的束缚。就我个人来说，金钱不一定能给我带来安全感和满足感，但种地可以。我每天一眼望去就是菜地，那是我中午要吃的菜，那边的稻田，是我的米饭。我现在活得很踏实，从农不仅是生计，更是一种自主的生活方式。

（口述：唐义国；访谈：周其义；撰稿：刘良）

1.6 “大时代”和“小时代”的缩影

人才计划八期 王茜[1]

成长是一个凄美的故事

当要回忆所谓的“大学生活”并且写下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时，我突然发现生活是理不清的，生活的经验和感悟就像脚下的路，走过才能知道路上的风景，才能知道踏过荆棘的坚韧是如何练就的。

当大荧屏上闪烁着种种关于青春的影视作品时，这勾起了所有人对于青春的回忆和思考，尤其是将青春定格在了宝贵的“大学生活”中，不同时代背景下的青年人以不同的方式祭奠着已然逝去的青春岁月，不管是沉寂的默哀还是狂野的嘶吼，抑或是柔情的落泪，似乎都不足以表达满心的落寞和留恋，于是乎创作出了大量的伤痕文学，还塑造了一批批具有鲜明特点的青年人。如果说我们是在告诉自己和世人这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和社会，那最好的呈现元素便是流金岁月中一步步留下的生活印迹，因为它是“大时代”和“小时代”的缩影。

当繁华逝去、静守孤寂时，才能回味真实生命历程的意义，并含着泪花告诉大家：“成长是一个凄美的故事。”它凄美不仅是因为喧闹的青春太过短暂，也不是因为付出的汗水和流下的泪水，而是黑暗中透视的光亮刺痛了我们的心脏。

“90后”的精神逃避

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过我们为什么要从小在那么封闭的学习环境中刻苦学习，每天需要死记硬背地啃那些书本和试卷上的东西，这无疑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学习模式，因为只要那样做就会拿到好成绩。此刻的我思绪万千，短暂的大学生活牵动着的是走过的所有求学之路。越是小时候发生的事情越是浮现在眼前，凡事总有前因后果，指引我们前进的不是浅层次的行动，而是早已潜伏的思想。

7岁时，调皮的我总是带领着伙伴们穿行在村庄的每个角落，对于村里那些红火、热闹的场景好奇极了，即使有威严的老师在，即使有学校的时刻表管束着，仍战胜不了强大的好奇心，所以，第一次被老师惩罚（校门口罚站一上午）是为了看丧礼把小伙伴都带走了，老师上课找不到人气得火冒三丈。12岁时，叛逆的我总是能找到反抗的理由去维护受伤的幼小心灵，所以对于小小年纪的我们，对早晨6点起床，下午1点半放学，下午2点半上课，晚上8点放学，周末只有一个下午休息时间的

孩子来说，那是酷刑，所以会选择在黑板上公开写大字辱骂老师，以示反抗，直至班主任无奈地哭泣，引起校长注意而结束。那时的我是班长，于是成了双方沟通和谈判的代表，但绝对不能妥协于教条和体罚式的教育环境，毕竟我们更加需要孩童般的自由和玩耍，而这样的思考和行为影响着之后的每个阶段。

13岁时，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乡村愈加成为人们口中说的落后代表，包括教育，所以教育资源越加向城市集中。在一股入城大潮中，我挤进了很多人想去的城市中学，面对无限的自由和绝对的竞争，我们有了人生的第一个目标，那就是考入重点高中，但天知道那是谁的目标，起码不是我的。

16岁时，并未如大家的愿望进入“富裕和高傲”“贫穷和自卑”那么明显的重点学校，它开启了我所谓的“失败”历程，但自己总是能活跃在各大场合和人群中去找寻价值，继续当班干部，拿各种能拿的荣誉，去入党，去过各种自己想要的生活，只是忘记了我们人生的第二大目标，那就是考大学。

19岁时，我糊里糊涂地踏入了高等学府，只是因为报考时不知去向何方而抄写了同桌的志愿表，所以，我没有期待过大学那个“神圣”的地方，我至今能说的是感谢山西农业大学这所收留了我的学校，但我从来没有属于过这里！

当看到身边的同学不停地追逐着社团、学生会、班干部、入党等各种新奇的东西时，我迷惑了，一路走来，自己的学习是为了求得知识，当班长是为了提升能力，获取荣誉是因为表现优异，这些事情不是应该顺其自然的吗？为什么此刻的大家像脱缰的野马，以至于为了那一点缥缈的东西浪费时间、放下尊严，陷于吃喝玩乐、趋炎附势、暗藏心机的地步？我意识到很多人并不是在自己的轨道上行走，或许大家7岁、12岁、16岁、20岁的每个过程和转折都在错位着，我们用20年的宝贵时光建筑起的城墙在踏出象牙塔的那一刻全部坍塌了，以至于用更多的思想剔除大脑中原有的垃圾。

看着这些纷繁复杂的现象，自己却没有办法那么狂热，没有办法在人群中欢笑，以至于一度远离那喧闹之地和是非之人。独自行走于静谧的校园领略自然的美丽，独自蜷缩在图书馆的角落与哲人对话，独自在教室里认真地学习，独自晚自习后在操场上散步，独自看着形形色色的人……而自己只不过是想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思考过往的岁月和未来的人生，这是自己第一次开始真正探求生活和存在的理由，如果问为什么会从以前那么狂热、活跃的人变成冷静、低调的过客，我只能说是对于“青春的意义”有了较为理性的思考，这个意义中没有世俗的名、权、利，甚至没有意识形态化的“成功”和“成长”，而以后种种行事也是在此方向和目标引领下行进的。但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讲，这个过程是不容易跨越的，随即产生的现象用所谓的“迷茫”“困惑”掩饰，是啊，在这样一个繁华和没有精神归属感的现实世界中，怎么能逃脱那样的状态？

单纯的我们似乎还没有完全妥协，还在找寻自我存在的意义和这个大学赋予的生活，天真地以为自己是独特的，外放、骄傲、孤僻、脆弱是“90后”青年人的群体性特征，但是什么造就了现在的我们，我们越来越沉迷于个人狭小的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我们的伙伴是不会说话的网络、手机，是哼哼唧唧的调子，是只能看到个人情感宣泄的QQ空间，是无聊苍白的影视剧……不管我们选择以社团为单位的集体，还是以个人为主体的行动，都显得那么单薄，都无法磨灭身上的那些时代印记；无论是静默还是宣泄，都难以掩盖对生活和现实世界的淡淡忧伤。是啊，我们怎么了？这个我们一直憧憬的世界怎么了？不管借用多少人的话或看尽世间百态，依旧找不到答案，依旧还在狭隘的世界里沉睡着或是纠结着。

睁眼看世界 俯仰天地间

显然，纠结的人于沉闷的宿舍和校园而言是一种进步，比在沉睡中的人更能展现出一些青年的特质。但我们的纠结是为了什么呢？其实就是复杂和简单的矛盾。

简单对于我们青年人来说亦如煎熬，在繁华和浮躁的大世界中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和过有意义的生活显然是了不得的，那就要细细问问什么是“有意义”，这似乎又是一个哲学式的问题，但意义通常都是在个人思想认识不断提升和实践过后才能总结出来的，它基于客观环境下形成的价值观念。每个青年人价值观念的塑造路径不同，但大体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实践于现实世界形成的经验归纳；二是理论学习获取的一般观念以及形成的知识结构体系。对于青年人来讲，我们并不能清晰地知道这些过程在塑造个人价值观时形成的影响，以至于每个时代的青年人在时代大潮中多数是迷茫、困惑的。即使用不同的方法来找寻“物质”或“精神”的意义，我们仍免不了陷于狭隘的个人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以至于被各种意识形态所异化，没有多少人能跳过这样的陷阱而实现所谓的“成长”。

反观走过的几年大学岁月，自己如同大多数青年人一样选择以团体的方式回应成长话题，这个团体除了班级就是社团了。社团对于每个初入大学的青年人来说都是十分具有吸引力的，它代表着我们将要在这个平台上得到一些社会性技能，它代表着我们人生第三个目标的一个衡量标准，它代表着自由奔放的青春岁月即将拉开帷幕。是啊，如此繁杂的代表怎能不使我们这些一无所知的青年人盲从，怎么能不去满足一下好奇的内心！但似乎又开始了“本末倒置”的“选择”，又进入了复杂的程序化思维，常常会用“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将自己框住。其实我们并没有什么选择，因为这个主流社会能提供的价值观念和现实生存发展空间不是那么多元，一路走过来无非就是在实现标准化生产，而这就是主流世界推崇的“制式教育”，只允许你我有一样的思维和选择，不一样的只是行业的种类。常常和伙伴们开玩笑说我们就是那“放牛娃”，重复着那个让人们嘲笑的故事，殊不知我们是在嘲笑自己。放牛娃放牛是为了赚

钱，赚钱是为了娶媳妇，娶媳妇是为了生娃，生娃是为了继续放牛；我们很多人则是上学，上学为了考好学校，考好学校是为了找工作，找工作是为了更好的收入，好收入是为了好生活，好生活意味着房子、汽车、老公或老婆，好生活下有个好孩子，好孩子再继续走我们的路径。这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不同资源和环境下的问题升级。如果我们哀叹人生正是如此，那只能说我们文化的缺失和精神的沦落，是全民的沦落。

基于这样的反思或者说是对于“机械化、工具化”人生的恐惧，我开始走出来寻找有血有肉有生命力的青春，它不是出走，而是回归，回归人称为人的本性。正是这样的想法激起了我对人生、民族和社会的无限好奇，所以，我希望能走出狭小的世界去外面广阔的真实世界探求自我的追求，这个外在的世界绝对不是很多人意识到的宿舍外的主流社团，也不是仍旧在工业化市场经济体系内的狭义社会，那还是没有逃离“放牛娃”的成长路径。

我一直相信天助自助者，只要是自己想走出来，就一定能找到未知的世界。大学之幸是能结识那个陪伴我成长的“山西农业大学大学生支农队”，能和一批好孩子做点有意思的事情。与其说社团是个平台，不如说社团实现了本质上的含义，那就是青年人因志趣相投而共同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志趣相投必是“志”为本，“趣”相辅。所谓“志”更多的是基于对国家发展和民生问题的关怀而探求青年人的成长与责任，这期间滋生出无穷的向上的力量来使大家相扶而行。这有别于一般意义上讲的积极向上，大学校园里不乏刻苦和积极的青年，但多数停留在器物层面的学习和技术层面的积累，甚至一切社会体验和交流都是以“个人能力和知识提升”为目标，但这就是个伪命题和极其短视的想法，也无法从根本上开拓有意义的人生。我们从来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拥有雄厚历史背景和复杂发展过程的民族的一分子，是密切相关的整体与个体的关系，不探求这个背景，我们根本看不清甚至反思不到如今或未来青年人的成长，我们身上里里外外都透着这个时代的气息，我们这些渺小的个体无时无刻不被这个看不清的复杂世界裹挟着，我们的纠结、迷茫、痛苦无不源于外在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当我们纠结自己的食品安全、工作、住房、教育、医疗等一切服务的时候，当看到频繁流动的农民工、看到日益破败的农村、看到浑浑噩噩的大学生活时，是否能跳出来去看看？我与伙伴们的志不在大，也不在试图改变，而是先睁眼看世界、俯仰天地间不断反思，是在叩问大历史和社会间的思想认识的重塑。我们坚信青年人的成长必是要与同呼吸共命运的国家相联系的，它不是激进的愤青，不是忧虑的小资，而是试图建设的改良。所谓“趣”更多的是我们采取的行动和策略，它不一定就是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却是改变普遍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我们不再理所当然地去消费、去享受，而是开始寻求积极健康的生活。有人说“大学不仅不是学习的地方，甚至不是长身体的地方”，当大学毕业时很多人不仅精神状态不好，就连身体也变差了，体能一年不如一年，真的是很令人担忧。记得大学期间我们社团这群小伙伴经常去徒步拉练、去登山、去跑步和打球，而这些集体性的活动经常让我们能在一个瞬间忘记那些疼痛和疲惫，因为有相互之间的陪伴。印象深刻

的就是从中心（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回到学校后，我们校内班的几个同学相约每天早晨锻炼和朝话，分享彼此的生活学习。那是在冬天，偶尔几次下雪了，寒风凛冽，但大家都没有迟到，依旧相约在操场正常进行活动，这样的场景一直让我难以忘怀。或许在常人眼中我们是疯狂的，但那种傲立寒风的勇气和内生的力量形成了凝聚的文化。所以无论我们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无论内心如何苦闷挣扎，首先身体和意志不能垮，不能滑向堕落和低迷的边缘。哪怕我们仅是一群人相约骑车去乡野走走，去领略四季的颜色，去呼吸泥土的芳香，去触摸清凉的河水，都不要留在宿舍里沉睡，不要坐在电脑前傻笑，不要对着窗台发呆，不要穿梭于热闹的街市。

所以，我们存在的意义从大世界来、从生活中来，更从心底无限的关怀中来。

用宝贵的青春实践

其实我们多数时候是脆弱的，是经不起现实考验的，无论年少轻狂的我们曾经夸下多少海口，都会随着变幻的现实而烟消云散；无论我们给自身的行为赋予了怎样的意义，都会在下一个十字路口寻找新的方向。我们会不断拷问自己什么是真正想要的，而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自己还未被完全禁锢，是欲望也好，是憧憬也好，是追求也好，都冲击着原有的思想和现实的框架。

记得在大三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这些事情足以改变我，从现今来看甚至成为人生的转折。我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见惯了尔虞我诈，见惯了人生的起起伏伏，见惯了各种丑恶的嘴脸。在家人的眼中，只要学好一门技艺可以糊口就好，女孩子最有保障的就是当会计。所以在大学这一年除了一直在自学会计，考下证件，准备考注册会计师，每天拿着厚厚的教材和练习册学习外，唯一能得以休息的时候就是带领社团的那些后辈学习理论，学习那些我们认为的理论知识，去和他们讨论一些活动的策划，直到9月底结束注册会计师的一门考试后才正式解放。考试结束后，当一个人站在十字路口等待着回校的班车时，看着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我沉默了，沉默了一路——从未有过的那种低落。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心新开辟的试验区嘉泽镇开始招募志愿者，我看到这个信息后跟学校请了一个月的假，立刻就买票过去了，在这个南方小镇看着支农前辈们如何开辟这块新的阵地，如何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上摸索经验。当时我被震撼了，一个新的试验区在未打开局面时，只有几个年轻人在那里坚持和周旋，在那里做着生态农场和社区建设的工作。由于地域文化差异和政府的强势，他们一直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在开辟的这条道上，没有现成的经验，没有专业的团队，甚至没有优越的生活条件，但他们依旧憨厚地坚守着那块即将展开的阵地。周围有太多的不理解，内部有太多的不稳定，但大家依旧默默地承担着。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言语去表达内心的波动，只是知道他们在用自己的青春耕耘脚下的沃土，在真正践行着这个时代赋予年轻人的责任，在用坚强的意志对抗着

现实带来的苦难。而回想坐在静谧校园中的自己是多么脆弱，一如那温室中的花朵，没有经过任何的锤炼。一个月中，我几乎每天跟着镇文化站的演员奔走于嘉泽镇的大小村落间，和不同的人交谈着，介绍我们是谁，在这里做一些什么工作，同时在迈开双脚行走的过程中忘却了出发时曾经面临的困惑和纠结。在这期间，父母来看我，和我的那些伙伴交流，来看看我的另一个世界，这也让我备受鼓舞。直到11月末我才重新回到学校，不期而来的是队友和同学们异样的眼光，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我一直在支农队，当别人早已告别社团许久后，我还在里面，而且支农的行动不仅停留在学校，更走向了祖国的各个地方。他们好奇我哪里有那么大的力气去奔波，甚至好奇我到底在坚持什么。面对这样的疑惑，我只能淡然一笑。只有我明白自己的坚持一直未变，只是一步步填充它的内容，因为社团本身就不只是简单的团体活动的平台，而是开眼看世界的窗口，更是用宝贵青春走向实践的阶梯，更是人称为人的一种历练。我的坚持没有理由，只是基于生命本体属性的一种自然行为。

在这一年，家里迎来了一个小生命，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小家伙的到来改变了我们很多人的心情和生活。在幼小的个体面前，我开始重新认识孕育自己的父母，开始重新反思自己，开始忏悔曾经做过的种种，开始回忆经历的简短人生旅程，开始寻找作为生命个体应有的本真状态……这些开始或许不是突然的变化，更多的是内在潜意识的一种唤醒，只是我们的思想和行动迟缓于内在意识的形成，而只有当内外的机体保持一致时，自身才不会是纠结或矛盾的，起码是不为外在环境和外物的强行进入而苦恼的，所幸自己是一个愚笨之人，只懂依照内心的指示匍匐前行。所以即使很疲惫，仍旧在正月就请假和人才计划七期的学员到陕西富平去做生态项目的调研了。正是这个实践促使我萌生了在社团带领大家做深入调研的想法，因为这个过程是自己全面认识现有问题的一个途径，直至新一年的5月和7月，我们一直在针对农村的生产结构和生产关系做一些基础性的调研。其实平台是既定的，做事情和个人的成长绝对是主动性起决定作用，凡事都应该反求诸己。我很感谢的是曾经一同进入社团的那几个伙伴依旧还在，依旧能和我一起带领新的成员去做一些深化的事情，而我们的坚持没有太多的纠结和限制，更多的是自然的一种升华，一种基于个体和团队的成长。也许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有彼此的存在和坚持。

走向田野 从梦中醒来

也许我们谁都不知道人生的下一步将会面临什么事情，会遇到什么样的人，会创造自己怎样的人生。还记得大学期间一直非常喜欢的两本书，一本是高尔基的《我的大学》，另一本是卢梭的《忏悔录》，曾经因为这两本书有太多次的出走，曾经因为他们对于现实和生命的真挚而沉思过许久，在这样的世界中，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到底该如何坦诚地面对自己？无论如何，自己都希望内心是清明的，干净的，不希望那些肮脏的东西停留在大脑中太久，是忏悔也好，是忘怀、放下也好，只是希望还有一个空间可以汲取生命的养分，只是希望自己不要那么早

腐烂。所以，迷茫过后对于意义的坚持，便是在开创新的世界和人生。

回过头来想想，踏上未来的路途似乎就是去年的夏日，而今已是又一年的年末，这一年好久，但转眼即逝，我不知道是该放下它，还是该封存在记忆当中。无疑这样的一年早已刻在了青春岁月的书卷中，渗透到了自己的血液中，无论如何也挥不去。即使是这样的一年，自己仍旧能在平静中度过，是何等的幸福。在大四即将离开大学的这一年，我做了一个决定，参加了中心的人才计划项目，做大学生的培养计划工作，但其实自己是想跳出高校既有的“学习陷阱”，去真正找寻未来能深入做实践和研究的方向。为此曾经和价值观极不一致的父亲发生过激烈的争吵，甚至久久不能平息，我明白不是因为我的选择，而是他的固执和不信任，甚至是隐约的担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是忙碌在个人的世界中，去看书、去交流、去工作，行走于祖国大好河山的各个角落，去看各种现实社会的实践经验，我不得不承认，在这短短的时间内，自身的视野和思维开阔了很多，积累了相应的工作经验，这些是在封闭的校园内所看不到也学不到的。个人原有的支农社团的认识升华到了乡村建设，这个过程是十分令人兴奋的。但不是因为历史的厚重而兴奋，也不是因为初入工作领域而激动，就是被那些真正创造历史的人所感染，那历史不是普遍记录的黑白两大历史，而是蕴藏无限生机的民间历史。如果说它是一种生命力，那一定是基于这个危机重重的现实世界而言，于这个世界而言，它犹如一股清流，犹如新鲜的血液。面对这样的人，我会时刻想到是什么造就了这个面对苦难仍旧能创造辉煌的民族和国家，是那些真正能将苦难化作力量的人，而这些绝对不是我们小资群体能做到的，我们应该看到甚至记录这段历史。

面对无数沉沦在大学校园中的学生，我不知道在交流时该和他们讲述什么，因为我们小资群体真正该做的是走向田野，走进真实的世界，只有这样才能从睡梦中醒来，才能有机会去创造未来。所以，我希望能在这个阶段不遗余力地做这样一件事情，去和同伴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和创造。在这样的成长中，大家更多的是坚守下的坦然，没有所谓的光环，没有所谓的牺牲，更没有所谓的悲苦，是生活方式的选择也好，是理想的坚持也好，都应该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包容，而自己更应该明白坚守背后的价值。

对于我们而言，对于这个时代的青年人而言，唯一要蔑视的就是现实带来的恐惧，打破千百年来人类所建立的枷锁，面对社会危机转嫁带来的苦难，敢于创造新的世界，团结真正有力量的人创造共生的世界。当自己忙碌于大大小小的培训和繁杂的日常工作，从母亲那里得知在金融危机下因相关人员卷款潜逃而使父亲深陷囹圄时，我明白这个世界正在走向疯狂，而我们这群即将被裹挟或是已经被裹挟的人要如何去承担这样的危机，如何开创自己的未来呢？是啊，曾经自私地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可以肆意地不用理会狭隘的小家而去追寻人生的意义，但事实上该有的是困境下的共担，是危机下探索新的家园，不只是因为小家，还有大家。在大学毕业的这个夏季，在炎炎烈日下，我继续坚持着自己的坚持，也领悟了老子的那句话——“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未

来，要打倒的还是恐惧，要拥有的还是面对苦难的坚持。我依旧庆幸社团的那群队友——在这个陌生的城市胜过亲人的伙伴陪伴在身旁，庆幸那些亦师亦友的朋友能将生命的正能量传递下来，庆幸自己对于生命的坚守，庆幸在短暂的青春岁月中能行走在广阔的世界中。

没有盛大典礼地告别了大学生活，甚至没有一张毕业照，没有一张穿戴学士服帽的照片，没有同窗好友的合影留念，就诚如开篇讲到的那样，我从来不曾属于过那里，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唯一留下的身影即是我们那群人开会时的308教室，因为后辈依旧在那里，而在他们的印象中我已然成为支农前辈，已然成为社团中联系的纽带，一切就顺其自然地结束了，没有丝毫的留恋和遗憾。

告别那已然逝去的大学生活，意味着开启了人生的另一个转折，但似乎自己的每个转折都没有经过选择，回头观看大学走过的这些日子，在当下很难用言语就做出总结，那样显得很是单薄，而很多经历和收获也不是我们现在能体会到真谛的，只是希望在追忆过往的流金岁月时，能多一些感恩和平和。在此也将自己最为喜欢的一句泰戈尔的诗与大家分享：“生如夏花般绚烂，死如秋叶般静美。”

1.7 潮流下的返乡青年模式

人才计划九期 闫利霞[1]

不知不觉来中心已近四年，记忆的一幕一幕仍然清晰地萦绕在脑子里。回首这几年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不分彼此地忙忙碌碌，感觉越是向前，脚下的路越是不平。三年如此，十三年、三十年也是如此，成为更好的自己大概便是这一路的功课。参与乡建的时间短了些，我一直那么幸运地在那些有故事的前辈的呵护下无忧无虑地长大，那些有故事的人是我崇拜的偶像，是我尊敬的老师，是并肩作战的战友，是思想共鸣的知己。无论是精神世界还是生活世界，我都很容易地满足了，心存感恩于我所经历的岁月。而我却似乎一直都在迷茫中转悠，现实远不是自己所想象的那样。记得在隆化驻点时我总是抱怨，总是抱怨中心没人管我，把我抛在村里野生成长。想想那时的自己多么幼稚，如果那时明白，便不会有蹉跎岁月的耗损和浪费了。只是成长便是如此，痛苦并快乐着，苦的是“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迷茫和纠结，乐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坚守和前进。

顶着压力做傻事

2013年8月，我正式成为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以下简称“梁中心”）“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培养计划”第九期的学员，那一期共有15个小伙伴。回想那时的自己是多么理想化，天真地将人才计划的历练当成自己进入乡建的“加油站”，我们都曾将此幻想成乡建青年人的“黄埔军校”。所以当时毫不犹豫并且决绝地在大四时选择离开大学校园。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大一时加入了学校的“大学生支农队”（学校的一个学生社团），其实当时对支农并没有多大兴趣，只是因为社团的氛围很好，他们给我的感觉是安全和亲近的。大二时也是偶然被选为支农队队长，只为了老队长“无论谁退了，你们三个队长都不能退”的期望。渐渐地支农队几乎成了我大学生活的全部，大一到大三便是这样过来的，每个寒暑假都跑去下乡，每个周末都在学校里组织活动，长期在学校附近的小学支教，读与“三农”相关的书籍，跟队员一起探讨问题，打闹玩笑，忙忙碌碌。就这样，我渐渐地远离了我挚爱的军工专业。

因为在社团的原因，我便自然地接触到了乡建和梁中心。初识乡建，内心是那么简单而向往。记忆深刻的是“刘老石老师追悼会”和2011年“东北区的交流会”，在这两次经历中，我所了解的农村、农民跟我以前所知道的不一样，这对于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来说确实是震撼。正是那个时候对乡建感性的认知，激起了我一探究竟的好奇，我那么迫切地

希望自己成为其中的一员，也能在那广阔的天地里一闯青春。或许是因为起初内心深处的那份向往，一颗种子便已经悄悄种在我的心灵深处。大二和大三两年我一边在社团活动，一边在校内班学习和实践，对乡建有了粗浅和系统的认知，内心那颗不安分的种子开始萌发。随着越来越多的参与和深入，我发现支农不仅仅下乡支教这么简单，原来还有更多事情可以做，外面还有很大的世界。大学校园似乎有些局限了，尽管折腾了许多事儿，但是心始终不安定。于是在第七届东北区交流会后，我决定大四离开校园去参加梁中心的农村青年人才培养计划。

这个选择对当时的我来说其实是逃离。在学生阶段对于大学教育的认知极端了些也粗浅了些，自己不满于大学生的急功近利和世故，不满于学校体制的潜规则和死板，不满于老师念PPT，不满于专业课的枯燥无味，这些让我讨厌的现象促使我下定了逃离的决心，当时的我并没有能力看清其本质。现在却很怀念大学生活的自由，那里原本是一个可以好好读书学习、修学储能的地方，却因为种种束缚而牺牲了好些青年的意气风发。但是又有什么样的体制可以替代呢？

大学社团的经历，为我与乡建的结缘开了一扇窗。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我讲不清楚，就是那么简单地向往，一步一步走，踏实了青春的时光。我的人生轨迹因此而改变，渐渐地将自己从过去的压抑中解放出来。其实现在再看那段学生时期的“上山下乡”，别有一番意味。那个时候我们顶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坚持去做别人眼中傻气和不可思议的事情，富有挑战和刺激中更有一种对主流时代的反思，我们因此有了原本不可能却可行的另类人生选择。正是这样的经历积淀了我们对“乡建”的情有独钟。

广场舞与融入乡村熟人社会

2013年8月16日，我和同期的伙伴固隆到了隆化县的一个村子——二道窝铺村，开始我们人才计划学员一年的驻村实习。这个村子是梁中心的一个项目点，一个以生态水稻种植为切入点，组织培养生态农业的协作者以及有生态理念的新农夫的项目，项目名称叫“新农夫项目”。我和固隆在村里的主要任务是协助三个返乡青年胡新杰、王晓平、许丙举[2]开展工作，我主要负责协作当地合作社组建二道窝铺村的妇女文艺队、乡村图书馆以及协助新农夫记录生态水稻的种植过程，固隆协助合作社做一些资料整理和销售联络等。

在隆化驻点的前三个月，融入村庄的战线比预想的时间长了很多，有点儿拉锯战的感觉。三个月时间里我只认识了村里的几个骨干，收拾整理了村委会闲置的图书室，去了流芳村学习生态农业。刚开始与许丙举、王晓平和固隆聊的话还很多，后来渐渐没了话题，他们似乎都很忙，而我也回了一次学校处理离校的事情。在第二次集中培训与小伙伴交流时，我突然发现自己仍然没有融入村庄，内心很是困惑和彷徨，而我所憧憬的是一进村便热火朝天地投入行动，忙碌而且充实的状态。

真正让更多的村民知道我们，是在第二次集中培训后的一次新型农民职业培训上，当时我参与做些会务。后来我搬到二道窝铺五组的民宅住，与他们成了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居，更加混了个脸熟。在农村勤快一点，说话嘴甜一点，主动一点，很容易赢得村民的认可，尤其是一些老奶奶。记得有一天我送一个老奶奶回家，还帮她收拾房间、洗衣服，第二天我走在村里时就有左邻右舍的阿姨主动跟我搭话。这可是经验，在村里做工作“脸皮厚”绝对不是坏事。

因为学校的事情，我在村里的日子总是断断续续。合作社的一个女骨干经常跟我开玩笑：“小闫啊，你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这文艺队什么时候才能建起来啊？”文艺队的事情不能再拖时正是学生快要放寒假的时候。根据大学时期下乡积累的经验：农民欢迎大学生，支教和文艺是最容易切入的点。我跟许丙举沟通获得同意后，联系了我们学校社团的负责人，硬是劝服他答应带一支队伍到隆化下乡，他们也不好不给“大姐”面子。在准备接待学生下乡的时间，我在村里一边收拾图书室，一边给村里的几个孩子补课。

1月中旬，借着学生下乡的机会，我和合作社的骨干动员村里的妇女来跳舞，我们走街串巷，登门入户宣传文艺队。在动员的过程中，她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不需要浪费太多口舌，几句玩笑话就管用了，而我和学生更多的是赔笑和寒暄，混个脸熟。这便是农村熟人社会的优势。

下乡十天时间文艺队基本上成形了，大家的热情超乎想象。于我而言具有挑战的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带大家跳舞，有点儿赶鸭子上架的感觉，忐忑地害怕自己无法克服这个心理障碍。可能是任务所迫，可能是多次下乡的积累，也有可能是有团队在，同时多亏第一次培训时在燕山学堂学了几支简单广场舞，临时派上了用场。到现在我也忘不了她们学习第一支广场舞的情景，僵硬的动作、近乎疯狂的坚持以及学习的认真劲。刚开始围观的人有些风言风语，积极参与的都是村里比较爱玩的一些妇女，年轻的小媳妇也不少。每天音响一响，有些人来不及洗碗就往外跑，有些骑着摩托车赶路，也有很多人早已等待在路口。村庄因为文艺队变得有了生机，不像之前不可思议地冷清，每天平均两个小时，音乐响彻全村。最后一天我们在村委会办了小年联欢会，请了村干部，大院里站满了人，老人、小孩和妇女，还有较少的男性观众。文艺的行动是最好的宣传，从那以后我成了村里的焦点之一，备受关注和喜爱。

组建文艺队的过程中有几件事情让我很难忘。下乡结束后我就回家过年了，当我年后返回时正赶上他们元宵节的活动，看着整齐的队伍跳着我们年前教的十六步广场舞，内心很震撼，原来他们还在跳这支舞。他们见到我时除了真诚的问候和祝福，光是那份激动就让人感动，因为他们终于可以学新的广场舞了。还有一次应该是4月春种农忙时期，下了点小雨，本来以为可以休息，没成想被几个热心的阿姨叫去淋着雨跳了两个小时。自从有了文艺队，我的驻村生活变得丰富有趣多了，学舞、跳舞、串门、唠嗑、蹭饭，一天不跳舞心痒痒。

二道窝铺村文艺队的成功其实是必然的。文艺队是大众参与，不可或缺的是在地的文艺骨干和带头人，如村里的一名张姓老师（村里的小学老师），其角色不可替换，他本人会些健康体操，很能调动氛围，重要的是他的主动和积极。二道窝铺村文艺队能坚持两年时间自发组织与他有着关键的联系。第一次见他就是在大家跳舞的十字路口，他开着小电动三轮车路过，听说大学生搞文艺队，就放开自己的小音箱，教在场的几个人做五行健康操，不一会儿便有一些人循着声音过去了，他清楚地知道怎么吸引人来参加，我在时的几次文艺活动都是他在张罗和组织，因为他人民教师的形象，更多了一份权威，这是其成功的原因之一。另外也在于村委的支持，当时隆化地方在贯彻实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文艺建设就在其中。当时各个镇都在争相立功，对于各个村子的文艺队不仅鼓励，还有经费的支持，我在的时候张老师就争取到过音响、衣服和扇子等，也有派代表去学习广场舞的机会。外界力量的介入对于文艺建设的推动有重要意义，合作社提供音响，梁中心派实习生，这些都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组建文艺队的过程让我很有成就感，不仅仅因为文艺队一直持续地发展着，其实这样的行为渐渐地在改变着那个村庄，村里很多人反映妇女打麻将的时间少了，这是可以说明问题的。广场舞让乡村妇女从烦琐的家庭事务中得到暂时的解放，在参与中其内心是愉悦的，或许对家庭关系、邻里关系都是有好处的。如果做这样的调查和研究，应该会很有意思。

文艺队同时让我驻村的工作和生活颇受益。通过在跳广场舞的过程中跟她们的接触，我渐渐地熟悉了村里复杂的人际关系网，还有某些姓氏之间的矛盾纠纷，从他们那里也会迅速地知道村里发生的事情。这对于我深入地融入村庄有着重要的作用。那个时候我总是喜欢到处蹭饭，跟大爷叔叔们瞎侃，跟阿姨大姐们唠家常，跟小孩们戏耍玩笑，拉着几个老奶奶锻炼身体，练就了非常厚的脸皮，而这也是乡村工作的关键，自由自在地就把工作做了。

文艺队也为我后来做生态水稻种植记录的工作积累了一些关系基础。从2014年4月开始，另外一件让我忙碌的事情便是生态水稻种植。从选种开始，记录育秧、插秧直到收获的整个生产过程，以及生产资料的投入和使用记录。2014年是新农夫项目的最后一年，也是生态水稻试验的第二年，试验也从2013年的7户4亩生态试验田扩大到16户14亩。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关系很熟络，我的气场和自信自然是有的，而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我渐渐地体会到农民在利益面前的自私自利，体会到利益之前是非多的道理，内心很矛盾。在整个水稻种植过程中，个别农户偷偷用农药，偷偷施化肥，甚至中途退出，这些现象开始时让我不能理解。记得2014年5月，我从永济学习回到村里时正赶上气温下降，使得秧苗遭遇冻害问题。我召集大家开会商量应对的办法，没人能说得出不用农药的法子，但都不愿意承担绝产的风险，甚至有一个农户因此退出。我坚持不让用农药让大家很不满。开完会后我很沮丧，为什么大家不是努力找寻不用农药化肥的法子去补救，而是等我去解决？但我更担

心结果，万一苗都冻坏了大家没有收成怎么办？我每天都要去大家育苗的地方看秧苗的情况，看着叶尖发黄几乎不生长的苗，内心很是纠结。所以对于冻害期间有农户偷偷用过营养液之类的问题我没有过多干预，只是默默记录下来。那段时间我咨询了一些专家，也查了很多资料，去村里走访老一辈的种庄稼能手，寻找不用农药营养液的解决办法。当时的条件可用的解决办法就是追加一道生物菌肥，而菌肥只有合作社有，免费提供不属于合同里合作社应该承担的义务。大家让我去找合作社要，最后我跟牛场的一个负责人理论一番才拿到一斤多生物菌肥，好在也拯救了大部分秧苗。六七个月的努力换来了生态水稻的丰收，减产问题并不严重。在打谷子的会议上，本来商量的是打谷子的时间、地点以及打谷子的办法，而他们关注的问题却是什么时间拿到钱？这些新农夫明确表示必须拿到现金，不会像去年一样等到年底才催着拿到钱。最后没办法我只能挺着厚脸皮用自己在他们心中那一点好印象做了承诺。

这些事情其实反映出合作社和村庄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在利益面前人性终究是软弱的，而触发我神经的还有另一件事情。人才计划结业后因为新农夫项目的关系我继续留在二道窝铺，而当时合作社的负责人也很希望我能留下来。所以2014年下半年我一边继续做乡村图书室的小额项目，一边更多地参与合作社的一些事情。11月我一直都在忙贷款的事情。当时有一个机构愿意给合作社社员提供200万元的低息贷款，以合作社的信用担保，两个家庭联保，每个家庭最高2万元，目的在于帮助农民解决资金问题和改变生计。合作社需要协助贷款的社员做相关的合同等手续资料。当时的负责人却用100个农户家庭的户口和身份证，将200万元资金集中使用，而他承诺给参与的每个社员800元分红。当时我的工作便是找愿意提供户口和身份证的100个社员和100份贷款手续资料。记得有两个合作社的骨干带着我在村里转了两天，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天上掉馅饼的事情，都不愿意提供，有些开始愿意的人后来听了风言风语也有反悔的。最后还是另外几个村的村委会帮忙搞定的。那段时间我每天做着在我看来很假的资料，感觉无力也很无奈。甚至在这个过程中我更多地了解了合作社与村民之间的不和谐，如他们之间的租地纠纷问题……

当时我在情感上是倾向于农民的，思考问题也是从农民的权益角度出发，或许是因为他们的弱小而让我同情。我不能理解像合作社负责人所代表的“农村精英”的思维，甚至没有耐心去听农民说，而我也没办法帮助农民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我可能还会激发他们与农民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当时我的角色更像是合作社和农户之间的纽带。一直觉得合作社做的事情不是简单的种大米，而是农民组织的代言人。这当中的利害关系没办法用暂时的利益衡量。或许承载了太多的期望，所以当遭遇具体不如意的事情时失落是必然的，思考问题难免失去理智，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其实我的痛苦与最后离开的选择是必然的。没办法正视几方的利益关系，也就没办法真正融入和扎根当地。现在来想可能并没有那么糟糕，换一个角度去看那个事情的结果，合作社还是承担了社员的很多成本，那100个农户都拿到了800元钱，他们种植的水稻以高于市场的价格由合作社包销，租地给合作社的农户抗争后拿到了

高于本已签署的合同租金的地价，合作社给文艺队提供音响、扇子等设备以及活动经费……如果当时能看到这些，结果又会怎样？

“返乡青年”的理想与现实

在人才计划学员河北隆化驻村时期，我比较幸运地认识了二期的三个师兄，他们都可称为“返乡青年”，这是2012年开始一度被炒得很火的一个名词，现在似乎已成潮流。我与“返乡青年”的结缘也是在那个时候。

他们三人曾经是让我敬佩的“铁三角”，都有着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情怀和理想。其中两人义无反顾地选择返到异乡，也就是另一个搭档的家乡。他们三人走到一起的渊源很深，几次分分合合最后还是都选择回到同一地方去实现他们的理想。

我去的时候正是他们三人合作的高峰期，因此带给他们很多资源。像梁中心，连续两年派三个实习生驻点，并且将三年的项目放在那里，支持他们做生态水稻试验和综合社区服务，同时培养他们需要的生态农业协作者和新农夫，也给了他们很多外出学习的机会。2014年，小毛驴花了很大的精力为他们设计牛肉包装，并帮助宣传销售，甚至将其放进自己的超市销售。以梁中心和小毛驴为代表的乡建网络资源对在地农民合作社和城市消费者的关系网络搭建起到一定的作用，此外也有来自政府和外部机构的资金资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资源落地那里？其实现在也不得解，唯一能解释通的便是，因为他们这样的人可以为社区的改变带来希望，这正是现在的乡村所需要的。

没想到的是，2014年其中两个异乡青年相继离开。一个是因为家中独子要照顾年老的父母；一个是因为新生儿的压力，其工资难以维系四口之家的生活而遭受的家庭关系和经济压力。这样的结果让我苦恼了很长一段时间，不敢相信像他们这样信念坚定的人也会如此，曾经看起来坚固的“铁三角”也会散架。这不仅使我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同时增加了我驻村工作的挑战性，没有了他们在背后的支持，我做什么事情都感觉心里没底、战战兢兢。其实他们分道扬镳本质上还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理念产生了分歧，结果很遗憾！他们的结局让我对“返乡”产生了怀疑。

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在返乡青年的议题上深入，2016年却又稀里糊涂地接了一个返乡青年的项目，全职协助一个河南当地的返乡青年小组做了一年市集平台建设的工作。在之前四年返乡青年工作的基础上，梁中心尝试探索推动青年群体的返乡，建立地方的互助网络支持体系，通过市集平台帮助返乡青年在销售端突破，跟城市消费者建立良性的信任关系。

其实我们并不是专门做市集的，市集只是返乡青年的需求之一。我们一直关注的侧重点是返乡青年群体，从历史渊源来看，梁中心对这个

返乡青年互助小组的陪伴是长久的，2012年就有两个同事开始在河南地区活动，拉着返乡小组的成员开会讨论、相互拜访等，终于在2013年促成了这个小组的成立。我很荣幸地成为梁中心第二波陪伴和协助这个返乡小组的成员之一，并参与了其网络建设和市集平台建设的全过程，尤其在市集工作中的参与，甚至分不清自己的角色。有些时候我基本上是市集的常务工作人员，参与讨论决策、发微信公众号、联系生产者、探访生产者、与消费者沟通、市集现场布置、拍照、搬帐篷以及组织小组开会等。估计这一辈子都忘不了每次面临城管、物业等围追堵截的场面和“无家可归”的奔波经历，而即使这样也不放弃的他们，很让人感动。

我第一次参与市集是2016年4月，我提前一周到了项目地，协助他们做准备。当时讨论后说是要买帐篷和桌子，我自己就在网上找，根据大家对颜色、款式、质量以及尺寸的建议，真是货比三家，一块钱都要计较，花钱从来没这样吝啬过。结果花了很长时间跟卖家沟通，下了订单退，退了又下，反反复复，结果4月的市集有10个摊位还是裸在了绚烂的阳光和轻舞的微风里。而在最后的生产者会议上却听到了备受鼓舞的声音，写公众号分享的时候内心涌起一股强大的力量。后来我们定做了帐篷、桌布、围裙、布包和条幅等，从布置上改变市集的形象；在问题总结的基础上制定市集管理的规章制度；梳理市集的常务工作和分工；根据其他市集和PGS的经验做出产品准入的标准和各种表格；去组织拜访入集的生产者；组织有创意的市集活动……每次市集都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化和成长。

更重要的一点其实是在市集平台建设中理念的坚持。返乡小组坚持维护本土生产者的权益，抵制第三方平台产品的冲击，坚持建立以生产者为参与主体的市集平台。即使遭受场地的阻碍、不景气的销售、团队的分歧也不曾动摇过这个宗旨。所以对生产者和产品的准入把关是相对严格的，对认真生产的生产者是包容和支持的。记得有一次一个摊位突然多出比平时多几倍的蔬菜，而他的农场正被逼迁，这么大的量很难解释清楚其来源。几个负责人便连夜赶去农场看。正是这个农场，刚开始允许进入市集销售的原因是这个农场的主人对待土地的态度虔诚，在种植过程中很认真，他辞掉高薪工作只是因为对土地的热爱，坚持8个月不用农药化肥。另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一个摊位没有打任何招呼的情况下就在市集上销售来路不明的加工产品，当被问到时才解释说是外省的小农帮忙加工的，有些黄豆用了复合肥，她选择卖的原因是农户认真做生产而她也愿意陪伴。或许是沟通上的问题，最后的结果是那个摊位退集。对于一个生态苹果种植的返乡青年，市集的态度是包容和理解的。2016年10月，我们曾组织十多个人去拜访过那个返乡青年，在他的苹果树上只能看到零零星星的苹果，而其他的苹果树上却是果实累累。他们夫妇开始时组织村里的几个农户不用农药化肥种苹果，结果最后一起走下来的只有两户人家，因为不挣钱。他坚持四年种植生态苹果的经历足可以写成一部血泪史。如果这样的返乡青年还要作假的话，那这个世界上我们还能相信谁？

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我对返乡的理解也渐渐不同。我不断地接触后

发现在乡建这个圈子里无论做什么都绕不开返乡青年，返乡青年这个群体在乡村自建中已经成为主要力量。现在很多机构都在推动返乡青年，虽然从不同的切口进入，工作侧重点不同，对象也有一些区分，但是返乡青年群体返乡后面对生计、家庭以及周围环境的压力，其实是需要支持条件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梁中心返乡青年工作何去何从需要不断探索。在这个“返乡”已成为潮流和时髦的时代，似乎青年的概念渐渐被混淆。很多人都自称返乡青年，同时重要的是要为返乡青年下个定义，什么样的返乡青年才是真正的返乡？2012年梁中心提出“返乡有种”，返乡的年轻人不仅要有勇气和魄力，做扎根乡土的有种青年，他们也需要真正的种子，寓意是乡村发展希望的种子。返乡追求的更应是一种生活方式，能耐得住寂寞和诱惑，而不是谋取欲望的满足。

乡建多元化下的青年

回头想想，如果没有大学时社团支农的经历，我或许是北漂中朝九晚五、住地下室、挤地铁、外表光鲜时髦的白领，或许是某个小县城捧着铁饭碗过着父母期待的光景的公务员，也或许是我热爱的军工专业的一名技术工程师。因为接受的教育是这样的，家人的期待也是这样的。而我现在的生活和工作却与原来的各种可能都是背离的，却也那么满足于“宁愿低工资也不愿挤地铁”的自由选择。身边有着友善纯净的朋友圈，充满正能量的良师益友，有着修学储能的良好机遇，有着可持续的生活环境，有着充满未知挑战的工作，重要的是有着可以释放理想、安置情怀的空间……我们虽然也会面临父母养老、家庭婚姻关系、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烦恼、孩子教育等压力，但是在选择解决的途径中会找到其他替代金钱或者情绪的方式和方法，我们对于生活的态度决定了我们的行为选择。而脱离金钱、利益和权力，我们也会有可能的选择！

现在的乡建越来越多元化，青年人在其中的机遇也越来越多。面对的压力和成长的机会是对等的。从去年开始参与了慢食的工作，在收集中国传统食材的过程中，我又多了一个新视角去看待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发现这个事情调动了各种资源的力量，如媒体、设计、餐饮企业、商业公司等，食物连接了与社会的关系。梁中心从开始便参与了国际慢食运动在中国的落地，并成为其主要的推动力量，这也是中国乡村建设国际化互动的一个良好契机。

1.8 一个案例：一位农村媳妇的蜕变

人才计划十期 樊少欢[1]

樊少欢，现在河南灵宝弘农书院工作。她说自己“游手好闲一妇女，摇身一变一凤凰”，是弘农书院和乡建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轨迹，对于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她感觉很幸运。

从城市到农村

樊少欢是地道的河南灵宝市焦村镇罗家村媳妇，但并非一直是农村人。她是在城里长大的，回忆起自己童年的生活：虽然人在城市，却并不喜欢城市的生活，城市给自己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深深的陌生感，即便是邻居间也彼此不太熟识。再加上家人工作忙，经常一个人在家，有时候晚上也是自己在家，时常得不到关爱，内心感到害怕、孤独、无助，总想着长大后要离开这样的环境。当遇到罗金龙这样让人感到踏实、安全的农村人时，她就义无反顾地嫁到农村，成了罗家村的儿媳妇！

但那时樊少欢对城乡不同的生活方式并没有有意识的批判与选择，即使已经在农村结婚生子，依旧会对家庭有很多的不满，内心有很多的不甘与追求，在短暂的全职妈妈经历之后便出去打工了。樊少欢在宾馆、餐厅做过服务员，做事情习惯力争上游，总是想做得最优秀，大约也是年轻人习惯性的锋芒毕露，于是很受大堂经理的喜爱。但直接领导人小班长就不喜欢了，因为被抢了风头，在这种情况下，她经常会被小班长有针对性地刁难。她就有些不明白了，只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很好，为什么会这样？那时也是一股傲气，为什么要受小班长的窝囊气！于是换了几次工作后，还是回到了罗家村。

广场舞、道德与书院

2012年，樊少欢的公公生病，樊少欢就一直在家照顾。就在这个时候，何慧丽老师回家来了。作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的何老师，是地地道道的罗家村的女儿，从小看着何老师长大的乡亲都是把她当成功人士来看的。而像樊少欢这样只是听说过，却没怎么见过何老师的年轻人看到她回到村子里做事情，最开始是感到十分好奇。做事情需要人，何老师让侄儿何盼阳帮忙找人，樊少欢和何盼阳的妻子刘巧珍是好朋友，就这样樊少欢便过去了。

何老师刚回到村子里时，从村庄文艺建设入手，也就是组织妇女跳广场舞。樊少欢也去了，正值青春，身材姣好，动作标准，很快就成了领舞的人了。事事争先，希望出人头地的樊少欢很喜欢那种站在人前的感觉，于是在广场舞的活动中表现得非常积极。

村里的那所小学荒弃了好久，简单收拾了一下，何老师在村子里办起了道德讲堂。请外部的老师从传统文化的视角给村民讲家庭伦理道德，樊少欢也非常积极地去听课了。那时讲堂讲丈夫道、妻子道、婆婆道、儿媳道，也做活动，如给老人洗脚。樊少欢回忆起那些日子，说道："自己是一个城里的姑娘嫁到了村子里，婆婆和老公都对自己特别好，非常宠爱自己，时常自己出去打牌，婆婆在家就把饭都做好了，但自己一直觉得理所当然没什么不妥。即使这样，对家庭还有很多不满，内心还有很多欲望。直到道德讲堂，才恍然大悟。在道德讲堂上，第一次给婆婆洗脚，一边洗脚一边哭，婆媳俩抱到了一起哭。想想自己几年来忽视了婆婆的爱，十分愧疚。"

那段时间何老师在村子里做的活动，效果非常好。村民参与非常积极广泛，形成了三支文艺队，有100多人参与，同时村庄内从家庭到邻里关系也改善了很多。这样的良好效果更是得到了外部的认可，企业家往这里捐床、捐被褥，小学收拾得越来越像样子，樊少欢也忙着跑前跑后。

到2013年，何老师计划要成立弘农书院，并于4月12日举行了揭牌仪式。揭牌后，何老师便去美国访学了。书院虽已成立，并未在相关机构正式注册，何老师就让樊少欢去注册。但书院没钱啊，何老师之前已经拿出了一部分钱，现在已经拿不出钱了。于是村里几位年长的大叔多拿了些钱，虽然年轻人钱不多也拿来了钱，樊少欢也拿来了钱，终于凑够了3万元。书院注册需要去市里各个部门跑，樊少欢那段时间每天早早起来就去市里，天天跑，真的是很累，还出了些小摩擦：樊少欢主外，刘巧珍主内，刘巧珍每日在村子里、书院里也是忙坏了，樊少欢却整日不着家。有一天，刘巧珍非常生气埋怨樊少欢天天往外跑，放着书院里一大堆事不管。樊少欢很委屈，忍不住就哭了。之后，刘巧珍想着办法向樊少欢道歉，逗樊少欢开心。樊少欢说："书院成立以来，团队间这样大大小小的摩擦很多，几个人就这样磕磕绊绊走到了今天，不容易，越不易也越珍惜。"

弘农书院成立后，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东西多靠大家捐赠，比如被子，都是长的长、短的短。于是就组织村里的妇女把被褥全部拆了重新缝，后续书院便做起了接待工作。从那时开始，假期内陆陆续续有大学生的参观学习活动。书院也做了三期、每期45天的学习班，学习传统文化，认识生态农业，推动村民做起了生态农业。樊少欢是最早拿出自家苹果园做土壤改良的农户之一。生态农业与道德讲堂结合，与外部互动做起了道义流通，那时苹果也卖得很好。

与大学生一起

某企业资助弘农书院的主要工作人员每月1500元的补贴，可到了2014年8月，就到期了。之后，书院的日常开支、全职工作人员的日常保障都成了问题。恰逢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以下简称“人才计划”）第十期正在招募学员，如能被录取为学员，则在提供学习支持的同时每个月还有800元的生活补贴。何老师就动员樊少欢去参加人才计划，就冲着每个月800元的补贴，她就和刘巧珍一起报名了第十期人才计划，并被成功录取。但她们感觉压力非常大：一方面，人才计划的学员大部分是大学毕业生，而自己只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另一方面，人才计划学习要求每月写总结，最后写结业论文，自己哪里会写那些东西呢？后来有老师鼓励说，你们把自己做的事情写清楚就好了，压力才算小了点。就这样，起初是为了800元的补贴，之后却是收获颇丰。

人才计划有系统的乡建知识学习，有一年三次的集中培训，每次都请很多老师来给同学们讲课，也会有很多同学相互交流。樊少欢学到了很多，以前文化衫上的六个人头（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卢作孚、张謇、陶行知）是谁都不知道，通过学习知道了他们所做的事情，同时对于弘农书院的定位、对于村庄的文化建设和经济合作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三次集中培训之外，学员将会在村子里驻点工作和学习。樊少欢就在自己的家乡驻点。每人每个月要写月报（也就是月总结），相互交流大家在各个点上的学习与工作的情况。这可难为到了樊少欢，她觉得自己学历不高，文字能力较差，听到写东西就发愁。尤其是最后要写结业论文，就更为难了。樊少欢说：“与珍珍两个人，一起去打扫书院的厕所，满满的一桶粪又重又臭，抬抬歇歇，蹲在地上大笑，也过去了，都没有像写东西这样为难。”但还是不得不去写，就在那样主动与被动同在的环境下，经过时间的磨炼，樊少欢写东西也越来越顺畅了。

参加人才计划前期，因为学历的问题，樊少欢的压力很大。但当一年的人才计划结束时，樊少欢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答辩时，站在老师与同学面前讲发生在自己村子里的故事，讲自己一年做的事情，讲自己的思考与认识，那种感觉是非常有底气、非常自信的。再对比看其他人的答辩情况，发现自己虽然学历不高，但自己做的事情、自己的答辩都不比别人差！随着弘农书院一次次接待大学生的参观学习，下乡实践活动，樊少欢有了越来越多的反思，没有文凭的农村人不一定比大学生差，现代很多大学生的学习内容脱离社会、脱离生活，来到农村后生存本领极差，认知能力也很差，麦苗韭菜分不清，让村里的人笑话。

如今弘农书院还时常有学生来参观和实践，再与学生交流，樊少欢打心底有了自信。通过这么长时间的学习，樊少欢对乡村、对自己工作的认可度越来越高，作为一个真正想在村子里待下去的村里人，很自信！在对社会的认知，在做事处世的能力上都不比当代大学生差，很自

信！即使大学生讲自己的大学校园生活，讲课堂，讲论文答辩，樊少欢也都是见识过和经历过的。

农村妇女也能行

2015年人才计划结束后的下半年，樊少欢突然间有些空而无着落的感觉，现实逼迫她去寻出路。重新面对资金短缺的问题，她开始重构思路，便想到了生态苹果制作酵素的自主创业道路。为养活书院的人，给书院添置东西，维持弘农书院在村子里的公益活动，1000多瓶酵素，樊少欢与刘巧珍两个好姐妹，纯手工一个个装瓶、拧盖子……质量优异的酵素得到了认可，深圳某公司订购了许多，暂时缓解了弘农书院的部分经济压力。

同年，何老师因事务繁多辞掉了书院理事长一职，作为与书院共同成长的“老人”，诸多责任落到了樊少欢身上，樊少欢压力剧增。

到了2016年，因为河南“爱故乡”项目，弘农书院与基金会有了合作的契机，开始操作爱故乡项目。2016年做“弘农故事会”，还出了一本书叫《弘农故事汇》，搜集本乡本土德高望重的老人的故事、老树的故事、乡土风俗文化等。做弘农故事会的过程，也很苦。樊少欢说：“苦得要死啊！不会走访啊，不会记录啊，不会总结啊。真的是苦死了。”硬着头皮突破自己，一家家走访，一字字撰写，终于完成了《弘农故事汇》。基金会看到这样的成果大为赞赏，对几个农村妇女的作为是感到惊讶的。很多事情逼到一定程度就做出来了。

如今在走访与做故事会的过程中认识了很多附近村子里的人，又成立了五个合作社，再加上罗家村的合作社一共六个合作社，大家共同发起成立了联合社。联合社开展资金互助项目，虽然时间不长，但运行得非常好。现在再外出学习，终于可以和蒲韩乡村一样，一群人像队伍一样，很壮观，满满的成就感，非常开心。

在弘农书院申请下一年的项目时，基金会非常认可，一次过关。下一年的事情和资金都有了着落。樊少欢说，如果有十分的力气，那就要拿出十二分去努力做事情。任何一件事情如果不去认真做的话，今年之后便没有了明年。

一路成长

弘农书院团队很大的一个特点是变化。团队的变化来源于每个人的变化。关于自己的变化，樊少欢说，这一路走来成长了很多。相比之前自身不那么浮躁了，对事情有了很多耐心。之前任何事情都是想做到最好，为了做到那个最好，不撞南墙不回头，得罪了很多长辈，被别人认为自以为是。到今天，能够在尊重其他人想法与建议的同时来推进事情的发展。以前脾气特别大，稍有不顺心便大发雷霆。现在很少发脾气

了，看待事物发展的态度也变化了很多。是好是坏，自有其规律。有些事情并不是努力与着急便可改变的。她时常也能安慰起何老师了：“不要着急，事情会好起来的！”

除心态变化之外，更明显的是眼界的开阔与能力的提升。2012年参与活动之初，樊少欢性格活泼开朗，深受大家喜爱，但是何老师让她当众发言时她可紧张坏了。她拿着自己写的总结，站在台上，双腿发抖，声音颤抖，不敢看观众一眼。之后的日子，何老师会提供各种机会让她外出学习，学习地点大多在北京各个高校。樊少欢非常向往与珍惜这样的机会，但何老师说，让你参加这样的学习，而且可以报销路费，但是你必须讲15分钟。于是，很多次樊少欢都是为了报销路费的外出机会，硬着头皮去讲了。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她的眼界开阔了，演讲能力也提升了许多。

樊少欢在坚持中感受到了自己的成长，也感受到了因为自己的坚持带给村庄的变化。因为自己的坚持，书院存活了下来。书院让老人手里的传统手工艺，如花馍、剪纸、编织等又活了起来。除传统手工艺之外，书院里也时常有老人聚在一起唠唠嗑、打打牌等。然后是孩子们，之前孩子们都没有地方可以去玩，家家院子小玩不开，道路上不安全，书院这里院子大，设备也齐全，孩子们经常来这里翻书看、荡秋千、去黑板上写字，孩子们玩得开心，大人也放心。书院在假期还做夏令营，带一群孩子走村串巷认识自己的村庄，村子里的氛围也被孩子们搞得活跃了。村民之前要么是不怎么认识，要么有人聚在门口说别人的坏话，书院会组织大家学习，如道德学习、育儿交流、养生学习等，邻里关系越来越友好，村子里现在很少见到讲别人坏话的情况了。

乡村的工作与生活

对樊少欢的访谈地点是在她家中。樊少欢的婆婆在旁边熟练地踩着缝纫机；既是同事又是好姐妹的刘巧珍，抱着刚满月的孩子坐在院子里的阳光中，和樊少欢的嫂子聊着天。聊到开心处大家也一起笑，聊到樊少欢忘了的地方，马上就会有人补充。在这浓重的生活气息中，问起了樊少欢生活与工作的关系。

樊少欢说，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生活不好工作也不好，工作也会反过来促进生活。毕竟是做农村工作的，自己家中出现的问题很可能也会出现在别人家中，自己家中的事情难以处理好，那么村庄的事情更难以去理解、去处理。同样地，在与别人聊天时，别人处理事情的经验也促进了自己家庭问题的解决。

巧珍刚坐完月子，就开始接手工作了。而自己也会一样，现在怀着孕，将来也会坐月子，但并不会因此和工作完全断开。小孩子的出生又会促进大家对儿童乡村教育问题的关注与行动。

从一个点到一个省

自从当了妈妈后，樊少欢开始反思自己的童年生活，关注儿童教育问题。她一方面更加深刻地认识了自我，另一方面也促使自己成为更好的妈妈。如今怀了二孩，弘农书院与罗家村合作社的几位骨干也都要了二孩。当这几个孩子略微大一点，要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教育，也就是我们自己办乡村幼儿私塾，让孩子读《道德经》《弟子规》《三字经》等，在古今圣贤的经典中长大；让孩子们在田地里、大山里玩耍，在天地自然中长大。

樊少欢的自身定位也要进一步提升，作为弘农书院的理事长，之前主抓弘农书院的在地事宜。如今她是河南爱故乡的负责人之一，自身也要从在地工作到全省工作进行转换。河南有七个试验区，接下来还会再做五个试验区，而这些试验区都不是特别成熟，弘农书院算是较为成熟的点，樊少欢要去做弘农书院经验对其他试验区的辐射工作。自己之前的更多工作将会由刘巧珍主要负责，弘农书院近来加入的新人也都要开始担事情了。樊少欢说自己有又要上一个台阶的感觉。上一个台阶也是一种挑战，虽然自己对弘农书院的经验非常熟悉，但新的几个试验区自己并非特别了解，如何因地制宜地输出经验、给予指导，还是让自己很有压力的。但是并不害怕，自己不是一个人在奋斗，河南爱故乡团队成员能够彼此配合、相互支持，带来的都是希望与力量！

（口述：樊少欢；整理者：李园春、杨瑞欢）

1.9 一个从“支农”到“滋农”的成长历程

人才计划四期 张琪[1]

我叫张琪，一个从事了九年乡村建设的实践者。从汶川地震开始，就参与了不同乡村的文化保育、大学生下乡支教和农民合作组织培育等工作。2008年的汶川地震让我重新去思考人的价值和活着的意义，三个月的灾区救援经历促使我下定决心在不确定的人生中多做点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于是我投入公益领域，成为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举办的第四期人才培养计划的一名学员。六年的一线乡建工作后，我对乡村有了更深入的认知，也意识到乡村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种力量的参与。2014年，我和小伙伴成立滋农游学[2]，开始尝试引进商业力量，用社会企业的方式去探索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做游学、开民宿，联合村民组建合作社开展农村金融等，正式从“支农”向“滋农”转型，探索乡村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到目前为止已经在福建和浙江参与设计改造了22个村庄。

初识乡建

我2006年进入重庆邮电大学学习，大学的我是个十足的愤青，对社会有着激进的批判性思考。对官僚体制的蔑视，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对“三农问题”的反思，加上青春期特有的躁动，让我不能安静地留在所谓的象牙塔里面考研、考公务员，而是走出校园，不断地参与各种社会实践，践行我所认为的社会理想。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2008年7月14日，进入都江堰这座经历了大地震创伤后的城市，一座空城，高大的建筑上布满裂痕，居民全部迁居到帐篷里，地震的灾难让我对大自然充满了畏惧，人类真的太脆弱了，一场灾难下来，生命说没就没了，看到很多母亲在已经逝去的孩子尸体面前痛哭流涕，我只能呆呆地站在旁边看着，没办法给予任何帮助，甚至连安慰的话都显得苍白无力。

农历七月十五是鬼节，我驻点的村子是都江堰白沙村，满山遍野都是在祭奠的灯火，不远处传来的哭声让我无法入眠。除了反思人类社会的问题，我想得最多的是在这短暂而充满变数的生命当中，我要如何度过？我在临终前，回望自己一生的时候，会觉得有什么遗憾？

在三个月的灾区志愿者经历中，我第一次听说并有机会认识了很多NGO组织，尤其令我兴奋的是，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顿时觉得自己不再孤单，其间被他们专业的社区工作方法所吸引。为了能够系统性

地学习社区工作理念和方法，我报名参加了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组织的第四届农村可持续发展人才培养计划，开始了比较系统的乡村建设工作。这个过程就是在改造自我，改造社会。

在北京半个月的培训结束后，我被派往一家刚成立的以建筑工人为服务群体的公益机构实习，实习期半年。当时机构的服务内容包括宿舍探访、流动电影放映、工伤探访等。除了周一休息外，每天还要去探访一个不同的工地。2009年下半年实习过后，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建筑工人，我决定自己成为一名建筑工人，亲自去体验他们的生存状态，尤其是工作中所遭受的压迫和不公。我在工地干了八个月，到2010年的4月，因为长期居住在地下室，空气污浊并且饮食不太好，最终导致胃部疼痛难忍而草草结束了工地的劳动实践，加上北京医院收费甚高，无法承受，只能选择回老家养病。其间感触最深的是，看到了资本的强势和霸道，很多建筑工人因为工伤拿不到应有的赔偿或者被拖欠了工资，而不得不通过爬塔吊，以生命的代价来要挟以换回自己的血汗钱，当我们在享受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各种便利的时候，为之付出极大心血的农民工，却生活在脏乱差的环境中，还面临拿不到工资的处境，让人觉得这个社会存在很多的不公平。

再识乡建

养病两个月后，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此时晏阳初平民教育中心刚刚拿到民政部的一个项目叫“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社区”，选址在天津西青国家微电子工业区实践，服务的群体是18—23岁的女工，我也参与其中。由于对新工人状况不了解，担心项目预期与真实需求不能很好地匹配，我作为一名工人，先在一家电子厂待了三个月，对工厂和工人状况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后，才开始进行社区服务工作。2010年秋到2012年9月的两年间我一直在西青工业区筹备天津工友之家的工作，包括工友之家的建立、工作内容的确定、志愿者的招募培训和对外宣传等。

2012年10月，因为晏阳初平民教育中心筹备福州办公室，我从天津工友之家调到办公室任项目部主管，协调培田社区大学、莆田汀塘社区大学、福州工友之家各个项目点的工作，一直到2014年5月。其间我们在福建的不同村庄里，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发动村民建立文艺队，跳广场舞，活跃村庄的文化娱乐生活，低成本地提升村民的幸福感；挖掘村庄的传说和乡土故事，整理成乡土教材，教给村庄的小孩子，让他们对自己的故乡有更多的认同感；和村庄的乡贤一起组建村庄可持续发展协会，对村庄的环境问题进行分析和治理，梳理村庄的村规民约，建设美丽的居住环境；成立老人公益食堂，给村里的孤寡老人送餐，解决基本的饮食照顾问题；我们还协助村民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生态农业和互助合作经济的试验，这个部分是最难的，需要小心地处理村民的各种需要和彼此的矛盾，逐步推动村民自主化运营。

乡建反思

在乡村建设实践期间，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就是人与乡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先说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为什么我们要那么辛苦地做乡建呢？低廉的工资，粗糙的生活，父母的反对不理解……如果乡村建设是有价值的事情，我们这些从业者是有价值的，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刚从学校毕业的三年，这个问题还不会很突出，只要养活自己，就没有问题，但随着我们要谈恋爱、结婚、生孩子，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这些问题越来越凸显，是坚持，还是离开去寻找一份公司的工作？这种纠结挣扎的心情，我想大部分乡建从业者都应该经历过。

再说乡村的可持续性问题。我们现在推动的乡村建设，大部分是用公益组织的名义在推动，组织经费也主要来自公益基金会、社会捐赠和政府购买服务，这就决定了资金的不稳定性。一般基金会支持一个项目顶多三年，所以对于很多小型的NGO来讲，天天要想的问题就是资金的筹措，一旦资金链断裂，整个乡村的事业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乡村的建设一定是一件长期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花10年、20年甚至一辈子去推动，而这种依附于外部公益资源的乡村发展模式是否合适？反之我们是否应该有一个稳定的经济来源，才有可能有效推动乡村的发展？另外就是，如果没有乡村经济做支撑，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乡村骨干，面对生活的压力，也很有可能外出打工，赚取现金收入，而乡村工作者不得不重新培育村民骨干。

我们乡建前十年的乡村发展，主要是通过文化建设、教育建设等手段，逐步完成村民组织化建设，乡村的经济建设领域因为各种原因，很少涉足。可是如果乡村的经济不培育起来，乡村的复兴就是一个伪命题，而公益组织的身份是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使命的。

乡建转型

温铁军老师讲21世纪中国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中产阶级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乡村业态结构。和生态环境高度相关的休闲旅游、养生体验等消费需求都在快速增长。千差万别的、和自然紧密结合的乡村生活，最能吸引中产阶级对“三产化”农业的需求。这个新业态所要求的休闲农业，得体现“三慢”（慢城、慢食、慢生活）特点。这个业态要求的养生农业，也必须符合生态文明的多样化内涵才具有体验功能——在多样化的生态农业中就内生着这种体验功能。中产阶级下乡创业的浪潮已经兴起，他们把个性化特质与千差万别的乡土社会有机结合，特别是人文资源、旅游资源相对丰富的地方，最具有“后发优势”。

于是在2014年5月，我们几个成员组成团队成立滋农公司，开始转型做社会企业，希望用商业的模式去探索人与乡村共同可持续的可能性。我们首先选择做实验的项目点就是培田村，一个有八百多年历史的

客家古村落，是一个远离城市、拥有浓厚传统文化气息的村庄。

乡建团队（晏阳初平民教育中心）早在2009年就介入村庄的发展中，尝试了各种方式去激发村庄的活力。我们进入后，举办培田春耕节，挖掘和保存传统客家文化；进行生态水稻的种植，尝试让农民更有尊严；发动社会力量众筹资金为古村建造一座竹屿亭，继承和发扬古老的竹艺；与村民一起合办金融互助社，希望用经济的方式盘活村子；举办大学生支教夏令营和老人公益食堂，让公益重新融入村庄的血液……

培田是4A级景区，一年有30万至50万的游客量，村民经营了农家乐，增加了一部分收入。但是农家乐的整体状态比较粗糙，不够精致，没办法满足城市人的需求。如何开发和经营兼具高端品质、互动性强、消费力强的乡村旅游产品是每一个乡村旅游从业者必须考虑的问题。

我们希望改造一个民宿，作为一个标杆，引领培田民宿产业的改造升级，“乡语”是我们希望打造的民宿品牌。意指“诉说乡村的美好”，我们强调旅行中的文化体验，让客人在享受舒适的居住体验之时，也能从当地的建筑、民艺、语言中体会先贤的生活哲学。我们希望营造一种新的、健康自然的乡村生活方式，倡导尊重自然、简单生活、分享快乐的生活态度。我们更希望创造一个可供借鉴的乡村改造案例，让村民可以直接借鉴学习，参与到自有房屋的设计改造中，逐步盘活村庄的闲置资产，进而让居住的乡村更加美好。民宿所选的建筑是原来的“培田社区大学”，这个庭院承载着诸多乡建工作者的回忆，村民培训、青年交流、乡建思想碰撞……总占地面积196平方米，改造后建筑面积为328平方米，共8间客房，与培田的地标性建筑“大夫第”相邻，背靠历经六百年沧桑的宗祠和戏台。如何在尊重建筑历史的前提下，让改造后的建筑与周围老宅和谐共存，我们思考了很久。我们邀请了对培田同样热爱不已的北京青年建筑师李国发担任培田别院改造设计师。希望能通过设计让空间变得小而美。在民宿选址之时，我们也考虑过承租老建筑进行改造，但再三权衡，还是放弃了。原因有二：一是老建筑都布满了明清时代的浮雕、楹联、名匾、石雕，再完美的改造也会带来破坏；二是八十年代的建筑生活功能更为完备，日后客人居住时，会有更加舒适的居住体验。

接下来在民宿的经营中，我们发现很多客户都有村庄深度旅游的需求，他们希望更加深入地认知和体验培田这个地方，于是我们根据客户需求改造了敦朴堂为体验工坊，提供造纸、雕版印刷、扎染三个手工艺体验项目，作为对他们需求的回应。

我们跟村民一起成立了连城汇通种养殖合作社，我们出6万元，6户村民每户2万元，老人协会2万元，共20万元，在这个基础上开展农村合作互助金融的实验。到年底发展到社员50多户，资金规模200多万元，有效解决了一部分村民贷款难的问题。

在年底的总结中，我们发现最赚钱的业务是游学，且游学是轻资本投入，可以在很多类似的乡村复制。而民宿是重资本投入的，对我们来

讲，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农村金融需要取得村庄相互的信任之后，才能比较好地去落地，不然很容易被当作非法集资。

从2015年开始，我们把重点放在了乡土游学上，并经过2个月的梳理调整讨论，形成了乡土游学的商业计划书，经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厦门拉隆基金，双方谈得很顺利，经过尽职调查之后，我们拿到了一笔120多万元的天使投资。接着我们开始在福建其他乡村复制我们的模式，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已经签约了22个乡村，同地方政府一起开发乡村旅游。

人生导师

在这八年的乡村建设实践中，我先后遇到了两个对我人生有重大影响的人。一位是温铁军老师，另一位是高晓明老师。

温铁军老师，是一位用脚行走、用心治学的三农问题专家，我跟着温老师边学习边实践，学习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反思现代化的制度成本转嫁，老老实实接触基层实际，扎扎实实在乡村搞合作实验，搭建全国合作组织网络，倡导爱故乡的社会理念。温铁军老师一直倡导市民下乡与农业进城，城乡统筹发展的理念。在城市，CSA（社区支持农业）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小毛驴市民农园成为这个行业的标杆。生态多样、文化多元、食材健康的乡村，对生活在钢筋水泥中的城市居民而言，无疑是一个美好的去处。

高晓明老师，是一位有着丰富经验的酒店经营管理专家，曾参与中国第一家五星级酒店金陵饭店的筹建。在32年的从业时间里，他全程参与了16家五星级酒店的筹备与运营。与高老师相识是因为爱德公益基金会的“培田—东板古村落人才培养计划”，她当时是民宿发展课程的培训老师。她认为目前的乡村旅游，精品民宿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旅居载体。一方面，对向往自然的城市居民而言，民宿让短暂转换生活方式变为了可能；另一方面，对于乡村本身而言，闲置资源得到利用，自然资源得到挖掘，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温铁军老师一生都在研究乡村问题，对于乡村传统文化及文化旅游的发展，有着旁人无法比拟的经验。高晓明女士从事五星级酒店管理经营30余年，对顾客的需求与民宿的管理经营有着独到的见解。有两位重量级的大咖作为指导老师，让我们在乡村旅游的开发实践中有了更加明确的指导方向。

发展目标：社会企业家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步的中国百年乡建，涌现出一批社会企业家。在清末和民初两个时代都有重大历史作用的张謇，堪称世上第一个社会企业家。“社会企业”这个概念是在西方遭遇到全球化大危机之后才逐渐

作为一个新的概念提出来的。而张謇作为1894年参与实业救国的社会企业家，抱定“村落主义”辞官回乡，做的就是具有“在地化”性质的社会企业。他在南通创立大生公司，发起农会配合农田水利建设，形成农业增量来支持纺织业；他兴办交通运输、银行和保险业，再将一二三产业综合经营的收益投入本地教育、文化和社会福利。张謇之后，继往开来的是1925年在四川创办民生公司的卢作孚，他立足北碚镇开展了近30年在地化试验，产生的所有收益都用于本地教育、科技和社会民生事业。这些乡建前辈中的社会企业家，留下的是值得所有人借鉴的经验。

当代的乡村建设本身也形成了很多社会企业，如北京的小毛驴市民农园、分享收获农场等。滋农游学在福建生态环境丰富多元的背景下，提出“引导城市再识乡土，协助村民共建乡土”的理念，深度挖掘乡土社会的文化、历史、手工艺和自然等资源，据此开发成能够深度体验的游学项目，并将村庄的闲置房屋进行民宿改造，提出“民宿＋在地文化体验”的设计，既要满足城市周末休闲度假的需要，也带领城市居民去重新发现生态乡村的美好，以此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我们这些年轻的乡建人，十年来跟着温老师下基层开展乡村建设，后续的演变本质上是把从志愿者干起形成的社会资源逐步向实业过渡，未来滋农也会把形成收益的股权大部分捐赠给乡建基金会，以便资助更多的年轻人更好地参与到乡村建设这个延续了百年的历史运动中来。

公益与乡建转型的问答

问：如何权衡公益组织平等文化同公司效率文化的冲突？

张：公益组织内部讲究的是平权、民主，适合小团队的做事方式。而公司一旦发展起来，就需要更加严格的绩效考核、制度束缚和科层制度，这个跟原来的公益组织体系就会有很大不同。公益讲的是社会利益最大化，如对村庄的发展来讲，引入更多的团队来建设乡村，是个好事情，我们在村里做游学，你跳过我们，直接跟村民对接，客观上也提升了村民的收入，作为公益组织，我觉得是挺好的事情。但从公司的立场上来讲，就有问题了，如果所有的人都要跳过你，直接跟村民合作，那公司的利益就没办法保证，你就没有了收入，也就无法生存。公益组织的收入来自外界的支持，公司的收入来自市场竞争，这两者的概念很不一样。

在实践中，培田的村民就有人说，社区大学现在变了，不再以社区服务为主了，把更多的精力花在了赚钱上。这样的议论很考验人。我觉得社会企业，首先是企业，一定要讲盈利，只有有了收入，有了盈利，社会责任才能够谈，不然一切都是假的，根本不可持续。再有，社会企业要通过商业的手段解决村民组织化建设问题，才能保证合作共赢，单个的小农只能不断分裂业已原子化的乡村。所以我们在地方的实践中，优先跟村庄的合作社等集体组织合作，以便能够不断推动乡村力量的整

合工作。

问：从公益到企业的转型，是否意味着对理想的背叛？

张：我们通常在讲乡村的衰落和复兴的时候，往往隐藏的理念是排斥资本的，觉得资本是逐利的。资本进入乡村，只会排斥村民，独享收益。我们是否有可能更加合理地使用资本，把它视为工具，而不是异化物，用更加开放的心态去看待资本、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使大家能够更加合理地共赢。村民有收益、资本有收益，乡村也能可持续发展，生态更加多元化。如果我们的尝试失败了，那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探索，我希望能够把这个过程详细地记录下来，跟乡建的人士去分享，我们到底是如何被异化的，如何走向失败的。

八年来，经历了很多，以前是为了理想，背负着神圣的道德光环，一副解救人民于水火的姿态，希望通过乡村建设实践去解决这些问题，让地方政府对我们非常警惕。

而现在，坚守农村，进行乡村建设，内心更加平和和包容，更多地演变成了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这些人看到了乡村的衰败也看到了乡村的美好，原来我们在谈的是“三农问题”，但我更喜欢去谈“三农的优势”，尤其是在生态文明成为国家战略，开始出现大量中产阶级下乡的背景下，乡村的宁静、文化的沉淀和生态的多样性，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休闲度假场所。我们应该重新去审视乡村，去重新发现乡村的美好，同社会各界一起参与美丽乡村的打造，让更多乡村的美好能够被发现、分享和共建。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我们愿意缓慢地发展，缓慢地行走，用更多的时间去发现、去挖掘，去亲身体验，不断推出美丽乡村的故事。

第二部分
求索



打核桃的农人

引言 从全球和历史角度看乡建

人才计划一期 陈晶晶[1]

人生的路或许真的有好几条。不过我们走着走着就变成这个样子了。这个样子是好还是不好？如果有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生活会有什么不同？我们不知道。从“人才计划”毕业十多年后，还会有人问我：“你怎么看这个项目啊？会鼓励别人申请吗？”当我在琢磨要怎么说的时候，他多半就会自己给出答案：“我是不会的。”

确实，因为参加这个计划，我们的生活是有了改变的。用惯常的眼光来看，我们的生活或许是变得更为艰难了吧。要问其中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乡村建设的路本来就崎岖不平，并不是我们不够努力。当然，这100多年来，同行的人也很多。乡建一直在路上，筚路蓝缕，经历了很多的艰难困苦。有时候走得早了却走不好，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悲伤的事情。然而这条路值得托付，因为可以跟普通的人在一起（你看有中国的、印度的、南美的、非洲的、中亚的，有那么多的人和我们一样）。

乡土里有我们的生命。我们从村里出来，又到村里去，在城里、在乡村、在城乡之间寻找自己的生活和意义，为了能活出一个新的生活样式出来，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我们虽然走得早了些，但目标还是远远没有达到。然而这路和这走的过程，现在看看，也是这么美丽，特别是这当中有这么多年轻的生命。

倪永旺说他与乡建之间有着“生命中的偶然与必然”。他与乡建偶然相遇，其“必然”的种子在他听奶奶讲故事的时候就已经生根发芽了。

乡建和生意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广西，刘胡佳尝试在公益与商业之间探索生态农业的可能的道路。公益和商业的区分重要吗？它们的界限在哪里？他自己又是如何在其中跳跃、转化的呢？

王德斌是生态圈大家熟知的“店小二”。漂泊多年的他已经从北京一路向南，要回到彩云之南。小二开了个乡村土货栈，你想知道他这十多年是怎么过来的吗？他在大学毕业之后，去农村之前还给他父母写过一封信。

打了十多年工的徐文财是人才计划的学员，也是媒体上经常说的“农民工兄弟”。18岁的他学了点缝纫技术就背着行囊出了门。“振兴服装事业，美化人民生活”曾经是他的理想。现在他办起了草根网，要为工友服务，为理想奋斗。

魏川说乡建是他勇敢的另类生活的体验。一路走来，他曾多次想放弃，想着“就老老实实像别人一样生活”，但终究抵不过内心的召唤。他要做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赵武民是内退后参加第九期人才计划培养项目的。55岁，年纪比其他学员要大上一倍多，像他这样的是乡村建设的新生力量。乡村建设需要年轻人，更需要年长一些的同志参加。这正如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事业离不了老人，老人大有可为。

吴昊说他以前最受不了南塘的跳蚤和厕所，曾被它们深深地折磨。但是回不去南塘的他会隔着800公里的距离在手机屏幕上回想撑着伞走过那片跳动的麦田，看雨水洗去鞋上泥土的痕迹的情景。

费孝通先生说：“生命和乡土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我们年轻，我们就在乡土里面，我们在城乡之间奔跑，在“求索”中创造我们自己和乡村新的生命力。谁说中国的乡村就要衰败而不能振兴？

2.1 我与乡建：生命中的偶然与必然

人才计划一期 倪永旺[1]

你是最后一个被录取的

时间回到2005年，也就是十二年前，我参加了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人才计划”项目培训，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参加，也不知道是怎么入选的，一切似乎都来得有些偶然。但是，到今天，我居然已经在这个行业里做了十年，“中心”和“人才计划”是一个起点，也是一种弥漫始终的背景色，十年间，这颗偶然的种子似乎已经扎根、展叶、开花。

时间再回到三十年前，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在云南的大山里，我小的时候，大字不识一个的奶奶经常给我和弟弟半彝半汉地讲故事。因此，她常常被村里人笑话，但她一直坚持着，直到我上小学五年级，她去世的那一年。故事里有仙女与凡人的爱情、妖魔鬼怪、上山捡蘑菇如何识别有毒与否等。奶奶不停地叮嘱我们要好好学文化、认字，不要像奶奶一样不识字，上街常会被欺负。我和弟弟就是听着这样的故事长大的，这些和家乡、乡土息息相关的故事，是奶奶对我们的美好期许，也是我生命中自带的必然基因。三十年里，它们一直在我身上蕴藏、发酵直到被点燃。

如奶奶所愿，我一直在学校里读书认字、学文化。但是，像没有被奶奶的故事滋养一般，我在学校里并没有享受到乡土教育的滋润和启迪。我从课本上学到的东西离生活越来越远，课本和老师大多都在讲城市里的好和先进、乡村的落后和贫困。老师常要我们抛弃一切，努力读书走出大山，走出贫困的乡村，才算出人头地，才有出息。慢慢地，我发现，我们的确通过努力读书，从乡村到了县城、市里、省会甚至省外，可到头来分不清小麦与韭菜，儿时的歌谣、故事离我们愈加遥远。

早在初中时，我就想过不读书了，去学车跑运输，最终被一位叔叔训斥后，回到学校继续念书。初中毕业，很幸运地和死党考上了市里排行第二的高中，不过在同一班，死党是前十名，我是倒数十名。在高中期间还数次与父母争执，想放弃读书回家做农民。但父母说，无论我读到哪里，他们都会勒紧裤腰带供我们上学，不让我们重走父母的老路。舅舅们也来劝说：“你从小都很会‘读书’的，这是十里八乡都晓得的。”高三毕业，全班72人，有8人落榜，我是其中之一。第二年，参加了普通高考和成人高考，双中。实地到两校“考察”，由于种种原因，最后选择了高职专科的社区服务与管理专业，希望通过在社区居委会工作，能“接触”到名人、领导、老总，而立足城市。

大学毕业后，穿梭在城里高楼大厦间，不知怎么的，我很压抑，失眠、头痛等一系列问题常常围绕在我身边，去医院检查，结果都是一切正常。怪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曾期望能成为一位心理咨询师，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没有阅历可行不？

2005年3月开始我就在为毕业做准备，从重庆一路到杭州、到南京，最后停留在了古都西安，在一家做特殊儿童服务的机构做事；6月下旬，突然有一天接到学校班主任的电话说，“北京有一家发展机构在招类似实习生的学员，为期一年，有专家指导理论学习，又有驻点实践，这是非常好的一种学习方式，你去报名试试吧。再说，现在许多做发展领域的NGO很缺实践型的人才。”我觉得这可能是一次机会，因为一年前，我们年轻的班主任，也是我的老乡，刚从一家NGO辞职来到我们学校教书，他对NGO的判断应该可靠。而且，如果入选，这将是丰富我人生阅历的机会，也许我可以实现做心理咨询师的梦想。

就这样，我开始了填报名表、写文章等一系列申请程序。上网一查，梁漱溟、晏阳初、温铁军等，三农问题、中央1号文件、农业剪刀差……这些是什么？还要经过著名的专家学者评选。怎么填报名表？怎么写文章？我琢磨了整整一个星期，最后写出了发生在村里的两个小故事，截止日期就要到了，没办法，就这样上交吧，估计没戏。帮我打字的师弟也说：“小牛哥，就你这文章，能入选？我服了你，哈哈！……”刺耳的话语还有一串串。的确，提交后我非常后悔，也觉得非常丢脸，心情十分忐忑。但是很意外，半个月后，接到班主任的电话，说我被“梁中心”录取了，一起被录取的还有和我同班的张欣。

报到的那天，我和张欣从石家庄过来，从北京西站坐特6路公交车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走进校门口，呃！怎么没人接呢？问了学校门卫，他说不知道，没听说过。问了数位该学校的学生，他们都说，没听说过。见这情形，旁边的张欣着急了，怎么办？怎么办？快给录取通知书上的联系人打电话，同时找个打印店将录取通知书复印了一份，以防不测。

电话打通后，梁中心的游丽君来校门口接我们，在中国人民大学待了两个小时左右，陆续来了几个，我记得其中两个是鄂小明和张存沛。在游丽君的带领下我们从中国人民大学的西门出来，转了两次车来到了一个叫西苑的地方，七拐八拐来到一处民房处，安排我们住下，晚上见到了说话容易激动的詹玉平。当时，我还悄悄地不停地给张欣使眼色，记好路，不对劲就原路跑，跑到大马路上。

就这样，我们心惊胆战地在西苑的梁中心大本营过了一夜。第二天，我们一早一行人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开班典礼，刘相波（老石）、温铁军、钱理群、汪晖等专家给我们讲课。这一学，就是近半个月，不过，在这半个月里，班上的同学马永红、张明涛、江耀、吴加进、休学的尚荣才等个个都在和专家老师们讨论甚至辩论。而我呢，一言不发，因为他们所讲的、所讨论的内容我都听不懂，唯一一次听懂的

是一位老师说的互助换工。因为，这些从我儿时一直到高中毕业，我们家都有。我记得当时村里不是亲戚关系的几家人都公用一头牛、一台打谷机，村里十几头牛拼在一起轮流去山上放牛，一年一户也轮不到几天；我还记得，当时，每过一段时间，母亲都要扳着指头算一下，我家差村里哪一家几个工天，哪一家还差我家几个工天，并告诉我们，“你们在家里有人来喊工，遇上我们大人不在家的话，你们也要及时告诉我们。”这期间，我几次不停地追问詹玉平，你们选人的标准是怎样的？文章不是要经过专家评选的吗？“的确，你是这期人才计划中最后一个被录取的，当时我们也考虑了许久。”詹玉平如实说。

四川五亩村：从没吃没住开始

就这样，我们结束了第一次培训，我和尚荣才，所谓的“旺财”组合，来到了四川合江县虎头乡的五亩村。当然，我们对五亩村以及地方联络员谢正权、罗开俊以及本地一位四川农大支农大学生等人满怀憧憬，但是一进到村里就吃了闭门羹，村里人对我们的到来是不欢迎的，吃住的地方都没有，就连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开出的介绍信都不管用，还是不停地遭到村委、派出所等的轮番盘查。

五亩村所在的合江县虎头乡，地处川南黔北门户，是典型的丘陵地形，当地普遍种植橄榄（俗称青果）、荔枝、柚子，农作物主要是水稻。与中国绝大部分农村一样，该乡大多数人外出打工，留下老人、小孩和妇女在家。后面我们通过慢慢地了解才知道，近几年的农村税费改革使村民与基层乡镇干部之间矛盾不断。而且因为当时村里的联络人，其实在村里算是“刺头”，他们还会为村民争取公平的权益而组织村民商议并推选代表经常越级上访。他们喜欢看书和新闻，以便了解外面的世界和国家、省市的涉农政策动态，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人，并在村里尝试进行改革行动。

我和荣才后面借住在当地一位张大姐的家里，她家是开小卖部的，儿子和丈夫在外面做老板，家里有一个上高三的女儿；张大姐前两年也在外面，因为女儿上高中要高考才回来照顾女儿的，可能她看出我们真是大学生，想借机帮忙辅导她的女儿，也是让我们借住她家的原因之一吧。在和张大姐日常接触的过程中，我们就不断地跟她介绍我们，表明我们的身份，也说明我们是来村里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张大姐看到我们学生样子的装扮和日常有点学识的言谈就渐渐地相信了我们。意外的收获是，张大姐其实在村里是一位隐形的领导人物，虽然她没有在村里担任干部的职位，但在村里却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因为她的牵头，我们慢慢和村里建立了联系。加上之后我和荣才去拜访了乡里的一位副书记，跟他介绍我们的身份时发现他竟然也是温铁军老师的粉丝，经常关注和阅读温老师的文章，于是在第一个月的第三周，乡长、书记特意驱车来看我们，但当天村长有事不在村里，不过村长夫人看到了这一幕；接下来，我们在村里开展的如支教、到农户家访谈等许多活动就容易多了。

从第四周开始，我们的活动范围拓展到了附近的河坝场、海涵、坪上、龙汇等村，同时，也开始重新推动当时虎头乡种养协会的重建。早在2003年，当地就成立了虎头乡种养协会，是一个叫刘正海的农民发起成立的，但后来因财务问题一度陷于瘫痪，随后刘也外出打工，协会更是名存实亡。2004年秋，经支农大学生推荐，当地两个农民到湖北房县三岔村参加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举办的农民自组织能力培训班。他们是种养协会的成员，不忍看到协会如此衰败下去。于是学习回来后，自己找了一批人准备成立新乡村建设协会，但由于种种困难和阻碍被迫中止。

2005年10月上旬，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在张大姐家的小卖部见到了原种养协会的会长刘正海，就是经常到村里送货的那人，他家在镇里开了个小超市，批发日用品。不料过两天他亲自找上门来，相互认识之后发现他对协会相当了解，现在也想振兴协会，但苦于没有能人相助。见此情景，我们给他介绍了韩代明，一个也想组织农民做事的人，并约好下次赶集时见面，他走时我们借给他一些关于协会、合作社的资料。在第二天的集市上，刘、韩见面了，各自谈了对于协会的看法及合作的可能性。这次会开了三个多小时，结束后彼此都有了好感，都认为对方是能干大事、有能力的人，毕竟刘正海是自修法律的大专生，韩代明是20世纪80年代的高中生，两人的眼光确实比一般人长远一些。自从第一次见面熟悉后，以后他们就自己约时间交谈，这样几次后他俩就更加信任对方了。

2005年11月3日，原来的种养协会正式升级，升级为虎头种养协会，把原来名称中的“乡”字去掉，他们认为协会以后要发展成全县的协会，而不仅仅是虎头乡的。就在挂牌的当天，县科技协会主任到场，宣布该协会正式批准注册，是一个带领群众致富的合法组织。在会议上选举产生了理事长、监事长，分别是刘正海和韩代明，以及理事、监事若干，办公室就设在监事长韩代明的一间空房里。虽然协会的服务范围在整个乡，但起初正式注册的会员只有29户。11月中旬，乡政府名下的青果协会准备合并给种养协会，原因是协会是政府成立的，乡干部当理事长，村干部当理事，村民就是会员，完全不符合“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协会基本原则。所以政府想把青果协会也合并给种养协会，也是希望通过整合当地资源打造一个真正的农民协会。刘正海非常懂得怎样与官方打交道，他积极与政府沟通，一方面表明接受政府指导，另一方面希望有更多的资源支持协会的发展。当时，重组的协会成立后，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一是统购农资，按成本价分发给会员，当时化肥是85元/袋，会员价79元/袋，每袋为会员节省6元；二是成立了产业服务中心，为会员提供技术服务，以及农忙时为劳动力不足的家庭抢收抢种；三是建立了由协会统一管理的水果基地，并获得四川省农业厅的无公害认证。协会的不断发展，使地方政府对协会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由起初的反对到既不反对也不支持，再到现在的大力支持，协会还获得了“2005年四川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百强协会”的奖牌。

回想当初，我和荣才同用一部手机，同床共枕，抱团取暖，分工合

作，调研、培训合作组织知识，推动合作组织的建设。这期间我们遭受了来自地方的诸多质疑，村委、派出所等轮番盘查，但我们还是坚持学习相关理论知识以及写工作日志和月总结，进行总结反思并不断改进，践行从中心学来的和郭书田导师指导我们的方法来一一化解和应对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同时积极参加了中心安排到成都的学习，了解什么是乡土文化等相关知识。

半年后，旺财组合卓有成效地在当地推进了一个种养协会的成立，以及2006年5月后合作社的成立。当然，在这期间背后的推手刘老石老师和梁中心是功不可没的。正是在这种环境下，锻炼了我们旺财组合。

十年乡土文化保护与传承

2006年2月还在“人才计划”的时候，梁中心和滋根（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有一个关于合作社培训的合作，于是派我先去滋根贵州雷山的项目点做前期的调研。在贵州黔东南的雷山、榕江等地，我发现它们有非常丰富的苗族、侗族的文化，且滋根以社区为基础、教育为主线，通过民间互助、滋润根本的方法，促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这是我一直想努力的方向，当时有幸与滋根创始人杨贵平老师面对面交流（后来才知道，其实那就是面试）的时候被她的情怀所感染，于是“人才计划”结业之后，我就留在了滋根，这一留就是11年的时间。

从人才计划到滋根贵州项目点工作，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贵州团队就放手让我挑起了重担，我记得自己接手的第一个项目是为期一个月的滋根暑期大学生志愿者活动，让我参与该项目的方案设计并主持执行。当然，我远程请教了刘老石老师，并将中心人才计划的模式进行了复制，培训（理论学习、团队建设等）3天，按组分配下村调研一周，7天后回来进行中期交流3天（调研结果分享、再学习并进行实践活动设计），之后下村15天进行实践活动，最后3天总结。每天每个组都要坚持写日志以及坚持学习，要求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经过前3天的培训，大家给志愿者团队取名“夏风”。直到现在，我与夏风志愿者团队的队员还有联系，用当时参加了活动，中国农业大学博士毕业后在四川大学工作的罗同学的话说，“虽说我是博士毕业，在校期间参加过许多调研以及实践，但参与滋根在贵州这一个月的‘夏风’调研、实践活动是我终生难忘和受用的”。之后，举办了连续几年的寒假、暑假短期志愿者下村调研实践活动。这十余年我还在滋根，作为机构和社区伙伴（PCD）、NPO信息中心的青年联合培养项目，以及近三年友成基金会“小鹰计划”的在地督导，陪伴了20余名青年实习生共同成长。

在滋根十余年，我遇到了许许多多的人：从十几岁到七八十岁，这些来自五湖四海、三教九流以及热心关注家乡发展的滋根人，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地参与、支持乡村和地方的发展。和他们在一起，我学习到了许多，也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第一次生大病；第一次在冬天参与苗寨救灾时遭遇路面结冰；第一次参与拍摄纪录片电影；第一次主持70多

人的会议，但由于怯场被同事替换下场；第一次和村里的妇女一起过三八妇女节；第一次在山里迷路；第一次做青年实习生的督导……这一幕幕都让我记忆犹新，构成了我人生中精彩的故事篇章。

在这十余年间，我一直在做乡村文化与乡村发展的工作，在这过程中我发现和接触到了很多当地厉害的人物，他们有手艺、有想法，并一直在用实际行动推动和推广地方乡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我和我们的机构与当地伙伴一起合作，和他们一起设计适合学生的乡土文化课程，请当地的这些民间高手进课堂，讲述当地乡土文化，传授民间手工艺技能。支持和鼓励当地的青年继承当地乡土文化，热爱并将其传承下去，在苗寨支持和动员村民一起互助合作修建芦笙场，推动村寨公共文化活动的举办；在侗寨推动侗歌、故事的整理与传承。这些支持给当地提供了一种对文化认同的契机和方式，村里人参与得多了，对文化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热爱和责任。滋根发挥桥梁的作用，提供村里的芦笙队、侗歌队去参加外部的活动和在村里接待外部人士的机会，使大家感觉我们村寨的民族文化是受到这么多外面人喜欢的，从而提升他们对地方乡土文化的自我认同与自信。

这就是我们在乡土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三部曲：让乡土文化进课堂、乡土文化留村寨、乡土文化出村寨。同时，这是我们在保护文化多样性方面的一种尝试；也是展示当下中国，在维护乡土文化领域民间以及草根组织的努力。但是任重而道远！因为许多村寨的学校还在被“撤点并校”；被“撤点并校”村寨的孩子被迫来到城镇上学，这些孩子从小学甚至有的从上幼儿班开始，就在学校被“集中”起来，在课堂里的“学习”成为最重要的任务，与他的社区、家庭隔离开来，淡漠了生活、生疏了土地。我们儿时听到的，农村是贫穷落后的，城市才是文明先进的，这种教育思想愈演愈烈。乡土文化保护与传承到底还能走多远呢？

从异乡客到苗乡女婿

这十余年，在异乡工作的我，居然开辟了我的第二故乡，并一直在书写着第二故乡的故事。

来到苗乡侗寨四年后修成“正果”，摇身一变成了雷公山苗家的女婿，也就是被苗乡侗寨给收编了，这个之前是想都不敢想的。当然，这也是我这十余年间最开心的事之一，迎娶了雷公山的苗家妹子，生活在雷公山，那是真实而快乐的生活。

有许多朋友好奇地问过我和她的故事，一个孤身一人在异乡，不善表达，也不会喝酒的小伙子，居然还能成为雷公山苗寨的女婿？这个，起初在外打工的岳父岳母是极力反对的，因为那时他们打听到我的工作，以及是外省人，而且身子还非常弱。不过，由于当时工作的关系，我经常能接触到妻子家里的大伯、叔叔等，她家族的好多亲人都比较喜欢我，还有她的坚持。加之恋爱期间带她回我家看父母，我父母说，“我

们不在乎远近，不在乎她是不是种地或有铁饭碗的，更主要的是你们俩要合得来，因为以后在一起过日子的是你们俩，而且是一辈子；即使是回家来干农活，她绝对比你强，何况现在在家务农的日子也不比在外面差”。

于是，经过两年多的恋爱磨合，我们修成了正果，而且还办了有民族特色的婚礼，在2010年春节前的一天晚上，我约了几个哥们儿，晚上7点集合，带上防滑链、一壶酒，还有一些糖果及手电，驱车翻过雷公山，前往雀鸟，用苗寨的接亲方式，悄悄地将她接了回来。第二天一早，我们又赶火车一路直奔云南，在家里办了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婚礼。

从认识丽萍到现在刚好整整十年，现在我们4岁的小儿是满口的苗话，天天喜欢和外公、外婆上山、下地，玩泥巴，采茶，采竹笋，在稻田里钓鱼，也喜欢打电话给爷爷、奶奶问家里的小白兔、大公鸡的近况。这里，苗寨的一切小儿都非常喜欢，当然，高铁、地铁、公交车他也喜欢，而且经常自己用微信和他大舅、二叔留言、聊天、抢红包。时而，他会告诉他们，我们一起做的苹果酵素、姜酵素等可以喝了，每天和他们分享用酵素种植的草莓的长势以及果实。他还帮忙用相机记录我们的家庭学习和制作环保酵素，以及制作本地益生菌来改良茶园土壤等，成为我们家庭的干将之一。小儿的出生，给我们的家庭带来了许多欢乐，同时也使我更加坚定了我的方向，在乡村从亲朋好友开始推广可持续发展教育，期待做到民间互助、滋润根本。让孩子生活在自然中，且能自然成长，期待我们每个人都能生活在语言、文字多姿多彩的当下。

工作之余，这几年我也在做另一个实践，进行土壤和种植改良，2015年开始以姑丈在苗寨的高山茶园作为试点进行改造，逐渐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到2017年做到了没用一粒尿素。茶园里套种一些黄豆和草药，茶园周边养有十几窝蜜蜂。让小蜜蜂作为我们茶园的环境监测官，让蜘蛛网遍布茶园的各个角落。2016年年底，姑丈的高山茶园开始用环保酵素、糖蜜、米糠、原始密林里的腐质土来制作IMO（IMO指的是农业中植物所食用的微生物，又称本地益生菌）。这些人工制作的微生物含有细菌、真菌、放线菌、藻类、原虫、酵母等，再分为杆菌、根瘤菌、醋酸杆菌、微球菌、乳杆菌等2万多种菌。其作用有提高植物的免疫力，增加氮含量、从空气中固氮、分解除草剂、制造氨基酸、促进根部发达、增加磷钾等。我们用这种方法来改造茶园的土壤以及为茶园提供肥料。我们希望用这种种植方式提高当地家庭的经济收入的同时，实现保护水源，并维护茶园周边的生物多样性。

2017年，我们开启一些本地自留种、老品种的种植保育工作。同时，也开始辅导和组队在朋友圈中“闯市场”，卖地道食材，设计和推广具有地方乡土文化的体验游，以此开启我们的老品汇（种）再生计划，也期待能为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和生物的多样性出一点点力。

让乡村焕发出现代的生机

回想这十个年头里经历的所有人和事，好的不好的，成功的失败的，让我似乎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我与乡建看似偶然的相遇，其实是生命里早就隐藏着的“设计”，是我这“一辈子”必然的一种选择。这种必然性，从小时候奶奶给我讲故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这十年中，由于工作关系我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当中有村民、有学生、有小学老师、有大学教授、有企业家、有个体户、有媒体人、有官员，还有杀猪匠、猪贩子等，不计其数。他们的身份不同，所在地域也不同，但都对乡村有着依恋与思索，他们不希望在步入所谓现代化的国家行列中将我们祖辈传下来的技艺、历史等乡土文化抛弃。他们努力用自己的行动实践、记录、整理并挖掘乡土文化的现代意义，他们或埋头实干，或撰文呼吁，他们将情怀和专业，将激情与职业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他们的努力让乡村焕发出现代的生机，赋予乡村生活现代的意义。

这十年，我期望自己能像他们一样，同时也希望自己成为小儿心中最闪耀的那颗星。

2.2 试解生态农业的商业之困

人才计划二期 刘胡佳[1]

从10户小屯开始的生态农业
（2006年8月至2009年10月）

细数起来，我一共参加了三个机构的实习，2006年8月到2007年7月间是中心第二期人才计划学员，2007年7月到2008年7月间是爱农会的实习生，2008年到2009年间是中科院与广西玉米研究所合作的种子网络的实习生。

我是湖北人，在湖北宜昌上的大学，2006年上大三的时候休学支农参加了中心的第二期人才计划，最开始是在湖北房县三岔合作社蹲点。在蹲点期间，因为有一次回学校没有向中心请假，就被“发配”到广西来了。可能是我比较老实吧，因为当时我们学员中有不少偷偷回家或回学校或去其他地方都没请假，只是我承认了，所以就受到了“处罚”。

2006年11月，我和另外一个学员来到了广西，一起在柳州市柳江县土博镇纳社屯蹲点，这是柳州爱农会[2]的一个屯点。纳社屯是一个很小的自然屯，只有10户，常住人口23人，村里狗比人多。当时在村里有两个工作重点：第一个就是跟农民去搞生态农业；第二个就是想推合作社，因为我们中心学的就是合作社，想推动农民组织起来。虽然纳社屯常住人口只有23个人，而且还都姓韦，但合作社还是挺难推的，留下的几乎都是老人和妇女，还是缺乏一些合作的基础，后来我们的重心就转到了生态农业上。

其实最开始我们不怎么讲生态农业，也绝对不讲有机农业，因为这些话当时农民听不懂，就跟他们讲土生农业，或者是传统农业，就用一些老的、传统的、不用农药化肥和除草剂的方法去种地，种子也尽量用以前的一些老品种，就这么简单。当时我们就与社长商量，选了一个水源上游的区域，因为那时候我们开始有一点这种概念，希望能够在上游不用化肥农药，这样一是可以保护下游的水源，二是可以免受其他农户使用化肥农药的影响。我们在推生态农业的时候，大家对这个事情是持观望态度的，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参与进来，那时候我们在村里住，其实怎么搞我们自己也不懂，好在那个阶段社区伙伴（PCD）对这边的支持力度比较大，经常会组织一些农业技术的培训，包括带一些人员外出参访学习，我们开始有了一些技术和理念，就跟农户一起慢慢摸索，最后屯里的10户人家有7户参与。

那时候我们在村里蹲点是做生产者的工作，推动农户做生态农业的

转型；爱农会则在城市里组织消费者，到农村去共同购买农户的生态产品。与此同时，CSA（社区支持农业）的概念刚刚引入进来，大概意思就是让城里的消费者以公平合理的价格购买农户的生态农产品，这与我们做的事情不谋而合，于是我们就把这个概念借鉴过来了。当时我们把爱农会当作一个连接农户与消费者的中间平台，但因为初始阶段，农户不稳定，消费者也不稳定，爱农会本身的能力不足以去支撑这样一个连接的工作。例如，当时农户生产比较多的是米，消费者订了之后又不想要了，或者需要每个月分批要，那么我们需要在中间做很多协调工作，在资源比较匮乏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做不过来的。所以在那个阶段，大家就觉得可能需要一个更好的形式来连接消费者跟生产者，共同购买不是一个最佳的形式。

由于原来的共同购买模式无法持续地解决农户的销售问题，爱农会就筹备开饭店，因为开饭店可以最大程度地消费掉农户的产品，于是在2007年7月，爱农会第一个“土生良品”餐厅开业了。因为我对CSA的理念比较认同，在人才计划结业后，我又参加了社区伙伴（PCD）的CSA实习，又以实习生的身份继续参与爱农会的工作。

2007年下半年其实生意都不怎么好，用“门可罗雀”来讲是非常适合的，上午肯定没什么客人，那时候还有茶台，上午可以喝茶，客人基本上都是中午和晚上来吃饭；那时候我们还做过一段时间的夜宵，因为觉得生意不好，店租摆在那里，又不能亏本，就做夜宵。夜宵的品种不多，有一个叫炒粉，就炒那个簸箕米粉；消费者也不多，但是很固定，反正每天都是等着那几个人来吃完之后，就可以下班了。这种状况直到2008年才好转，那时候我们基本上不做广告，都是靠消费者的口口相传，消费者到店里的第一反应就说这里很安全，食材非常安全且有味道，我们就是抓住了食材这块。

饭店火起来之后，对食材的需求量很大，原来的农户已经很难供应得上，那一阶段我最主要的一个工作是发掘更多的农户，组建农户生产者的供应网络；再加上当时到南宁开了新店，2008年下半年我就来到了南宁，筹建南宁店。此时正好有个机会，我参加了中科院与广西玉米研究所合作的实习生项目，这个实习生项目是从农户参与式当地种子保育的工作切入社区，推动农户保留当地的土生种子，这与我们做事的理念完全一致，而且还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进入更多的社区，于是我又接着做了一年的实习生。

结合纳社屯的经验，到村里之后我们先找到一个带头人，那时候我们就发现带头人非常重要，一个社区如果能有一个很厉害的带头人的话，那么整个社区的发展都会比较快。我们总结了纳社屯的教训，到新的社区之后我们先不提合作社，而是根据当地的情况组织互助小组，如在马山古寨最开始就是以妇女互助小组的形式，来推动她们做生态农业，最后在时机成熟之后再组建合作社。

大概到2009年的时候，我们在南宁和柳州周边差不多就形成了一个

有十个社区的生态农户网络，核心农户有三四十户，散户有三四百户。核心农户大多是种养结合的家庭农场，也有返乡青年，以供应蔬菜、肉类、米等食材为主；散户主要是由一些老人构成，供应土鸡蛋、鸭蛋，也是我们后来说的百家蛋。

在这个农户网络里，我们对核心农户的要求是建立一个种养结合的系统，我们希望他们每户都能够具备一定的规模，但不是大规模，既要养猪、养鸡、养鸭，又要种米、种菜，养殖跟种植相结合，既能解决肥料来源的问题，又能分散他们的成本和风险，产品的品质也会得到很好地控制。对于散户我们主要是以土鸡蛋来切入，因为大多数都是老农，很难搞出规模化的养殖，然后我们要求农户饲养本地的鸡种，不要喂饲料，这样也让他们的投入没那么高。

因此，在做实习生的这几年里，我更多的是和农户打交道，从公益组织切入，推动农户去做生态农业；同时有商业的保障，就是在爱农会土生良品店的平台上，保证生态小农户的收益。

打造终端：市场化的土生良品饭店
（2009年10月至2013年3月）

在找到两三百户合作农户之后，我们又面临了新的困扰，就是需要有更多的消费者来支持CSA事业，我们就想到了社区农圩的形式，在小区里开店，更加贴近消费者。2009年10月，我回到了柳州，然后就开始做食材店，做一个社区农圩。我们觉得应该做全体系的，因为餐厅只可以照顾到一帮来饭店吃饭的人，还有一帮人是在家里煮饭吃的，主要是家庭主妇，她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消费群体。我们就是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在小区里找一个小铺位做社区农圩，卖这些生态农户的食材。

当时的食材是与柳州土生良品饭店互通的，因为店面的食材讲究新鲜，农友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要到自己的菜园里采摘蔬菜，然后通过班车送到柳州，我就在柳州的客运站接货，以保证菜品的新鲜。如果店里有卖不完的食材，我们就会在晚上收摊的时候把剩余的食材送到饭店，因为晚上饭店的消耗比较大；同时饭店如果有多余的食材，主要是一些米、豆等耐储存的食材，也会拿到我们店里销售，相互降低损耗。

这也许是我们在广西最早尝试的农夫市集的形式，我和媳妇做了两年，做得很艰难，每个月能赚到一两千块钱，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成的样子，就是那种不痛不痒、不死不活的状态。这是跟我们当时选择的小区有关的，因为这是一个老的小区，而且柳州是一个三线城市，大家对生态产品的接受程度还不高，对价格却很敏感，店里的销量一直起不来。此时我的儿子小米出生了，为了生计考虑，我和媳妇就商量把柳州的店关了，和其他在土生良品的实习生合作创业，到南宁开土生良品新店。

那时候土生良品正处在一个开店的热潮之中，整个柳州一下子开了

4家分店，南宁店的生意很好，就准备在南宁这边再开一个分店，而且我们这批实习生做了这么久，有了一定的经验积累，当时也考虑可以做老板了。2011年9月，我们回到南宁筹备新店，到11月新店就开张了。

新店开在南宁长湖路，那时候是由我来负责的，当时开餐馆和饭店的竞争很激烈，土生良品从2007年打出“食在当地、吃在当地”的理念之后，柳州和南宁都出现了大面积的山寨土菜馆，消费者很难辨别，所以竞争压力很大。在山寨版土生饭店大肆出现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们不能再走以前的老路了，不能只靠食材取胜，还需要把服务提上去，这就需要更多的服务员，为来饭店吃饭的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同时，我们这样一个具有很强理念倡导的饭店，消费者教育这方面的功能不能缺失，土生良品大概从2009年之后，因为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在饭店里，农业体验和消费者教育活动都做得非常少了。因此，我们尽量搞活动，带着消费者下乡做农耕体验；店内也设了CSA导赏员，去跟消费者交流，去给消费者讲生产者和农耕的故事，希望能够往回走一点，回到我们最开始做饭店时的一些设想和初衷。

在我管理长湖店期间，人员是很充足的，因为要配备这么多的人员，人力成本就一直居高不下，这方面控制得不是很好，导致利润不高。当时我们是由11个股东入股投资开的店，这种情况下一直回不了本，也难免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而且2012年年底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出台后，对整个餐饮业的冲击很大，来饭店吃饭的人开始减少，饭店的经济形势没见好转，我们和股东之间在运营这一块上就出现了分歧。最后，因为饭店的利润始终没上去，钱回得太慢，大家都很着急，就换一个人来管理，2013年3月我就从土生良品店出来了，不再负责饭店的工作。

从2009年我到柳州做社区农圩，到后来的土生良品长湖店，一直是以商业的形式在做生态农业，虽然没有赚到多少钱，但我们能以商业的形式存活下来，是以前没有想象到的。但如果商业能和公益结合好的话，就能把事情做得更好。在管理饭店的时候，有些成本是不大适合在一个商业体系中去消化的，比如说我们组织消费者去村里做农耕体验活动，去推动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连接的工作，对于饭店而言是一个额外的成本，本身不增加饭店的收入，饭店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去组织，这部分工作如果能得到基金会支持的话，在那个阶段就会比较好。所以我们对商业的期望值不要太高，饭店该干嘛就干嘛，要先做好销售和服务；其他一些消费者的教育、倡导与维护，生产者支持网络的维护工作，应该是由另外的人去做，而且这些最有可能是以公益的角度去做，做成一个公共的事情，才能让更多的人得益。

平台的困境与公益化整合
（2015年至今）

2013年从土生良品店出来之后，我休整了一段时间，然后和朋友在

南宁先后开过两个小店，简餐做过，面馆也做过，当时没做好，做不下去。于是，2015年年底我又回到柳州，和以前从土生良品店一起出来的实习生办了柳州捞堆市集。

一开始我们想做一个全链条的生态农产品对接的平台，只要是农户的产品，不管是有包装的还是没包装的，我们都收过来，有包装的直接卖，没有包装的就帮农户做包装，然后再分装、售卖；同时我们也做消费者的配送，和以前在社区农圩做得差不多，只是现在我们没有实体店面，通过网络销售，然后我们再去配送。那时我们还在柳州办市集，一般是在周末或节假日，找到了一些愿意合作的学校和商场，让附近的农友到柳州城里来摆摊，希望农户能与消费者面对面地交流。办了几场市集后因为这边没有合适的场地，在外面摆摊很容易被城管认为是小商小贩，后来只好把市集停了，专注于做销售和团购。

不过在那时候我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我们在没有什么外来资金投入的情况下，自己去做一个全链条的体系，从生产者考察，到分装、包装，一直到销售和配送，整个环节人力成本过高、利润太低，没办法再有足够的一些利润去支撑人员费用。后来我们就把配送停了，只做团购，而且只做产地直发的团购，因为不经过我们这边的话成本和利润都由生产者承担，对我们而言相对比较容易操作。

在做团购的时候，我们发现消费者对外地产品的需求比较大，这样我们就需要和外地的其他各个平台方去做串联；同时外地的消费者对广西的产品也有需求，我们就与其他的平台相互串货。最开始我们的要求很严格，要求平台上卖的全是有机产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开始放宽，我们认为平台方，只要你愿意销售我们的产品，不管你之前是卖什么的，现在是卖什么的，都无所谓，只要你愿意销售你们的产品，我们都愿意跟你对接，愿意去协助你。因此，我们希望这个体系的参与方是很广泛的，并不是我们之前做的单纯地从农户到消费者。

我们希望建立一个透明互信的机制，希望有一个基本规范，能够让生产者或消费者或平台方，都非常清楚我们的产品是在什么地方种的，用什么方式种的，种的时候用过哪些投入品，加工和包装又是怎么做的，因为产品质量才是大家关心的主要问题。所以在这个局面下，我们需要去收集生产者的一些基础信息，建立一个广西的生态农业信息库，把广西区域的生态农业相关方，包括生产者、消费者、平台方以及消费者组织起来，全部纳入这个信息库，然后再利用这样一个大的信息资源平台，去促进大家的互动。

对于我而言，我就从偏商业运作的角色转化为公益服务的角色，就是为广西的参与式保障体系（PGS[3]）去提供公共服务。我的个人经验是在生态农业这个领域，如果一个商业行为没有足够的资本去运作非商业行为的话，那么就应该先做好商业领域的事情。一些基础性的工作，特别是广西的生态农业发展已经有十多年了，有很多基础性工作需要有人去做，这些工作是公益的事情，比如说农户的拜访、农户能力和技术

的提升，还有消费者与生产者的互动、消费者的教育。这些都是非商业行为，可以由公益机构去做，当这些基础性工作都做好的时候，整个参与式保障体系就会具备公信力。

（口述：刘胡佳；整理：刘良）

附：刘胡佳经历

2006年8月，参加梁中心人才计划二期，到湖北三岔蹲点；

2006年11月，到广西柳州土博纳社屯蹲点，参与广西柳州爱农会工作；

2007年7月，爱农会柳州土生良品店开业，作为PCD健康农业实习生参与；

2008年6月，来到南宁，成为中科院与广西玉米研究所的实习生，并筹建南宁土生良品店，主要做城乡连接的工作，发展了马山、都安等地10个社区的生产者互助组；

2009年10月，来到柳州，做社区农圩；

2011年9月，离开柳州来到南宁，以土生良品的实习生为主体，11人入股筹建南宁土生良品长湖店，并于2011年12月开业，刘胡佳任店长；

2013年3月，刘胡佳离开土生良品长湖店，休整了一段时间后，做美美与共简餐饭店；

2014年6月，与老骆等朋友在南宁合伙创业开店，先后经营了2家门店；

2015年11月，回到柳州做捞堆市集；

2016年6月，与种子网络合作做广西PGS的工作。

2.3 一个合作社公益信托范本的打造

人才计划三期 王德斌

无论走到哪里，心里总有一个牵挂的地方，那就是故乡！离开喧闹的城市，放下一切所谓成绩，回归乡土。

昔日好友青庚赠诗《致燕子》：

原以为生命

只有白雪的冬天

是你的，衔泥筑巢

给了我整个春天

“绝版”农村区域发展专业

我叫王德斌，因为参加乡村建设工作，钦佩梁漱溟先生，取笔名叟民（梁先生有一个瘦民的笔名）；因为经营乡村土货栈，自称小二；因为是云南人，比较狂野，朋友称云南王；有朋友评价说看起来很老实其实很坏，所以要提防，笑称隔壁老王。我自己则觉得我是一个亦正亦邪，很重朋友交情、很有原则，认死理的执着的人。

我是云南东北部宣威县龙场镇人，贫农家庭出身，在记忆里，从上学时起就开始参与家里的劳动，尤其是每天下午放学就要给家里养的猪打猪草，每年年底还要给自家田地送猪粪当底肥。作为家里的老大，我一直都很听话，学习成绩一直是第一，回家就帮父母干农活，村里人都夸，一到周末或暑假还要上山打柴火或收松针或者割草做农家肥，那个时候很自然地觉得这些事就是要自己干，还要干好，每次都带着满满一篮子，100多斤的柴火或草回家。上初中后住校，每天回家吃饭，家里的活相对就少干了些，但是周末与假期基本上还是要做零工。我成绩一直不错，家里人希望能考上个师范减轻家里的负担，虽然我不是很喜欢读师范，但最后还是报考了，可惜没有被录取，最后上了高中，完全离开了家。高中时凭着中考的成绩我担任了语文课代表，应该说与语文老师的相遇相交是高中最开心的经历，他是一个好老师；自己数学也学得不错，数学老师比较偏爱，自己就有点小骄傲了，不太听话，有时上课时不太认真听课。这是高中很后悔的事，最后导致一向数学成绩很不错的我高考表现很差，不得不复读，最后复读一年来到武汉华中农业大

学。大学入学时，爸爸送我到火车站，并送我上火车，转身离开那一刹那，我流泪了。29个小时一个人来到武昌，转车到华中农业大学，我学的专业叫农村区域发展，是学校新开的专业，我们是第四期，我们之后就取消了！同班有很多人一开始就埋怨这个专业，一直到大四毕业。而我可能是高中时有点贪玩加上经过复读的缘故，一直没有抱怨什么，每门课每节课都是认真学，一直到大三我都没逃过一节课，座位都是在前三排，而且是固定的一个位置，作业都是认真地查资料认真地完成，所以学业上除了外语之外，基本没问题，我的入学成绩排在班级倒数第二，后来最好的时候还进入过班级前五！然后就是经常去图书馆看农经或社会学方面的杂志。我在大二时与同学一起去了武汉周边的一个村进行下乡调研，触发了自己内心的那点儿情感，撰写的调研报告获得社会实践调研报告优秀奖，团队也被评为优秀团队。

调研回来，我建了一个三农研讨QQ群，经常与一些对三农感兴趣的人天马行空地聊，认识了创办《理想有情》电子杂志的黄跃等人，通过这本杂志又认识了一些交往到现在的朋友，聊理想，聊青年人的成长。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乡建中心的大学生支农调研负责人让参加交流会的华中科技大学的同学联系到了我，找到了校外的小伙伴。其实我在院论坛上已经关注大学生支农调研交流网一年了，之后我们与武汉高校三农类的社团取得了联系，互相配合，组团开展活动。在大四时，我参加了师弟师妹建立的华农首个三农类社团，筹建了齐民学社。因为我的时间相对自由，参加了乡建中心农村可持续发展人才培养计划第二期学员的培训与学习，往返于北京与武汉之间，尤其是齐民学社保留了乡建的影子，如晨跑、朝话、唱歌、齐民书架等。社团在第一年就成为学校的新锐社团，齐民讲坛也成为除学校主办的狮子山讲坛外影响最大的论坛，曾经成功地邀请温铁军老师作客狮子山讲坛，在后面师弟师妹的努力下，齐民学社一直是校内的五星级社团。

合作社的公益信托模式

临近毕业，有三分之一的同学要考研或考公务员，有一半的人要找工作，我选择报名成为乡建中心农村可持续发展人才培养计划第三期学员，同时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我的选择。之后我接到乡建中心的通知，要求我先到江西兴国项目点下乡一个月，然后再回京参加培训。回京后，我参加了乡建中心为学员准备的培训，由来自不同领域、不同专业的专家老师授课，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内容。除此之外，还有二期的学员心路历程分享，有团队游戏及活动，一群青年热情高涨，现在想来也是充满欢乐。之后根据兴趣及乡建工作的安排到不同地方，我就与河北太行山结下了缘。

我清楚地记得，2007年8月28日，我得到要前往的地方的地址及联系人的电话，一个人赶到丽泽桥长途汽车站，搭乘直达县城的客车。因为没有很好地沟通，搭乘了只到县城而不是经过蹲点村的客车，所以要在县城转车，转乘时也不清楚情况，得到的答复是不能直接到村，只能

到村边，最后一个人在村边下车，背着包走了接近七八公里山路后抵达了一个叫小水的村庄。接待我的人是葛叔，也叫老葛，之前就见过，还邀请他去过华中农业大学齐民讲坛讲过他的故事。他是毛主席的铁杆粉丝及痴迷者，从《毛主席语录》到各种关于毛主席的书籍收藏了不少，很有那个年代人的特征，本身爱追求真理及公平，参与或帮助一些村民寻求公平的维权活动，用他的话说就是“我怕什么，我什么都没有，我就天天烦他们，最后他们没办法不得不给我办”。从我五年间和他的接触情况来看，他一直很乐观，总觉得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总会到来，而面临的困难都是对我们的考验，我们要想尽办法克服它。还有一个记忆是，老葛对国家政策很敏感，经常听收音机，爱学习，经常会发现他总在有感觉的时候掏出纸或笔记写下来一些东西，哪怕是在烟盒纸上，他自己也时常有一些小灵感，写点诗或标语，大家好像还蛮喜欢的。

在老葛的引领下，加上乡建中心已经在这里开展了三四年的工作，我算是很快融入了一个北方的乡村。作为一个无权又无资金的外来个体或组织进入一个乡村其实在当下是有难度的，而乡建中心凭借多年与农民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之所以这样说，那是因为乡村的复杂性，乡建中心应对或参与的仅仅是乡村里的一部分人群，和其他人群比如基层政府人员或乡村精英，我们的互动会少一些。

当地附近有5个乡建中心进入后建立的农民组织，大部分是维权转化而来的，以大学生支农调研开展文化文艺活动逐步组建的，早期有信息站、妇女协会、老年人协会、农家文化大院、文艺队、腰鼓队等试验，调动了一部分村民一段时间的参与热情，之后也有组织内部社员进行很小规模的个体化肥农药减量的试验，算是比较超前的生态农业试验吧！可以说这是新时期比较早期的农民组织试验，在农民合作组织法将要来临的前夜，他们已经做了而且坚持了三四年。我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协助他们注册合作社，获得一个合法的身份，前后协助办理了5家合作社的注册。注册之后，总得做点事吧，当时乡建中心在山东某合作社的农资购销服务做得不错，而太行山这个地方合作社比较多，而且相对集中，是否可以联合起来做农资购销服务呢？乡建中心经过讨论，派出山东的伙伴及中心的骨干前往太行山及兰考考察，最后两个地方都开始进行合作组织的农资购销服务。

太行山农民合作组织的农资购销服务一共涉及2个县6个合作社，分布在县城两边，每边3个。一边是丘陵山区，以果树种植为主；一边是平原，以大田种植为主。总共240多户农户社员，基本方式是乡建中心按照山东的做法无偿投入2万元（算是无息借款），合作社将吸收的社员股金放在一起作为运作的资金，乡建中心在地的人员负责管理资金及组织大家开会，根据大家的需求及意见使用资金，进行农资统一采购并分货，年底进行结算按交易量与股份分红到各个合作社，再协助各个合作社按社员交易量与股份进行分红。有一点在设计之外的是，因为6个合作社的距离及用肥的差异，最后一个农资服务中心变成两个。第一年总体做得不错，也顺利地给大家分红返还，利润是30%—40%；第二年开始扩大，吸收了2家合作社加入，开局还不错，年底问题多多直至最

后停止，而且到后面造成很大的影响。回想当时我们本就无社会经验，更无市场经营经验，去做了这样的工作确实是勉为其难；还有对农业生产及农业资料我们也不懂，第一年山东试验点推广的厂方农资在太行山的库存比较多，或者说在太行山下不适应，最后只能当库存，最糟糕的是最后过期造成损失，还有原本参与的合作社就因为规模大小不一样，这就为投入资金及销售农资量及需要农资的时间不一样，如何公平地协调处理埋下了隐患，扩大后的新成员与之前的成员还稍稍有些互相不买账，整体上我们把控不了，出现的问题导致之后分货结账退股，最后外部的资金怎么追回，这又是个难题，再追究这些问题谁来负责。

较早开始的农民合作组织联社的农资购销服务最后走到尽头，一直是我心里的阴影，之后在一个合作社农资购销的基础上小规模开始了资金互助的试验，从3万元开始，社员入股，社员专门选择3个人来负责运行，我们只是给予一些制度及相关运作的协助，慢慢地向10万元、25万元、30万元的规模发展，这期间相对来说没有出现农资购销的问题，就算有其他问题那也是村民自己去解决，我们只会提供其他地方是怎么处理的参考。虽然运行很慢、很小，但是是他们自己在运行，而且运行挺好。这个时候，我们接触到香港的一些老师或朋友，他们要捐助合作社，于是我们就提出让他们支持合作社的资金互助部，产生的收益用于当地合作社公益服务，三年或几年后还给支持人，而不是无偿捐助，开创了较早的公益信托做法。

从2007年到2012年，我离开了乡建中心。这5年中我一直在太行山下，变动很少，虽然一直没做好事，也没做成事，但是就因为待的时间长，与接触的村民都熟悉，他们把我当孩子，相处就像家里人一样，所以太行山下是我的第二故乡。

成为“小二”：亲历农夫集市

2013年，当年的一个合作社的200亩荒山正在进行生态养鸡，我于是开始在这个合作社学习生态小农场的建设及生态农产品地生产与销售。同时在调研中我发现了青年人参与农民合作组织的重要性，以及有青年人通过参加农民合作组织就业的趋势，于是我与20多位乡建或涉农的青年入股总额约3万元，建立了青年合作社，尝试自己为自己服务。这应当算是比较早的青年自发的民间互助组织，我们以有限的资金用于成员的互助，并同时对有需要而且有了解的农民合作组织进行小额资金支持，这些思路与后来一些农业公司或一些基金会或风投进入农村开展投资的思路高度吻合。我们每年还有一次或两次线下聚会交流，这也许算是青年自发的就某个话题进行互动比较早的做法。

在太行山乡村的农场，其主要产出就是鸡蛋与鸡，通过乡建中心国仁绿色联盟进入北京，在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平台上进行销售，我在当地配合生产把控，微博宣传，同时开始考虑另外的渠道及客户，还有当地生产产品的开发、在地生产者间的互动、协助城市消费者实地探访

等。

最开始我没有准备做销售的事情，只是有几件事促成了我开乡村土货栈，并成为货栈的“小二”。一是归元农庄的香油开发。那是一个夜晚，在山上吃过饭后，我与留在山上的大叔聊天，在聊天的过程中，他告诉我他之前做过多年的香油生意，我当时就寻思，详细打听了制作的工艺、手艺人、设备等，计算了投入，问他可不可以做，愿不愿意做，他说可以做，也愿意做。第二天与合作社的理事长一说，他也同意做，大叔自己掏钱买了一头驴，之后在村里找石磨，找手艺人，石磨香油项目就上马了。与国仁绿色联盟的伙伴一起核算生产成本计算定价，最后国仁绿色联盟伙伴把石磨香油推广到了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二是青年合作社组织了一次交流会，当时掌柜的带了父亲做的糖点，当我们休息时的茶点，台湾来的在绿色和平实习的朋友吃了以后要买，说很好吃，于是乡村土货栈开始有了第一款自己的产品。

自从有了自己的产品以后，我们开始每个周末参加京西生态农夫市集，一直持续了一年多。早期是每个周五从太行山乡村出发，到保定坐晚上的火车，第二天早上到北京，每次带上一些产品，来回折腾，算算可能并没有什么收入，但是坚持了下来。后来冬天太冷，也太累，考虑这样折腾成本也高，于是在北京租房，搬到北京之后参与了京西生态农夫市集、舌尖上的市集、绿色嘉年华生态市集、宋庄跳蚤市集等市集，参加小毛驴市民农园、同心农园等地的开锄节、丰收节，这一年多了一个拉车，几个箱子，在北京全城跑，我体重从160斤下降到130斤。通过这段经历，我认识了不少朋友及老师，也彻底改变了我的饮食，要尽可能多吃生态的或不在外面吃饭，朋友过来一起吃饭，那就在家里一起做，应该说这段时间累但是很充实，也很开心。同时这段经历让我对当下中国农夫市集及其问题、农夫市集与乡村发展等有了自己的认识与思考。

当然除了赶集，这段时间我还参加了各种涉农会议与分享会，拜访生产者朋友，外出寻找好产品，也调研乡村发展的典型。记忆比较深的是乌蒙山之行，从贵阳出发，转遵义，到桐梓，转凯里，到雷山，探丹寨，回云南宣威，上昆明，到楚雄，历时一个月，感叹云贵的神奇，小吃物产的丰富，感受到民间技艺与手工的诱惑，当然也有风景的优美。一路上花时间寻找手工艺人，探访生态从业者，也为货栈后来西南产品的上栈做准备。

回到彩云之南继续……

2015年8月，我接受原来乡建中心同事的邀约来到了河南，来到孔明躬耕之地，参与了一家乡村规划设计院的工作，主要是根据政府美丽乡村建设的政策，以乡建理念开展乡村规划设计或者说在乡建的做法基础上融入规划设计。不管怎样，乡村规划设计是硬货，乡建是软实力，两者相得益彰，加上新乡贤人士带头及村民参与，从文化、金融、环境

及产业上进行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思路与想法应该是没有大问题的，然而众人要达成共识尤其是在行动中达成共识，又好像太难，也难为创办人的协调。这段经历主要是在一个3000多人、6000多亩地的村里做了一些基础性工作，如前期调研、农民文化节日活动、农民文化节等。之后参与了两个村的基线调查，前往孙君老师2003年前后就开始操作的五山学习。我在大学时就有关注，想不到多年后终于成行。这段经历让我在对乡村发展的认识尤其是政府力量与资源的影响，有了极深的感触，也是这段经历让我对乡村规划设计、艺术进入乡村有了多一些的感想。

在这期间我来到新乡小刘固村拜访3年前的老朋友川崎广人老师，也了解他在中国扎根3年来的堆肥及堆肥栽培。之所以前往，一是为了看望川崎老师，二是因为在这一两年自己关注乡村垃圾处理，而在南阳的一年也面对这个问题，想探讨堆肥＋垃圾分类＋粪尿分离厕所＋秸秆还田或加工＋蚯蚓堆肥＋环保酵素，相对综合完备地处理乡村污染与垃圾的可行性。

关于川崎广人老师，我与他大约在6年前认识，5年前第一次在北京见面，当时我还在乡建中心负责农民合作组织的工作，我们2010年举办了第一届农民合作组织论坛，川崎老师从网络上了解到，通过邮件联系到我，大概意思是对我们的活动很感兴趣，于是提出可以来中国参加下一年的论坛。从这之后，川崎老师就与我邮件往来，他要来中国介绍日本的无店铺消费合作事业，觉得对中国的合作社发展会有启示。在邮件中我才知道，老师63岁才开始学习中文，花了3年的时间，能看能写，能说与听一点点中文，我被镇住了！之后川崎老师开始为一年后来中国参加论坛做准备，他的发言稿PPT改了多次，每改一次就发给我，我作一些调整，然后他再改，直到一年后参加论坛，他还打印出修改好的PPT，一直在温习，日本人的认真劲不得不服。论坛结束后，老师说他要来中国工作，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中国。川崎老师身上有着日本人的认真负责精神，对工作的条理，对制度的要求及遵守，对服务的高要求，还有对人的尊重，无不让我钦佩。比如，小刘固农场有白天不许喝酒，喝酒不许工作的规定，喝酒了他会与喝酒的人一起受罚，若不接受惩罚，他会自己绝食。再如，去看望他时，他正在改建生态厕所，他说厕所应该有门，每个蹲位也应该有个小门，而施工或当地农场的人还觉得多此一举，老师说了一句话：“如果是你妻子用这个蹲位，你会怎么做？”我与周边的人都怔住了！

2016年11月7日，我告知朋友们自己准备回乡，去从事自己想了很久的生活试验。十年异乡生活并未扎根，因为从内心里我就是外乡人，从来没有想过60岁以后我还在这里，短视地、功利地想立马见到成效，然后就开辟下一个战场，当然也不会全心投入。或许有人能做到，但是当地人接纳你的空间或合作的空间又会令试验可能偏离预期目标，所以我准备回乡，希望能为自己60岁以后做点事情，当然这样也可兼顾家人。我希望这次回乡是生活式的而非运动式的，不是革命，也无关改造，就是圆一个自己十年来内心想要回到乡村的梦，也是回应自己内心

认为乡村是有未来的，是可以与城市同在，而且是不卑不亢的。

当然，这样的乡村不仅仅是当地村民的事，也不是当地村民就能办好的事，不是种两亩土豆、养两头猪就可以实现的，更不是拱手交给外来人的事。那到底是什么事？用一个词回答就是：安居乐业；用三个词回答就是：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我期望自己作为一名十年游荡城乡的小兵，为了自己内心的安详而回到家乡，把内心之想逐一慢慢地去试试。既然这样，那就开始往南走，回家！回到彩云之南！

（改编自滋农游学微信公众平台文章《小二返乡》）

附：给父母的一封信

亲爱的爸爸、妈妈：

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意味着你们儿子的大学生活已到头，也说明你们的不孝之子已经决定了自己的工作道路。请原谅我一直到现在才给你们写信。

又是四年，你们又辛劳了四年，也许你们会跟自己说：“再坚持四年，就好了，就可以松口气了。”可是你们却一直辛苦劳作从不懈怠。深感你们的苦心，我很惭愧，不但没有为你们减轻负担，也没有替你们分过忧，更让我过意不去的是我还在“蚕食”着你们。你们精心的喂养，让我长得白白胖胖的；我的寄生，吸尽了你们的心血。爸爸有病在身，越来越苍老，妈妈你也在感叹岁月不饶人时增添了许多皱纹。每次回家，真不敢正视你们，每次回家，我都记下了你们操老过度加上年纪越来越大行动不便的那一幕幕场景，记得在你们背后默默的忧思，我能改变吗？我无用至极，还是让这场景年复一年地继续，年复一年。

今天，我要结束自己的学业，步入社会，做一个对自己、对你们、对国家负责任的自食其力的人，有太多的话，曾经没说的，现在想说的，然而我还是要说：“我可亲可敬的爸爸、妈妈，感谢你们25年来的抚养，你们无愧于伟大的父母，我为有你们这样的父母而感到骄傲。我真的对不起你们，没能让你们放松却带来担心，对不起，爸爸、妈妈。”四年中，你们一个个关心的电话，一句句慈爱的话，一个个信任的眼神都令我难忘。你们一直认为自己的孩子是最听话、最优秀的，但是我很惭愧，四年中随着毕业的临近给你们打的电话越来越少，给你们写的信也越来越少，每每让你们担心地打电话询问，当知道我还好时，你们才会松口气。你们一次又一次地叮咛叫我过一段时间就给家里打个电话，可我一次又一次地没做到，是我没有时间吗？不是。是我心里不想打吗？不是。那是什么？你们的孩子在外多少沾了一些坏的习气，总觉得麻烦别人不好，而且在大家都在谈论子女工作的这种环境下，我不想打，说到底还是我的底气不足，怪谁？可能我还有一种情绪在埋怨我为什么出身自农村，可我正在彻底让自己醒悟，我没有理由怪我的身份，要怪就怪自己的努力不够，农村是一座熔炉，是出优秀人才的地方。

爸爸、妈妈，请再次原谅孩子的无知。很早就想给你们写这封信了，但我一直在思考，一直在作选择的掂量，到今天已经没法再拖了，我想好了。我愿意回到农村，接受再教育，让我成为一个体谅父母、体谅农村艰辛的人。我相信我的这个想法你们不会觉得太突然，我是5月2日与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达成协议的，参加它的第三期农村人才发展计划，经培训后要到农村待一年，其中的一些问题我都仔细考虑了，犹豫过，但还是选择了参加。

理由如下：

1.来自农村，所学与农业相关，有责任也有条件回到农村。

2.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80%的人是农民，要了解中国，就要了解农民，而且农业、农村兴，农民富，则国家兴。简单说，没有农民，谁能活下来？儿子愿意回到这本厚重的大书中去学习。

3.社会在发展，但限制因素还在农村，所以有很多人关注农村，包括政府、专家、学者，也就是说农村以后大有作为。

4.儿子从小就想改变我们的家庭生活状况，但经过一些思考，觉得太狭隘了，也许我可以顺利地找份工作，至少让我们家的生活不要太紧，但我们还是生活在与我们一样贫苦的人民中，我想善良、朴实的你们也会劝孩子为他们想点法子的，不过你们担心这样的压力太大。爸爸、妈妈，我们多年的苦日子都挺过来了，就再挺挺，儿子愿意接受这样的挑战。

5.儿子向往乡村的生活。城市生活虽然很便利，但也有很多问题，如拥挤、污染、人情冷漠、奢侈、荒诞消费、灯红酒绿，儿子真的不适应，真的，在大学我们班上与父母的交流用写信这种方式的仅仅两个人，而儿子总觉得打电话不习惯，太土了。爸爸、妈妈，乡村实现便利也是可能的。

爸爸、妈妈，请相信你们的儿子，他不会做违法、有损别人的事。我所要做的虽说才刚开始，万事开头难，但前景无限，我相信我的判断，退一万步说，就算没有美好的前景，我也应该去做，想想：为什么占绝大多数比例的人口却不能过着便利轻松的生活？为什么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地劳作却抵不上别人几个月的工资？为什么别人可以拿到退休金，我们却在60岁后还要面朝黄土背朝天？为什么别人有这个保险那个保险，而我们却在生病时不能得到及时医治？为什么大多数人都把眼光投向远方，而不顾生我养我的地方？……

爸爸、妈妈，你们相信孩子的选择是经过长时间（可以说是20年）思考的。正如一个朋友所说："农民，我的父母；农村，我的家乡；农业，我的职业。"儿子的选择就是：致力于乡村建设，让农民过上有自信、有尊严、好一点的生活，让农村出来的人敢大声说'我家是农村的'，让大家欢呼'农民万岁'。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知道这个选择后一

定会像我要离家时给我准备行李一样，祝福我一路走好。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正因如此我希望这爱升华，所以我选择了这条路，选择了，就上路吧！

顺带向包老师、妹妹问好，珍重。

斌儿拜上

2007年5月11日晨
华中农业大学荟7—109

2.4 一位草根农民工的呐喊

人才计划五期 徐文财[1]

农民工也有大梦想

作为一个农民工，在最初背起行囊远走他乡时，都怀着灿烂的梦想。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很多人的梦想与激情渐渐被现实磨灭了。面对现实，几乎不敢谈梦想。“谁没有梦想，谁不想出人头地，但总要面对现实……”但是，面对现实，我们又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自己：“不能这样过，再也不能这样过……”于是，我们总是在现实与梦想中挣扎……

我也一样，18岁中学毕业后学了点缝纫技术就背起行囊，开启了打工的人生历程，那一年是1993年。那时候，工资不高，但是打工生活还是很美好的。那时候，杭州还很小，从东走到西，半天就能走到头，我还真的曾经这么走过。

那时候很少加班，偶尔加班，老板还会给我们一些“封口费”，怕我们向媒体或者劳动局举报。除了给封口费，还有一个细节，那就是黑窗帘一定会拉得严严实实，好像生怕劳动局的人会发现似的。回忆起来，那个时候，做服装是很幸福的，也是让人羡慕的工作。那个时候，“振兴服装产业，美化人民生活”曾经是我的理想。直到大概1996年或1997年，那几年是在杭州做服装的人最风光的时光，大家的工资是很高的，一般的都有3000多块，高的5000、8000块的都有。那时候租房子只要30块钱，大多也不需要租房子，工厂都有住房。

只是好景不长。因为做服装好赚钱，很多人选择做服装，那几年到处都是服装培训班，从农村涌进杭州的人，到服装培训班学一个星期就可以走进服装厂做工。随着服装工人的急增，服装工人的待遇就越来越差了。再后来，服装加工厂越来越多了，搞个几十台机器，就可以办起一个服装加工厂。有的老板本钱不多、效益不好，到了年底开不起工资就跑路了。服装工人最黑暗的日子就这样来到了。2001年之后，每到年底，总会有不少工厂老板跑路，工人拿不到工资的情况时有发生。与此同时，加班越来多，几乎没有加班的概念，大多数服装加工厂的工作时间是这样的：中午12点上班，一直做到第二天清晨6点或7点。上午6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一年到头几乎都这样，没有星期天。就算这样辛苦忙碌，一个月的工资也多不了多少，我们甚至也不奢求多多少，只希望能准时拿到工资。

就在那几年，我那“振兴服装产业，美化人民生活”的理想开始动摇

了。我觉得，我们打工者的生活不能这样！

2003年，温总理为农民工讨薪事件，让农民工问题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从那个时候起，我成了服装厂的另类：在我的机器上，时刻不离一个笔记本：我时刻在思考我们农民工的未来，我们的现状要如何改变，一有灵感立即写下来。当然，偶尔也会写一些情感感悟。

一转眼三年过去了，三年下来，关于如何改善打工群体的状况，我已经有了很多想法，笔记本上已经写满了一大堆。想法很多很多，但要去实施，却很难很难，因为打工还得继续，因为要生活。直到2005年年底，一则新闻再次刺痛了我，这个“新闻”是从当年万峰先生的《晚报浏览》中听到的，我至今还记得那一段话：“何春梅死了，加班在继续，在铧鑫厂继续，在广东的一些企业继续，在全国的大多数企业继续。何春梅的生命除了给自己换了几个赔偿金，并不能唤起谁的警觉。何春梅既不是第一个过劳死的女工，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当时，我就在想，下一个会是谁？谁也不知道下一个会是谁，但我们知道，肯定是我们的中华儿女！肯定是我们打工的兄弟姐妹！

那一天，我很心痛！我甚至有种愧疚的感觉。有那么多改善打工群体的想法，却一直藏在笔记本里不去实施。行动起来！一个声音在心中回荡！于是，这年整个春节我都在为理想的行动作准备。

踏上草根寻梦路

2006年4月18日，在我30岁生日那天，我终于放下剪刀，开启了公益梦想之旅。那一天，我做好最后一件漂亮的连衣裙，端详了很久，然后决定正式提出辞职，开始实施我改善打工群体状况的探索。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老板时，老板很吃惊，但还是爽快地给我结清了工资。她也给了我忠告：想要改变打工者的状况，没那么容易，至少得50年。我说：如果改善打工群体的状况需要50年，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把这个50改成49、48、47……因为我觉得，我们打工者的状况长期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必须改变！

就这样，我开始去奔走行动。2006年7月，“草根之家”网站建立了。我把多年来写在笔记本上的东西，放在了网上，呼吁打工的朋友们，团结互助，一起为改变我们的命运努力奋斗！我的呼吁很快引起了很多工友的共鸣，同时也引起当时《浙江日报》一个记者的关注，一篇《听！一位农民工的草根梦想》把我那个朦胧的梦想告诉了世人。那以后，很多有着相同梦想的人找到了我，更有远在广东打工的工友赶到杭州来与我一起奋斗，他就是刘明。进入2007年，我们开始筹划一个大型公益活动：草根文化艺术节。我们想用我们的方式展示打工者的风采，告诉世人我们打工者的梦想。在此期间，那个给我写过报道的《浙江日报》记者给我介绍了一个人，说他可能会有助于我们梦想的实现。他推荐的那个人就是刘老石。

于是，我试着给刘老石老师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告诉他我们的梦想。类似的邮件我发了很多，几乎都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但这次不同，让我非常意外的是，邮件发出没过几天，我就接到了刘老师的电话，他说他现在杭州，可以见面聊聊。于是，我就这样与乡建结下了不解之缘。还记得那天，我在之江饭店见到了刘老师，在和我交流之后，他给我的反馈是："你是一个有想法的人，但是还需要学习。草根文化艺术节这个东西，办了就办了，别看你现在这么有激情、这么努力，但办了就办了，办完了又能怎么样呢？想过没有？"他建议我找机会参加相关的学习培训，更系统地规划未来。

不孤独的"傻瓜"们

不久，刘老师就给了我一个学习培训的机会，他们正在组织一个"NGO领导能力培训"，我可以去参加！2007年10月11日，我带着梦想出发了。在报到时，我认识了很多与我一样在从事公益行动的同行。了解了他们的事迹后，我深刻感受到自己思想的狭隘。同时我也感到庆幸，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和我一样，坚守正义、良知、道德的人还有很多，我这样的"傻瓜"并不孤独……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听到了很多专家的声音。各种声音在我心中激荡，让我时刻在思考：做草根之家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要怎么做？

2008年，再次有机会到北京参加更系统的培训，我成了"人才计划"第五期学员，接受为期一年的培训。这期间，我更系统地接触了公益理念、社工理念；每一堂课，我都会将我的梦想和事业关联起来，思索这节课的知识如何运用到草根之家的建设和管理当中……

刘老石老师告诉我们，资本如何控制我们的经济、文化、生活，劳动者的文化如何缺失，我们该如何做。

韩德强老师告诉我们，投身公益，要从大处着想，从小事做起。一句话就是"脚踏实地，志存高远"，这句话此刻正挂在我们办公室的墙上……

杨帆老师给我们灌输了大国意识：中国要强大，民族自豪感要强，民族自信心要强……

程漱兰老师冷静地告诉我们，几代国家领导人完成了他们所处历史时期的使命，也给出了农村发展的思路……

温铁军老师总是让我们冷静后，再坚定信念……

钱理群老师"温饱问题解决之后的人生选择"解开了我一直以来的困惑，也可以代替我解答很多人对我的提问。很多人经常会问我，你条件不是很好，不去努力赚钱，做什么公益？是啊，为什么呢？以前，这个问题我总是难以给出明确的回答，有时我自己也会感觉有些困惑。钱理

群老师的“温饱问题解决之后的人生选择”给出了最好的回答，那就是：温饱问题解决之后，我们是继续选择无止境的物质生活，还是选择追求心中的理想？现在的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有温饱问题，那在这个条件下，为理想奋斗不是人生最美好的选择吗？还有什么疑问呢？

经过这一系列的思想启蒙，我们的梦想已经渐渐成为一种理想，为改善打工群体现状而奋斗的热情和冲动渐渐变成了一种信念，草根之家的宗旨、使命、愿景也渐渐清晰。

打造现实中的家园

结束了为期一年的培训，我回到杭州。我们的努力方向是创办真正意义上的草根之家：在现实中创办这么一个家园。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开始筹钱、找房子。最后，我们五个人决定勒紧裤腰带也要把我们打工者的大家庭撑起来。2008年11月23日，在众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的全力支持下，草根之家现实版——草根之家文化中心终于成立了。我们似乎离梦想又近了一步，最重要的是，这个时候，已经有一个理想团队在共同奋斗。

现实版的草根之家成立后，根据我们的愿景，设计了一系列的项目活动。这个时候，在乡建中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就很管用了。我们鼓励工友们发起成立了文学组、文艺组、义工组、法律组、体育组等兴趣小组。每个兴趣小组都有一个品牌项目。

文学组很有影响力，文学组负责《草根》杂志的编写，这是让大家兴奋的事，每一期杂志到手，大家都如获至宝。

文艺组当时最得意的项目是K歌大赛，我们的大赛还走进浙江大学举办过，杭州日报社、杭州电视台等很多媒体都跟踪报道过，越来越多的工友走进了这个大家庭。

义工组的品牌项目是100米文明，我们倡导以家为圆心，以100米为半径，用我们的行动，绘一个文明卫生的圆。我们组织大家走进一个个工友的家，以工友的家为圆心向外扩展……

法律组的品牌项目是法律讲堂，这得益于乡建中心的支援，给我们派来有法律工作经验的同行来讲课。

最有影响力的小组莫过于体育组了。我们把乡建中心的优良传统晨跑、朝话传承到工友队伍中来了。当我们迎着朝霞喊出“为工友服务，为理想奋斗”时，心中的理想越来越坚定。当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时，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兴奋，甚至有些工友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和我们一起晨跑、一起朝话。那段时光，注定成为大家心中最美好的时光！

最让我们感动的是家园中兄弟姐妹的情怀，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人

的情怀。“草根之家是我家”不仅是很多人口中的话，也是深入人心的话，无论哪个兄弟姐妹有困难，大家都会一起帮忙。有时候，哪个工友好几天不在家园出现，我们就有人会注意到，就会去打电话联系或者去上门走访，那人可能是感冒或者不舒服，而接到家人的问候电话，或者家人去上门走访，就像亲人来看望一样，很感动。

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事，还是一个工友患大病的事，那个工友患的是尿毒症，当得知要二三十万元的治疗费时，他自己都想放弃，但是，这个大家庭的兄弟姐妹不愿意放弃，没有人动员，大家自发地就行动起来了。先是进行家园内部捐款，接着是出去募捐、义卖。大家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拿去义卖，衣服、十字绣、书画……也有人组织去街头“卖唱”，我们的好兄弟黄新华在杭州最繁华的街头对着来往的行人唱了100多遍《爱的奉献》，唱得泪流满面，唱得嗓子沙哑，因为，他把那个患病的工友看成是自己的兄弟。经过一个多月的奔走，我们筹到了足够的医疗费，那位工友也成功地做了手术，身体康复起来了。这个大家庭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一个起初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大家都备受鼓舞！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我们可以做的事很多，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

就这样，草根之家大家庭的成员越来越多，草根之家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然而，随着草根之家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我们也遇到了成长的烦恼。2010年4月，新华社一篇《农民工组织起来的草根实践》的报道，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2010年5月，国家民政部、国家信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等部委领导来草根之家调研。调研后，领导们觉得，草根之家所做的事很好，但是要规范起来。后来，草根之家就变成了新杭州人志愿者服务站。那段时间，我们的心情是非常复杂、非常难过的。那时也是乡建中心同行陪着我们一起熬过来的。温老师一直告诫我们，不要有阵地意识，不要去纠结草根之家在不在，而要注重团队在不在、理想在不在，我们所做的事情的价值在不在。慢慢地，我们终于释怀了，用同样的热情面对新杭州人志愿者服务站这个新的平台建设，为更多的工友争取更好的平台、做更多有意义的事……

农民工群体的两条未来道路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探索，探索我们打工群体的未来。农民工的未来，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想了十多年，我一边思考，一边试着用行动去实践、去改善。我构想的农民工的未来有两条出路。一条路是融入城市成为市民，另一条路则是回到农村，成为新农民。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学习、在实践、在探索。

11年前我辞去服装厂的工作，开始创办草根之家。那时我的想法就是搭建一个平台，运用广大农民工朋友的智慧，共同探寻农民工问题的

解决方案。我一直相信广大农民工群体是非常有智慧的群体，解决农民工问题，只有依靠我们农民工自己。

我们的行动是从文化入手，让工友们先从业余文化生活中做回一个人。在工厂里、在流水线上，我们是机器，是赚钱工具；下了班之后，来到草根之家，大家感觉到我们是人、我们是有情感的、我们是有理想的。

2012年，我参加了杭州市委举办的“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论坛”，论坛提出了“两融两共”总体构想：“融入城市发展，共建美好家园；融合都市生活，共享文明成果。”看到这个构想，有些人可能会感觉这有些理想化。但是，我觉得可以用积极的态度来响应，让看似遥远的梦想早日实现。新杭州人志愿者服务站，成立之后就确定了“打造新市民融入都市的典范工程”的目标。面对这样的机遇和环境，我们非常兴奋，我们全体志愿者将更积极地投入到各项学习、实践、倡导的行动中，推动工友们更快融入都市。

当然，我们要清楚认识到，能融入城市的只能是一小部分人。按照“二八定律”来说，可能只会有20%的人融入城市，剩下的80%则只能回到农村。说到回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回到农村能做什么？可能还有人会说，我们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是不愿意回去的。但是，不管客观情况怎么样，也不管工友主观意愿怎么样，更多的农民工最终还是要回去的。一部分人回去是必须的，不同的是回去的时间和方式，是等到老得干不动了才无可奈何地回去，还是趁还能有所作为时回乡开创一番事业？这是我们要作出的选择。当前，面对全球金融危机，面对食品安全危机，我们可以意识到，这是农村发展的最佳机遇，是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最佳时机。

到了这个时代，回到农村，并非只能种田。如今，农业可以做的事很多，如生态养生、绿色食品、园林苗木、生活体验等。只要我们好好规划，在农村的广阔天地中，我们是可以有一番作为的！

从草根之家到新杭州人志愿者服务站，我们已经走过了十多年。十多年来，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有了很大的改变。农民工群体的状况也有了很大的改善。无论融入城市还是返乡创业，现在的环境都好多了。进入新的十年，我们正在为农民工群体的两条出路而奋斗，我们构想了“两栖人计划”，助推农民工扎根城市，连接城乡。过去，人们说新生代农民工融不进城、回不了乡。现在，我们想要推动农民工既要融得进城，又要回得了乡，我们要做扎根城市、连接城乡的“两栖人”。过去的五年，我们通过各种文化交流活动，让大家很好地融入这座城市。但是，似乎总还差点什么。因为大家是租房子住的，总感觉还是没有根。如何扎根城市，是我们现在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在与一些工友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不少奋斗在工厂一线的工友已经在杭州买房安家了，虽然他们还要面对房贷压力，但是，从言谈中，明显感觉到那种扎下根来的踏实感：累并快乐着！与之相对地，还有很多工友不敢去想扎

根城市，没有扎根的思想，行动也就更谈不上了，“迷茫”“月光”依然是很多一线工人的状况，我们感觉，有必要进一步提升工友们的思想境界，鼓励大家要有扎根城市的奋斗梦想。培养两栖人、扎根城市、连接城乡这一奋斗目标成为我们新时期的使命。

我们将通过一系列培训、交流、宣传，让大家更多地去思考自己的未来，并为之付诸行动。我们组建了一个两栖人团队，重点跟踪、培养，助推他们实现扎根城市的梦想，并着重宣传，让他们成为更多工友奋斗的榜样。因为他们来自工友，与大家没有多大区别，他们能做到的，其他人也能做到，这样的榜样更具有号召力。提出“两栖人”的概念，源于新杭州人志愿者服务站的发展定位。按照我们的理想，我们农民工，不仅要能融入城市，同时也能荣耀返乡。我们要做扎根城市、连接城乡的两栖人！

我们这一代，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成为两栖人、连接城乡；我们的下一代，才可以听从内心的召唤，按自己理想的方式选择扎根在城市或乡村，而不再需要为了生活游离、漂泊！

从现在起，让我们通过思考、行动积累智慧和财富，肩负起历史使命，为解决中国历史问题之农民工问题作出贡献，让“农民工”一词真正成为历史！

2.5 我的另类生活体验
——忆我的21—28岁

人才计划七期 魏川[1]

谨以此文，献给那些勇敢实践另类生活的年轻人。

走出象牙塔

“我是谁？”

在我21岁时我有机会去寻求答案，去触碰这个问题的核心。

我21岁考上大学，还记得上大学前的那个暑假，完全没有对家庭的不舍，整天被一些想法激荡着，脑子里想的是：我自由了！我可以去做我自己了！我可以对自己负责了！一场新的探险正在召唤着我。虽然前途充满未知，但内心充满期待，想去体验所有，想去实现自己心中所想。

我的大学没能给我提供相应的条件，我便自己去社会上做各种兼职，想证明自己有能力养活自己，更多的是想去接触这个社会。我卖报纸、发传单、做清洁工、送外卖……小心翼翼地去从事不同的工作，那时还不是很有意识，也没什么计划性。借由这些工作，我慢慢地去了解自己、触碰社会。即使是兼职工作中待遇很好的，我也不会长久去做，我无法使自己困在一份狭隘、重复的工作中，我想尽可能多地去体验各种不同的生活。

在此，我要感谢我的家庭对我的包容。同时，我也为这个社会使我的同龄人过早地背负生存压力，无法探寻更多的可能而感到遗憾。

我发现自己充满极大的热情和能量，对社会、政治问题非常关注，有强烈的道德感，属于理想主义。我总想和同学们谈论政治家关心的问题，但我并没有意愿从政，我觉得每个年轻人都会关心社会问题。能和我有工夫交流的人极少，同学们忙着更现实的事或者沉溺在游戏中。我很失落，只能看书或者在湖边散步排遣，甚至一度不想再上大学了。

后来，机缘巧合之下参加了学校的“支农协会”。我可以和一帮人一起聊人生、一起下乡、一起支教。我在社团里是比较激进的，对社团的官僚作风很不满，不喜欢什么“会长”“干事”这些称呼，只是觉得我们一群人可以做点事。我总是不管各种制度，天马行空地去想去做。

参加支农协会后，我的思考更落地也更深了，并且不只停留在思考层面，更有了真实的感受。但我用的还是旧有的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所以常常陷入其中。我多么渴望身边有良师益友啊！我希望有我可以学习的楷模，有我可以请教的师父。参加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第十届“支农调研交流会”，正是我生命的一大转折。

我遇到了“和我一样”的一群年轻人，在情感上得到了极大满足，觉得自己不再孤独了。同时诸位老师对社会问题的讲解，为我提供了解读社会问题的不同角度，让我从原来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和队友在乡村支农的一个星期里，我的潜能被最大限度地激发。面对陌生的一切，面对所有的人生第一次，我既要给孩子们上课，又要买菜做饭，还要入户调研、参与文艺活动。我不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勇气推开农户的大门，我也忘了我是怎么准备一堂课的，我只记得在三伏天的大中午，骑着破旧的自行车顶着大太阳去十几里外买菜，赶回来后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下午的工作。

那次下乡让我有机会直面活生生的老人、妇女、儿童，他们不再只是我脑中思考的素材，他们是真实、丰满、感人的生命。我想为他们做些什么，但真正能做的很少，但我却得到太多，不自觉间我被融化了。我发现自己有看到苦难会生起怜悯之心的特质，我也感受到自己在奉献过程中得到的喜悦与踏实，仿佛那就是我生命的意义所在。

因为那次经历太惊心动魄，在我给别人讲起时总会语无伦次，我不知道该怎么用言语表达我内在经历的一切。那次下乡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我决心在乡村建设这条路上走下去。所以，我参加人才计划，进行更深入的学习便顺理成章了。

参加人才计划前我略微有些犹豫，因为还在上大三，可能面临休学。鱼和熊掌的难题摆在我面前。我总结出来，现实利益的问题很难有个答案，因为一切都是在变的，人有旦夕祸福嘛！只要走正道，上天是会公平回报你的。我不知道自己是真有勇气还是子路式的“暴虎冯河”，总之，最后我休学手续没办，没跟学校打招呼，也没跟家里人说，就参加了人才计划。

从甘地身上学习乡建

我是2011年参加第七期人才计划的，到现在已经六年了，这六年是不停追问、不断寻找的六年。人才计划学员的经历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我始终感恩在乡建中心的经历，感恩它在最恰当的时刻——我可以独立探索真理的时刻出现。感恩它为我打上一层关心社会大众的底色，给我带来解读社会问题的另类视角，给我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的勇气。

刚参加人才计划时的我，和同期的刘培、康丽参与了“国仁绿色联盟”[2]的工作。当时全社会正笼罩在食品安全问题的焦虑中，人们迫切

期待健康的食物，绿盟的事业正是此时慢慢红火起来的。像挑豆子、筛茶籽粉、产品包装等劳动，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上。参加北京有机农夫市集，我们抬着几个几十斤重的收纳箱坐公交转地铁加上步行。面对消费者时，我们很难用简单的话语让他们理解绿盟到底是什么。我们也都不懂营销，幸而我们产品的质量好，慢慢积累了许多回头客。

我们会对自己的身份有疑惑，我们是不是“二道贩子”？我们怎么给予农民支持？当时脑子里冒出的问题大多和要具体怎么做好手头工作无太大关系。

一边是消费者期待健康食品，一边是农民渴望增加收入，中间还有我们这些年轻人的生存，绿盟仿佛诺亚方舟一样要承载很多东西。要驾驭这艘船，的确是需要专业素养的，我们都“太年轻”了。在那轮关注食品安全的浪潮过后，销售趋于平稳，竞争日趋激烈。我们的学员期也结束了，继续做下去就会有开支，成本陡然提高，很难有盈利。后来，绿盟挪到了小毛驴市民农园在柳林的农场，但问题仍没得到解决。所有制是模糊的，也就没有人会真正承担责任，这次转型没有成功。面临困境时我们开会讨论，但没有经验的大家做的又是一次探索性的试验，所以也找不出问题的症结。

人才计划培训的后半部分时间我基本都在河北衡水安金磊老师的农场里。第一次见他是在一次讲座上。见他之前我看了他的介绍，一种钦佩感油然而生，内心似乎在说“这正是我要成为的样子”。会后，我跑去找他，我问：“能让我看看您的手吗？”现在想想也觉得自己胆大、唐突，但当时就是想确认他是不是真的那么勤劳。

很快，我们便有机会去他那里。白天我们一起劳动，晚上我们一起学习。他推荐我们读《论语》，练八段锦。我始终在想：“这是一个农民吗？”虽然他和别的农民一样生活在农村，但他的精神状态、所思所想完全不是一般农民的样子。我仔细地观察过他，留心他的一言一行。

刚进他家门的情景我现在还记得，他正蹲着开心地用手洗衣服。农村的男人是很少做家务的，况且现在又都有洗衣机。他家里墙上挂着“晴耕雨读”“量周沙界”等装裱的字画，很有文化气息。他们家信佛、吃素。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好奇。一周的生活下来，他在点点滴滴生活细节上给予我们指导，农具如何摆放、门如何开关，等等。假如换一个人来教我，我可能不会觉得有什么，但他这么一说，我就觉得格外有道理，会格外信服。

在一周的生活里，我的心仿佛放慢了节奏，过起和他一样的生活。相处之中，我对他越来越信服。他为我打开了一扇门，让我看到一种生活典范，他的行就是他的言，他的生活方式就是他的“道理”。

我第二次去，是随部门负责人一起去的，但负责人要走时我却提出“留下”。我是较少主动提出自己需求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选

择了“留下”。

在我结束大学那边的事后基本在安老师那里。这期间有人才计划的结业，我甚至没有和七期的伙伴们一起去领温老师颁发的结业证书，因为想着地里农忙。我只记得结业文章最后写着“我已经知道自己不做什么了，但我还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2012年冬天，我把小额项目收尾后离开国仁绿色联盟，也告别了乡建中心。

在当学员期间结识了一个朋友，我叫他“老毕”。他会给我讲佛教，我一开始斥之以迷信，后来慢慢琢磨并重视，也开始对宗教感兴趣，因为它里面的确有许多人生哲理，甚至能解释宇宙生命乃至社会问题，只是侧重于人心的角度，我觉得也很好。加上在安老师那里的生活体悟，我慢慢认识到“要想改变世界，得先改变自己”。如何改变自己呢？儒释道三家都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于是最终回归到了文化。

我慢慢试着用温老师的理论解释现实层面的物质世界，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解释意识层面的东西，虽然生硬，但颇有趣，有时两者都能互补或呼应，我就格外高兴。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挫折时我就让自己放下，在心灵层面有了感悟时就告诉自己赶紧去实践。

儒释道三家都讲“修行”，而真正的“乡村建设”就是修行。就像潘家恩老师说的“乡村建设不等于建设乡村”，那么乡村建设是干什么？我的理解是，乡村建设是“人的工作”。在这个时代，就是恢复人类应有的生活、生命状态，构建更加和谐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内心的关系。不是每个人都能在从事乡村建设的机构里工作，但这并不妨碍每个人做“乡村建设”。我内心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我要做乡建”。对于我这个生命个体，该做些什么呢？匆匆一年的人才计划之旅，还没来得及找到答案便结束了。当生命走向成熟温和，面临组建家庭、养家糊口等现实问题时，我又该如何找到做乡村建设的力量源泉？如何将自己的生活和乡村建设的理想统一起来？如果不在这个过程中看清自己，在乡村建设的道路上是走不长远的。

我的乡村建设之路是一条“内心建设之路”。人才计划结束后，我在现实与理想的博弈中继续寻找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寻找自己的“乡建之路”。在此，我不得不推荐《圣雄修身录》《圣雄箴言录》这两本书，甘地将乡村建设与个人成长的关系讲得很透彻。这两本书我一直带在身边，它们帮助我很好地整合理想与个人生活，也将乡村建设从“政治经济问题”的范畴提升到宇宙人生真谛的层面上。

一路走来，我曾多次想放弃，想着“就老老实实像别人一样生活”，但终究抵不过内心的召唤。直到某一天，做乡村建设从外在的理论推导和道德约束变成一种自愿自觉的生活方式时，我才算真正开始做乡建吧。

返乡与新青年绿色公社

毕业后，自然面临就业、婚姻等现实问题，即使你不着急，你的父母也会替你操碎心，而他们的情绪又会影响你。我的父母也一样，他们担心我在物质层面落后。我会跟他们讲道理，但我发现跟亲人讲道理基本没用。

婚姻和工作是两道很大的坎儿，能看出你内心真实的想法。我看到许多曾经一起下乡的支农队友仍然选择了主流的工作、生活模式，一些女队友匆匆结了婚，在理解之余也唏嘘。在分水岭面前我不得不和上一个阶段的同路人告别，走一条更少人走的路。

我的确深入思考过自己将来要过的生活，因为在做学员期间我接触到很多生活理念，便不想从事某些带给个人及他人身心伤害的职业；不想与没有共同理想的伴侣牵手；不想自己的孩子接受填鸭式教育……那么，一种另类的生活方式便需要有一群人一起才能实现。我便想到乡建中心“新青年绿色公社”这种模式。鲁道夫·斯坦纳说：“我们教育的目标，应该是使年轻人带着自身使命感进入这个世界，他们能够对自己在世界中的生活自由地赋予形式、方向和目标，而不是去填充由过往世世代代造就的位置。”

于是，我来到顺平县的一个村子，之前乡建中心在这里做了“新青年农场”，我准备把“新青年绿色公社”在那里做起来。想想那时，自己真是什么都不管，也什么都不怕，只身来到陌生的乡村。找住处、租田地、开磨坊，一个大学生来到山村里生活，这成了当地的稀奇事儿。他们来我这里加工谷物，有时完全是“猎奇”。问我：“你来我们这里做啥？”我不能说“建设新青年公社”之类他们不好理解的话，并且我自己也确实没想清楚，我只能用“咱们这里好啊”这类的话搪塞。乡村的生活对我来说同样充满新奇，因为要像当地人一样劳作才能生存，所以比做学员时更加真实。同他们一样早起，在有集市时去赶集，还养了几只鸡，甚至开始做发酵床准备养猪。白天干活，夜里看书，真是跟隐居一般。

现在回忆起那段岁月，我个人的生存技能得到极大提高。生活上让我为难的是，我是一个人，不能又去地里干活又帮人加工谷物。我更真切地体会到乡村的凋敝，那种真实感不再是停留在脑子里的，而是穿透心灵的。我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已属不易，不敢奢谈别的。

后来，我得知乡建中心在转型，不会在这边做工作，也不会再有人来。同时，我租住的房子和磨坊的户主也要拆建新房，我自己也失去了信心，便离开了那里。

回到家中，我并没有“安分”下来，想着在家乡做乡村建设。我的想法是先从自己熟悉的“生态农业”做起，然后带动身边人一起搞生态种植，成立合作社。正赶上魏丰收（人才计划三期学员）在河南开展乡建工作，他“下的棋”很大，大学生支农社团工作、生态农产品销售、爱故乡工作站等都要一一开展。我能感觉出这些事情像一粒粒散着的珠子。他还没有找到把它们穿起来的方法，觉得我能做大学生社团工作，就把

暑假交流会的工作交给了我。那时，虽然人已离开乡建中心，但我在情感和思想上还是非常认同的，所以，他找我做事情，我也觉得还是在一家单位里，不能拒绝。

他筹措了5000元钱来举办第十八届支农调研交流会河南分会，就使用我舅舅在村里闲置的毛坯房。那时，我一面照顾田里的庄稼，一面准备交流会。这点钱实在太捉襟见肘了，又要刨除给房子跑电路的1000多元。记得采购物资那天，我中暑头晕，为了省几元钱，顶着太阳在批发市场里一家家问席子的价钱；洗脸盆，是我直接去废品站挑还能用的；被子，联系大学社团收购二手的；桌椅，租乡村里搞宴席剩下的一些，把姥姥老屋里落满灰尘的旧桌椅搬出来洗洗。放PPT需要让屋里变暗，我们买不起窗帘，就扯了点床单布钉在窗户上。买不起那么多褥子，绞尽脑汁想不出解决办法，甚至想买盖大棚的草帘，但又觉得太不像话，四处打听后，购买了几卷盖蔬菜的毡布。所有来讲课的老师一律没有讲课费甚至不报销路费，吃饭也和学员一样。

然而，办交流会最大的困难并非财物，而是我作为中间人要帮着在村里协调各种关系，这也是不容易被看到的。设想一下，一群陌生人来到一个村庄办活动，怎么可能不让人“好奇”，特别是那个村子又处在被拆迁的“虎视眈眈”中。还有一个插曲，我二舅要在村里办暑假班，大学生们开展支教活动就跟他有冲突，只好让学员们与他“合作办学”，后来又让学员们去另外一个村子支教，每天往返住地。即便如此，仍影响了二舅的招生，而我在村里的地又是租他的。他跟我诉说不满，姥姥也得知了，我的压力更大了。

那时，真不知哪里来的信念和干劲儿，这些硬是都撑过去了。

我在家里种的地是舅舅租给我的，之前一直租给别的村民，从别人手里收回来难免会让人不舒服，这也让舅舅为难，而舅舅肯租给我，完全是因为关系亲近，所以，关系一旦处不好，随时都有被收回的风险。那些地块儿又分散在相隔很远的地方，耕种起来颇费周折。许多农活是需要劳动工具，需要人帮忙的，我手头是没什么钱，家里也不肯借给我，幸而五舅资助我两万元，让我可以先把农事开展起来。

要照顾好那些地并不容易，因为不打药不上化肥，就特别需要人工。一个人干活是最难熬的，常常需要有人搭把手，也需要有人说说话。家人因为我种地承受了很大压力，我也尽量避开村民们，早上比他们早到地里，晚上等他们都回家了我才回。

一年下来，虽然日夜在地里劳作，但算下来还是不能养活自己，即便如此，城市化的脚步很快蔓延至我所在的村庄，那里要开发成“电影小镇”。拆迁已成定局，我犹如泄了气的皮球，这次艰难的返乡活动便在复杂的滋味中结束了。

乐观者与悲观者的合作

处置好一年的产出后，我收拾行囊到了北京一家将农业、教育、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的学堂“普润园”。在那里，我遇到了人生中又一位重要的老师——米莱老师。米莱老师做过大学教师、音乐人、环保人士，也曾在深山中独居，后来终于明了自己所担负的使命。他传奇的人生经历讲出来就能给我足够的指导，他充满艺术气息却又踏踏实实。和米莱老师一起工作，他总能教会我许多东西。开车时，他教我怎么开得省油，一方面出于他做环保出身的敏感，另一方面也出于他细心的体会总结。他天马行空却又能朝着一个方向一直努力，并灵活调整策略。

2015年年初，米莱老师接收了房山一个农场，我们一起商量怎么把农场利用起来。他思路活跃并敢于实施，看到农场堆积的旧建筑材料，便很好地把它们利用起来。那些旧材料被拿来铺设栈道、搭建谷仓、做木桌、做池塘围栏等。我是绝对想不到他会利用钢管、钢板构建起一圈池塘围栏的。

我总是从悲观的角度提出困难或分析如何不可行，他却总是充满信心的。我们一开始商量看看农场可以种什么，试着种蔬菜、姜、土豆等作物。虽然有收获，但灌溉、人工成本过高，菜大量上市时吃不了也不好销售掉。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优势就体现了出来，面对没有经验的事物，不怕失败，没做成就总结经验及时调整。

后来，农场办夏令营，又做“酵素农业”，建禅修房，直到最近办成“房山书院”，要建设“国学共生社区”。其中的崎岖探索恐怕只有他最能体会到。我有幸见证米莱老师如何一步步实现心中蓝图，自己也备受鼓舞。我这个“悲观主义者”的确需要用行动把梦想变成现实，而不是固执坚持一开始的想法，逡巡不前。

在房山农场的夏令营结束后我感到没有目标，自己很没有力量，状态很差。我又是那种喜欢让很多事在自己心里消化的人，但最终也没有重新给自己力量，便向米莱老师请辞。

在跟米莱老师工作的这段岁月里，我感受到居住在城市的人迫切希望能体验乡村田园的自然生活，也希望孩子能更多地接触自然。乡村里的确有很多人不愿意再种地或没人种地了。我之前的思路就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建设乡村，现在看来，乡村建设可能会有更多元的力量。热爱乡村生活、建设乡村的人未必一定要是当地农民。

辞别米莱老师还因为一个“伪问题”，就是过的生活不像外界竞争压力那么大，会怀疑自己与市场经济脱节了，或想体验一下那种工作。适逢乡建领域有像张琪那样的转型者，敢于把乡村建设与主流社会接轨，敢于与资本打交道。我便来到福建的“滋农游学”团队。

当时正赶上建造“竹屿亭”，我是不理解为什么要在远离村庄的地方建一个竹亭子的。建造竹亭的钱是在网上众筹的，这个过程中结交了许多建筑师、设计师。这些具有专业背景的人做起事情来确实不一样，他

们能运用专业的设计软件，熟知信息传播方式，能抓住现代人的眼球。他们的到来让古村显得格外有活力，在与他们的碰撞中我大开眼界。当最后亭子真的呈现在我面前时，一个梦想就这样变成现实，我真的被震撼到了。

乡村建设真的需要各种力量参与。即使那些建筑师不能一直从事乡村建设，就像这个社会上许许多多各行业的人一样，但他们的能力的确可以帮助到乡村，他们也愿意在合适的乡村展现自己的才华。“滋农”搭建了一个汇集各类有意愿到乡村做事的人的舞台。

我们之前一直排斥“资本”，但也说不清为啥排斥，可能是根深蒂固地认为它“邪恶”吧。但资本分左中右，也看为谁所用及怎么用。乡村建设者在农民眼里不应该是“生活的失败者”，而应过着有一定物质条件的、有品质的生活。随着乡建工作的深入，我们对农民、对自己、对人性、对人情世故都会有更深的理解。在资本的介入下，做事情也会专业、正规起来，这是一个团体到一定发展阶段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如财务、税务，约见客户，与政府、媒体打交道。

虽然只待了五个月，在思想上对我的冲击却是巨大的，这期间张琪又向我灌输了一些“后现代”的思想，对我的价值观念又有巨大影响，让我跳出各种意识形态的束缚，让我不被个人喜好局限而是客观地看待事物。“女权”“同性恋”这些我原本只知道名词的概念现在更清楚了。我佩服那些能将人的某种细微心理写成一本书的思考者，也感谢他们帮助我们看清自己，以使我们更自在地生活。

离开“滋农”，我又来到安金磊老师的农场。我想，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做职业选择了吧。之所以这么说，既有外界对我“换来换去”的眼光投射的压力，也有自己越来越迫近28岁关口时内心的危机感。我似乎来到一个盘点的时刻，我会问自己：我现在是什么样子？未来我想做什么？我的能力和局限是什么？我做的决定开始基于长久考量，对决定和行为的后果越来越有意识。

回到安老师这里，是因为心里一直忘不了，我也说不清为何。我意识到自己似乎更适合做动手的工作，做与自己内心对话的工作，像农耕、烹饪、木工之类，我天然就会觉得喜欢。安老师说了他这里的构想，希望传承中华传统农耕智慧，做原生种子保护工作，推动可持续小镇项目等。当然，他说的我是很信服的。我脑子里开始形成在这里生活的图景。

当时，我正好将步入婚姻殿堂。对于我要在乡村生活，另一半还没有准备好。我的愿景给了她压力，我只能建议她先去乡村了解了解，先对乡村生活有个直观感受。于是，她也参加了“人才计划”，在山西永济那边学习。她因为之前有儿童教育经验，又恰逢所在乡村开办“儿童私塾”，也能施展自己的才华，便慢慢找到了意义。

婚后，妻子检查出怀孕，我也正式迈入28岁，一系列内在外在的事情累积到一起，这让我下一个决心是艰难的。机缘巧合之下我们来到一所华德福学校，或许这在现阶段对我们来说是稳妥的选择。我们从人智学的角度了解生命成长的规律，慢慢看清自己在各个生命阶段呈现的状态。要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对策，就不能停留在问题表面，务必要探索生命的真相。我想，这就是我们既要关心社会问题又要跳出其中去关注生命成长的原因。这也正是乡村建设的艰难之处——革自己的命，也是其魅力所在。

来到29岁，我开始重新审视人生态度，并设立新的目标。理想主义的激情变成生活的实实在在，我要做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一生的理想

从最初的激情到现在的理想信念，“人才计划”的学习培训对我影响巨大，最重要的是，人才计划结束后，所有的老师、学员依旧那么热情、用心。任何时候有什么困难，依旧能得到支持。“乡建一家人，有事别客气”，无论哪条战线上的同行都是那么亲切热情。乡建是一个更大的大家庭，持续地给我温暖和力量，而我所能做的，就是把这份温暖和力量再带给广大的工友。

为工友服务，为理想奋斗，公益理想已经深入到了我内心深处。未来，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我心中的理想信念都是不会改变的。

写到这里，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幅温暖的画面：许多年以后，当我老了，依旧可以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奔跑，一起激情朝话：为工友服务，为理想奋斗！

附：答记者问——坚持，是为了良知！

昨晚，一电视台记者来电，询问了我的相关情况。当得知我已经30多岁，而且还有两个孩子，生活很艰难后，他对我们的坚持有点疑惑。其实有这样疑惑的人已经有很多了。除了和我有相同经历或感受的人，我想大多数人都是很难理解的。

到底是什么力量让我这样坚持？

我不想直接回答，我们先看看我们另外两个兄弟的故事吧。

“反传英雄”李旭，他曾经背井离乡外出创业而身陷传销陷阱，一年半后悔悟并主动退出。在这个过程中，他深刻感受到了传销对人的危害，从此走上了漫长的“反传之路”。反传事业不仅让他在经济上失去了很多，更是时时受到传销头目的恐吓、威胁。但是，他还是一直在坚持。因为他知道有这样一个被传销迫害的群体太可怜了、太可悲了，他知道有这样一个危害社会的东西在肆虐、在猖獗，他不去管，他就良心

不安！

与李旭有着相似故事的另一个兄弟就是反地下六合彩斗士李许。从2003年起，他所在的村庄经历了一场地下六合彩泛滥之痛，最高峰时这里超过80%的人买码，参与赌博的人小到几岁的孩子，大到60多岁的老人。自此之后，他就和当地的非法地下六合彩较上了劲，他不仅建立了反地下六合彩的网站，而且自费搞地下六合彩调查，研究赌博的心理，与全国各地的地下六合彩受害者交流，他甚至被称为“中国民间反地下六合彩的第一人”。

“我的理想是根除地下六合彩，不是为国家、不是为社会，而是为自己，为自己的灵魂——当我闭上眼睛时能告诉自己：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他们都一样，只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因为他们深刻感受到一个群体的痛，他们也有能力或有办法为之做一点事。所以，如果不去做，他们会很不舒服；去做了，虽然苦一点、累一点，心里却会很愉悦。

我也一样，打了十多年工，非常深刻地知道打工者的苦楚，也感觉有办法改善这种现状，至少通过努力能改变一点点。

我是2006年开始付诸行动的，其实早在2003年我就有了这个想法，但是和很多有想法的人一样，因为种种原因总是不敢行动。直到2005年年底，一个又一个工友被累死的新闻传入我的耳中，我再也坐不住了，而最终让我下决心的是工友何春梅的过劳死。那时我还在工厂里上班，这个“新闻”是在万峰先生的《晚报浏览》中听到的，我至今还记得那一段话：何春梅死了，加班在继续，在铧鑫厂继续，在广东的一些企业继续，在全国的大多数企业继续。何春梅的生命除了给自己换了几个赔偿金，并不能唤起谁的警觉。何春梅既不是第一个过劳死的女工，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听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我总会深深自责，为什么不去做，不去为改变而努力？那么多改善农民工现状的方案就这样一直放在枕头下的日记本中……

我终于下定决心做了，也得到太多工友的响应，太多社会的支持。曾经有人问我，到底帮过多少了，做了什么实实在在的事？很惭愧，我只是一个农民工，我真的没能做成什么，更没帮到多少人，更多的是很多热心人给了我很多帮助。

正式开始做草根之家已经快两年了，虽然没做什么实实在在的事，但是认真总结，我相信草根之家对工友、对社会的触动是深刻的，我们所做的事是有价值的，对推动整个农民工的生存环境是起到一定作用的。我曾经说过，只要有互联网，就会有草根之家！说这句话时，多少有点儿悲壮的味道。因为那时，我正面对着很多困难！说这话，更多的是给自己坚持下去的信念！

这种坚持，感动了很多一样有爱心、关注社会的人，不断有爱心人士向草根之家伸出援手。经过坎坎坷坷，现在总算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找到了明确的方向，虽然前面的路依然艰难，但在更多的爱心人士的支持下，在更多的大学生与工友的共同推动和参与下，我相信我们会做得更好！

如果你是一个有良知的人，请不要再问我为什么要坚持，做一些有利于社会和谐进步的事，一定还要找出一大堆理由吗？如果是那样，真的是这个社会的悲哀！所以，请不要再让我思考这个问题，让我更多地去思考怎样才能做得更好，怎样才能为改善打工者的现状做更多有意义的事！

如果你非要问的话，答案只有一个，我和那两位兄弟一样：只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2.6 另类视角：一位退休人员的乡建探索

人才计划九期 赵武民

赵武民，2012年1月从沾化县经济与信息化局内退，但退休后的他退而不休，回到自己的家乡继续开展乡村建设活动。返乡后困惑颇多，于是在2013年，报名参加了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第九期人才计划培养项目。与其他学员不一样，他不领补贴，每次培训都是自掏路费，但每一次集中培训，他总是在认真地做着笔记；为了每个月能按期交月报，50多岁的他开始学习电脑打字，每一次都能如期交上来；他也是所有九期学员中最乐观的人，身材略微发福的他，脸上总是乐呵呵的，更有饱经风霜后的从容与坦荡。

从供销社领导到乡建志愿者

我叫赵武民，1959年9月12日（农历）出生在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县宿牙桥村一个地主家庭。我出生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据老人讲，那时缺吃少穿，把树皮、枕头内的谷秕子、棒子瓤（玉米芯）都吃光了，饿得人都皮包骨头、面黄肌瘦的，但我还是勉强能够活下来。幼年时弱小，两岁才会走路，对幼童时期的穿衣吃饭等基本生活没有太多的记忆，母亲说是很苦的。小时曾拿薅地瓜的小扒锄当玩具玩，不小心跌倒，小扒锄的尖正好插进我的腮帮子，我母亲用野蘑菇灰涂伤处，止血消炎才无大感染，至今仍有痕迹，虽不刻骨铭心，但可想童年的悲惨。

我已不记得是7岁（1966年）还是8岁上的学，那时春天是新学年的开始。还清晰地记得小学的地点，是一个四合院，原来也是地主家的，我曾在东北屋读书，也在东南屋读过书。五年级毕业后，当年凡是家庭成分高的学生都没有让上初中，我被迫留了级，第二个五年级（1972年）时到了一个无人居住的地方，有四间小屋，其中一间屋供老师居住与办公，在此读五年级的学生只有不到20人。第二个五年级学习氛围较好，晚上有自习，记得课桌是用土坯垒的台子支撑着水泥面，台面上可以挖个洞用来放煤油灯。我学习认真成绩好，老师很喜爱，这一年整体上是学习的一年、充实的一年。第二个五年级毕业升初中施行统考，我在片区考了第一名，有幸上了麻姑庵中学。麻姑庵初中有两个年级，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我们班有七个村的学生，50来人。学校一开始还注重教与学，还有全公社的会考，以后因极“左”路线的影响，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影响了教与学，但总体上因老师中老实的多、讲正义的多，教学才没彻底瘫痪。

初中经过两年学习后，又增加了半年的时间才毕业，也就是1975年

夏季毕业（从此学生就改为了夏季毕业），总体上这两年半的时间在当时的极“左”背景下还算学了点东西，不幸中的万幸！毕业时无考试，上高中的人选不知是怎么确定的，后来听说是学校与各大队商量的，其中有家长找公社、大队与学校，可能全是走后门，因我地主家庭出身便没有了上高中的学习机会。从此失学了！我万分痛苦，也万分无奈！当年我只有16岁。

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1977年恢复了高考，我当时在工地，听说有考试这回事，但因信息不灵，对政策不了解，不相信地主家庭出身的能有好事，这一年就耽误了。后来得知有地主家庭出身的人考上大学的消息后才动了心，我从此就复习起功课来，那时缺资料，就以复习我的初中课本为主。正好大队的负责人让我掏学校茅厕的粪，我不怕脏，而且时间可以自己掌握，于是有了自己的时间便于复习。1978年技工学校与中等专业学校统一招生，经过几个月的复习，我参加了山东省中等专业学校的考试，考了210多分，190分就可以录取。当时需填志愿，填了哪些我也忘了，那时不在乎什么学校，只要考上就行。我考取了惠民地区（后改为滨州市）运输公司技工学校，我村及我初中班就我一人考取，我感到很自豪，父母也很高兴，我还与学习的伙伴一起吃饭庆祝了一下。

一开始我的专业是汽车驾驶，因我不喜欢，家中也担心，学校也考虑到学生的爱好与适应性，同意转专业，我就转了汽车修理专业，经过几次实习，我对汽车修理有了基本的了解。当时还有数学、政治、体育、机械制图、金属工艺、汽车构造、汽车修理、汽车电工等课程的学习，通过学习、实习，经考试合格，我于1980年7月毕业。

1980年7月我被分配到沾化县供销汽车队工作，当过汽车综合修理工、汽车电工、车间会计，工作期间我结了婚。虽参加了工作，我仍不满足，我边工作边学习，认为只有学习才能改变现状，我经常自学到深夜，但不系统，非常愿意再有一次深造的机会。终于机会又来了，1986年原惠民地区供销社办电大班，我就参加了全国统一的成人高考，考取了中央电大的山东分校，专业是商业经济管理。我很喜欢，学习很紧张，电大班老师没有出题阅卷权只负责辅导，中央电大统一电视授课、统一考题、统一阅卷，十分正规！考试也十分严格。我的数学（微积分、线性规划）学得很好，应用文写作几次做“范文”得到了老师好评。在上学期间我的儿子赵国斌出生了，虽辛苦但也带来了天伦之乐。在学校，我入了党，是电大学生中唯一入党的人。

1988年7月我电大毕业，回车队干调度。不久，不知是全省还是全国招干，我在沾化县考试，考了第二名，被录取到税务局，分到了齐圈税务所。新的岗位待遇好，社会地位高，但我总感觉空虚，现在看来也是自己涉世未深。干了两年，在好友老兄的支持下，1991年我又回到了车队，继续干实业，先干副队长，又干队长，买汽车12辆，建加油站两处，效益不错。此后曾任过县供销社和几个企业的主要负责人，2003年3月回到供销社主持工作，与全国供销总社的新合作合作，创办了山东

新合作，打造了五大经营服务体系：日用品经营服务体系、生产资料经营服务体系、家电经营服务体系、烟花爆竹经营服务体系、农村社区经营服务体系；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组织体系：县供销社、基层社、专业合作社；建立了合作社联合社，建设了10万平方米的商业设施。因为工作中的表现，我被选为县人大代表，担任过两届县人大代表与一届县人大常委，被山东省人事局与供销社记过二等功，获得过中国合作经济领军人物奖。

2012年年初，我在沾化县经济与信息化局内退。内退后我身体还好，精力充沛，精神很好，一直在思考以后的人生怎么度过。有人推荐到企业去，有人建议自己搞经营，有人建议就是玩，但我感觉这都不是我所愿，内心在彷徨犹豫。从个人角度来讲，我是农村出身，几十年的工作也与农村有关系，对家乡比较熟悉，有着深厚的感情，从自己的内心来讲愿意参与家乡的一些事，热爱农村与自然；从大环境来讲，国家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支持农村、反哺农业、关心农民，顺应自然，追求生态文明是大势。我感觉在家乡做点事是自己内退后的方向、事业，是自己的价值所在，既符合内心又符合大势，何乐而不为？在思考与探索的过程中，幸遇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招收学员，我有幸被破格录取，成为人才计划第九期学员，参加了2013年8月到2014年7月的学习与实践。

人才计划这一年的学习给了我很多新的思考和借鉴，特别是去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安徽阜阳南塘合作社等地的采访，给我在村里的工作带来了很多启发，以下是我作为一个退休人员在村里开展乡村建设的工作和思考。

为家乡做的几件小事

传统农具陈列室

2013年年初刚回到家乡，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造自己家的老宅子，在老宅子的基础上改造了三间房屋，返乡工作首先有了一个立足的地方。同时添置了一些必要的办公设备，我把其中一间房屋装饰成乡村建设议事室，其余两间以及院子则被改造成了传统农具陈列室。

中华民族是一个农耕民族，农耕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文化源泉。虽然国家有传统农具博物馆，但在村庄很少有传统农具陈列室，这很不方便农村的青少年学生去了解传统农具。我村历史悠久，又是传统农业村，农耕文化源远流长，但是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传统农具绝大多数已不再使用，有些已做柴烧，有些露天存放、风吹雨淋、不断损毁，只在老农民的老屋中还存一部分，再不搜集保管就会在不远的将来“全军覆灭”。所以回到村庄后，我立即与家中的亲戚朋友沟通交流，让他们理解保护老农具的意义，并与我一起搜集、保管、陈列这些传统农具。因为以前我在县城

工作的原因，村里人对我的工作表示理解和支持，并很快与村干部、亲戚朋友形成了有共识的团队，与我一起工作。

2014年，我捐出了2000元做先期的收集资金。因为没有市场价可以参考，我们就多和老乡协商，出价谨慎，询价也讲艺术，在搜集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形成基本的价格概念。同样的农具，价格基本一致；不同样的农具要有合理的比价，还要看新旧程度、完好程度、稀缺程度、意义程度。对于要高价的人要认真解释，一是不要亏了乡亲，二是要避免高价，这是一个传承文明的事情，也是一个良心事，必须平衡好。4月开始，我又通过学校和村里，与老师、学生、村民座谈，提倡捐赠、代存老农具，对捐赠者和代存者发放捐赠、代存证书并造册，在老农具上标明捐赠者、代存者的名字，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购买的资金，另一方面可以让大家都有参与感和荣誉感，而不只是我个人的事情。

对于收集上来的老农具，我们一方面联系青岛农业大学学编辑设计的志愿者，编辑说明书和宣传册；另一方面让我们村的大学生在假期做志愿者，带着村里的中小学生，对老农具的来历、具体用途、故事、使用方法做好记载，让大家在记录的过程中加深对农耕文化的认知，加深对家乡的感情。现在我们已经建成了一个160平方米左右的陈列室，这是一个齐全、规范、有故事、有教育意义的陈列室。

老年人活动室

建设运营老年人活动室是我想得最早也是准备得最早的一件事情，因为人终将一老，我马上要加入老年人的行列，所以也为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农村老人在家住习惯了，不愿意到乡镇养老院，就是有钱也不愿意到条件好的收费养老院，乡情难离啊！在家养老是农村的基本养老方式，大多数农村老人要在家乡安享晚年。在我们村里没有一个老年人活动的公共空间，老人冬天就溜墙根晒太阳，夏天在树下聊天，树下、墙根虽然生态，但风吹日晒，总是有不方便的时候，有一个公共活动室还是必要的。所以他们盼望在家乡有一个老年人集聚的地方，更盼望有老人一块聊天、活动甚至吃住的地方，他们说：就是把养老金、孩子们给的钱都拿出来也要参加。

为此，我动员了在县城的亲戚，把他在老家不住的房子改建了一番，房顶重新换了瓦，外墙加上了防雨层，安上了自来水，换了大门，整理了过道，配备了家具、电视机等用品，开放给村里的老年人活动。在运行时，我和老人们商量好了几条规矩：（1）不准在活动室赌钱；（2）不准在活动室吸烟、喝酒；（3）在村内有丧事及较大不幸事或国家有大灾难、灾害时不能有娱乐活动；（4）讲究卫生、搞好值日；（5）注意安全；等等。同时我也与村干部商议成立了老年文艺队，购

买了锣鼓等器具，让老年人老有所乐。

老种子保护与生态农业

据说神农氏时代的先民，已经懂得根据季节在同一类野生植物上采摘果实，但还不懂得种植。某次有一只漂亮的神鸟飞过神农氏的头顶，神鸟口中衔着的五彩九穗的谷子恰好掉落在神农氏的身边，神农氏认为这是上天的赏赐，舍不得吃，就把它埋在土里，没想到过了半年，竟然长出了一大片非常茂盛的谷子。神农氏揪下一个谷穗尝了尝，觉得味道不错，就把族人招来，让他们把这些九穗谷采摘下来，种植在地里——这是《神鸟授谷》的故事，也是最早的农业。

对于种子的保护和生态农业，我心中也早有想法。棉花是我国最早的转基因作物，我家乡所在的沾化县是山东的产棉大县，但据报道，我县种植的棉花90%以上都是转基因品种，穿用的棉花已不再生态，况且棉花种子（棉籽）是食用油的原料，棉粕是饲料，这就是说，我们吃的、穿的、睡的都是转基因产品。因此，我的生态种植就先从棉花生态种植开始。

我从乐观的角度推断，按此应该还有10%以下的棉花种子是非转基因的，但这10%以下的非转基因棉花在哪里？我找到了山东棉花制种大县惠民县的棉花种业公司总经理，在他那里没有找到；我问了几个种棉户，都说现在光买种子，老种子早没了；最后好不容易通过我的族叔，在滨州棉花研究部门搞到3斤非转基因棉花种子，还是两年前的毛籽。为了不浪费种子，我让在老家的族叔用传统的办法点种，不求棉花的产量，更重要的任务是繁育、保留更多的非转基因棉花种子，待来年有了较多非转基因棉花种子再全面生态种植棉花。这是生态种植的第一步，也是在非转基因棉花种子危机的状况下抢救和保护棉花种子。

2014年，我也在推动亲戚进行生态小麦种植，从9分地开始，自己留种种植，麦田不再打药、用化肥，而是用农家肥、生态种植允许的药物，单收单存，先供自家人食用，然后再慢慢推广。

有人说现在的人“吃农药、穿塑料”，很形象地说明了现在的人们吃穿安全问题。现在的环境污染有农业的较大“贡献”，环境的污染，农药入侵食物，转基因粮油、棉花已把人武装起来了，怎能确保健康？我们不是不要现代化，而是要什么样的现代化？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深思熟虑，需要真正转变观念，要改变污染的现代化，要健康的、生态的现代化。

退休人员应到农村去，支持农民生态种植养殖，和农民结对子进行信任式生态种植养殖，从自己的家庭做起食用生态食品，并利用自己的关系广泛宣传，推广生态食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生态食品用品的普及是大势所趋！人们会清醒的，也应清醒！

乡村建设需要退休人员

人生有几个阶段，退休后是人生极其重要的阶段，也可以说退休后是人生的另一季，第二个春天。人生的价值大小、意义如何，与退休后的定位、生活、作为紧密相关。退休后，若无所适从、内心焦虑，没有符合自己内心的事与活动，将影响人的身体健康，人生的价值意义将大打折扣，对社会也无益，体现负社会价值；若有符合自己内心的事与活动，不仅能丰富自己的人生，增加个人价值，也对社会有益，体现社会价值。我国现有退休人员几千万，还有说不清的内退人员，这部分人很多身体还好得很，自发挥或他发挥他们的作用，既是个人责任也是社会责任。每个人的爱好、认识、特长、条件、环境、情况各不相同，也不要求每个退休人员都参与乡建，但回归乡村、回归自然，在乡村发挥余热是极具价值的选择。

一是乡村建设需要退休人员。乡村建设涉及面广，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实践证明，退休人员是宝贵财富，他们信念坚定、经验丰富、威望独特、资源广泛，有时间无压力。他们中有协调能力强的老干部，有理论水平高的专家学者，有实践经验丰富的技术人才，有的人还身怀绝技，农民非常信任他们，说话有人听，做事有人跟，他们有特殊优势，参加乡建效果明显。他们可以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参与乡村建设，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乡村建设也非常需要他们。

二是他们适宜乡村建设。他们返乡应是自愿的，没有社会压力，没有经济负担，对前途不迷茫，思想稳定又有资源，行动上没有功利色彩，能沉住气把乡建事业搞下去。

三是了却他们回报桑梓之心。以前没时间或条件，现在机会有了，可以在情感上去除他们心中的一份牵挂。

四是可使他们健康长寿。身处乡间的小道田野，可锻炼身体，呼吸新鲜空气，饮食生态利于健康。

五是体现自身价值的需求，这是退休人员幸福的重要标志。他们虽然退休了，但责任心、事业心没有退，愿意展示老有所为的精神风采，而且随着国家保障水平和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他们有能力、有条件、有时间、有精力参与乡村建设，他们有愿望、有要求参与乡村建设，他们愿意充实自己的生活，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人生最美夕阳红，二次人生再创业，夕阳之时再灿烂，活到老事业到老，终生无悔；发挥退休人员的余热可以积极应对老龄社会。

六是缩小了城乡差别。他们把良好的生活习惯、知识、信息带到农村，把农村的生态产品带到城市，形成交融、有价值的城乡互动。

乡村建设事业的目的是幸福农民、生态农业、温馨农村，主体是农民，主题是组织农民，原则是尊重自愿、满足需求、讲求客观，整合资源，退休人员也是其中的一分子，大有可为。

我生历55载，去日不还，为当下未来，需总结思考！

我生已55载，来日几何？做好当下事，应有紧迫感！

我生才55载，来日还长，做好未来事，当放长眼光！

（改编自赵武民人才计划九期结业报告）

2.7 淌过的时光，留住的理想

人才计划十期 吴昊[1]

又一年南塘的“大地民谣音乐节”随着清明前后的十里春风如约而至。一周前，原本计划着再回南塘的时间表终于在清明假期紧张的车票面前被迫取消，只好在京城阴沉沉的天空下、灰蒙蒙的小窗内，隔着800公里的空间距离和一道手机屏幕想象并回想着南塘的今与昔，感叹“前度吴郎”还是没有再来。

从南塘“下乡”经历的结束到现在已近两年。2015年8月，带着“不甘于平庸的梦”和“不同于流俗的心”的我来到帝都，开始在北漂中追寻自己的“价值”和“理想”，工作和生活之余，乐此不疲地奔波于一场场聆听和激辩，也一次次地参与到民间公益组织中做志愿者，真心以为可以把大学时代的理想主义延续下去。虽然时常觉得，在与“现实”的对冲中想要保持那份“理想”，往往像负重前行一般，总是要增添些许烦恼；不过，更多的时候，却是觉得庆幸，幸好我还保留着那些过去和现在都觉得重要的东西，那是行走于半是原野半是荒漠的旅途中难得的动力和慰藉。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题材的电影《卡萨布兰卡》中有这样一句台词：“你的气质里，藏着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和爱过的人。”事实上，不仅仅是人的气质，还有人们每时每刻的所思、所想、所感，以及选择和决策，都深含着过往岁月打下的烙印。当我回想那些表面丰富实则乏善可陈的经历时，时常会对我“敢想却不怎么敢做”的行动力感到怀疑，不过，即使是表面的“丰富”，也足以把一些故事写在漫长的记忆简历里慢慢咀嚼了。

我一直是属于那种在现实生活中自觉理论化的人：××主义、××化、××派，看似平淡的生活、故事和人，总会自带标签地出现在我眼里。可是，面对或迷茫或坚持，或随心或理性，或包容或对立的自己和世界时，我往往会觉得，所有的理论及标签都会在零乱的现实面前变得破碎不堪，就像参加人才计划的前与后、起因、经过、结果，也都如同一片片或含苞待放或风光正盛或满地飘零的花瓣，很难简单地用线条串成串，只能随意地拾起若干，镶嵌在记忆的边框上，权作装点。

“你们来能做什么？”

我是在一个小城里长大的，所以我的成长经历早已给我打上了“小城镇人”的烙印。我一直觉得，小城虽不同于大城市的繁华与现代，却也不似乡村的落魄与传统，只是近几年，当“乡愁”一词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

野，我才意识到，小城也面临着同样被淡化、被遗忘以及被迫变得面目全非的命运。

很小的时候，家里还没有搬进楼房，我常常和街坊的小伙伴去一片池塘边抓蝌蚪，养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罐里，看它们是怎么慢慢变成青蛙的，只不过，小蝌蚪从来都没有长大过。从我的家乡出城往西，就是连绵的吕梁山脉，那时，有一座山叫“元宝山”，因为形状酷似古时的元宝而得名，我还跟几个表哥表姐爬过那座山。不过，随着家里搬进了楼房，也随着升入中学后课业负担的加重，我再也没有机会跟那座山和那片池塘亲近过，再后来，池塘消失了，元宝山也在附近采石的人们的“改造”下变成了一片小土堆。

从小学到中学的十几年光景中，因为很少接触乡村，对乡村的印象全都来自教科书，偏执地觉得乡村是现代化的阻碍，且代表着落后和愚昧，最终必然要走向衰落，也因此和在乡村教师家庭长大的母亲辩论过很多次。在母亲的印象里，乡村的人是朴实的、善良的，乡村的生活有很多值得怀念的地方，所以当我做出参加“人才计划”在乡村待一年的决定时，母亲是很赞成的。不过，当我真正开始试图融入村子的生活时，由于缺乏乡村生活的经验，着实遇到了不少麻烦。

首先是让我“深恶痛绝”的跳蚤和厕所问题。2014年7月，刚刚大学毕业的我从一个二线城市来到赫赫有名的“南塘”。到乡下的第一天，我就遇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可怕“物种”——跳蚤，在小床上睡了一晚上，就被跳蚤咬出了满身的疙瘩，奇痒无比。下乡最初的几个月，跳蚤是困扰我的最大梦魇。另外便是厕所。用惯了抽水马桶，对乡下的旱厕总是感到深刻的担忧，以至每次上厕所，都要先怀着忐忑的心情小心翼翼地站稳，直到现在，我还庆幸自己的小心。

其次就是融入问题。刚到南塘，我就发现想要融入社区其实并不那么容易，包括语言沟通的障碍，包括一些村民对外来“志愿者”的不理解，也包括我对村子里的人的不理解。当地的老人有很多是听不懂普通话的，在一次调研中，我跟一位老太太聊天，问起她的孙子是否已“上学”，我大声讲了很多遍她都没有听懂，最后我无奈地说出一句十分蹩脚的阜阳话，问：“你孙子在上xuo？”老人家一下子明白了：“对，上xuo了！”村民们的不理解很正常，村子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我们这些外地的人却来了，他们总是会问，“你们来能做什么？”还有的人直接劝我出去打工，说在村里没出息。

还有就是到了社区后，对自己初衷的怀疑。一次，合作社组织村里100多位老人到阜阳生态园游玩。一整天大家玩得都挺开心，不过下午回南塘的时候，却出现了一点“骚乱”。合作社包了三辆公交车，合作社的工作人员永芬事先跟大家说好先排队，等点名人齐了再回村子，一来避免把一两个人丢下，二来可以让年纪大的先上车坐下，大家都同意了。可是，当车来的时候，一大群老人家却不等点名就一拥而上，永芬挡在车门前苦苦劝他们排队，但是没有人听，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要上

车，怎么劝都解释不通。最后我只好挤上车让司机往前开了几百米，看着车走了大家才乖乖地排起了队。那时的我不仅理解不了老乡们的做法，更对自己为什么要加入人才计划产生了怀疑，面对残酷的现实，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

让我惭愧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坚持了十几年、原本最有资格抱怨的标哥却从不悲观。作为合作社的“精神领袖”，这位当年法律系的毕业生，从帮着村民维权到自己返乡扎根社区十多年，他是“侠客”，是理论家，又是行动者。他说，社区建设就像盖楼房，有的地方本来就有基础，从10层盖到20层，效果显著，但我们本来基础很差，从0层盖到15层，虽然没有出效果，速度可不慢。

标哥坚信“行动会让我们和世界产生无限的联结”。这两年，我也欣喜地看到南塘正在发生的一点一滴的变化。虽然当初人才计划结束后，我选择在城市工作，多少有些“逃离”的意味，因为我是打小起就被“城镇化”了的。我一直觉得，更亲近自然的乡村生活是人的本能，而被“城镇化”了的人则丧失了这种本能。不过，当我开始漂在城市CBD的时候，对那一年的怀念总让我觉得那里一切都是好的。钱钟书说，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很多时候，乡村也是如此，村里的人想出去，出去的人又何尝不想回来呢？

南塘的呼唤

早在中学时候，我就常常被周围的人冠以“文青”之名。不过，我一直都对这个称号有些排斥，我清楚地知道，或许是因为这个时代人们对物质的追求遮蔽了一切精神层面的追求，又或是因为那些自诩文青实则酸腐不堪的人的“高级黑”和“污名化”，“文艺青年”这个称谓早已带有了强烈的嘲讽意味，所以，我常常会刻意逃避这样的标签。不过，每当我直面自己不甘心沦落于“眼前的苟且”的心理时，却又愿意接受这个身份认同，无论是中学的青涩年华、大学的理想主义还是毕业后的执着追寻，都带着浓厚的“文青”色彩。

很多人怀念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往往会有这样的描述：“白衣飘飘的年代，诗与哲学汇成的理想主义，大学校园的才情与浪漫，那是新时代的启蒙岁月。”乡建圈的前辈们缅怀的刘老石老师也曾在《文化三十年》中将80年代描述为最好的时代。见多了诸如此类的叙述，又常常看到让人钦佩的那个年代涌现出的诗人和知识分子，所以我一直对那个时代羡慕不已，于是当我看到“70后”的许知远因为自己没能在最好的年华遇上那个最好的时代而生出“生不逢时”之感时，“90后”的我竟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种“共鸣”主要源于身为文青对“理想主义”的憧憬。而这种“理想主义”，最初则起源于小时候的一点“早熟”。

我几乎是从刚上中学时就开始倾心于一位女同学，那个秀外慧中的女孩有着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的优秀，始终都是老师和同学眼中的“焦

点”。后来到了高中，我们不再同班，但她的风采并未因此淡去：高一的新年晚会，她的诗朗诵赢得了阵阵掌声；汶川地震后的募捐活动，她做主持人用最打动人心的声音触动了每个人。于是，想象中的她也是一个有着情怀和理想的女子，这一点想象也成了我在后来许多年里航行中的“灯塔”。

那时做得最疯狂的事，是高一结束时文理分科的决定。按照学校惯例，文理分科后，理科班会在一个楼里，文科班会在另一个楼里，而两楼相去甚远。我知道她一定会选理科，但我擅长的却是文科，由于从小培养的兴趣和知识积累，只是上课随便听听，历史和地理就全都是90＋；得益于文科的助力，高一一年，我都是班里的佼佼者。可是，为了偶尔会发生的“邂逅”，我却舍弃了“得天独厚”的优势，选择了本不擅长的理科，从此离曾经可能踏进的憧憬过的“名校”越来越远，走进了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二本学校。

几乎是一踏进大学的校园，我就开始了对自己当初不慎重的决定和荒唐的选择的追悔。在那个“亭台楼阁”一应俱全、“风花雪月”无处不在、时不时还因几个学生开着兰博基尼的“临幸”而登上新闻头条的园林式的校园里，唯一缺失的就是想象中榕树下本该有的朗朗读书声、课堂上本该有的思想激辩、图书馆里本该有的宁静致远。说不出的失望对于一个坚强的内心来说，也许会化作求索的动力，可对于当时的我，却变成了逃避与颓废，只能蜷缩在宿舍的床上和自习室的角落，一页页地翻着中学时代没有翻完的武侠小说。

我常常觉得，高中时做的那个选择无疑是至今最大的“错误”，它让我在一条本不属于自己的错路上拼命地爬了好多年，直到精疲力尽才迷途知返，不是有句鸡汤叫“自己选择的路，跪着也要走完”吗？可是，当我幡然悔悟时，当然知道，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当初放弃的两个轻松的90＋，和从小培养的兴趣，已再也无法带给我更大的助力。偶尔会想，如果那年文理分科时选择了文科，也许就会在轻松拿到历史、地理高分之余，在英文、兴趣爱好、体育锻炼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度过一段完美的中学时光；也许就可以到一个非常不错的学校，遇到很多良师益友，并很快找到人生的方向，乐此不疲地如醉如痴地在学业上日益精进；也许最初梦中的“伊人”会在后来的某个路口重逢；也许……然而这些“也许”的蝴蝶效应永远不会成真，过去了的再也不会回来。

对于当时年龄上已经成人但心智上却并不成熟的我来说，所有的不顺利都会被“习得性无助”的脆弱内心当作“不可抗力”。在“要么完美、要么放弃”的伪完美主义的二元思维下，面对那么一点点的失望，我选择了“三分超然物外，七分游戏人生”的妥协（抑或“对抗”），除“看小说度日”的主业，还把玩游戏当作“兼职”，也因此认识了大学最初的几位“朋友”，开始的半年光景里，通宵游戏也成了隔三岔五就会如约而至的“必修课”。

都说“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我的这扇窗是

在半年多之后的大一下学期打开的。对于无意间加入并在其中“谋得一官半职”的社团，从开始就有了一种似曾相识之感：读书会、沙龙的思想激辩，下乡实践的理想主义，交流、碰撞的朝气和活力，似乎都在诉说着一段“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故事。我在社团里了解了民国与当代的乡村建设，也了解了或左或右的多种思潮，而事实上，那些我在社团里关注的，其实都在更早的时候就关注过，是命中注定的偶然相遇，又或是追寻了很久的蓦然回首？

我在大三暑假的一次长途骑行经历也起源于这之后产生的想法。看到乡建圈的一位学长的骑行，于是心生向往，就有了从沈阳骑回老家山西的想法。不过，那时我做出选择的初衷，多少有些“说走就走的旅行”的伪文青想法和想要增加炫耀资本的“闷骚”念头。有人总结“现代人四大俗”，即“从小有个音乐梦，辞职开间咖啡馆，改变世界要创业，放下一切去旅行”。那个时候的我，除了旅行的梦，也常常出没于咖啡店这样的场所，不过，对公共空间构建有点追求的我，并非完全是附庸风雅，而是真正懂一些咖啡馆的精神内涵的。

所以，当我后来听标哥谈到南塘有“公共空间构建”的主张时，是有强烈认同的。此时的南塘，已经开始跟一些“城市小资及中产”有了很多互动，标哥也常自诩“文艺的屌丝”，不仅致力于“文艺”的阅读空间和社区环境的打造，更向诸多的“泛艺术家群体”伸出了“橄榄枝”，并通过氛围的营造重建社区内和社区外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大地民谣音乐节”是标哥及南塘精神气质最集中的体现。社区功能与文艺气息完美结合的“音乐节”，更像是南塘本身的一个“缩影”。

那时在南塘，几个年轻人常常会买点啤酒，坐在星空下夜谈，或是一起徒步数里走到田间、池塘边享受“与夜幕平分此世界”的宁静，或是搭几个帐篷在屋顶，同月亮分享夏夜的清凉。标哥是一群人里唯一的“老男人”，能讲的故事也是最多的，自己的故事、村子的故事，还有公益人的故事。由于南塘正在做教育的探索和尝试，所以教育是最常谈起的话题，当时在合作社负责图书馆、夏令营工作的“蚱蜢”是个富有教育理想也有着很多实践经验的年轻人，对教育领域有着颇深的认知和见解，谈到精彩的部分，我常常会忍不住拿一个本子记录下来，像一个奇妙的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南塘团队的“文艺气质”，以及此间多种不同思潮的汇聚，也渐渐成了我寻找自我价值的过程中的重要参照。

多元化磨合

南塘社区的另一个特点，在我看来，就是持不同观点和主张的或左或右的“流派”都有在这里实践自己理念的可能，这一点，跟乡建群体本身以及我所参加的“人才计划十期”的多元特点颇为相似。

“人才计划”同期伙伴的面孔，我仍然清晰地记得：拥有最多国际视野、把小乘佛教介绍给同伴的海归鑫姐；扎根苗乡十余年的云飞姐；弘

农书院的欢姐和珍姐；西北政法毕业，在当时引起一阵轩然大波的谌洪果辞职事件中得到谌洪果老师声援的小强同学；同样刚刚大学毕业却履历丰富，以一人之力撑起一个公益项目点的行动派蒋峥；走在路上常常手拿一支藤条边晃动边独自哼着歌的地瓜；返乡青年迪桥、魏伟；离开《大公报》加入这个团队的夏斌；一起从“东北区支农队”走出来的李强；重庆美女小艳姐；丽江妹子海梅……每个人都有特点，共同书写了不少有趣的故事。

2014年8月，景色怡人的阳澄湖畔，人才计划十期第一次昆山培训在那里开始。每个人都讲述着自己的故事、经历，试着用同理心、非暴力沟通互动和交流。这个多元的群体中，个体的差异是很明显的，一次最大的争议发生在芬芳文化书院牛见春老师的讲座上。牛见春老师的观点并不是所有同学都认同的，第一个反对的同学直指他“反传统、反文化、反小农”。他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和独到见解令我佩服，但是他对左派的看法和转基因的认识却让我反感，于是在接连有两位同学站起来“炮轰”后，我也站起来貌似求同存异实为“拉偏架”地表述了一番，引起了更多的争论，团队的多元性表露无遗。

团队的多元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有时也是矛盾的源头。作为从大学“支农队”出来的愣头青，开始的时候我对团队的期待非常之高，希望它会是一个百花齐放、英姿勃发，又能共同进步的团队。第一次培训结束，我还被推选为“班长”。不过，由于期待过高，当我看到现实并不如愿的时候就产生了不少失落，加上大家都是单独被分到一个村驻点，我去了安徽阜阳南塘合作社，大家走进了各地的社区，团队建设也没能做起来，所以当所有人再次相聚，赴北京的大本营“西山雨舍”参加第二次培训时，矛盾便发生了。一个宁静的夜晚，西山雨舍的小图书室，十期学员的“吐槽夜谈”以激烈的争吵开始。由于“支农队出身”的“身份认同”，早已把中心当作自己的家，也因为所谓“班长”的压力而把团队建设的成败看得十分重要，所以在那场“吐槽会”上，我直接向一位伙伴“发难”，指责他只顾个人不顾团队。是夜，大家都不欢而散。不过，团队的融合却也并未因多元而撕裂，反而让每个人在不断的碰撞和磨合中学会了理解和包容，学会了如何对待不同。

从社团到“人才计划”的团队，都会接触到持不同观点和思潮的人，周围的同伴都会选择认同或反对一些观点，其中难免有一些人是被动接受了某一观念，但我对一些思潮的认同或反感，却是在很早就确立了的。

譬如我一直都对“民族主义”存有戒心，最早是因为高中时读过的一本英国的中篇小说《柑橘与柠檬啊》，小说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英国为背景的，反思了战争以及意识形态造就的悲剧，书中并没有提到“民族主义”一词，我那时也不知道什么“主义”，后来了解了一些意识形态后才知道《柑橘与柠檬啊》是在解构和反思民族主义。因为那时就形成的观点，所以后来很认同一位左翼学者对民族主义的解读，即“社会矛盾激化时，一些人出于自身利益，会动用意识形态的力量，将阶层矛

盾转嫁为民族矛盾”。

大学时，我开始了解了一些“女权主义”，并对女权主张深以为然，其实也是因为很早就读过《玩偶之家》和《简爱》。读过或看过的文艺作品以及从小到大的经历早已塑造了自己的“三观”，所以后来接触到各种不同的观念，就会自动分辨出哪些是契合自己想法的，哪些是有违自己“三观”的。过去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让我对传统意义上的“左派”和“右派”并无偏见，无非左派更追求“公平”而右派更在乎“自由”，我一直都坚信，无论到了哪个年代，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一切对“平等”的追求都是天然合理的。

理论与实践

在众多的思潮中，唯独“乡建”让我对中学时代建立起来的认知体系发生了一次180度的反转。中学时代了解西方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在殖民地的原始积累，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以及苏联式的工业化中农民的血泪史，所以隐约能感觉到，我们的工业原始积累阶段，也许乡村承担了一定代价，但仍然接受了教科书的理论，觉得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是天经地义的，并没有产生过质疑。直到接触“乡村建设”后，我才意识到我们学过的那些理论，其实从未站在乡村与农民的立场上考虑过。

大学时代接触到的“乡村建设”理论，多是从宏观的视角来看待乡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的，所以当我带着这些宏大的理念来到乡村时，就突然发现，参与“乡村建设”跟想象中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说之前的认知是“空中楼阁”，那么实践则更像是“鸡毛蒜皮”。来到乡村做事，我们不再会考虑“工农业剪刀差”，也不需要了解“三要素的净流出”，甚至不需要知道“解构现代化”，我们似乎更需要在家长里短间，体察村子里的人在生活琐事中的现实矛盾。

所谓“理想的落地”，不过是先把理想晾在一边，让自己融入泥土中。

毕业季的时候，我并不满足于周围的同学想要过上的那种日子，那在我看来乏味到了极致，尤其是我想起一些学哥学姐分享的毕业后的生活（要么请客户吃饭，要么陪领导喝酒），这让我感到无比的厌恶；同时，在大学投入了最大一部分时间与经历的“支农”让我觉得，对“乡建”的参与不该止步于此。于是，我开始想探寻另外一种“可能”，所以当第十期的“人才计划”开始招募时，我就迫不及待地递交了申请，接着，我就接到了赴南塘实践的通知。

初识南塘，我首先看到的是各种版本的故事和往事：从维权到乡建，从《罗伯特议事规则》到《可操作的民主》……在百度上输入关键字“杨云标”或者“南塘”，网页上可以弹出数十条相关的新闻以及评论，还贴着“乡土维权者”“新乡村建设”“罗伯特议事规则”“理想主义”“实践

者”等诸多不同的标签。当我怀着一点好奇和憧憬来到这片想象中的田园时，我渐渐意识到，故事中的“一波三折”还原到现实生活里，往往会变成一件又一件平淡无奇甚至有些乏味的柴米油盐的日常琐事。

在南塘最初的三个月里，我的核心任务是应对生活的挑战。除了适应厕所和面对跳蚤，还要学会跟多种陌生的昆虫“共享”房间。其中有一种黑色的体型巨大的昆虫，飞起来会发出一阵阵“轰鸣”，时不时还会横冲直撞，我把它们命名为“变态虫”，为避免半夜受其困扰，我花了很长时间研究其习性，以便于捕捉。炎热的夏夜，四下一片漆黑，周围除了虫鸣外便再无其他声响，当时的南塘大院里，经常只有我一个人，于是我可以肆无忌惮地用箫声和歌声打破暗夜虫声对周边生物群落“传播媒介”的“垄断”。

我在大学的最后一段时光是在忙碌中度过的，以至对毕业季的离愁别绪的感知也是滞后的，直到“人才计划”开始，我面对新生活的困境和孤寂，内心的离别之殇才一下子喷涌而出。夜静时分，我写了一篇表达怀旧和茫然的长文发给几个朋友，其中一个女生在回复中抱怨说，离校后原本已平复了离愁，我发给她的文字却又让她大哭了一场。

起初参与到南塘社区工作中的时候，我总是觉得，这好像不是我想要的“乡建”，为什么我们学到的那些理论跟实践是没有关系的？于是，我几乎是完全被动地参与到日常社区的一次次活动中的，直到南塘的一个对外项目“返乡青年培训”的开始。

在南塘时投入最大热情的工作，可能就是“返乡青年培训”了。由于已经有过两期的经验，我进入的“第三期项目”是一个比较成熟也比较完美的项目，从招募，到培训的开始，再到完结，我在项目里逐渐承担起越来越多的工作内容，除了文字记录以及培训期间的零星琐事，还写过项目中期报告的部分内容。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近距离地接触了一些机构、一些人：有以前在支农队时就常听说的乐施会；有贵州乡土文化社、贵州和仁乡村发展研究所等本土NGO组织；有参与项目的返乡青年学员；有做过记者又懂人类学，常常会分享台湾地区、泰国和“保育着世界上最丰富的基因库”的西南少数民族乡村故事的乡土文化社社长李丽老师；有在乐施会实习的香港大学女博士嫣然……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人生阅历和社会背景，也都有各自的故事和内心世界。过去我觉得，理想就应该是对宏观世界的情怀，而此时，我意识到，真诚地走进一个又一个平凡的个体的内心世界，去在乎每个看似渺小的生命的感受，也许比关注抽象出来的群体概念有着更重要和实际的意义。

也是缘于这个项目，我第一次走进了黔东南风光秀美的侗寨——龙额，开始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有了一点点的了解。从小到大一直都生活在汉族区域，除了在家乡的县城里卖羊肉串的维吾尔族商贩，我接触的少数民族基本上都是“汉化”过的，但这次，我却真实地从侗乡的鼓

楼、风雨桥，从侗族特色的油茶、烤肉、米酒，从侗歌侗话，从饮酒时的“吆喝”和敬酒时的习俗中感受到了“小众文化”的魅力——文化就在普通人的衣食住行里，文明就是在那些最朴实的人的生活劳作中积累起来的智慧，而多元文化的共存正是保存了人类最丰富的“智慧宝库”。

当我开始暂时抛开宏观的视角，看到社区以及每个微小的个体的价值时，南塘社区本土的文化也渐渐在我眼前绽放出了它特有的迷人风采。其中，年过八旬的罗桂兰老人的剪纸是最让我惊叹不已的。我竟是头一次看到，用一张普普通通的红纸、一把破旧不堪的剪刀，可以裁剪出那么多精巧细致而又变幻无穷的图案。老人家原本还会做阜阳当地特色的“虎头鞋”，只是年纪渐大，眼睛和手都不比年轻人灵便了，她已经多年没再做鞋，只有剪纸还勉强可以做。于是，我在人才计划的最后一段时间，隔三岔五就会跑到罗桂兰老人的家里，一来找她聊聊天，二来想看看是否能找到一些年轻人，来学习老人的剪纸，既作为文化的传承，也可以成为对老人的一种尊敬和认可。

彼时，南塘的年轻志愿者渐渐多了起来，最多的时候，小楼里住着五个年轻人，于是，生活中渐渐充满了欢笑和吵闹。有一次清晨，有三个同伴出门跑步，回来吃饭时，志愿者蚱蜢问道：“你们今天是不是没跑多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的日记还没写几行！”我突然说：“原来跑步跑多远是可以用多少行字来计量的！”于是在饭桌上，大家纷纷笑着戏说“跑出了一首长诗”“跑出了一篇散文”……后来，我作为第一个来的，也成了第一个离开的，之后又陆续离开了两个，那个短暂的小团队终于各自分散在了天涯。

世界并不大

当为期一年的人才计划走到尽头的时候，同期的伙伴纷纷开始寻找下一个人生阶段的方向，我自己则选择了媒体工作。其实更早的时候，在大学社团，我就隐约萌生了做媒体或者传播的工作，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做了很多读书会，我无奈地发现，就算是进入社团的稍有点情怀和思想的同学，对于公共领域的理论以及各种不同的思潮也知之甚少，甚至没有关注的兴趣。我那时觉得，所谓思想的碰撞，不过是公共知识分子和拥有思辨能力及人文素养的小众群体的自娱自乐，沉默的大多数听不懂，也不愿听。

于是，大学时我就想，为什么不能把我们的理念，包装成公众可以听得懂的、乐意听的东西呢？一年的乡建之旅更让我看到了传播以及拥有传播能力的重要，我开始向多家媒体投递简历。最终，我阴差阳错地进入了一家能源领域的“垂直媒体”。

2017年年底，标哥从南塘来京做事，返程前，我们在北京西站附近的一个小餐馆里边吃边聊了许久，谈起我们都熟知的人和事，还有很多NGO组织。因为时常会在不经意间发现，这个世界其实并不大，所以当

我知道标哥的朋友里也有关注能源的人时，并不感到意外，就像发现做乡建的人和环保主义者有很大交集时一样，不过是在我认识的不同圈子的人群里，又多了一条可以在平行时空中把不同的人连在一起的“隐形纽带”。

2015年10月，我开始以会员身份频繁地参与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活动，并尽可能多地关注环保。参与环保组织的缘起，有从小就建立的认知，我的母亲就是一个关心环保的人，家里卫生间、洗手池的下水管道，都是被她“改造”过的，这样，洗过手的水可以截留下来，而洗过菜的水也常常会被她用来浇花，从小到大，我们经常会聊起节约和环保的话题，所以，我似乎从小就完成了环保的“启蒙”；此外，更多的是机缘巧合的相遇——早在“人才计划时期”，就听多位乡建前辈提起“自然之友”，来京后我第一次参加的这个NGO的活动，也同样是一位乡建前辈推荐的。

不过，生态与环境虽然跟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关，但在日常生活里仍然是一个很小众的话题，所以总会有人问我，既非职责所在，又非科班出身，为什么会关注到这些问题？为了避免被当作愣头青，我总会尽可能解释得理性一点、实用主义一点。事实上，理性和实用主义原本就是我参与到其中的原因之一。由于工作的缘故，我需要关注能源，而能源和环境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在发现绿色和平、WWF等很多著名的环保组织都有关注能源的项目（如绿色和平可再生能源团队）后，我更加确认了这一想法。

幸运的理想主义

有人说，时间流淌过一个人的时候总是会留下痕迹的。

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虽然在现实生活的摸爬滚打中消磨了不少年少时的梦，更学会了隐藏和伪装，但我还是有一点理想主义的“特质”，也在世俗的环境里保有着一点“清高”。不过，我觉得我是幸运的，因为越是稀缺的东西就越是弥足珍贵。

我在北漂了数月之后，偶尔回想起在南塘的日子，曾作一首诗，名曰《记得彼时》，就以此作为结尾吧。

记得彼时，

那个夜幕下的安静的村，

和一群数着星星、夜谈的人。

记得彼时，

搭一个帐篷就能睡在屋顶，

等着阳光照到脸庞的清晨。

记得彼时，

一到周末就会有一大群小孩子，

叫喊着跑来，像小河里水的翻滚。

那片跳动的麦田里，

有时撑着伞走过，

总会有雨水，

洗去鞋上沾了泥土的痕。

那熟悉的歌声，

是朋友的相聚、别时的追问，

却像梦一样永存，

不会因风雨而变得残损。

因为，

那些好的人告诉我的，

我愿告诉每一个人。

第三部分
返乡



蒲韩乡村

引言 返乡有种

刘良

近年来，“返乡青年”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词，无论是国家政策层面的倡导，还是青年人自主或被动的选择，越来越多的青年返乡（下乡）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政策层面而言，2015年国家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之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中，首次将大学生等也纳入返乡群体，开篇就提道：“支持农民工、大学生和退役士兵等人员返乡创业，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使广袤乡镇百业兴旺……”

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以下简称梁中心）的创始人刘老石曾说：“要把青年人更多地带到农村去，让他们在对农村的关注中学习和体会自己的责任，让青年人在对社会的关注中超越狭隘的自我关注，从而把自己的命运和农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以此达到升华。”

伴随新乡村建设运动的深入开展，梁中心青年人的工作也随之走向深入。从2000年开始推动大学生支农调研运动，鼓励和组织青年人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到农村基层去做调查研究，在实践中进行锻炼；2005年启动的“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将原来短期的大学生下乡活动，扩展成为期一年的在农村的驻点实习。在这短期和中期下乡的过程中，部分青年人选择了返乡创业，用具体行动践行另类的生活，成为扎根于乡村社会、连接城乡的返乡青年。

在摆脱了被主流话语称为“劳动力回流”的概念后，这个群体以及他们的选择越来越具有正向的价值导向和重大的社会意义，对当前农村三要素（资金、土地、劳动力）净流出而导致严重的“三农问题”而言，无疑是一种改善和修正；也是对以城市化为导向的主流发展观的反思，在恢复和重建乡村的文化和价值层面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梁中心将返乡青年定义为：带着返乡返土的自主意愿，有着对乡土的社会、文化归属感，长期扎根在乡村社区；或虽驻点城镇从事城乡互动工作，但和乡村社区及农民群体保持着较为密切日常互动的青年人（群体）。

同时，梁中心提出了“返乡有种”的口号，倡导青年返乡，并赋予“返乡有种”以下四层含义。（1）返乡有种（zhǒng）：代表勇气，代表对青年人做出返乡选择的肯定、赞赏与鼓励。（2）返乡有种（zhǒng）：是火种的含义，意为扎根乡村的青年人是农村的希望。（3）返乡有种（zhǒng）：是种子的含义，鼓励返乡青年回到农村去，就地发掘和保育传统的农作物的种子，守护农业生产以及生命的源头。（4）返乡有种（zhòng）：种田、种地，意为青年人返回农村要去劳作、要去创造

更美好的生活，而非仅仅是把乡村作为消费或娱乐的场所，或者仅仅是乡村的过客。

3.1 隆化新乡村建设成功十年

人才计划二期 胡新杰[1]

在中国式众筹圈子里有一句流行语，“当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时，我在现场”，我很自豪地说，拉开隆化新乡建历史序幕的那一刻我也在现场。2005年5月5日在河北隆化一个极为偏僻的小山村，亮子沟合作社诞生了。我们九户农民喊出了“改变自我，做家乡主人，团结起来，建设新乡村”的口号，从此隆化新乡建的历史开启了。怀揣着“为农民服务，为理想奋斗”的梦想，经过12年的探索，经历一个个印迹，如亮子沟合作社、北戎牛业合作社、北戎生态农业公司、隆化县综合农协、新绿盟农牧公司、九号工社生态小镇，永远不变的是“为农者谋利，为食者造福”的唯一宗旨。

我从初中毕业就离开家乡，是一个种过蔬菜、当过经警、干过建筑、修过电梯的农民工。2004年受到“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老师的影响，于2005年返乡创业参与到隆化新乡建的事业中。我既是土生土长的当地农民，又是乡建志愿者、人才计划学员。今年（2017年）是乡建人才计划第12年，也是隆化新乡建的12年，更是我的返乡创业的第12年。

农村青年在城市

初中毕业后的一年里，我在家和父母一起放牛、种地。可是耐不住对大山外世界的憧憬，1990年17岁的我就开始了艰难的打工生涯——种蔬菜、当经警、干建筑、开餐馆，做最苦最累的活，挣勉强糊口的钱。四处漂泊直到1994年，我才在北京找了一份相对稳定但也相对危险的工作——修电梯。因为肯钻研、肯吃苦，我拿到了维修电梯中级工证，工资稳中有升。随着修理技术越来越高，我还同时做了几份兼职，收入相当不错。可是后来一个要好的同事在工作时意外离世，这让我坚决辞掉了这份连续干了七年的工作。2001年，我在朝阳广播电视局开始了新的生活，参与了公安网、教育网和综合信息网络建设工作，工资有保证，待遇也不错。2002年我和三哥注册了“北京世纪新中公司”，进行网络工程施工。与事业齐头并进的是我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可以这样说，一个两手空空的农村青年，经过自己多年的打拼，从建筑工地上搬砖扛水泥的小工，发展到拥有了自己的公司，拥有了自己的家庭，我已经感到十分满足了。

诺奖得主尤努斯的影响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并善于从书中汲取营养。我就是通过读书改变自己命运的人。随手捡来的一本美国作家施拉姆的《毛泽东》，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的心灵之窗，在自己还四处漂泊的日子里，心中就有了对社会问题、对农民工问题的思考。正是因为在心中有了为农民工、为广大农民做点什么的想法，才会在每一天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后，抱着一本本书，看得如痴如醉。我喜欢看传记，其中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创建人、穷人的银行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的传记对我影响很大。

我只有初中学历，所以我一直在努力学习，从最初参加中央农业广播电视中专的自学开始，每天利用业余时间看书、做笔记。1996年，我无意中听说了北京高教自考这件事，于是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财务会计专业的学习。凭借顽强的意志，我用两年的时间拿下了大专学历，后来又一鼓作气学完了本科的课程。随后，我又参加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MBA的学习。通过不懈的坚持，我学到了知识，也提高了自己的能力。

由一本书开始

1996年，郝在今的著作《八千万流民部落》深深地吸引了我，使我从此更加关注农民工问题，更加关心农民工的研究、教育、创业问题。1999年，我参加了公益机构“农家女”的活动，后来还参加了“光华创业”等机构组织的各种公益活动。我成立了北京姐妹家园文化发展中心，培训农民工流动儿童学校的教师。有着稳定的工作，充实的业余生活，扎根北京就是我的梦想。

2003年读北航在职MBA时，韩德强老师组织专家学者开展的讲座让我大开眼界，特别是刘登高讲关于农村合作社问题、姜柏林讲关于农村合作金融问题、何慧丽讲关于兰考的合作社，还有直言上书《我向总理说实话》的李昌平痛言“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都深深地打动着我的心灵。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发起者、“三农问题”专家、九亿中国农民的代言人温铁军对我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除了看温铁军的书，听温铁军的讲座以外，我还经常参加乡建中心组织的支农活动，成为一名支农志愿者，结识了刘老石、邱建生、何慧丽、白亚丽等新乡村建设的实践者。我充分利用所有业余时间，听讲座，忙得马不停蹄，但是我乐此不疲。得以受到国内知名学者的思想洗礼，我受益匪浅。

2004年，各种各样的思想在我的脑海中相互碰撞，使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是扎根城市发展，还是参与到新乡村建设的潮流中？经过横向比较、纵向分析，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方向，那就是回到农村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组织合作社，投身于新乡村建设运动中。

打造宁夏新农村建设试验区

罗曼·罗兰说过，生命像一股激流，没有岩石和暗礁，就激不起美丽的浪花！我就是一个愿意不断在自己生命中激起美丽浪花的人。

2005年5月，我回到家乡河北省隆化县，组织了“亮子沟合作社”，带领农民养羊。2005年10月我来到宁夏考察合作社，并读到宁夏第一个合作社创办者毛泽民的传记，他的传记深深地感染着我。2006年4月，经过艰难的抉择，为了自己心中的梦想，我毅然放弃在北京的工作、公司，带着妻儿和母亲甘当志愿者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组织当地农民创办合作社。因为语言不通，又不能直接给予老百姓经济物质上的帮助，所以合作社在创办初期极其艰难。

我作为乡建志愿者、人才计划二期学员开始了在宁夏两年的艰难探索。我创建了宁夏新农村建设试验区，参考综合农协模式，由政府、企业、社会机构三结合方式成立了永宁县瓜类协会。我和人才计划学员王晓平一起组织农民创办合作社，我们没有被这些困难压倒，想方设法地组织当地的大学生志愿者参与活动，取得群众的信任。实业家卢作孚参与乡村建设对我们很有启发，通过政府的力量、公司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整合资源，组织群众栽种无籽西瓜，让农民得到了实惠，得到了农民的认可。我们还成立了银川市中青农业合作社，筹备了宁夏新农村建设促进会，接管了一个荒废的小学校筹备卢作孚乡村建设学院。我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宁夏大学生志愿者支农行动，温铁军老师也多次来到宁夏考察指导我们的工作。我们立足西瓜产业基础，基本上构建了县级综合农协下的合作社体系，帮助农民把西瓜远销到山东、深圳等地，并组织了合作社直接对接各机关单位的西瓜配送，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的活动。宁夏两年的探索伴随人才计划学员的生活，经常去北京交流，不断学习跟踪着全国各地的乡建系统及地方政府在合作社和生态农业、城乡互助方面的经验教训，为后来的隆化乡建探索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宝藏，用之不竭，也结识了一批乡建同行。这时，“三农问题”已经成了党中央的重中之重，国家的惠农政策全面展开，农民合作社法颁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潮随之兴起。

返乡的生态农业路

2008年，我的三哥不幸离世，我俩不但有着亲情，还有着同学情、战友情，也是打工路上的难兄难弟，又一同成立了网络工程公司，直到去宁夏的那两年才分开。噩耗传来时，我痛不欲生，从宁夏返回了家乡经营三哥与人合伙的养牛场。同时还约来了乡建同行许丙举和王晓平，我们成立了隆化北戎牛业合作社，构建了肉牛养殖及生态农业示范项目，以及北戎生态农业园区发展规划。可是，竟一下子闯上了一条布满荆棘的创业道路。因为这个养牛场把资金过多地投入固定资产造成债台高筑，三番五次地被讨债人告上法庭。养牛场没有抵押物导致借款难，资金链断裂，特别是金融危机导致肉牛养殖市场整体萧条，很多养牛户纷纷不养牛了，而这个养牛场也最终关门。我背负了百万债务，陷入了人生的低谷。

尽管面临重重的经济压力，千难万难也要扛住，背上了百万债务我却赢得了诚信。我在思想上仍然信仰坚定，勇于创新，那就是把生态合作事业进行到底，为农者谋利，为食者造福！

2009年，在政府部门、农村信用社和亲朋好友的帮助下，我们创办了承德北戎生态农业公司，在一片新的土地上开始创建北戎生态农业园区，逐步形成“肉牛养殖—牛粪无害化处理—生物有机肥—生态种植”的循环经济产业链条，依靠自繁自育的生态肉牛、生物有机肥和生态农产品，延伸肉牛养殖产业链条，大力发展生态农业。

北戎生态农业园区位于承德避暑山庄到坝上草原之间的御道古镇唐三营镇。这里燕山环抱，伊水清澈，蓝天白云，牛羊嬉草，是远古原生态“北戎部落”繁衍生息的地方，也是重要的京津水源涵养地。园区分为生态养殖区、有机肥生产区和生态种植区，是集肉牛繁育、养殖、加工，有机肥生产和生态种植为一体的生态全产业链园区。采用“龙头企业＋综合农协＋合作社”的组织体系，立足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农业，生产的北戎生态牛肉通过CSA（社区支持农业）模式进入北京市民家庭，得到了消费者好评，生产的“北戎雪花牛肉”经专家鉴定达到A4以上标准，填补了河北省高档肉牛养殖空白。功夫不负有心人，立足“京津水源”承德生态环境，凭借自身的品牌优势和诚信经营的商业信誉，“北戎牛肉”成为河北省优质产品，实现了“进北京社区，上首都餐桌”的目标。

在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获得了一系列荣誉，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我们成为“农业部肉牛标准化示范场”“河北省农业龙头企业”“河北省扶贫龙头企业”“河北省示范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GAP（良好农业规范）认证基地”“国家肉牛产业技术体系示范基地”“全国农技推广农业科技实验示范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学生实习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试验创新基地”“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团队农禾之家会员单位”“PGS（参与式保障体系）研究会首家基地”。

我也获得了“全国农村创业创新优秀带头人”“河北省农村青年拔尖人才”“河北省返乡创业致富能手”“承德市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标兵”“承德市青年拔尖人才”，以及承德市党代表、隆化县优秀政协委员等多项殊荣。在荣誉面前，我总是觉得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实现美丽乡村梦的路还非常漫长，我们要不骄不躁，继续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争取创造更好的成绩。

综合农协的创新

读书、学习、思考，伴随我一路走来，始终在探索中前行。1893年诞生的四位伟人毛泽东、卢作孚、晏阳初、梁漱溟，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而他们又都是最为关注农民问题和乡村建设的，这让我深受影响。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的合作化、人民公社集体化，再到21世纪迎来的新乡村建设运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中国本土化的经验积累到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综合农协的发展，从合作经济到生态农业，探索出一条本土化的发展道路，激励着我始终如一地学习、思考和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社会企业”的蓬勃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综合农协”的创新发展，走一条不同于“商业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社会企业”探索道路，成为我们追求的方向。2011年，在隆化北戎牛业合作社、承德北戎生态农业公司发起下成立了隆化县综合农协，明确了走本土化综合农协道路，构建社会企业的目标。同时我参加了由中国社科院杨团老师创办的农合“CEO”学习，深切感到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要想让农民受益非常困难，需要“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农协引领、农社组织、农企推动、城乡互助”，整合各方资源，走出一条社会企业道路，才能带动农民增收。

喝水不忘挖井人，先富不忘乡亲们。在农村创办经济发展合作社，带领父老乡亲们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多年来一直是萦绕在我心头的情愫，我一直怀揣着回到家乡搞新乡村建设事业的梦想。发动农民、组织群众，通过合作社采用“认购牛股”的模式，以建设的养殖园区为基础，合作社组织社员集中托管饲养，既增加了规模化效益，又集中处理了粪便，改善了农村环境。我们有国家首席肉牛专家曹兵海的指导，多次邀请养牛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合作社讲课，加上多年的肉牛养殖，使合作社团队积累了丰富的养殖经验，使我们得到了社员们的信赖。

我们县通过“政银企户保”模式推动扶贫攻坚，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成为推动脱贫攻坚的全国典型，得到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的广泛宣传，我们也贡献了一份力量。通过“农家女书社”和“农村妇女大学堂”等活动，开办妇女社员文化知识讲习班，提高了社员和农村妇女的文化水平。我们也捐助修建道路，帮扶困难农户改善生活，引导他们发展肉牛养殖业，享受共同致富带来的乐趣。我们通过综合农协的社区推广工作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开展文艺活动，构建生态和谐的社区。

伴随隆化乡建事业的是一批批大学生志愿者的下乡支农，从2005年以詹玉平、王盼为代表的京津冀大学生支农联队，到以喻晓伟、李固隆、闫丽霞为代表的大学生志愿者，开展了新农夫项目，他们为隆化乡建事业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隆化父老乡亲们永远铭记。

从生态生产迈向生态合作

通过组织合作社，生产生态农产品，是认准了的同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可是合作社生态农产品生产出来怎么销售？只有推动城乡互助、生态合作，让更多的合作社农民受益，让更多的消费者吃上生态健康的农产品，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2013年，在北京市农委、商委组织的承德市优秀合作社理事长学习期间，我们以“生态全产业链CSA +

O2O”的模式，组建了北京新绿盟农牧公司。通过组织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对接的活动，多次组织消费者来农村体验考察，组织了全球500强企业约翰迪尔公司的领导们来体验农耕文化，帮助农民收割玉米、水稻，体验劳动的辛苦，品尝北戎牛肉的美味。通过在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农夫市集组织消费者牛肉品尝活动，在回龙观建立生态农产品体验配送中心，请蒋高明老师讲生态农业等活动，促进城乡互助、生态合作，让农民生产得安心、消费者吃得放心。

2015年，我们开始在北京顺义打造全国首家智慧农场“九号工社”，“桃源种瓜豆乐得自然，仙境品农宴共享生态”，九号工社取意“工有所得、社有所乐”，是众筹、共享的生态合作平台，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农业的创新基地，打造以“红色文化、绿色家园”为主题的红色文化生态小镇。

进城、返乡、再进城，不是简简单单的轮回，一切都是为了心中的梦想。我们的新绿盟公司秉承“创新、绿色、联盟”的理念，践行“为农者谋利、为食者造福”的宗旨，以毛泽东思想、习近平精神为指导，做致力于人类生态和人民健康事业的社会企业。作为一名人才计划学员，经过12年的发展，我们又站在了新的起点上。

3.2 少年白飞返乡记[1]

人才计划六期 白飞[2]

编者按：早在2009年就结识了白飞，后来一起参加农村可持续发展人才计划项目，便更为熟悉。白飞是一个“90后”1991年出生，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但受姐姐的影响，初中毕业的时候就参与了乡建工作，算是一个“老乡建”。那时觉得他挺能折腾事情，不管是在中心工作，还是返乡之后，总能看到他的各种尝试。他的思维也特别活跃，总会有很多灵感和思考。

实践启蒙

2006年8月，刚刚初中毕业的白飞，由于二姐白亚丽在北京梁漱溟乡建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工作，便来到了北京。当时中心正在组织第四届大学生支农调研培训，本是想来北京游玩的白飞便机缘巧合地加入其中，成为当时支农队中最小的一员。

“那时候下乡的内容和手法就是‘三板斧’：妇女文艺队和老年人协会、支农调研和支教。那年我们去河北易县，下乡的时间是半个月，在那个地方做了老年人协会，我参与了整个成立的过程，比如动员、选带头人，还有民主投票，选出来监事会、理事会。”白飞的这次下乡每天都在筹划老年人协会，从寻找村里有威望的老年人，到寻找活动场地，再到筹划选举，请村里的老年人来开会，选出德高望重的领导班子和老年人协会的会长。

自从那次下乡之后，在白飞的印象里，支农下乡就是为了做这些事，他对农村也特别感兴趣。当时中心有一套下乡工作“红宝书”，其中介绍了老年人协会的作用：让老年人老有所乐、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妇女文艺队能缓解农村的矛盾；合作社是统购统销，可以降低生产和生活成本。因为最初听到这些最朴实的理念后白飞很认同，就想着要把这些事情带到自己的村里去做，这可能就是后来白飞选择返乡的一颗种子。但是当时并没有什么返乡的概念，按照“红宝书”的标准，要在村里找一个有威望的带头人，于是，在大家眼里看起来还是个小孩的白飞，就在自己的村里——河南省漯河市白庄村，到处留心村里的“带头人”，但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暂时就把这个事情放弃了。但之后他在高中求学的日子里，几乎每个寒暑假都会跟随中心的支农队伍下乡，乡村建设这件事就和白飞联系上了。

“折腾”合作社

在接触了乡村建设之后，白飞开始了他的“折腾”岁月，一方面继续受中心的影响，到处下乡支农，另一方面自己村里原本很平常的事、平常的生活，因为他想着在村里开展乡建工作而发生了一些改变。

2009年，白飞高中毕业之后的那个假期，村里一位与白飞同姓的叔叔看到新闻联播上说：国家要提倡新农村建设，对成立合作社有一些政策支持，于是他便在村里开始动员并召集村民开会，宣传这一新的趋势，把土地集中起来成立合作社申请国家补贴。虽然那时候他还不怎么了解合作社，但是对政府的合作社补贴政策却比较敏感。

这个消息被一直在寻找村庄带头人的白飞听到了，很自然地就去找他，跟他讲合作社是什么、要做什么。当然，白飞知道他最关心的是什么，但是还是想着能够鼓励村里的骨干先做起来。“当时他最关心的是做合作社要不要注册资金，需要多少钱以及有没有费用支持。我为了鼓励他们先做起来，一开始就说没什么费用。”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合作社进入了动员、注册的阶段。

当时白飞和中心负责支农下乡的工作人员还一直保持着联系，第一次合作社动员是在2010年的寒假，联系了河南农业大学的三农社团来村里开展支教、文艺活动，开始做合作社动员。“2010年就开始准备注册合作社，动员了80多户农民开会。学习‘红宝书’上的如何注册、需要准备哪些文件，那个春节几乎都在忙这个事情。因为要准备各种文件，就得挨家挨户地收集户口本。还需要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捺手印，每家光捺手印就要按五次，于是就要跑五遍，那个寒假跑到脚软。最后我们浩浩荡荡地拿着80多户的户口本、一叠文件去工商局注册，注册人员当时都被吓着了，对我们说：‘别人都是5户的，你们咋弄了80多户呢？’正月二十前后，我们的合作社注册下来了，取名叫河南漯河田垦种植专业合作社。”

在注册之前，这批合作社骨干对前景都有非常美好的想象，想着合作社注册下来，自然而然地就会有国家补贴下来，就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但是，注册完之后的合作社并没有拿到国家的项目和资金，只是拿了一个合作社的牌子，大家都开始从原来的激情澎湃一下子变得情绪低落。此时白飞因要去北京上大学了，合作社的理事、监事也因为过完年要出去打工了，村里的合作社一个人都没了，就这样，合作社成立之后停顿了半年……这令白飞开始思考：“合作社到底要做什么？接下来的合作社该如何发展？现在一切只是开头，以后要做成什么样不知道，但是在心里却总是觉得这个事要去做。”

联合购销的失败与反思

2010年，白飞参加了中心第六期人才培养计划，在中心培训的时候就接触到了大量的合作社案例，其中以妇女文艺队起家的山西永济蒲韩

乡村合作社[3]对白飞的影响特别大。同时，温铁军老师总结的合作社二十四字经验“文艺活动，收益最大；联合购销，风险最小；资金互助，制度重要”，也让他铭记于心。

白飞开始思考在村里建文艺队。恰巧在2010年暑假，白飞负责北京高校联合下乡，于是便组织了一支支农队伍来到白庄，唯一的任务就是建立妇女文艺队，还在村里举办了一场文艺联欢会。文艺联欢会主要是宣传合作社，以合作社的名义设置了有奖抢答环节，问题非常简单，如：“我们村合作社的名字是什么？”“合作社是干啥的？”一个节目表演完就开始进行抢答，农民答对了，主持人再重复一遍，然后给发一个盆，或者发一个碗。那时候就是为了让大家记住合作。

尽管妇女文艺队的工作在大学生的带动下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遇到了新的瓶颈。合作社成立后不能总是唱唱跳跳的，还需要发展一些经济项目。于是白飞开始考虑探索一些能够帮助社员提高收入的项目。在乡建中心经验的影响和熏陶下，白飞想到在合作社发展初期，如果没有太多的经济条件，风险最小最容易入手的就是联合购销。在2011年的时候，合作社做了第一次联合购销。

“那时候我没在家，就引导合作社的骨干来做。我就说我们成立了合作社得给社员做一些服务，现在各家各户散买化肥价格较高，我们能否统一购买大家需要的化肥，这样能为社员省下一些钱。”合作社的几个骨干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进行尝试。事情进行得还行，那一次的化肥完全是几个骨干拉回来的，送到社员家门口，一袋化肥省了15元钱。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全村的好多人都说，他们几个合作社的骨干没少在里面挣钱。合作社的几个骨干为这件事没少操心，负责这件事的合作社带头人还贴饭钱，结果却听到这样的话，最后都失去了信心。他们觉得为农民服务根本行不通，自己不仅没赚，还搭进去精力、搭了时间、贴了钱。后来白飞又反思：“这个联合购销没盈利行不行？其实合作社挣钱，天经地义。无论是你给农民免费拉到家，还是免费做联合购销，农民都不会觉得你有这么好，世上怎么还有这么好的人？后来我就发现与其不挣钱，还不如你堂堂正正地来挣钱，一袋化肥就是要挣你多少钱，那农民就接受了。所以说这件事是一个很大的启发，那就是要做经营，而且要有挣钱的经营。”

当然，这也是从山西永济蒲韩合作社郑冰那里得到的启发。郑冰以前是从农资店做起的，但是农资店在开始的时候不是合伙干的，而是她自己的一家农资店。后来做起来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她才让合作社承担一些公共服务功能。“所以后来我就反思，前期的成本必须有人愿意来承担，后期还要愿意做成一个公共事业，那么这个合作社的事情就有戏。首先因为利益诉求不一样，其次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也不一样，多方的各自利益诉求再加上本身起步就是最难的。”因此，联合购销的失败，让白飞有了足够的教训，去思考合作社怎么办？农村怎么办？自己怎么办？

返乡与不理解

2011年夏天，白飞大学快毕业了，得考虑毕业后的选择。“我是学金融的，那时候有两个选择：一是去学校安排的银行实习，这样就有机会留在北京的银行工作；还有一个就是留在乡建中心，继续做大学生支农下乡的工作。”

起初白飞没有考虑自己要返乡，而是希望自己在外面理念引导，由合作社的骨干来执行，但是却行不通。“其实还是有一个责任在里面，已经挑起了这个事，然后你撒手不管了，那村里这群人怎么办？而且在农村就是这样，这个事要么就做下去，还要做得好，否则你会永远背这个黑锅。我如果不回来，这个合作社就要解散了，因为没有一个人负责。”考虑来考虑去，白飞自己又不想放弃，觉得必须自己亲自去做，此时白飞已经决定返乡了，因为“前期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就跟自己的孩子差不多，任谁都会觉得舍不得的”。

在决定要返乡时，白飞并不是一下子就回到村里的，而是一边在郑州工作，一边为村里开展一些小额项目，给了自己一个缓冲。“2012年的时候，何慧丽[4]老师打算在郑州推动有机农产品超市，正缺人手，我六期结业之后，就过去了，大概持续了半年。那就是个缓冲嘛！我在郑州可以经常回家，隔三岔五回来做合作社。村里人就会问：现在在哪儿工作呢？我说在郑州，在一个超市里当店长。那时候爸妈也以为是我在郑州工作的原因，才经常回来。”

在这期间，白飞还向滋根[5]申请了一个建设文化广场的项目。项目是2012年春节期间做的，虽然钱不是很多，但在白飞和妇女文艺队的努力下，在村中修起了一个可以跳舞的文化广场，还有几间房子作为乡村图书室提供给小孩看书。“滋根支持的这个项目起到很大的作用，我那时候刚毕业，如果空手回家来，肯定是得不到大家认可的。当把文化广场做起来之后，村里人就认为我这个人很了不起，这会让村里人看到，我返乡回来在外面是有人支持的，是有外部资源来支持我的。这个事做好之后，村里人对我的工作能力，还有对合作社，都有了认可，对于我之后实际返乡算是开了一个好头。”

2012年9月，此时白飞刚满21岁，郑州的有机农产品超市由于种种原因经营不下去了，他不能再在城乡两头继续跑了，于是就考虑返乡扎根了。“当时，知道我的想法时，爸妈都蒙了，他们说这孩子想干吗？到底要干吗？当然，爸妈的压力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村里都说闲话，村里人给他们压力，他们再给我压力；二是爸妈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对我前面的路一抹黑，也看不清楚。所以说他们的压力就在这儿。”

“2012年到2013年真的是要崩溃的一年，太难熬了，所有人都不看好我，然后我就像没娘的孩子一样，因为当时我已经跟所有机构都脱离了，就赤裸裸地站在那儿，没有任何工作可言。村里都说我是找不着工作，没能耐、没出息，又回来了。村里人几乎都看不起我，这种状态几

乎持续了一年。”

以前在乡建中心的时候认为自己就是神，要拯救农民于水深火热当中；回来之后才发现，原来自己才是别人眼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但白飞有信仰，相信前途总是光明的。就如他所说的：“别人瞧不起我，但是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们认可，我的事业和环境会有转变的时候。至于什么时候转变，我不知道；怎么转变，我也不知道，这个信心就是来自我的信仰。当前面没有路的时候，就是靠着自己的信仰坚持下来的，所以每一次在别人讲各种闲话的时候，也是靠信仰来度过的。因为信仰里有这样的教导：不要为自己辩驳，不要辩驳，自然有一天水落石出，不辩驳就是最好的辩驳，事情终究会过去。”

白飞也经常在反思，“村民为什么会瞧不起我？为什么会瞧不起一个回到乡村的小伙子呢？”在农村待久了，后来白飞放下了在乡建中心要作为神去解救农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想法，而是站在农民的角度去理解。“其实他们不是在瞧不起我，他们是瞧不起‘农民’这两个字，也就是在瞧不起自己，瞧不起农民这个群体。因为他们觉得我上完学，就有出路了，手里拿着那块文凭的砖头，就可以砸开由农村向城里跳跃的那个门了。但是我又回来了，又回来种地了，也就成为他们瞧不起的农民。”

返乡，不仅面临着心理上的挣扎，还有家人、亲友的不理解，以及乡亲们的冷嘲热讽。但不管有再多的压力和不适应，已经返乡回家的白飞还得继续在村里生活下去，还要继续探索如何在乡村经营。

从粮食收购再出发

白飞返乡真正开始出现好转是从收粮食这个事情开始的。2013年6月，白飞也开始在村里收粮食，而且从农民那里收购粮食是直接付现金的，这个在村里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按当地农村传统的做法，一般是先赊账从农民手里收来粮食，卖出去之后再给农民钱。当地人开始对他刮目相看。

“当时刚刚开始收购粮食（小麦）的时候没有什么资金，是从老金[6]那里借的，因为第一次贷的那1万元钱，后来我如期还上了，之后又跟他借了5万元、10万元。老金不是相信我，他是相信中心培养出来的人不会不还钱，后来确实如期地还上了，所以说那时候中心也是一个资源嘛。后来我又去跟他讲我要做什么事情，我要怎么做、缺多少钱，他又贷给我，先贷1万元，又贷5万元，然后又贷了10万元，之后就开始收粮食，收了几十万斤。”

对于白飞来说，收购粮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而收购粮食的过程正是他逐渐在乡村扎根的过程，也可以看到一个新型的返乡主体，逐渐被纳入原有的乡村体系中，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第一年在经营的利润上，如果扣除爸妈和自己的劳动力成本，是不

赚钱的，不赚不赔，但我觉得赚了，因为我赚了经验。第一年没什么经验，粮食拉到哪儿去卖都不知道，然后凑巧的是以前参加过下乡调研活动，在南街村[7]调研的时候认识了南街村公司的一位经理，他认识附近面粉厂的一个厂长，那位厂长刚好有一个粮库，那一年所有粮食都卖给他了。收粮食不是收上来就行了，收粮食之后，找什么车去拉，我连司机的电话都没有。所以第一年就是积累经验，后来司机的电话有了，卖粮食的地方找到了，质量如何来把握也有数了。当然还有人脉，因为了解到了乡村各种各样的人：知道有哪些卖粮食的农民容易斤斤计较，还会暗中把一些没有晒干的麦子给你；知道如何和运送粮食的大卡车司机谈判，谈价格；还学到了如何和面粉厂的老板议价，多少钱一斤，最低是多少。”

在开始做第一批粮食生意的时候，白飞的父母特别担心，因为白飞拿的都是现钱，害怕万一亏本了怎么办。那时村里收购粮食的人很多，白飞和他们一样，但又不一样。“很多人说你收粮食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我说一样啊，我也是个二道贩子，我不会把自己说得那么高尚，为农民服务[8]!服务啥呀？没啥服务的。唯一不一样的是别人压秤，我不压秤。还有就是在对麦子质量的把握上，我比较心软，有一次村里一个上了年纪的大爷，满满地拉了一车麦子来卖，特别辛苦，又是大夏天的，但是麦子还没有太干，我也没有让他拉回去就直接给他过秤了。后来因为这事，爸妈还说过我呢。”

正是因为不赊账，直接拿现金收购粮食，也不压秤，服务也比较好，白飞渐渐开始融入了村庄，村里的人对白飞的态度也开始转变了。首先粮食收购给白飞的经济条件带来了改善，同时也或多或少地为村里销售粮食带来了便利。经过两年的探索，收购粮食逐渐成为白飞的主要收入来源，白飞已经可以在村里立足了。现在村里的人慢慢开始认可和信任白飞，也有村民提议要他去竞选村长，但白飞不愿意介入村里的选举纷争，以至于每次村里换届选举的时候，白飞都要离开村子去外面“出差”一段时间。

依托中心资源做生态农业

在2012年辞掉城市里所有的工作之前的一个月，白飞已经开始在村里包地做生态农业了。“当时不敢直接和父母说要回家做生态农业，于是编了一个理由：就是说要做试验，我看看不上化肥、不打农药能不能种出东西来。当时全村的人都在看我的笑话，包括租给我地的人。”白飞承包的是村里租金最低，但随时都会被河水淹没的河滩地，种植的小麦、黄豆这些大田作物，杜绝使用农药、化肥、除草剂，用有机肥替代化肥和复合肥，有病虫害时就用烟叶水、沼液来防治。因为不用除草剂，地里的草经常长得比庄稼还高，只能人工除草。开始的时候白飞的爸妈也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可自己家的孩子还是得帮，就忍着别人嘲笑的话语，躲着别人异样的眼光，弯下本该休息的腰，两人一前一后地走进没有用化肥农药的麦田里，一棵棵地把杂草拔除。

2014年，是白飞返乡的第三年，当地爆发了大规模的蚜虫疫情，危害着正在成熟的麦子，村民不得不喷洒更多的农药。而白飞的地经过三年的养护，已经形成了一个好的生态系统，麦穗上的食蚜蝇逐渐增多，七星瓢虫也飞来飞去。为了保护这些小虫子，白飞停止了喷洒烟叶水和沼液，隔壁田里的同类也逃离那些水深火热的地方，远道而来在此定居，小麦并没有因不防治害虫而减产，反而增加了些。此时村里人开始渐渐理解白飞的做法，从最初看笑话的态度，逐渐开始相信白飞的生态农业，和白飞有些合作了。

因为接受过最理想化的生态农业理念的教育，白飞一直觉得应该用最传统的种子，才会是最理想的生态农业。但是周边基本上都是在市场上购买的种子，于是白飞凭借自己前几年在乡建中心认识的很多做生态农业的农友，比如广西的梁湄雨、四川的袁勇、河北一墩青的成鹏飞，引进他们当地的老品种来试种。白飞想通过引进其他地方的老品种，在当地种植，形成种子库，为以后合作社社员开展有机种植提供可靠的种子。

“2014年，我从广西引进了一个老品种的黄豆，却不适应我们当地环境，光长苗不开花。我种的那块地就在村里去地里干活的路边，每次村里人上地干活的时候，都会顺便拐到我的地里来看一眼，看上去他们比我还着急：‘咦！怎么还没开花啊！这种子是不是不中啊！’后来开花了，村里人终于松了口气，但还是比别人晚了一个月，其他人的黄豆都收了，小麦都快要种上了，我的豆子才刚刚结豆角。”因为黄豆生长的速度比别人的都慢，为了挽回损失，白飞把黄豆当作毛豆来收，并通过友田社把毛豆卖到了郑州，很受郑州的消费者欢迎。当然，白飞也留了一些作为来年的种子，让自己真正做到“返乡有种”。

在销售方面，最初的时候白飞和郑州友田社的姚卫华合作，将生态产品卖到郑州的消费者手中。因为白庄距离郑州还有3个多小时的车程，他们就选择了种小麦、黄豆这些耐储存、适合运输的大田作物。

“其实和几位合作伙伴（郑州友田社、广东沃土工坊、成都绿心田）并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都是长期的合作伙伴。绿心田的许程程[9]经常来这边考察，我们就像朋友一样，遇到产量高一点的时候，价格就会便宜些；产量低一些的时候，价格相应地就会高一些。一次，运输途中面粉受潮，她没有简单粗暴地处理，而是和我一起商量，最后决定把这些受潮的面粉想办法做成各种手工糕点，降低大家的损失。”现在的白飞，已成为绿心田忠实的合作农友，也有很多全国各地的市集和平台都在销售他的产品。

现在白飞生产的东西都很好销售，只要种出来就供不应求，而且价格也比普通的产品要高，村民渐渐开始信服了这个还没结婚的毛头小伙子。“当然我现在的生态农业经营状况很好，很多人都劝我扩大规模，其实这个不是我想要的。这是一个心态问题，因为销售得更多，可以改变更多的土地，所以我需要扩大规模。如果有一天不销售了，我完全可以

种两亩地自己吃，自给自足，也就是说需要做多大就做多大。”

除了生产和销售，白飞对生态农业有着更深层次的理解：“做生态农业之后的好处，就是自己不再浮躁了，因为人只要在土地上工作，那个踏实感真的很强。比如说我在外面开会，一个星期、半个月的，我回去之后第一件事情，就要去地里踩几下、转几圈，看看庄稼的生长情况，因为我觉得那样做能给人很踏实的感觉。”

合作社资金互助风波

2014年年底，合作社发生的事情，让白飞不得不重新考虑合作社到底是什么？怎样才算是一个合作社？刚回到村里做合作社的时候，白飞按照温铁军老师讲的合作社发展的经验“资金互助，制度重要”，在合作社下面成立了资金互助社，并在镇上开了门店。

“当时为了动员农户入股，就联系了中心，中心派了口皓（人才计划八期学员）跟我一块拉了不少人入股。我拉一笔存款要给他们讲两个小时：我是干什么的，我在哪儿毕业的，中央一号文件里怎么写的，中央怎么支持的，然后我们是怎么干的，然后他才放心，才在你这儿存1万元钱。如果他有5万元钱，不会全放在这儿，他要先放1万元，有时候没有到期他还要试试，看能不能取出来。那时候我就说：你存一年的定期，没有到期我也要给你取，然后还给你送到家，你要存钱的话我去你家拿钱，给你开票据，服务到家。其实那时候他们想贷不存，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那会儿就有人趾高气扬地往我这儿放钱，还要先说下：你这么小年纪，完全是给你爸妈面子。那我就得忍辱负重了，然后还要装出很感激的样子，合作社的资金量就是这样上来的。

“其实合作社的资金互助社一直都没有挣钱，根据政策的要求，为了防范风险，资金互助社要买软件、买设备，还要按照银行的要求装修门店，还要买票据，光票据买下来就花了1万多元；还有店面的房租，还要给柜台的人开工资……在合作社不赚钱的时候，社员和骨干们都闲着，该出去打工的出去打工，该下地的就下地，做成做不成都与他们无关；但是一旦听说要盈利了，他们只管向我要钱。其实那时候只是我自己收粮食有些盈利，但由于我长期在村里做合作社，和合作社是融为一体的，这些合作社的骨干会觉得我赚钱就是合作社赚钱，才不管是从哪儿赚的钱。所以说当时很无奈，跟他们又没办法解释。你要让他们来入股共同经营，他们也不会，因为做这些事情很明显是没有在外打工的收入高的。他们的愿望其实就是你挣钱了，给我们分红就行了。那么作为我来讲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我要从外面贷钱来收购粮食，所有的风险和成本都是我来承担了，对我来讲这不符合经济人理性的选择。

“后来，原先的合作社骨干给我压力，他们几个提前商量好，在下面开完私会了，然后来找我说：要么我们集体退出资金互助社，要么你就给我们说说，挣多少钱？该怎么分就怎么分。开始他们以为我会顶不

住，我就干脆直接一些，所有原先买票据的这些成本，我一个人承担了，你们该出去就出去，合作社挣的钱（主要是资金互助社的存贷款利息差），全部给你们分红。最后彻底分清是2015年3月，1万元钱两年分了1200多元，退出股金加起来也有五六万元钱。其实那时候大部分存款都是我亲戚的，也没全退，但还是得有一个合作社的平台，以前的田垦合作社理事长、监事长都不是我，章程里面写的我只不过是资金互助社的总经理，后来就重新注册了一个合作社——迦南合作社。他们刚退出去的时候影响是非常大的，他们会给新合作社散布负面消息，煽风点火，说你这不好那不好，一年多都缓不过来劲儿。刚好2015年中心又派来了久菊（马久菊，人才计划九期学员），在我这里待了一年，帮合作社做老年人集体生日，还有妇女文艺活动，这些活动给合作社带来了很多正面的影响，慢慢地合作社也在村里站稳了脚跟。”

在经过这样的一番“较量”之后，白飞在自己新成立的合作社中开始探索，这也让他开始重新思考到底如何来看待合作社和农民组织。

返乡的意义

白飞是一位特别具有反思和思考能力的人，在经过每一阶段的历练或者痛苦之后，都会有一些特别有意思和深度的思考。谈到自己的未来，白飞说：“对于自己而言，返乡的意义其实就是得活着，还要活得很好，即使是返乡种地也能活得很好，这就是意义。你的意义并不是脱离了主流社会你就活不下去，你还存在着，存在着就是意义。至于你要让所有人都认同你，这不可能，也不要做那样的影响，只要有这个状态就行了。”

（口述：白飞；撰稿：汪维行；修订：刘良）

3.3 彝族姑娘康丽的四次创业记

人才计划七期 李康丽[1]

我出生在云南北部的彝族山区。我的彝族名字叫“依鲁阿娜秀”（意思是美丽的花儿），在村里边，大家不知道我汉族名字，都叫我娜秀。我的汉族名字叫李康丽，大家比较喜欢叫我“彝族姑娘康丽”，这也成了我的微信名字。我自小生活在农村，内心理想的生活图景是：在广阔的田野上，有一所简单但温馨的房子，房前屋后都是大片的土地，可以耕耘出我喜欢的花草、瓜果、蔬菜和粮食。要是能在院子里养几只老母鸡捡鸡蛋吃，那就更好了。晴时下地干农活，雨时泡一壶茶、看一本书，不看他人脸色，不去讨好任何人，凭借自己的双手顶天立地地生活。

在小的时候，从大人的世界里我就清楚地知道，未来要想过得好，就一定要离开家乡，走进城市，因为家乡太贫穷落后了。村子里生活的很多农民都和我的父亲母亲一样，辛苦劳作，但收获微薄，和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为了生活不得不远走他乡。2010年高中毕业，因为没考上理想的大学，当时多少有点年轻气盛的我，就没有去上大学了，到昆明的一家公益机构做志愿者，从一个“小跟班”开始，稀里糊涂地走上了生态农业创业的道路。

从帮帮健康生活馆开始

2010年我到昆明的一家公益机构——真善美书家去做志愿者。在做志愿者期间，当时云南对转基因讨论得比较多，就结识了一位大学老师，那时他推荐我看一些反思全球化的书，比如加莱亚诺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舒马赫的《小的是美好的》等，虽然当时自己也没太想明白，但开阔了视野，也就不再满足于打工、挣钱、过小日子的那种生活了。

2010年10月，真善美书家分出了一个团队做帮帮健康生活馆，主要做生态农产品的销售，收购云南各地小农户、合作社的生态产品，在昆明开了一家门店销售。那时候我是在店里做销售，开始接触到生态农业，也接触到不同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后来生活馆经常要野生蘑菇，我家乡正好有，于是就开始让家里人去采野生蘑菇，又从蘑菇发展到核桃，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把生态农业和自己的家乡联系起来了，也为后来自己的返乡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当时自己还是懵懵懂懂的小女孩，什么都不懂，就跟着大家一起做，这算是我的第一次创业经历吧。

绿盟销售记

帮帮健康生活馆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团队，做事上免不了不太细致，所以在一段时间后，我觉得有必要离开了。2011年7月，我来到北京参加人才计划培训，这是我踏上探索乡村建设道路的开始。

初到乡建中心时，正处于闷热的夏天，七期班的第一次培训被安排在中心院子里，每个人都心怀建设乡村的理想，激情澎湃地在一起交流、讨论、学习如何建设新乡村，直到深夜还无法平息内心的激动，时常引得隔壁的村民大叔来投诉，但大家依然激动，最后大叔“投降”了。

培训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国仁绿色联盟，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学习和工作。那时候绿盟的人员还比较多，刚去的时候，绿盟有李留洋、魏巍、李昭等人，我们七期班又分了三个人过去，刘培、魏川和我；后来又来了另一个女孩张连娥。

当时在绿盟做的第一件事是捡红豆，因为当时中心的储存条件不好，从农户手里收购上来的红豆很容易生虫，需要把被虫子吃了的豆捡出去，把好的分装销售。长虫的那些给院子里的鹅吃，到后来鹅也不喜欢吃红豆了，我们只好把那些长虫的红豆和鹅粪掺在一起发酵，撒在地里做肥料种菜。好的红豆，在淘宝和市集卖了一些，还是没卖完，最后剩下的都让张连娥用我们中心取暖的煤炉，试做了各种红豆食品，于是大家给她取名叫“红豆姑娘”。2011年的冬天我们一直与红豆为伴，也是我们在寒冬里有趣而温暖的回忆。绿盟主要有两个销售渠道，一是参加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二是在淘宝上销售，我主要的工作是参加市集。那时候我和红豆两个小姑娘，一起扛着上百斤的箱子，倒公交、倒地铁穿过半个北京城，参加每一场市集。从最开始一次市集最低卖200多元，到2012年一次市集多时接近1万元，中间也有很多故事。2011年年底在望京的一个集市，我们摊位旁边是悠然社，一个小姑娘在卖白菜，十元钱一斤的大白菜，后来一个老太太就骂：“你们这群骗子，超市大白菜那么大、那么好，白白嫩嫩的，才几毛钱一斤，你看你们这白菜又有窟窿眼什么的。”当时骂得特别厉害，把那小姑娘都骂哭了。那时候买菜的都是一些老人，一般年轻人要上班，所以销售量很低。印象中还有被临时取消的经历，原本联系好的场地，说明天叫大家来赶集，但在夜里12点睡觉之前，接到信息说那个地方不让我们去了，我们只得灰溜溜地取消。到2012年，市集开始有了固定的场所，并且每个周末都能比较有规律地办起来了，市集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大家的销售额也一步一步提升。

北京的市集对我很大的一个触动是团结力量大，相互之间的支持是很重要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有人是想买香菇、木耳，或者有人想买其他东西，可能只是冲着一个东西去的，但是去了以后，就变成了所有人的客户。你带了一个客户，如果是十个人在那儿摆集，就有十个客户，所以十个客户是共有的。当时大家真的很团结，没有不让我的客户买你们家的东西，大家没有竞争性的想法。当时大家是相互帮忙，比

如有人说我想买花生油，就会推荐绿盟有花生油，或者谁需要什么菜，我们就会互相推荐，这是共享的一个过程，也是市集能够成功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但是，2012年也是绿盟最折腾的时候，因为中心各种矛盾和纷争不断，最后我们绿盟团队搬到柳林。刚搬过去是12月，张可（那时我和张可已经确定了关系）当时还兼着小毛驴出纳的工作，因为到年底了账目比较烦琐，他经常很晚才回来，大冬天的也没有暖气，我一个人要包很多货，又包不完，他回来时已经很冷了，我就抱着他哭。到2013年，因为绿盟牵扯到两个机构之间的事情，也包括我们自己干活的人之间的内部矛盾，所以我觉得是时候离开了，于是在2014年2月，我们离开了绿盟。也正因为有了这段经历，我们才深刻地体会到了创业的艰辛，有点像生一个孩子、养一个孩子的那种感触，从开始创业什么都没有，然后一点点劳动，一点点积累，然后有点什么，但又需要细心呵护的过程。这是我的第二次创业经历，感情很深，打击也很大，以至我和张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法完全释怀，总觉得绿盟可以做得更好。

在绿盟期间，我也通过绿盟的平台卖家乡的产品，主要是野生菌和核桃。当时是抱着做公益的想法，把利润分享给大家，自己在中间不赚差价，于是又鼓动村里人做合作社。2012年把我哥和村里的一些人带到北京参加合作社论坛，他们一看也挺激动的，回去就把合作社做起来了，陆续给绿盟提供核桃、香菇等产品，都是没有包装的、大量地发货过来，然后贴上绿盟的标签。后来因为在市集上卖得比较好，合作社也给其他的渠道和平台提供原产品。也因为合作社没有完全绑定绿盟，有了其他的销售渠道，后来我的返乡不是从零开始，合作社也成为一个很好的让我可以回得去的平台。

清净家园的思考

从绿盟出来后，我徘徊了大半年的时间，直到2014年7月，又阴差阳错地去了清净家园做销售、做网店，算是开启了我的第三次创业。当时清净家园也才开店半年左右，在那边感触比较深，我们老板娘和老板人特别好，教我们从洗碗、扫地开始怎么去做一件事情。在清净家园，我看到他们怎么样去处理内部的人员关系，以及处理与外部的关系。

而在中心那时候，可能我们做概念、理论性的东西比较多，甚至我觉得中心有矛盾的时候，处理方式也是很直接、很伤人的。比如说中心有很多集体活动，打鼓、跳舞都要一起干，这些很琐碎的事情对于我们具体做经营的绿盟团队来说，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跟大家一起去做。那时就会有人说你们不团结，没有积极参与中心的活动；还有人说你们二道贩子，挣钱是一件很不道德的事情。总得跟大家解释，跟做贼似的，心里挺不光明磊落的。

后来我们在清净家园，慢慢地对这个事情释怀了，因为我们要给别

人开工资，要有运营成本，会去核算成本。做商业是一个正当的事情，有一些利润是非常正常的事。我们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得到了一定的收入，这是一件非常有尊严的事；如果是因为他人同情而得到的，这事也是可以做的，但是对我们来说就不够平等和公平。所以做商业、做销售，这本来就是一个等价交换，第一，我们不压榨任何人；第二，我们也可以从中得到一点收益来维持自己的生活；第三，我觉得这事情挺好，自己也很喜欢。我不用再去给谁证明，我到底是不是二道贩子。我也不用给谁交代，我的钱花到哪里去了。这是我在清净家园受到的启发，反正我们不是偷的不是抢的，做这个事情光明正大。

返乡与追求自我

2014年我就想返乡，那时候手头上还有几万块钱的积蓄，但时机不太成熟，也没想好回来怎么办，于是又向亲戚朋友借了一点钱，付了我们在县城这套房子的首付，就和张可一起去北京闯荡了。

在北京有一个比较深的感触，在很多机构和平台，不管做销售、做策划、做宣传，还是做店铺管理，我的位置是可以替代的，找一个像我一样的人并不困难；但是对于家乡来说，我对他们而言是不可替代的，他们很难再找到一个可以为他们做这方面工作的人。在自我价值实现上，我觉得回到家乡能做更多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我就准备要回来了。当时家里的合作社主要是我哥在撑着，绿盟开始减少向我们的进货量时，合作社的经营压力也很大；村里人也觉得我哥挣了很多钱，有个别的就会在背后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实际上他经常贴钱，过年过节给合作社的老人买点东西，因为村里的舆论压力比较大，所以他也不想干了。到2015年年底，我就确定要回来了，如果再不回来合作社就该解散了。

2015年我和张可结婚了，考虑如果有孩子了在北京怎么养，还有上学等事情，这也使我们比较倾向于回家。后来父母也经常生病住院，年纪大了，总希望子女能在身边多一点，再加上我也很坚持，所以就回来了。我在返乡这件事情上一直比较有主见，另外我父母也比较开明，对我做的选择，不一定能够理解，但是至少能够接受，因为我做很多事情比较坚决，不会受别人很大影响。返乡的时候，我就想明白了自己比较适合做销售，主要做野生的核桃和菌类，因为我有这方面的经历，家乡刚好也有这些资源。

刚回来那会儿，自己还有很多的计划，想做的事情很多，也保留了在中心当学员时每天写日记的习惯，还有年前规划、年中总结、年后总结等，写了满满的一本日记。但从我怀孕到生了小孩之后，就是两眼一抹黑，能做到哪儿算哪儿，还好前些年在北京积累了一些人脉资源，去年一年算下来有三十来万的销量，减去投入，基本上能满足一家人的生活。

2016年6月以前，因为刚回来没什么收入，积蓄也花得差不多了，

我还会挣一些生活费，去别人的葡萄地里打零工，还去摘过桑果卖，摆批发市场、早市等，挺不一样的经历。后面张可因为在外面打工受伤，6月也回家来休养，此后我们再也没出去了，就在家专心做自己的事情。最开始我们做一些干货的销售，核桃和野生的菌类比较多，从7月开始，我们也跟合作社那边重新商定，添加野生牛肝菌类、松茸类的鲜货，2016年干核桃差不多有5吨左右，合下来新鲜核桃有10吨多。因为我们这边的核桃树大多属于野生、半野生状态，不用担心化肥农药过量的问题，所以以前都是社员自己来管理，自己来晾晒。但是后来发现大家晒不好，质量上不太好把控，于是从2017年开始，就由我们自己晾晒，统一管理，社员只管给我们提供原产品就行了。

从9月初开始一直到10月是核桃的收获期，核桃也是我们的主打产品，但在我们县城核桃的价格波动比较大，有时核桃的市场行情不太好，一天跌三个价的都有，比如早上收购是11元钱一斤，销售是11.5元，还能赚5毛钱的差价，但到晚上拉到城里后跌成10元钱，就赔了。但我们有自己的销售渠道，不太受当地价格的影响，因此我们都是按照县城最高的价格给农户。因为我们都是少数民族，老年人居多，除非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其他的农户都需要给他们现金，所以开始时我们的资金压力也很大。还好我们跟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平台等渠道合作，以及一些消费者团队，会通过预订的形式给我们预付款，也大大缓解了我们的现金压力。

我们在与消费者交流的过程中慢慢摸索，产品品种也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在一点一点地增加，比如核桃，最初我们是带壳卖，后来就有消费者提出需要核桃仁做面包、加工之类的，我们就剥核桃仁；剥完核桃仁就有核桃芯木，可以用来泡茶喝，于是我们也会卖点核桃芯木；可能有些时候核桃剥得比较多，一时半会儿卖不了，那就榨点核桃油。一个核桃就这样一点一点衍生出来了这些产品，到现在为止我们一共有十几个品种，以核桃、野生菌、蜂蜜为主，在我们能力范围内去做，也不希望一下子能做到多大，关键是要过好自己的生活。

返乡这两年来，我特别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跟消费者。过去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刻薄的人，对别人不太相信，比较猜疑，但是跟很多消费者接触之后，我觉得并不是我要赚你多少钱，你剥削了我这样的关系，虽然有些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但还是成了很好的朋友，这些事情也让我很感动。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最初发新鲜的松茸时，没有经验，因为路途遥远，加上不知道路上出了什么状况，到一个上海的消费者手里时，松茸酸掉了。当时我们就跟客户说我们给你补发，但是他当时在国外，他说："你不用给我补了，等我回国，再买一份，那点钱就当支持你的。"我挺不好意思的，因为是四五百元的货，后面我们还是补发了，但他说得特别真诚，他也继续买我们的东西，这个过程让我对人性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好事多，这些消费者对我们的肯定、支持，让我重新认识了这个社会，也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以前我觉得自己有那种要拯救世界的很大的想法，到了中心、到了绿盟之后，在那样的环境和氛围下，更加深了这种想法，要拯救世界，要拯救人类，要改变整个环境安全、食品安全问题。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些事情有点远了，我开始有一点明白，真正的奉献，应该是一种自我需要，一种好好活着的自然结果，而不是刻意，更不是道德优越感和功名。这些年来曲折的创业历程，也让我明白了我热爱每一粒蕴含希望的种子和可以孕育出生命的土地，我渴望与每一个农民握手言谈，我享受在田野里自由劳动的幸福感，我快乐在品味大自然随意打造的精致生活里。以后的人生里，乡村于我是一种自然的生活，已无关悲喜，过去留在心里的也只剩淡淡的回忆，未来我希望更多人都可以找回内心里的故乡，幸福地生活。这就是我第四次创业的感悟，也许是最后一次，也许不是。

（口述：李康丽；撰写：刘良）

3.4 扎根家乡的大学生村干部

人才计划九期 刘坤[1]

从大学开始的乡建求索

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刘坤于2010年离开家乡，前往山西农业大学追寻自己的梦想。

大一对刘坤来说是醉酒沉睡为一梦。

从见面会、军训再到各种晚会，各部门对新生的教育以至开始真正上课，眨眼间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之后就没有什么值得记忆的东西了。

刘坤进入大学之后接触到带班的学长学姐，几乎影响了他以后的大学生活。在那个时候，几乎每个班都会搞一次宴会，大家一块出去吃饭、喝酒。这也是刘坤进入大学后的第一次聚餐，每个人吃着说着，感情真挚得似乎唯有二锅头才能表达情意，那就举杯共饮，一杯又一杯，醉了，几乎每个人都醉了。清醒的说感谢，不清醒的也说感谢，大家都醉了。

考试时，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人在干着同一件事情——准备小抄；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小抄纸片，见到那么小的字体。考完试之后，一切忘记，这太神奇了，大一一年就这样结束了。刘坤使劲地回忆，也想不起大一到底都做了些什么，或者准确地说大一其实就没做啥。

想想大一这一年，其实不是在上大学，而是在忘记大学以前的生活学习。这一年不是很多人说的迷茫的一年，而是无知的一年；这一年过的不是大学生活，而是想象中的大学生活；这一年也是苦苦挣扎的一年，为了理想的大学生活不断尝试的一年；这一年是闭眼都做梦的一年，一切都太新鲜了，让自己感觉世界真的很大；这一年是最闲的一年，虽然做了很多事情，但几乎找不到几件有用的。

在大一下半学期的一个下午，刘坤躺在宿舍的床上睡着了，不知不觉中已经睡了三个小时，但好像被什么东西给猛然击打了一下，一下子惊醒，坐起来睁开眼看到的是夕阳，宿舍里空无一人。这种夕阳西下的情景，不知为什么突然让刘坤有一种想自我毁灭的冲动，心里边特别难受，也找不到任何人去倾诉。

也许是自我的不断探索与思考，刘坤在大一劳动节放假前一两天的时候，偶然看到学校大学生支农队的海报，于是就参加了一次农村合作

社的调研活动，骑着自行车跟着支农队的同学在学校周边的村子做了三天调研，那时他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社会调查，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自5月开始接触到大学生支农队，到6月社团举行下乡志愿者招募以及培训，这些刘坤全程参与，并且还做了很重要的工作，他设计了培训的课程，不到一个月，刘坤就已经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感觉到自己还是活着的。随着暑期的来临，支农队即将开展下乡活动，一共有四支队伍，刘坤被任命为其中一支的队长，结果他的那支队伍一直没找到下乡的点，他们骑着自行车把学校周边的好多村庄转遍了，结果还是让人很沮丧。无奈之下刘坤的队员就被分到了其他队，而他则是跟着其中的一支队伍下乡。下乡还不到四天，另一支队伍的队长突然家里有事，刘坤就被借调过去当队长了。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当了一回队长，完成了刘坤的第一次下乡。

社团组织的下乡结束之后，刘坤被社团派到了江苏去参加第十二届大学生支农交流会。他一个人坐火车赶往目的地，差不多20小时的车程，但是刘坤几乎没有睡觉，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到了江苏后，看到那么多的全国支农队友，有一种找到组织、找到同志的感觉。完成了理论学习，准备着又一次下乡，又被告知担任队长，下乡地点就在江苏嘉泽跃进村，当时做得比较好，办了一场很有效果的晚会。

下乡本身并没有给刘坤带来多少深刻的认识与收获，但是参与支农队以及其后的经历，是一种在大学里找不到的东西，这让刘坤感触很深。大二开学，社团面临换届，刘坤被告知担任大学生支农队副队长，这一年他管理社团，带着社团搞活动。自从加入支农队后，刘坤的精神是饱满的，战斗欲望极强，经常晚上11点熄灯的时候才回宿舍。大二这一年，刘坤在社团这个平台上结识了很多真正的朋友，能讨论事情，能一块去做事情，并且做的还是有意义的事情。

读书、思考是大学生活的一部分，是人生的主旋律。刘坤从大二下学期开始读书，将书籍看成生命的养分，每个月最少阅读三本书，涉及范围比较广，有文学、人物传记、历史、经济学、社会类等，每个月写三篇文章，可以是读书总结，也可以是生活中所思，但一定要是自己的东西。

每天读书、学习、思考，让刘坤感觉很充实，因为在阅读的过程中解开了自己不少的疑惑，也有许多新的感悟与看法，特别是阅读历史与人物传记的时候，那种将自己当成历史人物不断演绎的过程似乎是一部部电影，不仅历史活了，自己的感情也丰富了。

更重要的是，每周刘坤会和那些支农队友相互探讨自己的新认识，针对每个问题大家都会发表自己的看法，也经常会和大二的学生一起交流。

从大三开始，刘坤开始认真思考自己以后要做什么，思考得更为系

统、深入以及切实可行，想以后做教育工作，这是有一定现实社会原因的。当下的教育很不成功，但是没有多少新的尝试，更没有真正的教育家出现，出于对大学的反思和未来的思考，大四的时候刘坤决心要走出校园，参与更深入的乡村建设工作。

参加人才计划与西部计划

2013年7月，刘坤参加了第九期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在人才计划为期一年的时间里，刘坤在梁中心（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青年培养部门实习，学习乡村建设理论，了解如何在村庄里做文艺活动，如何发动农民形成组织化。刘坤在东北、东部沿海、大西南等二十多个省市走访高校支农社团和返乡创业青年，了解返乡青年的生态创业经历，认识了众多朋友，积累了很多人脉资源。

临近毕业季，和很多大学生一样，那时的刘坤原本也想着要考研究生。但是，一年的人才计划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人才计划结束的时候，刘坤的想法也变了，他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不断地在催促着他，投身于实践吧！他觉得只做青年人才培养工作，不足以满足他内心的呼唤。他想要在更大、更广阔的实践空间里获得人生的价值。

2014年7月，刘坤毕业之后没有选择继续留在梁中心。他要寻找适合自己生活发展的空间，于是参加了西部计划——西藏专项服务。去的时候，他想着这一辈子就扎根在西藏了。到了西藏后，刘坤被分到了居委会工作，每天的主要任务是整理文案资料。除此之外，刘坤还特别喜欢到社区里跟藏民交流，但因为不懂藏语，刘坤跟藏民交流起来有些困难，他每天大部分的时间仍旧是在办公室里，日复一日地做着相同的工作。在西藏，每天都有大把的空闲时间，他计算自己全年365天，把所有工作累加起来，按照每天满勤工作计算，总共才10天。为了打发时间，刘坤开始背诵《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来填补自己的空闲。

刘坤刚开始参加西部计划的实领工资差不多4000元/月。到了2015年年初，因为领导的赏识，专门将他吸纳到驻村工作队里，这时他的实领工资涨到了5300元/月。2015年年初的日子里，这种高工资又闲适的生活，让他感到心慌，感觉年轻人不能如此，此时他开始萌生了回去建设家乡的想法，认真思考后决定报考家乡陕西省淳化县的大学生村干部，主要是看重这个岗位能深入农村，因为平常就关心时政、三农等问题，仅复习了15天的他就以高分成绩如愿拿下了大学生村干部这个岗位。

驻村未遂与卖苹果

2015年7月，西部计划结束，刘坤回到了家乡，成为陕西咸阳市淳化县官庄镇的一名大学生村干部。淳化县组织部把刘坤分配到了官庄镇沟渠头村，任村委会主任助理，这样分配主要是考虑官庄镇离刘坤家里

近，情况熟悉，工作起来更顺手。2015年9月刘坤正式上班，每月工资2333元，刘坤心想这样既可以保证自己基本生活，又可以驻村做事，算是返乡一个很好的开头。

上班之后，他发现自己虽然驻村点安排在沟渠头村，但和绝大多数大学生村干部一样，平日在镇上办公，工作内容就是在办公室里整理材料。工作一个月以后，刘坤便开始向镇领导申请驻村工作。因为没有其他村干部彻底驻到村子里，县里领导出于安全等综合考虑，不同意他驻村。这样一来，他感觉自己原来在梁中心学习的组织农民、生态农业、农村文化营造等农村工作经验没有了用武之地。但是，内心里打定主意一定要驻村，既然暂时不能驻村，但总可以做一些有利于农民、能带动农民的事情吧。

怎么样才能带动农民呢？首先自己家要先做出个榜样来。2015年10月，淳化县的电商刚开始起步，刘坤自己家里有10亩地的苹果每年也愁销路，于是他就从卖自己家的苹果开始，试水电商销售。刘坤在大学及参加人才计划期间，拥有了很多人脉资源，通过这些人脉资源，刘坤拥有了相当多的消费者客户群，于是自己的电商平台建立起来了，自家的苹果也不愁销路了。

2015年11月，刘坤开始销售自家苹果等特产，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总共销售了7000多斤红富士，再加上1000多斤核桃和少量黄花菜，销售收入4万元。在做农产品销售的过程中，他坚持再好的农产品价格也不能太高，定的价格一定要老百姓消费得起，因为在他眼里，农产品的第一属性首先是养活人，让人生活健康，利润适当挣点，能保证自己的生活即可。这个探索也使得刘坤成了全县100多名大学生村干部里，唯一做农产品网络销售的村干部，他也靠电商卖苹果卖出了一定的名声，他的电商平台在淳化县阴差阳错地火起来，成为淳化县最早一批电商平台，2016年还荣获县政府5000元奖励。

村干部与创业

刘坤选择回家一边做大学生村干部，一边进行农业创业，这些事情父母并不太赞成。刘坤发现自己借用村干部这个角色，在父母看起来还算是一个比较体面的工作，自己的生存压力和外部舆论压力也会小很多。同时，刘坤自己通过电商挣了4万元，其中3万元都给了父母，自己只留了1万元，这也让父母对他的返乡有了更多的支持。

2016年春节，刘坤和自己在大学期间相识的邻镇姑娘程龙女结婚了，妻子在咸阳市区工作，刘坤留在官庄镇继续村干部生活。结婚后，妻子辞去了在咸阳的工作，在官庄镇附近的电商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妻子干脆辞职回到刘坤身边，全力帮助刘坤打理电商平台的事情。

但是，刘坤还是希望妻子在县里谋一份稳定的工作。他觉得妻子有

稳定工作，能经常照顾家里，自己也好在外边做事业。

精准扶贫项目的帮助

2016年3月，国家精准扶贫政策项目推行到了沟渠头村，主要是大棚香菇的生产，具体操作是在沟渠头村建设9座香菇种植大棚。每个香菇大棚的造价约为1.7万元，其中国家精准扶贫项目补贴3000元/棚，其余资金由大棚承包者自筹。刘坤和村里其他两名干部，三个人每人承包了一个香菇大棚。其余6个大棚由沟渠头村贫困户每人承包一个。由于没有积蓄投入，刘坤向朋友借了1.8万元用于建设自己承包的香菇大棚，相当于自己全年的工资预支了一半。资金到位后，香菇大棚很快建成。

香菇种植从3月开始，一直到7月采收，每个大棚能产出4000—5000斤鲜香菇。鲜香菇的市场批发价格为每斤5—6元。到了7月，香菇每隔一段时间就能采收一批，拉到市场按批发价格去销售。第一次是刘坤亲自开着三轮摩托车，装了600多斤鲜香菇，行驶100多公里，翻过两个山沟到隔壁县城的批发市场去卖。这样一趟跑下来，刘坤感觉长途运输实在是太辛苦了，随后他决定豁出去了，把鲜香菇全部晒干后再卖。6斤鲜香菇才能出1斤干香菇，当年产的所有鲜香菇晒干后只有500—600斤。但干香菇耐储存、好运输，可以在电商平台上销售。刘坤通过自己的微店和“欢耕辛语”微信公众号推广，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看到他的创业故事和产品。2016年9月刚推出时干香菇的价格是50元/斤包邮，因为产品质量好，消费者们建议香菇价格可以上涨，刘坤重新核算成本后，当年中秋节之后将价格提到79元/斤包邮。2016年，刘坤除了香菇销售之外，还有自家的10亩苹果、少量的黄花菜和核桃，全年的销售收入是6万—7万元，净收入为2万—3万元，将返乡与自己的创业很好地结合了起来。

与此同时，村里其他农户如果有卖不完的鲜香菇，也都晒干后找刘坤帮忙销售，最终刘坤把村里所有干香菇都销售出去了，通过自己的榜样作用带动农民一起致富。

驻村与入户

刘坤在镇政府办公已经很久了，但他依然想着要驻村。到了2016年5月，刘坤强烈要求驻村，没等镇上有回应，他自己就搬进了村子里面。镇里领导得知后，打电话把刘坤批评了一顿，让他即刻回到镇上，便于管理。但是，刘坤这次是下定决心要驻村，于是回到镇上后跟县委组织部表达了自己强烈的驻村工作意愿。到2016年11月，刘坤终于驻到村子里去了。同年12月，刘坤的电商平台“村里娃”商标注册成功。

真正驻村后，刘坤发现第一关就是如何入户了解农民情况。为了通过这一关，他经常思考入户的关键是跟农民怎样聊天，如果自己不了解农民的需求，对于农村的未来没有设想，那么这一关就过不去。

深入农户家后，刘坤发现跟农民打交道或是做农民的工作，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用眼前利益来带动农民。刘坤认为农民不愚昧，思想也不守旧，农民也不会相信金钱，很多人认为农民相信眼前利益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以前做农村工作之所以付出很大，收效甚微，之所以政府动、农民不动，主要原因就是村里没有农民能够信任的带头人。刘坤意识到要想引导农民做事，自己就先要做这个带头人，踏踏实实去做，然后再找村里面几个大户跟着做，随后慢慢建立信任，农民就跟着做了。刘坤觉得农民相信的是“说给农民听，做给农民看，领着农民干”的带头人。

未来村庄发展规划

现在沟渠头村里的产业主要以苹果树为主，农民普遍的发展思路是先栽树，后找市场。刘坤觉得这种思路特别落后，当今市场行情变化不定，种果树的投入产出周期至少3年，到时候产出的苹果有卖不出去的风险。

刘坤的设想是把沟渠头村打造成一个带有关中特色的生态农业民俗旅游村，而不是一产农业。村里要搞农业养生、剪纸、美食坊等关中特色农业文化的三产服务业，这个服务业里，要农村整洁、农业生态、农民热情。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他觉得要做好这些，必先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有了全村大部分农民的自觉参与，这个事情才能成。

早在2016年暑假，刘坤就邀请山西、陕西等地的高校大学生支农队来村子里实践。大学生支农队在村子里搞文艺活动，做支教和调研，使得村子里的气氛一下子活跃了起来，村民们对大学生来搞文艺活动特别欢迎。大学生下乡期间，刘坤组织人手在村里办了一场文艺晚会，整场晚会办了4个小时，村里大部分农民几乎未经动员就全程参与其中，而且十里八乡的人都来了。

而在过去，很多村都是发钱才能让农民来开会。这两者比较，充分说明农民缺的是精神文化、精神教育。刘坤觉得要提高农民素养，加强文化精神建设合情合理。文化活动也不用什么成本，农民还愿意参加，要先搞文化，后搞经济。

为了把沟渠头村的妇女组织起来，刘坤设计了四个“十佳文化活动”：第一个“十佳”是评选村内十个最佳环境卫生示范户，尤其是农村的厕所改造必须纳入环境示范户的评选当中；第二个“十佳”是评选村内十个巧媳妇，包括臊子面、搅团、饸饹面、馒头等在内的十种关中特色美食都在评选的范围内，每个特色美食评选出一名巧媳妇；第三个“十佳”是评选村内十个好儿媳，孝顺公婆，能处理好家庭关系，让家庭和和美美；第四个“十佳”是评选村内十个教育孩子特别讲究方式、母慈子孝的家庭。

这样就能弘扬正能量把村里的人心聚集起来，也能把村里的文化发

展起来。同时，评选出的几十个示范户可以为以后特色民俗乡村旅游打下基础。对这些农户稍加培训，就能接待外地的游客来村里体验关中农业、美食特色文化。通过文艺活动把村子里的气氛活跃起来，游客来村子里吃住心情就会很好，村里少花钱还能把特色旅游这样的大事情办了。

目前，有很多城里人暑期想到关中的乡村避暑，想去看关中特色的房子，品尝特色美食，带孩子学做面塑、做面条、蒸馒头、剪纸等体验特色民俗，特色民俗旅游市场空间很大。刘坤觉得特色民俗旅游这个远景规划，现阶段最重要的是村庄的内部组织建设。刘坤打算运用“互联网＋”，在网上建立一个“沟渠头”村公众号，村里有什么大的文艺活动，或者大的事情，都发到公众号上面去。

同时，面对已经被各种资本组织的农业服务市场，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刘坤认为村干部将村民组织起来，走出去对接市场才会有出路，否则单家独户过分依赖批发商来收购，赶上市场行情好就挣钱，过几年赶上市场行情不好又赔钱。对于村内现有的农产品销售，他觉得要把本村的农产品做出特点，做出品质，首先应注重打开县域市场。沟渠头村的农产品，淳化县的居民要先消费得起，愿意消费，这个农产品的生产—销售链条才能持久。在这一点上，刘坤借鉴了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的发展经验。

未来，他还是想着再坚持做几年村干部，而且一定是要驻村的。如果空间不允许，他会毅然决然辞去这个体面的工作。他对组织妇女工作很有信心，相信从妇女组织突破，定能逐步把村里的文化工作做起来。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村里一定能发展得更好，这也是他给自己压的担子。

（口述：刘坤；整理：梁少雄）

3.5 试着回到家乡

人才计划十期 陈迪桥[1]

休学打工

2006年6月，我念完了高二。早在未放假之前，我已经决定要休学一年，外出打工。放假后，不顾家人的反对和老师同学们的挽留，我和另一名同学就坚决地离开了家乡，背上了外出打工的行囊。

之所以想外出打工，一方面有家庭经济的影响——家里经济来源主要靠父亲一个人外出打工，母亲在家种地。由于长年劳累，他们的身体都不好，特别是父亲，由于经常在阴暗潮湿的矿井下干活，受过几次工伤不说，还患了些风湿类疾病，我不想拿他们的健康换自己的学业与前途，当时我和弟弟都在上学，我想减轻他们的负担；另一方面，则是自身的原因，是对自己在学校表现的不满，原来很克制花钱，上了高二后同学间吃喝、送生日礼物等消费主义的行为越来越无法控制，离开学校时我还欠下一个好友100元……总觉得自己在虚度时光。

第一次两个人一起出门（本地方言指外出打工、找活路），先去了堂弟所在的建筑工地，当时是在陕西宝鸡。辗转了两个工地后，我和同学又去了西安，经另一名同学介绍，去了她表哥承包的位于咸阳的建筑工地。在那里，我们坚持了四个月，现在想想，我最佩服那时的自己。当时的工作应该说是超出身体负荷的，我是木工小工，负责帮大工找材料，木方、搭架子用的钢管、夹子，很多时候靠肩扛手抱，配合织模板、拆模板和顶板等，晚上还常常加班。每天起床，手脚都是麻木的，特别是脚，因为没穿劳保鞋，脚底经常被钉板上的钉子扎。在单独被调到河南的工地后不久，因为一些不满，加上同学的手曾经骨折，也干不了重活，我们商量后决定离开。回到咸阳结算了工钱后，带着不多的钱，匆匆地踏上了南下广东的火车。

在深圳，又经历一番波折，20多天后，我们才找到了工作，进了一家小型的工厂。在那里，我度过了整个打工生涯中最快乐的几个月，虽然当时工资很低，吃得很差，但和同事们相处得很好，也许是因为当时自己的想法还比较简单吧。我在那里度过了外出打工的第一个春节，和同事们一起在外面聚餐。春节过后开始上班，厂方担心工人离职太多，迟迟不发工资，后来我们几个同事一起“罢工”，当天下午，工厂就给大家发了工资。拿了工资，我便一个人去中山市找先行离开的同事，那位同学已经在家人的劝说下回家了。

在中山干了一个多月，因为想家，我在开学前回到了家里，准备去

学校上学。只是，当我带着学费走进校园时，疏离感、不自信等各种感觉交集在一起，让我感觉学校已经不适合我了，或者说我已经不适合学校了。我又离开了学校，彻底地辍学了，再次踏上了南下广东的火车。从此，我开始了漫长的打工路。

经历富士康与传销组织

我辍学后的打工经历主要分为三段：（1）2007年9月到2008年7月在富士康当普工的经历；（2）2008年8月到2010年5月涉足传销组织阶段的打工经历；（3）2011年3月到2014年3月重回深圳后的打工经历。

第一阶段比较平静，带着学费离开家到深圳后，顺利地进了龙华富士康，接受企业文化培训，然后进车间上岗，两班倒，差不多一个月转一次班，5天8小时之外，基本上每月加班都在110小时左右。富士康是一个小社会，里面有超市、银行、书店等，因为上班比较忙，这一年在深圳都没怎么看过这座城市，偶尔与朋友一起玩玩轮滑、逛逛街，和同学聚聚、上上网，就没什么娱乐了。因为爱看书，不时地买书，到走时也攒了一箱书。

第二阶段算是比较曲折的。我被最信任的朋友用一个谎言骗到了传销组织里，因为对传销认知不足与存有侥幸心理，我最后加入了。虽然传销一般都打着直销的名义，但我知道是非法集资——骗人加入，然后拿抽成。只是因为我不擅长骗人，挣不到钱，但我又没有放弃，于是就经常出去打工，打一段时间工又回到组织里。但实际上呢，在组织里又非常痛苦，骗人的时候，自己的内心经受着折磨，也不喜欢传销组织的种种纪律、做派。当时一直没有选择离开，主要还是因为比较在乎这个朋友吧。回首离开学校后前几年的人生，他对我的影响可谓最大，甚至可以说我就像是他的“跟班”一样。在没离开富士康时，我曾经被他带着接触完美公司，玩轮滑也都是他带着学会的。那时的我们比较简单，就是两个想努力赚钱的少年。但我们对社会的认知都太浅了，并且都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这一阶段我做过餐饮服务、进过工厂，还下过矿井，并且辗转多地。感觉这个阶段的我们心理年龄都很小，对社会的认识也很少。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承担的责任太少了。

第三阶段是从传销组织出来后。因为爱看书，一次在书店里，看到一本《传销洗脑实录》，由这本书，我开始了自我反思与深度认识自我、认识社会之路。我反思自己为什么会加入传销组织，反思自己过去的成长。从这时候我开始恶补——大量地读书与读报。特别是在2011年，为了学习决定回到深圳，因为那里培训机构众多。

2011年重回深圳，为了有时间学习，我选择了一份比较轻松但工资不算高的工作，除了下班时间可以看书学习，上班时间基本上也都是在看书。同时，这份工作也是在深圳的关内，我开始经常到处走走，去看这座城市。以前在深圳，我很少到过关内，当时和几个女同事一起到莲

花山公园玩，虽然知道旁边是深圳书城和图书馆，却从没有进去过。从2011年开始，这些地方我都经常去，深圳的书店、图书批发市场等，我几乎都去过了，并且购买了大量的书、报、杂志。对这座城市和它的阅读文化，我有了更多的了解。当时深圳市政府打出的口号是“要建造图书馆之城，让城市因阅读而受人尊重，实现市民文化权利”，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中间还在深圳青年学院报过一次成人大专，电子科技大学，只是后来发现是花钱买学历，又放弃了。

2012年，我第二次进富士康，不再住工厂的宿舍了，每周休息时，不是去书店，就是去公园、图书馆。我住的地方也刚好在一个社区图书馆旁边，我每个月借书大概十本，在这个过程中，我读到了沈从文的作品，慢慢开始重点关注乡土文学；也看那些比较火热的非虚构作品，如《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工厂女孩》《打工女孩》等；也慢慢地关注到陈寅恪、梁漱溟等近当代知识分子，以及乡村建设运动等，并通过网络搜索，知道了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2014年，经过长期思考，我最终决定离开深圳，去投奔乡建中心，寻找另一种道路。我不喜欢打工，我相信，也没有几个人会喜欢打工。

虽然我对现实中的乡建中心还缺乏了解，但我还是在2014年的3月到了北京；6月正式参加了乡建的培训——“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第十期。至此，我的打工经历告一段落，从2007年开始算，到2014年，正式上班的时间有五年多。应该说，是阅读改变了我，离开深圳时，我把买的书报全部运回了家，重量达1000斤，运费花了1000多元。

重新走回农村

参加人才计划，是重新走回农村的开始。

自从离开学校，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城市里度过的，虽然心系家乡，可是在家乡度过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而打工前，虽然长期生活在农村，但对农村只有生活经历，而没有深入的认识——文化、民俗、社会变迁等。接受乡建的培训后，对农村的历史、发展变迁有了更多更深入的认识，也开始更多去思考自己的道路，自己要做什么，能做什么。在这里，我就不过多介绍在乡建做的都是哪些事情了。2015年结业后，出于个人经历与对未来的计划，我又去参加了工人大学（由工友之家举办），重点学习工人文化。

参加人才计划的一年，我下乡到过三个地方，都是乡建的试验基地。最开始在河南的漯河，是有名的小麦种植区，我的工作就是协助返乡青年白飞的工作，主要是小麦、黄豆的种植与加工，那时我们还一起到郑州给消费者配送嫩黄豆角（毛豆）。这时发现自己还是有点力气的，能搬动100斤一袋的小麦，想想小时候割完麦子往家里挑麦捆时，自己总是挑不动。我喜欢劳动，也许是缘于小时候的劳动经历吧，小时

候上学，我们每周都要抬粪。虽然劳动很累，但让人踏实。在这里学习了几个月，后来去做得比较成熟的南塘合作社学习了一个月。春节过后，到灵宝的弘农书院学习了几个月，在书院主要是学习传统文化与蔬菜和粮食的种植，如花生、玉米等。这一年，我参加了人才计划常规的集中培训，一次在昆山，一次在北京的乡建中心，还有一次在山西永济蒲韩社区（自此之后，蒲韩社区可谓我心中乡村建设的奋斗目标），还参加了乡建主办的合作社论坛和大学生支农调研交流会。

在工人大学，我们主要学习电脑硬件维修与软件使用技术，有电脑办公软件、PS等。工大提倡“劳动换学习”的理念，在学校附近建立了同心农园，还种植了一些粮食作物，我们一周到农园劳动一天。其他课程还包括劳动价值、团结经济、合作社等。我的同学都是来自全国各地打工的青年，老师则是来自北京各大高校的老师，有社科院的，也有党校的。工大教学让我看到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乡村之痛

说到返乡，其实经过这几年时间，特别是回家的一年多，我已经越来越不认可这些提法，包括“故乡”这样的词。2016年年初筹建图书馆时，我把图书馆名字定为“爱故乡”图书馆，现在，我已经把它改为“爱家乡”图书馆。我不愿意再用故乡这个词，更愿意使用家乡。因为“故”更多表示已经成为过去式了，是那些离开家乡很少再回去，乃至再也不回去的人的“乡愁”。然而家乡对我来说还没有成为过去式，我的父母还生活在那里，乡亲们还生活在那里，而我，也决定将要生活在那里。

在这里我会想到海子的《亚洲铜》：

亚洲铜 亚洲铜

祖父死在这里 父亲死在这里 我也会死在这里

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

实际上2015年在从工人大学毕业后准备回家过年时，我还没有想过或者说没确定要留在家乡，因为我打工的钱都买书了，而到乡建和工大学习我也没什么收入，但在我心里，是迫切地想在家乡做些什么，特别是在我回到家经历了几件事情之后。

可以说留下来的决定在我回到家里第一天就做了。那一天，我听到了几件事，这些事对家人、乡亲们都习以为常，但对我却异常残酷和很难接受。第一件是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的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也在外打工，给家里打电话联系不上，后来托亲戚上门查看，最后破门而入发现其母亲已经去世十余天了；第二件事发生在我回老家的前一天，村里的一位婶子跟丈夫一起干活，突然倒地身亡，据说之前她还在哈哈大笑。朋友的母亲和婶子的死亡除了与疾病有关，还与当前农村的制

度、文化息息相关。随着国家对农村的投入以及乡亲们在城市的“奋斗”，现在乡亲们的物质生活确实丰富了不少，生活习惯与消费习惯也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很多文化知识和生活常识却很匮乏，比如关于身体疾病的知识。

在参加朋友母亲的葬礼时，我还听到其他让人寒心的事——在另一个不远的村子里，有一对老夫妇开煤气自杀了，原因是老奶奶瘫痪了，老爷爷无力侍候。还有一对老人，老爷爷到红薯窖储存红薯时，因为空气不流通窒息而死，老奶奶失明，找不到老伴，后来也不小心掉下去了。他们的女儿下午干活路过父母家，没有看到父母，于是就去找，才发现两位老人已经死亡。老两口留下了大量的粮食，还有两万元现金，这是多么勤劳的老人啊！

这几年每到春节，返乡笔记、农村观察类新闻都会刷爆“新媒体使用者”的微信朋友圈。我说“新媒体使用者”，是相对于那些未曾使用新媒体的人们来说的，如农村留守的老人、妇女和儿童，这股热闹往往没有波及他们。而使用新媒体的人，也就是从乡村出去的精英们，春节过后，很快又会离开乡村进入城市。这些留守的人，生活便又回复了常态，事实上除了过年亲人团聚的热闹，他们的生活也没什么变化。除了写写文章，当真就什么也做不了？除了离开农村，就真的别无选择，没有另一条路可走？我想试试。

另一方面也是我比较崇尚简朴生活，我一直都想像梭罗到瓦尔登湖生活一年那样去生活一段时间。包括后来阅读到的《一年不花钱》，以及孔子《论语》里的很多话，都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一箪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我计划在自家土地上劳动，只要有饭吃就可以了。然后多在村里做些能做的小调查，记录一些乡土的变迁，自己也多读书多学习。这么想也是因为对自己能做什么没有太大的信心。

多年来我一直在外地到处跑，跟家乡人的关系很疏远，没什么本地的人脉基础。决定留在家乡时，我相当于一无所有，除了一些想法和藏的一堆书。虽然很想去做生态农业发展合作社，但连家里的土地，我也是做不了主的，而我们村的土地都是山地，极易因为干旱而没有收成，所以这些事情都没法做。至于如何生存下来，我还想过看家乡哪里有活可以干，去找个先干着。

从图书馆开始

因为我自己喜欢看书，回家后就有开个图书馆的想法，但因为自己没有什么积蓄，后来看到厦门的棚棚兄（颜钰棚）众筹来建图书馆，我也想试试众筹的方式。和一位朋友说后，他表示可以把自己的房屋免费给我使用，又征询了几位老师的意见，于是我就立马开始做了。

当时我并没有多少信心，不知道能筹到多少钱，并且由于我也没什

么实质的产品回报，众筹到最后变成了募捐，说到这里真是感谢所有给予我支持的老师和朋友们。包括后来的众筹空调，我说给大家回报玉米，大家也都没要，有一两位想要的我到现在还没寄出，主要是因为我想回报确实是由我自己种出来的产品，而不是去买市场上的产品。

最后，连图书馆开馆后众筹空调的钱一起，共筹到了21917.46元，还有一些朋友和机构给图书馆捐了书，收到的书籍总共有2000多册。经过两个月的准备，2016年7月10日图书馆正式开馆了，并在8月举办了第一届夏令营。

筹建图书馆除了受到棚棚兄的影响外，一个根本原因是我觉得阅读很重要。首先阅读也确实改变了我。人一生中的大多数知识，还是来源于书本，即便是现在的网络时代，人们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渠道，大部分仍然是来自文字的。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后，发展越来越快，这就需要人们爱学习、会学习，而阅读能力可以说是学习每一门学问的基础。筹建图书馆的过程中我的收获还是蛮大的，认识了很多富有爱心的朋友，一年走下来，自己的思想观念转变了很多，未来的目标也更加清晰起来，也自信了许多。

图书馆的目标是阅读推广，但在图书馆的运营和儿童阅读方面，我并没有花费太多的心思。以前只想着给想看书的孩子们提供一个阅读空间，让他们有书读，对于儿童阅读，我也没有太多去关注。主要原因是自己面临着最现实的问题——如何赚钱。之前住在家里开支小，现在住在镇上，支出就大了。而且虽然一直想做培训机构，但又于心不忍，觉得家长们外出赚钱太辛苦，多数都是干繁重的体力活，当时没想到要组织作业辅导，只有孩子们主动问我了，我才会教他们。

受春桃基金会资助，我出去参加了两次关于阅读推广的培训。这两次培训对我影响较大，接受培训后，我对儿童阅读的重要性有了更多的认识。首先是个人的认知与经验的局限吧，我一直是通过自主阅读学习的，然后自己的重心也是自身学习，更多时候看的都是成人看的书，我想生活中多数人也都很少专门去看童书吧，所以也一直没想过要把阅读推广当成职业去做，可以说对儿童阅读是不够重视的。但即使不从职业来说，出于将来要成为一名父亲，这件事也是需要学习的，并且我也很关注教育，也一直想做这一行，今后一年时间，我将会把重心放在儿童阅读推广上。我希望一年内能把图书馆引入正轨，之后再去做生态农业与合作社。

更进一步的未来

2017年8月，之前租的房子到期了，因为感觉原来的场地不是特别适合做图书馆，我把图书馆搬迁了，新馆在我租下的一个20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房子的前半部分是图书馆和小教室，图书馆占地近100平方米，小教室24平方米，桌椅也都已经购置，准备做辅导班用；后面半部

分是我的生活区域，一个卧室、一个卫生间和一个小厨房，旁边还有一个细长的彩钢棚作为仓库，目前购买了三张乒乓球桌，准备给小学生做训练用。租下这个房子目前我垫资两万多元，其中包括房租和图书馆、小教室这前半部分装修的费用。辅导班和乒乓球训练计划的是收费项目。

我个人对物质的要求不高，现在自己不到30岁，只要有口饭吃就可以了，只希望多做些事。主要是要把自己的负债解决了。当然，今后还是会利用空闲时间努力去做些其他的商业项目，可能是农场，也可能是农产品网店，但将优先集中精力把图书馆做好。以前没有花太多精力在这上面，近期已经举办过“试当小记者”、家长读书会、爬山、真人图书馆、儿童生命故事分享等活动，今后计划还要带领学生做绘本剧、开读书会、做自然笔记、作文指导等各种活动。不管能不能赚钱，将会集中精力做孩子们的教育工作。

说到图书馆现状，其实还算蛮困难的。因为回来时自己并没有什么积蓄，筹建图书馆都是靠社会捐赠，截至目前，募捐了三次，但募捐到的资金总是很有限。今年一年时间我将用心做儿童教育活动，看看明年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总之，图书馆我会想办法坚持把它运营下去，哪怕是出去工作。与过去相比，现在我的同学回来了一个，我们准备一起做事，目前已经一起做了几次活动，他也去乡建参加过培训，我们的价值观比较一致。同时，图书馆发起的月捐计划，也成功地找到了60位月捐支持者，每人每月捐赠50元，一个月有3000元，有了这些资金，我也想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和我一起共建图书馆。

同时，我把爸爸送到一个生态农场工作了几个月后，让他对生态农业和我的创业有了更多的认同，这使得我与家人的关系渐渐缓和，让家人对我做的事情有了更多的理解。

回到家乡，这应该算是我人生这么多年最“离经叛道”的一次选择，虽然面临着种种的不理解，但我已经不再感到孤独。我希望能用我的真诚、百折不挠，让乡亲们习惯我的存在，重新建立信任，也试图让他们理解我这样一个“异类”的存在。

3.6 探索另一种生活的可能[1]

健康农业实习生 梅红伟

小伟总是扎着一个颇有艺术家气质的小辫，绛红色的脸颊刻着风吹日晒的纹路，让人很容易就把他和饱经风霜的流浪歌手联系在一起。他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总是这样说："我叫梅红伟，大家都叫我小伟，如果觉得我年纪比你大点，叫我小伟哥也行。"这样一番自我介绍，一下子就拉近了我们与他之间的距离。其实叫"大哥"一点都不为过，已届不惑之年的小伟，是一位为周围人处处着想的热心肠大哥，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小伟哥"，甚至被其他的河南返乡青年略带调侃地称为"带头大哥"。

小伟的返乡与别人有点不同，他的经历就足以绘成一幅画卷了，用"生命不息，折腾不止"这句话来形容最为恰当不过，他一直都在探索生活的各种可能。正是在他返乡前的各种探索，以及他在汶川地震灾区的见闻和对金融危机来临时的判断，让他对生命、对家庭、对教育、对生活有了重新的思考和选择，促成了他告别城市回到大山，探索另一种生活的可能，建设自己理想中的共生家园。

弃学与义工

1978年，梅红伟出生在河南驻马店一个教师家庭，父亲是一名优秀的中学数学老师，家中姐弟四人，他是老小。作为一名教师子弟，小伟从小开始就跟着父亲住在学校里，只要是父亲教过的学校他都待过，经常是父亲在教室里上课，他在教室外面玩，直到9岁才开始上一年级。小伟早期的求学之路一直很平稳，成绩也很好，但到初二升初三的时候，被寄托了子承父业期望的他，却在家人的诧异中第一次为自己的人生做了个决定——放弃学业。

让他做这个决定有两个原因：一是觉得自己不是攻学业的料，"初二的时候两门课是我喜欢的，一个是语文，一个是物理，但英文一直是最差的，口语就不用提了，早上起来左右前后的人都在哇哇哇地背单词，自己也使劲地背，自习课结束人家要去吃饭了，我一个单词没记住，郁闷！从那个时候起就厌烦学业"。二是开始对父亲的职业有了新的看法，"我决定不要一辈子都耗在这个学校了，不然太痛苦了，真的太痛苦！"

于是，1994年，16岁初中还未毕业的小伟决定放弃学业，南下深圳闯世界。小伟到深圳的第一站是在一家挪威的企业做手表，一年之后就开始学习广告、广播、摄影，后来又去学习酒店管理，在一个星级酒店

做到了客房部经理，在当时已经是很高的级别了。后来发现酒店管理这个行业里面，有很多的内幕和关系，没办法学到真东西，就退出来开始做其他事情。

因为小伟的家庭信仰基督教，早在1991年的家乡教会活动中就结识了香港的公益团队人子协会[2]，初闯世界的小伟在深圳又遇到了人子协会，并开始做人子协会的兼职义工。20世纪90年代正处打工热潮，很多农村的孩子梦想着能进工厂，进城市。为了帮助农村的孩子能在城市顺利找到工作，人子协会开启了一个名叫“青年创业养成计划”的活动，免费介绍农村的孩子到安全的企业或工厂。因为人子协会中的大多数都信仰基督教，被介绍过来的孩子很大一部分来自教会，他们多会联系诚信可靠的基督徒老板，保证这些进城打工的孩子不被欺骗，能够正常地得到相应的待遇和薪水。此外，小伟还会跟着他们每个月去工厂做一两次探访活动，组织聚会，也帮他们协调解决一些困难。“看到他们对城市边缘人群的关心和扶助让我备受触动，于是决定辞职，从1996年开始我就成了专职义工，帮扶城市里散落各处的流浪者、问题少年。”

小伟和他的爱人苗九玲是在深圳的时候相识的，“认识九玲正是1997年她从老家确山县送一批孩子过去，那也是她第一次去深圳，怕在深圳不习惯，就背着很多从老家带去的东西，比如擀面杖，哈哈，很有意思！我去车站接的他们，后来因为我们那个团队也蛮需要人的，所以九玲就留了下来”。正是九玲的留下，让这两个年轻人有机会慢慢了解、相知，开始了他们相扶相携的生命旅程。

这期间还有个小小的插曲，因为在当时的团队中有个规定：当提出恋爱之后就要准备结婚，不能一直恋下去，不然可能会对其他人有影响。所以小伟和九玲考虑之后在1998年年底就离开了一段时间，在老家确山经营起来一家叫“西部牛仔”的服装店，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服装店开到6个月的时候，小伟和九玲被之前的团队邀至云南丽江做一个月的游学，没成想却在那时被安排办婚礼了，说到这里，小伟笑得一脸幸福。“有一天晚上活动结束后，老师说你们明天要自己准备东西，当时都没听懂老师什么意思。第二天中午，突然发现大家都不见了，以为要迟到了就赶紧赶去吃饭的地方，到了之后被老师一把拉上台，老师说今天是小伟和九玲的结婚典礼。当时我们俩也傻眼了，但身边的朋友都送上了早已准备好的礼物，我们就这样结婚了。”原本打算游学回来继续开服装店的他们，被“老师希望我们能去广东深圳，那边计划办一个共生家园”的活动动摇了，最终决定放手确山这个店。“其实有很多人为我们惋惜，觉得正是我们赚钱的时候，但我们有过很多集体生活的经历，心里边觉得一个大的家庭生活，一个群体的生活，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因为也办过婚礼了，也想在结婚之后能有一个新的开始。”

1999年，小伟和九玲再次来到深圳，和其他人子协会的成员一起探索共生家园，做大型的文化创意产品义卖。2000年，小伟和团队创业开餐厅，不大的门面却经营得热热闹闹，餐厅最大的特点就是会接待一些流浪的人，免费吃饭；还会帮助城市的边缘人群和弱势青少年，到劳工

聚集的工厂探访，为他们组织生日派对。在深圳这个被各种开发项目急速包围的生活空间里，他认识和了解了更多普通人的生活。2001年，他们的大儿子子悦出生，餐馆几乎没日没夜的作息让人的体力和精力都极度劳累，最终小伟决定关了餐馆，一家人暂时搬到一个地方好好生活两三个月。在一位一直陪伴他们的老师的建议下，他们一家三口前往上海，与另外一个家庭一起合作生活、创业。

返乡的失利

在九玲最早一批送去广东打工的年轻人中，有一个叫大春的兄弟，一直牵绊着他们的心。大春因为在雨伞厂的工作环境中接触了有毒物质，皮肤开始溃烂，在广东时小伟就带着他跑了很多医院，都无济于事，有位医生说大春最多只能再活五年。那时小伟一家去了上海，大春回了老家。在上海，小伟收到了大春的那封“连死都没有力气”的信，小伟回忆当时情景：“当时很心酸，之前在南方接触过理疗、健康饮食，有一种观念：吃健康的蔬菜改善人的健康。就跟大春说：我们决定回老家，找山清水秀的地方种有机蔬菜给你吃，只要你愿意，这五年我哪都不去，就陪着你走到最后，你就是我的兄弟。”

大春同意了。于是，2002年，小伟带着九玲、子悦一家三口，还有两个红色的行李箱回到确山，那就是他们在外这几年的全部家当。他们开始借钱，找地方，最终在薄山湖水库边的二道河村，租了现在这300亩地的荒山头。租期为50年，“当时对方要3800元一次性付清，我说算你4000元，再给你双倍，8000元我租下了。地租来之后在村里做了公示，并办了林权证。租完之后别人都觉得我被骗了，但这个价是我自己定的，我是急需要，我是想要生活”。可是在租完地、买完必备的交通工具（一辆摩托车）之后却已经没钱了，于是跟大春约定去深圳打工一年，赚钱回来盖房种菜。

2003年，小伟和九玲再次南下打工，小伟在康佳集团做销售，小伟的白酒酒量就是在那时练成的，有酒量就有销量，半个月后由销售代表升为区域经理。两人打工一年存下两万多元，借着过年回家的机会悄悄递了辞呈。走的时候老板很不理解，为什么那一座荒山会如此牵动着他的心？

2004年，小伟用打工攒下的钱建了山上最初的四间瓦房，并把大春接到山上。因为要生活下去，开始发展种植和养殖，河南地区有在八月十五吃公鸡的习俗，2005年他们在山上养了5000只鸡。等到鸡出栏的时候，禽流感正好在全国爆发，看着漫山遍野的红公鸡，却卖不出去。“当时山里没修通水泥路，很难运输，就付钱给附近村民挑鸡到大路上去，附近饭店都知道我们的鸡好，也会订购一些；但要大批量走出去只能靠鸡贩子，而鸡贩子却使尽手段拖延时间，已经完全长成的公鸡每天食量很大，养一天赔一天，最终不得不以很低的价格被迫卖给鸡贩子，那是一次很痛苦的经历。”与此同时，大春家里也发生了一些变故，

使得大春无法到山上安家，“我们不可能在山上等着大春偶尔来住一下，于是又出去做义工了。”

接触生态农业

2006年，小伟和九玲被邀请去云南丽江束河古镇建立人子共生家园，于是他们再次举家南下。在丽江，小伟认识了在做有机农业探索的朱明，因为前两年在山上养殖种植的失败经历，让小伟对有机农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朱明是社区伙伴（PCD）在广东地区的联络员，给小伟讲了很多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社区支持农业的工作，这在当时算是非常前沿的。“看到朱明在做这个事情，觉得这个工作很伟大，自己应该对农业生产再去做进一步的探索，而朱明也需要人参与，于是我就成了社区伙伴的第二期健康农业实习生。”

成为PCD的实习生后，小伟和朱明来到了广州，与另一个伙伴苏德彪，在韶关做生态农业基地，找了几个农户做有机农业的生产；农产品生产出来之后，通过社区支持农业的方式，对接城市来销售，就成立了一个专门做生态农产品城乡对接的机构——沃土工坊[3]。沃土工坊的名字是朱明起的，同时成立的另一个环保机构南岭会[4]，在韶关的南岭保护区内保护鳄蜥。当时要经常出差去韶关，与当地农户打交道，除了推广有机农业的生产，还帮助农户改造旧房子，安装了榻榻米，让城市消费者去入住体验。

一家人分居两地总不是办法，小伟在广州安顿下来之后，九玲就把子悦带了过来，一同过来的还有两个单亲妈妈的家庭。来到广州后，三个家庭都面临着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的困难，共生家园的生活方式是自然而然的。四个大人三个去工作，一个照顾家庭和孩子，收入共同使用。当时是在工业区蒸馒头卖，卖得很好，这样下来大家都感觉轻松了很多。

小伟在做实习生的时候每月的补贴是1100元，这样的收入在广州让他们很有压力，想着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经济收入和事业基础，才能让共生家园更稳固。于是在2007年下半年，小伟辞别了朱明，在一个做汽车贸易领域朋友的介绍下，带着几个家庭，来到浙江开了一家汽车配件进出口的贸易公司，去做另外一种尝试。

汶川救灾与都市创业的结束

2008年汶川地震，小伟在第一时间听到地震消息的时候，就把车开到修理厂去检修，决定要立刻开车进川。同时又在一线员工中间筛选了三男三女，加上小伟当司机，7个人当天晚上就出发，并且把所有能拿出来的十多万元，全转到一个账户里带着，去了四川灾区。

“这是对我人生真正改变的一刻，我一口气开了3000多公里，是从

建德一路走高速开到湖北宜昌，下高速后路非常难走，然后一直沿着国道进川。因为就只有我一个人会开车，3000多公里的路上一直灌咖啡，其间还撞上了高速公路旁的护栏，一边的车门都撞扁了，只能从另一边下去了，就这样开到了汶川。下车就联络当地的一些朋友，接触了一些国际组织，拿到了进灾区的通行证。第二天我们就直奔映秀，但进不去，就辗转到都江堰看自己能做些什么。后来就参与了一个前期的搜救，跟疾病防疫中心的一起做搬运的工作。当时我们就感觉这工作还是蛮危险的，因为有很多的问题会发生，就把女生留在了市中心青阳体育馆做灾民安置工作，男生跟我再下灾区。我们在那里待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住的是帐篷，吃的是馒头黄瓜，很累的，身体透支非常大，身心疲惫，花钱多少都不重要，关键是看的东西太多了，每天心里累积的那种压抑和痛苦，让自己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就觉得要回去了。”

从四川回去有两个原因，第一是觉得太累了；第二个是因为二儿子子蜀出生了（“蜀”字也是为了纪念汶川地震），就是在哀悼日第一天（2008年5月19日）出生的。在灾区，“一边看到的是残缺的身体，心里面想做很多的事情又做不了，自己过去时买了很多东西发放，这也只能解决得了一时，解决不了永远。另一边是新生命的出生，我又不在身边，心里总还是有一种亏欠。一面是死亡和灾难的产生，一面是新生命出生，死亡和生命的拉扯，当时心里还是蛮焦灼的，后来我就说回去了。”于是小伟就直接开车回老家，带着九玲和还没满月的小子蜀来到浙江。

紧接着另一个事情就来了，2008年下半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从华尔街到全世界，从金融界到实体经济，各国都面临经济危机。汽车产业算是最早收到信号的，外贸也越来越不好做了，继续做下去风险很大而且不可预测，就开始想到要撤。于是小伟很快关闭了来往的一些交易，注销公司，酝酿着想要回家。“换做其他生意并没有把握，与其寻找新出路倒不如退回去，家人们也都同意了我的想法。”

2009年4月，小伟把所有洋不洋、土不土的那些豪华办公桌椅设备都打了包，花了8000元租了辆15吨的货车，把这些东西一起拉了回去。“因为觉得丢了可惜，又没时间去二手市场，当时就决定这次是要彻底回去了，从此以后的人生就再也不会去城市发展了。从浙江的离开也彻彻底底结束了在都市里创业，不再想这个创业的部分了，而变成了另一种生活方式，乡村的创业生活。当时也做了一些动员，有些员工跟着我一起回到了河南，开始农业创业的生活。”

再度返乡的绿色方舟

如果小伟第一次返乡是基于宗教般的济世救苦情怀，那么这次的返乡则是在看遍生死之后，对自己生活方式的再一次选择。“从回来的那一刻开始，一直坚信这是我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我余生的生活方式。”

再次回到七年前就已经租下的这个山头，五年前盖下的四间瓦房在风雨的冲刷下破败残存。“刚回来那会儿其实根本没想到自己要完成些什么，计划些什么，觉得什么都不重要了，没有多大的梦想，就是想建一个稳固的房子，不会在地震中倒塌了，能够好好住着；不要妻离子散，不要跟亲人分开，然后能够陪在家人身边，不要有死亡，不要有分离，不要有痛苦。”小伟和他的家人们就这样开始了共生家园的建设，探索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小伟给农场取名为“绿色方舟农场”，绿色意味着注重环保、生态和保育，不是去“创造”新事物，而是想要恢复原来就有的环境；方舟来自“诺亚方舟”，这是人类在苦难的情形下聚集的一种方式，方舟上的人生活在同一条船上，所以是“共生”的模式，充满大爱，为下一代创造和抚育美好；农场是真实地落实农业生活、生产、创造事业的地方。

“从2009年到现在，农场的建设一直都在进行，所有房子都是生活在农场里的家人自己动手合力建造的，从完全不懂，到购买工具、材料，请师傅现场指导，然后农场里的男女老少全部参与建房。农场的原则是多买工具、少请人，有了工具就可以不停地创造，还可以从工具上学技术，而这些工具也能教给孩子们一些生存的技能。水电、油漆、排水管线这些都是自己来做，盖房子一类需要技术的活儿就请师父到现场指导，然后向师傅学习，以后就可以自己盖房子了。”

刚开始修整老房子，因为人多，又在旁边盖了500平方米的两排新房子。建设初期最困难的部分、也是花钱最多的就是运输，当时没有修通水泥路，所有的建筑材料都是运到离农场一公里的地方卸下，然后换拖拉机、三轮车或者肩挑背扛的方式，运到山上来，几乎是三倍的运输成本。房子是最先修好的，这是最基础的，就是想让大家能够安定地住下来。之后就是修路，当时得益于村村通工程，政府把水泥路修到了山上。

2010年，为了方便农场灌溉用水，大家在两山之间的小沟开掘出一个小水库蓄积雨水，水库深达5米，面积有3000平方米。“筑堤用的水泥方砖有2000多块钱，都是几个在农场生活的女人浇筑出来的，整个水库只用了两个月就完成了。”

为了更好地建设农场，小伟和九玲专门去学习了朴门永续设计的课程，在自己的农场中实践，各种永续生活的设计也在农场安家落户，如芦苇逆渗污水处理系统、生态厕所、火箭炉、面包窑等。再加上小伟之前在实习生期间接受的生态农业理念，在农场中是看不到任何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化学制剂的农业生产资料，甚至连肥皂、洗衣液等洗护用品，都是他们自己动手制作的，除了农场生产不了氢氧化钠需要外购之外，其他原料基本上都是农场自产或废旧回收的。在对于洗漱用品的使用上，农场对外来人员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基本上都会要求来访的人不要自带化学制剂的洗护用品，因为农场的污水都是汇集到芦苇逆渗污水处理系统里处理，经过处理后的水则可以直接浇地。经过近8年的改

造，农场已经自成生态系统，可以完全不依赖外部“养分”的输入，也实现了小伟最初给农场取名“绿色”的梦想。

对于农场的建设，小伟回忆说：“2011—2013年，是农场在经济上最艰难的时候，一方面是山上改造和建设用的钱非常多，另一方面栽下了3000多棵核桃苗和300多棵山楂苗，树苗如果没育活就需要补栽，这样每年都得有投入。所以这几年的经济一直处在比较紧张的状态，没有太多的存款。多一点的收入是前几年的夏令营，两个月的夏令营会有几万元的收入，也都投入在建设上面，改造房间，铺木地板，改造床，改造床垫，来提高大家的生活品质。建筑材料在最便宜的时候就囤好货了，这也是开源节流的好办法，把计划要建的一下预算出来，在材料最便宜的时候买回来，做长远的规划，知道自己钱少，就要做钱少的打算。”说到这里，小伟总是很开心地带着我们去看他的仓库，并给我们介绍：这些钢材是在2015年价格最低时买下的，这些砖又是在某某时候降价买下的，这些木料又是在某某时候买下的……

农场硬件条件的改善，一方面可以让农场里生活的人更舒适，另一方面小伟也在做青少年假日学校，“城市里一家三口可以来这里过周末，两天两夜，收几百元，食宿、农场的活动费用全包。农场还有周边的合作农户，如果培养起来的话，周日下午我们可以在农场做个市集，慢慢每个周末让城市人都可以带着蔬菜回去吃一个星期，下个星期再来。2016年夏天我就带了十几个孩子做生存挑战，时间比较长，一个多月，最短我们也要求是21天，孩子们都很喜欢，也是我的特长，我就能带他们玩，也可以是农场收入的一部分。2016年也投入买了一万多元的设备，做公益性质的留守儿童乡村图书馆，农场可以接收乡村的孩子在这里免费吃住，用城市的那部分收入来补贴他们，只要家长放心，甚至可以在这里过年，这两年都接待过好几个父母不回家的孩子了，大年三十就住在这里过年，都是免费的。所以这块也是未来农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对于农场的经营，小伟从来没有担心过，因为他们一开始的定位就是过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不是为了赚钱，“我们这里人多，种出来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自己消化，在外面买的很少，除非是自己不种的或者不养的，才到市场上去买。种多了也不担心卖不出去，因为我们可以囤着慢慢吃，或者尝试加工，让食物保存得更久。比如刚开始没经验，我们种的小麦比较多，那么接下来一两年我们都可以不种小麦了。这两年地里主要种红薯、花生，一个是红薯、花生好保存；二个是红薯、花生可以加工，红薯可以做成红薯粉条，花生可以榨油。蔬菜种多了就带着孩子们一起做腌菜，还会拿去和周边的农户交换，或者给他们分享，周边的农户有时候也会把他们自己种的菜送给农场，或者拿来交换。我觉得这样很好，大家减少现金的往来，少些消费欲望。”

“天下为公”的共生家园

小伟他们最初一起回去的有9个大人和6个孩子，因为之前在城市里有过做共生家园东飘西荡的经历，他们希望在这里创建一个稳定的共生家园。在小伟和九玲的信仰里是讲求奉献的，他们觉得这300多亩地就是应该奉献出来给大家使用，把这里做成一个“公”的地方，最早在农场中挂了“天下为公”四个字。

“2009年刚回去的时候接待了很多精神病人，或者说是有问题的人，不知为什么有家媒体称我们这里有很多精神病患者，所以后来大家一想到绿色方舟农场，就认为这是一个帮助精神病患者的地方。有熟人介绍的，也有看媒体找到的，也有教会的，最多的时候是40多人。去到那里的人身上的故事一个比一个凄惨，甚至有人被绑着从安徽花几千元的路费用出租车载到这里，那几年帮助最多的是湖北的孩子们。”

几年来的陪伴，让小伟体会到：“真正的精神病人应该不会多么痛苦，因为他经常处于发作的状态。其实最痛苦的是陪伴他的清醒的家人，我们看到他们的家人哭着，有的甚至是下跪的，渴望把这个人留下来，让我们带带他，那就没有办法，只能把他们留下。当时我们认为精神病人需要开放环境，有人陪他对谈，那时的缺点就是没有围墙、没有栏杆，人可以到处跑，一旦迷路就走不回来，周围的乡亲们都知道我们在天天找人。这些年来山上一直都养着不少于十条的狗，那么多狗其实都是给自己壮胆的，一堆的手电筒，四部对讲机，十来条狗，夜里就翻山越岭地找人，女生就两人一组，大路、小路、山路、湖边都去找，农场也因此建了围网。中间还有两个同工（一同工作的人），因为受不了这个煎熬离开了。”后来在农场生活的其他大人，大多也因为婚姻的需要都渐渐地离开了，光是小伟夫妇俩也照顾不了那么多的精神病人，加上2011年他们的小女儿子卿出生，就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孩子教育这一块儿。

“我们俩自学考过心理学二级证，不是为了给别人做心理咨询赚钱，那样没意思，不是我们的初衷，我们为的是可以更好地帮助到来农场生活疗养的那些问题孩子。在农场里我们安排半天劳动生产，半天学习，让孩子们在生活中学习知识，塑造品格。”到2014年，小伟他们已经不再接收新的精神病人，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稳定的社区，“这么多年经历了太多的人来人往、人聚人散，有婚姻的、成家的问题，有年轻人想去创业、家庭收入压力的问题，一个社区建起来需要一些根基的部分，一是稳定生活，二是对人生、对生活重新有了计划和想法的人。”

农场还会经常帮助那些流浪的人，在107国道上几乎每天都能碰见背包的流浪客，最简单的方式是给他们火车票钱、吃个饭，或者是带他们回农场，给他们梳洗、更衣，这种流浪的人一般不会留下来的，即使吃得好、住得好也会觉得不自由。“曾经接待了一位老者，他是湖南人，从哈尔滨走路过来的，都走了大半年了，胡子那么长（用手比画到胸前），脚上穿的都不是鞋，是轮胎绑的，一路上跟别人要吃的。我们遇到流浪的人一开始都会问：你需要我们做些什么，你需要帮助吗？不是所有人都会信任你，那位老人家我就是开车追了他好久，一路跟他讲，

他才选择来到了农场，生活了一个多月，后来我们就给他买火车票送回家了。还有一种比较惨的，就是把流浪的人带回家，走的时候偷了很多东西，给他洗完澡、换完衣服，偷衣服背东西背电线跑了，也有好几个。刚开始孩子们比较激动，问我要不要去追。我就说，不用。很简单，第一他没跟我们要钱，那这个就当作他的路费；第二他拿了这个东西表示他不傻，还能活下来，那就让他活下来吧。”

现在农场里生活的主要是小伟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孩子，以及几个在农场长期生活的“问题少年”。有一个在农场生活了六年多叫吉汤的孩子，有一天突然改口叫小伟“爸爸”，小伟当时比较震惊，就对吉汤说：“你一定要想清楚了，爸爸这两个字的分量是有多重的！”吉汤也对小伟说：“我已经想清楚了，我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谈到孩子们，小伟特别自豪，“现在的人都在炫富，但是我家子卿总是在‘炫哥’，总是在别的孩子面前炫耀子悦哥哥怎么对她好，子蜀哥哥怎么对她好，吉汤哥哥怎么对她好……但哥哥这东西是不能再生出来的，别的小朋友只有羡慕的份儿了。”对于孩子们，小伟一直有一个心愿，“我们从2013年就开始种核桃，每年再补种一点，到现在已经有3000多棵了。到子悦开始长大成人的时候，核桃就开始收获了，我就可以拿着卖核桃的收入，带着孩子组建一支摩托车队去欧洲旅行，带他们去沙漠过成人礼，所以鼓励他们去学习英语，不要求能写，但一定要能对话，能看得懂单词，分得出厕所，能交流就行了。”

对于共生家园的理想，自从2011年《三联生活周刊》《大河报》等媒体大规模报道之后，给农场带来了很多的困扰，此后小伟一直拒绝很多媒体的报道，他不想去大肆宣传，他希望：“农场是隐藏的、低调的、务实的、具备各项功能的共生社区，学习、生活、娱乐、创业、信仰、事业、家庭，事业是有社会责任感，生活是家庭生活，还有内在心灵成长，三者是绑在一起的，我们不需要宣传造势从而让农场走在媒体推广的方向上，而媒体自始至终带来的负面影响比正面影响要大得多。我现在不会极力邀请任何人成为社区的一分子，我们需要对共生社区理念感兴趣的人，一起去建设、一起去生活、一起去打造，只有住在这里的人，才对这里的环境结构和空间改造具有价值，才有更清晰的目标。我们不希望农场成为一个公众和媒体关注的东西，也不希望它是一个流动的席位，现在就想寻找有这种想法和觉悟的人，建一个共生家园。”

（口述：梅红伟；撰稿：韩瑞荣、刘良）

第四部分
扎根



年过九旬的农人

引言 “理想乡”蒲韩乡村建设纪实

梁少雄[1]

2015年3月，我们带着困惑和憧憬来到被誉为中国农民合作组织“大熊猫”的山西永济蒲韩乡村，希望借助蒲韩乡村20年的综合发展经验为有意愿长期参与乡村建设的年轻人搭建更深入的学习平台。

2016年4月，我们引进长春云凤社的发酵床养殖技术，先进行本地化的试验，再结合蒲韩乡村的生态种养殖计划向农户推广。

2016年9月，我们改造了一座有30年历史的青砖木制老房子，真正开启了我们放弃幻想，面对现实，以生活的心态在蒲韩乡村扎根的探索。

2017年，在记录与分享中我们开始了参与式保障体系的探索，并有伙伴深入参与蒲韩乡村的儿童私塾试验。

在与蒲韩乡村的深入互动中，我们触摸到了长期立足于蒲韩的思路与方法，有了更长远的预期。在实践中我们从以前的对社会问题的批判与反思视角扩展到了以建构为主的重建性视角，特别是自然教育、中医养生、生态生产、生态建筑等内容融入我们的生活与工作中，切实感受到了自身在参与乡村建设中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如果说来到蒲韩后，我们提出“不是逃避，也没有光环，而是以生活的心态为理想奋斗”是一种理念和原则的鞭策的话，那当下我们的踏实与自信则是呈现了一种理想主义事业和生活的真实存在。

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没有了焦虑与不确定后，我们提出：三年立足于蒲韩，形成稳定的团队，打造综合性的乡村建设人才培养平台；五年形成蒲韩经验向外辐射的思路与方法；十年看到我们在回应“农村综合发展慢、青年返乡创业难、生态产品价格高”方面的初步成效。

放弃幻想，面对现实。生活就是建构，以乡村的元素为载体，融合中华传统文化，构建可持续生存体系。我们希望重塑乡村生活的文化价值与自信，而参与其中的每个个体的成长变化就是见证！

4.1 向蒲韩“宝库”求索

人才计划六期 梁少雄

背靠中条山、面朝母亲河的蒲韩乡村，在气温不断波动的3月初就已经充满了春天的气息，真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感觉，杏花和桃花交织在一起，再配上零星的油菜花，一眼望去，非常绚丽，却又搭配自然。来到蒲韩乡村马上就三年了，从开始只是抱着一个单纯的想法，希望借助成熟农民合作组织的丰富经验与青年人共同成长，到现在以扎根乡村的生活方式承载对理想社会的思考与践行，感知到了前行的方向与动力，也体会到了个体改变的希望与渺小。如果说在此之前的各种文化价值表述只是基于对社会在认识层面的反思与思考，那当下所处的坐标使自己触摸到了大时代背景下为理想奋斗的脉动。没有逃避，没有放弃，也没有头顶光环，只为知行合一，一切新思想、新文化、新价值都从自我的践行开始，真正融入生产生活之中，这既是享受，也是探索，更是对主流文化价值的回应。

我从大学时期懵懵懂懂地接触乡村建设，到毕业之后全职参与至今，一路走来未必对所做的事情有多么清晰的认识，也未必对所要面临的挑战做好了准备，只是积极乐观些，也正因为此，在不同的阶段就很自然地有了不同的碰撞与选择。而脑海里闪动各种回忆时，还是充满了精彩与线条感。希望自己的回味既是自我的总结，也是乡建集体力量在小我中的展现。

恰同学少年

带着对自由的向往，按照自己的三个条件（外省、学校占地3000亩以上，校园内至少有两个足球场）选报了梦想中的大学，最终山西农业大学成为我的母校。

初入大学的自己和身边的众多同学一样，期待着在大学里好好学习，获得各种荣誉，未来能找个好工作，立足于城市，离开乡村。这种生于乡村，而梦想着离开乡村的文化价值至今依旧，甚至更炽。

然而大学的新奇度没多久就成过眼云烟了，起初大家还会因为上课占座而发生口角，课堂上也会认认真真地记笔记，晚上还会三两结群地去上自习或逛图书馆。后来上课都是抢着往后坐，以至于老师上课时前面两三排都没人坐，课堂上也开始玩手机了，空闲时间都是组队去网吧玩游戏。而自己因为酷爱足球，大量的空闲时间都驰骋在绿茵场上，甚至不惜逃课。不过自己倒没觉得无聊、空虚和迷茫，几乎每天学校操场

的小门都被自己翻两次，即便天冷，即便只有两个人，足球的乐趣依旧能让我感受到无尽的自由与充实。

这样的大学生活持续了两个多月，在一次同宿舍的伙伴带我参与他们老乡组织的暑期骑行北京分享交流会后就慢慢发生了变化。其实，我对那次分享会没有太多感觉，因为是在一个小空间里，人员比较少，大家的交流更像是内部的总结与反思。不过，此后同宿舍的伙伴提出了要创办社团的想法。因为2007年出了一部展现毛泽东学生时代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青春励志电视剧——《恰同学少年》，所以舍友提议成立一个名为“恰同学少年团队”的社团，旨在通过宣传历史与时事提升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当然，那时我们已经觉察到了身边的各种现象，比如校园里的垃圾问题，进食堂吃饭时，前者不顾后者，门帘直接甩向后者等，觉得大学生的素质不应该是这样的。

就这样，我们开始筹办社团了。第一次活动是在2007年12月13日至15日，校园里连续三天纪念南京大屠杀70周年，对于我们一伙没有什么经验的大一新生来说，当时的活动组织和效果都是空前的了。中午在学校人流量最大的食堂前放着防空警报，大白纸上的签名绕着食堂贴了一圈。也正因如此，引起了食堂工作人员的不满，居然撕我们的签名，结果就引起了冲突，最终我们的辅导员和学生会主席都来了。

这一次活动聚集了我们大一全年级一百多号人，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恰同学少年团队”社团没有办下来，但回看大学时光，这一百多号人无论是学英语的、搞园艺设计的还是参加农业创业的，大学生活都比较积极向上。而这一次活动最为重要的意义是结识了我们学校搞支农的伙伴（他们已经接触到了21世纪以来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老师倡导的大学生支农调研运动，也是我后来参与的主要工作），我的大学时光和人生都开始发生变化。后来才了解到，这些伙伴也有个社团，名称是“共产主义建设青年社”，关键是“非法”的（因其强烈的社会反思性，学校不给注册）。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对我的吸引。于是，没多久，12月底我们就开始准备和北京林业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华女子学院共同举办奔赴山西省大同市大同县倍加造镇西骆驼坊村的下乡支农活动。

支农第一步

整个下乡过程因为四校联合，充满着争议和瑕疵。当第一天晚上到达后，七八十岁的爷爷奶奶准备了丰富的晚餐，饭后他们就从炕上的席子下面拿出了一沓厚厚的账本，向我们诉说他们村因为修高速公路而出现的土地纠纷问题。这次下乡的经历，一下子将乡村的问题呈现在我面前，原来自己来自乡村，却并不了解乡村，只是想着要逃离乡村奔向城市。

当自己感受到了乡村与自身的关系后，就开始和学校搞支农的朋友

们走得越来越近，也开始参与相关的学习讨论和各类实践，包括大一暑期我们在学校周边组织的下乡活动，算是让我完整地经历了大学生短期下乡的方式方法。但这些经历和思考基本只停留在活动本身，对活动之外的社会发展层面的反思和思考从自身来说比较少。

2008年的国庆节，和社团的三位伙伴一起前往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也就是我现在的工作单位）参加“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专题培养，六天的时间彻底改变了我的大学生活和人生轨迹。来自全国各地40多所高校的80余位年轻人聚在一起讨论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而来给我们授课的都是以前在书本和电视里看到的专家学者。还有一帮全职参与乡村建设，集体生活在北京西山脚下新青年公社的年轻人。一切过程，让我一个来自地方农业院校的大二学生认识到了自己知识的匮乏和视野的狭窄，同时感受到了青年学生的社会责任与力量，也看到了另类的生活景象。在返校的火车上，和几位伙伴就商量要将我们学校的支农队伍“合法化”，成立“山西农业大学大学生支农队”。

回校没多久，我们真的就注册成功了，山西农业大学的学生支农活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时至今日，回头去看，我们培养了非常多优秀的年轻人。这也是我感到非常自豪的事情！

大二、大三的时光基本就在支农队里度过，组织学习讨论、拉练、辩论会、放电影、开展讲座、下乡实践……方式方法太多，但坚持一个原则和目标，就是以学习讨论为主，引导同学们走向实践，从对自我的大学生活反思开始，思考当下中国社会乃至全球的发展。其间，我坚决地放弃了自己的本专业（林学），从以前上课偷偷摸摸看课外书，到后来都是正大光明的，自己心里感到踏实。

大三下学期在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引导与支持下，我就开始外出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了，2010年5月去云南省东川区阿旺镇一带“抗旱救灾”，途中迷路，一伙人差点牺牲；2010年6月去广州中山大学，参加全国性的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交流论坛。慢慢地，自己已经对21世纪以来全国范围内的乡村建设运动开始了解，视野在打开，认识也在不断提升。

理想的实践与困惑

临近大四，身边的同学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考研、考公务员、找工作。原本打算在学校好好读书学习，弥补自己思想理论方面的不足，可是在刘老石的影响下，我和女朋友一起前往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参加“第六期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从此开启了自己全职参与乡村建设运动的历程。初到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是炎热的7月底，从敬仰到走入其中，自己很快就进入了工作状态，连续两个“非常态”的支农青年集中培训，累却兴奋不已。

9月团队建设结束后，刘老石就让我和另一名伙伴准备外出走访全

国支农社团的计划。我俩都是大四，按刘老石的要求，出去要搞讲座和交流，要指导各个学校的支农社团发展。虽略有担心，但毕竟是在社团里实打实地干出来的，还是充满期待。我们按照行程规划，走访了一个半月，从北到南再北上，山西—陕西—四川—贵州—广西—湖南—湖北—河南，原本还计划去江苏、安徽和山东的，因为有其他事情就提前结束了走访行程。

一个半月的行程，越走越自信，也感受到了21世纪这波大学生参与其中的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性，因为我们途中拜访了很多社会组织、老支农队员和高校老师。当然，也有让人烦心的事，我在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前往湘潭大学的路上收到了学院的“威胁”通知，说我旷课的节数已经超过50节，回来立马办理退学手续。去北京之前，学院就以大四有课为由不让我外出学习（原因比较复杂），当时是做了心理准备的。况且我都给四门代课老师请假了，老师们也允许我考试时间回去直接考试。包括在走访期间，有一门代课老师打电话说要考试，可是我真的赶不上了，老师就给我留了试卷，等我回去后让我一个人在实验室考，真的很感谢代课老师的宽容。

所以，在收到“威胁”通知时，我并没有害怕，心里很平静，更没想着回学校，不过当时的确准备了很多自己大学参与社会实践的材料。直到一个月后因为要进行毕业生信息采集才不得不回校，回去后这个事情也妥善地处理了，次年夏季我也顺利地毕业了。

过了2010年的冬天，学院的事情基本搞定，自己和伙伴们开心地进行着年后的支农青年集中培训，而一首《春天里》一直唱响在培训期间。

2011年3月下旬，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刘老石离开了我们这个年轻的团队。有无法形容的悲痛，为什么好好的一个人突然就没了呢？早上起床时还在讨论“起床不难，难的是决定起床”，上午还讨论部门工作计划，直到晚上出事前的几个小时还打电话过来询问了我们印刷集体学习材料的事情。

清明节期间我们内部组织刘老石追思会，当温老师走进青年公社的大院时，当时就差点大声哭出来，身边的伙伴也是眼里泪珠在不停地打转。可温老师的讲话，一开始就说幸好没有看到你们有人哭，要不然一定严厉批评，对刘老石最好的纪念就是学习他的精神，继承和发扬他所做的事情。这个教诲，一直铭记心中，也时刻怀念着刘老石。

几个月以来，刘老石的离开是同伴们无法接受的，但工作还得继续。只是因为缺失了这样一位年长的灵魂人物，团队之间的争吵和分歧越来越多，愈演愈烈。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们喊着“为农民服务，为理想奋斗”“团结互助，共同发展”，内部却有如此大的分歧与隔阂呢？甚至有一年过年期间，晚上想来想去睡不着觉，就给几位骨干发短信询问此事，不过也不了了之。后来，慢慢地自己也想明白了，大家各

有想法和对未来的预期，不是说谁就是对的，谁就是错的，既然不能形成共识，那就各自按照自己的想法努力去干，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刘老石走之后的两年内，自己充满信心地和几位同伴进行着全国支农青年的培养工作，在原来集中培训、区域交流、外出走访等基础上，我们也进行了各种创造性的尝试，总结以往经验、了解“90后”大学生的现状，编辑《大学可以这样过》文集等。直到2014年4月，团队内部出现了整体性的困惑，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影响了这么多年轻人，可等到毕业之后这些年轻人去哪呢？有什么成长平台可以让年轻人继续参与乡村建设呢？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在大的社会背景下不是我们能够完全回应的，但我们很想去探索。于是就提出，我们能否集中到山西永济蒲韩乡村这个成熟的农民合作组织中办公学习，当时还只是个想法而已。

扎根蒲韩

2014年5月12日，我的儿子诞生了。一个小生命的到来让自己开始思考起未来的选择。我在北京待了四年多，从来就没有过长远的预期，还是比较喜欢乡村的环境与节奏。大团队的分歧，小团队的困惑，再加上看到好些返乡青年的案例，自己和爱人有了返乡的念头。不过即便是离开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那也要从事与乡村建设相关的工作，因为对发展主义和消费主义文化价值的反思已经深入内心，也在渴求自己的人生能不断追寻真理与正义。当时返乡的想法比较单纯，想在村里推动一些农户做生态生产，在城里开一家生态面馆，同时以此为窗口销售村庄的其他生态产品。不过自己心里清楚这个事情极具挑战性，也一直在观察和准备中。

2015年1月，对我来说又是一个人生比较大的转折。在第五届全国农民合作组织论坛上碰到了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的韩磊，他向我们讲述了自己负责的城市消费店工作，同时询问我们能否参与，特别是吸引一些附近高校的青年学生。当时就觉得，我们之前不就讨论过驻扎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的事情吗？于是，2015年3月18日，我就带着团队单纯的想象来到了蒲韩乡村，希望在这块宝地能够为更多的年轻人提供学习成长的机会。

来到蒲韩乡村，我就开始跟着郑老师的团队工作学习，的确是和通过书本案例的学习不一样，不只有理论分析的骨架，更是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故事，绚丽多彩，但也充满了艰辛，让我真正开始深入了解了农村。

2015年7月，我们设想的通过蒲韩乡村的成熟经验培养年轻人的计划迎来了新的一批学员，爱人和孩子也来了，我们这个大家庭就开启了“扎根蒲韩，胸怀天下”的探索。

在蒲韩乡村的学习，综合而丰富，经常会有外面的朋友来访，顺道就会有各种讨论交流。但慢慢也发现，蒲韩乡村就是一个宝库，我们能

学多少，能学多深，完全取决于我们与蒲韩乡村的互动有多深。那我们就不能只是学习，可以有更多的想象和探索。于是，2016年4月我们开始筹备引进长春云凤社的发酵床养殖技术，先进行本地化的试验，再结合蒲韩乡村的生态种养殖计划向农户推广。而试验和推广的过程就是年轻人最好的学习机会，事实也是如此，在建设发酵床的两个月里，我们在技术员的带领下，木工、焊工、制作各种酵素和营养液，学习内容非常丰富。此刻，我们的猪仔在发酵床里已经快乐地成长了七个月，从其毛发竖立而发棕色就能看出健康程度，团队也已经与蒲韩乡村负责生态养殖的团队开启了向农户推广发酵床养殖的计划。2016年上半年我们建了一栋发酵床猪舍，下半年改造了一座有30年历史的青砖木制老房子，全年都在搞建设。它们算是真正开启了我们放弃幻想，面对现实，以生活的心态在蒲韩乡村扎根的探索。

2017年，我们已经在推广发酵床，也在寻找有理念有意愿的农户记录农产品的生产过程，一方面为城里的朋友提供价格实惠的健康农产品，另一方面探索参与式保障体系的运作过程。相信在蒲韩乡村这块宝地上，我们能探索的事情还有很多，儿童教育、中医养生保健、生态技术、建筑设计……

如果说蒲韩乡村在用看不见的方式重构乡村的生产生活服务体系，进而在一定区域和程度上超越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易方式及其文化，那我们希望一批批的年轻人也是其中一员，更希望蒲韩乡村这种植根于生产生活的经验能在有条件的地方得到借鉴和扩散。

乡村当下的一切，都不是自身孤立的表现，既不是自以为是者眼里的衰败与贫穷落后，也不是心怀幻想者眼里的世外桃源，乡村就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以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金钱至上和消费主义为核心的文化价值侵蚀渗透下的真实存在。

如果我们愿意在教训中反思，认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那就有了重新思考和认识乡村价值的基础，而生于此长于斯的人们及延续上千年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则是核心。

对我来说，最为重要的是逐渐认识到从一个批判与反思的角色走向建构时，自己就是参与乡村建设的直接受益者，既无光环，也不悲情，以生活的心态探寻理想社会。而以生态生产为基础，内含传统文明与智慧的乡村教育、医疗、养老等生活服务系统的建构，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立足于乡村的文化价值自信，也是中华文明引领世界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这足以让我们为之奋斗一辈子。值得庆幸的是，在孩子教育和父母身体调理中我们已经获得更多的启迪和能量，我们可以骄傲地说乡村可以办最好的教育和医疗。

在参与乡村建设的道路上，从来就没有终点，也一直充满着质疑。然而，当所有的一切都成为一种内在的生活方式时，即便只是黑暗中的一支蜡烛，但依旧充满光亮，因为我用自己的姿态活着，也许还会更持

久！

4.2 在蒲韩打造理想的儿童学堂

人才计划八期 韩瑞荣[1]

就像一粒种子，被轻轻地埋进土里，在自然的护佑下，积聚力量，破土而出，开始它生命的旅程。我喜欢这如草一般的生命，简单、阳光、自在，风霜雪雨皆是平常。

在我经历的20多年生命时光里，看似平淡的生活教会了我本真的东西，热爱、珍惜、选择和面对。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希望我能够活出这朴实如草一般的生命。

重新认识乡村

我叫韩瑞荣，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来自山西省会太原郊区的一个普通乡村。父母都是勤劳、善良的庄稼人，他们努力为我们营造了温暖的家庭。因为母亲一直以来身体都比较弱，姐姐在小学三年级时就帮着大人照顾我和弟弟，踩着小凳子给我和弟弟做饭吃——家人就是我的明灯。

2003年爸爸打工的焦化厂倒闭，面对着巨大的家庭支出，我们家贷款养起了奶牛。如果说前13年的成长经历奠定了我对村庄、对土地、对农业的无限感情的话，那么应该是从家里养奶牛起，我开始感知和关注我们村庄遭遇的变化。普普通通的小农户在面对市场、商贩、大资本、皮包公司的骗局，还有一些无助和艰辛伴随生活，在心里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和家人一起辛勤劳动谋生计，也培养了我不怕吃苦、积极乐观的心志，不慕虚荣，劳动光荣。母亲病重时无助的祈求，使我内心对村庄里生活的人们的感情越来越放不下，我们活着不只是为了钱，更希望我们生活得幸福有尊严，生活得有精神期待，在真的无路可寻的时候，能够有互助的手拉你一把。我决心去尝试，当时对村干部这类职业向往的心情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最终，我如愿以偿，毫无悬念地考上了本省的农业大学。

大学四年，我过得充实而满足，而这最要感谢的是我们的社团（山西农业大学大学生支农队）还有梁中心（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是通过社团让我稚嫩的“梦想”得以落在农村，不管是梦圆还是梦碎，在村里做一些事情的过程中，我开始重新认识养育了我十几年的村庄。关注三农，塑造自我，在反反复复的乡村实践中，那些所闻所感无时不在鞭策和教育着我，警醒着我。在困惑、期许和不甘中我接触到了梁中心，理想、现实、感性、理性，在中心的培训和学校的环境之间，内心

也在经历着反反复复的挣扎和斗争，庆幸的是我没有放弃，渐渐地知道了什么是最贴近心意的东西，或是希望或是愿景都可以勇敢地去追求、创造，为之奋斗，生活有很多可能。大四，不愿庸庸碌碌于校园，希望接地气的乡村实践能让心找到具体的方向，给毕业后的自己一个定位，一颗更明了的心，于是幸运地踏上了难忘的人才计划八期这一年的学习路程。

尝试中寻求变化

“我不清楚自己要什么，但我很清楚自己不要什么”，八期开始之前我说要给毕业后的自己一个定位，这句话是结业时我内心的真实写照，在农村发展领域去工作和探索是我接下来人生道路的一个最真心的选择，只是现在的我还不清楚自己擅长做什么，适合做什么。于是我继续在梁中心的团队中、平台上去寻找和学习。

2013年夏至2016年冬的三年多时间里，我主要参与人才计划青年人陪伴和农民合作组织网络的一些工作。人才计划九期、十期“副班”，从学员转为工作者、陪伴者，刚开始的团队适应和磨合是在痛哭之后才开始敞开心扉、真诚理解并沟通的，因为自己在过程中没有对青年人成长有逐渐深入的学习和钻研，更多的是基于自己有限积累的成长和体会，慢慢有了很多困惑和纠结，心绪的拉扯其实浪费了蛮多时间和精力，但就这样在自我的拉扯中总结教训，推着继续往前走。在农民合作组织网络培训中学习两年，自己也在不断的尝试中得到自我肯定，在组织协调方面有所突破和进步，开始更加自信，不再怯场，我知道了做充分的准备会让自己更加有信心，在实际中操练才能收获更多。这三年多来，因为组织培训和调研的缘故，去过了东南西北很多的省份和地方，走的地方多了，人也逐渐变得明朗，心里依旧在找寻我和乡村结合的那个契合点。

时间似乎过得飞快，从2010年（大一）暑假第一次参加梁中心的培训学习，转眼已过去这些年头，感恩这一路的陪伴和支持者。有时候想，如果没有遇到梁中心，没有一点点地加深了解，如果不是受这群人的影响，在与农相伴成长的路上，我一定走不了这么远、这么久，那时候觉得这些从事乡村建设的哥哥姐姐身上都绽放着光芒。这一路上，我都是追问着内心走过来的，每一个节点都是如此，追求自己内心渴望的事业、喜欢的人、想要的生活。2016年，我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很幸运我的另一半也是同道中人。家的组建让我对接下来的生活有了新的思考和尝试的勇气，不想继续在城市漂泊，我要回到乡村去，落地生根，我的心才能踏实下来，那里有更真切的点我可以去探索和尝试。“想走得远，就要一群人来走”，想要在如今年轻人纷纷逃离的乡村扎根生活并且探索一些事情，团队的支持和陪伴尤其重要，于是缘分又一次拉近了我和蒲韩的距离。

乡村是最完整的学校

如果说八期那一年蒲韩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驿站，那现在它已变成了一个家。在结业离开三年多之后的初春，我又一次真正回到了这块土地，有了一座小院，回到生活里，扎到泥土中生根发芽。在这近一年的时间里，我有幸成为一名乡村儿童的陪伴者，跟孩子们的朝夕相处让我对自己、对生活、对教育有了新的发现、观察和体会。

什么是生活？有生命的东西，在一个环境里生生不息的就是生活。譬如一粒种子，它能在不见不闻的地方发芽、开花。陶行知先生在他的“生活即教育”的演讲中这样比喻。生活，就是教育；是好的生活，就是好的教育；是劳动的生活，就是劳动的教育；是健康的生活，就是健康的教育；不是生活，就不是教育。

我们的孩子在园里不是被充分呵护着的小宝宝，他们不会被要求一直端坐在那里，这不许动那不许挪，他们更像是园里的小主人，或是我们这个家里的一员，大家一起磕磕绊绊，吵吵闹闹，欢欢笑笑，相亲相爱、有条不紊地过着我们的生活。在我们一起用心创造的多姿多彩的生活中劳动、玩耍、学习，慢慢长大！我们的村庄里处处都是好玩的东西，爷爷修剪下来的核桃树枝被我们扛回了学堂，老师帮我们锯成适合做积木的长度，接下来的活儿就都是孩子们的啦！砂布打磨切面，嚓嚓嚓嚓嚓嚓，切面被磨得滑滑的没有一点小毛刺。从园里的大枣树下找来细细长长的小树枝，小心用力地戳一戳，“老师你看，这核桃树中间的小小圆圆的（薄膜）多漂亮呀。”经过孩子的手之后，小积木基本就算做好了。在去看火车的路上我们发现了一大片黄豆地，收割后不久，虽然已被勤劳的农户拣拾过，但地里还是有好多品相不太好的豆荚可以捡。劳动中的孩子专注、投入，相互提醒脚边的豆根，相互帮助，满载而归。午饭就有新鲜的豆子可以吃啦！

初秋连绵的阴雨过后，园里的青石上生了不少的青苔，滑溜溜的，有几个孩子好几次都差点摔倒。于是，周五，我们的大扫除日，娃娃们拿起了铲子、刷子，刷刷刷，让青石露出它本来的样子，娃娃们小小的身体里蕴藏着大大的能量。温暖的初冬，我们去地里捡红薯，不一会儿我们的小袋子就被小小的红薯头装满了，洗净一蒸，咚咚咚咚咚咚，红薯捣成红薯泥，揉一揉，压一压，“老师，这个真好吃！”

院子里的两个沙发角是孩子们的娃娃家，娃娃们经常在那里过家家，娃娃们放学回家前都会自个儿把娃娃家收拾得整整齐齐！我们请隔壁爷爷帮忙清理厕所，孩子们高兴地观察爷爷工作，跟着车的声音打拍子，帮忙接水，还跟爷爷聊两句，爷爷工作完了，我们一起谢谢爷爷。我们一起在看似平常的生活中学习，体会，懂得感恩。

“乡村是最完整的学校”，我们希望孩子们不出村就可以得到最好的教育，而村庄里依然能够听到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欢笑声。孩子们奔跑在田间的一条条小路上，春夏秋冬是不同的模样，我们在每一条巷道

里捉迷藏。冬日暖阳下的巷口晒着太阳的奶奶笑盈盈地看着嬉戏打闹着的孩子们。听到孩子们一句“爷爷好，奶奶好”，老人家更高兴了，亲切地把孩子拉到自己身旁，摸摸胖乎乎的小手：“好，好。”

回到村庄的生活真切、接地气，也最自然和朴实，我相信好的生活就是好的教育，从生活出发，在平淡中学习，用心体会就会发现很多生命本来的样子，乡村生活中流淌着的朴素情感滋养着我和孩子们一起一天天地慢慢生长！在乡村教育探索学习近一年的时间里，大自然、村庄和孩子们给了我很多的“关照”，“人活着得有意义，有意义就是好好活，好好活就是做很多有意义的事”，彼此的陪伴让我几乎每一天都可以努力过得快乐、充实而有意义，我想已经找到了我要的生活。“有人爱，有事做，心存希望”，便是幸福。在乡村，我们将一直探索和用心创造真正幸福的生活！

在蒲韩的思考

2012年秋到2013年夏，我在山西永济蒲韩乡村学习，正是这一年，蒲韩成了我生命旅程中一个重要的驿站。她的光辉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目光，在她的怀抱中我生活了半年之多，我这个外来的农村姑娘深受她的恩泽。从黄河吹来的风，从中条山那边升起的朝阳，在黄河南边落下，布满夜空的星星，无论何时都让我觉得充满生机和希望。这一年，收获了感动、来自心灵的力量和更多的清醒，乡村世界带给我的自然、舒适和幸福，乡村中遇见的人们给我的真诚善意，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了母亲般的温馨和疼爱。想要懂乡村、懂农民，想要在这块口口相传的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里让心有个家，可以去做些事，这个愿望充满了孩子般的心意，简单纯粹，没有杂质，也清醒地认识到愿望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中想扎根、想实现要历经诸多的磨炼。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心理上经历了很多的冲突、矛盾和起伏，但正因为走过了一些困苦，心才得以沉下来，落地生根，也就一点点增多了一些理解，不去苛求而是边做边想，也就可以笑着往前走。不管是自己在村庄中的生活，还是之前短期地去村庄里组织一些下乡活动，这些经历离真正认识农村还差了好远，想象着组织起来就一定会有成效，就可以发展得越来越好，所以在稍微深入一点接触到现实中存在的合作组织，尤其是看到曾经合作起来红红火火，如今却凋敝的现实时，心里就有些受不了，产生了怀疑和失落。其实是自己把现实想象得太简单了，无知地认为不是这样就是那样，没有去了解一个事物它发展的历程，还有它出现一些变化的大环境和原因，盲目地跳进了自己设定的圈套中，这应该算是我跳出学生身份之后重新思考的开始。从对实际的片面认识中一点点解脱，在自我认识的路上一点点爬行，印象最深的是跟着辅导员一次次地跑农户，沟通解决实际出现的问题。

2013年3月底小麦春浇结束，意料之外的是有些村庄因无法冬浇，也没有适时、适量地补充氮肥，而导致处在第一年转换期的小麦出现了

明显的发黄现象，蔫蔫的没劲。我们前面几次去的时候好几家农户的态度都比较差，大家早已习惯了只要在播种时把复合肥施足，接下来除了常规的浇水便几乎不用再管，即使前面沟通中提到过，但大家也不太可能去重视冬浇追氮肥，而且有些村子并没有冬浇的习惯，所以当大家看到自家的麦地黄黄一片时，就对合作社统购的有机肥产生了意见和质疑，带着情绪时就更难听进去我们讲到底为啥小麦发黄了。于是我们就一遍又一遍地跑，发黄豆叶面肥，拿纸条给大家写补救的小方子。当我们远远地看到其中一位大叔背着喷壶走到地头时，心里的石头终于稍稍落地，第四次、第五次，我们再去那几户人家时，院子里阿姨的笑脸又回来了。服务服务再服务，在乡村工作多数是做人的工作，用一颗真诚的心去多沟通，就会慢慢地筑起信任和理解。

4.3 扎根蒲韩：干十年看成效

人才计划十一期 李园春[1]

不知不觉在蒲韩乡村已经待了两年多，从刚来时对村民说自己的虚岁假装年龄大，到现在对村民说自己在村子里生活的时间来表达自己对扎根乡村的决心。回想自己这条路上的步步选择，没有什么突兀与巨变，似乎自己与乡村的关系一直都是一种理所当然的状态。在父母看来我是一个喜欢折腾的孩子，不着家地去了山西一个村子里。而我却一直觉得自己并不喜欢折腾，生在农村也就爱着农村，选择了乡建也就认定了乡建。

要看得起穷人

20世纪90年代初，我出生之前父母在郑州打拼，但因为我的到来，父母又回到了村子里，大约是自己的家乡才能给予家的感觉吧，所以我是一个在农村出生并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母亲在繁重的农活中，有时会抱怨父亲当年不该冲动之下舍弃郑州的各种机会回到农村，父亲不语。而我对城市生活没有什么概念，对乡村生活也不觉有什么不妥。直到小学四年级去市里的学校寄宿，才感受到了自己与城里孩子的差距，衣服土、玩具土，似乎第一次有了自卑的感觉。妈妈宠爱我，会带我去买新衣服、新玩具，但那种追逐与迎合让我感受到了慌张和无措。似乎还是和村子里的土孩子们撒野，跟着父亲去地头散步让我更自在一些。

长大后与身边的朋友们交流时，很多人会提及小时候父母交代：努力学习，考上大学，将来一定要离开农村去城市生活。我庆幸，我的父母没有强烈地给我灌输这样的目标。在我初中时种地难以维持家中的各种开销，小家小户难以把控养殖的风险，父亲的木匠手艺在村子里也很冷清了。父亲便开始外出去建筑工地打工，打工是真的苦。但父亲不会给我讲太多自己打工的苦，也不会讲好好学习不做穷人，而是给我讲“要看得起穷人，有能力要帮穷人”。

高中期间我很不济，体弱多病，父母对我的期待就是健康平安，再也不会说我有能力要去帮其他人了。但随着我年龄的增长，父亲给我展现的对社会的思考与批评也越来越多，父亲的善良与正义在持续地影响着我。高考后，我报了河南农业大学，还选了一个“村干部”专业，我告诉父母，毕业后要到农村做事情，要找与农业有关系的工作。父母没有任何反对，父亲还把我送到了大学。

走出去与走回来

我去河南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农林经济管理（农村发展与管理方向）专业报到。此专业是我们学校在2008年响应中央的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提高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整体水平，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背景下，加强大学生村干部和基层管理人才正规化培养的鼓励和号召的创新举措。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村干部”专业。然而在我们宿舍的六人中有四人是被调剂到此专业的。后来接触到我们专业2008年第一届毕业的学长才了解，第一届毕业生中在见习村干部（与人才计划相似，大四一年学校安排学生到村庄里实习一年）的实习过程中，只有一人坚持到了最后，所谓的村干部专业毕业生中也只有一人一边读研一边当村干部。而见习村干部的实习仅限于第一届学生，之后就再也没有了。学生中80%都是被调剂到此专业的，对学习内容无兴趣，老师讲课也无兴致，老师与学生相互应付，再加上当时我们学校的新校区校址偏僻，设备不齐全，越来越多的课程流于形式。专业带给了我很大的失望。

但我比较幸运，在学校社团招新的“百团大战”中，农村发展研究会（以下简称农研会）嫩绿的招新海报吸引了我。于是我大学时代唯一的社团便是农研会，它支撑了我整个大学时期。大一时跟着社团的学长学姐们理论学习与下乡实践；大二时外出参加交流会进工厂打工调研；大三时去建筑工地放电影外出游学实践；大四时参加了人才计划。

大一参加的理论学习有些浅薄，但那种对大学的想象与批评，对理想的认识与追求，对“三农问题”的了解与反思等，对我还是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大一寒假下乡去了河南兰考的一个村庄，调研当地留守儿童的教育状况，虽是在农村长大，但认真地去了解一个村庄的状况还真是第一次，在他乡的调研也促进了对故乡、对自己的认识。乡村凋敝，留守群体难以维持乡村的活力，最有希望的孩子们却与父母两地分隔，深受伤害和折磨。而自己的家乡何尝不是在凋敝？在自己的成长中父亲又何尝不是长时间外出打工呢？大一暑假再次下乡，去了驻马店某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在校的理论学习多有对农民合作的赞扬支持，能去一个合作社看看，内心还是有很多期待的。然而看到的却是，农民自己合作起来困难，资本牵头下的合作社多有其他利益诉求，难以保证与农民利益一致，表现出来的是农民参与度不高，认可度也不高。于是曾经的期待变成了迷茫。

大二寒假报名参加了全国大学生支农调研交流会江苏会场，因为在校的学习与实践都难以有机会出去走走看看，所以这次交流会让我印象深刻。这次交流会上，有来自全国各地百余名支农社团的学生，还有乡建领域多个高校老师的讲座，都让我既紧张又兴奋。但由于自身积累不够，老师讲的很多东西我都听得云里雾里的，尤其是温铁军老师讲世界格局。但还是有很多启发，原来从文化自信的角度可以重新认识我们的乡村；原来乡村建设与青年成长，都是可以结合世界格局来认识的；原来民国至今乡村建设也有一条历史脉络……交流会也有下乡安排，南方

的村庄真是富裕，但是生产生活方式似乎和农业没有太多关系，我在感慨城乡差距大的同时，也看到南方与北方村庄差距竟也如此大！而我们想要的乡村又是什么样子呢？大二下学期参与社团活动少了一些，但“五一”还是去了趟河南登封归朴农园，在这里我被王宁哥所感动，他虽对社会整体认识悲观，但还是用拯救一块土地的努力来影响周边的人，这也算是自己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生态农业。

大二结束后的暑假我去南方工厂打工调研学习。不到一个月，在拥挤的人才市场里找机会，在凶狠的语气与目光中进厂，辛勤地加班工作，艰难地辞职要工资。在那里我看到了留守在村子里的孩子们的妈妈，妈妈通过电话听到孩子感冒发烧，内心的痛苦与折磨并不亚于孩子。在那里天南地北的人也会聊家乡，聊童年，但那种欢声笑语都会随着聊现在回家戛然而止！在那里人随机器不分昼夜地运转，过着黑白颠倒的日子，加班成了想要不一定能要到，不要也不一定拒绝得掉的“奖励”！后来我到了辞职的时间，辞职理由是：我感冒发烧还不准我请假，还要我加班。线长不准，先说没有辞职名额，自离则没有工资；再说受不了苦，能干什么？我说回家种地，引来一场哄笑……打工期间，重要的支撑是，许多如我一样进厂体验的大学生的交流互助，许多关注底层人、关注青年成长的老师的指导与帮助。从那时开始，在新生代农民工留不下城市、回不去乡村的状况中，我遇到了两个“好人”群体，一群是帮其留在城市，另一群是帮其回到乡村。

大三，静不下来心，我跑去了学校的建筑工地做活动，聊天、放电影、开联欢会。人们评价刘老石老师“手握两个弱势群体，一边是学生一边是农民，将两个群体结合了起来”，我是在大三，才去察觉同一个空间（当时正在建设中的学校），两个群体（学生与建筑工人）毫无交流轨迹。于是和几个朋友一起走进工地搞活动，那段经历让我走进了父亲的工地。父亲打工多年，身材消瘦，很少把工地上的苦展现给我，大三的打工与走进工地的活动，父亲给我讲了很多讨薪、工伤、高险、伙食、宿舍等事情。再去反思大学我所参加的活动，一系列走出去的事情却促使我走回来，走回自己的家乡与家人。一腔热血以为自己在做服务他人的事情，其实是在做自我认知、自我拯救的事情。

真实的家乡

大三下学期非常慌乱。工人与农民，城市与乡村，现实与理想，每个抉择都很困难。一度选择了考研来逃避，最终，还是放下考研的材料，认真痛苦地去想，回归初心，还是乡村。返乡的众多困难，都来自自己还什么都没做的情况下的想象，为何不去试试？就这样决定了。现在想来，真的是不知者无畏呀！后来是在河南以“返乡创业与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大学生交流会上再次听说人才计划的。从当时的情况看来，人才计划太适合我了。有了回归乡村的梦想与决心，却没有任何主意、任何技能与团队。负责人才计划的少雄哥对人才计划十一期培养方式的描述也令人十分向往：与在地成熟的农民合作组织相结合，为理想被激

发的年轻人们提供返乡的可能。于是我参加了人才计划十一期，留在了蒲韩乡村。

蒲韩乡村是一个非常丰富多元的社区，容纳了不同的学习需求。参加人才计划的前半年，我们几个学员刚开始跟着少雄哥一起做过蒲韩乡村辅导员手册，也借此机会把蒲韩乡村整体了解了一遍。之后少雄哥让我们独立思考自己的兴趣点，根据自己的兴趣点进入蒲韩乡村的不同部门学习。但对于我来说，明确自己的兴趣点好困难，一度苦思冥想，到最后明确的不是自己的兴趣点，而是我要返乡，在蒲韩乡村我想要学最基础的入户工作，因此我跟着蒲韩乡村综合业务辅导员下乡数月。综合业务共有18个辅导员，清一色的当地农村女性，年龄从18岁到50余岁不等，每人负责200户左右的社员工作，大多数时间是在一户户地走访农户。我跟着她们从开始克服方言障碍，接下来留心她们的交流内容，然后是感受交流技巧，再到最后却是有些焦躁了。平易近人是最基本的入户素质要求，一定要善良但不能是易欺，一定要真心但不能是单纯。我们一向以“敦厚善良”来形容农民，但现实中农民是非常多元的，狡黠与贪心甚至无赖与狂徒基本上存在于每个村庄里，所以入户是项对综合素质要求很高的工作。我先是为每天有一点发现而兴奋，再是为自己的木讷单纯而感到怀疑，最后是因参与感不强而有些焦躁。

就在焦躁之时，寒假来了。半年来的学习中时常想，如果我回家会如何如何。这时也恰好趁寒假之际，回家再做些探索。又去参加了河南区的大学生支农调研交流会，借交流会之际带一支队伍回家。然而假期，得到的不是鼓舞却是打击。没有回家的人还在远处漂泊，回家的人分头转进了棋牌室，村里的孩子们都跑到了邻村和市里的学校读书了，上了年龄的文艺队队长一直在叹息不好组织啊……我很吃力地在春节后做了一场村子里的文艺联欢。返乡之路却让我退缩了。

寒假后回蒲韩乡村。我们几人再谈学习计划，我说我现在不想返乡（故乡）了，现在返乡我就是找死啊，先积蓄能力与资源以后再看机会吧。这半年的日子我跟随蒲韩乡村老干事两个月，回学校忙毕业的事情一个月，在农场劳动一段时间，就这样人才计划结束了。半年来忙忙碌碌，终于拿到了学校的毕业证与人才计划的毕业证，但却毫无修成正果的感觉。暂不返回自己的家乡，那先去哪里呢？

留在蒲韩做好产品

在河南没有遇到特别适合回去的机会，在蒲韩，却有留下的机会。2016年春节，我们十一期几个学员单独回家备受打击时，少雄哥提到，既然独自返乡奋斗困难重重压力巨大，我们可以考虑以一个团队的形式继续做些事情。春季发酵床生态养猪技术的引进，老石农场的建设也是倾入了我们全员的劳动与期待。看着事情刚刚起步，团队感逐渐呈现，河南回不去，也不太舍得离开这里，于是留在了蒲韩新青年绿色公社。

然而2016年的后半年，并非是想象中的斗志昂扬与振奋人心，却是有些无所事事，烦躁焦虑。农场步入正轨后，再也不像建设时期每人都需拿出十二分的力气，像我这样的女孩子就更显得没什么事了。去了趟北京，承担了乡建润村（RRPGS农产品销售平台）在永济寻找产品以及整理面粉信息的工作，却是一项非常容易完成的工作。于是我出现了近两个月的空闲期，越是空闲越是无法静心去学习。终于在年底，我们团队讨论出了关于2017年在蒲韩乡村做产品生产记录的一系列想法，最大胆的想法就是要做一个为消费者提供蒲韩乡村四季食物的全年套餐。为了这个全年套餐忙了好一阵子，过完年还忙了一段，最终却因为胆子太大，步子太大，套餐给泡汤了。重新调整计划，开始踏踏实实、规规矩矩、一点点地做起了蒲韩乡村好产品的开发与记录。

2017年，在规规矩矩地做蒲韩乡村好产品的开发与记录工作中，我承担了走访农户，记录产品生产信息，书写产品故事的工作内容。在年前自己的空闲期，时不时地喜欢写点东西，写写身边的人和事，于是2017年的新工作就是走访农户，挖掘产品背后的生产故事、人物故事，再去书写就成了一件让自己充实愉快的工作，产品也成了我去认识乡村与融入乡村的一个切入点。每种食物，不管在食用者看来它是光鲜的还是丑陋的，背后都同样有着酸甜苦辣的土地故事、人物故事、村庄的故事。有人在坚守，其实也有人在抛弃；有人选择了放弃，也能遇到人重新捡起。行走在广袤的黄河滩地，我是真的能看到丰富的作物，能感受黄河的庇佑与自然的恩赐，也真的能感受到我们去糟蹋土地时的心痛，与善待土地的希望了……关于农人，在我心中也开始变得更加丰富生动，从淳朴到淳朴之中也有狡黠与贪心，再到今天越来越能理解：当今在土地上、在乡村里谋生并非易事，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勤劳还是小聪明还是强势，或许都是为了一席生存之地啊，而且想要生活得略微好一点，这些素质基本上都是需要的。

蒲韩给予的勇气

回想起参加人才计划期间，少雄哥让每个人想自己的兴趣，我坐在院子里的阳光中，努力地感受阳光，内心却依旧阴郁。扎根乡土，情怀必不可少，但自己的专业技能、兴趣点同样必不可少。大约我也是受体制教育深刻影响的孩子，我不知道自己的兴趣点，对身边看似感兴趣的事情也保持怀疑的态度。阴郁不解后，我有点急了：我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兴趣，苦想也不知道，我这么年轻干吗一定要把自己固定到一个兴趣上呢？直至人才计划结束，内心依旧迷茫。而如今，在走访农户、记录产品、书写故事的过程中，却感受着那缕驱除阴郁的光。再去想这样的经历，会觉得，想要扎根农村，自己的兴趣与技能真的是必不可少，当恐慌与焦躁还有空想并无助于自己找到兴趣与技能时，做事情再做事情，学习再学习，过好当下，自然而然会找到自己所需要的。

参与乡建，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在社团时，我以为是如同支农队下乡一样起早贪黑，打着鸡血地奔跑；大三时，我以为是理想无处寄托，

努力之下却还是一片村庄的凋敝；人才计划时，我经历了学习的日益见增、停顿不前，信心满满、萎靡不知如何振发，不分昼夜地劳作、整日无所事事；结业后，同样是在经历着各种不同的工作状态、学习状态、生活状态。在这些不同的状态中，我逐渐明白，乡建不是一个固定相同的状态，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状态，同一个人也要去经历各样的状态。而如果想要走得长远，就必须要有勇气去接受不同状态的挑战，熬得过不同阶段，享受不同的过程。像少雄哥说的那样——“扎根！”像郑冰老师说的——“干十年，看成效！”我对自己的期望也是如此：不折腾，扎下根，努力干！

4.4 一位大男孩的“生态养猪”

人才计划十一期 胡雅超[1]

2015年8月，我与一行校内班的同学拖着行李到了蒲韩乡村北郑村村口。胡雅超来接我们，很热情地做起了自我介绍：“我叫胡雅超，古月胡，优雅的雅，超越的超，是人才计划第十一期先来报到的学员。”皮肤黝黑，笑容满面，一直露着的牙齿显得特别白。当时只觉得这个男孩皮肤黝黑但却一身清爽与阳光，戴着眼镜，却没有书生气，而是有一股矫健利索的乡村青年的粗野之气。我大约是见过很多文质彬彬一副礼貌客气模样的支农学生，也见过一些不修边幅邋遢苦兮兮的返乡青年，乍一看到雅超这样的，有些意外惊喜的感觉。同为第十一期人才计划驻蒲韩学员，再同为蒲韩新青年公社工作人员，我与胡雅超接触的时间越长，越觉得这个人很是丰富有趣！

不羁的问题少年

人才计划一周的集中理论学习后，我们用了一段时间来做人才计划第十一期的团队建设。雅超自觉主动地担任了班长的职位，也开始了一步步把更丰富的自己展现给大家。首先是生命历程分享，我们这个班长经历丰富，故事精彩，让我至今记住了很多。

雅超生在太行山深处的山西省长治市黎城县黄崖洞镇，这里曾经有华北地区敌后中共最大的兵工厂，让雅超很是自豪。这里真的是山的深处。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会问妈妈：“妈妈，山的那边是什么？”妈妈回答：“山的那边也生活着像咱们一样的人啊。”小雅超再问：“那太阳每天都从山的那边升起来，山那边的人不会被热死吗？”……“90后”的胡雅超，小的时候物资匮乏，也是大山闭塞的缘故。就拿水果来说，南方的水果很少见，不知道橙子叫什么，小雅超对妈妈说：“我想吃那个皮不好剥的橘子。”时常还会停电，刚有电视时，小雅超非常喜欢看电视，停电时一片漆黑，妈妈说：“停电了，不能看电视了。”雅超说：“点上蜡烛就亮了，咱们点上蜡烛不就能看电视了吗？”……但不管是在现代人看来的物资匮乏还是环境闭塞，都没有影响到雅超有一个开心、快乐、自由的幸福童年。

一群孩子，漫山遍野地跑，似乎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爬到树上摘核桃，搞得衣服上全是灰，老妈骂一顿，却也只当是耳旁风；下到水里，抓鱼抓螃蟹，没有水污染，也不会害怕水深危险；放学扔下书包，在家门口与一群孩子打扑克，孩子们有自己的圈子自己的玩法，从未觉得大人就有多么了不起……

初中时，调皮孩子变成了问题少年。雅超就读于县城较好的中学，成绩名列前茅。恰逢县城里小黑网吧疯狂发展时期，好哥们儿喊，就跟着去玩了，一玩成瘾。在一次考试前夕，通宵也没玩过瘾，考试成绩全年级倒数第二，倒数第一的是陪自己一起通宵的好哥们儿，优等生变成了差等生。终于，一群泡网吧的孩子，被老师抓了个正着，叫家长。雅超说，那天老师和爸爸在办公室里聊，自己被罚站在门口，不知道聊了些什么，爸爸出来时说："走，跟我回家。"问："爸，为啥回家呀？""学校把你开除了！"回家后爸爸每天让他跟着干繁重的体力活，意在告诉雅超："不好好学习，就要干活。"几天后，让去镇子上学，在一种强烈的羞耻感中，雅超很迅速地把网瘾戒了。这件事情对雅超的影响是有长远性的，他形成了较强的自制力，高中时发现自己要形成烟瘾时也是说戒就戒；工作时，发现自己体型变得肥胖时，说减就减。

高中时，他成了一个小混混。当学生们都在害怕老师时，从小也怕老师的雅超想通了："老师也是个人，有啥可怕的！"特别紧张的高中时代，课间十分钟老师早到好几分钟在门口站着，同学们都匆匆忙忙跑进教室坐好，而雅超不，就和老师一样站在门口，和老师就聊了起来。更多的时候是翘课，到了全年级最差的班级，老师一句"不想听，都别来了"，下节课就真的全打球去了，教室里只剩老师。关于上大学，雅超觉得上大学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呀，村子里、镇子里上了大学的那些人也是普普通通的，不是什么好的模样啊。于是高中后去了太原一所专科学校。

人大到"人才"的反转

雅超的大学很是风光。班长、班上的学生对他十分称赞；团委社团部部长，学院所有学生社团的活动都要经他过目；学生会外联部部长，各种人脉与关系……团委的老师对他十分认可，毕业后还会对他说："老胡啊，现在这学生当班长的都不如你啊，学生们不领情，老师们不喜欢的……"当年的雅超，天天旷课，打游戏，打游戏赚的钱也够自己的网费了。考试时还次次拿奖学金。如鱼得水的日子中也收获了爱情。

大三时，全国人大信息中心来学校招聘，工作地点在人大办公厅，北京人民大会堂附近，工作内容是负责人大的网络系统安全。听起来很牛的样子，北京也是个让人心生向往的地方，于是就报名去了。刚去时，感觉还不错，工作不累，吃住待遇不错。日子久了，就不爽了。一坐便是几个小时，盯着电脑看，其实也没啥事，一边工作一边偷偷做淘宝客服，还是无聊得要命。合同签了两年，在2015年两年快到期时，是可以续签的。但想到自己又不可能一辈子在北京，房子都混不上，女友在郑州，一直异地也不是个事。从小到大，一直往外跑，一直想走出山沟的心，突然间想回去了，至少要回到山西吧。这时，很意外地遇到了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第十一期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招募。这么长的名字，还是简称"人才计划"吧。雅超至今都难以顺利完整地说清人才计划的全称，就这样，阴差阳错地参加了人才计划，成了村里一

个“养猪”的青年。

在蒲韩办农场

参加人才计划真的是意外。雅超曾经与自己的一个本科朋友聊天，建议朋友去考公务员，理由是不累，有保障，多好呀！朋友说，读书、考大学、考公务员，人的一辈子就这样了吗？一眼看穿，只是为了混口饭吃，多无聊啊！雅超只觉得朋友想法新奇有趣也有理，但这事也就这么过去了，从未想过自己要选择一种独特的生活与发展方式。不打算在北京干的时候，要去哪里？还是没谱的。这时老家村里一位干部发来了人才计划招募书，说是想让村里青年去参加；至于村干部去参加了什么会，是什么人给分享了人才计划的信息都不太容易搞清楚了，但这招募书真的是引起了雅超的兴趣，就报名了。当然人才计划结业后，不知道那个村干部还记不记得村里年轻人参加了人才计划，只知道雅超返乡不成，倒是留在了蒲韩新青年公社专研起了发酵床养猪技术。

雅超经常说自己“可能是参加人才计划这么多人中最少反思的一个了，别人都是参加过大学生支农社团，参加过什么公益组织，在什么农场待过，而我就是在北京工作太无聊了。报名人才计划之前都不知道‘三农’是什么，因为写报名表，要填对‘三农问题’的看法，才去百度的”。然而雅超是我们几个学员中，最能迅速将各种理念吸收与转化的人。来蒲韩之初，参与蒲韩乡村儿童夏令营，接触梁少雄、梁云燕这对坚持自己带孩子的年轻夫妇，这些教育理念与行为也促使雅超开始反思主流教育。在2015年国庆节，雅超回老家几天，带着短短几个月的学习与反思，在自家办了一场小型儿童教育座谈会；而在平时的儿童私塾与周末蒲韩少年互动的活动中，雅超也是最受孩子喜爱的老师之一，于是“超叔叔”的名号使用至今。谈起饮食，雅超说自己之前的生活是：“重点是好吃，什么食品安全啊，从来没有关注过。吃不死就行！”唯一一次控制饮食，控制垃圾食品的摄入量，是决心减肥，发现各种饮料零食含糖量极大，于是全部戒掉，配合锻炼，效果特别好。人才计划开始接触到了食品安全的问题，也开始身体力行地做些事情，在自己的饮食上先是减少零食，做菜关注食材与调料；当他拿这些理念与行动去影响亲人时，却遇到了阻力：讲道理，没人听，甚至在吃饭时，不吃鸡精也被嘲笑了。面对阻力，雅超的办法却是简单有效，一方面是少说大道理，多落实到行动中；另一方面是把家乡的生态好食材小米啊红豆啊，装进礼盒打扮一下，代替市场上泛滥的牛奶方便面礼盒，效果非常好。

人才计划的前半年，雅超是想着要返乡的，一边学习一边关注老家的动态。国庆假期办了个小型座谈，寒假更是带了一支学生支农队，回家“搞事”。然而“搞事”不易，想着创业肯定是更难的了，2016年蒲韩新青年绿色公社与蒲韩乡村共建的“老石青年农场”开建了；雅超也就把独自返乡创业的事暂且放了放，干起了自己本身就感兴趣的农场。虽为山村里长大的孩子，但种地与养猪这样的事情，参与并不多，顶多就是家里农忙又恰逢自己周末或假期时搭把手，说“会干”已经很勉强

了，“懂”这个字是不大敢说的。这样的问题不仅雅超有，当时我们团队大多也是如此，脑袋中仅有一些零散的童年记忆和经验。在这样的情况下，雅超展现了很强的担当力与学习力。春天刚来时，测量土地、画图纸、列种植计划；天气转暖时，买种子、找村里的种植能手、做记录；苗苗都长出来时，拔草、浇水……至今还记得：当时雅超与王鑫去农场浇地，早上四点多出发，晚上九点半回来，两个清爽的男生变得黝黑邋遢，准备好的饭菜都有些凉了，两人一边吃饭一边喝酒，我在旁边问：“感觉如何？”雅超说：“这就是生活呀！”我问：“什么是生活呢？”雅超说：“种地与喝酒都是生活，这种感觉真好。”雅超就这样慢慢地在开拓农场紧张的节奏中，在繁忙的土地劳作中，找到了自己的状态与感觉。在我看来，雅超种地不算好，但真的是最靠谱的，我们中也没人敢说比雅超做得好。少雄哥说：“雅超是能担事的人。”

蒲韩生态养猪的起步

学习发酵床养猪技术，对于雅超来说是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意料之中是因为：第十一期人才计划招募时，有两个学习基地，一个是蒲韩乡村以综合服务为主的农民合作组织，另一个是长春云凤农牧合作社以生态技术为主的农民合作组织。雅超一看，综合服务是啥玩意啊？不感兴趣，还是学点技术靠谱。然而，梁少雄的一番电话，说蒲韩乡村这里也有机会学技术，你来蒲韩乡村吧。想着蒲韩乡村在山西运城永济，女友家也在运城，就答应了。这样看来，当2015年后半年，建设老石农场引进生态发酵床养猪技术时，雅超当仁不让地参与和学习就是很正常的了。但再远一点来看，从小学习，爸妈交代不好好学习就要在家种地，又脏又累；不好好学习就像那养猪的，又累又臭。雅超也一直认为养猪就是臭的，从未想过返乡的雅超当然更是从未想过养猪啊。这样看来，又是一个意外了。

学习发酵床猪舍养猪技术，已不仅仅是养猪技术了。猪舍建设、发酵床制作、养猪技术全部是要学的，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不管上过多少学读过多少书，也不管是不是在村子里长大的，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基本上都是零基础。雅超却表现得很自信，更有干劲。东北长春云凤农牧合作社的技术员李叔过来了，雅超就跟着，采集微生物做菌，各种水果药材做酵素、做汉方，还有鲜鱼氨基酸、钙液等，雅超跑前跑后，从材料的准备到过程的参与到最后成品的鉴定“一条龙”。猪舍建设除了看得懂图纸，懂得方位，还得懂打地基、砌墙、电焊、木顶制作，在当时资金不是特别充裕的情况下，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是要参与进去的。雅超也在那个时候，突然间变成电焊工、木工、砌墙等样样都能来几手。那段日子在我看来，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忙和累：起早贪黑，高温繁忙，如果不是偶尔下个雨，根本没有喘口气的机会。我曾一度认为我坚持不了太久，但就是看着少雄哥与雅超拼命的样子和大伙儿彼此的鼓励，不知不觉地把发酵床猪舍建好了。

当人才计划结束时，雅超的发酵床猪舍学习并没有结束，似乎又是

一个开始。猪舍建好了，菌做好了，发酵床也做好了，该上猪了，但怎么养猪好像还不会。雅超先去“小毛驴”参加了一周的培训，系统地、理论加实践地再次学习了发酵床养猪技术，回来后，跑到山上看猪。我们在村里有家邻居，把猪养在山上，猪满山地跑，健硕无比，我们也想着一定要养底子就健康的猪啊！看猪、定猪、拉猪，六头小黑猪，六个小宝贝入住发酵床了。雅超说：“喂猪可不仅仅是把猪喂饱啊，还要好好地观察它们。”玉米打碎按一定的比例配上麦麸豆粕，再根据小猪的生长情况，不断地调整喂食量；除此之外，雅超还忙活着在黄河滩找应季水果蔬菜，第一个冬天，小猪们的零食都是苹果南瓜，硬是让很多人羡慕起了猪的生活！到2017年陆陆续续又进了好几批猪，而第一批猪出栏时，我们的猪体态浑圆，毛发黑亮，雅超一脸的得意啊！

到了如今，喂起猪来，雅超基本已经应付自如了。在2017年的发酵床技术推广工作中，他又担起了大梁。当很多人来蒲韩乡村参观时，到老石农场看起了发酵床养猪，雅超能轻松地把所有的原理与优缺点讲清楚；即使是在课堂上，雅超带上PPT，也能讲得面面俱到。这些还都是小事，蒲韩乡村有几家农户也要建发酵床猪舍，雅超一下子从2016年发酵床建设技术员李叔的小跟班，变成了总揽全局的大师傅。发酵床技术一点点地被更多的人认可，也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做起了发酵床建设，雅超逐渐在蒲韩乡村扎了下来，也从老石农场走了出去！

乡村也可以不同

众人都觉得养猪又脏又臭，种地又苦又累。年轻人都觉得，扎根城市的生活与工作才能成为奋斗的动力。雅超也坦然地说，曾经的自己也是那样认识的。然而如今雅超说自己在参与蒲韩新青年公社的工作中是感受到希望了的，曾经的观念也有了很多改变。

来蒲韩首先是人与人关系的改观。梁少雄是人才计划第十一期的项目负责人，是我们的班主任，也是面试我们的老师，雅超一直把梁少雄当领导看待。但刚来蒲韩时，少雄哥每天早起给大家做饭，雅超感到非常惊讶。哪里有领导给大家做饭的？他遇到的领导都是三步路都懒得走，总是喊：“小胡，你过来，给我……”所以来到蒲韩，少雄哥是第一个对雅超形成巨大冲击的人。而接下来的日子，蒲韩新青年公社的一群年轻人，虽然不能像自己之前的弟兄们那样可以在一起随便吹牛皮说脏话，但和这群年轻人可以在一起平等互助互爱互信，还是让人感到非常舒适的。

其次是对于农业的认识改观。之前提起农业当然就是父辈与祖辈那些人辛辛苦苦、依靠土地讨营生的日子，如今却是发现农业原来有新的模样。养猪可以不脏不臭不累，发酵床养猪便是如此，没有臭味，不用出粪或者冲粪。种地也可以不“土”，甚至是挺“洋”气的，什么CSA农场啊订单农业啊乡土游学啊，等等。而且乡村年轻人的缺失，也正是我们的希望。

最后是对于生活的认识改观。乡村相对城市更有生活气息，雅超更是喜欢那种少有拘束的自由，喜欢开着三轮车带上几条狗在黄河边跑的感觉。自己在乡村的饮食与生活节奏越来越健康与放松之时，雅超对饮食、教育、养老、医疗等问题有了更多的反思。在雅超看来，房子啊车啊等物质的需求，并不会因为选择了乡村而不是城市就不再需要了；我们选择了理想，但并不是就不食人间烟火了，况且自己也不是一个理想青年啊，自己一直很现实啊。别人在城市追求的很多东西，我们在农村并不是不能实现，甚至在饮食、医疗、教育等方面，乡村是拥有更好的资源的。乡村并不是之前土气而又闭塞的环境，而是更有利于实现我们想要的生活的环境。

如今的雅超，主要负责生态发酵床技术的研究与推广，同时也开始有了精力参与我们在蒲韩乡村RRPGS探索的工作，综合能力越来越强。在2017年的国庆节，也终于与大学时已经恋爱的女友结婚。媳妇在郑州一家公司做会计几年，工资不低，日子却是又累又枯燥，曾经因工资低而反对雅超，但如今也意识到结婚成家后，两人应该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雅超的新打算便是，过了年让媳妇也来蒲韩做份乡村的工作，找个房子，努力工作，好好生活！

（口述：胡雅超；整理：李园春）

4.5“农二代”：从城市回归乡村的艰难心路

人才计划十二期 傅艳吉[1]

从心理上回到乡村

一直想动笔不知道该写什么，我是个太普通的“农二代”。从小接受的教育和千千万万个走进大学校园的农村学子一样：好好学习，离开家乡、离开农村，到城里去，到不用种地的地方去。

因为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要离开农村的，所以我从来没把用在考试上的认真用在干农活上。现在二十几岁虽然不至于五谷不分，但是也不了解任何一种作物完整的种植过程。同样作为农二代，跟20世纪80年代《平凡的世界》里农村孩子艰苦奋斗的经历不同，我的成长是一直被升学的焦虑包围的。

从初中开始，我的求学之路就是我作为一个“农二代”的进城之路。念初中的时候我从村小的佼佼者变成了县城学校里的“土鳖”，那是我第一次深刻感受到城乡差距，感受到乡土的文化是不被认同的。在同学眼里，我的方言是土的，我的衣服是土的，我的学习习惯是土的，我的文具是土的，而“土”是不好的。慢慢地我开始认同他们，也觉得自己是土的，自己的全部生活都是土的，是不好的。我甚至害怕跟我的同学提及北方民居中最具特色的炕，我害怕说我家是睡炕的，说我家是农村的。我难堪地想着为什么别的同学家住在单元楼里，睡在床上，为什么他们的文具都是在文具店里精挑细选的？为什么他们都穿着得体的新衣服？慢慢地我的思维就开始转变：为什么我不是一个城里的小孩？

没有人能回答我。于是我开始努力学习普通话，努力考出好成绩，努力想让老师喜欢我。按照一般的电视剧套路发展，这应该是一个励志的故事。然而，初中的三年我像丧失了学习能力，我对自己全面的否定延伸到了学习上，我难以相信自己做出的数学答案，除非我马上能够看到我做的和旁边的同学是一样的。数学就像一个魔咒给我画了一个圈，让我只能徘徊在及格边缘，怎么也跳不出来。我对乡村的认识也给我画了一个圈，让我无法接纳自己跟朋友真诚地沟通交流，更学不会像城里的小孩一样跟老师熟练地亲近。我把这段初中时代叫作作为“农二代”心理上“城市化”的过渡时期。

进入高中以后，已经慢慢熟悉了城市的套路，跟城市里的同学打交道已经不会再闹出尴尬的笑话。但是最好的朋友都是“农二代”，也许是惺惺相惜、志趣相投，跟他们相处的时候我更像自己，也更有自信。换了新环境，有了新朋友，认识了新的老师，我开始发现数学没那么难，

我自己做出来的题目也会是正确的，我可以比城市里的小孩考得更好。成绩的提高也慢慢地让我找回了自信，于是像每一个经历过高考的学生一样，为了考上一个好大学日复一日地刷题。高考发挥正常，考上了一个还不错的大学。报志愿的时候按照老师的经验勾选了服从调剂，知道自己被录取后无比兴奋。渐渐地被从未听说过的专业冲淡了，一个跟农村跟农业紧密相关的专业。生活总是很讽刺，从小被教育离开农村，结果大学却要读一个与农业相关的专业。这段高中生活，可以算是我心理上完成“城市化”的时期。

从大学开始，是我心理上漫长的“逆城市化”阶段。大一的我茫然无知、浑浑噩噩什么都想尝试，大二开始为了奖学金专心学业两耳不闻窗外事。转变开始于大二的暑假，我在一个农资公司实习一个月，主要收集种植花椒的大户信息和销售农药。我发现工作的自己满脑子都是成为最优秀的销售人员，想办法让农户购买大包的农药，想办法让农户购买更多的农药。等到实习结束的时候，我慢慢回忆起一些被眼睛自动屏蔽了的本该关注的东西。比如一年比一年加剂量使用农药，已经造成花椒树的抗虫能力越来越差，当年蚜虫大规模爆发，用任何农药的花椒树都没能幸免，但是几年没有打药的树上却几乎没有蚜虫。比如很多农户买农药都是很盲目的，别人买什么就跟着买什么，农资店配什么就买什么，什么药杀虫效果最好就买什么。我开始反思自己扮演的角色，我只想到销售额，但是随着销售额一起销售出去的还有不断增加使用农药剂量的价值观。我没办法认同我销售出去的价值观，我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而感到愧疚。

愧疚就会思考怎么办，农民的问题怎么解决呢？课堂上学了那么多的管理学、园艺学、农学、经济学，我能做什么呢？于是去听很多老师的讲座，仍然是一头雾水，想要找人讨论，但是身边的室友都是城里的小孩，他们没有跟你相同的困惑，更不懂你的苦闷。幸运的是相似的人是有磁场的，大三的时候，我找到了自己的组织——老乡建潘家恩老师在学校组织的乡村建设主题读书会。我现在还记得第一次参与读书会时候的场景：老师居然一点架子都没有，跟同学们一起分吃零食，同学们也都很坦诚，畅所欲言地聊着自己的家乡、农村的生活和自己的思考。我发现那曾经被我的同学不认同，后来甚至被我不认同的乡村，是有这么多人深爱着它、牵挂着它，而且他们并没有像我一样因为成长过程中那些别人的否定就怯于谈论乡村、承认乡村的价值。

我渐渐在这种热烈而纯粹的气氛中放下了小心翼翼的敏感，敞开心扉积极地参与到读书会的讨论中。我们讨论“90后”的大学生活，讨论乡村的教育，讨论春节的见闻和思考，讨论青年人的成长，讨论过时的资本主义，讨论消费主义和法制建设，虽然大多数时候我们的讨论只是停留在现象层面和吐槽上，但是两位老师总会在话题“跑偏”的时候把大家拉回来，总会提出我们没有注意到的角度和逻辑上的漏洞，在不断转换视角的过程中越来越接近事物的原貌。然后慢慢发现我曾经认为的我的农村身份、我家的土炕、我逮蚂蚱喂猫的小时候，这些曾经带给我羞耻感的回忆终于慢慢回归了它本来的样子——平静的、温和的，朴实而充

满力量的。

被身边的声音否定了这么久的家乡和农村终于重新在我的生活中得到了认同。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温铁军老师分享了一个读过《八次危机》的读者的来信：“他说他是农村出生的孩子，原来有一种自卑感，尽管在城市里有相对不错的工作，收入也还可以，但是总觉得自己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因为家是农村的，自己的亲友有很多还生活在贫困当中，所以在价值观上有一种自轻自贱的成分。他说看了《八次危机》以后自我轻贱的感觉没有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国家能够有今天这样的起色，有这么大的经济成就，最初是我们贡献的，是我的父辈、我的祖辈，我们农村向城市贡献了大量的剩余，才有了今天中国让世界瞩目的成就。今天城市的一砖一瓦，城市的一分一毛都有我们的贡献，我们是功臣，我们没必要自轻自贱。”我对这段话深以为然，我终于可以直视我的家乡和我的过去，开始能够把自己的遭遇放到整个社会进程中看。原来我一直想往前走，不想也不敢回头看，我不愿意承认那些过去，但是一个没有过去的人怎么能看到自己的未来呢？接纳自己就像从一个漂浮在湖面上的水草慢慢变成一棵扎在土壤中的树，我的家乡不是我的负担而是我的后盾，是我成长的基石。

我终于从心理上走回了乡村，从初中“进城”到大三开始“回乡”，这条路太长了，长到我后面的路走得那么顺畅和理所当然。大三寒假参加了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主办的第二十一届全国大学生支农调研交流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校内人才培养计划第七期的培训，下乡支教、调研、办联欢会，在寒冬腊月的农家院里教村里的阿姨跳广场舞，在梁中心的小院子里听关注农村问题和青年培养的老师讲课，在自由论坛上跟生气蓬勃的年轻人一起畅聊理想和现实。

蒲韩历练与另一种可能

我大四报名参加了第十二期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开始了在山西永济蒲韩乡村为期一年的驻点学习。蒲韩乡村社区有3865个农户会员，在地域上涵盖了永济市蒲州、韩阳两个镇的43个自然村，同时对接了永济和运城的8100户城市消费者社员。团队核心坚守着真实生活品质第一、经济互助提升第二的原则和“服务、教育、再服务”的宗旨，通过建立农民综合服务组织开展资金互助、农资统购、日用品统购、农产品统销、农民技术培训等多项社员服务业务，并在村庄开办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儿童私塾、不倒翁学堂、红娘手工屋，是中国农民合作组织中“大熊猫”级别的存在。

在蒲韩乡村的半年，我主要参与了蒲韩乡村儿童私塾、不倒翁学堂以及合作社统购统销业务，在这个过程中见识了综合性的农民合作组织的力量，看到了理论和现实结合的可能，也通过在参与各项业务时不断地反思和总结让自己获得了成长。

在儿童私塾做老师的时候，我非常认同儿童私塾的教育理念，结合华德福教育和本地乡土教育元素，带孩子亲近自然，给予孩子爱和自由，从生活化的教育出发，关注孩子的内心需求。然而当自己真正成为一名儿童私塾的老师时，最真实的感受就是琐碎和累。因为蒲韩乡村的儿童私塾还处在探索阶段，很难提供给老师成熟的培训。这就意味着作为一名私塾老师，你的精神全天都需要高度集中，去观察孩子，照顾孩子的起居生活，注意孩子的安全问题，处理孩子的争吵和哭闹，引导孩子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实践自己学习到的教育理念并传递给家长，在每天不断重复的练习中总结自己的教育经验。也正是这种每天高度集中的精神、如履薄冰的体验，让自己提前了解到为人父母的不易，也因此更理解自己的父母。除此之外，通过自己反思和学习会慢慢觉察到孩子身上的不良习惯并不是这个孩子天生的，而是从家长身上或者家庭环境里带过来的，也就会明白郑老师说的那句：“教育家长比教育孩子更迫切。”也就慢慢能够从更客观的角度理解孩子，其实每个孩子身上出现的那些大人看起来不可思议的行为都是孩子在理顺头脑里混乱世界的过程。孩子价值观的建立是需要不断尝试的，老师和家长都需要给孩子足够的空间，尊重孩子自己的成长节奏。

参与不倒翁学堂的工作时，每天跟村里的爷爷奶奶打交道，跟他们在学堂读《三字经》、猜谜语、锻炼身体，两个月的互相陪伴，见识了乡村里老年人的活力，也见识了郑老师说的“乡村里藏龙卧虎”。有些不爱说话的老人会剪漂亮的窗花，有些缺了门牙的老人张口就是一段快板，有些走路颤颤巍巍的老人唱起蒲剧来抑扬顿挫，有些七十几岁的老人踢毽子可以踢几十个，有些不苟言笑的奶奶表演的小品让大家捧腹大笑。但是老人第一次走进不倒翁学堂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做了一辈子农活的老人一开始是非常不好意思当着众人表演节目的。为了动员爷爷奶奶积极参与学堂的活动，我想了很多办法。先是跟每个爷爷奶奶谈心，拉近距离，了解每个人的特长。了解之后给每个爷爷奶奶布置任务，让他们每个人负责一个板块，退休的老教师杨爷爷教大家念《三字经》，头发花白的兽医爷爷带大家练八段锦，爱唱歌的玲玲阿姨带大家唱歌猜谜语。其他人就每个人记住一个拍打动作，然后教会大家，带大家一起做。我自己就勤快地帮爷爷奶奶打扫卫生，认真地听爷爷奶奶聊家常故事，主动积极地在学堂组织多元的活动。为了让爷爷奶奶大胆地唱歌，我还专门去打印了很多爷爷奶奶只能记住只言片语的老歌，比如《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绣金匾》等，放大字体教给他们学唱，在他们开口唱时，给予热情真诚的鼓励。通过这些努力我很快获得了爷爷奶奶们的认同，大家的参与感也越来越强，学堂的氛围也就越来越热闹。

跟着蒲韩的辅导员参与年货统购更是让自己见识了乡村工作者工作方法的灵活多元。在登记统购信息时，辅导员面对不同家庭的不同需求，总是能根据生活经验和工作经验给出恰当准确的建议。面对不熟悉的社员时，辅导员能够通过亲切的话语和贴近社员生活的信息迅速地跟社员拉近距离，通过真诚的沟通和恳切的建议迅速跟社员建立信任。带着年轻的新同事下乡的时候，经验丰富的辅导员不仅会将片区内各个社

员的家庭情况和关系网络讲给新同事，还会通过带新同事入户，耐心地讲解农户的不同态度传达出的信息，这种乡土社会里最常见的传帮带能够让新同事迅速地成长。除了统购产品，辅导员入户时的工作是多线开展的，登记统购信息之后还要跟进社员家庭种养殖信息的变化，随时对社员信息进行更新，实时了解社员的需求动态，每个辅导员都是一幅活的乡土社会资源图。

通过参与蒲韩乡村的工作，我开始反思在大学里学到的三农知识。我在蒲韩看到的农民合作社是非常有活力的，有层出不穷的问题，也有游刃有余的解决方法。而我作为一个学农的大学生，考试重点里的那些合作社的原则、框架、政策、背景和演进，根本没办法告诉我如何把那些拗口的议事原则落实到每次会议中，如何解决合作社内部的纠纷，资金互助、统购统销这些名词如何能落实到实际工作中让合作社社员理解和接受，如何利用合作社中的盈利部分支持公益项目，如何在事实上完整地进行合作社的二次返还。这些在现实生活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这些经验是需要通过实践操作和反思总结才能学会的，而我的大学并没教我这些。我只能在乡村的工作实践中张开身上每个毛孔进行吸收，吸收小伙伴们的智慧，吸收农民的智慧，吸收合作社工作人员的智慧，吸收乡建前辈的智慧，将其他人的经验与自己的实践相结合来重新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

在蒲韩的驻点除了给我带来了工作上的历练，更多地让我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十几个年轻人在蒲韩新青年绿色公社的院子里过集体生活，共同承担劳动、共同学习、共同探讨社会问题。每个人都学着劈柴、生炉子、种地、做十几个人的饭，被我们一直忽视的生活好像回来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是一体的，不是割裂的，生活不只是一张床、一份外卖，而是用心地经营每餐饭、每个节日。我们吃当地当季的食物，按时吃饭，早睡早起，休息的时候去爬中条山摘野果酿酒，去黄河滩看落日踩泥巴烧烤，去老旧的寺庙看古迹。我们的生活节奏慢了下来，但是内心越来越充实、越来越踏实。

乡村的困惑与成长

人才计划面临结业的时候，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成型的想法：一定要做乡村工作，一定要在乡村里工作。于是应聘了中国乡建院驻村社工，结业之后开始在重庆市城口县巴山镇下面的村庄驻点。

当自己离开了有着共同理想情怀的十几个小伙伴，开始跟同事两个人在乡村驻点时，会发现自己的心态和想法随着生活和工作状态的改变，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刚进入村庄时很焦虑很急躁，感觉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太多，面对一片混乱的工作，面对政府和村民对自己的不信任，会觉得做乡村工作实在需要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才能在乡村里获得话语权。现实层面需要学习如何跟政府领导对话，如何跟村委对话，如何跟村民对话，如何回应各方（村民、政府、公司）需求，如何

推动内置金融合作社运转。理论层面需要了解国家政策、社区营造、环境治理、自然教育。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不熟悉的，但是看起来这些东西都是我的工作需要的。

最开始的一个月我感觉自己每天都像打仗一样，拼命地吸收知识，解决问题。但是因为我一直关注在解决具体问题上，我每一天都过得很疲惫。于是开始跟乡建的前辈们沟通交流，跟自己的领导沟通交流，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的工作方法是有问题的，乡村的工作者不应该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而应该是把身边精通各项武艺的人调动起来，而有效地调动资源才是协作者必备的技能。除此之外我发现自己在开展工作的时候容易被头脑里固有的条条框框限制，执着于希望事情朝着自己的预期发展，很难跳出原有的理论框架直面现实的问题，不够实事求是。

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之后就开始调整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在日常工作中注意调动村民，通过孩子带动家长参与，学会回应政府的需求，根据政府的工作节奏调整自己的工作方案，把自己的需求和村民的需求分解，一点点放进整体的方案里，找多方共赢的方案。学会跳出具体事务看整个项目的进程，给自己学习和反思的空间，让自己的工作节奏紧凑起来，让自己的生活节奏慢下来。现在虽然还是会有些急，有时候还是会不知所措，但是已经能慢慢关注到自己的成长，关注到村庄微小的变化，并为这些变化感到惊喜，愿意为带来持续的改变付出持续的努力。

对于一个农二代来说，从乡村走向城市是艰难的，要通过层层考试，进更好的小学更好的初中更好的高中更好的大学，然后不甘心地看着中产阶级的大门在眼前关闭，但是这个过程被包装成一个励志向上的故事刺激着越来越难以通过考试改变命运的农村学子；但是对于农二代来说，从城市走回乡村也是艰难的，游荡在城乡之间太久，在哪边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熟悉乡村但是不熟悉如何做乡村工作，乡村的工作环境也往往难以满足年轻人的预期。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琐碎而真实的，但是因为尝试过脚踩在泥土上那种踏实感和幸福感，也意识到了作为农二代、作为年轻人身上该有的责任和担当，我愿意回到乡村。我当然知道乡村工作不是田园牧歌式的“在希望的田野上”，也清楚自己未来还将面对更多更复杂的问题，我更明白面对瞬息万变的外部条件，资源有限的一个人能做出的改变是缓慢的而且是有限的。

但我仍然相信农村广阔天地将大有作为，而且这广阔天地里正在欢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农二代们的返乡。从大环境来看，十九大工作报告中习主席提出了乡村复兴战略，再次强调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能看到党和国家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的勇气和决心；从小日子来说，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关注食品安全和生态农业，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向往乡村生活，并开始走进乡村。这些都意味着乡村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也意味着乡村将给年轻人带来越来

越多的机遇，农二代返乡的路径会越来越多元。

我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二代大学生，我曾经被教育离开乡村去大城市生活。我现在在乡村工作、生活，发现自己并不羡慕大城市。

4.6 平凡大学生的下乡救赎

人才计划十二期 贾林闯[1]

这世上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成长模式，回想自己读大学以来六年的成长路径，便觉得这经历虽也有一把辛酸血泪，总有幸运可谈了。从高中相见恨晚的方爷进入大学后遥相慰藉获得思想“启蒙”，到进入本校支农社团的“上路”；再从社团里经历困惑之后的“逃离”，到宁波讲习班的重新“引吭”；最后从大四临毕业时的“回归”，到进入蒲韩之后的“救赎”——这些经历都让我感觉到自己的幸运，但更多的还是经历凄美成长过程中的辛酸。这些故事筑起了自己成长路上的长墙。

启蒙

大一上学期，还在院学生会里混迹的懵懂的我，被远在北京读书的方爷，其社团（北航大学网）经历所产生的思考和困惑点拨了：我开始反思自己所在学生会的环境、宿舍的环境乃至大学的环境，后来从他那里观看到《恰同学少年》这部影视作品，一口气看完，心潮澎湃。从那以后，我慢慢退出了院学生会等社团，但之后大学生活却因不参加任何社团活动而变得单调乏味，加上大学课堂上的空洞，我一下就陷入了初入大学的迷茫之中。

好在大一下学期行将过半的时候，我在学校草坪上邂逅了一群谈论“毛泽东时期的垄断”的师生，刚被《恰同学少年》洗礼过的迷茫少年，听到“毛泽东”三个字就下意识地停下脚步，去探听他们围坐一圈所谈论的话题。于是，当天便加入了自己剩余大学时光都与之有关的南昌大学三农协会。

进入社团之后的第一个小长假就跟着学长学姐们参加了为期三天的下乡调研活动。那次的活动虽时间不长，但它对自己的影响很深刻。我开始反思自己进入大学之后的各种不良表现和见闻，也开始正式跟自己当初反思过的——学生会里小屁孩之间的“官僚关系”，大学宿舍打游戏睡觉的虚度状态，大学课堂的沉闷空洞和考试风气的不正——这一系列并不积极向上的事物做彻底的决裂。

大学行思——贵溪下乡总结（节选）

此次调研，唤鹰队的11个青年男女去了一个叫贵溪的地方。在那里，他们一起挤一辆小三轮，在歌声中感受大自然对这几位“天外来

客”的洗礼。在那里，他们围成一桌吃着或东道主或后勤组为大家献上的丰盛的三餐，还记得钱大嫂给炸的虾，还记得谈可同学给拍的黄瓜。在那里，他们分组去各家拜访问询，与村民心贴心地交流，感受他们的苦与乐。在回来的路上，他们有说有笑，互相调侃，那笑声仿佛让少年回到了曾经的高中时代，那段肆意昂扬的青葱岁月。让人不觉感受到，走出来了，大家都在心里想着的那些再也回不来的高中，再也回不来的交情，真的像是做梦一般，快速地重现，却又像流星一般，划过长空，难再见！

……

把话题拉回这次调研，三天的活动有何收获？有对个人语言组织能力的锻炼，对祖国山水见闻的惊喜，一次完美的邂逅。可在很严重的现实问题面前，那都算些什么呢？也许调研就是去发现问题的，也许回来之后就是要反思，就是要在痛苦之中挣扎。本次活动让自己真正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久违的感觉啊！这是很值得庆祝的！Nice to meet all of you，my boys and girls!

带队

第一次的经历，开了自己走向校外的社团实践活动之先河。由于参加活动的积极性，加上对社团想要引导大家思考的问题又比较对口味的思考成果，社团的学长（并没有指导老师的社团，学长就是指导老师）就开始想着影响我、发展我。我也开始跟随他们学习、开会、聚餐、团建。渐渐地，我被当时社团“带头大哥”的思想状态影响着。

在跟着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学校里发生了一起校园车祸，一辆校外车辆在学校人流比较大的路口撞到了一位大一的姑娘，经抢救无效死亡，后来姑娘的家属到车祸发生现场拉条幅维权。自己在被社团“底层情怀”熏陶过之后，深深地感觉到这种弱势群体的申诉方式很令人心痛，于是就主动联系社团大四年级的原社长，提出要帮姑娘家属维权的想法。后来我们三个人深夜偷偷摸摸地找到姑娘家人在学校后街住宿的宾馆，拿相机拍了一些他们的视角里此次车祸之后，学校对姑娘救助过程的真实故事。然后我们还策划将视频配上字幕，发布到网上，将事情从另一个视角展示出来，为死者家属发声。后来学校跟死者家属达成赔偿协议，我们三个拍摄的“调查视频”便失去了实际意义。但经历这件事之后，自己的所谓正义感被激发了出来，我开始认为自己具备了伸张正义的行动力，而且对于事物的认知模式也极端地发展成为单纯的底层情结，也许就是后来被意识形态研究领域称为“民粹主义”的思维方式吧。

不知不觉就到了大一结束的那个暑假，社团一年一度的长期下乡活动要在这个暑假开展。而我到那个阶段的时候，已经从参加三农协会之前独立思想的“无党派人士”变身为贴着三农协会标签的社团分子。可以说，我的思维模式已经慢慢被社团经历改变了。

从第一次走出校门到第二次带队下乡，自己慢慢有了愤青的样子。这样的转变并不是全拜三农协会所赐，还有大学环境本身引发的思考，有《恰同学少年》影片的影响，以及社会环境的因素。协会的经历使我在大一酝酿了一整年的思想转变开始化为实际言行，它是催化剂，加快了自己这种世界观产生、发展的速度，却并没有改变这种“化学反应”的本质。随着这种变化程度的加深，我也已经开始在反思中走向迷茫，开始在批判与否之中挣扎，开始在理想和现实二元对立之间徘徊，但整体状态还是保留着对于协会的归属感。

春晚

在挣扎与归属感并存的时光中，自己跟随社团的学长又走过了一个学期的社团生涯。那个学期，我们社团的社友会经常去学校附近的建筑工地给建筑工人放电影、发报纸、作访谈，也会向他们分发一些从学校学生那里募捐来的军训服。当然，最令人难忘的是在元旦前夕给工友们组织的一场联欢晚会。在大二上学期期末备考的一次自习走神之际，因为脑海里浮现着下乡搞文艺、工地办晚会的种种场景，内心萌生了年底回家组织一场乡村春晚的念头，最终这样的想法一步步得到实现。后经过一个月的组织沟通，在放寒假回家之前已经组建了一个由在全国各地读大学的小学同学组成的春晚筹备组，我们在筹备组里分工、讨论，回到家后开会、收集节目、拉赞助。因为晚会筹备工作的各种不顺利，还忍痛放弃了和方爷一起去观看“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现场录制的机会。最终，晚会在步履维艰的进程中完成，其效果差强人意。

乡村春晚组织总结（节选）

曾经不止一次听说过，人最幸福的几件事里面有一件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可以很荣幸地说，这样的事情自己在两年前就很疯狂地做过了。在一本书上看到过：“人每天会有上千种奇妙的想法，只是很多想法都没有付诸行动。”对于这台晚会，这也许就只是万千想法中的一种，在众多想法之中，它比较有思想基础，就获得了付诸行动的动力。于是，便不在乎身边的朋友是支持还是反对，做了一件“想做就做”的事。

接下来，用自己的信念去找小伙伴，用执着劝那些从来没听说过“乡村春晚”的小伙伴，用自己也没底气的信心去安慰信念摇摆的小伙伴。在学校找学长要材料准备策划，备考之余在群里跟小伙伴报告晚会的进展，询问每个人对晚会事务的兴趣取向，以便安排每一项工作的负责人。为了不让一起长大的小伙伴感到所谓的“独裁”为了做到民主集中，每一项工作的商议拉得很长，一个月的时间，只是确定好了群里面的人员安排表，也很清楚地知道，在学校也就只能干这些事。还不得不提及跨年夜群里出现的争吵（为了抓效率，无意识地边缘化了初中之后便辍学的小学同学，因此激怒了本来积极性很高的同学），这件事虽然对晚会影响不大，但毕竟能看出“屁股决定脑袋”的说法是很对的，在学校里

就是学生思维，在社会上就是社会思维，还有人性里面的小弱点，那些不能逾越的鸿沟，也只能有一方作出必要的妥协。

这场自以为胜利的“村晚”搞完，内心虽喜悦但仍对拉赞助时那种如同伸手向人要钱的感受耿耿于怀。在这样的体验中迎来了大二下学期的开学季，我压抑着对钱的重要性重新审视的意识，刻意提醒自己坚持社团“崇尚精神修为，批判拜金主义”的理念，当然也在这样的提醒之中把自己逼到了用理想去对抗现实的对立面上。

逃离

不巧的是，在南下洪都的火车上恰好遇到从天津赶来的社团学长，两人亲切地聊起我在假期办的乡村春晚一事。当我很自豪地说出我们在晚会当天张贴了“大年廿九，和大学生一起办春晚”的条幅时，学长脸色一下变得煞白，为人耿直的他开始痛批这次晚会跟它应有的性质完全背道而驰了。然后两个人在火车上聊到不欢而散：他没有继续解释他对我批判背后的逻辑，我也没有继续询问他所发现的我的问题在哪。他回到自己的车厢，而我就在火车上陷入了对于“社团到底要培养什么精神，金钱到底重不重要”这些问题的苦苦思索之中。

回到学校，我缺席了社团开学初的见面会。感觉一个被拉赞助搞得自觉是在“向人要钱”的孩子，他努力完成的一场让自己身心俱疲的村民活动，却得不到学长的认可，而学长也没有给自己说出社团的思想到底是什么，连最起码的对自己批判的原因都不给，这让人开始怀疑继续在这样的社团待下去的必要性。

那个学期社团学长也会找我聊天，也会拉我继续回到社团里参与学习和实践，但已经难以重建对社团的归属感了。我成了一个没有社团，也没有社团以外交际的孤独青年。而那个学期自己的状态烂到了极点，我再一次踏上了逃离南昌的火车，哪怕一个人在路上，不管去哪，我都一刻也不想待在这座象牙塔里面，甚至是这座城市。

而这一次同样是把终点定在了方爷读书所在的城市，北京。现在看来，我去找方爷发泄内心的苦闷并不是明智之举，因为他作为一个同龄人，在国际化大都市里所遇到的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比我要强烈数十倍。他那个时候同样是热锅上的蚂蚁，对于我的到来当然也做不到平和疏导，相反，他把他在自己社团的经历、大学经历中的苦闷发泄到了我的身上。所以我那次逃离的旅程，并没有在终点处得到正面的作用；倒是在往返途中的火车上，一个人身处周围全是陌生人的环境中，内心忽然平静了许多。

回到学校，内心难以平静的状况一直持续着。在那段岁月里，视线里经常出现九姑娘的身影，在我很多次抒发痛苦的QQ“说说”上或是极度茫然的校园游逛时，都能看到九姑娘的名字和身影，她的点赞、评论或是校园偶遇的笑容都能够令人心头振奋。慢慢地自己开始频繁地接触九

姑娘，直至将她“勾搭”成为自己此生相伴的人生伴侣。

后来，在南方劳工NGO做学生工作的包子叔叔正好要为当年的暑期讲习班招募学员，我又一次被社团的社友拉到了曾经邂逅大家聊“毛泽东时期的垄断”的草坪上，他们建议我报名参加那一次在宁波的讲习班。

引吭

也正是后来决定参加宁波的讲习班培训，自己的状态才有了一种变化的可能性。在培训期间接受了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相关学科大牌导师专业的理论讲解，了解了“资本”“阶级与阶层”“商品经济”“广告的本质”等概念；接受了同期学员中认识深刻、理念坚毅的朋友的状态感染，感慨于曾经读过清华、北大的硕士、博士居然能够那么干脆坚定地放弃大好前程，俯首深入底层，在草根群体中搞事情；也接受了在全国各地做农民工组织工作的实践者的行动感召。

后来去湖南尘肺村——双喜村做与尘肺病相关的乡村调查，在村子里很多家庭都看到了一位寡妇带着儿女生活，她们的客厅中都摆放着亡夫的遗照；亦有父死母改嫁的孤儿被寄养到近亲家中的状况，但也不乏男丁因尘肺病去世后母女坚强生活的实例……这些不同的状态背后有着相同的遭遇，那就是家里的壮劳力在去深圳当风钻工之后，由于资方没有提供安全的生产条件而致病，因病发后没有提供及时到位的工伤保障而致贫致悲。

之后又去深圳工业区打了一个月的暑期工，在那的一个月里体会到了整日在生产线上做简单重复劳动的产业工人的状态。渐渐地理解了富士康的工人之所以跳楼，跟其在厂里没有业余生活的异化状态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进厂打工的那一个月里，我们二十几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社团学生，通过与厂里资方进行合理合法的斗争，经历四次辞职讨薪的过程，终于为全厂的工人们争取到符合劳动法的合法工资标准，使得每位员工最终每月能够多拿到几百元的工资。

进厂实践后的即时总结（节选）

30日下午下班之前，拉长拿着名单过来跟我说，明天你继续上班。当时的反应是大家都在盘点的日子里休息，我终于可以体验加班的“乐趣”了。拉长通知完事情后又大声强调了两句：“今晚加班和明天继续上班的记得自己要干什么，不要忘了。”我当时听完之后

略感事情跟自己想的不太一样，但也没太在意，继续下班，继续晚上不加班，继续在深圳的夜晚游荡，一如前几日的节奏。

第二天上午8时准时来到车间，看到几个面熟的和不熟的同事三三两两地进到车间来，意外地发现过来的工友都是略显稚气的年轻小伙，

小聊几句发现大家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刚来这个厂子不久，有的甚至直接是按暑期工进来的，一天80元钱。等大家都集合好，一位挺着肚子、板着脸孔的中年男性握住拳头伸出食指，一个一个地数点站在他面前的我们，确认人员到齐，斜视着旁边那个叫副拉的家伙说了句，“好啦，带过去吧”整个过程眼神几乎没有落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包括那几个副拉。

在下楼梯的时候，微微听到几个不是自己人（一起参加暑期进厂体验的社团同学）的工友在埋怨今天稀里糊涂被安排的不知是不是加班的工作。（其实，这里的加班和不加班是有更深层的区别的：如果这个是加班，那么大家可以选择今天休息，不挣这个加班费；如果是正班，一旦员工擅自不来上班或是请假，按照这个厂子里的规定，这种情况是会被罚掉200元钱的。）

当时我敏感的小神经顿时感觉如果前方有敌情，这次是一个搞行动的良机。从A栋走到B栋，同样是刚才数人的场景，大家被分成了三个小组，我这个小组是人员最多的，有十几个人。当大家被带到要工作的地方，看到高高的货架上摆的全是成堆的纸箱，需要被运到车间里，以及感受到的封闭的仓库里连个风扇都没有的那种闷热，能察觉到大家的怨气在此刻已经比下楼梯的时候更深了一层。于是，便顺水推舟跟身旁的小兄弟说，“我们过来都没告诉我们今天到底是加班还是正班”然后我伺机问了一下一个肥头大耳的同样会指人的男子，“我们今天是加班还是正班？”结果那个男的用一句“这个问你们主管，我不知道”就想敷衍掉。我借机又向旁边的兄弟说，“听到没，他说他不知道。等下我们干完了，再去问主管，主管一句今天周四当然是正班，我们就傻了。这么热的环境，这根本不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后来我直接跑到干活的那几个兄弟身边，拉了一下他们的胳膊，问道：“你想干这个吗？”他们说不想干可是没办法。然后我就对他们讲，“不想干就不干，干吗那么难为自己。我们都不干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一来二去，大家慢慢地都停下来，站在旁边，拿起硬纸板扇扇子乘凉。

看到这么多人都站在那里不动手，管仓库的那个人说了句，“不干也行，到时候四个工时给他们算两个！”听到这句话，大家就更不动手了，都杵在那里。过了20多分钟，仓库主管给我们的主管打电话说你们那边怎么回事，派过来的这些人都不干活！不一会儿我们的主管就过来了，问怎么回事。我见大家都不说话，就问那个主管我们今天干的是算加班还是正班。接着就有工友说，昨天没通知我们今天是过来干苦力的。我又加问了几句，那个主管听后没有对所问的问题做正面回答，而是针对问问题最多的我说，“你这么多问题，你跟我出来一下，我跟你说”。我对另外的工友说，咱们大家都出去听一下吧，然后大家一起走出了仓库，来到了另外一栋楼一楼的门口。我们争取的仍然是是否加班的答复，主管后来说，“今天给你们算加班，另外每人有60元钱的补助”。我不放心这种承诺的真实性，随后要求主管立字据保证，只是其他工友听到这个承诺已经松懈下来，被主管推搡着回到了仓库，我也就跟着回去了。

回到仓库之后，主管打了个电话安排了今天算加班还有补助的事，然后跟仓库主管聊了起来。我从他们聊天的神态和眼神里读出了一丝诡异，担心大家这次被忽悠了，担心他们拿我们当孩子耍，随即问了一句："哎，我们今天的补助跟工资什么时候能给？"听到是月底发工资的时候给，我就继续要求他们"要么今天就结，要么就立个字据"那个主管听到这个要求就提出要开除我，说我对公司不信任。

其实后来再一想，主管之前已经打电话安排了工资待遇的事情，应该不会是戏弄，只是个人的敏感造成了自己后来被开除的局面，

这是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

刚被开除那几天感觉挺失落的，没帮工人做成什么事，自己倒是丢了工作。尽管后来又找了一家厂，毕竟走了弯路。可是后来听MY说厂里已经规定以后每次盘点日的工作都算加班而且补助金也会按承诺发放，这是值得庆幸的一个结局。而且，这件事对自己也有一些触动。

这个时候再回过头来反思当时火车上与学长的不愉快交流，自己便稍微意识到了在组织晚会时哪里做错了。我不该站在大学生的立场上，喊出"和大学生一起办春晚"口号，本来是要推动离乡大学生重新融入乡土环境，以及增强同村内百姓和谐互融的活动设计，因为一张条幅把整个晚会的性质给改变了。而之所以这个时候才真正产生这种接地气的认识，跟自己两个月来接受的关注工农群体、体察百姓疾苦的学习经历有必然的联系。

有意思的是，自己的这种"底层立场"的确立，带来的是另一个极端的认识倾向：我开始从行动上站在一个百姓的立场上，去针对权力群体、强势群体，遇事动辄就发出批判谴责强势群体的"叫嚣"。

最典型的一次经历是进入大三上学期之后，学校推出的"自主保洁"新政在全校遇冷时，我毅然拿起笔杆子，站在全校几万弱势学生群体的立场上，利用新媒体公开向校长叫板，还惊动了澎湃新闻、央视13频道《新闻1+1》栏目，一时成为全国舆论界的谈资。

困境

不可否认，这次新闻曝光事件让我第一次近距离见识到了舆论的力量，也在成为当事人的过程中品尝到了"伸张正义"的喜悦。自己暑假经历了悲悯式的"看见"，加上新学年开学之初这一走上舆论风口浪尖的经历，自己刚过年时那种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徘徊的状态一下就转为"理想击败现实"了。我开始几近疯狂地投入到工人探访和社会问题理论学习的社团事务中去。社团的组织工作烦琐而低效，自己并没有在接受实践启蒙之后踏踏实实地进行自我的理论学习升华，而是在组织学弟学妹的理论学习时进入了夸夸其谈、不学无术的状态，还自以为是地跟新加入社团的学弟学妹讲述自己对社会问题所谓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大三上学

期的经历并不痛苦，我几乎没有考虑过“理想or现实”的问题，靠着刚过去的那个暑假实践启发的余温，支撑着理论储备低下、实践经验缺失的年轻人完成“带社团”的任务。而自己也在这以师者自居的可笑状态里跟九姑娘经历着“也许故事正在发生着”的美妙的恋前暧昧。在不经意的安逸中，更大的忧虑正在孕育。

转眼间到了大四，面临毕业的我一下觉得除了社团经历一无是处；可笑的是，我因为身心全部扎在了社团，于是真的就“死”在了一门专业基础课上：屡次补考不过之后最终面临了延长学制的“打击”。对的，在大多数大学生眼中，不能顺利毕业是唯一能让自己感觉蒙羞的结果；不管过程如何龌龊，只要结果不是这样的，他们都不会把大学的风云变幻放在心上。我当然也有了压力，一部分来自社会舆论，一部分来自前途未卜。需要强调的是，在这样的压力下，已经确立了恋人关系的九姑娘会开导我说，当时的遭遇是“人各有志”，她并不认为延长学制是一件多么丢人的事，也并不觉得拿到毕业证有多么值得骄傲，因为大学什么样每个人都心知肚明。这真是一位让人爱不释手的姑娘啊！

我在退出社团事务的大三下学期尝试考过一次新闻学的研究生，算是为自己对前途的担忧作了一次挣扎，结果不尽如人意。拿到考研分数又面临大四下学期的我，开始又一次纠结起了理想与现实的取舍。有几天痛苦到了想要出家做和尚的地步，在后来走出困境时九姑娘和我姐还会拿自己要出家的想法打趣。

在退出社团事务之后，种种抉择和取舍，尤其是努力学习的考研经历，算是对自己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走向极端的状态作出的一次回归。我开始在激烈批判社会现实的思维中变得理性、坦然，却依旧不知该如何处理自己缥缈的社会理想和杂乱无章的社会认知。

救赎

大四下学期，这种转身回归后却找不到回家的路的状态持续了两个月，那种痛苦到了极点的时候，有过一次彻夜不眠的经历。在纠结到心累的时间节点上，失眠的时候思考的问题是“无论如何都要给自己一个出路，不能再作没有意义的挣扎了”，于是就罗列出了“自杀、出家、下乡”这三条路。当时忽然就释然了，因为相对于“自杀”和“出家”来说，“下乡”好像是最好的选择，不会跟任何一种社会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割裂。于是天亮了就开始联系在宁波认识的两位朋友——园春和小宇，两位姑娘耐心地帮忙讲解人才计划操作的方式方法。而我是先做了下乡的决定，再联系的人才计划项目的相关人员，貌似也没怎么关注人才计划在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的具体操作原则，直接就报名了。后来我又传销式地拉女朋友九姑娘和曾经启蒙我反思社会的北航高才生方爷加入了第十二期人才计划团队。

参加人才计划半年多之后，就已经感觉到了周围环境和自我认识的

很多变化：跟家里人的思想斗争最终以老爸和老姐的不置可否和老妈思想上的支持而宣告结束；对引荐旭爷和方爷加入人才计划而被自己坑掉的担心，以两个人都走向了学习教育的道路而暂时缓解；因大学的社团经历而身携杂乱的思想认识和缥缈的社会理想，在这里有了理想的落地和生活化的体现，心态变得从容了许多，踏实了许多，也现实了许多；对于整个社会的认识，从消极反抗转向了积极建设，幸福感和光明感陡然上升；而对于刚来蒲韩时讨论到的以及过年回家时兴奋地想要筹建的返乡计划，也因为蒲韩和外界长达近20年的时空差距碰了一鼻子灰，曾几何时，改变了原有的天真，决定在外面的世界好好学习成长几年，再对返乡做未来现实的规划。

当然也有个人在处理感情和情感之能力上的变化：与“旭爷”半年的朝夕相处让一个男孩子更加体会到了爱人的包容，也触摸到了真正去爱的方式；与方爷四年后再一次的相处，让一个经历了大学四年二元对立式交友方式的年轻人，察觉到了非黑即白的交友逻辑，对于自己所定义的“黑”和“白”都是一种残忍——一颗更为珍惜、更为包容、更为从容的心在这不期而遇的半年时光里被呵护着成长起来；在跟几位新的朋友一起过日子的岁月里，一点点发现了这个大家庭里面的亲人们身上的各种人格：阳刚、谦逊、从容、安静、真诚、务实、坚强、柔软，以及固执、自我、任性、懒惰、依赖、傲娇……这样的感知让人珍惜这华丽的遇见，使在交朋友上面挑剔的人无可挑剔，也使人察觉人性的复杂，从而慢慢地去做到不难为自己，也不难为别人：一切都在觉悟反省时宽恕，在修身塑己中升华。

有言道：没有变化就没有成长，而成长是一个凄美的故事。这种凄美大抵是因为每一次成长中的变化，都是新自我与旧自我斗争的战果吧。凡是有斗争的地方就没有你好我好大家好，也没有一方向另一方完整的妥协：它就像一对太极，在阴阳的两个极端发生斗争，在新我和旧我之间求取阴阳的平衡点，合二为一，再以一个新的整体去寻找下一个新我，再去展开新一轮的斗争。

人才计划对我的影响除了如上述内心的变化之外，还有在蒲韩联合社核算中心实习期间被郑老师教化过后的思路启发，让一个无知的青年开始形成从入户行为之中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意识，慢慢形成人文社科领域认知社会的一般思路，这是自己一年来最大的收获，让自己学会了在入户过程中思考问题的方法，让人从“看山不是山”开始向“看山更像山”的认知状态改变；也有自己通过观察儿童来反观自己的能力养成，慢慢地明白孩子为什么会是成年人的老师，懂得通过向孩子学习来对沉沦的自我灵魂做救赎；也有观察雄哥、鲁锋哥两个家庭的生活状态，启发了自己在生活中学习积累的成长模式，人生一下变得从容了很多，前路也清晰了很多；当然还有对健康食材的感觉的建立，最终落实到对于可持续生活的向往。

结果可以证明，走进人才计划是我有生以来最为明智的抉择，它关乎了自己未来的生命质量和发展方向。

坚持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因为急于成长起来而表现得焦躁不安；但当对自己的过往做一次梳理时却又发现，很多的事情一旦发生了，就终归成为自己成长的垫脚石，只不过每个故事都不会让自己成长得一步登天，它更像是润物细无声般的影响。

很多时候，我们又容易在看不到成长的时候怀疑自己当下的环境，怀疑自己的选择，从而犹豫是否改变选择，换另外一种成长的道路；但当对自己每一份坚持到最后的故事做一次总结时，却又发现每一份坚持都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份感动和继续坚持的勇气。

很多时候我们渴望着成长，渴望着变大变强，而同时我们又能发现，成长的故事也许一直发生着。就像自己现在身处的成长平台——中国扶贫基金会——其组织精神那样：坚持就会改变，只要我们肯坚持，无须理由、无须激励地坚持，我们成长的故事，便一直都在发生着。哪怕命运无法改变，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生活的体验也终会变得越来越美好。

毕竟，任何的经济、人文、政治这些庞大的概念名词，其背后都是在围绕着“生活”做文章！

第五部分
家人



农人与麦田

引言 新的幸福，新的生活

人才计划三期 魏丰收[1]

2009年12月6日，第一届“新幸福主义”集体婚礼的热闹场面，似乎还在眼前。喜“柿”来啦！《社会创业家》杂志为我们策划专题，大名鼎鼎的奥美广告帮我们设计卡通形象，河北顺平合作社专门寄来了好几箱又大又红的磨盘柿子！北清路那个庄园里面的橘黄色木屋城堡，北京难得一见的湛蓝天空，大红的中式礼服，还有粉色与紫色相间的气球围栏……处处晕染着童话般的浪漫气氛！白亚丽与吕程平、秦岭与卢欢、娄文静与李留洋、孟婷婷与黄志友、彭影与陈士华，大乡建系统的五对优秀青年，在柿子树下讲述爱情故事，宣读结婚誓言，在温铁军老师与现场几百位公益同仁的共同见证下步入了神圣的婚姻殿堂！

2015年1月18日，在小毛驴市民农园举办了第二届“新幸福主义”集体婚礼。马久菊与汪维行、口皓与何志雄、李冬梅与周鹏辉、李慧娟与易贤涛、袁辉兰与詹荣、梁发珍与魏长、靳培云与严晓辉、高明与袁清华、杜洁与潘家恩，大乡建系统又有九对优秀青年喜结连理！这次活动的阵容更为庞大，小毛驴“教授”披红挂彩，亲自驾辕，用太平车接新人、拉礼物，绕园一周，接受大家的欢呼与祝福。民俗专家郑辉做总导演与主持人，温老师做主婚人，何慧丽老师做证婚人。盛大的中式传统集体婚礼上，九对新人在樊少欢的引领下行标准的跪拜礼，叩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并敬茶、改口、领红包。很多新人和父母都激动得流下了眼泪，现场气氛又喜庆又感人！中午在阳光餐厅安排了丰盛的生态喜宴，同时还举办了大地民谣、农夫市集、木工体验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喜庆与热闹的背后，真正值得大家深思的，是当年老刘提出的“新幸福主义”这个概念。作为投身乡建的理想主义青年，我们理解和追求的幸福生活又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还记得我们当时在中心征集、阐释和热烈讨论出的它的内涵：“平等、互助、勤俭、自立、担当、奉献”。而这恰恰是这两场盛大的乡建集体婚礼的主线！我想，它也应该是把这五对和九对优秀的青年男女牵到一起的红线！

关于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幸福”与“浪漫”，小潘在第二届集体婚礼前进一步地解读与提炼：“当纸醉金迷彰显成功，当一己的悲欢拒绝着大时代的燃烧和事实，当宝马车哭声与自行车笑声成为割裂对立的别无选择与笑贫不笑娼的新借口。在爱情、浪漫、幸福被一个又一个地定义征用，直接关联着金钱、收视率、眼球经济的今天。我们14年来或深或浅的足迹，只是提供了一个关于‘可能’的实践故事，另一种爱情或幸福都是可能的，多样性和可能性其实一直就存在，关键取决于我们是否愿

意去打开。”

彭影与士华说：“我们相信，我们正在实践一种新幸福主义，与更多人一起在探索着这条新幸福的生活之路。在这条路上，真实、简单、朴素、理想、热情、互助等一切美好的东西随处可见。”

高明和清华用事实证明：“爱情，与距离无关，与地域无关，与职业无关，与背景无关，只与共同的生活目标有关！”

重读大家的爱情故事，回看大家的心路历程，有时会发出会心的微笑，有时会感动得流泪，有时也会有些许的酸楚。杜洁的回忆，虽然啰唆，但也最是感人。我们平时谈的都是乡建与工作，但只有听了战友们关于情感与生活的诉说，我们同样滚烫的心，才会贴得更近！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才会更加真实！

乡建这条路，注定是坎坷的，是艰辛的，是布满荆棘的。一个人投身其中，已经是备感压力，何况两个人都来干这个？我的爱人是在主流社会工作的，她、她的家人、我的家人还有我们的两个宝贝女儿，刚开始其实也都是反对我干这个的。现在，他们虽然已经在无奈中慢慢地适应我的工作与生活状态了，但在一些非常需要我作为儿子、丈夫或父亲的身份陪在他们身边的时刻，我的缺席还是会给他们带来一些遗憾。你们可能都觉得我老魏来去自由，活得挺潇洒，其实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

反过来，最羡慕的还是你们这些能一起参加“新幸福主义”集体婚礼的新人。你们多好啊！两个人，都在做公益，都在做乡建，有共同的事业、共同的理想，真可谓是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啊！琴瑟和鸣，夫唱妇随，齐心协力，并肩战斗，白天在外面可以讨论工作，晚上回到家还可以交流思想。心与心贴在一起，不会孤单；肩并肩阔步前进，更有力量！

培云与晓辉的孩子，取名为“禾”，望其不忘乡土，秀于田间。杜洁与家恩，给可爱的小女儿取名“碚碚”，当然就是北碚的碚，bèibèi，拼音与发音，也都一样！这是什么？这又说明了什么？百年乡建，薪火相传，前仆后继，生生不息！乡建的精神，已经刻在了我们的骨子里，已经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

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到乡建事业中来，或在北京，或在福建，或在其他城市，或在乡间，或在合作社，或在同心农园，或在爱故乡大会，或在乡村建设学院……

在投身公益的路上，在为理想奋斗的路上，在践行“新幸福主义”的路上，有14对已经步入婚姻殿堂的新人，有更多有志于与心爱的人一起创造新生活的“新人”们。对于我们来说，理想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创造新世界，其实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因为在它一个一个的细胞——“家庭”里，我们已经在幸福地实践！

5.1 柿子树下的浪漫，一生一世的情缘
——第一届乡建志愿者新幸福主义集体婚礼的幸福故事 [1]

2009年12月6日，北京北青郊野休闲园挂满黄金柿子的树下，五对新人面对柿子树拜了天地。这场集体婚礼的特殊之处就在于，新郎新娘或是乡村建设志愿者，或是乡村建设工作人员。

志同道合，可以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柿子树下的浪漫，一生一世的情缘”，从准备结婚开始，白亚丽就写下了这句QQ个性签名。

白亚丽是最早参与大学生支农的学生，2003年，还在天津科技学院读书的她，休学到湖北三岔支农，被媒体誉为大学生休学支农第一人。毕业后一直在北京梁漱溟乡建中心从事农民培训工作。

2005年暑假，梁漱溟乡建中心举办农村发展人才计划，吕程平是人才计划第一期学员。那时大学毕业的他已经在通州农村做了一年的志愿教师。正式下农村服务之前，学员们要在人民大学培训上课，晚上回住处的公交车上，白亚丽第一次见到了吕程平。

“做农村志愿者，大家的交流很重要。我问他压力会不会特别大，他表现得很坚定。”白亚丽笑着说，自己当时没过多注意这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的男孩子，倒是确定恋爱关系后，吕程平总会描述当时见面的情形，“还埋怨我这么关键的时刻都不记得。”

“一个不动声色，一个穷追不舍”，婚礼中播放的PPT上，这样形容这对新人。虽然从2005年认识到2008年正式确定关系这段时间里，两人交往一直没有涉及私人情感领域，但据吕程平的朋友介绍，男方对女方是“预谋已久”。2008年汶川地震后，作为民间救援力量，白亚丽决定赶往救灾第一线，吕程平果断地一同前往。在帮助灾区人民的同时，他们爱情的火焰也在灾后的土地上愈演愈烈。

同年，吕程平考取了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社会学系的研究生，两人开始了异地恋。中心的同事们清楚地记得，从吕程平到达武昌的第一天开始，中心的信箱里就没间断地收到来自湖北的书信或明信片。

“当时距离比较远吧，难免有思念之情，每天有什么想法都希望能够交流分享，所以他每天都坚持写。”白亚丽说自己正是被吕程平坚持不懈的小细节所打动：“他常常会把我的短信抄在本子上，没来得及抄的就一

直存在手机里，以至于手机常常是满满的。”

“两个人在一起重要的不是物质生活，对于彼此理想的支持程度才是衡量幸福的重要指标。”婚礼上，这是白亚丽和吕程平的幸福宣言。白亚丽说，他们虽然只有很少的补贴，也没有更多的保障，但到农村扶贫一直是两个人的志向。“两人情投意合，便不觉得累和辛苦了。”

在婚礼上，程平送给小白的信物是一个杯子，寓意一辈子的幸福，一辈子的快乐，一辈子的分享。小白送给程平的信物是一条自己织的围巾，希望这条围巾不仅能抵御严寒，也能抵御某些不太良好的社会风气。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在白亚丽支农的过程中给过她很多帮助和支持，集体婚礼上，他跟在场的NGO单身男女打趣道：“我们扶农的NGO成员，男孩子比较多，我以前总担心他们找不到对象，以致走这条路的人越来越少，现在看来我不必担心了。我们内部结合，大家志同道合，还可以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牵着你的手，公益路上一起走

9月的深圳，还是一出门就汗流浃背的日子。秦玲在城郊公园广场为工友们进行法律知识普及。卢欢看见她时，小个子的秦玲正被大群农民工包围着，齐刘海被汗水浸湿，一绺绺贴在额头上。“当时对她的感觉不是爱情，而是崇拜和自豪。”卢欢说那一刹那是他认识秦玲以来最为感动的瞬间。

2007年，秦玲大学毕业后服务于北京梁漱溟乡建中心项目点，2008年后到南方从事工友工作。卢欢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参加农村发展人才志愿者计划时和秦玲相识。两人目前都在深圳工作。

最初到深圳的时候，卢欢工资很低，不用想能给女朋友买什么礼物，甚至连自给自足都成问题。为了节省开支，两人相约每个星期见一面。每次见面后卢欢回到住处，都会在衬衫口袋里发现200元钱。“秦玲不会刻意跟我说给你拿了钱，她知道我缺钱，就偷偷地放到我衣服口袋里，她觉得两个人就应该同甘共苦。当然，这也是想照顾我的自尊。”

得知有集体婚礼这个活动，卢欢早早就报了名。他想给这个“个子矮矮的，但却有着无比强大内心”的女孩一个家。“幸福就是努力让爱你和你爱的人都生活得快乐，就是社会更加和谐、公平、公正，每天都有积极的进步并且不规避问题积极面对，开动脑筋大家一起解决困难。”婚礼上，当主持人宣读这段爱情宣言时，卢欢潸然泪下，脑海中浮现出这样的情景：在广阔的田野上，秦玲和几个手拿猎枪的人对峙着，他们妄图在保护区里捕杀野生鸟类。“公益的道路很难走，让我牵着你的手。”卢欢亲吻了新娘，在她耳边低语。

同桌的你

娄文静来自河北沧州，李留洋来自河南鲁山，他们俩是大学同学。大一下学期的时候，他们是前后桌，相互间有了良好印象；到了大二的时候，特意保持同桌，于是日久生情，到大三时确定了男女朋友的关系。留洋说："我们刚开始谈恋爱是在大学的时候，主要是面对面的同桌，不好意思说，互相表达感情主要是通过短信。"

2005年大学毕业后，留洋来到北京参加中心的第一期人才计划，经常要下乡，那时候打电话还要漫游费，与文静的联系也还是靠短信。有一次留洋在湘西下乡时，信号不是很好，文静正好发高烧，很久没收到他的信息，就很着急。留洋大晚上跑了一个多小时，跑到一个山顶，终于找到信号给文静打电话，那时候让文静"特别感动、特别难忘"。后来文静追随留洋来到了北京，一直在梁中心负责财务工作。

有缘千里同行

2005年暑假，还在北京林大上大一的孟婷婷来到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参观学习，与当时正在学院工作的黄志友有过一面之缘。

2006年暑假，婷婷再次来到学院实习，在实习期满返校的前夜，与志愿者舍友"扫荡"各工作人员宿舍宝贝，行至志友宿舍时，只见地砖上长满枯草，无果而返，就说，"你明天早上送我去车站吧"。然后第二天早上他们没有坐车，徒步从早上六七点走到镇里，花一个多小时，直到婷婷快要钻入即将远去的客车，志友才急急塞了一张明信片给她（笑容灿烂的印第安女孩），并叮嘱婷婷回校再看，接着就羞答答地走开了……

2006年11月，志友到北京办事，特意转到林大与婷婷会面，并赠给婷婷一条围巾；婷婷也回赠十字绣一副，自此，两人开始心心相恋。2007年1月，一个美好的冬日，婷婷再次来到学院，在学院与志友情定终身，两年后终于取得合法身份！乡建学院是他们相知相爱的地方，他们的爱情有诗为证，"相见相知相恋相依四载风雨同舟；江西陕西广西山西九州山河壮丽——有缘千里同行！"

2007年5月，志友随学院搬迁到北京，参与小毛驴市民农园的筹办工作，在北京西北郊区凤凰岭下；婷婷毕业后，在皮村工友之家同心学校当老师。"那时候我在朝阳区的最东边，他工作是在海淀区的最西边，每个周五，下午上完课、开完例会以后都要五六点。晚上往这边赶都要三四个小时，每次一到那个车站远远地就能看到他在那里等我，心里很感动；有时候我晚上回来晚一点，我用手机一震，他就出来接我，真的很感动。"

幸福那些事儿

陈士华2005年在同济大学攻读硕士期间，休学参加梁中心第一期农村发展人才志愿者计划，后参与大学生支农工作；彭影在校期间曾多次参加中心组织的支农下乡活动，在2008年大学毕业后加入人才计划第三期。

某个冬夜，士华与彭影在中心厨房偶遇，略聊之后，士华离开厨房后回头，不经意间两人四目相对，彭影天仙般的微笑在士华心中留下美好的回忆。两年后，彭影来到北京，与士华开始共同的理想和事业。其间两人开始熟悉对方，寒假两人一同去南京、武汉开展培训，感情迅速升温。过年时士华喝醉了，给彭影打电话，聊了很久，双方开始明白彼此的心意。年后回到北京，两人一起出去放风筝，之后去北师大一起开会，回来途中成功牵手。

从恋爱到修成正果，走进婚姻的殿堂，说起来也算是“好事多磨”。彭影第一次带士华回家，虽然很明显看到家里人看不上他，还是明确表示“以后是要跟他结婚的”。把影妈气得大哭不止，哭到极其伤心处，差点都要晕过去了，表示“若是你坚持和陈在一起，就断绝母女关系”。回忆起以前的事情，彭影说：“不知自己那时心肠怎么就那么硬，就是不松口，那是对自己选择的坚持，就如选择了参与社会发展工作一样，毫不迟疑且坚持不懈。后来回到北京，为此事与我妈还冷战了好一段时间，后来通电话时，谁也不再提这个事。能赶上‘新幸福主义集体婚礼’，还多亏了两个表妹年底要结婚，我妈大概觉得我这个表姐年纪不小了，不能太落后，也就接受了这个事实。”

结婚是人生一个明显的转折，从父母的家庭里走出来，和另一个人组建新的家庭，再隆重盛大的婚礼，也代替不了婚姻的全部，而只是另一段人生旅程的开端。婚后，彭影和士华相互追随，一起来到了深圳，彭影仍在做社会工作，士华则决定从事生态农业和CSA的工作。于是，他们在深圳一个小山谷中找到一片合适的地方，开始开荒种田。

自从2013年陈士华开始在深圳做生态农业和CSA，士华就经常和家里人沟通交流，希望爸妈可以过来帮忙，同时也是希望爸妈可以从农村狭小的生活圈子走出来，让生活和精神丰富一些，也从繁重的农活中解放出来。最终士华的爸妈决定放下家里的20多亩棉花田，来深圳和陈士华一起创业。

前些年，士华爸妈及家里人都很反对士华的工作，一致“谴责”他浪费了交通专业，浪费了大学文凭，不务正业。这几年生态农业的发展形势比较好，再加上食品安全问题频发，家里人通过电视和媒体也在逐渐理解和接受生态农业这一观念，现在家里那些叔叔伯伯都说，“陈士华做这个生态农业，不错，有前途啊”。

创业的过程还是很辛苦的，尤其是爸妈出于对他们生活的关心和担忧，希望赶紧有成效出来，总是很努力地工作和劳动。有父母在身边，有一份家人一起去开创的事业，总算是有点“家”的感觉。家庭、生活和

工作的协调，建立在共同的社会理想之上，从恋爱到结婚到现在，彭影说："我们相信，我们正在实践一种新幸福主义，与更多人一起在探索着这条新幸福的生活之路，在这条路上，真实、简单、朴素、理想、热情、互助等一些美好的东西随处可见。"

5.2 喜事来啦!
——第二届乡建志愿者新幸福主义集体婚礼的幸福故事

杜洁[1] 潘家恩[2]

2009年，五对乡建志愿者，在硕果累累的柿子树下喜结连理，并用行动诠释，即使在简单的物质生活下，也有数不尽的“新幸福”理想——平等、互助、勤俭、自立、担当、奉献。

今天，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到乡建事业中来，或在北京，或在上海，或在福建，或在陕西，或在田间，或在讲台，或在市集，或在地头……

他们在为社会、为他人奉献大爱时，也没忽视对身边的TA的关心。他和她相互支持、相互仰慕，他们不只是工作上的伙伴，更是情感上的依靠；他和她在理想的事业中收获了爱情，迈入婚姻的殿堂；他们希望将他们的幸福和甜蜜，传递给更多的人。

2015年1月18日，农历甲午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宜嫁娶，第二届乡建志愿者新幸福主义集体婚礼如期举行。9对乡建新人在众亲朋的见证和祝福下成婚，从此世间又少了18位单身未婚青年，多了9对恩爱的夫妻。

这一天，素手交握，发髻轻绾；

这一天，画眉点唇，红裙换绿装；

这一天，做他的新娘，一辈子的新娘；

这一天，有了你，我就有了家，多了一个爸和妈；

这一天，在亲人、乡建师友、农民兄弟的见证下，我们，结婚了！

从这一天开始，乡建路上，相扶相持，相惜相伴，做彼此的肩膀。

有些惊喜，总让人幸福得摸不着边

她叫马久菊，是一个热情大方的陕西姑娘，有她在的地方，总能听到她爽朗清脆的笑声；他叫汪维行，脸蛋有点敦敦的，总是一脸可掬的笑容，爱和大家开玩笑，大家也爱和他开玩笑，为了更容易记住他，大家都改口叫他“汪汪”，他也笑眯眯地接受了。他们都是梁中心“农村人才

培养计划”的学员，她是第九期学员，他是第六期学员，他俩的爱情故事是从北京西北六环附近一个叫“青年公社”的院子里开始的。

2013年暑假，久菊参加了一个名为“青年之力”的徒步游学活动，从汪汪的母校山西农大（那时他们还不认识）徒步走到北京的青年公社，并参加了随后梁中心组织的支农大学生培训。培训结束后，久菊也对未来的工作有了新的思考，她想继续参加梁中心举办的一年期的农村人才培养计划，但需要驻点农村一年，她有点犹豫和纠结，于是就有人建议她去找汪汪。汪汪从人才计划第六期结业后，就留在了梁中心做农民合作组织的工作。后来汪汪推荐她去河南漯河合作社的试验点，因为是自己推荐的，汪汪担心“万一她要是在试验点上待不住或是有些问题，总觉得多少应该有些关注”。就这样，在开始的时候，他偶尔会了解和关注她在村里的信息或是状态。

参加人才计划的新学员每个月都必须要写月报，汪汪作为老学员，偶尔也会翻阅学员的月报，给些回应或是交流，也会特别地注意一下这个曾经很纠结的姑娘所写的总结，还会给一些标注或是反馈。他们在月报里进行交流，聊着聊着就会聊到在村里的人情世故，聊到在村里驻点的不知所措，聊到在村里的新鲜事，聊到热心的大姐、奶奶，聊到他们对农村的理解，聊到他们的内心世界，聊到他们对美好的想象……

每到年底梁中心都会举办“全国农民合作组织论坛”，作为中心合作社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汪汪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很忙，人才计划中的学员也都会回到中心来帮忙做一些会务工作。汪汪平时不很在意穿着，总是有些邋遢，临到年底论坛开始的前一天，想要在衣柜里翻出能够穿得出去的“行头”，这时久菊就很热心地来帮汪汪挑选衣服。在这期间，因为见汪汪太忙，没时间洗衣服，久菊还特地帮汪汪洗了他要穿的裤子，毕竟是12月天寒地冻的，把久菊的小手冻得通红，让汪汪心里很是感动。合作社论坛的这两天，每天晚上她都会给他发一些“早点休息”之类的短信。两天之后是汪汪的生日，刚好是圣诞节，在生日那天早上醒来，床头放着打蝴蝶结的礼盒，打开一看，看到熟悉的笔迹折射着祝福，就知道应该是她送的生日礼物了。只是……她不是已经回家了吗？原来这一切都是她走之前安排好的，偷偷地买礼物，偷偷地放在床头，给了汪汪一份很大的惊喜。

接下来的故事就顺理成章了，他们开始打电话，开始发短信，开始思念……就这样相遇、相知、相识……感情上的事久菊比汪汪开放，敢爱敢恨，在2015年3月8日妇女节那天，她在QQ签名上写下“汪汪，非你不嫁”，惹得众人一阵喧哗，也让汪汪有些惊喜，幸福来得太突然让他有点摸不着边……他俩很少吵架，不过也会有一些不开心。当她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在电话那头一顿说他，而有时也会低声哭泣，这个时候汪汪就在电话的这头默默地听她哭诉。

五一放假期间，汪汪去村里看她，久菊就拉着他一起和村里的小孩打乒乓球，一起去拜访很照顾她的奶奶、阿姨，一起去村里的教堂做祷

告，给教堂的孩子上手工课……晚上，他们一起在村口的小路上散步，吹着初夏夹杂青草味的凉风，听着远处各种小虫的叫声，远处昏暗的灯光，村中时而传来的狗吠声……他们没有说话，怕一说话就会打破这宁静、美好的夜，就这样静静地依靠着……五一的假期很快就过了，他们又各自回到了自己的角色中，她在村里继续工作、生活。

8月，人才计划结业。他们一起跑到内蒙古的草原，在广阔的草原上呼喊着、疯狂着……结业后，她开始找工作，开始面试。参加新工作的第二天，她就去内蒙古的草原上出差了。

十一放假期间，他们一起去了一趟久菊家，见了她姐姐，见了她父母，见了她家很多亲戚。到久菊家的第二天，汪汪就自己动手下厨，给她们一家做了满满的一桌饭菜。他们也会谈彩礼，试着理解父母。他们知道父母观念的转变不是那么容易，需要一些时间。他们理解父母独守在家的那种孤独，所以在第一次去了她家之后，她便提出每半个月互相给对方的家里打一次电话，他给她家父母打，她给他家父母打。对于双方父母来说，结婚后子女不是离开他们，而是又多了一个人关心他们，特别高兴。在11月的时候，她和她父母说了集体婚礼的事，她爸妈竟然答应了。后来她了解到，原来这和汪汪每个月给她们家打电话有很大的关系……每次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汪汪总是自豪地向其他人传授经验：搞定丈母娘，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缘于一支钢笔

她叫口皓，口是口号那个口，皓不是口号那个号，甘肃人，人才计划第八期学员，大学期间就开始参与大学生支农下乡工作，现在在爱故乡工作；他叫何志雄，外号河马，湖北人，人才计划第一期学员，在梁中心工作已有十几个年头了。

他们相识于2012年，是在做大学生支农下乡工作中认识的。2014年，河马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收到口皓送的一支钢笔，于是她从此走入了他的心里。他们走到一起，不仅仅是因为简单的感情，更多的是有一种对于农村的情感，一直有一个信念在支持着他们在支农的道路上不断地往前走。他们都喜欢自由和折腾，不喜欢受世俗的限制和约束，在参加集体婚礼的时候还没领结婚证，据说那时他们双方父母还不知道他们已经结婚了，先上车后补票的他们就是这么任性！

不是一见钟情，而是“乡建”恨晚

她叫李冬梅，四川人，在陕西西安农夫市集工作；他叫周鹏辉，陕西人，在宣明会甘肃定西项目点工作。他们相遇在嘉泽姬山书院，那一年是2013年，他是姬山书院第一期乡土青年培养学员，她是第二期学员，也是刚毕业就来到嘉泽，刚开始并没有什么一见钟情或者像电视剧里的浪漫情节。当时他住在她宿舍的对面，她常常会看到他在洗志愿者

用过的床单，还看见他打扫水房，那是别人都视而不见的死角，她觉得他总是在默默地、很认真地做一些事情。一起聚会时他总是会默默地照顾她，后来交流得越来越多，经常发短信聊天，慢慢地越来越有默契，她每天上班都要看看他到了没有，有时会默默地看他在干什么，她觉得看到他一天都有好心情。

鹏辉快要结业了，原计划准备离开嘉泽，那时候冬梅突然觉得心里有点难受，因为想到每天见到的人就要离开了，心里很无奈。于是在短信聊天的时候，冬梅跟鹏辉说了自己的想法，也说了自己听到他说要走后的反应，鹏辉动摇了。开始时鹏辉也很苦恼，因为这打乱了他的计划，最终鹏辉为了冬梅留了下来，他也觉得缘分是不能等的，于是就在一起了。冬梅很豪爽地说："那时我来嘉泽正好一个月，也许很多人都觉得太快了，可是对我来说，是遇到他太晚了。不是一见钟情，而是'乡建'恨晚。我们决定在一起，过年回家，我的父母不同意，但是我们也没吵也没闹，就这么静静等待。2014年3月，我爸爸终于同意我们在一起，他说只要我们幸福就好了。"

不在一起工作，就在一起生活

她叫李慧娟，来自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现在一家NGO工作。他叫易贤涛，2004年大学期间就开始做支农志愿者，参加中心组织的支农下乡活动；2007年又回到梁中心参加人才计划，是人才计划二期三期跨届的学员，最早是在江西兴国项目点上驻村蹲点。

他们相识于2012年5月，那时是在北京同一家NGO工作。因为当时有一群年轻的同事，大家喜欢在一起游玩打闹，在这个过程中，彼此有了感觉，就慢慢地熟悉了。正式确定男女朋友关系，是在他们共同离开那家NGO以后，"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走在一起，分开之后反而走在了一起"，在平平淡淡的生活中相知相爱，再到结婚。

青梅竹马，乡建为媒

她叫袁辉兰，曾参加梁漱溟乡建中心组织的第四期"校内人才培养计划"，在杭州一所医院实习；他叫詹荣，曾参加梁漱溟乡建中心组织的第三期"校内人才培养计划"，以及社区伙伴（PCD）广西青年实习生项目，在爱农会土生良品实习一年，在杭州太阳公社工作。

他们是高中同学，高三那年她转入他的班级，那时他是班里学习成绩最好的，也是学习最刻苦的，从不像其他同学那样打打闹闹，总是端坐在座位上写作业。遇到难题时，她就会去问他，他总是讲得那么仔细，那么认真，每次让她的心里都很感动与佩服。高中毕业后他们就分开了，他去广西上学，她则去了山西学医。

大一寒假的时候，在一次同学聚会上，他跟她提起了乡建（他是梁

漱溟乡建中心“校内人才培养计划”第三期的学员），还给她看了他参加活动的照片，当时就很激动地问她是否愿意参加。那时让她印象最深的是他们一起走在田间小路上，他气定神闲地望着那田野与山丘，还说有空的时候就喜欢到这外边来走走。她当时就感觉他是一个诗人，有对大自然的敏感发现，也有对生活的无限包容，心底始终流淌着暖暖的温情。

为他们牵红线的还是乡建，这个寒假之后，他给她发来参加“校内人才培养计划”的报名表，还要写五篇文章的读后感。她打字慢，又是期末复习紧张阶段，就有些为难，跟他说了之后，他竟然说要帮她打字，让她又是一阵感动。通过一轮面试考核之后，她也加入了“校内班”，也成为乡建的一分子。2013年寒假过年时，他提着东西来她家玩，她带他到家乡的田地和小河边，他们聊得挺愉快的，出乎意料的是她爸妈为他准备了一大桌子的菜，还有一个红包。等寒假过后回到学校，他就打电话给她，第一次是闲聊说了他在土生良品饭店工作的事，第二次打电话来祝她女生节快乐，可她都不知道那天是女生节。这样一个严肃、不轻易表露的男孩子竟然会为一个小小的节日打电话给她，不禁让她有些心花怒放，她也就鼓起勇气给他发信息——“你的电话让我好激动”。等过了两天后他便直接跟她表白，而她也毫不迟疑地答应了，她跟舍友说她有男朋友了，舍友们都很惊讶。

没遇到他之前，她在想象着男朋友的模样——他要是高高瘦瘦的，有着崇高的理想抱负，有着善良而淳朴的心，而他正符合她心中对另一半的要求，他们就这样开始了美丽的爱情故事。他们俩都是初恋，表白后不久她所在的学校居然神奇般地放了十天的清明假，她毫不犹豫地打电话过去，不由分说地跟他喊“我要到你那去”。他刚听到时都有些反应不过来，后来他告诉她说当时有点蒙，担心自己表现不好而惹她生气。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没必要的，短短的几天时间让她看到了更真实的他：严肃的外表下有着那样善良而温柔的心，稳重而又从不表现出骄傲，只是很认真地去做自己能做的事，并且尽力把它做好。短暂的相聚之后她回到了山西的学校，他还在广西，就这样他们开始了辛苦的异地恋，但每次她接到他的电话都是那么开心。他也成了她的骄傲，只要是熟一点的朋友，她就会情不自禁地说起他来，她便跟他开玩笑说：“发现自己走到哪都喜欢给你打广告。”

2013年他大学毕业后，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继续留在广西参加了PCD支持的健康农业实习生计划，并全职一年在南宁土生良品饭店做志愿者。2014年7月，她到杭州实习，他实习期也正好结束，于是他为了她也来到了杭州，来到了杭州的农村，在太阳公社工作，继续着他的乡建梦，也在她身边坚实地守护着她。

患难之中显真情

她叫梁发珍，来自广东；他叫魏长，来自福建。2009年第一届集体

婚礼上，当时还是单身的魏长抢到了新人抛的绣球花，他觉得这定能带来好运。果然，第二年，魏长就在福建泉州一个教堂里学习的时候遇见了发珍，并且一见钟情。

初识之时，发珍还拄着拐杖，身体也不好，是一个渴望乡村生活的病人。那时候魏长什么都没有，身无分文，没有收入，没有房子，也没有车子，只有一把锄头、四亩地，和一个做农场的梦想。共同的愿望和生活的追求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们耕种田地，从零开始。魏长在地里干活，从不会种地，到慢慢会，到联系客户销售送菜，一步一步创建了佳美农场；发珍就在家里煮饭、算账，在乡村的生活也让她脱离了拐杖，病也神奇地好了。

在集体婚礼上，魏长说："她叫梁发珍，是我发现的珍宝，勤俭持家，是我很好的搭档，正因为有她，我才拥有了一切，才拥有了幸福。"发珍说："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的生命，正因为有了他，我才有了幸福，有了家。"当顺风顺景的时候，不足以考验两个人的感情；只有共同经历了很多波澜的时候，患难之中才足以验证爱情的忠贞。

不再错过爱

她叫靳培云，来自河北；他叫严晓辉，来自陕西。农村出身的他们大学毕业后都参加到当代乡村建设事业中，因乡建走在一起，也成为乡建队伍诸多眷侣中的一对。

相识八年，但来去匆匆；志同道合，却总是错过；刚刚相恋，便远赴他乡。迟来的爱情，怎能再错过。

他说，他也曾错过美丽的爱情，有过遗憾和愧疚，但面对真正的婚姻，他是幸福的，因为他知道，朴实无华方永久，平淡无欲真生活，乡建路上，她会陪他走到底。

她从不要求，但她愿意跟着他吃苦，无论乡间田野，无论风里雨中。她说，追求理想或许是痛苦和孤独的，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跟你一起疯狂，我愿意那个人就是我。

2006年第一次相遇，是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那时他在学院工作，一边耕田，一边盖房；她那时大三，去学院做志愿者，两个多月的志愿工作，让她深深地喜欢上这座乡间学校和那些土房子，还有那群朴素可爱的伙伴。

2007年学院关闭，他去了广东学习，她却在毕业后追随学院，跟着转移到北京的团队（生态农业工作室）参与小毛驴市民农园的筹备工作，2008年汶川地震后，她跟着分出来的建筑团队（乡村建筑工作室）奔赴四川救灾，在灾区一扎就是三年。

2009年，他从广东被调回北京，主持小毛驴的工作。那时农场正处在发展期，急需人才，她则是他要叫回来的伙伴之一。

2010年她从四川回到北京，加入小毛驴，那时，他对她说，你是学院的老同志，在这里，大家一起工作，一起学习，一起生活，享受同样的待遇。但是在不久之后的农场改革中，他并没有如愿实现对她的承诺，她也不计较待遇，开心享受大家庭的日子。

2012年农场的一场小风波，却促成了他们美满的爱情，但很快，为了支持他的工作，出于避嫌的她哭着放弃农场的工作，选择到每天要坐4小时公交的市区上班，对于她钟爱的事业和伙伴，她再次变成了志愿者。

2013年9月，她决定辞去工作，跟他去外地读书时，对他说：我们不会再错过在一起的机会。那一天他们订婚，也是他再次开学的日子。三年前，他报读了岭南大学的硕士课程，却因忙于小毛驴的工作，长期休学，当接到学校即将取消他资格的通知后，他不得不暂停在农场的工作，赶赴学校。那时她则刚刚被邀请重新返回团队参加柳林的社区工作，社工出身的她曾对此充满期待。回想起这些年错过的时光，在工作、学业和爱情之间，在无数次的犹豫之后，她作出了艰难的选择。

2014年10月，这对乡建战友迎来了他们的宝宝，取名为禾，望其不忘乡土，秀于田间。终于开花结果的他们，回想起自己的恋爱经历，总有些许感慨，但却十分满足。

八年的时光，成就一段美好的姻缘，他们最终在一起了。2015年1月18日，是一个他们期待已久的日子，他们再次回到农场——那块洒满汗水和快乐的土地上，和其他八对乡建同行一起，举办集体婚礼，向所有亲朋好友、兄弟姐妹，老师、长辈、同人宣告：这一生都不再错过，彼此珍惜！

乡建路上，有你有我，一路风雨，携手同行！

新小知与新小农的另类爱情

她，叫高明，来自上海，在上海大学当老师；他，叫袁清华，又名“黑哥”，来自河北，现在做什么呢？经理、店小二、农夫、外联、民宿客服、大米销售、活动带领——一人数角儿。

乡建十年，他们相识相知相爱也历经十年，终于在今年修得正果。一个从上海出发，到过河北乡建学院，当过志愿者，飞到英国伯明翰求学，最终在上海一边当老师，一边继续做乡建实践；一个来自北京，经福建，到泰国“米之神”，最终为了爱情，放弃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工作，来到上海重新创业。两个人满世界地兜了两个大圈子，最后走到了一起。2013年年底，两个人终于开始了幸福的同城生活。

事实证明，爱情，与距离无关，与地域无关，与职业无关，与背景无关，只与共同的生活目标有关。

海阔天空，两个人许下了海誓山盟的誓言。2014年10月两位终于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他做生态农业，像照顾幼苗一样，呵护来之不易的爱情与家庭；她做研究，走社区，改变世界从自己的生活开始。十年青春岁月，十年乡建浇灌。对于他们来说，理想并不遥远，就在日常生活中，就在脚下携手同行的路上。

一个乡建家庭的故事

她叫杜洁，河北人，现在中国乡建的汇聚地北碚继续新阶段的乡村建设；他叫潘家恩，福建人，现在重庆大学当一名梦想中的教师。同为“80后”的他们至今已经相恋且乡建14年，领证7年，并拥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儿“碚碚”。

杜洁的回忆

今年是我们相识的第14年，结婚第7年。谢谢这次集体婚礼，提醒我们注意到其实已经是新婚后第7个年头了。7年，不知是否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痒”，对我们俩来说，每一天、每一年都有挠在心底的痒处，无声的躁动、安静的生长，日久弥新。

认真回忆一下十多年的过往，有太多太多的糗事、窘事，回想起来都会不自觉地笑出来，而要记录下来却又十分琐碎。

初识是在一次讲座上，那时我还是懵懂的大一新生，他是讲座台前忙碌的社团骨干，我在台下仰望时觉得：这个酷酷的研究生挺能干的，粉笔字写得很有气势。后来才知道，这家伙只是大二而已。他那时候很爱装严肃，看起来至少比实际年龄老10岁。

而真正彼此认识是在我也加入了社团之后。我们的社团叫作“农村发展研究会”，我入会之后作为一个小干事很长时间没人理。于是我开始在社团的各个部门里乱撞，撞进了当时他们几个骨干秘密在搞的“新农人”工作室。在那个好像黑网吧的校外小屋里，我在几位师兄的带领下闯进了一个充满了热情与躁动的梦。在那里，有人彻夜长谈富农创业，有人守着电脑研究B2B电商，有人四处谈创建乡村图书馆，有人捧着厚厚的书慷慨激昂……捧着书的这个，就是潘家恩，当时的社团学术部部长。因为走进了这扇门，于是他有了面试我的机会，然后得出了“这小丫头一般般”的初步结论。好在面试我的不止他一个。

那时候，大家一起熬夜是很经常也很正常的事情。而一起熬夜，绝

对是培养同志间革命友谊的温床。从一起做会刊、做评奖材料、做宣传单、做讲座海报，到组织讲座、组织下乡、一起去拜访老师，渐渐地合作增多，配合也越来越默契。从副会长—办公室主任，到会长—常务副会长，我们的组合变成了社团里的固定搭档。数不清多少次的彻夜长谈，星空下、草地边，谈过共同的话题，唱过最爱的歌曲。也说不清什么时候算真正的表白，还记得他别别扭扭地说了一句“又岂在朝朝暮暮”，我们就都笑了。当他在某个深夜把我从宿舍叫出来吃5毛钱的麻辣烫，从怀里掏出一朵花，说是看卖花小姑娘在寒风里可怜所以买了下来，我觉得，我真的很幸福。

作为农科院校的涉农社团，“三下乡”是传统保留的重点项目。从我大一开始，就跟着他一起下乡，一直在同一个队。也因为有他这个领队在，我一直到大四毕业都没做过下乡的领队，也从来没体会过有什么辛苦艰难。下乡过程中一起经历过的故事数也数不完：“花生瓜子八宝粥，啤酒饮料矿泉水”是来自列车的经典民间“诗句”；内蒙古草原上何慧丽老师跟乡镇女干部共同唱起的歌至今还回荡在我的脑海；在张家口仰望着给我们做参与式调研培训的张兰英老师……那些歌、那些笑、那些争吵、那些苦恼、那些思考，伴着我们走过了大学阶段的每一个寒暑假。曾经字斟句酌写出来的调研报告，今天看起来非常幼稚可笑。但那并不重要。做过喜欢的事，做过想做的事，足矣，不是吗？在那个过程中，我们不仅熟悉了彼此，也认识了影响我们一生的很多师友，老刘、老邱、何老师……以及温老师、健芝老师，太多太多人。我们相约走遍万里山河，从那年开始，却不从那年结束。

除了实践，还有一个很值得一提的讲座。潘家恩酷爱邀请人做讲座、开会，这个习惯延续至今。当年社团讲座99%都是他张罗的。于是，我就成了最擅长贴讲座海报的人之一。当年我们穿梭在北京诸多高校里，蹭讲座、蹭课、蹭研讨会、蹭老师的赠书……见缝插针、无孔不入。记得有一次去人大听讲座，回来的时候没钱坐车，于是我们一路从人大走回农大，穿过北大时在食堂用仅有的1元钱买了一个花卷分着吃了，现在想起来特别欢乐。而我们蹭到的最有价值的课，就是健芝老师2002年组织的“草场地”研讨班，激烈的讨论、热情的歌唱、发人深省的电影还有秀梅夫妇感人的婚礼……一扇扇“另类”的新世界大门打开了，也播下了后来生发出很多种社会创新探索的种子。很庆幸，所有这一切，我们一起经历；听到的每一个讲座，我们一起争论、一起消化、一起去找书、一起去找老师。我们一起走过的路，没有那些故意营造的浪漫和秀给别人看的恩爱。不过，还有比思想的共鸣更浪漫的事吗？

他大四毕业去了河北定县的村里，我尚未毕业留在学校考研。离开的时候，他买了厚厚的三个大笔记本给我做考研笔记，还留下三封在考前和考中才能依次打开的信。2004年的冬天，整整十年前，我肩上披着细碎的雪花走进北大的考场时，心里装的是来自那三封信中暖暖的力量。此后的三年里，我读研他在定县，我假期过去看他，同时断断续续做一点点志愿工作。当时，我妈说，如果你们分开这三年后还确定在一起，那么你们就在一起吧。三年，很快就过去了，而我们其实都没有分

别很久的感觉。于是，就这么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地走到了一起。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很早之前他的一句话早就打动了我妈，他说，我是他的“燕妮”。

2007年的佛诞日，他从翟城村来京和我一起去领证，9元钱的事。当年结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婚礼，只在定县即将告别的小屋贴了个“囍”字，严晓辉亲手剪的，那时他还是光棍。我们在网上给所有师友群发了邮件，收到了很多很多的祝福，还记得有一位老师说：“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是很多童话的结局。而对你们来说，这才只是开始。”

7年后的今天，沾各位的喜气参加这次婚礼，我们很幸运地说，那个傻小子和傻丫头还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还有了一个小小丫头，感谢我们双方家人对我们的容忍和支持，长大后的我才知道，当年不办婚礼让我爸爸损失了多少礼金收入。感谢潘家恩的包容，14年的日子里，我有太多的任性、逃避、懦弱、彷徨，是他的宽容与支撑让我们走到了现在。幸福美满的故事，永远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岁月的磨砺，可以不是一把杀猪刀，而是一个砂轮，磨出真玉、琢出真心。

记得以前有一次听讲座的时候，潘家恩给我一个字条，是鲁迅《伤逝》中的一句话：“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这句话，其实就是任何情感保持生命力最真实的路吧。谨以此，与大家分享我们的故事。

小潘的啰唆

大家好，我就是上面故事中略显啰唆，因毛病不断而常常被她踩脚尖或使眼色的那位“少年大叔”。忽然发现日子飞快，大二大一的青涩学生转眼间也都初为人母（父）、人师了。

当专属于少年的激情淬火后，似乎许多故事也就是一个故事而已，这个不断进行，重复和延续的故事，是关于如何学会生活，特别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的。可能简单，但同样可以精彩；如何面对一己之限，让彼此能真正“输”得起，因为常常挂在我们嘴边的所谓“后盾”，不仅需要抵御外部压力，更要面对内部张力，不只可免除后顾之忧，本身也应成为前行的动力；如何学会珍惜彼此，所谓“执子之手”，绝非聚光灯下和仪式现场的片刻停留，更是一种心态，如何让分享分担、倾听自省成为内心流露和生活方式；如何在互以对方为重心中去接近中华文化与传统伦理的真精神。

2007年，我们在定县翟城村结婚了，在简单的小屋门口贴上个“囍”字就成为我们的婚房，我们穿的是学院的T恤拍的结婚照，衣服上写着七十多年前就流传在当地之《农夫歌》的最后一句：“没有农夫，谁能活在天地间！”

那两件T恤虽然已经洗得发白，我们至今仍然在穿，父亲和姐姐都看不下去了，好几次都要掏钱让我们去买件新的。我们淡然一笑，不因其所谓纪念价值，更重要的是穿着舒服。也常问自己，人为何要名牌锦衣，是给自己看的吗？当然不是，照镜子，也只是为了更好地给别人看而已。如果你身边的大部分人，是以简朴为美，那么你该如何穿着呢？大环境改变不了，小环境呢？没有现成的，一起去创造有可能吗？无论华北村庄，或是京郊农场，还是在重庆北碚，已经有过多多少少的尝试和努力。

当纸醉金迷彰显成功，当一己的悲欢拒绝着大时代的燃烧和事实，当宝马车哭声与自行车笑声成为割裂对立的别无选择与笑贫不笑娼的新借口。在爱情、浪漫、幸福被一个又一个地定义征用，直接关联着金钱、收视率、眼球经济的今天，我们14年来或深或浅的足迹，只是提供了一个关于“可能”的实践故事。另一种爱情或幸福都是可能的，多样性和可能性其实一直就存在，关键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去打开。

念念不忘，不忘初心，必有回响！

碚碚的故事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你们好，我叫小碚碚，再有20多天我就1岁6个月啦。妈妈和爸爸讲了好多故事，我也有，只是我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你们一定想知道我为什么叫“碚碚”，可不是宝贝的“贝”哦，因为那是奶奶邻居家小狗狗的名字。妈妈说，这个小名是为了纪念我出生的那个地方——北碚，很多年前，那里有许许多多和你们一样有梦想、愿意做小事的人，发生了好多现在还能听得到的故事；爸爸说，“碚”，就是江中的石头，他希望我长大后能像石头一样坚强、普通，他还给我讲刘老石伯伯的故事，老石伯伯的名字里也有石头，不管是大石头还是小石头，我们最好都能踏踏实实地铺在地上，让更多人把路走好。

那我的大名叫什么呢？哈哈，很多人都不知道吧，因为我是在重庆最热的时候来的，那可是相当的热，妈妈给我取了一个“晴”字，“天无云、眼无泪是为晴”，希望我积极热情。爸爸那时正和叔叔阿姨们在忙一个叫“爱故乡”的事，做梦都在琢磨，于是突然想到了一个“梓”字，希望我“晴耕雨读，行归桑梓”，于是，潘梓晴就成了我的大名。

我很喜欢笑，妈妈说，看到我笑时，感觉世界都亮了！

附录



返乡青年与乡村老树

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简介

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简称“梁中心”）正式成立于2004年，前身为《中国改革》杂志社大学生支农调研项目部，是以新乡村建设事业为核心，以推动农民合作与城乡和谐发展为宗旨的民间组织。我们以梁漱溟等前辈的乡村建设理论为基础，开展乡村建设的试验工作和行动研究，促进以农民为主体的合作组织发展来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乡村复兴的目标。

愿景：农民过着幸福、有尊严的新生活，农业成为生态、可持续的新农业，农村建成美丽、和谐的新乡村。

使命：为农民服务，为理想奋斗！

目标：

1.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能力建设，保障农民主体；

2.鼓励青年群体参与乡村建设运动，接力乡村工作；

3.探索城乡间平衡发展的多元路径，增进城乡融合；

4.开展国内外的乡村建设经验交流，促进国际合作。

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简介

21世纪之初，中国农村社会日趋凋敝，“三农问题”日益突出。与此同时，随着大学教育市场化、产业化指向下的大规模扩招，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青年群体，从人人仰慕的天之骄子，日渐成为普通劳动者中的一员。这种落差使一部分人迷失自我、日渐迷茫；但也有一部分人坚持理想，并走向农村，从刚开始的零散下乡调研，到有组织的下乡支农支教，再到成规模的乡村建设运动，大学生与农村就在两者都处于困惑之时联系在一起了。

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带着对大学教育的反思，以及“三农问题”视野下的农村社区发展的需要，在香港社区伙伴的支持下，启动了“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项目”（简称“人才计划项目”），旨在构建一个青年人学习与实践的平台，推动青年人走入农村，关注农村发展之路；同时也尝试促使青年人将个人成长与农村发展结合在一起，在与农村的互动中重新认识自身与土地、农村乃至社会的关系。

人才计划项目从2005年8月开始，一年一期，每年在全国各地选拔学员，并将他们派往全国各地的农村社区，通过为期一年的学习与实践，培养了一批具有农村发展领域理论视野，同时具备行动能力的有志青年。从2015年开始，人才计划项目驻扎于具有丰富的乡村综合发展经验的山西永济蒲韩乡村，专注于培养兼具乡村建设思想理论和实操经验的青年人才，同时探索青年人返乡的路径方法和以乡村为载体的可持续生存体系。

从2005年8月至2017年8月，人才计划项目已成功开展十二期，共有207名学员参加，目前正在进行第十三期。学员下乡实践锻炼的乡村建设试验点总计70余个。目前有116名学员依旧服务于社会公益、生态农场、返乡创业、工友服务等乡村建设领域，被外界誉为“支农战线上的黄埔军校”。

梁中心人才计划及青年人陪伴工作大事记

2001年，时任《中国改革·农村版》杂志社社长兼总编的温铁军教授，邀请了中国社科院等多家机构共同推动大学生回乡调研，从此，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开始兴起，并在全国200多所高校里建立了支农社团。

2004年2月，来自天津科技大学的支农社团骨干白亚丽（大三在读）选择休学一年，与另外两名大学生志愿者肖青和詹玉平一起，来到湖北省十堰市房县三岔村，开始了青年大学生志愿者扎根农村学习、实践的探索之路。

2004年12月，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注册名为“北京梁漱溟乡村文化发展中心”）注册成立，此后，梁中心每年寒暑假都组织全国性的大学生支农调研交流会。

2005年7月，在香港社区伙伴的支持下启动第一期“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项目”，第一期共招募学员30人，分别在安徽、湖北、河南、河北等十多个省市区的农村驻点实践。

2006年8月，第二期人才计划项目启动，共招募学员22人，实践地主要在山东、安徽、河南、河北等地的农民合作社。

2007年8月，第三期人才计划项目启动，共招募学员20人，实践地除了在农村之外，还有部分学员参与了生态农业及城乡互动的工作。

2008年5月14日，梁中心的学员及志愿者与河北枣强芍药村村民共同组成抗震救灾联队，第一时间奔赴汶川地震灾区开展救援工作，为灾区人民筹集和发放了几百万元的物资。

2008年7月1日，梁中心培训基地搬至北京西山脚下的温泉村，并建立了集工作、学习、生活于一体的新青年绿色公社。

2008年7月—9月，梁中心开展“农村骨干青年培训班”，共招募20多名来自农村的初高中生，对其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文化知识、创业和农民合作组织的培训，为乡村建设试验点培养本地人才。

2008年9月，第四期人才计划项目启动，共招募学员16人，部分学员参与了汶川地震灾区的灾后重建工作。

2009年8月，第五期人才计划项目启动，共招募学员15人；同时启动“农村可持续发展校内人才培养计划”（校内班），在不同地区的高校

招募学员展开为期一年半的学习计划。

2009年12月6日，第一届乡建“新幸福主义”集体婚礼举办，五对乡建新人创造着新的婚姻观、家庭观与幸福观：自然和谐、简约适用、参与共享、勇于担当、乐于奉献。

2010年8月，第六期人才计划项目启动，共招募学员11人。

2011年8月，第七期人才计划项目启动，共招募学员13人。

2012年8月，第八期人才计划项目启动，共招募学员12人。

2013年1月，“返乡青年”网络在第三届全国农民合作组织论坛上宣布成立，梁中心的青年人才培养工作开始向扎根于本土的返乡青年延伸。

2013年8月，第九期人才计划项目启动，共招募学员20人，其中有部分学员系来自其他公益组织的青年，梁中心开始探索与公益组织合作的青年人才培养工作。

2014年3月，梁中心启动“提升青年关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发展经验和不平等问题”项目，整理国内外青年人参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案例，并开始探索青年人才培养的国际交流。

2014年4月，梁中心与江苏昆山城投公司合作设立了昆山产学研基地，尝试在地化的返乡青年创业人才培养实践，两年来共招募学员13人。

2014年8月，第十期人才计划项目启动，共招募学员18人。

2015年1月18日，第二届乡建“新幸福主义”集体婚礼举办，九对乡建新人传承了平等、互助、勤俭、自立的“新幸福主义”婚姻观、家庭观。

2015年8月，第十一期人才计划项目启动，扎根山西永济蒲韩乡村和吉林长春云凤合作社，共招募学员13人。

2016年1月1日，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人才计划项目”十周年纪念活动如期举办，会议总结了人才计划项目十年来的成果，并发布了梁中心未来十年的青年人才培养计划，分别是针对青年大学生志愿者的“青鸟计划”、针对农民骨干带头人的“头雁计划”和青年人才培养的国际交流计划。

2016年6月，梁中心培训基地搬迁至北京顺义区龙湾屯镇大北坞村。

2016年8月，第十二期人才计划项目启动，扎根山西永济蒲韩乡

村，共招募学员12人。

2016年12月，梁中心在乐施会的支持下，发起了针对农民合作社骨干及返乡青年国际交流互访学习的“鸿鹄访学计划”。

2017年8月，第十三期人才计划项目启动，扎根山西永济蒲韩乡村，共招募学员12人。

致谢

感谢社区伙伴（PCD）十五年来对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的资助与支持，我们既是项目合作伙伴，更是乡村建设道路上的同行者，大家在彼此的信任、包容与爱惜中共同前行。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继续携手努力，陪伴更多青年人认识和思考新时代背景下乡土社会的价值，践行可持续生活，为生态文明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添砖加瓦。

后记



乡村大树

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因当代乡村建设运动孕育而生，也为乡村建设运动的持续发展提供着源源不断的人才力量。

感恩已经离我们而去的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创始人刘老石老师，他的无私奉献为更多青年人搭建了服务乡村的学习成长平台，作为老石的学生，我们依旧在实践中继承他的思想与行动。

“人才计划”项目非常注重学员思想理论水平的提升和对社会发展形势的了解，感谢众多老师曾在简陋环境里为学员们传道授业解惑！他们是温铁军、钱理群、刘健芝、张兰英、戴锦华、谷莘、郭书田、张孝德、程淑兰、白南生（已故）、汪晖、韩毓海、姚洋、王曙光、崔之元、旷新年、秦晖、杜晓山、高梁、卢周来、赵树凯、张文木、张木生、黄纪苏、周立、刘忱、党国英、徐友渔、李昌平、何慧丽、仝志辉、刘海英、王平、董筱丹、杨帅、潘毅、严海蓉、姚国华、曹建海、梁鸿、杨思远、杨团、杨帆、郑功成、韩嘉玲、杨雅茹、孟登迎、姜柏林、施永青、张兴无、冯丹、邱建生、潘家恩、杜洁、石嫣、梅红伟、严晓辉、黄志友、孙恒、李大君、肖青、詹玉平、袁英华、袁清华、高明、马永红等。

“人才计划”项目的落地实施与不断创新，离不开扎根一线实践探索的农民合作社，感谢全国各地农民合作社带头人及其团队的陪伴与支

持，他们是山西永济的郑冰、安徽阜阳的杨云标、安徽亳州的王显强、河南兰考的王继伟/张砚斌/王猛、湖北房县的向昌海、山东鱼台县的马宜昌、吉林长春的李云凤、吉林梨树的姜志国、河北隆化的胡新杰、山西汾阳的王树霞/段锁兰、河北顺平的赵爱民/葛和平/于宝银、江苏盐城的周严东、广西横县徐华朝等。感谢社区伙伴（PCD）十余年来对“人才计划”项目的资助与支持，感谢邓文嫦、薛启婵等合作伙伴的温暖陪伴。

感谢本书策划和校稿中乡建同仁和志愿者们的悉心付出，他们是李管奇、陈晶晶、白亚丽、何志雄、吕程平、姜令、魏丰收、王德斌、张斌、曾丽华、张可、闫利霞、王茜、口皓、刘海英、汪维行、唐义国、吴昊、周其义、何笔云、张玉、杜刚、陈帅、杨瑞欢、贾林闯、杨宁、李园春、魏川等。

编者

2019年9月

注释

“国仁文丛”（Green Thesis）总序

[1]这几年我们会有十几本书分别以不同作者、不同课题成果的名义问世。这些出版物都被要求做单独的“成果标识”。但我们实际上要做的仍然是这几十年的经验归纳总结和理论提升，“实事求是”地形成“去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体系。由此，就需要为这个分别标识的系列出版物做个总序。

[2]参见即将出版的《温铁军自述——难得5个11年》（暂定名），其中对20世纪80—90年代在官方政策部门开展农村改革试验区及新世纪启动民间为主的新乡村建设试验区，两个11年的经历分别予以归纳。

[3]参见温铁军：《告别百年激进》，东方出版社，2016年4月，第一版。这是我2004—2014年这10年演讲录的上卷，主要是与全球化有关的宏大叙事和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甫一出版即被书评人排在当月优选10本财经类著作的第一位。但在此书出版之前，我还没有来得及设计“国仁文丛”，也就不能把这个序言加上去。

[4]最近10年一直有海内外学者在研究乡建。国外有学者试图把中国乡建学者的思想上溯归元到孔子或老子，国内也有人问我到底偏重晏阳初还是梁漱溟，还有很多人不理解梁漱溟晚年由儒家而佛家的思想演变。其实，我们从来就是兼收并蓄。在儒道释合一的顶天立地和五洲四海的融会贯通之中形成乡建思想。因此，这些海外研究者的关注点对我们来说本来不是问题。

[5]本文丛并非团队的全部思想成果，但在“国仁文丛”设计之前的成果没法再纳入进来，只好如此。

[6]这些年，我一直试图对承上启下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形成的国仁思想做归纳，遂借作序之机凝练成这段文言，意味着国仁追求的是一种“大道、大润、大象、大音”的思想境界。

[7]中国乡建运动之所以能够延续百年而生生不息，乃在于参与者大抵做到了思想和行动上都“去激进”，不照搬西方的左右翼搞的党同伐异。

[8]参阅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第二版），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记得一位学者型领导曾经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农民在现代化的大潮中挣扎着下沉，就剩下两只手在水面乱抓。你的思想无所谓对错，只不过是被溺水者最后抓住的那根稻草，再怎么努力，也不过是落得跟着沉下去的结局……

[9]乡建前辈学者梁漱溟因在1953年与毛泽东激辩合作化问题而被后者批为“妇人之仁”。据此，梁漱溟可以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早期女性主义者。尽管在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前，打上何种类别的标签并不重要，但如果这是当代学者们的本能偏好，也只好任由其是。

[10]我们2003年创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时候，主办单位是我担任法人代表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和翟城村米金水老书记代表的村委会。合作创办的海外参与单位，一个是香港岭南大学刘健芝老师主持的“中国社会服务及发展研究中心（香港）”，另一个是张兰英老师作为首任驻华代表的“国际行动援助ACTION AID”。三家联合创办单位最初全部投入约为20万元，一直都没有回报。我后来陆续投入各项工作

（包括赞助3年以上乡建骨干获取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的资金不低于百万，转化为当今所有以乡建为名的志愿者们无偿使用的无形资产。我和这两位无私奉献的老师至今仍是参与乡建的志愿者。

[11]关于精英专政与大众民主的分析，请参阅《人间思想第四辑：亚洲思想运动报告》第2~19页，台北：人间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

[12]近年来，我不断在乡建团队中强调对乡建经验的归纳总结要尽可能提升到理性认识高度，并且要努力接续百年乡建历史，并带领团队申报了一批科研项目。那么，要完成科研任务，就要花费很多精力。对此，就有一些长期从事乡村基层工作，必须拿到项目经费才能维持单位生存，为此来不及形成理论偏好的同人难以接受，甚至有些意见相左之人表达了误解、批评。这本来不足为怪，对批评意见也不必辩解。总体上看，大乡建网络的各个单位还是积极配合的。但，考虑到这些批评说法将来可能会被人拿去当某些标题党的报道和粗俗研究者的资料，因此，我才不得不以总序的方式让相对客观些的解释在各个著述上都有起码的文字依据——尽管这些话只是简单地写在脚注中。

[13]中国有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国家行政学院、清华大学、重庆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上海大学、西南大学、福建农林大学、香港岭南大学。海外有英国舒马赫学院、美国康奈尔大学，近期正在形成合作的还有国际慢食协会的美食科技大学（意大利）等。

“一懂两爱”与“去精英化”的教育创新

[1]温铁军，1951年生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乡村振兴中心主任；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乡村建设是人的建设
——从自身经历来看人才培养

[1]张兰英，女，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主任，行动源研究中心主任（筹），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特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可持续发展、乡村建设、行动研究、环境治理。

[2]老刘，即刘相波，又名刘老石。出生于黑龙江黑河，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师从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2000年，刘相波任教于天津科技大学基础科学部。世纪之交，“三农”问题凸显，刘相波开始组织大学生下乡支农调研，带领并影响了成千上万的青年从城市回到农村，帮助农民成立专业合作社、文艺队、农民协会。2004年年底组织成立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2010年7月辞职专事乡村建设工作。2011年3月24日因车祸不幸去世。

[3]国际乡村改造学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Rural Reconstruction，IIRR）中的“乡村改造”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而英文则是基于20世纪初在中国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翻译成英文Rural Reconstruction。该学院的名称是基于晏阳初先生所说的“在原有的社会基础上改造成一个新社会”而使用“改造”二字的。

[4]由于需要将选择的稻子进行数量和质量的检测，我们收集的数十捆水稻放在我的房间里，也就将很多的益虫带到了房间。特此说明。

[5]当时的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并没有正式的员工编制，大家都是以志愿者、老学员和新学员的身份在中心工作。特此说明。

理想寓于行动中

——实践式教育与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农村发展人才计划

[1]本文原载于《立场——教育对话》2010年第3/4期，文章有修改。

[2]刘老石，即刘相波。

种子的信仰

[1]薛启婵，社区伙伴综合能力建设项目经理。

引言 两个历程的相互嵌入

[1]吕程平，男，北京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第一期学员，人才计划第三期、第五期项目执行人员。

一场悄悄的新时代乡村“乌托邦”实验

[1]原文发表于《文化纵横》2011年03期，文章有修改。

[2]白亚丽，女，河南漯河人。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创办人之一，北京共仁公益基金会秘书长。2001年参与中国当代乡村建设工作，2004年1月，休学一年，到湖北省十堰市房县窑淮乡驻村开展乡村建设工作，被《大学生》杂志评为“2004年度最有魄力的大学生”，被誉为“我国休学支农大学生第一人”。

1.2 一位大学生的十年“下乡记”

[1]刘良，男，1985年生于江西瑞金。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农业推广硕士，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第二期学员，师从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先后在山东、江西、广西、江苏、北京等地，开展合作社推广、农民培训、农村扶贫、生态农业试验、返乡青年陪伴等乡村建设工作，至今已有十余年的农村工作经历。现供职于香港社区伙伴。

[2]社区伙伴（Partnerships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PCD），2001年5月创立于香港，是一个在境内服务的社区发展机构，主要工作包括：保护生态环境、推动生态农业、传承和创新乡土文化、反思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学习和实践可持续的生活。

1.3 问道乡闾

[1]车海生，男，1983年3月出生于河北省景县。2006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大学时候学习《易经》等传统经典，离经辨志。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第五期学员，人才计划结业后在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工作。2014年到2018年5月，在灵宝弘农书院工作，尝试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和农民组织化，论学取友；2018年5月到福建永春生态文明研究院工作，追求知类通达、强立不反的境界，为将来致力于中国文化变革做准备。

1.4 乡村衰败下的合作社

[1]汪维行，男，安徽黄山歙县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在职硕士，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第六期学员。人才计划结业后入职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开始负责全国农民合作社网络推广培训计划，曾在安徽、河南、陕西、甘肃等全国十几个省份开展农民合作社的培训，连续五年负责乡村建设农民合作社培训。

1.5 从农中追求自主生活方式

[1]唐义国，男，安徽枞阳人。2008年开始参加环境保护工作，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第七期学员，现任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昆山项目经理，芜湖生态保护志愿者协会项目顾问等职。2015年起负责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昆山产学研基地工作，主要工作内容是青澄米水稻PGS项目（生态种植）、青澄夏季学校（青年人在田野调研学习项目）、青澄实习生项目、青澄中心基地运营等。现主要工作领域：城乡互助、农业生态化、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

[2]昆山城投，全称昆山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是昆山市政府管理的一家国有企业，主要以公司化方式进行城市运作，在城市公共空间营造、城市功能完善、老城区更新改造等领域进行投资、建设和管理，为市民创造更好的居住环境。

1.6 “大时代”和“小时代”的缩影

[1]王茜，女，1990年生，山西省孝义市人，西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第八期学员，现为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咨询服务中心副主任，主要推动西南地区乡村建设实践工作和经验总结。2009年自大学起，参与当代乡村建设的实践活动，至2015年，参与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青年人才培养工作，其间，多次组织高校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在吉林、河南、陕西、甘肃、福建、广东、四川等地开展乡村发展经验调查研究和实践行动。

1.7 潮流下的返乡青年模式

[1]闫丽霞，女，内蒙古察哈尔右翼中旗人。2014年毕业于沈阳理工大学特种能源工程与烟火技术专业。大学期间一直参与校内支农社团的活动，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第九期学员。人才计划结业后一直留在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工作，曾在雅安、河南执行合作社和返乡青年项目，目前主要负责慢食相关的工作。一个内心崇尚自由、渴望活出真实自我的内蒙古女孩！

[2]他们都是人才计划的二期学员，胡新杰是隆化本地人，王晓平是甘肃武威人，许丙举是安徽六安人。

1.8 一个案例：一位农村媳妇的蜕变

[1]樊少欢，女，1983年生，河南省灵宝市焦村镇罗家村人，初中学历，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第十期学员。先后从事文员、酒店餐饮、务农等工作，2012年10月开始参与灵宝弘农书院的筹备工作，现为弘农书院总干事，负责书院的全面工作。

1.9 一个从“支农”到“滋农”的成长历程

[1]张琪，人才计划四期学员，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研究员，福建省级传统村落保护大使，福州滋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福州汇贤公益服务中心创始人，有10年参与不同乡村改造和复兴的工作经验。在福建连城培田、晋江、泰宁、浙江德清等地，开展乡村振兴的示范区建设工作。

[2]滋农游学是福州滋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游学品牌，是一家分享自然文化生活的平台，让旅行者可以深度体验不同地域的文化、美食和手工艺。滋农游学以乡村为主要目的地，通过深度挖掘村庄的文化、历史、手工艺和自然等资源，在此基础上开发成能够深度体验的游学项目，将旅游与教育结合在一起，满足周末亲子家庭寓教于乐的需求。

引言 从全球和历史角度看乡建

[1]陈晶晶，男，浙江兰溪人，2005年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第一期学员，现为国仁乡建社企联盟秘书长。在农民合作社、生态农业、扶贫与乡村建设、农村合作金融领域有一定的实践经验。曾在福建、海南、四川、广东等省的多个村庄工作五年，为国内外多家机构提供过农户生计、农民组织、社区发展、外来人口公共服务、农户市场能力等方面的咨询。

2.1 我与乡建:生命中的偶然与必然

[1]倪永旺，男，彝族，云南峨山县人，社会工作与管理本科毕业，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第一期学员。2006年6月加入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参与设计和执行机构乡土文化保育、滋根“二代”创业、社区综合发展、社区教育、支持乡村绿色生态文明学校和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示范等项目。现为中国滋根农村可持续发展教育中心乡村发展部负责人，主要推动“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人才培训”的课程开发、培训及推广。

2.2 试解生态农业的商业之困

[1]刘胡佳，人才计划二期学员，从2006年11月来到广西之后，胡佳就一直往返于广西的柳州和南宁，追寻他生态农业的理想。

[2]柳州爱农会：2004年，广西柳州一群喜欢乡村生活的消费者从寻找土鸡开始，自发成立了民间组织“爱农会”。他们从尝试社区支持农业开始，由农户不用化肥农药、不用工业饲料进行农产品生产，然后组织城市消费者以双方协议的价格购买。从2007年起，在柳州、南宁两个城市开了多家土生良品餐厅。

[3]PGS是基于当地利益相关者的活动，对生产农户进行评估，并建立在信任、社会网络和知识共享的基础上。PGS方案着重于小农户认证和直接销售，为更多的消费者提供有机产品，鼓励消费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管理。

2.4 一位草根农民工的呐喊

[1]徐文财，男，江西余干县人，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第五期学员。1994—2005年在服装厂工作，从基层工人到中层管理都做过，了解工人的辛酸、无奈与希望。于2006年开始，从网站起步，创办农民工公益组织“草根之家”。2010年6月，在浙江省各级工会的支持下，创办了新杭州人志愿者服务站，为工友们搭建了更好的学习交流平台。

2.5 我的另类生活体验
——忆我的21—28岁

[1]魏川，男，河南中牟人。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第七期学员，喜欢农耕、烹饪，目前在生态村中实践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2]国仁绿色联盟（简称“绿盟”）是在温铁军教授的倡议下，由来自山西、山东、河北、河南、湖北等地的农民合作组织联合成立的。绿盟的工作理念是推动农民合作组织的联合，以产品为纽带与城市消费者对接，探索农业可持续发展与公平贸易的模式，并在城乡之间实现良性互助。

2.7 淌过的时光，留住的理想

[1]吴昊，男，山西文水人，2014年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第十期学员。现为《中国改革报·能源发展》周刊记者，关注环境、能源、减贫、乡村建设、工人组织、性别平权等领域，业余时间参与自然之友、绿色和平等多家环保NGO活动，并担任志愿者。

3.1 隆化新乡村建设成功十年

[1]胡星杰，男，河北承德隆化人，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第二期学员。

3.2 少年白飞返乡记

[1]本篇文章是乐施会资助的“支持河南返乡青年网络建设及农夫市集平台机制探索”项目成果之一。

[2]白飞，男，河南漯河人。2006年开始参与当代乡村建设，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第六期学员。人才计划结业后便返乡，目前已在家乡发展生态农业和农民合作社七年。

[3]山西永济蒲韩乡村合作社，是1998年开始成立的农民合作组织，在十几年时间里该组织发展成为兼具经济、社会、文化多功能，覆盖两个乡镇，为当地农民提供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共同购买、共同运销、信用服务、农技推广、品种改良、文化教育等综合性服务的农村合作组织。

[4]何慧丽，河南灵宝人，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先后在兰考、开封挂职，是河南地区乡村建设试验的倡导者。

[5]滋根：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简称中国滋根，成立于1995年，是在中国民政部正式登记注册的全国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愿景是推进以人为中心、可持续的、人人都能公平参与的发展进程。

[6]老金：河北一资金互助合作社的带头人，曾多次参加乡建中心的培训，白飞以前带过大学生去他那里支农下乡，算是白飞的忘年交。

[7]南街村，属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关镇。1984年，在人民公社制度土崩瓦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挥巨大效力时，南街村却在支部书记王宏斌的领导下，选择了重走集体化经济的道路，通过回收耕地开设村办企业，1991年成为河南省第一个“亿元村”，它是集体主义经济的代名词。

[8]为农民服务，为理想奋斗！这是白飞在梁漱溟乡建中心朝话时，每天早上都要举起右手说的两句话。

[9]许程程，成都绿心田的负责人，早在2009年就和白飞认识。那时白飞实习的机构乡建中心在北京六环边的一个村子里，做生态堆肥的试验；许程程正好也在北京一环保机构工作，她会定期把自己家里的厨余垃圾收集起来，转上几趟公交，带到中心做堆肥，因此和白飞比较熟悉。

3.3 彝族姑娘康丽的四次创业记

[1]李康丽，女，云南楚雄人。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第七期学员，目前返乡创业。

3.4 扎根家乡的大学生村干部

[1]刘坤，男，陕西咸阳淳化人，1991年4月出生，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

第九期学员。2014年6月毕业于山西农业大学农村区域发展专业；2014年7月报考西部计划西藏专项服务，在拉萨工作一年；2015年6月报考陕西省大学生村干部，现任咸阳市淳化县官庄镇沟渠头村村委会主任助理一职，陕西省第六届大学生村干部创业明星，咸阳市优秀大学生村干部。

3.5 试着回到家乡

[1]陈迪桥，男，湖北十堰上津镇农村青年，上完高二休学外出打工，后来辍学，热爱阅读，多年来通过阅读自学。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第十期学员，北京工友之家工人大学第13期学员。目前返乡在上津古城筹建爱家乡公益图书馆，服务于本地居民和中小学生。

3.6 探索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1]本文是乐施会资助的“支持河南返乡青年网络建设及农夫市集平台机制探索”项目成果之一。

[2]人子协会，全称“人子创意生活发展协会”，倡导自主学习、自觉成长、自然共生的生活。

[3]沃土工坊是成立于2006年的一个志愿者团体，早期的主要工作是推广“社区支持农业”理念、考察小农户。2008年开始，为了给农户提供销售渠道，解决生态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沃土工坊慢慢转型为一个生态健康产品销售及理念推广的社会企业，至今与全国各地生态农场建立合作，为消费者提供上百种经过严格甄选的健康食物。

[4]南岭会是成立于2007年1月的广东本土环保NGO，最初以关注自然保护区的野生动物生存和自然环境的保护状况而走进了广东的天然屏障——南岭。南岭会希望联结乡村社群和城市消费群体的需求，在保护区内推广可保育土地的永续生态农业，鼓励当地农户不使用农药和化肥种植农作物，实现土地的永久可持续耕种；同时积极联系城市关注环境保护、关注健康生活的消费者，直接购买这些地区出产的健康农产品，建立健康永续的生活方式和“公平购买”的消费体系，令农民有更合理的收入，减少对当地自然资源的高度依赖和破坏，减少砍伐和盗猎的行为。

引言 “理想乡”蒲韩乡村建设纪实

[1]梁少雄，男，1988年3月生于陕西宝鸡陇县。2007年9月至2011年6月就读于山西农业大学林学专业，在校期间参与创办山西农业大学大学生支农队。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第六期学员，2010年8月至今就职于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参与青年人才培养工作，目前长期驻点于山西永济蒲韩乡村，探索青年人扎根乡村的路径与方法。

4.2 在蒲韩打造理想的儿童学堂

[1]韩瑞荣，女，山西太原人。毕业于山西农业大学，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第八期学员，人才计划结业后长期就职于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参与农民合作社培训推广工作。2017年2月开始参与山西永济蒲韩乡村儿童学堂工作，喜欢简单、自然。

4.3 扎根蒲韩：干十年看成效

[1]李园春，女，河南新乡人。毕业于河南农业大学，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第十一期学员，人才计划结业后留在蒲韩新青年公社工作，现主要参与蒲韩PGS探索工作。

4.4 一位大男孩的“生态养猪”

[1]胡雅超，男，山西长治人。曾就职于全国人大信息中心，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第十一期学员，结业后留在蒲韩新青年公社负责老石农场工作，现主要参与蒲韩PGS探索工作。

4.5“农二代”：从城市回归乡村的艰难心路

[1]傅艳吉，女，河北秦皇岛人。毕业于西南大学，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第十二期学员，人才计划结业后加入中国乡建院，至今在重庆城口县开展驻村工作。

4.6 平凡大学生的下乡救赎

[1]贾林闯，男，山东聊城人。毕业于南昌大学，大学时期便参与南昌大学三农协会的各项志愿活动。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第十二期学员，人才计划结业后，先后就职于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乡建院，目前在中国乡建院参与内置金融合作社组织培育工作。

引言 新的幸福，新的生活

[1]魏丰收，男，河南上蔡人。2001年毕业于河南农业大学，之后在北京工作六年，主要涉足建筑材料、管理咨询、会议培训等行业，其间一直关注三农、教育、环保等社会问题，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第三期学员。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项目主管、国仁乡建社企联盟董事、河南乡村建设试验区办公室主任、河南爱故乡工作站站长、河南灵宝弘农书院法人、河南弘农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河南新纪元乡建院副院长、河南王拱璧研究会副秘书长等职。

5.1 柿子树下的浪漫，一生一世的情缘
——第一届乡建志愿者新幸福主义集体婚礼的幸福故事

[1]文章来源于《公益时报》，内容有修改。

5.2 喜事来啦！
——第二届乡建志愿者新幸福主义集体婚礼的幸福故事

[1]杜洁，女，河北石家庄人。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办公室主任、助理研究员，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自2001年起以志愿者身份参与当代乡村建设实践，并参与相关社会调查与乡村建设研究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农村社会学、乡村社会企业、乡村建设。

[2]潘家恩，男，1981年生于福建宁德。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特邀研究员、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自2001年起参与当代中国乡村建设实践17年，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执行创办人之一，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重庆区域统筹。在Cultural Studies、Inter - Asia Cultural Studies、《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二十一世纪》、《开放时代》、《人民日报》等处发表文章60余篇，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中国乡村建设脉络机制研究”等项目。